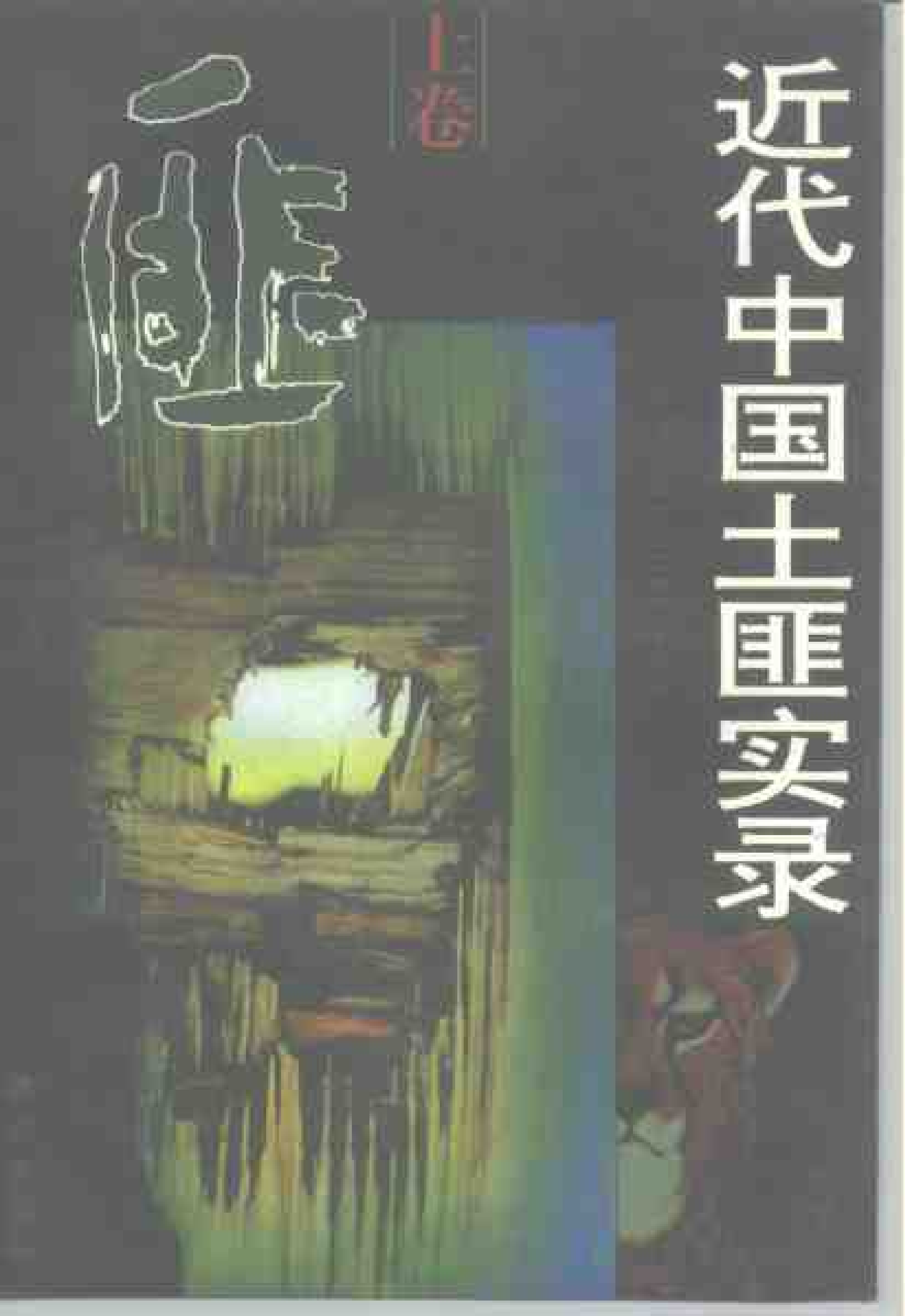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上卷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上　卷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EA35/01

编　审：李秉新
主　编：石玉新
编　辑：徐俊元　杨小波　武永召　杜丽英

前　言

近代中国，在本书中特指自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中叶，即从晚清戊戌变法到新中国成立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这里有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形式上看，本书选收的200多篇文章绝大多数为全国各地人民政协提供的文史资料，这50年正是文史资料工作征集时限；更主要的在于内容，50年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剧烈的动荡变化之中，匪人蜂起，匪情不断，匪患猖獗，匪祸惨重，其状在国史上甚为鲜见。因之留给我们今天的史料也特别丰富，确有集编实录之必要。

关于土匪，《辞海》中解释："以抢劫为生、残害人民或者一贯窝藏盗匪、坐地分赃的分子。"土：本地、当地之意；匪：强盗，为非作歹之徒。本书所反映的近代中国土匪情况，与其词意相符的史料文章固然居多，但也有相当一部人物和事件的内容是着意于大范围、跨年代、多角度、全方位地记述各类土匪的。为的是让读者对"土匪"这个概念，对近代中国上下五十年、纵横八千里的各色各样的土匪有个更全面、更详细的了解认识。

本书将各地土匪情况按区域分为三卷。上卷包括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一部分；中卷包括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下卷包括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大部分。

从内容编排上看，各卷均大体上按一地或一股土匪之概述、受害人的控诉记述、具体事件、著名匪首人物、剿匪斗争等分类。概述类如《东北土匪》、《热河匪祸》、《记浙闽海匪》、《兵匪横行祸豫西》、《七大股匪乱凤凰》、《云南土匪》等；控拆类如《匪穴余生》、《我两次

被绑票的经历》等；事件类如《津浦路大劫案》、《[illegible]匪火并记》等；人物类如《张作霖的胡匪生涯》、《山东巨匪刘黑七》、《我所知道的乌斯满》、《湘西巨匪姚大榜》等；剿匪类如《横扫嫩江土匪》、《回忆新疆剿匪斗争》、《扫灭湘匪十八万》、《滇南剿匪之战》等。土匪的归宿是全面记述近代中国土匪情况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选编新中国成立前后剿匪斗争的史料时，我们注意了被剿灭的匪部的性质问题，即该部虽为国民党反动军队之残部，然系不久前方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收编委任的土匪武装；或其头目及主要成分皆为匪出身；或其部主要为纠集当地股匪惯匪杂凑而成。这样，才与本书内容更为贴切。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军阀混战造成的社会黑暗与动乱，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暴虐专制，是造成代近中国匪患惨烈的主要原因。在忍无可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便有揭竿而起者，抗击官府，杀富济贫，成为绿林好汉。由于缺乏正确路线的引导及自身蜕变，亦其间有的又走上仇民道路，滥杀狂掠，沦为股匪，亦有走上革命之途者。更多的情况是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一些歹徒趁乱起事，打家劫舍，啸聚山林，绑票勒赎，攻城破寨，杀人如麻，纠众万千如土皇帝独霸一方，如活阎王烧杀千里。土匪"杀人放火受招安"，官兵借剿匪而扰民发财，苦的是黎民百姓，所谓"匪来如梳，兵来为篦"……所有这些，都在本书中得以大量的、真实的记述，读来令人难忘，令人深思。

作为史料，其价值首推真实无误；而文史资料又以亲历、亲见、亲闻见长。本书选收了许多阅历丰富的老人的回忆文章，从各方面记述了近代中国土匪的形形色色，甚至有《一个土匪的自述》，足见内容之丰富、翔实、珍贵。

如果读者能通过本书增加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加深对旧中国的了解，加深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我们将不胜欣慰。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

目　录

东北土匪…… 曹保明(1)
清末东三省绿林 …… 宁　武(77)
长白山土匪 …… 顾正仁　沈明勋(89)
闲话旧社会土匪…… 关士杰(114)
土匪的四梁八柱及匪规…… 朱景荣(129)

张作霖的土匪生涯…… 张占军整理(135)
辽西巨匪杜立三…… 王寿山(145)
匪枭谢文东的兴灭…… 余　生(161)
走上抗日之路的"老北风"…… 潘喜庭　魏福祥(198)
黑山著名匪首"老二哥"…… 郝让先(204)
恶匪"滚地雷"毙命于亲兄弟…… 王悦安　李传江(212)

匪穴余生…… 王志超(215)
土匪生活目睹记…… 崔右任(223)
我两次被绑票的经历…… 刘庆祥(235)

群匪两祸伊通城…… 刘庆祥　李南浦　王中兴(247)
伊通土匪和日租界…… 张庆麟(269)
"小白龙"围攻佳木斯…… 齐述师　齐春才(273)
张学良怒铡老占东
…… 李春科口述　胡光　于仝整理(276)

女匪驼龙与兵打乱石山
…… 陶中孝　刘山口述　万家明　邵学友整理(284)

刀砍大窝主杨玉树…… 王喜荣(288)
千里追匪记…… 许长春(295)
深入匪巢改编"庄稼人"匪队…… 张瑞麟(300)
林甸匪患与剿匪斗争…… 朱景荣　孙　可(315)
侦察英雄杨子荣剿匪纪实…… 温　野(334)
哈东剿匪记…… 王文焕(359)
于福匪帮的覆灭…… 宋永春　李元东　杨万久(369)
长白山麓的剿匪…… 蒋会君(385)
肃清梨树县匪患…… 梨树县史志办公室(394)
回忆合江清匪…… 张如屏(401)
横扫嫩江土匪…… 张汉丞(409)

草原土匪如是说…… 赵清阳(430)
榆林匪患二十年…… 史书博(436)
吴忠匪患略谈…… 张山林(440)
喀什三十年代的匪患…… 夏维荣(443)

川陕边境的山大王——王三春…… 王永清(445)
巨匪袁刚的一生…… 李庆东(453)
大匪霸周寿娃…… 郭志文　杜国兴(461)
王友邦盘踞吴山纪实…… 阎存正(472)
宝鸡恶匪王海山…… 娄生成　段志恭(478)
我所知道的乌斯满…… 拉提甫(484)

草头王包布拉及其覆灭
…… 土布生　纳木加口述　丁尕　王洛　王武魁整理(502)
门源平息"十月匪乱"纪实…… 祁郁春整理(508)
宁夏南部山区匪患及清剿经过
…… 牛化东口述　曾　干整理(519)
剿灭叛匪郭栓子始末…… 郑维田(526)
回忆新疆剿匪斗争…… 许亚夫(540)
南山剿匪的日日夜夜…… 袁学凯(546)

广汉"匪世界"…… 侯少煊(557)
綦江高青匪患…… 胡超斌(574)
一个土匪的自述…… 善成口述　黄竹川整理(586)
川北土皇帝黄清沅…… 梓潼县政协文史组(598)
金堂巨匪赖金廷…… 金堂县政协文史资料组整理(607)
赖子方闯荡秀山十五年
…… 田玉先　田明钧等口述　王明宗　何祖谟　邹庭轩整理(624)
"国军"剿匪部队扰民害民纪实…… 陈子尚(631)
朱德剿匪在汉场…… 罗大千(635)

东 北 土 匪

曹保明

出家为匪——入绺与退伙——绺子的组织——主要活动——匪礼匪规及刑法——图腾与迷信——土匪的种类——关于收编——黑话——报号——穿戴——娱乐习俗及其他

祖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是一块富绕美丽的地方，东北各族人民也有自己极其生动而悲壮的历史。在东北这块土地上，曾有过一个独特的层次——土匪（也叫响马，胡子）。本文将介绍他们的生活、习俗、信仰、图腾、禁忌、黑话等等。

本世纪初到40年代中叶，东北的大地上曾经涌起千百股土匪，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日俄战争的爆发，战败的俄国人取道东北回国，一路上，他们烧杀奸淫，使得无数的和平之家支离破碎，穷困和饥寒笼罩着关东的山川。于是便有一些过不下去的人组织起来，“起局”、“占山”、“立规”、“建绺”，过上土匪的生涯；接着便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和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东北整个沦陷了。在这些日子里，一方面是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是有正义感的东北军将士，公开摆脱蒋介石的控制，英勇地对日作战；再一方面就是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自发的武装斗争，其中包括一些先当了土匪的而后抗日的，也包括先起来抗日而后因种种原因又当了土匪的，还有

一些是被日本特务机关收编或假收编的一部分武装，等等。当然，本文主要是记叙那些趁着天下大乱而集结成绺的土匪的活动，但不能不把前几种情况加以说明。

在侧重说明纯土匪生活习俗的同时，对为什么把有些“先为匪后抗日”或“先抗日后为匪”的要列为匪的原因说明一下。

东北土匪的形成是极复杂的。而先为匪后来又走上抗日道路，这是东北地区土匪的一个特色。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以60万关东军的优势兵力，控制了白山黑水，他们日夜讨伐、围剿，把抗日联军逼进寒冷的深山老林之中。人们找不到党，往往自发起来抗日，有的自己“起局建绺”，成了土匪。但他们毕竟是有良心的，经过东北抗日联军和地下党的“说降”，有的投入了抗日的行列。参加抗日之后，因抗日军的生活十分艰苦，有些从“绺子”来的因受不住艰难的考验，于是重新拉回了山林。这部分人如不记叙，就不能算全面地记叙土匪的生活。还有一种“土匪”，他们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当然也抢老百姓，在此把他们作“土匪”来记叙，这是充分反映了东北的独特真实。总之，东北的土匪范畴，是有其独特概念的。而本文着重介绍的是包括这几种情况在内的土匪的生活、故事和习俗。

出家为匪

逼上梁山

俗话说，人逼极了为匪，狗逼急了咬人。在二三十年代的东北，土匪多如牛毛，他们大部分是被逼而出家当上土匪的。被逼为匪的原因也不同，但大致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做了什么坏事，被人追捕、追杀，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当儿，一狠心，当了土匪；还有的欠了人家的债，或要钱输得还不

起人家了，不得不逃走；被地主老财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户，没办法，只好上山等。

在旧时代，因为婚姻爱情不如意而被逼上山为匪的也大有人在，如双阳县的土匪头子“双镖”就是如此。

双镖，姓李，双阳桥石桥子人，家里是大地主，有钱有势，光房基地就30多垧。年轻时，他当打头的，领10几个伙计下地干活。他平时爱穿戴打扮，把山东老白布用米汤水一浆，硬刷刷的，做成一身白色制服一穿，屁股挂着五彩烟荷包，金黄的挂穗在外边露着。他会唱地方戏，一肚子民间小唱本。18岁那年他到29里外双营子老徐家串门，徐家姑娘一眼就看上了他。在那年月，别说恋爱，就是男女走对面细看一眼都不行。可这双镖和徐家姑娘，两人都胆大，双镖回家时，把这姑娘给领走了。旧时候，这叫“私奔”。

老徐家一家人都毛了，派下人去找，最后在双营子双镖的一个亲属家找到了。徐家老爷子赶紧给姑娘找了个主，嫁到外地去了。李家老爷子却大骂自个的儿子不争气。徐家姑娘临走，秘密托人给双镖捎来一封信说：“铁树千年要开花，妹子和哥是一家。铁石钢锤砸不断，哥和妹的情疙瘩！”

双镖对家里人表示：“非徐姑娘我不娶。你们要不同意，俺就当土匪！”他本来是想吓唬老爷子，说完就上朋友家玩去了。一玩玩了3天。

家里人可吓毛了，以为他真的当了胡子。当时，谁家有人在外当了土匪胡子，知情不举，全家按死罪，抓来不问青红皂白，一律“背毛”（勒死）。李家老爷子一见儿子没回来，料定出事了，急忙到区公所说：“我那该死的逆子挂柱（当土匪）去了！他从今不是我儿子，任凭你们处理吧。”老汉吓得嘴都抽筋了。

谁知第四天头上，双镖从朋友家玩回来了。一进村，几个人见了他说：“你小子还回来干啥？你爹给你除名报匪了！”他一看，

弄假成了真，没招儿，一转身出了村，起名“双镖”，当了土匪。

应该提到的是，东北的土匪中有不少是旧军人，这是东北土匪的一个特殊情况，这一类也为数不少。

图　官

古时有一句话：“不当胡子不当官，不下窑子不为太太。”过去有不少人出门为匪是为了当官。天下大乱，就有“遍地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一类人物。有些大财主、旧军阀，往往趁乱世占山头，拉人马，他们是单等事态一过，论官定职。当匪图官的人，多是那些手中早已掌握了一部分武器的人。

图　财

为图金钱加入土匪、当胡子的为数最多。他们之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枪就别在腰后头，真是神仙太自由。”

大土匪傅殿臣就是这样当土匪的。他是盘石县凉水台子人。小时家里很穷，年轻时到一个地主家给当半拉子。有一天，这个地主家来了胡子。一进院，胡子就喊：“小嗄，压连子！”（放马）

有人喊：“瓢洋子！瓢洋子！”（饺子）“翻张子！”（饼）。“挑龙！”（面条）。

土匪们要吃啥，这家就给做啥，酒席大菜摆了一桌子。土匪们吃完了，剩了半桌子，走了。傅殿臣和伙计们边收拾边吃，他禁不住问：“他们是谁？吃的这么好！”

有人说：“他们是土匪。”

“专吃好吃的……”

“咱们去当吧！”

“可，谁当头呢？”

几个人一想，这样吧，弄几个粪箕子，上面放个凳子，谁坐

上去不倒，谁就为头。他们弄好了，一个一个坐上去，都坐不住。轮到殿臣了，他一上去，坐住了，还挺稳。于是他说："我这还挺沉，又稳当坐了殿，干脆就叫殿臣吧！"——这简直是笑话，可他真就当土匪去了，后发展到2万多人。傅殿臣原名傅学文，个子不高，罗圈腿，黄头发，手使双枪，上马时，还要两个"崽子"（士兵）一人抬他一条腿，往马上一扔。在30年代的吉林，大人小孩一提殿臣，没有不知道的。有一首歌谣唱到："江东殿臣，江西王林，又坑国来又害民！"

为发财当土匪的大有人在。俗话说"兵匪一家"，这是指兵有时和土匪胡子一样坏，兵相当于土匪，好发财，捞外财。民国15年，双阳青草没棵时，土匪成群的起来了，当地驻军一营长不去打匪，却把他手下的班长找来几位说："明天换衣服，你们出去！"

班长不解地问："干啥？"

"混到土匪里也行！占山为王也行！"

"多长时间？"

"两个月，每人拿回5000大洋！"

班长们都乐了。说："上头来检查怎么办？"

"我就说你们执行任务去了。"班长们一听，一个个脱下军装，拿起武器，高高兴兴当土匪去了。真是兵匪一家呀。

入绺与退伙

当土匪，有两个门路，一是起局——也叫占山为王；二是挂柱——也就是入伙。如果洗手不干了，则称"拔香头子"。

起　局

起局，往往是几个人一起发誓起义，拜十八罗汉。相传十八罗汉是他们的祖师爷。古时的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当中，没

有“匪行”，但有佛主，而十八罗汉是佛道混合化身。因此在上中下九流之中，“佛”反而列为“一流”。据金宝忱《关东山民间习俗》，上九流是：一流佛主，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员外，六流客（客商）；七烧（烧锅），八当（当铺），九庄田。另一种说法为：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斗官，六流科；七工，八商，九庄田。可见，信仰“十八罗汉”佛祖的“土匪”还是上九流中的上流，但三百六十行中却没有匪行。

起局时，几个人割破手指，滴血水入酒碗，然后燃香。喝一口后，领头的人先发誓说：“拜过老祖拜四方，咱哥们今后就起局了。我自个定的规矩我要遵守，我要是横推立压（不守信，不忠诚，玩女人叫压裂子），我不得好死。我上前方，一枪打死，一炮轰死，喝水呛死，吃饭噎死！”然后别人也跟着这么说。“死”字只是在起局时说，以后就不许说，如遇到死就说“倒了”或“睡了”。他们非常讲究“忌口”。

发完誓后，就要给大当家的起个报号。起这种报号一般没什么规律，往往是即兴，如“殿臣”、“双镖”等。“双镖”，指他双手枪法如神；“草上飞”，指他行动很快；“穿山甲”，指他翻山越岭很麻利；“老北风”，指他勇猛无敌；“滚地雷”指个人爱好，每次出门前，他都喜欢在门前的地上打个滚儿。因之得名。也有根据自己的特征来起报号。如：“小白龙”，指年轻漂亮；“马秀才”、“小老头”、“老二哥”、“马傻子”、“金大牙”、“张大下巴”、“独眼龙”、“单掌”等均属此类。大部分绺子掌柜的绰号，还都是出于吉利，为大富大贵而起的，如“万盛”、“君子仁”、“君子义”、“仁合”、“双龙”、“龙凤”、“六国君”、“战胜”、“万富”、“财源茂”、“宝全”、“南来好”、“北来好”、“东来好”、“西来好”等等。出于明确的目的而报号的，也是大有人在。如九台的“三江好”和安图的“老三省”，就是有明确的目标。“三江好”罗明星在起局时，发完誓，他把兄弟们召集到院子里，高喊着说：“弟兄们，我

们为什么叫三江好？就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这三江两岸的老百姓都团结起来，一同打日本鬼子。今后，谁要是有个三心二意，可别怪我不客气。”“老三省”是吉林安图、延边、珲春一带有名的头子，早在1931年以前他就“亮”起来了（出名）。一天，他和号称“野马”的杜连升见了面，说：“我今个是来‘滑’你，（拉，带的意思，）咱们一块去打日本。”野马说：“真的？”老三省说：“这还有假？我早在起局时说过，我老三省就是照顾这东三省的父老，如今眼瞅着当了亡国奴，命都掌握在人家手里，还算他妈什么‘老三省’！”他还说：“我为了起局，把老祖宗留下的姓都扔了。我姓杨，可是，羊在山里是受欺负的，我宁肯姓狼。所以，我从来也不提我姓啥，大家只知道我是老三省！我要对得起这个报号！”可见，他们的报号有着明确的针对性。

起了誓，报了号，然后是安派炮头、水香、梁台等四梁八柱，挑选好“山场”、“岗头”或“苇塘”等地段，还要和这一带已有的山头“绺子”打打招呼，一支新绺子就算起局了。

挂　柱

除了起局之外，为匪的另一渠道就是入伙，黑话叫“挂柱”。挂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分保人保举和自己投靠的两种。

保人具保，这个“保”人一般都是和绺子里的四梁八柱熟悉的，头回说完了，二回要有个字据，交由“字匠”（先生）保管。他们讲究“行低人不低”这个绺规，这个“保”也就算个入“绺子”的手续。上面写明你的来意，愿意“走马飞尘”、“不计生死”等字样。

对自己来“挂柱”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盘问。而大多自己来的人，就是没亲戚也要找个朋友，没朋友也要找个“相识”的，总之还得弄个保人，叫“挂勾”，对来者要先试试他的胆量，这叫“过堂”。

“过堂”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来人在头上顶个葫芦或酒壶之类，朝前走去不许回头，走到百步左右，大当家的举枪射击，只听“啪”一声，头上的东西碎了。这时，大当家的派人去摸摸他尿没尿裤子。尿裤子的，或吓懵了的，绺子里叫他们是“扒子”；能挺住、胆大的，就叫“顶硬”。

第二种考验“胆量”的办法是陪着“炮头”（领队伍冲锋陷阵的神枪手）出去“打食”（寻找抢劫的对象）。不给他“喷子”（枪）和“青子”（刀），却让他去“踩盘子”、“望水”打探情况。如果他干得好，炮头就对大当家的说：“这人蹓过了（考验过了），还算顶硬！”于是就进行“拜香”。

拜香，就是插香对天盟誓。这个拜香不同于起局的拜香。起局拜香是由大掌柜的“栽香”，这次要由“挂柱”的人自己“栽”。插香要插19根，其中18根是表示十八罗汉，当中一根是师博大当家的。19根香要分5堆，插法很讲究，要前3后4，左5右6，当中再插1根。然后，来“挂柱”的人自己跪下（别人都围着他坐着）说：“我今来入伙，就和弟兄们一条心。如我不一条心，宁愿天打五雷轰，叫大当家的插了我。我今入了伙，就和众弟兄们一条心，不走露风声不叛变，不出卖朋友守规矩，如违犯了，千刀万剐，听大当家的插了我！”

这时，大当家的在一边说：“都是一家人，你起来吧！”

“谢大哥！”

大当家的又说：“去认认众哥们！”

他这时要先来到“炮头”那，说声：“听大兄弟指点。”

炮头就说：“强中更有强中手，你的枪法还得练那。每天早点起来，别踏被窝子，也没吃奶的孩子。到你的卡子时精灵点，你要及时，生命都在你这儿了……”交待完了，叫人给拿子弹和枪。

他又来到“粮台”那儿，说声：“听大兄弟的！”

粮台就说：“我们在外追风走尘的，不易呀！啃富（吃饭）时

别挑肥拣瘦的。东西少了大伙分着吃。你听说过孔融让梨的典故吗？要好生学着点……”然后派人给他拿套衣服或被子、毛巾、肥皂。当年，富一点的绺子自己也有衣服，往往是大襟的半大布褂，冬天是件大棉袄，狗皮或狐狸皮帽子，还有的发一支大烟袋。

这时他要走到“水香”那儿，还是施个抱拳礼，说一声：“大兄弟听你的！”于是水香也说一些他管辖之内的注意事项。直到拜问完了绺子里的四梁八柱，又见过了众兄弟，这“挂柱”入伙算是完事。

特别一提的是到“炮头”那儿，他往往被大声训斥：“你有胆子吗？打仗时前打后别的，后跑可不行！”

这时“挂柱人”要答：“死也不后跑！”

炮头往往还不放心地说：“你现在退伙也不算你现眼！别到时候吃不住劲儿，可别怪我的柴禾（子弹）没长眼睛！”

入伙的“崽子”弟兄，要绝对听从绺子里“四梁八柱”的，还要“孝敬”大当家的和里四梁、外四梁，如过年过节，要给四梁八柱和大当家的打点“小项”，也就是“进贡”。

起局的资本

起局要有“局底”，就是家当。有的绺子在起局前，要做充分准备。有的没有枪，就用红布包个树疙瘩，到乡公所和村联卫队里去夺枪；还有的用布盖着个铁管子，当成火炮，去威吓大财主，逼他们交枪。流传甚广的是张作霖起局时的情况。

张作霖小时对老母很孝敬。这一年，到了“乱世英雄起四方”的时候。一天，他听说屯里大地主“武善人”家雇伙计，于是就去了。张作霖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明天把我挣下的粮先送去，一年8石高粱，没粮折钱也行！”大地主家一听，雇人给钱，也合乎道理，就满口答应下来。从这家出来，他又在周围几个村庄的有钱人家，以同样的方式把自己雇了出去，一共8家，只

是让对方交钱的时间依次下推。

钱和粮都收好了。有一天，他通知东家们来他家庆贺“上工之喜”。8个东家都来了。张作霖给每人倒了一碗白开水，然后他自己也端起一碗，说：“众位一定纳闷：张作霖这小子穷死巴活的，今天咋这么肯出血，摆上八碟八碗两大件款待各位呢？其实这是你们自己的钱……”

众人大眼瞪小眼。

他说：“你们也不用瞪眼。我今个就是请你们来庆贺我入绺子的！是你们每人出了8石红高粱！不然我用什么去买这20响大镜面呢！”说完，掏出崭新的匣枪，“吧嗒”一声放在桌子上。

士绅一个个大为震惊，可是谁也不敢吱声。

张作霖这时把话题一转，说：“可是诸位，你们也不必胆颤心惊。俗话说，好狗护三邻，好人护三屯，我姓张的拉起大帮起局靠绺，是为了打官兵，保护你们。没有钱粮咋养活我的老母。我成了局立了绺，决不骚挠你们乡亲！”接着他又说：“可你们谁要是丧良心，和官兵一个鼻孔出气，可别怪我子弹不长眼睛。再说，我起事造反的枪支弹药，都是你们几家出钱买的，捅漏了谁也别想好！将来我干好，就加倍还你们！”

他又问：“你们甘不甘心？”

大伙只好说：“甘心！甘心！”

“同不同意？”

“同意，同意。”

“好！”张作霖说，“把你们的合同都拿回来，咱们重新签字！”

土豪老财们一个个打掉牙往肚里咽，只好颠颠地回家取来合同，交给张作霖。张把这些合同都毁了，又重新和各家签订了合同，然后开怀畅饮。这天晚上，张作霖把那几个老财灌个大醉，便挎上枪带上弟兄们，一溜烟地起局入伙去了。

“起局”之先，必须要设法弄到资本，这是为匪起家的关键一

步。

拔香头子

“拔香头子”，黑话叫“叠拉”，是退伙，洗手不干的意思。如果说“挂柱”（入伙）相比之下容易一些的活，那么“拔香头”就属于玩命的事。一般人不敢“拔香头子”，除非爹娘、老婆孩子在家里出了大事，一定让儿子或男人回去，大掌柜的让“蹲盘的”一溜，是这么回事，于是一拍桌子喝道：“拔香！”

拔香头子，也有固定仪式。之所以称“拔香头子”，大概是因为入伙时拜香起誓，现在要退伙，就得把香拔掉之意吧。这个日子一般选在一个月份的阴历十五左右。天上月亮出圆了，星出齐了，在院子里的空地上插好香，插法和“挂柱”时相同，也要插19根，插的数字还得是前3后4，左5右6，当间插1根。要退伙的人往中间的香堆前一跪，说：“十八罗汉在四方，大掌柜的在中央。流落山林百余天，多蒙众兄来照看。今日小弟要离去，还望众兄多容宽。小弟回去养老娘，还和众兄命相连。有窑有片弟来报，有兵有警早挂线。下有地来上有天，弟和众兄一线牵。铁马别牙不开口，钢刀剜胆心不变。小弟废话有一句，五雷击顶不久全。大哥吉星永高悬，财源茂盛没个完，众兄弟们保平安。”

每说一句，拔掉一根，19句说完了，香也拔完了。如果把大伙说乐呵了，大掌柜的从凳子上站起来，说：“兄弟走吧。啥时候想‘家’，再回来‘吃饭’！”

“谢大哥！”

“来人哪！”

“来了。”

“给兄弟拿盘缠！”

“顺当！顺当！”

崽子们和里四梁外四梁都围上来，连发钱带问话。一般是给

一些衣物，“飞虎子”（钱）和一匹马。

如果说得不好，不利索，或吞吞吐吐的，大家都没笑模样，大掌柜的一拍桌子脸色就变了，说：“你个不上道的，我今个‘插’了你！”

于是手下的崽子们也嚎嚎叫，说：

“别叫他‘邮了’（跑了）！”

“你想‘采条子’（逃跑）！”

“他想去‘放笼’（报信）！”

这时，大掌柜的把帽子摘下来，扣在桌子上。炮头走上去，说：“难为你跟队这么长时间，给你个‘走’！”（让拔香者自己选死的方法）。

每当拔香头子开始，众土匪都围着要退伙的人，瞪着眼珠子看他。有的胆子小的人早都尿裤子了。胆大的一听说“拔香头子”往往也汗流浃背。还有的绺子听大当家的一发令，众土匪往往一齐抽出刀，有时割掉他的耳朵、眼睛，有时一刀割下他的生殖器，说：“看这个葫芦还能不能打籽！”有时片下他脸上的两块肉，挂在树上喂野鸟……

当然，处理“拔香头子”的有时是他们看不上的人，逼着他“拔香头子”，然后借机弄死他。大多想退伙的人，有正当理由还是能退出的，再加上有“挂勾”（保人）和绺子里的人有联系，到时也帮着说说情。土匪中间流行着一句话：“挂柱容易，拔香头子难。”有人想到绺子里避难躲风，没入绺子之前就要先请师傅指点“拔香头子”的过程，不会“拔香头子”就不敢去“挂柱”，怕“挂”了“柱”后“拔”不出来。

绺子的组织

土匪绺子里的组织机构和职务分工、名称是这样的：大掌柜

的（也叫大当家的），或大哥；以下分“里四梁”、“外四梁”和“崽子”。

里 四 梁

正规的大股土匪里的“里四梁”，是指“炮头”、“粮台”、“水香”和“翻垛的”。“炮头”分“正炮头”、“副炮头”，正炮头也有叫总炮头的。这“炮头”就是绺子里带兵打仗的神枪手，他们的枪法都是黑夜打香头练出来的。

炮头的枪法，要得到大家的认可。他们平时要亲眼见识一下炮头的枪法，往往是在墙上栽个酱杆儿（秫秸），离百步远打枪，打上了，再往后挪，挪到一里地远了，还得打上。再就是打飞禽。天上过鸟，要点射而下，说打鸟头不打鸟脖。打小家雀，一枪出去，打“花达了”（碎了）不行，要留个完整的尸体。另外打雁不许打头雁，以免成帮的雁没有着落。

除枪法之外，炮头还要有生死不惧的胆子，他们管这样的人叫“胆壮”。为了考验炮头的胆子壮不壮，1931 年夏天，傅殿臣派“四季好”领着 100 多人去对付“大来好”。当时，大来好是奉傅的命令，到永吉镇东的一个窑里去接枪，和他同去的有崽子“九站”。他们来到蛤蟆塘的蔡聋子家时，大来好渴了，就叫九站去买点“青皮子”（香瓜）来啃啃。他弄个 20 响的槽子，倒在炕上擦。老蔡家是 3 间大房，没有院子，南边是个马圈。大来好对老蔡家的人说：“给我板着点（看着点）！”

“行啊！”老蔡头答应着。

就在这时，“四季好”带着人摸上来了。蔡老汉耳聋，没发现。大来好从窗上的玻璃影里发现了人，他“哨哨”两枪，就手放倒两个，又用腿夹起奔到炕沿前的一个人，甩到了炕里，接着就手站了起来，一个箭步窜出后窗，跑到后山上去了。在那儿他碰上了个拾粪的老汉。

那老汉说："掌柜的，屯里都开锅了。和谁响？"

"和我响。"

老汉问："九站呢？"

"整青皮子去了。"

"准是王林的人！"（当时王林和殿臣的人马不对付，常常接火。）

大来好说："我不管他是谁。老头，你进去给我打探打探！"

四季好一看没抓住大来好，就把蔡聋子的姑娘给绑了票。不一会儿，拾粪的老头回来，对大来好说："掌柜的，咋办？老蔡家的姑娘叫人给绑去了！"

大来好一听，说："我去！我一个人也要去。"他来到村口，向里喊："你们报个迎头！他妈的！"

村里没动静。

大来好大踏步地闯进村里去了。

刚来到蔡家大院不远，有人闪出来问："干什么？"

大来好说："有点事，来看看，商议商议。你们谁是掌柜的？"

那时，四季好是殿臣秧子房的掌柜的，在别处活动，平时不露头，这次是奉殿臣之命，特意前来考验大来好的。他说："有啥好商议的，你撂倒我好几个弟兄！"

"你要住在别人家，外边来人围你，你也得打！我犯了什么法？你们围我！我看打你们打的轻！"

四季好发话："把他给我码（捆）起来！"

大来好说："他妈的，谁敢动！"

"你还有啥话？"

"把人家老蔡家姑娘放出来，我随便。"

四季好想了一会儿，点点头，示意把人家的姑娘放了。接着来到门口，两个崽子要下大来好的枪。大来好说："你们干什么？我他妈怕就不来，来就不怕！"

四季好手下的有人说："大来好和殿臣一起干过，捆人家不对！"就要松开，大来好却来劲了，说："绑着吧！肏你个妈的！"这时，远处有一匹马飞奔而来，到了跟前，傅殿臣从马上飞快跳下来，走到跟前，说："兄弟，是你呀！"

大来好说："我犯了哪一条！他们这么多人，我一个人，他们都穿着军装，我以为是'洋跳子'（警察）呢！我能不开枪吗！"

傅殿臣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兄弟别怕，哥不处理你，今天这招就是我出的！"

"啥？你出的招儿？"大来好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傅殿臣说："你有胆量。管直（枪法准），我终于得了个好炮头！"大来好正在犯愣，四季好走上来说："大来好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使你蒙在鼓里。方才，这是咱们的大哥考验你能力的绝招儿！"一伙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可见，里四梁里的头一梁——炮头，在绺子里是个何等重要的角色。其次就是"粮台"。粮台，顾名思义，放粮食的台子就是管理弟兄们吃喝的人。当粮台的人必须心眼正，全绺子上下一视同仁，不图财不图物，算盘好，心眼来的快。

"水香"，管站岗放哨和纪律的。绺子经常"滑"过来"挑"过去，（走过来走过去），站岗和放哨就成了大事。每到一地，水香要先布置好"卡子"，派那些枪法好的，勤快的"崽子"去放"卡子"。如果砸开一处窑，一进院，水香立刻把卡子设在墙上和房上，用以监视和防备官兵和村屯联队的袭击。水香一般是由机灵、干事麻利快当的人来担任。

"翻垛的"是里四梁里的最后一梁，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翻垛"的人是绺子里的军师，是大掌柜的参谋。此人必须有文化，而又精通天文地理和八卦行文，会看生辰八字。每次行动前，要由他推算黄道吉日，并定出往哪个方向出击。这人还负责看星相。在出击的途中如迷了路，他要搬八门，有时还能作法。红白喜事

的执事也是他，还得能装神弄鬼。

同治年间，土匪马傻子攻打长春，他们的队伍里有炮。那时，南门一带是一片涝洼塘，炮车陷在泥里出不来了。马傻子绺子里"翻垛"的姓刘，叫刘三，他走到炮身前用手摸着炮筒子，说："我奉达摩老祖之命，来此收编此城；大炮再不出泥，就要天打雷轰。"

叨咕完，他用战刀一砍炮身，说："拉吧！这回该出来了。"果然，众弟兄一使劲，炮拉出来了。

"翻垛"的一般会利用神、仙、佛、道来鼓动大家，以迷信调动积极性。一个绺子里有个好翻垛的，往往减少不少损失。

外 四 梁

外四梁是指"秧子房"、"花舌子"、"插千的"和"字匠"（也叫先生）而言的。

"秧子房"，就是专门关押绑来的肉票的地方，秧子房掌柜的就是处理这类事情的头子。由于土匪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绑票，所以秧子房掌柜的权力最大。选秧子房掌柜的第一条，就是心黑手辣，俗话说"心硬"。土匪绑票，常常绑一屋子一屋子的，肉票们哭天叫地。有的肉票被绑在马上，日夜行走转移，屁股都让马背铲烂了，大腿里生了一堆一堆的蛆。土匪留着这些人质，既怕他们死，又舍不得给他们用药，于是常常用车轱辘采火烤肉票腿上的蛆。那火一烤，肉票疼得拼命叫，爹一声娘一声，惨极了。胆子小或心软的，那是当不了秧子房掌柜的。

秧子房掌柜的还要会观颜察色，看肉票的动态，分析他们的心理，以决定增加多大价码。在早，双阳县有个大地主，姓田，家财万贯，却小气得出名，别人叫他田吝巴垠子。土匪"双镖"知道他有钱，就绑了他的票。可是他宁可死，也舍不得出钱。家里人想赎他，又不知钱放在哪，因平时金银大洋都是他一个人经手。

田吝巴垠子在双镖的秧子房里，不甘心就这样死了，他知道他一死，一辈子的家底就白瞎了。他想来想去，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上是四句顺口溜："双镖手里把命丧，死到临头不可忘；若问家底藏在哪，上扯下来下扯上。"

其实，他是告诉家里藏家底的地方，他知道他的大儿媳妇聪明，特意写了这么个哑谜，以为能瞒过土匪。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绺子里边有能人，双镖的秧子房掌柜的叫"二屁"，姓马。此人是个鬼精灵，遇事好动脑筋。他得到这封信，细一分析，田吝巴垠子是想临死前告诉家里点秘密，一定是告诉儿子藏钱的地方。"上扯下来下扯上"是什么地方呢？马二屁终于猜破了这个谜，"快！包围他家！把他的袜子找来！"原来，田吝巴垠子说的"上扯下来下扯上"就是袜子。当时他被绑票走的急，没来得及穿上，袜子就放在炕席下边。他攒了一辈子的钱，换成的金片子，就藏在袜子里的补丁里。结果这伙土匪发了财。可见秧子房必须要善于动心思。

外四梁的第二位是"花舌子"。

花舌子是绺子里的联络官。票绑到手，多则5天，少则3日，家里人便会接到"花舌子"送来的"海叶子"（信件）。花舌子往往暗中为匪，明处是村里人。他给绑票的人家通风，并亲自交待绺子里赎人的价钱。

当花舌子的人，首先是要能说善辩，得有死人也能说活的本事。一个肉票多少价，往往早已由翻垛的和秧子房掌柜的商量好了，这个数码是量"票"家底出的，出多了票家拿不起，就得伤票，白绑了；出少了弟兄们白忙活一回。只有出个不多不少的价，其中全靠花舌子去周旋。他见了票家往往说："你家摊上事了，我也挺同情。不过你家也要想开，把人赎回来是大事。有了人不怕没有钱，好歹这是一条命。再者说了，这是你们当家人，古语说的好：家有万贯，主事一人。不能不去赎。"也有的人家，死活不

赎，这时花舌子也改变招法，弄个死人耳朵或一条猪舌头，给票家送来，威吓对方家人。

选花舌子还要选对绺子忠诚的人，不从中取回扣或“打小项”。

外四梁的第三名是“插千的”，这是探查情况的掌柜的。选这个人一是要“管直”（枪法好）；二是要机智勇敢，因他往往要先打进日后要攻打的“窑”里去，探明那里的一切情况，特别是“窑”里有没有地堡地枪。地枪，就是设在暗处的枪口。砸窑一般都在黑夜，如不探好，一跳进人家的院子就扣了弦，一下子就丧了命。插千的往往装扮成货郎、收猪鬃狗皮的小贩，或是剃头的、卖布头、卖梳头油什么的，混入大户人家院子屋里，查明情况，以定好攻打的路线。选插千的当然也要选对绺子忠诚可靠的，没有当官为宦亲属的人，以免防止他们有意无意泄露行动机密，被“跳子”（兵）一网打尽。

外四梁最后一名是“字匠”，也有叫先生的，这是在绺子里是专门管写信的。其实这个职务也和绑票有关，肉票一到手，字匠就要起草写信，言辞要得当，力求打动对方，出钱赎人。选“字匠”的条件之一就是有文化，且主要是毛笔字写得端庄漂亮，拿得出手，而且还要会写各类笔体，会模仿别人的字迹，会刻图章什么的。除了给票家去信外，绺子里其他文墨方面的事，如写个对联、写个去邪符子什么的，也全是他。这类人物一般都是戴个眼镜的老学究。

崽　子

土匪绺子里的弟兄叫“崽子”，崽子要绝对服从大掌柜、二掌柜和里四梁、外四梁的命令，打仗时要前打后别，“压”（住）下来时要站岗放哨，到年终或猫冬时，也根据得份多少分小份子。

崽子们吃、喝、抽大烟都是随便的，但女人少时他们不能象

里四梁、外四梁那么随便，因此有时崽子们和大掌柜、二掌柜的闹得也挺僵，干出杀大当家的勾当。据说傅殿臣就是得罪了他手下的一个崽子被杀了。有一天这个崽子“放卡”（站岗），傅殿臣从别处玩耍回来，崽子问：“你是谁？”

傅说：“我是我！”

“压着腕！”

“闭着火！”

这是夜间自己人回答的一套暗语，意思是别开枪，双方都压着点扳机。可是，这个崽子一听说是傅殿臣，心里就来了气，等他走近了，一枪就把傅殿臣开了壳。

平时，大当家的和四梁八柱也不敢轻易得罪崽子们，特别是那些在绺子里有点威望的人物。据说，崽子们想要收拾掌柜的时候，就拿一个猪头，用刀子一块一块往下片，这叫崽子要“起屁”了，想要钱了。一到这个时候，掌柜的就要给他们分钱，打发得崽子们乐呵呵的。但大多时候是崽子中的头子刚一露尖，不久就让大当家的和四梁八柱给收拾了。

主要活动

土匪的主要活动有7项：“砸窑”、“绑票”、“义举”、“报复”、“猫冬”、“吃票”和“靠窑”。

砸　窑

砸窑，就是攻打有钱人家的大院，攻进去叫“砸响了”，没攻进去叫“没砸响”。砸窑分“软窑”和“硬窑”。软窑是指柳条子、木板障子夹的院套，四周没炮台，但往往屋角、马圈里、道栅和猪圈里有“暗枪”，也有设地枪的；硬窑是指砖砌起或土打的大院，四周有炮台，有专职护院人（都是花大价钱雇来的百发百中的炮

手)。

本世纪初，在那些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每当青草没棵时，胡子土匪、大排、山林队、老少团遍地都是，常常有去打家劫舍的。每到开春，有钱人就到山里的猎户人家去请炮手来护院，以防匪患。军阀和大地主也自己养兵，或请官兵和团练、保险队、警察大队地方武装，组成“村团”、“联防”之类杂七杂八的队伍，名曰“防匪”。

绺子里有句话，叫做“砸窑先砸红窑”。“红窑”就是挂红旗的。那些自己养兵拥士的大地主、大财主家，既怕土匪来砸窑，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武装，于是就挂出一面红旗，绑在烟囱上，意思是可以来砸。这是吓唬土匪。绺子里对挂红旗的主儿，往往是不可擅动，但最后还是要动，因为这挂红旗的窑油水大。在砸挂红旗的窑之前，先要派插千的和炮头去探地枪。这个任务艰巨而危险。

民国12年春上，双阳县双镖绺子准备攻打一个姓胡的大地主家，这个窑插的是红旗。双镖这时当炮头，和插千的装成卖布的货郎子，背着一个大口袋就进了村。他们围着老胡家大院吆喝一阵，老胡家的小姐就把他喊进了屋里。

这胡家是东西大厢房，宽敞明亮。那时双镖正年轻，长得英俊漂亮，1米8的个子，这老胡家的小姐叫二霞，长得精灵美貌，从小喜欢舞刀弄枪的，象个小小子。卖布的进了家，她上去挑成色，与双镖眉来眼去，心中爱慕不已。双镖借口喝水，就走到外屋，往西屋的墙角一打量，有4台暗枪和2杆地枪。老胡家掌柜的发现这小伙贼眉鼠眼的，就猜出来者不是卖布的。双镖发现对方已有察觉，况且地枪已探好，赶紧和插千的溜走了，胡家立刻布置了人巡夜。

第二天夜里，他们攻打胡家窑。双镖领着几个人从大板棹子跳了过去，然后爬上了墙头。当年，挂红旗的大户人家都是两层

院墙，外边那层就是大板樟子，里边才是砖土垒的带炮台的墙。他们从大墙上跳过去，已绕过了地枪，谁知一个弟兄忙中出错，脚尖碰在地枪线上，只听“咕通”一声响，惊动了胡家护院的，当场打死两个，双镖被打伤让人捆了起来，胡家掌柜的提着灯笼走过一看，说：“这不是白天卖布那小伙吗！”

二当家的说：“他贼眉鼠眼的，就是想砸咱的窑！”

大当家的说：“我胡家窑是好砸的吗！”

胡家把他吊在马棚里，用皮鞭蘸凉水抽。

为了砸窑探地枪，大炮头、二炮头有的打成了残废，有的挺不过苦刑，招出绺子地点，又领着官兵去围捕。为了能砸响“挂红旗”的窑，插千的就要收买窑里的人，称为“内盘”。这内盘有的是窑里的伙计，有的是当家的姨太太什么的，也有老妈子和丫环。有了内线，可以里外配合。民国4年，长岭“老二哥”绺子攻打大户马家窑，收买了他家的大老婆（因大老婆受气，当家的宠着小老婆）。在砸窑时，家里人一人抱一门洋炮向外打，她却抱着一门洋炮把当家的放倒了。她的门牙给坐掉一半。后来这个“半拉大牙”出了名。双镖攻打胡家窑也属于有“内盘”，这就是胡家小姐二霞。这胡小姐对双镖一见钟情，再说，她多少已厌烦了这枯躁的老守田园的家。那天晚上，胡家掌柜的打双镖打累了，说：“咱们回去歇歇气。明早送乡公所……”胡家小姐见双镖挨打，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一听爹说明早要送乡公所，心里就毛了。她过去看见过，送乡公所的土匪不是砍头就是剜眼睛。有一年她见乡公所的士兵拉了一车土匪的脑袋，象一车西瓜，招摇过市。双镖要是给砍了，好好一个人不就完了？她悄悄来马棚，一下子割断了双镖的绳子，说：“大哥！你快逃！快走！”

“为啥救我？”

“别问了……”

“你告诉我大号（什么名字）。”

“你就叫我苦妹子吧！”

“好吧！妹子。等我养养身子，我一定回来接你！”

她给双镖打开后门，放他跑了。

第二天早上，胡掌柜的一见人没了，还以为是双镖的同伙进了院子，救走了他呢。日后不久，胡小姐从家里出走，投入了双镖的绺子，一同过起山林生活来。

探好窑的内部情况，砸窑就开始。砸窑的当天，要由翻垛的看好黄道吉日，然后出击，砸窑往往在夜里行动。炮声（土炮）一响，弟兄们在炮手带领下猛攻。有怕死怯阵的，就当场“插”了他（枪毙处死）。如果谁立功，回去就披红授奖。

砸窑是不容易的，每次都扔下一些崽子。如果砸响了（进去了），就花天酒地，残害百姓了。进院后，让老头和小孩给溜马，女人给他们做饭，要吃啥饭自己点。他们吃饱喝足了，就玩女人。有时为了争一个女人，互相厮打。有的用刀割下自己腿上一块肉，以威胁对方，而另一个也不示弱，一刀割下自己的一个耳朵，于是先前的那家伙只好让步。还有的把一个女人衣服扒光，在她的肚子上打牌，谁赢了，这个女人就是谁的。没有年轻女人，碰上老太太有的也祸害。民国 12 年，东北一支叫“驮龙”的大绺子，攻进了村子，大掌柜的喊：“弟兄们冲啊！进村自个找老丈人家！”诸如此类之事多如牛毛。

砸窑之后，他们往往不会停留太久，以防备官兵围追，往往吃喝玩乐一通，带上值钱的东西赶紧“划了”（撤走）。

有时碰上硬窑，如里边“枪头子硬”，打不进去，但也要硬攻。民国 3 年，佳木斯“小白龙”攻城砸窑，在爬犁前竖起草把子，上边浇上水冻冰，造成屏障，人在屏障后面驱赶着马爬犁前进射击。还有的，将豆饼垛在爬犁前面浇水冻冰，作为屏障，边打边叫。民国 12 年，洮安土匪“天照应”攻大安城砸窑。因城墙坚固，天寒地冻，无法攻进，土匪就用牛粪火把墙外的土地烤化，从外边挖

到城墙里的马圈里，终于将这个窑“砸”了下来。

绑　票

绑票，就是绑有钱人家的重要人物，如当家的、掌柜的或独生子、老儿子、老闺女什么的。一到春草没棵的季节，有钱人家的子女上学堂都有兵来接送，当家掌柜的也不轻易出门，有什么事都让伙计去办，如果有要紧事非得当家的亲自去不可，就得有护身保镖的带着家什一块走。可是防不胜防，绑票的事常常发生。

有的土匪，拿着猪套子等在桥底下，等“财神爷”（有钱人家的要人）过来，上去一套子套在对方脖子上说：“来吧！”然后蒙上眼睛堵上嘴，背起就走。民国 8 年，土匪“大龙”绺子的人要从“金玉堂”妓馆里赎一个妓女叫张淑贞，老鸨子小金宝死活不肯，于是大龙决定绑票。一天，小金宝领着她的独生儿子去逛庙会，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大龙的人就在小金宝儿子的头抹上了蒙汗药（拍花），然后趁小金宝不注意把孩子给绑走了。后来花舌子给小金宝送信，她万般无奈，只好舍出摇钱树张淑贞，换回儿子。

土匪绑票，花样翻新。民国 24 年，吉林省九台东部山区的桦树沟附近，住着一户大财主。此人腰缠万贯，但抠得要命，人送外号“姜老抠”。当地有一伙大绺子，大掌柜的姓罗，叫罗明星，报号“三江好”。他 3 次带人砸姜家窑，都没砸响，于是就改了招子。一天，姜老抠家出了件怪事。这天早饭后，姜老抠正躺在炕上过大烟瘾，只见二当家的突然跑进来问：“大哥，咱家谁老了（死的意思）？”

姜老抠 50 多岁，秃头胖脸，一脸老奸巨滑的样子。他家大业大，院里雇了 12 名炮手护院子，大院套四角都有炮台。自从高粱棵子一没腰，他就猫在屋里，连院子都不出，就是怕被绑票。当他一听说二掌柜的来报丧信，立即就火了，从炕上坐起来大骂：“他妈的，大白天说鬼话，老人要是死了能这么消停！”

“那祖坟地咋有人打墓子呢!”（埋棺材前挖坑）

“胡说!”

“真事!”

姜老抠一听，这事非同小可，气得他穿鞋下地要去。可一想不妥，又怕叫土匪绑了票，于是把烟枪一摔说：“再派人去！好好打探打探是谁这样大胆，敢上姜老爷我家的坟地里埋死人!”不一会儿，回来的人报告说：“墓子已打好！快要埋了!”

“反了！反了!”姜老抠暴跳如雷，立刻打发二当家的再去一趟。

不一会儿，二当家的又急急忙忙回来，说：“撵也撵不走，一边哭一边埋……”

姜老抠再也不顾细想，摔了烟枪就出了大门。那时正是8月，地里的庄稼长的扑扑腾腾的。姜老抠领着家人来到他家祖坟地，离老远就看见地当中摆放着一口红赤拉的大棺材，一些戴孝帽穿孝衫的男男女女，正号啕大哭。他心里一激愣，心想，这是不是胡子土匪扮演的？因他听说宽城子出名的接骨先生孟昭惠被人绑票的事。

据说有一天，孟昭惠出诊回来坐火车，有两个小子坐在他对面，抽烟往他脸上喷。他气得训斥了几句，那两个小子就出口不逊，并要动手。这时，坐在不远的一个人见义勇为，几拳几脚，把那两个家伙教训了一顿，打到别的车厢去了。孟先生感恩不尽，就和那人唠起了家常。那人说他母亲前几天腿脚摔了，他去请接骨先生，不巧先生外出了。孟昭惠一听，主动说：“你不用再找先生了，我就是接骨先生啊!”接着就自我介绍一番，那人高兴地双手作揖说：“久仰久仰！不想在这儿与先生相遇，真是三生有幸哪!”于是，孟先生就跟那人下了车，到地方一看，是个胡子的绺子。原来他被人家巧妙地绑了票。

可是现在，姜老抠看眼前情形，地里人都号啕大哭，喇叭匠

子还吹着丧乐《九条龙》，不由气得破口大骂："肏你妈日你娘，是谁这么狂！"那伙人好象根本没看见暴跳如雷的姜老抠，哭嚎的更来劲了。姜老抠再也忍不住了，撸胳膊挽袖子地就扑了上去，一把抓住前头举灵幡那人的脖领子，刚要举手打，就见那帮人齐刷刷摘掉了孝帽子，扔了孝衫，其中一人把大红棺材盖一揭，说："来吧！就等你呢。"一下子把他给按到棺材里去了。就这样，姜老抠让"三江好"给绑了票。

票绑到手，秧子房要养票，压下来时，要把票关起来，各处流窜时还得带着他们走，是挺麻烦的事，所以他们希望快出手。对重要的肉票，他们舍不得"撕"，转移时也带着，有时一带三四个月。民国2年，辽阳"徐老帅"绑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才4岁，花舌子送了7封信，他家也不来赎。他家是个老太太当家，极其抠门，说："孩子还小，长大也不知是个葫芦还是瓢。不赎！"可徐老帅绺子又舍不得这个茬，反正孩子也小，就让一个老胡子缝个大皮兜子，把孩子装在里边背着。几个月过去了，两人也有了感情。后来看看那家人家真不要这孩子了，老土匪竟收下这小子为干儿子，这孩子认老土匪为"继父"。

绑了票，就要设法使人家来赎回去，不然就没意义了。赎票不光要钱，有时也要物。价格都是开始大，后来双方讲来讲去，往往都要降一些。双方讲好价，就由花舌子指定时间、地点，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赎人是老百性最恨的事，往往使人倾家荡产，人赎回来了，家也完了，日子也没法过了。常常是赎了人回来办丧事，家里人急得一命呜乎。胡子土匪如果砸窑得了吃穿，一般就不绑票了。

绑票要格外注意一件事，就是提防"挂牌"（外出寻找绑票对象的人）者"借刀杀人"，或利用局里武装，为他个人报私仇。

另外，绑票之前，不能轻易出击，要和"挂牌"人立好"生财之道"的合同。也有专干"挂牌"的人，自己找上门来的。他

们来到绺子央求："我给你们做点事？"

"做吧。"土匪答应，又问："多少码？"（要多少报酬）

"四六。"

"太多。我们自己摸窑！"（不用挂牌人亲自出头）

"那就三七吧！"

于是，就达成了协议。但对此人，也需要调查。一般都是"托壳"（可靠）之人。对"不托壳"的，决不轻易成交或"听他的摆布"。

义　举

行帮各派，义气为重。胡子土匪中，"义举"是他们全部活动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如同伙之间，一方遭了难，对方绝不能袖手，否则就是"毒草子"（无义之人）。

义举之一，相帮相送。

1935年初冬，"三江好"罗明星攻打烟筒山，被敌人打花达了。撤退的途中遇上一股叫"大来好"的土匪，三江好双手抱拳于肩头，说："大来好掌柜的，我拉不出去了，柴禾（子弹）也打完了。求你送我一站（一段路）！"

"点多远？"

"上九台！送我到岔路河就行。"

"跟我走吧！这一路我'园子'好！（人熟）"

就这样，大来好和三江好虽然初次见面，但义气在，大来好送三江好一直过了岔路河，死伤了不少崽子。

还有一种"义举"，可归为大义灭亲一类。

1936年初冬，祁明山"祁老虎"的队伍驻在八虎力河附近的一个小村时，一天，一个老太太哭着跑来了，扑到他面前说："老总，你开开恩吧，咱们穷老百姓，实在架不住呀！"祁明山把老太太搀起，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老太太说她家的两条裤子，让绺

子里的人给拿去了。他立刻把全体都集合起来，问："哪一个抢了人家的东西！"没人吱声，翻了一阵，没有结果。最后一点名，发现少了一个班长和一个弟兄，说是请了病假。他立刻命令把那两个人找来。这二人，一个是哗变过来的伪军，一个是二道河子的农民。祁老虎两眼一瞪，那两个弟兄就变了脸色，他把老太太领到近前，指着他们说："你看是他们吗？"老太太一看，向后退了一步，颤抖着不开口。人证物证俱在，祁明山说了声："就地正法！"老太太一把没拉住，他的枪响了。事后，祁明山跑到土岗上，双手抱着头，泪流不止地看着两个倒下去的弟兄，后又命人将他们厚礼安葬。这也是一种"义举"。如他们有妻子父老和后代，还要好好照看，过年过节，及时送钱，

最出名的是抚松的"刘不开面"。跟他出生入死的一个老叔，一次"压"在村里，强奸了人家的闺女，人家找上门来。他老叔心想，大掌柜的是亲侄，他能把我怎样。可是刘不开面一挥手，下令让人绑了他老叔，然后给叔跪下，说："叔，我今个要送你上西天！"

他老叔大骂："小兔崽子！你敢！我是你叔！"

刘不开面说："什么叔不叔的，你不就比我早来两天吗？我没有你这样的叔。再说，我刘不开面当初说过，我如犯着了，对我也不开面。不杀你，今后的这伙人咋带！"

老叔终于想过来了，说："孩子，说得好！我犯了你的规！弟兄们，乱枪打死我吧！"刘不开面亲手杀了他老叔，又用厚礼安葬。这都是匪绺里的"义举"。

报　复

在土匪的绺子里，"报复"也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这主要是针对那些背叛的、告密的人而言，但也包括给被害的"崽子"（小兵）报仇。每年"猫冬"结束后，约定见面的第一个月的

主要活动是“报复”。先是清点人数，发现某某没来，就派插千的先去了解内情，如是“猫冬”期间被人所害，就要查出凶手，砍下脑袋，给死去的弟兄祭坟。如果没回来的人是去告密或叛变了，那就寻找本人和保人，严惩不赦。

还有的绺子称回来后的第一个月为“吃插月”（意思就是专门报复人），也是“清理队伍”，纯洁绺子。这一个月忙的不开可交，弄的神神秘秘，大当家的信不实回来的每一个人，于是用巧妙的办法——考验，一露马脚，当场“落鬓”（捆起来）。

猫　冬

在平原上活动的绺子，一到秋风起、树叶黄的时节，天上的大雁嘎嘎叫着向南飞去，他们也到了猫冬的时候了。大掌柜的把全体人马集合起来，按财产多少，每人分了“红柜”（钱），藏起长枪，带着短枪。掌柜的说：“天冷了，咱们拉帐分开了。有家的回家，没家的上亲戚那！没亲戚的上朋友那！没朋友的上庙上、到租界地去都行。来年的四月十八老地方码人（集合）！”于是，大伙又发誓打赌地重复一遍纪律，就东西南北地走了。有家有口的回去都说做买卖回来过年。也有的三五一伙上山，到木把的木营（木场）子里去过冬。因山场官兵警察少，呆起来消停。还有的到好朋友家去。过去有句俗话，“谁还没个三亲六故的”，他们都能找到安身的地方。

猫冬，对土匪来说，也是享受的季节。腰里有钱，他们不用出生入死去打仗、去砸窑了。有的光棍去找相好的女人，这类女人也叫“靠人的”。她们一般都有丈夫，往往是小买卖人，隔三差五的不回来；也有的好耍钱弄鬼，跳大神，唱小戏，打哈拉巴要饭的，老婆和土匪勾搭他们也不在乎；还有的去找“海台子”（暗娼），还有的去“拉帮套”。

“拉帮套”，就是一个女人两个丈夫，一个公开的，另一个没有手续，但村里和女人都认可，连她的合法的丈夫也认可。土匪

猫冬时去拉帮套，这在本世纪初的东北是屡见不鲜的。拉帮套女人的前一个丈夫，往往腿脚不好，也有的干脆是残疾人，有时两个丈夫住在同一个炕上，一个前半夜，一个后半夜，有的住在别处，晚上来。这时，拉帮套的往往先敲敲窗户，说："上灯花来了(说好晚上来)！"

女人对自己的丈夫说："里码人。"

丈夫往往说："何苦呢！挺吊累的！"

女人这时去开门。

一般的情况下是住在一块，每天帮干活。

第二年春天，绺子快"落局"(返回)了。女人象打发出远门的丈夫似的，给他收拾好穿戴，倚在门口，送他远行，说："天一杀冷，你麻溜回来！"

猫冬的土匪，还有专门组织赌局的，也有放赌抽红的，在东北的民间叫"押会"。"押会"是东北民间规模最大的赌博。也有看小牌的，玩一冬天。也有的土匪在猫冬时"掉了脚"(被警察局查出，抓起来了)，掉脚的土匪多是有人告密，也有的是酒后失言，落于官兵之手。

吃　票

"吃票"，就是专门管理地方一些"单开"——专干一种"案件"人的事情。吃票的绺子多指那些常在一个地方来往的大绺子，也有的就是他们派出去的。

人们常说关东山好混穷，到山上弄点啥都值俩钱。就因为大山里太富了，于是关外人大量涌进长白山。开荒的，放山的，打猎的，捕渔的，淘金的，采药的，放排的，干啥的都有。山里小镇上的杂货店、铁匠炉、烧锅、油坛、毡坊、皮坊、山货庄、成衣店、药店、粉房、车店、客栈、木铺、染房、银匠铺、鞋铺、面铺、妓院等，都随之兴旺红火起来。土匪绺子随之打进这些行业

中去，“吃票”，设下“暗卡”、“底线”、“坐线”。

在二三十年代，随着关东山的被开发，各类大小毛匪更多了。每到各类山货下山的季节，各条路口、旅店、客栈、车铺、赌场、妓馆、货庄、车站、码头等要害处，下山的老客都要格外提防着点，防止这些人物夺取钱财。

就说说放排季节“吃排饭”的那伙人吧。长白山盛产上等的红松原木，白桦、水曲柳、黄波萝等贵重树木，遍山遍坡。可是当年交通不便，运输全靠鸭绿江、松花江放排，从上游飘运到船场（吉林市上游），然后各类木材老客从这装车外运。早春，是放排木把们最繁忙的季节，放排也是人世间最凄苦危难的事，充满了艰险和辛酸。放排的头几天，木营（木场）掌柜的要给“头棹”（放排的领头人）、“二棹”和“三棹”杀猪送行，仿佛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江水全化了，开排的日子到了。起排时，如有人技术不高，激流带排进到河道的一瞬间，就能把人砸碎，下游的哨口一个接一个，而每一个哨口都足以要放排木把们的命。他们最怕的是“起垛”（就是正流送的木排被礁石卡住，突然堆起来，有时能堆成几层楼高，卡住江道）。每当流排“起垛”，头棹就要找人“开更”，也叫“排垛”（就是专门排除这种障碍）。这样的人，在流排的日子里，遍布大江沿岸的各个危险哨口，专等老排“起垛”出事，这些人叫“吃排饭”的。这些吃排饭的，往往要到管这个地段的绺子掌柜那去“报号”，取得他们的认可，叫“考票”。实际是去拜见“吃票”的头子，也是去寻找“靠人”（靠山）。不然他们得了钱也出不了山口。土匪是靠吃排饭的这类人物养着。吃排饭的闯进绺子，抱拳在左肩，施礼道：“西北连天一块云，乌鸦落在凤凰群，不知哪是君来哪是臣？”

大掌柜的说：“从哪来相府？”

来人说：“称不起相府，抱老把头瓢把子，吃排饭的。”

其他行业有报“挑山肯”（卖假人参）的或“牵点”的（引人上当的），或是“背大叶”的（倒卖土特产的），等等。

这时掌柜的说：“给这兄弟倒酒上烟。”这人说：“等一排下来，我恭敬弟兄们和大掌柜的……”

大伙就说：“放胆挑吧！”算是认可了。

在当年，开更的人为了避开带钱多引起麻烦，有的由木营掌柜的给开“奉号”（就是记钱数目的支票），到镇集子上的固定钱庄去支付；也有的直接带现钱，但必须有保镖的跟着。开更靠人的排开垛，就回到绺子，打开钱搭子，说：“大掌柜的和弟兄们分吧！”这时，土匪们都乐了，按要求命粮台拿出一部分，然后说：“爷们都是自家人，你留着花吧！”

“谢大掌柜的啦！”

吃票的费用一般是在三成，到后来越来越少，也可能只吃一成。对不肯来靠绺子的吃排饭的主儿，土匪们也轻易不敢动，要打听好了是吃谁的“靠”的，不然往往会惹出麻烦，两败俱伤。

靠　窑

“靠窑”，就是受对方的招安，或对方向自己投诚。一个绺子从起局那天起，就时刻想着是向别人靠窑还是别人向这靠窑，这一类的工作，就叫“说降”。说降是一个有风险的活动，土匪常常是变化无常，动不动就对来说降的人下毒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地风云骤起，各类胡子、绺子遍地都是，日本人也学会了“说降”，共产党也要争取这些山林队、土匪、胡子、大排、花膀子队、天地会、父老会、开山道等杂七杂八的队伍，进行抗日。

1933年冬，在梅河东玻璃河套一带兴起一股大绺子，大掌柜的叫“长山好”，带领好几百人，活动在山林中。日本人和杨靖宇都看准了这个“目标”，双方都开始说降。杨靖宇一有空就做“长山好”的思想工作。一天，杨靖宇特意来见长山好，说：“长山好

兄弟，你枪法好，有本事应用到抗日上！”

“杨司令你放心，我还有弟兄没来齐！3天后你听我的信儿！”长山好是嘴上说一套，实际干一套，暗中也和日本人来往，但杨靖宇决不放过这一机会。

看看已到第三天头上，杨靖宇就打发两个机灵的小通信员去给长山好送信并看看他的态度。

这两人过了东沟就进了长山好的3层卡子，土匪弟兄听说是杨靖宇派来的交通，都恨不得能靠杨司令，免得受鬼子的气。剩下土院门套的最后一道卡子了，一个手提六轮子的崽子问道：“哪来的！站住！”

两个小交通说：“站住就站住，何必大惊小怪呢！”

那家伙说：“这是胡子窝，你们不怕吗？”

“嘿，胡子是不是中国人？日本鬼子都不怕，还怕本国人！告诉你们当家的，我们是杨司令派来的！这里有信。”

那崽子上来就抢信，两个小交通急忙躲闪。那崽子说：“站住！不然我插了你们！”

两个小交通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们这样无理叫人耻笑。”那崽子没法，只好给长山好送信去了。

这时，长山好在屋里正和一个日本人嘀的热乎，这个日本人许愿，只要长山好“靠窑”到他们那边，就封他个少尉中队长。恰在这时，一个崽子进来报告说：“杨靖宇派人来了！”那个日本说客一听杨靖宇派人来了，吓得就往桌子底下钻，长山好说：“太君，你先藏到里屋去。”

长山好出得大门口，一看是两名小交通，就扑上来说：“快把信给我！”

两个战士说：“看来你是掌柜的了，可是不怎么礼貌！”

长山好说：“小小毛孩子，讲什么礼貌，快把信给我……”

战士小崔说：“我们是杨司令派来的，都听说长山好讲义气，

原来是这样啊！”

长山好实在没招儿，就一摆手说：“请吧！”

到了屋里，长山好看过信，就进里屋去了，他是和日本人商量下一步行动去了。那门只挂一道布帘，他们认为这两个小交通是孩子，说话根本不背着他们。只听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半夜开拔，奔朝阳山方向，要提防杨靖宇先礼后兵！”不一会，长山好走出小屋下令说：“把这两个小崽子给我捆起来……”两位交通员说：“长山好！你披着中国人衣裳给外国人干事！真不够人字两撇！”一个土匪恼羞成怒，举手要打，长山好说：“别跟他们浪费时间啦！等队伍滑完，就插了他们！”约摸过了两袋烟的功夫，土匪撤走了，只留下一个胖土匪愁眉苦脸地守着他俩。

小崔这时说：“这位大哥，外边人都走净了，你怎么办？”

那人说：“还不是留下我们断后吗！”

小崔说：“告诉你吧，这位大哥，长山好想的倒美，这四周的山早都让抗联给卡住了，他休想逃出去。我看你这位大哥不如趁早把我们放了，立下功劳，也好去见杨靖宇！”

几句话说得那土匪活了心。

小崔用手抹着眼泪趁机说：“我这个人从来不怕死，爹娘都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只盼着跟上抗联打鬼子报仇，哪想到又落到土匪胡子手里……”他一边哭，一边骂土匪，骂土匪无国无父，直说得那土匪也湿了眼眶。

小崔问：“大哥，你也有难心事？”

那人说：“谁愿意当土匪？还不是和你们一样，被日本人逼得没招了，哪知道他长山好还要投日本呢！”

“只有杨靖宇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

“可我一放你，我命也就完了！”

“你，跟我们一起走！”

那个土匪同意了。

就在这时，有个传令兵走进来说：

“走，把这两个小崽子带出去枪毙！”

那个土匪吓坏了，可是小崔他们却呵呵乐起来，原来这个传令兵是抗联战士装扮的。于是，传令兵和那个土匪假装押着两个抗联朝后山走去。当他们来到杨靖宇的驻地时，战斗正打的激烈，长山好和那个说降的日本人被围在山沟里。长山好见走投无路，高喊：“剩一个人也要拼到底！”话音刚落，一颗子弹把他撩倒了。

这一仗打得痛快，活捉了长山好的四梁八柱及日本说客。有70多名土匪参加了抗联，20多名愿回家的，每人发给3块现大洋作盘缠。长山好这个绺子就这样被拔掉了。

当年，有许多大绺子逼小绺子“靠窑”，也有小绺子联合起来收拾大绺子的，因为改编了一个绺子就等于占了他们的地盘。当然，杨靖宇收编土匪不是为了占山为王，而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抗日的队伍。

匪礼、匪规及刑法

匪　礼

土匪不打懂行的。过去出门在外，如果掌握了土匪的规矩及各种表示方式，懂得他们的“黑话”，他们就把你看成是“里码人”（内行），不难为你。常言说：“江湖的进班，尼姑进庵，内行人见了内行人，就是进家了。”若不然，往往“动青子”（刀）。山里的土匪经常在木营（木场）和参房子（挖参放山人住的地方）打尖找宿，会来事的山里人往往给他们安排住处，做好吃的，临走时还给他们点油、盐和烟卷。这叫“打小项”（进贡），主要是和他们拉好关系，不然土匪就祸害人。比如种大烟的，若不好生给土匪“打小项”，一到秋头子，大烟花一落，结了烟葫芦，胡子晚

上拿个小棒钻进烟地，一拨拉，烟葫芦都掉落，一年的汗水全白流。你种瓜不给他吃，他晚上派几个人拿个大掏耙，把你的瓜秧从地头搂到地尾，这才坑人呢！可是要和他们拉关系还必须得懂他们的规矩、黑话及各种礼仪。

五行八作的人见了土匪，都要有自己的表示方式。如长年在外行镖送货的武林之人走着走着，见前边的山口闪出一伙土匪来。领镖的人就一挥手，把车停了，然后拔下镖旗卷起来，在马上外腿甩镫，口里喊："达摩老祖威武！"镖师这边一喊，土匪们一见对方恭敬他们了，于是说："大师兄辛苦了，寨子里歇歇脚吧。"

大车走在路上若遇上了土匪，头车的老板子就一挥手把车停下，然后走上去把前边那匹马的肚带解开，一顺手搭在马背上，再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倒扣在辕马背上，接着手提鞭子从左车辕子跳上车，再从右车辕子上跳下来，然后施礼、问安。前边的动作是表示尊敬礼貌，后边跳蹦的动作是表示自己没带"青子"（刀枪武器）。一般出门的大车都带着枪或其他武器，但如遇上大股土匪就得把枪刀藏在车上。只要枪和刀不在身上，土匪就不害怕。

施礼并不是象如今有的电影、小说里表现那样"双手抱拳举在前胸作揖"，土匪最忌这个动作，因这有点象被捕时扣上手铐子的样子。土匪的施礼是双手抱拳举过左肩，向后一伸，或右手攥住左手腕放在左胯边上，然后弯腰施礼。

在当年，关东山的土匪有名的大绺子就不下几百股，常常有小股绺子来投靠大掌柜的，也有几个小股联合起来要收拾某某绺子。绺子互相联系时，往往是各股的掌柜的亲自出马或派出亲信。见了面，各种规矩、暗语、手式都对了，于是把门的问："爷们从哪来？"

"称不起爷们，在马二爷那吃饭。"

"是路过是候着（呆一会儿）？"

"要见你们掌柜的。"

"进来抽[illegible]。"

"好嘞。"

于是，客客气气跟了进去。见大掌柜的还要有一套，双手抱拳举过左肩施礼，说："西北连天一块云，乌鸦落在凤凰群。不知哪位是君，不知哪位是臣。"

大掌柜的坐在那里不动，但要搭话："西北悬天一块云，君是君来臣是臣。不知黑云是白云？"

来者又施一礼，说："黑云过后是白云，白云黑云都是云。"

这段话的意思是："你闯进来干啥？谁是掌柜的不很清楚了吗，你是从哪来的？"对方的意思是说："咱们是一家人，要不也不敢闯。今天来有事。"

这时，来人要伸直左手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指向自身，意思是我是哪的代表，来商议重要事情。于是，大掌柜的要伸直右手掌的中、小指，掌心向身，意思是，我是大掌柜的，有话说吧。至此，一套规矩完了。大掌柜的乐了，说："台儿拐着（炕上来坐着）。"

当一个绺子的大当家的，必须懂得各类黑话、手势、仪式，什么"搭扣子"、"斋里教"和一般社会（黑社会）流行的规矩都要懂，不然被同行们笑话。如果土匪想收编一股武装，这股武装开始时不懂他们的黑话和规矩，这是可以谅解的。

民国18年，王芝明（后来起局报号"大来好"），在吉林野炮连拉出300多人打算上山为王。这时，在盘石的大土匪头子傅殿臣听说了，就派人去收他们。那天下着大雨，王芝明他们在雨中奔走，傅殿臣的队伍围上来，说："喂！报报迎头！"

他们不懂，不吱声。

对方又说："来碰碰码（见见面）！"

他们还不懂。土匪中有人就要开枪，领队的"炮头"君子仁说："不能动手，他们初来乍到，不知者不怪。"于是把他们接到

山上避雨吃饭。

傅殿臣说："王兄弟，你管子亮打的真好（枪打得漂亮）！"

王芝明说："司令打发人来接我们，多谢了！"

傅殿臣："你今后有啥打算？我看靠窑吧！"

王芝明说："靠就靠窑吧！"

傅殿臣说："好！你这局红管亮，打的也好！就叫'打的好'吧！"于是命令杀猪宰羊，欢迎王芝明部。以后"打的好"叫来叫去，就叫成"大来好"了。后来他自己解释成"大家好好团结起来，共同打日本子"。

几股人联合，要有个仪式。

1937 年初，安图县木营里的"野马"（杜连升）准备联合"老三省"（姓杨）一块打日本人。他们经过商议，决定"滑"几个"绺子"来"涨"他们的大队头。老三省说："这好办，我马上派人去，拿我的海叶子（信、名片）滑几个绺子来。先请他们到你这来过年，然后就起事！"2 月 12 日前后，老三省的结盟兄弟"黑星"、"江南好"、"包打一面"，都带着几十人的队伍，聚拢到安图木场杜连升的山场里来了。新绺子的"结成仪式"决定在正月初进行。

这一天，安图的大庙岭木场上飘着一面红旗，木场的大简子屋里铺上、地下坐满了人。野马和老三省等五六个"首领"，围坐在地当中的木桌四周，每人面前都有一碗白干酒，一碟油饼和一大盘子焖羊肉。在欢笑声中，老三省站起来了。他摘下破旧的狐皮帽子，双手抱拳，向全屋弟兄施礼后便说："大家吃着，我先说两句。咱们都知道日本鬼子现在占了咱们东北，眼看咱们就要当亡国奴了，看看朝鲜人，就该知道那是个什么滋味。咱谁都不愿吃窝囊饭，咱们也有枪，想不当亡国奴，只有抱成团儿，齐心打日本鬼子，撵他们滚蛋！这块土养活了咱们，咱们过去对不起它。这回到了紧要关节的时候了，咱们一定要豁出半斤八两，好好报

答报答养活咱们的这块土！咱们已是一家人了。今个就算起事。死活都在一条船上，这得选个头行人……”

这时有人说：“我推举老三省当家的做掌柜的！”这是野马杜连升提出的，大伙一下子都同意了。

“不！”老三省忙挥动着手臂喊：“咱们还是听杜把头的，选他当掌柜的！”

顿时人群里异议纷纷：“什么杜把头！”“这是怎么回事？”“他行吗？”

老三省见大伙议论，不由得哈哈笑起来：“我就料定有人要这么说，可你们还不知道，这杜把头就是前几年绿林中出名的好汉‘野马’！”

大伙一听是野马，都欣然同意了。

这时，当家人要进行第二个“仪式”了。

杜连升站了起来，说：“大伙瞧得起我野马，我真是却之不恭，当之有愧，既然大伙推举我了，我只有豁出命去跟大伙干到底。不过，有几句丑话很碍口……”他说到这儿，故意停了一下。老三省一拍桌子，大声说：“咱们干啥说啥，我替他说，家有家法，铺有铺规，咱们，联局也得有个规矩：第一，要听从号令；第二，不准扰害百姓；第三，打仗不尿裤子。谁要是犯了那就不客气了。别看话是我说的，我违了和野马掌柜的犯了，都一样！”

“对！”杜连升说：“真是两挂鞭一齐放——响到一块去了。请大伙记住，以后有看见我杜连升打仗不顶着上，枪响撒鸭子，谁要不当场‘插’了我，就不算义气！”

大伙齐声喊：“中啊——”杜连升顺手摸出枪，用枪筒子挑起桌子上一个空酒盅，一下甩向空中，接着枪口一点，“叭”的一声，酒盅子炸个粉碎。

“看见没有！”他说，“任何犯纪的人，照此办理！”

接着，杜连升和老三省、黑星、包打一面等用刀割破腕子，让

血滴进酒碗里，又端起一齐说："干！"然后一饮而尽。这几股绺子就算是联合起来了。

七不夺八不抢

一是喜车丧车不抢。红白喜事自古为人生的两件大事，土匪不抢喜车丧车，主要是想图个吉利。

二是邮差不抢。邮差没多少"片儿"（钱），俗话说："穷教书，苦邮差。"

三是摆渡的不抢。因为他们过江渡河常求船老大。

四是背包行医的不抢。绺子里有伤号，他们经常要请医生去治疗。

五是要钱、赌博的不抢。据说他们和要钱的是一家人，有二首歌谣唱道："西北连天一块云，天下要钱一家人，清钱要的赵太祖，混钱耍的十八尊。""千山万水一枝花，清钱混钱是一家。你发财来我借光，你吃肉来我喝汤。"要钱的人家叫"要清钱"的；胡子、土匪也是"要钱"的，人称他们是"要混钱"的。

六是挑八股绳的不抢。挑八股绳的一般有两种人：一是锔锅的，用竹皮子当绳子，挑着工具和凳子，这叫硬八股绳；二是卖梨糖瓜籽的，卖酒、油的，用以换猪鬃、马尾、狗皮什么的，这都叫"软八股绳"。他们都是小本经营，抢他们不值得。有时还能从他们嘴里打探点消息。

七是车店不抢。尤其平原地带的胡子、土匪，青纱帐一倒，大雪纷飞的严冬到来了，北方的老炮烟雪整日地在平原上吹刮，寒风刺骨，他们无处藏身，往往扑到车店来猫冬住宿，吃点喝点。所以不抢车店。

八是僧侣、道人、尼姑不抢。

九是鳏寡孤独的不抢。

十是单身的夜行人不抢。

另外，开棺材铺的也不抢，主要是犯忌。土匪平常也尽量不杀人。打人骂人则是家常便饭。

不横推立压

不横推立压是两层意思，“横推”是指办事出乎常理，太不近乎人情。规定“压”在哪家，人家要是告饶，就不许打杀，不要做出超乎人俗的恶事来；“立压”是指用强迫的手段糟踏女人，对于有这样事的绺子，他们叫它“邪岔子”，多要严惩。这个规矩很厉害。

民国 4 年，双阳“大来好”的队伍从吉林开到万人沟，晚上压下后，一个崽子去村里把一个姑娘给糟踏了。不一会儿，姑娘家人找上来了，大来好把人都叫到院子里，手提着灯笼，叫人家认，认来认去都不是，大来好说：“把卡子换回来！”不一会儿，那个崽子回来了，大来好命人把他的枪下下来，问：“你知道不，犯了什么法？”

“不……知……”

“哼！人家才 15 岁！咱们起局时，咋个明的誓！”

“不准打骂老百姓；不动老百姓的闺女；冻死迎风站，饿死腆肚皮……”

“可你呢！来人哪！给我点了（毙了）！”

“是！”几个崽子走了上来。

那人叫道：“大哥，就饶我这一回吧！”

大来好说：“不行啊。我掌柜的要是犯了横推立压的规，也叫我摊上横梁子！这是绺规！”崽子把人带走了。

不一会儿，响了两枪，大来好一听，枪声不对，是朝天放的。他急忙自己赶去，一枪结果了这个崽子的性命。

要尊敬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又叫大哥、大掌柜的，是绺子里最有威信的，其他的四梁八柱和崽子们必须尊敬他，因为当家的是绺子里的主心骨。这也是土匪中的规矩之一。

平时有人打听绺子，往往说："他那局红管亮！"这"局红"，就指绺子兴旺，当家人的威望高；"管亮"，就指当家人的枪法准、狠。当家的都必须是神枪手，必须精通"十步装枪法"。这"十步装枪法"，就是拆了一大堆枪零件，兜在衣大襟里坐在炕上，一声令下，要从炕上跳下，边走边装，走到院子门口，就必须勾火打响；装不上者，不能为大掌柜的。大掌柜玩枪如家常便饭。大当家的还要会"两腿装弹术"。就是用两条腿的腿弯压子弹。因为大掌柜的都是双枪，上阵交火，不用腿弯压子弹跟不上趟子。大掌柜的都有几套拿手好戏，足以使弟兄们钦佩，敬大哥如敬父母，有违心的和存心不良的要受到处罚。

对于里四梁外四梁，往往是由大掌柜的任命。他提名之后，被任命的头头要出来和弟兄们见面，并露几手，这叫"拿威"，就是在弟兄们面前亮相，也算给大掌柜的"掌掌脸"。

兔子不吃窝边草

土匪进了绺子，到处砸窑绑票，可他们自己有个规矩，即兔子不吃窝边草，就是不打搅难为父老乡亲。村里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只要他们知道，往往也要去参加。讲的是人身为匪，乡情还在。特别是救过他们的命，有过恩情的人，更要如此。

永吉县大绺子"天虎帮"掌柜的好友、老林大哥的儿子说媳妇。头三天，天虎就打发手下的给林家送去了重礼，是金银财宝、首饰什么的，并定下正事的第二天晚上去。那天下午，林家当家的知道天虎要来了，就对亲友们说："各位对不起了，家里有事就

请自便吧……”天擦黑时，天虎帮的探路的露头了，先在院子外转3圈儿，又进院子转个圈儿，问当家的：“皮子在没在（狗）?”

“锁起来了。”

“别让它喘了（叫唤）。”

当家的点点头，探路的扭头出了院子。不一会，天虎身上缠着好几圈绳子，外边套着新鲜的礼服，走了进来。进了院和当家的点点头，麻溜抽身上了墙角的炮台，林家掌柜的吩咐把酒菜端到上边去给天虎用。他一个人在上边连吃带喝，直到办完事他再悄悄地走。有一次，他也参加一个朋友儿子的喜礼，人多嘴杂，消息一下子传到区公所，联防队带着人马来了。天虎在炮台枪眼里看得真切，就把早已缠在身上的绳子，一头栓在里边的凳子腿上，然后从枪眼里爬出去，到了地上割断绳子，安全地回去了。

土匪所在的乡里辈数较大的人死了，或过生日，一般他们只要知道信都回来随礼。他们也有一句俗话：树身再大，叶落归根。对有些不顾父老乡亲，在家跟前砸窑绑票的绺子，被称为“邪绺子”，如能抽出机会就收拾他们，也叫“打打邪岔子”。

乡亲们要有个危难遭灾，求到他们，往往也能给以帮助。但乡亲们轻易不求他们。因为老百姓视他们为“浪子”，盼浪子回头还盼不过来，怎能还逼他们下火坑呢。

处理违纪人的刑法

土匪对违犯绺规的人，往往处以枪罚，就是枪毙。开枪前历数该人的“罪恶”，然后拖到低洼处，让那人冲着枪口跪下，然后开枪。他们不从背后打，这叫不开“黑枪”。

“活埋”。这常常是“压”在某一个地方，时间比较充足，对自己内部和抓来的人都适用。

“背毛”，就是用绳子勒死。用一根小细绳，套在违纪人的脖子上，然后用擀面杖在脖子后一点点上劲，直到把人勒死。

"挂甲"。一般在冬天用此刑，把人全身脱光，绑在树上，向他身上泼凉水。只一夜工夫，人就能冻成雪白的冰条。

"穿花"。在夏秋之季，把人脱光，绑在大树上。东北地区的山蚊子、小咬、瞎虻（一种如苍蝇大小的蚊虫叮人很厉害）很多，一到黄昏，成群飞来，糊在人身上，一夜间就把人血吸干。他们往往用这个刑法对付抓来的又逃跑的人。

"看天"，也有叫"看山"的，这是最残酷的刑法。把一棵青干柳小树（一般碗口粗细）的一头削尖，插进犯人的肛门里，然后一松手，人被挑上天空。这一般是对付那些叛变、告密的人用的。

此外用马拉、火烧、刀割等等的也是很多的，但最多的是用皮鞭子蘸凉水（或用皮带）抽。他们折磨人的花招也是很绝的，如抓住不肯听他们摆布的女人，就把猫塞进女人的裤子里，然后用笤帚疙瘩在外面狠打猫，那猫一疼，就在里边又抓又咬。这种刑法也是胡子土匪常用的招法。

他们对"压花窑"（强奸女人）的人处理很严，一般都是死刑。平时"压"到谁家，是不能随便见人家女人的；如要见，如谁的袜子什么的破了，要补一补，都必须把袜子交给粮台，粮台去找人家当家的，通过当家的交给这家的女人。缝补完了拿回来。随便找人家女人，就要受处罚。

在土匪当中，当大掌柜的人，都不能有"家"（娶媳妇），不然就分散军心，绺子里对这一条要求很严（这个规矩也有例外，有的绺子就可娶"压寨夫人"，如"驮龙"绺子等）。1934年，盘石土匪傅殿臣准备攻打岔路河。出发前，他发话："拿下岔路河，我都叫你们安家！"结果，当岔路河拿下来后，有"占九"等五六个土匪头子，在当地找了"老丈人家"，布置了新房，放枪当鞭炮。傅一听，枪响如鞭，就问：

"和谁响（枪和谁打）？"

“和红姑娘（新娘）响！”

傅火了，说：“集合！开会！”

不一会儿，占九和那几个结婚的人都进来了，傅一挥手，把他们的枪都下下来。一顺手，占九等五六个人，都让他给枪毙了。

熬　鹰

土匪绑来“票”，由秧子房掌柜的把他们关在一个屋里，酷刑拷打，逼他们给家里人写信，来赎他们。在他们写了信，秧子房掌柜的派花舌子送走等赎的日子里，是最难熬的。土匪们有一种刑法，叫“熬鹰”。

这种办法常施用在行走、转移的途中。队伍停下来，秧子房掌柜的命令肉票们围着一堆火坐下来，他拿出一个象小孩“花拉捧”样的东西（也有用铃铛代替），交给肉票们，从一头开始，每人摇5下，再传给下一个，到谁那里停了，放卡的哨兵就在后边给谁一棍子，这就叫“熬鹰”。用这个办法来折磨人，不让你睡觉，防止逃跑。有的人几天几宿没睡觉，真熬的受不了啦，摇着摇着，一头扎进火堆里，活活烧死了。有的则烧个满脸花。

折磨“票”的手段也多，有的也因特殊情况，肉票在手中“甩”（出手）不出去，有的一个肉票“甩”了一二年才“甩”出去。个别的也有“养”票的。

图腾与迷信

图　腾

西北连天一块云，
天下要钱一家人。
清钱要的赵太祖，

混钱耍的十八尊。

这是东北土匪经常念叨的俗歌。他们信奉的神是“十八尊”，即“十八罗汉”。在他们的胸前，都挂着一个小铜佛，是布袋和尚。据说这是“十八罗汉”中第十七个罗汉“达摩多罗”，是他们崇拜的老祖。而在佛教中十八罗汉则有“杀富济贫”、“普渡众生”的说法。在传说中，这十八罗汉则与“胡子”称呼的来历混淆在一起。据说从前有一家兄弟18个，家里很穷，娘就说：“你们兄弟就出去谋生吧，一年后回来见我！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道理。”哥几个走了一年，所到之处，穷人多富人少，富人吃喝玩乐，穷人受苦挨冻。他们回来对娘说：“天下不公平！”

娘说：“怎样讲呢？”

“富人太富，穷人太穷。”

“你们想怎么办？”

“世上什么行业都有了，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

娘说：“可你们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是我的儿子吗？”

儿子们说：“我们都戴面具，面具上插些毛，别人就认不出我们是谁了。”于是，他们化装好了，就去杀富济贫了。所以，民间管他们叫“胡子”。后来，由于他们长年躲在山林里、青纱帐中、寺院或大车店中，不能剃头刮脸，一个个长毛披散，自然而然名副其实地成为“胡子”了。

另一种说法也叫“响马”。这是指他们骑的马上都有铃铛，一走叮当作响。起初人们管骑在马上的胡子叫“响马”，后来统称胡子、土匪是“响马”了。

作　梦

绺子里的土匪十分重视作梦，往往以梦的内容来决定第二天的行动，特别是大当家的作梦。梦卦结合，他们都很迷信用先天速的掌中八卦，来推算以后的行踪是否吉祥可靠，对各项时辰行

动有极严的要求。如说：

丑不南行西不东，求财望喜一场空。
寅辰往西主大凶，病人遇鬼邪害在。
亥子此方大失散，鸡犬做怪事难成。
巳未东北必不通，三山挡路有灾星。
午申休往西南行，文生下马一场空。
逢戌不上巽中去，口舌事非有灾星。
卯上西北必不通，隔山隔水不相逢。

大当家的十分注意自己的梦境：

梦到老太太、老头——财神爷；

梦到大姑娘、小媳妇——贵人（如梦到穿黄衣服的姑娘，这叫黄小姐——黄金的意思）；

梦到大火——火烧旺星；

梦到大水——水送金银；

梦到红棺材——有财有宝；

梦到小毛驴——驴驮财宝（梦着驴，是说神仙张果老到了，有财有运——因张果老倒骑驴）；

梦到出殡，有一帮小孩在哭——这不好，不吉利；

梦到刮大风——一定不能出击，刮风是刮“财”；

梦到老虎——也不能出击，老虎是“老佛爷”，说明有强手；

梦到狗追人——千万不能出击；

梦到有人从树上跳下来——一定不能出击，“跳”字的音同“洋跳子”，是指“兵”和“警察”。

迷　路

土匪砸窑、绑票、报复、义举等活动多是在夜里进行，往往迷失方向，这就要看“翻垛的”人的功夫了。

一是由翻垛的摆八门（一种纸牌），分“乾、坎、艮、震、巽、

离、昆、兑”八方八门，其中一张牌为“开门”，只要在哪个方向找到这张牌，就往哪个方向撤。

二是由翻垛的扔帽子。他把帽子的某一方定为“开门”，然后拿在手里，嘴里念念有词说：“十八罗汉各位仙爷，给俺指指明路，队伍拉出去了，供奉你各位仙爷。”说完，将帽子一抛，帽子落地看是哪边对着那个方向，就往哪边撤。

三是由翻垛的点香堆。东西南北埋4堆土（大约是这几个方向），每堆上插一支香，看哪支香烧得快，他们就往哪个方向撤。

四是空中飘手巾。由翻垛的拿出一条手巾。把4个角叠起来，用手托着，嘴里念着：“十八罗汉各位神灵，给俺指指明路。”然后撂着一抛，落地后，哪个角开了就从哪个方向走。

五是由翻垛的看星相。从星相上知道此时是几时几刻，决定如何行动。如他们常常讲究说：“一七艮上不可移，口舌事非步步逼（这是指10点钟——12点钟）；三九兑上有横事，祸伤人亡要当心（指6点——8点钟）；五十一坤必要死，毕星查辰有救星（指2点——4点钟）；六十二坎准得伤，钱财不旺人有灾（指半夜12点——2点钟）。”

翻垛的人要精通看天相、算八卦和批字看相、算命等术，不然是不能为“军师”的。如果是阴天，看不清天相，就要找河水，然后顺着河道走，准能出去。

天相和咒语

土匪的看天相和念咒语，是值得记载与研究的。如走黑路时，眼前出现“黑杠”（俗话鬼打墙），这时心里明白事的就要唱戏，使劲哼上几句，以驱邪。另外，各人有各人的办法，“大来好”外出“办局事”，一般都在夜里。一迷路，他就念一首咒语：“黑夜走路我不怕，我有铜手铁指甲。我有七杆八金钢，我有火龙照四方。”

念完再走，就有路了。别人问这是为什么？他们说：“夜行千

里都姓虎。”原来，他们把自己看做是“虎”。这虎，在东北是被当成“山神爷”、“老把头”，老虎是什么也不怕的。走黑道、念咒语和把他们自己比喻成虎，虽有迷信观念，但又有给自己壮胆的一面。

看天时，实际是看天相地相，包括山川江水的变化。如春天松花江开江了，他们要到江边上看是“文开江”还是“武开江”。文开江——就是江边上的雪，慢慢融化，江里的冰，也是自然的化了；武开江——就是江面起“鼓”，大块的冰排叠起来，据说是“老独角龙”用一只角划开的。如果是“武开江”，就说明年年头好，四方太平，五谷丰登，可以在此地长期呆下去。这叫“天有龙助”，龙即为天神，一龙治水好，而龙多则不好。所谓“文开江”，是说这年春天“春脖子”长，而“春脖子”长，必然无霜期就短，这在高寒的关东，自然影响收成。土匪、船夫、放排工、淘金汉、农民大都信此俗。

土匪的种类

在东北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本世纪初，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下子涌起上百股武装。其中有土匪，有先为匪后抗日的，也有先抗日后为匪的，还有的被日本人假招安的，真真假假，不好分辩。

据笔者的认真调查，仅在吉林、长春地区和黑龙江的部分地方就统计出有名姓有报号的绺子及匪首 100 多股。他们是：老长青——抗日；青林——抗日；天虎——抗日；赵参谋长——抗日；陈军——抗日；田司令——抗日；孙小个子——去向不明；明山——抗日联军第十军负责人；双镖——土匪；殿臣——先抗日，后被日本人收编；大来好——土匪，抗日；四海——土匪；九江好——双阳工匪；朱六子——土匪，国民党；露青——土匪；天照应——土匪；红娘队——女，土匪；滚地雷——盘石，姓王，土匪；北边好——土匪；北霸天——土匪；半拉好——土匪；龙团

——土匪，抗日；薄团——土匪；毛团——土匪；常占——土匪，抗日；青山好——土匪，抗日；君子仁——土匪，抗日；四季好、公平、陆林好、马金山、高鸡五、五龙、刘子玉、徐之介、王子仲均为傅殿臣部土匪；快马林三——土匪；九头鸟——土匪；宋玉方——土匪；田广林——土匪；海顺——土匪；双宝——土匪；三盛——土匪头子；大威——土匪；明全——抗日，土匪；东江好——土匪；六合君——土匪；老二哥——抗日；陈义——土匪，抗日；西边好——土匪；万盛——土匪；六国君——土匪；九海——土匪；凉山——土匪；阴山——土匪；宋司令——国民党，土匪；岗溜子——土匪；西江好——土匪；四季好——土匪；张黑子——土匪；战胜——土匪；海达——土匪；红山——土匪；仁合——土匪；红好——土匪；宝全——土匪；战天时——土匪，国民党特务；何君好——土匪；三江好——抗日；北来好——土匪；草上飞——土匪；穿山甲——土匪，一个人活动；刘不开面——土匪；刘大马棒——土匪；侯老帅——土匪；马傻子——土匪；驮龙——土匪，(女人)；大龙——土匪；二龙——土匪；官傻子——土匪；老北风——土匪，抗日；徐老帅——土匪；王林——土匪；双龙——土匪；刘东坡——土匪；双胜——土匪；野马——土匪，抗日；小白龙——土匪；黑星——抗日；老三省——土匪，抗日；江南好——土匪，抗日；包打一面——土匪，抗日；占中洋——土匪；占中海——土匪；交人好——土匪；爱中华——土匪；东洋好——土匪；青勾——土匪；红勾——土匪；靠边好——土匪；衰大队长——抗日；老诸君——土匪。

东北土匪基本上可分这4类："纯胡子"、"杀富济贫"、"救国救民"、"旧军队"，这4种成份构成了东北土匪的主体。

纯胡子土匪

纯胡子土匪，就是专门抢老百姓的东西。这类绺子一般不砸

窑，而是专门绑票，抢中小户人家的财物。过去所说的胡子，人数多少不等，平常是“七人为一绺，八人为一局”，可是也有一个人“搓单”为匪的，抚松的“穿山甲”就是一个人干。这类绑票、抢东西的绺子，老百姓是最恨他们的。

民国4年，浑江一带起了一股土匪，为首的叫“冰上飞”，烧杀抢夺，不干好事。一天他们“压”在一个老太太家。这老太太很穷，屋里没有值钱的东西，他们先是将罐子里的咸菜疙瘩捞上一串，临走时发现老太太戴个金镯子，撸又撸不下来，就用菜刀活活把老太太的手指给剁下来了。

这是纯粹的胡子，土匪。这些胡子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好“撕票”。因他们绑的主大都是中下生活水平的人家，逼着人家交钱交物赎人，主人家不能按时交出，他们就折磨“肉票”。有时把人质身上割出一条条口子，发烂生蛆；有时用火烧肉票，叫“烧地瓜”，让肉票的喊叫声传到其亲人的耳朵里，以此来逼人家出钱。

民国13年，王林绺下边的一伙家伙，他们“哧”出了大队（拉出去），到地方上胡作非为。绑了“花”票，是蚂蚁河子老魏家的姑娘。这家老俩口就这么一个姑娘，没招，就只好“挑线”（卖血）赎人。等凑够了钱赎姑娘，老太太由于失血过多不几天就死了，姑娘叫土匪给糟蹋了，回来就投河了。老头一看，3口人死了俩，他也上吊自尽了。好好的一个家，由于匪乱，全完了。

那时，这样的小股乱匪还是不少的，往往三天两头就来一伙，有时一天来好几伙，百姓恨得直咬牙，宁可不吃不喝，自已出钱组织联防，或雇用“护村队”。

杀富济贫

杀富济贫，这类绺子完全不同于前一种，他们也属于匪，但他们的主要活动是“砸窑”，也绑票，主要绑有钱有势的主，他们

砸窑也总砸那些“挂旗”的人家。

这样的绺子，一般都是人多，枪好，打头的心正，“管直”，里外四梁八柱也都硬。他们除了“砸窑”外，还往往“救票”（帮助一些穷人从小绺子里索人要票）。双阳的“大来好”就是这样。

有一次，双阳的邪岔子“红山帮”，把黄榆家一个豆腐店老头的孙子给绑去了，还抢走了拉磨的驴。这天，正好大来好路过这，听屋里哭得伤心。

大来好走进去问：“哭啥？”

“孙子叫人家抢走了！”

“是不是红山干的？”

“正是这伤天害理的呀！”

“别哭了。我给你要回来。”

“天哪！这是真的吗？”

“真的。花舌子来没来？点儿留在哪啦？”

“桦树河子。”

“你等着。”

大来好说到这儿，把队伍“压”在黄榆家，带上炮头和翻垛的就去了。到了红山的地界，大来好直接闯进去说：“我得了个信儿，听说你在‘冒里’（别人的地盘）把人给绑了！你懂不懂十八罗汉的规矩！”

“这……这，我们实在缺钱花呀！”

“缺钱花就‘涨’（扩大）队儿，去砸响窑，也别欺负老百姓啊！把人给放了！”

红山没招儿，把那孩子抱出来，大来好叫人背回来了。

这家见了小孙子回来，别提多乐了。这家有个闺女，17岁还没找主，人挺标致，老两口叫人问大来好：“你们当家的说不说人啊？”大来好一听，这可来了气，说：“没说人怎么样？”老两口以为大来好同意了，就打发闺女到桌前又点烟又倒水，大来好一挥

手说："去去去——"

老两口说："我们这完全是好意呀！"

大来好说："行，你们把这孩子给我，我再给红山送去……"

老两口吓坏了，连连说："掌柜的别生气！"

大来好说："就是么！我救人是应该的，我就是这样一个绺子。我弟兄和我的脾气也一样。你们可以闻一闻，我大来好的身上一辈子没臭味！"

还有一种土匪，光杀富，不济贫；"杀富"也不是"杀"了人家，而只是图钱，以便他们挥霍玩乐。

救国救民

"救国救民"岂能称为土匪呢？这就是东北民间武装的一个事实。这一类武装在起局时，往往没有明确的投靠共产党或国民党的意图，为的是吃喝玩乐，消遥法外。但他们的掌柜一开始就立规定法，一般不扰老百姓，只是砸大户人家的窑，绑有钱人家的票。可是，一旦民族矛盾一起，他们凭良心觉得应该对付外来的敌人，于是转到抗敌救国的道路上，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由于他们的口号、习俗、纪律、规矩和命令，还多沿用绺子的方法，所以一般仍视其为土匪。这就是东北地区自发的人民武装的特点。

1937 年，在吉林的敦化、汪清一带的山里，出现的"野马"绺子，就是典型的救国救民的"土匪"。"野马"与"老三省"、"江南好"、"包打一面"、"黑星"等绺子联合起来以后，于是年旧历正月初六，直奔延吉，袭击了那里的日军。他们打了一个胜仗，战果赫赫：歼敌 250 人；缴获野炮 1 门，轻重机枪各 6 挺，手枪、骑枪 270 枝，军马刀 75 把，弹药 60 箱，钢盔 270 顶，军马 76 匹，焚烧兵营一栋。

当时，"野马"、"老三省"等绺子没有马占山、李杜、冯占海

等部队的武器装备好，人也少，但他们有其独特的作战方法，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引起了社会的震动。

旧 部 队

以兵为匪，此说已不新鲜，而东北以兵为匪的这部分人多指那些过去就是土匪的，后来进了军队，然后局势突变，有的趁着天下大乱，又起局建绺，重操旧业。也有的当地驻军由于缺钱少饷，或干脆就想捞点，于是布置手下人便服出击，以土匪的名义打家劫舍，捞足了再穿上军装回营。这类旧军人为匪的在二三十年代的东北不是少数。

伊通大土匪“占天时”，名叫楚仁廷，报号楚七爷。此人就是土匪出身的旧军阀，他兵也当，匪也当，以至最后人们分不出他是兵还是匪。九·一八事变，他又收了好几个小绺子，三四百人，然后他又在十三甲当上了保卫队，穿个军服，整天耀武扬威在街上走。一次，他在羊草沟砸了个窑，在砸之前他说：“进院都服了也收拾他们！”攻进去后，他让这家人跪在猪槽子上面，一枪一个地给毙了。打到当家的时，他打了3枪没打响，那家闺女爬过来求他：“楚司令，枪都不响了！谁也不该谁的命，你就饶了他吧！”他一脚把闺女踢一边去了。闺女说：“你算什么‘保卫队’，纯粹是土匪！”楚哈哈笑着说：“军队和土匪是一家人。”说完，又压上一颗子弹，到底把家主给打死了。这是典型的兵匪合一。

关 于“收 编”

土匪之间的主要活动之一有“靠窑”，就是指小股绺子投靠中等绺子，或中等的投靠大绺子；另有一种方式是“收编”，多是大绺子去“接收”小绺子，还有有关方面如日本人、国民党或共产党去做小绺子的工作，这也叫“劝降”。“收编”包括“说降”和

“靠窑”两个方面。

分析对方的来路

要想收编对方，首先必须摸清这个局（绺子）的背景，对症才能下药。前面说过，傅殿臣收“大来好”就是如此。老殿一听说吉林野炮队有一股人“闯出来”了，知道他们四处奔波，无处藏身，就派人去“接应”他们，然后让他们站住脚，靠自己的“窑”。这一接一劝，很能打动人心，大来好果然同意了。

还有是这一片地面上起了两个“局”，其中一个绺子总受那个绺子的气。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考虑对这个受气的绺子进行收编了，如派翻垛的前去说合。往往一见面，翻垛的说：“××掌柜的，我们当家的派我来打探打探，你有没有什么难处！”

这人可能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他他妈嫌我碍眼！”

“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何必在他这儿受气呢……”

“你有啥办法？”

“掌柜的这次派我来，就是让我们帮你出这口气。请你靠我们窑吧！”

“条件呢？”

“帮你挣下地盘！”

“好！一言为定。”

“决不失信。”

双方这就谈成了。

胆量和技艺

一方收编一方，除了摸清对方的情况，向对方许愿或定合同作抵押等，还须靠去“说降”的这个人。这个人必须是既有足够的胆量，又要有精湛的技艺。

1932 年，长春西北米沙子土匪“大林三”克扣崽子们的“大

饷”（砸窑和绑票得来的大洋），他一个人把银钱用钱褡裢在自己身上，不给弟兄们用，饿得大伙七八天没喝一口水酒。手下的“小林三”急眼了，有一天在后边给大林三打了黑枪。长春西北沃皮一带的“大家好”听说了，就派人去说合，收编小林三。当时，小林三刚打死大林三，绺子里人心浮动。大家好恰恰此时派来了绺子里的军师“铁憨”。铁憨来到小林三绺子处，小林三正玩牌呢。铁憨说明了来意。

小林三说：“我要抽口烟！”

铁憨明白，说“兄弟给你拿火。”

当时，地上的大火炉子烧的呜呜叫，铁憨用手掀开炉盖就捏出一块烧得通红的火炭，走到小林三跟前举着。小林三也不示弱，撸开裤腿，露出大腿根子，说：“先放这！出完牌再抽。”

这时铁憨说：“别！先放我这！”

那火炭在铁憨的大腿上烫得“吱吱”冒油，铁憨却笑呵呵地边喝茶水边看牌。

还有的情况是收编者一进院，掌柜的一声吆喝，崽子们架起一座“刀棚”，来者要在下面走过，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要经过这个考验才能办成事。

抗日联军要想“收编”土匪，也要针对时机，对症下药，并且要懂得他们的规矩和习俗，同时要有胆量和勇气。

1941 年到 1946 年间，梨树县四马架一带出现了一股大土匪，掌柜的姓杨名忠，报号“九头鸟”。这九头鸟不靠共产党，也不靠国民党，在这一带骚扰百姓，砸窑、绑票。一次，由于叛徒出卖，中共辽西县委书记周亚纲不幸遇难，临终前在自己的小本上写了个纸条，记下了叛徒的代号和自己被害经过。不料这个纸条让夜晚逛窑子回来的九头鸟拾到了，他们以为这下可捞到了“大货”，准备打探消息，从中勒索。

这时，共产党又派辽西县委第二任书记李然（沈洋同志的化

名），前来辽西开展对敌斗争。李然虽然是个女同志，但勇敢坚强，对敌斗争也有丰富的经验。她听说侦破叛徒的线索落在土匪九头鸟手里，于是决定闯土匪绺子，说服九头鸟拿出字据，并收编他们。大伙都担心，说："九头鸟这小子是土匪，变化无常，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

李然说："这我想过。不过这事宜早不宜迟，再危险也得闯。九头鸟的老母也在绺子里，杨忠是个孝子，我们要从这儿来个突破口……"李然决心一下，第二天就带着一名叫姜雨林的警卫员，直奔四马架九头鸟的绺子而去。

他们刚走进九头鸟绺子地带，几座荒坟后突然闪出几条汉子来，为首的一拉枪栓喝问："什么来路？"

李然说："有要事见你们的大哥！"

那家伙把手在裤裆上擦了擦，二指并起来在嘴里打了个响亮的口哨。转眼间又来了七八条汉子。那人说："好吧，先委屈你们一下，上蒙眼！"接着几个人上来，把他们的枪给下了，蒙上眼睛，带走了。约有一袋烟功夫，带路人大喊："共匪押到！"

接着，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给我带上来！"

有人给李然和姜雨林除去眼上黑布，只见眼前是个好阔亮的地方，一片芦苇都被割倒，地上挖了一排排地窝子，在一个八仙桌后边的椅子上，半躺半坐地歪仰着一个汉子，桌上摆的吃食却是咸菜条、窝窝头。双方沉默片刻，椅子上的九头鸟拍桌道："通报共匪姓名！"

李然大声地说："想必那位就是杨掌柜的了。我们不是什么匪，我是辽河支队的代理队长——李然！"

众土匪一惊，嘁嘁喳喳交头接耳：

"啊！来了个大个的！"

"还是个他妈的老娘们！"

九头鸟傲慢地说："你们要干什么？"

李然说："和你们交朋友。杨忠，眼下国难当头，你们应站到人民一边，对付真正的敌人！"

九头鸟说："放肆！敢来瓦解我的军心，你这是存心不良！来人哪！把他们给我码（捆）起来！"忽拉一下围上一帮土匪，一个个亮出明晃晃的匕首。

李然冷笑一声，说："就凭你们这两下子也要比试吗？比什么？是飞马打鸟还是枪掐芦苇！这样下手，算不得好汉！"

九头鸟一听，气炸了肺，说："放开她，我倒要见识见识她的枪法！"

就这样，九头鸟和李然在百步开外，枪点芦苇，专打贴地皮那节，结果九头鸟不如李然。九头鸟手下的一个家伙不服，开枪向李然射击，被九头鸟一枪打死。九头鸟十分敬佩"好汉"，于是请李然到屋里去见老母，并与之结拜成姐弟。

诸如此类"收编"，靠胆子和技艺的事是很多的。

由于土匪凶暴残忍，收编也往往失败。1934年，盘石的傅殿臣正是红火兴旺之时，有一次，日本人、国民党和抗联3家派去说降收编的人同时在傅殿臣的绺子里相遇了。抗联派去的说合人叫王清合，见此情形，他力图团结国民党那位要人，以揭露日本人的阴谋。可是傅殿臣脸一下子变了，命人把王清合捆起来，当着日本人的面，把王清合活埋了（此事为九台县桦树沟乡一个当年参加过傅殿臣队伍的杨老汉亲眼所见）。当时，王清合英勇不屈，一边大骂傅殿臣不仁不义，一边揭露日本人阴谋，毅然跳入大坑。

日本人收编土匪

1934年，盘石的大绺子傅殿臣部，正在兴旺之时，日本人为了搞清傅殿臣部队中军情和武装情况，派特务打进了绺子里。这个机密的情况是"三江好"的人发现的。是年秋，九台的三江好准备攻打驻扎在盘石的日本宪兵队，就派炮手"北斗"前去盘石

“插千”打探。北斗会日本语，又精明能干。他化装成一个赶集的人，混进了盘石县烟囱山大集。那天，集市上十分红火热闹，南来北往的人也很多。当时，在集市的“北来顺”冷面狗肉馆门前站着一个小伙，搀扶着一个老太太。北斗有点饿了，想进“北来顺”去弄两碗冷面，要几两白干喝一喝。就在他和这一老一少擦肩而过的一瞬间，他猛然听见他（她）们说的是日语，使他吃惊不小，心里产生了怀疑。

北斗买来了一壶老白干，要一块牛肉，站在这一老一少不远一个卖狐狸皮的小贩跟前边喝边吃，装着没事的样子偷听。他一听，才知道这两个人是日本人，说话的大意是“不知傅殿臣心思如何”，“手下的人当中有没有对立”等，还有关于傅殿臣的武装力量和人员情况。他们说完话，那个老太太就挤进人群中去了，那个男的又买了两串糖葫芦，汉话说的相当地道。这又使北斗吃惊，他决定搞清这人的来历，于是在这人身后跟随不舍。那人发现有人跟踪，三拐两转，消失在人群中了。

北斗回来后，曾同“三江好”罗明星谈过这个情况。次年，三江好去烟囱山面见傅殿臣，告诉他说：“日本人对你图谋不轨！”傅殿臣哈哈一笑说：“三江好掌柜的！你放心，日本人一翘尾巴我就知道他屁眼是黑是红！”其实傅大意了。日本人为了“招抚”傅殿臣，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但派人打进其内部，而且还多次在傅部制造“内乱”，曾经策划刘东坡率人攻傅殿臣的司令部。日本人3次清点傅殿臣的兵数，说是发给棉衣给养，实为寻机剿灭傅殿臣。后来，傅殿臣终于被“招抚”了，结果是死得不清不白。有人说是让他的仇人（他的一个部下）打死的；也有人说傅殿臣是“挨了日本人的黑枪”。日本人是惯用此种伎俩的，他们打死傅殿臣，又装模作样的给他立了个碑，意在继续“招抚”其他的“绺子”。

日本人对这些地方武装如此费尽心机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土匪、胡子非常熟悉山林的地形，如果收编了他们，利用其带路

或围剿抗联，就会减少日军的损失。由于不熟悉山道、老林，日本人因迷路而全军覆灭的也是有的，这使日军伤透了脑筋。据《星火燎原》第四集中《雪夜“拉驴”》记载，1933年冬，日军搜山队300人在北满林海中追击抗联。抗联战士们利用自己对地形的熟悉，把日军引进方圆数百里的老爷岭。东北的严冬，夜里气温达零下40多度，日本兵“麻达山”（迷路）了。当天晚上，又是“大炮烟”雪（东北特有的老风雪），一下子把300名侵略军活活冻死了。直到第二年春天，山林里气温升高，日军的尸体才发出熏天的臭气。

日本人为了收编地方武装来攻打抗联，围剿抗联不惜花血本，收编邵本良就是一个实例。邵本良是有名的土匪，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团长，日本人收编了他，并委任他为“东边道剿匪少将总司令”，拨给他大量的现代化武器，日军司令官三毛中将还答应派飞机配合他作战，并在沈阳特意给他修了一座“邵公馆”。后来邵本良被抗联打死，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黑　话

吃，穿，戴

吃饭——啃富（也叫“上啃”）。

喝水——富海。

喝酒——搬姜子（也叫“梦头春”）。

大米饭——抻腰子。

小米饭——星星闪。

饺子——飘洋子（也叫“掐边”）。

烙饼——翻张子。

面条——挑龙。

鸡蛋——滚子。

喝茶——软富。

烟——草卷（大烟叫“海草”或“黑土子”）。

抽烟——啃草卷。

齿轮——月饼。

干枝子——粉条。

宽帐子——被褥。

枕龙——枕头。

帽子——顶天。

鞋——蹚土子。

结交联络

碰碰码——见见面，也有叫“对对脉子”或“对盘”、“盘道”的。

什么蔓——干什么的。

单搂——专干一种事，也有叫“单开”、“砸孤丁”。

满转——什么都干。

里码人——同行，一伙的。

熟脉子——同伙，自己人。

空子——外行人，也有叫“空码”、“老空”、“外码”的。

春点开不开——会不会说行话。“春点开”——会说，“春点半开”——半通不通。

门清——懂咱的规矩。

挑号——此人很出名。

局红——绺子兴旺。

管直——枪法准。

传正——这小子胆子大。

接灵子——别人说啥他领会得快。

传快——心眼来得快。

尖——真的。

星——假的。

瓢紧——嘴严，不泄密。

晃门子——不可靠，说假话。

污兰——对同伙撒谎。

掉脚子——被兵警抓住。

底子潮——多次被抓，有前科。

起皮子——起事开局。

扯出来——逃出来。

挂柱——入伙。

拔香头子——退伙。

歇搁——怕出事不干了。

踩盘子——行动前寻找目标。

上道——出发。

点正兰头海——这个目标好钱多。

点活——目标容易拿下。

响没响——开没开始。

和谁响——和谁打。

海瞧——看朋友。

码人——集合同伙。

连旗的——一伙的。

靠窑——投到一个绺子。

挑人靠窑——多拉人一块来。

勾道关子——合伙出击。

插旗的——寻找出击目标。

料水的——放哨的。

底线——拉线人。

花舌子——双方说合人。

卧底——派人打进去。

上天——上房。

窑变——出事了。

买卖顺不顺——事干没干成。

挣着了——得手了。

兰头海不海——得钱多不多。

点背——不顺气。

对扇子——关门了。

皮子喘了——狗叫了。

明了——被人知道了，

漏水——被人发现了。

划、挑——快走。

起跳子——兵来抓人，也有叫“起烟了”。

砸窑——攻打有钱人家的大院。

邮了——跳掉了。

烫了——受伤。

踏条子——躲起来。

舵窑基——找落脚的地方。

压下来——住下来。

浪飞——没有固定的局绺子。

放笼——报信。

举了——揭发报官。

叶子——信，也有叫“海叶子”、“发海叶子”就是邮信。

姓　氏

什么蔓——姓什么。

报报蔓——报个姓名，也有叫“报报迎头”。

甩蔓——互通姓名。

尖子蔓——姓丁。

顶水蔓——姓于。

压脚蔓——姓马。

滑子蔓——姓尤。

顺水蔓——姓刘。

山根蔓——姓石。

雪花蔓——姓白。

补丁蔓——姓冯。

断子蔓——姓孙。

江子蔓——姓朱。

横水蔓——姓乔。

疙瘩蔓——姓纪。

千斤蔓——姓陈。

操水蔓——姓本。

跟头蔓——姓张。
白给蔓——姓宋。
锅烂蔓——姓周。
山头蔓——姓杨。
灯笼蔓——姓赵。
单人蔓——姓郝。
两角蔓——姓姜。
梯子蔓——姓高。
压脚蔓——姓马。
高头大蔓——姓马。
烧干锅蔓——姓胡。
虎头顶蔓——姓王。
兄弟宽蔓——姓尹。
龙子龙蔓——姓孙。
二龙戏蔓——姓朱。
空中飘蔓——姓齐。
西北风蔓——姓冷。
崩子皆蔓——姓关。
九江八蔓——姓何。
一脚门蔓——姓李。
犀角灵蔓——姓杨。
云山雾蔓——姓赵。
里倒歪蔓——姓谢。

如两人见面：

一个说“报报迎头，什么蔓？”

一个答：“里倒歪蔓。”

一个说：“啊，是谢掌柜的，到屋里抽口烟吧。”

人体器官

靶子——人头。
苗——头发。
大绒——女人辫子。
盘儿——脸。
盘亮——脸真好看。
花盘子——大麻子。
昭子——眼睛。
讯头——鼻子。
瓢——口。
条子——牙。
沙拉子——连毛胡子。
鸡爪子——手。
五腹子——肚子。
踏水子——脚。

物　品

喷子——枪，也有叫“旗子”、“花帽子”、“鸡蹄子”、“鸡脖子”等等。

柴禾——子弹，也有叫“瓢子”的。

叶子——衣服。
通天——大衣。
毛叶子——皮大衣。
盘条子——皮带。

穿龙——鞋带。

熏筒子——袜子。

邪叉子——褥子。

瞒天子——帐子。

月子——怀表。

开花子——雨伞。

韭菜叶——戒指。

汗条子——毛巾。

插子——钢笔。

青子——刀。

快嘴子——电话。

崩星子——火石，有叫“喷星子”的，也指火柴。

水饼子——肥皂。

操子——木梳。

板仓——箱子柜，大柜。

疙瘩——锁头。

排子——钥匙。

动　物

压脚子——马。

连子——马。

尖角子——牛。

爬山——羊。

山头子——山羊。

哼哼——猪。

江子——猪。

搂金子——狗，也有叫“皮子”的。

顶水儿——鱼。

扁嘴子——鸭。

长脖——鹅。

跳树——猴。

钱串子——蛇。

革鞋——蜈蚣。

大花鞋——蛤蟆。

山神爷——老虎。

仓子——狗熊。

芝花马——猫。

一般用语

倒——东。

阳——南。

切——西。

裂——北。

红光子——太阳。

炉子——月亮。

定盘子——星星。

轮得急——风。

插棚——阴天。

摆了——下雨。

流水窑——旅店。

啃水窑——饭馆子。

蔸子窑——茶馆。

混窑——澡堂子。

老秋家——理发店。

艺窑——戏院。

古楼子——庙宇。

压连子——骑马。

趴窑——住下。

甩飘子——大便。

甩浆子——小便。

掐灯花——黄昏出发砸窑。

上托——配合行动。

吃毛缵——盗出大牲口。

赶小脚——盗出一头猪，也有叫“滚哼哼”的。

喘鸣——偷出一些小鸡。

吃臭——盗墓的。

码上他——捆起来。

插了他——杀了他。

海台子——暗娼，也有叫“苦窑”的。

老头——银元，也有叫“萝卜片”的。

黑货——大烟土。

兰把子——耍钱，“摸叶子”、“玩张子”和“打川子”，都是用马掌牌和骰子赌博时的用语。

放台子——聚众开赌局。

接财神——绑票，也有的叫“养鸡生蛋”。绑架女的还有叫“接观音”的。

圈子——县城。

鸡毛店——农村。

捆龙——绳子。

旱烟管——棍子。

哑巴——剪子。

宝莲子——灯笼。

雾土窑子——大烟馆儿。

苦水窑子——药店。

花子房——要饭人住的地方。

漂五腹子——肚子饿了。

把枪窑了——把枪藏起来。

叉摸子——寻找同样的主。

片儿——钱。

飞虎子——大票。

挑片儿——分钱了。

打小项——给大绺子东西。

上项——给人家进贡。

吃皮子——勒索别的绺子的东西，让人家进贡。

吃横的——绺子里的头子。

苦窑——监牢。

码走了——被人绑走了。

绑票——抓人质。

支门子——找介绍人，保人。

勾挂的——保票的人。

斗花——小女孩。

念语子——哑人。

念昭子——瞎子。

外哈——外地盘的人。

秧子——被绑来的人。

红票——绑来的女人，也有叫“软秧子”的。

跳坑子——卖艺的，也有叫“耍脏钱”的。

耍清钱——耍钱的。

耍混钱——胡子，土匪。

明连子——说书的。

飘行里——剃头的。

撒网子——占卜的。

挑线的——卖血的。

靠死扇的——要饭的花子。

当家的——大掌柜的。

开局的——赌头。

水滚子——地头蛇。

吃长路的——贩卖人口的。

里几来的——本地盘的同伙。

方言土语

过去两个马——过去两个人。

压着——就是住着。

犯了条——犯了法。

捧你——维护你。

扣他走——带他走。

举举我——送送我。

不磕硬——不顶硬。

磕了一天——打了一天。

枪吃土——枪已上锈。

蹓跶着吃——走着吃。

交得宽——交得广。

托底守铺——信得过，老实巴交的。

反晃子——变卦了。

烫人家——骗人家。

爷台——神气。

歇虎——厉害。

护屁子——坐垫。

报　号

土匪都有报号。东北的土匪也不例外，就是在姓名之外再起个“外号”、“绰号”、“浑号”之类，这叫“报号”。东北土匪的报号五花八门，但归结起来，不外乎有这么7种，即：“枪法”、“地盘”、“民意”、“财气”、“事件”、“纪念”、“威武”等等，这主要是和他们的活动有关。

枪　法

东北的土匪以枪法的准确来起名报号是很多的，如“双镖”、“快枪林三”等。这是因为土匪的活动砸窑、绑票、义举、报复没有一样不是靠“管硬”、“管直”（枪打得好）来决定的。参加绺子的崽子首先要求枪法好。据说大绺子里吃饱了喝足了唯一的娱乐就是玩枪使刀。

玩枪也多是练枪法。比如，大家都坐在屋里大炕上，把窗户敞开，窗外的墙头上挨排插上蒿子或酱杆儿，然后开枪射击，比谁用枪“掐的齐”。大当家的都是这样打出名的。另外，绺子里的四梁八柱和大当家的一般都是使“双家伙”，左右开弓，骑马点射，空中打飞物，夜晚打香头，说打鼻子不打眼睛，这一套必须熟练精通。

“双镖”的来历就缘于枪法。有一次，他一个人“搓单”干，去抢一个大车。他装作买卖人，搭车坐在这个大车上，准备等车进入了高粱棵子大道好动手。走着走着，就见从远处飞来两匹单骑，到跟前说：“站住！你们谁是掌柜的？”这两个也是劫道的。这真是做贼的遇上打杠子的，双镖心里这个气呀，于是说：“我是当家的！”

那两人问：“有枪吗？”

“有。”双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枝枪扔出10多步远，“自己拿去。”

那两个小子一见有枪，双双跳下马来，弯腰去拣，双镖顺手从后脖梗又抽出两枝匣子来，“砰砰”两枪，左右开弓，把那两个人撂倒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瞎犊子，没看俺是干啥的！”然后，对车老板一抱拳说：“掌包的老板子，让你们受惊了。我今个本打算抢你们的车，不想让这两个小子当了替死鬼。好！你们走吧！”说完，他把那两个死尸拖进高粱地里，骑上一匹马，拉着一匹马，扬长而去。从此，这一带就管他叫神枪“双镖”。

地　盘

以地名、地盘、地点、山头来定名报号的，这在东北土匪之中也不少见。绺子都有自己的老窝，这个地带往往是属于他的活动范围，别的绺子进来是属“闯盘儿”，这是不允许的。绺子报号带地盘字样的，说明了这个大掌柜的资格。如“常山虎”、“土岗龙”、“阴山”、“水边”、“占东岗”、“老三省”、“三团主”等等。前面说过的“老三省”就是这样，他觉得自己命定的是三省的“主”。当日本人侵略了东北，他一不投共产党，二不靠国民党，只觉得东北三省如果都沦陷了，他这个“老三省”不是也不存在了吗？干脆和日本人干吧，于是组织了几个绺子的人马，和日本人较量起来。

民　意

土匪再凶恶，也不愿得罪百姓，事情就是这样地矛盾。这是因为他们本身也是人，也有父老乡亲。有时官兵或联队追得紧了，他们往往要到亲友乡民家里躲躲。他们干坏事，却怕别人说他们坏，怕人们指责他们，为讨吉利，往往按民意报号，如“南来好”、“北来好”、“东来好”、“西来好”、“一江好”、“两江好”、

“三江好”、“五江好”、“九江好”、“半拉好”、“大家好”、“哥俩好”、“青山好”、“绿林好”等等。

财　气

起局建绺，都为走运发财。有的大当家的就以财宝之类名称报号，如“宝全”、“金局”、“银堆”、“金闪闪”、“开门宝”、“出门宝”、“宝盛”、“财神爷”等等。稍有点文化的绺子里的大当家的，如果以财气为报号，也有起什么“达三江”（取“财源茂胜达三江”的古句）、“飞虎团”（飞虎子——指大票的钱）的。

事　件

偶然发生了一件事，决定了这个绺子的报号，这在东北土匪之中也不在少数，如“顺风耳”。民国18年，农安北黄鱼圈一带起了一股土匪，大当家的叫“顺风耳”。年轻时，他因枪法好，被一个大户人家请去看果园。那个果园很大，晚上有人来摘果，他贴在树上一听就能听到。偏巧，这家主人有个儿子，刚从外地回来，不信他有这个本事，就在一天晚上，进果园偷果子去了。深夜时分，年轻人听到草和树叶的响声，知道那边有人摘果，就说：“行了，摘几个你走吧！”主人家的二儿子以为他是“炸庙”（东北方言，就是诈唬对方的意思），就还摘，他又叨咕：“你走不走？”他还摘，就是想试试他。年轻人火爆性上来，顺手发出一支“袖箭”，当时就把主人家的二儿子给撂倒了。由于他是护园，主人家也没怪罪他，主人家的儿子养了几天也好了。不久他占山为王当了土匪，就因耳朵好使，报号“顺风耳”。

抚松的“刘不开面”，是在处罚了他的起局好友之后叫开的。“大来好”原先是叫“打得好”，因一次从吉林野炮团里拉出来，沿途边打边退，当傅殿臣派人救他时，就根据那次打得漂亮给他起名“打得好”。

纪　念

有的绺子的报号是有纪念性的。这主要是某个绺子半途之中更局改号的，也有起局时或在此之前有了什么举动，作为纪念而报号。

如“穿山甲”，他是抚松的一个绺子，一个人“单搓”。1937年夏的一天夜里，他装成借宿的，混进“木房子”掌柜的（山场子的大财东）大院套，一个人砸了响窑，劫走金银大洋一背褡子。护院的发现后，提着灯笼追他。他身轻如燕，穿岭过涧，飞树跳林，把护院的远远甩开了。从此他给自己起名叫“穿山甲”，就是为了纪念这一次出击。他是东北唯一较出名的“单搓”土匪绺子。

再如“包打一面”。原先，他是一个绺子里的炮头，也没有报号。后来在一次砸窑途中被官兵包围，他对大掌柜的说：“大哥，你领兄弟们划！我打这一面子！”

“能挡住吗？”

“放心吧！包打一面子！”

大掌柜的领人先走，他一个人躲在一棵歪脖子树后双匣子断后路，将官兵挡住一夜。不久，大当家的得病死了，大伙推选他当大当家的。报什么号呢？有人说：“那次你不是一个人断后，包后一面官兵一宿也没上来，就叫个‘包打一面吧’！”他同意了，还挺乐！

威　武

当土匪，靠的是“管硬”、“管直”、“胆壮”，就是说一定要够个“汉子”。以威武的气质报号，给人以刚烈之感，这也是东北土匪、绺子、胡子、响马的一大特点。

以凶猛的动物为名的有：“下山虎”、“飞龙”、“山豹子”、“野马”、“大龙”、“二龙”、“金龙”、“龙双”、“千条龙”、“小白龙”、

“黑龙”等等。

以枪法的猛准为名的，有前面说的“包打一面”、“打得好”、还有“双镖”、“滚地雷”、“火神爷”、“神枪马”等。

以人的猛勇悍武为名的有：“老北风”、“刘大马棒”、“徐大马棒”、“徐老帅”、“双胜”、“万胜”、“守司令”、“大威”、“占胜”、“常胜”、“侯老帅”、“北霸天”、“南霸天”、“驮龙”、“驮虎”等等。

此外，一些有了马匹而行动神速慓悍的绺子，也往往要以“岗溜子”、“一股风”、“旋风队”、“草上飞”、“野马”、“飞虎”、“快马林三”等等来起名报号的。

穿　戴

东北土匪的穿戴，也有独特之处。冬天气温下降到零下 40 多度，他们的穿着必须暖和轻便。

先说帽子。清末民初，人人头上都有辫子，为行动方便，土匪们往往把辫子缠绕在脖子上，头上扣一顶八块瓦的帽子，耳朵上戴耳护子（也叫耳包），多是黑色缎子制成，绣有暗花，里面有棉花或毛皮，还有的干脆弄两块动物皮毛（有兔皮、狗皮等等），又柔软又轻松。后来头上的辫子剪掉了，土匪们的帽子也开始变化，春秋多巴拿马礼帽，夏天是草帽圈子、草帽和瓜皮小帽；一到冬天，大哥和四梁八柱大多是土耳其式水獭绒帽，弟兄崽子则多是瓜皮里缎帽头、黑帽，或长毛皮帽子。皮帽子的毛很长，有兔皮、狗皮、猫皮、狐狸皮、狼皮、猞猁皮不等，但都是长毛，可以遮住后脖梗子，以免北风和雪花钻进去。另外，也因他们常把短枪藏在后脖梗子边上。打仗时，棉帽子“烧”耳朵，他们大都把帽耳系起来，扣在脑后，这也是为了保护脖子不受风吹和短枪不外露。

上衣，多是对襟黑布棉袄、夹袄，一排拴摸疙瘩，但是不系，

而是系一条腰带子，外边是一件大氅或棉袍。枪别在小棉袄的腰带子上。行走骑马，需把棉袍的一角撩起来，掖在腰带子上。这样穿戴多是那些大当家的或四梁八柱。弟兄和崽子们多是小棉袄外套一件棉坎肩。这坎肩有棉布的，更多的是动物皮毛的如兔皮、狗皮、狐狸皮、狼皮、鹿皮、虎皮、狍子皮。还有皮袄，一般当大氅穿，也叫“护腚袄”，盖住屁股，外系一条腰带。

土匪的腰带子，一般都是黑布、蓝布两种。他们的腰带子用处很大，除了别枪挂刀外，里边还可以藏金卷银，另外可以当绳子用。当土匪的不离绳子和带子，这两样东西都有大用场。有时到谁家做客，他们大都是靠窗台坐，万一有了紧急情况把腰带子一头系在屋里的凳子上，一纵身跳下窗子，就可以逃走了。再就是可以用腰带子上房、上树、上墙、下井、下窑等等。总之，土匪的腰带子用处极大。

护肘和套袖。土匪的护肘，多是动物皮毛做成的，袖手插在里边，十分暖和舒适，此外还可以掩盖藏在里边的枪和短刀。小棉袄的袖子上套一副狗皮套袖，借以保护手心手背。东北土匪的这一打扮，也是从满族的马蹄袖头演化而来的，既轻便，又实用。

土匪们的裤子多是紧腿马裤，下边打绑腿，里面藏着“腿刺子”（一种小而尖的短刀）。也有外穿套裤。套裤，是东北人发明的一种穿戴，对那些在山里放山、打猎、放排、淘金、采药、挖煤、采珠、捕鱼的关东人是最合适不过的穿戴。这种裤子没有裤裆和裤腰，穿起来行走灵便，坐下站起的不用提裤子系裤带。套裤肥大，土匪可以在里边藏枪藏刀。特别是骑马的土匪，穿上“套裤”，奔驰来往不受风寒。

在本世纪初或二三十年代，东北土匪的鞋子多是靰鞡，靰鞡是用上等牛皮制作的。据说做靰鞡的牛皮都是从活牛身上扒下来的，先把牛的四蹄皮从根割开，再把牛头从嘴割破，一直卷到脖子，然后一拧，狠狠掐住，用铁丝子栓在大树上，再用木棒狠击

牛的屁股。这时，牛已疼得不能忍耐，在木棍猛击下，那牛猛向前一蹿，整个皮从头到尾被剥了下来。牛皮冒着热气，皮不充血，平整，厚薄均匀适度。这样整张的牛皮，去掉四肢、脖子和肚皮上的部位，剩下的才用来做靰鞡。靰鞡这种鞋帮底相连，新靰鞡就象是只牛皮船，不分左右脚。穿靰鞡要先光着脚缠上靰鞡草，缠靰鞡草要厚薄均匀，不紧不松不漏不串。有经验的人只缠3把草，先当腰一把，再脚尖一把，最后脚跟脚脖一把，缠好草穿靰鞡，再扎上腿带。腿带是用宽的蓝粗布条子带同棉裤腿一起扎上几道，有的扎在绑腿外边，最后勒紧靰鞡绳在腿带上打个活结。白天穿一天，晚上脱下来时，要把靰鞡草抖搂开，不使汗和草粘连。土匪如在冬天砸进窑去，就让这家的小伙计和半拉子给他们脱鞋，抖搂靰鞡草，一抖搂满屋子一股臭脚丫子汗气味。夏天，土匪多穿布鞋和胶鞋，又防雨又轻快。由于胶鞋很少，他们往往在布鞋外打个胶布鞋套，防雨防水。

土匪常穿的鞋还有“毡疙瘩”，这是用羊毛擀的，做成长短不一的筒靴、筒鞋，暖和，不冻脚。有的做成鞋套，套在单鞋的外边。有的里边穿上大布袜子。这种鞋的特色是轻松、软暖、防潮、吸汗。还有一种鞋，叫“水靰鞡”。水靰鞡，就是那种大脚指头和其余4个指头分开的鞋子，胶底，帆布帮，多是日本造。

另外，土匪的服装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护屁子”。护屁子是土匪绑在屁股上的皮子，主要是可以随走随坐，无论在山上还是在平原，可以防凉防潮，很方便。护屁子有1尺见方那么大，护住屁股和裤裆，多是狐狸皮、狗皮、猫皮、虎皮、兔皮、海龙皮、或老耗子皮和棉布做的。在二三十年代，一般的土匪穿戴和东北农民差不多，上述的这些穿戴，多指那些大局大绺而说的。

娱乐、习俗及其他

土匪也有自己的娱乐、玩耍和游戏，什么押宝、看牌、下连、走五道、“憋死牛”、比枪法、比刀枪和猜迷，看小戏等。其中最常见的活动是“打飞钱”赢子弹和划拳行酒令赢酒喝。

打 飞 钱

打飞钱，就是弄来一串古钱，挂在树上，一般距离在百步之内不等，开枪射击，击中铜钱者为胜。那串钱也就归胜者，实际是一种赌博游戏。绺子里常常进行这类游戏，因这可以和演习枪法结合起来。四梁八柱和崽子们比，四梁八柱之间也比。更精彩的“打飞钱”，是用弹弓子把飞钱射入天空，然后举枪射击，击中者为胜。这往往是大炮头、二炮头才能胜任。

行 酒 令

这是土匪中很常见的一种娱乐活动。

在砸窑之后，如果有菜有酒，他们就边喝边划拳，行酒令，但多数时候是回到绺子里，这样会更安全，行起酒令来也就更热闹。行酒令最少是两个人，喝酒前两人围着桌子坐下，或在院子当心铺上一块炕席头子，先要唱“酒令”：

当朝一品卿，两眼大花翎，三星高照四季到五更。

六合六同春，七巧八马九眼盗花翎，十全福禄增。

打开窗户扇，明月照当心。

唱完了，接着就划拳。不会唱者，先罚一杯酒。划错者也当然要喝的。土匪的“酒令歌”南北方有很大不同，北方以数数为主，如从1到10，而南方土匪的“酒令歌”却多以述事为主，这可能同东北民间的地方戏曲、二人传的影响有关。

自演自唱

土匪的精神生活是枯躁和空虚的。为了聊以解闷，有时他们自己也演戏，或扮演角色，自拉自唱，以消解内心对家庭亲人和故乡的思念，这些小戏小曲，常常是有情节的叙事故事。

他们搞这种自演自唱的活动时，往往要在非常安全可靠的地带进行。

杀人取乐

土匪有时也以杀人害人为娱乐手段。有一次，永吉县“半拉好”绺子的土匪在山上走，看见前面来个怀孕的女人，这时一个土匪说：“她肚子里的一定是个丫头！”另一个说：“一定是小子！”二人争执不下，举枪就把那个孕妇打死了，然后用牛耳尖刀开膛破肚，看看是男是女。永吉县西下河子大洼地一带，有个土匪叫张发，此人凶狠至极，一时兴起，竟然把人脑袋割下来，砸了，喝人血。还有的把“票”的耳朵割下来，拿着当牌玩。

喜事丧事

绺子里也办喜事和丧事。喜事，往往就指大当家的娶压寨夫人什么的，也包括攻下响窑和年终“分份子”（分钱回家）；丧事就是指有的弟兄阵亡，就要举行葬礼。

有固定地点的大绺子，一般办红白事也去请一到二班“鼓乐班”来。土匪去请鼓乐班，一般挺客气。进门见了鼓乐班掌柜的说：“鼓乐班掌柜的，给我们去几个好人，不怕花钱！”说完，扔下几个定钱。鼓乐班也不怕胡子，因为胡子一般不抢他们。鼓乐班来到绺子，头一通都要吹《九条龙》，据说十八罗汉外行，每两人骑一条龙，这9条金龙正好十八位罗汉骑着。不管是喜事还是丧事，《九条龙》是坐棚吹，悲悲喜喜，变化自如。一般的小股绺

子和行走无定的土匪是不请鼓乐班的。

在交战中死了弟兄，最后要埋葬。大当家的点上香，别的弟兄齐刷刷跪下，大掌柜的说："江湖奔波，人老归天。兄弟你走了，大伙来送你！"一个小崽子给烧纸。

劝 土 匪

"劝土匪"这一类民间歌谣，有时确能起到令土匪改恶从善的作用。《劝匪歌》一共16句，是在民间的《四季歌》和《劝满军》的基础上改编而来的，在东北民间流传很广。

1934年初冬，盘石的"滚地雷"带着他绑的30多个"票"，开进了驿马的老林子里。这一批肉票里没有几个"肥货"，至多是小康人家的家主和后代，有的"花舌子"已送去信，也不见来赎。这一天，天降大雪，滚地雷去投盘石日本人宪兵队，嫌日本人给的官太小，把日本人臭骂了一顿，一赌气返回山林。这时，天已黑了，30多个肉票围着一堆火，冻得哆哆嗦嗦地坐在那里，秧子房掌柜的逼着他们"熬鹰"，可是有几个肉票就是不听命令，而且低一声高一声地唱道：

"眼看过了秋，穷人百姓犯忧愁；为何种地不打粮？日本鬼子把税收。他们把咱当牛马，拿着户口把兵抽；一时不动棍棒揍，打得浑身血水流。我劝土匪弟兄们，别给俺们火浇油；日本强盗是咱大敌人，何不起来打外狗？土匪父老弟兄们，可想想，你是何种人？生在中华，长在中华，为何欺负亲骨肉……"

几个人一唱，大伙也围着火堆跟着唱起来。秧子房掌柜的举棒子挨个打，但他们还是唱。这惊动了屋里的滚地雷，其实他已听了半天了，这时走出来一挥手，说："都放了他们！"

秧子房掌柜的急了，说："大哥，这里有几张票，给200大洋都不出手！"

滚地雷说："少废话！还不快放人！"就这样，他的绺子里破

天荒第一次放掉了抓来的“票”。后来这件事在盘石一带传为佳话。

还有一首妻子劝丈夫的《劝夫歌》，也是劝土匪的。内中唱道：

“我劝丈夫快回头，别入局和绺；家中有妻又有儿，别在外逗留；杀人要偿命，害人要报仇；谁家没有子和妹？谁家没有马和牛？快拿人心比自心，别让家人犯忧愁……”

另外，还有一些《劝哥歌》、《劝子歌》，内容也是大同小异。

土匪中，也有“自劝”的。比如某某土匪得知自己的爹或娘“老了”（死了），当儿子的不能回去守孝，于是就光着脚到小庙上去报庙（冬天也光脚，以示孝心），没有庙，就搭三块砖头，边哭边叨念：“娘啊娘啊！怀孕养俺多不易！省吃省喝苦遭尽，儿却不能去送终！老人恩情报不完哪，清明节令去送钱……”主要是述说老人一辈子的恩德。这是土匪自己通过祭祀爹娘来发泄内心的苦闷。但当家的一般都不让，怕瓦解军心。

这篇有关东北土匪的史料至此搁笔了，尽管还不甚完整，有所欠缺，但是写土匪，搜集他们的资料有相当的难度，主要是这些人大部已经过世，就是有一两个活在世上，往往也年老体弱，不是听觉不佳，就是表达力太差。而文字资料简直极少，有，也是散见于浩如烟海的记叙中，往往也只是三言两语。几年来，我有意识地了解了30多人次，这些人中，有的是土匪头子；有的是土匪的儿子和亲属；有的自己让土匪绑过票或家里亲属让土匪绑过票；有的走南闯北，对土匪的生活多有所闻。另外，还参阅了各地县志及有关的书籍，完成了此文的撰写。

由于过去还不曾见过把有关土匪生活习俗归结成文，在编撰时一定有许多欠妥之处，诚望专家、学者和关心这个选题的朋友们批评指正。

（吉林省长春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清末东三省绿林

宁　武

一、绿林各帮概况

东北三省从清朝末年以来，就以产生土匪著闻。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它是甲午、庚子两次战乱的产物，是清朝反动统治黑暗腐败、对人民残酷压迫和剥削的产物。它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对于东北的侵略和荼毒所造成的结果，并非由于东三省人性喜为匪，更非由于东北这块土地适于产生土匪。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唯有这样，才便于进一步说明清末东北的土匪问题。

东三省的土匪多数是骑马的，所以又叫“马胡子”。它有反对反动统治政权的一面，但也有危害社会秩序、破坏生产力的一面。因此，我们对这些人要进行具体分析，方能比较正确的了解。

清末东北的绿林，主要产生于甲午、庚子到甲辰这10年之间。其所盘踞的地区，基本上在辽河下游一带及辽西各县，也就是甲午、庚子以及甲辰各次战乱的受害严重的地区。这些地区由于兵灾之后，地方糜烂，田野荒芜，民不聊生，社会上呈现极度动荡不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游手好闲的青壮年就要铤而走险，这是很自然的。同时，战后的一些散兵游勇，流散到社会上，无所事事，也是产生胡匪的一大来源。于是就有别具野心的不逞

之徒，利用这种机会，竖起绿林的旗号，啸聚徒众，称霸一方，俨然形成了独立王国，为所欲为，莫可谁何。这就是东北各帮胡匪产生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是以后军阀割据关东、称王称霸的历史根源。

当时各匪众主要分为以下几帮：

1. 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的冯麟阁。冯是海城县的衙役出身，为人贪残狠毒，利欲熏心，他看到社会动荡不安，认为有机可乘，就趁火打劫，混水摸鱼。为了欺骗群众，笼络人心，他也仿照义士赵志刚① 打起杀富济贫的幌子，纠合地方上的流氓赌棍、散兵游勇等，在盘山县的田庄台、辽中、台安、锦州、彰武一带横行霸道，抢劫淫掠，为害一方。解放后为我人民政府镇压的大汉奸张海鹏和曾当过绥远都统的汲金纯，都是他得力的助手。他的徒众经常有百八十人出没各地，最多时能啸聚到几千人。

2. 骄横强悍、独树一帜的杜立山。杜是辽中县人，家境贫困，为人豪爽。据说，他有 8 个老婆，都非常剽悍，杜和他的老婆都能骑马打枪，百发百中。他在辽中县威信很高，能纠合徒众千余人，枪马俱全，自立一帮。杜在各匪首中是最年轻的一个，但他的势力最大，声威最盛。伪满有名的汉奸于芷山，原来就是他手下的健将。

3. 具有政治野心的张作霖。张本是宋庆所部毅军的一个骑兵小头目，跟兽医官学了些兽医知识，退伍后回海城县高坎村开一小兽医庄。他因经常给各匪帮医马疾，因而同各匪帮都有所接触，

---

① 甲午战争后，牛庄有一铁匠赵志刚，为人有胆识，好打不平，深得贫苦群众爱戴，称之为赵义士。当地范姓恶霸地主逼令佃农白老头将其女菊花押为侍女，引起群众公愤。某夜赵侦知范夫妇毒打菊花，乃越墙而入，救出菊花，并将恶霸击毙，随即约集贫苦群众数十人组织穷人队，赵自率青壮年杀官济贫，为穷人报仇。老弱妇孺则由白老头率领，到处吃大家，声势颇为浩大。后赵加入同盟会，表现很勇敢，辛亥革命时，不幸因被部下出卖而牺牲。

到后来社会上都说张作霖是匪徒的窝主，所以也就迫使他走上了绿林的道路。当时张的势力，同其他各匪帮比较起来，还是很薄弱的，他的徒众最多不过数百人。但张有几个助手都很强悍，如曾经毒害热河老百姓的热河都统汤玉麟（绰号汤二虎），曾当过察哈尔都统和伪满内阁总理的张景惠和曾作过吉林督军的张作相等都是张作霖的得力助手。汤玉麟在捕盗营当兵，原是个赌棍出身，为了闯光棍，他用烧红的铁通条烫自己的肋骨，眉头不皱，谈笑自若；张景惠原是个豆腐匠出身，后拉起一小帮；张作相是泥瓦匠出身，在锦州也拉起一小帮。后来他们都投到张作霖的旗帜之下，入了大帮。张作霖在帮中本来是后起，他的势力所以扩展得那样快，和他手下这几个健将是有直接关系的。

4. 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金万福。金原是小站北洋新军的一个小头目，因不惯军队的纪律生活，回到家乡海城县，见到当地土匪势力很大，而且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他就起意纠合一批流氓、恶棍、赌徒等成立匪帮，他自己当上了头目。但他因为人少力弱，便拜冯麟阁为老大哥，等于冯麟阁的一个别动队，唯冯之马首是瞻。

5. 混入匪帮进行间谍活动的日本人王小辫子。所谓王小辫子，就是甲午战争时在旅顺口被清军捕获的日本间谍田老二的同伙“王老板”（他的日本名字已记不清了）。他是甲午战争后日本潜伏下来的特务机关长，有一个助手叫林大辫子，日本原名叫津久居。他们都是日本现役军官，潜伏在中国作间谍活动的。这两个人和众匪拉拢勾结，为各匪帮供应枪械子弹等，自己也成立一小帮，跟着各匪帮活动。

以上这几帮红胡子都是在庚子前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冯麟阁的资格最老，除金万福拜他为老大哥外，杜立山和张作霖都算是他的晚辈。杜立山有个本族叔父名叫杜泮林，是辽中县一个举人，给众匪首出谋划策，俨然是他们的军师，除因年龄关系，和

冯麟阁以弟兄相称外，张作霖、金万福都拜他为义父。各匪帮初起时，抢劫财物，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庚子以后，他们的做法有所转变，基本上是各踞一方，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已不以一家一户的抢劫为主，而是与地方富绅、地主勾结，并与官吏互相默契，各在所盘踞的地方实行保险，即保证在所保险的界内不发生绑票抢劫案件，而由界内居民按月摊派一切费用。这样，地方上虽然可以苟安于一时，但是劳动人民的负担就越发沉重了。

二、日本间谍对胡匪的勾结和利用

甲午战争后，东三省成为帝俄和日本两大侵略势力角逐之场。日本因被帝俄联合法、德两国强迫归还辽东半岛而始终不肯甘心，一直在进行阴谋活动，想实现它的所谓“大陆”政策。因此，日寇秘密派遣现役军人潜入东三省及内蒙等地勾结和联络土匪，并挑拨汉、蒙族之间的关系。王小辫子就是负有勾结和联络土匪任务的一个日本军人。在甲午战争前，他是在旅顺口和山东威海卫一带刺探我国海军情报的大间谍。战后他又混入东北匪帮之内，极尽拉拢勾结利用之能事。他的助手林大辫子和同盟会的兰天蔚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辛亥革命前二年，笔者曾在兰天蔚家里见过面。那时他着日本大佐的军服，自称是关东厅守备队驻瓦房店的一个联队长。这次王、林两人在勾结和利用土匪的问题上所下的工夫更深，所起的作用也更大。在东北土匪的问题中，这是更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因此，特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写在下面。

王小辫子和冯麟阁、张作霖结为盟兄弟，金万福因与冯的关系也常同王接触，后来成为密友。这几个匪首都称王为大爷，唯杜立山则不然。杜与王不相往来，因为杜立山的第三个老婆就是甲午战争时在小平岛杀死前夫日本间谍田老二的那个英雄女子。

他在众匪首宴会中见到了王小辫子以后，王氏将王小辫子的一些情况说给了杜立山，所以，杜对王小辫子始终保持着警惕，拒绝和他接近。

杜立山虽是冯麟阁的晚辈，但他与冯的关系比较深，冯对杜也较亲近。杜曾劝冯说：王小辫子是一个日本间谍，他所以要混到我们这里来，是不怀好意的；我们过去不得已走上了土匪的路，这已经是很难看的了，再受日本间谍利用作个卖国贼，那岂不更是留骂名于千古吗！后来冯把杜劝他的这番话，告诉了金万福。金听到后，一方面在表面上对冯进行敷衍，另一方面对王不但不戒备，反而更加密切了。王听到金的诉说后，更加利用种种手段把金紧紧地笼络在他的手中，使金完全听从他的摆布。金在王的吹拍之下，更加得意忘形地劝冯说：人生在世，总要有个出头露面的日子吧，我们搞这种勾当，到什么时候才算了呢？这能有什么好下场呢？接着他就把王的情况介绍给冯说：不错，王确实是个日本人。他因为在军队中犯过错误，不愿回日本，就流落到这里和我们混在一起；我虽然和他认识在后，但是他很相信我，对我无话不说，可说是相印以心。他过去在陆军中当过将官，有好多同学同事和三井洋行老板有关系，我们和他多接近，不但现在的枪械子弹容易解决，而且将来我们缺钱有钱，缺人有人，哪里有这样好的借重呢！我看我们应该想开一点，日本固然是中国的仇敌，但这和我们个人又有什么相干呢！我们要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不要听杜立山这个小子胡说八道。杜立山耳朵软，听老婆的话就信以为真，太没有汉子气了。我们应打定个人的主意，不要三心二意，摇摆不定。金的这番话虽然打动了冯的利欲念头，但杜立山劝说他的话已先入为主。是留骂名于千古呢，还是贪图快意于一时呢？这两种思想不断地在冯的脑海中斗争着。因此，冯对王小辫子也就采取不即不离、亦即亦离的态度。

杜立山的忠告，终究是战胜不了日本间谍处心积虑的勾引。冯

麟阁对王小辫子虽然存有戒心，但仍逃不出王的魔掌。金、冯两个匪首终于在日本的指使下，出动他们的骑匪破坏东清铁路工程，并扬言除非帝俄拿出巨额代价，绝不停止扒路活动。帝俄侦知这种情况，派便衣人员设法把冯捕去，押赴西伯利亚下狱。但为时不久，又由王小辫子收买中国通事（即翻译）刁义廷从西伯利亚监狱中把冯营救出来，回到奉天，仍旧干他的老勾当。从此以后，冯、金同帝俄结下了深仇，同日本间谍王小辫子结成不解之缘。

甲辰日俄战争中，日军在辽阳南首山一役遭俄军抗击，屡攻不下，伤亡惨重，结果利用冯麟阁、金万福所部骑匪数千人组成的所谓“忠义军”（当时人称为“花膀子队”），从辽河以西挺进，抄袭首山的右侧背。俄军出于不意，放弃首山，向北败退。日军乘胜长驱北上，俄军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日俄战争胜负之局，由此也就决定了。冯、金两匪部，帮助日本袭击俄军，使首山战役转败为胜，因而决定了整个战局，对日本来说，这是很大的一功。日本军事当局奏明天皇奖赏他们两人宝星勋章，并电请清政府将这两个匪首收编重用。不久金、冯两人就被清政府擢用为奉天省巡防营统领和帮统。虽然如此，冯麟阁多少总还知道一点民族气节，以后渐渐地与日本疏远下来，唯有金万福一心甘愿作汉奸，所以他的帮统衙门里用了大量的日本顾问为其出谋划策。日本还利用金、冯与张作霖明争暗斗，制造纠纷。金所部巡防营驻在铁岭、开原一带，常在辖区内兴风作浪，敲诈撞骗，设赌抽头，在奉天绑票勒索，由此，土匪变成了官匪。

三、张作霖的起家和杜立山的被消灭

张作霖对各匪首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一般说来，还敷衍得不错。他是个机警过人、别有野心的人物。庚子变乱之后，他看这样干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就同张景惠等几个得力伙伴计议

说：我们长此在绿林中吃黑饭，前途是暗淡的，是毫无出路的。我看不如借我们现有的这点实力作本钱，向官家讨价，弃暗投明，总比这样继续干下去有些出路。当时他的几个伙伴都表示同意，并且说，只要当家的（匪中黑话，即首领之意）有好办法，打定主意，我们无不唯命是听。张接着说：只要大家愿意，我自有道理，不过在未实现以前，必须严守秘密，如果泄露出去，不但事情要失败，而且更要被绿林朋友耻笑。你们也许听说了吧，奉天将军增祺带家眷逃到锦州、义州一带好久，后来他自己回到奉天，家眷就进关去了。听说前些日子已派人去接他的家眷回到奉天。现在火车只通到沟帮子，这就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将来曾的眷属从此经过，我们要连人带物都给劫下来，但不准乱动，到时听我的命令行事。关于这一点必须同众弟兄讲清楚，违者就要以手枪相见。

果然，不久曾祺的老婆和随护人员，乘着十几辆马车行至新立屯附近一条荒僻路径，就被张作霖早已埋伏的匪众拦截住，将大小官弁所携带的枪械子弹以及数十件箱柜全都劫了下来，连人带物一并押解到新立屯街上。

他们把掳来的人员车马都安顿停当，单给曾的老婆和她的贴身侍者安置在一座很好的房舍里，并用最好的鸦片烟款待曾的老婆和随行人员。这些人看到这帮土匪非常温和，很容易接近，心中有些莫名其妙。张作霖又亲自招待随行的几个重要人员躺在床上吸鸦片烟，还表现出唉声叹气的样子，并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如此的软弱，毫无国际地位，受尽了外人的欺凌，国内人民生活竟达到这般境地，真使我有说不出的伤痛！我们所以当上土匪，也是被逼上了梁山哪！曾太太的随行人员看到张谈吐如此文雅和满腹牢骚的情景，料定其中必有文章，其中一个比较有地位的人搭讪着说：我们很同情你的处境，我想我们将军来到奉天一定会有办法的，你们也一定会有出头露面的那一天。接着又说：请原

谅我不懂规矩，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我要大胆请问您贵姓。张答说：我就是张作霖。这几个人一听是张作霖，倒抽一口冷气，一时都很愕然。这些人过去听说张作霖是奉天著名的一个匪首，生成的身魁力大，面貌凶恶，今天真个见了面，却是这样一个儒雅温和、文质彬彬的廿六七岁的青年，暗中觉得有些诧异。张作霖接着就把自己的身世和为什么会走上绿林这条路的前因后果，很坦率地说出来了，言下流露出一股愤懑不平之意，对奉天将军曾琪故意特别表示怨恨，说曾到任不久，不弄清真假虚实，就要严拿法办，使我们有口难分，不过我们干这个勾当，个人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了！那个随员接着说：依我之愚见，长此同官家作对，毕竟是没有好处的，为了个人的前途，我看你们弃暗投明，才是正路。随后问张：假如有这样的机会，尊意如何呢？张回答说：我已说过了，我们是万不得已才当上土匪的，假如能得到机会为国家效命是正合我们的心愿的。不过听说曾将军这个人很固执，我们现在还很难使他改变态度，等等。张接着又问：你们究竟是哪一部分的呢？那位太太又是谁呢？请放心，我们保证不会加害你们的。带头的那个人思索片刻说：待我回禀太太一声，取得她的吩咐再同你谈。这位随员立即去见曾太太，把和张作霖的谈话经过述说一遍。曾太太当时考虑，一来为了解除眼前急难，二来为了替曾琪去一地方治安的大患，论公论私都应见张一面。她和随行人员商议决定之后，准备与张一见。张入室行了个大礼参拜，低首站立着说：张作霖冒犯夫人，愿听吩咐。曾太太看张对自己很恭敬，也很谦逊，就对他说：我明白告诉你吧，我就是曾将军的夫人。我们这次是由京城来到奉天，路过此地。我原在省城时，就听说绿林各帮与曾将军为难，特别是你的声名最大。现在路上巧逢，想不到你这样对待我们。适才听到随行人员报告关于你过去的一切和你的愿望，我很同情你，我看你是一个很有为的青年，而且又有这样一部分力量，假如你能很快地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前

途一定是不可限量的，我想你一定会愿意这样作吧！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达奉天，我也一定保证向曾将军建议收编你们这一部分力量为奉天地方效劳，既有利于地方治安，你们也有了出路。你看这样作好吗？张立即称谢，并说：假使我张作霖能带众弟兄投到曾将军麾下，为国家效命，有生之日，决不能忘掉曾太太的大恩。随即辞出与张景惠等说明，并命令匪众把所劫的东西连同枪械子弹照数交还随行人员查点清楚，寸草未动。曾太太和随行人员更大受感动，并命出5锭纹银赏给张的部众。张婉言谢绝说：只要我们有出头露面的一天，那就殁世难忘了。曾太太一行人等随即离开新立屯，平安回到奉天。

曾太太到达奉天后，立即把途中遇险和张作霖诚心弃暗投明的愿望说与曾祺，并且把张作霖的实力和他的为人以及她本人对张的看法，详细向丈夫叙说了一遍。曾祺听太太和几个亲信随员说了这些情况，一时大为动容，经过考虑后，决定奏明清廷，并命新民府知府增韫（子固）把张部收编为省防营。这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事情。从此以后，张作霖和他的3个助手就成为奉天省防军的正式军官了，但仍驻在新民地方负责维持这一带治安。

过了不久，曾祺召张作霖到省城进见，张作贼胆虚，托故让张景惠顶替他去省城见曾，被曾的左右识破，禀明了曾祺。曾知道张作霖有所顾虑，加以原谅，并指示张景惠说：只要你们真能为朝廷效命，我就一定准许你们戴罪图功，决不会欺骗你们的。现在奉天省还有杜立山等几个匪帮为害地方，应密告张作霖相机图之，如能为地方除掉这些巨患，那就是你们的大功，将来一定还要重用你们的。张景惠受到曾的抚慰之后，回到新民如实对张作霖说明，张作霖听到后，又羞愧又感动，同时内心也就打定主意了。

奉天各匪帮中，实力最大的算是杜立山了。他在匪中独树一

帜，除对冯麟阁以老前辈相待、特别尊重外，对其余各匪首均不在话下，骄横傲慢，目空一切。杜和金万福不常来往，对于张作霖的投降，认为没有骨头，加以鄙视。日俄战争中，冯、金两匪帮助日本攻陷首山有功，经日本建议清廷收编为省防营，其他零星小帮大部被张作霖陆续消灭。到了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只有杜立山一股还为害辽西一带，未被消灭。这时徐世昌已任东三省总督兼练兵大臣，带了一镇（即一师）陆军到奉天，以壮声势，首先严令新民府知府沈金镛和张作霖二人共同负责，限期剿灭杜立山匪众，逾期不灭，惟他们两人是问。因此张作霖对此案就更加重视了。

其实张作霖在投降前对杜立山就认为是上眼皮子了，投降后更视为眼中钉，早已打定主意要消除他，但当时只是苦于难得下手，这次机会总算到了。在未动干戈前，他同沈金镛计议，秘密布置自己的心腹，对杜立山的匪众进行分化，同时以朋友交情劝他投降为由，派亲信诱请杜立山来新民宴会，以便乘机捕杀。但这一计遭到了杜立山的拒绝。去人回来说：杜立山的态度仍然很骄傲，杜并说：张（作霖）为官，我为匪，我们已经是走两条道路的人了，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朋友和交情，我们是有骨头的，我们看他升官好了。张知道杜立山很听他叔叔杜泮林的话，张就以义父子的关系，亲自把杜泮林接到家里，优礼相待。张向杜泮林表示，他常想劝杜立山改邪归正，并说：以立山的才干和力量，何愁不青云直上呢，可是立山始终不肯回头，前几天因徐总督带兵到省，觉得他再这样干下去太危险了，特设酒席请他来，再进最后忠告，可惜他反而误会了，不但拒而不来，并且说些闲话。这次请老人家来，就是为了此事，仍想请他舅叙共商进止。现在徐总督带重兵来奉天，决心要消除地方匪患，不象从前自家朋友，彼此可以相安无事心照不宣了。立山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趁徐总督还没有动手的时候，我和沈知府力主招安，他投降是有把握的。

老人家如果同意，拟请亲自出名邀他前来，以免再发生误会。杜泮林听了这番话，认为张作霖很够朋友，是完全出于诚心善意，慨然应允，并亲笔写信给杜立山，要他马上前来。杜立山见到叔父的手谕，也就毫不迟疑地来新民府赴约。他恃有实力，骄傲自满，同时又有自己的叔父从中为力，根本没有考虑张作霖别有歹意，因而毫无戒备。但张作霖暗中早已布置好了，当杜立山到后，表面上表示特别欢迎，并对杜泮林尽量恭维，使杜立山无所疑虑，因此使杜坠入了他的天罗地网而插翅难逃了。一个暗号，里外同时动手，当场把杜立山捕捉起来，外边也把他带来的十几名底柱缴械捆绑了，随即经派来的警务处人员监视就地将杜处决。

到此时杜泮林如梦方醒，才知道是中张作霖的诡计了。杜指责张作霖卖友求荣，无信无义，要和他拚命。张作霖很镇定地说：杜立山凶横残暴，恶贯满盈，我奉总督之命为地方除害，这正是大仁大义。事前所以不同老人家说，因怕事机不密，就要大动干戈。这样一来所全者大，所伤者小，老人家为了侄儿，情固有所难堪，如从大义灭亲的道理看去，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了。这次兵不血刃而为地方除一巨患，完全是老人家的力量，我张作霖决不能贪天之功为己功，一定要报请徐总督从优奖叙。杜泮林气稍平和，回答张作霖说：我没料到你会这样欺骗我，我已老了，苟全性命，不求显达，所最痛心者，是我诱骗了我的侄儿。侄儿虽不是亲手所害，却死于我手。言毕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张作霖极力安慰，并保证对老人家晚年生活负其全责。杜泮林见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勉抑悲怀，对张说：算了吧，为奉天除害，你是作对了。死者不可复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希望你对他的身后加以照顾，对于他的部众有所安抚。你赶紧向总督报功去吧．前途远大，好自为之！张又安慰杜泮林一番，答应对杜立山的家属一定要尽到朋友之情。

杜立山的匪众因已作了分化工作，除少数抗拒的已予剿灭或

逃散外，其大部分均降服，报准收编。张作霖因这次剿灭杜立山有功，被升任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张景惠任他的帮统，张作相、汤玉麟都作了他的管带。抄获杜立山的赃物，只白银一项就数百缸，均上缴省防军营务处，枪械子弹、马匹留营使用，免予上缴。徐世昌另外还赏张作霖银1万两。从此奉天省的大帮土匪都已消灭，张作霖的实力益强，后来就成为割据东三省的大军阀了。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

长白山土匪

顾正仁　沈明勋

匪　情

今浑江市所辖之3区（八道江区、三岔子区、临江区）、3县（长白朝鲜自治县、抚松县、靖宇县）位居吉林省东南、处于长白山腹地之西麓和西南麓。境内沟谷纵横，群峰突兀，巉岩危壁。地上森林蔽日，植被茂密，地下矿藏丰富，构成了长白山独特的立体资源宝库和宜人的自然景观。浑江市统辖的广袤地区建置不过百年。原因是清朝政府曾视长白山为“龙兴之地”，予以“封禁”。自顺治到咸丰的200多年间，盛京将军派台兵在此巡守，禁止关内百姓进长白山区打柴、狩猎、游牧、采集、垦耕。凡来此谋生的人，多数都是濒临危亡的贫民，他们不惜以命相许，以求死生之间的一逞。在长期的与自然和社会的拚搏中，养就了长白山人粗犷、豪爽、勇猛、任性、刚毅、残暴等等复杂的天性。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既留下了人民英雄的业绩，也留下了胡匪耻辱的血污。据档案记载，仅在临江县区内，从民国7年到民国20年的13年中，上报到奉天省的胡匪案例竟多达数千个。

其时匪患遍地，山林里有匪，木场里有匪，孤屯有匪，闹市区也有匪。一家人有人当兵，有人为匪。如濛江县（后改称靖宇县）有个匪首“王太平”，他母亲王老太太就为匪多年，她的6个

儿子，5个是土匪，1个却当了兵。有的明里做生意，暗地为匪牵线拉票，民国11年六道沟居民傅永财（当年42岁）以作木厂为掩护，认匪首“红子”为义子，为其探信牵线，从被抢被绑的钱物人票中渔利。有的明里是兵，暗地是匪；入队为兵，单行为匪。有许多大买卖、大商号、大户既靠官又通匪，有的甚至依靠外国人的保护。民国9年前后活动在濛江、青江园一带的“长江好”（匪首张魁武），依托朝鲜炮台山为据点，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窜入境内烧杀抢掠，匪众多达470余人，仅一次通过日本人买到快枪1000枝、炮2门。这帮土匪杀人越货，残忍已极，自民国9年11月17日至民国10年2月1日3次共绑去人票64人，在2月26日一天，就用刺刀刺死53人。民国16年，临江县地面上较大土匪帮有“老得江”、“仁义军”、“新军”、“铁雷”、“战九洲”、“战中华”、“上山好”、“青山好”等等。这些土匪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同年7月，“战九洲”等匪帮800人攻入八道江，杀死区官，掠财无数，烧房300多间。警甲畏匪如虎，“人民探知匪情报告就近警甲，则迟不敢出击。匪已他遁，又重责人民以妄报之罪”。在这种民无宁日、朝不虑夕的情况下，红土崖五道峡羊岔（今芦家沟）住户张宗耀集资返鲁，请来刀会法师张树声设坛授法，成立了大刀会，提出口号：“消灭土匪，保家安民。”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土匪，并在短时间内，先后消灭了“久胜”、“玉山”两股匪伙。10月初，打败了拥有300余人的大帮土匪“上山好”，中旬活捉了拥有百名匪徒之匪首侯天一。同月，“老得江”、“战中华”、“双胜”、“青林”等匪帮千余人，联名向浑江北岸飞来“海贡”（鸡毛信），欲强行捐款。板石沟居民张宝泰聚众成立大刀会，打散“战九洲”，继而杀死著名匪首“老得江”，成为威名远震的大刀会首领。

民国时期长白山土匪如麻，究其原因，主要是“乱世枭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腐败社会造成的。民国初年，土匪出

身的张作霖把持了东北大权，一批贪官污吏把清朝的官庄、旗地掠为己有，借放荒、招垦之机，“承领”大量土地，成为新式地主。1916年，张作霖一次就强占达尔汉亲王的旗地18万垧；吴俊升“攫取土地几遍全省”。借“清丈”土地增收赋税，滥发纸币造成贬值，无物无捐，形成了暴政下的畸形人性和邪恶心态。

然而在土匪中，也有许多人在“砸窑”、绑票时，体现出一种古朴的人道精神：他们杀富济贫，打抱不平、欺强怜弱。1932年6月4日，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四纵队成立。当时有一支抗日的“常占”匪帮靠近义勇军。但不久，常占便又和其他胡匪勾结，阴谋杀害队内的共产党员，于同年10月21日把义勇军拉出哗变，报匪号“五洋”。杨靖宇为了挽救分裂的抗日武装，只身从哈尔滨赶来，找到常占时，却被常占捆起来。常占扬言要拿杨靖宇为他死去的几个匪兄弟报仇。杨靖宇凛然大度，以好言相劝，以革命大义开导，终于使常占回心转意，将杨靖宇放了。这件事说明土匪也有爱国之心。但由于匪气已成，恶习难改，悔改走上正路的是少数，且需经过一段艰苦的自我改造过程。1945年九·三光复后，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先遣军第三十三师，原抚松县讨伐大队长于福，摇身变成了三团的分队长。此人出身土匪，1936年春曾在“压五营”中“挂柱”（入伙），受到“大掌柜”郭占山的赏识，委任为“炮头”。不久，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二军军长王德泰和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二军政委魏拯民的说服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整顿了队伍，克服了土匪恶习，成为一位反日山林队的领导者。1939年末，“压五营”投降日本长岛特工队时，于福便充当了汉奸。当“国民党先遣军”撤走后，他又按军队编制方法，自任队长，报号“于福大队”，成立了于福匪帮。他趁人民政府刚刚成立，正规部队正在打仗之机，对人民政权进行破坏和骚扰。他在形势不利时，假降栖身，暗保局底；他在有机可乘时，袭击区公所，杀害区干部，并积极扩充势力，准

备接受国民党的整编加封。这股匪帮不同于其他的土匪，它以破坏人民政权、反共反革命为目的，实际上是以匪的形式出现的国民党军的残余势力。

1945 年 8 月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在浑江市辖区内的广大地区，相继建立了地方人民政府。在我人民民主政权尚未巩固之际，长白山区的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他们与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破坏新生政权，袭击人民军队，干扰减租减息，到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时浑江市境内的土匪共有 160 余股，有匪众 1560 余人，有枪 1300 余枝。仅临江县境内有大、小匪伙 28 帮，400 多人；靖宇县境内有匪 17 帮，600 多匪徒，枪 600 余枝。至于一人独挑，或几人成帮的匪徒则遍及各地。

匪　号

土匪的报号，反映着时代风尚、弊端、习俗、民意等等，也反映出土匪这一特殊阶层的道德、理想、崇信和特质。

民国 8 年临江县石青沟有股土匪，自谓“东边”。这一名号，反应出这股土匪具有独霸“东边”的狂妄野心。类似的如“战中华”、“战九洲”、“战北省”等等。有的匪帮的名号表达了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民国 16 年临江有股较大的土匪，叫“仁义军”；濛江县境内的“保国军”、“保中国”；1946 年被我临江县地方政府处决的“余共仇”等等。有的匪号本身反映出这股匪徒陈腐的江湖习气和对命运的希冀冥想，如“平推”、“草上飞”、“穿山甲”、“全胜”、“常胜”等等。也有用匪首的绰号、名字报匪号的，如“刘二敢干”、“大善人”、“李国德棒子手”、“王文峰匪帮”等等。有的匪帮报号只用匪首姓名后面两个字，如“长海匪帮”的匪首是孙长海、“宝林匪帮”的匪首是王宝林、“文山匪帮”的匪首是许文山等等。有的匪帮是以一技之长报号的，如“滚地雷”。匪首曲

振广手下有50余匪徒，常年奔命于深山老林之中，行走如旋风，自报“滚地雷”。土匪自立匪号，人多有个号，人少也起个名号，所谓“没有外号不发家”，土匪特别讲究这个。有的土匪一旦出了点名气，便有人来“靠窑”，很快就会发展成一帮。

经初步考证，浑江地区自民国8年（1919年）到1948年秋出现过的匪号大致有：东边、草上飞、平推、东边道、西霸、双山、天下知、四海、占中华、老九占、穿山甲、串山甲、长江好、压东边、金龙、长生好、五龙、金字、东边罪、海山、海乐、东边海、德好、云龙、九好、傻子、北河、两江好、红子、红字、子龙、森联、青山、双龙、老四海、占中阳、才来、义龙山、满江红、东洋、十三阎王、中林、铁公鸡、铁雷、天鬼、长来、海亭、南侠、两广、九胖、扫北、常山、长海、西山好、董元、战海军、北海、仁义、太平、六合军、江东好、红胜军、赵武林、保山、保国军、常胜军、风山好、北梁、中义霞、划满洲、压江龙、四海军、战东川、忠良、天山好、胜国军、云中雁、双江、战北省、战东洋、青林、满山红、战中原、战三省、战山、压东洋、云中、双胜好、胜国、胜军、仁义好、老来好、王太平、平日军、田龙、江边好、老得江、仁义军、文明军、新军、铁雷、战九洲、中山好、青山好、天龙、平街、高如天、西广、春来好、铁牛、冰上飞、文山、高玉德（棒子手）、毕仁祥、王文峰、李国德、车福顺、贝焕斋、吴忠好、德胜军、迟黑子、孟广库、银龙山、滚地雷、康玉山、刘二敢干、久胜军、曹锡明、滕义春（棒子手）、吴缉崇、孙班长、宝林、孙殿庆（棒子手）、战满霞、杨福增、刘单子、杨班长、刘德贵、荆玉明、孙连、五傻子、于福、小北海、马连、辛连、黑瞎子战、五种好、岳营、剿共军、国民党先遣队第六军第三团等。

土匪种类

在浑江境内长白山区活动的土匪大体可分为4种：纯土匪、武装土匪、土匪建军、棒子手。

一、纯土匪

纯土匪，俗称胡子。这种匪伙，人数多少不等，多则上百，少则一人单干。民国8年活动在临江报马桥一带的“东边道”土匪帮就有100余众。他们打官兵、砸富户、抢买卖、绑人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临江县小石人沟的“西霸”只有八九人；“占中华”近百人；“压东边”有10余人；活动在大石人沟掌的“长江好”40余人；六道阳岔一带的“五龙”50余人；八道江一带的“德好”匪帮120余人；而胡匪“北河”只一人。这些纯土匪在民国年间遍地皆是，他们瞟准了有钱人家，抢劫之余绑去人票，看押在票房子内，逼家人交钱来赎。他们变着法子折磨人票，有时割下耳朵和鼻子捎回家去，让家人着急，震惊，以便肯出高价赎人。民国11年9月，胡匪“红子”帮六七人，各持枪棒，身穿便衣闯入临江县七道江野鸡背住户徐三合家，抢去衣服3件、棉被2床、清水布2块，并将其长子绑去做人票。10月底，因徐三合没钱赎人，匪徒竟将其长子的耳朵割下一只，让人送回，并扬言“若凑不齐小洋3000，就不用赎人了”！徐三合思儿心切，倾家荡产凑借了赎金，才把儿子救回。民国12年旧历五月初四晚，一股土匪冲进临江县城东北35里处的周恩邦家，抢走羽绸夹袄1件、单布裤1条、票包1个、旱烟袋1支。因周恩邦躲进树林中藏匿，才幸免被绑票。接着这伙土匪又到北半里许的德盛栈店房，将锅内煮着的20余斤猪肉拿走，还抢去鹿胎膏2两，铺盖1床、小洋10.2元。最后又到北4里处，对都兴春家行抢，一家人奋起肉搏，

土匪放枪将都老头杀害，都母、都兴春及妻子均遭到枪伤。由此可见纯土匪在打家劫舍绑票之际，往往又伴随着烧杀。土匪往往使一个家庭顷刻间家破人亡。百姓畏匪如惧虎，昼不敢远行，夜不能成眠，有钱有物担忧，有儿有女发愁。

二、武装土匪

武装土匪多半有政治背景。这类土匪成份复杂：有的在起局前，因为某种原因犯了罪，为逃避法规，“挂柱”成匪，后发展成大帮，以武装报复社会；有的曾欲“救国救民”，但由于环境和时局所驱使，陷入匪穴，爱国心和正义感不泯，他们“打着吃”（过土匪生活）仅仅为了维护生存，一旦国难当头，也可挺身而出；有的是出于个人野心，以为“乱世出英雄”，发展人马枪支势力，以便伺机邀赏。由于这类土匪有背景、有目的，大都武器弹药齐备。浑江市境内，至1947年共有146帮武装土匪（临江县130帮、濛江县14帮、抚松县2帮）。如光复前八宝伪警佐许文山，因解放时家庭被清算，于是拉起匪帮，发展到百人，拦截火车，抢劫枪支弹药，袭击乡公所，枪杀民兵队长和群众，完全出于反革命的阶级报复。1945年起局的毕仁祥匪帮也是有政治背景的武装土匪。同年9月，他带领匪徒在临江通往抚松的老岭坡上设伏抢劫，将我邮递员杨福成击伤，抢去现款300多元；10月又窜到大阳岔强抢、洗劫了王学贵家小铺，将周凤武枪杀。“黑瞎子战”匪首于1946年在抚松抽水一带阻截我军政人员，抢劫民财，破坏土改；4月袭击抽水区东大村，打死村长隋长发，抢走钱物；5月袭击榆树村，枪杀村文书王成满。

三、土匪建军

土匪建军，出现在时局动乱的时期。浑江市在1945年解放后，一部分国民党残余势力躲进偏远山区，与纯土匪相勾结。当时活

动在临江县境内的28帮匪伙中，有的就是国民党的杂牌军、被我击溃逃窜的国民党军、警、宪、特残余分子；有的是曾混入我方队伍的策反叛变分子；有的原来为匪，后来当了兵混子，野心膨胀，起局后仍招兵买马，建立军制，妄图东山再起。

1945年秋，国民党安东前进办事处处长关大成，委任旧军阀出身的马兴山为“中央陆军东北先遣队第六军”上将军长。这个马兴山，1932年曾在辽东民众自卫军中当过旅长，打过日本人，此番却秘密潜回临江县组织地下武装。9月，马兴山同汉奸王仁奎等相勾结，正式成立了“中央陆军东北先遣队第六军”。马兴山任军长，王仁奎、徐华斋任少将参谋长。不久，他们又在砟子、松树等地吸收“三番子”成立第十一师，委任公成立为副师长，刻制公章和名戳。他们又许以虚衔厚禄，笼络日伪汉奸散兵游勇组建成团、营、连、排，一切按军队编制。1946年又收拢了“文山”、“滚地雷”等匪伙，改编为五十四团，任匪首许文山为上校团长，下辖4个营。随后又收编了车福顺等匪帮，成立五十五团。这些匪伙到处烧杀抢掠，劫我军用车辆物资。如许文山率匪徒攻入城墙砬子街，枪杀了民兵队长徐明武、民兵王玉祥、农民李瞎子和徐老太太，强奸了吴家幼女，烧毁民房40余间，抢牲畜20多匹。许匪率部伏击我护路队压道车（八宝煤矿处），绑去干部1人、战士2人，抢去枪4枝、手榴弹百余枚。

九·三光复后，国民党东北行辕委派贾绍华来临江与伪县长边树芳秘密勾结，网络通化、集安、临江、濛江、抚松等县的伪警甲残余组建地方武装。上述各县的伪县长、警宪要员曾麇集于临江，讨论成立了“统前前进军第一师”，下设副官、参谋、军法、军需、军械、军医、兽医、秘书等8大处。其中网络许多土匪，其行径亦属匪列。

四、棒子手

棒子手，顾名思义，这类土匪没有枪支武器，多手持木棒拦劫行抢。民国时期到处匪患肆虐，棒子手也遍地猖獗。民国 13 年 1 月临江四区错草沟里砬子沟门丛云瑞家被棒子手抢劫。22 日晚半夜时分，突有胡匪 3 人，均穿便衣，各持木棒由大门闯入，逼索钱财，开箱抢走票洋 27 元、英大洋 1 元、小银元 4 元、新靰鞡 1 双，由大门出，往沟内遁去。

棒子手匪帮有几个特点：①人数少。一个人手持木棒乘夜入宅、拦路行抢者亦称为匪；多则几人，但没发现有大的帮伙。②时间短。棒子手多数是明民暗匪，抢过摇身一变装作好人。有的则具季节性，农耕时为民，挂锄猫冬时为匪；有的青纱帐起时为匪、叶落林稀偃息为民。还有官兵为匪的，为了隐蔽，不带枪，脱下军衣，持棒拦抢。总之这类土匪危害的对象多数是单行者、小户人家。1945 年 7 月，大青沟有个高玉德棒子手，拦抢一个老太太的包袱，内有流通币 20 元、衣服 2 件、花布 30 尺、大烟土 2 两。作案当天即被捕获。滕义春棒子手于 1945 年 4 月发起，第二天在小黄子劫道，抢得农民潘文经 13 元钱、新被 1 床、被套 2 床、鞋 2 双、肥皂 1 块。第 4 天自行解散。③活动区域小。④组织的快，解体消失的也快。

组 织 机 构

土匪帮也称绺子。大股的纯土匪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和匪规匪语。单就组织机构来讲，也足见其历史发展之一斑。

土匪总头目叫“大当家的”，也称“大掌柜的”。在绺子内部称“大哥”、“大柜”。绺子如果正规，还有“二柜”，即二头目。下设四梁八柱。四梁分里四梁和外四梁，合起来也就是八柱。长白

山区土匪的历史近半个世纪，形成的组织机构也较完备，虽内外设置的名称不一，内容却大同小异。如里四梁有“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有的绺子把“翻垛的”称为“叫将员”。下边的匪徒称“崽子”。“炮头”必须“管直”（枪法准），能百发百中才行。每当关键时刻，“炮头”可以一枪定砣。“炮头”还须胆大。长白山区到处都有类似的传说：某某“炮头”在屋里看牌，“料水的”（放哨的）跑来说：“跳子（兵）来了！”炮头把脸一沉问：“多少人？”“20吧！”“你们先滑（快走）！”他点一袋烟慢慢地吸。院门被砸开了，一队人一下子拥到门口，枪口对着他。他冷笑了一声说：“兄弟们请了！”一脚把桌子踢了过去，众兵一闪之际，他双枪齐发，在炕上一滚从后窗跳出去走了。他弹无虚发，谁也不敢去追。这种故事，也许经过了人为的加工，但是却活画出一个“炮头”的大体形象。

里四梁除了“炮头”之外还有“粮台”。粮台是负责绺子吃喝的人。长白山区森林茂密，人烟稀少，一年四季能管好吃粮吃菜却也不易。尤其冬春两季，必须加紧抢储备。在上百人的大绺子里，粮台负有重责。有时到老百姓家吃饭，粮台还要注意饭菜是否有毒，有无传染病等。

“水香”是里四梁的第三把交椅。为什么叫“水香”呢？究其渊源颇有来历。古时候，没有现在的钟表，那时计时完全靠漏壶和香炷来计算。漏壶用铜制作而成，分播水和受水两部分。播水壶分2至4层，每层布有孔，均可滴水。滴下的水流入受水壶，受水壶内有立箭，箭尺上刻划着100个刻度，随着蓄水的增加，可标出时间。这种以水滴表时间的方式，可能就是“水香”之“水”的来历。除了用滴水表示时间外，还用焚香来表示时间，比如“一炷香时间”，正如后来的“一袋烟工夫”。这点香记时大概就是“水香”的“香”字来源。水香管站岗、放哨。什么时候放“卡子”，什么时候换岗。每当砸开一个窑（攻打下一处），水香第

一件事就是放卡子，以防不测。

“翻垛的”（也有称“叫将员”的）是里四梁之末将军。翻垛的是绺子里的军师，大柜的参谋长。及任此职须懂天文地理，会卜算生辰八字。每逢行动之前，均要由他指出吉凶祸福、酒色财气。如遇险情，也要由他祈求神灵指点迷津。

绺子除里四梁外，还有外四梁。外四梁有“秧子房掌柜”、“花舌子”、“插千的”、“字匠”。有的绺子还有“稽查”和“马号”。

“秧子房”也称“票房子”，是关押人票的地方。主管这个地方的人叫“秧子房掌柜”。土匪绑押人票有时多达几十人，如民国9年“长江好”匪帮在长白县二十二道沟和二十三道沟一次绑去人票32人；翌年2月3次绑人票64人。民国16年10月大刀会首领张宗耀活捉匪首侯天一（“青山好”匪帮）时一次救出人票18名。临江县板石沟大刀会首领于同年11月从巨匪“老得江”的票房子里救出人票20余人。由此可见土匪“秧子房掌柜”的职责。干这一行的人大都心狠手辣。绑来的人票无论如何央告，也不发善心，否则就吃不到肥头。有时凶相毕露，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如割下耳朵、鼻子等。有的人票没了用处，便撕票（杀掉）。

“花舌子”是外四梁的联络员，负责给人票的亲人家属送信、讲价，按大柜的旨意，千方百计从票户家弄出钱来。民国11年临江六道沟木厂掌柜傅永财为匪首“红子”当花舌子，第一次从徐三合家索要1300元小洋钱，5天后又索要了1700元，才将徐的长子送回。而第一次索要的钱款全部落入了他个人腰包。可见花舌子一要查明被绑人家底数；二要能言善辩，善于伪装，让票家拿钱出血。

外四梁的老三是“插千的”，长白山区的胡匪中也有叫“稽查”的。这种人要胆大心细，善于勘察“砸窑”的目标、路线等。干这种活的人要有时迁的精明和能干，他们的素质往往决定行动

的成败。

“字匠”主管文墨，他是八柱中最后一把交椅，是绺子中的秘书和书记官，凡文字的事都要由他去作。长白山有些大匪帮养着这样有学问的人，有的写一手象样的毛笔字，会模仿别人的笔体；有的还会刻印章。每当给票家飞去“海叶子”（信），都出于此人之手。凡收来的文字材料，均由“字匠”来解谜处理。

有的绺子因头目不懂这一套编制，或绺子势力小，也出现了许多简化了组织机构的土匪帮。如只有“大柜”，不设“二柜”；“炮头”、“水香”由一人负责；或设“叫将员”，既是“字匠”又是“翻垛的”；“稽查”一人管勘查又管说票；有的设“马号”，专管马匹车辆等等。

民国期间，浑江市所辖区域的许多小匪帮没有完整的组织机构。解放初期，出现的大股匪帮多数是旧制军队的变种。

匪　语

长白山区的居民多来自山东省，少数来自辽宁、河北、江浙一带。历史上匪语与方言有时交织使用。笔者将搜集的部分有关匪语资料概列于后：

碰码——见面
碰——有交情
顶——无交情
滑——走道
蹻（同跷音 qiāo）——行路
水——官兵
项——钱财
板山——饮酒
山串——饮醉了
押白——休息
活窖——有认识人可以串通
顶天——帽子
拉线——侦探
肯腹、嘈腹——吃饭
开克——打仗
踢筋——打伤
狗子——巡警

跳子——兵
皮子——狗
搂金子——狗
风子——马
压脚子、连子——马
水柜——看人票
压水——设卡
飞子、柴火——子弹
瓤子、柴禾——子弹
别梁子——劫路
起皮子——起事，成立绺子
开局——起事，成立绺子
挂柱——入伙
拔香头子——退伙
上道——出发
海瞧——看看大家，看朋友
码人——集合
上天——上房
窑变——出事了
点背——不顺当、晦气
皮子喘了——狗叫
漏水——让人查觉了
烫了——受了伤
压下来——住下来
放笼——报信
叶子、海叶子——信
发海叶子——送信、邮信
片子——钱
飞龙子——大洋票
绑票——抓人押在票房子、抓人质
别梁子——劫路
放亮了——放火烧房子
漂洋子——饺子（指水饺）
翻张子——饼、烙饼
星星散——小米干饭
富海——喝水
搬姜子——喝酒
梦头春——喝酒
珍珠散——粳米饭
马牙散——蜀黍饭、高粱米饭
啃海草——吸鸦片烟
拉篇子——分赃
掐边——饺子
啃草——抽烟
齿轮子——月饼
干枝子——粉条
滚子——鸡蛋
大页——长袍、长衫、长衣服
页子——衣服
通天——大衣、长衣服

毛页子——皮大衣
宝盖子——马鞍子
提手子——马勒绳
盘条子——皮带
摩手子——马鞭
顺旗子——藏枪
插旗子——藏枪
摔旗子——打枪
摔条子——打枪
起跳子——兵来了
起烟了——兵来了
苦窑——监牢
挣着了——得了把
砸窑——攻打有钱大户
勾挂的——保票的人
滑了——快走
挑——快走
上项——交钱、进贡
挑片子——分钱
拉柱——拉帮、纠合
抻腰子——大米饭
月子——表
快嘴子——电话
崩星子——火石、火柴
喷星子——火柴
追秧子——绑票
响窑——有枪之家
支门子——找介绍人、找保
吃横的——匪首、大柜，绺子头
吃皮子——吃其他匪帮的贡，索金
打小项——给大匪伙进贡
连旗的——一伙的
料水的——放哨的
花舌子——牵线说票的
兰头海不海——得钱多不多
卧底的——打到内部去的人
码走——被绑了票
叉摸子——寻找同样的主
窑枪（把枪窑了）——把枪藏起来
舵窑基——找落脚处
浪飞——到处走，没靠局
吃长路——贩卖人口的
花票——绑来的女人
红票——绑来的女人
软秧子——绑来的女人
秧子——绑来的男人，人票
线头子——侦探
插蓬了——天阴了
插子——钢笔

轮得急——风
红光子——日、太阳
楼——太阳
炉子——月亮
定盘子——星星
黑货——大烟土
放台子——开局放赌
圈子——县城
苦水窑子——药店
越边——解散
脱下——散伙
鸡毛店——农村
花子房——乞丐住处
哑巴——剪子
吃臭——盗墓的
旱烟管——棍子
码上他——把他捆起来
雾土窑子——大烟馆
插了他——杀了他
滚哼哼——盗猪
赶小脚——盗一头猪
哼哼——猪
江子——猪
尖角子——牛
爬山——羊
顶水儿——鱼
仓子——熊、黑瞎子
长脖——鹅
扁嘴——鸭
山头子——山羊
水饼子——肥皂
睡觉——击毙、死了
躺桥——睡觉
安根——睡觉
脱条——睡觉
疙瘩——锁头
排子——钥匙
开花子——雨伞
韭菜叶——戒指
穿龙——鞋带
对扇子——关着门，门没开
明了——被人发现、让人知道了
底线——拉线人
马刺——天黑
宝莲子——灯笼
接财神——去绑票
接观音菩萨——去绑女票
流水窑——旅店
艺窑——戏院子
海台子——暗娼
掐灯花——晚上砸窑，天一黑行动
操子——木梳、梳子
山神爷——老虎

压连子——骑马
上托——配合行动
兰把子——要钱，赌博
摸叶子——玩纸牌
玩张子——玩纸牌
打川子——掷骰子
老头——银元
萝卜头——银元
混窑——澡堂子
趴窑——生下
青子——刀
熏筒子——袜子
喷子——枪
旗子——枪
花帽子——枪
鸡脖子——枪
上窑——进屋
拢窑——进屋
梗子——山
踏水子——脚
汗条子——毛巾
耍混钱的——胡子、土匪
举了——揭发报官
踏条子——躲起来
点活——目标容易拿下
管直——枪法准
门清——懂匪规
点正兰头海——目标找的准、有钱
响没响——开始了没有
和谁响——和谁打仗、和谁接火
污兰——向匪伙撒了谎
掉脚子——被抓住
底子潮——多次被抓
扯出来——逃出来
尖——真的，是实话
星——假的，骗人
靠窑——投了匪伙，靠了个绺子
当家的——匪头
大掌柜、大柜——匪头
挑线的——卖血的
水滚子——地头蛇
念昭子——瞎子
念语子——哑巴
山头——匪号
黑页——书信
拐拐吧——歇歇
拣蘑菇——抓俘虏
抹尖子——割耳朵
推大沟——全屯烧光
炮头——拉道的
水香——管站岗放哨的
粮台——管粮的
闲员——管传信的

水柜——看人票的
二掌柜——二匪首
窑——房子
起浮——来了
抹梆头——割首级，砍头
捐大介——向全村要钱
明连子——说书的
飘行的——剃头的
对对脉子——见见面
对盘、盘道——见面
什么蔓——干什么的
单搓——单干
单开、砸孤丁——单人暗杀
满转——什么都干
黑码人——同行，一伙的
熟脉子——自己人
空子——外来的，不是自家人
春点开不开——会不会说匪话
挑号——此人名气大
局红——绺子兴旺
传正——这小子胆大
接灵子——他对别人的话领会的快
传快——心眼来的快
瓢紧——嘴严，不泄密
晃门子——说假话
歇阄——怕出事不干了
踩盘子——找目标
挑人靠窖——多拉人一块来
勾道关子——合伙一块出击
插旗的——寻找出击目标
斗花——女孩
外哈——外来人
跳坑子——卖艺的
要清钱——看牌输赢的、要钱的
靠死扇的——要饭的，乞丐
里几来的——本地的匪友
翻毛子——小鸡
钱串子——蛇
草鞋——蜈蚣
大花鞋——蛤蟆
跳树——猴
兰花马——猫
地滚子——鸡蛋
踢土——鞋
邪叉子——褲子
靶子——人头
苗——头发
盘儿——脸

瓢——口　　鸡爪子——手
条子——牙　　沙拉子——连毛胡子

匪　患

凡为匪者，不管他起什么雅号，只要他生存发展起来，窥其走过的道路，步步是人民的斑斑血泪。土匪生存发展的基础靠的就是“砸窑”（抢财物）、“绑票”（抓人质）、“插人”（杀人）、“放亮子”（放火）、“别梁子”（劫道），从中“挑片”（分钱），达到享乐的目的。凡为匪者，也不管他怎样仗义，必然作恶，因为他赖以生存的方式本身就充满了恶行。

长白山区的土匪五毒俱全。民国16年初临江县红土崖五道峡有个12岁的小牛倌，晚上东家对他说：“睡觉小心点，土匪来了可没好瓜打！”他顺嘴说了句笑语：“土匪来了怎么样？还能把我鸡巴割去！”没曾想这话被土匪听到了。第二天小牛倌丢了，东家和邻里到处寻找，最后在村外沟里找到了尸体，小便真的让土匪给割去了。象吃人心、扒人皮、抽大筋、剜眼、削耳、割鼻、上酷刑，诸如此类在匪窝里屡见不鲜。环境能改变和扭曲正常的人性，一旦某种恶行成为风尚，什么想不到的和难于理解的坏事都干得出来。1936年4月，土匪“中山好”将一名张姓的人票绑来，土匪们将他吊打用刑，首先“上大挂”，然后又把衣服扒光，绑在板凳上灌辣椒水。把肚子灌鼓起来了，再用棒子压，水从屁股和小便流出来，从嘴和鼻孔流出来，人被灌死了，尸首还被压在木头下面。

土匪心黑的原因是为了钱财。绑票要用钱来赎，“熬鹰”（折磨人票）为了逼钱；杀人为了消除抢劫钱财的障碍；烧房为了发泄得不到钱财的恶怒。民国年间土匪无所不抢，如民国12年8月

28日，有五六名匪徒窜到临江县大青沟华山堂店铺，掠去票洋41.30元，红坎布被1床，红斜纹布褥子1床，红哔叽褥子3床，刀牌香烟1大盒，洋腊4包，正蓝细布裤褂1套，青坎布夹裤1件，粗布青夹袄1件，礼帽1顶，石蓝细布大衫1件，美人皂2块、洋烟1大盒，青夹裤1条，青粗布2匹，杂货帐薄10本。同年8月土匪8人（持快枪者3人，其余5人持棒）闯入榆木桥村宋万财家，将三小子水水绑去，掠走蓝青水女布衫2件，蓝大尺布裤2条，蓝大尺布衫1件，青坎布棉马褂2件，红色丝腿带1付，青老头带1付，银手镯1付。同年7月5日汉葱沟小秃尾巴沟居民邹利成、安宝、沈吉祥3家被匪绑去人票3名，掠去财物有：邹利成家：来复枪1枝，高乔布衫1件，青布裤子2条，青皮小夹袄1件；安宝家：青水布1对，双角银元50元，蓝布裤子1条；沈吉祥家：麻花褥子2床，傻鞋2双，麻花棉被1床，蓝大尺布1匹，毛布1匹，女青年布大衫1件，绑去沈吉祥10岁幼子及丁玉才、刘忠仁。

九·一八事变后，因为民族矛盾上升，长白山区有许多土匪转到抗日队伍中来。如1936年2月7日，杨靖宇率队驻扎在闹枝沟二道坡口时，将“万顺”、“万军”、“压五营”、“仁义军”、“文明军”、“老来好”、“五傻子”、“平日军”等绿林武装改编为1000余人的抗日山林队，引导这些匪伙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也有的土匪摇身一变，成了汉奸。日人委任为“东边道剿匪少将总司令”的邵本良，是临江县城兴隆街人，自幼随伯父习武练枪，一度是有名的土匪，日本人收编了他，并拨了大量武器来对付抗日联军。杀人越货的土匪凶恶，卖国求荣的土匪更凶恶，日本人利用中国人中的败类来残害中国人。1935年隋宝文给“开山军”拉线，被李德林发觉，隋怕李告发逃到朝鲜，被日本人原井指导官捕获，收编在临江县伪警察所当特务。1937年隋宝文带讨伐队打死曹亚范部战士两名。1938年田木匠由五道沟回家娶妻，行至七

十二道河子时遇见一土匪令他抬水，田趁匪不备将匪打死。田木匠缴三八枪1枝、金镯子2个、伪币70元，走到石灰桥遇见隋宝文，田把打死土匪的事说了，隋宝文把他领到错草沟警察分所，隋与所长串通将田木匠打死，将头割下交临江示众，将钱财私吞。1939年10月又枪杀我抗联2人，并向无辜群众射击。

匪规习俗

长白山的土匪构成一个特殊的世界，它不但有匪号，有组织机构，有匪语匪行，还有一套为土匪专有的匪规习俗。据地方志、档案、口碑和文字材料所载，土匪有严格的匪规和习俗，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土匪信佛。有的大土匪项上挂串佛珠，系一尊铜佛，有人说这佛叫“达摩多罗”，是东北土匪的上帝。凡是想借群体之威立足于世者，必须要端出一尊偶像。有了这尊偶像，土匪的头目们就成了圣明的使者，任何恶行也就并非个人之所为。凡是作恶者又总要有善规，以欺世盗名，施放烟幕。长白山土匪和东北大多数匪帮同出一辙，也有许多条“不夺不抢”，即：1、丧车不抢，喜车不抢；2、邮差信件不抢；3、挖参渡河的不抢；4、走村行医的不抢；5、赌局不抢；6、货郎不抢；7、大车店不抢；8、僧人不抢；9、开棺材铺的不抢；10、妓院不抢；11、单身行人不抢；12、算命摇卦的不抢；13、鳏寡孤独者不抢……等等。然而，“不夺不抢”无非是掩人耳目，为自己留条后路而已。纵观百年匪行的罪恶事实，足以证明纯系一派谎言。

二、土匪处理违犯绺规的人时，经常是残酷的。如果有谁开了小差被抓回来，或者投了对立一方的一个绺子，或者出卖绺子内部的人和泄露秘密，大柜就要处罚这个人。这时就要挖心、挖眼睛、活埋、“背毛”（勒死）、“挂甲”（脱光泼水冻成冰甲）、火

烧、枪毙等等。

三、大帮土匪也有些“人道”的规定，比如“不横摧立压”（不随便打杀，不奸淫妇女）；“不吃窝边草”（不危害百姓，以便留后路）；讲“义举”（义气为重），同伙遭难，不袖手旁观，对服软的人或求助者相帮相助，等等。

四、对战死的匪徒，要“送行”。大柜点香致词，众兄弟跪拜灵牌。

五、匪伙都非常迷信，信天地鬼神，信阴阳八卦，什么“诸葛神算”、“元天刚人生八字”、“周公解梦”、“推背图”等，由专人掌管。每当出行，都要占卜问卦。

六、土匪的娱乐也总和他们的匪行有关，如“打香头”（用枪射击火头）、打飞鸟、打头上顶的碗、打筷子、比刀剑、比酒量、比吹牛、比摔跤、比驯兽、比胆大等。也经常押宝、看票、宿娼、走五道、憋死牛。他们偶而也自编自唱些歌曲，多为老调，如“妓女悲愁”、“苏武牧羊”，歌词多属下流俗陋之作。

剿　匪

浑江市所辖之长白山区域内的剿匪基本上可分为官府剿匪、民众自发剿匪以及解放后的剿匪。

一、官府剿匪

本文开始部分已阐述过，民国期间的13年中，仅临江一县上报奉天省的匪患案例竟达数千起。每个案例都由当时的临江县官府作过勘查记录，发过文告，派警兵追剿，其危害结果均有记载。从地方上的牌长、什长、保甲长，到区县的警官、清乡办、知事、东边道镇守使，直到东边道尹兼安东交涉员、奉天省长公署、国府，也都是累文详载，顾及不暇。民国10年2月，道尹何厚琦抵

长白县与朝鲜的日本当局交涉，又有奉天省交涉员出面，使日人不得不将他们庇护的巨匪“长江好”匪众引渡交到安东，3 次交匪 109 人，被判死刑者 93 名，但匪首没有交回。某县志记载：“……濛江素为土匪出没之乡，绑票架人屡见不鲜，远者弗论矣，近者如民国十一年匪首仁义军等以攻破山城镇；十三年压五营等之攻破朝阳镇，皆勒捐与商会，绑掠与民户，号召匪徒。动以千百计，非调集各路之警甲不能驱逐。然此大股之匪，事前尚可防范，而小股每于夜静更深乘隙而侵入人家，既绑其票复伤其人。”由此可见官府对于匪患的无能为力。

二、民众自发剿匪

由于民国时局动乱，官府腐败，民众只好奋起自卫，临江红土崖大刀会就起因于剿匪。五道峡阳岔沟掌住户张宗耀祖籍山东省诸城县，移来数载家道小康。1927 年夏，突被土匪将侄儿绑走，又将邻里 2 人绑去，索以重金赎回。张宗耀为保自家与乡里的安宁，返鲁请来刀会法师张树声、匡香圃，设坛授法，组织起大刀会，月余发展到百人。大刀会提出口号：保家安民，消灭土匪；并规定“不得抢掠民财；不得强奸妇女；不得妄杀无辜；见仗时勇往直前，不得彷徨四顾”。9 月，红土崖大刀会在三道岔消灭了“久胜”、“玉山”计 80 余人，杀死匪首玉山，扒了他们的“票房子”，获大量物资。首战告捷，振奋了民心，苦于匪患者，纷纷加入了大刀会。10 月，大败巨匪“上山好”（匪首王殿阳），将匪众 300 余人杀散，毙匪 15 人，获枪 50 枝，靰鞡 30 双。同年 10 月，胡匪 4 帮千余人联名向大、小板石沟飞来“海叶子”（鸡毛信），强索巨额捐款，并扬言：“限期不交，人芽不留。”板石沟居民张宝泰愤慨万分，派人请来刀会法师解兆瑞，设坛焚香，组织起板石沟大刀会，月内亦有百人参加。11 月初，张宝泰大刀会在三岔子摧毁“战九洲”秧子房，毙匪 24 人；12 月击溃巨匪“老得江”。

三、解放后剿匪

1945年底浑江地区为我人民解放军占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县各区相继建立了地方人民政府。在减租减息、支援前线部队的紧张时刻，人民政府为了对付境内的大、小土匪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组成的武装土匪，我地方政府和人民军队紧密配合，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1946年初，在全境范围内各县区配合作战，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剿匪斗争。至1948年秋，仅两年多时间，基本肃清了长白山区主要区域的大小匪帮，取得剿匪斗争的巨大胜利。

1945年的秋季，土匪马兴山被委任为“中央陆军东北先遣队第六军”上将军长。9月他同临江县河口村的王仁奎、徐华斋、丛玉山相勾结，成立了“中央陆军东北先遣队第六军”，马兴山任军长，王、徐为少将参谋长。他们收编土匪、网罗社会的残渣余孽，刻制印章，编制军团，下设营、连、排，并以匪帮的恶行掠夺民财、拦劫军车、策反革命组织、烧杀抢劫无所不为。1946年9月，临江县大队李红光支队围剿了该匪帮，终将其击溃。马兴山等被镇压。

1946年初，八区红土崖建立了区中队，由吴缉宸任队长。3月临江县政府又派张亚翼接任了红土崖区区长的职务，并由白玉龙接任区中队长吴缉宸之职，吴退居副职。5月吴缉宸密谋叛变，未遂。不久，区中队奉令去临江集训，当在途中住宿时，吴缉宸便散布谣言，使部分队员动摇返回。中队长白云龙在返程追赶队员时，被吴缉宸开枪打死，接着他便拉起了匪号，闯入区中队，杀死烧锅经理黄永斋，绑架农会干部，抢劫杀人。同年8月，临江县大队和李红光支队将该匪帮于下三道沟村击散，活捉了匪首吴缉宸，予以镇压。在吴叛乱的同时，临江县七区区中队队员孙志远为吴缉宸作内应，杀害了区干部刘世英、侯佐贤，抢去枪支弹

药，有9名队员随帮叛变，上山为匪。同年8月被剿灭。

1946年5月，杨靖宇支队收编了伪公安队员董见廷并任为班长，其与副班长车福顺等16人携枪叛变，窜到山里为匪，车福顺任大柜。他们夜闯民宅，袭击村屯，抢劫强奸，为非作歹，8月又与“吴忠好”“战九洲”等匪伙合局，投靠了“东北先遣队第六军”，车任五十五团团长。9月在我军围剿追击下溃败。

1946年6月，我辽东军区后勤部二连一排一班长孙家福，串通黄德有（土匪头）逃离了大栗子沟，有22人被胁迫上山，并携走小炮1门，机枪1挺，长枪18枝，手榴弹80枚，子弹4000余发。黄德有任大柜，孙家福任二掌柜，下设多种匪衔，9月潜入辉南县境，投靠了国民党。后被我军剿灭。

1946年下半年，临江县六区区长张仁玉得知土匪头子刘青山（外号“刘二敢干”）夜宿于外号叫“小洋猪”的女人家里，便连夜带人包围了宿处，将其歼灭。

抚松县境内的于福匪帮，是以土匪建军方式组成的特别匪伙，于福任队长，赵连海任队副，报号“于福大队”。1946年1月，于福匪帮窜到松江一带捐屯子、打家劫舍、绑架我侦察员。2月，正当春节之际，于福佯装归顺，正月十五这天借灯节之机重又携枪“起局”。3月，于福匪帮在乌梅沟阻截车辆，抢劫资财；4月又在小山村伏击抚松县大队车骑，杀死事务长及妻子；5月，杀害抚松县大队1名战士，班长受重伤；同月在密营处枪杀我李红光支队2名队员；策反我抚松县公安局侦察员，枪杀3名公安人员，将12人胁迫入伙；6月冲进松江区公所，枪杀了杨春仁副区长及孙福有、沙成金；策反我东岗区的驻防人员，捆绑我排长，枪杀了王区长，并收编了叛部，洗劫了村屯。至此，于福匪帮将两个中队变成3个中队，扩充到156人，长短枪百余枝。随后又伙同其他匪帮设伏袭击我县大队，杀害了我11名战士，俘虏司机和战士多人，双阳县县委书记乔海涛同志也同时遇难。7月，于福匪帮在三

道庙岭林中勒死3名拣蘑菇的群众；8月与我李红光支队剿匪小分队遭遇，支队副司令员吴靖宇亲自率队追击，至辉南县境内，终将匪徒打散。经政策攻心瓦解，使许多中小头目洗手投降。1948年春匪首于福被捕获，8月在抚松县滑石沟处决。

除了大规模的武装剿匪外，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通过肃清反革命运动，清洗了几乎所有的土匪潜伏人员。如1952年匪首车福顺被捕获，依法判处了无期徒刑。

通过剿匪斗争和深挖残匪运动，我长白山区各地的大小匪帮均被彻底歼灭。存案可查的匪帮，临江县歼灭了161帮，靖宇县歼灭了17帮，抚松县歼灭了5帮。据统计被我剿匪部队打死匪徒200余名，俘虏300名，判处死刑者56名，判处徒刑者42名，送农村劳动监督者30余名，教育释放者600余名；收缴长枪1000余枝，短枪200余枝，机枪3挺，手榴弹、子弹不计其数。

浑江市位于长白山的中腹地域，历史上匪患猖獗，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民国初年至解放前的30多年中，旧中国官府也苦于匪患，警兵们畏匪如虎，不敢进剿，甚者兵匪一家，致使这一地区人烟稀少，经济凋蔽，文化落后。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和地方政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历经几年的奋战，终将匪患铲除。

（吉林省浑江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闲话旧社会土匪

关士杰

铺 局 底

民国年间和伪满初期，扶余与东北各地一样，匪徒猖獗，少则六七人一伙，多则数百人成群。这一伙一群，用其行话来说，叫做“绺子”。

大绺子，组织细密，设头目人，称“大掌柜”或“大当家”的。下设：大柜、二柜，掌握财务。水柜掌柜的，管了水（土匪管官兵称水），报水情。秧子房掌柜的，看管秧子。炮头，是全绺子的先锋。凡重要人物，如当家的、炮头等，分红时，属大股，一般胡子只吃五六分股。如能自己带枪、马来投，可多加一个股。此外在大绺子中，还设有“搬舵先生”。他专推演八门，用以定去留，辨方向、时间、地点等事。

每个胡子，都要报个字号，如：“大福字”、“天河”、“四海”等等。大当家的“山头”（即其所报的字号），可代表整个绺子。当两个绺子相遇时，就要互问：“你们是哪个绺子的？”或“哪个山头的？”各自报完山头后，才能进行其他事务。

定 局 规

大绺子讲究什么“七不抢，八不夺”，如：不劫出殡的、结婚的、小孩、老人、鳏、寡、孤、独、僧、道、尼。有的还不抢劫

邮电业、开店的、要饭的、算命的、鼓乐班。有的还不劫学生。这些人油水不大，并不是因为土匪有什么善心。

有些大绺子还规定："上马不嫖、下马不赌。"即当上了胡子，就忌讳嫖女人；退出了绺子，也忌讳去赌钱。其原因是常出入此类场所，人多眼杂，容易被人识破露了马脚。

虽有局规，但真正照办的并不多。特别是小绺子或大绺子分散活动时，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求 挂、柱

有要当胡子的，须要亲自去绺子里"挂柱"（参加）。挂柱，一般需有人介绍，不然，人家无以凭信，不能收留，虽也有毛遂自荐的，但大都是内行人或活人儿。他们见到了绺子里人，先要说些特定的对话："老哥哥、小弟弟们，你们从哪边滑来？当家的横哪个山头？"待对方回答了"××绺子"之后，就要直截了当地说："这儿人强马壮，局红管亮，兄弟现在马高镫短，想托托当家的洪福，找一碗饭吃……"当家的如有意收留，也得考验他一番，看看是否机灵、有胆量。挂柱人当然不能示弱，自我吹嘘说："没有三把神沙，不能倒反西歧。"众匪徒都要看个热闹，众口同声地鼓励他："好！真金不怕火炼，好货不怕试验，是好汉是孬种，抻出来遛遛！"

于是，当家的命令左右取一个鸡蛋来，再用谷草编个帽箍儿，把蛋放在箍内，命挂柱人顶在头上（也有顶碗的）。当家的说："要在你头上枪打鸡蛋，你是否敢挺着？"

在众目睽睽之下，挂柱人宁肯死也不能说赖蛋话。于是群匪簇拥着挂柱人走到外边，当挂柱人前行数十步之后，那个"管亮"（枪法准）的枪手，就冲挂柱人头上砰的一枪，将蛋击碎。枪声响过，群匪就将挂柱人拉回到面前，查看面色，如果挂柱人神情泰然，就算是好样的，欢迎你挂柱。若是吓得六神无主，萎靡

不振，则被看成是草包，不受重视。此外还要考验是否有骑马的技术，智力如何。

说 黑 话

绺子里如有朋自远方来，相见之下，要互相问礼。匪中入见礼，自己两手相抱，放于右胯上，表示尊敬问好。生疏的朋友相见，切忌问姓名，只呼用山头（匪号）。日久相熟，才可甩甩蔓子（报个姓名）。姓亦用土匪的黑话讲。如跟头蔓子，姓张；虎头蔓子，姓王；抄手蔓子，姓李。

平日土匪内部，也要说“朋友话”（即他们的行语，人称黑话）。如管饺子叫漂瓢子，面条叫挑龙子，饼叫翻张子，大米饭叫珍珠散，小米饭叫星星散，玉米饭叫马牙子，吃饭叫啃富，喝酒叫搬浆子，酒醉叫山串，喝水叫抄海，喝点水叫抄得海，困了叫条恋了，睡觉叫抻条，睡着了叫抻严了，歇歇叫拐拐吧，炕上坐叫台上拐着，大便叫甩瓤子，马叫联子，快马叫飞联，骟马叫跑联，母马叫骚联，小鸡叫翻毛子，鸡蛋叫地滚子，抽大烟叫啃海草，见面叫碰码，走道叫滑，劫路叫别梁子，放火叫放亮子，分赃叫拉篇子，绑票叫拴秧子，向全村要钱叫捐大界，全沟烧光叫推大沟，打枪叫甩旗帜，藏枪叫插旗帜，割头叫抹榔头，割耳朵叫抹尖子，抓俘虏叫拣蘑菇，侦探叫拉线，打仗叫开壳，受伤叫踢筋，兵叫跳子，军队叫水，兵溜上了叫水深了，警察叫皮子，巡警叫狗子，设卡叫压水，枪叫炮，子弹叫飞子，头叫瓢，杀头叫摘瓢，开走叫滑，城镇叫框子，上城里叫上框子里，屯子、响窑叫卡拉，房子叫窑，有枪人家叫响窑，进屋叫上窑，打响窑叫踢卡拉，窑难打叫卡拉难踢，帽子叫顶天，鞋叫踢土，靰鞡叫溜子，皮袄叫暖墙子，衣服叫叶子，单衣叫单叶，棉衣叫棉叶，长衣叫大叶子，串换衣服叫串叶子，信叫海叶子，来（去）信叫飞海叶子，等等。

拷 秧 子

被胡子绑架的人质（票）叫做“秧子”，归“秧子房”看管。这里的当家人，称“秧子房当家的”（或称掌柜的）。这个人要选凶狠、狡猾的人担当，能了解秧子的家庭情况，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能下手拷问秧子，且不打坏这些财神爷。

“秧子”多了，要依次编成顺序号。其身上背着一块方形白布，号写在上边，作为标志，防其跑掉。如遇兵匪交火，两方都便于识别，免受伤害。胡子压在某处，秧子一定要跟随左右。入室要叫秧子面墙席地而坐。夜间怕秧子跑掉，对之施行“疲劳战术”，不叫他们睡觉，使之依号报告。倘有困睡未报出时，看秧子的人便用手中二龙吐须的鞭子劈头打夹，这个过程叫做“串牌子”。

拷打“秧子”所用的刑法有：棍棒打，压杠子、吊挂、灌辣椒水、向嘴里扬灰等等。其行语叫“教秧子”。要教谁，多半把绺子压在他家附近的村落里，来这儿进行拷打，便于村中人通风报信，促其家人早赎。对家离远的，则不作此徒劳之举。久经催促，仍不来上项的，常被抹尖子（割下一个耳朵），差人送至其家，施加压力。如仍置之不理，惹恼了土匪当家的，亦有双耳全被割掉，甚至把他扣了（弄死），弃之于野，用以恫吓其他秧子及其家属。

花 舌 子

“说票”，就是去人向绺子当家的讨论如何赎出某某秧子的事宜。这需要一个能说善道，会“传话”的，能与胡子有共同语言的，或与匪中人有旧交的。人们把这种人，叫做“花舌子”或称为“活人儿”。

一般情况下，被绑票的人家，要登门拜访这种人，求其出面调解，当然要许些报酬。“活人儿”既受重托，不免要到绺子里走走。胡子们也欢迎他，因为这也是为他们办事。另外，也有由胡

子方面派人报信的。官家对此类人，多持以知而不理的态度。“活人儿”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善说两家，在胡子方面，要取得“够朋友”的信赖。其实多数花舌子都是通匪的。

去说票时，要先上“小项”（即送些礼物给土匪头头，尤其是秧子房掌柜的，以免自家人皮肉受苦），说妥后再上大项（即索要的财物，如香烟、大烟土、食物、穿戴、现金以及枪支、弹药等），胡子认为满意时，才能放人。

卜 吉 凶

土匪一般都很迷信。绺子压（住）到那儿，当家的要摆案焚香，求保平安，祈求幸运。

大绺子内设有“搬舵先生”，专门以纸牌等推演八门（术数家以休、生、伤、杜、死、景、惊、开为八门），利用八卦、八门来演算吉凶祸福，自诩“八卦能通天地理，六爻搜透鬼神惊”。他择生门而出（以开、休、生3门为吉，余门为凶），避死门不入。凡遭水没脖（即被兵围困）时，众匪无策，惟赖八门先生“神算”定夺方向，然后“大当家”的下令，炮头要前打后别，以其管儿亮（枪准）来掩护群匪撤退。此时，余匪亦各拼命厮杀，希望打出一条活路来。

在打仗过程中，久经战场的老匪，是不容易被兵抓住的。前有炮头，后有总催，加以自己有经验，万不得已时，把一些“吃溜达”的（随匪行动而无枪，拍巴掌的）扔下一二人，作为绺子的牺牲品，以甩掉官兵的追击。

诸 忌 讳

土匪诸忌：忌摊横梁子（即打死人）。匪头常告其伙伴：汝等切记，凡奸污妇女者，必遭“横梁子”，他们总避用“横”字。吃饭时，忌讳把筷子横放在桌上，用完饭，不准把筷子横在碗上，当

然更不允许把饭桌横着放上。

在土匪黑话中，把“死”说成“睡了”，因此“睡”成为口忌，睡觉被称之为“抻条了”。吃饭时，不许“打口哨”，不要脚蹬炕沿；人走了，不准送。这些都是戒条。

不吃窝边草

土匪中间，虽有些“清规戒律”，但认真照办者，寥寥无几，如切忌“耍混钱”，“不可吃窝边草”，“不准奸污妇女”等，很多土匪都肆意所为。土匪所讲的“兔子不吃窝边草”，“好汉护三邻”，意思是说，不要危害邻近乡里，乡里知情者多，积成民愤，就自断活路了。伪满初期，有一报字“云龙”者，系县城北罗斯屯一带人，他竟然在本屯中作案，乡人恨之。一日，见其夜归，屯人藏于暗中，一枪将其击毙。

棒 子 手

土匪之外，尚有一些“棒子手”在地面骚扰。他们枪少，常用一只手枪，加上棍棒甚至使用假枪来干事，私进民宅或拦路抢劫。他们不报字号，使用先发制人之法，趁人不备，便一棒将人打倒，死活不管，只要抢到财物就行。这些图财害命之徒，其手段较之土匪，尤为阴险、毒辣。俗话说：棒子手，不听鼓词，即是说你再苦苦求情，他也一概不理。土匪把他们叫“捅猫儿蛋”的，骂他们是“胡子的小舅子”。

砸 黑 窑

所谓“砸黑窑”就是指一帮歹徒，黑夜之间闯入民宅强行抢劫，这是事前有组织有计划的作案行动，多是些当地人，知道人家根底，如钱财物的数量、存放地点，临时组织几个无赖，拿一枝枪，或干脆无枪，使用假枪、刀剑、木棍等。他们怕人认出，多

把脸抹黑或戴上假面具、口罩、帽撸(只露双眼的帽子)，按插千人提供的线索，夜半越墙，打开大门，入室作案。进屋后先要把人盯住，或赶在一起，用一匪看着，然后逼要财物。如得不到东西，便进行拷打，同棒子手一样的凶恶。

插 千 的

插千的是胡子暗探，他事前调查好谁家有财宝，谁家秧子值钱以及家中人口，进出地点等，做好作案准备后，便去绺子密告。如插千的没弄准情况，匪徒行动扑空，或得不偿失，则要受众匪的责难，严重者还有被扣（杀）的危险。因此插千人均谨慎行事，多在邻里熟人中下功夫。这种人只要发财，任何伤天害理的勾当都能作出，可恶至极。

匪患的蔓延

沙俄侵入我东北后，大肆搜刮，发行“羌贴”，拼命收购各种物资，运回本国。以后日本人取而代之。前门去个虎，后门进个狼。小鬼子比大鼻子更不示弱，他们设立了道胜、正金、朝鲜等银行，独占金融市场，弄得百姓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男逼为盗，女迫为娼，盗贼蜂起，打窑绑票，夺人财物，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更令人痛恨的是，那些日本侵略者指使当地的民族败类，持枪打劫，且在租界内，豢养匪首，以备将来入侵我国时，用作狗头先锋。

有以上的后台支持，加以官匪通气，无人认真进剿，因而匪患蔓延难除。

1、军官铺局

民国年间，扶余县长春岭有一刘营长，是个土匪出身，原报字“大生字”，投降官军后被任为营长，驻防岭街。其人匪性不改，假借军队名义，出枪铺局，把抢来的财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拉到营部院中，就地分赃，百姓虽然认出自己的车马等物，也不敢去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百姓们联名去省上告。吉林督军见告来的呈状，集满案桌，不得不饬令扶余县陆军团部的陈铭安团长设法逮捕刘营长，并由吉林省派来人员协助办理。

陈团长对刘亦不敢强行逮捕，乃以军官会议的名义，将刘等召来。刘作贼心虚，来团时带有很多卫兵，以防不测，自己的亲随卫兵更是不离左右。但陈团长早已有了安排，刘等刚到，即有团部的人员将刘的卫队全部让至官店，设酒相待。军官们在茶余酒后齐集会议室，各叙一些私生活。团长新买来一枝手枪，主动递与刘营长说："我这枝手枪虽是新的，听说也不如你的，你看怎么样？"然后又说："来，我看看你的！"刘营长只得把自己的枪递给了团长。陈接枪在手，检查一下，枪膛正顶着子弹，他立刻用枪对着刘并喊话："来，将他绑起来！"手下人马上拢过来。刘也不示弱，忙以手中的手枪指向陈说："你想干什么？我也不是白给的。"陈微笑了一下："你输了，我的枪无子弹，你不用空使威风了。"刘急忙大叫其卫兵，可是他们早被人以同样的方式逮捕了。官店的卫队也在大吃大喝时被人缴械了。

刘被捕后，经省、县共同审理，罪案累累，俱各确凿，与其爪牙共7人，都被枪毙于扶余西门之外。

2、地主拉局

伪满初期，三岔河东6号一带，有一刘姓，家有土地七八十垧，当家的名叫刘廷举，与两个弟弟、一个儿子下地干活，外雇几名伙计，生活富有。因当时遍地土匪，所以家里筑有炮台，并购买枪只，用以自卫。

一日，二弟廷洲携枪院内巡视，忽听后墙外边有锹镐声，急登墙头，向外查看，朦胧中见有几人，正在挖墙基，乃大声喝问："什么人，想干什么？"外边人答了话："正要拿你，你下来！"廷洲见此情况，知是土匪意欲进窑，眼看墙洞要通，便举枪放了一

下。匪人们也立即还击两枪，一枪打中廷洲肩上，廷洲不备一头栽下墙外。土匪马上飞跑过来，将其绑架。

当家的刘廷举闻声赶来，见后墙里已钻进了3人，便举匣枪射击，把进院的土匪又都赶了出去。这时在高粱地里藏匿的土匪，也包抄过来。刘家父子兵各占一个炮台，两方便正式开火了。刘家人少力孤，正在危难之际，忽闻远处号响，交战双方都知有兵来了。刘家有了信心，乃鼓起勇气，拼命喊打。而土匪则边打边退，不敢恋战，待兵进屯时，匪已远遁。

事隔半月之后，刘家突然来一不速之客，自称途经“三江好”绺子所压之地，因自己为外乡人，且无财物，故被放行，但三江好托其过此地时，要向刘家传个信，必须火速去人赎刘廷洲。刘廷举听毕，满口称谢，并备酒相待。客去后，廷举却无意立即派人前往。又月余，这个客人再次光临，刘家得知来客乃是个“活人儿”，为了自家被绑的人，仍得善意相待。活人儿告曰：“你家廷洲肩上负伤，那儿缺医少药，如不快赎，怕有生命危险。”廷举听罢，也觉事态严重，不能再拖延下去，但弟弟究竟病体如何，尚不清楚，不能冒然“上项”，于是派扛青的姚伙计陪同活人儿先去上点小项，看看动静再作下步打算。

二人来到匪窟，活人儿说明来意，秧子房当家的说：“你们可以与刘秧谈话，但不准入秧子房内屋，只准隔窗相望。”二人只得照办。但见廷洲躺在那里，蒙盖着一条被子，唉声叹气地说：“老姚，快叫我哥哥张罗钱来赎我吧！我有病，说话吃力了，声音都有些变了，快要不行啦！在这里真受不了折磨，罪实难挨呀！请我哥念念手足之情！花点钱吧！告诉我家里的，若是早来赎，我们夫妻尚能见面团圆，晚了就难说啦！”说着就哭起来了。姚伙计一听，也很觉心酸，忙安慰他说：“二东家，请放心吧！我回去一定转告明白，并催大当家的及早拿钱来赎，你家老婆孩子都好，不必挂念。千万不要着急，好好休养吧！”说罢，同活人儿一齐返回。

廷举得知人在，但病实不轻，不能弄得人财两空，于是以要用一段时间准备钱为由，有意拖延，以观其变。

廷洲妻董氏心急如焚，哭诉于其弟董万宝。董万宝即逼刘廷举马上赎票。刘只好筹款找来活人儿与姚伙计同去上“大项”。几十天过去了，活人儿与姚伙计却音信全无，家人与亲友托人四出寻找，均无消息。

一日，刘家长工进屋来报，有一老太太要进见东家。廷举吩咐快请。老太太进屋落坐后，声称要见她儿子。廷举忙问：“谁是你儿子？”老太太气喘吁吁地接着说：“我是从几十里地以外走来的，我的儿子在你家扛活，几个月没有回家了。要想饿死他妈？他在哪里，我得问问他。”“你的儿子是谁？”“你家打头的姚老大呗！”刘廷洲一听，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又添上了一件愁人事。这该如何安慰老太太呢？他委实有些为难，只得先以好言相劝：“姚伙计外出办事，还没回来，你老不必着急，家里缺柴少米，我这儿派车拉点去。待他回来，马上叫他回去看望你老！”在姚母的追问下，刘廷洲不得不将姚伙计去赎票的事如实相告。姚母得知后，深感凶多吉少，乃哭喊着逼刘家还他的儿子来。经过调停，决定刘家先派车给姚母家送些柴米，并请姚母回家等候。这期间再派人出外探听姚的下落，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这场风波，才暂时停息。

秋忙到来了，姚伙计仍是杳无音信。当时扶余县城驻军有一位鄂营长，一日带领20余骑去郊外遛马，途经东门外，见有3人坐在城壕边上。他们见马队一来，便立即举止不安，惊慌失措。鄂久经行伍，一见生疑，遂即勒住马头，随手把盒子枪一伸，3人不敢怠慢，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鄂营长命手下人去搜查他们，三人身上都有小枪。鄂遂吩咐，暂时带回。经过审问，3人供出，是三岔河那边“李大当家”的绺子下挂柱的。匪首李某，家住三岔河西10号一带，种地五六十垧，自有大小枪四五枝。每年庄稼一

起身，即筹备组局，待青纱帐起，就亲自拉局，庄稼收获后，便挑局归家，料理家务。

李匪作恶多端，刘廷洲就是他绑架的。原来，刘廷举与其族人因土地发生争执，因各不相让，乃积怨成仇。某族人亲自“插千”，唆使匪首李绑架廷举之子刘勤。李一想，这个卡拉不好踢，不能硬碰，便派人私自挖刘家墙角，准备打进人去，以便里应外合，达到绑票目的。不料绑来了刘廷洲。刘被绑后，因肩受枪伤，又无医无药，病势日趋恶化，在奄奄一息时被弃之于野外埋掉。但财物尚未到手，岂能善罢，乃叫活人儿去刘家催促赎票。姚伙计来探望时，匪首李急命一名匪徒，佯装刘廷洲，且假作嘱托，欺骗了姚伙计。

李匪对姚伙计有些面熟，第一次相见时，李未敢正式露面。第二次姚来赎票时，他被姚撞见，因而不得不出面与姚相谈。他问姚：“你认识我不？”“怎不认识，我还在你家扛过半拉子呢。”李一听，心想大事不好，遂即嘱咐道：“回去可不要讲这些，知道不？”“知道了，一定不讲，这不是小事。”李听了，沉思了片刻，然后又开了口：“你还得先回去一趟，叫刘家补上几十粒子弹来，事妥再与刘廷洲一同回去！”“好！我回去就来。”

姚走后，不到10分钟，李匪猛然站起，忙吩咐小崽子：“去把姚伙计叫住。”说着他也随后走来，行至村外杨树林处，姚已被叫住。他问：“还有事吗？”“我告诉你的话，千万记住了。”“记住了，哪能忘呢，李当家的放心吧！”“那么，你急去快回！”姚走出方十几步，李便抬手一枪，将姚打倒在地，然后吩咐匪徒们将姚就地埋掉。地点在小八号某一高粱地中。

鄂营长问明底细后，即带队去三岔河西10号，将李匪逮捕，对证口供，与3匪所供相符，乃令先押回县城，听候发落。之后，组织了村人，挖掘姚的尸体。附近老乡闻讯赶来，均哀叹姚之遭遇，乃自动地持锹镐挖找。挖掘到第三天，突然有人挖出一个小

旱烟袋，接着又发现一只鞋，最后挖出来一具尸体。姚母一见烟袋、鞋子、尸体，便心痛欲绝，放声大哭："不想我儿忠厚老实，实心待人，竟遭到这样下场。天哪！是谁这样狠心，害死我的儿子，老天爷！你还有眼睛吗？……"她的哭声，撕碎了乡亲们的心，大家再也忍不住了，顿时嚎啕之声，震遍了四野。

有人高声喊道："光哭无用，大家商议一下后事吧！"

有人发言了："这事是李匪丧心病狂，杀人灭口；刘家损人利己，轻视人命的罪行，也是不可饶恕的！我们要刘家备棺成殓，将灵拉到李家去。把棺材停放于李家院中，在其上屋房顶上压上黄纸，也就是将他家的上屋做坟地。"众人无不同意，于是就按计划办了。

深秋之时，李匪首与其他3个匪徒，全被枪毙了。阖村老幼闻讯，无不称快。

3. 逼上梁山

何大爷是一位毛笔工匠，与笔者同住一院。他经多见广，又喜欢谈论旧事，什么日俄在旅顺口打仗啦，义和团杀洋人啦，以及枪毙驼龙啦，这都是他耳闻目睹过的。其中枪毙驼龙给我印象最深。在我读高小的时候，扶余各地就已传遍匪首驼龙的故事，成为当时轰动关东的社会新闻，几乎家喻户晓。可是都是人云亦云，不得底细。驼龙的来龙去脉，何大爷是知之甚详的。

驼龙原名张淑珍，是我们同乡。她父为人忠厚，人称"张老好"。在日俄于中国东北土地上打仗的时候，张老好携其身将临产的发妻，坐在大轮车上逃难，在太子河畔不幸遇上了老毛子兵（俄国人）。这群畜牲，一见张妻，即欲行无礼，老好苦苦哀求也无用。正在危难之际，幸遇一群行人相救，方免于祸。但张妻经惊吓之后，昏昏迷迷，神智不清，并于途中生下了一个女孩。这女孩就是张淑珍。她出生不久，母亲就因忧劳成疾死去了。老好无奈，不得不重返家园，先求邻人乳喂淑珍，后又买到一只奶山

羊，才把孩子养大了。

淑珍十七八岁时，恋上了一个在她家作短工的青年于志和。于是个烧香跳大神的“二神”，人称“于二神”。于二神将淑珍骗出，来到宽城子姑母家。在这儿住了两三个月，眼看把淑珍带来的钱物要吃用光了。于二神无处挣钱，生活困难，遂起坏心，与其姑母私议，狠心地把淑珍卖与了娼门。

张淑珍初期不肯就范，但经不起鸨子的折腾，只得卖身求生了。一二年后，她遇到了一个报字“大龙”的匪首，二人情意相投。大龙想尽了一切办法，把淑珍赎买出来。张淑珍得了自由，便带着大龙的手枪，径往于二神之姑母家，欲报前仇。于姑母一见来头不善，遂以花言巧语，假作好人，把逼其为娼的罪责完全推到于二神的身上了。张淑珍信以为实，反而认为这个老婆子是个好人，并拜为干娘。

于姑母知张为匪，曾两次偷报官来捕。但当官兵来搜捕时，张淑珍恰巧一次去街，一次去巷间厕所，她看见有兵来，就躲闪一旁。因此两次均被其走脱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张不知警惕，始终没有怀疑是其干娘出卖她的。

张淑珍当上了胡子之后，不知可怜穷人，在距宽城子七八十里的乱石山一带为非作歹，残害人民，因而民愤很大。后经曹二虎派兵将这个绺子打花落了，她无处安身，又不得不重投妓院。因其干娘的告密，驼龙终于落了法网。

这年的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在欢庆灯花节，何大爷到街上买东西，亲眼目睹了驼龙临刑前的情况。当时宽城街上等待观看的人很多，天寒地冻，人们的脚冻麻木了，不停地跺着脚，只听咚、咚、咚打着点地响个不停。

“听！号声响了。”人群中一个青年喊了一声。这一喊，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停止了跺脚。

人们伸长了脖子，向远处瞧。不多时，一辆铁轮马车走到近

前，有几个兵押着一名女犯人，五花大绑。她身穿紫底白花的斗篷，头戴一顶黑色绒帽，样子长得很俊俏，瓜子儿脸，眉目清秀，时髦、漂亮，活象戏台上一位贵妇人的打扮。在她的脖后，插着一个白色长条“招子”，上写“奉令枪毙匪犯张淑珍一名”。

人群波动了，拥挤着，人们忘记了天气的寒冷，有的嘴里还叨念着：“白瞎这个年轻人了，这样俏皮人，为什么单要当胡子！若是她妈知道，该有多难受呀！”“她的妈，早就死了，她今年才24岁，本来也是个好孩子。可惜这个世道，好人少，坏人多，她是被人卖到窑子的！”“可怜这个孩子了！”一位老太太眼里淌着同情的泪，不断地用手巾擦抹着。

刑车跑远了，很多人跟到了法场，他们回来传说着：驼龙坐的刑车，来到一家绸缎庄前，她要了一丈红绸子，披挂在身上，刑前还要了一碗酒，也一口喝了下去。下了车，她对刑警们说：“我有个要求，把我这件斗篷，请送给我的干娘，给她留个纪念吧！”一位老人说：“这个傻丫头，至死不悟，仍拿仇人当恩人。”事后才有人知道，那件斗篷里，全贴满了钱票子，那个于姑母为此发了一笔财。

临刑前驼龙高喊：“来吧！我不怕死，我----不怕——死——啊！”砰、砰，两声枪响，结束了驼龙的一生。

五六十年过去了，可是枪毙驼龙的故事，却一直在东北民间流传着。当年曾有人把这件事编写成小说、剧本，在扶余新舞台上，也曾用过大口落子（评戏前身）演出过“枪毙驼龙”这一出悲剧。

土匪的归宿

语云：“当一天胡子，怕一辈兵。”对此，土匪们皆引为心病，因此他们也不能不考虑一下自己的命运，如何结局，一般不外“降、隐、死”3个字。

1. 降

大多数土匪，均愿投降，匪首当个官，匪徒当个兵，不愁吃穿，不怕官捕，又何乐而不为？张作霖、张作相、汤玉麟、张景惠等是其榜样。难怪当时有这样两句话："不当胡子不做官；不当婊子不当太太。"可见当时的社会，竟是谁家的天下！

九·一八事变时，有些胡子还很懂气节，如李海青虽然也当过胡子，但他不降敌而抗日，深明大义，因而受人敬爱。

另一部分土匪，不是降于人民而是投了日伪。如云龙、仁义之类都降在扶余尹保衡部下；桑老九、东平、双侠、凤好、忠南侠等被于大头收降了。投降日伪的头头，后来多为日寇所杀。一般小卒，当上了日伪的特务腿子，谁也没有逃脱其主子的卸磨杀驴的命运。

2. 隐

有一小部分土匪，逃入了深山老林之中，隐姓埋名、担惊受怕地了其一生。如有人揭发，亦不得善终。解放后，匪中之罪大恶极者，都没有逃出人民的法网，而被镇压了。

3. 死

这是匪徒深忌的一个字，但他们是躲不了的。不是老死、病死，而多是所谓"横死"的。某些小匪在解放后，能改邪归正的可争取宽大处理，但有些不知改悔，且继续作恶，成为惯匪的，或被剿灭，或被人民检举，均被治以应得之罪。

总之，土匪的末日，多无善终，常言道："自作孽，不可活。"诚则斯言！

（吉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土匪的四梁八柱及匪规

朱景荣

凡是拉起的一伙人，搞掠夺民财的成帮胡匪，统称绺子。匪首报什么“字号”，这个绺子一般就叫什么名，如“草上飞”、“小白龙”之类。绺子的骨架以“四梁”为核心，以“八柱”为骨干，有如房子有梁栿、柱脚一样。

四梁：

一、顶天梁：是一个绺子的总头目，黑话称“大柜、二柜”，又叫“大当家的、二当家的”，掌管绺子的全权，也管土匪的训练教育，劫掠的重要财物的分配和迎来送往等事务。

二、转角梁：是“撒垛先生”，通称先生，是匪绺的军师，负责用唯心迷信的方法，如“推八门”、“算计”等伎俩，指挥整个匪绺行动的去向，决定攻守的措施等。

三、迎门梁：土匪称“炮头”，该人须有胆量大、枪法准、指挥能力强等特点，充当先锋角色，遇到紧急情况负责“前打、后别”——先行和断后。

四、狠心梁：匪话称“秧子房掌柜的”，负责看管、拷打绑来的人质——“票”，通过人质索取枪、弹、钱、物等。

八柱：

一、总催：是攻打响窑或突围的总指挥，也负责督察。

二、水相：掌管各棚胡匪的站岗放哨，一般是一炷香一换班。

三、马号：负责掌管胡匪的坐骑分配和管理等。

四、帐房：负责劫得财物的上帐、分配等。

五、稽察：负责监督检查匪徒执行匪规的情况。

六、上线员“负责侦探，掌管与所设“汗线”（侦察员）的联系、攻打响窑或突围时领头指点等事宜。

七、传号员：负责给大柜、二柜、总催传达命令，向匪首汇报军情等。

八、棚炮头：类似军队的班、排长，负责管理他手下的那伙匪徒。

土匪绺子有着统一的规矩和黑话。

主要匪规是“七不抢”、“八不夺”、“五不准”。

“七不抢”：娶媳妇送姑娘的，送葬起坟的、和尚道士、妓女、吹鼓手、学士和医生的东西不抢。

“八不夺”：鳏寡孤独、邮递员、抽贴算命先生、乞丐、挑担小贩、货郎、赌博者及跳大神和“当鼓的”的东西不夺。

“五不准”：不准抢穷苦人；不准调戏、奸淫妇女；不准进产妇的房间；不准走猪或驴在前面横走过的路；不准用娶亲人家的酒饭，只准上礼、喝水。

土匪的规矩，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黑货，虽然标榜不滥抢、滥杀，但尽人皆知，他们是烧杀掳掠无恶不做。有些似乎很“良善”，实则是出于迷信思想及匪性。例如，“不进产妇的房间”，是怕“血气之灾”冲了他们的运气；“不奸淫妇女”，是因为他们认为干了这等事就要摊“横梁子”，不是逃跑被人抓住，就是打“响窑”挨枪子儿。土匪还有一套为所欲为的“变通”伎俩。例如，土匪行路时遇到猪或驴在前面横穿路面，按匪规就不应再走下去了，可是土匪们只在几步之内改变一下方向，以后又折回原路，这就算按山规办事了。

土匪有一套见面礼。

如来者是入伙的，在外边遇见放哨“子水”的胡子，得先拱

手，然后说："西北悬天一只鸡，绿林不把绿林欺、绿林若把绿林欺，伤了绿林好和气！"了水者放行，手指柜房说："请见大柜。"

来者迈着显得精神利落的步子走向匪首居住的"柜房"，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当儿看见柜房的人时，要抢先搭话奉承一下。如果去的是"草上飞"绺子，就先说"草上飞管亮……"，"管亮"是"枪法漂亮"的意思。此外还有个"里掰筋托手礼"，也就是两掌相向，两手拇指外的4指相互勾起来，把手放在左腹前时微微蹲一下。整个对话是这样的：

来者说："草上飞管亮，人强马壮，托福泰咳！"行"里掰筋托手礼"罢，面对众头目有节奏地朗诵般地说："西北悬天一块云，乌鸦落到凤凰群，有心我把真主拜，不知哪位是君来哪位是臣。"总催、炮头或给匪首带马的"小崽子"，起身指着大柜、二柜说："这位是君，这位是臣。"大柜、二柜让来者坐在炕上："请台上拐着。"来者接着说："我登局晚，出局早，山规局势没学好。"这样"谦逊"完了，便说明来意，匪首才表示收留与否。

如果是其他绺子派人来办事的，走完上述见面礼后，还要继续"盘道"——用黑话对话，走大程序。其具体情况是：大柜示意给小崽子点燃一柱儿香，摆上28个装粮食的香炉碗，这些香炉碗代表胡匪祖师二十八宿。来者下地净手上香，每上一次香都有定规的讲究、插法和黑话。上完香，大柜一看是内行，不敢小瞧立即让座。小崽子递过抽大烟的家什，宾主开始抽起来，边抽边唠并逐步转入正题。如果来者岁数小，是来求借的，便说："我马高镫短，小弟浅住了（遇到困难了），绿林朋友把话搭，打下银钱大伙花。"大柜回答说："缺吃少穿找哥哥（指枪支弹药）。"下面接着用半黑半白的话谈具体问题。

如果"活人"（说合人）、懂行者来瞧朋友或财物被劫留特来求情，得表示"找柜房瞧朋友"，进屋行完前述见面礼后，大柜、二柜问"你瞧哪位"，如果所瞧的人是认识的就"翻万子"——用

黑话说出那人的姓，如果是不认识的就说“海交”——谁都瞧；然后表明自己和哪个匪绺头目有什么关系，或自己曾在哪个山头干过；再说明什么东西被劫扣，“请高抬贵手”。匪首一看是同行或朋友、立即传下号令，交还东西放行。当然类似这种接触都有许多礼节和客套话。

匪绺通常使用的“黑话”，又叫“行话、江湖话”，大体上分人、物、事3种，现将搜集到的与普通话语意相对照列表于下：

大柜——大当家的　　大噗——大炮
花舌子——说情者　　汗线——土匪的侦探
了水——岗哨　　狗子——警察
耍混钱——棒子手　　秧子——人质
花大脖子——活人、说客　　把什或马拉子——身边卫士
水跳子——兵　　手花子——手枪
飞子——子弹　　助手子——筷子
草卷——香烟　　响子——枪
老串——银钱　　优连——走马
连子——马　　压手子——马鞭子
盖子——马鞍子　　碎嘴子——机关枪
跑良子——匣枪　　硬粒——炮弹
轮子——马车　　飞轮——汽车
蹬轮子——赶马车　　流子——爬犁
排回头线——原路返回　　花打了——被打散
净场——打扫战场　　飞叶子——去信
挂线——联系接头　　飞子上线——练枪法
枪头子——枪法　　水头——字号
溜子——足迹　　棵上——正式胡子
插边儿——入伙　　丢刀的——伤亡
上小项——送礼　　站条子——列队

睡了——死了
打着吃的——胡子
回叶子——回话
拷秧子——拷打人质
线上——绑上
起水了——官兵来了
挂花——负伤
拉个对马——联合作战
拜庙的——送大礼
借道的——通过占领区
肉票——人质
降大杆子——投降队伍
挑——转移
上亮子——点灯
捆——这伙吃掉那伙
掏灰扒拉火——揭发检举
挂柱——入伙
蹓连子——蹓马
贴克——打仗
顶水啦——与兵走碰头
水流子急——追兵打得紧
踢卡拉——攻打响窑
打管——打尖吃饭
接页——接见
要清钱的——正规胡子
撂帘——天黑
抻条——躺下
台——炕
捏酥了——打死
扳江子——杀猪
学舌子——口信
啃窝——吃饭
花子——钱
压——冲的意思
蹩住——顶住
烧香的——送小礼
抽票的——赎人质
挡眼——把眼蒙上
落点——安身之处
叫秧子——过堂
压下——住下
水深水浅——兵多兵少
插干——提供抢劫对象

吃里爬外——叛逃出去
拉房身——在家乡抢劫
龙口——放枪垛口
起水啦——来兵啦
水没腰——被兵包围
管亮——枪法准
拧响——放枪
叉上——骑上马
团——翻黑话
挑帘——天亮
条乱了——困啦
抻——睡觉

清碰——真认识
台甫——叫什么名
混碰——面认识
贪横梁子——用枪打死人
阳——南
倒——东
区区——亲戚
有靠——认识
揭边——胡子偷着搬家
列——北
切——西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张作霖的土匪生涯

张占军整理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今属辽宁）人。他出身土匪，1902年受招抚，任清军马队管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调入卫沈阳，屠杀革命党人，后一跃升为师长。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他乘机夺取了奉天的军政大权，始为奉天督军，后为东三省巡阅使，全部控制了东北三省。1924年进军关内，打败直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1926年自封“安国军”总司令，次年4月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等，6月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6月在北伐中战败，退回东北。由于他未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发生利害冲突，当他乘火车经过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张作霖是中国近代史风云一时的人物，他早年的土匪生涯就已表现出机谋狡诈的特性，加之时势的推动，使他登上历史舞台。

张作霖，小名“张老疙瘩”，1875年农历二月十二日生于奉天海城小洼子村，其祖上为河北大城县人，因家道艰难，无以为生，曾祖张永贵遂带领家人逃荒关外，落户海城。其父张有财，不务正业，终年在赌场中厮混，是当地有名的赌棍。张有财先娶邵氏为妻，生一女，长大后嫁于杨春芳（外号杨魔症，后充东北军团长）。邵氏死后又娶王氏，生三子，长子作泰，次子作孚，张作霖是第三个儿子。张作霖幼年时与鲍贵卿家对门而居（鲍后充吉林省督军，与张作霖结为儿女亲家），来往密切。鲍、张彼此互吃母

乳，后来成为莫逆之交。

张有财长年累月在外赌博，放赌抽红，借以养活全家。1883年，张有财一去数月不归，致使家中生活无着，王氏托人四处探寻，仍不得结果。忽一日，他家养的黄狗从外面跑来，见到王氏后叫个不停，并用嘴叨扯王的衣襟。王氏甚觉奇怪，便跟随黄狗走向村外，走到一片树林处，只见一群乌鸦被惊动飞起。行到树林之中，王氏发现地上躺着个人，走至近前一看，竟是她的丈夫张有财，顿时惊呆了。她强忍悲痛回到村里，求当地的“乡约”到县上报了案。县府接到报案后，派人来验了尸，发现有刀伤，证明是被人谋杀致死。因张家贫穷，无钱上下打点，只批了个领尸掩埋，听候缉凶，就再无下文了。后来据传，是栾家堡子一个姓王的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局上赌输了，张让其以老婆抵债，王怀恨在心，遂预伏于张回家的路上，趁张不备把他杀害了。张有财死后，一家5口生活更加艰难，无奈，只得将家中仅有的3间房子卖掉，投奔琐安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的外祖父家中。当时，张作霖年纪尚幼，母子5人就靠作泰、作孚给人扛长工维持生计。

张作霖受其父亲的影响，自幼顽劣，鬼心眼子不少。一日母亲跟孩子们说，我家生活这么艰难，欠邻居的债总也还不上，可怎么办呢？张作霖听后，眼珠子一转，想出一个鬼点子来。第二天，他故意将邻居的猪撵入池塘中，并大喊“猪落水了”。村里人听到后纷纷出来观看，他便跳入水中，把在水里挣扎的猪救了上来。邻人见状，很是感激，便对作霖母子说，多亏作霖把猪救了上来，要不非淹死不可。为表示谢意，借我家的钱就不要了。

张作霖12岁时，因家贫无力上学读书，后经托人向村中私塾先生说妥，让张一边给先生做饭，一边读书，不收学费。张作霖天资聪颖，书念得也不错，但就是不守规矩，还不愿受塾师管束。一次受到先生责备，心中大为不快，一时性起竟打了先生。他嘴里一边嚷着：“干啥都吃饭，我不念了。”一边抄起课本回家去了。

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不到一年书，就中途辍学了。失学后，他在家无所事事，学会了赌钱。母亲怕他学坏误入歧途，便凑了几个钱让他去做小买卖，先是叫他卖包子，他馋了就吃，常常亏本。一日下小雨，包子没卖出多少，他见乡里几位老太太赌马掌纸牌，也吵着硬要玩。人家怕他输了不给钱，所以都不愿让他参加。张说："我虽没几个钱，但有包子，你们怕什么，谁还赖你们的。"几位老太太无奈，只得叫他参加。偏巧他一人大输，于是耍起无赖，一把将钱抢去不少，提起篮子往外就跑。几个老太太哪能赶得上，急得什么似的，把他臭骂一顿，也就作罢。张朝老太太们作个鬼脸，嘻笑着说道："你们下次再别跟我玩了。"便扬长而去。

后来，王氏又凑钱买了些针线、鞋面、胭脂粉之类，让张背起货箱，手拿唤铃，当起货郎来。张作霖性好赌博，只要手里稍赚得几个钱，碰上赌钱的，丢下货箱就要起钱来，时间不长就连货担子也输了。而后到赵家庙木匠铺学木工，不久感到没意思，就不学了。最后他去学兽医，对马发生了兴趣，学会了一些相马、医马的本领。他在给附近驻军医马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些清军的兵弁，沾染上了兵痞的习气。张作霖学了一段兽医后，因不愿呆在家里，又跑到附近村的大车店当打杂的，干一些给旅客端茶倒水、帮着卸车套车一类事情。辽西巨匪冯麟阁曾在该店住宿，两人一见相投，冯讲了许多有关土匪的事情，并在言谈中流露出引诱他入伙之意。他在大车店干了两三年后，又流浪到营口县的大高坎镇与流氓赌棍厮混。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当时，所学无成、游荡于营口街头的张作霖，便由过去熟识的清军小头目援引，投到宋庆标下马玉昆部的赵得胜营中。因他精明伶俐，又善骑射，博得长官好感。后长官的爱马有病被张医好，故更得赏识。不久，张即被提升为哨长。翌年张请假回乡探望母亲，他骑着马，身着整洁的军装，马背上还披着红褥套，神气十足。乡邻们见后，都说张作霖长出息

了，当上官了。当时即由赵家庙街高木匠铺的高老惠作媒，将该村赵占元次女许配给张作霖，夫妻同庚，都是21岁。

中日停战后，宋庆军移防关里，张趁机携械离开部队，回到家乡。他与兄弟作泰、作孚分家单过，因家贫，只分得两双筷子两个碗，于是寄居于岳父家中。为了谋生，张作霖在营口附近大高坎镇设了个兽医桩子，又当起兽医来。当时，东北遭受帝俄侵略，盗匪蜂起，那时的匪帮多是骑马，俗称“马胡子”。张作霖常给他们医马，故结交了许多绿林朋友。此外，当时不少村子还成立了“保险队”，也常去找张医马，所以跟他们也混得很熟。在大高坎当兽医时，张曾与当地一个姓于的共恋一私娼，因争风吃醋，张被于某用一铁锹打昏在地。后张作督军时，有事到营口大高坎，找于某来见，于避而不敢前来，张骂于孬种，并说：“若他前来，我将给他一官做。”后来，他因嫌兽医赚钱少就不干了，靠赌博和放赌度日。一次张作霖赌输了，拿不出钱来，一群赌徒硬逼他还赌债，并扬言不给钱就扒光他的衣服，把他活活冻死。张无奈，冒着刺骨寒风落荒而逃。路上，碰见卖豆腐的钟三，钟见他如此狼狈，大发善心，将身上穿的羊皮背心脱下给张御寒。赌徒们得知后，硬逼钟三将背心追回。钟三骑着驴子赶上张作霖后，更生怜悯之心，不仅未索回皮衣，而且把当时卖豆腐的钱和驴子送给了他，使之得以逃脱。以后张作霖当上“督军”和“大元帅”，感钟三救命之恩，将钟请到奉天和北京，倍加优待。当时，不少人都知道“大元帅”府中住着一位“钟三爷”，就是救张的那个钟三。

张作霖的二哥张作孚，也是个赌徒，外号叫“揭宝的”（因为他常在赌场为“宝局”揭宝）。那时赌场中常来匪徒，他二哥早与匪徒相通。有一次，他和二哥在赌场和人打架斗殴，滋生事故，被二道沟村李老恒以“通匪”罪名告到广宁县衙，被县里的捕盗营捕去。后经张作霖岳父赵占元托人具保，被解到省里受审，以“查无实据”而获释。到后来，张作霖发迹，当上了奉天督军，有

一年张回到赵家庙，时二道沟村李老恒闻讯，恐张翻起旧账，定会跟他过不去的，于是带上他的老伴一起到张的行辕请罪。叙及往事，张毫无怒容，从容置之。张作霖对李老汉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恨，你虽告过我的状，但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反而使我奋发向上，才有了今天。"说罢，拿出200元钱送给李氏夫妇，并再三嘱道："你们老俩口不要害怕，回家去好好过日子吧。"于是，李志恒如释重负，谢恩而去。

张作霖出狱后，不思痛改前非，继续赌钱，不务正业，与地方无赖及草莽之辈多有交往，后又赌输欠下赌债，便去偷人家的猪，被抓住挨了一顿好打。此事在村中传开后，张自觉无地自容，难见乡亲父老，思前想后，终于横下一条心，决意投身绿林，去当土匪。

张作霖离家出走后，先找到以前熟识的巨匪头目冯麟阁，然后由冯介绍，在广宁加入了董大虎匪帮。张作霖当胡子之后，主要充当"当把子"，负责看票，即看守绑来的人质。时间不长，张觉得干这种差使意思不大，遂又离开了这个帮伙。

当时，中国正爆发义和团运动。沙俄帝国主义为镇压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疯狂派兵侵略我国东北广大城乡。战乱之中，各地陷于无政府状态，胡匪也更加猖獗起来。在黑山县姜家屯一带有洪辅臣、陈印堂二人为首，啸聚四五百人，声势浩大。张作霖慕名前往拜访，与洪、陈相晤。张随身携带一支十发手枪，爱若掌珠，洪见后亦甚喜之，于是张忍痛割爱，当即解枪面赠。洪不肯受，说："君子不夺人之所好。"张乃说："若你不收，就辜负了我们相交的诚意。"于是洪收之。至此二人遂成至交。

当时，辽河流域一带许多村镇的地主绅商，为保护身家财产，勾结土匪，纷纷建起"保险队"之类的民团武装。张作霖以为保险队较土匪生活更安定更有保障些，于是征得家乡大户的同意和支持，网罗散兵游勇30人，也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后逐渐将

保险队扩大到附近20几个村屯，张作霖乃移驻北镇中安堡镇。当时，跟随张作霖的主要有宋老丰、崔大楞、齐大有、赵明德等人。

保险队打的是保护地方安宁、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实际上是给有钱人家“保镖”。这些人的开销，名义上是在“保险区”内按地亩摊派，实则由有钱有势者居间操纵，将摊派的绝大部分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在各自的“保险区”内，“保险队”一般是不抢不夺，但他们却常到“保险区”外勒捐，甚至恣意抢掠。后来，地方政府为改变“东屯聚党至西堡而逼捐，北堡揭竿向南村而抢勒”的局面，采取“化盗为良”、“化私团为公团”的办法，在辽河两岸设巡捕局8所，以土匪头子冯德麟为总巡长，约束“胡匪”、“马贼”，制止保险队四出抢劫。然而这一着也并未收到显效，总巡长对各保险队不仅没有多少约束能力，而且连他手下的徒众也照样四出抢劫。

在张作霖到中安堡前，受俄军招募的保险队匪首金寿山已在这一带活动，视中安堡为其“保险区”。金寿山匪股有100多人，比张作霖的势力大得多，并有沙俄的支持。沙俄侵略者让金寿山招收控制张作霖，张不听摆布，并顶撞了金。因而，金寿山怀恨在心，时刻想将张消灭或逐出中安堡。为此，他想出一条诡计，派他的干儿子打入张作霖内部，刺探虚实，以便选择有利时机，消灭张作霖。腊月二十三日（1901年），金的干儿子见时机已到，便伪称请假回家过年省亲，回去向金氏报告了张部底细，说张作霖忙着杀猪宰羊，张罗过年，并无什么防御准备，如乘机攻打，肯定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腊月三十日除夕，正当张作霖欢度春节之际，他做梦也没想到，金寿山已带领所有部众，由中安堡镇西北角悄悄摸到他的驻地。张作霖等毫无戒备，突遭袭击，慌作一团，仓促突围，携带妻子儿子和残部向东南方向的八角台镇一带狼狈逃窜，想去投奔冯德麟。当时张夫人正怀着学良，是由宋老丰背着突围的。路上，

他们在新民境内抢夺了一些蒙古马，骑马急驰，奔向台安县的八角台镇。到距八角台镇不远的雷家屯时，天已亮了。当时人困马乏，又知后无追兵，于是就停了下来，喂马打尖，稍事休息，并让当地派人前往八角台镇联络商量借道事宜。

八角台镇是张景惠的"保险区"，派去的人先找到该镇商会会长张紫云说明来意。张会长问送信的人："张作霖有多少人？什么枪？"答有四五十人，多是背的快枪。张紫云找到张景惠商量怎么办，张说："我们恐怕打不过他们，干脆让他们借道。如果等打不过了再叫他们进来，损失可就大了。"遂告诉来人："我们不但同意借道，而且欢迎他们进来。"张作霖知后，即率队顺利进入八角台镇。

张作霖和张景惠会合后，一见如故。张景惠认为张作霖既够朋友又能干，便想留他在八角台一块来干，并愿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他。张景惠对张作霖说："你的才干胜我10倍，第一把交椅非你不可。"张作霖虽一再推辞，最后还是同意了，于是当上了八角台的团练长。自此，张景惠成了张作霖的重要伙伴。

张作霖当上了八角台保险队"大当家的"后，常常受到周围匪帮的威胁和袭击。当时，在台安一带有回教的土匪头子项昭子，拥有徒众200多人，与八角台作对，决意把张作霖吃掉。当时张仅有70余人，众寡悬殊，不是项的对手，于是派人到镇安县红螺砚，向另一土匪头目汤玉麟（外号汤二虎）求援。汤玉麟慨然允诺，亲带四五十个人增援。汤、张将项昭子杀死，扩大了声势。不久，汤与张即合为一股。张作霖势力扩大后，不断有小股土匪被其吞并或主动来投，如瓦匠出身、在锦州一带拉杆子的张作相。盗魁海沙子率众百余人，内有蒙人半数，入境骚扰，绑走半拉山门士绅常老太太。张作霖与之进行一场恶战，肉票被张景惠打下，海沙子受伤遭擒处死，众匪溃败远遁。于是张作霖远近闻名。这样，就慢慢形成以张作霖为首，以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为骨干的

拥有200余人的土匪武装。

在与其他匪股角逐争斗中，张作霖逐渐懂得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的门路。他认为：要发展势力，使自己有足够的粮饷、单靠坐地抽捐和到外边抢劫是不够的，还必须取悦于当地豪绅，取得他们的支持。为此，他结交了不少地方"名士"。其中与他过从甚密、且有一定名望的有举人刘春霖（东阁）、李雨浓（龙石）、贡生张程九（紫云）、秀才杜泮林（恩波）等。还有新民一烧锅的彭掌柜、八角台富商戴春荣、新民厅的红人赵经丞等。为进一步拉拢这些人，张还认张紫云和彭掌柜的为义父，使其死心踏地为自己效劳。这样一来，他在八角台一带绅商心目中的身价逐渐抬高，彼此勾结更加紧密。那些绅商富户以"保镖"有功，每月支给张作霖近3000两充军饷，加上他抢劫所得，饷项宽裕，在辽西的势力越来越大。

庚子变乱之后，张作霖为实现其野心，寻找"出路"与"前途"，计劫清奉天将军曾琪之妻，取得信任，被清廷收编为省巡防营，时为1902年。自此，张作霖由"草莽胡匪"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

张作霖的结发夫人赵氏，赵家庙赵占元之女，与张同庚。赵氏貌虽不美，而且有斜眼病，但甚能干，为人十分贤惠。张好骂人，常与同伙发生龃龉，经赵氏从中斡旋，赖以相安无事。张作霖的第二个夫人姓卢，其父为村中塾师。张在拉竿为匪时，见卢女生得貌美，遂不断向卢家献殷勤，甜言蜜语求婚。1900年秋，张娶卢女，赵氏料理一切婚事，当时赵氏已怀孕学良3个月了。1906年，张已为清军收编，任管带。在这一年里，他连娶3位夫人：即三太太戴夫人、四太太许夫人和五太太寿夫人。张在拉帮为匪时，劫掠财物不少，据说还曾抢过帝俄一批金币，办团练时又劫得其他小帮财物不少，因此富有，尤其是1907年诱杀辽西巨匪杜立三之后，更得大批财物和赏银，故而能养活几房太太。

张作霖性喜良马，不惜重金购买。当管带时，他个人就有良马10余骑，后赠与奉天营务处总办张锡銮两匹。张作霖任督军时，因溥仪之叔载涛亦爱马，二人成为好友。张常吟诵“美人名马英雄胆”之句标榜自己不凡。张素重文人，多与之交往，并常得教益。他虽少年时仅读私塾数月，但能粗通文字，常将孙子十三篇及尉缭子兵书置于枕边。张颇善言谈，口才甚佳，每对军士们训话，常至二三个小时，滔滔不断，言之成章，但不能执笔作文。

三太太戴氏原为县内捕盗班头之儿媳，貌极美，经杜泮林设计说亲，用去万金，先在外边居住4个月，后与四太太许氏同日进门。后来张任督军不久，因戴氏责打使女被张看见，赶出府门，削发为尼，郁闷而死。后经阎泽溥介绍，张又娶前黑龙江寿将军外家王氏之女寿氏，由奉天接到新民。寿氏聪颖，能说会道，机警过人。寿氏初到洮南时，卫兵列队欢迎，寿亲自讲话，极得体，并给欢迎兵士以赏赐，因此，部下皆称赞之。

张的大太太赵氏生一女名首芳，长成后嫁与鲍贵卿之次子莫麟为妻。生二子，长子学良，次子学铭。生学铭时，看门人老薛午睡作梦，见一小喇嘛，直入院内。薛尚带睡意，便起而追之，适与张作霖相遇。张见薛踉跄前奔，遂问：“跑来做什么？”薛说：“见一小喇嘛进院，所以追到这里。”张骂薛：“胡说，你作梦吧！”正当此时，赵氏生学铭。张作霖骂道：“这小子，找我算帐来了。”因张办团练时曾杀一小喇嘛，故而疑学铭是小喇嘛托生，所以对学铭一直不甚喜欢。1911年冬，赵氏携学铭到奉天找张作霖要钱，赵与学铭住在外间，张住里间，因学铭夜间啼哭，将张作霖吵醒，张即起身将学铭打了一顿。为此，赵与张吵了一架，次日即回到新民杏核店胡同家中。转年4月间赵氏病死。赵氏生病期间，张曾去看过，但见面后一句话未讲。赵死后，给张发去电报，张先是不信，后确知已故，不免想起赵的许多好处，不觉感到痛楚。赵氏死时年仅38岁。时张学良12岁，学铭5岁，皆由卢氏照管。卢

氏生二女，1907年生一女名怀英，1911年生一女名怀青。许氏生二子二女：1911年生学曾，1915年生学思，1909年生怀瞳，1913年生怀羲。寿氏生四子：学森、学俊、学英、学铨。生学铨时，正值郭松龄倒戈反奉之时，生在南满站日本顾问松井家中，乳名太平。后来寿氏又为张在天津娶六太太马氏，生一女名怀敏。

（根据《张作霖》等资料整理）

辽西巨匪杜立三

王寿山

清末辽河下游大平原，包括辽阳州、新民府和海城县接壤的地区。这个地区有辽河、浑河、太子河、柳河流贯其间，堤坝纵横，犬牙交错，成为匪类潜伏的渊薮。当时水利不修，荆榛遍地，“九河下梢，十年九涝”，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尤以甲午中日战争及庚子帝俄入侵，清王朝失其统治能力，溃兵游勇和地方狡猾无赖之徒，铤而走险，拿起历次变乱遗留下来的枪支，杀人越货，以致社会秩序极为混乱。那些匪徒虽经官府多次清剿，但散而复聚，聚少成多，卒不能根除，一直延续几十年，杜立三就是这里的一个绿林头目。

杜立三是辽中县青麻坎人，离我家只有2里多路，鸡犬相闻，彼此虽无往还，但时常见面。因此，对于他的身世、入伙、拉帮、抢劫、杀人、攻打帝俄军队、参加“东亚义勇军”以及为张作霖诱杀经过，耳闻目睹，知之较多。现就记忆所及写出来，以供研究社会史者参考。

一、身世和闯荡

杜立三原名国义，字阁卿，乳名立子，排行第三，因此乡里人便叫他杜立三或杜立子。他在闯荡初期，就以杜立三报号。

有一次，他单人在辽阳城西抢劫，被官兵跟踪追缉，跑到八

宝胡同村外，正当危急时，遇见一个村民，挑着黄花鱼叫卖，他急中生计，用几块银元，换下村民衣裤，并鱼筐、扁担，装做小贩，缓步前行，大声叫卖。官兵赶到，问他看见杜立子没有，他说："不认识，只看见一个带枪的人向前村逃去。"官兵为他所骗，向前追赶，他便从容逸去。他认为这是天意，从此改报为"杜天意"。我们乡间，一谈起杜天意，都把他当连环套的窦尔敦、二贤庄的单雄信。

杜立三的父亲叫杜宝增，叔父杜宝兴、杜宝善和杜宝旺，都是著名的马胡子或坐地分赃的寨主。杜宝善是以专劫"皇杠"出名的"好汉"。杜立三的母亲，能说善道，经常周旋于各匪绺之间，为他们排难解忧，是各匪绺公认的干妈妈。除杜宝兴是杜立三亲手枪杀的以外，其他三兄弟，都是被官府拿获斩首示众的。

在杜立三家的西南约 10 里，有一个村子叫三界沟，是辽阳、新民、海城分界的地点，从这里南到海城县城 100 里，东到辽阳州城 120 里，北到新民府城 190 里，到辽中县城 60 里；这个边缘地带就是杜立三祖祖辈辈的老巢。这个老巢到杜立三手里，大事扩张，沟渠纵横，堤道骈联，碉堡四立，重门深巷，真是一个深沟高垒、易守难攻的匪穴。

杜立三凭着他的恶势力，在青麻坎这块土地上，霸占了上等良田 800 余亩，当地人民，每年代种、代耕、代收，不论年景丰歉，对他一家的供纳，不得短少一粒。青麻坎周围几十里内，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所有居民都由他来"保护"，外地匪帮不得动一草一木；有到青麻坎来拜会他的，必杀猪宰羊，招待备至，但不能在他家落脚。最初在西岗子，设立"天意大营"为招待处。酒食草料，由地方按日供应。后来日久天长，村民供应不了，又把招待处迁到于家房子的老当铺内。在那个年头，凡是辽阳、海城、新民、广宁一带的匪帮头目，没有不到"天意大营"来拜见杜寨主的。

有一年辽河决口，淤塞了附近的背河堤道，影响了他家田地的排水。他家管事人串通附近地主，命令老百姓替他挖掘沟渠，远至几十里外的隔河居民也都来出工。事后，地主们还倡议，说杜阁卿"大人"造福桑梓，有功于民，应当歌功颂德，立碑纪念，因而在吊鞋窝子大庙前，树立一块高大的透龙汉白玉碑。

二、爱好枪马，精于骑射

杜立三不喝酒，不赌钱，不吸鸦片烟，这和其他匪徒不同。他最喜爱好马好枪。只要谁家有好马好枪，他必千方百计得来而后甘心。各小股匪帮所送的礼品，也以好马好枪为限。他尤精于选马，善于骑乘，还要得一手好枪法。他拥有200多匹精良健壮的好马，分成青、黄、红、白4队，每队一色，不但鞍辔鲜明，马头马尾和马鬃也均扎以各色丝绸条子，以为标饰。

杜立三中等身材，紫红脸，满脸杀气，望之令人生畏。他和他的贴身崽子一样装束，头上扎着紫红色头巾，脑后垂着一尺多长的紫红飘带，身穿紫红宁绸上衣，蓝缎裤子，脚着青缎靴，每人携带两柄最好的手枪和一枝毛瑟大枪。每次出行，杜立三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总是身先匪众，跑在最前头。他的匪众，每10人分为一小队，有一小队长。在他下面，有一个帮同指挥的名宋庆濂，人称为宋帮带。

杜立三训练骑术，极为严厉，专讲横越沟壕，穿林涉水。在青纱帐起后，他们不循道路，纵横驰骋，践踏禾稼，任其所之，听到远处有车马声，立即飞奔前去，追到车马行人前面，即横截道路，屹立不动。杜有一匹跑得最快而又最不驯服的马，名叫"青燕子"，别人不敢上鞍，只有他才能驾驭。

三、在辽河岸上搭棚开捐

杜立三心黑手辣，不但地方上老百姓闻名丧胆，就是和他打过交道的匪首，亦无不畏惧。他17岁时，单人到辽河岸上，用红布缠起一把木头饭勺子，形似土造手枪，威胁上水船只，一天之内，劫了16只由营口回航的粮船。那时候，辽河两岸出产的粮，多半靠水运到营口去卖，回航买杂货。每到秋季，沿岸各码头，热闹异常。杜立三限令每只船，放下“买路钱”，船家或多或少放下银元或元宝，才准解缆上行。后来杜的力量渐大，索性在柳条岗子渡口岸上搭起席棚，公然设临时“官卡”，派人开捐，规定到营口卖粮下航船每只2元，由营口运货回航上航船每只5元，船商没人敢过问一声。

四、与张作霖、冯麟阁的关系

张作霖没有就抚之前，仗恃人马比杜立三多，势力比杜立三大，曾缴过杜立三一小股匪徒的枪支，因而触怒了杜立三。杜立三明知彼众我寡，但他自恃强悍，与对方打杀。结果，张作霖失败逃走，杜立三放马穷追，由辽阳界追到镇安县十七户。十七户有一个大地主“汤二爷”，是汤玉麟认的本家，平时与官匪各方均有交往，势力很大。张作霖率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等逃到那里，请求“汤二爷”保护。杜立三跟踪追到十七户，经“汤二爷”出面调解，两人均认“汤二爷”作义父，并结金兰之好，焚香拜把，海誓山盟。但这是张作霖一时权宜之计，内心已对杜埋下不两立根苗。

那个时候，在各股匪帮当中，人数较多、势力较大的要数冯麟阁（名德邻）。冯麟阁之所以能够成立大团，是暗地里受刘东阁

的支持。刘东阁，名春娘，举人，黑山县齐家窝棚的大绅士。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在奉天省城为冯麟阁活动，以冯“保境安民”为由，请上峰准许成立大团；因此，冯麟阁得以扩张势力，驾凌他匪之上。团址设在辽阳界高家坨子。当时著名的牛帮、海帮各股土匪以及镇安、广宁间各地小股匪帮，大多被冯麟阁吸收，共有108帮，头目称为一百单八将，以凑梁山泊天罡地煞之数。

在杜立三家附近，有一个结交匪类但不直接抢劫只是坐地分赃的大头目，叫田宝廷，平时以“行侠仗义”为号召，各地匪首无不结识。杜立三经他介绍，才和冯麟阁开始交往。同时，杜立三的叔父杜宝善又和冯是朋友；因此，名义上杜立三也算加入了冯麟阁的大团，但不在108帮之内。108帮都受冯麟阁的命令，改组受编，莫敢违抗；惟杜立三只听“请”不听“令”，分庭抗礼，独树一帜。杜立三来到大团时，受上宾待遇，因招人嫉恨。

五、生性狠毒杀人不眨眼

杀死叔父杜宝兴

杜立三生性狠毒，虽至亲亦所不饶。他的父亲杜宝增在一次抢劫后因官兵跟踪捕拿，隐匿在附近民户中。他的叔父杜宝兴被逼，供出下落，杜宝增因而被捉杀头。那时杜立三年纪尚小，没有什么衔怨。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杜立三为二老婆杜凤扶正（大老婆已走）办喜事，前来祝贺的有当地财主、绅士、官吏，还有辽阳、广宁、盘山赶来的举人、秀才，可称是十分热闹。这天晚间客人走后，杜立三的母亲在高兴中叹了口气说：“要是你爹活着也跟着享福了，你爹死是你三叔一句话。”杜立三听了，面色苍白，咬牙切齿，很长时间没有吱声。他母亲微有察觉，就把话题转到别的上去了。

过了几天，大约是十一月二十日傍晚，杜立三带着打手肖汉、王福兴等十几个人，乘马直去王家窝棚，到杜宝兴家。杜宝兴问他吃饭没有。话音刚落，杜立三掏出手枪喝道："你要吃饭到阴间去吃吧！"说罢一挥手，四五个人一拥而上，将杜宝兴和他的儿子一起捆绑，带到村外坝头上。杜立三指使肖汉，先杀杜宝兴。杜宝兴苦苦哀求，无效，遂被打死。杜宝兴的儿子见势不好，也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说："我才19岁，留下我吧，情愿侍奉你一家老小。"杜立三有点踌躇。王福兴说："当家的，你还想留下个报仇的祸根吗？"结果杜宝兴之子也被一枪打死。

枪毙兽医为马抵命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的一天，杜立三领着一伙人在坝墙子李荣家（杜的姑家）吸大烟，忽然警卫来报告，"青燕子"病了。他出去一看，这匹心爱的马病的不轻，立刻派人找兽医治疗。下午兽医到来，杜立三指着"青燕子"说："这匹马你能治好吧？如果能治好，我封你为兽医官。"那个兽医听了，说："我能治好。"不料药量用的过大，没到一个小时马死了。杜立三怒火上升，掏出手枪要打兽医。这时他姑母捺住他的辫子，手枪没有打响。兽医抬腿往外跑，不料被外边的喽罗开枪给打死了。

要毙风水先生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杜立三给他的父亲杜宝增建立新茔地，找来一位风水先生。这位风水先生是浑河东辽阳界的人，名叫李东人。李素知杜立三凶恶，在野地里找穴位时，心慌手颤，左指右划，按不准罗盘针，搞了将近一天，也没找出正穴。杜立三勃然大怒，掏出手枪要毙他，后经多人求情，得免一死。

寻包麻子复仇

包麻子名叫玉芝，也是一个悍匪。光绪二十八年杜立三派他驻在于家坊子大营，统领众喽罗。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以后，杜立三没给他们“放饷”。众喽罗让包麻子去催。包麻子去了两次，杜一直不理睬，又去一次也没有头绪。包麻子急了，和杜吵起来，说：“大伙用性命抢来的金银财宝，为什么你一个人享受，真好意思呀。”杜一看不放不行，答应第二天开饷。届时于家坊子、吊鞋窝子等大营都来领饷，管账的李先生把银锞子抬出三四箱。这时杜的二老婆杜凤就骂起来了：“这些吃才物，没钱花不到外边捐去，今天不放。”因此，放饷叫她给闹黄了，大家一轰而散。

包麻子回到于家坊子怒气未息，几天后带领20多人往青麻坎，袭击杜立三。夜半时分，包麻子和同伙从后墙跳进杜立三院内，把住北窗户往屋里开枪。杜立三的大嫂被打死了，二老婆杜凤也受重伤。杜立三和他的弟弟从梦中惊醒，抄起枪来卧在地上还击。交火一个来钟头，包麻子看到杜立三消灭不了，遂带同伙逃去。

杜怀恨在心，四处寻找复仇。那时正是秋天，我在田里看高粱，远远望见一行人马从大路上奔驰而来，知道是“天意大营”的队伍，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忽然带头的掉转马头，离开道路，踏着高粱茬子，奔向我来。到面前，杜立三认识我，厉声问：“你在这里干什么？看见有人过去吗”我心惊胆怯地说：“没看见有人过去。”不等我的话说完，他掉转马头，向前奔跑，只见尘土滚滚，刹那间人马都不见了。

击毙栾佐廷

青麻坎西北六七里，隔一条辽河，有一个村子叫小高力房。这里有个豪绅兼地主，叫栾佐廷（名尚林），人称“栾七爷”。此人

在地方上很有势力。栾佐廷和刘东阁是儿女亲家，与冯麟阁、张作霖均有交往，栾佐廷纠集了附近村屯，成立联庄会，与辽阳吉洞峪徐珍的团练、海城沙岭杨惠风的联庄会，遥遥相对。当时人称徐珍的团练、杨惠风的联庄会为清会统（不和胡匪往来只和官府打交道），称冯麟阁的大团、栾佐廷的联庄会为浑会统（和官匪都交往，什么都干）。

栾佐廷为保护自己的财产，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但对杜立三颇有戒心。因杜的活动据点，与栾家相距甚近，感到大受威胁。光绪二十九年二三月间，栾赴大石桥，请来20多名俄国兵，驻防荒地村一带，以防备杜立三骚扰。四月中旬，杜立三即与俄兵有接触，迭次失利，即转到西马场整休。俄兵乘杜不防，于某日夜间，摸进杜的驻所，刺死二揽把肖汉。杜的弟弟打死了俄兵班长，自己也受了重伤。杜立三梦中惊醒，用被子遮挡刺刀的劈刺，手指亦受微伤，乃抽身逃出。

从此杜立三对栾佐廷怀恨在心，不杀死栾誓不罢休。是月下旬，杜整顿人马，对俄兵发动总攻击，把俄兵赶出荒地村，一直追到插拉村。俄兵死10余人，其余退回大连。当时俄兵在地方骚扰太甚，人民感到打的很痛快，所以公送“包打洋人杜立三”的称号。俄兵去后，杜即派人给栾送信，告诉他“大年三十晚间见”。

这年十二月三十日过大年，栾严加戒备，四门紧闭，警卫十分严密。往年接神在大门外，今年改在院内，告诉家人不许晚间到族中拜年。杜立三在接神之前，带刘海清等12人到小高力房村，摸到栾家大门外隐藏起来。鸡鸣，东方发亮，栾家大门外有人叫门，说“给七爷拜年”。栾的大哥以为没啥事了，就去开门。不料大门一开，杜立三率领匪众随着拜年的人闯进院内。栾佐廷从窗往外一望，看到情况不好，急忙回身取枪，没等枪拿到手，外边飞来子弹把他打死了。还打死工人王得胜、艾义。栾子乃春及巡

广田玉祥、常凤金等均受伤。

六、与官兵会勇对垒

杜立三这样无法无天，许多地主豪绅接二连三地向官府控告。奉天将军令海城县王顺存（字理堂）、营口绥靖营统领朱庆澜（字子桥）联合进剿，又令驻在新民府的巡防营张作霖，负这一区域的清剿责任。地主豪绅亦纷纷成立联庄会，自备武器，配合官兵，相机行事。这给杜立三和其他匪帮以严重的威胁。

在这样行动之下，海城县沙岭地区的大地主张海澜（字子安）出财，土豪杨惠凤（字尔和）练兵，士绅邴克庄（字敬如）主谋，在共同合作之下，又得到朱庆澜、王顺存的支持，发给枪支，成立联庄会，自筹口粮，训练团丁，协助官兵，定期进剿。联庄会的声势越来越大，他们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从清剿地面散匪开始，一步一步向北推进，后来到了金家桥，逼近杜立三的势力范围。杜立三不能忍受，多次予以反击。

在1902年的秋季，张海澜等联合海城县和营口绥靖营的两部官兵，人马近千人，由杨惠凤指挥，大举进剿，直捣杜立三的老巢。

事前杜立三得到消息，精选各股悍匪约500人，准备迎敌。杜的计划是诱敌深入，一举消灭。这时浩浩荡荡的官兵会勇，进入后插拉村。村里只有陈、于两家大户。这两大户有院墙，有炮台，地形险要，便于攻守。除陈、于两户之外，还有十几家孤零零的小户。官兵进村后，即驻在陈、于两家。杜立三见官兵全部进驻，即从隐蔽中窜到各小户里。当官兵将休息时，杜立三见他们进入圈套，便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顿时枪声四起，炮火纷飞。杨惠凤等几次突围，均被击回。在猛烈攻击下，官兵会勇伤亡惨重。围到3天以后，院中粮绝，杀马代食；饮水断绝，以马尿当饮料。杜

立三想把官兵一网打尽，亲画图样，制造土炮，叫人刨空大树干，裹以铁皮，中实火药，加入铁钉、碎石、铁砂；准备长枪、土炮，双管齐下。朱庆澜、王顺存得到官兵被围消息，前来驰援，但已无兵力可调。

庚子俄军入侵以后，迄未撤去，沿辽河两岸，设有若干哨所。青麻坎西南约七八里的的荒地村，驻有一部分俄炮兵。朱庆澜、王顺存在危急中，商借俄炮兵协助进剿。俄炮兵携炮车循辽河堤坝前进，在柳条岗子岸边的坝上，架起大炮，向后插拉村连发数弹。炮弹掠过村庄上空，居民异常惊恐。实际上杜立三所部匪徒，散处在各个小户，损失很微，而陈、于两大宅，反受严重的震动，人人自危。

杜立三知道俄兵已到，但不知道人数多少；又因初次见到炮火的威力，在村民再三恳求之下，撤退逸去。当朱庆澜、王顺存带队进村时，惊魂未定的官兵会勇，已狼狈不堪。在惊慌饥饿中，勉强整队，偃旗息鼓，回到海城，从此不敢再和杜立三较量。

七、参加“东亚义勇军”

俄军自庚子进占我东北各重要城市以后，军纪败坏，骚扰太甚。辽河两岸各个据点的俄军，三五成群经常外出，为非作歹。驻所在大万村的俄官兵，每每进入民宅，侮辱妇女，地方人民恨之入骨。

杜立三对这些事情，早有所闻，加以这次遭受帝俄炮兵轰击，身受创痛，对俄军更为痛恨，因而专找机会和俄军作对。他先向荒地村的俄炮兵寻报复，精选几十名悍匪，前往攻击。因俄炮兵据险固守，又使用新式水连珠大枪，杜立三帮全使用短枪，火力不强。因此，他把队伍埋伏在堤坝上，准备袭击。俄军探得虚实，潜出一部兵力，绕到杜的左侧，乘其不备，予以痛击。杜立三以

事出突然，几乎丧命，损失匪众在半数以上，不得已鼠窜而去。俄军亦未敢追击。

但杜立三并不罢手，经常率领一部分匪众，找到俄军人数较少或未加防备的地区，打了就跑。俄军损失很大，对于这股忽隐忽现、出没无常的悍匪，毫无办法，而畏惧忒甚。每到一处，即操生硬的中国话问："杜立子有没有？"老百姓也利用仅仅学会一两句俄国话答："也西！"（俄语"有"的译音）俄军立时惊窜。

光绪三十年二月，日俄战起，俄海军在旅顺口吃了败仗，死守待援。沙皇派哥萨克骑兵从北满南下驰援。八月间日本特务桥口勇马、镰田弥助等在辽西和辽南，以土匪为基干，组织东亚义勇军，冯麟阁加入并当上了头目。杜立三、金寿山、田玉本等也成为主力，和日本军配合行动，以牵制俄军前进。杜立三受大重仁之助指挥，带领一部分骑队北上，到了洮南，和哥萨克骑兵相遇。杜部先行隐蔽，而后向大队哥萨克骑兵突击。哥萨克以为骑兵遭遇了日军，于是列开阵式，大炮下架，准备迎敌。但经侦骑一加搜索，不见敌人踪影，其时杜立三早已率队远飏。哥萨克军整理队伍，再行前进。走不多远，杜立三又依样来一次打了就跑的突击战术；哥萨克军又依样来一次列队、收队的防御战术。这样多次阻击，哥萨克人疲于奔命，不能不延迟进程，所以未到旅顺，俄海陆两军已全军溃败，节节向北撤退。

后来日俄两军在辽南东清铁路支线（南满铁路前身）沿线各个战役中，东亚义勇军给俄军以很大的牵制影响。杜立三虽然同样为日军效力，但不受冯的指挥，也不惯日军约束，始终单独行动，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俄军对他无可奈何，日本军队对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敢和俄军作对，并且杀过有残暴兽行的俄官兵，老百姓出了一口气，对他亦表同情，所以当俄军来搜索时，每每予以掩护。从此，杜立三成为日俄两国知名的巨匪。

八、被张作霖诱擒

光绪二十九年到三十年的两年期间，正是杜立三的势力扩张和发展的期间。他自称为“马上皇帝”，在他盘踞的地方，随便封官许愿，群众见他称之为“杜大人”，这就更刺激了他横行霸道、掠夺民财的野心。同时他也感到当地尽是些小财主，不适应自己的胃口，没有什么油水，就派人到处送海叶（土匪行话，即送信）。光绪二十九年四月，杜带100多人，到辽阳、营口、盘山等地强抢硬捐，逛完岳洲山回来，路过辽阳八岔沟，在大财主郭金人（外号）家大吃二喝，临走抢掠一空。

光绪三十年七月，杜又与冯麟阁合作，在辽中县西佛牛录任朝武营内，抢去快枪300枝，子弹万余粒，裹去降队250人。任突围逃出。杜将西佛牛录占据，并在吊鞋窝子一带借名筹饷。奉天将军增祺迭接人民控告，终无如之何。

日俄战后，杜立三余党尚有数百人，在辽西一带盘踞，掠夺民财，霸占民女，案件层出不穷，海城县、辽中县接呈状十数张。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密派发审处委员殷鸿寿，会同右路巡防统领张作霖相机严拿，就地正法。殷到新民后与张会见。张接这个命令颇为踌躇，以为杜立三枪法好（会使双枪），伙党甚众，防备极严，如带队往剿，声势一动，不但兵贼互伤，百姓惊恐，而且徒劳无功。经再三研究，乃用计擒之策。

张作霖以结义兄弟关系，派专人到青麻坎，向杜立三贺喜，说奉天总督府派委员来向他招抚，给他的名义比自己还高，请他速来新民晋见委员，以便筹备一切，一同晋省。

杜立三机警过人，不肯就去，同他母亲和兄弟商量。他母亲和弟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他去，以免上张作霖的圈套。

张作霖见杜立三不来，第二步使请杜泮林（名恩波）出来说劝。杜泮林黑山县人，是杜立三拜认的同宗叔父，深得杜立三信任。

这里要多交代几句，当年关外文化水平不高，社会上的读书人很受人尊敬，要是有功名的，更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那时候辽海平原上，举人有刘东阁和李龙石（字雨农）；贡生有张程九（字紫云）、张梦九和林拱宸；秀才有崔骏声、杜泮林等。他们在社会上名望很高，结识者多引以为荣。张作霖和这些人都有交往，而且特别尊重。杜立三杀人如麻，这些书生望之生畏，当然不敢接近，独杜泮林以同宗关系常来常往。杜泮林为进一步拉好关系，每每讲一些历史上侠义英雄来鼓励杜立三，并亲书“忠义家风”匾额，悬挂在杜立三家的大门上，暗以宋江相期许。他认为杜立三若受招安，其地位当在张作霖、冯麟阁之上。所以杜立三遇事必向他请教，而且信任不疑。

张作霖见杜立三不肯即来，于是以甘言厚币将杜泮林接到新民府，重情相托，并引见殷鸿寿，证明确是上宪招安，绝非欺骗。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候杜立三来到之后，一同晋省。杜泮林为张作霖所惑，给杜立三亲笔写了一封信，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语，邀杜立三速来新民晤面，一同晋省谢委。杜立三经他这番劝说，才决定前来新民。

杜立三在动身之前，做了严密布置：第一着是通知附近匪帮和留守的亲近匪众200多人，准备发生意外时，让他们驰往救援。第二着是由青麻坎到新民200里途中，安置4个哨所，每所派驻10名骑匪，并以西佛牛录镇作重点哨所，如果有风吹草动，立即快马传报，由杜老疙瘩（杜立三的弟弟）率队接应。他自己精选13名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一同赴新民府来会张作霖。

张作霖的布置更加周密。在杜立三动身之前，密令张景惠带

骑兵500人，绕道八角台（今台安县治，东距青麻坎50里）暂待，派人探得杜立三动身后，进驻新开河镇（东距青麻坎15里），一面准备进剿杜立三的巢穴，一面防止外匪增援。另遣一部分骑兵由辽中县老达房，潜入辽河岸上的卡力马，以牵制西佛牛录杜立三的重点哨所，并防备杜立三逃逸回窜。在新民府街上兴和店为杜立三设立招待处，店内伏下便衣队伍。招抚委员殷鸿寿住在一家当铺的后院，重门深入，潜布士兵，天罗地网，安排妥当，只待这个巨匪进入牢笼。

杜立三一干匪众，行到新民府城郊外，张作霖派人前去迎接，引至招待处。稍事休息，杜立三即派宋庆濂到张作霖处报到，并约期会面。不多时张作霖随同宋庆濂来招待处拜会，便衣简从，只带两名护卫，杜立三感到惊讶。当时张留在招待处与杜共进午餐，频频举杯，庆贺杜立三这次晋省，一帆风顺，升官耀祖。随杜立三同来的13名护卫，经招待处大酒大肉尽情招待，皆大欢喜。饭后，张作霖同杜立三策马到殷委员处拜会。杜立三这时只好带孙殿卿、杜振东两个护卫随行，其余田春录、孙占海等人，留在招待处等候，由宋庆濂指挥。

到了当铺，两人下马，并肩入内。殷委员迎接他们进后院北房。杜的两个护卫留在外屋。本拟让杜立三吃鸦片烟，在炕上使人按住擒拿，无奈杜立三不吸烟，没法下手。杜立三久闯江湖，经验特多，进屋坐在背墙面向大家的位置，两手不时插入兜内，抚摩枪柄，以防不测。殷张二人卧在炕上，边吸鸦片边谈这次上宪的意旨，说杜立三敢和俄国兵交锋，给国家出了气，替老百姓报了仇，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朝廷由于爱惜人材，不但赦免过去一切罪恶，而且要升以军官，为国家出力。但是任凭两人如何恭维，杜立三总是唯唯诺诺，不做肯定答复，连说“再商量”。他发现进进出出的人以及门外杂沓的脚步声和低语声，疑心更大，一再起身告辞。

张作霖见第一步办法已经失败，便使用预定的第二步办法。预料门外业已布置就绪，他和殷鸿寿便起身，殷高声喊："送客！"杜立三在前头，走到里屋门口，门外有人揭起门帘。杜跨出门，转身请殷委员"留步"。话未说完，有人从背后伸过手来，将他抱住。杜知不妙，边骂边拔枪反抗，但两手已被人压住不能动转，同时又上来几个壮汉，将他按倒在地，摘下手枪，捆绑起来。最先动手的是张老树、汤玉麟（外号二虎）等。当杜立三叫骂时，留在外屋的两个护卫听到，拔出手枪射击，不料孙殿卿被张作霖早已布置好的监视兵打中手部，遂一并被擒获。这是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事。

杜立三被擒后，张作霖按照和殷鸿寿、新民府知府商定的计划，于当日晚在大营西边将3人处死。

在杜立三离开招待处之后，潜伏在店里的便衣队，趁那些"崽子"酒醉饭饱、人困马乏之际，把他们包围起来，悉数予以解决。其中有欲反抗的，宋庆濂约束不准动手，听凭处理。事后有人说，宋庆濂在报到时，已为张作霖收买。宋庆濂和我家相距4里路，且有亲戚关系，他曾对我说："我们一到新民府，便知道进入陷井。杜立三为人残暴，待人苛刻，不若张作霖为人和善，待人厚道，所以当即决定，弃暗投明。事实上在众寡悬殊之下，要抵抗也只有自己吃亏，毫无益处。"

张景惠接到杜立三伏法的消息后，立即率队，驰往青麻坎，将杜立三的老巢层层包围。同时在卡力马潜伏的队伍，收拾了杜立三沿途布置的哨所。张景惠先派人进杜家，劝杜母改邪归正，不要抵抗，可以保住全家性命。当包围时，杜立三的大哥，正在田间，乘机逃逸，流落在外。杜老疙瘩不肯投降，要为杜立三报仇，拼命到底。杜母看到杜立三已死，大势已去，劝小儿子暂时忍耐，徐图报复，打开大门，迎接张景惠队伍进去。张景惠的先头部队进院时，持枪布岗，其势汹汹，如临大敌。杜老疙瘩忍耐不住，开

枪射击，其余匪众亦加入战斗，双方均有伤亡。但张景惠的大队，随即涌入，寡不敌众。杜老疙瘩的枪栓，因激热发生障碍，束手就擒，立即被张景惠拉出院外，砍下头来。

张景惠按照预定的步骤，搜索全院，将衣物枪弹，装载几十辆大车，运往新民府巡防营，又在胡仙堂座位下，挖出元宝、银元无数。双方开火时，有一部分房屋起火，被烧毁。

杜立三的田产，由辽中县衙门没收，土地出租，作为教育经费的补助。事后经老百姓请求，由县公布，以前被杜立三霸占的田地，准由原主半价收回；其余田产悉数充公、变卖，建立起辽中县东门里第一所高等小学堂。

张作霖结束了杜立三的生命之后，同新民府知府沈金鉴向东三省总督上了一篇详尽的报告，由殷鸿寿代呈。先叙述杜立三在地方上为非作歹的罪恶和惹起外交上的纠纷，其次说本拟遵上宪指示，意在招抚，奈杜匪性难改，顽不就范，不得已加以逮捕。彼又伙同随来匪众，开枪拒捕。就擒之后，本拟解省，因彼党羽甚多，恐途中生变，所以就地正法，以免后患。殷鸿寿既与张作霖同谋，乃向上宪善为说词，加以谀扬，遂成定案。

杜泮林在杜立三被杀时，静候在招待所，还蒙在鼓里，听到消息，已挽救不及。事后，怕杜立三的伙伴说他出卖，向之寻衅，做了一篇动人的祭文，四六排联，从第一句“呜呼阁卿”起，到末了“哀载尚飨”止，通篇用“青”字韵。大意说张作霖骗了他，他转骗了杜立三，“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为了表明心迹，特把这篇祭文和他写给杜立三劝降的信件，抄写了好多份，散布出去。

崔石甫整理

（辽宁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匪枭谢文东的兴灭

余　生

一、逼上梁山，参加抗日

为生存而来北大荒

谢文东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出生于辽宁省宽甸县永甸镇碾子村一个贫苦农民之家，属于满族正白旗人。父名谢福喜，母焦氏，生他兄弟3人，谢文东为长。那时他家给本村大户王庆云家扛活、种地，以及承租蚕场放养柞蚕来维持生活。后因村里地少人多，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全家迁到桦南县长甸河口村，租种盛作臣的50亩土地，苦干到民国初年，家中生活才有好转，置有大车一挂，牲口六七头，男女劳动力十几个，成为中农。但直到那时，全家人还没有一个识字的，过年写春联、平时写信都得请人代笔，钱财帐目全凭口算心记，常出差错。父亲见谢文东头脑聪明，干活有心计，才叫他上私塾读了4年书。谢文东辍学后，除在家种地、放蚕外，还带领两个弟弟，和乡亲们一道过鸭绿江到朝鲜山上放蚕；二十六七岁时，他还当过“马贩子”，收买村里的老弱牛马到安东（丹东）去贩卖，返回时买些食盐卖给农民，从中渔利。这样的生活经历，使青少年时期的谢文东有了一点文化知识，见了一点世面。1924年（民国13年）鸭绿江涨水

出槽，田地被水淹没，颗粒不收，谢文东在朝鲜放蚕又吃了官司。这时，年已37岁的谢文东听说北大荒土地肥沃，地多人少，日子好混，便和父辈们商议，要到北大荒来垦荒。

1925年（民国14年），谢文东全家来到了依兰县土龙山区黑山嘴子（现桦南县八虎力乡西太平村），投靠表叔关明林。他表叔看谢文东家劳力多，又能干，便为他作保，租杜福臣的8间草房安了家，又租了杜家10几垧地和张明喜的20几垧地来耕种。他自家买了三四头牛，四五匹马，两辆大车，一面种地，一面垦荒。在那三四年中，他家除了给杜福臣开了大片荒地，分得熟地二三十垧外，还自买荒片开成熟地30来垧。到1929年（民国18年）谢家已有熟地六七十垧，人丁四五十口，劳动力十四五个，牛马10多头。到这时，谢家所有土地还是全由自家耕种，农忙时才雇些短工；而在冬季农闲，他们又套上大车进山拉原木，打成排子卖。就这样，谢家盖起了房子，修筑起大院套，还买了2枝手枪、4枝大枪来看家护院。也因此，谢家的人一般都会打枪。

谢文东矮胖身材，胆大气粗，办事有魄力，好打抱不平，也善于交际。他到黑山嘴子不久，就和清茶馆的景振卿、王乃华，五道岗的王奎一、崔和，太平镇烧锅老板王凤金等交上了朋友，与一些地方官员也有了联系。因此，他这个外来户很快就被选为土龙山五保保董，掌管30多人的民团武装。到1929年（民国18年），他又被依兰县官府任命为土龙山区五保保长。

举行暴动，击毙日军大佐

九·一八事变之初，东北军第九旅旅长兼东北路镇守使李杜将军，联络第七旅旅长兼吉（林）长（春）镇守使丁超等，在哈尔滨及其以南地区抗击日军。李杜将军撤回依兰时，曾于1932年5月初来土龙山宣传抗日，发动地方武装，组成了抗日自卫军骑兵第十混成旅，由当时统辖土龙山全区民团武装的太平镇团总马春

德任旅长，谢文东、王会、盖文义、王鸿儒等任团长。这个旅成立不久，由于日寇入侵和领导无能而自散。但这次活动，却给土龙山人埋下了“不当亡国奴，誓死抗日”的火种。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我东北全境后，便拟定了一项移民计划，要在20年内由日本向我东北境内移民100万户，约500万人，侵占可耕土地9920万亩。其中移到伪三江省（大致为三江平原地区）的人数为移民总数的1/5。仅1933年3月和7月，先后入侵依兰县永丰镇（现桦南县孟家岗乡）和七虎力河沿岸的第一、第二屯垦大队，就有1000余人。日本关东军为了满足移民对土地及其安全的需求，于同年秋委，以“东亚劝业公司”征用的名义和“治安肃正”的借口，除对永丰镇、七虎力河沿岸的土地不分荒、熟一律强占外，还下令强行收缴土龙山区各保农民手中的地照和枪支。

这事端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大家议论：收去地照和枪支，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绝对不能答应！于是，谢文东和六保保长景振卿商议，将两个保的民团武装联合起来，组成100余人枪的自卫团，由谢文东任团长，实行武装自卫。入侵的日本武装移民为了来年春耕，恰在这时又到八虎力乡去抢夺中国农民的农具和耕畜，谢文东便将那些被抢的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到依兰县伪县公署去告状。日本参事官（后称副县长，实为“太上皇”）藤本到八虎力乡去了解情况，查明告状的农民是受谢文东的指使，回到依兰就把谢文东的保长一职给撤了。谢文东丢了伪保长职务，却赢得了众多农民的信任。

日本关东军为了贯彻执行“收枪缴照”的命令，于1934年（伪康德元年）春节前，命令太平镇伪警察署，让他们通知所有农民要将枪支、弹药一律送来登记、造册、打印，并威胁说：“腊月三十不交送，正月初一也必须送到，否则按私藏军火论罪。”接着，日本关东军就采取了高压手段，派大批士兵到各村，挨家逐户翻

箱倒柜，捣毁房屋墙壁，收去藏在地窖和夹皮墙里的地照、枪支，并强迫各村选送青年妇女到日本兵营供他们发泄兽欲。日本侵略者的这些野蛮行径，激起了中国农民的强烈愤慨，一些有枪有马的人找到谢文东，要他拿主意，纷纷表示："你说咋干，我们就咋干！"在这种情况下，谢文东找景振卿商量，认为日本侵略者欺压到家了，不起来抗日就没有活路了。于是，他们一同到半截河子、五道岗一带发动群众，号召大家有枪出枪、有人出人、有马出马、有钱出钱，共同抗日，保卫家乡，很快就组成了一支300余人的抗日武装，并且迅速发展到700余人。

曾在抗日自卫军骑兵第十混成旅任过三团团长、尔后又通过关系打入日伪内部的盖文义，这时当上了依兰县伪警大队长。他借过春节的机会从依兰回到土龙山，与谢文东、景振卿和二保保长曹子恒、八保保长王奎一等，商量武装暴动抗日的事。他们商定于旧历正月二十日举事，各保武装到太平镇后，先解除伪警察署的武装，再攻打依兰县城，盖文义在城里作内应。但到二十日那天，由于谢文东还在犹豫不决，谁也没动。这时，伪依兰县警备司令部对土龙山情况已有所闻，派张营长率一骑兵连，随同伪依兰县长关锦涛来到太平镇，驻进当时的最大商号同成兴院内。旧历正月二十日下午，在太平镇办事的曹子恒、张奎武等看到伪军这一行动，认为对即将举行暴动的事极为不利，应趁他们还未摸清情况时先下手为强。于是，他们回到邢家沟火速派人，将这一情况通知了谢文东。谢得信后，连夜通知景振卿、王奎一、董殿福、冯丙辰等人，约定次日清晨举事。1934年（伪康德元年）3月9日（旧历正月二十一）凌晨，曹子恒的队伍一马当先，不费一枪一弹缴了太平镇伪警察署和商团的武装。随后，冯丙辰队进镇，包围了同成兴院内的伪军；接着，谢文东和景振卿的大队人马也开进了太平镇；相继而来的，除王奎一、董殿福、白云龙、小王富队外，还有明山（即祁致中）队、山林队、李生队，以及大刀会

和红枪会等，也都赶来同谢文东、景振卿一起组成了暴动总部。太平镇及附近村屯全是带枪的人，当他们计划攻打同成兴院内伪军时，同成兴经理兰锡纯出面调停，达成协议：伪军不干预农民暴动，暴动农民也不进攻同成兴大院。这时，参加暴动的农民达到1万余人，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这时，伪依兰县长关锦涛想以县长的身份平息这场暴动，他要在太平镇召集土龙山区、保长会议，可是没有一个区、保长到会。他又提出以“解散暴动队伍，停止抗日活动，回家一概不究”为条件，与暴动农民领袖谈判，谢文东等对其要求置之不理。关锦涛不得已，只好在同成兴打电话给驻依兰的日本关东军第十师团六十三联队长、陆军大佐饭冢朝吾。这个饭冢朝吾是日本黑龙会骨干，曾在日俄、中日战争中立过战功，获昭和天皇御赐战刀一把。当时，他正在依兰县城内著名饭店四合发参加宴会，接电话后，当即决定第二天亲自带领一小队日军和一部分伪军、警察，由伪警备司令部宋参谋长和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陪同，来土龙山平息农民暴动。伪县长与饭冢朝吾通电话时，同成兴经理兰锡纯正在室内。听清之后，他便悄悄出来，将饭冢朝吾决定亲自出动的消息告诉了暴动队的小王富。于是，暴动总部马上召开会议。景振卿说：“咱们起来就是为了打鬼子，他们来了正好。”大家商量决定：以白家沟为阵地打一个伏击战，煞煞侵略者的威风。当即指派景振卿之子景龙潭和曹子恒、小王富、白云龙等，各带本保队伍连夜赶到白家沟，选择阵地，修筑工事，歼灭饭冢朝吾一伙敌人；另派冯丙辰率队埋伏在柴家一带，阻击从依兰方面增援的敌人；派王奎一率队封锁太平镇，监督和阻击同成兴院内的伪军；派董殿福、张九炮队到卡伦山，阻击从佳木斯方面前来增援的敌人。

景龙潭奉命后，当即选出樊老六等40余人，连夜进驻白家沟东头的院套里，曹子恒进驻沟西头的田家大院。第二天一早，他

们根据白家沟地形，又作了伏击部署，由景龙潭打敌头，卡死敌人去路，小王富、白云龙打中间，曹子恒截住敌人后队，不准敌人跑掉一个。

战斗部署刚结束，大约9点左右，从董家村西面开来5辆汽车。曹子恒立即下达了战斗命令：以景龙潭的枪声为号，他不开枪谁也不准动。不大功夫，两辆小汽车在前，3辆大卡车在后，开进了白家沟。最前面的小汽车刚开到屯东头拐弯处，景龙潭的枪"噎、噎、噎"响了3声，车不动了，司机已被打死。顿时，沟里枪声大作，雨点般的子弹从院套里、墙头上飞向敌人。饭冢朝吾从第二辆小汽车里探出头来喊到："不要打，有事的好说。"暴动农民一看是日本军官，就一阵猛打。两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者饭冢朝吾立刻丧命。敌人最后一辆汽车调头向西，企图逃命，曹子恒指挥火力集中射击，也开不动了。汽车上的敌人跳下来往北面的坟茔地里乱跑，小王富队的张景发提枪冲出院子，猛扑过去，边跑边打，打死一个敌人，自己也倒下了。这时，曹子恒率队冲向坟地，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景龙潭率队冲到敌人汽车跟前，肃清了附近的所有敌人，没被打死的都当了俘虏。伪警备司令部的宋参谋长受了重伤，抬到镇上医治，算是拣了一条活命。景龙潭在饭冢朝吾尸体旁拾到一把战刀，柄上刻有"昭和"字样，他高兴地说："饭桶被砸烂了，这把宝刀也归我们了！"

这次战斗从打响到结束总共不到一小时，共毙敌21人，其中日酋饭冢大佐、铃木少尉以下官兵13人；击伤、俘虏伪军警22人，缴获了全部武器。暴动农民伤亡28人。日本关东军在白家沟战斗的公报中说："该大佐（指饭冢）于将校之战死者，自满洲事变以来为第三人。"同年3月13日，我国《大公报》将土龙山农民暴动的消息公布于世。7月下旬，美国《纽约时报》也刊登了这一消息。

在白家沟战斗胜利的庆功会上，暴动总部的头领们对下步行动进行了商量。当时大家意见不尽一致，有的主张乘胜攻取依兰县城，认为城里警察和伪军都不会认真抵抗，拿下依兰，抢了银行，部队的经费问题就可以解决，占了粮栈可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并能以此壮大抗日力量；有的主张先整编现有队伍，统一思想，统一号令，以便迎接更艰巨的战斗，理由是这些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没有战斗经验，纪律松弛，经不起更大的战斗；王奎一则主张消灭同兴成院内的伪军，活捉伪县长，以消除近在咫尺的心腹之患。这些意见当天没有得到统一。

第二天清早，王奎一独自到北小山侦察地形和同成兴院内敌人的情况，当他向院内窥探时，被哨兵发现开枪击中，当场牺牲。消息传到暴动总部，大家都很气愤，王奎一的部下，特别是带在身边的第二个妻子，坚决要与伪军决一死战。经大家再三劝阻，他们才放弃了这个决心，将王奎一的尸体运回来才河安葬。这时，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德佩（即季青，公开身份是依兰中学教师）和兰锡纯一起对谢文东说："鬼子在白家沟遭此打击，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要来大部队进行报复。如就地在太平镇整编，敌人来了，不但百姓遭殃，对抗日也不利。最好转移到适当地方，整顿好队伍，看情况再定今后的行动。"当天中午，太平镇上空还飞来一架敌机，飞得不高，像是侦察情况的。暴动农民纷纷向它射击，敌机仓皇飞去，飞到团山子西面就坠毁了。这架敌机的出现，使暴动的头领们信服了李德佩的意见，同时又考虑到要做内应的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也已在白家沟战斗中被打死，进攻依兰的成功希望不大了，便决定向半截河子方向转移。13日凌晨2时，暴动总部下达了这样的命令："顷得消息，佳木斯方向的敌人派出汽车、坦克百余辆，载机枪、大炮向我进发。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

向东南方向撤退。"到天亮时，除一、三、四保队在外，都已撤到半截河子一带。

撤到半截河子时，谢文东住在王乃华家，当天傍晚便在王家举行了暴动后的第一次重大会议。会议一致推选谢文东为总司令，景振卿为总指挥，钱子久为参谋长；所有队伍编成5个大队，每个大队辖3个中队，每个中队辖2至4个小队；第一大队长是秦秀权，第二大队长是景龙潭，第三大队长是曹子恒，第四大队长是刘海楼，第五大队长是成海波。当时，每个大队各有250—350人不等，总人数达到1430人，队伍定名为抗日民众救国军。当时还规定3条纪律：（一）临阵脱逃者死刑；（二）不许用老百姓蹓马；（三）不许拿老百姓财物，不向老百姓要好吃的。队伍整编后人人精神振奋，战斗力大大提高，很快就发展到2700余人。

饭冢朝吾在白家沟遭伏击时，佳木斯日军立即派出警备队乘3辆卡车前往土龙山救援。车到卡伦山时，被董殿福队、张九炮队打了回去。依兰日军闻讯后，立即派横山部队到白家沟收殓饭冢等人的尸体，路过梁喜春大院时，遭到冯丙辰队的阻击。冯队撤走后，院内老幼全被日军杀戮，房屋也被焚毁一空。饭冢朝吾的上司广濑师团长急忙调集重兵，讨伐民众救国军。日军在大部队行动前，首先派百余人的吉川增木骑兵队，从佳木斯到永丰镇（现孟家岗乡），会同那里的屯垦大队警备队，向北半截河地区讨伐。3月12日一大早，以吉川为首的讨伐队，前面开着两辆大汽车，后面跟着马队，从孟家岗经过火烧沟，朝北半截河杀来，对那小店、张麻花、桑殿武、马青山、刘海楼等村屯，实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特别是在韩国文大院打死无辜农民300余人。

谢文东在半截河子召开整编会议期间，听到了北半截河遭敌人烧杀的情况，又听到日军广濑师团的平岗部队乘50余辆汽车，由小川少将指挥，从依兰直扑土龙山的消息，随即决定率队经湖

南营、柳毛河、九里六、大八浪往南转移，并通知他的家属立即撤离黑山嘴子。

3月19日，暴动总部行抵勃利县境，景龙潭率领的百余名后卫队，还在下九里六，为战马挂掌和修补鞯。大约9时左右，3辆日本军车从阎家方向开来。下九里六屯的民团武装30多人和景龙潭的后卫队一齐上了孙启元院里炮台。日军头两辆汽车一直开到屯里饭馆门前才停下，后一辆停在屯外。当日军下车时，景龙潭的后卫队和民团武装向他们猛烈开火，汽车被打坏了，未被打死的日军慌忙逃到屯外那辆汽车上跑掉了。下午2点多钟，下起了一场雪，后卫队刚刚吃过午饭整队出发，听说又有50来辆汽车满载日本兵向九里六开来，景龙潭与民团队长张球子会商后，认为走已来不及了，不如占据屯里有利地势予以痛击，到夜晚看情况再定下步行动。于是，各队选好地势，准备迎战。下午3点过后，日军平岗部队前面的30余辆汽车横冲直撞地向屯里开来，景龙潭见敌人已进入自己的火力网，首先开枪，接着各阵地枪炮也一齐打响。日军纷纷跳下汽车，利用各种地物进行反击，枪炮声响成一片，很快就展开了阵地争夺战，杀声震天，血肉横飞。由于暴动队伍英勇果敢，又占据着有利地势，一直坚持到晚10点左右。这时候雪越下越大，又有秦秀权带100多人赶来增援，他们便趁雪大夜黑，反穿棉衣，在民团的掩护下撤出了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民众救国军死伤30多人，景龙潭在掩护撤退时，身中7弹，受了重伤。战后，从敌人举行的追悼会上获悉，日军阵亡人员中，有大尉2名、中尉3名、少尉5名、士兵110多名。另有受伤的日军53名，其中有少佐1名，北条、小泉大尉、吉田中尉、明池少尉等；敌死伤人员中还有饭冢的弟弟。此外，毁敌汽车17辆。这是暴动农民首次以少数兵力抗击比自己多10倍的强大敌人的特殊战斗。当时，《盛京时报》称之为“土龙山之激战”。

下九里六战斗的胜利，保证了民众救国军主力的顺利转移。谢文东到达七台河附近的罗图河一带稍事休息后，为甩掉日军的追击，继续往宝清县大山里撤退。进山后不久的一天，在一个名叫梳妆楼的小屯休息时，听到了敌人全部撤回的准确消息，民众救国军便在阴历三月初三回到了土龙山地界。这时，敌人到处张贴悬赏布告，“活捉谢文东来献者，赏洋四万元”，“来献谢文东人头者，赏洋一万元”。中国百姓将谢文东、景振卿等视为英雄，竭诚拥护，敌人这一做法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谢文东回到土龙山后，即联合当时和他一起暴动但未一同转移的各队武装，以太平镇西南10余里的横岔山为依托，与日本侵略者周旋起来。日军驻土龙山的横山大队和当地几处以村指导官为首的伪警察队，对暴动队伍进行联合讨伐。当他们摸进山里时，首先遭到曹子恒队的阻击，一声枪响，八方接应，敌人象捅了马蜂窝似的，被民众救国军团团围住，你进我退，你退我追，周旋到深夜，闹得敌人一夜数惊，寸步难行，吃的用的也断了来源，只好丢下12具尸体狼狈撤走。

横岔山战斗的胜利，赢得了暂时的平静。谢文东趁此时机到依兰附近的宏克力等地，与拥护暴动抗日的队头联系，取得了他们在武器、弹药和金钱上的资助。在他带人返回五道岗时，听到孟家岗日本武装移民欺压中国人民的许多情况，民众救国军即派第三、第四两个大队去攻打日本屯垦大队。4月15日拂晓，第三大队到达孟家岗南山与敌人接了火，但因第四大队没上来，第三大队坚持到9点左右，在人员不断伤亡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撤了下来。

驼腰子金矿当时是依兰县境内最大的金矿，日本侵略者在这一带榨取了大量的财富。民众救国军为制止敌人的掠夺，解决自身的经费问题，联合一些山林队，于4月23日，趁敌人不备，一举攻入镇内。这一仗，缴获沙金400余两、步枪200余枝、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野炮1门，打死敌人60余名，并且自己开

采了一些黄金。这时，民众救国军的钱多了，枪多了，人也多了，开创了暴动以来的新局面。曾在李杜将军部下任警卫连连长的周亚山，这时奉命从上海回到东北，负责抗日武装的联络工作，听说谢文东攻占了驼腰子，特地前来面见。谢见他年轻有为，谈吐不凡，又是李杜将军的代表，将他待为上宾。

日本侵略者进驻湖南营（即今桦南县城）的开拓团，常常欺压附近村屯的中国百姓。周亚山向谢文东建议攻打这个开拓团，谢表示同意。景振卿鉴于上次攻打孟家岗的教训，决定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他事先派人与镇内的壮丁团联系，约定5月1日夜间行动，由壮丁团做内应，到时开门迎接民众救国军，并商定队伍进镇后不缴壮丁团的械。可是，曹子恒队的人，进镇后看见壮丁团的武器好，不顾前言，硬要缴械。双方发生了枪战。日本开拓团听到枪声，立即跑进预先筑好的工事和炮楼里进行抵抗，使曹子恒队在壮丁团和开拓团两面夹击下被迫退出。他们撤退后，又在镇外与敌人对峙了18天，经过10多次的争夺与冲杀，未能进入镇内。一天傍晚，景振卿在南门外观察敌情，被敌人发现，开枪射击，景振卿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景振卿牺牲后，由周亚山接任总指挥，继续围困湖南营。这时，敌人得到关东军第三师团一个大队的增援，民众救国军才不得不向南撤退。当他们途经杏树沟子时，与日军遭遇，敌人抢占了有利地形，民众救国军只好边战边撤。董殿福在撤退中牺牲。这两次战斗，民众救国军元气大伤，尤其是景振卿的牺牲，使谢文东失去了左膀右臂。

绝处逢生，改编抗日联军

土龙山农民暴动，震撼了日伪首脑机关。1934年（伪康德元年）4月4日，在日本关东军与伪满国务院的多方策划下，以吉林省伪警务厅长三蒲为首，由日军第三师团和伪军第四军配合，运用政治分化瓦解和军事讨伐的两手来对付民众救国军，企图消灭

这股抗日武装。

谢文东在部队元气大伤之后，接受周亚山的建议，带着中共特派员李向之的信件，想去苏联求援军火。他率队东去，经罗圈河、瓦金别拉河、金沙河、宝清、义顺等地，长途跋涉来到虎林北部山区的炮手营、三人班一带，在这里会见了饶河游击队领导人张文阶和李学福。在他谈到去苏联请求支援军火时，张文阶说："苏联哪有什么军火支援我们，我们手中的武器还是从敌人手中夺取的。"谢文东听后虽很失望，但还是派周亚山去试一试。周亚山到乌苏里江边，看到日军封锁很紧，无法与苏军取得联系，在当地乘船，经抚远到佳木斯，又由哈尔滨回到上海找李杜将军去了。谢文东在炮手营等待消息，直到8月中旬，周亚山音信杳无，才率队回到土龙山。

这时的土龙山，经过敌人的政治欺骗，说是枪支不收了，地照不缴了，回来就是好人，发给良民证等等，原参加暴动的人多数回了家，有的自立山头建立壮丁团，不听谢文东的了；民众救国军内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队员离队回家，有的投靠了别的队，只剩下300余人。谢文东感到不能再在土龙山呆下去了，便率队到来才河、四道沟和依兰二区一带活动。9月末，为避免敌人冬季讨伐，决定到牡丹江东岸深山里去"猫冬"。10月12日早晨，部队在桦木岗附近渡河时，突然遭到日军小柴支队的袭击和包围，民众救国军仓促应战，当即死伤百余人。冲出重围后，敌人穷追不舍，民众救国军各自逃命，溃不成军。谢文东仅带10余名骨干和士兵跑到依兰县吉兴河的深山里。在"明山"队头领祁宝堂(即祁致中)的劝说下，又从吉兴河经黑背金沟跑到刁翎和三道通。轰轰烈烈的土龙山农民暴动队伍，至此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正当谢文东徬徨绝望时，刁翎三道通的高云阁，因仰慕谢文东在土龙山率众暴动的壮举，率200余人前来投靠，才使谢文东重新得到一线生机。

1935年（伪康德2年）1月，谢文东率领30余人在方正县东南70里的山寨中休息时，遇到了李杜将军原来的部下军官李华堂率领的抗日队。在李的劝说下，他们又共同带队到延寿、宾县一带活动。1月底，他们在宾县三道河子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商谈之下，赵尚志军长答应帮助，有事共同行动。当年春，他们率队在方正县大罗勒密镇，三方商定，以三方队伍为基础，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谢文东为委员长，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在庆祝指挥部成立的会上，决定联合进攻方正县城。同年3月9日，联合军450余人包围了方正县城，第三军于正午12点首先从东门攻入城内，打死伪警察小队长1名，有4名伪警察受伤，缴获步枪15枝，俘虏伪警务股长1人，烧毁了日本参事官、指导官的住宅，部队安全撤出。接着，又联合攻打了半截街、新开道、老五团局所、楼山局所等山区。同年8月，他们又联合袭击了依兰县五区的兴隆镇。民众救国军单独在刁翎活动时，也占据了百顺沟，袭击了三满里的伪自卫团。9月中旬，谢文东队伍与人民革命军三军一团、四军二团及李华堂部队联合攻打了南刁翎，敌警卫营营长段××投降，编入了民众救国军。10月间，民众救国军在日军冬季讨伐中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在赵尚志的建议下，谢文东于1936年（伪康德3年）1月率队北上，渡过松花江，来到汤原县团黑金河，受到了汤原抗日游击队的热情接待，并且让他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扩大联席会议。同年2月谢文东回依兰时，在抗联四军的帮助下收编了刁翎北面的“山羊”山林队，进一步扩大了民众救国军的实力。同年6月，谢文东率队攻打庙岭森林警察队时，缴获了夏衣24套，皮鞋16双，子弹带66条，雨衣5件。一年来，民众救国军在共产党及其他抗日队伍的帮助下，活动于依兰、勃利、延寿、宾县与松花江以北的广大地区，部队又发展到三四百人，编成4个团（一团团长段连升，二团团长关文吉，三团团长徐德民，四团团长

赵庆祥），并且在牡丹江西岸的老爷岭构筑了密营。

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谢文东共同抗日，发展三江地区抗日斗争的大好形势，于1936年9月，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在抗联五军党委和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的帮助下，将民众救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谢文东为军长，滕松柏为副军长，刘曙华为政治部主任，于光世为参谋长。

抗联八军成立后，得到了中共吉林特委和抗联五军军长周保中的支持与关怀。五军抽调一批政治工作人员到八军帮助建立政工系统，分别担任师的政治部主任和团政治委员，开展建党工作，发展新党员，进一步扩大了党在八军的政治力量。为培训基层干部，还成立了教导大队。周保中军长亲自做谢文东、滕松柏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八军内部与对外关系上出现的各种矛盾与纠纷。通过这些工作，八军的混乱局面有所好转，战斗力有所加强。

中国共产党在对八军进行整顿工作的同时，还帮助他们不断收编抗日山林队、义勇军以及过去曾属于民众救国军的队伍，扩大了武装力量。到1937年6月，谢文东的队伍在原有4个团的基础上发展到6个师、1个独立大队，人员增加千人以上。当时，一师师长是秦秀权；二师师长是关文吉；三师师长是王自孚，师政治部主任金根；四师师长是尤连富，师政治部主任柴荫轩；五师师长是董宪章（报号天义），六师师长是赵庆祥。他们分别活动于依兰、勃利、桦川、富锦、方正、延寿等县广大地区。同年9月，伪军团长赫奎武带领该团450名伪军投到抗联八军，编为八军第七师，赫奎武任八军副军长兼七师师长。这时八军人数超过2000，是该军的最盛时期。1938年初，八军加入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序列，成为松花江下游地区抗日队伍中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

自1936年9月谢文东率队改编为抗联八军，到1937年8月，这支队伍在这一年中与日伪军进行了大小26次战斗。如1936年11月4日，八军一师的300多名步骑兵，在依兰县团山子蚂蚁浪

地方与伪军混成二十七旅的讨伐队遭遇，经过6小时的激战，击毙敌人若干，缴获敌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战马5匹。1937年3月20日零时30分，八军同三、五、九、四军联合攻打依兰县城，八军攻打北门，在于光世参谋长的指挥下，从县城西北角突进北大街，用火力封锁敌人炮台，向伪银行和伪县公署进攻，消灭了日军警卫人员，打死了日本井口指挥官，破坏了伪县银行的设施；并与前来增援的伪军展开巷战。在这次联合战斗中，共打死打伤日军20余名、伪军数名、俘虏15名，缴获步枪14枝、手枪4枝、弹药406发。与此同时，八军一师配合五军二师在双河镇阻击增援的日军，击毙日军220名，缴获步枪130枝、轻机枪3挺、迫击炮2门。同年8月13日，八军与二、四、五军协同向驻守三道通的日军发起攻击，在五军柴世荣的指挥下，打死打伤日军40余名，缴获步枪4枝、弹药500发。同年8月20日，八军与五军二师的七、八两团及独立师在土龙山区五道岗伏击日军黑石部队，从上午11时激战到下午4时，共击毙敌人300多，伤500多，打死敌战马200余匹，缴获马枪210枝、轻机枪10余挺。这些战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变节投敌及其汉奸生涯

遭打击变节投敌

伪军团长赫奎武于1937年（伪康德4年）9月11日反正，编为抗联八军七师开往五道河子驻地时，日军出动大批飞机，沿牡丹江流域不断侦察、轰炸，并出动1500余名日军封锁牡丹江，尾追不放。随后，八军军部及一师一团和七师撤退到方正县无影山密营，敌人又抽调依兰、延寿、方正3县的兵力，向无影山发起

进攻，围困半月之久。这时，八军在山中的口粮吃光了，天气渐冷又无棉衣，生活十分艰苦。在敌人的围攻诱降下，赫奎武于同年10月30日带领七师的200多人叛变，重回敌人营垒。这一事件，打开了八军上层人物投敌的缺口。

11月，日本侵略者在各地方施行“归屯集甲”和“连坐法”，使抗日队伍与人民群众失去了联系；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开始进行冬季大讨伐。当时活动在依兰、勃利一带的抗联八军，遭到了日军石川部队与和田部队的围剿，不得已而进入深山密林。山中缺吃少穿，携械投敌者日益增多。敌人又把变节分子派回抗联原部从事离间、劝降活动，有的还给敌人带路，进山围剿抗联。在这种险境中，八军二师七团于1938年4月，在依兰县道台桥遭到日军的袭击，团长李凤武于5月底向敌人投降。八军一师一团在勃利遭敌人围剿时，副师长徐德明、政委贺成久牺牲，部队随之瓦解。八军四师一名副官携带6枝盒子枪、6枝手枪、4枝步枪和部分人员，到依兰肖正屯投敌后，又带2000余名日军进攻七星砬子抗联密营，使八军四师政治部主任柴阴轩在战斗中牺牲，部队大部溃散。在密营遭到严重破坏的同时，八军六师师长赵庆祥、参谋长刘廉汉于1938年6月24日，带领23名部下到勃利县向日军投降；五师师长董宪章也于9月初率残部15人到方正县投降了敌人；三师师长王自孚带领55人，于9月5日到勃利县投降了日本宪兵队。

随着部队的瓦解，抗联八军只剩下军部和二师残部。谢文东、滕松柏和二师长关文吉，带领残部躲进了刁翎一带的深山中。10月的一天，日军讨伐队在五道河子森林中发现谢文东的密营，当即发起进攻。谢文东下令与敌人决一死战，立刻将跑在前面的几个日军击毙。敌人遇到抵抗，便用炮火掩护，驱赶部队向密营猛攻。谢文东的叔伯兄弟谢文章和他的三儿子谢生堂被打死。他的大儿媳杨秀贞刚生孩子才几天，身体虚弱，行动困难，为了不拖

累亲人，用手枪自杀。他的二儿子谢生顺突围时负伤，被日军抓去立即枪毙。谢文东70多岁的母亲，带着二孙媳妇和孩子也在撤离密营途中被日军打死。这场战斗，谢文东所率的队伍被打死40余人，其中仅谢文东的亲属就7人，加上被勃利日军抓去死在牢房里的小女儿，使他失去了8个亲人。他带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和残部转移到另一个密营。

关文吉见谢队大势已去，带领70余名部下，到二道河子向敌人投降。投降后日本侵略者又派他回到山里来劝谢文东和滕松柏投降。滕认为关文吉有诈，当场将关击毙。

这时，伪三江省日本军事顾问北部邦雄少佐，为了劝降谢文东，特将反正后重新投敌的伪军团长赫奎武及其部队编入讨伐队，令赫专做谢文东的劝降工作。这时，谢文东身边只剩下十七八名跟随者了。据当时在伪三江省公署警务厅警备科任属官并负责管理投降后的谢文东的郝益之回忆说："日本人派赫奎武劝降，开始时谢文东还不想下山，想要死在山里算了，可是弟兄们心活了，特别是谢文东的卫队长姜永茂心活了，他们打算投降，只有谢文东的儿子和女儿和他一个心眼儿。后来日本人摸清了谢文东内部的底，直接找姜永茂谈判。谢文东一看再不答应日本人的劝降，自己就要吃亏，这才于1939年3月19日下山，投降了日军。同年，八军副军长滕松柏也去佳木斯投降了敌人。至此，由声震中外的土龙山农民暴动起家的谢文东及其抗日队伍，全部瓦解。

土龙山农民暴动抗日后，日本侵略者曾利用各种机会，用威胁、诱惑、收买等手段使谢文东屈服。早在1934年5月，谢文东母亲领着家小从黑山嘴子逃到倭肯河南立民屯，藏匿在表亲艾德新家，被坏人告发，日本讨伐队便将谢文东的母亲、大儿媳妇杨秀贞、二儿媳妇焦志贤、小女儿谢淑荣和小孙儿谢宝玉，以及艾德新等人抓去，送到勃利县看押。但敌人对他们不予杀害和虐待，倒用好吃好喝加以招待。日本官员劝说他母亲捎信叫谢文东回来，

他母亲不肯，日本官员也不强求。关押期间，谢淑荣因病死去，日本人用头号花头棺材装殓，并举行了盛大葬礼。

第二年春天，日本侵略者将谢文东的母亲、儿媳、孙子和艾德新等放回立民屯，同时贴出悬赏布告："活捉谢文东来献者赏四万元，献谢的人头者赏一万元。谢文东自己来投，不但无罪，还委以重要官职。"谢文东得知亲属已被敌人释放，秘密派人将他们接到通河县。至1935年秋，这些亲属又被敌人抓去，送到佳木斯南岗兵营软禁起来，还是优礼相待，并于1937年初冬取保放回半截河子。这时，谢文东立即派团长徐德明将这些亲属接到五道河子密营居住。

1938年，日军冬季大讨伐，在五道河子发现了谢文东的密营，谢母带着二儿媳妇和小孙儿谢要国突围，被敌人打死。当敌人从尸体中认出是谢母及其儿媳和孙儿时，又在三道通搭起一个高大的台子，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一个月后才将台子拆掉。日本侵略者这些做法，对谢文东的变节投敌也不无影响。

到新京、东京为敌张目

1939年（伪康德6年）3月21日，谢文东带着大儿子谢生发和大女儿谢淑芳，及10几名部下，由日伪军陪同，从西四道河子到勃利县城去投敌，受到了驻勃利日本宪兵分团长吉屋大尉、伪军三十八团团长赫奎武、伪勃利县长周宇文和县公署日本参事官宫泽源等人的会见。吉屋大尉对谢文东说："你们放心，你今后的工作和全家生活，皇军会统统安置好。"说罢就当面责成伪县长落实这个安置。谢文东对此表示了谢意。

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谢文东投降一事的政治影响，巩固他们在我东北的殖民统治，于同年4月初，由宪兵团分派专人将谢文东送到伪满首都新京（现长春市），参观市容、部分工商业和学校，并准备送日本东京去参观。在去东京途中，谢文东起了疑心。他

怀疑日本人骗他到东京，是不是要用他的人头给饭冢祭灵。想到这里，他打算早点死。于是，他在船上要往海里跳，不过几次都被陪同人员拦住了。

谢文东到东京后，受到日本侵略者当局的欢迎，还受到天皇的弟弟、陆军大将衔参谋总长的接见。在会见一些上层人物时，有的人还请他签名留念。特别是请他到饭冢家里作客，同样是以礼相待，不言旧仇，不露怨尤，他被日本侵略者彻底地征服了。当时，他跪倒在“忠魂碑”前，表示了深深的忏悔：“鄙人谢文东，从康德元年3月10日，在满洲土龙山起事，误入歧途，与皇军作对……”日本侵略者将谢文东这次新京、东京之行拍成电影到处放映，对于粉饰侵略者的罪恶行径，瓦解抗联军心，巩固殖民统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为日本侵略者效忠

谢文东投降后，伪勃利县公署根据日军宪兵团和伪三江省公署警务厅的旨意，在城内西北角（现镇安小学）为他修建了5间青砖瓦房，并在大尾巴屯（现小五站大义村）划给他40多垧地，还拨给他五六十只羊和牧羊草场。1940年（伪康德7年），年已53岁的谢文东和他儿子谢生发先后续娶了第二房妻子。谢文东把大尾巴屯的土地交给他的二房妻子管理，又将失散在外的弟弟谢文德、谢文春接到勃利，帮他经营大尾巴屯的土地和牧羊场，不久就使羊群发展到二三百只。谢文东之子谢生发先在勃利街公所当出纳，后随谢文东到鸡西城子河煤矿劳工大队去管事；四子谢生荣当了伪国兵，3年后回勃利成了伪县公署卫生股的职员；女儿谢淑芳与齐杰山结婚后开了个配给店；谢文东本人则与高荣仁、朱××、崔××合伙开了一处食品加工厂，加工面条、豆腐泡等，专供西大营日本关东军食用。伪三江省警务厅警备科属官郝益之1941年秋到勃利视察“顺匪”生活情况时，在谢家吃过午饭后对

人说："谢家生活大变样，比地主家好得多！"

伪勃利县分署早在1939年秋在鸡西城子河承包了一个煤矿，至1941年冬，便介绍谢文东去煤矿当上了大把头。从1942年起，煤矿矿工实行劳工制，勃利县每年要从各村农民中摊派六七百人，送到煤矿去当劳工，谢文东便被任命为劳工大队长。他对劳工们管理很严，有时也用小恩小惠来笼络。在煤矿上负责的日本人原田大佐及其部下，还主动支持谢文东的工作。在此期间，谢文东对日伪军政用煤，出了不少力气。

如果说谢文东在日本投降前那几年依旧怀有异心，那仅仅表现在每晚10点以后，他一个人偷听国民党的广播，还不让别人知道。而这一点却构成了他走向反共反人民之路的一个因素。

三、迎蒋反共，与人民为敌

摇身一变，东山再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侵占我东北长达14年之久的日本侵略者及其众多的移民，如丧家之犬，各自逃生，或为效忠他们的天皇而"玉碎"去了。伪满洲国的大小官员，也各奔前程，自寻生路。桦南一带的日伪残余势力和惯匪，以及抗联叛徒与地方上的土豪劣绅，趁此机会相互勾结，在各地纷纷成立维持会，组织"保安队"、"自卫团"等。一时间，政治形势极为混乱。在鸡西城子河煤矿当劳工大队长的谢文东，这时急忙赶回勃利家中，闭门不出，静观时局发展。

进兵我东北的苏联红军于8月16日开进勃利县城。一名曾在伪勃利县劳工协会做事的名叫赵聪的人，因在中东路一个小站上当过站长，会说俄语，到苏军司令部毛遂自荐，愿为苏军效力。赵聪的出现，使苏军很快了解了当地情况，还了解到日本人在撤退

前，曾将两卡车物资寄存在谢文东家。于是，苏军司令部命赵聪带队到谢家，将日本侵略者存放的军用物资连同谢家的一些东西，装了几卡车拉走了。谢文东遭此不测，气出一场病来。与此同时，苏军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保证苏军的物资供应，与县城某些上层人士协商，成立临时政府，并提名赵聪担任县长；而当地人士则提出由谢文东任副县长。谢文东听此消息，觉得自己曾是抗联八军军长，岂能当这个小小的副县长；再说赵聪曾带苏军抄他的家，决不能与赵聪为伍。因此，谢文东于8月末搬到大尾巴屯"养病"去了。

这时，原来入侵各村屯的日本武装移民和日本兵营里的士兵，已将武器、弹药、马匹、器材、服装及粮食等等丢弃满地，那些靠近日本开拓团和日本兵营的村屯农民，纷纷拣起这些枪支弹药，组建起各种地方武装。如湖南营（现桦南镇）的王连富、梨树园子的褚景才、半截河子的景龙潭（即当年指挥白家沟伏击战的景龙潭）、柳毛河的秦秀权（也是土龙山暴动骨干）、头道沟的穆青山、桦南火车站的任庭珍等，都分别组建了"自卫团"，共有200多人枪。8月25日，苏联红军进驻湖南营后，原伪街长李振东和伪警察署长李凤金出面组成湖南营维持会，要把这些"自卫团"全部并入维持会管辖之下。可是这些自卫团，除穆青山、任庭珍外，都是谢文东的亲友和旧部，平时就与谢有联系，这时他们就让秦秀权写信给谢文东，请他出来收编指挥。与此同时，勃利县小五站的梁希文、大六站的卢秀山、七台河的傅长山也都起来组织了队伍，请谢文东出面指挥。当时，谢文东有病在身，行动不便，只答应将他在大尾巴屯的住处改为司令部，实行坐地指挥。

谢文东在大尾巴屯也在招兵买马。他把当年随同他为日本侵略者采集松脂的100名劳工召集起来，组成警卫团，由他的四儿子谢生荣任团长，加上小五站、大六站和七台河等地的自卫团，合起来就建立起三四百人的队伍。与此同时，谢文东派大儿子谢生

发到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去找国民党。谢生发从长春找来一个老赵头，称谢文东的这些队伍为第五战区先遣军，委任谢为军长。后来，长春的国民党又派来一名叫武康的，带20多人参加了谢文东的队伍，然后武康独自离去。就这样，谢文东打出了“中央军”的旗号。

谢文东在尾巴屯组建“国民党中央军”，轰动了勃利县。赵聪等准备派队伍攻打他，谢闻讯后感到在勃利不可久居，而在桦南的队伍大部分是自己的旧部和亲友，便于指挥和发展，应该及早去桦南。于是，在当年（1945年）10月间，派傅友章和王柏林捎信给秦秀权。秦接信后，马上派去了20多人，于10月29日，用担架把他接到柳毛河太平屯秦秀权的家乡。他把他在勃利组建的队伍200多人也带到了柳毛河。

谢文东到柳毛河后，积极收编队伍，准备召开收编会议。会前，秦秀权把伪满时的“自卫团”团长、光复后的保长穆青山找去，对穆说：“谢军长来了，准备建立一支军队，你随过来吧，给你一个角色，以后好扩充力量。”穆青山还想借谢文东的声望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故而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谢的改编。开会时，湖南营维持会所属各“自卫团”团长也都参加了。谢文东宣布：“桦南和勃利的队伍合并成东北民众军，谢自任军长，军部设八大处和一个警卫团，下辖2个师、6个团。他任命秦秀权为一师师长兼四团团长，高凤阁为参谋长兼二师师长，王连富为一团团长，褚景才为二团团长，景龙潭为三团团长，穆青山为五团团长，任庭珍为六团团长，谢生荣为警卫团团长。会后又收编了依兰县邢家小铺（后属勃利县恒太乡）的陈凤山团，三道岗的田奎团。这样，谢文东的队伍已有六七百人马；再加上勃利县的梁希文、卢秀山、傅长山3个团，总人数已达1000余人，成为哈尔滨以东地区一支最大的匪队。

1945年11月，驻佳木斯苏军司令部和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

部，在佳木斯召开了地方武装工作会议。湖南营维持会副会长李凤金，各保“自卫团”团长王连富等人，分乘两辆汽车来佳木斯参加了会议。会上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部指示：各保“自卫团”收编为合江保安支队，并要求各“自卫团”团长回去后，一定要维持好地方秩序，听候收编。同时，合江省政府主席李延禄（原抗联四军军长）和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员孙靖宇，分别写信给谢文东，要他顾念当年抗日的可贵经历，认清形势，靠近人民，建设祖国，并派桦川县刘团总来柳毛河劝说谢文东。当时，谢文东表示同意队伍改编。但在随后委任他为富锦地区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时，谢文东顿起疑心，他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调虎离山”计，害怕队伍开往富锦时会被中途缴械。因此，他将队伍带到驼腰子一带按兵不动，窥伺时机。

同月，国民党特派员武康特地赶到桦南来找谢文东，将他的队伍编为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第一先遣军，委任谢文东为上将司令，武康自任参谋长兼总指挥。谢文东得此重任踌躇满志，即将队伍开往湖南营。队伍走到大金缸北门外时，一师副官长王大中集合队伍讲话说：“咱们不再是自治军而是中央军了，快把自治军的臂章撕掉，把武指挥拿来的中央军袖标换上。”说完，都带上了青天白日袖标。到湖南营后，武康宣布，将湖南营改为“将军堡”，谢文东就任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第一先遣军上将司令职，并向维持会要钱要物。

几天后，以第一师为先锋，由武康负责指挥攻打勃利县城。他们行至倭肯时，发现何金生夫妇是三江人民自治军派去收编张凤歧匪队的，当夜便将何金生夫妇和抱在怀里的孩子抓去杀害了。谢文东到勃利时，地方武装孙访友部正在搞叛变，当即受到孙匪的热烈欢迎，并与孙匪共同主持县政府的组建。他们扶植李儒忱为县长，元发火磨经理王润丰为副县长，要求县政府负责供给部队粮食、被服等等。这时，武康宣布将第一先遣军改名为“东北第

一挺进纵队”，谢为上将纵队司令，并扬言这支队伍是胡宗南的队伍，一时影响很大。桦南、勃利、依兰、林口、鸡西等地的一些匪队纷纷前来投靠，甚至三江人民自治军中某些不坚定分子也投了过来。这样，谢文东的队伍除原有的10来个团之外，又有陆续投来的王德利、鲍得水、王恒、张继武、王跃庭（外号王大脑袋）、于江、李炳章等团，以及鸡西的于队、赖队、卢队、杨士范队、毕队、郭兴典炮队等。到此时，谢文东匪队人数号称四五千人，实际能随军行动的也只1500百人左右。同年12月苏军第二次进驻勃利，限令谢、孙两匪队克日撤出县城时，他们将境内的粮食、油盐、药品及大肥猪等抢劫一空，然后才搬到小五站、七台河一带。

“东北第一挺进纵队”的溃散

在谢文东撤出勃利后，武康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树立个人威信，经与谢商量，带领鲍得水、梁希文、穆青山等3个团约三四百人去接收鸡西。队伍走到滴道煤矿时，被当地维持会欢迎进城。这时，鸡西维持会也派人来接。可是，当武康与苏军联系接收鸡西时，遭到了苏军的拒绝。

在武康与苏军谈判期间，穆青山、卢和等人，在苏军驻鸡西办事处门前，把一辆苏军吉普车门砸开，拿走了车里的4枝大枪和4000元红军票。两名苏军战士来要枪，还被他们绑起来送到自己的司令部里。武康回来一看，这事办得不对，苏军一定会来追查，急命放人，并令队伍立即开回滴道煤矿。次日清早，苏军乘车赶来，武康派赵参谋前去接谈。但赵参谋一去不归，武康感到大事不好，又令部队自滴道煤矿从速撤走。武康与穆青山乘汽车当天返回勃利，鲍得水和梁希文带队从山路撤回。半路上，他们听说苏军从后追来，忙在山路两侧设下埋伏，拦击苏军，当场打死苏军四五十人，缴获转盘枪四五十枝，重机枪1挺，击毁苏军

汽车2辆。他们自己也有不少伤亡。

武康逃回七台河后野心不死，又带领秦秀权、穆青山、陈凤山、田奎、王德利、张继武、鲍得水、梁希文等团七八百人去“接收”依兰。队伍走到邢家小铺时，被杨清海率领的三江人民自治军包围，双方打了一天。下午，武康率队从右面赶来接应，自治军才撤走。武康等在邢家小铺休整了三四天，再次开往依兰途中，在一个山岗上又与人民自治军突然遭遇，激战一个上午，遭到相当大的伤亡，这才退回杨家烧锅。1946年元旦那天，他们听说人民自治军要来袭击，鲍得水以迎战为名带队离开武康回勃利去了。

两次战斗减员，加之鲍得水离去，武康企图“接收”依兰的力量显得很不够了。于是，武康派人请谢文东派队增援。可是，谢文东眼看武康独揽大权，树立个人威信，大有取而代之的企图，早已怀恨在心。因此，他接到武康信后，不但拒不增兵，还要往回抽调队伍。这样，武康不得已而跑到太平镇请孙景涛匪队协助。孙景涛率队走到团山子附近被自治军团团围住，忙向武康告急，武康又率队星夜赶往团山子，被围困了三天三夜的孙景涛匪队才免于灭亡。秦秀权在这次行动中常与武康意见不合，处处掣肘，武康怀恨在心，一到太平镇就想借孙景涛匪队之手缴秦秀权的枪。2月6日，双方箭拔弩张，次日一早，秦秀权便带领陈凤山、田奎、王德利、穆青山等队离开太平镇，到湖南营去了。一场内讧的闹剧不了了之。

2月21日，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率队围剿太平镇。战斗一开始，武康和孙景涛匪队即被打得狼狈不堪，分别向依兰、湖南营等地逃窜。

秦秀权等到湖南营后，旋又窜至大金缸，陈凤山队将大金缸屯的进步群众朱凤山、林伯春2人从家中抓走；在路上又将人民自治军的两名侦察员抓去。匪徒们对朱凤山和一名侦察员严刑拷

打，灌辣椒水，打得血肉横飞，露了骨头，然后将这2人铡死在大金缸南门外。另一名侦察员因是机枪射手而被匪队留用，几天后逃走了。陈凤山了解到林伯春是合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戴鸿宾的磕头弟兄，想为自己投降作准备，因此，当林伯春刚被拉上刑台时，便急忙派人把林带回，对他说："你人性不错，保你的人不少，我们决定把你放了。"又说："以后我降过去，你能不能拉一把？"林伯春当即点头。林被放后，到佳木斯去找戴司令员，第六天他回到大金缸，在六马架找到陈凤山，向他交待了政策，陈凤山就作好了投降的准备。

不久，秦秀权获悉苏军要来攻打，便指定王大中负责防守。王派陈凤山、穆青山两队到西山占领阵地，防备苏军包围，其余各队在北门外选占有利地势。当苏军汽车来到大金缸时，遭到匪队突然袭击，未及下车的苏军有不少人被打死、打伤。双方激战两个多小时，由于苏军炮火猛烈，匪队不支逃往驼腰子。这次战斗，苏军被打死30多人，伤10余人，2辆汽车被毁；匪队死伤11人。苏军第二天追到驼腰子，将匪队打得溃不成军。秦秀权带着田奎、王德利等逃到勃利小五站时，又被那里的驻军打得懵头转向。秦秀权逃回太平屯，王大中对他说："你不是在抗联时就和戴鸿宾很好吗？咱们不和老谢扯这个了，你和老戴说一声，缴枪吧！"秦秀权表示同意，同王大中等20多人去湖南营找戴司令员投降去了。可是王大中在投降的当天又溜了出来，投奔谢文东当了副官。端午节后，他又离开谢文东到王相久匪部当了参谋。田奎被打垮后带着几个人来到驼腰子李焕章处，他们同陈凤山一起到戴司令员处投降。孟家岗的张继武也于同月去湖南营向戴鸿宾投降。穆青山则带着本队人马到六道沟、五道沟、头道沟一带活动。

"中央军东北第一挺进纵队"由于到处挨打，内部矛盾重重，武康出走，及大部分队伍投降三江人民自治军，到此时，已所剩不多。

合江保安军的消亡

当武康在太平镇利用孙景涛与秦秀权搞内讧时，谢文东在七台河听高凤阁说，刁翎、牡丹江一带还有些匪队可以收编，那里还有一座军械库可以弄些军火回来，于是他同高凤阁带着卢秀山等匪队数百人，分乘40辆马车，于当年（1946年）2月7日往牡丹江奔去。队伍行至二道河子时与苏军发生战斗，双方各伤亡数十人，谢文东的副官处长张子佩等数人被苏军掳去。在苏军打击下，谢文东损兵折将，又听说牡丹江一带驻军多，防守严密，无意再往南去。在返回的路上，他与李华堂匪队相遇，一同来到石头河子。

谢文东一到石头河子，就听到了武康和秦秀权以及陈凤山等人的情况，知道自己的队伍损失大半，悲伤不已。但他不甘心失败，派人找回了王德利，又到三道沟把穆青山找了回来，移兵太平屯，企图重整旧部等待国民党“接收”。谢文东正作等待“接收”的美梦时，合江军区部队于3月初从湖南营、柳毛河两路出击，对他们进行围攻。谢急命伊文阁负责指挥其警卫团，命褚景才、王德利等队进行抵抗。在合江军区部队的猛烈炮击下，匪队不支，又往大金缸、驼腰子方向退去。这时谢文东军费奇缺，无法开支。随后，合江军区部队离开湖南营返回佳木斯，谢文东便于3月上旬率队到湖南营找维持会筹款。

湖南营维持会副会长李凤金，伪满时是依兰县警佐，与谢文东也是老相识。谢文东这次前来，除了筹款之外，还派他的副官长刘子仁劝说李凤金参加谢文东匪队。谢的老参谋韩希经与李凤金是同乡，也来劝李参加匪队。到3月中旬，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带领主力部队三五九旅来湖南营围剿谢文东，还出动了装甲车。谢队仓皇逃走后，李凤金带着公安分局的50多人、4枝手枪、1枝冲锋枪、1挺重机枪和几十枝步枪，对空放了几枪，便去投奔谢队，

和他们一道去作等待中央军“接收”的美梦去了。他们逃到石头河子时，谢文东集合队伍，宣布李凤金为谢队的指挥。

1946年3月上旬，谢文东盼望已久的国民党联络员杨义儒来到石头河子，当即向大家宣布，任杨义儒为参谋长。杨义儒是国民党加委的合江省主席吴翰涛派来的，带来了任谢文东为合江省保安军（自称保安支队）军长的委任状，谢文东为此特在三道沟召开了改编会议。会上，除宣布杨义儒任参谋长，李凤金任指挥外，还宣布汪洋任参谋处长，韩希经任参谋，刘子仁任副官处长，乔××任军需处长，孙××任军医处长，警卫团长仍是谢生荣。保安军军部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长由李凤金兼任，二支队长是穆青山。总人数计有600多人。

合江保安军组成后，由于人马较多，成为当时剿匪部队的重要目标。谢文东深知石头河子金矿不是久留之地，决定分散队伍往鸡西方向活动。当即由韩希经协助李凤金指挥第一支队为先头部队，军部居中，第二支队为后卫。匪队行至勃利县大房身时，遭到合江军区部队的袭击。当时，李凤金指挥队伍进行抵抗，谢文东在后面听到枪声，却立即向南逃走。李凤金见此情形，也只好收拾残兵跟着南逃。他们逃到哈达岗，听说自卫队长要去鸡西报信，当即派人抓回来给枪毙了。在哈达岗，李凤金见到原谢队的第五支队长杨士范，随后，李又同汪洋、韩希经等到黑台会见了原第六支队长卢和，提出要杨、卢两队与谢文东共同行动。然而，杨、卢二人认为谢队风声太大，无论到哪里住几天，共产党就会追来围剿，不如单独行动方便。他们最后商定，为攻打鸡西这个共同目标，谢队向西，杨、卢两队向东，分头活动，互相接应。谢文东有杨、卢两队的配合，力量增到千人以上，对进攻鸡西有了信心。

谢文东匪队走到平阳镇附近，给镇内守军送去一信，让守军自动撤离，以便借道西行。但镇内守军不听这一套，准备抵抗。谢

文东即命李凤金、汪洋、韩希经制定进攻计划。他们察看了地形，研究了进攻方向和兵力配备，然后决定由毛仁杰团、刘肇成团、田奎团胡闹营担任正面进攻，伊文阁团、褚景才团在右侧待命，还调来了郭兴典炮队，由炮兵先行射击，再发起进攻。天将黑时炮击开始，炮声一停就开始进攻。镇内驻守的是三五九旅十四团的一个连，只有八九十人，听说进攻的六七百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便在天黑后主动撤出。匪队进镇后，杨义儒和乔军需向维持会要款，胡闹营匪队则抢劫群众的马匹、衣物，将平阳镇居民害得好苦。

谢文东攻占平阳镇后，又准备攻取平阳车站。车站东南还有一座高大的山岗，岗上有一道长梁，长梁往南还有三个小山梁，驻军就守在长梁上。谢文东命穆青山带领毛仁杰、伊文阁等团负责正面进攻，褚景才团做预备队。4月6日上午8时，进攻开始，攻势一再受阻，直到10时多才爬上山顶。随后，守军撤往鸡西南山，谢文东总算占领了平阳车站。

占领平阳车站后，谢文东召开了团以上匪首会议，计划攻打鸡西。鸡西的东南鸡冠山是个天然屏障，要攻鸡西必先占此山。汪洋根据这一特点制定的作战计划是：穆青山、毛仁杰和杨士范支队于半夜开始行动，分别从鸡冠山北面左右两侧发起进攻，汇合一处后再发起总攻，拂晓占领山顶。可是，穆青山等攻击开始就遭到三五九旅守山部队的火力压制，他们爬到半山腰时，守军火力更加猛烈，打得他们抬不起头。他们看看天将大亮，决定就地休整，等到天黑再向山顶发起进攻。中午时分，穆青山派人下山叫后面送饭，发现已被三五九旅包围，便决定往长脖子岭撤退。匪队刚刚开始行动，三五九旅就发起了猛攻，整个匪队立即败退下来。在三五九旅的猛烈追击下，他们跑过了长脖子岭，又跑过了平阳车站，一气跑了70多里，队伍乱成一团，一点掩护部队也留不下来，只是顺手抢了老百姓的七八匹马和衣物。汪洋深有感触

地说："这些兵打胜仗还可以，一旦打败仗就完蛋了！"

驻在平阳镇的李凤金接到军部来信，叫他快向东海和永安方向撤退。当他赶到东海及永安时，两地都已被三五九旅占领。李凤金一伙40多人，就这样与谢文东失去联系20多天，到6月中旬才与谢文东在宝清县境的保安桥相遇。在那里，他们向群众要了几口肥猪，过了端午节。杨德坡和刘肇成，这时各领20多人离开谢文东，往桦南方向去了。谢文东匪队端午节后移驻四人班，穆青山带领250多人驻守哈达岗、大荒地两处，卫护四人班。6月25日拂晓，穆青山发现自己防地遭到合江军区十四、十五、十六3个团兵力的包围，一面命令各队尽力抵抗，一面将守在大荒地的王跃庭团调到哈达岗。战斗到8时许，穆青山指挥匪队突围，发生了肉搏战，匪队死13人，被俘70多人，机枪、大炮都丢了。

谢文东离开四人班经过黑台时，又遭三五九旅的三面包围。穆青山主张撤退，他和谢文东先走了。郭兴典认为自己的炮多，布置阵地进行抵抗。战斗一开始，剿匪部队的炮火排山倒海似的打过来，打得郭兴典阵地人仰马翻。郭兴典实在守不住了，就和杨士范向宝清方向逃走。当天夜里追兵赶来，又是一场混战，打得匪队四散溃逃，郭兴典和杨士范带着10来个人逃到驼腰子。谢文东在三五九旅和合江军区部队的穷追猛打下，带着数百人落荒而逃，跑了一天一夜，逃到东安（即密山）山里。他们满以为在那大树参天的深山老林里可以好好休息一下，谁知刚停下来，三五九旅又跟着来了，不得不爬起来再跑。就这样，匪队一气跑了200多里，武器、弹药、衣物扔得满地都是。在鸡西截得的马车和车上的重机枪、弹药、粮食和肥猪全跑没了。在黑台才回到谢队的傅长山队，这时带着八九十个人离开了谢文东。谢文东仗着熟悉当地地势和道路，先跑到太平砬子，又绕道跑到宝清县的保安桥，最后经勃利县的东大房身回到桦南东太平屯，才算暂时逃脱了剿匪部队的追击。

拒绝挽救，一意孤行

谢文东被打得焦头烂额。他逃回太平屯后，合江省主席李延禄仁至义尽，又派王副官给他送去一封亲笔信，大意说：当年我们共同抗日时，国民党不是说支持我们嘛？可是给过我们一粒粮食没有？给过我们一文钱没有？给过我们一颗子弹没有？今天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希望谢文东对国民党放弃幻想，幡然悔悟，最后写到："你过来吧！你想干什么，文的武的尽你挑。"可是，谢文东第二天对王副官说："你回去对李延禄说，我已经是这样了，跟国民党跟定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谢文东失去了又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7月下旬，合江军区部队从湖南营出击太平屯。在太平屯南山战斗两小时后，谢文东逃到驼腰子，军区部队追到驼腰子，没有找到谢队。谢队已经由八虎力向西逃到太平镇，王衡的马队这时也前来投归了谢文东。

国民党合江省党部书记张玉书，因到处发展国民党组织，封官加委，拉拢控制了不少匪队，致使一些匪队听命于张而不理谢，谢十分恼火。这次谢文东逃到太平镇，向最大的商号同成兴要款时，人家说款已给了张玉书，谢文东因此更加仇恨他。3月初，张从外地回太平镇与谢文东相遇，两人在饭馆同桌共饮，谢文东说："你真行啊！你向同成兴要了那么多的钱；我这么多人，还一个钱要不出来。"张玉书说："党部活动需要很多钱。"谢文东说："你需要我不需要？"这句话激怒了张玉书，他挖苦谢文东说："你们不是能抢吗？你的队伍到处抢劫，还用什么商号捐款……"谢文东一听更恼火了，瞪圆眼睛浑身抖动着说："他妈巴子，你是个什么玩艺，是干什么吃的？"张说："我是国民党合江省党部书记，你能把我怎么的！"谢说："你国民党当个屁？老子枪毙你！"张说："你敢？我是中央委任的，国民党马上就要过来了！"谢说："有啥

不敢？国民党来了我打国民党！”张玉书见势不妙，正要掏枪，谢文东的警卫员上前抓住他捆绑起来。这时，杨义儒上前劝解，谢文东不听，将张玉书推出门外，门外有四五十人也跪下为张求饶，但谢文东不加理睬，把张玉书押走枪毙了。谢文东回屋时还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杨义儒问他说：“这样做能行吗？”谢文东冒火了，拿起皮鞭朝杨义儒狠狠地打，边打边说：“谁他妈巴子说不行？”把杨的眼睛也打肿了。

8月10日凌晨，合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戴鸿宾带领部队前来，将酣睡中的谢文东匪队包围在太平镇。李凤金去观察情况回来向谢文东报告时，谢已逃得无影无踪，李便命匪队突围向北逃走。谢文东过松木河后找到了匪队，到大来岗、宏克力之间游窜，后来又窜到依兰南部山区。这时，他们在牡丹江边找到了号称“国民党第一先遣军上将司令”的李华堂匪队，旋又回到刁翎会见了号称“国民党东北挺进军中将总指挥”的张雨新。这三股合江地区最大的匪队在刁翎村公所院内正房里召开了三军会议，国民党合江行署专员李天民参加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杨义儒、汪洋等积极主张去长春投奔中央军，李华堂和张雨新则主张三军联合攻打依兰，想趁此机会将曾与李华堂有联系的杨青海部（合江军区十九团长五支队副司令员）拉过来，以便保存实力，等待中央军“接收”。随后，当他们向北活动时，又听侦察员报告说驻守依兰的部队戒备森严，很难下手，于是，谢文东西渡牡丹江，到头道河子、二道河子、三道河子、四道河子等地活动了近两个月。横道河子有50多人的杨德林匪队，这时投归了谢文东，使谢队人数又达到300多。

进入10月，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在剿匪部队的打击下，谢文东匪队的吃、穿问题越来越困难。为了过冬，他们在牡丹江附近，对有300多人的八道沟屯抢劫达4个多小时。他们当时把住了屯子向外的所有通道，到各家各户翻箱倒柜，你争我夺，不给

就打，搅得全屯哭叫连天，鸡犬不宁。这场抢劫，他们共抢到40多匹马，3000多斤粮食和大量衣物。穆青山队还认为抢的粮食太少，又到附近的林家房身屯抢了10几匹马，300多斤粮食和一些衣物。第二天，被抢去马匹的群众找谢队要马，匪徒们却要群众用胶鞋来兑换，气得群众咬牙切齿，对他们深恶痛绝。

穷途末路，落个可耻下场

谢文东匪队在牡丹江西岸一带作恶多端，我军三五九旅与合江军区骑兵部队又在那里布下了天罗地网。首先撞到网口上的，是谢文东的警卫团长谢生荣，他在转移的路上被埋伏在路边的军区部队打下马来，当场毙命。谢文东悲恸不已，带领匪队调头西窜，没走多远又遭到同样的狙击，死伤10多人。谢文东仗着熟悉地形和道路，与剿匪部队东躲西藏。杨义儒、汪洋、韩希经等看到形势严峻，便离开谢文东去长春找中央军去了。

谢文东在被打得东奔西逃的时候，想起了西莲花泡有一个很有名的“大神”（即巫医）。他想恳请神仙指给一条出路，算算何方吉利，中央军何时才来“接收”，便连夜带队，悄悄来到西莲花泡。“大神”见是谢军长驾到，使出了最灵验的“请神法”——用一把尖刀插在头上，满脸带血为他“请神”。谢文东十分虔诚，不断向“大神”提问。但是，“大神”的回答，没有一句是他满意的。

11月6日，谢文东带队窜到大夹皮沟，老老实实钻进了剿匪部队为他设置的口袋里。据当年合江省军区司令员贺晋年的回忆，经过如下：

“当我和三五九旅副旅长谭友林同志带领三五九旅和合江骑兵团追剿土匪到莲花泡时，经询问老乡，知道谢匪昨天下午在这里抢掠一阵，进了西山夹皮沟。部队在西莲花泡休息一天后，和谭友林副旅长把团以上干部召集到指挥部，向他们介绍了情况，然后我说：还是那句老话，擒贼先擒王，剿匪要捉匪首，捉到或打

死匪首，就等于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二；若不消灭匪首，即使全部将匪徒消灭，也不算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谢文东就在牡丹江西岸，我们要活捉谢文东，消灭这股顽匪。部队虽然很疲劳，但必须坚持追击，坚持就是胜利！现在必须派部队进入大夹皮沟，堵死谢文东南逃的大门，同时封锁牡丹江西岸从沫勒气到三期的所有渡口。这样，北面有依兰独立团在黑瞎子沟堵住口子，西面有老爷岭，谢文东就成了瓮中之鳖。我指着作战地图继续说：南起夹皮沟，北至黑瞎子沟，东至牡丹江，西至老爷岭东麓，是一个东西窄，南北长的方块。为了加速剿匪进度，我们要把这个狭长地带切成几块，除夹皮沟一路外，再向西三道通、四道河子打进两个楔子。我讲完之后，当即和谭友林同志给部队分配了任务，反复叮嘱各路搜山部队要注意配合、衔接，不给土匪钻空子，并要求各部门一定要搞好动员，各级干部要身体力行，发扬吃大苦、耐大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战胜严寒，制伏林海，活捉匪首，为民除害！会后，各部队抓紧进行了搜山的准备工作。

“进入夹皮沟的，是合江省军区王平同志率领的骑兵团。一进深山老林，战马用不上了，只好留在山外交给少数人看管。其他几路部队也都按计划越进了山林。谢文东很有一套欺骗匪徒的手段，他随身揣着一个小铜佛、一本‘卦书’和‘诸葛金钱神术’。每当他要往哪个方向走，他就把小铜佛供在地上，占上一卦。那些匪徒们，对他这一骗术是很相信的。谢文东就凭这一套，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流窜各处密营，同我军捉迷藏，妄图逃脱人民的惩罚。

“进山搜索的部队和封锁牡丹江的部队出发几天后，北风越刮越紧，气温不断下降。谢文东凭借他多年经营的密营和对山路的熟悉，与我军在深山里周旋。因此，我们想到密营和粮食是敌人在山林中赖以生存的头等重要条件，只有烧毁敌人的密营，断绝敌人的粮食，才能使敌人束手就擒。我们把这个想法同广大指战

员一商量，和他们的心思不谋而合，这个意图立即变成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行动。同志们在这个基础上，想出了各种方法发现匪踪，炸毁密营，断敌粮源。由于我军多路连续搜剿、袭击，土匪的密营和粮食不断被我焚烧和炸毁。土匪没有粮食吃，靠杀马度日，于是开始腹泻，后来渐渐便血，加上没有盐吃，四肢软懒，浑身无力。谢文东到这般光景还给匪徒们打气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天无绝人之路，江西不好咱们到江东去。'

"牡丹江流域南起莲花泡，北至大、小一期的所有的渡口，我们都驻上了部队。多则一个排，少则一个班，还有骑兵队来往机动，互相接应。我们控制了沿江所有船只，并动员沿江的零散住户，暂时到附近较大的村庄居住，把牡丹江这一段的西岸封锁得铁桶一般。11 月 11 日，谢文东带队从五道河子下山，打算从五虎嘴子偷渡过江，被我封锁部队一阵猛烈射击，堵了回去。谢文东不死心，带队向北窜去，企图从能能沟偷渡。当他们刚接近能能沟，被我一阵激烈枪声撂倒了几个匪徒，才夹着尾巴躲进了深山。

"为了促使匪徒早日瓦解，我们加强了政治攻势。凡是土匪经过的地方，都贴上了标语，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交枪不杀，投降留命'等。由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又没有吃的，有的匪徒开始动摇，陆续向我军投降，我们对他们经过教育，又派他们回去，劝其他匪徒来降。11 月 13 日，我们派了两名老乡（当地猎户）进山劝降，他们很快遇上了谢文东一伙。土匪们一边向他们要吃的，一边打听山外情况。老乡向他们介绍了我军对牡丹江的严密封锁情况，并讲了我们的俘虏政策，当时就有两个'营长'站起来说：'不干了，投降去，留条活命！'谢文东有气无力地吼道：'这是共军的宣传，别上当！'把两个老乡捆了起来，要枪毙。正在这时，我搜山部队赶到，一颗手榴弹扔在匪徒的火堆里炸开了，机枪也响了起来，匪徒们四散逃命，这支二三百人的匪队，谢文东再也拢不住了。当天夜里，匪徒们三五成群纷纷向我投降，李凤金、穆

青山领了一伙人向南蹿去。在我军打击和瓦解下，最后只剩下5个人，于11月18日改名换姓，编造谎话，冒充小兵向我苇河县政府投降。

“谢文东的身边，此时，也只剩下5个人了。一天，他们气喘吁吁地逃到了一个山坡上，实在挪不动步了，索性躺在雪地上，谁也不吭声。过一会儿，谢文东一边无力地摇着脑袋，一边用力支撑着肥胖的身躯，坐起来对几个喽罗说：‘弟兄们别泄气，胜败兵家常事，当年刘备同曹操打仗，兵败小沛，只剩下单骑投奔袁绍，后来还鼎足三分天下。今天我们这里还有6个人，何愁大事不成？等中央大军一到，合江还是我们的！那时候，弟兄们都是有功之臣了，哈哈！’谢文东装出轻松的样子，干笑了几声。谢文东的马弁汤二虎却听不进他的这一套鬼话，气呼呼地走到谢文东跟前，把枪口对准他说：‘军长，你不投降，我要投降了。’谢文东看到汤二虎的架式，知道来硬的不行了，便装出可怜的样子说：‘二虎，你今天先去投降，替我办好手续，明天拉个马，带两个饼子来接我。’第二天，汤二虎领着我们去找他时，狡猾的谢文东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在四道河子与五虎嘴子之间的江面，历年封冻较早，估计谢文东这个光杆司令，很可能在那里偷渡。三五九旅八团五连副连长李玉清，于11月20日中午，带着二排长刘树严和十几名战士，身穿便衣，打扮成土匪模样，从四道河子沟进入五虎嘴子山林。他们爬上一个又一个山头，穿过一层又一层密林，下午太阳偏西时，他们翻过一道山梁，走过一道冰川，再往山顶爬时，二排长突然在前面喊道：‘副连长，找到了。’原来他发现了一堆大便和一些脚印。经过研究，估计匪徒没有走远，决定继续往前搜寻。当他们到达四道河与五虎嘴子之间的一个山头时，突然发现在一块向阳的小平地上有座小山神庙，庙前围着五六个人。李玉清立即让刘排长带一组战士从正面接近小庙，他自己带一组战士从右侧向

庙后接近，他们走到庙后时，谢文东正跪在地上喃喃地说：‘神灵保佑多保佑，保佑我父子性命安全，脱离苦难，将来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李玉清断定，这个胖子准是谢文东，于是端起手枪从右侧抢前跑几步，对着谢文东大喊一声：‘谢文东我捉你来了，看你还往哪里跑！’谢文东被吓得失魂落魄，瘫软在地，嘴里嘟哝着：‘我，我不是谢文东……’他的儿子和其他匪徒还想逃跑，刘排长和他带领的一位战士这时也赶到庙前，匪徒们走投无路，都乖乖地投降了。

“当天晚上听说谢文东要拜见我，说他在北满还是有影响的，可以帮助我们说服其他土匪来降。我听了很生气，说：‘谢文东与我是敌我关系，要见面只能是在法庭上对他的审判。’我当即向骑兵团长王平同志交代，第二天把谢文东父子押送到依兰县，交地方处理。

“谢文东被活捉的消息轰动了依兰县城，更轰动了勃利全县。由于他在勃利地区作恶最多，根据勃利人民的要求，在依兰示众后，押解到勃利县。12 月 3 日上午，在勃利县城召开了剿匪反奸胜利公判大会，远在 40 里以外的大四站、小五站、倭肯、杏树、三合屯、青龙山、七台河等地的群众都赶来参加大会。大会主席报告了活捉谢文东的经过，在群众的血泪控诉中，将谢文东处死。这个恶贯满盈的匪首，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走上抗日之路的“老北风”

潘喜庭　魏福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帝国主义越发猖獗，东北地区很快沦陷。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侵略行径，激起东北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涌现了大批民间抗日武装。其中亦有被逼为匪、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绿林英雄”，如出现在辽河沿岸、名震东北大地的“老北风”抗日义勇军，就是一支典型的先为匪、后抗日的武装。

老北风，名张海天，原名张贺年，1890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九台村（今属台安县）。其父张鹏一，是一位老实持家的庄稼汉。张家祖籍山东，清末逃荒来到关外，家境可称得上是吃穿有余的殷实人家。到张海天的父亲一代时，正值清廷腐败，国势日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日甚一日。当时，外国侵略军逆辽河而上，张的家乡倍受其害，农家纷纷破产，张家也开始衰落，沦为连温饱也难以保证的贫寒人家。

张海天弟兄5人，他是老大，由于生活贫苦，没能上学念书，到十一二岁时，为养家糊口，他便去给本村一家地主放猪，从童年起即踏上艰难的人生旅途。

辛亥革命那年，张海天已长大成人。从这年起，他开始到一个叫张海兰的地主家去赶大车和当看家护院的炮手。翌年，辽河发了大水，九台村一带颗粒无收。为求生存，张海天的父亲乃带领一家人迁到郑家屯附近一个村子落了户。在张海天23岁那年，

他到警察分所去当杂差。由于他年轻气盛，性情耿直倔强，不甘忍受所长的打骂，于是决意投身绿林，去做一条杀富济贫的好汉。决心既定，他先把妻子赵氏休掉，让其另适他人，然后从警察分所偷出几枝枪，投到报号“老头票”的匪伙，干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

“老头票”的首领是一个姓刘的山东人，他们不仅打富济贫，而且经常与日本侵略者作对。他们在抢劫日本人时，专要日本银行在东北发行的“金票”，这种“金票”上印有日本“武内大臣”的头像，俗称“老头票”，他们即用“老头票”作了他们的报号。张海天身材高大魁梧，遇事胆大心细，为人大度，精于骑射，很得众望。他曾多次参与对日本奸商的抢劫和绑票，还同众人一起捣毁了设在郑家屯、洮南附近的日本特务机关以及军火、鸦片贩卖所。张海天十分能干又很讲江湖义气，不久便被推为“炮头”，成为匪队首领之一。

1928年秋，张海天离开“老头票”匪帮，回到原籍九台村。他虽为匪5年有余，但并未捞到多少油水，生活依然清苦。1929年秋，他又与于跃东一起参加了纪兴玉的“西胜”匪伙，仍当“炮头”。不久，他的报字“山河”的三弟张海岱、报字“黑龙”的四弟张海秋以及五弟张海迟也参加到“西胜”匪帮之中。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20余万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没作任何抵抗即退入关内，日军很快占领辽宁全境，横行肆虐，残害中国百姓。张海天闻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后，悲愤异常，怒发冲冠，决心拼死抗击。他召集部下说：“原来当土匪是想升官发财，这回鬼子打进来了，国没了，家也没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要不打日本，还有什么人性？还算什么好汉？”众人一齐响应，打起“抗日自卫军”的旗号，报号“老北风”，开始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

这支抗日队伍取报号为“老北风”，含有抗日杀敌的深意。

“北风”本是麻将术语，为本庄的上家，本庄能否吃上牌，全看北风位置上的人出牌如何，因而北风是可以控制本庄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张海天取报号“老北风”，正是取麻将牌的北风克本庄之意，暗含一定要克敌制胜、打败日本侵略者之意。抗日自卫军拉起后，在当地很有影响，许多绿林豪客纷纷来投，著名的有项青山、盖凌香、蔡宝山等股，不久即发展到2000余众。

日军占领沈阳后，一方面继续向吉林、黑龙江进攻，一面提出“以华治华”的方针。10月11日，日本关东军派参谋陆军大佐仓岗繁太郎和松本德松、道源元助等人，到沈阳收买豢养多年的汉奸、民族败类凌印清，令其收编土匪。10月19日，凌即假借民意成立了伪东北民众自卫军。随后，日军利用《盛京时报》编造新闻，谎造舆论，说什么“东北民众自卫军”成立后，不长时间就发展到数万人，编成了18个旅。10月21日，凌从日人那里领到步枪300枝，机枪6挺、手枪24枝、子弹7.8万发，设总司令部于海城腾鳌堡，并四处联络收编土匪，一时间网罗300余人。

老北风、项青山、傅天龙、蔡宝山、高德山、盖中华等人为了获取凌匪军械，假意接受收编，均被任命为旅长。他们有了日方供给的枪械弹药后，即暗地里与锦州的省警务处长黄显生联系，相约合力消灭汉奸凌印清和日本特务，黄表示赞同，并派督察长带兵援助。11月18日清晨，大雾弥漫，老北风、项青山等人率部悄悄包围了三道沟凌印清驻地，老北风和项青山等以有要事面见为由，照直闯入院内，冲进凌的卧室。当时，凌尚未起床，正躺着过大烟瘾，还未搞清发生了什么事，老北风已用枪把他逼住，缴了他的手枪。几乎同时，盖凌香、项青山等人也分别冲入仓岗繁太郎等住房，缴了他们的械。其余日军见被大队人马包围，无计可施，只得自动放下武器，当了俘虏。被俘伪军200余人，经老北风给他们讲明抗日救国的道理后，有150多人愿意留下，参加

了抗日救国军，其余全部释放回家。他们把汉奸凌印清、参谋长王槐三、军法处长刘信春、第十五旅旅长冯仙洲及日军军官仓岗繁、松本、通源等7人押往沙岭抗日军驻地，经审问后，在该镇北卡子门外执行枪决。另外12名日本特务，用大车拉到魏家河口辽河沿，也给枪毙了。老北风此举，威振辽南，鼓舞了辽河两岸人民的抗日斗志，抗日队伍迅速发展到5000多人。

12月22日，日军关东军精锐第二师团主力从辽阳、海城出发，偷渡辽河，于24日攻占田庄台，26日又占领大洼。老北风、项青山等闻讯率3000人赶到，于26日晚进攻田庄台。佐藤联队长指挥500余名日军进行顽抗。经过一场激战，老北风的义勇军击毙日军50余人，杀伤100余人。翌日，老北风乘胜再围大洼车站，与东北护路队联合，同日军展开激战。义勇军不顾敌人炮火猛烈，英勇冲杀，经三进三出的拉锯战，日军不支，乘夜败退营口。老北风的义勇军第一次与日军作战即取得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抗日斗志。

田庄台和大洼车站战斗之后，老北风、项青山率领义勇军在营（营口）沟（沟帮子）线上，与日军第二师团第三十九联队多次进行战斗，使日军每向北进犯一步，都要付出一定代价。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一再电令东北军退入关内，致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锦州门户沟帮子于12月31日落入敌手，锦州危急。在此紧急关头，项青山、老北风等以东北民众义勇军名义通电全国，慷慨陈词，谴责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坐视东北沦陷的滔天罪行。1932年1月3日，关外重镇锦州城陷于敌手。

东北军全部退入关内后，义勇军不得不单独开展抗日活动。老北风等将队伍拉到敌后，以台安高力房子为中心，向日伪军不断发起攻击，继续浴血奋战。他一面整顿扩编队伍，一面派人到北平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系，以求得其援助与支持。

老北风的抗日行动，使日军大为恼火，他们攻占锦州之后不

久，即派出海城日伪军300余人，进攻抗日义勇军，并侵占了大沙岭村。老北风得知，当即决定出击，歼灭这股敌人。1月16日，义勇军将沙岭四面包围，于晚9时许战斗打响。老北风率队四面同时进攻，一时间枪声大作，杀声震天，西路率先冲入街内，将日军指挥系统打乱。西、南两面的日伪军遭到突然袭击后，一时不知所措，拼命向村内溃退。街内的敌人以为是义勇军攻入，遂开枪射击，于是相互残杀混战起来。经一夜激战，日伪军共死伤百余人，大尉河野英基被击毙。天将破晓，日伪军突围逃到牛庄，沙岭镇被收复。

2月18日，老北风又率部直捣牛庄。盘踞于朱庄的日伪军400余人被围，一听说是老北风的义勇军，就胆颤心惊。义勇军一阵猛攻，敌人从西门仓皇逃跑。这次，义勇军不仅缴获许多军械物资，而且伪军王殿忠部的一个连起义投诚。不几日，老北风再次乘胜出击围攻营口，虽因缺乏重武器而未将城攻下，但却使得营口之敌不敢轻易出来骚扰义勇军的驻地。这期间，救国会派出高鹏、马宏德、纪亭榭、肖东藩等军政人员到老北风的部队工作，建立政治宣传处，加强了政治领导。

5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划为5个抗日军区，每一军区成立一个军团。第二军区所属辽阳、海城、台安、辽中、营口、盖县、复县、庄河、岫岩、凤城等10县，共编为17路义勇军。老北风被任命为第二军区第三路司令，下辖10个旅，20个独立团。这支抗日队伍活动于辽河两岸，名震长城内外。5月26日，老北风联合吴三胜等袭击辽中县，占领老鹳坨、六间房村。6月29日，老北风率部攻克台安县，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抗日爱国人员，并将伪县府文书档案焚烧，将现款及贵重财物抄走。7月30日袭击海城，打败了前来围剿的日伪军，并将闵家房的伪警队缴了械。8月初，老北风在项青山、顾冠方、卢士杰等部支持下进攻营口，战斗中将日军少佐阴山、少尉忠直等10余人击毙。9月12

日，老北风又参加了第二军区统一组织的围攻海城作战。为坚持长期抗战，老北风在大本营高力房子村开设了兵工厂，自制枪支子弹、手榴弹和地雷，解决了武器来源。

老北风的抗日义勇军，成了日伪军的心腹大患。为消灭这支抗日武装，日军于10月间，派第十六旅团长川原少将指挥所部和王殿忠的伪军共万余人，于15日兵分两路进犯高力房子抗日根据地。老北风率部与敌激战了3小时后，因寡不敌众，退入海城界内。为保存实力，老北风奉军团之命率部退入热河，后被国民党四十一军孙殿英部改编。1935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北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老北风率400余人前去参加，不久队伍被打散，老北风回到北平。后他又参加平西抗日游击队，在与日军作战时负伤，回到北平治疗。因他多年吸鸦片，体内中毒，加之枪伤，终于卧床不起。此时，救国会亦被国民党强行解散，使其经济来源继绝，老北风贫病交加，身体状况日渐不佳。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到处搜捕抗日人员，老北风病情加重。1939年5月2日，老北风在贫困、悲愤和绝望之中死去，时年50岁，被葬于奉天会馆义地。

张占军整理

（选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七辑）

黑山著名匪首“老二哥”

郝让先

一、老二哥的出身、家世和为匪经过

黑山县著名匪首“老二哥”，姓李名魁武，字正义，“老二哥”是其为匪的绰号，家籍辽宁省黑山县西北60里的三台屯。父务农，生子3人，老二哥排行居中，所以得到这样绰号。老二哥生于光绪末年(1911年)，少年时即桀骜不驯。在竹马玩耍中，常常抢夺邻儿的器物，且每每打骂欺侮同里少年。其父母亦不知管束，放任自流，因而地痞行为和流氓无赖的坏习气，从此就逐渐养成了。另外三台屯一带，正处于黑山县边缘，北毗阜新，南接北镇，是个“三不管”的三角地区。三台屯和白厂门以西的西山沟地方，是医巫闾山的北尾。北岳重叠，沟叉纵横。老二哥幼年的环境如此，家庭教育又如此，他到20岁后，更目睹那些辽西著名胡匪如野狼、青山、双红、二升子、毛锦州、毛义州等人，大马金刀，杀人放火，任意抢民女，掠夺财物等等的无法无天行为，因而，他当胡子的思想就油然滋长起来。没过二年便常同沈老疙疸、占山好等明来暗去的出外抢劫。有时卡大钱(指在大通道上拦劫)，有时砸明火(指在夜间抢劫住家的财物)。从此他便一次又一次的干上了土匪的勾当了。又过几年，自己也拉拢几名“底柱子”(胡子所说的隐语，是对自己亲近而贴底人的称呼)，组成22名小绺子土匪，老二哥的匪号也就开始传出去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听从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主义，放弃东北，竟将所有东北军陆续撤出关外。当时日本军队已占领沈阳、吉林、黑龙江等地，辽西各县一时遂形成无政府状态。

那时各县虽然组织了维持会，但只能维持县城街面治安，至于城外各村屯，尤其是边缘地方，大批胡子就左一起右一起蜂涌而起。这时老二哥已为匪数年，且底柱子很多。同时他们听说山海关内外有辽西义勇军在活动，便抱着趁火打劫的思想，冒充起义军，到处裹了不少百姓。为首的是占山好，其次老二哥李魁武、草上飞郭九贤、春字沈老疙疸等，连同老百姓号称千人上下。正式胡匪骑马在前打头，末后跟的就是手拿棍棒或赤手空拳的百姓，有些还是胡匪的亲戚和家族，有驴驮子、有大车，这都是准备打进屯子后，拉东西用的。他们的大队浩浩荡荡从三台、黄马窝铺经过石家沟、南三家子等而扑到陈八道壕。适时日军的骑兵已经进驻到黑山城内，旋又遣步兵乘火车向北伸展，双方相遇，并未冲突。因为老二哥这伙胡子，他们并不是真心抗击外敌，而是借打日本鬼子为名，实行其抢劫惯伎，故而一听日寇到来，即行卷旗回窜三台、花楼、四堡子一带黑北两县交界地方去了。日军下车后，听说陈八道壕来过义勇军，就把房子烧了数十家。

二、老二哥攻打二台子的失败

同年冬季，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代表同战士约 10 余人，从北平奉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命令，经山海关、兴城去北镇路过四堡子、三台子、白厂门、二台，然后直奔彰武和通辽一带，去发动有武器的蒙汉人们起来抗日。事有凑巧，在三台子就宿中，竟和匪首草上飞郭九贤、老二哥李魁武接上了头。经过谈话申明救国大义，郭九贤表面上赞成当义勇军，老二哥虽也首肯，但心中有了打

算，总是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假借抗日义勇军的名义，破村入屯后捞一把。他们两人就这样又树起义勇军的大旗来。

这时白厂门东一带如八道壕、赵屯、头台、老河深、李屯、罗台、大夏、二台等，均有地主和豪绅们组织起来的联庄会。以公厥屯大地主杜化桥为首，下分步兵团练及骑兵团练两种，声势浩大，武器及弹药亦极充足。外加黑山的警察队数十名，跟队长牛万庆回驻到自己的家乡二台子屯（白厂门东8里距三台15里）。他们大小枪械都很齐全，且有数名干练的好打手。二台子屯内义聚号，是由张德荫、张仲三当家掌权，是联庄会大本营。他们听说三台、四堡子一带，过来了辽西义勇军的干部，又得悉草上飞和老二哥都树起义勇军大旗，开始要"抗日"了，预料二台屯正是他们两个匪首觊觎的目标。因为二台屯内枪械子弹多，财主家中的物资厚，这头一仗准在二台上打起来。果然，一日傍晚"抗日义勇军"以抗日借道通过并收编一切武装起来抗日为号召，下书给二台屯的联庄会。会首张仲三与队长牛万庆，立即声明不准通过，如上来，就打打看。信使走后，即调来罗台、头台、老河深、赵屯等步骑兵团练约200名，同本屯八大户炮手以及牛成庆的警察队等，分兵把口，配发子弹，大作阻击的准备。义聚号且杀猪宰羊，搬出大米白面，犒赏所有参战的人员。最后把屯内青壮年编为工事、运输、抢救、医护等4组。

一日当太阳偏西的时候，从二台的西面南面就上来了"义勇军"的尖兵（侦察的骑兵），随后大红旗就在屯西台子缸山上、王八盖子山上，随风摆动起来。接着军号嘀哒，人皆鼓噪前进。枪声密一阵，松一阵。屯子里面的警察队和团练有窑可凭，有炮台和掩体可守。屯子外边的"义勇军"越摸越近，双方战斗就此开始了。老二哥队伍中的10名辽西义勇军干部是真心为人民、为抗日而打击敌人的。他们首先从二台的西面大沟中，且战且进靠近义聚号的前胡同，采取灵活战术，有勇有谋地夺下来几处掩体，而且占据了一幢小院和一堵矮土墙。这给南面老二哥绺子所攻取的目标，造成了有

利形势，致使老二哥大部匪徒，很容易的攻下二台子屯的西南街各家（即西树沟南树沟的一些贫苦人家约计34户）。可恨老二哥这伙人，假充义勇军抗日，而心眼里是惦念着抢夺财物。在匪徒们身后，跟着十几辆大车、驴驮子，还带着挑子、绳子及跟着胡子们的家属，准备破二台子屯后好抢东西。攻打时候持枪的土匪在前，这些人就在后边高喊："攻啊！前进啊！拉大网啊！"

天黑后二更时分，二台子的西南街大部分为老二哥和草上飞郭九贤的一部分匪徒所控制。这些匪徒开始抢掠起来，到处翻箱倒柜，有的点火烧房，烧柴草堆。火光冲天，照得满街通亮。子哭娘嚎，叫苦连天。辽西义勇军的干部们看见匪徒们的虐民行为，便绕道奔阜新北上，离开了这些人。

这些冒牌义勇军的匪徒，人数虽多，终是乌合之众，结果，老二哥绺子的一部，被牛万庆警察队所包围，草上飞的那一帮，也没攻进义聚号大院，反倒有了伤亡，被打死了七八个人。原打算拉抢东西的大车，现在倒装上了阵亡的匪徒了。

天快亮了，老二哥和草上飞才会了面，知道这样干下去很难取胜，决定退却。老二哥部下的10多名挂了彩的匪徒，竟被遗弃在西南街最靠边的3间房内。天亮了，牛万庆便把这些匪徒一一枪毙在屯外的草甸上。这一场争杀，老二哥遭到惨败。除白搭二三十名伙伴的生命和把二台西南街贫苦人家的东西抢掠一空外，大地主义聚号和大老财张洛湘、孙宗武等的家资，并未摸到分毫。可是牛万庆倒因此得功，后被调县里任警察讨伐队队长去了。战后第二天，由于联庄会上报义勇军攻打二台子未成，全部西退的消息，日军由沈阳派来两架飞机，到白厂门和二台子一带大肆扫射和投弹，炸死几头牲口，又把一个在屋里坐着的妇女炸死。

三、老二哥投降日寇

老二哥和草上飞郭九贤在打二台子失败后，痛定思痛，恨透了牛万庆，听说他当上了警察讨伐队的大队长了，更是要找他的别扭，所以土匪在黑山县西北界面和城乡附近就处处闹事。秦屯车站被胡子攻打过，黑山县车站也被胡子攻打过；邮局局差老赵的儿子赵庾申被绑走无下落；陈姓王姓住家被砸明火；据说黑山第三小学后院女生部住有女教员3名，夜里里进去胡匪5名，叫女教员给他们烧水做饭，吃完后奸污了她们而去。这些都是老二哥唆使部下底柱干出来的。最后在魏家岭，老二哥与牛万庆打了一仗，牛万庆将老二哥包围，在黄昏时顶烟往上闯，结果牛头部中弹身亡未能得胜。

这时伪黑山县长是李铭三，参事官为日本人松田直树，警务局指导官为中山竹雄、小关太吉、田北义彦，还有日本警尉上杉正规、西谷弥太等。他们为了急于肃清地面，争得功绩，对全县土匪，采取了剿抚兼施的办法。

1936年前后，警务局来个曲翻译名泽泊，日本话说得很出色，有交际手腕，在各指导官面前很受信任，但大烟瘾很重。有一次他为办理缴枪事情到了三台，经人介绍，与老二哥相见。老二哥也是瘾君子，二人很投机，就喷云吐雾起来，且吸且谈，非常密切。终于谈到县局对土匪的剿抚政策上来，曲便劝老二哥乘此时机，放下枪杆，赶紧改邪归正，受抚投降，同时立功赎罪，永保平安，可为他担保一切。老二哥闻此正中心坎，交出3枝大枪，匣枪1枝，并说动同伙同屯十几名匪徒，也交出枪支弹药等。曲某回局向指导官陈述经过，指导官夸曲办事得体，遂将老二哥李魁武召到黑山设宴款待，并为其在西街租妥小院一所，令其迁家来住（为的是叫他找寻投降的匪类）。从此老二哥就成为当时所谓"民为"，在城里过上了安闲

享福的生活。同时警务局又给他办了一个大烟证，一个吗啡证，允其公开吸食购买。他和妻子就这样在黑山住了四五年。

老二哥表面上不为非作歹了，但暗中却出卖过两次朋友。据说日军在尖山子大沟枪毙的四五名胡子，还有在黑山城外小南庄屯道旁的大土包下用洋刀砍死的6名匪贼，都是老二哥给扎的眼。

1942年，老二哥给他儿子娶媳妇，大肆宴请亲戚朋友，杀猪10余头，来道喜的军、警、政、学、工商各界都有。用马车接来的官太太，都带两三付金镯子。就连笔者也曾去吃酒。此外他家乡三台、白厂门、刘屯、四堡子等地也有不少老乡和其不错的，全来上礼，接钱不少。老乡们看了这种情形，都讥讽地说："人家老二哥李魁武，当胡子还当出息了，真够上大要人了！连日本人、日本官都捧他。"

四、老二哥的伏法

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投降了。东北各地一时又陷于无政府状态，有的成立了维持会（无非还是伪官吏和豪绅的集团），有的连维持会也没有。幸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领导群众，维持治安，如北镇县支队长赵文龙就首先来过黑山，首届县长云戒三、于科长等，也都不避艰难和危险在黑山开始建设政权，组织武装。所以县城秩序非常良好，附近各屯亦均安谧。惟偏僻地方则鞭长莫及，仍有匪类的蠢动和骚扰。

老二哥李魁武是时早已把家小迁回三台，便乘机到外找到占山好和春字沈老疙疸等，约会旧友，勾结新匪，又拉起大帮来。老二哥和占山好是大头子，其次为沈老疙疸等。他们树起大红旗，上写"天下第一团，人人都该钱，善要他不给，恶要他就还"20个大字，籍以表明他们这伙人所以要抢夺烧杀的原因。同时还给附近各屯子下条子要钱，如不齐，就进屯抢烧一空。他们这伙匪团约300名上下，大约是十几个绺子，全是骑马，马鬃和马尾都扎有红绿布或

各色绸子。这些马匪在大路上疯狂地奔驰，冲起沙尘障眼，路断人稀，百姓都吓得象鼠避猫一样。这些匪人都是黑地庙、窑沟、鲁家荒、白厂门西沟、四堡子、江家沟等处人。

10月26日，这些虐民害物的匪团，从大郑线劳山镇车站旁边经过，首先到杏坨子，闯进大蔡沟村，附近所有六七个屯子如纪屯、龙湾、杨屯，修屯、史油坊……都住满了。每占一屯即分别乱闯各家，翻箱倒柜，抢夺东西，凡是完整不破的被褥、衣帽、鞋袜、布匹等只要是好的物品，均行抢去。甚至连做鞋用的裱布也被拿走。更命令各家不许关门，夜间屋屋都得点灯。那几天里大蔡沟一带，真如大年三十晚上那样明亮，屯里人有的跑了，跑不了的（匪徒每在进屯前，往往骑马兜大圈子，把跑出的人圈回来），就得伺候胡子，做饭烧水，牵马喂马，全屯男女老少都变成他们的奴才。他们说："现在没世界了！只有我们这天下第一团的人们说了算。各家有年轻的姑娘可以和我们结婚，我们当拦把的（拦把是胡子头的意思，是黑话），都能出头给当媒人，操办一切……"每找到一个姑娘，就硬行搭配一个年轻胡子，并给操办结婚。就这样，土匪成天在大蔡沟一带杀猪宰羊，吃喝玩乐。可是屯里百姓亡家破产，简直是陷于地狱一样。尤其老二哥新弄来一个年轻而又泼辣的妍妇，才二十几岁，匪团里的大小拦把都以"老二婶"呼之。她好骑大红马，也使用大小枪。她的为人更坏更恶，女孩子若拒绝与匪人结婚，她便扒开女孩的裤子给捺着。她看谁家有新零布头，就向这家要新衣服，没有就吊起来或压扛子。有时她又到各家敲墙跺地，听有空声就扒开找东西。诸种罪恶，不胜枚指。

同年12月1日，我云县长闻老二哥在大蔡沟一带种种害人之事，即约黑山、北镇两支队，在彼此兵力悬殊的情形下（即匪多枪多，我人少武器少），黑夜驰赴大蔡沟屯。谁知带路人走了岔道，浪费了时间，等到天亮，才将大蔡沟屯从西南两面包围上，这时匪已察觉。老二哥、老二婶等数十匪骑，由屯内顺道向南冲去，经我支队

战士和云县长开枪截击，匪即落马数名，老二婶左胸亦被弹穿一处，坠身道旁呻吟不已。老二哥欲救不得，便割爱率部下向南西折而逃。其他占山好、春字沈老疙疸等闻枪声即开始与我支队交战，我支队人人勇敢，击毙击伤匪人不少，但大部分匪徒均从杨屯方面逃逸。

这次战役我黑北两支队毙匪11名，击伤数十名。大蔡沟一带的村屯人民，对打扫战场的我支队战士，无不尽力帮助，亦无不交口称赞："打得好！打得好！真给老百姓报仇出气了！"我支队战士亦牺牲6名(现葬于八道壕车站东南数100米外的烈士墓内)，云县长也受微伤。

再说老二婶被击落马后，向群众求救说："谁把我救活，我就给谁做媳妇。"但大蔡沟人把她恨透了，不但不救，反倒用粪叉子、木棒子把她活活打死。大蔡沟谷姓老汉，家有一女，被某匪看中，与其强迫结婚，因有县支队攻入，某匪未得脱身，即躲入缸中加上盖。支队战士搜查到屋，问老汉有无匪人？老汉不敢明说，即以手势暗点大缸，当即揭缸抓获正法，谷姓女子乃化险为夷。

老二哥、占山好、春字沈老疙疸等于靠边屯集合后，仍继续窜扰于彰武阜新一带，但对黑山、北镇则存有戒心，轻易不敢前来滋事了。1947年至1948年，解放大军不断进出黑山，致使这伙虐民巨匪，更无处潜踪，因有随时随地被缴械或被消灭的可能，故而散伙回家。土改时，老二哥在家乡三台，穿上破旧衣服，带上破帽子，假装贫雇农，常到三台农会走动，终于被群众揭发出来，控诉他的各种罪行，经我政府人员的细致调查，一切罪证属实，于1952年在三台拘捕，又于同年5月和其他30多名反革命分子，在黑山南门外伏法。

(辽宁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恶匪"滚地雷"毙命于亲兄弟

王悦安　牟传江

"滚地雷"是个匪号，他叫张志平。他家住在伊通县马鞍山镇西南魏家屯。老张家是从辽宁海城一带迁移到伊通的。那时人们习惯称海城一带为南城，所以当地人称老张家为南城张家。南城张是个大户人家，有100多口人，土地400多垧，是马鞍山一带的首富。那么为何张志平还当土匪呢？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一个冬天，从公主岭来了一辆汽车，路过魏家屯南城张家附近时，汽车突然在雪地里陷住了。那时伊通还没有去公主岭的公路，来往于公主岭和伊通之间的车辆必须得走土道。那时的汽车也算个"怪物"，不用骡马牵引自己就能跑。汽车一陷住，人们都来看"西洋景"，张志平也在其中。车上的人一边用锹镐往外抠汽车轮胎，一边观察着围观的人群。突然车上的人把张志平用毯子蒙上，推推搡搡塞到汽车里。围观的人们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四处奔跑。

原来这辆汽车是土匪在路上劫持来的。他们打算绑南城张志平家的票，怎奈张家是座响窑，四周有院墙、炮台，墙外有水壕，壕上的杨柳密密匝匝，不用说过人，就连猪狗也休想通过。土匪见硬攻不能取胜，就施计夺人。张志平被塞进汽车后，好几个土匪看守着，他一喊叫就用锤子敲打他的脑袋。张志平当年二十六七岁，五短身材，有股蛮劲，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车轴汉子。但他在车里折腾一阵就没劲了，暗想，我一个人怎能斗过这群土匪

呢？莫不如等待时机再逃。

这时，正巧南城张家有几挂大车去公主岭卖粮返回魏家屯，见有辆汽车误在雪地里，没有理睬。车老板刚要赶车通过，汽车上的人拦住去路，央求车老板和掌包的把前套骡子卸下来，帮助将汽车给拉出来。掌包的见汽车不大，用两个骡子就可以拉出来，于是叫老板子用里套和外套骡子给拉"误"。正在这时就听汽车里有人喊叫："二掌包的，他们是'红胡子'，快打呀！"

随着喊叫声，汽车门子咕咚一声被踢开了，一个人从车门口滚了出来。随即车上又跳下几个人来，向四处奔逃，那个要求拉"误"的人也逃跑了。就在这一刹那间，张家几个掌包的、车老板子同时从车上拽出大枪，从腰间掏出手枪，向逃跑的土匪开枪射击，土匪也不时回头开枪还击。这时，南城张家炮台上炮手们闻声也开枪射击相助，把土匪打得屁滚尿流，丢下汽车逃之夭夭。

原来张志平在汽车里，听到外面雪地里有几辆大车碾雪的声音，心中升起一线希望。车掌包的同土匪对话时，他从口音里听出来是自家卖粮的大车回来了，便拼命地挣扎，一边喊叫，一边用头撞倒了看守的土匪，用脚将车门踹开从车里滚了出来。土匪逃走后，大家来到张志平跟前问明了原委，都称赞他说："你真是个'滚地雷'，土匪不但没把你绑去，还给咱们送来一台汽车。"从此以后，'滚地雷'的名声就传开了。

九·一八事变后，马鞍山镇一带成为北山皮的土匪的天下，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南城张家是座响窑，一些亲朋故旧和附近有财势的人家都到这里躲避土匪的掠抢。滚地雷有个小姨子也来南城张家避难，被他奸污了，还非要强娶他的小姨子为妾，遭到全家人的斥责。他大哥张志荣是当家的，很气愤地对他说："人家姑娘来躲匪，你不但把人家给奸污了，还要强娶为妾，这事太缺德了。"他的妻子和他小姨子不敢声扬，姐妹相对暗暗哭泣。这年冬，北山皮土匪降到县城，稍平静些，滚地雷的小姨子回家后

向父母哭诉了自己不幸遭遇。他的父母怕滚地雷再来纠缠就托人为她说媒。滚地雷获悉后来到姬家油坊他岳父老魏家威胁说："你们要给她找婆家，我就把你们全家给打死。"结果没人敢给她提媒，后被土匪抢去为妻。

滚地雷自打小姨子走后，整天无精打采，游游逛逛，把家中一枝最好的"快枪"——连珠枪给偷走了，同几个土匪鬼混在一起，报号滚地雷。家中人虽然知道他当了土匪，但认为是自家人都不戒备。一天傍晚，南城张家装了四五辆大车秫秸，准备到县城卖给西烧锅。夜间，滚地雷悄悄回来，把两辆秫秸车给点着了。家中人拿着枪追赶，他边跑边喊压呀压呀逃走了，家中人没有追上，见两辆大车和犒马家什都被烧光，气得恨不一下子把他打死。

1932年春，滚地雷从外地窜回家乡，在姬家油坊、韩家屯一带活动。一天他到申家屯，托人捎信叫他媳妇同他会面，家中得知后派人通知了魏家屯三保。他的叔伯三哥张志贤在保里当保丁，领着保上的人来到申家屯。滚地雷见保上来人抓他，就往北边韩家屯方向逃跑。他见有种地犁杖，就跑去卸牲畜，准备骑马逃走。保丁开枪射击，将他胳膊打伤。保上的人将他绑上，往回押送。他的三哥张志贤在后边暗想，把他送到县也是蹲牢坐狱，这种人留下来是个祸害，莫不如把他打死。当走到拐弯路时，滚地雷一转身，同前后拉开了距离，张志贤朝他开枪，打成重伤。到家时，他的十四弟又补一枪将滚地雷打死。

滚地雷被打死后，保里把其首级割下来，送到县里。县里验完首级后，南城张家把滚地雷人头取回，用丝线缝在尸体上，掩埋入土了事。

（吉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匪穴余生

王志超

我的原籍是辽宁省海城县王家石堡子，自幼随父母迁居吉林省通化南花甸子村。父亲王洪勤曾于民国年间充任过吉林的省议员，弃官后，回乡经商，与朋友合资经营“三盛记”商号。哥哥宗信，毕业于旧式师范学校，曾一度做过甲长、教员，以后，协同父亲经商。家里经济情况略有盈余，尚能维持生活。九·一八事变后，我和弟弟正在小学读书。那时，我什么都不懂，只听爸爸常说“鬼子要进村了”。我就东躲西藏的，很害怕。爸爸常告诉我们，胡子闹腾的挺凶，别往远处乱跑。因此，我每天总是提心吊胆，既怕鬼子来，又怕胡子绑票。爸爸和哥哥们每天都很警惕，并备有火枪，一旦有胡子来，发现就打。

就在1935年腊月（那年我12岁）的一天，全家刚吃过晚饭，躺在炕上要睡觉，只听院外狗一阵阵咬，冷不防，几个身穿便衣的人闯了进来，手持短枪，贼眉鼠眼，直奔父亲，逼着说：“快走！”就在这时，一个大高个、罗锅腰、左脸上长块黑痣的人，一把抓住了我背起来就往外跑。我吓得浑身直抖，心里扑登扑登地跳，心想，这黑灯瞎火地往哪里背呢？走出20多里地，才看清楚他们是9个人，都带的短枪，绑来我和父亲，还有其他两人，一共4个人票。在雪地里走到下半夜才住到了一个农民家里。他们说的话，什么“皮子串”、“操海”，我根本不明白。后来才知道狗咬叫“皮子串”，喝水叫“操海”。他们不准这家人外出，怕跑了风声。

白天他们隐蔽不动。夜里坐抢来的马爬犁，在雪地里飞奔。一连走了十几天，到了挠头（老穴），我们被带进了票房（秧子房）。这是一座阴森森的地窖，已有不少人票在里面，其中多数是青壮年，少数是老年人，小孩就我们3个人，总共是37个人票，押在这里做为人质。过了几天，知道了绑我们的胡子头叫“中山好”。这个人大秃头，说话结巴，腿瘸，山东人，50来岁，是匪帮的大柜，有生杀大权。这帮胡子有100多人，是些乌合之众，一盘散沙，说吵就吵，吹胡瞪眼。我逐渐了解到：所谓胡子，是些人面兽心的豺狼！他们成分非常复杂，大都是从河北、山东、河南、江浙等地过来的地痞流氓、无业游民、兵痞、逃兵等等，都是为了抢钱财，占山为王。有的带进枪支、弹药，有的加入股，按枪支的多少，人马的多少，将抢来的物资以及人票的赎金，按股分赃，并由四梁八柱统帅指挥全绺子。另外我又发现胡子之所以叫什么“飞呀”、什么“好呀”，如“中山好”、“草上飞”、“打天下”等等，不表真名实姓，就是为了掩盖他们为非作歹的罪恶。因为，如果胡子发了财，探边了（不干了），谁也不知道其真名实姓。这些胡子常年出没在长白山脉南部老爷岭一带，迂回在天桥沟、龙爪沟、挠头、长白的十几道沟，外窜到蚂蚁河南部集安、通化边界，老穴在挠头。挠头，这里是原始大森林，人烟绝迹，面积约有几百里长，参天古树，不见天日，峰峦叠嶂，怪石林立。有的地形好象个炮台垛口；有的谷深数里又像似口袋，真是鬼见着都发愁！胡子就利用这种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做为栖身隐蔽的场所。“中山好”匪帮和它的“秧子房”就设在挠头的深谷里，是在一个险峻的石砬子底下挖成的地窖，用树皮覆盖在上面，难以发现。岗哨在制高点，居高临下，易于了望。

“秧子房”里黑咕隆冬阴森森，潮气熏人，人票坐在地上仅铺一层薄薄的豆秸。每个秧子都被绑得紧紧地串联在一起，绳子吊在高处，便于匪徒看管。每天两顿饭，一顿4两窝窝头或是大饼

子，一块咸罗卜头，有时给点热菜，给一次开水喝。睡觉必须一颠一倒，不准说话，防止串供及其他密谋。每天早晨5点钟起来后放风（出外大小便），起来慢了，轻者脚踢，重者皮鞭抽。平时，一旦有了大、小便，也不让“放风”。他们说：“不是在你们家，那么随便。”所以有的人憋得捂着肚子直叫，大小便就在裤子里。冬天，裤子冻的崩崩硬，把屁股磨破了也得硬挺地坐着；夏天，屎、尿在裤子里，臊、臭难忍。伏天热得喘不过气来，渴得难受，也不给水，那种滋味抓心挠肝地难受！渴得没有办法，只好硬挤点尿，尿在衣服上，再拧出来，用舌头舔舔以解渴！匪徒们叫众人票白天一律靠墙根坐好，腰板还得挺直，不准打瞌睡。一旦有打瞌睡的被匪徒发现，轻者叫俩人面对面打嘴巴子；重者，匪徒用香火专门烧鼻子尖、烧手、烧脸、烧眼毛、烧乳房或者用皮鞭子抽。一次，一个姓袁的老头打了瞌睡，匪徒们疯狂地折腾他，先烧胡子，又用细马尾把两个大拇指勒上吊起来，勒得他蹦高直叫，豆粒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下来，眼泪刷刷的，还得挨揍。在那三九天，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窝窝头冻得象石子也得啃，不吃就挨饿。人票没有被子，睡在冰冷的地上，晚上冻得牙巴克得直响，几个人想往一起靠靠，匪徒就是一阵脚踢、鞭打。有的人票脚被冻肿直淌血水，手冻得象馒头。这样残酷虐待人票的目的，就是让你早赎或大价码赎。

这年冬天，就在挠头过的年。在除夕晚上匪徒们大吃二喝，然后在炕上闹腾起来，有的抽大烟，有的推牌九、看纸牌、玩六点（骰子）。他们用明柴、火油灯，把住的地方照得灯火通明。可是秧子们吃的是高粱米饭，炒罗卜条，吃完了都耷拉着脑袋。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看看父亲，父亲也看看我，心酸落泪，十分难过，心如刀搅。昔日过年，全家人在一起，欢天喜地，妈妈给包饺子，我和弟弟捉迷藏，可今天，我和爸爸在这深山老林落在这样的死人坑里，何时能到头呢？我不禁泪如雨下。最可悲的是我

竟成了小崽子的玩物，把我当成皮球似的踢过来，踢过去。这小崽子虽是大柜、二柜的随从，背着大烟枪、单挎、大烟土等等，专门侍候掌柜（在匪帮里他比别人小一辈，管同伙人叫叔叔），但这个丧尽天良的崽子对人票特别苛毒，说打就打，说骂就骂，30多人都被他给折腾遍了。特别是折腾父亲时，叫我陪绑。1936年2月的一天下午，秧子房掌柜把父亲提走进行审讯，问父亲家有几枝快枪，多少金镏子、大烟土，小洋钱在哪里放着？说不出来就打。先用三角带抽，又用香火烧胡须，烧完以后，再烧鼻子尖，把脸部烧成麻脸了。然后又坐“老虎凳”，让父亲坐到凳上，由俩人把木杠子压在两条腿上，使劲压，压得嚎嚎直叫，尿、屎都压出来了。结果爸爸胡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然后又叫我跪在带刺的木轮上，痛得我昏了过去。施刑后，大柜、二柜说：“向你们要一个老串（现小洋1万元），外加小项（小礼）、烟、酒、糖、茶等，叫花舌子给你家送信去了。”几天后，匪徒们说：“你们家知道了，人也太平。”一片谎言。

这时，“中山好”绺子带人票迂回在天桥沟、龙爪沟、蚂蚁河一带，胡作非为，强奸妇女，残害人民。他们活动时，若是走雪地，几百人也必须踩着一个脚印走，还专门踩着草丛走；如果是小溪，一定沿着溪边走，就是夜里行动也尽可能要走成一行的脚印，防止被发现行动的踪迹和去向。每次行动有口令，什么“胜利”、“友好”、“战胜”、“和平”等一类的词。中山好匪帮为了督促人票家快来上项（交款），把秧子带出来活动。凡是胡子所到之处，不仅百姓被糟踏得九死一生，自然环境也被践踏得满目疮痍。

3月，正是农民准备春耕时节。中山好、老太平、打天下、草上飞、九洲、魁字等几个绺子联合约500多人，沿鸭江南下攻打江甸子。这天拂晓，江甸子被围得水泄不通，匪徒们枪声四起，村内只能稀稀拉拉地抵抗，因无援兵，不到一个小时，村子被打开了。匪徒们边纵火边抢。当时，有的农民准备下地干活，有的还

在睡梦中，有的妇女的衣服半披半穿，披头散发，赤着脚，还有的妇女怀抱小孩，乱成了团。孩子哭，妈妈叫，跑着跑着就被枪打死了。两个多小时，村子被血洗一空，空气中散发出一股血腥味。绑来的人都拴成了串，抢的米、面、各种衣物、鞋子、枪支等装了5马车。随即匪徒们夺路北上，逃进了天桥沟，压在老林高山上，将绑来的人过筛子，最后留下23人，其余都在夜间带到山外把眼睛蒙上放到蚂蚁河一带。

4月19日，秧子房掌柜的“南五省”，小矮个，40多岁，黝黑的脸，小眼睛，镶的金牙，挺恶，他把父亲提走了，不一会又提我，来到天桥沟的南山坡木杷工棚里，花舌子（姓于）带着哥哥走了进来。我一见到哥哥眼泪夺眶而出，爸爸也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匪徒们不准我们对话。哥哥说：“家里实在拿不起，求亲戚，拜朋友，只凑现小洋2000元，带点小礼。”没等哥哥说完，匪徒们暴跳如雷，有的说：“枪毙这个小鳖犊子。”有的说：“先留他几天。”匪徒们收下钱和大烟土（约50两）、烟卷、茶、冰糖等，告诉花舌子把我哥哥带下山，回去再赶紧办，随后把我和父亲带回了挠头。

一天“南五省”把父亲提出去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回来，我一看，掉了一个耳朵，血水染红了上衣。父亲脸色煞白，身子晃晃悠悠地坐在地上，眼睛发直，当时把我心痛地昏过去了。后来，放声大哭，在地上打着滚。哭得人票们个个愤恨，人人流泪。过了几天，知道是崽子“双红”用剃头刀把父亲的耳朵割掉，连同鸡毛信捎回了家。那时我13岁，但胡子的滔天罪行，一生难忘。爸爸精神错乱，饭吃不下，骨瘦如柴，只有一口气支撑着身子。为了保住爸爸的命，我想让爸爸回家，爸爸也领会了。一天，我和爸爸见大柜和秧子房掌柜，我双腿跪地，苦苦哀求，先放回爸爸，只有爸爸回去才能办来钱。经几次哀求，匪徒们才把爸爸放了，并限定1个月必须将项上齐，办不到就去烧。在这种情况下，父亲

才得以逃生。从恒仁绑的票姓李，50多岁，因为家人长期没来，大拇指被剁掉了一个，由花舌子带信捎走的。后来李某被折腾死了。4月的一天，姓张的人票家里没来人，匪徒们急眼了，把张某吊起来“上大挂”，用三角带抽，抽得遍体鳞伤，屁股肿的象个鼓，不敢坐，硬逼着坐，不坐就打。第二天接着折磨，把他的衣服扒光，仰面朝天，手脚绑在板凳上，从鼻孔往肚子里灌辣椒水（也有灌汽油、火油的），十几分钟后肚子灌得鼓鼓的，再用木棒挤肚子，水顺屁股、小便处冒出来。几次折腾，人被灌死了，尸首压在倒木下。他家里不知道，来交钱，连尸首都找不到。胡了绑来的人有富有穷，但他们说：“错绑不能错放，都得拿钱。”拿不来钱，人就没了。我们3个小孩，那两人都是15岁，姓张的白天瞌睡，匪徒们叫我们对面打嘴巴子，怎么忍心打？不打，他们就打我。后来病死一人，走到长岗一带放了一个，剩我自己。那时，我身背小绳，给匪徒干点什么的。一次，小崽子叫我给拿个“撇拉”，我以为是吃的菜撇拉，拿来了，却被他连骂带踢挨顿揍！后来才明白，“撇拉”是胡子的黑话，指的是饭碗。

5月，青纱帐起，匪帮窜到通化边界，捐村镇、打大院，把秧子带到天桥沟、龙爪沟、长白的十几道沟，压在高山密林里。那年冬天不见太阳，不洗脸，不脱衣，屎、尿都在裤子里，浑身生臭，身上绑的小绳把膀子都勒烂了。小绳也被血水泡烂了。那头发擀成毡，虱子滚成球，夏天被太阳一晒，走路时虱子从身上直掉。在深山老林里，一到晚上小咬成群成团，咬得脸上大泡一排一排的，草爬子叮进肉里，皮肤肿烂以后，钻心痒痛，流血流脓。若是夜里走路，罪更难熬，吃不饱，睡不足，行动打晃，一不小心跌倒了，挨顿脚踢，爬起来，用绳拖着走，拽的半死不拉活，死了扔在倒木底下。匪徒们用尽惨绝人寰的毒辣手段折磨人的肉体，真令人深恶痛绝。在这里，我亲眼看到胡子到处抢劫，灭绝人性地残害人民。那时，民间有一段小唱：“只曾想当胡子占山为王，

抢钱财绑人票发财还乡。没曾想做坏事丧尽天良，到头来落法网尸骨成浆。”

9月，中山好、打天下、九洲等匪帮联合向通化一带的热闹街、头道崴、二亩地村镇要大捐，约300多人压在二亩地沟里，派花舌子送信，接头地点在二亩地。第二天，几村的村长代表等五六人在指定地点，接受大捐的内容：长短枪50枝，弹药5000发，军衣100套，大烟土200两，大米5000斤，白面200袋，鞋、帽等，现款1万元外加小项（小礼），3天内交齐。因枪支、军衣不足，匪帮火速奔天桥龙爪沟，沿途践踏百姓，强奸、拐带妇女，如有不从当场枪毙。每到一处翻箱倒柜，鸡犬不留。

十月初二土匪返回挠头，有的躺在炕上抽大烟，有的推牌九，晚5点来钟开饭。正当饭菜端上了桌，只听外边“叭叭”两声枪响，匪徒们说：“不好了！来跳子了！”（跳子指的是军队）秧子房掌柜南五省喊道：“长胜军赶快往外提秧子！一个人牵一个秧子（人票），奔北沟！进老林子。”屋里乱成了团，这时对方的枪声激烈，炮头占东北说：“五洲带弟兄捌住（捌是死打）！我向北面迂回。”匪徒要逃是很困难，从民宅到老林子要经过一大段开阔地，这里虽有横倒竖卧的烂倒木和被火烧过的黑树橛子，可以利用顽抗，但是他们的枪支破旧，弹药不足，没有战斗力。对方的机枪声炮声步步紧逼，象炒豆似的，秧子被逼得紧跑，顺着倒木和借树橛子作掩护，跑几步躲一躲，一些匪徒和秧子被打死了，女匪（白龙）被打死了。秧子有中弹的不能走的，被枪毙了。相持两个来小时，土匪抵抗不了，往老林里撤。

这时天色渐渐黑下来，人也都打散花了，我趁机拱进烂倒木的窟窿里趴下来。等匪徒跑的没动静了，军队进了大西岔村子，狗越咬越远，我悄悄爬出来。这时我又冷又饿又害怕，全身无力，坐了一会儿，便气喘吁吁地下山，走几步，蹲一蹲。到了山底下有几户人家，我前去叫门，主人让我进去，看我挺可怜的，让我上

炕暖和暖和。这时，外面又有人叫门，开门一看，也是一个人票，一瘸一瘸的，他说："我的腿中弹打伤了，滚到沟底下跑出来的。"大叔大婶叫他上炕，弄了点饭吃。他说是通化南英格布的人，姓张，21岁，被绑来1年多了，说着哭了。第二天，主人告诉我奔花甸子的路，经过蚂蚁河、大荒沟，走了两天终于找到了家。全家一见到我，都愣了，呆了，说不出话了！后来那个高兴劲儿，乐得都合不拢嘴。爸爸乐得叫我小名说："宝财，你怎么回来的？"我把经过一说，一头扎到妈妈的怀里放声大哭！妈妈抚着我说："感谢老天爷！人可盼回来了。"

这就是我童年时期，1935的腊月至1936年10月，被"中山好"匪帮绑去后的一段亲身遭遇。

（吉林省浑江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土匪生活目睹记

崔右任

土匪俗称胡子（或红胡子），也叫强盗，也有叫要钱的，古时叫响马，或叫绿林劫帮，日本人把土匪叫马贼。

大帮胡子称为大绺子，多是马队，几十人至几百人，多的上千人；小绺子有几人或十几人。他们凭着手中的武器，打家劫舍抢夺民间财物，有的偷袭，有的明火执仗。他们除抢夺黎民百姓的财物车马以及牲畜外，还绑架财主家的人做为人质，叫家人拿钱来赎，否则就摧残折磨这个人质。他们把这个人质叫“票儿”，或叫作“秧子”。人们将土匪抢人这一活动叫“绑票儿”。被绑去的多半是财主家当硬的人，或是他家中心爱的儿孙等人，限定时期交齐财物赎人，如不按时拿来财物，就给“票儿”上刑，这叫做“叫秧子”。在胡子中流传这样一句口头禅：“秧子好比摇钱树，不打它就不掉金儿。”胡子“叫秧子”的酷刑很快就被一些“活人儿”或“花舌子”有意地传到“秧子”的家中，家人听说心疼万分，有的很快拿钱去赎。如果不赎或迟赎，胡子的“秧子房”就把“秧子”的耳朵割掉送到他家。有时还可以把“秧子”转卖给另外的绺子。这些“活人儿”或“花舌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通匪者，他们能说会道，两头装好人，吃里扒外，所以两头谁也不愿意得罪他们，他们从两头得到好处。

让我谈谈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吧。

那是民国21年（1932年），我还不满15周岁。阴历二月初八，

一场罕见的大雪刚刚过后，我已准备好上农安中学念书的行装，打算第二天天亮坐大车启程。这时，忽然响起几下枪声，我父亲拿起一枝套筒子步枪和一枝匣枪惊慌地跨出了屋门，继而就听到院中响起了枪声和呼喊声。我和母亲都惊呆了，预感到天大的祸事即将发生，赶紧躲到东里屋我嫂嫂的炕上。屋内除我们外，还有我嫂嫂的母亲宋大娘，她是从县城来串门的，准备天一亮坐送我们哥几个上学去的大车回家。这老太太信奉耶稣教，跪在炕上祈祷着什么“主啊，主啊”和“阿门，阿门”的。时间不大，一个大麻子脸高个头的胡子一手端着油灯，一手举着手枪闯进屋来。他一把把我从炕上抓起来，叫我端着灯，腾出手来翻这翻那找东西，同时向腋下夹了几件我嫂嫂的毛衣毛裤什么的。这时，我宋大娘说：“这毛裤埋汰了。”用手往回拽，那胡子也不说话，一大巴掌打在我宋大娘的脸上。之后问我有没有“盖子”，我说有，就领他到东厢房去取锅盖。一进屋正好看见一个马鞍子，他也不管我给他的锅盖，便背起“盖子”（马鞍子）领着我向大门外走去。一出门他看见我爷爷从东边走来便不管我了，把我爷爷绑上之后带到了屯子西头的“秧子房”（集中关押人质的地方）。

原来这伙胡子是由“为民”、“老天合”、“八方好”3个绺子临时凑到一起的，共约300人的马队。到我家的那个大麻子叫老天合。他早就认识我爷爷。后来才知道，老天合前一天由本屯一个内奸崔某领着在屯子内外各处走了一遍，“插了千儿”（摸了底），已做好安排，谁从哪进，谁占哪院，绑谁家的“票儿”，“秧子房”设在哪个院等等。无怪他们能这样顺利地一举攻破了这个“大响窑”（有枪的大屯子）。在老天合进入我家的同时，八方好则去了屯西头我二爷家，我二爷从后树林子逃出去了。

我被老天合放开后溜到一个小户人家，给那家临时当了个傻儿子，整整一天不敢出屋。

这一天这帮亡命徒在各家杀猪宰羊，翻箱倒柜，把抢来的东

西共装了满满的8大车，光我一家就装了两大车。整个院子洒满了厚厚的一层粮食，一些牲口都在院子低头吃粮食。几口锅不停地做饭，做了一顿又一顿，吃了一伙又一伙。

我母亲听说我爷爷被胡子绑去，秧子房设在屯西头的我八爷家，她悄悄地溜出去看了一下。被绑去的人除我爷爷外，还有崔国兴、崔国义、崔右学、孟宪章（我大姑父）、吴克成和潘大围子等7人。他们都盘着腿端端正正地坐在炕上，每人背上都钉有一块一尺见方的白布。这白布有两个用处：一是万一票儿跑掉，在夜间看得清楚好抓回来；二是防止票儿被兵或响窑的枪打着伤财。当我母亲去的时候，秧子房当家的报字"说理"的，正在用二龙出须的马鞭子打我爷爷裸露的胸背部，要金镏子，要大洋，要大烟土，要全鞍马。我爷爷说："这些已经叫他们拿去了。"可是他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个劲儿地打。我爷爷被打急了，便豁出去了，破口大骂。我母亲边拭着眼泪，边向牟老爷的家走去。

这时已夕阳西下，天渐渐地黑下来了。牟老爷是我屯中一位能说会道很有威望的长者，我母亲对他说："老叔哇，您看见右任（笔者）了没有？您能否跟胡子说说叫右任把他爷爷换回来。我爹年纪大了，又被打成那个样子……"牟老爷的眼睛立即就湿润了，嗓子也哽咽了，他竖了一下大拇指，一句话也没说，打个咳声就走了。他来到我在的那家，对我说明我母亲的打算，我也一句话没说，下地就跟牟老爷到秧子房换我爷爷去了。胡子把我绑上，在我背后也缝上一尺见方的白布之后就叫我爷爷走了。临出门的时候，那个秧子房当家的叫说理的说："老头！快点准备大项（赎款）和小项（送礼），不然等着见孙子的'耳级'（耳朵）吧！""我宁肯倾家荡产也不牺牲我孙子一个耳朵啊！"我爷爷的声音有些呜咽了。

这时，外面传来了"挑"（出发）的一声号令，接着院内屋内都乱套了，"一棚，二棚……"（一排，二排……）的喊声、人吵

声，马嘶声响成了一团，其中我听见有人喊："秧子的连子在东边！"我最喜爱骑马，首先跑到东边的槽上抢了一匹又高又大的备鞍子的儿马子，用胡子的黑话来说，就是一匹带"盖子"的"骚连子"。我腿短够不着马蹬，又被一根绳子拴在鞍鞒子上，没有整理和说话的工夫，随着一声"滑"（走）的口令，我们便蜂拥地挤出大门，向屯子东头驰去。到了我的家门口，天已经完全黑了，不知为什么都停了下来。这时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边哭边喊我，她是我的右权妹妹，举着一条大人穿的破棉裤对我说："娘怕你冷，叫你把它套在外面穿着。"有一个好心的胡子帮我套上了这条又大又厚又硬的棉裤，紧接着就拼命地向围子的东大门外飞奔而去。就在这时候，后边的追兵来了，枪弹从头上飞过，幸亏我骑马的技术高超，无论啥样的烈马，一旦被我骑上，只要马不跌倒，我是不会掉下来的。忽听"妈呀"一声，说理"粘管了"（打伤了），飞弹打在他的右外踝上。我们几个票儿心里十分高兴，大伙小声议论："他是打那个老爷子打伤天啦。"

那时的兵不是真打胡子，彼此通气儿，这是追兵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的原因。表面上是他们放枪把胡子撵跑的，胡子也故意扔下几匹老马或几件衣物，兵捡回去就算是他们的战利品了，以此向上级请功领赏。

我又困又冷又饿，在马背上一阵阵地打瞌睡。忽听"扑通"一声，孟宪章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也从梦中惊醒了。他被马拖得直叫，马站下了，他趴在地上怎么也不起来。胡子用枪托子打他一下他就妈呀一声。"用脚踢他的'血核头'（脑袋）！"一个胡子叫着。"他八成是'睡了'（死了）。"另一个胡子用脚踢了他的脑袋一下他仍没动弹之后说。"是他妈的装睡（装死），准是犯大烟瘾了，'扣他'（枪毙他）算了。"又一个胡子说着，同时把大栓一拉推上了顶门子儿。这个声音可真灵，孟宪章听到猛地从地上站起来，上马又跟着跑了起来。

第二天的早晨，我们到了一个叫做“二楼”的“不响的卡拉”（无枪没有抵抗力的屯子）休息了。我们7个票儿一个挨一个盘腿坐在半铺火炕上，剩下那半铺炕躺着那个受伤的说理。炕热，屁股下坐的是湿谷子，裤子凉再加上骑马铲破了屁股，所以裤裆里湿辘辘的难受。

说理这家伙可真恶，长着一副凶相，铁青阴沉的脸上满是络腮胡须，年龄不过30岁，眼大无神，象双死羊眼，看谁至少也得三五秒钟目不转睛。他躺在炕上挨着我们，手中拿着马鞭子，死死地盯着我们几个人，谁一打盹，他猛地就向谁脸上抽一鞭子，说：“好哇！你们都‘条乱了’（困了），‘抻了条’（睡了觉）想逃跑哇，没门儿！”

中午，我们继续赶路。雪化了，道路泥泞，道边仍有未化的残雪。我骑在马背上看着这么一大队胡子，穿红挂绿，有一个胡子竟穿着我祖父的衣裳，口中哼着一些下流的歌曲和一些不伦不类的小调。

下午，到了一个破烂不堪的瓦房子，几个胡子在做饭，一些胡子争着抢东西吃。我的肚子早已饿了，不知是谁用一个破瓦盆子端来了半盆猪食一样的小鱼，小鱼煮得一塌糊涂，看不出是个鱼的样子，用手抓烫手。我悄悄地从炕上站起来，试折一下用秫秸做的房椽，可惜那个朽房盖太陈旧了，用手一捏就成碎末，连一根秫秸的硬皮儿也没弄着。经我这一动，还纷纷地落下不少的灰尘来。这顿“饭”谁也没有吃成就又“挑”了。

什么时间“挑”，往什么方向“挑”，这都掌握在一个叫做“搬垛先生”的手中，他是胡子中的军师，能掐会算，会推八门，就是指乾坎艮震巽离坤兑8个方向。向×个方向“挑”吉利是生门；向×个方向“挑”不吉利是死门。哪个时辰“挑”吉利，哪个时辰“挑”不吉利，这个先生说一不二。他报字“太公”，有的胡子干脆称他为师爷。他在胡子中除了大当家的（也叫“大柜”

的）“为民”、二当家的（也叫“二下手”或“二柜”的）“天偿”外，就是第三号人物了。第四号是“大饷员”，顾名思义，他是管大饷的，是分赃的会计，他叫“打东洋”。第五号人物就是前面提过的叫“说理”的那个“秧子房”当家的。第六号是“水香”，管“了水”的，“水”指敌人（兵），“香”指烧香的时间，由“水香”负责分配站岗放哨，他报字“压五营”。第七号人物是“炮头”，报字“打得狠”，是前打后别的“管亮者”（神枪手）。第八号人物“总催”，是管督促检查的，报字“交得宽”。

据说，有些“要清钱”的绺子里的规矩很严，在对鳏寡孤独、婚丧嫁娶、残废人、老人、病人、给病人抓药的人等，不抢不夺，统称为“七不抢八不夺”，不许无故杀人放火，不许“压裂子”（奸淫妇女），抢来的财物归“公”等等。我呆的这个绺子，我看不是“要清钱”的，也不是“要混钱”的，可以说是不清不混介于二者之间吧，因为最后这3条纪律还是严格遵守的。这些都是由总催监督检查的。以上提到的这八号人物就是绑我这个绺子的“四梁八柱”。此外，还有“马号”（管马的），“联络员”（通讯的），“小崽子”（也叫马拉子）等。

一天，这个大绺子到了安广县境内的一个破烂大屯子住下了。我们的秧子房设在屯子中央的一个破大院内的东外屋，东里屋住的是大柜和二柜。这天来了一个“串局的”（从另外的绺子来的胡子），他进院后直奔东里屋，也不说话，有几个小胡子跟着他。进屋后他点着3根香插在小佛前的米碗上（大柜、二柜一般都在东屋或东里屋，在正北供上他随身带的小佛），然后面向大家，两手抱在一起，在胸前向右一滑动，有些象斜着作个揖，眼睛扫视一下在屋的人，同时口中说声“泰和”（平安），继之又说：“西北乾天一块云，乌鸦落在凤凰群，不知谁是君来谁是臣？”这时大当家的或“二下手”便走过来自我介绍一番，互致问候，彼此寒暄之后，关起门来再谈来访目的。据说这是久走江湖“要钱人”的内

行话。是一家人了，才敬如上宾。

同一天我还看见来了两个要当胡子的小伙。他俩站在约 20 米远的地方，头上各顶一个水碗。叫“天偿”的“二下手”举起手枪，叭叭两枪，两个水碗都被打得粉碎，在场的人都赞不绝口夸他的“管亮”（枪法好）。这两人就算考试合格录取了。被录取后无枪无马，跟着绺子“吃溜达”。绺子里有些吃溜达的，步行或坐在大车上，狐假虎威，每到一处便气势汹汹，不分好坏一齐“划拉”。其中还有几个用木制的假手枪外边包块红布来吓唬人、抢东西，一旦有机会弄到一枝真枪，那时他就可以从大饷员那里分到一份赃款了。

自从抢了我们屯子以后，再未攻打或偷袭过任何一个“响窑”，停停走走一直向正北方向流窜。

有一天上午，绺子经过乾安县的龙泉镇，走到镇南侧约 100 米的大道上，龙泉镇内向我们开了枪，子弹擦耳边而过，发出短而急的“吱吱”声音，有些象雀叫，而不是悠悠的长音。这时炮头打得狠高喊：“借道走走！”接连高喊几遍，对方仍然开枪，他一面下命令：“拉开一马的档！”（马与马之间的距离要空出一匹马的空隙），一面跑出队伍奔龙泉镇，距镇约 50 米处站下来继续喊话。突然一颗子弹正打中他的帽疙瘩（他戴的是帽头式的四喜帽子）。这时他马上转回马头跑进队伍，口中不住地骂道：“早晚一定踢开这个卡拉（攻击此响窑），叫他鸡犬不留！”大队便飞驰而过，直奔洮儿河而去。

天气一天天的暖和起来了，到处可以见到刚刚冒出地皮的小草。我们在洮儿河南岸的一个屯子（屯名忘记了）住了下来，一呆就是 3 天。我算了一下，已经被绑离家一个月零几天了。此间从未洗过手脸，两只小手真象是一双老鸹爪子。这天，大当家的“为民”笑嘻嘻的来了，他穿一身将校呢的军服，长得很魁梧，很象个大官儿，几个小胡子见他进屋，都站了起来，让他“台上拐

着”（炕上坐）。他没说上几句话就连连夸我什么孝顺啦，聪明啦，鼻梁高有福啦等等，最后叫我认他作干佬儿。在屋子里的一些小胡子和几个票儿都急忙地逼我说：“还不快下地磕头，你这孩子真傻！”我既不磕头也不表态，作出十分腼腆的样子。为民还是很和气地对我和全屋的人说：“我家也是个大粮户，为了逃避一场人命官司，不得不拿出自己家的枪和马，拉出来走上了这条绝路哇！”他命令一个小胡子给我打一盆水，叫我洗了脸，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了。之后他又对我说：“你分给我了。”原来，为民、老天合、八方好3个绺子的大当家的，在这里分赃了，分完了车马财物之后，又来分我们这些票儿了。我的价格是银洋1万元，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的赎价。

从此他们3股土匪便分道扬镳，各行其道了。我被一个叫“合财”和一个叫“西来顺”的两个小胡子看管着离开了大队人马，步行到各处，如小集镇啦，打鱼的网房子啦，活人儿和土匪的家啦等地，走到哪住到哪。这时我已被松了绑，活动也比较自由了，精神也活泼了一些。天气暖和了，我把棉衣的棉花掏出来当夹衣穿。

从人们谈话中，我才知道这些胡子都被招安了。为民任了个东北军第八支队炮兵团的一个上尉连长，他的真名就叫徐为民。据说在投降的条件上还与官方议定了我们这些票儿仍必须拿钱来赎，因成为正式军人后，再绑着个票儿带着一块走，实在太不雅观了。因而，在条件中规定，可以由两个穿便衣的人带着票儿，与队伍保持密切联系，直至赎出为止。

我们3个人自从离开队伍，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住在乾安县叫作烧锅熬的小集镇子的西头一家小杂货铺里。在那个天下大乱的年代里，这个小镇子无人管理，带我的这两个小胡子就成了此地说一不二的太上皇了。他们与常在这里出入的一些既是官兵又是胡子的人胡作非为、任意勒索老百姓，今天要吃“漂洋子”（饺

子）或“翻张子”（油饼），明天又要吃“翘脚子”（小鸡）或“江错儿”（猪肉），后天又要吃“挑龙”（面条），如果有一天给吃了粗粮，这些人张口就骂，举手就打。他们常说：打粳米骂白面，不打不骂“星星散”（小米饭）。

一天，突然把我扒光了上衣，用绳子绑起，背上横绑一条大扁担，两个上肢伸直被绳子固定在扁担上，整个身子象个十字架。绑定之后领我从街西头的住处一直走到街东头一个小土地庙的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有五六个人手中端着上刺刀的步枪站在我的周围，好象要枪毙我一样。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不知为什么忽然对我杀气腾腾，十分害怕。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他们都在交头接耳地互相打听这是在做什么。一个持枪的胡子故意大声告诉大家：“这个小秧子被我们绑起来两个多月，家中不来人，不上项（送钱），他在这里吃的又白又胖，比在家都享福，我们是在叫秧子啊。”原来不知从哪里传来一股谣言说小秧子家来人了，偷偷地看见孩子在这里不遭罪，所以暂时不打算赎了。他们估计我家人现在还没有走，才突然拉我出来游街示众叫秧子。家人能看见更好，既或看不见，左传右传渐渐地也能传到我家，这样就能很快拿钱赎我，小胡子也就可以从中分红了。

他们当中一个人手持二龙出须的马鞭子，左右开弓在我前胸后背狠狠地抽打起来，大约打了 80 多条鞭花，皮肤马上条条隆起，各个鞭花处都破裂冒出血水来。打完之后又把我带回原处，一进屋就把我按倒在地，用刚扒出来的小灰撒在我的伤处，再用脚蹬在我身上，使我在地上来回滚动，叫鞭伤处都滚上了一些小灰，据说这样就不会毒火攻心了。我被糟蹋得不象样子，放声大哭起来。

第二天，还是这几个“胡子兵”（因为他们既是胡子又是兵），进房来也不说话，就把我左耳朵用两枝筷子夹上了，筷子的上下端用细麻绳勒紧。我知道这是要割我耳朵了，我哭着要求松点绑筷子，那人说：“越紧越好，夹松了割不齐更疼。”正在这时，进

屋一位老者，看样子有50多岁，挺精神，几个胡子兵看见他，都站起或转过身来说声“泰和”，向他致意。他一进屋就大声喊：“不许割耳朵！快给我松开！”接着他又说：“孩子上他姥姥家两个月不回来他娘还惦念呢，何况叫你们给绑来！听说这孩子是听他娘的话换他爷爷来的。我问你们，谁家的媳妇能舍得让自己的老儿子换回一个年迈的老公公呢？这样一个孝顺的孩子，你们知道将来能出息一个啥样的人。你们破坏人家的五官，我绝不让你们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说来也怪，这些人谁也不敢吱声，乖乖地把我耳朵松开了。他刚刚出屋，那个叫“西来顺”的胡子小声骂道：“这个老东西！早不来，晚不来，他妈的偏偏在这个时候来，算干啥吃的！”可怜我的耳朵一直疼了好几天。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者家住离此处不太远的一个屯子，是大当家的为民的父亲。他听赶集的人回去说在烧锅熬镇看见了为民的部下在叫秧子，又听说他儿子降了军队，才从家骑马特意来这里打听一下。他是个吃斋念佛的人，看来我的这只耳朵，也应当算是老佛爷给保佑下来的了。

又过了两天，那个被称做师爷的搬舵先生来了。他姓张名叫太公，降了个少尉副官。在胡子当中，谁也不说真名实姓，投降以后才一个个地露了出来。平素，两个胡子谈话时，有时就“盘起蔓子来”（问起姓什么），如对方姓张，他就说是“跟头蔓子”，姓王叫“虎头蔓子”，姓于叫“顶水蔓子”，姓陈叫“干金蔓子”，姓刘叫“顺水蔓子”，姓孙叫“龙子龙蔓子”等等。两个人盘来盘去有时竟盘出个“曲曲”（亲戚）来，这样，两个人由“不碰”（不认识）到成为“曲曲”，在绺子中就格外亲切，从此互相间都有了个照应。这位师爷进屋后，笑嘻嘻地交给我他事先写好了的一封信，叫我照原样抄下来向家“飘海叶子”（去信）。我用毛笔抄下了他给我家写的“海叶子”，照样签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交给了他。直至今天我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崔父大人：

膝下敬禀者，万福重安。孙自被绑以来，家中无人来看，舍孙于九泉之外，无人可怜，每日三次拷打，痛苦难堪，周身俱破，坐卧不安，有心寻死，匪把我看。现在为民路子已“落点”（驻在）乾安，欲知详情，请与去人细谈。送信人雇妥，银洋二十元。见信持款速来。否则孙命难以保全。

孙

崔右任叩首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三日

大约过了二十几天，那个送信人回来说：“家里看见小票儿的信都痛哭流涕，家人都说虽然是孩子的笔体，但不是孩子写的内容，准是照抄的。”这个送信人还对胡子说：“他家中可难了，连给这20元也是东借西凑的。前些日子家中为抽这小票儿，准备了1500元埋在粪堆里，又被人盗去了。直到现在因无车马还没有送粪，现在已接近芒种，我看今年的地有撂荒的可能。卖房子卖地没人买，我看见全部都挑袍（盖衣服）睡觉。他们急的团团转。”我回家后知道他们的这番话全是真实情况，这也是我母亲在这人跟前说了不少好话，还从中打了不少“进步”的结果。

这一个月来，我由被叫秧子、夹耳朵，到给家写信和听到送信人回来说的这番话，心中十分闷闷不乐。我想家了，特别是想我的娘了，不知不觉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了。

阴历五月初的一天，西来顺和合财两个人领着我离开了这个住了很久的烧锅熬镇，在天黑前赶到了为民家住下了。他家有个老太太，据说这老太太是徐为民的母亲。使我终生不能忘记的是，那个端午节的早晨，当我起床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这位老太太偷偷在我的手腕脚腕和脖子上都系上了五色线绳，并且在我洗脸的盆里还放上了艾蒿，在我吃早饭的时候，还给我煮了5个鸡蛋。

后来，八支队炮兵团和徐为民的这个连，都开防到农安县城，就这个机会托人把我三哥崔右纯也安插在这个军队里，在徐为民这个连队当了个上士文书。之后，又找些能说会道的头面人物，把徐为民连长请到南门外宋大娘（我嫂嫂的母亲）家中，殷勤款待，大摆筵席，又抽大烟，又送金镯子，最后只花了2000元现款才廉价地把我赎出。等这个军队又回到洮儿河附近，徐为民和我哥哥等人从西来顺和合财两名胡子手中把我领出来，我留在哥哥的身旁，骑着马跟着这个连队东走西走。最后，家中接到我哥哥的信，派我的孙表叔骑着小毛驴，到我们在洮南县城内驻防的地方把我领回。我回到家中的那一天是阴历七月十八日，算起来我在土匪中间整整流浪了160天。

（吉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我两次被绑票的经历

刘庆祥

民国年间我家就住在伊通县城的西门外，以开菜园子为业。家里人口多，住个大院，很引人注目。在30年代初，我曾两次被胡匪绑走，在他们绺子里几经磨难才算脱离虎口。这虽然是50多年前的事了，但回忆起来还是胆战心惊，留有余悸。现在我就将我被绑票的遭遇记述于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县城驻军第三十三团二营的五连、八连哗变了，他们到了靠山一带，同早就在这里活动的伊通有名胡匪“赵全胜”绺子同流合污了。不久，就传来了他们要攻打县城的消息，县政府和驻县城的第三十三团加强了防守。到了11月4日拂晓，北山皮的大股胡匪和哗变的士兵汇集在西门外，开始攻城，双方激战1个时辰，胡匪从西壕线上攻入县城。他们进城后围攻县政府，攻打三十三团团部，砸电报局，烧永衡当，抢掠商号店铺，使县城陷入空前的灾难之中。

这场灾难我家也未能幸免。5日上午，一股胡匪如狼似虎地闯入我家，为首的就是全胜绺子的“孙傻子”。他们将我们全家老小驱赶到一个屋里，用几名胡匪监视着，然后到各屋翻箱倒柜，大肆抢掠，在一个箱子里翻出一个匣枪壳子来。这下可惹出是非来了，他们连打带骂，非叫我们家交出匣枪来不可。我们靠种菜谋生，哪有钱买枪呢？原来在胡匪破县城之前，一些小门小户人家怕贵重的东西被胡匪抢去，都寄存在一些大户人家或响窑里，以

为这样能保险些。他们翻出有匣枪壳子的那个箱子，就是我家在德惠县当过保卫队长的亲属范清廉寄存的。我家人怎么讲他们也不相信，如果交不出枪，就要把我和我的小侄海生带走。那时我才 13 岁，吓得两眼发直，浑身打颤。我的嫂嫂吓得面如死灰，紧紧抱着哭叫不止的小侄。孙傻子横眉立目大声喝斥，上前将我的小侄从嫂嫂的怀里夺去。我嫂嫂扑上前去，被胡匪一脚踢翻在地。全家老少哭天喊地，苦苦哀求，匪徒们全然不顾，无动于衷。我和 6 岁的小侄就这样陷入了魔掌。

胡匪把我们俩先带到刘家大院，后来又被押到天兴源的饭房里。饭房的炕上早已坐满了被绑来的“票儿”，他们是天兴源掌柜的赵老贵，西门外王家油坊当家的王瘸子，西门外祝大眼珠子，煎饼铺的郭山东子，还有西门外的徐关门。徐关门是个地主，每年能吃三四百石粮，他怕胡匪抢劫和绑票，无论白天黑夜，大门总是关着，所以人们叫他“徐关门”。

我们这些票儿由孙傻子和两个拿着棒子的匪徒看着。拿棒子的比拿枪的更厉害，叫我们坐在炕上不停地晃动，谁要稍一停顿，就劈头盖脸一顿毒打。下午，来了一个胡匪，有 50 多岁，对大家说：“天冷了，你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出去，赶快换一换衣服。”孙傻子瞪了他一眼骂道：“看这样你当不了胡子，不如出家当和尚得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人就是全胜绺子秧房掌柜的“老头好”，叫张焕臣（张勤），我们这些“秧子”都得归他管。听老头好这么一说，大家就下地换衣服。地下堆的衣服同炕沿一般高，都是胡匪抢来的，他们将好的拿走，不值钱的就扔在这里。大家七手八脚地换上了几件衣服。我只拿了 3 个狗皮套袖，准备冷时套在手上。

天黑时老头好对大家说，凡是一家有两个绑票的留下一个，放走一个，留大不留小。他们将我小侄放了。临走时老头好找来一个老百姓，叫他背着我小侄送到家，还给拿一筒有五六斤重的铁盒糖。我小侄被送走后我心里轻松多了，剩下我一个人死活就跟

他们滚了。

老头好见大家换好了衣服，天也黑下来，就喊了一声“挑”，我们3个人被绑成一串，共9串27人，在孙傻子和两名匪徒的监督下，走出了饭房。一出门大家惊呆了，院内的两个大草垛不知什么时候叫胡匪点着了，火势熊熊，烈焰腾腾，照亮了半边天。只听孙傻子一声吼叫，那两个拿着棒子的匪徒，左右开弓朝我们打来。我们被打得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走出烧锅的北大门。

我们从北门出去后往县城的西北方向走去，再往西走一段路程，又往南走去。到西大岭乱尸岗子时，孙傻子向那两个匪徒吼道：“你俩个眼睛瞎了，没看这些秧子要蹦么？”我们这些人都成串地绑着，两个匪徒又寸步不离，孙傻子拿着套筒枪押着后阵，能跑吗，敢跑吗？可孙傻子不相信，一边下马一边喝着：“滑住。”还没等大家站稳，他拉开枪拴，推上顶门子，冲着我们这一串就开一枪。这一枪如同晴天霹雳，把我的耳朵震的嗡嗡作响，眼冒金花，我心想这回算死在乱尸岗子了。可定睛一看，是我们这串的另一个票儿被打倒了，他哼了一声就死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只知道他家住在河北。孙傻子上前用刀挑开了线（松绑），对我们骂道：“狗杂种，看谁敢跑，就叫他去摸阎王鼻子！”我们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连一步都不敢错，在阴森森的黑夜里向前走去。

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行了多少路程，走到什么村落，我们被押到一间黑黝黝的屋子里。这时过来一个人，给我们抱来几抱豆秸，摊在地上，叫我们坐在上面。我们从5日上午被绑到现在滴水未饮，粒米未进，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多么想要饮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饭哪，可是无人敢表达出来。哐当一声门开了，还是刚才给我们抱豆秸的那个人，端来一瓢凉水让大家喝。我们一连喝了好几瓢，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过了漫长的黑夜，天亮时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屯叫七家半，这家人姓侯，给我们送水的那个人就是这家的主人。他是在破县城之前被绑的票儿，还缺500元

钱没有被抽出去。他也有着同我们一样的遭遇，不幸的命运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孙傻子走进屋来，用脚连踢带踹喊道："快起来'啃富'！"我愣了，不知是什么意思，小声问身旁的人，什么是"啃富"，他告诉我这是黑话，是吃饭。接着，果然有人给我们端来一盆小米饭，一盆猪下水汤。大家七手八脚地抢着碗筷，狼吞虎咽地填饱了肚子。孙傻子又下命令，叫我们到外边"登轮子"。我又茫然了，到大门口一看有两辆大车，才明白了这"登轮子"是让我们坐车。我们这26人再加上那好心肠的主人，还是9串27人，被押上大车向西赶路。

6日上午到了靠山镇。此时的靠山镇是胡匪的天下，从县城撤回来的各绺子和哗变的士兵都集聚在这里。胡匪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到处是人喊马嘶，闹得鸡犬不宁。我们被押到侯家店，有7间宽敞明亮的店房，胡匪出出进进，听说他们在这里要"拉片子"。我们这么多人挤在店房的一头，仍然由那两个匪徒监视着。这时从公主岭来了飞机，在空中盘旋，胡子炸营了，都躲藏起来。飞机走后，他们又冒出来，哗变的五连李连长走进了店房，仍然穿着灰军装，背着三八枪，挎着匣子。他坐在南炕沿上，操着一口山东腔对匪徒和士兵们骂街："俺说不出来，你们非拉出来。打了一次县城每人才分7钱金子，13钱银子，挣俩钱也比这个多。当一次胡子一辈子也扒不掉贼皮。"他骂了一通，众匪默默无言。这时我才知道"拉片子"就是分赃。

胡匪在侯家店放了8个票儿，他们是通过在靠山的亲友和胡匪通融才脱离虎口的。胡匪在靠山杀猪宰羊，又吃又喝，我们却受了两天的折磨。第二天傍晚，我们和胡匪都吃的是小米饭，他们的菜是猪肉炖粉条子，我们喝的是下水汤。刚放下筷子，院子里突然响了一阵排子枪，说是"洋跳子"（警察）从公主岭来到了太阳岭，胡子们要"硬挑"。我们剩下的19个人被押出了侯家店

往西沟走去。走了五六里，我们又登上了“轮子”。临天黑时，前边传下话来，叫在三道岗子“压”。大家都坐在车上默默无言，短叹长吁，对未来的命运忐忑不安。

9日晨我们到了三道岗子屯，被带到一座三合院。这座院很气派，正房5间，东西厢房各5间。我们被押到正房西屋的里间，挤在一铺炕上。孙傻子和那两个拿棒子的坐在南炕上看着我们。在外间的南炕上坐着一个老头，身披貉绒皮袄，双臂被反绑着，我心想这一定是个“大秧子”，比我们这“小秧子”有钱，要不怎么这样特殊呢？

两天后，鼓动五连哗变的侯班长来了。他除了原有的三八盖子枪又多了两把匣子，昔日军队的班长如今成了地地道道的胡匪了，匪号叫“海蛟子”。他进屋后瞧了我们一眼，就坐在外间的南炕沿上，对着那个老头说：“西恩厚，你把金银放在谁家了，快说出来。”通过他俩对话我才知道那个老头根本不是抓来的秧子，而是个匪首，“西恩厚”是他的匪号。海蛟子说他独吞了大饷，要他把赃物交出来。西恩厚对海蛟子起誓道：“我要吞大饷，对不起炮手，不得好死。”海蛟子见他盟誓，没再追问，就来到里间吩咐孙傻子道：“秧子没过筛子的得赶快过，天冷了，没油水叫他们滚蛋。”孙傻子说一两天就过完。海蛟子转身刚要走，西门外煎饼铺的郭山东子对他恳求着：“俺是煎饼铺的，西门外谁不认识，把俺放了吧。”海蛟子叫他下地了。郭山东子没等给他松绑，望一眼祝大眼珠子又对海蛟子说：“他家是出布床子的，布都给抢没了，用啥抽票子？”海蛟子也叫他下地了。原来这祝大眼珠子是郭山东子的房东，交往甚密，所以才给讲个情。郭山东子被松绑后，指着我对海蛟子说：“他是刘家园子的，你要大白菜拉两千斤吧。”海蛟子笑了笑说：“你们三都快滚蛋。”

我听了他这句话，心里象开了两扇天窗，非常高兴。我们刚要走，从大门外又来伙胡匪，闯进来问道：“他们要干啥？”海蛟

子说："他们都是穷光蛋，叫他们回去。"其中一个匪徒说："放了？1000不抽，500能不能抽？500不行，三二百还不能抽吗？"我一听凉了半截，这算没有出头之日了。那个匪徒看我们紧张的样子，就缓和地说："海蛟子叫放人能不放吗？我是跟你们闹着玩的，我们把你们放了还有小帮呢。你们走路要小心，遇见屯子口有人要绕道走，那是'了水的'。"我们记下了他的话，匆匆地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走了一个时辰，我有些跟不上，郭山东子就斥责我，我很不高兴。郭山东子解释道："你不知道，俺家北门灶子里藏有两支匣子，也不知翻出去没有，我很惦念。"一个开煎饼铺的家里藏着枪，我感到惊奇。后来我才知道，这郭山东子是个有钱人家，光吃租粮就100多石。我们一路上担惊受怕，过了大孤山的德云堂，一颗心才落了地。从大孤山直奔白家店，不敢走大路，怕有人拦路抢劫，走的是横垄地。白家店的老孙家是个响窑，见我们往屯里走，在场院就把枪支上了，看见有小孩才没开火。走到近前，祝大眼珠子才认出这是他的家。我们在老孙家住了一宿，受到热情招待。第二天，老孙家听说干沟子一带不安全，就派4个人，拿5枝枪，把我们送过干沟子的庙门口，遇见了带棚的拉脚车，他们才回去。我们坐着拉脚车就回家了。

这是我13岁时，第一次被绑票的经历。我没有想到，祸不单行，次年我再次遭到绑票的厄运，落入胡匪魔爪。在胡匪绺子里熬过了24个日日夜夜，才逃回县城。

1932年9月，伊通县城被土匪围攻，攻城的不光有南、北山皮的胡匪，还有从磐石过来的大刀会，人数多，声势大。胡匪一连围攻七八天也没有攻破。后来由于驻军团长周瑞武起了不良之心，下令撤军，胡匪才在9月15日（旧历八月十五日）攻进了县城。我怕被胡匪绑票，就从城西跑到东门的亲属老刘家。傍晚我在街上遇见了八连的邱连副，我们有亲属关系，论起来得管他叫

姐夫。他知道我上次被胡匪绑去，就劝我跟他走。我想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跟他往哪走啊，他见我很犹豫就说："这里不安全，你快到有驻军的大院躲避。"我听了他的话，就从东街向丁华甫、常老伯的大院跑去。我到那一看，过两个大院早就住满了兵，大门紧闭，我只好跑到附近的姥姥家。我姥家和赵老疙瘩住东西屋。我刚进屋，一伙胡子就闯了进来。他们先把赵老疙瘩弄到西院，随后又说我是"秧子"，要"粘"我。我想这一定是赵老疙瘩把我递出去了，这回算完了。胡匪把我带到道南老胡家，一进屋他们就到处翻东西，从柜里翻出不少套月饼来，每套由小到大有 10 多块。月饼做的很精致，上边有寿桃。他们吃了一气月饼，就把在税捐局任职的胡主任和我一同带到了西边的道德会。道德会挤满了逃难的买卖人，他们一进屋就喊："老山货在这儿呢。"随后他们在这里又抓了一些票儿。我们这些人被押到了天兴源的糊子房，几个胡匪将我们 30 多人都上了绑绳。其中有判家小铺少掌柜的，鞍鞒铺潘老景的儿子，西门外王家油坊的少老八，东门外的白大屁股，开锅房的张朋仁，还有出小床子姓朱的等人。

傍晚，胡匪把我们这些人绑成几串，带到了距城 8 里地的沈家屯，住在金大人家。金大人是前清的官员，住的是三合大院，正房和东西厢房都是砖瓦结构的 5 间大房，院套用石灰抹的墙。通过听胡匪交谈我才知道，他们是由"抗日军"、"访友军"、"三民军" 3 股组成的绺子。"抗日军"是由范大鼻子率领，有 30 多人。范大鼻子我认识，他是虫王庙的人，叫范云阁，早年就当过胡匪，被捕后要判刑，后来他托人通融，花了五六百元钱被放出来。这次他明明是当胡匪，可却报号"抗日军"，其实他一天也没抗日，真是挂羊头卖狗肉。"三民军"的头头刘华堂，是聂家屯的人，曾在西门外 14 校当过教员，还当过甲长。他手下有 30 多人，报号叫"三民军"。"访友军"的匪首报号叫"新来胜"，姓徐，是王太屯的大户，全家有 100 来号人，住 3 个大院。他这伙有四五十人。

这3伙合到一起共100多人。大当家的是新来胜，二当家的是范大鼻子。

夜间，胡匪把我们牵到了西下屋，开始鞭“秧子”了。鞭秧子，就是对绑去的秧子进行拷打，叫你说出家中的金银财宝或枪支弹药埋藏在什么地方，他们好去起。如果你确实没有东西或不知道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轻易放过，将你毒打一顿，甚至割掉你一只耳朵或剁掉一个手指，捎到你家，叫你家拿出一笔巨款，才能把你赎回去，不然他们是不放人的。

这时西下屋的胡匪早就作了准备。过梁上搭着一条绳子，凳子上放着马鞭子、马缰绳，旁边还准备一堆小灰。几个匪徒袒胸露怀，目射凶光，铁青的脸上还挂着一丝狞笑。他们把我们当中的一个做小买卖的叫到跟前，逼他说出家有什么贵重东西，藏在什么地方，这个做小买卖的哀求道：“老爷们行行好，我是做小买卖的，家里什么也没有。”一个匪徒吼道：“行好？你上庙里找和尚老道去，我们这是卖人肉的，得拿钱来买。”说着就上来两个人，用布把他的眼睛蒙上，扒掉上衣，用扁担把胳膊支起来，再用绳子把他吊到过梁上。两名匪徒站在过梁的两侧，用马鞭子疯狂地鞭挞起来。那一道道鞭痕，一滴滴鲜血，一声声惨叫，使人撕心裂肺，肝胆欲摧，目不忍睹。每当他惨叫时，匪徒就抓把小灰扬在他嘴里。惨叫声消失了，呼吸声没有了。当他缓过气来再叫时，从口腔和鼻腔里就喷出血水来。他们就是这样用这种最残忍、最凶暴、最野蛮的手段拷打着人票。这些丧失人性的土匪，简直就是衣冠禽兽。

我们这31个秧子，有27个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可他们没有捞到多大油水，只是税捐局胡主任说他家有600块现大洋埋藏在北坑洞子里，让他们去取。他这么一说就停止拷打。该轮到我了，我想胡主任说他家有大洋就不打了，我也照样描，不然，我还不被他们打死呀。我说：“当家的别打了，我家有地窖，

埋啥东西我不知道，天亮我领你们去起。”这一招真灵，我免受了皮肉之苦。其实我家哪有地窖。这是骗他们，躲过一时少一时。剩下还有3个，他们也照葫芦画瓢，有的说家有枪支的，有的说家有金银首饰的，也有说家有地窖的，都答应领他们去取。在这31人当中，就我们4个人没有挨打。

我们经受这一宿的折磨，又饿又渴又困，被拷打的人们痛苦不堪，呻吟不绝。从9月15日到17日上午我们一直关在西下屋，连饭味都没闻到过，可没有一个人敢提个“饿”字。我年龄小，经不起饿，肚子里咕咕作响，身上直打突突，眼睛发黑，实在忍不住了，我对监视我们的“东边好”说：“你们是要项（钱）啊，还是要我们核头（脑袋）？”东边好问为啥说这话。我说：“我们这些人都两天没‘啃富’了，你们这不是要核头吗？”东边好似乎是恍然大悟：“我还忘了，院里有很多鸡，你们找人宰，好啃富。”东边好让两个人到院子里抓了不少鸡鹅，宰后月大锅炖上了。肉炖烂了，香味扑鼻，还没等我们吃呢，胡匪们从县城回来了，把肉吃个精光。我们这些人空欢喜一场，连一口汤都没喝着。

17日晚，绺子里传来了命令要“挑”。大伙说两天没吃饭了，走不动，东边好说走吧，不太远。我们就3个人一串，忍着饥饿和伤痛，趔趔趄趄地在黑暗中往前走。果然走不多远，就到聂家屯，住在“三民军”匪首刘华堂家。东边好对我们说：“这回你们神气了，一会儿给你们吃翻张子（白面饼）。”看秧子人也换了，是前姜家屯的姓刘的，拿着大棒子看着我们。烙饼的那屋有两个胡匪守着锅，不让我们拿。看秧子的见我年龄小，就用马棒挑来一张饼叫我吃。这张饼有1斤多重，我狼吞虎咽地吞了下去，肚子刚垫个底。等到开饭时，白面饼被胡匪吃得净光，我们吃的是小米饭，连口汤都没有。刘华堂的父亲见没有菜，弄来一碗咸菜让大家分着吃。刘华堂很不高兴，把他父亲申斥了一顿。刘华堂出去后，东边好指着他的脊梁对我们说：“你们听着没有？这是有文

化的人，还骂他爹呢！”

我经过两次绑票，懂得了胡匪一些黑话，胆子也大了，所以大家有事就叫我同胡匪联系，谁要是“架梁”（小便）、“甩瓢子”（大便）就叫我和看秧子的说。到了晚上西院炮台上打了两枪。不一会儿那院过来人说：“有人跳墙跑了。”看秧子的一数人，就剩下30个了，缺少个姓裴的，他是县城做小买卖的。看秧子的骂了起来。我暗中好笑，谁叫你们不放人呢，跑了好。

18日，胡匪叫我们往胡家烧锅“挑”。我这串有王老八和一个姓王的小尕子。走在半路上来了飞机，看秧子的叫我们藏在柳林里。我一看机会到了，不跑等待何时。我忙着解绳扣，还有一个扣没有解开，东边好喊叫一声，那个小尕子应声而出，扣没能解开。飞机远去，我们又上路了。到了胡家烧锅。大家登上“轮子”，围绕大孤山、大甸子、大榆树、程家屯、下沟等地转来转去。这时抓来的“秧子”多了，分好几伙，六七个人看着。

到了9月初，我们被拉到大孤山南疙瘩屯。胡匪们要聚绺子去打西安（今辽源），范大鼻子、刘华堂的绺子都走了，只留下了新来胜的绺子。胡匪聚的绺子刚进奉壕过烽堆子，就遇到了各响窑有枪人家组织起来的秧子队，被打得卷回来，死伤七八十人。

我们这帮人住在疙瘩屯王老逛子家。这一天来了3个骑马的，我一看有王国财，他是我家的朋友，在医院学习西医，人称王先生。还有一位耿先生，另一位穿着灰军装，戴着大盖帽子，是个当兵的打扮，是耿先生的亲哥哥。他们是来说降的。我和王先生认识，就对东边好说：“掌柜的，我有特，接接叫！”这是两句黑话，“有特”是说我和他有亲属关系，“接接叫”是有话要说。王先生一听从炕沿上站了起来，我小声对他说：“我姓赵，请老哥哥帮忙叫我回去。”我不敢说真名实姓，怕他们知道底细不叫我回去。新来胜对王先生说：“既然你们认识，大柜不要钱，小柜给几个就行了。”小柜指的是秧子房。东边好见当家的说话了也没好意思阻

拦。新来胜又问我是哪天来的，我告诉他是八月节。新来胜说："今天是九月初八，一个来月了，我给你做主了，给小柜20块钱吧。"王先生承担过去说："他眼下没钱，下次我把钱带来。"我下了地，他们给我挑了线（解了绑绳）。

10月8日（旧历九月初九），吃完早饭，我和秧子们说："我要回去了，有什么事我可给捎个信。"这么一说大家写了10封信，都交给我。我所以要给他们捎信，是因为遇见胡匪我好说是"跑海叶子"的。跑海叶子就是给胡匪传递书信，他们不抓。就是真正跑邮差的，懂规矩的绺子也不抓。临走时新来胜从老王家柜里翻出一件带大襟女棉袄，叫我穿上。王先生把我送到东山，我道谢后，就象出笼的小鸟一样往家奔去。

走到西苇的黑瞎背，天下起雨来，我往屯子走，想要避避雨，被胡匪"了水"的发现了，把我带到一家的西屋。我想糟了，刚跳出龙潭，又要掉进虎口。这院住的是"小海蛟"绺子。小海蛟很年轻，有20多岁，炕上放一枝撸子。他问我是干啥的，我边掏信边回答他，是"飞海叶子"的。他拿起信仔细看看问我："挣多少钱？""能挣20元。"我一边晾晒着信件，一边回答他。这一招果然灵，他再也不盘问了。另一个匪徒道："你赶快走，还在这磨蹭什么？"

我刚想要走，北炕上站起一个老头来，操起烧火棍。我想坏了，一定要挨打。出乎我的意料，他用烧火棍在天棚上挑下一个棉麻蓑衣来，叫我穿上。我一试太长，他又用菜刀剁下一截。他是这家当家的，看我顶雨走路，就把蓑衣送给我。我穿上这蓑衣心里热乎乎的，眼睛也有些发潮。在胡匪绺子里滚了一个来月，现在才尝到了人间的温暖。

我离开黑瞎背，以小孤山为目标，冒着淅沥沥的秋雨，迎着萧瑟的秋风，在泥泞的道路上向前挣扎着。临吃晚饭时到了聂家屯，距离县城只有12里地了。我走到井台前去喝水，遇见一个挑

水的，他问我哪里来，看见他们绺子没有？我见他戴着白胳膊箍，就问他是哪个绺子，他说是“访友军”。我心想这聂家屯是“三民军”的老巢，他还打听“访友军”的去向，这家伙一定不是好东西。我说你问个正道，要问别的绺子不知道，你要问“访友军”、“三民军”、“抗日军”我最清楚。说到这我趴在水桶上一连喝了3次水，接着就胡扯起来：“别提他们了，一过奉壕就踩响了，那边的秧子队拉着大抬杆撵着打他们，叫人家打得屁滚尿流，死伤不少。县城的王先生和耿先生都被他们请去给治伤。”他听我这么一诌，挑起水桶就走了。

傍晚，天下雾，我转了向，好不容易找到县城。此时，南门还堵着，城里还在打冷枪。我跳进城壕，水到胯骨，上来以后到我姥姥家住一宿。第二天，我舅母找一双新鞋叫我换上。我临走时穿的是一双新鞋，没到一个月就穿飞了。我回到家，见到了久别的亲人，真想痛哭一场，叙叙这不幸的遭遇，但是我忍住了。家里人见我没病没灾，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王喜荣整理

（吉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群匪两祸伊通城

刘庆祥　李南浦　王中兴

一、一祸伊通城

九·一八事变前，伊通县的南山皮和北山皮就经常有胡匪出没。所说的南山皮是指伊通的南部和东南部的半山区，包括苇子沟、营城子、老地局子、板石庙等地。北山皮是伊通北部和西北部的半山区，包括马鞍山、靠山、莫里青山、景家台、五台子等地。这些地方的胡匪大绺子有七八十人，小股也有二三十人。尤其是北山皮的胡匪闹得更凶。他们有时啸聚山林，独霸一方，有时占据响窑，建立据点。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打响窑，砸孤丁，绑人票，无所不为。闹的这一带人心惶惶，民不聊生，鸡犬不宁。

1930 年 10 月，县城的驻军第三十三团二营协同县保卫总队第五队去莫里青围剿天恩绺子时，在王八盖子山、石棺山发生激战，该部第六连连长孟广顺、连副刘鸿柱同时阵亡。县公安局长刘汉卿虽督饬县保卫团总队长封绍先，率队到匪患严重的小孤山、靠山、赫尔苏等地多次去追剿，但无济于事。匪患有增无减，匪势日益猖獗。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县城驻军第五和第八连突然于 9 月 24 日哗变。这使伊通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五、八连过去曾多次去北山皮剿匪，部分官兵即与胡匪有了默契和勾结。官军还未进山，胡匪那边就有人通风报信，就挪

“窑子”了。五、八连对胡匪也很关照，凡是“采响”的地方不去。所以胡匪越来越猖獗，有名的绺子就有几十股，北山皮简直成了他们的天下。五、八连拉出去后，先后都被在北山皮活动多年的有名绺子赵全胜接去了。兵匪一家，同流合污，这就更助长了北山皮胡匪的嚣张气焰，声势越来越大，时刻威胁着县城的安全。

不久，北山皮的“赵全胜”、“靠山好”、“天恩”、“西恩厚”、“孙傻子”、“草上飞”等绺子要进攻县城。县长白鸿逵得知后，对县城的防务作了一番部署，命省警察队60多名警察防守正东、东南两门及东面的壕线；县公安局的100多名警察防守正北、正南、正西及西北、西南5门及南、北、西3面壕线；商团40人补充北面；民团120人补充南、西两面；自卫团补充各方面壕线。五、八连哗变后，县城兵力空虚，只有一个六连驻守，团长杨崇武将驻防在双阳县的第三营第十连调到伊通县城，布防在西门的南侧；又从驻营城子的七连调进两个排，由连长傅泽民率领，扼守在西北门一带，加强了对县城西侧的防守。此时，县城气氛紧张，城门关闭，店铺关板，街道冷落，行人匆匆。荷枪实弹的军警和商团、民团都进入了阵地，严阵以待。县城的居民都提心吊胆，苦度时光。

到了11月3日下午，西门外传来匪警，北山皮的胡匪和哗变的士兵逐渐向县城逼近。傍晚，西门外突然枪声骤起，人们以为胡匪开始攻城了，大惊失色。其实是县保卫团总队部下令叫驻守在外区镇的保卫团小队增援县城，守军以为是胡匪，开枪射击。经联系后，保卫团小队被接进县城。人们惊魂未定，德裕长店铺附近又有人纵火焚烧房屋。一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原来在前几天就有10多名胡匪，身着便衣，腰藏短枪，潜伏在同胡匪有交往的德裕长店铺里。他们听见枪声，以为胡匪开始攻城了，就举火为号，作为内应。人们扑灭了大火，而那些匪徒仍潜伏待机。

11月4日拂晓（旧历九月二十五日），北山皮的几十股胡匪和

哗变的士兵共七八百人，从西南、正西、西北三面开始攻城了。一时枪声大作，子弹呼啸，硝烟弥漫。三八枪、自来得、套筒枪、洋炮、抬杆子等枪炮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守城的军民同胡匪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激战不久，守卫在西门南侧壕线上的十连长在战斗中负伤，全连无人指挥，遂撤出阵地，往县城西南姜家屯方向撤去。

十连撤出阵地后，从西门到南壕线上的一段防务成了最薄弱的环节。民团、商团解体，只有部分警察在坚持战斗。胡匪见有隙可乘，就把这里作为突破口，进攻县城。他们冲过了西壕线，警察没有发现，还在城壕上向外射击，有两名阵亡，一名负伤。胡匪控制了这段阵地，之后陆续攻入县城。

守卫在西门和西北门的七连两个排和警察队，见侧翼阵地失守，有被胡匪包抄的危险，无法坚持战斗，就纷纷撤下来。七连长傅泽民带领一名马弁到炮楼上了望，见胡匪毫无阻挡地大摇大摆往县城走，非常气愤，把马弁的三八大盖拿过来，压上3粒子弹，连开3枪，打倒3名匪徒。他又向马弁要子弹准备继续射击时，马弁央求道："连长，兄弟们都撤到团部去了，这么多胡匪打不了，再不撤就走不了啦。"傅连长无奈下了炮楼回到团部。至此，西门完全失守，大股胡匪涌进了县城。

胡匪入城后，大部分去围攻县政府。县政府院内东侧是保卫团总队部，西侧是公安局，全院由保卫团总部抽调的120多名保卫队员守卫，公安局由军警和消防队四五十人保卫。凌晨4时许胡匪向公安局发动攻势，守卫的军警奋勇迎战，两挺手提式机枪和各种步枪一齐开火，胡匪也猛烈攻击。围攻县政府和保卫团总部的胡匪，遭到保卫队和消防队的迎头痛击，至8时许，只得撤退。

胡匪见攻不下县政府，就从各绺子"拔马"一大批胡匪，协同哗变的士兵去攻打三十三团的团部。他们攻打团部的主要原因

是想把二营长关德彬救出来。关营长因五、八连哗变被撤职查办，软禁在团部里。团部四周无围墙，只有六连和七连撤下的两个排守卫着，形势紧张。团长杨崇武让士兵将团部房屋墙壁掏成枪眼，严阵以待。胡匪从北面开始进攻，三十三团的装备好，清一色的三八盖子枪，不少老兵枪法准，匪徒难以接近。打了一个时辰，胡匪在老爷庙那里留下了3具尸体，才停止了攻击。如果胡匪再继续进攻，杨团长就要下令处决关营长，使胡匪和哗变士兵的阴谋不能得逞。胡匪没有攻下团部，占据了西烧锅天兴源，同三十三团对峙。

下午6时许，大股胡匪又复攻县政府，鏖战到晚10时，守卫的军警子弹告罄，县政府失守。县长白鸿逵在公安局长和保卫总队的保护下，携带着印信逃到了郑家大院避难。至此，伊通县城陷入胡匪手中。

胡匪攻入县政府后，开放监狱，有40多人犯逃窜。随之纵火焚烧县政府，一时烟云弥漫，烈火腾腾。县政府一部分房屋被烧毁，民国年间的行政、清乡、检察等档案和簿据及已经编纂完稿的伊通县志共4000多卷宗，均被付之一炬。

就在胡匪攻打县政府和三十三团部的同时，另一股胡匪拥到市街上大肆抢掠。他们首先闯进了伊通电报支局，割断了电话线，捣毁电话总机和话匣子，切断县城同外界的电话联系；随后把支局主任江厚德等人的獭皮大衣、驼绒袍子、俄国毯子、夹金表等衣物抢掠一空。他们洗劫了永衡官银分号和永衡当，并纵火焚毁部分房屋。街道的商号店铺，均遭到了抢劫，无一幸免。被他们抢劫去的各种贵重物资和金银首饰难以数计，还绑去了一批人票，有的人票被他们带出县城后，折磨得致残、致死。

城内箭亭子却没有遭受严重的匪患。当时伊通有“10个营城子不如一个箭亭子”之说。箭亭子在县城的东南部，住的都是伊通的首富，财势显赫。胡匪的魔爪还没来得及伸到这里，就被十

连打跑了，箭亭子才幸免遭难。

十连因连长负伤撤到纸房屯后，于5日转移到二道。他们用电话同团部联系不上，就给驻防在双阳县的三营部打电话。三营长周瑞武听说伊通失守，十连撤出阵地，认为事态严重，要十连打回伊通，驱除匪贼，将功补过。十连官兵听从了周营长的命令，于傍晚赶回伊通县城，从东门冲了进来。胡匪以为是从双阳和磐石来了援军，边打边撤。在城内的六连和七连听到了消息，由傅连长率队冲出了团部，在官军的夹击下，土匪于5日夜间到6日晨陆续撤出了县城，盘踞在县城西北干沟、七家半一带。

仅仅两天时光，昔日县城的繁荣景象一扫而光，到处是断垣残壁，几处废墟还冒着缕缕青烟，店铺的门窗被砸得七零八落，货架子东倒西斜，各种货物抢掠一空，好端端的一座县城被他们糟踏得千疮百孔。

胡匪逃跑后，6日上午县长白鸿逵同公安局长等县政府人员从郑家大院回到县政府。他一见部分房屋被焚，几千件档案荡然无存，监狱被砸，罪犯逃走，惊得呆若木鸡，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万万没有想到，自他4月20日上任以来，不到半年时间，县城就遭此惨祸，人民受到涂炭，这使他痛心疾首。他料理的第一件公案就是传讯德裕长掌柜的单绎明。单很早以前就同北山皮的土匪有勾结，县城的买卖铺商去公主岭办货时，他给胡匪通风报信，使货车多次受劫。他的店铺有地窖，窝藏赃物，这次他又帮助胡匪潜伏下来，举火为号，里应外合。经过审讯，单绎明供认不讳，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被就地处决。

白鸿逵在上任时就许诺，要整顿好伊通县的治安，肃清胡匪。可他没有料到，五、八连哗变，胡匪破城，使他焦头烂额，一筹莫展。所以群众讥讽他，管他叫“白来一趟”。他自己也承认，造成此空前惨祸皆他一人调度无方所致，咎无可辞，要求从严处分。11月8日他被免去县长职务。驻军三十三团长杨崇武也被撤职，

调回长春。擢升三营长周瑞武为团长，二营七连长傅泽民为二营长。

二、二祸伊通城

1932年夏初，南山皮和北山皮的绺子又活跃起来，他们南北呼应，匪警频传，匪势逼人。7月26日在北山皮活动的“九江“、“太平”、“四季好”、“占中林”、“东边好”、“天缘”、“二德”等20余股绺子，约数千人，攻破了营城子，尔后又北上，攻破了伊丹乡，时刻威胁着伊通的安全。盘踞在北山皮的“全胜”、“靠山好”、“双胜”、“草上飞”、“傻子”、“老东山”、“火车头”、“金龙”、“大、小海蛟子”等绺子也虎视眈眈想再次荼毒县城。县城的形势异常紧张，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军民拒顽匪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新上任几个月的县长张柳桥和驻军团长周瑞武及伊通著名的绅商人士，几度商讨城防计划。他们唯恐上次破城的悲剧重演，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部署防卫力量，动员全城军民同心协力保卫县城。因为县城兵力空虚，首先缩短了西侧防线，由新西门退守到老西门，加强了老西门西侧的防御，从老西门往南修了一段城墙，同南壕线的西南门衔接。因为上次胡匪是从这里攻入县城的，所以加强这段城防。县政府将筑墙工程包给了回族居民。回民们日夜抢修，挥汗如雨，按期完工，使这里“深沟高垒，御侮折冲”。

这时原三十三团已改编为警备第五旅第十三团，旅长是朱力军，团长周瑞武，二营长是傅泽民。七匪第一次破城后，十三团召了一批新兵，补充了缺额。驻营城子七连士兵也被调进了县城。周瑞武深感兵力不足，又从双阳调来了他的嫡系第十连守团部。十

三团守卫县城的兵力充其量只有 4 个半连。地方武装组织省警察队有五六十名警察马队，带兵的绰号叫齐大土豆子。县保卫团总队部有 40 多骑兵，由总队长郑秀峰指挥。县公安局有 60 多公安兵，带兵的是八大绅士之一的杜玉衡。该人罗圈腿，人称玉蛤蟆，群众说他们是玉蛤蟆挎洋刀——“邋遢兵”。

偌大一座县城，这么少的兵力是难以支撑的，于是县政府又重新整顿和组织了民团和商团。民团 150 人，团长张景贤。其实这民团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成立了，他们平素不集中，到了夏季蔬菜下来时才执行守城任务，所以群众称他们是“茄子队”。商团是由商务会组建的，有四五十人，队长叫王义，好刁难商人，谁遇见他就要倒霉，所以群众说“时运不济碰见王义”。

这样全县城有军队和地方武装力量共七八百人，分别布防在县城的四周壕线上。如果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胡匪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可是他们除了少数是老兵外，不是新招的士兵，就是“邋遢兵”、“茄子队”，怎么能旷日持久地同慓悍的胡匪对峙呢？

到了 9 月初形势险恶了。南、北山皮的绺子向县城逼近，城里风声鹤唳，一日数惊，军警民团等进入了临战状态，7 座城门完全封死，有警察防守。十三团还从磐石调来一个迫击炮连，带有两门山炮住在天兴源院内。县长张柳桥和团长周瑞武、保卫总队队长、民团团长经常骑着马到壕线上巡视。

县长陈柳桥认为守城的兵力薄弱，就叫各甲动员青壮年参加守城。上次破城时居民受尽了蹂躏，对胡匪有切肤之恨，所以经过动员，居民们都积极参加守城。武器不足，县城的各铁炉昼夜升火，赶造扎枪，有些青年动员家长将自家藏匿多年的枪支弹药拿出来。

9 月 7 日傍晚，麇集在县城周围的好几千名胡匪将县城围得水泄不通。

突然，枪声四起，胡匪开始攻城了。顿时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在密集的枪声和震耳欲聋的土炮声中，夹杂着人们的叫骂声和马的嘶鸣声。城门上、城墙上、壕线上，趴满了守城的军民。他们手握着盖子枪、套筒枪、自来得、连珠枪、单出子、洋炮、抬杆子、扎枪等武器，同仇敌忾地迎战着数倍于己的胡匪。天兴源的炮手们索性也走出炮台，把抬枪架在炮台顶上，轮番地向匪群轰击。这时，壕线上的灯笼火把一齐点燃，像一条蜿蜒起伏的火龙，在城壕的支架上挂着被煤油浸透的砖头和棉花团，点燃后成了团团烈火，发出耀眼光芒。这火焰照亮了城墙和城壕，也照亮了匪贼鬼蜮般的身影。他们一旦暴露在火光之下，一颗颗子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向他们飞去。他们有的中弹丧生，有的抱头鼠窜，没能越雷池一步。守城的军民不分昼夜，坚守阵地，一次次打退了胡匪的疯狂进攻。县政府组织各商号和居民，支援守城的军民，送来了白面、猪肉、粉条、蔬菜等物资。

县城陷落

几十股绺子，数千名胡匪，一连进攻了几昼夜，见县城攻不动就有撤退之意，9月13日，有的绺子已经开始撤走。县城的保卫战已经胜利在望。正在这紧急关头，十三团的周团长起了不良之心，策划率部潜逃。

周瑞武从双阳调到伊通任职后，就同县长张柳桥结为亲属。他将自己小姨子，介绍给张县长做姨太太。在这次土匪攻城前，他们就做了安排，将家属和金银细软之物都转移到二十家子，张县长只将他的小老婆留在县城。就在胡匪激烈攻城之时，从外面传来了消息，说十三团的一营在磐石反正，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又说旅长朱力罕在取柴河叫老殿臣缴械了。这使周瑞武军心动摇，决定弃城而逃。

14日下午，一次决定县城命运的会议在老爷庙召开了。参加

会议的有伊通的八大绅士、商务会长和天兴源、公发祥、铭记号、增兴玉、永盛会、福兴源、永衡当等大商号的经理，以及各买卖铺商的代表。

伊通的八大绅士，指的是住在县城的丁、宗、宝、玉、任、苟、刘、洪八大家族。这八家在清末民初是伊通的豪富，财势显赫。他们有的是陌连千顷的大地主，有的是官宦门第，有的是清朝遗老和奉系军阀亲属。他们或联姻，或至交，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清末到民国的历任知州、知县、县长到任时都得登门拜访，一些重大决策也得请他们商议，不然，就有摘掉乌纱帽的危险。过去胡匪“小傻子”破县城时，知县朱约之守城不力，就被他们告倒。张县长和周团长深知这些人的厉害，所以特邀他们参加会议。

张县长在会上介绍了县城的危急形势，对军民坚守县城，拒匪贼于城门之外，表达了感激之情。周团长讲述一营参加抗日和旅部瓦解的情况后，话锋一转：“诸位，我实无良谋，孤掌难鸣，只有退路一条，将兵带走，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有负重望，希诸位谅解。”大家以为召开会议是研究城防事宜，没想到在县城危亡的关头周团长要撤军了。丁华甫是八大绅士的首富，他见大家面面相觑，便双手抱拳道：“周团长，县城危在旦夕，系存亡于团长一身，在此危难之际，我们本应同舟共济，十三团岂能釜底抽薪呢?”大家异口同声地哀求道：“周团长不能撤啊!”有的甚至跪在关老爷像前焚香祷告，祈求关老爷保佑，请求周团长保护。

张县长见这场面，斟酌半天道：“诸位乡亲有如此诚意，感人肺腑。不过周团长也有难言之隐，团部军需官去吉林领饷携款潜逃，守城的官兵无法开饷，何以安定军心?”周团长迫不及待地接着道：“诸位，如果能帮助我筹措军饷，贡献1万发子弹解燃眉之急，我和张县长愿同县城共存亡。”

张县长和周团长这一唱一和，完全是给大家演的双簧，其实

周团长早就将他贪污的一大笔军饷叫他妻子带走。他见县城攻不破怕事情败露，受到惩处，一旦县城陷落，他就可乘机将水搅混，为自己开脱罪责。驻军饷银一向由军方供给，军需物资由地方供给，历任团长都没提出异议。如今周团长要地方筹措军饷，大家愕然。张县长出面打圆场道："诸位乡亲，现在是多事之秋，匪警、匪患遍地，伊通尤烈。一旦县城失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希望诸位还是以大局为重，为守城官兵筹集军饷为上策。"丁华甫反唇相讥道："张县长，你是伊通的父母官，距上次破县城不到一载，民户有没有钱你还不知么？"丁华甫一句话把张柳桥顶得哑口无言。其实，丁华甫说无钱筹措军饷也不尽然。就光他们八大绅士，不用说给守城的官兵筹饷，就是给全团开饷也不在话下。可他们都惜金如命，岂能花这冤枉钱。周团长见大家议而不决就亮出了底牌："诸位休要争执，筹措不了军饷，拿不出子弹我只好下令撤军了。"丁华甫见周团长步步紧逼，就面红耳赤道："周团长请便。你实在要撤军，我们就自卫。"说完拂袖而去。

老爷庙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

老爷庙会议一结束，周团长就下令叫县保卫总队长郭连长集结县城内的所有车辆，准备载运物资外逃。早在胡匪攻城之前，城外乡镇的一些大户人家怕胡匪抢掠，就用车辆将一些细软之物运进了县城，寄存在亲属家中。逃难的人群也集中在县城。郭连长领着十连的士兵，在城内抓了很多车辆，装上周团长和团部的物资。县城的居民听到十三团要撤军的消息，都惊慌失措，哭天喊地，乱成一团。一些有财势的人家和商绅，也准备了车辆，将细软之物装在车上，准备随军逃难。

9月15日（旧历八月十五日）晨，十三团团长周瑞武率部与张县长及县政府一些官员和省警察队、县保卫队等向东街撤走。在车队的后面跟着几百辆小车和花轮车，装载着满满的物资，争先恐后地出逃。那些担担的，挑挑的，背包的，携儿带女的，都挤

入了这逃难的人流之中。

周团长率队到东门，士兵撤开堵城门沙袋子。城门一打开，在外面围攻的胡匪以为军队要往外冲，一排密集的子弹射来，周团长肩负轻伤，随同逃难的十二校的校长张聘之中弹身亡。张聘之、唐绥之、范敬之都是伊通教育界的名流，素有“三之”之称，受人尊重。这次张聘之死于匪贼的乱枪之下，扔下孤儿寡母，凄凄惨惨。

周团长见东门冲不出去，便转道南门。当他们从东街往回走时，老百姓都聚拢过来，黑压压一片跪在周团长马前，苦苦哀求，请他收回成命，保卫县城。周团长原计划从东门撤出，可没想到在东门受阻，又被老百姓缠住不放，万般无奈，他只得下令各连队返回自己的防地，坚守城池。

但是，十三团要撤军的消息，胡匪已有耳闻。军队刚一撤走，他们就发动攻势。那些“邋遢兵”“茄子队”同胡匪刚一接触就败下来，溃不成军，四处潜逃。等到十三团的部分士兵返回阵地时，为时过晚，全防线处在崩溃之中，一部分胡匪从西壕线攻入。有30多名返回西门的士兵，见阵地失守，就占了天兴源的西南炮台，一阵激烈的射击，将进城的胡匪又打出西门。胡匪见官军火力猛，就从西南门的城墙和南壕线的衔接处攻了上来。士兵们见胡匪众多，阵地已失，无险可守，就从炮台上撤了下来。

在南壕线上守卫的保卫队、民团和商团同南山皮的胡匪和大刀会展开了激战。大刀会上阵后，身披红布，头缠红巾，手执大刀、长矛（就是把锄头钩打直，磨出尖来，当矛使用）、扎枪轮番进攻。当他们被排子枪压下去之后，大法师一声吆喝，他们就象着了魔一样，又跳跃而起，舞着大刀、长矛蜂拥而至。保卫队和民团、商团被吓呆了，无法应战，纷纷败退下来。

15日中午，伊通复又陷入魔掌。

正当胡匪和大刀会攻破县城之际，周团长和曹副官率嫡系十

连逃到河东张鸣九家后去双阳。以后，逃到北平，被伊通八大绅士之一的荫化南（荫荀堂）发现，敲了他的竹杠。这荫化南于北平大学毕业，是热河督军汤玉麟的门婿，有财有势。周瑞武怕他揭露贪污军饷弃城而逃的罪行，就在他贪污的1万多元军饷中，拿出数千元拱手献给荫化南，才算免去了一场官司。

县长张柳桥则率领政府官员和保卫队及逃难的居民，逃到了八大绅士之一的宗大人院内。宗大人是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门达（传达处的官员），颇受依将军的信任。他离职后，迁到了依将军的故里伊通。他家四周是青砖院墙，筑有炮台，易守难攻。张县长见逃难的人太多，就叫省警察马队和保卫队的士兵在左胳膊上扎上毛巾，作为联络信号，从南壕线往外冲。从南壕冲出后，直奔邵家甸子秦家大院。秦家大院是著名大地主秦墨的住宅，两个大院相邻，有围墙和炮台，是个大响窑。秦墨曾担任过伊通县的农务会长，他见县长来避难，开门迎进去后，大门立即落锁。省警察马队和保卫队分别登上炮台，以防胡匪进攻。

中午1时许，南山皮的“太平”绺子来了。太平是营城子人，叫刘文波，他原是营城子庆泰祥商号的股东，只入了二厘五分的股，人们称他是二厘五掌柜的。九·一八事变后为匪，报号“太平”。这次进攻县城时，他在西烧锅被乱枪打死。太平绺子在外面喊话，要张县长跟他们走，保护县长安全，否则就要进攻。形势紧张，张柳桥六神无主，坐卧不宁。沈科长对张县长说：“县城失守已铸成大错，如若再同南太平同流合污，那将成为历史罪人，说什么不能跟他们走。”张县长也不愿铤而走险，委托沈科长同南太平交涉。沈科长趴墙头上对南太平绺子喊道：“你们要保护张县长，此是‘义举’。可是县城刚破，南、北山皮的绺子云集，现在要跟你们出城恐有不测，等到夜间12时，我们一定随你们出城。”南太平绺子信以为真，都策马而去。其实这是沈科长一个缓兵之计，他计划在夜间保护张县长逃往公主岭。

南太平绺子走后不久，北山皮的赵全胜、孙傻子、草上飞、老头好等绺子也来了，声称要保护张县长去公主岭。赵全胜此举是为自己留条后路，沈科长一听计上心来，对他们说："南太平12点要来劫持县长，如果你们有诚意，将南太平打退，保证县长的安全，我们就跟你们走。"孙傻子骂咧咧道："南太平算个屁，几条破枪，百八十号人，还能保护县长，我们收拾他们。"当下议定晚饭后去公主岭。

刚吃完晚饭，南太平绺子得到赵全胜绺子要抢县长去公主岭的消息，就率领大群匪徒赶到了秦家大院。赵全胜的绺子此时也赶到了。这两股胡匪话不投机，就在秦家大院门前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北山皮的绺子素以凶悍著称，把南山皮的绺子打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

晚10时许，张县长及政府的一些官员，在保卫总队、省警察马队的保护下，由赵全胜绺子开路，逃往大孤山张庆麟家里，以后逃往二十家子和公主岭。

在周瑞武率十连逃出县城后，十三团二营的五、六、七、八3个半连队，没有随他出逃，占据几家深宅大院固守。这几家围墙坚固，易守难攻。院内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军队占据后更增加了防卫力量。

胡匪攻入县城后，抢占了一些大商号作为据点。有的绺子在驻地还扯起了大红旗，旗上写着"天下第一团，是人都该钱，善要他不给，恶要他得还"，落款是某某大局。大刀会的驻地遍插着牙旗，"仁义军"骑着白马打着白旗，以区别于其他胡匪。

此时的县城，形成了兵匪割据的局面。十三团二营的各连队放出流动哨，胡匪也派出了水的。但兵不打匪，匪亦不惹兵。好像他们之间有某种默契，和平共处，真正受难的还是老百姓。

胡匪入城后纵火焚烧驻军团部和县政府。顷刻间，这两处火光冲天，烈焰腾腾，烟云蔽日。县政府是伊通建州后，于1885年

（光绪十一年）经第一任知州彭明道修建的州衙。共修建大堂、二堂、仪门及其附属设施69间，耗银5200余两。1931年破县城时，只烧了卷房、厢房等少部分房间，这次除了警察所的3间房和一个胡仙堂外，都化为一片焦土。福兴顺及其附近的店铺也被焚毁。

与此同时，各胡匪绺子都如狼似虎地闯入了公发祥、铭记号、增兴玉、永盛会等商号和银匠铺、糕点铺、杂货铺、当铺、布店、钱庄等店铺，大肆抢掠，各种贵重的货物被他们洗劫一空。福兴源、福兴长、福兴泰、福兴堂等“福”字号的买卖无一幸免。这福字号的买卖是由当地有名绅士何闽臣开办的。他的父亲是清末福州副都统，家财豪富。这次遭劫使何闽臣濒临破产，从此一蹶不振。西烧锅天兴源是清朝嘉庆九年（1804年）开办的，所产白酒远销黑龙江省的呼玛和奉天的盛京（沈阳），是久负盛名的大烧锅，这次也被他们糟踏的一塌糊涂。

街道的居民家和县城避难的老百姓，都成了胡匪抢掠的对象。胡匪翻箱倒柜，金银首饰和贵重物品尽数掠夺。翻不出东西来，就用马鞭子、马缰绳和棍棒毒打，惨叫声四起，不绝于耳。大刀会用长矛、扎枪穿屋破地，把地下埋藏之物搜刮一空。

这股绺子刚刚离去，另一伙闯进家门，再次掠抢。有些人本来不是胡匪，可他们利欲熏心，趁县城攻破之机，也戴上白胳膊箍，装扮成胡匪模样，走到哪里抢到哪里，老百姓称他们是“二茬胡子”。那些拣“洋落”的更凶，手持棍棒进屋就打，见东西就抢，尽饱私囊后，便扬长而去。这就是“三茬胡子”。

胡匪不但抢掠财物，还大肆“绑票”。有财有势人家的秧子他们绑，买卖铺商掌柜的他们抓，就连做小买卖的，摊煎饼的，他们也不放过。每伙绺子都抓去几名或十几名人票，押到他们的据点严刑拷打，索要财物。此时县城是十室九空，多数男人都弃家而逃，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妇女儿童了。

这些匪徒大逞淫威，抢掠一些俊美的年轻女子为他们做妻当

妾。在天增厚鲜货店里，一名满脸胡须40岁的匪徒，手持短枪，逼迫一个20来岁的姑娘同他成亲。象这样被他们糟蹋的妇女不知有多少。

逃到二营各连队驻地的难民们，也受到了军队的欺辱。五、八连那些新招的士兵，军纪败坏，趁火打劫，掠夺难民的财物。老百姓有苦无处诉，敢怒不敢言。

兵匪纷争

在胡匪攻破县城之后，西浴池掌柜的马鸣久于深夜冒险跑到长春密报求援。此时伪政权初建，东北各地义勇军风起云涌，把敌伪弄得焦头烂额，无暇他顾，无兵可发。

县长张柳桥逃难来到了公主岭以后，讲述了县城陷落的经过，要求怀德县出兵解围。怀德县听到伊通失守，匪势猖獗，恐危害公主岭，便派伪县长马春田率队赴伊通“解围”。

马春田（回族）原籍是奉天海城人，曾在伊通县城城隍庙前居住过。九·一八事变前，他在公主岭河北日本租界地黑帽子衙门当过巡捕，同日本人联系密切，颇受信任。九·一八事变后任地方维持会委员长。1931年11月初赵全胜等绺子攻破伊通县城后，降到了公主岭，赵全胜任大队长，天恩、西恩厚任大队副。马春田认为这些降队可以利用，就率领他们去接收怀德县城。怀德县长赵泽民将其击退，马春田潜逃到长春，搬来了日本兵，攻破了县城，赵泽民县长在公主岭遇难。这是马春田投靠敌人后立的首功，受到日本人的青睐和赏识，于1932年被任命为怀德县第一任伪县长。

赵全胜在帮助马春田攻破怀德县城后，于1932年春又将他的绺子拉出来，回到了伊通的北山皮，重操旧业。这次破县城后，他保着张柳桥逃到公主岭时，又同马春田勾结，答应帮助马春田镇压南山皮胡匪，确保北山皮胡匪的势力。所以，在马春田启程来

伊通前，他就密令北山皮土匪将进城时戴的白胳膊箍，一律换上红胳膊箍，以区别南山皮帮和大刀会。南山皮的胡匪还蒙在鼓里，尚不知大难即将临头。

9月25日，马春田率领四五百身着黄军装的县大队，带着从公主岭东大营借来的3挺机枪和一门炮，杀气腾腾地从公主岭直奔伊通。

在他们到达前，日本侵略者从公主岭派出数架飞机飞临伊通县城上空，在西门外投下几十枚炸弹。这是伊通县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飞机的轰炸。西门外一带的居民被这突如其来的轰炸，吓得惊恐万状，晕头转向。马家炉掌柜的马发老伴胯骨被炸伤，鲜血淋淋。给他们家做零工的徐麻子和他的10岁小儿子及居民王兰亭等人同时被炸死。西门北侧清朝年间修的碑碣子和娘娘庙的大墙被炸得弹痕累累。

飞机声音消失不久，马春田率领的县大队和赵全胜绺子就出现在西大岭。他们在西岭架上炮，向大刀会驻地任家大院轰击，炸死炸伤一些大刀会成员。然后他们就从西门进了县城。顿时，身着黄军装的军队和戴着红胳膊箍的北山皮胡匪，同戴白胳膊箍的南山皮胡匪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街头巷尾杀声四起，枪声阵阵，子弹纷飞。南山皮胡匪被杀得抱头鼠窜，陈尸街头。他们又追杀到任家大院，同大刀会厮杀起来。大刀会是从磐石流窜到伊通来的。他们以吃符念咒、刀枪不入骗术为诱饵，勾引愚民入会，甚至连胡匪也信以为真，见他们都望而生畏。军队与大刀会，展开了格斗。这是一场原始武器同现代武器的较量。大刀会也是血肉之躯，怎能抵住那钢枪的子弹。他们死伤累累，败下阵来。大刀会退到县政府东侧警察所时，遭到了二区警察的袭击，又死伤二三十人。大刀会杀红了眼，冒着枪林弹雨冲了进去，将区警官和几名警察用大刀活活砍死，然后他们扔枪弃刀仓皇而逃。

马春田率队在县城盘踞数日。他的士兵都“缴获”了很多

“战利品”，身上都背着五颜六色的包袱，有的把座钟挂表背在身上，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在临行前马春田命令士兵把被打死的胡匪和大刀会的人头都割下来，装了 11 麻袋，用大车载着回公主岭报功去了。

马春田走后不久，从长岭县来了个孙大队长。他率领三四百名身着灰军装的军队，来伊通剿匪。

这个孙大队长有 50 多岁，留有两撇仁丹胡，身着呢子大衣，看上去很斯文。九·一八事变前他也是草莽人物，过着绿林生涯。九·一八事变后他降于日本人，被封为长岭县保安大队长。还是在伊通县城被胡匪围攻之际，省里就命长岭县出兵伊通。孙大队长率队从长岭县出发后，按行程计算在胡匪攻破伊通县城前是可以赶到伊通的。可是孙大队长闻知攻城的胡匪势众，恐难解围，进军迟缓，当他们进入怀德县境后，这些降队又旧病复发，做起手脚来，延误了战机，待他们到伊通时，县城早已被胡匪攻破。

孙大队长到伊通县城后，以司令部的名义张贴安民告示。从此孙大队长摇身一变成为孙司令了。他把司令部设在铭记号，派出士兵四门设岗，盘查行人。县城的一些绅商，如郑秀峰、马鸣久、田鸣山、关慧风等人，听说孙司令是由省里派遣，有权有势，都向他献媚取宠。孙司令就利用这些人组织了治安维持会，由他们维持社会秩序。维持会便派人八方奔走，四处说降，鼓唇摇舌，同胡匪斡旋。一些绺子经过马春田的镇压，已成为惊弓之鸟，不敢同孙司令抗衡，便纷纷投降，暂寻栖身之地。孙司令按军队的编制，以降队的人数多少，分封官职，共收降 1000 多人。他的势力在县城迅速膨胀起来。

县城遭劫后，货物奇缺，就连食盐也买不到。孙部进城后，物资就更紧张。维持会一方面为降队筹划粮秣，一方面组织商务会把粮食运往公主岭，兑换货物，供应孙部和居民。孙司令怕货车被劫，就派他的副官率队保护，还委托铭记号掌柜的田鸣山给他

开办油坊。田鸣山低价收购大豆，高价出售豆油。破县城前市价大豆1.5元1斗，豆油0.16元1斤。田鸣山收购的大豆0.8元1斗，出售的豆油0.2元1斤。有时收购大豆无款，就以孙司令的名义出欠据，答应日后偿还。买卖铺商和一些饮食行业也相继开张营业，动乱不安的县城开始有了转机。

县长张柳桥听说县城略有安定，就带着他的难兄难弟返回伊通。县政府已成为一片废墟，无法办公，他就将县政府设在“张家大狱”院里（现在的教育局）。张家也是县城的著名大地主，全家人几乎都抽大烟，大门常年关着，象森严的监牢，所以人们称为“张家大狱”。县警务科和保卫总队等机构也相继恢复，但他们无公可办，形同虚设。县城完全在孙司令控制之下。

不久，驻扎在磐石的原十三团一营长宋国荣率义勇军开到伊通，要县城供给他们食盐。这时的宋营已改编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第八路义勇军，宋国荣任司令。孙司令听到消息后命令部队严加防守，不许宋国荣部队进城。义勇军把炮架在河北的乱尸岗子上向县城连开两炮，头一炮的炮弹落到北门里，第二炮的炮弹在二营部门东侧爆炸。

宋国荣是伊通人，同在去年被撤职后又恢复第二营营长关德彬是沈阳讲武堂同学，又都在十三团当营长，有些交往。宋国荣见义勇军不能进城，就写封密信，派一名身着便衣的士兵给关营长送信。这名士兵走到北门时，被守城门的军队把信搜出来，交给了孙司令。团长傅泽民获悉后，同孙司令交涉，将送信的士兵放回。那封密件后来叫孙司令给了日本守备队。据知情人透露，宋国荣来伊通取盐是假，而真正的用意是劝关营长把部队拉出去，参加抗日义勇军。

在宋国荣部队来县城之前，商务会组织的23辆办货大车，由公主岭返回县城。率队保护货车的是孙司令的副官边凤池。当他们走到万福德时，听说县城来了军队，边副官先回县城联系，在

途中被义勇军击毙。第二天货车走到干沟子时被义勇军发现，以为是给养车，有两辆货车被劫走。

宋国荣听说密信被孙司令搜去，又得不到关营长的音讯，便率队离开了伊通。

日伪“剿匪”

11月初，张海鹏的秦团、黄团来到伊通。张海鹏1917年由东北跑到关内参加过张勋的复辟活动。复辟失败后他又逃回东北，被任命为洮辽镇守使。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独立宣言”，公开投降日本。1932年3月伪政权建立时，被任命为参议府副参议兼侍从武官长。此时，他的部队改称为“警备旅”，由他五儿子张五虎率领围剿南满一带的抗日武装力量和胡匪。这支有1500人的伪军，都穿着带有白袖标的黄军装，进县城后，驻扎在刘家店附近。与此同时，从长春来了100多名日本守备队，也进入县城。次日，“警备旅”和日本守备队同奔磐石县烟囱山围剿“老殿臣”去了。

七八天后，他们又返回伊通。“警备旅”驻扎在县城和附近的一些村屯。这些伪军成分复杂，其中有不少是被招降的胡匪和一些散兵游勇。他们吸吗啡，抽大烟，调戏妇女，掠夺财物，欺压百姓，军纪极度败坏。他们分住在老百姓家，每天3顿饭，2顿带馅的，1顿米饭，地方维持会每人每天只给2角钱补助，还不够他们一顿的饭费。如稍有差错，他们就非打即骂，闹得老百姓心惊肉跳，晕头转向，所以老百姓说：“这年头真发懵，去了胡子就是兵，兵比胡子作得凶。”“匪来梳我，兵来毙我。”这就是那时的真实写照。

日本守备队队长是神田大尉，有40岁左右。他的军队进城时，用20多辆宽瓦小脚车拉着枪支、给养。赶车的多是山东人，戴的白袖标上面画着牛样子。还有20多个中国人也戴着白袖标，上面写着“工作队”3个字，印有红色公章。他们占据徐靠山大院后，

就赶着装有糖果、火柴等东洋货的宽瓦小车，招摇过市，边走边撒糖果和火柴。居民们都识破了他们笼络人心的阴谋诡计，不屑一顾。唯有不懂事的孩子跟在车后看热闹，拣糖果吃。他们边走边宣传，极力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涂脂抹粉，制造舆论。他们声言，凡是归顺日本的降队和胡匪都会受到优厚待遇，给换枪换马，保证生命的安全。

过了几天，他们见无人归顺，神田就带领1名上士和1名翻译，到降队的驻地验马，将马匹的数字都一一记下来。这同调查降队的人数没有区别，有马有枪就有人。经过几天的调查，守备队掌握了孙司令从长岭带来的军队和伊通降队的人数、马匹、武器装备等情况。据此，守备队和“警备旅”一条“验队”的毒计产生了。

在11月下旬的一天，守备队通知孙司令的部队，在旗修庙前柴草市场和田家油坊“验队”。孙司令的部队接到通知后，分别往这两个地点集结。

田家油坊是个大院落，西院就是日本守备队驻地。这个院集结有600多人。守备队设上门岗，日本兵把轻机枪支在大门洞里，枪口对着那些降队。这时降队已明白“验队”的真正含义，窃窃私语。不一会儿神田队长和一名翻译来了。神田命令大家4个人一行站好，把枪码上，后退5步。然后来了4辆宽瓦小脚车，分头把大、小枪都装在车上，拉到守备队去。昔日如狼似虎的胡匪，如今象绵羊似的被缴械了。守备队把他们押送到对门的二营部。傍晚这600多人见无人看守，都逃之夭夭了。

旗修庙前的“验队”，也如法泡制。被缴械的有1000多人，只留下孙司令和19名军官，其余的人就被遣散了。孙司令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第二天守备队用小脚车把孙司令手下的19名军官，拉到北门里（老招待所）的东侧，推下车去，一阵乱枪，这19个人都倒在血泊里。

在这19人中有一个是马鞍人，他是北山皮胡匪绑来的“票子”，家里用巨款把他赎出来后，竟然当上了胡匪，随着其他胡匪一同降在孙司令手下。这次他听到“验队”，就弄来一条武装带扎上，打扮成军官模样，以为日本人会封他一官半职。守备队在缴械时，认为他是军官，不容分说上了绑绳，这一念之差，使他丧了命。

在处死那19名军官的次日，日本守备队又缴了五、八连的械，还计划要将十三团全部缴械，傅泽民团长得知消息后，给守备队长神田大尉送去两身狐狸皮袄，才算作罢。

北山皮赵全胜等绺子在帮助马春田击溃南山皮胡匪和大刀会后，就盘踞在干沟子和七家半一带。孙司令来伊通时，有的绺子降在孙司令手下。赵全胜、老头好、孙傻子、草上飞等绺子见孙司令势力强大起来，就返回了北山皮，静观其变。到了11月初，“警备旅”来伊通剿匪时，赵全胜在北山皮一带同“警备旅”周旋，始终没有被围困住。后来“警备旅”协助日本守备队杀了孙司令的军官，遣散了该部，又缴了五、八连的械，赵全胜等绺子才感到事态的严重。

正在这时，日本守备队派遣说降的人员到了北山皮。赵全胜代表北山皮的绺子，提出受降的条件，只降地方，不降日本守备队。神田大尉得知情况后，便叫警务科出面谈判。神田派出两名军官，带着县长张柳桥给赵全胜劝降信来到了北山皮。经过谈判，赵全胜、靠山好、双胜、孙傻子、老头好、草上飞、老东山等绺子共1000多人同意降到伊通警务科，接受改编。

县警务科经过一番策划，于11月末将收降的绺子和县保卫总队、省警察马队编为1个保安大队，5个中队，任命赵全胜为大队长，孙傻子、老头好、双胜、草上飞、裴永厚分别为中队长。老东山等人为中队副。在这5个中队长中，只有裴永厚不是匪首，而是省警察马队的队长。靠山好任命为大队部总稽查。

在这些降队进城时，县警务科叫工商界和居民们到西门外迎接。居民们都吃尽了胡匪的苦头，心有余悸，不敢前去。这些降队耀武扬威，骑着高头大马，披红挂绿。就连赵全胜的小老婆都披着红绸子，挎着双匣子，俨然像位官娘子。居民们见他们这种得意忘形的样子，都忿忿不平。

这就是1932年土匪破县城前后的情况。伊通人民虽然在腥风血雨中熬过了凄苦的时光，可是他们前面的路，是迷漫漫的路；夜，是黑沉沉的夜，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伪满傀儡政权更残酷的统治就在眼前。

赵全胜等人投降了，他们绺子被改编了，可是从他们投降之日起，日本守备队就为他们掘下了陷井，敲响了丧钟，大难即将临头。

王喜荣整理

（吉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伊通土匪和日租界

张庆麟

在九·一八事变前，伊通北山皮的土匪为何猖獗一时，气焰那么嚣张，就连驻防在县城的一个团的军队也奈何不得？要想解开这个谜还得从北山皮匪帮同公主岭日租借地的关系上去追根溯源。我家有几千垧土地，每年收缴的地租多数都卖到公主岭一些粮栈，家中的一些日用百货也到公主岭去购买，所以我经常奔波于伊通和公主岭之间，结识了公主岭方面的一些绅商和头面人物，从中了解到北山皮匪帮同日租界之间的一些内幕。

公主岭河北靠铁路附近有块日本租借地，它同日本在东北其他日租借一样，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由沙俄无条件地将长春至旅大间的南满铁路及其支线转让给日本的。此后，日本将租界地变成侵略中国东北的据点，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在公主岭河北有所房子，是专门接待土匪的地方。负责联系接待的是怀德县大土匪头子宗厚。宗厚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他同日租界有密切联系，南满线的火车他随便坐，是三等免票。他帮助日本人贩卖军火，长春、伊通、怀德、四平、昌图、磐石等地的土匪用的部分枪支弹药，就是由他从日租界买去后再转手卖给土匪的。日本人不仅从中牟取暴利，更重要的是怂恿土匪为非做歹，扰乱中国社会治安，使中国动乱不安，以便达到他们侵略中国的可耻目的。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宗厚是个匪首，又为日本人效力，可却是我父亲张俊德的把兄弟。我父亲为何同他结盟，这里还有一段隐情。我父亲来往于伊通和公主岭之间经常雇小车子。别的客栈小车子时常遭到土匪的抢劫，唯有雇义成栈的小车子没人敢劫。因为义成客栈张掌柜、河北东关大车店掌柜党庆云和宗厚是盟兄弟，所以土匪对义成栈的小车子不敢轻举妄动。我父亲到公主岭经常住在和盛通粮栈，粮栈经理张老德告诫我父亲说：你是伊通县大地主，赫赫有名，光当土财主不行，黑道上的也得交往，不然人家把你绑去，就得倾家荡产。我父亲听了他的劝告，经他牵线，同宗厚结为盟兄弟。每当我父亲去公主岭时都给宗厚带去一些贵重礼物和上好的土特产品，到公主岭后还在河南兴发源宴请宗厚。凡是宗厚及其朋友到兴发源吃饭时，都将饭帐记在我父亲名下，“三节”时由我们管家去结帐。从他们二人结盟后，我父亲从未遭到抢劫。

土匪到租界地后，就算上了保险，哪怕是官方通缉的重犯，一旦进入河北日租界，中国政府也无权搜查追捕。1930年“恩厚”绺子在莫里石棺山打死了官军第三十三团二营六连的孟连长和刘连副，在北山皮呆不下去了，匪首就逃到了公主岭，在河北日租界地隐匿起来。就是一般的匪徒在割倒地后，也腰缠万贯去那里“趴风”。他们一到了日租界就嫖娼妓、吸鸦片、赌大钱，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租界地的妓院、大烟馆、赌场等设施归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管理。匪首匪徒到这里寻欢作乐，不能用中国货币，必须将中国货币兑换成日本银行发行的日本金票，1.5元现洋能换1元金票。只要有了金票，在租界地就能畅通无阻。要到日本妓院住一宿得花上60元金票。要是嫖有名的娼妓，价格更为昂贵。这些土匪在租界地挥霍一冬春，带去那些不义之财，几乎被吮吸得一文不名，才灰溜溜地返回北山皮。草木萌生时，这些匪首匪徒又重操旧业，大肆抢掠。待到青棵子一倒，他们又带着金银财物回到租界地“趴风”。一冬春，照样把财物挥霍

的一干二净。这样年复一年地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大量财物滚滚流入日本人手里。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通过娼妓监视一些匪首的行径，以达到控制其目的。1931年哗变的五、八连和“赵全胜”等绺子破县城之后，为何降到公主岭？这是宗厚、党庆云和马春田策划的。马春田是奉天海城人，在公主岭日租界黑帽子衙门当巡捕，曾在日本爱知县力桥市六十联队学习过，从日本回来很受日本人信任，九·一八事变后当上了怀德县伪自治委员会委员长。他在公主岭招降赵全胜等北山皮绺子后，就安排吉庆堂的娼妓闻卿同赵全胜的三哥靠山好赵文生交往。闻卿是公主岭的名妓，曾走红一时，虽然年过30，但姿色不衰，风韵犹存。靠山好本是有妻室之人，从同闻卿相识后，恨相见得迟，被迷恋得魂销魄散，夜夜宿在烟花柳巷，如胶似漆。闻卿遵照马春田的吩咐，跟靠山好“从良”结为夫妻，成为马春田安在赵全胜、靠山好等人身旁的一个耳目。闻卿把赵全胜等人的行动及时向马春田汇报。靠山好还蒙在鼓里，深信闻卿能同他白头偕老，把为匪时抢劫的一些金银手饰都交给闻卿收藏。靠山好被南侠击毙后，闻卿摆脱了赵全胜及其妻子的监视，携带着一些贵重财物逃得踪影皆无。

1932年北山皮土匪破县城后，马春田要赵全胜帮助他把南山皮土匪打出县城，再降到伊通。开始时赵全胜拒绝了，怕上次降到公主岭事件重演。马春田见赵全胜不肯就范，就通过他的盟兄党庆云（党四爷）把赵全胜的岳父孙殿财（孙四爷）请到公主岭来说项。孙殿财对赵全胜说：“鸣九，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把南山皮土匪打出县城，便就是立了一功，为你投降到县城铺平了道路。不然公主岭你还来不来？你有几个脑袋？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租界地还能卖给枪支弹药叫你们继续为匪吗？”赵全胜也深知日本人是马春田的靠山，得罪了日本人和马春田就是死路一条。他终于按马春田安排，把南山皮土匪赶出了县城。所以1932年破县城时，

才演出了戴红胳膊箍的北山皮土匪追杀戴白胳膊箍的南山皮土匪的闹剧。

王喜荣整理

（吉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小白龙”围攻佳木斯

齐述师　齐春才

1913年大水之后，农业收成连年不佳，官府、地主租税繁重，直闹得匪贼四起，民不聊生。到1917年时，汤原县出了个“小白龙”。此人名叫沈桂林，28岁，原是自卫团的一个小头目，因风流韵事被撤职，他便组织一伙人，以他的4个“拜把子”弟兄为核心，在汤原县北大青山村前龙王庙集会，以庙定名，用“龙”字报号。沈桂林自称“小白龙”，4个心腹弟兄为“黑龙”、“花龙”、“混江龙”、“大白龙”，人称5条凶龙。一天深夜，小白龙带了两枝枪和他的队伍，偷偷摸进一个村的警察分驻所。正在熟睡的8名警察毫无防备，有的被打死，有的逃走了。小白龙得了8枝枪和一些弹药。随后他们乘势袭击了附近一带的大户财主，又得了不少钱财、物资和马匹。从此，这伙土匪迅速发展，很快就有二三百人，形成一个破坏力很大的匪帮。

他们盘踞汤原，破富锦县城，困佳木斯镇，袭击桦川县城，搅乱宝清，侵扰萝北，波及绥东，远袭饶河，松花江下游南北大部分商贾和大户皆被骚扰抢绑。

1917年9月一天拂晓，小白龙匪队向佳木斯镇进攻。商民慌恐，给依兰府拍发求援急电，驻军关营长率150名士兵乘帆船顺流而下，驰援佳木斯。小白龙闻讯后，率匪队东下，攻破了富锦县城，烧了县政府，掳走了知县，破监狱，放囚犯，抢掠了大量财物。关营长带兵到达富锦时，小白龙已退出县城，经由佳木斯

西 12 里处的杨树村逃往江北。当关营长追到莲江口时，小白龙已退到汤原县北大青山。这些人熟悉山路，官军进剿非常困难，李连长在战斗中被打死。这是小白龙围困佳木斯镇的前奏。

正值此时，俄国革命成功，在中国要解除满洲里至哈尔滨俄国守备部队的武装，关营长被调往哈尔滨执行任务。小白龙探得情报后，于 11 月间攻破格金河金矿，绑掳矿长和 20 余名护矿兵，大有率队南下、再袭佳木斯之势。佳木斯得此情报后，采取了防备措施：一是增加警察力量，由 150 名增加到 235 名，将二警区分驻所和三警区分驻所合并，调入佳木斯镇，分段把守各卡；二是挖沟筑墙作屏障，从 11 月开始动工，昼夜兼程，浇水合泥、深挖城壕，修城墙 1740 丈，四周修筑 6 个门，6 个炮台，12 月初竣工。

12 月 14 日，小白龙匪队从江北逼近佳木斯镇，各商民惊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警察队、警备队和商团分段把守城池，并将城内闲散人员聚集一处，派兵看守，以防动乱。15 日夜 3 点钟，警备队派一排人到西门外第一小学校驻扎，让师生员工全部到城里避难。16 日天空阴云密布，风雪交加，杨排长率警备队回城，临行前将学校洗劫一空，真是“兵匪互变，兵匪一家”。继而是大雪成灾，厚达 3 尺，道路堵塞，缺柴少米的贫苦居民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不愁吃烧的人家也在天灾人祸当中感到朝不保夕。

正在此时，小白龙于 17 日早 7 点钟，率 300 余人，坐着马爬犁从松花江北岸孙家烧锅出发，开始向佳木斯镇进攻。当行至船舶码头时，被设在此处的警、团击退。匪队不甘撤回，又沿江西行，分成两队，攻击西门和西北门。城内由警察队和商团分别护城堵击：警察所长孙绍臣带领警士守西北炮台，兼总指挥，警察队官孙玉英带领警士守西北门，中间一段垒卡由警备队一排长带领防守；区分所长带领警士守东北门，东北门至正北炮台一段垒卡由区警备队防守，商团一排长率领团丁协助防守东北炮台；警察和警备马队共防东南炮台，区警察守东门、东南门和西南门，东南炮台至西南炮台

一段仍由警备队防守；商团防守西面、西南炮台、西门和各垒卡；商团关桂祥、唐振江带领团丁循环设卡防守江沿粮栈。这天夜晚，小白龙两队人马分头从西、北两面发起猛攻，重点攻打西门和西北门。匪队猛攻一夜，直至天明撤到西门外小学校和公盛和院内。

18日，匪队抢入西门外路北民房，凭借房山墙向城内射击，形势非常紧急。警察和团丁奋力抵抗，最后用"大抬枪"将民房院内的草垛打着，因院内起火，匪队才撤至学校。这天深夜，小白龙匪队又分成两队攻城，一队坐马爬犁攻夺西门，在爬犁前竖起草把子，上边浇水冻冰，造成屏障，人在屏障后面驱赶着马爬犁前进射击；另一队攻打西北门，也坐马爬犁，将豆饼垛在爬犁前面浇水冻冰，作为屏障，边打边叫。城内西、北两面的士兵坚守阵地，奋力抵抗。一时间，城内和城外喊声连天，叫喊声和枪弹声交织在一起。激战一夜，匪队死伤数人，攻城不下，退回原处。但是，小白龙围困佳木斯镇，并未就此罢手。

19日，桦川县保卫团派一甲长带9名团丁前来支援。20日，保卫团团总带团丁19人前来助战。同日，小白龙又带领匪队攻打沿江各粮栈，被保卫团和商团打退。21日，县长到佳木斯镇督战，小白龙又来攻城，激战一夜。23日深夜1点钟，匪队身披白布，在雪地里匍匐前进，攻打西门和西北门，被守城的警、团发现，向匪队猛烈射击。匪队多次攻城不下，终于撤退。天明后，守城的警、团发现匪队各卡炊烟已断，派人打探，才知小白龙匪队已经撤到江北去了。

小白龙围攻佳木斯镇，从12月14日到23日昼夜吃紧。匪队被击毙数人，警、团死2人。双方伤亡虽然不重，但给镇内外居民生活带来很大损失，商店停业，学校停课，工人无处做工，还有4名学生被匪队绑架。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张学良怒铡老占东

李春科口述　胡光　于全整理

我是学中医的。民国9年(1920年),我买进了500来元(现大洋)的中草药,打算在阴历十月初一正式开业。不料头一天晚上"老占东"这伙人就进了佳木斯城,所以,我对这个日子记得很清楚。至今有63年了。

老占东本姓孙,是个山东人,五十六七岁,还有一身武艺。他从东满(珲春)带了300多人(其中约有七八个白俄),与盘踞在富锦的土匪"镇中华"纠合在一起,在挠力河畔烟沟里种大烟。老占东当把头。不论清政府也好,张作霖时代也好,口头都说"禁烟",可是因为钱毛,他们抽捐、要税都要大烟,或者以大烟价做为捐税的标准,所以,种大烟是官准的。当时饶河、密山一带烟土好,"下江土、原浆货"是深受官方和瘾者欢迎的上品。民国9年,老占东招了一些人种了好多垧大烟,又遇上一个风调雨顺的年头,眼看烟地里万紫千红罂粟花开,老占东喜不自胜,组成了几十把烟刀(一把烟刀两个人,一人在前割烟桃,一个在后面抹浆)准备收割。

正在这时,忽然开来一支军队,他们是驻防在依兰一带李少白旅长的部下,声称为了禁烟才来此地。其实,禁烟是假,勒大脖子是真,只要认头,多给他们好处啥事也没有。但是他们谈崩了。于是这支军队就用镰刀把眼看要收割的大烟桃全部给刷光了,而其他烟沟的大烟照旧收割。一年辛苦落场空,老占东这伙人急了,就在饶河一带闹了起来,打家劫舍,还攻下了几个镇子,最后占据了密

山。老占东被举为"当家的"，镇中华是"二当家的"，"搬舵"是叫"五洋"的人。

老占东占据密山后，听说割他们烟桃的军队在佳木斯驻扎，为了报仇，决定攻打佳木斯，并派了心腹人到佳木斯刺探。据探子向老占东报告说：当时佳木斯防备不严，守城门的士兵倒背着枪，探子进城根本没有被发现。佳木斯有军队400人左右，由悦来镇派来的守兵100人，警察120人，商团180人；并说佳木斯很有钱，还有大银（指银元）；城门比较坚固，但城墙不高，四角是土造的4个炮台，炮台里每天晚上有四五名商团看守着，看守人员晚上经常要钱；炮台下有壕沟（护城河），人能爬到炮台上去。老占东听了后喜出望外，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镇中华也主张非攻打佳木斯不可，搬舵五洋出主意，要打佳木斯得把正规军诱出城外，减少阻力才能攻打。他们经过一番研究，在晚秋的一天，老占东这伙人便向佳木斯进发了。

当时佳木斯，是由吉林省依兰镇守备师李少白旅孙华堂营驻守。李少白是个白面书生，外表不象个军人。他对密山窜来的老占东这伙人很警惕。当听到老占东已经出发来攻打佳木斯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他分析老占东这伙人至少得三四天才能到佳木斯，因此，一方面命令孙营长出击堵截，另一方面命令韩营长率300人迂回抄老占东的后路。老占东探到李旅的行动计划，遂伪称李旅的军队，转走小路，疾行猛进，日夜兼程，终于在9月20日傍晚，到达佳木斯城南的陆家岗一带（陆家岗位于现佳木斯东南岗之南约3里的地方）。

当时商务会长曲子明每天晚上都带着商团巡逻一圈，这天晚上曲子明照旧巡逻了一圈，没发现异常，便回家睡觉去了。当天晚上是个阴天，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这就给老占东攻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11点钟左右，老占东领着十匪分路向城里进攻了。这时东南门守炮台的几个商团士兵正在玩纸牌。土匪爬上来他们

根本没有发觉，当枪口指在他们脑瓜门上时，报警已经晚了。东南炮台失守后城门被打开，老占东率领着大队人马进城了。这时曲子明正在睡大觉，听到枪响后从床上爬起来，飞身走出房间集合商团队伍，但外边已经火光冲天，枪声密集了。老占东的人攻下东南门，进城后先点燃几家干柴垛，然后高声喊话，叫人们不要害怕，说："我们绝不杀人，谁要是乱喊乱叫就打死谁！"这时商团和警察们已经从西门和西北门撤走了。一部分撤到西门外永胜泉田家烧锅和老徐家两个大院里，一部分撤到江沿同源德粮栈的大院里。这时已是凌晨3点多钟。城内只有西南炮台没有攻下来，其他各门都由老占东派人把守着。当夜进城的有七八百土匪，第二天又有几百人坐着大马爬犁进城。

孙营长听说老占东已经攻进城了，便率领堵截的队伍飞马返回佳木斯，但已经进不去城了，只好以永胜泉田家烧锅当做指挥部，以江沿同源德粮栈为进攻的前哨阵地，向城里发起了猛攻。由于老占东的两挺机关枪很厉害，双方打得非常激烈，一直没有攻下来。

大当家的老占东、二当家的镇中华和军师五洋等住在永春源商店的楼上，指挥所也设在这里。三当家的"托天"和"粮台"、"炮台"等四梁八柱住在同义德商店，后勤部也设在这里。其他一些人都找了一些富户、商店住下了。然后，他们便开始洗劫商店、富户，抢居民东西了，他们把这叫做"下底"。但不准个人"下底"，至少得一二十人一伙，他们不许奸污妇女，不许随便杀人，有几个奸污妇女的土匪，都被抓起来枪毙了。

城里闹成这个样子，我的药铺也开不成了，大量中草药都放置在家中。因为这伙人常年在外流窜有不少得病的，有患伤寒的，有患疹子的，感冒的更多，每天都有几伙找我看病的，抓药不给钱还得说好听的，稍有怠慢马上翻脸。我记得，住在西南门里有个叫李玉田的中医，因为找他看病，他不痛快，就被绑上，吊在西南门里一

个洛子园的梁上痛打一顿，多少天不能行动。找你出去看病你就得马上跟着走，不看病的进屋就翻箱倒柜，什么好就拿什么。

城里的商店、住户几乎都被洗劫过，已经到了十室九空的程度。他们抢到大宗的东西，如金银、绸缎、烟土、布匹等归"公"，由"粮台"派人看管；小的如衣服、鞋帽及小的金银首饰，谁抢到就为谁所有。这样他们的穿戴在进城之后，来了一次普遍的更新，个个穿得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把女人的花衣服穿在里面，外面再套别的颜色的衣服；有穿皮大氅的，有穿皮大袄的，有穿长袍马褂的；头上的帽子有貉壳的，有狐狸皮的，有毡帽头，还有缎子面帽头顶上带个红色帽疙瘩的……五颜六色，千奇百怪，乍看起来真象正月间大秧歌队。东西抢多了又没有地方放，所以抢到新的扔了旧的，这些东西就被要饭的拣去了，往年这些乞丐都穿麻袋片过冬，这下子他们也有穿的了。

老占东和镇中华也常在街上露面，查看他们的巡逻队，查看他们的人有没有随便杀人或强奸妇女的。老占东长得瘦小枯干，身穿青面旧皮袄，腰间扎个兰布带，一枝七星子手枪别在布带上，头戴一顶酱色毡子的四开扇狗皮帽头，腰上还挂着一个鹿皮烟荷包，里面插着一个半尺长的旱烟袋，脚上蹬着皮靰鞡，腿上穿着鹿皮套裤，看起来象个庄稼老头。与老占东相反，镇中华40多岁，四方大脸，膀大腰圆，头戴貉壳帽子，身穿皮大氅，脚下是一双"趟趟马"，腰间别着一支长苗大镜面匣枪，他是"跑老客"(行商)的出身，显得挺神气。

这时全城只有西南炮台未被老占东攻下。守西南炮台的商团分队长名叫李德宝，30多岁，长得墩墩实实，有一手好枪法。西南炮台的附近没有多少人家，都是菜地，是一个没有什么可做掩体的开阔地带。因为老占东的人无法靠拢，这里的居民没遭到抢劫，所以他们支持这个炮台的抵抗行动。

老占东的人为了攻下这个炮台，就在城里抓了百十来人在前

头，老占东的人在后面督队前进，打算接近这座炮台。结果炮台照旧开枪，打伤不少无辜的老百姓。“卢家枪炉”的卢老二就当场被打死。

老占东与城外的孙营长、曲子明等对峙了 5 天之后，双方互通信使，协商退出城去的条件。老占东提出：“如果你们能拿出 100 万元（现大洋）我们马上就撤走。”但是佳木斯当时没有这么多钱，就是福丰号和福顺恒各有一笔钱已经送到鹤岗煤矿去了，而在佳木斯市面上流通的是由商务会发的纸币。老占东一看弄不出更多的现大洋了，就准备绑票，抓福丰号东家刘德林的儿子刘奎元当人质。但是去到刘家绑票的人被刘德林开枪击毙 3 人，然后刘德林也逃匿了。老占东火了，扬言要血洗了这座小城。

这时在佳木斯有一个孟监督叫孟颁平，原是富锦县知事，与镇中华是同乡，李少白便派他从中斡旋，说降老占东，答应让老占东当营长，并向奉天张作霖打报告，希望尽快回电，允许这些人归顺。过了 20 天左右，帅府复电，大意说你们要停止战斗，同意收编这支队伍，并任命老占东、镇中华为营长职务，其他人担任连、排长，士兵们收编后给发武器和装备，你们尽快把花名册和武器数报上来。不久奉军派张作霖卫队团长外号叫“郭鬼子”的郭松龄来到佳木斯。郭以上司的资格训斥了失地有责的李少白旅长。以后奉军又派密使，带着张学良的密信来见郭松龄，命令郭松龄设法诱擒老占东等人。因此，郭松龄找到了吉军营长王永清。王永清也曾在下江一带啸聚山林，报字“天下好”，打家劫舍闹了几年，后来受降于吉军，当上了营长。他不仅有一手扬臂打飞鸟的好枪法，而且胆大多谋，善于词令。

第二天，围城的官兵都撤出一定的距离，王永清匹马单枪来到东城门外喊话，他对城上守卒说：“我是天下好，请你们大当家的老占东上前搭话。”老占东等人一听就猜到了天下好的来意，几个当家的一合计，决定放他进城。

王永清进城后马上与老占东等人称兄道弟，意恳词卑。说到归顺为良时，王永清以自身为例说："当上官，将来还有上升之望，这是封妻荫子的好机会。"又说，当时的张作霖、张宗昌、汤玉麟……都是绿林出身。王永清的话，弄得老占东内部有的要战，有的要降。小商人出身的二当家的镇中华是个主降派；三当家的托天和搬舵不相信王永清的花言巧语，是主战派；大当家的老占东因为自己年岁大，对当官不抱希望，处于战降两可之间。

王永清几次进出城，往来传递双方的意思，城外官兵不再攻城，呈现一种和平解决的气象。最后谈妥了条件，王永清向老占东等人说："兄弟把当家的意思转告给郭团长了，同意把你们的人编成两个营，由大当家、二当家的担任营长。兄弟是一手托两家，为了不落埋怨，你们双方应该当面鼓、对面锣明侃。郭团长也同意会会面，商谈一下你们今后的驻地。"很多人都信已为真，独有托天和五洋不信，所以托天、五洋在城内守城。老占东、镇中华率领二十几名全副武装的人随王永清来到了东北门外松花江边上的同源德粮栈大院。

老占东等人由郭松龄出面招待，一些随从人员由郭的下级军官相陪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宾主经过一番客套寒暄，老占东等人逐渐消除了戒备。这时王永清又谈到归顺的好处，他说："咱们当胡子的就是为了当官，你们看我……"说话间，他两手同时拍了一下小肚子，就势从腰间抽出两枝叫起大狗的匣枪，两枝枪的枪口紧紧对着老占东和镇中华。几乎在同时，郭松龄也亮出了手枪，等老占东等人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缴械了。在另一间房子里，老占东的随从人员也被缴械了。

老占东、镇中华等人被擒的消息很快传开。留在城里的托天、五洋等人已经知道出事，他们一方面组织抵抗，一方面大举报复，到处杀人放火。城内一片火光，杀声震地，炮火连天。

官兵们连续攻城两天两夜，还是无法越过城壕。这时已到冬月

了，四周的城壕被浇上了水结成厚厚的冰，明光镜亮，无法越过。一个叫纪永亮的人向官军献计，出了攻城之策。

纪永亮是在松花江边扛脚行的。他是山东人，30岁左右。见这两伙人这样混战，倒霉的是老百姓，再这样下去是不堪设想的。因此，他向官兵提出破城的办法。他说，东北炮台外有几幢小房，此时无人居住。江边有跳板，应该用这几幢小房掩护把跳板顺到城壕里，人随跳板下壕，再把跳板搭在城壕里侧，这样人就可以越过城壕了。

郭松龄认为这个计策很好，于是命令官兵作侧面佯攻，吸引炮台里的火力。纪永亮一马当先扛着跳板向小房移动，一些扛着跳板的士兵陆续跟上……以后很顺利地越过了城壕。把守在东北炮台的二十几名老占东的人都被打死在里边。东北炮台拿下来了，东北门也打开了。城内土匪抵抗不住，向西北门逃窜。托天这一伙人绑了4名人票，其中就有福顺恒的柜伙邹井伍，过西北门桥时邹假装跌倒滚入桥下得以逃生。托天这伙人向梧桐河金矿方向逃走了。

城里的商民日夜盼望官军进城以解倒悬之苦，不料官军进城后，首先把老占东这伙抢劫来还没有来得及拿走的财物看管起来，老占东进城把抢到的大宗东西都集中在"永春源"和"同义德"两处。官军把这些东西当做战利品归军方所有，然后下令进城的官兵可以从进城时起，抢到太阳出来。于是进城的官军到处抓人伕为他们抬扛抢到的东西。

在官军围攻佳木斯以后不久，少帅张学良即乘火车从奉天出发，到哈尔宾改乘汽车用3天时间到达佳木斯。这时正是民国9年(1920年)旧历十一月十日，收复佳木斯城的第二天。张学良感到环境危险，严加警戒，不准举行欢迎仪式。他们一行从西门进入佳木斯城，然后在西门里正大街路北鹤岗煤矿佳木斯办事处停留，并在这里接见了桦川县商务会长曲子明和对收复佳木斯城有功的王永清营长等。

十一月初十日，军队贴出布告，宣布对老占东、镇中华就地正法。这天下午，佳木斯最热闹的地方北市场新天地戒备森严，周围挤满了人，两把大铡刀平放在祭坛上。老占东、镇中华被押上了刑场。老占东仰着脸，对周围的人说："你们听着，我是受了你们骗了，我最糟糕的是听了你们这些混帐东西的话，等我到阴曹地府当官了，非把你们抓去不可……"这时人群骚动了一下，闪出了一条道来，郭松龄陪着一个大高个、仪表堂堂的年仅 20 来岁的高级军官模样的人来到刑场中间的祭坛前，这人就是张学良。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然后指着老占东说："你就是土匪头子老占东吗？"老占东这时满脸怒气地说："我是土匪你是啥？你是土匪崽子！"张学良怒火中烧，大声说："铡了他！"这时两名刽子手分别把老占东和镇中华掖在了铡刀的下边，只听喀嚓一声，镇中华的头滚了下来；但老占东的头铡不下来，刽子手立即用麻绳把一捆秫秸绑在他的脖颈上，把老占东的头铡了下来。然后由郭松龄布置，把老占东、镇中华的头和心摆在祭坛上，祭奠阵亡官兵。张学良面对官兵，朗读了张作霖写的祭文。而后，老占东和镇中华的头分别用木笼装着，挂在东、西城门楼上示众。

老占东这伙人从十月初一半夜进城，到十一月初八半夜被打出去，共在佳木斯城盘踞掠夺了 38 天之久。他们的人被打死 300 来人，城里居民百姓也死了几十人，伤的无法计算。吉军的汤营长战死在西北门外，士兵也死伤很多。全城商民经过这两伙人反复洗劫只落得十室九空，经营多年的永春源在这次兵灾后倒闭了，其他商号都遭到了惨重损失。在炮击、火烧破坏下，到处房倒屋塌，一片瓦砾。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女匪驼龙与兵打乱石山

陶中孝　刘山口述　万家明　邵学友整理

1923年在德惠县万宝镇曾发生过一起震动全县的剿匪事件——兵打乱石山。

乱石山在万宝镇善人屯的北面，山不算高，东西而卧。屯西头有条沟子，每当暴雨倾泼的时候，常从山上冲进沟里一些石头来。因此，人们便把此山叫做乱石山。兵打乱石山，是指长春保安队击毙“仁义军”匪首大龙的那场战斗。以后“仁义军”匪首就是女匪“驼龙”，曾为著名的绺子。

据传说，女匪驼龙，原名张素贞，系辽宁省辽阳县人。自幼家境贫寒，母亲先亡，父女二人，相依为命，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由于张素贞生逢乱世，加之年幼无知，不幸被坏人拐骗到长春，卖入妓院，落进烟花，沦为妓女。她当时只有十六七岁，本是良家儿女，对黑暗的旧社会非常仇视，极力想逃出火坑，企图报仇。

她在妓院里结识了仁义军的匪首大龙，俩人情投意合，订为终身，大龙用高价将张素贞从妓院赎出。从此，张素贞与大龙成为夫妻，并随大龙参加了土匪绺子，率匪2000余众，经常活动于滨江道属五常、榆树、双城等县。一直到1923年大龙在攻打德惠县万宝镇善人屯纪家大院时，被长春县保安队击毙后，张素贞便自任土匪大当家的并报号“驼龙”。因其枪法较好，又有“双枪驼龙”之称。不久其匪队被击溃，驼龙无奈又隐匿于娼门。因驼龙

这伙土匪，无恶不作，老百姓恨之入骨，所以官府悬赏，捉拿驼龙，于1925年在公主岭妓院被擒，同年1月在长春被处决，年仅24岁。

兵打乱石山的时间是1923年的阴历八月二十五日。清晨4点多钟，天还黑咕隆咚的，便从乱石山善人屯屯西进来一伙土匪，共有100多人。由“仁义军”匪首大龙率“爱国”、“九龙”等几个绺子土匪直奔屯中摸来。当时正是深秋大忙季节，东毛家沟有个农民叫赵普，赶车上西刘家窝堡去拉地，当他赶车走到善人屯屯西的时候，迎面碰上了这伙土匪。赵普见事不好，急忙赶着大车顺着屯后的大道往回跑。胡子假装追撵赵普的大车，紧紧跟在后面，进了屯子。胡子过了护村壕，屯里地主纪家大院发觉了胡子不是追撵大车，而是来打窑的，便向胡子开了枪。胡子一边还击，一边破口大骂，说是借道走走，等抓住你们非把狗崽子的嘎拉哈摘出来。老纪家西面是张凤和老黄家，这两家窑小，被胡子几枪就打进去了。胡子进屯的时候，屯里有的人正在山上割地，有些人听说来了胡子都吓跑了。没有跑出去的，都被胡子赶到张凤和老黄家，叫他们烧水做饭。

胡子这次进善人屯，是来打纪家窑的。老纪家是善人屯最大的地主，自己不种地，依靠土地出租，坐地分成。老纪家的院套很大，分为老院和二院，是座连环窑。住在老院的哥俩，当家的叫纪惠文；住在二院的也是哥俩，当家的叫纪炳文，外号“纪花脸子”，枪法很准。纪惠文和纪炳文系亲叔伯兄弟。老纪家常年雇佣着打杂的、小猪倌和大师傅，并建立了地方保卫组织，叫做大排，共有20多人，使用快枪，还有手榴弹等，为纪家日夜防守护院。大排的头子叫甲长，当时任甲长的叫孙向廷，因为讲话总好摆手，人送外号“孙老摆”。纪家大院的院墙一丈多高，墙顶上带垛头子，院墙都是用草辫子裹大泥垒起来的，比较坚实。大院的四角都修有炮台，并架设着台枪（一种比洋炮大些的火药枪），紧

贴院墙内堆放着树枝子，里边暗下带弦地枪，碰一下就响。为防备胡子打窑，绑票，老纪家做了各种准备，还把砖用煤油浸了，一旦夜间有事，用火点着仍在外面照亮以便防守。

由于胡子是几个绺子汇合起来的，人多势猛，很快就占据了屯中的各家各户，包围了纪家大院，使其成了一座只能困守的孤窑。胡子使的全是清一色快枪，他们把临近人家的墙头、房山抠开做枪眼，向纪家大院射击。老纪家嫌老陶家的房遮挡眼目，有碍防守，就在箭上绑了棉花，蘸上煤油，用火点着，把老陶家的房子射着了。因为老陶家的房子离老纪家的房子较近，因此，纪惠文家的5间厢房也被烧了。胡子一边打，一边呼喊着，以壮声威。有些冲到院墙下面，抠开了一截墙，打进了院里。就在这时，他们碰上了暗弦，下在树枝子里面的地枪响了，再加上院里的火力很猛，进了院的胡子又被打了出来。就这样，胡子在明处，老纪家在暗处，从日头一出来，一直打到晌午歪，也没攻下纪家大院，胡子很恼火。原来“搬舵”先生搬道时，定的是半夜子时打善人屯，不知是什么原因来晚了，眼瞅着这种费劲难打的局面，胡子都嘟嘟囔囔地发泄着不满。有个胡子头来找大龙，大龙正跟老婆驼龙在张凤家抽大烟。大龙一听，拎枪就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大龙负了重伤被人背了回来。

这时，长春的保安队，足有一连人，跑步赶来了（一种说法是老纪家在长春有人，调来了保安队；另一种说法是保安队闻讯赶到的）。保安队在屯西稍稍停了下，等拉在后面的人到齐了，整理下队伍，一齐攻进了善人屯。保安队在外面打，老纪家在里面打，把胡子夹在当中，使他们腹背受敌，形成了内外夹攻之势。不到半个钟头，胡子伤亡惨重，渐渐支持不住，便骑上马突围了。临撤时，他们把负了伤的大龙放到马上。还没等突围，大龙就咽了气，只好把他扔在南大洼的九桔坟，慌忙往西南逃窜了。保安队在屯里没有站脚，顺着胡子的逃路，在后面紧紧追赶。追出不远，

便转回长春去了。驼龙领着败兵跑到吴家窑，才稳住了神儿，摆设香案，成捆儿地烧香，哭喊起大龙来。

乱石山这一仗，胡子被打死20多人，连胡子头大龙在内，统统都被保安队剁了脑袋，拿到长春做为凭证，领取子弹去了。善人屯只死了3个人：老陶太太，张大神的老儿子，还有大榆树的一个人。大排的甲长“孙老摆”被打掉了一个指头。事后，光子弹壳就拣了几箱子，可见这一仗是何等激烈！

自从这一仗后，善人屯的南面虽然还时常过胡子，但是，因为胡子在此惨败，又被打死了匪首大龙，有些忌讳，一直再没来打过。

（吉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刀砍大窝主杨玉树

王喜荣

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东北义和团掀起了反帝斗争，六月十三日伊通天主教堂被义和团焚毁。久有吞并中国东北野心的沙俄，以保护铁路为名，悍然派遣几十万俄军入侵东北。伊通州境内有从京师（北京）经盛京（沈阳）至吉林乌拉的驿道。这条贯穿全州的大驿路长达255里，是州内交通的大动脉。沙俄侵略军入侵黑龙江省后，便分兵南下，伊通境内大驿路，成为他们侵入吉林的重要通道。侵略军所到之处刀光剑影，烧杀掠抢，黎民百姓遭到痛苦的蹂躏。

在国难当头之际，一些溃军游勇聚集州南，由兵变匪。一些匪盗也乘机蜂起。在全州境内就有“占西山”、“大五轮子”、“钻天鹞子”、“唧唧嗄”、“冯老俩”、“十四阎王”、“孤雁”、“大金字”、“小金字”、“占中花”、“思强”、“海北”、“石兰芝”等几十股胡匪。他们同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勾结在一起，到处打家劫舍，胡作非为，残害百姓。那时真是“有钱的怕绑，有姑娘的怕抢，走路怕劫，出门怕攮。”当时流行着：“大孤山的胡子，小孤山的贼，赫尔苏的窝主谁也别说谁。”闹的全州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伊通知州朱兆槐对匪情、匪患束手无策，他虽曾派遣捕盗营剿匪，可是无济于事，匪警有增无减。佐领富勒吉扬阿、保英阿等人，也是畏匪如鼠，闭门不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吉林巨商牛子厚（外号牛犊

子）派大车去盛京办年货。货车行至伊通州境内火石岭子时，被胡匪抢劫。车上的货物几乎被抢掠一空，损失严重。胡匪把抢去的赃物除分掉一部分外，剩下的东西都窝藏在窝主杨玉树家，以便日后分掉。

杨玉树是何许人也？若提起他的名讳，在伊通州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家在州北勒克山（乐山）的杨家屯，是个秀才出身，行四，人称杨四爷。他家财豪富，在伊通街有买卖当铺，在勒克山一带土地连片，有财有势，在州里横行霸道，与官私两厢都吃的开。他进出州里东西衙门（东衙门是佐领衙门，西衙门为知州衙门）象走平道一样，就连知州都惧他三分。胡匪十四阎王、占西山、孤雁等绺子也与他公开来往。匪首占中花认他为干佬。他是这些胡匪的大窝主、大靠山。沙俄入侵伊通后，在州城西大岭驻一营沙俄侵略军。他通过其盟兄、俄军的通事王子厚结交驻伊通俄军总管毕全克，跟侵略者眉来眼去。人们说杨玉树要在勒克山一跺脚，伊通州也要颤三颤。

牛子厚货物在伊通州被劫后，便写封状纸，上告到省城。吉林将军长顺接到状纸后，深知伊通匪情严重，豪绅作恶，民遭涂炭，经过再三斟酌，决定派统领诚明到伊通剿匪。诚明在此之前曾到伊通剿过匪，在追剿孤雁绺子时，孤雁走投无路，子弹已经告罄。可是追到勒克山，杨玉树却暗中供应胡匪子弹，使官兵受挫，剿匪失败，诚明无奈返回吉林。这次诚明接到军令后暗想，要解除伊通匪患，必须先砍倒杨玉树。于是他向吉林将军长顺讨下了先斩后奏的号令，率领本部人马来到伊通州。

诚明到伊通后，把公馆设在州里最大的当铺德兴当。州里老百姓听说诚明又来伊通剿匪，都奔走相告。一些被胡匪糟塌的老百姓，纷纷到德兴当申冤告状。从勒克山来一位张老太太，状告杨玉树，说杨玉树的干儿子占中花抢去了他的女儿，窝藏在杨玉树家。他的丈夫前去要人，被占中花枪杀在勒克山西沟里。说完，

哭得死去活来，从包袱里拿出血衣，叫诚明察看。张老太太走后，诚明派出的暗探回来禀报，说老牛家的货物确实藏在杨玉树家，还有数名土匪在那里“趴风”。诚明为了获得真赃实据，再次派人去勒克山两半屯和小西沟查访。

经过一段明察暗访，诚明掌握了杨玉树的罪行材料，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派一营管带哈金奎去勒克山捉拿杨玉树。哈金奎带领人马到了两半屯，没有捉到杨玉树，却在他家搜出了几名土匪和一名民女，起出大量赃物，他急忙率领人马赶回伊通，准备追捕杨玉树。

杨玉树在这前几天，正带着两房老婆坐着小车子来到伊通街南王家屯，去拜访他的盟兄王子厚，还到街上料理一下自家的买卖和当铺。他想逛逛灯花节再回勒克山。这天，他正同王子厚和几名绅士打麻将。玩的兴头正浓，忽然衙东门的捕班班头慌慌张张来报：“四爷，大事不好，听说诚统领正派人拿你！”杨玉树暗暗吃惊，一打听才知道火石岭子案件犯了事。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案件的底细，劝他躲避一下。杨玉树说：“诚明早就想锯倒我这棵树，可他没有真赃实据，定不了罪，不用躲避，看他把我杨四爷怎样！”经大家再三相劝，他才同意先去大孤山，再去半拉门躲避。临行时，他又同王子厚和几名绅士策划一番，说他如有牢狱之灾，请设法搭救。嘱托完毕，翻身上马，带着大老婆、小老婆，从王家屯路经州城南门，往西门走去。

杨玉树的车马刚到西门，正巧哈管带率领一彪人马，烟尘滚滚地从勒克山回来。哈管带追捕杨玉树心切，差点没同杨玉树的马头相撞。他勒住战马一瞧是杨玉树，急忙甩蹬离鞍下马，双手抱拳微笑道：“下官奉诚大人之命，去请四爷，幸好路遇，请四爷光临。”杨玉树心里明白，催动坐马想要脱身：“请管带回禀大人，等过完元宵节定去拜访。”说完扬鞭打马想要溜走。哈管带命军卒拦住马头道：“杨玉树你走不了啦，有人告你，诚大人传你归案。”

这时几名军卒将他围上，杨玉树心想，他一个小小统领能把我怎样，去去何妨！于是他把妻室打发回家，随着哈金奎来到了德兴当。

诚明听说捕到了杨玉树，在他家起出了赃物，搜出胡匪和民女，就吩咐把土匪带到大堂。经审讯，胡匪供认他们有的是绺子上的二柜，有的是水香，有的是炮头，都是胡匪中的“四梁八柱”，有一名参与了火石岭子的抢劫案。诚明叫他们在供词上画了押，带下堂去。随后又把那名民女叫来审问，她哭述了被土匪抢劫的经过和在杨玉树家的不幸遭遇后，也被带下堂去。

杨玉树被三五军卒推到堂口，他见堂上坐着一位30多岁的武官，白净面皮，五短身材，浓眉下两道目光逼人，脸上有股刚毅的神色。他想这一定是诚明了。诚明往堂口一看，见杨玉树头戴貉壳帽子，身穿貉绒马褂，脖子上捂着一张火狐狸皮，脚上穿着趟头码子，好生气派，就故意问道：“你是杨玉树吗？”杨玉树心想：在伊通州谁不称我杨四爷，连县太爷也不敢提我名讳，你小小统领就这样放肆！他走到近前也不打躬施礼，拿着太爷的派头，眼皮往上一翻，只用鼻子哼了一声，诚明见他这副目中无人的架式，非常气恼，劈头问道：“杨玉树，你见到本官为何立而不跪？”杨玉树微微冷笑：“我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能跪你这个小小统领？”“杨玉树你可知罪？”诚明追问了一句。杨玉树把胸一挺：“我一不欠粮，二不欠草，是私的不吃，是官的不犯，何罪之有？”诚明被激得两眼冒火：“你强霸民女，残害百姓，隐藏胡匪，窝赃吃赃，难道不是犯罪？”“这是诬告，没凭没证岂能定罪！”杨玉树又顶了一句。

诚明心想，这小子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叫人把人证、物证带到大堂之上，同杨玉树对质。杨玉树一看铁案如山，如同凉水浇头，怀里抱冰，背后直冒冷气，两腿发颤，刹时矮了半截，但转念一想，我在伊通州是个头面人物，又有功名在身，闯过了多少

大风大浪，怎能让这小小泥潭把我陷住。于是了腆了腆胸脯，长了长精神，强词夺理地说道："诚明，上有吉林将军府，下有伊通州衙，我犯罪也犯不到你手里，看你把我怎样？"

诚明一听心头火起，命军卒把杨玉树绑在马桩子上，狠打40皮鞭，煞煞他的威风。这40皮鞭把杨玉树打的皮开肉绽，鲜血淋淋。谁知不仅没有打掉他的威风，他回到大堂反而破口大骂："诚明，你私设公堂，拷打功名之人，我要告你！"诚明喝道："你既然是功名之人，就更应该遵守王法，安分守已，为何胡作非为。别说你是个秀才，就是状元犯在我手里也决不轻饶。"杨玉树心想诚明不过是威吓他，不能把他怎样，就故意将了一军："诚明你好大胆，要想斩我，光走公文的毛头纸也得先买上二斤！"这一军，把诚明将的火冒三丈，"唰"地拔出一枝令箭说："吉林将军赐我三枝令箭你可知道？你仗着树大根深，我的刀砍不动你，你想错了。我斩你不用说买二斤毛头纸走公文，就连二指宽的纸条也不费。就地正法！"说完诚明传下军令，给杨玉树上了法绳，要推出西门问斩。

就在这时，一名哨官来报，说杨玉树的盟兄王子厚串通了侵占伊通的俄军总管毕全克，要派500俄军在西大岭劫法场。诚明怕与俄军发生争端，不好收场，就命令军卒把杨玉树推到东门外用刑。又一名哨官禀报说，杨玉树的干儿子占中花勾结占西山、大五轮子、钻天鹞子等绺子云集东门外，要劫法场。在哈金奎捉到杨玉树从西门往德兴当押解时，一些同杨玉树有交往的富商豪绅，在王子厚的串通和要挟下，都来到德兴当门前，保释杨玉树。他们当中有大财主王翼南、西烧锅赵掌柜、东轿房的刘小辫、西轿房的关子珍，就连东西衙门的一些地方官员也来说情。城里的一些市民听说要斩杨玉树也来观望，把个当铺门前围个水泄不通。

诚明一见西门外和东门外设不了法场，门前又来不少保人吵吵嚷嚷，闹的心烦意乱，在大堂上踱来踱去，心想对策。这时管

带哈金奎进来禀报："统领当铺前的保人要求见大人。"诚明一听保人要求见，计上心来，就对哈管带说，"哈金奎，你告诉那些保人，叫他们略等片刻，我就同他们面谈。"随即又向一名哨官吩咐说："你把杨玉树锁在当铺的号房子里，当铺的四周要加强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当铺。"诚明整理一下官服，带领哈金奎和两名随员走出大堂，来到了当铺门前。那些保人见诚明出来接见，都一窝蜂似地围拢上来，打躬施礼。一阵寒暄后，诚明抱拳当胸说："诸位父老乡亲，卑职奉吉林将军之命，来伊通剿匪，靖乡安民。杨玉树却通匪、济匪，伙同胡匪残害黎民，犯了大清律条，本应就地正法。但因诸位连名具保，暂且关押起来，待解到吉林后，听候将军发落，诸位请回吧。"众保人听后都半信半疑，窃窃私语，不肯离去。

诚明回到大堂，命一名哨官把杨玉树从号房子里提出来。这时杨玉树面如死灰，两眼发直，浑身发抖。诚明一挥手，急命军卒把杨玉树从德兴当后门推出问斩。几名军卒手执鬼头大刀，身披大红，把杨玉树推到铭记号后边的臭水泡子前，手起刀落，杨玉树一命呜呼。诚明验了首级后，命号兵鸣号。那时要斩人得先鸣号，后用刑。刚才诚明是施用缓兵计，假称把杨玉树解到吉林，听候将军发落，是怕同众保人纠缠不得脱身。

几把牛角号刹时呜呜地响成一片，震动了伊通城。当铺前的保人听了大惊失色，呆若木鸡；土豪劣绅听了胆战心惊，丧魂落魄；匪首匪徒听了如坐针毡，毛骨悚然；黎民百姓听了拍手称快，奔走相告，赞扬诚统领不畏强暴为民除害。

刀砍杨玉树的消息，象一阵风似地传遍了伊通州，景家台有个地头蛇叫景会，人称景老太爷，绰号叫"景秧子"，平日作恶多端，闻讯后，怕作刀下之鬼，就吞金自杀了。州里老百姓流传下一句话说诚统领"砍倒杨玉树，囤（吞）上一面井（景）。"在此前后，诚明又处死了石兰芝、占中花等匪首，解除了伊通的匪患，

才返回吉林。人们说树倒了，（指杨玉树），花落了（指占中花），枝干了（指石兰芝），诚大人回船厂了。

民国10年（1921年）秋，吉林省吉长镇守使耿玉田被免职后，诚明任吉长镇守使时，曾来伊通驻军。

（吉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千里追匪记

许长春

民国10年(1921年)12月19日,报字"南平"匪帮在匪首大柜陆云亭、二柜"五龙"的带领下,约150余名土匪盘踞在奉天省梨树县界郭家店附近。该处距伊通县四台子屯只有20余里,一旦窜入为害甚深。县公署根据情报,立即命令警察所所长张广成率保安游击警察马队、保卫第一步队各50名星夜驰往四台子防堵截击,并命令该区警察及附近保卫团队一起协防。正在布防时,23日,又获悉有马匪150余名,均着陆军服装,枪械整齐,由奉天省怀德县窜入伊通县境庙子沟地方,抢劫过往行人车辆的情报,随即飞令第三第六两区警察迎头剿击,防止窜扰,并飞调警察所长张广成前往援剿。第三区区分所长张任辰奉命率本区长警50名立即整队出发,驰往该处,探明土匪还没有逃走,考虑正面进击,兵单难以获胜,当即带长警绕到庙子沟北岭。该处四面皆山,颇占地势,警长将长警分踞三处山头。这时天已见明,远见该匪分为3大队向东奔窜,马队阵势整齐。警队攻其不备,迎头开枪,三面截击。只见有身穿军官服匪首数名,各持自来得枪,率土匪约五六十名,蜂拥直上,企图抢占山头,先后3次都被分所所长率警击退。这时警队与匪队彼此相距不过半里之遥,当即击伤匪首1名,中伤落马五六名,击毙匪马数匹。这时匪马队陡见纷乱,分所长率警奋力射击,积极进攻,拟夺取伤匪。土匪第二马队五六十名急驰前来应援,一面向警还击,一面将死伤各匪夺回(内有死者1名)。因匪强警弱,不便近剿,分

所所长率警退回山顶，三面兜击，匪不知警兵多少，不敢恋战，向西败退。分所长率警下山搜查获得十响枪1枝，杂色骡马17头、鞍子2盘、马搭子2个，口袋2条、药匣子2个、八门书8本，击毙匪马3匹、伤1匹。据侦探，土匪马队已逃至黄岭子地方，当所长率警追至太平沟，剿击1小时后，五、六两区援剿警队同时到达。这时土匪马队又向周户屯一带逃窜，天已黄昏，警方子弹已殆尽，未敢继续追击，收兵住宿。次日土匪挟持被绑去的"人票"和被抢去的枪械、衣物往奉天省东丰县境逃去。土匪此次窜扰绑去刘新泉、刘乃勋、刘桂岩、刘镜贤、高青显、刘富人等人票6名，抢劫刘新泉等23户枪械70杆、子弹5665粒、骡马15头、洋票2795元、衣饰杂物243件。

12月25日，警察所长张广成奉命会同驻伊通陆军骑兵团团长王俊臣所带领的炮手队20人和第六连连长范殿升、第八连连长马成龙带骑兵40名，连同警察马队保卫团步队各50名，共有马步军警察160余名，前来追剿南平匪帮。当南平匪帮进入东丰县境时，所长张广成考虑：匪既在伊通境内绑去人票，剿匪不分边域，自应越界追剿，救回人票，歼灭盗匪，便率队跟踪追至东丰县蛤蟆塘。张所长怕土匪逃遁，又飞调第一区分所所长唐惠林，四区派出所巡官祝景山各率警兵10余名，驰往助剿。军警联合星夜追剿至29日上午，追至磐石县东南50里杨家船口处，探悉土匪在附近东沟一带住宿，分住十六七户，东西延长八九里。土匪正在吃早饭时，警察所长张广成当即与王团长商议，决定立即督队进攻，以马队分两翼包围，步队在后兜击，派游击队队长孙长阁、保安马队长初林各带所部马队为右翼，由南岗一带包剿；王团长派范连长率所部骑兵从北岗后抄往东西一带堵击；王团长率炮手队和马连长所部为左翼，从北岗一带堵击；张所长率第一区分所长唐惠林、保卫第一队一分队长何毓珊、四区巡官祝景山各带所部从南北岗之间分别兜剿。布置妥当后，开始发起攻击。土匪负隅顽抗，开枪还击。土匪大都隐

身民房墙角处，分两伙抄袭军警两翼，土匪与军警队势均力敌。军警队勇猛进击，酣战达3小时之久，匪队未得超越。在枪林弹雨、冰天雪地中，军警队且攻且进，愈逼愈紧。这时，第一分所长唐惠林从山岗抄袭过来，见有一匪身穿陆军官服伏沟壑指挥众匪反攻，气势十分猖狂，料是副匪首五龙，便持枪射击，将其击伤，坠落沟底。警兵汪有臣奋勇进前夺取匪枪，潜伏在沟内的土匪连击数枪，将汪有臣击伤，分所长唐惠林当即还击，击伤匪兵一名，其余土匪纷纷退出沟外。在军警队救护伤兵之际，土匪将副匪首五龙尸体及伤匪抢回，用马及爬犁驮运逃走。匪势力渐不支，众匪纷纷向南岗败退。保安马队长初林也当场击毙土匪2名。马警初仪春、四区派出所步警寇德山因进前割取匪尸耳级均被击伤。在军警队抢救伤兵之际，土匪乘隙将击毙匪尸夺回，拖上爬犁向正北逃窜，又被王团长督率骑兵击退。张所长从西南兜剿甚紧，唐惠林何毓珊两队争先恐后攻击不停。土匪见势不妙，于是往东南一带夺路逃窜。张所长见土匪已冲出阵地，率领各队与范、马两连跟踪追击，直至小呼兰沟口见驮着五龙尸首的马断缰窜出匪队，被军警队将该尸夺获割取耳级。该匪被追至辉发江时，将爬犁上死尸3具填入冰眼。待军警赶到，尸首已被水冲没，军警随即过江，又追至桦甸县三四道沟、荒沟，众匪已窜入深山密林之中。这时天色昏黑，不便穷追，便收兵宿营。经核查，此仗军队击毙副匪首五龙及土匪3名，击伤土匪10余名，打下梨树、怀德、伊通各县人票10余名，获杂色枪5杆，获马5匹，骡1头，马爬犁3张，割取匪首五龙耳级一个。

军警队本应乘胜追击，将土匪全歼，但因人困马乏，子弹殆尽，出师日久，又因本县兵力空虚，蒙受土匪扰乱，边防吃紧，势不得不收兵。于是，便于民国11年1月4日回师。

此次警团会同陆军追剿南平匪，先后经过奉天省东丰、西安（辽源）、海龙和吉林省磐石等4县，匪踪飘忽不定，忽东忽西，或南或北，辗转莫测，按里程计算，不下八九百里。其间经过险要地点，

如蛤蚂塘、老貂洞、半拉川楼沟、橡子沟、车道沟、大小锅盔帽山、北石灰窑、细鳞河、石头河、富太河等处。土匪节节设卡，军警队步步猛追，过关夺隘，驰骋冰天雪地，出没于枪林弹雨，实属奋勇可嘉。虽然土匪未被全部歼灭，但大灭了土匪的嚣张气焰。

南平匪帮在伊通境内绑票和抢掠各户实物清单：

1、民户刘新泉家绑人票1名，套筒枪2杆，子弹1600粒，奉小洋750元，金手镯2个，现大洋35元，金耳环8付，麻花四幅棉被5床，银手镯3付零1支，德国缎夹裤2条，银牙签1付，青坎布棉裤4条，银扁方1支，白单裤5条，毛保大布4匹，青坎布羔皮袄1件，青大布半尺，俄国绒毡一条，青坎布男棉大袄4身，袜子4双，青坎布女大袄5件。

2. 民户刘乃勋家绑人票1名，套筒枪2杆，子弹800粒，洋毡3床，金钳子4付，金手镯3支，貂皮褂2件，貂皮袄1件，男衣20件，女衣15件。

3、民户刘桂岩家绑去人票1名，套筒枪1杆，子弹450粒，改造枪1杆，四幅被9床，洋毡3床，金钳子3付，普绒棉褥1床，男衣18件，女衣20件。

4、民户刘书严家，套筒枪2杆，子弹350粒，茶色莫本缎13尺，线缎青裤1条，奉票240元，金手镯5个，现洋10.5元，金钳子4付，铜币1.50元，貂皮袄1件，青裤缎女褂1件，镯皮貂1件，太西缎女褂1件，男袍褂2件，大布女衣15件，单袍褂2件，男女牙签2件，舒罗缎夹裤1件，太西缎夹裤1件，青霞缎棉褂1件。

5、民户刘宗勋家，套筒枪2杆，子弹525粒，浮物不计其数。

6、民户刘桂芬家，奉小洋180元，浮物不计其数。

7、民户刘桂春家，奉小洋120元，浮物不计其数。

8、民户刘镜贤家绑去人票1名，被褥5床，女衣12件，奉洋160元。

9、民户刘桂悦家，俄枪1枝，子弹400粒，奉小洋75元，女

布衣 14 件。

10、民户高青显家绑去人票 1 名，套筒枪 1 杆，子弹 240 粒，奉小洋 260 元，羊皮褂 4 件，貂皮褂 1 件，洋毡 5 床，马鞍 1 盘，衣服等物不计其数。

11、民户李春荣家，奉小洋 130 元，毛保大布 2 匹。

12、民户田永春家，青骗马 1 匹，兔灰骗马 1 匹，皮褥子 1 床。

13、民户张海家，羊皮褂子 2 件。

14、民户张卓家，青骡马 1 匹，青骗马 1 匹。

15、民户刘富家绑去人票 1 名，套筒枪 2 杆，子弹 700 粒。

16、民户刘桂香家套筒枪 2 杆，子弹 420 粒。

17、民户刘庆勋家，青骡马 1 匹，全鞍子 1 盘，奉小洋 120 元。

18、民户牛坤家，白骗马 1 匹，黑骡马 1 匹，皮马褂 1 件，奉票 142 元。

19、民户董富贵家青白色骡马 1 匹，唐黄色骗马 1 匹，奉票 240 元。

20、民户牛俊家，黄骗马 1 匹，红骡马 1 匹，奉票 135 元。

21、民户牛宝成家，红骗马 1 匹，黄骗马 1 匹，奉票 80 元。

22、民户李合家，黄骡马 1 匹，青骗马 1 匹，奉票 156 元，羊皮大氅 1 件。

23、民户徐庆常家套筒枪 1 杆，子弹 100 粒，俄子弹 80 粒，全军衣 3 套，毁坏俄枪 1 杆。

以上 23 户，共计被绑去人票 6 名，被抢去枪械 17 杆，子弹 5665 粒，骡马 15 头，洋票 2795 元，衣饰杂物 243 件。

（吉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深入匪巢改编“庄稼人”匪队

张瑞麟

1937年四·一五事件使哈尔滨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以后，我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我曾先后3次派人到海伦县、拜泉县、阿城县玉泉打石场和河北省交河县寻找党的组织，但都落了空。1940年农历六月的一天，我和常佐臣离开生活、战斗了8年的哈尔滨，徒步奔向肇东县方向，去寻找一支称做“庄稼人”的土匪队伍，意在深入匪巢，开展争取工作，使他们迷途知返，改邪归正，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一、找关系打入匪队

我离开哈尔滨，去庄稼人匪队做政治争取工作能否成功，还没有把握，因为我对这小股队伍的底细不清。庄稼人匪队的消息，是常佐臣听他的同乡王庆发说的。在一次闲谈中，王庆发说在离他家不远的肇东县南江沿一带，有一小股武装部队，他们也打日本鬼子，日军虽多次出动打他们，但由于这股小部队武器较好，打起仗来挺厉害，又加上神出鬼没，日本鬼子到底没治了他们。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常佐臣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以后，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当时就想到，这会不会是一支和主力失去联络的抗日队伍呢？如果真是那样可太好了，只要找到这支队伍就能找到党组织。可经过我和常佐臣仔细一分析，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小。

因为只要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就绝不会干抢劫、绑票这类土匪勾当。最后我们认为，这支队伍很可能是不甘心日寇统治，被逼上“梁山”的土匪队伍。如果是这种情况，这次政治争取工作便面临着很大危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民族解放事业，如能把这支土匪队伍争取教育过来，改编为抗日队伍，壮大抗日力量，别说去冒险，就是流血乃至牺牲，对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应该的、值得的。同时我也相信，即便是不折不扣的土匪，他总还是中国人。他们打日本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还具有民族的气节、进步的因素。只要对他们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讲清民族大义和亡国的利害，他们是会被感化、争取教育过来的。我又有1933年与曹国安、宋占祥一道在烟筒山发动伪军迫击炮连起义的经验，因此，当我和常佐臣最后商定冒险深入匪巢的时候，觉得心里有了底。

我们这次的行动，事前经过周密的分析，下定了决心，义无反顾。我和常佐臣说，不争取成功就不能回来。走前，我做了长期打算，用我做工挣的钱和在小鞋铺入的股金买了一些衣服、鞋袜和生活日用品，包了一大包子，随身带上。

为了避免在火车上被特务盯梢，我们决定不坐火车，徒步前去。出发那天，我俩起早在江北马家船口会合后，就直奔肇东县三站区南边的小蒋家围子，先去找王庆发。

到王庆发家，天已经大黑。常佐臣向王庆发夫妇介绍我是“老张大哥”。晚饭后，我们一起唠嗑，常佐臣有意把话题引到小股武装部队上来，以便进一步了解情况。王庆发说这小股武装队伍就是吃打饭的匪队（“吃打饭”是土匪行话，土匪的代名词）。这些人从前曾参加过各种杂牌“抗日”军，在家呆不下去，是被逼出来吃打饭的。现在大约有三四十人。由于他们的头头大掌柜号称“庄稼人”，“庄稼人”就成了这支匪队的代号，一提“庄稼人”，这一带的人都知道。

听了王庆发的介绍，我试探地问要找庄稼人匪队好不好找，并说我想去参加，不知能不能行。听说我也要去“吃打饭”，王庆发有些惊奇了。看他的神情，显然对我产生了怀疑。

我早就从常佐臣那里了解到，王庆发是一个普通农民，为人忠厚老成，他们是结拜盟兄弟，因此我并不担心王庆发会危害我。为了消除这位老实人的怀疑，使他能支持我，帮助我达到目的，我必须把实情告诉他。我说：我去找庄稼人，并不是真心去当土匪，危害百姓，发财致富，而是想做工作，团结、教育、争取他们一道投奔抗日队伍，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常佐臣也从旁边帮助解释。王庆发夫妇听后，如释重负，表示非常赞成，说这才是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干的事。他说他们这个屯子的刘家老三刘胜武就在庄稼人队伍里吃打饭，还是个小头目。刘老二和刘老疙瘩都还住在屯里，与刘胜武没断联系。我委托王庆发找刘家哥们儿给说说，希望通过他们给牵个线，并能带我们去找庄稼人。王庆发说这能办到。

第二天王庆发就去找刘老二，和刘老二一说便妥。王庆发领着他来见我和常佐臣，我把我的意图和想法又给他讲了一遍，顺便又向他宣传了一番抗日救国的道理。刘老二对我们说，胜武出去也是迫不得已。谁都知道吃打饭名声不好，说不定哪一天掉脑袋。这个世道反正不能安生，宁可吃打饭掉脑袋，也不能等着挨抓挨杀。胜武早就知道在那儿常混下去没有出路，想着另找条道。这次张大哥来，拉着他们走抗日道路，他准能愿意。明天我就去找胜武，你等着听信吧。

过了两天，刘老二果然高兴地回来了。他说经过刘胜武的活动，二掌柜宋志生（号“草上飞”）是没问题了，大掌柜也露了活口，希望我去面谈。我和常佐臣听了也很高兴。当天吃过晌饭，就背上衣服包，随刘老二一同上庄稼人匪队去了。

我们出了小蒋家围子，直奔南江沿，走了两个来小时，来到

松花江边一个秘密上船地点。在那里等了半小时左右，只见从江心岛树林边划过一只小船，划到我们跟前拢岸。我们上船后，划船人把我们带到江心岛上岸，然后穿越树林、草莽，来到丛林深处。那里搭了五六个草棚子，这就是庄稼人匪队的“营地”。

二、结拜盟兄弟，以退为进

我和常佐臣跟随刘老二直接来到二掌柜草上飞住的草棚里，先和草上飞见了面。随后“炮头”（即队长）“青山好”、“水香”（即司务长）刘胜武、“秧子房掌柜”（即专门看管被绑来的“票”的人）孙景彬，还有一个很年轻的人叫刘鹏飞（后来了解到他是从哈尔滨王岗日本航空队开小差出来的），陆续聚拢到二掌柜这个草棚里。

刘老二把我和常佐臣向他们一一做了介绍。大家寒暄了一阵子，我又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我说：“今天当着各位弟兄，咱们真人不说假话。我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人，因为执行任务，现在哈尔滨暂住。听说你们在这一带活动，今天我特意来拜访大家，和弟兄们共同商量抗日救国的大事。”说到这里，我察看了一下他们的情绪，看到他们听得都很认真，没有反感的表示，就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企图进一步侵吞全中国，讲到中华民族将要沦为奴隶、当牛做马的悲惨命运；从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分民族，不分信仰，团结起来，和日寇决战到底，把日寇赶出中国，才能解放全中华民族，讲到我们祖国和人民美好的未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过上自由、平等、幸福、愉快的新生活。我说：“现在有爱国觉悟的中国人，已经行动起来了。关里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的十一大抗日联军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同日寇和国内反动派进行着坚决的斗争。这

样的队伍，为祖国的解放而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打骂群众，因此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爱戴和拥护。我们每个参加这个队伍的人都感到前途无限光明，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也会留下光荣的一页。现在各位弟兄们吃打饭，东奔西跑，有家不能归，父母、妻儿离散，还要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增添痛苦，让人唾骂。走这条路前途暗淡、历史无光，对不起父老兄弟，也对不起子孙后代。就算是你们打鬼子，靠少数人，势单力孤，东捅一下，西捅一下，伤点皮毛，动不了筋骨，解决不了大问题。两相比较，我们为什么不走光明大道，非要往死胡同里走？”他们听我说的在理，都点头称是。这时二掌柜接上说：“吃打饭的都是穷人，有钱有势的人没有干这种遭罪又危险的事的。”

宋志生说完就出去了，过了好一阵子又回来，明显地表现出闷闷不乐。他把我叫出去，先是诚恳地表白他要走抗日道路，然后告诉我，大掌柜对我有些怀疑，不相信我真心要在这里“挂柱”。大掌柜说：“吃打饭的人没有不要东西不要钱的，不为钱财也罢，也没有带着东西（指我带来的衣物）来参加的。”大掌柜还对二掌柜说，要加小心，提防日本特务混进来。

大掌柜的态度使二掌柜很有些为难。我的心头也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此时我想的不是能不能在这里挂柱的问题，而是如果我被怀疑是日本特务，那就一下子把我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但是我没有惊慌、害怕，当初决定打入匪巢，已做了各种思想准备。我又冷静地分析了一下情况，我到庄稼人匪队后，所接触的人除了二掌柜以外，其他多是小头头，对我都表示有好感，也表示愿意走抗日救国的道路。二掌柜是匪队的的主要人物，他带来的武器比大掌柜的多，在弟兄们中间威望较高，大家愿意听他的话。他对我没有怀疑，对改编问题态度积极明朗。他不但可以影响大家，而且可以继续帮我做大掌柜的工作，保证我的安全。利用这些条件，做好工作，完全可以逢凶化吉，争取主动。

根据我过去所了解的情况，吃打饭的人，浪迹江湖，最重哥们儿义气。我拿定主意，在这关键时刻，抓住他们这个特点，提出和他们拜把子结为盟兄弟，靠这一招争取在这里先站住脚。

时间紧迫，在众目睽睽之下，没办法也没时间同常佐臣商量，我就拉着二掌柜又回到草棚里。我对大家说："我这次一心一意投奔各位弟兄，没有一点歹意，没想到大掌柜对我还不了解。看来我留在这里是不可能了。至于原来打算带弟兄们奔暗投明，共赴国难，眼下不行，就得往后搁一搁了。我这趟不算白来，有幸和弟兄们相识，交个朋友，一块商量抗日救国的大事，机会实在难得。这次我们虽然还不能走上一条抗日救国的道路，但我相信这是暂时的。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已经看出来各位弟兄都是有爱国心、有正义感、讲义气的人。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中，各位弟兄是不会眼看着亡国灭种的悲剧落到中华民族的头上而袖手旁观的。我们早晚会走到一起来的。只是希望大家要早走这一步，多做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的事情，不要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千古罪人。"我的一席话说得他们很受感动。我接着说："我这个人也很重感情。既然在这呆不下，就不必久留，明天我就回去。为了我们的友谊长存，我愿意就此机会同大家诚心结拜，建立生死之交。弟兄们愿意的话，就在此时此地进行。"在场的二掌柜草上飞、水香刘胜武、炮头青山好、秧子房掌柜孙景彬、刘鹏飞，还有刘老二，对我的提议，众口一词，完全同意，加上我和常佐臣，共计 8 个人，当即举行了结拜仪式。

我们来到草棚外边，有人用手在地上扒个土堆，把出岗放哨记时用的香找来一些点着，插在土堆上。然后大家面向南一字儿排开跪下。从我开始每个人都发了誓，表示今后我们都是手足兄弟，有福要同享，有难要同当，不能同生，情愿同死。我还特别强调说："咱们弟兄之间，谁如有一点坏心眼，就对不起枪（土匪认为枪是最神圣、最宝贵的。用枪发誓是最高的誓愿，最至诚的

态度)。”结拜后排行，青山好是大哥，我排行第六，大家亲昵地称我为老六，对我也更加随便、更加亲切了，还有人赞许地说：老六是最诚心诚意了。

三、慷慨解囊，站稳脚跟

大掌柜对我产生怀疑，还特别提到了我带的那包东西。说起这包东西，还是我和常佐臣离开哈尔滨以前想到的一个办法呢。当时我考虑，象庄稼人这样的小股匪队，远离城镇，在荒僻的草甸子里流窜，日常需用的衣服、鞋袜等日用品，他们依靠抢劫是可以解决的；而我们来是为了作政治争取工作的，又是共产党员，不能享受不义之财，既不能分东西，也不能分钱。于是买了那些东西，除准备以后自己用外，也可以根据需要送给别人一些。没想到这包东西给我带来了麻烦，对我下一步开展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我想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何不赶快把这个“包袱”甩掉，消除误会，进一步取得大家的好感，让他们出面把我挽留住呢？不然我真的就这样走了，或有其他情况，个人的安危并不重要，革命工作就要受到损失。

那天晚上，趁大家又凑到一起时，我对他们说：“我从哈尔滨出来时，带了一点生活用品。我要回去了，就分给大家做个纪念吧！”说完，我把我使用的一支钢笔送给了刘胜武，因为他是水香，记帐用得着；把怀表送给了青山好，他是炮头，也有用处；其他人每人分了一份衣物等。东西虽不多，但触动了大家的心怀，都认为我为人处事仗义。他们听说我要走，都不答应，有的说，你回哈尔滨也没有什么紧急的事，就在这多住些日子吧；有的说，你既来了，就挂柱别走了；也有的要找大掌柜说说。我顺水推舟地说：“弟兄们的厚意，实在盛情难却。我在哈尔滨也住够了，出来换换环境，多住几天也好。”二掌柜也明白我的意思，也说不让我

走。他一说话，事情就更好办了。就这样我便暂时留下了。

我虽然留下了，但要完成政治争取工作还需要时间，需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我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期间，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三棵树机车厂和道外小鞋铺两个党支部，还联系着一些进步群众。我离开哈尔滨，他们就失去了领导，长此下去，我党在哈尔滨的地下斗争必将蒙受严重损失。想来想去，在当时最好的办法是叫常佐臣回哈尔滨，把我原来的工作接下去。

常佐臣走后，我虽然还没有被大掌柜认可正式加入匪队，但呆得还比较自由，言谈、活动都很随便。因为宋志生在队伍中有威望、有影响，又比大掌柜对我友好，我就一方面积极和他靠近，进一步做他的工作，一方面和弟兄们建立感情。通过拉家常、谈向往，反复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大家对我越来越熟悉，渐渐地就不隔心了，啥都和我说。很短时间，我对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出身、经历、对抗日的态度，都了解得比较清楚。大掌柜对我，在感情上也比以前近了，见面常主动打招呼。

有一天晚上，住在南江沿一带的地主老财们，用小船载着猪肉、白面、烟、酒、大烟土等东西来送礼。二掌柜看这是个机会，就把他们先让进草棚，特意把我介绍给他们。然后把我来的经过、来以后的表现以及大掌柜对收留我还没有吐口等情况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到大掌柜面前给我做介绍人，从中说合一下。他们相信宋志生的话，都愿意帮这个忙。有人说，就是老六真把枪带走，我们也能赔得起。

地主老财的话还真起了作用，他们到大掌柜那谈了约半个小时就说好了，大掌柜明确表示态度说留我。他们回来后就吵吵嚷嚷地给我贺喜。按照土匪的规矩，每个人都得有一个号。他们也议论着要给我起一个。我赶忙说："不用再起了，我已经有个号，叫'瑞麟'"。老财们马上奉承地说："这个号好，瑞麟，麒麟献瑞嘛。"我现在这个名字就是从那时开始叫起来的。宋志生高兴的程

度不亚于我。他当时就把一枝三八大盖枪发给我，这是他自己的枪。在全队中也是比较好的一枝。

四、宣传抗日救国，扩大抗联影响

从此以后，我在庄稼人匪队中有了稳定的地位。为了工作有利，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严格要求自己，不做越格的事，以免授人以柄。我完全以自己人的身份，参与内部事务，发挥作用，树立威信。

在土匪队中，盛行着种种迷信规矩和不良习惯，我发现后，就找时机给他们指出来，劝他们改正。如土匪中有一套专用的黑话，人死了叫“睡了”，而管睡觉却叫“躺桥”；因为忌讳吃饭的饭字同犯罪的犯字同音，而管吃饭叫“啃富”；点灯不叫点灯，叫“上亮子”等等。我跟他们说：“这些话不象中国话，又不象外国话，说出来既不好听，别人也听不懂。咱们中国人就得说中国话，还是说大家都明白的日常用语好。”他们感到我说的有道理，就逐渐不再说那些黑话了。

放荡不羁的生活，使他们之中多数人染上了不良习惯，有人抽大烟、吸白面；有人作风不正派。我就从正面进行说服教育，指出吸大烟扎毒品对身心的危害。我还向他们宣传人民队伍的优良作风。我说：“我们抗日军队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解放人民。在抗日队伍里不准许存在这些不良习惯，不许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如果弟兄们想在将来参加抗日军队，就得从现在开始改正这些毛病。”他们对我说的这些话也很信服，有的戒了大烟，有恶劣行为的人也慢慢有所收敛。

入秋以后，大掌柜和二掌柜开始考虑队伍的冬季服装问题了。土匪中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头头说啥算啥，他们俩一捏点子，就决定了行动计划，别人谁也不知道。一天晚间，大掌柜、二掌柜

带领大家分乘四五只小船，到满洲一带，抢了蒙古屯蒙古保长和地主老财家的大批衣物，满载而归，由于路途远，天亮以前到不了家，为了不暴露目标，船队就在中途停下，把东西放到打鱼的网房子里，人员就地休息，等天黑再走。

对这些东西大家都很眼热，有些小头目更是急不可耐，不等回去，就把好的、适用的东西都给挑走了。大掌柜也挑选了狐狸皮袄、水獭皮帽子等贵重物品。这样一来，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发生了争吵。看那情形，这类问题不解决好，早晚得闹出大的事端，我该站出来说话了。我说："咱们大家谁也别吵。依我看，这些东西既是大家得来，就应大家公平合理的分配，有福同享嘛。谁认为好的就自己拿去，这样做不太合适。"接着我提出建议，将东西好次搭配，按人分堆，然后抓阄，分到啥算啥，愿意串换的自己串换。大家都认为这样办公平合理，分好分坏都没话说。大掌柜和小头头们不得不把拿去的东西都交了出来。

在分堆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不要算我的份，他们说啥也不依，非把我算上不可。等大家都抓完阄，把剩下的一堆还是给了我。我指着这堆东西说："这堆是我的，谁用谁就拿吧！"他们也不客气，衣服都挑走了。还剩下一部分毡子、被子、褥子等东西，我就都送给那位渔民了。

那位渔民也知道了我在抗日军中呆过，悄悄地跟我说："还是'红军'好啊！不拿群众的一点东西。"这位渔民有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他一定要我把这孩子带去参加抗日军，说把孩子交给我放心。处在当时情况，争取改编还没有眉目，我又不能把孩子带到匪队里去，我对他说："你热爱红军，革命也需要你的孩子。现在孩子还小，情况也不允许我带他。等我完成任务，有机会一定来带你的孩子。"后来，我找到了抗联十二支队，接受了新的任务。戎马倥偬，转战四方，始终没有机会重来"三肇"（肇东、肇州、肇源三县）地区，对渔民的承诺也就未能实现，想起来总感

到是一桩憾事。但是我相信，在革命的需要，时代的推动下，那位渔民的孩子一定会成为一名英勇的抗日战士。

在这里我还要提一提刘鹏飞这个青年。

我刚到庄稼人匪队时，看到刘鹏飞感到很奇怪，心想，这么年轻，怎么出来当土匪？后来在交谈中才得知他是被征当“国兵”，后又被派到日本航空队，因不堪虐待、凌辱，一气之下开了小差。刘鹏飞年轻，思想比较激进。我发现他愿意、也比较容易接受进步思想，就多和他接近、谈心，对他进行党的知识和抗日教育，使他逐渐成为促进匪队接受改编的骨干。我离开庄稼人匪队时，他已经成为我的仅次于宋志生的第二个可靠的朋友了。

庄稼人匪队被改编为抗日队伍后，我经过请示上级领导，又派他回哈尔滨做航空队的工作。以后，由于他的大力工作，终于策动了航空队 100 多人携械暴动，放火破坏了机场。暴动队伍在投奔抗日队伍的途中，遭到日军的追捕和残酷镇压，刘鹏飞不幸被捕，后被敌人活埋，壮烈牺牲。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却给日伪统治以很大震动，在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五、找到抗联十二支队，完成改编

9 月中旬，听群众传说，东北抗日联军有一支部队开到“三肇”地区，第一次战斗就将肇州县丰乐镇攻克。这个消息一传开，在庄稼人匪队中成了议论的中心。有的人认为这回投奔抗日军有了希望，高兴地翘首以待。我听到这个消息，比他们更加高兴。我为了寻找自己的队伍，寻找失去联系的党的组织，经过很多周折，这回找到抗联队伍，就能找到党的组织，同时改编庄稼人匪队的问题，也不再是遥遥无期的了。当时，匪队中绝大多数人是愿意改编的，少数人虽不坚决，但也不会反对，能随大流。就是大掌

柜也能跟着走。他就是不去，也左右不了大家，影响不了大局。改编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但是光等待是不行的，抗联部队行动迅速，打了就走，一旦他们离开“三肇”地区，就要坐失良机。我决定马上去找部队。

宋志生支持我的想法，但怕我在路上出事，一定要陪我一同去。他建议改编的具体时间最好往后推一推，因为当时绑来的人票还有一部分没赎回去。等人票赎完，大家还能多分点钱，送回家去安排生活。不然到抗联队伍里，不许再抢夺了，又不发工薪，就不能再给家钱了。家里生活不安排好，人在抗联也不能安心。我同意他的意见，表示找到抗联队伍后再具体研究。大掌柜也同意我们的意见。这次行动就这样决定了。宋志生又安排了一个带路的人。因为带大枪出去不方便，他把自己的一枝银把的枪牌槽子给了我，自己带一枝二号匣子枪。

我们是在天黑以后出发的。走到半夜 12 点以后，到达肇东县三站以北的一个屯子，才找到抗联队伍。我们在一个大院找到了部队的住处，向哨兵说明了来意，他经过请示汇报，把我们领到一间屋里，由一位负责同志接待。这位负责同志就是抗联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第三十四大队教导员兼支队党委书记韩玉书同志。当时十二支队因为在宋站战斗中受到了损失，原支队长戴洪滨负伤离开了队伍，兼任十二支队政委的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也奉调回三路军指挥部了，由副支队长徐泽民代理支队长职务。

第二天，韩玉书同志单独和我谈话。我把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在哈尔滨做党的地下工作的情况和四·一五事件地下党被破坏，我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的情况下坚持工作，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以及打入庄稼人匪队，做政治争取工作的情况都做了详细汇报。我向他表示，愿意接受组织的审查，希望尽快恢复我的组织关系，把庄稼人匪队改编为抗日队伍，壮大抗日力量。韩玉书答复说，恢复我的组织关系、确定工作职务和庄稼人改编问题，都

要向三路军指挥部汇报，由领导研究决定。他要求我马上把全部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我就连夜赶写，写完交给他，他就派交通员刘升同志送回山里三路军指挥部，据说是交给了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同志。

韩玉书同志把我和宋志生暂时安排到十二支队三十六大队活动，等待上级领导的决定。在这期间，我们曾经参加了攻打色望窝堡和敖木台战斗。这两次战斗打得都很激烈。在色望窝堡和日军打了一次遭遇战，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这次战斗伤亡很大，我军仅有一个战士负轻伤，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敖木台一仗我们伤亡很大。三十四、三十六两个大队的大小队干部和战士，多数都牺牲了。战斗到最后，我们只撤出 18 个同志，途中又有 3 个同志因伤势过重牺牲。宋志生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宋志生是我在庄稼人匪队中结识的最坚定、最可靠的朋友。他的前半生误入歧途，当了土匪，那是被迫的。他觉悟后要当一名光荣的抗联战士的夙愿，虽然在名义上还没实现，但他实际上已经尽了一个中国人、一个抗联战士应尽的职责。

敖木台战斗后，我找到代理支队长徐泽民同志，催问庄稼人匪队改编问题。他说上级已经同意改编，但考虑到当时我们的队伍受到很大损失，人数少了，武器也不如从前了，这个时候把他们改编过来，会给他们造成一些消极影响，因此改编问题要稍往后推一下。

我抗联十二支在敖木台战斗后，重整旗鼓，经过周密准备，乘敌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打开肇源县城，歼灭了敌人，夺取了大量武器、物资，扩大了队伍。这一胜利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在“三肇”地区影响很大。这时，十二支队领导通知我，派人去通知庄稼人匪队前来接受改编。我给去的人介绍了情况，指点了路线，并写了一封介绍信。在这同时，大掌柜在众愿所趋和当时形势的影响下，对抗联队伍和改编问题认识有了很大进步，看

我们很长时间没回去，也派人主动找上来。这样，庄稼人匪队全部30余人就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十二支队独立大队。大队长一职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只好让庄稼人暂时担任。独立大队刚刚改编，没有政治工作人员，支队领导考虑我曾在庄稼人匪队做过一段工作，熟悉情况，决定我到独立大队兼做政治工作。

独立大队在十二支队领导下，在“三肇”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活动。到1940年底，根据三路军指挥部决定，和十二支队一起向山里转移。在向山里转移途中，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独立大队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十二支队在和敌人、严寒的搏斗中消耗很大，退到山里时，整个十二支队只剩下100多人了。

六、重新投入党的怀抱

我随十二支队在“三肇”地区活动期间，一直没有接到上级恢复我的组织关系的通知。部队退到山里以后，我有机会和许亨植总参谋长见面。他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跟他一同去海伦县山里找九支队。那年冬天雪大，路非常难走。我们在路上历尽艰辛，经受了严寒、饥饿、疲劳的考验，走了20多天才到达目的地。一路上，我又把我的经历详详细细地向许亨植总参谋长做了口头汇报。到达九支队以后，我又按照他的要求，把我在哈尔滨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员的情况和名单写出来交给了他。

1941年5月间，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从苏联回国，到九支队视察工作，我们很意外地见了面。在1933年冬，我在南满游击队负伤后，转到地方工作，兆麟将军曾经单独给我上党课，对我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使我在政治、军事素质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在受训期间，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和蔼可亲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我终生难忘。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分别8年后，我们会在这冰天雪地、深山老林里见面。兆麟将军

是我那一段历史的见证人。我见到他，心情十分激动，他见了我也非常亲热。在谈话中，他还兴致勃勃地忆起1933年在哈尔滨给我上党课的情景。就在这次见面后，由李兆麟同志和许亨植同志研究决定，恢复了我的党的组织关系。

张　静整理

（选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四辑）

林甸匪患与剿匪斗争

朱景荣　孙　可

我们是林甸县土生土长的人。林甸是个小县，方圆不足170里，人口不到10万，但过去土匪多，匪患严重，这是我们从小耳闻目睹的。现在就我们所知讲叙如下。

一、八·一五前的匪患

林甸有个口头禅，当不懂事的小孩子一闹时，大人就说："你听，外面来胡子了！"于是孩子吓得立即止住哭闹。这个地方出胡子，大小股绺子，劫道的棒子手，蹲高粱根绑票的，三五成伙砸黑窑子的，抢劫马匹民财的，种类颇多，闹得民不聊生。据档案记载，民国年间全县大小股土匪151股。九·一八事变后日伪时期有22股。

从历史上看，林甸是匪患严重之地，有些屯子是匪窝，如街北的永合公、五撮房和街东、街南、街西以及与邻县交界处的一些小自然屯都有当胡子的。人们称此地为"九反之地"，"是雁过拔毛的地方"。民国年间和伪满初期街里大商号买卖家和有钱的大粮户去齐市、泰康、安达等地办货、卖粮，都必须雇几个炮手保镖，否则中途必被抢劫。那时兵匪难分，有钱的财主也通匪，背着钱褡子给胡匪上子弹。不管是民国的自卫团，或者是伪满的讨伐队，还是警察署剿匪的，都与大小股绺子通气。所谓"剿匪"，

是离匪绺子三四里地便向空中放枪，实际是给土匪送信。到天黑绺子逃跑后，这些兵就该进屯了，借故骚扰百姓。所谓“打粳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小米饭”这句话，就是由兵打胡子、进屯欺压老百姓流传下来的。

我们亲眼看到，林甸街东石小人、田锡久、刘振等大地主家，都交几个“活人”通匪。所谓活人，是专门为通匪的人与土匪通话搞联络的人，他们常来大地主家吃喝、存站，当家的出面招待，好吃好喝，大烟泡供着，目的是互相利用。

遭殃的是小财主和普通百姓。1940年前，距街东30里的周磕巴屯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小土财主王兽医家晚上来个砸孤丁的（也叫砸黑窑子的）土匪，他以给马抓药为名进了屋，借王兽医进栏柜里边抓药之机，掏出六轮子手枪逼上要钱。没想到王兽医一转身操起个镐把，猛一家伙把匪徒手中的小六轮子打飞。土匪窜到屋外，王家3口齐动手满院追抓这个胡子，匪徒着急爬到墙上想逃跑，而王兽医却趁势扯住他的脚往下拉。兽医老伴用菜刀狠狠往屁股上砍，儿子拿洋炮当棒子猛揍。喊打之声在夜空中回响，惊动了全屯。插千的（为土匪穿线的）大地主周磕巴知道事情不妙，怕匪徒被捉交官咬出自己，竟以提枪过来帮助为名，一枪把匪徒脑袋打开花，以杀人灭口。

二、八·一五后的匪情和政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不久，以林甸伪县长高化南为首的一班伪满的头面人物和土豪劣绅，按国民党广播电台播发的指示，于1945年8月18日成立了一个“林甸县治安维持会”，凑了委员30余人，高化南任委员长，伪县警察署长戚如楫任保安部长，下设一个50余人的保安大队，委任伪福发村长林绍先为大队长，委任赵学禹、程锡河为队副。他们以维持治安为名，

以下乡抓赌、剿匪为借口，城里城外，“穷吃臧喝”地闹哄一大阵子。

其时，土匪猖獗，遍地蜂起。田锡久屯，1945年全屯约40户，就有10家为匪的，有4户跟“青龙好”、“大风字”等绺子吃过“蹓跶”（跟土匪混吃喝，有机会也抢点东西）。街北五撮房屯不满200户人家，1947年冬大土改时，有58人交代当过胡子。当时光复军、维持会的保安队跟30多股土匪相勾结，全县胡匪足有2000多人。这些人破坏我党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和政权建设，一心要投奔江南的“中央军”。

到1945年10月下旬，我嫩江省主席于毅夫派新四军的李振兴带领13名战士到林甸接收政权。李振兴是林甸人，家住林甸街东，曾是流亡学生。李振兴到林甸后，王明贵、张瑞麟又派奚华歧等2位同志来协助他工作。经十几天的工作，解散了国民党的县党部，组建了民主大同盟，会员发展到30多名，有200多名青年积极报名参军，等待省里发下武器便入伍训练。

10月底，李振兴、徐左棠等3位同志在县公署召开了有150多名地方各界人士参加的会议，筹建民主政府，并选刘传亮当县长。

会后不久，省军区一旅吴富善司令员的特派员王维同志到林甸县城会同李振兴等3名同志，召见原林甸县维持会成员，就如何改编县保安队问题进行谈判。已经掌握军事实权的林绍先顽固反对，当场翻脸，将匣枪往桌子上一拍，说：“我不参加民主政府，坚决不接受八路改编，我是马占山部下，我手中的兵权只能交给国民党正牌军。”

当时的空气异常紧张，林绍先企图以事先已准备好的警卫人员强行扣留特派员，并对李振兴同志下毒手。有的豪绅苦口劝说：“李振兴是本乡本土的人，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何况江省（指齐市）还有八路的大军呢？咱们的家眷都在这，一动干戈，后果难

以收拾。”这才算把空气缓和下来，将王特派员送走，而李振兴率领警卫人员撤回齐齐哈尔。

11月底，嫩江省军区一旅吴善富司令员率领1个团，省公安副总队长李振兴带3个中队，共1000多人，由齐市出发，途经二十棵榆树，奔赴林甸强行武装接收政权。24日午后5时许，我军在西门城壕一带与林绍先的所谓保安队交锋，林匪总共50多人，是贪生怕死的乌合之众，根本无抵抗力。经过1小时的战斗，我军就攻进了县城，林匪溃不成军，由东门逃窜。

李振兴同4名战士，在攻城时中弹牺牲。我军在林甸住3天，接到省军区命令又返回齐市。

林匪得知八路军撤走的准信后，又从街东返回县城，一中队住北烧锅，二中队住东烧锅。林绍先当官心切，一心想等中央军来，弄个旅长当当。为此，他返城后，大肆招兵买马扩大反动武装，与乡间多路土匪绺子串通，招降纳叛。他先与“七省”、“爱国”、“四海”等胡匪绺子进行勾结，明来明往，土匪随便进城出城，林绍先还常设宴款待各路匪首。他先收降七省绺子70余人，住在城郊东北张家油坊屯。那时正过春节，胡匪到处抢劫，根本没人管，城内城外几乎乱套了。全县除少数有钱的大粮户高筑院墙，设炮台，有枪支、手榴弹看护“响窑”不准胡匪进驻外，多数村屯普遍受胡匪抢夺骚扰，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1946年2月初，林甸县维持会派外交委员辛凤桐、彭寿天到齐市与国民党接收大员彭济群接头。2月14日彭济群派邢宪章带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代表国民党接管了林甸政权，郭英男任县长，光复军头子尚其悦也派队伍到林甸。表面上解散了保安队，实际上他们沆瀣一气早已暗中勾结在一起了。

这时的林甸县，以县城为中心，简直成了胡匪世界。

三、苏军的剿匪战斗

1945年底，光复军头目尚其悦部下第二旅，匪首王忠义（是拜泉县伪县长）在明水县与拜泉、林甸交界处（今通达公社前进大队）一带集结，准备会同尚其悦攻占齐齐哈尔。号称是1000多人大部队，实际加上林甸、依安、明水等地来合伙的“新中华”、“登山好”、“青龙好”、“文君”、“七点”等匪绺总共不足900人。由于齐市布防严密，没有得逞；于是又扬言要攻占明水立据点。我明水部队得知情况后，立即与齐齐哈尔取得联系，请求驻齐苏军出兵帮助围剿这股顽匪，苏军当时不同意，说没有最高统帅命令，不能随便出兵参战。明水县又请求北安黑龙江省军区领导出面与齐市苏联驻军求援，方得苏军同意出兵。苏军从齐市出发途经林甸，开来6辆坦克、4辆十轮大卡车，配有机枪、大炮等各种轻重型武器，在明水通达一带同这一大群胡匪相遇接火。匪徒们看来势不妙，顾不得还击，急忙逃窜，由明水的西城沟边的初海屯出境向西南林甸方向逃跑。这股顽匪都是马队，追击战十分激烈，苏军充分发挥机械化优势，满甸子追杀的炮声、机枪声惊天动地，荒原雪地上到处可见胡匪的尸首和抛弃的枪支与马匹。苏军一直追到林甸县东南角的兰家围子，追途达80华里。苏军还在兰家围子屯的场院草垛、碾道仓房等处搜出躲藏起来的胡匪13人，在屯西头土庙上枪毙了。

这场战斗，共打死匪徒300余人，缴获战马200余匹，缴获的武器装了一汽车，匪首王忠义被乱枪击毙。

还有一次战斗，是消灭“好友”绺子的战斗。

1946年2月20日（阴历正月19日），新发村于万忠屯（现已划归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吕清连给儿子吕怀恩娶媳妇。吕家的亲戚“三门周家”是有钱的大粮户。好友匪帮预计正日子这

大，周家准来人送礼，想趁机绑周家的“票”。于是匪徒在19日上午10点左右，住进吕清连家院套。

于万忠屯地势险要，屯北面是无边的大苇塘，南面是一个东西方向的沟塘沼泽地。全屯的房舍建在一个大岗子南坡上，总共9户人家，50多口人。于万忠和吕清连两家的院套相连，而且整齐，四角设有大炮台，防备也很严实。

好友绺子匪徒共20人，他们进屯后，先占据了炮台，设人放哨，大门有4个匪徒严密把守，所有外来人，只准进不准出。进院的人经过搜查盘问后，集中一处，由匪徒看守。同时他们在院外老赵家设个“秧子房”（囚禁人票的地方），押着从泰康街内绑来的一个人票。

正月十九日，上午10点许，由东面林甸方向驶来一辆满载苏军的十轮军用大卡车，炮台上放哨的紧急通报大柜（胡子头），请示办法。好友（名字叫苗贵兴，是个蒙族的惯匪）与炮头等几个头目紧急商议后，认为这一车苏军是屯西南前后代车站上的护路兵，车里肯定装有“干货”（值钱的东西），得劫下来。

好友当即下令：“紧关大门，用大车把门顶上，开枪打。”说话间满载苏军的汽车已经到吕家大门前停下，一看大门紧闭，感到奇怪，有几个苏军跳下车来，蹬上吕家大粪堆往院里张望，发现西厢房马圈里全是拴的备鞍子的马，炮台里还有人，于是发出信号弹，调转车头紧急回返。这时，东南角炮台的匪徒已开始向汽车射击。当这辆车刚出屯子头时，后面来的几十辆苏联军车，已经赶到距离这屯一里半地远的陈家屯集结，正架炮准备射击。几百名苏联步兵分南北两路，由东向西，匍匐着包抄上来。在陈家屯架设好的大炮开始向两个大院射击了。5辆坦克分别由北转向西，从大树林里冲上来，枪声、炮声、坦克声交织在一起，全屯子子弹、炮弹横飞，硝烟弥漫，打得土匪狼狈不堪。到11点左右，苏军步兵与炮兵联系的电话线，已经拉到屯前场院内；吕清连家

的5间正房落下不少大小炮弹；于万忠家的上屋草房被炮击中起火，房脊被炸断。村民都躲藏在炕沿根底下，有的匪徒被打得蒙头转向，顾头不顾腚地往屋里钻，有的老头老太太急啦，连骂带推给硬撵出去。到12点半，4个炮台被击垮，苏军已经逼进各个房山头，两个院的大门已被坦克撞毁，守住门的苏军一劲用机枪向上屋窗户、门内扫射。匪徒吓得把枪支都扔了。苏军停止射击，喊话命令屋内人爬着出来，剩下的土匪随着老百姓连滚带爬地跟着出来。苏军命令这些人在外边爬着排队被冻多时，才叫妇女和小孩站起来认领自己家人，举发胡匪。当女人或小孩手指谁并摇头表示不是自家人时，苏军就对准那个人的脑袋开枪，只有两个当地土匪藏在马草料堆里没被翻出，得以活了下来。

这次战斗，击毙18个土匪，其中包括大柜好友、二柜姓于的、秧子房掌柜的李清海。混战中，老百姓受伤多人，死的有本屯的7人，外屯的有6人：一个人票，两个被截留的皮毛小商贩，一个打板算命先生，林甸城里赶车来串亲戚的李奎林哥俩。

四、林甸的解放和当时的斗争

1946年3月21日，我东北民主联军七师十九旅旅长杨国夫、政委李雪然率领四十六、四十七两个团1000余人，由依安县出发，途经依安与林甸交界线北大壕、黄家窑、刘家窑，行军100多里，下午5点钟左右，到达距林甸县城35里的伪东兴村公所旧址，在城沟林家屯宿营。我先遣骑兵早已控制村公所的电话，县城里的光复军打来电话，问："来没来八路军？"我们人回答："没有，一切安全无事！"3月22日早4时许，我民主联军起早行军，从东、北两个方面进攻林甸城，狡猾的尚其悦率领一部分光复军，在半夜就从北门偷偷逃之夭夭了。

盘踞在林甸的光复军第六中队和改编后的自卫队约500余人

进行顽抗，不到两小时就被民主联军打垮了，敌人大量被俘，打死打伤敌军20余人，国民党县长郭英男和他的小姨子被俘，我民主联军伤亡一名战士。3月23日成立了民主政府，李大受任县长。4月初，各区、村政府已经搭起架子，区里的政委、区长、中队长都是关内来的老干部、老八路任职。根据当时的形势，伪村长、屯长、甲长或小官员担任区政府的副职、村政府的正职。区、村政权，一半的区政府和几乎全部村政府，掌握在伪满残余、乡绅手里。尽管新政权做了许多工作，但斗争仍很尖锐。由于反动官僚、国民党特务、地主豪绅的宣传恫吓，群众惶恐不安，有的群众说："关里来的老八路不打人、不骂人，好是好，可是都说不是正牌军，怕长不了。蒋介石的中央军是正牌军，已经来到长春、白城子……"等到青纱帐将起的时候，很多股匪开始活动，接连制造了几起骚动叛变事件。

第一起，张地区政府干部被俘事件。1946年4月初刚成立区政府时，整个区机关加上区中队，总共有4枝枪。旧历三月廿七日，下午1点多钟，我军解放齐市时被击溃的散乱光复军流窜到这里。当时的区长于文林（家是地主）、副区长于培辰（当地乡绅）、工作人员李百候、徐秀章、公安队员孟广林，突然被包围在办公室里。匪军把他们用麻绳拴成一串，边打边问他们把枪藏在什么地方。几人都说，总共4枝枪，都被工作队带到乡下去了。当时，从李百候身上搜出5粒子弹。匪军把他们带到土财主梁万余家，继续拷打要枪，并将5人押到区政府南大坑沿，要枪毙。经乡绅王仲元、张永贤百般讲情，没下毒手，又带回梁家。匪军以孟、徐二人作人质放出区长于文林、李百候，让他们取回两枝枪来。于文林当晚回家取来两匹马和一枝连珠枪。李百候去响窑张巨峰家取枪，住在张家的光复军头目讲："他家的枪不能动，已被我们全部收缴。"匪军又打发李百候和乡绅张永贤连夜去公安队长沈志山家取枪，沈志山以护院为名坚决不给。等天快放亮时，匪

军听到西面乔家围子响起枪声，以为八路追军赶到，才吓得慌乱逃窜。

第二起，张地区中队哗变事件。1946年4月中旬，县里派来吴春轩（原是嫩江省军区教导队的一名排长）任区长兼区中队长，他从街西北三合区带来一个土匪降队，组建成这个区中队。他委派降队惯匪报号“靠天”的张作山任队副、“青林”潘福民任班长，当地降队匪首报号“东山”的冯德才也编入这个区中队，共30多人，中队下设两个班。

4月末，县里派关内来的老干部黄群任区政委。他到任两天后，带领区公安干部于惠云、李继春（省军区教导队新分配来的）、当地干部李伯候及两名农民干部去穷棒子岗，给当地农户百姓试分日本开拓团扔下的土地。

区中队的降队认为八路长不了，中央军马上就会到来，于是暗地里策划叛变。5月上旬的一个晚上，中队副张作山、班长潘福民以给新上任不久的区长擦枪为名，借机下了区长吴春轩的匣枪、副区长杨国春的撸子，并扬言：“老蒋的正牌中央军已经到了哈尔滨，3天后来接收林甸，我们不当八路，当中央军去。”晚10点钟吃完夜饭，区长吴春轩主动随从叛变，伙同10余名降队臂带区中队袖章，前去偷袭穷棒子岗的区工作队。夜深人静，他们突然侵入工作队的寝室，缴了工作队的4枝枪，撸下黄群的手表，并劝诱工作队人员跟随叛变，黄政委立场坚定地表示：“我要为穷苦大众打天下，坚决不能去当匪！”其他三人也表示跟随黄政委。叛匪们变脸要枪毙他们，经过当地一些熟悉“东山”的老百姓说情，叛匪们才放了他们。黄政委连夜徒步走50多里返回县城，一大早闯进东门，守门岗哨向他要路条，他急了，怒气冲冲地喊道：“娘的！要什么路条，我是老八路，在穷棒子岗被他娘的土匪缴械啦！”

这伙叛匪拉出后，奔向安达县的老虎岗一带，后流窜在林甸县的街西李家围子、庄地房子一带。变节后的吴春轩、焦凤山当

了10多天土匪，一看前途无望便洗手不干了。这一小撮叛匪没到秋末就被我军全部收拾干净。

第三起、李富春的警卫员魏奇忠牺牲事件。1946年5月初，林甸县公安大队组建了一个独立骑兵连，住在熊家大车店，原西满分局书记兼西满军区政委李富春的警卫员魏奇忠由省军区派来任连长，下设3个排（其中2个骑兵排）9个班，共80余人，有步枪60枝，机枪2挺。当时连队人员成份异常复杂，新收一部份土匪降队，一些班排长职务多由降队大小头目担任。仅集训了20余天，5月15日上午接到上级命令去富裕、依安一带剿匪。下午2点多整队出发，由魏奇忠和副连长臧子山带领2排骑兵前头开路，步兵乘两台胶轮大车拉着给养在后边紧跟随行。当队伍出北门，走到街北小树林屯时，混在我公安大队中的降匪头目“九江龙”李延彬、杨德胜等几人合计，说：“八路计策多，不知往哪调，别白送死，想法拉出去。”下午5点左右到达街北永合公屯以后，连长命令就地宿营，要求切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安排连部住在天主堂内，各排分住四门。天黑时，降匪周德文、王占峰等人私下集合，开始了预谋叛变的活动。

他们晚9点开始动手，先缴了各排长的枪。当冲进连部发现有抵抗举动时，叛匪王占峰先开枪打死了臧子山副连长，后打死魏连长。通讯员张中信、文化教员马福林被俘。然后他们将队伍集中到屯东头，原匪首九江龙李延彬训话说：“穷八路长不了，中央军马上到，我们拉出去，投奔正牌中央军，前途是光明的。愿去跟我走，不愿去的把枪支弹药留下，可自讨方便。”众人明白，说出个“不”字就得大祸临头，违心地硬着头皮说愿意。匪首讲去取弹药、给养，于是匪队向富裕境内走去。

队伍走出不远，三排副焦墨林借口下马紧肚带离队，逃向附近区政府，叫开门与县里赵大队长通电话，说明情况，经请求军分区后，答应马上出发追剿。

次日，叛匪到达五撮房冯学志家吃午饭。匪头目在这里临时组成班子：大当家的周德文，二当家的李延彬，总炮头王占峰，总催崔凤林，马号杨德胜，水香兼秧子房掌柜的邹德恒，棚炮头是高凤阁，稽查夏志回。他们自命为“中央军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匪首为“中央军队长”，扬言两天两夜赶到哈尔滨，然后投奔江南中央军。

叛匪由五撮房出发，到富裕李家粉房住下，傍晚5点多钟，我林甸县大队赵润山率领的警卫班和富裕县大队来接应的部队已先后赶到，敌我双方接上火，枪声响作一片。6点多钟，富裕县大队邵连长被一个由院里跳出的匪徒开枪击中牺牲了。打到天黑时，群匪突围出去，向林甸东北方向逃窜。我军循踪紧追，到林甸东兴区北边一个小屯撵上了逃匪。当时我军有110多人，叛匪五六十人，双方各有两挺机枪。打一阵，叛匪看势头不妙，不敢恋战，又突围顺林甸东程地房子往东南逃窜，我军又紧追过去。这时，由宁年调来的骑兵连也赶了上来，在林甸县东南肖细狗屯宿营，林甸县大队在蒋纯福屯住下。17日中午，我军在兰家围子将叛匪追上，这时匪徒仅剩下30余人。在军分区宋康司令员和李团长指挥下，开始炮击，龟缩在屯子里的群匪看到败势已定，拼命突围向东北明水方向逃窜。在我骑兵追击下，除九江龙和少数顽匪逃跑到明水县小三里三外，其余全部被歼。

步兵在搜索兰家围子屯时，在仓房草垛处活捉5个土匪，当场为我军6名死难烈士祭灵，在屯西头土地庙跟前枪决。

在连续两天多追剿叛匪战斗中，六七十叛匪除少数逃命外，其余全部被歼灭，我军牺牲3名连长3名战士。5月18日剿匪大军胜利返回林甸县城和富裕宁年驻地。

第四起，三合区中队叛变事件。县大队骑兵连的哗变刚被平息，5月19日县里派李世民到三合区调该区中队到县里担任警卫。全中队13个人，其中有11个人是降匪。降匪中，匪首“青

林”以为到县里是缴他们的械，于是，全队在青林操纵串通下叛变，带走14枝枪，与“靠天”绺子合并，在安达县的老虎岗、泰康的喇嘛甸子、富裕县的龙安桥一带活动达六七个月之久，到年底被我军击溃。

第五起，吉祥村村政府被“青龙好”缴械事件。1946年6月的一天晚上，在离县城东25里的东兴区吉祥村，村长曹德、调解委员张殿有、财粮委员苑世和、武装委员邓奎英、文书董奎友、会计史俊才等人，身带九九枪、匣枪和十几枚手榴弹庆贺村农会成立，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地主分子程景春报信勾来青龙好土匪绺子夜袭村农会。这些村干部革命思想不坚定，贪生怕死，外面土匪一鸣枪喊话，他们便乖乖投降，交出武器。

第六起，霍地区三村民兵队长叛变事件。1946年8月18日，街西霍地区三村民兵队长郝庆余，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八路军长不了，携带8枝枪、两匹马投了“靠山”绺子，报字“三江龙”，窜扰在林甸街西李家围子、庄地房子一带，不久被我剿匪大军击溃。

这个阶段，人民政权虽然已经建立，但土匪的活动仍很猖狂，局势不安定。

五、林甸的剿匪斗争

林甸解放后，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基本摸清了底数，区村干部都换了一茬，人民掌握了政权，不仅干部换上劳苦群众担任，而且每个村政府都配上三四条枪。广大群众说：“八路军治理天下有一套。胡子和大粮户都怕共产党、八路军。”同时，“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剿匪为老乡……”这首歌也在到处传唱。土匪一听说八路军，就吓得毛骨悚然，他们说：“八路厉害，打仗不怕死，净是晚上摸，一顿猛攻手榴弹，谁也受不了。”

1946年夏秋两季，我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主要有：王老七屯战斗。

1946年旧历七月十四日晚上，“大青山”绺子在义和村田锡久屯住下，被距3里远的村农会发现，一股劲地向那儿打枪。胡匪怕区中队和县大队来围剿，第二天下午2点多钟冒雨向东南明水县方向“挑”（走）。匪伙有30人，都穿着雨衣，多数匪徒都带双枪。他们进入大甸子又转向东北，奔向7里地远的平安村王老七屯，午后4点多钟进屯后，就象饿狼似的到各家抓鸡。一位赵老大娘求情把“老抱子”留下，“小崽子”瞪眼说：“给你留下一窝鸡崽算照顾，嚷什么？”

王老七屯在林甸最东头，与依安、拜泉搭界，是个偏远的小屯子。全屯共有5户人家，王老七家算个大户，两合房，有个一人多高的院套。西边距院套不米远是史玉和住的3间平房。东院3家伙计住，都是小平房。大青山等五六个头子，都住在王老七院里，20几个小胡子住在院外。胡匪进屯，在屯西放了哨，来往行人许进不许出，怕走漏风声。

“大当家的”大青山，细高条儿，50多岁，两道凶眉下一对黄眼珠，使双枪。他命令群匪说：“这是朋友，大家注意，要规矩点！”说罢进屋摆上八仙桌子，弄个香炉碗，上好香，供上个发黑的小铜佛，叨叨一顿鬼话，乞求神灵保佑。晚上大吃二喝完毕，这些土匪抱着大枪，不脱衣服，头朝炕里呼噜呼噜地睡起来。外边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接着下起小雨来。后屯李大犁屯的“旱线”（为匪人报信搞联络的人）孙二扁头来送信说：“四季好绺子22个人，刚由光复军组建起来，人马家伙整齐，头目叫张司令，有韬略，跟国民党中央军有联系，准备与你们合伙投老蒋去。”走投无路的大青山忙让孙二扁头去牵线。半夜12点多钟，一伙全副武装的马队顶雨悄悄进入王老七大院，来人都带双枪，还有三四颗手榴弹。大青山迎进“张司令”会过黑话后便进入正题。这个小小

的张司令能说会道，会造谣，一讲就是一个小时，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中央军是正牌”，“老蒋很快就会用飞机来送给养”……把大青山哄得蒙头转向，一直到天快放亮时他们还在七嘴八舌地谋划着。

第二天早晨，他们从王老七那里得知本地的地形、平安村农会的枪支、东兴区中队的距离等情形。晌午 11 点钟雨停了，屯北旱线于海匆忙来报信：“离这 5 里远的李大犁屯，从泰安来了两胶皮车八路，有四五十人，是去林甸换防的，现在正在屯子里打尖吃午饭。”两伙的头子紧忙碰头，决定截击这支部队。张司令口出狂言，说：“泰安镇这伙兵，是一帮窝囊废，我知道底细，跟他们打过多次仗了，没多大尿头，我们一定要干掉他们！”说罢，选出 8 个枪打得准、力气大的匪徒，埋伏在屯北 3 里远的青纱帐里。这地方在周德山屯通往李大犁屯的西南东北方向的大道上。敌人设三道卡子，意在让过第一道，在我军接近第二、三道时，进行堵截偷袭。但于海错报了军情，他看到的是我军先头队伍，在他们之后还有 4 车步兵和一连骑兵进了屯，是专门追剿他们的。

当这 8 个匪徒到了指定地点刚动手挖掩体时，我军大队人马按预定计划以包抄队形向王老七屯进兵。这 8 个匪徒鸣枪报信，与我军接火。12 点多钟，王老七屯北面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8 个匪徒感到不妙便从青纱帐逃命了。在王老七院里的胡子，有的用铡刀在院墙上开垛口，多数蹲在工事里等着打仗。

不久，胡子设在院外的卡子都与我军接火，东、北、西三面都有枪声。近 2 点钟，土匪的卡子大都陆续跑回王老七大院。这时我 80 多名骑兵在小壕拴好马，摸进东、南距院 300 米远的秧棵地里。西面和北面的步兵，也从青纱帐摸到屯子跟前。双方开始对射，王老七屯象开锅一样。当我军把敌人团团围住后，稍停，向敌人喊话“缴枪不杀”。尖嘴巴里镶两个小金牙的匪首张司令狡猾地在垛口后用一口辽宁话大声喊叫道：“你们是泰安哪一部份的？

报报头目的名字，要我们缴枪投降，办不到！你们想要吃的（指子弹），一个一个来吧！”我军神枪手，对回话垛口瞄准射击，一个飞子正中垛口右上角，崩他一脸土，吓得他缩回头再没敢咋呼。

午后2点半左右，我军从西面70米处羊草垛开始用六〇炮向院内轰击，头一炮落在大门口，吓得影墙两侧顽匪龟缩进正房东西两胡同里；第二炮把王老七家西窗下的酱缸崩碎；第三炮落在院心开花，顽匪们象热锅上蚂蚁一样顾不上还击，光留神躲炮弹；第四炮落在西胡同鸡架里崩死一窝鸡崽子；第五炮落在上屋门口，把3间房窗户纸全震裂；第六炮又落在院心开花；第七炮落在东侧马圈罗花木上爆炸，把一匹4岁红儿马炸伤，挣脱缰绳，逃出大门，跑到屯西头死了。

炮击停止，匪首又命令群匪严守垛口射击。由于垛口多、顽匪枪法准，虽然冲锋号已吹响，但我军仍难进攻，只能对射相持。

太阳快落时，匪首张司令逼迫王得成领3个伙计，把东胡同影壁墙和院外民房的东北墙角，用铡刀砍出4尺见方的洞，张司令带10多个土匪向外投一排手榴弹，骑上马用匣枪开路冲出去，窜入高粱地向依安县方向逃跑。当大青山匪绺的20多名土匪跟随马队向外冲时，我军机枪射手用轻重武器交叉射击东北角，把大青山绺子14个土匪打死。大青山先逃到距院房60米远的北谷地头，又返回院救一个匪友，当他二次冲出院时，我军已发起冲锋。他抡一槽子弹跑出30多米远，躺在一个小壕沟里忙上匣枪子弹，没等子弹入膛，我军一个战士对准他的胸膛就是一枪，结果了这个顽匪的性命。

当日头落入西山，我军已占领王家大院搜索战场，命令所有屋里人爬着出来，脸朝地挨个趴下，叫妇女和小孩出来认领自己家人，又活捉6个土匪。

当我军趁天亮逐屋搜查时，发现东院外老刘家仓门紧闭，向里喊话也没回声。主人刘老太太趴窗户看了一下，忙回头奔上屋

跑去，说："里边还有一个！"狠心肠的顽匪一枪把老太太右肩胛骨打个透眼。我军战士以密集的子弹射进仓房后，再三喊话，却没回音，就用柴火把仓房点着了，实际这个亡命徒早被我军乱枪打死。

这天半夜，屯东头的柴草垛里还爬出来一个受伤吓懵的土匪。他手提大枪，到紧东头的老朱家叫门，问："我们绺子在哪？"朱清在屋里回答得干脆："都在西头老王家大院！"这个亡命徒一瘸一拐地奔屯西头，遇上我哨兵，没对上口令，被当场击毙。

第二天一早，我军吹号集合准备出发时，又在狗窝里搜出一个胡匪。他自己说是被"绑票"的好人，我军找来依安镇一个被俘胡匪认证他是正牌胡子，也当场被处决了。

旱线于海也当场被俘。第二天，在我军押返依安途中，经他家李大犁屯时，他父亲拦住队伍苦苦求情，说他年轻不懂事，也是穷人，要求留他一条命，保证再不干丧天害理的事，结果被保下来释放。后来在1947年夏砍挖运动中，被村民乱棒打死。

这次战斗消灭了大青山、四季好绺子，打死19名，俘虏多人，除张司令带领冲出的10余人和逃跑7名下卡子的顽匪外，其余全被我军抓获或消灭。这19个"放白条"胡匪，第二天被当地群众用马套分别拖到东城沟喂狼了。从此，大青山这个害民匪帮在林甸与依安、拜泉、明水县交界处算彻底绝迹了。

牛地房子战斗。

1946年秋，在林甸一带活动的土匪，有"青龙好"、"林胜"、"局红"、"七点"、"文君"、"靠山"、"中侠"、"张司令"、"九江龙"等10多股土匪共130余人。这些政治土匪，于8月初窜扰到依安与林甸交界处的傅家窑（今属依安）"合局"，阴谋投奔江南国民党。他们装备齐整，全是马队，多是双枪，有1门六〇炮和1挺机关枪。匪队活动时，前一里地放出7匹探马，队前打一面红旗伪装成我们的军队。

这股新合伙的顽匪，8月12日上午从傅家窑出发，顺大草原城沟往安达方向流窜，走至林甸县界东北大壕角附近，与拜泉方向来的我富裕县骑兵团相遇。两方相距2华里远时，队伍都停止前进，双方用望远镜观察情况。胡匪“旱线”探马跑回来报告大柜，前面与八路顶水（碰头）。双方判明情况后，都指挥各自队伍抢占西南方向阻水壕大坝有利地形，这股群匪由于离壕近、熟悉地理，抢先占上壕坝。

富裕骑兵共160多人，由东向西拉开队形，由北向南来包抄。胡匪占有利地形，我军前进缓慢，难于靠近。匪首为找后路，命令枪打得准的顽匪，专打我军的坐骑，我20多名骑兵由西北方向攻上来，马万明等炮头将他们全打落马。匪徒的六〇炮击中我军机枪阵地，火力封锁得很严，使我军寸步难行。双方相持一个多小时，顽匪顾虑来援兵，不敢恋战，借着大坝向富裕方向逃跑，每离三四里地就布置三四名炮头、总催下卡子，致使我军追赶速度特别缓慢，匪徒向远方逃脱。特别是，我军在明处，胡匪占有利地形在暗处，因此追击的骑兵团伤亡较大，被土匪甩得很远，相距70余里。午后3点多钟，这群胡匪远逃到富裕县三兴镇住下打尖，虽然伤亡损失不大，但也人困马乏。

旧历八月十三日早7点左右，这股顽匪向林甸街西逃窜，上午11点多钟到达西城沟边牛地房子住下，准备过中秋节。由东北方向返回来的旱线报告说：“追兵离这有10里远，赶快做准备。”实际富裕骑兵团在追赶途中，早已派人与林甸县大队取得了联系，林甸县大队和东兴、三合两个中队已经发出援兵。

牛地房子的西面是一望无边的草原，东、南、北三面是庄稼地，顽匪在三面都是青纱帐的地里，隔半里或一里地共设了九道卡子。午后1点多钟，三面头道卡子处就响起对射的枪声。20分钟后9道卡子全撤回屯内几处大院里。30分钟后，我军的轻重机枪已攻入屯内场院，死死封锁住尤二爷和牛家两个大院的大门。到

午后两点半，院内群匪已被我军的六〇炮和机关枪打得抬不起头。土匪想以绺子为单位分头向外突围但未得逞，3点多钟时整个战斗结束了。

这场战斗我军共打死顽匪五六十人，活捉10多名，散花逃出50多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马匹。富裕和林甸两方面，我军有6名战士光荣牺牲，有11人负伤。

从此林甸境内的中股胡匪，基本上就没有了。

长胜村战斗。

牛地房子一仗，“文君”绺子已被打散。但不久，他们在街北五撮房一带，又重新凑合了30多人，窜扰在林甸西、北边界一带。

庄稼快割完的时节，这个绺子住在街北长盛村东西相距一里的老丁家和老雷家两个屯。这伙顽匪全是马队，已被我军追得筋疲力尽。大柜文君名叫周德文，他一个人去西边5里远的五撮房的舅舅李本娄家串门。我军侦察员报信后，驻富裕县九岗子第三骑兵连，在王连长率领下快马加鞭前来围剿。文君在西头与我军相遇，借苞米地向北边逃跑边鸣三枪向匪群报警，可是两个屯相距较远，文君的枪声东屯匪群根本没听着，不多工夫我骑兵连已闯进老丁家屯。正巧在房顶上“了水”放哨的王老鬼还睡着了，当我骑兵冲进丁家各屋时，睡在梦乡的匪徒已来不及反抗了，只好束手被擒。

手使双匣枪的二柜林胜刚起身穿上衣，被我军一名战士扑上去死死抱住了。总催文明动手打几枪，击伤我军一名战士，但在众多枪口威逼下，他只好交枪被俘。小胡子黑山提枪想跑，后边我军紧追，命令他缴枪。黑山转身躲进一个猪圈妄想反抗，一位班长一勾扳机，黑山的脑袋便开了瓢。

眨眼间，我军在丁家大院活捉3个土匪，打死一个，缴获10多匹马。东面老雷家屯的20余名土匪，听到西面枪响，如惊弓之鸟，急忙上马拼命向东边分散逃掉。

以文君为首的这伙顽匪，看到大势已去，在丁家屯被枪声惊散以后，再没敢轻举妄动，便各奔他乡，自找出路了。

1946年秋后，在林甸地界里再也没闹过胡子。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侦察英雄杨子荣剿匪纪实

温　野

在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土匪蜂起，配合国民党进行反共内战。他们袭击我军，骚扰百姓，残杀农村干部，极具破坏性与危害性。在我军剿匪战斗中，侦察英雄杨子荣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剿灭土匪作出了重大贡献，最后光荣牺牲于牡丹江剿匪战场上。笔者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整理成此文，真实地再现了杨子荣传奇式的剿匪事迹。

一、深入虎穴俘顽敌

1946年1月，杨子荣所在的部队进驻牡丹江地区，当时他在牡丹江军区二团三营七连一排任一班班长。

此时牡丹江一带到处都是土匪武装，北有谢文东、李华堂等大股匪军，不断窜扰鸡西、林口等地，与惯匪高永安、张德振、李开江等部相联系，威胁牡丹江市。南据春阳、鹿道、镜泊湖等地的是马喜山、郑云峰匪帮，经常扰犯东京城。而牡丹江市内特务分子凭借这些土匪为外援，几次策划暴动。由于土匪横行，各地交通断绝，人民遭受屠杀抢掠，苦不堪言，陷于饥寒交迫之绝境。人民渴望早日肃清匪患，过上安定的生活。

为剿除顽匪，救民于水火，我军于1946年2月上旬即开始分路进剿。3月25日夜里，二团一营两个连、团机炮连一部和杨子

荣所在的三营七连，奉牡丹江军区命令，连夜出发，拂晓前偷袭李开江匪部占据的另一个大据点——杏树村，务求全歼敌人。

杏树村，也叫杏树底。它建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大沟里，有100多户人家，房屋座落在地势平坦的南山坡上，村北和东西两面是开阔的稻田地，村子周围有2米多高的土围墙，四角耸立着4座高大的炮楼。围子外面有三四米宽的壕沟，壕沟外面的要道设有桦木鹿寨和柞木杖子等障碍物。这个村子住着土匪多人，是几股合在一起的，没有统一指挥。

进攻开始后，七连冒着土匪的炮火从两边向村子运动。营部组织爆破鹿寨未能成功，部队冲不进村子退了回来。敌我双方处于相互对射的相持状态。杨子荣奉命带领全班战士，在晨雾中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运动到离围子100多米的小沟里隐蔽。他一边组织射击，一边琢磨：如果进行强攻，部队的伤亡和群众的损失都会很大。除了强攻，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战前，他通过访问了解到这一带老百姓都恨土匪，更怕在本村打仗，盼望能早日获得解放。土匪呢？各股之间都有矛盾，士气不振。最近几次战斗后放回的俘虏，在土匪中也一定会起宣传作用。他反复考虑后，想出一个大胆的办法，决定趁敌人与群众处在惊恐、混乱的状态中闯进村子，利用我军的声威，群众的压力和各股土匪之间的矛盾，宣传我党我军政策，迫使敌人投降。

杨子荣回头看看，地形不利，敌人封锁得很严密，向连部报告又要拖长时间，便果断地把步枪交给身边的两个战友说："你们别动，我进村子去说降土匪！"两个战士吃惊地说："不行，班长那太危险！"杨子荣坚决地回答道："为了消灭敌人，保护群众，我什么也不怕！时间来不及了，你们替我去报告连首长吧！"说完，趁敌人射击的空隙，纵身冲了出去。他挺着高大的身躯，右手挥动着白毛巾，大声喊道："弟兄们，不要打枪，我要找你们当官的讲话！"他一面喊着，一面迈着大步朝围子西大门走去。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动了敌我双方，枪声骤然停止，战场上出现了瞬间的寂静。围子里的一个土匪连副，被杨子荣这一举动吓得不知所措。突然他似乎明白过来，以为杨子荣是来投降的，急忙向匪兵们喊："不要开枪，放他进来！"接着，围子的大门"嘎吱"一声开了一道缝，杨子荣敏捷地闪身进去。

七连的干部和战士正为不能立即冲进围子而万分焦急的时候，突然见杨子荣喊开大门进入围子，他们虽然感到意外，但很快就明白他进去的目的，可又担心他会遭敌人的毒手。为了掩护战友，威慑敌人，全连战士一齐向敌人猛烈射击。与此同时，连长急派通信员去营指挥所报告这一情况。

杨子荣刚闪进围子的大门，"哐"的一声，大门又上了栓，胸前立即被两只枪口顶上了。土匪连副凶恶地问："你进来干什么？"他沉着地回答："我是民主联军的代表，你们被包围了，来劝你们投降！"另一个家伙吼叫："我看你是来送死的！"杨子荣坦然自若地说："若怕死我就不进来了，我是为了你们不死才进来的！"他说着扫了敌人一眼，见匪兵们仍惊恐地看着他，于是他又挺起胸膛，顶开了敌人的枪口，向前走了几步，对匪兵们说："伪军兄弟们，我军的政策你们该知道吧？只要放下武器，就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土匪连副听了这话之后，吓得叫喊起来："不准你宣传，跟我到连部去！"

这时，杨子荣想：土匪头子多是惯匪，而匪兵大多是受骗的穷人，容易接受我军的政策，只要瓦解了匪兵，匪首自然也就孤立了。于是他又大声喊道："弟兄们，不投降，我们的十几门大炮就要把围子轰平了，想活命的跟我一起到你们连部去。"

村子里的群众听说一位老八路进了围子，也都惊奇地出来看动静。杨子荣一边走一边向群众打招呼："乡亲们，你们受惊了，不要害怕！"群众对杨子荣一个人就敢闯进围子很是敬佩，他们纷

纷议论着围了上来，有的说："快交枪吧，不然也得和马桥河一样，倒大霉！"有的说："咱村的郭连长好说，他家也有老有小，就怕青北寨的许大虎不干。……"

杨子荣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群众痛恨土匪，土匪之间确实有矛盾。

土匪连副到连部没找到连长，便命两个匪兵看着杨子荣，又到别外找连长去了。杨子荣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匪兵和群众说："乡亲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我们的大部队已把村子包围了，再打下去，老百姓就要遭殃。只要你们投降，保证生命安全，全村也可平安无事。"他喘口气又继续说："伪军兄弟们，你们都是有家有业的，有的家在本村，打下去会怎么样？你们有的家在青北寨，北甸子和板院那里都解决了，你们还在这里犯罪，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兄弟吗？！"

杨子荣的话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的匪兵说："咱们都被包围了，还打个啥劲？"群众见有老八路在场，也壮着胆子对匪兵们说："你们还打个啥？等着爹妈来收尸啊！……"村里的维持会长邱老六不知什么时候也钻在人群里探看情况。群众发现后，把他推了出来，告诉杨子荣他是村里的维持会长。杨子荣立即向他交待政策。邱老六很会看风使舵，连连点头称是。杨子荣还叫他立刻去准备几面白旗，插到围墙上去。

正在这时，青北寨的土匪连长许大虎和家住本村的郭连长等4个匪军头目来了。许大虎气势汹汹地用手枪顶住杨子荣的胸口。声嘶力竭地吼叫："住嘴，不许你宣传，不许你扰乱军心，煽动百姓！"杨子荣知道来的是匪首，决定先打掉他们的气焰，便大声地问："你们谁是青北寨的许大虎？哪位是本村的郭连长？"这个有区别的点名，很有作用，说明他们的情况，我军掌握得很清楚。没等他们回答，杨子荣又威严地厉声说："你们听着，杏树村已被我们包围，为了保护乡亲们，也是给你们一条出路，我军的十几门

大炮才停止了射击。只要放下武器，就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走哪条路，由你们自己选择！”许大虎心里恐惧，表面上还装腔作势地叫喊：“你们不要吓唬人，我们宁死不投降，看你们怎么办，还是你投降吧！”

杨子荣看出他就是许大虎，便对群众说：“乡亲们，青北寨的许大虎，要在你们村顽抗到底，你们同意吗？”

“我们不借地方给他打仗，叫他带着人到他们村打去吧！”

“我们不同意！”群众七嘴八舌地回答着。

杨子荣又指着匪兵们对许大虎说：“你看看他们谁愿意跟你去送死？把他们往死路上送，能听你指挥吗？郭连长的家就在本村，他愿意把自己的村子打个稀巴烂吗？”

许大虎怕郭连长动摇，咋呼着说：“有李团长的命令，谁敢不听我的？”

杨子荣为了分化两个匪首，厉声说：“你别做梦了，别说小小的李开江，就是大匪首谢文东、李华堂，也是菜板上的一块肉，很快就会吃掉他们。我警告你，别不知好歹！”

这时邱老六拿着白旗来了，他哀求着说：“许连长，你行行好吧，看在我们杏树村几百口人的份上，和解了吧！”

许大虎一听火冒三尺，用枪顶着邱老六的脑门狂叫着：“我……我枪毙了你！”

邱老六吓得筛糠似地跪在地上说：“我……我可是一片好心，我是为了全村的百姓，也是为了你青北寨的弟兄啊！”

郭连长正在考虑不投降也没有好结果，又看到许大虎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欺负本村的头面人物，太有失自己的脸面，就拦住许大虎说：“姓许的，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还是见好就收吧！”

“你想怎么样？”许大虎威胁着。

“你敢怎么样？”郭连长也不示弱。

两个匪首顿时变成了仇敌，各自端着手枪，怒目相对，眼看

就要火并。另两个匪首，愣愣地对视着，不知怎么办好。

群众和匪兵也开始骚动起来，面对这一情况，杨子荣心想：土匪之间打起来，不但对匪军投降不利，还会造成群众的伤亡。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他灵机一动，果断地指着附近一块空地向匪兵们说："弟兄们，不要白送命了，愿意放下武器的把枪放到这里来！"

"我们缴枪！"两个匪兵走过去把枪放在地上。

邱老六见郭连长和匪兵都有降心，又有杨子荣这个老八路威震群匪，他就爬起来，壮着胆子说："为了杏树村的三老四少，大家欢迎弟兄们缴枪！"

"欢迎弟兄们缴枪！"群众异口同声地喊着。

在场的匪兵们见此情景，都纷纷放下武器。许大虎见大势已去，把手枪往地下一扔，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杨子荣见大事已成，便命令郭连长、邱老六去围墙上插白旗，又叫那两个土匪头目去集合各处的匪兵，把枪架在大街上，整队待命，对反抗者决不轻饶。我军见围子上插起了白旗，知道杨子荣说降成功，营指挥所立即下令吹起进军号，部队从东、西、北三面迅速开进围子。

从上午 8 点多杨子荣进村，一直到中午，经过几小时的宣传斗争，终于迫使 400 多名土匪全部投降。共缴获重机枪 4 挺、轻机枪 6 挺、平射炮 2 门、迫击炮 1 门、掷弹筒 8 具、长短枪 300 余枝和大批弹药。

杏树村一战，杨子荣立了特等功，被评为战斗英雄。

二、频繁剿匪再立功

牡丹江北部地区剿匪战斗获得胜利后，杨子荣所在的二团又回到海林镇休整。不久，杨子荣被调到团部，升任相当连级的团

部直属侦察排排长。以后，他以卓越的侦察才能和机智勇敢的精神，胜利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险的侦察任务。

5月上旬，二团一营进驻苇河。根据群众反映，在亚不力山里有一股土匪，团部派杨子荣带人去侦察。他和两名战士化装成老百姓进入亚不力山，弄清这股土匪是一个营兵力，有300多人。团首长接到杨子荣报告后，准备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为了防备敌情有变化，5月13日，杨子荣再次化装进入匪军盘踞的村子侦察，发现敌人又增加了兵力。团首长按照新的情况，立即改变作战计划，重新进行了战斗部署，一举歼灭了这股匪军，活捉了在这一带危害严重的“许家三兄弟”，即许福（营长）、许禄（连长）、许祥（营部文书），还有一个国民党派来的接收大员——赵专员，获得了重大胜利。

由于匪军王枝林旅在东宁、绥阳一带大肆烧杀抢掠，残害群众，牡丹江军区又将进驻珠河一带的二团队部调回，进军绥、宁地区，围剿这股土匪。

一天上午，一团剿匪部队乘坐火车从穆陵镇出发，当火车快到八面通时，发现了敌情，可是前边正是一段险路，铁轨右侧是刀削斧劈似的悬崖峭壁，左侧是一条大河。由于敌人事先破坏了铁路，第一个车头刚刚拐过弯去，突然几声天崩地裂似的巨响，两个车头和前三节车厢，就脱轨翻到河里去了。后面的车厢也倾斜在路基上。埋伏在山崖上的匪军开始向我军车疯狂地射击。我军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跳出车厢还击敌人。匪军的机枪火力很猛，我军已有伤亡。这时，杨子荣抓起一枝步枪，以倾倒在路基旁的车厢为掩体，瞄准山上的敌人狠狠射击，一连3发，敌人的一个机枪火力发射点被消灭了。就在敌人机枪刚一“哑巴”时，他把一颗手榴弹甩上山崖，随着爆炸声，他右手握着手榴弹，左手提着驳壳枪，猫着腰冲过硝烟，飞身跃上悬崖。敌机枪射手已被打死，他迅速抓起敌人的机枪，向山上的匪军猛烈扫射，敌人

一个个倒下去。匪军在我军的打击下，死伤很多，仓皇溃退了。

6月间，杨子荣一个人奉命去绥芬河南侦察匪情，当时到处都有溃散的匪军。这天他完成任务后，沿着森林小铁路往回走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时分，天下着小雨。他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边有个搬道岔子的小房，他走近小房听见里边有土匪说话。于是，他悄悄走到门口，厉声喊到："不许动，我们是民主联军，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他又诈喊："二班堵房后捉活的，三班准备好手榴弹，不缴枪就甩！"屋里的匪兵吓坏了，忙喊："别扔手榴弹，我们缴枪！"杨子荣问："你们几个人？"土匪回答："就3个。"杨子荣一听心里有底了，3个人好对付，就下命令："先把枪扔出来，再一个个爬出来，脸朝地，谁抬头就打死谁！"

3枝步枪扔出来了，杨子荣把枪拣起来放到一旁，3个匪兵象3只大乌龟从屋里爬了出来，四肢平伸趴在地上。杨子荣叫一个敌人坐起来，解下绑腿把那两个家伙倒背手绑上，然后杨子荣把这个匪兵的双手也捆好，再把3枝步枪的枪栓卸下揣在怀里，把空枪挂在3个俘虏的脖子上，把他们带回团部。

从俘虏的口中了解到，匪军"姜左撇子"大队已逃回铁路北面。这股匪军有三四百人，匪首大队长"姜左撇子"是个有名的惯匪，已60多岁了，他左手打枪百发百中，故而有此绰号。我军追到细鳞河之后，敌人已进入北大山。经过了解，得知北山里有个百十户人家的屯子，是伪满日本人搞"归屯并户"时建立起来的"集团部落"，屯子四周有很高的土围墙。经过研究分析，估计敌人可能进入这个易守难攻的屯子。为了查明敌情，决定派杨子荣带一个战士前往侦察。

这个侦察任务是很艰巨的。杨子荣接受任务后，找了向导，吃完中午饭就出发了。一路未碰上敌人，到达这个屯子时已经半夜。他们在距屯子不远的一棵大树下停下来，杨子荣让那个战士和向导在大树下等着，他自己摸上去了。

杨子荣悄悄地绕屯子转了一圈，见土匪墙有2丈多高，伸手够不着顶，围子的南北门都有岗哨，而东、西又没有门。只有东墙的中段塌了豁子，墙根还有1人来高。他观察和试探了好一会，确认此处没有暗哨，就敏捷地从豁口爬了过去。围子里面有3排民房，家家户户都住着敌人。他刚顺墙根溜到东北角，就听见从南边沿墙根走过来一个人，他赶紧隐蔽起来。那个敌人直奔一间北屋走去，屋里闪着灯光。他侧耳细听，原来是带班的来叫人换岗。不一会，那人带着4个匪兵出来，然后分两路，一南一西地走了。杨子荣决定利用敌人换岗的机会，抓一个“舌头”带回去。他等匪兵们走远，立即闪进这间屋子，只见大炕上半截睡着敌人，半截空着。他走到炕边，把靠外边的那个匪兵狠推了两下，喊道：“起来，换岗啦！”然后躲到门后等着。那个匪兵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拎着枪跟杨子荣往外走。到了东墙的豁口处，杨子荣突然转过身，用匣枪对着那个匪兵的胸口，低声命令：“不准动，不许出声，我们是民主联军，老实跟我走！”这个匪兵吓呆了，就地缴了枪，被杨子荣带回来。

第二天中午，他们赶回团部。审问俘虏后，弄清了匪军的兵力情况，王团长让杨子荣留下休息，第二天随后勤人员一起出发。

部队经过连夜急行军，拂晓前到达离该屯3里左右的地方。部队集合后，分两路进攻敌人。正在这时，前边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敌人发现匪兵失踪，怕我军来攻打，也在天亮前转移，与我遭遇。枪声一响，敌人四散溃逃，钻进树林里。就在这时，杨子荣突然来到王团长跟前。原来他当时口里答应留下休息，待部队出发后，他还是悄悄地跟来了，而且趁敌人奔逃时还抓到一个重要俘虏。这个俘虏是姜左撇子的亲信副官。杨子荣向王团长建议，叫这个俘虏站到一棵大树下喊话，召唤敌人，我军埋伏在附近捉活的。王团长同意了杨子荣的建议，下令部队分散隐蔽起来。杨子荣让这个俘虏大声喊叫：“弟兄们，大部队在这里。”他一连喊

了几遍，果然匪兵从四面八方三三两两地走来了。我军顺顺当当地活捉了100多个俘虏，连那个老奸巨滑的匪首姜左撇子大队长也被我们活捉了。从此，消灭了王枝林匪旅的大部队，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同年7月间，杨子荣带领孙大德、孙立珍、赵宪功3名侦察员，到海林东部山区马圈子一带侦察马喜山匪部的人数和住地。他们化装成当地农民，腰里暗藏手枪。他们在山上看见山下有一个屯子，决定进去侦察。由于人多不方便，杨子荣把带来的侦察员分成两个组，分头行动，他和孙大德一个组。他们下山时碰见一个打柴的农民，杨子荣向他探问屯子里的情况，打柴的人说屯子里有300多匪徒。他决定亲自进去侦察一番。

他向打柴人借了用具和衣服，化好装后，让孙大德留在山上掩护，他挑起一担柴向屯子里走去。刚一进屯，几个骑马的匪兵就喊住他，叫他给遛马，杨子荣答应了。遛完马，他又假借找草料喂马的机会，把敌人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他们回到海林团部后报告了敌情，第二天我军赶到那里，全歼了这股敌人。

不久，杨子荣又带几个战士去磨刀石附近侦察“九彪”匪军的活动情况。他们从远处看到一个屯子，见村口有一个站岗的土匪，杨子荣让战士们在屯外隐蔽起来，他自己向屯子走去。在进屯之前，他顺手在地里拔了一些菜拿着，站岗的问他是那儿的，他就说是屯里老张家的，给他们弄菜去了。说着就坦然地掏出旱烟袋，一面抽烟，一面和匪兵唠起嗑来，从匪兵嘴里搞清了敌情。

还有一次，杨子荣带人去黑石砬子附近侦察，途中遇见土匪队伍，他们躲过了前边的尖兵，然后大大方方地迎着土匪大队走去，杨子荣一边走一边还和匪军打招呼，土匪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等大队走过去，后边只剩下一个在老百姓家抢东西的匪徒，杨子荣就把这个“舌头”捉了回来，从这个俘虏的嘴里得到了许多

重要情报。

又一次，团部作战参谋陈庆和杨子荣带侦察班一起去海林县南新安镇一带侦察李德林匪部情况，以便派部队追剿。当时二营驻防新安镇，这是个朝鲜族聚居的大村子。杨子荣他们中午到达二营营部。二营副营长介绍说当地区中队的人，大部份是附近沙兰站的，与李德林匪徒有勾结，很可能发生叛乱。营部已派一名排长到区中队当副指导员，以便掌握区中队的动向。陈庆让副营长把那位排长找来，一起开会，布置了警戒任务。因区中队不可靠，又调五连防守新安镇，并加强岗哨。

当天晚上，李德林匪部果然前来偷袭，匪徒们从屯子两边摸进区中队部，绑架了我军的副指导员。在他和敌人搏斗时，敌人的枪走了火。杨子荣一直没有睡，听见枪声，机警地就地一滚，打开门冲出去。这时，他听见脚步声已到院外，急忙隐蔽在院墙下喝问口令，没有人回答，他举起匣子枪打了一梭子，敌人用冲锋枪往屋里扫射，窗户玻璃都打碎了。杨子荣一支匣枪顶住了进攻营部的匪军，营部和五连的同志猛烈还击敌人，一直打到天亮，敌人才退走。由于杨子荣机警，及时冲出去挡住偷袭的土匪，使营部免受损失。

1946 年 9 月间，匪首马喜山带几百人，被牡丹江军区一团从镜泊湖一带追赶到海林西马场附近，有越过铁路北窜的企图。二团奉军区命令堵击，战斗由中午一直打到傍晚，敌人向南溃逃，二团紧紧尾追。团部派杨子荣带两个战士尾敌之后进行侦察，随时报告敌情变化。匪军经过头晚的行军和半天的作战，退到十道梁子时已疲惫不堪，到那里后他们马上宿营做饭。杨子荣追到这个屯子，看见家家冒烟，知道敌人在这里，他叫两个战士在屯外监视，自己进屯子里侦察。杨子荣从屯子西北角墙豁子钻进去，看到一家门口有一对水桶和一根扁担，于是灵机一动挑了起来，大模大样地在各院串了一遍，把敌人司令部住处、匪军有多少人，哪

里做饭喂马，那里有伤号，都侦察得一清二楚，及时报告给团部，使团首长对敌情了如指掌，对追歼匪军起了重要作用。

惯匪九彪部经过我军几次打击，大部分被剿灭，还剩下几十人。他们的匪巢在宁安东部50多里的深山老林中，二团王团长带一个连进去围剿，由于林子太密，给作战造成很大困难。为了找到匪穴，杨子荣不顾艰险，一个人钻进不见阳光的密林里，摸索着往前走。他带着一把利斧，走一段在树上砍一个白印，做为回来的标记。每登上一个山头，他都爬上一棵大树，观察远近山势，校正方向。整整走了一天，终于发现了敌人的窝棚，赶紧回来报告，我军顺利地歼灭了这股残匪。

这年冬天，二团王团长又带了一个连到宁安东部山区追剿残匪，他们冒雪行军，夜里到了靠山屯，大雪覆盖了整个山林。村落和道路。杨子荣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他想屯子里很可能有敌人的坐探，见我军到来，一定会进山去报信。所以第二天天刚亮，他就起来围着屯子转了一圈，果然发现有一行新脚印向林子里走去。他立即报告王团长，当即下令部队出发，跟着脚印进山。杨子荣带着侦察员走在部队的前边当尖兵，在没腿深的大雪中趟出一条雪道，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他们走了一天，到了太阳偏西的时候，突然雪地上的那行脚印消失了。杨子荣他们四下寻找都没找到。真是太奇怪了，这个匪徒难道“飞”了？部队只好停下来休息。就在这时，突然从林子里响起了枪声。顺着枪声的方向望去，从密林的缝隙里，隐约看见土匪象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一个又一个钻进了林子。王团长下令向敌人射击，但由于林子太密，打枪和甩手榴弹都不顶用。最后由地下钻出一个土匪机枪射手，他抱着一挺苏式机枪，刚跑几步，就被树枝绊倒，杨子荣冲上去把他活捉了。从他的嘴里才知道这些匪徒都藏在地窨子里，上边栽了许多假树，所以很难发现。

杨子荣不仅是优秀的侦察员，而且关心战士，关心群众的疾

苦，严于律己，是战士们拥护、群众喜欢和热爱的好干部。1946年10月1日，二团召开第一届奖模大会时，杨子荣光荣地当选为全团的模范。

三、智擒惯匪“座山雕”

经过1946年一年的频繁激烈的剿匪战斗，到年底，合江、牡丹江地区的大股土匪谢文东、李华堂、张黑子（张雨新）、王枝林、马喜山等基本上都被剿灭了，但小股土匪还有一些。入冬以来，二团对国民党委任的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三代惯匪“座山雕”张东山部进行了多次搜剿，歼灭了大部分，但潜藏在海林县北部夹皮沟山里（现属海林县林业局夹皮沟林场）的座山雕老巢，却一直找不到。

座山雕这个老匪非常狡猾，行踪诡秘，旧军阀张作霖时代和日本侵略军都未能对付了他。二团也曾用一个营的兵力，背着行李、带着炊具，进山搜索一个多月，也未发现他的一丝踪迹。在那茫茫无边的林海雪原里，大部队行动很不方便，敌人很容易发现我军行踪而隐蔽起来。

1947年1月中旬的一天，在海林镇农会办公室的地上，发现一封写给农会主席贾润福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座山雕匪部向他要20件棉衣、10袋白面，3天内送到胡家窝棚，否则要他的脑袋。贾润福把信交给了二团首长，他们立即开会研究围剿计划。从土匪这封要给养的恐吓信和群众的反映来看，座山雕的老巢还是在海林北部山区，人数也不太多。

团首长找杨子荣研究情况，要求他一定要摸清座山雕匪穴的情况，能打就打，不能打要搞清地形地貌，最好能抓个“舌头”回来，搞准地点，再派队伍去围剿。只要消灭了匪首座山雕，匪众就不战自溃了。

杨子荣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但也感到这个任务相当艰巨，座山雕这个老匪实难对付。他靠几十年的土匪生涯和山林活动经验，从来不大股集中活动，总是少数人分散出入山林。他住的巢穴更是极其秘密、隐蔽，除了少数亲信知道，一般的土匪都不清楚，所以从俘虏的土匪和群众的口里得不到一点线索。

虽然查清座山雕老巢难度很大，但杨子荣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经过周密考虑，他决定这次化装成被我军歼灭了的王枝林残匪，先设法与土匪直接见面，拉上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再打入匪穴，实行智擒。这样做虽然很危险，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能胜利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需要组成一支人数很少，但能胜任这一特殊任务的机智勇敢、战斗力强的精悍侦察小组。杨子荣从两个侦察班里挑选出孙大德、魏成友、赵宪功、孙立珍、耿宝林等5名侦察经验丰富和熟悉当地情况的侦察员。

杨子荣借了农会会长贾润福二尺半黑棉袄穿上，外罩一件日本军用黄呢子大衣，化装成土匪头目，其他侦察员也都穿上便衣，做好准备，腰里暗插匣子枪和手榴弹。

这时春节刚过，农历正月初五午后，杨子荣带领5名同志由海林镇出发，一直往北走。夜里到了靠山的一个小屯子，他们询问老百姓有无土匪，群众说不出，没有得到一点线索。走了半夜，也未发现什么情况。天亮后，他们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杨子荣让大家讨论侦察方法。同志们首先提出一些意见：没穿棉大衣，天太冷，在山里时间长了挺不住；每人只带几个冷饭团，没吃的也不行；如果找不到线索怎么办？杨子荣鼓励大家说：“在山里活动，困难肯定是很大的，要想抓大鱼，就得放长线。抓座山雕这只老狐狸，不花点力气，不吃点苦头能行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我敢保证，我们在山里转上几天，一定能打到土匪。”侦察员们都了解和佩服杨子荣，也知道他从不说大话，但总觉得心里没底，就又对杨子荣说：“吃苦我们倒不怕，

就是担心见不到土匪，完不成任务！”杨子荣看他们提不出具体方案，就把自己想法说出来：“从现在起，咱们正式化装成土匪，就说是东宁王枝林部被打散的人，要到吉林去投国民党。大家都要说过去学会的土匪黑话，而且一定要记住，再不能互叫同志，见到群众也不能叫老大爷、老大娘，装得一定要象。但有一条，除非斗争需要，不准违反群众纪律，不准拿群众的东西。”接着他确定了一下身份，杨子荣装土匪副官，孙大德装土匪排长，其他人是匪兵。见到土匪后，主要由他和孙大德答话，别人少插言，以免说漏了引起土匪的怀疑。大家都认为杨子荣的想法可行，就这样定了下来，以后出现新情况再研究。

具体侦察方案定下后，杨子荣就领着大家向北大林子奔去。一路上，不断演练土匪黑话和动作。杨子荣带头用黑话和大家“说山（即闲扯）”，故意说些民主联军的坏话和下流话，哼着庸俗的色情小调，表面看和真土匪没有什么两样。

天黑后，他们到蛤蟆塘地方，发现山角下有灯光，以为前边是个屯子，待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伐木头的大工棚子，里边有十几个人，不知是土匪还是工人。杨子荣问出了一个姓孟的是把头，然后用黑话试探他，问民主联军来过这里没有？孟把头坐在炕上一袋接一袋地抽烟，一句话也不说，好像听不懂似的，孙大德又问了一句，仍不回答，“工人们”也不吱声。杨子荣为进一步试探这个孟把头，就和孙大德在工棚子外边用黑话闲谈起来，说他们怎样被共军打散，没办法才准备到吉林那边去投奔国民党等等。这些话是故意说给孟把头听的，以此来打动他。他俩说了1个来小时，孟把头看他们象土匪，这才叫他俩进屋去坐。他们坐下后，杨子荣发现孟把头多次看他脚上穿的那双部队发的大头鞋。他知道这个家伙怀疑他的身份，就顺嘴编了一套嗑，说在东宁八里沟，他们如何伏击共军（二团确实在那里被王枝林匪部伏击过），一边说一边还把脚翘起来，说这双鞋就是当时从共军的尸体上扒

下来的等等，讲得有声有色。这一生动具体的“故事”，打消了姓孟的疑虑。这时他才拿出几斤苞米面和一些盐，装在一个铁桶里，还给了一把锯、一把斧子和一把小铁锹，叫孙大德他们背着，他给带路往山里走。大约走了二三十里地，到了大森林里一个空木棚子，他对杨子荣说：“这里最僻静，共军来不了，你们就在这里住吧！”说完他就走了。

从姓孟的这些表现看，他肯定与土匪有联系，他一定会去给土匪报信。杨子荣叫大家弄木柴点火取暖，等他再来。可是等了两天两夜，姓孟的也没来，他们带的干粮和几斤苞米面也都吃光了。战士们等得不耐烦，都要求回团部。杨子荣一再说服大家，要坚持，孟把头一定会来，他不会把咱们扔在这里不管，否则就不会送咱们到这里。这几天他准是在与土匪联系，也是对咱们进行试探。这样又等了一天一夜，孟把头还没来。没有吃的，大家饿得不行，魏成友把木棒子里的虫子抠出来烧熟，分给大家吃，还挺香。大家都认为姓孟的不会来了，可杨子荣仍坚持说：“这是土匪对咱们的试探，没有耐心就见不到土匪，咱们不走，他们就得来管咱们。”

又等了半天，果然不出杨子荣的所料，那个姓孟的又来了。杨子荣把他让进棚子里，假装问他赚不赚钱，生活过得怎样。姓孟的却问杨子荣他们出去抢吃的没有，杨子荣说没有去。

孟把头说：“我领你们去夹皮沟赶给养吧！”孙大德一听心里犯思量，夹皮沟是他们常去的地方，群众都认识他们，那怎么行。姓孟的从孙大德的表情上看出他不怎么愿意，就继续试探他们敢不敢去。孙大德只好说那个屯子很空，去也弄不到东西，过去去过。姓孟的听了说：“夹皮沟老刘家有粮有鸡。”杨子荣明白孙大德的心事，也看透了姓孟的诡计，他还在考验他们是不是真土匪。为了使姓孟的放心，于是对孙大德说：“有粮咱们就去！”

说完，他们就跟姓孟的回到工棚子，到那儿已经天黑了。杨

子荣说很多天没洗脸了，叫孙大德去弄点水来，孙大德没理解杨子荣的用意，找到一个盆，到外边弄些雪来架在炉子上烧化。杨子荣趁姓孟的没注意，抓了些黑灰放在水里，以便把脸弄黑些，群众好认不出来。其他几个都洗了几把，轮到魏成友，他说水太黑不洗了。这下子又引起了姓孟的疑心。杨子荣机智地对孙大德骂道："你他妈干嘛的，弄点水都不会，这些水全是黑的，你这小子真没用。"一边骂着，抬起脚把盆子踢翻了，说不洗就走，这才消除了姓孟的疑心。

杨子荣他们跟姓孟的到了夹皮沟屯，群众怕土匪来抢，把粮食都藏起来了，他们进了几家，只拿了点粘豆包，最后到了姓刘的家里，果然有吃的，他们拿了十几斤荞麦面和两只小鸡。天亮时回到窝棚，他们把荞麦面做成饼，煮上一只小鸡，6个人抢着吃，象土匪似的。这时姓孟的才相信确实是"自己人"，于是对杨子荣说明，他是座山雕张五爷的联络副官，愿意引荐他们入伙。杨子荣表示很高兴，孟又说山里会来人和他们面谈。由于杨子荣的耐心坚持，果然把座山雕匪部引出来，这真是件大好事。同志们都非常兴奋，充满必胜信心。

第二天，果然从山里下来两个匪徒，一个自称姓刘，另一个管他叫连长。他们用土匪黑话盘问杨子荣，杨子荣回答得很流利，说他们在东宁被打散后，走投无路，要去吉林那边投国民党军队，混个事干。说完这两个人就走了，并答应明天再来。可是第二天他们却没有来，战士们都埋怨杨子荣，好容易见到了土匪，把这两个"舌头"抓回去，就完成了任务，他们再不来了怎么办？

杨子荣很有信心，他知道土匪肯定会来，现在已经发现座山雕的踪迹了，不搞个水落石出，岂不前功尽弃。他的目标不是抓几个"舌头"，而是要直接抓到座山雕。于是他说服大家要耐心等待。又过了两天，那两个人果真来了，他们说座山雕要和杨子荣拜把兄弟，请他们上山过元宵节。他俩现在就去牡丹江买酒肉，到

时候再来接杨子荣他们。

两个土匪走后，杨子荣和战友们研究，他们已经出来七八天了，团部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一定很着急，得派人回去报告，请示下一步行动。17岁的小战士魏成友是海林县当地人，熟悉这一带情况，他主动要求回团部送信，一时被土匪发现也不怕，就说是不愿干了回家去。他人小，不惹人注意。杨子荣同意他的要求，决定派他回去，而且要他立即把团首长的指示带回来。

农历正月十四日下午，杨子荣等送魏成友到夹皮沟屯，当时天已黑了，见屯子东头一家有一匹白骒马，向主人说“借用”一下，魏成友就骑上往回跑。这里距海林镇有六七十里路，小魏打马飞跑，到“一部落”屯子时，见到团部派来寻找他们的七连一个排。小魏和七连副连长说明情况，要他们赶快撤回去，以免引起土匪的怀疑，影响打入匪穴的计划。说完他又骑上马赶回海林镇，到团部已是夜里11多钟了。

因时间紧迫，还得在天亮前赶回去，小魏只见到团部作战参谋陈庆，向他报告了如何见到土匪和他们准备进山侦察、探听虚实的情况。陈参谋让他转告杨子荣：正月二十日前能抓回来“舌头”也行，或画好地形图回来，如果到时没回来就是进去了，团部派队伍去支援。他还把支援部队的口令告诉小魏，以便到时候里应外合。

小魏急忙吃点饭，又装了两背兜馒头和熟肉，就骑马跑回夹皮沟。杨子荣他们在那里等着，放回马，一同回到木棚子。大家已两天没吃到东西了，用小魏带回的干粮饱餐了一顿。

正月十五下午，那两个土匪头目又来了，说过节的酒肉已筹办好，明天接他们上山。说完他俩又走了。杨子荣和战友们研究：“座山雕这个老匪果真狡猾，经过这么多日子的试探，他还是疑虑重重，迟迟不让他们进山。夜长梦多，再拖下去也可能又有变化，所以不能再等了。请求部队支援也来不及了。经大家研究决定：

“土匪再来时就把他们先绑起来，叫他们领进山去，便于动手。因为不知山里敌人有多少，尽可能不暴露真实身份，继续装土匪，骗取敌人信任。如果被敌人识破，就进行强攻，大家要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谁活着谁就回团部送信。

第二天，正月十六日下午，还是姓刘的那两个土匪来了。杨子荣他们把留着的那只小鸡煮上吃了。杨子荣装做出外解手，见没有别的土匪，就回到棚子里，装做生气地说：“这么冷，还不加柴火！”这是事先约定的暗语，战士们立即动手，下了两个土匪的手枪，把他俩绑起来。杨子荣发火地使黑话喊着：“你们这两个小子，也他妈的太不讲交情了，我们等了这么些天，都要饿死了，也不领我们上山，你们安的是什么心？是不是五爷给我们的给养都叫你们独吞了，快说，是不是？”两个家伙急忙分辩，说是为了考验你们是不是自己人。杨子荣装做不信他们的话，要面见“五爷”问问，叫他俩赶快领着进山。

这时天已黑，杨子荣他们押着这两个土匪向山里走去。一边走，杨子荣一边讲些民间趣事，他谈笑风生，既冲淡了紧张气氛，使敌人相信他们是自己人，也减轻了大家走路的疲劳。

他们在没腿深的大雪里走了 30 多里地，到了大砬子山里，根本没有道了。这时见到土匪的第一道卡子房，小窝棚里有一个岗哨。由于土匪刘连长答话，杨子荣他们很容易就把岗哨的枪缴了，也把他绑上带走。越往山里走，路越不好走，只有土匪踩的一行脚印。又走了 2 里多地，见到一个马架子房，里边有十几个人睡觉，也有岗哨。到这，仍由土匪刘连长答话，他说这些人是干活的，锯箩圈板的，没有武器。实际这些人也是土匪，但主要为捉拿匪首，尽量不打草惊蛇，所以杨子荣没有叫这些人出来，仍让他们睡觉，只把岗哨的枪下了，也把他绑上带走。

又往前走了 2 里多地，有个小房，这里设两个岗哨，是第三道卡子。杨子荣佯装发火，对刘匪叫喊：“是不是不想叫我们见五

爷，怎么走这么远还不到！”刘匪说：“这条路是最秘密的，很不好走，前边就到了。”于是把这两个岗哨的枪也下了，绑起来。杨子荣说：“张五爷可太不够意思了，对我们太刻薄了！”刘匪说：“就到了。”这时才看见前边有微弱的灯光。

杨子荣叫孙立珍、赵宪功、耿宝林3人看押那6名土匪，他带着孙大德、魏成友向灯光处摸去。走有百十米，从林子缝里看见一座埋在雪里的大马架子房子，门冲西，门前没有岗哨。他们摸到房子跟前，杨子荣一脚把门踢开，枪口对准地炕上的土匪，喊了声：“别动！”孙大德冲进屋站在东南角，魏成友站在西南角，3枝匣枪同时对准敌人。屋里点着一盏马灯，还有松树明子，很亮。睡在炕上的一共是7个土匪，其中一个瘦小的老头，有70多岁，白头发，下巴上是一撮白山羊胡子，鹰勾鼻子旁边两只深陷的小眼睛闪着贼光。此人正是著名惯匪座山雕——张乐山，现在他已是穷途末路，身边只有这几个人了。

老匪一看进来了生人，赶紧伸手摸枪，杨子荣一个箭步窜上去，踩住他的手，缴了他的枪。其余6个家伙都举起了手，也都缴了枪，杨子荣让他们穿上衣服。由于土匪人多不好对付，杨子荣他们仍装土匪，并故做愤怒地用黑话斥责座山雕。话的大意是：你张五爷太不够朋友，不论怎么说咱们都是打着蒋委员长的旗号，我们不过是借条路到吉林去投国民党，你们却这样不讲义气，让我们等了八九天，好险没饿死……座山雕一听原来是刘连长他们联络要入伙的土匪，都是自己人，这才放了心，连忙道歉说：误会，自己人好说，是为了考验你们是不是共军。杨子荣说：我们要是共军早就打进来了。在你们的地盘上，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对不起，只得暂时委屈你们一下，请张司令送我们过铁道。我们知道这一带到处都是你们的关卡，离开了你们的地面，再请诸位弟兄回来，你们的枪支弹药我们都不要，连我们的枪出山也不带了，都给你们，请五爷尽管放心……。

杨子荣一口气说了几十分钟，座山雕连说："误会，误会，一定送你们。"那6个家伙也同声说：我们一定送，请放心。杨子荣叫他们带枪，他们说不带，以表示信任。杨子荣叫孙大德、魏成友把座山雕等7名匪首绑结实，然后下令出发。杨子荣牵着座山雕等3个土匪；孙大德、魏成友各牵两个；孙立珍等三个战士押着那个土匪跟在后边，向南走去。

座山雕这个老匪，别看他岁数大，走山路却非常快，他在前边走，后边的人小跑还跟不上。爬过一座山，天就大亮了。到了山下，见到二团团部供给处派来这里拉木头的大车。座山雕说那是共军的大车，快躲开。杨子荣却笑着说："正好，卸他们几匹马，骑上走更快些。"土匪刘连长（外号刘扒皮）很狡猾，一看不好，转身就跑，杨子荣一枪打中他的腿部，倒在地上。同志们也大喊："不许动！"供给处保护大车的一个班也打枪威吓敌人。这时杨子荣才公开身份，说他们是民主联军的侦察员。座山雕等匪徒一听都耷拉下脑袋，腿肚子一软瘫坐在地上。座山雕嘴里嘟囔着说："真晦气，大帅、少帅（指张作霖、张学良）、日本鬼子都没整了我，竟被你们几个土八路整了。真是打了一辈子鹰，最后还叫鹰啄了眼……。"

他们把抓到的13个土匪牢牢实实地绑好，坐上两辆大车，同时叫魏成友骑马先跑回团部报信。

由于几天没睡好觉，一坐上大车，战士们就打起瞌睡来。土匪见状就想跑，赶车老板一再把大家叫醒，告诉他们要注意，只有杨子荣一直很警惕，始终睁着眼睛，握着枪监视敌人。正月十七日傍晚，他们胜利地把13名土匪带回海林镇二团团部。

这时团部早已接到消息，群众听说活捉了座山雕，都特别高兴，自动出来列队迎接杨子荣他们。牡丹江军分区司令部接到二团打去的电话，也非常高兴，田松副司令员亲自赶来海林祝贺。

经过审讯，这13名土匪中除座山雕张乐山外，还有联络部长

刘兆成、秘书官李少堂、连长刘忠汉等。山中其余的土匪，团部又派队伍进去全部剿灭，缴获了一些粮食和枪支弹药，烧毁了匪窝棚。座山雕派到各地的情报人员也先后被我公安机关全部抓获。从此，座山雕匪帮便彻底消灭了。

接着在海林镇小学召开了公审座山雕等匪首的大会，全海林镇的群众都跑来参加，挤满了学校，人们拍手称快，齐声夸赞杨子荣。

杨子荣等智擒座山雕的英雄壮举，受到部队和当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二团团部召开庆功大会，给杨子荣记了两大功，孙大德、魏成友各记一大功，其他3名侦察员各记两小功。

座山雕后来被送到牡丹江军分区司令部审讯处理，不久因病死亡。

2月19日，《东北日报》以《战斗模范杨子荣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报道了他们的英雄事迹，称这次战斗是“创造了以少胜多歼灭股匪的战斗范例”。事后，战友们让杨子荣介绍这次战斗的经验，他谦虚地说：“小经验还没有总结出来，大经验只有一条，就是为人民生死不怕，对付敌人一定要神通广大！”

四、追残匪英勇牺牲

座山雕股匪被消灭后，流窜在牡丹江地区的土匪已为数不多了。在这些残匪中，还有李德林匪部没有全部剿灭，他们就在海林北部黑牛背一带潜藏着。经过我军多次打击，该匪部已经溃散，据梨树沟群众反映，附近山里有土匪，可能就是李德林残部。后来从俘虏的匪徒口中得知，他们正是李德林匪旅中3个凶恶的匪首：营长刘俊章（一说刘维章）、副官（也称经济部长）丁焕章（外号丁疤拉眼）、恶匪大盗副连长郑三炮。他们3个是被我军打伤后，来到梨树沟孟老三的窝棚里养伤。孟老三（后改名孟桐

春）原是附近羊脸沟屯的农民，他常在山里打猎，1946年8月间，他和一个叫张立云的土匪，在闹技沟山梁上盖了一间1丈长8尺宽的马架棚子，他俩就住在这里。后来土匪刘俊章、丁焕章、程树林、马连德、牟成顺等也来过这里，丁焕章给孟老三一枝七九步枪。冬天，郑三炮被我军打伤后也潜伏到这里，李德林和他的几个儿子也来过，不久又离开。1947年农历正月下旬，刘俊章、丁焕章受伤又回到这里。据孟老三后来交待，当时窝棚里共有7个土匪：即刘俊章、丁焕章、郑三炮、程树林、马连德、牟成顺及孟老三本人。

二团得到情报后，由曲副政委和杨子荣带领侦察排两个班和机枪班共30多人组成的小分队，前往侦察搜剿。农历二月初二日下午，小分队由海林镇出发，一直向北走，天黑后到达夹皮沟屯。部队前半夜住在该屯，后半夜出发，继续向东北走。走了30来里路，到了闹技沟。这里有个打皮子老人的小窝棚，询问打皮子老人，他说北面有个日本人统治时期盖的工棚子，日本垮台后，劳工都走了，剩下个空棚子，土匪有可能住在那里。于是队伍赶到那个工棚子，把它围住，但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杨子荣带领战士们摸进去，里边空荡荡的，没有人。可是地上烧过的木柴灰还没有凉透，旁边还有土匪扔下的野兔肠子，也没冻硬，这些迹象表明，肯定有土匪在这儿住过，离开的时间不长，顶多五六个小时。这时已是下半夜两三点钟，天很黑，辨别不清敌人去的方向，又怕土匪偷着回来袭击我们。为了有利作战，队伍先回到打皮子老人的窝棚，并派人去夹皮沟屯，动员群众给做些干粮送来。

第二天天刚亮，杨子荣又去工棚子附近侦察。他从西北面绕到工棚子，发现工棚子西边有一趟脚印，初看象一个人走的。仔细一看是几个人走的一个脚印。杨子荣回来报告曲波副政委，又问了打皮子老人是不是他走的脚印，老人说不是，这就肯定是土匪走的了。于是部队出发，顺着这溜脚印追击。杨子荣、孙大德、

魏成友等在前边，其他人一个接一个紧跟着。在没膝深的大雪中急走了十五六里路，这时天已大亮，杨子荣发现了前边山梁上孟老三的马架子窝棚。

窝棚中的土匪郑三炮似乎听见点动静，叫马连德出去看看，马端盆水出来倒了，没发现什么，就又回到屋里。杨子荣看见土匪出来，急忙向后打手势，让大家蹲下。待土匪进去后，杨子荣立即冲上前去，他身后是孙大德，再后边是魏成友。小魏这时“靰鞡”鞋带子开了，他正绑时，杨子荣已冲到窝棚门口。杨子荣靠在当做门框的大树干上，一脚踢开门，大喊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土匪丁焕章叫喊着：“谁也不准跑，都给我打！”土匪们急忙操起枪，杨子荣听见拉枪栓声，立即扣动手中的匣枪扳机，但却没有打响，原来是早晨在窝棚里烤火，枪膛里“缓霜”，行军时由于天太冷，撞针冻住了。孙大德的轮盘式冲锋枪也没打响。屋里的孟老三见外边人的枪没响，他就冲门旁开了一枪，这一枪正中杨子荣胸部，杨子荣晃了三晃，倒在门旁。这时孟老三冲出来，战士们向他打了几枪没打中，这家伙拼命地逃走了（以后他改名潜藏起来，后来才被挖出来，供述了当时的情况）。

杨子荣倒下后，又咬着牙，用左手捂着胸部伤口，右手掏出手榴弹，但怎么也举不起来了。孙大德扑过去抱住杨子荣的上半身，连喊：“杨排长，杨排长！”杨子荣用微弱的声音说：“大德……任务……”话没说完就牺牲了。时年 31 岁。

这时队伍冲上来，见杨子荣牺牲了，都红了眼，一边向屋子里打枪，一边往里扔手榴弹。土匪顽抗着，进行还击，扔进屋里的手榴弹又被土匪扔出来。恶匪郑三炮使一支大镜面匣子枪，噎噎地向外射击，疯狂地挣扎着。战斗持续了 20 多分钟，最后曲副政委命令魏成友，拿了 5 颗集束手榴弹，从东边绕过去，爬上房，又从窗户扔进屋里，爆炸后，只有马连德（当地人）受伤爬了出来，其余 5 名土匪全被炸死。

杨子荣牺牲后，指战员们万分悲痛，大家用土匪窝棚的门板把他的遗体抬到梨树沟，又用爬犁拉到黑牛背屯子（今朝阳）。在这里从群众家里买了一口棺材装殓上，然后由魏成友等同志用马拉“轱辘马车”（森林小铁路运木材用的小平板货车）运到柴河，又换群众的马车送回海林镇团部。

1947 年 2 月 25 日，二团指战员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在海林镇朝鲜中学操场上为杨子荣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安葬大会。海林镇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赶来参加追悼会。牡丹江军分区首长致悼词，并当场宣布把杨子荣同志领导的侦察排命名为“杨子荣排”（现属 51034 部队建制）。当时营以上干部抬着杨子荣的灵柩，在一阵阵排枪声中，绕海林镇走一圈，以示悼念。

由于杨子荣在剿匪斗争中战功卓越，东北军区司令部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

建国后，海林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为纪念杨子荣同志为党为人民建立的不朽功绩，在海林镇东山修建了杨子荣烈士墓和杨子荣纪念馆，以志永久纪念。

杨子荣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光辉名字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选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哈东剿匪记

王文焕

八·一五光复后，哈东地区的汉奸、特务相继接受了国民党的收编和重用，这些民族败类，打着中央军的招牌，到处招兵买马，封官许愿，将各零散的汉奸、特务、土匪……都收编成所谓的“挺进军”、“先遣支队”，有大、小股土匪万余众，土匪司令、旅长、团长遍地皆是。他们手里掌握着从日伪手中接过来的大量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控制着重要村镇、山林和要隘，抢男霸女，烧杀掠夺，恣意涂炭人民，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严重地危害哈东地区广大城乡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四面围攻，平息刘鸣之叛乱

我党为了建立和巩固哈东这块大后方根据地，在松江省工委和松江军区的领导下，于1945年8月底，派出大批干部，分别在哈东几个县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扩大人民武装。在阿城、宾县、珠河等9个县先后建立了县政权和县民主政府领导下的军事武装、公安武装。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我军的力量还没有占绝对优势，当地的反动武装和国民党特务、土匪仍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范围。

同年9月初，根据斗争需要，我党改编了阿城县平山大地主刘鸣之的保安队，组成了松江自卫军阿城自卫团。自卫团建立后，

住在蜚克图。为了团结和改造这支部队，党决定让刘鸣之任团长、陈克明（中共党员）任政治委员，下设3个营；营长、教导员和绝大多数的连、排长都是我党派来的干部。10月上旬，阿城县公安局的4个中队五六百人在料甸子编入了自卫团，正式组成了江南分区（一分区）第三团，有2000多人。一、三营和团部住在蜚克图，二营住料甸子，配合分区一、二团兄弟部队，投入了哈东地区的剿匪斗争。

编入到三团的刘鸣之部成分复杂，成员都是刘的盟兄把弟和给地主恶霸看家护院的“炮手”，还有一部分是刘鸣之“摇旗招兵”收罗来的土匪。刘鸣之在伪满时抽大烟、刮民脂、玩女人，一惯吃喝嫖赌。我军进入北满后，刘鸣之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伪装进步，接受我军的改编。表面上刘鸣之支持我党剿匪建政的主张，协助开辟新区的工作；暗地里却勾结惯匪刘占海，投靠大汉奸姜鹏飞，被委任为国民党新编二十七军的旅长。

不久，刘鸣之就积极准备武装叛乱，带着一伙心腹早出晚归，活动频繁。10月中旬的一天，刘匪预定当晚在蜚克图、满家店叛乱的阴谋被政治委员陈克明同志及时察觉了，陈政委立即派人把这一情况通知了我党在部队中的营连长，命令他们掌握好部队，相机行事。晚饭后，陈政委趁刘匪不备，把警卫班的8名同志隐蔽在屋子里，窗户蒙上了两床棉被，在窗户的下角留下一个碗口大的小孔，里面架上一挺机枪。团部的通信排悄悄地控制了团部的大门和几排房子中间的通道，时刻准备打击叛乱分子的进攻。

天黑以后，刘鸣之就带上了从各连纠集来的二三百人马，包围了团部。妄想出其不意，一举拿下团部，打掉几位团领导。刘鸣之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行动已经处在我们的监视之下。战斗一打响，他就感到情况不妙，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我军的包围网。混战了半宿，他们丢下10来具同伙的尸体，逃到了蜚克图以北的糖坊，与糖坊土匪徐占海会合在一起，公开地打出了国民党土匪

武装的旗号，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叛乱后，刘鸣之与徐占海以糖坊为巢穴，四出骚乱，附近村屯的老百姓又重遭蹂躏。

遵照江南分区“在短时间内，消灭这股土匪”的指示，我们三团在11月初的一天晚上，发动了对刘鸣之匪帮的围剿。那天，太阳刚下山，我们三团二、三两个营900多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糖坊，将屯子里的400多名土匪团团包围起来。匪徒借着院落和房屋的掩护，拚命地抵抗。战斗从黄昏一直打到清晨，刘匪终于顶不住了，部队从四面攻进了屯里。屯子里到处可以见到土匪的尸体和畏缩在墙角下的土匪伤兵，战士们活捉了匪首刘鸣之和徐占海，第二天就召开了公审大会，按人民的要求，枪毙了刘、徐二匪。消息传开后，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继续追剿，击溃刘昨非匪帮

1946年4月以后，我军主动撤出了四平、长春，国民党军队一天天逼近松花江上游两岸，哈东各县处于战争威胁之下。几个县的反动武装和未被剿除的匪徒都纷纷蠢动。他们结成大帮小股，策应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捣毁了苇河县政府和宾县摆渡河、汤什河、常安等4个区乡政权，袭击各地自卫队，破坏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在这期间，200多名县、区、乡干部和自卫队员遭到了杀害。

在这一带活动的几十股土匪中，最猖狂的是一面坡伪警察署长刘昨非和韩小胡两股匪帮。刘、韩两个惯匪，在日伪统治时期就为非作歹，捕杀我抗日联军第三军战士，残酷迫害当地人民群众。他们网罗了五六百伪警察、宪兵、特务、地痞，成为惯于在山林作战的“坐地虎”、“地头蛇”。刘昨非接受了国民党新编第二十七军一〇六师师长的封委后，更加死心塌地的反共反人民。他们盘踞在哈东几个县的乡村，打家劫舍，残杀我工作队和农会干

部，扰乱后方根据地的建设，并且严重地威胁着滨绥铁路和哈绥公路干线的安全。当地群众气愤地说：这帮匪徒一天不消灭，老百姓就没一天好日子过。

根据松江省“清剿土匪，为民除害；拥政爱民，改善民生”的指示，江南分区及时命令所属3个团，采取“猛打”、“穷追”和“分进合击”的战术，追剿刘昨非、韩小胡匪帮。

连日来，刘、韩二匪被分区部队围剿、堵截得寸步难行，在宾县、阿城平原地带到处挨打。后来他们感到实在无处藏身，只好带着匪帮窜到了山多林密的珠河、苇河两县的丘陵山区，继续负隅顽抗。我们三团紧紧盯住这股土匪，进入珠河、苇河两县。团部设在一面坡，部队分散在一面坡至亚布力一带。我们二营住在一面坡附近的鞭杆抬。当时，我在二营六连七班当班长。

4月底的一天，苇河群众来报告，有一小股土匪窜入苇河八里地。接到情报后，营长秦仪才命令我们六连立即出发，清剿这股匪徒。队伍沿着蚂蚁河以急行军的速度向东奔去。我带着七班走在队伍的前面。

那时候，物资供应很紧张，我们身上穿的仍然是越冬的棉衣、棉裤，脚上穿的是牛皮靰鞡。没跑出多远路，一个个就累得气喘吁吁，汗水浸透了棉衣，阳光一照，上面长出了一层白碱。4月的蚂蚁河，冰雪刚刚融化，人走在上面，冰吱吱作响，有几个战士不小心踩塌了冰层，掉进了没膝深的水里。河水透骨的凉，刚才还是一身大汗，被冰凉的水一激，顿时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裤腿和棉靰鞡都湿透了，加上肩上背着10多斤的武器弹药，沉得有点抬不动腿。可是50多里坎坷不平的山路，我们不到3小时就赶到了。接近了八里地，全连拉开大网，警惕地搜索前进。忽然听到南山坡上响起了枪声，二排首先发现了土匪，同敌人接火了。我带七班战士顾不得躲闪横七竖八的乱树杈子，径直朝响枪的方向冲去。匪徒见不断涌来援军。吓得慌忙逃窜。我们一阵追击，打

死了两个匪徒，其余的翻过了山头跑掉了。

5月份，当地群众报告，有大股土匪集结在亚布力以北的沟里，伺机出击。团里决定由副团长郑志生带一营一部分和二营全部战士去这一带剿匪。6月初的一天，离端午节还有三四天，留守的同志都来到亚布力车站，给郑副团长和两个营的战友们送行。

小火车慢慢地开动了，郑副团长站在车厢上，挥着手，向战友们告别。送行的同志们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竟是与郑副团长的诀别。

第二天，部队在亮河丘陵山区与四五百土匪遇上了。土匪首先抢占了附近几处山头，凭借着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不断地射下密集的子弹，部队处境十分不利。各连向山上发动了几次进攻都没有成功。在后面指挥作战的郑副团长气得眼睛都红了，只见他几步冲到前面，大声地喊："压住土匪火力，跟我往上冲！"警卫员小关看实在拦不住他，也跟着冲了上去。

山丘不太高，长满了灌木丛和稀稀落落的落叶松。郑副团长带领着战士们，冒着土匪机枪的疯狂扫射，利用树丛和突出的石头作掩护，向山上冲去。匪徒们发现了指挥冲锋的郑副团长，集中了火力向他射击。在离山顶二三百米的地方，机枪子弹射中了郑副团长和冲在前面的一营班长罗永贵、二营副排长徐廷合、班长关西德和战士徐海银。只见郑副团长向前踉跄了几步就倒了下去。警卫员小关跑过去扶起郑副团长的头，赶紧包扎他头上和胸部的伤口。他见郑副团长紧锁着眉头，手向前一指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不禁失声痛哭。战士们看到郑副团长中弹牺牲，悲痛地呼喊着，仇恨的子弹准确地射向匪徒。

悲壮的呼声震撼着山谷，战士们飞步冲上了山顶。战斗结束了，山坡上留下了200多具匪徒的尸体，我们三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取得了几次小规模的剿匪胜利后，部队积累了一些剿匪经验，

追剿土匪的信心更足了。为了不让土匪有喘息和落脚的机会，部队一抓住刘昨非、韩小胡子的尾巴就连续追剿不停，每天途程少则五六十里，多则百八十里。

6月中旬，江南分区各县全面地进入了剿匪斗争的高潮，时间要求紧迫，我们团的任务也就更重了。亮河至四十六公里一带的地形险要，刘、韩二匪利用这带地势，同我军周旋于山林之中。一天清晨，全团3个营加上团直属队共2000多人，在团长陈克明和参谋长张治银的率领下，沿着铁路线向北开始了清剿。出发前，团首长把部队分成三路前进。一、二营在路右，三营和团直属队在路左，炮连连长曹明发组织炮连分别坐上了4辆在铁轨上行驶的"轱辘马子"（平板车）。每辆车上架着一门迫击炮，坐着十几个战士。

炮连在剿匪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每次执行剿匪任务，只要有炮连在，同志们就甭提多高兴了。因为炮连对匪徒有很大的威胁，所以，匪徒对炮连恨之入骨，他们早就想伏击炮连。接近四十六公里处的铁路有一段两边是100多米高的陡山坡，沟深林密。匪徒们探知我们三团进山来清剿，就打定伏击炮连的鬼主意。匪徒们扒掉了20多米长路轨后，便埋伏在山上。匪首刘昨非、韩小胡子下了很大赌注，带着匪四团、六团共400余人等候在这里。

4辆"轱辘马子"顺着坡度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向下滑行，曹连长站在第一辆车上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突然，他大声地喊道："不好，前面的铁路被扒坏了，快停车！"但由于坡陡，车速快，想停车已来不及了。曹连长的话音刚落，4辆车全翻下了路基。车上的迫击炮、炮弹和炮连的战士们都被掀落在路基下的树丛里。曹连长赶紧爬起来，检查一下全连的炮和几名受了轻伤的战士，就立即组织大家架炮，准备战斗。

土匪发现他们的预谋得逞了，随着一声声怪叫，子弹象雨点一样从两边山上扫了下来。听见枪声，我们部队从两侧急速迂回

上来，各营立即向土匪包抄过去。一阵冲锋就把匪徒压在路两旁的山丘上。时间不长，我们就争取到了战斗的主动权。炮连在曹连长的指挥下，炮弹象长了眼睛似的落在匪群里。“轰隆”、“轰隆”……炮弹落在山头上、山坡上，炸得匪徒血肉横飞，匪徒象马蜂窝炸了营一样，没命的乱跑乱窜。匪首们也慌了手脚，用枪逼着喽啰们拚命抵抗。我们吸取了以往剿匪的教训，在打法上采取了“缠住不放”的战术，决不能再让匪徒溜掉。陈团长和张参谋长分头组织部队围攻两侧山上的土匪。战斗从早上八、九点钟一直打到太阳偏西。估计土匪的体力和弹药都消耗的差不多了，团首长就命令各营趁天黑之前拿下山坡，消灭土匪。这时，匪徒们已经无力抵抗，我们的战士一阵猛冲，就把他们打垮了。刘昨非和韩小胡子带领残匪拚命地向北逃走了。这场战斗，消灭了匪徒200多人，沉重地打击了刘、韩匪帮的士气。

转眼到了7月，我们已经有十几天没发现刘、韩二匪的踪影了。一天夜里，我刚睡着，突然一阵紧急集合的哨音把我惊醒。“有情况，快起来！”我唤醒了全班的战士，拿上武器向集合地点跑去。

这时秦营长已经等候在那里了。他看大家到齐了，就说：“同志们，刚才送来紧急敌情通报，刘昨非带手下200多匪徒窜到了庆阳。这伙禽兽不如的匪徒，强抢明夺，奸淫妇女，又欠下了庆阳人民一笔新的血债。我命令全营兼程奔袭庆阳，消灭这股顽匪！”秦营长简短地做了战斗动员，全营立即出发了。

从一面坡到庆阳有170里路程。全营400多人沿着铁路线向东急行军。天黑得象锅底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路很不好走。几个月来。不停脚的追剿匪徒，我的脚掌打满了水泡，没走多远，就全磨破了，露出的新肉沾在鞋底下，每迈出一步都钻心似的痛。许多战士也都是一瘸一拐的。尽管行军这样艰难，却没有一个人掉队。为了早日为民除害，大家都咬紧牙关，坚持走在队列里。

后半夜，我们赶到了亚布力，征用了一列森林小火车，载着全营向庆阳奔去。小火车烧木柈子，蒸汽总是上不来，走走停停，象老牛似的慢慢地向前蠕动着。尽管这样，有了小火车，还是大大地加快了奔袭的速度，争取了时间。

翌日凌晨，小火车在离庆阳六七里路的细鳞河跑不动了。秦营长第一个跳下车厢，站在路基上命令道："六连插向屯西，五连插到屯东，四连和机枪连跟我从正面靠近庆阳，一定要把土匪围起来，关门打狗！"

庆阳四周都是大草甸子，布满了塔头，到处是水洼子。当我们刚接近屯子二三里地的时候，一声枪响，划破了黎明的宁静，土匪哨兵发现了我们，霎时间，枪声大作，战斗打得特别激烈。土匪在暗处，躲在屋后、院墙里，只能见到子弹射出后一闪一闪的光亮。我们暴露在明处，地形对我们也十分不利。接火不久，我们就伤亡了几位同志。

面对不利的地形，营长及时调整了战术，除一部分正面佯攻，其余同志都向屯子背后绕去。战斗持续了1个多小时，我们六连首先从屯西攻进去，慌乱的匪徒从屯东北角冲了出去，向山里窜逃了。在院落里，墙角下横躺竖卧了10具匪徒尸体。老乡们纷纷走出家门欢迎自己的子弟兵，并控诉被土匪凌辱的惨状。

连续几仗，消灭了大小头目以下500多个匪徒，大大削弱了土匪的实力。匪首刘昨非这只狡猾的老狐狸，眼看主力被歼，大势已去，丢下同伙，只身逃往沈阳国民党的军官训练团。余下的土匪更加孤立，活动范围在一天天缩小，日子也一天比一天难混了。残余土匪不得不改变同我军的作战方式，化整为零，隐匿在大山丛林中，继续与人民作对。

政治攻心，彻底消灭哈东匪帮

根据残余土匪活动情况，我们营在驿马河住了下来。部队的任务是一方面继续追剿残匪，一方面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协助工作队建立政权组织。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军队开路，工作队巩固成果。"我们用了很短时间，就在农村广大屯区掀起了"斗恶霸、砍大树、挖匪根"运动。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加深，我军的威望一天天提高，基本群众和积极分子的队伍也逐步地壮大起来了。

没过多久，我们在驿马河挖出了国民党东北派遣军二十七军一〇六师的"建军参谋长"、"外号"胖和尚"的潜伏特务，掏了土匪的联络点，切断了土匪的"内线"。打这以后，只要土匪一"照面"，群众就会主动来报告。军民组成了坚固的联防，土匪无机可乘，一个个成了惊弓之鸟。

随着斗争方针的变化，我们相应地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东南分区命令我们：把打击土匪的手段，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以政治争取为重点。

时间很快到了1946年的秋季，天渐渐冷了下来。当时，大股土匪已被相继肃清，匪徒又失去了青纱帐的掩护，处于饥饿寒冷的境地，加上前方不断传来国民党节节失利的消息，土匪内部大多数人已开始认识到，再这样混下去不行了，唯一的出路就是缴枪自新，下山找条生路；也有个别匪徒担心罪孽深重，人民群众不会饶恕他们，顾虑重重。

这时，加紧对土匪政治攻心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一天，秦营长把我叫了去，对我说："小王，交给你一项任务能完成吗？"我一听有任务，高兴地说："营长下命令吧！"

"你以我的名义给沟里土匪头目'洪当家的'写封信，宣传一

下我们对土匪的宽大政策，劝他们缴枪自新，下山投降，重新做人。”

“怎么送去呢？”我为难地挠了挠头。

“你们动员附近屯子里的土匪家属和亲友上山送信。”

我读过几年私塾，仅有高小文化程度，但在全营就算是个大“秀才”了。我接连给十几伙土匪写劝降信，动员土匪的亲属上山送信。

由于形势所迫，政治争取产生了远比军事围剿更有效的作用。亚布力沟里的土匪头目洪当家的接到信后，觉得共产党办事信得过，再坚持下去不行了，不如趁早投降，争取政府宽大处理。没过几天，他领着手下20多个土匪投降了。经过短期集中教育，把他们全部释放回乡参加生产去了。自洪当家的下山投降后，先后带动了几股土匪投降，动摇了极少数不下山的匪徒的决心。

接着，我们趁热打铁，在山口、路口竖起一块块木板做的标语牌、路标，上边写着“枪口朝下，欢迎回家；安心生产、立功赎罪。”一类的宣传口号。10月份1个月间，在我军合力追剿及政治争取下，珠河、苇河一带骚扰的匪首韩小胡子、匪旅长北来、匪团长王奎一、黄炮、九州、王德奎、谢连科等448名匪徒携带370余枝长短枪，纷纷向我江南分区、三团和县区乡民主政府投降了。

珠河、苇河一带的土匪基本绝迹了，我们三团完成了剿匪任务。

（选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于福匪帮的覆灭

宋永春　李元东　杨万久

于福，男，1912年生人，汉族，原籍吉林省西安人（现辽源市）。他自幼游手好闲，14岁随父亲到抚松县习枪狩猎，1928年（17岁）入抚松县公安第三十七大队当兵，由于枪法超群，历任班长、营长等职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于福又随抚松县公安第三十七大队大队长王永诚投降日本侵略军，改编为抚松县伪警察大队。1936年春他又进山“挂柱”（入伙），受到了“压五营”匪帮的欢迎，大掌柜的郭占山（又名郭彦全）认为于福“管直”（枪法好），“传正”（胆子大），“能拉得开”（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委任于福为“炮头”。这支土匪队伍，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二军军长王德泰和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二军政委魏拯民的耐心教育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整顿了队伍，克服了土匪恶习，坚定了抗日决心，终于成为一支与抗日联军紧密协作的反日山林队。1939年11月，压五营被迫归顺日本长岛特别工作队，改编为长岛特别工作特设二大队，12月趁该部开往临江之机，郭占山又率部起义。于福拒绝回山，充当了汉奸。1940年他加入了唐振东伪讨伐大队，当上了队长，先后去柳河、通化、濛江、临江、热河等地讨伐抗日联军和八路军。九·三光复后，他又随唐振东讨伐大队，改编为国民党中央先遣军三十三师三团，继任分队长。

1945年12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解放了抚松，国民

党中央先遣军第三十三师向长春溃退。19日抚松县人民民主联合政府正式成立，由县长李南洲、副县长陈俊升颁布了第一张布告。人民政府刚刚建立，正当集中精力接收农村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时候，日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不甘心于灭亡，组织匪帮继续与人民为敌，其中罪恶最大的是于福匪帮。

一

于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国民党先遣军撤退是暂时的，国民党正规军很快就会占领抚松。趁当前天下大乱，遍地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候，逃跑不如就地“起皮子”（结伙为匪），大干一场，既能发财，又能升官。所以在溃退过程中，他秘密串联13人，携带匣枪1支，步枪17枝，机枪1挺，于黄花松甸子离队，窜至距抚松县城只有20里的南腰营，摆香案结拜为弟兄，发誓“起皮子”（又叫开局）。

于福匪帮的组织机构，不同于一般匪帮，他不设里四梁（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和外四梁（秧子房、花舌子、插千的、字匠），而是按军队的建制方法进行编队。于福亲任队长，赵连海任队副，报号“于福大队”。

开局后，于福匪帮没有立即进行破坏活动，而是利用南腰营距离县城近、交通不便（车不能通过，马不能乘骑，人行还得爬山涉水）、既偏僻又紧连密林的地势，夜间轮番潜回县城，通过家属、亲朋了解当前形势，刺探情报，串通和招募日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上山挂柱。于福也多次潜回县城与那些原日伪时期的官吏、警察、职员、兵痞、地痞密谋，并极力与国民党地下组织挂钩，取得赞助。

1946年1月，民主政府成立了抚松县大队，由县长李南洲兼任大队长，县委书记李政兼任政委，唐林根任副大队长，下设1个

中队（计划建立3个中队）共170人，125枝枪。当时，抚松县大队的成员很复杂，除排长以上的干部是我军派来的以外，其余全部是在当地招收的农民和市民，也混杂了一些日伪时期的伪警察、兵痞等，战斗力很弱，不仅需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而且更需要抓紧时间进行思想整顿。在抚松的驻军只有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一团和少数生产部队，并正在抓紧时间进行整训，准备开往前线解放安图县。

于福趁抚松人民政府刚刚建立，地方武装还在组建，正规部队正在抓紧休整即将开赴前线之机，开始活动。他们窜至松江（三道庙岭村）、乱泥沟子、兴隆一带捐屯子。驻抚松县的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一团，研究决定先派1个班和3名侦察员到兴隆一带进行侦察。当3名侦察员进兴隆屯后，突然与土匪于福等相遇而被俘。于福认定是共产党的密探，命令崽子（匪徒）将3人五花大绑，准备到板石沟秘密插了（杀害）。当与侦察员同行的战士得知3名侦察员被俘的消息后，埋伏在兴隆屯外，将3名侦察员救了出来。于福由于不知虚实，则率匪徒向板石沟逃去。

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一团根据侦察员的报告，派出一个排长率两个班跟踪追击，连续在板石沟、三道庙岭、刘汉帮小山等地同于福匪帮接火多次，于福匪帮被打得连连退避，喘息不定。

于福匪帮在抚松站不住脚，就向长白流窜。1月下旬，于福匪帮窜到长白县二道岗打家劫舍。二道岗是一个朝鲜族集居的高寒山区屯堡，由于受长白山气候的影响，作物生长期很短，人们的生活极为艰苦，夏种土豆和大烟（罂粟），冬季狩猎，严冬后，他们就依靠猎物和大烟土换来的油、盐、衣、食品等物以备猫冬。于福本想在二道岗一带发点财，没有想到二道岗这样穷，他把老百姓抓起来，吊打非刑，抢走了大枪一枝，大烟土数十两，扒去了部分衣服。

春节临近，于福匪帮既想在“起皮子”后过个肥年，又想妻

子老小团圆，在长白转了一圈也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决定除夕回西岗，靠“棒槌营”（大参户）过年。

2月1日，正是大年三十，于福率匪徒从长白二道岗拉到西岗大房子（现西岗乡东江沿村）。这里位于松花江上游，距珠宝岗40多里，是一块很小的河川平地，当地群众叫崴子。北面和东面是头道松花江，水由南面北绕小屯堡流过，江对岸是陡峻的山崖，南面和西面依山而存。当时根本没有路，行人去东岗时，必须渡江攀登板石沟坡口，去西岗屯必须爬西山，运输只能靠大江封冻时走爬犁，大雪封山后，再无人出入。这里人家虽然很少，住的是“霸王圈”（圆木楞垛起来，再抹上泥的房子），但生活还是比较宽裕。

于福匪帮共14人，压下（住下）后，于福派新收的崽子“了水”（放哨），分别在板石沟坡口，江边和西岗放了三道卡子，剩下的一个新招的崽子，安排在房门口“了水”。于福和10个弟兄在屋里推牌九。年饭时，由于土匪认为在这里过年万无一失，所以见到烧酒大肉，放胆地猛吃猛喝一顿，饭后又在火油灯下推牌九。屋里折腾的乌烟瘴气，真如一个乱羊圈。

他们的行踪，被东岗区漫江村群众发现。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一团接到东岗区公所的报告后，派何营长率一个连队乘大车赶到东岗，在向导的引导下，连夜经板石沟向大房子摸去。紧跟向导的5名尖兵，走到坡口时，由于路太难走，拉开了距离。走在最前面的是向导和两个尖兵，其中有一个刚入伍的新战士。他们发现于福匪帮的了水时，因天黑看不清，误认为树茬子，走到跟前才发现是一个人抱着一枝步枪睡着了。一位老战士想绕过去从背后活捉这个人，而新战士急忙拉枪栓推子弹上膛，土匪被这突然的的枪栓声惊醒，刚想顺枪，新战士勾动扳机，将土匪打死。

枪声惊动了于福等匪徒，他们拎着枪从屋里钻出来，猜测枪声的方向和响枪的原因。还在犹豫不定的时候，西山顶上的卡子

跑了回来，上气不接下气的向于福报告："江对岸有人啦。"还没等于福下令，匪徒们就往西山跑去，于福怕东北民主联军再有队伍从西山压下来，忙命令："妈的！回来，顺江沿往下跑！"刚跑到老母猪圈子，于福的主要部下被打倒了一个，开始还架着他跑，可是没跑几步因流血过多而亡命。于福等人（其中有新收的崽子3人）一口气跑到了大斜哨。

于福的另两个同伙，一个叫赵相恩，一个叫李福万。他俩根本没听于福的命令，携两枝大枪单独跑出来投降了东北民主联军。李福万原是东北抗日联军二军战士，1939年所在部队被打散后，他插枪到珠宝岗隐居。九·三光复后他找在东岗居住的赵相恩到县里当兵，结果错投了门户，被编入国民党先遣军三十三师三团于福分队，在黄花松甸子又跟于福上了山，心里非常后悔，但始终没得到机会，这次大房子一仗他俩携械投诚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

二

在于福匪帮活动的同时，于福等匪徒的家属有的串联日伪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上山"挂柱"，有的刺探我军情报，有的散布流言蜚语，进行反动宣传。抚松县民主政府对活动很猖狂的人进行了拘留，教育他（她）们认清形势，改邪归正，并通过各种形式劝其家中当土匪的人下山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于福在大房子遭到打击之后，心情很沉闷，特别是想到在南腰营起局时结拜的13个兄弟，没等露亮就先下山回家2个，大房子一仗又被击毙了1个，"靠窑"（投降）2个，更让他担心的是"局底"一旦泄露，将会被一网打尽。于福想来想去，决定向抚松县城靠拢，便于窥探形势。当于福沿江而下走到王八脖子时，他收到小老婆（外号大洋马）捎来的信，看完信后，于福决定下山，

并派人向抚松县人民政府递交了降书。

抚松县人民政府根据党的政策，决定对其宽大处理。接到准降的通知后，于福指定每人只准带一枝破旧步枪和数粒子弹下山投降，将机枪和多余枪支弹药全部“插”在山上。县委书记李政、县长李南洲接见了于福及其部下，并根据投降者本人的要求分别给了生活出路，有的安排在县大队当战士，有的到了公安局担任外勤侦察员，也有的安排在其他单位或发给生活安置费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对于福本人待地委批复后再予以妥善安排。

于福等诡计多端，根本不是真心投降，而是采取暂时栖身的缓兵之计。他利用投降的合法身份，探亲访友，出入机关和逛市场，多方探听国共两党和两军的情报，权衡双方的军队、装备、经济等各方面的力量。最后他决定投靠于国民党，不仅通知原降匪徒携家眷重返山里为匪，并串联原日伪残余势力多人拉进匪窑，誓与共产党和人民武装为敌到底。

2月16日（正月十五日），于福等匪徒利用当地灯节晚间上坟送灯的机会，携其家眷重新进山，直奔北岗地区小南岗。这里位于东岗、北岗之间的深山密林之中，距东岗、北岗和松江（三道庙岭）各约30里，距抚松县城约60里，而且原东北抗日联军修建的密营尚能使用。于福等待起枪的匪徒回到小南岗后，重摆香案，发誓招兵买马，屯积军需，扩展“局底”（资本），再次“起局”。3月，于福在西岗收罗了小股土匪祝瑞云（伪警察出身）等11人，大枪9枝，又在北岗收罗烟匪（种大烟并抢劫大烟）7人，同时又约伪警杜学俭、杨志忠，伪官吏李元德以及刘乐天、吕长胜、季惠海等人上山入伙。

是月，于福匪帮又在乌梅沟子阻截大营供销社大车一台，抢走许多布匹、香烟、糕点等商品。4月，又在小山村伏击了抚松县大队接物资大车一台，抢走全部物资。县大队事务长和一名战士及事务长的爱人，为保卫军用物资而光荣牺牲。于福匪帮通过抢

劫和在边远村屯砸窑（攻打有钱人家的大院）、绑票等办法，勒索大米、白面、玉米糙子、小米、肥猪、香烟、白酒、豆油、食盐、人参、大烟土、衣服、鞋帽、被褥等大量物资。

5月，于福匪帮在头道庙岭村活动时，发现抚松县大队一位班长和一位新入伍的战士带一枝步枪由东岗回抚松县城，正路过头道庙岭，于福匪帮在暗处开冷枪，战士牺牲，班长受重伤。是月，东北民主联军通化军分区李红光支队进驻抚松，任务是负责在临江、抚松、濛江地区剿匪和在老岭、二道江两处设防，以防御国民党从西南和北面向解放区进攻。李红光支队派出几批侦察员侦察匪情，侦察员王××等两人到北岗一带侦察时误入于福匪帮的里边子（密营），遭到于福匪帮的杀害。不久，抚松县公安局侦察员张玉才（伪警察出身绰号张大鼻子）暗与于福勾结，以侦察土匪为名带公安队15名战士出发，在姜家趟子与于福匪徒接头，当时打死拒不投敌的公安战士3人，其余12人随张玉才投降了于福匪帮。

接着，于福又收罗了小股匪张绍周、王云福等15人，胡登昌等5人和散匪7人。此时于福匪帮扩展到70余人，有机枪2挺，长短枪78枝。于又进行了首次整编，于福自任大队长，于景龙任大队副，刘乐天任秘书；下设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长祝瑞云、马洪义，第二中队长杜学俭、赵连均、张绍周；报号“东北剿共游击大队”。

6月8日，于福匪帮在板石村接到坐探吴秀云的报告：“松江区公所，只有杨区长和几名工作人员在区里，区中队都到外村去了。”于福感到机不可失，决定袭击松江区公所，并与姘头“八百块”（吴秀云的绰号）幽会。

于福让四秀村刘村长派宫显廷去松江区公所报告“土匪来了”，借机探清区公所内的人员情况；令匪徒肖文伦抢占区公所两侧炮台，厉二虎占领松江区十字街，刘文彬、方××放出通往东

岗和抚松的两道卡子，赵连均等在长龙岗上保护家属；他自己则亲带马洪义、秦吉田、杨福增等攻打区公所。当于福匪帮占领了十字街后，宫显廷从区里出来向于福报告："杨区长在屋里，没几个人。"于福等冲进了区长室，杨副区长正打电话向县里报告匪情，工作队员孙福有因昨夜带班站岗，背着区长的手枪在炕上睡觉。匪徒们一拥而上，夺去了手枪，将杨区长和孙福有捆绑起来，连同工作人员武洪宝、臧成宪、沙成金、李成良和长龙村妇女主任谢素兰、松江村妇女主任叶素琴，押往田家店。途中武洪宝假装是被区长所捕犯人而溜掉。到田家店后，杨副区长右肩被土匪打成骨折，孙福有被折磨得昏过去好几次，沙成金也遭到毒打。在酷刑下于福一无所得，又逼群众在村头集会，于福亲自进行反共宣传后，便将杨副区长、孙福有、沙成金、谢素兰、叶素琴等人押到群众面前，命令匪徒马洪义、王洪玉用刺刀将杨副区长和孙福有刺死，并将沙成金射杀于东山坡上。

松江区副区长杨春仁同志，牺牲时年41岁。他是山东省蓬莱县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敌后武工队队长等职，1945年1月任抚松县建国联合会副主任，3月成立松江区公所时，任副区长兼任区自卫队队长。孙福有和沙成金，都是当地人，孙福有任区财粮助理，沙成金分担区建国联合会工作。

同日晚，于福匪帮又杀害了东岗区区长王秀东。王秀东是山东省蓬莱县人，1945年12月由山东省胶东地委调到东北工作，1946年1月到抚松县，2月建立东岗区公所时，任东岗区区长。

东岗区是一个地域大（包括现东岗、松江河、漫江三镇辖区），距县城较远，社情复杂，以参业生产为主的边境地区。为防止土匪搔扰，县大队派二排副排长李宪臣带领四、五两个班的战士，驻防东岗区公所。

6月8日，二排五班长姜永清（又名姜玉录、姜运武，原日伪抽水洞警察署特务系主任）在抚松县城修好机枪零件后，携件回

东岗区，路经松江区时，正遇到于福杀害杨春仁副区长。姜永清在“八百块”家主动向于福买功，汇报了东岗情况。于福满意地让崽子拿出5两大烟土，奖给了姜永清后说：“你告诉王殿元，我今晚去接你们。”

姜永清回到东岗区公所，与四班长王殿元密谋后，通知战士罗士忠、王海臣、李明龙等人做好哗变准备。晚饭后，副排长李宪臣组织两个班的战士填写军人简历表。因识字的战士少，大家分别围着几个识字的战士填表。姜永清、王殿元认为时机已到，王殿元先到区公所大门口，以换岗填表为名，将枪收缴，让人集中到屋里。这时，姜永清暗示罗士忠跳上炕，从枪架上抓起一条枪，同时王海臣、李明龙把副排长李宪臣捆绑起来，将战士们集中看押。罗士忠、王海臣、李明龙3人闯进区长室，同时向正在办公的王区长开枪，王区长当场牺牲。接着姜永清宣布叛变，并亲去北门接于福进村。于福匪帮进村后，洗劫了供销社，逼群众杀猪宰鸡备酒。次晨又逼群众集会，于福做了反共宣传之后，当众释放了副排长李宪臣，将其余的14名战士和两伙夫，全部收编。

于福为得到高官厚禄，大力扩充势力，派花舌子串通抚松县大队卫生员李文喜（伪警长出身）、三排七班战士由金璞（土匪出身，绰号打一面）等人哗变。6月12日晚，驻守北岗区的县大队三排八班长郝培林与七班战士由金璞共谋，以“有情况”为名带八班10人、七班2人出发到三道砬子河村后，宣布叛变，进山为匪。是夜，抚松县大队卫生员李文喜与关景刚（伪警尉）、王景文（伪警尉）等在万良村东山上成立了“剿共军”匪帮，李文喜任队长，关、王为坐探。次日，关景刚、王景文探知东北民主联军通化军分区杨靖宇支队三团两名骑兵通讯员，从北岗兵站来到万良，傍晚回抚松县城，通知李文喜率匪徒在仁义砬子设伏截击。两名骑兵通信员乘坐骑到仁义砬子时，遭到伏击，一人牺牲，一个冲出伏击圈。

6月17日，在北岗区头道碰子河，于福匪帮与李文喜匪帮合局后进行了整编，将原两个中队列为第一、第三中队，李文喜匪帮为第二中队，李为中队长、王殿元为中队副。随后，于福匪帮又在头道庙岭、黄花松甸子、松江河、板石沟子、王八脖子等地招募了匪徒40余人。

当于福匪帮扩充到156人、长短枪134枝、机枪3挺时，又进行了整编。这次整编中，该匪连受国民党3次封委：一系吉林长白军司令孔照熙委任；一系安东长官部第五支队委任；一系安东保安司令部第九支队少将王绍武委任。任于福为上校团长，于景龙为中校团副，刘乐天为少校团副；任祝瑞云为一营少校营长，姜明山为一营上尉营副，杜学俭为二营少校营长，马洪义为二营少校营副，张绍周为三营少校营长，赵连均为三营上尉营副；胡登昌为一连上尉连长，王福山为二连上尉连长，由金璞为三连上尉连长，栾喜贵为四连上尉连长，江存才为五连上尉连长，王云福为七连上尉连长，郝培林为八连上尉连长，赵文明为九连上尉连长；李文喜为上尉医官兼军事联络员，王殿元为中尉副官。

三

于福匪帮接受国民党改编之后更加疯狂。当他听到国民党军进攻到辉南样子哨，中共桦甸县委和武装部队向江东战略转移的消息后，认为时机已到，决定豁出老本大干一场，与混入濛江县（今靖宇县）大队任副大队长的曹东翰，里应外合夺取濛江县，迎接国民党。他带匪徒104人潜入青江岗，听到曹东翰因叛变暴露而被歼灭，而且桦甸、永吉、磐石、双阳、伊通等县机关和武装部队，向濛县那尔轰地区转移，驻军较多，所以未敢进犯濛江县。6月28日，于福又派二营马洪义率领10多人，化装成东北民主联军到濛江县东兴一带阻截行人，得知东北民主联军有一台汽车坏

在牟家屯，马洪义带人连夜袭击牟家屯，打死押车的一名连长和一名战士。

29日，于福探知抚松县大队一中队一排，押一辆汽车由濛江县驶往抚松，便伙同濛江县土匪“北海”匪帮共150余人，于陈家趟子附近公路两侧分三段设埋伏，打死抚松县大队一排长刘文岐、班长沙可勤（2位均为战斗英雄）等9人，俘去汽车司机和战士9人，缴去长短枪11枝、机枪1挺、东北流通券567000元，汽车被焚毁。双阳县委书记乔海涛同志，也同车遇难。

于福匪帮在陈家趟子截车后，押着6名战士和四纵队的3名司机渡过松花江，当日下午6时到达抽水洞区碱场屯。正巧，抚松县的地主武装胡新春（绰号黑瞎子战）匪帮正在碱场捐屯子。胡新春是抚松街街长胡新民的胞弟，地主出身，自幼游手好闲，常以猥亵奸淫女性、习枪打猎为乐趣。一次上山打猎时被一只黑熊扑倒，咬伤面部，抓瞎一只眼，留下满脸伤疤，从此得绰号“黑瞎子战”，报号也是“黑瞎子战”。

于福匪帮从前甸子往碱场行进时被黑瞎子战的“了水”发现，误认为是剿匪部队，胡新春率匪抢上了山梁，于福匪帮也误认为黑瞎子战匪帮是民兵自卫队，双方接仗，交战中双方发现是“里码人”（同行的）而停火。两伙匪徒合兵于碱场准备庆功。

匪徒到处抓鸡宰鸡，逼群众给“飘洋子”（包饺子），“搬姜子”（备酒），并在屯子当中支上两口大锅煮上猪头、方肉和小鸡，为次晨摆香庆功做好准备。吃过晚饭后，匪徒们分散到老百姓家住宿。

同日，距碱场屯3里路的东大村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因没有看到碱场岗梁上的儿童团员，却听到碱场方向有枪声，偶而还看到碱场岗梁上有游动的人影，便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村长李玉山和民兵队长钱连生。村公所干部们判断有大帮土匪到了碱场屯，急速报告给抽水洞区公所、抚松县委和李红光支队党委，根据抽水

洞区的电话报告和濛江县村屯联防递过来的报告，判定于福匪帮在陈家趟子作案后窜到抽水洞碱场，决定县大队驻抽水洞区的一个班保护东大村，县大队副大队长唐林根率一个班和李红光支队的一个连守县城，李红光支队副司令员吴靖宇率两个连，经新委口子向碱场包抄。半夜时分部队把碱场屯包围，唯留陡沟子一面，待土匪突围时歼之。连长朱元明带3人摸掉了碱场正门的“了水”（哨兵）冲进村内。因为有夜幕掩护，土匪又和群众混杂在一起，剿匪部队不便开枪，被迫撤出村子。于福凭经验断定，剿匪部队留突围口子引诱上钩，决定分散突围。土匪突围过程中被剿匪部队击毙13人，打伤匪中队长杜学俭等10余人，活捉匪徒10人，其余各自逃命，跟于福逃到碰子河的不到20人。

此役，李红光支队连长朱元明身负重伤，在往抽水洞区抬的途中，因失血过多而牺牲。

战斗结束后，经公安司法部门审理，对有血债的8名土匪与参与杀害杨春仁的土匪女坐探吴秀云判处死刑。

吴秀云，是抚松县夹信子村人，她父亲以伪币800元的身价把她卖给了三道岭的一富户人家，因此，群众给起绰号“水性杨花，八百块”。“八百块”20多岁，专门与伪警察和土匪勾搭连环，是土匪于福姘头。她不但经常给土匪探听情报，还亲自参与偷袭松江区公所，杀害杨春仁、孙福有、沙成金事件，所以民愤很大。

刑场在东山的滑石沟门，围观群众很多。执刑官一声令下，枪声齐鸣，8名罪犯同时倒下，大快人心。但枪弹击中吴秀云的胸部，当时没有击毙，等待收尸的吴秀云的父亲，一看没死，便以“一刀之罪”理由要将女儿背走，引起在场群众的极大不满。当县领导由公判会场走到刑场时，吴秀云已被背到刑场门口，当即被制止，补枪击毙，才平息了民愤。

四

于福匪帮在碱场屯狼狈逃回北岗区小南岗“里坨子”后，仍不甘心失败。暗派花舌子和匪徒四处活动，网罗社会余孽，扩充势力。7月25日，于福匪帮的花舌子带一帮新招的土匪，在三道庙岭附近的森林中，被3位拣蘑菇的老百姓发现。于福的匪徒怕暴露踪迹，将3名无辜的群众勒死于密林中。到8月份，于福匪帮又扩充到150人，加上逃避反奸清算斗争的地主、恶霸、汉奸及土匪骨干的家眷等共达200余人。人多负担也大，能打仗的少，眼看树叶稀落，粮草断绝，到处挨打，不但于福发愁，连他的上司王绍武也发愁。他担心于福重新扩充起来的队伍再被歼灭，还担心于福如果投到别人手下，自己会空忙一场，想来想去，决定立即拉队出山，逃出解放区，到辉南去靠国民党保其局底。于是王绍武一方面在南甸子、王八脖一带招募匪徒；一方面派联络员鲍玉海去小南岗找于福，商定同去辉南，在濛江县穷八家子会合。

于福送走鲍玉海之后，便整队出发，走了两天才到达三道松江河口（土匪行军不走正路，专转山梁），在河口休息了一天，于次日下午与李红光支队剿匪小分队相遇。因土匪是在苞米地中，小分队被土匪开枪打死一人，双方对射，剿匪小分队又牺牲3人，土匪倒下5人。双方都未恋战，小分队一口气跑到兴隆派人回县报告。于福匪帮急行军，经过仙人洞前山梁，在红石砬涉水渡过松花江，跑到穷八家子。途中在红石砬子沟里遇上两名种大烟的群众，于福怕泄密，将这两名群众勒死于树林中。在穷八家子，王绍武和于福、于景龙、杜学俭、吴景刚等研究了向辉南去的路线、方法和集结地点。

李红光支队副司令员吴靖宇同志根据各剿匪小分队侦察报告，分析于福匪帮将向辉南转移，投奔国民党。他亲自率两个连

队向濛江县追去，准备阻击。一天夜里，小分队发现长板坡方向有火光，原来是土匪拢火烧苞米充饥。吴靖宇即率队追剿，在望乡台的一个山洞中发现土匪。李红光支队边追边打，土匪留下20多具尸体，被打散了。匪团中校团副于景龙的老婆被追得吐了血，由两个崽子轮换背着追赶匪队，实在走不动了钻到一个种瓜的地垛子里，抓到一位姓李的老百姓，用破麻袋做了一付担架抬着于景龙的老婆、在林中转了3天才找到于福大队。当时于福身边只有40来个人，藏在辉南境内的一个山沟里（国民党占领区），等待王绍武去朝阳镇联系结果。

在等候的过程中，辉南地区小股土匪从此路过，被于福火并了匪徒20多人。8月21日他们钻进了朝阳镇，改编为抚松县保安大队，由唐振东任大队长，于福任大队副，于景龙、杜学俭、吴景刚各任中队长，充当了国民党军的马前卒。

于福匪徒在望乡台长板坡一带被李红光支队打散后，匪团少校营长张绍周，上尉营副赵连均和中尉副官王殿元带10余名匪徒，找不到于福，就又拉回北岗小南岗，经常出没于万良区一带活动。区长孙锡亮为收降这股土匪，通过伪警察司永义，上山向张绍周、赵连均、王殿元等人讲明：只要下山缴枪为民不再为非作歹，人民政府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并帮助安排其生活。在此期间，家住万良村的赵连均之妻病故，村公所给买了棺材，帮助安葬。土匪看到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表示先行谈判再定。万良区公所派县大队驻万良区的排长张平和公安助理孙继森2人去万良小东沟与土匪谈判。张平和孙继森向土匪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讲明共产党必胜的道理和前途，摆清为匪为还是为民的利害关系，指出了只有放下武器，下山为民，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土匪仍不相信，要求再和区长谈一次。区长孙锡亮亲自接待了匪首张绍周和赵连均，并在区里设宴招待，张绍周和赵连均当场交出手枪，答应拉队下山投降。为表示相信他们，当时区长只收下他们1支手

枪，并送他们回山。几天后，除三四个匪徒不愿下山外，其余10多人带8条枪，下山向万良区公所投降。万良区公所根据党的政策，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棉衣，对愿意在当地落户的人，发给了土地和小农具，并帮助安排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还帮助张绍周恢复了裁缝职业；对要返籍的都发给了路费。不久，土匪赵福顺也率10余人到万良区公所投降，连黑瞎子战匪帮的匪首胡新春也到万良区公所缴枪投降。

原于福匪帮的匪徒张玉才（绰号张大鼻子），在望乡台一仗逃命之后，一直贼心不死，纠集逃命匪徒10多人，到处打家劫舍、无恶不做。张大鼻子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根本不会领兵打仗，只有靠炮头苗春德领群匪到处抢劫，而张大鼻子却坐享其利，众匪徒不满，与苗春德共谋取代张玉才。1947年春的一天，因在东官道又分赃不匀，苗春德串通匪伙将张玉才捆起，逼他让位，张大鼻子不干，被带入密林准备处死。当走到穷神庙时，张大鼻子趁看押匪徒不注意，撒腿就跑，一个匪徒打了一枪没打着，眼看张大鼻子要跳过山洞，正巧被山洞边的一棵歪斜大树叉挂住了绑绳的绳扣，把张大鼻子吊悬在山洞中，被匪徒开枪打死。以后，苗春德报号“岳排”，也因恶贯满盈，被当地群众用乱棒打死，其他匪徒纷纷向人民政府投诚，求得宽大处理。

1948年，罪恶累累的于福也终于落入人民的恢恢法网。8月11日（农历7月7日），抚松县人民法院在县第一完全小学院内召开了公判大会。革命烈士松江区副区长杨春仁之妻和烈士孙福有等受害家属，还有多位群众纷纷登台愤怒声讨了于福的罪行。最后由抚松县人民法院院长冯惠宣判：“判处于福死刑，立即执行！”滑石沟一声枪响，结束了土匪于福罪恶的一生，除去了人民心头上的一个大祸害。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揭发检举，陆续将潜逃在外地的匪首和有血债的土匪逮捕归案，经抚松

县人民法院分别进行了审理，判处曾任日伪警察署密探长、讨伐中队长、东北“剿共”游击大队副、国民党中校团副、抚松县保安大队中队长等职的于景龙死刑；东北“剿共”游击大队中队长、国民党少校营长、抚松县保安大队中队长、地下建军营长、团营区中队副杜学俭死刑，在抚松县东岗区执行。1952年抚松县人民法院判处于福匪帮队副（二掌柜的）赵连海死刑；同年判处抚松县大队叛徒、伪警察“剿共军”总队长、东北“剿共”游击大队中队长、国民党于福匪部上尉军事联络员、中央军特务团军官李文喜死刑；东北“剿共”游击队中队长、国民党于福团匪上尉营副、抚松县保安大队少校分队长姜明山无期徒刑。1953年抚松县人民法院判处伪警长、抚松县保安大队中队长马洪义死刑。对其他匪徒也按其罪恶和悔改表现分别给予了适当处理。

于福匪帮从起局到灭亡，共1年4个月，在抚松活动最猖獗时期是1946年6月份，最后终被人民解放军所剿灭。

（吉林省浑江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长白山麓的剿匪

蒋会君

临江、抚松、靖宇、长白4县位于长白山麓，地处中朝边陲，高山峻岭，地势险要，解放战争期间，除了长白县外，其余3县土匪猖獗，袭击新生政权，干扰破坏“四保临江”战役，奸淫烧杀掠夺民财，群众深遭涂炭。

在临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县大队、公安队在李红光支队的紧密配合下，从1946年初到1948年初，经过3年的围剿，采用大部队围攻、公安机关歼灭小股、劝降残匪、开公判大会、公开处决顽匪、走群众路线等多种方法和途径，剿匪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共剿灭大小匪帮183股；肃清匪首、顽匪600余名，一般匪徒1400余名。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巩固和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保证了四保临江战役的顺利进行，解救了人民群众，迎来了第二次黎明。

临江、抚松、靖宇自1931年至1948年匪患不断，危害极大。解放前临江先后发起的土匪帮有133帮，靖宇县有9帮。较大的匪帮有：长海、西山好、董元、北海、六合军、文明军、严来、东洪、赵武林、风山好、压江龙、忠良、天山好、云中雁、青林、满山红、战三省、云中、田龙等土匪帮。这些较大的土匪帮大部分都是在1936年以前发起的，其中1932年发起的最多。这些匪帮枪支齐全，弹药充足，在临江、靖宇专事抢劫民财、捐大牌（捐款）等罪恶活动，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

1945年8月15日祖国光复以后，临江、抚松、靖宇等县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在我人民民主政权刚刚建立尚未巩固之际，土匪又开始猖獗起来，他们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破坏我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袭击我军，干扰减租减息，危害人民。1945年至1947年，临江境内先后有大小匪帮28帮，有文山、高玉德棒子手、毕仁祥、王文峰、李国德、车福顺、贝焕斋、吴忠好、德胜军、迟黑子、孟广库、银龙山、战东边、滚地雷、康玉山、刘二敢干、久胜军、曹锡明、滕义春棒子手、吴缉崇、孙班长、宝林、孙殿庆棒子手、战满霞、杨福增、杨班长、刘德贵、荆玉明；靖宇县有孙连、于福、德胜军、双胜、四海、小北海、马连、辛连等8股；抚松县有黑瞎子战、五种好、岳营、剿共军、国民党先遣队第六军第三团等5股。这些匪帮有的是国民党为了扩充势力与我新生政权对抗而组织的先遣队之类的地方反动武装，他们占山为王，名义上编入国民党的杂牌军，实际是活动在深山老林中的一些匪徒；有的是由被我击溃逃亡的军、警、宪、特残余分子勾结在一起的乌合之众；有的是曾经混入我队伍中的、被策反叛变上山为匪的；有的是长期以来就在深山老林里活动，以匪为生的惯匪。他们大都较解放前的匪帮人数多，武器弹药齐全。这些匪帮自发起的第一天起都由大掌柜、二掌柜、字匠、水香、粮台、炮头、闲员、崽子所组成。如1946年发起的活动在临江一带的银龙山匪帮，有匪徒46人，长短枪46枝。赵殿胜自封大掌柜，匪号“银龙山”，封张兆福、李云江、李宝田、吕玉春为二掌柜，邹世业、李春阳为字匠；赵殿臣为粮台；孙振东、修福有为水香；姜振河为炮头；刘明光、李长信、杨有春、赵殿荣为闲员；蒋忠田、宫长胜、金仁起为崽子；牟君、韩殿士、梁殿文、李德新为一般匪徒。

土匪的匪首都有所谓“山号”即匪号，也就是匪帮的名称。匪号由来有7种，第一种，是以匪首姓名为名的，如“毕仁祥”匪

帮，该匪帮的匪首是毕仁祥；第二种，是将姓去掉以匪首名字报为匪号的，如“长海”匪帮，该土匪帮的匪首是孙长海；第三种，有的土匪是从我军叛变上山为匪的，他们就以匪首的姓加上叛变前的职务报匪号，如“杨班长”匪帮；第四种，是以匪首或匪徒的一技之长报匪号的，如“滚地雷”匪帮的匪首曲振广及50余名匪徒经常奔窜在深山密林，滚跌爬窜行走迅速，自报匪号滚地雷；第五种，是以匪首的绰号报为匪号的，如“刘二敢干”匪帮，匪首刘成山，人送绰号刘二敢干；第六种，是以政治目的报为匪号的，如“剿共军”匪帮，匪首李文起系伪警察出身，与我党不共戴天，自发起那天就抱着剿灭共产党的政治目的；第七种，是以保××、战××为匪号的，妄想永占山林为匪，这些匪帮为数较多，如“保国军”、“战三省”、“双胜”匪帮等。土匪的匪号千奇百怪，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活动区域，有自己的匪首。

在临江、抚松、靖宇活动的土匪按性质可分为三种。一是武装土匪，这种土匪武器弹药齐全，有政治背景，成分较复杂。他们破坏我人民民主专政，袭击我新生政权和部队，奸淫妇女，烧杀掠抢，残害人民，无恶不作，危害性最大。临江境内有130余帮武装土匪，抚松境内有2帮武装土匪，靖宇境内有14帮武装土匪。如黑瞎子战匪首胡新春率领匪徒于1946年袭击我抽水区大东村，打死我村长隋长发，抢劫钱物；5月袭击榆树村，打死我村文书王成满。二是土匪建军，这种土匪是由国民党派员联络组合编入国民党的杂牌军。他们武器精良，弹药充足，还有机枪。国民党派特派员到土匪建军以加强领导。这种土匪袭击我人民民主政府，残杀我政府干部，瓦解策动我军人员叛变，攻打我军，反动气焰嚣张。1946年5月，国民党特务李文合来八道江，策反我驻军某部排长戚战跃叛变，遭到拒绝；与此同时，特务孔广德诱骗我松树区中队班长盖德胜、副班长黄培福、队员张来安等叛变革命，带枪投敌加入匪伙。同年6月李文合指挥吴忠好、贝焕斋匪

帮（被国民党收编为国民党东北先遣队第六军第五十五团）在临江至抚松公路三股趾子劫击我军车2辆，打死汽车助手和2名乘车群众，抢去手枪一支及军用给养。同月五十四团（许文山匪帮被国民党收编，编为第六军五十四团）在八宝矿区伏击我军护路队，掳去护路干部1名，战士2名，抢去长枪4枝，手榴弹百余枚。然后该团窜到城墙趾子村，将徐明武、王玉祥和李姓农民等4人杀害，强奸幼女吴某，烧毁民房40余间，抢去牲畜20余匹。三是棒子手，这种土匪帮因没有枪支，多以木棒为武器，因此被称为棒子手。他们自发起到灭亡的时间较短，主要活动在本地，专门抢劫民财，对我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一定的威胁，危害比武装土匪、土匪建军要小一些。

土匪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无恶不作，残害人民，是我心腹大患。人民群众曾请求政府派部队清剿土匪，为民除害，同时剿匪也是我党发动群众建立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先决条件。1947年辽宁省军区司令部命令各地成立人民武装指挥部，负责对剿匪的统一指挥，统一领导，命令各地军队、地方武装及所有当地境内的机关进行剿匪斗争。各地相继组建了人民武装指挥部，为了强化军纪、保证命令实施，还建立了人民武装指挥部纠察队，由公安机关派员担任。人民武装指挥部司令员由驻地部队首长担任，政委由当地县委书记担任，副司令由当地县大队大队长担任。

根据上级指示，临江、抚松、靖宇人民武装指挥部除积极部署部队进行剿匪外，还注意发动组织群众武装防匪，缩小土匪活动范围。在我军、县大队、区中队的大力围剿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从1946年起到1948年初肃清了活动在临江、抚松、靖宇境内的大小匪帮。

1945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先遣军三十三师三团在刁密趾子被我辽东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一团击败后由长春溃逃到抚松榆树河子村时，分队长于福拉出17人携枪17枝上山为匪，在抚松北

岗、万良、东岗、松江一带活动。他们拉拢伪警察、地痞流氓，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到1946年春节前，这股土匪扩充到30多人、30多枝枪。他们干扰、袭击我军和人民民主政府，对我山区的人民民主政权构成威胁。为尽早消灭这股土匪，稳定社会治安，抚松县人民政府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指令县大队将匪首于福之妻抓捕，诱使于福等匪徒投降；二是派出李红光支队、县大队深入于福匪帮活动的山区追剿。时值严冬，又近春节，于福匪帮被我剿匪部队追击得无处藏身，匪徒军心浮动。于福迫于内部压力，不得已率匪徒10余人来向我政府伪装投降。我政府误认于福真心悔过，放松了对降匪的监督管理，使于福在一天半夜携妻率众匪徒带枪潜逃上山继续为匪。

国民党军北犯时，于福四处用写信、派匪徒联系等手段勾结活跃起来的伪警察杜学俭、于景龙、杨致忠以及伪官吏季元德、土豪李长胜、恶霸李会海等人，收罗一些小股土匪，策动我县大队、公安队3起叛变，使这股土匪扩大到100余人。他们自称“东北剿共游击大队”，于福自封为大队长。5月，“剿共军”匪帮在抚松仁义砬子被我抚松县大队击溃后，残匪在砬子河会合，投到于福的“东北剿共游击大队”。这时于福匪帮已达150余人，有机枪2挺、长枪120余枝，短枪20余枝。6月，国民党东北长官部派少将王绍武潜入抚松，收编于福匪帮为国民党东北长官部第三团，于福为上校团长。这股反革命武装袭击我松江、东岗区政府，杀害我2名区长、1名区干部。他们以茂密的森林为掩护，昼伏夜出连续不断地袭扰我地方政府、部队和县大队，打死、打伤并俘去我干部、战士多人。

抚松县人民武装指挥部决定，要在尽短时间内根除于福这股反动势力，即部署我公安局集中主要侦察力量，摸清这股反动武装的活动规律。

6月中旬，这股匪帮窜到靖宇县伏击我军，打死我双阳县副县

长乔海涛，俘去战士9人，劫去机枪1挺，长短枪12支。这股匪帮得手后与黑瞎子战匪帮相勾结，并在抚松抽水区碱场集合，威逼群众杀猪宰羊，大摆宴席，大吃大喝。酒席上于福还劝黑瞎子战匪首胡新春投到他们帮中。公安局侦察员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查清了这一情况，火速报告指挥部。指挥部派出李红光支队、县大队等700余人当夜赶到，将碱场村团团围住。经一夜激战，击毙匪徒13人，打伤40余名匪徒，俘虏10余名匪徒，我无一伤亡。

经过这次围剿，使这股反动势力龟缩到小南岗一带。7月，王绍武派鲍玉海来抚松传达命令，令这股匪徒到辉南集结待命。这一情况又被我公安局侦察员侦察到，李红光支队奉命追击，在途中击毙匪徒5名。追至望乡台时展开激战，战斗整整打了1天，打死、打伤匪徒20余名，只有匪首于福带40余名匪徒逃到辉南。

12月，抚松县公安局在辉南镇将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于福抓获，押回抚松县审判，于福被处死刑。公安局在第一完小（现实验小学院内）召开了公判大会，许多群众登台控诉于福犯下的罪行。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连80多岁的老人也来到了会场，要目睹这个杀人魔王的可耻下场。一声枪响，于福罪恶的一生结束了。

在剿匪斗争中，各地公安机关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大部队剿匪，出击围剿小股土匪，争取土匪家属，以达到瓦解土匪、消灭土匪的目的，对土匪进行清查登记，依靠群众打掉土匪眼线，使土匪变成聋子、瞎子。

1945年10月，六道江的农民来我公安局反映有股匪号“王文峰”的武装土匪在六道江一带抢劫。公安局派公安队迅速出击，将王文峰击溃。俘虏匪首王文峰及4名匪徒，缴长短枪三支。同月，我公安队奉命到红土崖伏击李国德棒子手帮，将匪徒11人全部生擒，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1946年3月，抚松大营区公安班获悉在大营一带活动的散匪匪首“金蝴蝶”，窜到大营东山根一居民

家用枪威逼该户农民之妻炒菜、烫酒、做饭，饭后准备逃窜的消息后，立即出击将金蝴蝶抓获后，就地枪决。4月，抚松县人民政府行政科秘书王中天被土匪头目李天顺用美人计策反，加入土匪，充当土匪眼线，向土匪提供情报。县公安局侦察清楚后，将王中天枪毙，打掉了土匪埋在我们内部的钉子。同月，国民党中央陆军上将马兴山派少将于贵濮到抚松，进行地下建军活动，委任伪警察李天顺为抚松地区军事、政治联络员，并勾结班秀峰等人在抚松秘密组建国民党中央陆军东北先遣队第六军一团，发展成员130余人。我公安局得到这一线索后，组织力量进行侦查，破获了这个反动组织，将李天顺、班秀峰枪决。同年7月，抚松县公安局在第一完小院内召开公判土匪大会。会上判处顽匪于喜延、史惠民、吴秀云（女）等8人死刑，对坦白认罪，有立功表现的3名土匪当场教育释放。这次公判会对抚松境内的土匪震动很大，先后有70多名土匪向我人民政府投诚和自首。

1946年秋，国民党安东前进办事处处长关大成委任旧军阀出身的马兴山为“中央陆军东北先遣队第六军”上将军长，秘密潜回临江组织地下武装。他们吸收反动会道门“三番子”头领公成立，并把其编为暂编第十一师，委任公成立为副师长，网罗文山、银龙山、滚地雷、贝焕斋、吴忠好、岳宝仁、车福顺等匪帮组建了两个团。我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合力征剿匪帮，给予其沉重打击，该匪伙一部分投降我方，一部分窜至辉南投国民党军队，最后终被击溃。马兴山、许文山、公成立等匪首被我政府捕获，依法镇压。

为稳定投诚和自首土匪的情绪，使其彻底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不再入山为匪，安乐为民，我公安局配合剿匪部队的强大攻势，举办了一次投诚和自首土匪短期训练班，历时7天，受训者达27人，此举对巩固根据地，稳定社会治安，保证“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剿匪斗争的胜利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省委先后发出“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发动群众武装和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把剿匪作为党的重要任务来抓，指出要注意发动群众防匪；组织群众武装，规定了正确的剿匪政策：“（一）只要土匪放下武器，我们就争取他们回来务正，安居乐业；（二）对携械投诚者，应适当给予奖励；（三）对土匪家属不应加以扰害，应迅速登记、清查，实行联保制度，在政治上适当教育，使其保证不通匪，并通过土匪家属去争取土匪，叫他们回来务正。镇压土匪内应、消灭土匪眼线，争取土匪家属，以达到瓦解土匪，消灭土匪的目的。”

1946年8月，于福匪帮往辉南集结时被我部队击溃。10月，残匪三营营长张绍周、副营长赵连均、王福带数十名匪徒窜到方良一带活动。12月，我万良区政府发现这股残匪后，区长孙锡亮亲自给残匪写信，通过多种渠道传递到残匪手中。信的内容是：“当前天寒地冻，大雪封山，我剿匪部队步步紧逼，你们要认清形势，放下武器，重新为民，人民政府会宽大处理的。”还派出干部张平等去小东山与土匪谈判，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指明只有放下武器下山为民才是唯一的出路。根据谈判中土匪的要求，孙锡亮区长亲自到小东沟向土匪进一步宣传党的政策，表示了收降土匪的诚意，终于使这股土匪放下了武器。政府还给他们分了土地，安置了生活。要求返回原籍的，政府给开路条，发给足够的路费。在这次收降的影响下，先后有赵福顺等70余人、李青山等9人投降。

我军大部队在剿匪斗争中与地方武装、公安机关相互配合是剿匪斗争胜利的关键。

土匪隐蔽在深山老林中，没有稳定的巢穴。如果派大部队盲目清剿，收效不会太大。需先摸清土匪的活动规律，然后迅速出击一举歼灭。公安机关熟悉当地情况，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每

当公安机关的侦察员承受侦察任务时，他们总是不辞劳苦，跋山涉水，爬冰卧雪，克服重重困难，获取了一份又一份准确的重要情报，及时地报告给指挥部，为准确、及时地歼灭土匪提供了依据。剿灭于福匪帮，就是公安局侦察员得到情报后，大部队、县大队、公安机关包围了碱场村痛歼了这股匪徒，使不可一世的于福匪帮一蹶不振。当这股土匪的残余势力向南逃逸时，又是公安局准确及时地侦察到这一情况，大部队、县大队勇猛追击，歼灭了这股残匪的大部分。

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也是取得剿匪胜利的重要因素。在剿匪斗争中，我大部队、县大队、公安机关每到一处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他们为部队带路、组织儿童团、妇女会、民兵站岗放哨，发路条，配合剿匪。有的群众参加剿匪部队，有的群众机智勇敢地配合我军抓土匪。1948年秋在抓获金蝴蝶时，就是农民王某之妻报告给公安机关的。所以金匪说："我走南闯北，没想到栽在一个女的手里。"人民群众是剿匪部队的依托，土匪一旦掉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就只有灭亡。

（吉林省浑江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肃清梨树县匪患

梨树县史志办公室

八·一五光复后，趁政局混乱之际，梨树县县内匪盗蜂起，如报号“大连字”、“镇北候”、“两伸手”、“生财”等，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60多个匪绺在县内活动。这些匪绺人数不等，多者如“南霸天”200多人，少者如“双凤好”只有5人。据解放后统计，当时共有3000余人落草为匪，到处窜扰以抢劫民财为职业。

国民党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曾派建军头子来梨树进行秘密活动，到各地招收土匪，组织中央先遣军。从此兵匪一家，气焰十分嚣张。

一、土匪类型及其罪恶活动

土匪类型有以下几种：

1、受国民党收编的政治土匪。东北光复不久，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罗大愚即委任惯匪王永清为招兵司令，与原保字大队秘密联络，到各处收降土匪。我党接收梨树后，国民党县党部即转为地下建军，以封官许愿的手段，网罗“金龙”、“四架山”、“大连字”等匪绺，然后再通过这些匪绺的首要人物，用磕头拜把子的办法联络其他土匪扩大反动武装。这些土匪多活动于四平外围的郭家店、榆树台、三江口、八面城一带，是国民党的别动队。除行抢外，还直接受国民党领导，有袭击我农会及区村政权，杀害

我军干属的任务。属于这种类型的政治土匪计有“天下好”（王永清）、“占中原”（乔国轩）、“压五营”（石得胜）、“民助国”（宋宪章）、“绿林会”（吴银匠）等共124个匪绺。

2、与国民党正规军和保安队有联系的土匪。属于这种类型的土匪计有“黑手”（刘海堂）、“打一面”（唐树林）、“滚地雷”（韩守清）等共17个匪绺，都与国民党七十一军第八支队和保安大队有联系，活动于辽河沿岸的四、五、七、八区一带，袭击农会，暗杀干部，破坏农民翻身，常和政治土匪在一起“吃顺线”。

3、一般土匪。计有“财字”（李财）、“金山”（杨少武）、“海龙”（戴超凤）等共15个匪绺，多以抢劫发财为目的，与国民党军队有某种关系，但是不完全接受其指挥。他们主要活动于四平至梨树，梨树至郭家店，郭家店至公主岭之间的要道旁。

4、从国民党军队中分离出来的土匪。计有“东边好”（武青林）、“大爷”（陈宝财）等共4个匪绺。他们多为个人发财或筹集回家盘缠，从国民党军队中叛逃出来而从事抢劫活动。

以上4种类型的土匪，多数属于被国民党收编或与国民党军队有联系的政治土匪。国民党利用其反共势力，对其杀人、放火、抢劫等土匪行径采取放纵态度，致使土匪的活动日益猖獗。当我县委县政府第二次返回梨树，国共两军处于南北拉锯的情况下，政治土匪即趁我部分区村政权初建尚不稳固之机，经常袭击农会，杀害区村干部及我军干家属，骚扰民众，抢劫民财，梨树人民深受其害。1945年末至1948年3月13日四平解放，在2年多时间中，据解放后公安部门统计，这些土匪进行大规模行抢80余次，打民窑98次，杀害无辜群众149人，烧毁民房29间，抢大车92台，马匹1027头，打农会35次，打死我农会干部103人，与我正规部队接战32次，打杀我军干部战士48人。

如1945年10月，我军十几名战士执行任务途经六区羊尾岭，屯中一苏姓地主派人到榆树台找保安队报告，孙晓峰等立即带人

出榆树台西门直奔羊尾岭。赶到时，我十几名战士已离开这里。孙晓峰带人追至董家沟，以多胜少将我十几名战士从三面围住。当我军一战士出示证明，孙谎说要随我军战士同去梨树。趁我军战士不备之机，孙以开枪为令，众匪一齐开枪，当场打死我军战士8名，其余皆被绑赴榆树台。

又如1948年农历正月十三日半夜，五省、两伸手、财字、金龙等4个匪绺，合伙偷袭我四区生子屯农会，打死农会干部5人，绑走2人。后又于正月十四日，打入我四区毕家堡子农会，打死农会干部4名。

此类打农会、偷袭我军小分队以及截车、杀人等事件难以尽举。他们半兵半匪，兵匪合一，在国民党武器弹药的装备下，这些土匪绺子或联合为害，或单帮行抢，在县内各地到处窜扰，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匪患一日不除，人民难得安宁。

二、梨树县的剿匪斗争

我军及我县委、县政府、县大队，代表人民意志，坚决剿灭土匪，自接收梨树以及北撤后，虽与土匪时有接触，给予了有力回击，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还是从1947年冬榆树台剿匪会议之后开始的。

1947年冬农历十二月十三日，二分区罗司令员、地委书记杨易晨同志，在我县榆树台主持召开剿匪工作会议。会上，罗司令员传达了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和布署及二分区的剿匪计划。同时，对我县的剿匪斗争作了具体安排，决定兵分四路，全面围剿，一举歼灭。

榆树台剿匪会议的召开，预示着土匪末日的到来。县内土匪得此消息后，无不惶惶于心。巨匪魏连成等，为挽救灭亡的命运，欲与我拼一死战。就在榆树台剿匪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魏连

成等匪首收罗大小股匪共1000余人，从万发街奔榆树台镇，妄图一举破城，打乱我剿匪斗争的计划安排。当时榆树台镇内，只有罗司令员和杨易晨同志带来的一个警卫排，众寡悬殊，很难抵挡，而众匪来势凶猛。当镇内得知这一消息时，土匪离此只有四五里远了。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榆树台的人民群众，为保卫胜利果实，保证军分区及地委领导同志的安全，自发地组织起来，钩杆铁尺，各操器械，在武工队的指挥下，配合警卫排，奋力出城迎击。魏连城等匪首，胆怯心虚，不敢恋战，接火不到半小时，便仓皇卷戈而逃。

剿匪工作会议后，一场全面剿匪的战斗开始了。

1、分兵四路全面剿匪

按榆树台剿匪工作会议部署，我县地方武装配合正规部队，分东南西北四路从四面进行剿匪。东路，由二分区罗司令员亲自指挥，带一个团的兵力首先攻占郭家店镇，俘虏国民党反动地主武装200多人，然后自东向西追剿过来。

负责西路的是我人民解放军蒙古骑兵团。12月9日，蒙骑团在九区（喇嘛甸）太阳庙一带与九胜绺子等大股土匪相遇。蒙古骑兵团个个快马大刀，作战英勇，一路向东追击10余里，击毙匪首九胜，俘匪首吉星、东来好等以下10余名。后又与我负责北路围剿的梨安部队及区武工队汇合，从万发街直追到吕家岗子，经凤凰山、青堆子到汲水河子，除打死匪首太阳星、占海龙、扫北等40余人，还活捉了30多匪徒。群众喜闻剿匪奏捷，纷纷亲送肥猪慰问。

南路剿匪由几个区的武工队负责，主要目标是消灭梨树镇内及周围附近的土匪。自1947年9月，我县委、县政府南渡辽河，重新开辟四、五、六、七、八、九区工作以后，国民党军队逐渐撤进四平，梨树镇便驻进了降大杆子和于德水的保安队。他们在城内抢男霸女，肆行无阻，白天到处窜扰，夜间匪盗难分，闹得

商门闭户，路无行人。有时几十个匪绺成千名土匪，赶着大爬犁，公开出入梨树县城。降大杆子从南门进街，土匪就从北门让出去，降大杆子从东门进去放两枪，土匪就从西门再进来。在于德水保安队的支使下，绑票逼命、逼财，干尽坏事，所到之处，劫掠一空。

按照剿匪会议的部署，各区武工队立即行动。一、六区武工队由顾显明等同志带领，绕路南杏山，占据地主“响窑”，截断土匪逃往四平的退路，把东胜匪绺的400多土匪逼进梨树城。同时，为防止土匪东逃西窜，由四、五区武工队把住梨城东门，八、九区武工队在西门外，分别担负阻击任务。是日天刚放亮，外边正下着雪，我十七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北门打进城里，将保安队压缩在富盛泉大院内，保安队长于德水被击毙于墙下一石旁。500多名保安队员群龙无首，除死伤外全部受俘。与此同时，被赶进城里的各路匪绺，也都在县大队各区武工队和十七团协同作战中被一网打尽。

2、枪毙18名匪首

经过一天一夜，梨树镇剿匪战斗胜利结束。县大队于拂晓前在最后消灭镇西南一处据点守敌时，俘虏了40多名土匪。由于县大队在战斗结束后需马上向梨树东南方向的主力部队靠拢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出发前将所俘土匪移交给留守镇内的一、六区武工队处理。当时得到消息，驻守四平的国民党军队已向梨树方向出动，情况仍十分紧张。留城武工队立即决定进入城南阵地，准备迎敌。在这种情况下，要将40名被俘土匪押赴百里外的县府所在地处理，在人员安排上感到困难很大。当此紧急关头，武工队政委徐明和武工队长顾显明等当机立断，决定将这些土匪交群众民主处理。武工队除大部分人员准备迎敌，一部分人员负责看守被俘匪徒外，其余人员分片到各街道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土匪罪行。上午10时左右，召开千人大会，请受害群众登台控诉，然后采取举

手表决的办法，拉出金蝴蝶等18名罪大恶极的匪首，在西北十字街头就地枪决，群众无不称快。

3、巨匪魏连成被捕获

报字“大连字”的巨匪魏连成，是受国民党收降的政治土匪。在我剿匪工作会议在榆树台召开之时，魏曾网罗众匪绪共1000多人，妄图攻打榆树台破坏剿匪计划，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是一个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但在四路围剿时，魏却漏网潜逃，躲藏起来了。1948年秋，靠山屯农会到二区报告，说在山脚下有一个人被打坏了。顾显明同志立即带二区公安助理到现场侦察，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被人用手枪打伤。据交待，他是大连字的马拉子。原来魏连成漏网后，受国民党之命潜入六区，一次作案后因分赃不均，马拉子与之口角，魏开枪将其打伤。被害人还提供线索说，魏经常从四平来三区到一姘头家鬼混。于是在三区作了布署，把魏的姘头找到了，在附近派人监视。当魏又一次来姘头家鬼混后，乘车返回四平时，被我侦察人员跟踪至四平车站，在检票口查票时，从后面将魏抱住，缴了双枪，当场捕获归案。

4、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

在大规模的武装剿匪之后，除被歼被俘者外，一部分土匪跑到四平投靠了国民党。1948年3月18日四平解放，这些土匪一部分为国民党充当了炮灰，一部分又逃往长春寻找新的主子。同年9月长春解放，残留下来的土匪，有的隐姓埋名逃往外地，有的回到家乡隐藏起罪恶身份，表面装得很老实。

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政策，依靠群众揭发检举，根据这些人的罪恶及认罪态度做出适当处理，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全县各区区政府和区武工队，在带领翻身农民搞土改分浮财的同时，宣传贯彻党的政策，说服教育土匪的家属，劝其走坦白从宽重新作人的道路。当时在农村流行这样一首歌曲，正反

映了强大政治攻势所发挥的威力："数九隆冬天气寒，司令把令传，八路剿匪一齐进了山，胡匪不得安然；吃没有吃，穿没有穿，身上无衣怨天寒，何不学好回家园，好过中华太平年。"

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一些因家庭生活所迫或上当受骗当土匪的，首先向我区、村政府坦白自首。同时在群众检举揭发下也揪出一些恶贯满盈的匪首就地正法。少数隐藏比较深的，也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先后现了原形。巨匪王永清曾被委任为辽北省保安司令总指挥，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解放后匿居沈阳市大东区永保当胡同，以卖青菜为掩护隐瞒身份，1950年10月间被我公安机关捕获，翌年判处死刑，枪决于梨树镇西门外大桥下。

（选自《吉林党史资料》第六期）

回忆合江清匪

张如屏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决定迅速调遣10万大军和两万干部进入东北。同时，还派出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等近1/3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近20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去东北加强领导。10月间，我奉命带领1个中队离别了延安，踏上了奔赴东北的千里征途。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行军，我们终于在12月间，到达了党中央指定的目的地——吉林省东南的海龙镇（当时东北局所在地）。东北局安排我在吉黑军区工作。1946年2月，我调任合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方强是军区司令，李范五是军区政委（兼省委书记），省长李延禄。当时我们的军事力量还比较小。合江军区实际上只有1个团的战斗力，不到2000人，随后逐渐扩大。我去了以后，才成立政治部。我调任之前，吉黑军区政治部主任钟赤兵找我谈话，特别强调去合江要深入群众，抓好清匪和反霸两件大事，为建立东北根据地打下扎实的基础。

一、清剿胡子，活捉匪首谢文东

我到合江省军区的时候，正是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紧张阶段。国民党军占领了城市，其他地方则靠收买土匪来统治。合江省属

北满5省之一，山高沟深，林海雪原，匪如牛毛，民不聊生。蒋介石搞军匪一家，给许多土匪头子发了委任状。老百姓讥笑这些委任状“连擦屁股纸都不如”。著名匪首谢文东是依兰县人，1939年成为日伪汉奸，抗日胜利后被蒋介石封为“国民党北满先遣军总司令”，领中将军长头衔，号称有12万人马。东北人民称土匪为“胡子”，谢文东成了国民党的“将领”，人民把他们叫作“中央胡子”。另外，李华堂、张雨新等一些匪首也都得到国民党的委任。全省30多股武装土匪到处奸淫烧杀，劫夺财物，无恶不作，弄得老百姓非常之苦。老乡们吃的是橡子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披个麻袋当裤子。人们十分害怕土匪，谈匪变色。这些土匪严重地危害着老百姓，也严重地危害着我们。我们刚到东北时，穿着和装备是很差的，远没有国民党军那样“神气”。有些群众对我们能剿灭土匪信心不足。“正统”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国民党和土匪的造谣污蔑，也使一些群众对我们有着隔阂，不敢同我们接近。我们合江省委研究了面临的情况，一致认为剿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不剿灭土匪，我们就站不住脚，就不可能进行反霸和土改，就不可能解放人民，也就不可能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我们的剿匪斗争，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6年1月至8月底；第二阶段从1946年9月至1947年3月底。

1946年1月初，我们在依兰整编部队，贯彻陈云等东北局领导同志12月在哈市报告的精神，克服盲目的和平乐观思想，积极准备剿匪作战。二、三月间，我军围剿了合佳、牡佳两线的大股土匪，使佳木斯、汤原、依兰等地形势得到了发展。匪徒受到沉重打击后，暂时潜伏不动，欲待机再起。4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趁苏联红军回国之际，向我军大举进攻，占四平，进长春。5月间，北犯之敌已到达德惠、三岔河一带，与驻北满的我军隔松花江对峙，并叫嚣要进攻哈尔滨和牡丹江。敌人被暂时的优势冲

昏了头脑，潜伏的武装土匪乘机又起，大肆骚扰。他们以深山老林作为活动的后方根据地，准备与我进行长期的较量。他们袭击我区乡武装部队，杀害我地方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袭击我进剿部队及运输车辆，破坏铁路和桥梁；他们造谣惑众，威吓群众，破坏我发动群众的工作等等，欲以此策应国民党军向我的正面进攻，里应外合，夺取我北满后方基地。其中最猖獗的是活动在东安、密山县的连珠山、黑台、半截河子一带的“东北挺进军”郭清典、杨玉范匪部（有2000余人）。6月2日，我合江五支队将该匪击溃，残匪逃往宝清、富锦、桦川等地。从1月至6月上旬，我军先后在同江、勃利、依兰、佳木斯、通河、萝北、凤翔、饶河等地，经过大战役5次，小战役200余次，总计歼灭土匪6000余人，缴获大炮20余门，步枪3000多枝。

6月30日，合江四支队配合三五九旅（刘转连旅长，晏福生政委，谭友林副旅长）继续追剿土匪，经过两天战斗，解放了宝清县城。7月3日，我军又追剿逃往富锦、桦川之1400名残匪，经连续作战，至7月12日，俘匪团长2人、营长4人、匪兵974人。在我军强大军事和政治的攻势之下走投无路而被迫缴械投降的有300余人。

为了在6、7、8月更有效地打击土匪，我军区司令部在勃利前线设立临时指挥部，方强同志率领部队追剿，我留守司令部。当时，谢文东、孙荣久、张雨新等匪首盘踞在小石头河及刁翎两地。我军把窜扰在依兰、林口、勃利等地之土匪团团围住，逐步压缩到刁翎。8月初，方强司令员率四、五支队配合三五九旅进攻刁翎，经过激战，歼匪7000余人，谢文东等匪首率残部逃入深山密林。至此，合江省大股土匪已全部击溃。

1946年9月，在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闻天同志和军区司令员贺晋年同志领导下，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贯彻东北联军总部制定的“穷追猛打，钉楔堵击，彻底消灭”土匪的12字方针。会

议分析了残余土匪的特点：合江地区大股土匪全部击溃以后，尚存的残匪多为敌伪时期的大汉奸、警察、宪兵、特务、惯匪以及被清算的反动地主和恶霸，反动立场顽固，溃散而复起再三，行动极为狡猾。会议指出，我们虽然解放了被土匪盘踞的大部城镇与乡村，消灭了武装土匪的主力，但大部匪首仍未擒获，还有4000余名匪徒到处流窜。他们装备齐全，拥有迫击炮、轻重机枪，不断劫夺列车，破坏交通，威胁我农村政权，因而有些乡村仍被土匪控制，群众思想动荡不安。会议总结了过去剿匪的经验教训，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重新制定了穷追猛打的剿匪方针：掌握情况，穷追猛打，紧跟不离，连续打击，反复清剿，擒获匪首，彻底消灭。由于谢文东等一批匪首反动影响很大，会议强调指出捉拿匪首的重要性，提出了“捉到或打死匪首即等于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二”的战斗口号。会议还强调了在军事清剿的同时，也要重视政治攻势，分化与瓦解土匪下层，以达全部消灭的目的。实践证明这次会议的决策是正确的。

11月6日，匪首谢文东率300余残匪被我军包围，经过10余天的围困追剿，土匪的粮源断绝，只得靠杀马充饥。他们吃不上盐，走不动路，行军速度一天天减慢，无法在山中隐匿。11日夜间，谢匪企图从五虎嘴子偷渡，被我警戒部队击退。13日想从能能沟逃去，又遭我骑兵大队和八团的痛击。匪徒到处碰壁，无心再战，纷纷向我缴械投降。贺晋年司令员和三五九旅谭友林副旅长相机派出许多便衣全面搜山。群众告诉我们，哪里有乌鸦群叫，哪里便曾经有过胡子，因为土匪吃剩的腥臭马骨头、马皮和肠肚，招来了乌鸦群。哪里有灰烬，也曾经有过胡子，因为土匪在那里点火烤过马肉。而且可以从灰烬的热度、马肉的腐败程度、马粪的温度来判断土匪离去了多久。在群众的帮助下，21日下午，我独立一旅八团二营五连副连长李玉清率十几名战士终于在勃利县牡丹江边马架山的土地庙里活捉了罪大恶极的匪魁谢文东。

11月22日，我们接到东北民主联军的嘉奖令："合江军区全体指战员：此次刁翎剿匪战斗，肃清了民族叛徒谢文东股匪，并生俘匪首谢逆文东，为人民除害，巩固了解放区的社会治安，特电嘉奖。"

在胜利的鼓舞下，我独立一旅八团一营一连又在12月12日于刁翎西北山生擒了东北第一先遣军司令、惯匪头子李华堂。15日，我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发出布告：

合江境内土匪，大股谢李孙张。
老谢黑子被擒，活捉李匪华堂。
打散了郎亚斌，歼灭了吴长江。
本军对于残匪，决予继续扫荡，
务求彻底肃清，不留一匪一枪。
如果残匪投诚，绝对不咎既往，
不打不骂不杀，遣送回家为良，
没有地分给地，生活定予保障。
倘若执迷不悟，难逃本军铁网。
特此剀切告谕，勿再自误彷徨。

布告中第一句的"谢李孙张"，分别指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张雨新。

经过军队歼灭性打击和政治宣传，12月27日，我八团二营又在四道河子活捉了匪中将副指挥车礼珩。至12月底，合江军区共活捉土匪978人，击毙匪参谋长潘景阳以下218人。缴获步、马枪856枝，短枪110枝，转盘枪5枝，自动枪4枝，轻重机枪42挺，掷弹筒9个，平射炮1门，迫击炮4门，马150匹。1947年3月26日，在勃利北面俘获伪中将军长孙荣久。至此，所有匪魁全部归案，国民党反动派在合江境内的建军土匪大部被剿灭，社会秩序也就稳定下来了。

二、解放刁翎，变土匪窝为根据地

刁翎是合江省的土匪窝子，过去是个三省分界、五县分管的地方。三省是指松花江、牡丹江和合江省，五县是指依兰、桦南、勃利、方正和林口。说是分管，实际上都不管，加之有三条江和深山老林，于是成了土匪横行、暗无天日的地方。抗日胜利后，苏军和我军曾进剿过3次，但三进三出，没有拿下来。第一次是苏联红军进攻，开始他们不相信有土匪，后来一位副司令被土匪杀掉了，这才相信有土匪，派去军队用大炮轰，摧毁了些房子，没有打到土匪，部队就撤了回来。第二次是我民主联军进攻，用缴获的日本飞机，假装国民党对谢文东等匪首加委，想诱其聚集，一网打尽。但狡猾的土匪在集合时，骗去了很多群众，并且有所戒备。埋伏在刁翎外围的部队怕伤害群众，不好下手，又撤了回来。第三次是1946年8月初我军的进攻。当时，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车礼珩等都会聚于刁翎，约有9000匪徒。我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与二分区（驻依兰）吕清副政委率四、五支队配合三五九旅发起进攻，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分进合击，把土匪全部包围，经过两天激战，歼匪7000余人。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等匪首率残部逃遁。我军进入了刁翎。但是，10月10日，杨清海与匪首李华堂勾结，率领百余人叛变。李华堂与车礼珩、张雨新等匪900余人踞守达连河一带（刁翎西北），企图占领我依兰县城，活动极为猖狂。

通过与土匪斗争的反复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军队进剿必须与工作队发动群众相结合，才能巩固从土匪手中解放出来的地方。9月军政干部会议以后，合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闻天同志对我说："党中央指示我们，在东北的任务就是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东满、北满、西满背靠苏联，三面无敌，只一面向敌，进可以攻，

退可以守。刁翎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关键是发动群众，群众不起来就无法彻底消灭土匪，而土匪不消灭，群众运动也不可能胜利开展。你带领一个土改工作团进驻刁翎，发动群众进行反霸和土改，指挥武工队配合军队剿匪。”我被任命为省土改工作团团长，率领武工队200多人，于10月中旬随军进驻了刁翎。这是我军第三次进攻刁翎了，我们决心在解放刁翎的基础上，发动群众，首先反霸，然后进行土改，变土匪窝为革命根据地。我知道：在国民党军进攻最凶时，东北局曾作最坏的打算，如果哈尔滨守不住就迁到佳木斯，佳木斯再守不住就迁到刁翎。因此，把刁翎这个土匪窝变为革命根据地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刁翎过去叫兴隆镇，顾名思义是个物产丰富的地方。“中央胡子”有首歌谣：“刁翎甸子赛北京，难舍难离三道通，伤心落泪莲花泡，要吃要喝到刁翎。”刁翎南面有个甸子，出产大豆、玉米、小麦，还产水稻。附近森林野味特别多，野鸭、野鹿、狍子都很容易碰到。猎人上午出门，下午不到天黑就是满满一担挑回来。镇上有千户人家，3万人口，有酿酒和榨油坊。有个十字街，吃喝都很方便。过去街上设有伪区公所、警察分局，专门镇压老百姓。东面还有个飞机场。国民党非常重视经营这个地方，早在日本投降前夕就派其党棍张雨新（即张黑子）从天津来此地建立国民党党部，专门联络土匪，进行了不少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

我们进驻刁翎后，首先访贫问苦，放手发动群众，清匪反霸，然后土改建政，发展生产。方针是紧紧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富农中小地主，打击恶霸地主与汉奸。开头就是反霸。为什么开头就必须是反霸呢？因为土匪躲起来了，只有反霸才能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土匪。恶霸是地主、日伪汉奸和通匪的“关系户”。我们发动群众反霸，就是挖掉胡匪在农村的“墙脚”，拔除为胡匪通风报信的耳目，截断胡匪赖以物资供应的来源。反霸是土改的先声，是暴风骤雨打破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序幕。我们反

霸开始采用清算的方法，然后逐步深入。

在工作中我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做了5件工作：第一，清匪反霸。在刁翎反霸，主要对象是张雨新、于廷洲，孙树元等，他们是把国民党和胡子联系起来的关键人物。清匪是肃清散匪，特别是肃清秘密的“中央胡子”。我们发动群众诉匪患之苦，进行阶级教育，提高觉悟，知道如何与胡子和国民党斗。发动群众和积极分子去找、去拉受胡子欺骗上当的人，造成起枪热潮。第二，清算分地。对封建地主使用清算的办法，清算出来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头一个月我们就清算分配了290多垧土地，并使500多户分到一些衣服和粮食。我们贯彻“五四指示”，把分地这一工作当做是发动群众工作中最重要的中心一环。在清算分地中，积极动员农民群众亲自参加分配土地的一系列斗争。第三，建立农会。第四，组织自卫武装。第五，保护工商业，使他们安心经营。以上几项，以清匪反霸为中心，这个中心工作做过后，再进行大规模的分配土地。

由于剿匪和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残匪纷纷来降。我们在刁翎期间，先后接受来降和捉到的散匪近200人。其中约55%出身好、转变表现较好的送往勃利补充新兵；有30%成分不太好的或历史不够清楚的，经勃利转佳木斯，送往兴山煤矿生产；还有15%民愤大的，就地监督改造或处决掉了。

1947年6月，我们土改工作团已在刁翎完成了土改工作。不久，工作团大部分同志陆续调回省委工作。解放了的刁翎，气象更新，喜气盈盈，昔日的土匪窝变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了。

（选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五辑）

横扫嫩江土匪

张汉丞

近些年来，每逢冬季，听着呼啸的北风，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我总不免回忆起当年在嫩江剿匪的艰苦岁月，想起为东北解放而浴血奋战的警备二旅指战员以及与我们同甘共苦的广大嫩江人民。

警备二旅，创建于1945年11月，隶属原嫩江省军区领导，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嫩江省建立的一支人民武装。这支部队，认真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展剿匪斗争，帮助建立和保卫人民政权，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有力地支援了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的战争。在嫩江省解放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我是警备二旅的主要领导人和组建者之一。现将警备二旅在嫩江省剿匪的情况，记叙如下。

一、警备二旅建立的前后

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党中央审时度势，向全党全军发出进军东北的伟大号令。从全国各根据地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开辟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我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组织上决定我参加工作团，由林枫同志率领，进入东北。8月下旬，我们从延安出发，昼夜兼程拼命赶路。

11月9日，我和刘锡五、于毅夫、冯纪新、朱光、王盛荣等15名同志，赶到了当时嫩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市。到达齐齐哈尔市后，我们与先期到达并且建立了红军司令部的王明贵同志接上了头。经他介绍，又与苏联红军驻齐警备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得到支持。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成立了中共嫩江省委。刘锡五同志任省委书记，朱光同志任中共齐齐哈尔市委书记，于毅夫同志任嫩江省省长，王明贵同志任嫩江省军区司令员。根据形势的需要，省委和省军区决定迅速组建警备一旅和二旅，委任我为警备二旅旅长，负责组建二旅。

当时，嫩江省和东北其他地区一样，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动乱时期。曾卖身投靠日寇，对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军、警、宪、特和地主、恶霸、流氓、惯匪，捡起了日寇投降后丢下的武器，招兵买马拉队伍，建立各种反动武装，窃踞基层政权。一时匪患四起。在齐市，打着马占山旗号的国民党特务马传悦，暗地里树起了“东北挺进军第三师”的旗帜，专门网罗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反动武装，大发委任状，在嫩江省收罗了7个旅，通称“东北挺进军黑龙江××旅”。活动在龙江县和甘南县的主要是六旅和七旅，群众称之为“黑六旅”和“黑七旅”。他们到处流窜，扩大势力，仇视我们的新生政权，妄图控制嫩江省，迎接国民党的到来。此外，小股的土匪也纷纷拉队伍。在龙江县、景星县和甘南县一带，先后拉起的土匪绺子就有“四海”、“扫北”、“战九山”、“局胜”、“双山”、“占山”、“中央好”、“天棚”、“红海”等30多股。这些土匪后来接受国民党的委任，都是政治土匪，老百姓叫他们“胡子”。各股土匪，既分散活动，又互相联合，成为我们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障碍。

苏联红军进东北后，在龙江县建立了一个解放委员会，在各区、村建立了维持会，基本是日伪时期的原班人马，政权仍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县、区、村都成立了自卫团，名义上维护社会

治安，实际上是看家护院的地主武装。自卫团多与土匪有联系，明来暗往，串通一气，欺压人民。这些基层政权和自卫团，是我们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又一障碍。

由于连年战乱，日寇14年残酷的统治和压迫，地主的盘剥，土匪的蹂躏，素以美丽富饶著称的嫩江平原，一片凄凉景象，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广大农民吃橡子面，穿更生布。很多人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中光着脚。有的一家人合穿一件破棉袄，谁出门谁穿上，其他人裹着一床破棉被，蜷伏在茅草屋的土炕上。在政治上，广大群众存在着盲目的“正统观念”，对共产党、八路军知之甚少。但是，广大人民群众都恨日本帝国主义，都恨地主老财，更恨土匪，渴望翻身得解放。然而，他们对地主和土匪又十分害怕。我们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引导他们起来斗争。这就要消除他们的惧怕心理和盲目正统观念。而要消除他们的这种心理，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工作，扩大我们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要荡平匪患，建立人民的政权。

为了尽快建立剿匪武装，我到省军区找王明贵司令员，研究建立警备二旅的问题。当时别说战士，连干部都没有。王明贵司令员向我介绍说，嫩江省各县都有县大队，大队长都是苏联红军接收嫩江以后任命的。让我下去了解一下，看能否接收，但要提高警惕，因为这些队伍里可能有坏人，甚至是坏人掌权。

根据王明贵同志指示精神和提供的情况，我带着警卫员张指南到了龙江县富拉尔基镇。当时富拉尔基驻着苏联红军。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我到富拉尔基后，首先到红军司令部作了自我介绍，并把在延安中央党校发的毛主席像章（随身珍藏着），拿出来作为证件，给他们看，算是挂上了号。当天下午，我以省军区特派员的身份，召集驻富拉尔基镇的龙江县大队全体人员开会，宣传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军队，讲穷苦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当

兵的都觉得新鲜，听得入神。大队长却显得不耐烦，引起我的注意和警惕。当天晚上，这个大队长要我和他住在一起，我没同意，我说还是住在部队里好。我也想与战士们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夜里12点多钟，我正在屋里考虑第二天的工作，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我警惕地把枪抓在手里，张指南也机警地打开了手枪的机头。接着门开了，闪身走进一个人来。来人正是县大队的大队长魏大狗（这是外号，名字忘了）。他进屋后，倒背手站在门口，见我们已有戒备，表情很不自然地说："你怎么还没睡呀？"我随声回答："天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随后，他又没话找话地搭讪两句，就倒退着出了房门。出门后转身走时，我见他手里握着枪，当时我意识到此人来意不善，很可能是想暗杀而未得手。

次日，龙江县解放委员会委员长常守陈（他是伪满最后一任龙江县长，有民族主义思想，为人尚好）到富拉尔基镇检查工作。我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对他说了。他听了很惊讶，并告诉我说，他已经查明魏大狗不久前还在朱家坎一带强奸了几名少女。又说："我们正是来找这个人的，因为许多老百姓控告他，他的民愤很大，县解放委员会正准备处置他。"常守陈让我赶快离开县大队，到他那里去住。第二天，县解放委员会以开会的名义，把县大队长魏大狗抓了起来。这个家伙被抓的时候悔恨万分，吐了真言："后悔前天晚上没下手把关里来的那个共产党打死。"

此后，我又对景星、泰来、甘南等县的县大队做了调查。这些县大队成分都很复杂，兵权没有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又都与土匪有勾结，要接收改编他们根本不可能。即使暂时收编了，在紧要关头，他们杀害我们的干部，又把队伍拉到国民党那里。经过调查，并吸取富拉尔基的教训，决心动员和依靠群众，组织一支自己的人民武装。

于是，我又去找常守陈，请他帮助解决兵源问题。因为据组

织介绍和当地群众反映，都说他有民族气节，有正义感，特别是他抓捕县大队长一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才找他。此人果然很热心，主动以解放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县各区发出通知，根据我们的要求，帮助我们做宣传，号召群众踊跃参军。这一号召很灵，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听说要建立自己的军队打土匪，都积极报名。仅几天时间就送来500多名。当时我和翟东平、王战瑞、张指南，还有当地的姜文元，在原日本宪兵队的大院内，组建了3个连，开始训练。这时，新四军调来两个建制团的班长以上干部，分到一、二两旅。刘烨同志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兼龙江县委书记，任务也是征兵。很快又送来500多战士，先后在东海牙屯、梅里斯、达乎店等地组建队伍。

12月中旬，我们把队伍拉到甘南县。不久，太行太岳区的干部队伍也到了，组建了第四团，旅部的班子也配齐了，随即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

在甘南县期间，我们经过集贤村等几次打土匪及围剿“黑七旅”的战斗之后，兵力又有增加，又组建了第五团。

1946年1月，经过打朱家坎和集中围剿黑六旅、黑七旅的除夕之战及解放碾子山、李三店、朱家坎等几十个村后，各区都组建了公安中队。裔国礼同志曾被派到布特哈旗大河湾（又名林家围子），组建公安大队。这些公安队，全是骑兵，旅部派刘烨、吴永福同志去主抓，并且搭起了第六团的领导班子。

至此，二旅组建基本结束。四团的活动范围，在富拉尔基一带，解放齐市后，改为市公安纵队了，旅部就设在富拉尔基；五团活动在朱家坎、碾子山到甘南、阿荣旗、布特哈旗土匪多的一带；六团活动在景星县、扎赉特旗、泰来县北边，也是土匪很多的地方，展开了全面的剿匪斗争。

除上述3个团以外，内蒙古扎兰屯一带还有一个蒙古支队，也归我们指挥，与3个团配合剿匪。这支队伍有500多人，全是蒙

古族，所以取名叫“蒙古支队”。西满军区派夏林同志任支队政委，支队长叫鄂嫩日图。

在组建警备二旅的同时，我们着重抓了部队中各级党组织的建设。成立了旅党委、团党委，营、连都及时成立了党支部，排也成立了相应的党组织。重申党的纪律，实行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确立了党在部队中的领导地位。

开展剿匪斗争，不但要有人，还要有武器弹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刚投降不久，枪炮、子弹扔得到处都是。我见到富拉尔基镇公所存着几百枝枪，我们就取了来，有“三八”、“九九”、“四四”马枪等等。后又派人到兴安岭捡回来不少枪炮、弹药，装备了队伍。因为有了炮，旅部又组建一个直属机炮营，机炮营长是张纯义。全旅上下，清一色的日式装备，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

从警备二旅组建起，我们就先以甘南，后以富拉尔基为基地，在龙江、景星、甘南几县和内蒙古的几个旗，展开了近2年的剿匪斗争，直至挖清匪根，才告结束。

二、全歼黑六旅、黑七旅

“黑六旅”的旅长叫尹彬甫，是碾子山维持会副会长，原是东北军的一个逃跑的军官（他自称当过营长）。他在碾子山自卫团当头头，被马传悦收编加封为“东北挺进军黑龙江第六旅旅长”，于是招兵买马，为非作歹于碾子山、朱家坎一带。他的得力干将是一营长张百奎。“黑七旅”的旅长叫宋同山，是嫩江省方圆几百里有名的土匪头子。他是兵痞出身，也在东北军里当过连、营长，后被日本俘虏，下煤窑当了劳工。宋同山认贼作父，卖身投靠日本人，对劳工大打出手，受到日本人赏识，当了工头。日寇投降后，他跳出来，收罗伪官吏、警察、宪兵、恶霸地主、盗寇惯匪、地

痞流氓、大烟鬼，还有日本人，拉起了土匪绺子，后也被马传悦收编为“黑七旅”，他被委任为旅长。黑六旅和黑七旅以及其他杂牌绺子，共组织起七八千人的土匪武装，全部是骑兵。这些匪徒，凶残狠毒，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他们深恶痛绝，又恨又怕。面对这样的土匪，西满军区司令部黄克诚同志指示：“打土匪要猛、要狠、要穷追猛打，一直追到底，直到把土匪歼灭为止；一旦抓住土匪头子，定要严加惩办，决不能放虎归山。”我及时把黄克诚同志的指示传达给全体干部战士，并且用土匪残害人民的各种罪行教育干部战士，激发他们的阶级仇恨和剿匪热情。还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及战略战术，不断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军事素质。为了对付敌人的骑兵，我们先后把五、六团都武装成骑兵，在茫茫的嫩江雪原上，与黑六旅和黑七旅展开了斗争。

清剿黑六旅和黑七旅的斗争是非常艰苦的。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冰雪封地，行军时雪深没膝，路也看不见。部队御寒物资奇缺，在零下 40 多度的天气里，干部战士只穿着一套单薄的棉衣。不少人马都不敢骑，经常牵马跑，来暖暖身体。嫩江西部人烟稀少，部队宿营常常找不到房子，就在雪地里烤火过夜。有时打伏击，因为地坚如石，挖不了工事，干部战士就把柴草堆起来，浇上水冻成冰墙做掩体。在这种冰筑的掩体里，趴的时间长了，衣服就跟地上的冰粘在一起。当时，部队真正在战斗中减员的并不多，而冻伤减员则大大超过了战斗减员。不少人冻坏了手脚，一些骑兵战士冻坏了小便。这严重地威胁着部队，妨碍着剿匪斗争的开展。为战胜严寒，度过难关，取得剿匪斗争的胜利，我们首先在内部进行一系列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号召广大指战员振奋精神，看到光明，克服困难，使部队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同时，积极想办法解决各种物资供应问题。部队御寒物资，就地筹措，尽力解决。如买老乡的羊皮，做成袜子穿在脚上；做成皮裤，让骑

兵战士穿上；把日本鬼子丢下的毛毯剪成小块，分给战士包脚；有的连队把狍子皮、猪皮、牛皮剪成块，穿上小孔，扎起来当鞋子穿。真正成了“土八路”。部队还收集了当地群众的防冻办法，教给战士怎样防冻。广大指战员正是靠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保证了剿匪斗争的顺利进行。

在作战中，我们根据土匪熟悉地形、民情等特点，一般以团为单位行动。争取主动，争取时间，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因调动大部队目标大，容易被敌人发觉）。同时，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总的目的是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清剿敌黑六、七旅的斗争，从1945年12月开始，到1946年4月末基本结束。在此期间，敌我双方频繁战斗，小的战斗天天在打，主要战斗有以下几个。

打朱家坎途中失利

朱家坎是中长铁路上的一个较大的站，也是龙江县境内的一个大镇子。敌黑六旅、黑七旅常到这里与国民党嫩江保安司令张伯范收编的自卫团团长徐文达来往。徐文达已被任命为嫩江保安第三旅旅长，这个旅有260多人，为害地方。我们决定先拿下这个杂牌，铲除黑六旅、黑七旅的帮凶。1945年12月28日（旧历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带着四团从甘南出发，冒雪行军，走了一天到达七棵树宿营，并想联系被军区派到旅里来的张才参谋已收编的自卫团，一起去打朱家坎。可是听说自卫团已解散，只好决定自己打。30日经过休整，做了战斗部署，决定把警卫连留在七棵树，守卫各科、处，作为战斗后方。31日早，大部队冒雪向朱家坎进发，想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想不到我们的军事行动计划被内奸泄露给土匪。当我行军50多里，离朱家坎还有20来里路时，警卫连两名警卫员飞马来报信，说土匪已把七棵树包围，请大部队立刻回援。我一听，马上与尹政委、刘主任、吴团长研究，决

定回援七棵树。途中遇到警卫连指导员刘曙仁及保管科、政治科、卫生科、供应处的20多台大车及30多名同志。据他们讲，为掩护他们，在富山屯岗后牺牲了5位战士。我听后心急如火，命令部队快速前进。到了富山屯，只见烟火冲天。路上，我们找到5位战士的尸体，派人抬着，奔向七棵树。战士们看到战友牺牲，悲愤交加，急速行进。冲到七棵树南山时，战士们喊起："冲啊！"声如惊雷，飞跑着向村内冲去，有的战士跑掉了鞋，光着脚在冰雪地上飞跑。匪徒的骑兵听到喊声，见我大部队袭来，纷纷上马逃跑，正在抢东西来不及跑的，被我们包围，活捉了30多名。我们走到旅部驻地大院，见13名干部战士被扒得精光，倒在血泊中，其中有警卫连长张国卿同志，其他战士我还都叫不上名。这些被害的同志，有的千里迢迢从关里来到东北，有的是刚参军不久的新战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壮志未酬身先死。大家心里比油煎还难受。还有11名战士被俘，也被扒光，另有一名因藏在大缸中，幸免一死。见了他们，我们都忍不住流出眼泪，战士抱着我们痛哭。经过审讯俘获的土匪，才知道是姜恩久、曹化东已投靠国民党马传悦，被收编为"东北挺进军七棵树地区独立团"，他们勾结黑六旅、黑七旅，乘我大部队去打朱家坎之机，包围我留守部队，制造了惨案。后又抓住了来给姜恩久送军需的王小胡子等20多人。1946年1月2日，我们为死难的战友安葬，同时枪毙了民愤大、与这次事件关联重的王小胡子等5个匪徒，为战友们祭了灵。

我们这次失利，主要是由于指挥员缺乏在新区对敌作战经验，对敌情估计不足造成的。这一血的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对敌斗争，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麻痹。战后，我们及时认真地进行了总结，对部队进行教育，提高革命警惕，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由此我联想到陈云同志的指示：你们到了新区，首先要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否则，就死无葬身之地。

这是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应该牢牢记取。

张家大沟之战

1946年1月上旬一天，我接到情报，说黑六旅和黑七旅向我驻地甘南集结，其意图是吃掉我们这支新生的人民武装。我立刻召开旅、团干部会议，研究部署迎击土匪的作战方案，决定迎上去打。并向部队做了战前动员。

我们带四团去张家大沟与敌交战。张家大沟南北都是山，我们到达后马上抢登南山。我们刚占领山头，敌人就上来了，但比我们晚了一步。黑六旅和黑七旅纠集了三四百名红枪会反动分子当炮灰。他们见我们占领了山头，便唆使红枪会分子冲在前边，很有节奏地高喊着："刀枪不入！刀枪不入！"拿着大刀、扎枪，杀气腾腾地向我军阵地逼来。我们的新战士，没见过红枪会，缺乏经验，有的打枪心跳手发颤，干放枪打不倒敌人，真以为"刀枪不入"呢；有的甚至要撤退了。我立刻喊："不要慌，稳住神！"吴团长下令："打！"机枪、步枪、冲锋枪，一齐向敌人开火，手榴弹也在敌群中开花。"刀枪不入"者象秋后的秫秸，顿时倒了一大片。战士心情立刻稳定了，战斗情绪马上高涨起来。黑六旅、黑七旅的匪徒们见拿大刀、扎枪的倒下了，在匪首的催逼下，向我们阵地开火、冲击。几百名匪徒象旋风一样驱马向我扑来，匪首们高喊："兄弟们，冲啊！消灭土八路，到甘南去过年！"为了消灭敌人，我们迅速调整防守，把队伍分成3排，前排卧倒，中排跪下，后排站立，组成密集的火力网（这是我在红军大学学的打骑兵的战术），在有效距离内，向敌人马匹猛烈开火，打得土匪人仰马翻，寸步难行，几次冲锋都被打退了。在我军顽强阻击下，土匪们打红了眼，死盯住我阵地不放，一心想消灭我们，占领阵地。这时，我见时机已到，告诉吴团长，用步兵牵住敌人，派骑兵迅速从两侧向敌人迂回，断其退路，争取全歼敌人。不一会，我骑

兵战士在敌人后边打响了，敌人腹背受击，慌乱了。匪首们率队向西逃窜。黑六旅尹彬甫的最得力的营长张百奎被我击毙，这等于斩断尹彬甫的一支胳膊。我们一营长张广增同志，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敌人伤亡过百，我们则无大的伤亡。这一仗，我们占据了几个重要村落，大振了士气。敌人经过这一仗，只要风闻我二旅到来，就开始逃窜，或避实就虚，再不敢与我们的大部队交锋。

除夕围歼黑六旅、黑七旅战斗

朱家坎战斗失利之后，我们决定回甘南休整和集训。同时，又组建了第五团。在20多天中，打过多次小仗，每仗必胜，显示了我军的政治和军事素质都有了增强。可是黑六旅和黑七旅并未被彻底消灭，又纠集土匪，妄图与我较量。到了腊月二十九，通过侦察（主要靠我们已占据的地方的老百姓和当地战士化装侦察），了解到黑六旅和黑七旅等匪徒又在七棵树到甘南一线的一些村屯集结了。我们研究决定，利用三十晚上，全面出击，消灭黑六旅和黑七旅。三十晚上，匪徒们正在各村屯抢了酒肉要吃饺子，没有防备。我们部队突然袭击，打得匪徒们措手不及。他们有的被堵在屋里缴了械，有的上马仓皇逃窜，都来不及还击。我们的进展十分顺利。打死打伤和俘虏黑六旅、黑七旅和朱家坎的“保安第三旅”的匪徒400多人，缴获了大批战利品。我们对被俘的匪徒，进行教育，他们都表示再不当土匪了。于是警告他们，要与人民军队为敌，是没有好下场的。后把他们都释放了。这一仗，使这3个匪旅大伤元气，基本都崩溃了。

在这次大胜仗的基础上，我们在正月初三又出兵解放了碾子山，毁了尹彬甫的老窝。正月初四解放了李三店，挖掉了宋同山经常出进的一个基地。战后，我们又到甘南，吴永福去组织骑兵，很快组织起3个连，他又带骑兵去打外线，从李三店、景星北，又

转奔赴朱家坎，于正月十八（2月19日），缴了保安第三旅的械，解放了朱家坎。旅部设在朱家坎。正月二十八日（2月29日），尹彬甫带领黑六旅残匪竟窜到朱家坎，我们与苏联驻军配合，将其全部缴械。至此，黑六旅彻底瓦解。尹彬甫逃跑，后在土改运动中，被我人民群众抓获处决。

李三店西南的遭遇战

1946年3月初，我六团解放了富拉尔基，并把旅部设在这里。3月中旬，得到消息说，黑七旅残部又纠集了一些匪徒，活动在李三店西南20多里的几个村子里，约有几百人。旅部决定乘胜追击这些残匪，于是，我带着四团的一部分部队和一个机炮连，开到碾子山，又集中五团的全部，向李三店西南进发。部队出发后，五团在左，四团在右，旅部指挥机关和机炮连走中间。抄小路直奔匪军驻地，去包围敌人。夜间3点多，五团和四团摸到敌人驻地，结果扑了空。几乎在同一时间，旅指挥机关和机炮连遭到匪徒的袭击。后来才知道，袭击旅指挥部的匪徒，就是黑七旅的残部。匪徒们看到我们人少，从四面围了上来，企图吃掉我们。我指挥机炮连占领一块高地，进行反击。我自己抢过一挺重机枪，猛烈扫射，连续打退敌人3次冲锋。但由于土匪人多，火力很猛，打了1个多小时后，机炮连有一半同志牺牲了，还有不少人受伤，子弹也不多了。这时，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离我们只有20多米远了。匪徒们蜂拥而上，嗷嗷叫着要抓活的。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干部战士毫无惧色，坚守阵地。不少同志上好刺刀，准备和敌人展开白刃战，拼个你死我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了。五团和四团部队扑空后，听到枪声，急速赶来支援，从外面包围了敌人，形成了敌围我，我又围敌的局面，把敌人夹在中间了。我们的机炮连从里往外打，五团和四团从外向里打。敌人腹背受攻，顿时乱了阵脚，一时间被杀得横尸遍野。经过不到

1个小时的激战，歼敌400多人，缴获了许多枪支、马匹。黑七旅经这一仗，一败涂地。宋同山带着少数残兵败将侥幸逃出去南奔，归附了国民党的部队。

三、平息甘南县大队叛乱

在我军攻打齐齐哈尔前一天，我接到省委书记刘锡伍和司令员王明贵同志的一封信，说甘南县大队要叛变。我心里很急，忙带着四团三个连从富拉尔基赶往甘南。

甘南县大队是我们到甘南后收编的，人员是由甘南县被抓到大兴安岭的劳工组成的。光复后，他们从大兴安岭回来时抢了不少枪，由刘治国挑头，组织起来成立了县大队。当时我认为阶级成分较好，就收编了，并且派庞汉英同志去当指导员。可是没想到刘治国和地主、土匪有勾结，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过不惯我们的艰苦生活，想投靠国民党。我们赶到甘南，使刘治国感到很突然，他也预感到来头是对他们的。我们旅部研究，决定以召开干部会议的名义，把县大队的头头先缴械，而后做战士工作。但是，刘治国接到通知后，拒绝参加干部会议。我们感到不缴这个县大队的械，让他们拉出去，为害太大。于是决定强行缴械，即以全部战士集合去剿匪为名，把县大队的战士都集中起来，以武力缴械。方案是：由我做动员讲话，当讲到“要整先从内部整”时，就开始缴械。

这次全体集合，他们都来了。可也看得出，他们已有了准备。当时县大队3个连站在中间，我四团3个连，还有附近的一个连站在两边，集合在广场上。我站在前边讲话，当讲到“要整先从内部整”时，我举手用力一挥，我们4个连的战士立刻高喊：“缴枪！”想不到刘治国布置得也很周密，他也事先做了安排。当我们缴械时，他们的3个连竟向我们开火了。我4个连的战士，也立

刻向他们开火，在短距离内开始了枪战。由于我的警卫员先向刘治国开了枪，并有几个战士抢上去抓住了刘治国，而且我们人多，经过实战锻炼，枪战持续的时间不长，就把县大队的械缴了。可是为保护我，司宏元同志和我的警卫员都负了伤。这次对面枪战，双方伤亡都不小，约近百人死亡。

这是一次不该采取，而又不得不采取的缴械形式。伤亡的惨重使人心痛，可是县大队要真的把队伍拉出去与我为敌，后果将更难想象。

四、解放齐齐哈尔

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经过半年多艰苦奋战，我们终于在嫩江渡过了难关。随着黑六旅、黑七旅、保安第三旅等匪帮的覆灭，广大人民群众的心转向了我们，公认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除害的，开始靠近我们，从各方面支援我们。因此我们的力量也越来越大。

当时，苏联红军根据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只能把政权交给国民党。因此，我们嫩江省委和省政府、省军区，不得不于 1945 年 12 月 31 日撤出了齐齐哈尔市。国民党接收大员彭济群，进驻齐市任嫩江省主席。恶霸地主出身的尚其悦，组织了“光复军”，与彭济群勾结在一起，当上了卫戍司令。马传悦被我们镇压后，他委任的一些挺进军，也纷纷归附于尚其悦。在剿匪斗争中，被我军打得无处存身的土匪、地主武装和地主、流氓，都纷纷逃往齐齐哈尔，投靠光复军。因苏联红军在齐齐哈尔设了司令部，我们又不能攻打齐齐哈尔，捣毁彭济群的反动政权，消灭尚其悦的光复军。我们省委曾经写信给东北局领导彭真同志，请敦促苏联红军撤军。4 月 6 日，苏联红军开始从沈阳、哈尔滨撤退，继而又撤出齐齐哈尔等地回国了。4

月中旬，我们接到西满军区和省军区的指示，命令我旅立即做好进攻齐齐哈尔市的准备。

为了攻下齐齐哈尔这个战略要地，西满军区调来了辽北军区部队和东北民主联军一个旅。西满军区副司令员倪志亮赶到嫩江任攻城总指挥，王明贵同志任副总指挥，刘锡伍同志为政委。攻城前，指挥部召集部队负责同志开了战前会议，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决定4月23晚攻城。具体战斗分二步：警备一旅和我旅四团一部分，攻南面，由一旅长吴富善同志担任指挥；西南和西北由辽北部队和东北民主联军主攻；我四团攻北面。东面不攻，由我骑兵六团打阻击，在平原和低洼地中围歼逃窜之敌，我和六团长吴永福负责指挥。会后，我们分头行动，向部队做动员，进行战前准备。广大指战员听说要打齐齐哈尔，个个兴高采烈，摩拳擦掌，参战热情高涨，请战书、决心书象雪片一样飞到旅部。

4月23日晚9时，按预定计划，几路大军实行对齐齐哈尔市的合围。我军行动迅速敏捷。到了午夜，各路兵马都到达了齐市外围，等待总攻的命令。4月下旬的北方，还是很冷的，特别是进入后半夜，冷风刺骨，把战士们冻得打哆嗦，急切盼望快点发起总攻，消灭敌人。

突然，几颗发起总攻的信号弹冲天而起，战士们立刻振奋起精神，随着命令，开始对齐齐哈尔市发起了总攻击。顿时，枪炮齐鸣，攻城部队杀声四起，震憾着夜空。光复军被突然的攻击，吓破了胆，但在匪首们的监督下，被迫仓皇应战，已失去了战斗力和主动权。国民党接收大员彭济群，一看形势不妙，先乘飞机逃跑了。战斗到凌晨，已基本包围了几个战略要地：省政府、卫戍司令部等处，展开了激战。但是敌人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丧失了抵抗力。特别是光复军的头头们，看到大势已去，先化装逃跑了。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第一面红旗，已经在省政府的大楼上升起。当红旗徐徐升起的时候，干部战士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站

在楼顶上的同志们高兴地呼喊："齐齐哈尔，人民的城，我们回来了！"

被打得焦头烂额，溃不成军的敌人，向东逃窜了。敌人出城不远，便遭到我埋伏在城东的骑兵六团的迎头痛击。我六团长吴永福同志，一马当先，率领千余名骑兵，迎面冲上去。由于骑兵四面围击，逃跑的敌人被圈到大洼地里，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我六团战士俘虏逃敌1000多人，打死打伤难以计数，并缴获了大批战利品。伏击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六团战士王全，打得最出色，他一人两匹战马，一挺轻机枪，全身背满子弹。战斗打响后，在马上抱着机枪扫射，堵住逃窜的敌人，歼敌近百名，荣立一等功。他英勇善战的事迹迅速传遍全旅。大家给他改名叫王强。

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全歼光复军近万人。至此，在嫩江省几股大的"官匪"，全被歼灭，除了彭济群、尚其悦及宋同山几个匪首逃脱，我们取得了嫩江剿匪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齐齐哈尔市解放之后，指挥部在这里为参战部队召开了庆功大会。我旅战绩卓著，受到西满军区通令嘉奖。我旅四团被留驻齐齐哈尔市做卫戍部队。西满分局和军区机关、嫩江省委和省政府及省军区、齐齐哈尔市委和市政府机关，都从甘南迁回齐市。

五、反奸除霸，追剿股匪

齐齐哈尔市解放之后，嫩江省的政权掌握到我党手中。龙江县、甘南县、景星县不但建立了县政府，也建立了区政权，开始了反奸除霸、减租减息运动。这一下，触动了各地的汉奸、恶霸、地主和劣绅的利益，他们要与我们进行拼死的斗争。因此，股匪纷纷拉起，不断扩大，成为我新生政权的死敌。他们仇视我人民解放运动，到处袭击我地方政府，砸我农会，残杀我工作人员及农会干部，阻碍反奸除霸斗争。穷凶极恶，十分猖狂。在龙江县

的股匪就有孙瑞宪拉起的“四海”绺子，刘奎武拉起的“仁义”绺子等；在景星县的股匪就有大地主韩喜林拉起的“局胜”绺子，惯匪刘祖武拉起的“文武”绺子，惯匪刘占富拉起的“双山”绺子，大地主阎立发拉起的“中央好”绺子，仲孝先拉起的“天元”绺子，李永贵拉起的“扫北”绺子等；在甘南的股匪有刘兴东拉起的“好友”绺子，等等。嫩江以西各县，仅土匪绺子就有近40股。土匪时多时少，最多时可达四五千之众。

4月，局胜、文武、草上飞、四海、长江好等绺子汇合在一起，约三四百匪徒，攻打景星县政府。当月，海红绺子在龙江县五百七十垧，抓我朱家坎区干部10余人，杀害3人。双山绺子曾在景星县西南，截击我工作队员，杀害了我干部莫洪臣等人。8月，中央好绺子策动景星县头站二中队叛变，打死我南来的干部张治国、刘教导员、张善等人。又于10月，配合四海绺子，攻打龙江县二区区政府，打死我公安队长武云起、战士陈喜、工作队长田焕章、农会主任温广厚等人。特别是“李三店区中队叛变事件”，轰动了嫩江平原。李三店是嫩江地委书记顾卓新同志抓的土改工作试点地区，曾派去我旅干部刘烨、贾克、翟东平、赵敬璞、李超等同志为工作队员。经过一段工作，各村都建立了政权，成立了农会，建立了民兵组织。可是土匪勾结中队内的排长陈中凯、吴玉芝等人，策动中队指导员黄鹏飞叛变，残杀了中队长赵义恒、区委书记刘健、我军区组织科长李超。

严酷的斗争，使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不彻底消灭股匪，不仅人民群众难以翻身，也难以建立起巩固的人民政权，更难以完成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任务。因此，我旅展开了全面的追剿土匪的战斗。此时，我旅已改成嫩江省第三军分区所辖五、六团，都改为骑兵团，战斗力相当强，既以团为单位活动，也以营、连为单位活动，积极追剿土匪。小仗几乎天天打，大仗有几次。

首战景星

4月下旬，齐齐哈尔解放后，我旅部回到富拉尔基，就接到了景星县告急的消息：几百土匪包围了景星县城，县委和县政府已经撤出县城，转到朱家坎。接到这个报告，我立刻与五团长贾增祥研究，决定出兵景星，消灭股匪。这时，我们不但有骑兵，而且有了汽车。我们25日早出发，赶赴景星。到了景星县城，见到蒙古支队已经赶跑土匪，占领了县城。我们会兵一处。忽然又得到消息，从齐市逃出的黑七旅的少数残匪，从西北过来，与撤退的局胜、文武、草上飞、四海、长江好等包围景星县城的土匪绺子汇合，取道金山西，奔向苦山区的六九山。我们立刻做了战斗部署：组织轻骑兵先头部队迂回包围，大部队随后跟进，在土匪闻风逃窜之际歼灭之。敌我双方在仙人洞南展开激战。子弹呼啸，刀光闪闪，杀声震天。我们指战员随即策马冲入敌阵，奋力拼杀。匪徒招架不住，开始向西南逃窜。我军穷追不舍，边追边打，把敌人追到一块低洼地中。我骑兵战士策马飞驰，进行围剿，匪徒们乱作一团。战斗打到天黑，我们歼敌100多名，还缴获了一些马匹和枪支。其他匪徒不敢恋战，拼命逃到泰来境内去了。这一仗，股匪尝到了我团的厉害，以后听到我部队出动的消息，就逃跑了。

这次战斗的胜利，为巩固景星县政权做出了贡献。我们留下随后跟进的六团，驻守景星，继续开展剿匪斗争。

哈拉剌战斗

10月上旬，李三店中队叛变事件后，我五团得到报告，立刻派二连进驻李三店。10月2日，土匪来攻李三店，妄图消灭我二连，夺去枪马，扩大土匪队伍。我二连在连长裔国礼、指导员张廷清的指挥下，凭借振盛东大院，打退土匪的多次进攻，从下午

2时一直坚持到下午5时多。当一、三连返回碾子山后，贾团长立即带领一、三连奔赴李三店。经过里外夹攻，把土匪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扔下不少枪支、马匹和尸体。后来知道，这些土匪，并不是黄鹏飞拉出的叛匪，而是佟长平组织起来的。旅部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贾团长带兵去追剿，消灭黄鹏飞叛匪。贾团长亲自带队，大约周旋了三四天，在哈拉剌与黄鹏飞叛匪相遇了。这时黄鹏飞已纠集局胜、双山、天下红、四海绺子，约400多骑马的土匪，兵分三路，向我开火。我先就地还击，后集中炮火打西山头，然后调来六团骑兵一连，骑兵跃马冲杀叛匪的正面和北面，一下把叛匪击溃。黄鹏飞落荒西逃，再没拉起队伍。这一仗，我们消灭四海、天下红的匪徒最多，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在李三店和哈拉剌，牺牲了两名同志，一位是姜学志，一位是原记成。后来得知制造李三店事件的9个叛匪头子，都先后被我们捕获、处决，祭了烈士墓。

除上述几次重要战斗外，在我记忆中还有牛山战斗、苏秀江屯战斗，追剿并俘获双山头子刘占富的战斗等等。

总之，到了1947年夏，土地改革进入高潮时，在龙江、景星、甘南、泰来、扎旗、布旗、阿荣旗等地的土匪绺子，已全部被我们歼灭。落局、四海绺子，被我追剿无地站脚，逃到吉林，投靠了国民党七十一军。局胜也南逃到大林站投了国民党，其头目韩喜林在镇反中被我人民政府抓获处决。海红绺子于1947年2月，被我围剿无活动余地，在海兴屯遣散。天下红绺子于1946年10月牛山战斗之后，即溃散。文武绺子于1946年7月被迫于扎旗西家子屯解散。双山绺子于1947年2月被我六团缴械投降。

龙江县等地剿匪斗争的全胜，巩固了县及区、村的政权，为土地改革的全面展开，打下了基础。

六、实行土改，追挖匪根

股匪已歼灭，但是匪首有的投靠了国民党，有的则隐藏起来，不除尽挖绝，还是祸害。1947年夏，土地改革进入高潮，广大贫苦农民都发动起来了。随着斗地主、分田地的进行，从上至下，开始了“挖匪根”的斗争。

在“挖匪根”的斗争中，为了防止敌人破坏，首先对内部进行整顿。对所有的干部逐个登记、审查、建立档案。通过整顿，我们发现制造李三店事件的首犯黄鹏飞原来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由龙江县公安局立案搜捕。在我们干部中，确实清洗出一些坏人。

其次，发动和依靠群众在土改中挖匪根。我们组织了二三十人不等的小分队，跟随土改工作队下乡，一面搞土改，一面挖匪根。事实证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那些当过汉奸的土匪，那些依附于恶霸地主的暗藏土匪分子，对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土匪分子，也都象老鼠一样，一个个被挖了出来。如李三店区人民挖出了在李三店事件中密谋并杀害我3烈士的叛匪、原区中队排长吴玉芝，将他处死，为3烈士报了仇；叛变后又来打我二连的伪李三店邮电局长贾义为也被挖出来，等等。

对于流窜的土匪，我们一方面组织小分队追剿，一方面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对土匪进行瓦解。一般说来，土匪都很顽固，是不易瓦解的。但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不少被胁从的、不坚定的分子。他们当中有的是被抓、被逼去的，有的是去“吃蹓跶”（即跟着土匪绺子，去吃大锅饭或抢点东西，或弄点钱养家糊口），误入歧途的。其中的一部分人，无疑是能够争取的。为了彻底消灭土匪组织和势力，我们配合土改工作队，办土匪家属训练班。对他们不打不骂不虐待，也不胁迫，以常人之心真诚相待，

耐心地启发教育。给他们讲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的大好形势，交待我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使其丢掉幻想，打消顾虑，号召他们及早动员自己的亲属脱离土匪组织，弃暗投明，主动向各级政府投诚。不少土匪家属在提高觉悟，认清形势的基础上，纷纷捎信，动员他们的亲属脱离土匪组织，回乡生产，也有的派人去找回来。特别是那些被打散的土匪不敢回家而隐藏起来的，不少都被找回来了。对于当过土匪又回来的人，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分子，只要把问题向政府、向人民交代清楚，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我们都表示欢迎。家境困难的，照样分土地、房子、粮食和衣物，使这些人很感动。有的还主动给自己原来的同伙捎信，介绍他们回乡情况，宣传我党我军的宽大政策，对土匪起了分化瓦解作用。如双山股匪中刘占富的弟弟报号“财旺”的刘占江，被抓住后，主动交代了双山的组织情况及枪支藏匿的地方，我们按他说的，把双山绺子的土匪都找到了，经教育，都决心重新做人，全部释放。

在挖匪根斗争中，我们正确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正确路线。到1947年底，全部肃清了残匪，铲除了匪根，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全面翻身。他们发自内心的拥护共产党，热爱子弟兵，对党的号召一呼百应，积极支援前线。辽阔的嫩江平原成了我们可靠的根据地。

嫩江剿匪的胜利，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是坚持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方针的成果。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都深深感到：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是夺取胜利的保证。

（选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草原土匪如是说

赵清阳

解放前，在辽阔的青海黄南牧区，常有土匪出没，他们或七八人，或十几人，或数十人，最多可达百余人。他们一般都有较严格的组织纪律，个个乘好马，带刀枪，拿打牛的抛子，一物三件，强悍异常，牧民们没有不害怕的。他们的抢劫，多在夜间进行，白天化整为零，隐蔽进行侦探。抢劫的主要对象是过往商队、较富的牧户、有钱的活佛，有些较富的寺院也在遭抢之列。他们的抢劫活动给牧民、商队、寺院带来很大的危害。瘟疫、匪患、火灾、鼠害是牧区的四大害。藏语称土匪为"巨化"和"恰巴格麻"。前者指较大的职业性土匪，这种土匪类似流寇，与官府和军队有勾结，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后者类似汉地的经济土匪，其成员一般为赤贫户，多为生活所迫。

藏族地区特别是牧区的匪患，历史久远。据《元史·卷二十四》记载："仁宗一年（公元312年）吐番寇礼店、文州（今甘肃礼县、文县），命总帅亦怜真等讨之。"《元史·卷二十六》记载："仁宗五年六月，西番土寇作乱，敕甘肃省调兵捕之。"《元史·卷三十九》记载："顺帝三年五月甲寅，西番贼起，杀镇西王子党兀班。立行宣政院，以也先帖木儿为院使，往讨之。""顺帝八年三月壬寅，土番贼起，有司请不拘资级，委官讨之。""顺帝十二年庚寅，以杀土番贼功，赐歧王阿剌乞巴钞一千锭，邠王鬼厘，诸王班失监，平章政事锁南班各金系腰…。"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那时藏族地区的匪患是

相当严重的，他们杀王子、驻守使节，肆意抢掠财物，其势力之大，使朝廷不得不派军政要员出征讨伐。

黄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海省东南部，东侧与甘肃夏河县为邻，南与甘肃碌曲县、玛曲县和本省玛沁县接壤，西侧与同德县、贵南县、贵德县相连，北与化隆回族自治县、东北侧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为邻。自治州南部的泽库县和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为纯牧业县，北部的同仁县和尖扎县为半农半牧区。笔者主要调查了两个纯牧业县及其边缘地区相关的情况。从调查资料看，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几个乃至十几个以抢劫为生的人。他们中间必有一个强悍者为首领。其为匪的原因主要是生活所迫，大部为赤贫户。牛羊是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有些牧户全家几口人，仅有几头牛或几只羊，而牧民主要靠吃牛羊肉、牛奶和用牛奶打成的酥油拌糌粑为食，一般没有二三十只羊和五六头牛是养活不了一家人的。这些赤贫户或半赤贫户的经济状况还不及解放前汉族农村的贫下中农。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妇女，主要靠给别人打零工干苦力养家糊口，而另一部分人不愿意或找不上活干，只好结伙去当强盗。过一段时间抢一批牛羊，或赶到家中宰杀食肉，或赶到市场出售，换来米面养家糊口。待抢来的东西吃完了再去抢。

草原强盗在进行抢劫活动时，一般奉行"兔儿不吃窝边草"的原则，到本部落以外，甚至到外县去抢劫。抢劫的主要对象是过往草地西上西藏，南下四川松藩等地的商队及过往活佛等。每次抢劫多少视自己的力量而行，抢劫牛羊，少则几十头，多则几百头，如自己人多势众，装备精良，就多抢，最多时一次抢劫牛羊达千余头。但草原强盗抢劫有个特点，一般不洗劫一空，打劫过后还给对方留下返回的盘缠和干粮。

草原强盗的抢劫大抵有这样几步：①化整为零，四出打探情况，摸清对方的居住地形、人手及武器装备情况、路程远近及行动路线。②抢劫得手时，一部分人拼命赶牛羊尽快逃离，一部分人员

负责殿后，阻击对方的追捕，如对方及时组织人马追击，就进行激烈的争夺战，抵抗不住，就弃畜而逃。如果双方实力都比较强，争斗常常要持续几小时，往往双方均有伤亡。此外，抢劫行动前必须进行煨桑祭神活动，祈求神灵的保佑。

抢劫成功之后，将大批牛羊马赶到村上，首先宰杀一些牛羊放在火堆上烧，叫"煨红桑"，以此祭神，答谢神灵的保佑，呼号庆祝胜利。其次，宰杀一些牛羊煮手抓肉，大吃二喝一顿，叫做"东毛"，即喜宴。最后将抢来的牛羊按各人出力大小及抢劫时的表现进行分赃。也有的将抢到的牲畜直接赶到数百里以外的市场出售。

牲畜抢来以后，有时被畜主追至村上，如其势力强大，即可将牲畜夺回。有的则告到部落头人那里，若头人惧怕，便严令抢劫者将牲畜如数归还畜主，甚至还要受到头人的严厉处罚。

牧区的土匪和农业区的土匪一样，也有大中小之分，大土匪不仅人多，装备好，而且匪首名声大，就连官府也畏避三分。他们往往与各地大小头人及军政要员结拜把子兄弟，暗中勾结，互相利用。匪首一般不直接参加抢劫活动，如果其部下抢劫了某部落的牲畜，而部落头人与他有拜把子关系，只要给他带个话或写封信，他便通知其部下将抢来的牲畜归还对方。在黄南地区最大的土匪首领有泽库县麦秀部落的龙果尔久赛，夏德日部落的公保加知妥，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境的有尼什江东尕（达参部落人）、索南卜热海（外斯部落人）、超洛（外斯部落人）、宗吾加洛（今循化县刚察部落人）、阿卜江斗宁（今甘肃省玛曲县右然部落人）。这些人在当地和省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

为搞清牧区土匪的情况，笔者于 1987 年 8 月，专程到泽库县夏德日乡夏德日村采访了原土匪首领公保加知妥，他已是 82 岁高龄了，中等身材，身体很壮实，耳目灵敏，谈话自如。他的老伴前两年去世，家中有儿子、儿媳和孙子，日子过得很幸福。笔者说明来意之后，他毫不隐讳地谈了他解放前从事土匪活动的情况。

公保加知妥说："我从16岁上开始从事抢劫为生的土匪活动，是河曲草原上较有名的匪首之一。"当我问到当土匪的主要原因时，他说："土匪也不是好当的，弄不好是要送命的，看看有吃有喝的人谁愿去当土匪啊！解放前当土匪的人十有八九是穷得没办法才冒险去干那种事的。当时我家6口人，只有3头牛，3匹马，全家几口人单靠这么几头牲畜是没办法生活的。"

当我问到当强盗有什么规矩时，公保加知妥说：天底下干那一行的都有一套规矩，当强盗的也有一套规矩。每次行动前，先进行煨桑祭神活动，全体成员双膝跪在地上，呼唤泽库草原上的山神，妥保久期木即十三位高山之神，祈求众神保佑此行抢劫成功。呼唤山神时有两句口号是"打富人心要狠"和"打人先打马"。每次行动的去向要看桑烟而定，如果桑烟向南流动，就到南边去行抢，因为这是山神所指引的方向，如果桑烟直冲向天空或顺煨桑台倒流，说明桑还没有煨好，就继续加大火力直至桑烟向一个方向流去才决定去向。临行前要由"极洪"即匪首作组织布署，对神灵发誓，其誓词大意是：不叛变，不出卖朋友，不贪生怕死，不占便宜，要统一行动，绝对听从指挥。武器也要合理搭配，每二人中有一匹备用马，马必须力大跑得快，如果有一个人的马被打伤或跑乏了，就立即换上备用马。带灶具和帐房也都有分工。

首领的产生。首领一般由大家推举有组织能力、胆子大、有威望、有经验的人来担任。首领若办事不公、分赃不均或无能，大家有权罢免，甚至开除出去，不许他再参加抢劫活动。

报酬的分配。每一个土匪组织都有一套制度，总的分配原则是根据各人抢劫时的表现。具体办法是："除每人平均分一份外，给带了备用马的人多分半份，给带了帐房、灶具的人多分半份或1/3，表现特别勇敢或负了伤的多分半份，首领可多分半份。如果有人私分或暗中贪污，就被开除并不许他再参加土匪活动。

抢劫对象主要是大小牧主，有时也不分穷富，从一个部落的牛

羊中抢上一大群就跑。抢牧主的牛羊时，有时将主人抓住作人质，把他们带出其势力范围，再将他们狠狠教训一顿才放回，使他们不敢反抗。过往草地的商队也是抢劫的主要对象。当探听到有商队经过某地时，选择人烟稀少，道路险要之处，事先埋伏，待商队进入埋伏圈，再仔细观察，如果对方势力不大，就出其不意地冲杀出去，强攻猛打，呐喊呼号，抢其一部或大部分驮牛就跑，同时留几个人作断后掩护。

当笔者问及抢劫是否有失败时，公保加知妥说：干什么事都有失败的时候，当强盗搞抢劫，如虎口夺羊，干的是不义之事，失败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带领一帮人马去甘南欧拉部落抢劫，抢劫对象是当地一户有名的大牧主，他一家有父子5个，都很强悍，有4条步枪，还有一帮干活的伙计。待我们晚上抢了牛羊，他们父子几人和部落的邻居一大帮骑马带枪紧追上来，我们边打边跑。经过几小时的争夺战，他们打死了我们的3个伙伴，另有几个伙伴的马被打伤了，牛羊也被惊吓得四处奔跑。我见势不妙，只好将得手的1000多头牲畜放弃，才逃出来。

牧区有些地方的抢劫情况比较复杂。如有些地方的抢劫与两部落之间为争占草场世代打冤家有关系，有些部落之间的抢劫与抢亲发生的婚姻纠纷有关系，有些地方以抢劫来报复对方的抢劫。有时全部落男子倾巢而出，多达数百人，将对方的牛羊一抢而空。被抢者不服，就组织更大规模的人马去夺回被抢的牛羊，双方厮杀不休，仇越结越深，械斗延续几十年以至上百年，成为世代冤家，对民族团结和畜牧业生产破坏性很大。解放前我们索乃亥部落有500多户牧民，大部分人进行过抢劫活动，有一年全部落出动抢劫邻近的蒙古人。富人出钱出马，穷人出人出力，组成一支数百人的队伍去抢人家的牲畜，互相打死许多人，结成仇恨深重的冤家，连年械斗不止。解放后经过共产党、人民政府的调解、教育，才逐渐和好。

笔者问到他的社交活动时，他很得意地说：我们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关系网：我与远近的头人、政府官员、寺院大小活佛都有些关系。有的是朋友关系，有的是结拜弟兄，有的是亲戚，我先后结拜过82个弟兄，大部分是远近部落的头人，其中有果洛大头人康格·索洛，有甘南的土皇帝黄正清，有贵德县的浪拉大千户杭谦，泽库和日大头人哇加是我的妹夫，关系涉及甘青两省七八个县。关系广，耳目灵，势力大。我有事去找他们，他们有事也来找我，能帮的就帮，能办的就办。如我的部下抢了他们部落的牛羊，只要他们给我打个招呼，我给部下们说一声就归还了；他们的人抢了我们部落的牛羊，我给他们带个话，他们也会想办法归还的，当然不可能全部归还，宰杀了的就没办法归还。总之，我们之间是很讲信用，很给面子的。

我20岁那年正月，到同仁隆务大寺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祈愿大法会"默兰木"。有一天浪拉大千户杭谦带着一把子手枪自卫队来找我，他很威风，初见时有些害怕。他一见面就说："你这个人很有名，也很能干，我们结拜个兄弟吧！"他说我很有名、很能干，是有个原因的。以前我有一匹特别好的马和一枝手枪，被果洛尕玉部落的孽什江知合玛偷去了，我向省主席马步芳告了他，马步芳托人带话训了他一顿，他就把马和枪乖乖地还了我。从那以后我的名声就更大了。浪拉千户对此早有所闻，所以他才承认我有名，有本事，才主动和我结拜弟兄。我们结拜时，双方面对面、头顶头，发誓说："大佛爷在上，我们二人情投意合，愿结拜为义兄弟，上了一个山头上坐，下了一个坑里坐，我的心交给了你，你的心交给了我，愿佛爷保佑我们百事顺利，万事吉祥如意。"发誓以后，他对我说："我有3个儿子，省主席马步芳是我的义兄，我什么也不怕，你以后抢到牛马羊交给我，我帮你出卖，我们互相帮助到老，永不变心！"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榆林匪患二十年

史书博

民国3年（1914年）高硕秀匪众800多人，经内蒙古伊克昭盟窜入陕北榆林北乡罗家湾、乌兔采当等地，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百姓叫苦连天。陕北观察使崔叠生派榆林巡防十六队副管带余天祥领兵前往追剿，被围于白河庙湾小山之上。天祥白日未敢出击，俟到夜晚，派挑长拓占鳌带兵3人及号目1人，潜至白河庙外，打死匪岗哨2人，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匪营发起猛攻。匪众梦中惊醒，乱作一团，遗尸四五十具，溃散逃遁。

民国4年（1915年）旧历三月间，山西岢岚县土匪刘三林子等300多人渡过黄河，骚扰沿边人民，危及神木官碱局的安全。栓林道尹吴敬之派余天祥带兵100人前往防守。余天祥到神木后住在官碱局附近商号瑞隆昌、福盛源内。并约杭锦旗队长莽肯，追刘三林子于府谷河畔。天祥见河东山西瓦棠地势险要，即率队过河埋伏，匪军渡河来犯，激战后活捉匪18人，打死30多人，随将所捉土匪在府谷枭首示众。后匪又侵扰杭锦旗，天祥与该旗队长莽肯协力夹击，活捉刘三林子并将其斩首。

民国5年（1916年）初，刘道尹国栋派警备队队长余天祥带兵40人，去绥德、米脂、吴堡、清涧等县禁烟，行至清涧附近，遇盐厘马巡报告说："郭坚率众千余人由南北犯，不时就到清涧。"余天祥即将军队扎于西山之上。清涧县长请军队进城协助守卫，天祥认为清涧东西两山对峙，城位于两山之间，不易防守，且敌众

我寡，力弱难御，于是退至绥德二郎山埋伏。清涧被陷后，郭部半夜进犯绥德，被天祥伏兵截击，死伤百余人。天祥拟继续扼守二郎山凭险拒敌，而粮弹不济，派人去绥德城求助，绥德县长未给弹药，只送蒸馍、米汤劳军。天祥无奈退兵40里，绥德遂失。郭坚复于旧历四月十三日由绥德西窜，侦知驻定边陆建章的部下索会东专做烟土生意，在安边存很多大烟，于是直逼安边，欲劫索部烟土。索紧闭城门，精选强壮市民600名守城，并急请刘国栋派兵支援，刘派团长商震率全团日夜兼程前往解围，在商震和索会东的夹击下，郭坚始溃退。

同年旧历五月土匪芦台奎率匪步骑千余，由伊盟窜犯沿边一带，先向榆林五道河子、榆林东郊窜扰，榆林军民上城防守，匪未能得逞，后又西窜，占据定边县城，抢劫而去。是年腊月复至，县城又遭抢劫，继而围攻安边，勒款议和。芦派郑士杰、诸国定进城商谈；当时退守安边的靖边团队队长武发奎，受郑、褚之贿银1300两，他在给芦匪送物之机大开城门，使芦匪驱兵直入，安边城陷于匪手。芦匪进城后，一面威胁商会勒索白银1.2万两，一面在民间大逞兽性，到处奸淫掳掠，全城遭受了7日7夜的劫掠。

刘道尹是陆建章外甥，安福系失败后，刘惧牵连，于同年旧历五月初六月晚弃职东去。初七日中午他所带之陆军（商震为团长）突然哗变，打死营长刘博录，大肆抢劫商号货物钱财，及边商、磨房的骡马，下午经商会凑交银洋4000元始离开榆林城。

同年六月黄龙山悍匪王廷桂（绰号穿山甲）等步骑600余人，被省稽查员李振甲（字槐光）招抚，意图来榆安置。但匪众野心难驯，沿途多有骚扰，因此榆林早有戒备。官绅等虑其生变，出城款待于南关永远店。王匪等竟将代理道尹张立德、警备营长裴尼臣、营副余天祥、团副高镇五、县长王叔度、士绅白中雄等全部扣留，提出：要快枪200支，军衣600套，大米10石，银洋1

[illegible]，如不照付，即行破城。当晚半夜，余天祥托农民给城内送[illegible]云："王廷桂已备云梯准备攻城，希加强防守，勿以我等被羁[illegible]"至六月七日晨，王廷桂见官绅未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便[illegible]镇孤、余天祥、白中雄等3人捆绑起来，在南关外巡回示威。

[illegible]城内警备营四连连长拓占鳌带18人，越西城从黑树湾过河，[illegible]于演武厅西旁麦地，见王廷桂正杀差人谢有生。拓占鳌等开[illegible]击，南城楼守兵相应连放九节雷大炮，炮弹击中南关阁楼北[illegible]。王廷桂乘马逃跑，被拓占鳌等追至官炭窑附近击毙，枭首悬[illegible]城示众。拓占鳌等抖擞精神，继续清剿余匪，兵在三岔湾、刘[illegible]寨，突接城内调令云："匪来攻城，速回防守。"占鳌等即速回城，方知是一场虚惊。复追匪于归德堡饭馆门前，匪已远遁，余天祥、高镇武2人惨遭杀害；又至永远店附近，发现乡民黄小库、姬毡匠、王某（名字不详）3人，被匪活埋。城内军民闻讯，莫不哀惜。官绅等为余、高2君呈请议恤，蒙准给恤金，在新明楼底立碑纪念，并在东山刘公祠内设立牌位。

民国11年（1922年）包头滩上的土匪马二营骚扰沿边，榆林北乡的逃难农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拥进城里来，晚上在大街上睡觉。后经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收编，驻在定边、安边、宁条等地。驻防安边、宁条梁的部属在任三海子的策动下，发生兵变，枪杀了井岳秀侄子井清泉，向安边商会勒银6000两，继迫士绅白银4000两，复闭城抢劫3日而去。

民国20年（1931年）三月，绥远省河套地区的地主武装王英部属杨猴小，率众3000余人流窜于陕北沿边各县及榆林西北乡，到处抢劫掳掠。民国22年（1933年）杨匪被孙殿英收编为师长，随孙军进攻宁夏，被宁军击溃，杨匪率残部回窜察、绥，被察哈尔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收编为骑兵独立团。但杨匪性难改，复又叛变，流窜于绥陕边境，蹂躏人民。民国23年（1934年），邹青云率匪400余人，脱离杨匪，为国民党驻榆暂编十八师师长井

岳秀收编为骑兵第二营。民国24年（1935年）二月，杨匪分股流窜沿边各地，一股流窜在榆林西北蒙汉边境的那拉堡、惶惚兔一带，一股流窜在榆林东乡双山、建安一带，一股流窜南乡归德堡一带，奸淫掳掠，四乡民众纷纷逃难进城。一时谣言四起，说匪要攻城，因之人心惶惶，年轻妇女面擦黑烟身穿破旧衣裳到处藏身。井岳秀也很震惊，派以前收抚与匪有关系的赵有禄前往收编，杨匪拒不接收，遂派二五八旅旅长刘滋庶、手枪队长李笃祜、二五六旅五一一团左世允等人带队分路进剿。杨匪逃至靖边九旦湾一带，追兵乘夜袭击，匪众死伤很多，仍顽固抗拒，继续逃窜。追兵跟踪尾追，使匪无喘息机会，至靖边杨桥畔将杨匪击毙。群匪俯首投降，除匪部陈秉义带二三百人逃走外，（不久陈秉义亦向井岳秀投降，改编为骑兵第三营），余匪全部开到榆林改编，收缴枪支千余、马匹千余。至此，流窜在察、绥、宁、陕数省，为害数年的最大匪患，得到平息。

（陕西省榆林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吴忠匪患略谈

张山林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原为灵武和金积两县的一部分。地处黄河东岸，银川平原南部，是银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历史上有“水旱码头”、“小上海”之称。说起匪患，可上溯至本世纪20年代末。1928年10月2日，宁夏南部山区土匪头子杨自福（绰号杨老二）率匪众1000多人，明火执仗，攻打吴忠，初战被当地守军阻于城东南涝河桥，双方对峙，经昼夜激战，守军退至吴忠城堡据守。杨匪带领众匪扰窜四乡，抢劫农民骡马财物。搜索民间防匪用的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和粮食，以装备土匪，准备大肆围攻吴忠城堡。双方以秦渠对垒。土匪先用火攻，烧毁东大门，企图打通进城之道，但久攻未果，因为守军与市民百姓，同仇敌忾，修筑加固防御工事，用土坯堵砌城门。杨匪见硬攻力量不足，便采取笼络伙并办法，勾结当地土匪马鸿义、马建升、马树华等匪首，强行攻城。守军见势不妙，撤兵30余里，退守灵武县城。土匪入吴忠城，掠抢三日，烧杀奸淫。这次共有50余家商号被抢，烧毁民房、庙宇、官府等建筑不计其数，伤亡平民百姓甚多。匪患劫难给人们留下难以弥合的伤痕。

旧社会兵匪为伍，狼狈为奸。1929年5月甘肃河州马仲英攻占宁夏城，被国民军吉鸿昌部击溃。马部退到内蒙古磴口一带，因该地区属于三盛公教堂，系罗马教廷内蒙教区管辖，享有一切特权。马仲英在吉部打击和军饷无着落的境况下，内部互相倾轧，1

万余众分为6股，各自为政，变兵为匪，其中一股由旅长韩进录率3000人扰乱灵武，一股由师长马存良率数百人驻金积。吴忠市正是这两县的各一部分，遭受其害非常严重。马存良盘踞金积时，烧杀抢劫，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农民奋起，以长矛、菜刀、铁锹、锄头等为武器与马存良匪部展开殊死斗争，迫使马部数百匪众向甘肃逃遁。但匪患并未因此而间断。

新中国建立初期，不甘心灭亡的反动统治阶级，垂死挣扎，土匪武装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相勾结，十分猖獗。新成立的人民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剿匪稳定社会秩序。当时打击的匪股有：1950年2月6日生擒匪首马绍武，逮捕土匪周满堂、马学武、丁自明、马登云、李生云、高长春等28名土匪；1950年9月23日捉拿匪首马吉武；1950年11月10日又破获匪案21起，缴获短枪3支、长枪22支、子弹460发。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3月1日处决土匪头子闫海山。10月召开公审大会，将作恶多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王生林、马三喜、黄占海、马维成、马浪、吴国英、马良英、何永忠、吴金玉、马兴红、马正和等11名匪首处以极刑。

现将三起重大反革命土匪案分述如下：

（一）1950年3月1日，以前马鸿逵暂九师团长、后升任师长的马福元为首，伙同旧政权团长余正朝，勾结匪首勉进、张印奇、黄守信、王连璧、强荣、曹景轲、李保树、马树礼等，与贺兰山区匪首郭永胜（绰号郭栓子）、东山匪首张庭芝、南部山区匪首周富财等土匪武装相呼应，聚匪数百，配备枪支马匹预谋暴乱。他们窜扰在吴忠、金积、灵武一带，抢劫银行，袭击人民政府、政法机关，妄图推翻我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镇反期间即破获此案，匪首马福元、余正朝、张印奇、勉进等20多名罪犯落网，分别处以极刑和徒刑。

(二)1951年4月，混入我公安机关当侦察员的中统特务马兴国，暗中与土匪劳保春、萧铭、刘祥等人勾结，由匪首张海录接济，纠集匪众20余人，进行抢劫。被我人民政府破获，捉拿归案，马犯被处以死刑。

(三)匪首张海禄，历任国民党军班、连、营、团长等职，1939年退役，在中宁县开大烟馆，1950年2月弃业为匪。张犯从匪后，积极联络各方土匪组织，购买与抢劫枪支弹药，招募地痞流氓，不长时间便聚起匪徒170余人，分编为4个小队。在同心、中宁等地大肆进行抢劫活动，与新生政权作对。先后打死我人民解放军战士8人，打伤5人。张匪窜入吴忠城，勾结以马福元、余正朝为首的反革命组织和马兴国敌特组织，密谋暴乱，杀害我干部，袭击公安机关，企图推翻人民政权。1950年6月张匪武装被我剿匪部队独一师追击于同心南瓦窑沟，毙敌匪首张海禄等13人，64名匪徒投降，共缴枪122支。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镇反运动中，吴忠地区歼灭土匪15股，200余人，收缴长枪127支，短枪29支，冲锋枪1支，轻机枪2挺，各种子弹5281发。基本上肃清了土匪武装和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社会秩序得以稳定。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喀什三十年代的匪患

夏维荣

1935 年 5 月，马仲英部下马占仓攻下喀什噶尔汉城（今疏勒县），柯尔克孜族武装部队首领乌斯满攻入回城（今喀什市）不久，有“和田王”之称的伊敏与沙比提大毛拉的一部分武装部队也开往喀什。

当时聚集在喀什的各路人马，成份复杂，用心各异。马占仓是坚决执行马仲英命令的，他们宁愿与喀什地方官员马绍武合作，也决不容忍泛土耳其主义者割据喀什的企图得逞。但是，刚刚进入喀什的铁木耳和乌斯满都拥有重兵。乌斯满自称总司令兼师长，铁木耳自称总指挥，他们都想做喀什王。至于从和田方面来的伊敏与沙比提大毛拉及地方的泛土耳其主义者则想把乌斯满、铁木耳拉到自己一边，消灭马占仓，进一步分裂新疆，成立独立王国。

英国侨民胡南木哈趁此混乱之际，到处招兵买马，纠集了大批的地方败类，自立山头，充当土匪营长，肆无忌惮地抢掠民众财物和地方政府的武器，然后在 7 月间流窜到叶尔羌（今莎车县）一带。英国驻叶尔羌县商总阿不都沙米妄图混水摸鱼，暗中指示他率领二三百匪兵，趁夏收之际去攻打莎车县城。胡南木哈攻进城内，抢掠了大量金银和文物，陆续卖给印度商人，印商将财宝和文物又转送到英国商总阿不都沙米的手里。英国商总还向他们提供枪支弹药。1936 年，胡南木哈卖给印商的黄金总数已达 800 两，据他女儿在一份交待材料中说：“现在家中有银元 600 块，黄金 900 两，长短枪支数箱，不知父亲藏在何处。”

据英吉沙县公安局旧档案记录，1936 年，以胡南木哈为首的匪徒扩充到 500 多人，遍布喀什各县，到处发生抢劫杀人案，弄得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在同一份记录中说："窝都隆发现匪徒 100 余人，强迫群众供给他们驴马、牛羊、粮食和女人，不遵命者立即拘押，轻者受到皮鞭抽打之苦，重者杀头。"

1936 年 4 月 20 日，铁列克其克山 250 余名匪徒进攻克木勒，抢掠牧民。英吉沙警察局得到情报后，立即派出警察第三中队，由郭天泰队长率领，会同骑兵，激战 4 小时，将这股匪徒包围，打死 15 人，俘虏 120 余人，缴获捷克式轻机枪 2 挺，七九步枪 80 支，战马 60 匹。

稍后，一股匪徒进驻窝都隆，并切断了和外地联系的交通要道。匪徒还征集了大批民工建筑营房，构筑工事，想进行长期抵抗。又派出匪徒前往叶城、莎车等地与溃散的匪徒联系。

这时，莎车匪首艾克木带领的 300 人撤到霍拉浦卡群西各支点，残匪六七百人从阿拉他什河口溃败，政府军出动 1000 多人增援警察。在四面夹攻下，匪徒企图退往黑孜他哈乡与当地乡长艾买提会合。

与此同时，在博司塘铁列克的阿牙尔提地方的 200 名匪徒，由色依提伯克阿巴汗、胡大牙、毛拉土米等人带领，其中 50 人配有长短枪与马匹，在布伦口一带抢劫民众。因匪徒无粮，后经做劝说动员工作被瓦解。

1938 年 1 月初，盛世才派人在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成立边卡大队，调新兵大队政委胡鉴任中校大队长。大队共 500 余人，由苏联教官任教。派中共党员周纯麟、曾玉良到喀什三十八团，赵海丰到叶城四十一团，谭庆荣到和田骑兵团工作，经多方努力，才清除了喀什一带匪患，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南疆的势力，稳定了南疆的局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川陕边境的山大王——王三春

王永清

解放前，川陕边境有一个盘踞巴山20余年的大土匪王三春。他活动在陕西镇巴等川陕边界20多个县，极盛时期，武装力量达4个团，5000余人。王三春曾和陕军孙蔚如、四川军阀郑启和、田颂尧、刘存厚、刘汀等争过地盘打过仗，接受过招安，当过陕军委任的“川陕边游击司令”和四川“剿总”司令，还接受过刘湘委任的“城口游击司令”；也曾和红四方面军打过仗，也讲过妥协；他还赶走过大土匪陈德三在镇巴的统治，计擒过大土匪罗玉成；在盘踞镇巴期间，曾“委任”许芝田当镇巴县长；设立税收局统一收税，自收自出不上交；组建铜元局铸造铜元和印布币，在川陕边境发行使用；在镇巴城修建“泾洋桥”等群众福利事业。他在经济上自成一体，军事上独霸一方，政治上别树一帜，在国民党军收编问题上坚持“受招不受编”，“受调不受编”的原则。他以山大王起家，游离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最终于1939年12月31日上午7时以结伙抢劫、啸聚山泽、抗拒官兵等罪名被国民党枪决于天水行营。

铤而走险

王三春，本名王汝仁，乳名仁娃子。1884年生于四川平昌（原巴州江口镇）长垭一户农民家中。父亲早亡，母亲杨氏，是个

跛子。王三春自幼读书，记忆力很强，一年读完“四书”，还念了很多小本书籍。父亲死后，无力再读，便跟着母亲种地操持家务。王三春从小性情倔强好胜，母亲身残又管教无方；又处在痞痍满目、世俗糜烂、奸掠抄杀、民不聊生的乱世，使其个性更加怪僻。

1904 年，王三春 20 岁时成了家，妻杨氏系农家妇女，老实本分。王三春此时还无他想，仅仅是为吃饱饭而筹谋。但当时世道，弱肉强食，虎狼当道，哪里有他们这样的孤儿寡母生存的余地。不久，因争田地和山林树木与族长王宗林斗殴。王宗林能文能武，口蜜腹剑，为一族之长，又恶霸一方，敲诈勒索，霸田霸产，无人敢说半个不字，王三春偏不吃这一套，挺起胸膛，公开与王宗林骂嘴打架、提刀动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官府控告！”王三春说：“在这个世道，与其求官，不如求我自己下个狠心。”事过不久，他和蓑衣匠王汝友一起走了。走之前他把王宗林的一间茅草房放火烧了，边烧边鼓起一双铜铃大的红眼睛，说道：“这是放火，老子十年后回来还要杀人呢！”说罢上了巴山，进了老林。

盘踞巴山

王三春上巴山，一路赌钱吃烟，交朋结友，聚集了不少伙计，于是商量决定弄枪造反，当草头王。他和王汝友等数十个伙计们，为了获得枪枝，经常埋伏在密林中观察行人，以便相机行事。有一天忽遇土匪罗玉成的几个兄弟迎面走来，王三春等看清以后，每个人拿根棒子，乘其不备，一拥而上，把几个零散土匪打倒在地，然后劫枪而走，但几支枪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他们东奔西走，又得知土兴场的民团有枪 50 多支，于是采取深夜“以大火炮为枪”的疑兵之计，在这个小村的两头接连放了几颗大火炮之后，王三春站在街头，几声口哨一吹，然后大声吼道：“兄弟们，不要先动武，我先去与团总交涉交涉再说。”这话是说给团总听的。团总原

先以为自己势力强大，可一听火炮声，就惊恐万分；当听说有人来“交涉”，真是求之不得，立即出面，愿意和平解决，便全部交枪，以图保全性命。于是王三春兵不血刃，获得50多支枪。

1914年起，王三春就在大小通江河及大巴山一带山区，坐青山，把坳口，掌红吃黑，坐地拉肥。这时他还主张“打富济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抢富不抢贫，抢远不抢近”。他常说：“饿死的老虎不吃子”，“兔子不吃窝边草”。

王三春在大巴山流落几年，发现通江小河的朱、陈二坝盛产银耳，遂想把通江银耳全部吞噬口中，数次与巴中军阀郑启和争利，但终因力量单薄不得不转移到陕西镇巴一带。1929年，王三春来到陕西镇巴渔渡坝，抢了镇巴南区区长王应钦的几十支枪。至此，他已有200多支枪，五六百人，并和势力相当的土匪陈德三互相勾结一气。

1929年，四川军阀刘存厚垂涎陕南，派其部下廖雨辰到镇巴争抢防地。王三春见廖势力强大，主动让开。1930年，廖雨辰被冯玉祥、王志远等部队打垮后，已接受陕军招安的土匪陈德三回到镇巴驻守。不久，王三春聚集千余人马，将陈赶走，从此他就坐镇镇巴，收罗旧部，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设税局统一税收，自收自支不上交；设铜元局、制币厂，实行财政独立；并设立军械处，修造枪支弹药。据老年人回忆，王三春印的票子是布质石印的，印得很好。他造的铜元比一般铜元小，边上印有“陕西省镇巴县”等字样，中间有圆圈，里面有个五角星，当时流通很广。

匪性难改

王三春稳定镇巴后，一面招兵买马，一面认真操练，大有蓄积力量，坐地称王之势。《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4月19日三版报道：“镇巴王三春前用计诱扑之匪首罗玉成，被赵寿山司令以罗

匪恶贯满盈，民众切齿为由，派员提押来汉，日后可将明正典刑”。赵寿山时任三十八军旅长兼西乡警备司令。不久，王三春即接受三十八军招安，并被委任为川陕边游击司令，驻防镇巴。此时，王三春势力发展到鼎盛时期，有 4 个团的编制，5000 余人。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也派出陈仁三以参谋身份深入该部，发展党的组织。

王三春接受陕军收编之时，正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夕。1933 年 9 月下旬，红军与王三春相遇于黑虎山等地，王不敢交战退走。10 月，红军向东推进，迅速拿下宣汉、达县等城市。刘存厚的三路司令廖雨辰深感大势已去，于 10 月 17 日逃出万源县境，使万源县城成为空城。王三春闻讯，于 18 日从平乐、延厂等地出发，一夜之间进兵万源，意图据为己有。红军闻讯，21 日派兵入城，发动群众，发布安民告示。王三春见势，未敢轻举妄动，一夜之间，又急奔大竹河。当时红军主力已经东进，对付刘湘、王陵基的六路围攻，没有对王采取行动。王在大竹河稍事停留，即派人到城口逼走刘存厚委任的邓占荣知事兼司令。10 月 31 日将人马辎重全部移驻城口和大竹河等地，并极力避免与红军作战。红军亦未穷追猛击。彼此相安无事，先后将近半年。

王三春素以奸掠烧杀著称，据老年人回忆，有以下事实：

有一天，王三春由警卫连长王普益打的旗子忽然倒了，按土匪规矩，倒旗就要杀人。于是王三春命令部下，在村里抓来一个老乡杀了，然后才把旗子升起来。

又有一次，王三春与王普益一起饮酒取乐，王三春说：“有猜拳饮酒，吃菜饮酒，你见过杀人饮酒么？”王普益说：“没见过。”王三春说：“我叫你见见。”于是命令左右杀一个人，然后哈哈大笑地饮酒。

有一年，王三春把宁强县陈百万的女儿抓来了，要陈百万办 500 条枪、3000 银元、1500 套军服来赎取女儿。等陈百万办齐来

取人时，陈的女儿已被埋在官山很久了。

还有一次，抓着了刘财东的女儿，要她陪睡。一月之后，刘女开玩笑说："你们这些'棒老二'硬是不讲理哟！"王听到这话，一刀将刘杀了。

他坐镇镇巴时，对于其他土匪是毫不容情的，他想出了一个"医治"土匪的刑罚，叫"坐椿"。就是把一根端正的小树腰折后，把树桩削得尖尖的，然后把土匪剥光衣服，把尖桩对准肛门，用力插进人的五脏六腑。人们当时无不害怕此种非刑。

王三春住城口时，共有4个团。一团团长苟伯当，二团团长王和清，三团团长辜伦章，四团团长邓芝芳。邓芝芳是他第三房妻子，很能作战，会使双枪。二团团长王和清经常在外打仗，疲惫不堪。有天晚上回家入睡后，突遇炊事员把煤油桶打倒在地而且着了火。王的妻子惊醒，三次叫王和清起床逃跑，但王沉睡不起，反而大发脾气说："再来打扰，我枪毙你。"是时火已封门，王的妻子痛哭不已，不忍独自一个逃走，转身又倒卧床上，搂抱着王和清，同时让火烧死。苟伯当团的战斗力很强，军队的纪律也较好。他在城口时，常给老百姓打招呼："你们的姑娘、大姐少出来为好，我们的部队有些人不讲理，出了事情不好办。"驻高头坝的一个连长，因为强奸民女被告发了，苟伯当下令在城口河坝枪决了那个连长。苟伯当与陈仁三相处很好，据王三春女儿王金兰回忆说："王三春在城口，成都刘湘通知他去领枪支弹药，他派了600人到成都，由苟团长带队。苟在返回途中和红军联络上了，然后给王三春写信，劝他与红军合作。后因暴露机密，被刘湘知道了，就派兵打王三春。王三春只得从城口退到湖北，转而又到陕西。"

1933年冬，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对红四方面军所在的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1934年1月22日，刘湘、王陵基委任陈厚坤为四川"剿总"；委任王三春为第一纵队长，意欲笼络人心。2

月1日，陈厚坤调王三春部同行，由城口经万源东部固军坝方向，向万源县城进攻。5月4日，陈、王等配合万源地方反动民团和神团曾一度攻下万源县城，向望星观、关坝方向推进，骚扰红军后方。红军出于通江方面战事紧急，以调虎离山计，摆出越巫溪、过万县与贺龙部会合的架势。7月中旬，王三春、王会文等为了保全城口，迂回返回，与红三十三军激战于冉家坝。正激战中，王三春背后忽然开来刘湘部范华聪旅和佟、杨二团，正好把王三春夹在红军与范军中间。此时王三春发觉刘湘借刀杀人，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的实力，以收"渔人之利"。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从各方面获得情报，立即指示红三十三军政治部作王三春的工作，争取王三春不战不和，就地驻守持中立态度。红三十三军政治部得令，派政工人员魏传统与王三春代表进行密谈，后来达成协议，彼此互通有无，红军给王三春菜油、草帽等物；王三春送来了一些驳壳枪和子弹。此后一段时间，红军在城口方面战事基本停止，未发生过大的战斗，但王三春等匪性难改，不愿投向革命营垒中来，终于被国民党消灭了。

穷途末路

王三春和红军的关系，很快被刘湘知道了。1934年10月下旬，刘湘在"六路围攻"遭到惨败后，就下令川陕军团围剿王三春部。11月10日，王从城口向陕西方向撤退，到大界岭又被陕军击败。12月11日撤回城口，又向巫溪前进。在此期间，王三春以3000之众，在巫溪与刘湘军队和民团激战20余日。1934年12月17日《新蜀报》以"王三春在巫溪与军团激战"为题报道：王三春到巫溪后，与刘焕章、齐明德、方海全等土匪合股。驻万刘湘部队于9日到达，进行分剿。

1934年12月31日《新蜀报》又以"巫溪匪肃清，刘焕章投

降，王三春残部溃退陕鄂”为题报道：目前汤家坝股匪刘焕章、王三春等遭痛剿后，刘有人枪千余，听候招编，王部七八百人，分散行动，现又窜鄂陕境内，溃不成军。此时王三春的主力团长苟伯当，接受了刘湘收编，脱离了王。

王三春逃到湖北竹溪县向坝场后，将两个女儿寄养在竹溪一个姓范的保长家里，又收罗残部，带领妻妾向陕南转移。1935 年 3 月 20 日《新蜀报》报道：王三春匪部退三元坝。此时犹有 700 余人，400 条枪。19 日已抵长田坝。

三元坝和长田坝等地，均在陕西镇巴南部，王回老巢，四处进行活动，又养成羽翼。1936 年 3 月，他返回镇巴攻打县城。时镇巴县城有保安队，人枪各四五百，由杨均率领。县长马志昆命令群众守城，并宣誓：“决心与城共存亡”。王三春人仅 1000，枪约 300。但他虚张声势，号称 3000 人马，给城里人写信道：“你们把马志昆、周瑜生二人之妻和黄一甲母子捉住，开城则放，否则攻城杀人”。此信本来是虚张声势的，王三春找人送去，随即打算退兵。那知马志昆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接到王三春的信，生怕别人暗算，带起两个中队人马悄悄走了。王三春正要退兵，但又发现马志昆逃跑了，于是马上折身转回，拼命攻城。将城攻下后，怒气大发，一把火把县城烧个净光。蒋介石得此消息后，急派十九路军李纪南部将王赶走。王在川陕边境，人地两熟，时东时西。1937 年春节，王派部下数十人伪装乞丐，在靠近镇巴的四川万源县城侦察情况。1 月 12 日，数百名匪徒从四面八方拥进县城，抢枪 100 多支。王三春重回镇巴后，奸掠烧杀故态复萌，群众恨之入骨。王见失去民心，不得已率残部东下安康。到安康后，国民党命令已经接受收编的苟伯当团从四川去招编王的队伍，王仍坚持“受调不受编”的原则，不愿投降。可是此时，其小老婆周云秀与其指挥官田希贞早已勾搭很深，极想摆脱王。苟团来不久，周、田即带数百人投苟。王三春势孤力弱，被迫渡过

汉江，到宁陕、佛坪及秦岭山地进行活动。不久即遭国民党一个师的围攻。1939年，王三春因部队粮食困难，不得不化整为零，进行分散活动。他本人和其妻邓芝芳一起，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在搜查中，他令邓芝芳乔装外逃，不意镶有金牙的邓芝芳很快被发觉。1939年4月4日，王三春、邓芝芳被捕获。12月31日经蒋介石批准，枪决于天水行营。流窜川陕边境20余年的山大王，到此了结。

（陕西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巨匪袁刚的一生

李庆东

解放前夕的陕南，是一个兵匪横行的地方。仅西乡一县，即常有驻军一个团和土匪十余股，土匪、军阀和土劣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史书记载："惟西乡自民国十余年来，或为匪贼骚扰，或为军队驻扎，地方多故，秩序不宁。"（见姚懿子《西乡胜迹》一书）。其时，兵匪之祸，尤以匪为甚。占据川陕交界的西乡西南大河坝高洞子、横行 10 余年的袁刚匪部，就是当地一股著名的土匪。

一

袁刚，又名育成，四川省宣汉县鲵池苏家沟人。1888 年 11 月 18 日，生于当地一户贫苦农民家中。

袁刚幼年丧父，靠母亲一手抚养成人。及长，事母至孝，被当地人称为"袁孝子"。从 16 岁起，为了养家糊口，袁刚开始在宣汉一带为有钱人帮工、赶脚。因他性格刚强，好抱打不平，在同伴中有一定威信。

1924 年，宣汉大旱，秋无收，第二年春，地主派人挨门逼债，吊打袁刚老母，袁刚一怒之下杀死差人，藏匿深山老林。他被当地政府通缉捕拿甚急，无处容身，遂南下万县，入国民革命军二十军杨森部当兵，他先为号兵，后升班长，逐渐在旧军队中站稳

了脚跟。他虽不识字，但长期在社会上厮混，故谙熟人事世故，善于谋断。当时，军阀队伍中政出多门，尔虞我诈。袁刚见此腐败现象，知不是久居之地，于是暗中组织小团体，以图日后自卫。从这年起，他先后联络了丁勋轩（又名继轩，四川巫山县人）、万炳成（四川大足县人）等8人组织"红帮"，因他年长，被举为大哥。

1928年冬，在一场争权夺利的军阀混战中，杨森的二十军被刘湘的二十一军打败，向川北的广安、渠县、营口一带溃逃。杨森溃部途经宣汉县南场坝时，袁刚认为有机可乘，遂与丁、万等8人携带短枪3只离队，潜回家乡暂避。杨部离开宣汉县境后，袁刚决意独树一帜，占山为王，他考虑到宣汉一带为杨森部防区，又有仇人从中作梗，遂决定入陕西境内活动。不久，袁刚等人经川北的通江县北上到陕川交界的大巴山区，进入陕南西乡县县境，从此开始了打家劫舍的土匪生涯。

二

袁刚等人进入西乡县境后，开始在县城西南的左溪和渔渡坝的神仙洞居住，渔渡坝历来为川陕交通要道之一，往来商旅不绝；神仙洞首当其要冲，是商旅必经之地。袁刚遂在此私设关卡，以保护商旅为名，巧立名目，征收护商、印花、查验等税款。与此同时，他还暗劫富商大户，聚敛财富。未几，即积蓄了相当数量的钱粮物品。他经济宽裕后，就四处购买武器弹药，并广召匪众，企图称霸一方。其时，由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破产地富游手好闲之徒和一些贫苦农民纷纷应召而来。袁刚为了迅速扩充势力，对于来者一律不拒，未及一年，就网罗匪众100多人，在当地有了一定势力。这样，袁刚匪部的基础，就初步形成了。

当时，西乡县西南的土匪，力量最强的莫过盘踞大河坝曲江洞一带的罗玉成匪部。1929年秋，罗匪为了扩充势力，抗拒川陕

驻军围剿，派人前来神仙洞联系。罗封袁刚为先锋大队大队长，丁轩、万炳成为副队长，让其部移驻大河坝高洞子，以为犄角之势；否则，刀兵相见。袁自知羽毛未丰，难以与罗分庭抗礼，又探知高洞子在深山老林，易于自保和发展，遂决定暂时降罗。不久，袁刚率部西上大河坝，占据了天险高洞子。高洞子系大河坝南坪对面半崖上一天然方形石洞，其内宽约 10 米，长约百余米，可容百余人。洞内有一条阴河，长年流水不断，若广蓄粮草，则可长期固守。袁刚及丁、万等匪首，即长住此坐镇指挥，高洞子下有一簸箕形土洞（俗称土洞子，又名黑风洞），亦可容百余人。袁刚让警卫队驻此，扼上山之路，屏障高洞子。上下洞之间，原有一小洞可通，但为了安全，袁刚下令将其堵塞。两洞的交通，仅以一浮梯相连，浮梯从高洞子收吊，每次只容 1 人上下。若有情况，收起浮梯，则插翅难上。两洞通往山下之路，不仅戒备森严，而且崎岖难行，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袁刚占据这一天险后，在南坪以练“神团”为名，继续招兵买马，进一步扩充势力。数月之内，匪众即增加到 200 余人。大河、河西、尤池、骆家坝一带，均成为其势力范围；大巴山川陕交界之处，亦成为其经常活动场所。从此，袁刚遂成为称霸一方的大土匪。

三

1929 年冬，川军田颂尧部某团团长甘国柱领兵围曲江洞、高洞子，企图消灭罗、袁二部。罗、袁二匪首率众依据天险拼命抵抗，川军久攻未能奏效。翌年春，瘟疫流行，川军多病，遂将大部撤离陕境，只留一营军队继续围困。罗、袁匪部被川军久困，弹尽粮绝，处境危急，遂致书镇巴大土匪王三春，约他出动两面夹击川军。是年夏初，王三春致书围洞川军，劝其撤围，不然，则

武力解决。川军孤军深入，唯恐久战不利被歼，连忙撤回川北。5月，罗玉成为了答谢王三春救命之恩，亲自率卫队赴镇巴见王。谁知刚至镇巴，就被早有吞并之心的王三春强行收编，罗本人被杀。消息传到曲江洞，罗残部遂溃散。罗部被吞并后，袁部势单力弱，日夜恐慌不安。于是，袁刚一方面收缩兵力，据洞自守；一方面派人四处探试，另寻新主。

其时，川陕交界的南郑县碑坝一带，也有一股势力颇大的土匪，其匪首为徐耀明。徐耀明原系南郑碑坝一带的大恶霸，家有良田肥地数顷。他看到当时兵荒马乱，为了保护家产，遂以办民团保家护乡为名，干起明团暗匪的勾当。不久，匪众即发展到五六百人。1932年冬，胡宗南委朱兆楚、李茂春为川陕边防剿匪军正副司令，徐耀明为所部团长。从此，徐遂以南郑碑坝广家店为老巢，勾结川陕军阀势力一直伸展到四川通口和两河口一带，成为川陕交界处的土霸王。袁刚探知此事，遂决定降徐以自固。1933年初，袁刚正式降徐被任命为二营营长。徐虽纳袁，但对袁并不放心，他让袁部仍在高洞子一带自谋发展，而不供给武器、弹药、粮草和资金，并时有吞袁之意。袁虽降徐，但称霸一方之志仍存。他自恃有险可守，不甘久居人下，也时有图徐之心。因此，双方貌合神离，彼此勾心斗角，都想乘机吃掉对方。

1933年4月中旬，陕军三十八军参谋武志平（中共地下党员）受共产党委托，经大河坝入川和红四方面军联系，商讨订立互不侵犯协议。为了使袁部保持中立，武志平以陕军参谋的公开身份，为袁刚谋得西乡县民团团总之职，并送给其一些子弹。袁部中立后，中共汉中地下党组织开辟了一条秘密交通线。他们从汉中经南郑碑坝、西乡高洞子和楼房坪等地，多次给川北红军输送各种物资，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在川北的反围剿斗争。徐耀明与袁刚素有矛盾，当他得知袁刚投靠陕军并对红军保持中立后，气得暴跳如雷，决意消灭袁部。为了消灭徐耀明这股反动顽匪，确

保红军侧翼和秘密交通线的安全，在中共党的指示下，武志平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这一矛盾，导演了一出袁刚火并徐耀明的武打剧。

这年6月下旬，徐耀明派副官晏某到镇巴代池坝联络杨均的民团，约期两面夹击袁刚。但是，当晏某从代池坝返回南郑广家店复命时，却被袁刚安排的游哨截获。袁刚从晏某身上搜出杨均给徐耀明的复信，认为“打人不如先下手”，遂决定立即进军广家店，消灭徐耀明部。7月初，袁刚以给徐耀明拜寿为名，带领10多名骨干先行，又安排两路人马随后接应。袁刚到广家店的当晚，徐耀明以洗尘为名，设宴招待袁刚等人。他设下伏兵，欲擒袁刚等人。正当酒席热闹之际，袁刚摔杯为号，首先开枪打死徐耀明，尾随接应的两路人马及时赶到现场，三路人马里应外合，消灭了徐的卫队和伏兵，缴获长短枪100多支。火并徐耀明后，袁刚率主力仍回驻高洞子，留下一连的兵力防守广家店。从此，袁刚的势力又伸展到南郑碑坝一带。

四

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西征，12月底途经汉中入川，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中共汉南特委书记陈浅伦在西乡县骆家坝的马儿岩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川陕边区游击队。翌年2月中旬，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陈任军长兼政委（3月，政委由李良接任）。马儿岩根据地建立后，打通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交通是当务之急。高洞子是从马儿岩入川的必由之路，因此，袁部的态度至为重要。为了打通川陕交通，1932年冬和1933年春，陈浅伦先后两次亲赴高洞子招降袁刚。袁刚慑于红军威力，同意改编为红二十九军游击队。从这年2月至6月，袁刚和红军

保持了数月友好关系。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曾派了武选、余诚斌2人在高洞子举办了二期干训班，为红二十九军培训了一批领导骨干。党组织通过高洞子向川北红军运送物资时，也基本上可以畅通无阻。红军在大河坝一带活动时，袁刚还在物资方面给予了一定的援助。凡此种种，对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斗争和红二十九军在陕南的发展壮大，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年4月2日，发生了震惊陕南的“马儿岩事变”，红二十九军暂时受挫，国民党军队一时得势。袁刚见此，不久即宣布脱离红军，继续打起土匪旗号。但是，由于红四方面军在高洞子不远的楼房坪驻有重兵，袁刚尚不敢公开与红军为敌。袁刚自火并徐耀明后，自以为羽毛丰满，数次率部骚扰红军，均被击退，于是仍退入高洞子固守。1934年初，由于川北战斗激烈，红军驻楼房坪兵力大部入川，余部收缩阵地至楼房坪曲江洞一线，对北采取守势。在此情况下，袁刚即率部出洞，公开与红军为敌。2月，他率匪捣毁楼房坪苏区第五村苏维埃政府，对苏区干部群众进行反攻倒算。4月，他又率匪袭击曲江洞红军，捕去前来检查工作的北路游击队指挥部参谋杨国道，并带至高洞子关押月余残酷杀害。7月，他一连派出数股匪众，在楼房坪苏区烧杀奸掠，对苏区造成很大威胁。为了保卫苏区，打击袁匪嚣张气焰，红军决定对袁匪进行反击。7月中旬，红军在大河坝尖阁洞设伏，一举打死袁刚匪部20余人，夺回一批粮食衣物。12月，又长途奔袭袁刚设在大河坝么岩坡的一个巢穴，歼敌数十人，夺回袁匪抢劫的大批粮食和衣物。此后，袁匪气焰大减，龟缩在高洞子之中，不敢轻易出动了。

五

1935年初，红军撤离楼房坪北上。袁刚认为出头之日到了，遂

尽率匪徒出洞，四处抢地盘，独霸了大河坝一带。数年间，袁匪在大河坝横行霸道，闹得这一带鸡犬不宁，人人自危。其罪恶事实主要是：①强迫农民种植大烟，武装走私，牟取暴利；②私设关卡，明夺暗抢来往商旅；③大搞绑票（用武力绑架人质，让其亲属用巨款赎回），敲榨勒索钱财；④杀人放火，抢占民女，闹得白天路断人稀，晚上不敢在家居住；⑤抓丁拉夫，带到高洞子长年累月服苦役。

大河坝乡民和往来商旅时有人赴县告状，要求派兵剿匪，但县政府和驻军知袁狡顽凶悍，料剿灭不易，遂决定招安。这年秋，由国民党西乡县杜县长出面交涉，封袁刚为常备第三大队大队长。于是，袁刚遂与国民党当局合作，由匪而变为正式民团。从此，袁刚以其合法身份开到钟家沟、贯子山、峡口、私度河和延水等地活动，其势力遍及西乡西南一带，成为西乡境内的最大股匪之一。为了美化自己，翌年春，袁刚在峡口办了育成中学。接着，他又借给儿子办婚事大摆宴席，遍邀西南区的头面官吏绅士以壮声势。当时，袁刚真是得意忘形，不可一世。他出门动辄坐八抬大轿，卫队前呼后拥，耍尽了威风。驻县国民党军队几次想乘机除掉袁刚，但由于袁出没无常，百余人的卫队又形影不离，故一直难于下手。

1938 年夏，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以抗日为名，封袁刚为团长，令其下山赴汉口接受改编，欲乘机擒之。袁刚虽与国民党合流，但对国民党常有戒心。因此，他受封不服调，拒绝离开高洞子西赴汉中。对此，祝绍周无可奈何，暂时听之任之。翌年春，袁刚以团长身份衣锦还乡，看望老母和亲友，他大办酒席，遍请亲朋，并赠精英中学银元 1 万元。凡此种种，使袁刚一时成为鲲池风云人物。但是，好景不长。夏末，袁刚忽闻情况有变，遂率卫队立即返回高洞子。原来，这年夏初，祝绍周奉调川北，任川军某师师长，准备北上围剿袁部。袁刚返回高洞子后，下令匪众广蓄粮草，准备死守。这年 9 月下旬，祝绍周令亲信李俊华率川军七三七、七

三四团围剿袁刚，驻西乡的陕军三十八军五十一师一〇一团也奉令前来配合。但是，由于袁刚早有准备，又凭险拼命抵抗，因此，川陕两省数千国民党军队围攻一年之久，竟不能攻下。

1940年9月初，祝绍周派人将袁刚老母叫到师部，让袁母赴高洞子劝子出洞投降，许其不死，或在军政界任职，或退隐田间，由其自选。袁母表示愿意前往。9月下旬，祝绍周派人将袁母护送到高洞子附近李俊华团部，令李相机行事。高洞子被围年余，弹尽粮绝。固守不易，突围亦难，加之袁刚老母多次喊话，致使军无斗志。在此情况下，10月6日，袁刚只好与丁、万等匪首出洞投降。袁刚等投降后，余匪溃散，他与丁、万等人被一〇一团解送汉中关押。袁刚被擒，川陕一些与之有旧的军阀、官吏和匪首纷纷为其求情，要求赦免。汉中国民党当局举棋不定，未能及时做出决策。但因袁刚在西乡县西南为非作歹10余年，积怨甚多，民愤极大。故绅民要求杀袁的呼声甚高。同时，袁刚在西乡西南区的所作所为，又直接危害国民党的财政收入和政治统治。于是，汉中国民党当局权衡利弊，决定将其处死。

1940年12月16日，袁刚与丁、万等匪首，被国民党汉中当局枪毙于汉中北校场，时年42岁。

（陕西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大匪霸周寿娃

郭志文　杜国兴

周寿娃，又名周兴文，外号“周狼”，陕西省商县大荆周岭人，生于1911年。从1935年开始走上罪恶的道路。10多年内，他在商县北区（大荆、腰寺、板桥一带）、黑龙口及洛南县、华县、渭南、蓝田等县边界，烧杀抢掠，称霸一方，干尽了坏事。1950年12月23日，商县人民政府在商县南门外丹江河滩召开万人大会，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匪霸。祸害既除，人心大快。

一

周寿娃小时家境比较贫寒，1930年至1934年前后，在家熬葱谷糖，经常肩挑糖担，串乡赶集，靠小本生意混日子，尽管家境比较清贫，倒也安分守己。他24岁的时候，却选择了玩枪弄武的道路。30年代初，由于地方个别人凭着枪杆子欺压群众，称霸一时，周寿娃看得眼红，便产生了邪念。1935年，他混进了国民党联保办公处，先在腰寺镇联保主任李建中手下当镇丁，后又给腰寺自卫队长王益三当护兵。为了达到更高的目的，竟密谋杀害他的主子王益三，夺取自卫队长的职权。不料谋杀未遂，便串通周兴武、周金升、苏世恒等人，流窜马角山、大荆一带，每日神出鬼没，大肆抢劫，并不断纠集同伙，形成了自己一股势力。

1937年清明节前一天，商县上秦川古世珍（土匪出身，曾任

国民党团、旅长、副司令等职，抗日战争末期投降日本，参加日伪皇协军。解放前夕，被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处死于西安）率部千人劫掠西荆、黄川、大荆一带，周寿娃这伙新凑合起来的势力被赶至洛南保安一带。当时，周寿娃出于争夺地盘、扩充势力的需要，先派人回大荆侦察古部情况，以便寻机将周部逐出大荆。4月中旬一天下午，周寿娃便率领20多人，由洛南向大荆迁回，半夜时分到达大荆，凭着他土生土长、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从一人家后院进入大荆街，摸到古世珍留驻大荆的郭金鉴、任怀德两营的驻地，枪弹齐发，郭、任所部对这突然袭击毫无准备，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立即乱作一团。西边山上古部孙振杰闻声前来援救时，周寿娃已全部撤离。这次古世珍部死亡80多人，重伤20多人，被周寿娃夺走长、短枪100多支，损失很大，士气低沉，只好撤离大荆。同时，由于周寿娃这次以少胜多，打败了古世珍，壮大了实力，使他的名声很快传开了，也为他牢固地控制大荆地区，并在当地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真正成了大荆地区的土霸王。

周寿娃的实力壮大起来后，他的族兄周维华（解放前曾任商县北区保甲督导员、陕保三团营长、陕保十五团团长、山阳县长、宝鸡警备司令部警卫团团长等职。解放后潜逃，至今下落不明）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于是便与周寿娃勾结起来，互相利用，狼狈为奸。1937年周维华被委任为商县北区保甲督导员后，为了借用周寿娃的武装力量，便把他拉进保甲组织，当上了大荆镇的保甲自卫队长；为了使周寿娃更多地为其效力，并扩大自己的势力，又提升周寿娃为常备队大队长。至此，周维华如虎添翼，周氏弟兄很快掌握了北区的军政大权。周寿娃直接控制武装后，明派暗抢，摆赌抽头，大肆掠夺人民财产。同时，又把掠夺来的大量财物用以贿赂官府，以求巩固周氏弟兄的宝座。1938年冬，周寿娃在与蓝田县地方势力李长余合谋攻打蓝田另一地方势力穆自贤后的返

回途中，抢劫了华县石头峪丁增华开办的火柴公司，并抢走群众为该公司搞运输的20多匹骡子，沿途又拉票20多人，勒索了大量银元和钞票。嗣后，华县等地群众数十人向省上告发，省上才决定由蓝田、渭南、华县、洛南等县联合出兵围剿周寿娃。但由于周维华四出周旋，四区专员温良儒、陕保九团团长龙凤山等人亲自出面，结果不了了之。从此，周寿娃越发猖狂，祸害人民更为残酷。1942年周维华被委任为陕西省保安第十五团团长时，周寿娃随之被提升为营长。1943年，周维华率陕西保安十五团赴西安受编时，周寿娃及其亲信，坚持按兵不动，继续盘踞太荆，作威作福。1946年，新四军一部进入商洛以后，商洛根据地的革命形势愈来愈好，周寿娃曾主动和我游击队长张俊芝取得联系，谈判中周匪一再表明不与共产党作对；同时，还暗地派张炳焕（1947年叛变）、袁树虎等人参加了蓝洛支队，给游击队送吃送穿，但时隔不久，周寿娃又投靠到国民党的怀抱，大干反共反人民的勾当。1947年，史直任陕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后，又委任周寿娃为专署第六突击队大队长（周树有为副大队长）。1949年春，谢辅三（十九绥靖区中将司令兼行政长官），以看望周营长病情为名，亲赴大荆，商县副县长马振立随谢一同前往，召集腰寺、大荆、黑龙口等三镇所有保镇长、地方武装头目等200余人参加联防会议，委任周寿娃为商县西北地区联防办事处主任（王哲夫、王定承为副主任），并送给周寿娃七九步枪子弹14箱。谢辅三在讲话时反复强调说："现在时局紧张，你们要组织起来，准备打仗。你们都是当地人，为了保卫家乡，必要时可以化整为零，也可钻进秦岭深山去打游击，弹药不足时我们给你们送。"千方百计为周寿娃撑腰打气。1949年5月间，谢辅三又委任周寿娃为十九绥靖区警卫二团团长，并把自己的吉普车送给周寿娃（因谢准备逃镇安，无行车公路），周寿娃接到委任状时，已忘乎所以，说什么团长还没司令大，干脆当司令，遂以自封的司令身份任命一名参谋

长（王哲夫）和下属3个团的团长（周培云、杨全林、潘建都）和特务营营长周金铭等。从此，周司令的名声便很快传开了。其武器装备已有长枪2500多支。短枪290多把，轻、重机枪36挺，六〇炮2门。

二

周寿娃在统治大荆一带的10多年间，奸污妇女，烧、杀、抢、掠，任意摊派，搜刮民财，聚众赌博，贩卖毒品，残害民众，无恶不作，由于上与官府勾结，下有武装势力，群众敢怒不敢言。

（一）奸污妇女，惨无人道

周寿娃有6个老婆，除大老婆魏梅系童养媳外，其他5房姨太太均属奸污后霸占得来。虽然如此，周寿娃仍不满足，还仗势到处奸污妇女。据大荆、黑龙口一带群众所知，周寿娃先后奸污妇女最少也在百人以上，其凶残之状，千古罕见。例如：他在黑龙口强奸一名15岁幼女时，其母心疼女儿，宁愿自己受辱，虽经苦苦哀告，但仍无济于事，其母泪如泉涌，终于在荷枪实弹的威逼下，将女儿抱在怀里让“恶狼”凌辱一番。大荆李××结婚那天，刚吃晚饭，周寿娃便派人装作到李家拉壮丁，进庄之前，有意先放了几枪，等新郎及其亲友全部逃跑，周趁机闯进新房，强奸了新娘。1946年周寿娃在强奸×村李××之女时，其女见势含恨欲绝，语言上顶撞了这个恶棍，于是他便狠心地发出狂叫，命令他的6名随身护兵将这一女子拉至山坡上“打排子枪”（此话系他们的黑话，即轮奸之意），使这一女子数月卧床不起，险些丧命。至此仍不放手，后又将此女让其部下赵××霸占为妻，长期遭受折磨。1937年一天晚上，周寿娃闯入闵××家强奸其妻时，竟令护兵将闵绑在小房内的桌子腿上，并出恶言：让你亲眼看看。致

使闵气极吐血，约一年后身亡。更有甚者，周寿娃奸污妇女无论老幼，其兽性已达到六亲不认的地步，所以“周狼”的恶名在百姓中越叫越响，可见百姓对他恨到何种程度。

（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挖人心为已治病。1940年，周寿娃眼睛生病，听人说用人的心与胆能治眼病，遂于1941年1月14日派周金升等人在马角山（今商县庙湾乡）把郭树旺杀害，掏其心与胆，后经医生辨认，胆非真胆，即又二次去郭家。当时，死者已经装棺入殓，但他们仍不罢休，将死者从棺材中倒在地下，掏其胆，扬长而去。

抢人妻害人命。周寿娃为霸占刘爱娃为妻，曾于1936年春枪杀了刘的丈夫杜东娃。在霸占张念娃为妾时，也想置张的丈夫牛兆哲于死地，后经人说情，送钱送礼，才得死里逃生。

放土匪，得财伤生。1945年4月，周寿娃派部下周树秀、牛江娃等人把西荆张宪殿家抢劫一空，并开枪打死张宪殿父子3人和年仅4岁的小孙子，使张家破人亡。1948年8月，周匪派周金铭指挥抢劫砚川丁振汉家时，除抢得银元2500多个，大烟土5斤以及布匹、大麻等物以外，还用木炭火烧死了丁振汉，开枪打死丁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媳和一名帮工，其悲惨之状，目不忍睹。凡到现场去了的人无不痛心落泪。据当时在大荆小学教书的王玉庆说：“我看了之后说了句，‘谁他妈的昨晚干下伤天害理之事？’在场的王哲夫便暗暗踢了我一脚，过后他才对我说，你招祸呀！那是掌柜的（指周寿娃）派人干的，我听后猛吃一惊，很长时间提心吊胆。”1947年9月，周寿娃派其爪牙周银全、周五娃、闵虎山等人抢劫腰寺杜村杜辉升家时，在抢得大量财物后，仍不满足，声言是要大烟土来的。于是便把杜捆绑起来，吊在屋梁上，用火点燃泼了油的竹扫帚，直烧得年过七旬的杜辉升老人喊爹叫娘，匪徒们临走时又向杜的头部捶一镢背，使杜当即死亡。

残杀新四军和游击队干部、战士。1946年11月下旬，新四军五师从大荆经过时，周寿娃率部追击，于西荆太子寺捕获新四军战士8名，即将其中一位排长枪杀，其余7人解送商县，亦被国民党政府杀害。1946年，袁树虎（原属周寿娃部下，参加革命后不久被周寿娃杀害，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等人参加新四军领导的游击队，经常活动在韩峪川大龙庙一线。同年七八月间，周寿娃秉承国民党商县县长杜得霖旨意，千方百计谋害袁树虎并指示部下王绍灵威逼袁的部下赵志杰（赵系王的妻弟，已被镇压）将袁设法打死，否则，就要将赵一家杀绝。赵深知周寿娃心肠狠毒，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所以犹豫数天后，即趁袁不防，将袁树虎杀害，并割其头奉献"周狼"。1947年6月下旬，西荆群众牛秀儒，暗地联络大荆地区喻白娃、牛靠山、王德保、梅海娃、王孝忠、李时斌、王靠山、郭代娃等人于同年7月9日在西荆小蒜凹山地集合，打算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周寿娃闻知后，即派手下干将李元治带头围剿，王靠山还未到达集合地点，就在骡子沟被杀。李元治带人包围小蒜凹后，由于敌众我寡，牛靠山等7人当场被捕（只有王德保持枪越房逃跑），当天送至大荆镇公所，严刑拷讯，午饭后即派周占熬等人将牛秀儒、喻白娃等三人枪杀了。牛靠山、王孝忠同时被拉去枪毙。王因开枪后仅划破头皮，即趁势倒向涧下的庄稼地内，乘机逃跑。郭代娃等2人因和周寿娃有亲戚关系，所以当时没有被杀，暂交周金铭管押，后经托人说情，杨、郭二人卖房卖地，拿出50万元才了结了此事。

泄私愤，杀害无辜。1948年7月，华县东坪陈景华托周寿娃为他购买枪支。结果周给了一支坏枪，陈生气将周运往渭南的大烟土没收。周怀恨在心，当即派苏世恒、周兴武等人将陈一家7口连同一名伙计一齐杀害。1949年4月29日，周寿娃命周培云、周百锁率部300余人，长驱直入洛南县保安一带，其目的是要把叶振慈、叶振礼两家人杀光、抢光，以解除他统治保安一带的障碍，

适逢叶、董两家在4月26日发生武力争斗后，叶振慈弟兄预感周寿娃一伙可能插手，故于27日晚上全家秘密逃走。周培云、周百锁扑了个空便大发淫威，一阵枪声过后，保安街、窄巷子、北湾村一带到处一片砸门声、孩子哭啼声、女人求饶声、翻箱倒柜声，乱成一片。忽而火光冲天，烟火弥漫，当地群众无不深受其害。可怜自以为与周匪无冤的叶思家一家没有逃走，却受害最深，门里门外，拥满了凶恶的匪徒，家人想逃无路，只好任其凌辱、抢劫。忽然大门外进来一个自称班长的张治华，把叶思家一家老小都吆喝到院子中间，遂即举起手枪一阵点发，叶思家的母亲，叶的妻子和弟妻怀里抱的一个小孩，已经出嫁的妹妹，姓何的伙计，一个个都倒在了血泊之中。周培云在窄巷已抢过叶童生家，当他路过一个生墓（未葬人的墓穴）时，发现内中有人，拉出来一看，原是叶童生之子叶长安，不由分说，一枪将其打死，并将其头割下拿走。周向前走不远，又发现对面麦地里有人，遂派人搜索，原是火烧寨人秦中华，亦被就地枪杀。在这次抢杀事件中，匪徒中的头面人物个个满载白洋、元宝、绸缎细软、大烟、首饰而归，大发横财。

杀良民，放纵恶人。1946年冬，周寿娃的姑表王正娃等人抢劫了黄川王举斌家，打死王的二子王新庄及伙计薛××。案情暴露后，王举斌的亲族王益三直接出面破案，周寿娃无可分辩，只有照王益三的办，但在枪毙有关罪犯时，故意放纵要犯，指示王正娃潜逃外地，却把王正娃之妻赵娥娃无故杀害，并装入娘家父亲赵金堂的备用棺木送至王正娃家掩埋，声言是枪毙了王正娃，谓之“大义灭亲”。

逞霸道，草菅人命。1944年冬，周兴武（周寿娃的亲信）部下高俊齐、王姜娃在大荆砚川强奸×家姑娘。这时，周寿娃亦前去行奸，恰巧碰面，当场将高、王二人捆绑活埋。1948年5月王哲夫的侄女王蜜娃因不满包办婚姻，与在大荆二簧戏班唱小生的

一外地青年发生私情，周寿娃、王哲夫等人便籍口有损地方声誉，即派周五娃等人将王蛮娃投入大荆杨巷一枯井中，用乱石砸死。

大荆解放后，当地群众揭发；解放前，周匪及其爪牙杀害无辜群众约计300余人，周匪交待材料中供认由他直接杀害的群众32人，革命同志17人。

（三）敲诈勒索卖毒品，摆赌放债刮民财

周寿娃在统治大荆一带期间，任意私派粮款，中饱私囊。仅1944年5月，周一次就给大荆、腰寺派壮丁费8000余元（银元）、小麦1000石；周还借其势力巧取豪夺王丹商、王自珍、王喜尧、曹树俊、高明哲等人土地10.9亩，房屋6院；利用拉票，敲诈勒索王生杰、周顺娃、杜尚勤、闵良山等人白洋9840元，小麦100多石；又安排亲信李文华、沙建吉、张彦庆、潘文耀、李殿福等长期在腰寺、大荆、黑龙口、两岔河等地以开设货铺为招牌，摆赌开烟馆，放高利贷以肥私囊；逢年遇会，又命苏学祥、周百锁、苏义民、周树纪等人为他的几个姨太太摆赌场，抽头取利（见十抽一）；如有人把本钱输光了，摆赌者就采取变相的记帐手法引诱他们继续赌博，当你把家产输得差不多时，他们便不让你赌了，立即威逼交出现款。大荆地区的王双庄、喻光杰、屈自强、张四喜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倾家荡产的。有的甚至走向邪道，危害乡里，逐渐变成人民的罪人。

三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古城西安。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六旅副旅长江炳功及其下属400多人（包括军医处、副官处、军需处、参谋处、特务营）和由国民党华州专员张雅宣、大荔专员艾捷三带的400多人（包括华州、大荔专署以及华县、华阴、潼

关、大荔、朝邑、郃阳、蒲城等7个县的部分在逃人员），分别由石头峪、瓷峪窜入商洛，并在洛南县两岔河进行了合编，由张雅宣总领一切，然后经大龙庙窜到黑龙口一带，妄想继续南逃汉中。后因此路不通，张荣顺（系蓝田县铺花子人，团长）即通过他与黑龙口镇长华生辉的私人关系，千方百计勾结周寿娃一伙与保六旅合作反共反人民。

就在5月中旬，保六旅张雅宣邀请周寿娃、王哲夫、潘建都、王朝栋等人在韩峪川华生辉家举宴换贴。王朝栋奉劝周寿娃说“人家都是大官，有学问，见识广，与他们换贴，日后必有好处。”席间双方表示“要精诚团结，坚持到底，等待时机，配合胡长官（胡宗南）反攻西安。”

此时，崔书田（商县自卫团团副）与其侄崔毓斌（军统特务、西安绥署二处副处长），专程由商县前往大荆，在杨全林家与周寿娃、王哲夫、王朝栋、杨全林、周兴康等人秘密会面。周寿娃问：“县城情况怎样？”崔毓斌说：“县城情况很好。白旅长（白青云）决心和商县父老同生死，共患难。”崔书田接着说：“我们这次来大荆，是白旅长亲自委托的，他让我转告各位，对解放军、游击队，咱们必须保持一致行动，要提高警惕，防止受骗。白旅长还说，这里有事，他一定派人援助下边（指县城），如有事各位也要随时策应，只要咱们同舟共济，商县大荆万无一失。”

一贯狂妄自大的周寿娃，在张雅宣等人的吹捧下，加上保六旅电台的欺骗宣传，更加忘乎所以。因此，当西北军政委员会联络部派郭志文（大荆人，曾任商县北区民团团长等职，当时闲居西安）和王继武（蓝田洩湖人）回大荆奉劝周寿娃要认清时势率部起义，为解放商县出力时，周寿娃则继续听信王朝栋、王哲夫所说，初见面时阳奉阴违，总是说不要急，让我想想再说。嗣后，又避而不见。周匪死心踏地，终未接受劝降。

1949年6月19日，周寿娃率部进驻红岩寨、马角山一带，保

六旅旅部警卫营300余人，也先后进驻两岔河，并在大荆、腰寺两镇火速摊派小麦800多石，指定专人，采取暴力手段，加紧催收，限期运送指定地点，妄图负隅顽抗。在此期间，周寿娃一再扬言："要枪有枪，要粮有粮，打他几年游击怕啥，我就不相信共产党能坐天下。"岂知，此时此刻，他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6月30日晚，我商洛军分区部队和洛南支队先后抵达两岔河西边的七里店和大龙庙麻村一带。洛南支队侦悉敌人警戒疏忽，队长蔡兴运便命张青山连绕道登上马角山高地，严防敌军外援，自己带领二连（三连打援）趁敌熟睡之际，冲入敌群，于7月9日黎明前后一举歼灭保六旅300多人，生俘参谋长孙英以下1160多，击毙击伤敌副旅长姜炳功以下百余人。与此同时，我分区五团也向盘踞在秦岭庙一带的周寿娃部发起了猛烈攻击，战斗进行了约半小时，周匪四处逃窜，因为他们都是当地土生土长，人熟地熟，所以很快散伙隐蔽。

周寿娃在其所属武装全部散伙之后，即躲进东箭子沟李有娃（李和周寿娃四姨太太的娘家有亲戚关系）家，后由李有娃、李文福（大荆东峪人）护送，翻化岔岭，直达渭南油火川李忙庄（原籍大荆李渠人，与李文福皆为亲族）家隐藏起来。后又由李文福护送到河南郑州，先后在郑州市天泰药房和翟玉山（1943——1945年任大荆镇长，与周寿娃关系密切）家长期隐藏。

四

大荆地区解放后，周寿娃的残余势力继续在腰寺、大荆两岔河一带残害人民。仅1950年2月至4月份，大荆、腰寺一带发生抢劫案24起，地、县党政军领导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亲自研究布置对这一带的搜山剿匪工作。商洛公安处侦察科长韩彬，县公安局长杜景，带领工作队，深入大荆山区，指导剿匪工作。荆寺

区第四乡发兵在乡长王景正的带领下，紧密配合，终于查明了周匪及其余孽在当地解放后的一系列罪恶活动，首先抓获惩办了一批；将护送周寿娃去渭南的李有娃送交县公安局。地、县公安部门即火速派侦察员李平亚等人，由李有娃引路，先后在渭南油火川找到隐藏过周寿娃的李忙庄。然后，顺蔓摸瓜，于1950年6月28日，在郑州市有关部门和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终于在翟玉山家将周寿娃逮捕归案。以后，周匪伏法，人心大快，社会治安日见好转，一些仍不死心的匪徒也相继落网。

（陕西省商县政协　供稿）

王友邦盘踞吴山纪实

阎存正

王友邦盘踞陇县吴山是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至1928年春被甄士仁部击溃，前后共5年时间。兹就亲见亲闻和从当地老人口中询问而来的材料，得成此文。

一、王友邦的身世

王友邦系河南省人，1924年因饥馑与其同乡冯占彪（通称冯老三）逃至陕西西部各县，乞食为生。他们到陇县时，适值夏收以后，生活比较好混，即长住陇县八渡区东部梨林川一带，有时讨要乞食，有时作短工糊口。这样，混的时间长了，与梨林川苏家坡人苏克勤相识，苏在杨虎城部下当过兵，藏有步枪一支。王、冯系离乡背井之人，无所顾忌，遂与苏密商，纠合不务正业者数十人，持苏步枪窜往陇县吴山，又与家住吴山附近之高廷瑞联络在一起。王、冯既有苏之步枪为武器；又借高之家庭作掩护，昼伏夜出，打家劫舍，秘密聚积财物、枪弹、粮食，至1925年春，逐渐演变到招兵买马，积草存粮，正式称霸吴山，王、冯、高三人为首领。这时有个沦落异乡人，略识一些文字，也被王友邦笼络上了吴山。这人到吴山为王友邦办理来往信件，曾写过一首诗，至今能记忆起的两句是：群雄聚义在吴山，护国英雄镇陕甘”。王、冯盘踞吴山的野心与猖狂可见一斑。

二、王友邦的势力

王在吴山的实力，首先是枪支，由苏克勤的一支步枪，发展到300余支步枪，还在吴山设立炮局（即造枪厂）自造枪支、弹药，除手榴弹、土枪等各种武器外，还能造出比土枪质量好的枪械，名为“木碑子”。此种枪据说该炮局每日可出1支。制造枪械的工匠有百余人。并有马300余匹兵卒3000余人。当时传说，吴山共编有8个营，能记得起的三营营长叫王海潮，八营营长叫刘介石，其余各营营长姓名记不清楚。另外，家住千阳县封头村坐地分赃的惯匪李德胜（即李水娃）雇长工10余名，种地务农，养犍骡10余头，驮脚经商，在家私藏枪支，半农半匪，无恶不作，也被王友邦拉拢成了吴山的一部分力量。李很狡猾，名义上归吴山，实际所有人员枪支未去吴山，对王友邦表面服从，总不正式入伙。到1928年春，王友邦被击溃逃跑，他还是在家盘踞，仍旧过着坐地分赃之抢劫生活。

三、王友邦的抢劫活动

王友邦盘踞吴山，以抢劫为主，抢劫地区主要分三路：一路在吴山的东南，地区是陇县下南区官村、新街、庵头一带；一路在吴山的西南地区，即陇县上南区赤沙、香泉一带（陇县上下南区，解放后划归宝鸡）；一路在吴山的东北，地区是陇县东区，八渡、大底村、梨林川一带。东南、西南两路，是王盘踞吴山不久，先后打通的根据地，但东北部八渡以下，王的势力尚不能扩展，主要阻力是梨林川之枣林寨村庄办有民团，组织坚强，赏罚严明，领导人阎曲章为人精明强悍，有军事常识，除保卫枣林寨一村外，还联络其他地区民团共同防御，有围剿吴山之策划，并邀请陇县河北区号称神团的何姓兄弟2人与兰姓1人到枣林寨作为协助。因此，惹起吴山王部的极端仇视。1925年4月间的一个清早，王统

率吴山精壮兵卒千余人，黑夜开拔，天未明即抵枣林寨村，伏该村四周，乘农民有早起者往田间耕作、送粪开放村外四周围墙设置的木门栅栏之机，蜂拥而入。村中民团兵卒自请到神团三人到村后，据说神团枪弹不能杀伤，兼之每晚守夜，天明时休息多未起身，匪众进村如入无人之境，到处鸣枪放火，抢劫掳掠，该村40余户房屋大部烧为灰烬。一时杀声与房屋倒塌、砖瓦破碎之声，远近皆闻。我家距枣林寨尚有半里，当时随父亲跑到屋后山坡上了望，所有上述烧杀情况，均系亲眼所见。枣林村经此抢劫，死10余人，被绑票拉去10余人，负伤四五人，由河北区请来的神团何姓兄弟2人均被枪杀，惨痛之状，目不忍睹。王友邦盘踞吴山数年，远近抢劫次数之多，不可计数，独枣林寨村庄之抢劫为最惨。

四、王友邦的征派活动

自枣林寨村庄被抢劫后，王友邦在东北部八渡以下之抢劫道路，畅通无阻。因此，由抢劫进一步发展为征派，在东北部八渡以下之梨林川一带。征粮派款。梨林川南村有安姓“书手”（书手是满清王朝遗留下来专门记载农民纳粮数字人的名称），其家藏有梨林里（陇县共有28里）农民纳粮底帐，王友邦匪部查出，即依据该底帐向当地农户征粮。派款办法则按过去八渡区分配比例，直接向各村摊派。当时农民普遍种植鸦片，所有派款以鸦片烟款为最重。征收的办法是随派随收，在派后两三日内即须交清。催收的人，乘马持枪，凶恶不可一世。记得催派款只在一日之内，就因欠款枪毙过两人。一人在温家堡，一人在峪头。杀人的凶手叫侯振华（外号小猴儿），是吴山派来专门催款的。当时催收粮款的紧迫与凶狠，可以想见。

1926年后，王友邦扩张的范围大了，征派的粮款不敷开支，主要是粮食不足。于是，他下令在接近陇县东部的千阳县寇家河原

上产麦地带抢运小麦。抢运的办法是前一日，在八渡以下梨林川各村派好驴骡数百头，选派好的脚力驴骡，整队出发，并由吴山匪部派出马队三四十匹作先导，到了抢粮的地方，鸣枪示威，惊散当地农民，再由赶驴骡脚户进入各村庄农户家中抢装粮食；抢装齐全，吹消集合，脚户驮运粮食先走，马队再鸣枪一次，押送返回到陇县境梨林川口一带之峪头、枣林、南村等村庄暂存，第二日再向吴山驮运。这样的抢粮方式每月总有一二次。抢粮出发之日马队先行，驴骡继后，道路为之拥塞，均从我家门口大路经过，我幼时站在门口观望，不止一次，，至今还记忆犹新。

五、王友邦的架票活动

王友邦除用抢粮来维持他的食用外，经济上主要靠抢劫架票。架票就是扯票子，即在抢劫后离开时，把遭劫人家中未逃出的大人或小孩拉上吴山，押入石洞内，以粗米淡饭维持生命，然后向被拉去人的家中勒索钱钞（主要是白洋），当时要的白洋以所谓尺、丈计算（白洋一百为一尺，一千为一丈），“一票”索要一尺或几尺，甚至有索款在一丈以上和诸如大烟土、布匹、绸缎等物品的。如不能按期送去，还要紧票子（即拷打拉去的人）。现在的陇县政协前任副主席孙子成的儿子孙永福，就是王友邦抢劫枣林寨后拉去，因拷打死在吴山的。王匪架票在吴山打死打伤的人数，据说先后有百余人。这些人死后尸体无人掩埋，大部均填在山谷深处，真是匪性残忍，达于极点。后来架票地区扩大到甘肃省的崇信、华亭等县。王匪在宝鸡县一次架票中竟把宝鸡玄寿山中学的30余名学生连同校长张子才，一并拉上吴山，勒索了大批钱财。后来除用钱财赎回张校长和20余名学生外，另有五六名学生，因遭摧残，到释放时，已得病死亡。

六、王友邦逃离吴山

王友邦踞吴山数年之久，扩张势力，荼毒人民，主要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内政纷乱所造成。1928年，甄士仁师长奉冯玉祥国民军总部之命，来陇县进行围剿。甄到陇侦得吴山地势险峻，不易攻克，须用出奇制胜的办法，全师驻扎陇县一段时间后，于一天下午将全师官兵集合在陇县东门外讲话，说他本来是奉命专来陇县剿除吴山土匪的，可是上级有紧急命令，调他的部队东下另有任务，须即日开拔。讲话完毕，命全师士兵于当日下午全副武装，由东门外水银河沟挺进东行。吴山王匪侦得此消息，以为是真实情况，戒备之心稍懈，甄部进水银河沟10里左右，即改道由杜阳沟向吴山黑夜进军，天明已至吴山附近之官村一带集结。王匪不备，惊慌失措，全部逃上吴山，抢险拒守，双方激战，互有伤亡。甄部除士兵外，还有尚超辉、史天儒、马希斌等营连长阵亡。激战竟日，王匪尚欲在吴山顶峰负隅顽抗，甄士仁命开炮轰击，王匪残部力竭不支，由山后潜逃，吴山匪患遂告平定。

七、王友邦的轶事

吴山王友邦的起源与终结，大致情况已如上述，尚有轶事数则，似有必要叙述：

1、王友邦做寿。王友邦盘踞吴山到1927年以后，算是猖狂到了极点。在做寿的前一月内，就叫他所管辖的各地区按村杀猪宰羊，磨面碾米，向吴山运送。据说从做寿之日起，海菜筵席数百桌，连续吃了四五天，宰杀的猪羊在300头以上，杀鸡鸭约有千只，在宝鸡、陇县罗致了厨师数十名，豪华铺张不可一世。

2、王友邦之死。王友邦从吴山潜逃，无所归依，后逃到甘肃岷县碧口镇驻扎的旅长鲁大昌部下。王与鲁均加入红帮，以义气为重，且早有联系。王虽是潜逃匪首，鲁竟把他收容庇护。当时

鲁部下有个团长何戒僧与孙子成系旧交，孙的儿子为王友邦架票死在吴山，王友邦被击溃逃跑，地方尚有股匪骚扰。孙既痛爱子伤亡，又感家乡不安，遂往碧口何戒僧处去游。他到时，适值王友邦亦在碧口，仇人相见，形同水火。孙子成遂将情况向何戒僧团长详述，并请何为他报此深仇。何素器重孙子成为人，并痛恨王之恶迹，借鲁大昌赴兰州参加军事会议离碧口之机，将王友邦按逃匪罪名枪毙。鲁大昌由兰州返回，对何衔恨在心。何平日读进步书报，据说鲁曾派人在何的屋内搜出有关共产主义书籍一大箱，遂诬陷为共产党人，又将何枪毙。孙子成不敢在碧口居住，又逃回陇县家乡。

3、王子威和王友邦通款。王友邦做寿时，陇县三老之一的王子威，秘密派人向王友邦送礼，并持有名片。王友邦潜逃后，甄士仁在王的老巢搜查，得此名片作执据，回县扬言王以地方老绅与巨匪来往，非依法严办不可，意在威吓，当时由李虎臣出面疏通调停，由县商会给甄部备送优厚财物礼品，才作罢论。王是当时的商会会长，李也是陇县三老之一，与甄士仁有旧交。

4、王友邦对我家的庇护。王友邦盘踞吴山数年之久，我家门口即大路，匪兵过往频繁，但从来不进院内。枣林寨抢劫的当天，也没来我家扰乱。有人说王给部下有命令，不准进我家，其原因据说是王、冯匪首在乞讨时，我祖母给过他二人衣食，我父亲还给王友邦看过病。对王、冯的施舍与看病，我记忆不清，仅系传闻而已。

（陕西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宝鸡恶匪王海山

娄生成　段志恭

王海山比之危害宝鸡的其他人，年纪轻（死时才32岁），兴起迟（民国18年人们才知王海山之名），手段毒，危害大。王从民国18年（1929——1934年）六七年间，祸宝鸡，扰咀头、乱渭北、掠徽县、据灵台，做过别人不敢、不忍做的事情，罪恶累累，令人发指。仅就见闻，陈述于下：

困苦的童年

王海山原名西省，又叫胖娃，宝鸡县八鱼原姚家沟人，幼家贫，母早死，乞讨度日，稍长即离父游荡，流落虢镇（今宝鸡县城），乞食为生。每日向富商大贾讨要些残羹剩汤，聊以充饥。严冬季节，白天讨要，晚间寻个卖饭卖肉的热锅炉，借余灰取暖。

王海山在虢镇乞讨度日，总觉得不是长久之计，产生给人放牛羊或做小工的念头，便北到陈村，东到阳平，却一直找不到这种活儿。并且越往东旱象越严重，最后只得返回家乡投靠伯母。

王的伯母为人善良，将侄儿当自己孩子看待，王深感伯母爱怜自己，对伯母甚为尊敬孝顺。伯母家日子也不宽裕，一到灾年更是清苦，但较之以前乞讨蹲锅炉时毕竟安定得多，便一心一意地过下去。其时王海山的父亲尚在，由于家贫如洗，在外胡逛，也顾不上照管儿子。

做匪首枪毙六娃

王海山投靠伯母时，年龄尚小，还算温顺，年龄一大，思想就起了变化。看到别人手中有枪，就朝思暮想自己手中也有。于是东找知心，西找朋友，入伙为匪。

八鱼有个王六娃，在匪军刘长江手下当过卫士，兄弟二人，从过境败军逃兵中得了几支枪，经常暗里抢劫。王六娃为了扩充实力，瞅中了王海山、康占魁等，先与之交好，后来拉他们入伙。王海山随着年龄增长，坏心眼越来越多，成了心肠毒辣的人。他早有取王六娃而代之之心，便伺机枪杀了王六娃兄弟，独揽枪支，继续劫获散兵武器，扩大联络范围。后来凭借枪多人众，便开始组织乡团。又以保护地方为名，就地征粮派款，八鱼一带百姓深受其害，无有宁日。

助纣为虐害百姓

当时任宝鸡县长的余鸿知，看到王海山势力渐大，称霸一方，私自派粮收款，不受县政府制约，便以招抚方式，委以第七区地方民团长头衔。余以为这样处理，或许对地方治安有所裨益，自己也可保任内太平。岂不知这正是为虎添翼，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这时王海山的粮饷由全区百姓负担，取得合法化，便大肆扩充实力，联络士绅，出入官府，甚嚣尘上。八鱼原一带群众，目睹王海山横行乡里，胡作非为的行径，恨之入骨。如今看到官府如此待王，为避免自己吃亏，只好表面恭维。余鸿知这种养痈遗患的做法，更加助长了王的气焰，抢劫行为变本加厉。当地家道殷实的人家，总是提心吊胆，寝食难安。八鱼原与底店一水之隔，底店百姓受害更大，王时常令部下过河烧杀抢掠。那里的群众忍无可忍，一个叫马神仙的，活埋了两名匪兵。王怀恨在心，意欲报复，许多底店人不得不亡命他乡。

王海山当了团长以后，与堂兄弟联手作恶，搜敛钱财，无法无天。其大堂兄王正海性格残忍，人称大团长，仗势占田霸产，几年内蚕食鲸吞水旱地1000多亩。王海山的堂弟王西魁称三团长，更是贪得无厌之徒，他每晚必凑足100响元，才能安然入睡。人们说："一夜一百，千夜千百，村民日瘦，王家日肥。"

民国20年（1931年），由宝鸡县民团局何雪堂负责收集地方武装，把王海山编为常备第一团，王有喜编为第二团。给养薪饷由县里安排，负责维护全县治安。但王海山仍自行其是，气焰较前更加嚣张，见了别人的好东西，就攫为已有，魏家崖魏显德家中的"楠木玉石屏风"便被他霸占。

随刘南窜扰徽县

民国19年（1930年）刘德才在西北民军任师长，王海山在刘部任团长，曾骚扰渭北三原、泾阳一带。甄寿珊死后，西北民军瓦解，张老九、刘德才等在凤翔杀害李云溪、安方洲、尚天柱等，张跑庆阳，刘窜徽县。王海山、王振江等随刘同去徽县。王海山时任二团团长，王振江为一团团长，他们合伙虐害良民，激起当地回民反抗，到处遭受截击。加之内讧迭起，刘德才以谋反罪枪毙王振江后，团营各自分散。王海山仍回八鱼原，伪装投诚，接受宝鸡指挥部编遣，改名王仁山，表示诚心归服，不再危害地方。其实他的匪性没改，明为解甲，暗藏枪械，继续作恶。一次到虢镇，把靳德录带到夹马村，将他开膛剖腹。

沽名钓誉葬伯母

王海山的伯母死后，一面举行大葬，想落个孝子贤孙的好名声；一面想凭借其显赫的地位弄些银钱。于是张罗筹备，收礼待客。县长石海帆及地方士绅大部分去行礼祭奠。还请了两台戏，群众称为"死人会"。新制酒席桌椅40余组，令七区各村（包括今

之宝鸡市渭滨马营乡及宝鸡县之八鱼乡）纸活匠工都去帮忙，所做的纸杆、纸马、纸人、牌帐、挽联、亭榭、车轿等，花样繁多，数不胜数，从姚家沟直摆到八鱼原二里多路的墓地。正值阳春3月，大片大片的麦苗被践踏，群众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墓穴非常宽敞讲究，用砖明箍墓穴，四门八窗，棺材可以径直送入。来的人没有不送礼的，七区各村较富裕家庭，因怕王匪借端生事，都要送钱物。各村除送其他应用东西外，30多个村，每村还各送肥猪一头。葬前为选坟地和葬日，找来10几个风水先生，勘察周余，七嘴八舌，定不下主意，最后公推鲁继周作主定局，鲁家由此招致杀身之祸。

恶贯满盈遭围剿

明是民团暗为匪的王海山，自从宝鸡县政府公开承认为县民团后，又看到全县官绅亲临祭奠他的伯母，更加肆无忌惮，抢劫烧杀，绑票勒赎，日夜不断。抢来的良家女子，因坚贞不屈，就命护兵王子魁将该女绑在西岔河树上刳成两半，其情惨不忍睹。七区群众除给王团全部吃用外，还要为王之四弟供给学费。全区30多村，每村20块硬币，全年就负担600多元。王海山凶残如兽，连手下的人也难逃魔掌。他的排长苏应坤死后，王以苏的妻子不祥为由，指派兵丁在埋苏时，将其妻也一同活埋。王海山不但亲自杀人，而且纵容部下杀人。匪连长叶永清给父亲做棺材，木匠一时来迟便被枪毙。群众说：“这算什么世道啊！”王海山把持油盐专卖，从中渔利。凤翔人康茂昌卖给群众一点油盐，就遭到毒打。

群众实在不堪忍受，便联名控告，此时董辑五已接替了庄则敬的民团总指挥。董系本县人，情况熟悉，事先拟定好围剿计划，省上又派杨竹松团协助地方民团剿王海山。部队和民团几面夹攻，王匪进退维谷，又加之兵力不支，于民国21年（1932年5月20

日）败逃咀头。王把3个营分散，枪支分藏在店子村任培祥、斜坡村寄尊东家，等待时机，妄图再起。王虽败逃咀头，但抢劫仍旧。到靖口拉来柏恒春父子勒索银元千余、大烟土300多两。在咀头王见何其祥兄嫂有姿色，日夜纠缠，逼得何嫂雨夜逃至山外。王匪部队分散后各霸为王，奸淫抢劫，更是猖狂。

杀鲁全家为报复

王海山深信迷信，又多疑忌，想当初以游花浪子，赤手空拳，竟几次跃上团长宝座。葬埋伯母又是全县为之震动，何以时隔不久就遭围剿？回想埋葬伯母的坟地由鲁继周决定，又想到民国20年在宝鸡枪杀鲁继周次子鲁兴良又霸占其妻的事，怀疑鲁继周一定给他选定了绝地忌日，使他遭受艰险，落得这样结果。于是认为鲁家是最大的仇人。就在当年腊月三十日晚，派亲信吴振邦趁鲁家团圆之际，持枪闯入鲁宅，枪杀了鲁继周及其大儿、三儿，鲁家就此被杀绝了。

枉费心机谋再起

王海山被围剿后，部众东逃西散，他乔装打扮混出潼关，流窜河南郑州，找到了匿迹郑州的刘德才，欲与刘同谋再起，重回宝鸡。但遭到刘的三太太的阻挠。于是又窜到北平找到张老九，张表示同意给予经济援助。王在郑州让人给凤翔、宝鸡、千阳、陇县、乾县、武功等地的狐朋狗友写信，密约集中地点和起事日期，要这些人做好准备伺机而动。

天怒人怨遭毁灭

王海山返里后，匪性不改，多方串联，不长时间又在扶风、岐山、凤翔、麟游等地纠集匪众近800人。王原拟据守灵山，后因情况变化，觉得仍回八鱼原老巢为上策。遂于民国22年（1933

年）秋，将匪徒们带至宝鸡县之周原，想夜渡渭河，不料渭水暴涨，连续数日，只好向北转移。此时各处武装力量配合围剿，又有刘、杨两团协同，王寡不敌众，粮饷又无来源，士兵无心抵抗，王令部队先退，自己在后堵击，后被击毙于灵台唐家山。王海山这条祸根，至此才算彻底根除。

（陕西省宝鸡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我所知道的乌斯满

拉提甫

一、1940年青河富蕴发生叛乱的经过

1939年盛世才通知各县派两三个代表到迪化来开会。这次代表会议开了3个月，到1939年11月各县部分代表才回去。在会议上，盛世才曾命令把群众手里所有的武器，包括枪、刀、子弹，都收集起来，并限北疆青河等7个县于1940年8月，把武器集中到阿山(即阿勒泰)专区。但所有7个县的头目(包括贝子、台吉、乌库尔台、扎楞)连同夏热甫汉托热，被盛世才于1939年9月传到迪化开会时，一起扣押起来。

1940年1月，盛世才又派热斯别克和克日木队长，带领100名士兵，抓走了剩下的青河县头目巴言木拜乌库尔台、巴衣哈达木乌库尔台、苏叶尼扎楞、布克衣汉扎楞、加克斯拜比、沙合沙拜比。

1940年2月27日，盛世才又通知7个县的部落长去承化(即现阿勒泰县，以下同)开会，并威胁说："如果不去开会，就要用武力强迫。"全阿山地区参加会议的人数有500人(其中青河县有60人，富蕴县有70人)。阿山专区的行政长说："在迪化的代表会议上，你们的头目们说：'群众是有枪支的。'你们必须把群众手里的枪支都收集起来，用大车或骆驼运到承化，不能空着手来！"部落长们返回后，未能从群众中找到一支枪。可是盛世才紧逼着大家交

枪。当时头目们想，如果空手去承化，他们是不会罢休，一定会被关押起来的，只好不去。

富蕴县的头目没有收集到枪支，也斯木汉乌库尔台没有上富蕴县去。富蕴公安局派以沙尔奴海为首的3名士兵前来叫也斯木汉。也斯木汉说："我有病不能去。"士兵们强拉他前去。于是双方殴打起来，也斯木汉打死了这3名士兵。从此就引起了武装冲突。

青河县是我的家乡，我也是被叫的人之一。当时我们在青河县附近。我们派那孜尔台吉的弟弟斯牙哈力达衣上青河县去，说到我们没有收集到枪支，因此不去承化。结果派去的人被杀害了。刚巧，也斯木汉派巴拉旁的儿子克斯比提带信来，说到打死3个士兵，引起武装冲突。这样，1940年3月22日，青河县也变叛乱了。

富蕴、青河两县的群众手无寸铁，用棍棒与盛世才的兵打了40天的仗。我们缴获到50支枪。领导我们打仗的是富蕴县的也斯木汉乌库尔台、阿克铁开比、卡的尔拜、吾木提拜比和青河县的热斯汉乌库尔台，射手木沙、阔克赛根乌库尔台、扎铁力拜。盛世才从迪化、奇台、阿山调派士兵和飞机增援。我们死了很多人，眼看就要失败，我们就走了。

1940年5月20日，我们的2000顶房子搬到布力根、沙尔布拉地方。能骑马的男人们都走在群众的后面。所以在布力根战场上，奴哈衣拜乌库尔台等9人，被飞机扫射受伤而死了，扎铁力拜等7人，与步兵打仗时死在一个山头上。在这次迁移中，男女群众，大小牲畜被飞机扫射和步枪射击而死亡的不计其数。哈族群众至今不忘这次屠杀，咒骂盛世才。

我们失败了。大约有1500人（妇孺约500人，其余都是男人）逃向野外。我们分好几批，走了10来天，最后到巴格也布地方才汇合在一起。在荒无人烟的野外，我们少吃没穿，生活十分艰苦。加之飞机还在空中追击扫射，在这样无防御无给养的地区是无法久待下去的，我们决定转移到哈布的克地方去。在哈布的克，我们整

整休息了 30 天。粮食吃完了，就宰马和骆驼吃。最后每人只剩了 1 匹马。怎么办呢，我们开会商量，一部分人包括阿克铁开、热斯汗、阔克赛根乌库尔台主张越过巴里坤上青海去投奔马步芳。另一部分人包括也斯木汗、克的尔拜、吾木提拜比、拉提甫认为上青海的路途干旱，而且从巴里坤到青海，一路上抢不到牲畜吃；主张越过阿勒泰，上富蕴山里去，一面抢牲畜吃，一面打仗。结果，意见不一致，我们一伙 400 人离开哈布的克，来到哈布的克以东的乌蓝拜山水边。这里离哈布的克只有一天的路程。在哈布的克和我们分手的阿克铁开、热斯汗派人来要我们等一等，与我们一同走。我们会合后，走了两天，上了北塔山。盛世才从达布生调 1000 名士兵和我们打了 3 天仗。我们缴获了 13 峰骆驼(驮的是豆面)、5 匹马、3 支枪。不久，粮食吃完了，不得已抢了当地哈族人的 500 匹马。盛世才又调来 2000 士兵，7 架飞机和我们打仗。阿克铁开受了 7 处伤。我们无法在北塔山再待下去，决定到富蕴去。

我在哈布的克到北塔山期间，第一次见到并认识了乌斯满。当时他在也斯木汗的营里管伙食。据他说，他原来是个小商人，来往于阿山外蒙之间，后贩牲畜，1931 年 8 月被外蒙查获而被押了 3 个月。

衡量当时的形势，我们应该到阿尔曼特去。从北塔山到阿尔曼特要走一天一夜。途中要经过达布生。盛世才在青河、富蕴的兵力就集中在达布生，驻有 5000 人光景，就是要防止我们去青河、富蕴。我们在夜间强过达布生，打了 8 次仗，缴获 150 支枪和不少子弹，终于到达了阿尔曼特。我们没有休息，连续打了 6 天仗。阿克铁开到这里两天后去世了。

从沙漠跑到戈壁的一部分土匪——莫里合部落的吉力海达尔、切内其部落的苏来曼、马沙里毛拉等——约有 200 人，全是男的。他们从飞机的来往中得知阿尔曼特地方在打仗，便派吉力海达尔等 3 人来联系。吉力海达尔说："我们有盛世才从青河、富蕴派来

的代表，我们没有放他们回去。”最后，商定在克尔特地方阿克提哈主持的礼拜寺会合。在卡克尔特礼拜寺会合后，我们商量了两天，认为从卡克尔特去富蕴山里要走两天一夜，不但路途难行，而且沿途水口都被盛世才的兵把守着，一路上很艰苦。所以凡是不愿上山的可随同代表们一起回去，不愿回去的，要继续前进，作好上山准备。青河阔克赛根乌库尔台所带领的 200 人决定回去，青河热斯汉、拉提甫所带领的 200 人决定和富蕴土匪一同上山。

二、乌斯满抢劫邮局

在卡克尔特我们和回去的 200 人告别后，第二早上赶到托列克地方。当我们清点人马时，发现也斯木汉部下的乌斯满和 40 个人不见了，还有 3 支枪不见了。显然，他们带枪逃跑了。

乌斯满一伙人逃到哈热布力根。他煽动这 40 人逃跑的理由是：大队人马在一起行走，打仗多，伤亡重；少数人单独行动，目标不容易暴露。他还向大家保证：吃的东西由他负责。可是逃跑以后，马跑瘦了，口粮也吃完了，加上 6 月天气，蚊蝇特别多。大家感到难受，埋怨乌斯满说：你真的要把我们饿死不成，我们要走了。”乌斯满安慰大家说：“我去给你们找东西吃。”他们从加甫沙尔地方出发，白天隐藏，晚上行动。后用柳木做成筏子，浮过克吾也尔特斯河（即额尔齐斯河上游），来到库尔特。这是乌斯满原有的冬牧场，靠近富蕴通向承化的大公路。公路边有一个邮政局，守卫邮局的有 11 名士兵，他们有 4 支枪，100 只山羊、30 头牛马。邮局的附近有蒙族人沙尔加沙等 7 顶房子，约 30 来口人。到了晚间，乌斯满带了他的人去抢劫邮局，把 11 名士兵和沙尔加沙全部打死。乌斯满只带领 4 个人，穿上士兵衣服，呆在邮局里看动静，等候机会再抢劫，他把其他伙伴安排在别处。3 天后，由承化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哈族，一个是汉族——带信给邮局。乌斯满抓住他们盘问。那二人

说："我们带来一封公函，上面说：'由承化出来200峰骆驼，驮的是军用品，要邮局护送到巴拉也尔特斯克郎站，交给富蕴的驻军接收'。"乌斯满又问："是否有兵从承化护送来？"他们说："没有。拉骆驼的全是普通老百姓。"乌斯满听完之后，把那个汉族人打死，把那个哈族人收为部下。乌斯满很顺利地抢到了200峰骆驼(其中100峰全是米麦，90峰是军衣、皮靴之类，还有10峰是各种子弹)他集合部下带着抢来的东西，来到巴拉也尔特斯草原，煽动再叶力乌库尔台部落参加他的队伍。他说："我们的武器很多，回族给了我们很大援助，我们穆斯林联合起来了。"其实，乌斯满这伙人总共只有12支真枪，其他全是假枪——木头做的，外包黑皮。就这样，巴拉也尔特斯和哈热也尔特斯等地方听信了乌斯满，跟着闹起来。

以乌斯满为首的这支队伍由40人逐渐扩展。到1940年9月，乌斯满即与热斯汉、苏来曼、也斯木汉的队伍汇合在一起，将盛世才的兵从山里赶回城里去了。我们随即包围了富蕴县城。

这时，迪化来的飞机，散了不少传单。传单上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你们停止打仗，把要求写出来。"经过商量，我们决定提出几点要求和盛世才方面谈判。

三、第一次谈判及其后果

1940年10月，盛世才派他岳父邱宗濬前来和我们谈判。我们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是释放我们所有被关押的人，第二是青河富蕴乃至阿山的领导不要一个"黑大爷"(指汉族人)，不设公安局。

谈判结果是：领导没有"黑大爷"，秘书可以有"黑大爷"，具体人选，以布哈提担任阿山专区的行政长，贾尼木汗、塔滨担任副行政长；热哈提担任富蕴县的第一县长，卡得尔拜担任富蕴公安局局长；阔克赛根担任青河县的第一县长，哈得尔担任青河公安局局长。

谈判还决定：群众手里的枪全部交归政府。从此，群众手里再也没有武器了（可是到1941年第二次事变时，人们发现乌斯满隐藏了1枝枪和1个望远镜。后来富蕴群众认为他有“胆”，是真正的“英雄”）。

谈判以后，我们给3个人以巴图尔（英雄）称号：第一个是苏来曼（切内其部落人），第二个是热斯汉（卡哈拜部落人），第三个是乌斯满（莫力合、阿衣吐汉部落人）。

盛世才一心想消灭我们，他一面给热斯汉以英雄称号，一面派奸细贾尼木汗把他毒死了。贾尼木汗和热斯汉有一点亲戚关系。热斯汉当时得了一种头痛病。贾尼木汗对他说：“会后，就住在我这里，我给你请医生好好治病”。贾尼木汗给热斯汉服了毒茶，热斯汉全身发肿，不久就死去了。我们当时怀疑是医生害死的。贾尼木汉却说：“我待热斯汉象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决不允许医生下此毒手。”我们相信了贾尼木汗。后来证实贾尼木汗早已卖身投靠了盛世才，作了奸细。群众称他为盛世才的“黑狗”。

盛世才除了用奸细暗算，还处心积虑要用武力消灭我们。

1941年4月，富蕴来了200名汉族人，说是来挖金子的。后来又说这里金子很多，要增加劳动力，接着又来了400名。到6月增加到了800名。当地人没有注意内幕实情。

1941年6月，富蕴公安局长卡得尔拜突然失踪了。第二天秘书（汉族）向富蕴县政府报告说：“卡得尔拜局长回阿吾勒去了，还没有到局。又隔了五六天，晚上，有8名盛世才的士兵到富蕴县政府，抓走了勤杂人员。第二天，热哈提县长从阿吾勒回到县政府，见情况不对头，当天就逃跑了。苏来曼巴图尔得到消息后，带了一些人来到公安局，要求交出卡得尔拜局长，并抢走公安局的30匹马。后来政府派200名士兵到苏尔特的阿吾勒，抢走20多户牧民的牲畜，抓走4名年轻小伙子。至此，我们才明白所谓挖金工人都是盛世才派来的兵。

1941 年 7 月 11 日，富蕴县的哈族头目，联名通知青河县的头目说："政府违背去年(1940 年)的谈判，我们又要反抗了。"青河县头目得讯后，没有立即响应。青河县于 1941 年 6 月间来了 200 名汉族人，也是说来挖金子的。我们没有注意。到 8 月间，200 名盛世才的士兵来到布勒克地方抢走哈族牧民 20 多头牲畜，还打死 9 个青年人。

7 月富蕴起事，8 月青河起事，盛世才调兵 8000 人来到富蕴和我们打了 6 次仗。

四、第二次谈判及其结果

哈列力台吉写信给富蕴县的盛世才代理人说："我们主张停止打仗，你们派人来谈判。"富蕴把信转给阿山，阿山又转给迪化当局。盛世才随即派贾尼木汗前来谈判(前面提过，这时候我们还未觉察到贾尼木汗是奸细)。

贾尼木汗当众说："我嘴里说的是胡达，怀里抱的是经典，只要你们停止打仗，政府会遵照谈判协定，将所有汉族人调离富蕴。"他这样起誓保证，所有富蕴的哈族头人，包括哈列力台吉都相信了。

这次谈判，我们没有提出要求，相信贾尼木汗的保证，以为政府会遵照 1940 年谈判协定办事，所以我们就解散了哈族队伍，让盛世才的士兵进驻富蕴县城。贾尼木汗邀集所有哈族头人进城，把我们当作客人那样招待一番。在富蕴城开了几天会，随后，我们将散落在群众手里的枪都收集起来，交归政府。

贾尼木汗代表政府，让我们进行选举。他说："哈热塔斯地方比较合适，你们可以在那里进行选举，有声望的头人都请到那里会合。"

为了选举，哈列力台吉、也斯木汉、哈力曼、热哈提、卡日衣等 17 个头目都来到哈热塔斯，贾尼木汗也到那里。迪化方面事先派

来飞机，停在那里。贾尼木汗用欺骗手段，把17个弄上飞机，送到迪化，被盛世才关押起来。最后只活下3人，其余14人都死在盛世才的监狱里了。

可是贾尼木汗的诡计，没有使狡猾的乌斯满上钩。在第二次谈判中，乌斯满不相信贾尼木汗。他不愿投降，也不交出武器，悄悄地带了30顶房子逃往沙漠去了。

五、乌斯满第二次单独活动

1941年冬季，承化方面派出3个代表找到乌斯满落脚处，叫他投降。这3个代表是阿山的马美拉赞根、青河的鲁瓦提汉、富蕴的马高维亚扎楞。乌斯满说："你们还不如贾尼木汗。请问谈判的17个人那里去了？"乌斯满夺下他们的马，打发他们步行回去。

1942年3月，由富蕴县派出一支部队，包围乌斯满的阿吾勒。乌斯满和另外4个人逃到哈热玛依力地方，追兵没有找着他。5月，乌斯满回到富蕴的布登哈热地方。这时候，乌斯满的弟弟表示不愿再跟哥哥过流窜的生活，要想回去。乌斯满给他一支枪，并让他带信给富蕴县，说乌斯满本人也愿意投降。结果，他弟弟一回去就被富蕴的公安局逮捕了（乌斯满只有这一个弟弟，1943年解往迪化，后来死在盛世才的监狱里）。

就在这时候，富蕴公安局传切内其部落的克列斯到城里去。克列斯在1941年曾同苏来曼巴图尔到公安局闹过事，要求交出卡得尔拜局长，并抢过公安局的马。克列斯知道苏来曼已死，匹马单枪去，一定没有好处，于是决定和儿子一同逃离家乡。他们在库尔特克孜力恰克同乌斯满等一共5个人又逃到离北塔山很近的哈热玛依力。克列斯有一个亲戚叫马力克阿吉达尔毛拉住在北塔山，他们决定找他探听消息。克列斯带着一个伙伴前往北塔山。哪知找错了，来到另一个阿吾勒。这里的哈族人都知道他们是逃匪。克列斯

只好说："我是来找马力克阿吉达尔毛拉的，我们准备通过他告诉马尔提（北塔山地方的公安局长）说，我和乌斯满都愿意投降，要他派代表。"这样，人们就帮他找到了马力克阿吉达尔，克列斯将错就错地对他说，你明天到公安局去报告说我到你的阿吾勒来过，并转告他说："我和乌斯满都愿意投降，请他派代表去沙尔也西克找我们谈判。如果公安局派你的话，你也别害怕，大着胆子来找我们好了。"第二天，马力克阿吉达尔到公安局去报告，公安局果然就派他和马赛、赛依提3人为代表去沙尔也西克找乌斯满。结果没有找到就回去了。公安局认为他们是同情乌斯满这帮土匪，要把他们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这3个人只好投奔乌斯满。他们一伙8人离开哈热玛依力地方，返回富蕴。在富蕴的吐尔根作了商量，认为8个人在一起来来往往，容易暴露目标，分散开就更机动安全。于是乌斯满和他两个儿子为一伙，克列斯父子和马力克等3人为一伙，在1942年6月分开活动。临别时，他们商定到9月的5、10、15这3天大家到沙尔布拉克的一个高峰上，晚上会面。谁在这3天内来不到，谁就不在世了，其余的人另找生路。分手后，乌斯满等逃到湖苇森林地带，克列斯等逃到富蕴的多尔根沙尔哈热哈衣地方，分别隐藏起来，偷吃群众的牲畜度日。过了夏天，他们在9月10日到约定地点平安地会面了。冬季开始了，他们合伙到沙漠，在阜康一带，这时候从迪化监狱里逃出2个人来（其中一个名叫阿力吐热）投奔他们。这样乌斯满的匪伙就有10个成员了。

乌斯满从1943年7月到1946年7月这3年中，以10来人的小股土匪发展成为独霸阿山地区的巨寇，自称为哈萨克王。1946年8月，投靠了国民党。

六、乌斯满反对三区革命投靠国民党

乌斯满与苏力曼、奴尔和加衣（都是卡哈拜部落的）在三区革

命前曾出力打过仗，在三区革命后，，没有给分配工作，他们心怀不满，于1945年8月带10几个人投降了国民党，随即搬到沙漠地带过冬。1946年1月，他们派奴尔哈生木（是奴尔和加衣的弟弟），到迪化与贾尼木汗联系。他们给贾尼木汗的信上说："阿山变成赤色了，乌斯满待我们也不好，如果我们到迪化，会不会对我们有好处？"贾尼木汗将此情况报告了他的国民党上司。国民党上司通过贾尼木汗写信给哈帕斯（和苏力曼、奴尔和加衣一伙的，是乌斯满的亲信）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1946年2月，哈帕斯把贾尼木汗的信带给乌斯满。同时，贾尼木汗另外写信给乌斯满，让奴尔哈生木带回。信上说："如果决心叛变（指反对三区革命）的话，可派代表来。联系地点是九龙街附近，靠沙漠的地方有一个单独的村庄。村长叫大石，回族人，你们的代表找到大石，就可以和我联系了，你有什么要求，张治中都会答应。这里有我可以代你办理。"

1945年10月阿山解放，进行选举，乌斯满拒绝参加。但人们还是选他为阿山区专员。乌斯满并未往承化到任，还留在富蕴吐尔根家里。12月10日伊犁来人通知要乌斯满去参加三区和迪化谈判的会议，他也不去。后来我代表阿山出席了谈判。我于1946年6月回来即将谈判签订的十一项和平条款告诉了乌斯满。乌斯满却很生气。那时他已和迪化勾搭上了。

乌斯满一面不动声色地住在牧区，一面把大石送到富蕴库尔特种大烟，隐蔽起来。8月，他派哈那提拜、哈哈夏、大石3人带他的信到迪化。贾尼木汗报告了宋希濂，宋当然欢迎乌斯满投靠国民党的这一行动，所以给乌斯满送去一架收发报机和两个管理机器的技术人员（汉族），一件皮大衣，500块砖茶，40匹呢绒，50匹绸子，100匹各色布，用10峰骆驼驮着，派回族人居尼斯护送到哈热洞克。同时迪化方面又派胡赛音县长和3名汉族职员来协助乌斯满工作。贾尼木汗就作为乌斯满的驻迪化代表，他因拉拢有功，当

了新疆税务局局长，不久又升为财政厅长。

七、我是怎样和乌斯满混在一起的

1946年冬天来到之前，我被任命为阿山专区税务局局长，一直住在承化。所以乌斯满在牧区搞的叛变活动，都不了解。冬初，我向达列力汉（是选举出来的阿山副专员，乌斯满不到承化办公，达列力汉就代行专员职责）请假回青河家乡。当我从青河回承化时，交通已被乌斯满封锁，回不去了，我只得去拜访乌斯满。他问我："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我说："请假回青河，现在要到承化去销假，可是路已封锁，回不去了。你如果允许的话，我就留在你这里，否则就回青河家里去。"他说："先住下，以后再谈"。第二天，同他手下的4个委员阿的力汉拜、木汉买提江、哈山赞根、莫木拜（都是乌斯满的参谋）进行了交谈。乌斯满对我说："你们三区革命和迪化的协定，远不如我现在所得到的胜利。你看看我的力量：第一有收音机（即收发报机）可以直接和迪化联系说话。第二、三天以后，飞机就会来到。今后我所需要的东西可以马上用飞机运来，现在正在修飞机场。你去亲眼看看，再回青河不迟。"

当时，乌斯满手下有200名士兵——一半是他在富蕴征集的，一半是马那提从福海带来的；还有4个委员，1个哈孜，名叫哈帕斯木夫提（就是和贾尼木汗秘密来往的人）。

我在这里参加劳动，修了4天飞机场。乌斯满相信了我。他说："你可以回家去休息1个月。先在铺子里挑选一些你所需要的东西。"我拿了1匹人字呢，1匹花洋布，10米呢绒，15米绸子，10块茶——这就是我投奔乌斯满所得到的东西。

我回青河休息。到11月底乌斯满派人来叫我。我和青河的所有头人商议：究竟去不去？他们都说："要是你不去，乌斯满就要抢我们的牲畜，不让我们安宁，我们派人带信同你一道去见他，这样

我们才好安生!"我同一个人来到乌斯满跟前。乌斯满说:"张治中来电:要我派人去迪化接受援助。我决定派4个代表前往,你也在内,因为你懂得财务,由阿的力汉拜率领。不知青河的人是否愿意合作,你本人是否愿意去?"我们把青河头人的信交给乌斯满,并表示愿意,他也表示欢迎。

1946年12月28日,我们一行8人,外加迪化方面的一个汉族,一个哈族,10人同行。到了迪化,我们住在贾尼木汗的院子里,1947年1月17日张治中接见了我们,我们把乌斯满要求支援500支枪、40挺机关枪、1万发子弹的信交给张治中。过了两天,张召见我们说:"我要去南京,需时两月,你们暂且住在这里,乌斯满所要的枪支都可以给。"他对陪我们同去的贾尼木汗说:"你要很好地照顾他们的吃住,他们骑来的马可交士兵喂养,其余的,由刘秘书长(孟纯)处理。"

我们在迪化呆了3个月,还不见张治中回来。1947年3月底,贾尼木汗和刘秘书长叫我们去说:"现在乌斯满和达列力汉打起来了,这事做不得。明日你们得赶快回去,叫他们停止打仗。不管怎样,阿山是乌斯满的,我们会把阿山给他夺回来。"我们说:"支援武器的事,回去怎样交待?"刘说:"我们已送去300支步枪,20挺机枪。其余的等张治中回来后,再由奇台送去。其他详况,通过收发报机联系。"

1947年4月我们由迪化赶回,路上只走了6天,累死两匹马。我们见了乌斯满,劝他停止打仗,乌斯满不听。胡赛音从旁煽动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这次战争是宋总司令(希濂)指挥的。战事如果扩大,就从奇台调韩师长的兵力来,不夺取阿山不罢休。"战事没有停止,我也只得参加。7月初,我在与达列力汉打仗时受了伤,打断了一根腿骨,在北塔山的吾增布拉克养了3个月。

八、乌斯满与宋希濂勾结

在乌斯满败退北塔山前夕，奇台的国民党驻军韩师长调来60名回族、40名汉族共100名士兵归乌斯满指挥，并送来200峰骆驼驮的子弹。乌斯满得到支援就带领所有兵力向山区转移。当撤到布登哈热地方时，遇上了达列力汉部队的封锁。双方就在乌斯满的阿吾勒里打起来了。迪化来电：要我们撤向北塔山。于是我们把家眷留在青河，与乌斯满一道，带了100士兵，200骆驼来到了北塔山。

在我们到北塔山之后，韩师长命令派来的60名回族士兵撤回奇台。我们开了一次会，乌斯满、马那提、胡赛音、居尼斯……等很多人都出席了。会上决定派马那提和我马上到迪化去请求国民党军事负责人支援人马武器。我们两人同60名回族士兵回到奇台，先访晤韩师长，韩用汽车把我们送到迪化的贾尼木汗家里。他带我们去见宋希濂，交谈之后，宋决定先派4辆汽车运面和茶给乌斯满。让我随汽车先回去，让马那提留下继续办别的事。宋对我说："回去告诉乌斯满：我们就派军官去见他，以便了解具体情况，更好地满足他的要求。"宋又对贾尼木汗说："你叫你的儿子(哈米提)和哈德万(艾林之妻)的儿子(扎克汉)随拉提甫一同去见乌斯满。"此外，宋赠我一枝十响匣子枪，一块毡子，并对我说："你把家眷丢在青河，一人跟着乌斯满，我们以后安排，你别生气。"我们3人乘坐运茶和面的车到奇台，先见韩师长。韩派马副官一同去见乌斯满。我们5个人带着4辆汽车的茶和面，还有5匹骏马，于6月初到北塔山。

这时青河的艾山乌库尔台衣得日西赞根为首的100户人家，在赛克布力太的地方叛变，向北塔山潜逃。乌斯满派他的亲戚再叶力带领40人去接应，中途和达列力汉所派的奴斯夫江(维族，我们

当时称维族为"沙尔提")带领的60名卡尔里官兵(达列力汉自称其士兵为"土耳其斯坦"士兵,乌斯满称他们是"卡尔里"士兵,意即坏人)打起仗来。结果这些追兵和他们所乘的汽车均被俘获。后来,青河的莫力合部落及一些蒙族头人吉力海达尔、衣马多力达、哈哈尔曼、塔海、吾西尔加甫、吾西尔巴特、哈拜、哈因、吉力克其、阿不得哈力等派4人来,给乌斯满和我的信上说:"我们也要去投奔你们,请派兵来。"乌斯满即派哈帕斯巴图尔带领百人去接引。我到北塔山,他们已出发了。哈帕斯等行至沙尔托海,水涨难行,请再加派些人。乌斯满就叫我亲自去一趟,顺便接家眷。我们接引500顶房子的迁移,一路和"卡尔里"打仗,我的马受伤而死,我也受伤。大队来到青河边。因水涨,小畜都落在"卡尔里"手里。我们带了大畜来到别衣特克乌斯满跟前。

1942年7月初,青河群众因失去小畜和先来的群众都受到饥饿的威胁。这时候韩师长派来500士兵,奇台哈族也派来200游击队。乌斯满亲自指挥,和北塔山以东的对手——外来部队打了一个月的仗。

在北塔山闹了一年,乌斯满于1948年5月被迫迁移到吉木萨尔县。他怎能甘心罢休呢?他从吉木萨尔派胡赛音、谢尔德曼、哈那提拜到迪化请求援助。宋希濂先送给乌斯满2顶白色毡房子,100匹布,300块茶,让他们带回,随即于6月底,宋派扎克青来邀请乌斯满去迪化。乌斯满同意了。

1948年7月10日,乌斯满同70名头人,100名士兵来到迪化。国民党政府派贾尼木汗的大儿子达列力汉、扎克勤、省府秘书长艾沙率领百人到郊区迎接。事先,国民党准备了10顶毡房子,20顶白帐篷,照乌斯满的意思安置在水磨沟(因乌表示到迪化后不愿住城里)。我们在迪化一共住了8天。

在这里有一段插话。乌斯满到迪化,双方都象演戏。乌斯满大摆威风,国民党来一个虚情假意的盛大欢迎。乌斯满在动身前,强

迫召集青河、富蕴的头人约270人到介别湖地区(奇台与吉木萨尔之间),挑选体面的头人70名,随侍左右。要他们做出尊敬服从的样子,好在国民党官僚面前摆威风。他还从群众收集(实则是抢劫)了40匹好马,再从40匹中剔出次马,从头人坐骑中挑出好马来补上,结果连我的坐马也征了去。这40匹好马是献给迪化的国民党头子作礼品的。国民党方面布置了4次盛大招待:第一次是总司令宋希濂出面请客,客人百余人;第二次是专员公署出面请客,客人80余人;第三次是维族文化促进总会出面请客,由和加尼牙孜阿吉主持,还送给我们200匹大布,70匹黑布;第四次是贾尼木汗、扎克勤以哈族名义出面请客。乌斯满为什么能劫持青河富蕴的头人?为什么国民党反动派要利用乌斯满?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乌斯满有300名士兵的实力(其中100名是从他自己的阿衣吐汗部落征集来的,100名是由承化、吉木乃逃来投奔他的,还有100名是由哈巴河县哈鲁唐逃来投奔他的俄罗斯兵)。乌斯满利用这300名兵力,抢劫并欺压人民。

这一次在迪化,乌斯满和宋希濂签订了协定,内容是:扩充乌斯满的武装力量到1000人,军饷由迪化的财政部门负担,由国民党军队派100人去协助乌斯满训练,驻军地点在吉木萨尔县的三台,留一个人在宋希濂那里做联络工作。宋亲自送给乌斯满1枝手枪、1架望远镜、1把刀、还有100块茶、几百匹布(乌斯满分给我们每人2块茶、1匹布)。

乌斯满派哈衣木哈孜留在迪化宋希濂跟前,他和同来的人回到吉木萨尔,驻扎三台,开始征兵,只征到600名,由哈帕斯、马那提、胡尔曼、奴热克4人(团长级)分别带领,军饷由哈衣木哈孜直接向迪化领取。从此,乌斯满又活跃起来。

九、乌斯满与马克南的勾结

1947 年，我腿骨受伤，在北塔山的吾增布拉克地方养伤 3 个月。有一天，乌斯满和哈那提拜来探望我。乌斯满和我谈起他第一次和美国领事马克南会面的经过。

他说："美国领事同 3 个人来到了北塔山，就在我的阿吾勒搭起帐篷，住了 4 天。他来的目的是测绘地图。领事对我说：'把我送到北塔山的顶峰，我们要绘图。'我就亲自送领事到北塔山的最高峰阿勒特怒巴。正在绘图时，被外蒙驻军发现，开了枪，把领事的帽子打落在地上，领事慌忙地逃到我家里。"

1948 年 7 月 16 日，乌斯满到迪化的第 7 天，上午 9 点钟，原先同我们认识的一位回族人叫尤奴斯（即马尚贤）带一名士兵坐小汽车到水磨沟乌斯满的住处。不久，乌斯满把我叫了去（当时乌斯满的小儿子那比也在场），我同尤奴斯握手见了面。乌斯满对我说："司令（宋希濂）叫我同你一道去一趟，这是秘密的，别告诉旁人，你把好衣服穿上吧！"我说："我再没有好衣服了。"尤奴斯说："这身衣服就可以了，司令单独请你们两位的客，又不到别处去。"乌斯满没有带副官和士兵，只带他的侄儿哈布力巴里和他的女婿额布西旦。我们 4 人坐汽车来到宋希濂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已经坐着 2 个人，宋希濂给我们介绍其中的一位说："这是美国领事马克南先生，你们在北塔山已经见过面，还记得么？"乌斯满说："不错。"我是第一次见到马克南。

马克南说："你来迪化，很好。美国和中国是好朋友，你是中国的一个好样儿的。"乌斯满说："从前我就听说过，中国和美国是好朋友。美国的科学技术是最高明的，我请求你支援新式武器。我听说美国有一种可以从山这一边打到山那一边的武器，还有可以越山远望的望远镜。为了两国的友谊，请给我新式武器。"马克南听完

他的话，问我："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没有别的见解，巴图尔（指乌斯满）的建议就是我们共同的愿望。"马克南说："美国有强大的技术力量，在世界上美国是无比强大的。如果迪化遭到困难的话，美国有的是飞机，打一个月的仗，就可以解决问题。你需要新式武器，好，你先派人来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技术。"最后，马克南说："今后我们可以通过总司令来联系，你派一个人在总司令跟前做联络工作吧！"

我们派哈衣木哈孜留在宋希濂那里。在1948年10月，我们派4个青年去接受训练，其中1个名叫扎列拜，另外3个名字我不清楚。

从1948年5月以后，我和乌斯满的关系不很好，机密的事情他不告诉我了。他和马克南有什么秘密勾当，我就更不清楚了。

到新疆解放前夕，乌斯满和贾尼木汗把马克南秘密地从迪化带到巴里坤隐藏起来。乌斯满、贾尼木汗和苏力唐夏日甫、卡拉黑旦商议，决定派4个人护送马克南到青海。从巴里坤送马克南到青海的有孜热提拜、哈日衣哈等人，在青海迎接马克南的是哈木，从青海送马克南到边界的是尼合买提。

马克南与乌斯满分别时，对乌斯满说："从西藏去巴基斯坦有个地方叫太吉奴尔，你可以带领所有哈族到那里去。你到了那里就可以得到美国的援助。"1949年9月20日，马克南离开新疆。

以上乌斯满掩护马克南逃跑的经过是吉尔特克、尤奴斯告诉我的。尤奴斯是乌斯满的翻译，又是亲戚。马克南从迪化到巴里坤，又从巴里坤去青海的时候，尤奴斯在乌斯满身边。

十、坚决与人民为敌的乌斯满

乌斯满是个文盲，出身是小商贩。办事主观，对人残暴、多疑，反复无常。

1949年8月，贾尼木汗派二儿子哈米提、哈力别克、阿不斯旦拜，哈德万的儿子扎克汉、吾热孜拜毛拉、卡依毛尔旦、塔克曼巴图尔等15人在乌斯满家（切别湖河流上游的渠根大夏牧场上）开了3天会，商议如何煽动住在迪化附近各地的哈族，起来叛乱，反对和平解放。他们明知在新疆是立脚不住了，所以企图劫持群众逃往青海。商议决定：第一，由贾尼木汗、吾热孜拜毛拉、卡衣毛尔旦负责挑起昌吉、呼图壁一带哈族人的叛乱；第二，由哈力别克、萨力斯挑起南山一带哈族人的叛乱；第三，由阿的力汉·莫木拜、阿不都热合曼拜挑起阜康一带哈族人民的叛乱；由乌斯满、胡赛音、沙力克挑起吉木萨尔、奇台、木垒一带哈族人的叛乱。

贾尼木汗还从银行里盗窃了30峰骆驼的珍贵物品，作为反革命的资本。

我自己在解放前是反对三区革命的人，又做过乌斯满的帮凶。可是当乌斯满挑起叛乱，企图逃跑之时，我的想法和做法和他有了分歧。我想："现在天罗地网，到处一样，要脱离是没有法子的。我只有劝阻群众，不要再叛乱迁移，不要让妻儿老少再受罪。要是真的走投无路，至多把我一个人打死。"我还听说，人民解放军对投降的人宽大不杀。所以我就回到自己的库力莫力合部落，到每个头人家，劝说他们不要再跟乌斯满跑了。这样，我们部落的400顶房子决定不搬。另外，卡日衣赞根的200顶房子，沙力克台吉的1000顶房子，瓦黑衣提的500顶房子都决定不搬。而且已由阜康搬到乌斯满跟前的阿的力汉、莫木拜等听说我不搬，他们想："我的罪不比拉提甫大。他留下，我们更可以留下了。"他们也决定不搬。

从乌斯满跑到巴里坤，用欺骗手段煽起哈族叛乱和人民解放军顽抗，直到他被活捉枪毙，还有一段复杂过程。但由于我已和乌斯满分了手，详细情况就不知道了。

（选自《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草头王包布拉及其覆灭

土布生　纳木加口述　丁尽　王洛　王武魁整理

包布拉系蒙古族人，祖上以畜牧为业，不能温饱。包布拉青年时期，为生活所迫，带家人背井离乡，流入新疆境内寻找活路，四十年代初又流落至甘肃北岩泉一带游牧过日。当时该地区蒙古族部落与哈萨克族部落发生冲突，时常聚众械斗，闹得地方不安。在这荒乱年月，包布拉为了在此立足，带领胞弟、儿子、女婿纠集亲友及当地蒙古族平民持械自立，发展个人势力，明抢暗夺，啸聚草原，以"枪准头"称雄，遂沦落为匪。

1944年，蒙古族、哈萨克族部落纠纷再起，包布拉同当地蒙古族部落头人因缘时会，合枪并马与哈萨克部落频频械斗，使哈萨克部落元气大伤，迫迁他乡。自此，包布拉声势大振，一些流民投奔入伙，这更使他屡次纵匪抢掠，四处骚扰，害得百姓不得安宁，人们称他为"草头王"。

追随马英九

1947年，哈萨克人乌斯满匪徒窜扰甘北地区，岩泉国民党驻军头目马英九深感势孤力单，处境危殆，即派员携带银元、枪支弹药前去唆动包布拉聚匪策应，共同对付乌斯满。包布拉得到厚礼，盘算投靠国军名位有望，加之与哈萨克已结冤恨，欣然应许，表示愿意死力相助。后来，马英九与乌斯满交战时，包布拉瞅准风头，聚

人侧击勇猛冲杀。乌匪两面受敌，死伤惨重，遂向北溃退。马、包合力乘胜进击，直至甘、新交界，才罢兵回防。马英九在此战中看到包匪冲杀刁顽，包又有一手百发百中的好枪法。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设宴为包布拉庆功，并委任为副司令。为此包对马卑躬谦词、执礼甚恭，时送重礼，表示忠顺。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包布拉虽归马节制，表面唯命是听，但匪性难改，看到自己的匪伙粮饷不敷，就明里暗里外出干掠抢之勾当。然又怕被马发现，恐遭不测，于是脚踏两只船，混迹于兵匪之间，并趁机壮大势力，解放前夕，包布拉的家族亲信已达50余户，枪兵百余人。

河西反共活动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西进，国民党军土崩瓦解，马英九部奉命在甘北岩泉地区组织所谓"西北反共救国军"，自任司令，封包布拉为副司令。包获副司令头衔，欣喜若狂，认为时来运转，遂与马英九策划作垂死挣扎。时值人民解放军向新疆进军，马、包率残部多次寻机向解放军零星部队偷袭，拦劫运输汽车，气焰十分嚣张，后经解放军进剿，在作战中，包布拉长子旦巴被打断手臂，大女婿东吉布的大腿中弹后被匪伙用马驮逃才免于一死，马、包目睹众匪徒死的死、伤的伤，溃不成军，匆匆逃回岩泉老窝。

是年9月，酒泉解放。解放军酒泉指挥部为了解岩泉马英九、包布拉残匪的活动情况，组织侦察小分队。由某部严秘书率领，化装成商人以做买卖为掩护进入岩泉。此时包布拉匪伙恐遭解放军围攻，人心惶惶，几个亲信劝包尽快脱离马英九，远逃西藏。包受马掣肘，欲逃不能，欲留不成，一筹莫展。深入岩泉的解放军侦察小分队一面暗中向群众宣传全国即将解放的喜讯及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一面侦察马、包的兵力和动向，并将情况及时向酒泉指挥部报告。这时酒泉建政，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严秘书按指挥部

指示精神，暗中促使包布拉家族中较开明的人士沙木腾久荣到酒泉参加会议，会议期间解放军酒泉指挥部专门找沙木腾久荣多次谈话，鼓励他回岩泉后做包布拉及其亲信骨干的策反工作，争取和平解放岩泉。临走时，还送他两只枪作自卫之用。沙木腾久荣返回岩泉与侦察小分队暗中多次接头，并根据严秘书的布置，利用给包布拉等同伙传达酒泉会议情况之机，详细讲述了共产党的政策、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以及解放军岩泉指挥部对包布拉的态度和希望，并规劝包审时度势早作定夺。

然而愚顽不化的包布拉不但未受感召归向人民，反而对沙木腾久荣产生了怀疑，对沙的行动严密盯梢，当获悉沙和严秘书等人接触甚繁，随即带打手闯入沙的住宅，软硬兼施，逼问严的来路。沙深知包的为人，虽是患难与共的亲朋故旧，一旦背弃就会招来杀头之祸，又联想到包对自己的恩恩怨怨，就把解放军酒泉指挥部对他的谈话以及严的真实身份等向包全部作了交待。包布拉顾念沙效忠有功，又考虑到他在匪伙中的威望，深恐激起匪变，为了笼络手下，防止分崩离散，对沙不再深究，只是好言安抚；而对严秘书等人派出得力亲信跟踪打探，以防不测。一天，包在酒后给沙木腾久荣透露了寻机杀害严秘书，武力解决解放军侦察小分队，南走西藏，以图将来的行动计划。沙表面道好，声称上策，可沙心里知道，大局已定，继续与共产党为敌，只能落个以卵击石的悲惨下场；而自己跟包则亡，背弃则又不忍，沙思谋再三，想出了既不与解放军结怨，留条后路，又保包布拉不死的花招。等到包行动之夜，沙一面向严秘书告密马、包在天亮前要击杀严和小分队，然后外逃的行动，要解放军侦察小分队早作防备，并建议向酒泉指挥部报告，派部队攻打岩泉；一面急忙去包处，声言得到可靠消息解放军今夜要进攻岩泉。包本是惊弓之鸟，闻此情报，心如火燎，未及与马英九联系，只带邻近的少数匪徒和胞弟浩特、儿子旦巴、女婿东吉布及其家眷连夜仓惶出逃。解放军酒泉指挥部接到严秘书报告，考虑到马、包一

旦外逃祸害无穷，火速派出部队进击岩泉，天亮时分，解放军包围了马英九兵营及包布拉匪伙，经短时战斗，就消灭了马英九残兵和包布拉尚未带走的匪徒，解放了岩泉，但是包布拉及其亲属早已逃窜。

落网经过

包布拉残匪自岩泉脱逃后，闻之马英九残部和自己所留的众匪已被解放军消灭，更加惊恐不安，遂风餐露宿，向南疾窜，进到柴达木边缘才松了口气。时值隆冬，大雪封山，无法上路，于是就在荒漠隐藏，狩猎过日。

1950年春夏之交，包又带匪护眷继续南逃。是年深秋，行至马海地区，被流窜的美国间谍马克南、国民党哈萨克专员尧罗博斯、国民党都善警察局长哈里以及18名白俄分子包围。天亮时，这伙人用重机枪向包布拉营地上空射击，威逼包交出马匹给养，包自感势孤力单无力硬抗，壮胆出面交涉，费尽口舌，才反仇为友，以带路合伙进藏为条件，平息了这场变故，在路经都兰诺木洪艾斯力靳时恰碰早在和哈萨克争斗中相识的太吉乃旗的保长乔四楞，两人商谈并征得马克南等人的同意，决定暂在该地藏身过冬，让乔四楞以放牧为掩护，打探都兰地区解放军的情况，若情况正常就在乌尼生陶里哈（一座大灰土坡）上画个"○"，发现意外，就在"○"符号中间划一横杠。都兰人民政府获悉哈萨克匪徒在诺木洪地区活动的情况，立即派县公安总队前往进剿。部队到达诺木洪时，乔四楞主动找总队领导，一面安排住宿，并谎称长期在周围放牧，未发现有哈萨克匪徒；一面连夜去乌尼生陶里哈上划记号报警，返家后又考虑到包布拉一伙在此人生地不熟，逃不出去就麻烦了，于是就派自己人乌托查汉给包匪带路出境。

漏网的包匪庆幸自己能安然脱险，不敢乱窜，继而不顾严寒，

带着马克南一伙艰难跋涉，月余后到达西藏拉萨。在拉萨，马克南一伙凭借帝国主义势力，再也不顾及包匪，让包自谋生路。包在藏举目无亲，无法立足，于1951年春离藏返回诺木洪的乌努洪山区苟延残喘。是年10月，过惯了酒肉生活的包衣食无着，处境艰难，眼看寒冬即将来临，深山野沟里难以抢掠度日，便与沙木腾久荣密议进退善后之策，要他以酒泉人民代表的身份携带妻儿等5口人以迁户名义进入巴隆滩落户，试探共产党如何对待，若能允许立足，派人联络作全部迁入的打算，妄图一有风吹草动，趁火打劫、东山再起；如有危险则迅速回山，另作他图。沙到巴隆不久就被人民政府逮捕，经数次提审，沙死硬不言。然沙木腾久荣的出现，说明包布拉残匪肯定就在县境内诺木洪南山一带。于是成立了剿匪指挥部，总指挥是县公安局长纪炳文，进剿部队除县公安干警外，还有解放军驻香日德骑兵连，由宗加、巴隆、香加、太吉乃旗民兵自卫队编成的骑兵连（由四区区委书记齐英才、自卫队总队尕才仁指挥）。指挥部命令民兵骑兵连在巴隆夏拉艾里格整训，克期待发，并派出小部队进山侦察包匪动静，作战斗准备工作。12月初，被困在乌努洪山区的包布拉久等不得沙的音讯，急不可耐，又打发一喇嘛领一小匪冒充活佛到宗巴滩探听沙木腾久荣的消息。但这两人在途经宝尔汉布达山时，被宗加旗巡山民兵抓获，当即带到巴隆夏拉艾里格民兵连部，后押送县公安局拘留。进狱的当天夜里喇嘛畏罪上吊自杀，第二天小匪就无所顾虑地供出了包布拉的匿藏地址及其他所知的一切，并表示愿意带路去追捕包匪。

1951年12月23日，县公安队、解放军驻香日德骑兵连奉命赶到夏拉艾里格与四旗民兵连会合，并火速日夜兼程进军诺木洪。第三天黎明时分，兵临诺木洪老城，经多方了解尚未发现匪情。剿匪指挥部决定抽出百余兵力留守诺城以作接应，主力则立即开拔，当日赶到田格里宿营。26日部队顺乌努河沟向马努洪山脑进发，于28日抵达目的地。再说包布拉原与喇嘛2人约定25日在乌努

洪山口碰头联络，可到了27日仍未接上线，包断定凶多吉少，一定又出了问题，眼见情势危急，仓惶与胞弟浩特、儿子旦巴商量如何应付困难。旦巴再也不想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主张自首投降。包兄弟2人虽有此心，但又感到罪恶深重，共产党轻饶不了他们，最后决定宁可战死也不投降，旦巴见父辈死到临头还一意孤行，就叫手下准备动身，脱离匪窝，包鉴于父子之情以"合则存、离则亡"等语劝阻，浩特眼看众叛亲离，为稳定匪心，一怒之下将侄儿的贴心随从一家3口人开枪击毙，旦巴闻悉至感愤怒，然奈何不得，自料难以脱身，只好含恨随包迁营转移。是日晚，进剿部队由于有所俘小匪的带路，提前到达包的营地附近，可迟了一步，包匪已潜逃。指挥部下令部队就地宿营，派出自卫总队长尕才仁带人连夜侦察包匪去向。尕才仁奉命率部外出，途中发现一对男女和一小孩的尸体，旁边篝火残灰中还有点点火星，立即派人向指挥部报告，总指挥纪炳文和其他指挥员研究，认为此处山高沟深，地形复杂，不宜在黑夜出击，决定等天亮再分兵进剿。第二天拂晓，兵分三路搜索前进，天大亮时就发现前面高山间扎有五顶花布帐篷，指挥部下令部队火速从三面包围并架起数挺机枪朝天开火，以威慑残匪，同时组织民兵喊话，要包匪投降。包布拉听见枪响，跑出帐篷，眼见已被解放军、民兵层层围住，情知无路可逃，只好举手就缚，匪伙也缴械投降，此外还有28峰骆驼，30头驮牛，3匹骡子也成了剿匪部队的战利品。在清点俘虏时，发现包的胞弟浩特漏网，速派出一个班追捕。当夜浩特逃至一大石崖处，凭险顽抗，不肯就范，次日才将其捕获。1952年1月，剿匪部队押解包等35个匪徒及家眷，带着战利品凯旋返县。自此，包布拉这个土匪起家的反共救国军副司令、草头王及其匪伙终告覆灭。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门源平息“十月匪乱”纪实

祁郁春整理

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师二团副团长张星垣同志率领一师侦察连、二团侦察排，途经桥头、大通县城、广惠寺、卡子沟，于9月12日到达门源县城，门源即宣告解放。

“十月匪乱”是怎样发生的

兰州战役后，青马溃败的散兵到处抢劫群众财物，并携带枪支、弹药和马匹，纷纷返回乡里。当时回到门源的大小军官就有85人，士兵约500余人。在溃逃前青马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一九〇师师长马振武、骑八旅旅长马英和马步芳的妹夫冶生华等人，在大通桥头镇召开了秘密会议，宣读了八十二军军长马继援留下部署应变的信：“战马当耕马，武器埋地下，待机而动”，决定利用旧职，收罗残部，勾结各地反动分子伺机进行暴乱，并向门源派遣匪特联络员冶生贵（俗称骑青马）与门源匪首马成骠、马国范取得联系，暗设联络据点，积极串通反动头子和匪首李复泰、张仁、马乾及旧教育科长杨发泰、牧主头人郭毛兰等人，打出“保族保教”的幌子，采取“杀父逼子”的手段胁迫群众，这是发生匪乱的根本原因。

当时，门源县人民政府刚刚建立，区、乡基层政权仍利用原

来的保、甲长，其中反动的保甲长乘机捣乱，给匪首通风报信；各族群众尚不了解党的政策，疑虑重重，恐慌不安；同时部分领导存有麻痹轻敌思想，对门源的社会情况和反动势力了解不够，警惕性不高；只注意了散兵股匪局部骚扰，而忽视了发生地区性暴乱的可能。另外，县上虽有一个骑兵连和县公安大队（两个排），但大部分战士外出执行任务，县上主要领导郭力中同志赴省开会，其他同志对匪乱一时疏忽。上述种种原因，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终于在1949年12月7日（农历十月十八日）发动了大规模的暴乱，当地群众习惯称之为“十月匪乱”。

磨儿沟与匪激战情况

12月5日（农历十月十六日），卡子沟主要匪徒韩成、马公祥，串通下阴田匪徒肖龙光、马如林等，趁驻在卡子沟武装班的王义高等4同志从上阴田二区政府去寺儿沟开会之际，施以谎报军情、调虎离山的阴谋，一面在卡子沟至上措隆一带设下埋伏，一面又派人到二区政府谎报说，上措隆、卡子沟来了土匪。当王等4人行至上措隆附近时，上措隆匪徒马兴旺手握石块拦路高喊“缴枪不杀！”王义高等人当场将此匪击毙。这时匪徒三面开枪，将他们包围。危急中被迫突围过河，王义高向卡子沟乡政府方向突围，行至猪咀子山梁时，大批土匪从上措隆口、卡子沟磨房、狮子山咀一齐开枪射击，王义高下腭中弹负伤。乡政府的同志们闻声接王至乡政府，当天将王送往县城。

县政府接到二区电话后，由公安局长兼武装科科长宋信忠同志，率领县大队一个骑兵排，于农历十七日下午到达二区，并和区长张二小及区干部50余人，到卡子沟一带巡逻。当晚在卡子沟住宿一夜，第二天经过卡子沟脑过红牙合，从下措隆沟脑搜山后又到措隆滩，抓获土匪沈家湾（外号大牙岔奴儿）、马九爸（旧保

长)、马孝（外号瓜三九）白永成（白四爸）等4人，县大队即回上阴田区政府，将4名匪徒关押在区政府内，准备第二天押往县城。

匪首马成骠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秘密召开匪首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第二天在磨儿沟伏击我回县部队，抢回被俘匪徒，趁机掀起叛乱。他派马乾到大沟口伙同白永录（白乙布拉）、韩成、马万彪、高登基（高奴亥）等人，于当晚在大沟口马场槽召开了100余人参加的暴乱会议。会上，马乾传达匪首的旨意说，“尕马英从小峡、大通反上来了，你们不要怕。”匪徒马万彪说：“我不放心，怕你们到时候变了卦。我刚从草大坂被人扶下来，如果来得及，今晚就动手，杀掉解放军，救回我们的人。”会后，进行了分工。当时，匪徒马公祥胁迫参加会议的人，连夜去磨儿沟潜伏。马万彪还派人去串通马成骠、张杰卿、李复泰等地主分子，天亮前，各路武装土匪200余人连同胁迫的群众数百人，分别在磨儿沟、旱台、黄田前崖根、黄田南栅门、红山顶等处设下埋伏。在红山咀、磨儿沟各部署轻机枪一挺，由罗万寿、林得保担任射手，并委派马志杰（青马士兵）作指导。由马国范、高登基二人为前线作战指挥，马成骠为总指挥。

12月7日（农历十月十八）上午8时左右，解放军由二区出发，过浩门河到磨儿沟，宋信忠同志带领3名战士前行，张二小同志带领大部分战士在后面押解匪徒。当我大部队进入磨儿沟东台时，高登基发射了信号弹，顿时匪徒齐出，枪声四起。经过两小时的激烈战斗，终因地形不利，寡不敌众，张二小等18人当场壮烈牺牲。宋信忠到旱台庄子时，战马中弹倒地，他步行用手枪还击迎战，子弹打完后，匪徒马仓趁机用铁锹砍中他的头部，又砍断了他两根肋骨。宋在身受重伤、眼球突出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据理斥责匪徒暴行，最后被匪徒祁光元开枪击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磨儿沟战斗失利后，县上立即派出一个骑兵班到旱台增援。前锋7名战士冲到磨儿沟西台时，土匪在红山用机枪扫射，我4名战士当即光荣牺牲，另外2人向南突围过浩门河到达大沟脑，被当地群众营救。班长杨秀潭在战斗中被土匪砍了7刀，当场昏厥，衣服也被匪徒扒光，等到傍晚苏醒后，爬到庄上，得到群众营救。

上午11时左右，我方又派县大队一个骑兵班去接应，行至中途得知磨儿沟战斗中我军已失利，便立即从大沙沟撤回守卫县城。

县城失陷和翟副县长等20名同志殉难

磨儿沟我军失利后，匪首马国范向胁迫群众训话说："现在就去攻打县城，如果谁不去，就杀谁的头，抄谁的家……。"随后，马成骥令匪徒按地区分三路进攻县城，一路攻打北城和西北城角；一路直逼东城；一路攻打南城和西南城角。下午4时左右，各路匪众千余人，逼近县城并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头塘旧保长杜占林和其弟杜福林，同他两个叔父，将我军在头塘收购柴禾、蔬菜的县大队司务长乔佩厚同志杀害。

当时守卫县城的部队已不足百人，翟鸿儒副县长等主要领导同志在12月7日上午11时左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坚守县城。在兵力部署上，由翟鸿儒负责全面指挥，并和王振基具体指挥三排（主力）防守北城和西北城角；郭志诚、王廷印指挥二排，防守东城，把守钟楼和鼓楼；步兵排防守南城和西南城角。当时门源古城已是残垣断壁，在难以坚守的情况下，我军指挥员和全体战士，英勇善战，击退土匪10多次进攻。西南城角重机枪手在横宽150米的防线上沉着射击，匪徒未敢前进一步。战斗激烈进行到下午7时左右，天已黑尽，城内潜伏的恶霸张仁，率匪多人在城内开枪，向我军射击。我部队在腹背受敌、难以继续坚守的情况下，决定8时突围，由步兵排掩护撤退，翟鸿儒率领三排冲出西门；郭志诚、

王廷印、沙汉、黄顺成等率二排冲出北门。战斗坚持到晚上10时左右，城头机枪射手牺牲4人。这时，刘发扬、马凤刚、裴双堂等15人从西门突围后，经干马龙过河到黄草坡，越头塘大坂进入大通县城，其余冲出敌围者均被群众营救躲藏；郭志诚等人突围后，经寺湾马场，越平羌沟到达甘肃。翟鸿儒等23人突围后，于夜半4时左右，路过黑石头，经青石嘴到吊沟找清真寺阿訇王占恒（河南人，解放后是各族各界代表）了解情况。此人未找到，此时已是农历十月十九日晨，天已大亮。这时，黑石头匪徒马如彪等早已和吊沟、红牙合等地土匪通讯联系就绪，由匪徒包万和、马保有、马二不都、马乙思麻（枪手）及青马军散兵马福海等武装土匪和胁迫群众数百人在寺湾山梁、盘坡等地埋伏。我突围同志因地形不熟，误从上吊口东沟进入寺湾山梁，到红山湾时，土匪已形成包围圈，即向我军袭击，当场1人牺牲，其他人被迫朝东药草梁方向突围，到夏日莫得又遇股匪，经过激烈战斗，仅熊吉娃1人突围，从老虎沟西岔到达甘肃，翟副县长等19名同志壮烈牺牲。

县城失陷后，县政府的枪支、弹药、物资被土匪抢掠一空。第二天，我二区政府仍被土匪包围，副区长张发亮等坚守阵地，英勇顽强，沉着阻击，打死土匪一人，其余土匪未敢靠近区政府。这时，匪徒马公祥、高登基从县城返回，又胁迫数百人，配合白永录发起猛烈攻击，战斗激烈地进行到下午，由于内部混进的坏人马英（炊事员）将子弹偷偷撂出墙外，并高喊："区长没子弹了！"匪徒马兴才听到后，冲到大门口，用汽油将大门点着，我区干部弹尽粮绝，决定挖开后墙冲出，突围到黑刺滩时，土匪将他们四面包围并开枪射击。除勤杂工马尽忠因负伤躲藏外，其余6人全部遇难。副区长张发亮子弹打完后，就跳进河里，泅水向北岸突围，不幸中弹牺牲。土匪将他的遗体捞出后剖腹抽肠，并将肠子挂在黑刺上，充分暴露了土匪的残暴本性。

在匪乱两天中，翟鸿儒等49位同志光荣牺牲。1950年后，剿匪战斗中又牺牲了11位同志，共60名烈士。

匪徒心不死　军民鱼水情

门源县城失陷至光复的16天中，各族人民初获解放的喜悦心情，立刻又变为忧心忡忡，青马残余反动军官、地主恶霸为害一时，整个门源地区又陷入妖雾迷漫之中。

后来据被捕获的匪首坦白交待，县城失陷的第二天（农历十月十九日），由匪首马成骠等在南关清真大寺召开了数百人参加的匪众会，各地区到会的匪首、地主、劣绅有大滩马金龙，吊沟包元宝，瓜拉马国仁、马国范，浩门镇李复元、张仁、史廉武、雷鸣锋、张隆儒、魏生发、宋乐天等。会上马成骠讲："祸已闯下了，是回、汉合办？还是河南面办？河北面办？（指浩门河南岸、北岸。办是承担祸事责任之意）"与会人都认为要回、汉合作。马金龙提议建立一个组织，经商定成立一个"××治安委员会"，下属1个总队，由李复元、郭毛兰、马成骠为正副总队长，下设5个大队。马成骠又说："这次攻城谁的功劳大？"马国仁说："张仁功劳大，没有他在城内开枪接应，南城攻不下。"于是就指定张仁为第一大队长，包元宝、马鸣谦为副大队长；第二大队长梁生宝（未在场），副大队长马应录；第三大队长白明珠；第四大队长马国范、副大队长肖龙光、高登基；第五大队长郭毛兰（兼）。并要求每个大队编制500人，组成3个分队，到各交通要道把守，企图负隅顽抗。最后还选李复泰为县长，马国仁为副县长。

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在南关再次召集匪首会议，由马金龙、马成骠主持会议，到会的有包元宝、张仁、马鸣谦等几十人。主要是商议派人到老虎沟把卡，防御我部队从甘肃过来。次日，在城隍庙内召集群众约400人开会，成立了3个分队。马鸣谦在会上

煽动说："大家鼓一把劲，把守好卡子，不叫娃儿（指解放军）过来再驻门源地区。"匪首不但胁迫群众站岗守卡，而且继续搜捕被群众救护的解放军战士，并扬言："谁家藏了解放军，就要满门抄斩，烧掉房子和垛子，整个庄子要株连。"等等。但不论匪首们怎样恐吓威胁，各族群众面对"十月匪乱"的惨状，认定了共产党、解放军是消灭反动派、为劳动人民谋福利的唯一救星。因此，许多群众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千方百计地保护了我战斗中失散的58位同志。

回族群众马万德，在土匪攻破县城的危急时刻，将解放军战士陈岱忠同志藏在家中，严密保护，直到大军二次进驻门源时才送回部队；蒙古族群众哈连奎，冒着土匪多次搜捕的危险，终于将张存福等3名同志掩护下来；藏族群众贾它勒，将赵云芝、赵亮、侯四等7名同志藏在家中，自己出外以放牧为由站岗放哨，当土匪搜捕紧张时，又连夜将这7人转移到歪里沟他弟弟贾脑勒家，当地群众刘仁德、张永财、苏连宝等人送来皮袄、毡帽，将同志们化装成当地人，白天躲进山里，晚上请到各家款待。

县政府秘书崔仑同志在转移时，带着两位县长的印章及门源县人民政府的钢印，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李华盛为崔换上便衣并亲自伴送他经甘肃到达西宁，以后平安的返回门源。

在解放军大部队经大通沿途消灭大量土匪向门源进军之际，门源土匪内部勾心斗角，分崩离析。汉族中主要匪乱头子李复泰等，釜底抽薪，利用回族参加匪乱和出头露面较多的情况，想把匪乱的罪责推给回族，他造谣煽动说："回回反了，要杀汉民。"民族关系顿时紧张。在回族中一些地主、旧军官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也利用历史上民族屠杀的惨剧，在回族中煽动说："解放军回来要杀回灭教。"并不择手段地动刀动枪，逼迫群众为匪，企图顽抗到底。如上阴田高登基（高奴亥）疯狂到狗急跳墙的地步，每天在阴田，卡子沟清真寺里吊打群众，派马要人，逼迫群众参

加匪乱。高的父亲看不惯这种惨状，上前劝阻时，高一脚将其父踢翻，连踏两脚，致受重伤。这种残暴行径，不但群众恨之入骨，而且暴露了匪徒之间勾心斗角的内幕。如匪首白永录当时秘密设下圈套，以开会为名将高逮捕，由仲有仓枪毙在大沟脑窑站，借此推卸罪责，杀人灭口。

平叛斗争的伟大胜利

12月21日，解放军三师分两路向门源进军，22日进驻门源县城。这时除一些血债累累的匪徒已逃往深山老林外，一些胁从匪众，由于受反动宣传，大多数在家坐待受罚；还有一部分匪众拖儿带女到浩门河边，打算一旦“屠杀”开始，准备全家投河自尽。

我部队全体干部、战士察觉到这些被胁从群众的恐惧心理，处处以政治争取为先，对受胁迫并已放下武器的人，一律宽大对待；对宗教寺院坚决保护；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秋毫无犯；对逃藏的人，反复向其亲属交待政策，以消除顾虑，劝其亲人返回。解放军这种宁愿牺牲自己，一心爱护人民的模范行动，使很多被胁迫的群众深感内疚，纷纷流下眼泪，安心回家生产。

郭力中等同志也随军回到门源，重新组织恢复县级政权。

在平息匪乱过程中，党政军人员除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外，坚决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当时，确定打击的对象是主要匪首和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其他的都予以宽大处理。本着上述原则，举办了匪首集训班，令参加匪乱的匪首到集训队学习政策，交待问题，互相检举罪行。同时也揭穿了首恶分子李复泰、杨发泰、郭毛兰等想以“回民造反”来挑拨民族关系和推卸罪责的阴险伎俩，并将这些人拘押审查。我们还按照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利用当时比较开明的的民族上层分

子马录文、朵含章等，争取了门源、祁连等地土匪百余人前来缴械投降。并根据党的政策和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各族群众认识到这次匪乱是马步芳残余势力和回、汉地主阶级不甘心灭亡的表现，他们就是制造阶级苦、民族恨的罪魁祸首。从而很快地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孤立了少数顽固匪徒，基本上稳定了社会秩序。

门源匪乱被平息后，逃进深山老林的残匪继续顽抗作恶，这些匪徒所到之处，大施淫威，被遭到抢劫的群众，不但财物被抢掠一空，而且男遭杀害，女遭奸淫，虽十五六岁未成年女子，亦难幸免。有的妇女惨遭轮奸后几个月不能起床，有的致使终身残疾。浩门镇有一姓李的夫妇到老虎沟口磨面，匪徒当着她丈夫的面将其轮奸致死。

他们还十分仇视靠拢我党和政府的群众积极分子，并称他们为“二转子”，扬言：“宁杀一个二转子，不杀十个解放军”；“见了解放军缴枪，见了二转子杀光。”凡是遭到土匪杀害的村干部或人民代表，都被拔舌挖眼，抽肠扒肚，还有的被用铁丝穿通肩胛、锁骨或下腭，用马拖拉。红牙合木特儿（随回教，甘肃人）曾给我军当过向导，后遭土匪报复，被穿通腿（膝部后面）筋，并拴在马缰上拖至野外，活活肢解分尸，惨不忍睹。大滩村干部高维清、马发科，红牙合人民代表韩生福、马天义、留用人员陈珑，都是被土匪用同样手段杀害的。一些潜伏下来的土匪，时刻伺机反扑，如1950年3月19日，马乙思麻等股匪300余人，袭击我吊沟四区政府，区武工队长符开珍等3人被匪包围，奋战一天，毙匪10余人，最后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6月22日，马乙思麻、冶子明、哲马录、甘肃马六爸等股匪700余人，又袭击皇城区政府，我副区长翟理才，战士王文康、王文才、侯四等在战斗中光荣牺牲；邮递员蒋彦才被害于大坂山上，邮件被匪徒抢劫一空。

匪徒们的种种罪行，激起了各族人民的义愤。县、区政府和驻军部队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积极发动群众，进行民主选举，

尽快建立乡、村基层政权。根据县委决定，以剿匪肃特、生产建设为重点，对残余匪特展开清剿捕捉的全面斗争。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一师二团团长陈忠宝指挥三师九团三营等部队，于1950年3月，在巴里哈图、那子海口等两次战斗中，消灭和击溃冶子明股匪200余人；又于同年7、8月间率领骑兵营和三师九团一营四连、六连，在珠固寺口，截击鲁国佐等股匪800余人；在鱼龙滩与鲁国佐股匪遭遇，经过浴血奋战，击毙匪首马金龙等土匪5人，活捉匪首马占清等土匪6人，鲁国佐只身骑马逃走，其余土匪全部溃散。我驻防门源的三师八团三营等主力部队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1950年共进行剿匪战斗23次，消灭了门源地区的主要股匪。

在剿匪、生产建设过程中，组织起来的自卫队（后改为民兵）500余人，有枪百余支，配合主力部队，出生入死，与匪徒英勇战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全县涌现出47名英雄模范人物，其中甲等模范13名。1950年农历中秋节，马公祥股匪50余人，在窑洞庄企图杀害我公安人员王万候等人，遭到民兵韦玉林的抗击掩护，击毙土匪2人，最后他被包围在自己的茅庵中仍奋战不息，直到土匪挖开房顶，被击中后牺牲。大滩民兵副大队长马世彪，在黑沟侦察马哲录股匪时，打死土匪1人，活捉1人，并积极检举大滩地区“华正大队”匪特组织的情况，为破获门源地区匪特组织提供了线索。浩门镇民兵中队长祁映学，胜利民兵大队长李建寅，珠固民兵大队长陈才郎，皇城民兵队长刘完德，各带民兵剿匪参战10多次，击毙土匪多人，缴获大量枪支、马匹和物资，得到县、省和兰州军区的表彰和奖励。

各族人民积极支援我剿匪部队和民兵，供应马匹、粮草，同时检举揭发匪特行踪，使匪徒失去依托，到处遭到打击，走投无路，狼狈不堪。匪首冶子明1951年冬，在老虎沟被我民兵捕获时，双脚冻坏溃烂，寸步难行。马二不都、马乙思麻先后被我击毙。土

匪通讯大队长祁广元被我四区武工队和民兵围在下铁迈口沙忠义家的草房里，拒捕时，遭到我民兵的猛烈射击，终未逃脱毙命的下场。

通过平息匪乱，我方还破获了“西革会”、“反共救国军”、“华正大队”等反革命组织；清除了混入基层政权中的匪特人员，纯洁了组织。这对安定社会秩序、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起了很大作用。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宁夏南部山区匪患及清剿经过

牛化东口述　曾　千整理

1949年9月26日，宁夏解放，结束了马鸿逵集团在宁夏的黑暗统治。然而，宁夏的一小撮反动军官、潜伏特务、惯匪等残渣余孽暗中串联，密秘勾结，组成数十股武装土匪，占据险山要隘，切断交通，抢劫财物，杀害地方干部，袭击生产部队，策划武装叛乱，实行反革命复辟，气焰十分嚣张。鉴此，剿匪建政，成为当时我军的首要任务。

在宁夏南部山区的同心、海原、固原地区共有大小股匪20余股，计500余众，小至三五为群，大至一二百人。其中，以马绍武、张海禄为首的两股匪徒为最大，其他股匪多直接受其指使。他们互相勾结，为非作歹，偷袭我宁夏军区所属部队26次之多，使我军伤亡170余人。

匪首马绍武曾任“同、海、固反共游击大队”大队长。1949年7月，他率匪徒在固原县王家湾打死打伤我游击队战士20多人。同年8月在甘肃会宁县抢劫我边区政府长枪50余支，打死打伤我战士各1人。解放后。马匪慑于被歼，于1949年12月，曾向我军假投诚，1950年元月即叛变为匪。他纠集200余匪徒，盘踞同心县高崖子西南的庙山，自称“小台湾”，公开张贴布告，标榜效忠台湾蒋介石政权，反共到底。同年元月中旬，他们拦劫银（川）平（凉）公路的商运汽车，抢掠行商骡马20余匹，又伏击我军骆驼运输队，抢走骆驼33峰，2挺轻机枪，7支长枪及大量

军需物资。之后，他们又抢高崖粮库小麦、面粉2万余斤、饲料45石、饲草6万余斤。平时，他们在高崖、豫旺一带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致使附近百姓弃家外逃，我区、乡政权亦受到严重威胁。

匪首张海禄，原为国民党马家部队的军官，解放后窜到同心、海原一带，纠集溃逃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并与海原惯匪李彦良、杨伯义合并，号称500余众（实有200余人），编为1个团，下辖8个队。张海禄自封为团长，他每到一处，就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一插，叫嚣他们是什么“保回保教的仁义军”，造谣说“共产党要杀回灭教”，妄图挑拨民族关系，煽动回族人民反对共产党，仇恨新生政权。更为阴险的是，他还将抢来的物资分给不明真相的群众，声称他们是专抢公家东西，不扰百姓的“仁义军”，以迷惑群众，收买人心。他还强迫阿訇为他们造舆论，宣传“抢公家东西无罪”。这是一股比其他土匪更具有煽动性、欺骗性的政治土匪。

南部山区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处，山多沟深，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有利于土匪活动，匪徒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能迅速疏散、隐蔽，加之他们善骑夜战，因此很难彻底清剿。

中共宁夏省委对匪患十分重视，于1949年12月中旬，召集省委常委及驻宁部队首长会议，部署清剿工作，制定了军事清剿、政治争取与发动群众三者结合的剿匪方针。省委书记潘自力在会上强调指出：“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清剿中要把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信仰和风俗习俗，揭露匪徒的阴谋和谣言，作为发动群众、分化瓦解匪徒的工作中心。做到尽量争取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反动匪徒，从而达到根绝匪患的目的。

根据当时宁夏的驻军情况，省委决定由十九兵团六十五军负责清剿黄河以北贺兰山一带的郭栓子股匪；宁夏军区和独一师负责清剿南部山区股匪。

我当时是宁夏军区参谋长，我和独一师师长黄罗斌同志（不

久调任军区副司令员）负责南部山区的清剿工作。这里将我亲自参与剿匪工作的全部过程作一简要叙述：

奔袭庙山　歼灭马匪

1950年元月，我和黄罗斌同志来到银南灵武县独立一师一团驻地，做好战前准备，选择时机，待命出发。

25日，我们侦察到马绍武股匪正在庙山集结，便当机立断，决定出其不意奔袭匪巢，来个“一锅端”。当日晚，我们从灵武出发，避开公路，绕东山根的荒芜小路连夜急行军，于翌日拂晓赶到了豫旺地区，随即派出哨卡，封锁消息，隐蔽于山村休息。我们用两个夜晚急行200余里，按时到达了庙山附近。

本来我们原计划从东、西、北三面包抄，但因地形不熟，不得不在距庙山不远的王家团庄找了3个当地向导。不料，这3个人中，有2个是通匪的，带着我们转来转去，结果延误了战机，向导也溜走了。此时，天色微明，山上土匪已发现了我们，他们凭藉居高临下的地形和工事，首先向我们开火，发起攻击。匪徒负隅顽抗，正合我意。黄罗斌同志当即命令炮兵开炮，令骑兵迅速向庙山东南方向围截，一营、二营分两路向南北两侧延伸包围。交火后，炮兵连只用3炮就摧毁了匪部指挥所，匪徒们一窝蜂似的仓惶逃窜。我轻重机枪和冲锋枪一齐射向匪群，不到3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共击毙匪徒30余人，击伤20余人，活捉10余人。从俘虏口中得知，匪首马绍武和中队长李成富已受伤潜逃。溃散残匪一部分由匪徒马青云、李少俊带领逃向了高崖以西地区；一部分由郝福祥带领向豫旺方向逃走。为了不给匪徒以喘息之机，我们立即封锁交通要道，挨村逐户进行搜捕。

匪首马绍武受伤后，和李成富逃到了杨家湾一老乡家，因我们步步紧逼，搜捕甚严，二匪首只得转移隐匿地点，最后逃到了

川口地区。我们边侦察边追捕，数九寒天，山风刺骨，整整7天7夜，追捕部队日行百余里，足履冰凌，连续趟过10多条小河，为不暴露目标，夜间总是匍匐通过村寨。农历腊月二十四日，我们终于在川口地区一个破窑洞里，活捉了匪首马绍武和李成富。接着，我们对两股残匪展开了全面围剿和政治争取工作。2月中旬，在海原和盐池地区歼灭了马青云股匪20余名；下旬在豫旺地区击毙了郝福祥等4人；又发动政治攻势，促使王彦福等百余匪众携械投降。到3月上旬，同心地区的马绍武股匪已基本肃清，少数残匪投奔海原张海禄股匪去了。

三擒顽匪李成富

我们活捉了马绍武和李成富后，为了争取更多的土匪投降，又把李成富释放了。但是，李匪毫无悔改之意，又纠集王彦福投奔张海禄，继续为非作歹。

我们从俘获的李匪中，找到一个叫杨学宝的人，他与李同村，经教育，杨供出了李潜藏的地点，我们再次捉住了李成富。李匪当即磕头求饶，跪倒不起，拍掌捶胸对天发誓，表示痛改前非，永不为匪。为了教育多数，我们再次释放了他，可是李匪恶性难改，不久，他又上山为匪去了。

群众对二次放李的做法，很不理解，认为我们“放虎归山，太宽大了”。部分群众产生了顾虑，有匪情也不敢再向我们报告了。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只有第三次抓到李匪并予以严办，才能平民愤和解除群众顾虑。否则，剿匪工作将陷于被动局面。

李成富是马、张匪首的骨干，外号“李大爪子”。他三次上山为匪，深知我们不会再饶，行动十分诡密，我们多次根据密报搜捕，都扑了空，群众因怕他的报复，急切盼望我们尽快抓住李成富。我在高崖镇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反复宣传党的剿匪政策，并

向群众保证：3天内定捉拿李成富归案。

会后，我们一面抓紧搜捕，一面召开各种形式的调查会和谈心会，深入发动群众。到第三天，我们仍未捉到李匪，心中有些焦急。这天我正参加一个阿訇座谈会，一个叫金明好的阿訇，突然从门外走进来，贴在我耳边悄悄地说："请您出来一下。"我走出会场，他把我拉到一个没人的墙边，告诉我："李成富今晚在他姘妇家过夜。"我得知这一消息，真是喜出望外。我问他为什么不在会上讲，他说："会上的那个区长是通匪的"。我才明白，李匪之所以消息灵通，原来我们地方干部中混入了内奸。

回到指挥部，我们制定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搜捕方案。这晚，专门召开了一个让那个区长参加的"捉拿李成富"的会议。与此同时，我们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小分队，由金阿訇带路，直奔李匪姘妇家。果然，我们未费吹灰之力，便抓获了李匪。第二天当我们押着李匪送往高崖镇指挥部时，沿途群众翘起大拇指称赞说："解放军说到做到，真是天兵神将，再狡猾的土匪也逃不出解放军的手掌！"

因李匪作恶多端，死不改悔，群众一致要求公审处决。经省委批准，我们在高崖子召开了公判大会，远近群众蜂拥而来，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一些受害群众争先恐后地控诉了李匪罪行。最后由独一师马参谋长代表军事法庭宣判，当场枪毙了这个恶贯满盈的顽匪，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杀了李成富，震惊了其他匪徒，一些散匪再不敢潜藏了，三三两两地向我军坦白自首，缴械投降。群众高兴地说："过去我们不敢举报情况，怕土匪报复，现在有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做主，我们什么也不怕了。"

瓮中捉鳖　一网打尽

张海禄是海、固地区人多势大的政治土匪首领，他当过马家军团长，懂军事，会指挥，且熟悉地形，尤其是他会运用政治手腕迷惑和收买人心，比一般土匪阴险狡猾。他收罗的匪徒多是一些反动军官和兵痞，善骑马，能各自为战。这伙匪徒以夜间活动为主，一夜可转移三四个地点，他们采用游击战术和我军周旋。我军追击时，他们迅速散开，化整为零，潜伏隐蔽，伺机出击；若遇到我小股部队时，则迅速聚集，全力向我袭击，或狡猾地采用弧形引退，诱我深入，然后两翼向我合围。

面对这股匪徒，我们采取连续作战、跟踪追击、不给喘息机会的办法，进行紧逼包抄。

6月12日黄昏，我们闻讯张匪正在西山窑抢劫乡政府，打死了黄乡长胞弟。我们立即以骑、步兵4个连，分3路包围。但张匪早已转移，我们扑了空。14日，我们侦察到张匪在黄谷川一带抢劫，立即派骑、步兵9个连分4路围剿，张匪又提前逃出了包围圈。我们虽两次扑空，但已盯住张匪的踪影。于是由独一师马参谋长带领骑、步兵4个连跟踪追击。从海原县兴仁堡追到甘肃的靖远、打拉池，后又追回海原县，前后8天8夜，行程千里，张匪终于逃回了老巢——海原黄谷川。

匪徒们被追得精疲力竭，无处可逃，只得纷纷缴械投降。但在大批的投降者中，唯独没有张海禄。经我们个别谈心教育，一个投降的张匪班长，悄悄告诉我们："张海禄就在附近山上。"我们一连几天，采取篦梳式搜山，始终未发现踪迹。此时我们已把黄谷川封锁得如铁桶，张匪即使长上翅膀也难飞出罗网！

我们逐渐缩小包围圈，四面埋伏岗哨。一天，搜山部队在山坡上发现一个背筐的小孩，神色紧张地往山上爬，筐里有五六个

大锅盔（乡间的一种面食），引起了战士们的怀疑，便把这个小孩带到连部询问。开始小孩不敢说实话。一口咬定是自己上山割草用的干粮。经反复教育启发，他才承认是给土匪送的，并表示愿意为我们带路。我们立即组织一个排，由小孩带路直奔土匪隐藏地点。

在一条长满齐腰深茅草的山沟里，小孩指着一个比井口稍大的山洞说："土匪就在里面。"我们随即向洞里喊话，喊了半天，毫无动静，我们以为小孩撒谎或土匪已转移他处，便再次审问小孩，小孩肯定土匪在里边，并说："这山洞只有一个出口，他们正等着送干粮，绝不会走。"于是我们继续喊话，仍无动静，排长便往洞里扔了一块大石头。土匪以为我们进洞了，便朝外开枪。排长探明了虚实，便向土匪厉声警告："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要填土堵洞，把你们闷死在里面！"一边喊话，一边铲土往洞里扔。匪徒们怕死，只好先扔出武器，一个个挨着爬了出来。张海禄等8名匪徒被一网打尽。

从3月下旬到7月底，我们活捉张海禄股匪大小匪首69名，击毙击伤匪首14名，64名匪徒自首投降。在围剿张海禄的同时，我们还以一个营的兵力在高崖子山区搜索散匪，先后剿灭了李成富、李正富两股残匪，击毙了另一匪首李文科。至此，南部山区的股匪全部肃清。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办　供稿）

剿灭叛匪郭栓子始末

郑维田

1950年，惠农县（今石嘴山市）回汉各族人民，刚刚获得解放不久，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就开始上下串联，阴谋策划暴乱。惯匪出身的贺兰保安大队（地方起义部队改编）大队长郭永胜（绰号郭拴子）先随宁夏和平解放归顺我人民政权，终因匪性难改，于1950年3月4日，在黄渠桥驻地率部叛变上山为匪。郭匪的叛变，给解放了仅5个月，刚刚获得新生的当地人民又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郭拴子叛变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

郭拴子祖籍平罗县，汉族，粗识字，兄弟9人，其为大，因家境贫困，于民国初年，其父郭荣贵带着当时全家5口迁居内蒙左旗呼鲁斯太以背炭为生。那时的宁夏土匪密布，到处可见。马鸿逵武装劫居宁夏主席的宝座后，为了维护、巩固其军阀统治，在一个不到百万人口的小省，就豢养了10万大军。45岁以下的男子都要轮流分期参加训练。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地方官吏搜刮民财也不甘落后。再加上匪患，宁夏回、汉人民，民不聊生。郭拴子就是在这样一个病态社会背景下长大的。

郭拴子19岁，借在蒙地放牧的机会，学会了蒙语，熟悉了贺兰山的地理，结识了山里一些小窃小盗。22岁时又结识了贺兰山

当时最大的土匪头子、自称贺兰山大王的周墩子。这时郭拴子就和他幼时的几个伙伴，以及他的二、三、四弟，名义上在西山放牧，实际上已结伙打家劫舍，成为一小股土匪的头领。由于其势力迅速扩大，到1930年已能与周墩子势力抗衡。就在这个时候，马鸿逵为了独占宁夏地盘，组织一部分兵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山，名为剿匪，实则抢掠民财，强奸妇女。郭拴子为了与“剿匪部队”势力抗衡，经梁风惠等匪伙中的骨干说合，于1931年11月，和周墩子联合到一起，以周为正首领，郭为副首领。经过一段时间的清剿，马鸿逵不但没有把土匪剿灭，反使土匪势力愈来愈大，无奈只得息兵罢战。

1932年，郭拴子同其几个亲信商议，并拉拢收买了周墩子的心腹白四子，趁周不备将其吃掉。从此郭拴子就成为盘距贺兰山的山大王。梁风惠原是周墩子手下的一个小头目，一看情况不妙，急忙逃往后套去了。周的其余匪众均服郭拴子统领。为扩大影响，郭还让手下人四处散播说，“郭大王手使双枪，百发百中，马鸿逵根本就奈何不得……”

郭拴子占据贺兰山后，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害得平惠一带及来往商旅不得安宁。1931年，他和张怀忠、牛占元带领匪众100多人，抢劫了九泉子董生华家，得白银1000多两、大烟一罐，及其他大量物品，并将董生华当场枪杀。1934年，还是他们3人，带匪众100余人，洗劫了吕家堡一家商铺，抢走大量物资。当地群众对这股土匪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1934年入冬，马鸿逵以“若要想太平，必须贼杀贼”的格言，设计了一个以匪治匪的策略，封官许愿，派出代表，请老匪梁风惠（这时梁已从后套返回，并任地方保长）等人引见，到郭拴子驻地同郭谈判。经过反复讨价还价，郭拴子被升官发财、安家立业、荣享富贵的欲望所驱使，同意被马鸿逵招降。招降后按照谈判时许下的条件，郭被任命为平罗县保安大队大队长，随来的部分匪众即

成为该保安大队的骨干力量。张怀忠、谢占奎以及他的两个弟弟，随即脱离郭拴子到深山（大小松山一带）老林继续为匪。1937 年平罗保安大队改编为独立营，委任郭为独立营营长。1938 年调升平惠贺兰保安司令直到 1949 年解放。

郭拴子被马鸿逵招降后，携带眷属及为匪时抢劫的物资，迁回石嘴山郊区燕子墩米家村定居。除为匪时的大老婆石氏被其枪杀外，先后又娶了 4 个老婆，二房张氏因被其遗弃羞愤成疾而死，三房王氏在家侍奉公婆受活寡。二十五六岁的四房王××和二十四五岁的五房董××作为随身太太，与其同居生活在一起，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郭到 1949 年宁夏解放时，已成为家财万贯的富翁。计有水田 100 余亩，宅院 2 处，共 40 余间，骆驼 200 多峰，山绵羊 1200 多只，骡马牛车等大牲畜、大农具俱全。雇长工 20 余人。

宁夏和平解放，是在我大军迫近永宁仁存渡时，原宁夏省派出军政代表芦忠良、马廷秀、马光天等，到吴忠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部驻地，向杨得志司令员提出“要求谈判、举行起义”的要求，后经过谈判，于 1949 年 9 月 23 日双方代表签署“和平解放宁夏问题的协议”而实现的。这虽使宁夏回汉人民免遭战争灾难，但也留下一定的隐患。少数特务分子摇身一变，以种种伪装潜伏了下来；少数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的敌军政头目和地主分子，也伪装进步，按兵不动，以求等待时机再作图谋。

1950 年春节前后，社会上流传着一些荒诞无稽的谣言，说“苏联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不使用原子弹，一定是他们没有原子弹。波罗的海已被美国扰乱，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起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打起来，14 小时中国就可全部收复（指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在美帝帮助下卷土重来）”。一些反动会道门头头也造谣说：“共产党的劫数到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郭拴子又做起了“当宁夏主席”的美梦，遂率部背叛人民，上山为匪。

郭拴子的叛乱

1950年3月3日下午5时许，郭拴子请指导员杨景国和分队长以上干部到他家过元宵节，摆了一桌很丰盛的宴席，一直喝到深夜席将终了之际郭向杨说："指导员，明天我去参加一个同志的婚礼，准备带两名随从，我只有一支手枪，你的枪我用一下。"杨景国不假思索便把枪交给郭拴子。席毕送走杨后，郭留下张进义、王文间、沈学仁等人，他长叹一口气对张、王、沈3人说："我去宁夏（指银川）时，见到了过去一些老同事，有人对我讲，在开河（指黄河解冻）前后，要把宁夏的共产党、解放军全部赶走。可以依靠的力量是：银南有芦军长（暗指芦忠良），河东有田福祥（马家军团长），北有左军长（可能指左明道），西有黑达子骑兵投必成（蒙古骑兵团）。我们的任务是尽快把队伍拉进贺兰山。"最后郭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出于自愿的跟我走，不愿意的不强迫，但不能把这一秘密暴露给共产党，否则可不能怪我郭某无情……"张、王、沈3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从内心愿意跟着司令，决无三心二意。"

第二天一早，杨景国、张仁奎（该队副大队长）、刘荣耀（管理员）等人去省军区开会，兼代领夏季服装，奔赴银川。郭拴子即着手实施他的计划，先派车把他的2个小老婆和贵重财物转送到山里。部队开过早饭约9时许，郭拴子从家里赶到大队部，令王文章以开荒种田的名义集合队伍。然后又将年龄小的和视为不可靠的叫出来留下，计集合58人。郭拴子简单讲了几句话，即令王文章领队出发。带走轻机枪1挺、驳壳枪4支、长枪40支、长短枪子弹计7200余发。约11时把部队开到西山坡米家沙窝。王文章按照郭拴子事先的布置，令机枪射手把机枪架到一个高沙丘上，把部队集中坐在一起，说："郭队长给大家讲话。"郭拴子走

到队伍跟前清了清嗓子说："弟兄们，我们这次出来是开荒种地吗？不，我们再不为共产党干事了，把弟兄们带到这里来，是有重要的事和大家商量；有的人也可能听到一些风声，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打起来了。我们宁夏的民主势力（指反革命势力）也在作准备，计划在约定的时间举行大暴动。我们要走在他们的前头，决不能落在别人的后边。我去省城（银川）见到以前一些老同事，都计划好了……"接着他又说，"山里游击战我郭永胜是有经验的。共产党的部队都是由华北来的，他们人地两生，这是我们的有利条件。别看他们能打败马鸿逵，但他们难对付我郭永胜，请大家相信，跟着我是吃不了亏的，将来有那一天，大家都可以闹个官做……"他结尾时又加了一句，"愿意跟我走的欢迎，不愿走的放下武器回家，我郭某决不阻拦。有不愿意走的没有？"见个个默不作声，王文章气急败坏地学着郭拴子的腔调问："有不愿意跟司令走的没有？"郭又让张进义讲话，张除重复了郭拴子一些话外，他着重号召和强调，"大家要忠实于郭司令，跟着郭司令干一番大事业，决不能有三心二意……"

张进义讲完后，郭拴子令王文章带队向贺兰山进发。当晚赶到芜菜沟，住在一个羊圈里，郭拴子为匪时的一个分队长吴成玉带10余人到芜菜沟与他会合。次日，翻过一道山梁到了黄草滩，与我一生产部队遭遇交火，因我人少，边打边撤，郭拴子也没有让追。他们在黄草滩住下后，郭拴子召集了原分队长以上的有关人员会议，研究决定了临时编制和初步的反革命行动计划，有如下几点：

（一）决定成立"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宁夏军区司令部"。郭拴子为司令，张进义为副司令，安禄为司令部参谋，司书徐光义，司令部另配随从4人。下暂编3个队，一队队长沈学仁，二队队长吴成玉，三队队长王文章。

（二）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通过私人的老关系联络扩大队伍。

（三）突袭区政府以下基层政权、财务企业机关。以取得枪支弹药，物资来源，扩大影响。

（四）设法和富有者，特别是回族上层有威望、并对共产党怀有不满的人进行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依靠这些人征集粮草布匹等物资，解决给养问题。

（五）选择能干的人，专作上（指与其上边人联系）下（指在山下串联扩充反革命力量）联络工作。

会后，分两股进行活动。吴成玉因对平罗县地界熟悉，活动在汝箕沟以南。郭拴子则领其余两个队暂活动于汝箕沟以北。并决定由吴成玉带其二队待机攻打平罗县崇岗区政府。次日，即1950年3月6日，全伙开往古拉本煤矿，又有事先由吴成玉联络好的23人入伙。由吴领上晋见了郭拴子，郭对新入伙的匪众讲了几句鼓励、欢迎的话后，令全部编入吴的第二队。至此，郭栓子叛变不到3天，匪众已发展到90多人。7日晚按照计划，郭与吴成玉带领各自匪众分头活动。吴匪带领其二队于当晚赶到崇岗堡，目的是袭击崇岗区政府，夺取枪支弹药。由于我区政府有了准备，使其阴谋计划未能得逞，遂到崇岗税务所抢劫一空，把收缴、换取的白洋、大烟及库存现金全部抢走。郭拴子亲率一、三队围击了我大武口光华瓷厂（现石嘴山瓷厂），绑架杀害了该厂军代表兼厂长刘万忠、主任李振奎等3人，抢走大米20余石，人民币20多万元（旧币），白洋数十元，布5匹。不久，又抢劫了我汝箕沟煤矿。

从3月4日郭拴子叛变为匪到4月16日，通过担任地下联络任务的政匪（即政治土匪，以下同）吴国兴、张万保、马大清、吴忠孝（以上4人均被枪决）活动，匪首（后来的土匪队长以上头目）吴文元、刘同禄、米三贵、任自强、丁福山、王梦元以及平罗、贺兰县境内的杨尕尕、孙强、张怀忠、谢占奎（以上10人均已枪决）等，在平、惠、贺3县区域内组织匪徒，搜罗枪支弹药，

为配合山上郭匪活动并为袭扰惠农县黄渠桥作准备。政匪刘文彩同匪首马维林（以上2人均已枪决）、王梦元于4月6日，在惠农县境内南北长渠一带，组织马奎、马福山（均已枪决）、杨玉和（被我剿匪部队击毙）等匪众100余人。同日经马大清（已枪决）联络，吴文元等在宝丰组织20多人。经吴忠孝（已枪决）联络郝忠、杨尕尕、孙强等在平、贺境内组织80余人。梁风惠同刘同禄、任自祥在黄渠拐子、西永固一带组织50余人。分别在米家砂窝、黄家大庄子和南长渠新渠湃等地集合开会，布置如何配合郭拴子下山袭击我黄渠桥区政府和黄渠桥驻军。企图抢夺枪支弹药，抢掠民财。

4月17日零时，各匪伙按照郭拴子的布置，分东西南北四路进逼黄渠桥，并由谢占奎、王梦元、马维元率领的较大一股向我黄渠桥驻军营地进发。由于我区政府和驻军于当日下午获悉这一情报，做了准备，交火仅五六分钟，匪徒即被击溃。双方均无伤亡。群众亦未受到损失。但是，袭扰黄渠桥事件，郭拴子虽未得到物质上的任何便宜，在政治上却扩大了其反革命影响，扰乱了人心。此后，匪势迅速扩大，一度发展到300余人。

清剿第一阶段

3月4日上午，惠农县委正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获悉郭拴子叛变的消息后，立即又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对此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讨论。会后指派四区区长田宝丰和我配合省军区高立同志，去贺兰保安大队处理一下郭匪叛乱的事。我们赶回黄渠桥区政府后，先和高立简单商讨了一下，同到大队部找该队指导员杨景国（军区派到该大队的党代表）交谈了一下情况，然后又找了该大队副大队长张仁奎（曾当过马鸿逵部队的团长）、刘荣耀（管理员，曾当过马家军少校军需官）2人谈话。最后把留下来的

30多人都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会上高立、田宝丰讲了话，安定了一下这些人的思想情绪。并指出，“望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耐心等待另行安置”。过后除张仁奎、刘荣耀调政府部门工作外，其余30余人都表示愿意回家务农，经请示上级批准迁返回原籍，并按照各自的具体情况发给了迁返费和路费。

同日下午又召开了有当地驻军首长和有关人员参加的县委会议。会议首先介绍了郭拴子叛变的经过和上午县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对郭拴子叛变的原因等情况进行了分析，定下5条清剿方针：①以政治争取兼军事清剿，并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作为党政统一行动的原则；②军事清剿的任务，交由黄渠桥驻军一九四师五八二团担任，具体部署由党委讨论决定；其他部队待命；③平罗驻军积极配合，如何配合视发展变化情况而定；④定期召开军队、地方主要负责干部会议，互通情况，讨论研究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清剿方针；⑤为使驻军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及时传递情报，政府派专人同五八二团配合。

同时，又召开了包括社会上层人士、上山为匪的亲属在内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开展了政策攻心战，进行分化瓦解工作。3月8日，惠农县政府和当地驻军，在黄渠桥召开万人以上的群众大会，县政府、驻军的领导同志，以及民主人士代表讲了话。他们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肯定了郭拴子在宁夏解放之际，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率部举行起义，保护仓库、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也阐明了我党对起义投诚人员宽大为怀的一贯政策。希望郭拴子及其下属弃暗投明，人民政府可以既往不咎。同时，又严正指出：如果执迷不悟，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是有决心、有能力，将其彻底消灭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政治争取和分化瓦解，并辅以军事清剿工作，随郭拴子叛变上山为匪的部分人员，思想发生动摇，加之他们刚到山上后，因事先没有食宿等物资准备，只靠抢劫沿山羊圈上的羊只

和沿边住户的少量粮食维持生活。在这种处境困难、生活困苦的情况下，他们感到跟随郭拴子继续走下去没有什么出路。因此，很想下山向人民政府投降。4月6日，在张进义、沈学仁等带动下，潘知兴、刘光德、徐光义等48人下山向我政府投降。区、县人民政府按照党的"对放下武器投降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迁返回原籍。但是以郭拴子为首的一伙顽固不化分子，对人民政府的多次忠告却置若罔闻，对我党宽大为怀的政策视为软弱可欺，继续与人民为敌，进行罪恶活动。

4月17日郭匪袭扰黄渠桥后，刘同禄、王梦元、马维元、丁福山、任自强、米三贵、杨尕尕、郝忠等匪伙上山同郭拴子会合，其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4月24日，匪首任自强、王梦元、马维元率领匪众在候家嘴大武山袭击我上山打柴的教导队一个排，打死我干部、战士5人，打伤16人，夺去轻机枪1挺，冲锋枪1支，手枪1支，步枪2支，子弹数百发。同月，匪首米三贵、杨玉和还率领匪众40余人，在王泉沟袭击了我给前方送给养的小部队，打死打伤我干部、战士11人(牺牲副营长1人)，夺去轻机枪1挺、步枪11支、子弹数百发。活动在平罗境内山区的谢占奎、吴成玉、杨尕尕率匪众也先后袭击了平罗五区区政府、汝箕沟税务所，抢去手枪1支、步枪5支、子弹若干发。两次截击我运输队，打死干部、战士2人，打伤1人，抢去步枪4支，子弹数百发，骡、马70多匹。并于4月23日在简泉山将进山驮炭的群众阎玉厚抛崖摔死。4月29日，派米三贵带领匪徒刘元堂、米四子、刘清等下山，绑架枪杀了我四区下乡催征公粮的干部、民政助理刘元生。5月5日夜间，郭又派匪首王梦元、马维元率领匪徒10余人，下山潜入北长渠地主丁玉堂家，马维元说："这次下山掌柜的(指郭拴子)说，主要是收拾二油子(指我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经过策划于当夜在富农分子马英德家院内绑架了我四区马家高庄乡乡长马彦清，将其抛到黄渠内溺死。5月14日晚，匪徒毛金瑞、马万兴、丁占福、何洪祥和地主分子田

丰海(以上5人均已枪决),在政匪头子张万保(又名张七)组织策划下,杀害了我五区三乡乡长班希珍。

郭拴子还派人到平、贺一带串联当地股匪,企图配合5月11日银川市暴动。因匪首阎廷芳(后被我枪决)等被捕,截断了联系,使其阴谋计划未能得逞,郭匪为搞乱人心,进一步制造恐怖气氛,还组织众匪实施下列行动:

(一)制造和散布谣言。在郭匪袭扰黄渠桥以后,社会上立即出现了各种扰乱人心的谣言。政匪马彦林造谣说:"惠农县让'郭司令'打的不敢住人了,解放军部队(指惠农县驻军)和惠农县政府要撤到平罗去。"匪首丁福山下山后,潜入到群众中造谣说:"山里一仗,我们就消灭了解放军5000余人,一九四师师长被打死,参谋长被活捉……"

(二)组织小股土匪下山潜入农村烧杀抢掠,强奸妇女。四五月期间,匪首丁福山、毛金虎等(以上2人均已枪决),分别带领10余名匪徒,先后抢劫了惠农县五区沈皮匠、周大吹、吕宝善、黄××、裴××、二区刘乃烈等6家。抢劫了平罗县张福元、张春、郝廷芪等3家。在抢劫郝廷芪家时,由于在家的老小都吓得藏入墩内,惨无人道的惯匪毛金虎、毛金瑞等放火把老幼7口全部烧死在墩内。全家只有郝廷芪(当时任头闸小学老师)一人因当夜住校未回而幸免遭难。在抢劫沈皮匠家时,匪徒毛金瑞、马五子、马万兴(均枪决)3人,把沈家13岁的女儿轮奸。

(三)勾结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分子、敌伪军政人员中的反动分子,策划新的图谋:

反革命分子丁炳南、马冲汉,按照在平罗县北大寺接受马正清的旨意,积极进行复党(指国民党)活动。据马彦林供称,4月间一天,丁、马2人在马冲汉家里,召集马彦林、丁创业(曾任马鸿逵部便衣队长,已枪决)、张德志(曾任旧政权惠农县党部书记长)等6人开会,研究筹划组织惠农县敌党县委会,并由马冲汉指派了各区

负责人，进行筹划组织敌党区党部的活动。这次会议后，马冲汉、丁炳南2人于5月4日潜往河东蒙地，去联络那里的反动势力。由于我政府及时逮捕了马冲汉、马彦林、丁创业等，使其复活敌党的阴谋计划未遂。

此外，哥老会的梁风惠、张万保、吴国兴等，召开会议计议配合郭拴子袭扰惠农县宝丰县城，组织匪徒上山，为郭拴子扩充反革命势力。一贯道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头子，也上下串连，设坛讲经，说"郭司令是黑虎星下凡"，制造和传播谣言，以恢复和发展道徒等手段，企图组织扩大其反革命势力，配合郭拴子的反革命活动。

由于匪势迅速扩展，郭着手进行组织改编。根据"黑虎星下凡转世"的谣传，郭将自己的武装改名为"贺兰山黑虎军"，郭拴子为司令，张怀忠（原自称中国国民党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宁夏军区副司令的股匪头目）、阎廷芳（曾任旧乡长，解放后伪装进步，留任我乡长）为副司令，安禄为参谋长，周炳文为郭拴子的副官。下编3个旅：第一旅旅长谢占奎、副旅长魏学忠，下设3个团，第一团团长张成高，第二团团长董风祥（人称董乱子），第三团团长孙强。第二旅旅长杨格娃（蒙古人，解放后曾任左旗哈拉窝卡长），主要是联络蒙古人，以投必城黑达子骑兵团为骨干，组织蒙古旅。第三旅旅长米三贵，直属司令部统辖，兼保护郭拴子的家眷。

在反革命策略上，提出笼络回、蒙族人，借以壮大力量。在活动方式上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必要时集中。行动上决定选择时机攻打左旗政府，夺取枪械物资、电台等设备。然后，联络各方力量为攻打宁夏（指银川市）作准备。同时积极设法和台湾"政府"联系挂勾。

郭拴子先派出吴国兴、吴成玉等分赴河东联络匪首张廷芝、永宁县勉××；派董风祥、任自强率其部40余人到宁朔县境内山区开展活动；派马大清、吴忠孝分别负责平、惠、贺三县的联络。整个匪伙展开了疯狂一时的反革命活动。

1950年6月10日郭率匪徒200余人，攻打左旗政府，打进东

街后派一股土匪首先占据了广播电台。由于我旗政府事先获悉作了较充分的准备，采取了有力的防御措施，使其未能攻破。经过一个时辰的交火，匪被迫撤退。撤退时将广播电台的电台及各种电讯设备、密码本等全部抢走，并挟持走该台台长和李××等人。

清剿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在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思想指导下，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给特务分子胡生明、胡鑫荣（解放前马鸿逵的理发员）、张柏子，匪首郭拴子、张怀忠、谢占奎等一个得以喘息、发展的机会。他们利用我党的宽大政策，活动更加猖獗。在此期间，群众反映十分强烈，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土匪把他们的罪恶活动也称之为“跑宽大”。在这个时期，由于土匪到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绑架杀害我基层政权干部，袭击我生产部队和剿匪部队，人民群众人心惶惶，给各族人民生命财产以及解放不久的新生政权，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7月31日，左旗旗委书记曹动之同志由银川返回定远营途中，走到贺兰山范家营遇匪，曹及随行一通信员均被匪徒杀害。

人民政府和驻军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针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形势，召开一系列会议，研究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讨论决定了以军事清剿为主、政治争取为辅的正确方针和措施，重新调整了力量和部署，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的侦察工作，基本上摸清了土匪活动的规律、地点，绘制了贺兰山的详细地形图，同时也培养起一批耳目和特情人员，为大部队进山清剿创造了有利条件。黄渠桥驻军五八二团党委讨论决定，全力以赴投入战斗，除指挥机关设在山外，绝大部分武装力量，进入山区参加剿匪；平罗驻军一九三师派出一部分兵力进入南侧山区配合，采取南北夹击、步步紧逼的战术进行

围剿。经套输沟、剪泉子山等地几次围歼战，匪伙基本被冲垮。到7月底，郭拴子带其残部和眷属被逼至大小松山一带。我剿匪部队跟踪追击穷追不放。于8月11日在松山一战，把其残部匪众大部歼灭，一部弃郭逃亡。郭拴子只带20余人和他的家眷沿后山调头北逃。刚逃到呼鲁斯太，脚跟尚未站稳，又被我部追上。这时郭拴子已成惊弓之鸟，只顾个人逃命，抛下他的2个小老婆等家眷和家产，带领20多名亡命之徒拼死突围，又调转头向南仓惶逃窜。

郭拴子和他的二旅旅长杨格娃、参谋安禄等人逃回松山一带后，又和被逼向北移的张怀忠、谢占奎余部会合，共约50余人。我军获悉此情后，即采取合围战术，步步进逼，经过几次战斗歼其大部，最后把几个匪首直逼至西福沟一个深山洞内，先后于9月20日和24日将郭拴子、张怀忠、杨格娃、谢占奎等活捉。

经过审理，并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4名首犯死刑，于1950年11月19日在银川市东教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执行枪决。至此，这个反革命气焰嚣张一时、自命不凡的"黑虎星"，终于受到了人民的制裁。

搜捕残匪

郭拴子被生擒后，被打垮的散匪，除少数向我政府投诚外，还有部分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分子或潜藏隐蔽，或逃亡外地，或流窜乡间继续进行罪恶活动，抢劫民财，奸淫妇女，无恶不做。匪首米三贵、毛金虎各自带领匪徒10余人，逃窜河东蒙地。毛金虎率其残部匪众毛金瑞、毛金良、马政文、李兴堂等10余人，于农历八月二十四日，在黄羊木头抢劫蒙民牧马5匹，令匪徒王大虎、买文华拉回平、贺一带出售。米三贵还带领米立立、雷喊子、雷进贡等人，持冲锋枪1支，步枪4支，潜回惠农县，企图报复杀害我乡治安主任刘喜，后因匪伙内部意见不一致，改而抢劫了季良儒家。次日携带抢

劫的白洋、大烟和其他物资逃返河东蒙地时，被我公安人员在石嘴山截击捕获。惯匪出身的丁福山、马奎海等投诚被教育释放后，仍继续作恶，三五成群聚众抢劫。反革命分子马冲汉、丁炳南、刘文彩等则窜逃河东蒙地潜藏活动。

这时肃清土匪残余的任务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军区派出一个连的兵力组成武工队，来惠农协助剿匪。武工队在县公安局和三区政府干部的配合下，分工负责沿山边村庄搜捕工作。县公安局在省公安总队一个排兵力的协助下，赴内蒙临河、陕坝一带，在当地公安机关积极支持配合下，追捕匪徒20余人。惠农境内活动的残匪，除被追捕的少数几人外，在我武装清剿强大压力逼迫和党的宽大政策感召下，绝大部分携械向我政府投诚。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共中央和宁夏省委也同时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省公安厅为此召开全省公安局长会议，进行了具体的部署。由此很快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至5月底先后逮捕了罪恶大、民愤大的分子300余人。经过审理并报经上级批准，7月28日和31日，在黄渠桥连续两次召开了万人以上的公判大会，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王梦元、丁炳南、丁万福、李宗谦、马维林等17名罪犯判处死刑，绑赴刑场立即执行枪决；对马文礼、马奎龙、马炳林等4人判处无期徒刑；李生洋等4人判处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另外，在宝丰、黄渠拐子等地也召开了公判大会，罪大恶极的特务、土匪丁占福、丁福山、买文元、刘同禄、毛金瑞等首犯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经过这次镇压，残存的土匪势力基本肃清，各族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为1951年下半年土地改革和基层政权建设扫清了道路。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回忆新疆剿匪斗争

许亚夫

1950年9月，我在新疆军区后勤部运输部独一营四连当连长。一天，营长到我连传达命令说："新疆巨匪乌斯满在孚远县南山叛乱，要我连全部车辆人员迁移奇台县，配属剿匪指挥部，担任部队的运输任务，并要我们立即出发。

当时，剿匪总指挥由第六军十七师师长程悦长同志担任，指挥部设在奇台西街。我们到奇台后，即到指挥部报到，指挥部要我连暂住奇台老满城卫生院隔壁的运输站。运输站长杜守义作为联络员负责传达指挥部的派车命令。当时担任运输任务的除我连外，还有独三连一个排的老羊毛车（排长刘继远）和七师的部分车辆，总计有百余部汽车。另外，还有运输部驻奇台骆驼营的4个连，有骆驼500余峰。

新疆从1949年9月和平解放后，匪特头目尧乐博斯、乌斯满、贾尼木汗等利用新疆刚解放，基层政权还未健全，以及各族人民对党的政策不够了解，社会秩序还未稳定之机，挑动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叛乱。1950年3月，匪徒在哈密以东的扣门子打死我军保养连连长及驾驶员等数人。同年4月在七角井附近截击我十七师罗副师长和参谋驾驶员等人，车辆也被烧毁；9月在孚远县南山武装叛乱。这次平叛战斗长达3年才告平息。

参加这次剿匪的部队以原驻奇台的骑兵二团为主力，还有七师、十七师的部队，他们分驻各交通要道。另有装甲车一连，估

计当时剿匪部队约有3个师的兵力。

为了堵截匪徒到处流窜，指挥部决定，凡是交通要道，有草有水源以及匪徒经常出没的地区，均设军队把守。木垒县至大石头全程约90公里，地处要冲，它东通巴里坤、伊吾、南山扣门子可直达哈密。由伊吾东南方向，通过崎岖的羊肠小道，可以抵达青海，1951年乌斯满匪徒就是经过上述地区流窜到青海的；由大石头向南，通过天山山口可抵达南疆。在大石头，驻有一个营的兵力，配有电台。

木垒至红柳峡，全程约120公里，水草丰富，是好牧场，也是乌斯满的老巢。附近有小堡一座，驻一个营的兵力，配有电台。

指挥部派我连的一个排、汽车20辆移驻木垒县，由排长官培仁负责大石头至红柳峡两地的运输任务。

从奇台向北，经过北道桥子，北沙窝，黄草湖，六棵树，哈萨坟，达不逊，小草湖，二台，哈尔通沟至可可托海矿区，全程600余公里。由哈尔通沟向西，经过肖尔不拉克、福海、白吨至布尔津，全程约400公里，布尔津至阿尔泰约120公里。以上地区除二台设有运输站外，余均露营，只有临时架设起来的帐篷，以御风寒。

北道桥子至黄草湖，要通过50公里的沙漠地带，车辆均系一二档行驶，车速非常缓慢，有的地方须要填杠子才能通行。这里又是匪徒经常出没的区域，也是车辆往返、落脚打尖的地点，所以指挥部派了一个连配有电台驻扎该地，没有房，部队就架起帐篷。

二台有5个土围子，有房屋百余间，4个土围子驻有一营兵力。另一个土围子是运输站，接待过往车辆。有一条70多米宽的河流，因无桥，汽车就从河水中通过。二台的东边是清河县，北塔山与外蒙接壤，地处要冲，又是国界线，该地区与哈族牧民联系方便。

1951 年 4 月，王一之率领车队到可可托海矿区执行任务后返回途中，至六棵树附近时，见东面隐隐约约有两个人影向六棵树方向奔来。王一之认为是自己人，因为匪徒一般都骑马，不会步行。他令车队在六棵树等候，人走过来一看，果然是自己人。将他们救护上车。向他们询问追击土匪情况，他们说：我们两个排的兵力并有骆驼营的 10 余峰骆驼，共计 70 余人，由骑二团的关连长率领，跟踪追击匪徒。土匪司令谢尔德满，匪参谋长吉林奇（该人以后因劝说土匪投诚反正有功，被吸收奇台县政协委员）是指挥大沙坡战斗的总指挥。当时，他们凭借骑术高超，熟悉地形，所以在大沙坡中与我军周旋许久。

我军追击匪徒已有 6 个月之久，匪徒在北沙窝的边缘往返转圈子，把我军拖得疲劳不堪。最后诱到大沙窝的一个较长的深沟处，土匪开始射击，这批土匪凶狠厉害，枪不放空，枪一响，不是人死就是马亡。土匪的骑兵来往奔驰，关连长率领的两个排是步兵，难以对付土匪的骑兵。此时又起风，沙子刮进机枪发生故障，失去战斗力。终因寡不敌众，除关连长及王一之救护了 2 名战士外，其余全部被俘。匪徒将被俘人员用刺刀捅死了，近 70 名战士无一生还。这批殉难者，绝大部分是从四川才来不久的新战士。

1951 年的 7、8 月间，匪徒们流窜到青海，被青海驻军中一位炊事员发现，经驻军包围全部活捉，并押解送往新疆军区。遗憾的是匪首中只有乌斯满等几个人，谢尔德满及其大女儿等匪徒，却狡猾的溜掉了。

同年冬季，王震司令员在北教场召集驻迪化的部队、机关、学校 1 万余人开公判大会，被枪决的匪徒有 11 人。王司令员在大会上号召，对匪徒要穷追猛打，彻底干净地全部消灭。

1951 年秋季，乌斯满的儿子谢尔德满及其大姐（名字不详）所率的匪徒又窜回新疆，这股匪徒人数虽然不多，但凭借熟练的骑

术和熟悉地形山路及语言等便利条件，在天山至阿尔泰长达千余公里的地区流窜，抢劫车辆行人，致使各族人民生活不安。这股匪徒后来又和朱奎（原国民党木垒县长）结成一伙，横行东北疆广大地区。

这股土匪的战术，近似抗日战争中的我军使用的游击战术，一是打了就跑，二是用少数骑兵诱我剿匪部队深入，在北沙漠及起伏不平的山地转圈子，将我剿匪部队拖得疲劳不堪，有时断粮断水，以吃生肉、喝牲畜血充饥止渴，匪徒骑兵常用四面散开的战术，将我剿匪部队围困后，从四面八方，向我军射击。1952 年的 6、7 月间，我连的王一之同志率车队返回奇台途中，在将军戈壁东北发现一名伤员，救护到车上后，他说他是骑二团的，追击匪徒 6 天后，被诱到一个山凹里，他们连被围，生还的没有几人。

匪徒非常狡猾。稍一放松就会溜掉。如在百顶帐蓬中隐藏少数匪徒是很难查清的，因为这些帐蓬都是老弱妇女小孩，部队的同志不会哈语，这就给匪徒造成可乘之机。你打他，他就伪装成牧民，你走了，他们又钻出来，给剿匪部队增加了不少困难。

1952 年元月，指挥部要我连派汽车 12 部，由黄春银同志带队，由奇台装运物资至可可托海矿区，并派骑二团的一个 17 人的加强班护送。车队完成任务返回途中，在二台住宿。第二天，天气阴沉沉的，但无风，就决定还是出发。这时正处三九天气，温度达零下 40 度，特别寒冷。车队行驶至小草湖约 10 公里处，气候骤变。西北风怒吼，霎时间鹅毛大雪从天而降。车队行至小草湖九沟十八坡，坡滑又被雪埋平，虽然先头的九部车冲了过去，但到第十部车时，因为稍一迟缓，车子滑坡，无法过去。押护人员帮助推车，手脚冻麻木了。但由于是上坡。轮胎被雪埋住了。所以十几个人也难将车子推动。

正当同志们设法将车子开出时，从小草湖方向来了 4 个骑马人。他们在距车约 1000 公尺时，一字摆开，像是在商量什么。护

送车队的指导员，误认为自己人，即向骑马来的人打旗语联系。骑马人没有回答旗语，而是左右分开成扇子形，持枪向我方射击。这时，押车人员才知道是遇到土匪了，当即原地卧倒。开始远距离的枪战。大约有1小时之久，我轻机枪手中弹牺牲。另有7人的腿部也被打伤，连护送的指导员也受了重伤。

指挥部接到黄草湖的电报后，程军长连夜组织剿匪部队，亲自率领装甲车、汽车去黄草湖堵截匪徒。

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车队抵达不逊出事地点已很晚了，匪徒早已逃走。翌日拂晓，我们向九沟十八坡进发，到达出事地点见三部车子仍在原处。程军长和我们查看了车况，发现有数处枪击痕迹，油箱及车上的燃料都原封未动。顺着马迹又拾到一块带血的破毡，这说明4名匪徒中也有人受伤。因为没有发现土匪，所以军长除给我留下押护人员及救济车辆外，追剿部队和装甲车就奔赴二台去了。据指挥部后来捉到的匪徒供认，这4名匪徒是谢尔德满的4员大将，他们是去北塔山和外蒙牧民联系。由于外蒙戒备森严，拒绝过境，他们在返回途中遇到了黄的车队，想抢劫车上的物资，却未想到车上有较强的武装人员，才发生了1个多小时的战斗。

1952年5月，营部通知要我返回迪化，参加运输部的运输会议。会议期间接到奇台的紧急电话，说车队二次遇匪，匪徒打死我方20余人，烧毁老羊毛车两部。后来，我回到奇台了解事变的经过。

原来五月份指挥部派我连汽车15部，由王一之率领，另有独三连的汽车15部，老羊毛车15部，由排长刘继远同志率领，由奇台装运米面及工四团的部份搬迁人员，开往可可托海矿区。当天住小草湖，次日早饭后，老羊毛车队准备完毕，出发先行。车队行至哈萨坟一公里处，车停下来等候尾车，并下车查看哈萨坟动静，几十个人都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这时尾车也到了。为了

提防哈萨坟内藏有土匪，刘继远和押车人员各持一挺轻机枪，架设在装有米面的垫包上，车上凡有武器的人也都作好了准备，并规定车距不得超过30米，车队缓缓地开进哈萨坟。

哈萨坟的进出口各有100米左右山口，中间约有4公里长起伏不平的空地。车队进山口不到500米，就听到轻机枪声、步枪声和手榴弹声，响成一片，先头的车与土匪遭遇了。第三部车看到情况紧急，调回头就跑，后面的车也跟着调头跑，到了六棵树遇到王一之率领的车队，说明情况，一同返回黄草湖，向驻军作了汇报。并由我连负责将车上的米面卸掉，然后装运军队又向哈萨坟进发。部队到达哈萨坟已是日落西山，匪徒早已逃之夭夭，只剩下21具被烧得面目不清的尸体，和被焚汽车的残骸。刘继远、驾驶班长和押车人员都已殉职。

（选自《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南山剿匪的日日夜夜

袁学凯

1949年8月26日，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指挥下解放了兰州，歼灭了马匪主力，接着以排山倒海之势相继解放了银川、西宁以及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等重要城镇，直逼新疆东大门。9月25日和26日原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先生分别通电起义。中央决定由王震司令员、徐立清政委率领一兵团（辖第二军、第六军）迅速进军新疆。

我十七师奉命进驻北疆之迪化市、绥来、奇台、伊犁、惠远地区，肩负着维持地方治安，民主建政，整编起义部队和生产建设的重担，努力完成毛主席要求我军既是战斗队、工作队，又是生产队的光荣任务。

一

1950年春，是新疆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有很多工作摆在我们面前，接管城镇和边境防务、整编起义部队、建立地方政权、恢复生产建设等，可新疆的形势很不平静，政治土匪乌斯满，秉承前美国副领事马克南的旨意，勾结骑七师内部一些反动军官，公然在阜康地区发动了武装叛乱。

骑七师原为骑五军，是从青海调到新疆来，专门对付三区革

命的一支军队，是青海封建军阀马步芳的嫡系“王牌军”。新疆和平起义后，骑七师大多数军官和士兵是拥护起义的，但也有极少数国民党特务分子和反动军官对和平起义和我军的整编改造极为不满，于是铤而走险，发动了武装叛乱。

正当我们在迪化和部队驻地忙着拉石头修水渠，积肥送粪准备开展大生产时，3月24日，接到驻阜康部队的报告，骑七师特务营400余人在反动军官马占林、冶生林的欺骗下发动了叛乱，抢劫了九运街及其驻地的村庄。尔后窜至南山牧民的冬窝子，准备配合乌斯满进攻迪化市。我们把这一情况立即报告了军首长，并告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做好进剿叛军的准备。25日晨，罗元发军长亲自来电话，令我率四十九团一个加强营、五十一团一部，在战车五团的配合下，尽快围歼这股叛军。放下电话，我立即与程悦长师长研究（当时我是十七师政委），确定四十九团一营配属团炮兵连，和五十一团2个连担任围歼任务。并请军区司令部令战车五团派装甲车3辆，在迪化至阜康的公路上昼夜巡逻，确保这一段交通运输的安全，如遇叛军向迪化运动，则进行拦阻。我们立即给四十九团张江森团长、五十一团李凤友团长下令，叫参战部队迅速向阜康集结。四十九团并以一部兵力在阜康至奇台的公路上拦截，防敌东窜奇台；五十一团除加强迪化市现有哨所警戒外，还要增设流动哨和巡逻队，随时做好迎击叛军进攻迪化市的作战准备，确保迪化的安全。战斗任务下达后，我就直奔阜康，指挥作战。

阜康是个小县城，人口不多，由于叛军的抢劫和屠杀，弄得人心惶惶，商店关门，街上见不到几个行人。一片凄凉景象。我们到达阜康时，县委书记王帮玉同志（原四十九团一位教导员，是个经过长征的老同志）已等在街上了，见到我们高兴地说：“你们可来了，这就好了。我们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紧接着，他讲到叛匪的情况，“这些叛匪坏透了，不但抢劫财物牛羊，打骂群众，

烧毁房屋，而且将我们派去的军队干部全杀了。杀头不算，还开膛破肚，真是太残忍了……我们派去的干部，个个都是好样的。据叛乱后跑回来的人讲，解放军派去的干部没有一个孬种，当这些同志被害时，还痛斥这伙叛匪对人民犯下的罪行"。

听了他的话后，不由激起了我对叛匪的憎恨。我们一定要为受害战友报仇，化悲痛为力量，坚决干净彻底地消灭这股万恶的叛匪，巩固革命政权。

一阵马蹄响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抬头一看，张江霖团长已经下马，向我走来。紧跟着的是一营营长曹升林同志。我问他们部队的情况怎样，张团长讲："部队情绪饱满，没有一个掉队的。"曹营长讲，"好久不打仗了，这次狠狠揍他们一下，叫他们尝尝解放军的厉害！"我说"很好，让部队休息一下，连以上干部跟我去看地形。"

我们爬上东面的山坡，从望远镜中看到叛匪400多人，近千匹马都麇集在甘河子以南的一条山沟里，烟雾腾腾地正在做饭，在通往阜康的大路上有一排的兵力担任警戒。看来叛匪并未想到我们会这样快赶来剿灭他们。

大家一面看地形，一面分析情况，研究打法。王帮玉书记讲："叛匪很狂妄，扬言只要有乌斯满配合，就可拿下迪化市，解放军装备差，没有什么了不起。"张江霖同志说："今天晚上就叫他们见阎王当俘虏。"接着有的提出插到叛军背后，从南面居高临下，来个泰山压顶消灭敌人。这种打法虽然跑路多些，但地形对我军有利；有的提出为防敌西逃窜扰迪化，西面应派出部队加以防范；有的提出为了争取时间从正面进攻好。最后确定兵分三路：一路由曹升林营长带一个连轻装快速绕过甘河子。到匪军背后沟脑上，由上向下打；五十一团的一个连，迂回到沟的西侧向东打；我与张江霖团长率领炮兵和其余部队从阜康正面攻击。要求三路部队动作迅速，行动隐蔽，不要被敌人发觉。打响后，要勇猛顽强，狠

狠地打击敌人。发起攻击的信号，是三颗红色信号弹和十分钟的炮火射击。任务明确后，就按预定作战计划向叛匪实施迂回包围。

迂回到叛匪背后的部队路远，又要翻几个山梁，正面和西面的两路部队都已占领了攻击出发地，还看不见南路的动静，使我有点着急。炮兵连长几次跑来报告："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你一下命令就开炮！"我从望远镜中看到，后沟脑上丛林中有人在行动。

于是，我下令攻击开始。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迫击炮、六〇炮、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射向叛匪群中。大路上担任警戒的叛军一个排，被我炮火打得七零八落，剩下几个人南逃，向匪群靠拢。匪首冶生林见警戒部队败退，亲率一个连的兵力向我正面扑来，连续三次被我击退，叛匪死伤过半，冶生林也在反扑中丧生。后又向西面突围，被我五十一团的部队打了回来。正面、西面突围不成，东面是陡壁，上不去，只好向南跑了。我迂回到匪军背后的部队居高临下，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打了下来。这时沟内人喊马嘶，搅在一起，忽尔向西，忽尔向南，乱作一团。敌人阵势已乱，我便下令总攻开始。冲锋号一响，三路健儿奋勇争先，迅速冲杀至沟底。叛匪马占林被我生擒，大部叛匪被歼，只有少数人乘隙隐蔽逃窜，武器弹药及马匹全被缴获。

这次战斗是我军入新疆后的第一仗，部队打得英勇顽强。从战斗开始至结束，只用了3个小时，这股所谓的王牌军就被我们消灭了。

二

甘河子一仗，歼灭了叛匪，这在起义部队中震动很大，部队稳定多了。但在新疆受美蒋特务指挥的乌斯满、乌拉孜拜等几股土匪并不甘心，他们利用历代反动统治造成的民族隔阂与仇视心

理，挑拨民族关系，煽动和胁迫部落群众进行叛乱。

乌拉孜拜系哈族封建头目千户长的儿子，1945年投入国民党反动阵营，并加入新疆警备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组织。随即出任景化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国大代表。他在任期间，任意杀害进步青年和各族群众，绥来、景化一带群众对他早已恨之入骨。新疆和平解放后，他与匪首乌斯满勾结，继续与人民为敌。

为了确保南山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军区令我率五十一团、骑兵团、四十团各一部，配属军炮兵团重炮连，组成步骑兵，向南山进剿。南疆由六师熊晃政委率一个团，进至天山南麓之焉耆阻敌南逃。

剿匪政策性很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问题复杂。我们首先学习了西北局“军政并重，剿抚兼施的剿匪方针”和在民族杂居地区，着重展开政治瓦解工作，争取胁从群众回归，对怙恶不悛和敢于顽抗之股匪，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集中优势兵力进行连续围剿的原则。根据这些方针、原则，结合新疆的特点和部队的实际情况，我们于7月28日制定了具体的政策。这些具体政策是：

（一）除少数一贯为非作恶的匪首外，一般的哈族同胞是拥护赞助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但因不了解政府的政策，而被匪首乌拉孜拜等胁迫参加抢劫者，应宣传教育，争取其归向人民政府。只要归向人民政府者，就应很好地团结他们，在作战中应分别好坏，予以不同处理。

1、拥护并赞助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者应帮助其解决可能解决的困难。保护其生命财产之安全。

2、凡持中立态度不帮匪特者，应进行宣传教育，争取其靠拢人民政府，对他们的牲畜财物等不许丝毫侵犯。

3、坚决顽抗者，要坚决勇猛彻底予以歼灭。当其已向我投降归顺或被俘虏时，应尊重其人格与风俗习惯，决不许有任何侮辱

虐待，其牲畜财物除被劫群众认领者外，仍归原主不许随意动用。

（二）对叛匪遗弃的和战场上缴获的牲畜，应发动群众认领，余者呈报前指物资处理委员会统一分配处理。各单位不得擅自处理。

（三）在政策上如发现特殊问题应即报前线指挥所不得轻率处理。

最后要求我参加剿匪的全体指战员，在剿灭匪特的战斗中，发挥英勇顽强，吃苦耐劳，不避艰险的优良作风，完成党和上级及全疆人民所给予我们的伟大而光荣的任务，活捉匪首乌拉孜拜，解放南山哈族同胞及各族人民。

各参战部队以3天时间进行思想动员、政策教育和物资准备，于7月30日由绥来、昌吉、迪化出发。五十一团5个连由副团长杨光国率领为中路，骑兵团5个连由吴政委率领为西路，四十团5个连由团长玉苏甫率领为东路，指向匪巢——三道马场。

顺着山沟南走，耕地越来越少，沟越走越窄。走了10多公里就进入松林绿草铺地的夏季牧场了。

三

向前望去，部队已开始上山。当天的宿营地是骆驼脖弯山顶。骆驼脖弯名不虚传，真象骆驼脖子一样的一条山梁挂在天山雪线下。翻第二个山梁时，东南方向雪山深处，一股乌云升起，随着东南风向西北飘移，很快布满了整个上空。当我们爬至半山腰时，下起了暴雨，随着霹雳的雷鸣，暴雨转为冰雹，打得驮炮的骡子和马乱蹦乱叫，我怕战士们被冰雹打坏冻伤，叫警卫员传令，指战员用衣服顶在头上继续走（因无处躲避）。到达山顶时，气温急剧下降，冰雹变成了鹅毛大雪，穿上皮大衣还觉得冷，风刮得人站不稳。部队宿营要架帐篷十分困难，后来发现东面绝壁下风小

些，就在那里架起了第一顶帐蓬。这时天已黑了下来，通信员报告，五连有一名战士冻昏过去了。我叫卫生员小梁来，对他说："你就在路旁，等病号一到，赶紧送到帐蓬去，给他将大衣盖上，想办法给搞点开水喝。"

部队全部到达后，风停云散，天又晴了。三营营长张思礼同志是随后卫连最后上来的。一见我就说："袁政委，我们今天不到24小时，就过了春夏秋冬四季，饱尝了风雨冰雹，真不简单呀！"我看他满头大汗，扛着两支步枪，雨水雪水汗水交加在一起，湿透的衣服还在滴水。就紧紧握住他粗壮的大手说："思礼同志，今天你这个收容队长当得不错呀！马让给病号骑还不算，又帮战士扛双枪。看来，你这个负过9次伤的红军战士，还经得起摔打几下子呢！"他指着一走一瘸的两个战士说："这是两个新同志，走山路少，脚上打了泡。"我说："你做得好，这种爱兵精神要发扬，越艰苦，越困难，越需要关怀他们。进山第一天就遇上这种天气，这对我们是个考验。我们不但要与乌拉孜拜斗，还要与地斗，与困难作斗争呀！"他说："请首长放心，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说完，又踏着他那沉重的步伐前进了。

这天晚上，同志们就露宿在骆驼脖弯山顶了。

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8月3日11时，我们占领了三道马场，俘敌23人，缴获步枪45支、马80匹、牛百余头、羊250支、帐蓬8顶。被胁迫的包哈尔汉库什毛拉、哈尔哈提、阿也汉、包思良、沙克及东山的乌爱阿吉等10多个部落，均脱离乌匪，归向人民政府。匪首乌拉孜拜率匪徒19人，向塔西河脑后山逃窜。我们除派小分队追击外，并派人配合绥来县委副书记高克勤同志领导的哈族工作团和景化县公安局长王文宣同志领导的工作队，深入哈族群众，广泛宣传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帮助维护社会治安。

8月29日，我们进至西沙尔大坂。这里标高4000多米，空气稀少，上面是冰山，下面是绿川。就是这一段，寸草不生，全是

不大不小的碎石片，一敲当当响，走起来比在榆林沙漠里还要难，一上去就滑了下来。几百米的一段陡路，部队爬了2个多小时。重炮连驮炮的骡子一下就陷进碎石里去。五十一团的同志们走在前面，一面走，一面将大点的石片垫在上面。重炮连的同志们将炮身卸下来，十多个人扛着，旁边的人拉着他们的手，就这样我们的炮兵一步一步连拉带扛地上了西沙尔大坂。带路的哈族老乡伸出大拇指称赞说："这里道路崎岖难行，我们哈族人也很少走。我到这里也是第一次，你们的大炮都上来了，真是英雄。"

翻过西沙尔大坂，进入阿比西太沟，这里地势比较平缓，离雪线很近，融化的雪水汇成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两岸还有薄薄的冰层，什么草都不长。可是长满了雪莲花，跟我们追剿叛匪的孟翻译（锡伯族）告诉我们说："雪莲，可以治疗癫痫病，女人生孩子发高烧，胞衣下不来，用一朵雪莲花熬水，一喝就好……"他这样一讲，我们每个人都摘了几朵。

回到帐蓬时，炊事班长老李走来，说："今天吃饭成问题，这里水不缺，可柴草树木没有一根，烧什么呀？"我说："不要着急，你看这里牛粪马粪不少，这都是好燃料。我们长征过草地时烧过，还好烧呢！"说着，我叫警卫员蔚保，拿了条口袋去拾牛粪。其他连队见我们指挥机关拾牛粪，也很快动了起来。

叛匪在满头白、多仑沙尔大坂凭借天险，阻挡我军，均被击退，为策应乌拉孜拜，匪首司迪克派他的儿子哈米提，亲率百余名匪徒，由乌拉孜拜的参谋长阿不拉哈森带路，翻越天格尔大坂增援，企图阻我进剿。

8月30日，我们翻越4000多米的阿比西太大坂。下午2点多，进入桥龙沟。这条沟是翻越天格尔大坂，通向南疆的必经之路。阿不拉哈森亲率70多名匪徒在这里阻我前进，打响了第一枪。敌人藏在半山腰石缝里打冷枪，很难发现。我令"骑兵团前卫连边搜索、边前进，如发现敌人就进行追歼。"后来枪声愈来愈激烈。

我带几个人跑到骑兵团指挥所。这里地势高战场情况可以看得清楚。敌少数人在半山腰打冷枪，大部分人和马匹隐藏在沟内的两块大石头后面，不露头，只是鬼鬼祟祟地打冷枪。吴特政委正在给几个连长交待任务："一连从正面攻，另一个连从西侧山梁迂回到敌人左侧夹击，防敌向西南方面逃窜。另一个连从东侧攻击……"任务交待完后，吴特同志问我："行不行？"我说："同意你们的部署。为减少伤亡，尽快消灭这股匪徒，叫炮兵连跑步上来支援。五十一团来一个连，从东面配合你们。"这时后面的部队，也向前靠拢了。

部队展开后，即向敌猛烈射击，躲藏在半山腰的敌人见我部队上山，都悄悄后退了。可藏在石头后面的敌人凭借两块几间房大的石头，仍顽强地抵抗。我对重炮连长讲："敌人躲在大石头后面不出来，步枪机枪用不上，手榴弹又够不上，这可要你们显一显威风了。"连长高兴地说："用杀伤弹燃烧弹各一枚，保证命中。"我说："好"。

第一颗杀伤弹打出去，轰的一声，正中敌群，人马四散外窜。我轻重机枪、步枪一扫，他们又卷了回来。这时，第二颗燃烧弹正好落下，敌人、马身上燃着火，惊慌逃窜。我东西两侧的部队均向敌群猛烈射击，敌人有的脱掉皮衣裤，有的脱掉皮靴，拼命向山上跑，各自逃生。我叫部队组织小分队追击，并令特等射手向逃敌射击。不到3个小时，战斗结束，顽敌大部分被我歼灭。阿不拉哈森被我们活捉。当他被托克提同志押送到我们指挥所时，他看了看四周，胆怯地说："你们的炮弹真厉害，都是从天上下来的，打得我们无处躲藏。"随即，低下了脑袋。

桥龙沟一仗，打通了通向天格尔大坂之路。但叛匪仍不死心，匪首哈米提给父亲司迪克写信说："解放军来了，从速组织人枪抵抗。"他们又纠集百余人，据守天格尔大坂，躲在陡壁悬崖石丛中，不断向我射击。我五十一团五连为前卫，战士们个个精神饱满，冒

着浓雾爬上崎岖难行的大坂。经过精细的观察，弄清敌情、地形后，发起了攻击。战士们忍耐着高山缺氧的困难，奋勇向前冲。忽然，听到南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是我四十团，从东面乌提肯大坂迂回到敌后的骑兵部队，向敌开火了。叛匪见我南北夹击，火力猛烈，便向西之哈拉爱特沟逃走了。

四十团、五十一团这两个不同民族的兄弟部队，在天山高峰天格尔大坂会师了。同志们热情的握手拥抱，高呼“胜利万岁！”红旗插上了天格尔大坂。

第二天拂晓，五十一团配合骑兵团占领了小哈拉爱特沟，开始向叛匪猛烈地追击。黄昏时，骑兵团首先越过大哈拉爱特沟，缴获了匪徒的850多顶帐篷，乌拉孜拜的3个老婆和女儿也当了俘虏。

9月底的天山深处，已经很冷了，是夜下了一场大雪，不少帐篷被压倒，四十团和骑兵团有数十匹战马冻死。

早晨，四十团的部队，从我们营地通过。团长玉苏甫特来向我们报告：“我们押送军粮的一个班和几十头驮粮的牲口遭敌伏击，11个人全被他们杀头剖腹挖眼了，真残忍。我们的口粮成问题了，你看战士们有的就是拿死马肉充饥……”我说：“天冷了，又遇到没吃的，但群众的牛羊是他们的命根子，不能动，我们只好打山羊吃了。昨天带路的哈族向导哈拉尔打了一只90多斤的大头羊，味道蛮香呢！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爱护战士，遵守群众纪律。”玉苏甫说：“我们不少同志鞋子全磨透了，弄了些牛皮、马皮做皮窝子，这东西轻便爬山很好。”我说：“骑兵团、五十一团在桥龙沟战斗中，不少人光着脚追击敌人。这仗下来后，孟翻译也告诉我们，牛皮、马皮可以做成窝子，还指导战士做皮窝子，不少人穿上了蛮舒服。”最后我说：“你们团这次作战任务完成得很好。行动迅速主动，能吃苦，为民族军争了光。今后更艰苦，我们要继续克服困难。”玉苏甫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搞得更好。”

说完，他随四十团的后卫连去了。

经我军近2个月的追捕，南山股匪基本肃清，被迫从匪的哈族同胞全部被解放，追回牛羊牲畜近6万头。景化、迪化、绥来、昌吉各牧区工作组，对回来的哈族同胞，重新划分了牧场，调剂了冬窝子，进行了妥善安置。

1951年，乌拉孜拜终于被活捉。1951年，他与乌斯满一起被公审，判为死刑。

杨庆余执笔

（选自《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

广汉“匪世界”

侯少煌

我的家乡广汉，距成都40余公里，处在交通大道上，从辛亥革命起直到解放，匪患一直没有肃清过。尤其是从1912年到1926年间，这里竟成为匪世界，县属23个乡镇，除三水关外几乎全被土匪盘踞。弄得田地无人耕种，野草丛生，甚至长起了碗口粗的杂树；交通断绝，商旅不通，连小部分军队通过，也得交涉假道。

我是广汉县人，又是袍哥，当时同土匪接触很多。我曾替他们买过枪弹，为他们调解过纠纷，作过掩护。有的匪头穷蹙时，我在生活上接济过他们；有的匪头我曾介绍他们招安成军；而最大的匪头侯永成、侯体乾，又因与我同姓，还同我认过家门。因此，我也是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为当时社会情况作一个历史见证。

一、1912——1916年间的广汉土匪

广汉土匪的猖獗是在辛亥革命以后，而且与辛亥革命有相当关系。

1911年秋，四川各县保路同志会纷纷成立。广汉袍哥由本县革命党人（也是向阳场的袍哥大爷）侯橘园倡导，在县城组织成立了广汉县保路同志会，并计划组成保路同志军到成都北门参加包围省城。7月23日，驻德阳清军某哨官率兵士50余人开赴成都，进到广汉西区距向阳场数里的地方，因沿途人民在大道上设

置“德宗景皇帝”牌位，并拒阻清军，这些士兵不能通过，停在筲箕坡下休息。这时，侯橘园出来这位哨官说：“向阳场公口（指哥老公口）的坐堂大爷是我，保董（等于团总）也是我，你的部队要通过，可来同我交涉。”哨官喜出望外，就挽着侯的手到附近东岳庙内商谈。刚进庙，侯突然夺取哨官的战刀，顺手将其砍死。士兵骤失头目，慌乱无主，各自散逃，被群众持马刀、锄头、长矛围追，杀死了10余人，群众也被他们开枪打死多人，最后把这支队伍全部缴械。

侯橘园旋即约集各场袍哥队伍到三水关会合，打算开到成都围堵北门。但县境许多袍哥大爷因为怕造反灭门，都未请到，有些只派管事率少数人来凑热闹。三水关的哥老公口完全由地主掌握，不让各场开来的队伍进场，只住在场外的祈水寺。各场袍哥来了七八百人，看见没有一个知名的袍哥头子到场，认为侯橘园不过是一个留洋学生（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同盟会员），不是真正的袍哥，不能领导他们，遂三心二意，不愿前往成都。侯橘园忙爬上祈水寺的戏台演说，讲述反清革命的道理。连山带队的大爷秦老皮深怕人众被侯说服，在侯刚一开腔，就带头大闹，猛一枪将侯打死在戏台上。于是这一群乌合之众，就各自散去。

不久，成都独立了，赵尔丰交出政权，参加包围成都的各路同志“大王”，都由革命的都督府委以军职。广汉袍哥眼红了，深悔当时不该打死侯橘园，应该到成都参加革命。

不久尹昌衡继任四川都督。他想利用哥老势力作为自己政权的支柱，除在成都成立“大汉公”总公口，自任总舵把子外，还通令各县哥老头子率领兄弟伙到成都点验成军。这时广汉向阳场的大袍哥张明之、邓永文两人统率几百人的队伍，人人带红花，缠套头，腰悬各式刀剑，携带明火枪、马炮等等，扬威耀武地开到成都成军。尹都督把张邓二人委为广汉县保安营的正副营长，叫他们回县，维持广汉的治安。

这时袍哥真是红极一时，被称为“点点红”，即是说，只要你有“点点”（即加入了哥老），就算走运。又称为“袍哥翻身”；因为清朝禁止袍哥，民国哥老组织却合法化了。因此形成了人人都想当袍哥的局面，广汉袍哥的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城乡各地新增了很多公口。

张、邓回县后，营部驻扎城内考棚。他们统率的兄弟伙，除少数流氓痞子外，原本多是青年农民，这时脱离了生产，已失去农民本色。他们住在县城东街的韦驮堂、北街的广东馆、西街的火神庙等处，摆设牌九和大宝赌场，日夜聚赌，包庇烟馆。乡场的袍哥也公开摆赌场、开烟馆，与城内看齐。每逢赶场日期，集队你来我往、都是各带刀矛枪支，赌博酗酒，把全县闹得乌烟瘴气。

张明之、邓永文的保安营，是由县府拨给粮饷的。但他们纠集的哥老人数越来越多，粮饷渐感不够。于是就自动去挑地主的谷子。大地主的谷子不敢担，中小地主乃至农民的谷子都被他们强迫担走。后来张邓二营长在城绅地主和县官的要求下，下令禁止担谷子，于是他们就干脆动手抢劫，广汉全县，开始成为匪世界了。

保安营成立将近半年，被代理四川都督胡景伊下令解散，但并没有如何安置处理的下文。这一批已经胡行乱为起来的“好汉”们，就公开继续在各乡为匪，日夜抢劫。

1913 年熊克武在重庆起兵讨袁，广汉同盟会员张晶三起来响应，成立川北讨袁军，自任司令；由张明之、张菊东两大袍哥头目及三水关的袍哥大爷兼团总向玉如等分任支队长；张将其集合起来，开赴绵阳闹独立。这时各县的哥老大头目如安县的何鼎臣，什邡的李润生，金堂的李华山、李连洲等都集合队伍前往绵阳参加，分任支队长或团长。但绵阳的讨袁军迅速被胡景伊所派的刘存厚军队击败，张晶三、张菊东逃走；张明之率队同何鼎臣退据

安县，在北门外灵官楼被刘部追兵用大炮轰垮楼房压死，他部下的哥老土匪，大多仍散归广汉，继续为匪抢人。如此下去，逐渐形成侯瞎子和巫鸡儿两股巨匪。广汉西门外各乡是侯的势力范围，北区各乡镇是巫的势力范围，2/3 县境都成了土匪出没的地区。

二、侯瞎子、巫鸡儿两大股匪的形成

侯瞎子名永成，曾于 1911 年 7 月参加侯橘园率领的向阳场袍哥，截击过道清军。兄弟 3 人：二哥侯棠是清末最后一科秀才，住过铁道学堂，任过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办事处职员，民国时期在四川省警察厅当过科员、科长；大哥侯孟平在家务农，后来三弟兄都当了匪头。他母亲是广汉举人廖士英的妹妹。他家原有 18 亩田，后来扩展到 60 亩，在广汉算个中等地主。人称侯瞎子为“侯幺老爷”。

侯瞎子在截击清军时抢得一支九子步枪，1912 年参加了保安营。这时本乡大地主周达三、周竹安、周锦堂等都买了九子枪（100 元一支）保家，侯瞎子硬向他们各借枪一支。不久，连山大爷秦老皮派人从成都买枪回来，路过向阳场，他把秦的 5 支九子枪给吃了。有了近 10 支枪就拖队伍抢人。在“向阳公”张、邓两派袍哥互相惨杀中，他的实力越来越大，又大量购买枪弹。城里的地主当权派如团练局长廖抟九、侯泽坡等都暗中替他买枪送弹，县官或军队派队去剿捕他时，又事先给他通风报信，多方掩护。他抢来的财物，也不时分送一些与这些当权派。拉到的“肥猪”（即绑票），只要廖等出面来取，总是给他们面子，而后大家分肥。在城绅大土豪支持下，侯瞎子在三四年间人枪发展到四五百，不但广汉西区各乡镇成了他盘踞出没、任意抢劫的场所，而且邻近县也遭到他的祸害。

1914 年，他抢劫新都的军屯镇，洗劫全场。同年，为了营救

向阳场的两个袍哥，率队攻入新都县城，把警备队的枪抢了，放火烧了新都县衙门，打开监门，释放了全部囚犯，把新都的陕西馆、南街，都放火烧了。全城被劫，拉了很多“肥猪”，最后安全退走。

1915年新繁袍哥勾引他去抢新繁，打进城后，大烧大抢，还杀了很多老百姓。邻近的德阳、什邡、罗江、绵竹等县场镇，多遭到他的匪队抢劫。

1916年护国之役，国民党人王蕴滋时任川军第六混成旅张成孝团的连长，奉旅长锺体道的命令，同旅部参谋李挽澜到成都领运枪弹。王认为是一个自我发展的好机会，事先托同盟会员郑宇熙通过侯棠的介绍，与侯跰子联络，叫侯率匪队在预定的途中进行拦劫。侯跰子率己部并巫人杰的部分匪徒约800人，在金堂赵家渡前方约50里的风洞子潜伏，结果护送械弹的技术营全部在此被缴械，计步枪500枝，子弹50万发。

风洞子袭击得手后，侯跰子、巫人杰率队随王蕴滋到三台，打出四川讨袁军的旗号，王任总司令，委侯任先遣支队（同旅长），巫任别动第一支队长。还有其他县的著名哥老匪头如什邡的张升廷，安岳的李布客，潼南的段老和尚等，也都被王委为别动支队长。

护国战役结束后，王蕴滋取消讨袁军总司令旗号，令巫、侯、张等各率所部匪徒回川西一带占据地盘。巫人杰遂率队占领绵竹，委官收税，形同割据；侯跰子率队驻绵竹城外。数月后，川督罗佩金因巫侯两部拒绝移地改编，派滇军24团团长李真生率队攻打绵竹，巫人杰被击毙，侯跰子率队退逃广汉，在滇军尾追中亦被击毙。

巫人杰，因身体矮小，绰号巫鸡儿，广汉北区高骈乡人；弟兄3人，巫家贫，幼扯猪草，12岁帮人种田，15岁即加入本地兰丰码头袍哥会。

辛亥革命后，巫人杰凭借祖父、父亲都是袍哥的关系，聚集了10几个袍哥，在永丰乡巫家大林一带抢人。因有本乡团总唐么贡爷及城内团练局长兼大舵把子廖抟九的掩护，未被逮捕。有一次县知事李尔奇探得巫匪聚集北门新场，即召集县城有关首脑人物密商，决定派驻县的北洋军队及团防、警备队会同前往围剿，期在一鼓歼灭。但部队尚未出动，团练局长廖抟九已派人缒城而出（当时城门经常关闭）报信与巫。军队来到，扑一个空。

由于巫与侯瞎子互相勾结合作，官军来剿，人多他就避让，人少他就硬打。有时还与侯瞎子联合围剿大部官军的枪支。因此实力逐渐扩大到五六百人，盘踞广汉北区各乡镇。

巫人杰还有一套办法，即侧重抢外县人、外乡人。他的匪队经常到中江、什邡、绵竹、德阳、彭县地区抢劫，在本地则专门抢过道客商，抢各县解送成都财政厅的税款。1916年在广汉拦截北洋军伍祯祥旅的零星部队，抢了200多支枪；风洞子伏击得手后，又分得几百支枪，其实力发展到1000余人，超过了侯瞎子。

他在绵竹独立时，自称“清乡司令”，委广汉袍哥唐辅仁任知事，替他征收税款，压榨人民。除贩烟摆赌抢劫拉肥外，最突出的罪恶是大肆奸淫妇女。

滇军李直生团攻巫匪时，巫匪一面紧闭城门，不准居民逃走，一面搜集全城洋油及引火之物，堆置各街口子，准备撤走时焚烧全城。但第二天他就被击毙了。

三、军阀招匪扩军，广汉成匪世界

1916年以后四川军阀外与滇黔军往复混战，内又不断自相残杀，社会秩序更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就更给土匪的继续滋生发展提供了泉源和肥料。加之大小军阀都要扩充部队，除自己招兵买枪造枪和互相兼并、互相拖拉队伍外，最便利的办法

是招安土匪成军。土匪成了军阀扩军最有效、最经济的补给源泉，军阀不是患匪多，而是要造匪、养匪。因此，广汉匪头在侯、巫被击毙后，就又产生了一批一批的继承者。他们在军阀的扶植下，都是由匪头而当上军官，或者是当了军官又当匪，当了匪又再当军官。在这种军匪不分的环境下，广汉土匪势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

（一）侯瞎子一系的军军匪匪

侯瞎子死后，他的匪队还剩400余人，由绰号“粉壳壳”的郑金廷、绰号陈豹牙的陈裕光和胡国明3人率领到什邡李家碾和高桥一带盘踞，在茂县地界种烟贩烟。郑、陈、胡都是广汉向阳场人，谁也不肯甘居下位，于是议请侯瞎子的大哥、二哥来统带。

侯棠认识军政要人较多，1918年川军第四师师长刘成勋委他任营长，侯孟平及郑、陈、胡3人分任连长。但刘成勋并不信任他们，要吃这一营人，于是在次年驻蒲江改编时，将侯棠改委为邛崃烤酒局长，侯棠达到做官目的，欣然到任了。刘又调侯孟平及郑、陈、胡等分任师、旅部副官，但他们知道这丝毫没有前途，于是就依然回李家碾拖棚为匪，种烟贩烟，抢人拉肥，买枪置弹，不久又发展到三四百人。

这时郑、陈、胡之间发生了争夺首领地位的冲突，陈豹牙将郑、胡2人刺死。

1920年，熊克武与滇黔军作战，刘存厚打着靖川军总司令的旗号回川，委田泽孚为川北清乡司令。陈豹牙被田委为清乡团长，调驻德阳。匪头清乡，在当时已不是怪事。嗣因田颁尧的旅长孙震与田泽孚争夺德阳，陈仍退踞李家碾一带。

不久陈又被为匪起家的张升廷旅长委任为骑兵团长，驻防广汉。

1921年冬，赖心辉解决了张升廷，陈豹牙除把队伍留一部分

在广汉当土匪外，拖了一部分到新都受邓锡侯招安。邓委他任总指挥部督察长。邓往来广汉、新都、德阳各地指挥战斗，陈豹牙都跟随他的身边，给他保镖，当时人称这是小匪头保护大匪头。不久，邓部北去，陈未随行，又回李家碾和广汉收集旧部当匪去了。

次年，第十师刘斌部乔德寿旅收编土匪队伍驻防广汉，陈豹牙又被乔委为团长，并被保送到成都住“讲武堂”。但他刚进学校，乔就把他的人枪吃了。他出学校后就又到李家碾一带当匪去了。

不久又由我介绍他与驻合川的邓锡侯部旅长林翼如接洽，由林委他任团长。他把罗江县略坪的匪头易祖德、李新斋的匪队一并带去，勉强凑到200余人。1926年林部把他的队伍改编，改委他当副官。他不愿干，安稳地回任广汉“向阳公”的坐堂大爷。1942年被仇人刺杀。他一生共计5次当官，又5次退下来当匪。

侯系最后一个有名的匪头是康绍文，广汉新丰乡人。刚成年就当上“向阳公”的袍哥，陈豹牙几次成军，都留人枪交他统带，在本地继续为匪，并为陈在广汉收保险费。其势力渐长，有人枪200余，转而依附金堂匪头彭植其、赖开太，连家也迁住金堂地界。后彭植其任乔得寿部团长，康任彭部营长。杨森“统一之战”中，乔得寿改投杨森，移防川南。彭植其让康脱离军队，继续在广汉、金堂一带拖棚当匪。

1925年秋，乔得寿串通何金鳌将彭植其枪决；金堂匪头随彭成军任营长的赖金廷等逃归，与康一起收集彭匪余党等在金堂康家渡、姚家渡一带盘踞，表面办团，实际当匪，估收烟税、船捐。每天午后正式吹军号集队远出邻县抢劫，“肥猪”关在康家渡、姚家渡街上。不久队伍扩充到人枪2000余。

金堂驻军邓锡侯部杨秀春旅长要赖、康让出部分烟税船捐，赖、康不允。杨派团长许达权从中分化挑拨，造成匪部内讧。1930年冬，杨秀春趁机与广汉驻军旅长陈离合派4团人围剿赖、康等匪，赖、康不支，率众向29军田颂尧的防地撤退。田部师长黄正

贵是赖金廷的拜弟，出兵掩护赖、康部，把他们的家眷、行李、辎重，连同所拉藏的“肥猪”一并保护到罗江、绵阳安居。赖金廷本人在经过绵竹筲狗滩时，被团防打死。团防怕匪党报仇，给他修了一座“赖公祠”。

康绍文所属金堂帮匪徒到绵阳后，田颂尧不便正式收编，允许他们在川陕道上肆行抢劫为生。数月后，仍拖回新都下东区老巢为匪。当1930年北洋军阀吴佩孚在离川赴甘途中，以“兴国军总司令”的名义暗中组织部队的时候，康绍文由我介绍给吴的师长袁崧生(原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的参谋长)，袁委他任团长。途经安县方水，被二十九军驻中坝的吕康团长截击缴械。康从此无法再起，旋为下东区人民处死。

侯辫子一系的大匪，至此才最后消灭。

（二）巫鸡儿一系的军军匪匪

巫鸡儿匪部在绵竹突围后，由其弟巫人元统率，流窜于安县搭水桥、河边场一带，不久由彭斗胜旅长招安，委为独立团长。彭部调驻成都，他未随去，改受刘存厚所属刘崇峻司令的招安，被委为特遣队司令。刘戴之役，刘存厚部围攻皇城，巫人元曾自充敢死队长，由地雷轰垮的城墙缺口冲入皇城。虽然立了大功，但部队改编时，巫却被授任闲职，他又回到广汉北区高骈、永丰一带为匪。

他凭借巫鸡儿的名气和他曾任团长、司令的招牌，很快就有很多散匪投入他的麾下。他的亲信爪牙盘据高骈乡、太平场、金轮寺等要地，各拥人枪数百，于是广汉全境，几乎都是巫系匪徒的天下。1920年他再到靖川军张邦本部所属纵队司令刁青云部下成军当团长；以后赖心辉又委他任张升廷旅的团长，驻在广汉。

1923年，他的部队又被赖心辉吃了，遂又办团，任广汉北区的联团司令，北区各乡的团练队长都由他派亲信的匪徒充任。1924

年，驻广汉的乔得寿旅长又委他任团长，他又拼凑匪队团防，再度组成部队。这是他第5次被招安成军。不久，乔调川南，他随赴泸县，队伍又被吃掉。此时广汉新驻军陈离与他不通声气，他不敢再回广汉，只好迁居什邡李家碾居住。

巫人元手下的大匪头钟焕章，是广汉北区高骈乡人。巫人元几次成军，巫当司令，他即任团长，巫任团长，他即任营长。解放前夕，他又受国民党特务招纳，到军校游干班受训，还想在广汉组织人枪，1950年在广汉伏法。他的一生，经过6次当匪头和当军官的反复交替。

钟焕章手下几个大匪头，最凶恶的是侯体乾、曹杰三等，他们一样是又当军官又当匪：成军后即被宰割，回山后又招集匪队，结果军阀扩大了势力，他们一个个被消灭了。他们的消灭不足恤，问题是在这一长一消、屡长屡消的循环往复之中，不知人民付出了多少代价！

四、军军匪匪下广汉人民的惨痛生活

（一）所谓“岩鹰不打窠下食”

侯胖子、巫鸡儿匪徒在发展初期，为要取得地方恶霸豪绅的掩护（事实上地主当权派是把他们当成一个财源）和诱骗本地居民参加他们的匪队（事实上许多老百姓是被逼得铤而走险），他们当时抢劫的重点主要是外县的城镇和一般富户以及过道商旅。这个办法，叫做“岩鹰不打窠下食”。其目的是要借以消除本地居民的仇视，争取他们的掩护，保持匪窠的安全。他们对本地有钱的人，只借口有仇有气，才去抢劫。因之当地人民在既痛恨政府和军队而又怕他们、有时还宁肯同情他们的情况下，有些人曾经直接间接地掩护过他们。遇有军团来清乡剿匪时，常给他们通风报

信，或给他们隐藏人枪赃物。在一般贫苦老百姓看来，尽管他们许多已成职业匪徒，但其中却不少是出于被迫，有的还是自己的亲眷子弟；还有他们对自己能直接作祸作福，有时也还可以得到他们的照顾，不象军队、官吏和地主狗腿子那样毫不讲情。两害相权，取其轻者，这就是这些老百姓的现实主义。所以在侯巫两匪已经闹得很凶的1914—1916年内，虽然邻近各县多遭到他们的抢劫破坏，广汉的道路已经半通半阻，但广汉本地一般居民大半尚能勉强过活。

（二）划片分区的抢劫

继侯、巫而起的匪头，作法就不是这样了。那时各县都有土匪，到外县抢劫，会引起土匪与土匪之间的利害冲突；而且军队防区各别，这个防区的军队，也难于掩护别个防区的土匪，于是匪头们就只好“就地取财”。各个匪头，视实力大小，各划一片地区作为抢劫范围。广汉全县，除三水关地主武装（即团防）实力雄厚，和土匪有相当默契，被一般人叫做“租界”外，共余22个乡镇，都成了匪区。城里的人不敢下乡，县城的城门，也经常白天关闭，城门上有时由军政机关贴一张布告，写着“大军剿匪，暂闭城门”，其实并未剿匪，只是怕土匪进城。

（三）设关设卡护商保险

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保险费5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1元，布贩、丝帮看货议价，多者百元，

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西路一带，从广汉金雁桥起到唐家寺止，由侯系匪头陈豹牙包收（由盘踞这一带的康绍文派人经收）；北路一带，先是巫人元、钟焕章包收，后由侯体乾、曹杰三等又分小段包收。

水路一带，因什邡叶烟出口数量很大，必须经过沱江上游船只运往赵家渡再转运重庆，而在广汉县境一段水路，多属于北区巫系各匪的势力范围，于是由钟焕章出面，取得金轮寺、小汉镇、连山、金鱼场、和兴场、三水关、青江镇及金堂火盆山、赵家渡等船只经过的九处哥老匪头同意，用“九成公”名义，对河上船只抽收保险费。对叶烟的抽税标准，他们规定每担头烟抽5角，毛烟抽2角；其他货物，各有规定。仅这一项保险费，每年即可搜刮几十万元，由各股匪头及沿河哥老公口照议定成数分提。广汉县城有名的大地主袍哥如廖抟九等，逢年过节，也各能分润几百元，作为他们包庇掩护的酬劳。“九成公”在河道上抽收的保险费，从1919年到1925年一直没有停止。在钟焕章、侯体乾等成军离乡期间，他们留在本乡的兄弟伙照常征收，有的还把提成所得缴送他们。

（四）农民逃散遍地荒凉

对于本地住民，在众多匪徒分乡分片抢劫之后不但富户、中户人家无一幸免，即贫穷佃农，也在他们挨户搜劫的行动下一同被劫。有许多地方，抢了一次又抢二次三次，不但贵重财物扫光，即粮食、锅碗，也被一齐运走。“肥猪”已不择肥瘦，只要住的瓦房，在匪徒来抢时没有逃脱的人都被拉去。以致有些“肥猪”久关无人来取，或发觉事主实在拿不出钱，匪徒怕白垫伙食，降价到10元、8元一个也卖。就在这种情况持续之下，1920年以后，广汉各乡做庄稼的人（包括贫、下中农）因猪牛被拉，农具粮食也被劫夺的关系，无法耕作，也无人愿意做活，有的全家搬迁外

县，有的远出劳力贩贸。而留在本乡的青壮年又大都参加当匪，以免被劫和维持生活。于是田园荒芜，在县境广大肥沃的田地里，长满了乱草，很难看见几块稻麦作物。有些田土，因多年未耕，竟致长起了树木，甚至有的树木已有碗大。劳动人民世代辛勤开拓耕垦出来的米粮产区，已回复到原始荒漠的状况。极目四望，田野萧疏，少见人影，连鸡鸣犬吠之声，也不大听见，只有天上的鸦鸣雀噪，匪徒行劫时的枪声和被难者呼嚎声，偶尔打破这个僵死世界的寂寞而已！

（五）田价低落几元一亩

这时广汉的田价大大跌落。因为农民不耕田，地主无法收租，也无力缴纳田赋，于是他们就纷纷卖田，想把粮税转嫁别人身上。出卖的多，买入的少，田价原卖一二百元一亩的，逐渐下跌得几元一亩。新买主多半是从外县“编”来的，他们有的存侥幸之心，以为匪患以后总会好点，把买田的钱当做押宝赌博一样，横竖便宜，输了也算了。这种新买主在1925年时以安岳人最多，因为当时新来驻防的军队是邓锡侯部下的旅长陈离，他是安岳人，他部下的军官、士兵、同乡很多。这些人看见广汉的田肥地平，比瘦瘠多山的安岳田土好得多，而田价便宜几十倍，军官买田当做下闲棋，士兵劝他们的家人把安岳的田地卖了到此落业，希望借助自己部队的保护，在此发家致富。这些买田的人数极多，例如陈离的挂名秘书罗仲麒买了300亩；陈离的秘书、当过新都县知事的刘善征，买了几百亩；陈离委派的新（都）广（汉）马路局长唐鲁珍，陈离同乡邓微心教授，邓的岳父、国会议员刘茂恩，陈离的兄弟也是他的参谋长陈谷生以及陈离部下若干团营连长参谋副官之类，也各买几百亩几十亩。在这些人的影响带动下，辛亥革命当过四川都督的尹昌衡，也在广汉买田2000多亩，邓锡侯部旅长刘丹五也买了300多亩。不知道名字的人还多。安岳人这个

期间迁到广汉居住的共达1000余户。这些人又因与驻军有关系，买田过契税时，可以不缴清这笔田产以前的欠粮；而他人买田，则很难减免，所以别人不敢买，他们却敢买。这些人买的田，有的在后来匪患渐减、田价上涨时出卖了，赚钱脱手；有的则直到解放后减租退押时如尹昌衡、刘丹五、罗仲麒等还是广汉的地主。

（六）分乡分片抽保险税

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即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1只，月缴5角；养猪1只，月缴3角；种稻1亩，秋收后缴谷1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5角……如此等等。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但是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钱财是越多越好，人枪也是越多越好。这种分乡分片自收保险费的办法，总对他们有了限制，他们当然不能满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险费的地区，仍有抢劫事件发生。地方首人（当然是袍哥大爷）去报知大匪头，匪头只推说某些兄弟伙不听话，答应清查。有时也把兄弟伙“毛”几个做个样子，以表示他们的“信用”。但抢劫终未停止。匪头们为了要打破就地搜刮对他们无限发展的最后局限，就只有去依附军阀，由匪而军，参加军阀内战，从事更大范围的劫掠。

分乡分片盘踞筹收保险费的匪头，俨然就是这个地区的领主。他们抢劫的行径虽然有所减少，但对善良人民的欺侮奴役并未停止。凡是得罪了匪徒的人，被打被杀，总是常事；对匪徒们婚丧

庆吊不送礼捧场的人都会遭到祸害。甚至象淫恶匪头曹杰三那样，在他盘踞的永丰、金轮、兴隆三乡，凡属年青貌美的妇女，大半受他奸污；他并规定凡是出嫁的新娘，都要先送他家由他侮辱后才能送到男家，如果不遵照办理，新娘的父母就要遇害，新娘就要被拉！

（七）相互火并人民遭殃

匪头们相互寻仇报复、抢夺“防地”的战事，也经常发生。侯体乾盘踞连山，收了保险费不好在本地抢，就经常派人到三水关地界抢，与三水关的团队经常打仗。他的匪队一到三水关地界，为了发泄挨打的怨愤，总是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杀；三水关的团队追匪到了连山地界，也同样办理，见民房就烧，遇人就杀，不管你是不是匪。而在 1924 年阴历正月，驻军乔得寿旅长调派他招安的匪队巫人元、锺焕章、彭植其等部以及三水关团队共 4000 余人攻打侯体乾一役，人民损失最大。在双方战斗中，侯体乾的匪队把三水关所属王家营一带的民房完全烧了；乔旅匪队及三水关团队又把连山的八大保、秦家渡、董家坨一带的民房付之一炬。连山街市被乔旅匪队及团防攻占后更遭到巨大的破坏，人民被指为侯匪党羽，被诬为隐藏侯匪枪支财物因而被关被杀被抄家罚款的，不计其数。在双方战斗中被波及死伤的生命，被毁的财物，更无法统计。

匪头们与团防寻衅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很多人都还记得 1923 年阴历八月十六日陈豹牙打新都下东区团防的事件。

那时，陈豹牙从军队垮杆回来，没有多大力量了，想把实力已经长大的兄弟伙康绍文笼络到手，以便再度成军，当什么旅长团长。为了买康的欢心，显示自己的招牌硬扎，人缘广阔，就出名片字样到各县招请匪队来与康帮忙，打与康有仇的新都县下东区团总夏德三。什邡的匪头冯老四、冯老五，彭县的匪头何吉三，

安县的匪头李磨子，绵竹的匪头谭开述、廖成谷，罗江的匪头易祖德等，一方面由于袍哥互助是所谓“义气”，而主要的是为了打伙求财，都应陈豹牙的招请，率匪队来到。加上与康绍文直接有勾结的金堂匪头彭植其、赖开太等匪部以及陈豹牙、康绍文自己的兄弟伙，共计四五千人，打出陈豹牙精心拟出的“奉天命打团防”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去攻打与广汉西区邻接的新都下东区。团总夏德三没有料到匪人有这么多，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团队被缴械了，夏德三弟兄被击毙，驻军张有卓（夏请来防匪的）营也被打垮，张营长被俘。各部匪头，名义上由陈豹牙指挥，实际上当然谁也管不了谁。他们在新都下东区的蔡家庙（现在的四川化工厂）、唐家寺及广汉连接地区的向阳场一带大抢三日，成都到广汉的交通完全断绝。这一带居民家内的财物被扫劫一空，匪徒拉了“肥猪”1000余人，并拉去青年妇女五六百人。这些妇女后来有很多不从而自杀和被杀。在乱拉和乱抢中，当地哥老匪徒的家也被抢劫，妇女也被拉走，连侯辟子的二嫂（侯棠之妻）也被廖成谷的匪队拉藏。陈豹牙、康绍文是侯系匪头，当然不能丢这个面子。为了取他们的侯二嫂，而廖成谷又不放，双方几乎火并起来，在匪徒大抢三天当中，新都到广汉的大道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周围几十里的居民都跑开了。他们扶老携幼，四处逃生，个个咒骂，惨痛难言。

匪徒抢劫之后，退驻广汉北区，在什德绵三县交界的兴隆场、金轮寺一带出卖拉到的“肥猪”，有的几百元几十元一个，有的几元一个也卖，因为他们要回原来的匪窠，地距新都远，以后事主家人不容易来取，宁愿降价出售，以免多费伙食；同时他们拉的穷人也多，实在卖不起价。他们说：“我们当拉了一只鸡一样，总要卖几个钱。”

各路匪徒经过一个多月才退完。在这个期间，广汉和新都的驻军坐视不理，不肯去追。就连彭植其、康绍文俘获的张有卓营

长，也是后来由新都地方哥老首领派人交涉，向新都全县人民筹款1.8万元，才得取回！

（八）所谓“清乡剿匪”

那时的广汉人民，不仅受到匪徒们的祸害，也深受军队剿匪清乡的灾难。那些年代广汉先后的驻军长官如刁青云、郑慕周、乔得寿等本身都是著名的袍哥，他们的队伍，都是哥老土匪拼凑而来。而广汉的匪头如陈豹牙、巫人元、锺焕章、侯体乾、康绍文等又都曾于招安后以“驻军长官”的身分驻防广汉。所有以上这些人，谁能望他们清乡剿匪。他们也偶尔借清剿为名，下乡“打起发”，把许多善良的人诬为土匪、通匪或与匪有关系，而任意逮捕，抄家罚款，甚至大批杀戮。至于正式军队，1920年赖心辉曾派他的旅长张英（又名张挺生）到广汉清乡，他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在两三个月内，就捕杀了2000余人，在广汉北门、西门各立“匪冢”一处，掩埋被杀者的尸体，高如山丘。但是被杀的人，除一部分是从匪而外，绝大部分都是无辜农民和与匪人沾亲带故的干人等。他这样乱杀，反起了“为渊驱鱼”的作用，使很多人乐于当匪，坚决从匪，因为当了匪，就有抵抗力量，还可以活命，免于枉杀，由于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与哥老匪头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所造成的广汉匪祸，先后达十五六年，广汉人民受的苦难，不是纸笔所能尽述的。这是解放前旧中国的一个缩影。

米庆云整理

（四川省成都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綦江高青匪患

胡超斌

一

从民国5年（1916年）袁世凯窃国称帝、蔡松坡云南起兵讨袁开始，滇黔军轮番入川，军阀连年混战，土匪遍及各地，而綦江匪患尤烈。民国7年（1918年）以后，势更猖獗，集聚成股，盘踞与邻县交界处，抢劫拉肥，杀人放火，设置关卡，强索财富，造成交通梗阻，生产停滞，百业萧条，民生凋敝，全县人民过着苦难深重的生活。綦江高青匪患更甚，不但延续时间长，而且危害也大。

高青乡兴建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取高庙场之"高"，青龙场之"青"而得名。高青乡的政权机构，一直设在青龙场的龙台寺内，因此，也有人把青龙场喊做"龙台寺"。

高青乡位于县城西面，座落在川、黔两省的津、綦、习3县接壤处的崇山峻岭之中，为川东和黔北部分地区商旅必经之地。该乡的"茶坪"、"红岩沟"与贵州的"青溪沟"、"木皮槽"以及江津的"四面山"、合江的"大、小槽"紧接相连，山高沟深，犬牙交错，林茂木森，人烟稀少，两省三县土匪经常啸聚于此，历来为匪盗出没之地。民国初年的大匪首周燮清，抗战期间的王鳌匪部，均以红岩沟和茶坪为巢穴。在青龙场前后的三四十华里间，高

山峡谷，道路曲折，土匪更不时在这里“邀线”拦劫商旅。因而，这条为川、黔物资交流的繁荣要道，早在解放前的10余年间，已成为商帮绝迹、旅店冷落的羊肠小道了。

清末民初，乡人叫土匪为“棒客”、“马刁客”。“两客”在光天化日之下拦路“邀线”，夜静更深则打家劫舍。一年四季，尤以冬、春更为突出。

民国11年（1922年）至14年（1925年）间，高青匪患更加猖獗。乡人称这段时间为“糜烂年间”。其时，高青地区遍地皆匪，土匪不但四设关卡，征收来往行人的“买路钱”，而且还四出乱拉“绅粮”。其实被拉者大都是自耕农民或农商兼业者。而真正的绅粮和乡政人员却早已钻进事前修有屋掘有井储有粮的“风香堡”、“拍香堡”、“岩洞”、“牯牛背山寨”里避匪，土匪根本拉不着。甲子、乙丑年（民国13、14年），高青人民连遭天灾人祸，真是饥寒交迫，饿殍遍野。当年幸存而今健在的老人，谈起“糜烂年间”的悲惨岁月，无不心酸话梗，老泪纵横。

民国15年（1926年）直至建国前的20多年间，綦江境内匪患逐渐平息，社会秩序稍有好转，而高青乡不但白天仍然“老二邀线”，深夜仍有匪徒抢劫，而且更有较大的股匪王鳌、何海云、刘麻子（名不详）等先后长期盘踞高青乡之茶坪山、红岩沟一带，与乡政要员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横行乡里，鱼肉乡民。据知情老人说：“解放前的‘老二’哪个平息得倒啊！大官通大匪，小官通小匪，有的保丁、乡丁就是匪，哪个乡长、保长不通匪！”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二

高青匪患持续达38年之久，盖源于军阀混战，时局大乱。据老农许少平说：“川、黔军中的部分小军官，在‘乱世出英雄’的

思想支配下，都想走周矮子（周燮清）为匪当大官的老路。”还说：“当时那些土匪头子，有的是川军里面垮杆的连、排长，有的是江津地区的团防队长。”

清末民初，盘踞高青地区有名的土匪头子有周燮清和刘安银等人。

周燮清，绰号“矮子老沙”。祖籍江津县黄泥场，幼时随父辈迁居高青与贵州泥坝一水相望的何家塘么店子。从小喜欢练跑步，常用河沙或铁渣装于布袋内，绑在脚杆上，追捉狗尾为戏。清末民初，刘逐渐成为津、綦、习交界地区的土匪头子。

周燮清伙同刘安银匪部抢劫“皇银”，是高青人们记忆中较大的一次抢劫案。清朝末年，周、刘二匪得知有大批“皇银”从贵州押运到江津，他们料定必由江津地界的十八岚垭经过。于是事先率匪众伏于十八岚垭险隘处。待押运“皇银”的人夫一到，乱枪齐发，经过短暂的伏击，押送“皇银”的人夫大部伤亡，20挑银子全部被劫。随即强迫人夫将银全部挑至高青乡红岩沟周燮清家，按人枪多少，进行分赃。周燮清用分得皇银添置枪弹，裹胁良民。很快，周燮清匪队巨增。“矮子老沙”在川、黔边界一带，名噪一时。后来，周被“招安”，先后当上国民党军队的团长、旅长。抗日战争前，曾在川、湘、黔接壤一带，长期与我红军为敌。抗日战争中垮台经商。民国38年（1949年）春、夏之间，又在湘西沅陵、花垣一带，依仗昔日同僚与上司的支持，纠集旧属，又当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妄图阻止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川东秀山解放时，周被活捉而依法判决。

刘安银是敦扶场上人，一贯不务正业，滥抽鸦片。初以赌博为生，继则抢人为业。民国2年（1913年），刘匪已有人枪四五十，为了扩充匪势，劫夺高青团防枪支而攻打龙台寺。龙台寺由上、中、下三殿组成。上殿名观音堂，中殿叫佛殿，下殿为玉皇殿。当时高青团防队长李君谟（绰号红胡子），率团丁20余人，坚守龙台

寺上殿，居高临下，抗击匪徒。刘匪进攻龙台寺，打到中殿，被团丁打死多人。虽经组织几次冲锋，仍无法攻上比佛殿高约10米的上殿。刘匪恼羞成怒，一面唆使匪徒洗劫青龙场上商贩的财物；一面在下殿纵火，妄图烧掉整个龙台寺。由于敦扶乡乡团防闻讯赶至离龙台寺三四里的狮子山上，向青龙场不断放枪。刘见援军快到，只得向贵州泥坝方向撤逃。经团丁、乡民奋起灭火，只烧掉玉皇殿，其余两殿，完好无缺。次年重新修葺玉皇殿房盖，正梁上书有“民国三年甲寅岁旧历冬月念六日培修”等字样，至今犹存。

刘安银洗劫青龙场，火烧玉皇殿一年后，因拉痢疾而藏躲在镇紫乡西泥坝的生基坪，其时只有匪徒2人随从。李君谟获悉后，即率团丁去攻打，不见刘安银，李即下令团丁纵火烧房，刹时大火冲天，可怜无辜农民的房屋财产，竟成焦土。后来在粪池内找到刘安银的尸体，李君谟命令将刘尸抬回青龙场，在场口暴尸3日示众。

三

民国10年（1921年）冬，各地土匪日益增多，当时高青地区比较大的一股土匪是陆安廷匪部。陆曾多次筹划劫取龙台寺的团枪。那时高青的团丁，已增到四五十人。李君谟自玉皇殿被烧后，在培修庙宇的同时，加派民夫，在龙台寺的前后两侧，新建了大、小碉楼3个，以防土匪的再次围攻。

陆安廷是高青李家坪人，外号“二老柳”。其兄陆安成，人称“大老柳”。早年，兄弟二人帮人扛木料为生。后来匪风四起，两人皆以抢人为生，逐渐成了土匪头子。到民国11年（1922年），陆安廷匪部已裹胁一二百人。这年的腊月间，陆匪伙同其他匪部，共约三四百人，在一个清晨，突然打进青龙场上，欲出其不意劫取

高青乡公所的团枪。土匪进场后高喊："活捉李君谟！撤枪不杀！"陆匪的枪响后，李即率领团丁，分别坚守在龙台寺内的3个碉堡和围墙的枪眼处。青龙场上的老百姓，一闻枪声，也跟着涌进龙台寺庙内和庙侧的魏家大碉楼里躲避。土匪围攻两天两夜后，仍无法得手，且伤亡较重，锐气大减，匪恨商贩逃尽，就放火烧场。同时陆匪还叫人把"大石包"（李的住宅，离场不到1里）也一并烧掉。匪见两处的房屋都烧光后，才撤走了。

这次陆匪火烧青龙场、龙台寺和乡公所并未着火。因为在民国3年（1914年）培修玉皇殿和新建乡公所时，把庙和场的屋檐相隔了一定的距离。

当土匪火烧青龙场时，躲在龙台寺内的商民小贩，眼巴巴的望着熊熊烈焰吞没了他们的房屋财产，无不心急如焚，撕肝裂肺，悲痛欲绝。土匪在撤走时，还把没有来得及躲避的人作为"绅粮"拉走了。

当时青龙场上不过40来户人家，多为小本经纪。这些人的本钱大多是在亲友处借贷来的。遭此劫难后，衣食住均感困难，谁还有钱来重建家园？不少人户只好离乡背井，流浪外地。

自陆安廷火烧青龙场、大石包以后，乡团队长李君谟也无家可归，只得将妻室儿女送去"岩洞"避匪，自己只身外出，寻请正规军队来"报仇"撑腰。李君谟一走，乡政其他要员，也不能在龙台寺的乡公所立脚，便各带团丁亲友，分别上寨进洞躲藏。乡长魏莲孚，团队副李海云，爬上牯牛背寨子，据险峰盼李早日请来援军。

乡政要员离去后，匪势甚嚣尘上。一时整个高青地区成了"遍地皆匪"的局面。那时，从中峰与江津交界的三角塘到高青、高庙和贵州的泥坝一带，纵横数十里的较大瓦房内，无一处不为土匪所霸据。每逢青龙场赶集时，场上熙来攘往的人群里，至少有1/3是土匪。

当时土匪头子的“官衔”是以裹胁人枪的多寡而自封的。先时，大股匪首叫“老窑”，小股匪首叫“偏棚”，继后众匪首索性自称什么“团长”、“营长”、“连长”、“排长”。据不完全统计，民国12年（1923年）驻高青地区的匪部有：土匪团长罗太平（江津人，原为某乡团防队长），匪部五六十人，驻离青龙场半里的水竹林；土匪营长周美章，绰号“周偏颈”（江津人），匪部百余人，驻青龙场上，后为部属冷枪打死；土匪营长叶炳成（江津人）匪部200余人，驻离场5里的拍香湾；土匪营长宋推屎爬（江津人，名不详，“推屎爬”乃绰号。）匪徒百余人，驻离场2里的新房子；土匪营长张草墩（高青人，名不详，“草墩”乃绰号），匪帮百余人，驻离场3里的弯里，后为李君谟带人活捉，送去东溪枪杀；土匪营长何跩子（高青人，名不详，“跩子”乃绰号），匪徒百余人，驻离场20里的红岩沟，后为李君谟活捉枪毙。其余营长以下的连、排、班长那就为数太多了。总之，民国12、13年（1923—1924年）夏，这段时间，高青地区土匪总人数不下两三千人。

民国12年（1923年）夏，李君谟请来贵州军阀周西成一个团约千余人的兵力，到高青地区“清乡”、土匪闻讯，纷纷逃往川、黔交界的深山老林以避其锋。本地人为匪者，有的向军队“投诚”、“自新”，有的未来得及逃跑或“自新”者，就被团防拉来枪决。这时躲藏在山寨岩洞的乡政要员和团丁、都纷纷出洞下山配合军队进行“清乡”。

“清乡”名为“保护治安”，实则嫁祸百姓，假“窝匪”、“通匪”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高青广大人民前门去狼，后门进虎，被诬以“通匪”、“窝匪”之名而又拿不出钱财，惨遭酷刑活活被折磨丧生者何止百人。

周西成的军队在高青协同“清乡”月余后，留下不足一连人的兵力而离去。遁隐在川、黔边境的匪部闻讯后，又卷土重来。同年初秋、黔军离去数天后，周美章匪部纠集匪徒400余人，在拂

晓前气势汹汹向青龙场猛扑过来，当时两头场口的“榨子门”还未启动，青龙场已陷入土匪包围中。在一片枪杀声中，场上驻军及部分商民即刻奔进龙台寺和魏家大碉楼据险抗击。其余来不及躲避的居民，只好听天由命，任其摆布。

和上次一样，土匪攻打龙台寺两天两夜仍无进展。周美章记取“二老柳”的教训，下令火烧青龙场后退到离场不到半里的“猫鼻梁”处隐蔽下来，待天黑后欲以“偷营劫寨”的办法夺取龙台寺。殊知在“摸营”途中，周为一小匪首冷枪打死。“蛇无头不行”，土匪才真正撤去。

青龙场民国10年被匪烧光，好不容易才重建起来，不到两年又被焚毁。在这短短的两年内，匪患、兵灾、火烧、饥寒接踵而至，场上居民及商贩，劫后余生，度日如年。为了重建家园，谋求生存，有的典押或出卖了乡下仅有的少量土地；有的求亲乞友，勒紧裤带，重整废墟；有的借贷无门，只好在烧光后的土地上搭临时篾棚，摆摊度日；另外还有10余户，连搭棚摆摊亦无能力，只好逃奔外地。时至今日，青龙场自建场起就定居下来的仅存一家。

四

高青乡土匪二烧青龙场之后，乡政大员为之慑服。有的龟缩在家，暗地与之勾结；有的公开出面，与匪串通一气，坐地分赃。

民国13年（1924年）前后，高青地区土匪除了拦路抢劫、打家劫舍外，勒索老百姓财物的手段就是拉“绅粮”。一时拉“绅粮”成风。有的是祖孙三代，三代被拉；有的是父子兄弟，无一幸免；更有甚者，连孤儿寡妇也逃不脱拉“绅粮”的劫难。总之，凡是土匪认为“挤得出油水”的都要拉。整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高青地区的“绅粮”，一般是拉到江津的四面山或贵州的寨坝去；外地拉回来的“绅粮”，则关在青龙场上的“僵房”。

所谓拉“绅粮”，有的地方又称“拉肥”、“绑票”，即土匪把认为拿得起钱的人拉到远地方去，然后通知其家属备足规定的钱财，在指定的日期内，到指定的地点取人。对在限期内没有人去取的“绅粮”，则对之施以种种酷刑，活活将人折磨致死。不少人家为营救亲人，不惜倾家荡产，筹足钱财，到土匪规定的地点准时去取，结果取回来的竟是一堆无法辨认的尸骨。有的等到将钱财备好送去，连骨头也未见一根。更有甚者，如青龙场的黄子义被拉到贵州的环栈山，其家属四处奔走，告贷亲友，典家押产，等凑足土匪规定的钱财到指定地点换回来的却是一个黑木匣内装着的一只无头黄狗的尸体。

民国以来，持续不断的高青匪患给高青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十室九空，交通梗阻，田园荒芜，杂草丛生，举目四望，田野一片凄凉！偶尔有个别农户，冒险偷着回家种上少量庄稼，待接近成熟时，又被土匪全部割走。乡民无奈，只好宿山洞，食野菜。到甲子、乙丑年（1924—1925年）冬春之际，茅屋断炊，路有饿殍。那年头，糠壳吃光了又用棕树子来做粑粑吃，后来连“鹅儿肠”、“糯米菜”、“岩半壳”、“地木耳”等无毒野菜全部吃光，连梧桐皮、枇杷皮都剥来磨细糊口，以致芭蕉头、蕨苔根几乎挖绝了种。到乙丑年初夏，四季豆叶还没有长大，就被人们摘来充饥。最后实在无法，就去高庙场口挖“观音土”（白膳泥）来填肚皮。据说当时每天去挖“观音土”者，不下数百人，挖“观音土”还得排班站队。匪患、灾荒双管齐下的甲子、乙丑年，高青地区百姓有的全家饿死，无一幸存。如龙台寺土角屋的王裕林父子3人，大儿子饿死在竹林堂的河沟里，二儿子伏在饿死的父亲尸体上，哭喊无力，咽泣无声，后来竟倒在父亲的尸体上断了气。

五

继周燮清之后，綦江又一大匪首王鳌，从民国23年（1934年）到民国29年（1940年）的6年间，长期盘踞高青乡，虽曾一度被"招安"离去，而他的部属仍然挟制高青地方政权，左右高青局势，危害高青黎民。

王鳌又名王月辉，江津县两岔河人。民国23年（1934年）冬天，未满30岁的王鳌，带着四五条枪、十几个人来到高青的茶坪山，通过地方绅士和袍哥的关系，与乡长、乡队副共订密约：王保证乡公所横竖20里不出抢案，乡公所保证王部的一切安全。王鳌盘踞高青的数年间，大体上未在高青一带作案。他抢劫的重点是在川黔公路上，或阻劫商车，或劫持商帮。王匪将劫车、抢商所得财物，除一部分分给"兄弟伙"外，其余全部用来购买枪支弹药。另外又大肆勾结乡政要员，火并当地小股土匪。不到两年，王鳌匪部人枪巨增，由初到高青乡时的四五条枪十来个人，扩展为枪支数百匪徒近千的大股匪队。

民国26年（1937年）冬，綦江"清乡"军见王鳌匪部迅速膨胀，怕上峰查究，不好交待，本想出兵"清剿"；但又无能为力，于是剿抚互用，胁诱王鳌"招安"。王权衡利弊后同意招安。在接受招安的同时，王匪却隐藏部分枪弹，交予"管事"（匪部副官）何海云、刘麻子（名不详）2人。不久，王鳌奉调离高青去成都"当官"。王临行前命何海云、刘麻子带起隐藏下来的枪支，拖上红岩沟为匪，继续控制高青一带。

王匪去成都后，通过周燮清等人在外地的关系，弄来一台仿制法币的机器和纸张，秘密运回高青，交与何海云、刘麻子2人，令其在茶坪伪造红伍角的法币。数月后，何、刘二人因私利冲突，刘麻子一怒之下，便暗向綦江县政府密报。民国27年（1938年）

6月某日清晨，团防军乘茶坪土匪换岗之际，越过险隘，与刘麻子里应外合，袭击了茶坪，人枪机器，全部抄获。当时高青乡乡政要员及地方绅士，因“茶坪伪造纸币案”坐牢株连者，不下五六人。王鳌也因之由成都押解回綦，关进监狱。

王鳌坐牢不到一年，通过“拿言语”、“送包袱”得以出狱（一说是买通典狱官越狱而逃）。王出狱后返回高青乡，聚集残部，重操旧业。不过这次拖上山不象原来那样长期盘踞高青，而是诡秘地出没于川、黔毗连的温水、泥坝、高青一带。当时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綦江县设有“渝南卫戍司令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清乡军”的不断征剿下，王鳌被迫向渝南卫戍司令张轸投诚。民国29年（1940年）旧历年底，王鳌及其一齐投诚的30多个兄弟伙，被张轸在一日之内分四批枪杀于古南镇沱湾河沙坝。

六

渝南卫戍司令部枪杀王鳌以后，綦江县军政当局下令把高青乡的“乡自卫队”编制扩展为30余人，并在高青地区实施“连环保”即在家家设置竹梆，山垭通道布置岗哨。发现匪盗，立即敲梆鸣号，各家闻梆响，户户皆敲梆，传通信号，齐捉匪盗。否则，以窝匪藏盗论罪。一家犯罪，附近数家连坐。此外，还在高青与中峰交界的两河口处设“护商站”。站上常驻有乡自卫队一个班的兵力。还组织有“护商队”，护送商帮到安全地带。看来措施周密，事实并非如此，直至解放前的七八年间，高青地区的匪患并没有得到平息。

由于“伪造纸币案”，高青乡长下台。不久，一个姓韦的花了不少钱买到了乡长头衔。然而上任不久，就在小股土匪白天、黑夜的不断袭击下，不到半年时间就卷旗收伞，溜之大吉了。后来，

只好把年近花甲的李君谟找出来收拾“乱摊子”。

李君谟上台后，对上大力谄媚逢迎，对下则“睁只眼闭只眼”。很快，乡公所那些脚脚爪爪就摸透了李的“施政”之道，各自去找“生财门路”去了。如长期充任乡丁班长的罗青云、罗树成，号兵邵克武、郭树云等人，“白天是乡丁，晚上是土匪，本人不到场，也要分几文”。当时青龙场上住户不过30余家，长期外出抢人的就有七八户。其中吕甫州经常一人一枪，在高青、郭扶、镇紫一带“邀线”。还有个叫周二的家住新店子。本来离新店子不到10里的两河口就驻有专收“保安费”的护商班，而周二竟敢在护商班的眼皮下拦路抢劫，其中奥妙，不言可知！类似吕、周这样明火执仗的“合法”匪徒，在当时的高青乡，不下十四五人。

李君谟当政期间，高青地区也常有“老二”邀线。因此，从江津白沙经东溪去贵州的商帮及长途贩运者，只得改道而行。剩下郭扶、镇紫一带去高青贩运山货，推销杂货的小商小贩常常成群结队，出钱请乡自卫队护送。刚开始一段时间，较为安全，到民国36年（1947年）前后，情况就变了，护商队前脚把商贩送出“危险地带”，商贩们后脚就挨抢。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日子一久，商贩们就悟出了道道：“原来护商队就是土匪的报信队。”从此，郭扶、镇紫、高青一带的小本经营者，只好改行商为行贾，万一非出门不可，也只好听天由命。

七

民国37年（1948年）初，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在即，綦江县的几个较大特务、豪绅，如谭济舟、张我承、赵济黎、夏奠言、方正等，预感末日来临，妄图垂死挣扎，选定高青这块民国以来长期匪患不息的地盘，作为继续危害人民的基地。他们先后在赵济黎家召集乡长、保长、绅士、恶棍等，策划反共，并由谭济舟任

司令，秘密组织“九路军”。1949 年 11 月 27 日，綦江县正式宣告解放。而这几个碰壁苍蝇，竟自在高青策动原乡长杨耀廷，把乡公所的长、短枪支全部拖上狮子山“磨山”去了。

1950 年 3 月，谭济舟在郭扶、东溪、中峰等地，蒙蔽煽动一批不明真象的老百姓来到青龙场，四处扬言谭司令率“九路军”2000 多人接管高青乡来了。正当杨耀廷为谭济舟接风洗尘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连赶到高青乡。几声枪响，“谭司令”纠集的 2000 余名乌合之众，如惊弓之鸟，向贵州泥坝一带逃跑。接着，我人民政府派驻高青乡的工作队即开始发动群众，开展征粮、剿匪运动。在人民政府政策威力的感召下，土匪纷纷缴械投诚，自新悔过。谭济舟等几个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则受到了人民应有的制裁。自此，从民国以来延续近 40 年的高青匪患，才真正得以平息。

白　水整理

（四川重庆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一个土匪的自述

善　成口述　黄竹川整理

我是四川华阳县石羊场人，20岁开始嗨袍哥、当土匪，从老么嗨到大爷、总舵把子；由三个两个散匪发展到百十人的股匪。民国5年（1916年）到民国12年（1923年）那段时间，我在成都县、华阳县、仁寿县、简阳县、温江县、双流县、新津县、彭山县和眉山县一带，抢劫财物，危害人民，买些枪，吃些枪，编些兄弟伙，武力愈裹愈大。到民国13年（1924年）在眉山县正式受招安，成为清乡司令彭光烈手下的营长，我的职业土匪（浑水袍哥）生活才基本结束。

我的土匪罪恶活动，和当时军队、团练等黑暗势力是分不开的，军、团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袍哥，也绝大部分都与土匪通声气，可以说军、团、袍、匪是四位一体，这正是当时社会面貌的简单缩影。本文所写的内容，仅仅是民国5年到民国12年7年间我当土匪的经历。

一、吃粮当兵，也是当匪

1911年，成都和川西、川南、川东、川北各县公口林立，乡镇也遍设码头，简直成了袍哥世界，当时的都督府也设有“大汉公”的公口，尹昌衡（四川都督）本人就是“大汉公”的总舵把子，他有时还骑高头大马，拜访各路码头，放鞭炮，挂红彩，袍

哥声势盛极一时。

川西一带同志会大王孙（泽霈）、吴（即吴庆熙，外号吴二大王）、丁（厚堂）、张（即张达三、外号张瓜瓜）的同志（会）军，原本是袍哥土匪组成的乌合之众，满清推翻以后，多数遣散回家，少数编成了军队，内中吴二大王吴庆熙，带领弟兄伙进了城，聚集在今成都南门三巷子一带。

1916 年，蔡锷首倡反袁，护国军兴，同志（会）军再起，吴二大王挂起游击司令的招牌，在温江、崇庆、灌县、双流各县招兵买马，大肆吸收土匪袍哥，扩充实力。一时成都市面上到处插起什么××游击司令部、××支队部、××纵队司令部的旗子。街头巷尾，烟馆赌场，三五成群的人穿去穿来。当时《群报》称此有几多：一、各街毛厕多；二、启用关防告示多；三、纵队司令官多；四、烟馆赌场多。

那时候一般无赖之徒，总想当兵吃粮，趁浑水把鱼摸。我也希望将来发迹，于是就应招入伍，编在吴二大王的侄子吴国栋连当兵，从此开始明兵暗匪的生活。

民国 6 年（1917 年），吴二大王受编在二师师长刘存厚的部队里。刘存厚打戴戡，我们转战于仁寿、威远一带，为刘师长卖命。那时军队，无饷无粮几乎全靠搂抢维持生活。仁寿县出棉花，农民把一年辛苦所得的棉花卖了，换得少数的钱来活命。我们先在街上的茶馆酒店里和棉花市上把线钓好，跟在他的背后，在僻静的地方声称检查，说他是土匪、侦探，措此把钱搂抢，然后把人绑在树旁，用衣服塞住嘴巴而去。记得我第一次抢人是民国 7 年的夏天。我们的部队住在仁寿麻柳场，我同彭吉安（彭二麻子）钓到一个老妇人卖棉花回家，在隔场 5 里的凉水井地方，用菜刀威吓，抢走 40 吊钱（铜元折合数）。当时我仅 21 岁，感到干这种事不费力，不要一点儿本钱，认为这是发财的好门路，以后便经常做这个“无本通商”的买卖。因为队伍不关饷，弟兄伙又要烧烟，

有的还要供家养口，“长官”没法管，于是上上下下，都搞这个“台子”。面子上说查出抢人要枪毙，事实上是鬼哄鬼，从不追究，我每次做了“生意”，送点给我们连长，连长也欢喜，我的胆子就愈来愈大，缺钱用的时候，几个兄弟伙便出去走动走动，每次走动总有一些收获。

二、正式当匪，匪团不分

1919年，熊克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向传义改编队伍，编眉山邓锡侯为第三师的旅长，吴二大王的队伍驻在仁寿、华阳一带，受编为第一师但懋辛师长部下的工兵营第二连，我在二连当兵。有不受编的就拖走。我们的兄弟伙吴歪嘴外号“吴机关枪”就不受编，拖了一些人枪到双流与温江交界的柑子树、刘家浩地方，继续专搞抢人的买卖。我在工兵营当兵，本想拖走专搞抢人买卖，但是工兵营部队就驻在我的家乡石羊场、中和场，本地人不敢拖走，于是暂留一时，等待机会。不久，调我到第一师办的军士队学习6个月，我也乐得学习一些军事技术，以改变我从前蛮干的章法。学习完毕，我回家探亲，华阳县黄龙场（即三道桥）的袍哥土匪头子姚树廷见着我，百般拉我入伙，我就不再当兵，跟姚舵把子磕头入袍，正式当匪，做他的小管事，记得这是1920年下半年的事情。

这里要把姚树廷简单说一下，我当土匪起家与他是有极大联系的。

姚树廷因为人长得高，面目凶恶，人称高足蚊子，反正后有几支快枪（新式步枪和马枪），到处抢人，与双流巨匪、团阀李安邦、王绍武，成都巨匪赵国栋，华阳傅家坝大恶霸傅秉之，简阳海洛河舵把子鄢伯林，石盘铺团总谢吉武和石经寺方丈和尚常敏等换过帖、拜过把，结成一股恶势力。

姚曾在部队任过营长，后来被刮掉，便跑回家乡。姚在搞抢人的买卖当中，与同伙林敬堂、谢雨生（外号谢花狗）因分赃不平，结成活冤家死对头。他投奔华阳警备队长、团练局长张么太爷作靠山，于是横行霸道，谁也不敢动他。后来因与其妻玩耍手枪走火毙命，不得善终。

1920年，正值熊克武驱逐滇黔军之战，各军系忙于内战，乡间没有清乡军，县上的警备队只有一二十杆烂枪，力量极为单薄，于是成了我们袍哥土匪的天下。姚树廷知道我有点军事技术，人又骠悍勇猛，想收我为“帖心逗伴”充实他的声威。我的勇猛骠悍是姚早已知道的，我曾经干过两桩事情，姚很看得起我，一桩是：吴二大王手下有一个排长叫徐石清，奉吴命回双流招兵买马，徐的连部设在成都老南门外柳阴街一家栈房，门口插了一杆第九纵队连部的旗号，威威武武，煞有介事，后来徐石清告诉我完全是虚张声势，表面上说是一连，实际上只有一杆毛瑟枪。徐回到双流后，地方上有个刘某欠徐的钱不还，引起纠纷。徐叫我把刘“毛了”（打死），我诱骗刘某来徐家，刘口出大言，我横不说白不说拿起5斤半重的钢刀将刘某的脑袋削去半边，登时毙命。

第二桩事情是：华阳县中兴场团总刘雨膏为了清明会的事与族人刘子云（外号倒挂子）扯筋，刘子云扬言要烧刘雨膏的房子，因此结成死仇。记得是正月间，仁寿煎茶溪码头上丁舵把子丁宝山请吃“迎宾会”，请各路袍哥舵把子吃饭，刘子云亦应邀参加。刘子云曾在松懋屯垦司令陈泽霈下面当过连长，拖走7支快枪（新式步枪）、保宁枪回家当匪。东道丁宝山大爷问刘子云说：“刘雨膏码头（指黄龙场）有罗贵方（土匪）、邹绍卿（号善成）来到这里，你们之间有无‘粉子’（仇气）？”刘子云说：“叫他们来见我。”刘子云疑我们是刘雨膏派来钓他的，在席间臭骂了我们一顿，说什么你们还年轻，给你们刘大爷捎个信，叫他好生耍，说得不合式，烧他龟儿的房子，弄死他。我们本与刘子云无仇气，因为

他这一顿臭骂和提劲，就很生气。我当时年轻气旺，认为大失体面，便回报刘雨膏舵把子，并从旁添油加醋。这一下刘雨膏更气极了，派了他的儿子刘伯申同华阳张么太爷的警备队全体人马，一共人枪 40 余，暗地潜入煎茶溪乡里他的妹夫家里住下，等待机会下手。那几天风声很紧，总下不了手。有一天逢场，我同兄弟伙刘建成、王国栋、罗贵方暗带手枪上街看动静，我走进一家烟馆，刘子云正倒在鸦片烟盘上烧烟，枪是放在烟盘子上的，我进去，对方已经来不及，我对准他的脑袋就是一枪。他的兄弟伙闻声赶来，烟馆内外都打响了，我们带去的“逗伴”与他们挽着一阵乱砍乱打，结果打死了刘子云，砍死他一个兄弟伙，余人就不要命地跑了。

这两桩事是我一手做成，姚树廷舵把子知道事情的整个经过。他为了对付林雨堂和谢花狗，便来收我。我向姚磕头以后，很得他的信任，很多事由我拿言语，办交涉，走“字样”（袍哥的片子），后来当了姚大爷的总管事，经常带起人出去抢人。

在姚大爷的手下当匪，当然就不是以前那样简单的拦路抢劫。我们有了一套组织，内层外围，分工负责，集体出动抢劫。大体要有下述种种准备：

（一）平常养有“钩钩”。找一些地痞、流氓与了解那家那户有贵重金银财物的人挂钩，这些“钩钩”多半住在客栈、沿江码头上和船上，他们一有情报，就来告诉我们，根据所报情况，暗中再作调查，靠实在以后，约好时间下手。

（二）各方面接纳“点手”。“点手”对情况十分了解，比如银子钱埋在那里，衣物放在那里，家里有些甚么人，平时的行动如何，有几间房子，有无后门出口，房间门是什么方向，由“点手”当场指点，生意做完以后，看情况给“点手”一些油水。如其没有出问题，事情很顺利，钱就拿多一些。如事情不顺利，赃物和钱少，就一个子不花，等以后再酬劳。假设“点手”虚谎情

事，便要暗地整死，装在麻布口袋中扔下河。

（三）找好带路的“长二”。长二亦称“带线子”，即带路的人。那条路最近便，沿路地势如何，那些地方是口子，那些地方有乡团，如有乡团的地方，要怎样绕过才不出事，都由长二先弄清楚。假设长二带的路与乡团打了仗，甚至打死了兄弟伙，不但不给钱，往往押到“乱葬坟”或河边给他一刀，送他见阎王。

（四）事前准备好“驼牛”。根据“钩钩”、“点手”报的情况，看金银财物的多少，找几个精强力壮的彪形大汉带上箩筐、滑竿、抬的抬走，担的担走。

以上这些事情有了着落，准备停当，便开始行动，行动之前，有“前传后代”的规矩：初五、十四、二十三不能出动抢人，所谓“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骑牛不练丹”。出动抢人，多半选定二十边月黑头，白天大家散在街上耍，黄昏时分，约在沟边、乱坟坝、庙子里。除“钩钩”、“点手”、“长二”、“驼牛”以外，内伙子作具体分工。哪些任尖兵，哪些“排扇子”（推门），哪些护货，哪些堵后门，到了目的地，统由总管事提调指挥。沿途不能喊名字，只能拍掌，或用嘴作“咋咋”声，联络前后，在行动前任何人不能“登台子”（在床上站起），不准犯讳、说鬼、说不吉利的话。准备好“青水子”（用洋油浸入草纸，草纸裹成筒形，插在竹筒里），插在头巾上，以免占手，走拢目的地大家点燃，火光烛天，如同白昼。亦有用松香合清油，浸入布筋，编在两块竹篾块上，点燃作照明之用。

走拢目的地“燻签张子”（即烧钱纸）敬神，负责排扇子的弟兄伙，三四人挤开大门，一哄而入。如其门太大、太紧，便搭5人梯，即所谓“冲（读去声）围子”，另外根据点手的指点，排房间门。

如其失盗主（被抢的人）“马子奎”（力量大），事前亦分配有固定的人对付。去的时候总要把后门堵好，因为失盗主经常警戒

着，一有狗咬、响动，总会从后门跑走。进了屋便“拣渣渣”（被盖、罩子、衣服统称），专人负责，见东西就拿；点手点出金银窖的地方，有专人起运；最多半个钟头，大家传呼“下了”，即行结束。十有九次惊动了民团，左邻右舍喊“打抢人啦！”“打抢人啦！”我们始终不做声，不慌不忙的回去。当时军、团、匪、袍是一家，大家声息相通，假如遇到“鸡毛子”（指不识相的乡团），拣顺吃了就是。

东西抢到手，弄到事前找好的地方分赃。内伙子根据总舵把子的意思办事。多半在乱坟坝和庙子里分。分时舵把子提几成，总管事提几成，枪提几成，子弹提几成，没有枪的就分抢来的破旧衣物和不值钱的东西，刨成堆子，一家一堆。按枪分也还要依枪的好坏来定多少，毛瑟枪、手枪子、新式步枪、双筒枪和马枪，都各有细致规定。

东西分了下来，由舵把子命令各人秘密卖去。如果卖东西不仔细，被失盗主发现，就要找出事的人，不“毛”（杀）也要大“短”（断）以后的财路，即以后不再约参加抢人了。抢得来的金银，如发现有人“掐股子”（即私吞的意思）亦得暗杀投河。

除了到失盗主家中抢劫金银财物以外，还有“巴帖子”。在失盗主的大门上巴一张大红帖子，丢一封信，说“我们军队无法维持伙饷，向你暂借若干，并限期交到某某地方，否则烧你的房子”之类的话。我们时常这样搞，要二千、至少也可收到三百五百。

此外还有专门去拉肥猪的手法。拉的男子叫“肥猪”，女的叫“母猪”，拉小孩叫“抱童子”。事前准备好滑竿、“驼牛”，逮到后便塞住口绑在滑竿上，抬起就走。

记的是1922年，那时姚树廷尚在，我们做了一笔抱童子的生意，敲了2万银元。那正是腊月尾间，我带了40几个兄弟伙，打扮成军队模样，开到仁寿县永兴乡街上驻下。一个寒冬的夜晚，我

们到一个大“土老肥”严某家，抱走他的11岁的独子，“驼牛”把严老头的儿子驼在背上，我们几十杆枪前后左右，团团围护小跑，一天晚上走了100里。第二天找一个管圈的人把小孩关在事前弄好的“猪圈”（地下洞窖里），耳用棉花塞住，手足上锁。地下洞窖，阴暗潮湿，黑暗无光，每天送小孩两顿稀饭吃。第三天写封信给严老头，要价2万银元，指定严老头请托一个人打着灯笼，灯笼上贴红色纸条，作为记号，由我们给这个人取个名字，叫他穿青灰布衣服，戴遮阳瓜皮帽，指定时候到秦皇寺的凉风垭土地庙来议价。到时候果然来了一个老头，手持灯笼，早在凉风垭土地庙的石阶上等候，我呼名字（我们为他取的）之后，这老头咕咚一声跪下，眼泪水股股流，向我哀告，要求少出点钱，领他的外甥回去。我问过严老头和他的亲友，都没有点点（袍哥），假如占点点，拿出公口和全堂（舵把子、管事、三排）字样，可以少出钱领走。因为严老头是黄脚杆（没有点点的黄泥巴脚杆），索价2万银元，一个莫少。那老头把我的意思回告严某，严老头是个爱财如命的人，一方面疼儿子，一方面又疼钱。过了半个月，我们又写封信告诉严老头说他的儿子由关在地窖改为关在蜂窝眼的拌桶下，空气很稀薄。严老头子疼子心切，主动写信给我们，承信如数拿出，领其爱子回家。我们把2万元拿到手，交出他的儿子，但已经成了睁眼瞎、四肢无力、不能行走的废人。

假如小孩关在圈里死了，我们便把尸体埋在乱葬坟坝，坟堆前面插一个木牌，上写着名字。等到钱拿到手，写封信给失盗主来领。领到的不是废人，而是一堆骨头了。等钱到手叫失盗主挖走尸骨，我们称之为“卖腌臜”。

如果“翻了圈”，“肥猪”跑了，就要把管圈的人处死。因为“肥猪”跑了，乡团就要来“清剿”，多少定有损失，在土匪看来，管圈翻圈，弄死是千该万该。

事实上翻圈的绝少，因为拉来的肥猪，必要捆起、锁起、关

起、耳朵塞起，关在地洞或拌桶下面。我们的手段残酷、毒辣，“肥猪”总是弄得眼睛瞎、耳朵聋，成了废人。

除了“拉肥猪”、“抱童子”以外，还有“打歪子”。“打歪（读上声）子”就是在河中劫船，有事前钓好的，有打碰对的。我们多半与船老板勾结，比如在成都东门外码头、中兴场的下河坝船码头、栈房里的钩钩，与船老板支起出来的钩钩勾拢，报与我们的管事，管事查明路线，摸清楚开船的时间，计算好沿途行船的地点与时间，带起兄弟伙去“起货”。

记得1923年2、3月间，我带30几个兄弟伙在仁寿与华阳交界的古佛洞地方打了歪子，抢得人字呢、布匹很多，还有银子3000多两。船上派有几个兄弟伙，配合岸上的兄弟伙行动。我带30个人在古佛洞转弯处等。船开的下水，我们放了几枪，叫船歪过来。船上的内应估着舵手靠岸，把乘客吆下船，吆到河边沙坝上排成两排，举起手，几只枪逼着，“驼牛”边搜边拿。记得那次抢了布匹、银子27挑。兄弟伙把岸上乘客身上的钱理麻干净，把衣服脱了只剩一件汗小衣，然后把乘客吼上船，叫船立即开走。一时不知究竟的贫苦老百姓，围拢来看热闹，我们临走时，故意丢些破烂东西、撒点小钱在地上，让他们去捡，口中说：“上山打兔儿，见者有份儿。”

要知道这些人是不敢开腔的，怕当讨人嫌，怕脱不倒手。我们扬言，谁当讨人嫌，要烧他的房子，整死他全家。我们认为世界是我们土匪横行的世界，马干一切。

除了“打歪子”，还有“掸鞭子”，有些是钓，有些一样是打碰对。借检查把来往客商抢了，这种办法，即所谓“掸鞭子”，或称“宰根子”，区别于上面所述的抢劫办法。它费事小，收效却很大。记得是1922年，我们钓到川北帮有20挑银子，银子是银贩挑到成都造币厂铸造银元的、每挑有100斤，内中有5两、10两重的银翘宝。我们在龙泉驿山上做的这笔生意，走了约半个钟头，

团练局撵起来，声言捉土匪，结果把当地的一个有钱的叶老头抓走，硬说他通匪，后来叶老头送了100两银子才了事。这位团练局长亲自到我们码头上向姚大爷致意，感谢对他们的“关照”。

那些年间，川北帮如顺庆帮、遂宁帮带的丝绸 布匹和银子钱，只要经过我们的地盘山泉铺、界牌、茶店子、九泉驿场口上，都得给我们留下“买路钱”。

我们每次抢来的钱财，绝大部分是总舵把子、总管事分了，下面的兄弟伙，分得无几，比如抢得1000元，兄弟伙们最多一共只分200元。我们抢得20挑银子翘宝那次，分到每个兄弟伙名下，一个人得了1个银子。“鱼吃鱼不腥臭”，袍哥土匪对兄弟伙一样剥削。

兄弟伙平时吃鸦片烟，在分股子的时候还要扣去平常发的烟费。扣除以后，剩下的就更少了。他们拖襟挂缀，一个个烟容满面，这些烟鬼有的还要赌、还要嫖、戕害自己的身体，生病的特别多，病死了挖个坑埋了算事。“挂溜（读上声）子”（打仗）死了，连尸都不收。我们姚舵把子和管事们的生活，却是另一样，姚树廷走那里，坐6人拱竿轿，一二十个“逗伴”后面跟着跑，俨如一方的土皇帝。姚舵把子多在成都、双流和较大的乡镇上嗨玩，我记得他一天晚上赌博输过3000两银子。我在姚的手下，一切抢劫、分赃、对外交涉、拿言语，通通由我办。那时的商家旅客，为了保险不出事，暗中与我们码头上说包袱，我们得了包袱，便派一两个兄弟伙一路保险，遇到有别路码头来“起货”，便拿出姚舵把子姚树廷3个字的名片与公口的双花样字样，于是得以顺利通行，我们美其名曰“护商”。由于匪盗横行，后来商人来往，正式组织护商队，官府逐渐成立保商队、船捐局之类的机构，无形中更增加了商人的负担。

民国12年（1923年），杨森得吴佩孚帮助，东山再起。杨森到重庆以后，捐刘湘为各军总司令，联合邓、田各军向第一军进

攻，战祸蔓延川西川南川北川东各县，人民痛苦万分。当时吴克仇（吴敌）驻在简阳贾家场，我与覃胡子覃月洲、程宾武、鄢伯林等在吴部、张（张子重）部都挂有一个营长的官衔。张叫我们打吴，我们不去，张把我们围在贾家场上街，打死打伤120余人，我带了几十个人冲出去跑到窑子坝，后退到中兴场。由双流巨匪李安邦拿出警察总监杨莘友的公事（公文），才算了事。

我在吴克仇部挂个营长的名，插杆旗子，表面是军队，暗地还是搞土匪的勾当，实际上兵就是匪，匪就是兵。除与军队勾结以外，我还与石盘铺团总谢吉武勾结。大家开过会，我们保证在地方上不出事，他们保证给我们方便，装眼睛瞎。很明显，军队利用我们作前哨，为其打仗，利用不到，就打我们，所以才有贾家场的火并。

三、招安就编，由匪而官

1923年年底，熊克武由三台退到成都，再退叙、泸一带。当时姚树廷已死，我同弟兄伙们给他办丧事，花去8000元银元，百十人抬起姚的棺木，在中兴场、龙泉驿走了一个大圈，真是无法无天已极。

原来我手中只有10几支枪，以后陆续买了一些枪。当时双筒枪、马枪每支140元，新式步枪每支120元，汉阳枪每支160元，手枪（法国手枪）每支600元，子弹20元一板（10颗），步枪子弹5元一板（5颗），一共买了30支枪，多数是向成都枪贩子买的，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偷出来卖的也有，守卫的兵拖跑卖的也有，收荒匠那里买点零件插起的枪，价钱要低些，要少个1/3左右。此外我还吃了一些枪。记得六师师长余际唐部的独立团送废枪到成都，我与独立团汪海云勾结，在龙泉驿地方打劫，各分得20支。熊克武退经华阳石羊场，我以每支20元的代价收枪120支。

我的力量渐大，经常有人请我们吃饭，送我们东西，把军服委任状送过来。那时各个军系部队都在招安，扩大自己的武力。记得赖心辉的参谋长张挺生的兄弟来编过我，想招安我当营长。我住在茶店子，张本人来向我说："我们弟兄与赖司令（指赖心辉）有很深关系，对我的哥哥还要补充人枪，今后只有步步上升，决不会垮杆，我们是赖的基本队伍，大家共生死、同患难。"我想大树下好遮阴，应承下来再说，后来他的伙饷用完，我爬起来走了，只剩他一个光杆团长。

民国13年（1924年）初，成属清乡司令彭光烈在眉山招安，因为双流李安邦的介绍，保证我以后不出事，于是受编为彭的成属清乡司令部第一支队营长。从这时起，我才基本上不再搞土匪的买卖，想从枪杆中求得升官发财。自从招安以后，便开始新的罪恶生活。今天回忆起过去的事情，真吓我一大跳，我痛恨旧社会，痛恨我自己。如果在旧社会继续搞下去，自己真不知道如何死法。是共产党挽救了我，使我走上重新做人的道路。

（四川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川北土皇帝黄清沅

梓潼县政协文史组

解放前，江（油）、梓（潼）、剑（阁）的老百姓只要提到黄清沅，无不咬牙切齿，忿恨难消。“黄门四虎”以江、梓、剑交界的重华（现在宝成铁路小溪坝站上游10里的一个大场）为虎穴，上至马角，下至梓潼，西至武都附近，东界剑阁武连，纵横200余里，控制反动武装，操纵金融买卖，组成官僚、党棍、土豪、土匪、烟匪、哥老合一的封建势力，其杀人之野蛮，剥削之残酷，时人莫不“谈虎色变”。

解放初期，黄清沅反动透顶，率匪抵抗解放大军。黄匪被击退后，欲潜逃香港，但沿途人民群众对可疑行人盘查甚严，黄匪只得潜伏南充。1951年被捕获归案。在重华公审时，万余人捶胸顿足，哭泣控诉。黄被当场枪毙后，人人掷草把焚烧其尸。群众欢呼：除了黄虎，家富人宁。

一、黄清沅家世

黄清沅家族在解放前的梓潼重华场、青灵口一带是大族，有很大的封建势力。黄清沅的父亲黄德斋是光绪末年的秀才，因生平包揽词讼，略通文笔，人称“烂秀才”。其人矮胖，淫滥不羁，群众称呼为“骚土地”。民国时期，曾任一届梓潼县参议员。原有出租土地60多亩，因抽烟和日嫖夜赌，至民国16年、17年，只

剩20余亩，黄德斋共生了4个儿子：长子黄清沅、次子黄庸如、三子黄复初、四子黄燎如，人称“黄家四虎”。

黄清沅，又名黄正培、黄退菴、黄三元、黄澄、黄中、黄本利。生于1898年农历三月十四日，曾任梓潼县公安局长，防护团副局长，保安局长，梓潼县商会主席，国民党梓潼重华区分部书记长，国民党四十一军咨议员，江（油）、彰（明）、梓（潼）、平（武）、青（川）、剑（阁）6县联防团第三区指挥官，梓潼最大哥老大同公总社长（下设41个分社，3000多人参加），川甘陕反共救国军顾问，梓潼县禁烟委员会主任，江油、梓潼、剑阁3县边界土匪集团头头。所组织、控制的哥老、土匪势力拥有枪支2000多支（不包括公有枪支），多数是步枪，另有少数机枪、冲锋枪和手枪。本人占有好田4100亩（四弟兄共有田地7600多亩），开铁厂2个，锅厂1座，共有工人330多人，利润甚大。当地人称“一股银水流向黄家”。他还开大山货铺“本利昌”，经营蓝靛、鸦片烟、木耳、皮毛，运往成都、重庆销售，并开茶馆、烟馆和饭馆、赌场。

黄庸如，又名黄正崇，黄清沅的二弟。国民党员，哥老大同公分社大爷，长期经商，来往于成都、绵阳、江油和重华。开商店名曰“崇德昌”，经营山货皮毛、大烟丝烟、蓝靛附子，有田地500亩，均出租。

黄复初，又名黄正本，黄清沅的三弟。国民党重华区分部书记长，县参议员，保安团督练长，梓潼县反共救国委员会委员。开商店名曰“平裕昌”，经商物资同前，有田地1000余亩，亦全部出租。

黄燎如，又名黄正烈、黄阶北、黄旭初、黄炎、黄泽民，外号“脚猪子”，黄清沅的四弟。曾任国民党重华区分部书记、梓潼县门户督练长、梓潼县青寿乡乡长、江彰联团中校参谋、团练局游击队长、反共救国独立营营长、哥老大同公副社长，又是土匪

大头头。有田地2000亩，开商号名曰“烈盛昌”，经营项目如前。解放后，1952年11月12日被枪毙于重华场。

二、在匪窟中成长

黄清沅的父亲黄德斋，长期与当地哥老、劣绅乡保人员喝茶醉酒，打牌抽烟，深谙反动统治阶级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处世之道。“人无混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他长期想“操面子发混财”，偏偏自己家底不厚，又加上烟瘾大，三五天要抽一两膏子（比较纯的鸦片烟），祖上留传下来的60多亩田地，为抽烟卖了40多亩。黄德斋常说：“一个光棍，三个帮衬”，“要打三班鼓，离不了五行人”。他想：自己操不出来，就是势力单薄。于是他和老婆陈氏商量培养长子，因为黄清沅口齿伶俐，很有“培养”前途。民国2年一个秋天的上午，夫妇俩把黄清沅打扮得整整齐齐，头戴毛织贡瓜皮帽，身穿青哔叽夹袍，足登新式操鞋，领他到靖安乡长、坐堂袍哥大爷敬俊卿家里拜把，口称：“老表，我把大娃交给你了，希望你提携提携。”黄清沅规规矩矩给敬大爷磕了三个响头，从此入山。以后天天给敬大爷背梆梆枪，跟着大爷的屁股转，保护敬大爷，在敬家的第二年，在正月里的“迎宾会”和五月十三日的“单刀会”上，敬大爷给弟兄伙“拿上咐”：“黄老幺是落教的，以后兄弟伙维持维持。”黄清沅就这样与袍哥管事、大小土匪混熟了。黄清沅还意外地练得一手好枪法，百步外打红皮子萝卜，百发百中，他接待外面来的“外交管事”、“边棚客位”，有迎有送，八面玲珑，敬俊卿很满意。民国5年，黄清沅已经满18岁，打扮成一副“绿林”英雄模样，头戴卷顶的亮草帽（夏天），身穿白绸敞褂子，腰系红带子，足登丝耳子草鞋，腰杆上斜插一支勃朗宁（手枪）。有一次，川北著名的大土匪谢宴富，人称谢司令（活动在四川边境青川、平武、剑阁、梓潼）指着黄清沅对敬俊卿说：

"这个小伙子是青龙码头（浑水袍哥）的好兄弟。"便把他要去当拜弟，敬俊卿平时仰仗谢司令做后台，也情愿把黄清沅转送给谢宴富当拜把兄弟。黄清沅如鱼得水，就在谢司令手下大显身手，"摇钱子"（探视路过有钱的客商）、"拉肥猪"（绑票）、打家劫舍，招呼应酬，练得一身"好"本领，胆子越来越大，混财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显赫。20来岁就吃得开了。民国11年（1922年）黄清沅24岁。重华场镇担心土匪洗劫，请他负责街上治安，当了联保主任。他把他兄弟黄庸如找来在街上跑跑跳跳。黄清沅心想：唱戏要有自己的班子，要想出名就要干"大事"，吃人家的残汤剩菜（指在别人手下得点小恩小惠）是操不出头的。他找了与其知心的土匪头头黄文旭、刘定三商量，要做一桩大生意买卖。他们计划夜袭江油团防总队，那里有几百支枪，弄到手后就可以在附近几个县耀武扬威了。在一个深秋之夜，他们带领几十个弟兄，打伤了代理江油团总欧奎，捞到了几十支枪。后来专署和县府严加追查，既要还枪，又要交出土匪头头，黄清沅知道"水涨了"，县、区、乡人员都不敢包庇，只得求情跑到蹇家山蹇幼樵家躲藏。蹇是川北很有声望的士绅、哥老头目，和国民党省、专上层人士有密切关系。经过蹇的说情，黄退枪、赔款，赔情道歉，还"抛出去"几个弟兄才算了结。但黄清沅却因"敢吃团防局"而名声远扬。第三年（1925年），黄清沅27岁时就自立堂口，称大同公总社，当年升为梓潼县重华区副团总，结交了附近几个乡镇的乡长、乡队副、袍哥大爷，作为互相吹捧、狼狈为奸的集团势力，如中坝场的雍文固、青灵口的何子元、马角坝的张杰夫、后坝的唐伯常、文胜的李道仙、兴胜的邱心斋，并经常来往于梓潼县城及江油、盐亭、剑阁等县。同时，他还与梓潼城内的党、政、军、袍哥等"著名"人物高梓琴、邹少华、薛礼堂、张寿之等礼尚往来，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他与几个"提起脑袋耍"的青壮年歃血为盟，结为金兰弟兄，所谓"重华七子"，即冯子才、杨子会、张子[illegible]、

吴子英、刘子中、黄子玉及黄清沅，这7个人，人人有枪，个个有钱，打家劫舍，烟酒嫖赌，吹捧抬举，无所不为。在黄清沅支使下，干了不少坏事。至后，因贪色争风吃醋，分赃不平，黄清沅叫他的弟兄伙李明顺、黄复初等把张子厚、冯子才杀了。杨子会、吴子英、刘子中害怕黄清沅下毒手，离开重华场跑滩去了。1929年（民国18年）黄清沅因为"剿匪"有功，当上了梓潼县的清乡团长。他叫弟兄伙协助梓潼县国民党县党部大土豪张受兹、哥老大爷陈高元收渔税、屠宰税和贩烟，拜陈高原为把兄，又当上了梓潼县商会主席。这段时间，黄清沅利用哥老、乡团总势力在青灵口、后坝、马角坝买卖矿山，雇用他的佃户和附近农民100余人（包括背运铁矿石）办了2个矿厂，1个锅厂、铧厂，1个炼铁厂，一年牟利几万银元。又开了一个山货铺，铺名"本利昌"，经营蓝靛、鸦片烟、皮毛等。重华地区山大多雨，土质肥沃，鸦片烟驰名省内，名叫"堰坭"（当地又名重华堰）。黄发动他的佃户（此时他已买了千多亩田地了）和附近农民种鸦片烟。当时国民党也挂名"禁烟"，黄清沅说："说是我黄清沅叫种的，没有人敢撵边！"因此重华、青灵口、马角坝、文胜种鸦片烟由原来的两三百亩发展到一两千亩。收了烟土还要给黄大爷"上寿"。1930年（民国19年）。黄清沅因有钱有势，有人（指哥老）有枪，国民党采取以匪治匪的方针，黄清沅就当上了梓潼县剿匪督练长，兼马路局长。1931年（民国20年），青灵口团总（又是暗地的匪首）邓云龙的弟兄伙与黄清沅的弟兄伙发生争执，黄清沅藉剿匪督练长的势力"拿梁子"（土匪之间的报仇）。把邓云龙"丢翻了"，吃掉了邓云龙几十杆枪。当时蹇幼樵当了梓潼县长，保举黄清沅当公安局长。头一两年，为了发展他的私人势力，每年只有4、5个月住在城内，他说"台基稳了，不怕水涨"（水涨是指官兵包围）。后他又兼国民党重华区分部书记长（次年，他把区分部书记长交给他三弟黄复初），他兄弟黄燎如当了副乡长，黄复初当了保安团督

练长。黄燎如在区乡“擦滥污”更为毒辣，奸淫妇女不计其数。当地农民结婚，如果新媳妇略有姿色，“初夜权”即归其所有，人称“脚猪子”。抢劫、拉壮丁、敲诈勒索，他都直接出手。黄清沅在“羽毛丰满”后，才把重华区7个乡的势力交给他的三弟、四弟。1932年（民国21年），吴二大（音代）王（据说是吴佩孚的兄弟，在北方站不住脚，带领部分人枪从甘肃到四川）路过重华，先给黄清沅“拿上啃”（联系）。黄清沅满口欢迎，却暗地里布置了六七十人在场口民房上，架上机关枪，房内可以瞄准街上，街上却看不见人、枪。黄清沅、黄燎如等亲自到场口放鞭炮迎接，并叫他的大管事欧欣亭喊：“请到江西馆（场内的大茶馆）吃茶、造粉子（即哥老语的吃饭）。”吴二大王的兵刚进场内，就被机枪、卡宾枪哒哒打死了七八个，黄清沅的弟兄伙高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就这样吃掉了吴二大王100多条枪。大匪吃小匪、本地匪吃路过匪的武器，黄清沅就搞了好几起，国民党政府还说黄清沅“剿匪”有功。1934年（民国23年）国民党二十九军田颂尧部黄正贵（师长）驻扎绵阳地区，召集各县公安局长开会商讨“剿匪”事宜（实际是防止红军北上），黄清沅趁机拉拢，称哥道弟，并暗地送黄正贵200余两好烟。黄正贵送黄清沅10支卡宾枪、手枪及子弹等，并用小汽车送黄清沅回县。从此，黄清沅声势更大，人人畏惧，都说：“黄师长与黄清沅是拜把兄弟。”他趁此带队剿匪，又把川北另一大土匪邓天王吃掉了。吃掉土匪的枪支弹药，并未报入公安局，都散发给他的哥老弟兄，作为私人财产。同年公安局改为保安局，黄继任保安局长。次年正月（1935年），国民党当局力阻红军北上，绵阳专署成立江、彰、梓、盐、青、平6县联团指挥部，蹇幼樵任总司令，黄清沅任第五区指挥部司令，负责剑阁至梓潼、梓潼至江油这一地区的防务。除原公安局武器外，梓潼各类地方武装组织（如门户练、保卫团、保甲训练班）都统一归黄清沅指挥。此外，又临时增加一个特务中队。指挥部司令

方筹款和上面拨款，购买100多支新式枪支（黄从中增派捐款，贪污银元1万多元）拨给黄清沅。1935年（民国24年）红军突破嘉陵江直向剑阁、梓潼进发。农历二月底，红军红四军和红三十军以及红九军一部从剑阁、梓潼南面金仙、元山、王河向梓潼进发。邓锡侯部驻梓潼的一个旅向元山逃窜，黄清沅的1000多地方武装在农历三月初八日也全部离开梓潼，调到他老家重华。到重华后又遇红军，他闻风退往江油，再由江油退往安县，保住他的公安部队和哥老土匪部队，接受涪江左翼民团总指挥杨选福指挥。黄清沅在退出重华时，私运一车鸦片烟，约有千两，值白银1万余元，命其军需官欧欣亭运到成都，计划送一部分给邓锡侯、田颂尧，再出卖一部分，但被成都卫戍司令部第四检查处查获扣留。欧欣亭去找邓锡侯的副官，才取出来。黄清沅不战自退，被梓潼黄祉生、王蕴朴、薛少叔、任清华等59名士绅、教师联名告发，绵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转报成都保安处，保安处派人将黄清沅逮捕，1937年（民国26年）1月27日判处黄清沅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欧欣亭判有期徒刑1年，他的哥老弟兄高延德判有期徒刑8年。黄清沅即令他四弟黄燎如、三弟黄复初和梓潼保安团第一大队长肖尔瞻、公安局大队长唐靖一等将留在他家里的鸦片烟3000多两、银元20000多元和银锭、金子共值10万多银元，运到成都活动，贿赂贺国光、邓锡侯、孙震等。黄清沅因此被无罪释放，又回到重华。1937年起，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黄结交附近几个县的大土匪、大袍哥和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互相送烟、送女人、摆赌场、做生意。他结交的人有梓潼县长张年略、来元义，平武的杨朗如，昭化的米少谦，江油的蹇少樵、蹇幼樵，中坝的唐淮，大烟匪、大土匪张守华，并和碧口、平武、青川、南坪的头面人物过从甚密。这时，黄已有枪支2200支，哥老成员有3400多人，势力主要在重华区7个乡场，方圆300多公里。

三、杀人如麻，奸淫成性

黄清沅利用其攫取的权力及土匪、哥老等恶势力，穷凶极恶，杀人如麻，奸淫成性。其杀人手段有枪杀、刀砍、绳吊、火烧、水淹、棒打、轮奸、毒药等。群众说："黄门四虎，虎虎吃人，躲过初一躲不过初二。"

1. 民国23年冬，重华乡小学教师张华沛，年终应补领薪谷1石4斗，因黄清沅包管公粮粮谷，其管家用小斗量了1石4斗，又多是秕壳。张华沛到城里暗暗告了黄清沅，旧官府与黄清沅完全是相通的，把状纸转给黄清沅。在冬季的一天，在重华街上，张华沛被黄清沅的狗腿子拉去，口塞棉絮，浑身用旧棉絮捆了两层，外面浇上煤油，活活烧死。烧死后扔进砖瓦窑内化成灰。

2. 重华街上居民何天舟死后遗下寡妻，略有姿色，有房屋数间，瘦田数亩。黄清沅的儿子受其父命，晚上去奸污何天舟的妻子。恰巧黄清沅的兄弟黄燎如也正去奸污，侄儿与幺叔碰了头，你要开枪，我要开枪。有人给黄清沅报了信，黄清沅把儿子和兄弟叫回来训了一顿，说："大家都不要，把那婆娘丢了。"隔了两天的一个晚上，两叔侄和两个兄弟伙身带枪支和猪尾巴，跑进何天舟屋里，把何氏女人衣裳脱光，用猪尾巴塞进阴道拖进拖出，何天舟女人就这样活活疼死。

3. 民国24年，黄清沅被四川军法处软禁时，黄清沅另一狗腿子欧阳德亦被军法处传询，对证黄清沅材料。黄清沅知道欧阳德证实了自己的一些罪恶，便写信给他兄弟和知心兄弟伙，趁欧阳德回重华时路过山垭，拦路捆了欧阳德，用木棒打死。至后，黄清沅释放回重华，将欧的家具、衣物、钱财全部抢光。

4. 民国24年初，原国民党重华区区长彭越生，原来常给黄清沅上"寿"。当时所谓"匪"（指红军路过）情紧张，每晚由区

长亲自带领兵丁清号（查旅馆），彭越生不知道重华街上一家旅馆是黄清沅的狗腿子开的，按“规矩”清号时，旅馆老板要把旅客亲自带到门口排成队，点名清查。当夜旅馆老板蒋铁匠向黄清沅求情，黄清沅叫蒋藏起来。至后，黄清沅反诬彭越生“借查号为名，私自抓蒋铁匠”，命令兄弟伙把彭越生拖出来用砖块打得半死，丢下粪坑。后来彭越生爬回家，不久死去。

5. 民国19年至23年，黄清沅的兄弟伙在山垭路口多次抢劫来往客商，有一次抢了成都某大官的烟土，绵阳专署要清查，黄清沅把他的弟兄伙杨天宽、欧进“丢出去”枪毙了。

黄清沅杀人罪行难以尽述，仅举以上为例。

黄清沅奸淫成性，动辄“丢翻”，强奸、骗奸、诱奸妇女难以数记。他杀人后，再奸淫其妻、女，杀其父兄；甚至先奸后杀，他还把年轻妇女当作商品送给或卖给外地哥老、土豪官僚。其弟黄燎如奸淫估霸不逊其兄，据1950年群众揭发，经过核对的受害者有54人。在重华、文胜、青龙等地，黄燎如有所谓“初夜权”，手段之卑劣，令人发指。

（四川省成都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金堂巨匪赖金廷

金堂县政协文史资料组整理

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四川尤甚，兵祸连绵20余年，大小战役竟达400余次。因而各地匪患日益严重，以金堂县最为猖獗。先后有赖金廷、赖合山、蒋炳南、解伯衡、黄子昭、苏传文等，都是拖棚带队、称霸一方的股匪。其中以赖金廷势力最大，不唯打家劫舍，剪径绑票；甚至截击溃军，洗劫场镇。搞得金堂及邻县一带暗无天日，民不聊生，商旅裹脚，各要道通衢变得路断人稀。致使金堂县也被污蔑为匪县，把金堂人叫做“金堂帮”（意即匪徒）。在那些日子里，金堂人外出打店，旅馆不敢留宿；路途与人交往，别人也要尽快回避，惟恐招来祸事。足见赖金廷一伙作恶之多，为祸之烈，造成何等恶劣影响。

一、赖金廷是怎样成为绿林巨匪的

赖金廷字国英，1877年出生于金堂县红瓦店四方碑双樵子赖家老院子。父赖开模（人称赖驼子），养有赖金廷、赖合山等子女8人。赖金廷小时候读过2年书。父死后，随母迁居康家渡长坟地佃田为生。但赖好逸恶劳，不安心务农，跟随三哥赖熙（土匪）操袍哥。后来又跟他的叔父赖开太（匪首）放过牛，暗中参加抢劫。不久，又投靠叔伯姐夫彭执其（匪首），从此公开行劫。由于赖胆大妄为，动辄冒险亡命，为彭所赏识，被提拔为管事。彭拨枪10

多支给赖，赖成为分棚舵把子。此后，赖金廷抢劫拉肥，愈益猖狂，很快发展为拥有近200人枪的大股匪。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为了互争雄长，抢夺地盘，都采用招匪成军的手段，扩充武力。1922年，川军刘斌师长派人招安彭执其，彭讨价过高未达成协议。同年军阀杨森部第六混成旅旅长乔仲权对彭招安成功，委彭当了第一团团长，赖金廷、赵华山、康绍文等分别当了营长。赖营中小匪首何锡珍、何子丰、赖昆等分别任连长，部队驻扎广汉。赖金廷被招安后，怕把自己的本钱要掉，背地将好的枪支悉数埋藏在康家渡老巢，拿赖的话说叫“留条后路”。赖上任七八个月，匪性难改，认为受部队纪律约束，钱不够花，眷恋抢劫生涯，乃呈请将营长职务交侄儿赖绍尧继任，保住人枪，自己回老家拖棚子，重操旧业。在抢劫裹胁中，逐步扩展实力，抢劫范围遍及毗河、中河、北河南北地区。

当时，赖匪的各分棚经常剪径之处有：成都的倒牌坊，唐家寺的蔡家庙，新都的桂登铺，中江的风洞子、老牛坡，德阳的龙爪溪，广汉的花牌坊，简阳的云秀、新观音，淮口的三王庙、滴水岩等地。拦路抢劫时，起初仅限于银子及行商货物，后来不分对象，只要身上有几吊钱的过路行人都要遭殃，甚至连读书的学生亦不能幸免。

赖金廷利用四川军阀连年内战，无暇顾及各自防区的治安之机，大肆购买枪械，收罗走卒，特别是他先后在新都桂登铺、倒碑坊、高堵桥等处多次寻找机会，截击各军阀的溃散官兵，收缴了各种枪支400多，尝到了甜头，于是贪得无厌，遇上败军，就想吃掉。一次，他和匪众在广汉连山附近，见某部军队从前方溃退下来，他即率领匪徒拦腰截断，想吃掉这支部队的枪支。岂知这部队有一定战斗力，一接上火，军队就摆开阵势应战，打了一个上午，赖匪阴谋非但没有得逞，且陷于重围。他以为自己无生还希望，把枪也丢了，绝望地叹道：“我死了算了！”他的贴心逗

伴赖淑芬忙将枪捡起来给他打气说："哪有这样就算了，拼死也要打下去！"这样，赖金廷才勉强坚持到下午，俟各路来援救他的匪徒赶到，才将这支军队击溃，赖匪还分得百多支枪。至此赖金廷已有手枪300多支，步枪千支以上，分棚10几个了。

往后，他又与新都、新场的匪首黄笨、肖德渊，金堂大小寺的土匪余耀山，镇子场通匪的袍哥大爷刘惠安等连成一气；又和金堂龙王场、红瓦店、云绣乡的匪首罗春山认作老庚，还结为干亲家；继而又与川西、川北、川南30余县大小匪首联盟结拜，互通声息，互相支援。从此，赖匪的声势越来越大，就连金堂驻防的旅长杨秀春也怕他三分，不得不对他施以笼络。当时，杨秀春旅的团长许达权就与赖金廷结拜为兄弟。因此，赖金廷一伙，在几年内终于成为啸聚金堂地区，滋扰川西一带的巨大匪帮。

二、赖匪残害人民的暴行

赖金廷一伙匪徒抢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手段极其残忍歹毒，现略举一些事实：

1. 拉肥绑票，勒索银钱。袍哥的术语，绑架大人叫"拉肥猪"，绑架小人叫"抱童子"。一次在廖家场红梁子将李景堂、李皋陵等4人绑走，家中细软抢光，关了42天，勒索大洋1400元。至于"抱童子"，往往索价更高。付不起钱的人家，只有忍痛不去赎取。赖金廷的养子赖荩成，人称"肥猪儿"，就是无人赎取的童子，赖见其聪明，留下收养。

关押"肥猪"的地方，设在康家渡附近的黄家院子、草庙子、下河心等处，有专人管理，戒备森严。被掳人家若不如数付款，决不放回，直至关押到死，死了领尸也要给钱。往后，因赖实力扩大，拉肥范围竟至川西、川北、川南一带，主要由外地土匪搭线，这些远方"肥猪"一般都要几千元大洋的赎价。

2. 洗劫场镇。赖匪一伙对拦路抢劫、打家劫舍不满足，还先后在云绣、三水关、唐家寺、新店子、石板滩、龙潭寺、赵家渡等场镇以及成都牛市口等处洗劫，甚至还妄图洗劫广汉、新都等县城。1922年2月某日，赖在赵镇洗劫了巫家绸缎铺。当晚10点左右，店主巫云山出门不久，店员钟庭三刚关上门，首先赶到的几个匪徒一脚踢开大门，乘势在钟头上砍了一刀，钟立即昏厥倒地，被两个匪徒拖出门外，扔在坝子里（后经陈吉三医好，不久病死）。其他数十名匪徒蜂拥而入，把所有店内财物抢劫一空，巫家铺子就此关闭多年。另一次，赖匪洗劫云绣场时，正值逢场天，匪徒乔装军队，全副武装，堂堂正正开进场内，公然在茶馆内插上军旗。等到登场时，一声令下，宣布戒严，众匪徒逢人便搜，见货就抢，连红灯烟馆内烟斗中挖出的烟灰都抢走了。

3. 杀人放火。赖匪在抢劫中，只要遇到阻击，即报复泄愤，杀人放火，倒楣的往往是当地百姓。一次，赖匪在西河场绑票与团防遭遇，受到阻击，赖就一连烧了几个院子。1925年，赖匪手下的头目徐宗顺（绰号徐瓜娃）率众洗劫赵镇。入夜前，先派人到城隍庙杨家茶铺放火，制造混乱，以便趁机抢劫。因被“门户练”发觉未逞，心怀不满。半夜，徐又率匪徒前往，路经冯家柑子园，正遇“门户练”一班队丁围桌打牌，乃乘其不备，将队丁全部击毙，只一人装死逃脱。不料，徐匪等刚从清平街进场时又碰上“门户练”未能进入。盛怒之下，徐大喊：“拿红来！”立即放火烧了廖、范两家民房。后又转到篦子市，把薛家院子和篦子市民房点燃。顿时，烟雾弥漫，火光冲天，篦子市一带房屋一宵变为灰烬，损失惨重。第二天，驻军派兵去老牛坡追剿，匪徒尚未离去，打死了一些，才被驱散。同时，赵镇团防和姚渡保安团又合击了云绣场赖匪部的一股匪徒。赖因此大发雷霆，立即派人去烧了赵镇所辖的菜坝。一过麻石桥，就“放大普”，见房子就烧，一个好端端的场镇，就此成了一堆堆瓦砾。

新都县团总夏德山，在赖匪入境抢劫时，几次进行阻击。赖为报复竟纠集匪众打起“奉天命打团”的旗号，浩浩荡荡杀到新都夏德山老家擦耳岩，枪杀了夏德山兄弟俩，烧了夏家所有的房舍，并把夏家附近群众抢劫一空，连鸡、鸭、鹅、兔等家禽家畜一并抢走。并胁迫康家渡农民用鸡公车把抢来的粮食、财物运回匪巢。车队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三、“清乡”军残民、“招安”匪当官

1925年，杨秀春旅驻防金堂时，为显示自己的力量，扫除防区障碍，就准备对赖金廷的老巢进行清剿。清剿前，为制造舆论，还编出歌谣：“三岁孩童七岁匪，八十老翁坐地分肥。”把整个康家渡说得没有一个好人。不久，便打起了“清乡保民”的招牌，沿着去康家渡的大路，分兵进剿。狡猾的赖金廷则利用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避实击虚，与之周旋，在混战中，赖金廷有时还吃掉部分队伍的枪支，然后又分散逃跑。军队吃了亏，无处泄愤，也同赖匪一样，不分青红皂白，见有可疑的人就整。有一次在清乡时，把3个被他们怀疑的对象（实系农民）抓去戴高帽子，吊鸭儿浮水，脚上挂石头。乡里群众出面说情都不行，结果把3个人的眼睛吊瞎了。又一次，王营长带队清乡，借口扫清视界，竟下令砍光竹笼树林；更有甚者，他们借口不让土匪立脚，丧心病狂地实行残酷的“三完四光政策”（即树子砍完，竹子砍完，缸缸罐罐打完；大小猪杀光，鸡鸭鹅兔吃光，蔬菜扯光，院子烧光）。遭殃受害的全是康家渡一带的群众，所以，老百姓一听说部队要清乡，就吓得背井离乡，逃走一空。“清乡”的办法，非但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反而于匪有利。

杨秀春的清剿政策失败后，乃决定招安、收编土匪。1926年，杨秀春委命他的团长许达权做金堂县县长。在许上任后，遂派营

长陈洪宾与赖金廷、罗春山商谈成立“联合团”维持治安，条件是不在辖区内抢劫。联合团的给养，由地方附加田赋来负担。赖、罗一伙，认为有利可图，于是积极筹备，协商划分防区。最后决定：城厢、绣水、姚渡、玉虹、清江等平坝地区划为一个辖区，由联合团团长张执中（未负实责）、副团长赖金廷直接管辖。龙王、日新、云绣、福洪等乡丘陵地区，由罗春山管辖，罗任大队长，归赖指挥。两辖区赋税，各收各用。许为了进一步施展笼络手段，又与赖结拜弟兄。一伙打家劫舍、荼毒生灵的匪徒，一跃而为官府的座上客、“保卫桑梓”的民团了。这是赖金廷势力的极盛时期，他能调动的人枪约7000余，经常在身边的也有1000多人，马10多匹。赖金廷有了权势后，在其管辖区内，委派胞弟赖台山为手枪大队长，亲信赖昆山、赖淑芬为大队长、马枪队长，而且堂而皇之地办起兵工厂，设立监狱，修建阅兵台，俨然象一个割据一地的军阀。赖还委官收税，税名税额随心所欲。除田赋附加税外，尚有什么保商税、耕牛过境税、商船税等。有的税预征到1973年，真是骇人听闻。为了整饬联合团部队军容，匪徒也仿照部队装备，头戴白边军帽，身穿绿色军服，腰系弹袋，左碗右壶。赖金廷踌躇满志，择吉日于八月初一到“联合团”走马上任，以赖国英名义发布公告：禁止在辖区内抢劫，违者格杀勿论！竟也杀了几个闯进他辖区抢劫的小匪。但赖合山等仍暗地在外抢劫拉肥，他就睁只眼、闭只眼、坐地分赃。加上在辖区内横征暴敛得来的钱财，买田置地，开油房，造新屋。落成之日，杨秀春、许达权等官员以及各路码头袍哥土匪头目等均亲临贺喜，敬送匾额。赖趁机做大寿，大摆筵宴，开流水席，叫自己的班子唱戏，一连闹好几天。

四、亲家杀亲家，“联盟”变冤家

金堂县巨匪罗春山，成立“联防团”时，任赖手下的大队长，

独霸云绣、红瓦店等丘陵地区。此人性情残暴，20岁时就伙同土匪林狂天杀死曾瓜瓜（土匪）得枪2支。后在惯匪林二兴、林三兴等支持下到新店子抢场，又得枪10多支，实力渐大。1922年刘利生团长在混战中阵亡，他趁机截击部队，抢枪数十支，并裹胁一批败兵入伙。稍后，川军乔仲权旅的招安连连长严茂生又率队加入，云绣土匪头子庄子才也投靠了他。从此，罗的声势更大，成了仅次于赖金廷的第二号匪首。

赖金廷与罗春山曾争一散兵的新式手枪，因罗抢先夺到手，赖对罗颇有怨气。后经赖的叔祖父赖得斋及叔父赖开太疏通和好。1927年，两人合伙去成都抢劫大面铺后，加深了感情，结成了生死与共的老庚。继后，赖金廷侄儿（赖合山之子）又拜罗为干爹，结为干亲家。但不久，赖金廷的二水舵把子何锡珍的兄弟伙罗老九在罗春山管辖区抢劫，被罗所杀，何由此怀恨在心，经常在赖面前挑拨，赖开始对罗有些不满。1928年，严茂生（罗春山的亲信）率匪徒冒充军队去成都外东抢劫时，慌乱中遗失物证，经查明系金堂赖金廷的“联合团”的东西。成都有关方面疑为赖匪部所为，乃将罪证交驻军杨秀春查处，杨嘱许达权转告，并有意对赖说：“上峰原打算委你当清乡司令，看来这个局面，你也难维持了！”赖听后，怒不可遏，认为是罗春山有意陷害他，又使他失去升官机会，乃决计除掉罗。

1929年3月，赖金廷抓住罗春山信佛的特点，设计在康家渡悬幡挂榜打“罗天大醮”，请罗申文上表，表示对罗的尊敬。罗很高兴，乃亲率庄子才、严茂生等心腹逗伴15人前往赴会。罗春山骑马，行至河边上船时，马嘶叫不已，严茂生认为是凶兆，劝罗不去，罗不听，执意要去，庄、严2人则返。遂由林二兴带领其余逗伴随行。到达康家渡后，赖金廷假意盛情接待，赖的二水舵把子何锡珍，与罗素来很熟，陪罗烧大烟，罗的逗伴也各有赖的兄弟伙陪伴，实则监视。当晚二更后，何锡珍与罗开玩笑，乘其

不备，连发3枪，未击中要害，又拖至天井里，把余下7发子弹全部倾泻在罗身上，结果了他的性命。

罗春山的逗伴在外吃茶，忽听枪声，知道有变，忙问："啥事？啥事？"赖手下的何子丰立刻站起来吼道："不准动，把枪缴了！枪是罗大爷的，缴了还是要退给罗大爷的。"罗的逗伴在夹持下无法反抗，只好把枪缴了。当时还有两个罗的逗伴在看戏，一见情况不对头，溜了。

严茂生、庄子才折返后，回到了红瓦店，一听到逃回的匪徒报告，知道凶多吉少，怕赖金廷前往袭击，连夜将兄弟伙撤往龙王庙暂避。

罗春山死后，何子丰等把他的尸体从后门抢出放在市场坝。这时，赖金廷走来，潸然泪下，亲手给罗烧了一堆"倒头纸"，并吩咐兄弟伙用被子裹尸，派人看守。赖对众人宣称说，这是军队的计划，自己也迫不得已。第二天他又派赖合山、赖昆山等10余人，随带抬盒2个，装满金银斗壳、香蜡钱纸、猪头三牲等祭品，护送罗的尸体回到罗家。

赖金廷狡诈多端，这种假意标榜袍哥义气的作法，果然收到一时的效验。罗春山的老婆非但没有计较，且以礼相待，请赖合山等进屋入坐。庄子才暗中怂恿罗大娘把人扣起来，也遭拒绝。她说："罗大爷已经死了，今天是拜把兄弟前来烧纸，不能损一点粗皮，否则你们要负责。要报仇，等罗大爷安葬之后，由你们去做。"庄子才只好顺从。

赖金廷打死罗春山的消息传开后，康家渡街上人心惶惶，异常惊恐，来贺拜"罗天大醮"的袍哥土匪头目怕事态扩大，一个个相继溜走了，一场热闹非常的"盛会"，就此倒幡收坛。

罗春山死后，手下兄弟伙虽然有些丧气，但酋亡将在，力量未损。庄、严二匪旋扶植罗的幼弟罗绍光继兄稳舵，他二人掌握实权，发誓要为罗报仇。赖金廷作贼心虚也想到这一着，自恃实

力比庄、严两人强大，加之受许达权的怂恿，决定一不做，二不休，遂与许相约互相配合，以武力吃掉庄、严的实力。是年4月下旬，赖集中全部力量，外调集一区民团，兵分几路去龙王场攻打庄、严匪部。许达权部也配合行动，经姚渡、西江河、泰山庙，向龙王庙前进。民团的战斗力弱，布置在外围“扎墙子”。这天，正是安葬罗春山的日期，刚一“发引”（即把棺材抬出大门之意），闻匪徒报警，庄子才跪在罗棺材前求保佑说：“罗大爷，你要有灵，应显圣啊！不然我们就糟了！”说完，立即集合兄弟伙去了。罗家院子只剩下厨师及罗的舅舅邓银山两人。这时，赖金廷手下管事刘华春带领一部分人正赶到罗家门口，气势汹汹地问道：“人到那里去了？”邓银山答：“不知道。”刘为了显示威风，指着罗棺材打了三枪。这事传到庄、严二匪的兄弟伙耳里，更激起了满腔仇恨。庄子才背着罗的灵牌子，头上顶着钱纸，其余的人也脱光上身，一心与赖决一死战。于是兵分两路，向已到达牟塔寺的赖合山部拼死进攻。哀兵必胜，以一当十，赖金廷稳不住阵脚，节节溃退。许达权部队本是佯装支持，见赖败逃，就一枪不放，从泰山庙撤向姚渡，赖氏匪军因之全线崩溃。

这次战斗失利，赖金廷认为关键是许达权不予配合支持所致，是上了许的当；又意识到许所以见死不救，是有意坐山观虎斗，使他们互相残杀，借以削弱两方的力量，于是赖对许怀恨在心。

庄、严二匪虽然取得胜利，但自量实力不如赖金廷大，最终斗不过他，不如回避一时。于是，庄子才避往新繁，严茂生逃走大邑，这场两大土匪势力的拼搏，才暂告停息。

这段时间，赖金廷不仅杀了罗春山，还杀了与他结过盟的黄笨，从此“山坝”分裂，亲家成了冤家。

五、借民意绥靖防区，邓军长四旅围剿

1914年，四川军阀刘湘主持在自贡召开了一次军阀的分赃会议，分享盐税，重新划分防区，混战暂时停止。各地军阀又把注意力转到扩充自己的实力、整训部队和绥靖防区上。邓锡侯、杨秀春对各地股匪原有两种打算：一种是招安，可以扩充军队；二是利用袍哥来维护地方秩序。赖金廷当然也懂得这一套。当时杨秀春旅和二十九军黄正贵师都打算招安赖，但赖自恃实力雄厚，待价而沽，犹豫观望，杨驻防城厢与赖接近，接触多，磨擦也多。赖对杨旅、许团颇有戒心，不愿接受他们的招安。而黄正贵又驻防德阳，相去太远，赖又舍不得离开老窝。杨对赖招安不成，乃援用第二种打算，以袍哥维持治安，利用赖的声势，拉拢金堂长寿山、万年山、飞龙山的袍哥，成立“三山”总社。名为“忠义公”，由该部团长许达权坐堂，赖金廷稳舵。

一次，赖金廷传堂“忠义公”通山大会，城厢遍街都是赖的兄弟伙，到处鸣枪，飞扬跋扈，肆无忌惮。杨秀春叫赖制止，赖不仅不听，反而冲着杨说：“袍哥不要枪炮，难道要剪刀？”杨听后极为不满，认为赖气焰嚣张，非但不能利用，也无法控制。时川西几县士绅正以不堪匪患滋扰为由，联名向邓军长请愿，呼吁对赖采取措施。并指出成立联合团的作法，实为“栽林养虎”，邓考虑到“不能用则杀之”的条件已经成熟，乃决定“顺应民情”，以4个旅兵力对赖匪进行彻底清剿。当时，4个旅的兵力部署情况如下：

第五混成旅谢德堪部扼守镇子场；第十七混成旅李树骅部控制新繁斑竹园一带；第一混成旅杨秀春部及第二混成旅陈静珊部担任主攻，将赖金廷包围于毗河地区。这时赖察觉自己已被围困，打算藏枪外逃，但颇合山力主应战。最后，赖金廷下定迎战决心，

说："球啊！打就打！"1930年3月25日，杨秀春旅所属许达权团率师出城厢南门，经绣川桥到达姚渡，杨秀春率主力经陈家巷、瘟祖庙到达青龙桥一带，布下包围圈。杨旅的叶政营早驻龙王庙；陈静珊旅所属陈煜生团到达新都新场张家庵一带；陶凯团由广汉经三水到达狮子桥，完成第二道包围部署。赖金廷一伙也相应安排了一个内线作战方案。趁川军部队尚未完成部署，提前主动进攻突围。当夜，赖合山率领赖淑芬、刘春华、谢大神等200余匪徒，出其不意奇袭了龙王场的叶政营驻地。首先点燃营房，然后集中火力猛冲猛打。叶营官兵从沉睡中惊起，仓惶应战，损失惨重。营长叶政、连长张柱林2人相继阵亡，全营溃退。次日上午9时，大部队始向赖匪全线进攻。赖率主力首先向杨秀春部反击，杨不能抵挡，节节败退。从官田坝、五间房、瘟祖庙一直后撤，午时退至城厢郊外陈家阁。在退却时，旅长杨秀春险被击毙，逃入县城不敢出来。赖匪不失时机地将主力转向新场陈煜生团进攻，其双庙子一战，陈团一触即溃，直退至新都城郊福禄寺才稳住阵脚。这时，陈静珊旅的陶凯团从狮子山推进到壁山头，听说杨、陈两线失利，亦不敢前进，撤回广汉。包围歼灭赖金廷匪部于毗河地区的计划遂告失败。

赖金廷匪部击败邓锡侯部的围剿后，乘胜于当夜突围，倾巢投奔德阳、罗江一带驻防的黄正贵师。路经高堵桥、关帝庙到大小寺，然后与余跃山匪部汇合，再经壁山头，穿过清江，过北河板桥，拂晓抵达官仓。在官仓遭到驻军及团防阻击，激战两小时后，继续向德阳方向逃窜。

杨秀春的许达权部，于3月27日会同陈煜生团，进驻康家渡赖匪老巢，搜索残匪，把赖金廷的油房、碾子、院子放火一烧而光。杨、陈二旅主力仍向赖匪跟踪追击，新繁李树骅旅亦挥戈向北截击。

就在赖匪逃窜时，邓锡侯下令所属川西各路驻军阻截，并通

报各友军、特别是二十九军协助围剿。二十九军第五师长黄正贵虽过去与赖金廷交往甚密，但此时不敢冒此风险，去收容掩护，也只好翻脸不认。黄下令宣布戒严，并作阻击姿态，于是赖匪就走投无路了。

六、烧龟滩赖匪毙命，杨秀春刀剃良民

赖金廷抵达连山八角井时，获悉德阳方面黄正贵师情况，知道大势已去，欲改逃茂县，又听说该地驻军也出动阻击。旋决定经由丝瓜架、大瓜坪、红白场窜往北川。邓、杨分析敌情后，也料定赖匪必往北川一带落草，遂通令沿线驻军阻截，并在必经之道红白场部署兵力，严阵以待。赖匪抵达红白场前，派手下人曾晓山前往办交涉。曾骑马并随带一人刚过铁索桥即被守军击毙。随之各地埋伏的部队枪声齐鸣，向赖匪射击。由于军队据守险要，火力又猛，赖匪伤亡甚大，慌忙后撤，拟绕道距红白场约 10 里的桥头通过。殊知杨秀春早派钱关喜连先期赶到，进行封锁。当赖的匪众进入射程，立即遭到火力阻击，无法通过，再次受挫。此时，赖匪前无进路，后有追兵，左濒高山陡壁，右临深涧急水。匪众大乱，妄图涉水趟涧逃命者淹死不少；意欲翻山越岭躲藏的，又遭击毙。赖匪亲信欧中兴亦中弹负伤，匪众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四处逃窜，赖经营多年的土匪部队就此土崩瓦解。赖本人穿越山林逃奔与赖合山失散，待战斗结束，身边只有 7 个人，躲在荆棘丛中不敢露面，几天后，才从山沟偷偷跑出来。拂晓时，行到绵竹县北 30 里拱星乡、烧龟滩处，饥饿难忍，几个匪徒正挤在一起吃汤元，突闻碉堡内团丁呼问："干啥的？"匪徒吊儿郎当地回答："做人的。"言毕，只听一声枪响，子弹正击中赖匪太阳穴，这个恶贯满盈危害人民几十年的巨匪立即毙命。

邓锡侯、杨秀春获悉赖匪被击毙后，立即电令所属部队将赖

尸体拍照，并抬回金堂示众。金堂和邻县人民莫不拍手称快。红白场逃散的溃匪，纷纷向德阳黄正贵师投奔。黄开始有顾虑，不敢收留。赖合山一再向黄求情，才决定收容骨干数十人，其余统统缴械作为俘虏，换上军装，集中待命。邓、杨知道后，移文索人，黄不得已，乃变换手法宣布：愿回金堂者报名，不愿回家的留下当兵。当即有八十九人自愿回家，内中只有4名是康家渡惯匪。其他的多是在赖匪逃窜时被裹胁前往的团丁或强拉去当脚夫的贫苦农民。当杨秀春派兵来时，黄便将这批人交出，押回金堂后，杨不问青红皂白，于农历四月二十八、二十九两天，分批在金堂（城厢镇）西门外、南门外处决。这些人在押赴刑场途中，呼天叫地，大喊冤枉，死者父母痛不欲生。一场浩劫化为几冢冤魂了事。邓、杨怕残匪潜回康家渡伺机东山再起，旋令团长陈相楷督办善后。陈为“教育”乡民，制定“教令”60多条，强令背诵，不会者责手掌3个。同时、又训练所谓挨门丁，实行联防。除以上措施外，1931年，杨秀春还悍然下令拆毁百年历史的康家渡场镇，将材料运往城厢外北8华里处，修建新镇大同村，以图绝灭祸根。可怜康家渡居民只得扶老携幼，到处投亲靠友，无依靠的只有在附近搭棚子居住。老百姓编有一首歌谣，描述这场浩劫道：“匪如梳，团如篦，官兵犹如刀子剃”，流传许久。直到4年后的1935年，才又重建康家渡，更名为祥福乡。

七、庄、严两匪在葫芦溪、大邑覆灭

在新繁、大邑避祸的庄子才、严茂生得知赖金廷倾巢逃离康家渡后，于农历五月间收罗残匪返回老巢龙王场，一时间竟扩展到五六百人。加上赖中海、陈海如、何昆等分棚合伙共约千人左右。继赖之后，在金堂及毗邻县区为害。杨秀春以过去清剿无多大收获，沿用老法招安，委庄匪为保卫大队长，允其收税作为给

养。1933年，四川军阀毗河之战，杨又委庄为游击大队长率部袭扰刘文辉驻姚渡的部队。在杨、庄合击下，逼刘部节节败退，撤出金堂，退守成都。当庄子才到达成都北门簸箕街时，杨秀春不让主进城，令其返回金堂。庄没有捞到油水，认为两次委任纯受利用，决心另找靠山。遂于当年八月初，通过田泽孚与二十九军田颂尧部的旅长兼警备司令陈宗进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招安，陈派一营兵力来兴隆场老牛坡接收。庄子才于八月十日率其匪部经中江、射洪到南充，整编为警司护卫连，庄被委任为司令部中校副官，其弟庄高禄被委任连长。

1932年，双流县巨匪李安邦一伙，在东路抢劫汽车后，来龙王场避祸。庄子才对这伙人携带的新式罗汉手枪很眼红，半夜，背着严茂生将这伙人全部捆绑，枪支收缴。次日，将人送赵镇驻军黄石英团，被悉数处死。李安邦在双流闻讯，极为忿怒，大骂庄是吃杂米饭的野种。于是四处"拿上咐"、"走字样"。听说庄子才已去南充，打算要回金堂网罗残匪，即通知当地袍哥和驻三台的三路司令何瞻如部袁继先营长（新都人），趁庄正月路过时加以诛灭。袁与李关系密切，答应相助。遂派连长王楷率队伍在庄必经之路的葫芦溪等待，终将庄子才等9人全部打死在葫芦溪的江边。

严茂生因庄子才背着他吞噬李安邦爪牙的枪支，又将这批人送驻军处死一事，深为不满。认为此事乃不仁不义之举，不愿再与其共事。但客居中又不好离开，待庄被招安去南充时，正好分道扬镳，于是率自己的人去大邑落草。岂料行至大邑山区，遭当地驻军阻击，伤亡极大，严本人亦中弹身亡，余则四处逃窜，严匪一帮就此散伙。留在金堂的罗绍光，继续为匪抢劫，在杨秀春的进剿中，负伤逃往新都班竹园治疗，闻庄子才的死讯，乃一气而亡。至此，罗春山一伙的各路匪徒全部覆灭。至于赖金廷外逃被歼后，金堂附近先后又有祥福的邓昌辉，姚渡的陈茂文、钟焕章，云秀的钟次祯等股匪为害，其规模远不及赖金廷、罗春山，至

解放方才平息。

八、杀许达权弟报兄仇，镇压赖合山群众称快

自赖金廷在烧龟滩毙命之后，其弟赖合山念念不忘为其兄报仇，扬言要将烧龟滩刮地三尺。曾先后两次率领匪徒残酷洗劫烧龟滩场镇，逼得商店关门，居民逃散。不得已由当地袍哥拜托什邡县舵把子马伯华居间调停，答应由红白场每年祭祀，事情才算平息下来。为赖匪修建的祠堂在1952年我县民工去黑水支援解放军平叛时，才被捣毁。

1933年，正当川军刘文辉、邓锡侯等军阀毗河之战展开，赖合山认为有机可乘，纠集匪徒百余名，虚张声势，号称千人，返回金堂。途经冯家寺，被杨秀春所属黄石英团第七连阻击，赖奋力迎战，使黄部受创，伤亡30余人。赖重返康家渡老巢后，第二天即封存粮仓，并四处抢劫，直至城边，驻军不敢应战，闭城自守。杨秀春在成都闻讯，赶赴金堂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5个连兵力进剿。赖合山重施故伎，派管事刘华春率匪徒夜袭杨部的高楼寺驻地未逞，刘被击毙。赖见势不好，遂于当夜经红风店再次逃往德阳。痛定思痛，他检讨过去失败原因，认为是上了许达权之当。因许先与赖金廷结为兄弟，然后从中离间诸匪联盟，怂恿杀害黄笨、诱诛罗春山，并结怨庄、严二匪等。最后，遭到邓、田两军的四旅兵力围剿，乃至红白场全部覆灭，联系起来都是出于许某的划谋。故发誓与许不共戴天，决心杀许以报仇。不久，赖合山手下匪徒探得许达权已去成都赋闲，即派其亲信李选清密去成都，会同惯匪薛开太，四方跟踪。一天，终于在鼓楼洞葛园茶社发现许在里面喝茶，二匪见茶馆人多不便下手，乃候许离开茶园，尾随至灶君庙街附近偏僻处，同时开枪将许杀害。李匪于回德阳复命途中，赖合山早已派人在广汉等候，沿途鞭炮不断，抵

德阳后还给李摆宴庆功，并传堂封李为大爷。

毗河之战后，刘文辉军败退西康，邓锡侯重新整训部队，绥靖防区，杨秀春部重返金堂坐镇。赖合山看无东山再起之望，乃托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主任张绍泉（巨匪出身，后任川军团长，驻防德阳、罗江一带，与赖匪颇有交情。1925年曾任金堂驻军营长，1941年被当时的金堂县长严光熙诱杀）为之活动。当上了善后督办公署情报处北区谍查主任。赖任职后，仍暗中通匪坐地分肥。

1940年，赖合山曾经一手策划，指使其兄弟伙抢劫成都署袜街金城银行。先是通过驻守古申市街四十一军留守军部辎重营长李铮金的同乡关系（金堂人。经常穿上便衣去赖公馆烧大烟，过往甚密），借得军装数套、卡车一辆。土匪乔装成军，携带武器乘车开往金城银行。一下车立即将银行的行警缴械加以禁闭，两个匪徒守在门外，不准任何人进出，威逼全体行员聚在一起，强令管库的职员拿出钥匙，打开库门。就这样一枪未发，库内的金条、金元、珠宝等全部被赖匪抢走。

抢劫案发生后，当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的邓锡侯极为震惊，他深知金城银行的后台，是政学系显要人物。因此，不敢怠慢，饬令警备司令严啸虎必须迅速破案。严立派侦骑四出，三天后，就在成都附近将这伙匪徒逮捕归案。第四天，就押赴刑场枪决。赖合山一听到他的兄弟伙被捕，恐怕供出自己，躲避了好几天。由于结案匆忙，或因兄弟伙讲义气才未将赖牵扯进去，使其得以侥幸漏网。其亲信爪牙何锡珍、李选清、彭敬孚、鼓义成、彭盛林、彭仲卿等也先后离开德阳潜回金堂从事零星抢劫，未再聚合。

赖合山先在善后督办公署情报处，后在警备部都担任北区谍查主任。因其本人就是巨匪，关系纵横，虽机关几经变易，仍能保住职位，直至解放。

1948年，赖合山派人回金堂串通“三山”袍哥，拥他当上了“忠义公”总舵把子，利用这个资本，又“炮选”为县参议员。解

放前夕，他伙同淮海战役败将、返回金堂的原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1949年任“成都防守副司令”），组织“反共救国军”，自任十九纵队挺进军司令，妄图继续顽抗。但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川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先后起义，成都和平解放，这支“反共救国军”也就土崩瓦解了。残匪虽然先后组织过几次暴乱，都被镇压下去，赖走头无路，余锦源也被逮捕归案，镇反中分别将2人在城厢、绣水镇压，绵延数十年的匪患，始告绝迹。

（四川省成都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赖子方闯荡秀山十五年

田玉先　田明钧等口述　王明宗　何祖谟　邹庭轩整理

1930年至1945年2月这15年间，在四川秀山县境内，有一股行踪不定、出没无常的土匪武装。他们啸聚山林，估吃大户，拦截富商，收拾团防，抢劫军火，攻监劫狱，名震秀山。这就是当时妇孺皆知的“赖子方”部队。

赖子方并非姓赖，姓田名维方，自号“现龙”，秀山县美翠乡岩窠寨人，1906年出生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父亲田成二是打油匠，母亲姚氏生育子女5人，维方排行第二。全家7口，靠打短工、捡狗粪、卖柴草凑合度日。1915年父亲去世，姐姐出嫁，二弟病饿夭亡。9岁的田维方帮助病弱的母亲担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

在为填饱肚子活下去的挣扎中，田维方格外早熟。捡狗粪卖，他把黄泥巴从竹筒里挤出来，再裹上些地灰，合在狗粪里，卖给本寨地主、保长陈应台家多挣钱。满12岁后到陈保长家去当看牛娃，每次推米，他看到碾房中响擂中都留下一些擂心谷，便用小手把谷子刨到擂齿边，再慢慢转动擂子，兜着推出来的几把米送给母亲煮菜菜饭吃。

渐渐长大的田维方成了娃儿头，他邀上一群看牛娃，在坡上“掷麻十三”（赌博）。赢了，他便收进腰包；输了，他无东西可给，就耍赖，因之大家喊他做“赖子”。“赖子方”这个绰号由此传开。这件事被魏管家向主子告了密，说他把牛拴在坡上去玩。东家陈

保长一顿棍棒，赖子方被打得浑身青肿。因此他恨透了魏管家，有次魏管家喊他端洗脚水，他动作慢了点，就被狠揍几耳光。赖子方无名火起，摸出平时玩耍的小刀，朝魏管家腿肚上猛刺两刀，而后一溜烟跑进了山林。

他在外边躲藏了一些日子回来，看到陈保长家在修碉堡，还请了两名背枪的保丁守卫。一个偶然的机会，赖子方听到陈保长同保丁商量，要设法捉拿他，他便跑到川河盖，与不务正业到处偷扒的赵麻子搞做一伙。他们打主意夺取陈保长的枪支。1930年冬，一天擦黑时，他两人提着刀，暗里跟踪正回家的陈保长和两个保丁。两个保丁进了屋，把枪搁在墙边，去抱柴生火。陈保长也把手枪放在桌上，转身去取糍粑烧。赖子方冲进屋，抓到手枪，对准陈保长扣动了扳机，陈应声倒地。两个保丁吓得缩成一团，赖子方急速转身跳出院坝，又一枪打死了赶出来叫骂的保长婆娘。赵麻子也飞快地提着两条长枪跑了出来。两人拖着3条枪奔回川河盖上。是年赖子方24岁。

赖子方和赵麻子在川河盖过了一些日子，赖子方见赵麻子只能做些偷鸡摸狗的手脚，不敢明枪亮杆搞，遂好聚好散，各拿一支长枪，另寻出路。

这段时间里，川河盖上有一个“狗脑壳”（吴绍卿）占山为王，拥枪20多支，拦路抢劫，掳掠村庄。赖子方便投奔“狗脑壳”混了两年。在打家劫舍中，他对“狗脑壳”的滥烧、滥杀，奸淫妇女，刻薄兄弟伙，专整干人，不敢碰巨头，心里很反感。赖子方暗中邀约七八个意气相投的弟兄，商量干掉“狗脑壳”，夺取指挥权。他趁“狗脑壳”熟睡之机，连开两枪，却没打死。这下他在盖上无法立足了，便拖七八条枪下山，投奔正拉队伍的叔叔田四麻子。

田四麻子家住美翠乡马颈坳，与乡团防队长简兴壳子有私仇。简兴壳子趁他在外面跑生意之际，勾结美翠乡长、大地主陈小竹

和黄泥塘保长廖兴汉等，杀死其兄长田庆魁、田老怀和两个侄儿田寅生、田明肇。田四麻子这才横下一条心，铤而走险，拖队上山。

赖子方得知四叔全家被杀殆尽，决心报仇雪恨。民国 28 年（1939 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叔侄俩聚集 70 多人枪，以祭祀土王庙为名，布置好各路埋伏。他们随身携带汽油等引火之物，在团丁都回家过年，对手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冲进美翠乡公所，捣毁了乡团防队窝子，烧掉了陈小竹的房子。叔侄二人冲上川河盖，赶走“狗脑壳”，相继接纳各地来投的小股武装欧鸣九、田五、周兰清、陈四方子等，遂组成一支百多人枪的队伍。赖子方领头制定约规：不准奸淫妇女，不准整干人。他还下令当场枪毙了两个奸淫妇女的手下人，一时上下颇为齐心。1938 年，田四麻子接受龙池区公所招安，带领原部 40 多人下山，驻龙池区公所听候调遣。

田四麻子接受招安下山后，赖子方便自任大队长，欧鸣九为副大队长，田五、周兰清、陈四方子为下属 3 个分队队长。他们以川河盖、平阳盖、太阳山、菠萝盖等地为主要据点，在秀山、酉阳、龙山、保靖、松桃等县毗邻一带横冲直闯，干着以下行当：

估吃大户。这一百二三十人枪队伍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吃大户。一种办法是队伍拖到一地吃一地，住进一个村寨，喊保甲长和富户煮饭吃。如赖子方带兵回去接母亲、五弟上山，就住在老家马尾冲寨子上，叫保长把酒肉弄好送来。开拔时，叫住户去乡公所报个案，免受连累。另一种办法就是派款。如龙池乡的几任乡长黄光潮、李宗楷、熊克信，每人都曾被派千块大洋，并且不准向农户转派。熊克信用乡公所的名义，把款子分派在老百姓头上，准备收齐后再交赖子方。下街庵堂坪穷人杨光友家被派交 8 块大洋。杨的父亲知道这笔款子的实情后，凑足 8 块大洋，还摘了一背葡萄子，以上盖卖葡萄为名，将款直接送到川河盖响水洞，交给赖子方。赖问明情况，安排他吃了午饭，带信给熊乡长说，我派的是你的款，不是叫你派给老百姓。已派了的赶快退，把你自

已的钱准备好，我们到期来取。熊深知赖子方的手段，赶忙凑足款子，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捉“肥猪”。派款逾期不拿的，便上门捉走人质。如涌洞街上头号巨富王老广，被派3000大洋不愿拿，时限一到，赖子方带领部下于深夜翻进王家掳掠，捉走其3个儿子。最终王老广送去了3000大洋作赎金，才赎回了3个儿子。

拦劫富商。这是他们养活队伍的另一财源，赖部经常在回星哨、猴子山、桂平坳、抱腰坡、天星坡、湖南野猪坪、蕨坳等地拦路抢劫。遇车拦车，见船抢船，掳劫的财物无可数计。如龙池宋农交界处的十字路，是湖南里耶通往秀山的要道，是大批生意人及鸦片走私贩必经之地。赖子方常在这里行劫，有一次他们抢得鸦片200多两，布匹1000多尺，洋纱10多挑，光洋100多块。

收拾团防。他们在估吃大户、拦劫富商时，往往遭到团防的攻打，因而赖子方部队就把团防作为收拾的主要对象。1941年7月，大板乡成立，委王西之为乡长，刘光烈为副乡长。上面拨发了一批较为精良的枪支，成立了50多人的团防队，委王西之的大儿子、中央军校毕业后曾任过国民党主席林森侍卫班长的王松龄为队长。赖子方决心收拾他一顿。八月初七，赖经过周密策划，找上门来。双方一接火，赖就用优势兵力把团防兵逼得退上窝颈坳的岩窠固守。赖部从左右两翼分进合击，打得团防兵四处奔逃，一直被赶出10多里外。接着，他们把空无一人的大板乡公所烧为灰烬。赖子方在收拾了大板乡团防队之后，于当月下旬下响塘，准备夺取停靠在响塘河边的鸦片船。凌晨，大雾弥漫，他们在美翠白庄桥边，与龙池区公所派往响塘收缴鸦片的团防队遭遇。一场恶战，赖部打死团防兵18个，打伤9个，区公所这支40多人的团防队被打垮。1943年农历冬月，龙池乡中平村大地主陈玉平家还愿，赖子方赶来看戏。吃过宵夜后，他叫陈玉平家派人去龙池乡公所报告匪情，他们跟着离开陈家到团丁必经的枣子弯设伏等候。20多个团防兵半夜赶到陈家，听说土匪已走，吃得一饱二醉，

嘻嘻哈哈回来。团丁们走进了伏击圈，一阵排子枪，便被打倒3个，打伤7个，丢掉了10几条枪。1944年9月下旬，赖子方到涌洞乡偏岩收款，杀猪宰羊，吃了几天酒席之后，叫当地百姓去乡公所报案。十月初一清早，涌洞、大板两乡团防兵及各保保丁，齐集偏岩围歼赖部，哪知却钻进了赖子方布好的“口袋”。双方从早晨打到天黑，涌洞乡团防队队长王杰和大板乡团防班长刘祖田都被打死，而赖子方的队伍却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抢劫军火。赖子方经过多次战斗，感到武器弹药不足，尤其是没有机关枪。他曾派人带300块大洋去八面山找李老菊部代购机关枪，结果落得个钱去枪空。唯一的办法还是抢。经过周密打探，获知妙泉驻扎有一营国军。这个营驻扎分散，龙潭河对面雄关寨子里的大地主、乡长黄良启家住有一个连，枪支弹药很充足，而且防守松懈。赖子方就把队伍开到离妙泉约15里的菠萝盖上，准备派人偷枪。这天，妙泉逢场，赖部分队长田五带着4个人扮成穷苦人来赶场，观察地形。晚上，他带着12个人、2把大刀、10支手枪，12支电筒潜伏在该连部周围。半夜过后，黄家门口的两个哨兵恹恹欲睡。两只“狗”慢慢走近，两个哨兵迷迷糊糊，也不去理它。突然，这两只“狗”猛然立起，“咔嚓”两刀，两个哨兵应声倒下。12支手电齐亮，他们冲进黄家堂屋，抱着2挺机枪，扛起4箱子弹，提着10支“中正式”步枪和10多个手榴弹，转身就跑。一个士兵惊醒，刚喊“有匪”，只听几声枪响，几个从铺板上坐起来的士兵便倒下了。这时堂屋后面一排枪打出来，田五手下有两个被打倒。天亮审问时，这两个俘虏都说是这家主人报的信，乡长黄良启因此死于非命。

赖子方部的所作所为使县府大为忧虑，便指派县中队的刘政卿领兵追剿。一年冬天，赖子方带人驻在“一碗水”，吃了大户后，照例叫主人家向县中队报告匪情。次日清早，刘政卿带兵直扑一碗水。赖部前哨一见，边打边退，退上了金龙山。县中队立即组

织围歼。从早晨打到天黑，县中队被打死8人，打伤10多人。赖子方却从后山溜了。又一次，赖子方行劫后，到抱木寨住宿。龙池乡团防袁队长得到密报，带人赶到了抱木寨。他闯进一家屋中，见一个妇女正在对镜梳头，便问："你们这里有土匪吗？"那妇人回答："有，上山了！"于是袁队长带人立马围山。这梳头的妇女就是赖的老婆黄大妹。待进屋探听匪情的士兵退出后，她才同赖子方从后门跑上山去。袁队长发现山上有一个人影晃动，喝问是什么人，话音未落，即被对方一枪打死。双方立即展开枪战。这时，龙池区公所请来了县中队及驻军一个营，并调集各乡、保团丁1000多人团团围住这个山头。次日凌晨，军队、团防开始总攻。冲上山顶，却空无一人。原来，赖子方早已在深夜从悬岩处用帕子结绳逃脱。

赖子方越闹越厉害，这就难免祸及亲眷。保长廖兴汉奉命将其老婆黄大妹与堂兄田维富夫妇捉来，关进了秀山李公祠监牢。赖子方探听到守卫监牢的是县警察第三中队，且一般都是半夜之后才严加防守，遂决定劫狱。劫狱这天傍晚，三中队只留下一个小队20多人看守，其余都到禹王宫看大戏去了。守监人员有的在喝酒猜拳，有的在搬桌子准备打牌。突然一声枪响，一支队伍冲进了监狱。执勤人员被打得跑的跑、躲的躲，赖子方迅速砸开牢门，找到了兄嫂、妻子，带着就跑，其他人犯也跑了几个。

民国33年（1944年），八十六军朱鼎卿驻防秀山，决心消灭秀山地主武装。谍报科长覃守益奉命招安收编赖子方，欲以此为诱饵将赖部一网打尽。经多次周折，覃才与赖子方见面，谈判签订了招安整编协议。确定收编地点在涌洞场。

农历十月十八日，覃守益、詹坤山带领8个谍报员来到涌洞。覃守益问赖子方具体整编时间，赖子方答："队伍到齐后就整编。"时间一拖过去了半个月，赖部头领陆续到齐。覃守益认为时机到了，便暗地派人回秀山军部密商，约定十一月十日这天围歼赖子

方部。到了初十覃杀猪宰羊，在住所王庆坤家堂屋大摆筵席，派人请赖部首领赴宴。覃守益、詹坤山内藏短枪，8个谍报员装扮成招待人员，都各藏短枪，约定席间以掷杯为号，一齐动手，将赖子方等大小头目枪杀。对军方的这一手，打入军部谍报科当谍报员的田伯泉早已向赖子方通了消息。在周密安排之后，赖子方和周兰清、陈四方子、长衣秀士一行头领，在8个警卫武士保护下入宴。门口两边，赖部严密布有岗哨，并有部众荷枪实弹往来巡逻，机枪控制了屋外的开阔地。赖子方的副手欧鸣九在外面往来指挥，全街戒严。见此阵势，覃、詹2人未敢掷杯。赖子方等喝了几杯后，起身告辞。覃问何时整编，赖子方答道："军饷今晚下发，明日就能整编。"说罢扬长而去。覃、詹立即分发军衣、军饷。但等到夜深人静之时，赖子方的队伍已无踪影了。

1945年元宵节，为避开国民党政府大军清剿，赖子方在湖南保靖小溪盖上与众头目商定，将队伍化整为零。欧鸣九带他的20多人仍在川河盖；陈四方子带他的40多人回溶溪；周兰清率领他的40多人与莲花乡刘树清上平阳盖；赖子方本部30多人，则等待时机捕杀他的最后一个仇人保长廖兴汉。这年2月，他从保靖小溪突然把队伍拉回皎白盖，于深夜猛攻廖家，打死了廖兴汉的儿子、母亲和管家，烧掉了他的房子。战事结束，赖子方在牛角山上举办了"庆功宴"，分了现有财物，宣布众兄弟各自回家，隐枪为民。赖子方本人，则带着兄弟、老婆，奔向贵州岑巩县，后来过了一段普通农民生活。

（四川省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政协　供稿）

“国军”剿匪部队扰民害民纪实

陈子尚

1939年春，国民党政府抽调第二军李延年部进驻酉阳、秀水清剿地方武装势力。半年时间，政府军一举将称霸酉东历时10年的张绍卿部剿灭。其部属杨树臣、李老菊、张恩普等，纷纷逃亡湘西，为湘西地方武装首领彭春荣、瞿伯阶收容，队伍又迅速恢复和不断扩充，力图东山再起。他们对张绍卿之死深为痛惜，认为张英勇有余而机智不足。在对第二军的作战中，不应该把自己的主力部队都摆在米旺和泔麻小块土地上，使敌军得以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攻，自己不能施展山地游动战术而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他们吸取这一次失败的教训。与瞿、彭等结成一个彼此呼应支援的武装集团，以地势险要、蜿蜒百里的八面山为巢穴，以八面山周围界连川湘鄂三省的酉阳、秀山、龙山、永顺、鹤峰等七八个县为活动区域，一旦遇上强敌，既可以凭险固守，又可在这广阔的边区地带开展游击战，把敌人拖疲拖垮。他们趁第二军李延年部撤离、新的接防部队尚未到达这一空隙，分头派出部队，在酉阳、秀山和三省边区其他县境到处袭击场镇，打劫公款，拦击车辆，破坏交通……抢风愈演愈烈，力量越裹越大。

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因日寇步步进逼，已由武汉迁都重庆。酉阳匪患如此严重，蒋介石怒不可遏，在长途电话上质询驻防湖北恩施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川东的酉阳、秀山和湘鄂边区，土匪闹得这样凶，连重庆都惊动了，你们怎么办！”陈诚当时正在

会商第九战区薛（岳）长官，共同采取行动，他请蒋宽心释念。不久，第六战区即调派东北部队高瞩东军，进剿酉秀各股地方武装。

高部于1941年冬进驻酉阳。他先在酉阳小坝乡召集酉秀两县党政负责人，举行剿匪工作会议。我当时担任国民党酉阳县党部书记长，是与会人员之一。会上作出3项决定，大意是：①这次剿匪工作，是“总裁”严令的一项重要紧急任务。地方党团参政负责人必须全力以赴，必要时可将其他工作暂时搁置，以竟剿匪全功；②消灭土匪，人人有责。军队负责军事清剿，地方负责推动民众协助，不得稍有怠忽，否则以贻误戎机论处；③遵循中央在江西“剿赤”的战略，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以达彻底剿灭之目的。接着高瞩东把手下2个师的5个团，全部开到土匪武装经常出没的酉酬、后溪、可大、五福、偏柏等地。政府军在各个点上构筑工事，严密设防，相机推进。白天平静无事，每当入夜，枪声此落彼起连夜不断。搞得政府军顾此失彼，防不胜防，一再缩短防线，还是防而不固。在地方武装小股兵力“摸夜螺蛳”的袭扰打击下，高军剿匪工作无所斩获，不到半年，撤防而去。

1943年春，第六战区又调派四川部队罗广文军前来酉阳清剿。罗广文刚一下车，即向第八区行政专员李放六、酉阳县党政负责人肖洪九（县长）和我布置任务。罗气势汹汹地宣称：“酉阳民匪不分，简直是‘匪化’了。只有使用严刑峻法，以除恶务尽的手段来一个斩光杀尽，让它寸草不生，才能真正根除匪祸。”他又提出：“军管匪，地方管民，对老百姓管不严管不住，剿匪失误的罪责就该由地方承担。”罗广文剿匪的办法是分两步走。第一步，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土匪主力；第二步，再分散兵力肃清零星散匪。他分兵两路，一路3个团向酉东进剿，一路两个团到酉阳桐麻岭一线，截击秀山地方势力饶文轩部。政府军所到之处，照例找不到土匪的踪迹。他们在民匪不分的思想指导下，不分青红皂

白，见人就杀，见房屋就烧。搞到后来，凡是政府军经过的地方，不但找不到土匪，连一个老百姓也看不见了。酉南让坪乡有个村寨20多户农民的房屋，全被烧光；酉东五福乡息宜姑半坡上，政府军一次枪杀无辜良民男女老幼30多人。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在两路政府军进剿所及的地带，瓦砾残垣，人烟绝迹，惨不忍睹。

1944年冬，罗广文军奉调撤离酉阳，第六战区又调派八十六军朱鼎卿部进驻酉秀，清剿湘西的土著武装彭春荣、瞿伯阶部和酉阳的杨树臣、李老菊等各股武装。朱军先是按兵不动，派出大批政工人员和侦察队，深入到酉东和湘鄂川边境调查。他们了解到对方活动范围很广，遍及八面山周围和湖南第八区的七八个县，与各地袍哥、文坛、同善社以及神兵等各种社会组织均有联系，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彭春荣部还提出了“抗丁、抗粮、抗捐”的口号，取得了一些群众的支持。朱鼎卿根据这些情报，制订出了一套清剿方案。

他划分了两个清剿区。第一清剿区，以八面山周围地带为重点，包括湘西的龙山、永顺、保靖、桑植、大庸、古丈等县，由朱鼎卿自己任总指挥，有兵力4个团，加上地方团防武装，合计8000人以上。第二清剿区，以酉阳的酉酬、后溪、可大、五福、偏柏为重点，包括酉秀毗连的川河盖、桐麻岭一线，由其所属的李士林师长任总指挥，兵力2个团，加上酉秀政府武装以及四川省第八区所属的一个保安大队，合计4000人以上。

1945年2月，朱鼎卿获悉各路地方武装均在八面山汇聚，率部由秀山出发，兼程前往进剿。朱部迅速地攻上八面山，各股土匪武装夺路逃窜。他们熟悉道路，取捷径又在保靖县境集中。待朱军赶到，他们又分兵几路退走。朱鼎卿一面分兵追击，一面电令湖南省第八区专员张中宁，迅速组织力量在辖区各县境内设防堵截。土匪消息灵通，向政府军兵力薄弱地区和一些空白地带转移。朱军在湘西边境的几个县兜了几个大圈子，两个多月时间，只

与土匪武装有几次小接触，互有伤亡。直至5月中旬，在石堤西才发生一次激烈的遭遇战，双方都死伤数百人。以后，各路土匪武装化整为零，把几大股分成几十小股散布各地潜伏。朱军又经几个月搜剿，收效甚微。由于连续征战，士兵疲惫不堪，遂撤回秀山休整。

当朱鼎卿在湘西清剿时，李士林在酉阳的剿匪工作也同时展开。他以一个团进驻后溪前线，一个团留守师指挥部所在地王家河、龙潭一线。还特别成立“酉阳清剿抚导委员会”，由第八区专员李放六和酉阳县党政负责人肖洪九与我共同负责，组织地方力量配合军队进剿。这时酉东的土匪以杨树臣和白太祥势力最盛，其余还有若干小股分布各地。白太祥统率着300多人枪，盘据在后溪场的河对面，同政府军相距咫尺。经过酉东士绅田绍安、彭斌如等多方劝说，白率全部人枪投降。不久，白太祥被李士林杀掉。

与此同时，杨树臣与其他零星散匪，依靠乡土关系同政府军时打时散。李部兵力有限，穷于应付，攻守两难。李士林遂采用“迁村并寨”的办法孤立瓦解土匪。他们把酉酬、后溪、偏柏、五福、可大等乡的几万人口，几千户人家，迁并至20多个“良民点”。那些良民点少则几百人，多至两三千人不等，分别由乡镇保甲人员看管。住地狭窄，人畜杂处，时疫流行，既无医药又缺口粮，病倒饿倒的无人过问。仅后溪乡一个良民点，两个多月时间就死亡100多人。其他各点情况相同。迁村并寨持续到同年9月李士林撤防时才告结束。

1947年后，国民党当局为了增强反共力量，对酉阳的土匪武装进行招抚，妄图共同抵抗人民解放军西进，阻止人民翻身解放。酉阳匪患最终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而被人民解放军剿除。

（四川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政协　供稿）

朱德剿匪在况场

罗大千

1916年初，北洋军在泸县、纳溪一带被护国军击溃后，丢下的一些武器弹药，落入土匪手中。有的残兵败将也一变为匪，如泸县崇义乡匪首李得村就是原北洋军的营长。在那战乱之秋，匪患本已频仍，再加北洋溃军资匪，匪势更加猖獗。其中尤以忠信乡、崇义乡、宜民乡为甚。忠、崇二乡，背靠与纳溪、合江、叙永数县毗邻的鼓楼山区，啸聚古楼山的匪伙，都以二乡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前沿出没之地。宜民乡地处长、沱二江之间，所辖场镇况场（当时的乡治所在地）、通滩、连云、石龙、宜定、石棚、马岭、大悲等，多数在长、沱二江之滨或沙坝之地，大小河岸有匪股几十个，匪众达三四千人。其中势力最大的匪股陈子光、周富云（绰名沙强盗）各有五六百人，佘云成（绰名魔大王）有七八百人。其余匪股有的百多人、几十人或十几人不等。这些惯匪悍盗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强奸妇女，掠人勒赎，恣意烧杀，强夺器械，封劫仓库，沿江设卡，估收商税，给当地百姓造成极大危害。更有甚者，匪首李得村竟于民国7年2月“……率众攻泸……渡江袭城，至南门外。”（见《泸县志·军事》）可见其嚣张气焰到了何等程度。

护国战争结束后，朱德任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兼下川南清乡司令，驻防泸、纳。他对备受兵灾匪患的当地百姓深表同情，乃誓以除暴安良为己任。他认为：“既其处此区域，忧患安乐，

当与民同，奈何民来求我，忍而弗救？以民养兵，以兵卫民之谓何？”（见《朱母潘太夫人荣哀录》）。1918年春，他乘李得村匪部进攻泸县城败退之机，奋然率部直捣古楼山，先荡平忠信、崇义一带长江的匪患，随即率两个团清剿长、沱二江之间宜民乡之土匪。一个团部驻通滩老鹰岩寨子，一个团部傍况场驻扎。1918年农历五月下旬的一个赶场天，土匪们三三两两的在街上走动，或在茶馆酒店，有的身背土枪大刀，耀武扬威地闲逛。中午时分，有几个商人打扮的青年人，大步走进一间茶馆楼上，突然掏出手枪对准正在打牌的匪首、恶霸戴步洲和文全安。这两个赌兴正浓的家伙，还以为是外来的“棚子”（土匪组织的俗称）与其开玩笑。这几个青年大声说道：“我们是朱旅长的部队，是奉命清乡来捉拿你们的。”两匪吓得丧魂落魄，俯首就擒。

这时，剿匪部队已把况场包围起来，大队人马随即进场，前面打着两杆大旗，上书“缴械投诚，一律免死”8个大字。在大队伍中间，朱旅长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英姿勃勃。下午，朱德召开乡民大会，号召土匪缴械投诚，叫人劝说被胁迫从匪的人自新，并当场将戴、文两匪首正法。还贴了安民告示，叫群众不要害怕，经商的仍然经商，种田的照常种田，并设置“无情箱”，便于群众揭发检举。又规定所辖各保，每天要交土匪来，如知情不报或隐藏土匪者，与匪同罪。吓得土匪东藏西躲，再不敢胡作非为。

有个叫许毛头的匪首，躲在方山龙口沟岩洞里，追捕的人从岩上用绳索吊下去，接连被打死2个，最后用辣椒把他熏出来，捉拿归案。对匪首和作恶多端的匪徒坚决杀掉，清乡期间共杀掉约两三百人，没有杀错一个好人。当时被杀的多是砍头，朱旅长说，不要浪费子弹，子弹是人民的血汗。对于被胁迫为匪又自动投诚者，都给予宽大处理。徐焕庭是街上一个贫民，被胁迫给土匪搬东西，后参加土匪，成为一个小头目，他带一支“勾勾枪”投诚，朱旅长亲自审问他。据当天在旁站岗的乡丁高云山回忆，朱旅长

问徐为什么要抢人？徐说他家里穷。朱旅长在桌上猛击一掌："你穷，穷就该抢人吗？天下的穷人多嘛！你抢了人家的财物，人家又怎么过活？"吓得徐焕庭作捣磕头，直喊饶命："以后不敢干了。再干你就枪毙我。"朱旅长说："枪毙你可惜了我的子弹。"后来调查清楚就把他释放了。

朱德审案有个特点，对要从宽处理的人，往往怒斥一通，教育一番；然后释放；相反，对要严惩的分子，却非常冷静，讲究策略，穆炳银是一个暗里通匪的的窝家，他有个姓王的的亲戚是惯匪，被捉后，他央求团总王学洲出面说人情、保他的亲戚。团总写了一封检举信，叫他带去找朱旅长。穆自以为是"绅粮"，又占团总之势，有恃无恐，公然坐着滑竿去。朱德一看团总的信，笑咪咪地叫他坐，并安排他住下，实际上是扣留审查，结果把穆和他的亲戚一起杀了。

况场"玉生和"陈家花园，环境幽静，朱德旅长平时爱坐在水阁凉亭边看书学习，或者与士兵、下级军官在水池边的桂元（即龙眼）树下下棋。他穿着很朴素，伙食也很简单，与普通士兵差不多，很多小孩子爱去看"稀奇"，有时还在侧边嘻笑顽皮，他从来不冒火，还逗着他们玩。如当地房主陈欧的侄儿陈开介（现名陈克强）一碰见就摸摸他的头，叫他"小胖子"，并同他谈这谈那的。

朱德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经常深入群众明查暗访，了解情况。农忙季节，还带领士兵去帮助农民搞农活，他经常教育官兵要爱护老百姓，所以他的部队很注意纪律，做到"秋毫无所犯，与民相见以心。"（见《荣哀录》）他对劳动人民很尊敬，不摆官架子，如当时通滩镇上一个理发工人冯碧廷，手艺好，朱德住老鹰岩寨子期间，曾三次派人用滑竿去接他来理发。每次同他亲切交谈，一桌吃饭，叫士兵给他添饭、倒茶、拿烟，并厚酬工资——每次2块银元。人们都赞美朱旅长是"好官"、"清官"。

由于朱德剿匪功高，受到群众衷心的爱戴，加上他平易近人，爱民如子，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就与当地群众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当他离开况场时，街上张灯结彩，充满了节日气氛，家家户户摆列香案，置酒席、放鞭炮，热烈欢送朱旅长。朱德从上场走到下场，对每个香案上的酒，都去尝一尝以表谢意。很多农民也赶来送行，他步行在前头，与群众频频点头，人们一直送了四五里，都还不愿转去，经他再三劝说“留步”、“请转”，大家才不舍地挥泪而别。

朱德剿匪杀敌，功绩昭著，但他自己却很谦逊，认为“中原未定慢言功”（朱德：《秋兴》）。他感到没有彻底消灭北洋军阀和土匪而内疚。1918年秋，他为剿匪阵亡的五通乡连长罗昭群等人作挽联云：

万家珠米白星星，是伊谁将血换米，有功于民，为桑梓捐躯，荣同死社稷；

数点磷光星闪闪，恨我辈杀敌未尽，无才救世，虽恫瘝在抱，害竟贻终身。

从上联可以看出，他自谦自责的心情是何等真切！

这时的朱德，风华正茂，立志救国救民，“身经沧海羞逃世，力挽狂澜岂为名？”（朱德：《艾承麻局长六十寿辰赠诗寓意》）他剿匪杀敌，尽管出自济世安民、并无沽名之意，但人民群众因脱身于水火，获得安居乐业，早已刻骨铭心，感戴不已，情愿勒石树碑，遗教后人。1918年9月，忠信各镇士民在牛背石场（即丰乐镇）外通往兰田坝的大路边，为朱德竖立“救民水火”功德碑一座。同年12月，即朱德离开况场之际，宜民全乡人民又在况场东面通往泸县的大路边竖立起一座“除暴安民”功德碑。此碑高1.9米，宽1.03米，是特请一位姓王的廪生（一说是其弟秀才）书写、由当地有名巧石工镌刻的，还有碑罩保护。此碑一直保留到现在。

60多年来，这块丰碑，经受了无数风风雨雨，特别是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叙永、古蔺等地时，泸县地区上层统治者惊恐万状，当时的保安团总队长雷清尘、总队副李华骏等恶意将此碑转个方向，在背面另刻上什么“千古遗恨碑”，并叙文和刻上若干被杀匪首、惯匪名字，妄图为匪徒翻案，诋毁我红军领导人朱德在群众中影响。解放后，群众又把此碑掉过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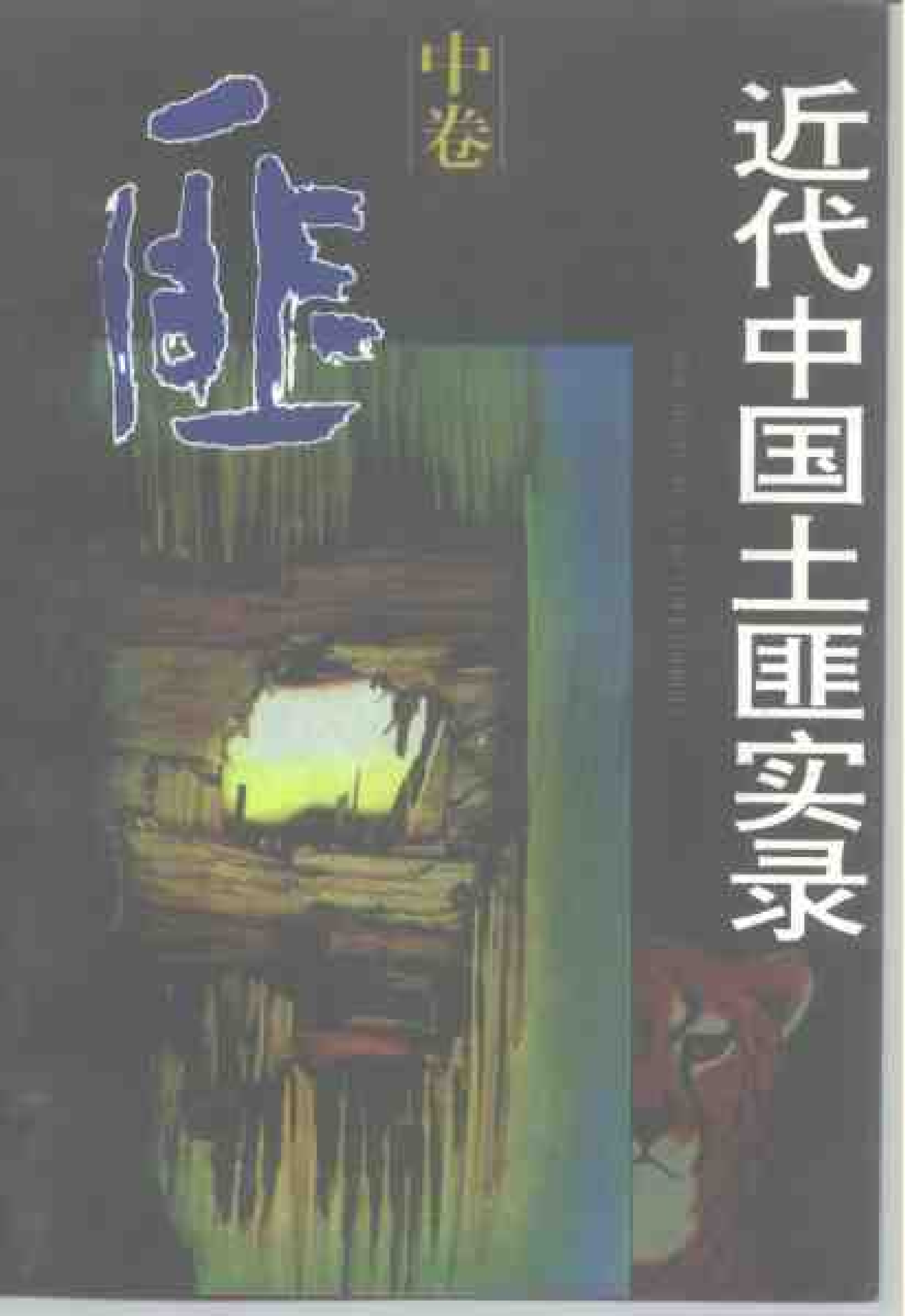
（四川省泸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上卷
作者=
页数=639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中卷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中 卷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目　录

热河匪祸 …… 王振兴　邓一民 (1)
塞外青龙匪患…… 青龙政协文史委 (29)
绥远五十年间匪祸见闻…… 刘锦魁 (41)
渤海土匪与海盗…… 王新华 (59)
回忆察北一带的土匪…… 忻　福 (74)
坝上土匪…… 郭　郭 (81)
丰宁匪患述录…… 李亚平 (86)
简谈康保的匪患…… 杨在泉 (94)
河间务尔头村土匪始末 …… 樵　夫 (100)

色布精额匪帮侵入海拉尔始末 …… 阿·恩克巴图 (105)
"三罗汉团"洗劫独力坝…… 韩振誉 (112)
土匪窜扰万全城 …… 李成栋 (116)
我被土匪绑架的经过 …… 刘永泉口述　王又青整理 (119)
我活埋了匪首韩子犹 …… 杨文凤口述　王清凯整理 (123)

从马贼到"蒙古军"总司令 …… 张占军整理 (127)
山西土匪乔日成 …… 康耀先 (154)
巨匪郭清的一生 …… 杜济生 (186)
冀中大盗徐二黑 …… 田　一 (198)
永年巨匪"铁磨头" …… 成合群 (209)
乱世顽匪宋殿元 …… 政　文 (227)

匪首宗孝罪恶录 …… 李继文 (234)
罪恶累累的土匪头子王二美 …… 宋克明 翟永宽 (240)
草原土匪胡图凌嘎 …… 高乐民 (246)
“活阎王”赵珍及其匪队的覆灭…… 卢海滨 李万源 (254)
著匪葛二秃子兴灭记 …… 王金瑞 (263)

雁北剿匪纪实 …… 仝有悦 郭日亮 (268)
王毛仁股匪覆灭记 …… 许闻新 (276)
河套地区剿匪纪实 …… 霍 建 (282)

民初临沂匪情纪略 …… 西 献 (298)
安徽匪祸三例 …… 史慕山 谭昆山 张凌九 (304)
临泉设县前的匪祸 …… 于丹忱 王树九 王慎修 (308)
巢湖土匪 …… 凌厚全口述 蒋伯举 黄庭宣整理 (313)
记浙闽海匪 …… 陈于滨 苏宰衡 (318)
台州“绿壳” …… 严振非 (324)
夏茂地区二十七年中四十四次匪祸 …… 巫德华 苏崇中 (331)
清源山十三乡的匪祸 …… 蔡景煌 (339)
三元匪害 …… 林伦榕 (343)
抱犊崮山区绿林暗语辑录
…… 明泉 桂军 培才 庆华搜集 (347)

山东巨匪刘黑七 …… 张占军整理 (352)
土匪头子陈德山 …… 孙 源 (383)
淄博土匪杨大山 …… 刘 仇 (389)
陈三坎其人 …… 吴云亭 (392)
苏鲁巨匪刘伏龙 …… 杨东野 (396)
惯匪“五龙二虎” …… 曹光复 (401)

匪首周文山罪恶的一生 …… 曾广济 (404)
廖世材与“铲污团” …… 刘 易 (414)
闽南著匪高为国 …… 洪卜仁 傅维翰 陈朝卿 (420)
同安土皇帝叶定国 …… 陈庆云 叶挺拔 (434)
叶文龙的军匪生涯 …… 蔡维祺 (440)
彭棠的土匪、军官、恶霸生涯 …… 彭田华 (450)
汪柴水匪祸在惠安 …… 郑国梁 (458)
匪首涂友情 …… 涂明哲 (462)
匪首林世球罪恶的一生 …… 王振经 (472)
吴赐匪部活动始末 …… 蔡竹祥 林志光 (476)

津浦路大劫案 …… 张占军整理 (487)
章丘旧军孟家遭匪记 …… 韩 炬 (513)
青岛孙马匪帮 …… 吕文泉 (520)
孙殿英三次祸亳亲历记 …… 张荫庭 (528)
“老洋人”洗劫阜阳目睹记…… 霍沛林口述 梁义三整理 (534)
十四起匪患祸阜阳 …… 代 霖 (541)
李老末撕“肉票” …… 黄选德 (545)
连庄会打败“大祆队” …… 赵同心 (547)
赵洪善破寨目睹记 …… 王质庵 (551)
二匪火并记 …… 潘永德 侯西山 (553)
尚万才火烧行流集 …… 方鹤松口述 赵子房整理 (558)
我家两次被抢的经过 …… 胡腾龙 (561)
清末民初土匪骚扰沙县四乡纪实 …… 张宗健 (563)
林桂芳股匪为害沙城 …… 陈玉堂 (570)
张雄南祸永春 …… 颜文锋 (573)

鄱阳湖剿匪记 …… 马逸飞 (578)

飞贼落网记 …… 张允贵口述　张书元整理 (583)
武装匪特岳岐山覆灭记 …… 刘培全 (590)
追捕杀人魔王胡肇汉 …… 陈希天 (597)
剿灭匪首“小雄鸡” …… 竺钦国　汪成法 (613)
劝降匪首蒋小瑞 …… 章如烈 (621)
南平剿匪述略 …… 程　楷 (627)
黄文炳股匪缴械自新的经过 …… 汤　涛 (635)

热河匪祸

王振兴　邓一民

一、热河匪祸概述

热河，原是一个省，1955年撤销省的建制，将热河省管辖的承德、赤峰、朝阳地区，分别划归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省管辖。

热河在历史上是个匪患丛生的地方，土匪多如牛毛。大股的数千人、数百人，小股的数十人，几个人。他们或拦路抢劫商旅行人；或聚众砸抢村镇店铺，烧杀抢掠，破坏性极大。所以，在热河，土匪与大烟、鼠疫统称为“三害”，是危害热河人民的主要祸患之一。

从1919年到1950年前后的30多年里，热河土匪的发生、发展及其覆灭，大约经历过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民国时期（1919—1932年）。这是个政治动乱、军阀混战时期，战争不断，灾害频仍，农业破产，商业凋敝，民不聊生。特别是热河，地处战略要冲，是联系关内外的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每次战争必打之地，所以战争的灾害尤为厉害。对于热河农业破产情况，当时一记者惠我在其《北游所见述略》一书中曾有真实描写：“商业日渐倒闭，农村恍若病窟，疾近膏肓，大有不可救药之状；而捐粮号草一夕数至，鞭捶棒獍，视

以为常。中产之家破其炕壁，坏其门窗，室内污秽遍地，以防军人之旅寓。农夫则断肘赘踵，妇孺则绽裤露衣，沉靡之气，污秽之状，向所未睹。”破产后的农民，很多铤而走险，啸聚为匪。另外，每次战争后的散兵游勇，也是热河土匪的重要来源。这个时期的热河土匪，数百人至千人以上的大股有荣三点（宝振荣）、白三阎王（白凤翔）、龙三点（真名不详）、巴布扎布、信字杆（李守信）、许喀叭等10多股；十几个至几十人的小股为四木匠、黄司令、罗老耗子、王文法、王秃子等百多股。1923年1月，一股土匪洗劫丰宁县大阁镇，击毙商民20人，抢夺骡子毛驴120匹，烧毁房屋118间。同年3月，胡匪许喀叭数百人，内外勾结，攻破开鲁县城，大肆抢掠，商民遭殃。开鲁绅商各界上书热察绥巡阅使兼热河都统王怀庆，要求查办“以金钱为第二生命”的开鲁县长李岫岭。1924年5月21日，胡匪金生字、王五点等在建（平）赤（峰）交界处公然抢劫了日本驻赤峰领事馆馆员北村唔太郎及日本领事平塚的弟弟平塚笃等人，引起外交事件。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这个时期热河土匪的特点是土匪与官府、军队相勾结，官匪一家，兵匪不分，形成一种彼此依赖和互相利用的特殊社会关系。因而有不少土匪，时而是抢人的“响马”，时而是护院的“炮手”，时而又成了站岗的官兵。

署理丰宁县长窦懋芳1930年6月向热河省政府民政厅呈报的丰宁兵匪为害的情况即说明了这一点：

“窃查丰宁自直奉战争以后，屡有大军云集，军队愈多盗匪愈众。丰宁共分四区，三、四两区与多伦、沽源为邻，时有大股土匪盘踞。其间，军至匪窜，军返匪来，往返串扰，迄无宁岁。三、四两区受害较一、二两区为尤甚，在一二年前已无人烟矣。至一、二两区，在三四年前尚可支持。自十七年三十一军来驻斯土，该军骑兵两师一旅，其人数在八千以上，其马与骆驼在万匹以上，一

切粮秣均索自民间。驻此一年有余，民间之损失统计不下两百万元。丰宁以瘠苦之小县，受此重大之损失，故商民日穷一日……”

第二个时期为日伪统治时期（1933年—1945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1933年3月日伪又侵占热河。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土匪这个社会阶层发生了大分化。一部分土匪，也就是“绿林好汉”，深明民族大义，在国破家亡的时刻，奋然而起，举旗抗日，给日伪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一部分土匪则在日伪的镇压和引诱下，当了汉奸卖国贼，帮助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成为民族败类。

高举义旗、坚决抗日的“绿林英雄”，是热辽抗日义勇军中的一支重要战斗力量。他们不仅数量多，活动范围广，而且作战勇敢、顽强，是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部队。绿林人物首先举旗抗日的是高老梯子（高振鹏），他是热东、辽西一带绿林盟主。九·一八事变后的10月10日，他在新民县沙岭岗子召开绿林首领会议，宣布抗日，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高被推举为司令。此后，他们与进犯辽西、热东的日伪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相继而起的有兰天林（号“平东”，东北农民抗日拥张铁血军司令）、刘纯启（号“亮之”，东北抗日救国军第三十四路军司令）、刘振东（号“振东”）、李天德（号“打一天”）、郭文连（“反满抗日仁义军”司令）、邓文风（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副司令）、邓文山（号“平康德”）等。他们曾战开鲁，击毙日军顾问松井大佐；夺锦西，全歼日军长贺联队；攻绥中，歼敌数百人；南岭伏击，活捉日本特务石本权四郎。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立下赫赫战功，并且有高振鹏、兰天林、邓文风等许多人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为民族的解放洒尽最后一滴血。

另外，白三阎王、荣三点等热河著名股匪，因被东北军收编，也参加到抗日的行列。

投降日伪、充当汉奸的只是土匪队伍中的一小部分，但破坏性很大。首先投降日本的是巴布扎布的次子甘珠尔扎布，继承其父衣钵，在1931年九·一八后即公开投降日本。在日本关东军驻通辽特务机关的支持下，组成伪“内蒙古自治军”，由科尔沁后旗统领包善一（额尔敦毕力格）任第一军司令，科尔沁中旗韩色旺任第二军司令，甘珠尔扎布任参谋长兼第三军司令，日本特务川岛芳子（金璧辉）也参与其间，由关东军发给3000枝步枪和60万发子弹，派松井渭之助等为顾问，积极准备进犯热河。1932年秋天，伪“自治军”集中在通辽以北的舍根吐进犯开鲁，在老哈河与热河抗日义勇军和中国守军遭遇，“自治军”被击退，损失惨重，连日本顾问松井渭之助亦被当场击毙。随之投降日本的是信字杆李守信。当时他任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团长，1933年2月不战而让开鲁，3月在林西公开投降日军，被委任为“热河游击司令”。当年夏又率伪军侵犯察东，任“察东警备军司令”。1936年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下，组织伪“蒙古军政府”，李守信被任命为“蒙古军”副司令。七·七事变后，又充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蒙古军”总司令等要职，干了不少危害国家与民族的事情。其他如尹宝山、丁其昌等降日的小股土匪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日本统治热河近13年时间里，由于政治、军事统治的加强，以打家劫舍、拦路抢劫为生的土匪已经基本上绝迹了。

第三个时期为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948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冀热辽部队挺进热河，收复热河全省，把400万热河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在热河没有一兵一卒的国民党政府军队，却来抢夺抗日的胜利果实。并于1945年末，调集十三军、五十二军、九十二军及九十四军10多万人，向热河发动猖狂进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抢夺热河，一方面大肆收编伪军、伪警，给汉奸头目封官加

委，组成国民党各种名目的“先遣军”、“别动队”，继续与共产党、八路军和热河人民为敌；另一方面则大量收编日本投降后蜂拥而起的土匪，委以各种番号，破坏热河人民的和平生活。因此，这个时期热河土匪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声势之大，危害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先后有 450 股土匪，有匪徒 50758 名。

这时期的热河土匪中，除国民党收编的汉奸、特务、伪军警、讨伐队和土匪外，还有在国民党 1945 年末至 1946 春进攻热河时期，由共产党队伍中叛变出去的叛匪 124 股，8849 人，还有反动地主和农牧主组织起来的“伙会”、“还乡团”。他们砸抢农会，屠杀干部和积极分子，截击运输车辆和过往干部、客商，配合国民党军队猖狂进犯解放区，袭击我区公所 97 次，杀害区（营）级以上干部 147 人，其中县团级以上 31 人，杀害的群众则更多，没有准确统计。

第四个时期为解放后的剿匪斗争时期(1949 年——1951 年)。1948 年 11 月，热河全省解放，热河人民与土匪的斗争也迎来新的时期。在中共热河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领导下，把土匪列为热河的“三害”之一。开展了广泛的剿匪斗争。到 1951 年末，热河的匪患基本根除，人民得到安居乐业。

其实，热河的剿匪斗争早在 1945 年冬就开始了，是分 4 个阶段进行的。1945 年冬——1946 年春为第一阶段，主要清剿由日伪汉奸、军警、讨伐队和惯匪组成的大股土匪；1946 年冬——1947 春为第二阶段，主要打击配合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的股匪；1947 年夏——1948 年春为第三阶段，主要清剿进行反扑的地主武装、伙会、大团、叛匪降队和“还乡团”；1949 年—1951 年为第四阶段，主要是清剿残匪，挖潜匪。经过这样 4 个阶段的作战，据 1945 年 10 月——1948 年 8 月的不完全统计，冀察热辽部队共进行剿匪作战 869 次，歼灭土匪 19211 人，缴获轻重机枪 104 挺，各种

炮28门，长短枪11501支，子弹14万发，战马1327匹，汽车8辆，大车140辆，到1951年末基本根除了匪患。

二、巴布扎布匪祸实录

巴布扎布“蒙匪”，是先受帝俄支持、后受日本豢养的政治土匪，为害热河北部地区10多年。

巴布扎布，热河卓孛图盟土默特左旗彰武人，蒙古族。生年不可考，死于1916年10月8日。巴布扎布在清末民初曾任过当地巡警局长。1911年沙俄策动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等一小撮活佛和王公宣布外蒙“独立”，巴布扎布即到库伦（今乌兰巴托）投靠了哲布尊丹巴活佛，被封为宗格德赛义达（即大臣）。1912年10月，哲布尊丹巴等派人兵分两路，大规模入侵内蒙古地区，巴布扎布的“蒙匪”成为这伙叛匪中的主要力量。巴布扎布率2000余“蒙匪”侵扰热河北部地区，攻占经棚，兵临林西城下，由于毅军米振标部在林西周围掘了战壕，又在接连乌珠穆沁的坝上乌民太沟与沙巴尔台沟等处建有营垒，所以没能攻进去。经过热河军民和爱国的蒙古王公奋起反击，经大小数十战，终将巴匪击退。但经棚、林东等地的农牧民遭受“蒙匪”抢掠蹂躏，十室九空，甚为凄惨。

1913年秋天，巴布扎布勾结另一“蒙匪”奈登公的匪队再次侵扰热北一带，米振标的毅军损失了四五个营，营长阵亡。后西路淮军和东路的奉军一齐来援，才将巴匪歼灭大部，逃回到外蒙的由基庙一带。

1916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企图直接控制我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组织满清复辟组织“宗社党”，阴谋建立“满蒙王国”。巴布扎布又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日军军官的参与下，率3000余人，再次侵扰热北地区，占领大片领土，直逼林西城下。

这时的林西城已与以前不同。由于连年战争，林西易攻难守，所以米振标于1914年在林西大兴土木，在周围筑起高2丈、长10里的城墙，有东西南三门，城门处配有坚固的设防营盘，并在五十家子、汤上等地建有驻兵的围堡，作为林西城的外围屏障。城池较为坚固。1916年10月7日上午，巴布扎布率匪队由乌珠穆沁绕道巴林，于8日凌晨3时许到达林西。由于林西城内毫无戒备。在外巡城的常得胜的三旗马队，遭突然袭击后四散逃跑，以致东门外的营盘被巴匪包围，守军石管带从被窝里爬出来仓惶迎战，除逃出一个号兵外，其余全被杀死。巴布扎布攻占东营盘后，即率队攻打东门，死伤很多，终未能攻下。到8日天亮时，城上的炮兵瞄准巴匪队开炮，一颗炮弹落在巴布扎布跟前，当即将其炸死。“蒙匪”见主帅已死，纷纷逃往坝上，林西之围始解。巴匪仅这一次就在林西烧毁房屋1000余间，惨杀无辜民众300多人，遭受奸污的妇女就更多了。

1918年9月，巴布扎布余党等三次攻打林西县城，并前进到坝北40余里的好尔图庙，扬言要为巴布扎布报仇，攻开林西后，要杀个鸡犬不留。米振标命令张连同的热河游击马队和常得胜的毅军三旗马队到乌珠穆沁阻击，把巴匪余党赶走。

1922年春天，巴布扎布余党攻占开鲁，屠杀300多人。只有开鲁县长张子良集中200多警察占据热河官钱局开鲁分局的一处大院，凭险据杀，打死一些前来进攻的“蒙匪”，始终没被匪队攻占。次日晨，张连同的热河游击马队赶来，收复了开鲁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巴布扎布的余党由他的儿子甘珠尔扎布和儿媳金壁辉（川岛芳子）率领，完全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充当了日本进攻热河的马前卒。在进攻热河的进程中，由于这支部队纪律太坏，名声太臭，被日本人缴械遣散，至此，这支匪队才寿终正寝。

三、“白三阎王”匪祸实录

“白三阎王”股匪，以匪首白凤翔绰号“白三阎王”而得名。“白三阎王”股匪是热河省最大的一伙土匪，最多时有2000多人，经常在热西、热北一带流窜作案，为害甚多。

白凤翔，1898年出生于原热河省围场县新拨区狼窝沟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自幼务农。到20多岁时因兵匪袭扰，生活没有出路，到荣三点（宝振荣）股匪处当了土匪。由于他精明强悍，有谋略，不久就成了“荣三点”的“贴杆”（即副手）。因他吸食鸦片的瘾很大，每次抽大烟时，得有个人烧烟侍候，故而得名“白三烟王”。因他当土匪作恶不少，人们把“烟王”就叫作“阎王”了。白凤翔于1923年左右脱离“荣三点”股匪，独立“拉杆”，在围场、丰宁、隆化以及经棚等地流窜作案。1928年被东北军改编为骑兵第六旅，调防黑龙江，白任旅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白凤翔带队撤入关内。1934年，白凤翔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毕业于第三期。1935年改编为东北军骑兵第六师，白仍任师长，张书斌（围场县半截塔人）、刘桂五（朝阳县人）、袁俊丰（围场县第三乡人）分任第一、二、三团团长。1936年，西安事变时，白凤翔和他的团长刘桂五及营长孙铭九是捉拿蒋介石的（即捉蒋队）主要组织者，并亲自把蒋介石由华清池押送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对促进全国全民抗战是有功的。张学良被扣南京后，白凤翔通电下野。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任命白凤翔为“热河先遣军”总司令，曾带队到绥东一带活动，后退到黄河以南。1939年投降日本，任伪“东亚同盟军”总司令。1943年因扎吗啡中毒死于固阳。有说是日本人毒死的，但只是一种推测。

“白三阎王”股匪在热河作案很多，现仅据有文字记载的抢劫围场县城一案实录。

1925年1月4日夜，“白三阎王”率匪徒三四百人，抢劫了围场县城，抓走县知事黄仕祥等人，此事成为当时轰动热河全省的大案。

当时的围场县城在粮捕府，即现在的克勒沟镇。1900年蔡宗翰任粮捕同知时主持修建了南北两座栅门，并与铺户的围墙联结起来，作为城的围墙，有警兵把守。早在抢劫县衙之前，“白三阎王”即派屈鸿朋、宋景义等四五名土匪到围场县城“卧底”，并从巡警第三队队长王玺清、巡长李文、巡官乔凤岐、富户李正文等人口中了解了城防设置、商户财产，安排了里应外合等项事宜。并探知巡警第一队队长朱文炳率部到山湾子一带剿匪，守城兵力不足50人；县知事黄仕祥仅到任三五天，虽侦知白凤翔欲偷袭县城的消息，并派人设防，但因奉军游击统领官张仙涛从县城路过，忙于迎送，防范并不严密。4日，白凤翔又在苍头坝截获送张仙涛的县署知事黄仕祥和驼轿及3名马警，于是白凤翔决定当日夜假扮奉军，抢劫粮捕府。

4日夜，守卫县城的警卫，隐约看到有马队接近城门，队伍整齐，号声嘹亮。经询问知是张仙涛的游击马队奉命返回剿匪，并有昨日出城送张的驼轿和送轿的3个城内警兵，巡长李文马上命令开城。轿内坐的正是“白三阎王”。他不费一枪一弹骗开城门后，立即直扑大商号“广义长”，设下指挥部，并兵分5路，按事先计划好的路线和目标进行砸抢。

第一股直奔电报局，砸毁电报机，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然后，占领了县署，搜出县知事黄仕祥上任时携带来的金银珍珠戒指、金石梅花、狐脊斗篷、青狐素里宁缎面皮袄等36件，价值3000多大洋的衣物。并抢劫了前县府知事戚廷瑄征收的各项税物大洋1.2万余元和黄知事征收的3000余元。

第二股直奔监狱所，首先解决了岗哨，然后抢占了看守员驻所，绑架法警王玉兰、张立仁2人，打伤狱员李永顺、谭广生，放

出已决犯 135 人，寄监未决犯 44 人，在所待审犯 38 人，劫枪 4 支，子弹 3000 多发。这一股还分别攻占巡警第二、第三队驻所，抢动各种快枪 67 支，子弹 3.34 万发，铝弹枪 15 支，铝弹 7000 余粒。

第三股抢占财政所，劫随课代征款大洋 1900 余元，劝学所基金学款 3000 余元，基金利息大洋 4500 余元。

第四股抢占兴业银行围场办事处，作废兴业票扔得满街，行员被绑架，大门被烧毁。

第五股捉拿警察所所长刘玉成警佐，刘闻警越墙逃走，摔伤脚腕，幸免于难。

各股主要目标抢劫成功后，又分赴各大商号和富家，广义长、永合堂、一元堂、德顺栈等 33 户商号，损失财物折大洋 6.9 万余元。38 家客户，财产损失折大洋达 1.46 万多元。并有巡警第三队队长王玺清及警兵 20 余人和犯人 40 余人投“白三阎王”为匪。

“白三阎王”的匪队在抢劫围场县城时也遭受一些损失。当一股匪队抢劫北街商号时，巡警第一队抢占了征收局的后院炮楼，居高临下进行阻击，当场击毙匪徒 11 人，马 9 匹，生擒匪徒张之田。

抢劫结束后，“白三阎王”率匪队出城，携带抢劫财物和 15 名“肉票”（即人质），经三道梁子、新地大沟，朝苍头坝方向奔去。

7 日，白匪于赤峰地区的砖风窑沟释放了县知事黄仕祥和其他人质，县署一科录事长董桂芳等 4 人设法逃回，唯对扣押的六合堂铺东王元索要大洋 3 万元，才被赎回，致使王家倾家荡产。

8 日，黄知事回县后，将白匪抢劫县城的详细情况电告热河都统汲金纯。10 日，热河省陆军第一混成旅骑兵开往苍头坝地区剿匪，在黄花山一带与土匪接火，抓获正匪李岐山等 7 名，截获一些马匹等物，并将李等斩首，悬于城门示众。当日，热河都统汲金纯电令尹怡思（号习三）接任围场县知事，陈玉魁为警察所长。黄仕祥、刘玉成则被撤职查办。

四、白金辉匪祸实录

匪首白金辉，经棚县（今内蒙克什克腾旗）白岔人，大地主，日伪时任白岔警察署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八路军解放了经棚县，县政府为了争取他，委他任白岔区区长。白金辉表面假装进步，暗地却与土匪勾结，密谋叛变。1946年1月，国民党军向热河东部进攻，白认为时机已到，带百余骑匪叛变，随即又到各地网罗土匪200多人。最多时（1947年初）曾达到600多人。白匪主要活动于经棚、林西、围场、乌丹、赤峰等地。白匪作恶多端，多次袭击我后方机关，砸抢区、村公所和农会，捕杀革命干部，先后袭击过经棚县的白岔、土城子，围场县的新拨、棋盘山，赤峰的大庙、老府等10多个区公所，杀害县、区干部20余人。1946年，白金辉匪伙在经棚、围场等地大肆抢掠，抢走马500多匹、羊2000多只，仅1946年1月在围场县姜家店一带就抢走大牲畜60余头，羊200多只，粮食4000余斤，并把群众准备过春节的豆包、粘糕、猪、油等物几乎洗掠一空。1946年6月白匪袭击驻在经棚四区的冀热辽军区后勤部，林西县支队赶往救援，激战两天，反复争夺，匪伤亡10多人，落荒逃窜。县支队乘胜追击，又打死打伤匪徒12名，俘1名。9月，白匪把林西县支队放牧的170多匹骡马全部抢走。县支队立即跟踪追击，至夜间12点左右追到白岔一个村庄，发现土匪正烧火做饭，于是发起猛烈攻击。匪徒丢下抢来的马匹仓惶逃走，有3人被击毙。1946年9月，白匪600多人袭击驻在白岔的我经棚县支队，林西县支队派一个连的兵力赶来支援。当他们赶到时，经棚县支队已突围出去。白匪见林西县支队只百余人，就疯狂向林西支队发起进攻，遭到林西支队顽强抗击。匪徒几次冲锋，均被击退，伤亡较大，而后，向围场北部逃窜。

1947年2月下旬，白匪与陶汉选匪队勾结，约千余人，到围北

县新拨一带，袭击围北县工委、县政府。围北县支队在二十二分区骑兵二团配合下，展开游击战，先后在牛肚子沟、竹立沟、二龙库等地与匪多次交战，终使围北县工委、县政府得以安全转移。同年5月，我冀东代表团参加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会返回途中，20日宿营在赤峰西部柴火栏子村，21日凌晨，被白金辉、于秀成、任芳伍等匪队800余人包围。代表团30余人仅有一个9人的警卫班。经3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部分同志才突出重围。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苏林燕、十五地委宣传部长冀光、十五军分区副政委王平民、十六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胡里光、冀东行署财政厅长王克如及警卫班战士共计22人壮烈牺牲。这就是冀察热辽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事件——柴火栏子事件。

事件发生后，冀察热辽军区下令，坚决消灭制造柴火栏子事件的匪队。朱德骑兵旅二、三团，热西、热北、二十二军分区的地方部队以及经棚、林西、赤西、围北等县支队，都参加了对白、于匪帮的清剿，先后在乌丹、经棚、林西、围场等县与之作战30多次。7月22日骑兵二团追击一昼夜，把匪队包围在平房村一个地主大院激战一天，毙俘匪徒14人。匪乘夜间突围逃走。二团继续追击到哈拉道口兴隆沟，击毙白匪副总指挥郑永寿，毙伤匪徒30余人。半月后，白匪窜至大碾子一带，朱德骑兵旅副旅长卜云龙指挥一、二、三团，将白匪包围在大碾子川，激战一天，毙、俘匪40余人。6月中旬，骑兵二团又在围场县杜格歹把白匪包围，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将白的大女儿和中队长刘振山击毙。白不敢再战，遂向经棚县逃窜。7月间，白匪在经棚抢大烟，遭热北部队攻击，白的大儿子又被打死。12月间白匪又窜回白岔破坏土改，进行报复，遭到林西步兵团痛击。经一场激战，毙匪8名，活捉4名。此后，我热北部队又乘胜追击，使得白匪难立足存身。在此情况下，白匪投靠了驻多伦的国民党军队。1948年4月解放军收复多伦战斗中，白匪又遭痛击，白金辉带百余残匪投靠了傅作义的部队。

五、张桐轩匪祸实录

张桐轩，赤峰县阴河川大地主，伪满时效忠日寇，当过警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位进步人士张英信，在赤峰组织起一支300多人的队伍，张桐轩乘机混入该队，伪装积极，被任命为连长。后来这支队伍被改编为赤峰县支队。张贼心不死，千方百计结党营私，网罗混入支队内的坏人，密谋叛变。暗地里，张不断散布："共产党不信任我们，张司令（指张英信）光听政委的"，"八路军长不了，跟着八路军没有好结果"等。同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山海关，攻占锦州。张认为时机已到，遂于当月6日夜谎报有人送信，说附近来了一股土匪。支队长张英信信以为真，立即集合队伍出发。出城不远，张桐轩在背后开枪打死张英信和他的警卫员，然后返回，袭击了县支队部，打死2名从关内来的连级干部，抢走一些枪支和军用物资，拉队伍北窜。沿途又袭击了2个区公所，杀害10余名干部。此后，他们便打着"中央军"的旗号，在围场、赤峰、乌丹等地为匪，到处为非作歹。同月9日，张派人到围场县，与混入围场县支队骑兵连的二排长毕雨华（大地主、伪村长）联系，密谋于腊月十三日夜，里应外合袭击围场县城。由于"走了风"，县里得到情报，并作了应急准备，使张匪阴谋未遂。毕雨华等10多名死党，偷跑出去投靠了张桐轩。这时，张桐轩匪队已有300多人。他们窜至围场北部的新拨一带，与当地土匪李喜宏、大杜、二杜、许连明等勾结，抢掠百姓大烟、牲畜等财物不计其数。围场县支队骑兵连奉命于11月16日，在宝元栈李喜宏家的大院，包围了张桐轩，一阵短兵相接，击毙匪徒3名，缴枪支、马匹各10余，张率匪突围。

1945年冬，张率匪队在围场、赤峰、喀喇沁等县流窜活动，到处抢掠，先后袭击了克勒沟、小牛群等区公所，杀害干部、群众20多名。1946年10月，国民党军攻占承德、赤峰后，张投靠国民党

军，被编为保安队，继续到处袭击我地方部队，抢掠群众财物。1946年冬该匪队在围场羊草沟，袭击了围北县武工队，杀害武工队员3名。1947年5月，解放军收复围场战斗中，张匪被歼一部后，逃往隆化、承德一带活动，并不断到围场境内骚扰。1947年8月，张匪率200多骑兵，长途奔袭围场刀把子，棋盘山、新拨等区，沿途冒充八路军，搜捕革命干部，杀害了刀把子副区长陈丛林等3名干部，抢走一批大烟等物资，然后又窜回赤峰、隆化一带。1948年8月，张匪带400多人，从隆化出发，奔袭围场。在围场大字号杀害一名专署下乡干部，并将抓住的另一名干部拴在马后活活拖死。9月19日拂晓，张匪又袭击了棋盘山区公所。区委书记张新吾等9人牺牲，2人负伤。土匪掳走长短枪20余支，将63家商户砸抢一空。21日，匪队窜至新拨区宝元栈，抓走10名民兵，抢枪10支，杀害2人，走时又在沿途杀害区村干部6人。同时，派匪连长杨万森带一个连到山湾子区半壁山一带进行报复，在旧拨村与新拨区骑兵排遭遇。由于匪队占踞有利地势，骑兵排牺牲2人，伤6人。晚间，杨匪在毕家窝铺大院，包围了区长侯庆山等人。侯庆山率领区小队和民兵11人踞守。战斗中杨万森被击毙，匪徒无主，只好撤走。第二天张匪妄图报复，包围了区公所，区干部和区小队顽强抗击，击毙匪连长和副连长3名，匪徒10多名，张匪不敢再战，向赤峰方向逃窜。我热西、热中部队又连续对其进行追击。张匪无法立足，遂向热北逃窜。1948年底热河全境解放后，张匪隐匿起来。1951年镇反时，张匪被群众检举，逮捕归案，在赤峰县丁家营子被公审处决。

六、韩桑杰匪祸实录

韩桑杰，原籍乌丹（今翁牛特旗）昭克吐村人，日伪时期任保安队少尉排长，后升为连长，迁居巴林右旗。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拉杆为匪。不久，投靠何子章内蒙自治军第四师任三十四团二连连

长。1946年5月，何子章部被热北军分区改编为蒙汉联军第四师，但韩桑杰匪心不死，1946年10月趁国民党军攻占赤峰之机，带二连叛变为匪，去林东投靠了李守信，不久又出来在林西、经棚、乌丹、翁敖旗地区，与"七十六"、"鲍排长"、"高特劳"，"秃喇嘛"、"希日僧札布"等股匪互相勾结，袭击区村公所、杀害干部，到处抢掠，为害百姓，无恶不作。

为了建设巩固的热北根据地，1947年冀热辽军区派出强大兵力剿匪。韩匪在林西一带站不住脚，即窜到翁牛特、敖汉沙漠地带，与希日僧札布股匪合杆，妄图在那里暂避风头，待机再起。

早在1946年9月，韩桑杰带40多人，来翁牛特旗头分地一带行抢，卓索图盟六支队闻讯赶来，与韩匪交火半日，韩的三弟拉隔然萨等5名匪徒被击毙，韩匪不支，突围逃走。

1947年冬，韩匪窜到翁敖联合旗，把响水村农会主任及其两个儿子捆起来，扔进老哈河冰窟窿里。1948年1月他又带着从辽西过来的一股匪队共400多人，到胡日哈一带行抢。旗委书记邓英、旗长巴彦尔楞闻报后，即带旗支队一、二连连夜追击，包围了胡日哈庙。这次战斗，由于双方都情况不明，经过包围与反包围几次争夺，土匪拖着10几具尸体逃跑了。我旗委组织部长陈明、支队副连长郝斯白音等7位干部战士牺牲。韩匪窜回林西，又遭昭盟军分区部队追击。辽西匪队拉走，韩匪只剩下百余人，又窜回翁敖旗。

1948年4月9日，韩桑杰为了救出被我扣压的他的几个亲戚，带匪队夜间偷袭旗政府所在地玉田皋。当时。旗政府和公安局只有副旗长王耘等10几个人，但他们不畏强敌、顽强抵抗。匪徒硬攻不成，又用火攻，把大门点着。在危机时刻，旗委书记邓英带旗支队三连赶回来，韩匪不支，仓惶逃走。这次战斗，支队4名战士牺牲，2人负伤。韩匪在玉田皋劫狱不成，又窜到梅林地杀害了武装委员孙德，抓村长王连才扑空，把王的妻子和3岁女儿刺伤。接着在这一带连续采取报复行动，在海日苏庙包围了旗工作队布和朝

鲁等10余人。工作队乘夜幕掩护突围出去，幸免于难。在额乐茫哈杀害了旗牧改工作团团长达木林札布和区公安委员拉西色楞。在六家子杀害了旗贸易公司萨义、高福财等3人。在昭克图杀害农会干部朝格都楞。在乃林皋杀死旗政府马倌嘎达。不到半年，被韩匪杀害的旗、区、村干部达30多人。4月下旬在那什罕抓走孟和、全喜等5名干部，带到乃林皋，捆在马桩子上，用皮鞭、木棍毒打，幸旗支队和赤峰县支队赶支，将匪打跑，救出5名村干部。

鉴于韩匪作恶多端，热中地委决定派卓盟纵队配合旗支队追剿这股土匪。5月上旬，韩匪与希日僧札布向那什罕、白音套海一带流窜。旗委书记邓英带旗支队一、二连跟踪追击，卓盟纵队孔飞司令员也带4个连赶来。经研究决定，旗支队在白音套海和白音塌拉拉间堵截，卓纵跟踪追击，接连追击几天，使土匪没有喘息之机。一天夜里。韩匪偷偷渡过老哈河，正在沙窝里做饭吃，我一连连长套格套带一连猛冲过去，匪徒措手不及，匪首希日僧札布手下18名匪徒被击毙。这一仗给韩匪以致命打击。1948年秋，旗支队采取“发现匪踪，穷追不舍”的方法，使土匪难以立足。匪徒怕剿匪部队跟踪，在马后绑上一捆柳条子，以拖掉行踪。他们不敢见人，就在沙窝里挖洞藏身。到1948年底，在我强大军事、政治压力下，韩匪内部发生分化，有些胁从分子，纷纷逃走，向政府自首。最后，连韩的大儿子也跑了。韩桑杰带着几个人流窜到锡林浩特一带，后潜入外蒙古。1953年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引渡，被捕归案。同年5月3日，韩匪在大板（巴林右旗）被公审处决。

七、李殿仕匪祸实录

李殿仕，丰宁县东卯（现属赤城县）人，日伪时期任东卯村长。日本投降后，李殿仕依仗他手中的几十名部落警察和坚固的部落围子，并到各地网罗伪军军警、讨伐队和土匪，纠集近300人，

打起“先遣军第二支队”司令旗号，盘踞在东卯一带。丰宁县政府多次对其争取无效，遂派部队清剿，虽给予一定打击，但一直未彻底消灭。1946年9月，国民党军进攻丰宁县。李殿仕乘机派人四出活动，进行反动宣传，策动我地方武装叛变。他首先把花盆区武委会主任魏均，干事周正刚、周正生和区小队长魏庆云拉了过去。李宣传什么“国民党力量强，八路军长不了”，“要自己地方自己管，外地干部一个不留”，并许以官职，煽动他们杀害外来干部，策动区小队叛变。农历八月十六日，花盆村唱戏，他们趁区委书记颜明不备，突然把颜捆绑起来，然后上台宣布叛变，并当场把颜和两名区干部杀死。随即，又把区长刘荣华抓住杀害。十七日，李又派人到茨营子区，策反区小队。因该区干部都在乡下工作，于是，李便通过地主郭金玉，串通区小队班长吴士喜，在东窑村把区农会主任康秉文杀害。之后，他又串通李殿仕的侄子李兆勋，把李兆勋捆上，到官路房找到区委书记卞廷，诡称“抓住了逃亡地主李兆勋”。卞信以为真，一同往区押送，在半路上把卞暗害，李匪还通过叛变分子，在万全寺把区长董殿连堵在屋里开枪打死，并策动区小队50多人叛变。十八日，又用同样办法策反了三道川区小队。李匪在3天时间里策反了3个区小队100余人叛变，杀害区干部9人，然后四出骚扰。他们每到一地，勾结反动地主，捕杀区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十几天时间，李匪即在头道营子、道德沟、曹碾沟等地杀害干部15人。1946年11月，丰宁县派民政科长黎明、区助理员赵明远带几名民兵，到东卯一带开辟工作，被李匪包围，除赵明远带伤逃出外，其余全部牺牲。在不长时间里，仅李匪亲手杀害的我革命干部就达22人之多。1947年春，察东军分区独立团、冀热察军区十三旅到这一带活动，对李匪进行连续围剿，将其大部歼灭，残部逃往关里。

八、赵辅臣、张其昌、陶汉选匪祸实录

赵辅臣是伪满青龙县讨伐大队长，日本投降后，他表示愿意接受改编，将其改编为冀东三纵队二团，赵任团长。张其昌是伪满宽城警察署长，1945年九·三胜利后，投靠赵辅臣任营长。他们表面伪装进步，暗地却与高占海、王印轩、王占元、姜克芝等股匪勾结，密谋叛变。1945年12月7日，他们共纠集200余人，在青龙杨树窝铺叛变为匪。10日，攻占了青龙县城，枪杀了县财政科长马良存、九区区长孔怒等13名干部，并诱杀了我十三旅彭参谋等12名干部，抓走战士30余名。接着袭击了木头楹区公所，杀害了区长李复新等3名干部。冀东军区当即派五十六团、六十一团会同县支队围剿赵匪，歼其大部。残匪百余人逃往秦皇岛投降国民党。张其昌逃回宽城。1946年1月，国民党十三军攻占平泉后，张其昌到平泉投靠十三军，接受组织保安队的任务，张即在平泉、宽城一带大肆网罗土匪和伪军警残余势力，拉起200多人在青西县活动，四出骚扰百姓，抢劫财物，袭击我地方部队。1946年8月，国民党军攻占承德时，张匪已发展到400余人，盘踞在平泉县五十家子、党坝一带，先后三次到我青西县进行骚扰。一次，奔袭青西县所在地宽城，使我地方部队干部战士伤亡几十人。

1948年5月25日，平泉国民党军在我大军压境下，仓惶向承德撤退。张其昌匪队在往南去秦皇岛投靠赵辅臣途中，又于5月29日，袭击了青龙大巫岚区公所，杀死区长佟文、武委会主任王俊学等8人。我热河和冀东部队对其进行围追堵截，终于在义院口将其全部歼灭，张其昌也被击毙。

陶汉选，围场县对廷沟人，民国时期拉过杆子，后被东北军汤玉麟部下收编任过团长，在围场落户，常与土匪勾结，成为当地一霸。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陶即网罗土匪、伪军警等，拉起300多人的杆子，自称"热西绥靖军"副司令。他们在围场、赤峰、隆化、喀喇沁等县活动，到处袭击区、村公所和我后方机关，抢掠群众财物，先后杀害我干部、战士30余人。

1946年8月，国民党军攻占承德，10月攻占赤峰后，陶投靠国民党军，被任命为绥靖军团长，曾多次与我军作战。1947年1月，陶队曾同白金辉、大杜、二杜等匪队到新拨区，联合围袭围北县工委、县政府，被热西骑兵团将其围在竹立沟。经一场激战，匪队溃逃，我军毙匪7人，缴轻重机枪各1挺，步枪20余枝。骑兵团牺牲战士一名。1947年5月，我军收复围场和追歼赤峰逃敌时，陶匪被歼大部。残匪数十人向热北流窜，又连遭我军打击。陶匪只身脱逃隐匿他乡。1950年，陶匪被我捕获，经热河省法院审理，判处死刑。

九、于秀成匪祸实录

于秀成，林西县小城子人，地主，曾任伪满小城子村长。1945年八·一五后，成立"维持会"，自任会长，清算斗争开始后，拉起20多人的杆子，匪号"天下好"。1946年春投入白金辉匪队。不久，白匪遭热北军分区部队打击，于逃往赤峰，与林西县逃亡地主王品卿密谋成立"林西县警察队"，封于秀成为大队长。于潜回林西后，秘密串连敌伪人员卢凤廷（地主，伪村长）、杨凤煮（地主）、王铁山（地主、伪勤劳俸公队教官）、任成藻（地主，伪村长）等，作为后台，又网罗张悦股匪（20人）、叶金生叛匪（60人）、毛德义叛匪（60人）、董万江（匪号"四海"）、崔成文、陈景春等股匪，合杆后打起"林西警察大队"旗号。这个匪队200多人全部是马队，窜扰于经棚、林西、乌丹等地。他们到处以地主、敌伪人员为基础，安排"底线"，刺探军情。于秀成匪队多次袭击我区公所和后方机关，杀害干部，制造多起血案。

1946年11月，叶金生带匪队一部分在大水泡子，抢塞丰公司一大胶车物资和长短枪4支。1947年1月25日，于匪率全队袭击林西县第三区公所。激战一天，匪徒伤亡数人，我区干部战士牺牲4人。2月11日，匪队在刘营子劫走解放军搂柴大车一辆，抓走7名战士。12日，于匪向月流沟流窜，路遇村武委会主任张守信。张开抢打死一名匪徒后被捕，被匪百般折磨后杀害。匪队又窜到二八地，把在这里休养的一排伤病员抓住，扒光衣服捆在院里冻着，并当场打死数人。幸一区区长带区小队赶来，把匪打跑，才使一些伤病员幸免于难。匪队窜到吉林坝后，又把农会主任王凤和抓住杀死。13日，匪抓住巴土村干部赵连顺，扒光衣服捆在树上毒打后杀死。其后数日内又连续杀害我村干部3人，打伤村干部民兵5人，抓走3人，还将一名村干部的小孩杀害。3月初，于匪窜至二支坝，袭击了7名打柴的战士。战士们英勇抗击，终寡不敌众，全部战死。此后，于匪即窜到乌丹、赤峰、围场等县活动。1947年5月21日。于匪与白金辉配合，在柴火栏子袭击了我冀东代表团，制造了“柴火栏子事件”。于秀成是这一事件的元凶之一。事件发生后，冀察热辽军区部署全面开展剿匪，并派部队追剿白、于匪队。白、于匪队遭到朱德骑兵旅及地方部队的不断打击，走头无路，于带百余名匪徒逃往张家口地区，投入傅作义部。

十、刘金生、袁喜廷、牛刚匪祸实录

刘、袁、牛3人全是围场县半截塔区人。刘金生住半截塔村，1946年初参加我区小队任班长。袁喜廷是杨树林村民兵队长。牛刚是北沟村人，在村中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当过炮手，后参加自卫团，1946年春当了民兵班长。1946年9、10月间，国民党军进攻围场时，他们先后带着区小队民兵叛变为匪，冒充八路军到处行劫。国民党占领围场期间，他们3人被收编为半截塔区警察队，分别任

正副中队长。他们到处敲诈勒索、抢掠群众大烟、牲畜、粮食等物资，还先后抓捕我村干部30多名。有的被送到县里邀功，有的押在区署拷问，乘机勒索民财。1947年1月，围场县委、县政府在围场西部开展游击战，并组建了孟奎、城子、小滦河等武工队。刘袁等多次带匪队对我武工队进行袭击。2月间，孟奎区区长史志新等2人在孟奎梁家营工作，被匪队发现进行追击，史志新壮烈牺牲。不久，匪徒又在任家营子发现了半截塔区区长王剑锋。在匪队追击下，王区长向山上突围时被击中腿部，被匪徒抓住。刘匪等专门朝王区长的伤处踢打，进行折磨，然后押回半截塔严刑拷问。匪徒们见王区长只字不吐，就用刀子把他的肉割开，然后撒上盐面，致使王区长几次昏死过去。匪徒们黔驴技穷后，便将王区长杀死。这还不算，他们又把王区长的牙砸掉，把尸体立起来，让匪徒们当靶子打，真是灭绝人性。

1947年5月，解放军收复围场后，刘、袁、牛等匪队逃往隆化，并与那里的赵珍、于合、卢文等匪队勾结起来。他们时聚时散，在隆化、围场交界的白虎沟、步左沟、张三营、唐三营等地活动，大肆抢掠群众财物。匪队还多次互相配合袭击土改工作团，制造了多起惨案。1947年农历九月十九日，牛刚、袁喜廷勾结卢文匪队共230多人窜到北沟村，先是包围了村长廉长祥家。廉向外跑时被土匪杀死。匪徒们抓住廉的妻子后活活打死，并把头割下扔出很远。她儿媳朱凤英扑在婆母尸体上哭，匪徒就用木棍乱打，把朱的眼珠打出一只。之后，牛匪下令把她带走，并在半路将其衣服扒光，割下乳房，用刺刀在身上乱捅，直至把怀孕四个月的朱凤英活活折磨而死。农会主任陶珍被抓住后，用马拖得半死，又命匪徒抬起来摔，并恶狠狠地说："你们看，这就是给共产党当干部的下场。"匪徒把吴窑营子农会主任耿唤臣的父亲抓住后，先用石头砸，后又乱刀刺死。护地连长陶山、农会法官包三和一名无辜群众也被挑死在村外。公安队战士刘玉在他表兄李春华家养病，被匪徒董国珍发现，

往屋里打枪，把刘玉打伤，然后拉出屋外。李春华求情说："他是我表弟，你们饶了他吧。"匪徒陈奎说："你窝藏八路军，也饶不了你！""说着，把刘玉刺死，又回身把李春华刺死。

群众对这些匪队恨之入骨。我热西分区独立团并隆化、围场县支队，先后多次围剿匪队，给其以沉重打击。1948 年 5 月，解放军收复隆化战斗中，匪队大部被歼，余者溃散，刘金生当了国民党兵，后在密云被俘，更名改姓参加了解放军，1952 年转业回围场。不久，我公安机关搞清了他的底细，并决定逮捕。刘自知罪恶深重，便在被捕时拉响备好的炸弹自毙。袁喜廷回乡间隐蔽，1951 年镇压反革命时，被群众检举，逮捕归案，公审处决。制造"北沟惨案"的罪魁牛刚逃往外地，先后用牛发、牛自强的名字，在北京、张家口、锡林格勒等地隐匿。1959 年，围场县委决定派半截塔区副书记周景凤去寻抓牛刚。周景凤行程万余里，费时 192 天，终于在内蒙白旗把牛刚抓捕归案，判处死刑。

十一、赵珍、于合、卢文匪祸实录

赵珍、于合、卢文是隆化县西部地区三股大土匪。

赵珍是隆化白虎沟人，1945 年冬混入白虎沟区小队任队长。于合是郭家屯人，任郭家屯区小队队长。卢文是卜格川大地主。1946 年 8 月底，国民党军攻占隆化县城。赵珍、于合先后叛变为匪；卢文也网罗一批地痞流氓、惯匪拉起匪队。他们有时集结，有时分散，勾结作恶。抢掠民财，袭击我地方部队和后防机关，杀害干部，破坏土改。1947 年 1 月，赵珍、于合匪队集结 400 多人，从郭家屯出发，沿小滦河川北上到围场南山咀一带，沿途以搜查八路军为名，大肆抢掠，见什么拿什么，稍有反抗，轻者毒打，重者抓走。三天间抢走粮食、猪、羊、鸡、鸭、鹅、肉、粘糕、豆包、油坛子、衣服、被褥等 20 多车、几十个驴驮。计粮食万余斤，牲畜百余头，肉 5000 余

斤，把群众过春节用的物资几乎扫荡一空。他们还强奸妇女多人。1947年5月解放军收复围场后，这些股匪盘踞在隆化、围场交界地带进行抢劫，仅被隆化县支队、武工队7次截获缴回的就有牛、驴108头，羊130余只。

1948年，中共热西地委和军分区决定开辟丰宁、隆化、滦平3县结合部地区，派出土改工作团，进行土地改革。对此，这些土匪头子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进行破坏。隆化的赵珍、于合、卢文、张显耀、李凤、王怀民、曹喜珍匪队，围场的刘金生、袁喜廷、牛刚匪队，丰宁的王德才（王大刀）等匪队，纠集起2000余人，轮番袭击土改工作团。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3月，先后杀害土改工作团及武工队干部30余人。赵珍外号叫"活阎王"，手下有"判官"卜延年、"小鬼"冯大全等。这些人外出活动时，带着特制的小锄刀，到处锄人，挖人心，上人头供，强奸妇女，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这个匪队自1946年冬至1948年夏就杀害干部和群众127名。一次，他们在张三营锄死3名农会干部，把人头悬挂示众，并扬言："谁参加土改就跟他们一样下场。"1947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日，赵珍、于合又纠集9股土匪共千余人，包围了土改工作团驻地老爷庙、北窝铺、北营子3个村，挨家进行搜查。由于工作团事先得到情报都转移了，匪队把村农会主任黄景全、积极分子吴世友、赵顺、张国彬、张信等5人抓住严刑拷问后当场杀死。赵万福正在推碾子，被抓住后当即杀死。吴志俊（傻子）被抓后，假装放他走，匪徒们在后面开枪把吴打死取笑。匪徒们杀人之后便开始大肆行抢，抢走大牲畜10头，羊200余只，把群众过年用的肉、油、豆包、粘糕、粮食、衣物等抢劫一空。1948年2月3日，匪队袭击千松沟土改工作组，热西专署教育科长（原围场县长）周哲民遇难。2月25日又袭击旧屯石虎沟工作队。土改工作团有2人牺牲，7人突围，穆林、李文化、田文丰3人被捕。灭绝人性的匪徒用铅丝穿上穆林等3人的锁骨，又用钉子、子弹钉透双脚，将他们活活折磨致死。之后，又把李文化、田文丰开

膛挖心。4月1日，赵珍、于合、卢文等匪队纠集500余人，把伊逊河武工队包围在石洞子山上。武工队面对7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5个多小时，毙匪37名。队长赵景春身上8处负伤，当20多名匪徒冲上来时，他用最后一颗子弹又打死一个匪徒，自己也壮烈牺牲。护地连长赵永山身负重伤，致死不当俘掳，把身负重伤的孙子叫到跟前补枪牺牲后，自己也自戕牺牲。战士尚宝财眼珠被打出来，自己用手扯掉，把剩下的3颗子弹交给战友，自己流尽最后一滴血。文书郭景山被匪徒逼到悬崖边上，几个匪徒要去抓他，他跳下悬崖壮烈牺牲。这支英雄的武工队，除一人突围外，63人牺牲，37人负伤被俘后，又有11人被土匪杀害。分队长李景春负重伤被俘，匪徒用铁丝穿上他的锁骨带到张三营，用绳子捆上双脚，绑在马后拖死。

对这几股匪队，热西军分区独立团和隆化、围场两县支队联合进行围剿，作战30余次，曾三次攻进张三营土匪据点，共歼匪300余名，截回大量被抢财物。在隆化高丽营一战中，击毙"活阎王"赵珍。1948年5月解放军收复隆化战斗时，这几股匪队也被歼灭。

十二、伊相臣匪祸实录

伊相臣，隆化七家乡孤山村人，日伪时在毛荆坝警察分所当警长，1942年被承平宁游击队俘虏教育释放。1946年初，他拉起百余人的杆子。

1945年冬，建西县（今内蒙喀喇沁旗）组建七家区公所，收编了部分伪职人员，当过伪警尉的岳子明当了区小队长，伊相臣当了副队长。这些人贼心不死，秘密勾结土匪，密谋叛变。1946年1月16日，他们把区长捆起来，抢走大枪20多枝，又连夜砸了承德县五家区公所，抢走大枪10多枝。21日，又袭击两家区公所，打死打伤干部3人。战斗中岳子明被俘，伊相臣便成了匪首。伊匪窜到围

场，勾结“奎字”、“双山字”等股匪共200余人，29日袭击了围场克勒沟区公所，打死干部2人，抢走大枪80枝，并在镇内大肆抢劫。2月4日，县支队骑兵连和两个步兵连攻入克镇，歼匪27名，匪队突围逃走，县支队伤亡连长1人、战士5人。骑兵连进行连续追击，先后在新地、狍子沟、太平地几次战斗中又俘匪10人。2月28日，伊匪在隆化坝底孤山子，被围场县支队骑兵连和一个步兵连包围。战斗持续2小时，毙匪5人，余匪四散突围时，又活捉30余人。伊匪窜到太花梁，又被骑兵连包围。连长谢明德、政委唐槐给伊写信劝降。伊提出两条要求：一是保证生命安全，二是立即释放回家。3月30日，伊交出步枪16枝，手枪2枝，带16人投降。伊被带到围场县城进行教育时，又设法逃走。4月底，他在太花梁与“见山字”股匪结为匪伙。5月6日，建西县旺业店区委书记丁庆林、区长陈发根、民政科长刘耀等10余人到按丹沟、孤山一带开展工作，夜间被伊匪袭击，虽经顽强抵抗，终因力量悬殊，子弹打光，致使多人牺牲，其余全部被俘(后被当地群众营救出来)。5月10日，匪队又在七家过河口劫去分区拉给养大车一辆。

1946年8至10月，国民党军向承德、赤峰进攻期间，伊匪趁机勾结地主武装，频繁出击，四处骚扰破坏，先后在霍里霍、兰旗卡伦、暴家伙房等地与警卫营、县支队作战。9月5日，在平泉黄土梁子劫我某部贺政委，抢去长短枪4枝，骡马8匹及其他物资一部，并把贺政委杀害。9月，伊匪投靠国民党军任五家乡自卫队长。后因“剿共有功”，被任为第二纵队总队长，对外号称“伊团”，活动于承德象鼻子山一带。不久，伊匪包围了七家区公所，抢走大枪20多枝。公粮10多石，抓捕区长崔利民等3人，将崔交国民党当局杀害。9月26日，伊匪串通混入旺业店区的副区长牛玉林、区小队分队长傅永发，策动区小队和民兵70多人叛变，当场杀害县公安科的李唐锋，抓走区委书记、区长等8人，劫去长短枪80多枝。10月1日，伊匪占据了旺业店村，大肆抢掠群众财物，奸污妇女。建西县

得报后，于 10 月 4 日派县支队 3 个连包围了旺业店，经过一场激战，消灭土匪 40 名。伊匪腿部受伤，带残匪突围逃窜。8 名被抓的区干部被解救，县支队牺牲指导员 1 人，战士 12 人。伊相臣在承德养伤 8 个月后又潜回隆化。1947 年夏，他又网罗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地主武装继续为匪。7 月中旬，伊匪在十三牌，烂石窖、头车沟等地勾结反动地主，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8 月初又以要枪价为名，抢走牛、驴 1035 头，羊 202 只，粮食 15 车。我隆东县支队闻讯赶到敖包山截击，因伊匪占据有利地势，县支队受损，牺牲 1 名排长和 10 战士。1948 年 2 月 2 日，伊匪与地主勾结，又袭击了大店土改工作队。我工作队员多数人突围，王进被捕后惨遭杀害。

1948 年 5 月解放军收复隆化、平泉等县城，在解放区内开展剿匪斗争。热辽军分区欧阳家祥司令员带警卫营，在隆化、喀喇沁等地剿匪时，曾给伊写信，劝其认清形势向政府投降。但伊不听劝告，死心塌地为匪，继续流窜抢劫。又先后在围场太后梁抢劫牛 10 头，羊 30 只。在隆化荒地后沟抢粮 3 石。在围场烂石窖打死 1 名妇女，抢走牛 6 头，羊 20 只，驴 4 头，被当地民兵截获。伊又窜到建西县骆驼山子抢群众胶车一辆，牛 10 头，羊 70 只。打死小牛群区干部 2 名，抓走村干部 8 名。

1948 年 4 月初，伊匪队在吴家沟被热中军分区十九团包围，匪队伤亡惨重。5 月，伊匪又被我十一纵队某部围歼，被击毙 50 人，俘 30 人。最后只剩下 18 人狼狈逃窜。8 月，伊匪逃到怀柔境内，11 月间被解放军缴械。伊相臣化装只身潜回围场克勒沟一带，又收罗起 3 名流散匪徒，进行作恶。1949 年 3 月劫群众公粮一车。4 月在冯家店抢去流通券 900 万元。

不久，围场、隆化、建西各县支队，区小队进行联合剿匪，布下天罗地网，使伊匪居无定处，东躲西藏。在人民政府强大政治攻势下，跟随伊匪的刘振强携枪投诚，只剩伊相臣和赵秀堂 2 人。8 月 13 日，伊匪逃到孤山村吴春起家。吴妻给他弄大烟抽，吴跑去村里

报告。区公安委员韩起亮与村干部刘殿元带12名民兵，到吴家将伊匪捕获。

1949年9月隆化县人民政府将伊匪处决。

十三、滕永昌匪祸实录

滕永昌，原籍山东蛟河人，后迁居东北。1942人曾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在周保中部当战士。他经不起残酷环境考验，叛变革命投靠日本，袭击我抗日联军。1943年充当日本特务，1944年在围场任日本讨伐队分队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滕纠集30余名匪徒拉起杆子。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占领围场后，滕在大地主孙继祥、孙继武支持和十三军五十四师副师长的怂恿下，大肆网罗股匪，很快扩大到500余人，号称"绥靖第二军"，滕自任团长。1947年春，滕投靠国民党热河省保安司令部，将"滕团"改编为承德县保安大队，驻防头沟。他们经常流窜在承德、隆化、建西、围场等县，到处烧杀抢掠，袭击八路军，杀害干部和群众。据不完全统计，3年中被该匪队抢去牲畜万余头，粮食近百石，大烟、衣被等不计其数。烧毁群众房屋2000多间，杀害县区干部40余名，杀害村干部和群众100余名。

1947年3月，滕匪队在承德三家一带行抢，把区武委会计芝生抓住后，带到头沟，把计吊在大柁上，先用皮鞭抽打，又用烧红的烙铁烙，再用烧红的铁条捅鼻孔，把计折磨致死。1947年夏，滕匪队到朱家营子一带抢粮，被区小队阻击，打死一名匪排长。匪队当即到烧锅营子抓住村民陈景，硬说他是八路军情报员，带到头沟，砍了头给匪排长祭灵，挖出陈景的心，让匪队刽子手宋学昆给煮着吃了。

1948年春，滕匪队到三家一带骚扰，在龙王庙村打死副区长胡志云，砍下头挂在头沟东大门示众。1948年7月匪队抓住头沟

北沟门村李文林，带到三块地沟，捆在一棵大树上，用刺刀挑死挖出心来，给匪队剜子手煮吃。

1948年4月，滕匪队到磴上川，见东西就抢，见牲畜就赶，见房子就烧，把军属梁礼、刘长荣、区小队战士蒙守录抓住后挑死。5月10日，滕匪伪装八路军干部，把头沟村农会主任高凤岐、农会干部赵义廷、青年干部孙廷柱、交通站长李德抓住后，带到后松树沟门，活埋在一个坑里。5月25日，该匪队又在头沟村抓住妇女主任王桂芝，农会干部姜俊、范如臣等4人，带到西水泉沟，活埋在一个坑里。对滕匪队的暴行，群众恨之入骨。我热中军分区和县支队曾多次进行围剿。1947年6月，热中骑兵团奉命追击滕匪队，将匪队围在河南营村，实行猛烈攻击，匪徒四散溃逃，毙伤俘匪百余人。

1948年8月，在我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龟缩在承德市，滕匪驻在市郊。匪徒看到末日即将来临，一些人纷纷逃走。10月，滕匪逃至密云。11月4日，解放军十一纵队攻击密云城，全歼守敌，滕匪队也被全歼，滕永昌被活捉。

（河北省承德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塞外青龙匪患

青龙政协文史委

青龙建县前归临(榆)、抚(宁)、迁(安)几县属理。由于长城一带及都山、老岭山势纵横，谷幽林深，加之两次直奉交战，直军败退南撤时丢弃很多武器弹药，助成匪患迭起，使地处塞外的青龙人民受了50年的兵灾匪患之苦。

一、清末和民国期间的匪患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临榆县志》载：长城以北地区，有匪众千余人，横行乡里，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牛心山乡花场峪村五道岭附近村民组织抗匪"联庄会"，然而匪众凶残暴虐，且人多势众，"联庄会"不敌被击溃。时村民吴弼德为避匪患，带其家小躲于村外山中，唯其母不肯随行。吴母不幸被匪抓去，将其家中财物抢掠一空，房屋被烧，吴母愤而大骂，抵死相抗。匪首怒，欲将吴母投入火中烧死。弼德闻之出山，挺身而出向匪首告：愿以己身代母死，于是匪众将弼德枪杀。弼德以身代母而死，精神传闻乡里。

民国13年(1924年)，二次直奉交战，随直军败退流窜过来"老耗子"(该匪队系辽宁省凌源县，有匪众千余人)匪队属下夏五虎、肖三品所率匪众百余人，活动在青龙县东的干沟、邱杖子、木头凳乡的老大杖子、山东乡的寿桃山一带，为害乡里，扰乱民生。是年11月，该部土匪退到凌源与"老耗子"匪队汇合。年底，该匪队被东

北军十九旅消灭在辽宁省建昌县老大杖子猫儿岭上。匪队在青龙期间，曾把百余枝大枪散失在邱杖子、烧锅杖子一带的农民家里。1943年冀东军分区马骥部队来青龙开辟工作，将散失的枪支起出，成立了周子丰游击队。

民国16年(1927年)8月，匪首朱玉璞(原名朱宝)、金海龙(原名宋奎元)、大青山(原名王青)匪队，有匪众150余人，活动在牛心山乡老岭地区。同年他们带领匪众从梧桐峪入关到抚宁的沿河营，火烧西吴庄，又在榆林甸绑"秧子"(人质)多人。官兵剿匪司令何柱国率四十六团、六十四团会同承德八十三团及地方民团2000余追剿，匪队不敌，向西留守营逃窜。是年9月，该匪队经冷口流窜到青龙狮字坪后牛山大洞北沟，将地主贾家财产洗劫一空，杀死贾家2人。该匪队同时被尾追的官兵何柱国部队和卢龙县刘鹤汀民团、抚宁县张任侃民团及热河省的八十三团合围在大洞北沟岭下，经2小时激战，打死匪徒100多人，俘虏匪众50多人，匪首大青山、滚地雷、忠正等被击毙，这股匪队被平息。

民国19年(1930年)正月，青龙西部地区又兴起多股土匪。匪首任福庆(绰号小白龙)、单田(绰号穿山虎)、赵匡印(绰号大灯楼子)、张柱等绺子啸集匪众近2000人。他们主要以都山的深山老林为基地，出没活动在青龙的马圈子、大障子、八道河、五厂、狮字坪、肖营子、西双山等地。当时匪众声势之浩大、所到之地危害百姓之凶恶，实属罕见。当时官府和士绅们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切身利益，恳求河北省府派兵清剿。河北省府责令地方成立民团，大障子一带推举马瑞为民团团长，马圈子推举二道杖子王举人、张兴舟为民团团长，两处共组织民团1200余人，枪支弹药由当地地主绅商富户中筹措。河北省府为协助当地民团剿匪，由天津芦台府派兵2000人，由韩、段两位武官带兵出桃林口、冷口到青龙区剿匪。官军汇同地方民团3200多人兵分两路将赵匡印、张柱两匪队包围在都山脚下大营子村老爷庙、黄土坡庄。赵、张得知官兵进山消息，当

即带匪众奔向老爷庙南山。张柱骑着一匹白马带匪众走到影壁下时，被官兵发现。官兵一齐射击，张柱左臂中弹滚下马来，迅速隐避于一坝墙下，用右手持枪向官兵还击。张匪号称神枪手，当即就打死官兵8人。官兵在山区密林中作战缺少经验，亦不知匪众虚实，下令撤退半里。官兵一官员说：谁抓住匪首有重奖，其财产都归谁。重奖之下官兵们又一齐扑向匪首，此时匪首张柱仍以有利地形向官兵射击，官兵又死伤10余人，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抓获。官兵泄愤将其人头割下，用油布包上带到八区郑沟，最后转递到县城挂在大街上示众。匪首张柱被抓住后，其大掌柜（匪首第一把手）赵匡印见势不妙，带领部分匪兵撤向都山娘娘顶，又从都山南面下山到郑沟村的大松沟，经塔沟窜向西双山的龙潭沟和官场乡的黄木厂等地。赵匪又串联其他匪队到该地区集中，以抗击官兵。

是年7月，官兵和地方民团再次兵分两路进山剿匪。一路由段××带官兵1000人、民团400人，从大障子街经马杖子越南大山直取龙潭沟；一路由韩××带官兵800人、地方民团200人，绕道七区七道河乡石板沟进山直奔当杖子黄木厂。官兵和民团的行动被匪徒们知悉后，研究了相应的顽抗对策。官兵、民团进山不到一个月，不时受到小股土匪的袭击，不但没有找到大群匪众，反而损兵折将近千人。芦台府统兵剿匪的韩××被匪首徐树打死在七道河的石板沟。官兵无奈，停止剿匪，撤回县城大障子。

是年8月，马圈子民团参谋刘文轩（马圈子头道河子人）向剿匪首领段××建议，派一能言善辩之人去匪队劝降。段接受了建议，并派刘文轩为说客，深入匪窟晓以利害，经多次谈判，达成协议。匪队归降的条件是：①不准追究过去的坏事；②匪首愿降者封给官职，并在军队供职；③匪徒一律接受改编，不愿从军的准其回乡为民不得伤害。刘文轩返回后就对匪众进行了收编，当时愿降的匪首有赵匡印、王青、马瑞等，不久将他们带到天津芦台府授给营长、连长等职，从此结束了为害数年的山区匪患。

1931 年至 1945 年期间，由于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加之日本侵略者的盘踞，没有较大的匪情发生，在都山、老岭及长城一带有小股或散匪活动，他们仅在远离八路军和日军作战的偏僻地区干一些坏事。

二、青龙解放至建国期间的匪患

（一）赵辅臣叛变为匪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撤出青龙，张金祥的 8 个讨伐队和骑兵队、特务队 2000 余人被八路军冀东军分区收编，将其改编为八路军冀东第三纵队，张金祥任司令员、赵辅臣任二团团长。改编后赵辅臣贼心不死，继续敌视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不久，他乘军分区扩军之机，暗中网罗伪警、宪、特及反动地主武装力量，组织第二补充连伺机叛变。是年 10 月，赵的二团再次被改编，赵被调十三旅任参谋长。他的叛乱阴谋破产后，对我党更加心怀不满。同年 11 月，赵辅臣以借口收降姜克芝、于庆瑞（辽宁省凌源县匪队）为由，向旅部请求回青龙。旅部批准赵的请求，并派旅部彭参谋、庞指导员带一个排护行。赵带原部下一个连（补充连）回青龙大障子后，马上与原特务队长高占海、原讨伐中队长张其昌、伪政府旧官吏匡占儒、张敏、马宗仁等密谋叛变。他们一面派人去秦皇岛与国民党都山县党部书记王嘉林联系，以取得国民党的帮助；一面秘密派人与伪满时的旧部下王印轩、董东儒、冯新斋串联，让其抓紧网罗当地反动地主、伪警察、土匪等成立反动武装队伍；同时还派人到凌源通知姜克芝、于庆瑞匪团来青龙协同应事。

12 月 7 日，赵辅臣秘密派人包围了杨树窝铺，以“设宴请客”为由，把彭参谋等 10 名同志请到自己家里。宴席间，匪徒突然开枪，彭参谋等人当场遇害。在别处的八路军战士也同时遭到匪众的

杀害。在震惊冀东的"杨树窝铺惨案"中，有18名干部战士惨遭杀害。同日，赵辅臣串联来青龙应变的姜克芝匪团，攻占了五区木头凳区委，李复新区长等3名同志被杀害。

是年12月10日，赵辅臣带叛匪300余人，攻占了青龙县城，又杀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11人，抢走县政府一部物资和枪支弹药。

12月中旬，在冀东部队和青龙县周子峰武装支队的围剿下，赵辅臣撤出县城，带残匪800余众逃往秦皇岛投奔国民党，活动于临榆、昌黎、抚宁、迁安、乐亭、滦县等地，与人民军队顽抗，所到之处，枪杀干部群众，破坏解放区的生产建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赵辅臣预感末日来临，携带财物和枪支离开匪队，隐藏于北京东城区贡院东大院东大街5号，妄图逃脱法网苟延残喘。4月8日，赵辅臣行迹败露，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解回青龙。

1949年12月1日，青龙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赵辅臣死刑，立即执行枪决，作恶多端的赵辅臣终于受到应有的惩罚。

（二）韩殿臣政工队

1947年夏季，逃亡到秦皇岛都山县国民党党部的反动地主、伪警察、宪兵、特务等110多人，在秦皇岛组成都山县政治工作队（政工队），后又改为民众自卫队。他们的宗旨是，发展国民党党员，鼓动不明真相群众，伺机复辟。政工队队长韩殿臣，指导员曹清，副队长冯悌轩，下分6个组4个中队：总务组长张起；谋报组长李香圃；事务组长袁少义；新闻组长谢子恒；宣传组长黄明远；突击组长谢文英。第一中队长王喜廷，队副李殿存，带匪众30余人；第二中队长张万彬，队副张起，带匪众40人；第三中队长张印，有匪徒20人；第四中队长王永，有匪徒20人。1947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四中队王永带匪队到一区龙王庙、山神庙和五区木头凳、三星口一带

骚扰，将五区龙头村农会东西抢光，把农会干部李宝增打死；将一区出头石农会主任李会枪杀。十九日到一区起河与我八路军小分队相遇，打死我八路军干部一名。1948年农历正月初八，王喜廷带一中队30名匪徒窜到五区干沟街，抢去商店物资无数，又将农会胜利果实全部抢去，杀死干沟街妇女七任田××。在东刘杖子村打死无辜群众孙宝；在黄石碴杀死一名要饭的；到一区出头石将农会干部李长贵杀死，又返回黄石碴村将农会干部王国珍、唐自武杀害；到木头凳牛角沟杀死一名群众。1948年9月，政工队被我剿匪独立团在龙王庙一带大部歼灭，一中队长王喜廷、二中队长张万彬、张起、三中队长张印被我军活捉；一中队副李殿存，四中队长王永向我剿匪部队投降。

（三）张寿芝自卫队

1948年7月，张寿芝网罗地主、伪、警、宪、特和社会上地痞流氓成立了民众自卫五大队，张寿芝任队长，队副贾太增，有匪众近500人。据统计，1948年被该匪队杀害的干部和地方积极分子65名；抢粮7万余斤，牛羊骡马800多头，金、银、布匹、黄丝、烟土（鸦片）等难以数计。1948年上庄坨解放时，这支匪队被我剿匪部队全部歼灭，匪首贾太增被活捉。

（四）王庆会匪队

1947年1月，王庆会、柳占宽、曹玉丰组织一个匪队，有匪徒30余人，配有机枪1挺，长短枪30多枝。他们活动在二区的隔河头，三区的双山子、茨榆山等地。1948年2月，在三区沙金哨村将农会主任方自武杀害；2月5日，匪队窜到三区周杖子村于杖子庄，将农会斗地主所得浮财物全部抢走，还抢去农会骡子3头，方自顺家衣服20多件。2月下旬，匪队到刘杖子骚扰，该村副村长杨发被土匪樊得林打死。不久，匪队又到口头的抚宁、卢龙等地抢粮

多次。在郭家坳匪徒们抓住两名女战士，带到牛心山乡花果山后，其中一人被樊得林匪徒强奸。1948年6月，匪队窜到三区二道河杨杖子庄，将我三区组织委员朱玉贵、民政助理王祥抓住，带到田杖子沟口后将2人杀害。是年7月，该匪队在三区刘杖子抓住该村妇女主任靳桂兰和在家养病的八路军战士朱权。匪徒王庆满将靳奸后杀死，朱权也被杀害。9月下旬，匪首王庆会带队副王庆义、匪班长樊得林杀害了三区袁杖子村干部宋金生；干树沟村农会干部马余和贫农吕有；隔河头村干部鲍万巨等工人。时隔不久，该匪队夜袭三区杨杖子，三区区小队8名队员被打死。三天后，匪队又包围袭击了隔河头村，抓去二区区长、区小队队长及区小队队员8名。

王庆会匪队组成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骚扰百姓，抢劫农会，杀害区村干部，袭击区小队，罪恶多端。1948年10月该匪队被我剿匪部队和县支队歼灭在三区安子岭南沟。

（五）宋绍久匪队

宋绍久原系地痞，当过伪警察，被收降后任七区区小队队长。1945年8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三军的一百六十师、一百六十一师因战事需要从东北调往华北，途经青龙。宋绍久认为形势有变，于是以中央军为靠山，暗中串联伪警察佟坤、伪七区自卫团长宋进珠等人进行了反革命叛乱。当时宋、佟等人组织起匪众120多人。叛乱当天，把七区王营子农会主任沈永发夫妇活埋在王营子庄的西河边；把农会副主任宋宽用棍棒活活打死。匪徒又连夜袭击了七区的高丽铺、七道河、山神庙等村。他们将区农会主任孙西海、组织委员杨春丰、妇联主任李沐清和武委会委员李印喜4人绑架到王营子匪窟，先是严刑拷打后，将李印喜交到县城五十三军，其余3人残遭杀害。他们又抢去原区小队和民兵枪支69枝。同年8月下旬，冀东军区独立四团在王营子将宋绍久匪队包围，俘虏匪众

70人，缴获大枪60余枝，其余匪徒在宋绍久带领下逃往八区狮子坪。同年农历八月十五的早晨，匪徒们正杀猪宰羊准备过节时，被我县支队包围在朴杖子庄。除宋绍久、佟风楼等个别匪首逃往平泉外，其余均被击毙和活捉。次日，在王营子召开了公判大会，将罪大恶极的何连布等6人当场镇压。

（六）张金忠匪队

1948年5月，驻守在承德的国民党十三军被我华北八路军击溃。以张金忠、高占祥、张岐昌为首组织起十三军的散兵和5个县的武装土匪共计1200人。高占海（原赵辅臣匪队一队长）亦从平泉带匪徒80多人窜回青龙。是年5月28日，该股土匪占领了县城（大障子），杀害土改干部7名，烧毁县街完小校舍12间，放火烧毁公粮和豆油12万斤。29日他们又流窜到四区大巫岚街，将区长佟文和大院村干部王学俊、区农会主任李珠及兵站3位同志杀害。6月中旬，匪队分别在大巫岚、红旗杆、广茶山等地被冀东八路军警备团和县支队包围全歼，俘虏土匪1080人。匪首高占海毁容更名逃到东北沈阳郊区，以作小本生意谋生。1953年春，高匪在锦西一饭店中酒后失言，被我县公安局缉捕人员得知，将其抓获。是年秋，我人民法院判处高匪死刑，执行枪决。

（七）零星匪队

1945年至1948年，活动在青龙境内的有17股土匪。

1. 张金增匪队。有匪徒30人，机枪一挺，大部活动在七区肖营子、七道河、白家店一带。

2. 肖成发、刘振彪匪队。有匪众30余人，武器有轮机枪一挺，主要活动在一区牛心山和花果山、二区隔河头、三区安子岭曾杖子一带。1948年秋被我八路军剿匪独立团和县支队击溃。匪首肖成发被一区花果山赵成金民兵队长抓获。

3. 李运长、郭春喜匪队。原系赵辅臣残匪，有匪众 10 余人。1948 年 7 月起活动于四区土门子、大街杖子和五区木头凳老大杖子、干沟一带，曾策反五区区小队叛变，逼迫该队 30 余名战士为匪。

4. 孙各顶、黄大炮匪队。有匪徒 30 余人，活动于五区山东、杨树窝铺一带，不久即投靠于赵辅臣匪队。

5. 宋山、侯永来匪队。有匪众 40 人，活动在六区北部马圈子、张杖子和四区的蒿村一带。1948 年 9 月，被我公安队消灭在四区架子山。匪首宋山被打死，侯永来被迫向政府投降。

6. 张振起、张春利匪队。有匪众 18 人，活动在六区大障子、西双山一带。1948 年秋被我剿匪部队全歼。匪首张春利被打死，张振起被捉。

7. 周振国匪队。有匪众 20 人，周振国自称是都山县警察局长。主要活动在四区石岭子和六区马圈子、张杖子、汤道河区一带。曾在四区炮手堡子劫去热河贸易公司大车 3 辆，杀害杨丈子妇女主任。

8、孙广明匪队。有匪徒 20 人，活动在八区八道河、王厂和青、平县交界处。1948 年 9 月，被我剿匪部队击溃，孙带部分残匪逃往口里。

9. 杨明春、杨恒春匪队。有匪众 30 余人，活动在八区八道河、狮子坪一带。1948 年 9 月被我剿匪部队全歼，匪首杨明春被捕。

10. 李仲甲匪队。有匪徒 11 人，活动在肖营子、西双山一带。1948 年秋，被我剿匪部队击溃。李仲甲带 3 名土匪逃往口里，部分匪徒向人民政府投降。

11. 张怀志匪队。有匪徒 11 人，活动在六区大障子、西双山和七区肖营子、七道河一带。1948 年秋被剿匪部队击溃。

12. 宋福基匪队。有匪众 80 多人。该匪队原系辽宁省绥中县残匪组成，经常来青龙五区的干沟、木头凳和一区龙王庙一带骚

扰，多次被我剿匪部队打击。1948年秋，匪首宋福基带匪徒向绥中县政府投降。

13. 田兴泉匪队。有匪徒40多人。该匪队是抚宁县散匪所组成，经常到青龙县二区隔河头、新城沟一带活动。1948年秋被我剿匪部队，在隔河头消灭其一部分。余者逃回抚宁，不久被抚宁县支队歼灭，匪首田兴泉被抓获。

14. 武云忠匪队。武云忠外号"小咕哨"，有匪众190人，经常活动在一区老院、上河西和牛心山的花果山一带。1948年冬被我剿匪独立团击溃，一部在老院被消灭，一部逃往花果山。不久，被花果山赵成金民兵队消灭。

15. 鲁瑞峰，李梦楼匪队。有匪众40人，活动在二区庄窠，新城沟、花果山一带。1948年冬被我剿匪独立团消灭。

16. 李文祥匪队。有匪众30人，主要活动在四区大石岭、米沟、榆树沟一带。1948年冬被县剿匪公安队歼灭于榆树沟。

17. 杨俊周匪队。有匪众30余人，活动在六区大障子一带。1948年冬被剿匪部队击溃。

除上述股匪外，尚有散匪近70人，全县13个区几乎各区都有。

三、1945年至1949年平息匪患情况

1945年末至1946年春，冀东十六军分区独立团、警备团、独立四团抽调大部兵力，加上县支队3个连队共1700余人，对活动在青龙各地的土匪进行围剿。1946年底统计，当年歼灭土匪5股，打死90余人；慑服270多人。在八道河公审匪首大会上，将罪大恶极的邢文生、朱盈等5人判处死刑。

1947年7月9日，青龙县委向全县发出"剿匪扩军"指示，建立区小队，整顿民兵队伍，配合十六分区部队剿除匪患。12月22

日，县公安局在隔河头召开千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悼念被土匪杀害的县、区、村干部。在会上，将匪首樊春林、冯万明等4人判处死刑。1948年3月，县支队在各区小队和民兵配合下，继续追剿土匪。4月，县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动员盲从和被骗为匪者弃暗投明，回乡生产。全县有420名匪徒及其家属向人民政府投诚请罪。5月28日，以高占海、张其昌等为首的5个还乡团（亦称大肚皮）窜到青龙大障子，烧毁县政府粮库，杀害区村干部7人后逃至义院口，被驻青龙剿匪警备团和青龙县支队围歼，俘虏1080人，其中有随匪家属60余人。7月中旬，六区战勤指挥部主任张春利叛变为匪，被剿匪独立团一连歼灭。8月中旬，独立四团会同县支队在八区狮字坪朴杖子庄包围了宋绍久匪队，俘匪70余人。

1948年9月3日，热河省委决定成立青龙县剿匪指挥部，县委书记刘保胜任总指挥，张志臣、贾忠业、冯万顺、段络、周化通、郭兰廷为委员。自此，形成以军分区部队为主，县支队、公安队、区小队和民兵以及邻县支队联合作战格局，在全县铺开剿匪运动。9月上旬，花厂峪赵成金率领民兵捉捕了匪队长肖成发；9月中旬在剿匪指挥部统一号令下，先将在六区大障子、四区蒿村活动的宋山、张振起两匪队歼灭，打开了剿匪的局面。11月11日警备团在花厂峪靴脚沟截击残匪100多人，大部被歼，个别匪徒逃往口里。是年底，在人民武装的围剿震慑下，匪势大为削减。

在1948年初到1949年秋不到两年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歼灭匪队19股，击毙匪徒223人，俘虏1427人。缴获六〇炮2门，炮弹12枚；机枪2挺，冲锋枪2枝，大枪257枝，短枪25枝，手榴弹12枚，大枪子弹2600余发；金、银、烟土、黄丝、布匹等物资若干。

1949年夏，经县公安局处理匪犯案件共218起，群众揭发检举通匪、窝匪案件28起。

1949年10月2日，经请示热河省政府同意，就地处决马荣等恶匪25人。

1950年6月25日，全县再次动员剿匪，将部分残匪、散匪彻底消灭。

1951年5月至1952年11月，在肃反镇反运动中，又检举揭发出匪案315人，按政策分别进行了处理。

在近半个世纪中，青龙县人民深受匪患涂炭；新中国成立后，青龙人民才得到了新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政协　供稿）

绥远五十年间匪祸见闻

刘锦魁

现在内蒙西部的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和巴彦淖尔盟(除磴口县),原来都是属于前绥远省所管辖的行政区域,自清末至解放前的50年间,绥远地区经过满清王朝封建势力的统治和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以及日寇入侵,致使各族人民饱受压迫、奴役的痛苦。

50年来,绥远地区由于政府的腐败无能,官吏的贪污受贿,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以及凶年灾荒不断发生,在这种天灾人祸的情况下,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不逞之徒,则相聚为匪。他们打家劫舍,奸淫抢掠,横行霸道,毒害人民。土匪的滋生蔓延,象胡须剃而复长,似蜂蚁赶而又来,官府对之也无可奈何。

旧社会的官兵与土匪本为孪生兄弟,他们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因为官兵大都是收编前的土匪,而土匪又常常是哗变前的官兵,这就形成了官兵来源于土匪,而土匪又是原来的官兵。这样循环往复,令人兵匪不分,真假难辨,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畸形社会。

关于50年来绥远地区的兵灾、匪祸为害情况,现仅就记忆所及,分录如下。

一、马家军的哗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岁在庚子,这年秋天,八国联军在攻

陷了一些华北重镇后，侵入北京。从此，义和团运动遂告失败。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西狩。此时，原召入京师保卫北京的甘（甘肃）军董福祥所属的马福寿、马福祥（马鸿逵之父）部，借口扈驾，率部向西溃退。

这部份队伍在撤退途中哗变，在他们经过的柴沟堡、阳高、天镇、大同、丰镇、张皋等地杀人、伤人不计其数；奸淫抢掠，横行无阻，其为害地区，涉及各个县城的郊区百里之外，其横行时间，从庚子年的八月，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为害人民长达 8 个月之久。

二、假意允婚，赵巨子杀张占奎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在现在的乌兰察布盟一带出现了张占奎等 5 名土匪。他们马快枪利，慓悍异常，但在数年的抢劫生涯中，不断地与居住在现察右前旗公沟双脑包村和恒义隆村的赵老三、赵巨子叔侄二人为难，处处找他们的麻烦。

张占奎也曾攻打过赵老三的家。但由于赵家深沟高垒，昼夜防守，始终没有攻入。尽管如此，张匪打算伤害赵家之心却未因此而作罢。一天夜里他将一颗人头悄悄地放到赵老三家的大门口，想借人命案件来陷害赵老三。后来赵老三据实将情况报告给丰镇县政府，并上下进行了打点，才算作罢。

赵巨子有女年 19 岁。一天，张占奎进入双脑包村赵巨子家，强逼赵巨子将闺女许配给他为妻，在张占奎的武力威胁下，赵巨子不敢不答应，于是定于光绪三十年（1904 年）中秋节后的次日（即八月十六日）午时成婚。

赵巨子并不甘心于招匪为婿，在张占奎匪徒走后，将此事秘密商之于友人孙占彪。孙当时授意："假意应允，伺机杀之"。赵巨子非常同意这个办法，立即与家中教读的常先生和密友高连生商量和布置了杀张的方法与步骤。为了防备泄密，3 人曾在神前结盟宣誓，以示同心同德。

旧历八月十六日吉期已到，张占奎等五匪徒亲来赵家迎亲。是日，赵巨子家设佳肴美酒以款待"佳宾"，并准备鸦片烟土供他们过瘾。在匪徒们酒醉饭饱、过足烟瘾之后，张占奎立逼赵巨子送女上马，以便回去洞房花烛。

此时，五匪中有二匪酒醉酣睡，另二匪去街上饮马，只有张匪一人在催促新人起程。这正是天赐良机。赵巨子等三人，乘张匪不备，从其背后以利刃刺入腹中。张匪立毙。然后，又分别杀了正在酣睡的二匪。不想在街上饮马的邱秃子、薛犬二匪徒听到了动静。他们闻讯大惊，立即乘马狂奔而逃。

三、为争房，土匪死于劣绅手

宣统三年(1911年)，在集宁县城北30里处的色力疙图山村，出现了土匪头目赵有禄。赵匪一开始曾纠集土匪5人抢劫过凉城县脑包洼村胡金荣所开设的当铺。不久，就发展成为百余人的大股土匪，这年为辛亥年，在辛亥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当地农民许登第号召起义，响应革命。赵匪乘势假借革命名义，攻克丰镇县城，进行了大掠夺，以后，又在绥东地区骚扰多时。

1913年，赵有禄被山西省大同镇守使收降，赐名为赵承忠，字立诚，希望他忠诚报国。可是不久，在绥远省收服卢占魁匪部后，赵有禄便带上部下300余人，脱离山西部队回来投入到卢占魁匪部内。后来他随同卢占魁由东胜县转入榆林。在榆林他结识了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因此，他便在榆林居住下来。

赵有禄在为匪期间，所抢掠的金银财宝，都悄悄地寄存在集宁县的朋友张全手中，此事唯有张全的小老婆知道。其后，赵有禄虽然投降官兵，身为军官，但他寄存的东西，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没敢讨要，因为抢劫之物，终系非法所得，他怕在讨要时惹出是非来。

及至1920年，赵有禄当了绥远省政府参议，这时，他官大了，地位高了，对于一些事也无所顾忌了，因此，他明目张胆地向张家

讨取过去寄存的财物。那时张全已死，张的小老婆承认此事，不过原物已交不出，张妾准备把他们在集宁县桥西通顺街东头路南的房院一所付给赵有禄，用以抵偿。

恰在此时，张妾改嫁，男方系她的姘夫张三亏。因此，这所房屋也随之成为张三亏的家产。张三亏原为集宁县的大地主，他和当时兴和县的大官僚地主王玺一样，交通官府，勾结土匪，称为地方上的一霸。他家养有家兵护院，每遇上土匪危急时，一入其门，便无人敢来追问。因此，土匪们把张三亏视为保护伞，对其财产分毫不敢打动，有时土匪绑票，都由张三亏居间赎票，从中获得好处。

赵有禄为人颟顸糊涂，利欲熏心，不识利害，对于张三亏据房不交一事，颇有怨言，并且信口雌黄，扬言对于张三亏的这种行动，一定设法予以报复。这话传入了张三亏耳内，他对此非常愤怒，决心不除灭赵有禄，誓不为人。

1929年，绥远省政府解除了王英等人的职务，并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这给赵有禄的震动很大，他自感前途不妙，祸将及身，于是，来了一个不辞而别，悄悄地返回了榆林。由此，他和张三亏争房之事，遂作罢论。

1936年，赵有禄年过花甲，过去他虽然当过土匪，干过坏事，但却已改邪归正。时过境迁，人们也就忘却了这些事。他此时在家安享清福，丰衣足食，当上老太爷了。这年正月，他因思念胞兄赵有子，在事前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忽然由榆林返回集宁他胞兄家中。

在赵有禄到家后3日，张三亏以赵有禄私通红军，并为红军工作为罪名，向集宁驻军告了密。集宁驻军闻报，立即逮捕了赵有禄，并在张三亏的大力活动下，将赵有禄执行枪决。

后来，据赵有子谈，在赵有禄被捕后，他曾以赵有禄的名义致电榆林方面的当权者，请出面予以营救。但以后发现，这封电报稿，被张三亏串通驻军扣留未发，致使赵有禄被陷而亡。

四、横行在绥远省全境的匪首卢占魁

卢占魁是丰镇县隆盛庄七道沟村人，曾为小摊贩，在隆盛庄马桥街摆摊营业。辛亥革命，许登第起义攻打丰镇县城，路经隆盛庄时，他随同起义队伍打过丰镇县。从此以后，他弃商为匪，一年之间，他就聚集了1000多名匪徒，并在民间搜集了无数枪支。

卢占魁为人阴险狡猾，有驾御匪众的能力。他佯装浑厚，摆出一付与人无取与世无争的样子，不讲究穿戴，不与匪徒争财物，用这种小恩小惠、假仁假义的方法拉拢匪众，致使一些匪徒被他所蒙蔽，都来投奔他、依附他、拥护他。另外，他还和当地地主豪绅暗通声气，互相支援。

1913年，卢占魁纠集其他股匪，曾围攻过包头。以后，绥远都统张名曾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招抚了卢占魁匪部为官兵，并授给卢占魁以统领的名义，令其驻防在五原县乌加河北、乌兰脑包一带。土匪虽被收编了，但绥远都统拿不出粮饷来供应他们，这样一来，却给卢占魁造成了发财的机会。当时，卢匪以就地筹饷的名义，在防地内大种特种鸦片烟，当地政府对之不敢过问，只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卢占魁原是当土匪起家的，现在虽然名为官兵，但仍在不断地吸收匪徒以扩大势力。不久，他的防地由乌加河扩展到狼山一带，东西长达百里之远，在他的防地里，兵匪不分，亲如一家，乃至在外地作案犯罪立脚不住的土匪，也从千里、百里外来投奔他，他一一接收，并给以妥善安置。在绥远地区来说，他竟然成了土匪们的一顶保护伞。

卢占魁盘踞后套数年之久。由于他祸国殃民，罪孽深重，1916年绥远都统蔡成勋，根据当地人民的告发，决定对卢匪进行围剿。当时出动了绥远省的全部兵力，前堵后截，给卢匪部以致命性的打击。最后，卢匪溃退到清水河县、和林县等地苟延残喘了一个时期。

1917年农历十月间，卢占魁东山再起，率部突然来到集宁县双脑包、大河湾村。土匪来临，人人自危，附近居民四出逃生，只有公沟区议员陈英，不仅不躲避，反而依仗他的家丁、武力，准备与土匪决一雌雄。

陈英系当地富户，为人个性倔强，遇事不知进退。从前，住在集宁县附近霸王河的毛煞楞，曾抢过陈家的马匹，事后，便逃入卢匪部队中躲避，陈英强令毛煞楞的家属变产赔偿了马价。对此，毛煞楞根之入骨。

十月初三日，卢占魁率领万余人的大股土匪，由大河湾村奔向东北20里处的大六号村。万马奔腾，黄尘蔽日，匪势的气焰十分嚣张。这时，毛煞楞带领匪徒30余人跟在大股匪部之后。当他们行至公沟区时，毛煞楞命令所部匪徒向陈家发起进攻，自午至晚，双方枪声不断，但未能攻入陈家。

后来毛煞楞顿生毒念，强迫村人堆积柴草于陈英门前，然后点火毁门而入。匪徒们在进入陈家后，毛煞楞为了报复赔马之恨，杀了陈英家的7口人，以泄其愤。陈英的幼孙孙陈德，时年2岁，尚在怀抱，幸被其乳母谎称是她的亲生子，才侥幸得免。

陈英家距公沟区才8里之远，在陈英家被匪围攻时，区团兵坐视不救，令人惊异。后来得知其原因是：公沟区政，向由劣绅张三亏所把持。陈英当选为议员后，常常过问区政，意存染指，以致遭到张三亏的忌恨，思欲除之，以减少政敌。张为人阴险，喜怒不形于色，在陈英自吹愿与土匪见高低之时，张三亏不仅不加拦阻，反而从旁怂恿，以助长陈英骄傲自大的情绪；及至土匪围攻陈英时，他袖手旁观，不派兵救援，终于使陈英惨遭灭门之祸。

这次除陈英家被灭门外，广大老百姓也被害惨重。农民们所有牲畜、衣物、毡被、粮草都被抢掠罄尽。随之，匪徒又放了一把大火，直烧得十室九空。在抢掠中，匪徒们杀人、伤人和掳人数以百计，凡衣冠整齐者，无论老幼悉被掳去。如后来在1925年当过国民军师

长的苏雨生，这次也是被绑票者之一。由于大兵尾追，匪徒日夜狂奔，以致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来得及回赎就死去了。在匪势猖獗、气焰熏天、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当时，一些农村青年不得不投入卢部为匪。

据被掳去的人回来说：卢占魁匪部是由 50 余股土匪组成的。其中以萨县、武川、固阳等土匪居多数。来绥东绑票、烧杀、抢掠的多系绥西股匪。平时能和卢占魁接近的多为绥东的匪首，如：赵有禄、张喜生、老四辈、卢高民等人，其他匪首则始终见不到卢匪之面。他们名为卢占魁匪部，实际上并没有主从关系，所抢财物，各归各有。各股土匪貌合神离，有利则合，无利则散，来去自由，不受卢匪的约束。尤其是在有政府兵追击时，他们就分头流窜，各自逃生；及至追兵一停，他们又合为一体，进行掠夺。现在官兵跟踪追击，匪徒们已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这正是肃清卢匪的大好时机。

当时，丰镇、凉城、兴和、陶林 4 个县归察哈尔省管辖。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委派镇守使乔建才为剿匪司令进行追剿。乔建才带所属六路统领将卢匪追出商都、兴和、丰镇等察哈尔省境外，然后又由山西省接续追剿。山西部队将卢匪逐出于阳高、天镇、大同、左云、偏关之外。卢匪又窜入清水河县，在攻清水河县城不克之后，转而攻进了和林县城。入城后，他纵匪大掠，并放火烧杀。之后，他率匪部奔向准格尔旗、东胜县。在他到达陕北的三原时，被陕军收服，任命卢占魁为陕军第六路统领，他在陕军内干了一个时期，又率部进入四川。在四川，他的部众被川军收编，然后缴械遣散。

卢占魁由四川回到家乡察哈尔后，乡人对他恨之入骨，但也无可奈何。这时卢占魁依然精神抖擞，威风凛凛，一点也没有显露出倒霉失势的样子。他还在窥测时机，企图东山再起。

1924 年，吴佩孚与段祺瑞、徐树铮作战，卢占魁暗中鼓动吴佩孚所属的丰镇县游击第二营稽查员胡羽子、栗景和哗变，以响应徐树铮。1922 年，吴佩孚和张作霖作战。卢占魁趁机投入奉军，给奉

军效劳。后在察哈尔奉军都统张景惠去职时，张作霖命令卢占魁组织力量扰乱察哈尔后方。

卢受命后，策动兴和县人何全孝（又名何三），丰镇县人白高旦、李清鸠等人，纠集匪徒500余人侵入了兴和县城，在县城盘踞达10日之久。曾委任当地大官僚地主王玺充当兴和县长。当时正值直奉军阀混战之际，地方上没有驻军，以致土匪横行无阻。

原来张作霖指使卢占魁扰乱察哈尔后方，乃是一张空头票，他对卢占魁所招收的匪兵既无物资上的援助，又无编制上的安排，致使这些土匪假借官兵之名，进行土匪之实，在察哈尔地区内为非作歹，无法无天。

当时，奉天（今沈阳）的报纸对卢占魁的行踪，曾大事渲染，并尽力为之鼓吹，但不久卢占魁已穷途潦倒，失意落魄，蹲居在奉天城内小北关的旅店中。尽管他处境不佳，可是嘴巴还硬，依然大吹大擂，炫耀自己，哄得他那些旧部下何全孝、富台子、张喜生、老四辈等人都来奉天，投奔卢占魁作寓公，以冀攀龙附凤。

在奉天期间，卢占魁与察绥的一些匪首还不断书信往来，以通声气。在信内他们完全使用暗语。如土匪多少？能否收服？他们则写作皮子多少？好买与否来联络。卢占魁在收发信件时，使用张润德皮坊的假名来蒙蔽人们。

当初，张作霖利用卢占魁招收土匪，扰乱察绥后方，意在培养和壮大奉军势力，而卢占魁甘心为张作霖效劳卖命，其意也在乘机建军扩军，为独树一帜打基础。张卢同床异梦，最后终于出现了分裂。

1922年冬，卢占魁去长白山招收了枪马齐全的土匪300余人，归后，张作霖举行宴会为之祝贺。在酒席筵前，张作霖当众宣布这次卢占魁所招收的匪众编补在阚朝玺的骑兵部队里。对此，卢占魁非常气愤，立即拂袖而去。对于卢占魁的举动，张作霖开口骂了一句"妈拉巴子"。在场人员闻之无不大惊失色。

1923年夏天，张作霖对卢占魁下了毒手。他一方面命令卢占魁去长白山招抚土匪，另一方面密令阚朝玺率部到长白山对卢占魁一行加以围剿。在强大的兵力包围下，不仅卢占魁丧了命，就连投奔卢占魁来东北准备为官作宦的察绥匪徒们，也被一网打尽，同时毙命。

事后，张作霖曾在察绥两省境内张贴布告，大书特书："祸害察绥两省十余年的卢占魁，今已伏诛！"。察绥人民见到告示后，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

五、为害人民、作恶多端的游击营长武万义

在宣统三年（1911年）时，武万义原是丰镇县公沟区长（当时丰镇尚未设县）。辛亥革命起事，农民许登第起义攻打丰镇时，武万义率部哗变，在抢劫了公沟的商家后，便跟许登第起义军进入了丰镇。

1914年，绥远地区土匪猖獗，丰镇县成立了两营游击队用以自卫，当时地方人士认为武万义做事勇敢，而且还有些军事经验，因此，一致推选他为第一营营长。武万义当了营长之后，曾带领100多人的营兵，在剿匪作战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

后来，军队里逐渐淘汰了旧兵，补充进来的全是招收的土匪，在军队的质量起了变化时，武万义的作风也随之转变成为土匪作风。如匪首楚三被他窝藏在军营内，当县政府向索要楚匪时，他竟答复："楚三已被我们正法了。"用以搪塞县政府。刘鸿儒因与魏有恒争地，一怒之下打死了魏的儿子。事后刘鸿儒逃入武万义的营中，魏有恒对之无可奈何。另外，在剿匪中，凡土匪住过之家，武万义都诬其通匪，严刑拷打，以搜刮财物。有一次，一个士兵正在贾红北曹不罕家强奸妇女，被曹不罕之子打死，此事触怒了武万义，他竟将曹子用极刑处死，以泄其愤。

武万义为害人民，惹起群情激怒。当地百姓以武万义依仗兵

权，敲诈勒索，包庇匪类，纵兵殃民为理由告到了察哈尔都统公署。尽管告状的人越来越多，状纸越来越厚，但丰镇县县长黄朴，贪图武万义的贿赂，始终置之不理。1920年黄朴去职，都统公署军法处才以武万义滥用军权，利匪害民的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

在武万义服刑期间，土匪何全孝围攻县城，当时城内无人统兵抵抗，当地人士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请求释放武万义御敌，使之戴罪立功。武万义被释后，率领一营游击队出城迎战，击散了何全孝股匪，由此立了功，恢复了营长职务。

武万义在重新复职后，其作威作福的程度，更甚于从前。如他霸占了王祥的土地，把王祥活活气死。他还霸占了满洲人文奎及阿哥世袭兴和县班定营陶卜窑的地租。每当他派兵丁下乡催要地租时，这些兵丁扰害人民，甚似虎狼。他们不仅在交租的时间上刻不容缓，而且还要农民备烟（鸦片烟）、备酒、杀鸡、宰羊来招待他们。

1926年，国民军张之江被委任为察哈尔督办，武万义投在张的手下当骑兵团长。可是国民军在察哈尔地区并没站稳脚步，不久，即行溃退，在国民军溃退中，武万义不仅没有跟着走，反而趁势收缴了国民军许多枪支，然后，又投到晋绥军中当了骑兵旅长。

武万义当了骑兵旅长后，他便大开招兵收匪之门，大量地收容和招抚了散兵、游勇与土匪。如：刚在3个月前抢劫过陶林县城的匪首张大双喜，也在武万义部队中当了团长。当时，武万义的部队驻防在集宁地区，由于晋绥军方面不供应给他们军饷、粮食，所以他的部队游食民间，要粮、要草，拉伕服役。扰害人民，苦不可言。

武万义共有妻妾4人，她们分住在4个农庄中。这4个女人都包领荒地（现在察右后旗中特拉及九台等大块荒地），放垦给农民耕种，她们不劳而获，坐吃地租。在她们的农庄中，都养有大群牲畜，如马、骡、驼、牛、羊等，不计其数。

1926年旧历十月间，武万义秘密派遣他的军法官向驻在绥远的石友三送信，行至中途，被驻在集宁地区的奉军旅长董怀德查

获，董立即将武万义逮捕，并以勾结国民军、谋害奉军罪处死。广大民众，在听说杀了凶神武万义后，异口同声地说，这才是为地方上除了一大害。

六、以抢劫致富的绥东土匪张大双喜

1926年夏天，家住在丰镇县东北大山麻池卜子村的惯匪张大双喜（诨名大老汉），纠集白玉、薛弼等匪徒500余人攻打陶林县城，在打死守城警士10余人后，这股土匪攻进了城里。他们在县城盘踞数日，并大肆抢劫掠夺后，又返回了集宁县。在集宁县城附近，遇到了迎击他们的骑兵团长武万义，双方展开了战斗。当天，只听到炮声隆隆，枪声哒哒，似乎在进行一场恶战，但激战终日，不闻死伤一人。从此人们才明白兵匪之间有默契，所谓剿匪，不过是演戏给人看而已。

当张匪率部骚扰在集宁、陶林两县地区时，正值夏季农民耕耘之际，由于土匪的抢掠烧杀，农民四散逃生，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显露出土地荒芜、四无人烟的凄凉景象。尽管农村凋敝，民不聊生，但这却成全了张匪家业的兴旺发达，使之成为巨富。原来张大双喜将所抢掠的财物，不断地运回家乡麻池卜子村，并用这些钱财作资本，开设了油坊、碾坊、制酒厂、杂货铺、车马店等各种行业，真是生意兴隆，财发万金。甚至他还将抢夺来的马匹公然放在他院内饲养，马主也不敢来向他追问。

不久，武万义收编了张大双喜匪部，并委任他为团长。但在武万义被奉军处死后，张大双喜又率部哗变，重新当了土匪。1927年因土匪之间闹矛盾，张匪为他匪击毙。

七、糟害东胜县数年之久的格计老五

格计老五是察哈尔右翼前旗（正黄旗）七苏木人。1917年，他由绥东随同卢占魁西窜，率领土匪300多人，盘踞东胜县地区达数

年之久。曾烧毁过东胜县公署(以后的东胜县署,是1930年重建的)。

当时东胜县无驻军,县长畏匪心怯,不敢来东胜居住,经常驻在包头办公,靠领取县政府的经费和收纳捐税过活。至于东胜县政府的木牌则挂在县城以南30里沙梁间陶油坊村一家。所谓办公者,不过是几个员工向民间要捐征税,敲诈勒索而已。1930年,王文泉当东胜县长时,才开始常驻县城。东胜县无防匪设备,匪来时,群众多逃向附近的炭窑洞内以避之。

1926年,格计老五被武万义招抚,委为营长之职。及至武万义死,格计老五移居在察右后旗三股水,以养马为业。他所养的300多匹马,绝大多数是他抢来的。解放后,格计老五怕人民群众清算他的罪行,自缢身死。

八、五十四匪徒的抢劫、勒索

土匪五十四(不详其姓),原是河北省张北县七甲人。在1911年以前,他就和弟弟二疙瘩、文奎子、五疙瘩等六七人,流窜在兴和县北部抢劫。及至1912年,五十四居然抢了九股泉阎寿同之妻为妻,并公然在九股泉合兴公村安家立业。

五十四匪徒善于拉拢交际,与当地的豪绅地主关系密切,因而,在豪绅地主的保护下,军队不易剿除他们。直到1923年,五十四等一伙匪徒,才被彻底肃清。

五十四等匪徒,他们掠夺人民的方法有两种。除持枪骑马外出抢劫外,还稳坐家中向人民逼索财物。这就是:匪徒们写出字条送给某人,并限定时间让其送来财物、牲畜、粮食,逾期不交,后果自负。凡接到字条者,无不遵限交付财物,不敢有半点差错。在五十四匪徒们的淫威下,受害者还不敢告发,深怕受到他们的打击报复。

这些坏蛋,他们明系匪徒,又做坏事,但还喜欢装作士绅,招摇

过市，以炫耀自己。如1914年九股泉庙会，该匪首的老婆，乘两骡轿车来庙上观剧。两匹骡子头戴红缨，颈系铜铃；老婆们也服装时髦，装饰新鲜；而匪徒们则挎枪带炮，耀武扬威。这时，庙会游人相率躲避，唯恐匪徒们挑刺找碴，招致杀身大祸。

有时，他们还给人们追索人质，借以索取报酬。如：1914年，著名恶匪魏大傻子（河北人，曾当过营长）绑去九股泉喇嘛孔督村崔彦虾之弟与郝五子二人，勒令两家出银元2000块回赎。崔郝两家曾经央求五十四等帮助解救，并许事成后予以重谢。五十四等匪徒，当即跟踪追击，终于夺回了人质，得到了报酬。

九、被人称为传统匪、世袭匪的卢氏一家

在兴和县南区大滩村树林深入，有姓卢的一家居住在那里。卢家族大人多，世代以抢劫为生。他们的口头语是："生而为强盗，做鬼也不冤。""宁我欺负人，不能受人欺。""年轻不刁人，到老后悔迟。""王八水蛋（骂人语），有钱的就是好汉。""丈夫不怕死，死后早托生。""不能抢夺人，一辈子长受穷。""与其死于病，无声无息；不如死于匪，落得英名千古。"

基于这种论调，从1909年到解放时的40年中间，卢氏一家常年在兴和、丰镇、商都等地区横行抢劫，杀人越货，其手段的残忍，办法的毒辣，实在令人难以尽述。其中危害人民最为凶恶的，要算卢文明、卢文亮、卢小辫和卢蒙蒙等人。他们不仅为匪，有时还用抢来的钱财买官。如卢文明在抢得兴和县农民周补应的孙媳为妻后，不仅没有受到惩处，而且还居然当了武万义部队的游击队副官，卢文亮也由土匪一变而为公沟区公所的警察巡官。

当地居民称卢家为传统匪、世袭匪，对他们无不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唯恐受其祸害。计40年中间，在卢氏家族中，祖孙、父子、叔伯、兄弟、子侄相率为匪者甚多，其中被军队割去的人头竟达30余颗之多。但从不畏死的卢氏家族，此伏彼起，相继为匪，毫无

畏惧之心。

十、剿悍凶狠的马匪四喇嘛

悍匪四喇嘛系察哈尔右翼前旗九苏木人，善于骑马，精于枪法。自从清末为匪以来，经常是出没无常，行踪不定。尤其是在遇到军队围剿的时候，他轻骑远飏，日奔一二百里，窜入乌盟四子王旗或锡盟苏尼特旗躲避，致使军队不易剿除。

四喇嘛性情凶恶，行为暴戾，对人民杀伤烧拷、奸淫抢掠，已成为家常便饭。在他们为非作歹时，人们跪恳宽饶，匪等竟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无丝毫惻隐之心。

1912年，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与喀喇沁右翼旗王爷贡桑诺尔布（民初曾任蒙藏院总裁）联合东蒙古王公制造蒙古独立，当时军队北调，绥远地区防务空虚，土匪乘势而起，并迅速蔓延。对此，阎锡山用剿抚兼施的办法，来平息匪患。当时，他委派集宁县公沟大地主张二亏负责办理这件事，结果是招抚无效果；在剿的方面，由于人地两生，也没有取得进展。

正在这剿抚两难的时候，恰好出来一个孙占彪，他自愿充当向导，常带领军队剿匪。孙原为公沟区议员，年近50，为人刚愎自用，并喜欢出风头。他本是雇工起家，当时家道丰润，很想取得一官半职，以光大门楣。孙的举动，惹得张二亏心中十分不快。但为了迎合孙占彪的心理，并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张二亏在镇守使陈某面前竭力举荐孙议员，终于被委派为军队的向导。

孙占彪充当向导后，骑马带枪，洋洋得意地夸耀于乡里、家人之前，不啻平步青云、直升九天了。在孙占彪带领下，军队曾搜剿过四喇嘛家，捉拿过四喇嘛匪伙中的土匪数人，因此深深地得罪下了匪首四喇嘛。1913年秋，孙占彪只身去商都县办事，中途被四喇嘛匪部所获。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四喇嘛准备以极刑处死孙占彪。当时，居住在附近的数百名蒙汉人民，再三央救四喇嘛免孙一死，愿

意备重金予以回赎。对此，四喇嘛不予理睬，他命令匪徒们首先剁去孙的手足，然后又割下孙的人头。在孙占彪惨遭杀害后，匪徒们又把他的尸体抛于商都县南边四台坊的盐海之中。

十一、军阀混战后，滋生出来的土匪群

在国民军西退时，很多人夺得了散兵游勇的枪支武器，相率为匪。顿时土匪多得象牛毛，数不胜数。其中最出名的有苏美龙、董发、范连、刘战镍、夏四、郝喜红、贾锁子、崔万子、小老石、纪三格、初德胜等匪首，他们有数百人的大股匪帮，也有数十人的小股土匪。当时虽然官兵也在剿匪，但此伏彼起，不易肃清。如：奉军骑兵旅长窦某，在剿匪期间，曾用马驮铡刀，以铡匪首，血迹淋淋，令人毛骨悚然，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了匪势的猖獗。土匪的害民、扰民，依然如故。

在阎蒋混战期间，集宁县城没有正式军队驻防，仅有100多人的团警在守城。县城附近有郝喜红的匪部在骚扰，时刻威胁着县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县长杨道一自感兵力单薄，不足御敌，向上求援，也无结果。在此束手无策之际，他接受了当地人士的建议，暗引匪首郝喜红进城晤谈。

在杨、郝会面后，杨道一首先表示：老百姓的饥寒冻馁和你们的栖身绿林，这是因为我德之不修、能力不足引起的，说起来，我问心有愧，罪不容辞。我希望你们帮助维持地方秩序，我报请省政府收编你们。今后如百姓不得安居乐业的话，我将引咎辞职。杨县长的这番举动，像一剂镇静药，一时曾收到过土匪敛迹的效果。但为时不久，杨县长调任包头，郝喜红从此无所顾忌。集宁县的人民，又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在抗日战争时期，郝喜红又投降了日本人，充伪骑四师师长，后又当了司令。他为虎作伥，残害人民的手段，更百倍于从前。后来，郝匪与其他匪徒发生矛盾，在一次火并中丧生。

这些土匪中，以苏美龙的人数为最多，扰害地方的时间也最长。苏匪所部共有匪徒数百人，盘踞在集宁、陶林、灰腾梁一带长达30多年。他们杀人之夫，夺人之妻，抢掠财物，绑票勒索。罪恶滔天，实难尽述。

十二、兵匪勾结，狼狈为奸

为了防御匪害，集宁县公沟设立了区团，其费用是由地方田赋附加税款项下开支的。区团在名义上设立团兵，保护人民，实际是在当地地主豪绅张二亏的把持下，成为张的家兵。

区团设立后，公沟附近的农民，因避匪患，有四五十户人家迁来公沟居住，希冀区团的保护。为了获得区团的欢心，以得到切实的保障，在农户阎老三、刘拴魁的倡仪下，每户人家每月另出银元1—2元，送交区团，用作补助区团团兵的薪饷。

半年后，一天晚上土匪来抢阎老三。阎老三为人小心谨慎，平时就留意于防匪。土匪到他家后，他严塞门窗以拒之。尽管土匪鸣枪攻击，但始终没有攻进来。他家距区团不远，在土匪攻击时，团兵坐视不救，大家很以为奇。事后才知道，土匪是区团勾引来的，目的是在土匪绑票后，区团和土匪瓜分财物。

再有，距区团8里处的张龙通沟村，住有农民王殿相。王系雇农起家，家道小康。在八月间的一个晚上，土匪闯入王殿相家，并鸣枪百余发以示威。王殿相的儿子飞奔区团，请求救护，但区团不理，任匪抢劫，结果王殿相竟死于土匪手中。

十三、拦劫火车的土匪和城市里的土匪

一次，在京包线上，一列由西向东开行的火车，至福生庄时，被500余骑匪所拦劫。土匪们气势汹汹，恶声怒吼，遍搜乘客之身。此时，乘客们只有俯首贴耳，任其搜身。凡衣履整齐者，都被脱去衣服，由匪徒们一并席卷而去。那些被脱去衣服的乘客，不分男女都

赤身露体蜷伏在火车厢内，有的披被单，围手巾以遮身，有的裸体妇女只有怀抱小孩啼哭而已。

在城市，小股土匪也到处横行。当时凡夜间在包头下火车的乘客，必须在南门外集中后，守军才开城门放人进入，等人进去后，守军立即关门，以防不测。至于上车的旅客，在去车站途中被土匪拦劫之事更是屡见不鲜了。

在归绥市也同样如此。一年冬天，我在夜间由归绥车站去新城，迎面来了几个人，他们向我喝问口令，等我站定后，这些人对我进行搜身，并夺去我的行装包裹，其中有一人要把我绑在树上打算冻死我以灭口。幸被其他人止住："在此冰天雪地的深夜里，捆冻死他干什么!?"说毕，他们匆匆逃去，我也捡了一条命。

十四、拦劫汽车及行人

从包头到五原间的汽车，在哈拉汗补隆和三顶帐房一带，经常遭受土匪的拦截。这些匪徒隐伏在汽车路两旁的草林中，汽车一到，搞突然袭击。多年来，他们打死的乘客，所得的财物，很难加以统计。后来，人们都视这条公路为危途，除公务人员因工作需要不得不来往外，一般客商都不敢走这条路。

当时汽车的质量恶劣，时常坏在途中，不能行动。而公路两旁村落无几，四无人烟。每遇到这种情况，乘客除在肉体上遭受冻饿之苦外，在精神上更怕土匪来抢劫，财物受损失，坐立不安，惶恐万状。

由包头至东胜这条路上，土匪拦路抢劫也时有所闻。在包头黄河南岸一带，因农民避匪他去，村落无人，耕地荒芜，芦草森森，正好给土匪出没造成机会。土匪们隐伏在芦草之中，伺机抢夺，有时还杀人。一次，东胜县警察局警士周美德赴包头公干，就在此处被土匪周昌旺等捉获，惨遭杀害。

十五、王英等匪部的流窜骚扰

1930年，土匪马大牛、杨猴小、康存良率众匪数千人，由集宁流窜到绥西一带抢劫。当时，五原县调各区区长回城防御土匪，那知三区和一区的区兵们通匪，在回城途中，他们打死了三区区长寿立宽和一区区长张某。后来，土匪攻打隆兴长，由于守门的士兵坚守阵地，匪未攻入，商民得以无恙。同年十一月间，王英率领杨猴小、康存良等数千名土匪，窜入集宁县的贲红区，并在那里盘踞了10余日。在盘踞期间，他们除抢掠财物，烧毁房屋外，还杀人、伤人、掳人无数。接着他们又流窜到商都、兴和地区骚扰，后被军队追击西逃。

在王英率领杨猴小、康存良等匪众逃到临河县地区后，他们便开始向群众征收田赋杂捐，俨然以地方政府自居，妄图盘踞绥西地区，搞独立阴谋。嗣后晋军师长王靖国、赵承绶联名致函王英，内言："喆臣（王英之字）兄：大好时机，汝已错过；咎由自取，夫复何言。兹限汝速缴武器，率部投降。否则，大兵围剿，绝不留情。勿谓言之不预也。"这封信从字面上看，是促其投降；但骨子里则暗示王英远离临河，双方互不侵犯。

1931年至1932年，王英匪部又两次窜扰集宁、商都、兴和等地区，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上述兵灾、匪祸的情况，并不是当时的全部情况，只是我本人的亲身见闻，属于一小部分。但从这一小部分的情况来看，解放前50年间，绥远地区的各族人民，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所受的熬煎、痛苦竟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张世杰改写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政协文史委　供稿）

渤海土匪与海盗

王新华

一、抗日战争前的土匪、海盗

渤海西部海岸，以河北、山东相交的漳卫新河入海口为中心，向南北伸展数百里，都是浅海滩涂。海域泥沙沉积，水色混黄，小小的帆船还常有搁浅；陆上沟汊交错，沼泽连片，芦苇丛生，人烟稀少；又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自古为“绿林好汉”活动的地方。史书载：从西汉起，这里“盗贼遍地”，“祸患成灾”，“常年乱世，官衙无法进剿”。太平盛世，盗匪也常出没；如遇战乱灾荒，那就更严重了。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内忧外患，闹得民不聊生，至使这一带的土匪、海盗更加猖獗。这一时期的土匪、海盗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为贫穷所累走上匪途。如30年代的大海盗头目“黑老五”，山东省沾化县人。家境贫寒，又遇灾荒，家无隔夜粮，取借无门。他姑家是个富户，但不肯周济他。“黑老五”身强力壮，自寻活路。于是他花了几个钱，买了块锅饼（一种又厚又硬的面食），切削成手枪的形状，用红布包起来，进行拦路抢劫。他把他姑家一匹骡子劫了来，后来越发展越大，成了独霸一方的海匪。当地渔民有这样的顺口溜：

“黑老五”本是个矮子，
买锅饼挎了个盒子（手枪），
盒子劫了匹骡子，
骡子又换了盒子，
盒子占了个坨子（小海岛或海滩高地），
掐住渔民的脖子。

1931年盐山县东北方许官村一带，有个要饭的叫马瘸子，因灾荒遍地，要饭不饱，于是拾了个笤帚疙瘩到大洼里去劫道。此种情况比比皆是。

二是为报仇雪恨走上匪途。1927年孟村县牛进庄有个姓刘的土匪头子，外号叫“没耳朵”。他原是农民，因家贫在渤海岸边关家堡村抗小活。由于经常偷东西，村民痛恨之极。有一次又偷了人家的东西，被群众赶出村。在逃跑的过程中，遇到打草的农民王哲彬。王用镰刀剁了他的屁股，割去了他的耳朵。伤势重，行动困难，被另一个渔民救了去，养好了伤。“没耳朵”对渔民感恩不尽，叩头认做“干爹”，并说“不混出个头脸来不回来见您”。以后“没耳朵”为报割耳之仇当了土匪，发展到四五十人，有枪、有掷弹筒，骑一匹小红马，带着大兵，浩浩荡荡，专程到关家堡去报仇。

三是为匪害所逼，走上为匪之路。1930年左右，唐山地区南堡渔民郭善贵，带一只大船与五六个人到附近海域治鲶鱼，被海匪许三头子的下属劫持。海匪用郭善贵的船四处追劫渔船、商船，把船上十几个人渔民闷在船舱里。郭善贵等人不得自由，还挨打受骂，气急欲反；但海盗手中有武器，郭善贵无可奈何。一天，海上刮起了大风，一连数日，匪徒们多数晕船，有的几乎不省人事。郭善贵借机串通了几个伙伴，解脱了被绑架的渔民、商客，大家齐心合力，分工包舱包人，定时动手，一举消灭了众匪徒。郭善贵有心还继续治渔为业，可眼前海匪遍布，还要任其宰割。于是

他与几个船友商量，“撮起杆子”，当了海盗。几年之后他竟成了统领几百人的海盗首领。

四是趁世作乱，趁火打劫。1930年前后，黄骅沿海渔村杨家堡有个铁匠张树杰，家住山东章丘县，为谋生来海边渔村，为渔民修制船上用的铁器和工具，已连续几年。渔民称他为张铁匠。1935年之后，海上一连发生几次风灾和海潮，许多渔民失去了房屋，有的被夺去了生命。渔民在风灾、水灾、兵灾、匪灾的漩涡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张铁匠趁世作乱，放弃旧业，当了土匪。在杨家堡“撮起杆子”，由几个人发展到四五十人。他霸占民妻，抢夺民财，还从山东五营一带勾来大批土匪，抢掠杨家堡和周围村庄，为害二三年。

五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蜕变为匪。1930年，塘沽一带农村有一伙土匪，头头外号叫刘老太（真名叫刘荫亭）原籍盐山县刘洪博村（现属黄骅市辖）。刘老太自幼随父去塘沽农村种水稻。他好吃懒作，种地不肯，做工不会，经商无能，整日游手好闲：起初刘老太联合三五人去盐滩偷盐私卖，后来串联朋友拉起土匪同伙，发展到几百人，四处抢劫，在小站及海河下游一带很出名。

六是家庭不和，出走为匪。1935年前后，津南大港的苇洼里有一股土匪，头目外号叫徐大眼（名刘振起），家住捷地减河下游下三堡村（现属黄骅市）。自幼在家为农，冬季持抢打猎，练就一手好枪法。后因妻子死亡，与父亲和不来，经常闹纠纷，堵气挟枪出家闯入苇洼。有一次刘大眼在洼中游荡，遇到一小股土匪，他开枪打死了几个人，夺得5枝长枪。他以此为本，联合几个盟友，“撮起杆子”，外出几百里作案，成为有名的匪首。

此外还有些人，犯了法、做了孽，为匪躲罪；或赌博输光家产，借贷不能偿还，入匪躲债等多种多样的情况。

1920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的匪伙，形成一定武装力量，占据一方水土，比较出名的有黑老五、许三头子、郭四楞子、刘四歪

脖、万字号、张铁匠、李连长、金牙老六、千金子、没耳朵、大成字、李同勋、三品子、刘老太、冯高堂、李芝文、任富贵、傅老七、冯景太、李二猴子、窦同义等，不胜枚举。

1934年宋哲元出任河北省主席，他对土匪海盗采用“剿抚并用”的方法，一方面用金钞、官职引诱收买了一大批土匪武装。比如孟村一带的土匪李同勋带百余人归顺了政府，匪首给了个连长。其余不归顺者省府发兵剿灭。

1935年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对大股匪盗采取招安的办法，改编为政府军队，然后再给他们任务叫他们去收拾小股土匪。这些收编的土匪也多为亡命徒，心毒手黑，枪法好，剿匪比正规部队好用。1935年海上大盗许三头子率千余人招安，1936年大海盗黑老五也被招安。土匪招安以后就成了“官匪”，他们不再四出“绑案”，而是按季节发案。沿海各村庄凡是养船的户，春、夏、秋三季（渔业各季停止出海），由他们发给票证按“官匪”分配的数额上交款项，到期不交或数目不足者仍被逮捕，受刑治罪。

30年代中期，冀鲁沿海的土匪海盗形成了“四大团”，各团千八百人不等，各吃一块海滩海域，而且匪匪相互勾结，官匪连为一体，整个海域乌烟瘴气。

海盗，乘船在海上为害。土匪，持凶器在陆地作恶。但这里的土匪、海盗多不定位，他们随政治气候，潮汐规律和自己的实力情况，时而乘船出海，时而登陆造孽，哪里得吃就吃哪里，只不过有主有副，时间有长有短。

土匪、海盗，老百姓都叫“三儿”，有时不敢直呼，就叫“黑脸子”、“马架儿”，或打手势，叫：“三加一”。

土匪、海盗内部有许多暗语和暗号。比如：

“撮杆子”——指建立土匪或海盗组织。

“掌柜的”——指土匪、海盗头子。

“线上的”——是说自己人。

“大路的”——指正规部队。

“杂牌种”——指小股土匪。

“吃白的还是吃绿的?”——是指在海上为盗还是在洼边作贼?“海盗”也叫“吃水皮子的”。

“打笼（割草或收麦的工具）打铲（割草的工具）是活不是活儿”是问“你是干这行当的吗!”

“不是活儿，不是活儿，除了磨就是磨!”——是答“是，是干这行当的!”

“是老洼股子还是新洼股子?”——是问“是老匪伙还是新匪伙?”

“你说谁那个硬?”——土匪之间发生误会时向对方联系。对方认为是发生了误会，就答：“小妹子的功夫硬。”于是和解。

“上谁家安歇去?”——是问抢劫的目标。回答也是暗号，比如“老三家”、“四四家”即村庄下三堡和四埝的暗语。

“后晌听么戏?”——是问晚上住那里？回答：“锯大缸”、“牧羊圈”、“金水桥”等都是他们为村庄编的暗号。

“干么活儿去”——问具体任务。回答：“咱一块做趟买卖”——是说目标已定，捉人或抢物。回答“剪子”——即是对付匪伙。回答：“碰到么赚钱就办么”或“一撇子钞，一撇子活”——是说：“找不到或没什么目标”。

“是办绸缎还是办虾酱?”是问上北还是上南?

“打点野食吃”——是说去“绑票”。

“草灭了”——是“杀死人”或叫“撕票”。

“卖票”——人质放走。

“贴贴饼子”——是“动刑折磨”。也叫“溜秧子”，“溜票”。

“挂笼子”——是割下人头，挂在门上。

“办了”——即强奸了。

“赶赶蛋儿”——即轮奸。

“穿上大褂”——即活埋。

“哨他”是跟踪追捕。

“砸旺火”——即武力抢夺。

外地匪伙比如东北胡子与内地匪伙会面，胡子先问：

“是捅子捅还是镲子撩？”同时扬扬胳膊。这是问对方“当地的还是外来的”。内地匪伙回答：“板子板，摇子摇”同时哈哈腰，是说“我们是内地”。

如内地人先说：“怕狼怕虎不在山上住？”是问：“你是胡子吗？”胡子即回答：“虎吃人，狼吃鸡？”意即“我们是胡子，你们是内地还是外来？”

“俺家姨想走一步。”意即“我想投降你们。”回答：“先过食盒，后过嫁妆。”意即“先把武器缴了。”

“野鸭子满世界飞，飞到哪里也吃食”——意想见一下头目。如回答：“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雀”意思是说“先不能见”。如果回答：“玩蛋的，丫巴不是好玩艺儿？”就是说“可以见”。

二、抗日战争初期的主要盗匪团伙

1937 年下半年，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大沽口、塘沽、烟台、龙口等地，驻守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区的国民党海军沈鸿烈部弃海逃走。国民党设在海上及沿岸港口的政权和海关行政机关都封闭门户，文武官员纷纷遁逃，冀鲁边沿海处于极端混乱的局面。海域、岸边、草洼除了那些老牌的大匪盗，又冒出各色各样的杂牌武装。诸如张团、小红字、陈二虎、冯冠奎、冯铁匠、王小黑、大金牙、大镰把、二镰把、槽叶子等不下百八十股，各立旗号，自封司令。群众称为“兔子王八满地跑，土鳖司令如牛毛”。各匪伙经过互相兼并、生生灭灭，到 1938 年形成势力最大的九股。现将匪首及他们发展过程介绍如下：

一、老牌海匪傅瑞五部，匪首号傅老七。有千余人枪，有船队，占据鲁北、沾化、无棣一带沿海及海域。傅瑞五是山东省沾化县傅家庄人，自幼家贫如洗，生活困难，无一定职业，到处流浪。十几岁加入匪伙，后与妻子双双作案。1931 年 8 月的一天，两人混入天津港口内，偷偷登上一艘叫“顺天轮”的英国船，暗藏在货舱内。轮船驶出大沽口，傅与妻子突然出现，各使双枪，将商船劫持到陶儿河口，掠夺了船上所有财物。自此，傅瑞五的名字，震撼渤海。其他零盗散匪，纷纷投奔入伙。

英驻我国使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惩治罪犯，赔偿损失。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布通缉令，捉拿傅瑞五归案。傅当时已有相当势力，痛恨官府，曾纠集沿海匪伙，袭击国民党沾化县城，将国民党部书记赵载方及其工作人员 10 多人杀死。自此，与官府更结下不解之怨。傅瑞五极力扩大势力范围与官府对立。他生活腐化，抽大烟、有小婆。抗日战争爆发，他更加活跃，兼并其他小匪伙，成为渤海西岸的一大霸主。

二、窦同义部，500 余人枪，活动在岐口海岸与南北大港的洼边。窦同义，又名窦森荣、窦志明，天津市大港区窦庄子村（先后曾为沧县、黄骅属地）人，1904 年生，幼时家贫，无土地。12 岁丧父，16 岁开始当雇工 10 余年，后开过小铺，贩卖过牲畜和大烟。

1930 年前后，在窦同义为地主窦广波扛活期间，不断替地主外出迎亲送友，与羊三木村（黄骅市属地）惯匪李善栋结识，来往密切。1935 年李善栋为与土匪拉拢关系，给窦同义 220 元银洋，委托他买一支二把盒子，送给小站土匪李秀山（秃三品子）。窦同义照办。他在青县买了枪，亲自给李送去，从此与秃三品子取得联系。后经李善栋介绍，窦同义又先后与匪首马青林、丁高三、刘荫亭等结识。此后窦与各匪伙的联系日益密切，经常往来于匪伙之间，干些窝匪说票的勾当。1936 年为匪首刘荫亭藏了几枝枪，被

官方发觉被缉拿，窦同义逃遁到小站，招兵买马，行凶作恶，开始了他的土匪生涯，抗战前夕已发展成上百人的武装。1937 年 2 月 17 日（农历正月初七）夜，曾率匪侵入马庄子（黄骅城东），烧房 18 间，烧柴垛 50 多个，枪杀居民 3 人，打伤 4 人，绑去 20 余人。经一月余，被绑去的 20 多人才用银洋 5 万元赎回。后经保安队围剿，逃往天津潜伏。

1937 年七·七事变后，窦同义与土匪段胜军合伙，以抗日为名，在天津南部和黄骅沿海一带，重新组织土匪队伍，由五六十人，二三十支枪，发展到 500 多人，号称救国军。段胜军任团长，窦同义任营长。救国军不打日本，却四出绑票劫财，当年绑了小站太昌和姓刘的人，要了 5000 元；在杨木头绑来 10 几人，扣押逼钱；曾在西崖庄拉去家具 80 车，大枪 40 支，子弹 100 粒，皮箱 4 个，金银衣服等。还将缉捕过他的新海县（现黄骅市）保安大队长刘文彬由新海城内劫至岐口，用竹签刺 10 指，铁丝穿鼻目，钢刀刮两腿肉，然后枪杀。

1937 年 8 月 25 日夜，由新海县城东门外将村民王如松、王金声绑至距城 60 里之张皮庄、杨庄一带，严刑拷打，眼贴膏药，经一月，用 4400 元赎回。

1938 年初，窦同义与段胜军矛盾激化，段被迫出逃，窦同义升为匪首。为躲避日本侵略军的锋芒，暂时驻扎岐口一带海堡村庄。

三、李景文部，有 200 余人枪，活动在岐口以北至小站的海滩及大草洼里。李景文又名李二，群众叫他李二猴子，系黄骅市岭庄乡中王曼村人；28 岁那年包下替盐山县官方到海堡收“落地税”（渔民将捕捞的海货由船上卸下来要向政府交纳的税，是盘剥的一种形式）的差使。一年下来，赔了钱，转为跑行商，到沧县一带贩卖鱼虾。

经商期间，李景文便与土匪不断勾勾连连。1936 年在家乡为

土匪马福林窝藏枪枝，被国民党政府发现，下令缉捕他。李景文便跑到小站，与当地一些散匪和无业游民搭伙，开始收买枪枝，以大草洼为穴，组织起50余人，李被推为匪首。在天津南郊及沿海一带，打家劫舍，绑票敲诈，为非作歹。曾在小站镇向居民勒索大枪7枝，稻米28石；在塘沽绑架7人，逼交大量财物。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打出救国军的旗号，招兵买马，搜罗乡间无业游勇，吞并小股匪伙，独霸津南沿海草洼。

1938年日本兵由城市向农村延伸，李景文龟缩到岐口，与窦同义合起伙来，窥视形势发展。其主要骨干还有王二、李九勾子、谢宗仁、冯冠奎等。

四、陈二虎部，约三四百人和数十只船。他们以大口河为中心，活动在沽口以南到山东边境内一带海域。

陈二虎又名陈志芳，乳名陈法，二虎是外号，黄骅市羊二镇大马庄村人。他出身贫苦，14岁丧母，没念过书。近成年时因生活所迫随父到塘沽附近农村，租种菜园，难以糊口。1938年在天津一鞋厂当学徒时，参与学生救亡活动，被日本兵打散，便与同事张连举、吕树林三个结为盟友，连同哥哥陈志儒（陈大虎）、弟弟陈志彬（陈三虎）五人，买了5支枪，立志除霸安良，打劫富商，活动在天津郊外，与当地土匪秃三品子搭过一段伙。不久因不满三品子的某些行为，密秘串联，纠集亲信10多人，与秃三品子决裂，自立旗号，到大口河安寨，专劫往来商客及外地富豪，横行海上，继续发展势力。

因陈二虎穷人出身，又是新海县（今黄骅市）人，他一般不伤害穷人，不扰害周围村庄，所以当地人民反感不大；加上有一手好枪法，在土匪中也很有威慑力量，散匪游勇纷纷归顺，不久由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

此外，黄河口以北，到羊角沟一带海面，还有一股百十来人的海匪。匪首叫孟青文，外号橹叶子。这伙人海面活动较多，有

时也骚扰河口和内陆。抗日战争初期袭击过羊角沟码头，抢劫商店，放火烧掉商会办公室。

其他小股匪伙，如小红字、冯景太等为时不长，抗战初期被消灭，这里不再赘述。

三、我党对土匪、海盗的争取工作及其各部归宿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付全民族的敌人，对土匪、海盗实行争取、教育、改造的政策。我们针对各部土匪、海盗的不同情况，分别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分化了匪盗力量，壮大了抗日武装。其中不少人为抵抗日本侵略军做了许多有利的工作。但还有些人坚持反动立场，誓与人民为敌，甚至背叛祖国，与日本侵略军合流屠杀中国人民；还有的在解放战争中，协同反动势力，组织地主武装，反攻倒算，犯下了滔天罪行，最后终于落入人民的法网，受到应有的惩罚。下面把我党对各部匪伙的争取工作及各部归宿介绍如下：

与傅瑞五的斗争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占据鲁北海域的海匪已有1000多人枪，4个营的兵力。为了争取这支武装，我冀鲁边区党委先后派出无棣县委书记傅洁尘（即傅文沐），沾化县委领导人张荣廷、耿同临和军事干部贾乾瑞（我军某部营长）及大批地下工作人员，进入该部工作。经过长期反复细致的思想动员，傅一方面表示不妨碍我军行动，另一方面又不明确站到抗日阵营中来。这一时期，傅瑞五犹疑、徬徨，时而投靠国民党杂牌军鲁北保安第三旅，时而投降伪军，时而与我交结，政治上极不稳定。我党也采取观察、考验的态度，等待其觉醒。直至1943年2月，傅瑞五奉伪军司令刘佩忱之命，进驻我沾化县根据地外围董卜堂村驻扎，配合敌人

蚕食政策，成为抗日的阻力。这时我军才宣布发起对傅瑞五的进攻，消灭其一部，将傅瑞五生擒。

我军优待傅瑞五。经过8个月教育，傅瑞五戒了烟，思想也有很大转变，表示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斗争。经山东军区批准，将其释放。

傅瑞五回到沾化，重新收拾旧部，组织起600多人，步枪300支，短枪40余支，山炮7门，机枪7挺，举行起义。我山东军区对傅瑞五部正式命名为“山东抗日自卫队第三旅”，傅任司令员。后改编为“八路军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独立团”，傅任团长。政委翁默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青林都是我党派员。下设三个营，各营也配了政治可靠的教导员。从此这支部队正式成为人民的军队。日本投降后，傅瑞五任冀鲁边区海防支队参谋长。1946年土改运动中，当地群众强烈要求清算傅瑞五的罪行，傅在群众斗争中死去。傅瑞五所在部队战斗力很强，打了许多漂亮仗。解放战争中，进军湘鄂云贵，成为解放西南和建设西南的一支劲旅。

争取陈二虎及其误“走麦城”

冀鲁边军区成立后，我党派新海县长杨耀奭、民运干事傅近民赴渤海西部沿岸开展抗日工作。为了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扩大抗日根据地，决定争取陈二虎。

1940年8月，先后派敌工干部傅近民、高志平、周宝成等同志，与陈二虎谈判。这时陈二虎已发展到二三百人，控制着南起大口河，北至大沽口一带广阔的海面和狼坨子到白浪头150余里海岸线。经过半年时间的反复工作，陈二虎终于愿意团结抗日接受我改编，命名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海上特务团。陈二虎任团长，我党派出干部傅炳翰任政委。各连队也派出政工干部。为加速改造这支部队，军区又派出一批干部、战士充实其机关和连队，秘密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使军区正气占了上风。

海上特务团的建立，被敌人视为眼中钉。日伪多次清剿进犯，均被我军击溃，为巩固和扩大我抗日根据地起过一定作用。

但到1943年夏季，混入我军窃取115师教导六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要职的邢仁甫叛变，抗日力量遭到严重损失，陈二虎也迷失了方向。于1943年10月一天的傍晚率特务团的部分官兵，企图投奔在国民党杂牌军山东保安第六旅旅长张之良麾下；但还未到目的地就被张之良全军包剿。陈二虎同时被杀，时年26岁。

智擒孟吉文匪部

抗战开始，我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活动，多次争取孟吉文共同抗日；但孟吉文自恃力量较强，又有海上优势，既不断与日伪武装力量抗衡，也不接受我军团结抗日的意见。

至1941年9月，我军解放了黄河口以北羊角沟一带沿海村镇，孟吉文失去了归窠，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表示愿意接受我军改编，我军也表示欢迎。将其编为冀鲁边军区八路军海防大队第四中队，孟吉文任中队长。

但这伙海盗匪性不改，仍到处行凶作恶，渔民恨之入骨，强烈要求抗日政府严惩这伙匪徒。我党对孟部多次耐心工作无效。1942年冬，借海上部队返回陆地之机，在行署主任李人凤亲自领导下，定下周密计划。在佯为孟吉文部官兵"庆功"的大会上，使武器与人员分离。在我军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全部被擒。

这一手在渤海西岸震动很大，一些不肯悔改的匪徒纷纷向我投诚。余匪有的远走高飞，有的销声匿迹，沿海根据地进一步安定。

反复无常的冯冠奎

冯冠奎部本是抗战初期新海县出现的一股小匪伙，归属过李景文部，但能量不小，危害很大，又是直接杀害我冀鲁边党政军

主要领导人员黄骅、陆成道等同志的刽子手。

冯冠奎自幼生活在苇洼，打草拾柴。1936 年前后李景文在苇洼拉人马时，冯冠奎干上了土匪，因勇猛敢拼，枪法好，混上了个小头目。1938 年随李景文投奔二十一军，1939 年又当了汉奸。不久，因与日军发生矛盾，率其队二三十人向我军投诚，为我改编为冀鲁边区手枪队，冯任队长。

冯冠奎胆大手黑，作战勇敢。在我军阶段，摸据点、端炮楼，打了些胜仗；但由于他匪性难改，鲁莽粗暴，且朝秦暮楚，无一定立场，被大叛徒——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利用。1943 年 6 月 30 日，在邢仁甫的指使下，带 11 名贴身队员，骗过警卫，闯进大赵村我冀鲁边军区侦察通讯工作会场，开枪打死我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和军区参谋处处长陆成道、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陈彪、二股副股长崔光华、一分区参谋董兴根等同志，打伤我一分区侦交支站站长齐跃亭、二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刘金财、三分区司令部参谋迟麟兆、军区教育股长迟田等同志。这一惨痛事件，使我抗日领导力量严重削弱，军民情绪受到严重挫伤；而敌人则幸灾乐祸，日益猖狂。

1943 年 7 月，冯冠奎又带队投降日军，不久被日军杀死在盐山县境内。

收编窦同义、李景文及二匪的罪恶行径

1938 年初，日本侵略军主力部队沿铁路南下，偏僻的沿海滩涂有了一个暂时的平静，广大人民同仇敌忾，要求抗日。我冀鲁边抗日救国总会正在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对驻扎在岐口的土匪窦同义、李景文两部（李、窦结盟阶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争取工作。

1938 年春节前的一天，我救国会派 11 分会秘书辛国治、杨兴州等三同志，与李、窦反复会谈几次，解除了李、窦的重重顾虑，

接受我共同抗日的意见。我抗日救国总会向李、窦分别发了委任状，两部均为“抗日救国军”31支队所统帅。窦同义部为二十一路军，窦任队长；李景文部为二十三路军，李任队长。

两匪虽接受抗日主张，但匪性不改，继续干着土匪勾当，打家劫舍、抢男霸女、杀人放火的事件发生多次。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两部在政治上各自走上不同的罪恶道路。

窦同义表面受我党领导，但认为无油水可捞，暗中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联络，被委任为滨海游击司令，更加与我貌合神离，步步疏远。杨靖远同志牺牲后，窦同义即与我军断绝关系。1939年11月，窦率部随高树勋的十军团南下，编为“十军团第三旅”，窦任旅长。1942年于河南濮阳为日军俘虏，1943年释放，跑到天津潜伏。

抗日战争胜利后，窦同义坚持反党反人民的立场，于1947年4月出任国民党新海县保警队大队长，伙同汉奸、土匪、还乡团，与我人民政权为敌，在天津南郊和黄骅一带制造多起惨案，捕杀我党干部、战士、积极分子多人。

1949年春天津解放，窦在潜伏中仍造谣惑众，策划东山再起反攻倒算。1949年4月为我逮捕归案，11月判处死刑，1950年1月28日执行。

李景文则走上了叛国道路。1939年8月，率80余人向日军投降，编为伪新海保安队，李任大队长。但因得不到日军信任，不久跑到天津，又被在四堡当土匪的盟友谢宗仁请去，又当了匪头。1940年他又发展到300多人。

1940年11月间，日军奸细刘启鹏和汉奸李墨翰，奉日军之命，又到苇洼招降李景文，李率全军再次投降。这次，日军把李景文和城里的伪警备队合并，约500人，编成“华北新海反共救国军”，李为司令。下辖3个大队，9个中队，分驻20多个据点，成为日军得力帮凶。

日本投降后，李景文又与国民党特务、地主武装勾结起来，组织起“新盐（即新海、盐山两县）先遣军”，袭击人民政权。1945年末，李景文率匪到沧县，投奔国民党专员张福疆（又名张汉泉），被改编为国民党河北第二专署“保警第七纵队”，李景文任队长。

1946年2—3月间，李景文又勾结地主、渔霸、土匪头子组织起“还乡团”，捕杀我党政军人员及其家属，在津南、黄骅一带制造7次大惨案，直接或间接杀我干部、群众108人，伤13人。

1946年4月至1947年1月，我军同李景文作战几十次，最后在王徐庄彻底消灭了这支匪徒，李景文狼狈逃窜，潜入北平。1949年北平解放，李景文逃到沈阳潜藏，1951年被当地群众揭发，落入人民法网。当年10月10日被判死刑，时年51岁。

（河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回忆察北一带的土匪

忻　福

在军阀混战、日寇侵略、国民党统治时期，察北一带匪过如梳，兵过如篦，横征暴敛，民不聊生。

清末民初，朝政腐败，内忧外患，国家危如垒卵。军阀们为了各自利益，互相争夺地盘，从南方打到北方，由关内战到关外。当时察北的张北、康保、沽源、化德、商都、尚义、宝昌、多伦一带辽阔的坝上草原也成了他们争夺的战场。他们所到之处，横征暴敛，搜刮民财，敲诈勒索，骚扰百姓，给这一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些嘎杂子、二流痞、灰鬼、好吃懒做的亡命徒等，趁着朝政腐败和军阀混战之际，捡上军队丢弃的枪支弹药与一些游勇散兵相勾结，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由小变大，甚至有的发展成千人以上的大杆子。坝上的土匪便这样形成了。土匪越多，官府油水越大。今日清乡，明日剿匪，匪变兵，兵为匪，兵匪成灾。老百姓苦上加苦，闹得田园荒废，草原荒凉，牲畜被抢，家破人亡。特别是日寇侵华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土匪凭借着地理熟和手中有枪，被日寇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收编利用，充当了政治匪兵，成了破坏革命、镇压人民、杀害我革命干部的刽子手。

在察北一带著名的兵匪杆子头有：夜猫张、席仁义、二张飞、荣三点、白三阎王、张风鸣、秃宽元、罗德胜、花马老三、范栓林、苏美龙、曹凯、小五点、杨锡壶、左全、左六子、高七子、漂亮二子、郝继珍等。这些名噪一时的乱世枭雄多是投机钻营、看

风使舵、朝秦暮楚的兵匪草头王。有的后来改邪归正为民；有的互相火并而亡；有的在战斗中被击毙；有的在和平起义中回到人民的阵营；有的贼心不死，被我镇压；有的自感末日来临而自杀身亡。

清末至解放前，夜猫张和苏美龙是察北一带有名的两个土匪头子。

夜 猫 张

夜猫子姓张，名成德，又名张聪德。因他机警狡猾，善于夜间活动，对察北道路熟悉，他的部下给他起了个绰号："夜猫张"。张成德，1885 年生于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尚义县小蒜沟乡一个群山重叠、地势险要的叫作碌碡沟的村子。幼年家境贫寒，给其表兄王占奎家放牛放羊。十七八岁时走出山沟，经常与一些三教九流胡混，学了些封建迷信的所谓"八门套九星"的邪说。20 岁上开始离家在察北驻军丁统领（丁常发）的巡防骑兵部队当兵。由于他善于钻营肯出力，后被提升为巡防骑兵第三路第三营左哨哨长（相当连长）。后巡防骑兵解散。1921 年（民国 10 年）张成德在张北闲居，正值芦老七总团总（张北学堂地人）在张北筹建十甲保卫团，张投奔芦老七认为干爹，表示愿效犬马之劳。芦认为他对己忠诚，又当过哨长，有领兵之才，任命张为张、康（张北与康保）游击队长，并限额招编五十兵丁维持治安。张为了扩充实力，除收纳了巡防马队的旧部，还招收了四周的小股土匪七八十人之多，在康保土城子驻防。由于人马多，薪饷供给不足，就私自组织部下的二三十名兵匪赴热河一带贩卖大烟，刁抢财物，骚扰百姓，以补充军饷，中饱私囊。为此，引起了百姓、绅商、富户的反对，纷纷向总团总和张北县衙门告状。芦老七多次规劝，毫无效果。1923 年冬，芦与张北县知事以调张成德到县开会为名，将

其扣押在县衙门狱中，令其悔过自新。张的部下对扣押队长深为不满，多次为张鸣冤起诉，均无结果。腊月三十深夜，他们派爬旦张、瞪眼张、草包张、王占元、韩建业等10多名把兄弟，以探监为名，未发一枪将张成德从狱中抢出，连夜逃回土城子。又纠集了兵匪300多人，去学堂地将芦老七请上（实为绑架），哗变为匪。他们由康保到张北下坝转到崇礼，沿路抢劫，骚扰百姓，并把芦老七杀死在黑石坝的沙河沟里。1924年3月末，张北的官员看到张成德的人马逐渐增多，到处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扰乱社会治安，便呈报察哈尔省都统批准，派员将张成德收编为察哈尔省警备骑兵部队，并委任张为第一营营长，驻在张北与沽源之间的东二台。

1926年冯玉祥的国民军撤离察北。张成德乘机收罗了察北一带的土匪、游勇散兵700多人进驻张北县城，并派员去张家口向奉军高都统（高维岳）汇报军情，取得联系，得到高的信任。张成德被任命为察哈尔保安骑兵第一团团长。从此，张成德投靠了奉军。高都统为了扩大巩固察哈尔地盘，确保察北骑兵实力，于1927年1月从东北调来了俄国造的大连珠枪等武器，彻底武装了张的部下，使张的部队如虎添翼，成了察北一支兵强马壮武器齐全的部队。

张成德是个善于投机钻营、看风使舵的人。他对奉军武装自己的部队虽感到欣慰，但处处存有戒心，深怕有朝一日被奉军吃掉，就不断派人去山西与阎锡山联系，密谋投奔晋军事宜。阎锡山为了壮大自己势力，委其以少将旅长的头衔。同年3月底，张将部队从张北拉出，西经尚义、兴和、陶林等地到达山西的保德一带驻防。张成德被任命为晋军骑兵第七旅少将旅长。9月，奉军从东向西攻打晋军，张成德骑兵第七旅奉命还击奉军，一直攻打到张家口至下花园一带。奉军调集力量向晋军反击，迫使张成德旅退回山西的偏关周围，重新整编为两个团。韩建业（张北大囫

囧人）、董尚义（沽源长良人）分任团长在此整训队伍。

1927年冬，奉军三十一军军长郑泽山率领师长宝振荣（荣三点）、白凤翔（白三阎王）、刘利权等从东反击，一直打到偏关。在南城门楼上围困住张成德等九人，并喊话劝说张投诚奉军。张怕奉军报前叛变之仇，以手榴弹拼命抵抗。在重兵围剿、寡不敌众、难以突围的情况下，张以假投降带奉军一个卫队连回阳曲调所有兵员全部归降为名，一去不归。之后，双方互相激战一月之久，百姓深遭残害。

1928年3月，郑泽山三十一军从西往东撤离，张成德因不降归奉军有功，被晋军晋升为骑兵第七师师长。从阳曲往东开拔到察北一带驻防并奉命将部队整编为一师三营十二连。1930年，冯、阎联合倒蒋，通电全国。8月，张成德部队进驻张家口，张成德任察哈尔省警备司令。10月，奉军刘毅飞率部占领了张家口。张成德在幕僚们的出谋策划下，摇身一变，又投靠了奉军，仍任师长之职。调部上坝，搜罗土匪，拼凑武力，在张北一带驻防整编为一师5个团。王占元、张福元、石玉山、张甲清（张成德长子）等为团长。师部设在张北大庙院内。一团在张北西关的西营盘。由于部队不断地打家劫舍，捞取油水，引起了内部不和，发生了迫击炮连长李振连打死卫队连长大李瑞，带领2个连当夜逃到公会为匪的事件。张成德亲自带领石玉山一个团追击围剿，大部追回，一部击毙在公会滩。李振连、李荣、李永胜等4人逃到张家口上堡旅馆潜伏，后被查获，4人在张家口被枪毙。

1932年，张成德师奉命开到宝坻重新改编为两个团。石玉山、张甲清各任团长。张成德被编到万福麟部下当师长。后又开到河南潼关。他自感大权旁落，兵力分散，地理不熟，好景不长，就再次脱离奉军，投靠了阎锡山，被任命为长城游击队司令。因人马大部失落，只好重整旗鼓，招兵买马。经几年的活动，只拼凑了官多兵少、战斗力不强的3个团，到阳高、天镇一带开展所谓

的游击活动。1944年（一说为1939年7月）与我晋察部队发生冲突，激战一天一夜，被我击毙在人头山（一说为被我军活捉后镇压），了结了一生。

1945年8月，张甲清为给其父报仇，从山西到张北一带成立长城防共自卫军，自称司令，网罗地主、还乡团、旧部、土匪，四处活动，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与人民为敌到底。1946年夏天，伙同郑殿元（小五点）在张北、康保边界骚扰百姓，抢劫翻身农民胜利果实，破坏我新生的革命政权，被我军围追到叠不齐山上，张甲清被击毙。

苏 美 龙

苏美龙名义和字哲中，号美龙。1901年出生于尚义县大营盘乡白家村，虽出身贫寒，但自幼吊儿浪当，好逸恶劳。年长之后吃喝玩乐无所不好。因无正当收入，又不甘心受人欺侮，17岁就到离他家不远的生纪会，在武化龙的旗地保卫民团当兵，经常骚扰周围的百姓。19岁时与其把兄弟魏二民、张福喜、马四、小和和（张和）、小个老三（孙三），在后石庄井的水泉梁借看戏之机，以朝天鸣枪为号，大肆抢劫，开始为匪。他们昼伏夜出，小刁小抢并把周围的二斜眼（肖顺义）、洋烟二子、郝继珍、左全、杨老八（杨占山）、左六子等小股土匪收留入伙，发展到百人以上的杆子。在察北、绥东一带“请财神”、“绑票”、刁抢骚扰百姓，残害无辜，干尽了坏事。

察北、绥东一带的人民对苏美龙切齿痛恨，希望政府官兵早日将其剿灭。经百姓多次申报、请求，当时的政府曾派部队多次出动围剿。由于苏匪人地熟悉，神出鬼没，避强击弱，很难制服。有时苏匪故意给围剿部队丢下些烟土、财物、马匹，使围剿部队互抢财物而不追赶。苏美龙自感势力不大、武器不精，为了壮大

势力，于1926年，经人说合被热察绥招讨使署收编，并委以排长。苏美龙在招讨使署利用威逼利诱、拉拢的手段，勾结了一些兵痞，将其部下拉出，在绥东投奔了本家苏玉升部下，得到武器弹药等装备，并到处搜罗匪徒扩大队伍，逐渐增加到四五百人马。他为进一步捞取资本，丰满羽翼，派人四处交友，与当时的军界大小头目、政界的官长幕僚保持着接触。1933年趁靖卫军骑兵第二师胡文秀部配合同盟军攻打多伦之机，带部投靠在胡的部下，当上了团长，打着官军的旗号，干着明刁暗抢骚扰百姓、扰乱村庄的勾当，大发横财。1936年，苏乘日寇向华北大举进攻之机，将部队拉出，伙同小田有子投靠了蒙古骑兵殷宝山部下。不久，又见察北一带即将沦陷，德王投靠了日本，他又在化德投奔了石玉山部下。苏随着石玉山部由东向西撤退，沿路抢劫，收罗散兵、游勇、小股土匪约1000余人马，在河套一带驻防。后经傅作义整编为骑兵第四师第二团，苏任团长。肖顺义、洋烟二子、左全、罗进厅、夏三、杨老八、小张三子、苏七子、左六子、高七子等为连排长。这些匪徒们沿用了当土匪的那一套，磕头、拜把子，结盟为誓："安乐同享，患难与共"。当官的成天躺在炕上手抱烟枪，吞云吐雾，大吃二喝，陪伴着姨太太寻欢作乐。当兵的闲游乱窜、捡洋落、找外块、嫖暗娼、聚众赌博。1000多土匪人吃马喂，致使民情激愤，怨声沸腾。1939年傅作义任苏美龙为绥东先遣军游击保安司令。他不但不打游击，剿歼日寇，保卫绥东一带的治安，而是经常与我八路军康建民旅、黄厚部队发生磨擦。有时挂着打日伪的幌子，从西往东游击窜扰。到察北一带汉、蒙民村庄，大肆抢劫烟土、财物，捉马，赶牛羊，大发不义之财。他们碰上伪蒙军就虚打一阵，遇上日寇则望风而逃。就在这国难深重的年月里，察北人民除了受日伪政权的压迫，缴纳重租、苛捐杂税外，还经常遭受苏美龙匪徒的骚扰抢劫。1939年至1944年之间，察北以及内蒙镶黄旗一带，曾多次遭受苏美龙匪徒的抢劫。被抢财物约

计牛羊上万、马匹近千，烟土、白洋不计其数。马匹补充了匪队，牛羊除吃外变卖钱财，烟土、白洋带回河套供大小匪徒吃喝玩乐和向其主子国民党头目献媚邀宠，请客送礼，以求荣升。苏美龙每次都是由西向东窜扰，进村后抓人遛马应差，拉伕铡草，号房点灯，抽大烟过瘾，大吃二喝。而后是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搜寻白洋、烟土，奸污妇女。临走时鞭打枪戮百姓，牵马赶牛羊，弄得村村鸡犬不宁，户户洗劫一空。老乡们对他们恨之入骨，气愤地大骂："苏美龙，官土匪，丧尽天良！"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对拉拢收编的土匪加强武器装备，扩大队伍，封官加爵，委苏以第十二战区先遣军司令，利用这伙土生土长、人地熟悉的土匪和广阔的察北草原，东扰西窜，抢夺我抗战胜利果实。1945年秋，苏美龙占领尚义一带，后被我军击退。其又对我地方武装和刚建立的区村政权进行骚扰破坏，经我军围歼追击，龟缩在绥远。

1949年，苏美龙在绥远参加了九·一九和平起义。1951年1月，董其武的二十三兵团六十九军骑兵旅长乔汉斌（凉城人），副旅长苏义和（苏美龙），由绥远开往河北省衡水整训。在民主运动中，苏美龙由于对我党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认识不够，不愿弃旧除恶，悔过自新，而服毒自尽。为了落实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经六十九军与地委统战部批准，尚义县政协与统战部于1984年10月8日派人到白家村对苏美龙的亲属和乡亲们进行了工作，并在埋葬苏美龙尸骨的地方，立起"起义军人苏义和之墓"的墓碑。

（河北省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坝上土匪

郭郛

坝上草原匪的形成，是与坝上草原地域偏僻，军事地位、畜牧比例大等原因分不开的。

地域偏僻使得股“匪”乃至大集团“匪”能够在此从容地休整，利于分散、隐蔽和聚集。地域偏僻使官府鞭长莫及，便于一些犯事之徒来此隐匿。

军事地位主要是指民国初第一、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九·一八事变以后，奉军、日本关东军入关都从此经过，使得这里的情况发生变化，由于遗散枪支弹药多，为“匪”的兴起提供了可利用的条件。

更主要的是，坝上草原有马，马在当时战争中是举足轻重的。不管是清朝政府，还是军阀各系，乃至散兵游勇都拥集到这里。由于他们的到来，由于草原上马对各类人物的重要，这就使坝上的匪势烈焰一样蓬勃起来，一至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要发财去拉杆，拉小杆坐小官，拉大杆坐大官”。这是坝上草原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另还有“山秃地平水倒流，不出将相出贼寇”的歌谣。

大的土匪曰“杆”，小的叫“二棒手”。

旧传坝上有72杆，但不仅仅这些；“二棒手”之类就更多如牛毛了。

土匪的头，土匪黑话叫“老爹子”，或叫为大当家、二当家

（副手）或大先生、二先生（副手）。

土匪的黑话很多，如：绑有钱人叫“绑票”；把有钱人住的地方叫“洋棚”；暗探叫“拉线的”；说客叫“说线的”；白皮烙饼叫“白张子”；吃莜面推窝子叫“瓦楞子”；叫莜面鱼子为“盘龙子”；白面饺子叫“漂子”；煮饺子叫“天鹅下蛋”；马鞍子叫“宝盖”；打仗时军队多少，称为“风硬”、“风软”；撤退叫“出水”；走漏消息叫“走风了”；抢了东西分叫“清身”；不当土匪回乡为民叫“洗身”。

土匪每到一村喊趟子：某某字树大叶儿茂，借贵字名气“活摇活摇”。

小杆靠大杆住的地方，叫有靠山怕什么风硬风软。

土匪与土匪一见面首先问：“你是什么万字”等等。

在坝上活动过的土匪很多，这里仅把收集到的摘录如下：

白三阎王：热河省人，从小就拉起了土匪，为惯匪，是华北北部有名气的土匪，人数最多达1300多人。

杜贵芳：本地人，民国22年在小河子自卫团当过官，后为匪。

唐二虎：原为多伦统领，娶本地女人。

刘桂堂：山东惯匪，绰号“刘黑七”。

郭大元：在小河子当过官，后为匪。

冯贵芳：即冯七点，在民国14年在过沽源县县大队等，后为匪。

曹老七：怀安人，自幼放猪，后为匪，匪队300多人。

刘壮斋：丰宁人，以抢牛为主，到张家口、天津出售，有270多人。

李景春：天津人，匪队200人。此匪队为害最深，抢男霸女，曾抢内蒙古太仆寺旗七号一村女为妻。沽源曾有民谣：“二块糖（唐玉林、刘桂堂），一根葱（李景春），可把沽源害了个穷。”

冯占海：丰宁人，100多人。

李进春：多伦干沟人，100 多人。

大明字：西口人，是大杆子。

小明字：大杆子。

牛排长：多伦人，日本统治时当过排长，后为匪，曾跟冯七点干过，后另立一股。

杨半武：不详。

刘疯子：不详。

幕子：不详。

刘七点：康保人，即刘世喜，300 多人。

小五点：名宋佃成，张北人。300 多人。是坝上有名的大杆，对小五点传说很多，此处就不取了，只取一句民谣："娶的'万人迷'，骑的水上漂。"是说小五点曾娶"万人迷"为妻，他的马叫"水上漂"。

"胡字"：宝昌人，其他不详。

"九江"：姓胡，围场人，有名的杆子头，专抢蒙古人，不绑票。常活动在内蒙五号、四号，沽源米地沟一带。

女司令：沽源石头坑人，原被土匪抢走，强逼为妻，后洗手不干，回家后依然与土匪有联系。

张喜元：不详。

吕小二：沽源长梁人，从小打猎，枪法极准，家被土匪抢了，一气之下拉起土匪，当时 40 多人，后发展到 800 多人，抢过后套，后投靠日本人，病死，埋在狼尾巴山。

"三财字"：150 多人。

贾副官：70 多人。

"梁字"：即梁玉隆，丰宁虎盆沟人，后为"杨锡壶"一大队长。

"三排长"：后投"杨锡壶"。

张虎成：丰宁黄旗小形蛋人，匪队 70 余人。

“金八点”：东北人，100 多人。

耿英：50—60 人。

孟兆德：大二号人，后为“杨锡壶”的中队长。

夏仲玉：大二号二十四号人，带 30 多人投“杨锡壶”，委为大队长。

赵德承：十八号人，30 人。

王队长：丰宁滦河川人，绰号“王缺爪”，70 余人匪队。

孟排长：山东人，1000 多人。

任海：围场人，300 人。

“草上飞”：40 多人，从南边来的，全是 15—18 岁的小孩土匪。

“二张飞”、“三张飞”：哥俩，大阁人，有 300 多人，哥俩都会武术，来此贩马、牛，到张家口卖，叫土匪抢了，遂拉起了杆子，打死了几个杆子，把残部收拢一起，专抢牲畜，也贩牲畜。

黄天霸：100 多人，民国 25、26 年被日本人抓住打死。

“九州”：丰宁坝里人，50 多人。

女盖七省：南边人，80 多人，时 30 多岁，有 20 个女护兵，长的都非常俊。每到一村专吃小鸡。

“小合子”：100 多人，民国 15 年烧丁庄湾，13——50 岁的女人多被奸污。

大喜字：不详。

东霸天：围场人，为股匪，计 50 多人。

小白龙：不详。

大圣字：不详。

山东老七、山东老八：哥俩，共计 400 多人。

楞李：400 多人。

赤洪斌：80 多人。

小英字：150 多人。

炮炮字：60 多人。

“铜酒盅”：即“丁”字，一杆两号，120多人。

还有不知情况的匪队有：张喜春、白木匠、四张飞、老五点、北霸天、高文贵、逭启等等。

（河北省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丰宁匪患述录

李亚平

丰宁历史上的匪患，与烟毒、疾病一起，被称为“三害”。“三害”之中则以匪患为首。因其涉及范围广泛，活动猖獗，从而形成“无匪不成丰”的民谚。因年代久远，资料残缺，匪患情景实难全录。仅能以只鳞片爪，供窥一斑。

一、匪患的成因

丰宁土匪为害由来已久。远无可考，自1928年汤玉麟当上热河省主席后，横征暴敛，搜刮民财，敲骨吸髓，不择手段，他在民国18年，就把民国30年的地税提前征收了。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揭杆聚众，弃家为匪的人与日俱增。当时，丰宁境内土匪遍地，多如牛毛。“杆硬”、“字号”响的大股土匪有二虎、二张飞、荣三点、四木匠、五喇嘛、五八音、小老刁、小和字、大福字等几十股，其他股匪不计其数。伪满倒台后，丰宁更是土匪蜂起，匪患成灾。历史上丰宁多匪，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丰宁多密林大山，地广人稀，交通闭塞，既便于土匪活动，又便于土匪藏匿。地域偏僻也易使散兵游勇、人命案犯来此逃避。干沟门、四岔口、滦河川上下，仅1946年前后，就有大小股匪28杆。有的牛羊倌都成了“大当家”的。“单蹦”的“二棒手”、“砸

明火”的遍地皆是。另外，丰宁有广阔的坝上草原，盛产相对于土匪活动来说举足轻重的马，亦是形成匪患烈焰之势的重要条件之一。

2、土匪较集中的东、北部山区及坝上地区，是丰宁、多伦、隆化、围场等县的交界地带，距各县县城很远，行政管理鞭长莫及，无政府状态下的土匪活动，无所顾忌。加之以剿匪为名的“老汤队”、“保安队”、巡警队等政府军队，遇匪非但不剿，反而资助土匪枪支弹药。兵匪一家，互相勾结，同流合污，助纣为虐。因此，土匪更是肆无忌惮，胆大妄为。1930年，丰宁县长窦茂芳给热河省政府写报告说：“自直奉战争以来，屡有大军云集。军队愈多，匪盗愈重，军至匪窜，军返匪来，往返窜扰，迄无宁岁……”。1932年4月14日，丰宁难民代表陈致中给汤玉麟的信中说：“以保安队剿匪不如不剿……在丰隆交界处遇（小和字）大股三百余，同行半日，并未开火，各分南北而去。……（保安团）即回丰宁添领子弹。该匪（小和字）前因缺乏子弹不敢入境；今皆上饱子弹，到滦河川大肆抢掠。”凤山、大阁均为丰宁政治、经济中心，但同样是兵来匪去，逼粮要草，烧杀淫掠，作恶多端。驻防官兵，遇匪抢劫，隔岸观火，置若罔闻，更助匪患蔓延。

3、受落后的经济文化束缚和历史上土匪活动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当土匪“吃香喝辣”，钱物来得容易，因而形成许多土匪“世家”，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特殊职业。如横行于苏家店滦河川一带的土匪韩广仁，其爷爷、父亲都报过“字号”，举家为匪。许多百姓为求生活着落和身家安全，也混迹于土匪之中。亦有少数农民，农忙时为稼穑事，农闲时则从匪活动，聊补生活之不足。

4、伪满洲国垮台后，伪军警宪特、散兵游勇，变兵为匪。伪满丰宁县警察局炮手队队长李德林（李二麻子），原来就是土匪头子。日军侵占丰宁后，他即率匪队投靠日本人，认贼作父，甘为侵略军鹰犬。日伪倒台，他又率部窜回原来的活动地盘，继续占

山为寇。我军西撤时叛变的区小队，以及反动地主武装伙会和国民党军队的溃兵等，为了逃避人民的惩罚，也落草为寇，成为建国前后一段时间内丰宁政治土匪的主要组成部分。

5、为掠夺中国经济和毒害中国人民，日本侵略者在统治丰宁期间，强迫人们种大烟，致使许多人吸毒上瘾。抽大烟没钱买，就“砸明火”、“打劫杠子”，以劫夺钱财和大烟为主要目的。这是形成小股经济土匪的重要原因之一。

6、丰宁原为伪满洲国西南“边境县”，日伪统治残酷、森严。我军解放丰宁不久又西撤，政权未及巩固，工作未及开展。国民党政府招降纳叛，利用土匪人熟地熟的特点，把土匪武装作为向我军进攻的先头部队。如1946年冬，韩广仁、于和匪队为国民党正规军带路，并配合在曹家窝铺偷袭我军黄河大队司令部，使我军遭受很大损失。国民党丰宁县长何文超，任用杀人不眨眼的惯匪王德才（王大刀）为自卫大队大队长，镇压和残杀群众。有了后台之后，土匪的气焰更嚣张，匪患的滋长蔓延更顺利。

二、土匪活动特点

“老中华”时的土匪，虽其中不乏溃兵和逃犯，但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由于饥寒交迫，为维持生计才铤而走险的。大股土匪多以“喊项”来筹集钱粮，即以“下贴子”（书信）或“说项”（口头通知）的形式，告知某一财主或商家于某日，把钱粮若干送到指定地点，并附以“如不照办，将如何如何”等威胁语言。一般被“喊项”的都不敢违抗。如荣三点“喊”偏道子大地主田功茂的“项”，田一次就用18辆牛车给荣送去了光洋和粮食。荣三点当过奉军师长，人多枪多，“杆子硬”，保安队、巡警队不敢招惹他。

小股土匪则靠绑票“砸明火”、“打劫杠子”等手段攫取财物，

解决开销。绑票，是将有钱人家的某一成员劫走作为人质，然后索价若干，让其家赎回，否则就“撕票”（将人质杀死）。砸明火即入户用暴力公开抢劫。匪徒多以偏远山村单门独户为抢砸对象，进门先将其家人“盘”（绑）起来，然后拷问存放财物之处，乱翻乱拿，什么都要。1946年农历端午节的前一天夜里，天桥龙潭上天桥沟佟九洲家，闯入几个蒙面的彪形大汉，把佟家准备过节的粘糕、豆腐等物悉数抢走，所幸佟家无人丧命。打劫杠子是匪徒在行人必经之路的偏僻处以暴力公开抢劫，对象都为客商。土匪都是以抢劫来的不义之财，作为挥霍与养家之资。大股土匪，也去内蒙草原抢劫马匹、牛羊，赶到口里出手卖掉。那时的土匪，除个别有私怨参加匪队以图报复外，多以抢掠财物为主要目的，政治倾向不明显。

伪满垮台、特别是二次解放前后，丰宁土匪组织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溃退前，有计划地留下了相当一部分残余势力，如吕明月、王德才等反动武装。他们串通土匪，袭击区村政权，捕杀革命干部，破坏生产建设。吕明月率匪队驻在多伦附近，挂了个国民党军大队长的头衔。无论大小“杆子”，只要赶牛到那里，他就换给枪支弹药。一条大牛换一支步枪和七八发子弹。还有从沈阳、平津逃匿来此的国民党溃军，如蔡树廷等，也拉杆为匪。他们有一定的装备和军事技术，剿灭他们十分困难。更多的土匪头子是在土改中被斗争的恶霸地主，如韩宗奇、韩国祥、王凤鸣、“小喇嘛”董锡瑞等。我军西撤时叛逃的区小队成员，为了逃避人民的审判，也加入了土匪行列，继续与人民为敌。上述这些人员的参加，改变了土匪队伍的性质。这时的大多数匪队，就成了由国民党特务操纵的，以反动地主武装为骨干的，以捕杀我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破坏土改、搞阶级报复为目的的政治土匪。他们比经济土匪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在经济方面，没人为他们补充给养，只能靠抢掠维持。因匪队骨干有极强的报复心理，所以，

他们抢掠财物比经济土匪更凶狠，赶牛羊、剥衣服，心狠手黑。

贪得无厌是土匪的共性。他们见利忘义，食亲财黑，无论到哪里都是专拣好的吃，见了值点钱的东西就要据为己有，弱肉强食是土匪的拿手戏。极少数“杆子”，如佟福队，还有些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江湖义气”，不在家乡骚扰抢掠。但大多数匪队，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匪首韩广仁是小庙子村人，属他糟害当地老百姓厉害。解放后，群众把他的全家镇压，足见其民愤之大。

参加匪队要入股，有人股、枪股、马股之分，抢来东西按股分赃。匪队往往因分赃不均而“炸杆子”（自相火并）。各“杆子”之间，表面上“称兄道弟”，义气十足；暗地里各怀鬼胎，互相倾轧。吕明月与韩广仁“磕过头”（结拜），但也是明争暗斗，心怀叵测。吕为控制韩的队伍，派其表弟去韩队“作眼”（当奸细），被韩寻机除掉。又因韩打着吕的旗号“喊项”和调戏吕的亲戚，吕怀恨在心。后来，吕明月把韩暗杀在石家马群，吞并了韩的人马。至于“大鱼吃小鱼”的事，在各“杆子”之间更是屡见不鲜。

土匪活动昼夜不定，出没无常。每到一处都是人手不离枪，马不揭“宝盖”（马鞍）。不分何时，老百姓看见土匪进村，跑不及就得赶快给土匪遛马、做饭。稍有怠慢，就被“盘”起；轻则非刑吊打，重则送了性命。

不论经济土匪还是政治土匪，都是掠抢烧杀，作恶多端，对社会秩序、人民生命财产及社会生产力的危害性和破坏性极大。后者尤甚。

三、土匪罪行择录

从“老中华”至全县解放，丰宁境内大小土匪几百股，总计数千人。土匪所到之处，无论城乡，绑票抓人，拦路抢劫，杀人害命，奸淫妇女，砸店铺，抢商号，赶牛羊，烧房子，无恶不作。

杀人手段之残忍，抢掠财物之残暴，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今仅择录几例。

1923年1月23日，大阁镇土匪蜂至，大肆抢掠，打死商民20名，重伤24名；绑去男女人票10名，焚烧房屋118间；1933年1月6日，土匪“二虎”杆子杀进大阁街，烧毁房屋200余间，抢去财物无计其数；同年3月4日，土匪“大拨”千余人，进凤山街抢劫商号财物。至于抢村庄、劫民户的，几乎天天都有。

匪首韩广仁，马后驮一小铡刀，常以铡人为乐。他手下有一绰号“干尖子”的刽子手，每铡一人，韩广仁就赏他一两大烟土。我军西撤后，他铡了苏家店的农会主任，以后又铡了许多革命干部和老百姓。韩队每到一村，即骑马绕村高喊：“人吃饺子马吃料，鸡巴硬了找×操。”奸淫妇女无数。一次，韩在某村，把一青年妇女扒光上衣，挂上马戴的串铃，让她给搓“盘龙子”（莜面鱼子）吃。那妇女双手一动，身上的串铃“哗哗”作响，韩匪则坐在炕上哈哈大笑。韩匪此类罪恶，不胜枚举。

日本投降后，坝上大河西村的郭云峰，为防匪用大烟土换了3枝“毛提溜”（毛瑟枪），后来出手卖掉。此事被坐地为匪家居三道泉子的孟妞子闻风，即纠集散匪10人来到大河西村，抓住郭云峰父子，严刑拷问，逼要枪支。先用皮鞭抽、凉水灌；后来扒光郭云峰父子的衣服，用烧红了的烙铁，在两人的上身烙出背心样的形状。郭氏父子皮开肉绽，伤口流出黄油，痛得死去活来。幸有我察北骑兵团闻讯，飞马赶去，击毙土匪。但因伤势太重，郭家父子悲惨死去。

1947年秋，匪队于白团袭击双井子村，将穷苦百姓的牛羊全部赶走，连个牛犊羊羔也没剩下。同时抓走村农会主任刘永和。土匪将刘带到大库乱，进行审问。与于白团一起来抢牲畜的双井子村逃亡地主苏贵，对土匪头子说：“这是敝村的农会主任，请多加‘关照’”。匪首一听，立令严刑拷打。以后每到一处，土匪就让刘

永和推碾子轧莜麦，每次都有4个土匪站在碾道旁用鞭子抽打着让他跑。干完重活，就让他吃胡麻秸、莜麦糠，说是喂八路军的"牛"。经过残酷折磨之后，将刘永和杀害。

惯匪白云瑞，穷凶极恶，心毒手狠，仅1946年上半年，他就"砸明火"30余处，打死我村长一名。我军西撤时，他组织土匪，袭击马架子金矿，将金矿负责人董殿凤等杀害。而后，又围攻我热西分区供给处，打死20多人，抢走大小枪支70枝、布2000多匹。并把俘虏的3名妇女干部屡屡强奸后，分给手下土匪当老婆。凤山二次解放后，他与惯匪王德才、李振堂等勾结，搞特务、暗杀活动。1948年阴历九月，他伙同土匪王景华，将丰宁七区组织委员李璞暗杀。并联络其他土匪准备暴动，攻打我区公所。

土匪兼国民党特务杜宝亭，原系伪满警察。1946年率匪袭击四岔口区公所，亲手杀害区委书记孙继良和其他3名区干部，将他们的头颅割下送国民党处报功。此外，他还亲自杀害我军被俘战士3人，普通老百姓3人。仅这一年，他就有10条人命的血债。另外，抢劫大牛142条，羊600余只，尚有骡马、布匹等财物。

站坝头"打劫杠子"的"二棒手"高宪荣，被人民政府处决时仅23岁。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打死打伤过往行人25名，抢劫大烟82两，布43匹，棉被褥55条，皮、棉衣22件，大牛3条，粮食150余斤，银钱若干。1948年8月29日，他用闷棍将邮局交通员打伤，抢去枪支准备继续为匪。

1950年农历五月初四，丰宁残存股匪晏成元等5人，窜去内蒙，在距贝子庙100余里处的公路上，拦劫跑运销的牛车12辆，将赶车的12人用铁丝拧住，当即挖大坑活埋。共劫走牛车一辆，蒙古皮靴31双，烟叶190斤，砖茶400斤，布4匹及其他物资一部。

其他土匪如王德才、吕梦更、吕明月、蔡树廷等更是惨无人道的家伙。他们抓住区、村干部，不是用刀子割、剪子剪，就是

用绳子勒、石头砸，杀人如麻，不计其数。一次，农民范广祥挑葡萄去城里卖，不幸遇见杀人魔鬼王德才（王大刀），硬说范是“八路探子”，不容分说，当下被王砍死。1948年1月30日，王德才指使匪徒将我被俘区长李玉青等3人残酷杀害后，王德才竟用日本洋刀将烈士的眼睛剜去，胸膛剖开，摘去心肝！

至于土匪强奸妇女，更是不择手段，形同禽兽。滦河川某村一青年农民新婚之日，正请众乡邻喝喜酒，忽有杆匪30余骑至，众人躲散。新娘子逃避不及，落入匪手，被众匪打了“排子枪”（轮奸）。待匪离去，新郎等回至家中，新娘已奄奄一息。

至解放前夕，丰宁百姓被国民党兵和土匪糟害得已到了尽头。滦河川和坝上地区，绝大多数农民身无遮体衣，家无隔夜粮。十七八的大姑娘没衣服穿，不是稀罕事。有的人家，在屋内挖有大坑，逢有人来，女性皆蹲入坑内，避身遮羞。苏家店这个近百户的村庄，被土匪抢得只剩两条不能使役的牛犊。春天种地，只好用人拉犁。

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生活，丰宁人民已经是苦不堪言，匪再到处骚扰为害，使人民更是冰上加霜！所以，解放之初，根除匪患成为丰宁人民最强烈的要求。为此，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在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积极支前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了5年多艰苦卓绝的剿匪斗争，从根本上解决了匪患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社会出现了空前的安定局面。“无匪不成丰”的这句老话，随着剿匪斗争的最后胜利，变成了历史的陈迹。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政协　供稿）

简谈康保的匪患

杨在泉

解放前，康保的土匪逞凶于察北，传闻于塞外，有的竟成为骄横于世的风云人物。在民间，许多匪首被涂上了魔鬼般的传奇色彩：如匪首“夜猫张”，被传说为出生时贼星落院，寒光四射；其人视力极强，夜观物如同白昼；他的马，蹄似月牙儿，能日行千里。匪首“小五点”，被传说其坐骑跑起来似白龙腾飞；他还能在马背上举枪点射房檐头，一个不漏，千军万马难以阻挡。匪首“漂亮二子”被传说为相貌出众、智力过人……。

所有这些，其实是匪徒间的互相吹捧，恫吓于人，以致造成了民间的以讹传讹。这些亡命的“草莽英雄”，在人民武装面前，如同八百万国民党军队，个个都逃不脱覆灭的命运。

不过要说其对民间的危害，实是罄竹难书。他们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兵匪不分，有奶便是娘；他们烧杀奸淫，鸡鸣狗盗，恶事无其不做。有的公开举旗拉杆；有的暗里打家劫舍；有的明火执仗抢劫；有的昼伏夜出行凶。解放以前，确实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产生过一定的阻力。在剿灭这些顽匪的过程中，我们也曾付出了不少流血牺牲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我方仅康保籍牺牲的人数达167人，其中多数是在剿匪斗争中牺牲的。土匪在康保县制造了“刘二营惨案”、“丹清河惨案”、“大盐淖惨案”、“大沟房惨案”等。我们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惨死于土匪的屠刀之下。为了使广大青少年

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使人民进一步认清土匪政治上的反动性、活动中的危害性和手段的毒辣性，特将康保县土匪的来龙去脉及其凶残狠毒剖析于世。

乱世中寄生的蛆虫

康保的土匪由来已久。20世纪初期，就有东北窜匪李景春、“小老耗子”、“金翅雕”在康保一带骚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又有“夜猫张”、“左六子”、“高七子”、“漂亮二子”、“袁焕”、“赵三”、“张三”、郭应征、孙占山、“小五点”（宋殿元）、“支二孩子”、“大黄风”、“二黄风”等大小杆子数十支，经常活动于此地。大杆子多则数百人，小杆子少则数十人，也有拉不起杆子，三五成伙拦路抢劫的“二棒手”。

康保的匪患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军阀混战时期的散兵游勇，在战乱中拉起杆子，按“有枪便是草头王”行事，狠发国难财。

二是直奉战争中，奉军败退，许多士兵化装逃跑，途经康保时扔下不少枪支弹药，为当地一些地痞流氓为非作歹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使少数被生计所迫的贫苦人走上歧途。

三是在第一次解放康保时，我军曾对起义后的伪警察搞过一次下枪改编，正在南门外交枪时，城东南角炮楼上突然打起了机枪（肇事者及其原因至今未搞清），队伍即刻大乱，混乱中大部分人逃跑为匪。

土匪多数是当地人，人熟地熟，耳目灵通，长年流窜坝上，骑马射击技艺较强，有的土匪还在各地布下了许多耳目和暗线，互相联络均用暗号和黑话。如夜间相遇、情况不明时，双方均先开枪射击对方马蹄，以确定敌我；通常联系的暗语是：“吃横饭”（意指土匪）、“入水”、“出水”（指被围和突围）、“条子”（指枪）、

"瓢子"（指子弹）等。他们有时各股分散活动，有时又数股合流，使人很难摸清其底细。

反动派羽翼下的胚胎

在北洋军阀和日伪时期，反动政府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经常以供给枪支弹药和封官晋爵等手段，扶持拉拢土匪，形成了官匪一家的局面。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变本加厉地扶持、改编、勾结土匪，为其打内战效劳。如大匪首曹凯，在日伪时期曾被封为警正衔（相当于校级军官）；国民党收编后，又封他为国民党察哈尔省骑兵第二纵队上校纵队长兼康保城防司令。

1942年，曹凯在张北成立警察队，他又收编了不少当地的土匪杆子头。这些土匪摇身一变成了官兵后，实则比纯粹土匪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兵匪勾结祸害人民，把张北县城变成了土匪的巢穴，简直闹得坝上各县路断人行；特别是边远村庄，受害更甚。当时的民谣说："高吉盖察汗，大小英图；土匪刚走，大兵来住；宁让土匪住一天，不叫讨伐队（即指收编后的土匪队伍）打一尖"。匪首"小五点"（宋殿元）亦曾被封为国民党骑兵团长等职，他在坝上地区更是作恶多端。

康保县的土匪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政治土匪。专与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做对，此类土匪一般势力都比较大。

第二种类型是经济土匪。即以绑票抢夺钱财为主。

第三种类型是"二棒手"。此类土匪势力小，一般有二人合干的，也有三五人成伙的。这些人没有什么好武器，无力外出劫夺，但是分布较广，一般多出没在夜间，抢劫于个别边远偏僻村庄。"二棒手"抢夺钱财不多，却对社会安定危害很大，有些地方单人大白天都不敢走路，商人都得结伴同行，不然生命财产都难得保

障。

以上这些土匪在活动方式和意图上虽各有异，但在反共反人民方面却是一致的。特别是在我军战略转移期间，土匪则多属于政治土匪，专与我基层政权作对。那时，土匪比较一致的口号是"打关南人，拉本地人"。他们认为凡关南人多数来自解放区，与共产党、八路军有联系，因此，遇到关南人，无论是农民还是小商贩，除抢劫财物外，轻者打个半死，重者杀害；见了本地人一般是只抢财物(实际上拿不出东西照样毒打惨害)，或者逼人为匪。

小股土匪一般不敢与我正规军作战，专门袭击我基层政权，杀害我基层干部，使我区、村政权难于立脚。一些势力较大的土匪队伍多被国民党收编，他们使用的是国民党供给的武器，穿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打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执行的是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据我军一些指战员回忆，这样的土匪队伍比国民党军队难打，原因是枪法准且顽固。如1947年1月我察北军分区攻打康保城时，康保城内的敌人兵力约1000人，其中国民党傅作义部正规军十四纵队和骑五旅一部只有400人，其他多数都是匪首曹凯和"小五点"的土匪队伍。曹凯和"小五点"部在城内负隅顽抗，据城死守，与我军打起了几进几出的拉锯战，事后还受到国民党孙兰峰部奖赏。大股土匪多为骑兵，匪首多是死硬顽固分子，手段也很狡猾。他们在广阔的察北草原上与我军周旋，一但失利后，便西窜绥远，置于国民党军队的保护之下；认为有机可乘，便又窜回来。有的甚至持有国民党的委任状，收罗人马与我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充当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先遣队。

祸国殃民的群魔

土匪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威胁很大。匪徒所到之处，抢夺财物，奸淫妇女，要给养，要粮草，要大烟，拿不出来东西就施以酷刑，

吊打、用火铲烫、头朝下活埋，或者用铡草刀铡脑袋，或者把人活活钉死在墙上，有的还用铁棍插入人的肛门，把人捅死。据有关方面记载，匪首“小五点”（宋殿元）自己供认，他一个人就霸占了4个女人，奸污妇女300多人，其中闺女120多人；杀害我地方干部和战士100多人，杀害的群众和抢夺的财产都难以计数。

匪患弄得民不聊生，被土匪毒打是常有的事，许多群众被打后得了恐吓症。有些小孩子夜哭哄不住，若说声“土匪来了”，哭声竟能立止。有些村庄的人民，白天黑夜不敢入睡，昼夜派人在房顶上站岗放哨。一些年轻妇女为了免受土匪糟蹋，平日里只得装束打扮成老太婆，有的妇女一听说土匪进庄，就急忙往自己脸上抹锅底黑。为了少受土匪侵扰，很多人家把炕刨塌，自己把自己家折腾的乌烟瘴气。年轻人怕被抓走，土匪来时跑不迭便钻在炕洞里躲藏，有时被烟火熏死在炕洞里。有的被逼的没法儿，竟故意损坏自己的身体，落个终身残废。农民记述当时的匪患情况是：“土匪到庄，鸡飞狗叫，人心惶惶；后生遛马，女人被要，老汉孩子挨打”。在土匪的祸害下，群众好房子不敢住，好东西不敢用，好衣服不敢穿，好媳妇不敢在家；青年人不能戴新皮帽，老年人睡不了囫囵觉，老婆不能生好丫头，小伙子不能娶好媳妇；妇女们头不敢梳光，脸不敢洗净，刚刚买件新白布衫，赶紧在上面补块旧补钉。

广大人民受尽了土匪的惨害、警察队的蹂躏、乡兵的勒索，住的房没门窗，睡的炕没席子，家徒四壁，苦不堪言，不少人生活无着，只好卖地离家，远走他乡。

匪患，是解放前康保县人民的一大灾难，从康保建县起，各区、乡、村都成立过民团、自卫队、保卫团等类组织，对防匪治匪也确起过一些作用。然而，旧社会是官匪不分，相互勾结，互为利用，反动政府也从未对人民的疾苦真正关心过，要从根本上根绝匪患，实在是难以办到的事情。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贫苦农民翻了身，生产和生活有了保障，社会治安得到了整顿。经过几年的清剿斗争，直到1951年，终于将康保境内的土匪全部肃清，康保人民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河北省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河间务尔头村土匪始末

樵　夫

河间市西南16里的古洋河套里，有个务尔头村，解放前因村里出了两股土匪而扬名四乡。

座落在古洋河套里的务尔头村，村东隔河与周村相望，村西隔堤与肃宁河北乡的郭楼村毗邻。解放前，古洋河几乎年年发大水，一发水整个村子就被大水包围，庄稼被毁，颗粒不收。人们只好靠在河里打鱼摸虾为生。贫困、饥饿煎熬着务尔头村一代又一代人。到了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兵匪遍地。村里本来安分守己子弟，被穷逼的，被坏人勾引的走上绑票、劫道的黑路，把历来安静的村庄，搞得乌烟瘴气。

一、火烧尹家庙

尹家洼村外有座规模不小的庙宇。七·七事变前，这座古庙原本有个老和尚掌管山门，春秋祭祀之日，烟火还挺盛的。后来河间与献县交界的垒头村出了姓白名春辉、别号白七的土匪头子，带着一帮土匪强占了尹家庙，把和尚统统赶出庙门。从此，这座吃斋供佛圣地成了土匪窝。

白七个头不高，长得墩墩实实、胖胖乎乎的，一脸浅白麻子，贼眉鼠眼，手下有20几名喽罗，专在河间城以南、献县城以北劫道、绑票。后来，县上派马快班前来抄拿。为了不至打草惊蛇，又

要一网打尽，决计夜间乘土匪熟睡时包围尹家庙。一天夜间他们来到尹家庙，浇蘸着煤油的火把往庙岗前一投，火把首先点燃了窗纸，火苗腾地窜起，那些松木窗棂一遇烈火，猛烈地燃烧起来，刹时浓烟滚滚，烈焰冲天。当熟睡中的土匪被烈火烧醒时，早已分不清东南西北。土匪们被大火烧得狼嚎鬼叫，活活被烧死在里面。大火从半夜烧到天明。待火势渐渐减弱，马快们冲进庙堂一看，别说是肉生肉长的土匪，就是被他们掠来的数万块大洋，也在大火中化成银水。

白七却没有被大火烧死。这是因为他白天吃了一肚子西瓜，又喝了一肚子凉水，夜里跑肚拉稀，突然听到远处嗒嗒的马蹄声奔尹家庙而来。他做贼心虚，赶忙提起裤子，翻过庙墙，蹲到高粱地里拉屎，马队包围了尹家庙时，他拎着裤子顺着高粱垄逃之夭夭。后在务尔头村卢福庭引导下，来到务尔头村，和新结交的狐朋狗友继续作恶。

二、盟兄弟反目相残杀

白七来到务尔头村，住在卢福林家的后院里。白七和卢福庭、福林、福顺结拜成盟兄弟，卢氏三兄弟称白七为七哥。过了段时间，白想多拉拢些人马，经卢福庭引荐，首先结识了南辛庄村的郭曾，并纠集一批地痞流氓。又和务尔头南头的土匪头子王西奇结拜成兄弟。从此，南北两头，两股土匪，各立山头，有分有和。有时握手言欢，有时又反目为敌。

1937 年的一天，白七、郭曾、卢福庭听踩盘人（探子）回来说："七爷，后黑马村大财主刘家挺称落（钱），可刘家有胳膊（枪），怕绑不了。"白七、郭曾、卢福庭 3 人一合计，于是就来到南头找王西奇商量："大哥，后黑马刘家有生货（称钱），咱们一块去取好吗？"王西奇满口答应。但因前些天分赃不均产生了矛盾，

王明里答应了，暗中却派人悄悄告诉刘家说："明天夜里有上匪绑票。"并说如愿出钱可出他们护院。刘家一听，愿明着破点财，也不愿夜间让强人绑了去，就答应了。实际上，王西奇心怀毒计，想利用护院把白七一伙消灭掉，解他心头之恨。按照预先约定，这天傍黑在郭楼村朱家窑集合。白七的人到齐了，左等右等却不见王西奇一伙人，恰在这时，头上流动一块乌云，"咔啦"一声响雷，天上下起雨来。白七说："他们（指王西奇一伙）没来，天又下雨，咱不去了。"王西奇那一伙也白白在刘财主家等了一晚上。纸里包不住火，后来不知怎么这件密事走漏了风声。白七、郭曾、卢福庭知道后说："好啊，王西奇！兴你无情，就兴我们无义。"3人商量好坚决杀死王西奇。

白七派人告诉王西奇说："今天咱们做个活（说票）。都弄船去皇亲庄村南玉皇阁汇合。"王西奇多了个心眼，自己不去，打发韩三、韩小胖等3个人乘一只小船去了。白七一见王西奇没来，也起了疑心。韩三、韩小胖等3人下了船，来到玉皇阁正四处张望时，白七说："天不早了，该来了。"（指说票人）。郭曾听到这个暗号，叭叭两枪撂倒两个，韩小胖一见急了眼，立即勾动枪机还击，结果是个臭子没响，郭曾一枪打伤了小胖的胳膊，小胖为了逃命，扑通跳进水里。白七说："小胖，你快上来，我们决不怎么你。"小胖被捞上岸来，白七夺过他的盒子枪，退出子弹和撞针，让小胖拎着空枪跟着白七他们回来叫王西奇的门。此时王西奇正在炕上抽白面，身上只穿着个裤衩，听到小胖的叫门声，拎着一盏马灯就出来开门。王西奇把白七、郭曾等人让到屋里。白七把一面口袋钱扔到王西奇的炕头说："西奇哥你分吧。"王西奇伸手去摸钱袋，白七伸手抄起王西奇的盒子枪。王西奇一见不妙，就和白七折腾起来，裤衩也掉了。郭曾朝王西奇背后打了两枪都没过火，这时只听白七说："郭曾，还不快开枪打死他，要不咱们全没命了！"郭曾迅速退出枪膛里臭子，顶上好子，一勾枪机，叭的

一枪，王西奇扑通一声倒地而死。白七、郭曾接着叭叭一阵枪响，先打死了王西奇的老娘，接着又打死了王西奇的妻子、儿子。一共8口死在乱枪之下，倒在血泊之中。王西奇一伙的人早被吓慌了神。白七弄了条船，把王西奇手下20多个土匪弄到他的住处，准备杀死。土匪韩云芳说："七哥，咱们返回去，把他们打死在王西奇院里，就说他们互相残杀的，不会猜疑是咱们干的。"白七同意后，用船把他们又弄回南头，一阵枪响把20多名土匪打死在王西奇院里。王西奇一伙就剩下个叫齐万和的没死，因他和韩云芳是亲戚，开船时韩云芳说："你别去了，让他们去吧。"，因此齐万和这才捡了一条命。

王西奇一家还剩下两个10多岁的闺女，白七一伙为斩尽杀绝，把她俩用船载到河心扔下，白七又用船篙杵几下子，心想，准会淹死。不料这两个女孩子会凫水，顺水漂出5里多地，被打鱼的救上船，才幸免于难。

三、穿着军装绑票的土匪

解放前，务尔头村南北两头248户人家，就有2家打烧饼的，2家炸馃子的，2家饭馆，昼夜开着，供土匪吃喝。村里原来靠打鱼摸虾的也不摸网了，做小买卖的也不做了。大都干上了土匪这一行。土匪白七、郭曾、卢福庭等人，匪势越闹越大。他们开始冒充军队进行绑票，在河间城内吴前海成衣铺里做了几十身军装、军帽。有个叫王五经的管着船，每到黄昏出去绑票，放三枪为令，土匪们一听到枪声，见了互相打着招呼："走吧，弄点生货去。"土匪头子郭曾，手中有10枝大枪。出去绑票没有枪的土匪就在郭曾手中借枪用，弄回生货（钱财）枪人各分一半。他们把绑来的人关到屋里叫"入窑"。眼睛用膏药贴上，耳朵堵上，让你看不到事，听不到声音。这伙土匪六亲不认，只要称钱，亲娘姨舅他们也敢

绑，也要绑。一次，踩盘子的回来说："七哥，东辛庄马洪波在锥子山有买卖（烟土庄），钱老了鼻子。"又说："马家有胳膊（枪）。"白七、郭曾、卢福庭商量好，由郭曾化装成军官，带着30多名化了装的匪兵，直奔东辛庄而去。

这天傍黑，人们有的正饮牲口，有的从洼里刚回来，马洪波家有一座磨砖对缝的宅院，种着几顷地，做活的、护院的、使唤丫头、老妈子儿十口，高房角上都有更楼。就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郭曾带着他的土匪兵闯进了马洪波内宅。当时马洪波与家人在台阶上正吃饭。马洪波一见来了生人，情知不妙，慌忙起身往屋里去取枪，郭曾一甩胳膊，叭的一枪，把马洪波的头皮穿了一道沟，血流满面。这时，匪兵迅速占了更楼，打了个措手不及，护院的两抄家伙已来不及了。郭曾做贼心虚，不敢久留，带上马洪波迅速撤退。

马洪波被绑来之后。马家托果子洼村孙振彩给说票，孙又找了务尔头村的白莲荣说票，地点在邵洪店村西南大堤圪垃上，准备10万大洋，结果花了5万就放了人，事后孙振彩给白莲荣50斤点心，每包点心底下有10块大洋。后来这伙土匪入了"大祆队"，驻防九吉。七·七事变后，他们把"大祆队"又改为"人民抗日自卫军"，郭曾任大队长，白七当了师长。不管他们换了什么名称，却改不了土匪的本性，继续干着害国害民的勾当。尔后，除铁杆汉奸郭曾和一些罪大恶极者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其他土匪经过党的教育改邪归正。

（河北省河间市政协　供稿）

色布精额匪帮侵入海拉尔始末

阿·恩克巴图

清雍正十年（1732年）以来，巴尔虎、额鲁特等蒙古人以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和汉族等民族就劳动生息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为保卫国家的北部边疆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东清铁路的敷设，铁路职工、俄国侨民相继而来，此地便成了欧亚交通的要道。

海拉尔是呼伦贝尔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设在旧城。当时海拉尔分旧城和新城。旧城主要居住着达斡尔族人和汉族商民；新城属于东清铁路管辖区（亦称站界，俄语称巴尔恰），主要居住着铁路职工、俄侨以及少数欧美商人，设有俄国侨民事务局管理侨民事宜。沙俄驻海领事馆和东清铁路俄国护路军也驻屯在这里。

民国6年（1917年）春，呼伦贝尔草原上，突然乌云笼罩，发生了一次惨重的匪乱。

一

辛亥革命后，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宗社党”相勾结的巴布扎布匪帮，纠集四五千人，扯起“勤王师扶国君”的旗号企图复辟，串扰内蒙各旗，后为张作霖、吴俊升军队所歼灭。巴布扎布本人被击毙，其残匪色布精额、本巴扎布等人纠合残匪千余人

在1916年退至索伦山、哈尔哈河、呼伦贝尔南部一带，妄图生息养兵卷土重来。他们派人来海拉尔，向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提出合作的意愿，但立即遭到了副都统胜福的拒绝。可是该匪帮仍赖在边境上不走。在此情况下，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感到自己力量不足，不宜以武力解决，为了缓和局势，便派都统公署帮办凌升等人，携带数十辆牛车的粮食、防寒物资等，前往哈尔哈河进行"慰劳"，受到匪帮的款待。双方保证互不侵犯。但色布精额匪帮贼心未死，假借做买卖，经常出入海拉尔市，住在日本特务机关太阳堂、富山楼等处，与日本特务、浪人相勾结，探听我方内部的情况，并换取武器弹药。又和日本特务有密切关系的明保（黑龙江省西布特哈达斡尔人）相勾结，通过他拉拢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门官（相当于卫队长、佐领）那木吉勒（额鲁特人）。那木吉勒长于权谋，善于投机钻营，取得胜福的信任，都统公署的大小会议他都参加，内部情况无所不知。匪帮将他收买过去，窃探情报，作为内应。

二

色布精额匪伙在哈尔哈河一带经过一冬的生息，恢复了元气，便开始进行入侵海拉尔的阴谋活动。先派明保去旅大、天津等地通款亡清肃亲王求援。

呼伦贝尔胜福等上层人物获悉色匪欲侵海拉尔市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有的人认为匪军有日本人支持，又有现代化的武器，不能轻举妄动，宜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求得解决；有的如凌升、福尔格图等青年官员主张用武力对付匪军，以绝后患。于是便派凌升等人去找沙俄驻海拉尔领事吴萨蒂，但吴萨蒂以不干涉内政为由，迟迟不表态。胜福等无奈，只好加强防御力量，调兵遣将。在市内布置300名兵力，派保安队营长荣安、根

登布带领500余名新兵驻屯在第一线新巴尔左旗南部罕达盖的地方。又派嫩林陪同那木吉勒和日本人甘风（不知真名实姓），前往哈尔哈河，探听色匪的意图。色匪继续进行欺骗，表示绝不忘恩负义，绝不袭击海拉尔，等夏暖后，便移驻他处。于是胜福等人，误以为真，便按兵不动。

经过一冬的养精蓄锐，色匪一到1917年阴历四月天暖之时，便将大批匪徒集结在却金查干诺尔一带，准备进攻海拉尔。他们先让那木吉勒率领匪帮的先头部队来到驻防罕达盖地方的荣安部队，欺骗荣安说，胜福副都统要和色布精额在海拉尔举行谈判，派我到哈尔哈河迎接他们来海，不许开火，这是副都统的命令。荣安误认为真，任其通过。其实此刻，大批的匪军已绕过罕达盖第一道防线，逼进南屯地带，直向海拉尔杀来。此时，胜福等人才看清了那木吉勒的险恶用心，但为时已晚，难以防守，只好率领大小官员，放弃副都统公署，撤退到海拉尔铁路管辖区避难。在东头道街俄国人开设的“诺米尔”旅馆内暂设办公室。

与此同时，南屯、西屯所有的达斡尔族居民，也随之逃到海拉尔铁路管辖区以及铁路沿线各站避难。

三

色布精额匪军侵入海拉尔以后，首先占领呼伦贝尔都统公署，设总指挥部，废除副都统公署，另设所谓的“提督府”。为了笼络人心，挟持车和扎（新巴尔虎右旗人，当时为副都统）为提督，帮贡扎布为帮办，明保为顾问，巴达玛齐木格充任俄语翻译官，还有乌泰、义尔格勒太等人为提督府官员，那木吉勒为额鲁特旗总管。但车和扎借口有病，没有赴任视事。

匪军占领海拉尔旧城后，为追捕胜福、贵福、凌升、福尔格图等官员，经常窜入铁路管辖区（即巴尔恰）搜查俄人住宅。当

俄国人拒绝开门时，便强行破门而入，翻箱倒柜，甚至打死了一名俄人妇女。有一次，为了追捕凌升、福尔格图二人，匪徒几人窜进开往哈尔滨的国际列车上，鸣枪威胁列车长交出两人，引起了中东铁路当局和俄国驻海拉尔领事馆的不满，提出抗议，随即严禁匪军窜入铁路管辖区扰乱。

胜福等人为了生命安全和保存实力，便离开了海拉尔去齐齐哈尔，在海拉尔铁路管辖区及铁路沿线的所有达斡尔人约千余人也都随之逃往齐齐哈尔避难。这些难民到齐齐哈尔后，人地生疏，生活无着落，死亡很多，尤其是儿童死得更多，情景十分悲惨，真是家破人亡，只盼望早日返回故里。

匪帮侵占海拉尔后，得意忘形，花天酒地，每日出动大批匪徒以巡逻为名，到处抢掠，搜刮民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商店关门，路断行人。又派大批匪徒，到牧民各翼各旗，抢夺牧民牲畜，甚至抢劫喇嘛庙，最后将庙烧毁，激起广大僧侣的愤慨。匪徒们随意打人杀人，索伦左翼的卓德仁佐领、新巴尔虎左翼的副总管多布丹巴勒朱尔，陈巴尔虎旗的骁骑校朋车布等都无故被打死。呼伦贝尔驻外蒙代表成德从外蒙返回途中也为匪军擒作人质，经过赎取才幸免于死。在敌人听闻的事端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新巴尔虎两翼的牧民纷纷逃到外蒙境内避难，有的便加入外蒙的扎萨克旗；陈巴尔虎的牧民移至三河一带；莫和尔图一带的牧民移入扎敦河以北的山区里；伊敏、辉河的鄂温克、额鲁特牧民去乌奴耳一带避难。

外逃避难的胜福等人，一到齐齐哈尔，便与黑龙江省当局取得联系，组织以贵福、凌升、荣安、福尔格图、倭格吉布等为幕僚的指挥部，拟定了收复海拉尔的具体计划。又向黑龙江省督军请求出兵援助。但由于他们亦在发生内讧，自顾不暇，于是又派凌升前往北京向北洋政府求援，而北洋政府也无具体援助行动。只好派贵福、凌升、福尔格图等潜入海拉尔、满洲里和留在呼伦贝

尔的车和扎等各翼官员取得联系，发出各翼官员同心协力，驱逐匪军，收复海拉尔的号召。各翼官员纷纷响应，首先是索伦右翼旗副总管鄂温克人吉勒格，带领堆西尼佐领以及达布、索米仓、额尔贺松、努恩格、罗占、贵青等10余名官民代表，骑着马绕过海拉尔一直奔到乌奴耳上火车到了齐齐哈尔，把胜福等人接入海拉尔。随之在满州里召开了各翼官民代表会议，商定驱逐色布精额匪帮的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呼伦贝尔都统公署副都统车和扎、新巴尔虎右翼总管齐布森格、新巴尔虎左翼总管玛哈扎那、陈巴尔虎旗巴雅嘎、额鲁特旗总管贡扎布，还有贵福、凌升、福尔格图、荣安等，以及地方知名人士等数十人。会议决定各翼共抽调1200名民兵；军马、军粮、帐幕各翼自备，并指定进攻日期为阴历八月十五日午夜，进攻目标为海拉尔、南屯匪军的据点。各翼军队由车和扎、贵福统率。并指定各翼部队的负责人。进攻方法：从海拉尔内部主攻，外部夹攻。另外又派福尔格图和达嘎去哈尔滨、赤塔向俄国人求援，又派成德去外蒙去援。

进攻日期——阴历八月十五日到了，但因各翼军队没能按期集结，又推迟了一天。十六日凌晨，由贵福指挥的以达斡尔人（多数是从齐齐哈尔返回的达族青年）编成的民兵向海拉尔匪军的据点开始进攻，由鄂温克人编成的民兵进攻南屯匪军据点。

进攻开始后，海拉尔街里展开了巷战。呼方军队以东关帝庙为基地向匪军的“提督府”进攻，匪众顽强抵抗，垂死挣扎，战火逼进铁路管辖区。俄国铁路护路军为保卫铁路安全和保护俄侨的利益，配合呼方军队，用4门大炮，轰击匪军。呼方军队占领了匪军巢穴——“提督府”；新巴尔虎、陈巴尔虎旗军队也赶到海拉尔外围。呼方军队士气高涨，火力猛烈，匪军被打得焦头烂额，企图从海拉尔撤退至南屯一带纠集残兵。正在此时，鄂温克人的民兵也进攻南屯据点，匪徒无力抵抗，从南屯向哈尔哈河逃窜。匪徒逃窜时，将南屯、西屯的达斡尔人聚居的村庄，付之一炬，顿

时火光冲天，全村变成了废墟。

色布精额匪帮从海拉尔、南屯向外蒙边界哈尔哈河逃跑，企图到外蒙境内亡命。但外蒙方面拒绝入境，派边防军将他们打出境外，匪军被打得几乎全军覆灭，其残匪四散，往南逃走了。

四

匪乱平息后，恢复了副都统公署。对这次平乱中做出贡献的不论大小官兵都分别论功行赏。

平乱中牺牲的人员予以优抚。如成序，当时为副都统公署右厅厅长，为胜福的得力助手。当色匪的先头部队临近南屯时，他恰好从南屯的自宅去海拉尔上班，中途为匪生擒，色匪头目亲自出面，软硬兼施，企图诱降，但他意志坚决，当面骂他们是土匪，受尽酷刑，始终没有屈服，当匪徒逃走时，将他杀害了。战乱平息后，为他举行了公葬，将名牌列入祀堂。

福尔格图，当时是副都统公署帮办，在平乱中和凌升一样，是胜福的得力助手。在与匪军交锋时不顾匪徒的猛烈炮火，身先士卒，勇猛冲锋，不幸头部中弹，虽然急速送到哈尔滨医院抢救，但终无效而牺牲，年仅 33 岁。为表彰他的功绩，举行了公葬，将其名牌祭在祀堂。北洋政府大总统规定其长子继承他的哈本（云骑尉）衔；其长子在学期间可享受官费待遇。对其老母、妻子和三个子女亦发给抚恤金以资慰问。

对其他在战斗中牺牲的还有朋车扎（扎藏）、卓德仁等人，其善后事宜，也都得到妥善处理。

对于在此次匪乱中与匪帮勾结的分子，依其罪恶程度依法惩处。现将其中主要几个人的情况做一介绍。

明保，黑龙江西布特哈人，早在民国 2 年，因参加呼伦贝尔独立事件，事泄未成，潜逃至海拉尔，与日本浪人、特务相勾结，

为日本人搜集情报，为色匪入侵海拉尔出谋划策。匪帮占领海拉尔后，充当匪“提督府”“顾问”，民愤极大。在匪帮占领海拉尔期间，他和古如二人带俄语翻译巴达玛齐木格去沙俄驻海拉尔领事馆，要求接管巴尔恰（即站界）的市政，要求中东铁路允许匪军人员自由旅行。沙俄领事馆认为这种要求违背中东铁路合同，侵犯俄侨利益，将明保、古如二人扣留。战乱平息后俄国领事馆将明保、古如二人引渡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都统公署根据其罪恶事实，报请黑龙江省当局，依法判处死刑，当即执行。

那木吉勒，原任呼伦贝尔都统公署门官兼额鲁特旗某佐领。早与日本特务相勾结，供给情报。民国6年色匪侵袭呼伦贝尔时与匪帮相勾结，里应外合。为匪帮占领海拉尔铺平道路。色匪占领海拉尔后，封为额鲁特旗“总管”，依仗匪帮，欺压牧民，民愤极大。战乱平息后，他畏罪与匪帮逃窜南下，据说逃至扎赉特旗后走投无路，“便自戕死了”。

此外，对投靠匪军、进行阴谋活动的根登布、额尔登布等人，予以免职处分。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办　供稿）

“三罗汉团”洗劫独力坝

韩振誉

我是独力坝村人，是土匪“三罗汉团”洗劫我村的目击者，现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记述如下。

解放前，内蒙西部地区（原绥远地区），历来多匪。特别是归、莎、托几县更是土匪遍地，人民惨遭祸害。不但军阀混战时期如此，即在北洋军阀被消灭以后也是如此。直至1931年以后，地方才渐趋安定。七·七事变前，傅作义搞乡村建设，对较大村庄派了指导员，人民暂时得以安定。但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从此中国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一些不肖之徒也乘机而起，成群结伙，为非作歹，骚扰地方。三罗汉团就是其中较大的一股。

1937年农历八月底到九月初，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入绥远地区，控制了京包铁路沿线，但由于兵力不足，只进占较大城市。位于远在莎拉齐县东南边沿的独力坝村，虽尚未见日军的影子，但人们已是谈“鬼”色变，一日数惊。趁混乱之机大小股匪抓紧网罗人马，扩充实力。三罗汉团先是派人去祝乐沁村下书，不外是要钱要枪，遭到了祝乐沁村的首脑人物韩国良的强硬对抗。韩将下书人的耳朵割去一只，让其回去答复：“枪钱都有，让他们自己来取。”随后，韩即让村民放弃边沿地带，把人畜集中在村中心天主堂大院内，并积草囤粮，准备抵抗到底。三罗汉团匪徒们欺软怕硬，被祝乐沁村顶了回去后，过了约半个月的时间，绕开了祝

乐沁村去进攻独力坝村。

农历九月十三日下午5时左右，在独力坝村街头突然传来紧急的锣声，接着喊到："土匪来了！快进围子！"这时男女老幼惊惧万分。我们一家4口究竟是外逃还是进围子，一时拿不定主意。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外逃比较困难。这是因为大水把独力坝村团团围定，只有在村西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坝，由村北一直延伸到村南再转向东南方，其余地方，全都是水。就是这条坝在村北一里处还有一处决口，人畜通行都得涉水，这时已经看见匪徒们到达决口处，情况十分紧急。因此，绝大部分人进了围子，仅有少数人留在各自的家里，向外逃走的极少。我和妻子进了围子，父亲留在家中，母亲当时正在二姐家。

匪徒们进村时，村里的民团先在村西北方面外围抵抗，双方展开了战斗。将近6时许，匪徒的前锋已经冲进村来，民团的人逐步撤回到小围堡里。这个小围堡是将原来的庙院筑起围墙，西南角又修了一个比围墙高出丈余的炮台。小围堡四面没有倚傍，而且除南面外，东、北、西三面被水环绕。民团退回围堡后，在房上和炮台上进行抵抗，枪声时紧时松，但匪徒们始终不敢接近围堡，只在四周呼喊。黄昏时分，匪徒们见攻不下围堡，便把所有登场的田禾付之一炬，登时浓烟烈火弥漫了整个独力坝村上空，照得围子里一片通红。

随着夜色的深沉，枪声也渐趋沉寂。在围子里的男女群众和民团的人总共约有200人左右，个个心情沉重，坐立不安。大约在午夜12点左右，西南方向响起了喊话声，匪徒们让把枪交出来，可以保证全村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并可派人出去救火。经过村长和村中父老反复商讨，最后决定派民团徐其发出去谈判，匪方代表为孙三疤。凌晨2时左右，谈判结束，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独力坝村将所有枪支交出，不再抵抗，匪方不再进攻，保证村民生命财产安全。徐其发回来复命，接着把11枝长枪、1枝短枪向匪

交出。

3时左右，有几个匪徒前来，说是要一部分老乡出去侍候他们，并说还可以出去救火。当时有10几个人自告奋勇随匪出去，我和二伯父也随之出去。我们的想法是出去看看家并意欲救火。谁知一出围子门，二伯父身上穿着一件半旧皮袄即被匪徒们剥去。我身上仅穿着一件夹衣，在深秋的后半夜，感到寒气袭人，战栗不已。其实匪徒们哪里是让人救火，完全是欺骗。我们被带到匪徒们的住处，为他们杀猪做饭。凌晨5时左右，匪徒们吃罢饭，我们则一直饿着。6时许，听见外面一些人大嚷着进围子，又听见几声枪响，大屠杀、大抢掠揭开了序幕。孙三疤已经不能实践他的诺言，觉得脸上无光，因此，带领他的部下30人撤离了独力坝村，没有参加这次屠杀大抢掠活动。我们也跟着他们出走。走到村北大坝决口处，孙三疤突然指着我说："你是民团！"要把我枪毙。后经徐则林夫妇恳求和我自己申述，才免于难。

当我们走到距小独力坝村不远的地方，迎面碰见有上百骑兵向独力坝村开去。我们到达小独力坝村，发现还有不少匪徒留在这里，大部为无枪马者。我进了一家人家，想休息一下。不料满屋都是匪徒，我一进门就被一个匪徒把我的鞋脱去。我一看这种阵势，不能久留，遂由村北出走，直奔大岱村。好在这时匪徒们不加过问，得以顺利脱险。

大约在下午4时左右，匪徒们从大岱村东城墙下由南向北而去，还用大车拉着两口棺材，这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两个匪徒尸首。大岱村的好多人登上城墙观看，我也亲眼看见。待匪徒们过完后，我也由大岱返回独力坝村。进村后，看见火仍然在燃烧，一股焦糊味扑鼻而来。顺着大坝走到我们房后，见停着只小船，走近一看，有一具女尸横卧船上，两只小脚搁在船沿上。这时夕阳惨淡，水面清冷，村里村外死一般的寂静，一片凄凉景象。我的心情万分焦急，不知家里人的死活，于是急急忙忙跑回家中，发

现父亲和妻子都在，并得知母亲无恙。在这次劫难中，父亲身上的衣服均被剥光，又被吊打，后来得脱，涉水逃往刘家营村。妻子和家嫂受到匪徒中一个熟人的照护，得以保全性命。但粮草成灰，衣物无存，生活无着。一家人劫后余生，恍如隔世，相对饮泣。

事后得知这次浩劫，全村被烧掉的粮食约20万斤，柴草约30万斤。全村人的衣服被褥被洗劫一空，家具什物毁坏甚多，妇女被奸污，群众遭吊打的也不在少数。民团徐润才、张疤德、徐申如被土匪千刀万剐，凌迟处死。青年徐银才、徐五招无辜被枪毙；徐六十五老伴在乘船逃走途中被打死在船上；青年徐好女被打伤腿部，造成残废。村长邢建英和徐润才等一起正在被开刀宰割时，忽然听说团长来了，匪徒们忙着去迎接团长，把他暂搁一边。后来可能是团长开恩，邢建英得以不死。

事情过去多年了，但今天思之，犹不寒而栗！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政协文史委　供稿）

土匪窜扰万全城

李成栋

所谓南山坡土匪，是指怀安县郑王庄、石坡底、廉家寨、小要子水一带的土匪。他们有时打着“救国军”的旗号，有时打着“日本人”旗号，经常外出活动，明目张胆地进行抢劫、绑票、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这股土匪，因家乡出产白土子，也被称为“白土子队”；又因他们无所不抢，百姓又称其为“破布队”（破，土音读扑），喻指连女人剪下的碎布都抢的土匪。

1938年农历三月，由土匪头子张世元、白耀武带领，集合了数百名武装土匪，往北越过洋河，向万全县袭来。他们由太师庄向西进发，经第七屯、第八屯、安家堡等村，又转向北进，经贾贤庄、大张窑、高庙堡，最后到达洗马林扎营。尔后，又流窜到周围的东柳林、西柳林、旧堡、三里庄等村活动，几乎窜扰了万全县西部半个县。土匪所到之处，见人就抓，见物就抢，见钱[illegible]就拉。起初，有些人听说是“救国军”而不加防备，所以不少村庄的百姓是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遭到土匪的掳掠的。农历三月二十二日早晨，土匪突然来到大张窑，凶相毕露，人们逃避不迭。农民郝建明在遭到土匪追捕时，当场被开枪打死。几天后，土匪窜到小沙沟村，捉住了村长胡某（外号大刘宝）逼要财物，未能得逞，土匪便把胡捆住，拴在马脖子上，让马拉着跑。胡大骂土匪，结果被土匪用刺刀挑了肚子，其状惨不忍睹。

土匪在洗马林镇祸害了六七天，当地所有商号、居民百姓被

折腾的苦不堪言。不仅所有大的商号被洗劫一空，甚至连百姓家里的碎布块、女人鞋之类的小东西，也都遭到抢劫。他们无恶不作，还强奸了村里的许多妇女。

这些土匪每到一处，边抢东西边“请财神”。“请财神”就是“绑票”，把人抢走，让家里花重金去赎。如若不然，就以削鼻子、割耳朵、剁舌头等惨忍手段相威胁。因此，多数被绑架人的家属，就是倾家荡产、借钱欠债，也要把亲人及早赎回。有的人家因家贫赎不起，土匪就将“财神”杀死或弄成残疾再放回。有的“女财神”被土匪扣留，供土匪们享乐，也有的强逼成婚。据了解，仅高庙堡村，就被土匪绑去八九十人。

这次土匪的大窜扰，不仅给方圆百姓带来了灾难，还使驻守在郭磊庄火车站的日军受到惊动。那天太阳快落山时，日军赶到洗马林东南二公里处的古城梁，朝洗马林方向开了炮。土匪听说日本人来了，如惊弓之鸟，慌忙押着“财神”从洗马林西门外沿沙河向南逃窜。在押解途中，由于天已渐黑，胆子大的“财神”便乘机而逃，混乱中土匪开了枪，剩下的大多数“财神”仍被土匪强行押走了。

土匪途经岸庄屯时，已到后半夜，便在这村“打尖”（土匪黑话，指吃饭，忌“犯”（饭）音）。第二天过了洋河，午后来到怀安的僧官庄，又宰猪做饭。这时寻迹而来的日军，已赶到洋河岸北的阳门堡村。日军用望远镜看见土匪的动向，又开了几炮，吓得土匪又慌忙逃窜。慌乱之中，又跑了一部分“财神”。土匪经过阎家岭、冀家窑时，受到两村联防队的自卫抗击。土匪依仗人多势众，很快闯入这两村放起火来，进行报复。就在这附近，高庙堡的胡方庆因年老走不动，又骑不了毛驴，当即被土匪枪毙。（据目睹者说，胡死后无人管，几天后眼睛被老鼠吃了。）土匪们经乔子沟“打尖”后，才回到老窝两旗屯、毛家坪一带。

土匪的这次洗劫，使不少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高庙堡村

何继周的父母，为赎回年仅16岁的儿子，花了200块现洋。为此出售了25石谷子（每石约150公斤）还不够，又借了许多外债，好端端一个富裕户变穷了。李成有家花了200元日本票子把他赎回家，可他已被折磨得卧床不起了。原来李成有从洗马林被押走时，土匪让他骑了个瘦毛驴，结果屁股被硌破，回来时伤痂发了炎，疼痛难忍。大张窑村的秦佃章，因家贫赎不起人，被土匪杀害于南山坡。他的妻子为拉扯大两个小儿子，一直守寡至今。

（河北省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我被土匪绑架的经过

刘永泉口述　王又青整理

1944年，我在李村合股开了个恒丰泰布店。旧历三月初六，我从天津购货回来，天色已晚。吃晚饭时，我忽然发现房上有人，头上都罩着白毛巾。我问"干什么的？"房上的人回答："我们是八路军！"我一听是八路军便高兴地去开门。他们来到屋门口，问我"这村住着八路吗？"我说："没有哇。""有人把你告了，得跟我们去打官司！"他们说着把我两只胳膊往后一拧就要捆。"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打官司我跟你去用不着捆……"我正和他们摆理，只见我大哥和我弟弟也被捆着来了。这时，我心里才明白，坏了，这不是八路，是土匪。

我们哥仨被带到村口，其中一个土匪冲着村子里"嘿儿嘿儿……"直叫狗。不一会儿，有七八个匪徒又捆来13个人。土匪们从紧把村口的邱家果子铺里拿出盖面的棉被子，把它拆开撕成条蒙住我们16个人的眼，然后用一根绳串起来。土匪前面领着，后边押着。我们这些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大约是在高口子过的河。过了河土匪说："快，都把鞋、袜子脱了！"。

我们被迫脱了鞋袜。开头，就觉得脚下冰凉，被硌得很疼，后来两只脚就木得失去知觉了。一阵狗叫声，知道又进村了。挨我捆着的叫王兴汉，他悄悄地说："我听出来了，这好象是狼虎庄，我姥姥家那村。"可坏了，这话被土匪听见了，把王兴汉拉出去，打了个半死。从此谁也不敢再说话了。

人们离拉歪邪也分不清白天黑夜，就觉着脚底被扎得疼痛难忍。我偷偷用脚趾碰碰才感觉出，原来脚下踩的尽是芦苇茬子，心想：这不是进了苇洼了吗！

进了苇洼，土匪把我们原来背后捆着的胳膊放下来，改成两个人的胳膊捆在一起，再用绳子串起来这样每个人可有一只胳膊活动了。虽然进了五月，但阵阵寒气袭人，冻得实在受不住了，就用一只手一把一把地往身上缠苇叶子。后来，土匪们又从桃园的和杨官屯抓来一些人。

我们的"队伍"扩大了，但相互之间谁也不敢说话。眼前一片漆黑，只有给窝头吃的时候才估摸着是白天（也不一定）。人们嘴里嚼着冰凉棒硬的窝头，前面有土匪牵着，后边有土匪督着，进行着无休止地折磨。土匪一会儿喊："上山！"人们猫着腰一个跟一个地往上爬。过一会儿，土匪又喊："下山！"人们深一脚，浅一脚，坑坑洼洼，也不知爬的什么路。当人们个个精疲力尽再也走不动时，土匪又喊："上船！"、"下船！"过河时，我走在一条又窄又小的跳板上，一脚踩空，"扑通"掉下水去。我一倒，连着拉下好几个。幸亏水不深，我上来又挨了一顿揍。

到了土匪驻地，就让我们"跑四方"。离拉歪邪地一个跟着一个，一会儿走，一会儿又跑，也不知是走直道还是转弯。开始觉得两个耳朵里都灌风，一会儿灌左耳，一会儿又灌右耳；再仔细听听，土匪老是在一个方向吆喝。原来土匪是在中间用绳子串着我们，就象牵着牲口转圈"轧场"一样。谁要走慢一点或不听吆喝，轻者挨枪筒子，重者拉出去单个"教练"——死揍一顿。

土匪们冷了、累了，该吃饭了，才把我们带回黑暗、潮湿、不透气儿的"厩棚"里。所有被抓的人都是两个一对，胳膊捆在一起，背靠着背坐着，谁也不准碰谁。大小便要等土匪下命令集体行动。有一次我的右眼被虱子咬得实在受不了，一只手不知不觉摸了一下"帘子"（蒙眼布土匪叫帘子），被土匪看到了，打了一顿，又把我拉

出去。土匪说："你小子不是眼难受吗？今儿个给你治治！"我一听害怕了，这回非死不可。我央求说："爷们啊！我求求爷们，我不难受了，不用爷们费心治了……"可他们根本不通人性，想怎么就怎么。他们先把我两手捆起来，然后不知用什么刑具连眼带耳朵就给我箍上了，两边土匪一使劲，我大叫一声就昏倒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来，就觉得整个脑袋象裂开一样疼。那次虽没有死，可以后我脑袋象"瘘"了一样，呼呼直响。

转眼来到了夏天，几十口子人都还穿着被抓时的衣服，人们囚在一起又渴又热，憋得喘不上气来。挨我捆着的是杨官庄老乡长的弟弟（老乡长也被抓来了）。他开头光小声说话，听不清他说的什么。我用胳膊肘一个劲地捅他，并小声劝他别说话，可他越说声音越大。土匪闻声过来："嚷什么？不想活了！你再嚷我要揍不死你就不叫土匪！"经土匪这一激，他的声音反而更大了："我不死，我不怕！我要喝酒，吃西瓜！我能拉两抬筐巴巴，尿三桶尿……"他还在嚷着，就听"啪嚓"一声，一股热乎乎带着腥味的东西喷了我一身。他身子一栽，拽了我一个趔趄。接着我胳膊上的绳子被割断了，他被拖了出去。我又和另一个人拴在一起。

昏天黑地又闷又热，周围的空气又腥又臭，我们就象焖在蒸笼里一样。天上飞的，地下爬的，再加身上堆堆麦粒一样大的虱子不停地乱咬乱爬，但手又不敢摸，一阵阵疼得钻心，痒得难耐；喊不敢出声，只听着一个个吭哧吭哧憋粗气。后来不知怎么几十口子一下子"炸笼"了。只听有一个人喊："走哇，扛着楼咱耩地去……"一句话没喊完，大伙都跟着喊开了，喊什么的都有。这个喊："等会儿，小子还没泥完啊！"那个喊："散啦，不过啦！赶集去，光买好东西吃……！"土匪闻听大声吆喝："全他妈找死，喊什么！"土匪的威胁不但没能止住喊声，反而声音更大了："谁找死？我们不怕，姓刘的不怕！（喊的人大部是桃园姓刘的）伙计们抄钐镰，钐了狗日的们……"奇怪的是，一没有人鼓动，二没事先商量，可这喊声却异口同

声。这种反映有人叫做“热疯”，是被压抑的集体自发的反抗行为。然而，仅这一次就被土匪活活砸死了13条人命。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土匪喊：“恒丰泰掌柜的，出来！”我听到这喊声，脑袋“嗡”地一下子，既没答言也没敢动弹。挨着我的那个人不知是为什么，一个劲地用胳膊捅我。他说：“刘永泉，叫你呢，快答话呀！”我这才爬起来问：“干什么？”“干什么，你小子来了这么长时间家里也不管你，白给你窝头吃，爷们养你有什么用！”说完几个土匪小声嘀咕着：“不远，坑都刨好了。”我心想：别是活埋吧！接着土匪给我解开绳子，架着我就走。可我的两条腿说什么也不能迈步，脚也不敢沾地，一个土匪一个劲地用脚踢我。我想哪儿不是死，于是央求说：“爷们，别走了，就在这儿吧！”土匪哪管那些，连提带拽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我又央求说：“爷们哪，我实在走不了啦，就在这儿吧！我……”我话没说完，两个架着我的土匪笑着说：“不是把你弄死，是放你回家。”他们把我眼上的帘子拽下来，对我说：“快跑吧，照直跑别拐弯！”我一听这个，也不知哪来的劲，腿脚也不疼了，撒腿就跑。一边跑着心里想：不能照直跑，别让他们从后面给我一枪。于是我就绕着弯子躲着跑，一气跑出有半里地。听后边没有动静，才放慢脚步，可这时腿又不听使了，脚也不敢沾地了。这可怎么办？为了活命，我把牙一咬，爬吧！爬了一阵子，我抬头望望天，眼透亮了，能看到天上的星星了。可就不知哪里是东西南北。爬一阵歇一会儿，突然听到了狗叫声，心想，这地方准有人家，于是就朝着狗叫的方向爬去。

我找到一户人家问路，他告诉我这是王徐庄。我按他指给我的路，才回到家里。家里人告诉我，是给土匪送去法币80万元才把我放回来的。

（河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我活埋了匪首韩子犹

杨文凤口述　王清凯整理

我是清苑县大福村人，本名杨文凤，人们习惯叫我杨凤。在清苑县的不少乡村里，一提我的名字，人们就自然想起了土匪武装“韩子犹”。

我跟韩子犹当土匪在清苑活动了一年时间。那是1938年，日军侵占了保定，国民党官兵已南逃，当时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冀中大地处于无政府状态。正是所谓“司令赛牛毛”的时候。就在这年的春天，我在大白城与东壁阳城的王百忠联系，也成立了一个武装组织。当时招集了六七个人。这时韩子犹驻在东壁阳城，想叫我们加入他的队伍。在5月的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家找我，说是“韩司令”派来的，让我去壁阳城找他。当时我心里没底，觉得此去凶多吉少，最后横下一条心去了，并将一颗手榴弹藏在身边，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一见面，韩子犹就问我：“你们干得怎么样？以后跟着我干吧！准错不了！”从此我就投了韩子犹，开始当勤务兵，主要是服侍韩抽大烟，后来得到信任，成了韩子犹的得力心腹和干将。

听说韩子犹是河南漯河人。说话操着浓重的河南腔，爱骂人，“妈土鳖孙”是他的口头语。据说他原是国民党五十三军的一个连级军官，部队南逃时，他流落到保定以东的安新一带，加入了当地一支农民武装。后来这支队伍编入了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成了革命队伍的组成部分。但由于韩的兵痞习性不改，受不了抗

日的艰苦和革命纪律的约束，便想脱离革命队伍，独立行动，当个独霸一方的草头王，过自己的享乐生活。不料队伍被王干臣拉去，奔向抗日前线。韩落得个光杆司令，便来到清苑一带，重新招兵买马。

我投奔韩子犹时，他身边只有10几个人，七八条枪。过了些日子，驻在南候村的一部分张荫梧的民军被八路军抄了，只剩下了崔明山、崔明海等不多几人，我也动员他们加入了韩子犹的队伍，这时还不到30人。我们把队伍往东拉，到了东阎、宋村一带。有一次在大庄附近的大堤上遇到了七八个八路军，我们下了他们的枪，缴了几枝大枪和一挺机枪，把人放了。只有一个叫付小圈的诱劝后跟我们一起干了。到1938年秋，队伍扩大到200多人，主要是宋村、大庄一带的农民。因人多了队伍不好带，韩子犹将队伍进行了改编。编成3个营，1个特务大队。一营营长张子修，二营营长张三合，三营营长韩树桐（高阳人），特务大队长崔明海。韩子犹自称司令。在司令部里，有一个是韩子犹的老乡，不知什么名字，因姓张，人们都称他河南张，是韩的亲信。另外，还有我和马乃贤、崔明山、裴文录、王怀林等。当时我们活动的范围，东边大庄一带，西边罗候、魏村一带，南边到牛庄、羊庄、耿庄、蒋庄、封庄一带。晚上住白天走，没有固定的地方，吃了就走。缺钱、缺物就向各村和富户要，不给就绑票，迫使人家拿钱赎。后来听说老百姓给我们骗了顺口溜："当了韩子犹，吃穿不发愁，三天不回家，弄头杠子牛。"

1939年夏，八路军通过裴文录、王怀林联系，要与韩谈判。我们当时驻在罗候，韩叫我去谈。我到了南边一个村庄（忘了村名），八路军的王文奎营长态度非常强硬，限期要我们接受收编，在7天之内做出答复。我当时表示，如果八路军要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给，收编的事我作不了主。回来跟韩子犹一说，他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他们钻山沟、吃小米，我不干，要去你去！"这时韩的

队伍，已发展到300来人，100多支大枪，20多支手枪，1挺机枪。在这段时间，张荫梧的民军和日本人都先后派人来找韩子犹，想着收编，但韩都未答应。1939年秋发大水，我们住东闾、韦各庄一带。保定的日本人带着皇协军来打我们，包围了韦各庄村。我们利用有利地形坚决回击，一直打到中午12点，日本也没有打进村。当时东闾村的老百姓对我们很好，给我们送饭、送水。但因敌人火力太猛，后来我们撤退了。时隔不久，我们驻在牛庄、羊庄一带，日伪军又来打我们。我们夺了他们几匹洋马，他们却把韩子犹的小老婆荷花抢去了，还抓去了警卫员。人被弄到了于庄车站皇协军那里。荷花本是一个妓女，是韩子犹买来的。丢掉了心爱的荷花，韩大为恼火，又气又急，不住地跺脚骂人。我们劝韩子犹："司令别着急，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人要回来。"不久，我们得到消息，于庄皇协军头子的儿子要娶媳妇。我们利用洞房花烛的机会，派人当夜将新娘抓来，然后谈判换人。记得交换人质的交易是在南大冉村进行的。当时南大冉村有一个开店的二掌柜，人聪明灵活，吃得开，叫得响。还有一个李凤亭，是日本特务。他们从中调解，最后平安地将人换回。不久，汉奸李凤亭又来说服我们投日本。韩子犹派我去联系。我带着付小圈和一个姓段的到保定，住在八条（妓院），结果叫一个日本特务组织绑架装上了汽车。幸好有个翻译高砚田从中解释，才放了我们。他们好言安慰，送我们出城。我们回到武罗候，再不敢去保定。就在这期间，韩子犹内部发生了内讧。韩的亲信"河南张"被韩子犹杀了。原因是，荷花被抓去于庄后，听到"河南张"与日本人有"勾连"的事，说"河南张"要杀了韩子犹去投日本。韩一听就火冒三丈，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其枪毙，杀害在韦各庄村南。这件事对我们这些人触动很大。心想，跟随他多年的亲信、老乡说杀就杀，如果对我们有什么怀疑的话那还了得！另外，我们也深深感到韩已成了我们的累赘。他虽40岁年纪，但吸毒成癖，大烟灯昼夜不息，

行动都让人抬着，身体已垮得不成样子。为我们自身的安全，也为了甩掉这个累赘，我和崔明山、刘春祥等人商量后，在深秋的一个晚上，将其弄到王胡庄村西活埋了。一个月后，为了铲除后患，又将小荷花活埋于同一个地方。

韩子犹死后，队伍没人统领，各自带着各自的人行动。我们司令部的人随着二营行动，又从武罗候移驻韦各庄。1939 年秋末的一个晚上，为了安全我带着几个人到村北一家睡觉，天明回村不见队伍了。我问一个老乡，他说，晚上队伍就拉出去了，这才知道发生了情况。队伍是被裴文录、王怀林拉出去的，投八路军了。我带身边的付小圈逃到村外，商量了一下，觉得投八路军不会得到信任，便急急忙忙跑到保定又去投日本井上部当特务去了，从此又走上了背叛祖国的道路。只要回忆起这段历史，我感到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非常痛心。

我从 1938 年春投韩子犹到 1939 年秋队伍被瓦解，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发生在清苑的韩子犹匪乱的这段历史我都亲身经历了。现在把它叙述出来，也算对人民的一点交待吧！

（河北省清苑县政协　供稿）

从马贼到“蒙古军”总司令

张占军整理

1964年12月，我中央人民政府特赦了一批战犯，本文所记载的主人公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名字叫李守信。

1892年，李守信出生在原内蒙古的一个蒙族小地主家庭，15岁时在朝阳民团中充当“马户”，开始和胡匪一面打仗，一面结交朋友，21岁时剃发出家，当了罗旺喇嘛的“炮手”。26岁时加入热河游击马队，开始了“马匪”生涯。到九·一八事变前的十余年中，李步步升迁，从排长直升到团长职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一年后李当上了旅长，不久，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充任伪“热河游击司令”、“察东警备军司令”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李曾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蒙古军”总司令等要职，认贼作父，作恶多端，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日本投降后，李仍不悔悟，投入蒋介石的怀抱，继续与人民为敌。中国革命胜利后，李潜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捕被引渡回国。经审判关入监狱进行改造。特赦后，我人民政府宽大为怀，将他安排在内蒙古文史研究馆任馆员，住在呼和浩特市新城江南馆巷一所幽静的小院里，度过了他的晚年。

一、青少年时期的李守信

1892年7月11日，李守信出生于内蒙古单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古力古斋大庙一个蒙族小地主家庭。这个蒙汉杂居的村庄位于牤牛河东岸，南距朝阳县城180里，北距黑城子王府90里，往东30里便到了土默特左旗地界。后来这里便归属于热河承德府朝阳县所管辖了。土默特右旗较土默特左旗开化要早得多，早在200多年前，这里便开始蒙汉杂居了，蒙民有姓鲍和姓乌的两家贵族，有姓白、姓高、姓戴的等奴隶。由于这些家族的祖先来自呼和浩特一带，故当地人称之为“真蒙古”。再有姓李、姓王、姓张和姓周的等家奴，因其祖先系娶蒙古妇女而入蒙古籍，因而被称为“随蒙古”。

李守信的先祖是山东济南府长清县李家庄人，因荒年只身跑到土默特右旗给蒙古人种地维持生计，后主人见其勤劳能干，又善耕耘稼穑，遂被招赘为婿，入了蒙古籍，成了“随蒙古”。此后几辈，再未与汉族通婚。

朝阳是热河人口密度最大的一个县，来自山东的移民占了全县人口的多数，他们把山东的风俗习惯带到了那里。朝阳人多好斗勇，城南的羊山、铧子沟、二十家子和松树嘴子一带的农民尤甚。朝阳境内山高水险，易于隐蔽躲藏，故在社会动荡年代，这里就容易成为胡匪的窝穴。

19世纪末，朝阳一带连年发生战乱，所以差不多人家都有武器，成年男子几乎人人能骑射。此外，当时赌博之风颇盛，赌场到处可见。汉人赌博工具主要是“宝盒子”，蒙古族人则用染有红白颜色的牛骨作为赌具。一些青年人沾染上赌博的坏毛病后，有的输光，有的倾家荡产，被逼走投无路，只得入山为匪。热河的锥子山盛产鸦片，各旗县也多有种植，致使很多吸毒成瘾。所有

这些，无不造就和加速了胡匪的生成。

当地称立有字号的土匪为“耍人的”，对那些三五成群或跑单帮的小胡匪则叫作“地蹦子”。所有汉族“大家”都有炮台，豢养着一批看家护院的“炮手”。一些中等户为安全起见，也多是数家联合建有一个围堡。但是，对不好对付的大股土匪，他们都是拉拢、联合与勾结，或在围子中窝藏，土默特右旗的王府和汉族地主一样，也包庇、收容立有“字号”的胡匪。正由于此，至使胡匪日益猖獗。当时，尽管朝阳一县经常有十几营官兵驻防，但他们从不敢硬剿，而往往是与胡匪取得妥协，甚至有的干脆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这样一来，倒霉遭殃的就只有那些善良的老百姓了。

古力古斋大庙共有百余户人家，蒙汉人各半。在50多家蒙古人中，姓赵和姓朱的占了30多户，他们都是王爷的奴隶。这些人都是“穷蒙古”，占有耕地很少，每年所产的粮食难以糊口，遂经常靠做佣工和做点小买卖维持生活。李守信的祖先是关内过去的，几代人都善于耕耘，因而收入较丰，也算得上是村上的富户了。李守信的父亲是个守财奴，不论买什么东西都得再三惦量从不花一文闲钱，因而村上的人送他个“土包子”的绰号。此外，李父还是个先天残疾，从小就弯腰曲背，所以人们很少呼其大号，而多称其“李罗锅子”。在李罗锅子当家主事时，李家已是比较殷实人家了。当时李家有耕地30多“天”（当地以“天”为土地计算单位，一“天”是十亩），还喂着牛、马和几十只山羊，通常每年还要养上十几口肥猪。不仅雇有三四个长工，而且经常雇用几十名短工。

李家一方面剥削穷苦百姓，一方面又受所属诺颜（奴隶主）的敲诈和盘剥。古力古斋大庙姓李的人家全归外村的一个姓鲍的贵族所有，都是鲍家的奴才，当时鲍家有个无儿无女的孤身老汉，名叫色楞。此人常去光顾古力古斋大庙，去后就直奔李罗锅家。因

李姓其他人家都过得较穷，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因而色楞从不到这些人家里去，每次去了李家，一住就是数天，不仅天天得有好酒好饭招待，还得有鸦片侍候。吃了不算，临走还要带一些银钱、烟土、猪肉和米面等物。后来，李罗锅花了2万串朝阳的“街市钱”（每百文折合铜钱16文），把其中的1．7万串给了色楞贵族作为赎身钱，用3000串贿送黑城子衙门的“档子房”，换得一张与鲍家永远脱离主奴关系的执照。尽管如此，色楞这个老无赖仍不时到李家去揩油。李罗锅因受传统观念所束缚，依然对他奴颜婢膝，以主待之，直到把这个鳏夫供养到死为止。

李家花钱赎身后，即由奴才变成了“自由民”。按照常规，一般可编入朝阳的汉户。李罗锅因耽心本家亲戚及乡亲们背后指责，所以没有这样做，而是跑到北票山南8里的下府，给土观活佛包的喇嘛花钱，领了一张印票，算是成为那个召庙的“庙户”了。当时，庙户要较蒙户负担轻得多，每年只捐少量的香钱，即使土观活佛每年到各村给他的庙户“净室”时，也只是随便布施一点就可以了。

李守信有两个哥哥，大哥叫李君，二哥叫李臣，起初教书先生给他起名叫李义，李守信是以后才改的。按照蒙人风俗，大哥许在本村庙上当喇嘛，后因父母疼爱，就叫李守信去顶替了。李守信的乳名叫那孙巴雅尔（即长寿之意），结果被人呼为三喇嘛了。李家是本村首户，建有高墙大院，因而军队和商旅过往此处，一般都到李家投宿。那时李家有快枪3支，“地蹦子”来了还能对付一气，但大股土匪就惹不起了，所以就得想法与之结交朋友，凡来此打尖过夜的，无不杀鸡宰羊，热情款待，好生侍候。

李守信生性顽皮好动，从小就爱玩枪骑马，喜欢和带枪的胡匪及当兵的接近。他家有枪也有子弹，因而还是孩童的李守信就背上枪到山里去打野兔和山鸡。到十一二岁时，他就已是使枪娴熟，射技相当不错了。李罗锅对他很不放心，生怕他长大后生事

惹非，便把他送到本村私塾，念了半年的《三字经》和《百家姓》。李守信哪有心去念这些玩艺，所以常常逃学，没办法，李罗锅又让他当带工的，每天起早贪黑到地里做营生，想把他培养成一个会种田守家过日子的财主，然而李守信这个不受拘羁的小野马，又一次叫他父亲失望了。在他14岁那年，李罗锅使出最后一招，给他娶了个比他大7岁的蒙古族媳妇，想用女人把他拴在家里，但仍是无济于事。

当时，朝阳一带各区都成立有名为“义务警察”的民团，凡有地10“天”的出一人作“步警”，称为“步户”；有30“天”的担任“马警”，要自备枪马，称为“马户”。起初，李罗锅每年花300多块洋钱雇人当差，后见给李守信娶了女人后还是拴他不住，经常不去田里干活，而是成天泡在“外八营”的兵棚子里，和那些当兵的厮混，就索性由他而去，叫他去当了马警。那年他才15岁。这一下李守信可算如鱼得水、虎入山林了。每逢民团与小股土匪作战，他都是争相前往，冲在最前边穷打猛追。由于他枪法好骑术高，胆子又大，时间不长就在当地的民团、胡匪和军队里出了名。就连平顶山庙上的大刺嘛和黑城子衙门中都晓得李罗锅子家出了个少年“炮手”。胆小怕事的李罗锅子又耽起心来，为免其在外招风惹祸，所以重又花钱雇人应差，把李守信从民团替回，让他呆在自己身边。

李守信当了几年“马户”变得野了，人在家中心在外，总是安分不下来。当马户时结交了不少朋友，时常找他闲谈叙旧。此外，“外八营”在李守信家乡驻防时，李曾结识一个叫安静海的人，安是朝阳兆星沟人，在汤玉麟时任过经棚县公安局局长，这时已离开军队，拉杆子立字号当了胡匪。安静海身材高大，外号安大个子。安匪每次途经古力古台大庙，总要到李家落脚，并设法勾引李入伙。李罗锅见李守信在家里也迟早会生事，弄不好就可能离家为匪，因而又托人把李守信送到平顶山庙上当了大喇嘛，被

罗旺喇嘛收为徒弟。罗旺喇嘛是该庙的当家大喇嘛，他对李守信的好枪法早有耳闻。这次名为收徒，实际是给自己物色个保镖的。自此，年方21岁的李守信剃发出家，当上了蒙古小喇嘛，别的喇嘛是诵经修行，而李守信则是整日里背匣枪，侍候罗旺喇嘛并招待四方来客。

罗旺喇嘛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同“要人的”和“官面上的”都有交往，热河和关东一带都有他的朋友，各个方面都有他的结拜兄弟。他经常是白天给“官面上的”接风，夜里给“要人的”“洗尘”。有时两方面的人碰到了一起，就安排在两个院子里分别接待，双方都心照不宣，睁只眼闭只眼，只当不知道，因而也从未发生过冲突。由于罗旺交游甚广，自然其声势也就不同一般了，他每次出门的派头，甚至比县官还显得威风。

李守信在给罗旺喇嘛当“炮手”期间，大开了眼界，长了很多“见识”，这对他后来所选择的人生道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和影响。这段时间里，他不仅跟许多“要人的”和官面上的混熟了，而且还学到不少为匪做官的门道和诀窍。通过与各方面的接触，使他在思想上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在当今这个世道，谁能有一套“本领”，得到一帮人的拥护，就可以横行天下，为所欲为。因此，从那时起，李守信就开始萌生了独树一帜、拉杆子的念头和欲望。要成事就得手下有一杆人，因而就得善交朋友，学会用小恩小惠等手段拉拢和收买一些人，对这点，李守信是看透了的。庙上一般喇嘛的生活是很清苦的。罗旺喇嘛是个色鬼，只要没有客人，他便以“回娘家”为名，到平顶山底下道营子村和一个寡妇鬼混。每次只带另一个贴身小喇嘛给他站岗。于是李守信就利用这一空闲时间，到山里打些野味给小喇嘛们分享，所以庙上不少人都感激拥护他。后来，罗旺喇嘛见李守信非同一般，深怕久留身边会闹事，便以经常杀生，不易当佛门弟子为托辞，婉言将他辞退了。

罗旺喇嘛并未把李守信直接打发回家，而是把他介绍到黑城

子王府，给衙门中掌印的协理富巴什当了“炮手”。富巴什的权势很大，有地数千“天”，年收租万石以上，身边常有4个“炮手”保镖。李守信到那里后，成天不是陪着主人外出，就是给他站岗警卫，枯燥单调得很。李守信这个疯惯了的，一心想的是在外大干一场，哪里当得下这样的差事，不到1个月时间，他就不干了。李守信回到家中，本想即告别父兄，远走高飞。但这时李罗锅已是古稀之年，因二子早亡而终日郁闷啼哭。见此情景，李守信不忍离去，只好在家里呆了下去。1917年，李罗锅病逝，李守信再无管束和牵挂了，便于翌年到了建平县，参加了张连同的半官半匪的热河游击队。当时，安大个子也加入了马队，升任连长，自此，李守信便开始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二、四年的土匪生涯

1918年，26岁的李守信加入热河游击马队，先是亲自出去当了将近4年的胡匪，到30岁他升官以后，也从未中断与胡匪的联系和勾结。特定的历史条件造就了李守信这个典型的反面人物，以至最后成为热河一带最大的胡匪头子，变为伪“蒙疆”的第二号战争罪犯。

李守信是怀着野心参加热河游击马队的，论他和连长安大个子的关系，完全可以生活得舒舒服服。但他为和当兵的弟兄们接近，结交朋友，就自动要求下到“兵棚子”中去生活。他认为，自己虽当过“马户”和“炮手”，但并未下棚子当过兵，现在当兵是为将来能带好兵。下到棚子后，他从伙伕、马伕、当起，担水烧火、铡草喂马抢着干，表现非常勤快，以赢得其他伙伕、马伕的好感。在热河游击马队，带有家属的一些兵都不到大伙房就餐，有钱的闲员通常到街上下馆子，每日到大厨房吃饭的，都是些穷当兵的和手头拮据的闲员，几乎一日三餐都是小米饭、腌黄豆，简直把

人们都吃腻了，一个个馋得够呛。为笼络这些当兵的，李守信常花几个小钱，买点烧饼、猪蹄之类的东西，叫上两个当兵的解馋。有时还弄上点烧酒，喝得高兴了就磕头拜把子，手头上宽裕的兵士有时夜里到外面赌钱或嫖娼，李守信就主动替他们站岗，常常一班接一班地站到天亮，他也毫无怨言。这些人感激他，有时就给点零用钱，而他正好用这些钱来结交和周济穷朋友，夜里安大个子等出去查哨，常见李站岗，因而都对他印象很好，不足半年时间，李守信即在马队中交结了不少把兄弟，并深得长官赏识。此外，李守信长得身材高大，而且有一手好枪法，所以当年秋他即调到统领部充当了扛大旗的差官。

当时，蒙古族土匪进犯林西，张连同受命率部到坝上防堵。当游击马队到达大坝底下的毡匠营子后，1000余人都驻在姓逯的一家地主大院和烧锅作坊里。

据侦察，“蒙匪”余党此次前来是为巴布扎布复仇，当时已到达坝北40多里的好尔图庙。张连同在毡匠营子观望了好几天，抽调120人组成“敢死队”，实际上怕死的还是多数。天亮前“敢死队”到了坝后，都不敢再贸然向山下走去。只有李守信、胡宝山等4个蒙古人和一个称为“刘师爷”的胡匪头子刘杰臣胆子特大，5人继续前行。他们走了20多里，天就亮了，在好尔图庙南边十几里处还有个弥苏庙，因被一座小山挡住，所以他们5人也弄不清那的情况，待走近弥苏庙后，才发现这里也有了敌人。他们清楚看到，四处炊烟升腾，敌人正忙着准备早餐；很多马匹撒在滩上吃草。于是他们决定牵走一些马匹。他们骑着马兜了一圈，马都朝好尔图庙方向狂奔。李守信凭着高超骑术冲到马前边，在临近敌人吃饭的地方开了枪，才把300多匹马打得调过头来朝南跑去。敌人万没料到会有人来偷袭他们的营地，听到枪响，顿时炸了窝、乱了营，以为是被官军包围，于是一面放枪，一面便拼命朝好尔图庙奔跑，待快到好尔图庙时，慌乱中把那里的“蒙匪”也

惊走了。李守信等5人把马群赶到坝上后，呆在那儿的“敢死队”初闻枪声大作，继见马群起的黄尘滚滚，以为是“蒙匪”打过来了，于是朝着马群放起枪来。李守信等人见状，知是同伙误会了，便大声喊话。待“敢死队”的人们弄清情况后，纷纷奔向马群抢马，以向上司报功。游击马队这些乌合之众，就是这样把“蒙匪”攻打林西的企图打破了。李守信初出茅庐，即崭露头角，深得张连同的赏识。更加他处处留心，结交了不少狐朋狗友，因而渐渐有恃无恐，放心大胆地干起胡匪的营生来。

李守信当胡匪时，比一般拉“杆子”的交游要广得多，因而路子很野，几乎是四通八达。他深知商人胆小怕事，从不敢沾胡匪的光，不象地主敢施出毒辣手段。因此，他总是以“烧、当”两行作为自己的“窑儿”，一般都是在商号中落脚。有时，风声紧了，他便跑到一些大商号中隐藏。这些商人都惧怕李守信这号人物，生怕得罪了会截他们的货物或绑了他们的票，所以纷纷上赶着跟他拉关系，进行交往。他每次去锦州或义县等地避风时，都是带上大批货物和上过税的税单，化装成行旅商人，多给赶车的几个钱，每遇关下检查，他就躺在车上装病，而由老板去应付。到锦州等地后，即投寄于大商号，因这些人与当地军警都有交情，所以从没人进行盘问，住在这里比藏在地主的圈子和军队营盘中还要保险得多。李守信不仅为匪有方，而且很快熟悉了商界投机倒把的各种门径，这对他后来成为热河一带最大的“要人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李守信在热河当胡匪时，不光能打大窑，干大的，而且还善于干一些小买卖，可以说是精于此道的“全手活”。有一年临近春节时，他手头紧张了，要划“杆子”来不及，即使“划起来”，准备仓促，自己也不一定得到多少实惠。于是，便决定单独干一下。赤峰是热河的码头，平泉县籍的商人节前一般要回家过年。因怕路上不安全，往往事先约好，百八十辆大车一起走路。他们都是

五更天从赤峰起身，往西南行20多里过老爷岭，再走20多里天亮到楼店打尖。李守信把这些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然后在热河游击马队中约了个叫孙三虎的，于旧历腊月二十八拂晓之前潜伏到老爷岭上，待赶车的商人队伍来到后，李孙二人也混入车队，背着步枪，口哼小调，和商人们搭讪着一同前行。有的车老板问他们有何公干，李守信、孙三虎便谎说是当兵的，因公事前往，赶车的见如此说，也就信以为真了。李、孙二人翻身上马，一路有说有笑，走到车队前边，他俩继续往前走了四五里光景，突然将马头拨回，表现得慌慌张张，直走到车队前边，谎说前边发现了胡匪，让客人们都下车到一旁隐蔽。商人都是胆小怕死之辈，突然路遇胡匪，人慌无智，一个个乖乖下车聚到一起。李守信见没有一个带枪的，更放大胆子。他站到高处，大声说道："列位受惊了，年关将到，兄弟们手头紧张，所以请诸位帮个忙，每人凑几块钱的盘费，多的多出，少的少出。"说完，令车老板在地上铺了一条毯子，用枪逼着商人，过一个往地上扔几块银洋。时间不大，就凑了三四千元，李孙急忙将钱装好，放于马背上，拱手说了声："朋友们，再见！"便上马扬长而去。

李守信当胡匪时，身上常带着3支手枪，"开壳"（交火）时恐怕"炮头"出现什么闪失，常在"跳儿"（官兵和民团）主攻的地方顶着，旁边有四五个人替换着给他装子弹。由于他从小即和"耍人的"及各方面的人接触，社会经验丰富，善用战术和权谋，再加上枪法好胆子壮，善于拉拢交往朋友，所以"打窑"打得响，"杆"合得多，胡匪势力发展很快。到1922年春，"蒙匪"又进犯开鲁，热河都统汲金纯让热河游击马队由建平前往增援。张连同知道李守信的"杆子"很能打仗，便正式公布李为该部连长，让其去抵御巴布扎布的余党。

三、发财有方，升官有道

李守信参加热河游击队后，在张连同默许下，当了4年的官胡子。1922年升为连长后，因已到而立之年且见的世面更多，所以变得越发老练和世故起来。他认为，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要想掌握一定人马干大事，在开始阶段绝对不能贪财，不能怕死，只有如此，部下才能服你跟你，长官才能信你用你。待羽翼丰满之后，自然会有人替你搂钱卖命，也就有了升官发财的资本。李守信非常重视和善于结交朋友，谁同他换帖都不拒绝。他不仅和军官及胡匪磕头，也跟政界、商界以及地主、牧主里边的人拜把子，对那些一时不得志或受人排挤的人，他格外注意接近，认为他们更容易成为知已，事后必会感恩图报。对官位比他低下的人，他从不怕降低了个人身份，总是屈身相交。

李守信不仅结交各方面有头有脸的人物或有知识者作他的"智囊"，也结交鸡鸣狗盗之徒作爪牙。他在热河时，经常在外狂嫖滥赌。但每逢打仗，他却能一马当先，从不退缩，总是冲锋在前、退缩在后，不论到什么紧急情况，也决不把一个当兵的扔掉，每逢战后缴获了东西，他就拿出一半给士兵，一半上交，自己从不沾染，他"放长线钓大鱼"的这一招果然厉害，他手下的兵士们都拥护他，愿跟着他卖命。

李守信跟过的几个长官和他就大不一样了，都是表面温和，内心残忍，诡计多端，笑里藏刀的家伙。如张连同就常用手抚摸士兵的头顶，显出一副爱抚亲近之态，对左右军官则称为"我的爱将"。这不过是灌些"迷魂汤"，使其效忠自己而已。其实，张的狠毒与暴戾是令人发指的。据说，张连同的姨太太因与本家孙子通奸，被张用猪鬃绳在阴户上拉扯致死。崔兴武有4个老婆，大太太生的姑娘尚未出嫁，得了水臌症。母亲带着女儿从老家赶来

开鲁，让崔给请医诊治。崔兴武受了姨太太们的挑唆，误以为自己的女儿是和小长工们私通而身有孕了，是有辱崔家门风，于是，崔一面让大太太领上姑娘先回黑山再去沈阳看病，一面布置手下亲信孙寿卿去到半路将他母女截杀。当时，孙寿卿让一个外号叫"黑手子"的马弁追到库伦旗大沙滩地里，用手枪将母女二人和赶车的一块击毙。黑手子出于好奇，将姑娘的肚子剖开了，结果里边尽是脓水，连个胎儿的影子也没有。象张连同、崔兴武一类人，对自己的妻妾儿女尚且如此狠毒，对待旁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李守信作战勇敢，善交朋友，会拉拢士兵、因而不仅得到兵士拥护，而且颇得长官信赖和赏识，故升迁较快。他 1922 年被任为连长，1924 年就当上了营长。1925 年，热河游击马队改编为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七旅，李守信又升为三十四团团长。

李守信不仅在政治上"盗亦有道"，而且在经营上也有与他人不同的生财门径。在旧中国，钱可通神，交朋友也得要酒要肉，没有钱是什么也办不成的。李守信深知这一点，因而也很注意抓钱，他担任连长前，是做无本生意，即外出抢劫。升任连长以后，就改做有本的买卖了。一开始是贩卖烟土，继而是倒卖盐碱米面，到后来竟逐渐发展成能操纵和控制赤峰、开鲁两地市场的大资本家了。他曾用 500 两烟土在开鲁买了 10 顷地，后以 1 万块银洋卖给为汤玉麟管"窝棚"的谢虎臣，又添上 8000 块现洋，在官银号村买了 80 余顷地，跟张学良的"窝棚"成了邻家。李守信在商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他曾联络赤峰的商界，将把持赤峰商会多年的杨裕文推倒，把李的磕头弟兄李瀛洲选为赤峰的商会会长。据说，李瀛洲曾和孙嘴子的天主堂计"钱盘子"，一次输了 80 万银元。李守信把商界的朋友们请去，一夜之间就给他凑了 40 万。李在开鲁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有一次他竟然把开鲁城中省钞的大部分调往阜新，卖给老百姓缴纳了全县的田赋和烟税。在经棚驻防时，当地最大商号"庆德正"的经理郑培芝也慕名与李守信换帖结拜。由

于李经营有道，在市场上周转灵活，跟富商过从甚密，关系深厚，所以自李当官以后，再没人以“胡匪”头子看他，反把他当成他们的保护者了。

在做投机生意方面，李守信比崔兴武等人显然是技高一筹。有一次，崔兴武看见热河省钞要涨，就把领到的40万军饷放在赤峰的银号中生息。李守信得知后，把这笔钱从银号中借出，除了给当兵的发饷外还做了其他活动的资本，结果赚了很多。到后来纸钞下跌，李仅用2000块现洋就买了40多万钞还了帐。崔兴武以为钞票将要变成废纸了，所以便向银号要现洋而不是要钞票。反过来，李又用少量现洋将40万钞票套走。时过不久，汤玉麟让崔缴上旧钞换新钞，崔却没了着落，只急得团团转。李守信何以如此神通广大？原来热河北部各县的电报局长都是李的把兄弟，所以他的消息特别灵通。李树声本是崔兴武派驻承德住的，但暗里却是为李守信办事的。再加上有李瀛洲等给他作参谋，因而李在同崔的“商战”中，轻易得手，把崔兴武打了个落花流水，李守信就是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办法争名夺利的。他在热河地方部队当军官时，搞到的钱比崔兴武还要多，但他并没有用这些钱办多少家产，而主要用在培植潜在势力上了。

四、镇压嘎达梅林起义

嘎达梅林，蒙古名叫老嘎达，汉名叫孟青山，是哲里木盟达尔罕王旗的带兵梅林。他因为反对出放蒙地，惹怒了本旗王爷，把他关进土牢里，罗织罪状将他处死。嘎达有两个老婆，二婆叫牡丹，会使手枪，胆子也大，称得上是女中豪杰。她联络了几名知己的亲属朋友，冲入土牢中救出了嘎达。嘎达被逼无奈，遂组织一些牧民，展开反对王爷的武装斗争。这支起义队伍发展很快，在整个科尔沁部及辽河边境地区有一定的影响。

嘎达梅林组织起义时，年仅20多岁，少帅张学良已继承其父张作霖统治了东北四省。当时热河省政府的主席是汤玉麟。少帅和汤玉麟都是站在王爷一边的。这两个手操兵权的人物要进行干预，那自然嘎达所领导的起义武装的厄运就再所难免。为消灭这支队伍，辽宁省派张海鹏部骑兵由洮南向西追击，热河省则命驻防开鲁的崔兴武旅到鲁北一带防堵，以期围而歼之。这年入冬以来，冰雪特别大，天气格外冷，崔兴武旅长怕吃苦受冻，不愿亲自率队前往，二十七团团长孙凤阁将队伍带到鲁北后即躲进烧酒作坊中图自在去了，而四十一团团长孙寿卿则是一听说执行任务便装起病来，一直呆在开鲁，根本未随军前往。当时任三十四团团长的李守信年轻气盛，好大喜功，遂毫不推辞地担任了3个团的指挥。

嘎达梅林的起义队伍只有700余人，在张海鹏的压迫下，实在无法在科尔沁部安身，于是决定到热河北部大小巴林旗的坝前休整。时值严冬，坝后下了四五尺深的大雪，察哈尔省乌珠穆沁旗的牧民们纷纷赶着牲畜和车辆，来到坝前安营扎寨，进行放牧。这些牧民们相当富有，每家携带的白面和炒米都绰绰有余。嘎达梅林打算利用这些牧民手中多余的粮食作给养，也在坝前与牧民们一起，度过严寒的冬天，张海鹏的骑兵粮饷充足，是舒服惯了的自在兵，都不愿在大冷天多日在外奔波，吃苦受罪。因而他们把嘎达梅林的部队赶到达尔罕旗的草地后即停止了追击。

崔兴武的十七旅是由热河游击马队编成，有不少胡匪马贼陆续加入其间。这支队伍都想借打仗之机发财，更加担任总指挥的李守信争强好胜，因而径直率领部队从东部深入达尔罕旗北部。

达尔罕旗和热河东北部的几个蒙旗，其地理形势是南窄北宽，南为农业区，北为地广人稀的牧区，中间地带是半农半牧区。听说嘎达梅林的部队要来，牧区的人们怕危及自身利益，过至南部的农业区。农业区各庄都有地主武装，为了免遭外来骚扰，他们

便将各庄的民团联合起来，以加强戒备和防卫，这样一来，嘎达梅林也不得不避开锋芒，只好在中间地带的半农半牧区活动。正当他们由东向西流动之时，在一个名叫土列毛都的村子附近，与李守信的部队遭遇。嘎达梅林不敢恋战，朝西奔逃，李部则穷追不舍。就这样一直追了三天，仍未得追及。由于天气过于寒冷，李守信所部官兵都把手冻坏，腹部也冻得铁青，如再追下去，将有全被冻坏而丧失战斗力的危险。李探知在大小巴林旗的坝底下，有乌珠穆沁的王府保安队计七八百人保护牧畜，他们决不会让嘎达的部队进入坝前他们的活动范围的。因此，李守信当机立断停止追击，转而折回到毛都，去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以便等起义武装到坝底碰壁回来时，再在这里将其一举全歼。

果然，嘎达梅林率队到大坝底后，遭到王府保安队的拦截，被迫折回而向东。因怕同李守信部相遇。故未敢原路返回，而是再往北去沿牧区北部边缘朝东退却。起义队伍退到土列毛都附近，因周围几十里内再无村庄，两条路在这里合到了一起，这时就成了必经之路。李守信正因为了解这一带的地理环境，才将部队驻于该村，并对外严密封锁了消息。上午，嘎达梅林的队伍来到土列毛都附近后，仍对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便毫无顾忌地径直走入李部的伏击圈。李守信一声令下，全线出击，一下追出 70 余里，起义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沿途被击毙和俘虏的有 300 多人，李部官兵穷追猛打，大发其财。

中午时分，乘李守信所部打尖的当儿，嘎达梅林把剩下的人马集中于一座小土山上。准备进行抵抗。李守信所部兵强马壮，武器也好，又是以逸待劳，因而是稳操胜券。他们吃完午饭，用两门重迫击炮朝起义部队集结的小土山上轰击，随之骑兵发起冲锋。这一下起义军慌了手脚，仓皇而退，嘎达梅林的大老婆被炮弹炸死，他们也没顾上带走。前跑后追，一气出去了七八十里，待到天色黄昏，方才罢手。李守信认为，嘎达梅林“赔了夫人又折

兵”，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断定他夜间必要前来摸营，偷袭报复。于是李便让胡子出身最善打仗的胡宝山连长在野滩上燃起数堆篝火，其余的则布置于四周隐蔽起来，疑阵布好，单等偷营者到来。果不出所料，至后半夜，嘎达梅林的部队突然出现，胡宝山的兵在火堆旁边打，四周隐蔽的士兵合拢包围，一下子又打死一二百人，只有不足百人突围，各自奔命，沿途失散得不少，李部追出近 200 里，嘎达梅林只带四五十人朝南败退。为了逃命，连曾救嘎达梅林出土牢的二太太牡丹也被丢弃于一个牧民家里。恰好胡宝山来到这家，见到了脸上冻得铁青的她，知其必不是牧民家女，经一番恐吓，她说出真情，胡宝山并未杀她，而是带上做了自己的老婆。

李守信带领 1000 多骑兵对嘎达梅林仅剩的四五十人猛追，紧紧咬住不放。起义军残部进农业区后，处处遇有民团，无法进村就食，只得饿着肚皮落荒而逃。由于长时间奔逃，人疲马乏，饥肠辘辘，最后在达尔罕旗舍伯吐北的洪格尔敖包的老哈河边被李部包围。其时正是开河时期，老哈河里流着冰排，嘎达梅林见突围无望，便骑马泅人过河。李守信一马当先，冲到前边，和一个随从副官趴在一个土楞旁，让当兵的给装子弹，他们二人一人一枪射击，又打死半数左右，只有 8 具尸体被拖上对岸，其余均被冰排冲走。泅过河的仅 20 多人，不久又折了回来。李守信一看便知道是嘎达梅林未能过河，这些人是返回拼死接应的。其实，嘎达梅林在过河时已被打死了。

李守信的部队过河后，将 8 具尸体的首级割下，经知情者辨认，其中有一个镶金牙的，便是嘎达梅林。李守信为邀功，把人头带到开鲁交给崔兴武，崔又送交汤玉麟，汤又送到沈阳交给了张学良，张又送到达尔罕王爷那儿，悬挂示众多日。

五、从“马贼”到蒙奸

九·一八事变前，阿鲁科尔沁旗爱根庙活佛萨布楞，即与日本早有勾搭，并接受日本大批武器，藏于佛殿之中。他们联络胡匪、马贼，伺机起事。早在1922年，李守信还在拉“杆子”当胡匪时，这个活佛就曾试探过他。1924年，李守信任营长，在开鲁爱根庙驻防，萨布楞活佛经常请李吃饭，后二人磕头换了帖子，萨布楞活佛与李守信交往日深，便将日本确实给阿鲁科尔沁旗运来500支步枪和10万发子弹的事告诉了李，并说：“这些枪支弹药就藏在庙内，如果你想大干，别说爱根庙的枪马，整个阿鲁科尔沁旗都能帮助你成立军队，”当时，李守信尚未羽翼丰满，因而还没这么大的野心，所以未置可否。此外，他总认为张连同开始包庇他为匪，后又提拔培养他当官，对他有“知遇之恩”，唯有死心踏地为张卖命方足以报答。因而不愿离张而另有他图。

九·一八事变时，李守信的三十四团正在鲁县驻防。是年冬，通辽失守。自此，十七旅崔兴武旅长便在投降和抗战两条道路中间徘徊。一方面通过开鲁商会会长、汉奸蒋金安和通辽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玖进行敷衍；一方面调李守信的三十四团到鲁东面九十华里的道德营子布防，摆出抵抗的架势。一日，崔兴武通知李守信回开鲁。到崔公馆后，李见客厅中坐着两个日本人和一个蒙古人，正由陈宝泉参谋长陪着闲谈，崔兴武旅长把李守信等三位团长叫到卧室说：“通辽自治军的松井顾问和第一师师长鲍殿卿想认识一下你们三位团长，为了维护开鲁的局面，你们可以和他们见见面。”来到客厅，互相作了介绍，然后在公馆举行宴会招待。宴会后，松井和孙殿卿到李守信团团长部访问。松井问李守信：“你们旅长不肯和我们携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李说：“我们旅长得请示汤主席，我听我们旅长的。”松井见李未表示态度，便将鲍

师长留下，和李谈了整整一宿，想叫李把部队带去担任他们的第五军司令，李当时未予答应。

1932年秋，十七旅和伪“自治军”发生战事，崔兴武把李守信调往哈拉毛都，其家眷仍在开鲁居住。是年秋末，开鲁城中疾病流行，不少人丧生。一日，崔给李打去电话，让李速回开鲁城。李冒雨赶回后，先去家中看了看，见自己5岁男孩染疫而死，老婆也躺在床上呻吟，心情十分沉痛。于是急忙粗作料理，方到崔公馆去。崔嫌李去得太迟了，满脸的不高兴。崔说：“子忠（李守信的字），我想叫你改个姓，好让大伙捧你，我以后就不管事了。”李说：“眼下开鲁快要沦陷，你怎能不管事而推御责任！我祖祖辈辈姓李，子子孙孙还要姓李。”崔见李也没好气，就不再说话，手握烟枪生起闷气来。李说：“俺的娘们儿快咽气了，我得回去看看。”说罢，抬腿就回家去了。

翌日，李守信问陈参谋长崔让其改姓是何用意，陈说，旅长想让你改为崔守信，无非是看你有一定影响，好让别人不好欺侮他。他随即说道：“谅我李守信在开鲁，谁也不敢端他崔兴武的锅。你告诉旅长，让他放心好了。”陈将此语告崔以后，崔遂将李看为知己，有些大事也开始同他磋商了。

1933年元旦，日军占领山海关，开始威胁热河。从阴历腊月初起，日军即不断出兵袭扰开鲁。崔兴武不敢在热河首先投敌，让李守信和刘继广两团在哈拉都和道德营子进行抵抗。临近春节，李部用步枪将一架飞机击落，飞机上有4个日本人，2挺机枪和2部电台。

飞机伤得并不很重，机上的日人全被活捉。崔兴武得知后，电告李守信将俘虏、电台和机枪全送到道德营子，交给刘继广看押和保管。1月29日，崔兴武把李守信找去说：“日本人想让咱们把飞机上的人送去，打算派你去通辽跟他们谈判。”李说：“你有什么想法？”崔说：“诓他们些子弹。”李又说：“我去有危险，因为

日本人知道我把‘自治军’打跑，不过为了子弹我敢去，别的我可不谈。”崔点头同意。

1月30日黎明，李守信身着长袍马褂，内藏两只勃郎宁手枪，到了崔公馆。开鲁商会会长蒋金安和日本人仓林已在客厅等候。临行前，李对崔说：“我死以后，拜托旅长把我们家眷送回朝阳老家。”崔满有信心地说：“你放心，绝无危险，此次开鲁商会会长同去，就是作谈判的保人的。”将近中午，李守信一行到了田中玖的特务机关。一见面，田中玖就问李守信：“飞机上的人现在怎样？”李说：“4个剩了3个，有一个因夺卫兵的枪，被我打死了。”田中玖也没再说什么。午饭后，李向田提出子弹的事，田说他做不了主，得请示关东军司令部。田问：“你敢不敢跟我到新京（长春）走一趟？”李说：“哪儿也敢去。”田接着说：“那好，我给关东军去个电报，明早给你回信。”

说完正事，田中玖又问李守信：“想到什么地方去玩？”李说：“到班子里去玩姑娘。”于是田让两个翻译陪李坐车去逛班子。到妓院后，李突然想起一个叫王子玉的朋友，就问翻译是否知道，翻译立即去把王子玉找来见面。当王得知李来时只带几百块钱时，立即派人取来5000元交给了李守信。王说：“此次崔派蒋金安跟你来，恐不是为了讹子弹，而是接洽投降的事。崔当汉奸要你出名，你可要小心。”当时，李尚未决计投日，所以回答说：“我早有提防，不会上当的。”

第二天，李守信一行到了长春，见到关东军司令菱刈大将和小矶国昭参谋长。一见面，菱刈就伸着大拇指对李守信说：“你是一个很勇敢的蒙古人，我佩服你李守信团长，希望你和我们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李说：“我是代表我们旅长来接洽送还俘虏，其余都不敢当。”菱刈说：“你为什么不把人带来？”李说：“因为没有谈出条件。”菱刈改口说：“你来顶好，咱们就先谈这件事。”说到这里，小矶插嘴说：“凭你们旅长，我们不相信他，你是蒙古

人，我们才朝着你谈。”李说：“我的身份和地位不够，我得按照旅长的指示办事。”小矶说：“最好先把人带来再谈，看你们有无诚意。”李说：“临来，我们旅长没提到这一点，我得回去请示。”小矶说：“人带不来不好谈。”李说：“有开鲁的商会会长担保。”小矶又说：“我们只信你，而你又不敢负责，所以必须先答应我们的条件，然后才能提你们的条件。”日方完全是一副盛气凌人、蛮横不讲理的架式。既然不好再谈，李便起身告辞。

李守信回到开鲁，向崔兴武报告了谈判结果。崔见没诓回子弹，很不高兴。经李一再说明，崔便答应先把人送去。李见崔气度狭窄，不能成其大事，于是产生了“与其替崔兴武联络日本人背黑锅，还不如自己挑头干”的念头。李守信第二次去长春时，把俘虏的飞机上的人、武器和电台都带去了，换得子弹22万发，另有15支热河造手提机枪，25枝韩林春步枪。

不几日，日本人进犯开鲁，崔兴武不战而退，撤往林西。3月4日，汤玉麟亦不战而放弃承德，崔兴武此时尚不敢出面充当汉奸，于是又要起政治滑头来。3月5日夜，崔在林西把队伍交给李守信掌握，让他代理旅长维持林西局面，自己却跑到林西城外的二龙台川观望形势。7日上午，李守信没有任何抵抗，就叫日伪军开进林西城。

不久，热河完全沦陷，长城抗战也告失败。日本人很快即开到北平附近的通州一带。这时，李守信决定在林西正式投降日寇。李平时结交的一些狐朋狗友闻听此讯，如蝇爱臭，纷至沓来，部队很快由不足2000人增加到8000多人。不久，田中玖发表李为“热河游击师司令”，下辖3个支队，每支队3个团，第一、二支队由汉人组成，第三支队均为蒙古人，司令部还附设一个炮兵大队。李让刘继广、尹宝山、胡宝山分别担任3个支队的司令，让丁其昌任炮兵大队的大队长。日军为控制这支队伍，田中玖派浅田、佐藤和义田3个日本人作为顾问。自此，李守信正式充当了

汉奸。

六、李守信在察北的罪恶活动

李守信投敌后，稍事整顿，即率所部向多伦开拔，赶走了刘桂堂，进驻多伦。不久，日军派松室孝良带着6万块“天津字”交通银行钞票飞往多伦，给李守信作为军饷。当飞机飞到隆化县境内的一百家子山附近时发生故障，只好降落下来，飞机落地后，被当地一个外号叫“二寡妇”的女人所带的胡匪包围，将松室及机上的日本人全部捕捉。李守信闻听此信后，认为是讨好主子的好时机，立即派出40多人，由连长张国治带领，赶赴一百家子山一带搜寻，借以取媚日人。后伪热河省长张海鹏虽以重金将“二寡妇”一帮胡匪收编，使松室等安全回到承德，但李守信也因此而更取悦于松室。此后，日军不仅按月给李部发饷，而且还给他送去20多名日本人组成的“特设队”，并附有3辆装甲汽车和配有10挺轻重机枪。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起“抗日同盟军”，7月初派出万余人进攻多伦。李守信为在日本人那里取得一定政治资本，决定坚守多伦。抗日同盟军于7月7日夜发起进攻，未下，将多伦围困。8日，日本飞机给李部运去6万发子弹和一些慰问品，此后接连四五昼夜阴雨连绵，日机无法飞往多伦，致使他部弹药紧张。抗日同盟军也因天气缘故，给养供不及时，再加上多次进攻不下，一时也斗志衰落，双方遂成胶着状态。为守住多伦，以博得日本人信任和重用，李守信常是日夜不眠，总在最吃紧的地方亲自指挥。致使抗日同盟军虽将多伦三面包围，但却很难攻下。于是冯玉祥遂派姚景川出面同李守信谈判。李守信为给自己多留条后路，便答应将多伦暂时让给抗日同盟军占领，时间约定为一个月。李守信为使“撤出多伦”的话由日军方面说出，便接连发出粮草弹

药告急的电报。他的日本人顾问见多伦被抗日同盟军包围数日，也怕城陷身亡，故亦夸大其辞，将双方作战描绘得十分激烈，以敦促上峰早下撤退命令，在此情况下，松室孝良乃于7月11日夜决定让李守信所部撤出多伦，把部队撤到围场县内的锥子山一带。翌日拂晓，抗日同盟军进占多伦。

李守信所部到锥子山后，休整数日，日方又给他补充了20万发子弹，500枝步枪和9万元军饷，然后就摧其反攻多伦。按照预先约定，李守信借故又拖延些时日，至8月10日再度“攻占”多伦。

李守信第二次占据多伦后，深得日本人信任和称赞。不久，日军即将李部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任李为司令，把原来的第一第二2个支队改称为师，由原来的刘继广和尹宝山2个支队长任师长。同时，日人还调拨来8门野炮和2门山炮，补充给李的炮兵大队，此外又增设了1个通讯队和1个宪兵队，自此，李守信便更加死心踏地为日人卖命，生活也越发腐化堕落了。他不仅学会了吸食鸦片，还娶了一年轻的小老婆，同他的日人顾问一样，终日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1933年8月，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宋哲元重主察政。到1935年，李守信不仅完全习惯了汉奸生活，而且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加，胃口和野心也更大了。1935年12月，李奉其日本主子之命由多伦进犯察北六县时，就企图将察北完全占领，继而再夺取张家口，过过当伪察哈尔省长的瘾。

当时察北六县只张北驻有二十九军刘汝明的部队，其他各县只有警察和民团维持秩序。12月中旬，多伦特务机关给李守信下达了南犯的命令。李守信接到命令后，决定先攻沽源。沽源城内只有白凤山所带的三四百民团据守。但李为向日本人邀功，谎称城中住有二十九军的一个旅骑兵。李守信先是让他的参谋长陈宝泉指挥攻打沽源城，当日，陈被守城的民团击毙，城未攻下。李

守信见参谋长阵亡，急了眼，便亲自前往指挥，8门野炮同时轰炸北门，将沽源占领。

李部占领沽源后，康保、尚义和商都几县，均未遇到抵抗就顺利侵占了。不几日，李又将队伍调回去攻占张北。驻防张北的二十九军已在此之前撤回张家口，连张北到张家口之间的大坝上。也没有部署军队，因而李部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长驱直入，骑兵直冲到大境门外。占领张北后不久，关东军便再次对李部进行装备，以示褒奖。给李一次拨来“韩林春”式步枪1．2万枝，野炮和重迫击炮各30多门，30多挺重机枪和100多挺轻机枪，另外日造歪把子轻机枪四五十挺。这样一来。李守信所部8000多人全部换上了新枪，子弹也堆满了仓库。

李守信占领张北后，即把整个察北完全控制起来，日本人对他更加赏识，不断拨给他武器弹药。因而其实力迅速壮大。正由于此，渐渐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先是宋哲元想拉他，并托李的团长陈景春进行试探，李对宋虽不十分看得起，但也不想得罪这个近邻，因而只是虚于应付。李听说宋的母亲过生日，就派陈景春代表他前往祝寿，送去一架15两重的梅花鹿茸。宋也回赠一块价值400元的怀表。后宋说他子弹紧张，李又叫陈景春把30万发子弹送到柴沟堡。经过这一番往来，宋以为李倾向于他，便托陈景春劝李归附。这一下把事情捅开了，李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李说：“宋哲元虽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在日本人跟前还不如我吃香。要找，咱直接找老蒋，用不着拐宋哲元这个弯。”李守信态度明朗，没有余地，因而这事便就此作罢了。时过不久，傅作义也派代表来跟李接洽，亦未得结果。

1936年4月24日“乌珠穆沁会议”以后，李守信又参加了德王在嘉卜寺成立的伪“蒙古军政府”，从此，在其反革命生涯中又步入一个新的罪恶阶段。

七、伪蒙时期的李守信

伪蒙政权这一历史怪胎，从1936年5月10日在嘉卜寺正式诞生，到1945年8月14日随着日本投降在张家口彻底崩溃，一共存在了9年又3个月时间。始称“蒙古军政府”，后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马贼”出身的李守信在此时期正飞黄腾达，从“蒙古军”副总司令到总司令，并兼任了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副主席，虽受治于日人，但也算是抖尽了威风。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之初，德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自任总裁兼伪“蒙古军”总司令，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德王的伪政府和李守信的伪军，由察北进犯绥东，所以关东军司令部曾默许帮助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那样的“国家”。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所以日军于1937年8月到10月间就轻而易举将张家口、大同、归绥和包头等地攻陷。日本帝国主义见李守信的伪军没起多大作用，因而也就尽食前言，于1937年10月27日在归绥只允许德王成立了一个直接受日本特务机关管理和操纵的伪“蒙古联盟自治区政府”。日本人为使德王不能独揽大权，所以进入归绥后乃让德王专负政治之责，把总司令让给李守信担任。伪蒙政府没有多少独立可言，实质上只是一个替日本帝国主义压榨中国人民和进行征敛的机关。

日本人为把伪蒙政府训练成俯首贴耳为其效劳的御用工具，除让一日本籍参议教德王学习天皇怎样迈八字步，还给他做了一套天皇和溥仪那样的“龙衣”，给李守信做了一身日本大臣那样的礼服。

李守信几十年闯荡江湖，很有一套笼络人心的办法。在他的总司令部里，有相当讲究的厨房，客厅和卧室，卧室中准备好几套烟具和赌具，伪府高级官员均可随便到那里吃喝玩乐，宛如一

个高级俱乐部。在李的司令部里，吃喝嫖赌四项中，就只缺少女人。日本人田中隆吉十分好色，他每次去视察时也总是下榻在李的司令部。李守信为巴结田中隆吉，不惜以每月1000块“交通银行”钞票的包银，从张家口弄来一个妓女小五子，后田中隆吉将小五子甩开，李守信就将其给了金永昌和于兰泽两位高级官员轮流玩弄。因别的人也跃跃欲试，僧多粥少，便又从张家口弄来四五个妓女，都放于李的司令部中，这样一来每到晚间，李守信的司令部便成了宣淫的“大炕”，调情的淫声浪语不绝于耳。

李守信的部队从热河进犯察北时，除李随军带着大小老婆，其他军官的眷属，都集中在林西城内。占领多伦以后，便都迁到多伦附近。到1936年改编的“蒙古军”时，差不多排长以上军官全有太太。当时老百姓对“蒙古军”的太太，都侧目而视。“蒙古军”于1937年秋天到1939年冬天的“全盛时期”，官兵不足2万人，眷属发展到1000多家，都过着荒淫腐化的生活。

李守信的生财之道，是靠从绥远往平津两地大搞黄金交易。他主要是利用职权掩护，包庇以及跟商人结交朋友，由他们为其通风报信和买进卖出，做转手生意，在热河时，李就从事此种勾当，早已是熟惯此道的老手了。以前他弄到的钱，全用来结交狐朋狗友，挥霍净尽。在归绥搞到的钱，除在北平购置几十处房产外，共余也是给“蒙古军”花了。因此他的总司令当得稳稳当当。

李守信在归绥和张家口设有两处公馆，并在归绥的剪子巷给高级军官设立了一个俱乐部。这三处地方天天摆宴，经常点着四五盏灯，还备有上等的香烟、鲜果。遇有吝啬的来客，连赌资和找姑娘的钱也由李守信垫付。这样一来，便把伪蒙政府的重要人员和一部分当权的日本人都引诱在李守信家中或俱乐部里吃喝玩乐、狂嫖滥赌。其用意主要在于联络部下，讨好日本人和探听一些情报。

李守信将搞到的钱除花费在自己的部下和一些高级军官身

上，同时在日本人那里也破费不少，他为了博得日本人的好感，以便能长期立足，真是费尽了心机，干了许许多多卑鄙龌龊的坏事，他不仅常请日本人吃饭，还给他们找妓女，并投其所好，给日本人送过很多的礼物，在多伦驻防时，他甚至把多伦庙仓中的珍贵佛像及赵氏乃莫城的出土文物等送给了“关东军”的司令官、参谋长、察北的几个日本特务机关长及他的大小日人顾问。到归绥以后，便常以皮衣和古玩给日本人进贡。

八、卖身投靠，下场可悲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前夕，李守信和德王都在张家口。当时的局势急剧变化。日本侵略者已是穷途末路，朝不保夕。为稳定住军心，安排好侵华日军的退路，日本高级军官不仅对其所豢养的汉奸伪军们严密封锁消息，而且对他们的中下级人员也进行欺骗隐瞒。因此，李守信等人当时连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这样的大事也毫无所闻。8月10日，日本裕仁天皇即接受了波斯坦宣言，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就在此期间，李守信等人还糊里糊涂地在张家口举行会议，兴高采烈地研究什么“蒙古军”的扩军问题。

8月15日早饭后，李守信接到日本“驻蒙军”军部打来的电话，让他赶快前去开会，说是有要事相商，待李守信来到日本“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处后，才得知了日本已彻底认输，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听完根本博最后的一些交待后，李即返回家中，让秘书指挥众人打点包裹行李，收拾金银细软，装上卡车以便运往车站。李本人先是打电话联系车皮，继之又亲自下手收拾东西。从上午10点多直至下午1时，才把东西基本打点停当。傍晚，李才按日本人的安排，将家眷和财物运到车站，准备乘火车逃离张

家口，前往北平。

8月19日，日本人给伪"蒙疆"政府拨了3节三等客车，车内座椅当中和过道上堆满了鸦土的金条银元和烟土，大约有2000多箱。人们只得爬到箱子顶上，脑袋几乎要碰到车厢顶了。由此可见，这些可耻的民族败类，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李守信投敌12年，究竟捞了多少油水很难说清，反正这次他是在察北扔下了30里长的一道山沟，400匹马，5000只羊，在厚和和张家口丢下50万伪币买下的两处房屋，但在北平还有十几处院子，此次运往北平的东西就计有10万两烟土，换成美金2万元的财产，以及不少贵重衣料、皮衣和值钱的东西。

李守信乘坐的火车从8月19日黄昏开车，由于沿途很多地方的路轨及桥梁被八路军破坏，所以只得边走边修，走得相当慢，走到次日上午，火车才开进北平，就这样，随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失败，李守信也结束了其罪恶的蒙奸生涯。

（根据《李守信自述》整理）

山西土匪乔日成

康耀先

一

乔日成，字化文。1910年出生于山西省应县下社村乔堡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因出麻疹，脸上留有小麻子。其父乔正富，以务农为主，另干拉弓子的营生(给马驴配种)。此人性情蛮横刁顽，一般百姓都惧他三分，故人们送他一绰号"乔棒子。"乔正富有两个儿子：长子乔日昌、次子乔日成，皆强悍不羁。

乔日成自幼胆大异常，且鬼心眼子特别多。他5岁时，一次在街上围观一个摆摊的铜匠，见摊子上有颗漂亮的小铜铃，十分喜爱，拿在手上把玩一阵儿，却无钱购买。他小眼珠子一转，想出个鬼点子：趁铜匠不注意，他把铜铃装入一个比他还小的娃娃兜里，随即推了那个孩子一把，让其走开。待铜匠发现丢了小铜铃后，即向乔索要。乔毫不胆怯，主动提出让铜匠搜身，结果一无所获。乔日成反把铜匠骂了一顿，然后走开，追上那个小孩，将铜铃要去归为己有。

1921年，乔在城内高小读书。是年暑假(阴历六月)，正值五台山历年的骡马交易大会举办时节。其父欲买匹好种马，于是带他同去五台山。乔氏父子在马市上转来转去，终于看中了一匹高头宽胸口轻的好儿马。因当时有几个买主，于是卖主便设标箱让众人投

标，最后看谁出的价高，就将马卖给谁。乔父寻思，投少了怕买不到手，投多了又怕吃亏，便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年仅12岁的乔日成。乔日成略作思索便说道："这好办，咱在票上不写多少钱，只写一句'我比别人投的最高价多一元'。"说罢，他即代笔投入箱内。开箱之后，他的父亲果然买到了那匹好马。

1924年，乔日成高级小学毕业，考入右玉县省立第七中学读书。该校英文教员王藩与乔同乡，且校内师生中惟有他们二人为应县人。因为这层关系，所以王、乔两人感情接近，平日也多有往来。1925年暑假后，七中部分学生为一些人所鼓动，借口王藩教英文学生听不懂，要撵走王另换他人。一天上午，四五十名学生涌到王藩宿舍，硬把王拉了出来，还把王的行李搬出，要将其赶走。恰在此时，乔日成赶到，冲进人群与闹事的学生拼死撕打起来。终因寡不敌众，乔不免吃了些苦头。他奋力突出重围，随即上了房顶，揭起房瓦就朝拉扯王藩的人们砸去。顷该间，不少人被砸的头破血流，东倒西歪，一哄而散，去找校长告状。一阵飞瓦之后，乔站在屋顶上喊道："以后谁再敢来拉王先生，老子就打死谁！"自此，凡被乔打的人谁也不敢来惹他。此事不仅使全校震惊，乔日成这个名字也轰动了整个右玉城。学校当局无奈，只得挽留王先生，开除乔日成，出钱给受伤学生医治，才算了结了这一风潮。此事之后，王藩自知在七中再难混下去，遂坚决辞职，转往宁武县第五中学。

王藩是应县刘义村人，与乔堡仅相距10余里。王家在民国时期是应县有钱有势的新兴大地主。王氏兄弟四人均为大学毕业。老大王相，山西大学毕业，当过察哈尔省财政厅科长、应县一高及县中校长，后任日伪县长；老二王辅，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毕业，当过山西阎军少将旅长，后任蒋中央军副军长；老三王魏，北洋大学毕业，时任天津纺织工程师；王藩是老四，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到右玉县七中任教，就发生了上述事件。乔日成舍命护王藩，除了乡亲这层原因外，再就是看中了王家的势力，想日后有个照应。

乔被七中开除后回到了应县老家。春节时，王家兄弟都回家过年。大年初二，乔特去王家拜年。除王先生热情招待外，王家兄长们也对乔倍加称赞和感激，各给乔几元拜年礼，并留乔家宴。席间，王辅旅长夸乔有胆识，是个军事人才，并说："既已失学，可到太原报考阎锡山的北方军校，我可与校方介绍，保你考上。"乔日成闻听此言，欣喜异常，感激不尽。席毕，乔毕恭毕敬向王旅长并王家众兄弟鞠躬辞行。

二

1926年春，17岁的乔日成借了本县高小同学于孝先的中学文凭，独自来到太原投考阎锡山的北方军校。经王辅旅长与校方说项，不论体格与考分好坏，录取为二期步科六队学兵。军校不收学费，且公家供给衣食，毕业后即有差使可干，所以当时一些念不起或考不上大学的中学生都踊跃报考军校。乔日成进入军校后，想到日后可谋个一官半职，真是春风得意，如愿以偿。

乔日成生性放荡，不受拘束。不到一年，他感到军校生活乏味，管束又十分严格，每日三操三课，从早到晚不得空闲，星期天还要擦拭武器和整理内务，因而慢慢产生了厌烦心理。由于此，他心中的无名之火不知朝何处发泄，经常与同学们吵嘴打架，甚至顶撞长官而屡犯军规。于孝先之胞兄于绍先与乔自幼相好，时任晋军连长，因犯军法被扣押于太原陆军监狱。1927年春，乔闻讯往探，方知于已获释住在了正太街大丰栈旅店。为同于见面，乔请假未准，遂于一天夜间从军校大营盘的厕所爬墙而出。后被校方知悉，将乔开除。

乔日成被开除后，暂住于处。他因手头拮据，觉得总花于的钱也不是滋味，一日便对于说："看那些洋人肥头体胖呢装革履，个个都是有钱的阔人，把你的手枪借给我，我去抢他们些钱，咱就不受

穷了。”于同意了。大丰栈与火车站相距不远。一天，乔刚出栈房街门，就见一个大腹便便的洋人提着皮箱朝车站走去。他疾步上前，用手枪逼着洋人进到栈房于的住处。洋人见状，心里发毛，只好乖乖地让乔、于二人搜身翻箱，将其所有贵重物品掠去。随即，乔、于二人离开大丰栈，移居他处。

当晚，山西省政府得到该洋人的控诉并电报了北洋政府及外国使馆。翌日，晋阳日报登出有两名军人在大丰栈抢了一个瑞典传教士的新闻。此事轰动了太原城，引起国际交涉。当局马上通令太原军营及宪兵严查流浪军人，但终不得结果。

乔日成初次抢劫得手，第一次感受到了有钱的快乐。他每日里下馆子，逛妓院，上赌场，看名旦，好不快活。只几个月光景，将钱挥霍殆尽。在于绍先劝说下，年方18岁的乔日成又从友人处借得一张初中文凭，考入太原私立中山高中。是年冬季，奉军攻打晋军并占领了雁北地区，致使在太原求学的雁北籍学生因邮政和交通阻断而无法得到家庭接济。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下令给每个学生补助30银元，由学校造册领取。乔日成见有机可乘，除领取个人的一份外，还开据其他不到校的雁北籍同学名单，向校方强要代领。会计不准并与之争吵。乔怀恨在心，于当天下午身着军装持枪到校财务室将会计打死，抢走银钱若干。一不做二不休，乔从学校出来后又转到原所在军校王教官家。他见王太太一人在家，就说是王教官让他来取钱发饷。太太说：“关饷是军需处的事，教官不管这事。”话音刚落，乔顺手从炉旁拿起一根火柱朝王太太猛击一下，并举枪说：“不准叫嚷，赶快拿钱，拿不出打死你！”王太太吓得魂飞魄散，赶忙开柜拿钱，还将手上的金戒指取下给乔。临走，乔让太太趴在地上，不许起来和哭叫，然后他即逃之夭夭。

乔跑到北门外一家旅店换上便衣过夜，第二天又抢了邮差的一辆新自行车，骑车跑到口外的绥远省。时隔不久，太原宪警将于孝先抓捕到案，复转阳曲县政府审理（太原城归阳曲县管）。该县县

长杨楷也是应县人，清末举人，听于叙说借给乔的文凭考入军校等情，方知抢匪真名是乔日成。加之杨县长也知于的二个哥均为现役军官，于是将于孝先释放，并上报省政府另行通缉乔匪。

乔日成接二连三的抢劫，一时成为全省奇闻。阎锡山即给各地军政下达通缉令，并严令应县政府务必将乔追捕归案。应县县长不敢稍怠，即令公安局派人到下社村搜捕乔犯未获，乃将乔父带到县衙，严刑拷打，逼问乔日成的下落，并关入狱中。直到把乔父折磨得快死时，方让讨保释放。

三

绥远省是奉军势力范围，乔日成逃到那里，就犹如进了保险区，阎锡山再也奈何不得。乔用抢来的钱结交了不少地痞流氓，整日包娼嫖妓，吃喝玩乐，并学会了吸食鸦片。如此约一年光景，乔的口袋里所剩无几。正所谓"富则忘家穷则思归"，他决定归家探望妻儿并察听抓捕他的风声。

1928年腊月间，乔日成悄悄回到老家下社村。该村是应县第一大村，由12个村堡连接而成，共有1400多户人家。乔堡位于十二堡中间，在其北邻的李堡设有应县第二区公所，管辖东南乡几十个村子。自省县通缉乔日成以来，该区公所一直负有侦缉乔的责任。乔心里清楚，要想在家中安居无恙，非取得区长的庇护不可，于是他决意拜会区长。入夜，正当区长及家人准备睡觉之际，乔突然破门入室，站在了区长面前，并自我介绍说："我是乔日成，今天特来向区长投案自首，请你逮捕我向上边请功领赏。"随之又说："我来拜会区长，是想与你秘密交个朋友，私下互相帮助都有好处，请你考虑咋办吧！"面对这不速之客，又听他如此唐突话语，区长吓得发愣，一时不知所措。乔见区长暂未作答，又说道："如你扣捕我，或向县里报告，咱俩结成怨仇，我必打死你的全家。但愿同你订个密

契，结义为兄弟，尊意如何？”听此言，区长顿有所悟，强露笑颜，给乔让座。乔落座后，故意解开上衣露出腰间手枪，并掏出大把大把的白洋放在炕上说：“这事你知我知外人不知，以后需钱时，我还接济你。”区长和太太见乔如此说，又凭空得了若多银元，马上认乔为友，以礼相待，摆酒对饮，称兄道弟，顷刻似为“莫逆之交”了。

乔在家中居住月余，不知何人告知县里，翌年正月的一天夜里，应县公安局30多名警察突然来到乔堡，包围了乔的住宅。四五名警察上了房顶，十几人进入院内堵住门窗准备入室抓人。当时，乔正躺在炕上吸大烟，听到杂乱脚步声响，立即提枪走到外屋，慢慢将房门拉下一条缝，瞄准院内警察连发射击。当即数人倒地，几个带伤的也惊慌惨叫而逃。房上和院外的警察还未搞清咋回事，亦随之撒腿跑散。乔见状迅即上房，又向街上警察射击一阵，跑散的警察才作还击。乔越过邻院房顶，趁夜幕掩护逃出村外。

此次公安局抓乔未成，反死伤十多人，便把气都撒在乔父身上。他们硬说乔父包藏匪儿打死打伤众警，要他抵命。当场把乔父打了个半死，然后叫民伕抬进城内投入狱中。乔父两次受儿之累，决心与乔日成断绝父子关系，出狱后便将日成的妻儿分居别院。

乔日成打死打伤警察后并未远遁，而是躲藏在附近村子亲友家中，暗里让人探听告他的人。不久，搞清了到县里报告的是本村一男人，他便在一个白天窜回村中将那人枪杀，同时警告村上的人们，说谁再报告就打死谁的全家。之后，他又跑到口外避风去了。

乔日成身上所带银钱不多，只得找绥包一带的朋友解囊相助。如此过了三个月光景，他估摸着家乡抓捕他的风声已过，遂又回到家中。

乔父恨子为匪累及自身，遂将乔日成妻儿分居单过，致使其娘儿三个生活无着，陷于极端贫困之中。乔日成在家里苦熬数日，便决计到赌场去吃黑钱。每到一家赌场，乔便插入人群中观赌。当有认识他的人发现后，往往都这样跟他打招呼：“乔二爷，怎么也来这

地方玩呢。”乔便哈哈大笑答道：“我现在穷的没办法，想来押几宝试试看。”宝主场家见是赫赫有名的乔日成，哪个敢怠慢，忙上前点头哈腰照应，为免生事端，便主动说道：“二爷没钱花，送你几十元不必押了。”乔也不客气，即笑而作答：“那就领情了。”随即道谢而去。如此，乔在赌场转了几个月，得了不少银钱，一时间，家中米面柴炭不缺，就连鱼肉大烟也都有了。

乔日成吃赌场黑钱，大都比较顺当，唯有一次出了点麻烦。一天，他到南山坡下一个村赶会，赌场的人谁也不认识他。观宝多时，他猜着了装宝人的规律，便嚷叫一声：“我在三上押一百元！”宝主说：“你押下钱！”乔说：“开了宝盒如输了再给你不迟。”宝主看他猴小的身子，便责他不放下钱就滚出去。乔厉声吼道：“滚你妈的屁吧！”宝主站起来推了乔一把，并叫人将他拉出去。乔一时性起，掏出手枪将宝主宝家二人的脚部击伤，吓得在场的人都呆若木鸡。正当此时，忽一人喊叫：“这不是乔二爷吗？”受伤的宝主宝家闻听此言，赶忙向乔赔情道歉，并各拿出 50 元给乔才算了结。

这年秋季，乔父怕连累再吃官司，悄悄进城报告了官府。鉴于上次捕乔警察死伤的教训，县里非常慎重，先训练好官警射击和定好抓捕方案才开始行动。秋末一天拂晓，县公安局长亲自带领 30 多名武装警察突袭乔堡，将乔的住宅包围。他们偷偷爬上房顶喊话并居高临下射击，令乔交枪投降。岂不知，乔日成已事先得城里朋友传来消息，设下空城计躲往他乡去了。众警折腾一番，乐得扑空，安全返回县城。

乔感到吃赌场黑钱既不体面也不过瘾，不如去抢老财的痛快。入冬后，他便纠合两个小匪，到浑源县南山界板沟抢了王美堂家。王家以种中药黄芪发财，所以人送绰号黄芪老财。一天黑夜，乔带一枝手枪，两小匪各带一杆长矛，相继翻墙进入王家。他们抓住王美堂，用枪逼着说是借几千元，如不借就打死他的全家。王老财见状，早吓得魂不守舍，忙让家里人扒开地窖，搬出存放银元的木箱

子。乔匪三人将银元分装三袋，飞返故乡，两小匪各得千余元，乔得的更多些。

王美堂的儿子在太原当官，闻其家中被抢，分析匪首面貌口音，认定是应县乔日成所为，于是报告了省府。为免遭缉捕，乔将妻子送往其娘家，将所得银元交予其妻，就到太原投军去了。

四

中原大战前的1929年冬到1930年春季，阎锡山在山西大搞扩军。正是在此时，乔日成投到阎军第十五军第三旅，当了王辅旅长的贴身副官。大战开始后，该旅攻击蒋的中央军节节胜利。作战时，王旅长除用电话指挥外，常派乔日成到前线传达命令、督战执法、了解敌情及联络友军等。乔一向胆大机敏，对王忠心耿耿，每次完成任务都很出色，颇得旅长赏识。

大战前一阶段，阎军和冯军进展顺利，不到半年工夫即进占了半个中国。危急中，蒋介石以金钱和地盘的条件，诱使张学良出兵山海关包围了阎冯军的后路，使整个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转败为胜后，迫使阎冯下野。阎军由张学良代蒋收编，由原来的15个军缩编为4个军。所有编余军官共8000余人，在太原成立了一个编余军官教导团收容之。王辅亦在编余之中，担任教导团教官。乔日成被编余后不愿入团受训，带着一个护兵闲住太原。

到1931年，年仅22岁的乔日成因断绝经济来源，又变得囊空如洗，再度陷入困境之中，于是重操旧业。

乔原所在三旅三团的团长邓兰友家是太原附近一有名的地主和兼营煤窑的资本家。在部队时，邓曾与乔发生过争吵，故乔对邓怀恨在心。一为抢钱，二为报复，乔此次将抢劫对象为邓兰友家。这年夏季一天上午，乔与护兵全副武装，乘马直奔邓家。乔让护兵守住大门，监视院内外动静，他独自入院并高声喊道："老太爷在家

吗？我是邓团长的同事，特来拜访府上的。”从正房走出一中年妇人，说是邓团长的女人，请乔进屋。老太爷已在堂屋迎候。乔扫视一下正房两侧屋，老太太在东间，太太进入西间端出茶水侍立一旁。乔先问讯团长的情况，太太说：“不常回家。”又问太爷高寿、有几个儿女等。寒暄毕，乔忽地站起举枪照老太爷前额砸了一下，老太爷咳呦一声昏倒椅上。老太太迎声跑出，见老头子血流如注，一时吓懵了。乔举枪对准她们婆媳说：“不准嚷叫，快取出银元首饰给我！如果叫喊，我打死你们全家！”老太太哆哆嗦嗦进屋取出些银元，乔嫌少，继续加以威胁。这时，老太爷苏醒过来，两手抱着血头，喊叫老婆子和儿媳赶忙开箱将存放的银钱全拿出来交给老总，并请求乔不要开枪。在邓家婆媳取钱当口，乔还亲自到两面里屋翻箱倒柜，找出一副金镯、一个戒指和一罐大烟膏。随即连同两个女人拿出的银钱用布包作两包，喊来护兵各挎一包，大步走出街门，骑马朝北飞奔而去。

两个女人把老太爷扶入里屋，急忙包裹伤口，洗去满脸血迹，知匪远去，方敢嚎啕大哭起来。四邻闻声赶来，方知他家被匪抢劫。当即派人将邓家儿女们叫回，并请医调治。邓团长听家人述说匪之相貌特征，知是乔日成干的，遂直接呈报了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徐严令应县政府缉乔归案。应县县长周敦信派出大批警探到下社侦缉，根本不见乔的踪影，又将乔父带到县城讯问未果，只得将乔父放回。

应县政府据实呈报省府，山西便移文绥远协助抓捕。当时，傅作义主政绥远不久，公务繁忙，且口外的土匪多如牛毛，哪里会把一个乔日成当回事去认真办理呢。因此，口外一带便成了乔的避风港。

乔日成抢了邓团长家后，由太原径奔绥远省省会（今呼和浩特市），换成便衣，把马卖掉，又尽情享乐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陷于内外交困之中，不得已又于

1932年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复掌晋绥两省军政财文大权。阎二次上台后，声言拥护蒋中央不争政事，以实业救国为号召，开始建设晋绥两省的轻重工业和发展交通运输、金融、水利等。为筹集资金，便在绥远屯垦土地大量种植鸦片，并准当地百姓亦广为种植。但在口内的山西是严禁种植的。阎锡山严令，所种大烟只准官收官卖，不许私贩私卖，为此在长城各口设卡，搜查甚严。因私贩鸦片获利很大，所以每年秋后都有大批烟贩冒险于此营生。为对付关卡，烟贩子结为团伙，雇用有枪的强人护送闯关。当时，应县有名的土匪王谋、弓三等就到口外以保镖烟贩赚钱。乔日成同他们亦多有往来。

乔到绥远后，先住进妓院，结识一雁北籍妓女张玉玲。此人颇有姿色，与乔相处非常亲热。初时，乔独占包房，张不再见客；继则乔出钱将张赎出，二人以夫妻相处，移住一旅店中。如此过了二年有余，手中银钱花尽，又将手饰等物卖掉维持一段时间。乔觉得如此下去不是长久之策，于是决定将张玉玲另作安排，然后自己好去谋一条生财之路。乔对张说："我是个危险人物，你跟我日后恐要受刑吃官司。再说我老家还有妻小，这么下去也不是长法。我想给你安置个长久去处，给你一笔钱去太原找我的结拜兄弟于荣先，去做他的小老婆吧。"张也知乔是赫赫有名的土匪，对乔如此安排也很理解，虽依恋不舍，但不得不照此而行。

于荣先，字化甫，应县小石口村人，距乔家乡乔堡只5里许。乔、于自幼同窗，后又同在阎军三旅王靖旅长手下做事，换帖结拜为兄弟。于时任少校营长。1933年时，阎锡山在太原成立整军会，于随王靖当上中校军训教官。乔知于在老家娶有一个小脚老婆，很不中意，故写信介绍张玉玲为妾。张到太原，于一见钟情，顿倾石榴裙下。张玉玲一妓女出身，身为一员威武青年军官的太太，倒也心满意足了。乔将于、张之事办妥后，是年秋季离开绥远城来到杀虎口外，开始了护送大烟贩子出关的保镖行当。雁北各县尤其是应县

的烟贩子，都知乔日成的厉害，所以大都愿雇他保镖。每次过关进口时，烟贩子们在口外集中成队于夜间行动，乔领队在前，独自先到关卡门口堵住卡警，如未发现即行通过；如被发觉，乔即送礼说情请求放行；若不放行，乔即开枪对抗，打死值勤人员护送烟贩子们安全进口。那时，关卡人员多靠吃黑钱发财，送上门的钱大都乐于收下，这样也免得双方交火造成伤亡。一来二去，乔便与关卡人员交上了朋友。关卡人员一见是乔保镖的贩子队，不讲给钱多少即行通过，都怕得罪了乔遭到报复。

乔干了一段保镖后，总觉得挣钱太少，来的太慢，很不过瘾，于是决定干一桩抢劫烟贩子的买卖。秋末的一天，他蹲在口外离关卡不远的地方，等待过客。夜深后，恰巧走来一队 20 多人的烟贩子，每人身背一包烟土急速前进。乔仔细观瞧，见其中没有一个熟识的，即尾随其后。入关后，乔跟踪烟贩走进一个村店，同住一个大火炕上。待大家睡熟后，他从炕上爬起来，点着大油灯，站在门口朝火炕里边墙壁"吱、吱"开了两枪。众烟客猛地惊起，不知所措。乔端枪对准炕上的人们喊道："我是关卡人员，你们把带的烟土各交出一半，把带的钱也全拿出来，扔到地下门口，谁也不准下炕，哪个敢不交我就打死他。"众烟客迟疑之中，乔照着炕边的人打了一枪。受伤者疼得惨叫，大家才慌忙哀求讨饶，于是一个接一个乖乖交出烟土和钱，扔到乔的面前。之后，乔用早已准备好的大口袋装好，出屋将房门反锁上，星夜赶路，洋洋自得地急奔于返回家乡的路上。

五

乔日成抢劫了烟贩子回到家中，官府抓捕他的风声已经过去。因此次抢劫是黑吃黑，无人告状，所以他在家中得以安然居住。

到了 1935 年秋季，乔日成的手又痒痒起来。于是便与其兄乔日昌合计，准备做个大买卖，目标是离应县不远的浑源黄崖村的张

凯家。张家是当地最有钱的大地主，以放高利贷和种黄芪发财。张凯是留日学生，阎锡山的化学专家，当时在太原任西北实业公司火柴厂厂长兼西北化学厂高级工程师，月薪可观。其父在家经营，有长工十几人，还有护院枪支，长工又兼为张家的家兵。

乔日成将同他抢过南山的两个小匪招来，连他哥哥共四人各带手枪一枝，夜间出发，次日上午到达黄崖村。他们进村后找到张家住处，察看了进出村的路径、街道情况及张家收晒黄芪的场院，然后开始行动。乔日成独自从容走进张家前院，经过厅直至后院的正庭，见到了张老太爷。他假称是买黄芪药材的客商，与老太爷寒喧后即谈论起黄芪价钱，并约定秋后再来收购，然后辞别出村。乔与同去的三人见面后，商定当天下午待村民和张家长工都下地后即行下手。他们四人潜伏村外，吃过干粮休息一阵子后即奔张家而去。乔让两小匪把守前院和街门临视院内外动静，让其兄守卫过厅监视内院。布置停当，他独自走到正房。当时，老太爷和老太太正在午睡，乔掏出手枪照老太爷头部砸了一下，随即砸了老太太背部一下后厉声说："快把你家的金条法币银元全拿出来，不然开枪打死你两个老狗！"乔又说道："我们是土匪，来的人很多，已经把你家包围了。"两个老人哪见过这阵势，老头子忙摧老婆子开箱取钱交给乔。乔还亲自砸开一个大板箱，找出一些金银、钞票和烟土。然后分成四包，将其兄和两小匪叫到屋里，每人背上一包，逃之夭夭。

乔等四人走出村外四五里许，有十多人从后边追来，用步枪朝他们射击，将乔日昌的腿部击伤，行进不得。乔见状忙令同伙散开趴下，隐蔽于地埂后边。追击的人仗人多势众，不停步朝前冲来。快到土埂处时，乔突然开枪，一梭子弹将跑到前面的几个人撂倒，后边的人转身往回就跑，寻找到有利地形后也隐蔽起来射击，双方成对峙状态。乔将其兄伤口包扎后，吩咐两小匪掩护其兄就地对抗，待天黑再作打算，他自己便悄悄返回村中，袭击张家后路去了。乔窜至张家晾晒黄芪的场院，见场中空无一人，放火将场中黄芪茎点

燃，顿时火光冲天。张家追击抢匪的人见场中起火，急忙撤回救火。乔日成亦趁机返回原地，令两小匪搀扶其兄先走，到前面村子雇一毛驴将乔日昌送至家中。

乔日成掩护其兄脱险后，独自乘星夜走出数十里宿在浑源县一小村庄。张家人伤了他的哥哥，他决意再进行报复。翌日下午，他酒足饭饱之后重返黄涯村。天近黑时，他窜到张家场地，见不少人正整理被烧焦的黄芪，掏出手枪就朝人群射击，当场死伤五六人，场中乱成一团。乔复仇目的达到，趁乱扬长而去。

这起抢劫案和枪杀案使浑源县上下震惊，成为全省的大案。张家将匪首面貌口音连续两次向县政府报案，并派人到太原告知其子张凯，又是直接上报了省政府。经查，此案又是乔日成所为。除浑源县派警察四出巡查追捕外，阎锡山亦下令各县严密侦查并悬赏重金通缉之。

谁能料到，乔日成此次带上金条元宝烟土和银钱，连夜跑到阳高县，化装成商人乘火车往北平天津游玩去了。“拾来的孩子不怕摔死”，乔日成到平津后，住的高级饭店，吃的山珍海味，包的高级妓女，看的四大名旦，凡是好玩有名的地方都去观赏游玩，真是随心所欲，大开了眼界。

话分两头。此案发生后，受阎锡山之命，应县政府再度派公安人员到乔堡抓人未果，就将乔父并其兄抓去拷问。乔父言道：“我痛恨这坏小子比你们当官的还恨，他每次回村我都报告官府，你们抓不住他，扣我有什么用。我跟你们发誓，如他再回来，我一定杀了他！”县长当堂嘉奖他大义灭亲，便即开释。随之审讯其兄乔日昌时，判定四名匪中有他，并当堂脱去衣裤压杠施刑，发现其腿部用布裹扎，解开视之乃是两个对口伤痕，分明是枪子射穿所致。乔日昌无言诡辩，供认不讳，遂被押往浑源县处决。其他两名小匪，一是南河种的智发财，一是下社丁堡的丁顺子，早已闻风逃匿，不知去向了。

乔日成在京津混荡了一年多光景，不仅目睹了有钱阔人的奢侈欢乐，也看到了破衣烂衫、忍饥受寒露宿街头的穷人的苦难，从而使其思想受到刺激，萌生了做一番正经事业的念头。尤其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爱国学生的抗日激情使其受到感染。从报纸上他了解到，阎锡山与共产党人合作，成立了山西青年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并提出守土抗战的号召，吸引了平津不少青年奔向太原。值此时局急剧变化之际，乔认为山西可能已不注意他这个土匪了。遂于1936年秋季返回应县。

其父见他回家，如仇人相见，遂生杀子之念。一天夜间，乔父带一把菜刀潜入乔日成所居宅院，从窗孔窥见匪儿与其妻在一条炕上头朝外睡着，正在玩吸大烟，便轻轻撬开房门，举刀朝乔的头部砍下。其时，乔日成已听得门响并机敏地移身起坐，正好将枕头劈烂，却未伤着乔的一根毫毛。乔随即拿起手枪对准其父的脑袋说："念你生养我一场，这一刀饶了你，如再行凶，我崩了你！"吓得其父抱头鼠窜，也不敢进城去报告官府了。

乔居家数月，整日转游各村探亲访友谈论抗战之事，准备成立部队。乔的一些同学、亲友在应县城中做事，乔决心深入虎穴，与这些人进行联络，以期举事时得到他们的帮助。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乔怀揣手枪，悠然闯入应县县城。走进东城门后，几个守城的警察认出了他。乔毫无惧意，主动上前打招呼，并拿出纸烟给众警吸。乔笑嘻嘻地说："你们认识我吗？"众警哈腰逢迎说："你不是乔二爷吗。"乔说："你们不抓我，不去报告，咱们是朋友；如抓我或去报告，咱就是仇人，我就打死你们全家。"众警忙说："请二爷放心，咱们都是本地人，决不害您。"

乔从容不迫进城后，沿十字大街观看了市容，还特意到公安局门口察看了院内外情况，最后到县中学和第一高小见到许多相识的教师，并秘密叙谈很长时间。中午，乔在一高吃完饭后，到街上铺子里买了些衣物食品，准备出城回家时，听到街上有人说："乔日成

进城了，城门都紧闭了，警察都出动了，正搜查乔日成呢。”闻听此言，乔转身进入北街一家商铺后院，爬上房顶，房串房地溜到北城墙根，爬上城墙，逃出城外。他想，既然县里知其返乡，必然会到乔堡去抓人。于是，他渡过桑干河，再度到绥远一带避风去了。

六

1936年秋，乔日成在口外的绥远、包头等地联络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他应县的老乡，也有兵痞、匪痞等一些无正当职业的人，为成立一支队伍作了必要的准备。绥东抗战爆发后，他认为时机到来，便急速返回家乡准备举事。当他走进下社村后，见村里驻满了军队，是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七十二师，师长陈长捷，师部驻扎在乔堡的天王寺大院，与乔家邻近。乔认为军队不管政府通缉他的事，加之官兵们又不认识他，便毫无顾忌地回到家中。万没料到，乔父见儿子回来，便悄悄到师部报告了陈师长，要求部队将他的匪儿扣捕。陈师长也早闻乔日成大名，且有阎锡山迭次通缉命令，遂派出特务连于拂晓时包围了乔堡，以一个排的兵力进入乔家院内和上了房顶并喊叫道：“乔日成出来，缴枪不杀，不出来就向屋内射击和扔手榴弹了。”乔在酣睡中惊醒，知是大军来抓难以脱逃，如抗击拒捕定会危及老婆孩子的性命，遂开门出降就擒。

乔被带到师部后，陈师长端详一会儿说：“好样的，可惜不走正路走了邪路。”乔幽默答道：“世上哪有正路邪路之分，成者王侯败者匪嘛。”说得陈师长慨叹良久不知所云。经师部军法处讯问毕，便将乔五花大绑押往城内交应县政府处理。应县申报到省政府，说是乔在本县查无抢案又无原告，最近犯案的地方在浑源县，应移交浑源县对案审理。到1937年春，省里复令将乔转解浑源县。应县城乡民众得知乔日成被捕，都想一睹其人为快。转解那天，县城街道两旁和房顶上到处人山人海。乔日成端坐囚车内，频频向

两边的群众笑颜点头，并不停地说："谢谢大家！谢谢乡亲们！谢谢父老兄弟姐妹们对我如此热烈相送。"走出城后，乔霍地站起来大声说："我生来不怕死，怕死不英雄，此去倘若生还再与大家相见吧！"

乔被解往浑源后，其父认为除了一害，感到舒了口气。其母却整日哭哭啼啼，寻死觅活，为其两个儿子都被送往浑源处死而痛心至极。她终于急疯了，日夜撕打老头子，说是他害了全家。不久，老太太即喝大烟自杀了。

乔到浑源县被下在死牢。待县政府将全部案情调查完毕，已是春末时分。在县长坐堂提审时，不少官民纷纷来到大堂围观。升堂后，县长一拍惊堂木对乔说："你叫乔日成吗？把你杀人放火抢劫全部案情详细供出，免得上刑筋骨皮肉受苦！"乔哈哈大笑说："我的杀人放火抢劫，你们政府和省政府均有报案可查，都是事实，请依法判处死刑好了，何必再多费口舌。"县长说："法律手续，必须有你的口供、划押才能判决。"乔顿时转怒戏谑地反问道："你们当官的贪污受贿了多少钱，也请向观众详细供出……"不待乔说完，气得浑身发抖的县长便令衙役掌嘴，打得乔口鼻腔流血。乔喷血大喊："我死都不怕，还怕身受疼痛。"县长又令压杠子，乔顿时气绝，昏死过去。在堂上致死犯人乃是违法，于是县长又忙令法警泼凉水使乔苏醒，然后送入牢房，听候再审。随即，浑源县奏请省府，说乔供认不讳，按律应判处死刑。在上下行文过程中，已届1937年夏季，7月7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

到1937年9月间，日军沿平绥线进攻，侵占了天镇、阳高、大同等地。所有驻防雁北的部队纷纷溃退，各县政权随之土崩瓦解。浑源县政府官员准备撤逃之际，自行决定届时将死刑犯枪决，活刑的释放。值此当口，一天下午放风时，乔对众囚说："外边情况不好，日军快来了，县政府要把我们犯人都处死，他们就撤到关南逃难去了，咱们赶快打开监狱跑吧。"众犯听后都很慌恐，一

致表示听从乔的指挥，立即行动。乔让两个没带刑具的青年犯人把开监房门的看守拉住，乔上前对他说："日军快来了，来了先杀你们吃官饭的。县里的官员要逃跑了，你何不放了我们也早些跑呢。你放了我们，对你感恩戴德，不放就先打死你。"看守见这阵势，知道不同意也没好，便说："狱门外有站岗守卫的警察，你们跑出去他们会开枪的。"乔说："外边的事你不用管，你马上拿把斧子把我们的刑具都卸了，开开狱门随我们逃走好了。"很快，五六十个带刑具的都把刑具砸开，由乔带二三十个年轻力壮的犯人冲在前边，其余 200 多犯人紧随其后。到狱门后，两个守卫的警察还没弄清咋回事就被缴了械。然后冲到警察班宿舍，抢了十多枝步枪及子弹、手榴弹等，冲出了监狱，在乔的指挥下，众犯安全逃出浑源县城。

当晚，众犯人同宿城西一小村庄，由村长安排了饮食招待。经过商量，有 6 人愿随乔到应县成立部队，有 7 人表示先回家探亲然后再到应县。至此，乔已拉起有 14 杆枪和 7 人的队伍了。翌日，大家各奔西东。

乔日成回到家乡时，地方上已是一片混乱，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即怕日军来了烧杀，又怕散兵土匪的抢劫骚扰。下社村民见到乔日成回来，并带有十几支枪，都非常高兴，一致拥护乔当队长，即日成立起保家队，雇用 30 多名青壮年，搜集起 30 多支步枪、冲锋枪，还有 2 支轻机枪和一批弹药交乔使用（这些武器大都是溃兵遗弃的）。乔即组织了 4 个班的一支武装部队，指挥所就设在他家。

乔父听说儿子越狱回来，还带有人枪，觉无颜相见，遂跑到村外跳井自杀。但井水不深，未被淹死，村人发现后将他捞出，并报告了乔日成。乔说："他既自寻无常，就让他痛痛快快去吧。"当即派从浑源跟来的 6 人带上铁锹，在村外井旁挖了个坑，将乔父活埋了。

七

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乔的保家队得以迅速扩大。与此同时，不少村镇也都建起了类似的地方武装。1937 年阴历八月十五日，日军侵占应县城，并随之建立了伪政权机构——治安维持会，后改称县公署。乔日成初时不愿投敌，后日军派伪县长王相（乔念高小时的校长）亲与说项，乃于 1937 年 12 月间接受伪职队长，改为南乡保甲队，武器弹药由日军补充，粮饷服装就地自筹，受日军节制。乔的野心是很大的。他明里降日当了伪军，暗里又投靠了国民党察省主席张砺生，给予其挺进纵队番号，委乔为纵队司令，令乔发展势力。张还给乔一部电台，并派一常驻代表狄则林为乔出谋划策。同时，乔还和南山的八路军雁北游击支队有联系。乔日成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加紧扩大自己的实力。

乔毕竟入过军校并在部队干过，因而对带兵是不陌生的。他对部属既能严格要求，又能与之同甘共苦，这为其部队的巩固和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不断收编散兵游勇，吞并其他小股武装，加之他乡的保家队主动投归，到 1939 年上半年时，其部队已发展到 2500 余众。

为利用乔的势力对付雁北的八路军，1938 年间，日军特加封乔为“雁北剿匪司令”。于是乔借机组织司令部，下设军法、军医、副官、参谋、秘书、稽查、军械、军需等八大处，将部队改编为 4 个大队和 1 个特务连，一时称雄雁北，乔队也改称乔军了。

乔虽接受了日军加封，但受编不受调。日军曾欲调其一部移防大同，并调他协助皇军作战，乔却以东南乡人民不让开动和应县籍官兵不愿离开家乡为由，婉言拒命。后日军又约乔进城饮宴，乔又以患病在身碍难奉陪为辞，予以回绝，如此，着实使日军不快且大伤脑筋。但当时雁北所留日军有限，欲制乔部而力不从心，

所以只好听之任之。

应县南河种村有一美貌女子，名次淑贞，15岁时即长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加之读过三年小学，略通文墨，聪慧伶俐，令人见之倾心。后由父作主，嫁给应县城一名医之子田俊为妻。婚后二年，抗战爆发，田俊远去南方参加抗战工作。淑贞在家独居，空房寂寞，春心萌动。日军占据应县城后，随军翻译孔仲文迫次结为露水夫妻。一次乔到县城开会，在老相识周焕家巧遇次淑贞。乔一见倾心，并提出娶之为妻。在次回家时，乔即尾随其后，二人同居。当时，乔已30多岁，而次仅十七八岁，故乔如获至宝，夜夜合欢。孔翻译后知此事，但惧乔威势，也只好退避三舍，忍痛割爱了。会议结束后，乔即带次到下社村，终日形影不离，正式纳次为妾。

侵华日军快速向南推进，使其深感留守在华北的兵力不足，于是加紧推行“以华治华”政策，或利用伪军替代日军占领交通据点，或调动伪军协同日军讨伐八路军和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开始时，日军几次让乔配合行动，他都回绝了；几次以日伪晋北政务厅名义调他到大同、张家口开会和受训，他也都借故推脱了。但迫于同日军的关系，乔感到如此下去不是长久之策，所以一度十分苦恼。后他终于想出了夫人外交的妙策，从此便将爱妾次淑贞推到同日军周旋的第一线。

1938年，日伪政府下令雁北各村农民种植罂粟，这给乔日成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他凭借自己的实力，逐渐控制了应县的乡村政权，除向农民征收烟税外，还大做烟土生意，聚财甚多。乔利用搜刮来的钱财，除进一步扩充兵源，增加实力外，还开办了兵工厂、修械厂、木器厂、铸铁厂、被服厂等小型工厂。

八

乔日成独霸应县乡村政权后，将这一带视为一己之天下，既抗拒日伪政府插足，又阻碍破坏抗日政权的建设。应县属我晋察冀边区政府管辖范围，但在应县南山没有八路军正规部队，只有雁北游击支队活动于此。游击支队的司令员刘苏，与乔既为老乡又是北方军校同学，依了这层关系，刘曾多次派人做乔的工作，争取他共同抗日，但乔始终虚与委蛇，抱定不准任何人染指他的地盘。由此，致使我应山抗日政府和下属应县的5个区公所难以下山开展工作。

1938年间，我五区区长、共产党员祁云山被乔队抓住，乔亲自审问。后经托人多方说情方免祁一死。乔为笼络民心，将祁释放后安置在他的工作队当宣传员。一日夜间，祁偷了工作队队长的手枪和马匹逃往南山。自此，凡被乔抓捕的共产党工作人员统统杀害，决不留情。

乔军司令部驻地新堡常驻一个大队和特务连的兵力，约计700余人。下社村南5里许的小石口村，亦常驻一个大队互为犄角。乔军在新堡构筑有防御工事：四周筑有土围墙，墙的上部及腰部筑有散兵掩体，挖有射口；下部地面筑有交通战壕，壕上盖木板堆土掩盖，战壕内通向堡墙外有射口，出击暗道，与堡墙外的伏地碉堡相连；堡内驻军院落修有地道同堡墙内的交通战壕相通。这样就构成上中下三层防御体系和交叉火力网，易守难攻。

1939年7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奉命由河北调回延安，途经应县时，应晋察冀边区政府之请求，同意攻打新堡，拔掉乔日成这颗钉子，以顺利开展应县平原地区的抗日工作。王震旅长命令七一七团突袭下社新堡。另以雁北游击支队配合包围小石口之敌牵制其支援新堡。拟以众胜寡，一举成功。七一七团于下社附近村

庄秘密征集百余架梯子，分成梯队悄悄摸到新堡围墙之下，一枪不发架梯猛上墙头。乔军已有所防备，所以接连上去五六批登墙皆未成功，死伤甚众，只得暂停战斗。拂晓，八路军又集中火力掩护梯队发起攻击，激战到天明亦终未攻入堡内。天明后，七一七团因返延安时间紧迫，所以便撤围西去。同夜，雁北支队亦未攻克小石口，复上南山。自此，乔日成便与八路军完全敌对了。

次日战斗结束，乔日成将战报报到大同日军师团部，并有驻防应县日军连夜发去的电报证明，乔日成再次得到日酋的赞赏和重视，即派日军联络部长兼晋北伪政务厅顾问大羽带大批慰劳品和伪蒙币来应慰劳乔队官兵，并赏赐乔本人一把日军战刀、一套军官呢军装及马靴等物。乔在申报弹药损耗时以少报多，日军照数发给。此后不久，乔又配合日军扫荡我南山八路军根据地，并向雁北游击支队驻地瓦窑沟、窨子沟进攻，迫使该支队转移到繁峙县境内的山上。

乔日成有个结拜兄弟叫王天存，天镇县人，自幼练武臂力过人，疾走如飞，刀矛剑棒各般兵器无不精通，尤擅长徒手拳术和腿脚硬功，一人能挡数十人。青年时当兵习武，射击能百发百中。壮年后拉起人马当了土匪，出没山后口外，绑票杀人打家劫舍与富为敌。为人义气，慷慨施舍，有绿林豪杰气概。抗日战争爆发后，奋起抗日颇有民族气节。其人不近女色，不沾烟酒，不捞私财，唯务势力，不服他人。后曾为八路军收编，但不久即又叛变，并与我军为敌。1939 年 7 月间被八路军在恒山打散后投奔乔处。在阎锡山支持下，王又重召旧部，搜罗起 500 余人马。在八路军二度围攻王部时，王天存率队又投于乔日成。乔是个野心勃勃、心狠手毒的家伙。待王到乔处后，乔即设计将王杀死，当官的遣散，当兵的大部归顺乔部。

乔日成将王天存部火并后，于次日晨电告日军。大同日军师团长派来汽车拉走王的尸体验证后，又转送张家口日军军团司令

部验明证身。日军对乔此举再次大加奖赏，将乔的“雁北保甲队”队长升为“晋北挺进军长城南境剿共总司令”。

九

乔日成解决了王天存部队后，又于1940年正月间把投归他的陆一平团500人马也解决了。至此，乔军扩充到三四千众，除5个区的武装工作队外，共编成步兵6个大队，骑兵1个大队和1个机枪连、1个特务连、1个通讯排。

乔的部队扩大了，唯缺乏有军事学识之人才，这时他想到了在军界的知己朋友。1940年初，乔电请阎锡山调用在二战区的上校军官于荣先和少校军官丁巨卿到他的部队工作。于系阎军学兵团毕业，丁是阎军北方军校毕业的，二人均为乔旧日的结拜兄弟。阎锡山为拉拢乔，加之阎部官多兵少，即同意此二人到乔部工作。乔任命于荣先为副司令，掌管整训军队和作战计划；任命丁巨卿为副官处长，掌管内部事务。于上任后即开始整训军队，将6个步兵大队改编为3个支队（团），每个支队下辖3个大队（营），大队下为中队（连），中队下为分队，分队下设班，均为三三制。丁巨卿又从大同请来北方军校毕业、现赋闲在家的同学齐化铭担任了参谋长。

进行如上整编后，于又统一制做了被褥和草绿色军装。在训练上依照日式典范令，注重了制式教练、器械体操和内部规则。于主持制定了三个月的训练计划，并亲自轮训各个支队，每日上课、出操、打野外，俨然如同正规军一样了。同时，在司令部设立一“干部教导队”，召收高小和中学毕业生，学习一年后分配到部队担任下级军官。

乔军中不少人吸食鸦片成瘾，为提高战斗力，于在征得乔的同意后，制定了全军戒吸大烟的计划。上自司令下至士兵，凡有

大烟嗜好者在三个月内必须戒掉。轮训时，将吸食者集中编成一个特训大队，将其烟具、烟膏全部没收，集中放在几个房间中，让这些人每天定时定量来房间吸烟，不准背地偷吸，并逐日减少烟量，逐月减少吸食次数。第一个月每日定时两次，第二个月每日定时一次，第三个月瘾小者即宣布戒绝，瘾大者隔三天或一周吸一次。轮训完毕，强制性地全部戒绝。如有违者即行长期禁闭，直至戒掉为止；若有逃跑者，抓回枪毙。在轮训戒烟期间，不准私离部队，由司令部供给上等营养食物和充足的纸烟。同时命令尚未轮训部队提早自行戒烟。

乔日成是全军中烟瘾最大、烟史最长的。在制定戒烟计划之前，乔曾有所犹豫。他对于说："瘾癖在身，实难戒绝，况全军大多数人都以吸烟为命，这玩艺儿好学不好戒呀。"于说："古今中外的精锐部队，决无吸大烟的官兵。"乔说："要戒不掉怎么办？"于说："军法处置！"乔日成终于下定决心，带头戒烟。他当即端起自己那套精致的烟具和正燃着的油灯，狠劲摔在地上，以示决心。戒烟之初，乔咬紧牙关躺在炕上硬顶着，以纸烟代替大烟，一根接一根吸个不停。乔的副官见他难受的样子，偷偷给他送来烟具、烟泡。他掏出手枪照着灯盘子打了一枪，吓得副官赶忙溜了出去。

第二支队长赵传甲，因打仗凶悍，人称铁甲队长，他的烟瘾仅次于乔日成。在轮训中，他吸上几口不过瘾，痛苦难熬瘫软炕上。在半死难活中他去见乔司令，一进屋就"扑嗵"跪在地上说："司令，咱这百十来斤早就交给你了，要打仗拚命全听你的话，要戒烟戒死太窝囊了。他姓于的没带来一兵一枪，想要借戒烟把咱弟兄都害死，他好夺了咱的部队当司令。请你放话吧，我把姓于的收拾了。"乔掏出手枪对准赵传甲说："再胡说，老子枪毙了你！不知道戒烟令是我下的吗？"说着，他强打精神下炕，把赵扶起来又说："你听我的，再坚持几天就挺过来了。咱俩比一比，看谁的

骨头硬。一定要戒烟成功，决不能半途而废。”赵说：“那我就死也要执行你的命令。”说罢怅然离去。

经过两个多月的戒烟训练，监禁的烟鬼们渐渐精神起来，只有赵传甲支队长发瘾成疾，吃不下饭而死去。乔为之举行了厚葬，并将赵的薪水照月发给他的家属。到1940年底，乔军中有烟瘾的2000多名官兵全部戒绝了。

十

乔日成解决了王天存的部队后，倍受日军重视。日军不仅给乔不少武器弹药、纸币等物，还给乔派入一名日人准尉军官当顾问，派来6名曹长（上士）当各大队的指导官，旨在想法控制乔军。乔明知日酋用意，但又不好回绝，所以欣然表示欢迎。待7个日军士官到达乔部后，乔把他们安置在司令部另外一个好房院集体居住，不往各大队分配。还专派了一名会日语的副官、一个厨师和几名勤务兵侍候他们。每日三餐都是好酒好饭菜招待，并备有上等的纸烟、茶叶、糖果等供其享用。又从村里雇了7个年轻姑娘，陪他们夜宿昼乐，教会了他们打麻将、吸大烟。这些下层日军士官，哪里享受过这般花天酒地的日子，故对乔无不十分感激，唯命是从。有时顾问提出到各大队看看，乔便说：“部队都在四乡打击八路军，各村都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和神出鬼没的游击队活动，看见你们日本人，非打死你们不可。为了你们的安全，还是住在司令部不到大队的好。”日人听如此说，也只好作罢。

乔的部队经常巡逻各村，不分昼夜进行实弹演习。每演习一次，即向日军假报同八路军作战的战况一次，要求日方补给弹药。这7个日人士官来后，也常听到枪声，便给大同日军师团部拍去电报，请给乔补充损失的枪枝弹药，日方总有求必应。这些日人到大同开会时，还常对他们的上司说乔的好话。这样一来，反倒

给乔造成了很多方便。

在应县境内，与乔军并存的还有个王国相的北乡保甲队，是彻底投日的汉奸队。乔早想吞并之，但慑于日军干涉不敢下手。1940年夏季，乔认为时机到来，亲率3个大队包围了王部驻地，很顺当地使王的四五百人携械归于乔军，只有王国相带十几名护兵逃出，并到日军那里告了乔的状。

驻扎大同之日军师团和张家口之军团司令官知乔解决了亲日的王国相保甲队，非常气愤。即令大同师团部的大羽联络部长到应县调解。大羽到乔的司令部后，责令乔交还王队的人枪，并向王当面赔情道歉。乔日成岂肯答应。大羽十分恼火，警告乔说："如不交还王队的人枪，皇军马上来应县收缴你的枪，消灭你的部队。"乔哈哈大笑说："乔某从来不怕什么黄军、黑军、狗军。"即令卫士们把大羽抓起来，扣押到北楼口据点。为给日军施加压力，乔四处放风，扬言要把大羽送到八路军边区政府。日军苦无良策，令应县伪县长王相亲往求情，但仍无结果。于是，王相便秘密派人到北楼口，假说是乔爱妾次淑贞娘家人，其娘家有急事，叫次速回探望母亲。次信以为真，随送信人去娘家。走到半路，忽从地里窜出十几名伪警察，把次绑架到县城，作为人质监禁起来。

王相再次派人和乔交涉，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日军承认乔解决王国相部的既成事实，不予追究；大羽和次淑贞互相交换。事情到此方暂告一段落。

乔放回大羽后没几天，日军即将派入乔部的日人顾问和指导官撤回。很清楚，他们要报复了。乔便加紧作战部署，并把所存银元及贵重物品秘密埋藏或寄存于附近村庄亲友家中。

1941年2月18日，日军派驻大同的师团长黑田中将亲自指挥一个日军机械化师团约8000余众和伪蒙一个骑兵师、一个步兵师约6000余人。日军由大同进入应县，伪蒙军分两路由浑源、山阴两县与日军同时进入应县，共是三路大军合击乔军。日军主力

攻打下社村的新堡和小石口两地，伪蒙军攻击东西北乡的乔军据点。黑田命令伪军先将据点包围，待听到下社村炮声再同时发起攻击。斯日拂晓，黑田所率日军到达城北 10 里的桑干河木桥，先以满载罐头饼干烟酒的两辆卡车开到桥头据点门前，当时守桥的部队尚未起床。日军翻译对碉堡上的哨兵喊话："这是给县城的日军送来食品，送给你们据点一部分作慰劳品，请你们开门并报告你们队长来取。"当哨兵走下碉堡时，日兵迅速割断了通往乔司令部的电线。后边的坦克随即开到桥上，冲入据点院内，并喊话说："皇军大部队来应县是解决乔日成本人的事情，对你们下级官兵不打、不杀、不捕。现给你们分发些食品和钱币，你们放下武器各自回家。如开枪对抗，一个也活不了。赶快徒手出院集合，领钱领食品。"此时，日军的坦克车、装甲车、炮车、步兵坐的汽车隆隆从桥上开过，已是震耳欲聋。守桥的队长急忙抓起电话报告乔日成，电话已不响了。当兵的不待队长下令，纷纷徒手跑出院外，听候发钱发食品。日军一面搬运食品点名分发，一面收缴武器装车运走。就这样，日军一枪未发将桥头据点的乔军全部解决了。远在司令部的乔日成此时还在梦中。

日军进入应县后，把伪县长和伪警务科长并全部伪警带上继续前进，将新堡和小石口团团包围。进攻之前，黑田命伪县长王相和伪科长刘玉霖先到新堡劝乔投降。二人到乔住地后，见乔躺在炕上，翘着二郎腿，一边悠然地抽大烟（为同日军大战，他开了烟戒），一边哼着小调儿，对王刘的到来，连睬也不睬。王相开口说道："新堡已被围得水泄不通，还是降了吧。投降了不过是解除你的武装，可保全性命，以后有机会再干。"乔打盹似地眯着双眼，等王说毕，突然瞪大眼睛，猛地坐起抽出手枪对准王的脑袋说："这番话念你我兄弟一场，我不计较了。要再让我降，当下打死你。乔某怕过谁！我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他小日本鬼子！"一时弄得王相非常尴尬。次淑贞见此情景，忙圆场说："化文，别发火，

有话慢慢说，再说各人主意各人拿，王县长也是一番好意。”刘玉霖接上说：“是的，化文，你斟酌吧。”说毕，王、刘二人匆匆走了出去。之后，乔日成提枪出阵指挥战斗。

十一

劝乔投降不成，黑田即下令发起攻击。四围的大炮、迫击炮齐发，轰击堡墙和堡内民房，顿时地动山摇，房倒屋塌，整个新堡成为一片火海。乔命守兵静伏，待敌炮火停止、步兵坦克冲上来后再开枪投弹，消灭日军。约半小时后，炮击停止，成横排梯队的步兵在坦克掩护下从东西两面开阔地冲到堡墙下。这时乔兵才一齐开火，使日军伤亡甚多。整个上午日军如此冲锋四次，也未能将小小的新堡攻克。

中午时分，日军停止进攻。飞来四架飞机盘旋于新堡上空，盲目地扫射村堡和狂轰滥炸。乔兵在四墙角的碉堡上用机枪仰射，使日机不敢低飞。约半小时许，日机北去。下午，日军重新组织兵力，集中火力只攻东堡墙，其他三面佯攻。日军先以密集的炮火将东面堡墙轰倒，堡墙上的掩体和射孔都被摧毁，继之以轻重机枪掩护步兵冲锋。日军火力太猛，使乔军不敢露头。当日军步兵冲上堡墙废墟并有的冲入堡墙内之时，乔又下令发起反击，战斗十分惨烈，一直打到黄昏。当新堡战斗打响后，四乡外围据点同时处于激战之中。

到天黑战斗停息后，守卫新堡的乔军1500多人阵亡近千人，重伤200多，尚有战斗力的仅剩下300余人。一天的激战，日军同样伤亡十分惨重。

半夜时分，乔日成将所余人马分为三路突围：第一路由乔率领200人突击黑田指挥部；第二路100人编成5人一组的敢死队，以麻雀战突击东面敌人主力；第三路为司令部官佐人员和家属。乔

所带人马偷偷摸到黑田指挥部所在寨子前后，发现日军哨所，即刻包围上去。日军除两个哨兵站岗外，另外30多人都在和衣而睡。乔军猛冲上去，迅速将哨所中全部日军消灭。随即冲到日酋指挥所的几处民房，先将站岗的卫兵打死，接着向院落内投入手榴弹。这时，有的日军冲出院外，有的上了房顶，并传出吱哩哇啦的喊叫声，乔军断定这是日酋指挥官，即向其射击。出敌意料的夜袭，使日军指挥部混乱不堪，并死伤不少中高级军官。日军一时搞不清是何处来敌，以为是八路军乘虚而入，下山袭击。加之听到东面乔的第二路敢死队的激烈枪声，更不知所措。日军指挥官忙以报话机命令西面和北面日军合围南面和东面之敌。于是，乔军官佐及家属组成的第三路得以乘隙安全向西转移。打了半小时许，乔以哨声为号，集合队伍向南山方向撤退而去。

翌日拂晓，日军派探子到新堡侦察乔军情况，进堡后发现空无一人，方知乔日成已于昨夜突围。日军涌入新堡和乔堡，挨户搜查，见人就杀，无论男女老少全杀光。有200多名男女百姓躲到了天王寺大庙，他们以为日人也信佛，在佛殿内是不会杀人的。日军发现后，用机枪堵住门口，让殿内群众出来。开始有人走出殿外，结果是走出一个用刺刀捅死一个，出来两个扎死一双，一连杀害了七八个无辜百姓。殿内的人们见此惨状，谁也不敢再走出来，于是日军就扔手榴弹，用机枪扫射，最后，殿内百姓无一幸免，其状惨不忍睹。此次日乔之战后，日军在新堡、乔堡等地大屠杀四日，共计残杀1650余人，烧毁房屋850余间，奸污妇女、掠夺财物难以数计。

乔日成率200人于半夜突围后，次日晨到了南山八路军的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北岳分区司令员邓华闻讯，当即写信，派人欢迎乔的到来。并随即带去边币1000元、手榴弹500枚，以资慰劳和鼓励。由雁北游击支队政治主任兼应县人民政府县长任达之代表送去，并对乔作争取工作。然而乔始终不愿归属

八路军。他要收集失散的官兵，重振旗鼓，以图东山再起，乔即刻派人下山联络散众，不多日即收罗回散兵300余人。

日军在新堡受到重创后，又从蒙疆各地调来大批伪军，重新组织兵力开往南山，一面扫荡八路军根据地，一面跟踪乔日成作战。斯年秋季，乔部转移到草垛山附近，日军以一个联队的步兵和一个师的伪军包围了小垛山。为便于对日军作战，乔即迅速将部队拉到山梁起伏的复杂地带。双方战斗打响后，乔部利用有利地形与日军周旋，采用“分兵诱敌，合兵歼敌”战术，使日军腹背受敌，伤亡很大。到下午时，乔清点人员，阵亡和重伤200多人，他将剩下的300多人编成3个连，从西边山沟悄悄走出日军包围圈，到了山阴县境内，然后率队直奔应县北乡的水磨村，又联络回被打散的官兵200多人，使其部队又达500余众，并暂以水磨村作为其根据地。

乔日成将这些人马编为5个连队，直接受其指挥。他的作战部署是：派出一个连经常埋伏于村外树林里，以便战斗开始后从背后和侧面出击；派出一个连放哨，在村边大路口及路旁大树上架起轻机枪并备有步枪、手榴弹；其余3个连分散埋伏于水磨村各街道两旁的民宅内，只要战斗打响，便上房居高临下消灭日军。

在草垛山追剿乔部的日伪军发现乔部突围后，继续搜寻追击。当乔队在水磨村扎定不几天，日伪军又以四路同时向水磨村扑来。他们先作火力侦察，继派少数部队进入村内搜索，只见村中鸦雀无声，空无一人。日军以为乔已跑了，遂集合散开的部队，以行军纵队进入村中。当走到村口时，路边树上隐蔽的乔部哨兵突然开火，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和投掷手榴弹，霎时打得日伪军乱作一团。与此同时，树林内的伏兵也从背后和侧面开火，更搞得日伪军晕头转向。当他们清醒过来并拉开架势与村外乔军展开激战时，这些乔兵已撤回村中指定的院落隐蔽起来。日伪军紧追不舍，凭着人多势众和武器精良，毫无顾忌地涌入村内，并沿街挨巷进

民宅搜寻。这时，乔部在各个院落的伏兵见敌就打，全村到处是激烈的枪声。日伪军的后续部队听到村内发生战斗，一面将村子包围，一面不断派兵进村增援。这次战斗，从上午直战到黄昏，乔部终因寡不敌众和弹尽而大部战死。天黑后，乔日成身边仅剩下7人，后突围而走，跑到怀仁县的一个村庄歇息。乔对身边的几个人说："这次水磨村战斗，我们又死亡了500多弟兄，而敌人的伤亡至少三倍于我们，我们也算值得了。我现在没有兵了，不能在应县抗日了，只好先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于是，乔到了绥远去找张励生和傅作义。

张励生时任国民党察哈尔省主席兼晋察绥边区抗日挺进军司令。乔到张的总司令部后，只给他一连人的军饷令其发展队伍，并给其向中央电报请功。乔的本意是请张给他补充兵员和武器，但当时张在绥远实是寄傅作义篱下，所以很难满足乔的要求，便推荐他到重庆中央高中级军官训团受训，并让他设法见到蒋介石，求蒋给补充兵员和武器。乔拿到推荐书后又去找傅作义，并表示愿投傅长官麾下之意。傅早知乔的为人，除当面嘉奖外，只给他5000元慰劳费。后乔以7个随从兵谎称雁北还有一个张朴支队700多人，请求给他一个八战区的番号。傅给乔一个别动队的名义，每月拨给他700人的粮饷，令其深入敌区活动，自行发展。这个头衔虽小，但总算有了立足之地，所以姑且从命。但在国民党、共产党和日伪交错的荒凉地区发展队伍是相当困难的，到斯年冬季，乔只发展起250余人的队伍，因而大失所望，只得又作别图。

1942年正月，乔去了重庆，到中央军训团受训。他托人引荐，晋谒了蒋介石，并提出补充兵员请求，蒋听后很不耐烦。最后只得到军委发给的一张"华北剿匪军少将司令"委任状和一张奖状，仍是令其自行发展。这使乔的美梦再次成为泡影。

1942年夏，乔在重庆受训结束，即返回绥远。当走到陕西韩城县时，他又想投归二战区的阎锡山，于是他到二战区兵站驻韩

城办事处接洽，并给阎发出电报。阎接电后颇为高兴，当即派副官处处长带一辆小汽车去韩城迎接。乔到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后，阎接连传见他三次，并与之促膝交谈，待他为上宾。阎先令乔在洪炉训练3个月，还参加了阎的铁军组织。受训毕，阎委乔为“第二战区雁北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并发给纵队部和3个支队的编制表及官佐的空白委任状，由乔带回部队，自委自填。先发1万元法币和300枝步枪、30挺轻机枪、10枝手枪、10枝冲锋枪及子弹、手榴弹若干。还拨给他一部电台和电台人员，并许他调用二战区的军官，帮其扩充部队。临行前，阎又面嘱乔“在绥远发展充实部队后，相机挺进雁北占领据点抗拒八路军；勿与日军冲突，保存实力以待后令”等语。同时，阎还电告傅作义帮乔壮大队伍。乔到绥远后，发展队伍也并非很顺利，所以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才仅发展到300多人。按阎锡山的指令，乔即时开进雁北。

十二

1945年8月17日，乔率部开进雁北。抵大同城外时，乔通知城内日军投降。日军听说是乔日成，便紧闭城门不予理睬。乔部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无法占领大同，遂联络旧部张朴率伪警备队500多人一起奔回应县。当时应县守城伪军400多人，正紧闭城门，以待国民党军队到来。城外有晋察冀边区雁北军分区的游击支队包围，要求接收日伪机关而遭拒绝。军分区正准备攻城之际，乔部突然到来，双方在城下展开激战。分区支队未及提防仓促迎战，为避免大的伤亡遂即撤离。城内伪军开城门迎乔入城。乔进占应县城后即刻成立司令部，设立八大处，加强城防，实行军事管制。随之又电报阎锡山，要求补充武器弹药等装备器材。阎即给他空运去迫击炮、机枪、步枪，子弹及医药、通讯器材等物资，还给他发去4000套棉军装，命他坚守应县。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应县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农会、武委会等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进行了土地改革。这一时期，乔日成一直盘踞在应县城，并不断派部队到城外活动，进行抢掠和报复，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同时，不断加固城防，时刻提防着解放军攻城。他们将城外四周靠近城墙的树木砍掉，房屋拆除，城墙外挖了壕沟，在外壕与城墙间架设了铁丝网，埋设了地雷并筑有伏地堡。城内防御体系是，以城墙为重点布置火力网，建有上中下三层工事，在各城门突出的瓮城城墙部和城墙四角筑有碉堡。城墙顶部构筑了交通战壕，上盖木板堆土掩蔽，壕内通向外砖墙开设射口，上边还有出口通向各个垛口的散兵掩体。在城墙中部间隔挖有射孔和筑有暗堡。在城墙底部挖有通向城外伏地堡的地道。并间隔筑成窑洞式的官兵住室、炊餐室、储存米面水及弹药的仓库、指挥所等。

1946年7月20日，晋察冀军区命令解放军四纵队第十旅旅长邱慰、政委傅崇碧指挥全旅3个团，加之雁北军分区部队的配合进攻应县城，一举攻占了东西两关，把乔的部队包围在城内。乔部多为亡命之徒，他们凭借紧固的城防工事顽强抵抗。一昼夜时间解放军发起三次进攻，仍未破城，伤亡很大。

在当日夜解放军发起第三次冲锋双方激战之际，乔日成俯身垛口向外射击，不料乔的连长岳中正因与乔有仇，从侧面击乔腹部一枪，乔当即倒地。乔让卫士将他秘密抬下，命内部人员绝对保密。军医们赶快施药，动手术抢救，但因伤势过重，弹穿内脏，急救两天后死去。至此，雁北一带赫赫有名的巨匪、后与解放军坚决为敌的乔日成，终结了其罪恶的一生。

张占军整理

（山西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巨匪郭清的一生

杜济生

从赌钱混子到土匪

郭清，字井泉，乳名玉宝，1906年出生于临漳县柏合乡大营村一个地主家庭里。父亲郭廷玉，是个与土匪素有来往的青皮混子。郭清5岁时，父亲去世，留下他和母亲、妹妹3口人，占有土地120亩。10岁时在本村入私塾，由于娇生惯养成性，不守学规，爱打架斗殴，14岁弃学开始赌钱。钱赌光了就去偷，再输光再去偷，后来因钱输多了，只靠偷解决不了问题，就去劫道，砸明火，绑票要钱。郭清由于嗜赌成性，家产和土地逐渐被输掉。到1932年郭清26岁时，时遇付村唱戏，郭清窜进张老局开设的赌场，不一会儿输了好多钱，当场耍赖，被张老局甩出赌场。郭清因手中无钱，落了丢人现眼，愤然跑到东五岔口一个老亲王自成家借了支枪，就开始行窃劫道勾当。他觉得自己一人太孤单，就伙同本村李金斗、张蒜辫子抢了大营村4枝枪，拉杆子成立武装土匪。从此到处流窜，食宿异乡很少回家，后渐与土匪赵金华、宋天成相识结拜为友，三股土匪合成一股，附近村庄深受其害。郭清为了在本地立脚存身，满足发大财的欲望，就广交匪友，联合土匪势力，先后又结交了梁国富、刘自祥、韩治和、姜勇、刘平贵、谢安度、刘生只、王自全、薛广宗、李德善、老殿、杜二保、

赵保才等土匪头目，拉大杆向远处抢掠。

1934年，郭清的土匪武装发展到八九十人，常驻大营、付村，活动猖獗。石友三的队伍从此路过，这股土匪在付村几乎全部被歼，活捉了30多名匪徒，都砍头示众。郭清逃跑后，短时期内吓得不敢出头露面。

后来郭清到安阳吴庄刘生只那里，刘死后连枪带人归于郭清。刘的两员干将金凤鸣、周治敬，对郭清是忠心耿耿，成了得力的助手。但只有几十人，不能与其他土匪抗衡，于是，郭清于1936年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名，在家乡一带向各村要枪100多枝，扩大自己的土匪势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南逃，地方治安更加混乱。郭清趁机在漳河南油房村设立据点，安起大锅，很快就收罗了地方民枪六七百枝，又联合程希孟、大根、老殿成立了土匪总部，郭清自称司令，到处派粮要款，不给就抢。

这时国民党想收编郭清等土匪武装，派赵保才（1929年被国民党李旭东部收编委任为副师长）以副师长的名义回到临漳，在柳园和集廷家委任郭清为旅长，程希孟为副旅长，程文选（外号半截砖）、李德善（名大根）、杜二保为一、二、三团团长。这些土匪虽被收编，但不愿随李旭东部队走。赵保才企图未能得逞，自感回去无法向国民党交待，他也留在临漳充当土匪。

1938年初，从抗日前线南撤的国民党二十九军一个营驻在回隆、吴庄一带，郭清狂妄自大，想收这个营的枪，结果被打得一败涂地，退到漳河以北。

郭清与正规军作战无能，抢劫讹诈老百姓却是好手。1938年4月26日早晨，郭清的土匪武装闯入了成安县的东范町，抓人、抢物、要枪，仅这一次就抓去30多人，搜枪40多枝，抢牲口30多头，大车20辆，劫回财物不计其数，对绑架的“肉票”以人定价，

拿款赎人。农民赵忠、林贵堂、林付臣、林玉贵、林太保、纪庆太、纪庆兰和他儿子等人，因定价太高，拿不起钱，被毒打后全部活埋。张跃林通过人说和卖了家产，凑够254元现大洋，才保住性命，抢来的民妇都被奸污糟塌。

同年初夏，郭清的营长范进忠奉命带领十五六名骑兵，从漳河南油房村出发，到田村讹枪支弹药，程凯抗拒不拿，郭部便把其父子分别枪杀在场里和街上，并进家把不满周岁的小孙子摔死，撕成两半。被讹户目睹惨状，只好破财保命。范珍买了2把盒子枪，范贵买了200发子弹，程明拿出200块现大洋，范玉明拿出130块现大洋，交给郭清才算了事。

1936年到1946年，土匪郭清活动频繁，抢劫成风，绑架肉票，奸淫妇女，胡作非为。据知，曾先后到协王村、申村、三宠村、南东坊，成安县的辛义、杨岗、东范町、豆公，魏县的回隆、北皋，内黄县的楚旺，磁县的前后弯漳、尹家桥，峰峰矿区的彭城、薛村、和村，安阳县的辛店集一带多次抢掠、杀人、放火，危害极大，人民群众饱尝匪祸之苦。

郭清向东行动，常遭到杨二宽的干扰。杨二宽是魏县杨岗村人，受国民党大名专员丁树本的收编，委任为北皋村保安大队长，在临漳县东北边界设有据点，是郭清等土匪活动的一大障碍。

1938年夏，郭清以给赵金华报仇为名，联合张村集土匪韩治和、河南土匪王自全共同去打杨二宽，包围住杨岗村，激战3天，杨二宽寡不敌众，突围逃跑。郭清进村，把杨岗村老百姓的财产抢劫一空，并填井锯树，烧房子，连碾场的石滚子也给拉走，把杨岗村变成了一片废墟。

郭清为了统率众匪，让一个叫苏明启的国民党小军官做傀儡司令。1938年秋，他把各股土匪集中到贾河口“合大操”，成立总团，推选郭清为团总，操练后各回原地，郭清也带部分人回到他家大营村。就在这一夜，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发动了漳南战

役。三八六旅六八八团和骑兵团从肥乡出发，长途行军，当夜包围并攻打了贾河口、大营、东辛寨、张村集等土匪据点，俘虏了苏明启，郭清部在大营被击溃，土匪死20余人，投降被俘多人。在战乱中，郭清见势不妙，光着脚仓皇逃脱。

媚外亲日　甘当汉奸

1938年秋，八路军发起了漳南战役，横扫了漳河北4个土匪据点，越过漳河攻占了回隆、柳园，争取了占据崔家桥的土匪王自全，继续南下，痛击了土匪扈全录，直打到新乡，才结束了这个战役。

郭清受到八路军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成了惊弓之鸟，不敢在临漳地盘久占，遂率残部数百人转移到磁县、峰峰一带活动。

1939年10月，日本为了利用土匪武装“以华治华”，成立“安临特别警备司令部”，任王自全为正司令，郭清为副司令，郭清还兼任临漳县日伪二、三区区长，从此，郭清由土匪变成汉奸。

1940年春，郭清留金凤鸣驻守北皋，他自己则亲自坐阵贾河口控制二区五十三村，同时让其弟郭志在冉店成立黑局子控制第一区。其武装力量日益增强，势力范围不断扩大。

1941年4月，日本唯恐郭清不好控制，就预谋收他的枪。一天日军一个连开进贾河口，命令郭清配合向东南扫荡，行至蒲滩营，以私通八路为名，将以郭清为首的官兵六七百人用汽车押走，路上士兵跳车开小差的不少。郭清被押到安阳，经王自全讲情才给了他几枝枪放回。郭清受到了挫折，垂头丧气，表示“再也不干了”！

郭清常驻五十三村，因此对五十三村派款、要粮从轻，每年每亩只要二三升，外地则拿两斗。五十三村的小偷小摸被郭清活埋不少，社会秩序比较安定，还在秤勾集设立“告状斗”，唯他的

参谋李绳五能开斗取状，给他口念，平了几家不白之冤，一时赢得了人们的称道。因此，一些保长、大户要求他继续干。

1942年，郭清开始投靠日军，那时日军一个少尉队长佐藤，因腿部受伤按军律应烧死把骨灰送回国内，是郭清为佐藤说了好话，才免他一死。佐藤感恩不尽，常在日军中说郭清好话，并让郭和驻邯郸日军少将岗田挂勾。从此，郭清又投靠了日军。

1943年5月，日军正式把郭清部队编为“冀南剿共独立旅”，任其为旅长，派懂中国话的日本人石田为军事顾问。随后日军一个班常驻贾河口。郭清受编后，明目张胆地按旅的编制，大量扩充军队，向各村摊派要兵。要一个兵，带一只枪、100发子弹，购置了2部大汽车，50挺轻重机枪，3门小迫击炮，设立了2个团，1个独立营，驻临漳韩步云的保安队400人也属他管，达到2200人。旅部下设军需处、书记处、参谋处、副官处，还有医院、裁缝处、电话室、电灯房、审讯室等机构。同时在邯郸、临漳、成安、安阳还设有办事处，控制范围以贾河口为中心，东到魏县城以西，广平县西南乡，西到临磁边界，南至漳河，北到成安城南，方圆80里。

郭清为旅长后，受命派一个营，去成安县东马村、西马村为日本炮楼助威、“压边”。有一个排在做饭的柴草内发现了300块银元一轰而抢，护兵李守谦（郭清内弟）得知赶去要全部霸占，在大家反对下，他卡了一半，部队撤回。日本人将此事电告郭清，郭清认为在日军面前给他抹了黑，非常恼怒，就抓起10几个抢钱人吊打，并咬出李守谦，李虽全部退出银元，仍被打得死去活来。在被吊的人中有一个班长被打死。伪兵靳特（和郭清一个村）被打后枪毙。

1943年日军命令郭清派人去魏县马于村打八路军，郭清派周志敬任营长，配合行动。在观察地形时，周拿望远镜在日本人面前夸耀，日军官看到是日本制造的引起了怀疑，事后追查来历，周

志敬一口咬定是与日军作战所得。曾任过团长的李德善，曾投降过八路军，李的四弟在八路军当连长，日军怀疑是李德善从八路军中得来。因此就派郭清抓了李德善缴了他的械，并把李德善送往邯郸被日军装入麻袋刺死，还把他的部下50多人送往日本作劳工。

郭清由土匪当上了铁杆汉奸，公开与八路军为敌，对无辜百姓实行残酷迫害。郭清怀疑大营村陈保善是共产党，抓到贾河口在一棵老枣树上吊打6个小时，直打得皮开肉烂，绳子吃进肉里，露出一寸多长的白骨，快要死的时候才将其放下。他怀疑贾河口农民靳福堂私通八路，就反捆双手吊在树上，用皮鞭沾水打成半死活埋。大营村农民靳志平、靳二贵父子俩耕地占了点路边，郭清看见就气急败坏地命令士兵把2人吊在树上用马鞭、木棍毒打，快要断气时才放下来，并用车拉到贾河口准备用大刑，走到半路死去。据知，仅大营村就被郭清残杀9条人命。

1943年，在魏县马丰头抓住几个农民，本想勒索钱财，一个伪军说了声都象共产党，郭清听了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活埋。同年，郭清的队伍闯进成安县辛集村，挨户搜查，把群众赶到街心架起机枪，威胁农民检举八路军干部，只要谁说一声“没有”，就被捆绑吊打，经过逐个相面抓住8个农民，说是八路军干部，无辜被活埋。在贾河口时，有人报告李付堂排里吕念只等4人想带枪去投八路军，被抓住活埋。郭清还杀害过女共产党员魏县妇联主任王婉贞和八路军南支队第四队队长郭度华同志。

从1941年到1945年，郭清为了在贾河口修筑寨墙、挖壕沟、保护他的安全，从周围几十里的村庄要粮要款，要物料敲诈勒索。在施工中农民稍有怠慢，皮鞭木棍随即加身，被打死打伤的不计其数。兵马寨去了100多个民工无一幸免。农民李文重因怠慢被枪托木棍、皮鞭活活打死在工地上，之后李母气死，老婆改嫁，留下3个孩子，岳母带一个，两个送人。贾河口寨墙又高又厚，外

有两道壕沟，每道沟足有2丈多深。

为了对付共产党，日军在临漳县署顾问仁木和郭清的相互勾结下，于1944年3月18日成立了日伪“临漳县剿共委员会”，其任务是实行保甲连坐制。

1945年初夏，南东坊抗款不交，触怒郭清，便纠集王自全、韩步云的部队，于5月7日围打南东坊。红枪会头领王吉林指挥村里200枝民枪与郭清对峙3天，抵敌不过，弃家逃走。郭清进村后逐户搜查，见人就打，见物就抢，把人赶到街上，使用各种残酷手段，杀害群众58名，其惨状目不忍睹。

1945年6月，八路军二十六团打北皋马丰头，俘虏郭清一连人，经教育释放回到贾河口。郭清气急败坏地命令交枪的兵在街上跪成两行，叫没交枪的兵用鞋打其头脸，还不解其恨，最后枪毙了5人，活埋5人，并扬言“谁要投八路军就是这个下场”。郭清部下有个连长叫李自刚，因看不惯郭清的所作所为，携儿带妻脱身到邢台隐居。郭清便抓住其岳母、内弟顶账，内弟无奈只好把姐夫叫回，继续为郭清卖命。所以在郭清部下当过兵的人都说：“郭清的兵是辈兵，逃跑抓住不是活埋就是枪崩，留下家属亲戚也不能算清。”

据1946年不完全统计，郭清在临漳、成安、魏县三地就残害7000多人。

刑罚无辜　残无人道

郭清的刑罚残无人道，随心所欲，实属世上罕见，概括起来有：活埋、割耳朵、奸后枪杀、机枪点名、饿死冻死、坐老虎凳、非刑吊打、火炷烫身等10多种。

1942年从告状斗里取出一张状纸，状告高河口村小生只（土匪马平的人）仗势强奸民妇，并将其夫杀死。郭清得知亲自动手，

烧红烙铁，把小生只的生殖器烫掉。贾河口村有对青年搞恋爱，有人告发是搞不正当关系，郭清知道后，将这对青年抓到司令部，强迫二人脱光衣服，让男的去舔女的阴户，然后让他俩刨坑一起活埋。宋村农民任××因和郭清部下一个士兵争地边，郭清得知后，派人去抓任××，没有抓到就把其女儿抓来绑在板凳上命匪兵轮奸，奸后用皮鞭毒打、坐老虎凳、火炷烫。第二天来了8个保人，郭清命他们都往女的嘴上尿。8个人怕挨打丧命，只好照办。这个女孩没几天就被折磨死了。付村有个地主叫傅俊华，到贾河口告发长工付西林、付少堂与母亲与妹妹搞不正当男女关系。郭清根据一面之词，将一人打死，一人活埋。这时付西林老婆已怀孕，郭清派人对她说："如果生下男孩，一撕两半，绝了你的后，生个女孩饶你一条狗命。"结果生下个女孩，才幸免于死。贾河口有个女的与人私通，其丈夫把事情告诉郭清，郭清让买了口棺材把女的装进去活活埋掉。事后郭清对着那女人的丈夫自夸道："这个女的你多次管不了，看我管她一次就改了。"先刘张石保在郭清司令部当伙伕，偷了米面，郭清得知将其吊死，还用东洋刀割去他一个耳朵。还有一次从辛店集抓回7个农民，郭清叫他们头对头，连环咬住耳朵狠拉，不用劲的活埋，结果7人都咬掉一只耳朵。

贩卖毒品　大发横财

郭清是个土匪，又是个大毒品贩。他与大毒品贩王自全、和集廷等都有来往。1940年夏，郭清为贩卖毒品，带10几个护兵全副武装，骑着马到崔家桥王自全那里，驮回白料面两包袱。一两白料面兑换100块现大洋。按这个标准来计算，郭清这一次贩的毒品价值4万块现大洋。

1942年旧历五月，郭清带两个护兵以避暑为名到北京，与刘怀德、刘怀真、张祥丰、曹孟林等人贩卖毒品，一次就住了49天，

郭清除自己出动外，还指示小王村的李春华常住北京、天津。郭清将贩到的毒品，再通过有各刘村的刘怀德、刘怀真、张路明等人销售出去，郭清实际上是“二刘一张”料子公司的后台老板。

1942年春，郭清在他的管辖区东北20多个村庄开始种大烟，每年种1000多亩，种大烟的地除正常纳税外，每亩还得交“大烟土”5两，一年就收“大烟土”六七百斤。除此外，还大量从种烟地低价收购烟土，通过有各刘村料子公司，一部分直接销往外地，一部分从天津请技师，加工后出售。

郭清明禁大烟，暗中贩烟种烟，毒害群众，大发横财，置买家业。除大营有他家财产外，还在北京专买了一座四合院，拥有几十间房的公馆。把头房夫人和孩子、儿媳搬到北京去住，有专人侍奉，任其挥霍享乐。郭清又夺人妻女4人为妾，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郭清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1948年在安阳他存有大量的金条、金砖。他的四房、五房夫人坐飞机南逃时带走了一部分，其余不知落入何人之手。

横行乡里　鱼肉百姓

郭清信神、信鬼，当土匪时不断给佛爷磕头、烧香。尤其是1938年八路军打大营，他赤脚跑出路过村西南孤寺废墟铁佛前，跪下磕头许愿，如果保佑东山再起，则给修庙、塑像、唱戏。1939年郭清又得了势。为了还愿，郭清修了庙，又增塑了神像，“开光四天”唱大戏5台，一切开支均有各村摊派。1944年秋，在郭清家一天就娶了3个媳妇，有郭清之子郭建章、郭志之子郭建勋、金凤鸣之弟金凤仙。郭清为了把这件事办的隆重排场，特意从北京、保定、邯郸请了3台戏。说书的来了10几班，同样是搭大棚，吃“流水席”，不仅要民伕帮忙，一切开支都由各村负担。这一天郭清家受礼受款30万元（日伪币），猪800多头、馒头100多车、双

料帐子 700 多挂，其他钱财不计其数。有个小土匪头目叫和文祥，给郭清送礼 1 万多元，肥猪 60 头，馒头 15 车，还有双料帐子 1000 挂。付村有几个穿破烂衣的农民来帮忙，郭清一见就破口大骂，让他们滚了回去。临漳城内万盛园等饭庄名厨来帮厨，郭清问“来了几个人”，厨师说“15 个”。郭清一听大怒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不来双数，偏来单数，冲喜。要不是今天办喜事，都得活埋。”说着让护兵上去毒打一顿，赶出了大营村。

1942 年夏，田村有名的 5 个财主，给郭清送去两口杀好的大肥猪，猪肉放到司令部厨房。郭清闻到有臭味，大恼，即令护兵埋掉，让送礼人把案板上的血舔净，爬出贾河口。这件事传开，都以此为训，以后送礼改送活猪。

投靠国民党　反共反人民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郭清又投靠了国民党。土匪王自全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柳园让给了郭清。王自全面上仁义，实际是让郭清给他当顶门棍。10 月 12 日郭清怕在漳河北被消灭，率领几个连约 1500 人离开他盘踞多年的贾河口，撤到漳河南王自全的地盘柳园。这时国民党把郭清、王自全、程道生 3 股伪匪合编为安阳地方自卫团，属河南省第三行政长官署行政专员、保安司令、清剿指挥部指挥官赵质良少将指挥。

郭清撤走，漳河以北解放，就逐渐建立了基层政权，组织雇佃户贫农搞减租减息，斗地主分田地。郭清为了保护地主恶霸的利益，对此极为不满，便组织还乡团，过漳河，杀干部，打雇佃。1946 年，贾河口、南寨、黑龙庙、郝家王村、东狄邱、南羊羔、张村集等几十个村的基层干部及其家属，均遭到残杀。贾河口有人到柳园报告情况后，郭清命贾存瑞带还乡团当夜包围了贾河口，枪杀了雇佃会主任袁老随和妻子、女儿 3 口。郭清勾结张村集地主

马光林，把张村集接近八路军的马付其一家 8 口全部杀光。1946 年 8 月，郭清派人到江村围攻我二区区长李励生。郭景贤为掩护李，被捕到柳园，郭清对他横加摧残，折磨致死。10 月 2 日夜，包围了奶奶庙，杀死我五区区长李秀峰的岳父孙佩，李秀峰因受伤过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柳园解放　逃入安阳

1947 年春天，为打破蒋军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发动了豫北战役。4 月间我军攻克柳园，5 月 6 日解放崔家桥，大军直指安阳。郭清率部从柳园败逃后，先驻安阳桥，退守袁宅，又到郭家湾，被国民党安阳驻军任命为“河南省人民自卫第二纵队”纵队长。5 月底，我攻城大军撤出战斗向晋西南挺进。安阳改由地方部队进行围困。在此期间，我方派临漳县知名人士郝庆祯连续 3 次进安阳做争取郭清的工作，郭最后翻脸，郝几乎有去无回。相反，郭清连续派人对我方偷袭、骚扰，破坏我地方政权建设和土改运动，反动气焰异常嚣张。1948 年郭清又被提拔为蒋军三三七师师长兼冀豫边区清乡剿共指挥部副总指挥。他的部队又驻防安阳桥和博爱村。

1948 年 9 月，国民党驻安阳第四十军以参加徐州会战为名，撤离安阳。同时，任命郭清为安阳城防司令，统率王三祝的 3 个团，王景昌的 2 个团，刘乐先的 1 个团，程万福的 1 个营，郭清本部 1 个团，加上四十军 1 个辎重营和 1 个卫生担架队。国民党军让郭清困守安阳这座孤城，用这些土匪部队当炮灰，以期保住这个前沿阵地。

解放安阳　郭清灭亡

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后，我华北地区除了太原、新乡、安阳3个孤城外，全都解放。这时驻安阳的冀豫边区“清剿”总指挥赵质臣和副总指挥郭清等辖多股地主武装，同时还有冀豫边界地区10几个县的流亡政权。安阳城区猥集了土匪、特务、还乡团、反动会道门头子、地、富、反、坏、顽、伪等3万多人。这些逃命之徒走投无路，凭借安阳坚固的城防工事，孤注一掷，作困兽斗。

1949年4月，我四野十三兵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围攻安阳。在扫清外围据点之后，于5月5日黄昏开始攻城，6日黎明爆破城墙成功，总攻开始，各部先后从北门、大西门突进城内。8时许，全城解放。歼敌14190人；生俘国民党第三行政区专员兼冀豫边区“清剿”总指挥赵质臣以下官兵15182名。敌副总指挥兼安阳城防司令郭清，在我军突进城内后，带了几个护兵从仓巷街逃至东门，受到解放军的阻击，后向南窜出，进了聂家院南屋，被我军包围，郭自杀未遂，后被击毙，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河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冀中大盗徐二黑

田　一

二黑姓徐，因其肤色深重，又排行老二，故名二黑，自号亚平，系河北省深县溪村乡北溪村人。

徐二黑修长身材，大高个，马蜂腰。七·七事变前上过高等（高小），是个读书人，谈吐漫言可语，显得彬彬有礼。但遇事胆大、心狠手辣，翻脸不认人。其父名长山，亦是遐迩闻名盗首，后被官府招安，深州知州赐名徐化良，取“化盗从良”之意。

徐二黑从不在深县做案，兔子不吃窝边草，是徐二黑的为盗哲理。平日对乡亲常施小恩小惠，尤其是逢年过节，大事小情，不论大门小户，有过不去的，找上门来，就不让你空手回去。所以在当地群众心目中，徐二黑是杀富济贫的“英雄”。至今一些上岁数的老人，一提起徐二黑还说：“要说徐二黑是个大土匪，那是不假，不过可没祸害过咱穷人，对乡亲们可不错，大门小户谁家没有沾过人家老二的光。”

徐二黑所以能够起家，还靠他的左右臂，即世人皆知的“蝇子”和“蚊子”，当然这都是外号。蝇子的正名叫尹迎春；蚊子的大名叫侯杜壮，都是神枪手，骑自行车不用手扶着把，双手打枪，百发百中。徐二黑对他的部下是恩威兼施，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恼火时便常说：“给他个四〇三（盒子枪子弹）算了。”当时社会非常混乱，军阀混战，暗杀、劫路、绑票经常发生，徐二黑不光是土匪头子，还是当时在社会上非常盛行的“清帮”的头

目，势力很大，别说是土豪劣绅，就是地方官也怕他三分。

徐二黑不暗杀，不劫路，主要是绑票。对象是那些有钱的富商、资本家和土财主。初时徐二黑人马少，白天很少做案，多是在黑夜。看好了绑架目标，由跑头人通知大小喽罗，于某时某地聚合。先是大吃大喝并大抽（白面儿），然后是徐二黑问："弟兄们吃饱了没有？"齐答曰："吃饱了。"又问："喝足了没有？"齐答曰："喝足了"。再问："抽恣了没有？"齐答曰："恣了。"徐哈哈大笑。"好！都恣了，卖命的时候谁要是当孬小子，可别怪我徐某不客气，走！"这时一起出发，放线人带路，今夜绑谁家的票只有少数人知道。为防走风，事先保密，只有到了去处才知道。此行有严密的分工，如内线、外线、了高的、掏窝的、窝藏财神的等。他们把绑来的人，叫做"请来的财神"。这些"财神"大多是老板、当家的、公子、小姐，因为这些人票价高，赎得快。赎人是有期限的，过期撕票，即把绑架来的人处死。这种情况很少，除非万不得已时。土匪的目的是要钱要物，而不是要命。要的价过高，被绑架主拿不出来，可通过中间人商量，当然不是一次商量成的，成后约定时间地点，一手交钱，一手放人。后来人多了，武器枪支也多，势力大了，徐二黑也出了名，名气已大，交结更广，与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三教九流甚至地方官吏勾结在一起。不光是夜黑天，白天也行动。以后发展成干脆写张字条，内云：向某某借洋若干，限期送至某地，误期休怪无礼。后署名徐某。收到条子的人，大多是照办，不敢延误，一时拿不出来的，亦有托人求情，延期或讨价还价的，答应不答应这就要看托的人与徐二黑的交情了。

1935 年，国民政府河北省省长于学忠派李青波带兵来到深县，剿拿徐二黑。一天，官兵气势汹汹地来到北溪村，徐二黑在村里有群众基础，早有通风报信的，说官兵人多。徐二黑等人躲藏起来不予接火，而官兵怕死，网开一面，放徐等逃去，然后官

兵以剿匪为名，抢劫一些财物，回省城交差了事。自此，徐二黑更加猖狂，并通过清帮、洪帮拉拢地方势力，招兵买马，扩大队伍，深县国民党政府也怕他三分。同年，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对徐二黑再次下了通缉令。

官方到处搜捕徐二黑，徐只好收敛躲藏起来。不久徐二黑通过他磕头的盟兄刘汝珍（河北省献县人），请求察哈尔省省长刘汝明（河北省献县人，刘汝珍的一母胞兄）保护。刘汝明本来不想管这事，可是奈不住其弟刘汝珍说情，并把徐二黑描绘成象小说的绿林英雄好汉，就答应下来，把徐二黑介绍给驻防在河北省任丘县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刘汝珍为兄长答应救徐二黑，非常高兴，次日天明，高高兴兴拿上他兄长写给赵登禹的推荐书，家也没回便直奔天津去了。

刘汝珍从察哈尔来到天津，在法国租界怡红班（妓女院）找到了徐二黑，酒席之间，刘汝珍把在他胞兄面前为徐二黑求情的事描述了一番，将推荐书交给徐二黑。徐二黑非常感激，接过信看后说："人们都说一字值千金，我看这封推荐信已胜过万两黄金，日后我徐某有出头之日，定报搭救之恩！"

徐二黑从深县逃到天津不久，就和怡红班的妓女翠仙成了知己，朝夕相处，搞得火热。分别时徐二黑答应今后如有出头之日，一定来天津为她赎身。

在北平南苑徐二黑找到赵登禹。一见面赵就说："久闻大名，我早就接到刘省长的电话，说你要来，怎么今天才到？"徐二黑说："小弟有罪，不敢贸然求见。"赵登禹说："扯他娘的淡，什么罪！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就凭老弟这身武艺早该重用为党国效力，给你个中校团副当当怎么样？在北平好好玩几天，回去马上把你的人马集合起来，招些新兵。"徐说："那当然好，就怕地方官找我的麻烦。"赵说："他敢！我的骑兵独立营，就驻防在深县，营长叫肖长春，营副叫李光东，都是自己人，我让他们保护你，你

怕什么?”这一下徐二黑心里有了底，在北平没有逗留，便急忙赶回老家。

当时任河北省深县县长的刘云亭，系河北省蠡县人。得知徐二黑的消息，派深县巡警队长大个子李庆云，前往北溪村捉拿徐二黑。而李庆云与徐二黑不仅是磕头的弟兄，还是“亲同参”。亲同参是清红帮的一句术语，同拜一个师傅叫亲同参，关系非一般可比。可是上司命令又不能不执行，李便想好主意，单枪匹马一人来到北溪村。

徐李相见，先是寒暄，后是用茶，没等李开口，徐二黑抢道：“大个子，你这次是奉上司命令，来缉拿我的吧!?”李道：“大哥说哪的话，多心了，你看小弟此来不带一兵一卒，又不带家伙，怎么敢拿大哥!小弟是专程给大哥磕头问安的。”说着便行清帮大礼。徐二黑赶忙上前扶起，各归座位，命家人摆酒。

李尽管不说明来意，徐二黑心里非常明白，为了不为难李庆云，徐二黑决定陪李一同返回县城去见县官。这个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飞到城里，传遍茶楼酒肆，也传到驻防深县南大街二十九军独立骑兵营。

次日徐二黑与李庆云骑上自行车，离开北溪村来到东城门外，徐二黑感到有些热，便停车脱下灰色纺绸大衫，对折后搭在车把上，用一只手推着自行车，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东城门，大个子老李紧跟在后面。到了衙门口，他先进去禀报，然后出来带徐二黑进去。深县县官刘云亭坐在大堂上，左右是录供员，4名法警在堂下分站两旁，这是事先早就准备好的，单等徐二黑一到就升堂，先给其人来个下马威。

刘云亭问：“你就是徐二黑吗?”徐二黑答：“我是徐亚平，亚洲的‘亚’，北平的‘平’。”刘：“什么‘亚洲’‘北平’的!是通缉要犯，你可知罪!?”徐：“我听不懂这些混话!”刘刚要发作施威，有人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什么。刘云亭把气压住说：“先把

他押到公安局去。”徐二黑扭头就走，李庆云和法警跟在后面，走出衙门，来到大街，只见驻防深县的赵登禹的骑兵独立营副营长李光东率领部下，把从县衙门口到西大街公安局这一段封锁了。看热闹的人群，东一伙，西一伙地在议论着什么，胆小的躲在自家门旁打听消息。

徐二黑在独立营副营长李光东的保护下进了公安局，走进会客厅。李庆云忙给徐二黑打坐，李光东上前给徐二黑行个军礼，说道：“小弟早已收到赵师长命令，迎候并保护老兄来深县招兵，只要有小弟在，没人敢动您一根毫毛。您先在这里委屈一下，我这就去找那狗官。”说完转身去了。徐二黑在公安局吃喝自有人侍奉。

李光东精明能干，外号人称“活猴”。原是赵登禹的随从护兵，对赵忠心耿耿，赵便提他当了独立营的副营长。正营长名叫肖振春，因事外出，所以保护徐二黑的重担就落在他的肩上，他气势汹汹来到县衙，弯弓射箭照直一崩，质问刘云亭道：“徐亚平是我二十九军中校团副，奉赵师长之命来深县招兵，县长大人给予帮助才是，为何把他拘押在公安局!?”刘云亭道：“他就是通缉犯徐二黑，你知道吗!?”李光东：“这个我不管，我是奉上司命令保护徐团副来深县招兵的，请县长大人马上放人。”刘云亭道：“我也是奉上边命令拿人的，既然已经把人拿住，我可不敢再放，得请示上边。”李光东怕夜长梦多，便紧逼一步：“闲话少说，请县长大人马上写个‘放’字，我好到公安局去领人，否则休怪小弟鲁莽。”说完转身走出衙门，直奔公安局。

李光东到公安局，命令一连长加强戒备，增设门窗，不管任何人，都不许靠近徐团副，违令者格杀勿论。又命令传令兵马上把二、三、四连连长和公安局长叫来。人到齐后，李光东故意当着公安局长的面，给他的3位连长下达命令：“二连长，带全连弟兄，到东街戒严，把机枪大炮架起来，目标对准县长公馆；三连在南大街戒严，也架起机枪大炮，目标是公安局王局长的公馆；四

连在西大街负责保护，如果警察胆敢妄动，立即全部消灭！”3位连长刚要去执行命令，又被李光东叫住：“请大家记住，现在正好是下午5点半，到今晚12点，县长若是还不答应放人，你们就开炮，先平了这些狗窝再说！”“是！”3位连长同时行了军礼退出，各自执行任务去了。这一下可把王局长吓坏了，连连哀求道：“别这样，千万别这样，这样会把事情闹大的，有话好商量，我马上去找县长，劝他放人。”李光东说：“劝不劝由你，放不放人你们看着办吧，反正时间一到，就开炮！”

公安局的王局长吓得满头大汗，来到大街上一看，街上静悄悄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机枪大炮都架了起来。他快步走进县衙内向刘云亭汇报了情况。刘云亭一听，吓得面如土色，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心想放人不行，不放人也不行。便说：“我现在脑子乱得很，王局长你想个主意吧。”王说：“依小弟看，先解燃眉之急先答应他放人，不然时间一到，我们可就全完了。”刘云亭说：“我知道这些大兵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可是这捉放徐匪的罪责，我实难承担，容我再想想。”王局长耐着性子又劝道：“我的县长大人，你还想什么，你也太认真了，徐二黑从北平公开回到深县，赵登禹的部下又这样保护他，说明是有来头的，再说途经各州各县，怎么他们不拿人？难道这通缉令是专门给大人您下的吗？”说完便退了出去。

王局长走后，刘县长思来想去，这官是当不下去了，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计。主意一定，事不宜迟，带上随从偷偷从后门溜走。县长逃走的事，很快就传了出来。王局长知后，飞快去见李光东，说县长明的是逃跑了，暗里是答应放人。你们胜利了，撤岗收兵吧。

第二天上午，无风无浪。徐二黑骑着大马四街夸官，看热闹的人们很多。走到县衙牌坊前，徐二黑从马上跳下来，在地上拾起一根木炭棍，在影壁上写了“脏官”两个字，没说话，又骑上

马回营房去了。

自此，徐二黑名声大震，又有了靠山，再也不干那昼伏夜出的黑活，而是明天明地，今天给某老财写个条子送去要两支枪，明天给某老板递个信派送若干现大洋，美名曰："国难当头，有枪出枪，有钱出钱。"老财老板接到条子谁也不敢怠慢，乖乖地送来就是了，当然也有讨价还价的，不过那要看托的门子硬不硬，和徐二黑的交情深不深了。那时正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官匪合一，军匪一体的时代。

1937 年的一天早晨，徐二黑带着他的便衣队来到深县大李村，走进一家大门楼。李秋甫（清帮头目，李村人）领着几个人也紧跟了进去。村民不明怎么回事，进村前，徐放了两声快枪，村民慌恐不安地站在自家门口打听消息。约有半个时辰，从大门楼里传出消息说："乡亲们不要怕，徐司令来了，是保护咱村的。村中拿出 200 块钱和一包'白面儿'（毒品），没事了，国难当头嘛，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没事了。"一时紧张的村民，又平静下来。

两个时辰过后，从大门楼里走出一伙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中等身材，白脸皮大眼睛，留着分头，身披米黄色呢子大衣，非常神气。其他人都穿着便衣，腰中亮着手枪，大摇大摆地跟在后面。走进李秋甫家客房，说是回拜。事后人们才知道，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年轻人，名叫苏佩林，是徐二黑家的女婿，与徐二黑的女儿徐大枝婚配。徐大枝自幼跟随父亲练就一身好武艺，用脚把自行车往前一踢，纵身上车不用手扶把，双手打枪，弹不虚发，人称"双枪手徐大小姐"。苏佩林拿着钱和"白面儿"来到李秋甫家回了徐二黑，回城去了。

也是 1937 年，忽然来了一支军队，穿戴枪支都还整齐，拉开电线，看样子要打仗了。听说这支军队的司令姓赵。还有个金司令和这支军队不是一回事，驻武邑、衡水，说是帮助徐二黑打段

海州的。城郊区的人们也说，徐二黑的人马，也摆开了阵式，看样子是非打不可了。

几天过去了，没听到枪声，人们总觉得心里不安定。后来才知是双方谈判好了的，共同合作打共产党。当时驻在大李村的兵有个叫尹瑞堂的，头上有个不大不小的圆圈不长头发，人们送其外号叫“白铁帽子”。白铁帽子在深武饶安一带也是小有名气的，是清红帮的头子，也是徐二黑的朋友，人称神枪手，即使是在夜黑天，也能打中 20 丈远的香火头。

1937 年日机轰炸深县城。1938 年秋，侵华日军第一次占领深县，铁蹄未稳旋即西去（顺沧石路由东往西）。深县专员兼县长陈文铎率其同僚弃城南逃。徐二黑仍盘踞深县城。当时共产党的政策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中共深县地下组织负责人侯玉田（深县周龙华人，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工会劳保部副部长、农业部监察室主任）派刘子祥（深县唐奉人）、曹振家（城里南街人）做徐二黑的工作，争取他共同抗日。徐二黑当时的态度是“既不愿与共产党共同抗日，也不反共亲日。要在深县成立什么保安司令部，自封司令。刘子祥劝徐在保安司令部前加上“抗日”两个字，徐二黑不同意，可是又不好得罪刘子祥，就干脆叫“司令部”，什么字也不加。下设 2 个处、2 个师，2 个处是军法处，处长是谢贵芝（深县溪村人）；参谋处的参谋长是李泽民（深县柳庄人）；2 个师是：第一师师长名叫尹迎春；第二师师长是苏佩林。这时的徐二黑是鸟枪换炮，在深县一手遮天，势力相当大，他请深县清辉头村清朝末科进士李维第出山，当深县县长，李不肯与徐为伍，便以年老多病为由，予以谢绝。徐干脆不设县长，称王称霸，当了深县的土皇上。

一天，大汉奸张二虎（衡水县人）从衡水来到深县，劝说徐二黑投靠日本人，初徐二黑不同意，后架不住张二虎说劝，就答应了，从此和日军勾结在一起。

1938年农历年底，徐二黑在深北攻打人民自卫军时，盘踞在武强县的段海州率其所谓“青年抗日义勇军”占据了深县东部，驻扎在衡水、武邑的国民党杂牌军也趁机开到深南，大喊大叫要帮着徐二黑剿共。段海州和中央杂牌军光是摇旗呐喊，坐山观虎斗，不出兵，徐二黑大败。就在这年腊月二十三，由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攻下了深县城，收编了徐部，整编时委苏佩林为团长。其余愿抗日的留下，愿回家的发给路费回家，也有一些人明里回家，暗里却找其旧主徐二黑去了。在攻打深县城这天，徐二黑、尹迎春等人，正在谢贵芝家吃喜酒（这天是谢家大少爷成婚之日），闻讯，徐等人连夜仓皇逃到沧州，从沧州跑到天津，投靠日本当了汉奸。

徐二黑被赶出深县后，盘踞在武强的段海州被迫倒向抗日一边。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在深县成立了河北抗战学院，杨秀峰任院长，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抗战形势好转，清红帮的活动有所收敛，李秋甫、尹瑞堂也表示同情抗日，成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团结教育对象，李秋甫经教育当了抗日联络员。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即有名的“五一”大扫荡。一夜之间，石德铁路、沧石公路、滹沱河、运河两岸都是日伪军，天上飞机，地上步兵、马队、坦克，包围圈越缩越小，到处杀人放火，抗日军政机关被形势所迫，不得不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活动。

侵华日军经华北伪行政委员会批准，在北平成立了“安清道义”委员会，即清帮总会，直属侵华日军特务机关领导。派清帮头子戴月波任衡水日伪司令；徐二黑任深县日伪司令。徐二黑的亲信尹迎春当了深县伪公署的知事（县长）。日伪经常出城清乡、抢劫财物、修筑岗楼安据点，在深共修建岗楼、据点81处，徐二黑在深县则大力发展清帮组织，到处设香堂、收徒弟。共产党利用这个机会，通过清帮内部敌工人员，选派立场坚定可靠的共产

党员“拜师”入会，打入敌人内部，以便利用和控制这个组织。如当时应敌伪村长刘玉山（共产党员），应敌干部刘庆元等人，就是经党组织批准“拜师”入的清帮。他们利用帮会在东杏元村北修了个岗楼，把附近村里的青年招来，明里是伪军，暗里是抗日的。

深县的清帮据说是从上海经天津传来的，是真是假谁也说不清楚。深县徐二黑、衡水戴月波想利用清帮发展自己的势力；我冀中公安局派张文耀、冯志甫到深县来，通过帮会头子张怀三、李品山、宋邦彦来转化徐二黑。张怀三按帮会辈行比徐、戴大，而且路子也比他们宽广。所以张文耀、冯志甫来到深县后，先派人到武强县请来张怀三。张文耀、冯志甫和张怀三等人谈话后第二天，徐二黑到了大李村。张怀三、宋邦彦、李秋甫、李品山等帮会头子摆酒席，开始做徐二黑的工作，徐二黑只答应保护入帮的人，收效不大。过了几天，经冀中公安局批准，在深县徐祥口召开清帮大会，由深县当时县委秘书李继真筹办，参加会的有抗日干部徐右民、刘玉山（共产党员，长官庄应敌村长）、王庆元等人，都是经党组织批准的；应敌人员有张怀三、李品山、李秋甫、宋邦彦等，都是帮内头头，还有临时换上便衣的伪军和深县、武强、武邑在帮的群众，共1000多人。冯志甫在大会上讲了话：“大家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张怀三也讲了话：“入了帮就是一家人，不能互相欺瞒，相互残杀。”

1943年大灾荒，日军和徐二黑的部下经常到农村抢粮劫物。深南县委书记刘露洗、县长兼大队长路砚农、副大队长夏仁义（日伪坏人非常害怕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吓一跳”）、公安局长吴庆成、组织部长李静、宣传部长陈敬之、敌工部长赵明之、县委秘书李继真等分散在各区，组织抗日游击小组，选派立场坚定的党员干部当应敌村长，有条件的打入敌人内部，争取伪军反正。敌工部通过戴月波、徐二黑搞出一批军火物资，充实了县游击队。东杏元岗楼由王庆元直接掌握着。李品山处的伪军大部听共产党

的话，张怀三通过敌工部打入敌人内部，李秋甫利用与伪军头头交朋友、拜把子瓦解敌人。通过长期考验，这些人还是立场坚定，坚决抗日，从敌人内部搞出的情报也是可靠的。

1943年，王庆元带领东杏元岗楼的伪军，烧掉岗楼反正；李品山也带领伪军投靠八路军；大李村村东岗楼上的12名伪军，在内线配合下全部反正。接着又在沧石公路上，区小队打了日军的伏击，烧毁汽车，日军死伤惨重。紧靠公路长官庄村岗楼上的伪军不敢下来，在岗楼上乱放一阵子枪完事。事后岗楼上伪军小队长急忙到城里向日军和徐二黑报告：说是打伏击的是八路军贺龙的队伍，也就没事了。徐二黑撤走了长官庄的岗楼。

因不时发生伪军反正，岗楼被烧，日军常遭伏击，日军非常恼火，撤了徐二黑的职，由尹迎春接任司令。

徐二黑被日本人撤职后，调到北平，没有明确职务，徐在日本人看来已失去利用价值，加上不断有人告他的状，于是，1944年春天，日本人逮捕了徐二黑，押解保定枪毙了。

1945年，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尹迎春弃城逃亡石家庄组织还乡团。1947年石家庄、正定解放，尹迎春落入人民法网，被处决。

（河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永年巨匪“铁磨头”

成合群

1947年10月6日，天刚破晓，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喊杀声惊醒了成安县吕庄村的人们。3个小时过后，一切又都平静下来。人们试探着从家里走出，只见村内和村北面的沙丘上，横躺着70多具尸体，还有60多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被束手就擒。原来是被困在永年城内达2年之久的土匪，逃出城来被我军消灭了。尸体堆里有一个五短身材、又黑又胖、面目凶恶的家伙，他就是危害永年一带达10年之久的土匪头子“铁磨头”。

一

许铁英，又名许钟琪，绰号“铁磨头”，是永年县有名的土匪、汉奸、国民党特务。他趁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之际发家，又在死不回头的反动道路上被我们消灭。其一生恶贯满盈。

地处河北省南部的永年县，七·七事变前，由于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的签定，国民党在永年的县政权已是名存实亡。七·七事变后，日军于10月16日侵入永年；23日大部日军继续南犯，只留少数兵力驻守铁路沿线与临洺关、城关二重镇。所以七·七事变前后，永年县的广大农村实际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会队、地主武装等纷纷拥兵自立，占地为王。县境内“司令”多如牛毛：永年城东有老牌土匪甄老德；洺山有惯匪杨兰子；永年城里有杨怀

珍、薛光宗等18个土匪司令；还有南碾头的程张义、三塔的田渭清、门赛的李逢春、界河店的阎昆山、榆林的向三林等匪伙，多者一二千人，少的几十人。会队的规模则更大，白枪会、黄沙会、梅花拳、大刀会、青红帮都是几千人众。地主豪绅也组织“护庄团”、“保甲自卫团”等，名堂五花八门。从此你争我夺，天无宁日，偌大的永年县，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当时的许铁英，还只是一个东奔西投、不断改换门庭的土匪走卒。

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东进纵队骑兵团，由邓永跃主任率领来到永年县，很快在永年城关建立了抗日政府，委派赵选同志为抗日政府县长，做了大量的抗日动员和组织工作，控制了全县的大部分乡村。但是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又回师重占了永年城关。我抗日政府被迫由永年城内转移到孙庄，后又迁至永北，建立了永北抗日根据地。日寇也在城内建立了伪政权，任命了汉奸县长；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也派他的叔父鹿建勋到永年当了国民党的县长。从此，一县三长，政出多门，造成永年县复杂的政治斗争局面。到1939年底，土匪、会队、地主武装各寻靠山：一部分在互相兼并中自消自灭；一部分投降日寇当了汉奸伪军；一部分转向进步加入抗日阵营，成了革命力量。土匪许铁英在这风云变幻的两年多时间里，不但由匪卒跃居匪首，还在洺河以南抢占了一大块地盘。1941年秋后，在永年境内，他的势力竟与日伪、抗日武装力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许铁英的势力是怎样迅速膨胀起来呢？请看许匪的发家史。

许铁英于1914年出生于永年县许庄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许炳瑞，先娶邯郸县招贤村大地主之女张氏为妻，生二男一女。许炳瑞与长子许国琪吸食毒品。许炳瑞又续娶永年武八汪村李氏为妻，生三男二女。长子许钟琪（即许铁英）、次子许长琪、三子许安琪和一女许然妮，这亲兄妹4人，后来都成了土匪。

许铁英18岁时，其父死。当时许家已败落，一贫如洗。由于

许家子弟平日横行乡里，常耍泼皮无赖，所以无人愿意提携。许铁英只好推起小车，干起了贩卖小盐的营生，由曲周往武安、涉县山里贩运，往返一二百里。由于官府禁止贩私盐，所以从事此业既辛苦又担惊受怕。许铁英为了逃避盐警检查，不论白天黑夜，经常独往独来，身上还常带着刀子，别着棍子，遇上单个巡警就边跑边打，练就了一身贼胆。1935 年冬，许铁英贩盐路过永年城时被盐警查获，不但没收了 盐还要罚款，后经巡官马勋臣从中说情，才以“今后不许再贩盐”为条件放了出来。1936 年春，许铁英在许庄村南的大路上，用木棒拦住了一个卖花生的老头，将钱物全部抢去。从此许铁英开始了土匪生涯。

许匪作案后，跑到武八汪村的舅舅家躲避风声。其舅李栓柱是个兵痞，在家藏有枪支。许匪一经下水，尝到不劳而获的“甜头”，就再也不肯罢手。他极力怂勇李栓柱结伙作恶，于是二人开始持枪行劫，直至绑架肉票，“买卖”越做越大。

1937 年 4 月，许匪同伙李双文、李珠的被官府捉拿枪毙，同时追捕许铁英。许慌忙投奔永年城东老牌土匪甄老德处，给甄当了“底线”。其间，许匪又学会了黑道上的不少伎俩。不久，又有许庄惯匪张凤梧聚众洺山，成立了土匪便衣队。许希望同乡土匪有所照应，帮他出人头地，所以就改换门庭，弃甄投张，在张凤梧的特务队中做了班长。此时的许铁英，已是权势欲望熏心，当个班长，难填欲壑，遂于 1937 年 11 月，又离开洺山张凤梧处，回到了许庄。

许匪下山后，先是在土匪王作州手下为匪，后来伺机取代了王的地位，又一次自成匪系当了匪首。这时，他的匪伙已有 20 余人，其二弟许长琪（人称“二官”）、三弟许保琪（人称“三黑子”）也参与其间。他们夜聚昼散，拦路抢劫，绑票杀人，无恶不作。1938 年初，许匪率众到西杨庄一带抢劫，与当地匪首“暴团长”发生冲突。许被对方连击 5 枪未中，狼狈逃回。同伙奉承他

说，连击5枪未伤一根毫毛，真是铁做的头。从此，许匪就得意地自称为“铁磨头”了。这次吃亏后，使“铁磨头”深感自己实力不足，决心多弄枪支，壮大队伍。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他抢劫、绑票多以得到枪支武器为目的，从而使其势力较快发展起来。

一些地主豪绅看到铁磨头匪伙越闹越大，做起黑道上的“买卖”又毒又狠，所以非常担心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趋利避害，这些地主豪绅决定笼络、勾结、收买铁匪，使之成为自己看家护院的走狗。许庄地主许廉臣过去就用一枝三把盒子，百余发子弹笼络过铁磨头，1939年初，许廉臣又与本村地主许老贵一起送给铁匪19枝长、短枪，助纣为虐。同年春，西杨庄大地主李海生也见风使舵拉拢铁匪，把铁匪请到他们村去成立“保险团”（即保安护村团的意思）。这正中铁匪下怀，于是他便率匪众到西杨庄立团，自己当了团长。铁匪有了“保险团”的招牌，土匪勾当就由夜聚明散变成公开活动，利用“办团”的名义圈占地盘，扩充势力范围，由到处流窜，变为有了较稳定的活动基地。自此，铁匪开始对西杨庄乃至南吕周、茹佐、大张村、石宫营、辛庄堡等村要粮派款，逐渐地控制了洺河以南的不少村庄。铁匪有了“团长”的头衔，又进一步想做一方霸主。1939年初，马到固小股匪首胡维章和邯郸南吕固匪首沄得胜投奔铁匪门下。入伙后，铁磨头仍派他们带原班人马控制过去的地盘。同年，铁匪与邯郸的大土匪郭化民，同被收编为河北民军冀南保安旅。是年10月，铁匪把砸抢得来的40件毛衣送给三塔黑团头子田渭清，以拉关系。经过大肆活动，到1940年初，铁匪的势力已发展到三四百人，能控制洺河以南20多个村庄。

地主豪绅们拉拢铁匪为自己保了险，善良的穷苦百姓却遭了殃。自从成立了“保险团”，铁匪对洺南百姓的抢劫变成了明暗结合，白天要粮派款，晚上绑票勒财。铁匪向群众的摊派从来是想要多少就要多少。要粮，除麦、秋两季必交外，平时要也得给；要

款，随用随收，不论次数和多少；要费，被子费、烧柴费、枪支子弹费等等，名目繁多；要捐，牲口捐、水车捐等不计其数。以上还都是所谓正项摊派。此外还有不少名目：如“饭折款”，就是催款人到村催款，须以鸦片、烟卷、肉馍招待，不在吃饭时间，就得出“饭折款”。使人有苦说不出的罚款、派差等则更让人胆战心惊。铁匪对洛南的统治就是土匪的统治。1939 年，铁匪曾连续向茹佐村要款 5 次，按每亩地 1—2 元收款，村民筹措不出，匪徒们就在腊月三十闯到茹佐，摘门卷被抄家绑人，家家户户遭到抢劫。农民陈志祥家仅有的准备过年的一斗玉米也被抢去。1939 年康庄农民大秃子因饥饿难耐，到本村地主的地里掰了几穗玉米，竟被铁匪活活打死。郑营村富农赵大发强买农民石秀身的园子地，石不愿卖，铁匪派人将石抓到石管营，吊起来打了 300 皮鞭，石秀身被逼无奈，将地低价卖给赵大发。同村赵大付，在 1940 年初青黄不接时，将 3 亩园子地当给了赵大发，到期赎地，赵大发不允，并叫铁匪将赵大付抓去毒打，逼着他说出不再赎地才肯罢休。东张固村地主王老新与农民王振的因房产闹纠纷，铁匪竟将王振的一家 3 口全部杀死。1941 年，铁匪派人到兴业村要款，群众没能按数付出，就把赵承方、刘福珍、崔成志和永冬的母亲 4 人抓去，村里花了几万元，才将他们赎出来。“保险团”就是保富人的险，要穷人的命，铁匪就是地主豪绅的看家犬。

铁匪的部下流氓成性，禽兽不如，经常到村子里糟蹋妇女。铁匪的三弟三黑子是个大流氓，经常赤身裸体乱闯民宅，奸污妇女。三黑子每到一村，妇女避之唯恐不及，经常有妇女被他拦住糟蹋。他威胁某村一个姑娘，该女不从逃到亲戚家，三黑子用枪逼住该女的爷爷让其说出藏身之处，硬将该女拉回本村进行奸污。有时妇女躲藏了，三黑子就抓来男青年当人质要挟。一次他到某村抓了 60 名男青年，逼他们说出家里姐妹妻嫂姓名，再指名抓来任他奸污，违抗者就拷打折磨，甚至让喝尿、吃屎。三黑子曾强奸了

他亲叔父的闺女，他的婶母向铁磨头哭诉告状，铁匪不以为然地说："他年幼无知，不必见怪。"铁匪就是这样纵容匪徒胡作非为。有一个有200户人家的村庄，除逃避到外村的妇女外，全村妇女均被铁匪部下强奸，无一幸免。

男人躲债，女人躲祸，最难躲避的还是铁匪绑票。铁匪绑票的次数和手段都是骇人听闻的。他的手里经常押着几十个"肉票"。铁匪从绑票起家，也在绑票中出了恶名。1938年的一天，铁匪在武八汪村外遇见肥乡县一个卖小鸡的老乡，不由分说，就绑住扔进水坑，将钱全部抢去。为少许钱财，就这样把杀人当儿戏，足见铁匪已嗜杀成性。在砸抢、绑架时铁匪杀人就更多了。1940年，铁匪到辛庄堡抢走大牲畜20余头，劫持群众20多人，将"肉票"关进暗室，逼使受害人家变卖家产，左挪右借，才将人、畜放回。同年，铁匪又到曲周县白町店拉牲口40余头，抓绑30余人，同样害得"票户"倾家荡产，他才放票。1941年阴历二月十三是施庄庙会，铁匪率众到施庄拉票，当场绑走20多人和18头牲畜，全村百姓花了很多钱财才赎回。他们还不断到外县绑票抢劫。1941年一年之中，铁匪到邯郸、沙河、鸡泽等地，大规模绑票就有5次，共抓人112名，抢牲畜136头。如在砸抢沙河县中旺村时，一次就拉牲畜30余头，绑人票40多名。据不完全统计，铁匪在公开投降日寇之前，就先后绑票369人，抢耕畜500余头，衣物、钱财不计其数。他们对无钱赎回的肉票，进行残酷迫害，手段十分残忍：打、冻、饿、挖眼割耳送给家属，或枪杀、活埋、投井等致以死命。毛村农民赵洪年被绑后，家里实在无钱赎回，竟被铁匪活活饿死，事后还要家属出500元才让赎尸。

综上所述，可知铁匪的发家史就是劳动人民受迫害，受抢劫的血泪史。

二

铁匪，身材矮壮，面貌凶恶，一人4个老婆。他从来只穿土布衣服。一年四季不穿袜子，打起仗来，常常是衣服一甩赤膊上阵。他目不识丁，孤陋寡闻。有人曾拿一张中国地图，把河北省的位置、大小指给他看，没想到他看后竟说："怎么河北外边还有中国呀?!"原来他认为中国只有河北那么大。据说，1946年当军调小组的美方代表离开永年城时，曾向铁匪索取纪念章以留念，铁匪当时目瞪口呆，不知纪念章为何物。经人解释，他才命银匠打了一个大号的长命锁式的东西赠给了人家。

永年县的百姓说铁匪是一个"好事学不会，坏事不用学"的人，事实确实如此。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铁匪搞阴谋，耍手腕，进行政治赌博很快成了行家里手。再加上他独有的亡命徒精神，就成了个地道的政治恶棍。抗日战争一开始，铁匪就采取了勾挂国、共、日三方的策略，并随时掂量着各方的份量，以从中取利，发展他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地盘。

在"保险团"成立以后不久，铁匪就开始把一些"有来路"的人拉拢到自己身边，充当谋士。如，茹佐村的老甄的，此人有文化，七·七事变前是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员，事变后仍与国民党方面保持联系。铁匪把姓甄的请到团里，并与他换帖拜把子，结成弟兄，铁匪企图通过该人不断与国民党取得联系。铁匪一副团长马勋臣的妹夫樊良才，七·七事变前就投降日寇成了汉奸，铁匪特地从安阳把他找来，委以重任，通过他不断与日寇联系。

抗日战争一开始，我冀南党组织为了争取一切力量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多次派人与铁匪联系，教育他抗日爱国，将功赎罪。1940年2月，冀南军区敌工站成立以后，曾派孙继平等同志到铁团，做了大量工作。当时铁匪为了窥测我方实力，也与我

方联络，接纳我方人员。到1942年底，我方与他逐渐达成一种默契：允许他在杨庄以西、铁路以东、洺河以南的范围内活动，但要求他对我党在这一区域内的区公所等抗日组织不能有所损害。在此期间，铁匪也为抗日军民做过一些好事，为抗日工作提供过方便。但是，铁匪对于我们的联合始终没有诚意，就连抗日军民在豆庄、赵庄与该团联欢时，铁匪仍令其部下架起机枪，对准抗日军民，杀气腾腾。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铁匪从未停止残害人民的罪恶活动。我党为了教训铁匪，保护抗日人民的利益，曾在1940年春由抗日县长赵选率县大队包围了东、西杨庄。当我们集中力量打击东杨庄的大股土匪时，铁匪在西杨庄闻讯逃之夭夭。铁匪逃脱之后，不但不知改过，反而催粮要款、绑票抢掠更加猖狂，并且公然杀害我抗日军民，以取媚于日寇。他每到一村，就指名迫害共产党员和抗日家属。1940年10月的一天，铁匪带匪徒窜到小北汪村，先将农会主任赵运来一枪打死，又逼赵妻供出农会干部姓名。赵妻宁死不屈，被铁匪打得死去活来。东阳庄有个汉奸老占的，亦是铁匪的下属，经常到永年城里给日军送情报，破坏抗战。1940年冬的一天，该村民兵趁老占的去破鞋家鬼混的时候，将其处决。铁匪得知后，立即派爪牙把该村的老共产党员、村支部委员张仲杀害，借以报复。同年，铁匪还亲手枪杀了八汪村和西张固村抗日村长等33人，抓捕干部11人、群众56人。铁匪的罪恶行为，引起抗日军民极大愤慨，抗日政府决定再次予以打击。

1941年2月7日是旧历春节。过节前，做贼心虚的铁磨头四出派人打探，得知许庄周围50里之内没有我军活动，便在大年三十晚上，摆酒设宴，与众匪徒在许庄村内大吃大喝起来。不料，初一凌晨神兵天降，八路军黄承彦营长和抗日县长赵选同志带领二分区一中队和县大队共200多人连夜奔袭而来。醉醺醺的匪徒们措手不及，在猛烈打击下溃不成军。战斗持续了2个多小时，除铁匪率少数人落荒而逃，共击毙匪小队长贾善书以下30余名，俘

多人，并解放“肉票”70多人，大大打击了铁匪的嚣张气焰。

三

本来就与日寇勾勾搭搭的铁匪，在1940年以后，看到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不断恶化，日寇对根据地的“扫荡”日甚一日，便于1941年秋，通过汉奸樊良才与日本特务高目正二的关系到武安投降了日军工藤部，被编为“工藤部队配属铁血团”，铁磨头被封为团长，变成正牌汉奸。在日寇的卵翼下，他在洺河以南的势力一下子膨胀起来。

铁匪先以太辛庄、大佛寺为据点，在周围村庄修炮楼、挖寨沟等大力构筑工事，又大肆“招收”新兵——其实是强迫青年为匪。还给他们聘请教官进行军训，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铁匪为了加强对洺南人民的残酷统治，把所占40多个村庄（后来发展到100多村）划分为八大片，号称八大组。每组委派正副组长进行管理，正组长管军事、副组长管民事。每组掌管土地2万亩，用以维护他对洺南人民多如发丝的摊派。八大组的具体情况是：一组组长杨茂春，七·七事变前是卖馒头的，铁匪的好朋友，属下有三四十人枪，管大小张村、北护驾、何营、东西张固、蔡营一带；二组组长连海中，四、五十人枪，管东西陈堡、郭庄一带；三组组长王小保，四、五十人枪，管杨庄、许庄一带；四组组长李吉尧，四五十人枪，管李庄、太平庄、周村一带；五组组长刘益田，四五十人枪，管七个刘营、八个李解一带；六组组长姓张，外号“二火连”，属下有六七十人枪，管许庄、方头固一带；七组组长李志蒙有六七十人枪，管八旺、西苏、洞头、李固一带；八组组长武志良，有一百四五十人枪，管河店、朱庄、杜村、瓜井、唯宁、段庄一带。

此外，铁匪属下胡八的人马编为九、十两个组。九组组长杜

锡章，曾给胡八的当过随从，有一排人马，占马头固、何营一带；十组组长胡尚林，管周村、捻头、贾村一带。

正在铁匪自以为得计之时，却引起了驻永年日寇的不安。铁匪这个受编不受调的汉奸，是不能让主子十分放心的。尤其铁匪的势力发展过快，还经常到其他伪军的防区要粮要款，更使日寇不能容忍，遂决定对铁匪进行“肃正”，逼他驯服。

1942 年 5 月 22 日，日寇集中邯郸地区十几个县的日伪军 1000 多人，包围了以太辛庄，许庄为中心的 10 多个村庄，首先打太辛庄。铁匪毫无准备，立即逃至许庄，丢下新兵二三百人被日军包围在大佛寺里。交火二三小时，新兵被俘 100 多人。接着日军又攻打许庄，激战竟日。铁匪两次突围未成，腿部受了重伤。我抗日政府从团结抗战大局出发，命基干团黄营长给以接应。黄营长率部从许庄村东南向日寇攻击，帮铁磨头突围。

经此一战，铁匪实力大损。为丢了地盘急得发疯的铁磨头，简直坐卧不宁，伤腿刚好，就迫不急待地到他最挂心的洺南一带，收拾残余势力，妄图重树淫威。1942 年阴历十月十五日是六星村的庙会，铁匪一进村，就向赶会的人们大喊着说：“你铁爷爷回来了。”接着用铡刀连铡死了 3 个赶会的群众，并指着尸体说：“你们看我老铁子没啥人了，就都不送款了，今后你们都照这样办！”当年十月，沙屯土匪刘老开带 100 多人与铁匪合并，铁又乘势东拼西凑，重聚了四五百人。1942 年末，正在铁匪为枪支弹药发愁之时，邯郸柳林桥一个伪军小队长合谋铁匪去弄枪支。原来，日本人正在邯郸的柳林桥训练一支 80 人的水上警察，该小队长与日本教官发生了矛盾，潜来永年给铁匪提供情报。见枪眼红的铁匪遂派出 200 人去了柳林桥，打死 3 名日本教官，生俘 80 名水上警察，得大枪 80 余枝，把俘虏带回永年后全部活埋。

四

为尽快扩充实力，铁匪于1943年3月派许二官带200多人包围西杨庄炮楼，用武力收编王泽民部伪军。双方打了两天，第三天许二官攻入炮楼，生俘王泽民等全部伪军。铁匪与王泽民在早期土匪生活中，曾是换帖弟兄。王泽民当了伪军头目后驻西杨庄，与铁匪的地盘邻近。铁匪经常到王的防区抢粮要款，发生过一些磨擦。俘虏了王泽民以后，铁匪导演了一场双簧：一面示意许二官非杀死王泽民不可；一面派人请他的娘来替王泽民“救驾”。他娘进门就大声吆喝：“王泽民就是我的儿！看谁敢动我的儿！”边说边抱住王泽民的头。铁匪趁势向王泽民说：“还不快给咱娘磕头！”王泽民如梦初醒，慌忙磕头喊娘。这样一打一拉，王泽民只好乖乖就范。3月底，已向我投城的伪军李逢春，因受不了我军纪律的约束，又带一部分人改投了“铁磨头”。这样铁匪人马一下子发展到3000余。

1943年阴历四月，日寇拼凑了邯郸周围各县的5000余兵力，对永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当时，从一致对外、团结抗日角度出发，我方曾派人关照铁磨头，建议其化整为零。然而其对我一番好意却当作耳旁风，结果吃了大亏。

日伪军的“扫荡”从阴历四月初二制造何营惨案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五月十三日以后，日寇“扫荡”的圈子越缩越小。铁匪的3000多人，一下子被日军驱赶到小北汪村，被铁桶似的包围起来。这时，铁匪才感到情况有些不妙，欲退无路，只好命部下拼死挣扎。第一天，“铁磨头”的人依仗村内房头屋顶的制高点，给日军较大杀伤。第二天，日军调来炮兵，将小北汪村内屋脊全部打平，而后攻入村内。铁匪部死伤惨重。第三日，铁部所剩无几。我军为了打击日寇，即派分区基干团长黄承彦带2个中队，在

村东北部打击日军，接应出反正伪军及铁匪部四五百人。夜里，铁磨头趁黑冲击，踉踉跄跄跑到方头固村的大庙里，身边只剩六七十人。天明日军冲入小北旺，血洗了该村，又杀害无辜群众370多人。

五

1944年2月，经樊良才牵线，铁匪又到河南洛阳投靠了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亲自接见了铁匪，还让他参观了部分防区，以炫耀其实力。铁匪真是受宠若惊。之后，铁匪又在汤部国民党战干团受训半年。受训期间，铁匪学会了不少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手段。

1944年7月，受过专门训练的铁匪返回永年。不久，他即遵照国民党反动派的旨意，又一次公开投降了日寇。

为了反对共产党，对付抗日武装，铁匪首先着力拼凑反革命武装，强迫洺南各村青年当匪兵。不去的，他们就抓、捆；逃避的，就对家属又打又罚。马固村杨敬宗弟兄2人守着一个独生子，也被铁匪抓去。杨敬宗托人给许二官求情说："家里没有人干活了。"立即被罚款7万元，结果兵也当了，地也卖了，落得生活无着，流离失所。许庄穷苦农民许娣的，家无土地，以卖烧饼为生，听说要他当兵，逃到贾八汪村躲避，被抓回来毒打，许娣的的母亲上前拦护，也被吊在树上进行毒打。仅1944年12月的一天里，铁匪就在各村抓了四五百人，光方头固一村就抓了83人。这样，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铁匪就又拉起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并在许庄设立军训基地，分期分批训练土匪骨干，在三塔、许庄、讲武等10多个村修了炮楼，同时筑工事，挖寨沟，加强军事设施。

铁匪在拼凑武装的同时，还组织会门、成立会队，用特务手

段控制群众。铁匪拉拢大刀会和青红帮的头子，以此帮会为基础，成立了“佛善社”，威逼各村群众参加。他们挨门挨户登记造册，威胁群众说：“不入社，不受保护。”同时，把各村男丁，不论老少，一律组织起来成立大规模会队，作正式武装的补充力量。

铁匪还谣言惑众，大造反革命舆论，矛头直指共产党。他明令手下匪徒要“对所有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家属一律按敌人对待，或扣押、或枪杀；对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都打黑枪。”

鉴于此，我抗日政府决定对这个穷凶极恶的敌人严惩。1945年2月，冀南军区三分区下达了讨伐“铁磨头”的通令，通令指出：

1. 铁匪已经汉奸、特务化。

2. 公布铁匪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日的罪行。

3. 号召铁匪部改恶从善、弃暗投明，不要替敌人卖命。

4. 放下武器投靠人民的，不咎既往，立功者受奖。继续助纣为虐，决无好下场。

5. 号召全区人民，提高警惕，相机歼灭之。

《通令》发布后，铁匪的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獗。1945年4月，铁匪亲自带匪徒到东杨庄将共产党员刘文升、王胖的、任书勤3人枪杀。后来，铁匪部又残害了抗日干部、战士刘冀民，张振江等19人，并以私通八路的罪名，将胡小恩、党凤鸣等10余名无辜群众害死。其杀害抗日军民的手段极其残忍，除枪杀、活埋外，还用刀割、石头砸、杠子捶等法西斯手段。

1945年5月，日寇将铁匪部改编为“冀南靖安独立旅”，铁磨头本人为旅长。从此，铁匪把旅司令部设在了临洛关，在永年城内设办事处，与日寇的勾结更加紧密。

六

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意日法西斯败局已定，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在此形势下，蒋介石加紧了抢夺胜利果实的活动。同年7月中旬，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派军事专员吴涧溪等人带电台一部由西安到冀南活动。他们网罗当地的伪匪，对付共产党，抢夺抗日胜利果实。吴涧溪到永年活动时，还带来胡宗南给铁匪的委任状，委任铁磨头为“先遣军第一支队司令”。铁匪得了国民党的正式委任，更使出全身解数讨好主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投降。9月，铁匪在吴涧溪参预策划下，将他的全部土匪武装开进临洺关镇。他还联络南河县伪军刘国栋、成安县伪军薛风山、沙河县土匪齐马三和本县土匪石振江麇集洺关，共有三四千人。9月11日胡宗南又委任铁匪为临洺关守备司令。

铁匪精心对临洺关进行了军事部署：薛风山部守东门，刘国栋部守西门，石振江守北门，他的匪部守南门。随之，铁匪派人到伪匪郭化民的地盘，在日军留下的一军用仓库弄到大批武器弹药，使其火力装备大大加强。

1945年10月14日，太行军区部队在秦基伟司令员的率领下，继解放了沙河、褡裢、黄梁梦之后，又迅速包围了临洺关，司令部就设在离临洺关不远的河北铺村。攻击开始之前，我军为了争取铁匪等缴械投诚，先派胡维章（铁匪密友，当时已向我们投诚）进城做工作，并让铁匪看了朱总司令签署的让伪军投降改编的布告，铁匪拒不投降。同时，我们也派人秘密入城做其他匪首的工作。永年县委委员、城工部长王之光找到把守北门的石振江，劝其投降。石说：“我是想过去，可是老铁子不让！”经过王之光同志的争取教育，石振江表示攻城之时，不向八路军开枪，并将

王之光安全送出城外。

16 日，我军先将东、西门外的两个据点消灭掉；17 日，全面攻击开始；18 日，全镇解放。此战共毙伤伪匪军 300 余人，俘 3000 余人，其中包括日军小野等二人。只有铁匪带 100 余人逃出洺关，向永年城关奔命，沿途又遭到民兵的截击，待逃进永年城时，只剩下 22 人。

七

永年城是一座历史古城，青砖垒砌的城墙十分坚固。永年城又处在方圆 70 华里的永年洼之中，一遇水涝，此城便是一片汪洋中的小岛，水是它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

当“铁磨头”带着 22 个残匪逃往永年城时，此城已被伪军王泽 民部盘踞。王又收编了永年、鸡泽县伪军和伪警察、伪政府的警卫队等共计 2000 余人。王匪已于 1945 年 9 月 1 日封闭城门，限制出入。又于 9 月 11 日将下堤滏河闸门打开，并在裴屯村东大堤决口，放水淹灌了永年洼。

1945 年 9、10 两月，晋、冀、鲁、豫军民经过英勇战斗，从日伪军手中解放了 59 座县城，又取得上党、邯郸两大战役的胜利。到 10 月 18 日解放了临洺关之后，整个冀南区域内，只剩下永年城这座孤城尚为王泽民所盘踞。王泽民与铁匪原来芥蒂很深，如今同为穷途末路人，同病相怜，所以开门容纳了铁匪。

铁匪进城后，不住王泽民的司令部文庙，而是自带人马住在城东门，一是表示自成一统，不受收编；二是避免与王泽民见面。从此，铁王二匪一方面合力对付城外的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另一方面又勾心斗角，争相在城内外抓兵、抢粮、扩大实力。王匪利用查户口，抓城内青年 300 多人成立了“义勇队”。铁匪马上成立“军官教导队”，借口为国军招考军官，也在城内抓青年 300 余，

加上陆续逃回来的散匪旧部，他又很快组成了一支500多人的队伍。铁匪一进城，立刻派亲信张雨泉到北平设立“永年守军驻北平办事处”，向十一战区司令部与河北省国民党政府钻营行贿，乞求支援。王匪紧跟着四处派人到北平、新乡、郑州等地呼吁求援。

1945年12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收编了这两伙伪匪，任命王泽民为“河北省保安第一纵队少将司令”，许铁英（铁磨头）为“河北省保安第二纵队少将司令”。次年5月，国民党又派永年区指挥官钟玉林化妆潜入永年城，直接指挥二匪，进一步加强与永年伪匪的联系。

1946年4月开始，国共双方军调部驻安阳第十九小组到永年进行调处。谈判桌上，我方代表尖锐指出城内并非国军而是伪匪，国民党立刻调8架飞机，空投大批武器、军装、食物，表示对城内伪匪的承认和支持，向我军民示威。1946年1月到6月，我平汉支队与冀南军区一部曾两次攻打永年城，虽有局部胜利，终因城池坚固，我军准备不足，并缺少重武器，均未攻克。紧接着，由于全面内战爆发，蒋军以25个旅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我围城主力部队奉命南调，只留一部分部队负责围城。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是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也是永年军民围困永年城最艰苦阶段。这时，铁、王二匪以为时机已到，一面呼吁大名之敌向他们“固若金汤”的永年城靠拢，一面派大股武装出城骚扰，抢粮、抢菜、抓伕、抓兵，暗杀村干部和民兵，制造了一个个怵目惊心的大血案。

据不完全统计，铁匪在这一年之中，共捕杀我区、村级干部105人，制造血案几十起，并把四五百青年人抓进城内。如1946年7月8日，铁匪勾结被斗地主暗杀兴业村农会主任和书记2人。7月底派10余人到马到固杀害党员胡陈朋一家3口。9月24日，铁匪中队长郭凤林带50人到北沿村杀害干部家属17口。10月20日，铁匪队长康思保带100人偷袭我辛庄堡派出所。10月底，潜

伏在城外的铁匪便衣队到铁路西段庄搞暗杀，被村内民兵韩用心发现，土匪开枪，打伤韩的手臂。11月初，铁匪部在南汪村枪杀我区干部3人。11月中旬，把马到固农会主任张兆根弄到护城河里冻死。11月底，到刘营袭击区干部，把范井春同志抓到城内，残害至死。1947年1月20日，铁匪即到魏家庄，杀害农会主任刘文相、民兵队长刘保的等6人。1月12日，铁匪部牛云山到固村杀干部范和的、军属程高等14口。2月16日晚，铁匪暗杀组长孙小更等窜到后六星将村干部游凤台、董清江、张成印、马考的等投入村外井内。3月，铁匪派人到何营捕我区干部王军等4人，把王军拖入永年城东门外水中淹死。仅此，就可看到铁匪手上沾满了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鲜血。

八

1947年春节以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被我粉碎，敌军被迫放弃大名向南撤去。至此，永年的紧张局势才告缓解。城内顽匪看到与大名国军会师已成泡影，嚣张气焰顿时大减。国民党反动派转入重点进攻以后，永年据点在国民党军眼里就大大贬值落价了。从4月初停止了18天的空投，城内顿时大乱。城里再也抢不到一粒粮食，竟争抢着把酱菜园的酱菜、中药铺的中草药一扫而光，接着把树皮、树叶吃光剥净，甚至到了吃水草、吃死人的地步。疾病流行，饿馁遍街满巷。

5月，我冀南军分区司令员王光华主持召开了借马桩会议，提出了“困死敌人在城内，消灭敌人在城外”的作战方针，并调集部队，加强了对永年城的围困。同时，我县政府又布告除奸反特，采取严厉政策打击潜藏在解放区内部的敌人。

铁、王二匪狗急跳墙，曾组织了一些人冒死出城抢粮，被我部队拦在城外的陈义村，消灭并俘虏大半。铁匪又组织“四人小

组”到城外筹粮，全被捕获。9月11日，国民党对王匪铁匪的空投完全断绝，并电告他们在9月15日以前向安阳突围。至此，敌城已山穷水尽，敌内部开始分崩离析。铁匪部二连长李青春提着一篮子弹到东关城外，向围城部队换东西吃，并说给一二十斤小米我就投降。围城的崔连长给了他30斤小米、20斤馒头。回去后，李青春去见铁匪，连说话边掏枪行刺铁匪，未成，李被扭着活活打死。王匪的亲信连长胡玉申在10月3日带160多人跑出城外，涉水向我投诚。之后，便有不少土匪想法摆脱控制跑到城外投降。铁王二匪看到此城已不攻自破了，只好放弃盘踞了2年又50天的永年城，向外逃跑。3日晚，二匪先派人出城诈降，麻痹我们。其实城内敌军已挑选了精壮骨干准备掩护他们逃跑。4日夜间，敌人窜出城门，仓惶出逃。在我军密集火力打击下，大部死伤或被俘。只有铁、王匪带200余人向安阳方向逃去。

5日拂晓，铁、王匪众逃到邯郸县东扶仁村，铁匪到村后的庙里祷告许愿一番。7时许来到贾村，把村内在押的10几个被斗地主放了出来，大肆抢掠了村民的衣服食物。到晚上，他们在村里抓了8名群众，抢了6头牲口，又向南逃去。6日凌晨来到成安县吕庄村。吕庄村北的沙丘上有邯郸战役留下的旧工事，铁匪占据了工事以后，派人到吕庄村内搞吃的。进村的土匪诡称是解放军，又做贼心虚地下了民兵的枪，被民兵识破，很快想办法通知我军包围了吕庄，组织了一场围歼战。时近中午，战斗结束，共击毙铁、王二匪以下70多名，其余均被俘获，无一漏网。

罪行累累的大土匪铁磨头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河北省邯郸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乱世顽匪宋殿元

政　文

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在那暗无天日的旧中国，在那外夷入侵的年代里，曾经出现过多少揭竿而起的英雄豪杰，他们毁家纾难，劫富济贫，舍身忘死，杀敌保国，推动了历史车轮前进。但是，也是在那样的年代里，黑白颠倒，良莠并生，一些地痞、流氓、赌徒、恶棍，"二狗油"、"小爬虫"，竟然也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磕头拜把，拉帮结伙，明刁暗抢，胡作非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成了祸国殃民的乱世蛆虫、中华民族的败类。曾经被国民党委任以团长头衔的、名噪一时的土匪头目宋殿元便是其中的一个。

要说宋殿元，恐怕鲜为人知；但要提起"小五点"，察北坝上一带的人民近乎家喻户晓。其实，"小五点"也并非生有"三头六臂"。他身高不满5尺，其貌不扬，胸无点墨，目不识丁，文不能看书写字，武不会打仗用兵，他曾带领的人马，少则一二十个亡命之徒，多则二三百名乌合之众。这个兵匪竿头子对察北、察盟一带的人民祸害至极，老百姓对他深恶痛绝。

赌徒无赖　兵痞匪首

宋殿元，乳名"五套子"，绰号"小五点"。原籍河北省崇礼县忽出太村，民国3年（1914年）出生于张北县疙瘩素村，后迁

居张北土木营子、康保新庙子、张油坊、麻尼图村。兄弟姐妹9人，宋殿元行五，其长兄“大套子”28岁因病死亡；次兄宋殿臣，乳名“二套子”，从小在康保县麻尼图务农，1947年当康保县通顺乡乡长，1951年镇反被捕后病死于康保监狱；三兄“三套子”20岁时病亡；四兄宋殿明，乳名“四套子”，日伪时当察盟直辖警察队警长，1951年被镇压；六弟宋殿林，乳名“老套子”，1945年跟随曹凯部队到绥西，1946年逃回来时中途被打死；其3个姐姐均嫁到外县。

宋殿元出生于贫困农家，其父宋荣，其母姚氏，一惯以农为业。宋殿元从小受父母兄姐娇惯溺爱，不受约束，放荡成性，打架、骂人、偷鸡、摸狗当做本事，10多岁便染上赌博恶习，经常偷拿家中物品变卖赌钱，而且十分无赖，输打赢要，家中无人能管教。其父没法，就将他送到张油坊给地主张秉忠当小长工。后又在红围子给王奉钧（王二毛）放马，因赌博输掉了全家的口粮，被他父亲撵出家门，便跟随王奉钧当了兵。王奉钧部被改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宋不甘吃苦，逃跑回家。回家后仍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终日以赌为业。

1941年，宋到华山给日本人做劳工，挖山洞时挖出了枪，“大精字”（当年土匪用“字”而不报名）带着他们70来人拉了出来，跑到张北县，每人又搞到一匹日本人的马，当起了土匪。没多久，宋殿元投到东地竿子“林”字部下。“林”字被打死后，他自己带了20多人拉起了杆子，在宝昌、张北、化德、崇礼、康保等县窜扰抢劫。

宋殿元从小没念过书，说话办事粗野鄙俗，害人手段却独出心裁，吊打、用马鞭抽、用火铲烫，拿绳子勒，用开水浇，拿子弹头刮，刑法多种多样。绑票请财神，先派出暗线打听，和谁家要东西不给拿出来是决不罢休的。平日里，每到一村，总是要枪、要马、要大烟、碰上就抢，不给就打；有值钱的 抢值钱的，没值

钱的，见什么拿什么，拉牛、赶羊、抓鸡、捉鸭，就是破皮袄也得拿上你几件。抢来的东西，除了自己用外，其余的交给“背手”（专门给土匪背东西的人）变卖成钱，买房、买地、买牛羊。解放初期，康保县还有宋殿元的70多只羊，5头牛，1头骡子，1匹马，1辆皮车和不少土地，在张家口上堡还有他的13间房。

宋殿元有三大嗜好：抽烟、打牌，玩女人。他每月要耗用大烟100来两（折合7市斤）。他的女人是娶得他老姨的女儿，以后又先后霸占了3个女人。1944年春节前，到康保五福堂乔风祥家，看中了乔风祥的后儿“二铁匠”的女人，硬抢上做了他的二女人；第三个女人是驮的阎油坊王大所的儿媳妇；第四个是他当日军警察副中队长时从张北大囫囵强娶的一个姑娘。

宋殿元奸淫成性，凡被他看上的女人决不放过。1942年7月25日上午，宋带领六七个匪徒，在白旗一带抢劫后，窜到康保范家营村，要草料、要大烟，在村中祸害了一天，临走时还要把村民范有的二儿媳绑在马上驮走。范有哭喊着，拽住宋殿元的马缰，抱住宋殿元的腿死活不放。宋殿元火了，横眉怒目地骂道：“你个老小子，敢拉五爷的马头，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说着冲手下人使个眼色。他手下一个叫小张有子的匪徒，掏出手枪朝老汉右腿就是一枪，把范有的右小腿骨打断。正在这时，蒙古队从白旗赶下来追剿宋殿元，宋见情况不妙，仓皇逃跑，范有的儿媳才没被驮走。

1944年11月，他带领匪徒到了满德堂村，见到一个妇女有几分姿色，便让手下人给他拉到马家房中强奸一夜。第二天仍不甘心，硬让这个有夫之妇和他拜天地，差点将这个女人逼死，村人再三求情，这才作罢。有时，他的拜把弟兄们也觉得他做得有些过分，劝他适可而止，宋听了后，竟不知羞耻地哈哈大笑，据他自己交代，他强奸妇女约有300多人，其中闺女就有120多人。

制造惨案　草菅人命

1942年，察哈尔盟公署任命曹凯为警正，扩充地方武装。宋殿元与曹凯在张北曾同村居住，素有来往，曹凯便将宋殿元匪部收回，改编为一个中队，宋任中队长（警佐），驻扎在张北二台。

1943年，宋殿元与曹凯被日军改编为察哈尔盟直辖警察队，宋殿元仍担任中队长。从此，这个“有奶就是娘”的兵匪草头王，便积极为日军效劳，多次带兵围剿我崇礼县抗日根据地，杀害我村干部和革命群众。1945年7月在崇礼县庄地村杀死会民李文，在巴图营杀死村民张三，在张北工会一带还杀死4名无辜老乡。

在此期间，宋殿元曾和曹凯闹崩，又带了他的人马拉了3个月的杆子。投降日军以后，仍然经常带人出来抢劫。

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殿元就随曹凯部队到绥远武川县境，投到国民党十二战区，在骑五旅当排长。同年8月，他持有国民党委任他骑兵暂编团长的委任状，带领20余人来到康保县境，招兵买马，收罗了康保县的警察乡兵200余人，宋殿元为团长，王玉成任团副，周志胜、卢巨恺、郭士杰、柳士林为连长。宋殿元带着这伙人在康保县周围窜扰，伺机袭击我区村政权，杀害我方干部和工作人员，妄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9月14日，他们在张油坊住宿时，抓住了曾当过伪警察的我丹清河区工作员张云涛，第二（旧历八月初十）驻在离丹清河区不远的武大郎村。我丹清河区政府发觉后，便向武大郎村鸣枪，宋殿元依仗人多，立即下令向丹清河围攻。那时，丹清河区政府刚刚建立，人员不多，寡不敌众，只得边打边撤。撤退时，我区长李明，区小队长张玉林，战士米文生不幸被俘。饭后，宋殿元命令他的副官高宗义将李明、张玉林、米文生和张云涛处死。当时，宋的部下有和张云涛一起当过伪警察的为张求情，宋一概不容，4人即被同时杀害。惨案发生

后，宋害怕我县大队前来围剿，即刻撤离丹清河，向北逃窜。9月24日，宋匪到了六区郝家营村住宿，将郝家营村的牛、羊、骡、马洗劫一空，值钱的东西全部抢光，受害者达40余户。之后便带领他的队伍开回绥远。是年底，宋殿元的连长卢巨恺、郭士杰、柳士林等带领200余人窜到化德县骚扰，在阿恼山被我军包围全歼，卢巨恺、郭士杰、柳士林被活捉后镇压。

1946年3月，宋殿元跟随国民党二战区中将司令（号称长城防共自卫军）张甲清（张承德之子）来到坝上，在镶黄旗收集了袁焕、李文斌、岳凤鸣等土匪队伍300余人，到处残杀我革命干部和群众，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这伙匪军在康保县阎油坊王家营住宿时，被我骑二团发觉后立即追击，一直追到康保与宝昌边界处的尖尖山上，将张甲清击毙，余匪全部溃散。宋殿元也逃回崇礼县老家隐藏起来。

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宋殿元觉得有机可乘，从崇礼县收罗了10余名土匪来到康保，又收集了孙占山、岳凤鸣、刘启金、李金贵、贾增贵等匪军200余人，猖狂向我解放区反扑，反动气焰极其嚣张。10月7日，宋带人窜到离康保县城8里的赵家营村，抓住了县城的居民于尚有，将于捆绑吊打了一天一夜，硬逼问八路军的情况，离村时还抢走了6匹马、4头牛、皮袄、棉衣等物品。10月12日晚，宋匪200余人住在了三义公司区政府附近的碌碡洼村，阴谋袭击我三义公司区政府。翌晨，宋殿元派人向三义公司区政府做假报告，佯说“刘二营子村住有五六个土匪，共三四支枪，子弹也不多，马也不好”，将我武工队诱去。其中一路发现情况较早，很快撤离未受损失；另一路30多人被宋匪200余人追击，我宣传部长晋拓东等19名同志被包围在刘二营村，虽经顽强战斗，终因力量悬殊，除一名同志幸存外，晋拓东等18名同志全部惨遭宋匪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刘二营惨案”。

1946 年 11 月，我军战略转移，暂时撤出了康保县城。曹凯和宋殿元的队伍驻进了康保县城。曹凯任国民党骑二纵队纵队长，下属 6 个连，宋殿元是第一连连长，一进城宋便连夜带人挨门挨户查户口，追问谁是八路，谁家是八路军家属，对我八路军家属和区村干部用惨无人道的手段进行屠杀镇压。南关村村长王纪贤被他抓住杀害；我户籍警宋元的父、母亲被他抓住吊起来严刑拷打；农会主任周忠的父亲被他毒打后扔到了水洞里；北关村抗属丁成林，被宋的部下痛打一顿后，将 1000 多斤白面、十五六担莜麦、2 两烟土和新旧衣服及家中一切财产全部抢光；曾给我公安局放马的于二小，被宋殿元抓去，硬和他要马，并用细麻绳拴住于二小的小腹将其活活吊死；我保平村一干部，被宋抓住后吊起来，用烧红的烙铁烙的全身流油，最后被宋用刺刀挑死。城里一家姓王的地主，向宋殿元告发南关赵氏兄弟曾分过他家的东西，宋殿元一听，即刻火冒三丈，恶狠狠地说："限他三天交齐，交不出来，拉出去挣了折口子（指用绳子勒死）！"赵氏兄弟 3 人被绑了 3 天，家人四处奔波筹划，将钱如数交齐并求人说情才免于一死。据不完全统计，仅 1940 年被宋殿元亲自杀死的我干部群众就有 100 人之多，被他打伤、烫伤致残者不计其数。

宋殿元的土匪队伍驻在县城，几百人的消费全由民间摊派，谁要一时拿不出来，便遭一顿毒打。宋殿元本人是三句话不到，先给你两嘴巴，稍有不满，朝屁股就是两马靴。一次，宋到农民张德家要官粮，张德一时无车拉不去，宋匪便说他有意抗粮，立即把张德捆起来、脱光衣服，烧了开水就往身上浇，把张德烫的满身燎泡，疼的死去活来，家人左说右说一个劲地求饶，答应立即找车送去，才算了事。东关开面铺的宋贵，宋殿元给他摊派了 500 斤莜面让他当日交去，宋贵一时凑不齐，便被抓起，定了个抗粮不交的死罪，经多方求人说合，把面交上，才放了人。宋殿元的匪军在康保驻了 2 年多，康保人民被压迫、残害得苦不堪言。

1947年1月，我军攻打康保城，宋殿元带领匪军守东门，我攻城部队20余人牺牲于宋匪的枪下。

1948年5月，宋殿元和曹凯不和，曹凯被编到骑五旅，离开了康保。康保成立了保警团，宋殿元先后担任了连长、营长职务。在此期间，宋殿元整天横行于康保街头，走东家，窜西家，抽烟、打牌、嫖女人，明刁、暗抢、捞外块，还和他人合资开饭馆，干尽了偷鸡摸狗的营生。

怙恶不悛　可耻下场

1948年12月，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宋殿元见大势已去，随曹凯一同撤到绥远，在十二旅当连长。1949年9月，绥远和平解放后，宋殿元在我军中受训3个月。当时，鄂有山嫌他过分无赖，不收留他，他也自知罪恶深重，便脱离了部队，住在绥远市通道街和他人一块开“永成店”。然而，宋恶性不改，继续为非作歹，1950年5月又伙同牛富仁等11人抢劫我军用物资，被打散后，宋殿元便逃往包头市，改名王贵，在西脑包四十号大店隐藏起来。

1951年4月，我察哈尔省公安处侦察到宋殿元的下落，公安人员即刻前往包头抓捕他。当40号大店的店掌柜带领公安人员将店院内的一间草屋围住时，宋正在屋里和他四女人及两个小孩说话，觉察到有人来抓他，“腾”地一下跳起来，装腔作势地喊他老婆：“快拿我的枪来！”（其实他屋内根本没枪）我公安人员见他如此顽固，便朝屋内打了一梭子子弹，喊话让他出来，可他就是不肯出来。为了不伤他的女人和孩子，就让店掌柜进屋去将他抱住抓获，4月底押解回康保县枪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公判会上，受害者字字血、声声泪控诉了宋殿元的深重罪恶，广大群众一致赞颂共产党为老百姓除了一大害。

（河北省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匪首宗孝罪恶录

李继文

宗孝，绰号宗秃子。生于1898年，原籍蔚县辛孟庄村人。本姓金，独子，3岁前其父母去世，由其外祖母抚养，后给其姨夫宗老胜（暖泉镇北关堡人，地主，外号宗白花）做养子，改姓宗，取名孝。

无赖、流氓、土匪的一生

宗孝的养父宗老胜不务正业，终日赌博，其妻是个装神弄鬼唱大仙的巫婆。宗孝在其家庭熏陶下，从小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终日混迹于街头，经常到暖泉镇南面的水磨房要米要面，有时在宝棚里当小跑，向这个讨两枚铜钱，向那个要支烟抽，干些偷鸡摸狗的事。还经常跟曲头一起在缸房里踩曲，整天骂天扯地，学做无赖。一次其养父让其打水，他不愿去，被其养父将开水烧在他头上，烫掉了头发，从此得了“宗秃子”绰号。随着年龄的增长，宗孝长成身材不足5尺的矬胖子，猪肚子脸、浅麻子。后来在北京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回来后成为一个大流氓，整日跟戏班、看媳妇、开场窝赌。29岁时，宗孝投奔阎锡山晋军十四师，在师部便衣别动队任班长、分队长等职。穿一身黑衣服，在街上胡作非为，晋军退却后他在暖泉聚众赌博、欺男霸女、骚扰百姓无恶不作，是“嘎杂子、地头蛇”。36岁时在特务张

宝真手下当了打手。

七·七事变前，暖泉镇的豪绅、恶霸地主张宝真，为了巩固其统治势力，欺压人民群众和宗孝结为狐朋狗友，在当地组织了一批流氓匪徒成立了“保商团”。名为保护暖泉各商业买卖，实为搜刮民财，敲诈勒索。后人员逐步扩充，成了抢劫人民群众的土匪，到处抢掠财物，奸淫妇女。事变后日寇侵占了蔚县，张宝真、宗秃子这伙土匪上了西北山。平型关大捷后，日寇撤离蔚县，宗孝又带“保商团”回到暖泉。此时，正逢我老三团组织抗日救国会，进行扩军。反动头子张宝真为了蒙蔽群众，也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并窃取了游击队指导员职务。宗孝也随同张宝真混入革命队伍，当了队长。他们暗地散布谣言，说日本鬼子还要来，八路军呆不长，企图破坏瓦解我抗日工作。我救国会指导员赖富发觉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以张宝真的名义解除了宗孝的武装。事后，宗逃回北山，张宝真被我逮捕。

宗孝逃回北山后，贼心不死，继续收罗地痞流氓、匪徒，扩大到400余人。1937年11月间，日寇二次侵占蔚县，我军撤退到南山。这时，宗孝即投靠了日寇，将“保商团”改为“自卫团”，自己当上了团长，除在暖泉设中心据点外，还在下宫村、西庄头、五岔、浮图村、鹿骨等地设了据点。日寇送给他一身军衣，一把战刀。宗跟随日寇抓捕我八路军的干部，杀害我无辜群众。由于他忠心为敌效劳，取得了日寇的信任，不断获得枪支、弹药、马匹，使其匪群又扩大到700余人，盘据在东至蔚县城，西至广灵，南至西庄头，北至鹿骨、五岔这一方圆50余里的地区，祸害群众，搜捕我干部，破坏抗日工作。

1942年，宗孝又组织了“下夜 团”。1944年3月搜罗训练了各村青年120多名，组织了“青年团”。1945年春强派群众50多人，成立了“防共团”。与此同时，又召来了“中央道”（九宫道）、佛教会的道首，利用道会门收罗一些反动分子和无知群众

180多名，组织了“大刀会”，使用的武器为鬼头刀。又向各村派要青年100多人，组织了“神兵——大刀队”，使用的武器为东洋刀，挂起了“八卦旗”，编为8个班，每天洗澡、喝符、排刀、复身，进行反动训练和“刀枪不入”的反动宣传。我军解放暖泉时，该会曾武装抵抗，垂死挣扎。

1945年解放前夕，宗孝听到消息，见势不好，便带着1000多人（其中包括佛教会300余人）跑到蔚县城。县城解放时，他挖穿城墙拉出一部分人逃回北山。同年腊月，被我军围歼，宗孝本人逃到孟家堡梁某（与宗孝是磕头弟兄）家中窝藏，后梁给他拿一捆麻做路费，使其逃到北平。在平时，宗孝与广灵县匪首彭国璋在“难民所”成立了“还乡团”。1946年我军撤退后，他回到暖泉又拼凑网罗400余人，在西庄头、五岔、浮图等地设了据点，到处纠集收罗地主、地痞、溃兵壮大自己的势力。不久又被国民党改编为保安大队，驻守蔚县城。1947年末，宗孝因与伪县长闹矛盾，又将人马拉到张家口，投奔傅作义的部下，后被分派驻宣化深井、阳原化稍营一带。1948年2月，我军二次解放蔚县时，他在深井、化稍营一带自称代理蔚县县长。4月间，他带匪徒若干人来到蔚县城，接走了他的大老婆，并打死我区干部邹九昇。1948年我军解放张家口后，宗孝漏网潜逃。1949年在下花园被抓获归案，在张家口被我处决。

抢男霸女，鱼肉乡民的大恶霸

宗孝在暖泉逞凶之时，常坐于街头，穿衣不整，冬戴毡帽，夏系毛巾，有时穿军服。白天大街上吃饸饹，粉饦，晚上跟戏班，看媳妇，耍钱压宝。就是这样一个生活无常态的家伙，却是这一带百姓头上的“太上皇”。

他靠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在暖泉置土地460亩，房院8处，在

广灵、暖泉开缸房 4 处，饼铺 3 处，客货店、帽铺、肉房、皮房、油房、饭馆等 6、7 处，还有宝店、剧院。他除出租土地外，还雇了长工 40 多人，家中有轿车 1 辆，铁车 4 辆，骡马数头。他的缸房、店铺雇佣工人 150 余人，宝店里还雇有看宝的、数钱的、做饭的 20 余人。宗孝利用这些大肆盘剥群众，鱼肉乡民，使许多人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宗孝过的是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仅老婆就有 5 个，都不是明媒正娶，而是抢霸来的。其大老婆王子英，小名桃子，绰号金葡萄（暖泉北关堡人），17 岁嫁给西焦山一个姓王的，后离婚，18 岁嫁给北关堡一个姓阎的。在此期间，宗孝每天夜里到阎家房上打枪，半夜让金葡萄为其做饭，缝针线，硬要金葡萄做他的老婆。当时王子英 20 岁，而宗孝比她父还大几岁。其五老婆绰号“一根杆”（蔚县城人），是宗孝赌钱赢来的。

宗孝养狗 100 多条，养猫 30 多只。他手下的打手和狐朋狗友 100 多人。这些人狗仗人势，欺压百姓，终日游手好闲，夏天玩百灵、冬天耍鹰。宗孝的狗咬了人，人们都不敢吭一声。宗的部下都不发饷，全靠要钱、诓骗、抢劫度日。因而，这一带百姓民不聊生、处于黑暗的牢笼之中。

日寇蒋匪的帮凶，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宗孝一生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死心塌地地做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走狗，顽固地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残害我党干部和无辜百姓，是地地道道的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1940 年 9 月初的一个清晨，宗孝的匪徒 800 余人和日军 30 多人，在特务陈守营（歇心庵的一个无赖）的带领下，包围了广灵县抗日政府所在地歇心庵村的北、西、南三面，只有东面是崖头深沟没有包围。当我干部和群众发觉后，在县长任山、公安科长丁石等

同志带领下，大部分从东面撤走。在撤退中，银行干部张文里、村青救会主任平启被打死。群众在逃跑中跳崖摔死了平秀和王焕武的母亲。敌人进村后，先抢了广灵贸易局，把火柴全部烧了，把棉花、布匹、纸张、皮袄、帽子等驮走5驮，10多头驴、3头骡子也抢走了。还将老百姓的被子、土布、衣服等抢走了许多。

同年11月间，宗匪和日军500余人，在陈守营的带领下，又一次包围了敬心庵。当时，县政府已撤到离村五里地的花椒沟里。敌人进村后，见群众大部撤走，便放火把全村500余间房子烧了多半，把上了场的庄稼全部烧光。后又向臭水盆村流窜，把沿路20余里的庄稼亦烧光。

1945年旧历腊月十五夜，宗孝趁我当地驻军不多之机，带领匪徒200多人，从北山返回暖泉，声言要"血洗暖泉"。他将匪徒分成三人一组，在暖泉镇到处搜捕我方干部和群众。一夜之间，即抓捕了我区村干部、群众、解放军战士32名，将这些人捆到暖泉朝阳楼饭铺，一个个严刑吊打，将我积极分子姚文玉的右耳朵割掉，两次到姚家抢走自行车和衣物，强奸了姚文玉的妻子刘凤英。把村干部郝福生、谢祥捆到凉亭东龙口的大树上，寒冬腊月脱光衣服，毒打火烧。宗孝的妻弟王贵德在抓捕我北关堡农会主任刘进德扑空后，又带上土匪20余人到邻居张如林院里寻找，将张妻宗万金的胳膊打断。匪徒们揭开一个用柴草盖着的窖子，听到窖内有婴儿哭声，即投入一枚手榴弹，将隐藏在窖内的刘进德之妻刘马氏和其刚出生三天的男孩炸死。我一名回家探亲的解放军战士也遭抓捕。临走杀死了朝阳楼开饭铺的，把其他被抓捕的干部、群众带到石板沟杀害了，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石板沟惨案"。我区干部赵培兴、村干部张树柏、张彦美、姚文玉，干部家属姚老品、刘马氏和其三天的小孩以及群众张佃银、刘义等32人惨死在这帮匪徒之手。

1948年8月17日夜，宗孝带领匪徒突然包围了阳原石匣村，企图袭击我区小队，杀害村干部。但由于区小队已经转移，宗在抢

了东西后，把搜捕到的100多无辜群众集中在秦家大院，由宗亲自一个个审问："谁是八路军，谁是区干部？谁是共产党员？"群众早就对这伙匪徒恨之入骨，谁也不理他。村粮秣干部赵仆、武委会指导员李天科、民兵队长赵绥、青年小队长李士秀，在残暴的敌人面前，不忍让老百姓受苦，都挺身而出说："我们是村干部，你们不要打那些老乡们！"宗孝将4人抓起来严刑拷打，逼问区干部是谁？区小队在哪里活动？粮食放在哪里？4个同志异口同声回答："不知道！"宗秃子将4人打的死去活来，遍体鳞伤。

居民李效品刚卖了一头骡子，换了几匹小土布，匪徒硬说是给八路军存放的，就把东西抢走了。张有忠家有白市布3丈多，宗硬说他是八路军的采买员，把他拉出去打了一顿，把布抢走。

宗匪在石匣村抢了一天，带着抢获的东西和4名村干部走了。到了蒋家梁，干部群众已把粮食、衣物转移到山沟里，匪徒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就把老百姓做饭的锅全部砸碎。

赵仆等4位干部因伤势严重，寸步难行，匪徒们竟用绳子拴了他们拉着走。到深井后，宗孝直接把4人送往张家口伪保安司令部，过堂审讯后关进监狱。不几天民兵大队长赵绥便被折磨死了。48天后赵仆等3人又被送往北平国民党的监狱，直到北平和平解放时，才获释放。

匪首宗孝奸诡狡猾，对他的部下也是心狠手毒。他的团副王仪，北关堡人，有个绰号叫"小老鸦"的老婆，能骑善射，很有名气。宗孝对其十分忌恨，一天他以王仪要拉走队伍之名，带一帮人马，乘王仪在药铺打牌不备之机开枪将其打死，而后又打死了"小老鸦"。一天一个士兵偷了他点盐吃，被他抓住捆到树上，用刺刀活活扎死。

匪首宗孝一生中干尽了杀人、放火、抢劫之事，罄竹难书，其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实乃一死有余辜的历史罪人。

（河北省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罪恶累累的土匪头子王二美

宋克明　翟永宽

王二美，原名王久田，又名王水泉，小名黑子，1900年生人，1969年被枪毙时年70岁，是张家口地区有名的土匪头子。

土匪出身

王二美，自幼游手好闲，不务正业。1927年随其兄王大美（匪首）聚集匪徒60余人上山为匪，在河北省阳原、涞源、蔚县、宣化、怀安和山西省天镇、广灵、浑源等地抢劫、绑票、杀人，无恶不作。1932年其兄王大美在阳原被国民党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下刘振山打死，王二美遂接收其兄的土匪班底继续为匪。其罪恶多端，笔难尽述。如绑蔚县李林庄范水、涞源县刘庄邢巨、阳原县西六马坊牛聋子等人的票时，有的即索要现大洋1万元，如不给就非刑拷打，用香火烧割耳朵等，把人打得死去活来，直到答应给钱为止。1934年阴历正月二十日夜间，王二美带了28个匪徒去阳原县下卜庄和曹村绑票，共绑7人。在下卜庄把李生美、李生茂、李生枝（叔伯弟兄3人）和李永旺（李生茂的侄子）绑走。还把该村李存宝家的牲畜骡子、毛驴抢走。将李生美叔侄4人绑到阳原县要家庄村向他们每人要大洋1000元，因当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就吊起来，严刑酷打，打昏过去放下来，苏醒过来再打，有时还用香头、棉花、麻油烧等酷刑。为尽快把大洋弄到手，竟把

李生美叔侄4人的耳朵割掉，用信袋装好寄回李生美叔侄家中。家里的亲人一看耳朵匪徒被割掉，吓得赶快出卖土地、粮食、衣物、牲畜等，最后将全部家产卖光，才凑足了1800元现大洋给王匪送去，把人赎回。阳原一带的村庄为了免遭涂炭，每年都要集凑大烟土几百两给其送去。

王匪心毒手狠，杀人不眨眼。因与阳原要家庄王志仁的女婿（其名不详，是个土匪头子）有私怨，在1936年的一天把王志仁夫妇二人杀害。王匪过去与阳原县苇子水村村长李献有私仇，为了报复，泄私愤，于1934年率匪徒赵河、焦志忠、赵友等，把李献杀害。对其手下的匪徒也是丝毫无情，随意处死。如土匪时二拐子（阳原县井儿沟人）因所谓不听他的话即被打死。

在1937年以前，王二美这股土匪，曾3次被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保安队所打散，王匪被活捉，并被收编，但他匪性难改，跑了后，又继续为匪。

兵匪一家

1937年1月，王二美带土匪去阳原县康石庄绑票时，被国民党二十九军胡道成部打散逃跑，王在逃跑中被抓获，后被国民党任命为察省保安司令部大队长和骑兵营长。1938年9月，王匪又拉走队伍300余人继续流窜为匪。随后，又被国民党察哈尔主席刘汝明和挺进军军长张砺生部收编，并任连、营长和察省挺进军骑兵团上校团长等职。1944年6月加入了国民党，1946年又到傅作义部任阳原县保安团长，后改编为察省保安第八游剿团长。王二美被国民党收编以后，与其主子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其土匪本性丝毫未变，仍继续烧杀抢掠，残害群众。尤其在当游剿团长时，曾在宣化、阳原、怀安等地指挥地方保安队到处扫荡，搜集我军情报，瓦解我革命组织，大肆抓捕我县、区、村干部，杀害

我干部、民兵达 40 余人。

（一）1948 年旧历五月二十一日，王匪带领匪队包围阳原县小西庄村时，将我千家营村民兵杨采林抓捕后残杀。

（二）1948 年旧历七月十九日夜间，王匪带匪徒到阳原县骚扰，当路经宣化县南口村时，王二美派蔡润（后被判刑）、陈作林（已镇压）等人冒充我工作人员首先进村，骗得村干部的信任后，当晚即抓捕我南口村长王恒、农会主任常发美、民兵队长张贵智、区小队战士王士元、教育委员张廷绪、村副刘进德、农民郝进德、郭仲元、吴振英等 9 人，于次日带到九沟村，酷刑拷打后，将王恒、王士元、常发美、张贵智、郝进德等 5 人残杀在九沟村西沟内。

（三）1948 年 7 月 21 日，国民党县长李阴溪和王匪带领部队到阳原县三马坊村，抓捕我地下工作人员曹志明。王匪亲自审讯，追问曹与解放军联系情况。曹志明看到此种情况，便机智地把信件放在嘴里吃掉。王匪气急败坏地嚷："这小子是解放军的探子，把解放军的证件都咬着吃了。"嚷完便将曹志明捆起吊在树上狠打。打到半死时，又拉到三马坊村南场内，用刺刀挑死，又用石头将曹志明的头颅砸碎。同日又抓捕三马坊村长孙成礼和二马坊村长唐义，经王匪和县长李阴溪决定，于 22 日早晨将孙唐二人枪杀于二马坊村西。

（四）1948 年 7 月 25 日，王匪伙同县长李阴溪率匪队在阳原县西城镇，将西城九街干部李瑞，东门外街干部赵启金抓捕，一同 枪杀在西城北关外。

（五）1948 年 7 月 27 日，王匪和县长李阴溪带队窜到阳原县要家庄村，将我在村里宣传农业税的区村干部刘应州、池云、李梅三人抓捕，带到怀安县西韩家屯，由王匪决定把刘应州、池云二同志残杀在该村。另外，还将在阳原县西城抓捕的干部李祥也给活埋在西韩家屯村。

（六）1948年9月，王匪伙同蔚县宗孝（绰号宗秃子，蔚县土匪头子，被国民党收编后作察省游剿第七团长）率匪徒攻打宣化县样田庄，妄图摧垮我民兵组织。经我民兵组织英勇抵抗。当场打死匪兵两名，王匪阴谋未逞被迫撤退。但王匪并不死心，于同年旧历十月三日又伙同蔚县察省游剿第七团长宗秃子纠集匪徒300余人，包围样田庄，我村干部、民兵因寡不敌众，一直战斗到弹药殆尽，村庄被匪徒占领，全村被匪徒杀害27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洗样田庄惨案。

综上所述，可知王匪实属罪大恶极。象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本应早日受到人民的惩处，但在全国解放前夕，乘国民党军队溃退之时，王匪于1948年11月潜逃北平。

潜逃隐匿

北平解放前夕，王二美潜逃到北平，后因生活困难，又逃回张家口市，1949年旧历五月十八日被张家口公安局扣押。当时因我公安人员对其审查不严，将其释放。王又潜回北平，然后去内蒙古集宁市（住集市南马桥24号）隐藏。因那里有他的3间房子，王匪靠出租收费和变卖家俱维持生活。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怕暴露身份，同时又听他同乡阳原县乱沟子村的张存仁（此人也在集宁住家）说："咱家乡有个叫田雨的人来调查过你的事。"他听后心中十分恐慌，断定此处不能久留，便逃往他方。

王二美离开集宁市以后去了内蒙古狼山县和陕坝等地隐匿。1951年又逃到包头察汉伊犁根（离包头40里）。此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是个很偏僻的地方。他来这里后改名为王水泉，假报是集宁人。在这里呆有半年，同年8月又逃往包头郊区赵家店村潜伏。在这里假报是兴和县大井子人，并散布谎言说他是穷小子出身，父母早亡，既无兄弟姊妹和亲朋好友，也无妻子儿女，从小

给人放牛羊，讨吃要饭。就这样，这个狡猾阴险，诡计多端的家伙，一直在这里隐匿了15年。

王匪善于伪装，十分狡猾。他在赵家店生产队隐匿时表面上伪装得十分老实，对人也很殷勤。他一来就住在了村干部赵山家中，当时还实行单干，他经常给赵山锄地、放羊、干杂活，每天下地回来还要到二里以外去担水，见哪家忙不过来，便主动去给担水或干杂活。1955年建立高级社以后，他还一度给社里养猪、放牛、放羊，表面上表现得极为“老实”、“勤劳”。他平时不言不语，不接触人，不愿说话，也不串门子。用王匪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想隐藏下来多活几年，就必须装孙子，多维些人，叫人们说咱不赖”。王匪就是凭借着这样巧妙的伪装，在一个时期内蒙蔽了人民群众。

在1959年，赵家店生产队的干部和包头市郊公安分局干部刘振曾问过王匪的来历，当时亦没有问出结果，但王匪却吓得得了神经病（可能是装疯），整天乱跑乱说。前后共患病一二个月时间，等他病好以后再也无人问他的来历了。

落网毙命

1961年包头市交通局平板车社工人吴大勋给政府写检举信说：“包头市郊新城公社赵家店村有个叫王久田（又名王二美）的，年龄在60岁左右，原籍是察哈尔省一带人，是个有名的土匪头子。曾在察哈尔省国民党军长张砺生手下当过上校团长，活动在张北、天镇、张家口一带。在1959年我去赵家店见过此人在那里放牛。此人是小个子，尖嘴吧，不识字。”因王二美化名王水泉，所以包头市青山公安分局的干部曾根据检举信去作过调查，但未发现此人。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后，生产队经常开会，干部们对他的出

身历史进行详细登记，还要让他开来迁移证明。王匪仍欺骗说："证明过去开来了，现在再去开，老的死了，年轻的不认识，开不来。"因王报的籍贯前后其说不一，因此引起了四清工作队和群众的怀疑，决定暗中对其监视，并将此情况报告了包头市公安局青山分局。包头市公安局和青山分局通过调查摸底，发现在赵家店住的王水泉的相貌特征，与1961年市平板车社工人吴大勋揭发的王二美相似。为证实王水泉是否是王二美，经与市平板车社负责人研究后，在1964年11月27日叫王水泉拉着赵家店生产队的马到新城公社兽医站，以看马病为名，叫检举人员与吴大勋在兽医站院内辨认。经辨认，确定这个王水泉就是那作恶多端，隐藏15年之久的土匪头子王二美。1964年12月，包头市公安局将王二美拘留。

在预审初期，王犯装疯卖傻，不交代真实姓名和籍贯。经摆实事，讲政策，在他感到确实难以掩盖的情况下，才供认了真实身份。1965年3月17日，包头市公安局将其解回原籍阳原县处理。在审讯中王犯态度十分狡猾，死不认罪。除交代一些历史外，对具体罪恶事实，百般抵赖，拒不认罪。每逢追问到他的具体罪恶时，王犯便说："你们想从我嘴里掏出什么东西，六辈子也掏不出来，我一概不知，你们看怎么样定就定吧。"以后经过多次审讯，王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承认了1937年以前抢劫和绑票等罪行，但却恬不知耻地说："我和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你们斗争地主老财，我绑地主老财的票。"后来，经过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和反复查证，才取得了确凿的证据。在大量铁的证据面前，王犯才供认了罪行，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1969年12月4日在阳原城关处决。

（河北省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草原土匪胡图凌嘎

高乐民

胡图凌嘎，又名宝音图，锡林郭勒草原最大的匪首。祖籍喀喇沁旗，其父吉格登嘎在西乌旗和硕亲王索那木拉布坦执政期间来到西乌旗，得到王爷的信任和重用，留在王府做事，并从乌珠穆沁旗娶妻成家，生了三男一女。胡图凌嘎为长子，1908年生，中等身材，灰黄脸，两颗门牙是镶金的。胡图凌嘎从小跟随其父出入王府，懂得蒙、满、汉三种文字。索王逝世后，他得到王爷福晋的信任，被聘为小王爷米吉德的启蒙老师并兼任王府包依达（管理王府总务事宜的头目）之职。

胡图凌嘎依仗小王爷的势力，欺压人民，无恶不作，牧民都恨透了他。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奉小王爷养母之命到国民党占据的张家口联系，跟国民党要了些武器，回来后便纠集了一部分反动喇嘛、流民兵痞，拉起队伍，在开鲁一带抢掠作恶。1947年，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开鲁时，胡图凌嘎被俘，后经教育释放。

胡图凌嘎回到原籍只过了一个来月。1947年7月，胡图凌嘎经多伦跑到张家口，再次跟国民党勾结，被国民党任命为察哈尔蒙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兼第四支队队长之职。他在多伦、张家口、宝昌等地活动一年，从国民党方面弄到了50枝步枪，拼凑了一部分兵力。这期间他派查罕喇嘛、丹巴二人到西乌旗，偷袭抢走70多匹马。他还向北京王喜福商号以西乌旗名义借贷款项，跟驻张家口市的美国救援处讨要过毛毯、马靴、白面等物资。

1948年阴历七月下旬，胡图凌嘎率领部下札丹巴、那松阿日宾、查罕喇嘛等几个人会同东阿巴嘎的顽固分子达希、朱日米德、明朱尔等70余人，从宝源县出发，经察哈尔盟之境，武装闯入锡林郭勒盟。七月二十九日他们在流窜途中捣坏察哈尔盟明安旗牧民会，烧毁文件，抢走武器马匹。他们在东浩齐特旗海留图哈布其勒口地滞留了几天，然后经西乌旗南部，偷偷到达西乌旗阿拉坦高勒，一面散布什么“国民党大军马上要占领锡林郭勒了”，“美国军队已经到达林西”，“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要爆发了”等谣言，蛊惑人心，另一方面派人探听旗政府武器装备，防卫能力等情况。

胡图凌嘎匪徒掌握了西乌旗人民政府情况后，于阴历八月十五晚从阿拉坦高勒出发，十六日黎明时候偷袭旗政府。当时旗政府没有一兵一卒，匪徒们包围起来就开枪，旗政府仅有的几名干部职工从睡梦中惊醒。主任布和巴图抓起手枪还击，受伤被俘。袭击西乌旗政府后，胡图凌嘎率领匪众又去打哈拉嘎庙。

在赶往哈拉嘎庙的途中，遇到旗政府打草场工作人员那达米德、洪格庆、章其布等人，当即把章其布捉住带到布利殷山附近，连同布和巴图一起杀害。

距旗所在地以东60里的哈拉嘎庙曾驻锡盟保安队的一部分士兵。当胡图凌嘎赶到哈拉嘎庙时，那一部分军队已调走，所以没有发生战斗。胡匪捉了几个在那里搞贸易工作的人，并杀害3个汉人，抢了几匹马和一枝步枪。胡图凌嘎在哈拉嘎庙住了一宿，把贸易公司的物资和庙仓的马车帐篷抢掠一空，然后窜往敖包图葛根庙。

胡图凌嘎在敖包图葛根庙滞留期间，为扩充力量，四处派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强迫硬拉，招拢200来个人马，抢掠了大量的马、羊、粮食、衣服、车辆等物资。

胡还派他的亲信去一些庙里策反上层喇嘛，并随意杀害无辜

群众。

为了剿灭胡图凌嘎匪伙，锡盟保安队、驻锡盟乌兰浩特警备团、骑兵十六师各一个连，共300余人从盟所在地贝子庙出发，由西乌旗政府工作人员孟克、陶克涛二人为向导，于阴历八月二十三日黎明时分占领敖包图葛根庙北山，从北面包围攻打胡图凌嘎匪众。胡图凌嘎无力交战，把抢掠来的200余头牛、800多只羊和6顶帐篷及车辆用具全部扔掉，向东南方向逃窜。这次战斗双方均无死伤，只有葛根庙一名喇嘛尾随敌人出逃被打死。

胡图凌嘎逃到塔宾山（现哈尔根台苏木境内），把逃散的人马聚集起来，又招募了一批人马，重新装备了坐骑、车辆、粮食等。

九月初，胡图凌嘎匪徒从迪彦庙东南山出发，向西往张家口一带流窜。他们走了半个月，途中在浩勒图庙抢走一名喇嘛2000多块银元，在吉林高勒抢走牧民马群200余匹。在宝源县至张北县途中遭到我军打击，伤亡几十人，辎重物资全部丢失，又缩回宝源县境内。

九月下旬，胡图凌嘎到达张北县，并与张家口市方面联系。驻在那里的他的部下松布尔、陶克涛等雇汽车到坝后接应胡图凌嘎等到张家口，其余匪众留在张北县农村。

在张家口国民党军政官员支持下，胡图凌嘎匪队在武器弹药上得到一些补充。

在1948年12月至1949年6月这半年中，胡匪多次窜扰锡林郭勒草原，与我方打了以下几次大仗。

沙布尔台战斗：1948年12月，中共察盟工委代书记肖诚，盟长苏剑啸等到锡察巴乌工委汇报工作后，带领行政干部和护兵20余人在返回察哈尔的途中，行至阿巴嘎旗沙布尔台后，与从张家口出来窜扰锡林郭勒草原的200余名胡图凌嘎匪徒遭遇。双方交战后，敌人不多，战斗不太激烈。两个小时后，匪徒大部赶来，对我形成腹背夹攻之势。我方20几人仅10几枝步枪和1挺轻机枪，

力量悬殊。一名机要干部为不让党和国家机密落入敌人手里，帮助肖诚同志将所携带的文件全部销毁。苏剑啸虽然左臂受伤仍坚持战斗。

这次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我方干部战士有的牺牲、有的受伤，反击力量越来越弱。最后终因寡不敌众，除几名同志突围外，其他16名同志全部遇难。

胡图凌嘎匪帮在沙布尔台战斗以后，穿过阿巴嘎旗中部，到东阿巴嘎阿尤勒海庙，摧毁驻在那里的东阿巴嘎旗政府、牧民会，杀害了2名青年干部和2名牧民，抢走旗政府大量银元及其他物资，还放火烧毁了阿尤勒海庙的一座大殿。

额吉淖尔战斗：胡图凌嘎几次窜入阿巴嘎旗骚扰破坏，在其流窜途中与达布森喇嘛土匪一伙合并，人数达300余人。1948年阴历十一月中旬，胡匪包围攻打额吉淖尔税务局。当时，税务局驻有警备团一个连和内蒙军区一连士兵，装备有4挺轻机枪和六〇炮2门。

胡图凌嘎匪众从凌晨开始直到下午3时，几次冲锋均被我方打退。这时，从喇嘛库伦赶来的我军支援部队赶到，敌人受到两面夹击，往北仓皇逃窜。

霍尔其格战斗：为了消灭骚扰锡盟的以胡图凌嘎为首的土匪，内蒙骑兵一师三团奉命从克旗经棚出发，赶了几天路程，于1948年阴历十二月十六日到达锡盟贝子庙。锡盟党政方面为了随时解决军队供给问题，以副盟长旺钦为首组成随军工作组，用100峰骆驼驮载军用粮食、马匹饲料随同出发。

部队从贝子庙起程后，经阿尤勒海庙、新庙、戡布庙、额吉淖尔，到霍尔其格沙漠后发现了胡图凌嘎匪众。战斗从下午打响，到日落黄昏时敌人溃散。这次战斗，俘获敌人20余峰载重骆驼，1000多匹马，数十枝破枪和维修武器工具；我方数人受伤，损失部分军马。

1949年1月1日早晨，我剿匪部队在萨麦又追上了敌人。刚开始三面包围，敌人就集中火力猛烈反扑。我方用重机枪扫射了一阵，敌人的火力被压下去后开始逃窜。

这次战斗，俘虏敌人多名，缴获迫击炮一门和大量白银、银元、布匹、地毯、烟叶等各种物资。胡图凌嘎主力虽然逃了出去，但气焰已被压下。

胡图凌嘎匪徒在这次流窜途中，在霍尔其格、萨麦、宝力格、道特淖尔等先后杀害了无辜牧民和一般喇嘛10余人。

乃拉珠尔战斗：胡图凌嘎匪徒在霍尔其格溃败后，赶了400余里路程，到达西乌旗东南的乃拉珠尔集结。

胡匪窜到乃拉珠尔后不久，驻岭南巴林左旗的骑兵四师2个团的军队路经距此18里处的尹札干庙时得知敌人消息，由当地人带路连夜赶去攻打。敌人发觉后没有抵抗，即向他处逃窜。这次战斗双方都没有什么损失，只是胡图凌嘎匪徒中两个骨干分子那彦泰和敖特罕巴特尔在睡梦中被活捉，当地一名年轻妇女误中流弹身亡。

胡图凌嘎匪徒在乃拉珠尔挨打后西逃，经克什克腾旗境到察哈尔沙漠，在那里吃马肉过了春节。当时张家口、北平等城市被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匪徒们进退维谷，无计可施，后又循着来路返回，春二月窜回西乌旗南山。

尹札干庙战斗：胡图凌嘎从察哈尔的浑善达克沙漠回来不久的一天夜里，袭击了驻尹札干庙的一部解放军部队。当时我方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占领大殿一直坚守着阵地。胡图凌嘎匪徒抢劫了那里的官方商铺，把物资商品用车装走。双方打了一夜，我方数人牺牲，胡匪死了一人。第二天早晨，胡匪看到大批军队从坝前赶来，遂全部逃窜。

古日班宝力格之战：古日班宝力格位于王盖庙（现巴音敖拉镇）东南百余里，距哈拉嘎庙70来里。此处山险峰陡，南接坝上

大山，北为广阔平川。当时，东部联合旗政府驻在哈拉嘎庙。内蒙骑兵一师二团驻王盖庙。

1949年春，以胡图凌嘎匪部为主的各地残匪汇合成400余人集结在古日班宝力格山。驻在王盖庙的我军发现后，派了一部分军队去攻打。我军先把敌人的马群赶过来，使得几百名土匪只剩几十匹马，后从敌人背后包围攻打。敌人虽然丧失了马匹，但他们占据了山上的全部有利地形，并在山的四面架有机枪。我军虽然武器装备胜过敌人，但地形极为不利，全部阵地暴露，发挥不了自己的优势，损失严重，最后不得不撤退。这次战斗我方数十名战士英勇牺牲，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等不少武器弹药落入敌手。这是我人民解放军追剿胡匪战斗中，受到严重损失的一次战斗。

哈拉嘎庙战斗：1949年4月26日黎明，胡图凌嘎300余名匪徒袭击哈拉嘎庙攻打东联旗政府。当时，在旗政府的有政治指导员苏和、旗长旺钦等20来名干部、14枝步枪，驻有骑兵一师二团三连一排40余名战士执行保卫任务。这支队伍有3挺轻机枪、1挺冲锋枪、1枝手枪，其余全是步枪。

部队和地方干部50余人，在哈拉嘎庙西北角两所小院内被包围，其余80%的僧院被敌人占领。我方在人数和武器上与敌都相差很大。

战斗一开始，匪众火力较猛，接连几次发动猛烈攻击，特别是向旗政府所在的两院外我军占据的却日大殿和西边小土丘，全力发动进攻，企图夺占。因为西边这座小土丘是政府院墙旁的高地，而且挖有往来通行的战壕，如敌人占领后，就能从北边较容易打进来。我军有一名叫哈斯的战士带一挺机枪守卫着土丘，屡次用火力把敌人的进攻打回去，使敌人一直未能占领。却日大殿是距政府大院东南最近的一座有楼阁的大殿，当时被我军占据，土匪无法靠近。如果敌人占领了这座大殿，就对政府院内情况一目

了然，我则极为不利。敌人多次攻击都没能取胜，最后堆起柴火纵火烧了这个大殿。守殿战士被迫退了出来。

在我方援军赶来前的两天一夜激战中，我军一排人虽然牺牲了6名战士，但他们与党政干部团结一致，英勇战斗，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坚守了阵地，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地方党政机关的任务。他们还打死胡图凌嘎匪部连长巴雅尔和神枪手霍林塔奔、西尼尼根、乌力吉等匪徒。

翌日午后，我驻王盖庙的主力军赶来增援。胡图凌嘎匪众慌忙向东溃逃。我被包围的战士和政府干部跨上战马会同大军追击敌人几十里，俘虏敌人19名，缴获一批武器和马匹牲畜。

1949年5月初，我骑兵二团300余人，奉师部命令追剿胡图凌嘎匪众。东部联合旗政府派出色楞等3名干部和15辆骆驼车运送部队粮食、帐篷等物。

剿匪部队在茫茫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一面派人四处侦察，一面进行搜索。追剿20多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军在陶里木附近找到了胡匪。团长一声令下，战士们奋力冲向敌人。敌人一面反击，一面逃跑，后分成好多小股逃遁。这次战斗中胡图凌嘎的坐骑黄骠马中弹倒毙，他和一名叫忠瑞的人合骑一匹马逃出。我军共缴获四五百匹马、20余峰骆驼、2门迫击炮和1挺重机枪。

我军顺着敌逃跑方向紧追，在横力格沙漠追上了敌人，可是，狡猾的敌人一碰上我军，就又分成小股逃散了。当时，正好下了一场大雨，雨水把土匪的马蹄印也冲洗掉了，至使我军接连搜寻了几天，也未找到土匪的踪迹。于是，追剿胡匪的部队来到喇嘛库伦进行休整。

部队召开了团党委会议，研究分析了敌情，认为：胡图凌嘎匪徒经过我几次打击后，已成惊弓之鸟，再不敢直接与我对抗，必然会千方百计地和我们兜圈子。由于陶里木战斗中大部分马匹被我们缴获，他们还会去抢马。这样，总会留下踪迹。敌人已知我

们跟踪，所以不会再向东，很可能向北部逃窜。由于我军所带的粮食已不多了，供应又一时上不来，因此团党委决定，以一个连加上驻守喇嘛库伦的警卫连一个排，组成一个加强连，继续追剿敌人，其余连队留喇嘛库伦继续休整，等待补充。

加强连组成后，进行了战前动员。随即全连130多人，用几辆骆驼车，载着大约够10几天吃的炒米、小米和食盐，向北直插沙麦。

胡图凌嘎匪徒继续在北部边境一带流窜。我军在阿拉坦黑里、戈布钦高壁一带山岭地区搜寻了10余天。一天，在古日班布良山发现敌人踪迹，当即追踪。第二天早晨，在巴拉子上特与敌人相遇。这地方是东西横向起伏连绵的山脉，其腹地有泉水、有榆树林，除南面外都是险峻地带。我军从西面向匪徒进攻。敌人一面抵抗，一面撤退到喇嘛海敖包高地。这里是我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线。胡图凌嘎土匪最后被打得走投无路，越境窜进蒙古境内，被蒙古人民军包围。除胡图凌嘎、车如布喇嘛等顽抗被打死外，其余300多人全部被俘。

胡图凌嘎这个政治土匪、草原流寇自1946年拼凑人马拉杆子成为土匪头子，到1949年6月被彻底消灭的3年多时间内，据不完全统计：杀害我地方干部70余人；杀害无辜群众60多名；抢劫马匹1000多匹、骆驼几十峰、牛500多头、羊2000多只、银元2000多块，其他帐篷、车辆等难以数计。他们给草原人民带来了灾难和不幸，但是，这群败类最终还是落了个可耻的下场。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政协文史委　供稿）

“活阎王”赵珍及其匪队的覆灭

卢海滨　李万源

1948年初，隆化驿马吐河川的人们奔走相告：“活阎王赵珍被八路军打死了！”“死得好！”“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早就该死！”群众为什么称赵珍是“活阎王”？他的死为什么是大快人心的事？还需从头说起。

一

赵珍，1904年生，隆化县白虎沟村人。其父赵玉和自幼为农，勤于操持家业，日子过得较为富足。赵珍是独生子，乳名小虹，自幼聪明机灵，倍受父母溺爱，娇生惯养，少年时期读过几年私塾，16岁务农，娶妻王氏，生子赵国政。

1930年，赵珍的妹妹被当地土匪头子二虎劫去霸占，这在赵珍心里种下复仇的种子。他知道要报仇用“杠子”硬拼是不行的，手里必须有武器，于是他弃农投于奉系部队白三阎王手下，不久当了司务长，后又升任了小枪队队长。

1935年秋天，白三阎王的军队被打散，赵珍携枪带着营长的小老婆张氏回到了白虎沟。第二年春天他靠捞取的外财新盖和翻盖了12间房子，挂起了“赵家客店”的牌子。此时，在这偏僻的山村里，赵珍可算得上走南闯北的人物了。由于他结交了一些南来北往的人，生意兴隆起来，财大气也粗了。有一次，他去小东

沟刘家讨还旧债，刘家用当时流通的“满洲票”还债，赵珍坚持非要“大洋”（银元）不可，因此两家吵翻。刘家以“抵日”之罪告到伪隆化县公署，赵珍被押于承德监狱。后来他三叔赵玉恒听到重判赵珍的消息，张罗些钱财买通伪警察署长舒先鹏，将赵珍释放回家，仍操旧业。

后来，赵珍谋上了白虎沟村伪甲长，催收烟叶，派劳工，成了管理百余户人家政务的头面人物。日本侵略军搞聚家并村修部落，受到当地群众的反对，赵珍为了不得罪官私两面，保全自己，还是逼着群众修了南、北大门，既应付了日本人，又在老百姓面前讨了好。

1945年秋季，日本投降后，八路军解放了隆化，在白虎沟建立了第四区人民政府，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力量。赵珍感到共产党的来势不凡，便主动接近我区委书记杨学英等人，在生活和工作上给予照顾和支持，有机会就自我表白不幸身世和遭遇，又靠着自己行武出身，会打枪，懂军事的本领取得了信任，担任了村武委会主任，后又到区公所当了武委会干部。但他受不了我党严格纪律的约束，过不了艰苦生活，更看不起我区干部的衣着和装备，暗地里窥测机会，另图他谋。为此他在区小队中结党营私培植自己的势力，拉起了山头。在背地里，他和王富、郭殿发、白春山等人结拜成把兄弟，盟誓：“有福同享，有罪同受，有难同当，海枯石烂，永不变心。”赵珍在区小队里有了自己的势力以后，便公开同区干部闹对立。一天夜晚，他拦截我区女干部，因此区委决定将其关押反省。但当晚即被其盟弟王富、白春山等人放出逃走。第二天区政府抓其子赵国政为人质，迫使赵珍投案。赵珍认为政府和他势不两立，便逃到小围场马家取了枪支后，在白云山下乱石丛中埋伏，将押解送县的赵国政劫走，并威逼押差的民兵吴贵、于祥2人携枪归顺了赵珍为匪。不久，赵珍等人便与匪首“双十点”程殿举、“四海”李朋林汇合，匪众30多人，程殿举为大柜，

李朋林为二柜，赵珍为前炮头（大柜、二柜、前炮头均为称呼土匪头子的黑话），拉杆子开始了“扛着枪杆走山头，吃喝嫖赌抽，老天为大咱为二，一生最自由”的匪徒生涯。1946年5月，赵珍随程殿举等人袭击了白虎沟区公所，抢走大枪5枝，财物若干，并放走在押犯人20多名。后来，因分赃不均而散伙，赵珍又拉杆子另立山头，当了大柜。他们昼伏夜出，到处强赶牛羊，掠夺财物，打骂群众，无恶不作。因他左有“判官”卜延年，右有“小鬼”冯德全，还有“小铡刀”郭殿发等，因而被当时百姓称为凶煞恶神活阎王。

二

1946年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挑起内战，并派兵向我热河解放区进攻，8月29日攻占承德，30日便占领了隆化。我热西地委和隆化党政军机关，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这时，赵珍认为进行阶级报复的时机来到了，便一头扎进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接受反动政府的收编，当上了地主阶级反动势力的代表杨清潭纠集的警察大队的上尉中队长，由土匪变成了地方武装——自卫队，明目张胆地干起了反革命罪恶勾当。

赵珍带领匪队在截击了北撤的热西供给处后，联合任智、张文科等匪队在山湾乡庄头营村截击了张三营区委书记陈君然同志率领的30多名区干部。在战斗中，除了郝发一人突围，杨凤珍被击伤外，其余全部被俘。由于当地群众奋力营救，大部分同志脱险。后来赵珍想出了鬼点子，让未被取保的人个个开口讲话，凡是本地口音的人可以释放，只要是外地口音的就按八路军论处。结果张洪志、孔常荣、叶金生3同志不幸被害。

国民党政府收编了赵珍等匪队后，由于无力开支薪饷和装备，明着是统编了番号，实际上仍然是各霸一方，靠抢掠的牛羊，财

物换取枪支弹药。赵珍队盘踞驿马吐河川，上至步古沟、西阿超，下至西头营、兰旗一带。他们打着保安警察大队的旗号，到处拉夫抓丁，扩充自己的实力，到1947年初已发展到120余人。该队有40名马队，并配有2挺轻机枪，1门小炮（掷弹筒）。中队部下设3个分队，其成员主要是二五减租和清算复仇时受到冲击的地富分子和社会上地痞流氓和惯匪及投敌叛变分子。这伙乌合之众，凭借着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怂恿下，向翻身农民进行了反攻倒算，搜捕和杀害了不少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

三

1946年冬天，我军政机关北撤不久，赵珍带匪队回到了白虎沟。农民赵玉山原是赵珍本家的一个叔叔，他们是从小光屁股一起长大的，青年时代因争强好胜两个人翻了脸，曾动过手脚。赵珍这次回来，见了赵玉山就火冒三丈，硬说他私通八路军，捆绑起来就要处死。群众见状，跪在地上向赵珍求情。赵珍上前几步边走边说："看在乡亲的面上饶你不死，可也得让你知道我赵珍的厉害！"说着随手就是一刀，赵玉山的右耳朵掉在了地上。众人目不忍睹。他又高声威胁说："犯我者，此也！"当天他又用文明棍将谢中海活活打死。后来又指使人挑死了逼婚未成的白家姑娘。

邻村的袁树贵是赵珍当年的结拜兄弟，过去相处得十分融洽。赵珍叛变以后，曾动员袁入伙为匪。袁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凭天地良心不愿干那打家劫舍的缺德事，并劝赵弃恶从善。赵珍责怪袁不够朋友，因此伤了和气。有一天清早，袁树贵兄弟二人赶着车拉小米到隆化去卖。途经白虎沟时，被赵珍匪队截住，硬要没收牲口、粮食。赵珍知道了，派人将他兄弟二人带到面前，袁树贵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着，赵珍却象素不相识一样，连理也不理。过一会儿，赵珍突然嘿嘿一笑说："前时你劝我去投八路，现在又

给八路送粮，来人，给我铡了！”话音刚落，铡刀已经摆好。袁树贵看赵珍反目为仇，料也躲不过一死，便毅然甩掉上衣，躺到铡刀床子上，大声骂到：“赵珍，你铡了我，你也不得好死！”匪徒鲍金山拿来一根高粱秸折成几截放在袁的脖子上，只听“噗”的一声鲜血喷出一丈多远，人头滚落下来，围观的群众无不掩面泪下。

1947年5月，赵珍在白虎沟的大黑沟门截住了3个从关里到口外做买卖的人，赵珍怀疑他们是八路军的探子，让郭殿发带到葡萄沟杀害了。同年7月，在烧锅梁抓住行路人李青（水泉人），被“判官”卜延年刺死。同年8月，栅子人高显章在大台营被赵珍抓住。白虎沟和栅子相距仅10里之遥，匪队中有些人就是栅子的，赵珍也认识高显章，但他明知故问：“你是台吉营人吗？”高没听清问的是什么，就顺口回答“是”。这就惹恼了赵珍，他命令判官卜延年上去就是一枪。乌素村刘华山祖辈都是守本分的庄稼人，赵珍匪队硬要牵去他家的大牛去关里换枪。刘老汉舍不得，拉住缰绳不撒手。赵珍大怒，下令铡了刘老汉，又牵去了他家的大牛。

赵珍对革命者更是不肯放过。1947年6月24日，柳沟营村农会主任刘元军、李明良、曹瑞祥、刘进忠、魏文恒、张喜、胡俊山等13人，满怀喜悦心情，丈量着没收地主的土地时，被赵珍匪队碰见。赵珍一声令下，将其中7名同志先后在柳沟营、白虎沟、蛤蟆梁和八达营一带杀害。

1946年春夏之际，白虎沟村代××在区委书记杨学英同志领导下发动妇女参加清算复仇斗争。1947年正月，赵珍匪队抓到了代氏母女，带至三间房梁上，将代母枪杀，并逼其女嫁给该匪队三分队长李朋林为妾。赵匪抓住了3个围场的人，从兜里搜出了我政府给开据的“运销证明”，被认为是八路军干部而惨遭杀害。有一个人拣了一副裹腿，学着战士的样子扎了几天，腿上落了裹

腿的印，也被当做八路军战士杀害。

1947 年夏天，我黄河大队在大洞子沟同赵珍队交战，击毙了两名匪徒。赵珍寻机报复。1947 年 8 月的一天，我县支队在赵木匠沟与赵珍匪队遭遇，9 名干部战士受伤后被俘，又被带到洞子沟。赵珍凶相毕露，要给被击毙的匪徒祭灵。他亲自指挥铡了 3 人，将尸体踢到匪徒的坟旁。又下令千刀万剐绑在树上的副排长马树清同志，众匪象恶狼似的扑上前去，罪恶的刺刀扎向了英雄的身躯。马副排长睁大双眼怒视着敌人，顷刻间遍体鳞伤，成了血人，鼻子、耳朵都被割掉了。赵珍从一个匪徒手中接过刀子，硬逼着一个姓王的群众去扎，王不敢近前，赵珍嚎叫着："不剐，我铡了你！"在赵珍威逼之下，王才哆哆嗦嗦地将刀子伸出去，当即就晕了过去。"真他妈的窝囊废！"赵珍骂着一脚踢开了王，又一挥手上来六七个杀人不眨眼的匪徒，乱刀将马排长扎死。赵珍又恶狠狠地说："都说吃人心是壮胆的，今天我要尝尝，给我扒！"话音刚落，匪徒李树华手持尖刀将马排长开胸破肚，然后又献殷勤地说："听说人胆能配最好的眼药。"他又二次上去割下了英雄的胆。

赵珍从 1946 年叛变投敌到 1948 年 1 月被 我军击毙，共杀害我革命干部、战士、群众 127 人。

四

1947 年春，我北撤的军队和地方干部经过整训先后返回隆化开辟根据地。当地群众纷纷向分区独立团、县支队和区、县政府写信控诉赵珍的滔天罪行，要求严加惩办。我县政府指示县支队消灭赵珍，为民除害。但狡猾的赵珍为避免和我县支队相碰，多与其他匪队联合行动，使我未得机会下手。

1947 年 10 月的一天夜里，我县支队和伊逊河武工队包围了赵珍匪队的驻地大台营子，虽然赵珍当晚带匪队逃跑，却为群众

夺回百余头牛，还意外地抓获了赵母，当作人质看押在山湾一带。赵珍在栅子得到其母被抓的消息后，反扑过来连夜袭击了疙疸营村。伊逊河武工分队长李长春的母亲李老太太和三子李长秀、四子李长荣不幸被俘。赵珍这一招的用心是非常险恶的。李长春在1945年隆化解放后，被群众推举为疙疸营村清算主任，北撤之前又动员二弟长青参了军。在北撤途中，他勇敢战斗，护送县长廖寒飞脱了险。1947年他回到汤头沟区领导护地复仇队，合编后又担任伊逊河武工队分队长。他带兵打仗有勇有谋，深得领导赏识。赵珍抓到李家母子3人作人质，目的在于保证其母的安全。

双方通过书信来往，协商同意由疙疸营村长、赵珍过去的挚友毕锡久出面调解。他带着疙疸营村46个大户的联名具保书，先保回了李老太太。赵珍继续扣留 长秀、长荣作人质，要求二换一。对换人质的消息一传 出，山湾子一带的群众急了眼，群众说："赵珍杀了我们那么多的人，大仇还没报。这次抓着了他妈，就得杀。"面对上述情况，在这里开展工作的廖县长分析了利弊关系，耐心给群众做了思想工作。这时有人到围场邀来县支队，将赵珍之母就地处决了。

赵母一死，对换人质的谈判终止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方经过精心安排，采取了新的行动方案：出奇兵袭击疙疸营，营救李家兄弟。当夜李长秀、李长荣逃出虎口，参加了伊逊河武工队。赵珍闻讯后，气极败坏将毕锡久用刺刀挑死，还要求疙疸营村在10日内交出100条大枪，并以血洗 全村相威胁。

此后，赵珍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连几夜坐立不安，不睡觉，性情更加暴躁。众匪徒决意尽快收回赵母的尸体，以安慰主子之心。

在一个北风呼啸寒风刺骨的夜晚，赵珍率匪队出发，窜入我解放区内疯狂地进行报复。匪徒所到之处，见财物就抢，带不走的就砸 洗 劫一空。在山湾子乡卧虎沟抓到了村长马振芳。马振芳面对凶恶敌人，大义凛然，临危不惧，自己躺在一座新坟旁的

铡刀床上，还高声骂道："赵珍你铡了我正好和你妈并骨！"又一名干部牺牲了。

1948年1月3日，赵珍率领匪队又窜到步古沟一带抢劫。县支队得到了赵匪在蛤蟆梁用饭的情报后，立刻进行了军事动员，县委书记、县支队政委罗平同志亲自"挂帅"，于夜10时从东阿超出发，顺驿马吐河而下，绕过高立营，直扑蛤蟆梁。狡猾的敌人在蛤蟆梁吃完饭后，又集合移往高立营。我军顺川而下时，敌人已有察觉，并作了伏击准备。我军在蛤蟆梁扑空后，又回师高立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士们冲进村里与敌人巷战，缴获轻机枪一挺。大队长杨明率主力一连，从东侧迂回到北面夹击敌人，抢占了东山制高点。战士们在夜幕掩护下，又悄悄接近敌人，冲进村里，战斗越打越激烈，攻势越来越猛。

赵珍在李运大院预感情况不妙，随即下令撤退。当赵珍刚骑上大白马时，一弹飞来击中他的腹部又跌下马来。匪徒们忙用担架抬上赵珍仓皇逃窜。匪徒们到白虎沟已经天亮了，见赵珍疼痛难忍，就给他喷了几口大烟，继续南逃。走到牛录山咀村时，只听赵珍一声惨叫，呜呼哀哉了。

五

赵珍死后，王富从承德警察培训班赶回来继任了匪队队长。他继承赵珍的衣钵，带领匪队到处为非作歹。但由于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壮大，解放区不断扩大，王富匪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1948年1月，匪队窜至庙子沟三间房、十间房村抢掠，并杀害了村干部魏显章、丁振江、高傻子等7人。

2月7日又配合杨清潭等匪队到北窝铺乡的大营子、北窝铺、老爷庙三村进行扫荡，并杀害了村干部和群众武世友、武傻子、赵万福、赵顺、张信、黄景全等6人。农会主任黄景全被捕后，受

尽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敌人穿透他的锁骨用铁丝捆绑着，又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前心和背后，往刀口上撒盐面，逼问我工作团的去向，黄硬是不说，气得匪徒哇哇乱叫，最后才下了毒手。黄景全到死也一声未吭。

解放后，据匪首王富供认，这次共抢群众的粮食 4 车，猪肉粉条 1 车，抢牛 10 头、羊 300 只、马 2 匹，其他衣食物等不计其数，回到兰旗大吃二喝过春节。受害群众则渡过了一个暗无天日的惨年。

正月初五，匪首王富接到地主郝春树报告杨学英同志活动地点后，便率匪队包围了庙子沟乡南台子村。杨学英同志奋力突围，不幸在八垄地沟处，被匪徒刘德福击中，壮烈牺牲。匪徒们割下杨学英烈士的头颅，放在牛笼嘴里送往县城请功。杨学英烈士的头颅被悬挂在隆化十字街戏楼上示众数日。市民都低头掩面而过，目不忍睹。

在这之后，我军不断发动对赵珍匪队残部的攻击，大大地消灭了其有生力量。迫使其龟缩在隆化附近的兰旗一带，惶惶不可终日，再也不敢轻易出动到我解放区骚扰了。

1948 年 4 月夏季攻势开始以后，我军奉命攻打隆化城。王富走投无路，率 37 名残兵窜至滦平白草洼避风。不久又被我清剿部队打散，又逃回隆化白银沟一带活动。旧历五月初三被县支队包围并全部缴械。王富等匪队成员被遣送回原籍务农种地。从此赵珍匪队彻底覆灭了。

隆化解放后，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和控告，在 1951 年镇压反革命斗争中，先后将罪大恶极的王富、郭殿发、卜延年、冯德全、李树华、刘起、赵玉升等人判处死刑，为民除了害，为死难烈士报了仇。

（河北省承德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著匪葛二秃子兴灭记

王金瑞

葛匪二秃子，原名葛荣华，又名葛贵斋（1905——1941年6月），河北省景县葛里庄（旧称葛家院）人。其人起于匪，归于匪，中间有过一段被八路军改编的历史。

葛匪放荡成性，桀骜不驯；吃喝嫖赌，杀人越货；造枪置炮，造假钱票；……有关匪事劣迹数不胜数。他曾娶三房老婆，但谈不上谁是压寨夫人，更不曾发现有认这位贼父的后人（据说景州城东有葛匪的一个女儿）。他最终投入日本人的怀抱而被日军杀害，落了个可耻的下场。

一、发　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大部地区沦陷，加之大雨成灾，收成无几，致使土匪蜂起，民不聊生。同年9月，日军出动3架战斗机向古老的景州城投下数枚罪恶的炸弹，死伤平民百姓300余人，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逃遁。葛二秃子的游杂武装就此兴起。

葛匪绰号“葛二秃子”，生性懒惰，不事农务；曾入旧军队当差，因耐不住艰苦，怕受约束，便回乡做了小商贩，贩瓜倒梨，杀驴卖肉；经常联系四周无赖坯子，以赌博为业，结为酒肉朋友。当他看到日军侵华，人民遭难，便怀着趁火打劫和乱世出英雄的侥幸心理，联络一些狐朋狗友打出“抗日”旗号，到处收缴地主富

户粮物枪支，拉起“杆子”。1937年9月的一个晚上，葛二秃子同其心腹烧完香、磕完头，在“苍天保佑”的护符下，一班人马乘船直奔高庄、草厂、孟庄等地，抢了地主的枪支、马匹，并开仓放粮。数日之内，聚众近千人。

此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景县大地盗贼蜂起，各自为政，一些兵痞流氓也揭竿而起，组成几股土匪武装。葛二秃子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办法，围孙镇，攻枣强，先后吞并了苏胡子（苏清山，占王谦寺镇）、胡金波（占龙华镇）等几股土匪，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到1937年底，他的人马发展到3000多众，控制了景县、阜城、枣强等地。葛匪曾得意地对部下吹嘘：“不知怎的，你们一下子就把我弄得这么大！”“干这玩艺儿真行，比做小买卖卖梨强多啦！”

是年腊月，葛在驻武邑的河北民军第二路军赵云祥的策划下，于除夕夜，兵分两路，合击枣强民团，攻占县城，洗劫恩察，包围大营。赵云祥派员要葛部改编为“民军二路三纵队”，让葛任纵队司令。当葛尚未决计投入赵部时，闻知八路军东进纵队已到南宫，不免内心惊慌，加之其内部出现一些内乱，于是便率部撤回龙华一带。回景县后，葛深感给养不定，不是长久之策，于是，他便率队从龙华连夜奔袭，一举拿下景县城，将伪警察局长陈九芳等10余人处决，建起“景县临时抗日政府”，委任其盟兄任汉珊为县长，为他筹粮筹款，并吸收县内一些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到政府和部队中任事。时间不长，葛的队伍就发展到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号称5000人马。

二、改　编

景县县城距津浦铁路较近，葛氏“县府”建立后，时刻担心日伪军对其进行袭击，于是便将大本营迁往城西的王谦寺镇。不久，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经与葛再三交涉，在那里成立了战委会，开

始了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

葛氏是一个新得势的草莽“英雄”，并没有什么政治见解，不过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人物。对于八路军的到来，他开始是惧怕的，怕的是吞并他、消灭他。然而，共产党八路军对各地的游杂武装不念旧恶，而是号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由此，他对共产党产生了一定好感。所以，我党组织提出要派几个同志到他的队伍里去工作，他就接受了。自此，我派入葛部的同志积极宣传抗日，对葛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38 年 3 月底，中共景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刘建章奉命回景县对葛部进行改编工作。葛对此犹豫不决，顾虑重重。葛所在王谦寺镇，曾是刘建章同志教过书的地方，这里有他的许多朋友和学生，大家都欢迎他的到来。这种情况，对葛的思想有所触动。

1938 年 5 月 15 日，葛率部歼灭了盘踞孙镇、勾结日军的民团头子徐子合。第二天，葛部在李辉桥与日军相遇，葛率 3 个团，坚持战斗 10 余天，打得十分艰苦，葛曾向赵云祥求援，赵非但不救，还将驻扎在附近的一团人调走。赵云祥的这一举动，对葛的刺激很大，从而使其投靠国民党的幻想最后破灭，产生了与八路军合作的念头。

1938 年 6 月，在共产党及葛内部进步力量推动下，该部正式改编为华北抗日联军二十八支队，葛任支队司令。8 月，二十八支队改为八路军东纵五支队，葛任五分区司令员兼五支队司令员。根据战斗需要，该部队后改为八路军东进纵队第三团，随东进纵队开展游击战。

三、投　敌

由于葛二秃子的流寇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改编后，他受不住严格的军纪军风的约束，认为是“用绳子捆住了他”；部队需

要整编，他认为是“夺了他的兵权，削弱了他的力量”；部队开支由上级拨款，不能私自动用公款，他认为是“有意卡他的脖子”。如此等等，葛氏又蒙生了叛变的念头。

1939 年初冬的一天夜里，趁分区副司令员赵义京不在之机，葛以移防为名，率基干营由小营村出发，直奔连镇。葛的叛逃行为，被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发觉，立即率部赶到连镇，对其进行喊话教育。基干营指战员明了真相后，大部返回。葛二秃子带数名亲信逃过运河，投降了日伪军。

此时的葛二秃子成了光杆司令，不被日伪重视。1940 年初他又逃到天津，在亲戚谢金龙的帮助下，在英租界黄家花园和安里赁了一所二层楼房，自作主东，让手下亲朋开办了“荣乐园”饭馆。同去的有他的大婆和三婆，有他的大哥葛荣升及叔父葛学品等。这帮人都是游手好闲之辈，哪是开饭馆的料，所以只有 8 个月，他的饭馆就赔光了。

1940 年 12 月间，沧石护路司令萧振江劝葛投日，希望他到连镇重新召集旧部。经过一番接洽，葛匪于 1941 年 2 月，带领若干亲信回连镇安营扎寨，在河东“通源栈”内设立司令部。其组织系统分为参谋处（谍报班）、秘书处（管理文件）、军需处（包括造枪所、印票所）、副官处（管理杂务）和第一、二、三支队。各处处长和各支队长分别由其亲信潘金龙（任参谋长）、葛学品（任军需处长）、葛荣升（任事务长）、胡崇斋（任军法处长）、朱友松（任秘书处长）、甘馨廷（任副官处长）、多连奎（任一支队长）、豆弼臣（任二支队长）、刘正斋（任三支队长）等担任。葛匪梦想在日伪庇护下东山再起，一方面积极招兵买马，一方面造枪印票。他瞒着日本人，暗中在连镇河西开办了造枪所和印币所，原想印日本票，因技术问题而改印冀南票。他在天津请来李寿山、王鹤年等 4 名印票工人，两三个月时间就印制伪币 30 多万元。

其间，葛匪与其部下胡作非为，出尽风头。不仅引起我军和

当地群众的不满，也引起了日本人的反感。葛的部下嫖娼与日本兵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使日军对他怀恨在心。同年6月，日军以开会为名，将葛匪调到沧州秘密处死。其他人也被驱散。

葛匪之死一直是个谜，一说是被日本人装入麻袋沉入运河；一说是葛匪到沧后见势不妙，没下火车便逃之夭夭。解放后，景县公安局曾派员进津出关，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侦查，但终是一无所获。据此看来，葛匪死于日本人之手还是比较可信的。若此，也算是以毒攻毒，象葛匪这样反复无常的人，日本人对他也绝对是信不过的。

（河北省景县政协　供稿）

雁北剿匪纪实

仝有悦　郭日亮

雁北地处塞外高原，是历代变革时期兵家争夺的古战场，也是地痞盗匪，散兵游勇藏身立足、盘踞横行之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一些残兵败将就利用雁北特殊的地理环境，结伙为匪，自立股系，自封司令，占山为王，横行乡里，扰乱社会治安，刺探我军情报，袭击我抗日军队，捕捉、杀害我抗日干部和群众。他们无恶不作，罪行累累。

当时雁北的匪股主要有：活动于应县的乔日成、郭养恩、王国相、史美录、孙成文等，仅乔日成匪股就有3000名匪徒。活动于灵丘西北山、浑源东山、广灵西北山一带的有张诚德（绰号夜猫张）匪股。张诚德原为国民党某军的一个师长，因被日寇击溃，流窜于山区为匪，自封为察南游击司令，收留当地小股土匪、地痞流氓、散兵游勇组织起五六千人的土匪队伍。活动于大同、阳高、桑干河两岸的有扈锡侯、王天存、白满胜、曹发刚等大小匪股，合有匪徒300余人。盘踞在广灵县东山和北山的有匪首宗孝、侯风凯、薛占奎、姜成孝、彭国章、赵昌信、牛拐子7个匪股，合有匪徒千余人。活动于阳高北长城内外的有杨永胜、许喜匪股，约有匪众500余名。活动于天镇县辛平、谷大屯、安家皂一带的有张如山、柴云山、韩振江3个匪股，有匪众二三百人。活动于右玉县、左云县、朔县的有王先滑、“不浪队”、“跨三连”、乔占山、

于子千、义满子、谢登云、谢登贵等大小匪股。至于全区零散的土匪就难以计数了。

上述匪股，扰乱社会治安，危害乡里，破坏我抗日活动，袭击我小股抗日军队。如赵昌信、彭国章匪股，将我桑干河武工队和工委干部郝春林等30余人包围在桥儿涧村，打死郝春林和一战士，其余人员被俘。1938年10月，杨永胜、许喜匪股声称愿意接受我战总会领导下的察绥游击军四支队的整编，邀请我军部及四、五支队负责同志到丰镇县东山亮马台匪股驻地参加整编庆祝大会。当我方人员到达后，他们按照事先布置，将我代军长郑荔庵、政治部长阮慕韩、组织科长钱应麟、四支队长任树林等80余人解除武装，扣留匪部。之后，他们又袭击了我军和支队机关。

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扫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障碍，稳定根据地的社会秩序，1939年，八路军三五九旅派出武装剿匪工作队，以七一八团为主，对土匪采取了政治上争取，组织上瓦解，打击死心塌地分子的对策，认真进行清剿、侦缉、追捕、收编等工作。在清剿过程中，我军的阻力较大，因为大多数匪股都有各自的靠山，有的投靠日军，有的投靠民国党，有的明靠国民党，暗投日军。我三五九旅在王震同志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冲破道道险阻，逐渐掌握了各匪股的确切靠山和兵力武器等情况，然后展开了针锋相对、灵活机动的剿灭收编工作。如对张诚德匪部，我三五九旅于1939年7月14日集中优势兵力分隔包围了其驻地，首先消灭了张匪的骨干力量，然后又在浑源大仁庄、官王铺剿灭了其司令部，活捉了张诚德。之后，匪首张诚德被我镇压于浑源县石嘴村，匪众大部被我整编。再如广灵县薛占奎、姜成孝匪股，于1938年被广灵县抗日政府整编为东西山游击队。扈锡侯匪股，于1938年夏天，被我军白一化部整编。应县郭养恩匪股，经应山县抗日联合政府多次派人做政治思想工作，同意归边区政府整编，于1938年7月间正式收编为边区政府政卫队的一个大

队，郭任大队长。接着，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小匪股有的被我军剿灭，如郭喜鹏、白满胜、曹发刚等；有的被我军剿散后，逃往内蒙古自治区，如杨永胜、许喜等；有的被我军侦捕，如冯弟、谢登云、谢登贵等。其中一些作恶多端、民愤大的匪首和惯匪，均被我抗日政府镇压。

大同城解放前夕，大同蒋匪军统晋北站站工张晓锋，向特工人员布置了应变任务，组建了“匪后游击队”，派出军统特务张金叶、张金山等一股13名政治土匪，带着武器、电台等，联络地富、汉奸、散兵游勇，潜入山阴、朔县一带，扰乱解放区的社会治安，破坏土改运动，进行游击活动。大同和平解放后，这股政治土匪，人枪分散隐蔽，转入了秘密活动。

1948年，广灵、天镇、阳高、应县、怀仁5县，先后被我军解放，大部顽伪和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大同城，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5月1日大同城和平解放。一些血债累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分子，以及被国民党军队收编的土匪、日伪警察、汉奸、日特、地主还乡复仇队，有的潜逃到未解放的内蒙古绥远、包头、后套等地为匪；有的占山为匪，继续侵害山区人民，抢劫民财、扰乱社会治安，袭击我民兵组织，破坏区、村基层政权，杀害基层干部。

1948年3月20日，天镇县第二次解放，县长王佃林带领一些残兵逃到永嘉堡村，会同后小川保警队长张汝山的三个分队，继续骚扰天镇县乡民，袭击天镇县县、区、村机关，捕捉我革命干部和群众。

1949年4月20日，原广灵县保警大队长侯凤凯（原为土匪，后投降日寇当了日伪警察队长，又被国民党改编）在广灵解放时潜逃到大同市，继续为非作歹。我军围攻大同时，该匪又伙同伪保安十三团副团长李克栋带残敌10余人流窜到浑源县、广灵县山区为匪，4月20日窜入浑源县英庄、大石头岭一带抢劫人民财物

时，被我方包围，当场击毙匪徒5人，俘获匪徒7人，缴获步枪5枝、炮弹6发、子弹百余发。4月25日，残匪又窜入广灵县境内，占领了白石山顶，我地区公安办事处及浑源、广灵两县的公安部队和民兵200余人急速赶到白石山下，对敌人展开包围攻势。最后，匪团终因弹药用尽，被迫缴械投降。

1949年5月，全区各县连同大同市全部解放，但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土匪特务潜伏下来，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他们不时跳出来袭击我基层政权，抢劫银行、商店、学校，抢夺人民财物，扰乱社会治安，蛊惑人心，刺探我党政部门情报。据各县报称，雁北区解放后匪股分布情况如下：

在阳高、天镇、兴和3县交界地带，尚有土匪3股：第一股匪首是张如山（绰号大头老子），系惯匪，纠集匪徒70余人，配有歪把机枪1挺，自动步枪1支，手搬炮1门，半自动步枪80余枝，手榴弹若干，经常祸害百姓，污辱强奸妇女，打劫路人，无恶不作。第二股匪首为曾宏儒，系阳高县九区莫家堡村人；另一匪首为李成增，系阳高九区太平堡村人，共有匪徒30余人，内有十八虎弟兄之称，配备大小枪20余枝，经常于丰镇东山、阳高北山小元沟等地进行活动。第三股匪首为王殿格，系阳高县九区罗文皂村人，约有匪徒9人，配有大枪4枝，手榴弹8枚，住在天镇县三十里铺村。他们白天分散隐蔽，夜晚集中行劫，主要活动的地方是阳高九区、天镇三区一带。1949秋天他们抢劫了阳高县解庄村两次，冬天又抢劫了罗文皂火车站商店；1950年2月又抢劫了天镇县南郝塔村、魏家窑村；3月又抢劫了阳高县太平堡村民兵大枪4枝、手榴弹8枚。

在应县，有以匪徒高日武、张密为首的匪徒13股，共68名匪徒。在怀仁县，有刘九州等5股土匪，共有匪徒21名。

在大同县活动的主要有5股土匪：第一股匪首为冯登陆，大同县九区小滩头村人，有匪徒4人，于1949年12月26日抢劫车

吕域我国家工作人员，还经常以查过路行人、查户、查店等借口进行明目张胆的劫掠；第二股匪首为武二后生，有匪徒3人，经常昼伏夜出，冒充我公安、税务干部，拦路检查来往商贩，以劫取财物；第三股匪首为魏来祥，有匪徒4人；第四股为郭丕玉、剧忠义二人合伙，系军统特务张金业组织的所谓“匪后游击队”成员，潜伏于山阴、怀仁两县交界地带搞破坏活动；第五股匪首为常富财，应县八区侯家岭村人，属惯匪，有匪徒3人，经常抢劫怀仁县第三作村大店。另外，还有一些零散土匪，共计14人。他们也是昼伏夜出拦路抢劫行人。

在广灵县，对匪股没有确切的记载，只有一些活动情况。如1950年5月间，发现有4名土匪，带大枪一枝拦路抢劫行人；在同月内，又发现匪徒5人，在马连盘打死2个卖布佬，抢去布30余匹；同年6月，又有5名土匪冒充我解放军，窜到二区宋家窑村，抢去老乡家白洋30元、土布3尺、包袱1个、手表1块。其他几县匪股活动情况不太严重，姑且略去。

由于全区各县都多少不等地有匪股侵扰破坏，致使我基层组织不能正常工作，银行、商店、税务等单位不能顺利营业，群众叫苦不迭。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坚决彻底地清剿这些十恶不赦的土匪，地区公安办事处在地委领导下，会同军分区，成立了地区剿匪指挥部，总指挥由地委常委、公安办事处主任兰亭同志担任。指挥部成立后，于1949年10月间，召开了各县公安局长专门会议，部署清剿任务。会议决定，为了作到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各县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迅速成立剿匪指挥部，并在各县各区建立防匪剿匪联防委员会。县区的剿匪指挥部指挥及委员会主任均由各县公安局长、武装部长及区治安员和区武装部长担任。会议结束后，各县先后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及各区联防委员会。各县区剿匪组织机构建立后，确定了专门工作人员。组织了以公安部队和民兵为主要力量的剿匪队伍，认真开展了清剿工作。

各县清剿土匪运用的办法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各县在县委剿匪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给所有的党员、行政干部都布置了防匪清匪的宣传任务，发动并教育群众不窝匪、不包匪，发现匪情及时向剿匪机关报告，发展群众性的防匪、剿匪活动。

第二，建立防匪剿匪联防组织。区与区、村与村联防，一处发现土匪活动，联防区、村互相支援，即行围剿。

第三，结合武装部门，审查民兵组织，组织精干的民兵剿匪队，发现土匪，就地围剿。

第四，采取以匪治匪办法。在调查了解摸底的基础上，选择与土匪有关系，或以前当土匪现在洗手不干的人员，经过我们争取和教育，然后让其深入匪股内部，一是了解情况，二是采用拉打办法，将匪徒从匪巢内部拉出来，最后一网打尽。

第五，进行政治争取。通过对土匪家属、亲朋好友的政治教育，让他们去做土匪的工作，争取使土匪退出匪巢，向人民认罪。

第六，进行侦缉围剿。组织公安部队和民兵，一旦发现匪徒踪迹，及时进行追捕围剿。

阳高县剿匪指挥部，为了剿灭活动于天镇、阳高、内蒙古兴和县3县交界地带的张如山匪股，与天镇县、内蒙古兴和县建立了剿匪联防区。在3县剿匪负责同志的指挥下，于1949年12月间，他们深入张如山匪股活动地区，搜山发现匪徒踪迹，于是跟踪追捕，先后抓获零星匪徒30余名。之后，匪徒在天镇县山地岭一带进行抢劫时，被我县公安部队的民兵包围，除匪首张如山逃跑外，被围匪徒俱在教育下缴械投降，缴获机枪1挺，手搬炮1门，步枪50余枝，大量手榴弹和子弹。同日，阳高县剿匪指挥部又与丰镇县公安局联系，共同对丰镇东山进行了清山围剿，先后抓获零散活动的匪徒12名。之后，又于阳高北山小元沟村包围匪团，活捉匪首曾宏儒、李成增及匪徒9名。这样，张如山、曾宏儒两

股土匪基本上被我剿灭。

张如山、曾宏儒二匪股的剿灭，大大震慑了这个地区的其他匪股。匪首王殿格自知力量单薄，不敢公开进行抢劫活动，曾一度避风，按兵不动。我剿匪指挥部经侦察，得不出可靠结果。为了彻底弄清匪徒隐藏的确切地点，剿匪指挥部采取了以匪治匪的办法，选择了以前跟王殿格一起抢过东西、现在关系仍比较密切的苗炳志。经反复争取，苗同意为我们办事，并很快搞清了王匪的人员力量、活动方式及经常隐藏的地址，及时报告了我部。从中我指挥部还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报：王殿格正在策划阴谋轰炸阳高县监狱，放出被押人犯。我阳高剿匪指挥部得到这一可靠情报后，迅速组织县公安部队，联合铁路公安部队和天镇公安部队共100余人，于1950年4月4日晚将天镇三十里铺村包围，然后进行认真的搜索，终于找到苗炳志提供的地洞，没费一枪一弹就活捉了匪首王殿格和大部分匪徒。

地委剿匪工作会议后，应县县委按照上级指示精神，于1949年10月下旬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公安局长田永善任总指挥，武装部长李政任副指挥。并立即召开了各区治安员、武装部长参加的清匪会议。会后，各区相继成立防匪剿匪联防委员会，很快搞清了土匪活动的情况。据统计，全县共有15股土匪，约68人。应县在剿匪过程中也开展了群众性的防匪、不窝匪、不包匪、踊跃检举揭发的活动，群众自觉清匪的积极性很大。往往是一村发觉，数村支援，共同围剿。通过这种办法先后抓获零散活动的匪徒岳振民、岳柱华等，然后采取以匪治匪的办法，对他们分别突审，让他们立功赎罪，交给其一定任务，放他们回匪股。一段时期后，他们大都将各匪股的近况及行动计划等情报送到我指挥部。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我们又抓获了大批匪徒。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一时期应县共抓获匪徒45人，缴获大枪12枝，手枪2枝，手榴弹10枚，子弹240发。

大同县剿匪指挥部，由公安局长高凤岐同志任指挥，武装部长任副指挥。各区成立联防会，抽调干警30余人组成3个侦缉小分队，深入到匪徒活动最猖狂之地进行调查侦捕。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共抓获匪首冯登陆、袁有财、王成、张玉忠等4人，匪徒11人，枪支弹药若干。

怀仁县剿匪指挥部，由公安局长韩文斌、武装部长贺呈祥二同志分别任正副指挥。从1949年11月份开始，他们根据所发现的土匪活动情况，除各区建立联防组织外，县公安局抽出干警人员与公安部队组成两个侦缉小分队，深入土匪活动比较频繁的区村，进行调查摸底，然后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侦捕包剿，先后侦捕了惯犯魏来祥、匪徒龚存善、魏官印等人，同时还抓获了政治土匪、"匪后游击队"成员剧忠义、郭丕玉二人，合计共抓土匪27人。

广灵县的剿匪工作，仅1950年6月间，就侦捕了马连盘抢劫案的匪徒师廷荣、葛永魁、孟喜等5人和抢劫西石门村、宋家窑村的匪徒聂文学、郭怀义、白小三、梁振叶等4人。

以上是雁北剿匪工作的一些实况。从1937年日寇侵华到1952年下半年，经我雁北党、政、军民的艰苦奋斗，终于将活动于本区的那些作恶多端的土匪基本剿灭。这是雁北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也是雁北公安工作的重大成绩。

（山西省大同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王毛仁股匪覆灭记

许闻新

王毛仁，又叫王占山，是固阳县福盛庄附近的十二分子村人。王在年幼时，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到十八九岁时，就开始“刮野鬼”，当土匪。抗日战争时期，因王毛仁从后山地区给傅作义往后套招兵买马，傅给王毛仁挂了个团长军衔。但王并不真正抗日，而是跟随乔二安和安华亭等人，在后山地区、乌梁素海东西及西山咀一带为非作歹，抢劫财物，奸淫妇女，干了不少坏事。1944年，王毛仁投靠了驻扎在后山地区的杂牌军王国祥旅长，因二王之间旧有交往，王国祥将王毛仁任命为四连连长，令其驻在明安川和小余太一带。1945年秋日寇投降后，王国祥深感王毛仁这个人桀傲不训，经常惹事生非，过分祸害当地百姓，多方招来非议，遂将王毛仁推荐给守备包头的赵炽昌旅长。王毛仁到了赵炽昌旅，仍当连长。从这时开始，王又与明安的张贵生、张五小勾结起来，主要抢劫后山和乌拉山前群众的马匹和大烟土等物。

解放前夕，赵炽昌逃往台湾。王毛仁预感到情势复杂，前途莫测，于是决定暂回固阳县十二分子村，观察形势，待机而动。

1949年深秋，武川县一个外号叫“干豌豆”的惯匪，用胶车拉着2个女人，载着2挺机枪，还带着名叫贺参谋、李排长、赵德胜等几个武装匪徒，打听着找到王毛仁处，在王家住了下来。当天，“干豌豆”对王毛仁说：你我二人若落到共产党手里，非活剥一层皮不可。依我看，咱还不如组织起来跟共产党干。王毛仁在

“干豌豆”的煽动下，顿生再度为匪之念。几天之后，“干豌豆”带着那2个女人，离开王毛仁家，奔他处去了。王毛仁则到海湾沟等处寻找当年一起“刮野鬼”的张五小、张贵生和他的小舅子马二虎，在回来的路上，又遇到来投奔王毛仁的原匪伙成员白海，加上“干豌豆”带来的贺参谋、李排长、赵德胜3人，共8人再次拉起股匪，重新干起祸害地方、残杀无辜的土匪勾当。

这股土匪经常活动在嵯石太山前后及乌拉山地区。王毛仁则常去后山海湾沟村和姘妇王有成的女人鬼混。

一次，王毛仁又带着匪伙来王有成家，和王有成的老婆鬼混够了后，派匪徒将民兵王石海和苗二娃抓来，捆绑在王有成的院子里，命令张贵生把王石海和苗二娃一起打死。张贵生感到处于朝夕不保之境，想为自己留条后路，遂用顶撞的口气说：“我不干！”王毛仁瞪着眼对张贵生说：“叫你打，你就打，这是命令！”在王毛仁的威逼下，张贵生翻身上马，转回身来，“当、当”两枪，将王苗二人打倒在地。匪徒们行凶杀人后，遂扬鞭策马，匆匆离去。后经查明，王有成夫妇因犯勾结窝藏土匪、坐地分赃罪，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1950年正月初四，我骑四师剿匪部队在小余太德合昌把王毛仁股匪包围，匪徒们见势不妙，抄小道向山里逃命。我剿匪战士纵马追击，打得匪徒抱头鼠窜。匪伙中的贺参谋、赵德胜是山西人，地理不熟，加之骑的是抢来的劣马，跑得慢，在逃跑中被我击毙。那个叫李排长的土匪，觉得再呆下去只有送死，于是化妆偷跑回了武川，最后也被我剿匪部队击毙。王毛仁的内弟马二虎，看到跟王毛仁当土匪终归没有好下场，也想脱身，在石门村向王毛仁提出，女人快要生小孩了，得请假回去照料一下。说完，放下随身带的枪就走。翻脸六亲不认的王毛仁一听就火了，在马二虎出门时，掏出手枪对准马二虎恨恨地说：“好！你小子也不跟我一心了。”在他抠动扳机时，匪徒们上去一夺枪，子弹射在门框上，

马二虎的命才被保住。第二天，马二虎向王毛仁说了好话后才回了家。马二虎回家不久，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并交出家里存放的一挺机枪。经人民政府教育后，给予从宽处理，让其回去参加农业劳动。

这时，以王毛仁为首的匪伙，连死带走损失了一半，留下的4名匪徒，丧魂落魄，昼夜逃窜。在人无吃、马无料的情况下，匪徒们强行抢夺，更加凶残。一次这伙土匪在小余太西边的太白山附近遇到了叫宫山虎的熟人，宫骑着毛驴，带着一匹役马。白海又饿又馋想吃马肉，就将宫山虎的马用枪打死。他怕宫山虎回去向剿匪部队报信，又将宫山虎杀害。匪徒们逃到什纳干后，杀了农民的一头牛，用来充饥。什纳干有个叫四喇嘛的老乡，因经常外出谋生，准备下些干粮，不巧遇上了这股土匪，将干粮抢走，还在四喇嘛的肩膀上打了一枪，致使四喇嘛半年不能下地劳动。

我剿匪部队为了早日肃清匪患，为民除害，经常夜以继日追捕匪伙。在与固阳县交界的大怒气发现王毛仁等后，剿匪部队奋力追击，匪徒们窜入深山躲避。通过这次追击，虽然没有将王毛仁等歼灭，但却进一步瓦解了匪伙。白海、张五小二匪离开王毛仁，各自奔逃。他们每日东躲西藏，不久被我公安机关抓获。

剩下王毛仁、张贵生二匪，日不敢入村，夜投宿山洞，经过三天多仓皇逃遁，自认为摆脱了剿匪部队的跟踪追击，在广生隆山上停下马脚，由张贵生给马拔草，王毛仁了哨。就在这时，我剿匪部队犹如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二匪面前，并向二匪猛烈射击，打得王、张二匪猝不及防，丢下子弹100多发，十五响盒子枪1枝，“汉林春”步枪、“七九”步枪各1枝和1架望远镜，逃入北山。

1951年秋季的一天，阴雨连绵，王、张二匪窜到乌拉山的大坝沟，从一户蒙民家中抢了一些吃的。因疲困不堪，就去沟里找了隐身处，将马拴在附近的丛林里，尔后倒头去睡。当他们被风

吹醒后，发现乘马不见了，他们就吹起口哨进行招呼。两匹马听见口哨声嘶叫起来，王、张二匪顺着马叫的方向走去，看见两匹马被拴在一个较高处靠近大石头的一棵松树上。由于二匪不明底细，不知是什么人将马牵走，虽索马心切，而又不敢轻易靠近马匹。二匪在丛林中窥视了一阵，牵马人发现了二匪，首先开枪射击，子弹从二匪身边飞过。二匪凭着多年的经验判断，认为牵马人的枪法不凡，加上不知细情，遂退下来。原来牵走二匪乘马的，是护畜打狼的蒙古族牧民那生乌力吉。二匪回到山洞，估计那个牵走他们马的如是本山沟里的蒙古人，第二天必然要往旗政府去送马。于是王、张在第二天一大早，来到沟口子埋伏好。等到前半晌，果然看见一个蒙古人骑着一匹马，后边带着他们的那两匹马顺沟来了。快到跟前，二匪一齐吹起口哨，二马听到主人的招唤，一下夺缰跑掉。那生乌力吉因不知虚实，便调转马头，飞驰而去。马匹回到二匪身边，已没有鞍鞯。二匪骑马走了一段路，因没有鞍鞯，实感不便，想入较大的村庄去抢马鞍，又怕碰到解放军难以逃脱。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既无马鞍，又无马料，骑马潜逃，又容易暴露，于是决定弃马步行。二匪离开大坝沟，步行了几十里，在坝梁与十一分子村之间的一块莜麦地里被固阳县的公安队发现，双方打了几枪，王毛仁的大腿上中了一弹。经张贵生给包扎后，二匪找了个藏身处，隐蔽起来。待到夜幕降临时，张贵生连背带拖，将王毛仁拖到磕石太山，找了个山洞，在洞里养伤20多天。伤好后，已进入冬季，王、张二匪感到在深山里潜藏，日子越来越不好混，于是逃到昆独仑河，乔装打扮成乞丐，计划经王大汉营子过黄河，到伊盟鄂托克旗一带躲藏。不料走到黄河中心，遇到一个又长又宽的亮子（水深处未能封冻结冰），因二匪均属后山人，不知道黄河封冻后会有亮子，却认为整个黄河未封冻，因而转身连夜回到前口子边墙壕村外，找了个避风处暂且喘息。就在这里，王、张二匪苦思瞑想，商议去向，最后决定，各奔逃生。

这时两个人身上还带着一枝加拿大手枪和一枝二号连枪，可是两枝枪只剩下一发不配号的小子弹。在分手时，王毛仁竟将两只手枪全部拿走了，气得张贵生暗自骂道："好一个姓王的，我跟你这些年，又多次救过你的命，如今到了这个地步，你连个要饭的家具（指手枪）也不给我留一枝，真是太没有良心，太不够朋友了。"

王、张二匪分手后，王毛仁在后山地区昼行夜伏，东躲西藏，企图逃脱人民的法网。

1951年12月底，我骑四师司令部参谋贺太保率领10几名骑兵，在后山地区到处追击王毛仁。当他们行进到小余太二十三分子村时，天空阴云密布，眼看一场大雪就要来临。但是为了尽快消灭匪首王毛仁，剿匪健儿们不畏严寒，在深山峡谷中披星戴月，搜索前进。到12月30日下午，当我剿匪部队到了点力素太附近的九分子村时，已经雪花纷飞，山上沟底，全是白茫茫的一片。这时，中后联合旗的10名公安战士在副队长陶克陶格日勒的带领下，也为追捕王毛仁来到九分子村。在太阳将要落山时，从东边来了两名骑马的老乡，向我剿匪部队报告说：在距九分子村5里远的两眼井处，他们见到了王毛仁。我剿匪部队得到这一情况，立即出发。当赶到两眼井时，当地老乡说：王毛仁从这里抢了些莜面，已经离开有一阵子了，但其去向不明。这时天色已黑，好在有雪映射，尚能觅路。我剿匪部队在几个路口处寻觅踪迹，终于发现了王毛仁离开时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我剿匪部队跟踪追寻了七八里路，见有两间低矮的土房，从窗户纸上映出明亮的灯光，战士们进入小屋，向主人打听来过个身子胖的人没有？主人回答说：刚才来了个身子很胖的人，朝北走了。贺太保与陶克陶格日勒一看情况吻合，便不顾深更半夜，带领战士们继续跟踪追寻。由于王毛仁留在雪地上的脚印时隐时现，再加上匪首的狡猾，为了少留踪迹，王匪有时偏离道路踩荒而行。我剿匪部队虽是骑兵，却很难快速前进。在拂晓以前，固阳县的几十名公安队员也为追捕

王毛仁乘马而来。他们三路兵马会合在一起，在天快亮时，行进到小佘太西边的公盛成口子（进入嵯石太山的一个沟口子）。贺太保决定就在附近村里老乡家休息一会儿，待日出后再入山搜捕王毛仁。

日头从东边山上升起以后，我剿匪健儿跨上战马，分三路从公盛成沟口子入山。由沟口子向西北侧延伸，便是嵯石太山西端一个名叫大白山的主峰。当时骑四师的剿匪部队从东北方深入，向大白山包剿过去；固阳县的公安队从西南方进沟，往大白山一带搜索；中后联合旗的公安队则从正面向大白山方向前进。在深入山沟五六里远的地方，发现匪首王毛仁正在大白山脚下一个向阳处靠着一块大石头晒太阳。陶克陶格日勒和丹巴瞄准王匪，同时开枪。王匪中弹后，跳起来走了几步又栽倒在地上。骑四师和固阳县公安队的同志听到枪声立即赶来，匪首王毛仁已经毙命。他们从王匪身上搜出2枝手枪，并将王匪首级取下，带到二十四分子村里。老乡们看到王毛仁首级，无不拍手称快。

匪徒张贵生在跟王毛仁分手后，化妆成乞丐，沿途讨吃要饭，潜逃到伊盟达拉特旗张四圪堵村住了下来，以给村里人做临活为生。他为了长期隐蔽，假报了祖籍和个人出生成长的地方，又改了姓名，伪装积极，骗取了当地人的信任，当了多年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娶了女人，组建了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当地追查他的历史问题，他自感难以继续隐藏下去，便偷偷离开达拉特旗张四圪堵村，跑到固阳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并把埋藏了20多年的一挺机枪向我人民政府交了出来。后被固阳县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7年。刑满释放后，回原地乌拉特前旗明安乡官牛犋村定居。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政协文史委　供稿）

河套地区剿匪纪实

霍　建

在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绥远方式”感召下，1949年9月19日，原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先生率领绥远军政人员光荣起义。

绥远起义后，周总理对绥远作出了“地区解放区化、军队解放军化”的指示。

1950年初，从包头到河套地区，驻扎着未经改造的数万国民党起义部队，等待我党对其整编。党的政工干部进入后，在军、师、旅、团都建立了政治机关，所有连队都派进一名政治指导员。这期间绝大多数起义干部，包括中上层干部，都衷心接受思想改造，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政工干部团结相处，感情融洽。至于士兵，更是盼望早日解放军化，为人民立功。

2月21日，由绥远省委、省军政委员会、省政府派出以沈新发同志为团长、邢情魁、黄波为副团长的绥西生产建政工作团，进入河套陕坝市及各县。3月末，陕坝军分区干部、战士进驻陕坝。此时暗藏在河套城乡的国民党特务分子便大肆活动起来。他们到处散布谣言，恐吓群众，扰乱人心，破坏我生产建政工作，离间河套人民和我党干部的合作，策动起义部队整连整团叛变。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特务分子与流散在地方上的反动军官、旧职人员、叛变部队、地痞无赖和原有的惯匪，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结成多伙股匪，抢劫群众财物，杀害无辜百姓，破坏社会治安。一些

较大的股匪，在特务的操纵下，竟公开打出国民党的旗号，攻打我县区所在地，杀害我县区干部，成为政治土匪。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河套地区的匪特活动更加猖獗，为害也愈来愈烈，加之驻扎在狼山县和陕坝附近的起义部队内部很不稳定，一些反动分子蠢蠢欲动，图谋叛变，以致搞得一些县镇人心惶惶，日夜防备。

根据这一情况，政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由绥远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和省军区派出人民解放军步兵、骑兵部队，进套执行剿匪任务。经过近两个月的进剿，将河套地区的股匪基本消灭。

现将河套剿匪前和剿匪中的一些情况忆述如下。

河套地区大批匪特之形成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解放前的河套，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傅作义率部进驻河套后，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就向第八战区的绥远地区（当时傅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副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设在陕坝）派来大批中统、军统特务，在党政机关和军警部门担任要职，秘密进行特务活动。接着美蒋在陕坝附近合伙开办的“中美合作技术训练所”，又训练出一批职业特务，派入当地驻军部队、地方机关、团体学校和解放区附近做特务工作。当时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特务头子张庆恩等，为了从事反共活动，在省县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积极发展网罗特务，秘密监视和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抗战胜利后，上述这些特务有的随机关东迁，有的随部队东进，有的则留在当地活动。

九·一九起义前夕，蒋介石派国防部长徐永昌等从广州乘飞机来到包头，妄图阻止绥远党政军官员和数万部队在董其武领导下即将举行的和平起义。徐在劝阻失败后，即同绥远当地和各省逃来绥远的特务头子秘密策划，重新调整了特务人员，严密整顿了特务组织，详细规划了未来形势下的特务活动。尤其对作为

“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反共根据地的河套地区如何开展反共活动，更是作了精心安排。为了适应共产党进入后的环境，徐将面目早已暴露、不利于留下活动的特务头子张庆恩（中统华北办事处主任）、祁觉民（绥远调统室主任）等带走，而将李鲲生（中统华北办事处副主任）等留下，以指挥绥远地区的特务活动。徐还利用与崔正春（保定军校一期学生，曾在绥远等军界政界担任过各种要职，时为临河县参议长）的旧关系，把崔叫到包头，委崔为“华北军政委员会”主任。时过不久，崔主持成立了“华北反共义勇军”，并以“总司令”的名义在绥远起义部队里为其委任了一些“军长”、“师长”，积极网罗反革命力量。

1948年，不少地区解放后，一大批特务逃来归绥、包头及河套一带；天津、北平、张家口解放后，那里的大批特务和原从绥远随国民党军队出去的特务，又混在愿回绥远安家的国民党官兵中间，一起来到绥包。

太原、西安、银川、榆林、兰州解放后，这些地方的国民党特务也纷纷潜来河套。如山西阎锡山的专员齐敬德一伙，甘肃有名的特务头子王富国，榆林有名的“调统”特务头子王之修，都带了一群特务来到河套。

九·一九后，绥包二市的特务绝大多数都转移到河套。以上这些家伙都深知河套地域辽阔，社会情况复杂，国民党统治多年，宗教势力雄厚，城乡早有长期潜伏的根深蒂固的美蒋阎特务的立脚点，特别是数万起义的部队中有不少人和他们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陕坝一地，原只有3万多人口，一下猛增至6万多人，街市上各行各业中，有许多人是有政治色彩的。于是他们便通过各种关系，在河套城乡和起义部队中潜伏下来，在九·一九后到1950年2月下旬之前近6个月的时间，在河套地区作了许许多多对抗我党的准备，光电台就汇集了13部之多。他们利用密码电台经常与台湾、香港联络，接受那里的指示。这是河套地区匪特形

成之一。

在七·七事变前，原绥远省归阎锡山统辖，因而有“绥远是山西的殖民地”之说。傅作义、董其武都是阎锡山手下的军官。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已暗地里把傅作义拉在手中。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又把绥远省划在第八战区，后又划为十二战区（山西为二战区），委傅为十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但傅与阎总有那么点微妙关系。天津、北平、张家口、大同解放后，阎锡山在这些地方的特务，便跑来绥远；太原解放后，除被我们抓获的特务外，有一些特务也千方百计地转来河套，猖狂地进行特务活动。他们在河套秘密组织“华北反共自卫救国军”，发展“铁血青年团”等特务组织。张选、马壮（原阎锡山手下的两个副师长）还公开成立“军官纵队”以及“山西干部收容所”，前后集中了4个中队，共300多人，进行特务训练，妄图将他们安排在绥远各部队内，渐渐掌管权力，反共到底。九·一九后，他们估计到绥包二城和绥西一隅，很快就有共产党的军政人员进入，于是张选、马壮便带上这4个中队，欲经河套过宁夏，转赴广州。此时，西安、兰州、宁夏先后解放，这些人遂滞留河套，一部分潜藏城乡各地，一部分进入阎锡山在百川堡（百川为阎的号）的屯垦队，隐藏下来。另外，曾在山西榆次、徐沟等地执行阎锡山“自白转生”（坦白自己过去的言行后，誓死拥阎反共。如认为坦白不彻底，就乱棍打死，山西人死于阎这一暴政者众多）暴政的特务专员齐敬德，在太原解放后，偷偷转至西安、兰州，组织起一伙“特工队”。这两地先后解放，他又带着这伙“特工队”转来河套，与马壮等特务联系上，一同投靠了潜伏于河套多年的特务崔正春。齐敬德手下的特务，混入各行各业，活动于绥远党、政、军、警、团和绥西各地。密设电台与香港、台湾阎锡山、蒋介石的情报机关联系。这是河套地区匪特形成之二。

九·一九起义后，绥西数万起义部队中的广大官兵，准备欢

迎我党派去的政工干部，接受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但是极少数顽固分子和美蒋阎特务相勾结，处处与政工干部对抗，反对改造，并暗中发展其实力。他们虽然穿着解放军的军装，戴着五星军帽，却采用“借水养鱼”的策略积蓄力量，或使用“水萝卜”伎俩欺骗同人。他们将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反攻复辟，因而时时准备将部队拉上山去和共产党打游击。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便迫不及待地率部叛变。如起义部队编为三十七军一一一师的副师长庞茂青率三二一团营长董钊50余人叛变；一一〇师三二九团一连连长张泰魁、三连连长张德彦，将我党派入这两个连的政治指导员、通讯员杀害，率60多名士兵叛变；一一〇师直属警卫连的两个排长杨天升、胡生明率30多名士兵叛变；三二九团副团长梁钊带24名士兵叛变；三十七军安恩达骑兵旅一团三连排长鲍喜才，带20多名士兵叛变；该旅二团康英带12名士兵叛变；该旅三团二连高水庆等14人叛变；该旅三团四连连长刘喜才带领一个整排27名士兵叛变。住后山份子地的鄂友三骑兵师一连长带领全连叛变，打死该连政治指导员、通讯员，又到团部杀害了团政治委员彭志超同志；安北县保警队杨世雄带领18名队员，杀害了该县副县长、秘书等叛变；西公旗卢万惠部的杨林等23人叛变；后王如意、郝鸿荣带出西公旗旗队20多名队员叛变；达拉旗的旗队长加木苏带随员叛变……他们的口号是：“背起枪，杀政工，上山投国军。”

九·一九后，我党为了安置改造流落在社会上而无正式职业的旧军官、旧职员，在五原县、陕坝成立了“无职干部招待所”，这个所也混进了特务，6月25日后，也拉走一部分人叛变上山。

以上多起叛变的武装人员，成了匪特的主力。这是河套地区匪特形成之三。

河套地区的匪特，尽管是一些乌七八糟的狐群狗党，然而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却是共同的。1950年2月，当我党人员进入

河套，要和河套人民一起铲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建设社会主义新河套的时候，他们组织特务团伙，拉起股匪，持枪行凶，瓦解起义部队，破坏我生产建政工作。6月25日以后，他们得到蒋介石集团的指令，认为美军很快就要打过鸭绿江，占东北，进华北，国军在美军协助下要反攻大陆，于是乌七八糟、股头庞杂、番号林立、三五人为一连、二三十人为一团、五六十人为一师的股匪，便公开打起了“华北反共义勇军”、“国民党游击队”、“反共自卫救国军”、“敌后游击第五纵队”等旗号，并在他们活动的地区，委派了他们的“县长”、“乡长”，向人民强要大烟，搜刮钱财和衣服鞋袜，甚至还摊派电池、手表。如在魏桓、赵三圪旦，每甲要手表3块、手电2个。在六八七圪旦，仅有10来家老乡，就给派下12块手表，限半个月交齐。有的县有几股匪伙，都委任了自己的“县长”。如米仓县的各股匪特，就委任了三四个“县长”。

暗藏在河套的美蒋阎特务，基于各股匪伙虽然反共目的一致，但是各自为政，不便同共产党斗争，于是便把这些各自独立的股匪纠合起来统一在“中国国民党华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的番号下，把多数股匪分子分别编为军、师、旅、团、营、连。在崔正春的领导下，由田树梅任总司令，马壮任参谋长，齐敬德任政治代表，李映南任参谋处长。任张疤子为师长，董钊、梁钊为副师长，下辖3个旅，12个团。3个旅长是张德彦、刘喜才、加木苏，并各兼一个团长；其余团长有：鲍喜才、王如意、郝鸿荣、陈进才、王耀武、魏殿文……另有一个李再团。匪司令部各处都有人选，各带几个随员，司令部直属一个宣慰团，团长王建和，一个动工团，团长张相辅。这些匪特总共不到1000人，多数骑马，装备都是轻武器，但有一些美造卡宾枪，多是起义部队叛变时带出来的。这些匪特盘踞于狼山西部西补隆、炭窑口、太阳庙一带，诡称万人，简称“国民党救国军”。他们每日拿着国民党的旗子，

升旗训谕，高叫“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蒋大总统万岁”等口号。

匪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以崔正春为首的这帮政治土匪，内部成员相当复杂，有中统、军统特务，有“铁血分子”，有“绥干团成员”，有起义部队叛变为匪的分子，还有各种反动会道门头子。在这些成员中，多数是些亡命之徒和大烟鬼。当匪首的只要手里有大烟，只要任下属胡作非为，就可以笼络住大伙。因此尽管他们口头上自称“救国救民”，而实际上却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在米仓、狼山、晏江、五原、安北等县的乌加河两岸和沿山地区，在东、中、西公旗的前山后山地区，直到伊盟境内的达、杭二旗和宁夏的阿拉善旗，匪特所到之处，见牛羊猪鸡就杀，见金银财物就抢，见妇女就强行无理，致使好些地方生灵涂炭，十室九空。在米仓县的白柜，匪徒们抢走白忠家4匹马、150只羊。为了要大烟，把老汉捆打了一夜。在太阳庙附近，一伙匪徒抢走了宁夏商人满载东西的19峰骆驼；在米仓一区平城乡三保五甲袁在家抢走17头牲口；在狼山县三区孟四村孟满发家抢走衣服、面料、毛毯几大包；在上蛮会，把一个老太太捆吊起来，要她把嫁闺女收的彩礼和干板子（大烟）拿出来，老人没有，匪徒们就用烧红的火钎在老人脸上乳房上烫；在平城一保一甲，把一个姓张的家抢了个一干二净，还将张氏打死，以致张家3个小孩无人养活。

匪徒的烧杀抢掠，使蒙人同汉人一样都深受其害。在中公旗一佐附近，匪徒们抢走218匹马、24头牛、46峰骆驼、80个鞍子、17副妇女头戴、48个银碗、47个鼻烟壶。至于抢走的栽绒毯子、绸缎布匹、皮袄皮袍，其数目都在几十匹、几百件以上。匪徒们在什尼乌素一带，把蒙民们的牛羊杀光，骡马赶走，妇女奸污，并把他们最珍爱的头带首饰抢走，锅碗砸碎，炒米木箱踏扁，糟害

得家破人散。在乌拉哈拉沙图西，刘喜才匪伙一去，就杀了蒙古族老阿妈10来只羊。老阿妈在夜里把其他羊藏起来，第二天刘匪把老阿妈藏匿的70多只羊搜寻回来，全部杀光。临走还把老阿妈家的3顶蒙古包全部烧毁，害得老阿妈一家老小无处栖身。在本巴图附近，有7户牧民的东西，几乎被匪特刁抢殆尽。在太阳庙一带，有140多家蒙民，都遭到匪徒的洗劫。匪特们到处抢掠，连喇嘛庙也不放过。如本巴图庙、哈尔呼格庙、太阳庙、乌兰奢力盖庙、阿贵庙、善丹庙等，都遭到匪特的洗劫。他们将这些召庙的神佛搬倒，把银铸的小佛抢走，把殿里的大铜壶、大蜡台砸扁，把旗幛帷幔扯碎，把庙里存放的奶皮、黄油、红枣、核桃、红白粮吃光，牲畜杀掉，把喇嘛个人的衣服和马匹统统抢走。在匪特们抢劫过的召庙，到处是人屎马粪，臭气熏天！

匪特毫无人性，肆无忌惮地奸淫妇女，他们所到之处，年轻姑娘媳妇无不遭难。在崔柜圪旦一伙匪特一次就强奸了11个妇女，其中有户人家2个儿媳和1个闺女都被强奸。在匪特们骚扰的地方，如果发现容貌俊秀的姑娘，往往是一二十个人一起扑去轮奸。在魏柜圪旦，刘喜才带的一伙匪特强行轮奸一个19岁的女人。在李五合村，有个怀孕8个月的妇女，被匪特追得流产在野地。匪特到了杨柜，把村子包围起来，然后强迫妇女出来“应酬支差”。有2个女娃娃没跑脱，非得去“应酬”不行。其父母给匪特跪下央求说：“孩子年小，积积德吧！”匪特把枪对准其父母脑袋，硬是把哭成泪人的女娃娃拉走。她父母哭着喊道：“她才14岁呀！”匪特狞笑着说：“没有14岁的女子，过不了老子们的瘾！”一家小姑娘才12岁，同样被匪特像老鹰抓小鸡子似的抓走，她妈“哇”地一声哭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

匪特们为了尽快扩大实力，对付我军剿捕，向部下提出：谁扩充人员多，谁的官就升得大。一个当团长的，如能将手下的二三十人扩充到五六十人，就可以委任为师长。于是一些股匪头头，

不论走到哪里，在抢劫财物的同时，都要挨门逐户搜抓青年，抓到多少就带走多少。有的股匪走在路上，碰见放羊的青年也要抓走。在米仓县西六八圪旦，一次就抓走刘得玉、徐三小等4个青年。一天夜里，匪特们住进义泰魁村，当夜就抓去赵小二、赵余儿、官财、郭三纳、辛旦志等8个青年……

匪特们还向群众进行欺骗宣传：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蒋总统反攻复国指日可待”、“共产党是先甜后辣”，以此来吓唬群众。如果谁不信他们的谎言，不跟他们逃走，便被扣上“通共分子”的帽子，进行拷打枪杀。仅在米仓一区匪特就杀害无辜13人之多。因而很多群众被匪特裹胁，被迫离开妻儿老小，上山为匪。

我剿匪部队纪律严明爱护百姓

由于河套地区匪特活动猖獗，危害日甚，我绥远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根据政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四师师长毕力格巴特尔带该师十团以及中公旗游击队，命令起义部队改编的人民解放军步兵三十七军一〇九唐副师长带该师三二七团，命令陕坝军分区张福来司令员带军分区红马、白马2个骑兵连和步兵营，在河套及后山地区共同执行剿匪任务。同时组成前方剿匪指挥部，由毕、唐、张3位同志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军分区参谋长刘生凯担任指挥部参谋长。参加剿匪的部队既有蒙族，也有汉族，既有步兵，也有骑兵，既有解放军，也有新改编的起义部队。由于各部队首长十分重视部队间的亲密团结和互相协作，在部队出发前，都向所属全体官兵强调了搞好与友军的团结和互相支援的重要性；同时学习了党在新区的各项政策，要求部队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实际行动戳穿过去国民党对我们的诽谤和匪特的欺骗宣传，为孤立和剿除匪特创

造了有利条件。

9月初，我各路剿匪部队在狼山县北刘富春的公中会师后，随即进入匪特自称“中国国民党华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盘踞的西补隆、炭窑口一带进行围剿。但是狡猾的匪特却多次突围，四处奔逃。有些则逃到后山的沙漠草原深处。

当剿匪部队分头进到匪特盘踞过的西补隆、新城、太阳庙、铁匠圪旦附近时，老乡们远远望见大马队来，便慌张外逃。到六缸房子时，全村跑得只剩下2个老头和1个老婆儿。战士们非常和气地对他们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可他们心里却疑惑地想：“土匪也穿着这号衣裳呀！”同志们说：“我们是来打土匪的。”他们也不相信。因此战士们对他们说上好半天话，他们只是点点头，“嗯嗯”几声。但事实却是最有说服力的。当老乡们看到解放军一个个精神焕发，威武雄壮，站有站法，坐有坐相；没有分好住房前，都整齐地坐在村边等着，或唱歌，或学习……在分好房子后，指战员们扫院的扫院，担水的担水，做饭的做饭，秩序井然，说话和气，尊称老乡声不绝于耳时，便对解放军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使那些污蔑解放军的谎言，不攻自破。有些地方在匪特逃离时曾经恐吓老乡说：“共产党来了敢回村的，我们绝不留情。”所以开始时，老乡们迟迟不敢回村。可是老乡们看到来的解放军不仅人数多，没一个抽大烟的，甚至连抽旱烟的也很少，而且武器精良，子弹充足，有炮、有机关枪，有步兵、有骑兵，兵强马壮，土匪是打不过的。再加上河套各县市党政军团的男女干部随解放军向群众做工作，使老乡们知道这些解放军就是当年打日本鬼子的八路军。于是，先是岁数大的男人回村了，继而年岁大的女人和男青年也回村了，最后姑娘们也回村了。解放军指战员向老乡们宣传河套、绥远和全国大好形势，老乡们便向指战员哭诉匪特们的罪行。有些老乡看到解放军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便把藏在外面的牛羊赶回来了，把埋在地下的锅碗什物也挖出来了。

一次，部队住在太阳庙附近一个村子，做饭烧了老乡10捆从洪水中捞出来的柴禾，给了1．5万元（合新人民币1．5元），这个老乡拿着钱愣在那里，甚为惊异。部队在六缸房子做饭时，不慎火燎了老乡的锅盖片子，给赔了2000元钱，老乡发笑。战士们在西补隆吃小米饭没菜吃，老乡柜上放着几根葱，却没有一个战士去拿点葱叶吃。老乡们都说："从祖辈也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这样规矩的军队。"一次，部队走了一天，也没见到一家老乡。到阿贵庙沟地，随羊粪蛋爬了七八里高山，才找到一家蒙古族牧民。当部队要用马驮的糜子换他5只羊吃，老阿爷要2．5石糜子，而部队给了2．4石，只要了4只羊。老阿爸感动地说："比，吉仁那素胡日特勒，伊木，赛音其日格，赛，乌吉勒！"（意思是：我活了60多岁只听说有这样的军队，今天才亲眼见到了。）

部队为追堵匪特，夜以继日地行军，一天走六七十里甚至八九十里，脚上起了泡，也没有借老乡一头牲口骑。可是每到一地，只要看到老乡成熟而没有收割的庄稼，就帮老乡抢收。军分区骑兵连在公主圪旦用一个下午帮老乡割了20多亩糜子。骑四师十团，一天给老乡割了180多亩庄稼，拾粪50筐。三二七团在平城只住了两天，就将各家老乡多日来未起完的山药、秋菜全部给起运回家。而部队不论在哪个村，买1斤白菜、1斤土豆，都要按价付钱。但老乡们说啥也不收，可是不收也得收。老乡们说："你们永远不要走了，我们养活你们。""有你们在，我们夜里就能睡个安稳觉。不然，土匪来了，我们又是野外芦草地里的客，连出气还得低声点。"

骑四师十团和军分区的红白马连，不论走到哪里，都自己遛马，自己铡草，自己添料，自己拉着马放青，生怕吃了老乡的庄稼。老乡们大小从小孩都围着看，他们说："过去国民党的马队和土匪的马队一到村，总是强迫老乡给遛马、铡草、喂料……有谁敢说个不字。象解放军这样一切都由自己干的马队，过去从来没

有见过。”

河套地区人口稀、村子少，大村二三十家，小村二三家。部队到一个村子，实际全睡在房子外、屋顶上。一次，骑四师十团住在太阳庙附近的王少东村，三四百人全睡在露天里，不巧半夜下起大雨，战士们被雨淋成落汤鸡，可谁也没有进老乡家去避雨。

部队在山后沙漠地带剿匪，不仅走二三百里找不到人家，找水尤其困难。部队天天在沙漠里行军，天上骄阳似火，脚下热沙如焙，身上汗都流干了，嘴唇粘得张不开，可就是找不到水。当得知再走20里才能到多索罗尔时，战士们忍着渴挣扎着硬是赶了去。可是那里只有一家牧民，被匪特刁抢的惨不忍睹，一看泉水，只有一点点。多索罗尔的意思就是一滴水。部队为了给老乡留下够饮用的水，几百人只用水滴润了润嘴。

战士们每次路过喇嘛庙，或露营在喇嘛庙附近，谁都想进庙里看看装饰、佛像。一些过去当老百姓时进过喇嘛庙的人，又说喇嘛庙里有这有那，和汉人的大庙不完全一样，这就更引起大家想进去看看的兴趣。但是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谁也不进庙里去看。有些战士渴了，也不进庙去找水喝。有个新战士在庙前阳坡下擦枪，班长看到了，就立即把他拉起，并说：“你忘了喇嘛庙前不准乱坐吗！”

由于我军的种种行动，感动了喇嘛。在部队离开时，往往是从活佛到大喇嘛、二喇嘛、三喇嘛，数十人、数百人同时颂经似地高呼：“宝日汗其日格（佛军）！”“腾格林其日格！”（救命爷，是天兵）。在部队离开善丹庙时，庙里的大小喇嘛欢送部队走了很远，并且高呼：“阿拉旦，齐力格！”（意思是金子，队伍）。战士们也高呼：“巴叶斯太！”（即再见）。

痛歼匪特　为民除害

8月10日，三十七军一〇九师三二七团，追击张德彦股匪，在大小红山口一带打了一仗。9月3日，李再匪伙窜至魏桅一带奸淫抢劫，我三二七团赶去，将其歼灭一部。齐俊德率各部匪众由山后窜来山前段六八、牛场湾一带刁抢，9月10日被骑四师十团、三二七团和军分区的步骑兵包围，痛歼其一部，余众四处逃窜，后被我一一歼灭，当场击毙齐匪俊德，活捉匪动工团团长张相辅、宣慰团团长王建和、营长丁芝仁及其以下匪徒51名，缴获战马69匹。9月24日，三二七团在铁匠圪旦以北的三桅补隆，将王耀武匪部歼灭，并将王匪耀武击毙。接着又在勾心庙再歼李再残匪，李与少数匪徒逃走。9月28日，刘喜才匪伙刚逃至善丹庙附近，就被我埋伏在那里的骑四师十团，中公旗部队快速歼灭，击毙和生俘匪众45名。张疤子率残匪逃往善丹庙方向，9月30日被我骑兵部队包围在南坑坑岭，击毙匪徒数10名，生俘匪团长杨天升、杜宝山及其以下匪众40余名。这时李再匪伙向东逃至郭四圪旦，被三二七团再歼。自此李再与手下数名匪伙再无音信。10月7日，军分区骑兵在信义昌牛犋，歼贾效起匪部20余名，生俘20多名。张德彦率领残匪20多名逃至东升庙北十八台，于10月12日被骑四师十团全部歼灭，活捉了张德彦和齐部参谋处长李映南等。……

匪特在我步骑兵部队日夜追击围剿下，走投无路，匪团长郝鸿荣于9月17日在阿贵庙投降，王如意于10月5日率残部投降，刘喜才带14名残匪，逃无去路，于10月11日向三十七军骑兵旅假投降，随即被扣。匪团长李建堂带32名匪徒向我剿匪部队投降，另有23名被地方政府缴械。至10月下旬，股匪只有鲍喜才、陈进才等匪首带数十名匪徒向同义隆北方向逃去，我骑十团进行了跟踪追击。

美蒋阎在河套操纵的股匪开头人数众多，他们又拉伕，又拉杆，扩充匪众；在起义部队中又不时有些连队叛变与其合伙，因而气焰十分嚣张。但是在我人民解放军新老部队的密切配合、协同进剿下，在这不到两个月的13次大小战斗中（不计地方公安、保安人员的小接触），击毙政治代表（特务）齐俊德、匪团长王耀武、贾效起及其匪众近200名；活捉匪师长（后升为司令）张疤子、匪参谋长马壮、旅长兼团长张德彦、特务张静、政治主任马子刚、参谋处长李映南、匪正副团长张相辅、王建和、杨天升、杜宝山、森可玺、康玉忠、加木苏等及其以下匪众239名。另外在我剿匪部队与地方公安人员的配合下，于9月30日把潜逃到伊盟杭锦旗麻迷图的“中国国民党华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也称“反共义勇军”的总指挥崔正春抓获，在另一处将匪总司令田树梅抓获。

在剿匪战斗中，我军共缴获步、马、卡宾枪等185枝、子弹5000多发、军用物资一部，战马330多匹，驴、骡、骆驼各一批，以及伪国旗、伪党旗、文件、信件等各一部。

缴获物资　归还原主

在山前，在后山，在农村，在牧区，每次战斗一结束，部队便动员附近老乡来认领从匪特那里缴获来的牲畜和财物。在善丹庙打完仗，牧民们一次就认走马50多匹、骆驼10多峰。凡战斗结束后没有人认领的东西和牲畜，都一批一批地送到陕坝绥西专署“剿匪物资管理委员会”，妥为管理。计有布绸213块、皮布衣裤238件、地毯63块、被褥98床、牛马羊皮101张、蒙人丈八长的腰巾多条、妇女首饰3副、银镯5只、金银戒指多枚、白洋92元、50两元宝1个、铜锅银碗一堆。另外还有喇嘛的大红黄袍、皮靴、念珠……蒙族的皮靴、皮袍等。这些仅仅是匪特使用毁坏

丢失埋藏后剩下随身带的。对缴获的牲畜，除认领走的外，都交军分区喂养，计有马273匹，骆驼50峰，羊142只，牛、驴12头，马鞍266盘。

专署、各县、乡都发出通知：凡是被匪特抢走的东西和牲畜的失主，只要带上县乡保甲介绍信，说明东西和牲畜的特征，来陕坝专署大院和军分区隔壁院领取。发出通知没过几天，各县、旗被抢的蒙汉族群众纷纷来到陕坝。狼山县三区大换圪旦梁来成认走棉被、衣服、布块多件。米仓新中乡六保八甲王治平领回马鞍一盘、牛皮数张。米仓二区刘子煜认走赤红大儿马1匹。米仓平城三保袁再，一次认走4匹好马（匪特抢走了他67匹）。凡是认准领走东西的老乡，都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如说“共产党、解放军是世上最好的人”等。

大批蒙古族老乡是从一二百里的中公旗、西公旗、杭锦旗、达拉特旗来的，还有从四五百里以外的阿拉善旗、鄂托克旗来陕坝认领的。10月18日，在专署大院把所有缴获的物资陈设起来，在军分区附近把缴获的马匹都拉来拴好。汉人、蒙人都笑着在东西前、马群里认自家的东西和牲畜。有的认去衣裤、牛羊皮，有的认去腰刀、银碗，有的认去头巾绸缎……但对不是自己的东西再好也不摸一摸。如中公旗一佐伦崩在所有很好的鼻烟壶中，却认领了一个较差的。如阿拉善旗的阿瓦干一进专署大院放东西的地方，就高兴地喊：“米尼！爪到拉！”（我的），随即抓起一双较新的仰头蒙古靴，当他拿起来看到靴内有一双新布袜子时，便立即撇出来放在原处，喊着：“米尼比先！”（不是我的）。杭锦旗吉告吾米得妇女，她家3副头带都被匪特抢走，这里陈列的3副头带，没一副是她家的，她只摇头，连这3副头带上一粒珊瑚珠珠也不动一动。西公旗维儿布已经认好一匹马，登记了，当他拉着马出大院时，他又仔细察看了马臀上的火印，发现有一点不对，便立即解开缰绳，把马放回马群。从晏江县来的一位大嫂，在衣物里

只认走一双穿过的布鞋，说这是她亲手给她男人做的，有好几双新布鞋，她说不是她的。

这一次，只认领走缴获物资的一部分。计有衣物200来件、马70多匹、马鞍40盘、骆驼17峰……牧民们骑在马上、骆驼上，举着认领上的财物，高兴地唱着感谢共产党、解放军的歌子走了。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政协文史委　供稿）

民初临沂匪情纪略

西　献

民国以来，事变更迭，乱及社会，危及民生。临沂地处鲁南冲要，军阀混战，兵祸匪患，灾难尤深。

“神山磨山，蟊贼万千”，这句话，至今还在临沂人民的口头上流传着。虽属夸张之辞，但也反映了当时土匪遍地的社会现实。据《续修临沂县志》载：自民国5年（1916年）至民国24年（1935年）的19年间，骚扰临沂地方、打家劫舍的股匪，有名的就有50余股，其中曾流窜数省的刘桂堂匪部，更为全国匪患之首。至于昼伏夜出、栖身草莽的散匪，更无从统计了。现将一些主要股匪分述如下：

王为：抱犊崮股匪，于民国5年（1916年）2月抢掠临沂八区。全县匪患自此开始，且成迅速蔓延之势。是年4月，匪首王为被沂防营营长张华亭击毙于鲍家庄。

王四麻子：是在临沂八区出没的另一股匪，于民国6年（1917年），被驻沂第七旅团长孔昭义，会同民团，击毙于该团之南桥镇西。

郭安：民国6年（1917年）12月，该股匪抢劫七区之车辋村。

张梁、于三黑：民国7年（1918年）3月，该股匪破四区之南曲坊村，掳男女40余人（俗称“绑肉票”）。

胡宗银：同年8月，该股匪破八区之横山镇，掳30余人。

张继先：该匪为抱犊崮股匪。民国7年（1918年）11月，大

掠县城以北之三区（汤头）、四区（鹅庄）各村；东屠五区（板泉）之枣棵村，杀82人，旋回扰南境六（今属郯城县）、七、八各区。翌年3月，匪劫二（城前）区之付家庄、车庄等处，掳33人。后被改编第五旅营长张华亭诱诛。

赵成志等：民国9年(1920年)，八区太湖村村民周成自外归，自言能以符咒避枪炮，用大刀杀贼。设坛授徒，蔓延全县。徒众分为红旗、皂旗等会。匪首赵成志、徐大鼻子、王景龙、刘四等匪徒，攻破太湖村，杀红旗会首领周成及徒众百余人，自此，遂分据八区各村，恣意劫掠。

民国10年（1921年）7月，徐大鼻子、徐黄脸、赵成志、徐牛等股匪占八区芦塘山一带各村，民多逃亡。民国13年（1924年)1月，兖州镇守使张培荣派张华亭往剿，擒斩匪首徐大鼻子等。

民国11年（1922年），山东督军派旅长吴长植来沂会剿抱犊崮土匪，要地方派筹给养接济。临沂县派给养，自此始。

孙安仁：民国11年(1922年)，该股匪破五区之姚家官庄，杀7人，焚房500间。民国14年（1925年）10月，股匪孙安仁、董福楼等占八区之兴隆镇。民国15年（1926年）1月，股匪孙安仁破六区之沙墩一带10余村。2月，沂州镇守使翟文麟派支队长杨镇藩剿匪于五区刘家屯，擒斩50余人。

赵妈妈（女）：民国12年（1923年）6月，该股匪破二区之迭衣庄，杀伤70余人，房屋尽焚。7月，第五旅旅长李森寻围股匪赵妈妈等于五区之涝坡圩，匿遁。掠三区之汤头镇一带。民国13年（1924年）3月，第五旅团长张烈擒斩匪首赵妈妈等。地方暂时肃清。

解玉志等：民国14年（1925年）11月，股匪解玉志等破五区（板泉崖）之南沙窝村，杀23人，焚房屋百余间。股匪宋东太等破四区之许家庄，掳30余人，杀5人。匪破五区之翟家官庄，杀8人。苏军（江苏驻防军）剿匪于卞庄。

孙复堂、田思清等：同年12月，匪焚三区（相公庄）之庙前村。股匪孙复堂、田思清等屠五区之穆家疃，杀1100余人，遂盘据苍山（今临沭县境）一带。民国15年（1926年）1月，匪破五区之楼子村，杀52人，全村尽焚。大股土匪窥城，至城南十里铺一带，被十一军军长王翰鸣派杨树藩击退之。

宋朝胜等：同年2月，股匪宋朝胜、刘天增、张黑脸、刘黑七（刘桂堂）等破四区之大山寨，杀63人，掳300余人。宋朝胜遂占程家屯。3月，刘天增、宋朝胜、宋东太等破四区之南曲坊，杀10余人，掳200余人。4月，匪破四区之闵家寨，杀20余人。师长方永昌剿匪于闵家寨，擒斩10人。匪首刘天增破土城子，掳400余人，旅长申策武夺回百余人。7月，股匪刘天增破二区之王家庄。村民肉搏巷战，毙匪147人，村民死182人。8月，股匪刘天增攻四区之庄家村，为村民庄元安率众击毙之。副贼张黑脸复纠匪破村，杀80余人，房屋尽焚。

徐宝献、王连庆等：同年4月，股匪徐宝献、王连庆、吴凤至、赵承学等，攻入八区之鲁坊村，经朱邑村村长徐成功等会各村民团击退，毙匪数十人。股匪徐宝献等破二区之守义庄，杀40余人，掳20余人。5月，匪破四区之庙疃村，杀83人。股匪赵家枌、徐宝献、谢立德等破二区之峰山村，杀200余人。又破小丁庄，杀46人。

同年5月，匪破五区刘家湖村，杀200余人。民国17年（1928年），匪攻五区之腾马庄，被击退。8月被招安之股匪武占山“先遣队”驻汤头乡，股匪赵家枌部驻相公庄索给养、勒罚款项，四处骚扰。9月，刘志陆率军来沂，收编武占山、赵家枌部。招安旅长刘福隆来沂驻防。10月，刘福隆解决赵家枌部于相公镇。12月，十军团长郭景唐剿匪于八区之王家场，毙匪首王连庆等40余人。得枪35枝，机关枪1挺。民国21年（1932年）9月，六十六旅旅长李占彪清乡，匪赵家枌、宋五、郭五等30余人被擒诛，余多远

遁。

许振邦等：民国15年（1926年）6月，股匪许振邦等破二区之富义庄，杀李传皋等15人，掳140余人。股匪围五区之山西头村，村民凌准、凌迪先、凌立端、凌云耀等率众死守。自5月至6月间，救出被掳挖圩墙的难民300余人。村民死49人。

自称苏鲁义军之匪首刘竹溪、高近彪、武占山等焚掠五区白茅村，杀5人，掳10人。

股匪陆宝山破二区之后东门村，掳11人。7月，匪破兰陵镇，破二区之城子村，杀20余人，掳200余人。

8月，股匪刘麻子破二区之尖山寨，杀21人，掳300余人。

丁大祥、相克爱：同年8月，股匪丁大祥、相克爱等破五区之西潘村，杀400余人，焚屋700余间。破二区之南大桥村，死伤20余人。民国17年（1928年）8月，股匪丁大祥破六区之挂剑乡民圩7处，杀500余人。九师剿匪于五区东部，匪遁。

9月，刘福隆部剿匪于五区陈家庄，擒斩匪首刘二顺、二平把（匪浑号）等40余人，毙30余人。救出男女50余人。

股匪趁四区北部闹虎列拉时疫，破该区王蝠鼻子寨，杀200余人，以寨内存粮，遂据为巢穴。

10月，股匪破二区之杭头村，杀5人，掳30余人。破四区之鹅庄村，杀7人，掳20余人。

11月22日，刘福隆旅开拔，索地方开拔费计4000元，并杀未赎之幼女7人，男2人。

12月，股匪丁大祥等掠五区之郑旺庄，大、小尤家一带，遂据守小尤家。

薛家斌民团剿匪于小尤家，匪遁往汤头以北。

十军杨虎城军长派队至汤头剿匪，股匪丁大祥遁之莒县夏庄，投奔刘桂堂。

十军剿匪于五区之小官庄，擒斩80余人，得枪40多枝。

民国 18 年（1929 年）1 月，二十一师（十军改编）剿匪于费县薛南村，追于朱柳屯。匪据民圩死守。兵士跃入，毙匪 180 人，得枪 80 余枝，自是，匪无敢拒守者。

匪破五区之埠上村，掳 150 余人。二十一师追匪至江苏省桃源村下庄，匪尽弃“肉票”而散，毙匪 20 余人，得枪 15 枝。

二十一师师长杨虎城剿匪于五区东北部，歼丁大祥匪部于莒县之夏庄。

李斗金、李斗银等：民国 15 年（1926 年）9 月，股匪李斗金、李斗银等焚掠兰陵镇西五六十村。10 月，二区民团首领王伯英破股匪李斗金、李斗银、赵家裕等于小官庄，毙匪 20 余人，救出被掳男女 399 人。

史思聪等：民国 17 年（1928 年）2 月，股匪史思聪兄弟，劫五区之齐庄一带各村，杀 40 余人。3 月，破三区之旦彰街，杀 14 人，掳 47 人。8 月，股匪劫六区、五区东部。警备队刘队长剿匪于苍山（今临沭县境）一带。擒斩积匪袁兆文兄弟及余党 20 余人。

刘殿选、刘四、赵连峰等：

民国 19 年（1930 年）9 月，五十八师剿匪于八区之店子街，击毙匪首刘四及其党羽 20 余人，得枪百余枝。

民国 20 年（1931 年）9 月，八十一师展书堂师长，剿匪于五区之白带、河里等村，擒斩 50 余人。

民国 23 年（1934 年）2 月，六十六旅擒斩巨匪刘殿选。

民国 21 年（1932 年）9 月，马陵山巨匪赵连峰等破二区之三重村，掳小学生师生 38 人，死者 24 人。八十一师剿匪于马陵山，擒获窝主薛谦德等。

刘桂堂（匪名刘黑七）：

民国 15 年（1926 年）2 月，刘匪等破四区之大山寨，杀 63 人，掳 300 余人。民国 17 年（1928 年）8 月，匪首刘桂堂招安过境，沿途骚扰，送款 3000 元，始免入城。民国 18 年（1929 年）2 月，

二十一师师长杨虎城破刘匪于莒县之大店镇，毙匪280余人，得枪百余枝，后以调防退兵。

民国21年（1932年）3月，巨匪刘桂堂自河南窜回鲁南，经六十六旅参谋长郭鸿儒督队在青驼寺镇截剿，不得回巢，即窜入五区东部，连破穆家疃、蔡庄、刘家庄、李家埠等10余村，杀20余人，劫掠一空。4月，师长孙桐萱、谷良民、展书堂各部会六十六旅歼刘匪余党于五区北部。

民国24年（1935年）2月10日，旅长李占彪趁旧历上元节，派队擒斩土匪40余人于五区之欢疃沟村。自是，临沂地方积匪患十有九年，始算肃清。

（山东省临沂市政协　供稿）

安徽匪祸三例

史慕山　谭昆山　张凌九

李老末股匪焚掠六安

1928年农历四月中旬，盘踞在河南的匪首李老末（又称李老猫），率领大股匪众由河南窜到金家寨（距六安210里），后复相继东窜进占麻埠和苏家埠（距六安只40里）。匪徒凶悍异常，防堵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一触即溃。李匪向六安县城愈逼愈近，国民党县长邢元伟、警备营长蒋鹏程弃城逃到县城东二十里铺，所携枪械，被当地红枪会缴去。23日拂晓，李匪遂由苏家埠一路顺利进入六安城。

李匪进城后，挨门逐户，搜劫金银首饰。铜钞不要，撒于地上。有贫苦居民未及逃走者，被匪捉去，须出钱始行放走，否则砍其头或断其手足。夫子庙水池中死尸成堆成堆，四肢多残缺不全。青年妇女大都被奸污，有轮奸而死者，有奸后又以刀穿破肚腹者，也有的妇女惧被侮辱投井而死。南内三道巷苏家大井一处即死妇女40多人，残酷之状，不能尽述。24日李匪离开六安，临走时绑去男女1000余人，又在四门内放起火来，直到25日下午四乡红枪会进城，才把大火扑灭，仅存北门内几道街未烧，余则尽归灰烬。李匪离六安复进窜霍山，因霍山早已得到六安失陷的消息，人民纷纷逃走。李匪到时，除抢劫放火外，所绑肉票不多，

仅住一夜，即呼啸向潜、太的山中而去。

不料30日黎明李匪又回窜六安，匪众比前增加，红枪会未与接触，亦先时而逃。匪众如入无人之境，搜索一空，越两日扬长向西而去，进驻苏家埠不作走计。

李匪住在苏家埠不走，其主要目的，乃为利于赎票者就近赎票。对前来说票者，非常客气，名曰“接财神”。但无钱赎票，则一日三审，不分男女，用大板凳压其手足，不使动弹，用铁丝鞭其背脊，名曰“刷鸭子毛”；有因受刑过重，立时死于鞭下。历时过久无钱赎票，即以大石砸其脑壳，名曰“砸鳖”。故被匪砸死者，全是贫人以及家中无人奔走者。

至五月初四下午（注：即在匪徒两度窜入县城，放肆烧杀淫掠、如入无人之境达12天之后），驻防蚌埠的国民党第九军第十五师师长黄国梁才率领军队，经六安向苏家埠进剿。匪被击溃，向麻城逃窜而去，黄部即停止追剿。

那时六安已陷于无政府状态，市民不许弃职逃跑的县长邢元伟复任，公推六安商会主席周子谦（合肥人）为六安县临时县长。鉴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皖西一带红枪会自发地发展起来。

关于匪首李老末，有人说，他是河南禹县人，弟兄有6个，他最小，故曰“老末”，本名叫振威，曾在刘镇华镇嵩军当过下级军官，以闹饷而变为匪，联络豫匪韦大邦、刘开泰、李效忠（李老末侄儿），号称三团；另外有李祥玉骑兵一营，最为残酷。

股匪老洋人陷阜阳

阜阳县为皖北较大的县份之一，土地辽阔，物产丰富，向为股匪垂涎之地。1921年冬季，有河南鲁山县匪首外号老洋人（其真实姓名叫张庆），啸聚、裹胁鲁山、宝丰一带匪众不下万余人，

窜犯阜阳。此时城防部队是民团组织。民团司令倪道煦，是倪嗣冲之侄，乃一纨袴子弟，且昧于军事，谬掌兵权。所属之团长倪德馨是其族侄，其年龄较长于倪道煦，双方争权夺利，对城防责任却互相推诿。老洋人匪众在攻城前即以少数匪徒，化装商贩，携藏短枪、炸弹，混入城内，城防部队尚不知不觉。入夜，匪众逼近城郊，驻防西关的民团部队，约有一营兵力，与匪一经接触，即被击溃。当时已混入城内之匪，响应而起，一面袭击守城门官兵，一面呼喊："老洋人进城了。"遂纵火焚烧民房。当大股匪众攻入城中，民团司令倪道煦、团长倪德馨仓皇失措，竟混杂在难民中逃走。老洋人匪众在城内盘踞三日三夜，肆虐烧杀淫掠而去。临行架去青年少女60余人，连同所劫掠的财物，回窜鲁山老巢。被架妇女之家，携钱去鲁山向匪赎票。老洋人以绑架之票，按其家资多寡，或成万，或成千，最低者五百元现金，予以赎回。官僚富豪之家，有此财力者，都将其妇女赎回，无此财力之户，只有忍痛将其女儿弃之不问。这是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给人民带来的浩劫。

阜阳西乡的一次匪劫

阜阳柴集西12里李楼鼓寨是一个较大的寨子。1928年秋，匪首老王泰纠合数股杆匪，号称5万之众，盘踞柴集以西一带，纵横百余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四乡居民到李楼鼓寨避难的800余户，男女老幼共3500余人。当匪众攻寨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闻不问，不发一兵一卒。该寨寨长李老秉，为自卫计，率同圩户各执土枪与匪对抗，激战一天一夜，终因众寡悬殊，天将明时，被匪众从寨西北角攻入。因为圩户敢于抵抗，匪众不由分说，遇人即杀。有怀抱婴儿的妇女，先用刺刀扎死婴儿，后杀其母；六七岁儿童，亦无一幸免。寨外匪众布岗如林，五步一岗，十步一哨，

犬牙相错，任你插翅亦难逃出。来此避难的3000余人，连同寨内居民共4720口全部死于匪手；其中只有一名叫李老显的见杀势太凶，钻进死尸堆里，得以幸免。匪退后，有外村王焕章者率人掩埋死尸，共占地40余亩。匪徒惨绝人寰，不忍卒述，迄今回忆，尤令人胆寒心颤！

（安徽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临泉设县前的匪祸

于丹忱　王树九　王慎修

临泉原系阜阳西乡的一部分，地面辽阔，文化落后，民性强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政治腐败，盗贼蜂起，凶残的匪徒攻城破寨，烧杀抢掠，广大百姓惨遭涂炭。自1922年豫匪老洋人（姓张名庆，河南宝丰人，因长相象外国人，所以人称"老洋人"）大股土匪经沈丘、杨桥攻陷阜阳后，至1933年10余年间，大杆（5000人以上）、小股（千人以下）达20几起。豫匪王泰（名学聚）、李老末（名不详）两大杆，窜于沙、洪河之间和新村集以西地区，拉来拉去各七八趟。同时，西方尚有老康、老狄、张保银等股，到处烧杀、掳掠、奸淫、惨绝人寰。各地群众为保卫身家性命，聚集在各自建筑的寨内，英勇抗击股匪，事迹可歌可泣。现将临泉部分集镇抗匪和受匪患情形略述于后。

一、李老末股匪攻破杨桥连陷七里桥的惨状：1928年冬，匪首李老末率匪徒二三千人，由河南省的汝南、新蔡、正阳、息县、沈丘等地窜入阜阳西乡（现临泉境内），于旧历腊月二十四日夜半攻陷杨桥。当时杨桥为阜阳西五镇，镇董张香山率民团数十人不加抵抗，一枪未发即率队保护家眷扒越寨墙，逃往阜阳。时值大雪初晴，田野积雪尺余，沟河均结厚冰，群众正在熟睡，半夜被枪声惊起，披衣扒墙渡沟陷于冰窟冻淹而死者数十人。

该匪徒进入杨桥集后，大肆抢掠，青年妇女被奸污的不可计数，又强迫少女与之"结婚"。一日即有匪首鸣炮结彩举行婚礼者

三四次之多。被奸妇女投井投沟自杀者亦有10数人。

时积雪溶化，街道泥泞，不易通行。匪徒即令将居民之衣物布匹以及各商店购办的旧历年货、纸张、红白糖和做成的糕点等铺垫在泥泞的大街上，以便匪徒人马通行。

杨桥集南的七里桥，距杨桥7华里。李匪攻陷杨桥后，七里桥附近村庄居民均扶老携幼避居寨内闭门固守。时寨内仅有长枪一枝，子弹百十发，即交一善射的退伍军人董姓使用。董姓射术准确，一发击毙一匪，弹无虚发，在寨墙上四面游动，向外射击。3小时内击毙匪徒30余人。匪徒大怒即由杨桥发出全队向七里桥寨猛烈进攻。寨内终因子弹已尽，寡不敌众，遂被攻破。匪徒盛怒进寨，不论大人小孩见一杀一，鸡犬不留。死尸抛至寨沟，沟内雪水尽赤。事后统计，被害绝户者30余家，其祸之烈，惨绝人寰。

二、崔寨抗匪：崔寨是一较大围寨，入寨避难群众达五六千人。1928年冬，李老末自方集拉来，先派几个匪徒，各带手枪，到寨东张老建家，威逼张陪同到寨内看看，表示决不打寨。实际是察看地形和寨中情况，夜间即将寨包围，黎明发动猛攻。寨中人奋起反抗，虽众寡不敌，武器悬殊，但仍密布寨垒，持械搏斗，不稍畏缩。尤其是守御南门和东门寨墙的大金庄等几村群众，平日习练武术，毙匪甚多，匪势稍挫。内奸张某突发三信号枪（立被群众击杀），匪又猛扑过来。守卫南门和南寨墙主力，正拼死决斗，不料匪从北面越寨沟（冬旱无水），头顶粪箕扑入。待南面守御者发觉，已腹背受敌，无路可逃，各自为战。所以南门和南寨墙群众战死特多，因人过密，尸体大都僵立不能倒下。匪众入寨大肆放火，并追击掳掠逃出群众。事后估计，死难及被掳走者，不下2000人，各村居民甚有死绝者，更惨的是匪徒灭绝人性地把被遗弃孩童都投入井中，而被掳走无下落者现尚有很多人。

三、李寨抗匪：崔寨破后，李老末、王泰两股合伙，窜至新

村集盘踞。集南李老炳寨也是一大寨并很富有，被匪视作猎食对象。先攻数次未逞，反伤亡一些匪徒。后匪摸清寨中底细，集中全力，轮番猛扑。守御群众并不畏怯，拼死抵抗。终因众寡悬殊，火力更远远不能相比，加之整天搏斗不得休息而力竭，被匪攻入。匪入寨后，见人便杀，逃出群众受匪内外夹击，得脱者，十不二三。真是鲜血染遍大地，尸骨横陈原野。匪徒走后估计罹难群众足有四五千人。尤为惨者，当时由于匪乱，家家养狗警戒，主人死光，狗不得食，相率啃食死人尸体，后竟成群结队扑咬生人噬食。一时路断人稀、行旅裹足。西方商人往阜阳购货，均结队持棒而过。当时有一民谣："李寨人，死得真惨；崔家寨，一股狼烟。"

四、攻不破的段楼寨：该寨在杨桥以北，寨主名李和光。1929年初李老末股匪从杨桥拉来时，周围群众闻匪残暴，皆扶老携幼急入段寨避难。人们深知守住围寨，才能保全性命，所以守寨群众，同心协力，斗志昂扬。经过严密的部署，不分男女老少一齐上阵：青壮男子手持火枪、长矛、大刀，两人一门土炮作主力；壮年妇女持扒铲、短刀辅助，同登寨墙守御；老年、儿童拆砖往寨垄搬运；老弱在家做饭、烧水；留一部分精壮男子作机动，巡回视察应援。当匪猛扑时，远则发枪，燃放土炮轰击，近则长矛刺，大刀砍，飞砖砸。匪徒爬墙，妇女扒铲、短刀齐下，或劈匪首，或斩匪腕，断匪手指。激战半日，匪见守御坚固，不能攻下，又搜集邻村秫秸，在四周高地，堆成高丈余大垛，匪徒爬上垛顶向寨中俯瞰射击。寨中人立即用耙齿裹上棉絮，浸以火油，装入土炮向垛发射，迅即燃起大火，烧得匪徒抱头鼠窜。激战两昼夜，寨中井水断汲，只得取沟中浑水饮用。但守御不懈，仍英勇战斗，方将匪击退。事后检验，匪遗尸寨墙外，周围皆是。单被妇女砍下的匪手腕、手指就有20多双，战斗激烈，可以想见。寨中群众亦有伤亡。段楼寨人抗匪英勇事迹，当即传遍各地。

五、老戴正盘踞瓦店、姜寨、庙岔：1927年春老戴正（河南

临汝人）率匪徒6000余人，枪支、马匹等装备齐全，在阜西边境之瓦店、姜寨、庙岔一带盘踞时间达4个多月之久。在此三处纵横百余里范围轮回窜扰，烧杀抢劫，奸淫掳掠。自春及秋无辜群众四散逃难，夏收秋种均告停止。真是路有遗尸，野有饥殍，路断人稀，惨不忍睹。等国民党军队孙建中部开来，匪徒已向西南湖北一带窜走。随地抛弃所掠财物，军队于后争相拾取，军、匪两利，受灾群众无处呼冤。该地区因失于耕种，次年即成灾荒，但未见政府有分文救济，一任穷苦百姓自生自灭。

六、王老八匪部攻破沈丘集（临泉）的惨状：1928年10月，由河南窜来股匪王老八（杨埠南25里的王庄人），集结匪众5000余人，围攻沈丘集。10月14日沈丘集被匪攻破，集内居民四散逃走。当时匪徒据寨向附近村庄抢掠，集西的染坊庄、王庄两村聚众抗匪，终因寡不敌众，匪徒攻进两村，杀伤群众70余人。匪众在沈丘盘踞二三日，率众东窜将刘洪魁、王明德等105人架走，打死刘明昆等40余人，纵火焚烧房屋200余间，集内商店住户均被抢掠一空。

七、赵洪善股匪践踏庞楼寨：匪首赵洪善，黄岭西王大庄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其祖父系清朝末年的武进士），幼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吃喝嫖赌，终日和匪徒、流氓鬼混，后聚众渐多，先是绑票勒索，随即白日抢劫。匪徒以赵洪善系官僚后人，在一方有点声望，乃共推赵洪善为首，聚众三四千人，东拉西窜，到处烧杀淫掠，横行豫皖边境各县，惨遭其祸的何止千万众！

1932年7月20日，赵股匪窜围庞楼寨，四面猛攻，事前有匪众杂于逃难人群之中，潜入寨内，里应外合，不到一个小时，即将庞楼寨攻破。匪徒进寨大肆抢杀，死伤群众有70余人，妇女被奸污者30余人，羞愤自杀者10余人，临走放火烧毁房屋100余间，寨外麦秸垛全被放火烧光。窜渡泉河路经曹庄、老刘庄、冯营、清凉寺等地，因清凉寺寨内居民闭寨门抵抗，匪徒将寨打破

杀死壮男23人，妇女9人，并将小学教员任德显投入火内活活烧死，其状之惨目不忍睹。

后国民党军队尾追剿匪。匪在前走，遗弃财物遍地，任官兵抢夺，匪徒回身又击官兵，官兵后逃，遗弃枪弹于地，任匪徒拾去，以资补充。如此来往拉锯，兵匪各有利益，只是百姓无辜遭难。

（安徽省阜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巢湖土匪

凌厚全口述　蒋伯举　黄庭宣整理

巢湖水面辽阔，地形复杂，又系交通要道，解放前，历来为流寇土匪出没之所。因我生长于紧靠湖边的大湾村，自小帮人在船上烧锅，学过弄船，后来也曾自置一只黄梢子木帆船帮客运货，兼做过短期的粮食生意，经常往来湖中，不得不与一些土匪正面接触，互相认识。1939年秋，我曾奉命深入匪巢，与匪周旋。现就记忆所及，略述当年这方面一些见闻。

(一)湖匪的由来

我初记事时，就常闻湖内多有杀人越货、贴票绑架的事件。抗战前，湖内比较出名的土匪有：白石山的夏长俊，长塘嘴的沈必山，新河口的苏广荣，派河的王二孬子，南湾的郑绍财，散兵赵开国、赵开炳等。但那时湖匪只是零星小股，一般三五成群，活动也较隐蔽。抗战时期，日军铁蹄践踏江淮，滨湖各县相继沦陷，巢湖周围，一时成为国民党、日伪、新四军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政治局面、社会秩序均异常混乱，湖匪遂逐步发展起来，气焰极为嚣张。这一时期，巢湖土匪有三股：①郭道发股。郭道发人称"郭老小"，原在国民党安徽保安团当兵，后结伙入湖为匪；②夏作三股。夏作三原是驻安庆大塘圩伪军官，后携长枪300多枝、重机枪1挺、轻机枪11挺，率众入湖为匪；③夏可三股。夏可三

原在沿江一带为匪，因巢湖是个“三管三不管”地区，且物产富饶，商旅较多，遂移匪驻此。这三股土匪，以夏作三股实力较强。夏可三股和郭道发股不相上下，在这三股土匪啸聚巢湖之后，原来在湖上活动的零星老匪被分别兼并，附近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也陆续来归。也有少数群众不堪国民党或敌伪政府压榨，迫于生活，误入歧途。同时在湖匪经常盘踞之地，如庐江的白石山、齐头嘴，合肥的塘西、新河、施河等处，居民不为匪即窝匪或者通匪，否则无法生活，所以当时这些地方被目为“匪区”。

（二）组织形式和活动范围

湖匪的大小头目，多系蒋军、伪军的官兵转化而来，因而他们也采用部队的编制形式。郭道发成立一个“大队部”，自称“大队长”，下辖8个分队，分队长有魏正邦、周德玉、魏家宗、“八道劲”、“二党子”、“孙大手”、“丁大师爷”、“吴小罐子”。夏可三则一度设“司令部”，自称“司令”，并竖起大旗。下面的大队长有张海清等，分队长有夏登池、夏可斗、夏小开、吴小嘴、吴其年、王一江（绰号“小日本”）等。夏作三也成立了“大队”，自称“巢湖大队长”。下面的分队长有：褚××（忘其名）、高家英、徐保见等。湖匪头目出行时，通常是前短枪后长枪，前呼后拥，威风凛凛，爱妻宠子也伴随一道。吸大烟者还有专人携烟具侍奉（夏可三即是）。他们的住所不定，日间散处港汊，晚间则集中民船几十只，联在一起，浮居水面，四围撒岗。他们的统驭方法是统一指挥，按级服从，集体策划，分别活动。

巢湖三股土匪，为了便于活动，依据天然形势和具体情况的不同，划定各自的活动范围。郭道发占据巢湖西湾一带；夏作三占据南湾一带；夏可三占据东湖一带。在划定界线以内，互不干扰，并订立信约：凡经某方征过“税”的商船，互凭收据或路条放行，不得留难阻挠。

（三）水陆并抢　匪寇勾结

湖匪虽分三股，各自为政，但所用的抢劫手段和分配办法，则大致相同。首先是在水面上拦路行劫。每天派出匪徒，伪装成渔民或船民，乘小舟靠近交通道巡逻，遇有过往商船，即鸣枪喝止，掠去货物，然后把人船放走。如无贵重货物可掠，又无较多现金可取，而能判明确系有钱的老板，就把人扣留下来，限令缴款。其次，在陆地上贴票绑票。贴票分两种对象：贴一家一户的单独票和贴一保一村的集体票。夜间派人把写好的条子（上面规定款额、限期及兑票地址），贴在预定对象的门上，或投进屋内。绑票也分两种：①个别富户的重要人物——家主或最得力和最宠爱的儿孙；②全村或全保的主要人物（如保长、村长或士绅）。夜间派人把他们捉来，进行谈判，同贴票一样规定款额，限期回赎（钱自然由全保或全村筹付）。不论贴票或绑票，经过讨价还价以后，不得低于半数。如过期不缴票款，对被贴票人前往恫吓，以至烧杀，闹得家家户户鸡犬不宁，直至达到目的而后已。巢城附近有个孟老三，他的儿子被绑，共用去3000余元才赎回。地主孙吉成儿子和侄子被绑，共用去8000余元才放归。此外还有登门掳掠。被掳的对象，一是由土匪自己派人打探的，二是由勾引人报告的。对象确定之后，夜间率众去抢，着重是逼取现金。逼取的手段，是一打二烧，打是用严刑拷打，烧是用蜡烛烧身。贴票绑票、登门强抢的事例太多，难以枚举。湖匪抢劫和绑票所得的财物，其分配办法，是先由大小头目从中合提20%，其余则以一人一枪为单位，按数均摊，美其名曰“经济公开”，如果有人抢不到，则向头目领取均摊的半数。

抗战前期，湖匪依靠抢劫绑票所得，尚可维持现状。后来人数渐多，入不敷出，乃勾引沦陷区的日本洋行（如三井、三菱、大丸、安元等）和买办商人，把布匹、食盐、火柴、煤油、肥皂、香烟、啤酒等，

通过湖匪盘踞区运往其他城镇；或由其他地方换购土特产物品（如油漆、米、麦、苎麻、明矾、花生），运往敌占区，从中抽取15—20%的“护航保险费”，以扩大财源，巩固内部。

（四）湖匪的内部矛盾及其火并与瓦解

巢湖三股土匪，人数最多时约有两三千之众，差不多是人手一枪，有美式、日式等，子弹也足敷应用，这些武器除有些是匪首从国民党部队里带出的外（如夏作三），其余都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搞的：①从国民党军队手里买的；②从伪军那里买的；③从有枪人家抢来的；④限令被绑架人备枪赎票取得的。以上4个方面相比较，前两个方面是主要的。他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凡匪众中与蒋方或伪方有直接或间接的亲戚朋友和帮会关系者，就叫他设法打通关节，拿高价收买枪支弹药。双方谈好价钱后，一般都由卖方包送到手。郭道发和夏可三部，开始武力不足，最后也发展到人枪七八百之多，与夏作三相差无几，主要就是采用上述办法搞起来的。

湖匪三股划片活动后，初期尚能各守界线，互遵信约。过了一个时期，由于吸收湖匪渐多，而各部专靠在限区内打劫分摊一点财物，难填欲壑。于是有些匪徒，碰到机会，就瞒上不瞒下，乘隙越界行事；对于他方发给收据和路条的商船，也往往故意留难，索取贿赂，甚至掠去财物。久而久之，湖匪三股之间纠纷四起，矛盾迭生。据说这是由郭道发部下开的头，夏可三、夏作三部下亦相继效尤，循环往复，愈演愈烈，由小摩擦到大冲突，终于酿成互相火并。一次，夏可三亲率所部到孤山附近，打死郭道发手下四五十人。历时既久，湖匪中力量较强的则为所欲为，企图独霸；而力量较弱的，则只能别寻靠山。

到了抗战末期，三股湖匪间，一方面由于内部矛盾日益尖锐，难以并存；另一方面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打击和争取下，湖匪队伍发

生了根本动摇和分化。当时由于湖匪同蒋军和伪军气味相投，本质一样，大多认不清形势，看不到前途，接受蒋方和伪方"招安"的，为数较多。如夏可三先为国民党桂系军队五二八团收编，不久又转投汪伪皖中清乡司令吴道南，编为"第一大队"，驻中庙和姥山，担任巢湖的防务。有一天他上槐林嘴，在茶馆吃茶，被结有仇恨的匪徒乘隙枪杀，连大老婆和大儿子也一同被打死。夏作三先是由国民党巢县警察总队司令杨惠农收编为大队长，收编后夏惟恐被杨缴械，重把人枪拉下巢湖为匪。迨胡正刚调任伪巢县县长，夏复向胡投靠，任"大队长"。胡调至当涂县，夏亦带队随往，抗战胜利后，在当涂被国民党收编。解放初期，夏作三逃往太湖沿岸潜伏，最后由上海捕解巢县，带至白石山枪决。郭道发由伪清乡大队长朱亚堂收编，朱部后被桂系军队打垮，郭的腿部受伤，他把所部交给伪清乡司令第二师第一团团长陈俊之统辖（陈以后又投降国民党），自己退归家乡（长临河）开大烟馆，解放后被捕判刑。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奉命北撤，国民党重又实行黑暗统治，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巢湖两岸，民不聊生，有些残匪余党，又继续活动起来，抢劫之事时有所闻。同时滨湖居民中，因不堪国民党压榨，也有少数人被迫铤而走险，沦为湖匪。不到两年时间，巢湖匪患又逐步蔓延滋长。所幸为时不久，解放大军南下，迅速解放了全国。巢湖地区群众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通过反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提高了觉悟，改善了生活，严格了户口管理，加强了社会治安。巢湖的土匪，才真正肃清，匪患才彻底消灭。

（安徽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记浙闽海匪

陈子滨　苏宰衡

海匪与“护航队”

旧社会里向有行路难之叹。这“难”不仅在道路崎岖，交通阻梗，尤其是山头海面都有土匪横行，拦路打劫，过往客商非照章献纳“买路钱”就无法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

解放前，从温州到台州这一段短短的海面上，就有两股海匪：毛止熙（其势力范围包括自小门山到洞头一段的瓯江洋面上）和王献金（其势力范围包括自洞头以北至舟山一带的台州洋面上），而浙闽洋面（从福建洋面至洞头一带）则另有乌军之滋扰。

凡往来上述洋面之客商船只，均得照章纳费，向海匪购得“片子儿”和“顺风旗”，以后自有海匪护送，可保沿途无事。否则，难免有丧失生命财产之虞。

1943年，国民党政府对这些为害商旅的海匪不但不予剿除，温州专员张宝琛和台州专员杜伟还联合组织了“浙江外海护航总队”，收编这些海匪，使他们变为合法化了。这样一来，张宝琛一则可以拥匪自重，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二则可以利用海匪力量，从事海上走私，发笔横财。当时，张认为总队长毛止熙不够亲信，就派其爪牙戴福权为副总队长，目的在于把自己的势力插到海匪中去，最后则取毛而代之。“养匪通匪”这一大法宝，便是张宝琛

久踞温州专员兼“剿匪”副司令之职的秘密所在。

“护航队”之成立及其内部情况

1943年，温、台二专区以“时局不靖，海面多匪”为借口，创办“浙江外海护航总队”，其组织为大队，下辖2个中队，其下更辖4个小队，“护航”士兵数达300多人，置有护航巡船数艘，温台各临海县份均设有护航办事处，专征护航经费。

各办事处中设有正副主任各1人，稽查2人，会计1人，文书1人，及勤务3人。而温州专署内则设有护航总办公室，负责一切护航事宜，主办为奉化人吴桂三。

各县办事处自总办公室领取船牌旗证等项，发给照章纳费、理应保护的商船。其征收护航费办法，是按照商船中原有海关簿担数计算，缴纳护航费。每月月底，由各办事处将征收所得数目，全部送缴专署护航办公室。

其实商人不是光缴了护航费，便太平无事了，此外还要另对海匪缴“片子儿”费。因为据说护航费是给官方的，而“片子儿”的收入，才是海匪本身的“衣食来源”。此外，对护送船只的卫队，还要给“顺风钱”；船到埠后还要商人出资招待卫队弟兄上岸洗浴、剃头、看戏等。所以对商人来说，每运一担货物要剥这许多层皮，能够到手的利润便是微薄得十分可怜了。

护航队的总队长兼正大队长是毛止熙，其中小队长人选，均由毛本人保荐充任。毛止熙，系玉环县楚门人，出身地主家庭，专喜出入衙门，交结官府，和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台州专员杜伟、温州专员张宝琛等均有情谊。同时又联络海上股匪，如台州张乐、王献金、郭小玉等，为其政治资本及经济来源。附近各县土劣大多为毛之拜把兄弟。由此他得能依仗此种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善良，更利用护航队名义，阳为巡洋缉私，阴则收买路钱以自肥，

更利用海上特权，进行包庇走私。

日本投降后，苏宰衡与女婿林书丹及同乡人等于1945年下半年，在温州东门永川码头开设裕丰商行，代客买卖，收取佣金，专做台湾船只来往生意，主要货色以白糖为大宗。以其收益不错，专署护航总办公室主任吴桂三亦投资20万元，列为股份。有马股长亦投资15万元。又洞头有同春商行行东叶美玉联络台湾人向日本做走私生意，规模颇大，获利亦丰。后闻吴桂三和叶之弟叶之雄洽妥，参加走私，资本由该行付出，而以介绍叶之雄为三盘区署区长及洞头护航办事处主任为条件。自此，吴桂三便放手大搞走私生意了。

当时往来温台海上船只，常见有高挂“毛”字大旗，或持有“毛”字名片，即可通行无阻，否则船被“土匪”扣留，货物“充公”。陈于滨曾于1946年间，自黄岩运盐2万担至温州，当时以船只缺乏，曾租用能容700担盐之驳船2艘。当船只通过小门山时，因风势较大，其他各船虽已通过，独此二驳船因缺乏风篷，留后而行。船上之“毛”字大旗被大风吹落海上，因而船被“土匪”截留。我闻讯后即与毛交涉。毛拍拍胸脯说：“你放心，这两船货色包在我身上还你好了！”果然我所派去接船的人未到小门山，那两艘盐船早开过来了。据船老大说：“船被劫后，起先曾被搬去一包盐，后来知道是陈先生（于滨）的东西，又保过‘毛’的险，所以他们便自动送还了。”由此可见毛止熙势力之大。

毛自任护航总队长后，官瘾犹觉未足，为求在政治上更进一步的发展，曾于1947年以全力包办其嫡亲兄弟毛光熙（留学比利时，国民党三青团员）出任国民政府玉环县国大代表。而毛本人则于1948年正式充任玉环县县长，于是类于江洋大盗之毛止熙摇身一变，竟俨然当上牧民之“父母官”了。

江东轮船被劫事件（护航队之内哄）

护航队成立时，张宝琛为图整个控制该组织，曾派其亲信戴福权出任副总队长，以与毛止熙抗衡，并进而夺取毛的大权。然而狡诈的毛止熙早已识破阴谋，丝毫不让戴占便宜，如陈于滨承包自黄岩运盐去至温州时，戴曾嘱陈将护航费交给他，经陈与毛谈及时，毛说这不行，叫陈将护航费交给毛，而将收据送给戴福权。戴在护航队内既无肥可沾，遂利用职权，开辟自江厦至东山埠的小轮船航线（因当时温沪航线被日军封锁，单帮商人自温至沪，均取道下一路线，即自温州趁小汽船至瑞头，再至乐清县城；陆行或趁小船至虹桥再步行至东山埠，趁航船至江厦；然后至台州、宁波、达上海）。往来东山埠——江厦的航船，装货既不多，又得候潮水开驶，旅客颇感不便，现在以小汽轮江厦代之，颇得客商欢迎，生意较好。此外，戴还可以利用江东轮进行走私生意，所以收入极可观。这便直接损害了毛的利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这时毛止熙虽说已出任玉环县长，但对“靠海吃海”的权利决不甘心放弃。所以便不动声色地派了个得力助手，扮作客人，自温州上船乘坐江东轮（这时江东轮航线放长，直接自温州至江厦）准备劫船。

原来江东轮上，戴福权派有亲信郑干臣、金正立等4人担任护航。这几个人每人均配有20发驳壳枪一枝，据说他们都是神枪手，可以百发百中。然而暗箭难防，毛的部下早把他们监视住了。船到小门山，他们6人已分头盯住船老大和护航人员，一声暗号，没等护航人员掏手枪，早把他们干翻了。于是毛的部下便命令船老大停船，召集乘客说话：“这事与大家无关，所以不必惊慌，只要求大家不要动！”于是他们便动手把4名护航人员的尸首抛到海里去，又把船上卖票收入的钞票，和戴托带的走私货色加以没收，

一声呼啸，海面上早停好的一只帆船便摇近江东轮，他们才满载战利品（货物、钞票和4枝驳壳枪）扬长而去。

事后旅客都庆幸这次轮船遭劫自己却毫无损失。而戴福权却叫苦不迭，明知这事和毛止熙有关，却又拿不住他的把柄，只好几次派人与毛商量，要求协助缉凶。毛当然虚与委蛇，一口答应，结果是一无下落。

乌军的前前后后

一、乌军的初起：1937年抗战初起时，有一自称台湾人的蔡光以不务正业、吸食鸦片之故，穷途潦倒，流落福州，至不能生活。蔡熟谙日语，乃冒充日本浪人，纠合当地恶棍，组织流氓集团，招摇撞骗，无恶不作。还发展势力至海上，联络海面股匪林义和等，盘踞闽浙海面之瑶山岛等处为巢穴，组织乌军数百人，分驻台山、南麂、北麂等岛屿，而由蔡光自任“乌军”司令。他们专在浙闽海面打劫航行商船，或上陆抢劫海岛居民之财物牲畜，且勾结洞头奸商陈崎、叶立等，代为进行粮食桐油等之走私和生意，换回棉布、药品等以攫取暴利。

二、乌军之发展：1944年洞头沦陷时，奸商陈崎介绍其堂弟陈荣博与蔡光认识，经蔡允诺，发给枪支弹药，令其扩充乌军。陈荣博即与坎门的郑亮、洞头的江声等拉拢一伙，纠合当地莠民，组成乌军一大队，由陈任乌军大队长，郑亮为中队长，江声等为分队长。全部乌军人数多达五六百人，驻扎在洞头东岙地方，助纣为虐，为日寇作伥，作威作福，残害人民至深且巨，又四出洋面劫掠商船，所获各种货物如白糖、布匹、药材等甚多，均与日寇朋分，收入极为可观。

三、乌军之消灭：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洞头日军亦匆促撤退。内有3人因有私人货物和重要军用物资，要乌军保护，稍缓

数日搬运落船。在尚未离埠时，此3人即被乌军陈荣搏、郑亮等谋杀，并将贵重物资托人送缴温州专署，接洽投诚。专员张宝琛即派人予以收编。此时陈荣博以无事可为，拟往福建找蔡光设法，道经平阳，闻在途中被当地老百姓识出，予以捕杀。至其首领蔡光，逃匿洞头，于解放时，被政府处决，乌军从此消灭。

（浙江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台州“绿壳”

严振非

“绿壳”一词源于咸丰元年（1851年），广东海盗船入侵海门，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清军水师抵挡不住。海盗占据海门10日，焚烧竟日，直逼至黄林洋。因盗船“形如蚱蜢，船壳涂绿色，滨海民呼为绿壳”（《临海志稿》）。“绿壳”本是台州人民对广东盗船的贬称，却被演变成对一切土匪的代名词。“台州绿壳”在清末民初影响颇大，至今“绿壳”仍为骂人的名词。

“绿壳”的滋生繁衍，与一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南宋时黄岩称“小邹鲁”，元兵入境，“起义抗拒，虽杀身破产，村落为墟，然前仆后继至死不悔”。《宏治赤城新志》称赞曰：“忠节孝义史不绝书，天下称文献者莫之先焉。”“以礼义廉耻为先，以行检名节为重。”《万历黄岩志》则曰：“民静而安，俗朴而俭。”这些记载虽有粉饰太平之嫌，但亦反映了那时较好的社会风尚和人民的道德水准。社会风气之坏始于清代道光初年。由于鸦片的传入，黄岩“种花法行，烟祸尤烈，而士风颓靡，细民失业，多由於此。浮惰之民多，则血气之争盛；礼义之教衰，则武健之风长”（《黄岩同治志稿》）。因而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书直隶总督纳尔经额说：“黄岩一县贫富吸烟。呆呆日出，痄无其阒人。月白灯红，乃成鬼市。”鸦片为“绿壳”提供了滋生之地。

清末的“绿壳”

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军，诏令各地组织团练。咸丰元年（1851年），台州各县土豪劣绅大办团练。一批“邑中诸无赖”纷纷参加民团，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充当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兵撤台州，民团更是无所顾忌，“四出勒捐，不从者即被焚掠”。因而王棻在《黄岩县志》说民团就是土匪，“长毛如篦，土匪如剃”。后来，清兵将民团作为土匪来剿捕，这些人就占山为王成了“绿壳”，对人民为害极大。

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因镇压太平军而军饷困难，采用钱江建议，创办“厘金”，设局、卡，在水陆交通要道向行商征收商品通过税，又向坐商收取交易税，统称为“厘金”，又称“厘捐”、“抽厘”（按米价征收1%）。台州知府刘赦在同治元年（1862年）设局18处、分卡38所征收厘金。同治五年又设局征收盐税，引起黄岩徐大度、太平谢仁旺等聚集数千人闹盐局杀贪官。后来刘赦血腥杀害了几百贫民，冤死的贫民却被诬为“绿壳”。

从同治元年到光绪七年（1881年）的20多年，征收“厘金”名目逐渐繁多，税率从1%增加到7%以上，设置关卡急剧增加。英人呤喇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说：“每隔半英里就设有敲诈勒索的厘卡，每个厘卡都从不幸的过往商人上硬捞一把。”浙江巡抚谭钟麟在奏议中说台州“二里一分卡，五里一分局。民之肩挑贸易，例所不捐者，概行需索，局卡并不给捐票，明明局员局丁分肥”，“纵令差役四向穷搜，乃任令虎狼肆噬。民或卖妻鬻子以偿，甚至投水悬梁以死”。他认为台州土匪之多原因是“由于捐厘重征税契苛索，受累已深，思欲泄愤，起而为匪”。

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临海金满在桐树坑起义，劫宁海西垫总厘局、小雄钱粮厂银钱和黄岩金清厘局，被官府称为“绿

壳”。其间还有临海蒋世炳、黄岩牟维宗、太平潘联瑞、叶兴宗等“绿壳”。多则百余人，少则数十人，纵横台州山水之间10余年。

宣统六年(1909年)仙居发生了打盐商厘金大案，“打掳扑空，大肆扰掠，纵火焚烧。……本系匪盗渊薮，居民犷悍，匪劫成风，一呼即聚，相率为劫……”(《东方杂志》)

清末，台州遭受巨大的自然灾害也是形成“绿壳”的主要原因。光绪十五年，天台、仙居、黄岩、临海、太平“依山沿海各乡均被水灾”。光绪十八年，“夏旱冬大雪，十一月大雪深尺余，咳吐成冰，江河冻合，冻解随流，下触浮桥为断；花木尽萎，南方百年所未有也”。时黄岩杨晨任御史，上疏赈恤，发放台州府常平仓谷万石救灾。他说：“受灾地方饥民夺食，匪徒乘机抢夺。”“米价一昂，民不聊生，恐盗风益炽矣。”《东方杂志》刊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仙居方锡汉，“因米价昂贵，乘机起事，结连温、处两府土匪，……筑垒设卡，抗拒官军。”

清末地方官吏对洋人奴颜婢膝，将人民自发反抗教会的正义行动也当作“绿壳”，黄岩应万德、玉环赵如璋、太平朱尧灿等为首人物都遭到杀害。

民国前期的“绿壳”

民国初期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虽政制改为民主，而民间经济迄无转机，山陬海澨莠民不绝，匪风颇炽”(《黄岩民国志稿》)。有一部分劫富济贫的“绿壳”响应辛亥革命，如浙江光复会陈赞清招抚天台周永广、仙居郑万枝等在台州起事，不久参加攻打南京，立下战功，周永广任浙江讨袁总司。后来二人壮烈牺牲。民国3年（1914年）8月，“绿壳”项甘富占佛岭立山寨，11月10日夜绑架樊川小学师生23人勒赎。县知事方敦素剿捕不力被免职，后由县知事汤赞清剿灭，这是黄岩近代影响较广的“绿

壳”大案。

民国9年、10年、11年、12年连续4年遭受风灾水灾，有时一年内连续3次大风雨，山洪海潮并作，沿海几成赤地，人民苦不堪言。王舟瑶《大水行》诗曰：“新堤与旧堤，千丈各一决。临黄暨太宁，瀕海成鱼鳖。”“连年天漏不可补，十旬竟有八旬雨，坡田一带变成溪，树断千山不用斧。”在如此巨大灾情面前，当地无力赈济，由华洋义赈会拨款救灾并以工代赈修筑堤塘。但是救济钱粮却被各级官吏劣绅贪污中饱。黄岩柯骅威叹道：“作孽难言上帝仁，赈灾半入贪官手。”（《小丹邱诗存》）饥寒起盗心，沿海百姓为活命起见而沦为“绿壳”，这就是沿海多匪的原因。民国11年（1922年）5月，大股海匪抢劫温岭石塘百条渔船，杀死10余人。次年又抢劫金清渔船，造成航线中断。

民国15年（1926年），温岭横河冯虞廷入海为匪，聚集千余人，自称护国军司令，抢劫商船，占据温黄边境。第二年1月，军阀孙传芳部属为北伐军所败，从福建入浙，经温岭、黄岩、临海，一路勒索军饷，强拉民伕。由于政局不稳，有枪便是草头王，“绿壳”乘机四起。当时有个江梦生被绑票，勒索1.4万元。民国17年2月13日，冯虞廷乘虚袭击海门省保安团第五团团部，占据4天。后被继任团长许康（黄岩人）击退。次年4月水陆两军会剿，冯被焚死。

民国18年（1929年），春旱严重，秋又遇大雨，大部地区颗粒无收。粮价飞涨，斗米银币一元二三角，百姓挖草根为食。因而“绿壳”更多，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勒赎。“绿壳”罗国梁等百余人于11月18日洗劫头陀桥，绑架12人，抢劫黄济汽船，掳去帐房及乘客4人，后被县游击队追至小五份救回被掳百姓。次年罗松三、罗国梁两股“绿壳”啸聚菁家岙，四出掳赎，闹得人心惶惶。小康人家纷纷避入城内，农村凋零荒凉。7月18日，县长孙崇夏率兵分路袭击，枪杀罗松三，拔除山寨。不久，罗国梁投降，

被收编为县保安团。民国前期黄岩的“绿壳”虽有客观原因而形成，但以抢劫勒赎为主，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给人民带来灾难，他们的土匪行径，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民国后期的“绿壳”

民国后期，随着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战争的风云突变，“绿壳”的性质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与共产党合作开展武装斗争。民国18年（1929年）4月16日的打盐厥武装暴动，就是中共黄岩县委委员戴元谱争取永嘉武装土匪潘喜堂，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见《党史资料交流》第二期）。这场斗争虽然失败，但可看出风起云涌的高昂群众斗争情绪，以及出身贫苦农民的土匪的正义淳朴的本质。

1940年春，中共台州特委对活动在西部山区的部分土匪晓以民族大义，组织和引导投身抗日，有1000余人服从共产党指挥，组成3个大队。经过党的教育，以后这支部队有人参加了浙南游击纵队。

第二种类型是投身于抗日烽火之中。民国25年（1936年）海“绿壳”王仙金（大陈人）在大陈岛立寨。1939年8月著名土匪王采平投向日伪，领得枪支弹药，又向专员公署投诚，率200余人反戈一击，击沉日艇2艘，杀敌40余，粉碎日军一次在海门登陆的阴谋。1942年8月，盘踞在雀儿岙海岛的杨信贵击沉日军小汽艇1艘，日军溺死多人，2人被活埋，结果招致日军残酷报复，杀死岛上老幼妇女300多人。同年12月，台州专署保安司令杜伟派人向台州沿海各岛的“绿壳”劝告，晓以大义，切勿投敌成为民族的罪人。1943年6月，杜伟自任护航委员会主委，收编沿海“绿壳”3000多人，编成8个护航大队。同年10月，王仙金断然

拒绝日伪劝降，守卫大陈岛，打死打伤伪军10余人，后不敌而退。次年3月，王仙金率部800余人收复大陈岛，全歼伪军。6月，杜伟委托原国民党军少将、黄岩毛静如招抚王仙金、李文彬、林济民等1000余人，改编为1个支队、2个独立中队，王仙金任中校护航支队长。1945年2月，王仙金击退日军企图在江厦登陆，接着又在温黄沿海数次痛歼日军，俘敌10余人。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10月，护航大队裁减，8个大队减为3个。次年1月全部裁撤。解放前，王仙金又盘踞大陈岛，经常登陆扰掠台州沿海，黄岩金清一带数次受害。

第三种类型是国民党兵沦为"绿壳"。民国29年（1940年）6月20日夜，驻棚浦的省抗卫团第三团六连连长郝守光，自恃抗日有功，因得不到升迁怀恨上司，率兵叛乱。当夜11时占领路桥区公所、乡公所、电话局，并在交通路口布置机枪，然后挨户抢劫店铺金银细软及地方银行20余万元，掳去镇长及群众30余人，黎明时呼啸而去。团长蒙志奉令进剿，却受叛兵贿物，按兵不动。以后虽然郝守光在温州伏法，蒙志死于狱中，叛军溃散后成为"绿壳"。

第四种类型是惯匪成性为害极大。著名的"绿壳"陈季甫（麻皮奶王，黄岩人）横行温黄两县沿海10余年，给沿海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又在民国36年（1947年）参与党团械斗，占据路桥，弹如飞蝗，恐怖一时。国民党政府多次剿捕失败，反而以"通匪"之罪烧毁民房，并将贫民作"绿壳"枪杀报功。民国37年6月，陈季甫被收编任突击营长，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效劳。1949年6月，陈季甫率80余匪在泽国向浙南第三支队投降，但在9月又纠集土匪四五百人反水，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3月，台州即将解放，中共"临天仙"三县武工队队长、黄岩王阿法勇赴临海白水洋匪巢，说服匪首王继学弃暗投明。这个占山为王、杀人成性、又不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自恃手中有几根破枪的井底之蛙，

竟在王阿法出门之时，背后开枪将他杀害。更令人发指的是将王阿法头颅悬挂临海西门示众。

民国后期还有许多的小股“绿壳”，时有“台州土匪如毛”之说。小股土匪大都是民间穷苦百姓，少数是惯匪枭首。民国23年（1934年）12月，县长汤日新到任，即宣布土匪、花会、烟毒为黄岩三害。民国后期黄岩两次被日寇沦陷，社会秩序极不安定，国民党政府又腐败无能，特别是通货膨涨，物价飞涨，没有止境，“金圆券一夜倒一半”，丧失了民心。高利贷的利率竟高达每百元日息6角，使许多下层人民破家荡产。还有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这些都是逼民为匪的原因。

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民不聊生。据《民国县政年鉴》记载，民国32年（1943年）黄岩遭受水灾24万多亩，遭受铁甲虫灾11万多亩。省社会处拨款6万元救灾。而当时的物价是每石米价246元，理西发头8元，理光头4元，棉制服一套120元，长衫50元，泥水工每工44元。6万元救济款只能购买244石米，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了活命铤而走险去当“绿壳”，或逃荒要饭，造成“土匪如毛”的局面。民国19年至32年，国民党黄岩县政府审理盗匪案件212起，枪决35人。“绿壳”之盛，可见一斑。

解放后，黄岩大多数“绿壳”改邪归正，从事农业劳动。但少数人在惯匪的欺骗裹胁下，跟随匪首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发动暴乱，抢劫骚扰，残杀干部群众达170多人，烧毁房屋100多间，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自1949年7月至1951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军六十二师与地方武装、民兵一道围剿各股土匪，发动剿匪作战445次，歼灭了黄岩境内土匪。又在土地改革时惩办了一批匪首、惯匪，陆上土匪基本消灭。以后随着沿海岛屿的全部解放，土匪失去巢穴，百年“绿壳”匪患终于肃清。

（浙江省政协台州地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供稿）

夏茂地区二十七年中四十四次匪祸

巫德华　苏崇中

夏茂地区从1922年到1948年的27年中，据不完全的统计，共发生44起土匪骚扰、劫难，其中倪居山村就遭劫8次。这期间，匪害频繁，给夏茂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很大的损失。现仅按时间顺序将全区匪患简述如下：

1922年11月19日晚，从汀州方向来的10余名小股土匪闯入倪居山村，抢走财物无数，抓去农民6人。后来，村民看到土匪人少，全村40多人手提柴刀、木棍奋起和土匪搏斗，一直将土匪逐赶10多里外，并把抓去的6位农民抢了回来。

1923年1月18日晚上，来自汀州方向50多名土匪包围了枫树叉自然村（今洋元村辖地），抢劫财物无数，烧毁房屋8幢，受害群众达40户240人，当场杀害3人，其中罗起定被土匪用刺刀刺进肚子致死。还将罗永灶绑走当了人质，押溪竹厂关了一个月，匪徒要他拿1000块银元赎回。由于他家属买通顺昌县元坑乡公所的一位亲戚，请50多名国民党兵和当地民众清剿了匪巢，赶走了土匪，救出罗永灶。

1924年6月2日晚，从汀州方向来的土匪10余人，再次抢劫倪居山村。这次土匪很凶暴，一到村庄就乱开土枪土炮。村民听到枪声，逃的逃，躲的躲，结果被土匪抢走棉被36床，烧毁房屋4幢33间，受害群众达8户32人。

1925年11月16日下午4点，从汀州方向来的30多个土匪

抢劫了瓦溪村，抢走财物无数，烧毁房屋 4 幢 24 间，受灾群众为 30 户 120 人。

同年 11 月 26 日晚，由将乐方向来的 20 多个土匪火烧洪厝窠村。匪徒先抢劫财物，后烧房屋。全村房屋 3 幢 66 间被烧尽，受难群众 8 户 66 人。

1926 年 11 月 5 日晚，来自富口方向的 40 多个土匪抢劫溪坪村。匪徒先抢财物后烧房屋。被烧毁房屋 20 幢，晒谷厂、粪房 60 座，受害群众 31 户。烧死妇女 1 人，打死 7 人，抓走人质 10 人，关在山厂里（地名大坑头），被土匪捆绑吊打，真可谓惨无人道。后用 7000 块银元才赎回。

1927 年 4 月 13 日晚，从汀州方向来的土匪 50 多人火烧倪居山村房屋 11 幢 75 间，受害群众 17 户 78 人，抓去小孩 2 人去向不明，抢走耕牛 1 头、猪 1 头、棉被 46 床。

1927 年 5 月 1 日，洋元庄村（今洋元村）18 个农民在枫树叉纸厂做工，去顺昌县天柱石灰厂挑石灰，下午 1 时，路经高际头村（今新建村辖地）休息吃饭，恰遇从顺昌方向来的 60 多个土匪抢劫高际头村，被抢财物无数。计杀大猪 1 头，受害村民 44 户。连过路的洋元庄人也未能幸免，18 个人全部被抓。张十均、罗聋于当场被土匪用枪打死，林启福等 16 人被绑押到招三（顺昌县辖地）附近的山窠茅厂里，关了两个月。土匪多次绑打他们，还用杉叶刺脸部，人人脸上直流鲜血，双脚上“木靴”，受尽折磨，后用 7200 块银元才赎回。

同年 10 月 6 日晚，由顺昌方向来的土匪 60 多个洗劫高际头村，全村房屋 22 幢被烧毁，受害群众 44 户 180 人。抓去人质 4 人，被土匪捆绑吊打多次，折磨了两个多月，身上生虱子，病得面黄饥瘦，后用 480 块银元才赎回。

同年 10 月 25 日晚，由富口方向来的土匪 200 多人洗劫山坊自然村（今东街村管辖）。土匪计抢走肥猪 20 头，鸡、鸭 310 只，

棉被35床，衣服等无数财物，后又点火烧光全村10幢120间房屋。这次受害群众20户120人，还抓去邓洪福、邓玉钦2人作人质。当晚邓洪福被匪徒绑押到下砂坑半岭打死，邓玉钦被绑押到下砂坑的茅厂里关了3个月。头一个月双脚用木头闩住，谓之"上木鞘"，脖子用竹筒和绳子拴住，一个月后才解了"木鞘"。在一个小房间里被关了2个月，以后用了200块银元才赎回。

1928年1月4日晚，从明溪方向来的土匪60多人抢劫曹树后村（今洋邦村辖地）。抢走财物无数，受害群众60户，绑去人质2人，去向不明，未回。

同年4月21日晚12点，来自富口方向的土匪60多人抢劫水头村。被抓农民11人，绑在村边房屋柱子上，全村财物被洗劫一空。第二天凌晨3时，一把火烧毁房屋50幢，受害群众65户370人。被抓的11人中，当场被打死8人，以后带走3人，其中1人用了200块银元才赎回，2人未回，下落不明。

同年7月27日下午3时，从顺昌方向来的土匪50多人，火烧福岭石村（今乐厝村辖地），烧毁房屋20幢，粪房、晒谷厂61座，全村受害群众41户230人。抓去人质3人，其中两人用400块银元赎回，一个小孩被土匪卖掉，下落不明。

1929年9月20日晚12点，罗溪土匪头林桂芳率匪徒50多个抢劫洋元庄村（今洋元村）。土匪一到村里，把每幢房屋大小门包围起来，然后抓人、抢劫，抢走财物无数。全村60多户受灾，被抓人质26人。张万福、张大同叔因病不会走路，匪徒将他们拖到洋元庄村头枫树下，用木棍打死张万福，用大石头砸死张大同叔。其余23人漏夜被绑押到罗溪和盖竹坑附近的山厂里，分别关在3个匪巢。23人中，20个是成人，全部被上刑具，双脚"上木鞘"，脖子被锋利的竹筒和绳子拴住。12岁的林和攀被绑在柱子上，一个12岁的女孩张××遭匪徒蹂躏。张高妹、张七均、张细婚被折磨了3个月，饿死在匪巢里，家属用300块银元赎回尸体。

其余20人中，有19人先后共用9500块（每人500块）银元赎回，其中2人关了20天赎回来，2人关了1个月赎回，5人关了2个多月赎回，还有5人关了3个月赎回。张章旺等5人因没钱赎，一直关到第二年农历三月，凑齐了银元才赎回。4岁小孩张世波被土匪卖掉，15岁才逃回洋元父母家里。

1929年10月11日晚，从明溪方向来的土匪30多人抢劫了车溪村，烧毁房屋一幢20间，受害群众15户25人，被抢财物无数，打死农民1人，重伤1人，抓去人质5人，花去1500块银元才赎回。

1930年10月30日晚，从明溪方向来的土匪60多个，再次抢劫车溪村，全村10户人家被抢去财物无数，劫去人质8人；路经山岭下（今车溪村管辖），又抢劫了9户，抓走人质8人；路经黄坑村（今洋邦村管辖），又抓人质5人，前后共抓去21人。抓去这些人中，除6岁小孩罗维煜外，其余人员全部被土匪“上木鞘”。茅风妹胸部被土匪打了一枪，流出鲜血，烂了一个洞。有2人被土匪折磨，饿死在匪巢；有10人关了1个月、每人花200块银元才赎回；有7个人关了2个月、每人也花200块银元才赎回；茅风妹家里没有钱，关了3个多月，父母卖了1个小女儿，凑齐200块银元才赎回；罗起煜家里穷得没有办法，一直关了1年多，最后他父母典卖了2间房屋，凑齐了200块银元，于第二年农历九月十一日才赎回家。

同年11月29日晚，从明溪方向来的40多个土匪，抢劫了上坂和邓厝自然村（今洋邦村辖地）。土匪先抢劫后烧房屋，抢走财物无数，烧毁房屋30幢，受害群众40多户。抓去人质3人，其中1个3岁小孩名叫肖进华，关了1个多月，后用600块银元才赎回。

1932年4月6日上午，汀州方向匪徒派一说客来到山坊自然村（今东街村管辖）派饷，要山坊村每户每季度交10块银元，限

3 天内将钱送到横坑路。农历三月初三上午，村里派了两位村民将200 块银远送到横坑路上交给土匪说客，六月初一上午，又派人送去 200 块银元；九月初三上午又送去 200 块银元。冬季年关将临，村民没有送去，到农历十二月初十日晚上，土匪 70 多人来到山坊村，一到村里就乱开土枪土炮，吓得全村逃的逃躲的躲，结果被土匪抢去猪 3 头，鸡、鸭 300 多只，棉被、衣服等财物无数。

1933 年 11 月 27 日晚，从汀州方向来的土匪 20 多个，抢劫了山堂村（今李窠村管辖）。抢走财物无数，绑去农民林发生当人质，被关在倪居山附近一个纸厂里过夜。林发生趁匪徒睡觉时，逃跑回家。

1934 年 2 月 27 日晚，来自明溪方向的土匪 30 多个，劫走罗坑坪村水牛 2 头；路经牛栏乾自然村（今车溪管辖），抢走全村 9 户人家的 10 床棉被和鸡、鸭干、粳米、米酒等类物资，绑去谢德光（罗坑坪人），关了 1 个月，花银元 200 块后才赎回。

同年 6 月间，由明溪方向来的 60 多个土匪抢劫上坂、邓厝、大布乾自然村（今洋邦辖地），抢走财物无数，抓去人质 14 人，其中妇女 3 人。这些人被土匪绑押到明溪县的一个山窠里（地名俞运际）关了 1 个月。农民肖庆被推下大石岩摔死，还有 5 人被匪徒毒打、挨饿、折磨死在匪窠里；其余 8 人中，有 2 人逃跑回家，6 人花银元 1200 块才赎回。

同年 12 月 3 日晚，来自汀州方向的土匪 20 多人抢劫板山村（今瓦溪村管辖），烧毁房屋 3 幢 24 间，受害群众 5 户 24 人，绑去人质 2 人，花了 400 块银元赎回。

1938 年 1 月 13 日晚，从汀州方向来的土匪 50 多人，抢劫曹树后村（今洋邦村辖地），抢走猪 2 头，财物无数，受害群众 50 户。

1939 年 1 月 29 日晚间，由明溪方向来的土匪头邹××，率匪徒 60 多个，抢劫了罗坑坪村（今罗坑村）。抢劫财物无数，谢坤杉等 13 人被抓去当人质（其中成年人 3 个，8 至 10 岁的儿童 10

个），押到夏阳（明溪县）附近的一个山厂里。3个成年人被用刑具，双脚"上木鞘"，全身被捆绑；10个儿童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关到第五天后，他们趁匪睡觉时，漏夜逃跑，因地方生疏跑错了路，一直跑了5天，才回到家里。谢坤杉等3个成年人被土匪关了1个多月，于第二年正月十一日花了360块银元赎回家。

1942年1月17日晚，从富口方向来的20多个土匪抢劫曹树后村（今洋邦村辖地），抢走猪2头，财物无数，受害群众20户。

同年2月8日晚，从富口方向来的土匪20多人抢劫木山坑村（今土碓村管辖），抢走棉被、衣服、鸡、鸭等财物无数，绑去农民周远福、周钦妹两人，关在深山密林的茅厂里。匪徒用各种刑具折磨他们，一连折磨了4天。2月20日晚上，他们趁多数土匪外出抢劫，留下4个土匪在睡觉时，周钦妹想办法脱掉身上的绳子，再去解救周远福，两人连夜逃跑20多里山路，周远福不小心跌进白溪口河里，头碰到大石头，头破血流，惨死在路上。周钦妹得以逃回家里。

1943年1月15日下午，土匪头（又是大刀会头）黄金旺率匪徒100多人抢劫砂坑、大水坑自然村（今东街村管辖），杀死猪2头，财物无数，受害群众10多户。

同年11月27日晚，从汀州方向来的土匪30多人抢劫倪居山村，抢走财物无数，抓去妇女1人，土匪将她侮辱了一天，后逃跑回家。

1945年12月5日晚，来自汀州方向的土匪8人抢劫瓦溪村，抓去人质2人，绑在山厂里1个多月，后花了银元200多块才赎回。

1946年1月12日下午，黄金旺一伙匪徒100多人再次抢劫砂坑、大水坑自然村（今东街村管辖），抢劫财物无数，受灾群众10多户。

1947年1月1日下午，从汀州方向来的土匪10多人抢劫枫

树叉树（今洋元村辖地），抢杀猪2头，抢走财物无数。

1947年2月1日晚，由汀州方向来的土匪10多个抢劫枫树叉村（今洋元村辖地），抢杀猪2头，抢走鸡20多只。

同年5月间，从汀州方向来的土匪50多人，抢劫倪居山村，打死农民1人，抢走财物无数。

同年9月间，由汀州方向来的土匪50人，再次抢劫倪居山村，打死农民1人，抓走人质1人，抢走牛1头、猪2头，财物无数。

同年10月14日晚，从汀州方向来的土匪50多人，连续第三次抢劫倪居山村，烧毁民房3幢18间，受害群众10户45人，抢走牛2头、猪3头，打死农民1人。

1948年2月2日晚，由富口方向来的土匪30多人抢劫溪坪村（今上碓村管辖），抢走财物无数，抓走人质6人，关在深山密林的茅厂里1个多月，被土匪捆绑吊打多次，后花了3000多块银元赎回，其中杨行茂用1000多银元才赎回。

同年10月12日晚，从汀州方向来的10多个土匪，抢劫枫树叉村（今洋元村管辖），被抢棉被12床，猪1头，鸡、鸭40多只。

同年11月1日傍晚，从汀州方向来的10多人小股土匪抢劫了倪居山村，抓走农民肖细和。匪徒将他衣服脱光，捆在树上挨冻，并用棍打、剪刀刺、开水淋，全身皮肉烂开，生虫，后花了1000块银元才赎回，没几天即身亡。

同年12月10日上午，高桥方向来的土匪头陈××，到倪邦仔、枧坑（今洋元村管辖）来派饷，通知这两个村5天内每户要交饷50亿元（民国纸币）。一个村按40户计算，每村要交2000亿元和一头大肥猪，规定送到白莲庵，一点不能少。这两个村于12月14日上午，各派两个人送去两头大肥猪，倪邦仔交去1900亿元，枧坑送去1950亿元。倪邦仔差三户没有交，枧坑差一户。匪首陈××知道后恼羞成怒，于12月15日和国民党部队相勾结，带领50多个土匪和国民党兵一道闯入这两个村，顿时枪声、炮声、

号声连天，邻近村庄的人听到都吓跑了。傍晚5点钟匪徒们点火将罗维享、罗维和两户的一幢14间房屋和一座4间的仓库烧光，随即又往枧杭烧了罗大木椿的一幢大仓库，抢走300多只鸡，全村40多户受害。

同年12月30日晚上，来自汀州方向的土匪20多人抢劫板山村（今瓦溪村管辖），抢走财物无数，绑走人质4人。其中妇女一人印××，被匪徒摧残得奄奄一息，以后家属花了500块银元才将她赎回，其余3个男人被土匪吊打多次，也用了600块银元才赎回。

同年12月31日晚，从明溪方向来的土匪20多人抢劫了曹树后村（今洋邦村辖地），抢走财物无数，受害群众有8户，抓去人质2人，关了1个多月，花了银元400块才赎回。

1949年1月8日下午，从窗口方向来的土匪20多个抢劫砂坑、大水坑（今东街村管辖），抢走猪3头，财物无数，受害群众10多户。

同年1月18日，来自汀州方向的土匪20多个抢劫砂坑、大水坑，抢走猪3头，财物无数，受害群众10多户。

（福建省三明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清源山十三乡的匪祸

蔡景煌

泉州清源山顶十三乡，包括水流坑、鼎底、福鼎、张耒、柳洋、茶寮、深底龙降、洞后、西田寮、磅坑角田、三篮、泰封、英坑。说是十三乡，其实早在清末民初就有五乡已废，而只剩下八乡了。

清源山各村地处高山僻壤，田园虽少，而土质肥沃，可供耕植稻米谷物；且晨昏之际，露重雾漫，地温气郁，山风清新，泉甘水沛，因而村民多植茶树，以为副业，且林木茂盛，也可取材资用。是以溯自明清二代及乾嘉时期，政局安定，村民尚可"靠山吃山"，聊以度日过活，清源山乡堪称平靖。及至清末民初，朝代交替，全国各地时有战乱发生，泉州地方随之不靖。而清源山顶各村之政事，封建统治政权鞭长莫及，于是散匪乘机扰乱。如民国 6 年(1917 年)护法军失败后，茶寮村的陈清棋(绰号瓶塞棋)、柳洋村的李玉来、福鼎村的洪阿富和双阳山下福山腰村的高为国(又名纪阿拗)4 人合伙为匪，在清源山、朋山岭一带，绑票抢劫，村民为之逃离乡里。这时大乡大姓者也趁时寻衅，侵凌小乡小姓的山林土地。猛虎凶兽出没，更为频繁，危害更加惨烈。因而地处深沟野谷的深底龙降、鼎底和英坑 3 个小村，孤立于山麓丛林的三篮和位于清源北麓远僻的磅坑角田二小里(这 5 个小村庄，人口都只有二三十个)，都因国不泰、民不安，而相继被迫逃往他乡。自此，这 5 个小村子即废。

小村小姓废了乡，大乡一姓者也难幸免。俗称："山顶泰封金，海底乌屿王"的泰封乡，在明清时期有 200 多人口，约占清源山十

三乡人口的一半，且有本乡人先后在泉州城里开13家典当铺，可谓首屈一指的富庶乡里。然而北伐战争时，军队入闽，匪首高为国的军队则由惠安洛阳退驻福山腰本家，继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四出绑架，匪焰十分嚣张。而泰封乡当地高匪巢穴（其匪军多盘踞于福山腰、河市、洛阳等地）要冲，故时遭兵燹匪劫之祸，村民不得不迁徙。时间不长，全乡只剩一户穷困潦倒人家，勉强生活下去。至解放初土改时也仅这一家，随后才有几户陆续回乡参加土改分田地。现在泰村已是100多人口的新村了。

这期间的洞后、茶寮、柳洋、福鼎、水流坑这五乡遭受匪患较轻。因洞后姓陈和茶寮匪首陈清棋（后盘踞南门外大下浯村一带）是同宗，柳洋乡匪首李玉来原为陈清棋亲信部下（后来陈失势逃往鼓浪屿，不久李即投靠高为国当连长，结果被暗杀，因高见其奸）；福鼎乡也有个土匪头目叫洪阿富，他也是陈清棋的亲信，当陈的特务连连长，而陈清棋又曾是高为国的结拜契兄弟。由于有这种封建宗派关系，高陈二匪也就井水不犯河水了。至于水流坑乡因地近城关，国民党政权尚可鞭及，且该乡人口最多，并筑有更楼防匪，故匪徒尚不敢觊觎掳劫。而西田寮和张耒二村，一在清源山西北，是清源洞通往福山腰高匪巢穴必经之地；一在清源山东北，是高匪军队驻扎清源洞咫尺之处，故时遭蹂躏抢掠，因而村民只得逃避他乡。及至1931年前后，民军陈国辉在省防军方声涛的支持下进驻泉州城时，高匪被迫退回老巢福山腰，再盘踞双阳山、清源山一带，继续纠集匪伙，增强实力，并深沟高垒，准备与陈火拼。这时清源山顶及附近村落受害更加惨烈。兹记述几件匪患史实，以窥豹一斑：

1、1931年初，高为国匪部驻扎清源洞时，经常到张耒村和附近的释仔前村（林姓）拆掉民众的门窗作床板，抢掠牲口，强派挑伕，吓得这两个山村的百姓都逃光了。直至这年夏天，高匪在南平被捕解省处决，和1932年10月十九路军从上海抗日前线奉调入闽，陈国辉在福州被枪决后，张耒村几户人家（全村约有40人口）

和释仔前村几家(原有50多个人口)才敢陆续回乡居住。当他们进入家门时,蒿莱丛生,蛛丝结户,景象十分凄凉。这时张耒村有个早年逃往小吕宋谋生的番客名叫颜金星的,他本想回乡重整家园,因闻知匪患尚烈而畏惧,就在城里购置房屋居住。这村还有4户也因早年匪患而逃往仰光谋生,惮于匪祸不敢回国。

2、西田寮村许马钳12岁时,一天深夜,高为国的匪徒破门而入,把他绑到青阳室去。因家境贫困无法筹足银钱赎放,匪徒就用香炷灸他的手脚,使他叫苦连天。尔后由"套仔"(系匪首耳目,专干赎放肉票勾当的家伙)传播讯息,说许马钳已被刑得半死,如不赶快拿钱去赎放,就一定没命。马钳的父母闻讯后,只得四处借债,央托"套仔"说情,才把儿子放回家来。从此马钳一家人只得逃离家乡。直至高匪在福州伏法后,西田寮才有几家回村居住,但田园已成荆榛了。

3、柳洋乡匪首李玉来被高匪暗杀后,该村有个贫苦农民名叫李法溪,他17岁时,端午节那天和父亲挑着菜篮,到祖祠敬祀祖先。返回时,路过村后小路,碰上一伙高部匪徒,即连人带菜一起被绑架而去。父子二人被关在青阳室两个多月,受尽苦楚。家中母子生活无着,哪来巨款赎放他们呢?而匪首却多次通过"套仔"传讯说,田地房屋卖不出去就卖人嘛!,要不就把他们刑死。最后法溪的母亲只得忍痛卖掉一男一女,才把法溪他们二[illegible]放出来。

4、据柳洋退休工人李国祥说,他12岁时,和另一个名叫李溪仔的孩子及两个同村的壮年人,同时被高为国的干儿子高扬罗(时当匪连长)绑架而去,关禁在河市的鸡笼山下连部里。从端午节到七月初九,最后才以每人身价白银400元赎放出来。

5、自民初至1932年十九路军入闽前,清源山的匪祸何止十三乡呢?山下各个村里也备受灾难,兹举其一二以证之:

民国7年(1918年),茶寮村浪荡子陈清棋(即上述的匪首),时年20多岁。这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是东岳大帝生辰,香火甚盛,沿

仁风街往岳庙大路，香客络绎不绝。这天陈清棋（未发迹时）因酒吃得酩酊，躺在石牌坊下，适埔任村学阿古等香客共抬一尊菩萨——康阿爷公过此，要去东岳庙取香火。学见陈醉卧路旁而住脚审视，陈也斜着眼看了他一下，随即勃然大怒，跳将起来骂道："屌你娘的，看什么！"两人随即扭打了一番，结果陈因矮小被学打得趔趄倒地，就此陈对学结下了怨恨。3年后，陈因纠集一些歹徒回清源山打家劫舍，又跟高为国结拜，羽翼渐丰，势力渐大。有一天陈身佩匣子枪，身着黄军衣，带领22个匪兵，撑着一杆写有大"陈"字褐红色的旗子，耀武扬威地开进埔任村，声称陈营长要找学阿古算帐。可学早已到厦门当伙计去了。于是陈就去找乡里的"老大"（耆老）陈天从和陈丕送要人。要不到人，就寻衅和恫吓，随即把两个"老大"绑往清源山去，关禁在洞后村的岩洞里。后来，由天从和丕送家人各出50块银元才把他们赎放回来。

1926年9月间，住在北门芋埔顶释雅桥（旧址即今第二新村侨建处）边，有个名中医叫杜宗尧，也被土匪设计骗出城廓而绑走，关在青阳室，后来花了200块银元才把他放出来。其经过情况：一天中午时分，有个村妇打扮的紧跟着一顶轿子，当轿停放在释仔宫口，那"老妇人"即开口说她家在清源山麓竹脚村，丈夫病危，要请医生诊治。杜见其哀求恳切，随即带药上轿出北门城而去。谁知轿子扛到上苍村（属后竹脚村）的石桥处停下，"老妇人"说声"先生请下轿，到了"。两个"轿夫"（实是土匪）立即把杜医生搀着直往朋山岭上去……而这老妇人其实也是高为国的土匪婆化装的。

（福建省泉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三 元 匪 害

林伦榕

农村匪害深重

三元是福建省沙县的一个小镇，周围村庄分散，人烟稀少，山高林密，交通闭塞，正是游兵散勇、流氓恶棍为匪为寇、拦路抢劫的场所。这一带最大股的土匪是尤溪土匪卢兴邦，其次是德化土匪朱廷芳和大田土匪吴得胜，还有下府土匪苏二忠。也有当地的散匪，如李丽吉、冯国安等。这许多土匪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勾结的。他们小帮靠大帮，狼狈为奸，残害人民。

土匪进村首先是“派粮派饷”，挨家搜劫，抓人绑架，奸淫妇女。如有半点违抗，就进行杀人放火种种骚扰。如民国 6、7 年间，卢兴邦股匪先后烧劫了筠竹村和中村；民国 14 年德化股匪朱廷芳烧劫张坑村；民国 17 年林桂成股匪烧劫陈敦村，黎王明股匪烧劫相对坑等。当时百家上下的中等村庄几乎都被洗劫。土匪还经常突然窜进乡村或在田野抓人，用各种毒刑残害人质，把人质弄得死去活来，强迫给家里人写信，限期拿钱到什么地方去赎。人质那时黑话叫“肉票”，不拿钱去赎，土匪就威吓要“撕票”，即要把抓去的人杀了。民国 17 年李红仔、李贵熊正在泥坑割稻子，被土匪抓去，李贵熊很穷，还被敲榨去 30 块光洋，才放他回家。承运的儿子在黄墩巷蔗园劳动，被土匪抓住，他没拿钱去赎，结果被刺死。民国 22 年列西黄铨拔在田里劳动被土匪抓到三板坑，要

他160块光洋的赎价。家里人闻讯即将最小的孩子元鸿卖了，只得了120块光洋交给土匪，因缺少40块，仍被活活烧死在土匪营里。

土匪猖獗时，到处拦路、拦河设卡“抽饷”。只有八九个土匪的史敬、蛏干仔等人，驻扎槐林村，竟敢在长岭尾设卡拦路“抽饷”，经过此路的每担谷子或笋干，要交多少买路钱，才能通过。靠三元城镇这么近的地方，竟敢如此，何况离城镇更远的地方？从永安到沙县唯一的水路是沙溪河。这段水路160华里，土匪设卡“抽饷”，最猖狂时达10几20处，如荆西上的三门坑口，荆西下的泥坑口，碧湖下的楮林滩、城头滩等处，商船、木排经过就得向土匪交买路钱，否则全船货物抢劫一空，甚至抓人要赎更加危险。造成交通闭塞，流通停滞，生产破坏，茶园、笋山荒芜，纸厂停产，甚至边远的晚稻田全部抛荒。

人民奋起自卫

三元及其周围各村庄的人民，受尽兵匪灾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自卫，各乡各村武术馆、一心会、大刀会一时兴起，并且乡与乡、村与村进行联甲（联合总动员自卫）。远近设岗哨，轮流站岗巡夜。如民国17年6月，曾有一股土匪以为三元城关没有防备，竟敢乘夜深人静时冲入大街抢劫。次日三元群众600余人，联合附近村民，并联络湖源等地数百人，围剿占据在中村等处土匪。民国20年，长安堡李贵锡等40人左右，聘请夏茂人罗桂仔来传教一心会，以学武自卫。因为他们感觉到，不组织起来自卫，不但生产不安全，生活也不安全。如农民黄杰接的儿子下田劳动，被土匪张福龙抓去烧死；白砂农民郑上栋兄弟3人被土匪抓去，花去几百块光洋才赎回来；甚至在富兴堡对面的村头洋的田地也不敢去收种。所以他们组织起一心会到田头去保护收割水稻和种豆。城关四坊八堡多数设武术馆，不分行业，每位青壮年，都到武术

馆学拳弄棍，学得一二手拳力，以便三五成群外出，能抵御土匪。

围攻土匪李方才

李方才是德化土匪朱廷芳的一股。民国17、18年间，卢兴邦为了扩张势力，准备攻打福州，将朱廷芳土匪“招安”为兵。李方才和朱廷芳一样，匪性不改，于民国19年初，带领三四十名土匪进驻三元。首先驻扎在下巷李氏宗祠，勒迫人民每户交纳土匪“下山税”2块光洋。后来为敲榨方便，移扎凤岗堡大户邓伯秩大厝，绑杀了商户邓辉和。开始时还装装“官兵”的门面，白天是官兵，晚上是土匪，明敲暗抢，搞得人心不安。以后就更猖獗，大白天搜劫行人财物，拦路调戏妇女。三元人民家家户户妇女小孩远避他乡，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当年6月的一天，李方才匪兵从凤岗堡经过传柑堡去河边洗澡，竟敢路上多次调戏妇女，在河边赤身露体上岸来拖过渡的妇女。传柑堡群众目睹这般兽行，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一面联络各村，一面准备土枪土炮。当这些兵回营经过传柑堡时，即被群众拳打一阵。匪兵回营拿来武器时，传柑堡群众已将闸门关闭，并用土枪土炮轰击匪兵。同时昌荣坊、阳巷、桂阳的群众们陆续赶到，从崇宁堡包围过去。白砂村、长安村的群众也提着土枪土炮，从朋盂头包围过来。李方才的匪兵被打死2名，看到群众来势很猛，立即放火烧民房，从飞凤殿岭尾撤退。数百名自卫的群众，奋不顾身地从红印山、天平针、长坑岭等山坑围攻追击。由下午2点多打到晚上9点多，把匪兵全部打跑，群众才回家。

杀人放火的张胜高

张胜高原先是卢兴邦土匪的头目，后来随卢兴邦招安，当上卢部的营长。三元群众叫他为矮子营长，匪性无改，仍然明敲暗抢，欺压百姓。他于民国20年带领一营“官兵”驻扎三元，寻机

为李方才报复。7月25日清早，匪兵分二路围剿长安堡，快到回瑶头时，被下田群众发现，立即赶回长安堡报讯。这时大部分群众已上山下田劳动去，少数青壮年闻讯，马上进入城堡和土楼，将平时准备对付土匪的土枪土炮对准各个路口。不料，张胜高命令匪兵分头窜进长安村和白砂村，见人就开枪刺杀，并且四处点火烧民房，两个村庄一时变成一片火海。老人、妇女和小孩根本毫无准备，临时四处乱窜，都被打死烧死，仅有百家的白砂村，被打死31人，10多家断子绝孙。被烧毁民房八九十家，只剩下二个祖祠和三四幢祖屋。全村农民拖男带女离乡背井，寄居亲朋家里，到解放初期才恢复74户。长安村全村300家，被杀害46人，其中儿童17人，妇女15人，老农7人，18家全部死亡无后嗣。70%民房被烧光，180多户无家可归。大部分人赤身或只穿一套劳动衣裤逃出来，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投亲靠友生活下来。长安、白砂两村人民，一代代相传这场灾难惨状，人人痛骂“矮子营长”比土匪更加残忍。

（福建省三明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抱犊崮山区绿林暗语辑录

明泉　桂军　培才　庆华搜集

在旧社会，每一行都有行话。秘密团体、揭竿团伙、盗匪马贼等也有黑话暗语，非通此道的人不易理解。占据抱犊崮逞强的孙美瑶部也不例外。究其成因，大致有二：一是他们胆大而心惊，愚昧而迷信，忌讳极多，“茶”与“查”、“饭”与“犯”同音，听了害怕，只好改用别名。二是他们行动诡密，运用隐语、暗语表情达意，便于活动，以利存在。“语言是交际工具”，是约定俗成的，没有阶级性，他们用的只不过是普通语言的隐语、暗语，寓意多有内在联系，而且有地方色彩。为供语言学、历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和文艺工作者创作的需要，我们辑录了过去抱犊崮山区孙美瑶等占山团伙的暗语资料，包括军事、生活、姓氏等几个方面计 146 条，供作参考。

一、军事行动用语 60 条

1、人物称谓类 21 条

官兵—仔子
北洋军队—大仔子
自己的兵—抗二枪的
县警备队—县仔子
红枪会—糟肚子
报信人—递钱眼的
领路人—带线的
探路人—趟线的
绑客—肉票
男绑客—钱票
女绑客—花票
看守人员—看客的

外人—勾子
大首领—大当家的
当土匪—闯光棍（闯马子）
吃里扒外的—扒灰
打围子爬墙进去的人—钻钱

2、作战行动类32条

打仗—捏焦壳
接火—上场了
死—就土
搜死人身—翻殃子
移动—活窑
打死人—砸子
偷袭—摸
逃跑—出水
撤退—下场了
撤退号令—“卖小鸡啦”
第一个冲上去的—贴头钱
第二个冲上去的—贴二钱
第三个冲上去的—贴碎钱
打完仗集合走—坑鸡老号
走路—上线
出发—开着了

3、武器类7条

匕首—清了（喝血虎、腿刹子）
红缨—硬钎子
石头蛋—冷子

掩护进攻的人—保外水
二首领—二当家的
成股土匪—马杆子
私自拉客—使小钱的

指路—引线
滑倒—跟进
官兵急攻—风高了
情况不好—风紧
受轻伤—挂花了
官兵进攻—来风了
钻山洞—迭钢窑
挖墙洞出去—捣洞子
成员被打死—滑啦
用石头打死的人—挤死
烧房子—红窑子
胆—苦
枪杀绑客—撕票
乘天明看围子的人回家打围子—打闪明差
用钱赎回死肉票—卖干的

土炮—灰筒子
信号枪—叫枪
快枪—焦壳
旗子—蛾子

二、生活用语 63 条

1、饮食类 9 条

酒—火山子（一三五）　　水饺—捏嘴

油饼—富烙子　　烧饼—亮子

面—灰子　　面条—扯丝

煎饼—摊张子　　醋—忌讳

馒头—火煊子

2、动物类 17 条

鱼—顶浪子　　猪—黑毛子

鸭—甩子（扁嘴）　　马—疯子

虾—蝲蛄　　骡—高脚子

鹅—长脖子　　驴—条子

鸡—伸头子　　狗—皮条子、皮子

羊—爬山子　　虎—拦路子

兔子—草溜子　　狼—柴嘴子

牛—春子　　蚕—抽丝子

猫—窟子

3、用具类 14 条

门—扇子　　筷子—对双

灯—老光　　菜刀—大片

碗—窑货　　雨伞—雨淋子

锅—温水子　　饭桌—平面

磨—推圈子　　梯子—花杆子

扁担—担尖子　　勺子—舀子

鏊子—退皮　　锁—圪塔

4、穿戴类 5 条

袜子—哈蟆叫　　鞋子—踩壳

裤子—叉挡　　子弹带—子带辫

别人穿过的衣服—臭叶子

5、气象类 7 条

下雪—飘蛾子（飘花子）　　上雾—挂帐子

下雨—摆啦　　退雾—清明了

刮风—走溜子　　天黑了—老光子坠了

阴天—上幔子

6、生活行动类 11 条

饭—泉子　　住宿—迭起来

茶—清泉子　　点灯—上亮子

吃饭—上泉子　　睡觉—迭了

喝茶—上清泉子　　闲话—二话

喝酒—搬火山子　　评理—讲亏头

派饭—看泉子

三、姓氏类 10 条

姓孙的—兔辈子　　姓吴的—口天子

姓刘的—水顺子　　姓于的—顶浪子

姓黄的—槐花子　　姓陈的—千金子

姓杨的—爬山子　　姓马的—高腿子

姓郭的—盖口子　　姓王的—虎头子

四、计量类 6 条

路程—线子　　一名土匪———线码子

一里路——尺线子　　十名土匪——线码子

十里路——丈线子　　一百名—百钱

五、地理类7条

大城镇—大晃台子
桥、河—横子
山洞—钢窑
黄龙洞—大钢窑
泥、沙—碜子
炮楼—土地庙子
关肉票的地方—客棚子

（选自《枣庄文史资料》第一辑）

山东巨匪刘黑七

张占军整理

民国以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天下一统局面消逝了，代之以军阀更迭频仍，内战连绵。山东大地，更加蝗、旱灾害不断，连年欠收。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社会诸多不安定因素，使得许多大大小小的土匪相继而生。他们成群结伙，持强掠压，图财害命，凶残狠毒，作恶多端。当年活动于山东省中南部沂蒙山区的杀人魔鬼刘黑七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刘黑七从1915年拉“杆子”为匪，到1943年被我八路军击毙，横行29个春秋，中间几经起伏，啸聚匪伙曾愈万人，最多时达到3万余人。他们先后窜扰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安徽、辽宁、吉林、热河、绥远、察哈尔、山西等10几个省。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抢男霸女，无恶不作。刘黑七活动范围之广，经历时间之长，聚匪人数之多，作恶之深，实属历史罕见。

据有关资料记载，仅1925年至1928年的4年间，光是沂蒙山区被刘黑七匪徒抢劫的村庄就有1000余个，烧毁房屋20多万间，杀害群众1万余人。

一、刘黑七的家世

刘黑七，本名刘桂堂，字兴田，黑七是其诨号。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刘桂堂生于山东省费县铜石镇南锅泉村（今属平邑

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当时，刘家地无一垄，一贫如洗，全家仅有的一点财产就是两间破房子，不要说象样的家具，就连切菜刀和案板都没有，只好用镰刀头垫着瓢背切东西。

刘桂堂的父亲叫刘湘云，略识得一些字，由于家境贫寒，到32岁时尚未娶亲。一次，他用石碴在山坡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南锅泉，出才人，出了个才人刘湘云；三十二岁没成亲，成亲必定是女人。"藉此发泄心中苦闷之情。第二年，张立庄一王姓女子到南锅泉村讨饭，经人撮合，与刘湘云结亲，因这个女人脚比较大，所以村里人都叫她王大脚。王氏先生两女，第三个孩子就是刘黑七，乳名叫"堂"，小时人们叫他刘堂。第四个也是男孩，乳名"小志"。刘桂堂幼年时，他家主要靠父亲夜间给村里打更和秋夏之际看护庄稼，挣点钱维持生活。因收入太少，时常揭不开锅，不得已，刘黑七从小就常跟着娘外出讨饭，四处流浪。后来，刘母到了本村地主孙协太家当佣人，因衣衫褴褛难入内室只好干些砍柴烧火等笨重杂活。刘黑七12岁时，就去给地主家放羊，当长工。放羊期间，他受到地主无数打骂，忍气吞声，整整苦熬了8年。8年的放羊生活，使刘黑七不仅熟悉了周围山地环境，而且练就了一身穿山越岭的好本事。刘自幼精明强悍，胆大过人。当放羊倌时，他曾拜唐四为师。唐四把自己放羊的绝技传授给他，投石子击羊角百发百中，不伤羊腹，同伙的羊倌对他这一手无不折服。

刘黑七年青时即有不轨行为，而且心怀野心。他曾与放羊的同伙们说："以后我管的人要比这群羊还要多，我非找几个大围女当老婆不可。"民国3年，年方20的刘黑七丢下放羊鞭，独自跑到青岛谋求生路。他在车站、码头当了一年的装卸工，后又到烟台游荡了1个多月，即返回了老家，继续给孙家地主放羊。按当时习俗，每年旧历的六月初六日为祭山神的日子。1913年"六月六"这天，许多羊倌聚到王崮山上喝酒凑热闹，刘黑七喝得烂醉，然后跟别人"推牌九"耍钱。由于神志不清，结果刘大输，醒酒

后死不认帐，便和众人打起来。他的师傅唐四嫌他不仗义，非常生气，飞起一脚把他踢到山崖下。王崮山崖高数十丈，陡如刀削，十分险峻。刘黑七从山顶被踢下去，当时人们都以为他必死无疑。谁都没能想到，他不仅没死，而且未伤一处并安然逸去。他自称是山神爷庇佑了他，其实是在滚下山的一瞬间，他猛地抓住崖中生长的荆丛，并以其爬山绝技，依扶荆丛攀缘而下，死里逃生。

大难不死的刘黑七又到外面闯荡一年有余，见了些世面，并结识几个狐朋狗友，心变野了，越来越不安分。他见当地匪伙打家劫舍，为所欲为，于是也渐渐萌生了结伙为匪的念头。

二、拉杆为匪

1915 年，23 岁的刘桂堂扯起“打富济贫”的旗号，开始网罗人马。他首先约集了本村的林传聚和赵春荣，3 人弄了一把鬼头刀，一支马冲子，走出家门，潜入山中，东抢西夺，开始了土匪生涯。不久，刘桂堂又联络了夏家村他的一个老亲夏兴德和张立庄他的表哥王太，并伙同当地的地痞流氓李满、苏四及其弟刘桂志，纠合 8 人，盟誓结拜为把兄弟。按年岁，刘桂堂排行第七，因他肤色黝黑，又生就一付狠毒心肠，故得了个“刘黑七”的绰号。

刘匪 8 人又偷了杨家峪子 1 枝土枪，1 枝德国造的套筒子，四处打家劫舍，绑架勒索，为害乡里。因长年受穷挨饿，所以一开始，刘黑七等土匪先抢了大批小麦白面、馍馍、猪肉等好吃的东西。其父刘湘云见后，敞开肚皮大嚼一顿，饿极暴食，当夜送命。不久，他们即聚众 60 余人，集结到苍山湾村富贵顶（山名）一带，占山为王，时聚时散，频繁活动。在郑城通向平邑这条路上，他们抢劫了不少过往行人。凡被劫而反抗者，当即杀死，一时间搞得人心慌恐，莫敢独行。经二年，土匪越聚越多，胆子逐渐大起来，抢夺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是年，山东督军张怀芝，为维持地

方秩序，下令层层剿匪。费县巡警哨官翟文林带领一个连队进剿刘桂堂匪股，将刘的弟弟刘黑八（刘桂志）击毙。刘黑七收罗残匪逃往抱犊崮山区，继续为非作歹。

三、刘匪迅速扩大

当时，正值袁世凯称帝失败，国内到处兵荒马乱，人心不定。有些生活无着的穷苦人和无业游民相继投奔刘黑七，人越聚越多。到1919年，刘匪就扩充到三四百人，所使用的武器也大部分换成了钢枪，活动范围达方圆百余里。

为尽快扩充实力，刘匪与山东南部另一股土匪勾结起来。这股匪徒大当家的叫张家栋，山东峄县郭庄人，因长了一张黑脸皮，故人称张黑脸。

1921年，山东军阀的第五混成旅开往费县，攻打刘黑七。这些地方军阀，只知保存个人实力，哪个真心去剿匪呢？他们与刘匪一接触，打了个小仗就撤走了。刘黑七虽死伤了几个人，并未伤筋动骨，军队一走，刘匪又猖狂活动起来。1922年春，山东省督军田中玉又派第五师第九旅到抱犊崮山区围剿土匪。田中玉是河北抚宁人，字蕴山。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田是段祺瑞的直属部下，但他却与王士珍接近。王任袁政府陆军总长时，田为次长。后任过山东兖州镇总兵、察哈尔都统，1919年底当上山东督军，历时5年之久。田督军所派部队先后围剿一年半左右时间，但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是抱犊崮一带山区地形相当复杂，到处沟壑纵横，重峦迭障，宜守难攻，官军新到此地，人地生疏，又不愿拼死卖命，因此除打垮几股小匪外，对象孙美瑶那样的大匪伙就无可奈何了。然而，因当时刘桂堂尚未羽翼丰满，故在此次剿匪中被打得七零八落，几乎难以存身了。在此情况下，刘黑七不得不收集所余残部投靠了颇具实力的孙美瑶，野心勃勃的刘黑七只好

暂且寄人篱下了。

津浦路大劫案后，1923年冬，孙美瑶被田中玉招安，被委为旅长。时过不久，田中玉设下圈套，将孙美瑶诱杀。这时，乖巧的刘桂堂见时机到来，便同滕县匪首张黑脸借机收拢孙的残部，以扩充自己实力。他们先后窜至蒙山、大小珠山、上冶、天宝山、方城、竹园、白埠一带为患，匪众已达数百人。这段时间里，不时有三五成群的小股匪徒投奔而来，有的农民也因没法生活下去而投奔了刘部，致使刘匪得以较快发展。由于刘黑七与张黑脸产生了些矛盾，所以二人便分手了，张带一部分人去了江苏地界，刘仍留在原地活动。

蒙山前有个较大的庙院，名为寿宫。这座庙院中有道士上百人，拥有大片林场和数百亩农田，还开有轧油作坊。当地多年风俗，每年三月三起庙会。方圆数十里的人们到这里来，有烧香还愿的，有赶闲集凑热闹的，有做买卖的，还有一些专来聚赌耍钱的。1925年山会时，刘匪带人乘夜袭来，抢了赌场，一下抢了银元2000多。

这一年，奉系军阀张宗昌当了山东督军，派旅长黄凤歧到鲁南山区剿匪。张宗昌是吹鼓手出身，少时浪荡，曾流落到东北为胡匪，因而对剿匪并不十分热心。黄旅长是个和事佬，素来不爱管闲事。此次受命剿匪，也是支应差事而已。名为剿匪，实则暗中勾结。官军每次进攻刘匪，都是对空乱放一阵枪，土匪放下大批银元"溃退"，然后官军抢了银元，丢下一些弹药"凯旋而归"。这样，刘匪得到了武器，官军得了银钱，各得其所。此正所谓"兵匪一家"也。

刘匪人马不断增多，武器也日渐精良，劫掠活动也就更加猖獗了。就在这一年时间里，他们先后抢了赵家庄，烧了王家庄，还多次到蒙阴等地大肆抢劫。有了物质和武器保障后，刘匪进一步招兵买马，扩展地盘。到1925年底，刘匪就发展到1000多人。到

1928年，刘匪竟达万人之众，加上“吃潮水”（黑话，意为跟着土匪趁火打劫的）共有1．5万余人。他们横行蒙山周围数百里，无人敢惹，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四、有奶认娘，反复无常

刘黑七匪部迅速扩大，自然就引起军阀们的重视。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为扩充各自势力，如蝇逐臭，都看中了刘黑七这块臭肉。早些时，韩复榘曾花了1．7万块银元和2000袋面粉收买刘黑七，刘黑七虽接收了韩送的东西，但并不投降韩复榘，韩以为刘黑七戏弄于他，恼羞成怒，便派人去捉住了刘黑七的老婆吴宗兰。吴宗兰是刘黑七的第十个老婆，刘黑七很不喜欢她，吴经常住在娘家，曾和刘黑七的一个连长私通，险些被刘枪毙了。韩复榘将吴宗兰扣押了一段时间，见刘黑七毫无反应，只好又把吴放了回去。

1928年，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派总参谋长何应钦率部北伐，打败了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进驻鲁南。何见刘黑七人马众多，便派人拉拢刘，劝其“改邪归正”，编为正规军。刘虽留恋土匪生活，但看上了蒋介石这块招牌，又觉得还是有个名牌好，便投到何应钦部下，在山东滕县东部被招安。何为表示抚慰诚意，便亲自率众与汤恩伯、顾祝同、谭延闿等显贵人物出席了招安仪式。刘部被编为国民党新四军，刘任师长，下设4个旅：第一旅旅长夏兴德，第二旅旅长刘克仁，第三旅旅长吴良杰，手枪旅旅长蔺兴田。刘即以“北伐先遣军”的名义，从滕县东部开赴莒县，后至胶东，又西转张店，乘车南下河南省禹县。刘黑七沿途夸官亮职，好不威风。刘部到达禹县后，正值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何应钦命刘攻打阎、冯。刘黑七为卖弄一下自己及其部下的战斗力，此次作战十分勇敢，在禹县把冯玉祥的一部分军队击败，一下子名扬四方。蒋介石为此拍去电报祝贺，国民党报纸也大加

吹捧。当时的刘黑七可是得意洋洋，高兴得神飘魂荡。是年冬，刘部又开往扶沟、临汝、西华一带，并委任其亲信平邑镇人刘汝洋当了西华县的县长。

刘黑七虽助蒋与冯、阎作战，但阎锡山为扩充自己实力，还是千方百计想把刘拉拢过去。阎派了一个叫王胡子的参谋打入刘的内部，并当了刘的参谋。王胡子想尽办法和刘接近，给刘以好感，为说刘投阎创造条件。刘黑七所部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又得到了蒋介石的通令嘉奖，满以为会给他个省主席当当。万没料到，他不但未能当上省主席，就连个军长也没当上，心里不由憋了一肚子的气。这时，阎锡山更是加紧活动，王胡子见时机成熟，便对刘黑七说，你跟蒋介石一月只拿 20 万元，若跟阎锡山干，每月可拿 60 万元，要多两倍哩；另外还给一些机枪大炮，不比跟着蒋强。刘匪历来信奉有奶便是娘的信条，谁给的钱多，许的官大，就跟谁干。于是，刘黑七在 1931 年 2 月便倒蒋投阎，为表“诚意”，阎锡山举行了隆重欢迎仪式，对刘大加欢迎，当场就给了刘部 4 门钢炮，12 挺重机枪，144 枝冲锋枪，还有 200 万元。阎把刘所部编为二十五军，下辖 3 个师，刘黑七当上了阎锡山的军长。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东北后，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不予抵抗，将部队撤到关内。这时，阎锡山怕张学良占了他的山西地盘，便率部开回山西老巢。刘黑七不愿随阎去山西，因而不服从阎的调动，自己带兵北上。何应钦恨刘出尔反尔，于是乘机袭击了刘匪的后路，刘无心恋战，匆忙率领所部万余人马经开封北渡黄河来到河北省大名一带，驻扎下来。为寻找新的靠山，刘黑七又投到张学良的麾下，张学良将刘黑七的人马编为新编第六混成旅，让其仍留驻大名。蒋介石为报刘叛己之仇，命其嫡系部队刘峙、展书堂等 3 个师和 1 个旅围攻大名，血战数日，刘损失惨重，最后仅带 2000 人马突围，回奔山东。时过不久，刘匪又东去鲁南沿海，攻打日照县城。正当此时，韩复榘密派费县地方武装包围了刘黑

七的老家南锅泉村，去捕捉刘的眷属。当时，把刘黑七的老娘逮住了，送交韩复榘扣押进来。

1931 年 10 月，刘黑七又西转费县、新泰、泗水三县交界地带。此时的韩复榘出于扩大实力的目的，仍千方百计想笼络刘黑七。韩复榘派部下陈席之和刘黑七进行联络。陈席之早就和刘黑七交情甚好。经和刘接触一谈，见刘果有投韩之意，立即回报韩复榘。韩听此讯后大喜，首先放回刘母，继而又封官许愿。1931 年 12 月间，刘黑七又招安于韩复榘门下，被任命为山东新编警备军副指挥，下属 4 个旅，又发展到 5000 余人。刘黑七虽又一次受了招安，但其自由成习，匪性不改，不愿受韩的约束，不听调动，仍是胡抢乱夺。韩见刘野马难驯，不能为己所用，时间不长就停止了对刘的粮食弹药供应。前后不到半年，刘又反韩自立。一怒之下，韩复榘将刘黑七在济南联络处的人员全部杀死。当时出面劝刘归韩的陈席之也被送上了西天。

刘黑七反韩后，于 1932 年 6 月北上，出山东，过河北，到达热河，把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一部分军队打垮。不得已，汤玉麟和刘订下了互不干涉和约，并同意刘到林东、林西等县驻扎。野心勃勃的刘黑七岂能满足于那块小天地，因此又于 1933 年春派亲信夏兴德到关外和日本人联系，企图借助日本人的势力以扩充自己。日方对刘匪也早有所闻，于是以高官厚禄收买。这样，刘黑七又投了日本，被封为第三路军总指挥，下设 3 个军，夏兴德当上了第一军军长。

刘黑七投日后，还未来得及给日方效劳卖命，又被宋哲元看中了，宋便派部下田家斌与刘黑七联系。田家斌是山东滕县的大地主，早些时就与刘过从甚密，结为好友。经田从中说项，刘又动了心，便于 1933 年 6 月反日投宋。刘黑七被宋哲元任命为抗日同盟军察东副司令，活动于察哈尔和热河之间的多伦、张北一带。当时，在国民党部分爱国将领奋起抗日精神感召下，在抗日同盟

军对日作战接连获胜形势鼓舞下，刘黑七也一度决心与日作战。在吉鸿昌将军指挥下，刘部多次与日伪作战。由于指挥有方，刘部作战勇猛顽强，所以屡打屡胜，很快便将察哈尔境内的伪军全部赶出察地。冯玉祥对刘倍加赞许。

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刘黑七向来是不管跟了谁，都不愿受任何约束，如果主子要管，他便翻脸，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带兵逃走。这次宋哲元收留了刘黑七，虽表面上和和气气，刘也表示听从宋的调遣，但内心里却相互猜疑，彼此不放心，互相戒备，处处提防。不久，刘与宋又闹翻了。刘黑七见势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933 年 8 月底，刘寻机带领人马离宋向热河逃去。一入热河，刘部和日伪军打了一仗，因刘无心作战，因而失利，败逃察哈尔省。宋哲元命团长李九思带全团兵力跟踪刘桂堂，距刘 30 里尾随，观其行动。刘发现后，又率部南逃到察省南口以东、山口西边的山峪里，不料四周被宋军所围。此时，如宋军开火，刘部将全军覆没。但宋事先有言，只跟踪不攻打，所以双方均未动武。刘因地理不熟，这回算是误入了死亡深渊。山峪两边的山坡是多年流水冲的光滑石板的溜水槽，行人相当危险。在万分危急关头，刘把旅、团长们召集在一起，将情况摆明，人人沉默不言，束手无良策，刘黑七把脸一沉说：“为了把队伍南开，死里逃生，只好把坠脚的东西全部放在这里了，牲口打死，东西扔掉，连家眷孩子也不留，统统杀掉，只留枪支。”说完，令属下回去立即动手。那些匪官一向是贪恋女色的，谁也下不得手把自己的妻妾打死。刘黑七见此情景，急了，亲手把自己的两个老婆打死，然后让所有孩子家属们站在山根下，命手枪队用机枪把家属孩子连同牲畜全部打死。为安慰众匪徒，刘说，这样做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到了河南、山东，我给你们每人弄个年轻漂亮的女学生。过山峪时，每人身上脚上绑些秫秸或干草，人与人拉开一定距离，向山下滚滑。过山

峪后，刘匪又大肆抢劫，继续南窜。

之后，宋哲元又派其管辖的汤玉麟攻打刘黑七。汤虽人多马壮，但由于吃过刘的亏，所以心里有些发怵。然而，他又不敢违抗上司命令，只得硬着头皮与刘交战。汤和刘接连打了18昼夜，又被刘部打败。刘匪得了不少战利品，大大武装了自己，很快又扩充到1万余人。1933年冬，刘部过察哈尔、热河，南下河南，到达南阳一带，一路烧、杀、抢、劫，为害百姓。

1934年2月，刘黑七又率部回到山东。韩复榘闻听此信，新仇旧恨，恼怒交加，决心把刘黑七彻底打垮。韩派出大批部队，并配有4架飞机追剿刘匪。经曹州和汶口两次战斗，刘黑七大败，所部匪徒逃之甚多，损兵折将，万余人损失过半，不多时日就只剩下4000余人了。刘黑七见大势不好，立刻率部东进，到达江苏省，先是打开了赣榆县城，后又北上，回到山东沂水、莒县等地。韩部穷追不舍，赶到诸城，终将刘部重重包围，血战20个昼夜，把刘黑七打垮。穷途末路，刘黑七丢下残兵败将，只带数名随从跑到天津日本租界躲了起来，他的部下刘德胜带残部几百人跑到了察哈尔宣化一带，暂避锋芒，保存仅有的一点实力。翌年秋，刘黑七在日本人的授意下，从天津到了宣化，找到刘德胜，继续招兵买马，不到半年，又发展到3000余人，分为6个支队。

1936年2月，刘黑七又率部进入关内，到达河北的保定、石家庄一带。但其元气尚未恢复，时过不久，即又被宋哲元、商震军队打垮，几近全歼。万般无奈，刘黑七再次溜到天津日租界躲了起来。此次失败，溃不成军，其部下都散居各方，窥测时机，以图东山再起。韩复榘知道这一情况后，花了6000块银元买通了刘黑七过去的一个连长。此人是平邑县人，名叫徐一龙。韩让徐跟他的亲信刘耀廷同往天津，去刺杀刘黑七。5月2日，徐、刘两位刺客潜入日本租界，他们乘刘黑七赌博的机会，猛地甩出一梭子弹，将刘匪黑七打倒在地，两人乘机而逃。其实，刘黑七是故意

倒下的，并未击中其要害，只是打伤了脚和嘴。刘黑七在天津治好了伤，继续派人与散居各地的土匪秘密联系，积蓄力量，待机而动。

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刘匪在天津马上将潜伏在各地的旧部召来投日。12月，刘黑七摇身一变，成为日本“皇协军前进总司令”，随日军又回山东。由于韩复榘只顾保存自己实力，不战而逃，刘匪顺利进驻胶东一带，在掖县、即墨等地大量扩充人员，又迅速发展到3000余人，仍到处残杀人民。这时，日军想把刘黑七的队伍进行整编，刘黑七非常刁滑，他识破了日军的阴谋，立刻和日军翻了脸。1938年底，刘黑七率部撤出胶东，以“反正抗日”的名义向鲁中南开进。当时，鲁南一带是由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所控制。刘黑七的参谋长朱复宇和于学忠的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素有交往，关系很好。周复原是复兴社的秘书长，反共积极，是国民党的老牌特务，很得蒋介石信任和赏识，后被蒋派到于学忠部担任了战区政治部主任。刘利用这层关系，首先通过朱复宇串通好了周复，周复又电告蒋介石，经蒋同意后，把刘黑七所部编为国民党三十六师，刘任师长，归于学忠统辖。1939年春，刘部进费南、费北两县。并在费南他的老家南锅泉村大兴土木、安营扎寨，将师部设于此，把其中8000人马分布于师部的四周各村。

当时正值国难当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因而刘黑七自改编为国民党三十六师，打着抗日旗帜回到山东后，我抗日根据地的费南、费北两县人民，都曾表示欢迎他，给他送粮送衣，希望他抗日救国。然而，刘是土匪成性，反复无常，不到一年就又反共了。其实，他抗日是假，而是借抗日之名，以避免遭受我驻费北的一一五师的打击，好先安下营寨，扎稳脚跟。他到鲁南不久，就和平邑镇的日军暗中勾搭上了，他一面和我们说共同抗日，一面又满口应承日军反共。日军不仅大量供给刘枪械弹药，而且让刘

在平邑镇日军首脑机关中设立了联络处。刘黑七施下这一计，取得了日军的信任，保证了日军不打他。反过来他又答应蒋介石曲线救国，国民党蒋介石又定时从安徽阜阳供给他弹药。刘匪还先后与国民党五十七军、九十二军相勾结，互为利用。这样一来，刘黑七明里是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暗里又是日军的“皇协军”司令，老百姓当时称他是“双保险”。

1940 年刘黑七公开了他的反共面目，积极配合日军对我费南、费北等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到处捕杀我抗日人员，封锁我抗日根据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刘黑七幼年家境贫寒，无文化，不识字，但他多年闯荡江湖，走南闯北，与官府上层接触频繁，跟其他土匪头子、地痞流氓共事也不少，因而养成了事事玩心眼、处处用计谋、时时要手腕的伎俩。他心毒手狠，诡计多端，狡猾善变，始终尊奉的信条就是“有奶就是娘，有钱就认爹”。谁给的钱多，有油水捞，许的官大，就跟谁。有利就干，无利就算。他曾跟着何应钦当师长，跟着阎锡山当军长，跟着宋哲元当察东剿匪司令，跟着张学良当混成旅长，跟着韩复榘当山东省警备副司令，两次投降日寇，又跟着于学忠当师长等，刘都是明一套暗一套，“你有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谁碍了他随意流窜的行动自由，他就跟谁翻脸，刘黑七的的确确是一个流窜成性、不受约束、不吃亏、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狡滑刁怪的惯匪。

五、残害百姓　恶贯满盈

刘黑七为匪 29 年，先后窜扰 10 几个省市。足迹所及，烧杀抢劫，残害百姓，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真可谓坏事干尽，恶贯满盈。

民国年间，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土匪四起，因而一些大的

村庄都有所防卫。土匪把劫掠村庄叫做“破围子”。刘匪开始时是选择靠山近而孤立的、防卫能力差的村庄。破围子前，他们首先以高价买通村子的内奸（黑话叫“勾子”），提供村内情报，然后选择夜间，尤其是下半夜守寨群众困乏、防卫疏忽的时候，由内奸配合，用事先扎好的梯子，竖在墙上蹬梯进寨。他们在进攻围寨前，要进行一番严密的组织工作，往往采用金钱收买土匪的办法，组成突击队，一般是匪首将银元放在桌子上，多少不等，让土匪自己去拿，拿多的进攻时在前，少的在后，土匪把这叫“贴钱”，并许诺打开围子后大闺女、小媳妇任意挑选。因此，一些匪徒要女人要钱不要命，自告奋勇，拼命打围子，打开围子后就大肆抢掠，抢财物，抢女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刘黑七自己就说他们是“三不拿”：碾不拿，磨不拿，尿罐子不拿。“二不抢”：不抢老鼠，不抢麻雀。刘匪杀人手段多样，无所不用其极。有刀刺、活埋、割耳、挖心、破腹、劈脚、上碾压、烧乳房、锲刀锲、零刀削、剜眼、穿耳、放血花、石头砸等等，残忍至极。待到刘匪人多势众，羽翼丰满后，他们便转向有防守设备的大村庄或县城了。

刘匪除以武力破围子大肆抢劫外，还以绑架人票（土匪黑话称被绑架的人为“票”或“肉票”），让其家人拿钱来赎的方法，勒索钱财。他们对绑架的人往往进行非人折磨，所用刑罚惨无人道。他们抓人后返回途中，为防止被抓的人逃跑，把每个人都捆绑起来，连在一根长绳子上，谁走得慢了，土匪就用枪托或木棍砸腿。若发现有人走不动或想逃走，就会立即被开枪打死。到了土匪住处，就把绑来的人赶进“客棚”（即黑屋子里），然后用马鞭或木棍逐人进行拷打，逼问家中有多少地、多少钱或其它财产，如若被打三四遍而不改口，土匪就此罢手。假如说的前后不一，那就更倒霉了。土匪会十遍八遍地抽打，直到把衣服抽破，脑袋打肿，打得遍体鳞伤，甚至死过去方肯住手。

土匪折磨“肉票”的另一手段是不让睡觉，俗称“熬鹰”，一天两天不睡觉还勉强支持得住，若三天五天不许合眼，谁受得了。只要谁合眼打个盹，被土匪看见后就用棍棒砸头，直打得疼痛难忍不能或不敢再睡觉为止。有的土匪为了夜间看守省事，每到夜里就用细麻绳把被架人的两个拇指并在一块拴牢，吊在屋梁上，只让脚尖点地。这样，往往是细绳勒进肉里，十指连心，疼得彻夜难以合眼。

被绑架的人如若有家中亲人或托亲朋前来要求赎人，土匪为多勒逼钱财，通常是当着亲人的面进行拷打，边打还边叫喊：“如不快赎，几天内就会‘撕票’（土匪黑话，即把“肉票”杀死）！”被架者亲人见此情景，就是倾家荡产，也得把人赎回，以免亲人遭此非人折磨或惨死土匪之手。

被绑架的人不仅随时受到严刑拷打，而且经常被罚劳役受苦。女的除被罚苦役外，还被土匪任意取乐。刘黑七为了取乐，有时让年轻女人脱掉上衣，在乳房上系上两个铃铛，强迫其去擀面条，铃铛晃动乱响，土匪把这种面条叫作“响铃面”。

刘黑七为匪29年，凶狠残暴，杀人如麻，所到之处，制造了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此仅举几例，以使读者了解这个山东巨匪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血洗白马峪

白马峪是个丘岭环绕、地薄人贫的山庄。连年旱灾，庄稼欠收，官征税，匪逼粮，农民难以维生。1925年底至1926年初，刘匪住在白马峪一带，多次向该村摊粮派款，庄长吴开久、闵先泰与村民商计，决定抗交硬拼。他们砍树烧炭自制火药，修补围墙，集中各家土造武器，日夜守护村寨，以防刘匪偷袭报复。

1926年1月23日，刘黑七带领匪部500余人，从圣良庄、解峪子一带抢劫回来，住在和白马峪相邻的毛沟、黄埠西、于家庄、

韩家庄4个村庄，指挥部就设于与白马峪仅一岭之隔的韩家庄，准备夜间偷袭白马峪村。

当时，这个村共107户，632人，加上韩家庄等村临时来避难的，总计有745人。寨子围墙高5米，有炮楼11个。入夜寒风刺骨，村民们不顾寒冷，警惕地守卫着自己的村庄。晚上10点多钟，刘黑七派刘德胜带领200余名土匪偷偷摸到北门，土匪刚爬上梯子，就被早有准备的村民打了下去。接着，土匪用火力掩护，派12个匪徒爬向北门，企图用大刀斧头硬把门劈开，但是，还未等他们靠近北门，又被村民的土枪炮送上了西天。土匪无计可施，只得撤回韩家庄，全村百姓怕土匪卷土重来，持戈待旦，彻夜未眠。

第二天早晨，土匪分为两股，向南北两门同时进攻，但又一次次失败了。中午时分，土匪从韩家庄捉来近百只鸡，浇上油，点着火，扔到围子里，这些满身着火的鸡到处乱飞乱撞，引着了房屋，土匪趁着越烧越旺的大火和村中的混乱，再次从西面和南面发起了进攻，用梯子和绳索等开始爬墙。这时，围子里已弹药不多，于是男女老少齐上，用铁锹、菜刀、石头、木棍，硬是又一次打退了土匪的进攻。到下午1时，土匪在先后9次进攻中，已死亡过百，攻打围子的信心有所动摇。恰在此时，刘黑七捉到胡阳村的一个算命瞎子，就让瞎子算算，白马峪的围子能不能打开。这个算命的吓得浑身发抖，连说："能打开，能打开，再想点办法，天黑前一定能打开。"于是，刘黑七和夏兴德亲自督战，硬攻南门。打了一天一夜的村民已极度疲劳，弹药已尽，伤亡渐多。下午2时左右，南门被打开了，土匪们狂叫着涌进围子，血腥的屠杀开始了。

吴开久、闵先泰等几十个守门的村民和土匪拼杀一阵后，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刘黑七下令把这几十个人的心肝掏出，然后碎尸数段。一个土匪朝闵庆修小外甥头上就是一棍，另一土匪上去踩着腿把孩子撕成两半。土匪用刀砍下了孙玉常妻子怀中小孩的

脑袋，母亲还抱着无头的孩子朝北门奔跑。村民吴纪士被枪打死，他3岁的男孩被土匪放在碾盘上压成肉泥。村民刘开背着个3岁的孩子想突出去，被一土匪在身后一刀劈成两半，然后提起小孩的腿扔出五六米远。庄长吴开久的妻子被推到火里活活烧死。吴纪信抱着妹妹，迎面碰上土匪连长夏登全，夏用短枪把吴打死，提着小女孩的腿摔到墙上。张四牛的妻子已怀孕8个月，拖着沉重身子，领着2岁的女儿逃跑，土匪逮住后，把女孩扔进井里，把张妻吊到树上，扒光衣服凌辱后，用刀豁开了她的肚子。土匪逮住一个姓韩的青年，用刀挑开他的棉裤，掏出棉花，浇上油，用火点着他的裤腿和袄袖，土匪们围看火烧活人，真是惨无人道。土匪们开心够了，就用尖刀从韩的左耳穿进，右耳穿出，然后又用石头把尸体砸烂。灭绝人性的匪徒用张善学作实验，看多少棍子才能打倒一个人。打一棍子，让张爬起来再打，爬不起来了就朝头上泼凉水。一共打了30多棍，待张奄奄一息时，又用刀把肚子剖开。村民张德元被土匪拴着辫子吊在树上，乱枪打死，其子张瑞云也被土匪打断手脚，浇上油烧到半死后又乱石砸成肉泥，张德元的母亲被土匪用标枪扎死，身上共捅了四五十个窟窿。土匪头子夏兴德用短枪把刚结婚的张二传打死，把张的妻子抢走作了压寨夫人。

这次血腥屠杀持续了4个来小时，村中血水、尸体到处可见。黄昏时分，土匪才用驴驮着抢的东西，押上杀剩的妇女，离开白马峪。走到盐店村后，土匪把妇女集中在一个场上，打着火把挑选了七八个年轻漂亮的闺女媳妇，把其余的都关在3间屋子里，点着了火。

这次，刘匪在白马峪共杀害393人，其中本村的307人，外村来此避难和走亲的86人，张玉岭、闵现林、闵光泰等11户被杀绝。

（二）南孝义惨案

1927年，位处蒙山前的南孝义一带连年大旱，三年碌碡不翻身。村里人有的外出逃荒讨饭，留在村里的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吃糠咽菜，连草根树皮都弄了吃，甚至还有卖人肉的。平邑西北有个小山，山上出一种不咯牙的石面，用火一炒，还有点米香味。人们饿得没法，十里八乡的人都到这里来挖石头，炒了当米面吃。可是，吃了这种石面后大便燥结，只好用棍往外挖。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刘黑七这伙土匪还向百姓要钱要粮。南孝义村拿不上，大伙一狠心："抗交！"这一下可惹怒了刘黑七，于是带领土匪包围了南孝义村，进行报复。

土匪把村子严密封锁，日夜攻打。村里的人一齐上阵，用刀锹棍棒和土匪厮拼。土匪攻进一次，被群众们打出来，再攻一次，又被打出来。如此往返7个回合，村民终因抵不住千余土匪的攻击，被土匪攻了进去。土匪一进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点，顿时村内火光冲天，哭喊声响成一片。徐立修尚未出嫁的姐姐被土匪捉住，扒光衣服，玩弄糟蹋够了以后，用刺刀捅进肚子，而后开膛剖腹，取出五脏，填入石块，真是残忍至极！王宗成的弟弟王廷，年仅10岁，躲藏不及，被土匪用挖耳尖刀刺穿脑袋，钉在墙上，惨不忍睹。青年梁兴存被土匪逮住，先是砍掉了腿和手，而后大卸八块。徐立珍之妻怀抱孩子，被土匪一把抢过去扔到熊熊大火之中。母亲不顾一切扑了上去救孩子，又被土匪一脚踢到火里，活活烧死。豺狼般的土匪杀红了眼，就连小孩也不放过。徐立方的儿子被土匪捉住后，用铡刀铡成两截。徐三省刚一岁的男孩，被土匪抱到碾子上压成了肉泥。卜庆和的儿子2岁，被土匪倒提两腿，一劈两半。有些老人、妇女不堪忍受匪徒残害，纷纷投井自杀，先跳的没入水中，后跳的积于水上，满满一井。土匪发现后，把碾砣滚进井里，使井中无一人幸免。

当时，南孝义村中共136户，735人，除在外逃荒要饭的300多人外，凡在村里的不到半天工夫，就被刘黑七这伙杀人魔鬼残害了346人，还抢走未出嫁的闺女15人。这次大屠杀后，有41户死绝，郭姓8户共26人，被杀25人，只郭传德一人幸免于难。

（三）大泗彦村的劫难

1928年春，杀人不眨眼的惯匪刘黑七流窜到大泗彦一带。旧历二月初八，10余个土匪闯入村来，嚎叫道："刘师长（刘黑七）命令你村交摊张子（煎饼）100斤，暄子（馍头）200斤，黑毛子（猪）10头，现银子（钱）100元！"两位庄长跪着苦苦哀求，请他们开恩让少拿点。匪徒们十分骄横，说："锅底下不结蜘蛛网，就得交钱拿给养，少一点也不行，今天下午要交不出，就枪毙几个！"村民刘希高气愤不过，向着土匪们仍去一颗土炸弹，炸伤了几个，其余逃回报告了刘黑七。

当时，大泗彦有92户人家，637口人，为防御小股土匪和盗贼骚扰，全村修了2个土围子，并筑有10几个炮楼。附近村庄有些群众也来这里避难。

当晚，1000多名土匪向大泗彦村扑来。围子里的群众奋力还击，直打了一天一夜，土匪也未能把围子打开。翌日晚，土匪又用声东击西办法进行偷袭，但还是未能得逞。

二月二十一日晨，刘黑七来到大泗彦南岭指挥，大叫："我定要拔掉这个小小的围子，杀它个孩丫不留！"双方激战了大半天，到下午时，围子被刘匪攻破了。

杀人魔王刘黑七率众匪攻入围子后，见人就杀，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刚出世的婴儿均不能幸免。刘光洪13岁的男孩被土匪提着腿头朝下扔入井中。在土匪机枪阵阵扫射中，一片片的村民倒在血泊之中。匪徒们把刘广岭绑在树上，把铁钎戳进脑袋致死，又用镰刀把全身的肉一片片削下来，最后只剩下一副血淋淋的骨

架。村民刘广钦一家6口被匪徒堵在家里，先是刘广钦被剖腹，挖出五脏；其妻被割掉乳房而死；他的小女孩因趴在娘身上护着，被土匪拉到碾子上活活压死；3个男孩有2个被枪杀，1个被土匪割掉了生殖器，并让小孩光着腚坐在簸箕里活活折磨致死。有的村民被刘匪活埋在地里，用钝器砸头放了“天花”，有的几个小女孩被匪徒将辫子拴在一起，用柴草盖住头，点火焚烧而死。还有的小孩被劈开了两腿。一阵大屠杀后，好端端一个大泗彦村变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匪徒们还怕有的人没死，又挨个用刺刀捅。到后来，为省事，土匪们干脆在死尸上堆放柴草，浇上煤油点火焚烧，整个围子顿时浓烟滚滚，一片火海。灭绝人性的匪徒们站在高处，看着冲天大火狂笑，土匪们烧杀过后，抢上可带的东西扬长而去。

大泗彦村遭劫后，到处一片凄凉。土匪此次大屠杀共残害947人，其中大泗彦村的559人，外村来这里避难的388人，刘广洪等48户被杀绝，刘光信一家是几世同堂的大家庭，被土匪杀死53口，一个600余口的村庄，被残杀得只剩下70多人。

六、生活糜烂　荒淫无度

匪首刘黑七不仅凶狠惨忍，杀人如麻，而且生活极端奢侈，荒淫无度。

刘黑七对其土匪生活感到十分得意，他常洋洋自得地对手下的匪徒们说：“官不打，民不问，咱们的日子真好混。地有千顷靠沙河，不跟钢枪压着脖。”的确一点不假，刘匪本出身贫寒，家中指地无有，个字不识，就因为拉杆子当了土匪，有了钢枪，靠着抢掠，发了横财。据说，刘匪在流窜途中，常有三五十匹马专驮着银元，并用抢来的钱购买良田2000余亩。

1939年春，刘匪被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收编，刘黑七当上

了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随即进驻费南、费北两县。当年秋天，他回到自己的老家南锅泉村安营扎寨，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巢穴。刘匪黑七在南锅泉村中间，选择了最满意的位置，赶走了17户农民，抓来千余名民工，拆墙扒房，垫洼打夯，垒墙盖屋，挖壕修堡，在匪徒的刺刀皮鞭下为其大建安乐窝。刘匪对匪巢建筑要求非常严格，所用的石头必须一样大小，六面见方，四面见钻，锋边锋棱，不能有一点残缺。有的大条石长约近丈，有些明面用的石头还得精雕细刻。刘匪嫌本村的石头不好，就派匪徒们四下里去抢。过去群众曾说："刘匪什么都抢，就是不抢石头。"这回，只要看中哪家的石头好，就是拆房扒屋也得给他。经过半年时间，修建了一座5个大院组成的八卦大宅。各个院落，横竖成行，一溜穿堂。还修了花园，盖了蜂房。此外，在村子四周还筑有围墙，墙高1.2仗，宽6尺，青石到顶，上面可操兵跑马。四个角上各垒1座三层圆形大碉堡，大碉堡中间又各修1个两层的中型碉堡，中型和大型碉堡中间又各修3个小碉堡。围墙的墙基下，全用石头砌通。大、中、小碉堡并围墙上和墙基里的通道内，枪眼密布。在围墙外面还挖了一条9尺宽的壕沟，壕中满水，常年不断。水壕外是一道密密层层的鹿寨，严密封锁，鸡狗难钻。为筑鹿寨，匪徒们逼民工们砍尽了四周村庄的树木，鹿寨外扯上了一道铁丝网，网外布着地雷。除此之外，还在村外东西两座山上各修了一座高大的炮楼和许多碉堡，刘匪的数千人马就布置在碉堡林立的周围各村和山头上。在这森严壁垒、坚固而豪华的巢穴中，刘黑七和他的妻妾们整日里吃酒作乐，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刘匪是个淫棍、色迷。刘黑七从当土匪起，生活就是糜烂的，整日花天酒地，寻花问柳，玩弄妇女。不论住在何处，还是在走路，只要看到哪个妇女长得相貌好，立刻派护兵抢来奸污，奸后推出。每到一处，晚上必定要让女人陪着他，他管这叫"换衣裳"。据说，有一次到了滕县孤山，老百姓都跑光了，实在找不到

年轻妇女，一个中年妇女在家未跑，被土匪捉住，就送到了他那里，他也不嫌弃。刘黑七玩女人，象野兽一样，只要他看上眼的，即使是他的部下或同僚的妻子，也要千方百计弄到手。刘黑七任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时，刘副师长是他的结拜兄弟，其三姨太年轻漂亮。一次春节时刘黑七宴请部下，刘副师长偕三姨太赴宴，宴席间三姨太出去解手。随即刘黑七也跟了出来，尾随其后，奔向女厕所，站岗的老兵以为他喝醉了上错厕所，未加理会。不多时听到厕所里传来了三姨太叫喊声，这个老兵知道刘黑七在里面，不敢进去，便从墙外跷脚偷看，隐隐约约看见刘黑七趴在三姨太的身上。

刘黑七奸污妇女是家常便饭，如果碰上特别貌美又中他意的，就作为他的老婆。刘黑七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连他的贴身护兵都数不清。他的老婆娶了丢、丢了娶，前后共有 10 几个。他闯土匪不久，找的第一个老婆是一个姓陈的大脚寡妇。因刘黑七在一次被官兵追捕时，陈寡妇把他藏起来，救了他的命。刘感其恩留她作老婆，时间不长就把她抛弃了。第二个老婆诨名叫“二麻子”，第三个老婆叫“小白脸子”。刘黑七四处窜扰时，把她们留在家里侍候他母亲，后刘黑七听说“二麻子”与主持家务的副官黄景山私通，说了声“该死”，他的护兵当即赶到南锅泉，把“二麻子”枪毙了。刘黑七每到一处，就从掳掠的妇女中挑选好的同居奸宿，他的老婆多数得不到宠爱，就暗地与别人私通。因此，他的第四和第五个老婆都跟着护兵远逃他乡。他窜扰到临沂，见到一个叫陈尚兰的妇女貌美，就抢来作了第六个老婆。1926 年底，刘黑七血洗费县白马峪时，在韩家庄看到韩桂荣的妹妹年轻美貌，抢来当了第七个老婆，当时非常宠爱，刘黑七还经常备着厚礼到韩家庄丈人家。但因年龄悬殊，后韩女与刘手下一个青年小头目私通。在两人私逃时，被刘匪抓回，亲自用手枪将韩女打死。死后，刘黑七还派了一个连的人到韩家吊孝和发丧。他的第八个老婆姓

董，乳名大彩。董女以卖大饼为业，当时年方19岁，貌美品端，为刘黑七巡街所见，强娶为妻。后来，刘匪被杨虎城打败，刘将董女移于天津租界。刘投冯玉祥抗日同盟军时，又接董女到察哈尔，后将其弃于内蒙。刘黑七第九、第十个姨太太是在外地和天津日本租界时找的，每个老婆住在楼上一个一等房间，整日陪他吃酒玩乐。刘黑七这还不够，还经常包着三四个妓女。刘黑七的第十一个老婆是平邑县巩立庄的，叫吴宗兰。刘很不喜欢她，吴经常住在娘家，曾和刘黑七的一个连长私通，险些被刘枪毙。第十二个老婆是平邑县小官路村的，姓孙，刘黑七流窜到柱子村时，把他娘和这个老婆从锅泉迁居，暗藏在费县岔河村居住。这个姓孙的女人和刘黑七派去侍候她的护兵王结实勾搭上了。刘母知道后，训斥王结实："你作死，师长知道了，活剥了你。"王吓得带上这个女人逃跑，躲到江苏省某地隐居起来，直到刘黑七被消灭后，才敢回到自己的老家平邑县卓家庄居住。刘黑七的最后一个姨太太是平度县的一个中学生，名叫苏倩。这是他的老婆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也是最受宠爱的一个。苏家是个没落地主，苏女的父亲早逝，她的母亲供其念了中学。1939年秋，刘匪窜到平度县，司令部就设在苏家。当时，苏女逃躲不及，他娘就让她躲在天花板上，刘匪一住数日，苏母只得天天偷空给其女送些吃的，时间一长，被刘匪发现了，刘黑七见苏女年轻貌美，十分喜爱，遂提出与其完婚。苏女不从，刘匪就让四五个人看着，也没难为她，直软禁半年之久。刘匪让看管她的人称她"刘太太"，企图以此法造成事实，刘黑七对苏女说："你来这里半年了，人们都叫你刘太太，即使我们没同居，别人也不会相信的。"万般无奈，苏女就和刘匪结了婚。说来也怪，刘匪自娶了这位平度太太后，很少再寻花问柳，把原来的几个太太也忘记了。此后，刘黑七走到哪里就把平度太太带到哪里，并教会了她骑马和放枪。然而，这位女中学生和刘匪是没有什么感情可言的，只不过是一个弱女子逢场作

戏罢了。

刘黑七不仅荒淫无度，而且生活也十分奢侈。他自己一个小灶，他母亲一个小灶，他老婆们一个小灶，随行人员们一个小灶。每个小灶每顿饭都是四盘八碗，名酒佳肴。刘黑七吃饭都是单独一个在一处，不让人陪他。一般情况下他吃一顿要值10块左右的银元，相当那时二三百斤粮食的价钱。至于办一些酒席，那一次就得花销几十块现大洋。他每顿饭都离不开鸡鱼肘肉，用人民的血汗吃得肥头大耳。逢年过节，刘匪的姨太太们都得给刘母磕头，一个头就赏100块银元。刘匪娶儿媳妇时，儿媳给10来个婆婆叩头，每人赏300块银元。丫环叩一个头，赏给50块。刘匪家到底有多少银元，谁也摸不清。

1942年，刘匪给他母亲过生日，便四乡里下帖子。当地士绅巴结他，各村被逼捐款集资，为刘母上寿，刘黑七借机又一次发了大财。据当时管事的说，当时光外村送的猪羊就有2000多头，糕点3万多斤，大摆寿堂10天，条几上放上刘母的画像，接着一溜八仙桌上摆满了金条、金砖、金八狗子、玉石人等珠宝玉器，一共请了200多个厨师，连日大办酒席。10天共宰杀猪羊2000多头，买酒1.5万余斤。三间屋的糕点，来了客就拿，拿了又有人送来，吃了10天也没见少。这次庆寿，究竟去了多少客人，弄不清，只知道每桌酒席坐7个人，光正式的燕翅海参席就吃了2800多桌。为吃席，刘匪派人到了50里外去找碗要碟。刘匪可谓是挥金如土，用抢掠来的人民的财产，终日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

七、诡计多端　为人奸诈

刘黑七是个五短身材，长的又矮又胖，头大脚小，手指短粗，面皮黝黑黝黑的，当时人们都说他是乌龟托生的，称他为“乌鱼精”。此人不但心黑手毒，而且鬼心眼子特多，善于看风使舵，为

人也十分刁滑、奸诈。

1934年春天，刘黑七率领众匪又窜回到山东。因和韩复榘结下不解之仇，韩集中兵力对其进行围剿。天上有飞机侦察，地上是军队日夜追击，从鲁西到鲁中和鲁南，又从诸城打到江苏边境，追剿一个多月，使刘匪损失惨重，几近瓦解。刘黑七见大势已去，就将残部交给部下带领，自己化装只身而逃。在路上，他遇到一个青年农民，用独轮车推着母亲赶路。刘黑七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忙上前搭话，主动帮助那个农民推车，并拜其母为干娘。为取得那位老人的信任，一路上的食宿盘费全由他支付，还不断亲切地喊娘，并送给老人一部分钱，青年农民母子以为遇到了“好人”，感恩不尽。途中遇有官兵盘查，老人主动掩护，自称是她的2个儿子。由于刘匪装得逼真，一路上未引起官兵怀疑，使其顺利混过数道关卡，得以脱身。脱离险境后，他只身逃亡天津，在日本租界潜居了下来。

因为刘黑七流窜到河北时，挖了韩复榘的祖坟，所以韩对刘恨之入骨。听说他逃往天津住在日租界里，就花了6000块银元，并以团长的职务相许，买通了刘黑七过去的一名教官徐一龙，让徐和韩的亲信刘耀庭去天津刺杀刘黑七。只因刘黑七狡诈，才大难不死。

刘匪是很注意培植亲兵的。1939年，刘黑七再次回到老巢锅泉后，一年之内就在附近村庄三次招兵买马。凡是离锅泉10里以内的，刘黑七都要亲自考核，问明其老人的姓名、亲戚的情况后，就把这些人编入卫士连或要害部门，视为自己的亲兵。刘黑七平时常对他们施些小恩小惠，要他们效忠。凡是表现忠诚而又有所贡献者，刘匪就予以奖赏。如有逃跑的，抓回一律枪毙。若抓不到本人，就杀尽父母、兄弟。父母兄弟逃了的，就杀亲戚，没有亲戚的，就杀他的四邻。因此，他那些亲兵都不敢逃跑，这些亲兵大都狠毒凶残，抢劫杀人成性，群众称之为“马面房里的人”。

为把这些亲兵拉拢的更紧些，年龄大些的就结为仁兄仁弟，年轻些的就认作干儿子，致使这些人大多誓死为其效劳。

刘黑七非常狡猾，一会儿穿军装，一会儿穿便衣。不仅如此，他还找了几个和他相貌相似的人，同他打扮的一模一样，充当他的替身。常言说狡兔三窟，刘黑七十窟也多，他行踪不定，没有一定规律。有时白天在一个村子，夜里又跑到另一村去住宿了。有时睡到半夜还起来再换个地方。常常官兵追剿，费好大劲暗中侦察其行踪，到头来捉住个假刘黑七。有时日军或国民党杂牌军请他赴宴，如他觉得不可靠，就派替身前往参加，真是比狐狸还狡猾。

1933年，在高官厚禄收买下，刘黑七曾在东北投靠日寇，当时日军还发给他部分枪炮。但时过不久，刘匪即脱离日军，逃入关内，又投到宋哲元麾下。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他再次投靠日寇，并随日军窜到胶东。因日本人受过一次骗，认为刘靠不住，所以不再愿供给他武器。于是，刘黑七就找了个要饭的妇女，让她穿上新衣服，假扮为刘的老母，送到日本人那里当作人质抵押。当然刘黑七是用花言巧语，给要饭的作了一番工作，经双方同意并答应按他的意思去做才把她送去的。日本人也知道刘匪对母亲是很孝敬的，既然他把老娘送来抵押，就不再怀疑他有二心了。就这样，又发给他3000人的武器弹药。时过不久，他又不听日寇的调遣了，还打出“反正抗日”旗帜，翻脸倒戈和日寇干起来，日寇一气之下，就把刘黑七的“娘”抓来要处死，可怜的老妇人吓得说了实话，日寇才知道又一次上当了。

刘黑七善于见机行事。他奉行的宗旨是不做赔本买卖，不管和谁，打的赢就打，打不过就跑，实在没法就暂时投靠，以待时机。拉土匪队伍初期，他和军阀张宗昌交过手，不仅未垮，反而得了便宜，使其发展壮大。韩复榘到山东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曾几次对他进行围剿，他看抵挡不住，就离开鲁南，流窜到安徽。从

安徽到了大别山湖北境内后，又遭到国民党军队攻击，又流窜到河南。没过多久，又遭到西北军攻击，刘便率部渡黄河北上，到了河北与山西交界处，为免受阎锡山围剿，得到喘息时机，就向阎投诚，并骗得军饷，度过了难关，如此等等。

刘黑七几经起伏，前后流窜数省，为匪近 30 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苦心培植了一个得力的“参谋班子”。刘匪出去“绑票”，有时就绑架一些有名望、有计谋、有影响的人物，把这样的人绑来后，不是勒其钱财，而是以上宾相待，让其充当“参谋班子”成员。刘匪不管去打哪村哪镇，都事先把意图告诉参谋班子的人，让他们出点子，作出具体行动方案。如果成功了，就宴请奖赏出主意的人。如果是因为主意出的不好而失败了，就把出主意的人立即枪毙。为此，那些参谋人员都是小心谨慎，谁也不敢出坏主意。这个参谋班神通广大，交往甚广，政界、军界、上层、地方都有人参加，耳目众多、消息灵通。正是靠了这些，刘匪才得以横行 29 年之久。

八、小恩小惠　收买人心

刘黑七为人阴险、毒辣，杀人如麻，坏事干尽，但为其生存，他在笼络部下、收买人心方面还是动了些脑筋，有一套办法的。

兔子不吃窝边草。一次刘匪部队开到他的老家费县锅泉村。刘黑七事前便通令各部，不得欺压百姓，违者严惩不贷。可是匪军抢掠成性，到锅泉后，仍有一些匪兵抢群众的东西。一次，一个老年妇女找到刘桂堂告状说：“桂堂侄，你的部下拿走我家两只鸡，还有几十斤粮食，这叫我老婆子怎么活？”刘安慰了老人并让副官立即如数赔偿。当他查到被告的这个人后，立即枪毙。在处决前，他召集部下讲话说：“我常给你们讲，有些人就是不听，连野兽都不如。兔子还不吃窝边草，都懂得窝边草是伪装，使敌人看不到

自己，怎么这点理还不懂！我们干这一行也要有几个‘窝’，也不能动窝边草。”

重用家乡和有能耐的人。刘匪最信任的是家乡一带的人，所以他的身边和一些重要部位都安插的费县、滕县籍的人，他常给这些人以好处，使其死心踏地替他卖命。对那些虽非同乡，但确有学问和能力的人，刘黑七也能予以重用，委以重任。如参谋长朱复宇是东北军军官，当过于学忠的参谋，投奔刘后，被破格提拔重用。再如李庸民也是东北军军官，刘见其有本事，很快从连长提到副团长。

给部下找女人。刘黑七为笼络部下，每抢到一些妇女后，就分给手下的一些人，有的找到合适的女人后，刘就为其娶亲，亲自主持婚礼。这一着，既安定了部下的心，也使部下对其很感激。

为部下解决困难。刘常用一些小恩小惠手段，来为部下做点好事。他常走访士兵家属，问这问那，以表示“关心”，当发现某家属有困难时，就给予帮助、救济。这样一来，不仅士兵感激，连家属也能为他“作思想工作”了。

称兄道弟，接近下层。刘对其部下很少打骂，一律称什么“大哥”、“二哥”、“麻子哥”，一派江湖味。刘的部下有很多人吸大烟，他不仅不管不问，有时也凑过去，躺在一起，一边拉家常，一边要过去抽上几口。匪兵以为刘是看得起他们，所以有什么话也愿跟他讲。

舍饭放粮。为笼络周围群众，有时就用抢来的粮食，做成米饭，放在大路口，谁去谁吃，一人一碗，连放三天。1940 年春，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刘匪曾让四周群众去领粮，藉以收买人心。

金钱收买。凡是乡里四邻，只要是找到刘黑七，或找到他的部下禀告一声，刘匪就给几块钱。有一次一下去了一伙子人，刘就让人拿来一布袋银元，倒在地上让大家去抢。

当然，刘黑七决不就是心地善良，真要发什么善心，为百姓

做什么好事，而只是虚情假意，收买人心而已。

九、刘黑七的可耻下场

1939年，刘黑七重新和国民党顽固派挂上了钩，蒋介石给了他国民党新编三十六师的番号。以后，他又投降日寇，挂上了伪“和平建国军”十军第三师师长的头衔。在蒋占区，他自称是老牌的中央军，在敌占区，他又称是日本皇协军，两方面都派驻了联络副官。他的队伍挂着红日、白日两个旗号，有黄色和灰色两种颜色的军装，吃着日伪、蒋军的双饷。

1943年下半年，抗日形势发生变化，我军困难局面开始扭转。刘黑七部接连遭到我军重创后，率残部离开老巢锅泉，逃往费县柱子一带，继续烧杀抢劫，为非作歹，疯狂摧残群众抗日活动，袭击我地方武装，杀害我抗日干部。鲁南军区首长根据山东军区的指示，为配合鲁中、清河地区的反扫荡斗争和从根本上改变鲁南斗争形势，决定集中鲁南部队兵力发起讨刘匪战役，决心除掉这个鲁南的最大祸根。军区首长将主攻刘匪司令部东柱子的任务交给了三团。

根据以往经验和刘黑七本人的特点，我军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对策，以假乱真，麻痹敌人，以达到最后彻底消灭之目的。

首先，在政治上对其进行麻痹。既然刘黑七打着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的招牌，我们就以鲁南边区的名义派人与其联络。开始，他对我联络人员进行扣压，诬为侦探，骂是“共匪”。我方又抓住刘黑七是个“孝子”特点，利用地方关系将刘黑七的娘请来，对其进行说服工作。生活上很好照顾，然后派人送去他母亲的信件，并请刘匪派人来军区看望他母亲。后刘匪果然派副官来军区看望其母，我方又利用副官来做刘的工作。刘的副官将所闻所见报告刘黑七后，他不仅将扣压的我方人员放回，还假意表示与我来往，

我则将计就计，派人往来，藉以了解其驻地情况。

其次，在军事行动上进行麻痹。为消除他的怀疑，我方有意将主力部队调开，并经常不规律地派地方小股武装向其驻地袭扰。待其反击时，早已撤走，踪影皆无。一个时期内，把刘匪搞得很疲劳，多次将主力拉出来，结果又没什么事。久而久之，刘匪习以为常，放松了警惕。直到1943年11月15日夜我方打响战斗时，刘黑七还躺在床上吸大烟。当他的警卫报告有情况时，他还不在乎地说："早听到了，又是毛猴子来扰乱，不要理他们。"

再次是在精神上进行麻痹。刘黑七从小爱听说书，特别喜欢听京韵大鼓。为投其所好，我方派军区宣传员化装成说书的，通过柱子村地下关系蒋玉平到了东柱子村去说京韵大鼓。连说10几天，刘黑七和匪徒们都听迷了。借此机会，我宣传队员把刘黑七的住处、匪徒人数和武器装备等作了了解。为确有把握，又于11月10日派三团二营营长曹明盘带领侦察小组，化装成卖盐、卖菜的、割草打柴的，对刘匪巢穴进行侦察监视，并把东柱子村内的大街小巷及火力配备绘制成图，供我军制定战斗方案时参考。以上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为后来全歼刘匪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柱子村位于费县西南约50里的山谷中，村庄较大，约有200户人家。这个村北接敌人控制的城（前）临（沂）公路，西靠日军据点梁邱，村的南面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沙河，东北西三面群山环抱，山峦起伏，树木成林。刘匪在这里的主要防御工事有两道石筑围墙，相距约60米，大围子里面还套有一个小围子，两道围墙均高4米多，宽近1米，还设有不少明碉暗堡，对我攻击十分不利。

为彻底消灭刘黑七，我三团首长精心研究作战方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和部署，并在全团从思想和军事训练等方面作了必要的准备。1943年11月15日下午5时左右，团首长一声令下，部队从泗彦一带出发，为迷惑敌人，部队未直奔柱子村，

而是绕崎岖小路向梁邱以东行进，尔后向西折回，直扑柱子村。

晚上10点多钟，部队到达东柱子附近的指定位置，很快战斗打响了。一连和五连担任主攻，分别从北门和东门发起攻击。几分钟时间，即把第一道围墙突破，匪徒们仓皇逃到小围子里。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匍匐前进，逼近小围子。敌人凭借坚固工事，集中火力向我射击。我军连续几次冲锋，均未能攻破小围子。于是，指挥员命令机枪掩护，让爆破手将围墙炸开。这一招果然奏效，战士们喊声震天，冲入小围子。

围子里的敌人见两道防线均被攻破，意识到大势已去，惶惶如丧家之犬。然而，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仍负隅顽抗，作着最后的挣扎。经过一阵激战，围子内的敌人全被解决。

四连是担任打“出水”（逃跑之敌）任务的。指导员耿春涛带着通讯员何荣贵蹲在连队阵地西侧的一片坟地里，注视着东柱子村大围墙上的一切动静。虽然有月光，但由于距围墙较远，所以还是模糊不清。为便于观察，耿指导员带着小何慢慢向围墙靠近。他俩一面向前走，一面密切注视着围墙方向的动静。忽然，他们发现围墙上滑下一个黑影，接着又是两个。三个黑影迅速离开围墙，向西面方向逃去。一会儿，他们看清楚了，一个高个，两个矮胖子。指导员和小何来不及通知部队，立即追了上去。“乒”的一枪，其中一个应声倒下，另外两个向不同的方向逃去。于是，他俩一人一个穷追不舍。何荣贵追的是个矮胖子，在相距只有四五十步远时，小何朝黑影打了一枪。矮胖子随即也朝小何打了一个连发。子弹从小何耳边嗖嗖擦过。当矮胖子慌张爬上一道地堰子时，小何已能听到其呼呼喘气声音了。这时，小何看清了前边这个家伙，矮、胖、短、粗，他心想，说不定这人就是刘黑七。于是更紧追不放，决心活捉了这个家伙。矮胖子急眼了，拼命朝前跑。这时小何当机立断，决定干掉他。当矮胖子又一次翻上一道土堰时，小何抬手一枪，矮胖子倒了下去。后经俘虏辨识，小何

一枪打死的正是恶匪刘黑七。

战斗结束后，附近群众闻讯，纷纷赶来祝贺八路军的胜利，感谢我军为人民除了大害。为解受害群众心头之恨，我军决定把刘黑七的尸体弄回费县，由民兵抬着到各村游行示众。这个罪大恶极的巨匪，终于落了个可耻的下场。

（根据《费县文史资料》第二辑整理）

土匪头子陈德山

孙　源

解放前，有一股流窜于济宁、汶上、宁阳、兖州、嘉祥一带的武装土匪，先后投靠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抢劫烧杀，残害百姓，破坏我根据地生产建设，袭击基层民主政权，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罪行累累，民愤极大。这股武装土匪的头子就是陈德山。

一

陈德山，又名陈俊峰，汶上县康驿乡陈庄人，出生于1915年。他幼年在家随父兄干点零活，16岁先后到汶上西河村和宋家铺宋结实的小窝班学戏，出师后到白观昌戏班搭班，演武生戏。

陈德山在白观昌戏班，结交了一伙酒肉朋友，经常乘夜晚外出，干些偷摸勾当，聚众吃喝。进而，陈德山学会了吸大烟、白面、宿妓妇女，染上了旧社会吃喝嫖赌吹一套恶习。后来他在自己家中修造土楼，结交汶上县南旺的刘咸林一伙，窝匪藏枪，逐步向邪道走下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形势的推动下，汶上县南旺梁白村爱国人士、开明士绅白观化（育普），奋起组织民众抗日，建立宁（阳）、滋（阳）、汶（上）三县抗日自卫总团。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任白观化为司令兼汶上县县长，张子明为副司令。由于我党派入该部的黄主一等人的积极工作，白观

北接受了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于1939年11月将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八支队，当时陈德山在这支部队中当骑兵班长、排长。1940年春八支队到胶东，7月间在黄县中村战斗中，陈德山趁机携枪潜逃回家，将枪隐藏起来，跑去济南搭班唱戏。

1941年初，陈德山由济南回汶上，又买了一支匣枪，伙同何志维、刘咸林等人，在蜀山湖干了土匪。开始是截路劫财，继则"喊项"、"架票"，越干越大，抢劫范围也逐渐超出本乡本土。第一次抢了平乐合作社，第二次绑架了南店子村刘家地主的"肉票"，刘家以纸币1万元（约折合银币1000元）赎回了人质。陈德山用此款购买短枪13枝、长枪8枝，组成了小股武装土匪。1941年冬，陈德山通过内线，探明情况，派其骨干刘本修，带领10余人的自行车队，长途奔袭到济宁，绑架了马泰盛酱园东家马老太太。马家出纸币10余万元，将人赎回。从此陈德山的土匪队伍进一步发展扩大。这时，他的胃口越来越大，提出了"不使小钱，干大的"。陈德山为了能在当地站住脚，不准自己部下的土匪在当地抢掠。他常讲："一百里内出了事，找我姓陈的。一百里外，我就不管啦！"当时，有一个姓魏的小土匪在本地抢劫被人告发给陈德山，尽管姓魏的土匪再三磕头求饶，陈德山为了笼络群众，收买人心，还是当众把魏枪毙了。陈德山这支土匪队伍，有一群死硬骨干分子，他们嗜血成性，杀人不眨眼，对陈德山忠实效命，严加保护。如刘咸林，在1948年济宁解放后，仍掩护陈德山在蜀山湖一带潜伏。

二

汶上县康驿乡刘庄的兵痞刘本功，抗战初期，拉起抗日游击队，后投降日军，被委任郓城县伪县长兼三县"剿匪"司令。刘与陈德山因争地盘，矛盾日益加深。刘想收编陈部，陈怕刘以收

编为名行吃掉之实。刘多方托人劝说陈，均无效，则欲消灭陈部。1942年，刘本功率部开赴陈驻地康驿进行围剿，未获，抓住了陈的三哥陈德旺，枪杀于康驿街东北角坑崖。陈德山为报仇，于1943年带人抄了刘本功的家，搜走步枪30余枝。

陈德山在刘本功围剿时负了伤，其部下化整为零，分头隐蔽。陈伤愈后，收罗残部60余人，投靠金山核桃园土匪白咸恩，被委任为大队长。后因与白产生矛盾，又将所部拉回康驿。

1943年，陈德山之父陈兴元，在汶上泉高村被伪县政府抓去。刘本功得知后，将陈兴元押到郓城监押做人质，以要挟陈德山归顺。经张鹤亭说合，陈德山接受改编，被委任为济汶嘉边区自卫团长，武器装备由刘本功供给，给养由汶济嘉三县边区拨给，驻防在太平庄、五戒寺、康驿、南照寺等村。陈趁机招兵买马扩大队伍，不长的时间，发展到300余人，建立了2个步兵连，1个骑兵连，还有短枪队、自行车队、武术队。

陈德山被刘本功收编后，前嫌未释，各怀鬼胎。陈不服从刘的指挥，刘不按约定供给武器装备，二人明争暗斗，矛盾日益表面化。1944年春，刘本功与伪兖济道道尹王绍武商定，在济宁潘家大楼道公署举行谈判，想借机将陈干掉。刘本功派其特务队长邵士玉骑马去康驿接陈。邵与陈有联帖关系，向陈透露消息，并说："三哥去吧，不去不好。你不要怕，做好准备，看我眼色行事，不等他们先动手，你先下手，谁动干掉谁。"第二天上午，陈德山由其干儿小崔、小银子和杜延存等护卫，邵士玉引路，骑马到济宁。在他们出发前，陈派出70余人，化装成卖秫秸的、做小生意的，潜入济宁城内，把守住潘家大楼附近各要道口，准备应变。陈德山到潘家大楼南门后，见岗哨森严，楼内正厅四周布满警卫，皆执短枪，气氛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邵士玉站在正厅东南角，眼看刘本功即行下令动手，迅即向陈德山递了个眼色，示意陈先下手为强。瞬间，陈德山左手抓住伪道尹王绍武的后领窝，右手

执枪抵住王的后脑袋。小银子亦同时抓住刘本功，用枪抵住刘的后脑袋。陈说："奶奶×，这哪是开会谈判？王绍武，今天你把我送出去，不送出去，我就把你打死在这里。"王绍武慌忙说："陈团长别生气，一定把你送出去。"陈喝令："走！"即将王绍武、刘本功挟持出门。王绍武的警卫见状要动手，邵士玉即大喊："弟兄们！谁也不准动，谁动咱们道尹、司令就完啦，谁敢动，我就打死谁。"陈德山从潘家大楼安全出来后，命令部下对空鸣了三枪（事先约定鸣三枪是告之潜伏人员没出意外）。潜伏人员很快集中城北三官庙后，陈向王、刘提出要军饷、弹药、给养。王、刘为进一步笼络陈德山，当场答复。一周后，按所提条件，全部送往康驿。后经伪区长董文富牵线说合，陈德山名义上仍归刘本功管辖。后来陈德山之妻认刘本功之妻（正房）为干娘。陈德山投靠日伪后，死心塌地地为日伪效命。

三

1945年9月日军投降后，陈德山率部投靠国民党宁汶泰肥东自卫总团团长张子明（张胡子），充任自卫团团长，从事反共活动。在我军解放宁阳前夕，陈匪遭到一次沉重打击。陈德山带残部流窜到蜀山湖一带分散隐蔽，进行骚扰破坏。1946年初，济宁、汶上、宁阳等地相继解放，兖州被我军包围。3月，冀鲁豫七分区司令员何光宇带领十九团和济宁、汶上、南旺等县地方武装，向盘踞在蜀山湖一带的陈德山匪部发动围剿。陈部在我强大攻势下，遭到沉重打击，迅速土崩瓦解，部众纷纷缴械投降、投案自首。这次围剿共缴获轻机枪6挺、长短枪80余枝、掷弹筒2具。陈德山带少数匪徒逃亡济南，住在大槐树"天顺油店"。1946年5月，在张子明指使下潜回济宁网罗残部，组织还乡团，破坏我基层民主政权。

1946年6月6日，陈德山带领吴大香、王成勋等匪徒30余人袭击汶上县李庄，打死我工作组组员小田同志，抓走工作组员曹言山和农会积极分子邵士明、李广树、李广正、李广栋、李广明等同志，带至田庄全部枪杀。

1946年6月某天，陈德山率部配合兖州国民党刘振伦团，于兖州县故县村南之旧公路上，截击我部队前进剧社和冀南银行汽车一部，当场打死我宣传科长孙健民同志，抓走女演员一名，俘去我干部8人，当天下午带至李宫村东之田家村，全部杀害，击毁汽车一辆，劫去黄金13两及其他物资。

1946年秋将我冀鲁豫十九团副团长郭歧同志截击杀害，抢去枪枝。

1946年7月，陈德山窜到宁阳县，在三天时间内，全县10个区公所，被其袭击7个，杀害我革命干部和群众百余人，夺走长短枪200余枝。

1946年7、8月间，我济北县大队连长邵士存回家结婚。陈德山一伙得知后，派出匪徒将邵士存夫妇枪杀于洞房之中。

1946年8月，陈德山带领匪徒窜到汶上县南站，杀害该村农会长吴恒太和群众李咸荣、刘运德等3人，拉走民兵22人，夺去长短枪17枝。

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后，我军作战略转移，济宁、汶上、宁阳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陈德山被国民党宁阳县县长张子明委任县大队副。1947年3月，陈德山在兖州县张吾南王家林，杀害了汶上县李尹村农会会长房茂令。同月又带匪徒百余人，袭击南张村，杀害我区干部4人。5月，陈匪把从河西抓来的两名农会会长活埋在东张吾村。8月，陈德山亲自指挥活埋了汶上东李尹农会积极分子房绪儒。1947年冬，陈德山被国民党中央保密局济南站任命为济宁组义务通讯员，更加死心塌地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

四

1948年6、7月，宁阳、兖州、济宁、汶上相继解放。陈德山被我军彻底摧垮。他伙同死党刘咸林等6人，携带短枪6枝，潜伏老寨蜀山湖一带，继续作恶犯罪。1948年10月，我地方政权逐步恢复和建立，陈德山感到无法长期隐蔽，把枪交给宋恒志等隐藏起来，带领妻小逃往徐州，住在铜北路刘家客栈。淮海战役前夕，又逃往芜湖。在芜湖经人介绍结识了张保涛（济南人），经张介绍加入了“反共救国军”，充任“鲁西南工作组长”，企图派人到济宁长期潜伏，进行反革命活动，但未能实现。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逼近长江，即将发动渡江战役，陈德山又带妻小逃往上海，住在番禺路。上海解放后，以卖豆腐作掩护。1950年初，陈发觉济宁市公安局派员去上海抓捕他，又逃往江西省玉山县，在林场干伐木工。1950年4月由玉山县逃往哈尔滨，隐姓埋名，在长山岭老乡家帮工。1950年秋，潜回济宁，乘夜晚到其舅父家，了解一些情况。自感无容身之处，没敢久留，只住了一天半，就返回哈尔滨，化名李子青，混入火车站当搬运工。1950年冬，由东北回乡的群众，向政府检举了陈德山。1951年2月济宁公安局派员去哈尔滨，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下，将其逮捕归案，2月20日押回济宁。1951年8月28日经山东省高级法院批准判其死刑。10月11日，在济宁市被依法处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时年36岁。

（山东省济宁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淄博土匪杨大山

刘　仇

土匪头子杨大山，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纠集了一些乌合之众，约百多人，盘踞在淄河以西的黎金山、卧虎山和大山一带。他们控制着边河、王家寨等57个村庄，残酷地危害邻近四县边区人民。

1938年，日寇侵占了张店。杨大山率股匪投靠日军，进驻张店，号称"天下第一军"，自封为司令，成为日寇的最忠实的走狗。他凭着日寇的势力，屠杀百姓，大发横财。尽管如此，他却感到在日军的卵翼之下不自由。所以仍保留一支人马和武器，守住老巢。

杨匪很少出头露面，除了日本主子有事找他出来会见之外，他总是呆在老巢里。他在卧虎山和黎金山建了许多密洞。有的在悬崖峭壁，有的在深山密林，有的在山根堰岭。有进口，也有出口，都是砖石封闭，伪装难辨。杨匪夫妇和他的"四大金刚"都住密洞里。小土匪根本不知道，也进不去。外出抢劫有他的一帮喽罗，管理财物有他的四大金刚。他们所管的武器弹药、金银财宝、粮秣被服等，也是藏在密洞里，各据一洞，互不通气，只有杨匪夫妇和他的护卫才知道。杨匪随身带有密洞分布图（联络图），他经常根据形势的变化改换他的住址。杨匪的密洞是很难找到的。为了保密，密洞建成后，便把建洞的匠人和监督建洞的小土匪统统杀掉。密洞是杨匪自己设计的，经过他验收合格后，就召开"庆功宴会"，在宴会上用毒酒把匠人和监工的小土匪统统毒死，不喝酒的则用子弹崩掉，甚至对查存枪支的小匪也不放过，以免泄密。

杨匪的部下都是一些亡命之徒，多数是地痞、流氓、恶霸、赌棍之类，到了穷途末路干了土匪。杨匪收留他们时，一惯采用过"三关"的考验办法，谁能经得起考验谁才能被收留。他的第一关是"假抢毙"，如果有人想干土匪，首先要经杨大山当面审问："你来干什么？""我想来当杆子(土匪的代号)。"杨匪拍桌瞪眼，大声喝道"奶奶个屁，我看你定是八路军派来的密探，还当什么杆子，拉出去崩了他！"如果来人吓瘫了，匪徒们就会打他一顿，骂他熊种，把他撵走。如果来人面无惧色，匪徒们便拉他出去，朝他头顶上、左耳旁、右耳旁连打三枪。仍然没有吓倒，便说他是个好汉，有胆量，然后回报杨大山，算是初试及格。接着过第二关。杨大山问："看来你是真想当杆子了？！""是！我真想干。""你有没有冤家对头？""有！""那好！给你一支盒子枪，去把他崩了回来见我，说是我杨大山派你去崩他的。"当然，如果说没有冤家对头，他也会要你去杀人的。因为他的意思是只要杀了人，有了血债，你就没有后路可走，只好干土匪了。最后一关考验是派你明火执仗到某村去抢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来，供匪徒们玩乐。而且作为绑票，限期拿巨额钞票或银元来赎回，否则要把这姑娘杀掉。这对于新入伙的土匪来说，确实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如果你真的这样干了，那就不得不跟杨匪死心塌地地干下去。

1947 年 9 月 14 日，杨大山、王六(土匪)和国民党二十四旅张伯言，配合蒋军合围军屯、万盛、凤凰庄、彭官庄、太平庄、迎仙官庄 6 个村庄，大肆抢掠牲畜和财物，逮捕村干部和翻身农民。仅太平庄一个村，被杨匪抢去牛马驴骡 83 头，猪羊 360 头，捕去村民 41 人，财物不计其数。杨匪十分狡猾，他把牲畜交给黎金山的放牧人，强迫为他牧放；把猪羊交给当地的屠宰户，强迫为他饲养。同时还交给报警任务，如发现共军要立即报告，知情不报者必遭格杀。因此，各山头放牧的和市场屠宰卖肉的都成了杨匪的义务情报员。对捕去的村民，经过严刑审讯，是普通农民，则要钱钞回赎；如是土改

干部，则处以死刑。对妇女村干，则强迫脱光衣服扭秧歌，不扭的用刺刀戳屁股，直至刺死为止。

杨匪统治山区人民，手段也非常毒辣。他扬言有"通共"之嫌或给解放军送情报的，要杀他全家老小。匪徒们把边河南面小寨村的支部书记全家老小杀掉了，又把西刘村所谓"通共"的一家老小也杀掉了。杨匪把这种作法叫作"斩草除根，永不发芽，以免后代报仇。"

1946 年 6 月，在中共华东局社会部的领导下，在金岭镇正式成立了益都、临淄、桓台、淄川四县联合剿匪指挥部。由桓台县公安局局长宋鲁源任指挥，制订了联合剿匪的作战计划。但尚未来得及调动兵力，驻昌邑、潍县的国民党第八军沿胶济线大举西犯，第二次占领了张店、周村等地，剿匪只好暂停。

1947 年 2 月莱芜大捷，张店、周村之敌逃往济南。华东野战军指挥部进驻博山。杨匪又窜回蓼河区。从 4 月初开始，四县联合剿匪指挥部进驻南仇镇，集结了四县 500 多人的兵力配合当地土改运动，展开了长期剿匪活动。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历时 50 天，对黎金山、卧虎山和大山地区的山沟、山洞以及 57 个村庄反复清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俘虏武装匪特排长唐英林（杨匪四大金刚之一）、队长马洪山等 60 多人，缴获长短枪 28 枝、机枪 1 挺及部分手榴弹、子弹和被抢财物。

至此，面上的匪特基本肃清，但暗藏的匪特仍须继续清查，于是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使残匪无藏身之地。最后杨匪只好找到毕子久、张延贵等军统特务作为靠山。1948 年，张店解放了，剩下几个匪特，只好化装潜逃。

根据张精忠《四县联合剿匪杨大山》整理

（山东省淄博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陈三坎其人

吴云亭

陈三坎，名锡胤，字子良，1902年生于新泰陈上汪村一个富裕之家。兄弟七人，他排行为三，故称三坎。

陈三坎早年读书，17岁辍学后，混迹社会。曾任上北约里长（给旧政府征缴田赋的人），因贪污亏欠过多，于1927年落草为土匪，手下有匪徒百余人。从此他横行莲花山一带，绑架勒索，杀人劫货。莲花山百姓不堪其祸，是年9月13日，红枪会总领娄增高率3000余人围剿莲花山，杀其弟陈四坎。陈三坎见势不妙，带领众匪徒窜入徂徕山中。红枪会撤兵后，陈又溜回莲花山老巢。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新泰县的两团兵丁再次围剿陈匪，众匪被打散后，陈三坎只身钻进他妹妹家的秫秸堆里，得以逃命。

陈三坎无法立足新泰。于1928年6月，带40名匪丁，到处流窜。8月的一天，与韩复榘部遭遇，众匪溃散逃窜之际，陈三坎落马摔伤右臂，被韩部擒获。

陈匪被押至济南后，韩复榘亲自审问。对其他不敢承认是土匪的尽皆斩首，唯陈三坎满口承认，并说不单自己是“光棍”（土匪的别称），兄弟五六个也都是。韩复榘对陈的亡命之举，格外赏识，便留他一条命，并任其为特务便衣队司务长。1937年，韩复榘又派陈去黄河征收税款，陈借机把住黄河，敲诈商贾，勒索百姓，中饱私囊。是年12月，日军侵占济南，陈三坎与其2个同伙携匣枪2枝、步枪1枝和一大包褓钞票，偷偷窜回新泰老家。

1938年2月，陈三坎纠集20余人，以“抗日救国”为名，拉起了队伍，驻莲花山前几个村。为找靠山，他投入了鲁南民团军谢富贤部，被编为特务三大队，驻防城东和庄。3月16日，陈去龙廷村谢部开会，在三部岭和一连日军相遇，激战3小时，日军死伤多人后败退。自此，陈三坎自觉身份倍增，到处自吹自擂。他嫌谢官微势小，遂投靠了进驻羊流的旧相识、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秦启荣。被编为二十旅十一团，陈任团长，时称“陈团”，约有1000人。

陈投靠秦部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属下多有不满，又连遭日军袭击，队伍中三五成群开小差者不断，有的甚至成连拉走。到1938年底，“陈团”已不足300人。此后，陈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任命为泰、新、莱、蒙边区司令。

1939年春，陈三坎驻防寨子（现寨子乡），参与围攻驻新泰城日军。他趁机纳当地火烟贩子阎三之女为妻，终日花天酒地，不理军务。7月上旬，500多日军逼进寨子，陈一枪未发即逃至魏家峪一带。几天后，日军派特务陆明扬（陈的干兄弟）等去魏家找到陈三坎，威胁利诱，劝其降日。在此之前，中共新泰党组织曾多次派人做他的工作，争取其共同抗日，但陈均未答应。这次经陆一说，陈即认贼作父，公开降日，并给日军送去降书，接受日军的国旗和纳降书，并于8月7日在前上庄大庙正式签定了受降书。

陈三坎降日后第三天，即带兵配合日军对我新泰县机关进行围攻。9月，陈又率部4000余人同日军一起，严重破坏了我莲花山抗日根据地，并在莲花山要冲施家峪安营扎寨。日军见陈如此忠心，便委以“山东中部民团司令”之职。

为打击陈逆媚日反共的嚣张气焰，11月16日我新泰县大队配合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袭击了施家峪，激战数小时，陈匪部死伤百余人，陈三坎狼狈逃窜。

1940年4月，陈逆在翟家庄把队伍整编为7个大队和1个特务营，分别住新泰城南关、翟家庄、鲁西（莱芜县）、龙港（蒙阴县）、汶南和新泰白石灰峪等地。“司令部”下设参谋、政训、军法等8个处。陈得意忘形，企图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上。半年时间内，他在翟家庄修砌了高7米、宽2米、长10里的围墙，筑炮楼10多座，并挖了宽8米、深6米、长12里的护墙壕。还在翟家庄以北30里内，村村安据点、山山筑炮楼，妄图封锁我莲花山抗日根据地，切断我新泰与沂蒙党组织的联系。到1941年下半年，陈逆扩充到7000人，并在翟家庄建了发电厂、兵工厂，自造步枪、机枪及手榴弹等。

陈逆配合日军多次对我根据地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疯狂屠杀我地方干部和军人家属。1940年3月29日，陈在胡家宅村纵火烧房1183间，烧死牛、驴、猪不计其数，使群众遭受很大损失。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军人家属等，只要落入陈匪手中，陈三坎往往亲自审讯，施以酷刑。在其军法处设的监狱里，常施行灌煤油、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穿锁骨、火烙、割舌、剜眼、割乳房等几十种酷刑。前后羊村我地下党员徐圣勤、李从泉和2名抗日军战士均遭其残害，在翟镇东沙河被枪杀、活埋的群众有70余人。驻莱芜鲁西的陈部三大队队长刘文贞，杀害我党员、干部及其家属也很多。

陈还横征暴敛，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在翟家建起2处宅院、1处别墅，占地50余亩。

尽管陈三坎大力祸国反共，但其日本主子仍不放心，于1942年3月，令陈放下武器，接受整编。陈三坎便星夜带7000名官兵窜入蒙阴、沂水一带，又投靠了沈鸿烈，将其队伍改变成5个团，1个特务营。后又返回新泰。此间，因遭我军严厉打击，陈部四分五裂，势力大减。同年7月，陈又带残部逃向沂水，改投吴化文部，被委任为独立旅旅长，不久又随吴化文投降了日军。

陈再次降日后，更加肆无忌惮。1943年春，根据鲁中区指示，我地方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先后拔掉陈逆驻玉皇山、鲁村、赵庄据点，毙敌130余人、俘虏500余人，缴枪500多枝，另有大批军用物资。1944年9月1日，陈率残部随日寇扫荡我鲁中根据地时，被我军包围在沂水城北的葛庄。9月3日围歼开始，陈左突右撞、焦头烂额。在随家店村，陈三坎部全被歼灭，陈三坎被俘，在押解途中，陈自知罪大难赦，自杀身亡。这个危害新泰、莱芜、蒙阴等地多年的土匪、汉奸头子，终于没有逃脱其可悲下场。

（山东省泰安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苏鲁巨匪刘伏龙

杨东野

从民国初年到本世纪40年代，刘伏龙股匪在苏北、鲁南一带到处流窜。那时人们谈“龙”色变，数说起他的罪恶勾当，无不咬牙切齿，愤慨不已。

一、巨匪与伪军

刘伏龙，又名刘庆余，绰号小羽子。1898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牛山乡西蔡村。小时家境赤贫如洗，无衣无食，八九岁时雇给地主家放羊放牛，混碗饭吃吃，仍是半寒半饥，于是就偷偷摸摸。十三四岁时他驱赶羊群到荒野草地上去放牧，因嘴馋有时把羊羔杀死架起柴火烤吃。晚间赶羊回圈，地主家发现少了，盘问下落，他撒谎说是丢失了。后来又发现丢失，就追查出根底，把他打得皮开肉绽，被赶出门。他离开地主家，从东庄窜到西庄，偷鸡摸狗，拦路抄身。他先是一个人行窃，后来和几个窃贼在一起行动。他们每人有尖刀、匕首、七节鞭等凶器，形成了一个匪帮，刘伏龙成为小头目。在他16岁时就公开打起了旗号，竖起了一面暗红色的旗子，在陇海路北的北山里占山为王。开初，他们常常把一些财主家小孩绑架来，名为“招财神”，通知这家财主限期限价来赎人，扬言过期不送钱财来，即把小孩杀掉。不久，这个匪帮聚集到三四十人，并搞到了枪支弹药，由此越搞越大，四出搞

武装抢劫，到处“招财神”、“架财主”，搞“肉票”。从民国初年到民国十二三年的10年间，他们就绑了三四百个“肉票”，从东海、临沂、郯城等县扩大到苏北、鲁南一带，刘伏龙匪帮的成员从三四十人发展到三四百人枪，他们到处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危害人民。

民国十四五年时，刘伏龙和他的匪帮同伙谭金奎、赵如秀等都参加了清帮。刘伏龙利用清帮发展匪帮势力，他称作大师，设坛，招徒弟、干儿子四五百人。他们按形势聚散，在地方政府出兵清剿时，往往化整为零，或隐蔽躲藏，或跑到外地；在风声平静时，他们又从四处聚集起来打家劫舍。

刘伏龙一伙匪帮，从民国初年到民国24、25年间，向南曾流窜到江南南京、上海一带，向北曾流窜到鲁中、胶东、河北、直至辽宁、吉林、黑龙江。在民国16、17年时，由于政府清剿得紧，刘伏龙即潜伏隐蔽起来，带着他的贴身徒弟二人，行商打扮，窜到了许浦港，隐蔽在那里开起了一片饭店，做起了饮食买卖。刘打听到他的东海县同乡人周四老爷（秀才）在许浦港教书，是清帮的人，跟自己是一个教派的，就投拜叙旧，按照清帮的班辈，周比刘高一辈，两人结拜，在许浦混了两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伏龙流窜到胶东，渡海去了东北，在那里进行盗窃活动。1935年他投靠日寇充当特务，先后在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地干起秘探、谋害、暗杀、诈骗等罪恶勾当。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伏龙从东北返回东海县，依仗日寇继续在鲁南、苏北一带进行匪盗活动，到处打家劫舍，掳掠商旅，残害百姓。1941年流窜到江苏睢宁县，已有六、七百人枪，横行一方。

1941年刘跑到新浦镇，充当伪盐警团团长、伪陇海总队大队长，仍不断地进行奸淫掳掠，敲诈勒索，残害百姓。在这个时候，刘伏龙娶了一个日本女人金雨仁做小老婆，她是个日特，常为刘

伏龙出谋划策，有时还持着枪随着这股伪军出来活动。刘伏龙把这个日本婆子捧在手掌心，对她有求必应。这个金雨仁是个娇艳女人，跟刘伏龙手下的参谋长李晓山等通奸，刘伏龙明知也不过问，顺水推舟，落得用来笼络他的亲信。

二、罪恶累累

刘伏龙为匪首30余年，流窜苏、鲁、冀、辽、吉、黑等省，到处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残害百姓，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据粗略统计，刘伏龙犯下的累累罪行，仅在苏北、鲁南一带即共杀死人命3134条，绑“肉票”1300多人，烧毁房屋6000多间，抢劫银元15430元、新抗票378.5万元，抢夺粮食963.67万斤，抢牲口374头、草1440万斤。据苦主和受害者的揭发，刘伏龙匪帮在鲁南郯城门里湖村200户人家杀死854人，在谭穆庄杀死864口，全庄被烧光后，还把尸体放在场上用碾子碾。东海县东丰墩、西丰墩、五湖3个村子有30余户人家全被杀死，东安庄被杀死150多人。苦主刘安邦说：“我一家12口人，被他杀死11口，只剩我一人！苦主徐士芳说：“我们安峰山南，有十几个庄子遭他烧杀，仅一个圩子就被他杀死17人。”

刘伏龙盘踞桑墟时，周围数十里，东至平岭镇，西至安峰山，被他抢烧一光，杀人无数。刘占据房山时，在附近石塘内填尸70余具，他还常自夸说：“在我手下杀死的人堆起来，不比房山小。”

刘伏龙残无人道，灭绝人性，他们曾将一姓王的“肉票”杀死后又将死者的下身割下、强迫另一“肉票”吞下肚。他们将年轻的女“肉票”奸污后还在其肚皮上打纸牌。他们将女“肉票”身上衣裳剥光，在两乳头挂下铃铛，使之擀面，人动铃响，称之谓“吃铃铛面”，这股匪帮就是这样荒淫残忍。

三、走向起义

1945年9月，日军投降后，共产党、国民党都想占领新海地区，扩大地盘。这时候，刘伏龙所部驻扎在房山、郁圩，此处正是新四军淮海三团进军海州的必经之地。这对刘伏龙来说，是有所顾忌与担心的。在东海县一带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力量之所以都要争取刘伏龙，乃因刘伏龙是经30余年发展起来的一支拥有六七百人枪（亦说千余人）的武装股匪，在地方上早已形成了一种很大的邪恶势力，把它争取过来，不只是对其分化瓦解，且有利于壮大抗击日寇的力量。早在1940年东海县（时称潼阳县）敌工部长周镜涵就对刘开展了工作，晓以民族大义，劝说其改邪归正。1945年日本投降后，共产党方面特派周镜涵与警卫团副政委屈振东为代表，在房山与郁圩之间的岭地上同刘伏龙进行秘密联系，表明中共方面的态度，指明前途，稳住刘部。这时候，刘伏龙对于究竟是投靠国民党，还是投靠共产党，是有所盘算与抉择的。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刘伏龙一时曾把他的“陇海总队”前边加上“中央”两字，想单独与国民党“中央”接头，弄个正式的“老中央”的称号，以示是“正式中央军”。可是，他又担心国民党的势力会把他吃掉。他的参谋长李晓山是国民党员，早与他的小老婆金雨仁勾搭上，他如果投靠国民党，不但他的小老婆保不住，且自己的性命也难保。刘伏龙尤其看到横在他面前的是共产党淮海三团，这是一支劲旅，具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他若与共产党敌对，其队伍就可能被打垮。权衡利害关系，刘伏龙决定投靠共产党。他派了他的参谋王子孚与中共方面联系。以后，为了不影响淮海三团东进新海附近地区，1945年10月18日，周镜涵同志奉令只身去刘部，在王子孚（时已为中共方面所争取）的协助下，作动员起义工作。这天晚上，有周镜涵、王子孚、屈振东与

刘伏龙等在一起举行谈判。在谈判中，刘说："只要保证我全家生命财产安全，我就投共产党。"周镜涵说："我们不但保证你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还要保你的名誉。你要成立一个团，还是一个大队，当团长、司令都行。"刘说："我不要什么，大队长我也不干。"谈判之后，刘伏龙当即召开全体会议，由周镜涵作起义动员，宣传当前形势，阐明共产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刘伏龙当场宣布起义，于1946年1月19日夜间，率领所部六七百人（亦说千余人）开往解放区。起义后，大约十天时间，刘部即为我淮海独立旅三团所整编。刘部被整编后，按照刘本人的要求，同意安排他休养，与潼阳县敌工部生活在一起。后因苦主的控诉，受害群众的强烈要求，加之当时有人怀疑刘与国民党有紧密联系，阴谋策划叛逃，于1946年4月17日由苦主逮捕（时刘身边无枪），控诉其累累血债，经公审枪决。1984年4月12日，经甄别重审，按照中办发［1983］32号和中统发（1980）002号文件精神，承认其起义人员身份，发给起义证书。

（江苏省连云港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惯匪“五龙二虎”

曾光复

“五龙二虎”，是解放前活动在蒙城县西南河沟集一带最著名的一股土匪。“五龙”是：李龙，绰号草上飞，化名李老五；赵龙、李龙、张仓龙、徐龙。“二虎”是：张虎，外号张傻子；李虎，外号李傻子。他们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带领30多名匪徒，到处拦路抢劫，图财害命，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闹得人心惶惶，昼夜不安，岁无宁日，使不少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现将这伙匪徒的罪恶行径分述于后：

1938年，陈茂文、陈茂永等匪徒勾结阚町匪伙，在一天夜里，各持武器，直达河沟集东徐庄，闯进徐明道和徐明荣家的杂货店内逼财勒款，把杂货店全部抢光。害得徐家倾家荡产，痛苦不堪。

1945年该股匪徒纠集匪众分两路闯进徐圩庄，越院墙，登房顶，封路口，严密把守，闯进农户，以武力恫吓勒逼钱财，连农具等物都抢劫一空，害得全庄老少悲痛嚎啕。

1938年春、夏接连8次抢劫河沟集，不但抢劫商店货物，连住户的牲畜、财物都抢掠一空。

1940年，各地商客云集三义，参加春会，三义集一时热闹非凡，家家设铺卖饭，招客住店，集内集外，拥挤不堪。各店货堆如山，市场繁华。该股匪徒勾结外地土匪，乘农历二月二十日逢春会，把长枪捆在柴草里，运至三义集附近。到天黑时，大批匪徒相继而至，各持武器，拥进三义街内，鸣枪示威，声言捉拿汉

奸，要闲人莫动。有先头匪徒闯进乡公所，把乡丁队里的步枪全部掠光，并严禁乡公所人员行动。另一匪徒封锁交通路线，不准出进。其余匪徒在街内疯狂地抢劫3个多小时，把客商财物抢光。被抢劫的客商，只有痛苦嚎啕，喊天叫冤。

1940年春，在一个月内连续抢劫曹街客商4次，每次抢劫时，都是满载而逃。第四次抢劫时，东街曹兰盈在门外听到匪徒喊叫，想跑回家，被土匪打伤胸部，流血不止，幸请医生抢救免于丧命。

1940年收麦时，匪徒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张胆在高隍与曹街之间的路上抢劫过路客商。当时受害人奔驰三义集乡公所急报，乡长率领乡公所全副武装分两路出击，并急令各保长立即集合保丁和国民兵，会合群众一齐追去，打伤2名土匪。土匪被打得狗急跳墙放火燃烧麦场，顿时火光冲天，酿成巨灾。在大家急于救火时，匪徒就混杂在客商里，跑至路湖。这时乡公所和各保群众等，都奋勇追击，一直追到刘板桥，匪股四散远逃。

1945年冬至1946年，匪伙乘乡政权组织改选，新、旧乡长交接之机，不分昼夜，大肆抢劫。群众怨声载道，喊冤诉状连续到县，积累案件日益浩繁。幸值县府司法科新任法官田某，目睹蒙城陷入匪患，若不及时镇压，后果不堪设想，便与县长商议捕匪之计，最后决定以放赈救济为名，两路进军包围匪巢。于是，一面通知篱笆乡公所，调查核实急难户，编号注册，以便领取救济粮款。一面秘密地派国民兵团一个特务中队和一个骑兵班配合一个手枪班，一个便衣队，分两路进剿。因该匪伙常在“青坊寺”内活动，就对这一地区严加搜查。这时著匪冯如弼，正从圩壕沟里匍匐逃窜，恰遇乡长卫士迎头赶上，立即把他团团围住。冯匪见事不好，只得低头受缚。

1948年6月初一夜晚，这“五龙二虎”等匪徒，会集于吕望集南黄集孜，先有一部分匪徒包围封锁路口，另一股匪徒闯进庄内，威吓毒打群众，闹得全庄老少齐哭乱叫。该庄牲口被抢去30

余头，衣物钱财抢掠一空。次日早晨，遭掠户主分别各处寻找，顺着牲口的蹄迹，找到赵集东南曹桥口、曹海子、安家等庄。当时有冤主黄庆廷及弟黄庆信等报告解放区曹楼乡长王怀善，经乡政府便衣地下工作人员曹金堂等伪装成下乡买树进行调查核实后，就由乡长王怀善率领乡政府武装，会同曹街群众赶到曹桥口等，将被抢的牲口找回。

1948年农历正月，这股土匪伙同外地大批土匪于夜间会集，直达阚町集东窝狗李庄，凶恶地杀死李凤仪的儿子，大肆抢劫钱财衣物，牛马牲畜牵拉净光，所有经匪抢劫遭害的男女老少齐哭嚎啕，惨情难述。

1948年秋，有一批猪贩子赶着一鞭膘猪经过河沟集，被匪徒徐龙、董金星、董银成、曹登肖、曹登峰等看见，便追踪到董桥南湖，持枪威吓，不容分说，把4个猪贩子捆绑起来，一个个勒死，埋在小刘庄河沟边，然后把猪全部赶到蚌埠销售。更残酷的是，事后猪贩子两个家属从临泉来找时，又遇见凶匪徐龙，徐用花言巧语，假意热情招待，最后毒害致死。

（安徽省阜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匪首周文山罪恶的一生

曾广济

周文山又名周盛连，广东省仁化县长江圩人，青年时期当过纸棚打杂工。他身材既不魁梧，资质也不敏捷，而且没有文化，只凭着狠毒、狡诈、蛮干，在湘、粤、赣三省边境特别是崇义西南地区，奸淫烧杀，鱼肉人民，为害几十年。

这三省毗邻的汝城、仁化、大余、崇义，正是五岭山脉的罗霄山脉南段与大余岭和南岭相连地带。这里山岭重复，溪水纵横，山高林密，洞深岩邃。山间小块平原，自成村落。在升平时候，是尧天乐土，在离乱年头，却是盗贼出没的渊薮。因为地连三省，统辖不一，就给那些狡黠的强人土匪以可乘之机。他们到处抢劫，杀人越货，出没在三省毗连几县的圩镇与群山之中。往往起事时只几个匪徒，不用三年两载，便形成股匪，啸聚山林，为害乡里，周文山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一

民国初年周文山在大余县内良的八公坑纸棚内当打杂工。一天，他上山去折胶叶，偶然打个呼哨，只见路上几个商人扔下包袱，拼命奔逃。他觉得奇怪，走过去看，几个包袱丢在路边，打开一看里面尽是烟土。他喜出望外，这一下便触动了当土匪的心机。回到纸棚，他对同棚伙计说："这没本钱的买卖做得。"几个

人商量之后，决定上山当土匪。

有时周文山一人去拦路抢劫。他用绳子把山路旁边林子里的小树拴好连起来，当有人路过时，便先扯动绳子，满山小树动摇，发出瑟瑟索索的声音，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后，自己便下山拦劫，搜取过客的财物。有时过客虽然人多，因不明真象，也只好任他把财物拿走，不敢抗拒。以后几个人越来越大胆，便买枪聚众，大干起来。

那时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地方官员朝秦暮楚，哪有心思过问这些“癣疥”之疾？不过几年，周文山竟聚有几百人，发展到明来明去，杀人放火，洗劫村镇。仁、汝、崇、余相连的山区都笼罩在周文山股匪的阴云之下。

周匪从 1919 年开始抢劫圩镇到 1925 年冬天下山，前后六七年中，曾多次洗劫文英、古亭、关田、聂都、乐洞；大余的沙村、吉村、内良，河洞；湖南汝城的集龙、热水、乐岭、鱼王；广东仁化的长江、扶溪、城口等乡镇村落。其中 1921 年在聂都打死刘性敷，打伤刘心凯。1924 年抢文英，捉去张林柱父子，烧毁水头何建章房屋和上达铁罗湾屋。在古亭绑架邱福隆儿子，回归途中又捉乌洞径蔡传琳和他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至小陈洞又绑架聂都做客的邓仁仪。1925 年 4 月 13 日劫古亭，绑架巫义泰父子和周姓少女。1924 年劫聂都，烧了老虎石、成塘子吴姓房屋数十间。1925 年正月，在樟冬坑大坳上绑架吴国淙。这一年还绑架了乐洞人黎宗藩，强制替他当秘书。至于拦路抢劫、打劫村僻人家，用酷刑逼取财物，牵走耕牛的事，真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因遭周的残害而家破人亡的更不计其数。

周文山抢劫钱财，较之一般土匪厉害。他不但抢劫人民财物，连他同伙的分赃也不放过，不过不是抢，而是用别的方法罢了。比如他在掳人勒索方面，就花样翻新与人不同。他把掳来的年青女子作为货物，作价招标，让他的同伙来投标。得标的就是从应分

得的赃款中扣付女子身价，然后把女子领去作临时老婆。等这女子家中拿钱来赎人，所交的卖身钱又归周文山，而这个得标的喽罗不过做几天或几十天“新郎”，便人财两空了。古亭某姓姑娘曾罹过这样命运，蔡传琳的女儿也被拿出来招标了，只是被她原来的叔母刘氏（即周抢得的第一个押寨夫人）所救，才没受到糟蹋。

周文山不但在抢掠钱财时又狠又毒，而且在储藏金银的时候，也做得狠毒出奇。据说他每逢埋藏金银时，便叫一个喽罗挑着金银到深山里去，要喽罗挖出大小两个坑，用小坑把金银埋好之后，他乘喽罗不备，用枪打死，埋在大坑里，还说是替他守窖呢。这些屈死的喽兵都是他平日记恨在心的。有曾经接近过周文山的人说，他性情猜忌，怀疑身边长得清秀的喽兵和他的小老婆有不正当关系，为了不让“家丑外扬”，便一举两得地叫这些人死后替他作“守财奴”。因为他为人狡诈，这样的行动又绝秘密，人们不易察觉。但久而久之，他的亲信从他和大小老婆的争吵中，探索出这个秘密来。

提到周文山的大小老婆，人们不由得会对他激起强烈的憎恨，而对他的老婆和他们的亲人寄以同情和怜悯。

就拿他的大老婆刘氏来说吧。刘氏是竹洞刘义洪的女儿，嫁给乌洞径蔡传斌为妻。在1924年正月初，周文山趁他们新婚后第一次归宁（俗称转门）的机会，在竹洞坳拦劫，把刘氏抢去作了押寨夫人。原来刘氏身长面白，长得漂亮。周文山早闻艳名，垂涎已久。无奈刘家是殷实人家，竹洞村又人多势众（居民多有枪支，且又团结，小股土匪向来不敢去那里骚扰），无从下手。这回打听得刘氏和丈夫出门，便喜出望外，在竹洞坳上埋伏起来，见刘氏一行来到坳上，他便跳出来阻挡刘氏去路，死皮赖脸地说：“刘妈，你来啦！这回你可得跟我去罗！不用回家了。”说完便拖着刘氏并押着蔡传斌等一些人一起上山，到了他的巢穴，便强迫刘氏从他，并威胁说：“你要不从，就把你娘家和夫家都杀绝，眼

前就把你丈夫先开刀。”刘氏慑于威势，为了保全丈夫和两家人口，只好忍辱求全，做了周文山的第一个押寨夫人。

其后周文山利用各种手段，先后弄到6个小老婆。其中最后一个叫黎日英的，原是他抚养的过继女儿，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日英出落得很有几分姿色，又当妙龄之际，自然更加妩媚。这时的周文山是年过花甲的老翁了，但他淫心未减，竟不顾他老婆的吵骂和他亲家（日英的生身父母）的劝阻与反对，硬逼日英和他结婚，做了第七位小老婆。直到如今，有人提到这件事，黎日英还是恨声不绝呢。

周文山不但在家里拥有“美妾娇妻”，就是外出“视察”也要找个临时“伴宿”，或是轧个姘头，而且在这些事情上还要恃强霸道，巧取豪夺呢。1933年，聂都有个朱茂顺与杨姓养女有私，周见杨氏漂亮，就硬和她往来，还嫉妒朱茂顺，扬言要杀他，吓得朱躲避了几个月。后来由江源标从中周旋，罚朱土纸五担并扫大街一个月，才算了事。大凡周文山见到老百姓家里长得漂亮的妇女，便想玩弄，“文”的不行，就用武的。

二

周文山强盗生涯的时间越长，作恶就越多，人民就越恨。仁、汝、崇、余各县都在加强防剿措施。周文山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安危，他想用多年抢劫积累的无数金银，经营一个安乐窝，享受后半世荣华。这只有“下山”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放下屠刀，改恶从善，不过是一种“隐身术”罢了。

1925年冬天，周文山顺水推舟地率部下山了，被崇义县政府任命为“边区大队长”。从此，山上的土匪变成山下的霸王。

原来1925年春天，周文山为了报乱石坑的仇，在樟冬坑大坳头绑架了聂都团总吴为和的儿子吴国淙。当时周文山发出黑信，要

吴为和交出4枝步枪和多少银元前去赎尸。吴为和一面派代表和他谈判放人，并劝他下山；一面到余、崇、仁、汝四县去告状请兵进剿，组成合围的形势，对周施加压力，迫使就范。

当时刘氏也极力反对杀害吴国淙，她对周说："你要了人家的钱，要了人家的枪，又要人家的命，这不做绝了么？"吴为和派去的两个代表（一个是竹洞的周振生——刘氏的舅父，一个是聂都刘学礼——刘氏的本家）也再三劝周不要杀害吴国淙，给自己留条后路。

周文山在内外形势逼迫下，又得到不给治罪并许为大队长的允诺后，终于下山了。

下山后，首先是要做点"好事"，一则在人民面前表示"忏悔"，二则要在政府面前立下"功劳"。

第一件"好事"是拿出一点钱给蔡传斌娶回一个老婆。事情是这样的：刘氏虽被周文山抢去了几年，但她还是难忘结发之情，留恋与原夫往日的恩爱。这回下山了，照理可以破镜重圆，无奈周文山死死拖着不肯放她。因此刘氏硬要周文山替蔡传斌另娶一个老婆。周文山一方面慑于雌威，一方面也觉得这是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好办法。便拿出一些钱替蔡传斌娶了一个老婆。这时的蔡传斌虽有一万个不愿意，也不敢不依从。因周文山手上有人有枪，啥样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这才叫"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只好把满腔仇怨埋在心底。待到抗日前夕，蔡某便抛弃家庭，从军去了。

在另一方面，周文山为了讨好国民党政府，极力镇压革命。在土地革命时期，多次与红军、赤卫队打仗。1930年革命高潮时期，赤卫队攻占崇义县城，就是周文山前来夺回去的。在镇压黄世宰农民暴动时，烧毁大密三条坑房屋的，还是周文山。他立下了这些"功劳"，赢得了国民党政府的信用和重视，成为"剿匪"的主力。

但是，花无长好，月不长圆。几年没事，这位大队长渐渐要被人忘记。正好这时聂都有个陈耀廉，还有刘学芬，他们把周文山的种种不法告到县里，因此撤了他的大队长职衔，在家里坐冷板凳。他对这事是不会甘心的，除了对陈直接施加压力报复，还采取另外一些巩固地位的办法——那就是“养匪自用”。

他有意派出小喽罗，发给他们枪支，上山当土匪，拦路劫抢，打家劫舍。他却在家中坐地分赃。等到闹厉害了，地方商民士绅又要求政府叫他出来剿匪。他一出来，“土匪”就没有了。他又受到了重视，不坐冷板凳了。

闹得最大的一次，要算在1904年前后黎英、黎雄的股匪事件了。

黎英、黎雄是亲兄弟，家住白溪田心村（是周文山在白溪的乡邻），周文山有意发给他兄弟俩一些枪支上山当土匪。这俩人早就知道周文山的厉害：先叫你上山当土匪，以后他又来剿你立功，所以他们俩人表面上听周文山的话，暗地里却加紧扩大势力。到了1940年前后，已有100多人，渐渐地就不听周的指挥，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势了。

这时正是蒋经国在赣南的时候，为了剿平黎英、黎雄这股土匪，也利用起周文山来，任命他为余、崇、犹边区剿匪大队长。对周文山来说，这是“皇太子”的荣命，怎不感到受宠若惊，感恩图报？因此更加不顾什么“绿林义气”而积极设法剿平这股土匪了。他毕竟是个老手，密派心腹打入黎英、黎雄股匪中间，终于在1941年正月打听确实：黎雄带着一个女人和几个土匪在白溪早堂纸棚内。周文山带兵围住纸棚，将黎雄打死，当场割下头来。接着在五洞茶头聂家捉住黎英，也砍下脑袋。周文山带着这两颗人头到赣州向蒋经国报功，受到了蒋的嘉奖。

从此，“边区大队长”的宝座就更加稳如磐石了。

三

周文山在山上的时候，一直把陈沙附近的欧沙作为巢穴。那里西通汝城的东岭、鱼王，北连崇义的乐洞，南到仁化的长江。这一带山连着山，既偏僻，又离交通要道不远。正好作为四出掠夺的中心。下山后，把老巢移到长江圩北边五六里远的木溪头。他在那里盖了一所大庄园，占地几十亩，内有9个厅堂，几十间住房，有仓库、兵营，修械所、水井等配套建筑。四周围墙高达丈许，四个墙角各有突出的碉堡，住在里面即舒适又保险。到1935年、1936年又经营白溪村，把那里作为他的第二巢穴。白溪庄园的规模比长江圩小得多，但在往来的要道上加建了碉堡，作为外围的防御工事。

从白溪庄园建成之后，周文山便往来于长江圩白溪之间。后来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白溪了。

周文山为什么不在长江圩要到白溪呢？

原来他下山后，虽在长江圩附近建立了庄园，但他与一些小股匪和散匪仍然藕断丝连，甚至把枪支发给他人去拦路劫抢，他坐地分赃，弄得商旅裹脚，市面萧条。长江圩商团到仁化控告他。有一次仁化县派兵来捉他，围住了庄园，幸亏在刘氏的帮助下才越墙逃跑。刘氏却被仁化县抓去，一年后才被释放，他也重回庄园。由此与长江圩商团结下了怨仇。长江圩是粤赣边境的大集散地，市区大、商行多，商团武装有几百人。这里民风强悍团结好，周文山吃他们不下。1932年农历六月初六，长江圩迎神赛会，周部和长江圩商团就打了一仗，周部被打死二人。他只好自忍吃亏，回避这是非之地。

白溪是个小山村，当时只是半个保，可是山岭重叠，地形复杂。附近的一些圩镇，如东北边的聂都、关田，东南面的沙村，北

面的文英、古亭，西边的竹洞、乐洞，人口都不多，民性淳厚，又没有什么地方武装，正好是他称王称霸的乐土。

另一方面，在白溪比在长江圩容易弄到钱，条件比长江圩优越得多，这里有无数的竹山，可以利用；有众多的土纸，可以转手赚大钱。这也是他要到白溪来的重要原因。

他建起白溪庄园之后，想到了要独霸一方，单凭几枝枪、几百人还是不行的，必定要在政治上有上级官府作靠山，才能霸得稳。还得有爪牙插进地方行政机关，才能扎得住根。因此，他便使用各种手段来勾结官府，树立威信。比如他在 1946 年做 60 大寿，仁化县政府送给他一方软匾，上面的大寿字是用仁化县政府印盖成的。崇义县长周国材亲临祝寿，还称他为叔。蒋经国到聂都视察，在他家住过一夜。这几件事给他大大地提高了身份，增大了威信。崇义县政府先后安排他的儿子周振民当文英乡长，周振兰当聂都乡长，他的亲信肖大勋当聂都、古亭乡长。

这样，他自己当大队长有军权，有武力。在人事关系上有上级作靠山，在乡镇有他的爪牙，这就使得他在以白溪为中心的四外方圆几十里之内，成为一方霸王。他私设税卡，征收过境税，每当旺季，一天可收税金 800 多元。他私设公堂，武断乡曲，不论是口角小事，财产纠纷，婚姻问题，他都受理。他断案既简单又干脆，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凭直觉作根据，但一经他判决，谁也不敢不听。当然他也不会白断案的，总得有点油水。

在那个时代，农村最不好解决的就是婚姻问题。女方和女方家属认为离婚不光彩，多不愿离，因此往往争持不下。但是男方只要到周文山那里一说，把老婆“打把他”（送给他去处理，由他卖也好，嫁也好），那么女方愿离也得离，不愿离也得离。而且从此以后，这个女人就等于周文山家的财物了，任凭他或嫁或卖都可以。女方及其家属只是敢怒不敢言，除非送够买身钱，才能回家。有的夫妻到他家请他解决婚姻纠纷，他叫男的先回去，把女

的留下，对男的说："最好不要离，等我替你劝劝。过三个五个月，她回心转意，你来领回去。"留下的女人住在他家替他干活。可是等到男的来领人，他却要人家付清几个月的伙食费，付不起钱，就判离婚，女人就算他的人了。这样的女人，都被安排住在一起，像商店货物一样，让人挑选娶走，他得身价钱，没走的继续给他家干活。文英、聂都都有这样真实的例子，也可说是尽人皆知的事。

在抓壮丁那个时期，凡是躲壮丁的，只要到他那里交上5担谷，报个名当兵，他发给一个徽章，便可以在大胆在家，乡保长再也不敢抓了。这些各自回家的"兵"又顶了编制的名额，不领薪饷，钱都归他自己了。有的出不起5担谷，就到他家白干活也可以。

四

周文山从当土匪到"大队长"的几十年中，做尽了坏事，享尽了荣华，他满以为可以在安乐窝里渡过晚年。一声霹雳，崇义解放。周文山顿时手忙脚乱，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吧，没有门路；去香港吧，土霸王没见过大世面，怕适应不了。想来想去，还是驾轻就熟，做窜山大王去。但在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下，他又"下山"了。当他被带到大余后，给他自由行动的待遇。他却想起了一生作恶太多，恐怕得不到人民的宽恕，再次逃跑上山。

他凭着往日的"余威"，凭着手上的快慢机，逼迫几个身强力壮的民夫用箩筐抬着他，东流西窜地躲藏在白溪五条坑、李坑、拐坑等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的穷山僻谷中，妄想苟延残喘，逃脱人民的惩罚。然而，人民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是逃不了的。

周文山在山上躲藏的时候，两腿患风湿病已不能行走，靠几个民夫抬着走。这时外有解放军追捕的压力，内有疾病缠身的痛

苦。也许是他平日作恶过多的报应吧，他此时两腿剧痛，不但白天不能行走，连晚上睡觉也没法消停。他必须命人将他的两腿用绳绷着高高地吊起来，头朝下躺着才会觉得减轻一些痛苦。过去他当山大王、当"大队长"，没少干吊人打人的事，如今不等别人绑他吊他，自己先绑起尝尝滋味。这天他正在拐坑纸棚里坐着，私自庆幸又能再活一天的时候，人民解放军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不由得呀的一声便晕倒了。醒来时，冰冷的镣铐已把他的手脚紧紧地扣住了。

在监狱中，他低垂着头，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生意，嘴角的肌肉不时地抽搐着。这说明他内心的恐惧与疾病的痛苦都到了相当的程度。当他还没有受完审的时候，一天，他头一歪倒下去，这个杀人魔王便呜呼哀哉了。

附近乡镇的人民，本来就等公审枪决周文山，来解解心头之恨，如今听说他自己死了，群众愤怒地咆哮了，他们不听解放军和政府干部的劝阻，竟把周文山的尸体分了，拿到河滩上包着砂子砸成肉泥，让它顺着流水饱饷鱼虾去了。

（江西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廖世材与“铲污团”

刘　易

解放前，会昌县东角山的官丰（今属洞头乡），出过一位煊赫一时的人物叫廖世材。他，开始是条反抗官府、劫富济贫的好汉，后来成了官民不分、贫富皆抢的土匪头。

廖世材出生于1924年，排行第四，小名叫四角罗。他出身富家，12岁入站塘小学念书。在小学读书时，廖世材成绩一般，对练武倒是饶有兴趣。他父亲特地请了一位姓叶的武术师教他学武艺。廖世材自小生性好动，胆子大，好逞强，在三兄弟中算是小霸王。由于他刻苦学练，十八九岁武艺就初有名气。当时，在官丰这样的偏僻山区，一个小学毕业生算是出人头地了。廖世材小学毕业后，在当地人们的心目中，称得上是个能文能武的稀罕人物。小学毕业后不几年，便当上了国民党官丰乡的乡长。当时，他年仅20左右。次年，又提任了设在永隆的粮食仓库主任。

廖世材出任官丰乡长，正值抗日战争中期，是国民党强拉壮丁的高潮时期。官丰廖姓居多，廖世材出于乡土、宗族观念，对国民党的强拉壮丁甚为不满，他对上级派下的征兵任务，总是敷衍了事。当时的会昌县政府以“宣传兵役绝少效果”为由，通过省民政厅的通报，给廖世材予记过处分。在他心底里，从此播下了对上级不满的种子，使他更为不满的，还是在任粮食仓库主任时的遭遇。

廖世材是个浪荡子，加上娶了老婆，在任永隆粮食仓库主任

期间，他经常外出，或回到相距四五十里的官丰家里。每次外出或回家，他都要委托别人代理仓库事务。这些代理人也就利用了廖世材性野心粗，加上年轻缺乏经验的弱点，千方百计窃取仓库的稻谷。有的手段更为厉害，在仓库楼板挖个小洞，让谷子源源流出。等廖世材来库时，便以“老鼠洞”瞒过。其中有个姓许的，是个老赌棍，一人就窃去稻谷几十担。当地土霸兵痞刘佐田、刘盛仁等也打了廖的主意，通过内外勾结盗走不少粮食。就这样东偷西盗，加上廖本人也挖走了一部分，一年多里，仓库里的谷子便不知不觉亏空了上百担。按规定，各乡粮食仓库的县仓积谷，每年都得向县里汇报并清帐查仓一次。身为仓库主任的廖世材，这下可心急如焚，明知交不了差，没有办法，年终清帐时，廖世材便寻找借口拒绝交帐。县府甚为不满，认定廖贪污了大批稻谷，要逮捕他。一天，县府通知廖世材到站塘开会。到了站塘，廖有个老同学向他告密，说县府借开会要捕他。廖听后，随即从后门逃走。返回官丰后，廖世材左想右想，觉得走投无路了，便横下一条心：“舍出八十斤毛屎，造反！”主意既定，便立即召集乡绅和保甲长会议，廖世材厉声地说：“福建北冀（与官丰交界）的老百姓都起来抗粮抗税，我们也要起来抗，还要抗丁（指征壮丁）。如果县里派兵来，我们就把他们打退！”又说：“咱们官丰地形好，难攻易守。只要大家同心合力，就有办法。”当时，黎民百姓正苦于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强拉壮丁，廖世材一番话很快得到响应。于是，一面组织人熬制土硝，一面把乡里剩下的县乡仓积谷卖掉132石，购置枪支弹药，招募武装人员。又串通福建武平匪首潘美庆和安远匪首刘建华等，另从外地招来一批人马，很快武装起三几百人，四五十条步枪。1943年秋，廖世材正式打出“铲污团”的旗号，自任团长，买了匹自用的高大白马，并任命洞头上霸蓝天碧为副团长，还有骨干分子徐公茂、高永春等。外地拉拢的拜把兄弟有武平的王某，以及安远的赖良东、刘建华等。由于他们

"不交粮、不纳税、不征兵"的口号颇具感召力，一时深得民心，声势不断壮大。最后发展到1000多人，拥有200多条枪。

廖世材组织"铲烟团"后，矛头直指官府。一次，县府派警察到官丰抓壮丁。廖世材闻讯后，立即召开全乡青壮年大会，每人供应6两猪肉，叫大家吃得饱饱的，好上阵杀敌。结果，把警察打得狼狈而逃，救出了4名险被抓去的壮丁。又一次，警察来到官丰突袭，抓走4名廖屋的壮丁。廖世材派武装追击，一直追到崇山峻岭的夹水，不但救回了被抓去的壮丁，而且把警察队长的弟弟当场击毙。之后不久，县大队派出一个分队到官丰催款，款没催到，反被廖全部缴枪。从此以官丰为据点，包括洞头、小昭以及永隆、中村、站塘部分地区，几乎成了廖世材的独立王国。国民党的县政府根本奈何不得，壮丁征不到，粮款也派不下。面对廖世材团伙的日益壮大，国民党县政府十分恼怒。

1944年8月间，会昌县政府以县长费绍宏的名义，正式颁布专门对付廖世材的"为剿匪告士绅民众书"。其中，主要内容是10条，即：

一、生擒匪首廖世材者赏给5万元；

二、以匪首廖世材头颅献给者赏3万元；

三、携步枪投诚者赏1000元，携短枪投诚者赏2000元；

四、觉悟自新者无罪；

五、能密报匪情因而拿获者，照上列各款目减半给赏；

六、执迷不悟者枪毙；

七、知情不报者枪毙；

八、窝藏匪类者枪毙；

九、供给粮食及物品于匪类者枪毙；

十、私藏枪械匿不登记者以通匪论。

发布这10条剿匪令，意在给廖来个下马威。接着，县府派出头面人物如县参议长谢民德、省参议员曾昭昌、国民党县党部书

记长刘秀波等，到永隆地区与廖世材的代表谈判，企图用招抚的办法要廖投降就范。岂知廖态度强硬，毫不让步，于是谈判破裂。无可奈何，县府便请求武装镇压。

1945年7、8月间，保安第五团最先派兵进剿。该团派出一个大队300余团兵，挑去8担子弹，一进官丰境界，便疯狂扫射。廖世材先在外围巧妙布阵，有意消耗对方弹药。进剿的保安团兵很快消耗了其中的7担子弹。剩下最后一担，原准备用来直捣廖世材的老窠，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担饼干，误当成子弹。保安团兵顿时慌了手脚，准备撤退。廖世材布防在核心地段的武装，一涌而出，只几个小时便击毙保安团兵10余名，还打伤一批，缴获几十条枪枝。廖世材怕后面还布有援兵，不敢追击。保安五团进剿失败后，廖世材的声威惊动了县境内外，他的名字从此家喻户晓。连当时驻扎在宁都的国民党五十二旅旅长黄镇中也看上了廖某。黄镇中为了培植自己的地方实力，暗中与廖勾结，支援了廖一批弹药，还有2挺机枪。廖世材真是如虎添翼。

起初，廖世材的“铲污团”有比较严明的纪律，只许对抗官府，抢劫富豪。在官丰一带的近两年时间里，他们的确彻底实行了“抗粮、抗税、抗丁”的三抗口号。他们也曾组织人马，在右水围攻县自卫队一个排，企图夺枪，在安远抢劫过国民党银行的现钞。还在筠门岭的盘古隘一带，数次抢劫大富商和国民党政府的运货卡车。也曾企图绑架县城头户商号“吴万兴”老板，以索取大笔赎金。因案情暴露，绑架未遂。此外，在各地农村抢劫地富的事，也时有发生。但是，到保安五团进剿失败、“铲污团”名声大振后，廖世材开始骄横起来，对下属渐渐约束得不那么严了。以后加入廖伙的也多属地痞、流氓、赌棍之类，这帮分散在各地的小股喽罗，披着廖世材的老虎皮，不分贫富，到处乱抢乱杀。一个冬季的一天，廖世材的团伙窜到右水下剑地方。这里有个叫廖天发的，家里十分贫穷。上有父母，还有个十五六岁的童养媳。这

个童养媳颇有姿色，年轻美貌。一伙匪徒不分青红皂白，除抢劫廖家的食用物资外，竟将廖一家3口杀死，将廖的童养媳抢走带往福建。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抢劫惨案。以后，又不断出现廖匪抢劫贫家的事例。从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廖世材的形象便逐渐由一个造反好汉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土匪头子。

县政府对廖世材软硬兼施，但都无济于事，特别是10条剿匪令颁布后，时隔一年多，还是收效甚微。粮款收不上，影响财政收入，壮丁征不到，向上面交不了差。加上父老百姓也苦于廖匪的胡作非为，于是呈报上级，请求再一次进行武装镇压。

抗战后期，欧阳江的保安十三团奉命开往赣中抗日。欧阳江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曾率部临阵逃跑，险些受军法制裁。江西省政府没拿欧阳江治罪，责令他剿灭在会昌及毗邻武平、安远边境一带闹得不可开交的廖匪集团，作为将功折罪。据说，廖世材开始造反时，欧阳江曾暗中予以支持。这时，欧阳江权衡了一下利弊，觉得还是丢卒保车上算，便毅然从命。欧阳江进剿廖世材时，接受保安五团的教训，事前作了充分周密的部署。先调了一个中队进行布防，到1947年春，欧阳江的1000多团兵几乎倾巢而出，采取层层包围、步步进逼的办法，猛冲猛打。深入到官丰腹地时，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交火，终于把廖世材的主力武装彻底打垮。廖世材带领几十个随从，突围脱逃。官丰老巢被打翻，“铲污团”从此土崩瓦解。欧阳江也就受到上级嘉奖。

保安十三团到官丰围剿时，抓了当地群众三百多人。其中男女老幼都有，且多属廖姓人。县府本拟全部问斩。恰好有个据说是国民党保安团三省总管廖世桥来到会昌。他与当时的县长赖佐汤商议，认为全部杀掉，会大失民心，“于党国不利”。最后把实属无辜的老、妇、幼放掉，剩下的二十多名壮丁，全部解去当兵。

廖世材在这次围剿突围后，带领一批人马投奔安远的拜把兄弟刘建华，企图躲过风险。第二年四月间，欧阳江得到情报，派

出一个大队的兵力前往安远追剿廖世材，并进剿安远刘建华股匪。在白石圩的一次激战中，廖世材被当场击毙。廖世材丧命时，年龄还不到30岁。

（江西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闽南著匪高为国

洪卜仁　傅维翰　陈朝卿

一、高匪一家

高为国是福建晋北福山腰村（今属泉州市双阳农场）人，早年家境贫寒，势单力孤，其父母在乡中常受人欺凌，故迁居城内相公巷。高为国原本姓纪名哮，出生于泉州相公巷。其父以小贩为业，维持家人生计，在纪哮10多岁时因病早殁，赖其母善于钻营，生活尚可。纪哮生性玩皮，自幼刁劣，好与人斗。他十七八岁时娶妻后，亦仿其父出为挑贩，沿街叫卖咸鱼白虾。纪氏性好结交，酷爱赌博，所得微薄收入岂够他的挥霍。后乃与友人张炉共入八都山。开始了时匪时军的生活。纪哮为匪时，怕人知其身世，因而更名改姓，以高与纪同宗故改姓高，自我标榜志在“为国”，乃以“为国”为名。其实所做所为，并无半点为国为民，而是地地道道的祸国殃民。待后来受编发籍，更有慕僚趋炎附势，为其抹粉，献议改官名为“高经礼”，以示有“儒将之风”。

护法军时代，高入民军的杜信忠部充士卒，旋即成为杜的亲信马弁。护法军失败后，高入仙游白格岭一带当上匪，拦路抢劫。曾获巨资，后回到老家福山腰，招兵买马，聚集百数十人，称霸一方。时间不长，遂受靖国军第四旅第八团团长黄孙坚招抚，出任连长。高任黄的连长后，仍是匪性不改，时常借靖国军名义，到

处敲诈勒索，为此被缴械逐出靖国军。高乃遁归福山腰老巢，重操绿林旧业，讨伐叛逆陈炯明时，高又隶归张达部，任营长之职。1924年春，皖系军阀王永泉部入驻泉州，其弟王永彝出任泉州警备司令，高为国又降于王永彝，受编为捕盗营。1926年革命军北伐入闽，高再度潜回福山腰老窝，窜扰晋江、南安、惠安等地，派兵派饷派枪，匪部扩充到1000余名。1926年6、7月间，讨伐卢兴帮匪部战斗打响后，海军陆战队林寿国旅奉命进驻泉州。各界以高为国怙恶不悛，极力请求林旅出兵剿灭高匪。但是，林旅非但不去征剿，反而收编高部匪众为海军晋南惠安游击大队，委高为大队长。此举犹如火上加薪，投虎以肉。自此，高匪气焰日盛，凭藉海军这一靠山，四处掳掠，为非作歹，凶残酷虐，日甚一日。

高为国的母亲贪婪残暴，唯利是图。高的绑劫生涯，极受其支持与鼓励，进而推波助澜，插手指挥。手下喽罗一旦绑劫不力，她便申斥道："这是我们的生意，生意不出力做，你们吃什么？不管他大富小富，砂母也能炸出油来。抓到一个肉票，总比养一只猪值钱！"有些人家被绑了票，往往不直接找高为国讨价求情，而是托人恳求"老太太开恩"，由她出"盘口"再来讨价还价，绑票之外就是挖墓，这也是老太太的一盘生意。她经常迫令喽罗遍寻古墓开掘，所得陪葬之物必先给她挑选，剩下的才赏赐给手下之人。高为国以团长驻防泉州时，她成了泉州的"皇太后"，人们都要巴结她。

高为国有一妻数妾，结发之妻姓许名韭，是高为国未当土匪时所娶，许韭原本是个平常的家庭妇女，因高为国当了土匪，而且越搞越大，她也就"夫唱妇随"，学起武艺来，经一番勤学苦练，居然能双手使枪，弹无虚发，正所谓"近墨者黑"，在匪窟熏染下，其性情也变得凶悍起来。有一次，北军夜袭高匪老巢福山腰，高为国因脚有病不能走动，许韭就率领高为国的一支亲兵抵御，亲自断后，终于掩护高为国脱险。许韭不仅能指挥作战，而且绑票

也由其策划，据说高为国匪部多半的绑票活动都是由她指挥的。高匪在城中设有“情报站”，由卢番子主持，探得某处某人可以绑架时，即报告许韭，经她点头同意，方可行动，某肉票赎款多少也常常由她定价，许韭婆媳二人，竟然成为这桩生意的老板。有些散匪绑了人，也常以低价卖给她们，把肉票移到福山腰看管，被绑者亲属需以高价取赎，她们从中渔利。1930年冬陈国辉进驻泉州后，高为国夫妻预感前途莫测，乃让许韭带上部分金银细软，由高的心腹林应兰、韦乔陪同，前往香港，并在九龙购置房产，以备万不得已时潜往那里作寓公。然而，福山腰被攻破后，高为国贼心不死，并未逃往香港，而是潜伏待机，以图死灰复燃。于是，高密电召林应兰、韦乔回闽，同往闽北投靠刘和鼎。高满以为对刘有旧恩，会得其支援，不意为刘所卖，将其解省枪毙。高死讯传到香港后，许韭曾带一子前往台湾，托孤于在台的高为国叔父。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许韭舍不得埋在福山腰的黄金珠宝，又偷偷潜回福山腰找寻挖掘，事为东洛民团探悉，将其捕获处死。

高为国落草为匪后，与3人结拜，作为亲信爪牙，后都当上营长，为高帮凶。高的3个义弟情况大致如下：一名高少白，原系外省人流落到泉州，为高母收留，见其伶俐听话，乃养为子，为其娶妻，原欲让其照管家务；后又参与高为国军务，高为国败后，高少白隐蔽不敢露面，及许韭潜归，取得联系，同往福山腰取宝，亦被东洛民团捕获处决；一名高扬罗，原为亭店乡杨姓之子，后承继高家，生性残忍，十九路军入闽后，在厦门被捕，押往惠安枪决；一名高吴持，于福山腰被攻破时，为陈国辉部俘获斩决。

二、老巢简介

高为国是个土生土长的土匪，福山腰是他的老家，也是他活动的主要根据地。在最盛时期，高匪地盘有泉州、晋江、南安、仙

游、惠安等地，但其老巢仍是福山腰。高匪缺少“开疆拓土”的魄力，眼睛只盯住老巢一隅，对离开老巢稍远些的地方，即不感兴趣，因而对福山腰颇费力经营。

福山腰背靠双阳山（大阳山、小阳山），山高林密，洞穴四布，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高匪为固在这里建有炮台 1 座，架设大炮 1 尊；设 3 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吕铺，第二道防线在福山腰村前，第三道防线在村子的前后左右，每道防线都安设有电网，建有防御工事。村后双阳山上密林掩映，大小石洞不计其数，高匪抓的肉票即关禁于洞中，待到赎款达成协议，方移至村中。山岗有一特大岩洞，可容上百人，经高整修，分为上下两层，作为秘密据点，只有高为国及其少数亲信知道，这里极其隐蔽，一般人是找不到的。第一道防线由一般士兵防守，二、三防线则由“乌兵”轮流防守。所谓乌兵，是指高的亲信部队，这些人多为本村青年或高的亲信知己。平常他们仍从事耕作或其他生产劳动，有事时即放下工具，拿起枪来投入战斗。这些人都穿黑色衣服，以资识别，故称为“乌兵”。他们不仅地形相当熟悉，而且使用最精良的武器，所以战斗力较强。高为国把这批人收为亲兵，给以优厚待遇，既诱以利、又动以情，故能为其所用。这支乌兵的直接统领即为高的发妻许韭。

高匪在福山腰设有造枪厂 2 所，初时只作修理枪械之用，后发展到能自造五响快枪，据说三天之内即可造步枪 70 枝左右，可见已有相当规模。后来还发展为能自造 25 响至 50 响手提机关枪，成为闽南一带最早能自造机枪的匪部。

高为国既是匪，又是军，时匪时军，变幻莫测。他公然为匪时，即以福山腰作为老巢，四出劫掠；受编为军时，仍以福山腰作为后方根据地，仍然阳为军，阴为匪，掠得肉票即藏于此。因而，任何时候这里都派有亲兵严密防守。

三、横征暴敛

高为国受编入城后，实行残酷的土匪统治，在经济方面，为了搜括更多的民脂民膏，高匪除了设局续征地方上原有的各种苛捐杂税外，又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增设了许多捐税，如烟捐（鸦片捐）、赌捐、戏捐、花捐（妓女捐）、军队捐（规定高匪防地，每户应出匪兵1名，如果无兵可出，就要每名折洋10元交纳），门牌捐和铺捐等。此外，高匪还在距城南7里的井兜设“航船杂货税征收局”，以连长林澄海兼局长。在洪濑和溪口也各设“船捐局”，以营长黄清逸兼洪濑局局长，以另一营长王定国兼任溪口局局长。关卡林立，重重盘剥，致使商旅裹足。

1930年7月初，高部林剑吾、苏立修进驻安海，立即派人设立“烟赌捐局”，赌捐按月收1900元，烟捐按月收2400元，又派张垣接办安海海关，一上任即向五谷、干果两途强借2000元，声言如不肯借，进口货物休想起卸。高匪还派黄福如到泉安汽车公司勒索敲诈，说林寿国旅驻泉州时，泉安汽车公司每天“报效林旅200元，按月6000元”，高部也要按成例收取。后经公司托人说情，结果认捐每月4000元，分两次交清。还有南门外各乡，也被派饷款10多万元。

在高部强征的这些五花八门的捐税中，最不得人心的就是铺捐和门牌捐。所谓铺捐即店铺捐，由高为国的心腹走狗韦乔领办。该捐无一定捐额，全凭韦乔一人任意摊派，商家叫苦不迭。韦说这家店面该收50元，店主即在三日内一文不短地缴清，丝毫不容通融。倘逾期不交，加罚一倍，再不认输，即派兵封店抓人，一旦到了这地步，主家除赶紧补纳罚款外，还得托人说情，送礼及“放索费”，韦匪方肯起封放人。在高部驻泉期间，此类事件，时有所闻。韦匪狗仗人势，横征暴敛，不到一月时间，即上缴高为

国2.5万元，可见其勒索之残酷，而他本人从中吞噬了多少，那就不得而知了。

所谓门牌捐，即是高匪将其盘踞下的城镇、乡村划为几个区，然后按区派定总捐额，再包给手下爪牙按户征收。高还设门牌捐局于新门街敬文亭，委派金石为坐办，并派营长黄清逸率部驻扎华侨公会帮助征收。按其规定，不论城镇乡村，洋楼草房，甚至牛栏猪舍，概须缴纳门牌捐，捐率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户征收12元，乙等户8元，丙等户4元。对那些富户和侨户，则给钉上特种门牌，捐额面议。对这样的人家，往往要敲索至百余元甚至数百元方肯罢休。

高匪这些独出心裁的捐税，惹得天怒人怨、人民极为不满。当时，抵制最为坚决的是富甲新南的著名侨乡——树兜乡。高匪闻得树兜乡抗捐不缴，十分恼怒，当即罚该乡一笔巨款，限期缴纳，并威胁说，倘再敢抗缴，马上派兵洗乡。以蒋铁光为首的树兜乡民团不肯屈服，决心为捍卫乡里与高匪决一死战。于是，他们积极筹措军械，增筑工事，训练团兵，并派人联络新门外各乡及晋南方面的黄金炎民团，准备跟高血战。双方相互对峙，各不相让，积极秣马砺兵，持戈以待。当高为国确知黄金炎民团也来与己为敌后，心中颇感不安，深感力所不及，交火势必吃亏，于是便想法缓和紧张局势。恰在此时，高匪闻得树兜乡另一重要人物蒋报捷前往厦门，便即派韦乔前去接触，表示愿意让步，并邀蒋来泉州和谈。蒋亦有和解之意。这样，双方剑拔弩张之势即有所缓和。因蒋某答应来泉州，故高匪对城区防御放松了警惕。高匪万没料到，却突然遭到民团的袭击。其中详情将有专章述及，这里不再赘述。

四、绑票劫掠

高为国自落草为匪到1930年覆灭的10余年间，为害乡里，残害群众，烧杀劫掠，掳人勒赎，罪行累累，罄竹难书。现将其中较大者介绍给读者，以加深对高匪罪恶之了解。

先介绍几个高匪报复抗交勒款的事例。

1926年冬，高匪向晋北仕篮坑派款2000元，因该乡无力负担，即派出部队勒征，乡人许成率众抵抗，高匪便下令将该乡所有房屋放火焚烧，财产损失无计，村民许扁、郑石、许清、林魁等被匪捉捕杀害，余者四散逃亡。仕篮乡这个好端端的村庄，遭此劫难后即被废掉了。

1927年间，高匪勒派晋北大河内乡款3000元，后因抗缴，被高焚毁房屋30多座。乡民没法在此生活下去，纷纷逃至泉州、厦门等地，此处亦成为废乡。

1930年，高为国派他的义弟、营长高吴持进驻惠安东园镇，因勒派乌单（派款），被惠安县民团康伯伦联系各乡民团抗捐，双方大战三天后，高匪吴持恼羞成怒，命手下喽罗纵火烧毁民房，大肆进行抢劫，使镇民损失极为惨重。据说，光是该镇一家打金店，即被抢走黄金数斤。

至于高匪绑架勒赎，为害人民，甚或图财害命之事就更不可胜数了。现仅择其要者数件：

1924年间，高匪绑架南安六都仁宅乡菲律宾侨民黄奕道的幼儿，勒赎1000元；绑架石狮新华路金店老板刘海通，勒款5000元；绑架南安丰州石盘乡乡民队，其费款1400元取赎。

1928年间，绑架南安六都仁宅乡东山坡菲律宾侨民黄奕抛，勒赎5000元；绑架南安七都溪西乡菲侨黄奕赐勒款3000元；绑架南安七都卢内潘乡前清拔贡潘章，拟勒款1000元，因无力取赎，

被禁一年后逃出虎口；绑架南安士都菲侨赵宋票，勒款5000元；绑架南安六都仁宅乡东山坡菲侨黄老传、黄老贤二人，共勒捐9000元取赎。

1929年绑架南安六都仁宅乡东山坡菲侨黄郁沼，讨价2000元，因无力取赎，被关押折磨而死，后由家属出500元取尸费赎尸安葬。

1930年间，绑架惠安洛阳镇杉木行吴老板，以5000元取赎；绑架泉州涂门街协义首饰店老板陈祥林，勒款2000元；抓走泉州医生柳鸿鸣，扬言非拿3万元取赎即杀死，吓得柳家六神无主，赶忙将全部家产变卖，方凑足一定款额，将柳先生赎出。

1933年绑走晋北董厝乡一小孩，讨价500元，因家贫一时难以凑够赎款，在关押期间小孩病死，但家属一无所知。后家属将款凑齐，领回的只是一具尸体。

高为国是闽南一巨匪，他们不仅直接绑票勒款，而且还经常收买各县散匪绑架而转售的肉票，从中加价勒赎，也往往是每票几百至几千元。此类情形就不再一一列举了。由以上不难看出，高匪在泉州及周围县乡肆虐乡民，罪恶昭昭，是泉州一带人民的一大祸害。

五、民团斗匪

高匪四外派捐勒款，为非作歹，乡民若有不照纳的，即予拘捕，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泉州新门外树兜乡，蒋姓聚族而居，是闽南一带著名侨乡，极为富有，夙为高为国所垂涎。派捐时，高匪对该乡格外苛求，所勒饷款不开明数额，而是要中国银行红底钞票50斤（每张面额10元），故意刁难。该乡民团集议，皆主张以武力相拼，决不任匪徒宰割。于是，他们四处联络各乡民团，进行了3次武装围攻泉州、驱逐高为国的战斗。

1930年7月10日，树兜等乡民团600余人，以蒋铁光为总指挥，布置攻城方略：团兵分为三路、另有便衣队一队。午后，先以百余名便衣队乔装赌徒、小贩，暗藏短枪，自新门、西门混入城中，约定届时举事，里应外合。

当晚11时，400多名团兵从新门、西门、南门三路向城内进发。突袭高部驻军营寨。时西门高部仅驻一排。经民团攻袭，几乎覆亡，悉被缴械。新门方面驻有一连兵力，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亦死伤10余人，被缴枪械20余枝。高部在南门新桥尾车站驻有一连。因民团突至，猝不及防，仓惶之中被击毙卫兵2人，伤七八人，10余人被缴械。

三路民团突破城门后，继续向城中挺进。这时，白天混入城内的便衣予以配合，对高匪形成内外夹攻之势。到12时左右，三路团兵在城内会师，左冲右突，凡高匪营地均遭袭击。高匪搞不清底细，不敢应战，率幕僚傅维翰等并卫兵数人从后山逃遁，向晋北方向退却。后来，高为国会合了从城内退出的匪部，转往西福乡，稍事整顿即派部下进行反攻。在此之前，民团已于11日午夜1时半许冲入高匪大队部，见内中空无一人，知匪已全部败退，为稳妥起见，民团亦主动撤出城外，因此，在高匪反攻时，又扑了个空。

树兜等乡民团突袭高匪，首战告捷，计缴获机枪6架，步枪八九十枝，打死高部五六十人，打伤无计。高为国此次被民团击败，极为恼怒，认为这是个奇耻大辱，力谋报复雪恨。反攻扑空，迁怒市民，自11日起，高匪在城内劫杀无辜难以数计，其情景惨不忍睹。

同年7月17日，民团再度攻打泉州高为国匪帮。一日之间，曾两度攻入泉州城，但旋进旋退，没什么大的建树。这二度攻打泉州，民团仍分兵三路，从南门、涂门、新门同时进攻。

凌晨3时，南门一路的民团300人，由黄金炎率领，冲入新

桥。高部已有准备，派出一连兵力，埋伏桥畔。黄金炎的民团刚刚过桥，就被高匪伏兵将前行执旗的击毙。黄下令用机枪向高部猛射，高部不支，退入城内顽抗。直到早上7时，高部高扬罗率众自洪濑驰援，黄见势不妙，于8时许率队向东山方面退却。

另一路民团200余人，由许乞指挥，尽着便衣，事先化装混入涂门，南门枪响后，许即集合所部，直攻天妃宫匪营，与高展开激战。后因知南门黄金炎退却消息，耽心孤军深入陷于被动，遂即率部退出。

树兜的民团在浮桥碰到桥北高部的阻击，双方相持数小时。到8时许，得知南门、涂门已退却，亦不再进攻而回。

同日午后3时左右，晋南民团对泉州发起第三次攻击。南门外民团仍由黄金炎指挥，从东山进攻新桥。高为国部有200人驻在新桥。民团将队伍分为数队，东袭西击，高部拼死迎战，由下午3时直战至黄昏，高部佯败，向城内退去。民团尾随急追，不料高部掉头反击。恰在此时，黄金炎腹部被流弹擦伤，仓忙中误认为中弹，遂速令退却，停驻新店。

高匪经民团三度痛击，气焰大大削弱，自此便开始走下坡路了。

六、血腥屠杀

高为国第一次遭民团突袭失利，十分恼怒，兽性大发，在民团退出泉州时，有3个团兵掉队被高匪捕获，其中有两名是北方人。籍此，高竟命部属在城中大举搜捕北方人，一经捕捉，不分青红皂白，立即斩决。7月11日一天之中，城内的北方人就有30多人被捕杀。新桥头的德盛信局、明新钱庄，因为老板是树兜人，高匪即派人围捕，除抢劫2万多元外，又抓去店内伙计10多人，其中凡是树兜乡的，尽被杀害。新桥头温陵医院医生陈祯嘉，由

于平日树兜乡人信仰他的医术，凡有疾病，都请他医治。陈先生为方便该乡百姓，在医院内装一电话，可与树兜乡直接通话。此次亦因此而遭祸，被捕杀于街上。陈的一名学徒同时被捕，并遭毒手。

7月12日，高匪一部人马驻扎新门，新门至浮桥一带尽遭劫掠。杂货店、布店、金银首饰店等，无一幸免。浮桥民团主任林某的住室被高匪纵火烧毁。同时，高为国又借口搜查隐匿民团，在城内水仙铺一带挨户搜查，无论住户、店铺，所有值钱的东西，均被抢劫一空。凡民团中人，或被指为与民团有关系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各铺团练员被捕杀甚多，各铺保长，亦在搜捕之列。

7月13日，高匪又捕数人，杀之于南校场西街门和东门车站。有青年学生数人，胸前皆佩带校徽，被高匪硬说是民团中人，立被处死。

某日上午，高匪部从南岳某人力车店抓来车夫12人，多为莆仙人，硬被说成是民团的内应，严刑拷打之后，于当夜用卡车运至东门车站杀害。高为国的心腹护兵猫唐充当刽子手，他一手执大刀，一手拿手电筒。当别的匪徒把这些浑身瘫软的车夫拉下车后，猫唐便挥动大刀，象砍瓜一样，“卡嚓、卡嚓”连砍了12个。之后，他还晃动着手电筒朝车上照照，问还有没有，真是凶惨至极。

此次大屠杀中，或枭首、或枪杀、或石击，甚至有用绳子绑在汽车后面活活拖死的，手段之惨忍，令人发指。据说，这次被高匪残杀的无辜，即达百人以上。

七、最后覆亡

在树兜等乡民团准备攻袭泉州高为国匪帮时，另一个在安溪、南安、永春一带称霸的著匪陈国辉得悉后心中暗喜，因为陈匪早

就垂涎泉州这个富庶之地，想取高而代之。当时，陈暗中派人与树兜民团联络，表示愿意派兵援助攻高，但当民团攻打泉州时，陈国辉并未出兵援助，而是坐山观虎斗。他这样做，无非是想利用民团将高击溃或驱之离泉后，他再乘机把队伍开入泉州，以坐收渔利。陈的如意算盘当时虽未能实现，但高匪严重受挫，使其图高之心更加迫不及待了。

高匪受到民团攻击后进行血腥屠杀，引起了各界的强烈不满，社会各团体及海外华侨纷纷驰电福建省当局，谴责高匪的滔天罪行，坚决要求将高部调离泉州。在这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省政府便下令高部撤出泉州，其他驻地不变。于是，高为国便把大本营撤回到老巢福山腰。

1930年冬，陈国辉部进驻泉州，高为国闻听这一消息后，深感大事不妙，便加紧部署，准备与陈拼个你死我活。

据说，陈国辉进驻泉州之前，当时的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曾当面对陈说，闽南地方由谁住，就由谁整理，即谁说了算，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于是，陈便借此说是“省政府有令”，要进攻高为国的老巢福山腰。陈部进驻泉州之后，立即调兵遣将，对高匪老巢形成包围之势。

一切准备就绪，陈即打电话给高为国说：“省政府认为你为害地方，激起民愤，叫我协助民团打你，希望你出来受编，我一定帮你的忙。”高为国自知力量悬殊，硬拼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便派他的营长苏立修和副官陈奕去同陈国辉当面协商受降事宜。此后，为表示诚意，高还将一连兵力开出福山腰，实际上是作为人质的。然而，陈的本意并非是让高受降，而是要彻底消灭掉，所以尽管高作出了姿态，但陈并无半点撤兵之意。高见状大怒，电话责骂陈国辉说：“都是你这个麻脸作鬼，故意跟我打官腔，我就是打到只剩一人，也要跟你拼到底。”

高、陈谈判破裂后，高部见大势已去，军心涣散，多想逃亡。

高为国见军心不可用，便改变了硬拼的打法，密令心腹将枪炮、发电器及金银财宝等埋藏，让义弟高扬罗带领大部人马开往枫亭与惠安土匪汪汉民会合，而只留下一少部分人看守巢穴，实际是准备放弃福山腰出亡。这样一来，当陈国辉下令进攻时，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兵临双阳山下，很快攻破并占领了福山腰。其实，高匪为国已带着几个亲信出逃潜伏起来。

高为国并未就此甘心，隐蔽一段时间后又想东山再起，于是召回早已陪许韭到香港九龙的林应兰、韦乔二人，同往闽北依附国民党二十六师师长刘和鼎。他们为什么去投刘呢？这里是不无原因的。原来，1923 年前后，王永泉统治福建，派其弟王永彝旅长驻守泉州，并令其部下郭寅皋团长收编高为国为捕盗营长，刘和鼎时为郭团团副，高与刘由此相识。后来，军阀孙传芳入闽，驱逐王氏兄弟，郭寅皋团长逃离泉州。刘和鼎因官职较小而经济上不甚宽裕，想走但缺少川资。当此危难之际，高为国资助其几百元，刘才离家去了南京。自此，刘和鼎倒交了好运，到北伐战争后，他已升任蒋军五十六师师长了。那时，高为国曾派心腹林应兰带厚礼往谒，进行联络。后刘师开入泉州一带，彼此更多有往来，高亦时有进献。待到刘部驻泉旅长陈万泰奉令他调时，刘即令高为国接管了泉州，以此算回报了高赠款旧情。在陈旅长离泉之际，曾向高转达刘师长的意思说，晋江县长和税务局局长都是刘的人，请高务必不要更换他人，高虽表面应承，但当刘部调离后，即将此两缺改派为自己的人了，由是引起刘对高的不满。

高为国被陈国辉打败后，走投无路，又不甘心就此隐踪匿迹，远走他乡，便带上亲信林应兰、韦乔等前往闽北投靠刘和鼎师长。刘因已与高有隙，虽都表示尽力帮忙，但暗中却派人监视，自然不以朋友之礼相待了。稍过一段时间，刘又让人向林、韦暗示，要高拿出一笔款项，才好代为活动。林、韦见事不妙，便相机逃走，林去了香港找许韭，韦下了南洋。林、韦逃脱后，刘即对高实行

了监禁，并提出非拿出5万元不得自由。高为国自知已身陷牢笼，便设法求一熟人带信物到九龙去见许韭，让她速付款赎人。林应兰以为，给了刘也不一定放人，使得许韭犯起踌躇来。当此之时，泉州各界及海外华侨纷纷致函，要求省政府将高处决以平民愤。为此，福建省政府便令刘和鼎将高解省处理。时过不久，又有人到泉州找到高的亲信傅维翰，请傅转告许韭，如能付出5万元，高为国仍有生还希望。然而，傅并不清楚当时许韭在何处，故也未能转达此意。又过些时日，高为国在福州被枪决，一代巨匪就此覆亡。

张占军整理

（福建省泉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同安土皇帝叶定国

陈庆云　叶挺拔

辛亥革命后，在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下，社会动荡不安。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处于各派系军阀相互争夺的混战局面。福建民军就在这种混乱的政治局势中产生。他们割据一方，亦匪亦兵，打家劫舍，横行霸道，给福建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同安土皇帝叶定国，便是福建民军中一个较有实力的匪首。

树旗招兵　独霸一方

叶定国，字硕豪，别名打石兜，出生于同安县莲花山下埯坪村，少年曾学过打石。民国初年，他就纠集一班盗贼，在漳州浦南圩一带四处盗窃财物，曾被官府送进漳州监狱，押禁甚久。释放后，就在浦南圩开设鸦片烟馆，聚集匪徒。因其凶悍成性，村民畏惧。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联合南方军阀讨伐段祺瑞。次年，孙中山委任泉州许卓然、莆田杨持平二人为闽南靖国军一、二路军司令。时逢闽南民军兴起。许卓然在南（安）、同（安）交界之王巢山招集晋江、南安、同安等地民军，杨持平在安溪招集民军。许卓然与杨汉烈等率民军攻打驻守厦门的北军。叶定国见有机可乘，便与其弟叶定胜、侄叶振南，在莲花山召集叶姓族长、家长开会。叶定国以自卫乡里为名，威胁各旅长、家

长献枪筹款，组织起地方武装力量，由此初具实力。不久，叶定国又率匪徒夜袭安溪东岭的盐兵、护路队，劫得好枪10多枝，又向杂姓的云埔、澳内等乡派款，树旗招兵买马，势力渐渐扩大，开始独霸一方。

朝秦暮楚　由匪而官

1918年6月29日，杨持平、许卓然率领安溪、晋江、南安和同安的民军，攻打驻守同安的北军。叶定国为保存实力，也为了寻求有力的靠山，便向杨持平要求受编为闽南靖国军。叶摇身一变，由匪而官被任命为闽南靖国军第五营营长。叶定国率众百余名，协同攻打同安之北军。

靖国军攻进同安后，仅驻守3天，北洋军阀臧致平又率全师由厦门攻打同安。杨持平、许卓然不敌，率靖国军退入安溪及王巢山。叶定国见形势逆转，便背叛靖国军，投靠驻守厦门鼓浪屿的粤军第九预备队司令林柱高，受编为粤军陈炯明部属。叶部受命开往漳州整编训练。因为叶部匪性难改，军纪败坏，叶定国担心被制裁，便先请假回莲花山，后密令其弟叶定胜、侄叶振南，诈称该部叶氏连长死亡，欲将棺木运回莲花山埋葬。经请示批准后，叶定国命部属暗中将20多枝良好枪了械装入棺木，护送回莲花山。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叶部即被陈炯明缴械遣散。叶定国为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不久，粤军派兵在同安、长泰交界之白狗洞、上陵、罗溪等地收烟苗捐，事被叶定国侦悉。为报缴械之仇，叶定国令其匪徒夜袭粤兵，夺缴枪械60多枝。自此，叶定国如虎添翼，更为猖狂。

1919年5月，粤军与靖国军互相倾轧。杨持平率靖国军将驻守安溪的粤军击败，派陈庆云追击粤军至长泰的枫洋、岩溪、林墩，并就地防守。叶定国遂向杨持平要求仍归编靖国军。一是因

为叶部与粤军的关系恶化，一是因为叶对长泰地形极为熟悉，想长久占地为王。适逢陈庆云奉命召回南安诗山，杨持平便让叶定国接防驻守长泰的林墩等地。叶定国正中下怀，便在莲花山、同安一带积极扩充实力，壮大声势。

1920年秋，驻漳州的粤军司令陈炯明奉调回粤，闽南地盘归福建督军李厚基管辖。叶定国趁机占据同安、长泰、安溪等地盘，并收编长泰土匪叶文龙为部属。叶文龙乃一亡命之徒，凶悍奸滑，获叶定国赏识，提拔很快。叶文龙又与叶定国侄儿叶振南结拜兄弟，狼狈为奸。叶文龙提升为连长，不久，叶振南病死，叶文龙又擢升为营长。

1921年，粤军许崇智入闽，联合部分福建民军势力，推翻李厚基。李厚基快要垮台时，黄展云（福州人）发起组织福建自治军，张贞任前敌总指挥。这时，叶定国再次背叛杨持平，投靠张贞，被任命为自治军团长，随军攻打驻泉州的北军张毅部队。叶定国将团部设在同安城内，权势炙手可热，连同安县长林学增（张贞的乡亲）也不敢惹他，任其胡作非为。不久，叶定国又将女儿嫁给许兆京的儿子为妻，许兆京是同安商会会长，后为代理县长。官匪联姻，叶定国更是有恃无恐。同安民众莫不称其为土皇帝、活魔王。

1922年，驻厦门的北洋军阀臧致平派兵攻打叶定国。叶败退至长泰。正逢粤军东路军司令黄大伟由云霄、漳浦、诏安途经漳州到达同安。经张贞拉线，叶定国转而投靠黄大伟，任独立旅旅长，驻军于同安附近的隘头、鸡母曲至东山一带。同年8月，建国军二十四混成旅杨化昭，北军王献臣、杜起云、曹离顺等各路大军云集同安，各派系军阀杂处，互相倾轧。不久，粤军黄大伟奉调回粤，叶定国无所依靠，便率部退回老巢莲花山。

1923年—1924年间，孙传芳率军入闽，派张毅所掌北军及周荫仁全师南下漳泉，与建国军杨化昭等在同安激战，为时甚久。双

北军阀北暗驰及叶定国。叶竟能率残兵败将，安然以旅长头衔盘踞在莲花山及长泰一带，继续当他的山大王。

兵败湖洋　东山再起

1926年，北军张毅率部讲攻叶定国。叶所部第一团叶定胜（叶定国胞弟）退守同安，第二团在长泰的林墩、江都被缴投降。叶定国残存一团。同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何应钦率领东路军入闽。驻守福建的北洋军阀见大势已去，纷纷倒戈，土崩瓦解。泉州、永春等各县民军首领见局势变化，纷纷投靠国民革命军，请求受编者达20个部队，约2万多人。同安的叶定国也向漳州绥靖公署请编。当国民革命军104师师长张贞所部行军经过同安，叶定国部队即随军北上，东路军进军福州，很快控制全闽。福建新编军军长谭曙卿命令全省各路民军开到福州受编。叶部被编为第二混成旅，叶定国任旅长。随后叶部受命开往莆田驻防受训。

叶部开到莆田后，纵兵扰民，军纪极坏，百姓怨恨。驻涵江的海军陆战队准备伺机将叶部围歼缴械。叶定国得讯后，急忙退走仙游，但在枫亭濑溪桥遭到海军陆战队和民众包围截击，伤亡大半。叶率余部狼狈退到永春县湖洋，又遭到[illegible]民团刘子宽部的伏击，几乎全旅瓦解。叶仓忙带领残兵[illegible]退回同安、长泰。

叶定国虽兵败湖洋，但因其部属叶文龙早就预先抽调一营兵力回守长泰岩溪，所以还保存了一部分实力。该营配备良好枪械300多枝，兵力雄厚。叶定国借助叶文龙势力，征兵派款，扩充实力。逼迫各乡各征兵5名，枪5枝（每枝80元），子弹500发（每百发10元），兵饷每月10元。叶定国继又在莲花山建枪械厂，制造"土汉阳枪"，每枝售价80银元。因为叶定国疯狂地招兵买马，很快就东山再起。

1931年，叶定国因年老交卸兵权，由其亲信叶文龙继承。

1938年春，叶定国病死。同安村民闻讯，无不拍手称快。由于他一生作恶多端，村民难解心头愤恨，纷纷传说叶定国是在病榻上被雷击毙，尸体被烧焦了半截。这一传说，反映了叶定国民愤之深。

叶定国为匪20多年，罪恶累累，以下仅列举数例：

开设赌场，占田霸业。叶定胜受其兄叶定国之命，在莲花开设“花会”。同安不少赌徒弄得倾家荡产。叶还在同安开设大赌场，设“十二支”、“天九牌”、“铜辇宝”、“八面仔”等各类赌具，还请京剧戏班演出以招引赌客。叶还设“花捐局”，抽收嫖税；设“同通号公膏公司”，专门推销叶匪自制的鸦片烟“铜盒膏”。同安不少青壮年被引上邪路，沉溺于烟、赌、嫖，精神麻木，形如废人。

叶定胜还仗势强行霸占杂姓云浦、后洋、溪墘等乡数十亩田地。在溪墘乡占地盖店数间，开设“合茂”大商店，任意抬价杀价、鱼肉百姓。叶定国之子叶金沙在莲花新店霸占田地，盖起10多座楼店，称“新店街”，经营各类商品，垄断食盐买卖，还在长沙乡占地数十亩，种植水果和农作物，称“长沙果场”，从中获取高利。

滥杀粮差，草菅人命。1922年8月，因为黄大伟奉调回粤，叶定国一时失势，退回莲花山老巢。当时杨化昭控制下的县府库房派出粮差18人，到莲花山征收旧欠税粮（以往同安官府因畏惧叶定国势力，多年不敢到莲花山征粮征税）。叶定国大怒，即带领匪徒数十人，夜袭收粮队。将所俘粮差17人押到逝柏桥，集体枪杀，埋在山边埔里。其中一个粮差因该夜到亲戚家住宿，幸免于难。

叶定国和叶定胜两兄弟，一向奸滑多疑，滥杀无辜，甚至对部属也不例外。凡在叶部干事较长久，偶欲请假回乡探亲者，叶定国怕其泄露山寨秘密，往往先假装批准，还假惺惺发给盘缠，然

后由亲信护兵在途中加以暗杀。叶定国手下有个名叫李剑生的，也因请假回家途中被害。所幸非致命伤，深夜逃出，才使叶匪阴谋暴露。可见叶定国之残无人性。

封山占水　巧取豪夺

1924年，叶定国利用权势，在莲花山一带封山占水。他命令手下将山上任意砍伐的木料，沿溪水放逐，任何人也不能动用。后浦村有一村民，在溪边拾取几根柴梢当柴火用，恰被叶部匪徒发现。叶定国知该村民贫穷至极，无油水可榨，但又不甘心，便心生一计，逼该村一位华侨负责赔偿损失。该华侨无缘无故被强行勒索赔偿所谓“造桥费”3000元，罚现款4000元左右。叶匪就是这样蛮横无理地敲诈吮吸民脂民膏。

强夺古玩，搜刮民财。1925年，莲花山张厝村华侨叶清成从南洋回来，带来祖传古玩水晶佛像一尊。这尊佛像雕刻精致，乃稀世珍品。叶定国闻之，便想占为己有，于是派人向叶清成“借玩”。物主知叶定国居心不良，便逃往厦门躲避。叶定国大怒，纵弟叶定胜带队拘捕叶清成亲属15人，投入私牢，并扬言如不献出佛像，就将所捕之人全部枪毙。物主畏惧，不得不忍痛割爱，献出佛像以赎回亲人。亲属出狱时已被监死1人，其余14人还被强行勒索700银元。

江菱菱整理

（福建省厦门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叶文龙的军匪生涯

蔡维祺

叶文龙，这个曾经称雄闽南，独霸长泰，残酷统治长泰人民达14年之久（1926—1940年）的土皇帝，已经覆灭半个世纪了。但流逝的岁月，抹不掉人们记忆中的斑斑血迹和点点泪痕。

一、童年时代

叶匪文龙，字起文，别号振凤。1899年出生于长泰岩溪镇唐社顶井兜村。一家五口，务农为生。其父早亡，母改嫁于戴墘。兄弟二人，赖祖母抚养，生活日趋贫困。

叶文龙自幼不爱劳动，浪荡不羁，而又习猾成性。曾为同村设赌为业的地痞叶佬挑赌担，赶圩赶场混饭吃，由是沾染恶习更深。也曾在村里的子弟戏班中充当丑角，博取哄笑。不务正业，游荡四方。

二、匪军生涯

叶文龙18岁时投在同安匪首叶定国部当马弁仆役，继充号兵，当叶定国部受粤军陈炯明整编时，叶文龙以平素较为机警灵活得宠于连长叶振南，未几提升排长，与叶振南结拜兄弟，改名振凤。辛亥革命后，福建处于军阀混战状态。1919年，驻漳民军

司令林祖密、林者仁收编叶定国部为支队，驻防长泰。1921年叶定国势力扩展至安溪、同安，招收3县散匪莠民，收捐派款，征粮摊枪，人枪发展至1000多，改为独立第二旅。叶文龙隶属一团一营一连。叶乃亡命之徒，在征战中凶悍敢拚，多次取胜，获叶定国赏识。连长叶振南患病，委叶文龙代理连长职务。1923年叶振南升营长，叶文龙擢为连长，不久叶振南病死，叶文龙被提升营长。其提升之速，在叶定国所部匪目中殊不多见。

1924年北洋军阀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张毅所部分防龙溪、长泰、海澄、南靖、平和、漳浦各县，巧立苛捐什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长泰人民受害最大者莫如勒令农民遍种鸦片，从中课收重税，按面积计，有烟苗捐；按人丁计，有锄头捐（一丁算一锄头）。并派兵坐镇岩溪、枋洋一带催收，违者逮捕罚款。1925年张毅派营长张正荣驻枋洋，扎营于赤岭庵（今枋洋汽车站）。叶定国部分兵三路，夜袭张营（俗称“打北仔兵”），张正荣败退岩溪，其本人在大安被击毙。一部分北兵在赤岭寨据守顽抗，终因弹尽援绝，被叶文龙部全歼。据传说叶文龙士兵王大婴在此次战役中，曾用锄头砸死北兵10多名。王大婴残忍嗜杀，从此名震叶部，群众视若蛇蝎。以后被叶文龙宠任“乌兵队”（便衣队）队长，长期替叶文龙搜集情报，欺诈勒索，充当逮捕、暗杀人民的刽子手。当时民间传说，凡王大婴行踪所至，小儿闻其名不敢啼哭，家犬见其影不敢吠，足见其人穷凶极恶达于极点。（王大婴土改时被镇压）。

1926年张毅进剿叶定国，叶所部第一团叶定胜（叶定国胞弟）退守同安，第二团陈林荣在林墩、江都被围缴枪投降。叶定国兵力号称一旅，至此残存一团。同年北伐军东路军入闽，闽民革命军独立四师张贞会合闽南各部民军协攻张毅，叶定国出兵莆田，兵败涵江。张毅被擒后，叶部退守同安、长泰、叶文龙提升团长，自称“新团”，驻扎岩溪珪塘。1929年张贞所部副团长陈林

荣（原叶定国团长，被张毅缴枪后投靠张贞）为与叶文龙争夺长泰统治权，（陈亦长泰岩溪霞美村人），出兵袭击叶文龙于岩溪圩。叶文龙受围于三楼，幸得其妾徐爱仙急中生智，向楼下倾倒大量白银，陈团士兵争相夺取白银，叶文龙始得沿屋顶逃脱。

1931 年叶定国因已衰老交卸兵权，由叶文龙继承，接受张贞整编，仍任团长。1932 年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攻取漳州，全歼张贞所部，叶文龙龟缩长泰，得以保存实力。不久十九路军入闽，师长陈策复收编叶文龙为一个团。1932 年 11 月 20 日，十九路军将领反对蒋介石残民媚外，丧权辱国，在漳州宣告福建独立，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改用公历纪年，尽撤国民党的党政机构，通电声讨蒋介石。12 月蒋介石令蒋鼎文率领大军分兵三路入闽围攻，配合空军以飞机轰炸漳州，十九路军败散。叶文龙见时局急转，乃缩小编制，伺机而动。1937 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福建地处沿海，金门、厦门相继沦陷，漳州吃紧。福建省主席陈仪恐叶文龙叛变通敌，为安抚叶匪部，乃收编为驻闽绥靖公署警备团，准其防守长泰。而叶文龙鉴于过去屡次受编、屡次被剿的教训，为保存一部分实力，仅用 6 个连接受点编。当时编制的配置有：秘书陈鉴修，军需长陈德茂，军需员少衡，一连陈孝思，二连叶肇基，三连林天良，四连高云龙，五连林森鸾，六连叶洞庭。各连分别驻扎县城、岩溪、珪塘、枋洋、林墩。从而控制全县，成为“叶家天下”。

三、叶文龙统治长泰 14 年的斑斑血迹

自 1926 年叶文龙握有兵权开始，至 1940 年被消灭止，前后三次受编于张贞、十九路军、张仪部，从未离开长泰，实际统治长泰达 14 年之久。叶在其统治期间，披着“建设长泰，造福人民”的虚伪外衣，挂羊头卖狗肉，干着搜括民膏，残杀人民的罪

恶勾当。过着金屋藏娇、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兹略举其残暴罪行如下：

(1) 叶文龙自接过叶定国衣钵后，首先抓兵扩军，充实力量。初成立新团时，即在长泰叶、杨、戴三大姓中征集3个基本连，连长从三姓封建氏族头子中选任，士兵由三姓壮丁抽征，枪支由三族联防队收缴。凡青壮年被其看中者，均须应编入匪部，虽孤丁独子，亦不能幸免。其余小宗小姓，或派一排一班，同样抽征。如枋洋蔡姓抽征一排，排长由蔡大确充任，班长以蔡维聪充任，全排士兵皆蔡姓青壮年。一时各乡惶惶，怨声载道。枪支补充来源，除派人向厦门、台湾浪人购买外，一度在林墩上林祖厝设造枪厂，制造步枪、土卜壳、土曲七枪。十九路军在漳州瓦解时，又乘机买进一大批散落民间的较好枪支和子弹。

叶文龙部编制最多时达12个连，但为防患拥兵割据，不设置营长，各连的调动指挥大权，概归叶文龙独揽，足见叶文龙用心诡谲。

(2) 叶文龙凭其权势，在原珪塘霞美林霸占田地，大兴土木，征派民工，构筑豪华宏大的房屋三幢，名曰“霞美堂”，以作金屋藏娇之用。经常大演赌戏，乘机征收赌捐，挑选戏旦为妾。当时遍请上海、福州有名京班，泉州高甲戏，石码程溪子弟班，在岩溪、枋洋、林墩演唱，一连数月，开设各种赌摊，许多人因此倾家荡产。而叶文龙不但抽取巨额赌捐，而且凡戏班中稍有姿色，演技较佳的女角，皆被叶文龙奸宿。中意者则被强纳为妾，叶文龙10个妻妾便有4个是群芳班、正吉班女角。其所热衷于演戏，闻尚有一动机，可借戏班搬运行李之便，从外地私购枪支暗藏于戏箱中偷运入泰，避免外县军警检查。演戏之举，一箭三雕，可见叶文龙既狡且诈。

在“霞美堂”落成大庆中，出现一个有趣的闹剧：大厦完工之日，叶文龙大摆酒宴，邀请全县官员、地方缙绅、各乡族长，以

及邻县显贵，举行盛大庆典（欲称“入火”），各方贺客盈门。贺客中有人以“霞美”两字撰联致贺，上联是“霞锦制成衣，温暖在官民怒目”，下联是“美纶彰大厦，劳民动众我灰心”。揭开叶文龙画皮，发泄长泰人民忿恨心情。讽刺功力，真是入木三分。

(3) 叶文龙为树立个人统治长泰的绝对权威，手段无比毒辣。借惩治盗窃，维护封建礼教，任意残害长泰人民，杀戮之惨，骇人听闻。例如城关镇马洋村有4个农民，深夜挖了朋友的几个芋头煮食，此原是民间常事，但叶文龙却强加盗窃罪名，令王大婴将4个无辜农民就地斩首示众。另城关市场某屠户丢失一刀一秤，原因是两个吸食鸦片者发烟瘾偷到京元村向张某换得二钱重烟膏，这两个偷刀小盗亦被砍首，首级挂在市场示众，张某则被罚银800元。1932年红军入泰，杨姑呆等3人替红军带路，均被抓到岩溪枪杀。由此可见叶文龙的立场极为反动。

对于民间通奸案件，一律处死。处死方法更为残忍。例如叶文龙的连长林某之妾与其护兵通奸，男的身捆石条，投入深潭。又如林墩石横村有一个王姓妇女因通奸被用布袋藏石灰粉套上，活活闷死。叶文龙这种借题发挥，“杀鸡教猴”的罪恶手段，造成长泰一派恐怖气氛，从而稳定个人独霸长泰的统治秩序。其实叶文龙自己妻妾成群，尚且任意奸污民间妇女，横征暴敛，迫使多少无辜百姓家破人亡。说什么“维护治安”，“尊重礼教”，实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代暴君，无不如此，叶文龙的倒行逆施也无例外。

(4) 叶文龙政治上贯用笼络利用手法，博取名利双收。对于地方上各派士绅，各村族长，各地恶霸，各角落封建头子，或延聘为幕僚，或招待如贵宾，互相勾结，以为羽翼，如用叶愚青（又名仰侨，历任长泰国民党执委、监委）联络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常委陈联芬；用长泰商会长杨植三、武安镇长王郑琳，勾结中统福建省特务头子林鸣冈，求得国民党当权者的庇护。另派长泰教

育局长叶思恭任交际，重金贿赂伪福建省保安处长叶诚、参谋长赵南，私通款曲，倚为靠山。对长泰旅外达官贵人，如曾任师管区司令、国民党军军风纪视察团中将副主委的陈林荣，曾任国民党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的连英豪，无不厚礼相赠，并优惠其在泰的家属亲戚。

(5) 叶文龙为支付巨额军饷与个人挥霍，在长泰大肆搜刮民膏。其主要财源：征收苛捐杂税，设什捐总局于林墩。罗溪、枋洋、山重、马洋、金锂各设分局关卡。征收各项农副产品及进境商品税，市场捐、牲畜捐，名目繁多。凡政府有税，他就有捐，农民商贾买卖，“一牛两皮”，叫苦连天。

实行专买专卖。凡人民必需生活用品，如食盐设有盐馆，城关、岩溪、枋洋、林墩都设专管机构，任意抬高盐价。迷信品类的香、烛、冥纸，亦包商专卖。最大收入是鸦片专卖，强迫农民广种鸦片，所获烟膏概由他独家低价收购，另设“一七四”鸦片局于林墩大路口楼，由其妻弟林森鸢兼局长，制造两种盒装烟膏销售长泰、同安、安溪3县。凡私买私卖者，轻则倾家荡产，重则拘禁枪毙。负责查缉之王大婴等便衣人员，更是丧尽天良，常在富裕农家，栽赃敲诈，随意勒索，不少人为此卖儿鬻女，家破人亡。

叶文龙还向反动政府承包田赋，在城关设粮总局，委戴瑞祥任粮总，然后转包给各乡保地痞。置粮差多人，专事催收，除少数缴政府外，大多数贿税，尽为叶文龙私饱。

(6) 在改良市政、开辟公路、兴建学校的幌子下，叶文龙从中捞取了大量资财。而这些有限的建设项目，在当时也只是为叶文龙少数人服务的。如1928—1929年先后在县城、岩溪、枋洋、林墩4市镇拆街道，名为建市场，实为其设立妓院、开设赌场之便利。市场建成之日，妓院赌馆林立，社会乌烟瘴气，坑害了不少人，而叶文龙不仅可以从中渔利，尚可在上述各市镇建置楼房，

充其治游“行宫”。泰浦、泰岩公路虽通，汽车公司仅有两辆破车，时通时停。而叶文龙却自置二辆小轿车，送往迎来。群众胼手胝足筑成的公路，竟为叶文龙一人所专用。

叶文龙视教育事业为沽名钓誉、借机敛财的捷径。例如他所倡建的枋洋、林墩、岩溪、陡塘、树农等5座校舍，经济来源都是从征收苛捐什税和私人罚款（所谓“倾家”）中提取。九牛仅拔一毛，却博得“热心教育”的美誉。名利双收，何乐不为？至若重金礼聘外地一些较优的教师，补充各校一些图书仪器设备，倡组“长泰教育参观团”远赴江浙、京沪参观小学教育，编印《参观报告》遍发省内外等措施，均无非为叶文龙的“治绩”涂脂抹粉，大做广告。当时外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士，曾受蒙骗而对叶交口赞誉。

叶文龙“热心办学”的居心所在，除沽名钓誉之外，还有其培养羽翼巩固统治的狡猾目的。叶文龙曾资助数十名青年学生到福、厦、漳等地升学，其中以叶姓族亲最多。这些人毕业回县后，大多被叶文龙收为羽翼，倚为心腹。有的安插到各校任校长、教导之职，有的担任乡长、保长，更有的保送国民党军官训练班受训，派充叶部排长，直接或间接充当叶文龙统治长泰人民的得力工具。林墩小学有一届高小毕业生，全部被叶文龙派充所部各连的正副班长。

叶文龙之所以能够称雄闽南、独霸长泰达14年之久者，除挥舞屠刀，杀人如麻，以逞其凶残之外，更有其“热心建设”、“致力办学”博得谋士众多，朝廷有人，豪绅相助，真是古往今来多少封建暴君、乱世奸雄，树“威”立“德”，“刚柔并济”的诀窍，都被叶文龙继承下来了。

四、最后下场

（1）被剿原因：抗日战争爆发，福建地处海防前线，长泰靠近厦门，形势紧张。当时国民党疑虑叶文龙为敌利用，予以收编。但叶文龙别有用心，公然违抗国民党征兵法令，将适龄应征壮丁全部补充入自己部队，外送兵额尽用病残顶替。因而触怒福建省主席陈仪，此为被剿原因之一。

1938年厦门沦陷后，日本驻厦特务机关不时派遣汉奸敌谍潜入内地，妄想窥犯漳州。叶文龙过去与厦门台湾浪人有所勾结，据闻日本特务人员曾利用台湾浪人潜进林墩，策动叶文龙作内应。事被福建省政府获悉，引起省主席戒惧，此其被剿原因之二。

另当时在同安县之叶金太（即叶老三，叶定国之第三子），在漳州的陈林荣，和坂里叶杨瑜等平时都是叶文龙的宿敌，明争暗斗，此时矛盾激化无不推波助澜，欲置叶文龙于死地而后快。此为促使叶文龙被剿的原因之三。

（2）围剿经过：1940年驻防漳州的国民党军七十五师奉福建省主席令，彻底肃清长泰叶文龙部。据当时七十五师“剿匪作战计划”部署，全师除留直属部队防守前哨外，3个作战团和1个后备团均投入清剿。另外还加调各县自卫保安部队配合进剿。龙溪由社训教官张志鸿率4个中队，同安由自卫总队长叶金太率3个中队，华安由军事科长叶杨瑜带2个中队，坂里林冠禄1个中队，海澄3个中队，统归师长韩文英、副师长范子时、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萨君豫指挥，指挥部设在长泰城关叶思恭家楼上。

5月23日晨，各县卫队包围长泰县境，封锁莲花、罗岩、浦南、良冈、郭坑、马洋各处通道。七十五师主力焦克功团直捣枋洋，后备团副团长仝时修所部进占林墩，金×团搜索科山、演柄，水团长一团控制岩溪、高濑、西湖各乡。全县军队密集，商贾不

通。顿时物价飞涨，火柴每盒由2分猛升至1角。保安队兵和国民党兵军纪败坏，抢掠奸淫，宰鸡杀猪，人民遭殃不浅，真是军匪同类。

叶文龙见大兵压境，众寡难敌，命各连官兵遣散，枪支子弹集中埋藏于丹岑、内枋、青阳、径仑、田头、西湖各乡。叶文龙只带护兵吴宗、叶春福二人，流窜于岩溪坡圳头、文坑一带山林，白天化装为农民，避人耳目。经过20天的搜索没有收效，剿匪部队因而改变计划，在群众中宣传“自新优待”办法。最初叶文龙第三连连长林天良自新，向驻林墩副团长仝时修献出叶文龙寄存钞票40万元，白银10万元，以及该连枪支子弹等，获得师长韩文英厚礼相待。委林天良任少校附员，随剿匪军工作。次日林包国（叶文龙亲信），林艺文（连长）同时出降，林包国在西溪庵社掘出叶文龙埋藏白银三大缸（一缸毫币，两缸光洋），林艺文得委任上尉附员，林包国得奖金1000元。从此，叶部连长叶肇基、叶洞庭相约自新投诚，林森鸾在吴田山被击毙，排长蔡大确献出存于鼓鸣山上的驳壳枪20余枝、白银8万元。至此叶文龙的武装骨干和多年搜括贮积的武器财物俱失。

叶文龙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不得已着林国明（林墩美宫小学教员）奔走接洽自首，经多次商谈，叶文龙终于6月23日在岩溪附近的文坑投案自新。自新当晚解送漳州，随后押往福州监禁。至1940年底转到南平监狱，当时在叶文龙身边有其妾筱春来、护兵吴宗、属员詹详审等人。不久因日本骚扰福州，国民党为根除祸患，乃于1941年3月13日上午将叶文龙枪决于南平。根据当时目击叶文龙受刑之詹详审说：是日凌晨叶文龙起床后，南平雾雨，天气寒冷。初有一警卫士兵入见叶文龙，嘱其将衣服穿好，未多时就有几个省保安士兵入内，将叶文龙捆绑。在捆绑中叶文龙曾倒在地上挣扎，并号啕叫哭，摔破玻璃数片。叶文龙死后，遗下6妻11子，曾经煊赫10多年之罪魁匪首至此结束。

叶文龙一生吸吮长泰人民膏血，积聚的财物武器，据从当时负责剿匪善后事务的七十五师副团长仝时修处得悉，总计缴获鸦片烟（四川云南大饼）50担，料膏十数缸，长短枪1300多枝，俄造重机枪1挺，钞票40万元，银元毫币100余担（每担约1000元），各式子弹200多箱。这些庞大财物绝大部分被国民党清剿部队的大小官员吞没。在剿匪中，蒋军官兵洗劫市井村庄奸淫妇女，与匪无异。叶匪蒋军，同是人民公敌。

（福建省漳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彭棠的土匪、军官、恶霸生涯

彭田华

一

彭棠，晋北山顶乡外塔村人（今泉州市罗溪乡苏山村），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没有念过书。10多岁父死，帮人烧瓦为生。后见乡人彭得时、彭南清等人，都是当上匪做了连长，威风凛凛，便抛弃烧瓦业，也和同乡彭信、彭尊等为匪，投入马甲杜信忠股，从事绑劫生涯。不久积有匪本，便购置10多杆枪，自树一帜。后与双髻山的蓝荣合伙，打家劫舍，再转到本乡东祺，招兵买马，拥有人枪100左右，被林安国部收编为连长。后随林安国归附于海军陆战队林寿国，彭棠连被林寿国缩编为一个排，降为排长。彭棠心存不满，于是乘林寿国令其随往永春攻打王恩时，稍为接触就故意让王恩部包围缴械。王恩予以释放，并给予枪支，令其回乡重整旗鼓，听候收编。彭棠回后潜伏于晋江、仙游交界处活动，被林寿国侦知，派队进剿。攻入山顶乡时，乡民惨遭牵连，被杀多人，有11人被掳，房屋被焚6座，另有1人被关在狱，财物被劫的难以数计，逃走他乡的有3000多人，田园荒芜，几无人烟，这是彭棠首次贻祸乡里。后由仙游龙花天主教神父朱某出面调解，由乡中以1万多元向林寿国赎回被掳去的人，林部才撤出山顶乡。那神父也就藉此进入该乡设天主堂，引诱乡民入教。后彭棠迁怒

于该神父，于某夜间把他绑架到深山中勒赎，乡民又筹集1000银元给彭棠，才把那神父放回。

二

彭棠得款后，复添购枪械，重组人马，于1922年间，投入南安九都杨安邦部（杨安邦本姓陈，为陈国辉族人，陈维金的父亲）为连长。后杨安邦不干了，把他介绍给陈国辉，陈闻其勇敢善战，即编为卫队连长。时陈任东路讨贼军第五独立旅旅长，驻在诗山、洪濑一带。彭以后随陈国辉开到泉州与孔昭同激战，因寡不敌众，随陈国辉退往南安八都一带，仍继续活动，也曾与高为国拉批在一起。后经陈国辉派其进攻驻在永春桥头铺的德化民军徐箴基部。彭得胜而归，缴获枪械财物，为数不少。

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入闽北伐，陈国辉部被编入新编军。陈任独立第一团团长，彭任连长，彭棠随陈国辉往福州追击北军张毅部。张部被消灭后，彭棠连奉令回驻南安诗山，并升任陈部的补充第二营营长。因与林寿国有宿怨，一到诗山，即往永春，缴获林部2个连的枪支，以充实力量。陈国辉即改派彭为第四营营长，又增拨100枝步枪为奖品，彭棠的力量壮大了。

时林寿国以彭棠或可再为己用，就连写四封信，表示修好，并答应如能合作，要委派彭当个团长，但彭却把信献给陈国辉。陈国辉大为嘉许，更加信任。

三

1927年秋，八·一起义部队南下潮汕。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调陈国辉团开赴闽西防堵，分驻龙岩、漳平、宁洋3县。彭棠营也由南安开往龙岩，驻永福里。但陈国辉部下多南永德一带

土匪，到闽西后不少人藉口溜回本乡，彭棠也带着一班亲信，溜回诗山。

1927年冬，陈铭枢的十一军入闽，在福州把新编军缴械遣散。陈国辉部因在闽西，得未波及，但感到自己名位不正了，因派人向代省主席方声涛表示效忠，请求另给名义。方声涛即委任陈为"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陈为加强实力，就再召彭棠等回闽西归队，任彭第一补充营营长，驻守龙门白土一带。

1929年，广东陈济棠发动反蒋，其部将徐景唐驻守潮汕。陈国辉奉令率部五营，协同新编第一师张贞部进攻潮汕，以牵制陈济棠。陈国辉既把主力开往潮汕，后方空虚。5月下旬红四军进攻龙岩，先取龙门，彭棠败走龙岩城。红军攻入龙岩城，彭棠率残部急从东门退出。逃跑时在东门外长达200余公尺的独板桥上，拥挤争先，士兵坠入桥下死者10余人。时追兵已迫，彭妻陈碧霞吓得不能走动。在生死关头，彭棠丢掉队伍不管，背负着老婆争跑。事后，连长陈维金曾当面讽刺他："啊！听说彭营长曾身负一旅（女）安全退却，英雄！英雄！"彭逃出后，把残部撤往永福，该营官兵伤亡30多名，枪械丢失四五十杆。至于旅部的文件、械弹、被服、粮食及白银、纸币5万余元则悉数丢在城内，没有运出。到第五天，红军退出龙岩城。彭棠和李忠于第六天，才收集了300多败兵，战战惊惊地奔回龙岩城来。过了几天，岩城又处在持梭镖土枪的农民武装包围之中，他们打打停停，出没无常，弄得彭棠残部精疲力竭。这些农民武装，先后被彭棠抓去三四十人，全被杀害。

彭棠屠杀的血迹未干，红四军第二次进占龙岩。彭棠见势不妙，带一连人照上次退路往龙岩洞逃走，半途受到埋伏的农民武装截击，突围后再逃往永福里。红四军二度进占龙岩后数日，陈国辉急率主力自粤返闽。红军以灵活战术诱惑和麻痹陈国辉，当陈部准备进攻龙岩城时，红军早已转移。陈国辉趾高气扬，进入

城内，大举祝捷，麻痹人意。没有几天，红军又突然进袭龙岩，战斗不到一小时，陈部主力被全歼，红军三度入龙岩。彭棠营因退往永福得以幸存。陈国辉后得逃脱，至永福里找彭棠，残部即由永福里开往同安集中。不久省政府以"剿共不力，擅离防地"的罪名，取消陈部省防军第一混成旅的番号，并下令通缉陈国辉。许卓然拟乘机消灭陈部，连络张贞及教导团，计划进攻同安。因张贞与陈国辉的关系还是藕断丝连，犹豫未决。事为陈国辉所闻，即率残部回南安八都等老巢，纠集残部，重整旗鼓。值杨树庄因事离职，方声涛代省主席，为捞取个人实力，遂再下令取消通缉，恢复陈国辉混成旅名义，准其驻防安、南、永、德各县，彭棠镇守永春。

四

时八都有个叫青盲西的，自称有神附身，枪炮不入，要替天行道，拯救众生。当时老百姓深受土匪、民军、地主恶霸的榨取压迫，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苦无生路，听说出了"救世主"，无知之民纷纷响应。青盲西便组织大刀会，盘据八都山，集众近千人，人各带大刀一把，树起杏黄旗，自称"皇帝"。他以法术欺骗会众，宣称只要头缠红布，身背红带，身上贴了神符，枪弹就打不进；把"盐米"撒向对方，枪就放不响，凡缴获枪支一概毁掉不存。青盲西大刀会的声势，日盛一日。陈国辉感到受了威胁，就派李祖仪营进入八都山剿办。这些所谓民军士兵，也多是无知之徒，自身就有浓厚迷信思想，听到青盲西的迷信宣传，早就心虚，他们一见大刀会众挥舞大刀，喊声震动山谷，斗志已丧，开枪时手先打颤，哪能打中，一交锋便被打得落花流水，纷纷逃散，丢下枪械，都被会众抢去，当场毁掉。陈国辉再派吴晋源营进剿，仍是一败涂地，被杀数十人。最后派彭棠前去围剿，彭棠鉴于前两次的失

败，就采取以迷信方式破迷信的办法。他让人杀了一头黑狗，命令士兵先把子弹尖沾上狗血，再排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阵势。36 人走在前列，72 人随后跟着，一队一队地前进，好象很神秘的样子。到达前线展开阵势，大吹军号，既壮了本队士兵的气，也涣散了对方会众的心，于是一面开枪一面喊话。由于士兵气壮了，打枪就比较准确，把自以为枪炮不入的人打死了一些，乱了对方的阵脚；另一方面，那些大刀会众，有不少是彭棠的乡亲旧部，听到喊话也动摇了，有临阵脱逃的。声势汹汹的大刀会，结果被彭棠打垮，纷纷作鸟兽散，“皇帝”作了阶下囚。彭棠回永春向陈国辉报捷，大受嘉奖。

五

1930 年 2 月间，陈国辉占领永春、德化后，为扩张势力，企图吃掉以刘子宽、黄高辉等为首的民团，曾多次派人前去接洽，要予收编，均遭拒绝，同年 8 月 21 日，便派彭棠会同陈育才、李雄、吴普源等部向湖洋进犯。彭棠由内外八坑进兵，28 日攻入湖洋。该乡为著名侨乡、人口众多。彭部一进村，即疯狂烧杀掳掠，焚房屋百余座，商店数十间，家禽耕畜被杀殆尽，家具财物荡然无存，据估计，损失达千余万元。尚有被掳去而后勒索赎款者有百多人，甚至把少女孩童拿到他乡出卖。乡民数千扶老携幼，逃亡他乡。后迫于海外华侨向国民党政府函电控诉，才不得不撤出部队，外逃乡民乃得陆续回家。

时因闽省政变，卢兴邦绑架省政府厅局长多人。方声涛为依靠陈国辉部夹击卢兴邦，在彭棠撤出湖洋之后，把他升为陈旅第三团团长。讨卢军事稍定，陈国辉又派彭棠返驻湖洋，使惊魂未定的湖洋人又复出逃他乡。彭棠以无人可掳，复放火焚烧前次未及烧毁的房屋。避往德化霞山，仙游苦竹、涂坡、尾洋、尖山、双

塔等地的湖洋难民，以及收容难民的当地居民，还不断受到彭部的骚扰劫掠，颠沛流离，有家难归。当时驻扎湖洋的为彭棠部第一营营长彭灶，他和笔者熟悉，笔者有个在福州同学同班的湖洋人刘鸣声，暑假想到家乡一探情况，而不敢前往，特邀笔者陪他同去湖洋找彭灶，请求他刀下留情，稍加照顾。笔者因而得目睹湖洋惨景，不禁慨然！

六

闽变前夕，逃往香港的前陈国辉参谋长洪文德，谋卷土重来。他在港密与十九路军接洽，受任为“闽南讨逆军第一路指挥官”，拟返泉纠集陈国辉旧部，与十九路军合作。当探知十九路军入乡剿办彭棠，彭灶与彭棠发生对立的经过，就来函约我去香港面晤。我去港晤洪，他要我设法劝彭棠、彭灶言归于好，重新合作，听候整编，有什么责任由他承担。我为了乡里的事，也希望他二人合作，免得乡亲再受牵累。于是回乡多方向二人劝说，他二人也终于释嫌，再度携手。洪文德受命回闽，在永春设立指挥部，招集旧部整编，成立3个支队，彭棠被任为第二支队长（第一支队陈佩玉，第三支队陈育才），均为少将级衔。支队下辖3个总队，1个特务连，每支队约有人枪1000左右，分驻安、南、永一带。彭棠初驻永春，后调驻南安的诗山、金淘、溪尾等地，威风重展。同时十九路军为使这些收编部队能够改头换面，也派翁照垣南下，以剿匪司令名义坐镇泉永，监督整训。在泉州设军官训练班，召集洪文德支队的连排干部和一些知识青年参加受训。

彭棠与彭灶合作，我是搭桥人。为使他们走上正轨，曾到诗山劝告他们，不要单靠枪杆，也要做些宣传工作，取得民众的同情。彭棠听了有点领悟，便召集干部讨论怎样去做。但那些人都说没有经验，搞不来，要我代为一写。我就代写告民众书一种，印发给群众和

报社，当时《群力报》给登出来了，标题为《彭棠发表告民众书》。彭棠知道后大为喜悦，要我担任他的团副，我谢绝了。

1933年7月，十九路军发动闽变，仅3个月而告失败。十九路军失败后，洪文德看风驶帆，先溜走香港，后受蒋军利用，所属各支队枪口都转而对准十九路军。陈仪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后，把各支队改编为保安团，彭棠任保安第九团团长，驻于南安诗山、金淘、溪尾一带。他在防地设立各种捐局，如花捐（妓女捐）、赌捐、香猪捐、屠宰捐等，名色不少，敲髓吸血，民怨沸腾。彭棠改编后，一直不忘怀的是彭灶在十九路军入乡时，不经同意，擅自缴械自新，并带队入山围捕。就在彭棠的驻地诗山，把彭灶扣押起来，要予枪决。后由副团长将彭棠与彭灶矛盾的事告诉了泉州驻军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才得宋的庇护，把彭灶调来师部，送省处理，彭灶才免于死。从此更加深山顶乡两房的对立局面，直到解放后才得消除。

七

1940年间，彭棠部调往闽北古田一带驻守，不久被调升为省训练所副所长，省保安处副员，这是空职。彭棠也自知趣，申请归隐于厦门鼓浪屿。

1942年抗日期间，德化著匪张雄南与日寇勾结。由于彭棠对德化地形比较熟悉，省保安处长黄珍吾令他组队前往围剿。彭于是会同陈维金、施德成等部进入德化，进剿3个多月，张雄南中流弹身死，其妻出面接洽投降。张部团长张克武，营长张维芳、张成福3人被枪决，余部送往永春改编。

张雄南被歼灭不久，金、厦两地被日寇占领，泉州成立抗敌自卫指挥所，彭棠被任副司令。1945年，日寇投降，指挥所撤销，彭归山顶彭乡，退隐在家。

八

彭棠弃职回家以后，从昔日向外地剥削榨取转而着眼于自己乡里了，甚至对自己的族亲也胡作非为。乡人有些田地和他的田地毗邻，非折价归他不可，无人敢有异议或不顺从。他每年可收入千担左右的租谷，并将余谷放贷，成为乡里唯一的大地主。乡人要建筑新房，要向他巴结献金，不然就暗使邻人出面阻挡。乡中有人自植杉木，他便借用建筑校舍的名义，亲自带出喽罗任意四处砍伐，归为己有，无人敢拦阻。1929年，乡中曾倡设“虹山学校”，筹募基金3000元。后改为公立，这些私立的基金，彭便攫为己有。他还时常派出喽罗四出抢劫，而自己则坐地分赃，受害最多的是路过本乡出而经商的仙游人。被拦路劫杀、毁尸灭迹的，不知多少。1940年派款重修族谱，每丁收银元5元，并将收入的鸦片烟款悉数充用，但在族谱上却写修谱经费是彭棠所献，假公济私，名利双收。为了便于彭作威作福，渔肉闾里，所有乡中保甲长非由他的亲信担任不可。

彭棠放纵两个养子彭墉、彭担及其侄儿彭智四出抢劫，因屡次作案，被南安县政府捕获，送交他自己处理。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加上这3个儿侄都是买的，就假仁假义地把他们枪杀；因疑心他的护兵彭墉同他的三妾有暧昧行为，突在一天叫他伴随外出遂抽出短枪把彭墉击毙。

1947年间，彭棠带领几个护兵由南安诗山到泉州，应黄克绳之请，于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参加黄的宴会。宴毕，由后城出来，途经府学口“夫子泉”被埋伏枪杀，彭的护兵陈金发同时被击毙，当时这件事轰动了泉州城。

（福建省泉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汪柴水匪祸在惠安

郑国梁

汪柴水，又名汪汉民，惠安东门外后坊村人，是民国初年惠安四巨匪（汪连、汪柴水、杜建、李法）之一。而四巨匪中，汪柴水这股土匪对惠安的祸害尤烈，横行惠安前后达15年之久，当时惠安人民在这股土匪蹂躏下，过着极其悲惨的日子。今就当时亲身所见所闻，对汪柴水为匪罪祸种种，作一简要忆述。

投靠汪连

汪柴水曾先后肄业于惠安县立中学和厦门集美学校师范科。1918年，集美学校发生校潮，他即离开学校前往晋江安海投其老同乡汪连（时任闽南民军的连长）部下当文书。不久，随汪连到凤巢山（闽南民军的根据地，在晋江、南安、同安3县边界）。当时民军成分良莠不齐，兵匪合一，在凤巢山民军中有被号称“二十四杀”的凶汉，汪柴水就是其中的“一杀”。从此，汪柴水开始了亦官亦匪的生涯。

盘踞田船

后来，汪柴水回到惠安，便把惠西田船作为匪巢，进行土匪活动。为了充实党羽，扩张实力，他从邻近各村各征抽壮丁二至三名，在他匪部充当匪卒。在他田船老巢中，经常拥有匪卒400多人。他还巧立名目，向各村征收所谓“联络税”，按户抽收。下户

每年2元，上中户每年8元。当时惠西一带被迫跟他“联络”的计有大小600余村，这笔“联络税”是相当可观的。敲财的另一办法是操纵走贩私盐，对各村贩卖私盐的每担抽成2角。又勒限各村农民大种鸦片，鸦片收成后统统归他收购，然后制成“烟饼”，运往浙江温州等地出售，换取枪枝弹药。汪柴水敲勒得来的钱，全由他的心腹汪达卿经营。据说每日所收银元，数量难以计算，只在室内挖筑几个大银窖，用竹箩装银元倒入窖里，经常银元满窖。在他抽丁派款、破坏田园生产的情况下，惠西一带群众过着苦难深重的日子。

绑票勒赎

汪柴水的土匪活动经常是绑票勒赎（绑票的同时也抢劫财物）。被绑架的群众，匪徒称之为“鲎仔”（即肉票）。每个鲎仔少的要被勒索赎身银数百元，多的至数千元。当时汪柴水的匪爪伸向惠安各个角落，他的匪徒到处绑架群众，连老人、小孩也难幸免。村下王双法就是在八九岁时被绑去的。汪柴水还经常派出他的心腹号称“龙卫连”的连长率领匪徒在惠（安）枫（亭）洛（阳）公路上劫车绑架群众。城关人陈雪华、柯联定、张昆友及王孙村黄森等7人，就是在惠洛段公路上遭劫车被绑去的。有一次，汪柴水派他的爪牙乘汽车来包围城关门外奎巷，一下捕去成人、小孩20多人。汪柴水除自己派出匪徒绑架群众外，还向仙游等地散匪“收购鲎仔”，每个“鲎仔”估计可以勒索赎身银多少，按20%为收购价收进，然后转手勒索。又把在惠安抓到的小孩卖给外县以取财，拆散人家骨肉。在那土匪横行的日子里，虽然在白天，人们出城一二里，或到科山寺去，都要提心吊胆，恐为土匪绑架，连乘汽车也视为畏途。

汪柴水生性极其残忍，为了“保密”和加深“鲎仔”的恐怖心理，更为了逼使“鲎仔”的亲属尽快筹款赎回亲人，对“鲎

仔”施行种种残酷的刑罚。他把抓来的“鲎仔”用布条蒙住眼睛，用布块塞进口中，用蜡烛油灌进耳中，今天关禁在这个山头，明天又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往往连续好几个山头。他设有土牢、水牢，把“鲎仔”关禁在里面，严刑拷打。据村下王双法忆述，他被汪柴水抓去时，关在水牢里，匪徒问他要吃签（一种豆制扁平条状食品）或是要吃面（指面线），而土匪黑话中，吃签是“打”，吃面是“吊”，经过几天的折磨，赎回时他的四肢严重浮肿，连大人穿用的裤子也穿不进去。汪柴水夜夜打麻将，一时兴来，即令4名“鲎仔”头上各顶烛火，蹲在麻将桌四个角的旁边，给打麻将的匪徒照明，一直到天亮。他还制成几个大木桶，桶内放蛇，把“鲎仔”投入桶中，以致有的“鲎仔”被惊得神经失常，变成呆子。对于无法赎身的“鲎仔”，即被杀害，土匪称之为“撕票”。被刑打致死或被杀害的“鲎仔”，屡见不鲜，上述遭劫车被绑架的城关人张昆友，就被汪柴水杀害了。

“清党特派员”

汪柴水亦匪亦官，混迹于军阀派系中，由充当汪连的连部文书起家，先后当上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时人称汪连为“老团”，汪柴水为“新团”。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5月间，汪柴水自省城福州打着“拥蒋护党”的旗号，以“清党特派员”的头衔，率领匪卒，耀武扬威地进入惠安县城，驻扎于惠安县立竞新小学（今县教师进修学校校址）。一下马，就多方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同时又进行抢劫绑架。城关商户林振堂、张光明、绅士陈镜湖等都遭绑架。后来林振堂、陈镜湖各以白银5000元赎出，张光明以白银1000元赎出。汪柴水还利用当时商会会丁陈九昌为耳目，摸清各商户家底，挨户科派巨款，大肆横征暴敛。

"六六惨案"

1929年6月6日（农历四月二十九日），惠城驻防军调防，汪柴水获得汪连暗中送来情报，乘城关防务空虚，从田船倾巢出动，率匪徒300多人进入县城，大肆掳掠奸淫，布商益成号（益隆）、通源号（汪才）、晋发号（林情）、义记（黄来兴）等19家大商户遭洗劫，其他商户民宅一并波及。被绑去的商人有郑接、火司、郑日、陈添、王蛋等13人，后来各以千元至数千元的巨款赎出。在匪祸恐怖中，满城哭声，惨不忍闻。这是惠安有史以来的空前浩劫，后称"六六惨案"。至今惠城年老居民想起此事，还会心悸色变。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1932年，汪柴水在仙游县枫亭被陈国辉打败，逃回惠安田船，把枪支弹药埋藏地下，分存财物，遣散爪牙，随身收拾部分细软、银元，逃往福州，再转逃上海。在上海时，多方钻营，结识了当时上海警备司令吴铁城的小舅子，由吴的小舅子把他藏匿在吴的官邸里。但后被惠安旅沪同乡会跟踪发觉，于是惠安群众及旅外人士叠呈吴铁城控告汪柴水的为匪罪行，要求惩办。吴慑于民愤，乃于是年10月下令逮捕汪柴水，绑赴龙华路龙华机场枪决。恶贯满盈的匪徒，落得可耻的下场。

（福建省泉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匪首涂友情

涂明哲

涂友情，乳名贻训，字荣志，又名飞凤，福建省大田县济阳乡济中村人，1896年农历二月初二日出生于永春曲斗涂山村。父亲涂同华，忠厚老实，家道贫寒，没有田产房屋，常年栖身于涂氏祠堂，租种祠堂和地主土地，以维持生计。其母陈阿五，是个克勤克俭、忠守妇道的农村妇女。夫早丧，厮守孤儿涂友情，母子俩相依为命，过着贫寒孤寡艰难困苦的生活。涂友情青年时代开始土匪生涯，后被收编，从一名普遍的匪兵开始，逐步发迹，青云直上，任过匪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国民党德化县县长、福建省保安四旅长、福建省闽南盐运视察专员等职，并被国民党授予少将军衔。1942年秋，途经大田往闽南各县视察盐运情况，被德化匪首、世仇林青龙侦知，遂派其外甥涂黑将等数人，潜伏于大田城关，遭到伏击，死于枪下。时年46岁。

失家教自幼愚顽　得机遇落草为匪

由于早年丧父，家道贫寒，生活艰辛，涂友情一直未能入学读书，目不识丁。他少时憨厚，呆头愣脑，鼻涕长流，挂于嘴上。热天赤身裸体躺在水田里，兼之衣衫褴褛，从未洗脸，满脸乌黑，浑身污垢，他人小体弱，不习劳作，长至十六七岁，劳动尚不及普通妇女，被乡邻视为愚童。邻人涂阿曾曾劝其母改嫁，免致老

年困苦无依。涂友情母不肯，坚持守寡。涂阿曾在母子俩面前嘲笑说："友情如能成器，出人头地，我愿为其打杂端水。"涂友情听后，先是默然，随后发出一句"你太看轻人"。自此，他不甘矮人一等，萌发了出人头地的念头。而促使涂友情落草为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生于清末，国家处于苦难深重、弱肉强食的年代，匪患猖獗，强人到处集结团伙，占山为寇，立寨为王，打家劫舍，摊派饷银，抓卖妇女、儿童和牛羊等。涂友情长大成人后，在"有枪便是草头王"这种社会环境的熏染下，逐渐对欺人霸道、为非作歹的土匪生活产生了一种羡慕之情。

在一个春雨淫淫的日子，正在田间劳动的涂友情，偶然碰到早已投匪并当匪排长的乡人涂荣宝。两人略略寒暄几句后，涂友情向涂荣宝诉说田间劳动的苦衷，涂荣宝即邀涂友情一同去为匪。涂友情不加思索，毅然答应。他不顾年迈孤寡的老母，丢下锄头，与母不辞而别，跟随涂荣宝投德化苏忆，先是当名炊事兵，半年后即编入涂荣宝排，成为一名正式匪兵。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土匪生涯。

善乔装骗取信任　巧藉口扩张势力

一名普通匪兵，难以满足涂友情不断膨胀的个人欲望。为此，他时时在寻找时机，以图发迹。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涂友情所在的排奉命到德化县境内的阳山村洗劫一富豪陈某。涂友情独个儿搜索到陈某藏匿之处，陈某颤颤抖抖，向涂友情跪拜求饶，并告以密藏400块银元之处，意为酬谢。涂友情虚于允诺，索出银元装入银袋并围缠于身上，无人知晓。后即告知其他匪兵将陈抓擒。陈不敢告发。涂友情则心头暗喜，不露声色。匪兵整队时，涂友情灵机一动，自动站出队列，建议领队人要逐一搜查各人之身，以防有人私抢贵重东西不交。排长涂荣宝为涂友情的"积极"面孔

所惑，信其为公、纳其所议，并令涂友情当场对各人搜查。这种伪君子之举不仅使他蒙混过关，且骗得上司的信任。之后，每有机会，他都要积极表现一番，以博得上司的欢心。俗话说"福至心灵"，顿开茅塞，他就利用此笔银元，与人合伙到安溪购买枪支，转卖给苏忆，从中获利一倍。经如此反复多次，本钱渐多，并自置步枪10余枝，为后扩张势力做了准备。苏忆看其年轻、伶俐、能干，对其青睐器重，委以排长之职。随后他同涂荣宝义结金兰，涂荣宝居长为兄，取名"飞龙"，涂友情年少为弟，取名"飞凤"。两人表示愿同生死，共患难，福同享，祸共当。这样一来，涂友情在匪营中的势力逐步增大起来。

1920年，涂友情升任匪连长。1921年他回乡谒祖。此时的涂友情，在乡人的眼里已大非昔比，判若两人。涂友情骑着大红马，身后有卫兵侍从，好不威风。乡中长辈、族亲等几十人带着彩旗锣鼓将涂友情恭迎到家。到家后不几天，想起幼时被乡邻涂阿曾轻视之情景，特令人写红帖邀涂阿曾到家晤面。涂阿曾懊悔先前之失言，惊恐万状，特备银元、鸡鸭等礼品一担，亲自登门道歉。涂友情本想借机当众侮辱一番，以泄先前被辱之愤。幸其母贤德，力劝儿子应念及族亲，不要提及前事，涂友情只好作罢，反怒为笑，欢颜招待。涂阿曾为此感激。乡人也赞涂友情宽宏大度，虚怀若谷。这也正是涂友情善于笼络人心之处。

苏忆死后，部属散伙，各树山头。1922年粤军许崇智入闽，收编各民军、土匪首领。盟兄涂荣宝率队往安溪受编于民军首领杨汉列，被委于营长、统领之职。多年的匪旅生活，使涂友情明白，只有占踞地盘，笼络人心，扩充势力，才能有牢固的地方基础。为此，他则率其部下回到家乡——济阳。济阳这个地方，虽是涂姓一家，但历来房族之间明争暗斗，结怨甚深。早在1917年6月，涂荣宝曾在家乡酿造一起宗派械斗的大血案：涂荣宝假借德化匪帮之力，对仇家涂富华实行报复，烧毁涂富华及其亲属房屋36座，

杀害族人数人，抓走小孩多名。因此，房派之争愈演愈烈，群众不堪其苦，结怨愈深。1922年涂友情回梓之后，乘虚而入，对群众施以好处，很快在族人中树立威信，扩张了地方势力。

时有泮林村匪营长涂福兴，归附于德化美湖匪首林青龙，对济阳虎视眈眈，常有吞并之意。1924年秋，涂福兴委派副官陈六四率士兵数十人到济阳，以访友为借口到绅士涂富华家（民国初北军傅旅长曾委他为民团团长），企图绑架勒索。涂富华家资颇富，雇有家丁，与涂友情素有宿怨。在匪兵下手绑架时，涂富华家丁奋起开枪反抗，一时枪声四起，混乱中涂富华潜入自家炮楼，匪放火焚烧。涂友情闻讯亲率队伍赶来救援，把涂福兴匪兵赶跑。此时，涂富华家房子、炮楼已成灰烬，涂富华及其家属2人被烧死，其侄涂晋学负伤。次日，涂福兴派出匪兵及民伕一二百人，想来抢劫涂富华家的财物。不料涂友情已事先有所防备，派人到涂富华家周围埋伏，等待猎物入圈。待涂福兴匪兵进入其埋伏圈后，一声令下，开枪射击，当场击毙匪兵多名，余匪仓惶溃逃。这一事件后的第三天，涂便召开各房派及受害亲属代表大会，大造舆论，说什么“亲不亲，本族人”，要捐弃前嫌，团结御外，并要求捐钱出人，购买枪支，建立民团，组织自卫。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宣传，有极大的蛊惑力，受到族人的拥戴，当时即认购武器30余支。一些好逸恶劳之徒加入其队伍。涂友情即将人员编入班排，委任从集美高中毕业的涂富华之子涂荣伍为副官，亲属涂萃刚、涂程华、涂荣辉为3个排排长。至此，队伍扩大，装备改善，声威大振，外人已不敢小视。此外，涂友情还组织全乡民事调解局，订立乡规民约，并选出局长、文书、总务及若干调解员，按月抽取丁钱为局里经费。凡有群众民事纠纷案，涂友情则亲自处理。村中凡有不法之徒，如参与赌博、盗窃等，调解局对其严惩不贷，或捆缚杖打，或罚款充公，因此民风一度好转，涂友情则更受族人颂道褒扬。这是涂友情笼络人心、扩大势力的又一重要手段。

泮林匪首涂福兴为匪多年，心狠手辣，多行不义，杀人抢劫，敲诈勒索，无所不为。且依仗林青龙之势力，利用群众中的宗族观念同涂友情抗衡，造成泮林、上峰一带群众与济阳的群众也势不两立，断绝联姻，亲戚难于往来，大路分段行走。此外，群众还得负担名目繁多的普通捐、特别捐、子弹费、过节费、优抚费等，群众不堪重负，积怨甚深，却敢怒而不敢言。涂友情抓住群众这一心理，从安溪搬来杨汉列和吕泰两匪首及匪兵数百人，调来轻重武器，攻击涂福兴的主要据点——上峰大湖寨。匪首涂福兴在一次激战中中弹身亡，其部属土崩瓦解，不少人投在涂友情门下。涂友情善于收买人心，比之涂福兴等匪的手段较为高明。自此，路障被撤除，双边群众消除对立，自由往来，上峰、泮林一带群众也归附涂友情。这样，几乎济阳、泮林、上峰、亩湖、古峰山等涂氏村庄成了涂友情的一统天下。涂友情的这一着，名则为解民水火之苦，实则是扩大地盘，扩充势力。随后，涂友情又派兵对林青龙的部属、洞口乡一霸、匪连长章国际进行围剿，并派人游说使章国际部属陈香、陈英、郭昭主、章明扬等倒戈叛变，削弱了林青龙的势力，而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屏山、吴山、洞口一带。

真匪盗横征暴敛　假仁慈暗中作奸

涂友情作为一匪首，地方一霸，政治上自有一套手腕，而经济上则更是多方聚财，满足需要。其方法是多样的。

其一，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摊派饷款，名目繁多。如丁钱、田赋税、普通捐、特别捐、子弹费、节日费等。匪兵所到之处，还要地方应酬饭菜，供其享用。

其二，以惩处不法之徒为名，敲诈勒索，归为己有。设立全乡民事调解局，对染有恶迹之徒，除肉体上鞭杖枪杀外，经济上

处以重罚，敲诈勒索。如涂萃全被人诬陷与林青龙暗中勾结，其兄弟涂萃奇被抓，备受酷刑，被勒索银元300元才具保释放，保全性命。涂银华因与堂弟争斗被枪杀，累及家人被敲诈银元820元。涂步墀入伙安溪剑斗匪徒林谟荣，被诱杀罚款银元600元，责令其房亲将其倾家荡产，将其妻、子出卖，以抵罚款数，不足之数，令其旁亲凑足。涂萃东因误杀其叔，被认为忤逆不道，处以罚款数百银元，归涂友情所有。1931年，有部属涂荣鹤、涂荣数俩兄弟垂涎涂友情之势力，乘涂友情受编于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陈国辉属下驻防永春县城，并因事发而被捕下狱之机，制造谋反，谋杀涂友情之支臂、亲信副官——涂荣伍。涂友情越狱后将涂荣鹤、涂荣数及其亲属卫兵8人同时枪杀，收缴枪械40余枝；责令其家属倾家荡产，并将两人之妻及新盖房产一座变卖得银元千余元。

其三、设立兵工厂，制造枪支，做军火生意。1927年，涂友情在济阳偏僻之地——大坪尾、大瓦格旧祠堂设立兵工厂，从福州雇来制造七九式步枪技工20多人，工厂因陋就简用手工摇动机器土法生产枪支。一方面派人到外地推销，一方面在他的管辖区域内，强令各村购买组织自卫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枪支紧缺，尤其是偏远的山区更甚，所以枪支价格昂贵。涂友情通过这项军火制造、贩卖生意，牟取了暴利。

其四，印发信用票，以此盘剥群众。1927年涂友情接受收编并驻扎永春县城期间，曾到厦门印制信用票，在其势力范围所及之内强行发行，票面一元，票面价值与银元、国民党中央钞票同样，发给部下为每月饷款，强迫群众使用通行。如遇抗拒不使用者，不仅受其逮捕还要罚款。经过使用一段时间，发行数次，到收取信票时，票面价值只以七折计算，以此获利而坑害剥削持票人。

其五，设岗立卡，收取商税。济阳、屏山是永春通往大田的

必经之地，常有商贩往返。涂友情便在永春曲斗、济阳下落、屏山等处设关卡，收取税款，获利甚多。

其六，种植鸦片，开设烟馆赌场。在其势力范围内，强令群众种植鸦片。成熟期到，按面积征收税款。收成后以低价收购，一面开设鸦片馆，供人吸毒。一面销往外地，获利甚丰。并同大田县城富商勾结，集股到仙游贩运鸦片，由涂友情派兵护送，每趟数十担，可收保镖费银元数千元。此外，还开设赌场，公开赌博从中抽税，以此坑害群众，毒害人民。

其七，伪造名单，讹诈索款。1933 年涂友情充任省防军第一混成旅团长之职，驻扎永春县城期间，伪造了一份县城及达埔（系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之基地）参加共产党活动之名册，并装出一副君子面孔，声称各人须交银元 10 元作“自新费”，由当地土绅具保即准予自新，领取自新证。因此，上了花名册之人，惟恐祸临旦夕，逮捕下狱，抄家没产，不得不求当地土绅带其到团部缴费自新。不到几个月，收取自新费几万银元。此为涂友情自认为一生中最得意之举。

1934 年 7 月，大田盛传工农红军准备路过大田县城。大田富商吴来（原名吴缓其，福籍永春）惊恐万状，携带家眷并黄金、银元等细软，逃离大田返回原籍，途经济阳，请求涂友情之妻——苏玉英派兵护送出境。苏玉英表面许诺，并热情招待。暗中则派营长涂金兴带兵预先埋伏于偏僻之处，待吴来一行进入埋伏圈内，对空射击，护送之兵佯装抵抗，边打边退却，结果吴来等被擒，黄金、银元等贵重东西被抢劫一空，后又将吴来作为绑票勒索 2000 银元。

此外，他还经营产田，收取租谷。经营商业，盈利聚财。以上所述种种，是涂友情搜刮民脂民膏的主要行径。由于手段狡猾，方法多样，经几年经营，暴发成巨富。他将盘剥、勒索来的资财，除部分作军资和创办一些公益事业外，大部分供其挥霍享用，先

后在济中、涂山两村建造楼房 8 座，耗资巨大。

受收编寻求靠山　结世仇饮弹身亡

涂友情在为匪生涯中，虽极力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总觉得势单力孤，犹如大海之孤舟，遇有强风大浪，难避倾覆颠没之危险。所以，他积极寻找政治后台，多次受编，投靠国民党，名正言顺地成为国军。

1924 年，广东革命政府派方声涛入闽收编民军。涂友情认为这是影响个人声誉、倚仗国民革命军之力维系自己势力的良机。因此，他派代表与永春民军首领尤赐福联系，请求收编。尤赐福同意收编，将其匪兵编入民军一连，授涂友情为连长之职。1928 年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杨树庄委任涂友情为德化县县长。上任不及 4 个月即委托其内兄苏庆余代理。同年国民党驻闽部队将其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一团二营，属张贞师长所部，委涂友情为营长，驻防漳州。1929 年随张贞入潮州、梅县讨伐陈炯明。曾在漳州与工农红军一战，不堪一击，全营几乎被歼，本人身负重伤，子弹穿进胸腔伤其肺部。其部属星夜雇小船，将其送进厦门鼓浪屿一所外国医院手术，伤愈出院后即辞职逃回本乡——济阳，续办民团。

1931 年，涂友情民团受编于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陈国辉，驻防永春县城，涂友情被委任营长。时适有德化匪首徐声机、西山张克武不愿接受收编。陈国辉欲将剿灭，故将旅部从泉州移到永春，准备攻打德化县城。涂友情因与张克武有八拜之交，暗通情报。不久，被陈国辉查获，并将涂友情及其部属 10 余人逮捕下狱，做了阶下囚。陈国辉准备在回南安为母诵经超度事完之后将涂友情等人枪杀。不意涂友情已有越狱准备，与狱外亲人约定，由探监亲友送进钢锯锯断脚镣，在一个暴雨之夜晚，趁

监狱值班人员麻痹不备，里外配合，按事先约定的位置，挖开墙洞，越狱逃往永春、德化交界地洋上村友人余少凯家藏匿，侥幸避过杀身之祸。

1933年国民党中央驻闽部队委任涂友情为团长，部队驻扎永春县城。1938年国民党中央派大部队入闽，瓦解第十九路军。福建省保安处处长黄珍吾受命组建4个保安旅，收编各地民军，委任德化西山民军首领张克武为保安第四旅旅长，下属3个团。涂友情将其兵力集中到本县桃源检阅受编。不料张克武受编后反悔，不接受命令，星夜拉走2个团的兵力（一个团是本部、一个团是安溪吕泰）。涂友情看准这一机会，亲自赴省晋见黄珍吾处长，并听取训示。黄看涂友情忠心不二，对涂友情加以慰勉，并委涂友情出任保安第四旅旅长之职，并拨给枪支弹药，划拨队伍补充遗编。原涂友情所任团长一职由本乡人士、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生、原在国民党正规军担任副营长、因抗日负伤在家疗养的涂犹龙担任。部队进驻三元、梅列一带，后改驻南平等县。在涂友情任保安第四旅旅长之职期间，曾派其妻苏玉英赴汉口结识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并随戴笠到成都。汉口、成都一行后，即派内弟苏辅德、乡人涂达德等7人到汉口中美合作所受训。苏辅德、涂达德后成为死心塌地的国民党特务。蒋介石溃退台湾后，苏、涂两人奉令在大陆潜伏，并组织闽南反共救国军，继续从事反共活动，策动苏玉英拒绝向解放军投诚。1942年，保安旅改编，涂友情改任闽南盐运视察专员，专事盐运。

涂友情与德化美湖匪首林青龙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其始因仍为争夺艳女苏玉英（德化双翰人）。早年，涂友情、林青龙同为苏忆部属，充任连长。两人同时钟情于苏玉英。最后苏玉英选中涂友情，并结为夫妇。林青龙情场失意，妒火燃烧，结下冤仇。后两人同时拉起队伍，树起山头，势均力敌，兵戈相见，互抢地盘，争夺势力，不共戴天。1942年10月13日夜，身为闽南盐运视察

专员的涂友情从永安欲往闽南各县视察的消息被林青龙侦悉，派手下干将事先潜伏大田城关行刺，乘涂友情到东门盐务局赴宴席散途经东街时突袭，连发数枪，命中要害，倒地身亡。林青龙为杀人灭口，又派其外甥涂黑将将下手之匪枪杀于半途之中。涂友情之死，天理昭彰，罪有应得。涂友情死后，苏玉英带领队伍，继续作恶，其凶险毒辣，较之其夫，有过之而无不及。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1951年2月，被我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包围合击，击毙在现今济阳乡泮林村山上。安插在她身边的国民党特务苏辅德、涂达德走投无路，自杀而死。至此，作恶几十年的涂、苏匪帮被全歼。

涂庆南整理

（福建省三明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匪首林世球罪恶的一生

王振经

林世球，生于1900年，清流嵩溪薯坑村人。早年丧父，家贫失教。薯坑是个盛产竹木的山村，设有许多纸厂。林世球在青年时代也常在纸厂做零工。由于林幼失教管，性嗜赌博，结交流氓浪子，不务正业。那时清流食盐受白匪封锁，因而一度紧张，有些商人跑到永安贩盐，盈利很多。林世球也跻身盐贩，从此家中比前宽裕。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土匪如麻，豪绅地主勾结官吏，横行乡里，为非作歹，鱼肉人民。人民生活极不安定，弱者沦为乞丐，强者流为土匪。由土匪出身当官的很多，当时有句民谣："民国没世界，枪杆子挂帅，流氓当官长，土婊做太太"。林世球耳闻目睹社会情况，认为当土匪是当官的捷径，就用贩盐的盈利买了3枝步枪，几十发子弹。从此，在山深林密的通道上抢劫客商，开始了他的土匪生涯。同时他还到处搜集逃兵、散匪的枪支弹药。这样日积月累，有了几十枝枪，成了薯坑一霸。

1931年间，红军在该县建立了红色政权，为了粉碎敌人的数次围剿，部队调动频繁。林世球认为有机可乘，组织起"剿共游击队"，联合大刀会、红带会等反动团匪组织，经常流窜在玉华峡、分水凹一带伏击我红军、赤卫队。到1932年间，成立了"剿共大队"时，有人枪200余。林世球的匪大队部驻在薯坑"猪膏髻"山。以余以明为副大队长，林荣其、温曾贤为中队长，张显良为特务排长，分驻嵩溪、小池、黄郊、阳坊、高地、洋背、温家山、黄

家碌等村。他的黑手由嵩溪区伸到温郊、嵩口两区。

国民党清流县府在嵩溪成立的保卫分团，由温锦堂为分团总。温仅有人枪 30 余，依附林匪，作恶多端。在林畲则联络丘致平保卫分团，互相呼应。

1933 年间，嵩口区所属乡村燕巢形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吴招仔（下车人），赤卫队长吴贵（桂坑人）。后皆被林匪派匪徒黑夜抓住，押赴薯坑，剖腹剜心，惨遭杀害。嵩溪苏区主席余金满、少先队长余苍松、文书余宜华均被林杀死。在林匪盘踞的乡村通道，均密布岗哨，藉盘查来往行人为由，乘机抢劫，遇有妇女过往，虽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污辱强奸。人民群众在其蹂躏之下，敢怒不敢言。匪徒头目还经常前往各村派款，搞得农村乌烟瘴气，鸡犬不宁。他们每到一村，还须殷勤招待，让其酒醉肉饱而后快，倘有不如意之处，横祸飞来，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林匪在乡村可以强占有夫之妇为妻。北坑村民妻阳××，娘家高地，被其强占为妾，经常在他家中饮酒作乐。还有逢场作戏玩弄妇女，则无法数计，上行下效，恬不知耻。薯坑一带乡村，成了匪徒头目的贼窟淫洞。

林匪为了诈取民财，还掠抢妇女出卖，宣布每个匪徒抓获妇女，应报告大队，缴纳小洋 500 角（小银币），听其留用、出卖，让部属鱼肉人民，林匪坐收渔利，朝暮取乐，择美伴宿。当时被卖他乡的妇女难以数计，远则永安、明溪，近则梧地、太山、芹溪、余朋。

1934 年间，红军北上抗日，国民党五十二师卢兴邦率领 7 个团盘踞清流。嵩溪成立了区公所，以邓永邦为区长。林匪腰缠万贯，朝夕迷恋酒色，把部属散到附近村庄藏匿。

1935 年正月初三日，由一个红军叛徒引导，林匪到宁化湖村石撩地方，挖出棺木一具，内藏步枪 110 枝。林匪得此一批武器，更为嚣张，连从前所有枪支已有 320 余枝。在县城则勾结省参议

员黄绍华为靠山，并利用黄绍华关系在福州购买机枪一挺，扩充实力。

1935年间，嵩溪区区长邓永邦（邓系三青团派），慑于林世球（国民党CC派）的武力，事事仰仗林世球的鼻息。1938年后，改区为乡，林、邓两派斗争剧烈。在进行所谓民选中，以邓永邦的选票占多数，县府委邓为乡长。林匪不服，缴邓的枪40余枝，机枪1挺。此时林匪已有步枪300多枝，机枪2挺。县长陈人杰以林匪实力在手，只得迁就他，改委林匪为乡长。从此他更加横行霸道，与劣绅张茂和勾结起来，共同压诈嵩溪人民。张在嵩溪包揽词讼，为人诡计多端。从此嵩溪、林畲两个乡为林匪恶势力盘踞，竟达10年之久，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1949年间，解放大军进入闽境，国民党残部纷纷逃窜。大军所至，有如秋风扫落叶，林匪惶惶不可终日。不久，解放军三野部队解放南平，进驻沙县、永安；四野部队进驻宁化。林匪有如热锅蚂蚁，更加坐卧不宁。

1949年8月间，由“十人读书会”组织成员邓福照、曾承勋2人。召集张献臣、张四满、易永基、叶荣富、雷瑞吉、易启光、张献辉、姜尚志、李叶青等在邓启华家中开会，拟定到嵩溪活动。9月11日由邓福照联络张献臣、雷瑞吉、曾承勋等人到嵩溪“福坛寺”秘密集会，讨论怎样用和平手段争取林世球和平起义。这一秘密被张茂和侦悉后，密告林世球。林即派人跟踪，待邓福照从明溪回到嵩溪后即行捆绑，从身上搜出红绿纸标语。继而又将曾承勋、雷瑞吉、余一峰等3人押送土堡内倒吊起来，口塞棉花，残酷折磨，并于9月13日晚将此四人杀害在高栋背。张献臣闻风逃回清流，邹圣基跑到宁化。邹抵宁化后，报告解放军，由解放军某部刘桐山团长派了一连部队进剿。林匪率领匪徒窜逃蕈坑，张茂和与张显良逃匿邵坑。清流县和平解放后，区乡政权建立，各乡组织了民兵，布下天罗地网，邵坑的张茂和无藏身之所，于1950

年4月间向连城方面逃走，企图投靠“反共救国军”唐宗匪部，被我调粮队在赖坊马家岭碰上，当场截获，押送清城。这个为虎作伥的劣绅，被我人民政府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林匪带领几百人枪回薯坑，解放军跟踪追剿。林匪逃匿拔口，与惯匪李猴子会合，被民兵发觉行踪，报告解放军，分数路包围，当即将林、李匪部击溃，李匪窜逃明溪，林匪又逃回薯坑老巢。在我“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感召下，林匪部属纷纷缴械，林世球成了众叛亲离的孤鬼。最后只剩林匪一人逃往山地。为了保全狗命，林匪以许多光洋、金器贿赂其姘头阳××，让阳为其送些粮食。这一情况又为我方掌握，布置许多暗哨，断其粮道。林匪独在山地，没有吃的，无法苟延残喘，便爬到阳坊母舅阳平章、阳含章处寻觅食物。他那母舅受政策的感召，不敢窝藏匪霸，向解放军报告，这个恶贯满盈为祸几十年的清溪惯匪、大恶霸，终于落入人民的法网，押解到清流城关，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此消息传开，全县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福建省三明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吴赐匪部活动始末

蔡竹禅　林志光

吴赐为漳州著匪。自1924年间张毅统治漳属时，即纠集匪徒进行抢劫绑架，勒派“乌单”，骚扰地方。迨1932年初，因其匪部受编为张贞四十九师独立营，调往闽西参与“围剿”苏区。在龙岩小池岭被中国工农红军击溃后，吴即潜居厦门，勾结日本特务，多方进行活动，阴谋叛国投敌。1934年初，十九路军发动的“闽变”失败后，吴又乘机潜回漳州招兵买马，继续滋扰地方。翌年5月间，吴赐本人虽被枪杀，但其爪牙仍先后活动于龙溪县东、南乡，直到解放初期才被全部肃清。吴赐匪部祸害地方将近30年的史实，正说明了解放前军阀与土匪之间、土匪与日本特务之间的反动本质关系。

一、吴赐的出身及其初期活动

吴赐原籍同安，本姓王，因在龙溪县鳌浦乡入赘于吴家，乃改名吴王赐，后仅用吴赐，通称吴仔赐。

吴成年后不务正业，常乘机盗窃，曾偷牵邻乡长泰县辖珠滨乡（欲叫“田边社”）权豪姚经邦（植庭，前清秀才，曾任叶定国参谋）的耕牛。因姚持势追查，吴赐乃避匿漳州，央托地方绅士陈垂我出为调解了事。

吴赐后来常混迹于东乡塘头社“家长”陈文明所开设的鸦片

馆中，交朋结友，成为无赖强暴之徒。1923年有漳州军警督察处警兵两人，乘春节期间乡民聚赌，于正月初二日私往东乡捉赌勒索，激起众怒，被群众殴打，追至市尾，警兵无路可逃，乃跪地求饶。吴赐与一名叫荣宝者即上前强夺警兵驳壳枪各一支，扬长而去。

不久，东乡有王渭西者，系福州鹤龄书院毕业，曾任漳州中学堂教员、龙溪县立甲种农业学校校长等职，后因失业又染上烟瘾。王穷极无聊，初以承办东乡田亩捐（鸦片捐）为生，后与劣绅庄可亭等流氓勾结，想出一套敲诈手段，分向市尾一带殷商富户勒派“乌单”，每次分向10户派款，被勒索者仅缴原索价的1/10，即可了事。由于当时处在军阀反动统治之下，官吏贪污无能，被勒派者认为只花三五十元或百元，总比报告官府查办而进行贿赂来得便宜，同时又恐得罪匪徒难以安居乐业，因而多愿隐瞒其事暗中托人讨价缴款了事。如杨振兴被勒派“乌单”后，深恐发生意外即首先缴款。王渭西经过两次勒派“乌单”后，即用所得款项，先后购得短枪、驳壳枪各2支，作为此后强行勒索的本钱。

王渭西因持其父王仰斗和王姓为东乡大族的封建势力，横行无忌；而吴赐其时亦正纠集匪类在东乡为非作歹，乃互相结纳。自此在东北乡勒派“乌单”都盖上“吴赐”的印章，实则王渭西为其策划者。盖王渭西以吴赐原为匪徒，正可藉其臭名威吓被勒索者，而自己亦可开脱罪责。被勒派者亦因多知王渭西与吴赐之间的关系，每直接或间接央托王渭西代为说项，以至“代收”勒款。如此吴赐的初期活动，系以王渭西为“参谋”，为其献策筹划一切的；而王渭西亦持吴赐的“资助”，以度其腐化堕落的寄生生活。王渭西常对人表示说：“我被吴赐‘逼上梁山’。”其实他们是朋比为奸的。

吴赐为招集匪类，添购枪械，以扩充其实力，因而贪求无厌。由于勒派“乌单”不满足其所欲，乃进一步进行绑架勒赎。在1924

年间北洋军阀张毅统治漳属时，吴赐匪徒在江东桥附近绑架长泰籍新加坡华侨戴献洛。戴被绑入民船后，偶遇曾略相识的同乡粟贩张清香于船中。张与匪徒素有交情，知戴系被绑，乃向匪徒说项将戴释放。戴返回后即“致送”匪徒银元1000元，从此戴重赴新加坡不敢还乡。其后吴赐又以延医为名诱骗石码名西医杨春藤，当杨搭上预先布置的匪船而驶离石码后，即予绑架，勒索巨款后释放。

吴后来又藉帮会组织的“三点会”，在东北乡招诱歹徒加入充当爪牙，同时作为勒款的耳目，因而徒众增至六七十人，流窜骚扰更甚，这时吴赐已成为漳州四乡的著匪了。

二、第一次受编

北伐军入闽前后，吴赐乘时局动荡不定的机会，又继续发展其实力，骚扰地方更甚。迨1928年秋，独立第四师（后改四十九师）张贞部调驻漳属后，吴部流窜于龙溪与长泰、同安、漳浦等县的交界地区，虽经迭次追剿，仍未铲除。1934年间闽南剿匪司令部成立，张贞兼任司令，加紧进剿。这时吴赐为保持其实力，乃有意受编。但张贞以吴为害地方多年，如予收编，恐地方民众多有指责，因而一再拖延，未敢遽尔决定。后迭经黄澄渊（张贞亲信，与吴赐素有交谊）力向杨逢年通说。其时张贞因杨为龙溪籍，且身任旅长，颇为倚重。经杨一再向张婉说后，遂将吴赐所部收编为闽南剿匪司令部所辖的一个支队，吴被委为支队长。

但吴赐名虽受编，由匪而官，却并未改恶从善。反而变本加厉，以支队长名义公开勒派人枪和现款。过去勒索仅以个人为对象，现在更明目张胆以社为单位了。如龙溪东乡杨姓潮阳社曾一次被其勒派人枪各40、现款银元6000元，派其匪兵包围该社催缴。该社家长四五人在惊恐之下急谒族亲杨逢年，申述情况并请

其出为调处，杨竟哑口无言，任其倒行逆施。由于吴赐如此迭次勒派人枪与现款，其徒众突增至四五百人。

其后四十九师对其辖内各股匪虽迭经进剿，无如匪徒聚散无常，流窜不定，终未得手，不得不改剿为抚，先后又收编张河山、陈祖康等部，吴赐所部亦改编为该师独立营（共辖3个连），吴任营长。这正是张贞部回驻漳属后，以其所谓"藉匪自卫"政策，收编地方股匪，贻害地方的例证。

吴部改编后经在南靖训练一个时期，于1931年夏开往龙岩，划归"闽西剿匪指挥官"杨逢年指挥，参与"围剿"闽西苏区，随同二八九团陈林荣部驻防白土乡。吴赐为巴结杨旅各级军官，常在其营部设宴聚赌，抽吸鸦片，终日以酒肉相征逐。后陈团移驻永定坎市，该营亦随同前往分驻于富岭乡，担任龙岩与坎市间交通维护之责。但在此期间吴赐亲信爪牙仍在龙溪县东北乡勒派"乌单"，骚扰地方。如吴的匪徒严长茂、咾仔山等设计抢劫和绑架漳州菜市志诚堂药铺东家蔡垒：先买通其店夥于夜间时后门不上闩，而匪徒乃乘机窜入，先行抢劫，凡金银首饰、现款、洋参以至虎标万金油等尽予搜去，而后将其绑架囚禁于龙溪县南乡洪塘社（吴的匪徒洪振龙家乡）。翌日由厦门打电话给蔡的家属，一面勒款银元2000元；一面威胁说："如敢报官，则赎价加倍"。后终以银元1400元暗中赎出。

1932年4月间，吴部在龙岩小池岭被中国工农红军击溃后，吴赐即潜回龙溪县东北乡老巢，纠集余众继续为匪。5月间，当中国工农红军进攻漳州，漳码一带豪绅、殷商、地富闻风匆惶携带家属细软避往厦门鼓浪屿时，吴赐已与海澄股匪郭漏碇勾结，分派匪徒在海门一带乘机截劫，抢夺金银首饰、现金等财物，发了大笔横财。为劫夺财物，甚至将妇女的衣裤脱光，或横加侮辱。

这时吴赐已勾结厦门台湾浪民和日本特务，以日本在厦门的特务机关——东南旅社（址在思明西路）为巢穴。因而避往厦鼓

者，路经海门匪徒要勒令停船进行“检查”（实为截劫）时，如答说“东南”者，则放行无阻，免遭截劫。

同年6月，红军回师闽西。四十九师残部返防漳州，但不久十九路军入闽，旋即併编该师，吴赐在此期间早已脱离四十九师，而潜居厦门重操土匪生涯，且与日本特务勾结进行阴谋活动。

三、勾结日帝　图谋叛国

自1932年夏十九路军入闽，至1934年初“闽变”失败前将近两年期间，吴赐因其实力在红军入漳前已被削弱，且惧十九路军将其捕杀，乃潜居厦门，同时以东南旅社为据点，勾结台湾浪民和日本特务多方进行阴谋活动，企图依恃日帝在厦势力乘机纠集徒众。而日方则阴谋扶植吴赐充当汉奸，作为将来侵扰华南，尤其是福建的内应。

据吴赐幕客刘子明（号少愚，漳平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毕业，历任赣南专员公署专员蒋经国秘书、江西信丰县长、福建省保安第四旅所辖第五团张克武部政治指导员等职）对林志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驻闽第二大队联络参谋，吴赐第二次受编时参与接洽工作，及吴赐所部受编为福建省保安处独立营时兼任该营营长）谈过一段有关情节：吴赐曾一度被日本间谍诱往台湾，与日帝商谈组织闽南武装力量问题（除吴赐外尚有仙游、平潭等地土匪势力代表），吴抵台北后住某大旅馆，颇受日方优待，整日派人花天酒地与吴周旋，日方极力怂恿吴赐在漳厦扩张军事实力，并允供应军火装备，及派员协助训练等初步条件。由此足证吴赐曾经前往台湾进行活动，外间猜测随其前往并担任通译者则系刘子明，亦属可能。

当时十九路军对吴赐的汉奸活动是曾予密切注意的，并经多方侦查，据传曾由潘澄峨（即朴庭，时任长泰县县长）设法取得

日本特务和吴赐勾结进行活动的据点东南旅社内部秘密出入路线详图，且曾有用武力予以破获的拟议，但终未执行。想系由于当时厦门政治关系复杂恐引起枝节问题，或因该军正忙于策划“闽变”工作。

当1933年夏，杜起云（周荫人部曹万顺师的旅长，东路军入闽后投降）在厦门日本领事的扶植下，纠集闽南民军头目，企图组织所谓“华南国”，这时也有吴赐与日本秘密订立协约，阴谋在漳厦组织“华南国”的传闻，想系是吴赐勾结日特或参与杜起云的阴谋活动而引起者。但以当时吴赐的实力而言，是无可能实现的，仅是吴赐与日帝的幻想而已。

吴赐在这期间，一面勾结日特进行叛国活动；一面仍派其亲信爪牙在漳厦等地绑架勒赎，骚扰地方。如在厦门密谋绑架蔡竹禅未遂，即其一例：1932年间蔡竹禅暂居厦鼓时，常往厦门裕孚银号坐谈，每次都由铁路头搭乘渡船返回鼓浪屿。吴赐据此情况，密谋在渡头将蔡绑架后即劫往海澄青浦囚禁。但在行事前，吴的匪徒蔡国隆潜往裕孚银号，将情密告蔡竹禅说：“现有吴赐爪牙连我在内计有6人潜伏于杉寮中，拟乘你搭渡时即予绑架，请速躲避……”，因得幸免。据蔡竹禅分析：“这次绑架，含有勒款和仇杀两种意图。因吴赐一向横行于我的故里龙溪东乡，当张贞部驻防漳州拟予收编时，我曾力加反对，及其受编后批责其过去为害地方，今后自当改恶从善，做些好事。吴因有积怨，图加报复。”

四、第二次受编

1933年末“闽变”发生后，由于时局动荡，给吴赐得以重整旗鼓的有利机会。因而尽力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蠢蠢欲动。

当时蒋介石一面调动其嫡系部队向闽省包围；一面又多方策动地方武装力量作为内应。因而在此期间，先后有徐瑞霖领导的

“福建讨逆军”、杨逢年组成的“闽南讨逆军”等的组织。杜起云、蚁去虫等也极力纠集地主势力，企图乘机“立功”夺取权力。这些民军、匪首的主要活动地方是在厦门鼓浪屿。吴赐对这些活动，曾这样对人表示过：“目前摆在面前的是三碗屎和一碗饭”。他当时认为徐瑞霖、杨逢年、蚁去虫等3人是无可作为的，和屎一样是不可吃的，也即是他不愿走这3人的路线；而杜起云是有可作为的，同饭一样是可以吃的，也即是他愿意而应该走的路线。杜起云是在日帝的指使下进行活动的。而吴赐亦早已勾结日帝，因而结合在一起是必然的。

可是，当1934年初“闽变”失败后，杨逢年由鼓浪屿返回漳州，设立“闽南讨逆军指挥部”于霞熏饭店原址时，吴赐即带同便衣三五十名随之入漳。在短短的时期内，又纠集了人枪数百。待蒋介石嫡系部队入闽稳定后，取消各种地方武装组织时，吴赐匪部就盘踞于龙溪、南靖、长泰等县交界间的天宝大山一带窜扰，抢劫财物，残害人民。

蒋军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进驻漳州后，认为该股匪扰乱地方治安，影响军事行动，初派三十六师宋希濂部李良荣旅进行围剿，越时两月未能剿清。1934年5、6月间，因该师急需集结，调赴闽西向赣边推进，乃将剿办吴匪任务，交由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驻闽第二大队长龚建勋负责处理。该大队会商后，决定由联络参谋林志光（曾在四十九师二九〇团黄克强部当正副营长）运用过去与吴赐的历史关系，并寻找吴赐的社会关系，对吴试图招抚，实行政治解决，如招抚不成，则采取军事围剿。

林志光在龙岩找得吴赐的儿女亲家张达成（龙门恶霸，龙岩团匪头目之一。张女嫁与吴为媳妇，平日与吴保持秘密关系），及与张、吴有密切关系的龙岩郑笔山，托由张、郑两人出面对吴进行开导，劝吴弃邪归正。旋得吴赐同意接受收编，并由双方派代表在天宝大山附近的一个乡村会商具体条件。商谈结果如下：①

吴部收编后，所有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由别动队为之担保；②吴部全部人枪集中在浦南，由别动队协同省保安处派员点编；③番号为福建省保安处独立营，按实有人枪编成若干连，服装给养与保安团队同；④吴赐本人安排在东路军总司令部为上校参议，营长一职由别动队派员充任，营长以下各级干部任用原有人员。以上会谈完成后，吴部随即集中浦南，共有人枪400余，其中重机枪1挺，驳壳手枪40多支，其余为各种步马枪。林志光奉派参与点编工作，结果只编为3个连。第一连连长黄哲民（石码人，吴赐主要骨干，曾任钱庄经理，后钱庄倒闭，流为土匪），第二连连长陈金旺（系吴赐原配妻舅），第三连连长丘鉴昭（别动队派任者）。该营编成后，由林志光兼任营长，划归东路军总司令部指挥，经费由省库拨付，开赴龙岩、长汀一带整训。

同年冬，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新成立于长汀，该营即拨归该署指挥。其时别动队第二大队已调离闽，林志光亦于1935年初调回别动队，乃由李建邦接充营长。未几该营复归并省保安第六团钟绍葵部。

五、被杀前后

吴部点编后，吴赐携同眷属赁居漳州东路军总司令部所在的雨伞街（今台湾路东段）四合巷内，照委为上校参议。这时吴已改名天爵，并号其住所为“天爵楼”，常与总司令部处长、科长频频应酬，并结识一些无聊文人。每在其家以诗钟作乐，并备酒菜茶点、鸦片烟招待，一时大有车马盈门之概。

1935年初，蒋军第八十师陈琪部调驻漳州，陈兼漳州城防司令，时管奋庸（广东大埔人，原为阴险毒辣诡计多端的小官僚，曾于张贞部初驻漳属时任漳码公安局局长）被派为漳州城防侦缉处主任。为图立功取宠，乃向陈琪副官长申某力陈其治匪有办法。陈

琪得悉后，即令管拟具办法呈核。管自任漳州城防侦缉处主任后，则专事诱杀匪徒工作。而漳州四乡匪徒为吴赐旧部，因与吴发生利害冲突。管乃向陈琪献策说：为剿匪工作的顺利进行必诛吴赐。经陈同意后，管因其时吴赐身为东路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议，必先征得蒋鼎文的允许。嗣经陈琪取得蒋饬格杀吴赐的手令交管，并令其从速执行任务。

吴赐的亲信部属每因与吴争权夺利发生矛盾而至分化，其中较为人所熟知者，先有张龙青（即张万三），后有郑元龙、吴进来等。管奋庸在获悉吴部内讧情况后，即诱骗利用郑、吴为刺吴赐的杀手。

管奋庸为谋杀吴赐，曾密派其便衣爪牙埋伏于吴住所的小巷口，后被吴察觉，知管在谋杀，因而常托病深居不敢外出。有一次吴赐对陈家瑞（时任龙溪县财政整理委员会审核主任，因其父陈重我的关系早已与吴相识，常在吴家坐谈，与管奋庸原为朋友，且每在管家用午膳）提及管派人窥伺谋刺事，托陈从中调解。嗣陈向管提出，管推托说系在搜捕吴的爪牙江天赐、陈永渊，且说："如江、陈自动前来见我谈谈便可了事。"陈家瑞将情转告吴赐后，吴即嘱江天赐、陈永渊随同陈家瑞往访管奋庸，谈后亦未加留难。这其实是管为掩饰其谋杀吴赐的阴谋而故作的烟幕。

但事后吴赐仍察有便衣窥伺于巷口，自知处境危险，心情极为不安。为求自慰，曾先后在漳州、鼓浪屿向娄真人（即娄大师）求问符乩。当吴赐在这走投无路，而又自知将被杀害时，曾对陈家瑞这样说过："我如到台湾去，势必当汉奸，但我不愿为；如再上山，现在已无脚手（匪徒），亦无本钱（武器）了，那么只有死路一条而已。"这时吴赐已在监视之下，自知难以逃脱投敌，即欲再上山为匪，也因缺实力而无可能了。

吴赐自任上校参议后，即聘杨遂庵在家教其读书。一日自己写了"我已甚弱，不可再弱"一句，问陈家瑞写得通不通。从这

句话的含意看，可知这时吴赐自己感觉到太受人“欺侮”，再不能忍耐下去了，但事实上他已无能为力了。这仅是他在穷途末路时的哀鸣而已。他在与陈家瑞的交谈中，也曾自说一生杀害人命数百。这也足以说明其凶残和罪债的一斑了。

在吴赐被枪杀前三日，自知死期不远，因嘱其妾找出人家向其借款作押的契据送还原主，并取出常在其家当食客的劣绅陈湘龄（曾任吴赐秘书，解放后因有血债被镇压）、李纪堂等的借款便条一尽烧毁。据陈家瑞说共有数千元，但这些都是从人民身上剥夺来的。

1935年5月间，管奋庸以吴赐深居不外出，难予刺杀，乃前往陆安东路（今新华东路）笃诚赐记参行后面的杨逢年寓所，诡称为消弭矛盾，请杨以电话邀约吴赐前来商谈（但据陈家瑞说：管奋庸对他说过，当时适杨逢年在其寓所的前面店里与人谈话，管亲自以电话藉杨之名邀吴前来的）。事前管已密派原吴赐的亲信郑元龙、吴进来等10多人埋伏于吴赐前来杨寓所必经的圆圈和陆安东路首段一带。当吴赐如约乘坐人力车前来，途经圆圈时，因见有郑元龙等徘徊于路旁，知有意外，急催车夫快跑，吴在车上亦拔枪防备。但预伏行刺的匪徒们，见状恐失去机会，即飞步跟上拉住人力车，其中一匪徒从吴赐北后射击一枪。这时车已停下，吴即跳下车来，意欲逃入林成记商店右邻的小米店中，但因已中弹，力不能支，遂扑倒在门槛上。郑元龙追上，随即亲自补上三四枪，其余匪徒先后拥至，亦集中射击，吴乃立时毙命。

吴赐在距杨逢年寓所数十步处被人枪杀，顷刻间消息传来，管奋庸尚在杨寓。杨知系管所为，责怪管不该。管乃出示随身所带的蒋鼎文饬其格杀吴赐的手命，并说：“为保全我的脑袋，不得不这样做！”杨只得默默无言。

在吴赐被枪杀后，陈家瑞曾与管奋庸谈及此事，管亦出示蒋鼎文手令，管且说：“当时原叫郑元龙等下手，但郑等推说原与吴

相识，恐开枪不准，最好叫别人先开枪，我们继之。因而才叫詹方珍的部下先开枪击杀。”据闻安溪著匪詹方珍（安溪长坑区卓坑人）部于1934年被长泰县割据者叶文龙攻打后，乃流窜于华安边境，后又向北溪货物出纳口的龙溪县辖浦南镇扩张势力，且包揽该镇田亩捐（即鸦片捐），后该镇田亩捐为吴赐所夺得，因与吴有利害冲突，埋恨在心。翌年詹部为陈琪部所收编（番号不明），詹及其眷属亦迁居漳州，而与管奋庸常有来往，因派其爪牙参与刺杀吴赐的行动。同年秋，詹被陈琪扣押后，在解省途经角尾时，藉图逃之名予以枪杀。

吴赐被杀后，其原部属郑元龙、张雨亭等仍横行于龙溪东乡。同年冬，管奋庸又与陈琪密谋，先答应收编条件，后以点编为名，诱骗郑元龙、张雨亭等及其匪徒百数十人，集中于漳州中山公园内中山纪念台前广场，予以围歼。郑元龙当场被击毙，匪徒逃脱者极少。张雨亭及部分匪徒被活捉后，亦于当夜枪杀于北门外。

其后吴部匪徒江天赐、洪振龙等又骚扰于南乡一带。抗日战争期间，张海客任龙溪县长时，曾一度收编为县自卫中队，江任中队长，洪任分队长。后江天赐在漳州米市街开设碾米厂，由匪而商。

解放前后，江、洪仍纠集其匪徒进行反革命活动，先后被捕镇压。至此，祸害地方将近30年的吴赐匪部才被完全肃清。

（福建省漳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津浦路大劫案

张占军整理

1923年5月6日晨，在山东省峄县境内，临城、沙沟车站之间，发生了一起有计划、有组织的劫车案。被劫的是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蓝钢皮列车。此列车是美国制造的，设备华丽，钢质蓝漆，故俗称蓝钢车。火车中被架中外旅客百余人，其中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国乘客近40名。此案发生后，顿时成为中外重大新闻，轰传遐迩，朝野震惊。这次劫车案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就是当时活动于山东峄县抱犊崮一带的匪首孙美瑶。

一、孙美珠、孙美瑶毁家为匪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地方军队向极腐败，卫民不足，扰民有余。由于民不聊生，所以山东省内成股落草的很多，其中以抱犊岗一股人数为最多。匪徒为求立足，一般都遵循“兔子不吃窝边草”原则，对附近富户很少抢劫，惟遇生意冷淡，伙食无着时，方向周围富户商借粮食。孙家原为富户，门弟宽广，房舍甚多，骡马成群，世据良田6顷，为峄县望族，与该县齐村的晚清翰林崔子湘有姻娅关系。孙氏兄弟五人，美珠最长，美瑶最幼。美珠字明甫，乳名大珍，山东峄县（今枣庄市）西沙棚村人，清末秀才。此人足智多谋。其胞弟美瑶性情粗暴。当时，抱犊崮落草的人们

向孙家借粮，美珠总是慷慨应允，从不拒绝。为此，曾多次被官兵借口敲诈勒索，搅得全家不得安宁。

为应付这种时局，孙氏一家人便集商对策。美珠忿言道："匪借粮，不借则结怨于匪，借了则受官兵陷害，真是左右为难，依我之见，到不如率众入伙，反而痛快。"当时，美珠虽出此言，但并未下最后决心。过数日，美珠又与其友人王翼民密商求计，王说："我们秀才既不能揭竿而起，就只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表兄既已进退维谷，倒不如变卖田园，剥掉秀才皮，入伙当土匪。"孙听了王的话，颇感痛快淋漓，再加正合己意，便当即对王说："王兄所言极是，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铤而走险，就这样决定了！"至此，孙便决意从匪。回到家里，美珠又与乃弟孙美瑶相商，美瑶也完全赞同，并极力撺掇。于是，他们便召集族人共商落草从匪的计划。

经一番磋商，决定如下四条：一是变卖家产、购买武器；二是派孙美瑶的族弟、行伍出身的孙美崧和孙美瑶同赴上海购买枪支弹药，并与上海、南京有关方面人士进行联络，以作外援；三是由孙美崧和孙美瑶到徐州、济南和鲁南等地，与各方面拉拢关系，联络各地股匪杆首，招兵买马，聚集匪徒，组织队伍；四是建立秘密联络点，刺探当时官府剿匪的消息。

计划制定后，孙美崧、孙美瑶二人便起程赴上海、南京等地进行联络，设法购买武器。二孙到上海后，首先拜访了张聘卿。张是山东省峄县台儿庄人，在上海、南京均有住宅。他是安清帮大字班，曾广收门徒，各阶层人士来者一概不拒。与南京的张飞、南通的张锦瑚为盟兄弟。曾任过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参议。孙美崧二人通过安清帮的关系，从德国洋行购买了套筒子钢枪 200 枝，盒子枪 50 枝，子弹若干箱。购妥武器之后，孙美崧便到南京找张飞设法解决运输问题。张飞是山东省滕县东漷人，安清帮大字班，长住南京夫子庙，门徒众多，散布长江下游及运河各大码头，

外号“大将张飞”，与张锦瑚、张聘卿并称为南清三老。张见到孙美崧后，问明来意，于是分别通知沿运河各码头水卡船帮的安清帮弟子，利用载运大米的船只，将武器装在船舱底部，分别运出。由于他们的保护，二孙在上海所购枪支弹药，均顺利运到台儿庄，然后由孙美珠负责运往山里。

二孙此次南行，通过张聘卿、张飞等安清帮重要人物的关系，还结识了刘玉斗（滕县兔子山人，出身贫苦，粗识文字，安清帮大字班，其门徒多系草泽中人，后曾任孙美珠、孙美瑶和山东巨匪刘黑七的军师）、张锦瑚、刘传金（滕县人，常住徐州，系鸦片商人。安清帮通字班，与张锦瑚、杜月笙有密切关系）、宋朝胜（滕县东山里人，安清帮通字班。幼年从乃父在北京游过大小权贵之门，专勾结北洋政府警卫人员，刺探军情）、郭致祥（泰安县人，田中玉任山东督军时，曾任济南警察局某分局局长，并密任孙美珠的济南联络员）、朱陶（滕县冯庄人，毕业于济南蚕业学校，后为孙美珠的联络员，参与了临城劫车案的谋划）、丁开发（江苏涟水县人，苏州镖局出身，是张聘卿的关门弟子，后任孙美瑶的参谋处长、警卫连长）、刘清源（滕县响水口人，刘姓是滕县东乡望族。后为杆首，所部二三百人，尽是本乡本族。刘在匪中颇有声望，能仗义执言，遇有纠纷，片言可以折众）、郭琪才（滕县东乡人，先后两度为匪，所部以游兵溃勇为多）和李子丹等人，在组织上打下了基础。为进一步联络党羽，准备力量，二孙从上海返回后，孙美瑶又以斗鹌鹑为名，奔走各地，又结识了张敬尧部下的毛思忠、毛思义等人。至此，武器及组织准备基本就绪了。

二、建立土匪武装

孙美珠等人建立土匪武装，实际上主要是将峄县及附近地区各股匪集中统一起来，因而是比较困难而复杂的，待武器人员有

了着落后，他们便着手进行组织。在孙美珠的组织下，先是在西沙棚村召开了第一次各地股匪首领会议，此次集会，他们商定了如下建立土匪武装的计划。

（一）队伍的番号定为“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并设立总司令部。

（二）总司令部的组织人员如下：孙美珠为总司令，刘玉斗为军师，孙桂芝为参谋长，丁开法为参谋处长，孙美崧为第一路司令，郭琪才为第二路司令，周天松为第三路司令，王继湘为第四路司令，刘清源为第五路司令。

（三）设立联络站。各地联络站的负责人是：滕县和鲁南一带由朱陶兼任，临城为李子丹，济南是郭致祥，薛城是尤吉三（峄县台儿庄人，出身地主，曾留学日本，是张聘卿的弟子），徐州为刘传金，上海为夏敏尧和一个姓牛的，南京由张飞兼管，北京是宋朝胜，临沂、郯城、日照等县由刘玉斗、段青芝、彭仲衡、徐子尚、赵宝泰、关德轩等人负责。

（四）举事地点在滕县与峄县交界处的金銮殿。举事时间定为1920年清明节前后。

（五）活动的根据地在峄县城北60里的抱犊崮山区。

（六）与各地零星股匪进一步联系，统一合作，逐步扩大组织，壮大力量。

孙美珠和各股匪首完成建立土匪武装的整套部署后，便独自一人到祖坟去哭祭孙氏列祖列宗。届时，孙美瑶用煤油将自家全部瓦屋楼房付之一炬，孙氏兄弟便率队直奔金銮殿。中途回首，仍见西沙棚村大火弥漫，黑烟滚滚直冲云天。

金銮殿聚首之后，各路匪首便各回原防地，尽其所能扩大活动范围，扩充力量，不久便形成一支很强的土匪队伍。他们的大本营设在抱犊崮，抱犊崮又名君山，其地在峄县东北、临沂之西、费县之南、滕县的东南方，适在四县插花地上，大部分属峄县，为

山中诸峰之冠。山的上端为突出之悬崖绝壁，俗谓之崮。顶上宽平广数顷，昔年为耕种崮顶田地，由于路险牵不上牛去，只好抱个小牛犊上去，养大了再用它耕地，因而得名“抱犊崮”。其状宛如茶杯倒置，周围都是绝壁，只有北面一线鸟道可通。鸟道中间最险处，凭石匠凿的半环形扒手，方可手脚并用，攀援而上。其余地方都是陡立的绝壁，真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个所在。崮下万山围绕，群峰拱立，树木茂盛，山村相望。此处虽上山可守，下山可攻，但其不足处是缺水。崮下虽有小泉，然一旦官兵围困，就远水救不了近渴了。

孙匪一伙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归国的华工很多，擅长军事建筑工程，由他们设计，在崮顶上沿着边沿建筑了一条半永久性的战壕。这条战壕，能避风雨，还可以代宿舍供匪居住。在崮顶中间，凿了个宽广的大蓄水池，以供崮上人饮用。平时孙美珠等就把不能送走的家小和伤员收容在这里，留下少部分人防守，自己则带大部主力在山下百余里外活动。他们因实力远不如官兵，且弹药补充困难，因而总是采取避战策略，日夜奔窜。只要没有官军围攻，崮上的人就得运粮汲水，忙个不停。他们还规定了秘密的旗语灯号，当遇到官兵围困时，缺水悬什么颜色的旗，短粮了挂什么色的灯，以告山下匪众前来救援。孙美珠匪部选择这么个地方作为根据地，真是煞费苦心了。

三、羊庄抢劫与老头子山战斗

羊庄位于滕县城东南狐驼山南麓，地势险要，风景清幽，能控制南北山口匪徒的出入。这里是大地主马世钰的家乡。马为人豪强自负，并拥有一伙看家护院的家丁，多年来称霸一方，常跟孙美珠匪部过境为难。孙因为吃了马家不少的亏，因而对马家恨之入骨，恰逢马父去世，为孙匪探得消息。于是，孙美珠便决定趁

马居父丧大宴宾客之际，出其不意地袭击马家一下。孙先密派得力匪徒冒充吊丧者，混入羊庄街里，以作内应。为先发制人，消灭马家看家武装，他亲率一小队人马，直冲入马家的自卫队部。这样，他们里应外合，很顺利地便缴了马家护院武装的枪支。之后，以风卷残云之势，将马家客厅内外的缎帐细软及门前的骡马抢劫一空，满载而去。

羊庄抢劫得利后，促成了滕、峄、临、费各县零星股匪的统一。参谋处长丁开发见形势有利，便向孙建议说："现在我们的力量强大了。应和北洋官军第六旅大干一场。"孙美珠当即表示同意。

时过不久，他们便在老头子山召集各路股匪首领开会。孙美珠首先提出打六旅的意见之后，丁开发说："大当家的说得对，以前我们打了几个小胜仗，如这回能狠狠揍他们一下，以后他们就不敢进山来剿我们了。"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当即决定以孙美珠的名义给第六旅下战表，约定在老头子山较量一番。会议结束后，孙美珠又与刘玉斗、丁开发等仔细研究了办法，一致认为，老头子山东有五旅，西有六旅，不能两面作战，要打拉兼施，各个击破，方可取胜。当时的情况是，六旅的战斗力较强，五旅原系旧巡防营改编，拖家带眷，子女众多，官兵生活较苦，多次偷卖子弹、贩运私盐来补生活之不足，战斗力较差。经过分析，他们决定联五打六。很快，刘玉斗即通过安清帮的盐贩子关系，贿赂收买了五旅旅长李森，并约定双方开火后枪朝天打，待孙部将六旅击溃后，五旅再伪装全面进攻。外围工作安排妥当后，孙美珠即着手调配兵力，作了如下部署：孙美珠自任总指挥，刘玉斗、丁开法为军师；把主要力量1000余人配备于老头子山西麓，少部分力量放于该山东麓；西路由郭琪才指挥，统辖刘清源、王守义和胡成采部；东路由周天松指挥，主要力量为周天伦匪部；孙美崧和李广田部为预备队；宋朝胜统辖其他各部分位于徐庄、大庵一带牵制六旅后方。

6月3日晚，各部匪众陆续到达老头子山附近地区，4日晚全部进入阵地，以逸待劳。翌日，官军第五、第六两旅分从东西两面向老头子山扑来，前为各县地方武装，后为正规部队，总共约有8000余人，来势颇为猛烈。6日拂晓战斗开始，双方酣战一天，未分胜负。当天晚上，孙美珠重新作了部署，决定将所有好匣枪、冲锋枪集中到第一线，另又挑选10名好射手，准备先把六旅的重机枪射手打掉，以扼制其火力，然后再长短枪集中射击，待敌阵乱后，即发起反攻。

第二天天刚破晓，六旅的重机枪一齐开火，一阵紧似一阵。孙匪将抽调的神枪手编为一个班，由段得胜任班长，张辅胜佐之，归郭琪才统一指挥。只见郭一声令下，段得胜、张辅胜果然出手不凡，一枪一个，一排子弹就干掉了官军5个机枪射手。几乎与此同时，另几个射手将其余机枪射手也打掉了。顿时，六旅阵地的机枪全变成了哑巴，引起一阵骚乱。郭琪才抓住战机，下令发起反击。经一阵冲杀撕拼，六旅官兵士气大减，全线崩溃，六旅损失惨重，一团二营营长杜吉卿也被孙匪所俘。

四、西集激战孙匪授首

西集位于李庄、横岭铺、邹坞三角地带的中心，三面环山，西临大平原，当时为官军第六旅吴锡九团包围抱犊崮北路据点之一，驻有一个连的兵力。孙匪为突破六旅的母猪窝、徐庄一线对他们的包围，决定把六旅在西集的这个据点拔掉。于是，在老头子山战斗不久，孙美珠又调集人马，对西集进行了突然袭击。

西集北门外面是一个场院，当时堆放着很多柴草，特别便于隐蔽。北门内不远处有个铁匠铺。根据这些情况，孙匪美珠作了如下部署：派3个人夜间偷偷爬进寨子，一人到铁匠铺取个大铁锤把此门的锁砸开，一人负责把守在北门的哨兵结果了，待开了

北门后，孙美珠亲率小队人马闯入寨中直扑官军连部。双方开火后，先进去的另一个则燃火为号，里外一齐进攻。此外，北门外还埋伏百余人，等孙匪所带小队得手后马上冲入寨中。另外200人偷占西集南门外小山，其余大部分埋伏于西集东部以作策应。

当夜天将破晓时，孙匪陆续赶到西集附近。按预定计划，先爬进去3个人。当一个到铁匠铺取铁锤时，被北寨门的步哨发现了。待步哨走近时，见这个人腰间插有盒子枪皮，举枪要打，恰在这时，另一土匪赶到了，一枪把哨兵打倒。枪声一响，各处哨兵都警觉起来，到处是问口令的喊声。这时，负责取铁锤的土匪拿上铁锤跑回北门，三锤两下就把锁头砸开了，乘北门尚无人的机会，孙美珠带领20余名土匪冲入寨内，拼命向南飞跑，去包围连部。接着，负责点火的土匪也把麦垛点着了，顿时火光冲天，潜伏于寨外的匪徒们听到枪声，又见寨内燃起火来，都知是先头人马已经得手，各路便蜂拥扑向西集。

话分两头。当北寨门响起枪声后，驻守西集的全连官兵闻警，迅速起床，各执枪械奔赴自己的固定岗位。他们在一家店铺的北墙上预作了一个秘密工事，是用来发生情况后封锁北街的。平时，这个秘密工事是用泥抹着的，连铺家也搞不清是干什么用的。为封锁北门，由一个班长带4个人飞奔有秘密工事的铺家，用刺刀把墙上的枪眼挖开，5枝枪一齐开火，朝着北门猛烈射击，在官兵挖枪眼的当口，孙美珠率领20多名敢死队员由北门闯入寨子，正拼命向南奔去包围连部的时候，秘密工事的枪眼挖开了。当孙匪一伙冲至北街中间时，官军开始了射击，一排子弹过去，孙美珠腹部被击中，同去的匪徒见大杆首受伤倒地，忙上去扶起，架到一家门首，把门撞开后到院中躲避，及至院中，孙匪因流血过多，一命呜呼了，官兵连长听到北街枪声密集，又加派2人扛上一箱子弹前去支援。这样，7枝步枪形成火力网，把北街给封锁住了。与孙美珠同去的匪徒见官兵火力甚猛，更加孙匪被击毙，知大势

已去，一个个无心恋战、弃尸而逃，大部分也作了枪下之鬼。

当孙美珠带领20余名土匪先闯入寨内后，后面又有七八十人也陆续赶到，均被官兵火力所阻，无法从北街前进，于是匪兵分两股，便从北街外向南迂回进攻。在匪徒摸索前进中，正好与官军相遇，双方在小巷中展开了肉搏战，在南山上埋伏的200多名匪徒听到北寨门处枪声激烈，也向寨内猛攻。他们打入寨内后，处处有官军抵抗，难以得手。黎明前后，双方打得最为猛烈，互有伤亡。待天亮之后，匪徒们得知孙美珠已死，一下子气都泄了，纷纷溃退。孙美瑶听说乃兄毙命，痛哭失声，硬逼着匪众死拼报仇。群匪无心再战，甚至有的带头逃跑，引起一阵火并，之后，就窜回山中去了。

清晨，驻守西集的官军开始打扫战场。一个理发师走来悄悄对一个士兵说："这一仗打得可好，你们把大杆首孙美珠给打死了。"士兵闻听此言，赶忙跑去报告了连长。连长听后十分高兴，但又半信半疑，为彻底搞清，就把理发师请到连部。连长问："你怎么认得孙美珠呢？"理发师说："我经常进山去赶集理发，孙匪一伙人也常叫我去给他们'马网子'，上两个集我还给孙美珠马过网子呢，怎么不认识他。"（土匪们忌讳剃头二字，以为说剃头不吉利，故称为马网子）。连长又说："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报给上边我得负责，万一弄错了我可吃罪不起。"那位理发师不含糊，十分肯定地说："这事绝对错不了，我敢向长官担保。"连长见理发师说得如此肯切，也就不再怀疑了。于是，他们来到一片乱尸中，理发师毫不犹豫地走到一具尸体旁，用手一指说："这就是孙美珠。"大家顿时围拢上去，只见死者四方脸盘，恶眉大眼，颧骨突出，指甲很长，是腹部中弹而亡的。连长认为这事很有把握了，便借了一把铡刀，把孙美珠的头切了下来，放进一个煤油筒里，撒上厚厚一层食盐，便亲自带上送往枣庄去了。当时，正值何镇守使公务繁忙，脱不开身，就让这位连长又转解济南督署。到济南

后，马上把孙匪首级拍了照片，悬挂于津浦铁路沿线的车站，宣传群众，威慑匪徒，以儆效尤。该连击毙匪首有功，督署奖励其大洋 1000 元。

五、临城劫车经过

孙美珠被击毙后，土匪锐气大减，官军进剿较为得手，于是更加紧了围剿步伐，日夜跟踪，穷追不舍。这样一来，土匪活动区域日渐缩小，生存日趋艰难。孙匪一伙十分清楚，和北洋官军死拼，力量悬殊，如卵击石，是自取灭亡，如远走他方，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扎脚之地，况且匪中不少人也不情愿离开故土。经一番分析认为，摆脱目前困境，非闯大祸难以渡过难关。按照张聘卿、朱陶的意见，决定在津浦路上打主意，扒铁路，劫火车，架富票，不管是本国人还是洋人，得手便一齐绑架，使北洋政府和军阀政客来个手足无措，大则造成国际事变，小者也叫他们丢丢丑。因为准备劫的是国际列车，因而必定有洋人，这就碍及国际交涉，势必会使北洋官军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剿捕。借此机会，匪部即可要挟政府，以走招安之路。这当是孙匪劫车之主要原因。此外，孙美珠被官军击杀后，众推孙美瑶为杆首，继任乃兄“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总司令”职务。为给孙美珠报仇，因而决定大干一场，这是临案发生的一个原因。

为使劫车顺利，匪首们精心策划，作了如下部署：

由孙美瑶担任总指挥，指挥部设于巨山山上，孙美崧带领少数匪众，配备精良武器，坚守老巢抱犊崮，让丁开发、周天松分别挑选所部身强体壮、精通武术者持短枪劫车。

郭琪才部身藏短枪秘密潜入临城街里和车站附近，监视和牵制官军第六旅的驻防部分及徐兖警务段警务人员。派刘清源和阎守聚两部，位于临城至枣庄之间，牵制第六旅驻邹坞的部队，专

负打援与接应之责。王守义和褚思振两部，潜伏于铁路以西的卜岭和白山一带，以之作为疑兵，牵制滕、峄两县的警备队，并通过微山湖水上交通，与沛县和曹属一带的土匪范明新部及时取得联系。吴臭带其所部匪众出没于马庙至峨山口之间，飘乎东西，以牵制第六旅前沿阵地的兵力。刘守庭小队骑匪，位于青山与焦山之间，主要是搜查山外行人及负责通迅联络。让王继湘选派华工中有技术者，负责扒坏铁路。另外，他们还预派部分匪徒，伪装为行旅搭乘火车，作为劫车的内应。

他们确定，劫车地点在临城与沙沟车站之间，时间为1923年5月6日（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清晨，所劫车次是从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蓝钢皮快车。一切部署可谓是严密周详。

一切部署停当，届时匪众即各按原定计划行动。王继湘带人到达预定地点后，在铁路检修工的住房里抢来工具，把铁轨卸下一根，仍摆入在原处一旁，等到火车司机发现，早已煞车不及。倾刻间，火车头及三等客车厢两三节出轨，歪斜于路基之上，后面的头等、二等车厢及卧铺车尚安然无恙。车停后，早已预伏等候在铁路旁的匪徒们，在丁开发和周天松的带领下，飞快窜上路基，纷纷夺门破窗而入，加之早已在车上的伪装旅客匪徒的内应，使劫车进行得非常顺利。匪徒们迅速将车上的金银细软贵重之物洗掠一空，并将部分中外旅客掳去。劫车时一枪未发，即告成功，只是临走之时，才放了几枪。劫车匪徒押着被掳肉票行10余里后，北洋官军第六旅闻讯赶到。匪徒发现官军来追，便斜行爬山，迂回避战，加快行进。六旅向着匪众开了一炮，以观有何反应。只见被架旅客纷纷手挥白巾，以示别打之意。匪徒们且占且退，催促肉票快行，不停地往山岭上爬着。后因英国人罗士满被弹击毙，其余被掳乘客怕危及自身生命，纷纷要求丁、周停战。于是丁开发等便派西人台氏携带一个翻译送书六旅追军。信中声言，如官军再不停止追击，就把所有被掳中西乘客全部杀掉。追兵鉴于枪

杀外人关系重大，当即停止了追击。今既架有外籍旅客，如何对付，六旅莫敢自主，决定先回防地，待请示后再作行止。于是，匪众们驱赶着中西乘客，奔向他们的老巢抱犊崮而去。此时被掳人员一个个如驯服的绵羊，听任土匪摆布，莫敢奈何。其中一法国妇人，实在不堪步行，无法带回，遂弃于邹坞，后转天津。当日晨，驻防官军及护路警兵赶往出事地点进行实地调查，只见该处铁路两侧，箱笼皮包狼籍满地。等到第二次再去复查时，一切物件皆无，统统不翼而飞。是谁人顺手牵羊去发点劫车案的小洋财，这就不得而知了。

六、田督军迁怒于部下

孙匪临城劫车一举，是当地政府及官军所始料不及的。此案既发生于山东地界，疏于防范之责本该由山东督军田中玉主动承担。然而，田督军却推卸责任，委过于部下。临城一带属兖州管辖范围，当时兖州的镇守便是由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何锋钰兼任的。何旅长初为山东新军训练总司令，所辖有尹锡五步兵第一旅，薄子明步兵第二旅及炮兵、骑兵各1营。因逐年裁汰，至劫车案发生时，所存兵力只有步兵2个团，骑、炮兵各1营了。第一团团长是吴锡九，第二团的团长为贺丹墀。

临案发生后，田督军闻之大怒，扬言要用刀来解决问题，意即对驻防兖州一带官军严加追究。六旅主要官长得此消息，无不震惊，为上司这种委过下属行为深感愤慨。翌日晨8时许，何镇守使与贺、吴两团长一起来到第一团第一营营部，个个脸上冷气森森，行色匆匆，默无一言。到营长寝室后，吴团长立即教屏去左右，并令一营长亲自在门外站岗，三人便开始了谈话，密商应付田督军带刀问题的对策。

三人会议正在进行中，忽有一年轻的英国人带着翻译来找何

镇守使，想探询一下英国人被架后的情形。这位英人来到客厅，就一屁股坐在靠近门的桌子上，斜歪着身子，两手抱肩，举止轻薄，态度傲慢，盛气凌人，样子十分令人可憎。恰在这时，何锋钰镇守使从屋内走出，到客厅一见那个英人的姿式，满肚子的火就不打一处来，顿时怒上眉梢。他手指英人问道："这是个什么东西？"翻译一看势头不对，赶忙说，他是英国驻天津领事的书记官，领事没在家，他是专门来探听英人被架消息的。何镇守使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的气，这下可送来个发泄的地方。他怒不可遏，声色俱厉吼道："你这个样子，就不怕给你们国家丢人！难道你们国家都是坐在桌子上谈！你这个下三烂东西，我没什么好对你讲，快滚出去！"说完，又转对翻译说："你要一字一句翻译给他听，如以后再不管是人不是人就朝我这儿领，当心你的脑袋！"英人见此情景乖乖从桌上下来，垂手站立一旁。何镇守骂完之后，就同贺团长回枣庄去了。那个英人见没人答睬他，也就退出而去了。

为防田督军对部下采取强硬处置措施，应付突然事变，六旅将其主力集结于铁路沿线附近，并约定各团旅军官暂不与田督军单独会面，以观动静。果不出所料，不几日，田中玉即乘专列南下。当他到达兖州车站后，站内如常，并无仪仗队相接，心中不禁愕然。为防不测，田督军未下车就继续南行了。车至滕县、临城等车站时，均无人迎接。田听说何镇守驻在枣庄，及到枣庄后，亦不见何的影子。他在枣庄停车并安排好行辕之后，立即传见何锋钰，何却称病未去。田见沿途无人迎接于他，到枣庄后何又不见，且请都不来，知是风声走漏，早有提防，因而不敢贸然行事，只好就坡下驴了。田由硬变软，只身简从前往何处探望。见面后，田开口就说："都到什么时候了，还闹脾气。"何说确实有病，不能前往迎接，田也就不再认真计较了。之后，谈了些营救的事，田就告辞了。一场刀光剑影的风波也就这样暂且过去了。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田督军对何更为不满，虽一时未能遂愿，

但却耿耿于怀。时过不久，田督军即决定将何锋钰免职，而以张培荣代之。六旅军官闻听后，均表不服，尤其两团长坚决抗命，并作了周密部署。真是一波刚过一波又起。何镇守使听到消息后，换上便装，即轻车简从，到上海避风去了。何锋钰的胞叔何春江，当时在省上供职，任都统。正当形势紧张、处在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何春江得悉后，生怕事态闹大，便派专人来请吴、贺两团长到省面谈。见面之后，何春江语重心长地对两位团长说：为了我何家，你们不惜一切，这我是很感激的。我跟田督军共事多年，配合默契，私交也不错，倘若你们采取什么对抗行动，我可怎么为人呢。况且，目前国势艰难，更不该在我们内部自兴干戈，望你们共体时艰，以国家大局为重，也为老朽着想，就莫再采取异动了。再说，大家也知道我们何家并不是没有饭吃，对镇守使这一职位也并不很看重，当不当并没有关系。你们与小侄共处多年，亲如家人，这次既是为何家好，就应听何家的话才是啊。何春江说完，止不住长嘘短叹，双方相对无言。两个团长见如此情景，也就再无话可说，于是告退，各回防地去了。自然，何锋钰镇守使一职不久也就被田督军给免掉了。

七、北洋政府对临案的处置

孙美瑶匪部在临城劫车后，顷刻间中外为之轰动。一时间，中外记者及营救人员纷纷涌入枣庄；官方人士往来如织，中兴煤矿公司热闹非凡；部队云集，枣庄镇如临大敌一般，尤其枣庄车站更显得气氛紧张；由于人员突增，旅馆、饭店、茶楼、酒市，终日客满，呈现出一派不寻常的畸形繁荣景象。

孙美瑶劫去中外旅客，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给北洋政府制造了不少麻烦。若采取强硬态度，派兵进剿，怕危及外人生命安全，导致国际纠纷；如果不打，又耽心会助长了土匪气焰，以后

匪患更甚。再说，此事件中外瞩目，中外人士纷纷要求营救被掳人员，采取置之不理态度已是不可能的了。那么，曹锟政府究竟如何处理呢？人们都在翘首以待。

山东督军田中玉一直是主张武力围剿的。临案发生后，北京政府曾电召田到京，列席阁员会议汇报情况。当时，田督军就慷慨陈词："此案发生后，中央因事涉外交不主速剿，首先与匪方谈判。奈匪贪得无厌，得寸进尺，所提条件日凶一日，藐视政府，如以后仍再主和，则威信扫地，本人愿辞职待罪。"但北京政府并未接受田的主张。

北京政府一方面责令山东督军田中玉派兵将山中土匪严密包围，勿令远窜，同时又调兵遣将，加强了津浦路沿线各重要车站的防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孙美瑶匪众妥协退让，派员进山与匪交涉，进行谈判。双方谈判主要是在枣庄进行，由山里派代表到枣庄与省方大员进行谈判，滕、峄两县知事及当地绅士和团体代表也参加了接洽工作。双方代表驻留的地方皆设有步哨，设岗检查，戒备森严。官方由郑士琦发通行证，匪方由孙美瑶的叔叔、人称"老当家"的孙桂枝发通行证，凡无证者一律不得出入。5月11日谈判开始，到6月12日乃告结束，前后费时一月有余。北洋政府官员和地方绅商参与谈判的有陈调元、杨琪山、申士魁、陈孝全、郑士琦、温世珍、黄德本、李麟阁、崔广沅、徐廉泉、陈华亭、刘正举、刘翰卿、薛跃宗、金方远、刘子干、刘玉德、陈家斗、陈炳辰、金省臣等20余人。匪方代表有孙美瑶、孙桂枝、孙美崧、郭琪才、王继湘，丁开发、周天松、刘玉斗、孙鸿图、诸葛亭、刘清源、刘守庭、褚思振、周天伦、孙经汉、刘梧桐、济振江、刘凤翔、王文卿、朱陶等20人。除此之外，上海总商会的孙筹成、冯少山及北京总商会代表等，也参加了说项、调停与周旋，而且还为被架肉票送了生活用品。（此内容将专章详述）。

谈判的中心内容无非就这么两个方面，一是释放肉票的条件

和办法；再是招抚收编匪众的条件和办法。双方谈判经历是颇为曲折的。中间有过不少争执、磨擦和斗争。孙美瑶深知临案关系重大，政府不敢贸然行事而致谈判中止，所以一开始就提出了苛刻条件，进行要挟。因政府一时难以应允，孙匪还一度故示决裂，开火示威，并撕去华票5名。同时，孙美瑶发了如下通告。

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孙美瑶为通告事：

吾同人等素具爱国热忱，原不以抢劫为本能，然值此无信月之政府，不正当之时代，不得不铤而走险，借以扬眉而吐气也。今军人等欺我太甚，吾实有不能已于言者，前数年，湖南招安，吾同仁兄弟未尝不额手相庆，色然而喜曰："天生我等以钢筋铁肋，今后可以效忠于国家矣！名垂于竹帛矣！"不知张督敬尧一经塌台，立将吾等尽行遣散，如栗凤羽等一时豪杰，皆郁而不平，衡情而论，谁肯甘心！不但此也，迨同仁等回籍安度，又被一般人面兽心，衣冠败类，可恶绅董，反造黑白，信口告讦，诬为故匪，有家不得归，到处无立足。我非木石，能不重蹈大海为蛟螭耶！由是集合同志，占领君山保主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真天地之根据地也。乃竟有廿旅牵入，突如其来，攻我本岗，一则曰："招安投诚"，再则曰："缴械受缚"。满口复杂，大言恐吓，实令人忍无可忍。吾人非不愿受招安，但恐再受其愚，故于三月廿一日有特别快车截劫洋人之举。是役也，非为抢劫财物也，非欲惹出国际交涉也，盖以中国若许政府，若许军人，无诚意，无统绪，诚不如外人保其信耳。今已至此，别无可言，若无水落石出之办法，予给正式之条件，许我相宜之驻地，决不放回西人。且吾地盘中，类皆父老兄弟，倘政府果有真实无伪之优待，俾得大展其志，定为地方上造极大幸福，断不似现军人之鱼肉乡民，贪生怕死。不然，非特泰、兖、沂、曹永受其蹂躏，将见我四万万同胞无安枕之日矣。吾同仁既不畏内，又不惧外，丈夫处世，敢做敢当，进退自如，有何惭乎哉！国存于斯，国亡于斯，吾国人戒令慎之审之可

也。为特告通知。

孙美瑶在通告中主要表达了这么几个意思：一是他们之所以为匪，是因为政府腐败，官军逼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二是愿接受招安，但又顾虑重重，深怕政府言而无信；三是用手中的中外肉票要挟政府，表示了强硬态度。

对孙匪所提苛刻条件，官方认为难以答复，也曾准备中止谈判，发动新的围剿，并调集了数架飞机，打算轰炸抱犊崮。但还是因为耽心这样做了，难免伤害外人，实在不好交待，故未成行。后经多多周旋，官匪两方最后达成了如下协议：为表官方诚意，将包围抱犊崮的各路官军从现地全部撤退；孙美瑶接受招抚改编，改编后归北洋第六旅节制；接受改编的条件是，各级匪首加官留用，改编后成立的新编旅由孙美瑶任旅长，现在匪众有枪者收编2000人，成立2个团，无枪者收编500人，作为补充兵，其余的遣散；不论就编与否，发给每个匪徒大洋20元；即日起释放所有被掳中西肉票。

6月11日双方达成协议，12日即将未释之被架肉票大部放出，官军第六旅同时亦派员进山收编匪众。收编过程中，手续十分繁杂，不仅逐人登记姓名、年龄等基本情况，还须验明受编人两手箕斗，一一注明，为了是防止有冒名顶替的。因此，收编工作一直到7月29日方告结束。收编完后，孙美瑶率新编旅下山，设防于枣庄车站，旅部设在下马道路南。孙美瑶为新编旅旅长，参谋长为朱陶，副官长是程焕寅，卫队连长由丁开发兼任。下设2个团，第一团团部驻郭里集，团长是郭琪才，团副为张传德。第二团团部驻枣庄附近的葛村，团长是周天松，团副是刘汉亭。

新编旅接受枣庄防务后，孙美瑶当即发了一纸所谓安民告示，以表明自己去恶从善之意，布告原文录下：

照得本旅官兵，原具本土良民，只因被匪所扰，复为官府不谅，家乡荡然，不能安业，不得已铤而走险，久在地方父老洞察

之中。此次幸蒙政府开诚招安，地方父老担保，得使编成正式军队。本旅官兵，素明大义，俱深感政府与地方之德，誓当宣力为国，以赎前愆。至于对服从命令，保护地方，尤属应尽之天职。兹因出防伊始，诚恐外间或有谣言，地方发生误会，故特恺切布告，凡本旅所住各地，务望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经此出示之后，倘有前项情事，一经查出，或被人民告发，即予严办，决不宽贷，特此通告。

至此，孙美瑶所部也就成为北洋官军一部分了。

八、上海总商会的营救活动

临案发生后，因被架旅客中有些是上海人，所以被掳肉票家属纷纷请求上海总商会出面，设法营救。数日后，上海总商会又得悉被掳诸人于当夜被押送山中，被逼步行山路数十里，不仅搞得疲乏不堪，且山中缺衣少粮，至使不少人患病。于是，乃于5月23日召开会董紧急会议，决定会同各省旅沪同乡联合会一起组成救护队赴鲁。

5月26日，上海总商会的救护队由冯少山、孙筹成带领，并带有被单、毛巾、衬衫、肥皂、水果、罐头、医药用品等共10余箱启程。5月27日晨，救护队到达临城，当地驻军派兵保护救护队到达枣庄。

冯少山、孙筹成等到枣庄后，便于29日致函山东督军田中玉，言明此番前来，主要是希望早日援救被掳肉票脱险，并提出了收编孙美瑶的建议。后见官方对临案徘徊瞻顾，举棋不定，救护队便商定自谋展开工作。于是便以冯、孙二人名义给孙匪写信，说明救护队来枣，带有被服、食品，为的是接济被难人士，还带有医生前来，并携有药品。听说山中患病的不少，请允许医生进山治疗。次日即收到孙匪等复函，信中表达了欢迎之意。

商会代表自与匪方互通书信以后，双方开始联系，匪方派丁开发、王文卿、济镇江、孙汉经4人下山向商会代表接洽接收救济物品。孙筹成等在与山里派来的人交谈中，得知山中粮食紧张，便又发报上海总商会，请速购米面起运枣庄。随之，所有救援物品分批运往山中。

6月6日，山内再次派孙经汉、褚思振、诸葛亭、王文卿、丁开发、郭琪才诸头目下山，对救济会送来物品表示谢意。趁此机会，孙筹成对郭琪才做工作说，现在政府既然主张招抚，等到招抚手续就绪，释放肉票需无条件，中外一律。郭琪才提出，释放肉票时要由美国人安迪生（即安德森）作保，并要求滕、峄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等团体代表同时上山作证。很显然，山中是怕释票后政府中途变卦，当即，孙筹成应允届时一定上山作证。

6月11日官府和匪方达成协议，12日孙筹成即和滕、峄两县士绅入山。他们到娥山口后，在陆军第二十团本部会合陈调元、温世珍、吴长植、安迪生等同行进山。抵达山中十里河，双方乃去一大草棚开会，各具保证书彼此交换。

安迪生交孙桂枝的保证书中写道："鄙人安德森美国人，中国之生死至友也。鉴于山中诸兄弟之苦况，并屡次会议，今鉴于诸当家表示之忠诚，言辞恳切，情愿投诚，鄙人愿担保诸兄弟编入军队……受抚后所有以前罪犯由政府一概赦免。受编之后，所有规定饷项由政府按照阶级按月照发，此项担保，自签字之日起以三年为限。……。"孙筹成等10位证人，也均在保证书上亲笔签名。

孙桂枝交安迪生的保证书是这样写的："鄙人孙桂枝代表众兄弟，愿受招抚编成国军。从此之后，永远忠心国家，决不做违反军纪及其他有损军人名誉之行为。并代表众兄弟郑重声明：对于安先生亲信不疑，对于安先生担保永矢遵守。"同样，那10位证人也在上签了名。

当日，即将外票全部释放，华票只放出部分。被放各票由安迪生、温世珍伴送下山，其余入山诸人留宿山中。虽然已签了保证书，但匪方对官方尚存疑虑，深恐外票一旦释出，官方言而无信，又改抚为剿。其所以要求诸人留宿山里，无非是作为人质罢了。

是夜，留在山上的人同宿于一大草棚内，孙美瑶前来闲谈。陈调元与孙美瑶已有多次接触，比较熟了。谈话也就随便些了。陈见孙两眼红肿，便询问何故，孙说因改编事务繁忙，连夜失眠。陈立即将自己所戴的墨晶眼镜取下赠孙，并说，老弟一寨之主，关系重大，应格外保重。孙一面道谢，一面向陈建议说，你和吴旅长所带的卫队都携有手枪，放在身边，恐在山中不方便，不如由我替他们保管的好。陈吴二人立即同意，并吩咐副官命令卫士将所有武器一并交与孙当家的代为收藏。

13日晨，孙筹成征得孙美瑶同意，到巢云观看望未释华票。只见华票6人同住一个草棚内，一个个面黄肌瘦，头发蓬松，衣服肮脏，臭气扑鼻，恰如囚犯一般。华票纷纷倾吐苦楚。至此，未释华票尚有10余人，孙匪还欲从这些人身上诈些钱财，但终未能如愿。孙匪被收编后，孙筹成等于18日返回上海，向上海总商会汇报整个营救情况。上海总商会为临城劫车一案所做的工作，至此也就结束了。

九、田督军决意除心患

孙美瑶当上新编旅旅长后，以为自此可光宗耀祖，太平无事了，因而心情比较舒畅。一时间，终日送往迎来，忙碌非常。他除回西沙棚老家祭祖外，又亲赴省城拜见了山东督军田中玉。孙美瑶万没料到，他虽被招抚，成了北洋官军的一部分和田督军的部下，但田中玉对他却一直耿耿于怀，无时不在处心积虑地设法

除掉他，并解散新编旅。

早在临案发生之初，田督军就力主武力剿灭。后北洋政府因怕牵涉外交，决定招抚，田也就无可奈何，只得服从了。临案既已了结，田中玉图孙之心依然不死。为达其目的，他调北洋五师吴可璋团到枣，与孙美瑶一同驻防枣庄，并委任吴兼任驻枣庄的执法营务处长，让吴对孙部进行监视、瓦解，待时机成熟，即将孙干掉。吴可璋到枣庄后，自恃后有靠山，从不把孙放在眼里。他一方面对孙美瑶所部严密予以监视，一方面采用挑拨离间手段进行瓦解。他首先拉拢新编旅第一团团长郭琪才，常以酒肉相待，并吹捧郭有天才，治军有方，将来定会高升，以暗示郭将来可取代孙的旅长职务。时间一长，郭与吴关系越来越近，也就被吴捧得忘乎所以了。很自然，郭与孙也就慢慢疏远了。

孙美瑶的旅部警卫连战斗力最强，也多是孙的亲信。警卫连连长丁开发作战英勇，是孙美瑶的心腹。吴可璋团长清楚，要想搞掉孙，先得把丁解决了。于是，吴便派人处处监视丁的行动，以寻找可乘之机。孙酷爱玩鹌鹑，丁曾谏言孙最好别玩，孙没接受，丁就在火头上顶了孙几句。探听到这一情况后，吴大喜，就找到孙别有用心地说道："孙旅长，听说丁开发还敢顶撞你，这还得了，若不严办，今后如何带兵打仗。"时过不久，吴又对孙说："最近听说有革命党人在你部活动，外面纷纷传说，丁开发与之有联系。如你不把丁开发除掉，就连你也洗白不清了。"孙明知是从中作梗，但又没有可靠证据，不得已，只得将丁诱至旅部杀害了。自此，孙便对吴憋了一肚子无名之火。

时有凑巧，不多日，孙的部下与吴团兵士在枣庄街上发生冲突，孙的部下人少被打。孙美瑶得知后大怒，亲率手枪队去找吴可璋算账，并沿街大骂不止，气势汹汹。枣庄市民见此情景，人心惶惶，纷纷关门闭户，吓得不敢出门。吴团长怕惹出大的事端，命令部下不准出门，任孙撒泼发野一番。后经绅商出面相劝，孙

乃作罢，率众打道回府。

吴可璋受了窝囊气，便秘告田督军。田中玉认为消灭孙美瑶时机已到，便对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密授机宜，让其以调解孙吴矛盾为名，相机将孙杀死。谨遵上司旨意，张培荣匆匆赶到枣庄，下榻中兴公司。他先将绅商找去询问了孙吴冲突经过。随之就把孙美瑶叫去谈话。据说，孙受招安后便拜于张培荣门下，因而张也就以尊长自居，对孙说话毫不客气了。孙美瑶一到，张就以不满的口吻说："你跟吴团长的事，真是胡闹胡闹。"此时孙的余怒未消，就力陈部下所受屈辱，指望张能为他出出气。张培荣慢条斯理，以教训的口气说："你现在是将官了，怎能对团级军官这样呢，胡闹胡闹。这样以后还能在一起吗？胡闹胡闹，太年轻、太年轻。"继而话锋一转说道："我现在公务忙得很，等过几日松闲些了，我做东置备酒席给你们合解。常言说，冤仇宜解不宜结嘛，弄不好会误大事的。在座的各位绅董也帮帮忙，请到时都来作陪。"绅商均表示赞同，答应到时一定前来。孙美瑶面对如此场面，也不好再说别的，只得唯唯遵从了。说至此，张的烟瘾大发，就一榻横陈，一面吞云吐雾，一面闲聊起来。

为使张培荣高兴，孙美瑶便海阔天空地山聊开了。他说到自己孩童时就学会手不扶地翻跟斗，纺车轮子一气能打几十个。张听后赞口不绝。孙还说到他近日得到个好鹌鹑，个虽不大但特别能咬。张说他早年爱玩鹌鹑成癖，这会儿公务繁忙没空儿养了，就叫别人给养了几只，等对空拿来咬咬。张还说，当然咱们不在乎输赢，但也要赌点什么，这样才更有意思。孙美瑶连连点头允诺。闲谈之后，张培荣又以长者姿态，显出十分关心的样子对孙说，这些天里你要严束所部，最好不要上街闲逛，以免再生事端。接着，又转过头去对绅董们说："请你们把我的意思转告吴团长，不要太计较了，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千万不要让他把这事报告田督军，把事情弄大就不好办了。"一派和事老的嘴脸。谈完话，

张就登车回其本部兖州去了。对张镇守使此番解劝，局外人谁能料到，其却包藏阴谋，暗藏着杀机呢。

十、鸿门宴前美瑶毙命

经过张培荣从中周旋解劝，孙、吴冲突总算平息下去。自此，孙美瑶也就把这事抛到脑后，平平安安地去当他的旅长。老奸巨滑的张培荣“果不食言”，没过几天，又从兖州来到枣庄，去实现他设宴和解的谎言。他一面让中兴公司置备酒宴，一面派人拿请柬去邀孙美瑶及枣庄众绅商名流届时赴宴。公司人等都确认是张镇守借杯酒以释前嫌，因而人人愿为效劳，置东办西忙碌非常，张灯结彩大肆铺张，一直忙到晚间，方一切准备停当。

当晚夜深人静之后，张培荣将吴可璋团长召去，面授机宜，秘密商妥杀孙计划。张在内院负责孙美瑶；吴在别院解决孙旅校级军官；副官对付孙的随从，为掩人耳目，杀手一律穿便衣，预伏暗处以待时机。张镇守使还告诉吴可璋，他已派人召吴锡九团长星夜回防郭里集一带候命，黎明前即可到达；兖州的马登瀛团已登车待命；沿途各站都已密令戒严。两人策划就绪，便分头密作布置去了，

第二天早晨，中兴公司内更加忙碌起来，服务人员摆席安座，厨师们煎炒烹炸。至9时许，应邀坐陪的绅董名流陆续到齐，张培荣让人给孙美瑶打电话，催其速来赴宴，并特嘱将鹌鹑带来。按事先布置，在诸客到来之前，张培荣已在二门过堂屋内暗伏便衣二人。当张镇守使正与绅董们寒暄之际，有人传呼孙旅长到，张培荣说声“请”，便同众绅起座相迎。孙美瑶一到中兴公司，陪同他一起来的武装随从们便被截邀，让到小客厅去了。孙走到二门处后，预伏的两个杀手便立即跟了上来。其中一个疾步上去摸孙腰部，看其是否带有手枪。孙见状吼道：“你要干什么？”话音未

落，另一个用一把石灰朝孙眼上一拍，前一个便衣趁机把孙往下一按，拿石灰的那个随手抽一把利刃，眨眼之间，孙便成了刀下之鬼。这一切都干得那么干净利索，在场的绅董们一见此景，顿时都惊呆了，有的吓得脸色蜡黄，有的浑身乱抖，甚至有的连粪尿都吓出来了。几乎与此同时，张培荣的副官们把孙的随从也都解除了武装。

孙的校级军官由吴可璋团长在别院招待，到此时却不见有何动静。于是，张培荣立即派人往探。原来，吴可璋早有图孙取而代之企图，今见张要将孙谋杀，认为这是一个大赐良机，便作起升官的美梦来了。他想，若乘此关键时刻，将实情告之孙的团级军官，他们必会感恩而拥他为旅长的。这样一来，岂不是毫不费力，即垂手可得一旅长吗。所以，酒席宴上他并未以武力相逼，而是照他的如意算盘行事的。当孙旅校佐们听吴可璋团长一说，一时都惊得无所措手足。探子回报张镇守后，张飞令吴锡九团迅速将孙旅驻地郭里集严密包围，并急电马登瀛团驰援吴团，逼孙部交械。同时，把枣庄也戒严了，尤其是中兴公司，更是被包围得水泄不通。这一切安排妥后，张培荣带人亲自前往晓谕孙的校级军官们说：枣庄冲突罪在一人，现已伏法，跟诸位没有关系，郭里集已被重兵包围，你们可选派代表前去告知所部，遵令缴械，给资遣送回籍，有抗命者立斩不赦。你们的职级不变，以后统归我来调遣。事已至此，谁还敢不从呢。至于孙旅兵士，也便很顺利地缴械，被分批遣散回家。至此，孙美瑶的新编旅彻底瓦解了。事后，张培荣还发了个通电，大意是：孙贼以往作恶越大，取得官位越高，此风一长，人心不可收拾，故不杀不足以儆效尤。

十一、尾　声

孙美瑶被诱杀后，为防止孙部携械而逃，枣庄及沿线各站都

戒了严。当时，新编旅还有部分带枪外出者，为免生意外，张培荣还下令在一些车站及重要路口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孙部人员即就地扣留。恰在这时，孙的下级军官、匪首刘守庭从外地返回枣庄，在临城车站准备换车时被吴锡九团查获。

刘守庭是滕县爱湖人，从小卖馍馍出身，故人送绰号“馍馍刘”。此人少年时读过些书，爱卜卦算命，能占周易，匪中遇有疑难大事，都是由他一卜决之，因有“小诸葛”之称。刘匪狡滑多端，生性残忍。他驾御匪徒的办法与众不同，既不施小恩小惠以笼络，也不用匪规严以约束，而是任部下随意奸淫，不加制止。这样势必惹得天怒人怨，百姓切齿，因而谁也不敢轻易散群。馍馍刘正是借此以断匪众退路，从而使其结成死党，死心踏地为匪的。他对肉票勒赎的办法也是十分残忍的，定期不去赎的即予处死。每次撂票时，常常是将肉票的一只耳朵割下来让送去，以进行威吓。凡被他所绑架之肉票，无不惊恐万分，家人也格外害怕，因而赎的也最快。刘匪一伙一次在攻打滕县山外民寨时，一个土匪被打死了，等把寨子打开肆意烧杀抢掠之后，馍馍刘说：“我的这个兄弟跟我跑了这些年，还没娶上媳妇就土了（即死了），我这回就给他说个媳妇吧。”说完，亲自在村中抓来个未出嫁的闺女，活活钉入棺中，和那个死去的土匪一块给埋了。

这天，馍馍刘到临城车站后，看到到处是军警，就疑心发生了什么变故，因而处处留心，更加警惕起来。当士兵过来对他施行检查时，他即悄声问士兵说，枣庄有什么变化吗？军人不予理睬，继续检查他所带的一切东西。当发现他随身携带六爻卦筒时，一个士兵戏谑言道：“馍馍刘，你的六爻卦今天不灵了吧？”开始他还毫不在乎，见士兵嘲弄他，便回答说：“少说废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呢！”待到检查完后，一个当官的说声“带走”，他才慌了手脚，断定是出了大事。馍馍刘被解往兖州，后被处决。当地百姓闻知此讯，无不拍手称快。

孙部缴械后，所有兵士每人发给3个月饷银，有快枪者每人增发10元，有杂枪者每人增发5元，发给每人一张免死证，由官方押送回籍。孙部匪众被遣散后，有些则回原籍本分度日，有的则匪性不改，又参加了新的匪伙。刘黑七瞅准了这个机会，网罗部分匪众继续为非作歹，匪众迅速得以发展壮大。猖獗一时的孙美瑶集团，至此便被北洋政府完全消灭了。

（根据万伯龙《临城劫车案始末回忆》、刘子衡《孙美瑶临城劫车案的如是我闻》、方椒伯《一九二三年的临城劫车案》整理）

章丘旧军孟家遭匪记

韩　炬

民国 17 年（1928 年秋），土匪张鸣九抢占章丘城，烧杀掠淫，为害甚剧。旧军是城北大镇，旧军孟家又是中国北方绸缎业著名商号“八大祥”的资本家，久称富豪，遐迩闻名，早为众匪所垂涎。

正当章丘民团剿匪失利、各界名流吁请邻近各县联合助剿之际，小军阀大土匪孙殿英率部来到章丘。各县民团闻之，纷纷撤回本县。章丘保安团长、二区区长孟德明也逃进了城里躲了起来。

民国 18 年（1929 年）农历正月初四，孙殿英派人通知旧军镇：“国民革命军第六集团军十二军，于五日到达旧军，稍住即东进。”第二天，副区长李敦复、保安团连长刘芾村、柴象柱、乡绅代表孟广茂、孟昭坤及旧军镇 32 条街各街长等人，手持彩旗，列队恭迎孙军于南门外。孙殿英进镇举目观望，只见街道民舍整齐，文昌阁、清净观、永兴寺宏伟壮丽，门前古柏参天，苍松蔽日。穿过十字路口北行，两旁店铺林立，繁华异常。由此向西，高门栉比，广第连亘，是旧军孟十大堂号的所在地。孙的军部临时设在“慎思堂”南宅，其附属机关和几个师部都驻在左右各大堂号的宅第或花园中。

孙殿英安营后，随即到各下属机关驻处视察。见旧军“孟”十大堂号果然是家家深宅大院，户户厅堂楼阁，室内陈设精美豪华。乡绅代表孟广茂等陪其登观音阁，访唐朝槐，参观永兴寺，游览

各家花园。孙见诸园或亭台宏丽，或花柳繁茂，或叠山曲水，处处显示着主人的豪富。此间，孙对各大家之财产，逐一询问，不觉暗自称奇，脱口夸赞“金旧军”名不虚传。

孙殿英对旧军孟家久有所闻，早怀觊觎之心。他得知张鸣九占章丘之后，欲趁火打劫，混水摸鱼，便率军来到旧军镇。彼时，旧军孟各大堂号如矜恕堂和进修堂早已远去天津，就是一般中小堂号和富裕之家也都外出避难。孙殿英对此既怅惘又恼火，因为这些人是旧军镇的财神爷。然而惯于巧取豪夺老谋深算的孙殿英，却不露声色地下令严饬各部官兵：“不得擅入民宅；不得骚扰百姓；要公买公卖。”同时派出纠察队沿街巡视，真象支秋毫无犯纪律严明的“义军”。于是地方首领李敦复、刘蒂村，乡绅代表孟广茂等联合“晋谒”孙军座，请求出兵剿匪，为民除害。开始，孙殿英故作姿态，说什么本军奉命东去，没有上峰命令，不能在此久留，剿匪一事，更需请示。代表再三请求，孙装出一副同情的面孔说：“本职派人找张鸣九，从中调停，让其离开章丘。”不久，孙转达张鸣九提出的条件，要旧军拿出 8 万元，作为撤离章丘的“开拔费”，否则，绝不离去。地方代表回说，匪不讲信义，倘交款后暂时撤走稍后复来将如何？这笔钱与其给土匪倒不如给军座用以酬劳剿匪将士，最好还是请军座施德于民，出兵剿匪。至此，孙始应诺。

当时，张鸣九驻守西关的头目刁松亭，秘密与孙殿英勾结，愿归服孙军长麾下。正月十七日，孙令部下几十人乔装刁松亭的部下，由刁率领潜入城内。至晚，孙派兵围城。天交子夜，鸣枪为号，里应外合，兵不血刃，取下章丘城。匪首张鸣九、赵著明被俘，匪军大部被收服改编，罪大恶极的赵著明交由旧军处置。19 日，在旧军南门外杀了越著明，首级挂在大杨树上，尸体被在城北山剿匪战斗中阵亡将士的家属刀剐凌迟，只剩一具骨架。张匪所掳马棚、宁埠等村的妇女 300 余人，全部释放回家。孙军长之

功德人人称颂，口碑载途。旧军百姓家家悬灯结彩，大门前设茶水点心，欢迎剿匪凯旋的孙军将士。章丘县十个区都向孙殿英献了万民旗、万民伞，并在耿家唱戏三天，慰问劳苦功高的孙军将士。二区副区长李敦复向其他九个区提出酬军费的问题，各区置之不理，派人去天津向孟雒川、孟养轩求款，也遭拒绝，无可奈何，勉强凑了2万元，交给了孙殿英。孙谦让再三，方收下，并无嫌少之意，于是孙殿英的大仁大义更为百姓所称道。

正月底，孙挥军东去，旧军百姓夹道欢送。32条街各派大车一辆，送至桓台方回。孙在桓台授命师长张立国、师参谋马孟九、独立营长杜武越，各率部暂住桓台，一个月后再偃旗息鼓返回旧军，具体任务是：收缴旧军保安团的武器；劫取旧军孟家的财物；向镇上首领索取剿匪酬金8万元。部署完毕，孙继续东去，直到平度。

二月二十九日，黄风蔽日，天昏地暗。下午，张立国、马孟九等率千余人，突然来到旧军东门外，取出公文交给守圩的门丁，要他速速送到镇上。公文诈称“孙军某部西去历城，路过此地，请在镇上借宿一宵。”李敦复看后，一时拿不出主意，保安团的刘芾村早为孙军收买，力主开门迎接。张、马进镇后，百姓听说是孙殿英的军队，都无戒备，却不想昨日仁义之师，今日变为劫舍的强盗。匪徒们分兵控制了四门，包围了东、西局子（百姓称保安团兵营为局子，东局子在东门里永兴寺，西局子在西门里书院），收缴了保安团的武器。天黑以后，匪徒们凶相毕露，开始了抢劫。他们先从各大堂号家下手，翻箱倒柜，大肆抢劫掠夺，楼上的东西翻到楼下；屋子里的东西扔到院子里；院子里翻腾不开，便往街上扔。匪徒们哪里见过这样多的好东西，他们眼花缭乱，抢了这件，扔掉那件，抢到好的，就扔掉孬的。各家各院，屋里屋外，遍地是衣物布匹，每个匪徒的腰包都是鼓鼓囊囊的。

当夜，匪徒们集中了一批珍贵物件，装了20多辆大车；另有

许多古玩玉器怕震之物装在十几只皮箱中，抓民夫抬着，一起送往平度大本营。被分派担任押运车辆的一个连，抢东西抢红了眼，发了疯，竟谁也不愿就此离开旧军，他们把负责集合的连长和一个号兵击毙在袁家胡同北口。

晚上9点以后，匪徒们便在全镇开始了洗劫、烧杀和奸淫。枪声四起，人喊狗叫，一片混乱。这时公祥当铺忽然起火，接着南孟家寨的安素堂、书业堂，袁家胡同的佩诚堂，西门里的矜恕堂，以及南门里西后街等相继起火。为制造混乱，匪徒又纵火烧了进修堂的一个大麦穰垛，烈焰腾空，火光冲天，全镇陷入一片火海。

凡房屋、陈设较好的人家，除物件被抢以外，还被逼交出银元、钞票，否则就毒打甚至杀害。程百智无钱可交，被匪徒枪杀。西后街李嘉平是该街上的富户，匪徒们逼李妻交钱，开始交出20元，一番毒打又交出20元，再打又交出20元……就这样被活活打死。木匠吕文堂把仅有的几块钱藏在锯末堆里，翻出后被枪杀，其妻抱子投井。程振铸之妻闭门不开，被匪徒从门缝中枪杀……如此残例，不胜其说。

匪徒们在劫掠中兽性大发，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到处奸淫。在李家亭，匪徒夺下一个妇女怀中的婴儿摔在地上，将其奸污。西后街一刚分娩8天的产妇，被奸后母子俱亡。赵其盛之妻宋氏被开枪射死。鸡市街程振甲之女坚不受辱，惨遭杀害。青龙街程凤松之妹，已嫁水寨裴姓，归宁遇匪，匪要将她拉走，奋力挣扎，身被数刀犹大骂土匪、强盗不止，终遭枪杀。因不受辱而投缳跳井身亡者不计其数。在烧、杀、奸淫的同时，被绑架的“肉票”多达几百人，最初押在各营、连部，这时肯花钱就能赎出。后来，匪首张、马下令将“肉票”都集中到善恕堂司令部，计有300余人。这时出钱赎票的日渐减少，于是设一毒计，声言要“撕票”，以示威胁。又说，家贫无钱“赎票”者，可放出。时有7人，未知是圈套，请求释放，结果出牢门不远全被枪杀。

为应付和讨好匪徒，以孟广茂为首成立了维持会，召集各街长开始办公，在致和祥酒店设给养处，张焕亭任处长，派百姓出夫当差，为匪服务。办公人员佩戴红布条，当差的佩戴黄布条，以示区别。

大抢劫三天之后，虽经孟广茂等人多次媚颜斡旋，但抢掠奸淫之事仍有发生。许多班、排长之类的小匪首公然霸占民女为妻。匪首张、马二人又出坏主意，在南门里的马家和东门里的永兴寺，设立所谓“妇女收容所”，说青年妇女住进去可免遭意外。开始，确有些安全，于是许多东躲西藏的妇女都进了收容所，仅南门里收容所就集中了40多名妇女。结果，全部被押到司令部，任匪首自由凌辱。

匪自进镇以来，百姓如陷汤火，而群匪却天天花天酒地，荒淫无度。各大堂号的山珍海味吃不完，三座大酒店里的佳酿香液喝不尽，吃饱喝足后抽大烟，打麻将，淫妇女。待百姓家的鸡、牛、猪、羊宰完了，各杂货店里的烟、茶、点心用尽了，他们又生出法子，让外村前来送给养的人，弄些美味在圩子墙外换取布匹、衣物。有人试着来了；一只鸡可换回一件皮袄；十个鸡蛋换去一床新被……渐渐地各圩子门外成了交换市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匪军撤走。

自东门外“撕票”之后，“赎票”的果然骤增。于是产生了一伙专门从事“说票”的掮客，他们与大小匪首拉上关系，便被封为某某“师爷”，在他们家的大门旁只要贴上“××营××师爷宅”的大红纸条，就可免受匪扰。300余人的“肉票”经这些“师爷”之手赎了出来，而成千累万的银钱也一笔一笔落入他们（包括匪首）的私囊。如在九如堂关押的瑞蚨祥总经理孟昭范之子、孙，儿子孟宪堂被用巨款赎出后，孙子孟庆潭（10岁）被杜武越留在身边当小勤务（实际上是人质），专管背大烟枪。两年后，杜把他送到济南父母身边，索酬金1000元，谢礼大烟老海各一批。

孙殿英在平度得到第一批赃物之后，知张、马等依计而行，欣喜异常，见他们久驻不归，怕生他变，于是下令催其速回。张、马接到命令，于23日让各街长派百姓大量烙烧饼，以做行军粮。旧军所有大小车辆掳掠一空，计牲口400余头，车200辆。24日凌晨，匪军撤走，大多数街长被掳去，用一条长绳各缚一臂，拴成一串。带走妇女、民夫共300多名，途中只有少数逃回。

孙殿英见张、马满载而归，喜出望外，但转念想到“东陵”余波未息，此次又洗劫旧军，社会舆论且不管它，倘或有人到蒋介石那里告状，岂不又要惹出许多麻烦，再说张、马在旧军待了20多天，私囊已满，于是陡生一计。一日，将张、马约于密室，说，你们这次在旧军为害严重，又掳来这么多人，事情不好收场。依我看，弄来的这些人都是些挤不出油水的，不如卖个人情，放他们回去。不过对二位要暂时委屈一下，你们先留在我这里，就说要给你们处分，等旧军的人走后再放你们出去。总之，我孙某亏待不了你们。

孙殿英将张立国、马孟九监禁后，马上接见孟广茂及各街长，备加宽慰，并表示要处决肇事主犯，放众人回家团聚。此时，孙早已派重兵包围了张、马所率之团，勒令他们集合在一个广场上，全部解除武装，并逐个搜身，令其交出赃物，否则立即处决。一时交出的银元装满了十几只大筐箩，其他如金戒指、玉镯、银项链、手表、怀表、古玩等难以计数。孙又下令凡旧军来的人全部集合，他当众讲话：张立国、马孟九奉命西去历城，不料途经旧军镇，见财生盗心，擅入民宅，抢掠奸淫，杀人放火，罪大恶极，实属军法难容，现本军决定，将二人就地处决，以正军法。遂下令将二人提出当场执行。最后孙说：鄙职治军不严，致有此事发生，本人也要向上峰请求处分。希望父老乡亲回家代孙某向旧军父老谢罪。大家见枪毙了罪魁张立国、马孟九，又给了路费准许回家，都十分高兴。

三月底，大家由兰村乘火车回归，家人相见如在梦中。此时旧军镇四门，大街要冲，已张贴出了孙军布告，内容与孙殿英在平度讲的大致相同。至此，孙殿英一手导演的这场洗劫旧军镇的悲剧，就这样收场了。

（山东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青岛孙马匪帮

吕文泉

民国以来，对青岛危害最大的一股土匪，是以孙百万、马文龙为首的匪帮（以下简称“孙马匪帮”）。

1916年1月袁世凯称帝时，孙中山先生曾派居正来山东，拟组织成立一支讨袁军。居正以青岛为根据地，在洋车夫、地排车夫等苦力中，招募起了几千兵员。但这些人战斗力太差，难以成事。所以，他又从东北招来一股3000人的土匪武装，市民俗称“红胡子”。这股部队凶悍善战，在攻占潍县、周村、高密、诸城、即墨等战斗中颇具声威。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讨袁相继告停。后来，山东军阀欲收编这帮红胡子，其头领刘得胜拒不受编，当即被山东第五师枪毙。多数红胡子窜回东北老巢。孙百万、马文龙这两个小头目，没有随大队人马回窜东北，便带着一部分红胡子跑到胶南大珠山、小珠山、薛家岛一带，干起抢劫、绑架勒赎的勾当来。他们既能扰乱、甚至诛戮官吏治安，又能帮助日本浪人贩卖枪支弹药、鸦片、海洛因等，因而极得驻青岛日军的青睐和支援。中国当地政府无法剿灭他们。到1922年冬，这支土匪已发展到约2000人，活动范围亦从胶南扩大到了隔海相望的崂东附近。

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从德国手中夺取了“胶州湾租借地”及胶济铁路。大战结束后，仍然霸占不走。在中国人民五四运动反帝怒潮中，日本不得不将青岛交还中国。中日双方议定，

交接日期为1922年12月10日。但日本军方却想利用孙马匪帮届时捣乱，以中国人无能管理为由，达到重新占领青岛之目的。

11月中的一天，驻青岛的日本特务山本领着日本水上宪兵分队的曹长等几个人，在重山密林中找到了孙马匪帮的巢穴，请孙百万、马文龙等几个主要头目，到青岛市内商量要事。

山本把他们安置在日本人开设的“吾妻旅馆”，先以酒肉、女人侍候，接着在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司令官由比光卫的私邸中正式达成交易。双方商定，在中日交接日——12月10日，中午12点一过，孙百万、马文龙的人马立刻行动，大肆抢劫、烧杀。为了“大局”的需要，杀上个把东洋人西洋人也未尝不可，一定要把青岛市搅他个混天黑地！

“这样，我们大日本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当局没有治理青岛的能力，不能保证我们日本侨民及其它外侨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把刚刚交出去的青岛，重新实施军事占领！”山本一语道破天机。

“这是正金票20万元，你们先拿去用，事后还有重赏。”山本把一个装满货币的小皮箱往桌上一放。正金票1元顶2块多银元，这2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够意思！孙马二人的目光，立刻被那小皮箱吸了过去。

山本仔细地观察着他们的脸部表情，又最后加了两句：“日本方面对你们是一向抱着友善的态度，中国方面却对你们抱着消灭的态度，如果中国接收了青岛，对你们可是大大的不利啊！”

孙百万双手抱拳：“在座各位，只管放心，我和弟兄们一定照办不误！”

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就此收场，各怀鬼胎，分头行动了。

交接日前10天，也就是11月30日晚，青岛商会会长隋石卿、监收专员茅少甫，突然遭绑架而不知去向。消息传开，市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次日，中国政府的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以“青岛

行政尚未移交，治安当由日方负责”为由向日本公使小幡提出质询，要求日方迅速查办，找回中国人质。日方诡称对此事件毫无所知，敷衍推脱。

其实，这一行动正是日军与孙马匪帮共同阴谋的一部分，是为中国接受青岛制造麻烦。那晚，孙马匪帮出动数人，直扑隋石卿、茅少甫、刘小坡的住处，分头将他们掳到了崂山的沙子口。

“隋会长不必担惊，这次弟兄们请你来，主要是想让你接济接济。”孙百万在为隋石卿设的“压惊”宴上说。

“你们要多少？”急欲脱险的隋石卿马上问实价了。

“不多，30万。”孙百万不慌不忙地说。

“30万?！这，这太……”隋石卿瞪大了惊恐的眼睛。

孙百万狞笑着，扫了他一眼，举起手来在空中一摆：“来，给隋会长上一盘珍肴！”

话音一落，只听见门外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接着就是刘小坡的几声惨叫。

一个匪徒手擎碟子进来，往桌上一放：“隋会长，请！”

隋石卿定睛一看，啊，是两只血淋淋的人耳朵！立刻吓得面色蜡黄，张着下巴呆住了。

“隋会长，不必多怪。刘小坡是你的冤家对头，抓他来就是给您老解恨的。”孙百万阴险地笑了笑，脸色一变，凶残的双目紧盯着隋石卿：“干咱这行当，杀人跟杀鸡一样平常，这个，你是该明白的！”

这一招，确实起了作用。隋石卿只觉得脊背一阵阵发冷，身体筛糠般地颤抖起来。钱，他是想拿的了，但30万这个巨大数字，对他来说简直意味着倾家荡产。数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岂不痛煞人！他还想试着再讲讲价：“这30万我确实是拿不出啊！能不能再……再少……”

马文龙把酒杯往桌上一放：“隋会长，弟兄们忙火了这么一阵

子，又杀了刘小坡，给你报了私仇，弟兄们花销上有点难处，叫你帮帮，你就这么扣腚咂指头的，太不开面儿了吧？这30万你们能不能拿得出来，我们也早就掂量过了。”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与孙百万的目光交汇了一下，夹起一块鸡肉放进嘴里嚼着，不急不慢地：“若是隋会长不爱脑袋爱财帛……哪咱就把肉票撕了！”

“撕肉票”就意味着把绑来者杀掉。此话一出，隋石卿简直是魂不附体了。为了保命，他先一口应承了下来。至于这钱怎么个出法，再慢慢琢磨吧。

此时，一个匪徒窜了进来：“刘小坡的心已经剜出来了，要不要端上来？”马文龙以征询的目光看看隋石卿，见隋石卿的脑袋象货郎鼓似地连连摇动着，便把手一甩：“不要了，看样儿会长不想品味了。”

酒席桌上的气氛，渐渐缓和了下来。匪众们有的夸隋石卿“够朋友”，有的夸“够交情”，更使隋石卿没有料到的是，他们可以先放人。

“我们可以先放你回去，也好让你跟商会的财主们商量商量，一块儿抓紧筹措筹措。”孙百万语调和气地说完，又一拍桌子，“你回到商会，就明着跟他们讲，哪个小子敢反对这件事，我们就登门去给他放放血！”

隋石卿木僵的脸上开始有了点活气，赶紧点头道谢。

“不过，”马文龙用筷子夹住碟中血淋淋的一只耳朵，语气骤然冷酷了起来，“干我们这行的，可绝不是吃素的，如果你回去后不认账了，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弟兄们要取你的脑袋，就跟翻翻这东西一样，再容易不过了！”说着，把那只人耳朵翻了过来。

“明白，明白，决不食言，决不食言！”隋石卿赶紧作揖。此时他心里略微踏实了一些：现在看来，他们这笔钱是冲着商会要的，回去召集各商家凑一凑，这问题也就不象原先想的那么严重了。

“茅少甫先生是不是也一块放了，否则我回去向各方面都不好交待。”隋石卿哀求地说。

“茅少甫先生你不必担心，那是中国方面办接收事儿的监收员，我们不会慢待了他。”孙百万指了指东墙，“现时正在那边的屋子里，也是酒肉相待。明天晚上可以跟你一块儿回去。”

失踪了几天的隋石卿、茅少甫，又重新出现在青岛市内了。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隋会长回来后立即召开了商会理事会，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孙马匪帮恫吓的一段话，又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动员。虽然出这笔款象揪心一样疼，但为了各自的生命安全，为了给隋会长点面子，几经讨价还价，诸位财东们还是数目不等的分摊了。

随着中日交接日的迫近，中国当局开始调动军队。11 月 30 日，接受青岛防务的中国警察 1600 名，由坊子乘专车到达青岛，分驻市内和李村，在太古洋行旧址设立了临时警察厅。与警察同时到达的，还有从山东陆军第五师中选派来的 640 名保安队员，称青岛保安总队，驻进了汇泉兵营。12 月 2 日中国“永绩”号军舰载着原先在烟台训练的水上警察到达青岛海面，担任青岛水上防务。

中国军队进驻青岛，而在市内的土匪倒若无其事，过得很自在，他们除了去妓院鬼混，便是四处游荡，危害社会秩序。在马路上，可以看到他们歪戴着礼帽，便衣上身敞着怀儿，插在裤带上的手枪露在小腹间，走起路来摇头晃脑的架式。在饭馆里，可以看到他们吆三喝四、酗酒胡闹的所作所为。在戏院门前，可以看到他们横冲直闯，骂骂咧咧的野蛮神态。他们根本不把中国进驻的部队放在眼里。

在这些日子里，日本军方因早已心中有底，表面上仍装出一副平平淡淡、准备撤退的样子。11 月 25 日，他们宣布，由日本高级文武官员所组成的俱乐部——青岛偕行社解散。12 月 1 日，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司令官由比光卫，还装模作样地率领所部将士来

到太平山麓，在他们的“忠魂碑”前举行了告别礼。

在市民恐惧与欣喜交加的心情下，青岛交接日终于来临了。12月8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抵达青岛。12月9日，山东省长兼胶澳（青岛地区的早期称谓）督办熊炳琦亦赶来青岛。12月10日上午，中方代表王正廷、熊炳琦与日方代表由比光卫在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现市政府大楼）正式举行交接了。签字仪式之后，日本的警卫全部撤掉，神气的中国军人列队站到了大楼门前；日本旗降了下来，中国旗升了起来……一切程序都在按步就班地进行着。

正晌午时，午炮“轰隆”作响了！按约定，这就是孙马匪帮跃起作乱的冲锋号。日本军方在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就要到来的时机。可是，直到天黑入夜，仍未见一点动静。

由光比卫一伙懊恼至极：青岛就这么眼巴巴地交了回去？孙百万、马文龙这家伙到底搞什么名堂！日本军方决不甘心，他们虽然交出了青岛，但“青岛守备军司令部”的机构却依然保留着——他们还在等。

其实，这一平静状态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那日，孙百万、马文龙从日军司令官邸回来后，心里并不踏实。绑票勒赎、劫夺钱财是他们的老本行，可在两国间做这么大的政治交易，却还是头一回。他们反复掂量，多次跟同伙们分析研究。匪帮中少数同意跟着日本人干到底，而多数人则表示异意。看得远点的人说：“咱们总得在中国的地面上吃饭啊！要是跟日本人这档子事儿办砸了，中国这一方真的站住了脚，日本兵一撤，咱还能跟着到日本去？”七嘴八舌地吵嚷了几次，孙百万、马文龙终于拿定了主意——向中国方面告密，同时也再捞上一把。当他们把隋石卿、茅少甫绑架到崂山沙子口的时候，就跟茅少甫开始了这一笔交易的密谈。茅少甫被放回来之后，向熊炳琦禀报了这件关系到青岛前途的机密大事，详细陈述了孙马匪帮提出的条件。熊炳琦听后，经请示王

正廷及北京政府，迅速应允了孙马匪帮所提出的条件：对孙马匪帮的队伍不予拆散，将其全部人马收编为胶东游击队，孙百万、马文龙分任正、副司令；今后一切军饷等费用，均由中国官方从优供给，而且立即拨给一大笔款子。最后，孙百万、马文龙亲往拜见了熊炳琦，熊炳琦又夸奖了他们一番。就这样，事物的发展调转了一百八十度；而日本军方却还蒙在鼓里。

由比光卫一伙直等到12月15日，即青岛守备司令部撤销、日军撤离青岛之日，也没见到孙马匪帮的烧杀暴行，相反却得到了孙马被招安的信息。由比光卫不得不快快不快地离开曾受他统治的这片土地。但是，日本军方并没有善罢干休，一个新的阴谋又产生了。

青岛接收之后，孙马匪帮被收编为胶东游击队，这帮匪徒整日的在大街上游来逛去。

春节前的一个下午，位于市内大窑沟的一家拍卖行，正在处理一批归国日侨的剩余什物。“叫价”的人站在门前的桌子上吆吆喝喝，四周围拢着一大堆人，其中很多是日本侨民。两个浪浪荡荡的所谓游击队员，也挤在里面看热闹。突然，几个日本人上来揪起一个游击队员，大叫：“小偷，小偷，他是小偷！”接着便是一阵拳打脚踢。另一个游击队员挣脱出来，撒腿就跑，立即回去报告了副司令马文龙。马文龙一听火冒三丈：他娘的，欺负我们还得了?！带上一帮弟兄就赶到了现场。这时，那个挨揍的队员已是鼻青眼肿，满嘴是血。马文龙一挥手：“上！”在场的七八个日本侨民便被围在了中央。饱受日本人欺凌的中国人，见此情景莫不拍手称快，站在外围叫好助威。这一来，马文龙一伙更加神气活现了。对这伙人来说，打架就象过年一般，他们施展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把日本人结结实实地收拾了一顿，然后押回了游击队的司令部。

岂不知，这正中了日本军方的诡计。早有准备的“日本居留

民团”，立即召集起近百人的日侨，去游行示威。他们有的持簿铁小油桶、小水桶，有的拿着木箱子、脸盆，胡乱地敲打着，参差不齐地吼叫着。在马路上，气焰甚为嚣张，不可一世。他们到胶澳督办公署楼前，耀武扬威地表示抗议，沿途还散发传单。传单上印着他们提出的条件：①解散胶东游击队；②枪毙孙百万、马文龙；③立即释放被抓去的日本人，并赔偿他们的一切人身损失；④青岛的中国最高长官亲到日本领事馆、日本居留民团来向日本方面道歉。限中国官方立即答复！并且还写道，已电请佐世保日本海军迅速派舰队来华；现时停泊在青岛前海的一艘军舰，已将大炮的炮衣脱去，瞄准了青岛官府……

无能、恐日的中国当局得知此事件的重要背景，早已被吓破了胆，熊炳琦立即答复了日本人的条件，并交由山东第五师师长郑士琦消灭胶东游击队。他以调动为名，将孙马匪帮调出青岛市，予以围歼，其中一小股逃窜至大、小珠山一带，也很快被剿灭了。孙百万、马文龙这两个匪首凭着多年土匪生涯的经验和本领，漏网而逃，远走高飞了。

（山东省青岛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孙殿英三次祸亳亲历记

张荫庭

一、孙匪祸亳前夕的亳县

民国初年，陇海路未通车时，流经亳县的涡河为南北交通的要道。亳县盛产白芍、菊花、桑皮、娄仁、金针、核桃、白麻、黄豆，物产丰富；此外，当时还有大宗鸦片烟土。因此众商云集，市面繁荣。镇压捻军起家的蒋希夷、蒋东才、蒋东亮、李传业、姜桂题等都变为拥有数百顷土地的大地主。尤其是姜桂题，已经成为一个旧官僚脱胎的新军阀，做着热河都统。这些人一方面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另一方面为了更多的掠夺民众血汗，也投资新兴工业，诸如蛋品厂、电灯厂先后创办起来。南北各大商埠的一些资本家也来亳县投资经营。这样，客观上促进了亳县的经济发展，使亳县具备了新兴城市的雏形。

二、孙殿英祸亳的起因

永城人孙殿英，原来在姜桂题的毅军里当过连长。毅军军纪败坏，人所共知，因而有“吊儿郎当混毅军”的口语。孙殿英凭借毅军军官的名义大干贩卖烟土、白丸的勾当。他贩毒的范围，北抵热河，西及河南，规模数量都相当庞大。他的白丸、烟土封口

上、印着一个飞鹰，起名“殿英牌”。亳县盛产烟土，所以也是他的贩毒基地。他在亳县很熟，结交了亳县几个地头蛇，都是大毒贩子，其中有白仿泰（绰号白小猪子，在里仁街开华清池澡堂。孙殿英到亳，就住在他那里）、汤云龙、陈益斋（绰号滋牙雕）等。他们结为金兰兄弟，到处搜罗亡命之徒，从事不可告人的勾当。1922年，毅军军统姜桂题病死他的部下由米振标带到河南，米当了河南帮办。孙殿英所在的那个连，原是姜桂题手下的统领、豫西镇丁香龄的部下，不服米的调遣，并炸营暴动。孙殿英在这次暴动后，跑到巩县、宝丰、鲁山一带，当了土匪头子，集结了约有1万多人的势力，自称旅长，到处抢掠，并有着窥伺亳州的企图。米振标写信给亳州以姜家为首的绅士们，通知这种情况，叫他们严加戒备。这时，孙殿英已经派人来亳州活动了。当时亳州驻防是原倪丹忱的部下老安武军第五旅华毓庵的一旅人。安徽军阀正在抢夺统治权，旅长华毓庵正想扩充势力，参与争夺地位，听到孙殿英有窥伺亳州的企图，他不但不打算保卫他的防地，反而与李传业的儿子李大瞎勾通，令他暗作内应勾孙殿英速来。他俩都想收编孙匪的势力。孙殿英未来以前，先公开写信要挟，说兵过亳州应供给银元1万元，可免骚扰。那时亳县的地方武装，都掌握在土豪劣绅之手，地方警备团、商团归蒋震之、蒋逊之、李筱庵、马敬臣统带。接到孙殿英诈财的恐吓信，这些人一时分为两派：二蒋和李筱庵自知势力不敌，意图贿款和事；马敬臣有几枝乡团的枪，以为亳县城坚财广，还有华毓庵驻防（这时他们还不知华毓庵通匪），老老实实交款给孙殿英那帮乌合之众，实在太丢人。因此犹豫不决，战守皆无准备。

三、三次祸亳经过

孙殿英匪众于1926年阴历十月到达石寨，因沿途怕军队追

击，跑得人困马乏，且枪支不多，弹药无着，未敢贸然攻城。当时马敬臣带乡团数百人前去堵击，因寡不敌众，一战即溃。马指望华部支援，不料华毓庵故意避往十河、双沟一带去了，城内只有北关驻有张拱臣一个团，按兵不动。李大瞎暗地送给孙殿英弹药一车。阴历十月二十日，陈益斋、白仿泰、汤云龙又勾通匪徒百余人，让他们埋伏在东门内李家牌坊下李家坊子里。守备南门的警备团营长李传运对此事佯作不知，偷偷的让开。次日夜，孙匪于外围鸣枪，东门和曹巷口潜进的匪徒，乘乱把煤油浇在扫帚上，在沿街屋檐下放火。城内居民，还有没睡的，刚听到城外枪声时，以为有那些军队保护，不虑城内会有匪人放火；继而发现情况不对，便同声喊斥；匪徒鸣枪杀人，始知这是孙匪的内应。一时火光冲天，喊声动地。城内警备团长蒋震之、李筱庵，商团蒋逊之，东台庙守卫蒋秃子，带队保护他们的家眷急急忙忙逃往商邱去了。匪兵突入北关，放了几把火，抢了几家大商号，随即冲进城里，关上城门，大抢大掠起来。姜家首户住的地方，有一个警官守卫，他持枪抵抗，被匪兵杀死，遂打开大门。这时姜家的男人，皆在北京，家里存的1万多枝枪，被匪徒全部劫走。匪兵们烧杀奸淫，无所不用其极。逃不出去的妇女，惧匪徒奸污，许多都投了沙缸坑，或者是跳井；投的多了，到处浮尸累累。夏侯巷有一户，全家的妇女，都投了坑。地主家里保险铁柜，被砸开后扔在街上，横七竖八；鲜衣美服，丢得足可垫路。匪徒逐户抢遍，又到处抓人，严刑审问钱财的线索。鞭打、吊梁、香烧、铁烙，各种酷刑无不具备。四角悲声哀号，惨不忍闻。人们跑到小庙、破屋，或是城墙角落里，脸上涂上泥灰，三三五五，这里蹲一堆，那里蹲一堆，如同死囚犯，坐以待毙。东门蒋家（蒋壁清）光银子掘出20余粪筐。有个王寡妇，是有名的殷实户，粮食摺子内，囤积的都是铜元，因为笨重，匪兵不要，铜钱雨一般撒得满街。大家富户的财产，这次全部抖了出来。很多过去在豫军混过事的，借

着毅军的势力，当年进入故宫，偷盗了许多文物，此次烧得点滴无存。匪兵们强迫王巷口一家锯锅匠，替他们把抢来的银元熔铸成个大银块，缠在腰间，穿着抢来的花衣服，拉着马匹；一匹马身上能垫上四五床绸缎绣花被褥，招摇过市。这场洗劫一直延续了18天。

北关商业富庶区，匪徒本来只突入一时，按说大致是可以保住了。不料老百姓花钱养活的警备团、商团以及华毓庵的一个团，放着土匪不打，却也趁火打劫，成了土匪。接着放火、抢劫，各商铺的细软货物，都被抢光。他们还强迫民船装载抢来的物资，运往蚌埠，准备事后分赃，余下的就一把火烧掉了。他们抢到我们住的马厂街，这里有一家蛋品厂，地方大，人们都藏了起来。蛋品厂会计鲍先生未及躲开，被他们扭住，打着问钱放在哪里。结果保险铁柜被砸开，鲍先生趁土匪争夺的机会，跑到我们藏的地方。我见他面无人色，头上被盒子枪砸了一个酒杯大小的紫疙瘩。大火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熄掉。老砖街、纯化街原来都是经营糖纸杂货的，糖被烧得化成了水，顺着石头街上流淌，遇冷凝结，道路成了晶莹的糖板路。我的邻居大江和一些人跑出去，趁无人的机会，用铁锤敲击凝结在地上的糖块，成篮子的拎回来当菜吃。在街上还能看见那些持枪的土匪，把电线砍下来，拧成数股，当作文明棍；姜桥下的电灯厂，也全部烧毁。城里关外，经过这次浩劫，损失实在无法统计。

当时陈调元已经当了安徽督军，亳县人高世读在他部下当旅长。得到亳县告警的消息，陈派高世读联合苏军孙传芳部下的一个旅（旅长刘凤图）来亳剿办。但是他们怕孙殿英困兽犹斗，真打未免损失自己实力，行动非常迟缓。孙殿英吃饱抢足，大开西门，冲了出去。刘、高随即电请省里派一个所谓道尹袁励宸来亳负责办理善后。蒋震之、蒋逊之、李筱庵等这些土劣，得到消息，又威风起来，带队赶回来准备抓办善后的事权。至于追查责任，当

然是官样文章，县长高培德，无权无势，首先被撤职，换了王汝敬。地方上的二蒋一李有保卫地方的责任，临阵脱逃，本来是有罪的，可是他们百般趋奉袁励宸，请客送礼，仅仅被处以罚款代赈。蒋逊之更会逢迎，结果说他商团力薄，没有责任，反而又当了善后局局长。只有旅长华毓庵是个问题。刘凤图想趁机"吃"他的部队，诱他进城开会，当场宣布他勾结孙匪，扣了起来。北关驻防趁火打劫的华部团长张拱臣、得钱卖放让开城门的营长李传运，因为老百姓恨之入骨，纷纷控告，为了消消民愤，与华毓庵一道，枪毙在大隅首。可是李大瞎、陈益斋)、白仿泰、汤云龙等全部跑了。后在六安一带逮到了白仿泰、汤云龙，解回来也枪毙了。然而首恶孙殿英却谁也逮不到。老百姓说：鹰飞（指孙殿英），雕攒（指陈益斋），逮住野猪还愿（指白仿泰）。

所谓"善后"不过是拿罚款的5万元，给城内被害之家，发放一点救济，以掩人耳目。试想杯水车薪，能济甚么用？而孙匪撤退，带走"肉票"400余人，却没有人问，还得各家自己备钱赎回。至于被杀、被奸、死难之家那就更无处呼冤了。

孙殿英匪众逃到济宁，用从姜家劫来的枪支武装起来，投降了直鲁军阀张宗昌的部下褚玉璞，改编为三十五师，孙当了师长。1928年，张宗昌反蒋，命孙殿英率领袁家骥、程占元等进攻阜阳蒋介石的新编十一军军长马祥斌，二次来到亳县。虽然亳县满目疮痍，到处残存他劫掠的遗迹，却谁也不敢说他是土匪。他居然堂而皇之征粮、征财、征夫，俨然是个土皇帝。恬不知耻的蒋逊之，还把他奉为上司，在财政局设立了粮食筹备处，专门替他筹饷。孙殿英还竟然跑到白仿泰的坟地，无耻地公开祭奠白仿泰。他给白送了一幅这样的挽联："冤狱竟织成，我今痛哭岳鹏举；深怀终莫吐，君熟犹怜周伯仁。"真是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二字！

商会会长蒋逊之在孙殿英的庇护下，生心坑害老百姓，由粮秣筹备处印发一种"流通券"，交给直鲁军在市面上公开流通，因

有武力压制，人们不敢拒绝使用。他们宣称捐款到手，由财政局兑现，农村一天一个条子要捐，农民被捐的连裤子都穿不上。不久，孙殿英在阜阳和马祥斌接上火，很快溃退下来。败兵退到亳县，老百姓恨透了孙殿英，得到这个打“败鸡”的机会，便自动起来缴败兵的枪。孙殿英立脚不住，狼狈退回济宁。但是孙匪人虽走了，却给亳县遗留下二条祸根：一是枪支丢在农村，有些坏人凭借这些枪支继续干着土匪的勾当，搞得老百姓不得安宁；一是流通券变成了废纸，城市中小商家，十有八九遭到破产，而商务会长，却发了一笔大财。

1930年，直鲁军又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倒蒋，孙殿英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第三次进驻亳县城，牵制蒋介石的上官云相、唐生智、王均等大部兵力；亳县城被团团围困。孙殿英从1930年5月在此地坚守，直到7月，城内粮食被吃光，树木被烧光。老百姓跟着孙匪军队困在城里，两个多月不能生产，困苦万状。直到7月中旬，冯玉祥派孙连仲部队来援救，孙殿英才率部突围北去。70余天的攻守战，到处瓦砾成堆，死尸盈野，亳县又一次遭受浩劫。

（安徽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老洋人”洗劫阜阳目睹记

霍沛林口述　梁义三整理

我16岁时（1920年）到阜阳，在大隅首北边汇昌和钱庄学徒，东家是王普（倪嗣冲的女婿，当时任皖南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经理马俊峰。汇昌和与倪家的两个钱庄倪萃恒、倪瑞恒在阜阳三足鼎立。我学徒的第三年（1922年），“老洋人”劫城。大街上的房屋基本上烧完，商店被抢劫一空，数百人被土匪杀死杀伤，更多的人则被掳走。“老洋人”劫掠而去后，倪嗣冲的旧部安武军进城，复行搜劫，其危害更甚于土匪。一时阜阳城精华俱尽，损失惨重。

“老洋人”劫城的前几天，城内就流传着河南省大股土匪往这里流窜的消息。“老洋人”是这帮土匪的首领，姓张名庆，河南宝丰人。因长相似外国人，所以人称“老洋人”。其凶猛异常，当过兵，后来聚集流氓地痞，四处掳掠，势力渐大。当时阜阳是倪家的天下，倪嗣冲有一团兵力在阜阳驻防，另外还有地方保卫团（团长是倪嗣冲的侄子倪道煦）1200多人。他们都正忙着盖倪嗣冲的将军府，乘机搜刮民财，根本不把匪情当回事。土匪乔装打扮成民工或小商小贩混入城内，刺探情报，作为内应。城里居民对此毫无觉察，未做丝毫防范。

我记得“老洋人”进城是民国11年旧历九月十三日。这天阜阳城内和往日一样。中午，地方保卫团团长倪道煦在马公祠请“花会”，倪家亲友、三家钱庄经理、城内士绅都在那里吃酒取乐。

晚上，德胜楼唱的是《九江口》，赵月来主演；德月楼唱的是《白马坡》，葛德华主演。马经理爱听赵月来的戏，我打着灯笼把他送到德胜楼。他们坐在前排听戏，我站在后边看戏，随时准备去伺候他们。戏刚开场，安武军的熊营长派人来送信，说探子探到"老洋人"已经过了杨桥集，往阜阳来了。当时剧院内就乱了，戏也停了，马经理叫我把钱庄的人赶紧找回去。

半夜，东家王普的客人程省三从剧场回来后，躺在南客屋里过瘾（吸鸦片烟），经理叫我到那里伺候他。我把茶水、烟具都弄好后，他在那里吞云吐雾，我却累得眼皮也睁不开了，往烟榻上一靠，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突然一片嘈杂的吆喝声把我惊醒了。睁眼一看，程老爷不知到何处去了，烟枪上的烟泡还未吸完，烟灯上已结了一个大灯花。院子里很亮，客屋通往套房的门已经上了栓。我隔着窗户往院内一看，只见十几个人打着火把，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他们正在砸帐房的门，还有人从套房里抬出卧柜并打开，围着抢东西。我想：坏了！土匪进来了！就悄悄地从后角门跑出来。刚跑到二门里边，就听右边有人喊："站住！"接着"哗啦"一声，我知道是拉枪栓，本能地站住了。一个高个子土匪抓住我的衣领喊道："逮住一个人。"有人回道："拉这里来！"我被揪送到饭厅里。这里有七八个人，其中一个腰里插着手枪的问我："你是这里的什么人？"我说："是学徒的。"他听我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就问："你是哪里人？"我说："山西人。""店里可有枪？""不知道。""钢洋（银元）放在哪里？""不知道。"旁边的一个人咋唬起来："这小子不老实，一问三不知，宰了他！"我说："真的不知道。钢洋有，多得很，可我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你干什么活？""我伺候他们，刚才还给程老爷烧烟哩。""烧烟？好的，好的，烟土在什么地方？""在客屋后面小套房里。"土匪叫我带着他们来到小套房。打开房门，只见几个大柜里都放满烟土，货架上、床底下放的也是大烟土，有盆装的，也有碗盛的，几个土

匪高兴得笑起来。腰里插手枪的那个土匪，拍着我的肩膀，笑着问："他们一年给你多少钱？"我说："一年四串。""别干了，咱们一块'趟'（土匪的黑话，意思是入伙）去。"我不知道什么是"趟"，低下头没说话。他又拍着我的肩膀说："不要怕，帮我们运这（烟土）。"土匪们把烟土往院子里搬，我也端起一盆烟土送到院里。搬了几趟，趁他们都不注意，就瞅个空跑到后院，翻墙到了周雁臣家的后院。裕隆公茶庄的管帐先生余孟亭见我跑过来，就问："那边怎么样？"我说："土匪进满了，正在抢东西。"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起火了"。我们抬头一看，只见西关一片火光，照得半边天通红。

这时从前院进来一伙土匪，我们10几个人被押到周家大客厅里排好队，扒开衣服，由土匪一个个地搜查。一个络腮胡子的土匪，掏出手枪咋唬说："谁家有枪？谁家有钢洋？快说！"我们谁也没吭声，他把枪掂了一掂冷笑着说："这枪可不是吃素的，在杨桥我一梭子撂倒十几个，到阜阳还没发市哩，再不说，可要叫它开荤啦！"正说着，外边有人喊："张老五快来，'排'（土匪的黑话，意思是'找'）着啦！""在哪里'排'着哩？""在茶叶箱里。""送这里来。"几个土匪把茶叶箱抬来，箱上写着"隆裕公"，一打开，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元。我望了一眼余孟亭，只见他面如土色，和死人差不多。外边又有人笑嚷着进来："张老五，我们给你'排'来两个'花票'（土匪黑话，意即年轻女人）。"土匪们拉着两个哭哭啼啼地妇女进来。我一看，原来是程四大人（程晓西，当时陕西财政厅长程会亭的过继儿子）的两个姨太太。张老五跑了过去，当众就对程家的姨太太动起手脚。不知是谁说了句："造孽啊！"张老五听见后，瞪着眼喊道："滚！都在这里看啥，快滚！"人们象得了赦令一样跑开了。

大街上很乱，土匪们自南往北，见门就砸，砸开了就一窝蜂似的涌进去抢东西。这里是商业区，有钱庄和几家大商号。土匪

们抢完一家，就放一把火，把房屋烧掉。我远远看见汇昌和那里火把通明，土匪们仍进进出出抢东西。不一会儿，我又被三个骑马的土匪抓住，给他们带路去县政府。刚过了古楼，后边又赶来一匹马，说："东门打起来了，老李挂彩啦。"土匪们二话没说，拨转马头就往回跑。

这时，古楼以北，人们还在梦乡，没有一点动静。保卫团的队伍正在北门里集合准备下早操，他们看见我就问："干什么的？"我说："跑反的。""跑什么反？""城破了，南关里进满了土匪。"保卫团的队伍当时就乱了。他们看见南边的火光，如梦初醒，登时炸了营，比兔子跑得还快，争着往北关外跑。我也向北边毛家窝跑去。

大火自南往北蔓延，14日上午烧到北关，城内的人能跑的都跑了，无人救火。夜间一片火海，白日黑烟弥漫，火烧的灰烬随风飘至数十里以外。土匪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如入无人之境。安武军和保卫团的队伍也不知道都跑到哪里去了。据说驻防的安武军团长倪金镛正在乡下买地，团部副官向他报告，土匪窜犯阜阳，他置若罔闻，坚不回城；倪道煦参加"花会"后，留下两个妓女作乐，土匪进城后，勤务兵把他从床上架起来逃跑了。县政府一枪未放就缴了械，县长陈涤尘也被土匪当肉票掳走。

15日上午，听说土匪已经往南去了，我便离开毛家窝回城。北门吊桥被火烧了，木板还在冒着烟，过不去。我就从城壕里蹚水过去，又从城墙的一个缺口爬进去，经玉石池塘转上大街。街口有两具被火烧焦的尸体，四肢蜷缩着，也分不清男女，焦腥味很难闻。我从死尸旁边跑过去，大街上空荡荡的，寂无一人。两旁是断墙残壁，门面房子都烧完了，有的地方仍在冒着烟。前天还是繁华闹市，现在却是一片凄凉。

中午，不知从哪里传出消息，说倪嗣冲军队回来了，王普也派兵来了，土匪往地理城方向逃窜了。我便回到汇昌和。可能因

为这里的钢洋、烟土太多，土匪为了搬运财富，未及放火烧掉房屋。我走进房内，只见柜房、仓库全被砸开，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地上撒满了销过的票、帐簿；前后院空荡荡的，没有见到一个人。当我走进后帐房的小院，忽听房顶上的有人压低声音喊："霍相公，霍相公！"原来是经理马俊峰。土匪来时，他藏在屋顶上，已经一天半没吃饭了。我说："下来吧，土匪都走了。"我把他从房顶上接下来，又到厨房里给他找些吃的。他吃着东西说："完了，什么都完了，咱俩还算好，留了个活命。"

"老洋人"不但抢掠财物，还掳人，所掳男女，称为"肉票"。一票值百元或者更多，随家估价，贵贱不一。票价定出后，就令"肉票"写信通知家内"赎票"，到期不赎，就要对"肉票"拷打折磨，甚至"撕票"（杀害）。

王普的五弟被匪掳走，王派了一个营长，化装成小商贩，跟踪"老洋人"到河南宝丰也没救下来，最后用1000块钢洋才赎回。常兴周被"老洋人"掳走后，10多天才逃回来，我见到时，他腿上被打的伤还未痊愈，谈到被掳的经过，令人惨不忍闻。土匪探出他是信立成钱店的二掌柜，就要1000钢洋的赎金。二掌柜也是职员，家里哪里有这些钱？缴不出钱来就挨打，打后还要给土匪当脚夫，挑东西。白日干一天重活，夜间还要被审问，有时还要"上吊山"、灌辣椒水，不几天，他的两条腿就肿得老粗。掳到息县时，他怕再挨打，就说家里已经来信，明天送钱赎人。土匪信以为真，没有打他，还给他一些好东西吃，并给他腿上敷了药。当天下半夜他借口解手逃了出去。

15日晚上，人们都陆续回到家中。我和马经理睡在帐房里，刚到半夜又听见人声嘈杂，一片吆喝，还夹杂着哭骂声。马经理"霍"地从床上跳起来说："土匪又来了。"这时，门已经被砸开，进来的不是土匪，而是身穿军衣的保卫团。马经理一见是官兵，放下心来，满脸陪笑地说："老总辛苦了，请坐，请坐。"可那些当

兵的却不理他那一套，一个个横眉竖眼的咋唬道："老子拼命流血把土匪打跑了，你们拿什么慰劳？"马经理仍是陪着笑说："这个兄弟知道，改日一定奉请。霍相公，你到厨房里看看还有酒吗？"我刚想往外走，却被门口站岗的用枪挡回来："他妈的，别装蒜啦，老子要的是钢洋、烟土。"我说："老总，土匪刚抢过，什么也没有了。"一个当兵的把我往旁边一推说："没你的事。"另一个说："马经理放明白点，谁不知道汇昌和？别叫兄弟们动手。"马经理却硬了起来，他身子一挺说："我马俊峰领的是王镇守使的人，王镇守使是你们倪团长的姐夫，汇昌和的钢洋、烟土多得很，想要请你们团长来。"这一招也没有镇住他们，两个当兵的拧着马俊峰的胳膊，从他身上搜出许多银元、钞票。其他人都乱翻腾起来，首先翻出了马刚从夹壁墙里拿出的一箱子银元，一哄抢光。接着又发现了夹壁墙。马经理气急败坏，嗓子都喊哑了，可当兵的只管抢东西，谁还管他。夹壁墙里放的钢洋、烟土被抢劫一空，连床上我俩盖的被子也抢走了。当兵的走后，马经理气得大骂倪道煦纵兵殃民，比土匪还坏。

16日，倪金镛、倪道煦都回来了。他们假惺惺的在大隅首枪毙了两个抢劫居民的士兵，还贴出"安民告示"。但是，城内居民的愤怒无法平息。几个士绅带着灾民到马公祠找倪道煦等评理，倪等自知理亏，警卫森严，不予接见。

次日，王普派一团兵进城维持治安，团长是吴大贺。受害的灾民又去找吴告状，马经理也找到吴团长，把汇昌和被抢劫的经过叙述一遍，也告了倪家一状。吴见事关重大，牵涉到倪家，不敢久住，第二天就借口土匪已走，没有驻防军令，带着队伍走了。

此后，阜阳灾民团赴省控诉二倪祸阜之咎，无奈督办马联甲与二倪关系密切，袒护不理。消息转到阜阳，群情激愤，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后由地方绅士吕荫南、丁家谦、宁灿枢、李采汉等组成阜阳灾民赴京请愿团。到北京后，联系安徽在京人士，终于

将呈文送交总统府。黎元洪见文后，接见了他们，面听详情，始下令通缉二倪。马联甲首获此讯，密送二倪逃避，倪道煦逃避天津租界，倪金镛也逃匿他处。直皖战后，倪氏垮台，1928年，二倪才被捕归案正法。据说土匪头子“老洋人”也因结怨甚多，后被匪徒刺杀在京汉铁路列车上。

（安徽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十四起匪患祸阜阳

代　森

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内，不仅边患频繁，而且土匪蜂起，现将1922年至1949年的27年间14次大匪患记述如下。

一、1922年秋河南土匪“老洋人”集中万余人，直奔阜阳，先派部分匪众化装为江湖卖艺的、卖油茶的带手枪混入阜阳城内。于1922年阴历九月十三日凌晨，外攻内应，一举攻破阜阳城，大肆烧杀抢掠，阜阳古城一炬之下，顿成瓦砾。熊熊烈火，吞没了千家万户人民生命财产，悬梁、投河、跳城墙自杀的妇女，不计其数。婴儿摔死、冻死、烧死者又不知多少。

二、1927年（民国16年）5月16日，河南省民权县老戴政，又名代民权，率匪万余人，由鲁山流窜到阜阳郊区大肆烧杀抢掠后，又窜到地理城，盘据40多天，杀人如麻，现地理城附近仍有着当时掩埋死人的万人坑。攻破了地理城附近的郁寨，烧毁全部房屋柴草、杀死数百人。附近数十里村镇、乡民逃跑一空，田园荒芜，茅舍为墟。同年6月底，南京政府将其招安，收编为暂编四十五师，移驻固始、淮滨等地，由匪变为清乡司令，后被蒋军卫立煌利用，作为反共的炮灰。

三、1928年10月18日，豫匪李老末，率匪徒2万余人，窜犯阜阳，又从阜阳向北，25日至王老人集，26日至求兴集，28日至延陵集，后绕城窜到阜南新村集，盘踞15天，破开陶寨，将乡

民绑在树上，用煤油浇透全身，点燃烧死很多，叫做“点天灯”。破天杨老洪寨，杀死乡民七八百人。破开崔寨，把村民们排好队，用土炮轰死500多人。破开李老炳寨，杀死寨内的全部人，吃完死人的群狗，四处撵活人吃，寨周围几里之内不能行人。匪众于11月13号，又窜到小田集，盘据40余日。破开了田集寨、杨小寨、孙老照寨等，又杀死很多人，烧毁了很多民房，惨绝人寰。

李匪部抢光了这一片，又窜到那一片，最后窜到方集盘踞13天，由于冯玉祥派部队追剿，又窜到大别山，被部队四面包围，飞机在空中轮番轰炸，李老末被炸毙，余匪逃散。

四、1928年冬，豫匪王泰股万余人窜入阜阳境内，先后在赵集、苗集、公立桥、双碑湖等处盘旋。该股匪众流动性大，以烟火进行联系，故到一处烧一处，每到一处就是火光冲天，群众的房屋、柴草垛被烧殆尽。该匪每到一个寨前就喊：要钱、要枪、要马、要皮底鞋、洋袜子、烟土、纸烟、大米、肉等，若不给就打寨，破寨后，进行大屠杀，鸡犬不留。寨主怕土匪攻寨，就向寨民们摊派，收齐送给土匪，免遭灾难。我寨就是这样办的，当时我在寨内。

五、1929年春，阜阳方集魏家湾惯匪魏老飘，混号魏大头，聚匪众1000余人，在豫皖边区拉票、贴票、要枪、要马、要物资，人民畏如虎狼，后被包剿消灭。

六、1929年夏，马肉蹄子、常国动集大小股匪拉大杆，在豫皖边区东窜西撞，盘旋月余，把赵集、薛集、方集、公立侨等地抢掠一空，在洪河南被军队包围消灭。

七、1929年冬，固始县大寺李围子匪首李克邦，所部千余人，被十二军任应岐收收编为一个团，已穿上军衣，由于粮饷无着，又率匪兵窜到阜南地理城、龙王、薛集、小田集、方集一带，要钱要马、要枪，打开了镇董刘老经寨，并拉走了刘老经，将寨内抢掠一空，烧了寨内房屋及其花园内图书室，历代收藏的万卷珍贵

图书付之一炬。四乡红枪会数千人跟踪追击，越追红枪会的人越多，土匪纷纷四散奔逃，丢下了镇董刘老经，红枪会才停止追击。地方不堪其扰，进行上告，当时的政府派军追剿，土匪在息县、潢川等处被消灭。

八、1930年，哗变的团长霍子录率溃兵几千人窜犯到方集、公立桥一带，烧杀抢掠。后追兵赶到，散兵把所拉的牛、驴、骡、马身上浇上煤油，点燃后鞭打向围剿的军队，乘隙四散逃跑，牲口都烧成灰烬。

九、1931年冬，阜阳匪首李辅仁由豫东鲁山一带纠集匪众数千人窜犯到阜阳、临泉县境，攻破了柴集王老培寨，杀人很多，红学头子杨老和集合会众数千人打匪众，被土匪打死几百人。匪众窜到涡阳时，被官兵追上，歼灭殆尽。

十、1932年夏，阜南苗集大匪首张学良乌合洪河两岸大小股匪万余人，由南照出发，途经三河尖、苗集、三塔、许堂冲向阜阳城。阜阳守城自卫队团长程某带队出城迎敌，看匪徒来势凶猛，匪众我寡，随又退守城垣。张匪看城内防守严密，亦未敢攻城，随绕城而过，窜到临泉、太和、豫东等处。数日后又回窜到县境，由于土匪都是乌合之众，抢的东西多了，遂作鸟兽散，张学良被阜阳驻军捕获枪毙。

十一、1933年夏，豫匪杨黑子、刘得胜率大股土匪万余人，自豫东先后窜入临泉县的迎仙店、老集，阜阳的新村集、柴集、三塔集、程集、袁集、颍上县的四十里铺、南照集一带，后又窜到阜阳、太和，界首等处，沿途烧杀抢掠，民众死伤甚多。

十二、阜阳双碑乡涂庄的涂庆吾，又叫涂七，先惯赌、后为惯匪，与河南商、固、息、鲁山一带匪首李克邦、魏老飘、苗集巨匪张老永、河南尚九、赵集涂六等结为十兄弟，先在河南鲁山一带拉大杆，1925年回到双碑湖家乡。当地的地主、绅士们害怕，都来向其讨好，每日客人盈门，大吃大喝。1935年夏，阜阳专员

南岳竣将涂招安，委派为清乡自卫队长，部众编为一个中队。涂七匪性不改，仍秘密派手下人到外地抢劫。专员公署派保安团将涂部包围消灭，涂七被逮枪毙。

十三、1945年霍邱县匪岳葫芦、岳岐山，有匪千余人，不断流窜到霍邱、固始、阜阳的曹集、崔集、老观巷一带，烧杀抢掠。1949年初他率众投靠“人民自卫军”汪宪部，充当支队司令，在大别山一带反共反人民，1952年被我解放军包围消灭。

十四、阜南赵集任庙乡的惯匪庞登江又名庞加子，人称庞大队长，性凶恶，人畏如虎狼。1947年冬，聚匪众数百人，在田集、柴集、运河两岸一带拉杆为患，攻破苗集孙老财寨、李店寨、三王寨，抢掠一空，刘晓初寨未破。土匪到处抢掠，群众纷纷逃难。后被阜阳县保安团收编为大队长。1949年春，被我解放军于三塔集北大桥口包围消灭。

仅列举以上大股土匪之为患，可见旧社会人民灾难之深重，而愈感今日升平之乐。

（安徽省阜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李老末撕“肉票”

黄选德

李老末匪部于1928年4月到1929年春流窜皖西，驻扎金寨县境，罪行累累，最后被冯玉祥所属的程希贤师击溃。

李老末，名振威，兄弟六人，李最小，故名“老末”。李曾在刘镇华部当过小军官，因闹饷哗变，聚众为匪。后联络豫匪韦大邦、刘开炎、李效忠，号称有三团人马，所到之处，裹胁群众，人众续有增加。

1928年4月2日（农历闰二月十二日），李老末自新洲潘堂率部到达皖西金家寨。4月3日（农历闰二月十三日），天未亮，李老末匪部一股，进入麻埠镇，枪声一响，地方民团仓皇溃逃。李部匪众进街后，一面贴出布告，大意是：“……数月未曾关饷，需从地方筹借”云云，一面选择建筑整齐一些的房屋或店面，破门而入，一是要钱，二是要物，三是捉人，并放火烧了麻埠河街草房。匪徒们除搜夺大批钱物外，还从麻埠拉走“肉票”计男女老少300余人。行至杨店黑龙潭附近，被杨店大刀会截击，被歼灭一部；此后，李部在双河骚扰，并窜扰牛食畈，在李集附近与大刀会相遇，打了起来。大刀会会首顾老道和赵尼姑均死于李集山沟。李老末抓来的部分“肉票”因没人来赎，被关在李集街上的三间土墙房内，外架干柴，放火焚烧。火势大炽后，匪徒离去，房内被关押的“肉票”，齐心协力推倒窗户，大部分得以逃生。

李老末股匪以“拉肉票”的方法，勒索钱财，手段残酷。拉

走“肉票”后，他们约定金额（最多1000块银元，最少400块银元），约定地点，要“肉票”家人按期来赎，过期“撕票”。所谓撕票，一是刀砍，二是石头砸，三是火烧，四是马撕。最惨者，是把两根生长着的毛竹拉弯，把小孩的两腿绑于竹上，手一松，利用毛竹的回弹力，把小孩撕死。

据被当作“肉票”拉走的、当年仅14岁的王建成回忆：李老末股匪以大批的“撕票”为手段，威吓“肉票”亲属，在限期内“赎票”。股匪从金家寨到汤家汇，把限期已到的“肉票”烧死100多人。后窜到银山畈，在银山畈锅棚（锅厂）烧死200多人。在一个坳卡上又枪杀了数十人。不久，李匪又流窜河南某地与同伙白云武部会合，攻打商城，未破，遇冯玉祥部打了一仗，退至固始蒋集，又转而到叶家集、苏家埠，流窜六安、霍山一带。

1929年1月23日（农历腊月十三日）李老末大批股匪从霍山方向窜驻流波礓，从扎子岭驻到李家坪，繁荣一时的山区街镇——流波礓被匪徒们糟蹋得一言难尽。这段时间内，李匪白天分成小股下乡，名为要粮，实为搜索钱财，奸污妇女。附近数十里内鸡鸭鹅猪被吃光，最后杀牛。1929年2月28日，李得情报：冯玉祥部程希贤师以及夏斗寅师、黄国梁师三路来攻。李老末布置丢下马匹、重武器，轻装逃窜，经李集、牛食畈、吴家店去湖北滕家堡（今罗田县胜利镇）。时遇大雪封山，受阻折回，部分匪徒被困于三省[illegible]附近。李老末率股匪窜至木子店、刀峰山，遭前后夹击。李指挥精悍匪徒突围，自己当场被击毙。李部残匪突围后仍有三四千人，流窜至河南境内。

李老末股匪被击溃后，散失的枪支、子弹，部分被群众收藏起来，或秘密地转交给我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小组，充实了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安徽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连庄会打败“大祆队”

赵同心

1947年春，豫皖苏二分区卫凤楼率领八路军两次解放界首。虽未长住，却给人民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那时的界首还属两省三县管，国民党的乡保长一见八路军来就吓得东躲西藏。国民党的保安队也自身难保，望风而逃；八路军一走他们又卷土重来，照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一来一走、一走一来，就形成了拉锯式。拉来拉去给土匪造成了烧杀抢夺的好机会，他们大摇大摆公开活动，拉肉票、抢财物，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为防匪骚扰，各庄有钱的户就买了潮北条、汉阳造、撅把子，组织起连庄会。一庄有难、四乡支援。这样一来，小股土匪不仅抢不到财物，有时还把老本赔上。小股不行，就由几小股拧成了一大股。连庄会想抵住大股土匪就难多了。

1947年农历八月十五，在刘庄发生了连庄会打败大股土匪“大祆队”的事。

刘庄离界首5里地，在拐台的寨外边，东3里的是曹寺寨，西3里是荣老家寨，西南2里是碾石寨，西北2里是王方庄，东北角与罗庄村树林搭树林，中间夹座祖师庙。

这股土匪是以郭松涛为首的，有七八十人，长短枪三四十枝，穿的都是抢来的衣服，花红柳绿，长袍短褂，老百姓称他们是大褂子队，又叫大祆队。刘庄有10几家赶马车的，因兵慌马乱没货拉，再加八月十五都想在家圆圆月。大祆队一看几十匹大骡子拴

了半截庄，就想做刘庄的活。这天后半晌，大袄队开进了罗庄。刘庄连庄会的刘浩然、刘兴泰、刘兴广等人还请来了拐台寨里的王敬贤商量了对策：刘庄的老人、妇女小孩和牲口都提前进拐台寨。拐台寨由王敬贤组织人死守。刘庄由刘浩然等人抵抗，打胜了，寨内出人追击；打败了，刘庄的连庄会撤进寨里死守，以待四乡支援。

定更以后，罗庄住的大袄队出动了，本想窜进庄内，到各家抢个痛快，哪知刚到庙门口，刘庄的枪就响了。一阵枪声放倒三四个，吓的大袄队赶快缩进庙里，把人组织起来向刘庄发动了攻击。刘庄的连庄会躲在暗处，地理又熟，敌人发现不了，打枪也是瞎打。敌人在明处，一露头就挨枪，子弹压的他们抬不起头来。一连发动5次进攻，丢下8具尸首，龟缩在庙里头再不敢露头。

大袄队攻不进刘庄，就派罗庄的罗会英出面联系。罗会英边走边喊："刘庄的人，别开枪，我是罗庄的罗会英，长官说啦，只要让把尸首运走，永远不抢刘庄。"他喊着向刘庄村内走，刘庄的人没开枪，因为认识他，也没答话，怕暴露了目标。但始终注意着，看罗会英身后跟的可有大袄队，怕他们乘机进攻。

这时候没有枪声，只有罗会英一人走着喊着。等罗会英进了村，刘浩然等人迎了上去，问明来意和大袄队的情况。罗会英说："他们看恁庄庄小骡子多，人和枪都超过恁庄，没打算你们的抵抗力这么强！"刘浩然笑着说："真打起仗来，他们这乌合之众、差远啦。我在西北军时打过大仗，还耍过大刀片呢。"罗会英说："他们提出只要让把尸首运走，今后永远不抢刘庄。若是不让运尸，以后要血洗刘庄。"刘浩然说："若让运尸，他们乘机扑进村来怎么办。至于血洗刘庄，打死他们那么多人，有能力现在就血洗了，还等以后干啥？要想不让他们以后血洗，只有现在把他们消灭。"罗会英一听这话，接过话茬说："那我回去咋向他们交待？"刘浩然说："你还回去干啥？"刘兴泰说："他们这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

吃人不吐骨头的。你回去他们问刘庄的情况你怎么说？把老底露他吗？要说你向我们露了他们的底，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那，那就听您的。”

东方亮了，刘庄的枪响了，拐台的枪响了，碾石的枪响了，曹寺、荣老家、王方庄的枪响了，东西南面的连庄会出动了，把大祆队由庙里赶进罗庄。这时枪响得象爆炒豆一样，人象潮水一般，大祆队吓破了胆。顾不得还击，窜出罗庄就向北逃，跑的象炸窝猪一样。连庄会也不打枪，喊着追赶，如打疯狗一般。大祆队正被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时，从曹庄又出来一群人进行堵截。连老头小孩都出来凑热闹，帮助呐喊助威，再加上到界首赶早集的，也追上去了。大祆队被追得只恨爹娘少生两个翅膀，不能腾飞逃命。最后会水的泅渡沙河逃命，不会水的被活捉。清点一下，缴枪 8 枝，活捉 18 人，象赶猪一样押进碾石保公所。

刘庄这时更热闹，刘浩然身背缴来的 5 枝长短枪，谈打仗的经过。刘兴广正指挥人用牛把尸体向乱葬岗上拉，各家各户的人都出来了，人人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

保公所押的俘虏送到刘兴镇的乡公所。后来才知原来官匪一家，送的俘虏都被乡长姜会荣放走了。刘浩然跺着脚说：“娘的，早知道当场打死好了，放虎归山，必有后患。”

刘浩然说对了，一个月后乡长姜会荣打着到刘庄来起枪的名义为大祆队报仇来了。因是白天来的，大部分劳力都下地干活去了。赶马车的预料到大祆队不会罢休，早把骡子送到亲戚家去了，庄上剩下的不多了。刘恒斌在家里干活没下地被抓住了。三句话没说嘭的一枪，打昏在地上（后来治好伤，瞎了一只眼）。说是起枪，东西也要，人也抓，逼着要钱要枪，闹得刘庄天昏地暗，哭声连天。

刘浩然正在地里出红芋，庄里情况早知道了。因是乡长带人来的，一不能用枪抵抗，二不能劝说平息，患难盼知己，绝处想

要人，他多想魏凤楼带兵来解救刘庄的危难呀！抬头一看，一支队伍开进了王方庄，走近一打听是国民党的新五军，一听松劲半截，这一家伙刘庄完了。又一想：别管你是什么军，只要能引进刘庄就行，救人要紧。想到这里，他走进王方庄，找着一位长官说："俺庄进来一批'土八路'，正在抓人要粮食，赶快去捉吧！"新五军这时正与刘邓大军周旋，由此处经过。一怕刘邓大军阻击，二怕土八路骚扰，听此消息，不能不问。派人一侦察果然有人在刘庄抓人抢东西，就命令把小钢炮支在王方庄东南角的柿树林内，派一连兵叫刘浩然带路，向刘庄包抄。在刘庄的姜会荣正抓人抢东西，一看西北方开来一支队伍，正包抄刘庄。心想这是哪一部分呢，要是国民党的军队好说，要是八路军那就遭了。看样子是有意包抄，祸多吉少，早走为妙。连忙集合队伍，放了抓的人，丢下财物，夹着尾巴向东南逃命。新五军进了刘庄一看"土八路"跑了，也没去追赶。因为他们知道土八路的厉害：聚则成军，化则为零；他打你千军万马，你打他无影无踪。于是，这支人马又回王方庄去了。

1947年乔道三奉命在界首三镇建立界首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界首支队，反匪反霸，抓住了姜会荣，从汉口缉捕了郭松涛，先后召开公判大会，把他们枪毙了。历经磨难的刘庄人吐出了肺腑言：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

（安徽省阜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赵洪善破寨目睹记

王质庵

1932年农历九月初一，我正在吃晚饭，忽从彭马庄传来消息，说是今夜有赵洪善大股土匪要来打寨，让急作准备。我慌忙丢下饭碗，因财物粮食难以搬运，遂将牲口牛马，挽个活结，拣好书籍装作一筐，匆匆逃走。村中人都扶老携幼，纷纷逃入芝麻稞地里躲藏。听说土匪打寨，人人心惊肉跳，大人小孩趴在芝麻地里不敢说一句话。约半夜时分，忽听西清凉寺寨及西边曹庄寨、张庄寨一带枪声大作，并伴有炮声。3个寨里火光冲天，哭喊声一声连着一声，惨叫声一阵接着一阵，真是耳不忍闻。小孩都把头钻在娘怀里不哭不动，不言不语。我一时惊慌，拉出一匹马，书也未及背上，跨马飞奔东南彭马庄而去。刚至彭马庄西北角，土匪就尾追而来，步步逼近，幸亏寨上亲朋鸣枪接应，吓退追匪，方得入寨。

藏在芝麻地里的村民尽被匪徒掳走，一路抢、掠、杀、打，惊天动地，惨状一言难尽。我村中房屋，尽被烧光，小孩烧死在屋里有六七个，牲口更无计其数。从九月初一直到九月初九，匪徒在这3个寨内肆意烧杀抢掠。初九上午，才有一支官兵，自北方开来。看那官兵可真威武，头戴钢盔帽，手握大洋枪，还有4门迫击炮，在关庙集摆开战场。刚一接触，官兵即失利缩首而退。下午官匪两军又在关庙集南清凉寺北大战。匪徒十分凶勇，迎着官兵射出的迫击炮弹，赤膊持刀，飞奔直前，大杀官兵。我在彭马

庄寨墙上向西看得清楚，官兵被匪徒杀掳多人。后从张庄出来一些官兵，又把掳走的人夺回，于是两下收兵。当夜二更，匪徒意料此处已无大油水，还有官兵对峙，于是浩浩荡荡往东南窜去。

三天之前，有清凉寺村民丁多逃进彭马庄寨内，村人问及清凉寺情况，他说：匪徒在寨内杀戮奸淫，目不忍睹。前天有一邻女叫颜媚，19岁，因貌美被马、张、刘三匪头目轮流叫去侍寝取乐，因在马处多留一夜，张即大怒，要杀马，以泄其恨。刘得知，向张、马说，我给你二人解决问题，遂将颜媚拉出门口枪杀。张、马看事已至此，即息怒了结。后来其尸体扔在寨东，衣服被狗撕破。满头青丝数月后仍在我村南地随风飘落，象是向苍天控诉无耻凶残的匪徒！

丁多还说：寨内因缺少粮食，匪首叫他领一匪徒到地里扒红芋，他对土匪恨之入骨，又不得不去，就同这个匪徒到了寨东地里。刚扒几块，他看匪徒正低头收红芋，就乘其不备，举钉耙狠命向匪徒头上打去，只一下即将其打死，遂奔彭马庄来了。

九月初九夜匪徒拉走后，天明初十，我回村一看，满村房屋烧尽，一片热灰红炭，人畜死尸，腐臭难闻。村中的水沟里，飘着人畜油花；村中井里，漂着人畜尸首。我在舅父家借来一牛，用沟水、井水拌草，牛亦不食，后来只得在沟边另挖一井。村人食粮都是从外村亲戚家借来的，做饭全用烂盆破盂。不久天冷，又向外村亲戚借来衣被，住在临时搭的草棚中度过寒冷的冬天。

（安徽省阜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二匪火并记

潘永德　侯西山

1947年，我解放大军如同风卷残云向南挺进。在阜阳、太和、临泉（当时还没有界首县）三县交界的地方出现了空白点。国民党军队已逃之夭夭，我解放大军还没赶到。一些地主武装和土匪蜂涌而起，鱼肉乡里，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其主要匪首有两个，一是刘云启，一是艾怀山。

刘云启，家住太和县大新区的刘老庄，为人凶暴残忍，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为了对付艾怀山，花钱在临泉县买了个临泉县保安队便衣大队长的官衔。兄弟四人，称为刘家四虎。在这一方，是赫赫有名的大土匪头子。

艾怀山，家住阜阳县滑集乡艾庄，为人心狠手毒，野心勃勃。他当过伪保长，三县联防清剿区大队长、阜阳专区保安团副营长。他手下有一帮凶恶打手，如号称艾家四虎的张文仲、董付田、艾永祥、艾家召。还有董现印、单庆国、孟继恩3个中队长。约有队员200余人，实力雄厚，独霸一方，是刘云启的劲敌。

为什么刘云启和艾怀山二人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头呢？这得从头说起。

分　裂

原来，这两个都是太和县范楼范老二的门下（范老二是二门上的“总瓢把”）。范老二对门下规定绿林规矩说：“干这行，采花

不盗柳，盗柳不采花，兔子不吃窝边草，不准在本地为非作歹……。”

刘云启、艾怀山两人烧过香拜过把，亲如同胞。民国32年刘云启的贴身随从杨卫和刘傲，把茶棚的3名年轻妇女绑架到于庄糟踏了3天，其中就有一个是艾怀山的远房侄女。艾怀山知道后，一气三天没起床。这天艾的打手刘小个问道：“大哥，有啥事不遂心，把你气成这个样子？”艾怀山就把刘云启手下人违背绿林禁令、奸淫妇女的事讲了一遍。“啪”刘小个把手枪摔在桌子上，说道：“违背禁令就该活埋，何况欺负大哥呢？这点小事交给小弟我了。”说罢，转身走出门去。

几天以后，刘小个约了杨卫和刘傲到酒馆喝酒。酒桌上三人猜拳行令，谈得十分投机。小个拍着杨卫肩膀说：“老弟，你只管趟着干吧，现在的天下便是咱弟兄的。”杨卫说：“还望大哥多指点！”

喝了酒一同出来，在集外的路上，小个拔出手枪，故意摆弄了几番，说：“我这家伙用起来得心应手，一连就是十发，三五个人在我手下都不算一回事。”刘傲说：“你这支盒子枪真棒，我的不行，好卡壳。”说着从腰里抽出来，小个接过一看，哈哈笑了起来：“你这枪灰是灰，锈是锈，咋能不卡壳，还不卸开擦擦。”刘傲说：“我卸不好。”刘小个说：“那有啥卸头，5分钟。”说着就蹲在沟坡上卸了起来。杨卫看到刘傲在擦枪，自己也把手枪抽出来，请求刘小个给卸开擦擦。正当他俩聚精会神擦枪的当儿，刘小个抽出手枪，哨哨两枪，干掉了这两个酒色之徒。小个把两支手枪用毛巾一兜，扬长而去。

偷袭艾庄

刘云启听说刘小个打死了自己的叔叔和贴身保镖，无比气愤。骂道：“你艾怀山太不够朋友了，这点小事就下此毒手，兴你不仁，

也兴我不义。”于是，就约了车老官一伙匪徒夜袭了艾庄，牵走7头牲口，抢走衣物无数（因艾怀山一帮人当夜不在艾庄）。从此，艾、刘两人结下了不解之仇。

范老二知道后，就花钱活动，在滑集成立了一个阜、临、太三县联防清剿区，让艾怀山当了清剿区的大队长，以官府的名义来铲除刘云启。

当时刘云启在本地无法存身，跑到河南潢川，开了个金货铺子作为门面，暗中仍带着手下的一帮人回来抢劫财物。有一次，刘云启的弟弟刘云镜和黄野鸡回来抢劫，被艾怀山发现，急忙差人追赶，一直追到阜南的赵集，捉住了黄、刘二人，解回滑集枪杀了。

刘云启为了报仇，从潢川回来，躲在刘同寨刘雅斋家里，托刘老庆去临泉花钱买了个保安团便衣大队长的官衔。从此，刘云启才敢公开露面，在临泉县境内捉拿艾怀山的部下（因为那时茶棚保归临泉管辖，而艾庄属于茶棚管辖）。

1947年农历五月，刘云启带了便衣队员，悄悄地围住了艾庄。当时人们正在打麦，刘云启突然袭击，艾怀山来不及转移，就被包围了。刘云启挨户搜查，并把男女老少都集中在打麦场里，把包围圈也缩小到打麦场上。

艾怀山这时藏在摔麦场的案板底下。他见刘云启包围了艾庄，走不出去，就叫董付田跑到庄外打了一枪，用调虎离山计，引走了刘云启的便衣队，艾怀山才得脱身。

打死刘雅斋

艾怀山大难不死，岂肯善罢甘休！他立即整顿队伍，联系土匪，准备报复。

六月十五日，正值茶棚逢集，人们熙熙攘攘。范老二的保镖申六在说书场里，用手枪打死了刘雅斋的贴身随从刘殿侯，接着

艾怀山的便衣、保安队，便在茶棚集上，挨门逐户，翻箱倒柜，搜捕刘雅斋（刘雅斋是刘同寨寨主兼保长，曾花钱给刘云启买了便衣大队长）。当搜到了柳培启家，见床下秫头子一动，申六叭地打了一枪，逼着柳培启扒开秫头子，从床下拉出一个尸体，原来是刘雅斋藏在床下被打死了。

激战艾庄

打死了刘雅斋，拆了刘云启的顶梁柱。刘云启决心报仇，请来了车老官，搬来了临泉的县大队，加上自己的便衣大队，不下五六百人。1947年农历十月二十这天要血洗艾庄。

艾怀山打死了刘雅斋，知道刘云启定要来报复，便把一个中队驻在董寨，另一个中队驻在前油坊，艾庄留下了一个中队。3个中队成犄角之势。这天密探报告给艾怀山，说刘云启搬来了车老官、临泉县大队，并带有7挺轻机枪。艾怀山自知力量悬殊，寡不敌众，便命董现印带队进了艾庄，自己带领两个贴身随从前去滑集搬兵。

刘云启兵分三路，对艾庄进行夹攻。第一路是临泉县大队，从东南潘庄去打前油坊单庆国的一个中队，然后进攻艾庄；便衣队从西南进攻小董寨，董寨攻破后打艾庄；第三路是车老官，从北面直攻艾庄。

车老官接到了刘云启请柬之后，带领本部匪兵，在早饭前就已赶到艾庄。守卫艾庄的匪兵，见北面来了一队人马，误认为滑集方面的援兵来到，赶忙派艾永勤去联络。艾赶到旁边一看，发现不是援兵，转身想跑，已经来不及了，被车老官的人立即绑住，押着走在前面，匪兵在后，让艾庄不能开枪。艾庄人马一见绑了艾永勤，不敢开枪。艾永勤被押着走到了村沟边，趁后面的人只注意村里的动静，他大声喊了一嗓："打！"就一头扎进了水里。村里一阵排子枪打出，车老官的人当场被打伤。因为他们已接近村

庄，又无遮挡，整个部队暴露在艾庄的火力之下。艾庄一阵猛打猛攻，车老官部已溃不成军。加上南面队伍没有赶到，艾庄又一阵猛追，车老官的匪兵只有狼狈逃窜。

刘云启部一路上烧杀抢掠。路经白庄、潘庄、小董寨，都是打人骂人，所过之处一片火海。特别是在董寨，一连烧了7家房子。这就耽误了进攻艾庄的时间。上午时分，刘云启部赶到前油坊时就与临泉县大队联合，猛打猛攻两小时却无效果（因为那里有单庆国一个中队防守，早就做好了工事，各个路口都埋有大批荆刺）。刘云启一看时间不早，怕滑集方面来了援兵，于是命令部队丢下前油坊，向艾庄进攻。手枪、步枪、机关枪响成一片。烟雾弥漫，火光冲天。又打了两个多小时，已攻到艾庄庄跟，双方都有伤亡。这时经头面人物于振堂调处，建议停止决斗。刘云启见艾怀山从滑集搬的兵也来了，打又打不赢，光棍不吃眼前亏，还是撤走为妙。于是急忙命令撤退，一场凶恶的战斗结束了。

歼灭刘云启

1947年底，我解放大军大举南下。杨桥区长郭和带着区队，对这一方恶霸地主进行了镇压，对土匪武装进行了清剿。艾怀山一看大势不好，认定了今后的天下必定是共产党的，决定缴械投诚，派人主动去与郭和联系，投诚了解放军。解放军就把艾怀山、刘金堂、董现印、李怡元、许金亭等人送到陈州集中学习。大军南下后，艾怀山乘机潜逃回家，继续为非作歹，后被人民镇压。刘云启依然负隅顽抗，妄图与人民对抗到底。郭区长决定：消灭这股土匪武装。

在腊月二十九这天，泉河北岸枪声大作。解放军东、西、北三面合攻。刘云启自觉力不从心，节节败退，一直退到泉河岸边。他后退无路，仍然顽抗，终被解放军击毙在泉河水中。

（安徽省阜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尚万才火烧行流集

方鹤松口述　赵子房整理

很早以前，行流集还没有兴集，只是两个相联接的庄子。南边的庄叫彭庄，北边的庄叫刘大庄。据说南宋初年，金兀术向南侵犯时，曾在那里设个兵马休息站，人来人去，川流不息，这样就形成了集。以后人们给它起个名字就叫行流集。

辛亥革命前后，行流集已发展成为阜阳北三镇之一，是阜阳、太和水陆交通要道。其地东靠沙河，阜阳、太和来往船只大都要在这里靠岸，阜阳到太和的公路直穿行流集街道而过。南北、东西两条大街虽然不宽，但沙土路基既平坦又清洁。街道门面，虽然都是草房，盖的比较整齐。那时行流集街东头有三官庙，街西头有关帝庙，南有火星庙、塘子庙，北有奶奶庙。还有文昌阁（俗称阁楼子）高高跨坐在行流集十字街口，南来北往的人都要穿阁而过。每到双日逢集，四面八方赶集的人络驿不绝，非常热闹。

1921年，就在这样一个较繁华的农村集镇里，发生了一起尚万才火烧行流集的事件。文昌阁烧毁了，刘振清、叶少卿等9户人家的房子烧成一片焦土。从此，行流集逐渐衰落。

尚万才是行流集河东杨海孜的人，有名的土匪，外号叫尚老六。他的弟弟外号叫尚老九。他们一般情况是不吃窝边草的，大都在很远的地方作案。他火烧行流集也不是为了抢东西，而是找刘金铭报仇。

刘金铭原来家里很穷，由于他的儿子刘生香（别号叫刘四

声）开盐粮行，当了练总，才富起来的。他是集上有名的一霸。尚万才同庄中有个叫尚万的人，会制造土纺花车锭子，经常赶行流集去卖。他和尚万才是平辈的，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他把尚万才干的恶事告诉了刘家。刘四声就带着局子兵，抄了尚万才的家，并审讯拷打了尚万才的父母。从此，他们两家结下了仇恨。尚万才怀恨在心，决意要报此仇。

1921 年阴历六月初六日，四面八方都来行流赶集。尚万才带着 30 多个土匪，腰内带着武器，打扮成卖菜的、卖其他东西的，也有装成闲赶集的，先后混进行流集，分路捉逮刘金铭父子和卖纺花锭子的尚万。上午 10 点钟左右，刘四声从家里出来到盐粮行里去，就被一个阜南姓应的土匪盯着。但是却被刘四声的弟弟刘皖九和行里代买人叫三保的二人识破。几个人一齐捉斗姓应的土匪，姓应的土匪因寡不敌众，打伤三保后被逮住，拴在盐粮行里。尚万才听到刘四声捉住姓应的土匪，一不做，二不休就和其他土匪一起动了手，火烧文昌阁和刘四声的盐粮行。这时集上火焰冲天，枪声大作，赶集的吓得乱跑，人群大乱。刘四声和他的弟弟刘皖九看到事情不妙，开后门趟河逃到阜阳城。局子兵没有打就跑了，有的枪支没有顾得拿就逃了。尚万才把刘金铭逮住了，用刀在小腿肚子上穿个窟窿，用绳象捆猪的一样捆着。卖锭子的尚万也被逮住了，他脚后跟筋被挑断。至此，尚万才达到了目的，不仅逮住了仇人，还缴获了数枝枪。为了拢络人心，就高声向街上群众喊叫说："我是来报仇的，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不要怕，赶快救火。"街上群众怕烧着自己的家，也就动手救起火来。因而大火很快被救下了，没有造成全集毁灭的后果。下午 2 点钟左右，尚万才才从流集撤走。在撤走的时候，尚万才除了把刘金铭、尚万二人弄走，为了防止刘四声到阜阳搬兵来追，还把学堂杨老师和 10 多个小学生（10 岁左右）带走作为人质。下午四五点钟，尚万才回到杨海孜，就把尚万枪杀了。到下半夜，才把杨老师和小学

生放回去。后来尚万才把刘金铭杀死在南红河沿。尚万才报了仇，不久又投奔李瞎子，当他的营长。因此刘四声吓得一直住阜阳城里，很长时间不敢回行流集。这就是尚万才火烧行流集的真实情况。

（安徽省阜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我家两次被抢的经过

胡腾龙

1938年以后，蒙城附近的土匪趁日军侵犯，国民党军队撤走之机，勾结乡、保、甲长，对当地群众白天敲榨勒索、拦路抢劫，夜晚进庄牵牲畜、抢财物，坐地分赃。老百姓谁敢不给就绳捆索绑，轻者打伤，重者当场打死。有不少户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家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我家只有42亩潮地，加上种地主的4亩坟地，计46亩地。车辆牛具齐全，自劳自食，生活还能维持。因被土匪抢过两次，家境日益困难。

第一次是1939年农历七月初，我舅父来帮助我家砍秫秫。一天夜晚10点钟左右，土匪到我庄抢劫，把我全家人关在屋里，点着灯，将我祖父和父亲衣服脱光，用绳子背剪手绑上，吊到梁头上，并用水桶套着头。两个土匪先用棍打，后用大扫帚抽，烟熏火燎，周身被燎成酒盅大的泡。我父亲被燎急了，骗他们说："钱在北沟沿埋着。"目的是想拖延时间。领他们去扒，跑了一圈未扒着。回来后土匪更生气，连打带燎有半个小时，只翻出4块银元。

当时我奶奶也被拴在门插手上，土匪用棍打她硬逼着要钱。她说："我是妇道人家，不管钱。"土匪看我家实实在在没钱了，要把我带走。我舅父说："这小孩是我带来的。"就在这时候，东院李老妈跑出庄，叫喊前庄看家的红枪会来救护。他们立即来几十人，高喊"逮土匪"，土匪人少害怕了，就打一阵枪落荒而逃。土匪被

撵走了，祖父被救下，痛得躺在地上不能讲话。父亲经治疗过了两个多月才康复。祖父因年老体弱，医治无效而死去。

1940年春，我家第二次被抢。一天夜晚，土匪们带着刀，砸开门喊着我父亲把灯点着，二话没说，把牛马牵走。

1950年反匪反霸时，抢我家财产的土匪头子均被镇压。共产党给我家申了冤、报了仇，也为人民除了害。

（安徽省阜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清末民初土匪骚扰沙县四乡纪实

张宗健

晚清失政，军阀混战，土匪蜂起，治安动荡，生产凋零，民不聊生。回想当年土匪骚扰、劫掠、烧杀沙县四乡的悲惨实况，记忆犹新。这里就个人所闻所见，概述其实况如下：

清末光绪十八年（1892年）沙县下南区人姚华倡立“乌钱会”，谣言惑众，啸聚莠民和乡愚数百人，骚扰四乡八堡，横行无忌。乡民不堪其苦，小康人家纷纷携带家属迁入城内避难，贫困人家只有忍气吞声，任他荼毒。当时政府视若无睹，坐使匪势猖獗，日甚一日，于是匪众扬言攻城，百姓惶恐不安。农历七月十五夜，家家正在祭祖，水南居民传言“乌匪”已到，争相扶老携幼争渡来城避难，因船少人多，有不及登渡的人都站在隔溪对岸大声嚎哭，惨声震耳。于是紧闭城门严防10多天，县令沈昌寿星急报请上级驰兵增援，由总带钟紫云率兵400来援沙，匪闻风潜遁，兵到毫无踪影。上司认为是虚报军情，结果沈被罢职。姚匪认为官军可欺，杀人越货更加猖獗，乡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后民众竭力和军兵联防，协力围捕，不久姚匪被捕获，解绑西门外后薛虾蟆坟斩首示众。乌匪之乱，终告平息。

宣统三年（1911年），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影响下，福建省光复。著匪吴凤标原籍系永春人，早年迁徙来沙，寄居北郊横坑村，明为务农，暗结匪类。在政权更迭之时，他认为有机可乘，因而聚众猖乱，打着江湖镖客的招牌，沿途发布暗号，以砖块或石

头作三角等号放置。凡和匪徒有联系的人，认识记号可以逍遥通过，平安无事。一般商贾行人，不知内情，错踏路标，即遭受劫掠，以此挟胁。从匪的人日增，只几月已拥有数百人，横行北区各乡和下南区高砂等处，肆无忌惮地扬言某日攻城，居民仓皇不安，闭城防守。时城中军械空虚，各界商议推举林致广、杨文藻二人专程去南平向郡府请拨军械。适值省方派总带左克明领兵到南平一带安民，得悉情况后即随同赶沙救援，途经下南区高砂乡时，匪首吴凤标刚好在该乡散发布号，胁迫乡民。左总带得到密报后，立即命令军兵会同乡民合力围歼，结果吴匪凤标被捕获，由军兵解送县署，在县衙前水井边斩首。左总带一面巡城安民，一面令各乡团练严加防范，沙县人民赖以安居乐业。

民国元年（1912年）列西乡秀才黄炳相倡立“卫清社”，以抗五捐为号召，煽惑乡民抗粮。县署派粮差下乡催征，被列西乡吴老兵、罗占龙杀害。黄炳相自知罪在不赦，乃假托神道，奉“欧阳仙府”大搞迷信活动，画符念咒，胡说：“能封枪锁炮，使不能发。”乡民信以为真，黄炳相见技已售，竟联络各乡聚众数百人，号称“童子兵”，以“不打家劫舍，不剪路要死钱”为标榜，目的在于抗交五捐，矛头直指官府，策划准备攻袭县城。农历六月十六洋溪乡童子兵首先行动，聚众近百人前来攻城，到西门时见城门已闭，乃遣一部分绕道沿溪马路，抢入小水门转西门破开城门。童子兵人众，长驱直入直攻县署。县令刘俊复命警备队以快枪防御，当场击毙童子兵10余人。余匪见状惊恐万分，四处逃命而溃。七月下旬省派司令官邹云彪率兵来沙戡乱，兵到立即挥师往洋溪乡。该乡童子兵闻风逃遁，乡绅罗培芹等热情犒军，极力为无辜良民请命，并负责筹集罚款光洋4000元充作军需，侥幸得安。可是黄炳相乃聚众盘据徐枋城堡，负隅顽抗，邹司令督军以猛烈火力强攻。经过一日一夜交锋，困守在徐枋城堡的童子兵力不能支，彻夜夺路溃逃。军兵随即夺得城堡，纵火烧毁民房，烈焰烛天，远

在沙县城关还能看得火光满天通红。这次兵燹共烧去民房数百间，无一座幸免。黄炳相等却逃遁于永安大湖乡十八寨。后在乡绅多方劝解和乡民协力通缉下，黄炳相、吴老兵、罗占龙等先后被捕归案，解县分发四门枪决，一场匪患始告平息。

民国5年(1916年)正月间，德化土匪苏益等率众数十人，企图入侵上南区昌荣坑村，幸该村士绅卓兴成等早有防范准备，筑碉堡设防，没胡得逞。二月，该股匪徒袭掠洋溪、正地两乡，打家劫舍，掳人勒赎，弄得鸡犬不宁。十月又攻下南区村头，烧去民房数十间，被掳5人。同时，下游土匪林飞标劫掠北区富口乡，掳人勒赎。三月，土匪王得贵侵袭柳源村土堡，烧毁土堡一座，民房十余间，掳保卫团总等11人，打死乡民1人。北区各乡人民屡遭土匪骚扰，不堪其苦。夏四月，倡议联甲捕匪。不料巡逻甲丁刚到富积坑，即为预先埋伏的肖子仁股匪突然袭击，乡众惊惶措手不及，甲丁芳、礼泰、张启辉等7人，中弹死亡。乡绅管世煊、茅乐灿、姜国锡等为他们立祠于富口桥头，表彰他们为地方壮烈牺牲。

在南北军阀混战年代，政局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匪害更甚。民国6年（1917年）冬，由闽南德化流窜来沙县的土匪，三五成群，百十结队，匪势蔓延，如同烈焰洪水。南区九都和廿都各乡，几乎成为匪类渊薮，行人裹足，鸡犬难安。其中下游匪王昇平、苏玉麟、陈国华等股匪，连续劫掠上南区草洋、昌荣坑、湖源、坡尾，据估计共被烧去民房达数百间，蕉坑、丰余土堡、太平土堡都被烧光。乡民中弹死亡的有蕉坑5人，昌荣坑8人，丰余17人，湖源、坡尾共30余人。家家户户尽被掳掠一空，为害惨重。另有股匪肖子仁、赖家明、胡金花等在下南区山峰、镇头、曹元圩、茶坪峡、溪源、南坑、洋岭、蒋坡、龙凤坡、松树坑、南坑仔等乡村，流窜劫掠，横行烧杀。各乡民房被烧毁的少则三五间，多达十几二十乃至数十间不等。此外还绑票勒赎，许多少妇，幼孩还

被贩卖他乡，弄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特别是山峰村受害最惨重，全村住房尽被烧光，击毙男女30余人，使该乡变为废墟，乡民无法重建家园。

民国7年（1918年）农历二月，尤溪土匪卢兴邦啸聚匪徒数十人，侵袭下南区，纵火烧毁琅口，山峰两村所有民房，仅留下荒僻的一座小庙，杀死村民24人。同年农历六月十三卢匪又劫掠田坑乡，烧毁民房50多间，枪杀罗姓族长等4人。路过曹元墟时，又烧去民房1座。是秋，卢匪率众百余人，突然袭击下南区高砂乡，焚烧房子200多间，受害二百七八十户，劫掠一空，损失达到百多万元。农民魏德义义愤填膺，用土硝、土炮埋伏在高砂头城门口，向匪众射击，击毙匪徒数人。匪不知所措，仓皇逃窜。事后匪首进行报复，即于九月初六派头目张兴金率众百余人，深夜偷袭高砂乡，有农民14人被杀死，然后洗劫该乡扬长而去。

民国12年（1923年）大田土匪吴德胜率众窜到东区高桥、上洋等乡村，勒索饷款未遂，焚烧民房百余间。当时有青年妇女11人，其中2个还有身孕，她们恐怕遭匪蹂躏，身藏在一小间砖房内，堵门避祸，结果仍被烈火浓烟窒息而死，造成高桥11尸13命的悲剧。另吴匪还掳去村民10多人。

同年四月，闽南土匪名篾的率匪徒10多人，劫掠官岭、根竹坑、弓坑、炉坑、双溪等乡村，民房被烧几尽，官岭还有男女6人被害。九月下旬土匪林桂芳劫掠上南乡，烧去卢姓库屋2座，焚死妇孺共14人；大发墩村被害3人。

民国14年（1925年）夏，德化土匪苏忠义以白水洋、马登为巢穴，大肆掳掠烧杀，各乡少妇、幼童都掳往下游发卖，弄得家破人亡。此外，著匪林桂芳、林桂成兄弟伙同胡金花等窜沙，以九都为巢，四出劫掠，凡上南区岩前、安坪、及洋岭、龙凤坡、松树坑、后盂等乡除烧去土堡民房数十间外，还有龙凤坡农民被害6人，掳去洋岭乡民6人。这年秋天，林桂芳又与陈景文率匪徒设

卡于北区罗溪，除向肩挑货物的过客苛抽过路捐外，又向各乡勒索助饷，稍不如他意就大肆烧杀洗掠。以上洋花坑、白溪、水头、富口、池村为害最烈。柳源、荷山、黄地、延溪、姜后、罗溪、富积坑、通门等处也被烧毁过半，击毙乡民8人。

民国15年（1926年）春，盘据上南区的著匪苏义忠由马鞍峡搬往顶头土堡为巢穴，与下南九都为首的苏国太、林宗高相互勾结，横行乡里，烧、杀、淫、掠、勒捐作饷，无所不为，乡民苦无宁日。民国17年春，匪首林桂芳在瓜楠姘妇家奸宿，正在抽大烟，被县游击队长林杰击毙。其弟林桂成知不能御，率残余窜往北区，与李陶万、张成龙等合伙横行乡里。

民国17年（1928年）农历九月二十一，长汀土匪吴得胜率匪众18人，趁夜深人静之时，偷袭夏茂镇岩坑。他们悄悄爬上岩坑日堡二楼，将守在东门台上的农民张十福刺死后，又转到西门，企图抢夺守门台张世才手中30多斤的土炮。张临危不惧，与匪展开搏斗，正在相持不下，不料被身后的两个匪徒开枪击毙。刹时，潜伏在土堡四周的土匪，纷纷以猛烈的火力向土堡射击，混战中张昌桂、邓发姑在门楼上被流弹打死。楼上的人惊惶失措相继跳楼逃命。张世起、张继兴的母亲抱着4岁的小孙子跳楼，小孩重伤而死。匪徒又在村中大抓人质，直到拂晓，吴得胜才押着张世纯等12个人质向荷山方向扬长而去。农民张世享、张昌炘第二天在毛仙庵和八寨先后被土匪枪杀了，20天后又传来张世绳的死讯。尚有张昌崇、张昌接、张世美各花出1200元；张继托花去1300元，张达金花去1500元，5岁的张继堂花去500元，才先后赎回。只有农民张昌镜、张纯高俩人侥幸逃生回家。岩坑这次惨遭匪害共被杀害9人，绑去9人，绑票花去6900元，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致使岩坑村更加贫困。

民国18年（192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土匪朱廷芳股匪率众潜伏在上南区洋溪乡交头庵，拦劫赴洋溪赶圩的商民，抢货、抓

人，有城关张信妹等5人被掳，带往九都风楠匪巢羁押作人质勒赎。土匪深怕人质逃跑，巧用大毛竹锯截去节，套穿在人质两下腿，然后下锁，叫做上“木靴”，使之不能行动，整天只能躺着，一任宰割。匪徒还把被枪杀死的人的手指、耳朵割下，寄给家属，限期交纳赎款，否则以枪杀相要挟，真是惨绝人寰。

民国19年(1930年)驻沙闽北民军卢兴邦的五十二师攻打福州。沙县是卢部的重要据点，卢为了扩大自己势力，动议招安沙县著匪朱廷芳。朱原名涂国正，永春人，他和陈庆臣、邱玉成结伙，聚众窜沙为匪，拥有毛瑟枪、曲七等武器，流窜于九都水南峡、墩头、长蜂、官昌、大洛、宝山、洋溪各乡，打家劫舍，烧杀淫掠，无所不为。他们利用卢部攻福州的机会，招兵买马，扩大地盘。以陈庆臣率众盘据水南峡为巢，以邱玉成率众盘据北区罗溪作巢穴，四出劫掠，声势日益壮大，为害之烈，军兵无可奈何。卢兴邦为防止朱匪乘机捣乱，扩充实力，暗示县长田应时，指派吴联友为招抚员，前往招安，并许朱匪以团长头衔。通过往返磋商，朱廷芳接受招安，由林观祥为点验员，前去罗溪点名验收，以后再往水南峡邱玉成处点名验收。朱廷芳受招抚后，率众一部入城驻扎在西门外汀州会馆，可是匪性难改，其本人和所属，照样嫖赌奸淫无度，乃至白天为兵，入夜为匪。在城5里内，时有土匪绑人事件发生，而且还公开进行勒索。中医生林永泰、孔海筹被掠去光洋近千元。他们设烟馆，开淫窟，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扰乱治安，毒害人民，以此为甚。直到九十月间县长因无力整肃，就将情况密报卢兴邦派兵星夜赶来沙县，配合地方民团，分二路出其不意围剿汀州会馆。匪副官王奕樵长汀人，跳墙逃跑，跌断两腿。另一匪副官曹某被执，匪众伤亡数人，其余仍逃出为匪。第二年春朱廷芳坐轿路过茶碛时被击毙，后将首级挂在西门外城楼上示众，人心大快。

沙县解放初期，1950年3月间，民兵罗子木、罗子松兄弟二

人，在楼云岭尾溪边布网捕鱼。傍晚有一个陌生人，向小罗查询有无渡船。小罗见其人形迹可疑，当面答应有渡，等陌生人去后，立即赶回向剿匪部队营长和团参谋报告。部队以为这是一个重要情况，立即布置行动，召集剿匪部队和当地民兵数十人分两路驰往埋伏，一路直扑楼云岭尾，一路过浮桥到磨面坑，仍令小罗依旧去布网捞鱼监视敌人。直到深夜11时左右，潜匿在底坑寨洞的10多名匪徒，顺底坑源小路，打着电筒悄悄下来。临近楼云岭时，部队发出口令，匪徒不知答应，纷纷逃窜。于是剿匪部队鸣枪射击，当即击伤一人，按血迹追踪，结果在大州观音堂河滨芦丛中捕获受伤的匪徒，抬回观音堂经群众辨见，才认得原来是国民党修械厂的刘班长，并在该匪身上搜出曲七一枝，子弹7发和一张匪徒发饷名单。其中计有张青等10多人，都是杜坑、碧东西村的保长和无业流氓。经追踪捕获几个，进行政策教育后释放，其余自己前来剿匪部队投案自首，悔过自新，部队给予教育后释放。从此沙县匪患始告息终，人民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福建省三明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林桂芳股匪为害沙城

陈玉堂

20世纪20年代，国内战乱频仍，各地军阀割据，为争夺地盘，互相吞并；一些原先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匪伙，像滚雪球似的迅速壮大起来。闽省其尤著者：闽西有郭凤鸣，闽南有陈国辉，闽北有卢兴帮等等。而那些还未成为气候的大股匪、小股匪，多如牛毛，到处烧杀劫掠、祸害人民。现就林桂芳股匪在沙为害情况概述如下：

林桂芳系由闽南地区永春、德化一带流窜来的土匪帮总头目，其手下还有苏隆堂、苏子荣、陈国华等。林桂芳在沙县为害最烈时期，是在1924—1926年间。他们有300多人，不但有土枪、土炮，还有“毛瑟”、“曲七”等少数洋枪，啸聚在水南白玉洋后门山上扎寨，经常派出小股匪徒到处活动。这伙匪徒是吃窝边草的，所以水南一带人民受害尤烈。当时驻军郭华森部，曾派一营兵力去围剿，结果反被其击败。

民国13年（1924年）10月间，陈罗坑佃农罗铨妹时年已近70岁。一天在田间劳动，被匪徒苏隆堂（林桂芳手下头目）绑去，关在虎跳山洞边草房里。匪写条子通知罗家送大洋70元（饷银）赎人。罗家贫苦拿不出，铨妹白天被绑在木椿上，脚穿木靴（一个木头中挖个孔，劈成两半，将人脚穿入孔中，然后上钉卡住，使其不能行动）。晚上则捆在木竹架上，不能转侧，倍受折磨。到年冬腊月，匪见罗家仍无人去赎，知已无油水捞，乃诓铨妹说：“你

家已交来赎款，可以回去了。”老人步履艰难，走到山涧竹桥时，被匪徒一脚踢去，摔死在桥下，尸体暴露不给收埋，只好任其被山洪冲走。另一个受害者是同村农民黄毓宽，林桂芳匪部苏子荣要他家“做饷”，将其两个孩子绑去，索要2000角小洋。黄为赎回两子，拼凑赎银，将两头耕牛卖掉。不想第二年，另一匪徒苏隆堂又“光临”他家，将其老婆和小儿子一起抓走。这次黄又使了400角小洋，才赎回老婆。因家产已荡尽，小孩无钱去赎，被匪徒带去闽南，以700角小洋卖掉，从此下落不明。当时家住水南潘黄官也被当“肉票”抓走，榨去大笔钱才放回。余阿困之母，刚分娩13天，就连婴儿一起被抓去，走到半路，该妇偷偷将婴儿放置草丛中，自己被拖去好几里路。天黑下来，匪见其实在走不动，弃之路上。阿困母连夜寻找到婴儿爬行回来，落得一场大病。还有个名叫流涕困者，家住三官堂，适当其弟结婚，匪侦知其陪嫁物多，就在其新婚之夜，埋伏其家附近。待酒客散尽，新婚夫妇进入洞房时，匪徒破门而入，将其手饰衣物及宾客送的礼金等洗劫一空。由于林匪到处抓人、勒赎，当时水南一带农民不敢下田，任其抛荒。有些人在城里有亲朋的，就搬进城里寄住。剩下没办法的，就利用两条渡船，晚上将船撑靠河中间旧桥墩边过夜。所以当时水南流行一句口语：“有福之人住城角。”其时林匪为害遍及四乡，这里举的仅是水南一隅。

民国14年（1925年）2月间的一天，两个匪徒过河不给渡资，船工张困仔不知其来路与之发生口角。第二天凌晨，匪众到船工潘如妹家（潘是另一条渡船船工），纵火焚烧房屋泄忿。当时众人都住在城内或船上，只得眼睁睁地看自己的家被烧。待到天亮，匪才放炮三响，呼啸而去。在船上的人急速上岸灭火，斯时有不少家产已被焚烧殆尽。这次被匪徒烧去民房共17栋。

匪患滋扰之甚，人民无法生活，奋起组织自卫。当时四乡已有“大刀会”组织，良家青壮年为了凭借“大刀会”对抗土匪，纷

纷参加大刀会。他们实行联村防卫，成为散居的人民防匪武装。由于熟悉本乡本土，易察通匪奸民，匪徒在村里没有耳目，也就无法潜身，自此匪风悄然，小股匪伙再不敢公开为害。其时驻守沙城的郭部为扩充实力，对林桂芳进行招安，林匪乃率众离开陈公山大本营，进城驻在武庙设大队部，门口亦有穿便衣背盒子枪守卫。但招安不久，郭部不能满足其要求，林匪又率众叛出，到乡间流窜为乱。尔后，卢又派营长张胜高围剿这股匪徒。林匪在逃匿中，被乱弹击毙，枭首于西门示众。至此，这帮股匪作鸟兽散。

（福建省三明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张雄南祸永春

颜文锥

1934年至1939年，德化蓄匪张雄南先后打着“讨逆军”、“省保安四旅”、“忠义救国军”等旗号，在永春进行敲诈、勒索和烧杀、抢掠，给永春人民带来了重大灾难。

张雄南（1897—1939年），原名耀，字英西，绰号“露目耀”，德化县西山村人。民国初年，当西山民团团丁，后投靠永春民国尤锡福部当排长，旋晋升连长。尤赐福败退大田后，张雄南依附其舅父德化民团黄其澜部任营长。黄被刺死后，张雄南并其部自称团长，横行于德化东部和仙（游）、永（春）、德（化）三县毗连地带。

1932年3月，南安民军首领陈国辉部彭棠围攻张雄南老巢西山，经月不克。后陈国辉被十九路军枪毙，其部属3个团逃经德化凤顶、水口、南埕时，被张雄南部截击，缴械3000余。他表面上接受十九路军收编，实际仍踞守德化窥测方向，伺机应变。

除夕夜洗劫溪乡

1934年1月，十九路军“闽变”失败。张雄南摇身一变，成为永（春）、德（化）、仙（游）讨逆军司令。19日，张率所部吴俊昌、涂飞凤（即涂友情）、林玉良等部进驻永春，在永春肆意派捐派饷派饭，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2月13日（农历除夕）夜和14日（农历正月初一），张雄南以围剿“共产党”为名，调动

所属官兵数百人包围“洑溪乡（包括现在的洑溪、新溪二村）。洑溪乡农会闻警，迅速组织全乡群众向深山转移，来不及逃跑的老、弱、病、残和妇幼100人，全部被捕，押送县狱监禁。全乡牲畜财产被抢掠殆尽。被捕的无辜群众，由于人数众多，县狱容纳不下，张雄南竟下令把县署西廊平屋改为临时监狱。被拘押群众有亲属在附城的，通知备款赎回。至张撤离永春时，未赎回的无辜群众尚有101人，其中妇女55人，尚在哺乳中的幼孩20人，男子仅有26人，大都系老、弱、病、残者。

“洑溪事件”发生后，舆论大哗，全永沸腾，连国民党党政要员也不相信所捕之人中有共产党人。张雄南被迫一方面登报声明，对批评他的人公开进行威胁恫吓；一方面在2月17日下午召集各界代表开会讨论善后问题。张在大会上宣称：“此次捕获之人，虽云良莠不齐，但在共党最活动之人，尚有多人为之缓颊，使弟无所适从。”慑于张之淫威，与会的人皆哑口无言，成为张自演自唱之独脚戏。

2月27日，陈国辉旧部陈育才、彭棠等为报“缴械之仇”，分别从安溪、南安进兵永春，与张雄南部在附城之万春寨、铜鼓山、社山墩、石鼓寨一带发生激战。从下午3时许，战斗至翌日晨7时，张雄南始全线溃退，经洋上乡逃回德化。

血染湖洋街

3月，福建省保安处为解决长期存在的民军问题，把各地民军收编为12个保安团，并调离他们统治的地盘。张雄南部被收编为保安第十一团。未几，奉调出发古田，遇共产党罗炳辉部，一战大败。张惧罪称病，由部属张克武代理团长。张雄南则化装潜往台湾，继赴日本，经年后始由日本转到香港九龙居住，暗中指挥张克武行动。

1936年2月，张克武率部逃归德化老巢为匪，到处打家劫舍。

5月16日晨5时许，张克武部股匪200余人带有轻机枪、自动步枪、卜壳等武器分三路攻入湖洋街，占领第三区署，打死区警1人，缴枪4枝。继对湖洋街商店肆行劫杀、抢掠，无辜群众被打死10人，打伤7人，掳去11人，被抢掠现金7000余元，财物不计其数。从早晨5时许起抢掠到10时许，直至各村壮丁队赶至，股匪始向大溪方面逃去。

抢掠洋上乡

继血染湖洋街后，24日，股匪二三十人猛窜扰东山乡，群众被打伤2人，掳去3人，后县城驻兵赶至，匪始逃窜。25日晨，股匪100余人携带武器分三路窜扰洋上乡，无辜群众被打死3人，打伤4人，掳去25人，全乡牲畜财产被洗劫一空，仅耕牛被抢掠100余头。如外丘村林姓共有耕牛48头，被抢掠46头，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强行摊派枪支

1938年1月，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批准张雄南自新。4月19日，张由香港抵永春。陈仪令张自筹枪支，收编仙游、德化、大田、华安、漳平、永泰、永春7县民军，成立省保安第四旅，由张雄南、涂飞凤任正副旅长，张克武、吕振山任团长。保四旅成立后，张雄南感到枪支不足，向各县强行摊派枪支2000杆，计勒派枪款数十万元。永春被摊派枪支300杆，各乡保乘机层层加派，许多群众无力负担，弄得倾家荡产，怨声载道。此外，张雄南还公开勒索受贿，包庇应征壮丁逃避兵役达4000余名，每名壮丁纳款50元至300元，张即给具已在保安四旅服役的证明书。

充当“忠义救国军”头目

由于张雄南飞扬跋扈，不断扩张势力，引起陈仪的注意。1939

年5月4日，省保安处处长黄珍吾特地到德化召见张雄南，张作贼心虚，称病拒见。陈仪遂下令调张雄南任省参议，保安第四旅旅长由涂飞凤升任。张抗拒命令，公开叛变。陈仪下令通缉，悬赏万元。6月，张雄南在仙（游）、永（春）、德（化）交界地区大派乌单。6日，介福富侨陈铿被掳。28日，郑章灿等5人又被绑架。同时，张雄南派亲信张逸舟、黄玉树潜往台湾，私通日寇，日寇表示尽力支持。9月，张逸舟等自台湾回来，张雄南立即打出“福建和平救国军”的旗号，自称总司令，窜虚攻入德化县城，并先后派出股匪窜扰永春的湖洋、洋上、鳌峰、苏坑、呈祥、锦斗、桂洋等地，大派乌单，打死打伤群众3人，掳去19人，牲畜财物被抢掠不计其数。同月18日至20日，日寇飞机连续轰炸永春、德化，炸死炸伤无辜群众100余人，以此配合张匪的行动。

冷水坑之战

张雄南公开叛变后，9月间，永春县政府成立“清剿协会”，向各乡摊派“清剿费”2.5万元。同月，省政府任黄珍吾为闽中剿匪司令，调动全省保安团会剿张雄南，并命令各县警备联队协剿。永春警备联队由县长黄镇中指挥出动协剿，于10月1日在湖洋冷水坑与匪遭遇，发生激战。结果，警备联队失利，副指挥康约法、队长林声忠及队员20余名阵亡。16日夜，湖洋乡长黄河书以及黄赞育等住宅被匪焚毁，焚毙妇幼11人。11月，湖洋、仙溪、岭头亭连续遭股匪抢劫，使永春县人民处在恐怖之中。

可耻的下场

闽中剿匪司令黄珍吾督率全省保安团会剿张雄南，历时数月，仙、永、德各县抗日后援会亦大力发动3县人民进行支援，把包围圈逐步缩小。最后，张雄南被困德化石牛山中，弹尽援绝，于12月28日夜失足跌毙。其尸体被运载至仙、永、德各县示众，然

后在德化县枭首。张的爱妾叶锦文被俘获。张匪部属张克武、张承福、张移风、吴俊昌等缴械投降后，张克武畏罪自杀，张承福、张移风被枪毙，吴俊昌解省判12年徒刑。所有匪卒悉数解往闽北安置。张雄南之祖父张镇市年已80余岁，亦被押送闽北，病毙于途中。横行20余年，集民军、土匪、汉奸三者于一体的张雄南匪，终于得到可耻的下场。

（福建省泉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鄱阳湖剿匪记

马逸飞

解放初，江西都昌、鄱阳（今波阳县）、余干、进贤4县的土匪活动十分猖獗。这里，不单有传统的湖匪，还有国民党败退时，布置在鄱阳湖周围的10多个支队，并在这一地区留下了上百挺捷克式轻机枪。他们互相勾结，给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因此，肃清鄱阳湖地区的土匪、安定人民的生活，是我军解放初期的一项迫切任务。

我是1949年6月随四野十五兵团四十三军一五六师接替二野四兵团十三军三十七师的防务工作进入南昌的。我们进城后，即成立了南昌警备司令部，陈奇涵兼任警备区司令，陈正人兼任政委、邓克明兼任副司令员。南昌地区还成立了南昌军分区，政委由南昌地委书记白栋材同志兼任。一五六师司令部代行军分区司令部职责，我当时任一五六师副师长，师长是邓克明同志，还有一位朝鲜族副师长全宇同志（政委钟人仿、副政委祝世凤二同志，都未随军入昌），江学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们遵照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和部署，分别在靖安山区和鄱阳湖地区进行清匪的艰苦战斗。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人民币贬值。三十七师驻防时，300元人民币兑换一元大洋，到一五六师接防时却变成600元人民币兑换一元大洋了。当时生活十分清苦，战士们吃不上菜，用盐水下饭，小灶也只能每餐一两个菜。除此之外，敌人还经常前来搔扰，

一到夜间，城内到处有冷枪声。敌机还经常来空袭。我和全宇同志在驻地百花洲找到2挺包装好的日本七九双管高射机枪，把它拼装好，一挺摆在驻地楼房顶上，一挺摆在闹市区一间商店的楼顶上，派2个朝鲜族班长掌握。有一天，一架敌机向百花楼俯冲扫射，被我高射机枪击中坠落在西山，以后敌机才不敢再来搔扰了。邓克明同志还亲自访问群众，了解情况，并派了一个连驻在滁槎，检查出入武器，城内枪声才算基本停止。

当时，靖安山区方面有一股五六百人的土匪，活动猖獗。邓克明同志亲自去了解情况后，决定与九江军分区配合，布置了五路围剿肃清匪乱的计划。这次是山区作战，非常艰苦。山路岖崎再加上悬崖峭壁，行军十分困难，到了夜间更是难行，一不小心就有摔下悬崖的危险。在行军中就摔死3人。但是困难阻止不了战士们打土匪的决心。在五路围剿下，匪首被我军击毙，大部分匪徒击溃，剩下少数人也向九江军分区投降了。匪乱得以平息。

靖安地区清匪工作结束后，邓克明同志立即部署肃清鄱湖地区土匪的工作。他把了解和处理鄱湖地区匪情工作完全交给我。

当时，情报来源，只有五六封匿名信，主要反映“反共救国军”支队的情况，师参谋处（没有师参谋长）的情报科长搜集敌军的情况还可以，对隐蔽的敌人却没有办法。

进贤的梅庄与鄱阳湖紧连，和余干的梅溪交界，匪情很严重，进贤县政府在梅庄那里成立了一个区政府，没几天就被当地土豪徐荣春打跑了。

滁槎设防后，发现余干县一个大豪绅罗大中的儿子，带枪乘船窜入赣江，被我军抓获。了解到，罗大中的侄子就是盘踞梅溪的匪首，名叫罗延辉，其人会武术，能一跃上屋；会潜水，在芦苇中可以潜伏半日，吃生鱼；手枪也打得很准，外号罗燕子。余干的梅溪和进贤的梅庄，两地都是伸入鄱阳湖的半岛，也是湖匪较多的地方，抢劫湖中的船只，包括轮船，大都是这些土匪干的。

为此，我写了一封信给罗大中，要他劝说他的侄子罗延辉，但无结果。

我们进入南昌时，都昌、鄱阳、余干、进贤4县都属赣东行政区管辖。我军渡江以后，五兵团解放了赣东，成立行政区，由苏振华同志任主任。后来，为彻底解放华南两广，四、五兵团都调走之后，进贤县才隶属南昌军分区管辖范围。当进贤县公安局长来向我汇报情况时，接到南昌地委通知：地委机关所在地附近，经常发现匪情。我派了一个连进驻三阳，情况立即好转。

从滁槎和三阳两地情况看，进入南昌地区骚扰之匪，都来自鄱阳湖。那时，我派驻在三阳这个连又在附近一个村子破获了一个“反革命救国军”支队，这证明匿名信反映的情况是确实的。

7月的一天，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召集了几个军分区的负责同志，开会研究清匪的问题，问我对鄱阳湖周围的湖匪怎么办？我说：“收缴武器，是一个可以少死人的办法。”他说：“你估计全湖周围有多少枪？”我说：“估计约有1万条”。他说：“你把老百姓的枪都算进去了，如照你的办法做，我们不好做广大群众的工作。”我说：“一般穷老百姓是买不起枪的。”他也没有再说，只是摇头不同意。随后隔一个多月，由于江西军区派人招安罗延辉，罗拒绝投降，还扣留了派去的排长，缴了一个班的武器。陈奇涵同志才把我叫去，当面吩咐，照我的意见“收缴武器”，在进贤搞试点。

我曾分析过鄱阳湖匪的来源：由于江西省的习俗，农村都是聚族而居，一个村子一个姓，或者附近几个村子一个姓，每个姓有一祠堂，有族长，也有族产。族长一般是土豪劣绅，族产就掌握在他们手里。经常为了一地、一姓之利发生械斗。因此，动用族产大量购置武器；加上国民党败退时，有意遗留给他们武器，都是全新的捷克式轻机枪。所以他们手上的枪支不少。比如进贤县的梅庄，有一个湖汊，汊口叫玲口。北岸姓何，叫玲口何家；南岸姓陈，叫玲口陈家。各有轻机枪五六挺，步枪100余枝。两村

经常为争夺湖汊之利而械斗。他们的部分枪支就是国民党败退时遗留给他们的。其他农村，也都如此。由于械斗，各族都养了一批杀手，不事生产成为亡命之徒，是湖匪的来源之一。国民党败退时，发了不少的委任状，使一些土豪劣绅当上了“反共救国军”的支队长。因此，又有一些人成了政治土匪。

我一到进贤，首先找县长彭怀德同志商量，用我们两家名义出布告，以清除械斗为名，收缴武器，并说明在国家清平之后，退还一部分给人民，确保社会治安。同时，军分区在三阳增兵至5个连，使反抗区政府的梅庄区土豪们有所畏惧。果不出所料，不几日，梅庄徐荣春来县府请罪，我们把他软禁起来。我和邓克明同志在电话上商量好，派驻在三阳的部队由四六六团张副政委率领，于夜间乘近百只大船，在拂晓时进入梅庄。首先，令徐荣春本人领路收缴了3个村子的武装；并命他通知各村的绅士来区政府开会，贴出布告，宣告3日内收缴所有武器，不缴者派队伍收缴。

原计划玲口两岸是收缴重点，先缴一个村。后来，依张副政委的意见，他亲自去南北两村一齐缴。这中间还出一件怪事：玲口何村的老绅士，是一个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大家叫他何博士。他本人在南昌城内开业，已经很老了。村内的事，是他儿子主持。这次，他儿子把他请回村。他一回来，便是又吵又闹要见我。我会见了他。他说我们收缴了他的自卫武器，使他村失去了自卫能力；还说我们是不合法的。我告诉他，“缴枪是普遍收缴，谁也不准留武器，就不要自卫了。”同时，我又反问他说：“你留学国外，见到有象你们这样的部落社会吗？枪是会打死人的，人命关天。过去，你们打死人，国家法律也管不着，现在是新的人民政府，不容许有这样部落社会存在。”他才无话可说。最后，还是费了四五天时间，由驻在两村的部队收缴，才陆续交出枪来。

我在梅庄约40余日，总共收缴到捷克式轻机枪40几挺，稍损的重机枪1挺，坏迫击炮1门，步枪500余枝，区政府随部队

进驻梅庄，他们也收缴了步枪约五六百枝。斗争是复杂的。我们死了一个学生，是政治部新招的宣传员。临撤的头一天，他们将已告一段落的组织群众的工作移交给区政府，将借物归还给群众。拂晓，这位宣传员却被坏人投手榴弹炸死。我立即通知区政府，逮捕审讯徐荣春，追查这一事件。

梅庄和梅溪是鄱阳湖的两大重点。梅庄收缴武器正甚时，江西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同志（后来是山东军区司令员）进入梅溪。他首先是捉拿匪首罗延辉，追捕数天后，罗匪只剩孤身一人，躲进一个牛棚。由于我解放军纪律良好、深得人民拥戴，一个放牛娃向追捕罗匪的排长检举了罗匪藏匿处。我们严密地包围了牛棚，罗匪因大烟瘾发作，束手就擒。杨副司令员恐其逃跑，立即将他枪毙、毙后暴尸，许多人不相信，纷纷前来观看。结果，我军威名远扬，不到20天，收缴武器进展异常迅速，捷克式轻机枪收得50余挺，步枪也不少。

康山，人们都认为是鄱阳湖中剿匪难点。有人把它比作洞庭君山。其实，并无什么险要，渔民很穷，沿山边水涯而居，房屋很简陋，我们只去了一个排的兵力，就把武器收缴了。

收缴武器工作基本上结束了，军区把湖区的巡逻工作交给四六六团张副政委主管，要我去参予布置工作。他们（指两个军分区）共有巡逻艇12艘。我亲去湖内一转，与两军分区（南昌和鄱阳）规定每日会哨时间和地点以后，我就回来了。

1949年12月，我调云南工作。鄱湖清匪，成为我一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江西省南昌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飞贼落网记

张允贵口述　张书元整理

1948年9月24日我军解放了济南。但残存的国民党潜伏特务、残匪、地痞、流氓几股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和我新政权进行较量，妄图死灰复燃，东山再起。

当时济南城有一个名叫李圣五（化名李燕子）的“飞贼”。解放前他在舜井街开了一个粮油店，其中就有国民党官员杨同光的股份，所以每次李圣五杀人抢劫，国民党当局总是明里逮，暗中保，还以艺人的名义印了几种专门吹嘘李圣五如何“艺高胆大”、“仗义疏财”的小册子，流传很广。他对社会治安威胁最大，人民群众提起他无不谈虎色变。屋顶上有猫走动，也说是李燕子又在飞檐走壁，惊惧不已。

为了尽快消灭李燕子之流的“飞贼”，保卫新生城市，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年10月我从部队被分配到济南市公安局担任刑警队大队长，队员有我的战友桂树怀、张守贤、端木、陈凯等同志。

从战火纷飞的战场转入城市斗争，从和戴着国民党帽徽的敌人厮杀，转入和形形色色的诡计多端的匪徒斗争，对我来说还是个新的课题。活捉来无影去无踪的“飞贼”，更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虽说困难很大，但我和同志们们没有半点畏难情绪。大家都下了决心，就是牺牲生命也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一、金店遭劫

1948年12月16日深夜，寒风凛冽，距我刑警队部只有100米的庆风金店被劫。我带着桂树怀等同志火速赶到现场。现场令人惨不忍睹，地板上、桌椅上到处是血，一股血腥味直冲鼻子。金店经理的父亲被杀死，头部被砍了两刀，尸体头朝东，脚朝西，死者的鞋子被扔得远远的；身上只穿一件睡衣，也全被血浸透了。

室内的保险柜门大开着，金银珠宝被劫一空。被窃的物品和现钞有：黄金4两，金耳环子11副，金表1只，金戒指1包，纸币（国民党发行的现钞）50万元。

现场上除了经理之父的尸体外，痰盂里有大小便，还有10多只烟蒂（死者是不抽烟的）。写字台上并排放着3只弹壳，大方桌上留了一个字条，写着“光明正大。刘吉作”几个毛笔字。

经理吴江源向我们哭诉：“深夜1时许，睡梦中听到父亲惊呼一声，随之一声巨响。知道发生事情了，我就将洗脸盆摔在地上，以此壮胆子，也想叫左邻右舍知道。哪知此刻又听到枪声，同时匪徒已持枪闯入我的室内，毛巾包头，黑布蒙嘴，看不清他的真面目，样子很吓人，只听他道：‘不准动，动就打死你，把头蒙上！’我们都蒙上了头。他要去了金柜钥匙，4点多钟又听他喊‘不许动！’快6点钟他才离开我家，父亲已被他杀死……”。

那么，刘吉是谁呢？凶手为什么要写“刘吉作”呢？我们很快就查到了10几个名叫刘吉的人。但经过分析，除了已在大牢里关着的一个刘吉，其他作案的可能均一一排除了。但是，剩下的这个刘吉，他既然被关着，又怎能作案呢？我们审问他时，他毫不犹豫地说：“这是李圣五干的，他和我有仇，嫁祸于我。”于是，我们翻阅了日伪时期留下的有关李圣五的许多材料。我们分析了他作案的特点，认为他作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决定要逮捕他。

二、一擒“飞贼”

在刚解放的济南城，捉拿李圣五真象大海捞针。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有见过李圣五，而被录用的旧人员有见过的又不敢讲，追踪、盯梢、等候等侦察手段也都用不上，我们就利用许多“特殊侦察员”（说书的、唱戏的、看相算命的、玩猴的、玩杂要的），叫他们通风报信。这些人多数是穷苦人出身，在旧社会受人欺凌，愿意帮助我们。

1949年1月15日，一个说书的向我们报告：李圣五窝藏在南关舜井街14号。我们马上开始行动。陈凯、张元光、端木带2名刑警人员化装成青岛来的“商人”，穿大街，走小巷，拐了很多弯子，到了舜井街14号，眼前出现了一座单门独户的小阁楼。陈凯同志上前敲门，过了好一会“吱”的一声，门开了一条缝，伸出一个中年男人的脑袋。陈凯彬彬有礼地问：“请问，李先生住在这儿吗？”“这里没有什么李先生。”中年男人冷冷地回答。“我们是做生意的，和李先生是把兄弟，劳驾通报一声。”“你们从哪里来？”“青岛来的。”中年男人一双贼眼骨碌碌地上下打量陈凯、端木，在他看清了站在他眼前确是两个“阔商人”以后，他的口气缓和多了。接着又盘问了许多，如“坐的什么车？”“几点上的车？”“哪一站下的？”“多少钱的车票？”……陈凯、端木对答如流。那人没有看出破绽，才开了门，说了一声：“你们等一等。”他转身上了阁楼，我们也悄悄跟了上楼。只听那人说：“李先生，有朋友找……”话未说完，我们已站在李贼的面前，把他逮捕了。李贼十分沉着，笑着说：“兄弟们，不要和我过不去吧！”

“我们是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好，好，走一趟。”说着，他就大步下楼。

“站住！”端木大吼一声，忙上去搜他的身。但这个惯匪狡猾

得象狐狸，他把枪藏在腹下，我们没有搜出来。我们认为他被捆着手，身上又没有武器，同时他又装着很驯服的样子，一时麻痹大意，放松了警惕。当走到普利门大街，迎面来了一辆洋车，李贼突然抽出了手枪，朝他左边的端木连打三枪。普利门是当时济南最繁华的街道之一，店门稠密，枪声一响，顿时乱了套，许多小摊子都被人流撞翻在地。我们怕伤害无辜百姓，不敢开枪，就这样，眼睁睁地让李贼逃掉了。

从此以后，李贼销声匿迹，但他的幽灵仍在济南城徘徊。有一天晚上，我们刑警大队的电灯断路了，一些接收过来的旧人员认为是李圣五来了，吓得哭哭叫叫，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身为刑警队长，当时精神压力越来越大，深感欠了领导和人民群众一笔债，说重一点，是对人民犯了不可饶恕的失职罪。

三、法网难逃

“飞贼”从我手中逃掉，公安部批评了我们，并限期3个月将李圣五捉拿归案。当时我只有27岁，血气方刚，过去在战场上从没打过败仗，现在却叫一个匪徒轻而易举骗过，又轻而易举跑了，只气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首长的重托，人民的期望，被害者的冤仇，党的公安战士的崇高责任感，终于使我从痛苦中振作起来。我暗暗下决心：“就是你李圣五上天入地，我也要捉到你！”

我们刑警队的全体人员，个个献计献策，日夜侦察。不仅深入到济南的大街小巷，寻觅李圣五的踪迹，还派端木同志到几个交通要道——徐州、蚌埠、兖州等城市侦察。

一天夜里，我正翻来复去睡不着，刑警侦察组长端木同志突然兴冲冲地跑来报告：“队长，李圣五有下落了！”“在哪里？”我一骨碌下了床，迫不及待地问。“在徐州一个妓女家。”接着端木同志向我作了详细汇报：有一个原国民党师长，徐州解放后和李

圣五狼狈为奸，合伙做买卖、搞盗窃。前几天，他落入人民法网，为了立功赎罪，他主动交待了和李圣五的关系，并交待了接头的地点。我们认为这个被捕的敌师长的口供是可信的，就连忙把二擒李圣五的方案报告了上级。

济南市公安局看了报告，立即召开会议。会上大家意见并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敌师长的口供不可信，说："李圣五逃到南京的可能性大（当时南京尚未解放），逃到徐州的可能性小，我们不能轻易听信敌言，上当受骗。"我和桂树怀等同志认为敌师长的口供是可信的。我们有两个很充分的理由：其一，敌师长欠李圣五一笔巨款，而且是有限期的，他深知李圣五心毒手辣，到期不还李是会干掉他的，他希望李圣五早日被捕，这笔款子就可以一笔勾销；其二，敌师长是个聪明乖巧的家伙，他已耳闻目睹蒋家王朝的覆灭，要给自己留一条活路。敌师长为了表示他的"立功赎罪的决心"，愿以妻儿为人质。

上级批准了我们去徐州二擒李贼的方案。我和4名刑警战士都化装成"阔商人"，到徐州一下火车就找到了歌妓张玉兰的住处。敲了半天门，无人答话。我们留下2个人在附近监视，又叫一位同志随敌师长挤进了说书场。

当时徐州天桥是说书、唱戏的地带，三教九流最为集中，人山人海，热闹异常。在那里，张玉兰在人群中发现了敌师长。他先是一惊，继而平静如常。她和敌师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敌师长马上心领神会，便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傍晚，他只身去找了张玉兰。但回来时他却象泄了气的皮球。原来，张玉兰告诉他，李圣五几天之前就离开徐州，到外地去了，干什么去了？何时才能回来？这些问题，张玉兰都是一问三不知。

这一意外情况的出现，给我们的行动带来了新的困难。时间紧迫（限期只有半个月了），不知李贼去向，怎么办呢？有的同志怀疑是敌师长耍的花招，有的同志怀疑歌妓张氏不说实话，也有

的同志认为是敌师长和歌妓互相勾结捉弄我们。我当时很想把张玉兰抓起来，严加审讯，认为那样也许会弄出头绪来。但又一想，如问不出什么来，岂不是打草惊蛇，误了大事？于是，我决定留2个人在徐州继续侦察，余下的人押着敌师长回济南。

回济南后，我们又对敌师长进行了反反复复的分析，排除了对他的怀疑。敌师长也觉得满肚子委屈。在审讯时，他发誓赌咒说："请张队长再放鄙人去徐州一趟，如还找不到李贼下落，请加刑重判。"于是我又带着敌师长二去徐州。一下火车，我们便与徐州公安局取得联系，了解到徐州4—6月份共发生了6起大抢劫案。据报案者说，每次抢劫，盗匪都是用手枪把被抢店号的经理、店员关到一间房子里不许动，叫他们用被子蒙上头睡觉。盗匪把抢的东西集中在一起，便慢慢地吸烟、喝茶、洗脸、大小便，天将明时才离去。从案情来看，和济南的那个案子很相似。我们认为徐州的这些劫案很可能都是李圣五干的。这说明李圣五在徐州确实有个"巢"。

1949年6月25日，夜幕降临后，我们埋伏在歌妓张玉兰住宅附近。突然看见一个黑影一闪。我心中暗暗一喜，心想："你总算露头了！"

"有人来过吗？"一个男人的声音。

只见黑影在门上敲了三下，房内灯亮，紧接着开了半扇门，黑影闪了进去。

"师长来过。"一个女人回答。敌师长向我们示意，那男人正是李圣五。此时，徐州的一位同志敲了歌妓的门。里面女人回道："谁呀？""查户口的。"徐州的同志很坦然地回答。因为刚解放那些日子里，查户口是很常见的事，不足为奇。李圣五从门缝里向外看，站在门外的民警中也确有2个是歌妓住家所在地派出所里的，平时见过面，他的戒备心便稍稍缓解。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有经验的惯匪，开门之前，连忙把身上的一支加拿大手枪藏进大锅

内（后被我搜出）。张玉兰开门后，我们问她："你家几口人？"并且指着李圣五问："这位同志……"我们假戏真演，而且演得活象。

这时李圣五不怀疑了，他用软的一手对付我们这些"查户口"的。

"长官，我是来看表妹的。"李圣五笑容可掬地答话。

"为什么不报户口？"我厉声问。

"我刚下火车，时间太晚了。天一亮就去报，长官放心。"

"我看你不报户口一定不是好人，带走！"我的话音未落，李圣五的头上已挨了重重的两拳。他刚想反抗，埋伏的同志蜂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他戴上了重铐（脚镣、手铐），因用力过猛，棕床都压了个大窟窿。横行一时、心毒手狠的"飞贼"再也飞不了啦！他象一头被困的野兽直喘粗气，并用凶狠的目光看了看我们，又猛一回头对张玉兰说："看好家，后会有期！"然后被我们推进了囚车。李圣五抢劫大案35起，欠人命10条，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济南市公安局批准，1949年7月7日，李圣五被我们处决了。记得处决李圣五那天，整个济南城都轰动了。老百姓拍手称快，奔走相告，都说："共产党真了不起，为济南人民除了一大害！"

（安徽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武装匪特岳岐山覆灭记

刘培全

岳岐山，外号岳葫芦，化名张道生、邱传义，原籍河南潢川，幼年逃荒，后来为匪。曾先后迁居固始东乡、霍邱西乡、淮北、淮南等地。他以霍邱为巢穴，活动于鄂、豫、皖3省边区20多个县市，奸杀焚掠，无所不为，长期受国民党军统特务控制，曾先后被委任为“霍邱第四大队长”、“自卫团团长”、“淮河挺进支队司令”兼“寿县县长”、“中央反共自卫军第一纵队司令”。所部武装匪特时散时聚，属其统辖之匪部通常保持在2000人左右，支队长以上的头目就有60余人。解放初期窜进大别山区与匪特头子黄英、袁成英、汪宪之流联合，妄图长期占山为王，与我革命政权相对抗。黄、袁、汪被歼以后，岳岐山潜逃，与转入地下之惯匪密谋策划成立所谓“太平洋统一联络行动委员会”。1951年岳岐山被我人民公安机关镇压后，蒋介石还于1954年派飞机到大别山空投特务分子，来找其所谓坚持大别山的“岳司令”。岳岐山这股匪特武装是怎样兴起与覆灭的呢，这里必须从头说起。

岳匪队伍的形成与发展

岳岐山，从小聪颖，随其父学木工，人称小木匠，兼种田地为主。1938年22岁时，国民党拉壮丁，岳被迫逃跑，其父被抓去抵押。第二次，国民党政府又抓壮丁，将其母打死，岳从此不敢

回家。1939年，岳岐山找到了他当土匪的姐夫冯传安，经冯的介绍投入了土匪许老凯部为匪，在霍固边界一带从事抢劫活动。这股土股有80多人枪，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军击溃。岳和惯匪短弁子、刘九、张三等4人潜到霍邱县茶庵子，遇到一个国民党军人，抢得手枪一支，受到了国民党政府通缉，其父被抓走。同年8月，冯传安资助长枪3支，岳岐山单独组织土匪武装，由冯传安作内线策应，抢劫了银元1000多块，匪众很快聚集到20多人枪。1940年，岳岐山联络霍邱境内及毗邻地区土匪王牙子，抢劫杨家楼，匪众发展到50多人枪。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和地主武装的对抗，岳岐山不得已于1942年迁居阜阳口子集，买田8亩，定居下来。1943年国民党政府捕岳未获，将其老二抓去处决，岳遂于1944年在田家庵投靠了日伪军充当汉奸稽查队长，与日军同流合污，收罗各地土匪武装，大肆抢劫，残害人民，成为公开的匪徒。

假意向我投诚

岳岐山充当汉奸后，国民党特务机关派军统特务分子田竹三与其暗地联络，企图拉岳反戈投蒋。岳因被国民党通缉在案，不敢应允。不久，军统特务分子田竹三被日伪军捕获，岳极力帮忙保释。田获释后，遂向特务机关报告。蒋特务机关对岳大为赞扬，保证岳投蒋后不计前嫌，从此岳便与田建立密切关系。1945年5月，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日伪军大势已去，岳预感到当汉奸已无出路，准备与田商量重整土匪武装进山打游击。同时，又与我方联络人员段松廷同志接触，表示愿意投向我方。岳又在田家庵进行一番洗劫，而后收拾匪众80多人枪和抢来的大量烟土、金银首饰等物，开进我根据地，化名张道生，与我寿六霍游击根据地负责人赵凯等同志见面，表示愿意投诚，共同抗日。赵凯等同志一面准备接待，一面集中4个区队，部署了400多名武工人员，加强警戒，以防不测。赵凯估计岳没有诚意，决定对其先行缴械，徒

手待编。当夜，这股匪徒果然全部逃走。事后得知张道生就是岳岐山，他投降是假，想吃掉我根据地武装是真。

三匪合流　占踞霍邱

1946年，岳岐山股匪发展到100多人枪，在霍邱一带活动。不久，打死了一个新上任的国民党军队副师长，又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被迫溃散。岳逃至定远青龙店姚国光家隐藏。在此期间，接触了我地下工作者丁万根同志，在丁的介绍下，与我解放军某部首长见面，经过教育，表示愿意重返大别山担任我游击团长。1947年秋，刘邓大军南下，霍固游击区迅速发展。岳得悉后，带3个人主动与霍固县政委朱广林同志联系，朱叫其暂任霍固县大队长，并派其带路攻打了李家圩。事后，岳感到现在只当个大队长，嫌官小，不大满意。这时，霍邱股匪屠继周、屠立武、凌致和、陈华先等在西乡作乱，岳便与屠合谋投向了国民党军。当时国民党霍邱县长委任岳为第四大队长。1948年岳、屠、凌等匪性不改，继续作恶，县长王瑞麟对其无法控制，呈请省保安司令部批准对岳部进行改编，委派黄埔军校学生刘纪渊当团长，岳、屠、凌分别担任一、二、三营营长。12月，王瑞麟与朱援五（霍邱县三青团主任）等电请国民党军长廖运泽重新收编岳、屠、凌，呈准加委。时值淮海战役即将胜利结束，廖运泽令岳等随蒋军渡江，岳等不干，又返回霍邱，乘霍邱城当时处于混乱之际，缴了县大队的械。县长王瑞麟见势不妙，弃城逃跑。

再次“投诚”　复又叛变

1949年春，江淮之间各地县城陆续解放，盘踞在霍邱城的岳、屠、凌已处在四面被包围的形势下，惶惶不可终日，城内秩序十分混乱。正在这时，我党寿霍工委书记朱怀明同志和霍固县政委朱广林通过有关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朱广林同志

首先争取了原国民党第四支队长蒋约初和红学大队长张雪东投诚起义（300多人枪），孤立了岳、屠、凌。同时加紧了对岳、屠、凌的争取工作。朱怀明通过常持清和岳岐山的老师白云亭接触，策动岳、屠、凌投诚。同年1月26日，朱怀明率部从寿县方向，霍固县长张瑞符于1月27日率部从河口方向同时开进了霍邱城。此时，岳、屠、凌只好率部投诚。我党政军首长向他们宣传了我党我军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指明前途，宣布将其所部调往六安进行改编。但岳等因罪恶深重，慑于我军法纪严明，始终对我怀有戒心，连霍邱绅士在马家大园举行的欢迎宴会，都不敢参加（事后得悉，这是国民党余孽从中挑拨所致）。凌致和当即带10枝枪叛逃。岳岐山、屠继周调往六安后，国民党军统皖西特技组组长白云亭又插手岳部，在白的策动下，岳部也携械叛逃。岳岐山逃至白大畈后与屠继周、凌致和匪部汇合。经王宝斋（当过国民党政府云南专员）撮合，他们与管笃生一起占邻了霍邱南乡，在大顾店成立了所谓霍南县政府。管自任县长，岳任自卫团长。

岳、黄、袁盘踞大别山

1949年3月，岳匪进山后，逃往山区的霍邱县反革命头面人物朱援五、管笃生等立即与岳挂勾，密谋策动我霍邱区乡政府中留用的旧乡保人员叛变。先策动了我收编的孟集区队长张文藻、长集区队长赵秉生、大顾店乡队汪泽东等叛变；又策动了临水集、五塔寺反革命叛变；还指使凌致和偷袭霍邱城，杀害我干部战士40余人；另一次在霍邱南乡活埋我革命群众24人。1949年4月，我军胜利过江后，我皖西地区军民开展了剿匪反霸斗争，一些漏网的惯匪纷纷投奔岳部。岳收罗残匪整编为2个独立营，到金寨整训；并通过国民党军统特务分子白云亭和大别山匪首袁成英、吴曙光、黄英等联合。此时军统特务分子白云亭、刘俊清、韦则民已与武汉反动政权取得联系，白崇禧指派中将师长汪宪来到大别

山，在白水河附近成立“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汪宪任总司令，袁成英任副司令，樊迅任副司令兼参谋长，指挥大别山区全境土匪武装。汪宪来到大别山后，白崇禧又派飞机送来了子弹。这支反革命匪特武装组织，一面积极派遣人员打入我内部，建立两面派政权，发展反革命地下武装；一面到处收罗各地散匪和兵痞土顽，扩充实力，拼凑了14个支队，约万余人。岳部也扩充6个大队，1300多人枪。

末日临近　被迫离山

霍邱人民对岳、屠、凌三股匪徒的活动情况，有一个顺口溜：“岳不离山、屠不离湾、凌傻子不离月牙滩”。岳岐山习惯在山区活动，虽不断窜入内地，一有风吹草动，就缩回山区。1949年8月，我鄂豫皖剿匪指挥部在罗田县成立，王树声任司令，辖东线、西线、北线3个指挥部。其中东线，亦称皖北军区前线指挥部，于8月25日在麻埠成立，司令员梁从学，辖2个指挥所；华东野战军二十四军副军长梁金华率七十一师配合清剿。我剿匪部队采取军事打击、政治攻势与发动群众剿匪自卫三者相结合的策略，集中时间，集中兵力，掀起了群众性的剿匪活动。经过一个短时期的进剿，使疯狂一时的大别山匪特受到了致命打击，迫使敌总司令汪宪等不得不钻进深山老林隐藏起来。岳岐山匪部消灭殆半，只剩600余人，流窜到霍邱丘陵地带，骚扰破坏，负隅顽抗。

四面受击　土崩瓦解

中共霍邱县委根据六安地委和军分区联合布告精神，进一步贯彻了“作恶之首要分子必办，胁从分子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发动人民群众布下了天罗地网，使流窜、潜伏匪徒所到之处都有群众监督报告，真正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9月8日岳岐山收拾残匪，改编后窜到白大畈一带即被我军重创，消灭

大部。岳慌忙将剩下的3个营拼凑成了1个加强营，但在叶集又被我重挫，流窜到我县高店。9月18日，皖北军区警二旅追上岳匪，在北大山南边七里进行围剿。岳匪不敢北逃（有淮河），只好向固始方向流窜，又被我军堵截。时逢大雨，洪水暴涨，致岳匪被打死、淹死不少，该役我军共歼匪众500余人。至此，岳葫芦的匪特武装全部溃散。岳岐山在他的部众于北大山被歼后，即与白云亭化装逃匿。岳岐山连夜跑到张井子万瘪子处（即万凤云，岳匪警卫连长），和其得力助手曹小孩（曹兰亭，岳的内弟）密商，设法隐匿。在万、曹的帮助下，以贩麻为掩护，经三河尖逃至凤台县一带潜伏。白云亭化装逃至陡岗乡南边王店子附近，被地里做活的群众发现，解送县公安局，后转送皖北公安局被处决。1949年9月30日，东线指挥部剿匪部队七十一师二一三团，在金寨白水河附近之帽顶山狮洞中活捉了敌总司令汪宪，副司令袁成英、樊迅，副参谋长马君慈等，彻底摧毁了大别山区残匪老巢，使岳岐山失去了唯一靠山。岳岐山逃往凤台后，先后辗转到冯传达、费海子等家隐匿两月余。后又来到淮南白云亭家，实指望找老师设法，岂料当头一瓢凉水，白云亭女儿告诉他白已被我捕获。不久，岳的爪牙朱援五、管笃生等也先后被我清剿部队和公安机关逮捕、击毙或处决。岳岐山的靠山、羽翼都被斩断，只得如丧家之犬，继续流窜。

洞山密会　企图暴乱

岳到黄山、合肥、颍上等地流窜，又与匪首余猴子、陈亚川等接触，准备重整旗鼓。1950年6月30日晚，他们在黄口裂召开了第一次密会，各地逃匿的匪首20多人纠集一起，密谋组织暴动。但因匪内有人劝阻，岳遂以部队未到为借口停止暴动，并部署各路土匪分头抢劫，准备粮草，组织地下军，番号是“中央反共自卫军第一纵队”。接着进行了封官，岳自任第一纵队司令兼指挥官，

田竹三为参谋长兼副指挥官。

洞山暴动未遂，岳即与田竹三先后在胡宝兴、贾传宾、杨德富、尹道山、吴茂才等处隐匿。不久，该反动组织为我公安机关破获。1950年8月，岳又与田竹三、徐济民在陈继甫家密谋到南京寻找蒋特挂勾，准备亲去台湾与蒋介石联络，因缺少经费，只好作罢。

岳、田自宁返蚌后，又与军统特务分子王俊一和已经混入我蚌埠皖北干校的李×接头，继续其反革命阴谋活动。在李×的介绍下与潜特李胜龙（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处长）见面。谈后，决定派李×到上海联络，岳到八公山隐藏。不久，岳见到了潜伏特务李革飞，便与李同到上海。这时得悉李×已拐款逃往台湾。岳、李去台无路，又窜回蚌埠。1950年10月窜回淮南与匪首许俊子计划搞枪，组织土匪武装。未几，许又被我公安机关捕获，岳窜回寿县南乡与田竹三继续活动。同年12月26日，岳、田窜至正阳关，住在迎春旅馆。寿县公安局侦悉后，立即包围了旅馆，逮捕了田竹三，而正在澡堂洗澡的岳岐山却乘隙逃窜了。不久，岳岐山窜到寿山苏王区板桥乡许家圩子王亚生处隐藏。岳岐山来到许家圩子以后，成天藏在圩子东南角的小炮楼上不敢出来，身带手枪，有5粒用毒药水煮的子弹和一颗手榴弹，准备作垂死挣扎。1951年2月6日，霍邱县公安局根据可靠情报，派出侦察员7人，在寿县公安局和当地驻军密切配合下，拂晓前包围了许家圩子，使岳犯俯首就擒。至此横行一时的岳岐山武装匪特全部覆灭。

（安徽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追捕杀人魔王胡肇汉

陈希天

胡肇汉（即京剧《沙家浜》中的胡传魁的生活原型。——编者注），湖南人，国民党败兵。1937年底，日寇占领上海，沿沪宁线长驱直入时，胡所在部队在常熟白茆一带溃退。胡原系班长，即与10余名散兵游勇结伴同行，因怕日机扫射，改走小道南下。得知苏州、无锡亦已沦陷，便于吴县阳澄湖中心区的太平桥北（羊箭头村）落脚下来。此时，盗贼蜂起，打家劫舍，民不能安，因此为开肉店的保长阙廷卿所收容，雇作保护地方之用。胡在当地乡、保长、富绅资助下，收集溃兵，购置枪枝，拉起队伍。1938年春，曾与“民抗”合作，夏秋又先后接受我“江抗”总指挥部加委和整编。同年10月初，“忠救”（忠义救国军）在我“江抗”西撤后即对胡肇汉等诱惑收买，胡即叛变，时而与国民党“忠救”挂钩，时而与汪伪“和平”军调情，反复无常，唯利是图，变为一股座山雕式的政治土匪。抗战胜利后，除一度担任国民党青浦县保安司令外，长期担任国民党吴县阳澄区区长，盘踞阳澄湖，前后达12年之久。其间，残杀我新四军伤病员，活埋进步青年和群众，令人发指；鱼肉乡民，强占民妇，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特别是蚬山、官泾、何家沿等几次集体屠杀渔民，真是骇人听闻。群众只要一提起“胡肇汉”三字，便会不寒而栗，如谈虎色变。

1949年4月下旬，我解放大军渡江南下，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时，胡肇汉自知罪孽深重，血债难偿，即从太平桥驻地，雇舟

潜逃。第二天傍晚，胡匪曾出现于唯亭镇南之后戴垭村。胡匪头戴呢帽，身穿黑呢大衣，在12名手持冲锋枪之警卫人员簇拥下，上岸往旧部下庶务长朱惠文家。吃晚饭后，匆匆乘原船继续南去。据知情人向我报告：胡匪要朱“收集旧部，伺机起事，有机枪×挺，冲锋枪××支，埋藏于某处大坟内，需用时，可往掘取”。并告行踪：现南去角直会合王群，然后再去青浦。（朱惠文伙同胡旧部邵银福等，果于1950年夏天阴谋武装叛乱，为我公安部门逮捕、镇压）。

自此，胡匪即告失踪。

但是，随着同年秋季的大水灾，农民生活艰难，工厂半闭，失业增加，群众情绪有所波动，一度蛰服的残匪开始蠢蠢欲动。先是施放谣言：“老蒋（指蒋介石）八月半回来吃月饼”。后即开始动手。从于陆巷枪杀我阳澄区陈助理员（凶手是胡匪勤务兵唐斌）开头，制造了一连串案件，恐吓群众，勒索商行，较大的如苏州娄门大街“鼎丰粮行”的“人头案”，一时竟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匪情从阳澄湖开始向苏州城区蔓延，给我们支援大军南下，恢复经济以干扰。这些几人一组的匪徒共同的特点是，都打着“胡肇汉”的旗号，一进商行、民宅，总是自称“老板（匪徒对胡匪的代称）派我们来的”，利用群众恐惧这个“杀人魔王”的心理，以助长反革命声势。于是，追捕胡肇汉的任务，便提到“剿匪肃特”的重要位置上来了。

一

主办胡案的任务落在所在地的吴县湘城公安分局（驻区所在地太平桥镇）。分局只有六七个干警：分局长包振家（海门人，老公安人员），秘书吴雅生，外勤崔钦文、高志伟、沈孝麟、沈少浓和警卫员小陈等。他们信心百倍，闻风而动，一有线索，立即紧

抓不放，常常废寝忘食，连续作战。从1949年9月起，连破武装匪特数十起，侦查苏、沪等地胡匪联络点数十处，但对胡匪踪迹却仍无头绪。直至1950年春节前后，突然一个喜讯送上门来。

原来，湘城镇国民党政权时的镇长赶来太平桥向我们回话来了，说："史云泉愿意同政府谈判"。史是胡肇汉的第一大队长、干儿子，是胡手下数一数二的人物。解放后，并未潜逃，只是匿居在家乡湘城镇附近，经常躲藏在镇南不远处的一座坟堂屋内。虽然手中仍有武器，但已不再活动破坏。此外，他枪法又准，坟上有松柏密立、很难近身。因此，决定暂时不去碰他，并通过这位旧镇长传话，只要他出来见面，缴出枪枝弹药可以既往不咎。这天，这位旧镇长前来复命，这是查办胡案的新的进展。

包振家出于"对胡案会带来突破"的考虑，当即满口答应，同意史的条件，单身前去约定地点面谈。那位旧镇长走后，老包就此事向上级作了电话请示。县公安局衡副局长十分关切，当即派侦察股长一行10余人火速赶往湘城布防，暗中接应。老包素来艺高胆大，又仗地点在我势力范围，所以在约定时间赶往湘城，在那位旧镇长陪同下，前往约定地点——位于镇梢的史宅。史的住宅房屋很大，围墙也高。天虽未断黑，但气氛阴森，寒风刺骨，老包到了这时，已顾不得个人安危，毅然决然随那位旧镇长推门而入。史云泉已站在第二进的天井内迎接。老包抬头看时，只见史身材魁梧，皮色白皙，神色从容，很有气派，微微露出两颗大金牙，装出一副笑容，客气地说："早闻包局长大名，今日见面，十分荣幸，请进！"老包见他也是一人，又并不抢上前来握手，略一点头，就随史跨进客堂。堂上也空无一人，只有简单的桌椅之类，史略一招呼，老包就抢占客位，朝南坐下，这样既可背靠墙壁，又可望到天井。再者，自己是政府代表身份，在气势上也须压倒对方。史也着实识相，在下面主位上坐下奉陪，行动拘谨，并不乱动。那位旧镇长则打横坐下，作了介绍，老包随即向史说明了党

的政策："我们只捉胡肇汉一人。"史连连点头，表示愿向政府靠拢。随即立起身来，提起茶壶，隔桌为老包等倒茶，似乎故意露了一下插在前胸衣襟内的枪形。原约双方均不得带枪，老包见他示威，也不甘示弱，趁立起来持杯受茶时，也故意挺了挺胸，将"左轮"隔军服凸了一下。史态度更为收敛。

关于收缴枪支的事，史一口答应。出乎意料的是，当探询胡匪下落时，史却连连摇摇头说："实在不知。反正这一带老小都知道，我史云泉在解放前几个月就辞职不干了，说出来丢脸，为了一个女人，和他闹翻了！"

老包见他说得斩钉截铁，一再动员，仍是水泼不进，便目光严峻，瞪了史云泉一眼，史感到难堪，低下头来认真思索。老包抽起旱烟竿等待。那位旧镇长递了一支香烟给史，史猛抽了几口，恍有所悟地说："我想起一个线索，胡肇汉有一个秘密的小老婆，胡临逃前夕，将她寄养在阳澄村的保长家，表面上算是保长新娶的小老婆，找到她，或许可以打听到胡的消息"。接着，史又说了敲门的暗号："用枪口在门上点三下，然后向下划一下"。胡匪狡猾透顶，他给部下约定的联络暗号都不相同，所以我们得来的一些暗号，都毫无用处。老包不动声色，规劝勉慰了史云泉几句，就告辞出门，同县公安局接应的同志会合。门外的同志看见老包笑嘻嘻地出来，无不喜出望外。（史不久果如约送缴短枪 3 支，以后确实为我出了不少力，直到 1950 年秋，还助我破获唯亭宿桥"无锡独立团"武装匪特。）

老包和前来的张股长研究后，觉得事不宜迟，决定连夜行动，将熟悉胡匪的侦察员孙如海同志（路北游击队出身）留下助战。当晚老包、老孙等六七人，就地动员了一只有棚船，在苍茫的夜色掩护下，渡过宽广的阳城中湖，悄悄地摸进阳澄村，找到了那个旧政权时的保长家，用枪口按暗号碰门，果然灵验。先是门缝内灯光亮了，接着女人在问："啥人？"老孙学着胡肇汉的湖南口音

腔调，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是老胡……快开门"！小老婆可能正在迷糊中，没有辩出真伪，果真开了门。老包见她探出头来，迅速用枪对准了她，不许她出声，然后拖她出村，押到船上，飞快地将船驶到湖心。此时，风绝了，湖面上水波不兴，天上皓月当空，老包索性将船停在湖心，开审起来。那小老婆是农村出身，见世面不多，又加之今晚的行动太突然了，所以一时竟被吓得说不出话来，成了一个"哑子"。包振家便改容相劝，片刻之后，终于结结巴巴地开了口。她一口咬定：胡匪在10个月前将她送到这里藏身后，从未来过。大家只能改问胡的落脚点，她把所到之处，断断续续地逐个排列出来。这些，大家早都去过不止一次了。直到最后，她想出了一个去处，那是大家第一次听到的，都高兴得不得了。

二

第二天，包振家带了两名助手，化妆成匪气十足的"跑单邦"，将小老婆也改装打扮，防止为熟人识出，横生枝节。并且警告好，非经老包点头示意，对任何人不准开口，提防她以暗语通风报讯，然后一起出门。

那新发现的落脚点在上海浦东，是一家布店，老板也说湖南话。前年，小老婆随胡肇汉曾去那儿住过几个晚上。

老包等一行到浦东后，逐条马路找布店，终于在一家三开间铺面的布店门首，小老婆点了点头。老包等仔细向那布店里面观察时，只见二排壁厨中，各色花布密砌，柜台里，站立着八九个店员，看上去十分殷实。接头，就到附近派出所了解该店的情况。那老板姓王，湖南人，在这里开布店已有好几年，平时言行检点，奉公守法，怕老婆，老婆却很贤慧，为人爽直。布店只占用那幢楼房的铺面。住房在另一处弄内，两处相距不远。

大家听了，不免狐疑起来，但也相信那小老婆不会认错。途中，小老婆又告诉老包等："胡匪和这个王老板见面时，总是称兄道弟"。大家判断，此人非同一般，决不可轻率对待。接着老包等又找到了那王老板的住宅，是一座两层楼的中式旧房，位于附近弄堂口的第一户．楼窗有一排朝着马路，有一支电杆紧挨那排窗口。弄堂尽头正是黄浦江东岸。这些地形老包等都一一记在心里。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老包当机立断，决定在半路上截留那姓王的，和他来一个短兵相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于是老包等挟持着胡的小老婆，站在两地必经之处，混杂在人行道的人丛中，守候着。不一会，她拉了拉老包的衣角。老包急忙抬头看时，只见一个身穿棉袍的中年汉子，正从布店方向匆匆朝这里走来。老包连忙将胡的小老婆推了一下，小老婆会意，踏上前去，和那汉子碰了个照面，开口叫了声："王先生！"那汉子猝不及防，顿时一怔。我们确定那人果真是王老板无疑，不待他们答话，迅速合围上去，将他扣住，押往附近派出所进行盘问。

王老板虽然江湖气十足，但掩藏不住内心的恐慌，说话有些结结巴巴。老包首先说明来意，开门见山地讲了三点：①胡肇汉的事和你姓王的不搭界，说清楚就算了。②我们就是找到了胡肇汉，也不碰他，我们的目的只是向他借枪，因为他手里有批短枪，我们急需要用。③你王老板向我们提供的消息，我们一定替你保守秘密，君子一言，决不失信。那姓王的究竟也是个老江湖，对老包等这批化装成不三不四人物的意图，在没有吃透以前，这几句空头保证如何肯轻信。于是，只是沉默不语。只承认"和胡肇汉是湖南同乡，前两年胡来上海游玩时，曾带小老婆来住过三个晚上。"完全和小老婆所说吻合，如此而已，其余则一概不知。磨了两个小时，还是那么几句。老包知道对这号人不能霸硬，弄僵了反不好办。上海地方很讲规章，单凭小老婆的口供又不能将他拘留。于是改变策略，叹了口气，装作无奈的样子，故意压低了

嗓门说："王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我亦是'茅山训练班'第二期的，投靠共产党不过混混而已。如今上峰逼我们收枪，我们那里去收？实在无法交差！末一条路，想到只有向胡老板借"。

王老板一直低垂着肥硕的脑袋，说话不多。听到这里，他抬起头来斜睨了老包一眼，半信半疑地："先生认识哪几个？"老包见他答话，心中一喜，知道在试探虚实，于是把自己在苏南公安处学习时看过的资料吹了一通。老板连问几个问题，老包都对答如流。接着又问了胡肇汉部的人事关系，老包又吹了一通。那姓王的也是个厉害家伙，讪笑着插了一句："先生说的，都是从史云泉那里听来的！"老包一惊，感到需要小心对付。那姓王的经过二三小时后，不再象开头那样紧张了，也半真半假地问了一句："你们如果抓住胡肇汉可要杀掉他？"老包见他试探，不知就里，连忙接口："当然不杀，当然不杀！"出乎意料的是，这回王老板却反沉默不语，并无下文了。他并不是不相信"不杀"，这样处置在当时"宽大政策"下是可能的。后来才知道，他怕的倒是"不杀"，怕政府"宽大"将胡肇汉释放了，胡要下毒手报复他。接着，老包和两个助手又转入轮番说服工作，那姓王的仍旧故技重演，一问三不知。这样，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老包知道心急不得，火功不到家，煮成了夹生饭更僵，只好表面上装出谈不谈无所谓的样子，坐待战机。这时派出所侦讯室的光线渐渐黯淡下来，黄浦江反映进来的落日的余辉在墙上跳荡着。王老板开始不断地偷望着窗外，眼神中也露出几丝焦急和惶惑。老包看在眼里，心里有了谱，知道他一定是怕老婆，想回家。于是，也开始把他干搁起来，掏出旱烟竿，只是一股劲地抽烟，还阴阳怪气地吐了一句："你不肯谈，晚上再谈！"这一下果然戳到了王老板的痛处。他叹了口气，吞吞吐吐地："谈也无用，你们早来两天就好了，他到朱家角去了"！老包见姓王的露出把柄来，紧紧抓住不放："你怎么会知道的？"那老江湖原来想搪塞一下好放他回家，不防老包认真

起来，一时阵脚大乱，一会儿说是“听来的”，一会儿又说是“看到的”。在这寒冬腊月的天气里，开始额角上渗汗。在压力下，他终于开始交待真情：“胡肇汉三天前来上海，住在我家里，要拖我入伙再干。我和胡是湖南同乡，也入过伙，后来和胡分手，我洗手不干了，开起这片布店，一心要做个正当的买卖人。老婆知道我的底细，对我管束很严，叮嘱我图个下半辈子过个太平日了。我对胡的胁迫十分害怕，我向他作揖谢绝，说是我已有了老婆孩子，这种事我不想再踏脚，免了罢！可是，胡死命缠住不放，说是：“我们是弟兄，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活一起活，要死一块死！”我被他逼得无路可走，怕他下毒手，只能勉强答应担任‘联络’工作，胡这才放手。他在我家里躲了三天，说是要到香港去接线，这样他就走了。”老包等听完王老板的交待，看到王老板的脸色死灰，不象是假的，知道该是收场的时候了。于是，当场要他写了书面保证：①一有消息，随时报告；②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并愿以妻子和家产作保。他写完后，看了又看，很慎重，誊清后，要拿草稿带回家去，说是给老婆看。老包怕泄密，没有同意。分别时，约定第二天到他住宅再谈，这样双方都方便。他提出要老包早些去，因为他吃早饭后要到布店里去照料，老包也同意了。

第二天，老包等将胡匪的小老婆寄押在派出所后，即去王老板住宅赴约。那幢楼房共住5户人家，王老板住的是第二屋，共占3间房间。老包等踏进王家的客堂，瞥见老板垂头闷坐着，他见到老包和两个助手慌忙站起来招呼了一下，神色十分尴尬。他老婆却心直口快，不经老包说明来意，自己先说开了：“先生！他是个老好人，老糊涂。前几年，胡肇汉带小老婆来这里住几天，事后，我关照他，今后别再和这号人往来”。又说：“我们现在拥护政府，要听共产党的话”。接着，她又端上一锅豆浆和一篮油条，热情地招呼客人。两个助手望了老包一眼，老包考虑吃了能打破

僵局，于是自己先伸手取了一根油条，大家边吃边谈，空气果然急转直下，缓和多了。那女人很起作用，当着三人的面骂自己的男人，要他彻底交代。老包等决定不再久留，便告辞走了。

老包等一行返苏后，向领导作了汇报，专候上海方面来信。那是1950年2月的事。

三

过了一段时间，吴县湘城公安分局接到了上海王老板挂来的长途电话："客人来了"！那是约定的暗语。老包听到追捕了半年的杀人魔王真的自投罗网，兴奋得再也呆不住了，于是带了两个助手，连夜雇船赶到苏州，连县公安局也来不及去汇报，就直接跳上半夜火车，拂晓时扑到了上海浦东。

到王家后，王老板急忙拿出了胡肇汉从香港寄来的快信。那是一封用铅笔写在普通纸上的信，信笺上歪歪斜斜地写着：

"××兄我已平安到港勿念，在沪承热情招待，兄弟十分感激，永记在心。现正在接生意，接到之后，一定返沪面谢，弟字"

老包知道，"接生意"就是与国民党匪特"接关系"的暗语。根据无寄信地址及信封、信笺是从商店购买的等情况可以推知：此时胡匪尚未与香港匪特机关联络上。但再一想，胡匪素来诡计多端，或许故意麻痹我们也未可知，说不定在最近一二天内会突然返沪。为防万一计，老包决定逗留在浦东，来一个"守株待兔"。

老包想去浦东公安分局联系，这才想起临行仓促竟连介绍信也忘带。于是只能先在附近的小旅馆住下，然后写快信回湘城分局。在此期间老包等3人则轮流去王家附近暗中监视，密切注意可疑情况。

过了三天，吴县湘城公安分局的介绍信寄到，老包等兴冲冲地跑往浦东公安分局联系。谁知上海地方极讲规章，坚持要持专

区公安局的介绍信才能接待这类破案事宜，这简直象兜头一盆冷水。包振家等无奈，只得连夜赶返苏州，打算向县公安局汇报后再说。

事有凑巧，刚到苏州，恰巧遇到苏南公安处黄赤波处长和侦察科江华科长，原来他们专为追捕胡肇汉一案找上门来了。

黄处长告诉大家："胡匪影响太大，公安处决定将胡案升级，由苏南直接来抓，你们原班人马配合"。接着，要老包说说"胡匪的特点"。老包一直认为自己对胡肇汉太熟悉了，虽然并未见过真身，但是对胡的照片天天揣摩，对胡的身躯、姿态亦打听得一清二楚，特别胡匪脸上带细白麻子很好辨认。因此，只要胡匪一出现，保证能将他从人丛中抓出来，万没想到要他概括什么活动规律，一时竟怔住了。黄赤波便扼要地讲了胡匪的三个特点：①他熟悉阳澄湖的每一港叉，甚至他睡在船中，只听橹声、水声就能知道到了什么地方；②贪女色，到处搞娘们；③专喜在晚上单独活动，只带几个人，乘一有棚船，神秘地外出。黄还分析苏南区敌人当前活动的特点：单线，分组，这样骚扰面大，出没机动，使我难于应付，破获却抓不住根。大家听了十分佩服，原来黄处长早已到太平桥一带去秘密调查过了。接着黄处长召集了专区、苏州市的有关领导，专门对侦捕胡匪作了部署。老包等县局同志作为先遣小组先去上海。

老包和吴同法同志等持了苏南公安处的介绍信，到浦东分局后就住在那里，摩拳擦掌，专等王老板送消息来。未几，苏州专区、苏州市两局，也各派3位同志来沪会合，都是苏北籍的渡江干部，平时大家奔忙，无暇畅叙，今日想不到会在上海相聚，分外亲热。这时，上海市局也派了一批人员来配合。大家一看，都是身穿呢大衣，头戴呢盆帽，派头一路。见面后，毫不客气，情况不了解，一味拍胸脯，口出狂言，说什么："你们放心，捉胡肇汉包在我们身上"！大家都是老公安，一轧苗头不对，知道是留用

的“包打听”之类（这批人直到1955年才转业），于是赶紧派人去上海市局找侦察科长戚丞，不料戚出差去了，于是只能直接找局领导交涉，再三要求改派渡江的老干部，否则要误大事。上海市局当即改派了侦察科副科长带了一批得力干部前来浦东。

过了几天，王老板果然又派人送纸条来了。上面写着：“老板马上就到”。大家劲头一下子来了，真象守候了几天的猎户，一旦听到野兽的蹄声一样狂喜。三股人立即紧急磋商，进行战前准备。突然门外走进一个头戴呢帽、身穿呢大衣、鼻架墨镜的人，手中还提着皮箱，对大家笑了一笑，就坐下来，一起听包振家同志的情况介绍。大家仍当他是先前派来过的上海“包打听”之类旧人员，不便多问。后来，那人插话了，大家才听出原来他正是日夜盼望的主角江华同志，真是又喜又羞。喜的是，他终于在关键时刻赶到了，羞的是，大家都是“老公安”，竟也被他高超的化装术骗过了。

又过一天，王老板火急地亲自来报告，说是：“来人了，通知我老板（指胡匪）后天到上海，要我做好安顿准备”。又说：“我是推说到市区去进货，兜抄拐湾过来的。今后不能再来了，只能靠递条子。”说完急匆匆地走了。

王老板走后，江华立即召开了实战部署会，进行了分工。他说：“这次行动，地点在上海，应当由上海市局同志负责指挥。战斗序列：苏州专区（包括吴县公安局）为第一梯队，由江华、专区局侦察科长、包振家、吴同法等同志组成，直接捕人，因为熟悉胡匪面形、体格，不致临阵错过。苏州市局为第二梯队，负责守卫楼梯、室内，接应第一线，同时防止胡匪突围。上海市局（包括浦东分局，水上分局）为第三梯队，负责包围现场，封锁江面，追捕逃匪，对付敌人外援。”江华的意见三方面都一致同意了。

临末，老包提出来要换新枪，因为带来的短枪都是陈旧的，临战时万一瞎火或机件发生故障，那就不得了。上海局答应借一批

新枪来。第一梯队每人一枝新左轮，一板新快机。这样战斗时，可以右手持快机以攻，左手擎左轮以护身。新枪马上送来了，于是大家都抓紧时间熟悉这些新武器的性能。摸着崭新的短枪，个个欢喜得真象得了宝贝一般。

四

大家在上海浦东分局内，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但又都感到时间长得难挨。

"后天"终于盼到了。参加战斗的同志，一清早都已扎束停当，整装待发；个个都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专候王老板送消息来。

那天，时间更难挨，时针仿佛老是不走似的。大家午饭都不想吃，午觉都不想睡，一直挨到傍晚。大家正在焦急万分的当儿，老板娘神色慌张，上气不接下气地赶来了。她结结巴巴地说："来了……28个……我家老头子……已封锁……在屋里，他们都在……楼上开会……我推说……布店断……货，要向小姐妹……借……布，才准我一人……出门"！她说完，拼命催老包快去，蹬着脚说："迟去了，散会跑掉了，就难找了！"

这情况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原估计胡匪及随从至多三四人，这是他的老规矩。因此，整个行动都是按这个估计布局的。现在，匪徒突然来了这么多，真叫人措手不及，又喜又感到棘手。明摆着，第一梯队接敌时力量明显不足；但矛盾的是，人多了，上楼梯又必然惊动敌人，而且在室内格斗时，力量又难以展开。大家反复比较利弊后，最后决定仍以原方案为宜，尖刀组仍由江华、包振家等三同志组成。这时，江华突然当众问老包："你敢不敢？"意思是：你不敢，现在还可以换人。老包是著名的孤胆英雄、"老公安"，从小学过拳棒，后来又经过多次训练，今天，盼了半年的猎物已到嘴边，如何肯让。"敢，敢！"他唯恐被人夺去似的，一

连说了自己能上的3个有利条件：①我还没有老婆，没有牵挂，父母在家乡海门，希组织上供应生活，不要让他们哭到江南来坍我的台。②我熟悉胡肇汉的面孔、个子，不会认错。③我在南京受过特种训练，枪法、拳击，都有一套。江华一直盯着老包，听到这里，脸上才出现了一丝笑意，微微地点了一下头。紧接着，研究接敌战术。老包首先提出："突入匪群后，趁敌人惊呆当儿，我火速抢占壁角，双枪对外，逼住群匪，喝令举手投降。或者，我趁乱钻入桌底下，使群匪无从发挥火力，我在桌底下发枪，扫射敌人足部，打乱敌阵，造成内外夹击之势"。大家听后齐称妙计。

接着，尖刀组3同志立即火速化装成人力车夫，好在他们都熟悉这门业务，不到一刻钟，都变成脚蹬麻鞋、全身破烂短打的汉子。有利的是，他们都是苏北人，和上海地面上常见的车夫简直没有两样。这时，浦东分局征借的3辆人力车已停在隔壁弄内，车上都装了几捆布匹，完全扮象了提货返家的排场，如果敌人从楼窗上窥见，也会深信不疑。此刻，夜幕已降临大地，时机正好，各路人马均已向指定地段运动。老板娘也跳上了第一辆人力车，由老包提起车杠拉着，快步向目的地奔去。第二辆、第三辆分别由江华等拉着，随后紧跟。

这时，马路上行人已少，店铺也大半打烊，车行毫无阻碍，不多时间，已抵弄口。3人乘停车当儿抬头观察，只见该幢楼房上下窗户紧闭，窗帘低垂，只有第二层的楼窗内有几丝灯光从窗帘上透出，整个底层则呈现异样的死寂，估计为敌人严密封锁所致，所以会呈现这种神秘和恐怖的气氛。

3人摸枪在手后，即随老板娘走近该宅大门。老板娘看来真心立功为夫赎罪，毅然摸出钥匙，去开门上的锁。钥匙刚插入锁孔，还未转动，即听见门内敌岗哨低声问着："啥人？"老板娘镇静地回答着："是我，提货回来了"！

大门刚开一线缝儿，3人即闪身进去，用枪逼住那敌人，一声

不响地解下了此敌的武器。正如老板娘提供的情况一样，楼下并无第二个敌人。室内光线很暗，只有楼梯上端的一盏5支光灯泡发着微弱的光，但从下面望上去，较清楚，可以看到楼梯上口并无敌人警戒。看来，敌人是麻痹的，或许王老板施计所致。

室内摆设看不清楚，只有楼梯转角处的一只煤球炉子，正吐着一圈蓝光，此时，开水恰巧沸了，炉子上的钢精水吊的盖子，被水全冲击得“咣……咣……”作响。江华何等机灵，右手提枪，左手顺便提起那把水吊，轻声跨上了楼梯。楼上敌人发觉有人上楼（或许是王老板），也低低地喊了一声“楼下是谁？”老板娘在楼梯下依然很镇静地应了一声：“是我！”楼上便不响了。

此时江华已登上楼板，控制梯口，老包等也随后登楼。活该敌人末日将到，3人登楼，敌人竟毫未察觉。这时，王老板过来用手指了一指，3人立即接近那个房间。侧耳一听，才知群匪此时正在聚精会神地开会，死到临头，还在争吵什么“官衔”。

江华立即用枪口向房门指了一指，老包会意，迅速接近房门，提起腿来，瞄准锁孔，用足全力，“蹬”地向门上踢了一脚，可说是老包功夫过硬，“嘣”地一声，房门洞开。

房内，电灯光通明，只见匪徒们围坐在3只大方桌拼成的会议桌四周，黑压压地挤满了一室。原先突入匪群的方案很难做到。于是江华、老包立即当机立断，趁敌人被这突然袭击震怔的一刹那，6支短枪伸进门去，迅速对准了群匪，一齐大喝着：“不许动！”“举起双手”！

这时群匪只能乖乖地举起手来，俯首就擒。原来匪徒们的武器都坐在屁股下，一时不易拔取。

这时，江华眼快。瞥见边座一个魁梧的匪徒，正在伸手摸枪，马上一扣板机，用快机向天花板上打了个点发，“砰”地一响，枪声在室内显得格外有威力。同时喝叫着：“谁动手，就打死谁？”吓得敌人一个也不敢再动。打一枪，也是向户外楼下同志报告“已

得手”的讯号，还有打两枪则是已“接火”的讯号，这些都是“老公安”所熟知的。那时老包手脚也快，早随声而入，一把将那个想动手的匪徒拖翻在地。后来才知道，此人正是和胡匪同时潜逃的另一匪首——国民党政权吴县淞南区区长王群，想不到今晚也在里面，正是意外收获。

房内开始骚动，困兽犹斗，一个亡命的悍匪突然跨上桌面，猛地向上一窜，用头颅撞碎了天花板上的电灯泡，室内顿时一片漆黑，敌人显然夺得了垂死挣扎的机会。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两支雪亮的光柱射了进来，室内顿时亮得须眉毕露。原来第二梯队的同志已赶到了。随带的两只大电筒起了大作用。三人又齐声大喝：“谁动手，就打死谁！”敌人又被震慑住了。

匪徒们一个个高举着双手，鱼贯着走出房门，接着挨次戴上手铐，押下楼去。

老包和江华，在匪群中认出短小的胡肇汉和高大的王群，押上等在弄口的囚车，首先开车走了。

为了一网打尽余党，江华和包振家当晚开审胡匪。为了安全，首次开审是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牢的地下室内进行的。

胡匪素称强悍，杀人从不眨眼，视人命如草芥，有“不怕胡肇汉跳，只怕胡肇汉笑”的民谚。但到了此时此刻，胡匪却面呈死灰，混身战栗，语不成声，连称“先生，先生”不止，杀人魔王成了猫爪下的老鼠。“惟残暴者最胆怯”，这句名言确有道理。

胡匪当即招供：“方才 20 几个匪徒，都是嵊余列岛的海盗，正在开会讨论合并的事”。当晚，上海市局的同志在附近的河浜中搜到了两条木驳船。舱内藏着近 200 支冲锋枪和数挺机关枪，还有数十箱子弹。如果那晚不破获，任其流窜，为害是很大的。

胡匪还招认：从香港到台湾后，因人事不熟，并未与匪特机关联络上，后转至舟山，找到了伪江苏省主席丁治磐，才取得联

系，被委为伪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官（报载为伪苏州专员公署副专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起先，企图携带电台从宁波沿海登陆，因我戒备森严未逞。只能仍从香港入境。胡匪自知性命难保，一再恳求“保全他妻子和独子的性命”。

就这样，杀人魔王胡肇汉落入了人民的法网。1951 年春，被判死刑，执行于苏州。

另一匪首王群则相反，骄狂异常，拒不认罪，直至临刑还打掉饭碗，辱骂刑警，带着花岗石脑袋下棺材。

（选自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

剿灭匪首“小雄鸡”

竺钦国　汪成法

1949年5月25日，奉化宣告解放，全县人民翻了身。但是，县境内打着“浙东行署突击大队”、“奉化自卫总队”、“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等番号的武装匪特，约有2000余人，还有从新昌、嵊县、鄞县、象山、宁海等地不时窜入的股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人民政权的建设。剿匪反霸便成为当时我党的一项中心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军教导大队、三十五军某团和省军区二分区（宁波）警备二团，先后到奉化剿匪，各地民兵紧密配合，采取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方针，把各股土匪逐个歼灭。其中号称：“浙东行署突击独立大队”的土匪首领“小雄鸡”，于1951年2月14日被跸驻村民兵击毙。现将其罪恶及被歼情况概述如下：

上山为匪　无恶不作

“小雄鸡”，名叫徐永昌，乳名云金，原籍新昌县上徐村，曾在奉化县晚香岭村买了一间楼房住过一段时间。他3岁亡母，14岁丧父，成为孤儿。因个子矮小，常与牧童斗殴，人们就叫他“小雄鸡”（云金与雄鸡谐音）。一次，他上山牧羊砍柴，遇见土匪头目孙立表，要他到村里购买酒肉之类食品，此后常受差遣，分享到一点抢劫所得的“甜头”。1928年，他16岁就跟随孙立表上山。1932年，因孙

立表被捕，在狱中服毒自杀，他被推为头领，就以“小雄鸡”作为匪号。经过几年的抢劫活动，他练得一手好枪法，指哪打哪；脚马快，上山坡如履平地；臂力过人，攀缘毛竹象猴子灵活。但这时的“小雄鸡”羽翼未丰，仅有30多个喽罗，常受地方士绅与国民党官兵的威胁，想找“靠山”以求发展。他把抢劫来的财物送给奉化前岙村陈传卿，后又拜奉化跸驻村宋孟果为干爹。陈传卿是奉西一霸，人称“老大爷”，其次子陈祥芳曾任国民党副军长；宋孟果是蒋介石的连襟。“小雄鸡”有了这两个“靠山”，常去这两家“拜望”、“孝敬”，一起吃喝赌博。这两个“靠山”，不仅给他枪支弹药，发展匪徒，而且给他介绍结识了更多的土豪士绅，为之吹嘘撑腰。从此，“小雄鸡”名闻遐迩。1937年1月，“小雄鸡”率匪徒百余人，流窜至奉化谷坑岙的赤云庵，均以红缎披身。著匪王鼎山、单阿毛、单孝友、单孝升、唐伦道等均听他的指挥。他先后强抢3个美貌少女作压寨夫人，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这段时间里，“小雄鸡”带领匪徒在新昌、嵊县、奉化、鄞县、象山、宁海等地，抢劫绑票，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仅举几例：1931年，他带匪徒数十人，回到老家新昌上徐村，亲手枪杀其堂叔一家3口，烧毁唐伯春楼屋5间；1935年5月23日深夜，把宁海桥棚刘更鼎为子纳聘之大洋150元及衣服、衣料、食米等物抢劫一空；1936年5月，率众盘居宁海王家山村，白天叫村民去大蔡购买鱼肉、香烟、电池等物，夜间奸淫妇女，其中年方16岁的少女王玉文，被匪徒轮奸；同年7月5日晚，宁海方前村林祥宗叔侄3人被绑架，勒赎巨款；1938年12月22日，带匪徒47人，包围新昌外王坑村，枪杀村民23人，打伤3人，烧毁房屋57间、耕牛7头、猪15头，全村只剩边缘小屋6间；1940年2月，窜到新昌大来村，肆意抢劫，并滥杀无辜村民20余人等等。人民群众叫苦连天。小孩哭闹时，只要说声“小雄鸡”来了，就不敢作声。

国民党官兵曾多次追剿“小雄鸡”，均无济于事，匪势越来越猖

獗。1937年6月，蒋介石电告浙江省保安处，命严剿"大老虎"、"小雄鸡"股匪。6月7日，六区(宁波)专员徐箴和奉化、鄞县、宁海、新昌、嵊县等5县县长及三、四、六保安大队长，在奉化溪口召开第二次联防会议，具体部署"清剿"事宜。同月在奉化三石设立新嵊奉宁四县剿匪指挥部。7月16日在新嵊交界的伏虎山"大老虎"乱枪丧生，"小雄鸡"却未伤一根毫毛。六区专员和保安司令部遍贴布告，悬赏捉拿，也毫无效果。1938年12月，六区杭卫总队在嵊新奉交界处再次围剿"小雄鸡"，可是连鸡毛也没抓到一根，结果倒楣的还是老百姓。这些官兵抓不到土匪，就抢群众的东西，还以"土匪窝"罪名，将房屋烧毁，真是兵匪一家。

兵匪合一　继续绑票

国民党派大批军警多次围剿"小雄鸡"，只抓到刘阿宝等几个喽罗，收效甚微。1940年5月，浙江省政府授意俞济民出面招安，封官许愿。经过陈传卿的长子陈林芳等人说合，"小雄鸡"接受招安。5月6日，俞济民亲自到奉北六诏安抚"小雄鸡"，将其部下点验编队，委任他为宁波自卫总队独立分队队长，不久，升为独立中队上尉中队长，带原班人马，驻在奉化跸驻等地。

1941年，俞济民命"小雄鸡"在嵊新奉边境招兵，所招的多数系失散的旧部，遂升任宁波自卫总队(1943年2月改为宁波警察总队)独立大队少校大队长，移驻宁波。宁波沦陷后，被编为抗日自卫总队第三大队，移驻宁海。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小雄鸡"部被缩编，任少校副大队长，驻宁波。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过了长江，蒋介石逃离奉化时，作了"应变"部署。刚任杭州市市长的俞济民改任浙东行署主任，他命徐永昌回到奉新边界的剡界岭招募新兵，把散匪、流氓、赌棍等组成浙东行署特务团第二营，"小雄鸡"任少校营长。5月，宁波解

放，他即带二营跟随俞济民逃到舟山，在普陀受特种训练二个月。

这段时间里，著匪"小雄鸡"变成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军官。其实是兵匪合一，继续进行其抢劫绑票的勾当。在宁海驻防期间，明里领的是官饷，暗地却掌握领导那一带的土匪，明抢暗夺，坐地分赃。宁海群众多次向俞济民控告，俞济民却把一张张状子丢进纸篓。1948 年下半年，"小雄鸡"纠集一伙人，把宁波一个大资本家绑到宁海樟树村，在一个地下室里关了二个月，后来以大批黄金赎回。"小雄鸡"即把其中大部分黄金送给主子俞济民，其余分赃给大小头目。其部下之抢劫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潜入奉化　终于毙命

1949 年 8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宁波警备二团等部开到奉化剿匪。在奉北歼灭"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所属的陈庆祥股匪。在奉东打垮"奉化自卫总队"唐光武、朱海飞、严杰等股匪，俘 30 余人，匪 3 个大队投诚 300 余人。在奉南消灭"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五六人，匪首陈公侠逃跑，下落不明。新昌、嵊县、鄞县、象山、宁海等县合力围剿，"浙东行署主任"俞济民所属的竺洪挺残部、单孝友残部及刘子良股匪逃窜四明山。

同年 10 月，"东南反共救国军挺进支队"（原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二纵）司令徐文忠潜往舟山，对"小雄鸡"说："竺洪挺等在大陆干得很出色，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们应该回去做一番事业"。其实竺洪挺股匪已于 9 月在嵊县被击溃，带残部狼狈逃窜。"小雄鸡"表示愿回大陆与竺洪挺等一起干。俞济民就委任"小雄鸡"为"浙东行署突击独立大队"中校大队长兼奉化县副县长，王祥丰为副大队长，王中元为大队副兼中队长，并再三叮嘱要在四明山区站住脚，等待时机，配合反攻大陆。原国民党奉化县长周灵钧（时在舟山，后逃台湾）向"小雄鸡"介绍了奉化的基本情况和反动社会基

础。经过一番准备，“小雄鸡”带领108个匪徒，3挺轻机枪、12支木壳及步枪，并随带1架电台、空白符号（作为扩军之用）和征收钱粮赋税的单据，深夜从舟山偷渡，次日凌晨到宁海加勺科村登陆。该村是他岳母家，小舅子林官兴也入了伙。这伙匪徒就钻进深圳鹿颈峻深山密林，这里是“小雄鸡”做“山大王”的老巢之一。他们在宁海、奉化、新昌3县交界的山区乡村，派款派粮，群众不得安宁。有了栖身之外，他一面派人与赖云章（宁海）、竺洪挺（嵊县）等匪首联络，一面派亲信侦察解放军驻防及人民政权建立情况，并扬言要攻打宁海县城。

12月中旬，驻宁海的解放军某部，侦察到“小雄鸡”股匪的盘踞地点，立即围剿，经2小时战斗，击毙匪班长俞同德，俘5名，缴获步枪4支，其余匪徒依托山高林深的复杂地形逃脱。匪大队副兼中队长王中元乘混乱之机，逃离匪部，躲入马岙一户农民家里，但不敢去自首，几天后被剿匪部队抓获。

“小雄鸡”带领残部转移到奉化董李大公岙山区，根据鹿颈峻战斗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整顿，把4月间新招收的胆小怕死、缺乏战斗力的20多个匪徒遣散回家，并关照他们：若有人问起就说“小雄鸡”又回定海去了。将这20多个匪徒的步枪收下，通过保长埋藏起来。他对部下说，与共产党打游击，一定要精明强干，多长几个脑袋。竺洪挺从嵊县潜来与“小雄鸡”接头，交谈经验教训，“小雄鸡”向竺传达了周岛　（浙江省主席）、俞济民要他们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指示。竺即返回。此后，“小雄鸡”白天在深山隐蔽，晚上出来活动，利用社会渣滓恫吓群众，散布谣言，说什么国民党就要回来，共产党要退到长江以北去，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等等，搞得奉西一带人心惶惶。

1950年1月，奉化县公安局会同县大队，方门区武装工作队进入董李，提出“活捉小雄鸡，回家去过年（指春节）”等口号，联合剿匪。“小雄鸡”见势不妙，率众窜至岩头与跸驻之间的小坑脑深

山。这时，有个小头目王金启，来到跸驻村与其妻相会，通过联系，弃暗投明，带领解放军和民兵上山围剿。“小雄鸡”一伙窜至新昌沙溪，又遇解放军和民兵的袭击，匪徒王国昌等被击毙。“小雄鸡”四面楚歌，流窜在奉西、新北、嵊东的四明山区，与这时潜入的徐文忠（后在上海被捕）、何信友（国民党奉化自卫总队长，不久被击毙）等合股活动。

5月上旬的一个深夜，俞济民派郭常颂潜入，来到北街村谢阿忠（已弃暗投明，县公局派他为“特情”）家里，要求帮助找到“小雄鸡”、竺洪挺。谢向郭宣传了当时的形势和我党的政策，劝他向人民政府自首，但郭不敢去自首，绝望地将携带的俞济民亲笔信烧毁，当夜离开奉化，次日在宁波被捕。从此，徐匪与其上司联系中断。

6月，竺洪挺在嵊县被击毙，该匪部大队长陈定瑞率残匪并携带一架电台，与刘子良（3月被俘）的残部徐筱宝（中队长，不久被捕）等，都投到“小雄鸡”部下，匪徒又恢复到100多人。于是分作7股，“小雄鸡”、王祥丰、陈定瑞、张道桂各带一股，分散活动，派亲信化装成商人、农民，混入我驻防部队，刺探军情；与不法地主、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相勾结，作为耳目；袭击我乡镇政府，杀害干部和群众，抢劫大米等物资，甚为猖獗。例如，奉化曹署村干部陈阿增、棠云乡乡长胡孝飞先后被杀害。6月27日晚，匪徒用机枪、步枪猛烈扫射剡前（岩头）乡人民政府，岩头上村农会文书毛恭存被枪杀，幸而该乡乡长房贵魁等外出巡逻，未遭毒手。几天后，又杀死大坑村农会积极分子毛老三、毛中火等。6月30日，聚集各股土匪，乘解放军调离之机，包围新昌张家车村，枪杀民兵队长徐大狗等11人，打伤5人，烧毁房屋12间。7月7日，又烧毁奉化六诏村房屋6间。7月中旬，在奉新公路上拦劫江浙公司货车和宁奉汽车公司客车上旅客的钱包、行李、货物等等，真是罪恶累累。

当时，在奉化的大部分匪特已经肃清，但“小雄鸡”股匪仍在流窜作案，其活动的特点和方式是：夜间声东击西，转换几个地方；白

天用木炭烧饭，不冒烟火；头目亲自放哨，笼络匪徒；造谣、威胁，使一部分群众恐惧，被其利用；各地布有眼线，及时通风报信。因此，一时难以剿灭。

10月，解放军二分区（宁波）警备二团三营，奉命进驻奉西跸驻村清剿"小雄鸡"股匪，认真分析了情况，总结一年多来工作经验，进一步贯彻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的剿匪方针，深入到各村串门访问，召开座谈会和村民大会，举办民兵短期训练班，广泛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揭露恶霸地主勾结"小雄鸡"的罪行，提高了群众的觉悟。石桥头村农会副主任带头检查了自己曾给"小雄鸡"搭过山厂，有12个民兵检讨了过去相信谣言，做了墙头草，表示今后与土匪划清界线。替土匪藏枪藏物的群众都纷纷交了出来，仅下跸驻村就缴出步枪6支，短枪2支，子弹400多发。同时，做好匪属的工作，重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宽大政策，指明悔过自新的光明前途，要他们把走入歧途的亲人找回来，与家人团聚，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劳动者。匪属很受感动，千方百计寻找做土匪的亲人。跸驻村武装委员设法找到妻弟王其昌下山自新，王其昌与毛信夫（自动投诚，县公安局派他为"特情"）一起上山规劝"小雄鸡"匪部副大队长王祥丰，王祥丰又把兄弟王世友及其亲信拉出来投诚，这对瓦解"小雄鸡"股匪起到重大作用。在此基础上，警备二团三营三连连长杨秋明，将跸驻村周围16个村的民兵组成联防大队，亲自兼任大队长，统一指挥，发挥匪情，立即行动，使"小雄鸡"股匪陷入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之中。

1951年春节期间，连降大雪，杨连长带领指战员和联防大队民兵，喊着"歼灭小雄鸡，农民好分田"的口号，与新昌的部队、民兵一起，合力清剿，击毙"小雄鸡"的小舅子林官兴等匪徒。"小雄鸡"又溜到小坑脑深山。他身边只剩梁昌华、"小老王"、朱志龙（匪班长）4个匪徒，粮食已吃光，衣服全湿透。他们在岩下坑龙王庙烤火时被已自新的原"小雄鸡"警卫员谢全宝发现并立即报告，三连侦

察班长纪田庆带领全班战士赶到，用冲锋枪猛烈扫射，击中“小雄鸡”的脚踝。不幸，纪班长的大腿也中弹负伤，“小雄鸡”等匪徒乘机逃入深山。他叫“小老王”、朱志龙去搞粮食和药品。杨连长闻讯，立即带领部队和民兵严密搜山。同志们不怕风雪寒冷，连续作战。2月14日下午，跸驻村民兵潘官清、宋兴苗、王大毛等在搜索中发现了脚印，就顺着脚印追击，可是走了一阵，脚印不见了，突然听到猎狗在脚印相反方向狂吠，民兵们折身冲杀，一阵排枪，将躲在柴丛里的“小雄鸡”和他的警卫员梁昌华击毙。原来“小雄鸡”是倒退走路，以迷惑人们。顽匪“小老王”带着朱志龙，窜到油毛岙村其妻家里，妻子劝“小老王”自首遭到拒绝，就偷偷离家向三连及民兵报告。“小老王”不见了妻子，连忙出逃，几天后在猛坞龙潭被曹家地村民兵击毙，并活捉了朱志龙。从此，奉西的股匪基本肃清。2月25日，在跸驻隆重召开歼灭“小雄鸡”股匪的庆祝大会。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中共奉化县委、县政府、人武部及各界人民团体等几十个单位都派代表出席，并赠送了锦旗、奖品。部队文工团从宁波赶来，为大会演出精彩的节目。军分区首长高度赞扬三连指战员和跸驻民兵的战迹，并亲手将扎有红绸的10支步枪奖励给跸驻民兵，勉励他们为保卫翻身的胜利果实而继续努力。当三连奉命调离执行新的任务时，广大群众和民兵，扶老携幼，都来欢送，还赠送了一面上书“人民长城”的锦旗，表达了人民对子弟兵的爱戴。

（浙江省宁波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劝降匪首蒋小瑞

章如烈

1949年7月，金华解放不久，我三十五军18个同志来竹马馆建立新政权，组织农会、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当时北山一带，土匪猖獗，匪支队长邢小显，收罗国民党二〇三师散兵游勇300余人，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更为严重的是，在罗店村偷袭我解放军筹粮队，在兰溪马涧袭击我过路卫生队。我三十五军一位连长和当时芙塘区长董兰溪以及该区田头、山口、灵殿等村的农会主任先后被杀害。当时许多农会积极分子，四处出去躲避，部分农会濒临解体。针对土匪猖獗情况，我人民解放军配合地方干部，开展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土匪原是乌合之众，大军压境，一击即溃，但他们熟悉地形，化整为零，就地潜伏。当时有土匪大队长蒋小瑞窜本区，昼伏夜出，到处骚扰，群众恨之入骨。

蒋小瑞原是金华府上街人，中等身材，浓眉大眼，力大如牛，心狠手辣，诡计多端，不务正业。解放前他纠集一批党羽，居然成为地方一霸。当年长乐戏院，不堪地痞骚扰，特请蒋小瑞坐堂保镖，竟无人敢捣乱。

1949年11月，我们乡政府得到情报：蒋小瑞率30余人，流窜到北山梅村骚扰。当时乡政府18个同志，除5人留乡看守外，其余13个同志当夜分兵出击。我们分析，虽然敌众我寡，但土匪是漏网之鱼，丧家之犬，士气一定消沉，加之日夜逃窜，疲惫不

堪，所以同志们信心实足。冬初天气，加上濛濛细雨，衣服湿了，冻得同志们手疼鼻酸，牙齿嗒嗒作响。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不照电筒，尽抄小路，路狭泥滑，时而跌得四脚朝天，也不吭声。我们偷偷地摸到梅村，埋伏在村庄周围，机枪占领制高点，切断北山去路。同志们紧握手中枪，密切注视村里动静。高昂的战斗激情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念，占据着同志们的心田。天朦朦亮，我们打响信号枪，对准土匪住房发起突然袭击。兵不厌诈，我们的机枪不断转换阵地，以虚张声势，同志们还大声喊："我们是县大队，现在向你们宣布政策：缴枪不杀，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你们赶快放下武器投降！"这时突然从村里冲出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边跑边慌张地叫喊："不要开枪！我是马涧金风桥战斗中被俘的解放军。"他告诉我们：今早起床烧早饭，听到枪声和山东老乡的口音，知道自己的队伍来了，急忙逃出虎口。根据他汇报的匪情，我们迅速进村控制要冲。土匪听到枪声、喊声，乱成一团，他们以为真是县大队来了，考虑继续顽抗死路一条，只有放下武器赶快投降。他们从窗口纷纷抛出武器，然后垂头丧气地鱼贯而出，口口声声要求人民政府给予宽大。直到押送途中，才弄清我们是竹马馆乡政府的人，只有一挺机枪，知道上了圈套，但已悔之莫及。在投降的土匪中没有蒋小瑞，经过搜索也没有发现蒋小瑞的踪迹。据匪徒供称，蒋小瑞单独活动，经常一夜投宿数处，搞得神出鬼没。

这次出击，我们13个战士和乡干部俘虏30多名土匪，缴获2挺机枪，几十支步枪和弹药，以少胜多，以智取胜，群情振奋，打出威风。同时，将一般匪徒全部释放，对土匪起了很大分化作用。到1949年底，大股土匪已基本消灭，农村局势转好，为实行土地改革创造了必要条件。

1950年早春，三十五军的14个同志奉命离开竹马馆归队。他们走后，乡政府的力量大为削弱。残余的土匪又死灰复燃，纷纷

蠢动。特别是蒋小瑞，同幽灵一样，经常出没扰乱。同志们夜间出村工作，莫不提心吊胆。蒋小瑞既然在夜里活动，我们只有在夜里抓他。有一次我和区长高相文同志黑夜埋伏在本乡六头塔村的三岔路口，想打伏击。等到9时左右，仍无动静。寒风凛冽，霜白如银，我俩冻得全身发抖，顺便到附近小学教师方某家讨口热茶暖暖身。谁知方某一见到我们二位不速之客，吓得目瞪口呆，连话也说不出来。原来他心怀鬼胎，肚里在琢磨："昨夜蒋小瑞在我家宿夜，一定被乡政府发觉了，否则为什么深夜来闯门？"他灵机一转，争取主动，结结巴巴地说："小瑞昨夜在我家宿夜，早上5时左右就走了，我身为人民教师，知道窝藏土匪是有罪的，我正想来报告，可是怕被他知道。他要杀我比杀鸡还容易。"说罢，露出一副可怜相。我听了马上随机应变，顺水推舟地说："关于蒋小瑞在你家宿夜的事，已有人来汇报，今夜特来看看。"高区长接着说："只要你能想办法动员蒋小瑞投降，或者帮助我们抓到他，政府是会宽大你的。"方某立即表态，愿意随时向我们汇报土匪行踪。

一星期后，方某果然来乡政府报告："蒋小瑞今夜要在六头塔村后面小山坡石板坟前过夜。"我们得到这个情报后立即与区委联系，由区委集中竹马馆、新狮乡的干部和区中队共30多人，当夜10点多钟包围这个小山坡，慢慢缩小包围圈，一声号令，冲到坟前。只发现地上留着一些花生壳、香烟头，其他什么也没有，扑了个空。据了解，方某家解放前曾在府上街做生意，就住在蒋小瑞家里，交情较密。是否他们有意搞假像，为方某开脱窝匪罪行呢？这就很难说了。

这天夜里，天黑风紧，寒气逼人，附近村庄传来几声狗吠，冲破旷野寂静。我们扫兴回到乡政府，已是11点多钟。只见姜衙头村的2个民兵，早在等待我，急不可待地向我汇报："今夜9点多钟，我到祠堂里去拿稻草垫猪栏，刚走到祠堂大门口，听见里面有响动，我偷偷地朝里面一看，哎唷！真吓死人！一个黑影正往

空棺材里钻，我拔脚就逃。”这祠堂在村的西头，比较偏僻，白天也是阴森森的，很少有人出入。

我们分析了情况，认为很可能是蒋小瑞这个刁匪躲在祠堂里装神弄鬼。他跑得了石板坟，跑不了姜衙头祠堂。我们立即准备出击。据了解，蒋小瑞有2支驳壳枪，200多发子弹。他的枪法很准，如要活捉，必须要有一定的战斗力，不能麻痹轻敌。我们乡政府只有5个同志，到竹马馆村召来5个民兵骨干，随带枪支、手榴弹，并布置住在祠堂边的民兵，先回家引走家狗，以免打草惊蛇。12点多钟，我们包围了这座古老的祠堂。我靠近墙根把守大门，紧握枪支，大声叫喊：“你已被包围了！快出来投降。”祠堂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大家屏住气，竖起耳朵，静得一枚针落在地上也能听到。有的同志等急了想冲进去，被我阻住。我唯恐蒋小瑞狗急跳墙，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政策攻心，逼他放下武器才是上策。我们继续叫喊：“蒋小瑞！你放下武器出来投降，我们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否则你插翅难逃，死路一条。”突然祠堂东边，“呼嘭”一声响，好像有人把棺材盖推倒在地。我们猛照电筒，果然有一个披头散发的人从棺材里爬出来，站在那里一声不响。同志们立刻紧张起来，全身每股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枪口对准黑影准备射击。我赶紧向屋内开了一枪，黑衣人应声而倒。同志们正要往里冲，被我再次拦住，我说：“慢点！”我放的是空枪，是吓唬他的，他没有受伤。蒋小瑞诡计多端，如果我们冲进去是会挨打的。

一会儿，黑衣人从地上爬起来，高举双手，战战兢兢地叫喊：“章乡长！我不是土匪，我不是蒋小瑞！请饶命。”

大家走近一看，原来他真的不是蒋小瑞，而是3个月前逃跑的国民党政权乡长姜寿贵。他身穿黑衣裤、满脸黑灰、头发胡须蛮长，真同戏台上的妖魔鬼怪一样。据供认，他怕群众斗争，白天躲在棺材里，夜里出来活动。此人与土匪有别，经教育，当场

释放。

这事过后不久，我接到一封不具地址的来信，内容大致是：

章乡长钧鉴：

乡长是读书人，年轻有为，实为敬佩。

本人解放后被迫上山，一失足成千古恨。我身居绿林，已到山穷水尽，不知何去何从。贵政府颁布宽大政策，不知其宽大限度如何？容我再考虑几天，再前来投诚。还有一事相求，对我不必追击，以免再伤和气。在半月前我在方下店附近，穿蓑衣戴笠帽，化装农民，我们相隔咫尺，但我无心伤害你……

敬请福安

蒋小瑞

根据土匪目前的处境和心理状态，我们一面加强夜间巡逻，一面开展政策攻心。我当即回信，通过关系劝其投降。

蒋小瑞：

来信有悔悟之意，我为你高兴。据说你过去干过苦工，理应是共产党的拥护者，可叹你偏听谗言，陷入岐途。如今蒋家王朝已崩溃，我军即将解放全中国。邢小显全军覆灭，已成为过街老鼠，他惶沮终日，不久定能就擒。识时物者是俊杰，顺从形势，弃暗投明，是你唯一的出路。

人民政府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首恶如顽抗到底必予严办。邢小显下属头目，虽干过坏事，但能悔悟投诚者，可宽大处理，希望你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章如烈即日

早春的一天上午，金色的阳光沐浴着苏醒了的大地，淡淡的热力驱散早晨一层薄薄的云雾，晴空万里。高耸的北山显得特别雄伟葱翠。蒋小瑞这个狡猾的土匪大队长，在我军事清剿和强大的政策威力感召下，终于随带武器按指定地点向县大队缴枪投降了。

（浙江省金华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南平剿匪述略

程　楷

解放初期南平军民的剿匪斗争，是新生的人民政权与敌对力量进行生死搏斗的继续。这场斗争尽管时间不长，但发动群众之广泛和武装进剿声势之浩大，斗争之尖锐，都是前所未有的。剿匪斗争的胜利，为巩固人民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和开展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剿匪斗争是南平人民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现将有关材料整理如下。

一

1949 年 5 月 14 日南平解放。解放后由于人民政权全力以赴忙于筹粮支前，群众尚未组织起来，土匪活动相当猖獗。据当时县大队掌握的情况看，流窜于县内各区的股匪有：一区叶仲扬等；二区曾木兴、吴兴民等；三区蔡新奎、陈伯森等；四区王元正、林建安等；五区郑元路、韦金瓶等；六区应威仪、应保大等；七区潘文珊、胡铁夫、吴生茂等；八区詹维明、丁扬声等。约 26 股，750 余人；加外来 19 股，500 余人。共有武器（不完全统计）长短枪 547 支，机枪 3 挺，手榴弹 60 多颗。盘踞 60 个保，经常活动 30 个保，约占全县 157 个保的 60%。尤其是国民党败退时网罗并武装了一批极端反动分子，以反共反人民为主要目的，组成地下土匪武装，如以潘文珊、胡铁夫为首的直接受所谓闽浙赣特击

司令部指挥的“福建省前线特击司令部挺进第一师”，其中匪第三团和第四团即潜伏在城内，并与山上土匪直接联络，企图扩充力量，待机武装暴动。此外，还有大刀会约3000余人，匪会串通，沆瀣一气。我占点线，匪占乡村，水陆交通常受威胁，欲往顺昌、沙县须派部队护送。

上述股匪中大致分为政治性明显的土匪、惯匪和恶霸地主或特务控制的会匪以及经济土匪等几类，人数不等，活动范围甚广。匪首为匪时间长者达20多年，如郑元路，短则10多年，如潘文珊、陈伯森等，各匪之间多有勾结。他们活动的主要特点是：一般以反共为号召，造谣惑众散布变天言论；杀害革命军政人员、积极分子和为我办事的保甲人员；收买我军政人员甚至打入我内部；袭击交通线，煽动群众，破坏征粮工作；抢粮派款，沿江坐钩，绑票抢女人等等。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我危害很大，使全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各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仅解放后到1951年5月以前的不完全统计，全县损失计有：1919户被抢劫，被抢6159次，被抢去白米231864斤，被子270条，衣服1534件，耕牛26头，猪羊545头，鸡鸭6371只，银元10200元，黄金29两；有238户房子被烧，烧毁民房460间；有10位区干部和106位乡干、积极分子被杀，受伤者38人（区干2人，其他36人），被捕者237人；一般群众被杀73人，受伤52人，被捕144人。匪患不除，国无宁日，人民为了生存，迫切要求消灭匪特。

二

1949年8月底，县武装在三野十兵团二十八军八十三师剿匪部队的通力合作下，开始了剿灭土匪的斗争。10月下旬，省军区又派来一支部队直奔大历口一带剿匪。10月28日武彦荣县长亲自带领县大队一部份同志前往配合，从三千八百坎经茂地、峡阳

而到大历口。武县长因准备第一次县各界人民代表会，11月12日赶回县里，由张副营长带队。

根据形势发展和开展大规模剿匪的需要，1950年1月26日正式成立了南平县剿匪指挥部，由县委、县府和县大队的主要领导组成：第一指挥武彦荣，第二指挥周道纯，政委秦定九，副指挥林关金，副政委武冲天。

指挥部成立后，坚决执行中央制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以及“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对全县剿匪工作做了具体部署。与此同时各区也相应成立了区剿匪指挥所。1950年1、2月份以反霸征粮为中心，3、4月份以减租反霸为中心，5、6月份以生产度荒为中心结合减租反霸，因而剿匪的主要力量仅是驻剿部队和县大队。3月中旬到4月中旬是最困难时候：原剿匪部队奉命他调，新来的剿匪部队来不及展开工作，县大队和区中队人数不多，群众武装只有260人，也缺乏教育和训练，有些人关键时刻不但不起作用，甚至发生动摇。匪特趁此大肆活动，拉一些意志薄弱者下水。县委及时总结教训，决心整顿原有武装并积极建设新武装，经广泛宣传发动，进展很快，到7月底群众武装已发展到61个村，计3021人，并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战斗。

鉴于一部分同志对党的宽大政策不够理解，贯彻不力，在剿匪中存在扣、打、杀、刑审等现象，县委及时进行了纠正。1950年6月16日发出《关于执行地委严禁乱打乱捕乱杀及刑审逼供决定的决定》，要求各区剿匪指挥所领导在剿匪中要注重讲政策。明确规定了逮捕审讯与处决人犯的权限：“凡未奉县以上人民政府命令，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得擅自逮捕人犯”，“严禁打人，凡打人（不管打什么人）均视为违犯政策的行为，应受到必要的惩处或批评，对犯人的审讯与处决，必须依据司法手续进行，送县公安局、司法机关审讯处理，在对任何人犯的审讯中，严禁刑审及

任何变相的刑审，区没有判犯人徒刑或处决之权。”并对个别违反决定的干部分别做了严肃处理，如五区公安助理员叫人打死匪徒受到处分即为一例。此后，政策执行较好，7个月中即瓦解争取匪徒242名，占这期间歼匪的36.4%。

进入7月份后，在我军事打击、政治进攻与群众武装自卫三方面的努力下，进剿不断取得战果，逐步刹下了匪特的嚣张气焰。匪开始由大股化为小股，由集中化为分散，有的则转入隐蔽活动。为度过夏荒，并防止匪特破坏夏收，县委于7月15日给各区剿匪指挥所和各个剿匪部队发了信，要求他们务必做到：①积极领导群众努力度过夏荒；②广泛宣传胜利形势，宣传剿匪征粮减租生产等政策，揭穿匪特的造谣欺骗；③积极领导群众开展减租斗争；④动员一切力量开展剿匪斗争，保卫夏收，保卫减租。接着8月13日召开了南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剿匪和发动群众。9月初，七区在峡阳召开了峡阳民兵检阅大会；9月12日又在大历口召开了有800多人参加的民兵检阅大会。这对大造声势，鼓舞斗志，压制土匪等，都有积极作用。原来很难打开局面的江汜，就是从此时起开始变化的。至9月底，群众武装发展到97个村，共6765人（其中民兵2813人，自卫队3952人）。据8个区66个乡村不完全统计，5至9月的5个月中，群众武装作战414次，歼匪451人，缴获美式机枪1挺，长、短枪94支，子弹约500发。匪特击司令部代理副司令应威仪就是这时被峡阳民兵抓获的。

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9月25日县剿匪指挥部又向各区剿匪指挥所发出了《关于处理自新土匪的指示》，强调剿匪斗争要掌握和运用政策，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土匪武装，并对自新土匪做了具体政策规定，这个指示对后来继续分化瓦解匪特起了很好作用。

入冬以后，在逐步开展土改的推动下，各区群众全面发动并组织了起来，大规模的群众性剿匪斗争席卷全县。这时尽管群众

武装的装备还十分简陋，只有极少部分枪支弹药，绝大部分民兵和自卫队员只能拿着土枪和刀矛，但他们却努力做到了“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夜以继日，连续作战，在县剿匪指挥部的直接指挥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

1950年11月25日，六区王台镇民兵经常艰苦搜剿，抓获了匪特“新编第六师参谋长”徐长悦和李长滋等3人。12月4日晚上，高埠头民兵40多人，在陆细妹队长带领下，经过反复搜剿，在溪口高巍山顶活捉重要匪首游元贞。12月18日上午9时，八区大笏村民兵22人在丁积兴队长带领下，运用打埋伏的办法，给股匪“第四师二十四团”张德基匪部以沉重打击，打死匪特6名。1950年一年内全县军民歼匪1492名，其中打死75人、打伤84人，活捉538人，自新795人。缴获机枪1挺，冲锋枪3支，步枪237支，短枪58支，子弹2704发，手榴弹160颗，各种炮弹2200发，土炮22门，土枪52支，刀矛237把，电话机2架，文件印等一部，金银衣物粮食约折款2240余万元，解放群众百余人，夺回耕牛20多头。这年年底，人民武装已发展到121个村，共12879人（其中民兵6408人，自卫6471人，村武装委员以上干部392人）。拥有武器：长短枪297支，子弹1476发，手榴弹353颗，土枪675支，土炮95门，刀矛4855把，逐步形成了一支特殊的武装力量并开始发挥较大的作用。有91个村的民兵配合部队出击314次，单独出击174次，两项共488次，参加人数602人，歼匪505。

近春节时土匪活动又比较猖獗，我剿匪部队和民兵发挥连续作战的作风，穷追猛打，1951年头4个月，在第一期土改完成、农民获得胜利果实的鼓舞和推动下，剿匪的战果更加显著：

1951年1月22日下午4时，王台镇民兵22人在镇干部袁隆贵、民兵队长黄和川、农会副主席黄昌深带领下，在洋坑乡属山后村附近山上包围搜剿到晚间11时左右，生擒匪首应保大、周步

云等4名。1月24日上午，分区部队和县大队三连各一部在一区属大原后山歼灭匪特副连长叶能治等3名。25日跟踪追击至双峰田后山，在搜剿中打死、活捉匪副官吴沛森等4名。27日又歼灭匪二团团长丁扬生、六团团长张旺兴及匪参谋长罗立品等10名。2月8日，七区属聪坑村民兵在水尾活捉匪连长胡山滕。12日，解放军一部和台林、桂林、李坑民兵在古田三区三宛坊山上搜剿，击毙匪一五一团团长林吓存。13日，大洋汾、聪坑干部和民兵在洋翠村附近捕获匪福建省前线特击司令部挺进第一师师长胡铁夫。17日，大刀会头子叶中兴窜到安丰桥，被西芹镇护路民兵活捉。19日解放军一部和民兵在二、三区交界大演、下坪、洋山一带包围搜剿，击毙匪闽东北反共救国军五十一师师长谢建国、师部书记长饶天洲，活捉匪徒5名。3月4日晚，五区塔前民兵在垄山搜剿中击毙匪魏日涛。11日，二区前坪民兵活捉匪突击军第二十三支队秘书长高裕光。12日，店口、江布、大坝三村民兵在店口山上活捉闽浙赣战线特击第四师一五一团第三营营长吴兴民。17日，匪参谋长林良魁、排长蔡天村以下7名携枪向五区政府投诚自新。4月10日，七区葛延民兵抓获匪福建省前线特击司令部挺进第一师师长潘文珊。13日上午，五区泗坑民兵陈立明上山砍柴时见有芥菜掉在地上，即赶回报告，康长胜等8名民兵配合区中队出击，在泗坑附近笋厂楼上，由区中队魏德樟同志发现疑点，抓获躲在笋榨中的匪首李建璠等2名。1951年1、2、3月歼匪最多，计1554名，占歼匪总数46%，光匪首就抓获135名。到5月底为止，全县股匪基本肃清，此后消灭的都是些零星散匪。

在军事围剿的同时，我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政治攻势的作用。除发动匪众家属及亲朋捎书带信进行瓦解外，还请城内知名人士做土匪的工作。如请陈仰周先生向郑元路说降。余维藩同志还特地从尤溪回来亲笔写信给郑元路，约他会面，晓以大义，劝其投降。在余维藩同志劝说下，郑元路迫于形势，只好让其部下全部携械

向政府自新。此外，二区凤池、五区洋州，八区群仙等大刀会经宣传后，也先后自动解散了。

从南平解放起至1951年5月底止，全县共剿灭土匪3409名（内有包括所谓师级在内的大小匪首共200余名），缴获轻机枪3挺，长枪595支，短枪108支，子弹7050发，土枪47支，土炮4门，矛刀400多把及其他物资。民兵配合部队出击1071次，单独出击863次，将近半数土匪是被人民群众歼灭的。以五、七区为例，千人以上的大搜山就进行过8次，其中有的一次即有2500—3000人参加，声势浩大。至此，全县已有民兵11553人，自卫队13658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剿匪斗争的胜利和人民武装的强大，为后来各项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三

福建匪患由来已久，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十分复杂。解放初期的匪患，其反动性更加明显。首先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匪特，明目张胆地进行组织与煽动；其次是一些恶霸地主为了挽救其垂死的命运而挣扎，他们依靠土匪做靠山，合伙并操纵了部分股匪；再次是一些惯匪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妄图苟延残喘。不少人认为土匪的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确实，在旧中国，土匪从来就没有被灭绝过。只有在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从前无法办到的事情办到了，剿灭土匪成为现实。究其原因，主要是：第一，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非常英明；福建军区所指示的重点清剿与面的坚持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武装自卫相结合的剿匪办法非常正确；第二，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全体民兵、自卫队协同作战，积极进剿，真正形成了有骨有肉的群众运动，显示了群众性剿匪的巨大威力，特别是主力部队在

剿匪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三，剿匪斗争与其他各项工作密切结合，相互促进，相互为用；第四，县剿匪指挥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县委领导具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决心，强有力的领导，保证了胜利的取得。千条万条，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的力量是根本的一条。

（福建省南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黄文炳股匪缴械自新的经过

汤　涛

一

1941年3月，统治长泰人民长达14年（1926——1940年）的匪首叶文龙，在国民党的官匪互相勾结、互相倾轧中被枪决之后，长泰匪患并不因此而平息。相反，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长泰人民继续长期遭受兵灾、匪患的蹂躏。

叶文龙在南平被枪杀后，其随从警卫班长吴宗潜回长泰，纠集叶匪旧部数百人，横行于岩溪、枋洋、林墩、陈巷各乡之间，到处勒派乌单、荼毒人民。

吴宗匪势扩大后，国民党当局只得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一方面调来龙溪、海澄等县自卫队官兵数百名入泰会剿，从军事上施加压力；一方面由地方显宦陈林荣（时任国民党军委会军风纪第一巡察团中将副主任）出面斡旋，劝导吴宗自新。

吴宗自新后，福建省保安处委为少校附员，以示笼络，调到梅列保安处供职，便于监管。不久，吴宗在泰旧部，又有些人死灰复燃，继续为匪，保安处归咎于吴宗的怂恿，下令枪决吴宗于梅列。吴宗死后，长泰匪患更加猖獗。

1947年冬，曾充叶文龙卫士多年并参加过吴宗匪乱的枋洋院前村人黄文炳，首先纠集平昔过从较密的亡命之徒数人，劫夺枋

洋的乡、保警备班武器后，力量迅速膨胀。一时原叶文龙、吴宗旧部匪徒闻风归附者达数百人，声势日益浩大，黄文炳股匪开始在长泰、安溪、同安等县边境骚扰，抢劫钱财，掳人勒索，摊派乌单，购买枪械。因此，福建省保安司令（由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兼任）饬令第四、五两行政区派队会剿。第四区保安副司令徐振中乃率领县自卫中队人枪百余，从安溪经枋洋抵县会剿。黄文炳、卢同安等股匪，侦悉徐的行军路线及时间，埋伏于枋洋、演柄山间，伺机狙击。当徐振中乘坐大轿途经溪口亭对面沿溪小径时，即被预伏于隔溪山岔“三相公庙”后的卢同安股匪，对准徐的坐轿开枪射击，一弹击中振中的腿部而流落轿下。轿夫与自卫队官兵抱头鼠窜，匪徒遂将徐挟持到院前社前（黄文炳家乡）枪杀。消息传到漳州后，长泰显宦陈林荣认为事态严重，即求助于张贞，请其致电省主席刘建绪饬派部队进泰剿办。张贞还备函刘建绪介绍我赴省洽谈成立本区保安团，以维持地方治安。

二

自1946年春，我已离开厦门的国民党别动军暂编纵队（当时任副指挥），在漳州北乡山美村开办农场，种植桃李千株，以及甘蔗、花生、蕃薯等农作物数十亩。经两载的经营，初具规模，颇思从此脱离军界，终老园林。

1948年1月间，忽接张贞约我谈话的通知。我到张寓时，在座的有陈林荣等人。（张贞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张贞问我说：“你的农场办得好吗？”我答：“还算不错，再过几年就有果子可吃了，”陈林荣在我们谈话间插话：“长泰叶文龙的旧部黄文炳等又上山为匪，近日在枋洋附近枪杀第四区保安副司令徐振中，这样任其横行，我们还能安居乐业吗？干老（张贞字干之，旧属都称他为干老）要你出来工作，你的意见如何？”我说：“文龙

有一团人枪和那样多金银都失败了，黄文炳等有什么大本事会窜扰到漳州来。”张贞笑着说：“即使他们不能骚扰到漳州，而你在北乡的农场怕也办不成了。我们认为你还是到福州走一趟，面请省府刘主席拨给枪械千杆，编成一个保安团。经费可由本区各县分担，兵员也由各县自卫队抽调改编，这件事由你负责进行筹办。”我即答：“经营农场，历时两载，收获在望，弃之殊为可惜！”张贞说：“目前形势紧迫，此事越快越好，明早来取给刘主席的介绍信，由厦门乘民航机飞往福州洽谈。”我推说：“现在没有作好准备，空手要到福州行吗？”张、陈都默不作声。我接着不客气地说：“今天能借到钱，明早就走。否则，改天再去吧！”当天我向朋友借到“法币”20万元，翌日即由厦门搭乘民航机前往福州。

我到福州后持介绍信到福建省政府晋谒刘建绪主席，并陈述筹办保安团意见。刘询问长泰匪情后，即在介绍信上批示：“严处长核办”。我往省保安处找处长严泽元，严阅信后说：“你来得正好，昨天曾由秘书室通知你来省。”我问：“有什么事情？”严说：“第四区保安副司令遗缺，拟调第五区陈拔萃接充，第五区保安副司令部悬缺拟由你接充。”我说：“张贞的介绍信处长已看过，无须赘述，但我回去如何向张贞回话呢？”严说：“目前我省几个保安团已无法维持，不能再成立一个团了。你接任第五区保安副司令，比当团长更妥善，至于具体情况等明白再谈吧。”

严泽元对于徐振中被匪击杀极为愤恨，已初步拟定了剿办方案。我到福州以后，适严要召开会议研究，参加会议者有省保安处秘书陈文照、保一团团长胡季宽等。最后作出如下具体部署：

（一）调原五区保安副司令陈拔萃（原籍南安，黄埔军校三期生）接充四区保安副司令。其遗缺委汤涛接任，负责处理黄文炳股匪缴械自新工作。

（二）调保安第一团胡季宽进驻于长泰与同安的边区，威逼黄文炳等股匪缴枪。

（三）调保安处秘书陈文照接任长泰县县长（因陈、汤、胡等均系中央军校同学，又是省保安处老同事，较能合作。）配合办理匪徒自新及负责清乡善后工作。

会上还强调：对黄文炳股匪，以招抚缴械自新为上策，以武力清剿为中策，若剿而不清那是下策。招抚以一个月为限，剿办以两个月为期。总之，要求在四五个月内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也都表示有把握完成。

三

省保安处长严泽元作了上述剿办黄文炳股匪的部署后，要我们切实执行。即令保安一团团长胡季宽克日归队，将该团兵力向同安、安溪、长泰边境推进，作为进剿的前奏。并面谕陈文照和我在春节前务必赶到长泰和漳州。我们都在除夕（公历2月9日）到任。

大年初一（2月10日），第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郭醇特地到区司令部和我会晤，商讨剿匪事宜。同日，我到张贞公馆陈述关于编组区保安团不能实现，省已委我任第五区保安副司令的情况。张贞表示："省已委你当了区保安副司令，那也好！"

初二晚，军统头目陈达元由榕来漳，到我家里访谈。据他说："军统闽南站行动组在黄文炳等匪枪杀徐振中后，已派上尉组员王元昌掺入匪部工作。请你到长泰时，将此情转告陈县长、胡团长加以关照，使王元昌能安全返回漳州。"

翌日，我往长泰县城，其时陈文照正忙于接收工作。我邀约长泰县自卫团副团长林春风和岩溪乡乡长沈飞凤座谈，了解黄匪动态。两日后，我到岩溪就近进行工作，这时陈文照已通知沈飞凤归我指挥，我指派他负责了解匪情和联络工作，他表示愿尽力以赴。

记得我初次派沈飞凤找黄文炳说明：汤涛这次前来长泰的任务，是负责协同陈县长、胡团长进行剿办工作。如黄文炳能接受招抚，保证他们在缴枪后生命安全，可以回家安居乐业。今后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可由黄文炳约定。

第三次沈飞凤与黄文炳会谈后，黄决定在岩溪湖珠境内同我晤谈。因此我即于元宵节日（公历2月24日）带同沈飞凤、何天青（南靖县自新的匪徒）前往湖珠，住宿于一碉堡内等待。当日夜间，黄文炳派人前来侦查询问："汤副司令来了吗？"沈飞凤说："我们下午就到这里了。"并指着我说："他就是汤副司令。"来人即告辞而去。约一小时后，黄文炳带同几个便衣匪徒在碉堡外叫开门，黄文炳进门后自我介绍说："我们几年前在马咏农场见过面（编者按：当时汤陪保安旅长陈佩玉去看望叶文龙），这次听沈乡长说，省处派你前来长泰，目的在和平解决，这种做法，我们是愿意接受的。至于打死徐副司令，当时我不在场，我们缴枪后是否有保障？"我即解答说："你们缴枪总比被剿办有利，叶文龙有一团人枪，经过个把月的围剿后，下场如何你也是明白的。现在估计你们的人枪还不足一营吧，能够抵抗多少日子呢？前车可鉴，如果你们顽抗，结果是害人又害己，请再三考虑。我是本地人，也是你们的老朋友（前叶文龙派一连编入汀漳师管区我的补充营为第四连），希望你回去同他们磋商，是否愿意接受和平解决的办法缴枪自新，回家务农。如果10天以内不答应，那时将由保安一团去剿办。你们吃了亏，就不要见怪我了！"

约一星期后，黄文炳偕同沈飞凤前来湖珠找我说："如果政府不追究枪杀徐副司令的罪责，我们愿意放下武器，回家种田。但是，政府官员讲话不负责任，谁会相信他们的话呢？"我对黄说："如果你们能够听话，我可负责保证你们的安全。"同时介绍何天青和黄见面，并加以解释，大意是：天青过去是天宝乡著匪韩柳添（曾被四十九师收编为补充营）的副营长，柳添死后，天青上

山为匪。在抗日战争时期，经我介绍向保安司令部办理自新后，委为本区专员公署的咨议，这次跟我到长泰来。随后天青向黄文炳叙述其经历的实情。黄文炳听后，神态较为安定，即对我表态说："请你代向陈县长、胡团长要求保安团队暂缓向枋洋乡推进，以便我们集合队伍缴枪自新。"我答说："这样，我明天就回县城和陈县长、胡团长协商，并电请省保安处核准，缴枪自新，不追究枪杀徐振中的罪责，你们的人回家为民，宽大处理。"

翌日，我和沉飞凤离开湖珠回到长泰县城，即向陈文照、胡季宽通报同黄文炳洽谈情况，大家同意报省核办。

省保安处长严泽元接到报告后，即电复，内容大致是："×电悉。黄匪等准予缴械自新，着限七天内，人枪列册报备，武器交保一团押送省处。自新证件由长泰县政府核办，仰遵照办理具报。"约几天后，黄文炳等集中枋洋乡待命。计缴步枪、手枪300多杆，自新人员400名左右，在3月底至4月初办完各项手续。

四

事后，黄文炳、卢同安等为感谢宽待，乃邀请我和陈文照、胡季宽（由副团长黄震欧代表）、林春风等人，并由一些地方人士作陪，在枋洋圩内一家商店楼上设宴款待（计楼上4席，楼下2席则是招待卫队的）。王元昌（充任黄匪参谋长）也在座，互相敬酒时，我小声问王元昌："你还不走？"王答："今晚离开。"宴毕，我们一行20多人步行返回岩溪乡住宿。只有林春风因酒后头晕不能走路，留住枋洋。

翌晨，忽接枋洋乡乡长黄奕骥来电话报告："昨晚王元昌带何建道向林墩方向逃亡。走到封头村附近山坡，被人枪杀。王、何两人随带的2支驳壳枪不知下落，应如何处理？请指示。"我和陈文照、胡季宽商议以后，电告该乡长："先行买棺收殓，候其家属

前来认领。”王元昌等两人为什么在自新后突被杀害？为查清此案，陈文照命令长泰县警察局陈林寅负责查明报备。后据陈林寅报称：“枪杀王元昌一案，经查与县自卫团副团长林春风有关。王元昌等所携带的2支驳壳枪，系缴林春风的。”事后，陈文照曾向林春风查询有无此事，林春风矢口否认。因此，陈文照与林春风发生争吵。

1948年4月上旬，福建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刘建绪来漳州，召开第五、六两行政区的专员、保安副司令暨县长会议。陈文照乘机向刘建绪密报林春风通匪并枪杀王元昌等案情，刘建绪甚为震怒，立即手令陈文照击杀林春风。

会后，陈文照回县，鉴于林春风拥有一部份地方武装，并常有戒备，不便公开宣布逮捕，以免引起骚乱。乃密令新任长泰县警察局长陈启硕（浙江人）周密部署击杀林春风的行动计划。

时林春风因已与陈文照发生矛盾，心存疑虑，不敢长住县城。为防备意外，乃离开城关自卫团部，移居岩溪圩一店屋中。楼上是林春风夫妇卧室，楼下日夜有武装勤务兵数人值班。贴身卫士萧水成佩带二十响快慢机驳壳枪及美式手榴弹，经常随侍左右。

警察局长陈启硕接受陈文照的密令后，首先充分掌握林春风身边警卫人员的动态。并在侦缉组中挑选一批比较精悍的便衣人员，具体布置行动任务。而后以调解林春风与陈文照之间的误会为名，公开来岩溪圩，登门拜访林春风。

林春风看到陈启硕一人单独上楼，谅必不敢捋虎须，因而笑脸相迎，热情接待。殊不知，正当楼上宾主高谈阔论之际，楼下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已在巧妙布置下次第展开。

陈启硕刚一上楼，侦缉组的便衣“臭头基仔”（远近闻名的刽子后）立即来跟萧水成耳语：“抽鸦片去，我请客！”两人平日交谊颇厚，而萧水成的烟瘾又是极大，闻言立即不声不响地跟着基仔到圩里一家烟馆吞云吐雾去了，结果被早有预谋的基仔一枪打

死，轻易地拔除了一大障碍。当基仔和萧水成刚一走出林春风住家，另有几名便衣来到楼下同林春风的两名值班勤务兵动手动脚开玩笑。在嬉戏声中，解除了这两名勤备兵的武器。陈启硕在楼上听到约定的暗号，知道所谋已遂，突然伸手夺取林春风放在床头的一杆短枪。林春风扑向启硕争夺时，楼下的几名便衣探警已飞步上楼架住林春风，推押下楼，"□街直奔圩头旷地，在一棵木棉树下开枪击杀，岩溪警察所大批员警立即出动街头严密警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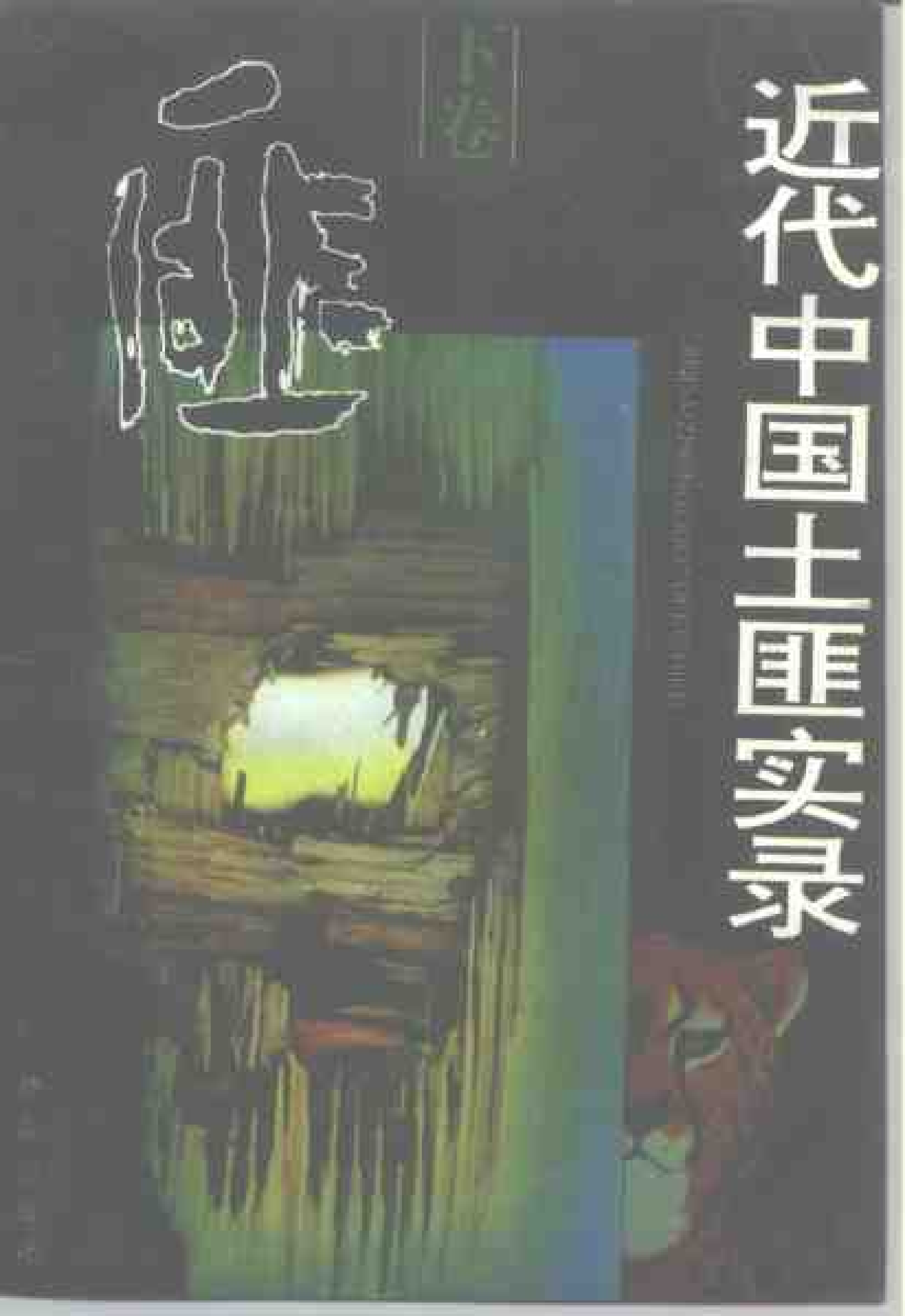
街上群众见状惊愕间，县警察局长陈启硕站在林春风住所楼上的窗前，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由县长陈文照签署的处决林春风的布告，向街上群众高声宣读林春风的罪状，并把布告贴到街上。林春风的死，再次暴露国民党政权内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阴森情状。

（福建省漳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中卷
作者=
页数=642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下　卷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上中下卷）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0.75印张　1507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948—X/K·19　定价：三卷共33.00元

印数：00001—15000册

目　录

兵匪横行祸豫西 …… 王凌云 (1)
新郑匪患与剿匪 …… 曹鹤岐 (16)
吕店匪患纪略 …… 姚清修 (22)
忆洛阳市郊匪患 …… 王兼三 (26)
我所知道的江汉平原的土匪 …… 朱国南 (30)
民国年间鄂西匪患 …… 王兴华　黄代芳 (54)
张治中谈湘西匪患 …… 谢心宁整理 (62)
七大股匪乱凤凰 …… 凤政文 (67)
雷州半岛匪祸见闻 …… 梁国武 (89)
大桂山匪患和私枪 …… 李伯权 (102)
豫西绿林暗语集注 …… 蒋留计 (107)

匪窟余生记 …… 姚文蔚 (109)
我在匪窟的一百天 …… 张义三 (128)
匪窟两月亲历记 …… 向永清 (141)

南澳海盗“三合公司”始末 …… 林俊聪 (146)
“三五八”称霸腊尔山 …… 凤政文 (156)
辛亥年海匪进扰万城纪略 …… 郑人权 (163)
三百冤魂 …… 邓安新口述　吴承学整理 (166)
九龙堂匪帮爆炸同兴渡 …… 李泽林 (172)
老戴正大破沈丘城 …… 刘慎五 (175)
孙攀脚巧拉肥票 …… 雷振都 (178)

豫省八中伸秋遭匪劫 …… 陈子美口述　李采山整理 (180)
大屯村筑寨防匪窝匪及其他 …… 李文修 (183)
一宗入校掳人勒赎案 …… 陈耀林口述　李纪麟执笔 (189)

清末民初的洛宁绿林人物 …… 苗培萌 (192)
中州大侠王天纵 …… 张　钫 (223)
柴老八与农民揭竿造反 …… 王凤梧口述　李玉瑞整理 (240)
驰名豫西的张寡妇 …… 王瘦梅 (245)
"老洋人"——张庆 …… 苏　辽 (254)
李元周及其一家 …… 李治生 (267)
湘西土匪瞿伯阶殷内幕纪实 …… 瞿波平 (281)
恶魔张平 …… 胡家模 (331)
湘西巨匪姚大榜 …… 杨长光 (344)
田伯卿武装始末 …… 彭景星　田廷清 (356)
陈汉章其人其事 …… 韩卫贵　欧玉琳　张化云 (361)
罪恶累累的徐汉章 …… 张永安　邓文海 (366)
宋占元打家劫舍的十年 …… 张振莘 (371)
十万大山女匪首覆灭记 …… 刘陶尧 (374)
大瑶山匪首林秀山 …… 易禹州　黄谷香 (377)
"大天二"萧天祥 …… 林　中 (390)

回忆四十年代初湘西剿匪 …… 张文调 (396)
扫灭湘匪十八万 …… 黄远炽　王吉云 (400)
三百村瑶民歼匪记 …… 赵富金 (419)
小瑶山剿匪述略 …… 凌崇征 (424)

云南土匪 …… 曹瑞鹤 (430)
石屏匪患 …… 刘　圻 (438)

建水匪首及匪患 …… 刘瑞周　李品三 (445)
镇远的兵匪之乱 …… 梁　鼎　黄永锡 (452)
道真匪患辑要 …… 柯昌佑整理 (455)
思县民初十年匪乱史略 …… 姚绍坤 (460)
回忆我家乡的匪患 …… 周道祥 (466)

恶匪张结巴 …… 马　锦 (471)
迤南悍匪赵小安始末 …… 李表东 (492)
弥勒五匪首 …… 杨　坚　陈荣华 (510)
滇西匪首王高脚与张梁 …… 苏松林 (517)
李继川在保里的罪行 …… 杨家珠 (523)

安龙壬戌事变纪实 …… 郑伯衡 (528)
股匪三劫谷陇街 …… 刘祚成 (535)

滇南剿匪之战 …… 陈文琪 (538)
元阳土匪暴乱被歼记 …… 张　纲 (543)
回忆贵州剿匪斗争 …… 潘　焱 (549)
贵州解放初期各地重大股匪的暴乱及被歼概况
…… 刘铭简 (561)
三穗土匪暴乱始末 …… 王国华 (572)
麻江土匪暴乱纪略 …… 姜克俊　梁勤之 (582)
回忆锦屏解放初期的土匪叛乱 …… 张武云　刘月卿 (587)
捣毁黔北大匪穴李家寨 …… 黄永龙 (595)
“雪、凉合围”第一仗 …… 袁宗武 (601)
云雾山剿匪记 …… 聂运民 (610)
台江剿匪斗争片断 …… 张明达 (613)
活捉大匪首吴河清 …… 唐成海 (618)

匪首钟志达落网记 …… 余庆县公安局史志办 (624)
活捉匪首陈鹏 …… 李绍武 (627)
“猫客”就擒记…… 葛仁敬 (631)
匪首刘启荣盗尸假死案 …… 丁德元　谢文武 (634)

兵匪横行祸豫西

王凌云

豫西山大王的开山祖

1909年间，豫西王天同（又名王天纵）、张黑子、张四庚、丁老八等人，因不堪清朝官吏的压迫，纠合所谓英雄豪杰、揭竿而起拥戴王天同为“老架子”（总头目），以杨山（嵩县境内最险山区）为根据地，四出掳掠为生，不时与清朝军队相对抗。

1911年间，豫西所谓民党（头上带一块白布为标志）如刘镇华（暗中运动人）、孙老九（揭竿而起的首领之一）、赵旺、张木桶等人，以嵩山为依据，他们的口号是“反对满清”。以后张书林、柴老八、憨玉琨等人继起，他们的衣、食、用，全是向民间强行掳掠，声势浩大，遍及豫西十余县。尽管他们的口号是反对清朝，可是到处掳掠，弄得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当时人民就叫王天同等人为“山大王”、土匪。山大王这个名字，在豫西来说，王天同算是一个开山祖。

刘镇华的镇嵩军

辛亥革命陕西起义后，张钫（又名伯英）以“陕西军政府秦陇复汉军东路大都督”名义，带队与清军赵倜部作战，从潼关打

进河南。经过刘镇华的活动，王天同等部及豫西当时所谓“民党”的一些山大王的武装，都参加到张钫的秦陇复汉军里面。这时，仅有少数人知道王天同、刘镇华等人是在反对清朝进行革命。而一般人都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因此，以后就继续不断地出现了一些山大王。如刘镇华统率的“镇嵩军”就是一个例子。

刘镇华是嵩山北麓的巩县人，辛亥以后他收编嵩山一带的大小山大王，参加到秦陇复汉军，又由秦陇复汉军分出来，命名为镇嵩军。

镇嵩军当时分三路：柴云升（即柴老八）为第一路标统，张治公（即张书林）为第二路标统，憨玉琨为第三路标统。他们都是揭竿而起的杆首山大王，都称“老架子”。他们都认为自己势力还小，又都放出些“外队”，去扩充势力。所谓“外队”，就是他们把已编好的连长、营长，讲好条件，暗中给他们些枪弹，再放出去拉杆子，等待人、枪拉多了，再把他们收抚回来。这样，连长放出去拉一个时期的杆子，收回来可编为营长；营长放出去拉一个时期，回来可编成团长。这些“外队”（人民称他们为官匪）到处烧杀、奸淫、抢掠、“拉肉票”、“下帖子”[①] 为所欲为，弄得民不聊生。“民团”或者其他部队来打他们的“外队”时，他们也不敢承认是他们的人，并且也派队伍假装去打。其实他们彼此早定有暗号，打是为他们的外队送“瓢子”（他们把子弹叫作瓢子）的。豫西山大王之多，就是因为以刘镇华为首的镇嵩军这种恶风使然。当时人们有个口号形容镇嵩军的官长出身，说是“嵩山大学毕业”。这就是说凡是镇嵩军官长，都是在嵩山上拉杆子的山大

① “拉肉票”是拉住有钱人，向他要若干两银子，或要若干支枪，将东西拿到，人即放走。“下帖子”是对某村有钱人某某，送一个帖子，上面写限几天送白银若干两，或枪若干支。这对有钱人来说，比拉他的肉票稍为体面一点。

王出身的。

因为有了这种恶风，以后孙殿英、王老五、张得胜等人在收编之后，都采取这种放外队的办法。如宋锡川、王太、孙子衮等杆，就是孙、王、张等人放出的外队，到处抢掠。人、枪拉多了即行收抚，人多枪多编官大，人少枪少编官小。就这样连续不断地演进了近20年。这是豫西府十处（即洛阳、偃师、巩县、孟津、登封、新安、渑池、宜阳、永宁、嵩县）的一些山大王形成的概况。

兹将最显著的几个山大王的情形分述如下。

张治公的兴灭

张治公是洛阳龙门南衙村人，张黑子的侄儿。他在拉杆时，夜间去打寨子（他们叫打围子），"叫牌子"说："张书林，在南衙，老爷背的是'马利匣'（快枪）。"这一面表示他有了马利匣快枪，一面显示他的威风。他们杆子里还有些黑话：把马叫"风子"，骡子叫"圈子"，驴叫"鬼子"，狗叫"皮子"，把人民群众叫"林子"。例如他们所到之处，村里的广大群众起来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林子发了"。再如夜间他们走至哪个村庄听到狗咬时，他们说"皮子炸了"。在杆子里的人，不能把马叫马。你要说马，就算放了快，会出不吉利的事情。以后张治公的人、枪拉多了，才被收编到镇嵩军当了第二路标统。1917年，他随刘镇华入陕，驻省垣附近，当时陕甘两省鸦片烟很多，他就利用势力，用数辆"轿车"不断地从陕西运烟到河南卖。他弄到的金钱很多，就在南衙村里强行买了半条街，修了8幢新院，称为张公馆；又在村东强收了农民200多亩田（不卖也得卖），修成了阴宅坟院；更在洛阳城里东大街买了一座三进院的"大公馆"；在龙门附近弄了数千亩好田，又利用势力强迫民众在伊河边上修了一条大渠成了张性

的私产，每年收的税粮无数之多。张治公从拉杆到收编，不数年就成了军阀，也成了洛阳县头号的大地主、大富翁了。

1925年间，张治公升为镇嵩军第二师师长，随刘镇华参加了所谓河南胡憨之战。他们失败，刘镇华只身逃到山西，张治公又潜伏豫西，暗放杆子（就是他拿出些枪支给别人拉杆，他坐享其成），人拉多了，归他收编。1926年间，刘镇华投到直系军阀吴佩孚下边当了"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张治公就把收编的杆子并到刘部，刘叫张当了"陕潼护军使"，驻洛阳城。张继续放土匪，同时收官匪。当时伊阳县民团统带王建昭所部，就编为"陕潼护军使"属下的第九混成旅，王建昭为旅长。我也在第九混成旅一团三营充当营长。张治公又派款、又派粮，弄得民不聊生，激起公愤，组织"红枪会"，同张部发生战斗。红枪会曾包围洛阳，激战了数十天。以后由张治公的第三个老婆从南衙托人与红枪会首领邓文魁说合，讲好条件：以后护军使署不准放外队，不准强派军款与军粮，并约束部下守纪律，不追究参加红枪会的人员等等。这样才解了洛阳城之围。当时有人说这是张治公用了美人计。这以后，刘镇华又把张治公编成了一个军长，随刘去陕西，参加了围攻西安8个月的残酷战斗。张在洛阳弄得天怒人怨，很多部下没同他走，第九混成旅王建昭部就留下来。张在陕西又遭到惨败，回转豫西把旧部下再放出拉杆。他的一个连长邢玉丑放出在伏牛山和嵩山间拉了几千人，杀人放火，以后又打开了伊阳城。另一方面，张又投到西北军宋哲元部下当了"豫西剿匪司令"。他一面放匪，一面剿匪真是一举两得。除了收编邢玉丑外，他又收编了些土匪，如赵老么、王殿阁，范龙章等。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中原大战时，赵老么、王殿阁、范龙章等人又归到张钫部下。这时候张治公已随宋哲元失败之后，潜回洛阳不干了。

1941年，日军侵占洛阳时，张治公又当了汉奸。日军叫他当了一个时间的"自由县"（现已并到伊川县）伪县长，任务是"不

让人民逃走，为日本鬼子派款、派粮及找"花姑娘"。日本投降以后，听说张害怕人民清算他，因此吓得病死了。

樊钟秀、戴民权、王振、张得胜等

豫西除府十处外，州五处（即汝州管辖的临汝、鲁山、郏县、宝丰、伊阳）的地区也有山大王。如1912年间，白朗、老洋人都是很出名的。白朗，鲁山县人，当时他的口号是"打富济贫"。他拉了数万人，声势浩大，走到陕西、甘肃，又转回来，失败之后，死到鲁山。他和老洋人的情形均不详，只听说老洋人以残杀出名，不久就被消灭了。

到了1918年至1919年间，樊老二（即樊钟秀）又是最有名的山大王。樊是宝丰人，从陕西靖国军里失败之后，回到宝丰、打煤窑、养壮丁。他占领了鲁山县以西百里左右的大山中的斑鸠城（地名）。那是一个最险要的地方，高约数十丈，四面皆绝壁，只有一个石洞口能走上去。里边有数百亩好田，可以耕种；有泉水可供千五百人之用；有竹林、有紫荆树林；人们称之为世外桃源。石洞口塞不进大牛，只有把小牛放筐内拉上去，养大使用。樊老二因有煤窑上的"钱库"，又有了这个斑鸠城的险地，所以经常拥有几百人的武装，名为保护煤矿，实际四出掳掠。数年间，人集聚多了，闹得势力很大，他就投奔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队伍里，把所部编为"建国豫军"，带往广东。以后又从广东回到河南，1930年蒋、冯中原大战时，樊属冯玉祥部队，驻许昌城里，他被蒋介石的飞机炸死了。

在樊钟秀走向广东以后，老戴正（戴民权的外号，宝丰人）、秦椒红、姜不辣等人继起接受了樊的衣钵，一面争夺掌握煤矿，一面结杆在外掳掠。老戴正凡拉到一个"肉票"，如叫他家拿1000两白银，限期10天，送到某处，肉票家里的人就不敢到第11天送

去。否则戴就用铡刀把"肉票"铡了。因而当时人们形容老戴正的厉害：如小孩哭了，大人对小孩说，老戴正来了，小孩就不敢哭了。老戴正的杆子，每到一个村庄，是烧杀得鸡犬不留的，以后拉人多了，蒋介石把他收编为四十五师师长。戴走后，王老五（名王振）、张得胜、姜明玉等人，继续在州五处，府十处，到处烧杀抢掠，闹得农民耕种都不能及时下地。

1926年，刘镇华任"豫陕甘剿匪总司令"时，也把王振、张得胜编成了军长，姜明玉编成了师长。连同柴云升、张治公等部共约有八九万人，完全成了一个惯匪集团。刘就领着这个惯匪集团把当时的河南省督办岳维峻打垮之后，又带着去陕西围攻西安。失败之后，又回窜豫西府十处、州五处，蔓延到豫西南宛属以南阳为中心的11县。他们把河南多半个地区弄成了一团糟。所谓一团糟，表现在：王振、张得胜、姜明玉各匪杆，回来都变成了官匪。所到之处，明目张胆，勾结当地县长、区长、镇长们，杀猪宰羊，向他们送礼；一面又勒派所谓军粮、军饷。再加上他们本身到处抢掠，广大农村，弄得十室九空，人民无法生活，只有县长、区长们，供派军粮、军饷，倒是都发了横财。而真正的大地主资产阶级，多与他们通气，都到天津、上海等地，去过那种吃、喝、嫖、赌的荒淫生活。

今天的山大王，明天可变为军、帅长。豫西山大王的所谓兴家立业，就是这样形成的。豫西山大王之多，是与反动头子刘镇华的一贯培养分不开的。

借神道扰民的孙殿英

孙殿英，又名孙魁元，河南归德府永城县人，12岁时，他父亲打死了人，弄出毁家灭门之祸，他跑到豫西加入了张书林的匪杆内，为老架子张书林当勤务。后来张编成了军队，孙就成了马

弁。再后孙在嵩县大山中抢了一个姑娘做老婆，他不干马弁了，来到了洛阳县付店街（现在的伊川县城），加入了"庙会"。那庙会是信奉"姜太公"的神道会，共约有50万左右的道友（男女兼有），以付店街为最多。孙殿英看准了那庙会可以利用，就投奔到前清秀才、忠实道友李凤朝家，由李引进，拜伊阳县蟒庄村王凌霄（我的族兄）为师。孙入庙会之后，就借神教力量来迷惑人。他又是赌博能手，只准赢不会输。又利用庙会做掩护，贩卖海洛因，兼做海洛因丸（简称红丸）。后来弄钱多了，买了些枪支，就投到豫西镇守使、曾任过清"毅军"统领的丁香龄部下，当了机枪连连长。

1924年间，孙殿英宣传他听奉神话，声讨丁香龄，带着一连人从陕州跑到洛阳龙门南，把彭婆街打开，这条街里有很多庙会的人作他的内应，当即烧杀掳掠，不数日把1000多户人家弄成一扫光。庙会人依附孙的已有数千人，他利用他们作引线，又从彭婆街打开了临汝和郏县。这时他的声势浩大，自称总司令，下边编了18路司令（意思是效法周朝的十八路诸侯会于中州）。住在我族兄王凌霄家里的小山大王朱锡川就被编成了一路司令。王凌霄的三个儿子也都跟着孙胡干。不久，国民军的师长叶荃把孙部编成一个混成旅，任孙为旅长，开到嵩县，住了一年多。在这时间里，庙会的人为孙殿英宣传，说他将来要当皇帝。其实这是他用钱供养的一个道友叫李大朝的，借口齐天大圣孙悟空降体胡说的。但庙会的人都被迷惑了，竭尽人力、财力，为孙捧场。从四面八方为孙送到嵩县的现款（银元），据说有百万之多。甚至有倾家荡产的，王凌霄就是其中之一。他有100亩田，就卖去了60多亩，为孙凑军饷，希望孙当了皇帝，他们就有地位了。孙把搜刮来的钱财，拿出一部分发给下边的人，又把叶荃的部队也吞并了。以后豫西的一些小股土匪都归顺孙殿英了。

这里只说孙殿英在豫西勾结庙会及当山大王扰民的一段经

过。至于1925年以后，他投奔张宗昌，当了军长，以及掘墓、投蒋、投日本当汉奸各节，已有人写过，不再赘述。

武庭麟叔侄的罪恶

武庭麟又名武奇峰，洛阳县龙门南王庄（现划归伊川县）人，也是镇嵩军中的一员。他在镇嵩军中，是由连、营、团、旅、师长，一步步上爬，最后爬到十五军军长。他对上（刘镇华、刘茂恩弟兄）逢迎备至，对下统治极严，因而既得上边的信任，下边也不敢不服从，才能于不数年间一跃而爬到军长的地位。

1931年—1934年间，他在刘茂恩的六十四师当旅长，驻在洛阳，曾用数万元在洛阳城里北大街修了一处新式的大公馆。又在王庄（老家）利用反动势力，修了60多亩大的一个花园。引水、修渠（浇花园）、圈地，害苦了很多人民。水渠长20多里，修到哪里，农民就得把地让到哪里。花园圈地，也是一样。

武庭麟的思想极反动，生活极腐化。他经常吸鸦片烟，烟瘾很大。1947年春，我在洛阳看到他的时候，他拿出很好的鸦片烟膏子叫我吸，我说："这东西现在能买来吗？"他说："能买来，但比黄金还贵。"他勾结当时洛阳县长（姓名忘了）及劣绅郭芳五（清举人）等人，大量地在洛阳一带搜刮人力、物力，支持反革命战争。人民生活几乎不能维持。当时洛阳一带有这样的歌谣："麦上场，就要光，没有粮食火柱烫。辛苦血汗一年整，打下粮食吃不上。抓壮丁，如虎狼，县府就是阎罗殿，蒋家官就是活阎王。"武还向我说："你们从云南来（我是带着国民党军整九师从云南才到郑州），没有与共产党作过战，处处要小心。每到一处，首先要肃清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如忽略这一点，是不能立足的。"

武庭麟的哥哥早已死去，武没儿，就把侄儿道圃当成宝贝，叫他在王庄老家管理家务。武道圃鸦片烟瘾也很大，又好女色，在

王庄强行霸占两个妇女。又在王庄经年不断地修房子，共有几百间。所用砖瓦，是从数十里外运来，要村中农民出车辆为他拉的。例如明天需用砖瓦若干，晚上就叫狗腿子们去挨户派车，说："我们少爷（道圃）说急需砖瓦，你们的车明天去给我们拉一天砖瓦。"农民们就是焦了麦头，出不敢去收麦，必须替武家拉砖瓦。他不但不管饭 吃，你要去的慢了，还得挨骂。王庄人民支应武家这个"官"差，是经常的事。

武道圃还包揽词讼。凡是找他保护的，都是理屈的人。只要你把洋钱和鸦片烟或红丸向他手里一送，他就把对方（理直的）叫来，蛮不讲理，而压制解决。对方再有理。也不也说出一个不字。事后给本县县长写一信。说张某与李某两家的争端，我已为他们和解了，县长得赶快写信谢谢他。这封信一给县长，就使有理者也不敢再向县上控诉了。武道圃些行为，是我听我村文天奇说的。武道圃倚仗他叔武庭麟的反动势力，在地方上大做坏事，王庄人畏之如虎狼。我不过举出几个事例而已。

武庭麟的内弟刘参议（名字忘了），伊阳县富留店（现归伊川县）人，倚仗武的反动势力（武给他一个参议名义）吸鸦片烟、红丸，同时贩卖鸦片烟、红丸。豫西吸食红丸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无村没有。红丸当时在表面上是禁卖禁吸的毒品。但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特点，是只禁止没有势力的人吸烟，而与反动政府有关连的人，却是可以随便吸、卖的。刘就是借武的势力公开贩卖红丸、他的巧妙卖法是：无论是谁，你只要有钱，有地，指出哪一块，他就供给你每天吸食红丸；到了一个时期，那块地就被他廉价立约收买了。刘也贩卖枪支、包揽词讼，就这样弄的不义之财，不数年竟成了富留店的大地主、大富翁了。

蒋介石命张钫招纳官匪

1930年，蒋冯中原大战前后，蒋介石对河南的土匪、官匪（土豪、劣绅们所统治的保安团队）一贯采取招安加封的办法。1930年夏，蒋介石任张钫代理河南省主席，入秋又命他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总指挥，对河南的官匪、土匪，一概收编。

张钫到了漯河，分头派人在豫西活动，收编了很多军队，经过如次：

（一）在许昌、保丰间地区收编李万林部为一师，任李为师长。李万林，宝丰人，是樊钟秀的老部下。樊在许昌城里被蒋介石空军飞机炸死后，残部万余人，由李带着活动于许昌、宝丰间，仍属冯玉祥。张钫到漯河时，李部才归张收编。

（二）在临汝县一带，收编范龙章部为一师，范为师长，范是伊阳郭村人，因与郭某（名忘了）家为世仇，他不能在家乡，就上山拉了杆。先与姜明玉合股，人拉多了，回到郭村“打孽”，把他的仇家郭某家的人打死了几个，仍然出去拉杆。以后与邢玉丑的杆子合股，于1929年夏（农历五月十八日）合力打开伊阳城。范自称为“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在城关烧房2000多间，打死打伤城关男女在1000人以上。他们在城里盘踞半年，是年农历腊月底，被所谓全县民团打走。范被当时宋哲元部的“豫西剿匪司令”张治公收编为一个师，驻在临汝附近。张钫到了漯河，范又背叛了张治公、宋哲元，归张收编。

（三）在伊阳县收编所谓汝（临汝）伊（伊阳）平（平等）自（自由）4县的剿匪司令王凌云部，为二十路第三师，王为师长。我原名王仙举，伊阳金庄镇（现为常渠乡）蟒庄村人。1929年，我在伊阳县城防大队长王建昭部下当队长。范龙章、邢玉丑两股攻打伊阳村，我曾带着伊阳城防队抗拒，因而受了伤。王建昭也被

范、邢打死。后来伊阳县长张宗黄及地方上的豪绅们，要我统带全县民团5000多人，同范、邢等打了6个多月，才把他们打走。我得了些枪支，收复了县城。由张宗黄呈报河南省主席万选才，委我为汝、伊、平、自4县的剿匪司令。该部的吃、穿、用，全是向地方上勒索的，所谓官匪也就在此。1930年秋，张钫叫吉维岳等人到伊阳来，收编我部，随国民革命军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参加了豫西解决宋哲元的战役，占龙门，攻洛阳，又占领了新安、渑池及观音堂。以后在观音堂我才与张钫第一次见了面，部队归了二十路建制。

（四）在宜阳收编王殿阁部一师，王为师长。王殿阁又名王紫庭，宜阳县人。原在豫西拉杆子，被收抚到镇嵩军当了官。失败了，又回到豫西拉杆，再投到孙殿英下边当了一段时间“司令”，随孙打亳州，参加掘（慈禧）墓等等行径。又失败了。再回到豫西宜阳一带拉杆，又被张治公收抚任为师长。

（五）在嵩山一带收编李万如部为一师，李为师长。李万如，邓县人，即著名惯匪李老幺。李当山大王先投镇嵩军当团长，嫌官小跑到山东归张宗昌编为军长。张失败后，李回到河南在灵宝、卢氏一带拉杆，又被张治公收编。不久，他又归张钫收编当了师长。

（六）在自由县（现为伊川县）白沙街收编赵冠英为一师，为师长。赵冠英，湖北人，即著名惯匪赵老幺，也是张治公下边的一个师长。归张钫收编不久，他就又带部队向湖北跑了。

（七）收编河南省主席万选才的部队，在蒋冯中原大战中，万选才被刘茂恩诱缚，送给蒋介石杀了。万部军长嵩县人宋天才，被张钫任为二十路三十二军军长，所部编为2个师，师长一为韩文英（嵩县人），一为史克勤（宜阳人）。宋、史、韩都是镇嵩军旧部。

（八）在灵宝县收编了1个团，团长为李学正。李是灵宝县的

民团头子，也就是把灵宝县一带民团编成了二十路的独立团。

所谓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总指挥张钫就是这样听蒋介石的话，把豫西的土匪、官匪，共编了1个军（军长宋天才）、8个师（师长为李万林、范龙章、王凌云、王殿阁、李万如、韩文英、史克勤、赵冠英），及1个独立团（团长李学正）。是年12月，经过整理，改编为2个师：以宋天才的三十二军及王凌云的第三师，缩编为七十五师，宋天才为师长，韩文英、史克勤、王凌云为旅长；李万林、范龙章、李万如、王殿阁4个师编为七十六师，张钫自兼师长，王殿阁为副师长，李万林、范龙章、李万成如为旅长。

1931年冬天，张钫叫二十路的军、师、旅长们，同路去汉口见蒋介石，挂的是专车。大家上火车之后，范龙章拉住我的手说："老弟，过去的过去了，现在只说现在。"我们曾经有半年之久，双方打死打伤在千人以上，结果不到两年，我们两个都在二十路当了师长。我们同路、同车同到汉口，同时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同样每人给了500块银元，说是"总司令"的赏号，有的说这是见面礼。以我现在的认识，应该说是蒋介石给我们危害人民的奖励；每个人当时的干法不同，其危害人民则一样。官匪不分的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可是老百姓倒了霉，被打死打伤的，拉走的，无衣无食无住的，就无人过问了。过去谁说王凌云是土匪，我就大发雷霆，今天我认识到：王凌云这个官匪比当时土匪的罪恶也不小，因为我是名为"保护"人民，是人民把我养活大的。结果我不管人民的痛苦、死活，只管自己"升官发财"，官与匪没有什么差别。

互相仇杀的恶风

正是因为北洋军阀张敬尧、吴佩孚、以及胡景翼、憨玉琨等几次在豫西混战，遗留在豫西的枪支很多；又因当兵的多，当匪

的亦多，多数人有了枪，也大都会打枪，人人好勇斗狠，这就造成互相仇杀的恶风。有的因为争夺乡、保长职位，有的因为身受乡、保长的压迫，有的因女色，有的因世仇等等。于是由一方秘密拿钱，买出“打孽”能手（也就是有胆气的亡命之徒），讲好条件，就把对方的人打死。也有子孙为先辈、妻子为丈夫报仇，亲自打死仇人的。这种打孽恶风真是骇人听闻。以下只举出两个例子。

嵩县东区黄兑村，村长郭灿是郭姓大族中的一个霸主，因为派差得罪了同族另一大地主郭某（名忘了），郭某买出打孽能手把郭灿打死了。郭灿的儿子早死，遗一孙名郭绍绪，才12岁，当时在他舅父家，闻讯逃往外边，投到镇嵩军当了小勤务兵。大地主郭某用钱买通了嵩县知事，知事说郭灿多行不义，不予深究，就把这一杀人案压下去了。事过六七年，郭绍绪长大了，又在军队中结了把兄弟，弄了两支手枪。约在1921年冬天傍晚，郭绍绪带同把兄弟各带手枪潜回黄兑村，把杀他爷爷的郭某和家人一下打死了4口。他在街上“叫牌子”说：“我是郭绍绪，是来为我爷爷郭灿报仇的，与村中老少爷们无关。”这样一喊，谁也不过问了。他们俩大摇大摆地走了。郭绍绪回到镇嵩军，又缴得两支枪，当了副官（镇嵩军里边只要你有钱、有枪，再有熟人保证，立时可以当官）。以后对于这一仇杀案就更无人敢问了。

伊阳县常渠寨张姓大族都是大地主，有的在清代辈辈有功名，人口也多，有钱有势。寨长张梦华本是常渠寨首户，办事严厉，手段毒辣。因此引起张丰年（清廪生）的儿子张韬、侄儿张炳的不满。他们利用上一代的功名势力，强把常渠寨长的名位拿过去，又买了杀人凶手把张梦华打死。张梦华的妻子知道是张韬、张炳干的。拿出很多枪、钱，买了三个著名打孽能手赵祥（我的内弟）等，又把张韬、张炳，连清廪生张丰年都打死了。

张炳的妻是伊阳县蟒庄阎永太之女，名葛娃，已有三四岁的

孩子名叫张绍洪。葛娃为丈夫报仇，煞费苦心，先把儿子拜到蟒庄王凌汉（我的兄弟，即王倬峰）名下做干儿子，又以色相和金钱（据说在2000元以上）来引诱他。王凌汉上了她的钩，以后又叫人把赵祥等三人打死了。打死赵祥等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8年我在家过春节，有一天下大雪，内弟赵祥（人人知道他手下有几个人终年以打孽为生活）带了两个人，各带手枪一支，来到我家。天已黑了，我被邻家请去吃年饭，由王凌汉在家招待赵祥等吃晚饭。在这个当儿，王凌汉与蟒庄寨长赵用贞商谈了一下。赵用贞是我村第一大地主。他害怕赵祥等人破坏蟒庄寨（赵用贞为保护蟒庄寨，曾枪杀赵祥的族弟赵二春），就对王凌汉施加压力，又把自来得手枪借给他。王凌汉叫佃户文清心和我的勤务兵赵元庚等，先把赵祥等三人的手枪缴了。一一捆在存放东西的闲院内。我从邻家回来，知道这事，心想放了赵祥等人，王凌汉即有杀身之祸，又恐蟒庄寨子不保；不放吧，赵祥等也没有活命。我立即去见赵用贞，他说我不常在家，不知内情，事已至此，不要过问了。他又着重指出赵祥等已与我村孟根的侄子孟银娃有勾结，将对蟒庄寨不利。因此我不管了。到了半夜。赵用贞叫人开了寨门，王凌汉、文清心、赵元庚等就把赵祥等三人，分别弄到村外野地，一个个都打死了。到第二天，我村孟银娃也跑了。晚上阎葛娃带着她的儿子来我家，见王凌汉叩头谢恩。我这才知道这件事的全部真相，可是已经作了一次杀人的帮凶。

另外再说1931年轰动开封也是轰动河南全省的一件仇杀案。

1931年，刘峙任河南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时，经过绥靖公署参谋长彭启彪的运动，收抚了豫西一个大杆子头名叫崔邦杰，崔曾经抢掠过很多金银财宝，受编后，驻在开封附近训练。崔本人在开封城里买了三进院的一幢房子，作为崔公馆。当时彭启彪以为帮了崔的忙，并知道崔有很多财宝，就不断敲他的“竹杠”。崔邦杰一次、两次应付彭的要求，而彭总觉得还不满足。日久天长，勒

索多了，崔不耐其烦，就决心对彭下毒手。

事前，崔先辞去师长，又把家中的一切东西秘密运出城外。有一天，崔请彭吃饭，为避免彭疑，请帖上还写有十来位陪客。彭是首座第一名，签答了请帖（就是在帖上签名）。开封请客的习惯是，由主人备两份请帖，一份是单独每个人的，一份是全体客人的名单，首座写在第一名，先送给他签答后，依次再送其他客人，崔请彭的请帖却只送彭一个人。彭不知道中计，到了下午吃饭时间，就坐上汽车，带着副官、马弁，到崔公馆来吃饭了。一到崔的门口，崔邦杰必恭必敬地站在门口迎接，请往后宅的上房。崔的副官、马弁，被留在前边房内，摆上很好的酒席，大吃大喝起来了。彭启彪一到上房，崔已在门里安置好的刀斧手，一刀砍下，彭的人头就落地了。这时崔邦杰带着他的刀斧手由后门坐小汽车出城扬长而去。前边房内还是吃着好酒、好烟、好菜，一片热闹。接着崔的副官们装作去催饭菜的样子，也一个个从后门跑了。彭的副官、马弁们，吃到半醉，还不见人来，走向后边，一看二门已从里边拴上了。他们看出情况不对头，才回绥靖公署报告，再带些人来，把门打开，到后上房一看，彭启彪已身首异处，呜呼哀哉了。听说崔邦杰跑到张家口，一年多后，仍被刘峙派人捉住杀了。

总起来说，豫西在旧时代里政治黑暗，军匪不分，山大王们今天为匪，明天就可为官。当官如不称心，又可拉杆为匪。军匪轮流搜刮，广大农村十室九空，因而逼得有些农民也随着去当匪。直到解放后，人民才得重见天日，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河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新郑匪患与剿匪

曹鹤岐

清末与民国年间，天灾人祸相逼，许多人走投无路，铤而走险，造成了新郑一度土匪猖獗。当时新郑比较出名的土匪有：二郎店的朱同德（外号老笼鹤），沙张的刘光头，君赵的王老幺、刘庚申，小岗王的王小孩，路庄的李同章，邢庄的邢葛妮，孟陈庄的孟增恩，二甲张的马其昌，坡刘的陈老二，山后马的马文德，东田庄的袁光头。他们手下都有几十个或上百个土匪。

新郑土匪横行的十几年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清末至民国5年，土匪多为夜聚明散，抢劫财物的主要手段是“贴帖子”。先多是贴无名帖（匿名恐吓信之类），勒令殷实富户在某日某地（多荒岗、古庙等僻静处）送交现洋多少。如不按时如数送交，或暗地请官兵捉拿，将遭杀身灭门之祸。后来，土匪胆子渐大，就贴有名帖，索钱要物。但这些有名帖。署名居多是某老大、某老二或绰号之类。这样时间久了，就发展成结伙猝然而至，抢劫财物。如当时比较出名的土匪孟增恩，手下就有四五十个人，还有马和二三十条枪。他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抢劫都在四五十里外，经常出没于鄢陵、扶沟、周口、禹县一带，采用贴帖等手段，抢劫富户财物。民国元年，这部分土匪被新郑县知事邓耀南收抚，编为县侦缉队，后改为武装警察队，孟增恩当了队长。

第二阶段，民国6年至10年。随着社会的动乱，土匪越来越

多，胆子也越来越大。抢劫的手段由夜聚明散、贴帖子发展成明火执仗的“起票”。所谓“起票”，就是土匪将人抓去，作为人质限定时间，由家里人送钱财赎人；到期不赎，就把“票”撕了（即把人杀了）。他们编的顺口溜是：“五洋钢、六轮子，打着舅子要银子，舅子没有咱不要，拉住舅子叫快炮（枪毙人质）。”这时，许多富户因被贴帖或遭遇其他抢劫手段，浮财不多了，只好变卖家产赎人。大户家家自危，便搬入城里。大户一走，二大户便成主要抢劫对象，随之也搬进寨里。大户、二大户一走，殷富一点的小户就成了砧上肉。有一个晚上，土匪起了花园村刘寿德、刘银妮等4户人家的“票”。还有一个晚上土匪一连起了17家的“票”。哪家不拿三五百块钢洋，人就甭想回来。一到晚上，人心慌乱，家家自危。

土匪为了得钱快或淫乐，就起“快票”。快票也叫“花票”，就是专起大闺女、小媳妇。这多是在夜里进行。那些被起“快票”的人家，为了顾全女儿或媳妇的清白，不丢脸面，就竭尽全力，火速赎人。那些象样的户或家有姿色好的闺女、媳妇的户，晚上不敢在家，扶老携幼，牵着牲口躲进寨里，或躲在其他地方，使土匪夜里起“票”往往扑空。于是，土匪就大白天起“票”。如果土匪起“票”扑空，抓到什么人，就叫他找“票”。这样，户无分大小，人无论老幼，一有动静，就立即躲藏。

土匪的抢劫，严重地危害了人们的生命财产，与使官府的财政和军阀的军饷受到严重影响。县上就成立了民团，驻城东杨家寨剿匪，刘治中为团长。当时与新郑结合部的洧川县东柴村的大土匪马老大，手下有200多人，长短枪百十支，经常在方圆几十里行动，地方官府都无奈他何。有一年，他娶老婆，叫了两台大戏，大摆宴席，竟然把请帖送到区署和民团，上面写道：“来了是君子，不来是小人。”以表对官府和民团的藐视。民团团长刘治中接到帖子后，决定消灭马老大。经过一番谋划，队伍出发了。区

署文牍马仲祥领着四五个人，带了200块现洋，以公开送礼为名先行；一部分人穿上便衣，暗带短枪，混进看戏人群，另一部分人扮作土匪扛着长枪后去。最后是团长刘治中带领剩下的人员在路上埋伏接应。

到了拜天地时，鞭炮一响，马仲祥掏出六轮手枪往空中连放3枪，接着院里、门口、街上、路上、戏场，枪声大作，一时大乱，人们竟相逃避。两个便衣民团架着马老大就往外走，高喊道："我们是十四师来办案的，闲人走开！"土匪初以为真是部队办案，便乱哄哄逃往岗东。后来见只有四五十个人，才知上当，就迅速聚拢，反扑猛追民团，追了数里，眼看追上，遭到刘治中的伏击。天黑了。土匪仍尾追不舍，民团只得退据路化宇寨。土匪将寨子包围，要民团交出马老大，民团把马老大头砍下来，扔给寨下土匪，突围回到杨家寨。

第三阶段，民国11年至16年。直奉战后，新郑土匪更为猖獗。他们经常盘火驻扎，攻城夺寨。东北乡山后马的马文德就是当时非常出名的"蹚将"。他曾联合几股土匪，先后攻打铜佛赵、古城角和密县的柿园。据说，打了铜佛赵之后，郑州第八旅来抓他，没抓住，把他父亲抓走。送到新郑县城。马文德派人往县上送信，说如不放他父亲，就攻打县城。县府惧怕于他，只得叫人作保，将他父亲放回。民国13年，马文德又带几杆土匪攻打密县岗牛寨，连攻四天四夜，没有攻下，就从崆嶂山弄去火药，从哈蟆洼拉去一门"老百龙"大土炮攻打，因装药过多，土炮爆炸，死伤几人才罢休。后来。这部分人被收抚，编为一个团，马文德任团长。不久，马文德回来，病死在哈蟆洼区里。路庄李同章一大杆土匪被陕军曹世英收编，部队开到禹县，曹世英将他们全部枪杀在北关颍水桥上，河水都染红了。

土匪猖獗，肆虐百姓。为了护财保命，各村都自动建立起一些组织，如红枪会，也叫红学及连庄会之类。各村都有联防公约，

一村有事，点火鞭为号，邻近各村听见鞭响，马上集合前来剿匪。红枪会或连庄会，多是青年男子，他们忙时生产，闲时便打村围子、修寨墙、练武术。有的集体住宿，夜里由富户出粮、粉条、豆腐、蔬菜之类吃顿饭。不能集体住宿者，晚上也是和衣而睡，一有动静，便迅速集合。他们还制造了许多武器，如红缨枪、青子、土大炮。有些地方还在村口路边埋上地炮，用以防匪。由于县、区及各村镇普遍建立了剿匪组织，大股土匪不断被剿，本县境内剩下的多是小股匪或单个匪，抢劫之后，不敢在内地躲藏，就窜到县边境地带。

民国14年的冬至那天，民团带领一些村的红枪会到县边境地带搜剿土匪。土匪跑了，就抄他们的家，烧毁他们的房子和家什等。去的人都说是君赵的。那年腊月二十二日半夜，这些地方的土匪聚拢了几百人到君赵报复。君赵村人发现匪情，立即点火鞭向周围各村告急，并组织起来处处严守。土匪攻到东寨门，先将用枣树条编的寨门点了。寨里人抬来一门土炮对准寨门打去，土匪不敢入村。黎明，天降小雪，炮打不响，一股土匪从东南门冲入。村内青年拿了红缨枪、大刀、青子等武器，与匪肉搏，曾几次将匪赶出寨去。这时，村中青年刘宗元，悄悄从东北角一个小门出寨，大喝一声冲入匪群，用青子砍杀。土匪见他势猛，只得后退，又见只他一人，就又围拢而上。刘宗元见寡不敌众，就跃身跳入大院里。几个土匪冲撞院门，那小门是虚掩着，他们都跌翻在地，刘宗元乘机跃前，几刀把他们结果了。后边土匪又冲上来，刘宗元又砍翻一个，去取他的快枪，谁知那个土匪未死，一枪将刘宗元打死。土匪在村外高喊："我们是郑州宪兵队，袁光头请我们给他报仇的！"百姓以为真是宪兵队，知不是对手，便纷纷躲逃，土匪冲进了村。一时寨里火光四起，烧、杀、抢乱成一片，直到日出，人们才敢露面。这时各自寻找家人，才知十几个青年被杀，抓走两男两女（其中高根聚被抓到东乡砍成肉块），烧房十

几间。这次土匪攻君赵伤亡也很大，光抬死伤，摘走的门板就有几十块。

土匪攻君赵时，花园村人听到火鞭响，前来支援，行至半路遭匪伏击，有人重伤，便撤了回去。歹庄等村前来支援，走到魏庄听说其中有大部队，也都回村。

君赵村被洗劫，在县东震动很大，许多村寨都加固了寨墙，深挖寨河，没有寨子的也筑起了大寨。红枪会根据各家土地多少派款造枪，站岗放哨，防守更严。土匪见各村守备严密，难以攻打，也联合起来，攻城夺寨。长葛土匪韦老八、崔文连、张祥等曾两次攻破长葛老城。军队一个营同许昌、长葛、洧川、鄢陵几个县的民团联合起来在石象围剿，竟无可奈何。刘治中团长到边梢地区剿匪，被围几乎丧命。在这种情况下，新郑、长葛、洧川、中牟、尉氏几个县民团以为各自难以对付，便协商成立了新、长、洧、中、尉民团联防指挥部，刘治中任总指挥，而土匪也扬言攻打各县县城。双方势均力敌，剑拔弩张。

民国15年3月，奉军张作霖南下与退守在武胜关的靳去鹗作战，在新郑、长葛一带，受到土匪的骚扰，辎重被劫，很是头痛。恰这时民团对土匪无奈，就请奉军配合剿匪，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奉军从许昌到开封，由开封到郑州，又由郑州至许昌，围圈布置了部队。又抽调一个团，由新郑、洧川、长葛等县民团配合围剿。这群土匪有1000多人马，盘距在洧川老岗寨一带，经常到新郑、长葛、尉氏、中牟等地抢劫。奉军、民团前往围剿，土匪突围，向长葛、许昌窜逃，南逃遇阻后又折回，由长葛东石象窜至洧川西部。奉军、民团围追堵截，土匪又奔向洧川县的韩佐镇、洪连张、老庄师村，被包围。土匪知无出路，就派人出寨求降。奉军、民团佯作答应，命他们交出武器、编伍造册、剃光头，还说发给军装。这时，刘治中从城里拉来几车麻绳，将他们个个捆绑押出寨来。土匪头头在韩佐镇西门外被铡了，一般土匪押到南门

外用机枪打死，共打死848人。。

在这次清剿中，新郑县民团还在一些边梢地区抓了十几个可疑的人。初审讯，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匪。有人出了一个主意，夜晚把这些人押到新郑县城北街城隍庙，叫他们烧纸上香，给城隍爷祷告，说我要是土匪就往我脸上记坏记号，不是就记好记号。祷告完叫他们脱光上衣，洗了手，给关进城隍大殿里。第二天早上，一看这些人有的脸上乌黑，背上一片片白石灰印、有的没有，原来，头天晚上，民团事先将城隍大殿的墙上、柱上刷了白灰，后来叫他们洗手用的黑水。这些人有在城隍爷面前起过誓，是土匪的作贼心虚，怕城隍爷给记坏记号，就背靠墙或柱，双手捂脸，自然会有这些记号；不是土匪的心中无愧，也望着给记好记号，自然不肯将脸、背掩藏起来，所以没有印记。再根据察言观色和其他方面情况，民团将其中几个人绑出北门砍了，其余的取保释放。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清剿，这几县交界处，特别是新郑东乡的大股土匪基本肃清，社会较前安定许多。但是，一些小股匪或散匪仍在一些地区作乱。民国19年正月十一日，禹县来的以马夹子为首的一伙土匪攻打辛店，打死了白东方等，抢走了南门里孙家的牲口，杀了5口人。有时兵就是匪，匪也是兵，互相勾结。民国13年某部队拉着枪支弹药，扬言剿匪，双方在东乡荒岗上一接触，部队丢下枪弹，拣了土匪丢下的现洋就跑，而土匪是丢下现洋，拣了部队丢下的枪弹就跑。这些兵匪，很多都与官府有牵连。官府往往就是土匪的靠山。

（河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吕店匪患纪略

姚清修

民国初建，军阀混战，时局混乱，土匪猖獗，当时仅登封县吕店一带大小股匪即有十多起。这些土匪头子（时称“架杆的”）是：邢科（吕店邢坡人）、孙延（吕店啦嘛店人）、赵德胜、张三妮（吕店王村人）、常天兴（白沙常岭人）、马之才（白沙窦村人）、张保城（吕店菜园人）、任双来（吕店人）、宋竹（吕店竹园人）、崔东来（登封崔圪塔人）、蔡书祥（彭婆槐庄人）、高凤英（女，彭婆高屯人）等。这些人聚众为匪，多则百人，少则几十人。有的夜聚明散，有的昼夜为伍，各据一方。他们或串通官府；或勾结军队；或为地主豪绅收买。多数有靠山，到处打家劫舍，残害良民。百姓们称他们为“刀客”，或讥称为“刀客王爷。这帮人多数是亡命之徒。其身份性质：有兵痞，有流氓恶棍，有监狱释放犯，有不守本份之徒。为了扩充势力，他们任意敲诈百姓。当时吕店一带有首民谣：“张三妮马子才，吕店出个任双来。小八响儿、六轮子，打着老爷要银子，要的银子白花花，买套筒来和米蜡。”有的土匪头子在扩充势力时“无恶不收，不毒不要”。入伙前还要讲条件和进行所谓“考验”。有个不务正业的人找着土匪头子张保成要求入伙，张保成说：“你如果想干，先带两条枪来！”这个人听后就直奔洛阳，黑夜潜入兵营，一连杀死2个哨兵，将枪带回，当面交给了张保成。张保成认为他有“种”，便吸收他入伙。因此，有人说没有老虎心、豹子胆，甭想当刀客。这些土匪的手

段有：

一、拉票子。即将人拉走，强令以钱物赎回，否则杀人。

二、下帖子。即讹诈谁家，便在这家门上贴张条子，上面言明索要财物数目，令其限期送至某处，如不照办，全家遭殃。

三、打村子。以武力攻克村寨进行烧杀抢掠。

四、点房子。打开村子后放火烧房，使村寨夷为平地。

五、拦路抢劫。他们三五成群暗藏于四不临村的要道口，拦劫过往行人财物，甚至图财害命，杀人灭口。搞得路断人稀。

六、夜抢暗杀。在夜深人静时，他们越墙破门窜入某家农户抢劫财物。或受人贿赂充当打手，替人“打孽”杀害人命。

在荒乱岁月，乡民为了防匪，村村筑寨修炮楼。有圈寨墙的，也有在村附近选一险要地势筑干寨的，一遇有刀客便进寨躲避。土匪到处骚扰，群众提心吊胆过日子，不见日头不敢出门。有的身逃异乡，钻山洞，宿荒野，白天吃不上松心饭，夜晚睡不了安生觉。由于土匪多持精良武器，许多村寨都被打破。土匪一进村家家遭殃。现举两例，可见一斑。

一、血洗吕店

清朝末年，吕店有个人叫孙太，曾与邢科在登封县城监狱内结为拜把兄弟。两人出狱后邢科便充当“架杆的”，拉起一帮人马。吕店寨首宋旺与乡民为了防匪，请来了“金钟罩”头目宗铁丁（洛阳二郎庙人），整天教群众排枪排刀。他们发现孙太经常与邢科来往不断，视孙太为“家贼”。“家贼不除，后患无穷”，群众盛怒之下干掉了孙太。邢科听说后，要为孙太报仇，他纠集数股匪徒，大约300来人，于民国3年（1914年）阴历三月一天早晨将吕店街团团围住。寨首宋旺组织群众奋勇守寨。南街有个烟匠叫任银娃，手持烟刀，在南寨墙上一连劈死了六七个土匪。匪徒们

见吕店难攻，便拨马撤兵。吕店群众怒骂匪徒，并准备出寨乘胜追击。这伙土匪恼羞成怒，重又纠集败兵，高架去梯，头顶湿被子疯狂反扑。恰在这时守在西炮楼的群众在给土炮装药时不慎将火药燃着，炮楼立即起火。土匪们便借机吆喝着："西门攻开了，打呀！杀呀！声嘶力竭，以壮淫威。其他各处守备村民因不明真相，误以为土匪已经进村，斗志大挫。匪徒们愈杀愈狂，一拥进入吕店，象野兽一样开始了疯狂的血腥屠杀。任银娃被几个土匪围追堵截先打死在南街口，宗铁丁和他的父、母、兄、妹相继毙命。寨首宋旺及其家人也被杀害。匪徒们还各找"仇人"进行报复。有个土匪过去在吕店一家饭店吃饭后不出钱，店主向他要钱，他认为是办他难看，进入吕店后，他第一个先找到这家饭店将掌柜活活打死。土匪们杀人红了眼，逢人就戳，见人就砍，家家哭声震天、嚎音动地。后来土匪们找到躲藏在关帝庙戏楼上的群众，先是用枪射击。接着直奔戏楼刀剁斧砍，50多名群众全被打死。戏楼上成了大血潭，鲜血顺着楼台往下流。过后群众去收殓自己亲人的尸体，才发现有个叫朱六升的人埋在死人堆里，仍还活着。朱六升虎口余生，幸存下来。

一直到当天下午（约4点左右）这帮土匪才撤出了吕店。

这场劫难过去了，一个不到700口人的村庄，竟被土匪们打死了297人，其中26家被杀绝，劫后消息传到登封县衙，姓王的县官闻到惨讯，遂下令将吕店所有这次死难者的姓名逐一刻写下来，竖成神位，供奉在江左北边的三官庙内，以示"慰藉"。

二、赵庄大屠杀

1922年（民国11年）阴历闰五月十五日早晨，土匪头子王老虎（宝丰人）、刘振江、崔纪华（登封崔圪塔人）率领数百匪众攻打赵庄（现属吕店乡管辖）。该村乡民虽然势单力薄，但不屈强盗

侵扰，用石头、瓦块、大刀、长矛、土炮坚守寨子，多次打退匪徒进攻。一直激战到近午时分，土匪将赵庄村寨门的门搭打断，闯入村内。不论男女老少逢人就杀，见房就点。八十老翁、数月婴儿也不能幸免。霎时赵庄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有的在他处藏着听到亲人死前的惨叫声，连哭也不敢哭。妇女们把奶头填在孩子嘴里生怕孩子哭出声来，有的将草篓子反扣着自己藏在下边，有的躲到红薯窖内，有的顺爬在屋梁上。有个叫玉亭的男子，自己将土坯横七竖八地压在自己身上，装作被土匪用坯砸死。匪徒们在村内整整横杀了大半天，只有300来口人的赵庄，这次竟被残杀了150多口。全村被打绝了7户，仅有3家没有死人，房子被烧毁200余间。

（河南省洛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忆洛阳市郊匪患

王兼三

洛阳地处中原，为兵家必争之地。民国以来兵战迭起，互争不息。不仅给人民带来了饥荒和灾难，而且给土匪的蜂起制造了有利条件。从民国初，到解放前，土匪之骚扰从无停息，致使民无宁日，生产受损。直至解放后徐宽一伙土匪因在收编中行动不规，均被打死在关帝庙内的广场中（后称关林事件）。从此，洛阳才算结束了40年来的匪患。

洛阳的土匪，以伊河南环庄的蔡书祥拉杆最早，徐马的徐宽后来有名。土匪之结伙叫拉杆子，匪首叫架杆。夹河地带以西石坝的白天中、黄建升、白锦章杆子最大。下庄的张朝和东乡的黄金贵也广为人知。其他，不管是伊河以南或夹河地带不出名的土匪更是无计其数。光我家的东邻西舍就有三人当了土匪，后均被打死在外。由此，足以说明土匪之普遍。还有叫做“刀客皮”的，更是村村皆有，无以数计。他们中大多数是地痞流氓、烟鬼赌徒，甚至各村的保长大都与土匪有联系，实际也是“刀客皮”。当然，他们并不是无功受禄，他们经常是替土匪下个线，说个票，买支枪，从中捞点油水。

真正当土匪的，多半是因饥荒所迫，无以为生者才铤而走险，拉杆聚众，也有一部分是被地方豪绅欺压凌辱，无以容身者而入伙的。总之，土匪之由来，与连年征战最为密切。

首先是战争之后，灾荒重重，逼的穷苦农民无路可走，与其

坐以待毙，不如结伙拉杆、苟且生涯。其次，每逢战后，溃兵枪支到处流失，光皖系段祺瑞的西北军溃败后，路经洛阳南郊时，流失到民间的枪支，足有几百支。记得我一堂兄王思善，年仅13岁，因其胆大好奇，背着家长下寨从麦棵里找回一支崭新的三八式步枪。当时逃入小村的兵士，只要给他一身便衣，管他一顿饭，他就撇下枪支弹药，换上便装逃之夭夭。民间有了枪支，不愁不为土匪利用，先是一支两支枪，就可树旗立杆。后来势头大了。人马多了，便到处掠夺或收买枪支，充实其力。这样“刀客皮”们也就忙了，到处寻家问户，为土匪购买枪支。他们本来自己都有枪，有时常把自己的枪以昂价卖出，再以低价从别人手中买回，从中渔利。土匪们到处买枪，富豪人家为了自卫，也到处买枪，一时买枪之风大起，枪价也就随之昂贵了。一支汉阳造步枪贵达七八十元，老套筒、三八式卖到百元以上。三把盒子价值一百五六到200元，二把盒子能卖到近300元之多。

土匪的杆子大了，各村的守卫任务也越紧了，各村除夜间轮流上寨值班巡逻外，白天下地干活也都要携带武器以防万一。特别是一听寨上鸣锣，在地干活的人，就得马上收工回寨。所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不过如此吧。

土匪闹得最厉害的年代，要算1910年至1920年10之间。那时，因农家缺少枪支，疏于防范，各村遭劫者较多，光我村（大屯）就先后三次被土匪攻入。先是1914年，我村的首户薛长富家被抢，次年是我家遭劫。当时除抢走部分财物外，还抢走了我的弟弟，临走时又点燃了三间临街房。第三次土匪进村后，只放了几声枪，叫了几声“牌子”——即匪首喊叫自己的名字“我是某某”，很快就离开了村。那是因为本村一匪首陈某回村探望和取衣之故，人们只受了点虚惊。

之后，村里为避免再受劫掠和惊扰，一方面重修村寨，加固墙垣，一方面以李小乐为首成立了“金钟罩”，并添购了洋枪，加

强防御。从此，小股土匪再也不敢轻易冒犯了。但小的村庄仍不断遭到土匪的抢劫和骚扰，如刘富村张天才家曾于20年代末被土匪抢劫一空。

到30年代，由于各村都注意了防范，被抢劫的事虽然少了些，但土匪的到处窜扰仍不减以往。劫路、拉票，仍时有所闻。我的岳父张德娃曾于1928年冬在从龙门赶车回城的途中被土匪绑架，后来他从龙门南大庄的一家红薯窖里爬上来逃回家。当时，虽不能说是路断人稀。至少傍晚后路上的行人是很少。

1927年，镇嵩军二师败走后，土匪又活跃起来，有一天夜里从龙门南来了一大股土匪约1000多人，头头称“老洋人”。路经大屯村边时，因村里防守严密，土匪未敢开枪。但他们大声呼喊：“我们是魏连升的朋友，请他到寨上答话。”果然，魏到寨上和他们对话后，并给他们系下些饭菜，他们吃罢，便起驾向东而去。到了东乡攻下焦寨，又过河骚扰了平乐、象庄各村。

夹河地带的土匪和“刀客皮”都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这句话的道理，白天中和黄全贵二人，对此更为注意。他俩都是被逼而当土匪的。白天中本是殷实户，因父早亡，自己年幼，与寡母相依为命，本来可以过得去，后因村中恶棍再三欺压讹诈，家产为之一空，终因无法存身，一气之下，才拉杆为匪。后来杆子大了，除报了旧仇宿恨外，因名声远扬，便成了洛阳一带的名匪。他家居西石坝，为人忠厚腼腆，不善言辞。他拦杆后，不仅不凶恶残暴，而且具有打富济贫的豪迈气慨。他拉票子不撕票，抢财不伤人。他虽然得财不少，但大半都救济乡邻们，自己最终家底还是很薄。所以，在1923年被镇嵩军二师炮二营收容时，除带一支手枪外，腰里分文没有。黄全贵因结冤仇杀，被逼拉杆。黄为人和蔼可亲，见人不笑不说话。他和白天中都不在夹河地带作案，近则洛河以北或偃师境内，远则黄河北岸温、孟等地。有一次他们从那里拉回一张票，系一老人。老人到此后，愁容满面，食不下

咽，坐不安席，经黄全贵百般安慰后，老人才放下心。黄全贵还专门给老人请了一个厨师做好饭吃。久而久之，老人也习以为常地不思归乡了。过了几个月后，儿子们差人带了很多银两来赎老人，老人说啥也不愿走，并说道："把银子放下你们回去吧，我在家亲儿亲女也没有象黄家对我这样好，我不走了。"又经黄全贵善意劝说，并认黄为义子，才答应回去。后来老人过生日时，黄全贵又亲自携礼去为老人做寿。此时，儿辈们想乘机把黄杀害，老人得知后，臭骂了儿辈一顿，并说"他是我的义子，与你们兄弟相称，怎能如此非理？再说，他手下的人知道后，又怎能与你们善罢干休？到时候恐怕你们的小命也难保吧。"儿辈们听罢，才算打消了念头。似此事例，实属罕见。白、黄二人因生不逢时，虽有良志，亦为封建社会所不容。

（河南省洛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我所知道的江汉平原的土匪

朱国南

股　匪

1、陈大全、朱俊士、张祯祥股

陈大全系天门县杨场区观音湖中湾人，赌徒，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幼孤，由其婶抚养，成年后，好吃懒做，遂流为匪。其为土匪，以赌场为根据，常在观音湖场上勾结地方劣绅邓明辉、恶霸江惟知等，开设赌场，因此由嗜赌而荡产的败家子如重阳树上湾的潘典法、江应远等被陈吸引"入棚"（土匪的组织叫棚）为匪徒。陈逐步扩大其"棚口"，遂拥有匪众百余人。清末民初，陈被官兵捕去数次，都是地方劣绅具结保释。1914年又被京山县永隆河的团队捉去，其婶母请托士绅去保。殊知此次士绅中有武举沈瑞延，向团队实言陈大全是匪首，并对陈说："我不来，你不死，我迟来，你迟死，我早来，你早死，怪不得我，只怪你不该做匪。"语毕，绅众愕然。陈遂伏法。

与陈大全股匪同时期的股匪，彼此有紧密联系的则有张祯祥股，张祯祥乃京山县永隆河区金河滩五甲湾人，辛亥年在刘铁部下当过兵，民初回乡，不事生产，在金河滩招朋引类，过土匪生活，1914年祯祥在京山县境何家场被地方团队击毙。

又有朱俊士股，朱俊士、潜江县朱矮子场人。父子两人都做

了匪首。俊士父子于民国初年被刘铁部营长沈乃柏捕获，大辟。俊士之头曾悬于观音湖场上的南榨梁上。

这三股土匪，各霸一方，陈大全据天门西乡，张祯祥据京山南乡，朱俊士据潜江北乡。棚子比较大、根子比较深的则为陈大全股，民国初年在观音湖场上演戏做会，开设七场赌局，招持各方来匪，一时匪风甚炽，人心惶恐，迄今思之，犹令人心悸。他们起初是日散夜聚，专抢劫地主富农，而且只抢浮财，不伤害失主的身体，遇着失主将“码子”（土匪称自己人叫“码子”，外人叫“码外人”）杀伤，亦不加报复，尚有封建时代的江湖行规。如陈大全部抢杨家场大沟边潘家湾地主杨忠巨家，被忠巨杀伤匪徒一人，土匪将被杀伤者抬走，事后并未报复。

他们这股土匪，在清末时期大多数是窃盗，乃至当了土匪，清规戒律比较做窃盗少了，而且人数一多，虽然他们的活动仍然是昼伏夜出，但地方民众武力分散，因此他们可以择弱而食，其生活比较窃盗阔绰。如重阳树下湾里潘亮儿原是一个泥瓦工人，一经加入陈大全股里为匪，就穿绸挂缎，俨然像公子王孙，富商大贾。美酒佳肴，生活豪华。因此影响观音湖重阳树湾上下同居的博徒及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加入匪伙，地方的土匪由此日益猖獗。

这些股匪的组织形式，都是结伙抢劫，得赃平分，匪首称大哥，徒众则以兄弟辈相称，棚内只有分工，没有高低的地位。伙伴的来源，有自愿的，有胁从的。他们抢劫时所使用的刀杖、油捻，其囤藏的处所及其隐蔽与分赃的地方叫“窝户”。当窝户的人有自愿的，其分赃物与匪伴相同；也有被迫的，则由匪徒给点钱物，如孙家贫农熊婆婆就是如此。匪首邀约伙伴，常在赌场或烟馆内递暗号结伙抢劫，其刀杖、油捻（用皮线搓成粗捻，灌以食油，行动时绑在头上叫“油捻”），由各人自备。匪伙无利器者，由匪首供给。他们结伙求财，谁犯的危险大，谁的功劳多，分得赃物就多些。例如意图某某大户，先去调查工作的人叫“线子”，俗

云："远强必有近脚"，帮匪做"眼线"的人，事成后，匪给予适当的报酬。像我们村里的江二生，就一贯帮匪调线子。调线子的人对匪棚报的情况要真实，并要严守秘密，如果"露了白"或"锥了签子"、"灌了水"，匪众对他一定要加以报复，重则"三刀六眼"，置之死地，轻则剜眼剔足。线子落了实，匪首酌量"水的深浅"（指对方的力量大小）后，再约集码子多少。抢劫必择天时，一般在每个月没有月亮的夜晚。这一切由匪首决定，匪众完全听其指挥。到了现场。将码子点了数，明火执杖，匪首将哨一吹，喊声"上呀"，于是群匪各执其事，有碎门的，有巡风的，有"斗水"的，有示威的（清末地方的土匪没有枪弹，用爆竹装在铁桶内燃放，其声如枪，示威者用之），有入室洗劫的，事毕，匪首又吹哨集合点码子，背赃急走，以防追击。到窝分赃，不待天明完事。

2、刘锡珍股

刘锡珍是潜江县北乡刘家台人，先随刘铁当兵，1913年时部队在沙洋被北军击溃，刘锡珍乃回乡间，遂勾结京山县拖船埠河岭上朱国贤及天门县观音湖王夫佬、马良云等为匪。以刘杨家台为巢穴，常出没于天门县河南两岸。民国5年（1916年）刘锡珍的眼线人刘汝明（刘杨家台人，地主）、杨子清（刘杨家台人，兵痞子）在汉口与刘满堂、邓汉卿、张润之等，侦知汉口汪洪兴商号由汉口承运邮政储金白银八大担，由挑夫10余人运送，路过天门县观音湖，宿百岁桥杨家饭店的情况后，即以之告刘锡珍，刘遂将八担白银于夜 间抢劫。当时地方的一股土匪，大多数没有手枪，刘部虽有几枝枪，但行劫仍很秘密，他们一惯只向地方筹饷、筹款，或者丢条子强迫地方富户出钱，并不抢劫行旅，以显示与其他土匪有区别。独有此次抢劫邮政白银，不但鸣枪示威而且将银抢毕，故意将挑脚夫其中一人的腿部击伤一处，表示抢银子的人不是观音湖附近的土匪，意图使地方脱卸抢劫的责任。白银案

发生后，汪洪兴向天门县政府控告，要求天门县政府强迫观音湖附近的老百姓照数赔偿，将观音湖的劣绅杨友海、沈学熙拘案审讯，勒逼地方照案赔赃。弄得地方百姓惶惶不安。后经朱希云（时在江西县做知事）寄信给天门县知事，其大意说："土匪抢劫邮政的款项，与地方人民有何关系，而要地方人民赔偿，那么观音湖附近农民，常常遭受匪害，又向谁请求赔偿呢？观音湖的人民属在宇下，平时不能仰庇仁荫，安居乐业，已感疾苦，今又不幸商银过境被匪抢劫，而责令赔偿，是以匪名强加诸良民之身，贤令尹 想不忍为此不情不义之举。"天门县知事觉朱函言之有理，遂将汉口汪洪兴控失白银被劫一案拖延了事。刘锡珍、刘满堂、邓汉卿等得一笔巨赃。邓汉卿在观音湖上黎家口建造华厦，购置良田，成了地主。刘满堂在汉口给刘锡珍等买了几打盒子炮，1918年在京山、天门、潜江三县边区成立了"联合团"，以刘锡珍为团长，朱国贤为副团长，大约有几十条手枪，匪众百余人。联合团设刘杨家台杨氏庙内，距观音湖约5里，管辖周围几十里地方，在其辖区以内，所有零星小股土匪，他们都有惩治之权，俨然正式的地方武装。民国11年（1922年）张润之、朱国贤、刘汝明等在汉口法租界被潘典华勾结捕房，逮捕解回天门县政府枪决。未几，刘锡珍亦死，其匪伙由其弟刘锡荣接管。

刘锡荣，原为贫农，从其兄锡珍为匪。因锡珍常在汉口，所有"联合团"实权，完全由锡珍代理，既是"当家三爷"，又是"红旗五哥"。其为人极豪悍，与当地土豪劣绅不睦，1921年左右，曾枪毙了观音湖河南北两岸大恶霸保长江钦凤、潘典泽等，一时人心称快。惜乎其匪性不改，将观音湖土匪江钦奎打死，而占据其姘妇杨欢喜，又与欢喜不和，将其枪杀于周家场野外。杀人放火，强占妇女，因此不得人心，于1924年被地方团队击毙。

与刘锡珍、刘锡荣股匪有牵连的劣绅沈学熙，乃系沈姓的族长，在观音湖场上开中药铺，看到刘股匪众势力大了，乃唆使原

在刘铁部沈乃柏营长名下当过连长的沈人杰，与土匪马良荣、刘锡珍等勾结，坐地分赃，并籍以保护沈家湾富户的安全，官兵来了，沈学熙则以绅士的面貌出现，使沈人杰隐蔽到襄河南岸，官兵去了，又通知沈人杰回乡为匪。我村与沈家湾为邻，地主江天章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乃效法沈学熙，唆使他的堂侄江应富、江应贵、江应举等，去参加匪伙，时间未及一年，1923年清乡，江应举被团队杀死在京山县放鹰台。江天章见事不妙，乃对江应富、江应贵弟兄说："你们到襄河南岸做临时农活去，俟清乡事结束了再叫你们回来。"殊不知江天章乃系一个小小的地主，其封建势力，不能出诸于闾门，杨场区长潘典华，威逼江姓房长交出江应富、江应贵兄弟两人，江天章不得已，到潜江襄河南岸将江应富捉回，逼令其自缢而死。

刘锡珍、刘锡荣股匪的外围组织，在民国7年到民国11年间刘匪势焰正炽之时，地方有些有钱人子弟，与刘匪为朋，因而助长其威势。我所见的有以下几人。

邹孟华，亦名大华；邹孟威，亦名大斌；均系潜江县浦团地方大地主邹进士炳林之子，落草为匪，1919年因吃水深了，俱在京山县栗林子被刘匪锡荣匪部枪杀。与大华兄弟同时做匪的有阎家湾人阎德俊，亦系地主出身，嗜赌如命，因与刘部匪队长马良荣系连襟，遂入伙为匪。某年，被潘典华团队追捕，泅水而逃，跑到广东进了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后来做了胡宗南的师长，因匪得官，一时传为"美谈"。与此同时还有京山县金河滩五甲湾张楚师，系大地主兼工商业者张某的养子，狂嫖阔赌，手腕极灵活，勾结沙洋驻军团长贺某，弄了一支手枪，与土匪刘锡荣等称兄道弟，借土匪的势力霸占了贫民汤友生的妻子。张楚师起初并不与匪分赃，而且还常以钱济匪，做"仁义大哥"，不到两年，几万元的家产荡为灰烬，他只好与匪一体，靠为匪生活。

与刘锡珍、刘锡荣股匪通气的，还有地方的部分劣绅如杨场

区秦家榨的秦藻香（庠生），灰埠头的吴齐山，潘家渡的潘大万，永隆区的谢宪之，观音湖的江钦容、陈海日等，他们藉其封建势力，为匪撑腰，或者给匪通风报信，以图将来土匪势力扩大之后，好多捞一些好处。当时有人说："江汉平原，绅匪不分。"洵属真实情形。与刘股同时的股匪，在天门县东南乡诸通口则有 陈于官股，京山县境则有高祯祥股。潜江县夏家场则有张明道股，潘家滩则有聂大辉股，郑家滩则有郑莲英股。这时江汉平原的股匪，大小有几十股，约计数万人。因而使得一个叫朱登五的政治野心家，"利用匪众，编匪成军"的阴谋得以实施。

朱登五系潜江县襄河北岸张港区蒲团场人，光绪癸未武进士，清末随潜江祁军门入川，积功任四川马边协台，理化知府，肖耀南任湖北省督军时，朱登五充督军署之咨议。1922 年潜江县在省绅士易君实（大学教授，长于金石，解放后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等怂恿朱回乡任京山、天门、潜江、钟祥四县边区安抚司令，朱亦想因此编成一支土匪队伍，由他自己充任司令，再过一次武知府的官瘾。1922 年夏季，朱登五率领匪队约一营之众，从京山县路过杨家峰宿营，我适在杨家峰白医生思详处，亲见朱坐四人大轿，白发银须，两目炯炯有光，身躯高大，俨然是一位封建大官。他巡抚了京、天、钟、潜四县边区的土匪，意图把这些土匪大小数十股集中到潜江整编为几个营，自己当司令官。次年春，朱登五召集各方股匪代表等集会于潜江县城内，协议编调问题。匪方主张受编不受调，各股仍驻原防；朱则坚持既受编应受调，不能原封不动，各驻旧巢。双方各执一端，协议不成，朱登五亦被匪行刺击中头部，抬到张港就医，子弹留在头部取不出来而致死。朱登五死后，八方风雨纷飞，江汉平原的匪势益形猖獗，但刘锡珍、刘锡荣弟兄旋亦死亡，该股土匪，或散或亡，或者另外依附他股了。

3、北洋军阀残兵股

1926年10月间，北洋军阀的一个旅，由于师长刘玉春失败，该旅始由汉口方面往鄂西溃逃，到了沙洋，遇到了国民革命军何键部的拦阻，又由沙洋往天门方。其奔窜意图由天门而应城绕麻城乘隙北向河南。时当我在京山县金河滩五甲湾教私塾，隔河遥望匪部的骑兵奔驰于县河南岸的沙洋到天门县的大道上，萧萧马鸣，尘土蔽天，使人见之闻之惊心动魄，沿途居民在县河以南者，逃避为之一空。又目睹匪徒百余人带着用八匹骡子拖的二门大炮，践踏田苗而过，大路两旁的农田，碾成了禾场。鸡飞狗叫，凄惨之状，言之痛心。匪旅部队暂住天门县城，意图抢劫。天门县商会会长胡庚庭侦知其意，乃将城内外的大小酒菜馆一律包下，设丰盛的酒席，款待匪众。酒后胡与匪旅长吸食鸦片烟，用试探的口吻谓匪旅长曰："旅长呀，当此寒冬，贵部的士兵，尚着单衣，万一士兵因饥寒而犯了错误，其责任还不是在旅长身上。我对此种情况，深为旅长担忧。"匪旅长喟然叹曰："势穷力促，叫我又如之何？"胡庚庭当即表示："愿在三日以内，设法将全旅官兵的冬衣一律制发，军饷照额发放一个月。请旅长叫其军需前来，询问如此办理，共需银洋多少？"匪旅长答曰："勿需召问军需人员，我深知本旅的军实，如此换发一季冬衣及一个月的军饷，8万多元够了。"胡乃慷慨允诺。天门县原属富庶之区，城内外的物资丰富，果然不出三日，天门县商会将匪旅换了冬季军衣，又发了一个月的军饷，花了8万多元。事后，匪旅长执胡手而言曰："为君实言，我部原拟洗劫了贵处，向北而去，不意老兄如此仁义，我们又何忍夹抢劫呢。"未几，该匪旅遂由应城方向窜到河南去了。

1929年北洋军阀张连升任襄樊镇守使，因吴佩孚失败，其旅众驻守襄阳、枣阳一带者，遂四散为匪。其中有骑兵连长丁子爵（河南人）及马冠之（河南人）等率马队百余骑，窜在湖北省京山县下洋港、杨家峰和聊崛山一带打家劫舍，过绿林生活，时人称为"丁马之乱"。是年冬季，京山、潜江、天门三个县的团防队伍

前往围剿，在聊崛山下被匪击败，天门县杨场区区长董大全阵亡，因此匪焰益炽。到了是年阴历冬月间，丁马匪部陷了永隆河，并由四根柳树、刘家榨、五甲湾县河北岸的大道直闯而下，县河北岸沿岸数十里的居民，纷纷弃家离舍，携儿带女，往县河东南方向逃离，我亦率妻秉子，同老母弱弟等7人，随在难民之中。时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惨不可言。匪部驻永隆河后，其前哨所即为观音湖，每日冲马一来，乡民没有逃跑的老弱和在家乡看守房屋的人，则匿于沟穴之内，以防奸掳。天门县城距观音湖走水路60里，陆路45里，匪如直捣县城，则指日可下。当时的国民党湖北省政当局视此匪灾为小事，坐视黎民受害而不派兵予以清剿。天门县商会怕匪来城陷，遭其洗劫，乃用送款给匪出钱买安之计，托金河滩张家茂（武昌文华书院协和师范毕业，基督教徒）前往丁马匪部作说客，愿一次献洋3万元，要求他们不要在天门县境内为害。是时湖北实权人物为何成濬，正在招安张连升旅，丁子爵等急欲归寻旧主，乃与张家茂达成协议，得了天门县现款3万元，往北而去。

4、朱乔松股

朱乔松，湖北省潜江县柏家台人。乃积年惯匪，有政治野心，长期住汉口租界，交结国民军队，购买枪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第十军徐源泉的部队，由武汉溃退，向江汉平原逃窜，朱乔松指使匪部，在襄河内线的张港和观音湖一带，拦截了溃兵的枪支1000多支，其中轻重武器子弹俱全，朱把部下编了5个团，共有枪枝5000余支，匪众约万余，朱为京、潜、天等县匪首，他自称司令，常出没于观音湖、永隆河、夏洋港、张港、渔薪河、灰市之间。潜江柏家台为其老穴。由于柏家台系朱姓的封建势力范围，有200多户朱姓黎居一村，乔松挂黄埔军校毕业生的招牌，利用封建宗族关系，号召匪徒，假仁假义，到处开山立堂。据雷章贤向我说：朱乔松当匪司令时，在雷家台驻过若干日，随从人枪

百余，朱年30余岁，文质彬彬的像个书生。朱乔松1939年被地方团队在京山县瓦庙集附近打死。朱的副司令为邓孔生，团长有沈锡庚、江应彪、高祥祯、陈必强，独立大队长有王介发、朱兴学等，兹将上述这些匪首的大致情况附下：

邓孔生，湖北省京山人。多年的惯匪，曾受刘锡荣匪团支持，1926年以前，其匪众不过数十人，以潜江夏家场为巢穴，狡黠善遁，常出没于潜江县境内的襄河南北两岸，拖到抗日时期，已有枪1000多支，为朱匪乔松的副司令兼团长，1939年与朱乔松同时被地方团队击毙于京山瓦庙集。

沈锡庚，湖北省天门县观音湖沈家湾人。家庭大地主，父名沈学官，江汉法政学校毕业生，娶妾江氏，生锡庚，乳名牛儿，幼时与我同私塾读书，天资笨，成年后习为匪。颇有野心，想拖起来，时常到汉口私购枪弹，徐源泉部队溃逃经过观音湖时，锡庚住在观音湖附近，沈姓又是观音湖的场主，因此拦截了部分枪弹，共有步枪300余支，并有几挺轻机枪，先受朱乔松编为团长，乔松死，继任团长。陈必强忌之，将其击毙。

江应彪，天门县观音湖河北岸江家大湾人。其兄名江应强。弟兄两人均以赶马为生。抗日时期，拦截了国民党溃军枪枝百余支，因此以江家大湾为山头，做了土匪的大哥。观音湖的地头蛇本为两条，在河南者为场主沈姓，在河北岸而掌有观音湖县河码头大权者为江姓。那时天门至沙洋的大道，观音湖码头由江姓掌握。行旅经过该地，雇用马夫、航船，只有江姓才有权承雇。应彪，应强兄弟在观音湖码头上向来称霸，做匪之后，县河北、放鹰台、洋港、石女山等区为其蹂躏地带，受朱乔松编为团长，其始是应强，时间不久，应强被击毙，应彪继之为匪团长，解放时，被镇压。

高祥祯，湖北省京山县人，当过朱乔松的团长，1939年，朱乔松与团队作战被击毙，高即拖出投敌伪当团长，驻永隆河。其蹂躏区域，主要在永隆区及夏洋港、聊峴山一带，有时偷过襄河

南岸，摸了螺蛳（土匪称夜袭为“摸螺蛳”），又转回老巢。1940年被陈必强击毙。

陈必强，湖北省天门县诸通口人。抗日时期，曾充潘尚武的卫兵，有政治野心，不甘居人下，乃脱离潘部。从其族叔陈于官当“拖家子”。为匪极凶悍，有胆略。1940年，陈于官为朱乔松匪团长，因与高匪祥祯闹意见，被高部捉去了。陈必强即纠合手下的弟兄20多人，黑夜冲入高匪团部，将高祥祯击毙，把陈于官抢劫出。未几，陈于官死，陈必强带领其众、人枪约千余，横行于诸通口、国家荡、习家口，郑家滩、张港、渔薪、杨场、观音湖等地。陈极其凶残，杀人不眨眼，民愤极大，1953年，被人民政府镇压于天门县渔薪河场上。

王绍发，湖北省京山县永隆河区金河滩王大佬人。出身于中农家庭，父名王开绪，1924年至1926年间王绍发十四五岁时，曾从我在金河滩五甲湾私塾读书，他极为笨拙，又不肯用功，其成绩可想而知。王身躯高大，有气力，赌博胆子极大，常揭“飞碗”（赌徒中所有的钱输光了，买宝揭碗，叫揭飞碗。揭飞碗的人，即要有几分二流子气习，又要体力能胜人，不然就要受赌徒的凌辱）。抗战时期，他做了土匪，横行于金河滩、观音湖、杨场区一带，有人枪百余。王绍发为匪极其凶悍，连恶霸区长潘典华的三儿子潘选藻也被他压了杠子。王独立为王，名义上受朱乔松编为大队长，但不受朱的支配，与其匪股亦少讲交情，因此孤立无援。1938年左右，即被消灭。

朱兴学，湖北省京山县拖船埠河岭上朱家大湾人，乳名学儿。系我房侄，家庭亦为中农。抗日战争时期，朱兴学做了土匪，有人枪百余，受朱乔松编为独立大队长，排行第九，人呼之为“九哥”，他势力大，在拖船埠、永隆河、夏家场、观音湖一带横直数十里，只要有了九哥的名片在握，就可以通行无阻。过去江汉平原匪区，没有袍哥打招呼，拿名片，是寸步难行的。兴学的妇人

叫新姑，年轻貌美，能左右射击。排行第七，称为“七姐”。1947年，朱兴学洗了手，到湖北郧县地方法院，依我生活，充法院录事。他曾对我说：“谁情愿当‘拖家子’（土匪），都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上山耳。抗日战争时期，江汉平原地区土匪横行，商旅寸步难行，我们做小生意无路，种田生活又苦，加之官兵拉兵拉伕，青壮年不去做匪，居在乡里，如处于水火之中。因此我们夫妇都上了山。‘码外人’只知土匪的生活奢侈，而不知其日日夜夜担惊受骇的生活之苦也。例如1942年，官军前来围剿我们，在江家岭激战了两昼夜，‘水深了’难以脱险，我隐蔽在芦苇荡里，幸亏新姑从官军的后面打了几梭子子弹，转移了官军的目标，我们才得以突围而出。”当其追述往事，内心犹有余悸。俗语说：“只见强盗吃肉，不见强盗受罪。”闻朱兴学之语，始得证实。当时我为郧县地方法院院长，本不应该包庇土匪朱兴学夫妇。由于我在乡间看到与土匪为敌者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他们的严重报复，如潜江庙河朱俊儒家即是这样，他得罪土匪后，结果房屋被烧，家属被杀，因此我不敢得罪他们。1949年11月，朱兴学从我在四川乐山地方法院充录事，解放后，他回到了故里京山县拖船埠河岭上朱家大湾。

组织状况

做土匪的吃江湖饭，当其入伙之初，一定要举行结拜仪式……“砍香”。砍香是用红纸书写“关”（羽）圣帝君神位”，供于堂前，入伙者当神位前拈香三柱在手，宣誓忠于组织，誓词念毕，将香砍成二截，表示如果背了誓言，像香柱一样，受到吹断的处分。好汉做事好汉当，遇到了危难，“不泄底”，“不拉稀”（即事泄后，不暴露组织，不向敌人求情，干脆承认是自己个人行为。”接着就是喝血酒，宣誓时，用碗盛酒，其中滴以鸡血，大家共饮，表示和

袍共济。仪式完，就算为“自码子”了。自码子的内部，如果是哥老会的组织，则“龙头大爷”或者“双龙头大爷”为领袖，叫做“舵把子”，或者叫“当家大爷”，也叫做“大哥”。大哥以下，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次序呼之为哥，但十不呼之曰十，而呼之为“幺”或曰“满”，其中没有二哥，避关帝讳也。三哥管负责头及招待来往的“在园”（袍哥组织内部叫在园，也叫在理）同志，五哥管风纪，老么管联系，老七的多属女性，所谓“七姐”，老八管招待僧道，其余按入伙顺序及能力大小加以位置，但没有一定的成规可寻。袍哥有“清水”或“混水”的区别，土匪则属“混水”袍哥。但有土匪的组织而没有在园的。则属临时组合，一人为首，众人附合，结伙抢劫，得赃平分，其团体大小不一，有三五成群的，有数十人结为小股的。这种土匪呼之为“土土匪”。1918年，天门、潜江、京山三县交界处设立的联合团，其本身即是土匪集团，它管理的对象就是“土土匪”。“土土匪”有的是二流子组合，有的是贫苦人民迫于饥寒而铤而走险的，其初次为匪，一般尚未脱离生产。如我们家乡的潘开洲、潘典法、潘典哲等，在民国初年为匪时，即未脱离生产。如有一个潘亮儿系泥瓦匠，被沈瑞延的乡团逮捕时，尚在为他人修理房屋，是乡勇把他从屋瓦上拉下来枪毙的。

他们的组织，以袍哥的组织为主要。没有袍哥的土匪集团组织，他们中间竿子小的就有被竿大的吃掉的危险。土匪的编制人数，是没有一定的数字可考的。一个匪首当了“龙头大哥”，开山立了堂，则天下哥老是一家，遇有事故，一经言语纳顺，则彼此可以互助，要多少码子，自家的码子不够数，邻近的舵把子可以叫兄弟伙帮忙助数。因此一个匪首，自己的码子明明只有少数，则号称多数，以壮自己的声势。如朱兴学只有近百条长短枪支，而称大队长；沈锡庚的人枪不到三百，而号称团长。他们对内则比杆子的大小，资历的深浅，非龙头大爷不能开山立堂；竿子大的官

皆大，分赃亦多。对外则一律以兄弟相称，那怕是满十老么 在大哥的面前，可以随便开玩笑，不讲什么官长礼。但是犯了“家规”，当挖眼的挖眼，当砍头的砍头，决不予以宽恕。所以袍哥性质组织的土匪，它的纪律既宽大又严酷。搞得不好，就有吹头的危险，做了土匪，想洗手跳出圈子，也是不容易的。除非改名换性，逃匿远方，否则没有不身首异处的。

活 动 规 律

1、抢劫

清末民初，土匪的活动，其时间多属在每年冬夜和春夜，其对象为当地有钱人家，其地点则为小村小湾或单门独户，因大村人多，势力大，故土匪一般不去。所以有些小村小湾的农民，则以大村为靠山，将其贵重衣物及其耕牛，寄到大村子里亲朋家中，以保安全。在1929年前，由于江汉平原的土匪股数虽多，但其枪弹却少，大村里“水深”，他们不敢轻于尝试去“啃硬骨”。1929年以后至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土匪的势力逐渐增大，“不砍大树没柴烧”，于是土匪抢劫的重点移向大村子了。1929年，邓孔生部将五甲湾抢了，我的干儿子张富贵的新媳妇被匪抢去了，费了许多神，才以现洋数百元赎回。抗日战争时期，京山永隆河和平乡的高家湾、倪家湾等小村的农民，将耕牛寄在李家大湾，被土匪朱兴学等侦知之，某个冬夜，朱集合匪众百余，长短枪枝数十条，将李家湾及各小村所有寄宿的大小耕牛几十条一齐抢走。我的内弟郑善庭等隔港沟听到土匪抢了李家大湾，自己寄宿的耕牛亦被抢劫，遂隔港沟用抬枪向着土匪打了两枪，匪众云“发了！发了！”乃在黑夜中向抬枪响处乱击，郑善庭等隐伏港沟的堤下，畏匪力大，不敢再击。朱兴学等乃仍将所抢的耕牛牵走了。1947年朱兴学和郑善庭都到湖北郧县地方法院充录事（时我任郧县地方法院

院长），朱兴学系我房侄，郑善庭是我内弟，一个是土匪在家不能安居，一个是农民躲避国民党抓壮丁，当时他们又都靠我做护身符，一日两人闲谈李家湾抢劫耕牛的故事，彼此揭穿了底。二人一笑了事。

2、上饷

刘锡珍，刘锡荣，朱国贤等散在江汉平原为匪，向当地富户筹借军饷，叫做“上饷”，上饷者向上缴纳军饷之谓也。上饷的活动，有在白日行之，也有在夜间行之者。其方式用布告式的文书，上写着如下字样：“都督府某某先遣支队，为筹设军饷，以应急需……仰该民某某，限于几日以内，筹借现洋几千几万元，送交某处，如敢违抗，则火焚房屋，鸡犬不留。”文书尾写某月某日，上盖都督府红色大印。因此见之者莫不咋舌破胆，地方人民，多恨刘都督。

3、借款

刘锡珍等除上饷之外，另一搞钱的方法，则为借款。上饷的方式是用都督府的名义出文书布告，其对象多属地主富农之类或者集镇上的殷实商贾。但由于破庙子与金河滩姓张的，及拖船埠姓朱的，既属刘家刘姓的亲戚，而其族大人多，势力又超过刘姓，因此上饷借款都不涉及张、朱两姓、借款方式，有持布告行之者，亦有个人单独出马，向自己的亲戚朋友或地方的富裕农户而行之者。1916年夏天，我在私塾教书放了端阳学假，某日傍晚，夜中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见面时，乃是河族上朱家大湾老屋的堂兄，名九儿。叙谈未几，转入正题。他说：“现在我是刘都督的部下，没有发饷，叫我们各人暂时自己设法，因此来向你处借点钱用。”九儿的大哥朱国贤，三哥朱三儿，都是土匪，宣统辛亥年（1911年）襄阳巡防统领刘韫玉领兵烧刘英、刘铁的故里刘家榨时，他们的住宅与刘家榨一河之隔，近在咫尺，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曾跑到我家避过难；九儿我也熟悉，我因恃此不恐。遂

大胆地向他说，“我家种几亩薄田，生活向来不富裕，你们弟兄伙都知道。”但是起了风总要下点雨才能息事。他既然来借款，不能不应付一下，乃禀告先父，送了九儿两串钱，作为茶资，他勉强接受，不欢而去。

4、丢条子

1918年以后，江汉平原的土匪，向地方、富农及富裕的中农逼款的方式，有一种叫做“丢条子”。丢条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合丢”，几家或全村共丢一张条子，要款若干由大家共同负担。一种是“单丢”，按户丢条，要款若干由某户负担。丢条子的时间，多属在秋收以后某个夜间。1920年农历九月我家即被单丢过一次条子。1922年又同邻居唐思忠家被合丢了一次条子。条子的样式，是一张长方形条纸，上面写着交款的数字及交纳的日期，尾上附几句吓人的话，什么“过期不交要杀人放火呀”等等。至于款子交给谁，条子上并未写明丢条子人的姓名住址，让我们得了条子去摸索，找人转圜。条子用浆糊贴在大门上，夜间来贴，神不知鬼不觉，次晨开大门，发现门上一张条子。我的父母及邻人都少有识字的，揭下来叫我一念：“妈呀，是叫我们出军饷，如果不出，就要……”住在隔壁的舅伯邹士安先生，开木匠作坊，时常逛街，认识的人比较多。我们遂托他探听消息。结果都是江钦奎丢的黑条子。所谓黑条子者，是有土匪集团的组织，假借匪式丢条子勒索人家的钱财。前一次我家出了80串文，后一次我家和唐家共出220串文。丢条子的勾当，一般都是择弱而噬。我们重阳村上下湾和沈家湾一个自然村共有150余户。其中沈姓、江姓、潘姓都有几户地主和富农，比我家和唐家富裕的也大有人在。然而他们有人有势，匪不敢惹，我们单家独户，辛辛苦苦，收点黄豆，就要卖光了向匪缴款子，真是气死人！土匪的规矩，如果假名“吃水”，必予铲除，所以江钦奎由于吃水深了，终为匪首刘锡荣所枪毙。民国27年（1938年）土匪江应彪丢了天门县渔薪区灰市的一

张统条子，银数万元，胡文卓约潘大万、刘满堂（两人均系江家的女婿，江应彪呼之为姑爷）在胡家台玩了一夜，向江应彪疏通，最后将条子收回。土匪亦有“人情”。

5、拦路

从清末到解放前，江汉平原的土匪，势力一年比一年大。他们除危害地方的居民外，还抢劫过路的行旅客商，叫做“拦路”。民国5年观音湖的银子案，是一件驰名遐迩的拦路案。因此凡是经过天门、潜江、京山等县境内，如襄河水道、县河陆道的行旅，莫不战战兢兢，偶一失慎，甚至人财两空。但是这一带土地肥沃，盛产棉花，黄豆、花生、芝麻等经济作物，榨油业户很多，其所生产的油饼，以武汉、孝感、黄陂等商埠为推销的中心，其利润很厚。每年夏秋季节，武汉、黄陂、孝感等处收购黄豆、花生、棉花、芝麻等及其加工的油饼等商品的船商，云集于天门县河及襄河汉川以上的沿河集镇码头岸边。又，京山县永隆河的牛马行业，驰名全国，每年由陕西、河南、安徽及本省各地区的牛马贩子来此贸易者络绎于途。各处的土匪拦路抢劫，但一般都不抢船商和牛马贩子，因为他们知道，河里没有船商了，陆路没有牛马贩子了，农村里农产品就没有销路了。抢的牛马就只有杀了吃而卖不出钱，他们要人出款，也就没有了着落。土匪留这条生路不拦，或者少拦，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其次过去汉水河域以及天沔一带与武汉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木船，土匪们到汉口购买枪弹，靠船帮给他们私运；还有的匪首如朱兴学等自己与人合伙经营榨油业，因此帮朱家大湾榨户托运黄豆的马贩子和帮运油饼的商船，只要持有朱九哥的名片，即可在匪区通行无阻。总之他们拦路是为了得钱，不拦水路与陆路的牛马客人，也是为自伙的便利，唯利是图，是土匪的作风。

6、拉疙疸子

绑肉票叫拉疙疸。江汉平原的土匪，大约到了民国7年左右，

才发展用这个方法勒索通款，其始只拉男性，不拉女性；只拉成人，不拉小孩。尚有封建时代土匪的遗风，有点侠义气。而且只拉有钱的富人，中农尚可以苟安，贫农更可以安稳睡觉。民国11年就开始拉中农的肉票了。是年十月既望，我的三弟朱国粹，时年13岁，被土匪碎门入室拉去了。家人乃央先祖父的契弟刘德英先生向其房侄匪首刘锡荣说情，出了几十串钱，将三弟赎回。当赎人之时，先把钱交付了，到了夜晚，刘德英先生率领先父和我一行3人，按照刘锡荣所指示的方向、地点前去取人。走到刘丕院堤西面观音湖至庙河的大道的旷野间，碰到一位骑"剑背"（无鞍）马的彪形大汉，原来是刘锡荣。他问刘德英先生："是么叔吧？"德英先生回答："是我们。""人在前村西头上，你们前去领回。"刘锡荣这样答复了两句话，我和先父如遇了特赦，喜之不禁，被掳去的亲人几天不见面，兹可以负回团聚矣。前行不远，忽然哨声连响，闻之，心中怦怦恐甚。回首望之，乃见各处的火把奔向骑马者刘锡荣处。刘德英老先生闻之，谓先父曰："快走！快走！他们这又是集合出发的，今天夜晚不知又是谁家的儿女遭受磨难。"言之喟然而叹。我们又向前走了一里多路，距庙河农村不远了，对面有二人，手牵三弟国粹，遥问我们说："是来领人的吗！"刘德英先生回答："是的"。对方始叫我们去领了人，先父乃将三弟背负回家，一场灾难，幸告结束。民国15年以后，江汉平原地方土匪拉疙疸子的情形更发展了，不但拉男性，也拉女性；不但拉有钱的人，贫农的女儿稍有姿色，也被拉去，受其奸污。抗日战争时期，此地成了土匪王国，拉疙疸子不只是一票二票的零星的拉去了，而一拉就是一个自然村，被拉去的男女人达数十或一百数十人，集体收押，分次赎回。如张明道驻永隆河时，一次将灰市附近吴姓、胡姓等村的农民拉了几十人。土匪拉了疙疸子，你如果坐视不理，他们就要扯毁肉票。但是有个别的地主兼绅保，而与土匪一贯作对头的仇人，或漏泄"哥底"（土匪的秘密），或

“上水”（暗叫官兵来打土匪）、“剃签”（给官兵指示匪路匪名），如果一经被匪拉去，则既要钱，又要命。如江家湾的保长江钦凤，被刘锡荣等拉去了，出了5000元现洋，又把他枪毙了。这次肉票拉毁了。人民反说土匪做了一件好事。

7、非刑勒索

江汉平原的土匪，到了1928年以后，逐渐学会了用非刑勒索钱财的手段。他们施用这种毒辣的手段，只是对准个别的地主及其一惯与匪作对的仇人或仇人的家属，到了抗日时期逐渐发展，凡是土匪认为是财主或怀疑某人有窖藏，即捉去用非刑逼供勒索，其惨毒过于封建时期的所谓“五刑”。我所知道的其勒索的毒刑种类如下：

压杠子　将受害人的双腿膝腕用竹或木杠压着，左右各用一人将杠端踏压而下，这是一种最普通的逼钱方法。

耕田　使被害人伏在地下，用竹杠或木杠二根绑其左右腿，土匪二人各持其一，竖立，使被害人双手伏地下向前爬行。1932年我的表弟邹志德，被匪捉着“耕田”，逼其出款，拿出了100多元的现洋，始获释。1962年春节我回乡与之见面，谈及“耕田”往事，他不寒而栗地说：“老兄，被土匪‘耕田’真苦呀，他们把杠子往上一扬，我痛得人都昏死了……”

坐快活椅　将坐椅的面上，密布着铁钉。钉子的尖端向上，使受害人坐在其上，叫“坐快活椅”。

摇电话和拉风箱　对被害人男的用竹棍伸入其肛门以内，用竹摇之。叫“摇电话”。女的用竹棍伸入其阴户以内，内外戳之，叫“拉风箱”。

划鲫鱼　将被害人的背面上用利刃划成斜方块形状，叫做“划鲫鱼”。

活埋　把地面的土挖成窖形，置人其中，使之站立，逐渐用土掩之致死。如果交纳了款子，可以拔出不至埋死。被活埋的人

由于站在地窖里，断气很慢，有的于次日尚未断气。邻近的行人能闻其呻吟残声，能见窖面上的浮土仍在动弹。

以上“划鲫鱼”和活埋两种毒辣手段，土匪非对恨之入骨的人，是不轻易使用它的。如朱文台的朱明焘和朱以侑叔侄两人，都是地主，在抗战时期，先后被匪捉着了。朱明焘向匪说情，压了杠子，同时也耕了田，将其所有的现洋百余元予匪，因而得了活命。朱明焘于1949年武昌充湖北省财政厅的科员，和我见面，谈其被匪耕田的经过，颇有趣味，兹附录之。某年秋天夜间，土匪十数人到朱家，明焘知不能脱逃了，遂向匪众表示：“你们来了，喝点酒再说罢。”乃具酒食以招待匪众，酒罢。明焘又向匪说：“明告诸君，我家只有100多元现洋，尽予诸君，诸君如不相信，让诸君耕我的田，我在诸君面前决不哼一声。”语毕，乃袒衣伏地，让匪耕田，果然没有哼一声。匪称夸其为好汉，乃释之。至朱以侑乃守财奴，每天夜晚在其宅近巡哨，某夜见匪一人与他家门缝窥测，以侑欺其弱，以扬叉（一种农具）击之，遂与匪斗，宅近伏匪闻械斗声，围其宅，把他捉去，先施划鲫鱼，旋予以活埋。

匪帮内规矩和行话

俗语云：“江湖有理，朝廷有法，三刀六眼，自绑自杀。”在清末，凡是走江湖的好汉，自带“盘缠”（盘缠叫本钱，土匪把暗器如小刀即匕首或手枪都叫本钱或盘缠，问其带有多少盘缠就是问多少枪支），犯了错误，当众自杀，当土匪的吃的是江湖饭，因而匪帮的规矩，也完全是以江湖的规矩为规矩的。其清规戒律，颇为严格，有什么“不拒铺”，“不采花”（强奸），“不出卖江湖”，“不吃水”（土匪私吞赃款赃物叫吃水，这条规矩很严格，每次出门抢劫回来，各个匪徒都要洗身——搜荷包，以防夹带，其有事先带款出门者，如果先不向匪首报告明白，一律以赃款论处，须

纳出并在赃款里平分)。如果违犯那一条，就挖眼珠、割吊筋或三刀六眼加以惩治。匪挖眼珠事，我见过一次，刘丕院刘汝明因吃水把眼珠挖了。后来学算命糊口。土匪处死匪徒我也曾见过。民国初年7月间，有土匪20多人，将一匪杀死在孙家岭后大路边，听说被杀之匪，平时喜"吃水"，杀死之前，匪众将其请到观音湖杨大旺的菜馆内，对他说："哥儿好吃一餐，今天你可以吃个饱。"既饱且醉之后，被牵到距观音湖场半里路遥孙家岭后大路汤忠炳的田边杀死。我们去观看时，其肠内的肉食尚溢于路边。

1915年以后，江汉平原土匪的规矩，其对外部的尺度放宽了，如"不采花"、"不拒捕"等规矩，逐渐变为凌辱妇女、打击失主等。土匪象反动官吏一样，自占上见，而以人民为鱼肉，予取予求，只准人民听其宰割，不许加以反抗。象我之胞弟国芳的妇人邓氏，被沈庚锡匪部沈某奸污强占达数年之久，吾弟因门衰祚薄，敢怒而不敢言。1947年我赴湖北郧县当地方法院院长时，路过天门县，虽知此事，但以投鼠忌器，对于沈匪某奸污弟媳一事，亦不敢向天门县地方法院检察处告发。土匪的积威，日久形成，信非一朝一夕之故。他们内部的规矩，则日益紧缩。在清末时期，通江湖行话的土匪亦名强盗，能通行各个"山头"。俗语说"挂九个口袋的叫花子，能走遍天下"。民国15年以后，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江汉平原的土匪，各占山头，自立为王，出了自己的山头以外，言语纳不通，就有"器被折"(枪弹被人吃掉)、"财被劫"、身被杀的危险。就是精通"海底"的"龙头大爷"，有货不分给当地的匪部，也是要吃亏的。例如天门县官僚胡宾之的后裔胡某，其父曾充天门县征收钱粮的鄂总，胡某是天门县有名的"龙头拐子"。抗日战争时期，他由鄂西带一批私货——烟土，数字很大，行至江陵与潜江交界处，被当地土匪拦截。胡某自恃是"江湖人"，固执己见，不肯分一杯羹与当地的匪帮，结果当地匪帮将胡某处死。

“行话”亦称“黑话”，即暗语。有习惯的暗语，有自编的暗语，并无陈文陈法可考。一般土匪沿用黑话，亦不究其词的根源和它的概念，凭口相传。若问之，他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江汉平原土匪的黑话，把人民群众叫做“水”。例如遇到了人民群众的打击，则叫做“水发了”，或简称为“发了”；人民群众多，就叫做“水很深”，与人民群众相抵抗，则叫做“堵水”；守卫自己的防区，防止官兵来袭，则被称之为“霸水口”；吃了人民的赃款的叫做“吃了水”。把官兵叫“凛勾子”（天沔方言凛同冰，冰暗指兵），兵来了，叫做“水涨了”。江汉平原多水，故江汉平原土匪的黑话，沿用古语“民犹水也，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之“水”字的含义。匪的生活事务很多，他们日常接触的对象当然亦广，因此他们的黑话，包罗万象。语云：“十年学得一个举子，十年难学得一个江湖。”要博通江湖上的黑话，是十分不容易的。一般黑话的常识，为匪者总要知道些，如匪首叫“老板”，匪徒叫“竿子”，匪徒多叫“竿子大”，匪徒少叫“竿子小”，或者前叫“大竿子”，后叫“小竿子”，如问“某老板的竿子大小如何？”则答称有多少“码子”，这是指人事方面的黑话。其对于集镇的黑话是，集镇俗称之为“街”，叫街为“混子”（街为混事之处的意思）。某某街则在混子前头用形容词的暗语，如观音湖则叫“娘娘混子”、渔薪河则叫“摆尾混子”（鱼叫“摆尾子”），灰埠头叫“泥巴混子。”其对姓氏的黑话，不说姓什么，而说是什么“河”。如把朱姓称憨河的，唐姓称为甜河的，江姓称为拐河的，汤姓称为水河的，董姓称为锵河的，杨姓称为咪河的。其暗语的含义，有象形的，有假借的，有谐音的……。但都较低级庸俗。例如对朱姓称憨河的，即取“朱”与“猪”同音，暗指猪是憨的；江姓称拐河的，则取“江”与“姜”同音，暗指姜形是七湾八拐的。那个地方有若干姓氏，就有若干“河”。其他暗语，走叫“踩”，走了叫“踩了”，绑票勒索则叫“牵猪”与“捞货”。行话还颇具有

封建迷信的色彩，如围坐忌“围”字，叫“圆坐”，过河与过桥叫过坎，（上语事情失败了叫“过了河”，死了叫“过了桥”。因此土匪最忌说“过了河”与“过了桥”。匪团长 聂大辉有一次骑马夜行，马夫紧随其马后，行至桥头矮檐下，对大辉说：“团长注意脑壳。”大辉在马上闻之，则嫌其马夫有意说破口话，心甚衔之；行未久，过小桥，马夫又对大辉说：“团长过桥呀！”大辉怒曰：“看是谁先过桥！”扭身一枪将马夫击毙，其重视迷信、轻视民命如此。

人民遭受匪难的惨状

1908 年以前，江汉平原一带尚称太平。1908 年开始蒙受匪难。1911 年冬，土匪抢孙家岭地主程鹏云家，相距我家仅半里之遥，黑夜间，家母唤醒年仅 13 岁的我说：“赶快起来，土匪在抢人！”我们站在门外遥视，只见那里人声嘈杂，喊赶土匪。这个时期，一些有钱人的家里为了抵御匪患，置有刀矛或雇请有武功的教师，他们寝不安枕，但中农以下的人民尚能安居乐业的。到民国 4 年（1915 年）以后，地方的土匪敞开了“盘子”。中农也要受其危害，夜间也就不能安枕了。每逢匪风炽盛之年，乡村的农民尤其是中农，就不敢在室内安寝，而是常在室外风餐露宿，以免土匪夜间来“逼笼”（土匪围着房屋捉人叫逼笼）。我的一家人经常在露天里歇宿，天明再回家做田活，过的真是非人类的的生活。这个时期一般农民都认为在这样土匪当旺的年月，不必勤扒苦做，有碗饭吃就算了。可见土匪对于农业生产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到民国 17 年（1928 年），江汉平原的土匪逐渐形成了大股以后，他们扰害地方则不分贫富，有钱的逼钱，无钱者拉去当匪，妇女年轻具有姿色的则拉去蹂躏，甚至久留不返，做匪的压寨夫人。如沈家湾贫农沈香儿之女被夏家场邓孔生匪部拉去，就跟匪骑马做夫人而未返家。因此乡人如果相惊以土匪来了，则不分贫富，男女老

少皆弃室而逃。是年，我的故里重阳树上湾的群众为了躲匪便利，在村后县河上面用梯子、门板、车杠等搭成浮排一方，浮于其上，匪来则群乘桴向河北岸而逃，匪去则乘桴回村。有一次夏天某日躲匪，事先不知谁将木排底下两根车杠抽走了，大家渡排时，木排下沉，我的长女崇静，时年8岁，次女崇朴，时年6岁，适在排上，均已没顶，幸经抢救得免于死。乡村亦有闻匪惊而不逃跑者，但除老弱残废而外，只有土匪的亲属，或者男女匪特，也有一些男的想去做匪，女的想因祸得福，让土匪拉去做个压寨夫人，这种妇女当时还不少，我的么弟媳邓氏即系此类人物。

土匪之为害，不但抢劫钱财，而且影响人民的卫生与生命。我的幼子名书经，未满周岁，幼女名酉芝，未满3岁，1938年夏因躲土匪，夜夜随其母亲宿于棉田之中，后因感受风寒患病而夭。村中如我的子女因匪患而死亡的还大有人在。由于土匪经常与官兵、团队作战，其阵亡的尸体，或暴露在野外芦林里，或抛诸河水内漂流，臭气熏人，传染疾病。1924年夏天，土匪和红枪会在京山县永隆河与官兵作战失败，打死了数十人，尸抛河中，顺水流下，我曾见浮尸一具又一具地流到我们村子后面的河水回旋处停下，苍蝇云集于尸体上面。乡人不敢收尸掩埋，致惹麻烦，胆大的青壮年农民，用竹篙将尸体推开回流处，让它往下游流走。1931年我由宜昌绕道武汉回故乡时，舟从天门山前过。见潘家渡口附近大回流荒野的河滩上面，白骨垒垒。乡人告我曰，当时河中的死尸多时，河中的水几个月不敢取饮。河鱼争食浮尸，因此，有的大鱼剖开它的肚腹，其肚腹内尚有死尸的手足指甲骨、鱼肉有毒，食之者中毒死亡。语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解放前，江汉平原一带地方年年有土匪作战，如观音湖刘丕院的附近鲤鱼湖，以及永隆河附近杨家峰、聊峭山、江家岭等一些平原青帐地带，土匪与官兵，土匪与土匪、土匪与团队等经常作战。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这些地方发生了流行性的瘟疫，死亡的人数很多，因此

这时天门县的人口数字大大降低，由80余万人降低为60余万人。农村里自然村因匪灾杀伤死亡与流离转徙，有的小村已不存在了，有的村子只剩下些老弱、“千村万落生杞柳”，其荒凉景象，使人目不忍睹。1947年我路过天门、京山，但见公路两旁一望无涯，几乎见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屋。

（湖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民国年间郧西匪患

王兴华　黄代芳

郧西地处鄂豫陕三省交界，山大人稀，交通闭塞，历代统治鞭长莫及，因此也是大小土匪活动的渊薮。民国年间，境内大匪小匪、明匪暗匪、亦官亦匪、时兵时匪的多如牛毛。老百姓在兵荒马乱中过着朝不保夕的苦难生活。

一、北伐战争前后

1924年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开始进行北伐。旧军阀逐渐土崩瓦解，残余部队，有的被收编合并，另立番号；有的重新组合，顽抗到底；有的化整为零，四处窜扰。他们在大城市、交通沿线呆不下去，便向山区逃窜，其中一部分便向鄂西北、陕南、豫西等深山老林蜂拥而来。郧西地处鄂西北顶角，南屏汉江天险，西北依秦岭山脉，东部接近豫西伏牛山区，地险林密，便于隐蔽，成为土匪盘踞或出入之地。当时在郧西骚扰最严重的有“老洋人”、唐鼎、李保魁（一说为李宝奎）、李昌友、李星武、张连三、老王太、崔二旦、王志胜、李斌等十余股。

大土匪头“老洋人”（本名张庆，后改名国信，河南人），原为军阀部队军官，后拉杆树旗，流窜为匪。民国12年秋冬之际，带领匪众万余人从河南窜扰郧西。农历十月十二日晚进城，奸掳烧杀，无恶不作。县城周围100余里，百姓逃遁一空，该匪在县

城盘踞两日后，十四日夜向西北方向逃窜遁入陕西。冬月上旬又回窜县境，在庙川、关防、槐树、上津一带骚扰。

北伐战争后，由军阀变为土匪的张连三，将“司令部”设在老河口，后移设郧阳，再移驻郧西。其众1万多人，分驻土门、香口、黄云、上津、马鞍、夹河一带。这批匪军的吃、穿、用一切开支都由郧西人民负担。人头税、房屋税、牛羊税、耕地税、屠宰税、枪支修理费、单衣费、棉衣费、鞋袜费等数十种。无粮无钱者，被严刑拷打，百般折磨。后来看到郧西再也榨不出多少油水，才把“司令部”移回郧阳。

唐鼎，又名唐立青，陕西商县白阳店人，原以掌箩为业。民国18年遭荒，拉杆树旗，在商州一带为匪。后被西北军杨虎城收编，挂牌“鄂陕剿匪司令”（实为杨的警备二旅一个团），从山阳窜至郧西“驻防”。当时郧西县长张凯臣，地方团练头目桂少翰（又名桂烈奇），有枪300余支，兵丁300余人，双方协议合作“剿共”。一次为争夺司令部住房，唐收缴了县里的全部枪支。从此，唐独揽全县军政大权，向百姓加税派款，有草鞋费、袜子费、纸烟费等。名目多达20多种。民国20年农历三月十一日（一说为二月二十三日）马鞍“大刀会”首领何经伟组织会众和农民2000余人，手持大刀长矛，抬着土炮，从马鞍出五顶，翻山过河，越沟跃涧，攻至县城西郊校场坡，直逼西城门外。双方交战数小时。大刀会组织涣散，武器落后，攻城不下，当天退回马鞍。

李保魁，原系张连三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后投靠老王太（四川开县人），民国21年农历八月，李保魁带领土匪200多人，从两竹经郧县南北峰窜至郧西。事前几天，县长华子林因城内空虚，调上津区董曹善亭的一个中队约100余人，来郧西防守。曹为保存实力，只带来一个特务班（主要是些“护兵”），10多把手枪，来到县城支应差事，当李匪离县城不远时，县长又命令曹调兵上城防守。曹却将自己的10多人带出北城门，仓惶逃走。八月初九拂

晓，李匪200多人从南门登梯入城。这次城内居民未及逃走。八月初九拂晓，李匪200多人从南门登梯入城。这次城内居民未及逃走，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匪盘踞三天三夜。仅城里被打死的就达10多人。十一日上午，匪撤出县城时，又拉走数百人。在土门干沟、上下香口和李寺关一带打死上百人。这次郧西共死300多人。

另一支残余军阀小头目李昌友，从四川插入陕南。开始驻旬阳，约3000多人，后来发展到5000多人。民国21年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围攻郧西县城，企图乘虚而入。由于势单力薄，攻城半月未破。从天河坪榆树垭一带退兵，窜扰观音、马鞍、白河、关防、庙川和陕南一带。所到之地，百姓的粮食、衣服和其它金银财宝均抢劫一空，妇女遭到凌辱，青年男子被拉去当挑夫。百姓死伤不计其数。

张连三部迁驻郧阳后，继续扩张势力范围，先后派人以金钱美女、威胁利诱等手段，收编了当时在郧阳境内窜扰的一些土匪，还收了从河南内乡、桐柏来的土匪头目崔二旦。后来，国民党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来郧阳谈判，副师长王怡群（住重庆）发来电报，联系收编。张同意归顺，改编为“均、漳、保地区剿匪纵队”，自任司令。纵队下分3个旅，其第三旅旅长唐鼎，驻郧西。

张连三驻郧阳时，他的骑兵连长李星武叛变，带领人马窜逃至郧西，与当时“驻守”郧西的唐鼎激战于宋家河的金盆。结果，唐部遭到伏击，唐鼎中弹身亡，唐的军队死伤过半，余部返回陕西。后来，人称此事为“金盆化糖（唐）”。

李星武打死了唐鼎，势力日增。不久，一度被收编的李昌友、李俣魁旧病复发，先后叛变为匪。3人合伙，李昌友为总头目，人称“三李合股”。“三李”以郧西为中心，穿梭游离于鄂西北和陕南各地，在郧西活动较多的地方是观音、马鞍、黄云、香口、沉溪、白岩、安家、茅坪、关防、庙川、大小坝一带，所到之地田

园荒芜，十室九空。

民国21年农历十月十三日，李昌友率匪众近万人攻打郧西县城。当时县城驻有胡宗南部一个团。团长姓胡。李企图吃掉该团。但打到南城门外，还未来得及进城，闻得国民党五十一师师长范石生率部数千人从郧阳北上增援郧西，便不战而退。但仍在郧西县境周围窜扰。

二、抗日战争前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外抗日，鄂陕边境的土匪活动有所减少，但山区百姓仍不安宁。几个大土匪头目在郧西闹了十来年之后，从外地又来了几个新的匪首。影响较大的有李斌、王志胜等。

李斌，据说是湖南人，由保安团哗变的。民国27年春，率数百人从郧县南化、白桑来到郧西三官洞、瓜子岭屯兵数日后，又西窜香口、黄云、上津、马鞍等地。这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陶铸、方毅派党员郑建安等人来郧西开展工作。郑的公开身份为郧西县合作指导室主任，以组织农村合作事业为掩护，团结社会进步力量，秘密发展党的组织，积极组建抗日武装。郑建安等人到马鞍同李斌谈判，想争取他走上抗日前线，但谈判3日未成。不久我地下党组织被破坏，郑建安被驱逐出境。后来，国民党保安团团长李朗星（后为襄阳专员）、郧西县长柯愈珊收编了李斌，把当时在郧西活动的大小土匪（包括本地外地在内）编为10个“大队”，“十大队”总头目王志胜（驻下香口，数百人）。

李斌被封为支队长，兼管“十大队”，也驻下香口。他在下香口召集“十大队长”开会时，对大家说：“当土匪没有好处，还是归顺民国政府为好，不然走到哪里总是挨打。”一个名余天官的大队长说：“‘匪’字是个半边框，封了三方，还有一方，框框里两

直六横，大路小路四通八达，不管谁来打，总有一条路可以跑。”结果 10 个大队先后哗变。大部份从沅溪河到陕西龙驹寨等地活动，不久被陕西国民党预备一师师长罗精华收编，带到西安缴了械。

余下的李斌带百余人，从香口到郧西，没进城来，直接到郧阳一带，后来去向不明。

李斌走后，“十大队长”之一的陈驼子未去陕西，他以沅溪河为中心，继续为匪。先后在香口、沅溪、白岩、九龙、茅坪、黄云铺等地称王称霸，作恶数年。后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归案。

接踵而起的是黄云铺的焦娃娃(大名焦雨亭)。开始为报私仇，派人到郧西城隍庙造枪厂，买来盒子枪 2 支，又通过买卖、抢夺、交换等手段，逐步发展到有快枪 10 余支、土枪 10 余支、大刀 20 多把，高峰时手下达百人。这伙土匪藏在边远深山老林，伺机窜入集镇，抢夺生活用品和金银财宝等，神出鬼没，动作迅速，随抢随走。仅黄云铺一地，小抢不计其数，大抢达 10 多户。民国 24 年冬的一天夜晚，富户王居朝被焦匪抢劫。计抢走大米、小麦 2 石多，箱子 5 口，银元数百元，金银首饰 20 多件，拉走王居朝及 3 个儿子共 4 人，藏入杨家沟垴白龙洞。焦匪传下话来，限 7 天内交白米 5 石、猪肉 300 斤，银元 500 元，花姑娘 3 个，否则就提着人头来烧屋。王居朝家里到处佐借，送去白米 1 石，猪肉 100 斤，银元 100 块。没达到要求，焦又传下话来，再缓期 3 天，不如数交来，就割掉王居朝耳朵、鼻子来见。3 天以后果然把王居朝的耳朵割掉用纸包着派人送到王居朝家。王家老少哭天嚎地，悲痛万分，实在无法交齐所要物品。后来除放回一个小儿子外，其余父子 3 人被杀死在一个大岩上。

类似这样被抢劫的户，还有王虎文、李连宾、王志坤等被烧房拉票，最后家破人亡。其余的户，有的逃往县城，有的托人向土匪说情送礼，甚至暗地勾结土匪，为其通风报信，出谋划策，名

为士绅，实为土匪坐探。焦桂娃为匪达两年之久，民国25年春，被逮捕归案，在郧西黄山枪毙，临死时，还狂叫说“老子死了也划得着，花姑娘玩了99个，人杀100个，现在该轮到我死了”。

焦桂娃为匪期间，土匪活动特点是：大杆少了，小股多了；明的少了，暗的多了；外来的少了，本地的多了。有的白天是人，夜晚是匪；在大路上是人，在山沟小岔是匪。在人烟稀少的关卡要道，或背弯暗地里，有时大白天就出现抢劫事件。特别是一到夜晚，三五成群、携带凶器，藏于暗处，发现有携带财物的人出现，便蜂拥而上，对来者一顿毒打，把所带财物抢劫一空，然后逃之夭夭。

象这样土匪出没过的地方，全县不计其数。仅天蓬山头道垭子，在民国的30来年中，至少大的抢劫行径就出现10余次。民国28年农历八月某日夜晚，月色朦胧，在香口官路沟有一个行人，背个小包袱在大路上行走。突然路旁有人厉声喊着：“不准动！把包袱放下，不然就开枪，小心你的狗命！”此人掉头一望，路边棉花地里果然有个半截人头在外，手中拿了个明晃晃的东西。他丢下包袱就跑。其实抢包袱的那个人是在棉花地里大便，见来了个背小包袱的，料是外地人，又是单独一人，于是见财起意，便去摘了根老黄瓜，冒充盒子枪，拿在手中吓唬人，果然生效。他大便后去捡包袱，内有衣料数件，银洋10余元。后来人们说：“一根老黄瓜就可发洋财”。

本地土匪另一个特点是，白天是人，夜晚是匪；当面是人，背后是匪。群众称之为：“两面人”。许多地方白天一村一湾，亲戚家门、朋友邻居，叫大叫小，有说有笑，一到夜晚，各怀鬼胎。一些户夜晚在冷不防中，突然来三两个人，头戴贼帽，面涂黑色，身罩怪衣，手持凶器，不声不响，把一家人绳捆索绑，丢在红薯窖内或拴在暗处，再把屋内粮钱、衣物抢个干净。次日对被抢之户，表示一番同情，或对“匪”痛骂一顿。此类事件，事后也有暴露

的，也有长期隐匿的。这类抢劫案多发生在山区，作案者不一定是成伙惯匪。有的是借机报仇，有的是见财起意，有的是生活无着，饥寒起盗心。

三、即将解放的前两三年

1941年冬，国民党实施新的乡政保甲制度，乡公所设有“义警班”，一般20人左右，20多条枪。每个乡保还有国民兵组织，也发有少量枪支，其余均有刀矛。这些措施名为防“匪”，实为“反共”。

1946年6月底，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7月中旬，从豫西到陕南，路经郧西边界。国民党一三五旅、六十四旅万余人尾追而来，先后窜到郧西。他们每到一地，抢占民房，抓丁派款，奸污妇女，抢劫群众财物，随便开枪打人，弄得群众关门闭户，连国民党乡公所也被洗劫一空。土门、香口、黄云铺、上津的乡公所，听说一三五旅要来，全体人员跑得一个不留，3个多月无人见面。老百姓为了逃避国民党军队，远藏深山，以至土地荒芜，杂草丛生。仅黄云铺一地，荒芜土地1000余亩，被国民党匪军奸污的妇女达20人以上。青壮年为了躲兵远离家乡。尽管如此，被拉走的仍然为数众多，仅黄云铺被拉走至今杳无音信的还有10多人。在上津，连正在送葬的人也被抓去当挑夫。群众说：“跑‘国军’比跑土匪还难得多。土匪人少，‘国军’人多；土匪来的时间短，‘国军’驻的时间长；有的土匪主要是整少数有钱人，而‘国军’不分军民人等都抓。因此人称‘军比匪狠’。

国民党内部许多做官的乡保人员是“明官暗匪”。有的本来就是“土匪”，抗战胜利以后，摇身一变，成为“剿匪英雄”。当时黄孟乡公所“师爷”王启哲吃稞50多石，父亲是一笔滔滔的“文人”，本人是文化股主任，老百姓称他“师爷”。一有机会，他便

出外抢劫作案。民国33年冬，一天夜晚，王带领家丁，到得胜关下边官路沟一家饭铺抢劫陕帮盐客。王掂着手枪，顶着盐客头说："你们是共匪，不许动。敢动，老子就枪毙你！"随后令人把客商所挑的食盐700余斤、银元300多块抢个精光。半夜回家，第二天上午照常到乡公所"上班"。民国35年腊月三十日夜晚，他身披大衣，头戴礼帽，一手打着电筒，一手提着盒子枪，在黄云铺乡公所上边石岩湾遇着一个过路人，不问青红皂白猛打一顿耳光，把过路人身上仅有盘缠费10块银元搜去。然后他抢先一步回到乡公所，立即把衣帽一换，坐在办公室里。当这位被抢者到乡公所报案时，王反咬一口说报案人"是新四军派来的奸细"。他家父子4人先后霸占民妻7人，受欺凌的贫穷户敢怒不敢言。

类似这样的事件，国民党统治时期，各乡保都有，只是数量与程度不同而已。

（湖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张治中谈湘西匪患

谢心宁整理

1937年11月，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人，二级陆军上将）接替何键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为了安定后方，团结抗战，建设一个新时代的湖南，张治中面临着亟需解决的三大难题，即伤兵、兵役、土匪。如何解决匪患问题，张治中于1938年5月31日至6月14日出巡湘西，作深入、全面的考察。所经过的县份有沅陵、辰溪、芷江、麻阳、凤凰、乾城（今吉首）、永绥（今花垣）、泸溪、常德、临澧、澧县等10多个地方，可以说是从上湘西走到下湘西，即从沅水流域走到澧水流域。张治中从芷江到乾城的几天，行程完全是山路，巡视归来，他感到“古道不存，人心陷溺”；“正义不存乎天壤之间”；“官场风气败坏”；“社会风气消沉”。1938年6月20日，张治中在湖南省会党政纪念周之际报告词中，作了《巡视湘西之印象及感想》的讲话，其中谈到了湘西匪患问题，现从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公报·专载》中全文抄录如下。

据很多人讲，湘西匪患之形成，大致不外下列几种原因：

第一是受了政治的压迫而激起反抗，所以逼而为匪；

第二是受了升官发财心理的影响，就是以祸国殃民的行为来做升官发财的捷径，而因为历史的风气关系，大家也不以做匪为耻辱，这样啸聚地方的也不少；

第三是一部分人为了保身家，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财产，以

防匪而为匪；第四就是甘心为匪的，这就是真正的积匪，是完全以匪为职业，以匪为生活。

湘西匪患的形成，大概不外乎这四个原因，根据这四种原因来分析，我们对于匪患的解决，就可以有相当的办法。例如：

第一类是因为政治压迫引起反抗来为匪的，现在省政府决心为人民服务，决心为人民解除痛苦，人民有话尽管说，当然谈不到什么压迫，所以现在是无所借口，当然要觉悟，要向政府归心的。

至于第二类，以做匪为其升官发财的捷径，及第三类为保障其身家生命财产而为匪的，我们都可以设法使之感化觉悟，可以善为化导；

只有第四类的匪，即完全是以做匪为其职业，为其生活，不受政府支配，不听政府合理的解决，那只有绝对地去剿，绝对地去肃清，没有第二句话讲。所以现在可以讲，湘西土匪是不成问题的！我们深信在不久的时间就可以得到一个正本清源的解决。当然要想达到这目的，还是要我们去努力，多方面地去努力，绝不是轻易说一句大话就可以解决得了的。比如刚才讲的历史风气问题很要紧，也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有很多人好像不知道做匪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也不认为是罪恶的事情，这就糟透坏透了！我们以后应该要怎样形成一个新风气，使大家都不想做匪，不肯做匪，都以做匪为最大的耻辱，最大的罪恶，上是辱没了他们的祖宗，下是辱没了他们的子孙，在这种风气之下，才可以使人共趋于善，这才可以得到长治久安，一劳永逸的解决。

讲到这一种历史的风气，有一个故事可以同大家讲一讲：这故事是说明社会上一种蛮性的遗留。我听到一位负责的同志讲，在芷江附近有一个乡间，风气非常奇异，12 岁的小孩子就佩上一把刀，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动手就是杀，假使刀拔了出来人杀不到的话，最少也要杀掉 1 头猪和 1 条狗，这意思就是说：这一把拔

出来的刀，非要带了血，才肯插回鞘里去。据说有这么一回奇事：有一个父亲愿意拿出500元要一个人把他的儿子杀掉，这一个人就真的提了刀到他的家里要杀那一个儿子，临时心里一想：这一个父亲要我杀他的亲儿子，莫非是有意思，万一杀了以后他又要我偿命，那可怎么办？就回身出来，踌躇了一下。可是再一起，这把杀人的刀已经拔出来了，刀不见血又怎么行呢？于是再跑进去，一刀就把这一家的儿子杀死了，到后还领了500元的赏洋。这种风气，这种残酷，真是人间很难想像的！我自己虽然没有亲身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不过和我讲这话是一位负责同志，我想不会不是真的。这一种原始的风气，是必需要用教育的功夫去转移，去改造。

另外还有一种风气，一家人儿子出去为匪，名叫"打生意"，一年到头可以不回来，但是在每年除夕吃年饭的时候，做儿子的一定要赶回到家里的，否则就算是死了，儿子即使死了，但是这一家人没有一点痛惜之心，还是一样的兴高采烈地过年。像这一种民性强悍，有战斗的精神是好的，但是这一种残酷是要不得的。每一个负政治责任的人，就要因势利导，潜移默化，撷长去短，拨乱反正。我们要发扬其固有强悍战斗的精神，这是可以有利于国家，有助于民族之兴盛的。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社会的安宁，为了人类的进步；小而言之，为了地方风气地方秩序的正常发展，我们也要运用政治的力量、教育的方式削除固有强悍中的残酷，来改正那一种狭隘的近于蛮野的战斗的精神。因此我以为这一类风气的清纯还有待于我们负政治责任教育责任的各方面的同志们的反省和努力。

还有一件事，也就是一种严重的病态的存在，不能不提出来要求大家的注意。我们设官收税原有一定的规章，一定的步调；但是在湘西有些地方却有着一种独特的情形，离奇的秘密的税收机关，还是存在；但这不是中央所收的税，也不是省政府和地方所收

的税，而是土匪要收的税，是所谓某大王某大王的税收机关。比如商人运输的桐油，经过某大王的“势力范围”，每1桶就要交3块钱的土匪税，这算是买路钱或者保险费。因为假使不缴纳，那货物的通过和安全，就要发生问题，要是缴纳了，那就可以通行无阻。所以现在一般商运，在那些地方并不是受着政府的保护，合法政治的保护，而是受土匪的保护，受非法的黑暗势力的保护。这是不是一个耻辱，这是一个什么原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发现这样事情的地方，还是一个重要的所在，还是有正式保安团队驻扎在附近的地方，又是政治力量可以控制到的地方，而尚且有这样的情形，那其他没有保安团队驻扎的地方，政治力量所控制不到的地方，土匪横行，更是不知道要到如何境地。这成为一个什么国家？！

这些土匪势力是怎样养成的呢？当然是有历史的关系，有地理的原因，也有社会的政治的原因。这些前面已经讲过。我听到各方面的报告：在湘西各县要成为一个土匪容易得很。原来有枪的当然一开始就可以为非作歹掳人越货，就是没有枪的，只要拖到别人的1条牛，跑到一个制造土枪的地方（是在川边一带），就可以换1根土枪，拿了1根土枪，就可以向老百姓去抢枪去吊羊，这样啸聚几十人几百人，就成为股匪了。根据这样的实情来说土匪所以形成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政治力量的薄弱。匪患嚣张到这一个样子，人民痛苦到这样子，我们负有政治责任的人，尤其是负有军事责任的人，现在大家要听一听，看一看一般人民是过的什么生活，所处的是什么境遇；现在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世界；要是我们不能负起责任起来解除人民的痛苦，不但不配站在我们的地位，而且也不配做一个人！这是我们莫大的罪恶，也不要说是莫大的耻辱！希望我们各位负责的同志要静夜自思，时时反省，错误要坦白承认，责任要坚决负起，不必掩耳盗铃，更不必粉饰太平。只要我们把握时机，负责去做，一切的难题都是

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绝对不讳疾言医，要绝对指出病症研究病因之所在，要求大家负责来医治，使一切早日恢复健康！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七大股匪乱凤凰

凤政文

凤凰县北接花垣、吉首，东靠泸溪，南邻麻阳；西边则是贵州省的松桃、铜仁，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从民国初年开始，时局动荡，地方武装势力蜂起，凤凰亦先后出现一些形形色色的杂牌队伍。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妄图在湘西建立一块反共基地，欺骗收买地方武装，扯出了各色各样的反共旗号。最后，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凤凰为害数十年的兵灾匪祸，尽数肃清，各族人民终得安居乐业。现将民国年间凤凰7支地方武装的始末概况略述于后。这7支队伍是：龙清富部、杨和清部、唐汉云部、谭森部、石光寿部、龙再兴部、吴香亭部。

龙清富部

龙清富，凤凰上打郎人，1884年生。少年时家境贫寒，全家每年收入仅十几运 谷子，自给不足，兼养鸭子添补。后来遭到贵州土匪的抢劫，室空如洗，生活难度，于是投奔新寨隆屏贵部下。混了一年多，结识了黔东的一些绿林人物后，回到上下打郎，纠集了10多人枪，打家劫舍。搞了几年，队伍扩展到五六十人枪。由于人多势众，劫物愈多，队伍扩大到100多人枪，便横行于总兵营南部乌巢河两岸，有时也向北侵犯到陈渠珍部下团长龙云飞父子俩的势力范围之内。

早在1929年，龙清富就曾与附近的小股武装龙建章联合，不断向龙云飞挑战逼进，进行与龙云飞争霸的尝试。一次，在胜花哨附近，龙云飞之子龙皋如被他们拦击，险些毙命。以后龙云飞向陈渠珍告状求援，陈派了督察大队长韩正鹏带领一队人马到总兵营婉言和解。干戈虽息，但积怨尤存。龙云飞父子悉心经营自己的"封地"，势力不断扩大，意欲统一总兵营一带地区。因此对龙清富的各种挑衅十分愤怒，一直设法寻找借口，企图消除这一股与之争霸的势力。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牛练塘是龙清富自划的势力范围。当地农民隆福共有一个妹妹，嫁在龙云飞辖区大码的一户农民家里。婆家觉得这个媳妇作风不正，不服管教，经常发生口角。娘家婆家双方因而发生口过，问题越闹越大。牛练塘人仗着龙清富和龙建章的势力，对女方的婆家进行训斥，语言中涉及到龙云飞父子。大码人很不服气，认为他们仗势欺人。有人唆使，要大码人向总兵营龙云飞告状，企图搬出团长这块"天牌"来压倒对方。龙云飞不愿多管闲事，只是劝说而已。但是他的大少爷龙皋如那时已当营长，正在家里，认为牛练塘人是"骂狗欺主"，在"太岁上动土"，但又不好直接插手。于是他就另寻事端，把事态扩大。他暗暗指示他的亲信布商龙二林，要他在赶两义河场那天到总兵营通往牛练塘的路上假报抢案，说是龙建章的部下所为。

龙建章是牛练塘人，早年毕业于贵州崇武军校，曾在陈渠珍部下当过大队长。龙建章平时不把龙云飞父子放在眼里，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介莽夫"，不足为伍，龙云飞爷子早已怀恨在心。陈渠珍部队被何键改编后，龙建章也回到家里，结纳绿林好汉，集聚力量，坐观风云。

龙皋如接到龙二林这个假案，立即通知龙建章，要他退还布匹，交出人犯。龙建章觉察事出有因，知道龙皋如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便以礼相答说：“是否我们的人，我负责查查。如果是部下所为，理应交还原物，严惩不贷。如若不是，那只有请龙营长自己负责了”。时间只限一场（5天）。龙皋如也表示赞同。但他又感到龙建章答复的“请营长自己负责”一语是“将军”的一着。他反复思索，到了第三天，龙皋如就出其不意地带领大队人马到了牛练塘，声言要搜查抢劫的布匹，缉拿抢劫罪犯。龙皋如密令将布匹带往被搜查人的家里，栽赃肇事。当搜到龙建章堂兄家里时，居然拿出一大匹家织棉布。龙皋如以此为“证”，当众宣布这是“抢劫”龙二林的赃物罪证，并立即把龙建章的堂兄枪毙了，同时放火烧了几栋房子。他还含沙射影，出言不逊地警告牛练塘人：“以后不要为匪，若再为匪抢劫，严惩不贷！”

龙建章受到这一突然袭击，见堂兄被无辜杀害，村民房子无故被焚，一股复仇怒火点燃起来。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势力敌不过龙云飞父子，便跑到打郎向龙清富求援。龙清富正想向龙建章求教往北扩张的高见，得此良机，便可师出有名了。于是满口答应龙建章的请求，立即整顿人马进攻总兵营。

龙清富与龙建章联合，带领两三百人马，突袭总兵营。龙云飞从梦中惊醒，见对方来势凶猛，身边只有几十个毫无准备的人，一面慌忙布置抵抗，一面带领全家向千潭方向沿山逃避。而龙清富、龙建章则亲自指挥，朝着龙云飞的公馆猛烈开枪。龙皋如的部下慌忙上阵，抵挡不住龙清富、龙建章的进攻。龙清富的人马直冲到龙云飞家里的中堂，龙云飞的保镖们拚命还击，才把龙清富的人逼退了。龙清富把龙云飞守家的人打死了几个，大骂一阵，在街上烧了一些场棚，鸣枪一阵，以示“惩罚”，然后凯旋而归。

龙皋如惹是生非吃了大亏，更加恼羞成怒。他发誓报仇，准备二打牛练塘。

龙清富、龙建章得胜回到牛练塘，认为打了胜仗，为地方争回了这口气，摸了老虎屁股，显示了自己的威风，便得意忘形，派

粮捐款，杀猪宰羊，庆祝胜利。随后龙清富率领人马自回打郎，并与龙建章订下了“友好盟约”，声言如果龙云飞父子再敢打来，就二打总兵营，杀他个“片甲不留”，活捉龙云飞、龙皋如，扒开他的蛤蟆洞，剥掉他的蛤蟆皮。

龙清富离开牛练塘不久，龙皋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以后，探知龙建章的队伍已经分散，虽有吞噬总兵营之心，但目前并无准备。于是龙皋如发出号令，要深入“匪巢”再次“剿匪”，带领200多人枪，从四面八方杀向牛练塘。牛练塘人临时组织几十人守住寨子抵抗，纯系乱兵上阵。龙皋如人马的一阵排枪，就把他们吓得逃之夭夭。龙皋如率众杀进寨子后，便一阵乱枪打死一些人。接着又放起一把火，顿时浓烟蔽日，火光冲天，80多栋房子，刹时化为灰烬。

这一来，龙云飞父子与龙清富、龙建章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龙清富和龙建章进一步整顿人马，招募“勇士”，扩大队伍，筹备钱粮，积极备战。不久便纠集了三四百人枪，准备二打总兵营。

龙云飞听说龙皋如烧了牛练塘的房子，又打死了人，知道对方不会善罢干休，骂了龙皋如一顿之后，不得不做好迎战的准备。他了解对方的实力现在已经超过了自己，不向外求援，结局将不堪设想。于是一方面组织人马，安置防线，准备出击；另一方面星夜派人前往腊尔山他女婿龙和清那里搬兵。

1935年冬，龙清富、龙建章兵分三路向总兵营进攻。他们的精锐部队很快占领了马鞍山。另外两路人马从好友等方向扎营包围。总兵营被团团围住。龙云飞的队伍也是日夜不眠，随时准备迎击。

龙清富驻扎在马鞍山营盘里，满怀胜利的信心，准备第二天出击，不料时至深夜，龙和清、龙再兴带领300多援兵，已从新寨经大码到达，连夜将马鞍山团团围住，突然向龙清富的司令部发起攻击。龙清富、龙建章遭此袭击，措手不及，慌忙把人马从

睡梦中叫醒，仓促应战，一出阵就被龙和清、龙再兴的伏兵打死不少。龙清富、龙建章只得率队突围，冲出去了一部分人，还有100多人仍在包围圈内，以岩墙为工事，与龙和清、龙再兴的队伍相持射击。为了全歼龙清富、龙建章的人马，龙和清、龙再兴下令烧毁马鞍山营盘，只留一条岩板斜道，让龙清富的队伍逃跑，并挑选了一些枪法准的兵丁进行阻击。在熊熊大火的照耀下，突围出来的人走上岩板斜道，便被埋伏在暗处的“神枪手”一一击毙。龙和清、龙再兴则集合人马，汇合龙皋如的部队乘胜追击。

龙清富、龙建章带领残部退回打郎，利用人熟地熟的条件，据险阻击追兵，在打郎附近又展开了激烈的厮杀。结果，龙清富、龙建章的队伍还是抵敌不住，只好退出打郎。在这场厮杀中双方伤亡都很惨重。龙清富的大将“鸡公大王”吴春洪在肉搏中身亡，龙和清、龙再兴的几名勇将也在龙清富的枪弹下丧命。龙和清、龙再兴一不做、二不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将打郎以及附近的几个寨子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龙皋如等追击龙清富回来，又把打死在马鞍山的龙清富部下的大小头目和骨干分子的脑袋割下30多颗。血肉模糊的人头和无数的尸体，放满了黄茅坪桥边和路边，惨不忍睹。

这一次总兵营地区二虎争霸，以龙云飞父子的胜利、龙清富的失败而告终。二龙相争，百姓遭殃。马鞍山、牛练塘、上下打郎以及总兵营附近的许多村寨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共死伤四五百人。无数苗家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无数孤儿寡妇号泣流浪。

1937年，湖南省主席何键派二十二师张惠忠旅进驻凤凰，企图彻底清除凤凰的地方武装势力。他们以“清匪挤枪”为名，深入苗区，大肆敲诈勒索，搜刮民财。陈渠珍许多旧部及家属均受牵连，如龙云飞就被勒令交出存枪。这时从永绥开始爆发的“革屯”运动愈演愈烈。为切身利益，龙云飞试图利用苗、汉、土家各族人民大闹“革屯”来重新寻找出路。龙云飞到武汉蛇山参加

倒何秘密会议后，根据陈渠珍的密示回到凤凰，便把有名的武装势力如龙和清、龙再兴、石光寿、龙清富、田儒礼、谢老祥和麻阳的自卫队龙文才等组织起来，准备倒何。

龙清富自与龙云飞父子厮杀成仇后，便与龙云飞等势不两立。现在陈渠珍已离开湘西，何键又派嫡系部队进逼苗乡，形势日益紧张。龙云飞认为，地方势力只有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才能求得生存。于是就请龙辑五和其部下吴兆用出面与龙清富等调解，一再说明省军来湘西是有一定用意的，若不统一对外，兄弟相煎，必遭各个击破，地方必乱。经过一段协商，他们抛弃前嫌，不记既往，各领自己的人马，各占自己的地盘，一致对外，互不侵犯，互为援应。龙云飞组织了人马以后，在杨光跃的协助下，成立了"湖南抗日革屯倒何义勇军"。当"革屯"军被收编开赴永顺、大庸时，龙和清、龙清富都被升为团长。但他们不愿离开老巢去永顺、大庸，就把自己的队伍分别拖回了腊尔山、总兵营。

1940年国民党派李宗祺来凤凰当县长，到了凤凰后，他突出地抓两件大事：一抓"剿共"，二抓"剿匪"。李宗祺一边整顿武装组织，一边进行"剿匪"。他首先协同独立团向总兵营的龙清富进行驻剿。他们一进入总兵营，就把盘踞在这里的一些小匪、散匪打跑，杀的杀，抓的抓。然后把龙清富包围在打郎地区。经过上、下打郎的几次激烈战斗，龙清富受到了严重打击，便将队伍化整为零，凭着高山悬崖的天险，人熟地熟的条件，昼伏夜出，与驻剿部队周旋，拖得李宗祺疲惫不堪。李宗祺感到单纯硬打，不同时采取"招抚"的办法，是降服不了龙清富这些人的。于是经双方派人商谈，龙清富为形势所迫，便接受了李宗祺的招安。在1940年古历冬月，龙将部分贵州来的人马遣散回籍后，还有60多人枪，向李宗祺"自新"。李宗祺也想利用龙来剿匪，不咎既往，热情接待，以示抚慰。并任命龙清富为警察局的巡官，除原有人枪外，还给他添了一些警察，协助政府"维护地方治安"，驻扎在

廖家桥。龙清富因此受宠若惊，在维持地方治安上也比较卖力，受到了李宗祺的好评。

1942年秋天，土匪杨和清从麻阳抢劫窜回阿拉营地区，要经过廖家桥。李宗祺获悉，即令龙清富堵剿。双方在廖家桥发生了激烈战斗。龙清富奋力冲锋，把杨和清匪部击败，在追击途中，龙清富遭到杨的伏击，大腿中弹负伤，医治无效而死。

杨和清部

1938年湘西“革屯”兴起时，杨和清混在“义勇军”中当了个分队长，在攻打乾城和凤凰时，放肆抢劫，他的队伍得到扩充。陈渠珍收编“革屯”军，龙云飞部开往永顺，杨和清暗率亲信10余人溜回凤凰，在阿拉营、新场、茶田、贵州的云场坪以及凤凰麻阳边界一带为匪。不久后又招安在顾家齐部当排长。顾部奉命调往前线抗日，部队开到芷江，杨害怕抗日，又约心腹杨红光等9人连夜开小差潜回凤凰。他以搜罗散匪散枪、逼民买枪等手段拉起一支队伍，自称“连长”，又至“营长”带着队伍到湘黔边境杀人越货，抢村劫寨。不到两年，他竟啸聚了五六百人，300多枪。从此，杨和清自称“司令官”横行于铜仁、松桃、麻阳、怀化、芷江等县边境；出没于本县的新场、黄丝桥、阿拉营、水打田、溪口、总兵营、木里等乡的丛山峻岭之中。以后他又勾结黔东股匪盘踞于铜仁六龙山，在铜仁凤凰边境一带骚扰。

有一次，杨和清手下的几个枪兵回转到他的家乡大岔，在小河正遇着新场乡乡长杨钧带领一排乡兵从大岔而来。因为杨钧与杨和清是冤家对头，狭路相逢，杨钧马上命令乡兵把那几个人包围，当场打死了两人。过了几天，杨和清带着人马回到大岔，把保长杨七光叫来，说他暗通团防局打死了他的兄弟，当场把杨七光拖到寨前溪边枪毙了。又到杨七光的家里，将杨的妻子满氏拖

出打死，还把杨只有10岁、7岁、5岁的3个小孩用刺刀戳死，将杨七光家的东西抢光，最后放火把3间瓦房烧掉。

1943年，凤凰县长李宗祺大量招安土匪，吴妹树、吴香亭、田茂喜、杨熙清、吴春刚、苏正武和杨和清等大小头目47人，都先后“自新”、“招安”。李宗祺将他们分别安排在警察局、乡公所，委以各种官职。

1949年11月，湘西全境已先后解放。7日，根据湘西行署的指示，凤凰县旧政府停止了一切活动，成立治安委员会。下旬，又将谭自平和熊子霖所辖的湘西自卫军官兵800多人合编为凤凰县地方常备队，受治安委员会军事组领导。此时杨和清在常备队中当中队长。正当县人民政府忙于接管旧政权，建设新政权的时候，杨和清在阿拉营反水了。他勾结匪首唐汉云，一同前去攻打松桃县盘信区人民政府。盘信区中队早有准备，予以猛烈反击。经两小时激战，匪被击溃。

事件发生以后，县长宋子兴、常备队指挥长谭自平当即采取了两条措施：一面派人去松桃县与解放军联络，商讨剿匪之策；一面通过杨和清的部下杨光珍、杨燕平的关系，带着谭自平的信到黄合的哈沙田争取杨和清回头。经过反复争取，杨和清终于带着60多人再次投诚，驻熙和乡的杜夜。杨和清匪性难移，他打着“维持地方治安”的旗号，公开强征商贩的保路费。摊派农民的购买枪支弹药费；勒索商人赵老板光洋400多元，并将赵的一个小孩杀死，勒逼小垅滕树礼交纳光洋470多元，交钱后又将滕杀死；还“关羊”抢劫一个姓沈、一个姓麻的布商，杀死沈老板；1950年2月3日，还杀害我干部杨再琼；此后又与唐汉云、谭德洪、向良、张长仲、刘翼等匪首勾结，在湘黔边境四处抢劫，袭击我人民解放军及县区工作队。

1950年7月初，杨和清在总兵营参加了龙皋如组织的“湘鄂川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自卫军”，被任命为“副总司令”。他接受

了攻打阿拉营的任务，强迫常备队中队长田茂喜30余人、机枪2挺反水入伙，随后将廖家桥至阿拉营一段的电话线破坏。他还在拉毫、都里、阿拉营、牛斗营等地勒逼民枪，声言凡不缴枪，不入伙者杀全家。

20日，杨和清潜回总兵营，接受了再次攻打阿拉营的任务，深夜召集紧急会议，宣布“反共救国自卫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决定第二天上午抢劫阿拉、然后攻打县城。谁知第二天拂晓，阿拉营镇子周围的各个制高点上都布满了解放军。杨和清闻报，慌忙命令匪众四散逃跑，化整为零，时聚时散地进行活动。

8月3日，杨和清再次投降，经过一个月的教育改造，让他回到城里自己家中，由谭自平负责控制。杨和清在家门口张贴了“和平处世、清白传家”的对联，用以粉饰自己，自欺欺人。但其匪性难移，乘人不备，于9月4日深夜潜回大岔，立即找到为其隐瞒枪支的原骨干杨树保取出枪支，邀约匪徒，大肆造谣说：“美国支持蒋总统，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爆发，各地纷纷反攻，我们要立即行动，不要错过机会！”次日，即9月5日，他又公开反水，自称“司令”，上山为匪去了。

1950年12月，杨和清匪部在我解放军部队的沉重打击下，只剩几个人了。在投诚自新的原匪部骨干杨光珍等人的带领下，解放军剿匪飞行小组在12月14日，找到了杨和清藏匿的地方——岩板井的白虎山。入夜，飞行组在山中的一个小窝棚外把杨和清等围住。杨和清吓得没命奔逃。连枪都丢掉了。飞行组竭力追捕。却误把杨卿光当成了杨和清。结果，杨卿光被擒，而杨和清却侥幸逃脱。

杨和清拚命逃脱以后，飞行小组毫不放松，寻踪觅迹追捕，他只身逃到都里一个姓石的老庚家里躲藏起来了。这时，他已面黄饥瘦，形容憔悴。1951年1月9日下午，风雪交加，大地一片寂静，杨和清象一只打伤了的豺狗一样，躬腰低头来到烂泥坝他侄

女婿王永树家里。他哪里料到，他本是来“避难”的，却反而钻进了“口袋”。原来王永树夫妇经过政府做工作，提高了觉悟。他们协助解放军把杨和清抓获。县人民政府于1月19日召开公审大会，将杨和清处块。

唐汉云部

唐汉云，凤凰阿拉营教场人，行武出身。早年为暂五师吴光烈团部卫士，后任班长。返乡后，任毓才乡乡长。解放前夕，他拖起一支队伍，在湘黔边境四处抢劫。

1950年4月，唐汉云率部80余人、枪30多支，与杨和清及松桃盘信乡乡长张长仲、大兴乡乡长向良勾结，突袭解放军盘信区中队，被击溃。溃逃时，他们顺势抢劫盘信附近的村寨，抢走耕牛13头。更为灭绝人性的是，唐汉云匪部竟然扒开我剿匪牺牲的解放军王连长的坟墓，拖出尸体用柴火焚烧，以示“报仇”、“泄恨”，反动气焰嚣张已极。凤凰县人民政府因唐汉云罪恶昭彰，布告全县，公布其罪状，下令通缉。县长宋子兴、常备队指挥长谭自平一同到唐匪家乡阿拉营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安抚工作。可是宋、谭回县以后，唐汉云又返回阿拉营，张贴反动标语，散布反动言论。进行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宣传活动，欺骗恐吓群众。他还派人进入县城张贴反动标语。

1950年6月23日，唐汉云探知有几辆汽车要从铜仁运布匹到松桃县盘信区去，便纠集匪徒500多人。准备阻击车辆，抢劫货物。就在这天，贵州省军区文区团在松桃县城慰问演出结束后，分乘二辆卡车从松桃县城出发，拟经铜仁回贵阳。车上载有80多人。文工团大多数是女同志，除几支做道具用的枪以外，没有别的武器。铜仁军区派了一名排长带着一个11人的步兵班护车。盘信区人民政府政委兼区武工队队长张清田因公要去铜仁，也搭在

车上。还有一些搭便车的当地党政工作人员和驻军出差干部。护车的主力都在第一辆车上，两车相距约200多米。当第一辆车驶进尖坡附近时，土匪即从山头上端着枪向车子冲来，同时用机枪向车上的人射击，当即有五六位同志伤亡。解放军利用汽车掩护立即进行还击。排长带领一个突击组抢夺制高点时不幸中弹牺牲，班长又带突击组抢夺制高点，也牺牲。凶恶的土匪更加嚣张，一片冲杀、叫喊投降之声，逐步向汽车合围。此时盘信区政委张清田又组织突击组，第三次抢夺制高点，仍没有成功，唐汉云匪众经过3个多小时的围攻，仍然摸不清我军虚实，而心里想的仅是抢劫车上的东西，所以只停留在周围的山头上进行防守式的射击。张清田组织撤退，与第二辆车的人员汇合。这时，唐汉云等匪众见车上无人，蜂拥而至，争先抢夺车上的东西，遭到我猛烈射击。匪徒纷纷倒下。我军乘机占领了两个山头，形成连环阵地。匪徒们抢不到什么财物，又见解放军占领了山头阵地，已知失算。我军始终坚守阵地，相持到黄昏，张清田准备组织突围。这时，从铜仁方向开来了二辆汽车，匪众误认为是铜仁来的援军，自相惊扰呼叫“解放军的救兵来了”，纷纷溃退。经过一场恶战，唐汉云的2个堂弟送了性命，匪兵死伤不少。我解放军战士共牺牲7人，文工团被捉去2名女同志，而后又被救了回来。唐汉云潜回阿拉营后，继续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搅得人心动荡，社会不宁。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谣言四起。唐汉云等认为反攻时机已到，于是拚命扩充队伍，准备举行武装暴动，他们在打动了阿沙塘以后，继续在凤凰、铜仁、松桃边境骚扰。他还窜到总兵营，拜见了龙云飞及其儿子龙皋如、侄子龙恩铭等，积极策划联合各匪部攻打凤凰县城。

6月底，朝鲜战争爆发，凤凰县境内大小股匪蠢蠢欲动。此时，唐汉云又勾结黔东股匪吴克惠、吴克信等往来于总兵营、阿拉营、盘丝营（盘信）之间，还派人去拉常备队的人枪。

1950年7月11日，龙皋如在总兵营附近新寨召集了唐汉云、杨和清（时尚任常备队中队长）等人，宣布成立“湘鄂川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自卫军司令部”。唐汉云被委任为前敌总指挥兼纵队司令。司令部定于7月15日，各部带齐人枪在总兵营集中，兵分两路：一路占领得胜营，一路占领阿拉营，枪夺仓库，备足粮食，然后东西夹击，攻打凤凰县城。

7月15日，各路匪兵约千人，在总兵营集结，并商定路过木里时先将县委派在维新乡的工作组和一个排的解放军消灭掉。16日，“自卫军”总司令部宣布了行动计划，命前敌总指挥唐汉云、副总指挥龙恩光、参谋长陈靖熊带领600多人，由唐汉云统一指挥，向得胜营行进。

维新乡的县委工作组和解放军获悉敌情，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主动撤退的策略。“反共救国自卫军”在维新乡扑空以后，唐汉云督促匪部快速前进，约9时左右，到达得胜营附近，探悉驻得胜营的解放军也已撤回凤凰。于是他们长驱直入，占领了得胜营。17日上午，唐汉云匪部打开仓库，抢去国家稻谷280多担。他们还大肆造谣，四处张贴反动标语，什么“打倒解放军”、“活捉宋子兴”等。

7月15日夜，沅陵军区接到凤凰县委的紧急报告，遂命驻麻阳的一三九师四一七团副团长丁原昌率人民解放军4个连赶来凤凰进剿。加上原驻凤凰的四一七团警一、警二连，县大队2个连和常备队，共有武装力量约1000余人。17日下午6时，进剿部队与匪部发生激战，我军用迫击炮、六〇炮掩护配合进攻。唐汉云匪部一听连珠炮声，阵势即乱。又见隔河右翼龙恩光部先已崩溃，恐为解放军包抄，不得不败退。众匪见唐汉云败退，即如惊弓之鸟，慌忙争先奔命。解放军很快收复了得胜营。19日，解放军继续向维新乡进剿。这天下午，匪众千人左右集结于维新乡，正强迫群众杀猪煮饭，准备饱吃一顿。下午4点多钟，当匪众争菜抢

碗、筛酒盛饭之际，我剿匪部队的炮弹在匪兵中开了花。众匪慌忙持枪抵抗。双方激战个把小时，匪部在解放军炮火轰击下，四散溃逃。

7月20日，唐汉云等分别率部从维新乡、香炉山、梨口嘴绕山道退至总兵营。时有黔东股匪吴克惠、吴克信和泸溪土匪李祥云、欧光富等从贵州松桃县地草坪率部赶来，杨和清从阿拉营赶来。他们在总兵营龙云飞家中开会，总结第一次攻打得胜营与维新乡的经验教训，分析形势，研究再次攻占得胜营、阿拉营以至夺取凤凰县城的计划。会议最后决定，仍由唐汉云、杨和清分别率匪部抢占得胜营、阿拉营。

21日，唐匪等立即行动。他们探听到得胜营并无解放军驻守，唐汉云等率部300余人，于上午11时，分三路进犯得胜营。当时，我驻泸溪解放军四一六团三营八连，为追剿徐汉章匪部陈靖熊、李祥云、杨昌炳等人，先天晚上从狗爬岩赶到得胜营住宿。匪众进入得胜营即鸣枪，分头抢占书院和后头坡制高点控制全镇。解放军立即占领了文昌阁，用六〇炮向书院、后头坡两地轰击。唐汉云等匪首竭力督促匪众继续进攻。解放军沉着反击，用六〇炮、机枪、步枪交织成严密火网，匪兵不能前进半步。相持至下午3时左右，匪众不敢恋战，纷纷败退。一路由碑亭坳对面的大坡退向都良田；一路由跳岩左侧坡上直跨老江田；一路沿天王庙背后下溪走万溶江，均朝维新乡方向奔逃。解放军追击至碑亭坳，见匪众有如一群山羊，争先恐后相逐奔跑，便用枪炮对空鸣放，以吓敌胆。

7月23日，唐汉云等匪部人枪七八百在司门前被四一六团一个连击溃，向牛岩、维新乡逃窜。解放军与常备队分队长龙云松追至维新乡。唐汉云见尾追之常备队人少，便进行伏击，与常备队发生激战。解放军赶到，将唐击溃。其后，“反共救国自卫军”龙恩铭、唐汉云等人枪共约2000左右窜至建塘、毛坪、毛都塘、

大码一带，四处抗乱，又进入总兵营与龙皋如汇合。

9月底，唐汉云窜入铜仁、松桃一带，与大土匪吴竹梅、舒志林及彭景仁残部合伙骚扰。10月4日，他们集中了千余人枪，攻打贵州松桃县牛郎区人民政府，与区干部、区中队50多人激战两昼夜。后驻铜仁的二野四十六师警卫连、驻松桃的警卫营前来增援、猛烈围剿，将匪部击溃。

1950年10月，湘西军区第二步剿匪战役铺开以后，我军剿匪有如风扫残云一样。"反共救国自卫军"前敌总指挥唐汉云及其死党向俊祥、王树清等，看到军民同心撒下了天罗地网，东奔西撞无处躲藏，只好于12月25日逃回筲箕乡天寨庙垴上的一座破庙里，借宿一夜。是夜大雪纷飞，北风怒号。唐汉云饥寒交迫，忍受不住，便乔装打份，以请先生看日子为名来找当地的王松云。这时天刚拂晓，王松云的妻子姚八妹一听屋外有人叫喊，立即起床开门。只见来人穿着一件烂外套，满头长发，鹰鼻鼠眼，神色仓惶，姚八妹心想，看这样子，不是匪首便是贼头。她早就听说唐汉云逃窜在外，来的莫非就是他？姚八妹情急生智，立表殷勤，躬请来人进屋，放下一炉干柴，生火给他取暖。打上一盆热水给他洗脸。随后，姚八妹借口外出挑水，来到姐夫杨生昌家，告诉了情况。杨立即转告邻人，并商量了捉拿唐汉云的办法。姚八妹挑水回家，生火煮饭，对唐有说有笑，加倍热情，不一会，邻居王老送以点火为名，来八妹家，看清了果是唐汉云，立即抽身退出报告行政组长。四五个群众正在商议，姚八妹又以借鸡蛋为名出来察看情况，交与大家商量了具体办法。不一会，有两三个乡邻以借东西为名走进屋来。唐汉云见总是来人，顿生怀疑，将手伸进裤口袋里握住手枪。进来的二人也已察觉，田喜干急中生智，立即装了一代草烟，毕躬毕敬地双手向唐敬烟。唐汉云不得不抽出口袋里的手，双手来接。此时，杨生昌、田喜干瞅准机会，顺势用力各扭住唐匪一只手。王素娜抢步上前，搜出了唐汉云藏在身

上的快慢机短枪，同时搜出光洋5块，唐因连日饥饿，已无力反抗，被扭翻在地，捆绑起来，当天，大家把唐汉云交给了驻阿拉营的解放军，而后将唐汉云押赴县城。县人民政府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于1951年元旦，在县城箭道坪召开了公审唐汉云的群众大会。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唐汉云死刑，立即就地处决。

谭 森 部

谭森，原名谭世森，又叫谭汉生，俗名谭应禄，凤凰尚义乡（长宜哨）第五保瓦场人，1916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从小好逸恶劳，既不读书，也不生产。其二伯父原在龙云飞部下当连长，谭即随二伯入伍。1938年他的二伯父死了以后，谭在龙云飞部下任排长、连长。1940年回家，1941年又到国民党驻青岛某部当连长。后因其弟谭世俊为与其四叔谭文举争夺二伯父的绝房财产，写信把谭森叫了回来。谭森1945年至1946年在家当了两年保长，常与田耀武、向秀龙、韩宗干等土匪、恶霸、地痞交往，在农村敲诈勒索最为凶恶，成为尚义乡清溪哨一带的地头蛇。1947年他看到时局开始动荡，通过谭自平关系，到麻阳县石羊哨"湘黔川鄂边区司令部"第二路总指挥官田耀武部当上了大队长。1949年秋，为争家产寻衅，以"保家"为借口强迫其四叔谭文举买2挺机枪、5支步枪。其叔父不从，被谭森绑押至石羊哨。谭文举女婿是沱江镇十三保保长陈开仁，通过各种门路向谭自平告状，后经谭自平勒令谭森将其放回。其叔父谭文举、堂弟谭建铭用大量贿赂，买通驻尚义乡县常备队第三联乡大队长侯尚仁为之报仇。1950年春，乘谭森不备，突然将谭森包围在瓦场寨子里，将其生擒押解回县城交谭自平处理。谭自平将他禁闭在县，到4月初才放出来。

谭森一出笼，即到石羊哨田耀武处搜罗旧部，又返回尚义乡五、六、七保造谣惑众，强取民枪，拉人入伙。谭森势力扩大后，便投

靠到龙云飞部下，在总兵营、木里、尚义乡一带造谣抢劫。7月11日，他参加了新光寨的“反共救国自卫军”会议。15日各路匪徒集中到总兵营，谭森受命破坏清溪哨至油菜塘一段交通，阻击我人民解放军增援吉信的剿匪部队。他乘机潜回老家瓦场，傍晚突然包围其四叔谭文举家，喝令匪徒将其一家绑缚到村口，用菜刀一连四刀将其四叔的脑袋和上半身劈为两片，用镰刀剖开两个婶娘的肚子，用匕首戳通其堂弟谭建铭的胸膛，用刺刀挑死其7岁的堂弟。谭文举一家5口，五脏横溢，脑浆迸裂，惨不忍睹。谭森然后又洗劫其家，并强令一老村民敲锣叫喊，要全寨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青壮年都跟他走，强迫参加“反共救国自卫军”。声称不从者要象对谭文举一样，杀掉他的全家，烧掉他的房屋，宰掉他的耕牛。全寨男子闻讯，连夜冒着雷雨奔逃一空。

谭森杀害其四叔父一家5口，只留其堂弟媳田氏一人。田乘匪兵酩酊大醉之机连夜逃出来，与姐夫陈开仁商议，卖了三头牛和若干大米，重贿常备队大队长侯尚仁，将谭森之妻王氏枪毙，并诬村民通匪，进而捆绑掳掠良民。人民不堪其苦，更对谭森恨入骨髓。群众自动侦察谭之行踪，协助追捕谭森父子，劝告被迫从匪者回家，谭森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至10月，匪首田耀武、谭森率匪在凤凰尚义、图强乡及泸溪狗爬岩一带交界处东躲西藏。

由于我征粮工作队深入农村，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在我驻泸溪狗爬岩四一六团和驻麻阳四一七团飞行小组追剿、阻击下，田耀武自带人枪逃离凤凰窜回麻阳去了。谭森这时连他老婆在内只有9条人枪，继续在尚义乡的五、六、七保及苗区黄双坪一带活动，不时还到得胜营的猪楼门、禾梨坳等地僻径要道“关羊”活动，有时便到木里、得胜营、长宜哨一带地方潜伏活动。

谭森部下有两名匪徒，一个叫王分分，一个叫杨昌昌。这二人不仅是谭森的同乡，而且是他的心腹。王、杨二人近来看到龙皋如、谭森一帮人被我军打得狼狈不堪，自己家里常来亲人劝说离匪回

家，思想动摇，但尚有顾虑。他们担心自己为匪多年，又打过解放军，一身几罪，人民政府不会饶恕；又认为和谭森很贴心，谭森不至于对自己下毒手。亲人们例举了人民政府对自首投诚的从匪人员宽大处理的榜样，又指明谭森是一个六亲不认的畜牲。王分分和杨昌昌终于有所悔悟，暗暗商量寻机立功回家。

征粮工作组将上述情况向区委和县公安局领导汇报以后，决定大胆争取王分分、杨昌昌立功自新，瓦解谭森股匪。经过几次曲折的工作，王、杨决定立功赎罪，改恶从善，重新作人。1950年11月4日早晨，谭森和王分分、杨昌昌商议，决定在12日去苗区依附龙云飞父子。谭胁迫部下，凡不同去者，叫他脑壳开花。王、杨见谭森第二天就要离开本地，便暗暗商定，在动身之前杀掉谭森父子，向解放军报功。并将这个行动计划向工作组汇了报，经工作组密议同意，即由王分分、杨昌昌相机行动。当晚，王、杨将谭森父子用酒肉灌醉，即枪杀了谭森父子，并收缴了匪徒的枪支，遣散了匪部。王、杨二人即向工作组自新，谭森股匪自此瓦解。

石光寿部

石光寿，又名石受满。1905年生于凤凰鸭堡寨龙家冲，19岁时便到惯匪龙妹堂部下扛枪吃粮。龙妹堂被陈渠珍剿灭后，他纠集残部，与龙和清一道逃避到贵州石凤鸣，龙万章部下，后来辗转到凤凰、永绥、松桃边境，啸聚湘黔边界游勇，扩充势力，自封“司令官”，肆意横行苗山，到处杀人放火。

1930年，陈渠珍将兵力往湘西北移动，暂时放松了对屯区七县土匪的清剿，这就给各地的游杂队伍一个较好的发展机会。石光寿这时纠集的骨干有50多人，能号召集中200多人枪，占领鸭堡寨、吉云、德榜一带，不时到凤凰、永绥、乾城交界的柯马洞、关刀、茶山、两头羊、龙蓬、盘干、雅酉寨、瓦窑等杀人抢劫，劫走财物不计

其数。

1937 年，石光寿在龙云飞的组织下，参加了“湘西抗日革屯倒何义勇军。”1938 年，“革屯军”改编抗日后，石光寿仍带着他的人马盘踞鸭堡寨一带，坐地称王。

1942 年，湘西苗族人民反抗国民党的“布将帅”（后来叫“跳仙会”）运动兴起。石光寿有七八十人枪分散在德榜、邦真一带，得知这个消息，求之不得。因为石光寿一向与乡公所和县警察势不两立。他便于 8 月 17 日夜，兵分两路潜入鸭堡寨附近的包谷地里，暗暗注视“布将帅”民军的行动，好避实就虚，趁机而入。18 日天刚亮，民军首领吴春妹带领近百名女将，杀声振天，蜂拥冲进乡公所。这时石光寿便带队出击了。他们混在“布将帅”队伍之中，将来不及越墙逃跑的乡公所人员麻老柳等三人当场击毙。石指挥队伍陆续抢占麻家弄后山，居高临下，控制整个鸭堡寨。仅有两个多小时，石部击败乡公所聚集的武装队伍。后占领该乡三天三夜。乡长刘良只身逃脱，跑到永绥县雅酉乡驻扎的江防总队求援。江防总队派兵开赴鸭堡寨。双方激战中，石光寿左腿中弹。20 日深夜，石部突围，向松桃边境逃去。是年 9 月，因枪伤继续感染，自己不能指挥部下，在把儿女托旁人抚养后，石光寿服鸦片自尽，部下随即星散。

龙再兴部

龙再兴原是凤凰匪首龙妹堂的部下。1927 年，龙妹堂死后，龙再兴、龙再生兄弟成了龙和清的骨干。龙和清自称“司令官”，封龙再兴为“副司令官”，龙再生为大队长。

1937 年前，龙和清、龙再兴、龙再生等曾率领队伍抢劫德榜、新寨两处，纵火烧毁民房 110 栋，杀死农民 77 人。1937 年 7 月 14 日，他们率领匪部二抢新寨，一把火烧掉了民房 47 栋，打死农民 5 人，财物被抢劫一空，耕牛能牵走的牵走，不能牵走的打死。

1940年冬月，龙再兴带领一部分人马仍在湘黔边境活动，控制腊尔山一带。1942年7月，龙再兴率领部下13人，三抢油麻坪，将龙妹海杀死，并烧掉他家3间瓦房。同月，龙再兴兄弟带领200人马，夜劫凤洞寨，抢走耕牛16头，打死农民龙有富。10月初，龙再兴兄弟又率部下9人抢劫油麻坪吴廷生家，把耕牛牵走，东西抢光，把廷生妻子打死。10月18日，龙再兴率部五六十人，抢劫大桥山农民17户，抢走耕牛14头，烧掉房屋14栋、打死农民吴强狗等9人，使11户苗族农民家破人亡。不久后，他又带人抢劫忍务的龙宗明家，牵走一头黄牛。捉走鸡鸭，掳光衣物，烧掉房屋，全家5口，有4个大人被杀害，只留下一个7岁女孩侥幸逃脱，四处流浪。

1942年秋，龙和清被县长李宗祺用计处决，其部队被田纯卿率警察大队打垮，纷纷投奔龙再兴。龙再兴搜罗了龙和清残部，人枪更多，即向黔东北窜扰，又从黔东的国民党军队中抢得一些枪弹，回到腊尔山一带大肆烧杀淫掳。

1943年9月7日，龙再兴兄弟率部百余人，二抢忍务12户，烧掉房屋11栋，抢走耕牛4头，烧死4头。烧死农民龙永章，用手榴弹炸死农民龙永昌，打死农民石老妹、龙正坤、龙云昌，能用的东西被抢光，不能用的东西被打烂，逼得这12户农民背井离乡，逃亡在外。

1944年8月初，竿子坪谢志祥跑到贵州的康精寨怂恿，龙再兴勾结四川秀山匪首赖子方、永绥匪首陈连清等，疯狂叫嚣："吴连如敢打凤凰县政府，我们为什么不敢打乾城！"8月24日，龙再兴等纠集1000多人马下山，直取乾城。队伍行至竿子坪时，为竿子坪乡长田儒礼劝阻。龙再兴等取道得胜营回兵，制造了得胜营大劫。8月26日凌晨4时，龙再兴、赖子方等兵分几路进攻得胜营，将得胜营四面围住。黎明时发起进攻，在一片喊杀声中匪兵如潮水一般滚滚而来，涌进镇里大肆抢掠。这次抢劫，焚烧民房20多栋，打死地方人士8人，掳去男女80余人，全城财物被洗劫一空，幸亏驻大

田的团防队伍赶到，在老满潭猛烈堵击，截回部分耕牛和笨重物品。龙再兴等恐增援队伍继续赶来，不敢恋战，边打边退。

1945年9月，龙再兴兄弟带领18人三抢忍务。抢走农民吴成章等7户耕牛3头，烧死3头，烧毁民房21栋，杀死农民吴炳求、吴庆珍等7人，其他财物全部烧光，有2户家破人绝。

1950年7月，龙再兴参加了龙皋如的"反共救国自卫军"。7月16日，龙皋如宣布了攻打凤凰县城的军事布署。龙再兴奉命率匪部驻高楼哨至长布卡一带，破坏该段交通，阻击凤凰、泸溪前来增援吉信的解放军部队，17日下午5时，龙再兴部与前来进剿的解放军部队接触，解放军只集中火力猛攻30分钟，龙再兴部就抵挡不住，纷纷向总兵营方向的都良田溃退。

1950年冬月，当我大军剿匪的战幕拉开，龙再兴又潜回贵州松桃县境活动去了。然而今非昔比，那里解放军也正在剿匪，无法藏身，又逃回凤凰，藏匿于腊尔山乌巢河一带深山峡谷密林岩洞之中。

1950年12月，龙再兴在鸭堡寨、新寨坡被我人民解放军四一七团的一个飞行队打得落花流水，匪众散.逃已尽，只剩下他一人和带来的贵州匪首石汉章的妻子、女匪首龙真姣，在深山密林中鬼混。一天，龙再兴和龙真姣由于连日吃不到饭，又冷又饿，便沿乌巢河的崇山下界，企图往贵州长坪一带逃窜。当他俩偷过腊尔山，到了大树坡山寨时，已经黄昏。朔风呼啸，冰沫夹雪，浓雾蔽天，他俩更是饥寒交迫，想来想去，只好溜到龙真姣的姨父龙受昌家去要碗饭吃，暂藏一霄。来到龙受昌家后，龙假装殷勤招待，生火煮饭。龙再兴既要吃饭，又不准烧火、点灯，怕被人发觉。于是龙受昌将计就计，借口出去借饭，暗中叫来5个人乘黑夜掩护，摸进龙受昌家里将龙再兴擒住。龙因饥饿无力，虽掏枪连发7枪，均未中人。龙被擒后，搜出短枪2支，子弹8发，大烟1斤。龙受昌等将他二人押送总兵营区人民政府。在审讯中，龙再兴供认他时年42岁，17岁上

山，当了25年的土匪。对亲手杀了80多人，烧毁民房100多栋，牵走耕牛100多头等罪行，亦供认不讳。

龙再兴被擒的《快报》发出后，各族群众奔走相告，纷纷要求将他千刀万剐。过了几天，县剿匪指挥部在总兵营场上召开公审大会，将其处决。

吴香亭部

吴香亭，又名求信、通富，字建平，号兰仙，凤凰总兵营下千潭人，1903年生。他好讲江湖义气，逐步结识了一些股匪头目，后来自己也上山入伙，干起无本买卖来了。1934年曾投身吴兆用部下，1936年又自称队长，独立活动。不久，吴香亭被国民党县政府收编为义勇队，任分队长。1937年参加了龙云飞的抗日革屯倒何运动，任大队长、支队长。1939年离开龙云飞，跟随龙清富为匪，当过匪队长。1940年，他单独向独立团自新，在县警察局当警长、队长、巡官。"三·二"事变时在龙皋如部下任支队长，后编为常备队，任中队长。1950年7月反水，在"反共救国自卫军"任支队长，积极参与攻打得胜营，并在松桃、铜仁等地抢劫，与我人民解放军顽抗。他在解放前长期为匪，明火执仗烧杀抢劫；为警为军期间，又是明警暗匪、亦军亦匪，抢劫勒索，为害一方。解放后，他积极参与龙云飞父子的活动，实属罪恶累累。当我四一七团回师凤凰，开展大规模地清剿土匪以后，吴香亭日感形势严重，在腊尔山将匪徒遣散，只带妻子一人，在两头羊、腊尔山、龙角洞、大田、万溶江沿岸和几县交界的穷山错谷、单家独户中潜匿。当我军民大搜山一开展，吴香亭同他的妻子龙躲妹逃到腊尔山、龙角洞、两头羊交界的藏鹿寨（现更名为解放村）边的一个孤寡老头子家里。那个老头子在两头羊跌落飞机时，捡得一堆"飞版"（光洋），生怕有人来抢，总想寻找保护人。听了吴香亭的自我介绍，认为"巡官"到来，喜出望外，热情款留

吴香亭夫妇住在他家。吴香亭夫妇说："以后我们升了官，请你搬到大门山去同住，给你用光洋买上大几十亩好田，养你老，送你终。"老头子听了这些甜言密语，笑在眉头喜在心。一天搜山的民兵到了老头子家里，吴香亭夫妇躲在堂屋中的大麻布帐子里面，一手握枪，一手紧紧拉住帐子，生怕风吹开帐子而被暴露。吴香亭心里盘算，万一老头子逼得吐露真情，就把民兵打死后逃跑。后来老头子死也不承认家里有人，民兵只好离开。吴香亭吓出一身冷汗，从床上扒开帐子跳出来，给老头子磕头不已。老头子便要他们躲到山洞里去。

在这次大搜山以后，吴香亭听说龙云飞已被打死，到处建立了民兵组织，心里恐慌起来。他对妻子说："我们不是被打死，也会被拖死，如何是好？"他让妻子龙躲妹去赶鸭堡寨，碰碰熟人，探听消息。有一次在鸭堡寨场上，龙躲妹被已经投诚自新的龙云飞心腹梁英发现。梁对龙说："快叫香亭回来，何苦躲到山上！共产党的政策好，只要真诚投诚就会受到政府宽大处理。如果顽抗到底被抓住，恐怕就性命难保。你们想，老头子（指龙云飞）上山都被搜出来打死了，你们还躲得好久？"龙躲妹感谢不已，回到藏鹿寨的山洞里，向吴香亭如实讲了。

过了几天，吴香亭约梁英在鱼井河相会，梁英用亲身体验向吴香亭宣传党的政策，并赌咒发誓不会当"卖客"。吴香亭见梁英发下重誓，也就相信了。过了两天，吴香亭便到驻上千潭的解放军那里交枪投降，受到政府宽大处理。吴香亭直到1983年才在家病逝，终年76岁。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雷州半岛匪祸见闻

梁国武

雷州半岛，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三面环海，北面连陆。半岛上主要有遂溪、海康、徐闻三县及湛江市区。遂溪、海康、徐闻三县，当时也称三雷。1913年至1933年间，三雷先后出现大股土匪几宗，活动猖獗，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笔者是当时剿匪的团长，现将这个时期雷州半岛的几宗大股土匪情况及其祸患简述于下：

一、土匪产生、发展的背景

雷州半岛土地肥沃，米、油、糖、鱼、盐等产品，十分丰富，有鱼米之乡之称。但当时雷州半岛的土地，绝大多数是掌握在地主、豪绅的手里，各县区沿海一带的港口，甚至能够捕鱼的地方，也多属于地主豪绅所有。当地广大农民和渔民，终年辛勤劳动的果实，被地主、豪绅及贪官污吏剥削，所剩无几，生活极其困苦。

赤坎，原是三雷的大门户，大宗商品，于此吞吐。1899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把广州湾（包括赤坎、今霞山等）划给法国为租借地。广州湾为法帝殖民地后，法人即利用广州湾对中国人民进行剥削掠夺，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如“人头税”、“田亩税”、“盐田税”、“门牌税”、市场税 等等），开设烟馆、赌馆、妓馆、毒害民心，危害民体，搜刮民财。商人从外国运来大米，大量倾

销市场，压倒当地的米谷；舶来机制的白糖，压倒本地的土制糖；运入大量的洋棉纱，压倒本地的手工纺织业。雷州农村的经济受到冲击，破产者相继出现。

雷州城（即海康县城）地处广东南路的中枢，北可直出高州、两阳（阳江、阳春）、广州，南可控制琼崖（海南岛），西可牵制钦廉和广东的南部；同时雷州城当时有比较坚固的城墙，周围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易守难攻，是军事上必争的要地。民国以后，10多年来，各大小军阀，争权夺利，互相逐角，对雷州你争我夺，连年鏖战。胜者占据，败者退走，似走马灯。如1918年间，军阀龙济光的第一军军长李嘉品率部占领雷州城，准备伺机进攻广州。广西军阀陆荣廷派林虎等5个军，将李嘉品部围困于雷州城，攻打了98天，因城内粮尽援绝，李仅率残兵2000多人，由城南门突围逃窜。这样规模巨大的争夺战，严重地摧残地方，人民颠沛流离，受害遭殃。继之而起的军阀，先后接踵而至三雷者，有林树巍、苏廷有、苏世安、申保藩、邓本殷和邓本部的黄志桓、邓承拔、陈凤岐等。他们的部队是乌合之众，到处抢掠财物，强奸妇女，逼害人民。尤其是八属军邓本殷部，占据雷州时期，横行霸道，无所不为。他们强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甚至把雷州各县的田粮赋税提前15年来征收；滥铸假银硬币，强迫商民使用。由于军阀混战，官吏盘剥，兵燹人祸，民不聊生。在饥寒交迫下，不断出现一些人铤而走险，沦为盗匪。

法租借地广州湾当局，与土匪联成一气，互相勾结，坐地获利。他们为土匪提供种种方便：给土匪接济军火，向土匪大量推销枪械；包庇土匪在租界内窝藏赃物，销售赃物；窝藏土匪于租界内行乐。由此，土匪的实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初时只是小股，几个人，十几个人，进行打家劫舍，掳人勒索；后来越来越多，由小股而发展为大股，进行围村抢劫，为所欲为。当时雷州的著名匪首就有李福隆、造甲三（石合三）、妃陈仔、蔡妃兰（妃

兰仔）等人。

二、各股土匪的匪首及其匪帮

匪首李福隆及其匪帮

李福隆，海康县企水圩人，出身于小贩家庭，因他身高体胖，浑名为“妃肥”。他青年时接手父亲经营的小食摊生意，由于人民贫穷，生意冷落。当时社会上赌风甚盛，不少人因赌博倾家荡产。李福隆嗜赌如命，把生意的本钱输光，无法生活，便纠合一班赌棍和圩上平日要好的流氓，抢劫商旅，掳人勒赎。后来，他加入以陈耀邦为首的雷州“三点会”。辛亥革命后，“三点会”被当地政府解散，李福隆率领部分帮会百多人，流窜各地行劫。他们把抢劫来的赃物拿到法租借地广州湾推销，并在广州湾购买枪枝弹药，扩充实力。他们诱骗无知青年和无业游民加入自己的匪伙，人数越来越多，大约于1914年就发展成为拥有1000多人枪的股匪。

李福隆的匪势日益壮大，到处抢劫烧杀，名闻远近，引起广东国民党当局的关注。李福隆为了对抗军队的剿办，进一步和法租借地广州湾当局勾结，共同商定：①李福隆专劫唐界（指广州湾租界以外的地区），保护洋界（指广州湾租借地所属，包括各乡村）；②李福隆所需要的枪枝弹药，由广州湾当局卖给接济；③指定广州湾赤坎的“西家楼”为李福隆匪帮堆藏和销售赃物的地点。李福隆及其匪众可以随时在广州湾出入，任意上烟馆，进赌馆，入妓馆，不受当局干涉。

1915年春，胡汉民派陈侠农（海南岛文昌县人）为琼崖讨袁军总司令，回琼崖联络地方有志青年和进步人士，组织讨袁军。讨袁军的组织稍俱雏形，就受到当时“保皇党”余逆文昌县知事胡熹和琼崖镇守使黄志桓派兵合同林肇洲所组织的林姓乡团兵的围

攻。陈侠农深知年轻的讨袁军寡不敌众，即派亲信吴伯前赴广州湾，通过法当局有关人员运动李福隆率其匪众约有1000人，到琼崖协助讨袁军打击胡熹、黄志桓及林肇洲。李福隆率匪众抵达文昌县境内，看到该县是侨乡，地方富裕，贼心发作，不服从陈侠农的指挥，大肆进行抢劫，一连洗劫文昌县的铺前、锦山、波罗、罗豆、三江等20多个圩镇和乡村。并收缴当地乡团的枪械，然后乘船溜回雷州老巢。

1918年春，龙济光由琼崖派其第一军李嘉品率部进驻雷州，后向电白、两阳（阳江、阳春）进军，于两阳、电白之间被李烈钧指挥的滇、桂军击败，退据雷州城。这时，李福隆已拥有匪众2000多人，猖獗活动在三雷。李嘉品为了巩固雷州的外围线，招安收编李福隆为三雷游击统领（相当于一个团），原匪众仍由李统率，固守徐闻、遂溪、廉江等县的外围线。同年秋天，李嘉品军被广西林虎、马济等5个军打败，李嘉品仅率残兵2000多人突围逃窜海口。李福隆死灰复燃，率部重当土匪。李嘉品部脱队的散兵游勇，有些把枪械卖给李福隆匪帮，有些携带枪械参加入伙为匪。此后，李福隆的势力，益加壮大。1920年春，李福隆率领匪众攻陷遂溪县城，大肆抢劫烧杀。接着李匪又进攻海康县雷州城，因城防坚固，李匪攻不下，便在城南门外大街及城区近郊乡村进行洗劫，后退回徐闻山的老巢。

1921年间，李福隆匪众已发展到3000多人。这时需要更多的枪支弹药补充，李怨广州湾的枪支太贵，为了买到廉价的枪枝，他亲自出马去香港、澳门采购。同年秋天，李福隆到澳门不久，受到暗枪行刺毙命，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匪首妃陈子及其匪帮

妃陈仔，是海康县东山村人，原是姓陈，因少年时当地人称他为："妃陈仔"，故以妃陈仔为名。他出身于贫农家庭，家乡耕

地少，又多为地主所有，既受地方官吏和地主的剥削，又遭天灾匪祸的侵害，无法为生。他铤而走险，投身参加了李福隆匪帮。他性情强悍凶恶，为李福隆所器重，不久便升为李的助手。李福隆在澳门被暗杀后，李手下的匪众统由妃陈仔率领。他照样和广州湾当局勾结，抢劫广州湾租界外的乡村坏镇，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1921年，粤军第八路司令黄明堂（黄曾是广西十万大山的大王之一，号称八哥）为了扩充其实力，亲自出马招抚妃陈仔，收编妃陈仔为第二统领（相当一个团）。黄明堂部会同粤军第一路司令黄大伟部和粤军第五路司令钟景棠部，分三路进攻广西龙州的壶关。守关的桂军是韩彩凤部，恰巧韩的主力从妃陈仔第二统领包抄迂迴，妃陈仔部伤亡惨重。他便率领残兵败将600多人，沿路抢劫，窜回雷州半岛。此后，他们有时占驻徐闻山匪巢，有时窜往广州湾租界的邻近乡村，继续抢劫，掳缚勒赎，残害人民。他们还经常混进广州湾销赃，尽情行乐，任意挥霍。

1922年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派粤军第七路司令黄强赴雷州座镇征剿土匪。黄强是广东省龙川县人，曾留学法国，精通法语，当时广东的军政人士，称他为“法国通”。黄强就剿匪之事同广州当局打交道，法殖民者认为，可以利用“以华制华”来巩固他们在广州湾的统治，同意黄强派兵进入广州湾租界内剿匪。黄强和广州湾当局公局长陈学谈互相配合，派便衣队在赤坎、西营（今霞山）等地先后抓了二三百人，除经准当地的殷商富户担保释放一部分外，其余者全部被押赴赤坎寸金桥附近旷地枪毙。匪首妃陈仔在黄强派兵进入广州湾之前，早已离开广州湾潜逃安南（即越南）海防。后被黄强派人侦悉，通过安南法殖民总督，将妃陈仔逮捕，由法轮“河内”号载运回雷州。妃陈仔临刑时，群众纷纷赴现场观看，刀斧手先击伤他的双脚，然后由群众乱刀切杀至死。

匪首造甲三及其匪帮

造甲三，太平圩附近的造甲村人（该村原为遂溪县属，后被划为广州湾租界辖属），真名叫陈振彪，因家中排行第三，又名妃三，后起事出了名，众人便以村为名，称他为“造甲三”（也称石合三）。他出身贫农家庭，由于生活所迫，曾在太平圩的一间私家饭摊打短工，因打伤广州湾租界的警察蓝带兵，被抓入监，坐牢几个月，后被保释出狱。他对法殖民者怀恨在心，加上又无法生活，铤而走险，到徐闻山加入匪伙。不久，他又转到吴川龙头山，因他枪法好，受到该山匪首的器重。匪首死后，造甲三便当上了首领，继续抢劫，掳人勒赎。为了扩大队伍，他举起“打富救贫”的旗号，招兵买马，大肆宣扬“只抢洋界，不抢华界”。海康、遂溪等县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广州湾租界内和租界附近村庄的农民，因不甘受法帝侵略者的奴役、压迫，也纷纷投奔造甲三。

造甲三势力的发展壮大，引起广州湾法殖民者的震惊，出动红带兵和蓝带兵（防守法租界的士兵，多是越南人充当）剿捕。造甲三率领匪众到徐闻。以徐闻山为据点，进行抢劫活动。此间，他派人与香港有关人员联系，购回一批枪支弹药，武装了匪众。造甲三为了扩大势力，打击对抗力量，曾率领匪众在徐闻山附近埋伏截击了陈炯明部的蔡炳寰团，缴获了约有一个营人的枪械；曾和广州湾租界的蓝带兵打过几次仗，打死打伤不少蓝带兵；也曾主动进攻抢劫“华界”（指广州湾租界以外的地方）的李福隆匪帮。例如：1919 年夏，李福隆率匪众围劫遂溪县乐民区的埠头村。造甲三闻知，即率领队伍驰援埠头村，使李匪众伤亡不少，埠头村获得解围。造甲三股匪的力量不断壮大，最多时达 2400 多人枪。

1920 年，造甲三从徐闻山转到离广州湾租界较近的遂溪县属牛[illegible]岭，并以牛[illegible]岭为大本营，对抗广州湾租借地法当局，抢劫

广州湾所属地方。牛牯岭连绵起伏，地形复杂，攻可守，进可退。农历三月二十二日是“南天婆”的诞辰，造甲三及其匪众多是附近乡村人，二十一日便回家去准备祭拜“南天婆”，留下守寨的匪徒不多。翌晨，牛牯岭被黄强和广州湾法当局雇请来的滇军包围。滇军用迫击炮轰炸牛牯岭，守寨土匪死伤惨重。造甲三闻讯从家里赶去，但山寨已被攻破，他仓忙集中被打散的匪徒突围，冲出了包围圈。

造甲三逃出牛　岭后，收集残部几百人，企图东山再起。1921年春，陈炯明的粤军进攻广西陆荣廷部，陈为了巩固广东后方的治安，派员招安造甲三股匪。造甲三匪众中虽有人反对，但其时他们的处境困难，便接受了招安，被收编为广东省虎门要塞守备队，造甲三被委任为守备队的总队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退往惠州，造甲三乘机率领他的队伍驰回雷州徐闻山老巢，重整旗鼓，扩充力量，继续抢劫掳赎，干土匪生涯。

1923年间，雷州善后处守备队黄薰南营，驻防徐闻县的英利圩，监视造甲三股匪的活动。造甲三率匪众去围攻，黄薰南当场被击毙，全营被缴械。1924年间，邓本殷的第二旅第三团叶培兰部，驻防于徐闻县的愚公楼、曲界等处。叶的军队是乌合之众、军风腐败，士兵肆行抢掠强奸，当地人民怨声载道。造甲三乘此之机，率领匪众1000多人前往围攻，打得叶培兰团惨败溃逃，被追赶至竹仔山村。叶部凭借竹仔山村十多个坚固的炮楼为据点，才退止造甲三的追击。这一仗，叶培兰团损失过半，惊动了广东南区各县。

1925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奉命出征广东南路。他派第十二师张发奎部开赴雷州半岛，任务是平定雷州土匪，然后渡海入琼进攻邓本殷。当时造甲三匪帮势力相当强大，而且以徐闻山为据点。要想一举剿灭是不容易办得到的。张发奎便用计谋引诱造甲三出来招安收编。造甲三不知其诈，同意招编，造

甲三的助手蔡阿兰和陈永富，不愿意招安，各率领几百人继续为匪。造甲三率领匪众1000多人到指定的地点沈塘圩接受点验编队，在旷地上列队欢迎张发奎的队伍。岂知张发奎部队一到，立即把造甲三匪众包围起来，用机枪、冲锋枪扫射，匪徒纷纷倒下，造甲三当场毙命，幸免而逃脱者寥寥无几。此后，张发奎部准备渡琼，雷州的剿匪任务交由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担任。陈济棠派他的参谋长李扬敬率领部队进剿徐闻山的匪巢，活捉陈永富枪决，蔡阿兰漏网逃脱。

匪首蔡阿兰及其匪帮

蔡阿兰，也叫妃兰仔，海康县禄祉村人，出身于中农家庭。他好赌瘾吹（鸦片烟），当家几年，就把家产荡尽，其时地方又连年遭受兵燹匪祸，无法生活。他铤而走险，纠合一些无业的游民，干起拦路抢劫客商的勾当，有时也绑人勒赎，渐渐地人数越来越多，成为拥有100多人的股匪。那时雷州半岛最大股的土匪是占据徐闻山造甲三股匪。妃兰仔就在这时投归造甲三匪伙，因为妃兰仔有一小股土匪的实力，为人凶顽，便当了造甲三的助手。1925年，造甲三被张发奎诱降击毙，陈永富也为李扬敬捕杀，徐闻山的残匪就由妃兰仔率领，重整旗鼓，发展势力。

徐闻山是由东西两山组合而成，妃兰仔把徐闻山划为沟尾、迈老鸦、黄挺、前山4个匪巢。他和自己的助手冯启山，占据西山的沟尾和迈老鸦为匪寨，另外两个助手符××和陈××，则占东山的黄挺和前山为匪寨。出山打劫时，东西两山的匪众一齐出动；有时只是西山的匪众出山抢劫，东山的匪众留守山寨；有时只是东山的匪众出山抢劫，西山的匪众留守山寨。他们互相轮流，交替出动；如遇有外力围剿，则彼此照应，及时支援。徐闻山森林密布，道路曲折，易守难攻。陈济棠部属的第二独立团钟继业部，第三独立团张文韬部和第四独立团刘起时部前往征剿，土匪有所

敛迹，但二、三、四团各部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刘起时部驻防于徐闻县迈陈圩的第二营，由于妃兰仔股匪的运动，竟发生了一个连全副武装叛变，当场杀死连长，由廖某和冯某两排长率队逃入徐闻山为匪。妃兰仔得到一个连的全副武装士兵入伙，势力益加壮大，气焰更加嚣张，肆意蹂躏三雷，残害人民群众，几年间，造成极大的危害。

1933年8月，妃兰仔被剿匪部队击毙，结束了他的罪恶一生。

三、土匪的残酷手段及其危害

1913年至1933年期间，雷州半岛先后出现了李福隆、妃陈仔、造甲三、蔡阿兰等几宗大股土匪。他们抢劫乡村、圩镇，不但劫掠人民的各种财物，而且进行残暴的掳杀，特别是任意掳走年青的男女。他们为了把掳来的青少年男女换取银元，采取了残酷的手法：一是勒赎金。这就是要被掳者的家属带银元去赎人，富裕家庭者，要勒索1000银元以上的赎金；一般家庭者，也要勒索七八百银元以上的赎金。据被土匪勒赎过的青年梁汉钦说，他是海康县乌石港人，在乌石港学校读书时，有一次李福隆匪帮劫村，抓去学生12人。他是其中之一，因他是独生仔，父母亲非常爱惜，初时土匪要勒索他2000银元的赎金，后来减为1600元赎回。他被赎回时已被土匪拘禁山中7个月之久，身体十分虚弱。其余11个学生，有的是被勒索1000多银元赎金，有的是被勒索七八百银元赎金。二是卖“猪仔”。如果被掳缚者的家庭贫穷，无法筹足赎金，土匪就把被掳青年当做“猪仔”贩卖，然后被遣送去南洋群岛等地做苦工。当时法租借地广州湾就开设有“猪仔馆”，专门收买和贩卖“猪仔”，坑害中国劳苦民众。三是卖入妓馆。土匪把掳来的年青女子分类贩卖入妓馆：样子好看的被卖入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妓院为歌女或妓女，卖出的身价，大约为七八百银元；样

子不那么好的，则四五百银元卖到江门、海口、安铺、北海等地妓馆为娼妓。不少女子，因此挨皮肉之苦，身心受到摧残。10多年间，仅徐闻一县的青少年男女，被土匪缚掠而辗转发卖者，达四五千人。

妃兰仔（蔡阿兰）股匪尤其凶残狠毒，根据跟随匪首妃兰仔为匪的“压寨夫人”陈英亲口供述，妃兰仔匪帮的灭绝人性行为还有下述几种：①“抢光、杀光、烧光”。土匪抢劫时，村庄如有抵抗，该村一旦被攻陷，不分男女老幼，尽行杀光，财物抢光，房屋纵火烧光。②“打活靶”。土匪出动打劫时，沿途如看见有人逃跑，则把其当作活靶射击打死。③“奸后插签”。土匪把村中的妇女强奸后（掳者除外），复用竹签插进其阴部，至流血不止而死。④“插肛挺起”。土匪把从村中抓的小孩，用削尖尾端的生竹插入小孩肛门，复将竹挺起，使小孩在竹尖上喊至声嘶气绝。⑤“投石落井”。土匪把抓来的男女老幼抛入水井中，然后用大石掷下水井压死。⑥“生剖取肝”。土匪有时抓到男子汉，将其生剖，取肝用酒炒食。

雷州半岛的遂溪、海康、徐闻三县中，徐闻县离匪巢徐闻山比较近，遭受匪祸更为惨重，不少无辜村民被土匪杀害。因连年遭受匪患，民不聊生，住不宁，寝不安，童辍学，田辍耕。为了逃避匪祸，很多村民远走他乡，当时徐闻县不少村庄，鸡犬无闻，人烟绝迹，田野荒芜，令人触目惊心。据当时民间统计的数字，徐闻县受匪祸的村庄有七八百个，圩镇20多个。不少村庄、圩镇，一片荒凉，无法恢复。如圩镇有孤廉、下水、高坡、上桥、水子、麻芋等。现在的山区附近，纵横七八十里，东西南北的开垦地方，大部分是当年败村、败圩的场所（地）。被土匪杀死的有5万多人，流离转徙他乡的五六万人，老弱幼少者因土匪抢劫，饥饿、颠沛而死的3万多人。1934年，徐闻山的土匪被消灭后，当地善后委员会雇用牛车去徐闻山区收拾被土匪捉去杀死残留的骨骸，运回

100 多年，合埋于徐闻县城北门外，墓前立“千人墓”碑，旁边建有“五里亭”（茶亭）。亭内有三雷振贡生谭昌朝写的一首诗：

茶余想乱世惨民，一片荒丘埋白骨；
亭建待文人骚客，千秋洒泪吊冤魂。

乱世民遭殃，无辜受杀戮。当时雷州半岛的土匪掳抢烧杀，危害无穷，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四、最后一股土匪被剿及其覆灭

1921 年匪首陈福隆（妃肥）到澳门买枪枝弹药，遭到暗枪所杀毙命；1922 年匪首妃陈仔被黄强逮捕伏法；1925 年匪首造甲三受张发奎诱骗招安收编而被击毙；匪首妃兰仔漏网独存。他东山再起，收集喽罗，扩大势力，以徐闻山为据点，窜劫各地。他们不但横劫三雷，而且骚扰遍及高州、钦廉，危害甚大。在广大人民的怨声下，1932 年春，陈济棠调派他的总部中将参事陈章甫为广东南区绥靖委员，设立南区绥靖公署于雷州海康县城；并派遣他的直属第二独立团钟继业部、第三独立团张文韬部、第四独立团刘起时部，先后集中于徐闻、海康两县，归由陈章甫指挥，进剿徐闻山的土匪。为了便于剿匪，还在徐闻县的青桐乡建立一个绥靖公署行营，派李江为主任。不久，陈济棠撤换李江行营主任，调林廷华为代理行营主任，并调他的第一独立团梁国武部开赴徐闻协助剿匪（当时梁国武团在番禺、顺德、中山等县进剿珠江三角洲的沙匪，刚告一段落）。

1932 年夏间，陈章甫召集各独立团长和徐闻、海康、遂溪等县县长，开剿匪会议，确定梁国武团负责进攻徐闻山匪巢，第二、三、四独立团会同三雷各县的地方警卫队，负责围困徐闻山的四周，截击和防止土匪向外流窜。鉴于徐闻山久绝人行，山深林密，道路曲折，为了便利部队的进剿，组织人员开辟山路。成立了徐

闻山开山总队，下设4个中队。被招募开山的役夫，多是在南洋群岛橡胶园被解雇的华侨劳工。开山时，虽然有军队掩护，但堵不了土匪的截击，曾因土匪三次截击，开山工人伤亡四五十人。同时，徐闻山的山风瘴气厉害，开山工人水土不服，又没有药物治疗，至患肚痛呕泻、恶性疟疾、脸黄水肿，死亡不少。开山工人纷纷逃散，开山尚未达到匪巢的一半路程，被迫宣告停止。开山失败后，纪兰仔匪帮乘机出山活动，企图抢劫徐闻县的东区海南村、锦囊曲界两圩和东区邻近的村庄把粮食、财物、牲畜等囊括回山，固守匪巢，顽抗到底。7月4日早晨，徐闻山的土匪四五百人，突破东区警卫队的封锁线，打死地方警卫队10多人，窜到海南村抢劫杀人。

梁国武团长接到土匪窜劫海南村的报告后，马上派其第二营营长何麟瑞，率领该营第五、第六连疾驰救援海南村，并堵截土匪退回山区；随即又派该营第七、第八两连出发，赶上第五、第六连之后跟进。何麟瑞率部抵达离曲界圩6里远的地方，就同土匪遭遇，展开激烈战斗。由于第五、第六两连的战斗兵员只有170多人，被土匪包围，幸好第七、第八两连及时赶到，把土匪反包围。经过激战，土匪被击散，向东山的匪巢溃窜。这一仗，土匪伤亡惨重，遗下尸骸200多具，何麟瑞营亦伤亡几乎达一连的士兵。据统计，缴获土匪的长短枪200多枝，其中有驳壳枪16枝，粤造七九步枪80多枝，粤造六八步枪60多枝，法国造三响步枪约100枝。

溃退窜回东山黄挺匪巢的土匪，已是疲惫不堪，警戒松懈。梁国武团乘胜追击，派出第三营营长沈维高率领该营的第九、十、十一连，于当天下午5时出发，进袭黄挺匪巢。土匪毫无准备，受到突然袭击，当即溃散，仓皇向西逃窜，这一仗，土匪伤亡100多人，沈营缴获长短枪100多枝。粮食100多担（包括杂粮），耕牛43头。同时当天晚上8时，梁团又派何麟瑞营迅速占领由曲界至

水尾桥一带，埋伏截击土匪窜回西山沟尾的大巢。果然黄挺溃散的土匪经水尾桥窜向西山，何营乘机截击，毙匪50多人，缴获长短枪40余枝。土匪经受这几次的打击，损失惨重，气焰大减，力量消弱。

1933年8月14日是土匪的忌辰，土匪集中沟尾大寨举行会餐，警戒的哨匪也撤回匪寨纪念它的忌辰。梁国武团长抓住这个时机，率领他的第一、第二营，进剿沟尾的大匪寨。第二营的第七、第八两连首先冲进妃兰仔的卧室边，攻入沟尾匪巢大厅，正在酷饮大醉的匪徒受到突然的袭击，措手不及，妃兰仔当场被击毙，其余匪众死的死，逃的逃，沟尾大匪寨被攻破。梁团缴获好坏长短枪300多枝，粮食（包括杂粮）390担，耕牛48头，生猪16只。匪首妃兰仔被击毙后，徐闻山的土匪群龙无首，大势已去，如惊弓之鸟。为了彻底剿灭土匪，梁团留驻徐闻山中，分成小队继续追剿分散的小股土匪。每次与匪相遇，均有所获。搜查被击毙（或俘虏）的土匪身上，发现仅有子弹三四颗，最多也只是七八颗，衣袋里装的是薯干、石榴充当粮食。徐闻山土匪已面临覆灭时期。

1933年冬，梁国武团调离徐闻山去接受新的任务，清剿徐闻山残匪的任务，由陈济棠的教导师第二团梁公福部负责。梁公福是新兴县的土匪出身，熟悉土匪中的行规和内幕，他一方面搜剿，一方面用计引诱。梁公福经过活动，引诱徐闻山残匪200多人接受招安。梁公福团把土匪带回海康县城，后由陈济棠命令，200多名土匪全数被就地枪决。至此，当时雷州半岛的大股土匪，完全彻底肃清。

邱炳权根据梁国武《雷州半岛匪祸见闻》并
参考黄秋同、陈以大、宋锐等提供的材料整理

（广东省湛江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大桂山匪患和私枪

李伯权

清末民初，帝国主义、清王朝、军阀政府、官僚地主加紧搜刮民财，桂东南平南县一带游民急剧增加，绿林蜂起，其中以大桂山土匪为害最烈。

大桂山座落于平南丹竹、安怀之间，周围三四十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山里有条深沟，长几里，两岸悬崖峭壁，树林荫蔽，藤蔓覆盖。崖下沟边是狭长的石巷。土匪栖息其间，外人看不见，枪打不到，火烧不着。

民国10年（1921年）前后，大桂山聚匪三四百。他们分设十多个帮口，各有头目。小抢劫各自行动；大打抢则合伙作案；有时利害冲突，又互相火并。这时匪首有陈飞鼠、鸭春煲、电光星、局隙、黄十九等。民国八九年间，匪首杨奇彪下辖十多个馆，头目有陈景初、覃就贵、金钢砂。

民国10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大桂山土匪袭击全村何仲家，当场打死何正，半路杀了何辉，掳何贵入山勒赎。不久，又抢全村私塾，掳走学生邓子祥、李碧莲、卓健波3人。民国11年，全村猪鸡商梁正伦赶赤泥圩，途中被土匪拉入大桂山，勒交东银2000元赎身。民国10年前后，土匪在丹竹圩附近乡村抢了29户，杀了6人，掳去31人，猪牛各21头。有3户家破人亡。其他乡村匪害大体类此。

土匪不但在乡村肆意作恶，在县城亦公然行凶。

民国 11 年，一天晚上 10 点钟左右，平南西街牛皮铺老板叶德祥被大桂山土匪“拉参”（即土匪捉人当人质）。过几天，土匪的引线“阿姑儿”来找叶的儿子索银赎身，叶之子无力筹够巨款，结果叶德祥便尸葬大桂山。

民国 13 年，平南开猪鸡庄的廖义昌，于某日圩夜，伙计们正在收笼，帐房先生正在扎数时，土匪闯进屋来，将廖义昌连夜架入深山匪窟，直到交够赎金，人才获释。

民国 15 年中秋节前的二三天，匪徒们伪装成客仔到信昌定购几百斤月饼，声称到散圩时来取货，并且装模作样地给了一些定金。天黑不久，几个土匪．即挑箩筐入铺取货。时掌柜、帐房先生正在扎帐，伙计们正在收拾家伙，上铺门。突然，匪众从箩中抽枪出来喝令铺中各人，马上将信昌老板及姓李的帐房先生揪住，帐房先生稍为挣扎，土匪立即开枪打死，众人吓得屏息不敢稍动，土匪趁机将老板掳去，路经西街的生兴染布庄门前。此时，生兴伙计方××恰巧手拿竹杠出来抬东西，土匪以为方××前来截人，又开枪把他当场打死。枪声所及，人心惶惶，关门闭户唯恐不及，土匪从容离城。后来信昌交了 6000 元大洋，老板始得归来。

还有乌江坑木铺的柳梦和，横巷的谢八、吴惜光，以及客居于城东中街黄子晋家中的蒙仲符均被“拉参”。牛栏塘郭八爷家，塘洲翁三记家，蓑衣塘梁华记家都曾被土匪洗劫一空。

大桂山土匪除抢劫财物，“拉参”勒赎外，还威迫人民拜会，勒交保护费。匪帮派出骨干分子四出活动，宣称已经“遍地红”（即入会的人已很多），会众势力如何如何浩大；如果再不入会，身家性命难保，以此威胁群众入会。假若有人拒绝入会，必绑架残害，杀一儆百。所以不少群众为求安宁计，无可奈何也入了会。

入会者，需履行拜会仪式。设一会堂，称为“忠义堂”。堂中央挂着关圣像，桌上备有香案、花烛等物，旁边有一大缸待装米。老头子（会首之称谓）坐在缸旁，“老胭脂”（资格老的骨干分子

之称谓）就陪同在会首身旁。在头门、二门均设有哨卡向前来入会者盘问："来者何人？"入会者答清楚了，哨卡再问："来这里干什么？"入会者道："投军吃粮。"过了这两重门，就入忠义堂宣誓。由老头子及"老胭脂"不断提出各种恐吓性的考问，如"吐露本会秘密，雷打火烧，全家死绝"。如"有反悔，七孔流血，不得好死"，"违反本会章程可杀全家"……诸如此类。这种宣誓仪式一般是安排在天入黑以后才开始，直到天亮。经过一夜的恐吓威迫，使入会者戴上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之后，才在花名册上记上入会者的姓名、籍贯。入会者还要向老头子缴纳会费，并向那大缸倒入事先带来的米。会费及米一般是事前由"老胭脂"视入会者家庭的贫富程度而预先规定好的，于宣誓时带来。天亮便杀公鸡，饮鸡血酒，歃血为盟。老头子高声朗读"饮杯红花酒，寿元九十九"。众者亦随着大声郎诵。仪式结束后，由"老胭脂"对新入会者讲授本会标记、暗号，以资识别及联络之用。

民国七八年间，大桂山贼伙公然在附城天堂岭的李村庙里进行了几日几夜的拜会活动。县政府和团练竟熟视无睹，充耳不闻。

大桂山土匪虽然凶恶，却不动官僚团绅半根毫毛，有时反而狼狈为奸。民国 11 年，两卢自治军借名招安，勾结大桂山土匪，把陈天泰自治军驱逐出白马圩，然后在那里设卡收税，开赌收捐。而土匪也乘机进白马圩抢掠，计劫居民 121 家，烧 24 户，杀 2 人，打伤 2 人，拉参勒赎 2 人。

北河八里团局有一支以"自新"土匪为骨干的团练百余人，驻防县城。

这支团练借剿匪到处设卡收捐，土匪借团练为耳目，狼狈为奸。每次所谓剿匪，都是团来匪躲，团去匪出，或是土匪抢劫于前，团练铲平"窝家"于后。正如民国 15 年国民党部给中央农民部的报告说的"团练利用击匪拿匪之权，以吓诈农民，更明行通匪庇匪之术"。由是匪害团灾愈演愈烈，直至民国 19 年才把大桂

山土匪消灭。

由于匪患日烈，官绅地主富商为自保争相买枪，甚至赶集的小贩也备枪防备“打脚骨”（指土匪强盗拦路抢劫）。于是买卖和制造枪枝弹药就兴隆起来。

那时，过往平南的滇军、黔军、桂军、粤军十分频繁。这些军阀队伍不论是官是兵，都想通过枪枝、弹药的买卖发点横财。那时每枝机制“七九”步枪可卖东银200多元，每颗手枪子弹黑市价格是东银3毫。这种武器买卖往往是通过鸦片烟馆作中人来进行。起初，也有人直接与军队打交道，但这些军阀队伍总是做成圈套敲诈勒索。比如先让三两个士兵与买枪者讨价还价，成交后，再令别的士兵去搜查扣押买枪者，诬陷买者偷盗军队枪枝，威迫诈索，直到交银才无事。故此，一般欲购枪枝防身者，皆不愿和行伍打交道。为什么会是烟馆做中间人呢？因为旧军队与鸦片结下不解之缘，特别是滇、黔军队，人戏称为“双枪军”，他们到烟馆抽鸦片烟，顺便让烟馆老板、烟棍将枪枝、弹药出手换钱。因而一般人宁肯让烟徒们赚些手续费，也比直接与兵勇交易保险。

除了官兵卖枪外，不少能工巧匠也打造土枪供应社会需求。象思旺、东平、兆村、塘村、新阜、十安路郑屋、古带、佛子李屋、船楼莫屋等约有三、四十户人以打制土枪为业。一个叫阿南四的人，还能用“七九”子弹改装成驳壳枪子弹，这种技艺全县知名。民国11、12年前后，蒙志就在社垌建造十多条炼铁炉，请工匠日夜打造了不少左轮、驳壳及土机关枪，招兵买马，扩大私人武装。

民国14、15年间，厢一里团总李清浦、黄子晋鉴于匪患严重，商家、富户急需枪枝自卫，便由团总出面向各士绅、商人征询定购枪枝数量，并呈请县政府准许团局聘请工匠打制“单的”，卖给各户自卫。每条枪价32元。凡属厢一里籍的士绅、商贾要的，每条枪售价是24元，另由厢一里团局给每枝枪补贴8元。以前购买的也同样补贴。

由于官兵大量卖枪，民间大量造枪购枪，加上百姓从过境军队偷得夺得的枪枝，以及张春如等一批军人挟带不少枪枝回乡，平南的私枪就日益增多。据民国30年查报，全县私有机制枪3484枝（隐瞒的还多）。民国38年8月查报，土造洋造私枪达8000多枝。这些枪不少流落到土匪手里，扩大匪害。解放初期，不少经济匪演化为政治匪。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办　供稿）

豫西绿林暗语集注

蒋留计

清末民初，政局不稳，地方一片混乱。豫西山区尤为复杂，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地方武装。他们有叫土匪的；有叫刀客的；有叫绿林英雄的；有叫[illegible]将的。这些人，有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反官府诛豪绅的；还有一部分是坏人，他们勾结官府，胡作非为，奸淫烧杀，抢劫人民财物。这些人为了便于活动，使用了很多暗语，现将常用一部分暗语集注于后：

架子——指山。

登架子——上山落草。

架杆——山上的头目。

总架杆——山上的总头目。

杆头——总杆下面的小头目。

碰杆——多股势力合在一起。

采盘子——挂线、联系。

条子——道路。

拉条子——走路

攮条子——劫路。

拉票子——匪徒把人劫走。

快票——拉的女票。

花票——指大闺女或年轻媳妇。

撕票——把劫走的人杀死。

双把叶子——一家被绑架两张票。

掰花子——分赃

灌袋——土匪劫钱后装腰包。

滤叶子——指拷打被拉的人。

叶子阎王——看管票子的

人。

黑筋——透露情况的人。

割黑筋——除掉透露情况的人。

贴帖子——匿名恐吓信。

围了——县城或村寨。

破围子——攻打村寨及县城。

冷子——军队。

套交情——换贴结拜。

冷马——地方团队。

红鳖——红枪会。

拉地软些——走慢些，快了就打。

拉地硬些——打着叫快跑。

漂子——大船。

炉子——月亮。

炉子亮——月出。

轮子——太阳。

轮子发——日出。

亮子——眼。

亮子高挂——指眼光放亮点。

皮子——狗。

皮子炸——狗吠。

薰子——鸦片。香烟也叫小薰子。

鞭子——钱。

麦色儿——黄金。

老铁——白银。

啃子——馍。

嚼瓢子——吃饭。

瓢子——碗。

填瓢子——舀饭。

疯子——马。

高脚子——骡子。

长脖子——驴。

吹子——牛。

膻子——羊。

哼子——猪。

尖嘴子——鸡。

垫子——鞋。

（河南省洛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匪窟余生记

姚文蔚

1927年5月，我任冯玉祥在开封所办的河南党政训练班文牍课长，该班同年9月结束。河南省民政厅长鹿钟麟委派我为项城县县长。接事未久，有杆匪李老末（即李振亚，曾充任刘镇华部团长）率匪众万余攻县城。尔时，蒋、阎、冯合力北伐，徐州战事方酣，乞援无效。我守城民团仅二三百名，虽有新收编之一团官军驻县城，但先一日奉驻潢川之任应岐（樊钟秀部）军长的命令，急于开拔，我再三挽留，只允暂留一营守城。支持三日夜，驻军竟有一部哗变，开了西门，随匪抢掠，县城遂陷，我被俘虏。拘匪窟两个多月，痛楚备尝。人民也遭受了空前灾难。爰据回忆记载，以留下旧社会的罪恶。

一

当我接到鹿钟麟委派我为项城县县长的命令时，驻禹县的李振亚部被冯部韩复榘军队击溃，靳云鹗部队哗变，四处抢掠。豫南一带，流寇遍地，闾阎不安。一天，我找到鹿钟麟，以县政不易治理为由，意欲推辞不干。不料他板着脸词色严厉地说："革命，就是要有牺牲的精神，任何困难，应竭力克服，一句话，就是不准辞职。"无奈，我稍事摒挡，带了约好的随员薛健五（秘书兼科长）、孙清芳（承审员）等，雇车登程。

当走近项城县的北关时，即有人恭敬地说道："各机关迎接大

老(本地人呼县长为大老)。"并递上名片。我跳下车来,和绅商各界并一般古董式的衙役、书房先生们握手点头,与之偕行。数十名民团团丁荷着枪,学生们吹着号,敲着鼓,街道两旁围观如堵,在稠人嘈杂之中,仿佛听见有人说:"大老带多少兵?总可打土匪吧?"

走到衙门前面,见前任县长李辅臣挑灯来接。由他领着,进了仪门,转过弯,有小门焉,往前一看,见有用麦秸构筑、用烂砖砌成的狭隘房屋两三间,上有书"法庭"二字的横匾。我未见过法庭有如此之简陋者,很诧异地问前任县长。据他说,系民国9年(1920年)被巨匪"老洋人"破城烧毁,迄未修葺。大堂、法庭尽成丘墟,各房书吏的住室和县长办公室、会客厅,都是湫隘不堪。

来县城不几天,看到的情况比原来预料的还坏。一天,民团军在城门口盘查出一个土匪,他暗藏着一支勃郎宁手枪,鞫讯之下,供称欲潜入城内,乘机谋扯城内高老九家的票子。不几天,马集村被匪攻破,烧杀无算。晚上巡城,听见北关半里许的村庄,有连发的枪声,知是土匪扯票,鸣枪示威。我督率守城民团出城追剿,赶到该村,见打死1人,扯去4人,状极可悯。四出跟踪追搜,而土匪已杳然无踪了。

不久,了解到南乡距城数十里的黄浦一带,有大股土匪盘踞,扬言要破项城县。城内的民团有200多名,所持器械,多是长矛及毛瑟枪,子弹又极缺乏,不可能抵御狡猾而强悍的匪徒。任应岐部下张殿卿一团驻县城外,他们的情况是乱七八糟。函电省府,回讯总是"仰督率民团自卫"等词令,敷衍塞责。真令人日夜忧愁,寝食难安。

一天,城外驻军张团长来了。他脸上带着愁容,嘴里自言自语地说道:"不讲面子的混帐东西,怎么跟我过不去呢?"又对我说:"李老末这个小子,今晚要攻县城哩,俺又要奉令开拔,怎么办?跟俺走吧!"我当然不能跟他走,但竭力恳求他暂留兵一营,并助我调遣一部分民团,准备迎头痛击。张团长允留下一营兵。

我和张团长谈话之时，张的副官长高亚雄进来说："总要有个开拔费才好，给弟兄们几个钱，方可免发生意外骚动。"张接着说："求老兄想法。"我考虑到不给钱，他们可能会抢掠，即允由财政局在地方款项下设法筹措。张团长见事已紧迫，未便再事逗留，向我说了许多不忍分离的客套话。临走，张送给我一支自来得手枪，子弹数条，嘱咐我带在身上，以备有事应用。送他出门，他用手指着他的眼眉示意我，遇机逃跑。

晚上，我焦灼万分，无论如何睡不着。正在似睡非睡的当儿，猛然听见西城门外盒子枪乱响，知已接火，赶紧集合了自卫队上城抵抗。就这样，督率民团坚守了三四昼夜，土匪没有攻上城来。记不清是哪一晚上，衙门外盒子枪乱响，知事不妙。原来张团长的第三营留在城内协助守城，但我早已知道三营十二连勾结黄浦土匪，一听衙外盒子枪响，就疑是该连哗变。仓皇间提上手枪，急出衙外抵御，见老百姓扶老携幼往北跑，孩子啼哭，大人喊叫，刹那间满城枪声四起，火焰冲天。我保持着镇静，忽有一人从后面大声喊叫道："县长！你还不走，等什么？"一句话把我的心机打乱了，急将大氅一扔，往前直奔。

我初跑的时候，是拿定主意往三营营部跑的，拟借营长的兵力，拼命御敌，胜则迎头痛击，败则随营部跑到城外，集合项城四乡民团，设法围巢，冀图恢复县城，以救民命。但时间紧迫，决不能容人作长时间谈话，即毅然将和我一同跑的人的手一扯道："快跑吧！逃命吧！"并叫他往城外跑，他朝北，我转南。甫一转弯，遇一大个子土匪，他用力过猛，将我撞得仰面倒在后边的土堆子上。也是他活该命尽，他偏朝着我脸仔细瞧看，我顺手照着他的头开了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前边即有数匪向我连发数枪，我躲在墙根掩蔽处，还他数枪，作横的姿势扫射，膛内的子弹用罄，再装子弹时，的确是平素未曾练习熟练，到此危急之时，胆怯手颤，无论如何装不上。乃把手枪与子弹埋在土内，记住标志，抽身潜入民宅，爬上屋顶，倾听

究竟，不料房顶是用麦秸铺成的，椽子是葵花秆，只听喀嚓一声，葵花秆儿断了，我跌下房来，腰部受伤。

不知有几分钟的时间，忽听墙外大声疾呼道："爷爷是卫老四，爷爷是杀富济贫的……！"我听到喊声，慢慢地爬至墙根角，见墙外房子点着了，火光四射，墙内却是乌黑。顷刻间见东边墙头上有几个黑影，向我躲藏的墙角扫射。我赶紧说："是朋友，不要打！"有人跳下墙来，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向我头部上边叭的一枪，并把枪口朝着我的胸脯，开口便问道："你是干什么的，银财宝在哪里？"同时便搜去我口代内装的3元大洋，皮包一个。并喝令我将一身棉黑制服裤袄脱下，换了他的精湿冰冷而又褴褛的夹衣，并令往外走。我因连吓带冷，未免步履缓慢。他又喝道："快走！非行（行，枪毙之意）了你不可。"才走了几步，地上有物把我绊倒，拾起来，是一件穷人穿的破大棉袄，匪徒发了慈悲心，令我穿上。他走着嘴里喊着："四哥，四哥，拿诱子（诱子意指绳子，暗语）来。"在火光烟雾之中，只见一个人头裹黑纱包巾，身穿褐色短衣，挎着长枪，手握盒子枪，面孔狰狞，恶狠狠地走到我跟前，卸下刺刀，向我左胳膊上扎了过来。我吃了一惊，稍觉疼痛，知道只穿过衣服，擦破肌肤而已。匪徒遂用绳子穿过衣服将我捆住，连同数十个肉票，如拴囚犯似的系在一块儿。同时又有一人，手拿着如蜡烛般的灯，照着肉票们的脸，逐一细看，见我的面目与一般人不一样，即误认我为有钱的人，惊讶地说："哼！，这是一个值货的哟！"我见他所拿的灯，是用纸条拧的绳子，蘸上黄蜡，点着照亮，口里不敢作声，不多时，把我们牵到一个富裕人家，我被单独锁在一间小屋。此时，心神惫倦已极，知事已告一段落，不觉的睡着了。

我醒来时，他们把我拉出，我见约有10多人，拿着一把粗的木棍，围着一个人乱打，口里喊着："你到底有多少田地，不说实话，非行了你不中。"被打的老头发如飞蓬，鲜血满地，立毙棍下。他们挨次又痛打了几个。我的腰、腿各部被打得肿破不堪，鲜血直流。正

在打的时候，老架子来了；他问我道："喂！你姓什么？"我说："姓马。"又问："干过什么？"我答："干过书记官。"他即对众卒道："是个混事的人，何必打呢？"这样把我暂时放下了。我浑身疼痛得不能走，即由众匪徒把我架至北房，设岗看守。有一人好像有哀怜我之意，给我舀了半碗绿豆汤，又有一人斜着眼骂道："树的枝叶，人的面貌，家里没有十顷八顷，也有三顷五顷哩，看你不像个混事的人。"霎时间，又有一人说："老架子请你写片子哩。"手里拿着笔砚红纸给我。我即问道："老架子尊姓大名？"他说："胡元生。"写了十数张拿去了。从此以后，众匪即呼我为师爷，有时也叫冯大哥。叶子官（看管肉票的头目）对我尚好，每日食宿均优待。有时我说鼓书似的给匪众讲些故事，这样糊里糊涂过了好几天，心里虽焦灼万分，但仍装着镇静。一天早上，见一人跑到叶子房里，口里叫了声："师爷，老架子请你哩。"我随着此人到后院房内，见胡元生在床上坐着，两个架杆一旁站着，门旁还站着一个人。二架杆带着生气的样子，手指着我问站着那人道："究竟是不是？"那人道："就是。"胡元生笑了。我莫名其妙。二架杆把眼睛一瞪，掏出手枪对着我的胸，说着："哼！明明是县太爷，还说你是混事的。"叭的一枪，子弹从我头部左边过去了，胡元生急忙从床上跳下来，拉着二架杆的左胳膊，说："行死，还办事不办？"二架杆怒气冲冲地说："10万块现洋，120打盒子枪，不然，行死你这孬孙。"

真情已无法隐瞒，不如说了实话，或者暂且可以偷生，我即对他们说："诸位老架子，请不要生气，事到如此，已瞒哄不过你们，但是我到项城县才当了20天的县长，那有这么多的钱。"此时旁边匪徒很多，众口一词地说："没有钱也罢，盒子枪呢？"我说："这更成了笑话了，你们想想，120打盒子枪，算起来总有1000多架，有这些枪，还守不住这个项城县吗？围观的匪徒个个露出恶狠狠的神情，拉枪栓的拉枪栓，压子弹的压子弹，有的扯我的衣领，有的拉我胳膊，这个说行了，那个说砍了。我见事已紧迫，即对胡元生说："大家

再容我说几句话吧！你们进城，烧杀奸淫，玉石俱焚，现在钱也没有，枪也没有，要命倒是现成，你们要行要杀，随你们的便。”但胡元生马上笑着说：“你说的哪里话，外边混的人，不是专讲钱，也讲朋友哩。”转过脸向二架杆使了个眼色。又对众匪徒说：“你们不要瞎扯，滚出去。”回头对我说：“闲话不要提啦，来吧！过瘾吧！”事情传到匪首李振亚（李老末）耳朵里了，他派马弁连长张老三到胡元生处提我。此人一来，就把胡元生想勒索我三万两万的念头打消了。因李老末的势力比他大得多，他敢怒而不敢抗，垂头丧气，无可奈何。由张老三领着我先见了张功甫。

张功甫是李振亚部的“师长”。驻守小禹州时被韩复榘破城击溃，他突围逃出，目前暂为李老末部下，以图发展。他声望比李高，势力比李小，故李部都尊呼张为师长。见面时，是在夜间 12 点，张正在床上吞云吐雾，见我来了，将头抬了抬，让我坐下，并令他的马弁取烟倒茶。他说：“冯玉祥不讲面子，排除异已，企图消灭我们这个杂牌军队。咱们弟兄（指我）素无仇隙，我们何苦为难。但是城已破了，当然要有些骚扰。一碗水泼在地下了，收也收不回来，希望兄台见谅。”我说：“北伐战事吃紧，军队复杂。你们攻破项城，混杀混抢，涂炭生灵，良可浩叹，希望张师长还是约束自己的军伍为是。”张赶紧起来说：“那当然！那当然！”并呼马弁给我另行安置床铺，彼此安睡，一夜无话。第二天，候至中午 12 点左右，张才起床，为我备餐。饭后，嘱咐他的马弁把我送到李老末处叙话。

李老末很蛮横，初见面时，还说些客气话，以后强迫我仍当项城县县长，我知道身不由已，就相约三件事难他。说：“只要能整顿队伍，严禁烧杀奸淫，放回男女肉票，出布告安民，这个县长我就能当。”他说：“其他事都好办，惟放回男女叶子的事情，还须大家商议，因为这一部分弟兄复杂，饷无来源，全凭叶子弄几个钱，若是把叶子都放回去，钱从何处来呢？这件事恐办不到。”我说：“这事办不到，县长我就不能当。”随即有一伙匪徒乱嚷着蜂拥而来，连拉带打

的把我捆起来，拉出去，众多土匪围住看。我听见他们互相争吵着说："我毙"，"我行"。我的确害怕了，想我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一念及此，如喝了酒似的，觉着胆子大起来了。即大声喊叫道："上不愧天地，下不负民众，为革命而死，死也死得正当，死怕什么呢？"并回头向执枪者说："朋友，请快一点！"匪徒听到后，议论说："哼！很有种，不错，是个朋友。"一人从后边远远地叫道："总司令叫带回来，再问一问。"我被拉到房子里边，他们将绳子解开，我自言自语道："快，快一点好！"听见李老末说："吓坏啦！喂！眼睛睁开，我本不愿意行你，可是你太执拗了！"我将眼睛睁开一看，仍在原来的房子里边，知道暂时还不至于死。嗣后李老末指着一人道："这是参谋长田耀堂，他也是念书的人，就住到他那里，放心吧，不行你了。"

随田耀堂另到一处，由他介绍认识了一位朋友，名叫郭惠庭，是李老末的副官长。其人吸大烟，尚文雅。问了我来历。知道迭经危险，颇有哀怜之意。田耀堂所盘踞的地方，有一处是山西陵川县人在这里开设的杂货铺，号内伙友早已逃之夭夭，有许多匪徒争相围观我，并问我是谁捞住的叶子，我答以是胡元生的部下。另有一人捧着一碗猪肉汤让我吃喝，我因饱受虚惊，语无伦次，无意识地说了一句："碗内的肉，是不是人肉？"适被一个在土匪窝里惯熟了的女叶子听见了，她说："哎呀，大老疯啦！"这句话陡然引起我的机智，心想："好，疯就疯吧，将来借疯可以逃生。我开始装疯了。我把胡元生的胡字，解释成古月二字，口里念着，手里划着，过了十数天的光景，简直把古月挂在嘴边了。匪儿子、匪孙子像斗玩艺儿似的同我开玩笑。我不会作诗，平仄也不懂，但到处涂写，逢匪便说，处处表示我的疯傻样子。我见马九儿待我不错，嗣后即呼他为九儿哥了。王德标到吃饭的时候，老是招呼我，常常在旁处偷个烟卷送给我吸，说他是决不愿意当土匪的。王是看守我的负责人，宿膳均和我在一起。时候既久，感情亲密，每于更阑人静的时候，把心腹话隐

约地表露出来。有一日，他说：当土匪是不定何时要掉脑袋的，到适当的时候，只有潜逃的一条路了。话至此，突然向我道："我将来要开小差，您怎么办呢？"一面说，一面把门帘一掀，看外边是否有人窃听，回过头来，低声向我耳边说："还是偷逃了好，你有钱没有？"遂从身上掏出3块大洋强交给我，让我偷跑的时候作盘费。我装在口袋里，转想怕他是侦察我的真伪，装作疯癫样的随口答应道："我将来偷跑到天上月宫里，好拿此钱向孙猴子买个仙桃，送给你吃，以作报酬。这就是投我以钱，报之以桃。"他见我仍是疯病不改，便喟然叹息地说："哎呀，大老，你这疯病很危险哟！"我装作不愿意听的样子说："我不是县长。"适被田耀堂听见了，把门帘一揭道："你不是姚县长吗？还哄谁呢？"我又作疯语道："我是道人，原姓桃，名叫李，字荫棠，今后仍复原姓，将归山学仙，叫我桃仙，或呼荫堂均可。"

一天，跟袁世凯当过马弁出了家的普惠和尚来看我。我初到任时，在衙门口和他会过面，没想到在此不期而遇。我们互相吁嗟之时，忽听外边有人叫苦连天，声音凄惨，耳不忍闻。和尚拉着我到外边看，见数个匪徒捆起一个老叶子，耳朵被割掉了，鲜血直流，两臂反接，吊在房檐底下。一匪用香烧其皮肤，一匪拿棍在身子下部乱打，任他再喊叫哀求，也打动不了土匪残忍的心。和尚问为啥要割掉他的耳朵？土匪说："这老叶子，原来着他拿300块钱来赎，不料想他家只拿来30块大洋，不能赎回全身，所以先割一个耳朵给他家捎回去。"

与和尚同行的还有徐云亭，是郏县人，素业医，亦不幸流落于土匪窝里，屡思摆脱不得。和尚和医生在吃饭的时候，极诚恳地相劝田耀堂要如朋友般的对待我。田耀堂低头不语。饭后允我随和尚、云亭等出外游玩，这才得以看见被捣毁的断墙，烧毁的残屋。县城是一片杀气和一片死气。我们先到高老九家中，他家老幼早已逃散，后院住着土匪。进到他家后院，由他两个介绍，认识了一位架杆

的范子英。此人衣冠整齐，相貌枭勇。我俩坐谈良久，情意相投。他蓄意结交，我有心联络，和尚和云亭从中周旋，这天晚上我和几个土匪孤装（土匪叫结拜为孤装）在高老九家中拈香结拜，参加的有：普惠和尚（项城人）、龙国恩（项城人）、徐云亭（郏县人）、郭惠亭（偃师人）、陈仁甫（郏县人）、范子英（宝丰人）、李老末（老汝州人）、田耀堂（登封人）、桃荫棠（即笔者）。

"孤装"时供奉的是关云长，除了陈设的香烛表馔外，桌上还摆着压上瓢子（瓢子指子弹）的勃郎宁、自来得手枪，几个人按次序分列站立，仪态庄严。烧香磕头时，口里念的咒语是：关爷在上，弟子某某在下，今晚"孤装"我9个弟兄，从此以后，互相扶持，对待众家兄弟，不准有三心二意，如果有三心二意，上前线炮打穿心而过，五狗分尸，肝脑涂地。每人磕头时，选烧一炷香，然后燃着表，端端正正地跪在关老爷面前，口里即念此咒语，念毕，朝关老爷磕三个头，仍站在原位。惟范子英发誓的时候，与众不同，他将应说的话说完后，将桌子上摆的手枪拿起，向着自己的心口，猛地摔了几下，加念两句咒语："我如有三心二意，现在枪发了也算。"这是表示他诚恳和耿直。我心想，草泽中何尝没有英雄，能使之脱离匪窟，转入正途，未尝不是国家的将材。按年龄我排行第六，范子英第八，老八照例要与老六磕头，范从此以后即叫我为六哥，不叫六哥不说话。

神刚敬毕，热腾腾的酒筵业已陈设齐全。首座当然是普惠和尚，其余循年龄大小依次坐下，让菜斟酒。酒过三巡，他们猜起拳来。我心中有事，话不多。范子英倒是能体贴我的心思，将我拉到床前一块躺下。床上摆有楠木大烟盘子、象牙洋烟枪、宜兴烟斗翠玉嘴儿、犀牛角烟盒子、烧蓝太谷灯等，都是非常的讲究。范子英躺在铺上烧烟，烧得极其熟练。我吸了几口之后即睡去，后来田耀堂将我叫醒，我即回到了原来住的地方。

我回去后，仍和王德标住在一块，半夜，土匪们以为军队来了，自乱了一阵。

翌日早晨，风雪凛冽，群匪准备在项城县过冬，所以都出外到乡村"摸吃儿"（土匪到乡村攫取食粮叫摸吃儿）去了，在家者，只有我和两个"赛角"（土匪掳得之妇女，奸淫过者叫赛角）。我披着被子装疯，田耀堂回来说："你尽管疯，将来恐怕因疯要误你的事。"田说此语的意思是：要是你真不愿意帮李老末的忙，长此似疯不疯地装弄，想乘机逃脱，他们即会不管了，有仍送还卫老四处的危险。当时我如坠在五里雾中，真相莫明，仍是屡次硬着脸皮，恳求田耀堂将我送至高市寨养病。当时避难者多居高市寨，因此寨有一个为本地土匪作保证的绅士张镜芳，弟兄中排行第八，人都称他八大人，很势力，每日与股匪往来甚密。他前次进过城，和我见过面。见面时，我曾暗中求他向田耀堂说情，将我送到高市寨养病。张八当时点头应允，嗣后，多方向田耀堂委婉关说，田当面允许我到高市寨去，然张八走后，田耀堂却不准我出城。

李老末这部分人马，原来想让任应岐收编，任应岐嫌李老末在项城附近烧杀奸淫，掘坟撕票，名誉太恶劣，不愿收编。李老末无路可归，田耀堂又不愿意再蹚。值此时束手无策的当儿，他们心里都不高兴。此中情形，我原来不知底细。一天，请求田耀堂将我送至高市，聒的他耳朵太讨厌了，惹起他的雷霆之怒，他说："你碰见我这个好人，乃是不幸中之大幸，俺们是蹚将，可不论理，论理就不当土匪，你再要唠唠叨叨，到对不起你的时候，你可不要后悔！"他这几句话，直吓得我半晌不敢作声。适有一个服装整齐的军人来了，这个军人是新蔡县人，在任应岐部下当副官，他到项城县的任务，无非是拿些子弹掉换烟土，带到潢川售卖，从中渔利。他和田耀堂见面，彼此言谈极为家常，他不客气地躺在床上，开灯吸烟，提起不能收编的情由来，田耀堂发了几句牢骚。正说话间，进来一个护兵，气喘喘地叫了声："参谋长，总司令请！"田耀堂即忙出去了。此时，那个副官瘾已过饱，对我说："阁下是卫老四部下胡元生捞住的好叶子，胡很想勒索你几个钱。此番李老末将阁下强迫提走，老四很

不高兴，然无计可施。而阁下呢，总是囿于疯傻，对于秘书长的职责，始终不屑担任，并有蓄意脱离的念头，业已有些泄露，所以他们近几天对于阁下均持不满意的看法。个中的隐情，阁下是明白人，难道还不知道吗？阁下要长此执拗的话，实有仍送还卫老四处的危险。卫老四那家伙手段毒辣得很，如果真送去，或者立刻就有性命危险。”我听了这副官的一片忠告，真是如梦初醒，回忆过去的装疯装傻，险些儿把命送入黄沙。以后将如何补救，第一步先要迎合田耀堂的心理，然后再想法子感化李老末。

李老末实不愿意再蹚，但任应岐不收抚他们。李只有再写信给任应岐，这件事李老末交田耀堂办理。惟田耀堂虽然念过两天书，而斗大的字也认识不了几个，这样的信件，他写不出，到他写信的时候，我站在他身后，他说：“不准你在这里闲看。”我即答以是为了纠正他的错字。他高兴极了，欣然道：“你可以代我写吧？”我说：“可以。”我就替他起草了一封信。

此信送去以后，停了八九天的光景，田耀堂同两个人进来。互道姓名后，乃知是任应岐的参谋长郭梅亭和秘书长李雅轩。郭梅亭一进来，烟瘾就发了。在同李雅轩谈话当中，才知李是沈丘县令，于五六月间，杆首老戴正（即戴民权）率部将沈丘县城攻陷，李被俘虏。老戴正归标编旅，李就膺了任应岐的秘书长之聘。

正说话间，李老末来了，一进门即喊叫一声“县长”，对我非常亲热，与向来的情形迥不相同，并且极其谦恭尽礼，说了许多道歉的话。任应岐收到我替田耀堂写的那封信，见信写得情词恳切，遂认定这一部尚有人材，有收编的必要。主意既定，立派郭梅亭、李雅轩二人来到项城，接洽收编。李老末问起突然间要收编的原因，才知道是写信的结果。郭、李二人称赞此信写得诚恳有力，李老末实在喜出望外，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

一天，我因身上有病，正在睡觉，王殿卿、马九儿等把我叫醒，催我赶快起来。他们说有一个叶子，已经承认拿500块现洋、300

两烟土赎票，请你赶快给他家写信。我即起来，到隔壁房里，见躺倒一人，遍体鳞伤，左手指头已打掉一个，手上脸上都是血迹，其状甚惨。正要说话，忽有一个马弁进来说："副官长郭惠亭有请。"我就跟着那位马弁到郭惠亭处。见桌上摆的热腾腾的肉菜，才知道是请我吃饭。吃罢饭后，又吸大烟。他问起我的根由来，我就从头至尾胡诌一遍。郭惠亭也是这一部分的重要角色。李老末如果要撕围子（土匪称攻寨为撕围子）、抹林子（抢村庄叫抹林子）和遇到往某处拉的军事行动，总要和郭惠亭共同计划。我们正说话之间，田耀堂提着灯笼来了，脸上带着不高兴的色气，扑通一声躺在床上，郭惠亭便知道有事。他说："顶子也没有（顶子指炮弹），瓤子又缺乏（瓤子指子弹），安徽的陆娃子又复杂（土匪叫军队为陆娃子），地理又生疏，老总（指李老末）还要往颍州（安徽省临泉一带）拉，拉不来怎么办呢？俺是不愿再蹚了！你呢？"郭惠亭吸了一口烟道："老总总是野性难改。老任（指任应岐）总是嫌咱们名誉糟糕，李、郭二位回去，总有个收编的消息。如果人家真不收抚，再蹚也不迟，何必着急呢？咱们同他商议去。"说着话，他们俩都出去了。

一天，吃过饭后，陈耀武（李老末的马弁）约我到他那里去玩，我即随他出门，街上悄无人声，冰雪凛冽，路旁溪边，尸骸狼藉。陈耀武在前头一面走着，一面哗啦哗啦地装子弹。我本是惊弓之鸟，不由毛骨悚然，怀疑他要打我的黑枪，心中一惊，就不加思索地问他道："你要行死我吗？"陈耀武经我这么一问，将他问急了，很震怒地高声答道："我为什么要行你！你实在是神经错乱了，人家说你有些疯病，我还不信，就这么样的不识人敬吗？"走到陈耀武盘踞的地方，见有一人到此赎票，他拿来大洋500元，烟土两大碗，直贡呢4丈，还有手表、金戒指等物。据土匪说，还得大洋200元，才准赎回去。赎票人跪下哀求，我在旁边极力帮言，始允予释放。票民走后，陈耀武请我躺到床上过瘾，令"金牙"替我烧烟。金牙原是河南军阀宋天才的姨太太，被宋扔掉后，在西华县逍遥集当了妓女，群匪将

她掳到项城。后来不知何人用黑枪将她打死，撂在水坑里。我本不愿意吸烟，为了应付陈耀武的面子，不得不勉强抽两口。吸罢烟，接着又吃饭，正吃饭间，忽然听得窗外有人说话，话犹未了，那人业已进来。我一看，不是别人，原是和尚大哥，他满脸的愁容，说道："前番楼昨晚打开了，死的男妇老幼，不止百二八十，项城境内的劫数，想是还未尽啊！"转过脸又对陈耀武道："总司令为何不约束约束？常常这样的烧杀攻寨，那如何得了呢？"陈耀武带着气答道："你别提啦，都是他们招惹的。"

原来项城县南有前番楼、后番楼2个村庄，距城七八里，虽有寨墙，却不甚坚固，而守寨的枪支只有10来支。群匪发财心急，曾给寨主送了一封信，要送洋钱5万，烟土百斤，以不攻寨为条件。不料寨内的群众负气不送，还回复一封信，语气强硬，要抵抗。匪徒们接到此信，生气了，由陈耀武率领攻寨，攻了一天一晚，卒因寨内人心不齐，抵御不住强悍的土匪，结果被攻开，烧杀奸掳，庐舍为墟。和尚大哥与此村人有朋友，有亲戚，能不伤心吗？他原想托陈耀武在李老末面前说些好话，不料陈耀武竟说出要全杀完的话来。和尚大哥觉着无趣，站起来拉着我手说道："咱们到田耀堂那里去，死了不说了，先救个半死不活的姑娘吧！"我说："在哪里呢？"和尚说："就在你住的院里楼上哩。"我二人过去后，见群匪围观如堵。田耀堂见我们来到，才把众匪驱逐出外。那姑娘衣手血染，倒卧地上，已哭的声哑泪竭。她见我和和尚来到，目呆视而口不作声，只是伸手将她裤腿解开，我已知枪弹从她大腿部穿过。我问她："你为啥不早些跑呢？"那姑娘仿佛认识我们似的，悲从中来，放声痛哭，以颐指其如菱角似的小脚，我始恍然其不能快跑的原故，乃是两只小脚所累了。和尚大哥向我道："她是城内老财家的小姐，破城的那一晚上，她从城门底下钻出来，跑到前番楼避难，哪料想前番楼也被攻陷，将她打伤，她家的房已经烧毁净尽，老父弱弟各自逃散，生死莫卜，真是劫数啊！"话未说完，听得楼下院子里哭喊声甚惨，从楼窗

往下窥视，见群匪将一个年约十四五岁的小孩上衣剥下，双手反接，把火香点着，在小孩胸前背后烧烤、烧的孩子爹呀娘呀的乱叫。执香刑的衙役，就是翻眼贼王殿卿。他嘴里还骂着："你家究竟有多少地，不说实话，烧死你这鳖儿。"亏王德标将绳解开，挡住翻眼贼不令再烧，小孩始忍疼止泪，不敢作声。我不忍再看，就往外走了。

二

过了几天，田耀堂邀我同见李老末。甫出大门，他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道："荫棠，咱们都是在外头混事的朋友，小弟有卤莽之处，还得要老哥原谅。"我听见此话，知道里边有些用意，即拿话敷衍："你说的哪里话，太客气了，现在我的处境，已是无路可走，大家如果诚心归标，我绝对帮忙，哪里不交朋友？何处不是干事？"说着话，已到"司令部"门口，门岗往里报告了一声，我们即迈步进去，郭梅亭赶紧站起，李老末急忙下床，将郭之来意细说一遍。郭梅亭接着对我道："任军长素抱大志，延揽海内人材。冠军（李老末的字）兄少年英武，雄称一方，军长极为敬仰。前次去的信，都知道是阁下手笔，敝军长及同事等尤为推重。此番派兄弟前来接洽，借此联络感情，通力合作，共图发展，还请阁下和耀堂兄帮忙。"我接着说："现在中国的局势，北伐军会师徐州，战事方酣，中原逐鹿，捷足者先得。贵军长虎踞潢川。扼南北枢纽，10 万精兵，占数县地盘，举足轻重。冠军和耀堂、惠亭诸兄，均系当今人杰，厉兵秣马，急找出路，对贵军长声威，钦佩莫名。如能和衷共济，大事可为。弟从客观上观察如此，谅识时务者当能洞悉。"李老末将任应岐来信递给我一看，大意就是派郭梅亭来此商议收编的事情，但得汰弱留强，移防训练，编余的遣散费未曾提及。我将信内详情，对李陈说一遍。李老末甚喜，当下就请我写回信，请郭梅亭带回去。大家又商议了一番，我即援笔直书如下：

瑞周(笔者按:任应岐的字)军长勋鉴:奉到
华翰,备聆种切。辱承藻饰,惭恧莫名。尚武本草泽散材,揭竿崛起。督率同伙,转战东西。幸士卒之用命,得领项城。慨驰驱之无依,急欲归标。方今南北混战,豪杰蜂起,中原逐鹿,捷足先得。我军长坐镇潢川,拥兵十万,廷揽群雄,冀图大举。不以末将而见弃,派员莅项接洽,凡有血气之男儿,敢不诚心附尾。尚武自汝、鲁而宝、郏,人数原不满三千。经叶、舞抵蔡、项,陆续逐增至一万。长枪、机关、盒子、八响,综约八千。汰弱留强,切实整顿,可编四团。惟顽强难驯之辈,虎狼也,纵之势为民害,必有以遣之之法。其法维何?关双饷,加之以恩,整军容,示之以威,恩威并济,诸葛所以服孟获也。不然实有重拉再蹚之虞。望熟思而规划之。敝部西起东征,财源枯竭,尚恳筹款接济,以资编遣。至编遣以后移防保处,惟钧命是听。关防服装,容造呈领。

谨上寸柬,恭叩
勋绥,诸惟
朗照不宣

弟李尚武谨呈

此信写好,郭梅亭、田耀堂、郭惠亭都说写的妥当,郭梅亭并念给李老末听。又说关防、服装当然没什么问题,发编遣费尚待和任军长商议后才能决定。李对信很满意,就是编遣费还向郭梅亭再三叮咛,如不发编遣费,收编还是个问题。此时饭已摆好,李老末就让郭梅亭和我上坐,以田耀堂、郭惠亭等作陪。席间无非说些如何编制、如何整顿的话。酒过三巡,菜上四起,和尚大哥忽然来到,大家即起来让座。李老末即对和尚道:"归标的事情业已说妥,此后就成正式军队,不能常照这样马马虎虎,乱七八糟,老叶子、女叶子就请大家费心协同耀堂查明,一律引出去。"并郑重地嘱咐耀堂说:"无

论哪一部分，叶子一律不准留。”话未说完，和尚接着说：“这个义务我当然要尽的，不过还有一件难事，就是那个小姑娘，他们霸住不让往外送。”李老末道：“哪个姑娘，谁不让送？”回头对田耀堂很生气地道：“参谋长赶快查查，谁敢藏匿一个叶子，枪毙！”李老末第二天带上马弁到女郎住的楼上，适有一匪在女郎身旁作调戏语，李当将此匪拉出枪毙，并立刻令和尚用门扇将女郎抬出去。和尚回来对我说：“姑娘脱险了。”

有一天，我到巴老人那里闲坐。巴系豫西著名土匪，须发皆苍白，人都叫他老人，也呼巴哥。国民革命军占领河南，设法铲除此种势力，他不能在家停留，遂纠合同党抵抗，溃败东窜。自与李老末合杆后，蛮横益无忌惮，所势更较前猖獗。闻此匪幼尚读书识字，酷爱玩器古画，每次攻开城寨，专事搜抢古物。在项城富豪家中，抢下字画多种，有唐寅的卧虎，赵子昂的八骏，董其昌的屏联，都是模糊残缺不堪，惟有王石谷的山水一轴，灿烂夺目。我稍微懂得一点字画，为迎合此匪的心理，姑且乱加评论。说是此画确系真迹，价值巨万。巴老人信以为真，急速卷藏，不示人看。正和我茶话之际，适卫老四来了，此贼是我恨入骨髓之仇敌，但在此环境中，不得不强与之周旋。我即起来和他握手为礼。卫匪目光炯炯，看着我说道：“财神爷在此，失敬！失敬！”又说：“财神爷发个慈悲，我们就可以回家抱娃子了（土匪发财回家，装作好人，叫做回家抱娃子）。”我说：“你将穷鬼认成财神，算是心机枉费了。”

任应岐终于没有收编李老末，李老末准备再[illegible]。一天，我走到范子英家里，恰巧子英才从外边回来。吃罢饭后，子英正在过瘾，猛然进来一人，面对范子英手指着我说：“外边有一个不熟识的人要见他。”我身在匪窟，如同惊弓之鸟，一听有人找，内心就害怕。不等子英答话，那人已经进来了，我一看，不是别人，却是我原来的护兵刘子清。我心里又惊又喜。他两眼把我瞅了一下，先向在一旁站着的人问了一声，哪位是：“老架子”，范子英急忙抬起头来，就问“尊

姓?”刘子清答:“在家姓刘,出外姓潘。”范子英忙问:“排列第几位?”刘答:“六字辈。”范说:“自家人来了。”赶紧取烟问饭。刘子清接着指着我说:“我这位东家,出身寒微,内圆外方,才学颇有,道路不熟,希望老架子多方关照。”范子英说:“六哥这个人,面善心长,可亲可敬,我们一见如故,已经孤装在一块儿了,情同骨肉,还请同家(一家人的意思)放心。”刘子清才回头对我说:“外边平靖,开封城内照常,只要东家你身体无恙,并有同家招呼,保险平安无事。”我听刘子清当着范子英面前尽搭官腔,实际莫明真相,也不便追问破城前后的情况,只能回答“好,好”两个字而已。

我家世居龙门县(编者按:龙门是山西河津县的古称),刘子清是同邑畅村人,自幼和我已故的胞兄在一块耍拳弄捧,练习武术,同在河津、万荣交界的潢河滩里,因争耕种滩地,各率年青力壮的劳动农民,互相械斗,因而结交了些清洪帮会,称兄道弟,进入山门。刘子清于民国二三年间(即1913～1914年)曾在家杀伤人命,逃亡陕西,跟着黄龙山的所谓“闯将”们东奔西走。以后跟胡景翼(字笠僧)之弟胡三麻子当兵,转战关中,升任连长,跟岳维峻开到河南,在开封成家,因打仗挂彩,赋闲汴梁。我任项城县县长时,经乡亲庞舟生介绍,说刘子清通达帮会道门,八面灵通,遇有事变,可作贴身护卫。我因豫南土匪横行,刘子清当过连长,用处很多,因而把他带到项城,委为警察局巡官,引为心腹,不离左右。刘子清是项城县被匪攻陷后的晚上打出去的。李老末股匪占据城池,刘来往项城、开封之间,多方侦探消息,设法营救我,在高市寨从普惠和尚口中,才把我在城内居住的地方了解清楚,通过介绍,装作赎肉票的人而混入城内。

刘子清和范子英通过介绍见面,说明了都是青洪帮弟兄,引为知交。在范子英处吃罢饭后,和我走出大门,又到衙门左右,到处察看了匪众,随风转舵,不说城外有风,便谈财气兴旺,说的都是些匪内的行话、暗语,局外人绝对听不出破绽。当走进田耀堂盘踞的地

方，刘子清同群匪拉长道短。王德标暗里对我说："参谋长（田耀堂）吩咐干子（田的护兵）说，刘子清走江湖，也许是"风"（探子），要小心一点。我把此话对刘子清说了。他说事不宜迟，赶快走。可巧，下午狂风大作，满城匪众闭门不出。到黑夜，各匪都在本屋内聚赌。天将亮时，赌散了，各自睡去。刘子清把我叫醒，我两人悄悄开门走出，一直跑到东城门洞里，见一个守卫岗兵，正在架枪烤火。城门虽加锁链，但有缝可以溜出。岗兵问：干什么的？刘子清答：赎票的。此时，刘子清示意于我。说："走！"我急乘隙钻出城门以外，一会儿听见枪声，刘子清把守卫岗兵打死，跑出来了。

高市寨内的寨主张镜芳（张八大人）听说我们跑出城来，赶紧吩咐守寨民团上寨墙布防，准备迎敌。同时，要求我暂住高市寨，用项城县长的名义，召集水寨、槐店一带的商团联防守寨，相机反攻县城。在高市寨，我先到张镜芳家，他家的院落富丽堂皇，极其宽敞，但因兵荒马乱，来此避难的人拥挤一院。这里的民团队长带着几个手提盒子枪的护兵来了，向张镜芳报告说："刘子清打死守城卫兵，这个乱子惹的不小，姚县长逃出虎口，藏在我们高市寨，李老末绝不会甘休，势必攻寨，怎样防范，应及早做准备。"我问："水寨、槐店的商团兵力有多少？"张说："这两个地方，商民富裕，团丁各有二三百名，枪械齐全，而且久经训练，作战勇敢，守寨有余。"我当即以县长名义，写了几张手谕："水寨、槐店商团长览：项城股匪，占据城池，已有两个多月，烧杀奸淫，天怒人怨。为了联防兜剿，保境安民，该团长应即督率商团，星夜前来集合高市寨，合力反攻县城。"同时我又向河南省府写了报告，大意说明股匪李老末率匪于10月5日攻进县城，我被俘虏，嗣于腊月二十六日打死守卫岗兵逃出虎口，现正在高市寨召集民团，准备反攻，收复县城。当日晚，水寨、槐店的商团长各送来复信，都说地方混乱，周围土匪如麻，守寨自顾不暇，无力抽兵外援。又报城内匪众纷纷给高市寨送信，说刘子清打死守卫岗兵杜秃儿，护救姚县长逃出城外，藏在高市，听说又要

集合民团攻城，你们可将刘子清与姚县长扣住，捆送来城，要不，就要攻寨，杀个鸡犬不留。风声鹤唳，情况紧张。张镜芳、张挥五得到消息，已经亲自上寨布防。刘子清悄悄把我叫到外头，暗里对我说："张镜芳已派人进城。李老末如果攻寨，实于我们不利，此处不保险，还是走为上策。"第二天（腊月二十八日）由西华转来一个电报：项城高市寨姚县长，速回省，遗缺另派陈万选暂代。看了电报后，告别张镜芳、张挥五等，辞别了项城十数万民众，由张镜芳派兵护送出寨，我和刘子清徒步北上。

1964年12月于山西河津县文史馆

（河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我在匪窟的一百天

张义三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兵匪交错，为害人民。而河南匪患尤甚，他们攻城破寨，打家劫舍，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回忆起来，不禁令人发指。

我在淮阳河南省立二师读书时，曾于1925年旧历十月十日，被破城的土匪掳去，时年16岁。这股土匪是来自驻防巩县的变兵，匪首路老九，率众千余人，攻破淮阳后，又窜到潢川县北庙集，被驻防潢川的建国豫军师长任应岐收抚。于是，土匪又变成了兵，便开到潢川城内驻防。此时我也被迫穿上了军装，随队入城。到1926年旧历正月十六日脱离虎口，回到尉氏故乡，历时百日，倍受折磨。兹将回忆所及记述于下：

师生被掳经过

1925年旧历十月十月的夜半，忽然枪声四起，知是土匪打城了。一时惊慌不已，不知所措。枪声越来越紧，喊叫声接连不断，怎么办呢？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想不出好办法。年龄大一些的同学逃跑了，年龄小的同学怕走不出去，只好眼看着，干等着，屋子里的同学越来越少，恐怖的压力越来越大，周围布满了黑暗，我心里越想越难过。

天，眼看要亮了，我和几个小同学，便在校内乱跑起来。忽

然发现有几个同学向一个拐弯的小胡同里跑，我们也就跟着跑去。那里原来是手工和图画教员钱老师的住室。这屋子比较僻静，里边已经站着和坐着不少人了，有老师，也有同学。一看这情况，心里顿时有了不少安慰，觉得这是一个好地方。那渐渐逼近的枪声、叫喊声，以及远远的哭声，令人心碎。我问钱老师：要紧不要紧呀？”他说：“别害怕，不要紧！”于是，谁也不再考虑如何逃走的问题，我也就决定跟着老师们听天由命了。

天亮了，心想土匪可能遁去。不一会，枪声在校院外边响了，紧接着就听见猛烈的撞门声。这时，一群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呀！土匪把门口堵住了！他们手里拿着长短不同的枪，威逼我们出来，排成队，押着我们出了学校后门，顺着城墙，往西门外走。土匪很多，有的头蒙黑巾，身穿黑色短装；有的长袍短褂，头戴礼帽；有的反穿皮袄；有的女人打扮，满脸抹粉。奇形怪状，不一而足。一排一排被押出城的人群，络绎不绝。当我们走到离城门不远的一家门口时，土匪喝令站住，把我们赶进了大门内，关到两间屋子里。这时只听一个土匪问：“共有多少‘叶子’？”“大概有五六十个，都关在这个屋子里。”一个土匪这样回答。“叶子”是土匪的黑话，指被绑架的人。在我们未到之前，那里已有二三十个“叶子”了。

太阳平西，房门开了，土匪喝令我们出来，用麻绳把我们捆成一串，绳子绑得很紧，膀臂都有些疼，但谁也不敢作声。绑好以后，用棍逼着赶出大门，随着一眼看不到头的大队向西走动。走到大王庙门前，又转向南走。究竟到哪里去呢？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恐慌。负责看管“叶子”的那个家伙叫老张，他那凶狠的叫声，到现在想起来还害怕呢！

正在行走中，只听见后面有人大声吆喝：拉地硬些！”紧接着老张就用棍向我们乱打起来，催着快跑。人们争先恐后，绞成一团，渐渐跑不开了。因为老张用棍打，有力的便拼命跑，无力的

被拖倒，好像一群将要被宰杀的鸡子一样。一个个气喘吁吁，再打也走不动了。老张大骂一阵之后，我们整理一下绳子，继续赶路。在行走中，如果后面有人吆喝："拉地软些！"前面的人就渐渐走慢了，我们若要再快走，老张的棍就又打将过来，并骂着说："奶奶，我叫你跑！"这样，我们很快就明白这两句黑话的意思了。一直走了半夜，才在一个村庄停下，我们被关到一家老百姓的磨房里住了下来。

血染朱集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又被照样绑了一阵。那个姓张的态度比昨天更恶。我的腿疼得要命，被汗湿透的内衣还没有干，肚里也饿得很，明知道不走是不行的。姓张的冷笑着说："谁走不动，就叫谁回去。"有一个老汉，的确是走不动的，姓张的就把他拉到门外，枪声一响，可怜的老汉倒了。姓张的又问："还有谁走不动？"再没人敢吭声了，他把棍子一举，我们又随着大队走去。

大约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大队走到淮阳东南方 50 里的朱集。朱集是一个砖寨，寨墙很高，寨壕的水很深，寨里的人口很多，还有快枪和土炮。土匪要求进寨休息，寨里不允，只答应在寨外供给饭食和送路费，双方没有谈妥，开火了。

我们在东门外的民房里隐蔽着。只听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寨上的土炮也不断轰轰地响，子弹的尖叫声，好像就在房顶上飞过，我们都吓呆了。约有半个多钟头的时间，枪声响得更紧，土炮不大响了。只见一人被抬到院里，两条腿被土炮打伤了，不住地流血。他哼声不断，别的匪徒则高声大骂，坚决要把"围子"打开。这时我才明白了"围子"这个黑语的意思了。

"围子"真的被打开了。匪徒狂欢，准备进寨时，一个匪首走来，向我们说："哪些'叶子'是从学堂里来的？"老师指着我们

向他作了回答。“你们愿意早些回去不愿意？如果愿意，你们先推举代表回去，去准备2000块钱送来，叫你们都回去。”我们听了多么兴奋呀！但是叫谁回呢？同学们觉得老师和年纪大些的同学会办事，就推举两个监学（训育人员）和同学余诚信3人回去。这两个监学，一个叫张仙洲，西华县人；一个姓唐，河北省人，忘记名字了，因为他平常说话好带“哈”字，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老哈”。代表推举好以后，土匪给他们每人一条红布，挂在扣鼻上，并嘱咐他们说：“如果有人问你们，你们就说是‘老廉的人’。”原来这一股土匪是很多小股凑成的，拉我们的这一股的头子叫廉新喜，一提老廉，谁都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叶子阎王”。

推举的代表走了之后，那个姓张的要我们进寨。我们一进东寨门，就看到一堆死人，地上的鲜血还没有凝结。再往前走，路旁的死人越来越多，好象来到了阎王殿里，看后不禁毛骨悚然。走到西寨门里，死人更多，据说这是别的土匪拉的“叶子”，遇到老廉，被他用盒子枪打死的。再略一向南拐，地上躺着一个人，肚破肠露，嘴唇还会动，使人目不忍睹。据说这是被一个年轻土匪用挠钩把死者肚子拉开的。后来我们被关到三间屋里，又添了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子——一个叫天恩，一个叫尿壶。

这天吃罢晚饭不久，只听外面叫喊着要“滤叶子”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会儿，姓张的和几个土匪拿着棍子和皮鞭来了。除我们师生以外，其他人被一个个审问着，拷打着，叫他们说家中有多少亩地，能出多少钱，说的多了算罢，说的少了再打，一直打的乱说一气，死去活来。有的被剥下衣服，冷水浇身；有的被捆紧两手，吊在梁上，用燃着的整封香向腋下烤。最后，土匪向着我们师生说：“你们学堂这一群是2000块钱说好的，你们的代表回去以后，如果不快些送来，小心‘滤’你们！今天先便宜你们一回。”

在往新蔡、息县路上

接着，我们又被迫向新蔡县进发了。走了一天一夜，连一滴水也没有喝，累得浑身欲碎。到了新蔡县南部，刚停下来，我便倒地而卧，昏昏睡去。当我被棍子打醒的时候，只见大队人马又向南涌去。在行进中，我们又听到了“拉地硬些”这可怕的声音。这时，天色已经亮透了。原来在我睡觉的时候，土匪去攻打新蔡县城，因为城里已有准备，未能打开，便仓促向南窜去。这天下午，忽然遇到红枪会追击，只听匪徒们吆喝“红鳖发了”，一会儿又听见吆喝“冷马来了”，同时听到后面有追击的枪声，原来是地方的团队来了。这使我又懂得了“红鳖”和“冷马”这两句黑话意思了。大队正向前涌，一条大河拦住去路。在姓张的棍子威胁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和衣下水。我平生没有下过水，水流甚急，几乎站不住脚。这时，臂上的麻绳，倒成了得力的助手，终于被同学们拉过水去。上了岸就是一个村庄，有了掩蔽，这才松了一口气。可是我的棉裤成了水裤，冷水顺着裤子流到脚上，只觉两条腿竟有千斤重，一步也不想走，但是不走是不行的。土匪对红枪会也有些害怕，他们争先恐后地向南跑，而后面的红枪会和团队紧跟着追。匪首路老九勒马而回，站在高处，祖奶三辈地大骂，喝令匪徒回去对打，一部分土匪被迫拐回头去，枪声又响个不停。

当走到一个村庄时，村里的人们还在梦中，匪徒们象捉鸡子一样拉了很多“叶子”，并放火示威，把麦秸垛点着了，火光冲天，喊声四起。匪徒催着我们继续向前走。身冷、肚饿、腿硬、头昏、眼花，但不走是不行的。走到了乌龙集（即现在的淮滨县城），住了一夜，又要过河了。这一次因无“红鳖”和“冷马”追赶，事先已把几十只大船（土匪黑话叫“漂子”）连接起来，成了一座大

桥，大队人马走在上面，摇摆不定，幸而未出意外。

第二天，又向往流集转移。经过一夜休息，两条腿反而疼得更厉害了，每个人都是一摇一摆地走着。有一个50多岁的难友老庞，眼看着累死在路上，结果挨了一枪，永远起不来了。姓张的看到我们的确走不动了，他说："走到往流集就不走啦，准备在那里卖'叶子'，可以休息几天。"还说："你们看，别的杆都赶上咱了。"这时有一位要好的同学李伯超被另一股土匪赶着从我身旁走过。我俩相对无言，心里有说不出的辛酸。

土匪的黑心肠

我们在往流集停了十来天，在这里受尽了折磨。到往流集的当天晚上，便听到门外喊着"滤叶子"了。几个土匪对我们师生说："你们回去的代表一直没有消息，大概是学堂不要你们了。我们养你们这么多天，一文没见。原先说是2000元都叫回去，以后，2000元连一个也不卖，干脆叫你们家里来回吧！"（"回"即赎买）又说："谁家里有多少亩地，有啥生意，能出多少钱，快说，如果不说实话，一直把你们打死！"接着就是打骂声，哭叫声，呻吟声，匪徒狞笑声，嘈杂刺耳。三个土匪把我按到地上，一动也不能动，用木棍痛打我，等我谎报家里有6顷地时，才不打了，我勉强过了这一关，而别的同学和老师，还正在棍棒下受煎熬。有的人被吊在梁上，用燃着的香烤着。

第二天，匪徒对我们展开了新的攻势。有一个被称为"师爷"的高抟九，穿着长袍短褂，戴着灰色礼帽，表面上带几分斯文。但仔细看，他的眼睛却带着一股杀气。据说他是新郑县人，是老庞这一杆土匪中的文书。他迈着八字步，走到我们面前说："你们想死还是想活？如果想活，赶快向家里写信，写的越苦越好，就说在这里天天挨打，不叫吃饭，叫家里赶快弄钱来回你。如果你

不好好写，可约摸着些！”我用发抖的笔写了一封家信，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亲人。高转九看了一遍，把信摔在地上说：“不行，重写！你就说家里如果不送钱来，非把你活埋不可！”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第二天下午，土匪的老架子廉新喜来了，他是个有名的“叶子阎王”，个子很高，面孔又黑、又麻、又长，还有两只马眼，说话喜嗓门，声音又恶又狠。他穿着长袍，戴着礼帽，对我们说：“养活你们干什么，你们学堂弄的钱在半路被截跑了，还要你们干什么，不如一下打死完你们！”并说：“快些刨坑把他们活埋了！”于是，屋外的匪徒也立即吆喝着“刨坑！活埋！”这时，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绝望的神色。姓廉的用手端着长枪，对我们一个一个地审问，谁说家里地少，就命令拉出去活埋。轮到我时，他用枪对准我的胸口，问我家里有多少亩地。我知道说的少了过不去关，就把原来虚报的 6 顷地加了一倍，说成 12 顷。姓廉的说：“把他留下，叫他赶快给家写信，就说少一万元不行，没有钱就得活埋。”老廉把“叶子”审了一遍后走了。

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学校来赎我们的消息如石沉大海。原来张、唐两个监学回校后，学校准备了 2000 块钱来赎我们，因为大股土匪过去之后，小杆土匪趁机活动起来，专在路上劫赎票人所带的现款，学校准备的 2000 元，被小杆土匪劫去了。后来学校又准备了一批款，让张仙洲二次来赎，谁知他竟然拿着公款把自己的孩子张海涛从另一杆土匪手中赎回了，而置我们几十个师生于不顾。这件事后来被在校同学知道了，大家气愤之下，要找张仙洲算帐。张吓跑了，以后学校也没有追究。

匪又变成兵

在往流集休息了十来天，即又向潢川县北庙集转移。两地相

距约有一天的路程。行走途中我们也摸着了土匪“拉条子”（就是走路）的规律，只要听到“拉地硬些”，就快走，一听到“拉地软些”就慢走。到了北庙集，住在一个天主教堂里。

土匪行里，吃饭也有一定的黑语和规矩，如果说错了，不挨打也得挨骂。吃饭叫“填瓢子”，筷子叫“挑篾”，碗叫“瓢子”，吃饭时，筷子不兴放在碗上；碗不兴弄碎，碗摔破是最大的忌讳，可能会因此送命的。

在潢川，土匪正和驻军任应岐部接洽投诚，这对匪首来说，是升官的机会。而任应岐收抚了这股土匪，便能扩充实力。一天，姓谦的把我叫去，问我是否愿意跟着他干。我不敢不答应，嘴里表示愿意了。

因为土匪正准备向军队投诚，急于把“叶子”卖掉，可是到北庙集以后，一个“叶子”也没有卖掉。姓廉的急了，一天上午，他来到“叶子”房里，咆哮如雷，命令一个姓倪的把“双把叶子”拉出来枪毙。所谓“双把叶子”，就是一家有两个“叶子”，先杀一个，以威胁家中加紧来赎。土匪把陈子箴和陈子琏同学拉了出来，我们大家都为他们兄弟的处境着急。老廉恶狠狠地问：你弟兄两个谁愿意先死？快拿主意！”他俩相对痛哭，泣不成声。陈子琏年纪幼小，当时还是附小的学生，他连声叫着“哥哥我怕。”陈子箴咬紧牙关，惨痛地、情义深长地向弟弟说：“不要怕，我去！”他用绝望的眼望着即将永别的弟弟，被土匪拉出去了。我们沉默着，真怕听到枪响。就在这短暂的沉默中，陈子箴又被急急忙忙地拉回来了，我们喜出望外，都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后来据陈说，他被拉出大门外，向南走了不几步，迎面来了一队马队，向着他们飞驰，原来是潢川驻军司令部派人来接洽投诚的。土匪们一看势头不好，就拉着他往回跑。

一天，姓倪的领了一套军装在试穿，他说：“又要当老总了，明天就开到潢川。”我们听后，多么希望他说一句“你们也该回家

了。”但却没有下文。老倪拿来5套棉军装，挑出我们5个同学，说：“你们5个也穿上军装，跟我们当老总去，啥时家里送来钱，啥时叫你们回去。”

我们5个难友依依不舍地告别，随着匪军骑兵连向潢川城开拔。豫南的气候比较温暖，虽然是旧历十一月天气，雪片一到地上就化了。路上泥泞很深，一步一滑，身上的灰军装不到半天就湿透了。我们小小的年纪，穿上大而无当的军装，湿军装一直向下垂，上身像个大鼓，裤腿卷了又卷，一直卷不动了，还想拉地。

雪越下越大，匪军沿途骚扰，到处抓人，把老百姓的被子都抢来披在身上，有的还到路旁老百姓家强奸妇女。在大雪纷飞泥泞难行的原野，成群成群的男男女女在逃难。有些土匪故意向着人群的上空放枪，吓得逃难者向泥里乱滚，这些家伙却高声大笑。

第二天上午进了潢川北城，暂在一家老百姓家里休息。雪一夜没有停，积雪已经有两寸多深。我们刚站住脚，匪军从外面抓来一个人，用枪托打了一阵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用绳捆成一个“猪肚子”，撂在雪窝里，还用铁锹向他身上盖雪。那人被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青。原来这是一个开小差的民夫被抓了回来，姓廉的叫这样办他的。

我们5个同学随着匪军到了潢川后，就住在骑兵连连部。听说最大的匪首路老九当上营长了，“高杆”、“柯杆”等，都编成了步兵连，老架子都当了连长。次一号的角色，也当了排长、司务长、司书和棚头（即班长）。这一部分新收抚的匪军在防地吃、喝、嫖、赌、奸淫、抢劫、运毒、贩毒、吸毒、打人、骂人、闹戏院、砸饭馆等，大街上成群的匪兵，歪戴帽子，服装不整，有的穿便衣，戴眼镜，持手杖，带手枪，老百姓见了就躲。

这些匪军在潢川开设“叶子商店”，我们5个就是商店里要高价出售的“商品”，此外还有许多老师、同学和其他难友。在这里，匪兵还是逼着我们向家里写信，催促家里人来赎“叶子”，我们天

天在骑兵连的“叶子商店”里等着出售，我还不断替匪兵们写信。

一天晚上，匪兵叫我们5个人一齐跟着他们走，我想一定是大祸临头了，但怕也不行，硬着头皮走吧。最后，把我们领到马号中，屋里已经挤满了人，都是老难友，才从乡下送来。有一位难友小声对我说：“乡下住不成了，红枪会、民团不断打，有几杆‘叶子’都被打散了，所以看‘叶子’的连夜把俺们弄到这里了。”从此，我们5个就又和难友们生活在一起，和过去一样受煎熬了。

“叶子”商店

廉记“叶子”商店城乡合营以后，交易的情况日渐好转，一批一批的银元、纸币、烟土、老海，还有说不清的见面礼，使廉老板发了财。老板们装满腰包之后，再给喽罗们“掰花子”（分赃）。分赃是不会公平的，所以常听到匪兵们发牢骚。一天上午，姓廉的带着气来了，后面跟着4个打手，拿着绳和棍，先喝令把一个姓李的难友拉出来，按倒在我们面前。4个人用绳子缠在老李的脖子上，下面用脚蹬住，上边用手一拉绳子，要把老李勒死。老李的头恰恰在我的脚跟前，舌头伸多么长，脸憋得发青，眼看人就不行了。这时司务长又出了场，劝了一阵，才停止了行凶。我记得在往流集时劝老廉不要打死我们的那一个人就是他。这时姓廉的对我说：“你怕什么，又不勒死你！”又说：“你家里如果能弄一万块钱，我把连长让给你。”后来才知道，是老李家里送来一些烟土，姓廉的先熬了一些尝尝，他认为烟土有假，发了脾气。他一发脾气，就要找“叶子”来发泄。

第二天上午，老李趁着去厕所的机会逃跑了。虽然老李跑了，可他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侄儿在这里。于是姓廉的又派了两个人对这个小孩进行了同样的折磨，把小孩勒了一阵，痛打一顿，并扬言，如果不赶快来赎，非把他勒死不可。

一天上午，几个匪兵从外面急急忙忙跑进来，对我们说："坐在地上不许动，不管谁在门外说话，不准你们吭声，谁不听话，可小心些！"说完即搬谷草把屋门堵住。大约过了20分钟，他们又搬开谷草进来说："方才任司令（任应岐）从门口经过，怕他到这里来。他看到你们，也没有什么，不过对司令的面子不好看。"

出虎口的经过

脱离虎口是每个难友所日夜盼望的，我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天夜晚，姓张的悄悄把我叫起来说："走吧，你家里来人啦，跟我去见见他。"我一听，兴奋极了，但立刻又想到，家里只120亩地，我虚报的很多，如果家里人说出实情，他把"虎口"一合，我就完了。又想路上土匪如毛，天天截路，就是有钱，也很难送来呀！我越想越觉得可怕，只得用迟缓的脚步跟着姓张的走。

走过几条大街，来到灯光处，姓张的站住了，一个当兵的走到我跟前，看了看我，提着我的学名问："你是继桓吗？"我一时不知所措，停了停才看出是我的小同学郑兆祥，他把我让到屋里。屋里收拾得挺干净，桌凳齐全，靠山墙的一张大床上有个人在抽大烟。郑兆祥说："报告队官，继桓来了。"正在抽烟的人坐起来问我："你是继桓吗？孩子，我想连长和老总们不会错待你的。马上跟我回家吧。"他接着作了自我介绍："我和你父亲是老朋友，我叫朱警滔，是城北七里头的，你没有听说过吗？"他的名字我有印象，可是没见过面。我情不自禁地给他作了一个揖。朱一面殷勤地招待姓张的抽烟，一面对我说："今天咱们先见见面，明天我把手续办好就接你到旅馆去，不要再胡想了。"姓张的抽了一口大烟，也凑趣地说："早晚我走到你们那里，可别装不认识啊。"

老朱过了烟瘾，叫我先跟姓张的回去。我这时像做梦一般，因为又要进"虎口"，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朱和郑都安慰我，郑兆

祥送我到门口，并说："朱是咱县的队官，我跟他当护兵二年了，他这一回是专来赎你的。这个地方是个大烟馆，天明了他手续一办，我们在豫潢旅馆等着你。"我跟着姓张的又顺路回到了马号。

第二天，果真到了豫潢旅馆，旅馆的席老板对我非常亲切。洗了脸，吃了饭，郑兆祥领着我去买鞋子和帽子，路上郑告诉了我此次出虎口的原委：旅馆席老板的哥哥席恩波，是潢川有名的中医，年老无子，一天他在旅馆见到朱老伯，谈及我的情况。朱老伯告他说，因为路上匪多难走，钱送不过来，这一次仅带来一些礼物，只希望见一见面，等家里把钱送来了，才能赎人。席先生非常同情，愿用他的药铺担保，把我先行赎出，以免发生意外，就是席先生打了2000元的条子，把我保出来的。

第二天，当我准备去感谢席先生的时候，忽然一个身穿长袍，歪戴礼帽，大长脸、高个子的人来到旅馆，我知道他是姓廉的手下的得力打手。他一见我，二话不说，掏出八音手枪，逼着我走，只说："你们找的铺保太小，不行！等家里把钱送来再说。"这时我吓呆了，朱老伯失望地说："你先去吧。"我被逼着又回到骑兵连部了。在连部负责的杜排长叫我仍住在老地方，和过去一样受着煎熬。

大约五六天后的一天上午，杜排长派人叫我去。到了杜公馆，席先生在那里坐着，刚给杜"太太"看了病，他亲切地说："我来接你回去的。"老杜对席先生说："我们对他很好，没有缺过吃的。"

我跟着席先生往旅馆走，路上他说："你家里人把钱送来啦，这一回再不会发生意外啦。"到了旅馆，一眼看见我本家的麦贵叔，我俩激动得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席先生为我们安排了午饭，吃饭时，麦贵叔叙述了他前来送钱的经过。他说："家里一连接到你三封信，你父亲急的没法，弄不来钱，愁病了。后来家里接到你朱老伯的信，说是2000块现洋说好了。卖地来不及，只有向亲朋去借。不管怎么难，算借够了，可是又怕到路上被土匪劫去，就叫

我和你留住哥扮成唱坠子书的，把票子套在一条破被子里背着，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谁也看不出是干啥的。在路上走了十来天，才来到了潢川。此时天已黑了，先住在东关一个旅馆里，听说不断发生抢劫，俺两个跑到野地睡了一夜，天明了才找到你朱老伯……。”

在潢川不敢多停，第二天就离开了。临走前麦贵叔领着我到席先生家里去，我就认给他作义子了。

我离开潢川大概是旧历腊月十五日左右。

1964年7月

（河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匪窟两月亲历记

向永清

官匪一家　民不堪命

鄂西来凤县第三区是这个偏陬远县里更加偏僻野蛮的地方，历来就是官匪一家，抢劫滋扰，民不堪命。民国时期，政府的区乡行政机构等于虚设。民国27年（1938年）勇敬乡（现卯洞）大队长张汉卿，智乐乡（今漫水）联保主任向汉云，都是明官暗匪的土匪头子。他们和当地的匪首彭雨卿、覃桂清、田仁双、王吉安、夏华娃互相勾结，明来暗往，坐地分赃。张汉卿、向汉云各霸一乡，互争疆界，多次发生火并。就在1938年的11月初火并激烈之时，县长周登云亲往百福司从中调解。在那前几天，向汉云勾结土匪覃桂清、田仁双、王吉安，进攻张汉卿的辖区百福司镇，洗劫三日而去。

我被向汉云绑票

从百福司到县城的大道，要通过漫水、茅坝两乡交界之地的沙子田，那里土匪经常出没，抢劫过往行商。向汉云就是在那里布下圈套，把我绑票去的。1938年10月上旬，我从百福司前往县城投考新近迁来的联合中学，因为路上不安全，就借周县长调解张汉卿、向汉云两霸争端之后回程返县的机会，与他一路同行。同行的有我们百福司小学校长张世贤、同学刘锡朋、张攀。当晚宿

漫水乡联保办公处，原定次晨即离漫水继续进城，谁知向汉云别生诡计，把周县长及其随行留下，说有事商议。叫张校长我们师生4人先走，沿途安全由他派枪护送，并说已通知亨利乡（现茅坝）派人来接。这是布置好了的圈套。我们走到兴隆坳，护送的枪兵停下不走了。他们说："我们送到此地为止，前面几里路就是沙子田，那里已有人接你们"。我们提心吊胆地走了一程，一到沙子田偏岩的凉亭桥上，突然从岩边草丛中跳出几个持枪的匪徒堵住桥的两头，"不许动"！我们一下子吓得呆若木鸡。一个手持短枪的高长大汉怒目狰狞巡视我们4人一遍，把手枪瞄着我一个人的头，说声"跟我走"！并向张校长他们说："冤有头，债有主，不关你们的事，请你们进城后通知他家里准备拿钱来取人"。我用乞怜的眼光望了张校长一眼，被押着回头往兴隆坳走，到了兴隆坳，先前向汉云派送我们的枪兵还在路旁小店喝酒。押我的匪徒和他们互相亲热地打招呼："哈哈！到手了！""哈哈！我们也送到了"！我如梦初醒原来是向汉云定好的圈套，送也是他的人，接也是他的人，兵也是他的人，匪也是他的人。

意想不到的"待遇"

当晚两个"侍卫"把我安置在兴隆坳对面山上一个岩窝里，绳捆索绑，弄得象一个刺猬缩成一团。我的"侍卫"一左一右呼呼大睡。天一亮，我的"侍卫"又把我带到离此地大概3里之遥的狭沟里一户茅舍人家。"你们把我捆死了，那就一钱不值了哟！请二位高抬贵手，开个恩！"我要求他们松了绑。可是到了夜里，我的"侍卫"又考虑到我的"安全"掉换了一个办法，把我关在"搭斗"（打稻谷的方形板桶）下面，他们就在"搭斗"上面呼呼鼾睡。我感到窒息，侧身向"搭斗"边沿缝里撒了泡尿，把泥土淋湿了，抠了个小洞，把鼻子贴近小洞呼吸点空气。

逼写血书　转入匪窟

在“搭斗”下面禁锢了5夜后，我又被转移到兴隆坳大附近茅坡上一户姓彭的人家，在那里碰上了同街的邻居肖金波，他也被绑票来了。过了几天，一个早上我被带到兴隆坳碉堡上，特别化妆打扮一番，蓬着头发，脸上擦上些锅底灰，穿件背心和短裤，赤着脚，显得十分狼狈的样子。他们要我写了一封家信，信里写明要家里速送1000元大洋前来取人。签了名，盖了血印指纹，再加上“火速！火速！救命！救命！”的字样。妆束好了，信写好了，我被带到兴隆坳大路边向老八的店子里，一个邮差早已“奉命”等着我了。山坳坳里寒风呼啸，我冻得浑身发抖，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吊着鼻涕眼泪，说声“请亲手把这封信送到我家。”

匪窟见闻　心惊胆寒

爬过曲折迂回的羊肠小道，越过险峻陡峭的悬岩深谷，跌跌跄跄，绕了半天，我和肖金波被押送到塘口酉水狭谷之间的、爬爬洞”。那里是匪首夏华娃的巢穴。向汉云把我们转手寄押在那里了。“爬爬洞”在悬崖绝壁之上，上下悬岩数十丈，壁上密布藤茨，下临百丈深潭。洞口宽约3丈，高约丈余，无路可通，只有洞后一条窄狭黑暗的裂口，可容一人俯着腰身进去，真是龙潭虎穴人迹罕到之地。洞内宽约百余平方米，匪首夏华娃及其匪徒匪眷30余人，杂居一穴窝藏于此。夏自称连长，他是大土匪彭雨清的外甥，他的老婆是在龙山桂塘坝从花轿上拦路抢来的新娘子，姓何，是良家妇女。匪排长彭廷根、田家银都带有土匪娘子，田家银的大小老婆是霸占来的亲两姊妹。还有匪徒李安清、李华清、夏友娃、陈华安，其余不认识，一共30余人。和我同时被绑票的还有肖金波、茅草滩的李元贵、何国太、何国安母子3人，加上一个年龄50岁上下的老尼姑。匪徒出外抢劫，洞里只留下少数人看守。

我们哪敢走动一步，只是服服贴贴做奴役、劈柴、洗衣服、捉虱子……。对我和肖金波却另眼相待，称做“师爷”。我们两个人帮那些绑来的“票友”写家书，叫送“赎命钱”来。匪徒们每逢出外“打猎”归来，便围着篝火赌“铜钱宝”、“掷骰子”、“摇单双”，狂饮烂醉，拥抱着女人寻欢取乐，乌烟瘴气乱做一团，俨然《西游记》里的妖穴魔窟。我们几位只好当看客，老尼姑暗暗念佛。说到尼姑真是冒险大胆，乘夜深匪徒们烂醉如泥，横七竖八鼾声雷动之际，尼姑悄悄地攀藤附葛溜下悬崖，下到河坎边，潭深千尺；怎么能到彼岸？凌晨又被找着了拖回洞来，可怜她又该添加磨难了。“猴子攀桩”的刑罚，两个大拇指被绑在木桩上，加上楔子，要杀鸡吓猴，匪首叫我们各在楔子上打上三槌。谁肯打，看都不敢看。匪徒在楔子上连敲几槌，老尼姑晕死过去了。她几天躺在地上哼哼，不食不动，一对大拇指血肉模糊，肿得象一对红蜡烛。“活该！死了也要拿钱来收尸。”

该不是“从水路而回”吧

匪窟的黑话：“水路而回”意思是如果不送钱来取人，就把你杀死将尸体从洞口抛到酉水河里，让激浪奔流送你回去。以前曾经有人“从水路而回”过。我在魔窟里度日如年，凭洞口的阳光屈指计算日程，我已“作客”整整60昼夜了。父亲怎么不设法送赎命钱来？难道我真的也要“从水路而回”吗？一天夏“连长”突然叫我：“今天请你甲马”，开始我不懂什么叫“甲马”，“甲马”是“走”，并亲手送给我5块大洋，叫一个匪徒送我穿过茅茅小路走到塘口渡边，对岸是常在我家做工的田兆贵在向我招手。我登上渡船，上了彼岸，当晚宿在我姐姐家里，姐姐把我周身上下的衣裤换下来烧了，沐浴了3次。次日回到百福司家中，家里父母兄弟姐妹惊喜交集，街邻老的小的都前来庆贺我虎口生还，问我历险的经过，我从头到尾向他们讲述。只是不敢说这件事是向汉云

干的。因为我一进门父亲就叮嘱我："千万别提是向汉云干的"！事实真象是父亲央请了一位畅通黑道最吃得开的汉流龙头大爷前往求情，缴了500大洋的赎身价款，我才得"从陆路而回"。不过我父亲做生意现存的山货桐油都贱价卖光了。

（湖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南澳海盗“三合公司”始末

林俊聪

南澳是孤悬于闽粤之交的弹丸小岛，地形险要，舟楫方便。自明朝到民国初年，海盗据为巢穴。尤其是民初，国家多故，大陆火并剧烈，南澳偏居一隅，鞭长莫及，岛上极少驻军，于是出现了以南澳人吴品三（1882—1933年）、陈顺（1886—1926年）、曾伯崇（1872—1928年）为首的海盗团伙“三合公司”。20余年间，这伙海盗抢劫掳掠，杀人越货，令商旅、渔人毛骨悚然，切齿痛恨。现将其兴起与覆灭的过程缕述如下。

结会起家　下海为寇

吴、陈、曾皆为深澳乡人。深澳是明、清总兵府和民初县署所在地，既是古城，又是县邑。

吴品三，原姓张，父务农，家住五福庙边。幼年给任澄海都司的吴本张做养子，住于城内公馆巷（今戏院）。吴眉清眼秀，读过几年书，体格魁梧，力气过人，曾在福建诏安县署前当众抱起重达100公斤左右的茶花大盆，绕堤一周，全场喝采。他留二撇胡子，人称“八万”。

陈顺，又名陈孝、陈阿客，住内东街白灰埕边。父亲是清末秀才。陈身材矮壮，善轻功，行动敏捷，能攀桅尾，腾跃过船，撑竿翻墙，步履如飞。他凶悍狠毒，杀人成性，先后娶过3个老婆，

其第一个妻子有一夜在补衫时把针丢了，遍寻不获，正在吸鸦片的陈顺轻易地从地上捡起。其妻戏言："真是贼目，一看就着。"一言犯讳，即被陈顺枪杀。其后，陈又娶两个老婆，也均因小故触犯陈贼，被虐杀。

曾伯崇，又名曾汉明，原是隆澳区港畔乡杨姓人氏，幼年给深澳曾氏做养子，读过几年书，为人老谋深算，阴沉寡言，人称"乌面"。入赘吴氏，一妻三妾。故也称"三姓（杨、曾、吴）司令。

辛亥革命前夕，吴、陈、曾等聚集四五十人，参加了以洪二爷、曾昭荣（曾伯崇之叔父）为首的青年会，练拳习武。与王贡爷为首的保安会群斗败北，便到潮音寺拜武术高强的僧人友然为师，再练拳功，以图报复。至民国元年（1912年）夏，青年会势力日盛，横行乡曲，为害一方。越年1月，首任南澳知事俞文炳（浙江省人）决意除之。派兵突捕魁首友然和尚、洪二爷、曾昭荣，于农历七月二十七日在校场枪决，强令解散青年会。吴、陈、曾等团伙亡命海上，始为盗，据深澳为巢穴。

初时，盗众仅数十人，成员以深澳人为主，部分是云澳、青澳人，也有个别是隆澳及饶平籍的，分隶吴品三、曾伯崇、陈顺管辖。这三伙海盗经常分帮各自劫掠，而又联合打出"三合公司"旗号勒收过往船只行水。数年后，啸聚海盗人数多达二三百人，有大乌底贼船10多艘。其中吴品三一伙有100多人，曾伯崇、陈顺各辖数十人。

约1924年，驻闽南一带的民军张贞部为扩张势力，对这伙海盗进行招抚收编。封曾伯崇为"少将司令"、吴品三为"团长"，陈顺则自封为"总管"，但却只有空名，并无粮饷。事实上，彼等仍是一伙靠劫掠为生的盗贼。曾、吴、陈三魁，既为盗，又各在云澳、隆澳经营钱庄，发行货币，办"老虎艚"、"舶业"。真是贼、官、商一体。

杀人越货　为害一方

时处乱世，匪焰日炽，三魁盘踞南澳岛，公开打出“三合公司”招牌，勒收往来行水，每艘经过南澳海面的潮汕、闽南船只，每年被迫要缴交一笔钱银，领取牌照——一支印着“三合公司”的小红旗，挂于船上作标志。贼船在海上，若发现无挂该旗者，就进行抢劫。有敢抗拒者，连人也被杀害。还有一些远海货船，则常被骑劫至南澳近海，杀人越货，洗劫一空。据1938年郭少音著《南澳血战记》所述：“著匪吴品三、曾伯崇等，盘踞岛上，和汕尾的大鹏、诏安的布袋澳匪徒相勾结，前后十余年，曾骑劫大洋船四、五十艘。”而闽粤沿海一般货船被劫掠者，更难以计算。下面所记述的，不过是几个当年亲历亲闻者的零星忆述而已。

1919年1月，一艘运载陶瓷器的货运量近千担的台湾龟仔船，驶至离南澳约30公里的打泵礁海面时，遇到陈顺为首的贼船，贼众用搭钩搭住货船后蜂拥而上，把水手们封在舱底，再把货船驶往福建诏安县四都。货主后用3000龙洋把船赎出，领到“三合公司”小红旗一面挂在船头，方得放行。

1920年春，有三艘白北龟木帆大货船，从福建驶往汕头，至南澳与海山之间海面时，吴品三手下三艘贼船从宴屿出发追赶货船。货船开炮自卫，击中一艘贼船，但另外两艘贼船仍然冒着炮火，追击货船。其中一艘货船终于在长山尾海面被追上，贼众把人全部杀死，将尸首抛于海滩，再把货船驶往南澳后江湾，卸下染有人血的茶饼2000担。

同年农历四月一天早上，陈顺在汕头港，混进了一艘开往暹罗的大货船。船出港后，他乘人不备闯入驾驶室，把驳壳枪口对准舵公，叱道：“其他人免来，我一人对付舵公就行了！”令他把船开往南澳岛前江湾。舵公听他口气，误以船上贼人很多，被迫

把船改变航向，驶至前江深水处覆飞礁，由吴品三、曾伯崇派手下驾小艇前来搬卸香云布、乌豆、花生、白糖等100担左右货物。搬完后，陈顺为显示自己“胆略”，对舵公说：“你把船开回汕头港，说是我陈顺单人劫船的。谁要比高低，就请他到南澳来！”

1921年春，一艘载重1000多担的八桨木帆货船，从汕头开往福建，过前江海面时，6名海盗持枪窜上渔民黄老鸭等的敲艄船，利用小船速快，驶帆兼划桨，追上货船，把人封在头舱，然后驶近浅海，搬走约1000担的绸布、黄豆等货物。

1927年8月5日（农历七月初七），吴品三手下的谢圆、陈猪槽等匪徒在柘林海面袭击4艘渔船，掳杀了隆澳渔民黄柳、黄土、黄坑、黄番仔、周荣秋、陈兴、许启明、许筐头、黄友才、柯夹、柯番茨、陈色、余双等18人。

当时，其中一艘渔船的舵公黄柳下跪哀求说：“先生，船及所有东西给你们，饶我们一命吧。我上有七十老母，下有三岁孩子。”其他5名船员也跪求。小贼目章尖航（山顶乡人）竟丧尽天良，将他们用斧劈杀，踢尸下海。船员章强，向一同宗长辈的贼徒悄声哀求：“叔公救命。”该贼有意救他，用绳子把他松松绕了几圈，推下海去，因此侥幸得救。

最为震惊世人的是1928年10月13日发生的骑劫汉阳号轮事件。汉阳号是行驶于伦敦、香港、上海、厦门之间载重量约2000吨的英国货轮。该轮航行到上海时，有饶平县虎头山盗魁杨狄等10余人，假扮为乘客，混进该轮。船在海上航行时杨狄一伙海盗分头出动突袭警卫班，控制无线电台、驾驶室等，搜刮去船上金、银、药材等珍贵财物，然后把汉阳号劫持至南澳岛青澳湾竹栖肚海面。在此之前杨狄已通知吴品三等“备船接货”。将船上留下的白丝、绸缎、手表等货物用来接济同党，又可借此转移目标。当时吴品三派“营长”谢圆，率人驾30艘对鸟船，从草寮尾出发，前往搬货。干了3昼夜，仅搬走一半，货卸在白沙湾、营盘头、吴

平寨，青澳的沙坡、山洞，还在近海山坡上，堆砌成三大堆，伪装为草垛，划船运货者，伙食除外，每人每天各得一匹布。为迅速藏好赃物，吴品三令青澳保长，强迫全乡男女200多人，于夜间来鸡笼山把布挑至五六公里远的青澳，藏于乡头坑仔尾旧厝内及山洞内10余处，到第四天拂晓才将汉阳轮放行，向香港驶去。天亮时船主、水手们认出了虎屿上的一座塔，分析出劫轮者是南澳巨盗，而不知是饶平海盗杨狄和南澳海盗吴品三合谋干的。

这伙海盗不单在海上杀人越货，整个南澳岛也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凡是触犯他们团伙利益的都很难逃过他们的毒手。

1921年初，南澳商人黄乃端、黄振良为保护他们在海上运载货物不受盗劫，邀请澄海县贼首王南番率数十人来后宅驻扎保镖。元宵前的一个夜里，吴品三、陈顺等在深澳贼巢内吸鸦片，闲谈中提及此事，陈顺火性大发，乘夜飞跑近20公里山道，至后宅前江吴厝王南番住所，探知王带卫兵去看戏，陈顺藏匿于路边厕所侧，伺王南番回归时开枪将他击杀。

1925年，在汕头市岭东日报当校对的深澳乡人吴桂东以笔名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鞭挞“三合公司”的文章，吁请政府剿办。三个贼魁大为震怒，误认为是南澳知识界名流林少颜、章肇华、蔡等元所写，怀恨在心。其时，林少颜任后宅水厂（即盐业公司）经理，他们在来岛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奋笙（潮汕工人运动领导人杨石魂胞弟）引导下，于1925年末，公开成立了县总工会，组织理发、泥水、打铁、搬运、补网、染网工人，合渔工近千人入会。数次游行，提出除匪患、反剥削、要求提升工资等口号，因此林少颜等三人被贼视为眼中钉，密谋杀之。善于钻营的南澳上岙章声敬图谋篡夺水厂经理大权，也参予策划。三贼魁采取抽签办法，各人认定暗杀对象，分头行动。

1926年3月2日（农历正月十八日）黄昏，住于后宅下鱼街三楼的曾伯崇，诱请林少颜前往其家。林与随员吴福顺偕往。林

上楼，哨兵将吴遣回。贼将林连夜绑押，从后江下船，载往深澳。是夜，家人见林未归，知凶多吉少。

翌晨，林少颜之金兰契友章肇华得知林被绑讯，即慌忙坐轿到深澳探访林少颜下落。途遇骑白马的曾伯崇，曾佯装好意，盛情相邀至家中打牌，不肯放归。章知身入虎穴，苦无脱身之计。两天后，曾又佯装好意，把自己那头白马让章骑归。章不知是计，骑马至后花园下伯公后山，伏兵闯出，捆人塞嘴，当夜被拖至深澳海面枪杀。

林少颜在被诱捕四天后，在深澳石狮头被匪徒谢圆、柯成忠等枪杀后破腹，沉尸海底。

就在林少颜被绑架当夜，陈顺也按预谋，率30多名匪徒包围了云澳蔡等元家。蔡本有一支手枪，但考虑到力孤势单，恐累家宅，便开门受擒。当夜蔡被拖至青澳竹栖澳沙坡，被斩断头和四肢，尸体漂至饶平县柘林前之西澳。

三魁有时也干绑票"生意"。一贯鄙视海盗的深澳人"荣美"号铺东陈居就曾于1927年正月被绑架，海盗当他的面刀斩一同被绑的深澳居民杨深以恐吓他，后经家属请人说情用钱赎回，才幸免一死。陈经此一吓，便奔叠石岩出家为僧了。

是年11月，三合匪众，攻陷县署及游击队、警察区署，搜净枪支，收缴铜质县印，俘获县长周潜之子（一说县长被俘囚果老山，串通两看守遁泰国）。贼自封曾匪之堂弟曾三为县长（仅当一二个月）。匪势猖狂，旺极一时。

官军围剿　海盗反扑

林先立上岛围剿海盗

1927年，广东省政府任曾伯垣（广州人）为南澳县长。县治

原在深澳，因为海盗盘踞，不能到任，乃就隆澳隆江书院暂设行署。

是年春，爱国民主人士林先立（澄海人）任潮、澄、饶沿海保安局局长。他应南澳中共地下党员蔡盖清、林奕明等请求，来岛清匪。

4月13日夜，林先立率随员及局兵30余名，配以海山及广州民团共约200人，在蔡盖清等配合下，乘船抵前江湾进驻隆澳。天明，匪见官兵，不知从何而来，也不明实力多少，纷纷逃匿星散。林先立捕获了杀害林少颜的凶手柯成忠，将其枪决于圆山脚下。

当时的潮、澄、饶沿海保安局仅有长枪20余支、驳壳枪数支、老式轻机枪1挺，各民团的装备也极简陋，林先立上岛后便成立了县清匪委员会，设县防卫团，任命吴桂东为主任，蔡盖清为副主任，在县城数次召开清匪动员大会，发动殷商捐资购买武器弹药。

5月12日，吴品三、曾汉义（即曾三）、谢圆等纠集饶平县东界著匪杨烟筒等共400余名，携机枪2挺，从深澳登陆，潜至隆澳，向保安队防地猛攻。林先立率队反击，隆澳乡民鸣锣配合，激战六七小时。在战斗中，匪一挺水轮重机枪发生故障，火力大减。匪势不支，向云澳溃逃。此役毙匪首杨流川及匪党20余名，伤者甚众。保安队也伤队长陈翔鹤及兵数名，耗子弹5000余颗。

不久，林先立组织民众义军300多人，经松柏坑村，分两路进攻匪据点雄镇关和深澳乡。经半天激战，匪败窜海上。当夜，匪又登陆偷袭设于云澳区振云小学的义军指挥部。时兵众多睡于中柱乡妈宫，指挥部仅有一中队卫兵。林先立听枪声与蔡盖清持枪抗击。匪徒来势汹汹，冲进大门，向厅房狂射。危急中，幸驻教室内的队兵已急起抵抗，林先立的卫士陈龙又奋力用机枪扫射，击倒了领头的海盗，终于反败为胜。是役海盗伤亡甚众。义军阵亡班长一名，马夫一名，蔡盖清左胛受伤，被送往汕头医治。

接着，林先立又率义军进剿深澳，实行清乡，匪无立身之地，逃离岛上，依附于饶平县的杨狄和闽南杨尚书等匪帮。

过两个月，林先立再调兵进剿饶平县大港匪穴。至此，盘踞于饶、澳的海贼已溃不成帮。

海贼卷土重来　劫洗云澳

越年5月，海盗又集结。吴品三率300余人，一路从深澳，一路从九溪澳，突袭云澳。贼众中不少人手持扁担绳索，预备对云澳进行一次大劫掠。

在城仔顶（今车站后），云澳防卫团商防队长蔡启祥、副队长陈著雄、黄成率队抗贼。在交战中，贼众武器装备优良，有水轮重机枪，火力密集，商防队员抵敌不过，边打边撤至五福埕（今小百货商店）。蔡启祥队长身中7弹，经救治无效，于第九天牺牲。陈著雄、黄成两位副队长，在云澳湾上划竹排外逃时，不幸被捕，押上贼船。两人乘贼不备，跳海逃走，被贼乱枪打死。贼陷云澳之后，饱掠而去。

事后，乡民集资于振云小学建一座纪念碑，上刻："民国十七年四月初十日，云澳清匪殉难烈士蔡启祥、陈著雄、黄成暨兵士吴明、陈大鹏、周判、陈卓辉。云澳防卫团董事会敬立。"该碑今放在中柱乡天后宫内。

匪洗劫云澳，震惊全岛。岛上绅商，以匪蹂躏劫杀无虚日为由，再向汕头当局请求清除匪患。数月后，驻汕防军派两团兵力（实数百人），来岛分几路进剿，10多天后，防军返大陆，匪又卷土重来。

陈叮冬剿贼

1928年10月，英货船汉阳号被吴品三等劫掠事件发生后，英政府即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抗议。民国政府深感事态严重，乃下

令痛剿南澳巨盗。

汕头守军团长陈庭雄（人称陈叮冬，原籍南澳县后宅），奉命率400多名官军来岛剿贼。当时民谣云："天顶雷公，地下陈叮冬。"陈叮冬原也是潮汕名贼，后被国民党收编，任为团长，但仍贼性不改，到处扰民。

官军上岛后，贼众藏匿。他们剿了深澳乡，抓到吴品三一名手下叫陈文的（绰号"大肚文"），迫其带路，在金山山洞，白沙湾等处，缴获了部分白丝布。同时，把吴、陈、曾三个贼魁家屋全焚毁。也乘机抢劫民财。吴品三之姐，嫁给郑提台之孙的吴金枝，刚从澄海县城搬家来澳，所携18箱财物，即落入了官军手中。从暹罗归国的华侨康思勇、康木垒所带的金器也被抢走。

其时，贼众躲藏在青澳乡李公墓边的山洞里，陈叮冬闻风率军进剿青澳。由于官军扰民不得人心，无人说出贼的去向，抓了40人，严迫带路，仍无人合作，皆恐日后受贼报复。陈叮冬失去深、青两澳民众支持，剿贼无大收获，一个多月后，便草草收兵回去。

作恶自毙　三魁伏法

这伙匪徒作恶多端，为害至烈。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号称三魁的吴品三、曾伯崇、陈顺也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先后于1926年、1928、1933年伏法。

最早落网的是陈顺。1926年底，他率崔阿铁、蔡水鬼等12人在厦门伪装乘客上了一艘轮船，船未开行，陈在舱小便，掀起阔裤筒时露出了暗系在小腿的驳壳枪，被一名水手发现，密报船长，船长急忙引来武装警察，将陈顺等当场捕获。

陈顺等被捕后被押在厦门监狱时，狱外匪党企图以重金贿赂厦门法院院长杨碇区，请他暗中放陈去香港，而以另一重犯作代

死鬼，遭到杨的拒绝。数天后，陈顺在厦门被宣判处决，他面不改色，竟然用脚踢倒案桌，扬言："十八年后再相会！"真是凶顽至极。

1928年，曾伯崇被官军追剿后逃遁他乡，匿藏于揭阳棉湖镇。一天夜间，隔壁抓赌，曾做贼心虚，误以为要来抓他，仓皇翻墙奔逃中跌折了腿，受擒后在揭阳县城枪决。

陈顺、曾伯崇毙命后，吴品三已处于穷途末路，这时贼伙内部又起冲突，吴品三诱杀了手下悍将谢圆，偕心腹数人逃窜福建。

1933年春的一天，他窜至诏安县城关镇六街义弟贼魁林国光家避难。林贪官军缉吴之悬红厚赏，假意在家中设宴相待，席间伏兵突起，绑了吴匪，押送给驻军。官军怕巨盗逃出，用铁线贯穿吴的双掌并剪断后脚筋。解往汕头市，被判处死刑。其妻康房平时伙同吴贼作恶多端，也被捕杀于汕头市。是年夏，国民党第七师副师长兼澄、饶、澳三县剿匪主任谭朗星又派营长李祥达进南澳剪除三魁残余。至此，横行闽粤沿海20余载，奸淫掳杀，罪恶滔天的"三合公司"便彻底覆灭了。

（广东省汕头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三五八”称霸腊尔山

凤政文

1921年至1925年间（民国10年至14年），凤凰县连遭水旱天灾，加上国内大小军阀不断混战，可谓年年灾荒，岁岁烽烟。一些散兵游勇，三五为伙，在县境内四处偷盗行窃，有的甚至拦路抢劫，杀人越货，弄得民不聊生，如陷水火。

1925年，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熊克武号称10万大军假道湘西北代。其下属川军第二军军长汤子模部进军湘西，与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发生激烈的混战。结果陈渠珍被打得一败涂地，兵勇溃散，枪弹四弃。川军损失也很惨重，丢下的枪支弹药不计其数。川军、湘军、巡防军抓夫派款，横征暴敛，使湘西各族人民蒙受了空前的兵患灾难。这时的湘西一片混乱，民怨沸腾，大有“一夫相招，所在蜂从”之势。

盘踞在腊尔山一带的一支绿林队伍，首领龙妹堂，自称“三五八”，眼看这种局势，便乘机扩充人马，打着“杀官吃大户”的旗号，搜罗饥民勇壮100多人，明火执仗地在湘黔边境，凤乾（城）、凤泸（溪）、凤麻（阳）等县交界之地，以及凤凰的总兵营、木里、得胜营、大田一带活动，开仓抢粮，大大震动了这些地方的富豪人家。由此而后，其势日益嚣张。龙妹堂自恃势力强大，曾先后几次攻打地势险要的两头羊，以作日后盘踞之地，但都遭到失败。1926年6月，两头羊茶山寨的吴寿云前来投奔龙妹堂，带龙部从茶山攻打并占领了两头羊及小坪、上下茶山、鬼塘大小18

寨，并招当地民众加入所部，于是龙的队伍很快扩展到五六百人，声威大震。

龙妹堂是新寨（腊尔山）附近板都国人，有兄弟三人：大哥号称“一七八”，二哥号称“二六八”，龙妹堂排行第三，所以号称“三五八”。龙妹堂原先在新寨“右翼游击司令”隆屏贵部下当马弁，隆屏贵统治着新寨和鸭堡寨的大、小98寨，摊捐派款，明要暗抢，杀人霸产，无恶不作。隆屏贵自知积怨甚多，恐遭人暗算，因此加强随行保镖，所到之处遍布岗哨。他规定凡有人通过岗哨，如口令不对，“无需禀告，枪杀勿赦”。一天，他的18岁的儿子隆宪义由鸭堡寨骑马回新寨，走到下马碑，哨兵不认识他，即问口令，隆宪义傲慢地斥责哨兵说：“是老子，你妈的问什么！”结果被哨兵一枪击毙。论理哨兵无罪，可是隆屏贵却将8名哨兵绑押白斗坪统统杀死。其中一名哨兵是隆屏贵的得力打手吴把三的表弟，因此引起吴把三极为不满。同时一些被隆屏贵欺压敲诈、积怨已久的富裕人家，乘机暗暗买合，怂恿吴把三为表兄弟报仇。1921年（民国10年）的一天，吴把三率领一部分人马到鸭堡寨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将隆屏贵杀死，砍头示众。并乘势率众奔往新寨袭击隆屏贵的老家，企图将隆屏贵的胞兄“左翼游击司令”隆屏侯杀掉。隆屏侯闻讯，急往贵州潜逃。这样整个新寨就失去了有权威的统治人物，局势大乱。吴把二、吴把三兄弟眼见隆屏贵已死，隆屏侯潜逃，就在本寨——土板垄组织一伙人马杀向新寨，将隆屏侯兄弟的财物一抢而空，房子付之一炬。

这时，龙妹堂和龙和清（曾在隆屏贵手下当排长，人称老排），不满吴把三兄弟的过火行为和不服其称霸新寨，便以替隆屏贵报仇和剿匪为名相号召，搜罗隆屏贵兄弟残部，与吴把三分庭抗礼，直接向吴氏兄弟开火。龙妹堂带领龙和清及“二六八”等一伙人，与吴把二、吴把三兄弟在新寨一带杀来杀去，他们双方一边厮杀一边抢劫，搞得新寨苗汉人民叫苦连天。他们这样混战

了两年多，到1924年（民国13年），龙妹堂与吴把三在新寨苏马河分路处的“咱搞者吹”（苗语地名）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决战，结果龙妹堂击毙了吴把三，打垮了吴把三的队伍。随后龙妹堂带领人马到吴把三的老巢土板垄、新寨一带烧杀。吴把二无力对付，只好带领残部潜逃。从此，龙妹堂就在新寨称王称霸，为所欲为。

龙妹堂占据天险两头羊和腊尔山以后，声势更大。凤凰境内不少小股队伍也打着“三五八”的旗号夜聚昼散，拦路行劫，杀人放火。“一声狗叫，心惊肉跳”，整个凤凰一片恐怖，国民党政府自顾不暇，鞭长莫及，只能听之任之，莫可奈何。

1926年11月下旬，陈渠珍在凤凰召集了剿匪会议，他沿用北河剿匪的经验，确定了“剿新抚老”、“剿抚兼施”的方针。他认为“三五八”是一群乌合之众，竟敢在自己“后院”放火，作恶多端，必须从速剿除。于是派了巡防军统带顾家齐率一团人马，声势浩大地进攻两头羊，清剿“三五八”。

两头羊，是一个天然的独立山区，海拔在600——1000米以上，为万溶江的两大支流所合抱，形成一个独立的山岛，岛上洞壑岩，交错钩连，边缘悬崖峭壁，万丈深渊。境内两座对立的奇峰高耸入云，形如斗羊；中部凹下，形成了7条长垅和2块小盆地，与外地相通的只有5条深谷溪水和一条崎岖险路。是一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加之此地与外地相距甚远，故明清两朝以至民国初年，统治者威称其为“不可王化之生界”。龙妹堂占据两头羊以后，虽有一些官兵来剿，见此天险，都是望而生畏，兴叹而还，连声名赫赫的龙云飞，也只好与他“划山而治”，不敢轻举往犯。

顾家齐人马抵边后，先从正面进攻，其势甚为凶猛，龙妹堂的人马靠山依河，居高临下，拼命抵抗。顾家齐连攻三日不克，反而损兵折将。顾见其势，便亲自到前沿阵地仔细侦察，他认为此地虽有苗岭天险，但龙妹堂的队伍纯系乌合之众，只要智取，完

全可以迅速拿下。于是先从各营、连中挑选土生土长且精通苗语、熟悉情况的200名精悍士兵，组成8个“飞队”，许以重赏，加以训练，使其攀援穹山峭壁如履平地，然后令其风雨无阻，日夜不息，如狼似虎地袭击两头羊。同时他命令部队兵分两路，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一路由桃花溪下南水，佯攻达尼；一路以重兵从两岔河上叭仁，经八公山直捣龙妹堂的指挥部包荷寨。果然，龙妹堂除命一部分守御正面之外，其精锐人马统统调往达尼御敌，当他们发现叭仁之敌进攻时，由于指挥不灵，难以集中力量，抵敌不住，只得节节败退。“飞队”从四面八方攀登而上，乱烧乱杀，龙妹堂的队伍越来越混乱。经过七昼夜的激战，顾部占领了大小18寨，捣毁了龙妹堂的指挥部。龙妹堂只好退避在“叭犁么”（苗语地名）的岩洞中。此时，顾家齐的佯攻部队已回师增援。埋伏在龙妹堂退路两侧的“飞队”也摆好了“口袋”，只等龙妹堂的残兵败将往里面钻，顾家齐则率主力乘胜围剿。龙妹堂在岩洞中召集会议，决定乘夜突围，哪知冲出岩洞以后，在“叭高热”（苗语地名）的要道上正进入顾家齐的伏击圈，被打得焦头烂额，死伤不计其数。龙妹堂深夜搜集残部，往高山区补抽方向逃窜，在逃窜中又遭到顾家齐部队的追击，终于被彻底打垮。顾家齐乘势搜剿，亲自在烂草坪（地名）捕获了龙妹堂残部一百八九十人，押回县城，不分首恶协从，罪恶大小，先后都杀掉了。龙妹堂逃出两头羊，只身逃往永绥（今花垣），企图重新组织队伍，卷土重来。

1927年，龙妹堂后因在卫城的雅酉寨赌博，被追捕官兵擒拿后杀掉。死后，其部下龙和清收集网罗残部，进一步扩充势力，盘踞凤凰腊尔山一带。

龙和清，1902年生于凤凰腊尔山所得板都国。19岁就在“二司令”隆屏贵手下当马弁。他胆大妄为，隆屏贵十分相信他。当隆屏贵被吴把三杀死后，他总想寻机为其主子报仇。不久，与“三五八”联合，终于打败了吴把二兄弟。杀死吴把三后，便与

“三五八”合伙霸占腊尔山，经常在石田、木里等地抢劫。他在龙云飞与龙清富混战期间，舍生忘死，手段毒辣，很得同伙赞扬。“三五八”死后他占据腊尔山为王。这时陈渠珍割据湘西进入极盛时期，其嫡系部队正云集凤凰。龙和清吸取“三五八”的教训，自知不是陈的对手，便带着队伍，投奔到贵州的石凤鸣、龙万章部下，避开了陈渠珍的进剿锋镝，而在湘黔边境一带得到发展。

1930年，陈渠珍割据湘西的势力日益雄厚，使得蒋介石和何键感到不安，进而对陈采取措施，限制他发展势力。陈渠珍为了应付何键、蒋介石的“剿共”指示，不得不将兵力往湘西北移动，精力亦不得不放在对付何键的阴谋暗算和蒋介石的“剿共”上，暂时放松了对有屯七县尤其是凤凰境内土匪的清剿。这就给土匪一个恢复和发展的极好机会。龙和清乘此机会在凤凰和松桃的边境拼命扩充势力。他的队伍由四五十人很快发展到三四百人，龙再兴、龙再生兄弟成了他的骨干。龙和清自称“司令官”，封龙再兴为“副司令官”，龙再生为“大队长”。他们以腊尔山为据点，不断窜扰两头羊、阿拉营和湘黔边境。

1940年冬，龙清富接受了县长李宗祺的招安，认为有机可图，便同其左右膀龙昌培、龙再兴商量，决定自己和龙昌培去接受招安，龙再兴继续留在湘黔边境一带活动，以控制腊尔山一带。经乡长余子坤返县城同县长李宗祺几度磋商，李宗祺任命龙和清为警察队长，直辖三个分队。龙和清自带一个分队驻县城副近清溪哨等地“剿匪”和“维持地方治安”；他的太太带一个分队仍驻腊尔山，龙昌培带一个分队被调往麻阳吕家坪配合“防匪”、“剿匪”。驻在腊尔山的一队人马，以“剿匪”为名，明警暗匪，日警夜匪，与龙再兴等狼狈为奸。龙再兴仗他的势力在地方危害更大。

原先当过新民乡（即腊尔山）乡长的吴把二，在1924年被“三五八”、龙和清打败以后，便四处潜匿，存心伺机报仇。顾家齐剿除了“三五八”以后，吴把二便招安在顾家齐的部下，后来

升任了营长。这时吴已离开了部队，回到本乡在乡长余子坤的部下当乡队副兼任“清剿”大队长。吴把二经常对龙和清部进行清剿，龙和清、龙昌培、龙再兴等几度被困，险些丧命。因此，他们之间积怨更深，水火不容。但由于吴把二十分狡黠，后来成了乡长余子坤的心腹之患。余想把他除掉。1942 年秋末冬初，当龙和清招安后还住在县城的时候，余子坤几经周折，怂恿龙和清的太太勾结龙再兴、龙春杰、隆光海等，共同密议，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将吴把二杀死在乡公所门口。余子坤利用龙和清一伙的势力杀死了吴把二，但龙和清一伙又成了他统治新民乡的绊脚石。于是，余子坤又暗中唆使吴把二的堂弟吴国恩向县长李宗祺控告龙和清，说龙和清是杀死乡队副的主谋。李宗祺接到控告书，加之平常又常听到余子坤汇报龙和清的太太及其旧部在腊尔山一带胡作非为，认为龙和清等“打狗欺主”，祸患在即。同时他又了解到龙和清同第九区督察专员陈迪光配合默契，陈将调他到专员公署担任清剿大队长，日后于己不利，因而决心用计杀掉龙和清，消除隐患，此时适逢龙和清的部下、驻防麻阳吕家坪的龙昌培擅自撤离防地，企图将队伍拖上山为匪。李宗祺获悉，即令龙和清前去处理。龙和清已闻吴把二事件，现又发生此事，已知李宗祺对已存有疑心。他到麻阳高村适遇龙昌培带队回凤，立即以“违抗命令”，扰乱军心”为名将龙昌培枪决，以释李疑。李宗祺本欲借龙和清之手杀掉龙昌培，以孤立龙和清，现又抓住龙和清不经请示，竟敢处决一个警察分队长，因此杀龙的理由更足。李即与余子坤、田纯卿密议，设计处决龙和清。当龙和清从麻阳归来，将亲信 10 余人带到县城兵房弄子余子坤家中住下以后，余即邀龙和清到县政府与李宗祺“面商大事”。当龙和清一踏进李之卧室，身高力大的警士包宗佑即将龙擒倒在床。接着来人将龙和清与余子坤同时捆绑。李宗祺宣布龙和清“通匪杀人”，并骂余子坤“知情不报”，喝令把龙和清押赴池塘坪枪决。然后为余子坤释缚，陪笑

言欢。

在县政府擒拿龙和清的同时，李宗祺还派了警察分队长龙万昌带领一个警察分队前往兵房弄子解决龙和清驻在余子坤家里的10多个亲信。龙万昌胆怯，一进兵房弄子就鸣枪。那一伙人听到枪声，情知不妙，慌忙冲出屋来，各自飞奔而逃。龙万昌紧紧追击，只打死一人，余皆逃走。

在县城动手的同一时间，田纯卿率警察大队到新寨天王庙围剿龙和清太太，将其擒获，在天王庙门前枪决示众。

被打散了的龙和清的人马，纷纷向龙再兴投奔。树倒猢狲散，龙和清部就此瓦解。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家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辛亥年海匪进扰万城纪略

郑人权

1912年1月（旧历辛亥冬十二月）中旬，海匪谢桂初（阳江人武秀才）梁儒南（阳江人文秀才）率匪众80人，帆船6艘，由乌场登陆，进扰万城，驻万城一天后退去。其经过情况如下：该股海匪，在两阳高雷一带海面和港口行劫有年，于旧历辛亥年冬，侵扰到海南东路沿海各县，先后劫掠了文昌之烟墩、陵水之藤桥等处。当年十二月中旬，从乌场登陆进扰万城。他们原企图于凌晨突击万宁县城，劫持县官，迫使交出武器和钱粮库存，然后勒令商民缴饷，否则大掠。因响导（被胁从的三加村人）机智，故意带他们绕走弯曲小道，拖延时间，当抵达县城时已是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了。因之县城闻讯，早将城门紧闭，伏兵城楼作迎击准备。时县知事沈福申（安徽人）与防军（督备军）队长周德宾意见不一致。沈要周带队出击，周（也是海盗出身的）则借口匪众势盛，且所持武器均系九响枪，比较精良，战怕不利，不愿出击。匪众看见县城有备，计不得逞，遂暂驻在城外迎恩街之新铺（店名，现菜市对面），并布防岗哨，作备战状。

当时，东门街有一位叫钟周南者，绰号“青鼻”。他的父亲钟环瞻，曾作过阳江县教谕。他少时跟父亲住阳江多年，通晓阳江话。知县沈福申邀他赴匪营进行斡旋。他性欲小利，对冒险犯难的事情很少顾虑，被邀便毅然担当。沈知县交100元光洋由他先带交匪作伙食费，慢议撤离条件。时天寒甚，他为匪众张罗伙食，

找铺席。匪提出条件，要县城锦章、全裕和万选三间当铺各交光洋3000元，商号各交600元，满足他们这个要求，他们就撤退。县衙和商众一面答应筹备款项，一面密派人向兴隆抚黎局钟奇曾告急，请派黎兵前来解围。钟周南也暂躲进鸦片馆内不敢露面。

此时群众知道战事就将爆发，奔走相告。有一山尾村人绰号叫"吃不饱"的，把县衙向兴隆告急请兵的事情在市民中播开，被匪兵听到。匪魁谢桂初派匪兵由一烟徒叫林士乔的带到烟馆里将钟周南抓来，骂他串通官府，制造圈套来陷害他们，并要当场将他杀死。但梁儒南主张不必杀死，只要他保证他们安全下船，并负责催各当铺和商号将所答应的款交来就可将他放回去。当天夜里就逼钟周南当响导带他们到乌场港下船。因钟周南不认得路，走到东关，又拉了剃头匠林光凤带路。时全裕当铺理事钟铭轩，是钟周南之兄，闻悉乃弟被匪掳走，便雇了壮丁30多名，持械追去要把周南抢回来，但他们刚追到东关洋，就鸣枪。匪闻枪声，就急把钟周南架走，胁迫他上匪船。到此匪魁令周南写信交给林光凤带回去，催各当铺和商号将认款汇齐缴来，才把钟周南赎回去。

第二天，钟奇曾的黎兵已抵县城，锦章当铺的老板南福村刘阳三也纠集他的黎族佃户携械（均是粉枪）赶到，各商号见匪撤退，情势已缓和，谁都不愿拿出钱来，匪众见已无望。便劝钟周南入伙跟他们一起去干。匪魁们对他说："你是我们的师兄，你父在阳江当教谕时，我们都是他的学生，我们因家贫还欠了他的束修（学费）"。钟以晕船辞谢。过了两天，匪众在扬帆之前，便将钟周南释放了。

当钟周南在船上写信回县城向各当铺商号催缴认款时，里写着"款如收齐，可交徐是德恩带来"等话，钟奇曾认为徐是匪党，将他逮捕，严刑拷打。徐没有招供。又以徐曾参加过点会（洪门党），意欲置之死地。知县沈福申有意开脱徐，通知地方绅士陈世祯、钟铭轩、王陈枢、钟维垣等到堂观审，相机保释。开审时，沈

故意大骂徐、并要治以重罪。此时绅士们向沈求情宽释。沈乘机宣判徐无罪释放。当时钟奇曾不同意这种宣判，与沈争辩，沈说："没有确凿证据，怎能胡乱关人？"钟无以对，徐才得免罪。沈在当时颇有政声。

事后钟周南获得各当铺和商号酬送300元光洋，但钟奇曾认为退匪之功应归于他，便将此款捞到自己的腰包里了。

魏宗周整理

（海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三百冤魂

邓安新口述　吴承学整理

向仁轩制造的东流坝屠村惨案，发生在1918年。时当民国成立之初，国内军阀混战，鄂西边区亦连年处于战乱之中，成了无政府状态。自封的“团防”、拖队的土匪乘机四起，各霸一方，屠杀抢劫，鱼肉人民。当时来凤巨匪向仁轩占据旧司东流司一带，报复杀人，东流坝邓家300余口，青壮少年，老弱妇婴，全被杀害，真是惨绝人寰！兹据当时集体屠杀中幸存者之一、现年（1988年）82岁的邓安新老人亲口叙述，记录其事。

事件发生时，我才12岁。

我们邓家世代在东流坝聚族而居，嫡亲的10房人家老幼共300余口，成所的壮丁亦有百多人。全族人耕田而食，安分守已，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总算世代相承，过着自给自足的安静日子。

到了国民初年，地方匪霸蜂起，横行霸道。县城里虽然有个县衙门，县知事管不了事。旧司东流司一带，成了巨匪向仁轩的势力范围。东流司还有个匪首叫邓宏，是向仁轩的帮凶。我们东流坝邓家就因为得罪了邓宏，为向仁轩所不容，酿成了全族惨遭屠杀的大祸。

先一年，民国6年的冬天，邓宏带领匪众出外抢劫，到距离县城5里的土堡“关圈”。他们没有抢得钱财，就把殷实富户蔡国棉“绑票”捉到我们高石坎邓家的一个岩洞里关着，通知蔡家拿800吊钱来取人。当时仍沿用清朝的旧币，1000文眼眼钱为1吊，

800 吊是一笔巨款。蔡家正在筹款之中，准备赎人，高石坎邓家的人把“码子”蔡国棉放走了。他们就此结怨于邓宏。三日后，邓宏率领匪众百来人，把东流坝邓家的房屋一火烧光，连猪圈牛棚也不留一个。我们只好伐木割草，盖起茅屋居住。

一天，邓宏骑着一匹骡子，带着三四个弟兄，大摇大摆路过东流坝。我们邓家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看见了，一商量，冤家对头送上门来了，我们拼个命除掉这个心腹大患！于是大家拿起鸟枪、梭标，蜂拥而上，从东流坝赶到油房坳，追了数里之遥。邓宏弃马落荒而逃。从此双方结怨更深。

我们东流坝邓家虽有精壮男子上百人，但仅凭梭标鸟枪，实在不能自卫御侮。何况一年到头忙于在田里干活，哪能经常戒备？和邓宏结下了不解之仇以后，我们随时有“覆巢”之祸。族长邓维乃向驻在旧司的北军詹连长陈述向仁轩、邓宏在地方上的骚扰情况，请求他出兵进剿。詹密谋定计剿除，事未举而北军旋即撤走。

邓维密谋于北军詹连长之事泄漏，“打草惊蛇”，从此向匪仁轩公开扬言要找东流坝的人算帐。不久，向仁轩率领匪众多人，耀武扬威地来到东流坝找邓维寻衅。向仁轩说：“明白告诉你，这里是我的管辖范围，就得顺从我。你邓家族大人众，必须挑选 30 个精壮青年跟随我干，而且每年你们必须向我缴纳军饷。如果你同意照办，就当面具结签字。”邓维心想我们邓家世代忠良，怎能从他为匪？于是答道：“我们都是靠耕田种地养活家里的人，怎么抽得出人来，跟随你们一起干？实在难以从命。至于出钱出粮，我们愿意尽力照办。”向仁轩立刻沉下脸来，从牙缝里慢吞吞地迸出几个字：“那你等着瞧吧！”说罢愤愤而去。

向仁轩的部下后来接二连三地来到东流坝找邓家寻衅闹事。次年（1918 年），春夏久旱不雨，东流坝的稻田没有插上秧，改种了苞谷。农历七月半，田里的苞谷才戴红帽子。一天中午，来了

十几个匪徒，手拿长刀在地里乱砍苞谷。邓维出门一看，就高声喊道："你们这些人是吃粮食的还是吃草的？为什么要砍苞谷？"一个满脸挂耳胡须的土匪汉子从地里跳出来，凶神恶煞地骂道："妈的×，老子不但砍你的苞谷，还要砍你的狗脑壳！"他们继续挥舞长刀，乱砍一阵，扬长而去。邓维当晚在家召集族人商议，他说："看来我们今后过不了安静日子，大家都得小心。我们不但不能惹事生非，而且要息事宁人，忍让为好，免得惹祸。"

大约个把月以后，一天，又来了十四五个匪徒，跳到邓二蔑匠的藕田里，乱扯乱抠，眼看一田藕糟踏完了。邓二蔑匠是个头脑简单的急性汉子，按捺不住火性，就指着这些抠藕的人骂："你们这些家伙没有良心，你们要遭天收！"这些匪徒，哪肯理睬，反而故意抠得更起劲，把藕往外乱丢，把藕叶尽都打断在田里。邓二蔑匠气得肺都要炸了，"妈的×，当真不听！"边骂边往茅屋跑去，取了一支鸟枪，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藕田就是一枪。其实邓二蔑匠也没敢瞄着人放枪，只是出口闷气，哪计后果。

这些匪徒回去向向仁轩禀报："东流坝邓家的人短我们的路，用枪打我们。幸亏我们跑得快，不然就被揭翻几个了。"向仁轩听后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好哇！老子就叫他东流坝邓家斩草绝根！"他一声令下，集合了手下喽罗数百人，刀矛火杆，杀奔东流坝而来。匪部把邓家村子四面围困，大肆烧杀。向仁轩命令："鸡犬不留，务必斩尽杀绝！"匪徒们首先抓住了邓维，没说二话，一刀就杀了。他们挨户搜索，见人就砍，邓家的人仓皇未备，被赶得鸡飞狗走，乱窜逃命。少数人钻进丛刺密林之中，大部分人被赶进一个大洞。洞里别无出路，男女老幼 300 多人塞满一洞，年轻力壮的拿着梭标鸟枪守卫洞口，老弱妇孺挤在洞内。

茅屋又被烧光，跑慢了的人被杀死，邓家村子一片火光和血腥。匪徒开始搜山，发现了我们躲藏在洞里，立刻封锁了洞口。躲了三天三夜，洞内没粮吃了，仅有的两三百斤粮食吃完了，洞内

更加慌乱。向仁轩叫人在外面喊话："洞内听着！向仁轩大哥不杀你们，只有邓维是我们的对头主子，已被处决了。你们各自出来放心大胆回家。"这话谁敢相信？大家面面相觑，都想不出什么办法。跑不掉，拼不过，一位我喊公公的白胡子老头站起来说："不出去也是饿死，出去了，他们或者可能做点好事，不杀我们。管他死活，我还是要出去。"说着他就往洞外走。200多人跟着老汉出洞了。青年、老人、妇女、小孩，跌跌撞撞，走出洞外。那知一出去就走向了鬼门关！还有100多人没有出洞，也是坐以待毙！

"不准乱动！向仁轩大哥在旧司禹王宫等你们，已经给你们办好了饭，还有话讲。你们如果不去，就是不愿意和解，那就不好说了。"于是200多人被押到旧司禹王宫，吃了一顿稀饭。一个匪徒出来喊话："吃饱了，现在送你们回老家！30个人一队，规规矩矩地走。不听话的，要他吃'板刀面'！"大家明白了意思，这是走上杀场啊！不走也得走！人们30个人一队，像一群柔弱的羔羊，被驱上屠场。200多人全被屠杀在凉水井河边。前一批人被杀得如同砍瓜切菜，后一批人眼睁睁望着，愤怒哭号，惨叫哀鸣，声震山谷。匪徒们挥舞大刀，人头滚地；梭标杀来，直贯胸背。刀矛拔不出来，匪徒们还用脚蹬。鲜红的血染红了老人的白发；小孩被抛向空中，落下来穿在簸箕刀上，手脚乱动乱弹；未出母体的胎儿被戳死在孕妇肚子里。草地染成一片血红，凉水井小河变成了红水，岸上横七竖八的尸体东一堆西一堆，小河都被尸体堵塞，不流了。留下20多个大姑娘，匪徒们你争我夺，拔刀相向，互不肯让；在把她们奸污之后，又通通杀掉，尸首填满一个苕窖。当时，树丛里有外村人偷看过。"天呀！绝灭人性！杀人像杀鸡！"东流司的卢绍南谈起过他当时在现场目睹那种惨状的情况，他是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百多人没出洞，束手待毙。匪徒们砍倒洞顶上的大树，锯成一截一截的，把洞口封闭了，还加了几尺厚的泥土。洞口封死

了，里面的人就等于被活埋了。一个叫贵老二的老汉，被抓去强迫挖土封洞。老汉的女儿女婿就在洞里，老汉不肯去。他说："我病得几天连水都没喝一口，挖不动呀！"匪徒的刀尖子指着老汉的脸上："挖不动也要挖！没喝水，我们请你到凉水井去，同邓家的人喝'透心凉'。"透心凉是江湖黑话，指一种双刃尖刀。老汉一步三滚地爬到洞口，泪流满面地用撮箕端土："天呀！我在为女儿女婿垒坟啦！"

封洞不知几天了。我们在洞里不辨天日昼夜，有的奄奄一息，有的已死去，尸体都僵硬了。我家8口人，身上还有点干粮吊着命，只感到透不过气来。我在尸体上爬来爬去，忽然看到有个亮孔，是没有堵死的地方。向孔外一看，没见人。把耳朵贴在孔上听，好像外面还有人在监守着。我告诉了父亲。于是大伯、三叔、父亲和我爬到亮孔边，屏息着用手挖动泥土，深怕弄出一丝声响。扒一会，歇一会，扒出一个能容一人伏着通过的甬道。我们回来摸索每一具躺着的尸体，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口上听，只要心脏还未停止跳动，还有一丝微气的，我们都要拖出去，让他死里逃生。可是只剩我们一家8口还是活人哟！我们爬到亮口，等待黑夜来临。父亲先爬出去，伏在地上听了半响，不见什么动静，我们才跟着爬出去，幸好匪徒以为我们都已死光，夜里没人监守了。我们爬到硝洞坡上，天快黎明了，就隐伏在乱石丛刺之中。谁知天亮后，匪徒又去查看洞口，发现了我们爬出来的痕迹。他们又遍山搜寻。寻到了我们隐伏的乱岩窝刺蓬蓬的地方。一个匪徒站在一块大石头上高声喊："在这里，捉活的！"又向刺丛里放了两枪。母亲把双手使劲地捂住弟弟的小口，怕他哭喊。等匪徒离开时，弟弟已捂得晕死过去，嘴脸发紫，好久才苏醒过来。天黑后，我们一家8口分头逃难。大伯母和我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弟弟6个人逃往湖南，三叔三婶逃往咸丰。

三叔逃到咸丰，人地生疏，哪里能找到口饭吃？三婶又身怀

有孕了。没法，他们只好偷偷回来。三婶藏在高洞河亲戚家里，三叔自己往来凤土堡去卖零工，帮人家打谷子，得几个工钱偷偷送回来，养活快要生孩子的老婆。谁知又被向仁轩和邓宏发现了踪迹。邓宏告诉向仁轩说："邓三的老婆，怀身大肚的，还藏在亲戚家，可是没看到他男的。"向仁轩说："干掉！"接着又改口说："慢点，别惊动，等男的回来，一网打尽。如果她生了女孩，就不忙杀；生了男孩，就马上干掉。要断绝他邓家后代根苗！"偏偏三婶生了个男孩。三婶抱着刚出生几天的婴儿，被押到徐家桥上，又被杀害。一个匪徒把婴儿掼到河里，还补上一枪，结果了小小生命。三叔在土堡帮人打谷子，夜晚睡在四斗种凉亭桥上，被向仁轩的匪徒探悉，砍掉双手双脚，悠了两天才断气。城边人亲见其事，过路的人无不切齿愤恨。

东流坝邓家10房300多人只剩下我和伯伯2家6口，流浪在外，不敢回乡。东流坝成了一片荒芜，凄凉惨淡。

（湖北省来凤县政协　供稿）

九龙堂匪帮爆炸同兴渡

李泽林

历史上中山县曾发生一件匪帮爆炸同兴渡，溺毙旅客数百人轰动一时的大惨案。

事情发生在1930年左右，那时珠江三角洲盗匪十分猖狂。单说中山县三、九区一隅之地就有许多匪帮堂口，啸聚匪徒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亦数十人。其中较大的堂口有五龙堂、九龙堂、彩龙堂、天子堂等。

五龙堂匪帮是由大霸头匪首梁骚（梁缉峰）、高佬才（林才），黄圃匪首高佬惠（潘惠），新沙、新地匪首梁桂、麦伯父（麦布）等所组成。九龙堂匪帮是由浮圩、抱沙、罗松、牛角沙等地匪首塌头义（吴义）、郭叶仔（郭永和）、陈球、冯应、吴容清、关世等所组成。彩龙堂匪帮则是由港口匪首烧猪金（吴金）、林满，大南沙匪首郭大隆、郭义隆等所组成。而天子堂匪帮则是由梁自带、关骚仔以及九龙堂的郭叶仔，加上四区涌口门的匪首细佬哥（吴义和）、豆皮十九等所组成。他们经常四出洗劫，杀人放火，掳人勒赎，勒收禾票，不仅为害农村，而且经常截劫客船，为患行旅。

在匪帮盘踞的地方，闹得乌烟瘴气。地主、富农常购置枪械，遣其子侄当匪，以求立足。风气所及，不少青壮年以当匪为职业，把佩短枪当绿林引以为荣。

当时，南海广东堂的匪首罗鸡洪专以水雷爆炸行劫各江轮渡，非常残暴。而中山五龙堂和九龙堂的匪首亦打算爆炸行劫香港梧

州线的大火船。但不懂水雷，于是派出小头目郭三珠到罗鸡洪处请有制造水雷技术的匪徒回浮圩秘密制造。后以香港梧州线的火船是外国人所办，船坚炮利，不易下手，因而改变主意谋劫行走广州中山线的同兴渡。参加谋划者为五龙堂的匪首梁骚、高佬才，匪书记黄杞（黄祺仔的父亲），九龙堂的匪首郭叶仔、塌头义等。商议结果，决定约请彩龙堂匪首烧猪金、林满、郭大隆、郭义隆等共同合作，在中山港口出口不远的百花海面下手。

爆炸行劫的一天是农历三月二十五日。按照港口封建迷信习惯该日是所谓“天后诞”，地方上照例搭戏棚、请名班唱大戏。因此，由三月二十日到二十四日是港口一年中最热闹的几天，各江轮渡经过港口都敲锣打鼓，祝贺天后诞辰，各地走台脚的小贩，探亲戚的群众，打荷包的扒手都云集港口，商店张灯结彩，烟馆、赌场通宵达旦。是日官匪互相勾结，大排筵度，戏台上下都是当地匪帮的武装，枪械林立。在匪帮盘踞“保护”的地方，他们照例不许扒手活动，被匪帮拿获的扒手，照例用猪笼笠住，捆在戏台上示众。二十四日是大放花炮一天，当地匪帮认为抢得头炮，可卜一年胜利，广场上人山人海，抢炮的人，打得头崩额裂，甚至有开枪轰击者。到二十五日早，众匪帮看完戏后，就出发打劫同兴渡去了。与此同时，另一股匪徒则提前半夜从浮圩出发，互相配合行动。

同兴渡是当时很出名的拖渡，沿途搭客载货。是日驶经港口时，由港口开街搭渡的十分挤拥。其中包括有拉箱的戏班，来往小榄、容奇、桂州的小贩，刚释放的扒手，探亲回去的群众约共数百人。当船开出港口炮台后，开街的搭客已经入仓，只有一扒手不准入仓，蹲在船头。渡船因防匪关系，出港口后，即将餐楼和大仓的仓门封锁，搭客不能来往走动，都挤塞在仓内。

参加行劫的各堂口匪徒共有百多人，以九龙堂匪首塌头义为先锋，还有九龙堂的悍匪烟屎东（梁东九）、水瓜二（梁二）及五

龙堂的小头目梁广仔等。

行劫的匪徒布置埋伏在离港口不远之百花头两岸，水雷则安置在百花头独有一株木棉树对开的海中，由梁广仔负责在大树下按电掣。本来按计划是将拖渡的火船炸毁，再行劫拖渡。但恰巧这天下大雾，前面看不清楚，火船拖渡的缆很长，火船过去了，梁广仔才按电掣，轰隆一声，有如天崩地塌，火船炸不到，却将拖渡近船头处炸断。被炸断之一截，火船来不及收车，拖离甚远，蹲在船头的扒手和船上水手纷纷跳水逃生。此时伏在木棉树对岸的匪徒即开枪猛烈地扫射，锁在餐楼和大仓内的搭客无法逃出，又因船的一面翻转沉没，因而淹死数百人。其中有6名伪装为搭客准备作劫船内应的匪徒亦被淹毙，其他匪徒一无所获而散。

此轰动一时的历史惨案首先由逃生的扒手在港口传播开来，但直到事后多天，国民党政府才派人打捞尸体，从船仓中一具一具拖出，闻说有全家遇难者。

（广东省中山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老戴正大破沈丘城

刘慎五

1926年，大杆匪首戴正率匪徒大破沈丘县城（今河南沈丘老城），给人民造成了极为惨重的灾难。虽时隔58年，但人们一提起这场巨大的浩劫，无不毛骨悚然，咬牙切齿！兹将当时一些亲历者对破城情况回忆整理如下。

戴正，字端甫，名民权，人称"老戴正"，河南临汝县戴湾人。自幼家贫，以背煤为业，后与当地土匪勾结，昼藏夜出，打家劫舍，逐渐聚集匪徒5000人，竖起大旗，举他当大杆头目。后拉到汝南，占据县城。当时冯玉祥部军长门致中路过该处，戴即假惺惺地请他吃饭，结果门中计被扣，缴了一团人的枪才将门放走。自此以后，他仗着人多枪多，就在豫皖边区新蔡、阜阳等地横行霸道，烧杀淫掳，无恶不作。戴匪攻沈原因，一是守城的周营长以前在县西南一带大收烟款，勒索很多银圆和烟土（鸦片），引匪觊觎。二是匪在未攻城前，得到驻项城的旅长李茂森枪弹的接济（李以前也是大杆头目，后归正于任应岐部，他们是一丘之貉。）就越发猖獗。

沈丘县城南临泉河天堑，四门四关，地势险要，号称"五顷四"大（即540亩的面积），城高壕深，有险可守。当时城内住有周营长的4个连和地方民团的2个连，共约700人，坚守抗御，使匪徒未能越雷池一步，而匪徒武力约有一师之多，人万余，屡攻不下。于是大扎云梯，于1926年农历五月十九日夜偷渡城壕（那时因天旱，水深只到腰间），从城西北角登梯越墙而进，首先发火，致使守军一时

阵脚大乱。但守军下定誓与县城共存亡的决心，与之展开肉搏和巷战，结果投靠戴匪部的一个溃军王团长被击毙（这团匪军最凶恶，杀人最多）。双方激战至次晨方告结束。由于众寡悬殊，守军只剩下40余人，余均壮烈牺牲。是时周营长右臂负伤，由4名卫士架扶出东门而走。匪部闻讯，立即追赶。周至东北角数里处占领地势，"砰砰"打了一排子弹，匪方退回。当时城内尸横遍地，血流成渠，真乃是"争城一战，杀人盈城"！

戴匪占城不久，一天从西北方向开来靳云鄂师的一个团，奉命剿匪。由于轻敌未作缜密的侦察和部署，就长驱直入，待行至七里桥时，被守城匪徒了望发现，于是戴正挑一部分精锐武力出东门向西北迂回包抄其后路，致使该团腹背受敌，前后遭到夹击。结果生还的只有200余人，余者战死。戴匪攻陷沈丘后，城内各户住满匪徒。直到农历六月初九日才拉窜到东南的地里城。在此城的20天里，戴匪的血腥残杀令人发指。

他们清除城内外遗留的累累尸体，将其分别填抛到四关外的洼坑里。

将拉到的票子（人质）残酷拷打，只要能承认有地或东西，就可暂免一死。规定每百亩要银洋千元。如果谁说没有地或没有钱，乞求饶恕，他们就说："穷人还活着弄啥！"立即遭到刀砍枪杀。据王世臣说：俺爷仨被劫持到一个屋里，另有两个票说他们是穷人，没啥出息，立即被匪部三团三营十四连有个叫"乔三"的用刀砍死。在极端恐怖中，我们只得承认有地30亩，得交300元。俺叔到李湾亲戚家借了一碗烟土，作价100元，余缴不起，后来把我们带到地里城后才放回。

审老票，拉新票。该匪在攻陷沈城后，一面清审已虏的老票，四门大开，让人赎回。另外，每日边马外伸几十里裹新票。如后冢孜任国栋的父亲在老刘庄店种菜园，一天被虏去，匪徒将审问拷打他时，他说："你们让我把这件汗褂脱掉再打，我就这一件，如果打烂，

再没有替换的了。"打了以后，还是得承认有30亩地，才暂免一死。

戴匪仅在城西南角就害死无钱赎回的票子两三千人之多。他们的手段极其残酷，如竖立一些高架子，把票子手足捆住，挂到预先拴的绳子上，荡秋千式的来往游转抽打，就这样将票子活活整死。死后把尸体仍到城外深壕里。而在西关外一个洼坑里，填有尸体约1000具。北关外西北角一条东西深沟里，填有尸体约1300具（多系阵亡官兵）。至于东关，杀死的无钱无地的票子更多。在东关外东南角一个高地光场上，枪决和刀砍的票子就有四五千人，均被拉填附近西南角一个洼坑里。后人就称这个坑为"万人坑"！全城内外总共死难军、民、票约万人左右。北关内李俊岭、李占臣等人，被匪拉走，至今无信，类此情况，不胜枚举。

这股大杆拉到地里城后，1928年率部投归蒋介石，匪首戴正被收编为某部旅长。他嫌官小，又向南五县（光山、潢川、固始、息县、商城）一带拉去。1930年9月又被改编为新编二十五师。1931年又改编为正式陆军队四十四师，戴为师长，驻防河南固始一带。此时戴即改用"戴民权"这个名字。从此，蒋介石就利用他与我红四军对抗，屡与我激烈战斗，逮捕、残害我共产党和地下工作者多人。后奉调福建，仍与我红军对抗。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戴即调升为国民党三十九军任副军长。他到上海后，目睹中日双方3个月的阵地大会战，伤亡惨重，十分胆怯，畏葸不前，辞职返乡。回乡后，又任国民党汝南游击队副总指挥。1940年信阳日寇北犯，戴在正阳遇上日寇，经激战，败回遂平一带，为田倚南所收容。戴以败绩抱病，在遂平死于军中。戴正的一生，是罪恶的一生，他欠下的人民的血债难以估量，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人们将一代代地传下去，永远记住旧社会的兵灾匪祸，更加珍惜今天的安定幸福的生活。

（安徽省阜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孙攀脚巧拉肥票

雷振都

1930年下半年，洛宁孙攀脚杆已发展到200余人，武器装备大大加强。名气大哗。宜阳匪首徐吉生，见其有胆有识，出手不凡，将其招容麾下作为手足。他们在宜阳、洛宁等县乡，抢劫、拉票，到处骚乱，甚觉不够，想到洛阳拉票子，搞大钱。徐、孙密谋托人弄来了军衣、军帽、大皮鞋、白手套、墨色镜等，孙攀脚打扮成了一个大军官，挑选了5个善说会道、精明能干的匪徒扮作护兵，乘一辆汽车，开往洛阳。他们进城后到西华街口的一家大京货店门前，停了车，护兵先下车对该店店员说："请你转告潘经理，我们西工驻军孙司令，今天来想与你们潘经理面晤，交个朋友。"潘经理觉得喜从天降，立即整好衣帽，满面笑容，跑出店房，弯腰打躬，双手作揖说道："恭请大驾光临，幸甚！幸甚！"说罢，一手向前一伸，将身靠边一站说："请进。"孙就带领护兵，大摇大摆步入客室，潘经理恭恭敬敬地递烟、沏茶、设宴招待。宴会一毕，孙"司令"向潘经理提出要求叫他一同坐车到西工兵营里去玩玩。潘经理犹豫不决，婉言相谢，孙"司令"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护兵们借着口气，边说边拉，把潘经理拉上汽车。汽车开出城门越过西工，风驰电掣地向西驶去。潘经理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不自由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只好闭着眼睛，听天由命。汽车一直开到宜阳县柳泉北山，在一个小村庄里停了车。潘经理被士兵们关闭在一家农户的窑洞里。

潘夫人不见潘经理回家，心烦意乱，托人四处查找，十天二十天过去了，不见音信。悬赏招信，仍石沉大海。

时过月余，孙攀脚才派人到洛阳，借买货为名，向潘夫人透露了消息。潘夫人闻讯，立即托人到宜阳请徐吉生当说客，以2000元现金、120支手枪、1000套军装作为赎人条件，钱物送到放人。孙攀脚在洛阳府巧拉肥票的新闻，一时成了人们的话题，轰动洛阳，传遍豫西。

（河南省洛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豫省八中仲秋遭匪劫

陈子美口述　李乐山整理

民国10年（1921年）仲秋之夜，土匪白天中、黄建升、李晚成等竟敢到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坐镇洛阳的东关省立第八中学“拉票子”，裹走了40多个家庭富有的学生，奇闻大案，轰动城乡。我是受害者之一，目睹此一事件，现忆述起来，仍不寒而栗。

省立第八中学原名河南府中学堂，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民国元年（1912年）河南省政府把全省所有中学编次排列，改为省立第八中学，简称八中，该校为四年制，学生在校吃住，办学认真，成绩优良，在豫西颇有名气。

民国7年（1918年）我考入八中，在上三年级时，即1921年，仲秋节半夜，忽然一阵吆喝，把我从梦中惊醒，被迫穿衣起床，见一些带枪的人手持火把，屋里院外照得通明，刺鼻的煤油气味熏得人难受。他们胡喊乱叫，把同学们拦聚一处，逐一逼问：“你是哪村哩？姓啥叫啥？……，站那边！”问到我时，我说：“我姓陈。”那个歹徒说：“是第七乡乡长家的孩子。”也叫我“站那边”。夜深熟睡后的冷惊，陌生歹人的凶言恶貌，令人栗栗危惧。我感到事情坏了，一定是土匪来“拉票子”。折腾了一阵之后，土匪们持枪威逼“走”，把我们押往校外。学监赵民乐不言不语地跟在学生后面，土匪捣他一枪托：“你想昨？”赵学监说：“我跟着，家长们把学生交给学校，我是学监，要尽职尽责。”土匪“哼”了一声，在杂乱的吆喝声和枪栓上膛声中，同学们被拥押进黑漆的街巷……

第二天，河南道尹龙升堂亲自到八中安抚在校师生，查明真相：是土匪白天中、黄建升和李晚成等作案，即申报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吴大帅闻知大发雷霆，立传城防营营长来见。

城防营长马玉辰原是老毅军的营长，不属吴佩孚的嫡系，惊慌失措地去见吴佩孚，立正敬礼后惊颤地说："巡帅，玉辰失职……"吴佩孚怒极："我命你守城维持治安，你让土匪把学生拉走，这叫啥?!"抓起桌上茶杯砸过去，砸得马玉辰一身水湿，"你把学生追寻回来，否则军法不饶!"吴佩孚给马营长加派步骑兵，与洛阳县各区局子全部出动追剿，消灭土匪，救回学生。

马玉辰回到城防营，一面联系派定的各部武装出发追剿，一面征询部下有谁与白天中等熟识，命其给土匪送信，赶快放回学生。听说土匪盘踞在三官庙，就率领步兵、骑兵与局子枪兵分路出动，直扑李家楼过河，向三官庙围剿。

窝聚在三官庙的土匪接到城防营的警告信，听说官军已来追剿，就押着拉来的40多个学生转移。由于马玉辰率领的骑兵在前，步兵紧跟，声势十分凶猛，眼看就要追来，土匪不敢在路上走，钻进庄稼棵地里隐蔽。官兵在大路上叫嚣追寻，土匪在庄稼棵里窥势潜逃。富里生富里长的学生们，从未吃过这种苦，一会儿被土匪按爬在雨后湿地上，一会儿被土匪拉着弯腰快跑，有的鞋都跑掉了，有的陷进泥地，行动十分困难，个别机灵的学生乘机溜逃，匪首即指定一个人押一个学生，寸步不离，以防止再有溜逃。

有人说官军中有人和土匪暗地勾结，通风报信，马玉辰要求土匪放学生，土匪也为了减少拖累，缩小目标，把"肉票"挑选筛选，放了一些不很富有的学生，马玉辰以此报功，说是追剿胜利结束。吴佩孚不答应，一定要消灭土匪，把学生全数追回，命令继续追剿。大路上的官军和庄稼棵里的土匪一再讨价还价，在马玉辰要挟匪首非把学生全放不可的情况下，学监赵民乐先生才被允许领回一批学生，会合前批获释学生从枣园渡河，取道坎区

（清末民初洛阳的行政区划，按八卦分为8个区，坎区为其一）平乐返回洛城。其他最富有的学生仍在匪徒胁迫拘押下绕道城南向西逃窜。

8个区的局子配合官军跟踪追剿，追到关林小作村西面击毙匪首李晚成。我在西乡路熟，在混乱中乘隙逃脱。气极败坏的土匪急于快逃，有个学生脚腿疼痛加上肚饿怎么也走不动，被匪首开枪打死（土匪的匪话叫“撕票子”）。被打死的那个学生脑浆开花，面目全非，无人能辨认。老百姓把死难学生的尸首抬到城里八区办公处分别通知被“拉票子”的学生家长前来辨认。平乐学生郭应琛之母辨认出死者的鞋袜是自己亲手做的，呼叫“应琛”放声大哭，大家才确知郭应琛死于匪难中。由八区办公处主持为死者安排后事，坎区区政府为之树碑，安抚其家属。由于被土匪拉走的学生没有全数追回，学生家长见郭应琛惨死心惊胆怕，请求当局勿再派兵追剿，情愿花钱去赎“肉票”，希求用这个办法保全自家孩子的性命。

事件发生后，八中在城外东关不安全，学生不敢到校，自动停办。民国11年（1922年）秋，经各方协商，学校迁进城内文庙里，学生在操场街林家院住宿，重新开课。后来又迁到西大街西当店内，最后迁到西北隅寇家院。

（河南省洛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大屯村筑寨防匪窝匪及其他

李文修

大屯村位于洛阳城南10里，早先老寨很小，直径约15丈。同治元年（1862年），为防捻军，村周圈起寨墙，设东西南北四门，西门上横额刻“同心寨”，村大人多，在城南算个大村庄。

（一）

民国初年，豫西土匪横行，大屯人重修寨墙，购买枪支守寨，以防土匪进村抢劫。可是，由于亲戚朋友关系，村里也有窝藏土匪、互为利用的怪事。

重修大屯寨墙高五六米，设4门。迷信开北门不利，故长期封闭。寨门高大，双扇门开可过大车，锁上长链，则仅可过人。东、西、南门顶上各放土炮一门，长约1丈，木架近2米。寨墙周围分散放有碗口粗的“轱辘炮”，长1米多。

寨墙上窄处约1米，可来去过人，宽处约2米，筑有垛墙。垛外横捆檩条，叫滚木。贴垛墙搭草庵，架床高约1米，供守寨人放哨、休息。每隔50米左右的地方，筑一斜坡，供人上下。寨外隔三四米地方，从寨垛向外斜扯一铁丝，晚上挂灯笼滑到半腰照明。靠寨墙地方叫寨台，安放地雷，管粗如擀面杖，一二尺长，顺墙扯铁丝拉线几丈，炮内装好弹药，安上引火（土名媒子），高处焊弹簧，拉线接弹簧。寨台再向外，挖寨壕，宽一二丈不等，水

深可没人顶。村南临大明渠，开通“垅道”（明沟），可经常向寨壕放水。南门外大桥与寨壕之间砌有迎壁墙。人车绕着过，防止土匪正面冲击。

中农每户派购钢枪一支。我家买的“汉阳造”，另外人家有水莲竹、大小金钩、带盖枪、大十响、十三推、一响毛丝等。有钱的头面人物要手枪、盒子枪、八音、左轮、一响搬等。普通人家都有红樱枪，大刀等。

南门里的奶奶堂是全村比较适中的地方，设“公伙场”（村公所），是寨首魏连升、红枪会头目李小洛和士绅议事的地方。

住户十来家，组成一个排，举一户为排头。平日北街守东门，中街守西门，南街守南门。各街分派三两人都带枪站岗，盘查生人，寨门晚开早关。紧张时，只开南门，后半晌各门上敲锣打鼓为号，叫地里人早回来，关锁寨门。

夜里家家户户去人上寨，是个大事。大屯寨东西长约1里半，宽多半里，这么大个寨圈，每排分守几十米一段。我家是排头，父兄忙时叫我带人上寨，不叫我扛枪。我们分的南边李家胡同段。夏天我带条席和铺盖提灯，拿几根香。夜里站岗2人一班，一夜5班。上寨人齐，先抽草棒，按长短定先后次序，都想站头班或末班。我年龄小，不会办事，多是叔们帮办。排好次序，我把灯笼系到寨外半空就睡了。他们点香站岗，大概是一班站一根香。有人捣鬼，掐短，或者弄湿，常有换岗早晚引起争吵。

寨首和士绅夜里在“公伙场”值班，安排街上敲锣打更，还要查岗和巡视动静。有一天半夜把我叫醒，问我怎么没人站岗，我也迷迷糊糊，魏连升说：“罚他洋油5斤！”

那时候，官府人不下乡，寨首、士绅掌权，实际是无法无天。一天，一个中年人过村瓜地，吃瓜后转游一会儿。有人怀疑他是土匪，逮到村里审问，我们跟着看热闹。拉到公伙场绑到树上，烧红炭铲烙，哭声凄惨。没问出啥名堂，士绅把那人送到伊河边，扔

到河里，被乱枪打死。

南街张狗娃为人老实，人少地多，生活富裕。叫土匪起票拉走，因看守不严，逃了回来。潘村某人来村查问。狗娃家临街屋是红枪会练功地方，青壮年学习“金钟罩”、练“刀枪不入”。群众同情狗娃，傍晚派出2人持枪在街守候，等潘村人出来开枪打死，绳绑两脚，拉到南门口，投入大渠。

第二天，全村“亮兵”，钢枪、长矛、大刀、铡刀，一路浩浩荡荡，开到潘村，搜捕土匪，当场打死2人。我们小孩跟去看热闹，村外树上拴着2人，中午带回大屯公伙场，下午拉到村东南枪崩了。

1930年前后，水灾、霍乱为害，土匪横行。特别是夏秋庄稼棵长高之季，行路上担惊害怕。关林离大屯约5里，很少人去。女孩不满结婚年龄，多护送男家，草率成亲。记得东门外住一户香坊，遭土匪抢劫。另一次白天，土匪也进村抢劫，那时我才十来岁，曾扛枪到南门站岗。

（二）

大屯村大人多，各种人都有。有当杂牌军的，也有当土匪的，三朋四友，亲属来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可本村人都明白，互不伤害，有时还得照顾帮忙。土匪头目白天中、白聚板等经常带少数侍卫住大屯。土匪黄金贵夫妇和小孩也在大屯住过。他们白天不大外出，村民说他们不好惹。他们大队人马在外也不惹大屯事，别的土匪知道这情况，也不来大屯扰事。就这样，大屯既防土匪，又窝藏土匪，互不相扰。甚至招来很多邻村亲友来大屯避难。

有天夜里，白天中带土匪去偃师打娥庄，回来过大屯，寨上下人搭话，下边人说明了，都是“自己人”，魏某出去，给送些吃

的，他们朝关林走了。

黄金贵老家有孽，住着不安全，在大屯西头买了5间宽房院准备落户。

有一次洛阳县大队来清乡，把守寨门，只叫进人不叫出人，搜查土匪。那时在这村住过的土匪郭川、白聚板已经走了，还有郭川妻、小孩和妻弟在村里。中医郭老急中生智给一包中药，交给郭的妻弟提着，郭妻把小孩子包严抱着。郭大夫送到东门，向卫兵说："这孩子急病，赶快回城角村煎药吃。"就这样3人走了。

另有土匪头目李拴牢、郭坤元也住大屯，他们去嵩县抢劫，并带回一个漂亮闺女，被李拴牢霸占。女家哥化装来大屯查访清楚，告到关林区署。区署派人来逮住李、郭2人，李就地打死，郭带到关林半路打死。亮尸多天，农民把他就路边掩埋。

由于大屯防匪、窝匪，不受匪害，成了个安全地方。邻近的铁匠村、豆腐店、皂角村、南王等村无寨可守。生活稍微好点人家，日夜不安，沾亲带故，都设法投奔大屯来往。村中家家户户挤满亲友。铁匠村李家兄弟在中街买宅院落户。

（三）

白天中是驰名远近的土匪头目之一，住过大屯。他原是洛阳东石桥人（现属偃师），家庭生活富裕。十几岁时，外表腼腆，像个姑娘，其实很有胆量，被土匪看中，用计谋拉他入伙。

白天中养鸽子，有人买他8只，说定每只一串（1000）钱，可拖延未给，土匪知道了，见到白天中，帮他忙，领他去讨帐，说一只1块钱，8只8块现洋，少一分也不行。买鸽子的怕事，当面给钱（当时现洋一块大约两串钱），由于吃亏心里怀恨白天中。土匪设计到处"撩牌子"说："我们是白天中的人！"就这样，白天中不能安心在家，入伙为匪，后来当了土匪"架杆"。

白天中有勇有谋，拉来票子手腕高明，说咱们穷哥拉票要钱，与人无仇，不能虐待。有个年老的票子，天热时叫个小孩子给他打扇，老头赎回家对孩子们说，人家待我比你们还好，花点钱拉倒，不能记仇。

一次拉来黄河北一家富户的老人，快过阴历年还没赎走，白天中交待吃住招待好，并亲送一些钱说："老伯，快过年了，给你送点钱用。"老人忙说："家人没送钱来，我咋能白花你的钱。"天中说："过节了，弟兄们给你拜年，你没钱不好。"老人说："好，随后给弟兄们买烟酒。"节后家人送钱来赎老人。老人走时告别白天中说："儿子已择定日期结婚，请你到时去喝喜酒"，白天中满口答应。到期，白天中带一些弟兄和几个贴身卫士到老人家贺喜。老人在当地很有名望，县上也来官兵送礼，老人交待："天中讲义气，不得无礼。"双方看这架势，心里都有数，白天中恐有不测，说明路远，提前吃饭离开。

白天中带人打过平乐寨。昼伏夜行，经常出没在洛阳城郊周围，有时还到黄河北拉票子。当时一些富户人家或逃进城里，或迁入像大屯这样筑寨防守的地方，也有雇人持枪保护的。所以土匪拉票子也不容易，但他们也有一些伎俩。有一次，白天中等上邙山化装成一支送葬队伍诱拉票子。一队鼓乐棺木，纸扎齐全。孝男孝女，哀伤哭泣。到一座大坟边停下，动手挖墓。当地人阻挡说："那是地主家老坟。"孝子说："这是我才买的，写有文书（地契）。"不一会儿，老地主出来，一蹦三跳讲理，孝子们开棺取出枪支，把老地主拉了票子。

后来，白天中在洛阳东二朗庙被县队包围，又对打一阵，被县队击毙，割下人头，挂东城门上示众。

（四）

旧社会“下九流”，清洪帮、说书、唱戏、土匪、算卦等等，都有各自的组织、规矩和行话，行话也叫眼子或黑话。土匪的黑话：碗叫“坷叉”（即盛猪狗食的盆），馍叫“啃子”，筷子叫“高竿”，墙叫“马”，葛针叫“狗”，狗叫“轮子”。“狗咬了”叫“轮子发了”，“墙上有葛针”说“马上有狗”，“给我筷子”说“给我高竿”。

（河南省洛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一宗入校掳人勒赎案

陈耀林口述　李纪麟执笔

培英中学是广州比较大的教会学校之一，只收男生，创于前清，及今有百年历史，校址在花地，另一分校设于多宝路。学校主要招收寄宿生。学生每月可以请假外出一次，外出时间为星期六下午至星期日下午，假毕便要返校听候点名上自修堂，校规甚为严格。

1925年前后，广东盗匪猖獗。知名的有单眼英、梁锡芬、黄杜章、胡八、罗鸡洪、歪咀裕等。市内又有“十九友”蒙振廷、苏福，还有罗坤，黎庚及“顺胜堂”苏麟等匪首。

1925年，培英校长是关恩佐先生。当年9月4日晚上11时左右，学校已下了自修课，各宿舍也熄灯就寝。正当师生甜睡的时候，突有一股匪徒，乘小火轮拖一大木船，拿着手提轻机、左轮、快制驳壳等武器。悄悄从芳村河面登岸，进了学校，便大叫：“火触呀”。一时师生纷纷起床，跑到操场看个“究竟”。时关恩佐校长仅穿底衫裤出来，却给一“贼公”截住，问校长在哪里？校长机警地乱指一座楼，才脱身逃去。当场各师生在操场被执住者有之，被贼入宿舍擒住者有之，总计被虏落艇的师生一共56人，现在尚记忆得姓名的是：罗英粲、陈文炯、潘（文书）、陈（护士）、梁得所、黄金德、林佐祐、陈耀林、刘天和、谭腾芳、陈哲如等，当时幸运的是排救健将曹廷赞和黄道在纷乱中逃脱。

匪徒得手后，即命令开船，直向顺德罗格围驶去。至深夜登

上小滩，押解到贼巢，每人都给加上手镣。随即进行分组，有3人、4人或8人一组的，被各匪徒分别带到不知何处预早准备的地洞和荒山寮阁去，从此大家便被分开了。当分组后，排队点名时，有匪徒高叫“陈文炯”名字，要他出列，声言给他“自由”。不料开锁时，钥匙被扭断在镣里，锁开不了。当时这匪徒觉得有点蹊跷，于是把陈文炯推到一旁，改叫“陈哲如”，陈哲如被开了锁带出户外，不久，只听到枪声数响。陈哲如就这样成为这一掳人勒赎巨案的牺牲品了。

有一组包括梁得所（良友画报编者）、黄金德、林佐祐、陈耀林等共8人，看“参”人叫宝叔和阿涯。初时匪首的“堂口”发下来的伙食费是每人每日一元，每餐有牛仔肉、鲩鱼或腊味，有时还有鸡粥吃。不过后来这些“窟家”因赌博把伙食费都输光了，弄到被掳人餐餐吃番薯，有时只得一团冷饭。后来匪方在这个小组提出取赎金每人2万元，最后减实为1000元港币，放梁得所打扮成乡人模样返回广州，并到学校召集各家长到仁济路礼拜堂开会商议，筹款赎“参”，当时还有位罗团长参加。家长有些愿筹1000元取赎的，但有些则不愿这样做，最后终于同意先由梁得所代带每人300元港币回去，与匪徒磋商，并请梁将磋商结果带回市研究，如需集款，仍由梁带回去，于是在10月8日第一批的人获释了。当时“窟家”把这一组人先带到海边，由罗团长带队接收，先到九江然后返市。其余各组也是各自讲价取赎的，用钱最多的是姓王的一组，共用去港币达4万元。

不过有两组是靠拚命搏斗而逃出来的。姓刘的一组，只得3个人，困在荒山的一个阁仔，他们用油纸扇骨弄开了锁头，天入黑，借取火灯为名，向入来的贼突然袭击，3个人合力击毙一个贼，夺枪逃跑。其他的贼闻讯追来，殿后的一个沿途与匪驳火，危急时跳入塘里，钻进小艇底，避过匪徒耳目，一口气冲到佛山市才脱险。另有一组8人，乘匪看守稍疏，弄开手铐，夺路而逃，但路

途不熟，跑了半天，仍未逃离匪区。他们远见田间有个看禾老人，即趋前问路，幸而老人不是匪徒之辈，了解情况后，带他们暂时隐蔽，并给以食物，然后引路避过匪巢，指导捷径，才化险为夷。

那个年代，萑苻遍野，岂独培英遭劫掳？岭南大学一只交通电船也在珠江河面被骑劫去，那是“十九友”匪首苏福所为。培正中学在东山水上游艺会也给掳去两个学生，则是“顺胜堂”匪首苏麟所干。古兜山大贼单眼英（女）、梁锡芬、黄杜章等则连军长的母亲也“光顾”到。其他实在数不胜数了。

（广东省广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清末民初的洛宁绿林人物

苗培萌

洛宁原名永宁，1931 改称洛宁，位于伏牛山阴，洛水自西而东，横贯县境。全县概属山地，尤其是西部，山岭起伏，峰峦叠峙，形势甚为险要。这些山岭都是伏牛山支脉，其最高峰曰全宝山，耸立于县城西南约 150 华里处。山巅庙宇辉煌，供奉祖师神像，在旧社会每年四月初一日开山，朝山进香之善男信女，络绎于途，香客必经崇阳街进崇阳沟，沟尽登山仅 10 余里。崇阳沟长 45 里，坎坷难行，行人有“45 里崇阳沟，有名沟 72 道，无名沟乱如牛毛”之语（所谓有名者，指有居民的地方，无名者居民鲜少）。全宝山有原始森林，面积很大，解放后才修建公路直达崇阳沟底全宝山麓之麻院，专为开发森林而设。全宝山除产木材外，还特产药材百余种，最地道者为柴胡，最贵者为卢贝（比川贝母力量强，我在幼年赴洛阳上学时，常带卢贝作学费，到洛一两贝母可抵一两白银），多行销于禹县药肆。崇阳沟居民种地的人很少，其职业非采药即伐木，木料可利用洛水运销洛阳。至于割漆、烧炭、打猎、打柴，又为普遍性的副业。深长的崇阳沟，两旁排列着无数岔沟，逢沟都有不同量的水源流出，遂汇成长年不涸之山河，由崇阳沟流出，经崇阳街北流汇入洛河。崇阳街北距洛水 8 里，南距全宝山 60 余里，这个山河的流程水量，既灌溉了崇阳街的部分耕地，而崇阳沟、崇阳街又利用此水量建筑水磨、水碾 20 余座，供居民食粮加工与榨油。

崇阳街在明代称为松阳关，位于崇阳沟口外，东距县城85里，东为董寺街，再东为孙洪峪街，西为下峪街，再西为故县街，故县以西10余里即入卢氏县境。故县、下峪、崇阳、董寺、孙洪峪一字排列于洛河南岸，统称为洛宁西五镇，亦合称为西山。镇与镇的距离均为10里，镇与镇的分界都是自然形成的山岭。豫西人常说，"洛宁竹竿宜阳煤"，这说明洛宁竹子是历史性的产物。西五镇的竹产量占全县50%以上，竹竿质量好，销路广，售价公道，故西山人外出，人多目之为大户，意指他们都是竹园主，其实拥有竹园者则百无一二；惟因西山土地宽阔，农产物丰富，人民食粮不缺，这便为盘踞土匪构成了便利条件。

豫西一带自清末至民国十六七年间，土匪猖獗，全境20来县几无一片干净土，尤以洛宁为甚，重点就在西五镇，而崇阳街又为五镇之核心。产生土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在旧社会封建制度下，农村土地大半集中于地主手中，如洛宁西部的乔、马、商，东南部的坡头雷、寨子韦，东北部的河底张，均掌握着数十顷或数百顷不等的土地，尤以河底张姓地方为最大，在清代曾挂过千顷牌，乃洛宁、新安、渑池、宜阳、嵩县5县的首户，民初尚有土地500余顷，包括竹竿园地20余顷。其他拥有土地十数顷的地主，星罗棋布于县境各地，形成富逾千顷、贫无立锥的贫富悬殊的现象。在地主周围居住的人民群众，什九为贫雇佃农。这些劳动人民，经常处在地主的奴役剥削之下，生活异常痛苦，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是产生土匪主要的原因。

2、在洛宁由土匪受招抚而充任了军、师、旅、团长者，除本文所述几人外，如万宗（李万如部旅长）、武鸿章（刘镇华部团长）、夏维礼（孙殿英部旅长）、王汉清（李万如部团长）、李其芳（王凌云部团长）以及金耀坤、韦凤岐、马德胜（豫西镇守使丁香苓部营长）等，无一非出身于洛宁的土匪。在封建社会里，一般人都有升官发财思想，洛宁一般名利之徒，则以拉杆子当土匪作

为达到此目的的捷径。丁老八开创了就抚的先例，刘镇华之流又敞开着收编之门，遂演成数十年豫西一带军匪混乱的局面，而以洛宁为尤甚。这是洛宁产生土匪的原因之二。

3、洛宁西部山深林密，沟壑纵横，人烟稀少，民性剽悍，且远距县城，这样的自然环境，适宜于土匪的生存。这是洛宁产生土匪的第三个原因。

民国初年，洛阳一带有一句俗话："洛宁有两大特产，一是竹子，二是土匪。"由此可以说明洛宁土匪的众多。当时洛宁的土匪多数是以崇阳沟为老巢，以五镇为外围，而崇阳街则是土匪集中活动的中心，由此四出劫掠，绑票勒赎，20余年几无宁日，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痛苦难以尽述。

洛宁人一般称土匪为刀客，匪首为驾杆，每杆人数无定额，数十人一杆、数百人一杆，三数人也是一杆。杆与杆联系叫做碰杆，为碰杆而到的驾杆少则七八位以至十余位，多则数十位不等。至于大杆匪首除基本伙匪外，有时还统辖着许多小杆子，为首的称为总驾子。丁老八就是总驾子中的代表人物。其他五七成群和夜聚昼散的零星小杆多不胜举。西五镇都是5日一集，有逢一、逢四集，有六、九集，有二、七集，有三、八集，崇阳街则逢五、逢十集。在赶集人丛中，足打鞋码、腰垂彩色枪穗者，比比皆是，这是土匪的明显标记。小商摊贩及人民群众，司空见惯，亦不惊恐。倘遇大杆聚会，集结人数过多，需居民供应茶水酒饭时，则气氛顿变紧张。因为与之接头，言语有失，就要立遭不测。当时土匪有黑语，还有禁忌，倘若不懂黑语，违犯他们的禁忌，例要当场惹祸。犯忌谓之"放快"，最重要者为四大快，即龙、虎、梦、落4字音，是必须忌讳的。要是姓氏与地名，非说不可，可代以黑语，如称龙、虎为"扒扇子"，梦、落为"惠"，而落又可称为"带"。如洛河北、即称"带北"。其他如城、寨为"圈子"，攻城打寨就叫"破圈子"；军队为"冷子"，马为"疯子"，骡为"高脚子"，驴

为“长脖子”，牛为“吹子”，羊为“膻子”，猪为“哼子”，狗为“皮子”，狗吠为“皮子炸”，鸡为“尖嘴子”，馍叫“芯子”，吃饭为“嚼瓤子”，路为“条子”，劫路叫“荤条子”，鞋为“垫子”，袜为“捞子”；白银叫“老铁”，鸦片叫“薰子”，钱叫“鞭子”，山叫“架子”，“登架子”是上山，月叫“炉子”，“炉子亮”指月出，日叫“轮子”，“轮子发”指日出，眼叫“亮子”，“亮子高挂”指眼光放亮。这些在西山一带已成为普通常识，如不懂这些黑话，无法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下去。我祖居崇阳街，和其中的某些匪首难免有所交往，20多年耳闻目睹身历，对他们的活动情况，因能略知梗概，兹就记忆所及，分述于后：

一、丁老八

丁老八名同升（见附文①），又名功辅，洛宁孙洪峪人。父继兰，清生员，教书于私塾，曾与大地主袁骆驼争地界讼于官，官吏受贿，讼不得直；新官到任则继诉，由此纠缠不休。袁苦于讼累，将丁继兰暗杀。时丁老八年幼未婚，尚有胞弟同庆在母怀抱；弟依胞叔丁继周抚养，而丁老八则避居岳父袁宗洛家（此人与袁骆驼同姓不同族）。宗洛亦生员，与丁继兰谊属同年，相契结亲，家住杨峪河庄，宅建炮楼，有自卫力，丁老八就在岳父家读书。18岁时，忽被岳父殴亲逐出。由此投身绿林，出没于崇阳沟一带。当时伙众仅10余人，惟枪械粮良，拥有斜排五洋钢、八里通、九里窜、十响毛瑟、攀机大六轮等新武器，常作案于陕州、灵宝、卢氏一带，以殷实富户为劫掠对象。陕、灵本富庶地区，卢氏地广民稀，兼有山货之利，因此洛宁贫雇农民佣工于陕、灵、卢者颇多。丁老八就利用佣工同乡的线索，向陕、灵、卢采盘子（挂线），他宣称“打富济贫，替天行道，得财不伤主”。他一向不在西五镇一带作案，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所以丁老八开始拉

杆后，三三五五的零星散匪及许多小杆纷纷来投，短时期内就集聚人马达1000余众，声势浩大，为当时山北（伏牛山）独一无二的总驾子。当时地方武力既不能与抗，而正式官军因人地生疏，亦感剿办棘手，所以时间不久，他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子。丁老八对穷人表同情，曾于积雷盈门时到古庙，送点抢来的粮食，并约束匪众“不准采花摄朵，不准路劫商旅”。在洛、卢交通大道上，如七里砭、双阳坡、五里湾、桐树岭、硖石河、十八盘坡等处，一向称为商旅难关。有一次有个洛阳基督教神父，路过五里湾遇匪，匪徒拔枪持刀，大喝留下包袱再走，该神父弃其行囊，跪地连呼“主救命，主保佑”，适有邮差毕丙午过此，将他扶起，他一边口呼“阿门”，一边问他的包袱何在，邮差说：“上帝拿去了。”土匪走后，他同邮差一同到了董寺饭店。事为丁老八知悉，将土匪张老二、张安父子扭获枭首，将首级悬五里湾树梢。该神父说：“丁爷是遵上帝旨意惩罚了魔鬼。”一时传为笑谈。由此在丁老八的辖区“犁条子”者绝迹。至于土匪如有采花行动，更为丁老八所不容，违者多数即行暗中处理。有一次崇阳河东竹竿园外，发现尸体一具，失去阳物，首级割下置两腿间，死者名梁才，乃当时的著匪，即因奸情被丁老八杀的。因此当时那里流传了两句话：“只要一采花，脑袋就搬家”，“只要你采花，难瞒丁老八”。故丁老八有“戴花英雄，人间报应”之称。

丁老八曾三打范蠡街。范蠡街乃卢氏首镇，是个商业集中地区。主要商品为漆与桐油以及猴头、木耳等，此外水烟、火纸亦属大宗。卢氏水烟，牛毛细丝，质量之佳驰名已久，这些商品都是聚销在范蠡街。正因为如此，自卫组织也比较严密。所以丁老八有三次攻打之举。头两次俱未得逞，并且伤亡了10余人。就一般土匪说，这就结下了深仇大恨，如果卷土重来，那就非来一个“破孽苦”不可了（“破孽苦”是烧杀泄愤的意思，打开之后，就要杀个鸡犬不留）。而丁老八却与一般土匪不同，他于一再失利、

伤亡重大之后，却暗中整顿所部，周密计划，增强力量，终于乘对方防备疏忽之时，攻破了范蠡街。攻开之后，既未杀人，又未纵火，只是尽量抢掠财物而已。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破孽苦”，丁老八说：“我为劫掠，人为自卫，谁能说杀人不让人还手呢？达到掠劫目的就够缺德了，何必再去烧杀呢？”

1910年（宣统二年）重阳节，丁老八和王天纵会于崇阳，时称南北会。是以伏牛山为界，山南以王天纵为首，山北以丁老八为首。大山南北的绿林豪客云集一起，人欢马叫，非常热闹。并在三官庙内外对台演起越调、梆子两台大戏。就在此时，南阳镇台（即镇守使）谢老道（名宝胜）统兵进至距崇阳10里的董寺。丁、王闻讯，立令停止演戏，率领众匪撤进崇阳沟上山去了。崇阳董寺间，沿道村庄犬吠声彻夜不绝。至次日拂晓谢部经崇阳河东追进崇阳沟。进沟5里处，有高约3丈之巨石一块，石腰有洞如床，相传王莽赶刘秀，刘秀曾卧此休息，名为刘秀炕。炕壁板平，上面写着一行粉白大字：“谢老道到此留步”。前卫报于谢，谢以匪去不远，传令继追。路旁有一座山神庙（土人称之为八里庙），庙墙上又发现了一行大字：“不知进退，后悔莫及”，谢老道在犹豫，忽然枪声四起，谢老道不明虚实，立即传令回击，打了不久，双方停火，而谢老道弁兵的乘马被击毙一匹。事后据匪传说，丁老八与王天纵率部埋伏于八里庙周围丛林中，待官后来到，令燃放爆竹，群山轰鸣，真假莫辨。实际匪方只发了一枪命中，系丁在王前显示手段的。王天纵久有神枪之名，固勿须夸示。这一枪是丁老八给谢老道的一个警告，以免事态扩大。谢老道以后又两次至崇阳街，均不敢进崇阳沟。

丁、王在崇阳开会之前夕，丁老八曾对崇阳乡保梁好仁说：“你要常向县衙报告匪情，县衙自要逐级上详，事后你可以报告，既受匪害，还遭兵灾了。”就一般土匪来说，透露匪情报官者名为“黑筋”，一定要把他杀掉，杀这样人叫做“割黑筋”。丁老八此举

与众不同，是要借乡保向县衙密报情况，使谢老道不明底细，寝食不安，疲于奔命。谢老道被丁老八摆布得晕头转向，用兵多次，毫无收获。

丁老八于辛亥革命期间，编入张钫部任团长，骁勇善战，颇有战功，后以张钫不掌军权，丁乃转任北京京畿稽查处稽查，在职时得识蔡锷。1915年，响应云南讨袁起义，途经潼关，守军白绫子（潼关城防司令）迎入，设筵款待，筵间出陕督手令捕杀之。同行36骑，免于难者只李生田1人。李为卢氏人，素习拳术，跳城墙逃出。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我们在汴相晤，为言其事甚详。

上述事实，原为当年西五镇群众所周知，惟丁老八被岳父毁亲逐出的原因，知者甚少。据吾师程毓宣言，这是袁宗洛掩人耳目的一个花招，实则丁在绿林的一切谋略措置，大半都是他岳父在幕后给出的点子。

丁老八当团长后，其胞叔丁继周，族叔丁继凤、丁继先（即丁老六，后在梅发魁部当营长）、丁继祖（即丁老七，后在李万如部当营长），均称丁太爷；胞弟丁同庆称二大人；内弟袁成孝称舅老爷；其他姨老、姑老、表老，不胜枚举，都是肥马轻裘横行于洛宁西山一带。

丁老八鼎盛时代，我尚在童龄，常自称丁老八与群儿戏，丁老八遇之而笑曰："当刀客最丢脸，不要学我。"

二、梅发魁

梅发魁字雪园，洛宁王范镇人，出身泥瓦工，技术平庸，惟口齿伶俐，善交际，以斯遂当了工头。洛宁县西北山区有三大地主：上戈乔、岭南马、娘娘庙商。三村三姓，形成三角，周围百余里内，都是他们的土地。地以段论，一坡、一洼、一湾，均为一段，估段定租，每段10石租或20石租不等。娘娘庙的商姓共

4户，合计拥有年租万石以上。乔、马两家各有年租三四千石。山地不通车，收租要用骡马运输，就商姓说，每户都喂养骡马20至30匹，经年运输粮食至30里外的长水镇销售。因此扩宅建院，泥瓦工活颇多。梅发魁以承接工作故，经常住在娘娘庙。此三大地主家中老少均嗜赌，娘娘庙赌风更炽，附近赌棍都来驻此设局开场。在此环境下，梅亦堕入赌窟，因赌输过多竟与地主商丙甲订立了10年义务合同。时有中医李锡元者，王范人，与梅系街坊，在娘娘庙开设小药店，与梅密谋曰："熬尽10年，你就完了，如今丁老八驾起杆子，近在洛河南岸，距此只30余里，何不到那里找出路呢？"梅遂托病夜逃，投丁。起初仅当一喽罗，因能说会道，渐为丁所信任，诸如粮草筹措，械弹购置，均由梅总管其事，慢慢成了丁的红人。

三大地主自卫力量很强，而以娘娘庙商姓枪弹尤为充足，且倚村筑有山寨，家丁多人，皆善于射击，自清末以至民初土匪极盛时期，向未受过攻打。梅发魁给丁老八出主意不要硬拼，他从暗中为双方勾搭，让丁老八向三大地主借粮，通过梅发魁的手，一次曾向商家借粮百余石，均慨然送交。土匪向地主借粮之风，由此开端。

梅、丁相处日久，关系逐渐亲密，丁受编任团长时，梅任连长，丁解职后，梅收其众，归刘镇华收编，充任营团，逐级上升至军长。1925年，刘、胡（景翼）交战（即胡、憨之战），刘败，战事结束，梅又在卢、灵活动。刘东山再起，击败岳维峻的国民二军，进兵围困西安时，梅任第三师师长，还指挥有河南第五混成旅（旅长崔凤岐）包围泾阳。冯玉祥部解围西安，梅率部仓卒向大荔、朝邑撤退，乘夜出发，经过焦口（泾水北），为农民截击，秩序大乱。官兵四逃。大荔驻军麻老九（名振武），原属于刘部，此时派兵迎梅入大荔县，收其武器，梅便服逃走三河口，随行者只剩3人，中有李参议（即昔日在娘娘庙开小药店的中医李锡

元)。1930年我晤李于洛阳，为谈此事其详。

1927年冯玉祥率西北军东进，刘镇华受编为第八方面军，梅仍任军长，在豫东与直鲁军张宗昌作战时溃败。1933年刘镇华任安徽主席，委梅为水上公安局长。抗战胜利后，刘茂恩任河南主席，予梅以省府参议名义，解放前病殁。

三、董世武

董世武乳名正学（见附文②），字绍文，系我的族外孙，洛宁下峪镇砖峪村人。家道小康，有地约百亩，主要是靠他父亲勤俭创立起来的。清末民初，土匪蜂起，其父赴下峪赶集，在归途中被匪绑去，索价过高，且急，董备办迟缓，说票人杨永塔缺乏经验，与匪首言语冲撞，匪将其父处死，尸体没有下落。土匪驾杆的冯老七，是下峪北庄头人，怕董日后报复，常有斩草除根之意，于是董随母逃避于舅父苗子实家。苗家住崇阳街，无力掩护，送其母子住南禅寺寨内以保安全。从此董就在南禅寺入私塾，塾师苗某，一日为生等讲解“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句，董很受感动，次日即逃学出走，数月无音信。据说，他当时打算进城报名当兵，因为走的是洛河南路，饭铺多不留宿，夜间摸黑进一小村庄，见有小房三间，尚有灯光，推门而入。一老汉坐在床上看《三国》，董便以实相告。问讯之下，老汉对他说：“当兵要找保人，你城里没熟人，恐怕不成！”董说：“要么我就去当土匪！”老汉说：“乱世当土匪也没啥丢人，不过也得存个好心肠，还须有人引进。你要当土匪怎么办？”董说：“杀贪官污吏，杀坏人孬种，打富济贫，为父报仇！”老汉点头赞许，又说：“最主要的是积德不缺德呀！我有一个学生叫孙金贵，他也是个驾杆的，我给你推荐去罢！”于是董世武便投奔孙金贵加入一伙。孙金贵拥匪众百余人，在县东部洛河南岸一带活动，绑票抢掠，破村劫寨，凶悍异常，有杀人不

眨眼之名。当时乡间，尤其东乡，遇小孩啼哭时，只要说："孙金贵来了"，立即止哭。有一次土匪在崇阳沟内碰杆，石板沟、顺水沟、芦花沟、砂坪等村，都住满了土匪，孙金贵杆住砂坪，人枪整齐，如军队一般。招集碰杆的是武鸿章（乳名武焕），乃丁老八部下骨干，曾充丁团营长武中魁的嗣子，家住崇阳下河月阳坡。后在刘镇华部第八方面军任团长。这次为碰杆而到的杆头中也有冯老七。武鸿章说："我们这次碰杆是为了套交情（换帖结拜）摸底，打开窗户说亮话，咱们不能跟那些坏蛋相交，冯老七就是坏蛋，冯老七怎样坏，就请孙金贵详细说一下。"孙金贵说："我们杆不足200人，都是好交情，本来无所谓谁是驾杆不是驾杆，不过推举我与董世武应个名义，但董是在患难中，他父亲被冯老七偷票撕票，有孽未报，不便暴露姓名，实际上杆中事都是董主持的，今天，董有了报父仇机会，各位说董世武杀父之仇应当报否？"大家异口同声说："决无不报之理。"这时董世武已把冯老七绑在别的房里，于是就将冯推至下峪集市，枭其首而刃其腹，腹部刀口血涌如注，董伏地而吮其血，观众惊骇。董世武当场叫牌子说："我是砖峪董正学，冯老七是我杀父的仇人，这与别人无关，各位叔伯大娘不要惊惶。"他历述其父被杀经过。由斯董世武杀人喝血的声名，就在民间传起来了。

上述事实，说明了董世武突然出现，为的是报父仇，同时也达到了报仇目的，此亦可证明其突然失踪原因，必为寻觅报仇门径而去，但不知其经过事实。1914年，董世武名声正盛，他和孙金贵虽同驾一杆，而他比孙的名气更大。当时政府兵力薄弱，洛宁城内只驻一营人，无力分防，董世武便在崇阳街一带活动，出没无常。

崇阳街有一回民闪麦子，以屠宰牛羊为业，生意颇好，突于某夜被匪绑去，月余后荡产赎回，因愤致病甚重。闪与苗子实（董世武的舅父）善，临终告苗子实说："绑我的匪人，均系本街

人，我的儿子年幼，恐后遭匪害，托你照拂。”言罢气绝。究竟匪为何人，闪未指出。街人陈桐盛绰号桐木腿，乃夜出作案、昼装良民的土匪，于闪死后不久的某日早晨在街外渠沿放羊时，村人梁统续趋与攀谈，梁乘桐木腿不备，出利刃刺其腹部，两人搏斗，顷刻间桐木腿倒地，抬回家就死了，梁逸。此凶杀发生后，闪麦子之妻始告苗子实说：“桐木腿乃绑麦子的主犯，他原先不让我说，怕遭灭门之祸。”嗣经调查，梁统续之杀桐木腿，系因绑闪案分赃不均所引起。苗子实据以密告董世武，未久，梁统续首级即挂在街外渠沿杨树上。此后抢劫暗杀案件，不断发生，几乎每日总有传说。洛宁西山一带就成了恐怖世界。因此各村庄就修建山寨，以谋安全。

董世武当时只有人枪 200 之谱，同时与董之势力相当或稍逊者，还有武鸿章父子及邓老换等多人。

董世武的绿林生活，时间不长，他是专为报仇而当匪的。如愿以偿以后，顾虑到将来无法安业，只好随孙金贵另作打算。1915 年他们就接受了刘镇华的收编，孙为营长，董为营副，驻防商南龙驹寨。孙在职年余病故，董补其缺，后升团长。在憨玉琨与胡景翼作战的前夕，董世武已位至旅长，属于憨之陆军三十五师建制。憨军溃败，战事结束后董避居北京。1930 年间曾一度充京畿稽查员，职微薪薄，遂返汴梁。原先董在职时，曾将个人私款交由旅军需裴子云代存于银行，折据亦由裴代执，数额 8000 元。嗣后董在京数次函裴提取，裴以款在活动中，或定期未到等词答复。董返汴后，向裴索要，裴竟说款交某商号经理周转，人逃未归，看来是昧心之意。当时我因公至汴，董托我代为周旋此事，我便邀同在汴同乡向裴交涉，裴允归还 5000 元。因较原额差 3000 元，董不依。终由同乡等强劝，方承认了事，但款须一个月后才能还清。

1931 年我在济南，听同乡王某说：裴子云欠董世武的钱，始终无心归还。后来裴任二十路总部参议，在洛阳买了房子，董就

住在他家里，向他讨债。裴一味推诿，不予清还，有时给一元二元来虚意应付。董怀恨在心，一天乘裴不备，在沉睡中将裴杀死，出门潜逃。事后裴家虽报官缉拿，终无结果。董世武由此下落不明（见附文③）。

四、李老幺

李老幺即李遂意，亦名万如，老幺乃其走入绿林后的称号。原为河南邓县人，因其绿林活动地区是在洛宁西山一带，所以也算洛宁的一名著匪。约在1917年间，洛宁崇阳街驻扎着镇嵩军的一个步兵连，连长为叶唐封，李万如是叶连四棚的一名上等兵。该连驻防崇阳年余，他调时，四棚正目刘振海、副目程天奇携带全棚人枪哗变为匪，出没于崇阳沟一带，驾杆为刘振海，其次是程天奇，李万如是刘振海的贴身要角。尔时余求学于洛阳师范，某年寒假回家，一天午夜，街上商人刘瑞成来对我说："刘振海在我号内，他叫你去，有事情！""不要怕，刘虽土匪，原在咱街驻过防，相处很好，大概是要你去写金兰谱的。"我不敢不去，只好跟他一同前往崇阳街北头路西京货庄正兴永后院，北屋3间，坐满了土匪，八仙桌上陈列着香案，并横放着手枪。刘振海很客气地说："劳你的驾，给我们抄写一下金兰谱。"于是各把年龄、籍贯、三代说出，我就按次抄写，共17人。刘振海系老四，程天奇为十一，李万如年纪最小，故称老幺。此时杆子初起，声势不大，趟了一年，还没有发展到100人。驾杆的是刘振海，因攻打上戈乔负伤，由李老幺代理。此时豫西镇守使丁香苓带兵来剿，3日内把秘密隐藏在距崇阳街仅3里的杨楼窑洞养伤的刘振海查获。丁并未将刘杀害，反而交保释放，条件是令刘带同全杆人枪来投，编为一营，以刘为营长。于是刘振海即着人送信给李万如、程天奇，提出5支钢枪，由程天奇率领送丁，中途却被李万如伙同心腹数

人将程天奇击毙，又把枪支夺回。刘振海闻讯，带伤逃跑了。由此李老幺便成正式驾杆，他对同伙老弟兄们说："如果四哥返来（指刘振海）要请四哥带领。"不久之后，李老幺的叔父李老八由邓县带领匪众二三十人前来和他合在一伙，由此李老幺的势力越来越大。李老幺外貌和善，内心恶毒，人称为"笑面虎"。颇有拉拢手段，远近股匪纷纷来投，至1919年，他已成了拥有2000人马的总驾子。

这年暑假，我放假回家。一天李老幺亲自来找我，他说："近来路上不断发生劫路情事，弄得路断人稀，太不像话，你给我写个布告，东自王范起，西至范蠡（卢氏属）止，在这段路上如再发生辇条子情事，查出来剥皮、抽筋、点天灯。"我照样给写了，念给他听，他很满意。他说："我将来要弄出个名堂，给你搞个县长干干。"

崇阳沟内的西沟，有猎户叫李之均，同胞5人，均善打猎，枪法精良，敢打"大坡"（即打虎豹）。曾于1913年在全宝山草店附近，兄弟协力进入虎穴，生擒虎子2只，装入铁笼，在崇阳街展览，人称为"打虎五太保"。历来盘踞崇阳沟的大小驾杆，都对他们很客气。李老幺以他是个猎户，没把他放在眼里。有一次匪伙中有人将李之均打获的獐子蛋抢去，被李老五击毙，李老幺在盛怒之下，派匪众围攻李宅，全家俱死于难。崇阳沟包括72沟，原有山货会组织，在清末民初械斗正盛时，各巨室望族莫敢与山货会斗。"打虎五太保"乃山货会的骨干，李之均惨遭灭门之祸，山货会众自不甘心，但李老幺以自己势力强大，对此并不重视，依然出沟抢掠，回沟窝藏。某次李老幺率领全杆精锐前赴陕县张村作案，只留少数老弱看守票房（拘留肉票的地方），及作案归来，发现所有肉票，留守人员及所屯粮秣物品，全部失踪，而且全沟居民亦均逃避一空。同时有不断零星枪声发于周围丛山密林之中。其时正在黑夜，李老幺虽有钢枪数百支，亦知为猎户所为，但不

敢进山。同时也意识到此地人心已去，不能立足，遂率队离开崇阳出沟，转移到北山（崤山山脉）上戈镇迤北一带山中，另找新地盘。

李老幺出发后，山货会人将其留守看票匪徒10余全部杀死。抛尸山涧；将将肉票30余人一律释放，其他匪人所有粮物亦均转运深山之中。又选精壮猎户，分守林间要口，准备与土匪周旋。李老幺闻此情况，满腹恶气亦无可奈何。

1921年李老幺在豫西已成为首屈一指的大股杆匪，零匪军阀都来与其联系。同时他也在进行就抚活动。尔时陇海路火车仅通至观音堂。有一次李老幺之叔父李老八，由邓县原籍带着李老幺的家眷，由观音堂下车返回洛宁，雇轿车南行。离车站20里处，突然来了一人大呼："八呼哪里去？"李老八视之，乃刘振海，大惊说："福如（刘振海字），老幺所作，我确不知。"刘笑说："不能放你过关"。拔出手枪，当场把他击毙。老幺的老婆在车内哭哭饶命，刘振海说："老幺作事，你决不会知道，我不杀你，你回去告诉老幺，我是经常在陕州观音堂一带等候着他的。"

1921年冬季，李老幺受刘镇华收抚，拉至卢氏迤西的木通沟一带集结，听候点验编制，所有大小杆头，什九随李而去；按照人枪数目分别编有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不等。李老幺为了扩充实力，又收容嵩县郭鹏举部土匪千余人。这些匪徒在赴木通沟点验之前，沿途见人便拉，每票定价4元，交款释放。与此同时受抚者还有汝州王老五（王振，号荣轩）、姜明玉等。点编地点，亦在木通沟附近。在李老幺人马过去后，王、姜两杆继之而来，没途逢人便拉，交一二元即行释放，连过二三日，给人民增加了无穷的灾难。

刘镇华一次收抚了这三大股匪，即编为3个师。1926年，刘镇华兵围西安，李万如的第十师亦曾参加，西安围解，李万如师驻灵宝县的虢镇。中原混战结束后，李改编归张钫之二十路军。

1945年刘茂恩主豫时，李万如以省府参议名义与梅发魁同住开封，1946年我曾晤李于汴垣。1947年我供职南阳国民党县府，李之胞弟由汴回邓，同行3人，暗带手枪3支，经南阳被查获扣押，李曾函我照顾。经调查后，缘邓县之大绅士丁叔恒与李不睦，私斗甚烈，李弟原为自卫而暗带武器，当系实际情节，乃予以释放。

五、程秀明

程秀明又名应岐，洛宁董寺镇程家营人，父程之荣，原为宿匪，后因年老"洗手"。其叔程之平乃丁老八之副驾杆，惟为时不久，因作案负伤而死。秀明出身于土匪世家，在李老幺初起时，他已拥有人枪百余，力量较李为大，亦常与李碰杆作案，坐地分赃，作案时他总叫李老幺的牌，而自己不露名。至李老幺势力养成，号称总驾子时，他依然自成一杆，各走各路，两人始终保持和睦关系。

程秀明作案是有钱就抢，决不舍近图远，甚至街坊的殷实户亦不放过。下峪街尚父韬乃较大地主，且富有现财，但与程姓有亲戚，他却暗中指使亢旺的杆子把尚家抢了，并绑了尚家爱子的肉票。亢旺是程手下最强大最蛮横的一杆，在破门入室搜索了细软之后，将尚家老婆拷打，逼问"老铁（即白银）放在何处？"老婆说："没有'老铁'，只有两个秤锤。"当时传为笑谈。绑尚家这一肉票，最后出款2万元，为当时票价最高的一个。我在1920年寒假期中，避匪乱住罗驾山寨，寨仅30余家，多是富、中农一类人家。将近春节，亢旺送来一张帖子："限5日送来烟土200两、鞋200双、现洋500元。"期迫筹办不及，不办又怕打寨，纷纷议论，两日不决，最后决定要求展限。因亢归程秀明掌握，乃遣人向程秀明说情。我便自告奋勇，携带了10两鸦片和2条纸烟。尔时程之荣尚在，人称老驾子，我素和他相识，称之为表兄；于是

迳到程秀明家见老驾子，告以来意，并献出鸦片和纸烟。老驾子说："竟有此事，欺负到表弟头上，就是向我脸上抹灰，我是干啥的，连我最近的朋友就不能保护了！"他大骂着说："找应岐去。"我说："老表兄，何必这样急噪，不要把事闹僵呀！"正在此时，程秀明回来了，老驾子走出门口呼："应岐，你表叔来了。"程秀明入，与我见面，因曾同我在小学同学一年，跟我客气了一番，即由其父代述我的来意。程秀明说："我确不知此事，亢旺系东乡人，归我时间短；这张页子算作罢论，我完全负责保管无事。"10两鸦片坚辞不留。全寨群众都很庆幸。程秀明非不知飞来页子，他可能不知我住此寨内。指使亢旺、李政两杆在西山抢劫绑票飞页子，自装不知，这是程秀明的惯用手段，一口承认作罢，亦只此一次。有一年我经程家营进城，偶遇表兄程毓珊在路边锄地，他对我说："胡辛酉（住潘村，紧临程家营）在城告我一状，传我进城过堂，昨日才回。"我问何事，他说："我常去他家，与他女人说话，他竟诬告我强奸他的女人，县官要他找出证据，他说不出来，我非把他除了不可。"我说："他又没告准，何苦跟他计较？"后来，我从城里回来，经程家营村边时，又遇见了他，他说："那事我办了。"我问啥事，他说："前几天，我着应岐（是他的族侄）派了几个人，夜间把胡辛酉枪毙在河滩上了。让他到五殿地府告我去吧。"据说程毓珊同胡辛酉之妻通奸确是事实，程秀明不分是非，手段狠毒，于此可见一斑。

后来程秀明的人枪已达1000以上，在当时仅次于李老幺，惟名声不及李大。不久程随李受编，任李师旅长。西安解围后，程部及李之师部均驻虢镇之河东村庄。在刘镇华所属部队开拔东下时，程秀明旅到达新安县某村（忘记村名），与群众发生冲突，大肆残杀，人民死亡百余口，新安张钫以实情告知刘镇华，刘遂将程秀明枪决。

六、吉长升

吉长升号鹏九（见附文④），洛宁东河南张村湾人，能说会道，村人拥之为村正。洛宁县组织巡缉队时，委吉为骑警分队巡官（职同分队长）。当时匪势正炽，区区巡缉队武力，仅能保守城池作官府的爪牙，用以欺压人民，根本谈不到进山剿匪。洛宁久遭匪乱，岁无宁日，但西至长水镇50华里，东至三乡镇与宜阳交界处30里，北至渑池界约70余华里的范围内尚能推行政令，维持秩序，县政府之所以能掌握这个局面，吉长升与有力焉。约在1924年，西北山股匪马得胜攻破城北30里的东宋街，县派巡缉队前往进剿，被匪包围，吉长升仅带所部30余骑一战而击退之，顷刻解围，并夺回许多肉票。同年马得胜与韦凤岐碰杆攻打河底镇（城北60里），巡缉队前往援救，一部被伏匪中途阻截，两地同时均在作战，吉长升带所部迂回至中间地带，分向两路攻击，一举而双获胜利，保卫了河底镇，打通了阻滞，由此吉巡官受到上级青睐和群众称赞。当时地方土匪，抢劫绑票，攻村打寨，层出不穷，而政府却依赖吉长升东挡西杀，暂时维持着残局。由此全县武力便统交吉长升带领，任吉为巡缉队总队长兼清乡主任。当时县有武力，全部人枪不足300（巡缉队只2个中队），但每次与顽匪作战，常能以少胜多。吉长升不学无术，所以有本领，是因为他暗中另有一套伎俩，据知其内幕者言：吉长升素常与各杆匪首暗地都有勾结，每次剿匪事前双方就已商量妥当，一经接触，匪方即佯败后退，留现款若干于地，吉则收款留给子弹如数。如此往返数次，交易完成，战斗即行结束。吉长升剿匪，无往不利，无非是以弹药供匪换来的。所以每次剿匪归来，从未损伤一枪一卒，同时亦未闻其击毙土匪若干。吉长升就以这种手法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

约在1925年间，巡缉队被嵩县杆匪郭鹏举消灭了一中队，吉势损失将半，于是他想走李老幺、王老五、姜明玉等的老路，乘县长进省述职之机，带领所部走入绿林，因为他过去和土匪都有联系，一出首就拥有千余人，以城南60里的金山庙为老巢。金山庙位于东河南，在这一带的大道上，土匪出入抢劫，三五成群，毫无忌惮。县城之对岸，有一个寨子村，居民皆韦姓，村人韦宪臣乃县公款局（即财政局）长，素鄙吉行，常在背地谈论吉长升通匪情事，至此，尤自夸其卓见，作诗为文，常予讽刺。寨子墙高池深，寨墙上设有了望哨，仗恃自卫力强，未把吉长升放在眼里。有一天，寨前路上有一人骑马经过，哨兵发枪射击，一弹命中，当时毙命。死者乃吉长升之弟吉金旺，原在县骑警充当头目。韦宪臣知吉必来报复，即与村人商议，决定先向吉求和。公推寨中老前辈韦景贤（县教育局长，素为吉所敬仰）前往。韦以家族关系不便推辞，并邀城内小学教师吉鸿儒（吉长升族叔）同往。吉长升避而不见，和解绝望。吉突于半月后，纠集匪众5000以上，将寨子层层包围，昼夜攻打甚急，枪声杀声震动寨内，攻打进行了4昼夜，寨被攻破，四处起火，入寨土匪，逢人便杀，老幼男女死于难者300余口，韦宪臣全家无一幸免。

吉长升于打破寨子造成惨剧后，积极扩充实力，抢枪劫财，广事招徕。他的匪徒四出窜扰，迫使各乡镇的殷实富户向其投靠，荷枪入伙买枪入伙或交款作价入伙皆可。吉长升出身团队，其所属亦按部队编制，名目上也有团营连排，交1枝枪就算排长，交2枝枪就算连长，交5枝枪以上就能得到营长之名。这样马上入伙，马上做官，而且可以保护自己的家产，兼以连年内战，溃兵武器流散民间者甚多（骑兵第五师的一部，袁英的整个混成旅武器均被洛宁农民收缴），因此在短期间吉长升人枪突然增加。最后亦被刘镇华收编为一个步兵团，吉任团长。

1929年北伐战役结束后，吉长升被编余，到洛阳训练总监部

之高级军事学校受训。抗日期间，吉长升作了皇协军的团长，又在洛宁活动，堕落为民族败类，解放前病死。

七、郑复礼

郑复礼字重兴，洛宁底张峪苏村人，毕业于洛阳省立第八中学。幼丧父。家道富裕。匪乱期间，寡妇孤儿，时虞匪祸，避居于东洼卢毛旦家，卢曾佣工于郑家，与郑父善。卢遭母丧，郑父济以棺木，卢尤为感激。卢后与嵩县土布客万选才相结识，并一度跟万拉杆，万被抚位显，卢攀附权势，地位不同于往昔，因此有保护郑复礼母子的力量。郑复礼中学毕业后，毛旦告诉他说："你父非病死，是为仇人所害。"并密告仇人姓氏，郑乃倾其家产，购买枪支，拉起杆子来了。尔时由于洛宁地面历次内战，溃兵遗留武器甚多，郑复礼尽量收购，又收缴了袁英部一部分枪械，内有步枪 300 余支，迫击炮 6 门，重机枪 4 挺，尚有不少马匹。由此郑复礼势力骤增，已有人马千余，武器精良，特别是还有重武器，在杆匪中尚属罕见。

约 1926 年，孙殿英驻嵩县城内，其参谋长王实坪与我有旧，我适因事赴嵩，顺便与王相晤，经介绍认识了孙殿英。在我事毕返籍时，王实坪说："洛宁郑复礼杆头很大，曾派代表吴某洽谈收编，去后迄无音信。"我告以我与郑在洛同时上学，过去都甚熟悉，孙殿英就请我从中玉成其事，并送给我一匹马用以代步。当时我离家已经半载，遂取道宜阳返家。第三日薄暮，经过北村（洛宁城南稍偏西），遇同学杨瑞五留宿其家，晤谈之下，杨告诉我：郑复礼目下正在围攻磨头，与寨主王清太相持不下。这时杨家塾师席位东亦在场，席是磨头人，磨头被围，忧心如煎，正在奔走呼吁请各乡士绅出面调停，尚无头绪。当他们听说我和郑复礼的关系时，他们就把郑围攻磨头的原因向我细说了一遍，并请我从中

调解。原来磨头三寨并列洛河南岸，寨与寨间相隔不远，西寨西面，东寨东面，以及正南三面，互为犄角，可守望相助，固非小股土匪所敢觊觎。某月某日有白占魁杆约四五人，由寨前经过，包袱行李笨重，显然是抢劫来的；寨中突然出来10余青年，不容回话，予以拦截，当场打死了白占魁，收枪4支，余匪逃跑。白占魁乃郑复礼部的一小杆，郑复礼闻之大怒，给东寨寨首王清太下了战书。限3日内将肇事人等送出（开列了10人名单，中有王清太之子王俨如）。王清太毫不相让，即时答复说："要钱有，要命没有，如果打寨，我们恭候！"郑复礼遂调动人马，将磨头包围起来，磨头三寨门均已屯闭，凡属男丁昼夜守护在寨墙上。目前情况是双方正在对峙中，惟为时已半月，恐怕激烈拼杀将不远了。我听了他们的一番叙述和恳切的央求，并经过仔细考虑，便向他们表示说："席老师住西寨，李瑜如（解放后在河南医学院任教授）、李俊甫（解放后任新乡师院院长）弟兄住中寨，王清太等均我厚友，俨如又是我的学生，为了朋友们的身家安全，居中调停是我义不容辞的。"于是，经过再三磋商之后，决定明天早上出发，先去见王清太，同时由杨锡五、席位东分向各乡村邀同部分绅士集中侯峪（距底张六七里），预听我通知行事。

北村距磨头约20余里，由乡人卫建邦作前导直达寨前。我向寨墙上守护人说："我与王清太系至交，路过此地，有要事相商，请你给通报一声！"移时王清太上了寨墙向我说："老弟何以在这枪林弹雨中冒险到此？"我便告以来意。最后我又强调说："依我所见，与土匪拼死活是合不来的。还有一层，据说郑复礼下令每人要带一张镰刀，准备收割你们的大秋，如果你们闭门不出，粮食让他们抢去，这个损失太大。老兄呀，我看还是和了好！如果老兄有意，我愿出面作调停。"王清太说："老弟呀！郑复礼愿不愿和呢？"我说："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诚意了。对郑复礼我也有几分把握呢。"王清太思忖后，大声说："全依老弟！"我说："老兄

放心，我保证不会出卖朋友。”我立即攀鞍上马离寨而去。至底张街北约里许，遥望有大队人马由底张街拥出，迎面而来，我扬鞭迎上，高声报出姓名后，大队中走出了郑复礼、李干卿、白玉璋3人。李干卿是郑之心腹，在郑前言听计从，人称“小诸葛”，毕业于河南法专，现随郑作绿林活动。白玉璋是我的小学同学，乃当地的殷实富户。郑复礼问：“老兄何事至此?”我说：“我有两种任务，一是替孙老殿给你送信，二是王清太恳请我向你乞和，低头认罪。”我又说：“磨头3寨几百口子，惹事者只几个人，在即将同归于尽的情况下，王清太后悔当初孟浪，是近情理的。”郑平素沉默寡言，对人少有笑容；皱眉深思久之，说：“老兄勿管此事。”说罢就要继续前进。李干卿急忙说：“还有孙老殿的信哩！他的两重任务，都不能完成，叫人何以自处呢?”白玉璋说：“不妨先到我家，从长计议。”于是同至白宅，我取出孙信交给郑看，并将所赠20双鞋、10筒炮台烟，还有药丸2袋，一齐点交。经过一再恳谈并由李、白从中劝解，最后郑终于接受了调和意见。次日早晨，由白玉璋派人通知各乡士绅到白宅作最后的决定。由一位年岁最高的侯瀛洲发言说：“老朽等这次前来，为的是磨头少数坏小子惹事，连累三寨老少不安，目前王清太低头认罪，央请我们到此求和，愿将原枪送还，并赔偿死者埋葬费1000元，务恳酌情允诺，撤围罢休。”郑说：“我是土匪，土匪行为都是越理犯法的，但有个目的，就是要钱，得财决不伤主！王清太拦路抢劫，得财杀人，欺人太甚。苗校长也是为此而来，又劳各位老前辈来，这是看起我，我只有遵命。”于是大家同声说道：“赏脸，赏脸！”一场闹剧，就此结束，次日即行撤围。此后我又与郑谈收编问题，郑表示不愿归孙老殿收编，但要等待所派代表吴杰甫回来再作决定。

后来郑复礼被刘镇华收编当了团长，曾参加刘镇华围攻西安之战。以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八、张寡妇

张寡妇，洛宁大原村段某之女，少字于县东河南陈吴峪金山庙村农民张安，过门后夫妇和好，街坊上都称赞他们是一对佳偶。时当民初，地面不靖，张安夫妇家道小康，为了自卫，购得长短枪各一支，因此而惹起了匪人垂涎，张安遭人暗杀而劫去其枪。张段氏逃避娘家誓不再嫁，并购得手枪一支，练习打枪，以后就驾杆为匪。1915 年至 1916 年间，就出了张寡妇之名，有称之为女土匪者，在张寡妇未归绿林前，杆匪很少有绑快票的，因快票为未出闺的姑娘，需要当天赎回，隔夜再赎，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索价较低。张寡妇初驾杆时，人枪不足 10 人，因为自己力量小，不敢向大的村庄“采盘子”，遂采取偷票的方式，一开始就绑了快票 2 张，至窝藏地亲自看守，既不缺饮食，还供给床被，非常优待，时刻守护在侧，禁止男性入室。日久远近皆知，凡是张寡妇绑的快票，早晚是无不赎的。某日夜间，有一男匪，偷至票房门外，拨门欲入，被张寡妇发枪毙于门口。从此所有男匪对快票不敢再起歹心。赎票有了充裕时间；娘家凑款不及时，婆家也来帮助。由此张寡妇的“生意”逐日兴隆，引得许多杆子纷纷来投。如杨德廉、金老十、袁禄、王瑞等杆都先后来投张寡妇，拥张为总驾子，认张为干妈；几乎当时洛宁土匪全为张所统驭。他们破村攻寨，打家劫舍，几无虚夕，甚至一夕数处出现匪案，无一不叫张寡妇的牌子。实际上张寡妇很少亲自出马，无形间就成了一个坐地分赃的总驾子。绑票的风气由此盛极一时。

约在 1926 年，张寡妇势力逐渐扩张，人枪已达数千，某军阀前来进行收编，张亦慨然接受，但她个人不当官带兵，其编制部队范围内的大小官职归她分配，点验地点在洛阳西工。她一手把枪支统一分给各“孩子们”，自己便又回洛宁了。所部编了 1 个团，

团长杨德廉，4个营营长姓名不详。她回到洛宁后，又拉起杆子。据说张寡妇匪部曾两次受编，均是将枪分给“孩子们”，自己依然为匪。自起首以至后来伏法，始终未停止过土匪活动。

张寡妇曾于1933年间单人由龙门里经临汝、郏县到许昌去，在郏县境内遭遇“辇条子”的。她坐着人力车，越过一座小桥，路沿高处有匪徒大呼：“站住！带私货没有？”一匪在丈余外以手枪向她瞄准，一匪迎面拦住去路。她却从容不迫地把包袱掳下说：“检查吧！”匪徒正在解包袱时，她掏出手枪，一枪将高处土匪手中的枪击落在地，一面叫牌子说：“我是张寡妇！”两匪闻声跪地求饶。她命匪将枪拾起，并给枪伤药一小包令去。车夫说：“老太太，你就是豫西的张寡妇吗？真看不出。大娘，怎不把他俩打死呢？”她说：“教训了他们就算了，已把他的手指打伤了嘛！”由此可见张寡妇的名声已传至数百里外。

嗣后她由许昌返家，经龙门一带，为驻军所获（据说带有手枪、毒品），驻军系刘镇华部武庭麟师，经审讯属实，被枪决于洛阳东关大石桥下。在押刑场途中，张寡妇故作镇静，满脸笑容，大夸其生平活动，观众惊奇。在洛宁的土匪中，女性只此一人。张寡妇被枪毙后，绑“快票”之风即不再出现于洛宁社会了。

九、十掌柜

十掌柜即程老十（见附文⑤），本名程毓琪，乳名十序，字宝斋，洛宁西部程家岭人。掌柜原意是对一般商店经理的尊称。因为程老十在1923年至1934年间是洛宁一带的一个豪绅，为人很霸气，一般人不便直呼其名，故称之为十掌柜。他是洛宁一名“明官暗匪”的杆匪的总后台。

十掌柜在1923年充当董寺、崇阳两镇的保卫团团总，他与县长谢述曾相勾结，在辖区内私种鸦片，就地征收烟土税发了大财。

他的烟税收入除部分上交外，用余款购买枪支，借口充实保卫地面力量，在西五镇大肆搜罗，凡属私有枪支一律作价收买，若隐匿不卖，查出没收。至于枪价如何，概无规定。他说："买枪是公事，绝对不亏待个人。"但结果从无任何人得到枪价，亦始终无任何人得到通知。就这样，他陆续得到不少枪支，据说百余支。并在1924年内战期间，收缴溃军袁英旅步枪300余支。由此十掌柜势焰日盛。他别开生面，用枪支放高利贷，贷出对象为零星土匪。土匪掳掠来的财物，须抽出60%作为贷枪利息。十掌柜这一恶劣手段，给许多不逞之徒走入绿林开辟了道路。当时股匪如尚宗、邓老换、刘尽趣等，皆系由他那里贷枪起家的（尚宗后来拥人枪千余）。

1928年有商人李凤梧，以贩卖牛羊皮为业，经常赴卢氏收购货物。有一次我问他洛宁西山路段交通秩序如何，他说："土匪遍地，确实难行，但只要贿通十掌柜，便可通行无阻，我就是这样往返的。"

1930年中原混战结束时，我供职三十二军军部秘书长，有秘书费晴轩者，新安县人，与张钫有乡谊，经军部电保省府任命费代理洛宁县长。费以洛宁地面时有匪乱，赴任之前向我询问施政要领。我说："程老十在地方势力最大，程不掣肘，县政自易推行。"并致函程老十作了介绍。费晴轩遂以十掌柜之支持，在任数年，一切尚属顺利。惟十掌柜依然是贷枪纵匪，费却不敢过问。在费晴轩去职后，有崇阳沟人王益，持我胞兄函投我当兵，当即补为传达兵。有一天我问王益为何前来投效，他说他在家曾买得三八式步枪1支，带子弹180粒，枪为程家岭提去，但未交出子弹，嗣为程秀芳（十掌柜之侄）查出，两次派人拿他，他在家呆不住了，才来当兵。我说："程秀芳是我的学生，我写信给你疏通，最低限度，也不会杀你。"后来王益果然得到程秀芳的"赦免"，并发还了原枪。程家叔侄的所作所为，由此可见一斑。

1934年，洛宁长水镇附近龙头山上设立一所中学，突于某夜被匪打破。学生悉被绑去，经过土匪挑选，留得肥票10余张，其余完全放回。此10余肥票中有李金斋之子。赵佩言时为该校校长。打龙头山的匪众，原系碰杆，多系十掌柜供应的枪支（贷出枪）。李金斋曾一度在董世武部充任副官，在西山乃是出头露面人物，儿子被绑后，曾要求十掌柜设法把儿子无代价放回，被程拒绝。李乃与赵校长联名上诉于陕州专署。专员欧阳珍，派兵一营，由洛阳佯向卢氏进发，途经洛宁董寺，休息造饭，找地面负责人办理购买粮秣手续，十掌柜忙下寨招待。一面派人办理粮秣，一面设筵款待，相谈颇为投机。该营长愿以手枪子弹500粒赠程，作为酬谢。饭毕，该营长突然下令将其逮捕押回陕州。这是预谋的一个骗局，不如此，则一营兵力是对付不了程老十的。程老十管押陕州专署一年有余而未判决。据说专署秘书王某系洛宁小街人，暗中为程贿通，可望开释。后因地方一再控告，程老十终于在陕州正法。其侄程秀芳亦被洛、卢民团指挥王希仲包围于程家岭寨内，当场击毙（见附文⑥）。

1965年6月

附文：

①洛宁县董正年撰文：丁同升，字兴民，洛宁县兴华乡人，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5年）。幼年家贫未读书。清末民初，山区杌陧，骚攘紊乱，饥民揭竿而起。丁亦拜把结义，自立山头，因排行第八，外人以丁老八称之。丁常谓人曰："既荡绿林，以林为家，当远出，勿使乡邻父老为害。"故常出没在崤山一带。以陕、灵边陲为藪地，均富济贫，故山区之民颂声载道。灵宝县长竟以团总委之。民元改革率部攻潼关清总兵，四民乐从，英勇善战，旗将被擒，破城而入，即编入张钫部为陕边游击，驻守潼关，勤苦操练，屡立战功。翌年，命入四川攻万县，四门总攻，城坚难克，旋

调盟友杜老六星夜驰援，两军夹攻，血战四昼夜破城。此役丁晋升三营标统，局定后移师陕西，命戍西宁，励行整顿。民国4年(1915年)，袁氏称帝，丁自反正后，拥护共和。云南护国军兴，各省响应，丁同井将军谋，分道入陕举义倒袁，及潼关为袁心腹走卒白绫子部所执，敕缴所部械。翌晨，白竟下毒手，召集三军于东城门外欲杀之。丁顿足痛骂曰："汝为虎作伥行将受戮，狐尾马蹄之辱腥膻夷华之耻无艺恋乎？""……大丈夫死有何惧，唯恨潼关吾取而不能守之，死当悬吾头于潼关城门上将亲睹青天白日旗飘潼关，20年后又当金钢铁汉，汝小与我何哉。"言讫慷慨就义，时年30岁。民国时乡人编有《丁老八打潼关》一剧上演多年，又有《丁老八打四川》弹词流传民间。

②洛宁县梁定华撰文：董十五，原名董正学，字绍文，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祖居洛宁县下峪乡前砖峪村。十五是他闯荡绿林时，拜把子兄弟的排行，故名董十五。董少年嗜赌，因输给上庄村王某，后王索钱，董杀王未遂惹祸，离家出走，投靠匪首丁老八（栾川县狮子庙乡人，原名丁巴山）为匪，，不久成了丁的副架杆。民国5年，丁老八死后，董被推为正架杆。镇嵩军在豫西收匪，董十五被收编，初任营副，后晋升为团副。抗日战争爆发后，董部在豫东作战失利；从此下野，辗转开封、北京等地经商。1934年至1938年，曾接母亲、妻子在洛阳居住。在洛阳期间曾与挚友裴之云、李谷仁来往，因债务纠纷，一日清晨闯入裴的卧室，乘裴熟睡，将裴刺杀后，出门外逃。董于1947年病故北京。

③裴玉君、裴玉梅的质疑与订正：苗培荫一文中说："1931年我在济南，听同乡王某说，裴之云欠董世武的钱，始终无心归还，后来裴任二十路总参议，在洛阳买了房了，董就住在他家里，向他讨债。裴一味推诿，不予清还，有时给一元二元来虚意应付。董怀恨在心，一天乘裴不备，在沉睡中将裴杀死，出门潜逃。"又60

页倒数7行，有“原先董在职时，曾将个人私款交由旅军需裴子云代为存于银行……”等语。我们是裴子云（宜阳县人）的女儿，现根据我们由先父母处得知的情况，对以上情节提出如下之质疑与订正：“1. 苗说1931年在济南听王某说我父被害，而我父是1936年被害的。2. 我父起初在陕西时，因接董的职务未成，二人已经结了怨仇。据我们所知，我父从未在董部下当过军需。3. 既然二人结了怨仇，董便不可能将银行存折交给我父。

据我们所知，我父亲被害的起因和经过如下：洛阳从前有家元恒德绸缎店，是张钫的五弟张镕原配妻子之母家洛宁娘娘庙商姓所开，该店经理名李谷仁。董世武存在元恒德很多木材。董去北京住家多年，1934年董说北京家中被盗，生活无着，回到洛阳住在大金台旅社，向商家讨要木材。此时元恒德已经关闭，商家将女婿张镕撵出来，想仗势赖帐。张镕到洛阳后，先将董世武全家接出，送到我们家居住。我母见董来家，心里十分不安，对父亲说：“你在陕西时，上级让你去接董的职，董说，谁敢来接，我就打死谁。你未敢去接职也罢，不该说他土匪野性未改。那时你俩已成了仇敌，难道你都忘了？”父亲说：“事隔20余年，彼此均已年近半百，他在难处，不可能再翻那本陈年老帐，再说张镕已经将他送到家里，决不能推出门去。”张镕回到郑州，对董一直不理不睬。先父看董生活困难，除十元八元的接济外，曾陪董去郑州找过张镕。年余不见张镕来洛，董看出张镕无心替亲戚还帐，误认为先父不肯替他出力，加之前仇，遂起害人之心。1936年5月20日清晨，我们全家都在熟睡，院中只有冯栓一人，年仅十六七岁，董骗冯栓说门外有人找，冯外出，董进房将我父刺死（我父睡觉从不关门），同时将元恒德经理李谷仁刺死在我们家前院。我们家的乳母见状高呼，董世武和帮凶董明二人逃走。次日董来一信说：“因等不到张镕，故将裴害死，今后裴家生活由张镕负责。”张镕来洛，拍棺哭诉：“为亲戚把朋友害了。”当众对我们说：“今后有我

张镕吃的就有你们吃的。”当时亲朋们让张镕写下以上所说，张镕流着泪说：“请大家相信，我张镕说话是算数的。”1937年春，我母亲去找张镕商谈在我父坟前立碑之事，张镕却说：“尊有头，债有主。当年子云在洛阳任二十路总指挥部上校参议、洛阳城防稽查处长时，在体育场烧的那一大批毒品，就是董世武的，为此董世武倾家荡产，董因报此仇，才害死子云的。所以对子云之死，我不负任何责任。”（1987年7月）

④洛宁县韦建章、吉维岳撰文：吉长升，字鹏九，乳名长金，生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洛宁县涧口乡西湾村人。吉秉性剽悍，勇而好斗，1917年经人介绍到县府，当上了巡缉分队长。平时善言诡辩的吉长升，任职剿匪中，施以投桃报李之计，进行政治交易，派兵佯攻，杆匪即退。如此惯用伎俩，逐步走向明兵暗匪，总是不伤一兵一卒虚报战功，名利双收。1922年冬，吉擢升为县巡缉队总队长兼清乡主任，后改为武装警察队队长。1924年，嵩县杆匪郭鹏举率众袭击洛宁，武装警察被消灭大半。吉见势消权敛，不愿再吃皇粮，而欲落草为寇。

1924年11月，吉在镇嵩军师长柴云升回豫西募军的策划下，串通杆匪马德胜，趁洛宁县长赴省述职之机，率众哗变，收缴县武装警察全部枪支，劫库犯狱，抢商店，烧街房，杀居民，绑架男女肉票10名，携兵枪千余，拉到南山金山庙一带，四处骚扰抢掠财物。宜阳县大杆匪赵高升窜扰洛宁时，吉派人联络与赵碰杆，到处破寨、抢掠。同年12月，纠集杆匪5000余人，借机攻破蒸子村，杀人放火，鸡犬不留。1925年，胡憨之战之后，豫西土匪势力更盛，吉、赵在洛宁作乱，连续攻寨占村，烧杀抢掠，绑架肉票，人们闻吉不寒而栗。

1926年，镇嵩军首领刘镇华由山西转天津绕道武汉见吴佩孚后，策划招集镇嵩军旧部，东山再起。吉长升意欲投靠刘镇华，带领3000余匪众，由卢氏，经淅川，过郧西到达安康，谁知刘部已

从襄樊返回豫西。吉和当地杆匪麻老九勾结，抢财掠物，杀人拉票，被陕西督办李虎臣派兵征剿溃败，吉率千余残匪退回河南，到潢川投奔万选才部，任炮兵营长，后升为团长。1927年，万部投靠冯玉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928年，冯部驻扎在洛宁的部队，告吉是土匪出身，作恶多端。冯下令查办，吉闻信逃跑。1929年，吉到洛阳训练总监部高级军事学校受训。11月，万选才任河南省主席，吉升任万部参军，被寨子村人告到省府警备司令韩多峰处，韩准状判处吉长升死刑，呈报冯总司令批示时，被刘镇华保释，到刘部干事。1934年吉任保长时，敲诈勒索，又被人告县府，派人捉拿时，吉逃跑。刘镇华任安徽省主席，吉到蚌埠，当上了蚌埠船捐所所长。1935年元月，梅发魁在安徽任水上公安局长时，有人告吉贪污，将吉撤职关押，经吉哀书与同乡替他讲情，梅将其释放回家。

1936年，涧口六村兴渠，推选吉为总理，因他为公益事业出力，群众曾挂匾颂扬于他。1938年，孙殿英在宜阳，洛宁成立教导队，吉到孙部当参谋。1940年，又到新二师任职，在山西省介休县与八路军对打失败，只身逃回故里。

1944年5月，洛宁沦陷，吉经汉奸杨彦推荐，当上了洛宁县日伪维持会长，奴颜婢骨，派粮派款，欺压百姓，为日军效力，后因贻误战机，被日军训斥，受惊卧病在床，8月死于日伪县府。时年54岁。

⑤洛宁县董正年对《十掌柜》一节有些不同看法：此文所写系我们洛宁家乡事情，现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提出几点订正意见：

1. 十掌柜于1923年在洛宁县底后里第五组当保卫团团总，任命他的人是县知事董书春，不是谢述曾。谢述曾是1922年的县知事，苗文说是县长，也不符合史实。

2. 苗文说西五镇民间枪支程宝斋曾作价收买，但结果从无任

何人得到钱。这不符事实，所收的枪概是有枪为匪的地面上人。至于良民的枪，谁买归谁有，惟民团集结时得出人带枪支差应征，事后仍为本人所有，自行看家。

3. 收缴溃军袁英枪支是1929年，不是1924年；是一师之众，不是一旅之众。

4. 苗文说，“用枪放高利贷，贷出对象为零星土匪。土匪掳掠来的财物，须抽出60%作为贷枪利息。”这是没有的事。

5. 邓老换、刘尽超、尚宗等人为匪，正是程剿匪的对象，邓老换就是程宝斋带民团围剿打死的。

6. 苗文说，由他胞兄介绍王益去他那里当兵。王益又叫王文英，是崇阳沟的坐地苗土匪，因为程宝斋收了他的枪，怕以后再要他的命，所以投奔于苗，以求庇护。王益是同我表兄张双成一齐去的。

7. 苗文说，1930年费静轩（苗文为费晴轩——编者）经他介绍须要求程宝斋支持，结果照他的话行事才得干了几年洛宁县长。其实1930年县长是曹耀祖、王茂昭，1931年是吉松傅、薛正清，1932年是秦硕、张廷柱、张志宪，1934年是栗振黄、汤绍汉，1935年是张仁序，一连数年都没有费静轩其人。

⑥裴玉君、裴玉梅对《十掌柜》一节结尾处的订正：“其侄程秀芳亦被洛、卢民团指挥王希仲包围于程家寨内，当场击毙。”此时期玉君因躲日军飞机轰炸，住在洛宁长水龙山寨上白辑吾家，正逢程秀芳被害。详情如下：

程秀芳又名程元，是地头蛇。当时陕州专员欧阳珍下令，让董寺联保主任丁同郁设法打死程秀芳。丁是读书人，心小力薄，不敢承担，即辞职。当时兴华有个叫李成安的青年，自报奋勇，找到欧阳珍专员，愿承担打死程秀芳的任务，于是他就接替了联保主任职。到职后，李就和程秀芳来往频繁，没黑没明地聚会吃喝在一起。时而在联保处，时而在程家，总是以打牌为名。一次在

联保处打牌，李成安暗有布置，而程秀芳却无戒备。半夜时分，程的护兵有睡觉的、打盹的，而李的护兵却时刻在注意，听到李成安说："手枪，你吃不吃？"（"手枪"一般是指麻将牌的七饼，七个圆圈形似手枪），还没待程秀芳回话，李的护兵已枪口对准程连打数枪。程的护兵见主人已死，交枪逃生。当时十掌柜的儿子程明进即跳墙逃出，到下家洼村，找着原十掌柜的护兵名程水，让其送他外出。二人行至北山大铁沟最险要处，程水即暗枪打中程明进腹部，经人抬到长水，后半夜死去。李成安下落不明。

李成安打死程秀芳之事，当时轰动了洛宁，可苗文却将杀死程的凶手说是王希仲，显然有误。

（河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中州大侠王天纵

张　钫

一、王天纵与孟老七

王天纵幼名天同，原名天从、字旭九，河南嵩县鸣皋镇（今属伊川县）人。他父亲原是鸣皋附近一个贫农，全家种七八亩山坡薄地，由于天灾欠收及官府劣绅的苛捐杂派，虽终年辛劳，仍不得温饱，因之他父亲把地卖掉，移住鸣皋街上做小生意。天纵有弟名天佑，兄弟两人读不起书，自幼随父劳动。自移住鸣皋街上后，天纵于帮父劳作余暇，常喜参加附近的练武场子，学习练拳使棒，舞刀弄枪，从此思想上就崇尚游侠作风，跟一伙年轻人斗群架打不平，到18岁上便补上本镇保卫团的团丁。时团上已有几支快枪，天纵爱之不忍释手，精心练习射击。

鸣皋镇是伊河上游的一个大镇，商业兴盛，经常有巡防营驻此维持秩序。镇中有孟先生老七其人者，他父亲原任山东省游击，老七幼随父在山东任上，也喜欢武事，30岁返回鸣皋，以宦门公子身份交游镇中练武青年，闻天纵精于射击，遂延之于家，以友待之。孟家枪弹俱全，天纵更有练习射击机会，技更精进，几乎射无虚发，人呼之为“神炮”。孟七之为人，讲义气，敢作敢为，爱交游，不择良否，且疏财济困，好打不平，故附近数县各阶层中皆有交结，甚至差役乞丐，亦乐于供其驱使。其最大短处是不

爱读书，使气任性。

鸣皋镇有一老进士郭铭鼎，是河洛一带文人山斗，曾讲学多年。他极鄙视孟老七之武而无文，对其滥交行为，尤为痛恶。会郭侄某少年浪荡，喜与孟七交流，郭知后痛斥之，戒与孟绝。一日孟路遇郭侄，询何久不见面，郭侄实告之并述其伯父鄙视孟状。孟自是深恨郭进士，私谓其党徒曰："郭铭鼎搞他的假道学，我辈干我们的义侠事，各行其事，风马牛不相及也，何欺侮吾辈太甚！"其党徒揣摩孟意，到处散布谣言，谓郭进士假充道学而其女竟与人通奸且有孕矣。且有其党徒某公竟然托媒向郭进士求婚以辱之。郭认为有辱门第，控之于县，郭女当堂剖腹死以自明，郭进士气恨交加，致病而死。殡葬时，狡诈者复杂于宾客中，故意失火，焚其灵堂。于是舆论大哗，郭的学生辈约会豫西10余县的秀才开蓝袍会（秀才穿蓝衫），为郭报仇。乘岁考时，群向府、省各衙门控诉孟七为造谣污辱以及焚烧灵堂的主使人，并写出文字传单，宣布孟七在地方上树党营私，毁辱斯文。

河南府（府治在洛阳）知府文悌（满人）奉省令查办此案，乃密令驻鸣皋的巡防营刘营官捕孟解府。刘营官与孟七为换贴弟兄，不好意思也不敢公然捕孟，乃以邀宴为名，诱孟至营，饮宴毕，才对孟说："文知府有公事请兄弟到洛阳去一趟。"孟从容不在乎地说："既然是公事传我，大哥不要为难，就照公事办好了。明天请大哥派兵送我去洛。"刘又陪孟闲谈至日暮，孟向刘说："请大哥派几个弟兄跟我到三妞（孟的外室）那里取点东西，并对她交代几句话，一会儿就回。"刘观孟词色温婉，且以远行告别亦属人情之常，故不疑有他，即派四个弁兵随孟至三妞家。进门后，四弁站于院中，孟入上房与三妞周旋。女迎孟进里间，但闻内室柜门响了一声，从此寂然。弁兵素慑孟威，且知与营官是把兄弟，不敢催促。直候了约2小时，从窗隙向内窥，只见三妞一人坐在灯下缝纫，并无孟七，疑而问说："时候不早了，请七爷走吧！"三

妞含糊应之。弁等不见孟出来，便进室搜寻。原来木柜后壁是一小门，孟已破门逸去，毫无踪影矣。回报营官后，营官即率兵围孟宅，时孟七已安置后逃去。王天纵感孟七对他多年之优遇，即毅然对孟的家丁们说："事已至此，我们不能旁观，眼看七爷眷属被捕，讲义气的跟我与他们干！"于是率众持枪抵御。天纵枪无虚发，连创数兵。营官派人大呼："谁敢抵抗官兵？"天纵答曰："爷爷神炮王天纵在此，不怕死的上来！"说着又连毙数兵，兵弁不敢近。天纵一面抵住官兵，一面着孟眷收拾准备逃走，另又派人传谕镇中素与孟七交好者，说孟七被围宅内，请他们援助。不一会儿，四面人声沸腾，趁此时机，天纵率众保孟七家眷突出镇外，奔向南山去了。镇中孟七友好随王走者百余人。

知府文悌得报后，一面派队搜剿，一面令各县协缉。不料数日之间，伊川、嵩县、宜阳、洛宁、卢氏等县皆发现孟七向县署辞行的名片，但谁也没有见其人，也不知名片从何而来，弄得各县官惊奇骇怪，都传说孟七到了那里。嵩县县官高某更是害怕被刺，数夜不敢安寝。其实这是孟七于逃离家后，分派人到各县故弄玄虚，而他本人则带着两个随从暗暗到山东去了。这是光绪二十四年的事。

二、占山为王的绿林生活

王天纵率众人南山后，首先把孟七的眷属秘密安置在山中朋友家中，然后对众人说："事情是闹起来了，谁回去也得杀头，梁山的好汉还不是逼出来的？我们也只有走这条路。七爷虽走，不久可回，我们就打着我的旗号干吧，有福同享，有罪同受。"众以为然，就从此过起绿林生活。初无定址，游窜于伏牛山区伊洛流域。文悌虽屡派队搜剿，但飘忽不定，也打不着他，有时遇见地利，反把追剿官兵狠狠地揍一下。不久孟七果派人回来联络，天

纵要求孟回来领导。孟愿奔走于山东、津、沪间，交接中外（外商和教堂洋人）朋友，替天纵买办枪弹、办接济，让天纵领着干。两年后，孟派人回洛阳联系运枪弹事，在郑州被官方逮捕，酷刑逼供，招出孟七所在，孟因而被捕。押回洛阳后，文悌亲自审讯，孟态度从容，缄口无言，不管文悌怎样威胁劝诱，孟始终一言不发。搞得文悌火起，毙孟于杖下。当时旁观听审者，拥挤大堂，本想听听孟的口供，结果却在脑海中深印下一架硬骨头的影子。以后传说出去，对绿林中的影响很大，认为孟七不牵连，不乞饶，不求幸活，自是英雄本色。

孟七死后，天纵更毫无忌惮地大干起来。他在这两三年中间，跑遍了伏牛山的大小道路，联络了山中各县镇的混人朋友，结识了不少绿林好汉，更重要的是实力已增加到二三百人，枪200余支，他认为条件已较齐备，乃选择杨山修寨扎营，占山为王。杨山在嵩县城南数十里的地方，其山三面峭立如壁，无路可通，一面坡度较浅，但沟壑横亘，仅有羊肠小道可通山上。山顶漫平，土石均有，易建房屋。天纵乃于山顶筑寨建屋，并于山后林木掩蔽处修一攀绳上下的暗路，以防不测。山下四周要道口和险隘处都派有常驻的侦探哨卡，再远之处则利用当地农民侦察传报，故山野的牧童樵夫都是耳目，唱曲赶牛莫非暗号。伏牛山中各县镇皆设侦察联络站口。官军入境，杨山即获确报，官军动作部署，杨山了如指掌。山寨中有粮仓，有布库，有铁匠炉，有裁缝作，有大伙房。举凡衣食及作战需用，无不齐备。

关于山寨的供给，王天纵也有严格的规定。山寨周围30里以内，只供给山寨柴草和蔬菜，主要任务是替山寨当耳目。30里以外60里以内为半保护区，只供给山寨食粮，由地主富户摊派和运送，不准向贫苦人家摊派。60里以外为公道区，用飞贡子的办法（即临时送王天纵的名片）向乡中大户、镇内富商要钱要布，限时间送到指定地点，否则用各种手段对付。在山区以外更远的去处，

如陕豫驿路上和其他交通要道，则派精悍小股截劫官府公款和富商财货。因此山寨上衣食需用，供应无缺；各路朋友到山寨中来，也是酒席招待，很象个局面。但山中一般百姓（地主富户除外）却并不感到有较多负担。嵩县知事虽明知各乡对山寨送粮送草，但势有不敌，也只好半眼睁半眼合地听之而已，只求王天纵不下山攻城就算幸运。天纵对山寨所收财帛并不据为己有，秉公办事，按功行赏。另外，他还规定三条禁令：一禁奸淫妇女，二禁在保护区和公道范围内劫抢，三禁私吞公财（即手下人所经手的任何粮钱物品收入，都必须如数交公）。

由于王天纵的“盗亦有道”和驭下有方，杨山山寨日益发展到千余人，王天纵成了伏牛山中的绿林领袖，东西数百里内的绿林刀客，莫不听他指挥。他曾在杨山召开过伏牛山各地绿林头子会议，以后还结拜弟兄14人。老大早殁，佚其姓名。老二张屏，外号仁义老张屏，表面上不干绿林行道，但对各路绿林都是知交好友。他是嵩县人，有本族子弟武装七八十人。各路绿林中间有矛盾，往往找张屏调解，张屏不偏不倚，一言而决。辛亥革命后曾任营长，是孙殿英的早期上司。老三、老四、老五早殁，不知名。老六即王天纵。老七为张治公，洛阳龙门附近南衙人，为清末刀客张士耿之孙，张黑子之侄，绿林世家，在嵩洛山中拥众六七百人。老八为柴云升。憨玉琨年最小，排行十四。柴憨两人均在嵩县潭头沟山中，各有枪数百支。老九姓关，嵩县潭头镇人，江湖上呼为关老九，真名反隐，一向为嵩县县衙的八班老总（即衙役总头）替王天纵暗中任各路总联络的任务。因之交游极广，王天纵飞贡子向大户富商所要的财货亦大多数经关手收受。嵩县县衙内的一切动静和官军活动，关皆随时传报与杨山。老十为陶福荣（民国9年王天纵在四川组织靖国豫军时，陶任师长）。十一至十三均不知名。除了他们14弟兄之外，当时还有永宁山中孙红峪地方的丁同声，有人枪近千，在洛宁西山一带；宜阳境内有王修

已、赵忠，各有枪五六百支；伊阳境内有李魁元（民国9年任王天纵靖国豫军的师长），鲁山有秦椒红，宝丰有杜其宾，宜阳县之韩城有周凤阁，各有人枪数百，均与天纵密有联系，为其外轩（见附文①）。在杨山寨中，有天纵胞弟王天佑带勇敢善击的精壮射手200余人作为天纵的卫队。天纵还有一个军师，名马文德，南阳卧龙岗人，师范学校毕业，此人文才武略在侪辈中确较高一筹，极为王所信任，众尊之为诸葛亮。辛亥革命时马文德适卧病极久，未能随王出山，否则王的发展当不止当时那样情况（见附文②）。

王天纵在杨山虽未象小说中描写的山大王公然挂着什么“替天行道，打富济贫”的旗子，事实上却以绿林好汉行侠仗义来标榜，故当时人以“中州大侠”称之。因之不但各路绿林推王为盟主，即附近各县一般穷百姓亦公认天纵为公道大王，而乐为之通风报信。甚至不少文人亦慕王之作风与他来往，如当时有革命思想的豫西有名望的拔贡石又謇、举人蒋我山、秀才冉信甫等均与王交好。洛阳的外国传教士和跑津、沪生意的大商人，也与王有交往，七在津、沪、汉购买械弹物品，皆经他们手。天纵唯一不妥协的只有清朝官吏和清军。

自王天纵占山为王以后，河南省巡抚、洛阳知府等清朝官宪即指派河南巡防营管带谢宝胜（徐州人，幼曾为道士，故外号叫谢老道）率兵进剿。10余年中谢老道搜山攻山不下百十次，天纵凭借地利人和，与清军周旋于伏牛山中，他的主要战法是远程奇袭，阻止清军接近山寨。在清军出动时，他由于情报迅速，就布署派队偷袭、截击、迎击，并吸引敌人向远离山寨的地方兜圈子。万一敌人兵力较大，直扑山寨，他就飞调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及其他山头绿林向敌尾击侧击，迫敌不敢深入；敌一回击，这些尾击侧击绿林又分别向不同方向撤退，使敌陷入迷惑。不管怎样打法，但每次战斗都是形式上绿林跑了，因而官兵就算胜了。当时清廷的省、道、府、县各级官吏最害怕本管区域出现所谓“叛

逆”一类的大事，因为这对他们的官运有碍，他们只求在3年任期内能平安渡过，任满就有官可升。因此山中各县的所谓“亲民之官”的知事，都不敢把王天纵等雄踞伏牛山明目张胆敌抗官兵的真实情形上报，府、道以上是承转机关，也只据情转呈，只说是山中流寇。谢老道每次上报打跑了流寇，自然各县上报情形与谢老道一样。由于每次进剿得胜报功，十几年间谢宝胜由一个巡防营管带屡次擢升，直升到南阳镇台。有一次王天纵与谢宝胜作战，双方隔山沟战斗，距离很近，天纵高呼：“谢老道答话！”谢果站起来。王说：“老道，你明白吗？你的升官都是我保举的，你要知恩感德！如再逼我，小心你的脑袋！”话音未了，砰的一枪，弹穿谢的风帽而过。王又说：“留你一命，交个不死的朋友，如再不服，举起你的马鞭试试。”谢果隐身举起马鞭，王又砰的一声，将谢的马鞭击断。谢宝胜惊吓之余，即挥军退去。从此搜山攻山也就敷衍了事，不再认真了。谢宝胜如此，他的部下士兵就更无所谓了。以后天纵派人与谢的部下交朋友，谢的部下利用搜山的机会，暗中把子弹卖与山寨中。我曾亲问过天纵，为什么不打死谢宝胜？天纵说：“打死谢老道容易，但谢被打死必惊动清政府派更大兵力来进剿，不但增加我们的敌人，山中老百姓也更遭殃；不打死他无形中订下了互不侵犯的默契，即使他逼于上命入山进剿，也不过兜个圈子罢了，对我们并无大害。”

王天纵虽在山寨中，但很注意外边形势，订有上海《申报》寄到洛阳转至山中，除知道不少时事外，也了解了上海的繁华，很想见识见识。他就和军师马文德商量，马认为去上海游历借以开阔眼界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去也没有多大意思，最好扮成官员去，可以排排场场地交接些上层人物，从而历练历练外间的世事。于是又把天纵的朋友、秀才冉信甫请上山来商酌，冉也同意马的意见，并自告奋勇陪王去沪。在动身之前，由冉设计把王装扮成候补道，又伪造了公文，由冉指导先在山寨使天纵演练

熟悉官场的礼节仪注谈吐派头，又由关老九介绍两个熟悉官场交际场面的人作为随从。一切准备妥当后，又挑选了多名精干随从人员，才微服乘夜下山，昼息夜行，间道由漯河车站乘京汉车赴汉口，转乘长江轮船至沪，住租界高等旅社中。在十里洋场中，一住两月，初则游览参观，借广见闻，继则渐有交游。由于天纵气宇轩昂，举止中节，言词谨饬和用钱大方，辗转介绍，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官有商，有帮会中人，也有教育界和报馆中人，天纵均能应酬细致，不露真相。他托人购办了一批德国短枪（自来得手枪），在汉口交货。有住同一旅社的候补道张某，与王交游过从颇密，慕王富有和豪放，将爱女（女学堂的学生）许王为婚，即于旅社中结婚。新夫人姿容秀雅，举止大方（民元我在北京曾屡次见过她）。王恐久留露出破绽，即带新夫人经汉返豫，由京汉铁路某小站下车，乘骡轿车仍是夜行昼息。新夫人问为什么夜里走，王说夜里凉快。及到杨山，她才知道“候补道的官太太”变成了山大王的压寨夫人。由于王对她备极钟爱，遂亦安之。每日给王读报纸念小说，也教王读书写字，伉俪之情颇笃。王游沪归来，既慕西洋的物质文明，又恨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租界的横行霸道，萌发了民族革命思想，从此就与同盟会的河南籍革命人士有了联系。

王天纵回山一年后即是辛亥年，3月初，值关老九母亲生日，各路绿林朋友都到嵩县潭头镇关老九家祝寿。老九大摆排场，不但酒席丰盛，而且招待物品多系外来洋货，就有人对王天纵说关老九的闲话，说关这几年经手收受的各方财物，折扣交公，侵吞甚多，在此次招待挥霍中可以看出关个人发财不少。王天纵认为关老九这种行为有违山寨“不得私留公财”的禁令，未多考虑，即令张治公把关老九击毙。柴云升、憨玉琨不服，认为事无佐证，遂与天纵有隙（见附文③）。旋王亦自悔，亲向关母请罪，并把关母接上山寨，以母亲待之，与柴、憨等关系才得勉强维持。

关老九被杀后，王天纵内部发生矛盾之消息为嵩县县官侦知，

报与洛阳知府，知府令谢宝胜利用这个机会袭击杨山。谢老道作了细密侦察，偷偷带队入山，并断绝山寨与外界交通，直抵杨山。由于关老九死后嵩县无人预报消息，柴云升、憨玉琨等不象以前那样策应杨山积极，故王天纵的杨山山寨第一次遭官军袭击。山寨上无水，不能久守，天纵不得已利用后山预设的秘密绳路，用整匹的布结成绳索将关老九的母亲及他夫人和其他女眷儿童等系下了陡坡、从后山转走，天纵亲率卫队利用黑夜从前山小路硬打了出来。他的卫队射击术都是他多年亲加训练，射无虚发，首先将封锁山口之敌击溃，冲出包围线转于敌后向敌猛攻，并叫人到处大喊“活捉谢老道”的口号。谢老道及其官兵平素本害怕王天纵，这样一来，官兵溃散，谢老道更是害怕真的被活捉，遂传令退却，回到洛阳向知府伪报已将杨山攻破，残匪已窜散。其实王天纵待谢部官兵出山后仍回驻杨山，加强与各路绿林的联系，加派远程哨探，团结内部，准备将来之大举。

三、参加辛亥革命

辛亥年武昌起义，陕西第一响应，光复西安后出兵潼关，北方震动。河南同盟会党人杨勉斋、蒋我山、刘纯仁、刘镇华、石又謇、吴沧洲等会集洛阳，图谋举事，派吴沧洲、刘纯仁上杨山联络王天纵及伏牛山各路绿林武力，推王天纵为丁部大将军，约王攻占洛阳迎接陕西的东征军。王即发动各路绿林，北出龙门，进攻洛阳，嗣以清廷派陆军第六镇十二协周符麟部接守洛阳防务，戒备极严，攻城失败。杨勉斋、刘纯仁建议说：“前年（1909年）在洛阳曾与伯英（我的字）计划，如陕西革命先成功，豫西革命力量就先与陕西结合，然后全力东下，河南革命方易成功。我们不如仍照此计划西去与伯英的东征军会合。”王天纵、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张屏、赵忠、丁同声等皆以为然，刘镇华、蒋我山、

石又謇等也都赞同，于是众绿林决心弃山寨参加东征军。

王天纵等率领其武装 8000 余人于 10 月下旬先后到达潼关，正值潼关二次光复、清兵东退的时候，骤然增加这些力量，东征军士气愈益旺盛。王等部队到来之前，杨勉斋、刘纯仁微服先来说明情况。王部到后，由杨勉斋等带领王天纵等与我会见，王穿军服，其余张治公等也有穿便服的，也有穿军服的。王的身材高大，鹰鼻鹞眼，两眼炯炯有神，态度威而不野，彬彬有礼，言语无多而中肯，似胸中怀有经纶者。我以慰劳和欢迎的口气首先发言说："诸位为国勤劳，辛苦了，我代表革命军欢迎诸位。"王说："为国家的事，说不上辛苦，我们是来听指挥的，当不起欢迎，都督以后不要客气，我们一定服从命令。"我听了天纵这两句简单而恰当的话，暗暗佩服他的天才。他并且解下自带的德造自来得手枪对我说："我闯荡豫西十几年，就凭这玩意儿，现在赠送给都督，表示我的心意。"那时陕西军队中还没有自来得手枪，我笑着收了，并说："你在豫西的侠义行为是久仰了，今日得见，并将共同革命，真是有幸！"于是就设宴欢迎。我与勉斋、纯仁等晚间略加计议，次日即委任王天纵为东征军先锋官兼第一标统，委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丁同声、赵忠、王修己等为标统，委张屏等为营长。另聘刘纯仁为总参议，杨勉斋为秘书长，刘镇华、蒋我山、贾巨卿、石又謇、刘玉山等为参议，在东征戎幕中参赞军机。因之军威为之大震。接着即出潼关攻击清军（赵倜的毅军和河南巡防营）。在战斗中，天纵表现了积极和勇敢，连败敌军。天纵亲自率队攻克函谷关天险，会同柴云升、憨玉琨、赵忠等攻进灵宝城，并一鼓作气将敌追退至渑池。嗣以清军增援（第一镇、第六镇一部及炮兵），王等不善于正面阻击作战，在英豪、张茅等处损失颇大，我军复退至潼关。

天纵向我建议说："只凭我们这一路队伍东征，敌容易集中力量对付，如先占领南阳、再发动伏牛山中武力从南进击洛阳，与

东征军收夹击之效，使敌兵力分散，较易成功。”他并且自告奋勇，愿意自带一部分队伍前往。我同意他的说法，问他：“你只带一部分队伍能够打下南阳么?”他说：“南阳是谢宝胜防守（时谢任南阳镇台），他是我手下败将，他的命是我给留下来的，我去打他，非死即降，一定有把握。再与湖北革命队伍联系起来，夹击中原，这声势和力量就大啦。”我拨给他一些银子，他却只带几百人枪经龙驹寨、荆紫关，在伏牛山中发动些绿林武力，进出邓州，与鄂北革命军季雨霖部联系会攻南阳。南阳镇台谢宝胜听说鄂军来攻，还打算抵挡一阵，又听说王天纵率部到邓县会攻南阳，他长叹一声说：“完了!”遂自杀于镇台衙门内（见附文④）。

王天纵到南阳后，其参谋长马文德（原住南阳天主堂中养病）亦病愈来会，并献计于王，应准备如何发展。会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各省皆停战，王应邀请赴京，从此离开了带领10余年的绿林部队，为袁所羁縻。

四、受袁羁縻和打击张勋复辟

袁世凯被清廷免职隐居彰德时，已熟闻王天纵“中州大侠”之名，及民元夺取革命果实为临时总统，思置之左右以为己用，遂派员招王赴京。当时在天纵方面，认为清帝退位，大汉光复，革命目的已达，袁总统又系同乡，从此走上卫国保民的道路，计亦良得，遂安置部属交与马文德带领，只带一连卫队赴京。到京后，袁屡次召见，垂询其过去经历，颇加礼遇。惟考虑天纵既不能文，而武又非正式出身，颇难位置，但又不愿将他外放，以免放虎归山，乃任为陆军部中将顾问兼京师军警督察处副处长职务（正处长为马龙标），将他带的卫队亦编入督察处的稽查处，供其指挥，负维持街道秩序稽查奸宄之责。袁并拨给天纵以华丽的公馆（端方的宅子），月发优厚的薪给，面谕王接眷来京同住。以稳其心。

天纵过去本是闯荡山林为所欲为的山大王，至此遂感无事可做，民元我到北京时，他对我说："这做官的事，真是无聊，真不如当山大王痛快。"至民国三四年，袁世凯大捕革命党人，也责成督察处干这种工作，王更感觉味道不对，就不大到处办事。民国4年我调京任职，与他不时过从，他对我表示留既乏味，走又不能，真是厌倦极了。他说："十几年的山林生活太不安定了，久则有些厌倦，不料北京的安定生活更使我厌倦。"他又告诉我，当白朗纵横豫陕时，他曾想趁机离京曾向袁请缨，说白朗部下有他的旧部，他愿出京招抚白朗。袁似窥透其意，好言慰勉，谓将另行借重，实则只是一味牢笼羁縻而已。及袁世凯帝制失败而死，黎元洪接任总统，又对他颇垂青眼，曾数次召见，备以辛亥革命同志的感情慰藉之，并劝他暂勿他去，表示容当另有借重，因之王仍留京供原职。及黎、段分裂，张勋乘机复辟，天纵对人说："既有今日（指复辟），何必当初（指辛亥革命）？是可忍孰不可忍！"段祺瑞誓师声讨，攻进北京时，辫子军仍据守南河沿东华门一带，天纵亲率其原来卫队扒开南河沿以北的围墙，猛攻张勋公馆，迫使张勋不敢继续指挥辫子军作困兽之斗而避入荷兰公使馆。事后我问他为什么打张大辫子这么大劲，他说："我当十几年山大王就打满清，参加辛亥革命也是为了推翻满清，张大辫子却逆天行事，偏要给满清当奴才，还要扶保皇帝羔子重新宰割大汉族，不打他打谁呢？"这几句话表明了他的民族立场是很坚定的，真愧煞了当时不少向溥仪称臣讨封的封疆大吏和君主立宪派的许多所谓政治家和文人学士。

五、服膺孙中山先生，组织靖国豫军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复任内阁总理，跋扈情形较前尤甚，黎元洪不再复任总统。天纵这一时期特感烦闷，不时找我闲谈。我

劝他北京形势已不可留，仍应本辛亥革命精神服从孙中山先生领导，继续革命。他深以然。不久，于右任由上海来京找我，传达孙中山先生意旨，叫我和于右任赴陕领导陕西靖国军在西北发展，我离京时又和天纵见了面，密告我即赴陕的任务。不久，他也通过田范九（嵩县人，常与刘承烈在孙先生前奔走），与孙先生取得了联系。我赴陕不久，天纵即到上海谒见孙先生，孙先生任他为靖国豫军总司令。他先派陶福荣、李魁元等赴豫西和南阳一带召集旧部，他自己于1918年9月从孙先生处领到一部分经费，即乘长江轮船赴四川。那时唐继尧任靖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在政治环境方面在四川组织军队比较容易（时河南、湖北都是北洋军队控制），王就在川滇两方支持下在四川夔府开始组织靖国豫军。陶福荣、李魁元等在豫西和南阳一带陆续召集了五六千人（枪支不全），分批向夔府集中，到1919年夏已编成了2个师，由李魁元、陶福荣分任师长，马自修任参谋长，规模略备、一面训练，一面与广州孙先生切取联系。唐继尧的靖国军联军总司令部进驻重庆后，召集川、滇、黔、豫、鄂5省靖国军开军事会议，天纵以靖国豫军总司令身份参加了会议，并表示愿意早日援陕（当时陕西是靖国军与北洋军战争的焦点）。会后王即返夔府整饬部队准备援陕的出发工作。时滇省靖国军叶铨部已经过四川开到陕西参加作战，鄂省靖国军王安澜部也已开到陕南安康，四川石青阳部亦在途中。惟王天纵部以广东方面接济困难，在川又属客军，不愿就地征筹，因而出发颇费周折。王积劳成疾，于1920年春逝世，他死的消息传到陕西时，正是我和右任领导陕西靖国军与北洋军作战最艰苦的日子，当时极感悲痛，曾写五言诗一首挽之。诗曰：

英雄出草莽，崛起河岳间。
独力反清虏，叱咤十余年。
幼本农家子，曾受饥与寒。

卖犊买长剑，习射发其端。
百发皆百中，名以神枪传。
作客倚长铗，当蒙国士看。
结交托生死，为义遂揭竿。
侠名遍中州，称王伏牛山。
辛亥革命起，跃马函谷关。
都门五年羁，常感髀肉添。
辫贼闹复辟，奋起举义幡。
为达靖国志，脱笼走四川。
夔门训劲旅，立待摧凶顽。
忽报将星落，风悲鼓角残。
军阀方肆虐，神州正骚然。
倚马为国痛，涕泪湿征衫。

予20岁即闻天纵之名，以后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时，间接有所联系，辛亥革命东征时才算见面。在东征中，戎幕密议，疆场驰骋，同安危，共甘苦，虽为时不久，然相处颇洽。民国4年、民国5年在京，又时相过从，故对其才识能力性格及生活情况，知之颇悉。天纵之射击术确有独到之处，无论步枪手枪均能射无虚发，不但对固定目标每射必中，即对活动目标（如飞鸟）亦命中率极高。神枪之名，信不诬也。作战指挥，擅长带小部队进行突击、偷袭、侧击和迂回等战法，东征打赵倜毅军时，他仅带数百人，以突击行动攻占险要之函谷关，迫使赵倜大军东溃。对正面的防御作战，经验不够，因他过绿林生活时，攻多而守少也。他常说："我的战术中，没有守字，守长了总要失败，不如以攻为守，可以处处主动。"作战时，他胆力极强，虽陷危急之中，仍能从容不迫，指挥若定。他平生作战不下百余次，但没负过一次伤，而直接死伤于他枪弹的敌人不知有多少了。以勇猛沉着誉之，天纵可当之无愧。他幼贫未读书，后略识文字，对人言语不多，但颇

中肯。他虽在绿林生活10余年，但从未入过任何帮会，也不相信各种神教，自信心和自尊心极强。他对部下管束极严，更能以身作则，不蓄私财，不吸鸦片，不嫖不赌。即在北京的5年官场中，也从未参与嫖赌场合。喜好枪，爱快马，是他唯一的嗜好。对朋友则豪爽慷慨。惟性太机警，有些近乎多疑，与任何人接触，均似存有戒备之心，匕首、手枪从不离身，迎客入室则退步相接，同时对客察言观色，到人家作客必先环室四顾，然后就坐。关于他机警多疑的行动，我曾屡次劝他改正，也未彻底改好。也许是他过绿林生活久的缘故。此外他气量稍狭，责人较严，故人多畏之。在山中杀关老九之后，盟兄弟辈对他也心存畏惧，敬而远之，对其事业上不无影响。

从政治上看，天纵于清朝末年竟敢独树叛逆之帜与清兵对抗，辛亥年能参加反清革命，最后复能厌弃军阀统治，走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帜下思有所作为，总算是一个能进步的人物，比之同时之豫西其他许多闯荡起家者高出多多矣。故我对辛亥前后豫西地方之闯将，独取王天纵、樊钟秀二人焉。

1964年2月

附文：

①柴云升（即柴老八）之子柴化周所撰《胡憨战争中的镇嵩军》一文（稿存河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关于王天纵、关老九绿林集团情况的记述，与此文有所不同，录以备考："满清末年，张黑子（亦叫张老七）和王天纵（人称王老六）在嵩县（现在嵩县和栾川北部）和现在的伊川县一带纠合贫苦游民起来反抗清廷统治。响应王天纵、张黑子的人很多，如伊川的黄告三、嵩县德亭的李永魁、阎庄的阎世清、大章街的关金功（人称关老九）、永宁（今洛宁）的丁同升（人称丁老八）、宜阳的王修己等。清政府派河北镇台谢宝胜兼任河南府镇台，前来镇压。不久，张黑子战死，

王天纵统其众。张黑子族人张治公亦在王部，连年的战斗，起义武装越发壮大起来。特别是关老九控制了东起大章、西至白土将近百里的广大地面，部下有柴云升、憨玉琨、马超远、孙官、李华来和张报甲等人，因得到广大农民的参加，力量逐渐壮大。王天纵坐镇杨山（在嵩县城西南），一切供应多数来自关老九，深为王所倚重。”

②内乡人张和宣所撰《南阳军阀马文德》一文（见《河南文史资料》第14辑）关于马文德情况的记述，与此文颇有不同。张文谓马文德系南阳县南河店人，幼时家贫，随其父兄学染匠开染坊，以后当杜勇，因杀人而外逃当土匪；辛亥革命时马文德正隶属王天纵部下，壬子年正月王天纵率马文德攻南阳，战败前路巡防兵，与马云卿率领之奋勇军在南阳会师。张和宣文没有讲马文德上过学，也没说马文德作过王天纵的军师。又据南阳人王笑山（1905年生）谈，马文德先学染匠，后架杆，本来不识字，经收抚做了官才请南阳一位姓王的当他的家庭教师，开始学文化。王笑山也说马文德是南阳县南河店人，并言南河店在民国年间分属南阳、南召两县，今全属南召。

③柴化周撰《胡憨战争中的镇嵩军》一文关于王天纵杀关老九的起因和经过与此文所述不同。柴文说：“负责镇压豫西起义武装的清总兵谢宝胜散布谣言，离间王天纵与关老九。关的部下张成说话不检点，夸耀自己的胆大说：‘九叔（指关老九）叫我杀谁我就杀谁，叫我杀六叔（指王天纵）我也敢。’这话传到王天纵耳里，王未加深察，即率张治公等夜下杨山，黎明到达大章街，召集关老九的部下议事，暗里布置伏兵。关闻王至，急率张成、憨玉琨往见王。一到王处，伏兵四起，击杀关金功（关老九）与张成。憨玉琨稍后，睹状逃去，呼柴云升等进入秋禾中始免于难。由此关氏所部悉归柴，与王天纵分裂。”

④谢宝山逃离南阳后在方城县的一个骡马店内自杀。详见

《河南文史资料》第6辑所载齐星贯《辛亥南阳等六县光复纪略》。

本文由张钫口述，陈子坚代笔。张钫，河南新安县人。1886年生，1966年去世。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等职。建国后为全国政协委员。陈子坚，江苏徐州市人。1905年生。曾任西安绥靖公署办公厅主任、国民党军副军长等职。现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河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柴老八与农民揭竿造反

王凤梧口述　李玉瑞整理

柴老八，栾川潭头人，名云升，字春霆，乳名书经。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民国25年（1936年）卒于天津，葬于栾川潭头党村。清朝末年，豫西一带农民纷纷揭竿造反，他亦在栾川潭头揭竿而起，成为潭头农民造反队伍的领袖。并和嵩县的王天纵、憨玉琨、李永魁、武世清、陶福荣等人结拜为义兄义弟，按年龄排列，柴为第八，所以称呼他为绿林弟兄柴老八。

柴老八幼年上过私塾，粗通文字。父亲早亡，家境贫穷，与母亲相依为命，时常受人欺侮，内心极为忿懑。惟有潭头街富户王世卿，认为柴志气非凡，必有作为。常告诫其佣人，对柴要尊敬，不许侮慢。有一年除夕，柴家中柴米皆无，王世卿派佣人赶着骡子，驮送米麦数斗，银子10两，柴感激涕零，表示日后必报此厚恩。

戊戌变法失败后，各地农民起义十分活跃，柴受到影响，也想起来造反。于是他和乡友王槐青相商，王是个儒生，原来对康梁很赞赏，在嵩县城入过政法学堂，响应康梁变法，广为结交同辈石朝臣、李遇春、李振铎等一帮倾向革新派人物。此时，因变法失败，又大失所望，在失望之余，又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当柴提出要拉杆造反时，王即欣然同意，于是柴云升、王槐青经常相聚，密谋造反。

经过柴、王二人四处奔走串联，潭头、旧县等地的刘锡卿、齐

占云、张孝友、党超、叶山堆、孙瑶、孙炳、金恒超、金恒光等，纷纷响应，并收集土枪、大刀、长矛，于光绪末年，揭竿造反。接着，捣毁了清朝在旧县的巡察署，官兵逃窜。蜜峪的憨玉琨、鸣皋的王天纵，南衙的张治公，也都先后揭竿造反，并率众千人会集潭头镇，与柴等结为绿林弟兄，并向嵩县城清军进攻，清军闭城坚守，终未攻开。

柴云升、王天纵领导的造反队伍日渐扩大，为了筹集粮饷，柴提出“仁义借款”的口号，向老财富户“飞叶子”，令其仁义解囊，缴送银粮，否则就绑架家属。只有富户王世卿素与柴结交好义，柴对王诚意保护，以报前恩，王至为感激，慷慨解囊，资助造反队伍。

柴除了强制当地富户“仁义借款”外，还到卢氏等临近县向富户要求“仁义借款”。柴亲自率众奇袭卢氏县范里镇，把号称富贵之家刘吉的母亲劫走，用轿抬到潭头，作为“仁义借款”人质。柴奉刘母如上宾，亲自陪她看戏，用轿抬她出外游览和去温泉洗澡，指派佣人精心侍候。后来刘吉筹措了 10 口袋银子送到潭头上神庙交给柴部，将其母赎回，临别时，柴又认刘母为干娘，派部属护送刘母安全回范里镇。

柴老八领导的造反队伍，成份复杂，特别是马老三、雷明均等部属，纪律很坏，经常骚扰群众，掠劫财物，淫污妇女。有一次马老三所属士兵陈跟娃，欲娶西营村高昆仑之女为妻，高不允，陈将高枪杀。还有一次马的士兵将中营村何姓女儿劫去淫污，柴闻之甚怒，本想严处，但碍于马老三的势力较重，恐为此引起矛盾，相互厮杀，才暂且容忍。

清宣统三年（1911 年）春，马老三与雷明均两人，率众 100 多人至狮子庙打地方团丁，团丁败逃，马老三、雷明均将张明的妹妹和马德纯的女儿劫来分别收作偏房，至秋扒街举行结婚礼，收索财物，大摆筵席五六天之久。柴老八为了整饬军纪，当马、雷

二人刚返回潭头，就解除了雷的武装，雷明均被杀头示众。所抢妇女让其家属领回。从此以后，纪律森严，声誉大震，归山落草者日众。

清政府在距县城较远的镇市、关隘，大抵设有巡检署，以分治边远之地。栾川镇、孙家店、朱阳关等都设有巡检署，每署各养近百名甲兵，群众称之为“镇山侯”。柴老八、王天纵决心除掉这些“镇山侯”。王天纵带领一杆人马经合峪出击孙家店，捣毁了孙家店巡检署，然后占据杨山，作为根据地。柴老八带领一杆人马，经五成沟、重渡，直抄栾川巡检署，捣毁了文武衙门。接着又西去朱阳关，赶跑了“镇山侯”。

1911 年冬，辛亥革命的风雷震撼中原大地。清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派南阳提督谢老道率兵进入栾川，围剿农民起义武装。柴老八的智囊王槐青，读过《孙子兵法》，他建议要“避其锐气，击其疲惫”，遂将造反弟兄全部分散隐蔽，埋伏于潭头镇四山深林中。柴化装成儒生，隐藏在王世卿家里，暗中指挥。谢老道率兵至潭头后，见集镇空虚，遂放心扎营休息。次晓，柴四面包围，谢老道丢甲折兵而逃。

谢溃败之后，清政府命河南府（洛阳）调增援兵，仍由谢老道指挥再次围剿，兵分两路，一路从鲁山向合峪进剿王天纵，王坚守杨山寨，据险杀敌。王天纵精于射击，有神枪手之称，击毙清兵甚多。某日谢老道又督兵冲锋，挥杖指挥，王天纵居高临下，高声喝道：“谢大人，暂且留下你一条命，劳你回禀府尹大人，不要再派兵前来送死！”说着，一枪射来，谢老道的指挥杖立折两断，谢惊恐万状，暗自叹道：“王天纵真乃神枪手！”由于伤亡惨重，溃败撤兵。

另一路清兵从洛阳出发，经龙门向嵩县进剿，柴老八、憨玉琨、张治公等率众 1000 多人，应敌于嵩县城西一带，经过数日激战，清兵败退，柴等追击至嵩县城，清兵守城不出，未能攻开。

武昌起义，陕西响应成立了军政府，清政府派赵倜（周人）西攻潼关，妄图扑灭民族民主革命的烈火。为了抵抗清兵反扑，陕西军政府派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伯英）御清军于陕豫边境。张钫是河南省新安县人，与巩县刘镇华（雪亚）为挚友，张钫托刘镇华联络豫西农民武装参加秦陇复汉军。刘镇华又与嵩县贡生石朝臣相识，石在酒后私塾教书，刘镇华于辛亥革命时是河南省视学，早已剃了光头，这时他又在头上安了假辫子，化装潜至酒后见石，经石的介绍，刘镇华与柴老八、王天纵相会于潭头，柴等欣然接受国民革命军领导，率3000多名农民武装归秦陇复汉军。

秦陇复汉军与清军相持于潼关，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民国元年2月12日），清政府宣布逊位，复汉东征军遂与清军议和。

民国成立后，张钫把原参加复汉军的豫西农民武装3000多人改编为镇嵩军，刘镇华任统领，共编3个标，第一标分统柴云升；第二标分统张治公；第三标分统憨玉琨。为什么称镇嵩军？其说法不一，一说这支改编后的部队，分驻豫西22个县，这一地区靠近嵩山，故称镇嵩军；一说该军是地方部队，其任务是在豫西一带镇压和剿匪，故称镇嵩军；一说该军的官佐多半是嵩县人，其统领又叫刘镇华，故称镇嵩军。

刘镇华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左右逢源，乘借各种机会扩充实力，时而勾结袁世凯出卖民党，时而依附军阀投机钻营。到1925年秋，镇嵩军发展到10万人，柴云升、张治公分别提升为军长。

先是刘镇华为了讨好吴佩孚，将其所属憨玉琨部交吴改编为三十五师，置守潼关，抗拒国民军胡景翼，终于导致了1925年4月的憨、胡战争，憨被击败于洛阳，服毒自杀。从此，刘镇华就拜倒于吴佩孚脚下，回到直系，受任为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当时在河南的民国二军岳维峻被刘镇华打得大败，只身逃往山西。刘

镇华乘胜西出潼关围攻西安，柴云升任前敌总指挥。从1926年4月至11月，西安被围困8个月，围在城内的国民军杨虎城等万余人，加上居民共10万人，断水断粮，军民困饿死近5万人。后来刘镇华被冯玉祥、于右任的援陕国民军所击败，方解了西安之围，刘镇华率残部仓皇逃到豫西陕州、灵宝一带，柴云升亦几经险阻，狼狈逃回河南。

1930年爆发蒋、冯、阎中原大战，刘镇华此时残喘未定，无力参预，遂将两个师残余兵力交给万选才和刘茂恩，自己出国到日、德游历。后来万、刘发生矛盾，万选才被刘茂恩诱捕杀害，柴云升遂下野避居天津。

1938年柴云升病死天津，灵柩运回栾川葬于潭头党村。

（河南省洛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驰名豫西的张寡妇

王瘦梅

民国初年，豫西一带，土匪遍地，大小匪杆，不计其数。在那众多的匪群中，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当土匪的动机和目的各有不同。有的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拉杆。还有一种是不堪忍受地主、官僚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逼上梁山的。驰名豫西的女土匪张寡妇就属于这一类型。张寡妇是个传奇人物，关于她的事实，在家乡时，我听到一些传闻，近年来，参阅有关资料和健在老人的补充，记述此文，有误之处，希知者指正。

张寡妇原名贺贞，光绪六年（1880年）出生在河南省洛宁县洛河南岸草庄村的贫苦农家，生下来就因母亲吃糠咽菜而没奶吃，但爹妈对她还是爱如掌珠的。

贺贞成年，性格开朗，通情达理。18岁嫁给德里北村贫农张洛山之子张有为妻。过门后，孝敬公婆，体贴丈夫，勤快和气，深得公婆和丈夫的喜爱，左邻右舍，也都夸赞张家娶了个好媳妇。

张洛山是个忠厚善良的庄稼人。他的妻子是个贤慧而多病的妇女。独生儿子张有，因为家穷，没有读书，但人很聪明、能干。贺贞对这个家很满意。

贺贞到张家的第二年，大孩子振升出世了，恰恰在这一年，久病的婆婆离开了人间。又过了3年，公公张洛山也相继去世。两个老人的先后谢世，给张有夫妇留下了一大笔外债。夫妇二人虽胼手胝足日夜操劳，但3年还没还清债务。次子明升、三子先升

都在这几年里先后降生。小俩口背着沉甸甸的高利贷，养着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日子是相当艰难的。

贺贞26岁那年，张有竟一病不起，丢下贺贞和3个孩子死了。从此，贺贞被人称为“张寡妇”。

在那风雨如磬、弱肉强食的旧社会里，孤儿寡妇的日子好象过刀山一样艰难，“寡妇门前是非多”，又给她带来很多麻烦和苦恼。但性格刚强、不畏强暴的张寡妇，拉扯着3个孩子，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尽力拼搏。她40岁那年，大孩子振升已经是一个21岁的小伙子了。老二明升19岁，连最小的先升，也17岁了。三个劳力，因为土地太少，却解决不了一家4口人的温饱。她大伯张更山（张洛山的哥哥）是个心狠手辣为富不仁的地主，在张寡妇穷困到人人劝她卖孩子的日子里，有人求他帮帮侄媳妇，救救侄孙子，他竟冷冷地说：“穷富都是命里注定的，常言说：‘救急不救穷’，她这个穷坑我填不满。”当人们把这个情况告诉张寡妇时，她气得浑身发抖，咬咬牙对人说：“冻死、饿死也不去求他。”

民国9年（1920年）秋收后，振升听人说张更山村南那4亩地要出租，他想把它租来，反正他租给谁都是缴租，何况自己又是他的亲侄孙，于情于理，都应该有优先权。于是在一天夜里，他背着母亲，去到大爷家向他请求：“大爷，听说你村南那4亩地要出租，你看租给俺弟兄们好不好？课租不会比别人少缴。”张更山一听，怕这个穷小子将来赖着不肯缴租，就马上回绝说：“那几亩地要我要留着自己种，不出租！”振升一再恳求，张更山都说不出租。振升气乎乎地回到家对妈一说，妈气得跺着脚说：“谁叫你去找他哩？我以前说过，饿死也不去求他。”说着，张寡妇把过去不曾对孩子们说过的往事又对振升说了一遍，要孩子记住，人穷骨头不能软，宁可去抢，不能去求。

第二天，老二明升从外面回来说：“他说不出租是瞎话，那块地被张清溪家租去了。”大哥振升听后憋了一肚子气，第二天一早

就去犁那块地。张清溪家一听说，马上跑去制止，先口角争执，后来竟打了起来。张更山闻讯也跑到地里，一问情况，就怒斥张振升道："我的地，我愿租给谁就租给谁，你这样霸道，想造反不是？"说着朝张清溪一努嘴："给我打，打死人有我哩！"后来明升和先升闻讯赶到，张清溪家才歇了手。这次振升被打得鼻青眼肿，顺嘴流血。回到家里，一家人都气得闷声不响。夜里振升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对妈说："妈，这真把咱逼得走投无路，我再在屋里蹲下去，要憋死的。我想出去闯一闯，闯不出人不回来。"妈沉默了一会儿，郑重地说："你走我不拦你，放有出息点，不要忘记是谁逼你出去的，给咱穷人争口气！"儿子斩钉截铁地对妈说："妈，你放心，我忘不了张更山，也忘不了张清溪，有朝一日我掌住刀把子，非宰了他们不可！"妈说："逼咱走绝路的是张更山，张清溪打你是不对，可他和咱们一样，也是穷人，不能一样看待。"后半夜，张振升辞别了妈，出走了。

张振升和他爹一样，是个手脚利落，办事干脆的人。他离家时，除了胸腔里一颗复仇的决心以外，手无寸铁，送他的明升和他分手时问他："哥，你到哪里去？投靠谁？"振升说："去东南山，谁能帮我报仇，我就投靠谁。"

当时宜阳、洛宁交界的洪崖、高湾一带，是有名的"刀客"窝。振升毫不犹豫地扑向那里入了伙。由于他好朋友、讲义气，对人赤胆忠心，时间不久就当上了二驾杆，成了匪中的小头头，有人有马、有刀有枪。胸中报仇的烈火驱使着他要报仇，要雪恨。

1922年（民国11年）秋天的一个夜里，他带着人马回德里村报仇了。他声言："杀死张更山，财产抢个干；抓住张清溪，套上去拉犁。"

张振升明火执仗进村后，警惕性很高的仇人，早已闻风逃跑，他扑了个空。据至今还在的目击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人们从睡梦中被人喊马叫惊醒之后，都纷纷跑出来看时，只见棵棵树

上都拴着马，振升带领着那些手执刀枪的人，杀气腾腾，从张更山家正院、偏院，跑进跑出，寻找张更山。最后，当发现仇人已经逃跑，无法找到时，振升对在场围观的乡亲们说："乡亲们不要惊慌，我恨的是大爷。他为富不仁，见死不救，我回来就是找他报仇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将来还是要回来和他算账的。搬不倒他，我就不回来安居乐业。"说完就带着人马出村去了。

张振升率领人马重回南山之后不久，被一个叫韦聚臣的同伙打了黑枪（有人说，韦聚臣是想抢夺张振升的枪支，当二驾杆；更多的人则说是张更山花钱买打手韦聚臣打死张振升的）。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打死张振升的韦聚臣也被张振升的朋友们打死了。

一肚苦水、满腔怒火的张寡妇，为了替子报仇，1922年一个秋风吹落叶的夜里，她咬牙切齿地对老二明升说："明娃，人家逼得咱无路走了，只能拼上跟他们干，走，上山！"说罢，向老三先升交待了几句话，就带着明升，连夜奔向高湾，投入匪伙，开始了她的趟将生活。

由于她是振升的母亲，同伙中的年轻人都把她当长辈看待，很尊重她，有事也和她商量。由于生活的剧变，刚入伙时，她还不知道怎样处理和应付这种刀客生涯。但她处事果断、有勇有谋、大公无私的气度和作风，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爱戴和信赖，大家推她当总驾杆，并称她为"干娘"，她也亲昵地把那些青年人叫"孩子们"。她说："孩子们，以前我只会拿针、拿线，现在叫拿刀拿枪，没法呀，这是人家逼的，要从头学，跟你们学，大家抬举我，让我当总驾杆，推不掉，咱就一块儿干吧。不过我有几句话要说在前头：第一，眼前咱要抢富户、拉肥票，购买枪支、子弹，招兵买马，扩充势力。第二，拉票不伤人，女票不能欺侮，快结婚、还没出嫁的快票，谁也不准近身……。"

当时，他们这个杆子人枪还不多，还没力量对大村大户公开抢劫，只能采用秘密绑票法。第一次就绑了2个大户人家的大闺

女，因未婚女子必须当天赎回，所以他们把这种肉票叫“快票”（洛宁土匪拉“快票”从此始）。这种快票也有当天来不及赎回，必须隔夜的，张寡妇对她们也特别优待，晚上有床有被，她并且亲自放哨保护。一次一个匪徒偷偷去拨快票的门，想干坏事，被张寡妇发现，一枪把那个坏蛋打死在门口，从此没人再敢对快票起歹心。

张寡妇行事仗义，有胆有识，愿追随者日众。当时一些散杆都纷纷来聚集在张寡妇的大旗下，于是她这个杆就成了一支兵强马壮的绿林武装，连当时著名的大驾杆杨德廉、金老十、袁禄、王瑞等都到她的麾下听命。他们活动在洛宁、宜阳、嵩县、渑池一带，攻村破寨。大的攻破抢劫活动，张寡妇总是坐在大队后边的抬斗上，跟随指挥。小的抢劫拉票，她虽不亲自出马，但手下人都照例叫张寡妇的牌子。有些根本不是张寡妇的人，杀了人，放了火，也叫牌子道：“我们是张寡妇的人！”有些向殷实富户“下黑帖”（要钱要枪的恐吓信），署名也写张寡妇。因此当时豫西几百里范围内，一提起张寡妇，大人吃惊，小孩止哭，地主老财们则编顺口溜：“蛇蝎心毒，寡妇心狠，犯她手下，挖苗断根。”张更山和德里的一些富户，痛恨张寡妇，一天夜里，将其在家安业的老三孩子张先升拉到洛河滩打死。张寡妇闻讯，悲痛欲绝，下决心杀回德里北村，为儿子报仇雪恨。确实张寡妇已经变了。

1925 年，张寡妇扩充到近 2000 人。她常对“孩子们”说：“逼我们造反的是地主老财，他们的仗恃是官府衙门，咱不光要杀有钱有势的财主，还要攻城劫狱，杀那些贪官污吏。”洛宁、渑池、宜阳、嵩县的各大村镇，为防备张寡妇的人马来打寨，经常处于戒备状态。洛宁县城，不仅从洛阳调来重兵防守，还从各区调来许多民团协助守城。坐镇洛阳的吴大帅（吴佩孚），也纷纷收到各县告急。

正当张寡妇准备破城劫狱，进行大举的时候，驻扎在洛阳的

镇嵩军第二师师长张治公派人到张寡妇部下活动，要收编这支绿林武装。来人先把杨德廉、金老士以及张寡妇部下的头头们都说动之后，才征求张寡妇的意见。张寡妇开始表示不同意。她对来顺说的人讲："我拉杆是为了报仇，不是想当官。再说，一个小脚女人，也不能带兵当军官呀。"来人说："仇早晚都能报，可是刀客不能当一辈子啊。况且你也得替他们年轻人想想，你不要前程，也不能耽搁人家一辈子呀。"几句话说得张寡妇动摇了，答应商量以后再说。

张寡妇同部下一商量，除极少数不愿下山外，绝大多数都愿意接受收抚。大家说："收编后，有军饷，不怕围剿，人离山沟，心不离干妈，早晚有事，招之即来。"张寡妇看到这种人心思去的情况，就同意来人的要求，接受收编，条件是：（一）按实有人数改编。（二）原班人马不能遣散。（三）收编后，所有军官，统由张寡妇亲自指派。条件谈妥后，1926 年初春，张寡妇坐着抬斗，带着这 1000 多人马，浩浩荡荡开到洛阳。按实有人数，编了一个团，张寡妇指派杨德廉当了团长，她的二儿子明升当了连长。她在洛阳西工亲自将人马、枪支点验交给杨德廉后，又匹马单枪回洛宁南山驾子岭拉杆子去了。

地方上的殷商富户及官府衙门的官老爷们，正为张治公调虎离山而额首庆贺；散居在洛河南北的零星股匪，正以失去依靠而不安的时候，张寡妇的重新归来，震动很大。张寡妇在架子岭上又树起了大旗，那些群龙无首的小杆子，很快都来集合，人马越聚越众，声势越来越大。他们不仅在洛宁东河南的洛宜交界处打家劫舍，而且北去渑、陕交界处闹腾，简直把熊耳山、伏牛山之间弄得神鬼不安。

1929 年张寡妇的人马又扩充到 1000 多人，当时万选才刚刚叛冯投蒋，正要扩充实力，也派人到洛宁诱张接受收抚，张寡妇照样把人枪交给"孩子们"去接受收编当官，她自己再次回洛宁

拉杆。

她在镇嵩军当连长的老二孩子张明升，1931 年奉命到陕县头峪去催办“日行兵差”，因性情暴躁，打骂地方绅民，激起公愤，当地一士绅，借请客之名，开枪将张明升打死在酒席上。张寡妇闻讯，恼怒万分，在明升所在部队配合下，血洗了头峪。全村死伤惨重，幸存者寥寥无几，房屋也被烧殆尽。老二孩子的仇是报了，但张寡妇确实欠下了头峪人民一大笔血债。

血洗了头峪之后，就准备回德里北村为老大和老三孩子报仇。1932 年秋天的一个夜里，张寡妇的大队人马由宜阳向洛宁的德里北村出发了。出发前，她对部下把张更山的罪恶叙述了一遍，交待大家到北村，要杀他个鸡犬不留。出发时，大队在前衔枚疾走，张寡妇坐着抬斗殿后。先头人马沿着今涧口乡东陶峪南进。这里上陶峪村北也有个北村，领头的二驾杆误认为陶峪就是王召峪，一问村名，也叫北村，于是见男人就杀，一下杀了 33 口人。等张寡妇赶到一看错了，立即命令停止乱杀，一问情况，才知道真正的北村还在西边一道峪里。张寡妇捶胸跺脚，对这次误杀无辜，深表悔恨。

天明后，张寡妇的人马撤到谷圭村后边的九女山上。这时被惊动了的王召峪各村，都鸣锣聚众，村村都严阵以待，县保安团也赶来追剿。张寡妇眼看报仇之愿难以实现，就面向德里北村大哭一场之后，带着人马向东南山而去。

1932 年以后，豫西社会秩序逐渐转趋稳定，大小股匪在国民党当局剿抚兼施的政策下，分化瓦解或化整为零，或洗手外逃，打家劫舍，聚众骚乱之风，已逐渐平息。过去与张寡妇血肉相连的镇嵩军，已分编各部，不复存在。曾经统率过几千人马，威震豫西的张寡妇至此已成孤家寡人，光杆司令。10 多年的风霜生涯，已使她这个刚过 50 岁的女人，两鬓发灰，头顶光秃，面带皱纹了。然而，晚年的潦倒处境并没有夺去她为子报仇的坚强意志。她决

心在有生之年，找到张更山报仇。

1933年秋，张寡妇带着几百两鸦片烟土，匹马单枪，坐着一辆人力车，经洛阳龙门，到许昌贩买枪支。当她进入郏县境，正过一座小桥时，路沿高处一个持枪的匪徒向她高声叫喊道"站住！带私货没有？"桥上另一匪徒拦住去路要搜。张寡妇不慌不忙，把包袱扔在地下说："搜吧！"然后从车上跳下来，趁势拔出手枪，对准路沿上那个匪徒"嘭"地一枪，把他的手枪击落在地，并叫牌子道："我是张寡妇！"两匪徒闻声吓得马上跪倒在地，请求饶命。她对高处那个匪徒说："把枪拾起来，以后把眼睛放亮点，要眼不是光占脸的！"说罢又扔给他一包枪伤药，才若无其事地上车继续赶路了。车夫过来问她："你老人家就是张寡妇？真看不出，刚才你咋不把那两个家伙打死呢？"张寡妇笑笑说："打掉他个手指头，教训教训他就够了，何必害他两条性命呢，他们要有办法，也不会来劫路。"

到许昌办完事，她本想乘火车南下武汉，再转南京、上海流浪漂泊，以终残生，但一想起大仇未报，张更山还没除掉，就恨不得马上返回洛宁，设法报仇。

她是从许昌乘火车经郑州返回洛阳的。在郑州到洛阳的火车上，被洛宁王范的一个回民认出盯上。到洛阳一下火车，那人悄悄跟在张寡妇的后边，亲眼看着她住进西关一个旅社之后，便马上跑到周公庙警备司令部作了报告。警备司令部很快派枪兵包围了那个旅社，并把机枪对准张寡妇的房门高喊道："张寡妇，你被包围了，赶快投降，把枪缴出来！"张寡妇揭开门帘向外一看，冷笑说："何必做这阵势！要人跟你去，要枪给枪！"说着把2支三把盒子枪往院里一扔，出来就要跟着那些官兵们走。那些官兵们要绑这个巨匪，张寡妇坦然自若地说："老娘不是孬种，不会逃跑的。"

要犯张寡妇被擒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洛阳。开庭审问时，法

庭内外，布满岗哨。当军法官提审张寡妇时，她态度昂然、旁若无人。

军法官问："你就是张寡妇吗？"

张寡妇："是的，张寡妇就是我，我就是杀人放火的大刀客头张寡妇。"

军法官："你犯的罪你都承认吗？"

张寡妇："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的事，我不赖。"

军法官："你罪大恶极，判你死刑你服吗？"

张寡妇："要杀要剐随你们，犯到你们手下，我就没打算再活！"

整个审讯过程很短。过了2天，洛阳城内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警备司令部要在当天中午12点钟枪决张寡妇的布告。

现在洛阳老城七八十岁的老年人，都还清楚地记得枪毙张寡妇那天的情形。他们说，十来点钟，东西大街两旁的人都站满了。一辆卡车载着张寡妇和押解的官兵，11点钟从周公庙警备司令部徐徐开出，到西大街时，人们看见被绑着的张寡妇带有皱纹的脸上，被微风飘拂着两绺灰发，态度很安详，背上插着亡命旗，上写着："枪决死刑犯张寡妇"。站在高处的围观者，还看到张寡妇的小脚。车到井胡同口时，视死如归的张寡妇突然用洪亮的嗓子叫牌子了。她高声喊道："乡亲们，你们都听着，我就是张寡妇，我是被逼当刀客的，我杀过人，我放过火，可我的仇还没有报！我今年53岁，再过53年，还是这粗这长。"她喊着，车开着，一直到东关，她的喊声没有断。在刑场她还最后高喊："死了也要报……""仇"字与枪声同时留在人间。

（河南省洛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老洋人”——张庆

苏　辽

老洋人并非洋人，他本名张庆，出生于河南省临汝县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因他长得身材高大魁梧，黄发深目高鼻，颇有些洋人模样，所以后来人们给他起了个“洋人”绰号。还有一种说法是，张庆有一次听到别人说洋人如何厉害，他便愤愤地说道：“我比洋人更厉害，我是洋人的老子！”因此人们便称他为“老洋人”。

张庆10岁那年，父母先后病故。他跟哥哥张林艰苦度日，自小胆大、好打抱不平。1911年夏收时节，豫西一带连遭天灾，清朝官府却征敛无已，张庆兄弟俩跟着乡亲们一起投奔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豫、陕。到1914年，其兄张林牺牲，不久，白朗起义也失败。张庆返回临汝老家，后改名张迁献，投入河南督军赵倜之弟赵杰率的宏威军中当兵。赵杰本是个为非作歹的衙内式人物，其部下多是一些白天是官兵、夜晚是土匪的扰民太岁。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赵倜企图联奉反直，被冯玉祥打败。赵杰的宏威军退往豫东中牟县被吴佩孚勒令解散。部分队伍退往山东，大部分则拖枪为匪，成为河南重要匪源之一。这时，老洋人已在宏威军中担任连长，也率所部及散兵共300人拉杆子（河南等地称拉起土匪队伍为“拉杆子”）起事。他们从中牟南下豫西，经过宝丰、鲁山、栾川、卢氏等县，然后北向直指陕州（今陕县）。这沿路各县普遍地瘠民贫，素来是　将（河南土匪自称“　将”，当土匪称“　”）产地。伏牛山、外方山、熊耳山、崤

山等几条东西走向的大山脉，从南到北依次排列，又成为蠹将们与官兵周旋的大好场所。因此，老洋人的队伍一路前进，一路不断有许多贫苦农民和人少势单的蠹将补充进来，至1922年7月中旬，到达陕州城下时，人数已达数千人。

陕州守备丁保成听说前来攻城的杆首名叫张廷献，便派人打探是否就是当年驻守灵宝县的张连长。得到肯定答复后，丁保成大喜，原来他当年曾在灵宝县巡缉队任副领官，与张连长过从甚密。于是，丁保成开门请降，邀老洋人入城叙旧，随后率全体加入蠹将队伍。老洋人喜出望外，酒宴上便任命丁保成为自己的参谋长，稍事休整后，杆匪按原定进军陕西的计划，西攻灵宝，逼近陕西潼关。驻守潼关的慈玉琨奉陕西督军刘镇华之命，率部东进援助灵宝守军。在豫、陕军内外夹攻之下，老洋人被迫放弃入陕的打算，沿豫陕边界南下，进入豫西广大山区。这时，匪队中已陆续加入了张得胜、李明胜、任应岐、崔二旦、李老幺、常建福、韦凤岐等大小30余杆（一股土匪称“一杆”），达七八千人，匪势大炽。老洋人被尊为“老架子”、“总架杆”，也就是总杆首。

老洋人的活动，使驻在洛阳的吴佩孚和先后两任河南督军的冯玉祥大为不安。他们制订了三路合剿的计划，计划在豫西将老洋人一举歼灭。1922年10月23日，老洋人股匪撕开重围，向东逃窜，在官军的围追堵截下，10天之内横贯河南省，从豫西一直打到皖西。数千名土匪高举着“河南建国军”的旗帜，一路经过鲁山、方城、叶县、舞阳、郾城等县，在京汉线上打垮了陆军第十四师的阻击，进入豫东。豫东各县驻军根本未料及匪队来势如此迅速，措手不及，以至上蔡、项城、沈丘、新蔡诸县城相继为老洋人攻占。老洋人在新蔡盘下（土匪黑话，即住下）后，找来几十名精明强悍的蠹将，令他们装扮成客商、小贩模样，各人给了一些银钱自去置办行头、货物，如此这般地交代一番之后，便让他们离去。11月2日夜，老洋人率大队人马来到安徽西部阜阳

县城下。

“城上的士兵兄弟听着，我们是老洋人的杆子。今夜想在阜阳城里盘下，请帮忙打开城门。”一个大嗓门的土匪隐在树后对着城墙上喊道，声音压住了周围闹哄哄的人声。

“不行啊！”城上有人答话说，“阜阳城太小，住不下你们的人。你们还是走吧！”

“嘿，咱们都是扛枪吃粮的，要多少开门钱，咱们照数给！”大嗓门继续喊道。

城上城下，言来语去过了好一会儿，渐渐变得粗野起来，于是开始对骂，匪群中还不时发出阵阵哄笑。突然，城上打下来一梭子机枪，打得树叶簌簌地往下掉。城下的土匪们也开始向上打枪，双方便交上火了。大小匪首们指挥着部下抬来绑扎好的长梯，数百名灌手（土匪称攻城为“灌”，攻城敢死队为“灌手”）们短打装扮，手持盒子枪，背插大刀，站在子弹打不着的地方，等待时机冲上去。

“灌啊！灌啊！”喊声从城外野地里轰然响起，夹着更为密集的枪声，汇成一股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

云梯上去了，灌手们紧跟着，借着枪炮射击时的亮光，可以看出有人倒下。正当灌手们借着云梯向城上攀登时，忽然见城内火光四起，传出一片混乱嘈杂之声。不一会儿，城上的射击停止了，城门被打开。原来老洋人派遣的“客商”、“小贩”，早已暗携武器混入城内，听见城外大队的攻击，便乘机动作起来。守军早已让城外匪势所吓倒，又见城内匪徒点火策应，无心恋战，纷纷逃之夭夭。老洋人大队人马顺利进入阜阳城。

阜阳是皖系军阀、原安徽督军兼省长倪嗣冲的老家。倪嗣冲从1913年起就担任安徽最高地方长官，直至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失败，他才避居天津。这些年中，他搜刮大量民脂民膏，其中一部分即藏匿于阜阳老家。他为图日后再起有所准备，还储存了

大批军械弹药。老洋人在倪的老宅起出3000支步枪、13挺机枪、200多万发子弹，甚至还有几门大炮。这些对于经过长途跋涉、一路打杀的匪将们来说，无疑是比什么都更宝贵的。当然，他们对倪嗣冲家中的金银珠宝，并没有弃之不顾，而是搜取无遗；对城内商人、富户的店宅也都一一光顾。他们还掳架了县知事陈祖荫和阜阳天主教堂神父、意大利人马福波。

安徽现任督军马联甲原来就是倪嗣冲的部下，闻报老上司家乡遭到匪祸，急令皖北镇守使殷恭先率领25个营的官兵大举进剿。老洋人见官兵势众，情知不敌，下令连夜纵火焚烧阜阳城。一时间，火光熊熊，映红了半边天空。在商民一片凄凉的哭喊声中，数千名匪徒背着、挑着劫掠来的财物，离开阜阳城，于5日拂晓返回河南境内。随后的数日间，土匪先克息县，架走基督教牧师、美国人巴牧林父子；再陷正阳县，架走基督教伦敦会牧师、英国人贺尔门；继而掘断京汉铁路明港至信阳一段铁轨；然后沿京汉线北上，相继攻陷遂平、郾城等县。每当遇到官兵围剿时，老洋人便下令将这些真洋人推到第一线，使得官兵不敢开枪。眼睁睁地看着土匪们呼啸而去。

意、美、英等国的传教士被绑架，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抗议。北京政府自然是诚惶诚恐。直系军阀首领、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任命驻扎河南的陆军十四师师长靳云鄂为豫省剿匪总司令，统一指挥河南省内各军围剿老洋人。靳云鄂在北洋军中是一名比较厉害的战将，11月4日，他指挥所部在汝南县境与老洋人股匪激战6小时之久，迫使匪众经上蔡县向西南退却。这时冯玉祥已被吴佩孚从河南挤走，新任豫省督军张福来派其嫡系部队陆军第二十四师一部，自开封南下，进至西华县夹击。吴佩孚嫡系陆军第三师的一个团也从洛阳南下豫鄂边境，设防堵截。湖北督军萧耀南则派湖北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潘守蒸率两营兵力，沿京汉线北上至信阳长台关一带助剿。老洋人匪部陷入四面重围，形势极为

险恶。靳云鄂自信剿灭股匪指日可待，便以剿匪总司令名义通告各军，悬赏捉拿老洋人。凡生擒者赏现大洋1万元，击毙者赏7000元，能救出洋票（被绑架的洋人）者，奖赏从优，加官晋级。

老洋人召集匪首们商议对策，决定化整为零，打破官军合围聚歼的计划。他将匪众分为三股。第一股由李明胜率领，窜向豫东大别山区，进入光山、固始等县。第二股由张得胜带领，往南进入桐柏山区。第三股由他亲自统率，向西窜入泌阳县境内山区的母猪峡。这兵分三路的动作，不仅迫使官军分散了兵力，向四下里追去，而且彻底打乱了他们原来的部署。到11月底，老洋人、张得胜等杆在官兵重新调遣、部署的隙缝中，竟重返豫西，再次啸聚于鲁山、宝丰、郏县一带，自称“河南自治军”，以老洋人为总司令。

12月下旬，靳云鄂亲自指挥第十四师官兵在飞机、大炮、骑兵、工兵的配合下，进驻鲁、宝、陕等县老洋人的巢穴。土匪们经过前一个多月的转战，枪械损坏很多，子弹也极匮乏；而人数也因沿途分兵、作战死亡等原因，减少到3000人左右，实力大减。但在他们的票房（即关押“肉票”的地方）中，这时外国肉票已经达到7人。这是匪徒们对付官兵的特殊武器——既可用来充作战场上的挡箭牌，又可用“撕票”的威胁来遏制官军的猛烈进攻。而官军所担心的也确实在此。所以，靳云鄂在铁桶合围之后，除以飞机示威之外，并不急于发起总攻，而是派人前去招安。经过几天往返磋商，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老洋人释放所有的洋票，匪队改编为正式军队，2个游击支队共12个营，由老洋人和张得胜分任支队长，仍驻宝丰、郏县一带。靳云鄂还举行了接见仪式，并宴请2个支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席间，他以关圣爷、岳武穆为例，希望各位忠心报国，并建议每人姓名的中间一字均改为“国”字。他当场为两个支队长改名，张庆（老洋人）改为张国信，张得胜改为张国威。

靳云鄂救出洋人，便返回防地鸡公山，再也不管这2个游击队了。老洋人以担负剿匪任务为名，收缴附近各县镇团防的枪支，吸收其中的人员，借以扩大武装力量。同时，他根据靳云鄂“就地筹饷”的指示，堂而皇之地向当地官府和地方士绅要粮要款。部下有时手痒，则于夜间携械外出，重操旧业，黎明前再返回军营。这些行为，首先损害的是有钱有地的大户人家，这些人多与县城、省城及洛阳的官吏们有各种联系，于是大家联名向吴佩孚呼吁，恳求让老洋人移防。吴佩孚遂令老洋人率部“赴豫东就食”，离开豫西老巢。

1923年春夏之间，老洋人以豫边游击司令的身份，率部驻防豫东归德（今商丘）地区。辖区包括宁陵、柘城、鹿邑、永城等县。这一带较之豫西略略富裕一些，老洋人部在此一如往昔，令各乡村交粮交款。每亩地税从过去的5角钱猛地升到一元几角，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当时各省虽明令禁种鸦片，但实际上因种种原因，鸦片仍到处都在种。老洋人便以保护烟苗为名，每亩征收大洋6元。其所部军服全交农妇缝纫，不付分文。这里是苏、鲁、皖、豫4省交界之处，大小股匪多如牛毛。老洋人与各股暗中联络，要求众匪积蓄力量，待机大举。因此，在豫东地区，委实兵匪难分。本地土匪蜂拥而起，所过村庄，要庄户人家每亩地捐麦2斗；外地土匪被追剿急了，则以此地为避难所，躲过风头。各县乡镇中，稍有钱财的都携家带口逃往县城借居，以致房租骤涨。而留下的贫苦农民，就只得忍气吞声地受着土匪和变为官兵的土匪们的蹂躏。这些情况，自然通过当地官府士绅不断上达于吴佩孚、张福来，便是苏、皖两省也时有电报，要求当局注意老洋人，以免后患。老洋人自然听说了这一切，为了取得吴佩孚与河南当局的信任，这年7月间，徐州巨匪萧春子被苏鲁剿匪司令陈调元追剿逃往永城时，老洋人竟一反常态地将其诱杀。因为老洋人知道，象萧春子这样的著匪逃入他的辖区是无法隐瞒的，陈调元必定要通

报豫省，如果收留萧春子，势将危及自己。

但吴佩孚仍不敢信任老洋人。这决不仅是因为老洋人在豫东骚扰百姓的问题。这类问题在当时，即使是正规军队也是不足为奇的。作为直系军阀的吴佩孚担心的是，这个颇有计谋、懂得战术的招安土匪会被皖系或奉系军阀收买、利用。当时社会上早已盛传，临城土匪劫车案的背后有这两个反直派系的政客在活动；又传说皖、奉两系正派人游说山东、河南的各股土匪，联合骚扰直系统治地区。而实际上，土匪在军阀混战中所能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时正在进行的四川内战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四川作战双方都极力拉拢、收编土匪，以扩充自己的实力。而那些不愿被收编的土匪，只要随意在任何一方的背后捣鼓一下，就会无意中帮了另一方一个大忙。因此，吴佩孚决定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10月间，他命令老洋人这支被收编的土匪到四川去参战，既可以帮助站在直系一边的杨森打仗，又可以借此机会消弱甚至消灭老洋人的队伍。

老洋人何等狡猾！他看透了吴佩孚的打算，借口饷械缺乏、部下蛮横，而拒绝了吴大帅的命令。吴佩孚此时不仅深悔当初同意招抚老洋人，而且得到消息说，奉系已派赵杰秘密策动老洋人倒戈，便下定决心彻底解决老洋人这个后患。他暗中下令调集苏、鲁、皖、豫、陕5省共4万军队，进行部署。10月上旬，山东郑士琦、江苏陈调元、安徽马联甲的军队从东面的三个方向向豫东包抄；驻守洛阳观音堂的陕西军队和驻河南的胡景翼、靳云鄂等军，则从西面的三个方向向豫东进发。吴佩孚的计划是，各路官军分赴老洋人部所驻守的几个县，各个包围，勒令缴械遣散。然而老洋人非常精明，他的探子遍布各地，道听途说加上内部消息，综合起来一分析，他认定官府将有不利于己的行动。10月16日，老洋人连夜下令各县队伍迅速集中鹿邑。17日，永城、夏邑两地人马到达鹿邑。宁陵县的人马于18日晨正准备出发时，官军已越界赶到。

老洋人部急行军奔赴柘城，与驻柘一部会合，将县府库存钱粮和商店劫掠一空，打开监狱释出囚徒，然后直趋鹿邑集中。

19日，老洋人下令在鹿邑县城纵火，放任部下大肆抢掠。然后匪队分作两股，分别由老洋人和张得胜率领，向西突围而去。苏、鲁、皖3省军队尾追其后，但仅能攻击匪队后卫，收效甚微。靳云鹗坐镇许昌，指挥十四师守卫京汉线，防止老洋人越过铁路窜回豫西老巢。他估计老洋人一定避开许昌，向西南方向越过京汉线，因此特别命令郾城、遂平、确山等县驻军加强戒备，并备有运兵列车以便随时往来增援。但老洋人出其不意，恰恰就在许昌附近插入。老洋人一股沿西华、扶沟、鄢陵、临颍等县，从许昌南面直趋京汉铁路；在临颍遭到官军迎击，颇有损失，但终于越过铁路向西逸去。当大队土匪经过铁路时，沿途车站急电许昌，以致已经从许昌南下的客车吓得又退了回去。张得胜一股则绕到许昌以北，从官亭越过铁路，虽也遇到官军阻击，却依然掳走了官亭火车站站长。至此，吴佩孚的五省军队解决老洋人的计划又彻底失败。

10月下旬，老洋人人重返豫西，在宝丰、鲁山至南阳一带的伏牛山中恃险顽抗。虽然在突围过程中，他的人、枪、子弹损失不少，却很快得到了补充。他在攻打鲁山县城时，仅仅依靠喊话形式，允诺给以金钱，便换取了守城士兵的开门揖盗，并获得了大批枪械子弹。而一向活动在豫西的其他杆匪，闻说老洋人重新拉杆起事，也纷纷前来投奔。例如原在江苏徐州的范明新股，窜入河南后屡遭追击，范明新死后，余部全体投入老洋人麾下。又如一直活动在登封、伊川之间的姜明玉股，也在这时南下与老洋人合杆。因此，老洋人的势力不仅很快得到恢复，而且有所扩大，人数竟达六七千人。

老洋人复叛，成为洛阳吴佩孚的肘腋之患；在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也深为震惊，因为他根据情报获知，皖系政客已派人

与老洋人联络，并邀请参谋长丁保成赴天津设置通信机构，意在骚扰吴佩孚后方。因此，曹、吴下令限期剿灭老洋人。豫督张福来亲自赶赴许昌坐镇，指挥官兵进剿；靳云鄂则奔走前线，视察敌情，随时调度。老洋人仍采用分散官军兵力的做法。他让姜明玉率2000余人向西北突围，自己则领着4000余人南下。姜明玉一股分出后，最终与张得胜合杆，暂不叙述。这里仅记老洋人一股情况。老洋人南窜目的是企图暂时避开河南处处设防的官军，而进入湖北。从11月4日至14日，他从鲁山出发，经叶县、方城、南阳、泌阳等县，抵达豫鄂边界的湖阳镇。这一段路并不很长，但匪队竟用了11天时间，与1922年10月他们在10天内，横贯豫省相比，一方面表明了此次官兵的围堵使土匪行动受阻，另一方面则反映匪势似乎确也不如当初之盛大。老洋人股到湖阳镇后，受到湖北襄郧镇守使张联升部的迎击，被迫向东进入泌阳母猪峡。这时，以桐柏山为中心的豫鄂两省大小股匪纷纷前来合杆，一些乡镇团防也携械投降，使老洋人势力猛增，竟达1万人左右。

老洋人与丁保成等匪首商议后，决定避开与官军正面交锋，经湖北入四川，利用川省军阀混战的形势，重新打出一个局面来。于是匪众自母猪峡冲出，沿着豫鄂边界向西，一路经过唐河、新野、邓县，时时试探着越过边界，企图窜入湖北。这时河南官军已察知老洋人准备出省，于是在匪队之后不紧不慢地追赶，意在将匪逐出豫省了事。而湖北军队则沿省界处处设防，不让土匪窜入。匪队在两省军队左右挟持之下，动弹不得，益发焦躁，杀性大发。11月23日，老洋人攻临豫南淅川县的李官桥镇，该镇隔丹江（汉水支流）与鄂省相望。镇中居民依寨墙顽强抵抗土匪的进攻。入夜，匪徒攻入镇中，顿时火光烛天，哭声震地。土匪大肆屠戮百姓，见人就杀。据后来统计，土匪在淅川县一地就杀死人民达4326名，焚毁房屋2.6万间。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匪徒竟以死尸掷填江中，企图叠成人桥而过。鲜血染红了江水，尸体随波浪冲去。匪徒终

未能渡过丹江，于是强逼着在李官桥附近掳来的男女老幼，肩扛背负着土匪沿途抢来的物品，继续循边界西进。途中凡不胜负荷者，便被一枪打死，弃置路旁，致使沿途暴尸累累。

11月下旬，匪队终于在鄂军的堵截中寻隙进入湖北，直抵郧阳（今郧西）城下。土匪仍企图以甘言诱使守城官兵开门并提供子弹，结果其计未逞，便架炮轰击，并用云梯攀城。守城刘营长率500名士兵奋勇抵御，土匪连攻三日未克，只得在四乡劫掠一番离去。与此同时，另一部匪徒则攻进了郧西县城，布满四乡，盘踞多日。他们除勒令乡民供应食物之外，还四出搜寻年轻妇女，挟至营盘进行轮奸，遇有怀抱婴儿的少妇，便将婴儿夺过，弃置于地，然后挟妇而去；稍有反抗，即被戕杀。匪徒人数众多，动作野蛮，被奸妇女几乎无不致残。一名孕妇被轮奸后，当场血崩而死。一名12岁幼女被奸后，奄奄一息，次日丧生。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郧西匪祸中，幼女、妇人被奸致死者竟达二三百人之多。

这时，豫陕鄂边界各小股土匪纷纷前来入伙。一些霸将（零星散匪）也乘机打劫行凶或加入大杆。因此，匪势增至惊人的程度：人数超过3万，拥有骡马2500头，新式来复枪5000支，手枪800支，机枪、小炮各数架，其余则为旧式长枪、鸟枪、大刀。但尽管人多势众，毕竟是乌合之众，且子弹不足，影响作战能力，因此老洋人打算西南行、入四川的计划非但不能实现，反被湖北军队驱往西北，进入陕西境内。

陕西军队吴新田和张治公、贾济川等部早已闻讯设防阻击，遂将老洋人围困在商雒山中的龙驹寨（今丹凤县）。这时，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军阀张兆钾、马鸿宾、马麒等人，也万分惊恐，因为一则当年白朗起义时，即是循此路线而深入甘肃的；二则这几个地区也是土匪如毛，宁夏河套地区的“套匪”、青海的“番匪”，都十分活跃。他们担心，老洋人一旦西进，各地匪势会迅速大张，因此纷纷要求加强驻军，架设军用电话，以防万一。再说商雒山，

属于秦岭山脉东段，山势险峻，隘口极多，官兵万难攻入。明末李自成起义时即以此山为根据地之一，屡扑屡起。老洋人在此与官军周旋了大半个月后，猛然挥师东南行，返回湖北。

12月26日夜，老洋人股匪攻陷枣阳县城，焚毁县署和数百间民房，打死、打伤商民、士兵200余人，绑架人票数百名。此外还掳走美籍女教士吉伦，击伤美国传教士贺福夫妇，再次震惊了中外人士。其中贺福夫妇刚在鸡公山举行过婚礼，返回枣阳欢度圣诞节。未久，贺福教士又不治而死。匪队随后向北窜入桐柏山区。在豫南各县分股骚扰。吴佩孚和豫、鄂两省当局函电交驰，调兵遣将，悬赏1万元，急欲救出吉伦。教会方面则派人与匪接洽，土匪开价10万元，另加步枪、手枪各500支，双方无法谈拢。时间已进入1924年初，在河南省内的鄂、豫、陕各军的严厉打击下，老洋人深感子弹不足，先后前来合杆的股匪也纷纷离去。这时，赵杰派人前来告知，他在豫东尚藏有大批枪械弹药，于是老洋人派出一股匪徒前往豫东去取；自己则率大部，挟持吉伦女教士北上，准备返回豫西山区休整。匪众还到处张贴布告，声称回家过年，明春再来。

豫东的一股在靳云鄂的打击下，未能如愿，遂自东向西从京汉线石桥站与临颍站之间穿过。匪势之大，竟使护路部队退避三舍，仅仅用电话通知上下行列车回避。因此，南下的车停在许昌，北上的车停于郾城各数小时，待匪队通过后方才开行，造成接连数日火车误点。此事为中外人士获知传播，诧为奇闻。

老洋人匪队虽然总算返回豫西，却已成强弩之末。土匪从1923年11月初开始南下，至此时已历2个多月，其间奔窜豫、鄂、陕三省达3000余里，昼夜行军，连续作战，实已疲惫不堪。尤其是返回豫省之后，所到各地，商民畏之如虎，坚壁清野，逃亡一空，匪徒人数众多，无从就食，挨饿几顿是常有的事，更导致人心浮动，怨声四起。1月上旬，老洋人所部被官军围困在郏县西北

山中老爷顶，穷愁日蹙。老洋人脾气变得极为暴躁，动辄发怒。1月12日这天，他通知众匪首前来议事。大家愁眉苦脸，刚刚坐定，猛听得老洋人大喝一声："李二黑！"

李二黑一惊，连忙起身。

"好你个小子，胆敢背着我私通官军！"

"没有的事！"李二黑辩解道。

"哼！"老洋人一声冷笑，说："想瞒我老洋人，你是瞎了眼！给我带下去砍了！"

这时，参谋长丁保成和其他匪首纷纷起身求情。老洋人恼怒地一挥手："这不干你们的事！谁也不能坏了我的规矩！"

然而，老洋人错了，他不知道李二黑的所为正是丁保成一手策划的。原来丁保成见眼下形势危急，硬撑下去死路一条，便想利用吉伦女教士这张牌与官军谈判收编。他曾几次婉转向老洋人试探，但老洋人因为当年收编后，几为官军暗算，所以根本不愿听到谈判招安之事。丁保成便与几名有同样想法的匪首商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暗中先与官军谈起来；事成之后，老洋人也许顺水推舟就答应了；若执意不从，或者放他一个人走，或者干脆逼他就范，迫不得已时也可动武。不料被派去与官军接洽的李二黑的行动，竟为老洋人暗中察觉。老洋人以为这只是李二黑个人行动，决定杀一儆百，因此他不从众人所请，执意要杀李二黑。

丁保成见老洋人如此固执，便环顾众人，大声说："既然如此，咱们散伙！"

老洋人闻言大怒，陡地从座位上跳起，掏出手枪。只听"砰"地一枪，却是老洋人应声倒地。原来，另一匪首早已暗中持枪在手，一见事急，举枪将老洋人击毙。当下丁保成对众匪首说："我们数人已决定向官军投诚。诸位愿意跟着走的，自然欢迎；不愿意的，人各有志，我不勉强，可将自己的一杆拉走。"

于是，大部分匪首带领自己的杆子分别逃窜而去。其中部分

被官兵消灭，被架的吉伦女教士因此得被救出。丁保成等人则率所部向豫南镇守使马志敏所部尤营长投诚。投诚后的土匪得到官军供给的食物，因饥饿多日而狼吞虎咽、食之过量，竟致撑死数十人之多。马志敏得部下报告后，立即发电报向河南督军张福来请功，称该部“生擒老洋人之伪参谋长丁保成”，“老洋人在老爷顶被魏营及尤营击毙”。老洋人匪祸至此靠一结束。

（选自《民国春秋》1989年第六期）

李元周及其一家

李治生

李元周，是豫西大名鼎鼎的绿林人物之一。他拉杆结伙，少则数十人，多则数千人，出没于洛宁、卢氏、嵩县、栾川等县。

我家与李家相隔二里，和其弟李贵周是多年的同班好友，假期经常到他家去玩，加上一些知情者和当事者的介绍，对李元周本人的情况和他家败落的过程，有一些梗概的了解。现择其要介绍于后：

（一）

李元周，字绍文。1905年生于洛宁县西南山区下高村，父亲李相臣是个粮食经纪，耶稣教信徒。李元周幼年家贫，十几岁时与堂兄李其芳随族叔李相元拉杆闯江湖。他身材魁梧，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胆略，很受李相元器重。随着他们势力之扩大，李元周也崭露头角，成了个小头目。李相元死后，李其芳升为杆首，李元周成为“二架”，他俩带领数百人马，攻城劫寨，走南闯北，在豫西绿林中，很快有了名气。

李曾两次攻陷洛宁城。第一次是在1929年6月初，李其芳、李元周联络郑福成、张文、张寡妇、孙瘸脚等部近千人，并勾通县常备队长李发三作内应，很快攻陷了洛宁城，活捉了县长田贵钦（绰号田糊涂），烧毁街房数百间，使国民党洛宁县府一度瓦解。

他们占居县城月余。

李元周撤出县城后，听说城里绅士贺卓如之妹颇有姿色，遂派人前去求亲，卓如之父贺万年立坐不安，左右为难，既怕拒绝惹恼李元周，全家生命难保，又怕女儿许匪官府追究。经再三斟酌，向来人暗示，可以“明抢暗娶”，于是李元周于7月20日，二次率人马攻入县城，把贺之妹带回，收为第三夫人。

（二）

李其芳攻破县城不久被国民党的二十路军（张钫部）收抚，调赴潢川一带，余部由李元周率领。李元周目不识丁，但会笼络手下人：一是对经常跟随他并立有战功的，他都想法给解决婚姻（有时到外地抢女人）和家庭问题，使这些人对他感恩戴德，死不变心。二是在周围各村网罗一些小头目，受其指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三是在下高村，他根据青壮年的具体情况，分别发给一支长枪或短枪，表面上说是让其看家守院，实际上是拉其下水，为他所用。四是他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约束部下极少骚扰附近百姓。五是对邻里不摆架子，经常逗着别家小孩玩，叔伯大爷照样叫。有困难向他告借的，他或粮或钱都给点，从不使对方落空。国民党两次到下高村剿他时，他总是掩护村民先转移，然后自己率部撤退，因而下高村有些村民，对他印象还好。但是李元周毕竟是个土匪杆首，残暴、狠毒的性格爆发出来，是非常惊人的。

1924年农历十月，李元周随李相元攻打洛北张村，李相元被该村红枪会打死，他为了给族叔报仇，于翌年农历腊月初八，率部再次袭劫张村，打死打伤张村、上窑一带百姓数十人，临走时还把上窑的卜曾亮等5个农民和几个小孩绑到下高村。先用分尸的方法把几个小孩处死。每撕裂一个小孩，匪徒们狂呼乱叫，极

其残暴。对5个农民则作为祭品，绑到李相元坟前，先逼其跪地磕头赎罪。然后枪杀，砍掉人头，贴着李的墓前摆开，再把5具尸体十字形架起，焚尸祭奠，惨状目不忍睹。

李元周对周围的异已势力，特别是反对他的人，则立即铲除。大阳村一个年逾七十的教书老先生张敬铭，对其所作所为不满，常对人说："李元周看着很厉害，就是不敢见官，我要动动笔，叫他绕天飞！"李听说后非常恼火，派赵书正、狄清河打死了张敬铭，并把张的侄子张应信捆起来，用炭火活活烧死，还拉走了张的孙子张清宪，让其家属用100两大烟土赎回。几家张姓被迫逃外躲难数载。中高村寨首李双基因和李的妹夫李作枢家结冤，并到李元周家逼过债，1926年春，李双基到下高村看戏，李派李大汉、李润年等，把李双基从观众中拉出来打死，并派人抄家。李双基的5个儿子，有4个先后被杀害，家中其他成员四处避难，长期生活在恐怖之中。

李元周有了势也有了钱，就尽量地讲阔气，寻享受。他每次赶会、看戏或到邻村走亲访友，总是衣冠楚楚，骑匹大青马，或乘一顶高轮马拉轿车，护兵数十人，前呼后拥，甚是威风。即使到野外打猎、捉鹌鹑，也是从者成队。李元周喜爱看戏，凡是外地来的戏班，都要先到他村上演，然后才敢到附近村演出。他还把从伊川来的一个曲剧团的主要演员留在身边，听候他的安排，所以附近群众中流传有："上高村有钱好治气（打官司），中高村有钱好置地，下高村有钱好唱戏"之说。

李元周、李应周、李富周兄弟3人就有10个老婆。其中李元周有4个，第二、第三夫人是从上高村、县城抢来的。其弟李应周也有4个，第二、第三夫人是从中高村、卢氏双槐树抢来的。其三弟李富周的第二夫人是趁女方新婚之夜抢来的。但他们并不以此而满足，霸占良女，寻欢作乐，附近有姿色的妇女，很难逃出李家兄弟的魔掌。凡被霸占的妇女，强作笑颜，百依百顺，丈夫，

父母必须表示欢迎，否则必遭杀身之祸。

下高村农民李虎臣，有个女儿长期被李元周霸占。李每去女家夜宿，必有贴身护兵送护，站岗放哨，李虎臣两口实在憋不住，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即触怒了他，于是在一个夜里，把李虎臣夫妇一齐打死，女儿为此上吊。下高村有个青年妇女叫宋大遂，有些姿色，嫁给中高村农民李振甲，但长期被李应周霸占，明铺夜盖，毫无顾忌。每逢附近村庄唱戏，李应周叫大遂打扮得花枝招展，和他同坐在一辆高轮轿车上，带着一群护兵前去看戏。李应周为了长期霸占大遂，还派人打李振甲的黑枪（李振甲手部受伤，被逼外逃，解放后方归）。李元周觉得李应周这样作影响太坏，遂派其三弟李富周把大遂打死。李应周为了报复，把被李富周霸占的一个妇女小遂（大遂之弟媳）以及小遂的娘家父亲和祖母一齐打死。象这样的事，受害者无人敢喊冤，官府也不敢过问。李家兄弟在底张峪这方圆数十里范围内，统治了近20年，附近群众不敢直呼其姓名，而把他父亲称为“老掌柜”，把他兄弟们依次称为“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

（三）

1931年，国民党洛宁县府鉴于四区（辖今底张、兴华乡）土匪、豪绅较多，政令不达，税捐难收，想利用李元周之权威，开展局面，遂委任他为第四区区长。他任职两年余，趁收大烟款之机自肥一部分，还把一些亲信如张天佑、薛东屏等安插到基层政权，使其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李任职期间，有两件事在群众中流传很广。

一是李元周点主。在旧社会父母死了，孝子要做一个木质的牌位敬奉，牌位上写着“中华显考×公大人（或×氏孺人）之神主”等字。其中其他字都先用墨笔写好，唯“神主”的“主”字

写成“王”。到殡葬时，聘请有职权的头面人物做“主官”，用朱笔把缺的笔划填写上，这叫点主。一次李元周被西南村一个姓白的绅士聘为“主官”，他不识字，愁的不得了。后来叫文书廉玉铭手教手练习了十几天，才勉强上阵。那天观众很多，李元周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端坐在主官席上，在礼宾先生吆喝声和鼓乐伴奏下，拿起朱笔开始点主。不知怎的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手软乱颤，头冒大汗，窘相毕露。事后他懊悔地说：“早知道这样作难，也不去吃他那一桌（宴席），再有这事，给磕一百个响头也不去了！”从此，“李元周点主”在群众中传为笑柄。

再一个事是李元周给祖母庆八十大寿，李当了区长，具有绿林好汉和政府官员的两重身份，心里非常高兴，想借祖母80岁生日之机炫耀一番。消息传开，绿林、政界的头面人物和各地的大乡绅，出于友情、恭维、拉拢、恐惧等各种心情，都准备届时前往作客助兴。岭南村大富户商老虎事先用成队的骡子送来面粉，有的官员还送来现金，附近各村都当成一场大事。有收钱买礼品的、有添置锣鼓彩旗的。李家则作了大摆宴席、唱大戏、安全保卫等各种准备。过事当天，宾客如云，人潮如涌，彩旗夹道，岗哨林立。迎桌时，前面有四杆军号，几盘鼓乐开道，后边礼桌排排相随（上摆现洋等各种礼品），各方贵宾随后紧跟，贵宾之后是数十名服装整齐的武装人员，持手枪的枪上套，持长枪的刺刀出鞘，排成三路纵队，威风凛凛，穿街而行。再后是附近各村客人，抬着礼物，举着彩旗，敲锣打鼓，依照次序，整队而进。鞭炮声锣鼓声直冲云霄，迎桌队伍绕村两周而止。然后唱戏摆宴，宴席上佳肴美酒、山珍海味，招待人员衣着整洁，服务周到，连“旋风”们（端盘子的）都打着绑腿，在人群中穿梭飞行……。李元周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直到深夜方休。由于他过这场事宾客之多、气派之大是全区前无仅有的，所以在群众中传说很广。

（四）

1935年春，陕州专署保安团由雷参谋率领来洛宁西南山区进剿郑福成、董彦荣部。他们知道李元周人多势众，且与郑、董关系密切，即采用让其互相残杀、自我消耗的办法，委任李元周为“剿匪队长”。李元周识破阴谋，采取明剿暗助的对策，把官方发给他的武器、弹药，偷偷地转交给郑、董。洛宁县长张仁序和专署保安团的雷参谋得知后，对他非常不满。鉴于他人多势众，不好整治，遂在长水镇设下“鸿门宴”，以诱李元周上钩，捕而杀之。

李元周接到请帖后，立即找久闯江湖、且有谋略的简子荣商量。简说：“雷参谋设的是鸿门宴，这就看你的胆量了，去是英雄，不去是狗熊，去与不去，你自己定夺。”李说：“俺李元周啥时候也没装过狗熊，大江大海我过了多少，还怕他们这条小叉河。长水之请，我非去不可，看他们能奈我何！”赴宴当天，李元周带人百余，在近长水的洛河南岸，设好埋伏，随时接应。挑选数十名精明强悍的随从，每人带两支手枪，明挎暗插，子弹上膛。到长水镇后，每过一个团队岗哨，李则设下双岗，监视对方。入席时，李派两个彪形大汉，站在县长张仁序、保安四团雷参谋身后。张、雷见此阵势，强作笑容，勉强说了一些奉承恭维的客套话。李元周却冷冷地说：“我是大老粗，说话直来直去，上次你们被郑福成围困到底张寨上，是我去解了围，你们要是忘记前情，误听闲话，想叫我过不去，俺李元周也不是好惹的！”冷言冷语，气氛非常紧张，县长、参谋没敢下手，宴席不欢而散。李元周却身骑大马，随从数十，威风凛凛离开了长水镇。

（五）

1935年6月，县府诱杀李元周之计未成，反而受到奚落，雷参谋急报专员欧阳珍，省保安第四团团长夏秋屏奉命带领全团人马到洛宁进剿李元周。于一天拂晓将下高村团团围住，并从东门冲进寨里，直奔李元周住宅。李早有提防，带了数十人睡在村中一个炮楼里，发现情况，立即率部反击。经过一阵激烈巷战，击退了第四团的进攻，并向寨外追击。占据东寨门楼的一班士兵，看到李部攻来，慌忙阻击，扔出的一颗手榴弹，碰在中梁返回，士兵死伤过半，未死的被李部吕秀林歼灭。不久李元周部从各处汇集来近200人，占据村北寨，并在寨上一边射击，一边拉弦唱戏。郑福成部也赶来增援，在盐池村后岭头上摇旗呐喊，吹号助威。官兵气急败坏，对峙近10个小时。李元周从东面反攻，拿下下高村对面的龙骨寨，解除了下高村的包围。经过这次战斗，震动县府，也震惊了省、专当局，省又派二十五师来洛宁协助省保安四团进剿李元周。李见势不妙，将部下转入深山老林，分散隐蔽，他本人暂寄居在潢川县李其芳处。

（六）

陕州专员公署专员欧阳珍，为整治洛宁四区，派亲信马永凯（又名马慈元，渑池县英豪人）来担任该区区长，区部地址在西南村。马永凯到任后，把区武装扩大到30多人，整肃地方，除掉了一些匪杆。李元周在潢川，有渑池县一个姓郭的劝他回县除掉马永凯。1937年冬，李元周回到家里，以宴请马永凯为名，欲借机杀害。马永凯也不示弱，按时偕驻军营长张承颜同往。马进入下高村后，看到岗哨林立，知李不怀好意，在与李寒暄一阵后，未

曾赴宴，即以区里有要事不能逗留为由告辞。李元周鉴于营长张承颜随行，未便下手。

马永凯回去后，区丁牛中立是大阳村人，因砍死李元周部卒狄清河，携枪投奔马永凯，他告诉马要把李元周的亲信张双年、李自平等尽快从区部清洗出去，以免后患。李、张二人闻风后急忙密告李元周说："要动手得快些，再过三五天就不行了。"李元周详细讯问了区里情况，并作了周密布置，约定了动手时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正准备晚间行动，下午恰巧区队长李时中求见。李时中是东磨头人，由家里往区部去，因和李元周是朋友，顺便前去拜访。李元周执意留他住下，并于晚饭后派人陪他打麻将。自带 100 多人趁雪夜奔向西南村。因有张双年、李自平、任福舟作内应，顺利开了寨门和区部门。李部一涌而进，按照原计划分头行动，很快打死了牛中立，解除了其他区丁的武装。张双年、李自平、任福舟等分工对付马永凯的卫士。马的贴身护兵姚文广，听到外边枪响，急忙点灯穿衣。张双年、李自平已进到他房里，姚问："哪里打枪？"张答："是兄弟们枪走火了。"姚知他二人是李元周的亲信，深夜枪响时前来，必不怀好意，举枪就打。张双年一个箭步上去把姚的手腕一推，叭的一声子弹飞向顶棚，李自平上去一枪结束了姚文广的性命。马的其他几人卫士王元生、罗顺学、韦京科等也同时被打死。马永凯听到枪声，披衣而坐，李元周部下宋某隔门缝看了看不敢进去，李元周见状，怒斥宋说："没用的东西，给我滚开！"随用脚将门踢开，进入室内。马永凯不会放枪，见李元周至床上跳下向李猛扑过去，李用力一推，将马推倒在地，活捉了马永凯，并叫人用刺刀戳透马的双手，穿上铁丝。在风急雪飘的深夜，马永凯身着衬衫、短裤，被拴到马尾上从西南村带到下高村。李元周回到下高村后，李时中还在打牌，李元周笑着说："李队长，我给你牵来了一匹马！"李时中问："啥马？"李元周说："马永凯！"李时中一听，吓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

话来。后李元周把马永凯带到南山当成活靶子乱枪射死。

区长马永凯遇害，陕州专署专员欧阳珍对李元周更加切齿痛恨，弄了李元周一张像片，放到身边，随时提醒自己要除掉此人。他先派专署凌悲潮副司令率领专、县保安队去进剿李元周，但未奏效。农历腊月二十九日，有一营正规军在营长邹富龙带领下，围困了下高村。李元周突围后，联络韩老九等杆数千人，流窜于嵩县、栾川、卢氏等县。后在卢氏范里受挫，率人返乡，官府对他仍无可奈何。

（七）

1936年冬，流窜数省的杆首崔二旦，攻卢氏县城未克，回窜至洛宁西南山区，被洛宁地方武装击溃。崔二旦只身躲入深山。当时李元周还在潢川，其弟李应周派简银学、王全发二人把崔二旦请到家，以贵宾相待，后派宜阳河东村人王波送崔二旦投奔孙殿英部。孙委崔为司令员，崔于1938年底派人来洛宁请李元周去作副司令员，驻林县北湾村一带。不久崔二旦病死，李又通过李其芳的关系于1939年夏投奔范龙章部。时范任第一战区抗日挺进军第二十七纵队司令，李元周任第一支队副司令（相当于团级），率部转战于济源、滑县、辉县一带，经常与日军周旋。几年间，他屡经恶战，气壮胆大，凡有长敌人威风减自己锐气的言行，必遭他严厉痛斥。他经常对部下说："日本人也是人，子弹打住照样进。他拿有枪，咱手也不是端豆腐哩，怕他们干啥！"他还多次主动出击，打击日军。

在滑县，一次他带着十几名卫士，身着便衣，腰插手枪，到敌占区活动。在一个约住有50多户人家的寨门口，望见远处尘土飞扬，数十名日军骑兵，向该寨奔驰而来。李元周高兴地对士兵说："日本人来的正好，一定要夺两匹洋马骑一骑。"命令大家迅

速进寨，就近隐蔽。他和杨典锁藏在离寨门很近的厕所里，听到日军进寨，他们一跃而出，杨典锁举手一枪，领头的日军应声栽于马下。李元周也连发数枪。日军见势不妙，拨马而逃。他们真的缴获了一匹洋马，还有日军的小带盖枪和钢盔，并迅速转移，等日军大队人马来到时，他们已走得无影无踪。

一次范龙章和李元周率部在滑县瓦岗寨驻防，突然遭到日军重兵包围，他们随机应变，搞了个假投降，等日军给补充了枪支弹药后，反戈一击，重创了敌人。

1942年秋，范龙章和李元周率部驻在辉县南村一带（辉县城为日伪军占领）。李元周立下军令状：要攻破辉县城，捣毁日伪县政府，活捉几个日本兵。军令状批准后，李元周立即请来辉县城里的内线商量，约定时间打开西城门，并买通北城门楼上一排伪军内应。李元周随即从自己的卫士中挑选了机智勇敢、眼疾手快的杨典学、廉荣太、范廷英等人组成突击队，专门去活捉日军。李准备自带人马摧毁日伪县政府。农历九月十四日（10月12日）夜，月色朦胧，李元周率300余人急行军赶到辉县城外，由内线开了西城门，顺利入城内。廉荣太、杨典学等人，飞身登上城墙，廉荣太沿城墙进入一个敌堡。一个正在青油灯下的日本兵，一见廉至，猛扑过来，两人扭打起来，从堡垒内打到城墙上，眼看就要掉到几丈高的城墙下，廉荣太使尽全力，掏出手枪，打死了日本兵。枪声立即惊动了城内的日伪军，一时城里枪声四起，所幸杨典学等3人得手，活捉了一个日本兵。李元周在紧密的枪声中，率部直奔日伪县政府，击溃了县府的一排伪军，俘虏敌人近20名，缴获枪20余支，马数十匹，并收缴了辉县伪政府的印章。这时日军沿着城墙奔向西门，企图迂回包剿。李元周趁其未站稳脚根，立即率部突围，凯旋而归。

李元周袭击辉县城、捣毁伪县府的消息，很快在辉县及临近各县传开，日伪人员非常震惊。范龙章召集全纵队人员开庆功大

会，表彰了李元周及其部属，并赏以重金。会后范还亲自跑到洛阳向第一战区司令部报功。经范的请求，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撤消了过去对李元周的通缉令。李元周的名声越大，日军对他越仇恨，经常派人刺探李的情况。而李元周却趾高气扬，不把日军放在眼里。1943年6月间，李元周率部路过辉县候兆川金王庙村南边一个小村庄，听说附近有一股日军，遂令特务中队长王青年带数十人登上背后的山岗掩护，自带一部分人埋伏于村里，等待天黑，袭击敌人。日军对此有所察觉，派两名兵士顺菜地溜来侦察。李元周看见后，不叫打枪，等到跟前捉活的。两个日兵果然越走越近，李部几人扑出捉拿时，被其挣脱逃跑，接着日军以大炮、重机枪等武器向李部射击。王青年等不支，率部撤退，李元周陷入重围之中。日军从四面八方扑过来，几次冲锋，都被打退。李元周在弹尽无援的情况下率部往山上转移，目标暴露，日军疯狂地扫射，随从人员牺牲殆尽，李元周也中弹身亡。

（八）

李元周死后，不到一年时间，其堂兄李其芳在日军西犯、国民党军队溃逃时被害。李家的两棵大树已倒，门面就靠他三个弟弟李应周、李富周、李贵周来支撑了。这三兄弟，性格迥然不同，李应周圆脸矮个头，心狠毒，枪法好，办事食黑财短，不善用人。李富周是个瘦高个，瓜籽脸，群众说他是有庙没神，衣裳架子，一肚子黄菜水，办事两手掰不开。李贵周长得眉清目秀，在河南大学医科系读书，思想进步，1939年秋被洛宁地下党发展为党员，在群众中名誉很好。

1943年夏，李元周的四太太由新乡移居洛阳，不愿返回下高村，李应周派刘正居到洛阳叫她。刘正居是李元周多年的谋士和打手，为人心毒手狠，诡计多端。他到洛阳不久，李的四太太死

去（有说是被刘害死的），刘携其钱物而归，一部分交给李应周，一部分自肥。后来李家弟兄知道，刘正居心中忐忑不安，又生诡计，决定除掉李家弟兄，以免后患。他分析了李家情况，认为李应周乃是鲁莽武夫，不足为惧；李富周是个草包，更不必挂齿；惟有李贵周年轻有为，成了其首先杀害的目标。老奸巨猾的刘正居，既要杀死李贵周，又不愿落个叛逆李家之名，于是他挖空心思寻找代理人。后来他终于找到了水沟外村（离下高村一里路涧河东岸）的一伙年轻人李海流、李明、李来喜等，以蒙蔽、笼络的手法先与这些人结为拜把弟兄，他挑唆说："过去老架子（指李相元）在时，街里李家处处听咱的。老架子去世后，李元周一家掌了权，咱沟人处处得听他们的。现在李元周死了，咱们得把权夺回来！"这些青年问他如何夺法，他说："先把李贵周收拾掉，就像一只鸟被割掉了头，剩下两只翅膀，也煽不起啥风浪了。"这伙青年人和李家都是同族，对李贵周还有好感，不忍心下手。刘正居一再催逼，并说："你们如再不动手，我就要亲自干了。如果事情不成，我死了，你们也知道我是为你们夺权而死的！"李来喜等人在刘正居的逼诱下，于1944年麦收乘日军西犯卢氏后，洛宁县地方一片混乱之时，把李贵周诱骗到水沟外村李来喜家。到黑夜，李贵周辞行走到门外，他们从背后突然开枪，将李贵周打倒在地。李贵周还击，被乱枪射死。随行3人，反抗不及，被缴了械。翌日拂晓，李应周带了100余人奔袭水沟外村，进村无人，放火烧房，向村后山上早有准备的水沟外武装进攻。双方枪战至中午，经张天佑等人从中调解，双方暂时收兵，从此结下了不解之冤。

1944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日军势力达不到的地方，建立了"洛卢人民自卫军"（由地霸控制的武装组织），王希仲为司令。王念及和李元周是故交，委其弟李应周为司令部直属中队长，驻在下高村中沟（下高村有南、中、北三条沟）一孔3丈多深的大窑洞。李应周住在窑上用木板棚的一层楼上，楼门开在窑底部，窗

口架着机枪并架着电话，楼下室内设有几个警卫人员，两壁上整齐地挂着两排步枪。李深居简出，戒备森严。刘正居这时也粉墨登场，成为“洛卢人民自卫军”第二支队一大队的大队副。刘对大队长张天佑、支队长马希周极尽恭维并奉马希周之密令带人打死了时任该大队的中队长、底张村的实力派锁正武，并抄了锁家，从而取得了马希周和张天佑的信任。这时刘正居得势猖狂，有恃无恐，纳妾作乐，得意忘形，但从没有忘记除掉李应周这个隐患，只是鉴于支队长马希周曾以团结抗日为名，对李应周和水沟外两家之争进行了调解，加之李应周戒备森严，一时不好下手。

1945年初，水沟外村李海流到下高村教书，刘正居与其密议除掉李应周的办法：一是在学校较大的学生和在这个学校上过学的青年中建立“学友会”，以互相帮助，有难同当为宗旨，暗地灌输反对李应周的思想。二是千方百计收买了李应周的护兵李同中为打手，作为内应。元月间一天，夜黑，伸手不见五指，一群“学友会”青年迂回到李家附近屏住呼吸，细听里边消息。窑内李应周还在楼上由四太太陪着躺在床上吸鸦片烟，护兵李同中乘机从李应周背后开了枪。枪声一响，震灭了烟灯。李同中仓皇走出李家院门，对埋伏的人员说：“事已办好了，你们进去吧！”这伙青年人一听，蜂拥而进，争先恐后窜到室内，有的抢枪，有的抢东西，乱作一团。李应周中枪未死，四太太很快锁住了楼门，替他包扎了伤口。他听见楼下很多人在抢他的东西，怒火难遏，忍痛从楼上窗口扔下两颗手榴弹，两个年仅十五六岁的青年人李海龙、张书林被炸死，其余的人飞快跑出院外。李应周接着用机枪接连扫射，封锁了院门，这时他的部属赶来救援，才把他解救出来。第二天早晨，李应周被送到中山镇（今兴华镇）治疗。月余时间伤愈，又返回下高村，此后他戒备更严，对刘正居的仇恨更深，不断派人探听刘正居的行动，伺机报仇。

这年秋，刘正居患病，在家治疗，李应周带了几个护兵突然

闯入，厉声质问后将其击毙。李应周打死了刘正居还不解恨，又索性打死了刘正居的母亲、老婆和2个孩子，刘的一个亲戚翻墙逃跑，也被李应周一枪击落，但没有再打，放过了他的一条生命。

1946年春，一天下高村逢集，水沟外村的一群青年以重金收买了山上2个农民牛希臣、廉新太作打手，挑着柴担，暗插手枪，随着成群的赶集人来到下高村。他俩放下柴担，行走在人流中寻找李应周的踪迹。李应周带着几个护兵在一家饭馆内吃饭，被他俩发现蹲在铺门外，待李走出饭馆时，即迎上去连射几枪。李应声被击倒在地，几个护兵来不及掏枪扭身就跑。牛希臣、廉新太放下李应周追赶几个护兵去了。这时潜藏在一个生意铺里的青年李明，听说李被打倒在地，唯恐其不死，一个箭步跳出柜台，掂着手枪直向李应周奔去。谁知李应周未死，一看李明来了，从腰里掏出手枪准备还击。李明跑近丈许时，就连发数枪，击中李应周胸部。李应周在生命完结的最后一刹那，射出一颗子弹，正好从李明的上嘴唇进去，后脑壳出来，两人同时毙命。

李应周死后，李富周变成了人们嘲弄、侮辱的对象，只有人们在讽刺他、拿他开心的时候才称他一句三掌柜，而他却以自己能保住一条命而满足，对一切侮辱、漫骂之举都逆来顺受。至于留下的一群妇女小孩，有的忍辱偷生，有的另行改嫁或躲到别处。李元周这一家人从此败落。

（河南省洛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纪实

瞿波平

湖南西部地区，简称湘西，与湖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地区宽广，地势险要，地形复杂。山高势陡，纵横绵亘不断，林木茂密，洞穴相连，交通又不方便，便于土匪盘踞。因此湘西土匪出没，由来已久。国民党统治年代更为猖獗，约有十几大股，人枪在10万以上，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各股土匪以山河为界，各据一方，各有其抢劫范围，称王称霸，互不干扰；越界即互相厮杀，互相并吞。他们山地活动经验丰富，进退主动，凭借地利，即不服剿，也不服调。几百年以来的湘西匪患，居民不能安居乐业，商旅视为畏途，人人谈虎色变，直到湖南解放以后才告全部肃清。

湘西土匪内幕实况，除官方的一些材料记载以外，人们所能知道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传闻，失实之处在所难免。我的族兄瞿伯阶，为国民党统治年代十几大股土匪中之一大股土匪。1949年病死以后，我接替了他的衣钵，继续为患，直到被迫起义。我是一个过来人，湘西土匪内幕实况虽不能洞悉无余，但我跟随瞿伯阶15年，我们这一大股土匪的起落经过，知之甚稔，举一可以反三；特就我亲身经历及见闻所及，尽情详述于下。

瞿伯阶和我的略历

瞿伯阶，湖南省龙山县二所乡人。祖父曾在前清中过举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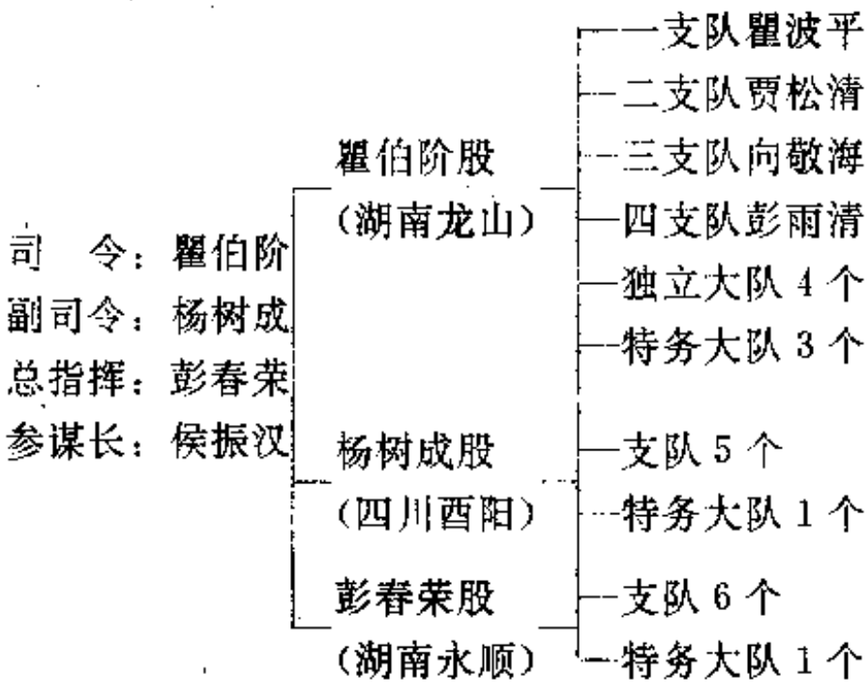
里薄有田产，由于不善经营，晚年逐渐衰落。父亲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赌钱、抽鸦片烟，家产全部耗尽。到瞿伯阶手里，只剩破屋数间，光棍一条。1926年开始为匪，在内部倾轧兼并、外部搜捕围剿的情况下，逐渐发展壮大。他由副连长起家，直到自号湘鄂川黔总司令。1947年，程潜任武汉行辕主任时，将其收编，任命为行辕第一纵队司令，后改任为暂编第十师师长。1949年病死于龙山。在长达20余年的时期里，为患一方，人民深受其害。

我系瞿伯阶的族弟。祖辈以务农为业，家境贫寒。我兄弟二人，弟尚年幼，我从小跟人学裁缝。瞿伯阶当了土匪，要我跟他出去。我因为家无隔宿之粮，又常以通匪罪名受国民党诬陷，不得不丢下针线，于1936年跟瞿伯阶当了勤务兵。那时我才18岁。有一次，国民党派兵围剿瞿伯阶，把我的父亲和弟弟都捉去杀了。我怀着杀父之仇，一直死心塌地跟着瞿伯阶，当到了支队长。瞿伯阶病死，我接任暂编第十师师长。解放战争期中，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从鄂西逃往四川时，曾委任我为新十师师长。湖南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湘西时，我自封为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兼新十师师长，与解放军为敌。1950年，我在解放军围剿劝降之下，正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接到程潜的信，命我将部队交出到长沙去见他，我才遵照他的指示弃暗投明而归向人民。我在15年中，由铤而走险，出家为匪，长期助纣为虐，以后发展到自搞一套，也给人民造下了深重的灾难。

实力及活动范围

瞿伯阶这支土匪，共辖15个支队，4个独立大队，5个特务大队。支队与大队喽罗的人数多少不等。支队最小的300多人，最多的千把人左右；大队从40多人至300人左右。总数约有19000多人。全部约有步机枪12000多支。

这支土匪集三大股而成，其人员组成情况如下：



在此以前，还有跟瞿伯阶当过副司令的王继安；当过总指挥的贾凤昌；当过参谋长的曾庆如、萧瑞娥、李国柱、瞿闵盛；当过支队长的王家仁等。

瞿伯阶辖一万多人枪，以湖南龙山为中心，称王称霸于湘、鄂、川、黔四省边境。他的活动范围，遍及四省边境的 16 个县区。北至湖北之宣恩、来凤、鹤峰、咸丰；东南至湖南之桑植、大庸、永顺、保靖、古丈、沅陵；西南至四川之酉阳、秀山、黔江及贵州松桃之一角。平时在这个区域内“吊羊”、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派捐派款、收鸦片烟、购买枪枝子弹等，胡作非为。一遇国民党派兵围剿，就在这个区域内到处流窜，进行顽抗。从湖北来打，窜到四川；从四川来打，窜到湖北；从湖南来打，或者窜到四川，或者窜到湖北。如果三面包围堵剿，就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你来我分散，你走我集中。”国民党对之难以捉摸，弄得束手无策，用烧房子、并寨、迫逼当地居民的手段来对付。不但没有丝毫效果，反而越剿越多。所谓官逼民变，老百姓常被国民党课以通匪、窝

匪的罪名妄加杀害，铤而走险参加为匪者日益增多。据我亲身经历体会，国民党军队不剿，瞿伯阶搞不起来，他们剿一次，他就壮大一次。

起家过程

1926年以前，龙山有两股土匪，一股为刘子良，一股为师兴五。前者系土匪巨魁、人称“湘西王”陈老统（即陈渠珍，又叫陈有木，土匪内部称之为陈老统）手下之团长；后者自称司令，系当地地主恶霸势力的代表，也是拉的陈老统这根弦，在地方办民团逐渐发展起来的。先是龙山16个乡，刘子良占其15，师兴五只据其一。二人各霸一方，各守各的势力范围，均碍于陈老统，初尚相安无事。惟师兴五野心极大，力图扩充实力及地盘，久而久之，经常越界厮杀，与刘子良倾轧，兼并其地盘，由1个乡扩大为4个乡。而心尤未足，继续招兵买马，企图取刘子良而代之。

1926年，瞿伯阶以一个光棍在区公所充自卫分队长，担任区长瞿代亮之扩卫。适值师兴五在二所乡扩充实力。乡长向树梅与其通同一气，而与区长瞿代亮不和。师兴五的扩展计谋常受瞿代亮之梗阻，遂利用红帮大哥瞿列成与瞿代亮之仇隙将瞿代亮杀了。瞿列成取区长而代之。瞿伯阶与瞿列成系五服内叔侄关系，而与瞿代亮虽系同宗，终不如瞿列成之亲，就投靠于瞿列成。从此开始为匪，经常私自带十几条枪越界到刘子良的范围内抢劫。

瞿列成当了区长，官匪是一家，对瞿伯阶的行为当然不会管。而师兴五吞并刘子良蓄谋已久，瞿伯阶此举正合其意。因此瞿伯阶越来胆量越大，并与其妻舅张明富合伙，共约30多条枪，继续在刘子良的范围内抢来抢去，实行倾轧兼并。这样搞了年把多，声势一天天扩大，自成一股实力了。

瞿伯阶肆无忌惮地在刘子良的范围内抢劫、倾轧兼并，刘子

良既不能制止，又无法对付，遂报告陈老统。因系属于师兴五范围，陈老统命师兴五剿除之。师兴五遂请准陈老统将瞿伯阶和张明富收编。瞿伯阶往见师兴五，知任张明富为连长，自己屈居副连长，心有不甘，认为师兴五不信任。一气之下，不服师兴五收编，与张明富分开，带着自己的一部分人枪，拖到湖北来凤去了。此是1927年的事。

来凤与龙山只隔一条河，也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便于土匪盘踞。当地十几个乡均属土匪魁首向作安管辖。此人为恩施国民党政府收编，委以旅长之职。另外，那里还有一条地头蛇彭树安，掌握一部分人枪，勾结一些亡命之徒，占据白福乡，自称大队长，为非作歹。向作安不让彭树安另树一帜，只得承认为其白福乡之大队长，但骨鲠在喉，欲去之而后快。瞿伯阶拖到来凤，经其亲妹丈胡跛子介绍与彭树安接了头，被任为连长。瞿伯阶就在来凤、龙山交界处卯洞的几个大山洞内住了下来，不时到师兴五的范围内去抢劫。师兴五派张明富去暗杀瞿伯阶不着，捉了他的外甥，并杀了他妹妹的公公。瞿伯阶代妹报仇，率部围攻张明富。将其全部人枪收拾，扩充了自己实力，并手刃了张明富。既与师兴五为敌，自然也就取得了彭树安的信任。后来彭树安被向作安杀了，瞿伯阶通过漫水乡乡长彭连城的介绍，就投告了向作安，仍被任为连长。

向作安在来凤为王，实力不小。师兴五在龙山扩展实力，到底把刘子良这股土匪兼并了，声势搞得很大。两人都有很大野心，双方都想向外伸展势力范围，尤以师兴五野心勃勃企图兼并来凤，遂在来凤、龙山交界处展开了激战。瞿伯阶对师兴五一再怀恨在心，在这一场战斗中，充当了一个凶狠的打手。他打死打伤师兴五100多人，还捉了不少。从而很受向作安器重，奖励了他20几条枪，加强了他的实力。

瞿伯阶充当向作安的打手，使师兴五吃了一场败仗，师兴五

命瞿列成到来凤去找瞿伯阶讲修旧好，许以要枪给枪，要名义给名义，只要不帮向作安而回到龙山来。这一着棋出乎瞿伯阶意料之外，一时倒难决策。向作安的部属对瞿伯阶也有了怀疑。瞿伯阶最后决计出走，一面将老婆儿子送至向作安旅部附近住起来，表示事出不得已，非有意叛离；一面利用夜晚率领部队拖向龙山。向作安在来凤所设兵工厂，与瞿伯阶驻地毗连。瞿部连夜出发，兵工厂以为有情况，胡里胡涂跟着一起拖走了。瞿伯阶发觉后，连忙叫他们回去。兵工厂内的枪枝、子弹，分毫未动，瞿伯阶一到龙山就派人给向作安送了一封信去，大意说："你的部属对我太怀疑了，此番拖走，情非得已，如果你不相信，和师兴五再打，我绝不为其卖命。"向作安接信，证以兵工厂之事，派人将其老婆儿子送回龙山。

瞿伯阶回来，师兴五并未履行其诺言，虽然给以副营长名义，枪却没有补充一条。原有的嫌隙未除，反更增不满。不久，师兴五病死了，乃弟师兴周承接了他的衣钵。几个月过去，倒也相安无事。

1935年，师兴周投靠陈老统，被任为保安团长。其时，贺龙将军在湘鄂西边区策应红军北上抗日，围攻龙山县城。国民党官匪勾结，堵击红军，派刘文华一个保安团及师兴周同守龙山。师兴周调瞿伯阶往守龙山之南门。龙山被围49天，弹尽粮绝。国民党空投技术太差，援救的子弹和粮食，全投到城外红军阵地上去了。守城部队饥饿难当，皮鞋底都煮食殆尽。红军自动撤离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龙山才得解围。师兴周与其兄师兴五一样，刁滑阴险，龙山一解围就自我吹嘘，上报守城有功，邀宠于国民党。国民党遂行其笼络的惯技，派员前来颁发奖章。瞿伯阶满以为论功行赏，决少不了自己一块奖章，谁知师兴周却全部发给了他自己的亲信。瞿伯阶深切地感到师家兄弟到底是一丘之貉，不能长与为伍，一夜之间，就从龙山县城把部队拖走了。

原来师兴周调瞿伯阶守龙山时，瞿伯阶闻知红军厉害，认定此去凶多吉少，但恐遗人以怕死的笑柄，又不得不去，遂将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自己率领到龙山去，准备送掉；另一部分由其胞弟瞿兴景及排长彭雨清率领，留在四乡抢劫。他打算在龙山失败之后，仍留有本钱，可以东山再起。龙山这一部分并未送掉，乃意外之喜，就拖出龙山，准备与留下的一部分队伍会合。来到距城15里之喜罗乡，系师兴周所辖范围，乡公所有20几条枪，亦为师兴周所有；为警告师兴周“瞿伯阶不是好惹的人”，一下就缴了这20几条枪，拖到明溪乡与留下的队伍会合了。这时瞿伯阶从10条枪搞起来已经搞了70多条枪了。

明溪乡有一股土匪，以王继安为首。他是从四川酉阳拖回来的，有80多条枪，投到师兴五手下，给他放了一个营长。师兴五死了以后，他对师兴周不感兴趣。师兴周调他去守龙山时，没有服调。师兴周在龙山对他大肆中伤。此人与瞿伯阶曾有交往。瞿伯阶来到明溪乡，把师兴周对他不满中伤他的话据实以告，既离间了他和师兴周的关系，两人又进一步建立了感情：砍香拜把，勾结得很紧；王继安还把儿子拜认瞿伯阶为干父。两人共掌握160条枪，在明溪、二所两乡活动，大有独树一帜之势。

瞿伯阶从龙山拖回二所乡，又与明溪乡王继安勾结，对师兴周很不利。师兴周有见及此，连忙左托人右想法，通过瞿列成向瞿伯阶说：“我对瞿伯阶决无二心，叫他不要误会！”并给瞿伯阶放了一个营长。

瞿伯阶起家的过程就是与师兴五和师兴周兄弟不断矛盾的过程。经过一次矛盾，实力增加一点，名义搞得大一点，同时江湖上也就结纳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为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首次受骗和倡乱

1936年，国民党军队于“围剿”红军后进入了湘西。次年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要陈老统将其部队编成一个师，美其名说是交师长顾家齐带出湘西到淞沪前线参加抗日，实际上是趁机收拾湘西土匪。在龙山方面，陈老统命师兴周编两个营出去。师兴周按陈老统指示，以贾义昌及其亲侄子师秀章为营长编成了两个营，并命瞿伯阶编一个连配给贾义昌营。瞿伯阶口里答应，实际不干，师兴周也莫可如何。其实师兴周也只是阳奉阴违，应付差事，把好枪都留下来，一些枪机都打不开不能作用的，七拼八凑，凑了300多条枪，编成两个营的番号带出去了。本人则仍留在地方。

瞿伯阶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是：国民党军队压境，收编部队参加抗日，陈老统接受收编，师兴周见诸行动，自己没有干。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到保安团去接头，承认缴枪。保安团认为缴枪不缴人，终为后患，对瞿伯阶说：“抗日嘛！人人有责，并不是要你缴枪，你还是把部队编好，你自己不愿意出去，派个亲信的人带出去也可以。”瞿伯阶信以为真，编成一个连交其胞弟瞿兴景带出去了。他还对保安团说：“我什么枪都带走了，只要政府保护不出事，我也不愿意玩枪了。”话虽这么说，还是留了好枪10条，短枪2支。另外保安团又给他留了长短枪各2支，假仁假义地说：“你在地方上搞了这么久，难免不得罪一些人，虽然政府可以保护你，留几条枪作保身之用也是好的。”瞿伯阶暂时就住在家里。明溪乡的王继安，仿照瞿伯阶的办法编成一个连，由他的儿子王家仁带到保安团去了。

国民党企图消灭湘西匪患，所有受编部队，编的编散了，关的关起来了，杀的杀掉了。瞿伯阶和王继安都遭到同样的命运。一

个晚上，瞿兴景带出去的部队被包围缴了枪，人全部被看守住。另以一个连围住瞿伯阶，双方展开射击，打死了瞿伯阶的堂弟，他本人夺路逃跑了，捉去他的老婆及未满两岁的小儿子。瞿伯阶一跑掉，国民党就下令将其胞弟瞿兴景及带去的40多人，聚集在一个草坪内，用机枪扫射全部杀死了。王继安的儿子王家仁带出去的部队，枪也缴了，只是没有杀他们，连同瞿伯阶的老婆儿子一起押送到龙山县城关起来了。

瞿伯阶和王继安上了国民党的当，遭了这次变故，几乎送掉性命。他俩从家里逃出以后，一直跑到四川酉阳的老寨亲戚彭继才家里。彭继才系当地的大恶霸地主，自任乡长，实力很大。他们两人就暂时躲在那里避风，等待时机报仇雪恨。

以后就到了瞿伯阶的倡乱阶段。

瞿伯阶为匪，其宗旨亦即其主导思想是：英雄可以造时势；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他常以此勉励部属。他20多年中的倡乱，敢作敢为，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瞿伯阶之倡乱，始于攻打龙山县城。其时龙山县警察大队三个中队之一的一个副中队长向道美，系二所乡人。他的堂兄向道和（大学生）在龙山活动乡长不成，对县长周献坤不满。向道和至龙山访其堂弟向道美偶尔谈及瞿伯阶的遭遇，其弟说只要“大哥”（指瞿）打来，愿为开城。乃兄一听，正中下怀，也想利用瞿伯阶攻打龙山，报复周献坤。二人计议一番，决定先找到瞿伯阶以后，再作商量。

向道和回乡，立即各处查访瞿伯阶的下落。终于找到瞿伯阶的一个老部属熊安乐。由他把向道和带到酉阳的老寨，见了瞿伯阶和王继安，告以向道美的意见。二人一听，为救出老婆儿子，良机岂肯坐失；但又不敢轻举妄动，遂请向道和再回龙山，坚定其弟的决心，许以打开龙山，所有缴获的枪枝子弹，完全归其所有，并另编队伍由其统领。经过向道和再度往返，转达其弟的决心。瞿

伯阶和王继安二人商定，请老寨恶霸彭继才襄助一臂之力，得到彭的满口应承，并借给200多人枪。他们组织好力量，再由向道和到龙山与其弟约定攻城时间，里应外合。

老寨到龙山只120里路，瞿伯阶和王继安二人率领200多人枪，于黄昏前出发，连夜急速前进，拂晓前到达龙山；稍加整顿，利用拂晓从南门向道美守城处一举就攻进了城。向道美中队三个排，拖走一个，两个缴了枪。其余两个中队，打走了一部分，一部分缴了枪。龙山县警察大队全部被解决了。所有缴获的人枪，都如约交给向道美，编成一个中队，由他任队长。瞿伯阶把押在监狱中的妻子都救出来了。其他在押的人犯也全部放走。凡愿意跟着干的就留下；不愿干的，打开粮仓，要粮背粮，不要粮的给钱，各自回家。龙山县长周献坤被捉到了，瞿伯阶仍叫他当县长，并挟令他向政府打电报，要求给予正式名义。

瞿伯阶往县政府一住，自封团长，以王继安为副团长，向道和为团附。下面编成两个营，以彭雨清及王家仁分任营长。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任意左右县长。

接着为了防止意外，瞿伯阶将各头目驻地作了调整。他自己迁住城外太平山一个庙内，王继安和他儿子王家仁也迁住城外石膏山，向道和、向道美、彭雨清则分别住在城内，并由向道和应付县长。但是他们内部不甚团结，因为打开龙山时，王继安缴了几根枪没有交给向道美，向道美兄弟深为不满，欲火并王继安。瞿伯阶劝和不成，王继安把部队拖到明溪乡去了。

王继安一走，实力大为减小。瞿伯阶住在龙山，如坐针毡，对向道和及其他部属说："城市终非我们久住之所，现在王继安走后，实力减小了，城里再不能住下去，如果不出城，国民党部队包围过来，会遭到全军覆灭的。"大家商量，自以出城为上策，但对王继安有顾虑，深恐发生火并。瞿伯阶说："王继安的事可以讲得通，还是出城要紧。"就这样全部从县城拖回二所乡了。

瞿伯阶拖出龙山，几百人要吃要用，于是到处“吊羊”、抢劫。达拿乡王和坝是一个有60户人家的寨子，财主很多。师兴周的姐夫贾胡五的姐姐住在那里，是个大财主。瞿伯阶把王和坝一扫而空，并捉了贾胡五的姐姐，向她要4万光洋，如拿不出光洋，折合鸦片烟要8万两。这只肥羊关在二所乡一个险要的山洞内，队伍就住在山洞附近，专等来款赎人。

事为师兴周所悉，报于龙山县，请求派兵剿除瞿伯阶，救出肉票。龙山调来一个保安团，还派了一个警察大队，围打瞿伯阶。打了一天，不分胜败。瞿伯阶把王继安从明溪乡调来了。他们一来，就一个夹攻，把保安团和警察大队打退了，还追了三里多路。战斗结束后，瞿伯阶料定敌人决不会甘心，立刻召集部属开会，说：“敌人虽然打退了，一定会增加兵力，卷土重来，我们不能等着挨打，必须撤走。但是，码子（绑来的肉票）不能带走，怎么办！”向道和家离关码子的山洞只有里把路，他提出建议说：“码子不带走，就关在山洞内，我负责来守洞守码子。”大家都说：“你守我们同意，不过要守就得守住，这是我们的摇钱树啊！”当时我也在场，因为这个码子是我捉到的，根据我们内部规定，谁捉到的码子，在赎款内可以提10%的奖励，所以我特别强调非守住不可。经大家决定，要向道和守半个月。向道和当众保证：“我一定守半个月，半个月以后你们再来。”于是留给他们够半个月吃的粮食及枪枝子弹，把被打伤的人也留在洞内，其余全部撤到来凤的卯洞去了。

第二天，保安团果然又来了。由于山洞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向道和率领40多个人对付一个保安团，断断续续打了4天，第5天一早才被攻破。向道和甩掉伤员及码子从洞内的另一个出口逃跑了。消息传到卯洞，大家非常气愤，认为这是纪律问题，纷纷要求杀向道和。向道和不敢到卯洞来，央求瞿列成向瞿伯阶请求恕罪。瞿伯阶召集部属说：“向道和逃跑是不对，但是上

次攻进龙山县城他有功，将功抵罪，这次应该原谅他。”大家被说服了，向道和才敢到卯洞来，没有再给他什么名义，和瞿伯阶住在一起。

摇钱树被救走，快过年了，瞿伯阶又派人到来凤城边抢劫，把一个姓冯的财主捉来，搞了4000块光洋，痛痛快快地过了一个年。

1939年春，原已缴枪的师兴周，久静思动，意欲东山再起，带了30石鸦片烟（约1500斤），到省里（长沙）去活动。省里认为瞿伯阶在地方上倡乱，声势越搞越大，过去师兴周曾收编过他，利用这个机会，任师兴周为保安团长，命其将瞿伯阶收拢来。师兴周回到龙山，派原跟师兴五当营长后来洗手不干的彭亦九，到来凤卯洞找到瞿伯阶，对他说，师兴周想请他和王继安回去，编成一个正式营，由他二人分任正副营长，他仍驻二所乡，王继安仍驻明溪乡。瞿伯阶本想搞个正式名义，那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虽与师兴周有成见，但为达此目的，暂时委屈编为一个营，心里是愿意的。不过他还有他的长远打算，对彭亦九说：“我和王继安各是各的，给我编一个营我接受，还得给王继安编一个营，请你回去转告师兴周，行就干，不行就不干。”胳膊扭不过大腿，结果师兴周同意了。于是瞿伯阶和王继安以保安团营长的名义回到了龙山。但瞿伯阶住在龙山里耶镇不久，对师兴周不满意，又回到二所乡，另作打算。

龙山有三个黄埔六期学生萧瑞禾、向阳和杨亦九。萧瑞禾过去当过几天县长，当时赋闲在家。其余二人当时虽都在职，但均郁郁不得志。1933年12月，三人碰头商议，认为瞿伯阶的声势不小，大有发展前途，把他抬起来，大家都有出路。于是联袂走访瞿伯阶，对他说：“现在玩枪杆子，小搞没得办法，终久出不了头，只有搞得越大就越有办法。搞大了，脱离师兴周，脱离湘西的派别，我们帮你去活动，编师、编军都由你，还怕蒋委员长不收编你？那时就变成他的直系部队，大家都有办法了。”瞿伯阶深以为

然，要他们出去活动。

1940年2月，萧瑞禾又来到瞿伯阶处，极力怂恿瞿伯阶先把架子搭起来，以广号召。瞿伯阶遂自封司令，以王继安为副司令、萧瑞禾为参谋长。王继安留在明溪乡一带抢掠，瞿伯阶拖到来凤白福乡、白福市活动去了。

白福市为鄂西一个桐油集散的市场。瞿伯阶一到那里，就把市场上的桐油抢劫一空。王继安在明溪乡也搞得鸡犬不安。两地均分别上告到省，请求派兵为民除害。湖北调一个保安团到白福乡打瞿伯阶，湖南调一个保安团配合师兴周保安团之一部到明溪乡打王继安。由于兵力分散，双双都招架不住，相约退到四川酉阳八溪界大山上。他们与当地土皇帝张少卿接了头，张少卿表示支持。就这样，瞿伯阶时而四川，时而湖南，到处流窜，和保安团打打跑跑，纠缠了一个短时期。

再次受骗，继续倡乱

1941年，蒋介石任命傅仲芳为剿匪总司令，命令彻底肃清湘西匪患，维护公路交通治安。总司令部驻四川秀山，以王严、朱鼎卿等师，并指挥湘鄂川三省部分保安团队，在湘鄂川边区一带搜捕围剿。

瞿伯阶带领几百人经不住傅仲芳部的围剿，在湘鄂川边境各处流窜，约莫有两三个月，人困马乏、不堪忍受，拟向傅仲芳缴枪投诚，以为缓兵之计。遂通过二所乡乡长瞿兴孝对傅仲芳说："瞿伯阶有意保命缴枪，不知总司令意下如何？"傅仲芳打算将湘西土匪人枪一网打尽，对瞿兴孝说："你回去告诉瞿伯阶，不要缴枪，把他所有的人枪收拢来，编成队伍，由他派一个亲信的人带出去。"瞿伯阶虽无洗手不干之心，但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得将计就计，把人枪集中起来编成一个大队，以向家彦为大队长带出龙

山县境去了。

瞿伯阶的人枪一带到沅陵，就全部被改编。此举尚属意料所及，却不料傅仲芳说他的枪没有全部拿出来，追逼他继续缴。其实，瞿伯阶有上次事变的教训，不仅枪没有缴完，而且人也没有全部带出去。傅仲芳不追不逼，就没有安心缴，这么一追逼，更决心不再缴了，并且还促使他立刻采取了措施：把留下的枪分散给亲信去埋藏起来，留下的人也“爬壕”（隐蔽）成了农民，他自己带了老婆和几个随从亲信，跑到湖北鹤峰他老婆的老表家里去了。傅仲芳下令到处搜捕他。

瞿伯阶到鹤峰以后，外面捕捉他的风声很紧，企图找一个有势力的人为其作护身符。适当地有个大财主名叫王庆山，瞿伯阶过去认得他，遂登门求助，把前后经过对他直言不讳，并说傅仲芳搜捕甚紧，问他是否可以招呼一下。王庆山慨然允诺，对瞿伯阶说：“老弟，怕什么！他有清官，我有清山，在我这里住倒，不要紧！”于是把瞿伯阶送到山上他的佃户家里隐藏起来。

瞿伯阶在鹤峰安然住了几个月，一榻横陈，消磨时日，待机再出。因带去的鸦片烟已经抽完，近处购买恐走漏风声，遂派人到宣恩沙道沟买鸦片烟。他老婆的老表的堂兄弟张麻子是一个走江湖闯码头专做鸦片烟生意的人，为了阴险刁滑，其时正在沙道沟卖鸦片烟。瞿伯阶派去买鸦片烟的人被张麻子闯见了，认得是瞿伯阶身边的亲信，也知道各处搜捕瞿伯阶不着，国民党正在悬赏捉拿归案，一笔送上门的喜事，岂肯轻易放过？于是表示很关注地探问瞿伯阶的情况，瞿伯阶派去的这个人据实一一告诉了他。张麻子立刻跑到鹤峰保安团一报，保安团连夜派了一个连把瞿伯阶包围了。瞿伯阶住的是半山腰里一间独立的茅草房。深更半夜突然有人打门，侧耳细听，外面有轻言细语的人声夹杂着来往的脚步声，偶尔还听到铁器的碰击声。凭其多年为匪的经验，知道已被包围，外面打门一阵紧似一阵，他顾不得自己老婆，一面答

应开门，一面和他两个亲信，拖出枪来，卡上子弹，把门一打开，三个人三条枪三梭子子弹一扫，打倒了几个叫门的人，趁对方措手不及，像猛虎一样窜了出去，突围逃跑了。保安连在那里闹腾了一夜，没有找到一点影子，把瞿伯阶的老婆捉去了。查明瞿伯阶系王庆山窝藏于此，将王庆山逮捕，一直关死在牢内。瞿伯阶的老婆怀有身孕，押解者以为一个怀孕的女人出不了事，她竟趁机溜掉了。押解者交不了差，七打听八打听，追寻到瞿伯阶嫁在来凤的妹妹家里，把他寄居那里的儿子捉去了。

瞿伯阶突围后到了来凤的卯洞，心想两次缴枪听编，两次都几乎送掉性命，知国民党之不可信，抱着“成则为王，败仍为寇”的决心再干下去，又进行招兵买马、积草囤粮的活动。

他一面派人从来凤卯洞回到龙山二所乡，把原来“爬壕”的人找出来，把埋藏的枪也起了出来，一面派人把王继安又找了出来。此时，师兴周的枪也为国民党收缴，本人关押于湖南邵阳。瞿伯阶利用这个机会，把师兴周遗留在地方的人枪收编了。保靖有个贾凤昌，浑名叫贾瘌子，苗族，拥有苗家喽罗300多人，自己找到瞿伯阶这里来，请求入伙。几部分合起来，共有700多人，400多条枪，哨聚于龙山八面山，杀鸡喝血酒，砍香拜把，重新成立司令部。瞿伯阶自任司令，仍以王继安为副司令，贾瘌子任总指挥。

在此期间，国民党部队上报说湘西土匪已经肃清，正规部队全部调走了，只剩下保安团配合县大队搜剿散匪。瞿伯阶率领所属到处窜拢，和保安团七打八打，子弹消耗殆尽。聚众计议，化整为零，以分散保安团兵力，节约子弹；并决定王继安同贾瘌子去保靖。贾瘌子回到保靖，部队一化，全部垮完，原来的300多人，均作鸟兽散，只剩下王继安带去的一部分人。瞿伯阶自己这一部分，化成几个人或十几人一股，零星活动。这样一搞，龙山一带表面上找不到匪踪了。

1943年春，收鸦片烟的季节到来。鸦片烟向为土匪生存的命脉，饷项和购买武器弹药都依赖它，所以每到此时，我们即四处活动抢劫鸦片烟。为此，瞿伯阶跑出来集中队伍。王继安在保靖有病，队伍由其子王家仁带回来了。瞿伯阶为扩充实力范围，沅陵、永顺之间有一股土匪，由彭叫驴子（彭春荣）掌握，遂派人前往联系。彭叫驴子派他哥哥彭杰青把队伍带到龙山来，愿听瞿司令支使，瞿伯阶又增加了400多人的实力。又是喝雄鸡血酒，对天明誓，热闹了一番。瞿伯阶把各部分集拢来的队伍，编成5个大队：第一大队彭杰青，第二大队贾松清，第三大队王家仁，第五大队向敬海，并把我升为第四大队长。5个大队分别活动于龙山和四川边界，到处抢掠鸦片烟。

国民党保安团的给养，一向也是仰给于地方，虽然不像土匪一样，明目张胆地放抢，但是抽捐派款，压榨老百姓，实质上与抢劫没有区别。抽鸦片烟捐税，为他们一大宗经济来源。我们抢掠鸦片烟，阻其收入，必为所不容，而又必出全力以护卫。因此，到处围剿我们甚紧。我们为避其锋芒，向桑植、永顺流窜。行至桑植卯子垭，适逢赶集，队伍一进集市，就如饿猫扑鼠，全部散在集上，吃的吃，喝的喝，什么也不管了。不料保安副司令赵某率领一个保安团将卯子垭包围，占领山头，居高临下，猛烈射击，以炽盛的火力封锁出路。我们被困在集上，冲不出去。瞿伯阶命令冲锋，抢攻山头，因保安团火力过猛，上去一批，打死一批。第一大队长彭杰青发火了，说："老子非拿下来不可！"亲率几十个人冲上去，也被打死在山腰上。瞿伯阶见硬冲不行，牺牲太大，改用火攻，便命令四面纵火。草枯风顺，遍山火海，这样才把保安团全部解决，赵副司令被烧死，抢了3挺重机关枪，搞了不少的子弹，装备补充了部队。在卯子垭休息一天，继续向永顺前进。到达永顺，与彭叫驴子会合。闻石田溪驻有两个保安连，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攻打石田溪，一举将那里两个保安连解决，并把那里

洗劫一空。从此任彭叫驴子为总指挥，此后即在永顺、沅陵一带窜扰。

永顺、沅陵一带系彭叫驴子的巢穴。瞿伯阶手下的贾松清和王家仁两个大队，在那里胡作非为，把老百姓的鸡鸭都抢着吃完了。所谓强盗要留三十里寨子，彭叫驴子很不以为然，向瞿伯阶提出说："这样搞不行，要整顿。"瞿伯阶立刻召集大队长开会，责备贾松清和王家仁的行为。贾、王二人表面接受，心里不服，第二天一早就跑到瞿伯阶那里，说要拖回龙山去。瞿伯阶与彭叫驴子商量，同意让他们回去，为避免发生误会，由彭叫驴子派人将他们送过古丈。走到古丈，与保安团遭遇，王家仁的腿被打断，当地地主武装张大智将其收留在那里养伤，贾松清和王家仁所部逃窜到龙山去了。这对瞿伯阶的实力发生一定影响。

贾松清和王家仁两个大队拖走之后，瞿伯阶和彭叫驴子率领其余队伍仍然窜扰于永顺、沅陵边界地区。当时三个保安团跟踪追剿，纠缠约两个月左右，子弹消耗很多，补充不易。瞿伯阶对彭叫驴子说："我们二人不能集中。我们集中，保安团也集中了，不如我拖回龙山，可以牵制一部分人，两人都不会吃亏。"商量既定，瞿伯阶率瞿波平及向敬海的四、五大队回到龙山。为了收鸦片烟买子弹，将队伍分散，三十、五十的一起到处活动。半年多过去，买了不少子弹。于是又把部队集中起来，连贾松清和王家仁两个大队也集中到一起了。

在此期间，瞿伯阶始终没有忘记招兵买马，扩大势力范围。队伍集中后，拖到四川酉阳。当地股匪张少卿为傅仲芳剿除后，留下来的部属杨树成，尚有10几条人枪，在地方上为害。瞿伯阶闻知，准备将其收来，叫他当副司令；又恐部属不服，先召集各大、中队长开会，说："我准备把杨树成找来，叫他当副司令，莫看他只有一二十条人枪，张少卿垮了以后，散在地方上的人枪不少，我们就缺少四川这一带地盘和这一带的人，有了他以后，不仅可以

增加实力，而且在酉阳、秀山一带的活动范围就大得多了。”大家听了都没得意见，才把杨树成请来入伙当副司令，砍香喝血酒。杨树成当然很高兴。他在酉阳、秀山、黔江等一带地区活动了两个多月，收了300多人，100多条枪。这时，四川保安团和湖北保安团一直围着我们打，瞿伯阶又与杨树成商量，叫他以副司令名义留在酉阳，继续收集人枪，自己率队回龙山，以牵制保安团兵力。

瞿伯阶回到龙山，声势更加浩大，各方面联系的书信往来不绝，前来投奔的人日益增多。以瞿伯阶为主，形成了犄角之势（瞿伯阶在龙山、来凤、鹤峰、宣恩等几处活动，杨树成在黔江、酉阳、秀山一线活动，彭叫驴子在永顺、沅陵、大庸、桑植中间地区活动）。虽然保安团一直与我们为敌，但是我们凭借地利，进退主动，他们总是吃亏，一口怨气发泄在老百姓身上。因此老百姓遭害越来越厉害，铤而走险入伙为匪的也就越来越多。截至1943年，各股都有很大发展。彭叫驴子有千把人，从永顺开到龙山。瞿伯阶在龙山也有千把人。两股集中2000多人，开往四川与杨树成会合。杨树成已发展到2000多人了。三股会合，共有4000多人，羽毛已经丰满。但被保安团纠缠不放手，尚不能自由飞翔，决心与之较量一番，以示警告。

瞿伯阶等在四川会合后，首先一回马枪杀到来凤的卯洞，不费吹灰之力就吃掉驻守那里的一个保安营，缴了他们的枪，当官的都放走不要，士兵跟着一起干的都留下来。卯洞得手，接着驰军龙山，把驻在达那乡的一个保安团包围一打，他们不战而败。我们缴了2挺重机关枪，100多条步枪。回过头来，又把驻四川溪口的一个保安营解决了，营长被打死，只跑掉一个连。稍加整顿，又转到永顺塔禾乡，把驻在那里的两个保安营包围，缴了一部分枪，把他们赶到永顺城里去了。这样一来，四川、湖北、湖南三省的保安部队都给了他们一点颜色，同时搞了不少枪枝子弹补充了队伍的实力。瞿伯阶深知保安团吃了亏，国民党一定又要派正规部

队来围剿，就和杨树成、彭叫驴子计议，决定各回原根据地，避免集中挨打，三股遂分散了。

果然不出个把月，国民党派来3个师围剿。此后，瞿伯阶率领所部进入抗拒围剿阶段。

抗拒围剿经过

湘西土匪为患，不利于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对湘西土匪一直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剿不掉就抚，抚不成又剿，交相进行。瞿伯阶为匪的20余年过程中，在实力没有长成以前，顾家齐、傅仲芳两次到湘西围剿，他曾两次投诚，而两次受骗。受骗一次，倡乱一次，终于羽毛逐渐丰满。从此更遭国民党忌讳，几次兴师动众，围剿瞿伯阶。瞿伯阶率部抗拒围剿，实力虽然有起有落，但是养成了气候，总的是发展的趋势，成了一股巨匪。

如前所述，瞿伯阶、杨树成、彭叫驴子三股土匪会合，与湖北、湖南、四川三省保安部队较量了一次，保安部队吃了亏，他们判断国民党一定要派正规部队来围剿，三股势力又行分散，各回各地。未出所料，国民党派来3个师，代号为万安、万全、万盛，酉阳、龙山、永顺各一个师，分别找着我们打。三个地方同时发生了战斗。打了一阵，瞿伯阶一看敌人来势很凶，不能硬打，派人分别送信给酉阳杨树成和永顺彭叫驴子，叫他们不要硬打，暂时将队伍分散，百把二百人或几十人一起，利用地利，以牵制国民党部队，看看动静，摸摸他们的底；并指示他们：如国民党军队少数人白天出来，我们就埋伏起来打，看情况打他们的前队或截击他们的后尾；如他们白天不出来，我们夜晚就去袭击搅乱他们。三处根据这个办法，搞了国民党军队不少的枪。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酉阳方面长短枪搞了200多条，轻机枪5挺；永顺方面长短枪搞了300多条，轻机枪7挺；龙山方面长短枪搞了437

条，轻机枪7挺半（有一挺没有枪管）。三处搞的子弹不计其数。既打击了敌人，又补充了自己，实力搞得非常雄厚。

国民党军队当然不是傻子，吃了几次亏，他们也搞精了，采取集中兵力攻打一处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的分散扰乱；并以擒贼先擒王的战术，把酉阳和永顺的兵力都调到龙山来，3个师集中打瞿伯阶。首先对当地老百姓施加很大的压力，实行并寨，把老百姓集中到一块，修起碉楼工事，派兵驻守，以免老百姓通匪、资匪，企图扼死我们生存的条件；然后派兵搜捕围剿。瞿伯阶看到这种情况，仍然不和他们硬碰，将队伍进一步分散，白天隐匿在山上，晚上出来扰乱一下，搞些吃的喝的。两个多月过去了，生活比较艰苦，风餐露宿，有些人吃不住，发现有向国民党军队缴枪投诚的；若不及时改变对策，队伍有被瓦解的危险。瞿伯阶有见及此，遂把队伍集中起来拖往酉阳，与杨树成股会合。国民党军队侦知我们动向，他们也集中起来往酉阳赶。打了几次硬仗，我们又和杨树成一起拖向永顺，前往会合彭叫驴子。国民党军队又赶到永顺打，不肯放手。我们前后和国民党军队硬拼了几次，子弹没有补充来源，经不起打，快要打空了。瞿伯阶、杨树成、彭叫驴子三人研究，决定仍各回各地，想法补充弹药，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对策。我记得彭叫驴子当时对瞿伯阶开玩笑说："你们把国民党军队引到我这里，现在都要开溜？"瞿伯阶说："春荣，你不要担心，虽然引到你这里来，我们一走，他们又要追我们，你不是可以松一下劲吗？说真的，他们一走，你就集中起来牵制他们。"终于三人又分散，各回各地去了。

经过一段时间，瞿伯阶也找到一条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经验：队伍不能过小地分散，只有采取拖的办法，你来我走，你走我来，以疲劳他们的兵力。就这样和国民党军队拖了半年，他们难以捉摸，弄得束手无策，烧房子、并寨、追逼当地居民，在地方上骚扰了一顿，不但没有把我们剿除，反而促使我们队伍发展壮大起来了。

以后不久，万安、万全、万盛3个师都调走了，只剩下一些保安团队扼守县城和重要的镇市，他们轻易不敢和我们作对。

原来万安、万全、万盛3个师开入湘西剿匪，匪没有剿掉，却把当地老百姓整苦了。对老百姓任意课以通匪、窝匪、从匪等罪名，吊打、枪杀，滥施刑法，烧房子，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弄得参加为匪的人，无家可归，抱着毁家杀父之仇，意志更加坚定；一些无辜老百姓，认为横直国民党军队来了活不成，索性入伙为匪，尚可求得一线生机。所以我们人数越聚越多。万安等3个师一走，瞿伯阶就露面了，老百姓都愿意跟瞿伯阶一起搞，三股一下发展到19000多人。我们分别向各地乡、保借钱、借米、收鸦片烟，到处收买枪弹。国民党军队卖给地方的枪弹不少，地方又高价转卖给我们，三处一下就收购了几千条枪，共有12000多条枪了。这是瞿伯阶的全盛时期，也是国民党派3个师剿匪的"硕果"。

瞿伯阶有一万多人枪，子弹特别需要，指示各处尽量设法收购。不久，接彭叫驴子报告说："国民党在辰谿有一个军械仓库，里面储存子弹很多，建议派人前往劫夺。"他看完报告，欢欣若狂，连说"天助我也！天助我也！"立刻派人传讯各处组织力量。他和杨树成各派1000人，彭叫驴子派2000人，总共派出4000人；以500人为一支队，编成8个支队。以一个支队担任警戒，一个支队担任攻击，其余支队担任抢运。任务分配既定，全部轻装利用黑夜出发，到达目的地时，正值鸡叫头遍，警戒布置完毕，由黎世勇指挥攻击队，把守仓库的卫兵摸掉，一枪未放就把仓库打开了。几千人一拥而入，枪枝背得很少，子弹箱堆积如山，各人尽力量背，愿背多少就背多少，一下就搬了六七千箱出来。已经天亮了，大家兴高采烈地踏上归程。不想国民党当局获讯，于我们的归程上作了堵击的布置。沅陵、永顺交界处，道路两侧为连绵不断的大山，只有中间一条通道，为我们必经之路。国民党派了2个正

规团和2个保安团，埋伏在两边山上，等我们全部进入这个山沟，两边山上机关枪、手榴弹猛烈向我们射击。我们事先没有防备，突然遭到伏击，几千人一下就乱了缰，跑的跑，躲的躲，还击的还击，指挥掌握不灵，好在我们凭以往山地活动的经验，还是突围冲出来了。但是，人被打死不少，什么都摔得清光，枪的子弹一颗也没剩下。队伍总算没有打垮，可是做了一次蚀本生意，只好暂时各回各地。

不久，国民党又派八十六军朱鼎卿的部队来围剿。他们先到永顺，只以小部队和彭叫驴子接触，进行试探。这样搞了一段时间，才派一个团到龙山来。团长侯振汉，率部驻龙山县城，两个月不见动静。瞿伯阶感到很奇怪，这种不同于以前国民党各剿匪部队的情况，引起了他的警觉，认为他们这一手很厉害，两个月按兵不动，不是想麻痹我们，攻我于不备；就是想静观我们的行动，相机出击。总之，不管怎样，他们来就是要打我们。于是瞿伯阶也想出了一个对付的策略。他知道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一向视钱如命，见利忘义，当他听说侯振汉这个团在龙山城军纪不好，决定拿鸦片烟去活动他们的士兵反水，一个班也好，一个排也好，把他们买过来，先惩他一个下马威。这个任务交给特务大队夏亦清去执行。

夏亦清有一个舅子住在龙山县城边。侯振汉团有一个排住在龙山南门外夏亦清舅子的一个亲戚家里。夏亦清叫他舅子利用走亲戚去活动这个排。他的舅子带了很多鸦片烟去做人情，天天和那些班长、士兵厮混，喝酒、打牌、打得火热。这个排的两个班长很快入了圈套，带两个班的人反水过来，还带来2挺轻机关枪，20几条步枪。这样一来，使侯振汉诚惶诚恐，立刻把住在城外的部队都龟缩到城里去了。瞿伯阶见两个班的人枪到来，心里非常高兴，杀猪办酒款待他们，并且补充他们一些人枪，将两个班长委任为排长，编入夏亦清的特务大队。这是8月的事。此后两个

月内，双方相安无事。

直到1943年10月，八十六军整个集中到龙山来了，几个乡都住得满满的。瞿伯阶知道来者不善，一面把队伍集中到龙山八面山，一面送信给杨树成，叫他到八面山集合；并决定暂时不和八十六军接触，准备等杨树成到达后，往永顺转移，以避其锋芒。如果他们尾追，也不和他们打，凭借我们山地活动的经验，引导他们到处转，等把他们拖疲以后，再回击其疲惫之师，以便稳操胜算。

八十六军侦知我们的行动，待杨树成一到，就把八面山团团包围起来。八面山山高势陡，地形险要，瞿伯阶和杨树成商量，决定据守。八十六军发动进攻，战斗一直在周围的一些小山头上展开，谁也攻不动谁。我们守了4天，到第5天下午，天气突然变化，落大雪，下大雾，对面不见人。原来里耶一个大财主和我们作对，时刻想整我们，当八十六军想利用天时进攻我们的时候，就由他带路从里耶附近王家仁据守的卡子攻上山来。打了几个钟头，他们的进展不大。到晚上，瞿伯阶召集大队长以上人员开会，认为这样困守，过于被动，终将陷于不利，决定向四川方面突围。第6天一清早开始行动，走到四川可打湖，不想八十六军有一个团在那里占领阵地，堵击我们。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打了3个多钟头，敌人的地势优越，又挖有工事，我们急切攻不动他们。瞿伯阶命令每个支队抽调精锐300人，共集中千把人，由他亲自率领打先锋，命杨树成统率其余队伍随后策应。但是，三番五次地猛攻，都没有奏效。打到下午，瞿伯阶着急了，惟恐敌人增加援兵，则更不易突出去了，一再命令，非攻上去不可。从先锋队中又抽出精强力壮的300人来，分成10队，每30人为一队轮番向敌人攻击，做到前仆后继。这样，敌人顶不住了，我们抢占了他们的阵地，把他们赶跑。后面的部队跟着上来，巩固了我们的战斗成果。此时，我们的死伤很大，300人中死伤将近1/3. 为了扩大战

果，又重新组织了400人一直向纵深突击。终于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我们全部突围冲出，到达湖北之河东三堡。休息了一天，打算开到永顺去。

我们的意图又为八十六军得知，他们集中于龙山二所乡一带堵截我们。我们永顺没有去成，倒死伤了一二百人。瞿伯阶见死伤太大，同时几次战斗打下来，子弹消耗很多，与杨树成研究决定，中止去永顺，暂时分散，杨树成仍回四川。

队伍分散之后，几个月过去，当时天下很大的雪，八十六军一直未停止对我们的搜捕围剿，我们的活动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士气下降；加以队伍发展过快，里面不少乌合之众，因此龙山、永顺、酉阳各地，在20天的时间内，就有好几百人向八十六军缴枪投诚了。八十六军没有放松这个机会，一面大搞并寨，断我退路；一面大搞招降活动，瓦解队伍。此时我们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打的打散了，投的投诚了，队伍垮掉一大半，连大队长王家仁也缴枪投诚了。过去一些乡保甲长被逼入伙的，为了立功赎过，给八十六军当向导来搜剿我们。瞿伯阶只剩瞿波平和向敬海的四、五大队跟在身边，不仅其余各大队失掉联络，而且永顺、酉阳也取不到联络。瞿伯阶为壮声势，将四、五大队编为一、三支队，带着这两个支队往湖北鹤峰拖。八十六军派两个团追击，追到桑植八大公山，打了一仗。敌众我寡，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折往龙山。八十六军正在龙山并寨，保安团、县大队依仗他们势力，也敢欺负我们了。他们为防止我们窜扰，除了交通要道深构沟垒派兵镇守外，各处河流不能徒涉的，控制船只，能够徒涉的，把荆刺成捆扎起来放在河里，阻止我们过河。瞿伯阶不得不再将队伍作过小的分散，凡咸丰、鹤峰等处的人叫他们各自回去，其余本地有家可归的，或者想法回家，或者想法隐藏起来。分散后，仍然有很多投诚的。瞿伯阶这一股整个搞得只剩下不到百把条枪了。他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救出自己才有办法。决

定把枪埋一些，寄一些，藏一些，他带了三个人避难于里耶镇瞿闵盛家里。

在此期间，我和向敬海的一、三支队，以及夏亦清的特务大队，虽然只留下一个架子，但始终没有解散。我剩下40几条枪，向敬海和夏亦清各剩20几条枪，到处流窜。然而我们三人各已失掉联络，没有碰到一块。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二所乡附近一个山上的茅棚内，我和向敬海不期而会合了。患难之中找到了自己人，倍增亲切，再也没有分开，就在龙山各乡活动。这个时期，我们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历程。我们隐藏在深山密林内，不论白天或者晚上都不敢出来，只是利用下雪的天气偶尔出来搞点吃的。我们跋山涉水一向来去自由，而今竟感到行路为难，过河吧，水上无船，水底有刺；在雪地上行走，留下足迹，马上就有追兵跟踪而至。河可以不过，路不能不走，我们把草鞋倒穿在脚上，一个脚迹套着一个脚迹走以迷惑敌人。可是敌人上了几次当，我们的法宝也就失去灵验。特别是赤脚草鞋在雪水里走，当时冻麻木了不觉冷，一停下来却刺骨地痛，就烧火取暖，大家把脚往火边一伸，人往地下一躺就睡着了，因此很多人的脚肿了，很多人的脚溃烂连脚趾头都烂掉了。后来好容易找到一个比较大的山洞，大家一进去就都不想出来，吃没有吃的，喝没有喝的，抽没有抽的（鸦片烟）。先还用雪水、盐巴、辣子泡点辣子水喝，以后这些东西也没得了。饭没有吃还熬得两天，抽鸦片烟的人没有烟抽一时都难过。大家叫苦连天。快过年了要饭吃，要鸦片烟抽，没有办法。我和向敬海带了20几个人冒险出洞，利用黑夜到了八十六军并的寨子附近。那里有一个连驻守，我们顾不得一切，摸进寨去，找到几家熟识的老百姓，他们一见就非常惊讶地对我们说："天老爷，你们怎么还敢来！来不得！军队就驻在这里。"我们说："过年了，没得吃的，你们想法给我们搞点米、肉、糍巴、鸦片烟，我们就走，决不连累你们。"老百姓没法只得每样给我们搞了一点.

我们就背起回洞过年去了。

在饥饿之中搞到一点吃的，当然解决很大问题。经过十几天，大家精神逐渐恢复过来。但是坐吃山空，没有接济，不得不拖出来，准备往桑植八大公山去。行至龙山罗塔乡，驻守该地一个警察中队跟踪追了上来，搞到我们宿营地才发觉，逼起一打，打死他们20多人，缴了10几条步枪，把他们打跑了。老百姓并寨以后，都散住在一些土洞内，我们把警察中队打走，没有人看守，我们拿出几条枪和他们换了一些糍巴、肉就走了。到达桑植，当地有一个无业游民张清，送了他10根枪，要他找点人，给他放了一个中队长。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共搞了80多条枪，发展到将近百把多人了。

1945年3月，八十六军大部调走，只留下侯振汉这一个团。瞿伯阶从里耶瞿闵盛那里回到二所乡，听说特务大队长夏亦清在湖北河东三堡一个山洞内病死了，队伍由彭雨清带着。他找到那里，见他们只有30多个人，问起一、三支队，他们都不知道下落。这时，我们在桑植八大公山，因为久不知瞿伯阶消息，八十六军即已调走，决定下山找他。回到二所乡，闻知他在河东三堡，我们立刻找到那里，见到他，说不尽的悲欢离合。我们三部分合在一起，又有一百四五十人了。瞿伯阶一心想收集以前的残部，企图东山再起，带着我们到处游动，侯振汉一个团奈何我们不得。瞿伯阶到处一收，除王家仁投诚后被关押于花园，其他投诚的被暗杀不少外，收了300多人，从地下起出一百几十条枪。他又把旗号打起，正式干起来了。此时和永顺、酉阳尚未取得联系，一直和侯振汉团纠缠。

瞿伯阶的儿子原来寄在来凤他妹妹家里，侯振汉把他妹妹捉去杀了以后，把他的儿子带走了。当时侯振汉驻扎湖北的白福寺。6月，瞿伯阶忽然接到侯振汉的信，说："我和你打了这么久的交道，算你是搞不起来了，居然现在你又出了头，我很佩服你。我

要调往恩施，你的儿子在我身边，希望你接回去。但是有个条件，只要你把龙山策动去的2挺轻机枪和20几条步枪归还给我，你的儿子就退给你。”瞿伯阶看完这封信，几经考虑，认定儿子既然带在他处那么久，就是枪不退给他，也不至于加害于小孩，遂回了一信，说：“我的儿子如果你不便带走，就放他回来。你所提的条件不能照办，枪现不在身边，暂时不能还给你。我是儿子的生身之父，你是他的养身之父，我有骨肉之情，你有养育之恩，将来儿子长大，定会感恩图报，送回或带走全凭于你。有机会我们还会见面的。”侯振汉接信一看不行，又写了一封信来，很客气地说：“你的儿子那还是由我带去吧！我负责抚养，只是你现在年纪已经老了，将来父子恐怕不易见面，嫂子或者还可以见到。”侯振汉想最后动以父子之情，可是瞿伯阶未为所动。他的儿子没有送回来，终被侯振汉把他带走了。

八十六军调走，他们卖给地方上的枪枝、子弹很多。瞿伯阶旗号树起，第一件事就是向乡保要捐款，要鸦片烟，大肆收买枪枝、弹药；第二件事就是和永顺、酉阳取联系。经过一段时间，枪枝、子弹收购很多，装备了队伍，然后开到酉阳找到杨树成，并与永顺彭叫驴子取得了联系。那时杨树成只剩60多条枪，百把多人，彭叫驴子却还有100多枪，300多人。这次三股并未集中会合，各人均在各地发展实力。瞿伯阶仍从四川回到龙山一带活动。

1946年2月，四川部队潘文华的3个师开入湘西，龙山明溪乡来了1个团，他们开始开过来时，瞿伯阶就去信调杨树成到湖北河东三堡集中，以便及时抗拒川军围剿。杨树成到来，瞿伯阶召集大队长以上人员开会，共商对付川军办法。他提出他的看法说：“我们不能和四川部队打，暂时避开他们向永顺转移。他们要追来，就和他们采取拖的办法。因为四川部队可能不会久住，他们此川是蒋介石逼调出来的，剿我们是个幌子。同时四川部队比国民党的其他部队要凶些，他们是和我们一样拖起来的。我们要

保存实力，如果和他们打，只有我们吃亏的，划不来。”他这么一讲，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第二天正准备出发，四川部队派来两个营，前哨已经接触响起枪来。瞿伯阶根据他的主张下命令守。还没有正式打起来，四川部队一个团都开过来了，把我们四面八方包围住，瞿伯阶仍令紧守，准备打到天黑再突围出去。这时四川部队向我一支队阵地猛攻，二、三次发起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他们人死得不少。打到下午 4 点钟左右，我见老等着挨打不行，等把他们第五次进攻打退以后，我就下令出击，一下就打出了一条通路，一直追赶过去，缴了 4 挺轻机枪，30 多条步枪。取得了战果，我才给瞿伯阶报告。杨树成指挥的二、三支队那边也攻动了。四川部队撤围溃退，我们乘胜追击，把他们赶到二所、明溪、白福等乡去了。总计缴获 13 挺轻机枪，70 多条步枪，不少子弹。

四川部队不经打，初非瞿伯阶所料，经过实际接触，发觉他们名强中干，瞿伯阶的计划也就改变了，决定在原地不动。他又召集大队长以上人员开会说：“四川部队不是我想的那么凶，用不着躲避他们，现在把死伤收拾一下，决定不去永顺，四川部队不来，我们就搞我们的；要是来打我们，就和他们对干。”这样决定后，还写了一封信给永顺彭叫驴子，告诉他四川部队可以打，不必害怕。于是我们就在龙山、四川边境地区来回活动。

有一天，我们到达四川边境，队伍停下来休息，四川部队来了一个营偷袭我们。我们有了上次和他们作战的经验，不慌不忙地和他们摆开一打，事实又一次证明他们不堪一击，打死他们 10 几个人，缴了 4 条步枪，他们逃往溪口去了。当我们离开二所、明溪乡时，有人留在那里侦察情况。我们在四川边境和四川部队打了一下以后，据侦察人员来报，二所乡滑石板驻有川军一个营，没有修工事，守备不严。瞿伯阶此时不仅不怕他们，而且起心相机袭击他们，得到这个情况，立刻率领我们于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就回到二所乡，利用拂晓，一举就把这个营摸垮了，缴了 9 挺轻

机枪，170几条步枪，捉了200多人。营长也被我们捉到。战斗结束后，从营长以下当官的都予以释放，士兵愿意跟我们干的都留下，不愿干的，一个人发给一点鸦片烟做盘费，派人送出境外。瞿伯阶在释放那个营长时，把他喊到鸦片烟铺前，一面抽烟，一面教训他说："你回去给潘老总（潘文华）说，叫他不要打我们！何必这样呢？他把瞿伯阶打垮了，他也是要垮的，瞿伯阶打不垮，他还是要垮的。蒋介石能容许你们这些杂牌部队存在吗？跟他效命有什么好处呢？"

四川部队吃了几次亏，一方面也学了并寨，在寨子边上修起碉楼，集中整营整连的部队看守，妄想切断我们的接济；另一方面集中大部队来追剿我们。瞿伯阶和杨树成商量，四川部队实行并寨，我们就不搞他们，开往永顺去，以避免他们大部队的压力。在前往永顺途中，经过桑植卯子垭，四川部队一个姓潘的团长带一个营二个连驻在该处。事前我们不知道，前面便衣队发现他们的哨兵，往后报告说卯子垭驻有川军，尚未发觉我们。瞿伯阶叫便衣队先上去把哨兵干掉，大部队随后就到。便衣队一上去就被他们发觉，问是什么人。便衣队见势很急，开枪把哨兵打死了。枪声惊动了他们部队，立刻扑了过来，我们也扑上去打。瞿伯阶见地势险要，恐怕急切难以得手，下令不要强攻，先抢占山头。可是发现敌人人数不多，一个猛攻就把敌人打垮了，缴了6挺轻机枪，50多条步枪，捉了几十个人，差一点连潘团长也捉住了。捉来的士兵都愿意跟我们干，因为四川兵都吃鸦片烟，跟我们干，不仅有鸦片烟吃，而且也比较自由些。

我们到永顺找到彭叫驴子，已经7月了，这段时间，仍然不断与四川部队接触。有时他们打我们，有时我们也敢主动去打他们。听说永顺白果坪驻有他们一个营，一个夜晚我们就把这个营摸掉了。步枪缴了300多条，营长也当了俘虏。捉来的人还是仿照以前的办法，放的放了，留的留下了。四川部队集中追击，我

们又从永顺往龙山拖。一天中午到达永顺瘟圹，休息下来，吃过饭，继续前进。途经一条隘路，两边山上各有一个寨堡，居高临下，控制这条隘路。守寨堡的人系县保安大队，过去吃过彭叫驴子的亏，构成了仇隙，见我们要从中通过，他们就用火力实行封锁。彭叫驴子仗着自己过去曾压服过他们，就上去喊："喂！你们不要打了，我们是瞿司令的队伍，我是瞿司令手下的彭指挥官。……"还没等他喊完，寨堡上一排枪打来，他就中弹一命呜呼了。有人连忙向瞿伯阶报告说指挥官被打死了，瞿伯阶听说，内心无限悲伤，只是没有表露出来，派人把尸体背下来办理后事，随即把彭叫驴子的大队长找来问道："我们不走这条路行不行？"他说："可以，只是要多绕一点路。"接着他问瞿伯阶："指挥官打死了怎么办？不能就这样算了，要把寨堡打掉它，为指挥官报仇。"瞿伯阶说："老弟！不行，不能打。他们只有几十条枪，打掉它有什么好处。几十条枪我们起码要几十个人去换。指挥官被他们打死了，仇是要报的，君子报仇三年，小人报仇眼前，以后再说吧！"于是绕道回到了龙山。把彭叫驴子的部队编成一个大队，叫他的侄子当了大队长。同时将部队分散成 30 或 50 人一股，到处活动。四川部队少数人出来，我们就搞他们；多数人出来，我们就避而不惹。此时以发展实力为主。

瞿伯阶抗拒围剿到此为止。总的看来，国民党三次派兵围剿他，动用了八九个师的兵力，不但没有把他剿灭，相反地，越剿越有发展，越剿基础越稳固。根据我的体会，国民党所谓剿抚兼施，剿是名，害民是实；抚是名，欺骗是实。到头来剿的不是瞿伯阶，遭害的却是老百姓。我记得国民党军队实行并寨时，集合老百姓发问"国军和瞿伯阶究竟哪个好？"老百姓实在气愤不过，众口一词地答道："国军也好，瞿伯阶也好，就是我们老百姓不好！"情况确实如此，国民党军队来剿，首先就不放心老百姓，认定他们窝匪、通匪、资匪，于是并寨、烧房子、杀人。国民党军队一

走，瞿伯阶回来，也不放松老百姓，凡是认为有通国民党军队的嫌疑，曾和他作过对的，也是烧房子、杀人。你来我往，搞得龙山、永顺、酉阳等处各乡几十里无人烟的地方很多。老百姓不当土匪怎么办？因此，越剿瞿伯阶的人数越多，越剿瞿伯阶的基础就越稳固。

接受收编

1947年1月，瞿伯阶在一面抗拒四川部队围剿、一面发展实力当中，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派人前来联络收编。担任联络的叫欧阳金，清红帮分子，系长江流域宜沙段一个流氓头目。他坐滑杆到了瞿伯阶的家里，找到瞿伯阶说："程颂公现任武汉行辕主任，有意想收编你，只要你接受，要什么名义给什么名义。"瞿伯阶玩枪杆子，以为英雄可以造时势，其宗旨就是希望创立一个正式前程，找上门来的事情，岂有不答应之理，一听就欣然允诺了。但是为了收集队伍，提出四川部队必须撤出我们的范围。欧阳金得到这个答复，立刻回到来凤。因为和他一道来的卢鹏高，职位比他大，不便直接与瞿伯阶接头，叫他先来试探，自己住在来凤等消息。卢鹏高听了欧阳金的报告，立刻打电报到汉口请示。汉口复电一到，又派欧阳金到龙山，对瞿伯阶说："行辕同意只要你听编，川军可以调离开一点。"果然不几天，川军有了行动，瞿伯阶就正式开始收集队伍。

瞿伯阶正在收集队伍的时候，湖南省主席王东原也派人来联系收编。来人为周克原和杨又然。他们二人先到里耶镇找到原任陈老统旅长的罗文杰及镇长瞿岗盛，请其介绍到瞿伯阶这里来，说："王主席想收编你们队伍，罗二爷（罗文杰）叫我们来的，只要你答应，给什么名义都可以。我们从罗二爷那里来的时候，他交代又交代，叫你不要失去机会，名义可以要大一点，在湘西的

号召力大些。”瞿伯阶不知听谁的好，把罗文杰和瞿闵盛二人请来商量。他们的意见：王东原系湖南主席，收编后，不致调出湖南，以听王东原的为上策。如听程潜的，难保不会调走。瞿伯阶则认为同是收编，程潜先派人来，已经答应在先，不好再与王东原约；主要是程潜的牌子比王东原老，来头也大些；同时王东原系安徽人，程潜究竟是湖南人，多少有些乡情，还是听程潜的为好。谈来谈去，最后确定先接受程潜收编，如王东原不放时，再由他向程潜去要。

队伍集中以后，有700多人，400多条枪，开到招头寨，住了个把月，程潜派人前来点编。瞿伯阶曾夸口说有上万人枪，现在要见实面，搞慌了手脚。于是派人到各乡各保，凡地方上的枪都借来应点，人也是一样，到处找老百姓，甚至在地里劳动的人也找来听点。结果点了千把人，700多条枪。瞿伯阶暗想，这么一点人枪，只能编个把营，能要个什么大名义呢？他急中生智，利用一些乡保长到处放烟幕，说瞿伯阶的好枪都没拿出来，尚留有后路，还有好多好多人在山里住着，这次点编是试探的等等。派来点编的人叫蔡泽南。瞿伯阶以所放烟幕故弄玄虚地有意透露给蔡泽南听。蔡泽南大概是没有什么正式职务的人，在龙山住了半个多月，瞿伯阶送了许多鸦片烟给他。他明知其中有鬼，也落得做个顺水人情，加倍上报为4000多人，1000多枪。得到程潜命令，队伍着调来凤。这是瞿伯阶的活动范围，毫不考虑地就开去了。住了半个月，又要调鹤峰，也没有什么犹豫地接受了。住了一个星期，又要调五峰。已出自己的势力范围，瞿伯阶开始考虑了，召集支队长以上人员商量，大家都说不动。瞿伯阶一想，刚接受收编，名义还没有给就不服调不好，试试看是真是假。队伍开到五峰。住了半个月，又要调长阳、资丘，越调越远，不能不使人担心程潜用的是调虎离山计。可是瞿伯阶却觉察到这样连续频繁的调动，是程潜考验自己听不听话，服不服调，不会有其他用意。心

想不服调，几百人终有被消灭的危险；服调以取得信任，程潜是要用我们的，自己也可图个正式前程，还是老实一点好。他即以此说服所属开到长阳、资丘等地。

队伍没有再继续调动，但又要重新点编，以便发给被服装具。瞿伯阶又遇到了难题。他连夜回去找人，这个也给一个大队长名义，那个也给一个大队长名义，总算收了600多人，300多枪。连原有的一起，共有1300多人，700多枪。这时，我带第一支队住在麻池一个高山上，副司令杨树成带第二支队住在长江边上的杨溪，三、四支队随瞿伯阶住在资丘。当时安排先点一支队，然后点二支队，再点三、四支队，分做三次来点。各支队互相约定，点到哪个支队，其余各支队的人枪全部开往应点。我们的名册上都是造的假名字，点名时，按假名字站队，准备他按名册点名。万一他不按名册点，我们也作了防备，把各人所顶的假名字写在每个人的手板心上，叫他们读熟。两种准备，事先都作了练习。果然他没有按名册点名，由于事先作了准备，这一关顺利通过了。但是，枪也要点，而点枪要看号码，不能做假。参谋长李国柱一看情形不对，在点我们第一支队时，暗地告诉我，叫我发脾气，以阻挠他们看枪号码。点枪时，我就故意发作了："你们尽搞什么名堂？把人都搞疲劳了，肚子也搞饿了"；转过脸来对士兵说："你们把枪都丢在这里，让他们去点，我们吃饭去！"果然很有效验，他们见我这样一说，连忙阻止对我说："既然累了，那就不看号码了，点一下数字算了。"仿照这个办法，各支队又过了点枪这一关。结果人枪都符合以前所报的数字。

点名以后，武汉行辕给了瞿伯阶一个直属第一纵队司令的名义，并按点编人数发了一套旧军服。瞿伯阶总算是被收编了，也取得了正式名义。他对这个纵队司令虽然心里犹感不足，但从此有了进身之余地，可以力图进一步发展。

10月，瞿伯阶接行辕命令调宜都，他又召集支队长、参谋长、

参谋主任等人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认为过去几次调动，都是一些山区，进攻退守比较方便，这次调宜都，下了平原，恐有不测，就难以招架。瞿伯阶说："根据我的估计，正在用人之际，程潜不会骗我们，我以为只要不调过长江，调到哪里都可以，决无妨碍。"于是按照调令开到宜都油漆河。这里离宜都县城30里。瞿伯阶到达这里，宜都县长蓝吉昌亲自带了一排人前来热情接待。

天气渐渐冷起来，行辕按我们上报人数发来新棉军服。根据我们的实有人数，要多出2000多套。瞿伯阶觉得太不像话，遂派人到来凤、桑植、保靖等地去招人，乱给名义，陆续招来1000多人。原程潜派来接头的欧阳金，任务完成后没有什么事，他在宜都一带很熟悉，也给了他一个支队长名义，叫他去招人。他到处一活动，上报说招了将近3000人，瞿伯阶很高兴，派人去点编，实际只有1800多人。这时瞿伯阶的实有人数已有4000多人。

原来朱鼎卿八十六军的团长侯振汉因故离职，从恩施到了汉口，准备回山东原籍去。他打听到瞿伯阶在宜都，写了一封信给瞿伯阶，叫他派人到汉口去接他的儿子，因为自己要回山东，不去接，就会把他儿子带到山东去，以后见面就麻烦了。瞿伯阶立刻派了一个姓黄的参谋，写了一封信交他带到汉口去给侯振汉。信上说："我接儿子是小事，听说你已离职准备回籍，如果你不嫌弃，接你到我这里来玩几天。"侯振汉真的被接来了。瞿伯阶办了一个干训班，连长、排长、班长等都轮流调去受训，就任他为该班班主任。这时瞿伯阶迁住宜都城边，干训班与一支队仍驻油漆河。

武汉行辕派了一个叫刘子义的住于瞿伯阶处，他向瞿伯阶建议："天快下雪了，这是个好机会，你给行辕下面那些人送点什么东西，联络一下。"因为宜都、长阳、渔阳关等地都出产木炭，所以决定雪中送炭。总计收买了10万斤，由刘子义派人运往汉口，确定以5万斤送行辕，另以5万斤发卖。当时瞿伯阶力图扩充实力，大肆收购枪弹，需款孔急，卖掉5万斤木炭，赚了不少钱，解

决了部分问题。同时，派人到龙山收买鸦片烟，运到宜昌一带卖，也获利不少，又解决了部分问题。另外，对全体官兵说明，除伙食零用，饷项暂时不能发下去，要扩充实力，以饷项及空缺的钱，也解决了部分问题。潘文华的四川部队的一个陈旅长和一个潘团长，被编垮了，住在宜昌，留下的枪枝、子弹很多，闻知瞿伯阶正在收购，陈旅长派潘团长与瞿伯阶接头交涉卖枪。瞿伯阶有上述三笔财源，一口气就向他们买了将近2000条枪，约20万发子弹。部队实力搞得很雄厚了。

武汉行辕又要派人前来点编部队。在宜都住得久了，和蓝县长、党部李书记长等人的关系拉得很好，就向他们借人借枪应点，并特委李书记长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有了人枪，瞿伯阶有恃无恐，要求集中一次点完，以示无虚。一下点了8000多人，4000多枪。点名以后，瞿伯阶正式提出要编一个师，程潜见他有这么多人枪，就给以暂编第十师师长名义，初步达到了他扩充实力的野心。瞿伯阶再三要求编3个团，却没有得到同意，只好暂编2个团。以一、二支队编为一个团，团长瞿波平，副团长贾松清；以三、四支队编为一个团，由彭雨清、向敬海分任正、副团长。另外给欧阳金以补充团长名义。参谋长李国柱有病，适瞿闵盛来了，就以瞿闵盛接替为参谋长。其他参谋主任、参谋等都是瞿闵盛找来的人。参谋人员一般比部队的待遇高，部队很有意见，认为我们拼死拼活打来的天下，他们坐享其成，都心怀不满。司令部与团队之间发生了矛盾，预伏下以后的纠纷。

部队编完，宜都左右一百七八十里地的防线都交给瞿伯阶师防守，并且要调一个团到当阳清溪河去。兵力分配不够，由干训班派一部分人去了。他们派人回来要求增派兵力，说共产党陈大脚在那里活动得很厉害，不增加人不行。瞿伯阶增派我带100多人去了。该处住有国民党一个情报队，其中有一个队员系潘文华的舅子，每天出入于一家财主家里。适我团有一连长住在这家人

家。他们两人遂成相识，常在一块吃喝。财主家有一女儿，这个情报队员企图强奸不遂，在他家吵闹不休。我的连长见不像话，前来向我报告，问我怎么办。我命将他捆到团部来。此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我将他杀了，还给瞿伯阶上了一个报告。瞿伯阶当时说杀就杀了吧，以后将我调回，却对我说："你管那些闲事做什么？惹这么大的祸！国民党的特务是得罪不得的，何况他还是潘文华的舅子！"我说："我的部队不住在那里，我管他干什么。就是我的部队住在那家人家，他胆敢旁若无人似地去强奸闹事，我就要杀他！"瞿伯阶无可奈何地说："祸惹得大也好！"人杀了，人家虽然提出反对，但是事过境迁，也就不了了之，并没闹出什么事来。

欧阳金在宜都一带很熟悉，原来招集的人就是一些乌合之众，瞿伯阶给他编为补充团，便不可一世，在长江抢劫来往船只。行辕据报，限令瞿伯阶彻查。一般人都怀疑是瞿伯阶干的勾当。瞿伯阶为洗清自己，派人认真追查。查明此案系欧阳金所作，认为有损自己名声，非常气愤，谎说有要事请其来司令部商量，将其扣留。随即派两个团包围他的部队缴了械，并把他拖出枪毙，照了一个相送到武汉行辕备案。

瞿伯阶成立师部以后，不断遇到一些大小事故，一一应付过去了。不想内部又发生纠纷。我第一团没发生什么问题，司令部与团队的矛盾此时从第二团向敬海处爆发了。他当副团长不高兴，认为是参谋长瞿闵盛搞的鬼。他公开说："部队能够存在，是两海（他叫敬海，我又名兴海，合称两海）的功劳，团长应该是两海的。"后来他竟将部队拖跑。瞿伯阶派原一支队副支队长瞿亏如追之于长阳附近，他对瞿亏如说："我对大哥没意见，只是大哥受了瞿闵盛的包围，如果要我回去，除非不要瞿闵盛当参谋长。哪天他不当了，我就哪天回去。"他还将这个意见写了一封信托瞿亏如带回给瞿伯阶，一直拖回龙山去了。事为行辕所悉，命瞿伯阶派人去剿。我第一团奉命开回龙山，带去瞿伯阶劝其返部之信，瞿伯阶

指示我先礼后兵。原来师兴周在潘文华进剿湘西时即已从邵阳监狱释放回龙山，曾为潘文华当向导打瞿伯阶，旧恨新仇，双方曾互相派人行刺未遂。以后瞿伯阶当了师长，师兴周分外眼红，他又在龙山办团发展实力。向敬海拖回龙山，师兴周自然要拉拢抓住他这支力量，而向敬海为争团长不得脱离瞿伯阶，巴上师兴周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双方不谋而合，结到一块了。师兴周给向敬海补充一些人枪，任其为团长。正在向敬海的兴头上，我率部到了龙山，先把瞿伯阶的信交给他，他还是从前说的那套话。我见他无意回头，只好摆开来打，把他的脚打断了，收缴了他部队的人枪。师兴周实力不大，爱莫能助。我团完成任务，暂时留住龙山待命。

1948年，程潜调任湖南省主席，调瞿伯阶师开驻慈利王家厂。到1949年2月，又由王家厂经慈利开大庸，命我第一团归还建制。我从龙山出发，相遇于慈利，遂一道开往大庸。参谋长瞿闵盛于到王家厂时即去长沙，此时来信说有病在省就医，推荐侯振汉接任参谋长。部队到达大庸后，瞿伯阶命侯振汉正式就任参谋长职。当时已到3、4月，收鸦片烟的季节到来，瞿伯阶有意开回龙山去收鸦片烟。往上报了一下，整个部队从大庸开回龙山。师兴周正在毛儿滩一带活动，瞿伯阶派我第一团往那里一驻，与师兴周争收鸦片烟。瞿伯阶一路来有病，到龙山后，在城里住了个把月，才迁到太平山养病。副师长杨树成这时已回四川去了。我正在毛儿滩收鸦片烟的时候，瞿伯阶来信命我到城里去，部队仍在原地收烟。我到城里，他对我说："副师长杨树成已回四川去了，我又要养病，我这次病恐怕很危险，部队要人掌握，你先来代理师长职务，我死了以后，你再好好搞，千万莫脱离程潜。"他临危即以此授命于我。

程潜任湖南省主席，手下一点部队也没有，他想抓一部分实力，因此决定补充瞿伯阶1000条步枪，100挺轻机枪。瞿伯阶派

军需、他的内侄田义汉到长沙去领枪，顺便给瞿闵盛去了一封信告知此事。瞿闵盛顿起不良之心，将田义汉暗杀了，枪全部归他领得。瞿伯阶见田义汉久去不归，只接得瞿闵盛报告说枪领到了手，已经起运。他很怀疑，派特务营营长邓柏林到常德附近去接。邓柏林在常德遇到瞿闵盛。瞿闵盛对他说："枪还没有完全领到手，只领到10挺轻机枪。"便把这些枪交给邓柏林，嘱其保管。邓柏林见瞿闵盛与第二团团副江大同，还有一个沅陵人陈子贤，经常在一块出出进进，风闻他要成立部队，枪全部领到了手，不准备交给瞿伯阶。于是便把10挺轻机枪带回龙山去了。他一走，瞿闵盛和十七绥靖区李默庵接好头，正式成立了一个旅。瞿伯阶见邓柏林没把枪带回去，知道瞿闵盛自己领了枪成立部队，叛变了他，一气之下，病更沉重起来，5月病逝于龙山。以后即由我接任暂十师师长。

带匪治军之道

纵观瞿伯阶由一个光棍变成一个土匪巨魁，由一个区公所的分队长成为一个师长，当然有其带匪治军之道。

（一）采取先破坏后占领的办法，以扩大地盘。

瞿伯阶辖湘、鄂、川边区16个县地区，不是一下就据有的，也不是派兵强攻占领的，而是逐渐蚕食扩大的。他所用的办法就是先破坏后建设。凡他想扩大而没有统一到的地区，或是对他持反对态度的地方，有时他派人去搞暗害活动，有时又派人明火执杖去抢劫，不是弄得那块地方胆战心惊，人心惶惶，就是闹得鸡飞狗跳墙，不能安居乐业，于是向他求情者有之，向他求保护者亦有之，那块地方就成为他的势力范围了。

龙山毛儿滩的几个乡，民枪很多，一向不畏强暴。师兴周原来办团，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到那里还走得通。可是瞿伯阶就休

想越雷池一步。他手下有个王家慈，在毛儿滩有亲戚，他就利用王家慈的条件，补充王一些人枪，指示王于夜晚到那里去抢劫，去暗杀，闹得老百姓无法生产。知道这是瞿伯阶干的勾当，又不敢直接来向瞿伯阶交涉，不得不通过两边老百姓的亲戚关系间接地求瞿司令保护，想办法。瞿伯阶把人一带就开进去了。他住到毛儿滩，向当地筹米、筹款，既要求他保护，就不能不应付他。这样一来，却犯了国民党的禁，他们军队进入毛儿滩，就课以通匪的罪名，烧杀随之。老百姓把毁家杀父之恨，一口怨气集中在国民党身上，就从瞿伯阶为匪，以图报仇。结果这块地方牢牢掌握在瞿伯阶手中，老百姓归向于他。他就是这样一块一块地扩大他的地盘。

（二）对人处事气量大，能容人，以笼络军心。

瞿伯阶对人处事气量大，能容人。杀父之仇可以不报；想暗杀他的人可以留用；要杀的人可以互相讲情；犯了错误只要来见他，什么事都没得。因此，下属都成了他的死党，乐于卖命。

八十六军来围剿他时，他的父亲不便跟随队伍到处流窜，他将其寄居于四川老寨一家姓王的人家。八十六军对老百姓窝匪者，一律杀无赦。这家姓王的害怕起来，就把他父亲勒死丢入深山的窑井内。八十六军调走，瞿伯阶出来，姓王的来报告他说："老太爷晚上出去不知到哪里去了，至今没有找到，恐怕是凶多吉少。"他父亲本来有点神经病，姓王的这么一说，他就信以为真。姓王的有一个远房侄子在瞿伯阶这里当勤务兵，姓王的有一个媳妇妍了这个侄子。瞿伯阶父亲被害的事，从这个媳妇口中传入这个侄子口中，又从这个侄子口中传到瞿伯阶的耳内。他听了就派人去捉这个姓王的，要剐了他，到处没有捉到，悬几百两鸦片烟的赏金捉拿。姓王的躲了几个月，实在躲不住了，一天晚上，跑到瞿伯阶这里来，把他怎样害怕，怎样杀他父亲，源源本本照直讲了，并说司令官要剐要杀怎么都行。他一听，既然来了就饶了他算了。

认为这个姓王的是出于害怕，杀了他，自己父亲还是死了。旁人劝他为父报仇，他还说服别人，不杀他。杀父之仇竟没有报。他常对我们说："杀死我父亲，难道我心里真的不想报仇？还不是为大家、为部队的发展而容忍着。"

瞿伯阶在实力没有长成以前，仗着自己的枪法好，养了一些打手，在湘西、鄂西、川东一带与各股土匪为伍，时而从师兴周打张少卿、向作安，时而又从向作安打师兴周，使人嫉忌。很多人都派人暗杀他。后来当他支队长的彭雨清，就是四川张少卿派来暗杀他而被留用的。张少卿派彭雨清来暗杀他，行的是苦肉计，带了一点人枪作为叛变张少卿投过来的，时刻寻觅机会刺杀他。事久露了马脚，为他所觉。一天，他毫不动声色地把彭雨清找到鸦片烟铺前，说："老么，我知道你是怎么来的，给你讲明白，张少卿派你来杀我。你不杀大哥，四川人不会相信你，你如果把大哥杀了，四川人还是不会相信你。张少卿利用你杀我，别人也可以利用你去杀张少卿，你想他还能重用你这号人吗？我现在要杀你很容易，但是我不愿做这种不义之事。你如果愿意跟我搞，我还是重用你；不愿意搞，可以回去，就说瞿伯阶防备很严，下不了手。"他这一段话打动了彭雨清。彭雨清照直讲了，他说："大哥既然晓得，没办法，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是奉张少卿命令来杀你的，允以事成给我当连长，并给我500块光洋。"说完并表示"只要大哥不怀疑，愿跟大哥卖命"。瞿伯阶说："我一点不怀疑，万一要杀大哥也可以。在大哥这里干，光洋没得，要当连长，我自己还是个连长，只有排长当。"彭雨清留下来了，并给他当了排长，从此一直死心塌地地跟着瞿伯阶，干到支队长、团长。

龙山二所乡乡长原为向树迷，后为向敬树夺得，向敬海与之不对。我的父亲、兄弟都系向敬树捉去杀了的，与我有仇。向敬海想打乡公所，利用我与乡长的仇隙，到八面山来入伙，借队伍去打。乡公所没有打下，倒打死瞿伯阶六七个亲信打手。向敬海

仍然回来见了他，不仅没得么事，那时我任特务连长，而且还编为我的副连长。后来他企图将队伍拖到桑植去，因为那时队伍已经分散，瞿伯阶认为他有反叛的意图，派我去杀他，他已拖走，没有杀着。他拖到桑植，搞了一些人枪，给瞿伯阶来信，表示愿意听大哥调遣。瞿伯阶过桑植时，他来见了瞿伯阶，就把他收留了。以后也当到支队长。瞿伯阶对要杀的人，认为敢来见他，等于向他承认错误，杀之不义，一律予以宽容。

至于杀人讲情的事，那是常有的。瞿伯阶要杀哪个人，他的下属从大队长一直到士兵，都可以向他求情，只要他不是在吃酒，无一不是有求必应的。如果他在喝酒，常常不该杀的也杀了。他的下属要杀人，他并不是以司令官的名义下令不准杀，而是以一种求情的身份去向下属求情。

瞿伯阶对人处事有如上述，很得人心，巩固了他的统治。

（三）对下属约法三章，以收揽民心。

瞿伯阶虽然不是什么仁义之师，更谈不上替天行道，但是他懂得要和老百姓把关系搞好，才能够赖以生存。虽然他对部队没有制订什么纪律，但是对下属却有约法三章，借以收揽民心。（1）不要得罪没钱的人。（2）不能强奸妇女。（3）不要牵别人的耕牛。

这三条约法，他经常和下属在聊天时讲他的道理，所以能够深深印入每个人的脑筋。他说："我们不要得罪没钱的人。一来没钱的人最有骨气，最讲义气。有了这两气，那就了不得，上可以顶天，下可以立地。古来多少英雄豪杰，原来都是没钱的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做朋友。我们不得罪他们，他们也就不会来惹我们，就是对我们的支持；二来我们都是穷朋友，和他们比起来，不过是多了一条枪。你去得罪他，你想想假如你没有这条枪，别人来得罪你，你是不是想报复。他们存着报复的心理，对我们只有百害而无一利；三来没钱的人总是比有钱的人多些，我们龙山有

钱的人究竟有几个呢？众怒难犯，我们不去得罪他们，虽然他们不会同情我们，但是至低限度不会跟我们作对，那我们到处都可以走得通。”他说的道理很多。他爱喝酒，喝了几杯酒，高起兴来，常常给我们讲些梁山上的好汉杀富济贫的故事。因此，他的下属对没钱的人，虽然没有做到秋毫无犯，但是跟穷人闹纠纷的时候就很少。

不能强奸妇女。他的道理是：“谁也有姑娘、姊妹、老婆，强奸一人，一族都不高兴。何必为一个女人，遭人忌恨。祸及个人，情有可原，人家要怨恨大哥，怨恨我们整个队伍。”他常告诫下属，如果违犯了这条，他是要杀人的。

至于不要牵别人的耕牛，他说这件事也是最遭老百姓忌恨的。老百姓种田靠的是耕牛，你把他的耕牛牵走了，等于夺了他的饭碗。人就是为了吃，你不准他吃饭，他不造你的反、杀你，那才怪呢！他总爱跟我们说什么“得民者存，失民者亡。”

我认为瞿伯阶之所以剿不垮，他对下属的约法三章，起了很大的作用，不遭老百姓怨恨，得到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在扩大地盘指使下属去进行暗害抢劫活动时，却交代下属尽量按这三条去扰民害民，这也是他惯用的手段。把老百姓糟踏得越厉害，他一来就按约法三章办事，就越显出他的恩赐，也就越使老百姓感激。瞿伯阶一生有些眼光，但也狠毒，就表现在这些地方。

（四）“吊羊”、抽税、派捐、抢劫，同时并用，以维供给。

瞿伯阶当土匪头目，本身一无所有，手下那么多人要吃、要喝、要用、要抽，他还要购买枪弹，一应供给，非粮即钱。同时他一向落落大方，豪爽成性，手下一开口一伸手，他都随便给，单纯靠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搞钱搞粮的花样很多，主要是“吊羊”、抽税、派捐、抢劫等同时并用。

“吊羊”。他一向是先礼后兵。在他的辖区内，哪家有钱，哪

家有靠山，哪家反对他等等情况，他都摸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他要“吊羊”之先，写一张条子送去，或要鸦片烟，或要粮食，或要光洋，都是根据这家财主家的具体情况而定的。有如数送来的，他还出具收据，甚至和这家人家结纳，认为这家人家拥护他。有仗着后台并请人剿他的，认为这家人家反对他，那就乘你不备时，派兵前来一扫而光，人也杀了，房子也烧了。有看风势不闻不问的，他就“吊羊”进行勒索，不达目的不止。凡“吊羊”所得，对手下人提出10%的奖金，以鼓励之。

抽税。指的是抽鸦片烟税。龙山出产鸦片烟，这是瞿伯阶一项主要经济来源。一是在收鸦片烟季节，派人到产地抢收。种鸦片烟的都是地主，他不管是谁种的，一来就给你割得精光。二是他没有去抢收的地方，规定按保交给他捐税多少。三是过往客商贩运鸦片烟，如果向他交了税，可以畅行无阻，如果没有交税，保险财物两空。

派捐。就是向乡保派钱派粮，以派粮的时候居多。乡保应付便罢，如有违抗，就派人前往骚扰，也是不弄到手不放松的。

抢劫。一种是搞大市镇，抢大商家。只要他进了市镇，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的，做一次案算一次。以抢钱、抢鸦片烟为主，任何人抢来的，一律要上缴。士兵抢的一些衣服用品，谁抢的就归谁得。一种是抢交通线，到公路上去劫车，抢赶骡马的，无论布匹、棉花、货款等都要。他派人在沅陵、咸丰等地坐守“调线”。运的什么东西，值多少钱，什么时候开车起运，事先都摸得清清楚楚，真是做到手到擒来。不过劫车或抢骡马队运的货物时，他是不准随便杀人的。

四种方法并用，瞿伯阶作案累累，居民不能安居乐业，商旅视为畏途，土匪为患，害莫大焉！

我的起义

我从1936年跟瞿伯阶当勤务兵起到1948年他得病时止，12年时间中，一直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加上家族关系，很受他器重，不仅由勤务兵、排长、连长、大队长、支队长而当到团长，而且临危授命我代理师长，立意让我继承他的衣钵。但是，这种私相授受的事，除参谋长侯振汉洞悉无遗外，其他的人无从了解。瞿伯阶病死之后，办丧事追悼已毕，即公开讨论继承人问题。这时部队的人事情况是：副师长杨树成在瞿伯阶病死以前已从四川回到龙山；参谋长侯振汉；参谋主任周光然，系四川溪口人；第一、二团正副团长依次为瞿波平、贾松清、彭雨清；向敬海已归队任补充团长。在讨论之前，众说纷纭，如参谋主任为四川方面的人，认为师长死了，继承人当然是副师长；如彭雨清等龙山方面的人，则主张遵照大哥的遗示，由我继承；副师长来搞，部队不见得都统一得到。副师长杨树成尚未表示意见。我想第二团团长彭雨清是我的儿女亲家，我的副团长贾松清是我的干亲家，他们当然是要拥护我的。参谋长侯振汉则坚决支持我，各处给我做工作；并一再叮嘱我："你现在连客气话都说不得，不要做声，大家给你讲。"后来我主持一次营长以上人员的讨论会，我只说："师长死了，要有个人来干，大家辛苦了十几年，部队不能解散，大家看谁来继承他搞？"我一说完，参谋长就赶忙接过去说："应该遵照瞿师长的遗嘱，他叫第一团瞿团长代理师长，就是准备叫他接任师长的，师长应由瞿团长继承。"他讲了以后，其他团、营长都说可以。在这时，副师长杨树成也说了："师长应该波平来搞，大哥死前的意思就是如此，我的能力不行；如果波平不搞，我们的部队不能散，就叫师长的儿子从盛（他只16岁）来搞。"他这么一表示，大家都说："副师长既然不搞，就由第一团瞿团长搞。"于是我正式接任暂十师师长。

1949 年 7 月，程潜在长沙通电起义，未给我师指示，消息不通。大家商量决定，派军需主任黄保安到长沙联络。他到保靖后报告说："到长沙交通已断，只能慢慢等机会。"他带去 200 两鸦片烟，就此吞没，人也未回来。这时宋希濂的部队从宜昌退到恩施。他的经理处长田直，龙山人，在宜昌为解放军所俘，乘机逃跑，回到龙山，即电告宋希濂脱险，并准备去恩施。田直在龙山与我会见了，我问起当时的局势，他概略谈了一下解放战争国民党节节败退的不利情况，然后对我说："程潜已经起义，靠他不到了，你可以到宋主任那里去搞，我帮你去说，仍可以编给你一个师。"龙山有一个省参议员叫陈静念，他很愿意给我出力，我就请他和田直到宋希濂那里去接头，随即电告宋已经答应。8 月，陈静念回到龙山，叫我往见宋希濂。我到恩施见到他，他任我为新编第十师师长，正式在那里就了职。就职后，我向他要点枪弹，通过田直只补充了我 20 箱子弹（1 万发），送了我 2 挺马克沁重机关枪、2 支卡宾枪。

我回到龙山，解放军已经进驻永顺。宋希濂的五十四师董惠部及二九八师傅碧人部开到龙山防守，对我有戒备模样。我设宴为他们洗尘。董惠也请我吃饭，他似开玩笑非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不要开口子啊！"言外之意，叫我不要随便拖走，让解放军进来。9 月上旬，宋希濂准备逃往四川，来电话叫我到来凤去会他。我到来凤，他交代我的部队归陈希平军长指挥。该军副军长系方暾。9 月 15 日晚上，陈希平叫我去开会，说："解放军已到龙山招头寨，我们开会研究一下如何攻打这个地方。我军准备分四路进攻，瞿师长这一带地方很熟悉，你看担任哪一路？"我说："我部的武器不好，弹药不足，担任一路进攻，恐怕不能胜任。我建议由我派出部队协助担任进攻向导。"他说："那也好，你回去作好这个准备，先编六个营，待命令再行分配。"随后他又嘱咐我："我要到宋主任那里去开会，以后你部即由方副军长指挥。"

9 月 18 日，陈希平的一部分队伍在龙山县城到处挖工事，挖

得一塌胡涂，挖了一整天，到半夜全部撤走了。当时我还不知道，部属都跑来问我部队怎么都撤了？我想他们可能是进攻去了。他们撤完，才命我向来凤撤退。我到来凤会到方暾，他很客气地对我说："我们准备撤到四川去，这些地方你熟悉，你就走后头，我们在四川弯圹等你。"我向他要子弹，他说部队都没得多少子弹了，以后再说。我在来凤等他们撤离后，即在后尾跟进。走到咸丰十字路，参谋长带部队走前面，我只带特务营和第二团一个营走后面，解放军追上来一打，吃掉我一个营，部队垮了下来，与前面的联络切断了。我一个圈子一绕，退到二平界，一点办法没有，只好仍向四川弯圹追去。追上了参谋长，他建议还是往四川跑。一出发解放军又追上来了。参谋长带两个补充团走前面，已经过了公路，我把原跟我的老部队带在身边。解放军吃掉我一个补充团，只剩向敬海的补充团。参谋长侯振汉顾头不顾脚，朝前直跑，我们又失去联络，我就把部队拖回了龙山。

这时，瞿闵盛已回到里耶镇，师兴周也已搞了一些部队。他二人写信叫我到他们那里去商量在解放军四面包围中如何搞法，并说我们现在应该合作。接到他们的信，我就找杨树成、彭雨清、向敬海等商量能不能去。他们认为可以去，与其挂上钩，地盘要宽一点，力量也要大一些。于是我带了一个连到里耶去会瞿闵盛和师兴周。师兴周一见到我就说："原来伯阶要怀疑我，我是没有什么的。现在我们一路来搞，我的部队都交给你，你和瞿闵盛一起负责，我的年纪大了，精力不行了。"瞿闵盛说："解放军搞不长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我们还是要继续干下去。"商谈以后，我就把部队调到里耶附近驻起来。这时四川有个它贡庭到里耶来活动。他原是酉阳、秀山几县的专员。他想搞起来，声言要搞大一点，以资号召。于是瞿闵盛、师兴周、它贡庭和我在一块开会研究，结果大家同意成立湘鄂川黔纵队司令部，由师兴周、它贡庭分任正副司令，瞿闵盛当参谋长，我和杨树成任正副总指挥。陈子贤也到了里耶，即

以他为政治部主任。就这样我们都驻在里耶。

保靖的比耳驻有解放军一个连，师兴周要瞿闵盛和我带部队去打。我们当晚从里耶过河，准备第二天拂晓进攻。到达距比耳还有上10里路的瞿闵盛的亲戚家里，离拂晓尚远，部队停下来等候。快拂晓时，瞿闵盛对我说："听说比耳的解放军走了，那我们就不去了，我先回里耶去，天亮以后，你再把部队带回里耶来。"谁知天刚一亮，解放军打起来了。我们一面还击，一面向里耶撤退，死伤30多人。解放军没有追击。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瞿闵盛设的圈套，想把我送掉，他派亲戚到解放军处报告，自己先溜走。我稳着没有做声，心想"你要整我，我总有机会报复你们的"。

我部仍驻里耶，师兴周、瞿闵盛、陈子贤等人极力拉拢我：找他们借500块光洋，立刻派人送给我，还假仁假义地慰劳我的伤兵每人两块光洋。他们一心想利用我和解放军作对，他们可以坐收渔人之利；败，他们可以遂借刀杀人之愿。我将计就计：驻在里耶不动，要吃要喝，就伸手向他们要。

师兴周的外甥贾继才，原是塔那乡乡长，解放军初来时就投了诚。他送信来说解放军调了一个多团的兵力，准备攻打里耶，叫我们注意。师兴周找我和瞿闵盛研究对策。解放军来打里耶，必须经过里耶旁边的岩窠路，守住那里就能保住里耶。师兴周和瞿闵盛向我灌米汤，说："波平，只有你的部队能打，你又年轻，只有你能把这个地方守住。"我想机会来了，所谓狠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连忙向他们保证："一个团我负责把他打回去，你们放心好了，安心坐倒，守住里耶，我完全包下来。"第二天半夜，我就把大部分部队、家眷、伤兵都送到八面山去了，只带了200多人，全部轻装，守在岩窠路。第三天天刚亮，解放军果然来了，我响了几枪，连忙撤起跑了。解放军一直冲到里耶，师兴周、瞿闵盛的部队被吃掉不少，差一点把他们都捉住，财物丢掉不少。他们想整我，我倒给他们吃了一点苦头。

我撤到八面山西头，他们也退到八面山东头来了。师兴周派人找我去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搞。我答复他们说："我到二所乡把伤兵安置后再说。"接着我就往桑植这些地方去了。瞿闵盛的部队只剩200人左右，缴枪投了诚。师兴周的部队由他侄儿师秀章领着分散了，他自己躲到一个秘密险要的山洞里去了。他什么东西都放在这个洞里。一天晚上从洞里出来，想找点人到洞里去开会；他还没有回去，解放军把这个洞包围，和他留在洞里的部队发生战斗，洞打开了，他的人财搞得两空。他只带了几个人到处藏藏躲躲，闻后来被解放军活捉了。

解放军把师兴周、瞿闵盛搞掉以后，集中来搞我了。我流窜于龙山、来凤一带，将部队分散活动。有些乡保长跟我搞的，都投了诚。副师长杨树成带点部队回四川去了。1950年2月，因为我们部队分散，解放军找不到我们，他们十个八个地出来，我见此情况，就派兵拦路伏击。这样搞了几次，怕遭大部队包围，我把部队集中300多人，拖到来凤的山内去。来凤的解放军堵着我们打，我只好又拖回二所乡。闻招头寨的解放军已经调走，我就开到那里去收鸦片烟。这时龙山所有的解放军都调到五崽乡喜东河去了，我就以新十师师长名义出布告安民，并招收队伍。参谋长侯振汉这时又找到龙山来了，他要我把名义搞大一点，以新十师为基础，改称"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号召力大些。师兴周的外甥贾继才前来投我，他还有不少民枪，给他放了个纵队司令；彭雨清、向敬海都任为纵队司令。龙山城内驻有解放军一个连，我们猖狂起来，想攻占龙山。招头寨有白莲教的所谓神兵，说什么刀砍不进，枪打不穿，传得神乎其神。我把神兵头子丁大鹏找来，问他打龙山有无把握，有把握就去攻城。他回去加紧训练了几天，说可以去攻城了，并说攻进城时，路上的枪和钱都不能捡。于是神兵把一面红旗子一打就走。到达龙山城门口，解放军很沉着，等他们走近，手榴炸一炸，神兵却变成了死兵。我们没有攻进龙山，退到招头寨附近的山上，在那里收鸦片烟

税，到处给名义，收人。

6月，解放军一下打进来了，我们从招头寨撤退到来凤、桑植，以后又拖到四川找到杨树成。这里拖那里打，子弹打掉一颗少一颗，买不到了。最后和杨树成商量，我们仍分散各回各地。后来解放军来了一个师，先打四川，杨树成在那里待不住，跑到湖南来。我二人在明溪乡会面。解放军追上来，我的警卫营被打垮了。我们从山上突围，杨树成被打死。他的部队我带了两天，仍叫他们拖回四川去；不到20天，整个投了诚。我的部队只剩原来一、二、三支队的老底子向敬海和彭雨清的部队了。七打八打，只剩七八百人，子弹打得差不多了，买又买不到，只好分散活动。

以后实在不能出来了，我只带五六个人在身边，其他到处分散。我开始打我的主意，实在不得已时，到沅陵做生意去，就会捉不到我。我满以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和我们是死对头，不投诚要打我们，投诚也是死路一条。解放军宜昌军分区负责人王××曾写信劝我起义，我就没有敢接受。后来又听信谣言，说共产党见投机的就杀，吃鸦片烟的要杀，有此二杀就够了。同时投诚要缴枪，枪一缴掉就不是好事，那还不杀我，何况还有二杀在前；所以拼死我也不投诚，和解放军对抗到底，已经被逼得快要走投无路了。

正在这时，程潜派人送了一封信来。记得瞿伯阶临死前交代我要听程潜的话，他叫我缴枪投诚，当时口里答应了。可是转念一想，程潜这个名字谁都可以写，图章谁都可以刻，不要是解放军骗我拢去，好解决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我反复考虑，又叫瞿兴孝把信一遍又一遍地念给我听，七听八听，听出来不像是假的，因为信写得简单、唐突、毫不客气。信上写道："波平弟，听说你在龙山一带作反动活动，因为我和你亲哥的关系，希望你把人枪交给当地解放军，即来长沙见我。"我想如果是解放军造的假信，一定写得很客气，这封信三言两语，唐唐突突，十分可能是程潜写的。我到这时深感前途渺茫，已无出路，就下定决心听程潜的。我相信他，他要我死，我就

死嘛！瞿伯阶叫我不要脱离程潜，他要卖我，我也值得，没有违背大哥的初衷。司时，解放军把瞿伯阶的儿子捉去，我能去把亲戚朋友救出也是好的。正在这时，向敬海投诚了，更促使我不再犹豫，到二所乡老兴场，会见永顺军分区司令员叶建民，接洽交枪事宜。他很客气，叫我自选地方，把部队收拢来。我就住在离他三四里处之田家寨。他派了一个科长陈子肃协助我。我收一点就交一点，结果大部分人枪都收来交了。当时侯振汉和彭雨清二人不服收，我也将他们的住地及路线都告诉了解放军。

根据程潜指示，部队交完，我就要求到长沙去。叶司令员已经回永顺去了，派了一个范参谋长在那里；他接到我的要求，打电报请示得到叶司令员同意，叫我先到永顺去。他问我有些什么要求，需要什么东西，带些什么去。我说什么要求都没得，就是要吃鸦片烟。他满口应承说："你需要多少就带多少。"我熬了十几两熟膏子，三四两吗啡；他还问我够不够，我说够了，不久就要戒掉它。我到永顺会见叶司令员，他请我吃饭，玩了两天，派人送我到长沙。在长沙住湘雅路联络部，见到李部长，我说要见程主席，他说程主席到北京开会去了。过了一个多星期，开了一辆小汽车来接我去见程主席。一见程潜的面，我更放心了。他也很客气、很喜欢，对我说："波平，你来了，很好！湘西的人都不听我的话，只有你还听我的话；把鸦片烟戒脱后，再去学习学习，为人民做点事。"以后我就是这样做的。党的政策光明伟大，使我获得了新生。现在我任湖北省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参事。

李宗青整理

（湖北省武汉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恶魔张平

胡家模

张平是湘西的股匪头目。民谣说："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人见张平，九死一生。"这是对张平的真实写照。当地百姓称他为坐地虎、杀人魔王。张平一生，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罄竹难书。

一、财主的恶少

张平原名张大治，古丈县李家洞张家坨人，生于1906年4月。他的祖父张朝玉，是张家坨的大财主，家有水田160亩。张平出世时，其父张廷舟因科举不中，吞服鸦片身亡。其母向桂莲改了嫁。从此，张平由其祖父扶养。张朝玉对他娇生惯养，宠爱纵容，使张平从小野蛮成性。张平9岁在李家洞读书时，用砚池把老师向正学砸得头破血流，因品行恶劣，先后被李家洞、桐木溪、芭蕉冲等学堂开除。此后，张平在家不务正业，玩枪弄棍，寻事挑衅，成为李家洞地方的小恶霸。

1921年，张平15岁，娶沅陵桐木溪向和甲的女儿向丁丁为妻。婚后，向丁丁服侍稍有不周，张平便拳脚加身。一次，向丁丁被张平无辜毒打，走投无路，只得丢下不满周岁的女儿张桃英，吞服鸦片自尽了。张平的姐姐张大妹为其抚养幼女，在张桃英3岁时，张平叫姐姐滚蛋，张大妹从此音讯杳无。

1922年，张平花100多块银洋买一支汉阳枪，成天扛枪游荡，狩猎打靶。当地百姓都不敢惹他。

1923年，李家洞印家坨财主印培植打着“保乡安民”的名目，买些枪支成立团防局，印培植自任局长，叫张平当副局长。印培植之弟印培林是张平的亲姑爷，也扛起汉阳枪。一次，召集甲长议事，张平不在家，印培林说了些瞧不起张平的话，张平得知后，把印的汉阳枪抢了。印培植一家怕张平再下毒手，便收拾金银细软，连夜逃上金华山。在山上修碉堡，筑土墙，防御张平袭击。张平从此自任团防局长。这时，18岁的张平，吃喝嫖乐，样样俱全。并且开始拖队，干起烧杀掳抢的勾当。

二、枪杀张廷富

李家洞团防副局长张廷富，知道张平长期奸污自己的婶娘和绑架奸淫过路妇女，因此曾经劝导过张平。张平对此却怀恨在心。

1924年冬月十九日晚上，大雪纷飞，张廷富一家围在火塘烤火。张平邀集张大美等三人闯进张家，将张廷富夫妇及其父母和小弟枪杀。当时，张廷富的妻子已临近分娩，被打死时婴儿流产出来，也遭惨害。张廷富有个19岁的弟弟张廷胜，当时未被张平击中，昏倒在他父亲的尸体下，这样才幸留一命；他的妹妹躲在门角里，才免遭杀害。张廷胜连夜逃到永顺石堤西，后来改名换姓，做工糊口。

张平杀害张廷富一家六口，社会舆论很大，便跑到沅陵县桐木溪他的姑妈家避风。张平走后，经张朝玉出面安葬了死者张廷富等。张平在外鬼混了一年多，到1926年才回到李家洞。

逃到永顺县石堤西的张廷胜，请人写了状纸，上告永顺县政府（当时李家洞属永顺县管辖）。县府委派石门寨团防局长张兴楼设计擒拿张平。一天，张兴楼主动提出石门寨同李家洞办联防局，

张平不知是计，欣然同意。1926年4月，张兴楼带领几名团防兵，一路埋伏在白路界，一路到李家洞，假传召开保甲长会议，把张平的人都派下去喊人，张兴楼和张平靠在火床上吸鸦片烟。团防兵张敬柏趁机从门缝中对准张平连开两枪，不料都是"水"子，反被张平发觉。张平和张兴楼一同跳下床扭打起来，从房里打到堂屋，从堂屋打到坪场，张兴楼一个手指被卡断，仍扭住张平不放，叫张敬柏开枪。张敬柏左瞄右瞄怕伤着张兴楼，正犹豫时，张平抽出小刀对准张兴楼的心窝，张兴楼松手躲闪，张平趁机得以逃脱。

张平逃到岩坳他的姑妈家。当时，岩坳属沅陵县，李家洞属永顺县，沅阮不管永顺事，张平遂平安无事。他在姑妈家闲住七八个月，曾在芭焦冲向国茂家读书，又经人撮合，与向国茂隔壁的向三妹订婚。到了冬天，张平见风平浪息，又窜回李家洞。

1927年，张兴楼探得张平的行踪，向永顺县府报告，加上已当上保安团参谋的印培植也告状，于是省里派出刘本洲保安团一个排的人马，从沅陵乌宿出发，并有沅陵县利平乡几十名乡兵配合，到李家洞捉拿张平。

由一个姓罗的排长带人包围了张家坨。这时，老百姓已闻风而逃，张平还在睡大觉，枪声响了，张平慌忙爬起来。一个保安团兵从窗口射击一枪，恰巧张平弯腰穿鞋，未被击中，蚊帐上穿了两个洞。张平夺门出去，一阵乱枪，保安团士兵不敢拢边。张平冲出重围后，躲在后山岩洞中。这时，洞中躲满了老百姓，大家要张平另找地方，张平黑着脸不言不语，抱着枪坐在洞口。保安团兵在张家坨杀猪宰羊，吃喝一顿后，罗排长命士兵攻岩洞。一个偏脑壳的团兵刚到洞门前，张平射击一枪，偏脑壳兵应声倒下岩坎（后来，叫此洞为偏脑壳洞），其他团兵不敢上前，只是远远地朝洞里放枪，并烧辣椒烟熏洞。正紧急时，李家洞的麻脸保长张朝连领着六七人前来营救张平，罗排长不知虚实，下令撤到金

华山。张平与麻脸保长会合后，仗着本地人熟悉地形，反转攻打金华山，保安团被打死打伤10多人，丢了几支俄造枪，撤退到沅陵乌宿。保安团退去后，张平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到头来免不了挨打。因此又离开了李家洞，去另寻靠山。

三、投靠舒安卿

1928年，张平经人介绍到一二八师旅长舒安卿手下当副官，给舒安卿看守沅陵清水坪的庄园。1930年，张平与沅陵向三妹成亲，不久叫向三妹回李家洞老家，后又被张平一纸“休书”逼回娘家。

张平在清水坪舒安卿家守庄园时，暗中筹划对张兴楼报仇，得到舒安卿赞同。张平买了一支套筒枪藏在李家洞，多次摸黑没有碰上张兴楼。一次，探得张兴楼去永顺县城开会，张平背上一斗荞粉粑粑，躲在吴家坪的后山坡，一连等了七天，终于等到了张兴楼和他手下的张廷胜，将张兴楼击毙在稻田中，张廷胜被打伤后逃脱。

张平倚仗舒安卿为非作歹。一次，丫角山场上，有一个叫化子做“活人头上打碗”的表演，张眩耀自己的好枪法，一声枪响，碗被打碎，叫化子吓得死去活来。1935年，张平随舒安卿部到永（顺）、保（靖）一带“剿共”，后来驻在永绥县城，在这里又强与摆杂货摊的16岁少女杨炳莲结婚。

抗日战争中，舒安卿部在浙江嘉善、嘉兴一带抗日，同日军血战七天七夜，因缺乏弹药和粮食补给，几乎全军覆灭，舒安卿带着伤残兵员回到沅陵后，张平为舒安卿熬汤煎药，阿谀殷勤，博得舒的好感，被收为“义子”。并由舒安卿推荐当上了古丈县警察局巡官。不久，又当了警察中队长。

野心勃勃的张平，当上中队长并不满足，仍为非作歹，扩展

势力。警察中队只20多人，他虚报10多人的薪饷，中饱私囊；又对城内旅社宿客，每晚征收200文户口税；还以抽壮丁、禁烟赌为名，攫取民财；打着“剿匪”的幌子排除异己，杀死保长石姜成；带领警察打麻溪乡村武装时，打死无辜百姓，抓去双伯球等人缴得10条枪，私藏花机关枪1挺；剿宋家寨向雪清，打死保长向先银，捉去向雪清父子三人在古丈杀害。更恶毒的是张平挑起地方武装势力互相残杀，从中渔利。李家洞附近的胡家岭，有胡小衡、胡小芸兄弟，势力很大，张平认为对自己是个威胁。1938年，张平指使杉树坡的宋太仁偷走胡小衡两头水牛，并带领十几人，攻打胡氏兄弟，打死了胡小芸的儿子胡锦杰，把头割下挂在树上。胡氏兄弟被迫搬到金华山，并从石门寨请来张安绪、张安成兄弟保镖。1939年5月，张安成看农民插秧，张平指派徐永耀等人将张打死，逼得胡氏兄弟不敢在金华山居住，使徐永耀等人马上占据了金华山。张安绪为了替兄报仇，和胡氏兄弟从沅陵清水坪请来保安团，打死了徐永耀，也将首级割下挂在树上，一把火烧了金华山的古庙，烧死徐永耀的两个无名小卒。这年冬天，张平指使宋太仁从淘金溪、杉树坡、徐家岭等寨纠集几十人，围攻胡家岭胡氏兄弟，打死了胡小衡的儿子胡锦泽。胡氏兄弟又从乌宿请来保安团攻打张平，反而被张平打败。胡氏兄弟斗不过，只得归顺张平，成了张平随时可吃的“窝边草”。

由于张平残害百姓，危害地方，百姓纷纷向永顺专署和沅陵专署告状。永顺专署布告各地通缉张平。1940年10月，张平被撤去警察中队长职务，他带着妻儿和心腹打手回到李家洞老巢，又重新为匪。

四、火烧石门寨

张平回到老巢首先做了三件事：第一，组织武装。他邀集宋

太仁和“七阎王”向国万、“八阎王”向国年等，砍香盟誓，结拜28个老“弟兄”，纠合人枪100多，在金华山落草。第二、在化江溪边悬岩绝壁上的岩洞里筑墙建屋，准备安全之地，防人暗算。第三，把老“弟兄”派出去放“边棚”（暗哨），拦路抢劫，打家劫舍，坐地分赃。张平的野心和打算是：当不上司令当草寇王，占不了古丈占李家洞。

为了独霸李家洞，石门寨的大财主张楚才便成了他的头刀肉。张楚才在北平上过大学，后来随父经营木材生意。张平对张楚才的田园家产，垂涎三尺。1941年，吴家坪的保长舒鑫，受到张楚才的欺压，怀恨在心，他找到张平说：“张楚才砍了几百码子木材，准备运往鹦鹉洲出卖，要买回枪支打你。”张平听了火冒三丈，决定攻打石门寨。

1941年6月14日，匪首张平聚集100多人，分两路包围了石门寨。寨上，20多户100多人听到枪声，纷纷外逃，张楚才一家跑到岔拉避难。张平一伙冲进石门寨，打死了张楚才的保镖张厚其、李大皮、李皮皮等，全寨39头耕牛以及生猪、鸡鸭、粮食、衣物被掳劫一空，然后一把火，整个石门寨浓烟滚滚，一片火海。老百姓房屋被烧后，有的住岩洞和古庙，有的背井离乡。收割季节，谁也不敢开镰。张平又派匪徒将石门寨所有稻谷全部抢收。

第二年初，张平派吴家坪的胡开书等10多人在鱼儿溪、吴家坪一带放“边棚”伏击张楚才。一次，在鱼儿溪过河时，胡开书一伙当场把张楚才之妻向氏及其儿子张敬柏打死，两个媳妇跳水后被捉。后来，张平又带人在吴家坪油房打死张楚才的母亲和木匠张璜初、汪友庭三人。进而霸占了张楚才在老官坪、李家洞、中柱岭的三个庄场，共计500多担稻谷的水田。

张楚才回不得石门寨，跑到省里告状。1942年7月，省政府派沅陵县保安团营长李前耐、连长曾广继，带领一连正规部队和乡兵约200余人，从乌宿出发，到李家洞剿拿张平。张平闻讯，带

领28个老“弟兄”跑到白路界观察后，匪分三路：一路从王家坨，一路从张家坨，一路从寨中突然冲出，保安团被打死13人，当即撤出。

8月，省里从沅陵调来海军陆战队连长刘富亮，带领一连人增援。张平躲到焦坪，保安团追到焦坪，张平跑到老鱼塘，保安团又追到老鱼塘，张平逃到流排溪，保安团又追到流排溪，眼看走投无路，张平派人去假投降，选了些烂枪缴给保安团，保安团才停止追击，就地驻防。

张平进不得李家洞，仍在附近活动。一次，他在鱼儿溪捉住并收买了保安团一个号兵，要他杀死与保安团同来的张楚才。这个号兵在张楚才住房门上安手榴弹时被发觉，没有成功。于是，张平派麻子保长和张朝连找李前耐求情，表示以后不再扰乱地方，请保安团撤兵。李前耐得了张平几缸鸦片和银洋，向上谎报军情，于10月撤走保安团人马。张平又用同样手段买通刘福亮，撤走海军陆战队。

张楚才斗不过张平，被迫在老官坪摆酒设宴，与张平取和，并送给张平几百担谷，要求撤回石门寨。张平一来怕张楚才在外活动，说他的坏话；二来张楚才在自己管辖的地盘上，要搞掉他易如反掌，便允许张楚才搬回石门寨。一次，张平派张老五暗杀张楚才，张老五过了半年未下手，张平怕走漏风声，派人在镇溪将张老五打死。一直到1945年，张平把暗杀张楚才的任务交给他的心腹，吴家坪保长舒鑫。一天，张楚才在鱼儿溪扎木排，舒鑫派人在晚上缠住张楚才，在打“包十和”牌时，将张楚才绑了用刺刀剖腹然后捆上石磨，沉入酉水河中。张平表面上假装派人调查，把替张楚才守屋的张延江抓走。张延江因替张平承担了罪名，坐牢有肉吃，家里还得800斤稻谷，只关上几个月便放出来了。

五、杀人如麻

张平为了谋求官职做护身符，托人送鸦片给国民党古丈县党部及县政府大小官员，官大多送，官小少送。这亲，张平便于1943年2月在古丈加入了国民党，土匪头子一下成了国民党员。

同时，张平还用鸦片换枪，扩充势力。这事被古阳镇镇长全锐发现了。张平便派亲信粟道机杀死全锐。古丈县长张鑫追查凶手时，恶人先告状，伍廉泉说是张世炎派人干的。于是，县警察局把张世炎抓了。张平怕走漏风声，为了杀人灭口，又派人将粟道机暗杀。

1943年调整县界，古丈县由7乡1镇扩充为12乡1镇，李家洞划为保安乡。张平给县长张鑫送鸦片，于是当上了保安乡乡长。张平原名张大治，便是这时改叫张平的。从此张平成为李家洞的坐地虎。他命全乡种鸦片，按株定产，按产抽烟税。保安乡百姓因交不足税而被杀害的有15人，逼得卖儿卖女的有12户，弃家讨米的有13户。而张平家里装满了几大缸鸦片烟，成了张平升官发财的资本。他用鸦片换枪，又把枪用高价卖给百姓，美其名曰买“自卫枪”，规定家家要买，不买不行。他还用从老百姓手里刮来的鸦片，购置不少田地。张平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有土地捐、人头税、出谷税、存谷税、火坑捐、子弹捐、碉堡捐等，许多农民因交不出捐税，被割掉下身、吊半边猪、搞猴儿抱桩、踩红犁头。张平特别爱吃猪舌头，沅陵县桐木溪有个向二老，因忘记给他留猪舌头，张平拿着刺刀说：“没有猪舌头，你的舌头也一样。”一刺刀戳进向二老的嘴巴。可见张平是何等的残酷歹毒。

1943年，张平用搜刮来的钱财，在李家洞修建住宅，建筑碉堡和石围墙；后来又重修金华山，上设碉堡和粮仓，水池和弹库。张平强迫每户农民出七个白工，逼老百姓下自己屋上的瓦，拆自

己的壁板，为他修建公馆。

这年10月，张平新屋上梁，大摆酒宴，晚上打夜靶，凉水坡财主瞿生振的儿子瞿永茂，打靶百发百中，此人是张平的外甥，又是胡小衡的女婿。张平见他枪法好，很是忌恨。第二天当他辞行后，在淘金溪界上，张平派人将瞿永茂击毙。

瞿生振怕张平灭九族，携带家小逃到沅陵控告张平。1944年3月14日，国民党七十四军一个连剿张平，刚到天台山，被张平的匪徒打死一个排长。七十四军便扬言要踏平李家洞，剿灭张平。张平见势不妙，跑到古丈县城给新任县长陈立谟送鸦片，请他游说七十四军。同时，派人抬两缸鸦片到沅陵"酬劳"，七十四军也以四箱弹药作为回赠。接着收兵回省。后来，有人说七十四军进剿，是与下张家村向开运、向开国和土墙坡的向丁浩有关。张平便派人将向开国一家5口、向开运一家3口、向丁浩一家3口，以及陈道国等人全部杀害。

新任县长陈立谟为了在古丈站稳脚跟，利用和依靠张平的势力。1944年10月，古丈县成立清乡司令部，陈立谟担任司令，叫张平任副司令兼河防大队长。接着，又向省主席薛岳密荐张平为古丈县自卫团副官。在陈立谟的支持下，张平如虎添翼。

1944年7月，古丈县政府成立土地陈报处，丈量田土，征收田赋。丈量员在西南乡、仁爱乡受阻，从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向爱国为首的土家农民反土地陈报运动。参加这场斗争的农民达1500多人，并有730多支枪。9月21日，他们分别从杨家河、业者湖出发，经梳头溪、翁草、河蓬、草塘、清水坪、荷花池等地，于25日直逼李家洞。张平纠集的400多人在枫香塘阻击失利，退至干田坳，向县长陈立谟告急。在驻永顺王村和潜阮乌宿的国民党独立团的配合下，参加斗争的农民有700多人被屠杀，尸横遍野，还捉去押了250多人，其中一次就被杀害80多人，有100多人被顶作壮丁，仅有50多人用钱赎了出来。

这场斗争，张平的一个心腹和两个“老弟兄”被打死。张平命令从捉来的人中，挑选两个年轻的祭坟，凶残地用尖刀把这两个年轻人从头到脚，进行剥皮。

在干田坳一仗中，张平获枪500多支，机枪2挺，白朗宁手枪1支，还夺得大批财物。张平的恶迹如此昭著，却获得国民党“清剿”总指挥傅仲芳“记功”奖励；“四省绥靖”主任彭元华，也在黔江召开的县长会上夸奖张平的“干田坳之役”；永顺专署专员孙常钧除通报“表扬”张平外，并于1945年8月15日，亲自到古丈为张平“庆功”，授旗三面。连省主席薛岳也送了锦旗。这年11月，张平就这样成了古丈县参议员。

六、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

张平常常找借口，挑事端，收拾地方武装势力。

进攻岩排溪。岩排溪有十几条枪。张平从1944年到1947年，三次派人攻打，逼走黄祥国、黄世德、黄开照，打死他们的亲属15人，烧毁其房屋，霸占其田庄。

赶走覃子美。沅陵清水坪覃子美有三四百人的武装，因与张平不和，1944年10月，张平带几百人到清水坪围攻覃子美，打死覃的老弟，捉去覃的妻子和另一个老弟，覃子美被赶走，家产被洗劫一空。

图谋舒安卿。舒虽是张平的恩人和义父，为了搞舒的十几条枪，张平逼迫舒汉卿谋杀舒安卿。未下手前，舒安卿病死。张平将其十几条枪据为己有。

火劫四寨。鲇溪寨大财主张耀元，竞选“国大”代表与张平发生矛盾。1949年3月，张平借口张耀元不去打辰溪兵工厂，说他“通匪”，派宋太仁带400多人攻打张耀元、宋开汉等，星夜包围鲇溪、坪家寨、亮坡、竹山寨四处，将其财物劫光、耕牛抢光、

生猪杀光、房屋烧光。这次烧毁房屋 76 栋 274 间，粮食16.3万多斤，生产生活用具 2.9 万多件；抢走耕牛 82 头、山羊 120 多头、生猪 82 头、棉被 700 多床、布 5000 多尺、银元 1600 多块，打死无辜农民瞿昌枚等 6 人，使 82 户 500 多人流离失所。

张平还陆续征服了李家洞周围的地方势力尹晓楚、陈昌洪，赶走了侯义金、侯文银等。一般老百姓更是任他宰割。1949 年 5 月，张平在鲁家寨过路，见一婴儿在摇窝里啼哭，他走去提起婴儿，一刀将其劈成两半，扬长而去，真是个残忍已极的杀人魔王。

1949 年湘西爆发“三·二事变”。事先，湘西各县军政头目在古丈开会。张平于 2 月上旬在古丈发难，占领县政府，赶跑县长王天龙。为掩人耳目，张平未马上接任，而由孙习林代理县长。接着，2 月 27 日，张平自称司令，率 1300 余众，从古丈出发，经古丈河蓬、泸溪浦市到辰溪抢劫兵工厂，抢得步枪 400 余支，机枪数 10 挺、子弹若干和迫击炮 3 门等。

4 月初，省府决定进剿湘西土匪，派保安第五旅周笃恭部由沅陵向古丈进军。张平的喽罗龟缩在李家洞，坐山观虎斗。这时的古丈县政府失去武力庇护，偏安在断龙山上的泽土库。直至湘西各地方武力纷纷赶赴古丈，如乾城的梁光湘，保靖的徐世弟，永顺的汪援华和曹振亚、罗文杰等，对周笃恭部形成由南到西的弧形包围，战场拉开 30 余里，整天枪声不断，迫使周笃恭部撤离古丈。省府自认无力，改变了对湘西用兵之举。“湘西事变”使张平得以“腾达”。1949 年 6 月，国民党委任张平为湘西自卫军沅（陵）、古（丈）、泸（溪）边区总指挥，他成立了由小队、中队、大队到支队的反动武装组织。并在沅陵、泸溪两县成立 4 个支队。总指挥部设在古丈张平的公馆内，下设副官处、参谋处、军需处，由手枪队、特务队、直属大队、游击队、6 个常备支队和 8 个后备支队组成，共有 2800 余人，各种武器 1900 余件。

7 月中旬，张平以武力迫使县长孙习林辞职。8 月 1 日，张平

率手枪队占领古丈县政府，自封古丈县县长。国民党反动派土崩瓦解之时，张平被封为国民党“暂编第十一师”师长，他将6个常备队扩编为3个纵队，面向沅陵方向构筑工事，布下所谓三道“防线”，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妄图与我解放军相对优。

七、可耻的下场

张平这个恶魔，在古丈县境和沅陵清水坪、乌宿一带，霸占大量田地，剥削农民无数血汗。单是田契就装满一大箱。张平在古丈有两栋公馆，但大部分时间住在李家洞，家里豢养枪兵100多人，还喂了12条恶狗。

张平奸污妇女无数。1949年，在古阳镇强夺一个不满13岁的少女李祖玉为妾，不到三个月，这个少女就被张平残害致死。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曾经引起社会公愤。张平无耻地说：“我承认损了私德，但可遗臭万年。”张平这个衣冠禽兽，他的一生是罪恶的一生，可谓十恶不赦。

古丈人民过去在张平的蹂躏和掠夺下，苦不堪言。人民终于迎来了解放，见了青天。1950年3月初，我湘西行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湘西分军区，顺应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消灭地方匪患，派解放军分三路进军，合围李家洞，粉碎了张平的三道防线，围住了张平的老巢。农历正月十五，张平家里正在闹元宵，枪声一响，张平甩掉手上的酒壶和猪舌头，化装成老太婆，携带着金银和妻儿溜走了。但他继续收买残部，制造谣言，暗杀我军政干部，杀害我人民群众。张平从李家洞逃到李家寨，遭到我军痛击后，又窜到保靖、龙山等地，连连碰壁；不得已又潜回李家洞。7月10日，张平躲在李家洞附近的杨家岭小里溪，由于饥饿和鸦片瘾发作，他胁迫正在薅田的农民张学意取饭、取鸦片烟。张学意假意顺从，并急忙要父亲张高升报告区人民政府。在我军和人民的包

围下，张平跳过田坎潜逃时，被我军民当场击毙在稻田中。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至此结束了他肮脏而罪恶的一生。死年44岁。击毙张平的消息传开后，人民无不拍手称快，都说张平死有余辜。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湘西巨匪姚大榜

杨长光

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剧中匪首“田大榜”狡猾、残忍、奸诈，令人忿恨。历史上究竟有无田大榜其人？是否真如文艺作品中描述的如许恶贯满盈？现选编介绍“田大榜”的原型——湘西巨匪姚大榜的文章，以飨读者。

一

姚大榜，字必印，号占彪，光绪壬午年（1882年）生于晃县（现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杨家桥的牯牛溪，上过私塾，毕业于贵州铜仁讲武学堂。1950年12月在十家坪偷渡濉水时被我堵击淹死河中，时年68岁，为匪50余年。

幼年时的姚大榜浓眉大眼，楞头楞脑，两腿滚圆，两膀粗大，父母疼爱，称为“大膀”。“膀”、“榜”谐音，由此得其名。姚成年后两颧高耸，嘴巴大，嘴唇厚，下巴像把铲子似的朝前凸出，两腮凹进呈猴像，除两颗门牙外，其余均脱光，鹰勾鼻子，两眼充满杀气，几根既长又黑又粗的眉毛，长相十分凶恶。冷天时常穿件长衫，脏得油光发亮，热天着短白布衫，青布衣，脚系布袜套草鞋，戴缎子壳球帽。无事喜欢拿人取笑，特别是喜欢用烟袋烧妇女、青年人后脑勺头发，发出“吱吱”响声，以作取乐。被烧者，不得发气。否则，他就借故生端。由此，人们与他接近也要

怕他三分，故伪称“姚老辈子”。

其父姚德钦，母杨氏，均是忠厚老实人家，务农为本，除耕种几十石谷田外，没有做过邪恶之事。其祖辈均如此。姚大榜年幼时，一家7口，除父母外，一个哥哥早先夭折，一个姐姐两个妹妹留在家里吃斋当老姑娘，一生没嫁，姚大榜年龄最小。自哥哥夭折后，他被视作独子，骄生惯养，少年时期就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好逸恶劳，吃、喝、嫖、赌是其之能事，家里管他不着。父母为他费尽了心血，开始送他读私塾，识几个字，看些杂书，好的没学，被那些绿林好汉、老奸巨猾的人所启示，把抢劫杀人者称为“强人”。姚大榜自小便盟发了要做强人的念头，因其不走正路，母亲死后，父亲恨他干这遭世人唾骂的恶事，给祖辈丢脸，打骂也若无其事，后悔不该养这个不孝之子，一气之下疯了，时间不长，也离开人世。

姚大榜16岁时，在贵州讲武学堂学会一套玩刀弄枪本领，且跑步如飞，登山如同走平地，因其父死后无人管教，便流浪成性。一次，蔡建狗偷了他一头牛，姚大榜知道后，要其退牛，蔡家人多势大，横蛮地讲：“要退，只有拿白鱼崽（意指小刀子）退你。”姚大榜见他们口出狂言，一怒之下用土夹板枪把蔡建狗打死，尔后，相邀邻近的姚国安（绰号牙生矮子）和姚本富（外号富林麻子）结为一伙，并从当时晃县有名的大土匪唐青云（混名唐大王）那里搞到20多条枪，开始了土匪生涯。

起初，姚大榜羽毛未丰，有些胆小，第一次杀人，怕别人找麻烦，便带其枪兵到贵州岑巩县龙鳌、牛场坡等地关羊掳抢，打家劫舍，残害无辜，得了一笔横财，回牯牛溪、发展为大土匪。为了便于作恶，他把家从离县城不远的牯牛溪搬到湘黔两省交界的偏僻地区——方家屯扎棚居住，此地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利于活动。不久，抢来横财颇多，姚便在那里买田置地，由一茅棚，扩大到一栋正屋，两栋厢房，又在不远的贵州玉屏县的雾程，新修

一栋别墅，供霸占来的老婆蒋冠英寄居。而且先后抢了龙氏、黄氏、梁氏和彭氏5个民女，恣意玩弄。其家产由原来的60石田，发展到1200多石，掌握有200多土匪武装，并在新民、学堂坪和张家寨等地开办兵工厂，铸造枪枝，成为闻名湘黔边界的大地主、大恶霸、老惯匪。

二

人称姚大榜比狐狸奸、比泥鳅滑，比老虎凶，比蛇蝎毒。他能为匪50余年，在他那团小天地里，自有他的护身符。他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石。”他不允许外人或手下人在方家屯一带为非作歹，若有不轨事态发生，将追查到底。有一次，他手下一吴姓匪兵，在他管辖范围内杀一个过路商人，外人说是姚大榜干的；他气极了，追查到姓吴的，吓得吴面如土色，全身发抖，当即跪下对姚作揖道：“我真该死！我真该死！请老辈子饶命。”姚大榜为了杀鸡儆猴，不再追问，就叫道：“好！你回去吧！”吴以为他大发慈悲，连连磕头，起来转身刚走几步，就随着“叭叭”的枪声倒在血泊里。

离方家屯不远的陈老满家，被贵州匪首潘桥桥抢劫，陈老满告知姚大榜。大年初一，他就带人去把潘桥桥等3人抓来，一面从中大饱私囊，要潘出500块银洋的“辛苦”费给他；一面要潘退还陈家财物。待钱物交清，他又当众人面把3人杀了。附近几个村子，国民党不敢去抽兵派款，青年人被抓兵或遇官司等事，只要给他钱，就可以万事大吉。乡里发生纠纷，不惜重金，酒肉相待，请他这个“老辈子”去“主持公道”，不管输赢，都由他说了算。岩上有一个叫妖婆的，家有万石谷田。一年，她出卖百多石，开始卖给张家湾的一个地主，还未落实，晃县大地主杨宗贵与妖婆关系较深，又背地唆使妖婆将田卖给他。因此，两家发生争执。

双方请姚大榜去解决，姚各诈取光洋200块，钱交清，把田解决给张家湾，并当众人说杨从中插手，给杨宗贵几个耳光。从此，姚、杨结下冤仇。

为了笼络人心，掩人耳目，他在晃县、玉屏、万山交界的三角地区，办了一所玉屏中心学校，自任“校长”，表面上解决附近儿童读书难的问题，不时真相的人，也认为“姚校长”给地方上办了一件好事。实际上他是以此为据点，与各处土匪勾结，坐地分赃。

1918年，姚匪猖狂，龙溪口商号对他产生畏惧，想把他笼络起来，以免后患，请他担任晃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姚则勾结了一些绅士商号的头面人物，又不择手段地向商家要供给，以肥私囊。当大批钱物到手后，姚把人枪全部拉走，与玉屏匪首曹云周合股为匪，驻扎玉屏县城。国民党无奈，进行招安，封姚为湘黔边区晃县、玉屏、万山联防办事处的大队长，主持三县治安联防。姚大榜的队伍得以扩大，武器装备充实，私囊中饱后，又反水上山，重操旧业。

今玉屏县长岭乡的汪家溪，过去团防局设在此。局长马玉书与姚大榜相互勾结，打家劫舍。有一次密探告知，有10人挑鸦片路过此地，姚与马密商，欲将得来的鸦片均分。便设下埋伏，把鸦片抢了，挑鸦片的10人中有9人被杀。剩下的1人被姚大榜用马刀砍了一刀，滚下田坎，带伤逃脱，到铜仁专署控告，国民党驻铜仁的白师长迅即派队伍来捉拿姚大榜。姚心窍诡秘，猜到定有人来捉他，早已躲藏，队伍扑了一空。无奈，白师长就怪罪局长马玉书管辖此地无方，治理不力，抓去坐牢，并押赴刑场赔斩。姚一口鲸吞抢来的鸦片，马则惊厥瘫痪，成了姚的替罪羊。

1926年，北伐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兵买马，姚大榜便带其喽罗投奔，被封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十师一团一营营长，得了不少枪弹军饷之后，又连人带枪拉回老巢为匪。

1934 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堵截红军，又一次对姚大榜进行招安，委为“晃县铲共义勇总队副总队长”。次年 7 月，他又拖枪上山为匪。

1936 年初，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过晃县时，就曾给姚大榜去信，告诫他不要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要改邪归正，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姚不听劝阻，相反还大量屠杀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和靠拢红军的群众，如新合乡农民广志桥因给红军带路，被其活活逼死。

国民党政府数次对姚招安，还把他掌握的匪伙进行收编，而他服招不服调，反反复复，屡招屡叛。因此，国民党政府对他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1940 年 8 月，国民党政府对姚大榜采取清剿，派陆军独立一旅三团前往。一次，清剿队得知姚从万山抢来一民女，在雾城过夜，迅即派了一连人星夜兼程，赶去捉拿。昏暗的油灯下，姚正与这女子打牌，捉拿队伍靠近屋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房子给包围了。姚大榜听外面有响声，知道事情不妙，吹熄灯，推开那女子，掏出枪，迅即爬上屋顶，凭着能在瓦屋上奔跑无声的轻功避险，并将一床烂棉絮捆成一个大包裹，往房子另一头扔去。围房子的队伍，看见有个黑影从屋上掉下来，以为是姚大榜逃跑，叫喊“抓活的，抓活的”，都往黑影扑去。趁慌乱之际，姚大榜又从屋上另一头，纵身一跳，待士兵们从这边扑来，他已遛之乎也。这时连长才知道中了姚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

一天，下着毛毛细雨，清剿队得报姚大榜已回到家里，天亮来到姚大榜寨前。早已起床的姚大榜一看情况不好，顺手捞一顶斗笠，披上蓑衣，把两支快慢机放在装满粪水的粪桶里，装扮一老农，挑着粪桶就往外走。没走多远，带队队长抓住他问：“老头，姚大榜在家吧？”姚大榜装着老老实实的样子，一换肩，粪水就往外溅，污了队长的裤子，队长后退一步，又问姚大榜在哪里？他

用手指着一房间道："他刚起术，正在抽大烟哩。"部队迅即围拢去，将房子层层围住。姚大榜过了两根田埂，把粪桶一扔，掏出两支快慢机，逃之夭夭。部队把他家里一搜，只见他的几个老婆和崽女。队长问其老婆，姚大榜在哪里？他老婆说："刚才挑粪的不是吗？"队长指着士兵喊："还不赶快给我追。"可为时晚矣。清剿队伍几经追剿，几经扑空，一怒之下，抓去了他的老婆、崽女，将他抢劫得来的金银财物8担多全部挑光。此后，姚更加警惕，每晚睡觉总是把香捆在手指或脚趾上，作为他的警报器。待香烫手时，又另换一个地方，往往一夜间转移数处。这便是他为匪的传家宝。

1942年秋，晃县爆发了"黔东事变"。组织者之一是晃县"同善社"社长秦宗炳（又名秦良善、绰号善人），他先后联络玉屏罗殿卿、马和林及晃县姚大榜等人，一同举事。姚是同善社的"天恩"，驻晃县酒店塘矿警队长，掌握人枪百余，弹药居多。但姚爱财如命，假意与秦共事，向秦索取大量金钱。晃县敦厚堂药店老板吴敦明是秦的女婿，家有万贯，秦以之为靠山，让吴先付给姚4万元，以作军费。姚表面答应祭旗出兵，暗地要玉屏县长李世家于祭旗之夜出兵镇压。李暗示黄道乡乡长刘元藻率领壮丁事先埋伏，计划于8月23日，姚大榜、罗殿卿、马和林、黄尚明带其队伍在玉屏县黄道乡鸡婆田杀猪祭旗。开始行动。姚心怀鬼胎，乘祭旗时说："此旗经高人勒赐，法力无边，能避枪炮，我乃试之。"说罢，拔出手枪，对旗而射，连打3枪，将旗击碎，并说："此乃骗局，吾不信也"，将其队伍撤出。刘元藻之伏兵即向罗、马、黄的队伍进行包围扫射，未经半小时战斗，罗、马、黄之队伍被冲散，各奔山头。秦宗炳催姚大榜出兵，姚向其索款不休，先后共计7万余元，却仍然不出兵。秦发现姚的阴谋，仰天长汉，投河自尽。

国民党禁止纱布走私，不准湖南纱布运往贵州，这损害了龙

溪口各商号的利益，他们暗地寻找靠山，给姚送去大批钱物，要姚带人押帮。而狡猾如狐、贪婪如狼的姚大榜，采取更阴险的手段，多次押帮抢帮。一次，姚带人押运一船纱布往玉屏，天黑到达小地（地名）住宿。半夜，姚又另派手下一伙人把纱布抢了，嫁祸于人，并抓来一些与之毫无牵连的装卸工，硬说是他们所为，当货主面，将他们全杀了，以消货主之恨。此类事，屡见不鲜。

姚大榜杀人越货，血债累累，遇人不免产生疑惧心理，恐遭不测。他的双枪总是放在衣袋里，与人说话时也手不离枪。某日与一客商在一店内谈话，对方由于感冒，打了个喷嚏，伸手到口袋里取手帕，而姚则以为他心怀不轨，顿时掏枪将其击倒在地。其他人拥进店，问其事端，他气愤地说："你们不看，他的手在口袋里掏枪，我不打死他，他必打死我。"众人扶起死者，抽出衣袋内的手，捏着一张手帕，无不为之愕然。甚至吃饭时，姚也端着饭碗蹲在屋角，靠近无人过往的地方，以防万一。

姚大榜年过花甲后，仍能步履如飞。有一次他和随从数人从芷江回晃县途中，看见一条狗在前面跑，便问随从，谁能前去把狗抓来，随从们个个摇头。姚见罢，卷起衣袖，三步并两步地赶向前去，一会儿就将狗抓回，旁人见了惊愕不已。

三

在晃县，有一人使姚大榜大伤脑筋，即是黄埔军校一期生，任过国民党正规部队团长、旅长的晃县大湾罗毛溪人张本清（又名张文英，外号张老虎或张大炮）。早年，张得到蒋介石的器重，曾任蒋的警卫团长，后因联名反蒋，遭到蒋的遗弃，回到家乡晃县，担任省参议员。他在晃县参议会第一局一次会议上说："我不允许恶势力发展，我要保境安民，最低限度上至鲇鱼铺（酒店塘），下至门楼坳，即在晃县境内，我不允许土匪们作乱，谁要作乱。我

就杀了谁。”由此，晃县土匪一时不敢放肆，匪势没有多大发展。对张本清，县府官员、地方绅士都不敢得罪他，其势力之大，令人生畏。

姚大榜视张本清如眼中钉，但不敢在虎口拔牙，表面上还是合睦相处。1939年，他们联合击败了经营晃县酒店塘汞矿的张平刚，合伙经营汞矿，来往甚密。不久，姚因在晃县为匪作恶，又支持龙溪口商号纱布走私，遭国民党独立团的围剿。姚虽化装逃脱，但他全家被抓入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姚请张本清出面说情。独立团得罪姚大榜，可得罪不了张本清。张以他的威望和能量，救了姚一家大小。此后，姚多次宴请，感谢张本清，并口口声声对张说：“张旅长，多亏你的搭救，我今生来世也不忘你的救命之恩。”张本清开玩笑说：“杀人算你的，打官司算我的。”姚大榜回答说：“我杀了人，就是打赢官司，我的比你的快。”两人同欢而散。过后不久，二人共同经营汞矿因瓜分不匀，姚派姚锡昌当汞矿管办，而张本清又派一秀山人杨洪当管办，姚大榜暗地将杨洪杀了，开始埋下无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张本清因要娶其堂妹张善芝（又叫张学英）为妻，其前妻郭顺清愤而出走。张之举被其家族视为败坏家规门风，遭到家族的责骂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对此，姚大榜也进行讽刺。在姚、张二人参加的一个宴会上，姚针对张娶其堂妹之事，当着众人说：“牛栏立在田坎上，粪水不落外人田。”张面红耳赤，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心里忌恨着姚大榜。又有胡积善（又名胡惠卿）从中挑拨，使姚、张二人矛盾更加激化。

张回晃县后，为发其家业，在龙溪口开了一家本善公司。公司占用了江西帮的房子，江西帮要求归还，张不允。张大量收购桐油等产品，生意兴隆，加上经营龙溪口码头，大肆征收码头说，夺了江西帮等各商号之财。江西帮对张怀恨在心，决意除掉张本清。可谁来干此事呢？姚大榜爱财如命，早为他们所掌握，是最

合适的人选。江西帮不惜重金，暗给姚送去白纱布数十匹，银元数千块。芷江匪首杨永清趁火打劫，极力支持姚大榜剪除张本清，并为他出谋划策。

1949年农历二月十四，正逢龙溪口赶场，人多拥挤，姚大榜派了手下得力亲信、分队长吴玉清（外号叫吴麻子或斗鸡麻子，其人在张本清手下做过事，后暗投姚大榜），带吴本军、吴本众、姚应林以及姚大榜的舅佬龙永安、彭秀才等人化装潜入龙溪口。姚大榜还派人在进出龙溪口的必经之地——杨家桥的土地坳、龙溪口的坳上等地接应。没过多久，张本清带着一个警卫到江西街。张指使警卫去办事，自己一人来到斌星街口小摊买烟时，等候在这里的吴玉清，向前喊道："张旅长，你买烟。"张刚回头，身着长袍的吴玉清，从内肘下拔出枪对准张的太阳穴就是一枪，紧接着又窜出两个随从，在张的后脑勺和腰部又各开一枪，张顿时毙命。随即街上一片混乱，吵吵嚷嚷，人群中叫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吴玉清等人趁混乱，慌忙逃脱。张本清——姚大榜的救命恩人，就这样死在姚大榜的手下。

张一死，姚大榜实现了称霸晃县的美梦。不久，在一些绅士、商人的簇拥下，姚带其匪部进驻龙溪口，以壮声威，随即成立晃县保安第二团。自任团长，并兼晃县治安委员会副主任、晃县警备第一大队长。一俟地位巩固，姚这个狡诈阴险的老狐狸，转而又向跟随他多年的亲信吴玉清、姚国安开刀。吴受姚大榜的指使，带人刺杀了张本清，排除了姚心头之患，可算是立了一大功，可他不曾想到，正是为了这个招来杀身之祸。姚借吴之手刺杀张后，心里时刻思忖着吴玉清连他的顶头上司张本清也敢杀，说不定迟早自己也会遭他毒手，此人不除终为后患，便借吴占人妻女之罪名将他杀了。姚国安因在外抢了别人的东西，也被当着众匪枪杀在玉屏的白马山。真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四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进入晃县剿匪，敲响了土匪们的丧钟。在解放军的追剿下，土匪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然而，为阻挠人民解放军解放湘西，芷江警备司令、“复兴楚汉宫”的双龙头杨永清于1949年8月、10月先后两次窜到晃县同姚大榜策划，扩大“楚汉帮会”，发展其匪势。姚以晃县“楚汉帮”龙头大爷、开山主之身份相迎。杨、姚二匪密谋拼凑“芷晃剿共游击总队”，姚任副总指挥，率其匪部隐藏在贵州玉屏的樟寨，以及玉屏、万山和晃县的交界地——六龙山，伺机反扑。

在此之时，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对姚进行政治争取，利用进步人士、晃中教员胡秀琰（姚是胡的救命恩人）去劝其投诚，要其认清形势，靠拢人民。姚也看到不利处境，曾有过回心转意的打算。一次，经做工作，姚愿意吃罢早饭就动身下山，抬他的滑竿也准备好了。因姚素来爱吃鲤鱼，村里人的鲤鱼都要送给他。正在这时，一乡里人给姚送来两条活鲤鱼，每条约有二三斤重。送鱼人喊：“姚公，鲤鱼！”狡诈多疑的姚大榜，一见到鲤鱼，脸色突变：“妈的，鲤鱼上钩，歹的兆头。去不得，去不得。”就这样，他对解放军的政治争取和多次派人劝说，均加以拒绝。其长子姚应科曾就读于贵阳大学，接受进步思想，看到解放军进入湘西以来，各地土匪纷纷落网，数次劝说姚不要再干下去了，放下武器，以求人民的宽大处理。而刚愎自用的姚大榜，谁也说服不了他，相反，还会遭殃。姚大榜见姚应科数次规劝，眉毛一竖，瞪圆双眼，露出杀人魔王的狰狞面目，大骂姚应科是逆子，说：“虎不食虎子，今天我就吃了你。”姚掏枪便打姚应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旁一喽罗忙抬高姚握枪之手，“叭”的一声，子弹朝天飞去，而姚应科一看势头不对，慌忙逃命。此后，父子分道扬镳。姚应科暗地将

国民党晃县县党部给姚大榜的24条大小枪支交给解放军，到贵州任教去了。

1950年春，姚大榜趁人民解放军驻晃部队主力往怀化支援中心区重点剿匪之机，联合肖宗淮、蒲老翠、杨国政等匪首率匪众600多人攻打晃县县城，被解放军四一九团副团长王满昌率领守城部队击溃。

1950年秋，姚主要活动在玉屏的板山、黑岩场等地。有一次，县大队抓到一名叫黄东生的土匪，黄供出姚的藏身处，并带路去捉拿。县大队会同民兵百多人，连夜奔袭，赶到那里，才得知姚头一天率部从酒店塘过河，又逃往扶罗、新寨、凉伞等地。

8月30日，湘黔边界5000多名土匪蚁集凉伞，姚身任“湘黔边区反共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妄图在凉伞（土匪称为小台湾）与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乌合之众，哪经得住解放军一击。“雪凉合围”一役，数千名土匪被擒被歼，姚从驻地新寨的龙寨带匪逃往壕庆湾。解放军勇追穷寇。壕庆湾一战，姚的人马几乎丧尽，家当输光。他的儿子，匪营长、机枪射手姚应金被击毙。姚的老婆彭氏和女婿杨宗振、舅佬龙永安等被活捉，姚仅带几十名匪徒临阵逃脱，窜往中寨，后过禾滩，逃到波洲上面的十家坪，在此又集结了一些散匪，妄图在此偷渡潕水河，回到六龙山老巢继续作恶。由于解放军和地方部队跟踪追剿，土匪疲于奔命，日夜溃逃，几天没吃上东西，一个个狼狈不堪。12月25日，土匪逃到十家坪的当晚，姚召开匪支队长、连长以上紧急会议，商讨下一步对策。他声嘶力竭地在会上说“我们好坏，死活就在这一夜，如能过河到六龙山，就有安身之所，大家要同心协力，成败就在此一举。”说罢，预感到末日来临，威风一世的姚大榜，从眼角里掉下串串泪珠。

土匪们按吩咐，作渡河准备，晚12点，开始偷渡。姚渡河的消息事先已被我方得知，在中共晃县县委书记杨建培的指挥下，十

家坪的河对岸埋伏了堵截姚的部队和民兵。当两船土匪渡到河中，堵截的队伍开枪射击时，船上的土匪慌作一团。一只船调头回逃，姚乘的那只船被踩翻，船上的人都掉入河里。第二天，民兵从河里打捞出10多具尸体，其中，有一尸体上还挎着一支快慢机，经辨认，此人就是姚大榜，是被淹死的。

姚大榜一死，标志着晃县百年匪患的清除。人们知道姚大榜淹死的消息后，都奔走相告，喜形于色。

（选自《纵横》1991年第四期）

田伯卿武装始末

彭景星　田廷清

田伯卿，又名田茂春，土家族，生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曾任湘西革屯抗日军旅长。1939年7月22日被国民党一九八师二四四团枪杀于保靖县城北门口。

田伯卿祖居保靖县马王乡夕东村，家境贫寒，世代务农。其父田福喜，农闲时烧烤米酒出售，今保靖还有“金作豆腐福喜酒”之俗语。其母吴氏，保靖县黄连乡盐井人，勤操家务，生子四人，田伯卿排行第四。1907年冬，田福喜到里耶赶场买酒曲，马王乡齐麻子一伙歹徒在芭蕉坪坡上拦路抢劫，向田福喜索取钱物。田福喜不从，被齐麻子用大刀砍死。从此，田伯卿的母亲拖着四个孩子，租种本村田金元的田地，兼搞煮酒磨豆腐，维持生计。田伯卿从小无钱读书，他牧牛砍柴，挑水推磨，饱受劳苦。1912年（民国元年），15岁的田伯卿跟鲁机匠学手艺，从师两年，学会织布。后来同三哥田茂佃出门做机匠，以帮人织布为业，勉强糊口度日。

1921年暮春，田壳瞎（壳瞎：土家语叫化子之意）要捉夕东村田维佩的儿子田茂高。田伯卿闻讯，劝田壳瞎不要“吊羊”，田壳瞎还是不听，仍将田茂高捉走。尔后，田维佩诬告田茂佃捉走了田茂高。里耶乡乡长将田伯卿捉去作人质，逼他交出田茂佃，乡丁将田伯卿押至野竹坪枫香树时，一个杨姓乡丁将田放走。从此，田伯卿不敢回家，跑到黔东吴鸭客（吴汉章）的队伍里当兵，后

又投靠四川秀山大匪首伍南卿，不久升为连长。1929年，田伯卿带了10多人回到夕东，并与谢老花结了婚。

谢老花，又名谢正英，乳名福香。1904年生于保靖县比耳乡糯里湖塔沙村，9岁失去母亲，与父亲相依为命，开荒种地，守牛砍柴，勉强度日。1923年初，谢老花嫁给了马王的田三喜。1927年，齐麻子将谢老花抢去强住一个多月。谢老花偷偷跑回田三喜家，田三喜不收，谢老花只好跑到夕东下寨田茂明家。田伯卿的母亲听说田茂明养了一个青年妇女，问清情况后，送七升米，托田茂明的妻子王银芝将谢老花收养，等田伯卿回来再说。当谢老花与田伯卿结合后的第五天，夫妻俩就上四川去了。谢老花学骑马、练枪法，闯荡江湖。尔后，她回马王时，腰插两支驳壳枪，骑匹黑骡子，人称“双枪将”。

1930年，田伯卿杀掉了马科坪的田柏周、中溪寨的吴祥喜等小股土匪头目，吞并了几股邻近武装，在马王乡专与乡公所和土豪劣绅作对。乡长彭天威偷偷溜进县城告状，要求县府派兵剿灭，县长汤肇基因征剿不力，被调离保靖。

1938年8月中旬，新编三十四师陈营长到保靖清剿田伯卿，驻扎在马王乡公所，托人带信叫田伯卿去见他。谢老花劝田伯卿不要去，以免上当。田伯卿却说：“我若不去，别人会说我胆小怕事！”田伯卿挑选亲信12人，每人2支枪，去会陈营长。田伯卿带4人向会客室走去，谢老花突然在门口大喊：“田伯卿！田伯卿！你娘从楼上滚下来快要死了，你还不回去看看！”陈营长听到喊声，走出来正要同田伯卿打招呼，田伯卿借此机会转身就走。当他回到家里，见母亲安然无恙，才知谢老花用的是计，便商议遣散队伍。田伯卿只身逃往四川。第二年，田伯卿又返回保靖，招集贾树臣、王必禄旧部，重振旗鼓，每到一地，便抗缴租税、捐款，惩办歹徒。

1936年3月，田伯卿派兵枪杀了给清剿部队带路的吴乾熬等

8人，之后，又枪杀了给清剿部队提供情报的甲长田景谷一家6口人。从此，田伯卿的队伍扩大到500多人。保靖县境西至毛沟、吉峒坪、茶峒，东到隆头、拔茅、比耳、马王、里耶，方圆200里，均属田伯卿的势力范围。中心乡苗民石兴顺、石把祺等人亦举旗革屯，与田伯卿互相呼应。

1937年初，田伯卿在四川省秀山县峨嵋关帝庙与吴恒良、梁明元结盟，号召保靖、永绥（今花垣）的苗民、土家开展革屯斗争。3月，湖南省主席何键派兵镇压革屯军。吴恒良求援于田伯卿，田将吴恒良隐蔽在保靖县卧党利八沟游达召家里，趴了个把月，使吴免遭逮捕。9月28日，吴恒良、梁明元、石兴顺、石把祺、田伯卿等人带领队伍攻打保靖县城。双方激战一场，但革屯军未攻进县城，却占领了水田、中心、葫芦等地。此后，打出“革屯抗日军”旗帜，自称旅长。10月中旬，田伯卿同吴恒良、梁明元率领的川黔湘苗民革屯抗日军在茶峒会合，革屯军指挥部正式委任田伯卿为第一旅旅长。

1937年腊月十六日晚，田伯卿带领革屯军将马王乡公所团团围住，并向守军彭天威发起猛攻。一连攻了三天，因乡公所防守工事坚固，也未能攻进。后来，田伯卿用计把部分守军拉了过来，彭天威见大势已去，只好丢下其父亲，匆忙朝县城方向撤去。这一仗，田伯卿缴获守军38支枪，毁掉了彭天威的小型造枪厂，以及屯务契约和帐单。

1938年3月，陈渠珍任湘西行署主任。4月，陈到茶峒点编革屯抗日军队伍，田伯卿被委任为湖南省新编第三团第一营营长。6月，陈渠珍命令田伯卿营开赴芷江、辰溪、麻阳一带。田伯卿将汉阳枪排、套筒枪排、手枪排留守家园，要谢老花、王必禄带好这些队伍，待受训军官回来后开赴抗日前线。8月，彭天威得知田伯卿离开保靖，便伙同比耳乡利湖村山脚寨向金贵，带领一队团丁向谢老花打来，并占领了马王村。谢老花叫汉阳枪排排长田仁

金驻在马王新街印子屋内，与彭天威仅一墙之隔。9月3日，彭天威的手下向魁友打死田仁金的两个士兵。谢老花听见枪声，带着手枪排、套筒枪排驰援，她身先士卒，队伍勇往直前。彭天威见势不妙，带着团丁逃往拔茅寨去了。谢老花驻进了乡公所，并组织贫苦农民将彭家的油茶籽捡光。

田伯卿自收编后，于1938年古历四月下旬，在保靖隆头开办了一所“军官学校”，培训骨干。学员大部分是原革屯军的下级军官，共55人，还训练号兵10余人。纪律较严，不准学员随便外出。每天清晨6时，号兵练习吹号，学员起床，列队唱《军人雪耻歌》、《牺牲歌》、《救亡歌》。上午学习文化、军事知识，下午操练；空闲时到野外看地形，或搞娱乐活动。但上面不发饷，生活困难，只得在隆头设立税务局，由田茂达任局长。每天按船只载货多少收税，以充军费。遇有鸦片概行没收。这样，学员的生活得到解决。

1939年2月，田伯卿在辰溪、芷江一带剿匪有功，受到陈渠珍嘉奖，并命田部开赴桃源待编。4月，奉命回保靖召集革屯军旧部，命套筒枪排排长田维楚带领148人分乘三艘木船开往桃源。5月13日，田伯卿自带154人分乘4艘木船从隆头顺水而下。当船只行至押麦坪渡口时，胖子嫲嫲（田伯卿族妹）从县城赶来送信，说国民党一九八师二四四团团长覃之斌在保靖河码头布下重兵，要捉田伯卿。田听此情况后，命船只靠岸，夜宿押麦坪场上。二营长王必禄劝田改走陆路，从永绥搭车下桃源，田伯卿不同意。次日，原革屯军旧部的船只快到县城码头时，覃团长的枪兵喊船靠岸，以田伯卿“偷运贩卖鸦片”的罪名，将其关进监狱，其余兵员均充作壮丁，送往王村的永顺师管区。谢老花得知田伯卿被关后，四处奔走，设法营救。

覃之斌将田伯卿关进监狱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捏造不少罪名，要求上司予以处决。7月15日，湖南省第三区保安司令王

时、副司令王协武指令二四四团将田伯卿立即枪决。7月22日，保靖县城龚家大门前，摆一张方桌，上面摆有几样荤菜，田伯卿、王必禄、王必贵三人被押至桌前，执法者令田等喝酒。酒毕，田伯卿将桌子掀倒。枪兵将田伯卿拖至门口阶沿下照相，然后将三人绑赴北门口刑场。田伯卿边走边骂："覃之斌受贿！老子在鬼门关等你和彭天威。"枪杀田伯卿时，田不跪，要求莫打脑壳。结果一枪点心而死。

谢老花赶到保靖县城买了三副棺木将他们收殓，埋在清水江竹篙滩山脚。田伯卿死后，谢老花抚养儿子，于1960年病故。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史委　供稿）

陈汉章其人其事

韩卫贵　欧玉琳　张化云

陈汉章又名岳棍子，小名岳娃崽，清丁亥年（1887年）生于怀化应虎坡（今怀化市泸阳镇和平村）。陈有兄妹四人，他排行老二，少年时家境很穷，其父陈钊以佃田为生，其母操持家务，陈汉章经常帮家里做农活，以维持生计。

家庭的贫困和受强人的欺辱，常使年幼的陈汉章忿忿不平。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看到在当时仅靠劳动是无法摆脱困境的，慢慢地便不甘心于干那又累又脏的农活，开始出外游手好闲、赌钱打牌了。由于经常在外，见识广了，胆子也就愈来愈大起来。有一次，村上有人在附近的溪里用茶枯药鱼，其堂兄陈贵龙到溪边捡鱼时，顺便砍了财主陈永地（又名秃脑壳）田坎上的几根柳枝条。陈永地知道后，硬说这破坏了他家的风水，非要陈贵龙吃一瓢大粪才罢休。受辱的陈贵龙，事后找到陈汉章诉苦，要他替自己报仇。陈汉章听了非常气愤，但想到陈永地有钱有势，也不敢轻举妄动，便与陈贵龙商议，到当时在国民党部队当营长的亲戚陈永龙那里借枪报仇。两兄弟从那里借来两支枪后，一天夜里，乘陈永地不备，将其捆绑到一山坳里，要他交出两支枪和1100吊钱，否则要其性命。陈永地为了保全性命和家产，只好答应照办。这时，陈汉章也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瓢大粪取出来，逼着陈永地吃下，以报堂兄之辱。

第一次捆绑陈永地得逞，不仅出了气，而且还获了利，陈汉

章尝到了干这行买卖的甜头，加上有了几条枪，他的胃口慢慢大了起来。不久，他又绑架新店坪财主张新娃，得钱1100吊。第二年又绑架了石门大桥村干塘的蒋马大，得钱1000吊。接连几次的绑架活动，使陈汉章的胆子越来越大，钱财愈多，威风也越来越大了。不仅过路商贾深怕其害，就连当地富豪人家也慑于其威，不敢轻易与他作对。有些人家为了保全性命财产，甘心情愿替他卖力。于是，他的人枪渐渐多了起来，大约在民国八九年间，他干脆拖队伍占山为王了。

上山为王后，陈汉章拖队出没在泸阳与铜湾的交界山区，以及芷（江）辰（溪）边境等地，时常骚扰百姓，拦路抢劫，奸淫妇女，无所不为。有一年他率部经过泸阳黄花树村的高岩时，将该村的9头耕牛全部抢走，至使该村农户无法耕种，岁末无食，活活饿死20余人。

陈将驻地设在沅水重镇铜湾，在那里拦路设卡，招兵买马，扩充势力。

1921年冬，某部蔡师长率部路过泸阳镇，陈令部下抬着不知从何处弄来的大炮，利用人地熟悉的优势，乘该师立足未稳，将其团团包围，蔡师大败，陈部缴获了很多枪支弹药及钱财。随后，陈把队伍开回铜湾，在新甸用计打败了杨玉卿师。在铜湾龙头庵，陈部又与某部郑吉海师相遇，双方发生激战，陈又缴得不少枪支弹药。经过几次大的胜利，陈的势力大起来了，后来他把队伍开往溆浦龙潭，扩充地盘，队伍发展到数千人枪，他也就自称师长了。

湘西历来被统治者视为“蛮夷”、“匪巢”。民国时期也不例外，只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只好采取“以湘西人治湘西人”、“以本地人制本地人”，“剿抚兼施”的策略。对于陈汉章，唯恐他的势力进一步扩大，以后无法控制，因而只好采取“抚”的办法。1923年前后，陈部被唐生智属下何键收编为暂编第六师，陈被委任为

师长。从此，陈汉章改头换面，从土匪一跃而为正规军的师长。

这时，陈部人枪已达4000余，下辖4个团，各团团长分别由陈渥（系陈汉章堂弟）、熊某、向成祖、李国钧（又名宝臣，石门人）担任，均系陈汉章任命。陈部拥有制造汉阳枪和花机关枪的机器各半座，其军饷一部分由上面发给，其余由地方摊派。陈为了进一步扩充势力，收编后曾攻打溆浦县城，在城内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随后又进军芷江、洪江、会同、靖州、绥宁等县。

陈被收编后，尽力为主子卖命，成为屠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刽子手。“马日事变”后的5月24日，溆浦县党部为了改善与陈部的关系，决定邀请各界人士联合召开慰劳陈部的大会。即日上午，溆浦县城各机关、团体代表和部分学生约百余人，由党务特派员、共产党员刘积成率领，抬着酒肉，放着鞭炮，绕街游行一周，最后来到考棚街陈汉章的司令部，举行慰问联欢。代表们满以为这是搞好军民关系的一个盛会，谁知陈部戒备森严，杀气腾腾，当鞭炮燃放得正烈时，陈的部下忽有人上前踩熄，不准燃放，入内代表也被置于武装监视之下，不许自由行动。陈汉章密令部下，代表们只准进不准出，并假意邀请刘积成讲话。刘讲话还不到几分钟，陈便喝令将到会者一律捆绑。当慰问队与官兵搏斗时，陈率队追至外院，下令用机枪把住门口，向内扫射。十几分钟后，许多代表便横卧于血泊之中。这次遇难的烈士共有30余名。随后，陈又先后到常德、绥宁、长沙等地大肆屠杀，负下累累血债。

其时，全国正处于混乱之中，各路军阀及地方武装势力，都想扩充地盘，壮大实力，以发国难财。1927年8月，陈奉何键之命，驻扎湘西重镇洪江。在此之前，黔阳、芷江等地均被黔军占领。陈决定用武力夺回，乃诈称2万人马分兵进取黔、洪两地。当时驻守洪江的黔军将领尤国才得此消息，自知力量不够，无法抵

挡，即令其弟尤禹九率一营兵力在洪江河东的南岳山一带（今洪江市汽车站附近）阻挡陈的先头部队，自己率领其余人马退守黔城。陈部的副师长陈渥得知敌军计划后，令两个营在岩头湾一带佯作攻取洪江之势，以拖住尤禹九之营，又令两个团的兵力由黔阳沙湾过河，越过土溪，以迫击炮等强火力猛攻尤团在黔城的临时阵地。另派两营直捣黔城。黔军一触即溃，败回贵州。不久，芷、黔、麻、晃、靖、会、绥、通等县尽归陈有。

陈赶走黔军后，将司令部设于洪江，又派兵分驻新晃、通道、溆浦、芷江等重要地段。

陈的司令部所在地洪江，是整个湘西的竹、木、桐油、鸦片的集散地，各处农副产品经此地再沿水路运往江浙等地。因此，来往商贾，络绎不绝。为了方便做生意，当然也为了获得更多的暴利，陈与湘乡巨商李镇湘等在洪江开设了一家大钱庄——谦益钱庄，声称有资金30万银洋，吸引大小商贾在此借贷、存款。同时，为了运输安全，陈在洪江至邵阳的陆路隘口——丝马界、梁山界、雪峰山等地，水路从洪江至常德沿岸的黄狮洞、仙人湾、龙头庵等地，均设有维护站，以便道路畅通。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洪江商业的发展，陈汉章的财源也因此愈来愈宽，暴利日益增多，曾派几百民工将其在洪江获得的光洋运回老家，并专门修建了一栋存放光洋的房子，派人看守。

陈随着根基的稳固，日趋于花天酒地，沉醉于酒色之中，仅明媒正娶的老婆就有11人。他把全部军务要事，均委托其堂弟、副师长陈渥掌握，自己只顾吃喝玩乐，赌钱打牌。当时洪江的十大会馆，为了迎合陈的嗜好，天天邀请他观戏喝酒作乐。巨商、油商还特意在天王庙的风景区修建一座戏台，并在其旁修了一栋酒楼，专门供陈及妻妾喝酒作乐。陈为了走出去威风气派，将原来的警卫换掉，特意从长沙招来八九个模样英俊的男子来替代。每逢外出，陈骑着高头大马，妻妾坐轿随从，卫兵前呼后拥，好不

威风。

1930 年 3 月 23 日晚，陈自湘乡会馆晚宴并看完戏后，坐轿回司令部，有 4 名轿夫和 8 名卫兵跟从，待轿抬至杨家港口时，突然从附近打来一梭子弹，有 2 名轿夫当即死于非命。接着又是几梭子，又有几个卫兵应声倒地。剩下的几个卫兵见此情景，哪里还管得上陈汉章的死活，各自慌忙逃命。幸好这里离警卫连很近，他们听到枪声，急忙赶来，打退了刺客，但陈汉章已身中数弹，奄奄一息了。正在黔城巡防的副师长陈渥闻讯，立即赶回洪江，一面下令严缉凶手，一面派人将陈及其眷属护送往泸阳老家。陈在送往泸阳的途中死亡。

后来得知，刺杀陈汉章的就是其部下李宝臣派人干的。原来，陈李二人都想吞并对方，李便先下手为强，他用封官许愿的办法选了六七个精干之人，要他们提着陈的脑壳来领赏。结果，这位威风一时的人物，没想到会死于自己的部下之手，了却不光彩的一生。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罪恶累累的徐汉章

张永安　邓文海

1952年4月14日，晴空万里。泸溪县人民政府接受广大群众的要求，在浦市清水坪依法公审处决了股匪头目徐汉章。

徐汉章，又叫徐助圣，字明文，生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泸溪县石榴坪人。其父徐扬品有田土16亩半，雇工耕种，另有茶林2亩多。徐汉章从小粗野，一度从父做过岩匠。14岁，跟泸溪达岚车头村张金玉学过裁缝，后来跟浦市陈良彬裁缝参师三年。

1923年，徐汉章丢掉裁缝手艺，到湘西巡防军第一营当兵，混到1927年，湘西巡防军改编为国民党独立十九师，徐在该师警卫旅当排长。1930年，投到泸溪县挨户团团长文一元手下当排长，混到1936年时，经泸溪县县长刘民英委派当了“铲共”义勇队队长。这年11月，徐勾结民团班长向立中（后改名杨云飞）和李子斌，拖走浦市民团35支枪；随后又勾结土匪曹鉴全等，抢走兴隆场民团30支枪。徐汉章带着这些人枪，到处打家劫舍。

1937年上半年，泸溪县县长李振文收编徐汉章的人枪为武装壮丁大队，徐任大队长。1939年，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派徐汉章为湘川公路（沅陵至官庄段）护路大队长，同年7月，改编为新六军五师二团五连，徐任连长。1941年上半年，徐趁去贵州接兵之机，贩卖鸦片。1943年10月，又拖队当土匪，自称“民团”司令；1944年8月，湘鄂川黔清剿总指挥傅仲芳将其收编，徐又当

上了“清剿”大队长；1945年5月，改编为暂编团第二营，徐任营长，并开赴湖北恩施集训。不久，徐又窜回湘西当土匪，出没在泸溪、麻阳两县边境。1947年7月，徐投靠国民党泸溪县党部，当上了区党部头目。1948年成立第十七绥靖公署，徐又混到绥署谍报处第三组当少校谍报参谋。7月间，回到泸溪县义安、爱安、信安等乡，纠集土匪500多人枪，同湘西股匪头目，如辰溪张玉琳、龙山师兴周、永顺曹振亚、保靖贾凤昌、徐雅南、古丈向登南等连成一气。1949年3月“湘西事变”中，徐汉章自称湘鄂川黔四省边区“第三军”军长、泸溪县保安团团长，害得乡里鸡犬不宁。湘西解放前夕，徐汉章又当上了国民党暂编第二军第九师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

徐汉章极其残暴，动辄杀人。他的堂弟徐喜有曾经指责他的暴行，徐即将其枪杀。1938年9月，徐指使匪徒覃文钧等，将爱安乡天堂坡农民陈魁吾的眼珠挖去。1949年，徐又指使匪徒覃文献将合水乡龙舟坪农民向洪云押至达岚坳，用竹片将他眼珠挖去。为了杀人灭迹，徐汉章常将被害人的尸体砍成几块，装入油篓，压上石块，投入深潭。一次，毛坪农民杨昌顶对徐汉章的暴行口出怨言，徐即令土匪将杨绑在树上，徐每问一句话，就叫土匪砍一刀，将杨昌顶砍了23刀致死。徐汉章及其匪部在泸溪县杀死无辜百姓，共达600多人，还杀害我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56人。

徐汉章所到之处，烧毁民房，抢劫民财。1936年11月，徐在杨斌庄、岩头山一带纵火烧毁房屋20余栋。1943年12月，抢劫永兴场曹家村后，放火烧毁房屋14栋。1949年3月，徐匪打进泸溪县城，烧毁县府房屋一栋及大批文书档案。同年4月15日，在和安乡十保烧毁房屋118间。特别是与信安乡张治平火并时，将信安乡、义安乡（今合水、踏虎、兴隆场）等地民房烧毁160余栋，有的村寨全部烧光。据统计，徐部在泸溪县烧毁房屋共计2164

间，害得群众家破人亡，无家可归。

1949 年 3 月，徐汉章抢劫泸溪县城时，劫去银元 1000 多块、金银首饰 50 多两。窃踞浦市时，抢去布匹 120 多匹，缎被面 49 床，衣物不计其数。据粗略计算，被徐汉章匪部劫去的粮食达 64100 多担、金银首饰 170 多两、耕牛 663 头。

徐汉章有一妻二妾，但其到处奸污妇女，罪恶累累。还纵容匪徒作恶多端。徐在强夺泸溪达岚车头向家村张妹时，残忍地将其父母和未婚夫一起杀害。1949 年 4 月，徐在泸溪县城，见田赋处刘某之妻有姿色，便打条子强将刘妻“借用”；他的团“参谋长”陈良富先后强奸妇女 30 多名；抢劫洗溪时，纵容匪徒李祥云等劫走 3 名妇女，都被残害惨死。据揭发，泸溪县的妇女被徐汉章及其匪徒蹂躏的达 390 多人。

1949 年 3 月 2 日，周海寰匪部洗劫沅陵，湘西股匪乘机骚动。3 月 3 日，张玉琳通知徐汉章率部赶赴辰溪潭湾，抢劫辰溪兵工厂。3 月 4 日清早，徐与张玉琳、向遂武、向克武、胡震、石美豪、米家进、刘华峰商议抢夺兵工厂的枪弹。此时，辰溪兵工厂的守护人员早已闻风逃走，徐汉章从兵工厂抢得轻机枪 66 挺、重机枪 3 挺、手枪 54 支、迫击炮 5 门、步枪 2824 支、子弹 82 箱。

徐汉章劫夺上述枪弹窜回浦市后，自称“军长”，辖 4 个纵队。3 月 29 日攻进泸溪县城，首先将县长高开明扣押，抢得县政府印信，缴得县政府步枪 60 支。之后，又迫使高开明电报省府：“泸溪县内治安由徐汉章负责。”4 月初，徐授意心腹王少章送高开明乘船去沅陵，嘱其在途中将高杀掉。待王、高二人去后，音信杳无。不久，县自卫队长杨元玑联络乾城梁光湘部攻打徐汉章，徐退到浦市，此时有人枪 3000 多，所到之处，横行无忌，给泸溪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949 年 5 月，徐汉章同从台湾潜回泸溪的原国民党南京团管区上校副司令陈靖熊（浦市人）取得联系，当张建初的暂九师拼

成后，徐汉章担任该师副师长，陈靖熊任参谋长，该部驻扎在沅陵三角坪和泸溪县城、白沙、浦市一带。这年9月，被我解放军击溃，逃窜到浦市。9月下旬，我解放军解放浦市。11月，徐汉章在距浦市15里的白头溪开会，企图负隅顽抗。12月中旬，古丈匪首张平派“纵队参谋长”李三安到大塘（今属兴隆场镇）与徐汉章密谋，定于1950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攻打沅陵、乾城、辰溪等地。由徐汉章攻打沅陵溪子口，阴谋在浦市阻挡解放军西进，后因张、徐意见分歧，未能得逞。但徐汉章一面向台湾国民党诡称尚有4个团，5000余众和3000多支枪，电报稿是交由龙山师兴周发出的。另一方面，送信与保安团长贾凤昌，约其暗自策应。此时，我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一三九师为了迅速瓦解股匪武装，派政治部谢主任和泸溪县二区副区长郝静恩，在中塘（今属长坪乡）与徐汉章谈判，晓以大义。但徐汉章匪性不改，将我谈判代表劫持。我一三九师和县人民政府当即警告徐汉章：“如不立即放回谈判代表，顷刻荡平匪巢。”徐汉章慑于我军强大威力，不得不将谢、郝两人送回。但徐汉章对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规劝，置若罔闻，继续负隅顽抗。特别是在1950年元月25日，徐汉章部下杨云飞，伙同乾城股匪张跃发共1000余人，在泸溪松柏潭与乾城黄连溪之间的麻窄鱼梁地方，袭击护送货船的我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直属山炮连并从货船上抢走食盐10多万斤及其它货物，杀害我解放军战士多名。1950年3月，在我解放军围剿之下，徐汉章带残匪10余人逃至麻阳县挂角田，与残匪李子斌、李祥云、李少白等30余人潜往石榴坪土溪坳。此后，徐汉章又纠集徐汉南、刘本法等残匪共约200余人，流窜于凤、乾、泸边界。这时泸溪县兴隆场已经解放，徐汉章率150余众在折回石榴坪胡猕冲时，被我军围剿击溃，迫使徐汉章等10余人流窜在泸溪与麻阳边界，后逃至凤凰。旋又逃至乾城狗儿寨。3月29日，在大华乡被我军痛击，徐汉章的右脸被打伤，身边剩下两个匪徒，只得白天潜伏，夜

晚活动。5月13日，徐汉章等三人隐藏在泸溪达岚、合水交界的大岩州山上，当我追剿部队搜山时，活捉两个匪徒。1950年6月初，徐汉章逃离泸溪县境，窜到辰溪县王安坪，找到一个原暂五师的熟人，弄得一张假路条，并将一只金戒指和5两鸦片卖得28块银元，化名“陈秀云”，假装“牛贩子”，窜到晃县又装成“瓦匠”，企图潜伏下来。于1952年元月11日凌晨，终于被我人民政府缉拿归案。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宋占元打家劫舍的十年

张振莘

宋占元，诨名绿眼屎，又名横二佬，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二，大庸县原康中乡四保鱼泉峪（今兴隆乡鱼泉峪）人，生于民国5年（1916年），家有田二石八斗。宋12岁到兴隆徐老四家守马；17岁在石门郑忠国家帮工。不久，以挑棉花、挑盐为业，来往于大庸、来凤、万县等地，常常结伙赌博。抗战爆发后，本地保长张洪多次到他家抓壮丁。一次，把他的母亲促住，保丁用步枪架在他母亲的肩上鸣枪，吓得他母亲昏倒在地，头上碰破一条血口。宋家几兄弟见此情景，十分气愤，加上张洪又仗势强占其弟媳宋二妹，宋占元当即发誓“三个月不杀死张洪，不在世上为人”。遂赴永顺找覃本业家借得连枪一支，乘张洪走亲戚回家时，拦路设伏，将其杀死，并夺得短枪一支。于是从1940年起，宋占元便上山为匪，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

国民党政府搞剿匪“招安”，实际是招匪封官。匪枪愈多，官就越大，宋占元懂得此中奥秘。他曾于1941年、1947年、1949年三次分别被国民党大庸和桑植县政府以及汪援华的保安司令部“招安”，先后当过县政府直属队分队长和保安司令部警卫大队长，宋乘此机会拖枪，并且一次拖的比一次多。到1949年解放前，宋占元的土匪武装达到160人，有枪116支，其中还有机关枪。他在大庸、桑植、慈利、石门以及湖北鹤峰一带，前后骚扰10年之久，烧杀淫掳，罄竹难书。

宋占元扩充匪势，首先是抓枪。1948年9月到1949年六七月间，先后在慈利三山潭、大庸康中乡八保、西教乡警察所三处抢得4枝枪；1949年6月，抢劫大庸西教乡八保时，将董开文的2个儿子打死，夺得枪3枝；在北镇乡插旗峪抢得陈伯元、陈有生的步枪2枝；在慈利溪南乡夺得“自卫”枪4枝。二、将抢劫所得财物用来购买枪弹。1948年9月，在西教乡桥头抢得桐油1800斤，卖出桐油后买得长短枪4枝；在慈利人潮河抢劫商船，抢得白布120匹，买得汉阳枪4枝；在石门县罗家坪唐家坊抢得马1匹，换得子弹1箱。三、火并土匪，夺取枪支。1948年6月，在大庸义安乡五保与土匪潘新五火并，捉住匪徒7人，夺得长枪4枝、短枪1枝。四、绑票勒索。1949年，在大庸北镇乡把陈新初的父亲陈采亭捉去，要他家拿100光洋赎人，否则要将陈采亭打死。陈新初只得将家中的稻谷、牛和猪卖光，凑齐光洋100元，送到宋占元手里。宋接款后，仍将陈采亭用枪打死；1949年4月，捉去大庸北镇乡板坪的符定轩，勒索黄金2钱赎人；5月间，捉去北固乡八家村孙裁缝的小孩，也索去黄金2钱；6月，又在北固乡宝峰山捉去向家一老妇，勒索光洋160元。宋占元绑票勒索，闹得地方不安，民不聊生。

大庸康中乡曾被匪霸熊海卿把持多年，因熊海卿与股匪相勾结，枪法又好，地主官绅也靠他支持。宋占元伙同匪徒覃德安、覃遵海、熊志卿等密谋，邀熊海卿赌钱，乘机将熊打死。从此康中乡被宋占元等股匪把持。1949年，宋占元等召开乡保长会议，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宋占元占住康中乡三、四保和西教乡四、五保地盘，从这年5月起，每月向各保摊派大米，并侵占西教乡四、五两保的学校积谷60担，用作匪徒伙食。又强迫西教乡乡民每户“借”缴光洋2元购买枪弹。宋占元还怂恿匪徒烧杀淫掳，无所不为。1948年，在湖北鹤峰铁炉乡和湖南慈利三潭抢得的布匹，以及1949年6月在大庸西庸乡夏庄坪

抢得的鸦片，都分给匪徒；1948年冬，宋占元在石门县五离乡强娶一民女，并怂恿匪众在该乡掳抢，奸淫妇女张春妹、吴二姐等15人；1949年7月，在慈利县溪南乡捉去毛姓女青年2人，强行配给匪徒赵疤子等人为妻；他的匪徒彭少卿，在大庸康中乡十一保磨子峪强奸林玉松之妻甄小妹，并将其夺去为妻。特别是在解放前夕，宋占元先后三次抢劫慈利溪南乡，抢得耕牛70余头，烧毁民房98栋，烧死施家3岁小孩1人，捉去毛锡新之子等共15人，打死毛李氏等2人，抢劫棉布120匹、被子100余床、衣服数百套。该乡董家峪口和胡家村两地，有青年妇女30余人被其匪徒轮奸，60多岁的妇女亦难幸免，真是灭绝人性。

1949年，宋占元勾结国民党残余武装陈策勋，被委任为大庸"反共"自卫军团长。解放初，宋扬言要攻大庸城，并破坏我人民支援前线工作。在我解放大军声威震慑下，宋搞假投降，拒不缴出全部枪支，继续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逮捕归案后，又企图暴动越狱。

据大庸县郑有先等105人和慈利溪南乡毛湘村等联名向人民政府控告：宋占元股匪抢劫耕牛计200余头、猪500余头、桐油3000余斤、盐2000余斤、布268匹、衣服粮食无数，杀害唐中田、黄大四、董开文之子共13人，被绑票勒索的30余人，妇女被强奸的80余人，掳去女青年20余人，烧毁溪南乡民屋98栋，受害群众280余家。时值严冬，害得百姓妻离子散，无家可归，饥寒交迫，悲惨已极。1950年4月3日，大庸县人民政府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依法将宋占元予以处决。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十万大山女匪首覆灭记

刘陶尧

十万大山，方圆百里，山峦起伏，谷深林茂，曾是哺育革命的摇篮，也是土匪出没的巢穴。

1950年，十万大山区刚刚解放，人民觉悟还不高，基层政权还未巩固，而隐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便与官僚地主互相勾结，纠集20余股2万多人的散兵游勇、土匪特务乘机暴乱，攻打我区乡人民政府，杀害革命群众。匪首就是韦秀英，即电影《英雄虎胆》中那个女匪首的原型。

韦秀英，女，邕宁县台马大空人，民国初随父母迁南宁当阳街打铁谋生，与张瑞贵为邻，两人从小契合。张投军当上连长后，即与韦结婚。婚礼日，张因军务羁身不便回家，韦只好抱着公鸡拜堂成亲。民国14年，张瑞贵当了团长，在合浦纳陈培兰（又叫豆腐西施）为妾。在军阀混战中，因张瑞贵曾是陈济棠的救命恩人，被陈提为师长，韦秀英夫贵妻荣，迁居广州等地当上了官太太。受到陈培兰排斥而失宠后只好跑到从化官邸，过着寂寞的生活。

1936年，张瑞贵当上了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事紧迫，时局不稳，张便遣其妾陈培兰内迁桂林，着韦秀英退居钦县贵台，困守家业，甘居田园。

抗战胜利后，张瑞贵被蒋介石解职，闲居从化。1948年，蒋恐张投共，命其复出，委予“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张便纠集地

方杂牌军数千人，进驻钦城，1949 年大举进攻十万大山区游击队。贵台之役，被我军打得晕头转向，退驻北海。年末，我南下解放军席卷两广边陲，白崇禧残部争相逃命，张瑞贵自知末日将至，事先委韦秀英在家乡作好潜伏准备，以图东山再起。在北海解放时，张只能只身逃亡出海。

1950 年，外逃在海南岛的张瑞贵，派遣特务李成威持台湾派令潜回大陆，与潜伏下来的韦秀英策动暴乱。2 月中旬，韦纠集匪首黄正球、韦雨庄、朱广畴等数十人，在大寺南间组织“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韦自任总指挥，并定了 3 月 1 日为总暴乱日。是日，长滩匪首杨茂培、官著勋等纠集匪徒 1000 多人，围攻那垦村，杀害我解放军和征粮工作队 41 人。接着在大寺、那蒙、那彭、那思、那香及沿海一带的土匪陆续公开活动。到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韦匪已扩充到 2000 多人，他们到处设卡收税，断绝交通，杀害我基本群众，给钦防人民带来极大灾难。韦匪是个没有文化的平庸之妇，但因她得到台湾支持，加上是个“将军”的夫人，使盘据在十万大山区的股匪不得不将她另眼看待，纷纷率股入伙，甘拜她脚下，以致韦匪很快成为群匪之首。到了 10 月，韦匪竟达 5000 多人，枪 2000 余支，她为了壮大声势、扩充地盘，便将手下的股匪编为 2 个师、4 个纵队、2 个支队，攻打区乡人民政府，骚乱县城，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当时，由于我军兵力不足，进剿顾此失彼，部分区乡政权一度陷于瘫痪，边远山区人民，只有实行各自为战，坚持与土匪斗争到底，保卫新生人民政权。

正当韦匪得意忘形的时候，毛主席两次对广西下达剿匪指示，限于 1951 年五一节前，彻底肃清广西土匪。11 月，广西省委、军区及时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总结前段剿匪经验，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击破”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大力进剿十万大山股匪。在广东钦廉军分区互相配合下，首先堵绝越南去路，对十万大山股匪布下天罗地网。匪首韦秀英对此一概不知，仍

沉迷于酒肉之中。11月下旬，横县、灵山、合浦股匪被我军逐个消灭，消息传开，韦匪人心浮动，何去何从，举棋不定，直至韦匪所属朱广畴被我军消灭后，她才预感末日将至，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2月初，韦匪骨干1000多人，向着十万大山以西方向流窜，企图入越。他们在宁明被我四五二团赶上迎头截击，围于九特、俊仁、大平、公安等地。韦匪多次突围，被歼过半，残匪自知入越无望，便向防城那勤方向回窜。刚到那勤，被我军“五一”大队断其去路，韦匪便迅速占据大包岭高地顽抗，黄昏时匪势不支，向大[illegible]方向逃窜。是夜，我军三营获逃匪情报，由当地区中队引路，连夜向大[illegible]方向进发，12月13日早晨于那厚村将韦匪包围。14日11时，我军展开猛烈攻击，一时枪声大作，一些顽匪转移到另一间楼房负隅顽抗，使我军战士再次出现伤亡，战士郭善林见状，怒不可遏，在密集的枪声掩护下，乘梯爬上楼顶，掰开瓦面投下一捆手榴弹。“轰隆”的一声巨响，烟光弥漫，最后的匪巢开了花。只见10多具匪徒尸首，七横八竖地躺在血泊之中。其中一50岁出头农妇打扮的女尸躺在门坎上，这就是罪恶累累的女匪首——韦秀英。

曾猖獗一时的十万大山股匪，在我军民的大力进剿下，于1951年5月宣告肃清。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大瑶山匪首林秀山

易罵州　黄谷香

1951 年 3 月 25 日，柳州市近 3 万军民在北校场举行公审大会，镇压在大瑶山进行反革命暴乱的匪首——国民党委任的一二六军军长林秀山。这个一生从戎从匪杀人越货，满身血污的土匪头子被抢毙，真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一、少年勾当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林秀山出生于广西鹿寨县雒容乡二兴村，祖籍福建。林秀山 5 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和哥哥林燕山，依靠叔父母抚养。林秀山既没有开蒙读书，又不听长辈管教。到 12 岁时，遂成桀骜不驯、刁钻古怪之顽童，浪迹鹿寨、雒容、柳州一带。

1914 年春节，林秀山在鹿寨甘王庙赌钱，欠下赌债。便溜回岭背村，从姨妈家弄得两个双毫（银币 4 角），赶到东泉买把骨柄的五寸刀，配上皮鞘，捆起时兴的三角黄布绑腿，穿上牛头短裤，渡河到尖山脚隘口，蹲在“鹧鸪塘”的乱草丛中，干起伺机行劫的勾当。

一天，太阳西垂，百鸟归巢。柳州到鹿寨的大路上，商旅正在赶路。一个湖南人，肩挑货郎担，由雒容走向鹿寨，行抵尖山脚隘口，林秀山便手持雪亮的五寸刀，一跃而出，大喝一声：“拿

钱出来"！这个湖南人一愣，林秀山一刀捅去，顿见血流如注，货郎扭摔在一边，林秀山将其东毫光洋、铜板抢走。这个湖南人受重伤苏醒后，自寻草药敷住伤口，死里逃生，到鹿寨报了案。

二、卫弁行径

林秀山杀人越货后，潜逃柳州。这一年，15岁的林秀山投效柳州驻军沈鸿英管带部，充当一名勤务兵。穿上戎装的林秀山更是耀武扬威，时常外出赌博，间或诈骗钱财，肆无忌惮。时值沈鸿英由管带升督带，又由督带升帮统，便提拔林秀山为马弁，充当保镖。

1916年间，林秀山跟随沈鸿英由湘桂边境入广东，沈鸿英部改编为护国军第三军，沈鸿英任军长，林秀山编入军部卫弁排。他恶习不改，涉足港澳，出入青楼酒馆，借端敲许勒索，每驻扎一处，总得千方百计，搞一次化装行劫的勾当。

三、落草为寇

1920年初秋，粤军陈炯明部从闽南奉调回广东，沈鸿英被打得七零八落，溃败星子、连州，部队整编之后，旋奉令开拔湖南永州驻扎待命。时值民国10年春节，沈军与湖南军阀赵恒惕的和战问题，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林秀山跟随在沈鸿英的马前马后，在弥漫战火中疲于奔命，常常出生入死。当时他心中自有一番盘算。春节前后，他结识了湘南匪首陈光忠，他们互相勾结，策划潜往山区要隘，拦劫烟土。1921年1月中旬，林秀山终于串联卫弁排的冯某等5人，挟带驳壳枪10支，每支配子弹40夹，更换便装，深夜从永州西门外潜逃。行约一公里，到一所香磨坊，见一老者，经威胁利诱，给老者5个光洋，强迫老者次日早晨，趁

送香粉之便，将枪弹藏于箩筐底，混过了盘查哨。林秀山等人，持械奔到东安、新宁。后来，伙同陈光忠匪众，窜到武岗山区巴寨，扼守烟商通道，大肆拦劫烟土。由于林秀山气焰嚣张，陈光忠疑虑鹊巢鸠占，一山难藏二虎，逼迫林秀山离开武岗。林秀山带20余人，离开武岗山区，沿着湘、桂、黔边境，经溶江流窜贵州。在湘、桂、黔边区的密林山崖中，林秀山成了有名的头目。此时他已吸食鸦片成瘾，在贵州呆了一年多后，又窜回了广西。

1926年间，林秀山曾向鹿寨镇商会“打单”，要借东毫2000元做伙食，被商会会长张兆卿严词拒绝，为此他怀恨在心。1927年间，广西桂、柳公路开始通车。有柳州朱姓鸦片商人（当时国民党政府对鸦片实施所谓“寓禁于征”的政策），装运一个汽车的鸦片，从柳州运往桂林，途经鹿寨投宿。朱某与林秀山为赌友之交，因而登门拜访。林秀山留餐款待，当晚，他便暗中布置劫车。第二天早上，汽车行到寨沙瓦窑附近，事先埋伏的匪徒开枪拦车，将鸦片洗劫一空，朱某幸能逃脱保全性命。林秀山劫掠大批鸦片之后，流窜平乐、八步一带，出售毒品，获得巨款，大肆挥霍，并增购枪械弹药。鹿寨镇商会会长张兆卿知晓林秀山劫车的底细。为此，林秀山更视张兆卿为眼中钉。1929年4月，林秀山从桂东潜回鹿寨，随带亲信黄奇、丘三、梁木保等，大白天在大码头抢杀了张兆卿。当时的地方政府，无可奈何，未加追究，林秀山逍遥法外。1928年北伐军抵定东南各省，广西政局相对稳定。平乐区民团指挥官尹承纲，曾一度招抚林秀山为连长，驻扎平乐，稽查水远木排。林秀山借端勒索中饱，以嫖赌为能事。在平乐妓馆，以重金赎妓女华氏为妻。后来林秀山又因作恶多端，畏罪潜逃，纠集原班武装喽罗，再度落草为寇，平乐区民团指挥部通令缉拿。

四、逃往香港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命令湖南军阀何键进军广西“讨逆”，何利用湘南匪首陈光忠当先遣司令，长驱直入广西。陈光忠到桂后，寻找林秀山参与其事，后林秀山随湘军直趋柳州。湘军在柳州河南一带，开始与桂军交战。由于地形复杂，不明情况，湘军大败，得林秀山引路脱逃，免于全部被歼。广西当局对林秀山深恶痛绝，悬赏小洋 2000 元缉拿。

1930 年冬末，林秀山的拜把兄弟武馆头目邓宝山，有两个徒弟在贺县八步比武打死人。榴江县府为此传讯邓宝山，这事惹怒了林、邓两人，他们乃纠集匪众，围攻榴江县府。县长毛仲诚仓惶应变，一面防守县府，一面向邻县雒容告急求援。雒容县民团副司令谢映棠率领武装常备队，驰赴榴江县府解围，战斗相持两日，谢映棠被打死。县长毛仲诚幸得寨沙绅耆设法搭救，免遭于难。林秀山匪众泄愤之后，呼啸而去。1932 年 3 月初，林秀山潜回老家二兴村吃喜酒，雒容驻军警卫团团长冯璜得报，决心缉拿林秀山归案，兴师围捕。

黑夜沉沉，雒容城厢营房，一阵紧急集合号声，两连轻装步兵，向二兴村出发。拂晓，二兴村被包围，步兵一排进村搜捕。一个班长带士兵两名，在村犬狂吠中，直抵林秀山住屋门前，匪徒从门缝开枪顽抗，顿时枪声大作，惊醒村民和外来吃喜酒的客人。村中一片混乱，喊声、哭声、犬吠声，响彻山村。那时林秀山随身的喽罗 20 多名，都带驳壳枪，分住林秀山住屋邻近。林开枪打死军队班长之后，指挥匪众将住屋的内墙挖通，用墙泥堆成掩体，与军方对抗。林秀山还在后屋，挖掘地道一条，作好突围的准备。

当时，军队增援的步兵炮排，上午赶到，并调集雒容、鹿寨的民团常备队，以及鹿寨商会的护商队，共约 300 人，加强了包

围力量。

中午，军队向村中高声喊话，命令外来吃喜酒的客人和村民，按指定的通路即刻离村。声言下午就要炮轰全村房屋。但仍有些村民不愿离家。下午，军队向村中发炮数发，但未打中林秀山的住屋。入夜时分，二兴村的周围不远，燃起草堆，蔗楂堆，火光冲天，恍如白昼。

林秀山率匪众于凌晨突围，径向鹿寨山麓逃窜。被突破的这段防线，为雒容县民团副司令何品山防守，何品山与林秀山素有深交，暗中有意放跑了林秀山。

拂晓，军队命令全面缩小包围圈，发动总攻，分四路入村搜捕，结果扑空。林秀山逃窜下范村，离二兴村 10 余里。雒容驻军，很快获得这个情报，连夜驰往围捕。当天傍晚，林秀山在下范窝家吃饭之后，立即转移附近田野稻草堆中歇息。军队入村搜捕，遂又扑空。林秀山在广西难以立足，决计远走高飞，将老婆安顿后，从梧州经广州逃到香港。

五、重归兵营

1937 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当时流亡在香港的林秀山，从香港潜回广西雒容县导江，寻找何次山谋出路。何次山原是广西军阀沈鸿英部下的团长，后任广西平乐区民团副指挥官，旋辞官家居。抗战军兴，广西当局赋予何次山招抚地方势力的责任。民国 27 年春（1938 年），经何次山推荐，林秀山当上柳州师管区补充团中校代团长，驻雒容县招募新兵。三个月后，募集新兵千八百人。7 月间，林带补充团到鄂东战区黄梅、广济等地。当时驻湖北浠水的中央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召见林秀山面谕，将该补充团改隶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第八十四军补充团，交林燕山率领。原该补充团团本部人员，组成鄂东第十二游击支队司令部，升任

林秀山为上校支队司令。令林秀山回广西临桂、义宁两县，招募新兵，分批送往鄂北老河口。民国28年间，林基本完成招募千余人的任务。由于林秀山所部连同补充团的经理工作混乱不堪，于民国29年（1940年）秋，被饬令回桂林办理报销工作。林秀山随即离职，回到老家居住。他由匪而官，名声大噪，自此以后，鹿寨一带的老百姓专称他为："二司令"（称其兄林燕山为大司令）。

林秀山乡居日久，静极思动。于民国31年（1942年）间，到鹿寨强买房屋几间，修建住宅，并且公然开辟赌场，从中抽头。当时政府早已明令禁止赌博，可是地方执政者，慑于淫威，无可奈何。也有地痞流氓甘愿听从林秀山的驱使，从中渔利，无可奈何。也有地痞流氓甘愿听从林秀山的驱使，从中渔利，巴不得接受"土皇帝"的庇护。林秀山长期豢养一帮门客，为其当谋士作打手，称兄道弟，结成一股气势汹汹的恶势力。

抗日烽火弥漫广西后，林秀山欲讨个头衔作护身符。他奔走桂林，拜访桂林区民团指挥官黄绍立老朋友，商量其事。黄绍立即推荐林秀山为该部副指挥官，呈报广西绥署。民国33年（1944年）8月间，林秀山走马上任，由桂林回鹿寨，竖起所谓"桂林区民团副指挥官部"的牌子。

1944年9月21日，日军侵入鹿寨，林的"桂林区民团副指挥官部"在三天前已转移到鹿寨附近的龙巢、大旦、黄豆山一带安营扎寨。鹿寨大部分居民都自动避难于此。林秀山大施淫威，在大旦赌场上，枪杀了谭老五。不久又以"汉奸"罪名枪毙了韦焕枢、罗明。前鹿寨镇长吴某等人，身遭拘禁，形同绑票。弄得人心惶惶。

林秀山手下的联队长黄老七，在龙巢、大旦、黄豆山一带，巧立名目，以所谓子弹费、伙食费、放哨费等向避难群众摊派。

不久，林秀山部转移导江，收容了榴江县驻鹿寨县警武装和鹿寨镇警武装，扩充武力。驻扎象县水晶、桐木一带，在避难区

大开赌场，征收赌捐。林曾以“汉奸”的罪名，先后枪杀苏炳恒与徐祖康父子等人。

林秀山还藉口清查敌伪物资，使用全部武力袭击象县，村民惨遭掳掠。林秀山随即移驻寨沙的古朵、板贡。

不久，林又借端杀害5人，都是慕名前来投靠林秀山的人。其中有个肖明仁，平南县人，原广西绥署参谋处上尉代参谋，其伯父与林秀山有厚交。另一个是平南县知名人士张春如的侄子。总之，杀害他们的目的是为谋夺他们所贩运的手枪和烟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林秀山赶回鹿寨发“接收”财。如鹿寨镇商人李某，疏散前购存洋纱一批，隐藏在家。林秀山竟以敌伪财产为名派人到李某家将洋纱通通搬走，据为己有。

六、流窜瑶山

1949年6月初，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这时，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抵达桂林，召见桂林绥署主任李品仙指示机宜。从速在广西各地收罗潜在势力的战略决策下，林秀山被委任桂绥第二支队上校司令，代号4423（即“秀”字明电码）。林秀山推荐林德奎、黄汉雄为第二支队副司令。该支队编制，相当于三三制的步兵团建制，附有机枪连、迫击炮排、通讯排等。

6月间，桂绥第二支队司令部成立于鹿寨。接着，招募员兵，时经两月，募集千人。其中有土豪劣绅的子弟、散匪头目、失意军人、趋附之徒，以及无知受骗群众。8月间，奉令将募集员兵开赴柳州点验，配发武器装备后仍开回鹿寨，分驻思贤、岭背、二兴、二坪一带乡村，进行一段时间的训练。

秋高气爽的时节，浩浩荡荡的南下解放大军经“衡宝战役”之

后，长驱直入广西，国民党部队望风披靡。

11月初，鹿寨出现从桂林溃退的马拔萃军梁名德团（六八六团）约五六百人，他们佯言无路可逃，只得投靠林秀山部安身立命。不久，梁团跟随林秀山部进行一次所谓战略性转移，从思贤、岭背、二兴、二坪出发，沿鹿寨山麓开往大河、六谷，行程约四五十里。当时遇上了交通警察总队（即军统的特务部队）约千人，自荔浦溃退而来。于是林秀山部、梁团及交警总队纠集一起，由大河、六谷折回鹿寨附近驻地，梁团及交警总队驻洛清江西岸。

11月中旬，解放大军第四野战军天津支队，由黔、桂边境自从江、丹洲直趋柳州。粤汉部队进入桂北，从正面南下指向柳州。22日，林秀山率所部及梁团、交警总队共约3000人，分头转移平山。

林秀山转移平山路经石村的时候，回家与妻华氏商量后事，把所有的黄金白银、港币美钞，悉数交与其妻，让她外逃港澳。并吩咐身边的一个东泉人吴启基跟随华氏照料，吴启基其人，原在柳州开设“建基行”商号，一向与林秀山过从甚密，可称“二司令”麾下的经济走卒。他们便一起经广州潜往港澳。

林秀山部窜抵平山时，与国民党华中长官部恢复电讯联络，接获命令，将林部、梁团、交警总队合并编成第一独立师，任命林秀山为少将师长、梁名德为副师长兼参谋长。并命令他们向北进入黔、桂边境，迂回我天津支队的后方，潜伏待命。

1951年1月8日，林秀山的第一独立师集结平山整编待发。当时我柳北剿匪部队四三八团进行突然攻击，经一个晚上的激烈战斗，林师便全线溃败，伤亡甚重，残部向泗顶狼狈逃窜。

林师溃窜泗顶，尚未喘息，即遭到解放军天津支队的迎头痛击，堵住去路。泗顶战斗开始，林师拟在泗顶附近，依山恃险，负隅顽抗。林秀山亲自指挥师部及所属非战斗人员百余人，速往山上一个大岩洞躲避。泗顶近郊，一时枪声大作，炮声隆隆。林秀

山见势不佳，临阵脱逃，交由副师长兼参谋长梁名德指挥。战斗不到4个小时，原来的交警总队、梁团、尤其是4423部，都被打得七零八落，晕头转向，各自抱头鼠窜。原梁团所部又遭遇柳北总队十四、十六中队猛烈截击，大部被俘，梁名德落荒南逃。躲避在岩洞的非战斗人员百余人，全部投降。

林师残部，先后从泗顶窜回鹿寨石村、龙坪一带，然后陆续东渡洛清江，经导江往象县，向大瑶山移动。林秀山、梁名德及师部暂留石村活动。1950年1月，林秀山在石村接获“桂中军政区”司令王景宋派陶松专送的函电，任命林秀山为“一二六军”军长，邓海山为副军长，古绍雄为师长，令该部活动于鹿寨、象县边境地区。同时，任命潘荣斋为“一二五军”军长，活动于修仁、寨沙一带。覃丽天为“一二七军”军长，活动于中渡、柳城之间的岩场地区。向天雷（何宗超的化名）为“一二八军”军长，活动于柳州、雒容边境地区。由此，桂中地区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十分猖狂。各股匪按自然村定额派粮，定员要人，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鹿寨镇人民政府查悉，林秀山与梁名德隐藏石村的情况后，立即派遣全部武工队，配合当地驻军，连夜驰赴石村围捕。但狡狯的林秀山，当晚已从外石村转移到里石村惯匪梁三的家住宿。驻军包围外石村时梁三获讯由外石村飞跑回里石村家中，背起林秀山亡命奔逃，住在外石的梁名德从梦中惊醒，企图拒捕，当即被擒。

事过半月，林秀山仍潜伏在离鹿寨15里的大汾村，继续进行阴谋活动，造谣惑众，扰乱人心。

鹿寨驻军获悉林秀山住大汾村，次日拂晓前往围捕。部队近村时，被林秀山的了望哨窥见，入村报信。林秀山急忙带领几个警卫向村外奔逃。林秀山急中生智，离村边不远，就地滚下一个牛恋坑，全身浸入污浊水之中，露出面孔，用些乱草遮盖，混过

搜索，又一次脱逃。

林秀山从大汾村脱逃，窜往导江一带，纠集“一二六军”匪众，先后流窜水晶、桐木，仍想执行白崇禧的以大瑶山作为反攻大陆基地的战略部署。

1950年1月，林秀山与国民党“桂东军政区”少将副司令甘竟生取得联系，曾到金秀开会，参加开会的还有国民党四十八军军长杨创奇，平乐、藤县、昭平、蒙山、荔浦、修仁六县清剿指挥部司令韩蒙轩，副司令黄品琼，以及参议员陶国钧等人，他们痴心妄想，企图以大瑶山作为基地，策动游击，负隅顽抗。

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在肃清瑶山外围股匪的同时，相继肃清在桂中地区活动于鹿寨、寨沙一带的“一二五军”匪部，与活动于中渡、柳城之间的岩场地区的“一二七军”匪部，以及活动于柳州、雒容边境地区的“一二八军”匪部，只剩下狡狯的“一二六军”林秀山匪部。他们善于流窜，武装力量较大，出没于大瑶山附近的西南地区，四出骚扰，企图死灰复燃。

1950年10月间，“一二六军”匪部（包括部分交警总队和梁团），已集结2000多人于象州县大乐附近，蠢蠢欲动。剿匪部队获悉情报，立即去了5个连进击，匪部溃败大乐圩，伤亡甚重，林秀山的养子、匪团长林忠发及匪众三四十人被俘，却不见老奸巨猾的林秀山。原来当剿匪部队向大乐圩最后总攻时，林秀山化装老妇，钻进一条大暗沟，沿沟向外逃窜。剿匪部队分头向大瑶山方面追击，并组成一条强大封锁线，封锁流窜大瑶山的林秀山残部及其他股匪。

1950年12月17日，大瑶山的匪首甘竟生、林秀山、韩蒙轩、黄品琼在金秀召开一次支队以上的匪首会议，商讨对付人民解放军进剿的对策。此时，甘竟生在美、蒋的直接指挥下，曾经统一组织和策划过瑶山地区和桂中、桂北地区的土匪暴乱。甘竟生曾写信给台湾的特务头子郑介民吹嘘说，已“率所部转入金秀

'瑶'山基地，策动游击，转战经年……现已扩展五十八个县乡之村长组织，有人枪数万之众。"要求郑转告在香港的国民党"桂东军政区"司令甘丽初"从速返桂主持"，还要求蒋介石"指示机宜"、"予以接济"。

七、落网伏法

林秀山所率残部，在我军民进剿之下，四处挨打，疲于奔命。林秀山一向诡计多端，惯施狡兔三窟的伎俩，一夜转移几个住处，他走遍了金秀、老山、下孟、平竹、罗运、圣堂山等处，剿匪部队紧跟追捕，历尽艰辛。当时虽传出很多谣言，说林秀山已逃出瑶山，但剿匪指挥员没有轻信，断定这些都是林秀山放出的烟幕，认为他仍在大瑶山里。

为了消灭林秀山股匪，剿匪部队布下了天罗地网。将林秀山的外貌特征及活动规律传达到每一个战士，号召动员群众查其踪迹。林秀山藏在大湾村的深山，没吃没喝，饿得骨瘦如柴，靠吞鸦片苟延残喘。他只得冒走漏消息的风险，深夜派勤务兵摸黑下山，到瑶民地里偷红薯吃，瑶民发现红薯地被人挖过，警惕起来，立刻报告大湾驻剿部队。第二夜战士们潜伏等待，果然抓住了一个勤务兵，从他身上搜出一个口袋，装着林秀山的"官印"，证实了林秀山就在附近山里。

大湾驻剿部队的飞行组长孙永富率组员们连夜奔上大山，在深草丛中埋伏下来。进剿以来，他们不知熬过多少这样的夜晚，东方渐渐发白了，眼看这一夜的辛苦又白费了。突然一个战士发现不远处有被人踩倒的野草，立刻跟踪追寻，这时全连的战士都上了山。瑶民们也守在山顶、隘口，扛着粉枪，扬着腰刀，摇晃着小红旗，呐喊助威，只听到漫山遍野一片喊声："不要走了林秀山！"

飞行组长孙永富他们沿着踩倒的野草步步搜索。到了中午，却

又回到早晨发现脚印的地方，再也找不到新脚印了。线索断了。战士们不灰心，不急躁，坚持着饱满的毅力和耐性。

一天晚上，剿匪部队指挥员变换搜索的办法，叫做“以逸代劳”。由一部分战士埋伏，一部分战士举着火把，到山间闹闹嚷嚷的搜索前进，一位副排长忽然高声埋怨地说：“真倒霉，听风就是雨，叫我们瞎搜十几天，林秀山早就跑了，大家回去罢。”战士们随声附和：“早该回去了，走呀”。于是，大家都撤走了。

林秀山在山林间窥见一切，一直伏着不动，四顾张望，一片静寂，方定下神来。此时面黄肌瘦的林秀山，鸦片烟瘾不住饥饿，决定摸黑下山，搞些红薯充饥。他犹恐潜伏哨发现，便弯腰弓背且行且止，刚到红薯地里，突然一声：“不许动！”好似晴天霹雳，四支冲锋枪已对准了林秀山，他手中光亮的左轮枪同时被缴。

“你是谁？”战士们大喝一声！

“我……林秀山，准备……下山投降”。

这是1951年2月26日的事。

林秀山穿着一件国民党军队的黄色棉大衣，下着黑色便裤，拖一双布鞋，背着两张小獐皮，腰带绑着半块烟土，衣服又破又烂，身上被山蚂蝗咬烂化脓了，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已经没有人样了。

剿匪部队专备一艘小汽轮并派一排全副武装战士从导江押解林秀山到柳州专署。

1951年3月24日，柳州专署决定将林秀山示众于柳州市区中心的十字街头，那里放一张八仙桌，上面再放一张靠椅，林秀山就坐在椅子里亮相。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男女老少都想一睹这个著名匪首的真面目，围观人群络绎不绝。

次日午前，人民法院将林秀山押赴柳州市北校杨（即今五一广场）公审。公审大会人山人海，热闹空前。

柳州地区所辖鹿寨、忻城、象州、武宣、来宾、融安、三江、

金秀等8个县都有代表参加。公审大会开始了，林秀山跪在台上，苦主们愤怒控诉了林秀山的种种血腥罪行。最后宣判枪决，立即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办　供稿）

“大天二”萧天祥

林　中

萧天祥是中山县（今中山市）二区大涌南文乡人，幼年丧母，以贩卖鲜鱼过活；同时也染上赌博恶习，与赌徒为伍。当年反动政权名为禁赌，实则地方军警包赌收规，萧天祥就做了他们的爪牙，混迹赌档代收赌规。也和鸦片私枭走运鸦片。他生得獐头鼠目，诡诈多端，少年时就进了所谓捞仔的坏人流类了。

1939年抗战初期，中山社会状态极为动荡，治安骚乱。大涌圩为二区下十乡的圩场，每逢圩期，赶圩的人，极为挤拥，偷窃掠夺之事常有，故地方商会，就在“自筹自卫”的名义下，组织了一个自卫队。由恶霸萧仲达出任队长，萧天祥为副队长，他凭借萧仲达的力，就结集匪类，横行乡曲。

1941年县境沦陷。有名萧东利者，凭借敌伪势力，也取得了自卫队名义，刺杀了萧仲达，占据了大涌圩。萧天祥得到土劣支持，就结集队伍，将萧东利驱逐，于是升充了自卫队长，还兼任了南文乡警长。但这次火并，大涌圩的店铺，多被其乘机抢掠。

萧东利被驱逐，当然不甘心，就向日伪报告，指大涌圩被游击队盘踞，并诬指几个土豪劣绅为游击队首领。日军就来圩扫荡。萧天祥预先率队潜匿，日兵在圩饱掠一顿，率队返岐，仍然指名捉拿萧天祥。

萧天祥为了能在大涌立足，就通过汉奸，投靠日军，由伪军收编为大队长，驻扎在对海湖州乡沙茭村，派队分驻大涌圩。同

时嗾使各乡坏人掠夺各该乡的自卫枪械，纷纷成立中队和小队，组织基本队伍。有个萧景兆浑名“死唔去”和一个李权浑名“哪吒仔”，为他的得力助手。

这时萧天祥借敌伪势力，开烟开赌，包私走私，打家劫舍，无所不为，孽钱到手，大购枪械，一、二两区群众都知道有萧天祥这个坏人了。因其作恶多端，受害各乡纷纷向敌伪控诉，他知道情势不妙，于是就重新投靠国民党。

当时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书记叫萧秉孺，是萧天祥的同族兄弟，萧天祥借金钱力量，买通萧秉孺，以“策反”的名堂，招纳了萧天祥为国民党的“别动队”队长，他得到这个护身符，就率同喽罗逃回大涌圩活动。这时大涌圩没有其他部队，南文乡的警长萧照，浑名贼公照，原是他的爪牙，故他在大涌圩称王称霸，人莫予毒了。

国民党的别动队，有所谓捉拿汉奸的任务，萧天祥就拿这个名堂向各乡群众诬陷勒索，被害者无门控诉。

第一区属的渡头乡，为雷姓聚族而居，乡中以华侨眷属及妇女老弱者为多，经济比较殷实而自卫力薄弱，故惹起萧天祥劫掠的念头。于某一黄昏之夜，借查缉汉奸之名，率带喽罗几十人，将渡头乡包围，向富有之家闯进，肆行搜劫，饱掠之后，呼啸而回大涌圩；将劫得的金钱钞票，首饰细软，按份瓜分，其他的衣物、时钟、留声机、衣车等公然摆在大涌圩拍卖。闻他分赃的方式，以人和枪分别计算。按人则领队占三份，头目占二份，喽罗一人一份；按枪则驳壳、左轮占两份，长枪占一份。萧天祥出枪最多，且是首领，所占特别多，共分得孽财有五六千元。他就大购枪械子弹，势力愈加膨胀。

中山沦陷后，国民党组织有所谓抗日游击队，名为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以袁带为司令，其下设有支队，各占地盘，以迫勒掠夺沦陷区的人民。

中山县长孙惠长支持萧仇在二区占踞地盘，组织第六支队，萧仇为支队长。二区以黏角为上方，沙溪圩各乡为中部，大涌圩各乡为下方也称下隆都。下方有广阔的沙田区名为“三沙”收益最大，以安堂林姓最接近，向受林姓绅耆的统治把持。萧仇组织支队，就先收买萧天祥为支队附；以林焕棠为第一大队长，萧志雄为第二大队长，刘敏德为第三大队长，在大涌圩设立支队部。当时虽挂起招牌，组织队伍，但不能任所欲为。因三沙（包括芙蓉沙、广福沙、附祥沙）这个地区，共有五六百顷沙田，向为恶霸林敏雅（占前历任护沙大队长，民军营长）所盘踞，林虽逃赴澳门，但派有爪牙梁有为自卫队长。

萧仇、萧天祥为扩展六支势力，认为必须夺取三沙这个地盘，于是日夜筹维设计。萧天祥自告奋勇，愿领队攻打三沙。除自己基本队伍外，并由萧仇将特务中队和第二大队一部分人马，集结了百余人，统交萧天祥指挥，负责战斗。萧天祥就配置队伍，分三路潜入，将炮楼和沙勇驻地包围缴械。经过一时的小接触，就攻占了这个大沙区。于是挨家逐户，尽情洗劫。农民的财物衣被和猪鸡鸭鹅以及粮食，均是他们的胜利品。并大酺三天，庆功行赏，除由萧天祥配置自己直属队伍，留守布防外，全部呼啸而返大涌圩。

这时萧天祥就进而把林焕棠的第一大队长取而兼代之，其势力已笼罩下隆都全部地区了。

再说三沙地盘向为萧、林两族所角逐，那族占领，就意味着两姓势力的消长，故三沙的争夺，也可说两族土劣的斗争。这个有利条件，就造成萧天祥恶势力的巩固和膨大。萧族的土劣就大力支持。

有一个任过李济深时代的工兵团长萧祖强（解放后被镇压）和一个任过十九路军旅长萧祖（解放后逃港），在沦陷时期，无所依附，因萧天祥夺得三沙，认为可分杯羹，就逃回大涌，投靠萧天

祥，帮助萧天祥组织队伍，参赞一切掠夺计划。有了这两个反动老军官的帮助，加上有人和有钱，萧天祥就成了“大天二”（粤语“土匪”之意）的突出人物，其势力由二区伸展到五区。萧天祥势力的膨胀，也巩固了萧族土劣支配三沙的统治权。三沙的农民，受到土劣踞耕夺耕，低租强佃，低价强买谷物的种种剥削，苦难愈重。

萧天祥以一个乡村流氓，不数年间，掠夺了几十万元的财富，就在南文乡景泰街建筑了一座三便过的两层洋房。门前有一片广阔地亭花圃，瑰丽堂皇。屋内中西家具，酸枝梳化，应有尽有。在家内设有鸦片烟具，长年供给萧祖和乡中绅士享用消遣，日夕聚集了一班土劣，以树声威。并娶了一个华侨的女儿为妻。

在新居落成，举行婚礼时，三山五岳人马，以及县长张惠长、司令袁带也致送贺礼，派代表到贺。萧天祥搭了彩棚，借了南文小学校和祖祠摆酒三天，雇请石岐和沙溪圩有名厨师为之治馔，每餐几百桌，供奔走的小厮也有百数十人。各乡土劣、私枭贩子也奉承恐后，纷送贺礼。这次所收礼品，折合现金，当逾万元，其豪华概可想见。从此他就交游广阔，臭名远扬。“老天”（萧天祥的代称）这个名堂，通行于一、二区和三区、五区一带，什么事情都可通过。

以杀人抢劫起家的萧天祥，除了上述两次大劫案外，杀害勒索事件，可说是罄竹难书。他曾派了一个小队长叫萧照，浑名“贼公照”者，兼任南文乡警长，征收保护费，看守禾田、果木园地，如有被窃，要照价赔偿。在沦陷时期，人民流离失所，米珠薪桂，尤其是1943年旱灾，饿殍满途，群众在饥饿痛苦下，为救死计，被迫在园地掘取一些果实和薯芋充饥。如被地主告发或被拿获了，萧照就报告萧天祥，他就一句“浸左佢”或“做瓜佢”，贼公照就奉行唯谨，将之杀毙，或投之海中，坠以大石浸死。被杀害的老弱和妇女，无从统计。故二区下方人提起这个贼公照，无

人不切齿痛恨，这实是受萧天祥指使，否则，在萧天祥的辖地，以一个小小警长，怎敢任意杀许多人呢？尤其是杀害青年，当时有曾任过二区周崧学校校长周守愚之子周某和一个梁姓青年，因好读比较进步的书报刊物，被萧天祥爪牙发觉捕获。知到周、梁两人家庭是有钱的，以为可以勒索一笔巨款，就把他们释放。谁知周守愚恃着自己是反动集团中人，以为通过人事关系，就可把儿子保释。萧天祥见到没有油水可获，就将这两个青年指为共产党杀害了。被诬指为共产党而遭杀害的青年，不止周、梁二人，这不过其中的一个事例而已。

战后，受过萧天祥荼毒的群众，以为是伸冤雪恨的日子来了，于是渡头乡人被劫害的、三沙农民被掠夺劫杀的，以及被诬杀的青年家人亲属、因饥饿被杀害者的家人亲属，都纷纷向广州行辕张发奎和省主席罗卓英处控诉，张曾密电驻中山的六十一师师长刘绍武，将萧天祥拿省究办。

萧天祥在抗战结束后，早知自己罪恶滔天，不能见容于乡人，预将队伍交由萧祖之弟萧官伟（解放后被镇压）改编为护沙第三大队，以保存势力，自己退居幕后，操纵把持。这时萧仇已由中山县长张惠长委充为警察局长，就请他在刑警队任组长，收罗其爪牙为刑警队员，住在石岐孙文中路一间商店楼上。刘绍武就派队按址将其拘捕。这时萧仇也恐受株连，辞职逃往香港。于是萧天祥被解赴广州行辕军法处审讯。

萧天祥被捕后，他的家人和党羽，赴省向萧祖和萧祖强请求设法营救。他们两人早胸有成竹，告诉萧天祥的家人不要惊惶，只要筹备金钱财物，便有办法。因他们和行辕的办公厅主任冯次淇是同学同事，就先向他搭通路线，进行贿赂，代向军法处行贿疏通。但在光复初期，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尚有些顾忌，虽受了贿赂，仍不敢遽然将之释放。拖延了几个月，适宋子文来粤代替张发奎，这时军法处趁人事更动之际就向萧天祥家人再行勒索巨贿，得到

满意后，把萧天祥的案件指为普通刑事诉讼，不属军法审理范围，转移广州地方法院审理。这样替他减轻了罪行责任，事情就好办了。之后，萧祖又代请律师，并向法官进行了贿赂，轻轻的判了他二年有期徒刑，缓刑一年。他这时被扣押了将近一年，就当堂觅保释放。他被释放返乡，就摆酒酬神，热闹如昔，慢慢的再施毒手向三沙农民，追勒索偿其诉讼的损失！

1946 年孙乾接替了张惠长为县长，筹备改选参议员，萧天祥又借金钱的力，活动起来。在三沙组成了一个所谓“农会”，选出萧祖强为县参议员，一则答射他营救出狱之恩，再则借以巩固在三沙盘踞的势力。又出款帮助萧仇组织全县的所谓“渔会”，也选出萧仇为县参议员。他自己则在势力范围下的南文乡，选出为县参议员。三位一体，朋比为奸，通力合作向三沙这个地区和全县的渔民以及南文乡进行压诈凶狂剥削，虽为时不及四年，又脑满肠肥，偿其大愿。

1949 年解放前夕，反动政权已危如累卵，岌岌不可终日。但广东反动统治阶级，为垂死的挣扎，仍指使各县的喽罗，组织反抗解放战争的地主武装团体，名为“××县民众自卫指挥所”。中山县的指挥所由屈仁则主持，石岐和各区也设立分支的机构，委任一个主任，组织地方反动武装与人民为敌。萧天祥就借这个机会，贿通屈仁则委任为沙溪民众自卫指挥所主任。于是凭借这个伪职，又来向沙溪圩和民众各乡进行讹诈勒索，责令出枪出钱，刮最后的一次“大龙”。

这时有人估计过他新旧掠夺得来的财产，有座落在三沙和竹排沙的沙田 10 余顷，座落南文乡三面过大洋楼一间，大涌圩铺业三间和所投资经营的商店资本合计，约达百万元。现款和首饰珍贵物品，尚难估计。以一个地方流氓，在十年间，追勒剥削和杀人抢劫种种罪恶的巨大，也实足惊人的。

（广东省中山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回忆四十年代初湘西剿匪

张文调

抗日战争初期，武汉、宜昌等地相继沦入敌手后，重庆与内地的水路交通中断了，全靠川湘公路运输，但这一带匪情严重。在此之前，蒋介石为了确保重庆安全和运输畅通，曾成立了鄂湘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以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为主任，绥署地址设在湖南芷江县城，剿匪以湘西为重点。谷氏调走后，成立了鄂湘川黔边区南区与北区两个清剿总指挥部。南区总部地址仍在芷江，北区总部初设在龙山县城，旋改迁永绥（今花垣）县城。南区的总指挥为毛炳文，北区的总指挥为郭思演。不久南区撤销，统归北区管辖。我于1940年春至1944年夏郭思演调往湘谷转运处时止，任该总指挥部军法官、军法处长等职，现就记忆所及，把当时的剿匪情况记述如下。

郭思演到任之初，设总指挥部于湖南龙山县城，后嫌交通不便，而改迁至永绥县东门外的3个山头上，中间的文昌宫为总部；左侧山头为天王庙，驻特务连；右后山头驻运输队，成犄角之势。由运输队驻地右出至总部，为悬崖峭壁，形势险要；特务连驻地旁的山脚公路，左往保靖县，右出永绥县城东门到西门车站，直通乾城（今吉首市）、泸溪、古丈、沅陵等县，即为川湘大公路。

郭氏上任后，想有所“作为”，但无嫡系部队，所供指挥者以辖区内的专署、县的保安团队为主，这些团队一向军纪不严，被人指责为成事不足，扰民有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虽有明令规定，

凡在剿匪总部辖区内的部队，均暂归总指挥调遣，但此等部队仅在其驻地范围内负剿匪之责，其他概不受命。

郭氏因实力不足，于是制定了剿匪的八字诀："剿抚兼施，恩威并重。"而实际上他是以"抚"为主的，自以为省力。其时驻防永绥县内外的军队，仅有一一八师的一个团，团长向某为本地人，熟悉情况。郭以机不可失，遂召向团长面授机宜，要他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与各股匪取得联系，晓以"利害"，如能缴械投降，则既往不咎，并确保其生命财产安全。向团长受命后，极为卖力。不久，贾凤昌（绰号贾辣子，有名的神枪手）、白三等大小匪首14人，陆续由向团长率领到总指挥部投诚。郭氏随即报请重庆军委会处理，旋奉指令设班训练，于是便在天王庙特务连驻地开班训练他们写字认字。训练班原定一个月结束，郭总指挥认为他们的"匪性"不易改，又延长一个月。在第二个月的某天午睡时间，白三竟偷偷出去在总部山后隔河的保靖县境，指挥其原部属，抢劫行商财物，为总部侦察小组发现，但我们秘而不宣，以观其后。此事发生后的第三天，郭氏奉重庆军委会密令，准备将他们全部杀掉。匪首14人均住在天王庙左侧无房门的一间长房子里，平时值勤人员每晚均须进房查点；郭氏深思熟虑后，认为将他们一一捆绑，枪决示众，用人太多，恐有不妥，遂决定于某日凌晨3时，匪首熟睡之时，派两个随从卫士用驳壳枪把他们打死。岂料那机警过人的贾辣子，一闻急促的脚步声走近房门时，立即从床上拼力推开一尺多厚十字砖砌的花窗，一跃而出，周围警戒的士兵闻声即密集射击，结果他仍逃脱了，其余13人被射死于床上。天亮后，我们通知死匪家属（这些人的家属，于各匪首缴械投诚后，均被接在永绥城内居住，以便易于看管），到天王庙领尸掩埋，结果无一人肯领，听从总部派人掩埋。特别是白三的尸体，当其年轻的妻子认清后，用脚尽力在其面部胸部等处连踩十来下，并对在场的人哭诉其被白三蹂躏的痛苦经过，并说：他一见到女人即魔鬼

般地死抓住不放；他还是个每天都要抽鸦片八钱至一两的大烟鬼，如今他犯了法被处死，我从此可恢复自由了。

此后不久，向团调离永绥，归回建制。郭总指挥遂调江防总队长唐静海率所部4个大队接防永绥县城。

匪首被处死后，谣言满城，说四省边区的各股土匪正在集结，拟于日内攻打清剿指挥部，替大哥们报仇等等。总部遂日夜加强警戒，以防不测。10余天后，在乾城的国民政府委员柏文尉登山看望郭思演，并替贾辣子说情，谓此人早下决心洗手不干恶事了，老夫担保其不再干坏事。郭氏除请柏老对贾严加管教外，还郑重地说："既然柏老说情，郭某敢不从命？"两日后贾拿着柏盖了私章的条子来总部，到军法处办理自新登记。以后，我曾数度传叫贾，问其怎么脱逃及其以后的情况，他说："那晚我就觉察到连部比平日紧张些，邹连长又说次日早晨6点钟，一一八师师长要对我们训话，今晚你们早些睡觉，明早一定要打起精神听训，并谓连部的闹钟恐怕走时不准，要我选两个好表借他对时，这些都引起了我的疑心，但又不敢对我们的人说，恐怕惹出造谣惑众的大罪来。所以那晚我通宵睡不着，及听到急促的脚步声走到门前，我心想大祸临头了，便不顾一切在床上推开窗子，拼力跳了出去。到天大亮时，约跑出20里路，躲藏在一家茅屋里，屋主认得我，他不敢出声，我坐下来数了身上中了6颗子弹，此时才觉得痛，但都不是打在致命之处，不多久房东请来一位草药医生，把6颗子弹头都取了出来，我当时想自己是真心实意投诚自新的，我们中定有人又做了坏事，才遭到这样的下场。"略停了停，他继续说："从那天后不断有人（指他的匪友）来找我，有的还主张攻打总指挥部，要替死者报仇雪恨，我都一一说服了他们，说总部地势非常险要，后面是悬崖峭壁，且有一条小河隔着，前面的路也很狭窄，周围的山无路可爬，左侧山头的天王庙，又驻有总部特务连，如果贸然攻打，那只有白白送死！"

上面的一段话，透露了邹连长因贪财（两个好手表）而泄露了机密，郭总指挥闻悉怒不可遏，将邹撤了职。从那以后，四省边区的大小股匪，都有明显敛迹，曾有两小股土匪因无立足之处，自动携械投诚自新。湘川公路上，抢劫商旅，杀人越货的事，也比较少了，交通暂时得以畅通无阻。

1942年春，四省边区南区总部奉命撤销，人员业务归并北区总部，合并后总指挥部改设在芷江县城，仍由郭思演主持。芷江防务由宪兵团长郭文灿担任，并令其率保安团队清剿芷江、麻阳、黔阳、晃县、怀化等县的残匪。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扫灭湘匪十八万

黄远炽　王吉云

解放前，湖南是全国匪患严重的地区之一，尤其以湘西最为突出。国民党反动派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对土匪采取怀柔政策，更加助长了湖南土匪的嚣张气焰。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后，又广为收罗湖南的土匪武装。蒋介石亲自写信要湘西匪首陈子贤“坚持游击战争”。他还指示湘鄂川黔边区军政长官宋希濂，将湘西地区的大股土匪武装整编成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将一批匪首委以“司令”、“军长”、“师长”等职务。1949年7月，白崇禧又带着10万银元和大批枪械，亲赴芷江，收买湘西土匪，妄图变湘西为“反共游击根据地”。据统计，解放前夕，全省境内的匪特武装(含国民党军反动地方部队和部分残余武装)约18万余人，百人以上集股行动的土匪就有170多股。土匪武装盘踞着湘西广大地区以及常德、邵阳、郴州、零陵、湘潭等地区的边缘地带，严重地阻碍着湖南人民解放事业的顺利发展。

长沙和平解放后，成立了湖南军区（由十二兵团兼）。军区领导认为湖南各地解放后，肃清盘踞各地的土匪武装，乃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关键。同时，制定了“军事清剿、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和“执迷不悟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剿匪政策。

在中共湖南省委统一领导和湖南军区组织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四十七军和湖南军

区地方部队以及广大民兵投入了剿匪战斗。经过1949年的初步进剿，1950年的全面进剿、重点清剿、边缘地区会剿等大规模的军事进剿，以及随后深入开展的肃清残余匪特的斗争，终于彻底消灭了全省境内的土匪武装，根除了湖南历史性的匪患。

一、1949年解放湖南过程中的剿匪斗争

1. 进剿长沙、常德、益阳地区股匪

七、八月间，湘东北解放后，长沙、常德、益阳地区还有2万多土匪和国民党杂色武装盘踞在山村、湖汊，骚扰抢劫，破坏交通。湖南军区决定以一五九师、一六〇师、一六五师及“冀南南下支队”一部，分别组成长沙、常德、益阳三个军分区，迅速展开对土匪武装的进剿。

8月10日，一五九师奉命组成长沙军分区，迅速作了剿匪的部署和准备。14日，四七五团二营首先向活动于湘阴东港、茶壶潭一带的“湘鄂赣人民反共自救军”第三纵队万少鼎部200余人奔袭，战斗4小时，全歼该敌。16日，四七五团六连奔袭岳阳小字洞李高峰股匪，予敌重创。李率残部窜至平江沙田铺一带，被我四七六团三营追击歼灭。18日，四七五团一部于湘阴锡安乡歼灭了刘铁峰匪部。至9月初，经过10余次战斗，基本上歼灭了湘阴、岳阳两县境内的股匪。随后在保证重点进剿的同时，开始对长沙、醴陵、湘潭三县土匪的全面进剿，至10月中旬，股匪全部被歼。

9月12日，一六〇师与“冀南南下支队”一部组成常德军分区后，会合我省洲击队湘西突击总队，占领了滨湖各产粮区。随即派四七九、四八〇两团进剿土匪武装。9月30日，四七九团主力奔袭桃源三板桥吕春初匪部，经过20多天的战斗，歼匪1500多

人，并争取了吕春初、余千伍、郭武生、罗聿奇等股匪1380多人投诚。

与此同时，一五九师、一六五师各一部组成益阳军分区，同“湘中游击队”第一、三支队进行了合编。随后以3个团的兵力向安化、湘乡边缘以及雪峰山区尹立言、周永池、王逸之、朱世奇等股匪进剿。同时，分布在各县的部队进剿散匪。经过半个月战斗，歼匪40余股，共计4400余人。

湘东北地区从7月开始进剿，到10月底止，共歼匪12900余人。10月下旬，湖南军区召开长沙、常德、益阳军分区军政干部会议，总结前段剿匪经验，强调“为顺利而迅速消灭匪患，必须将剿匪、反霸、发动群众结合起来”，“造成群众性的剿匪运动”。

会后，常德军分区集中四七九、四八〇两团向匪情严重的慈利、石门开展军事进剿，消灭了蒋维新、向应东、陈金次等股匪2000余人。长沙、益阳军分区部队就地展开政治攻势，号召匪徒交枪自首，对执迷不悟之顽恶匪首予以军事打击，并发动群众检举藏匪、窝匪、资匪者，争取了一些匪首向我投诚。到12月底，湘东北三个地区，除常德、慈利西部外，其余地区的股匪已基本肃清。

2. 湘南剿匪

1949年10月中旬，衡宝战役结束后，湖南广大地区基本解放。湖南军区先后以一六二、一六五、一六〇师为主，同湖南游击支队会合，组成衡阳、邵阳、零陵和郴县四个军分区。当时，湖南地区匪特武装有5.4万余人。

11月上旬，我一五八师（缺一个营）和邵阳军分区基干团4个连、独立团5个连的兵力，对盘踞于邵北地区的国民党“新八军”尹立言部进行大合击。11月4日，四七四团由南阳桥出发，先后在蓝田、丰山岭歼灭尹立言指挥部及其第六团400余人。与此

同时，我四七二、四七三团将盘踞于太芝庙的敌人全部击溃。11月6日，各路进剿部队合击孙家桥周围几十里地区土匪。由于部队行动被土匪发觉，土匪分散隐藏起来了。于是部队就地展开，封锁要道路口，进行搜剿，并结合以政治攻势，至13日，捕获了尹部第一旅旅长杨熙政以下300余人。15日，我军又以一部合击板子山地区股匪，歼敌180余人。

为了加强剿匪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四十六军留在湖南。11月18日，四十六军在衡阳召开衡阳、邵阳、零陵、郴县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和地委书记会议，决定成立湘南军政委员会和湘南剿匪指挥部，四十六军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分别担任湘南军政委员会正副主任和剿匪指挥部正副指挥。11月21日，湘南剿匪指挥部命令各军分区于12月底以前，消灭本地区200人以上股匪。指挥部直接组织指挥了嘉（禾）蓝（山）临（武）役和隆回战役。

嘉禾、蓝山、临武一带，当时活动着“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王春晖统一指挥之下的1.3万多人的匪特武装。为了消灭这股匪特武装，湘南指挥部派出了一三六、一三七两个师和郴县军分区部队共2万多人，采取外线包围，内线进攻的战术进行围剿。

郴县军分区部队担负东线包围，一三七师担任西线包围，一三六师担负正面突击。至12月15日，共消灭王春晖等土匪武装1.2万多人，解放了嘉禾、临武、蓝山、江华4座县城。

在嘉蓝临战役开始的同时，我军一五八师及武冈独立团一个连向盘踞在隆回附近的陈光中、贺幼农、胡锡、刘建章、袁庆光等股匪4000余人发起进剿。

11月28日，四七四团由新化出发，奔袭陈光中匪部。29日7时在水车与陈光中匪部展开激战，贺幼农匪部闻讯由文田增援，遭我军猛烈阻击。经过半天激战，消灭贺匪两个团全部及陈匪一部，共800余人。贺匪另一团向西北方向逃窜，陈匪残部向冷溪山、黄泥井方向逃窜，我军跟踪追击。于12月4日在容溪将残匪

全部围歼，并在武冈科书村活捉了陈光中。

一五八师之四七三团和四七二团一个营，沿邵（阳）安（江）公路进至桃花坪、黄板桥地区进剿胡惕等匪部，经几次合击，歼匪300多人，胡惕率小股残匪逃跑。

隆回战役至12月10日结束，共歼匪2600多人，刘建章、邓耀楚、刘科怒等股匪700余人向我军投降。

3. 湘西剿匪

湘西是湖南省匪患最严重的地区，全境有土匪武装10万之众。1949年9月，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保证南下大军侧翼安全，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命令第四十七军归十二兵团和湖南军区领导，“进驻湘西，经营湘西，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彻底肃清匪患”。四十七军接受任务进入常德一线后，首先以一三九、一四一两个师歼灭了盘踞大庸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二二军5000余人。

10月上旬，二野大军由常德、桃源地区，沿湘黔公路和沅水两侧南下，沿途歼敌8000余人，并解放了沅陵、泸溪、辰溪、溆浦、怀化、麻阳、芷江、会同、靖县等10座县城及官庄，榆树湾、浦市、高村、江口、烟溪、底庄、安江、洪江等市镇，打通湘黔、湘川两条公路线，开避了进军川贵的道路。四十七军随即进入沅陵，成立湘西军区，先后收降了“绥保守备司令”聂鹏升、暂编第一军副军长汪援华等部1.2万余人，争取了陈渠珍部起义，一度稳定了湘西局势。后来四十七军奉命以两个师配合二野入川作战，湘西土匪又嚣张起来。鉴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交通，支援进军西南，湘西军区直属队和一四〇师对公路两侧的杨永清、张玉琳、宋官荣等股匪开展了重点进剿。至12月，共歼灭土匪1730余人，争取了7400余人向我投诚。此时，除沅陵、芷江公路两侧一部分中心地区为我军控制外，大部分地方还被土匪盘踞着，斗

争形势仍然十分严重。

二、1950年春季的全面进剿

1950年1月，湖南省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指出：剿匪是当前的中心环节，必须动员全省人民协同部队迅速消灭土匪。军区决定以四十六、四十七军和二野驻湖南的一一四师，以及湖南地方部队共20多万兵力投入剿匪作战。四十七军主力于1月上旬由四川返回湘西后，即全力以赴投入湘西剿匪战役，并以一三九、一四〇、一四一师分别兼沅陵、会同、永顺军分区，积极建立地方武装。四十六军负责湘南剿匪任务，统一指挥湘南的衡阳、邵阳、零陵、郴县军分区的剿匪。湘东北的长沙、益阳、常德军分区的剿匪由军区直接指挥。

1. 攻克八面山，摧毁“湘川黔反共根据地”

1949年12月底，国民党暂编第一军军长陈子贤与瞿波平、罗文杰、师兴周等在龙山的岩科洛召开会议，企图以八面山为中心，建立“湘川黔反共游击根据地”。1950年1月，陈子贤等纠集4000余人盘距里耶，并在八面山上修筑工事。1月8日，我一四一师兼永顺军分区之四二二团由龙山出发，进击里耶，只有师兴周率1000余人逃上八面山。四二二团占领里耶后，协同四二一团2个营从南北两面夹攻八面山。

1月19日夜，四二二团由八面山的南面进攻，翌晨已有4个连队登上了八面山，消灭了把守路口的30余名土匪。南面的土匪以为神兵天降，大部从西侧鹅公头下山，仓惶逃往四川境内。这时，由八面山东北望乡台和新岩门峡进攻的四二一团，遭匪滚木擂石阻击，未能攻上主峰。四二二团分别向东、北发展，消灭了东、北两面把守洞口的土匪，接应四二一团上山。四二二团一营

在炮火掩护下冲向燕子洞，经6小时激战，占领燕子洞对面的高台，歼灭土匪100余名。我进剿部队随即以营为单位铺开于八面山、里耶、内夕棚等地区搜剿，到1月底，彻底攻克八面山，共歼匪8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重机枪7挺。

2. 合击长田湾，石玉湘再次投诚

第四十七军接管湘西后，曾与盘踞辰溪的国民党暂编第二军副军长兼暂七师师长石玉湘谈判，石表示愿意投诚。但是我主力部队入川作战后，石又改变态度，纠集1000余人，盘踞辰溪长田湾地区，扬言“与共军对抗到底”。

1950年1月19日，一三九师兼沅陵军分区的四一五团及2个健康营（部队入川时留下的病号，恢复健康后临时组成），开始对石部合击。20日拂晓包围长田湾。石虽有准备，但未预料我军来势如此迅猛，稍作抵抗即命令撤退，化整为零，企图避过我军进剿锋芒。我军占领长田湾后，即开展搜剿，跟踪追击，歼匪200余人，石带残部300余人窜至怀化边境。会同军分区部队即对石部追击，使其没有喘息机会。同时，四一五团1个营的长田湾发动群众，积极搜剿散匪散枪，在我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下，4月初，石率残部200余人在怀化花桥镇再次投诚，其潜散匪徒也纷纷来降。

3. 古丈围歼战，张平毙命

国民党暂十一师师长张平，有兵力2000余人，辖8个支队，盘踞于古丈李家洞和李家寨一带。1950年3月3日，永顺军分区的四二二团2个营，由王村出发，向李家洞合击；湘西军区直属队7个连由古丈东北和东南向血水潭、高桥头、落鹅坪合击；沅陵军分区的四一六团2个营由古丈西南向龙鼻咀、王崖溪、曹家坪一带合击。3日拂晓，四二二团2个营攻占李家洞西北的高望

界，全歼张匪警卫大队一个小哨30余人，打开了进攻李家洞的西北大门。该团当即分两路向李家洞张匪的指挥部进攻。张匪率部逃跑。黄昏时，湘西军区直属队2个连进至草塘、洞坪一线，堵住了张匪南逃之路，并协同四一六团向李家洞方向前进，寻歼张匪主力。湘西军区警卫营2个连进至李家洞东北的镇溪、凤滩一线，沿河堵击，防匪北窜。在四方溪和常安山驻剿的担架连和警卫营一部截住了张匪东逃之路。4日，张匪2000余人完全处于我军包围之中。

我进剿部队连续追击8天，先后经李家洞、曹家坪、李家寨、龙鼻咀等10多次战斗，消灭张匪400余人，支队长以上匪首大部被活捉或投降，匪众亦纷纷来降。至4月上旬，张匪2000余人基本被我军歼灭。匪首张平潜逃到古丈罗依溪，被群众发现，报告我军后被击毙。

4. 进攻江垭，活捉张绍武

盘踞在慈利、石门地区的张绍武（一作张绍吴、又作张召吾）、朱际凯、侯宗汉等股匪4000余人，于1949年12月在慈利西部江垭组成了“反共救国军湘鄂区总司令部”，国民党特务田载龙被台湾蒋介石委任为总司令，朱际凯为副总司令，下辖4路纵队。他们扬言要攻占沅水以北各县城填，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

1950年1月初，我军以一五八师的四一四团2个营，常德军分区的四七九团2个营及四八〇团一部，共5个营攻打江垭。3日，四一四团2个营由石门樟树间南下，向江垭、九溪推进，以一个连阻截敌人西逃之路。四七九团2个营由慈利出发，从南面包围江垭。进剿指挥部率2个连由中路直插江垭以东，从东南向江垭、九溪攻击。经过连续数日战斗，消灭张绍武部570余人，张绍武被活捉。朱际凯股匪闻讯后向湖北白果坪、走马坪方向逃窜。

随即，四七九团2个营在江垭地区搜剿残匪。四一四团分两路北上，向白果坪、走马坪一带追击，将朱际凯股匪全部消灭，朱被迫投降。至2月中旬，慈西地区的主要股匪基本被消灭，共歼匪1200余人。

5. 分兵进剿，击溃芷、怀、黔股匪

1950年1月下旬，一四〇师兼会同军分区组织11个营分别对盘踞在芷江、怀化、黔阳北部地区的杨永清、彭玉清、曾庆明、方世雄、周全福、姚大榜、肖德纯等股匪5000余人实行全面进剿。战斗10多次，歼匪850余人，俘虏了串联怀化、黔阳边界土匪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何冬明和杨景民，但不少土匪得以逃窜。

6. 夹攻麻阳，歼灭张玉琳等股匪

盘踞麻阳的土匪，主要有国民党暂编第二军军长张玉琳部的2000余人，麻阳地方势力派龙汉魁、田达光部1000余人。1950年2月上旬，沅陵军分区2个团和1个营与会同军分区2个团和1个营从南北两个方向对麻阳地区匪部实行夹击。

2月10日，四一六团沿凤凰边界南下，一个营分布于李家坳、江家坪、宵家坡一线，堵击土匪西逃之路，一个营进至羊头司和瓦屋地区，一个营由北向南直取麻阳县城；四一九团分别由晃县、便水、大小洪山出发，北上与四一六团衔接，由西向东进攻麻阳；四一七团由高村出发，分数路向麻阳城东北龙家铺、房家庄一带合击；四一八和四一五团各一个营由怀化、中和铺一带出发，从东向西合击麻阳城东江口地区的土匪；四二〇团一个营分布于怀（化）麻（阳）边界，防匪东窜。这次合击，由于地域过大，加之敌人有计划的化整为零，不与我军交战，进剿部队多次扑空，至12日，仅歼敌200余人。随后，部队就地展开搜剿，对小股土匪进行连续奔袭、追击。至17日，歼灭张玉琳部500余人，迫使龙

汉魁、田达光率部400余人向我军投降。

会同军分区部队和四一六团调离麻阳后，四一七团留下对张匪残部继续清剿，结合减租反霸，发动群众检举，又歼匪500余人，张匪下属之暂八师师长胡震和暂七师师长胡振华率600余人投降。张玉琳只身逃往香港。至此，暂二军的有生力量基本被消灭。

7. 合围兴隆场，千里追歼徐汉章

国民党暂编第九师师长徐汉章，率匪近2000人，盘踞在泸溪兴隆场一带作乱。我军进剿张玉琳匪部时，徐匪不断出击，企图配合张匪的活动。为了歼灭这股土匪，我军派出四一五团2个营和四一六团1个营，分三路向兴隆场合围。3月3日，我各路进剿部队分别于猪石冲、磨刀岩、吕布溪发起进攻，由于未形成严密包围圈，仅歼匪160余人。徐部化整为零，我即分散进行搜剿，并开展强大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协助清剿，至5月初，徐部大部被歼，徐汉章仅带亲信10余人潜逃。四一六团八连组织飞行捕捉队，先后穿越湖南、贵州、四川、湖北四省边界，追击1500余里，终于活捉了徐匪大队长李文治，迫使徐汉章向我军投降。

8. 进剿武冈，击溃段明堂等股匪

1949年底，邵阳地区部分股匪趁我军主力调离之机，疯狂进行反扑，袭击我军小分队和区乡政府。段明堂、张云卿股匪竟把我军一三六师直属队300人押送的军用货车90辆围困在雪峰山上，后经会同军分区部队增援才解围。因此，1月中旬，邵阳军分区部队和一三六师的四〇七、四〇八两个团对盘踞武冈一带的段明堂、张云卿等股匪实行进剿，先后经罗翁山、洗马潭、金家冲、半江岸等地的多次合击，歼匪2000余人。

1950年春季的全面进剿，共歼灭土匪2.38万余人，打击了主

要股匪，解放了乾城（今吉首市）、古丈、麻阳、凤凰、会同、靖县、绥宁、通道八座县城。

三、1950年夏季的重点进剿

4月初，湖南军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认真总结了春季全面进剿中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剿匪计划，确定暂时放弃湘西边缘区，以湘西的中心区、常德的太浮山区、邵阳的武冈、龙山、板子山地区为进剿重点，集中兵力，于6月底以前肃清上述地区的土匪。经过充分的准备，全省从4月中旬开始进入了重点进剿阶段。

湘西中心地区的重点进剿，由四十七军军长兼湘西军区司令员曹里怀等到军分区部署指挥。他们把会同以南的靖县、绥宁、通道，以及永顺、龙山以北，凤凰、麻阳、晃县以西之边缘地区暂时放弃，只在桑植、永顺、永绥（今花垣）、凤凰、麻阳、会同等地区留下少数部队构成一条半圆形的边缘防线，主力集中在大庸、永顺、保靖以南，会同、黔阳以北，凤凰、麻阳以东的中心地区，由东向西，由北向南，有步骤地进行清剿。

4月15日，永顺军分区首先以四二二团1个营和四二三团2个营围剿国民党暂四师副师长兼旅长李兰初部。李匪经我军春季进剿打击之后，率残部潜藏在永顺县云岩山的五连洞，企图负隅顽抗。进剿部队经过几昼夜围困，于24日上午8时发起攻击，先以炮火将土匪的碉堡和射击墙摧毁，以机枪压住敌人火力，爆破组随即将洞口工事炸毁，突击组发起冲击，攻入洞中，俘虏了李兰初和副旅长胡绍义以下85人。

4月底，四二一团以2个营向永顺塘坊坪的曹振亚、曹子西股匪进剿；四二二团2个营进至永顺县东北塔卧地区，向宋杰、宋家珍等股匪进剿；四二一团一营及永顺军分区直属队共7个连，向

保靖县的徐雅南、贾凤明等股匪合击；四二三团以5个连向大庸沙坝地区刘和清、潭头股匪合击，另以5个排向桑植、大庸交界地区的杨坤元、龚玉如股匪合击，均取得了较大战果。

接着，进剿部队即划分地区按点驻剿，派精干小分队专门追捕匪首，同时协同政府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反窝匪斗争。4月19日，四二三团侦察排获悉大匪首陈策勋藏于陈子界（一作橙子界），即冒雨赶到陈子界，但陈已逃走。在群众协助下，侦察排趁夜赶到麦地坪，逮住了陈匪的老婆、儿子和几个匪兵，审问出一些线索，又连夜杀回马枪，冒着大雨反扑陈子界，在当地民兵配合下，终于将陈匪捕获。经过一个月的搜剿和政治攻势，共歼灭土匪2500余人，活捉了陈策勋和暂一军军长陈子贤，迫使罗文杰、刘文安、彭大安、彭雄、贾辣子等16股土匪向我军投诚。至此，永顺地区国民党暂一军主力基本被消灭。

从4月中旬开始，湘西军区直属队和沅陵军分区约5个团的兵力，对分布在沅陵、辰溪、泸溪、溆浦等县的股匪和散匪7800多人进行围剿和搜剿，每个团包干消灭一个县的土匪。全区集中兵力组织了对麻阳以及溆（浦）怀（化）边界、芷（江）麻（阳）边界土匪的3次合围，到6月底共歼灭周全福、彭玉清等股匪5260余人，缴枪9700余支。

4月，会同军分区将全部兵力集中在晃县东部和芷江、怀化、黔阳以及会同北部地区，对几股主要土匪实行围剿。四二〇团1个营围歼黔阳中房地区的曾庆明股匪；四一九团3个连围剿芷（江）怀（化）边界的彭玉清残匪；四一八团1个营围剿芷江大小洪山的杨作治股匪，经30多次战斗，到5月下旬共歼匪4000多人，活捉了匪首陈通焕、杨作治，迫使曾庆明投降。

在永顺、沅陵、会同地区大多数股匪被消灭或击溃后，湘西军区集中了4万兵力，分布于东西200里、南北400里的中心地区，协同地方干部、民兵，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反霸和反窝匪斗

争，搜剿潜散土匪。到6月底，向我投降的土匪达5000余人。此次湘西重点进剿，共消灭土匪1.5万余人，湘西中心区的股匪基本被消灭，散匪亦大部分插枪隐蔽。

常德地区的重点进剿由湖南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指挥，主要进剿太浮山和桃源地区的股匪。

4月初，我军以四一四团1个营，常德军分区独立九团1个营和澧县县大队共14个连队的兵力，围剿太浮山侯宗汉股匪。我军先将周围小股土匪击溃，然后四面撒网，将侯匪包围于草丛石洞中。侯宗汉走投无路，只好投降。以后侯匪复又逃跑，继续作乱，被我清剿部队活捉击毙。至6月10日，共歼匪1340多人，基本肃清了太浮山地区的土匪。

4月中旬，一一四师（缺一个团）和常德军分区独立第九团共5000余人，对桃源县南部的郭和尚、刘彪等股匪进行围剿。25日，我军进入沅水两岩，以郑家河、戴家冲、师保山、水心寨一线为重点，分块拉网搜剿，将匪首郭和尚、刘彪等捉拿归案。此次桃源进剿，先后歼匪1200余人。

邵阳地区的重点进剿，在四十六军军长兼湘南剿匪指挥詹才芳指挥下进行，集中1.3万兵力，重点进剿武冈、龙山、板子山等地区的7000多人的股匪。

4月初，湘南剿匪指挥部首先以四〇八团、独立十五团、独立十六团各一部围剿板子山和金家冲地区的李吉生、邓耀楚、唐伟匪部，歼匪200余名，残匪四处逃窜。我军留下一部分兵力在板子山驻剿，主要兵力转向龙山，协同四一一团向龙山岩塘地区的尹立言、匡国钧匪部合击，歼匪900余名，并争取了匡的部下谢古城、唐禹鼎等股匪投降。同时，在板子山驻剿的部队活捉了李吉生，击毙了唐伟等匪首，消灭土匪750余名。到6月底，又捕捉和受降土匪达2000余人，尹立言、匡国钧潜逃香港。

在龙山、板子山剿匪的同时，一三六师集中2个团和一部分

师直部队，对武冈、城步、新宁地区的邓兆瑞、张云卿等股匪展开围剿，经10多次合击，全歼了邓、张下属的7股土匪，迫使4股土匪投降。接着对残散土匪展开追击、清剿，又先后消灭土匪3200多名。

从4月初到6月底，邵阳地区共歼匪7500余人，完成了重点进剿的任务。

在各重点区进剿的同时，我军加紧对一般地区散匪的搜剿，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郴县军分区和一三七师搜剿土匪1700多人；零陵军分区歼匪1200多人；衡阳军分区歼匪1800多人；长沙军分区歼匪1700多人；益阳军分区歼匪1000余人。夏季重点进剿，全省共消灭土匪4万余人，湘东七个地区和湘西中心区的股匪基本被消灭或击溃。这一阶段，不仅重点进剿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也很有成绩，破获了匪特地下组织100多个，逮捕了地下军组织者1000余人，其中将级匪首100余人。这些胜利，对于巩固新生政权和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1950年秋季清剿和冬季边缘地区的会剿

经过夏季重点进剿之后，湖南境内匪情分为三种情况：湘东七个地区的大部分和湘西地区的沅陵、古丈县为中心区，这些地方的股匪已被消灭，群众已初步发动与组织起来，但尚有散匪流窜，大批潜散匪枪尚未挖出。湘西的大部分县以及湖南与粤、桂、赣接壤地区为夹生区，这些地方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表面上已无股匪活动，但潜散土匪势力还很大，匪根仍然很深。与鄂、川、黔、桂等省接壤的靖县、通道、麻阳、凤凰、乾城、龙山以及桑植以北地区为边缘区，是我军暂时放弃的地区，仍由股匪盘踞着。为了彻底肃清湖南的匪患，5月26日，湖南军区党委在军区第一届党代表大会上，向全区部队党员和干部战士作了进一步剿匪的

动员。

根据军区的部署，秋季在中心区清剿的部队，以武装工作队为主，在县、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深入乡村发动和组织群众，深挖潜散土匪，摧毁土匪的社会基础。这一阶段，在湘东和湘西中心区，我军又消灭土匪1.5万余人。

进入夹生区驻剿的部队，先以20天左右的时间，在驻剿区内全面展开拉网搜剿、搜山清洞、清查户口。同时，发动政治攻势，把传单送到山头、洞口，宣传我剿匪决心和政策；建立土匪自首报到处；发动群众建立“规劝小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匪首，造成巨大的声势。湘西地区开展了“父劝子、妻劝夫、亲友劝亲友、自首土匪劝土匪”的活动，普遍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座谈会、匪属会，争取了大量土匪投降自首。广大民兵群众积极协助部队侦察、带路，有的还自动组织起来围山搜索，捉拿了许多土匪。在4个月时间内，把暂二军军长张玉琳有计划的遣散隐藏的280余名土匪、3200余支步枪和28挺轻重机枪、2门迫击炮全部“挖”了出来。到9月上旬，夹生区的残匪已基本肃清。

1950年秋季除了进行中心区和夹生区的清剿外，还粉碎了边界地区千人以上的股匪向我小部队发动的10余次进攻，创造了一些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7月3日拂晓，湘川边区匪首杨佐芝集中匪徒2000余人包围了茶洞城堡。守备茶洞城堡的只有我沅陵军分区两个排和二野护路小分队20余人，他们冲出城堡，夺回高地，打退了100多名土匪的4次冲锋。当100多名土匪从另一处攻进茶洞，占领了师范学校时，在这里指挥战斗的营长杨君全带领7名战士顽强阻击，毙伤土匪20多人。下午4时半，永顺军分区驻永绥的部队赶到茶洞外围，内外夹攻，终于将匪击溃。9月下旬，盘踞于湘黔边界的股匪1000余人向芷（江）麻（阳）地区窜扰，被我会同军分区警卫营和四一七团一部击溃后，逃往大树坳地区。我军分兵两路进行钳形追击，将土匪600余人钳夹在麻阳寨和毛虫

寨地区，实行严密包围，并以一部分兵力阻击企图增援之敌。经过激烈战斗，消灭土匪414名，击毙匪师长张居、支队长李摆子、张嗣基、肖德纯，占领了这两个寨子，取得了围歼顽匪的重大胜利。

1950年冬季的湘西边缘区会剿，是在北起湘鄂边界的来凤，南至绥宁800余里的湘、鄂、川、黔、桂五省边缘外进行的。在我军清剿中心区和夹生区的土匪时，边缘区的残匪获得了喘息机会。他们频繁召开匪首会议，啸集匪徒，重整旗鼓。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匪势更加猖狂，土匪人数由1.8万人猛增到2.3万人。

湖南军区决定，集中四十七军及一三六师和地方武装共4万人的兵力，会同湖北、四川、贵州等友邻部队，会剿湘西边缘区股匪。总的部署是：以湘西军区为主组成两个进剿指挥部，由湘西军区司令员曹里怀担任南部进剿指挥，湘西军区副司令刘贤权担任北部进剿指挥；一三七师部署在邵（阳）零（陵）边境和与贵州接壤地区，防止湘西边境股匪东窜。会剿第一阶段，集中10个团的兵务，采取分块进剿，分进合击，重重包围的战术，进行湘西北部和南部的会剿。

10月15日，会剿战役首先在湘西北部打响，我军集中1万余人的兵力，在四川、湖北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对盘踞来凤（属湖北）以南、永顺以北、酉阳（属四川）以东、桑植以西地区的几股主要股匪进行围剿。东北面、东南面和西面由我湘西部队形成弧形包围，并逐步压缩包围圈，北面和南面由湖北和四川部队向前推进，与湘西部队衔接，切断敌人外逃之路，然后我四二一团2个营分三路直插敌心脏，围剿贾家坝、抬头寨地区瞿波平部。同时，湖北恩施军分区独立一团和凤县大队2个连由龙山相应南进，配合围剿。瞿事先发觉我军进剿行动，集股逃至洛塔以北，发觉北边也被我军包围，又返回洛塔。我军向洛塔合围，瞿又由洛塔

窜回抬头寨、贾家坝，分散隐蔽。我军又向抬头寨合击，在梦龙山、茅坪、洛塔、马皮寨、贾家坝以及贵塘以北地区，以排为单位铺开搜剿，活捉了匪部参谋长和几个支队长，匪走投无路，被迫投诚，其部下亦纷纷交枪自首，这次围剿共歼匪500余人。

我四一七、四一六两个团各1个营和四一九团2个营，在贵州铜仁军分区的配合下，进剿总兵营和凤（凰）麻（阳）边界的“苗王”龙云飞等股匪，经10多次合击，歼匪700余名，龙匪仅带30余人逃窜。沅陵军分区发出缉拿龙云飞的布告后，凤凰、麻阳12700多名群众自动组织起来，配合部队大规模搜山，终于将龙云飞父子三人及“川湘黔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田瑞卿击毙于凤凰的八魔岭，并先后活捉了龙再兴、杨和清、唐汉云、孙龙培等匪首，其余匪众全部被歼。湘西北部地区的会剿，经过10多天的合击，歼匪1700多人。经过半个月的搜剿，到11月10日又歼匪4000余名，活捉了暂五师师长曹振亚、旅长陈植树和大队长以上匪首115人，迫使向阳、瞿南楷、瞿奎如、师兴周等匪首投降。缴获了各种枪3000余支，轻机枪30余挺。

湘西南部绥（宁）靖（县）地区的会剿由一三六师和会同军分区的四一八、四二〇师团、沅陵军分区的四一五团担负。10月19日夜，各会剿部队均以长距离的奔袭，向该地区的蒋雙琴、杨彪、龙怀麟股匪发起进攻。一三六师分四路由东、南、北三面围攻绥宁；会同、沅陵军分区以10个营的兵力向铁山庙和靖县合击；四一八团以2个营组成尖刀部队，由会同出发，直插匪穴靖县县城（春季进剿时已被我军解放，夏季我军转入重点进剿后又被匪占领）。各路进剿部队经过一昼夜的长途奔袭，均于20日拂晓前到达攻击地点，随即展开战斗，扫清外围。21日，一三六师和会同军分区各一部在靖县东南和绥宁西北之牙岩地区会合，四一五、四二〇团主力由铁山庙、熟坪、团河一线继续向南挺进，切断土匪北窜之路，从而经绥宁、靖县和雪峰山西麓地区形成了一个环

形包围圈。蒋燮琴、杨彪、龙怀麟的“华南反共救国军”约6000余人全部落入瓮中。我穿插部队切断了股匪之间的联系，将匪分割包围起来。四〇六团在鹅公岭、东山、上下白土一带对龙怀麟和杨大佐股匪800余人连续进行5次合击，歼匪500余名，活捉了杨大佐。四〇七团于21日在车水、邱坪地区向李连堂、邓兆瑞股匪1000余人发起攻击，经6天的追击和搜剿，击毙匪首李连堂，歼灭李匪全部和邓匪大部共800余人。四一五团追歼南逃的段明堂和易豪股匪。23日，在铁山庙歼灭段匪部130多人，段只身逃至黔阳的熟坪，被洪江十六保民兵活捉。24日，四一五团又在九牛塘歼灭易匪大部。

各地进剿部队，经过20天的追击和搜剿，消灭了我军包围圈内20人以上股匪，共歼匪5500余人。“华南反共救国军”首领蒋燮琴、龙怀麟均被我活捉。

会剿的第二阶段以清剿散匪和协同邻省部队会剿股匪为主，在几个地区同时进行：421团分布在龙山北部地区，协同湖北军区部队清剿；422团分布永顺以西的湘川连界，协同四川军区部队清剿；四一九团配合贵州镇远军分区部队围剿湘黔边缘三（穗）中（寨）地区股匪；四一八团配合贵州军区部队会剿湘黔边界九龙山地区股匪；四二三团分布在龙（山）永（顺）桑（植）三角地区清剿；四二〇团和四一五团各一部分布黔（阳）会（同）靖（县）三角地区清剿；四一六团和四一七团各一部围剿凤（凰）麻（阳）地区股匪。

在第二阶段中，各路部队密切配合，顽强战斗，共歼匪8000余人。股匪杨彪、吴君廷逃窜至湘黔边境的九龙山地区，企图躲过我军进剿锋芒。12月中旬，会同军分区部队由靖县进至藕团地区，贵州军区部队进至元贞、凤乡一带，将杨、吴匪部包围于九龙山地区，经过7天的合围、追击和10天的搜剿，全歼杨、吴股匪2480余人，杨虎男扮女装，只身逃往广西三江地区，后被我湘、

桂两省部队击毙。股匪杨永清、姚大榜部遭我军痛击后，龟缩在晃县以西的中寨、新岩、凉伞一带，纠集残余土匪3000余人，与贵州的土匪合伙，组成“湘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11月20日，会同军分区的四一九团和贵州镇远军分区的4个营，分别由东、西两面向中寨地区推进，将杨、姚压缩在中寨、淮匪、北罗、新岩、忙丹、凉伞一线，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合击和搜剿，歼匪2800余人，副司令姚大榜被活捉，司令杨永清化装成“新娘”，在“媒婆”黄玉姣（军统特务）的护送下，企图混过我西乡村封锁线，被我军侦察兵张学荣捕获。

冬季边缘区会剿，从10月15日开始，到11月30日胜利结束，我省秋季边整边剿和冬季边缘区会剿战役共歼匪2.3万余人。至此，湖南境内的股匪全部被消灭，匪患基本肃清，大规模的军事进剿基本结束。

肃清残散土匪的工作，主要是结合土改以及其他中心工作进行的。从1951年至1956年，全省共歼灭残匪20188人。活动于湘西的最后二名漏网残匪覃国卿夫妇于1965年3月23日被击毙，至此，湖南匪患彻底肃清。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三百村瑶民歼匪记

赵富全

位于广西中部偏东的大瑶山，方圆数百里，山高林密，峡长峪深，历来是打家劫舍之匪徒荫蔽之所。尤其在军阀混战年代，更为兵败为匪的流寇们提供了蔽身之地。清末民初，在山内残害百姓的匪馆不下30处，匪徒盘踞之地百姓称之为："死人潭"、"死人岩"、"死人树"，可见匪徒们的残暴。在众多的股匪中，黄阿峰股匪最为猖狂。黄阿峰是个杀不眨眼的魔鬼，曾蔽居白马山、门头山、六鹞坪等数处，当时的政府曾数次派兵会同武宣之东乡、二塘和象县（今象州县）之寺村、妙皇等地团练围剿，但总是兵来匪去，兵去匪还，官府对他毫无办法，就连山内山外各股匪也惧怕黄阿峰股匪。

1926年春，黄阿峰股匪再次挪窝迁至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大樟乡的古僮河源头——肥猪冲扎营立馆。几个月里，他们时常窜到妙皇、二塘、大林、大樟、百丈、中平、寺村等地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对青年妇女除肆意蹂躏外，还关押起来，勒索赎身银两，出不了赎命钱的就要被杀害或被运往远方出卖。当地有一居民一日路经该地，竟在古僮河（旧称黄泥河）死人潭处见到8具女人尸体，可见匪徒们的行径惨绝人寰。

是年冬的一天，离黄阿峰匪馆约30里的新村白竹屯李有明、李文安两户瑶民（外称"青菜瑶"），早饭后下田割禾，被事先埋伏于田边的黄阿峰匪徒抓走4人。是夜，土匪传信：每个人质要

户主带上银子2000毫到古懂河死人潭边领回，否则，将人质杀掉取心肝煮吃，暴尸死人潭。虎口逃脱的李有明、李文安无奈，只得连夜回三百村借银子（两人之妻均被劫，又同是三百村人）。当李有明把原委向岳父冯荣明（三百村石牌头人）诉说后，冯愤慨地说："土匪抢到'勉'来了（'勉'是'青菜瑶'的自称），如让了初一，十五怎样办？想要银子？向'勉'的刀枪要吧！"向来办事果断的冯荣明当即传三百石牌的另一位年轻头人黄文安到家中商量，两位头人一致认为：应该给土匪一点颜色看看，否则我们将来就难以安身。此时天已微明，两位头人立即召集全村父老，说明土匪的危害与情况的紧急，决定起石牌（石牌是瑶民的武装组织，临时组织群众武装行动叫起石牌）。约一个时辰后，若干名身强力壮的信使手持庄严的起石牌信物——禾杆串铜钱（即表示手令），迅速赶往三百石牌所辖的各个盘瑶村寨。当日下午，各路石牌武装便赶到三百村汇集。三百石牌头人冯荣明、黄文安即召开各路石牌头人会议，制定战斗方案：（1）由黄文安率队前去铲除黄阿峰土匪馆，夺回人质；（2）兵分三队：一队先锋10人，5人持大板钩刀，5人持鸟枪，一刀由一枪殿后，近匪刀砍，远匪枪击；二队围匪厂（匪厂是土匪居住房屋），由20多人组成；三队把守各条路口及土匪可能逃经之地；（3）取夜间攻进匪厂；（4）每位石牌兵左手扎一条白手巾作识别标记。

根据头人们的布置，大家当即作如下战前准备：（1）当晚要把大板钩刀磨得锋利；（2）每人准备4斤糯米饭团作干粮；（3）备好一个用煤油泡过的棉球，作夜间照明杀匪用；（4）准备一只雄鸡在石牌兵上路前在三百石牌板（即抄有石牌条文的木板）前祭兵。

第三天早上寅时，天刚破晓，石牌武装均汇集村连石牌处，冯荣明头人左手缚住雄鸡，左手握住"生人棍"（用优质棉木削成的木棒，上端雕有龙凤，下端套着一只大铁针，传说是盘护王用过

的“法棍”）往地上使劲一插，口中大喊一声“嗨”！便念道：

“盘古开天立地，
伏羲姊妹造人民。
先有瑶，后有朝。
一片乌云天上飞，
一群强盗地上行，
乌云纷飞扰天乱，
强盗横行闹地翻，
扰天乱，瑶家住不安，
闹地翻，瑶家坐不甜，
寄信飞过瑶山顶，
寄钱绕过瑶山脚。
信飞山顶，就邀兄弟来帮助，
钱绕山脚，就起石牌来支援，
来帮助，兄弟如风到我寨，
来支援，团丁如潮达我村。”

念到此处，便把雄鸡按在石牌板上，黄文安递过一把大平刀，冯接住高高举起，继续念着：“太上老君在天上看着，我现将雄鸡红水伴着醇酒分给你和天兵天将，请你领受，派出天兵天将助我，一起把黄阿峰土匪铲尽杀绝”。念毕将鸡头一刀斩断，把血和酒往石牌板绕淋三圈，一举手鸡被丢下路底，迅即将“生人棍”抽出递予黄文安；黄接过“生人棍”，立即率队出发了。

石牌兵队伍行动神速，50 多里山路，不到 3 个时辰，就到了去今桐六屯的山坳处，黄让大家隐入草丛中吃干粮，稍作休息。天将擦黑，队伍继续赶路，到距匪馆约 2 里处，黄命大家停下，派两名勇敢灵敏的石牌兵前去匪厂侦探，届时已是晚上 10 点钟。当探知匪徒无防范后黄果断地命令大家按计划行动。

先锋们摸到匪厂已是黎明时分，见一伙伕正在煮早餐，其余匪

徒还在酣睡中。一先锋架起弓步，一个跳跃冲到伙伕身边，一刀将马灯击灭，并杀了伙伕；一先锋的殿军与此同时迅即点燃火球投在厂棚中央，其余先锋鱼贯冲入匪厂，高喊一声："被抓的人不要起身，我们来救你们了！"土匪们听到"砰"的一声满厂通亮，知不妙，睡眼蒙胧地抬头抽枪，哪还来得及，被愤怒的石牌兵一个个杀死。

狡猾的黄阿峰就势一滚，逃到厂外，刚逃几步，想起忘了带枪，在折回取枪时，被一石牌兵一枪击中大腿。负伤逃脱的黄阿峰遇七卫兵及老婆后，要他们背着一起逃走。黄阿峰老婆和卫兵为了丢包袱，把阿峰杀死于离匪厂不远的山岭上，自顾逃命。

离阿峰匪馆约半里地另有一匪馆，头目叫大步二。在制定战斗方案时，石牌头们考虑到兵力所限等问题，决定这次行动不进攻该馆，让其醒悟，自行解散。谁知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当射击黄阿峰的枪声响后，大步二馆立刻向石牌兵们扫射，石牌兵中弹牺牲1人，伤2人，其中一重伤员在归途中死去。

这次战斗，盘瑶石牌兵在匪厂内共砍死土匪28名，连同击毙1名、土匪自相残杀1名，共歼灭土匪30名。由于大步二匪馆的干扰，打扫战场不彻底，仅缴获七八支快枪和一支手枪。黄阿峰匪馆被捣坏后，大瑶山西南的"花蚂蚁"、"大步二"、"陈四"、"陈七"等匪馆因惧怕强悍的盘瑶三百石牌武装，遂纷纷逃离。停留于百崖槽和白马山之匪也在大办"善后"期间，被瑶民起石牌在各汉区的团练配合下而消灭干净。自此之后，大瑶山西南部再也无匪敢占地立馆了。

这次行动，救出了被土匪关押的10多名瑶、壮、汉群众。当时的政府为表彰优抚三百村石牌瑶民，曾下文下拨因匪患而荒芜的古懂河两岸之田地给三百村瑶民。黄文安为首的盘瑶代表也曾到象县（今象州县）百丈圩接收划地文书；当黄文安等代表在百丈与象县官员议签免税等事宜时，盘瑶强调至少免纳粮税35年，

而官员坚持免纳粮税最长不得超过30年，双方意见未统一。稍后，象县官方借口盘瑶的要求过高而不允许免纳，结果此事不了了之。后来“善后”督办石团长决定在武宣县以督办身份召见三百村石牌首领。盘瑶人以为石团长官高势大，必有更多的田地赠予。以黄文安、李荣保（当时名冯荣保）等组成的石牌代表赶到武宣时，石并无田地奖赏，而是要黄文安等人出山做事，黄拒绝了。最后石团长以督办名义奖给一面二丈见方的蓝色大旗，以此表示嘉奖和鼓励。

这次捣毁黄阿峰匪馆，石牌武装仅靠几把大刀和几支鸟枪，就消灭了荷枪实弹的股匪，实属罕见！它充分体现出瑶族人民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和不畏强暴的强悍精神。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办　供稿）

小瑶山剿匪述略

凌崇征

群峰迭迭，林海莽莽，座落在广西中部的大瑶山，从地图上看呈椭圆形，有如一只硕大的芒果，小瑶山原名十八山，位于桂平县紫荆山区腹地，其形狭长，宛若大芒果一端上那小小的果蒂。它的面积还不到大瑶山的1/50。在本世纪30年代初，小瑶山出了个名盛一时的瑶王李荣保，是他带领瑶族团丁，赶跑了长期盘踞在这里的一群匪徒；之后，又带领瑶人在这里定居下来。十八山从此便被人们称为小瑶山。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民党残余武装麇集大瑶山及其边沿地区，妄图以此为据点，配合台湾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在地方政府和广大民兵的配合下，打响了进剿大瑶山的战斗。本文记述的，是大瑶山剿匪的一场外围战斗，即小瑶山剿匪的概貌。

一、天罗地网撒向小瑶山

1950年秋末冬初，广西省委、梧州地委作出决定，把剿匪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任务，并将桂平、平南、藤县三县列为重点剿匪区。桂平县随即成立了清匪工作委员会（主任廖联原，副主任韦纯束）。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设指挥部于县城郊区，于11月对县内各地股匪进行强有力的进剿，是月底统计，全县歼灭土匪

2085 人，击毙、枪毙匪首 129 人，俘虏 624 人，投降自新 1332 人。当时估计，桂平县境内仍有股匪约 1620 人（另有散匪约 400 人）。

世事沧桑，此时瑶王李荣保已当上了国民党四十八军三三〇师副师长、九八八团团长，成为土匪司令。李荣保和国民党政府桂平县长梁秉刚、三二九师师长刘谨堂、四十四军军长黄铭新、三二九师九八六团团长梁刚以及武宣匪首黄钜英等人，率领桂平县境内残余股匪的大部分，龟缩在小瑶山及其边沿紫荆山区一带，负隅顽抗，坚持与人民为敌。昔日宁静的小瑶山，顿时变成了魍魉横行，阴森可怖的世界。聚居在小瑶山一带的瑶、壮、汉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岌岌可危。

进剿瑶山之前，我解放军剿匪部队在地方人民政府的密切配合下，先于 1951 年 1 月初实行“封江”，凡行驶浔江、柳江的船只，均须接受检查人员的严密检查，不让任何一个可疑的人从水路逃逸；同时将瑶山边沿出入路口置于严密封锁之下。从南到北，在长约 400 多里的柳江流域，北起象县，南至桂平弩滩以及瑶山西部长约 200 余里的边沿地区，布下了天罗地网。

1 月 9 日，在瑶山股匪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我剿匪部队五大队兵分四路，由熟悉地形的民兵带路，冒着阴雨严寒，突袭十八山，将南北长百余里、东西宽 50 多里的小瑶山，拦腰切为三段，并运用外线迂回，内线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切断了黄钜英和黄铭新各股匪的联系，一举打乱了土匪的指挥系统。接着，剿匪部队采用“擒贼先擒王”的战术，以匪首为目标，组织飞行组，有计划地包围封锁山区，在狭路及偏僻山道设伏。23 日，匪首刘谨堂部数十人首先在洋米村一带被剿匪部队捕获。麇集小瑶山的匪徒们有如五雷轰顶，顿时乱作一团，惶惶不可终日。剿匪部队又运用“以匪治匪、将功赎匪”的策略，及时展开政治攻势，放出部分经过教育的俘匪和自新分子去争取匪首。这一招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五大队三营八连放出的自新匪首卫士数人，上山争取匪首

浔梧纵队副司令谢业彬、参谋长覃卫彬。但这两个匪首顽固不降，几个自新分子即乘夜将两匪首击毙。不久，四十四军军长黄铭新，也在深山中被他的几个已经自新的卫士架下山来向解放军投降。

二、瑶王扯起了白旗

1950年2、3月间，武宣匪首黄钝英带领匪徒窜到十八山，串连瑶王李荣保参加土匪暴乱。李荣保裹胁一批瑶民济匪、参匪。3月中旬，李荣保带领10名乡警，伙同黄钝英到桂平碧滩打劫过往船只。8月，李荣保受紫荆山匪首刘谨堂的怂恿，到三江圩攻打人民解放军。9月，他带领匪徒杀害当地群众，并再次袭击了人民解放军。

1951年2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对大瑶山进行大会剿。盘踞在大瑶山的匪首韩蒙轩、甘竞生、林秀山相继被歼、被俘。瑶王李荣保如惊弓之鸟，仓惶逃窜。他带领全家窜到紫荆山横冲村附近的深山里隐藏。经我剿匪部侦察之后，即将山口严密封锁起来。这时李荣保已成瓮中之鳖。

觉醒了的瑶族同胞立即行动起来。他们为剿匪部队带路、送信，有的还配合解放军巡逻守卡，不让一个可疑的人逃出山口。此时，瑶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想当年，瑶王带领他们平定十八山，并在这里定居下来，让他们过上了比较安定的日子。不少瑶人曾从心底里感激过瑶王。但是现在，瑶王的罪恶行径背叛了瑶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已经彻底改变了他在瑶民们心中目的形象。人们又恨不得立刻抓住他，交给剿匪部队予以严厉惩处。

李荣保一家20多口进入深山之后，三天吃不到饭，大人小孩饿得哇哇直哭，个个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是投降自新，就是被打死、冻死、饿死。

李荣保当瑶王之前，长期居住在距十八山不远的横冲村。瑶

山剿匪的序幕拉开后，该村16家瑶民开会想办法，要找李荣保出来缴械自新。第二天，8个瑶胞分成四路出发，他们跋涉在深山密林中，冒着生命的危险，忍受着饥饿、寒冷与疲劳，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两位瑶民（其中一个是曾经在瑶王家打过长工的老村长），从悬崖峭壁的草丛石洞中找到李荣保。李荣保惊恐地拉动枪栓，结结巴巴地喝问道："你……你是带大军来……来的吧？快说！"老村长掏出一封信，递给李荣保，平静地说："这是大军首长给你的信。乡，快投降吧，首长讲过，只要你投降自新，不再欺压瑶民，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可以保证你和全家的生命安全。"

10天之后，李荣保带领全家和手下的10多个匪徒，按照指定的路线走出深山，向解放军剿匪部队投降了。他将所有武器弹药一一缴出，其中：轻机枪2挺，冲锋枪5枝，卡宾枪3枝，加拿大手提机枪1枝，其他长短枪137枝，各种子弹约1万发。接着李荣保又到武宣县东乡，动员各村瑶民缴出长短枪55枝，子弹约1000发。

李荣保出山投降的消息传到横冲村，瑶胞们又是吹乐又是唱歌，还杀鸡喝酒表示祝贺。一位50多岁的瑶族阿妈高兴地说："这一下可好了，我们瑶家又能过上太平日子了。"

三、"县长"饿死在深山

瑶王投降自新不久，匪首梁刚率领6名匪徒，携带轻机关枪2挺，步枪4枝、短枪3枝，走出深山老林，也向解放军投降自新。

唯有伪县长梁秉刚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负隅顽抗。梁秉刚早年毕业于国民党玉林干校，他受任国民党四十八军三二九师副师长兼"桂平县长"，设伪县政府于紫荆山谷，委派了一批"区长"、"乡长"（瑶王李荣保被他委任为乡长），还张贴布告，强征民粮，勒索人民群众钱财，并指挥匪徒在沿江一带抢粮船、劫渡

口、收行水，又用栓杆胁逼当地群众加入土匪组织。他率领的股匪被击溃后，其部下大小头目逼于形势，也纷纷出山缴械自新，但是他仍然裹胁200多名匪徒，携带电台和枪枝，隐藏在平南、桂平、象州、武宣交界的大瑶山密林中，靠抢劫和偷盗附近村民的粮食财物度日，过着穴居野外的生活。

转眼间，一年多时间过去了。这股匪徒仍象毒瘤一样，威胁着我新生的人民政权。1952年11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容县军分区成立“桂、贵、石、平、瑶联合清匪治安委员会”，对大瑶山及其边沿的残匪进行最后清剿。这次进剿的指导方针是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县、区人民武装和广大群众紧密配合，四面严密封锁，以罗渌洞、花雷、双高、四明山、葛麻坪为重点侦察区，并布置侦察人员和民兵化装打进大平山、十八山、鸡爪山、高名山等几个地方。

大网撒开之后，所有剿匪武装分三个支队和一个直属队，分头插进山中。第一支队的任务是肃清三江、花雷至东乡一带残匪，并向十八山、大平山、鸡爪山方向搜索前进；第二支队任务是肃清南木乡至三江一带残匪并向高名山、十八山、鸡爪山一带搜索前进；第三支队任务是肃清四明山（平阳、兴旺、河洞）一带残匪，然后横渡黔江向鸡爪山北部前进；直属队负责防守大藤峡沿岸的平冲、大湾肚、渌水冲口三个岗哨和碧滩检查站，加强通讯联络和警卫工作，以及控制黔江来往船只等。

几天之后，三个支队按预定作战方案在鸡爪山下胜利会师。据第二支队一中队报告，他们先后击毙了两名匪徒，还在十八山附近的一个岩洞中发现了一具蓬头垢面，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尸首，身旁放着一枝卡宾枪和一枝驳壳枪。经部队派员辨认，此人正是罪恶累累，怙恶不悛的伪县长梁秉刚。他成为深山饿殍，大约已有五六天了。据另外两个支队报告，其余匪徒均被一一击毙。

至此，寄生在小瑶山严重危害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

毒瘤，严重危害共和国新生政权的一股反动残余武装，终于被彻底清除了。小瑶山的剿匪战斗取得了彻底胜利。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办　供稿）

云 南 土 匪

曾瑞鹤

一、概况（清末——1950年）

云南的土匪，就其人数来说，由少数而滋蔓到全省遍地皆匪，其中南防十一属尤其多；就其实质来说，由单纯抢劫的土匪演变为政治土匪。其过程分为4个时期。

1. 萌芽时期：清末到1916年龙济光扰滇以前。这段时期，各地土匪，人数很少，其产生的根源，多是由创“老武哥”的凶徒（人民称之为痞子头）及赌棍流氓几人集合在一起，由号召之人，充当“头子”带领，啸聚山林，四出摆赌，有时拦路抢劫人民财物。但起数不多，很少有成股的情况。

2. 滋蔓时期：1916年龙济光扰滇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这段时期，由于军阀官僚利用土匪，制造土匪以夺取统治权和对人民搜括压榨的原故，匪势因而飞快地滋蔓起来。地区遍及全省，人数多如牛毛，单说最大的匪首，在迤南则有：吴学显、杨有堂、莫朴、李绍宗、陈寿明、张国治、周兴国、普家仁、王文光、汤松龄、李保兰、陈春萱、张孟西、李润之；在迤西则有：杨天福、普小红、铁壳表、张结巴；在迤东则有：阮发高、冷忠臣、何维向；罗小直、兰猫彪；在滇中则有：蒋世英、普志诚、林毓宽等。但这也不过是举例，全省最大的匪首，实际上并不是只有这些。

土匪受军阀官僚利用，参加军阀官僚争夺统治权的战争，找政治出路，过荣华富贵的生活，成为匪首们的主要企图，其实质因而由单纯抢劫的土匪演变为政治土匪。

3. 潜伏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前，在抗战时期，云南扩充了军队，中央军也进入云南，与云南的部队分布于三迤，大军云集。其时，军阀官僚与土匪之间暂无政治上的勾结利用。各地土匪如张孟西、李润之、普家仁等多敛迹潜伏，干武装走私的勾当，运售鸦片烟、吗啡、唆唆，曹达、普家仁还伪造袁头大银元和云南半开银元，运进今之红河、元阳、绿春3县使用。

4. 军统特务与之直接勾结时期：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后至1950年解放大军解放云南以前。这段时期，军统特务勾结各地土匪，企图镇压民主力量，抵抗解放大军进攻。1949年年底，四川、贵州相继解放后，蒋政府妄图以云南作最后基地，做反攻之梦。军统特务委磨黑的张孟西，新平的李润之，金平、个旧、建水、曲溪的赵小安、钱玉湘、普家仁、李志鸿等以军长官职，阴谋抵抗解放大军。

二、云南土匪滋蔓根源

军阀委授官职：龙济光扰滇之役，对南防的土匪和建水的莫朴等，首开委授官职之门，饬其扩充匪部，为其扰滇内应。顾品珍由川回滇逼走唐继尧，唐继尧在出走香港前，招纳迤西的杨天福、南防的吴学显两部土匪，进驻昆明，作保省城抵抗顾品珍的打算。唐继尧第二次由香港回滇，驱逐顾品珍之役，对云南全省的土匪，如南防的吴学显、杨有堂、莫朴、陈寿明，迤西的普小洪等，一概委以司令官及各级各样的官职，作其内应。二·六政革到六·一四政变前后，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显廷、唐继

虞等竞委各地的土匪，如滇西的张结巴，南防的吴学显、莫朴、李绍宗、周兴国，滇中的蒋世英、普志诚，迤东的马旋海等以官职，以扩充实力。江映枢奉龙云之命来到南防建水，委李运鸿当司令官。

人们眼见各地的土匪当了司令，做了大官，以做土匪是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群起为匪，土匪因而飞快地增多起来。

军阀官僚坐地分赃供给武器：土匪抢得的财物，孝献军阀官僚，军阀官僚分得匪赃，卖给土匪武器。军阀官僚又给土匪通情报，凡政府的剿匪部署和争夺统治权的军事政变，土匪皆预先得知，早作准备，所以匪势日益滋蔓难灭。

个旧矿商争尖霸厂：个旧矿商开尖打厂，因没有政府的保障，自行招养亡命，以作保护自己的尖子或霸占别人旺铜的武力。一般游手好闲之徒，竞应矿商的招纳，当矿商的保镖，常常持枪聚赌械斗杀人，因而每多流为土匪。矿商招养亡命争尖霸厂的后果，是开了一条产生土匪的长流。

招安保路：反动政府积极地制造土匪，土匪多了，无力镇压，又作扬汤止沸之举，开招安保路之行，匪焰因而更日益嚣张起来。土匪未获招安保路以前，生活费用没有来源，买枪招人，只能秘密进行。待到受招安保路以后，情况就不同了，生活费用靠抽收保路钱，买枪招人可以公开进行，便一天比一天地发展起来，由小股土匪一跃而成大股土匪。

摆赌抽捐：赌为盗之源，反动统治期间，云南各地赌风甚炽，河口及沿滇越铁路一带和南防各县更长期地公开抽捐摆赌，导致倾家荡产之人流为盗匪。

法帝国主义暗助：南防匪首李绍宗，曾捆走滇越铁路公司高级职员法国人巴都。但他捆获巴都，不但没有勒索钱财，反而给予极优厚的款待，数月后还派人把巴都护送回家。从此李绍宗与法国人经常往来，李绍宗要的东西，法国人必如其愿地送给他，李

绍宗的人和枪，从此日益多起来，由小股土匪一跃而成全省的头一等大股土匪。李绍宗招安当官以后，防备极严，不论到任何地方，任何人请他吃饭，他都谢绝不去，独对法国人则不是这样。例如他盘踞开远的时候，滇越铁路开远车站的法国人请他吃饭，他不顾危险通过军警岗哨前往。这些迹象，是法帝国主义暗助李绍宗的例证。

匪首强派：土匪占据的地盘，俨然成其匪管区。匪首们效仿反动政府佔拉壮丁当兵的干法，在他们的管区内，强派人民扛枪当匪，因此，匪众日益增多。

三、土匪作恶的手段及对人民的危害

拦路抢劫。土匪四出抢劫人民财物，不仅在大路小路间抢劫行人，而且个碧石铁路的列车也不止一次地遭过李运鸿、白正贵、马有兴的等截劫。凡是没有招安土匪保路或是军队保商的路线，经常有土匪扎着抢劫，行人插翅也难飞过。百姓真是寸步难行。

打家劫舍。土匪拦路抢劫尤嫌所得不多，乃进一步打抢居民的家宅铺面。历年以来，各地城乡居民铺户，遭受他们打抢洗劫的太多了，无法统计。

捆人勒索。土匪抢劫的手段日益恶毒，又想出捆人勒赎的主意，随时潜入乡村城镇或匿伺通衢要道，捆人勒赎，个碧石铁路列车上的乘客，就不只一次被土匪捆走过，被土匪勒索赎金。百姓防不胜防，遭其毒手者甚众。

攻村夺镇。土匪与土匪之间，为争夺地盘，常常进行攻村夺镇的战争，进行抢劫烧杀，其死亡人数及破坏的房屋财产，为数甚巨，无法统计。南防匪首陈春萱与李绍宗争夺今之个旧市的械斗，把个旧市中心的一两千间铺面和李家花园一大片房屋烧成一片焦土，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1916年龙济光扰滇后，匪势日益滋蔓，匪风日益猖獗，各地人民因长期遭受土匪烧杀抢掠，生计日益凋残，田园多数荒芜，粮食生产逐年减少，贫饥之民一年比一年增多。又由于土匪拦路抢劫之故，各地交通长期被阻，不惟商业陷于停滞状态，手工业也受到严重打击，如广南的油篾帽，各地的大土布，皆大为减产，国民经济日益枯萎。捆人勒赎之患一出，人们躲在家中，不敢出门，连儿童也不敢到学校读书。学校虽然极少，招生仍感困难，此种情况，在农村尤为严重。

四、反动政府剿办土匪对人民的危害

剿匪官兵攻进土匪盘踞的村庄，多乘机掠夺人民财物。在他们每次剿匪之后，常看到他们赶牛马、挑粮食、杀猪宰羊、卖东西，从金银首饰、男女衣物到小儿尿布及一切什物，杂七杂八，无奇不有，无货不卖。老百姓说的“土匪如梳，官兵如篦”的话，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们。

土匪盘据的地方成为匪管区，匪管区内的人民，要接受土匪的管理，听从土匪的命令，土匪派粮、派款，谁敢抗拒不出？而剿匪官兵竟责怪人民出粮出款给土匪，诬百姓是匪，打进匪区的时候，每每不分皂白地烧杀人民。

旧政府一贯以剿抚兼施的两面手法对待土匪，土匪忽而受到招抚，变成为官军，忽而又被剿办，恢复为匪。当受招抚的土匪恢复为匪的时候，当局往往诬陷土匪招抚为官军时迫不得已与他们往来的人是“通匪”，又诬匪管区内受土匪威逼出粮款的人，也是“通匪”，罗织通匪之罪，向人民择肥而噬，大肆诬陷敲诈，此类事件，以南防各属为最多。

五、三次见功效的剿匪之役

制造土匪，剿办土匪，双管齐下，同时并举，是云南旧政府的特点。从1916年到1937年20多年当中，官方制造土匪，成绩卓著，剿办土匪，却功效太少。20余年的剿匪，只有张冲迤西剿匪，万保邦迤东剿匪，龙雨苍南防剿匪三役取得一些功效，但也未能彻底肃清。

张冲迤西剿匪。1927年六·一四政变，龙云消灭了胡若愚、张汝骥、孟坤等后，派张冲收拾唐继虞盘踞迤西的"北伐后援军"的残部，并剿办迤西的土匪。张冲在当时云南政局转向安定、迤西土匪在政治上没有军阀官僚支持的有利条件下，针对匪情，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先行设计格毙了曾受唐继虞委充师长最凶恶的匪首张结巴，破了匪胆，然后才派队搜剿其余股匪。各路股匪，闻风逃散，迤西通省干路，获得一段时期的畅通。

万保邦迤东剿匪。龙云解决了卢濮、朱旭、张凤春、张冲四师长宜良会议之变，逮捕了张凤春。张凤春是一贯通匪的师长，他一被捕，一般大小军阀官僚多引以为戒，跟土匪断绝来往，土匪失去了支持，正是剿办土匪的一个有利条件。万保邦即在这有利的时机于1930年和1931两年中，受龙云之命赴迤东剿匪。迤东土匪闻风多避入剿穴。万保邦采取攻破匪巢、跟踪追击的办法进行剿办，颇有毙获，救出被掳入匪巢的民众在百数以上，各县土匪，四散逃匿，迤东通省干道，遂获得一段时间的清靖。

龙雨苍南防剿匪。张凤春是一个一贯通匪的师长，是南防土匪的后台老板，他一被捕，南防土匪大为恐慌，龙云随即派龙雨苍到南防剿匪。南防是土匪最多的地方，而且有最大的股匪。龙雨苍感到这一任务十分棘手，即召集其部下军官开会，研究匪情，拟定剿办策略。他们掌握了南防土匪对剿不害怕，对抚不相信，人

数太多，剿抚均难收效，失去张凤春这个靠山，大为恐慌，而且多数土匪家大业大的，这些情况，乃决定采用不说剿，也不说抚，只说准许缴械投诚，领取良民证做良民的策略。南防土匪其时的情况，是分为李绍宗、周兴国两大派，彼此仇怨甚深，常常械斗。龙雨苍准许缴械投诚领取良民证做良民的办法，引起了李、周的混乱和动摇。这时候建水匪首杨有堂恰恰由香港回来，得知龙雨苍来剿匪的消息，即分别劝说李绍宗、周兴国解除仇怨，联合起来抵抗龙雨苍，或一齐进思普，占据边地，再想办法。李绍宗犹豫不决，尚无表示。周兴国则表示不赞成，说各人打各人的主意，谁也管不了谁，拒绝了杨的提议。龙雨苍的办法，受到土匪欢迎，这是龙雨苍剿匪取得功效的关键。

龙雨苍宣布准许土匪缴械投诚，领取良民证做良民的办法后，即以建水为中心，首先在建水进行清查保甲户口，实行来往人要报、连保连坐、断绝乡镇间的交通、出乡出镇须请领路票的办法，以防止土匪逃匿，断绝土匪的联络接济，从而促使他们就范投诚。周兴国首先遣散其匪徒，以黄金1500两向龙雨苍行贿报效，缴械投诚。周兴国手下大小匪首和李绍宗手下的大小匪首也相继争先恐后地效学周兴国的办法，行贿缴械。龙雨苍随即向曲溪、石屏、开远、蒙自、个旧等县，次第施行此法，均取得成效。整个南防的匪首，多数已就范投诚，未就范投诚的，亦已悉数逃匿。

但是不允投诚的匪首，对龙雨苍是否真的准许做良民渐不相信，陆续有逃走的情事发生。龙雨苍即命所部监视逮捕匪首，除李绍宗、王文光、徐道清、师家文、苏应祥等逃往贵州，陈寿明、李保兰、佟世发，普文成、李运鸿、胡永兴等等逃匿无踪，生死不明，周兴国逃匿建水江外以外，汤松龄、莫兴周、张家顺、戴某（记不清）、李明、黄玉元、徐家富、普文荣、普文义，纳逊臣等均被捕管押。

龙雨苍对捕押的匪首，除把没有对他行贿报效的普文荣、普

文义、纳逊臣3名解省交总指挥部讯办以表现他的清白外，其余的悉数由旅部就地枪毙。对投诚匪首中的孙国安，因诱杀杨有堂有功，普家仁因击毙了周兴国，马明光因鼓动李绍宗投诚出了力，均未予逮捕。逃往贵州的匪首，除李绍宗在贵州被格杀外，有王文光、徐道清被抓获，分别解回昆明、开远枪毙。但当时因佟世发逃匿无踪，生死不明，即听任其部下的匪首白正贵、马有兴二人漏网潜匿，没有及时逮捕处理，致贻后患。

六、云南土匪的肃清

1950年初陈赓领导的解放大军进入滇境，解放了云南。是年下半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即在全省范围内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协助解放大军，全面地开展清匪反霸运动，按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首恶必办、协从罔治的政策，对各地的土匪，分别给予镇压、劳改、教育释放的处理，先后镇压了磨黑的张孟西，峨山的李润之，金平、个旧、建水、曲溪的赵小安、钱玉湘、普家仁、李志洪等首恶分子，格毙了建水的匪首普文荣、马有兴，彻底肃清了全省的土匪。

1956年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石屏匪患

刘　圻

石屏匪患，历代未绝，民国时期，人民遭苦尤甚。民国5年（1916年）直至民国38年（1949年）30余年时间，先后出现大小匪首以百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始得肃清。

一、石屏著名匪首

回顾多年匪患，著名匪首甚多，仅将记忆中猖乱匪首概略一叙。

徐三，昌明乡亚花寨（今亚房子区）人。民国初年常到景东县烟区经商，熟悉该地情况，民国5年（1916年）为匪。徐领三五十人到景东扮作商贩，打听滇西客商动静，一经探实即集中匪众，伏于险山要路，将人杀害后，尽掳其大烟财物马匹。凡本县及邻县客商一律不犯，以“兔儿不吃窝边草”作保身之计，而且在所居附近各村，听到有孤独困难无靠之人，都给以救济，故当地人称“徐三头子”，不以匪视之。民国7年（1918年）为昌明乡团首陈会荣击毙于途，后徐妻又带人将陈击杀，砍首祭徐三。

何朝英、何应来，宝秀十老寨人，民国7年（1918年）合股领匪数10人，抢劫八抱树河、大桥河通道，夜晚入村抢劫杀人，大路和村庄多有人被捆勒赎。何朝英之母尤恶，勒赎之人，匪得款已允放，其母需再加款才得放回，致人倾家荡产。乡团多次围

剿何匪，都失利伤亡败归。民国 9 年（1920 年）两匪由其手下不满匪卒杀死。乡团抄匪家，何朝英母被擒解县城枪决。

杨松山，宝秀许刘营人，与何朝英等同时为匪首。二何死后，势单力弱，亦为乡团格杀。杨匪原为商贩，因赌博将资本输光，遂领数人沿途抢劫回家，复聚二三十人，与何匪通声气互作应援，在坝区抢劫捆人，遍扰秀山背后及八抱树河山村。

李春和，宝秀阿白冲人。民国 15 年（1926 年）后的几年间为拦路抢劫小匪，后擒关于县狱，服刑未满，即越狱逃跑。民国 22 年（1933 年），李聚众几十人，流窜县西北山区及八抱树河拦劫，捆人勒赎，行踪飘忽，抢粮及牲畜，山区村寨，饱受其害。民国 28 年（1939 年）受政府招安，委任为保路队长。但其匪性难改，保路中不时还有抢劫情形。民国 32 年（1943 年）有思普邮差挑邮袋出屏，保路匪卒认为邮袋必有贵重之物，抢下邮袋尽是函件不值一钱，遂将函件撕毁践踏，有些函件还是抗战重要公文。邮夫不敢收捡，空身到县邮局报案。石屏邮局逐级报到中央，转饬省办理。云南省当局派建水驻军马绍初营围剿，李匪只身逃走，避于绿春，后被该地驻军捕获，解送建水转解石屏，民国 33 年（1944 年）枪决于西门外。

薛杨保，西乡薛家塘人（今陶村乡）。民国 5 年（1916 年）为匪，10 余年间，遍抢所在附近各村，并杀人捆人勒赎，与县属南边山一带匪首互通信息，白日匿迹于林，夜晚归家肆虐。捆去之人被蒙以头布，不使其识得路径，送往匪巢石洞藏匿，勒赎财物。薛匪股虽只一二十人，但作案累累，当地村民多受其害。民国 21 年（1932 年）滇军第三旅剿匪将其擒获，连其同族匪徒 6 个一并枪决。

李自洪，弥太柏乡弥勒沟人。民国 6 年（1917 年）为匪，有众 200 余人，经常拦抢大塘河、八抱树河过客，附近村庄及西南一带山寨方圆百余里，无不受其害。李以砚瓦山为巢，掳赎之人

尽藏该处。民国9年带匪数百人，洗劫柏叶寨、朱冲两村，烧柏叶寨民房7所。各乡派乡团往救，与匪激战数日，才将匪驱逐，村民已被劫一空。砚瓦山高林密，路途且狭，李匪据乱10余年。民国21年（1932年）滇军三旅五团进入其巢穴，众匪瓦解星散，李匪带一卒，名“七十二”者，逃避深林，一日在井边饮水，被从卒由后击毙，砍首献于滇军。

李小潘，东乡仁寿村人（今大水乡管村），民国13年起（1924年）为乱。李拥众三四十人，在新街至白马庙和异龙湖水面，拦截商旅和赶街人众，抢捆勒赎，被杀者暴尸于通途。他并与异龙湖南岸各匪勾连，将被捆者送往该处匪穴藏匿。民国18年（1929年）为乡团格杀砍首，其首级被置于县衙前草地。受害者愤极，用石块将其砸碎。

彭万台，异龙湖南岸白朗村人。民国7年（1918年）充匪首，扰乱异龙湖南岸村庄及异龙湖水面，洗荡高家湾。民国10年（1921年）旧历三月率匪百余人，由南山绕小路窜入蔡营各村抢劫后，住进万德寺。是日值旧俗朝山会期，正当经声朗朗，鼓磬齐鸣，善男信女参神跪拜之时，匪众拥入，会众惊愕失措。尽管匪众安抚说，不要惊慌，大家办好佛事，他们是来保地方，决不侵害；但会众均害怕，星散回家。

彭匪据万德寺，未侵扰村庄，更未敢攻城，企图不明，不足10日自退。在过海河堤时，该匪遭符家营村人伏击，击毙匪徒2人于河滩。匪不敢收尸，一面对射，改道上北河堤，距县城只四五百米。日值正午，县衙门午炮照例一响，匪以为北城上发枪，遂进行攻击，一时枪声大作。巡城商团成城社人员在北城上与匪对射，见匪列中有一红蜈蚣旗为前导，其后有一骑马人带眼镜，将其击中落马（据说是师爷）。匪退走后，曾烧一村屋泄愤，不久彭匪率众投靠吴学显军为营长，开拔贵州一直未回。

车文富，南山云台乡乐家城人。民国5年（1916年）为匪，扰

害地方多年，云台、牛街两区乡大小匪徒10余，以车文富为害最久，方圆百里，遍遭其烧、杀、抢、掳、蹂躏之苦，以致牛街一带村民，多年不敢进城赶街。民国6年至民国10年（1917—1921年），者那、贾巴上下几村，反复被车匪烧毁房屋，杀掳人口，致村人不能立足，多迁逃县城避祸。车匪几次被招安当保路队长和云台乡长，又几次叛变抢劫。民国21年（1932年）滇军三旅五团在屏剿匪，侦知车匪带众在五郎沟河吃喝，即连夜奔袭，围歼于屋内，匪据屋顽抗，军队用火攻，将匪全歼屋内。

孔庆美、孔庆桂和孔开甲三匪，下坝底莫人。民国10年至民国17年（1921—1928年），盘踞底莫冲等10余村庄，尽胁丁壮从匪，故一出动，声势浩大，动辄可百千人。凡本县各乡村及近邻建水县村寨，无不受其扰害。民国13年至15年（1924—1926年），连连攻入新街、海东各村，烧杀抢掠，逃不及者惨遭杀戮，极为残忍。

民国16年夏（1927年）李绍宗围困石屏县城20余日，三孔匪跟随同来。李匪烧毁四乡房屋抢尽所有，得到滇币3万元后撤退。三孔匪分到赃款，心犹不足，盘踞大瑞城。旧历七月十二日夜，孔匪以少数匪徒留守大瑞城，大部匪徒数百人，欲到宝秀抢掠，在李家寨孔匪受到阻击，数日内六乡联合团，各乡乡团及县城中[illegible]千人与匪激战，匪不支败退，仍回大瑞城盘踞。同年8月初，滇军一〇一师张冲部到龙朋剿匪，抵石屏招安孔庆美等三匪。

民国17年夏（1928年），三孔受招安后未得实利，仍四出骚扰。建水石屏两县急调乡团会剿，两县县长带人攻入底莫匪据各村，擒斩作恶各匪。孔庆美逃走未获，后在建水城摆草药摊行医。民国31年（1942年）在石屏牛街摆赌摇宝，为官方击毙赌场。

白云生（白小七）、白正贵、白永山，牛街区红土坡人。民国17年（1928年）起，三匪逐年扩大匪众，数至几百人，并常合股抢劫，以白云生人枪最多。他们出没无常，抢劫马帮商旅，掳人

勒赎，杀人无数，积恶最大。民国37年冬（1948年11月27日）白云生率匪数百人，在老黑冲夹沟，以大石堆上铁轨，拦阻火车，打死打伤乘客几十人，抢尽车上的物资，掳去支男女乘客无数，勒赎财物。是日火车到站，各车厢遍布血迹，载来遗尸多具。民国38年（1949年）夏，三匪恶贯满盈，被匪巫枪杀，持其首级向县长报功。

许士好，白花河许家山人。民国31年至民国38年（1942—1949年）为匪，在白花竜河上下游及龙朋区村寨，远至通海县烧、杀、抢、掳。民国38年（1949年）夏率匪百余人，行经建水县曲江城外，被驻军伏击，尽歼其众，许匪亦身死。

许昌有，白花竜河人（今新城区），与匪许士好同族，为匪近20年。该匪股一二十人，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擒获，杀人抢劫累累。1953年县人民政府发动大量民兵搜山，围于石洞，许匪顽抗被击毙。

龙永和，哨冲区人，民国20年（1931年）为匪，拥众百数人，在哨冲、龙朋各村寨，遍肆抢劫杀人。民国35年与匪首白永山合股，抢劫邑北孔村，掠尽邑北孔乡公所武器，临解放时被消灭。

普四渭，龙武区坡店下寨人。民国15年（1926年）前后，普匪迭次攻入龙朋、哨冲、落水洞等地，烧杀抢掠。龙武、哨冲、落水洞解放前为大烟产区，普四渭仗官势按亩抽大烟养众[illegible]，遍在烟区抽头摆赌，纵其小股匪徒，拦路抢劫杀人。普匪与新平县土霸勾结，常带匪数百人，在新平县大小道路，堵截商旅，尤以大烟帮为抢劫对象。普匪拥有机枪步枪数百枝，为县中巨匪，官不敢捕。1951年镇反中被镇压。

二、邻县土匪窜扰石屏

杨有堂、皮中和、禹顺甲三匪，皆建水县人，民国4、5年

(1915—1916 年) 间相互勾结，四出抢劫，成为巨寇。甸鲁坝地接通海、石屏两县，宽广百里，山深地险，地形复杂，被匪盘踞为巢，建水、通海、石屏 3 县，年年受尽匪扰之苦。官兵往剿成连被歼，乡团也每每阵亡几十人上百人之多，剿匪队伍只能到其匪区边缘即告败归，从未到过匪区深处。

民国 7 年（1918 年）三匪裹胁丁壮二三千之众，黑夜偷过建水坝、深入个旧矿区，洗劫花扎口、弯子街、卡房等处后，下红河渡江攻入水卜龙新街（今之元阳）烧抢数日，又渡红河进入建水县官厅街，横穿建水坝捆载归老剿。次年攻入通海县城，烧杀抢掠后，又掳妇女多人，捆载归老巢。石屏旷野一乡地接甸鲁坝，多年迭受甸鲁坝匪扰，苦不堪言。小股土匪多次到石屏城郊村庄抢劫捆人，甚至四五岁小男孩也背去勒赎。直至滇军第三旅龙雨苍部设计除尽旧临 10 属大小匪首，通海、石屏等地方暂得安宁。至滇军撤走，甸鲁坝新匪复生，又盘踞为乱，人民永无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除匪患，地方才得安靖。

三、李绍宗围困县城目击记

李绍宗于民国 16 年 (1927 年) 春，率匪千余进入旷野乡到达藤子树时，分股进入山冲各村，抄抢粮食牲畜，搜缴武器，尽协各村 15 岁以上男丁数百人入匪群。四乡村民得知匪讯，惊慌拥入县城避难，遍宿于九铺庙宇。其时笔者到北城墙，城头已站满人，只见北郊村民，赶着牲畜挑负被盖锅甑用物，于塞途中争先恐后，仓惶挤入城中。日落时和尚木沟山头出现白旗一面迎风卷扬，匪徒陆续下坡，分股进入老卫寨、半月池、寺脚底等村。次日晓匪知近城各村已无一人，遂进入盘踞，匪首李绍宗进入大瑞城驻扎。只有符家营一村聚集村人防守，匪始终未敢窜扰。

匪围城时，城中有伍家宾带建水乡兵 200 余人及集九铺丁壮

千多人据城防守，日夜巡逻。匪虽号称2000多人，尽系乌合之众，无攻城胆量，只占据四面村落，不时打几下冷枪，每日烧几处村屋，向城中示威。伍家宾所带建水乡兵，平日威武十足，此时亦缩城不敢向匪出击。只有一日匪烧冒合村，才由城内开出百余人与匪激战于南河埂，几小时后无伤亡回城。此外，自匪围城20余日，并无一次激烈战斗。一日李匪众大烧四郊村屋，黑烟冲天，笼罩县城上空，还不时放出几阵排枪。县长黄正朝以为匪攻城，急令九铺乡丁在街巷鸣锣大叫："县长命令，凡15岁以上男丁，一律持械登城防守，若违查出治罪。"一时城墙上人头攒动，却未见一匪到城下。次日派一绰号名李二管事者，持官绅致匪信，由东城缒城，肩扛白旗，到生词村与匪接头，被引入大瑞城见到李绍宗交出信函，李匪允言和。次日城内派士绅李吉安等2人，仍由李二管事陪同，去见李绍宗，磋商给款撤走匪众事。商谈多日，匪始允给滇币3万元率匪离屏。其款均摊派在城中住户头上。匪得款后方撤光。

匪退次日，笔者出西郊，来回未见一人，鸡犬声亦毫无，静如深夜，只见附近各村被烧房屋还在冒烟。

石屏匪乱，以民国16年（1927年）前几年间最甚，匪踏平旷野，烧毁新街，攻入龙朋，围困县城，全境糜烂，只宝秀一区未受肆扰。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建水匪首及匪患

刘端周　李品三

建水匪患，由民国3年（1914年）驻防建水陆军步三团军人叛乱起，至民国23年（1934年）肃清止，这20年中，为匪患最激烈嚣张的时期。土匪有大股匪、中股匪、小股匪等称呼，大股匪首称为大老板，其次者称二老板，又次称小老板。大股匪经常有数百名匪徒，由匪首率领，若逢重要事件，能号召聚众数千人，甚至聚众至万余人。其次者亦可号召一二千人或数百人。这些匪人有受到严厉的苛派和压迫为匪者；有好吃懒做之徒，甘心自愿为匪者；有挟仇怨被迫为匪者；有地痞、地棍与赌博盘剥流为匪者；有商贩生意失败为匪者。故尔这些匪人，五花八门各色人物都有。早期为匪的，在民国初年，有白家营之周映堂，南庄坝之林桂清，狗街子之莫朴、白万，样田村之谭林、谭焕等。其次曲江野戈坝人吴学显、杨有堂、禹顺甲等亦接踵而起。军阀龙济光扰乱滇境之后，匪首的势力渐渐膨胀起来，其中以吴学显势力为最大，为众匪首之巨魁。迤西方面，有杨天福等亦能号召数千匪徒，经常抢劫扰乱西路，但杨天福之出身历史不详。

兹将各匪首出身简历录下：

吴学显，建水县典江野戈坝人氏，其父在清朝为武举人，故当时人称吴三少爷，粗识文字。在民国6年间与本乡乡团首俞英贤，为争夺水沟利益，闹成械斗，结果俞英贤被吴学显杀掉。吴学显自知不能逃免，乃率众流为匪人，经常以云龙山为巢穴，聚

众数百余人，抗拒官军。民国 8 年间，滇督唐继尧曾招安杨天福为滇军第一支队长，并招抚吴学显为滇军第二支队长。唐继尧被部下顾品珍等逼走后，杨天福被顾品珍诱杀掉，吴学显闻讯后即统率该部军人叛变，攻破元江城，抢掠一空；后又围攻蒙自城，据大屯街和鸡街与军长超威将军罗佩金作战，双方死伤人数亦多。罗佩金时任迤南巡阅使，被吴包围几被所擒。民国 11 年春季，唐继尧由广东回滇，吴学显号召各匪首在内响应，欢迎唐继尧回滇复任滇督。唐继尧曾任命吴为滇黔联军铜仁镇守使，在贵州被黔军击溃，负伤后回滇，任造币厂厂长。民国 16 年唐督死后，龙云为省主席，吴学显复反水，号召旧部人员欲暴动，被金汉鼎杀掉。

杨有堂，建水县曲江坝人，出身农民，为地主逼迫欺压为匪。聚众一二千人，经常与吴学显部联合在一起活动，曾编为陆军二十一团团长，后升任旅长，在贵州失败后退回云南。逢二·六政变后，在胡若愚、张汝骥部下仍为旅长。至胡若愚退位让龙云作省主席后，曾与胡、张军队叛变，一同围攻省垣，结果失败，向省外逃潜。回滇时正遇滇军步三旅龙雨苍在迤南诱哄众匪首缴械投诚，当时吴学显已死，各匪首听从禹顺甲指挥。杨有堂曾向禹提出，龙旅招安免罪之话，千万勿听。奈各匪首思想不一，再则人人都有了财产，只知缴械免罪、过幸福日子。杨有堂多次活动无效，后被龙雨苍运动杨有堂旧部人员孙国安，把杨有堂刺杀死掉。

禹顺甲，别名发起，石屏县矿野坝人氏，成分地主。禹为人暴戾绝悍，能号召千余人，经常与吴学显联合任事，声息相通，曾同吴学显欢迎唐继尧复任，编为省军旅长之职，后被遣散回家，常与官军作对，并把军队打败，抢得大炮一门。结果被三旅龙雨苍收买其身边姓韩的一人将其活捉送到省正法，临刑前还说悔不听杨有堂之话，以致如此。

皮中和，建水县曲江人氏，成分富农。皮在劣绅土豪的势力

下，被迫为匪，与吴学显相联合，共同抢劫元江、蒙自、大屯等处居民。在建水消灭赵瑞生旅长部，在陆良天生关消灭顾品珍滇军总司令部。后编在滇军八梯团任独立营长，随吴学显出发贵州，编在陆军二十二团任团长，结果在贵州被黔军击溃失败。

金恩荣，建水县龙岔仓房人氏，成分贫农。民国5年间，他胞兄金恩泰赶马求生活，与个旧劣绅杨某交往，后被杨某诬良为盗，仗势逮捕，送官究治。逢贪官受贿，竟将金恩泰杀死。金恩荣将马卖掉买枪支代哥哥报仇，在个旧柿花巷口于白天相遇仇人杨某，将其杀死。官家几次捉拿，金恩荣聚众抗拒，打死官兵几人。流为匪人后，时常抢劫捆人勒赎，势力渐渐发展扩充到数百人，与吴学显联合成一体，编为八梯团第七支队队长，后改编为陆军二十三团团长。在贵州省被黔军击溃失败后，来个旧办矿厂发展起来。最后因与石屏李杏国争挖厂尖事，被李串通蒙自道尹诬以暴动杀死了。

莫朴，建水县狗街子人氏，成份地主。民国初年，因犯罪被官家捉拿，率众抗拒，流为匪人。经常抢劫捆人勒赎巨款，受龙济光委任扰乱地方。民国6年受安抚后，负责保临安至个旧路线。民国10年受吴学显指使，集党同金恩荣部到广南欢迎唐继尧回滇，曾在宜良天生关击溃顾品珍、杨适生等部队，编成独立混成支队队长。后编为省军统带，又任陆军工兵旅长，盘踞个临蒙地方，大开赌场，收赌场捐款和苛捐杂税。以后反水，围攻个旧，任意烧杀天君阁外一带居民，被军人击败逃回狗街。继又率众到江外围攻新街子（即元阳），又遭遇人民的打击失败，逃回狗街巢穴。最后被驻建水陆军七旅派队围攻，当场击毙。

王应来，建水狗街坝人氏，地主恶霸，因犯罪为匪。常捆人勒赎，抽头摆赌。后在莫朴部下任分统，经常住个旧，压迫人民，估霸厂尖，财雄一方，解放后，被人民拿获，减租退押时，自知对人民罪重，自行吊死。

普文成，建水藤子寨人氏，出身地主，为莫朴部下分统，同兄弟普文荣欺压乡里，四出抢劫。普文成在民国24年率领匪党400余人，围攻弥勒属之竹元，抢掠居民。地方人民起来抵抗，与开远军警联合围剿，将普匪全数消灭，普文成被当场击毙。

佟汝甲，建水县人氏，少数民族。先与莫朴同为匪党，至招安莫朴保路，佟亦同为保路。民国7年间佟莫二人发生意见。佟反对莫朴，酿成械斗，二人势力不相上下。民国14年，佟曾率领匪党数百人，乘虚进入建水城内，占据四门，抢劫富滇银行和居民，临走时把建水县长郎松林和绅士富户数人绑架拖走。事后年余，被李发贵用计杀死。

李绍宗，建水县人氏，佟汝甲之侄儿。佟死后，李绍宗统率佟之旧部匪党，借报仇为名，扰乱地方，啸聚匪党二三千人荼毒人民，进攻建水城。并与町畦寨之李运鸿结连作乱，任意烧杀东坝一带的居民。后被蒙自道尹陈鹤亭招抚，保举任十三军一路追击军指挥官，同陈道尹进个旧驻扎。个旧先有陈春萱、朱映春二人为保商保厂大队长，占着不让，与李绍宗作战七八日夜，李绍宗势力不支，被陈朱二人追击逐出个旧。是役烧毁个旧正街铺面房屋数百间，人民死伤数百人，财产损失无数。后政府委李绍宗为少将指挥，令攻曲靖廖角山，打退胡惹愚、张汝骥、杨有堂等。以后，李绍宗又被调往路南县，次调开化（文山），又调往开远县。在所驻扎地点，均放纵部下，大开赌场，欺压人民，敲磕财物，暗地打劫抢掠，无所不为。后被人民告发，政府始派卫士队军人到开远消灭李绍宗，将其全部瓦解。李绍宗潜逃到省外隐蔽，直到民国28年在贵州黄草坝拿获正法。

金发明，建水县马军营人氏。民国初年到广东，在龙济光部下当过小军官，随龙军回来之后，在家赋闲，寻事生非，或摆赌，或敲磕人民，捆人勒赎，抢劫行人。经官军捉拿几次，皆被走脱。逃至个旧遇招安，为保路队队长，保个旧到江外路线。民国10年，

莫朴、金恩荣要往广南迎接唐继尧，邀约金发明同往，伊不但不愿同去，反把这消息泄漏，被金、莫二人诱到普雄杀掉。

李运鸿，建水县町畦寨人，彝族，出身农民。该人残酷暴戾，奸险异常，能号召数百千把人。民国14年与陈寿明械斗，在马军营上下数寨任意烧杀居民，酿成人民的大灾难。江映枢任蒙自道尹，曾招抚为蒙自警备司令官。然后叛乱，把蒙自的绅士商人等，如数绑架拖至阁洞内勒赎。继后在建水山心地方，拦劫火车，把个碧火车上乘客300余人，绑至阁洞内勒赎。后被驻军七旅派队伍围攻，经围攻数月，李运鸿潜逃到江外地方，染上烟瘴病，被伊部下人员杀死，将首级来献。

建水匪徒勒赎之事，在土匪肆虐之时时有所闻。开始进行捆人勒赎的，是建水南庄人孙某（失其名，人称孙歪老）。此人民国2年到广东在龙济光部下当小军官，后随进犯云南的军队回建水。龙军溃败后他亦同龙军到江外住了一些日子，以后又领着10余人潜回建水，途中至洒戛地时，偶遇富裕商人高定芳同一地师去看阴地，孙歪老等人把高定芳捆绑起来，将地师放回告知高的家属，云即日交大洋1000元赎人，否则要将其杀死。高定芳的家属接到信息，急速携款到洒戛地交清将人赎回。这是孙歪老由广东学来的做法，广东人称为“拖肥猪”。此风一开之后，建水各匪首人人效尤，捆人勒赎事件层出不穷，有匪首李绍宗更别出心裁，架绑外国来传教的洋人。以此要挟当时政府满足他的要求，此事还发生对外交涉，最后李绍宗才无条件的把这洋人放了。

兹将各匪首架绑捆人勒赎事件简列如下：

（1）民国14年，匪首陈春萱由江外逢春岭土司衙署架绑土司龙毓乾到建水白家营，勒索巨款数10万元。

（2）匪首张达，由开远架绑一位姓瞿的旅长；又由碧色寨车站架绑个旧厂商苏良田，俱勒索巨款数万元。

（3）匪首周兴国、梁道修在鸡街车站架绑法国东方汇理银行

蒙自支行经理梁子惠到官厅勒索巨款，因梁子惠自戕未遂。匪首周兴国到江外石头寨架绑团首肖金科，勒索银洋数千元。

(4) 匪首金恩荣，在宜良车站架绑个旧县长刘祖荫，勒索现款2万余元。

(5) 匪首佟汝甲，在县城架绑建水县长郎松林，勒索巨款若干（不记其详）。

(6) 匪首李运鸿把蒙自的绅商数十人架绑到阎洞内，勒索巨款才放了；又抢劫个碧火车数次，最后一次还把乘客200余人赶进阎洞内勒赎。

(7) 匪首杨春发，抢劫个旧卡房街居民、商号、厂商，并架绑100余人向元阳一带窜去。

(8) 匪首吴学显，架绑曲溪团首俞英贤，索款未遂将俞杀死。

(9) 匪首高维嵩，在建水东门口架绑富商曹鸿章勒索现洋数千元；匪首金发明在环城街架绑富商马骥；匪首祁晖在城内架绑富商曹茂，匪首黄玉元架绑伍绍稷；皆勒索现洋数千元。

此外还有徐家富、张家顺、李明、管有智等以及其他若干不知名的匪首，则逢人便捆，不管其有钱无钱，甚至连杨家庄小学校全部小学生和教员都被捆去。在土匪捆人勒赎事件猖狂期间，人们离开建水城3里路外就不敢行走。四道城门只开东西两门；各道栅子，只开石桥、泸江桥、环城街三处出入；并且不等太阳落就关闭。居民住户、商店等不到天黑就家家关门闭户，街头巷尾绝少行人。就这样，有的土匪还暗藏短枪潜入街市小巷，碰到机会就将人绑拖走，等团队人员赶到，土匪已走远了。

土匪捆人勒赎的手段，花样繁多，层出不穷，异想天开，非常毒辣。一旦将人捆到匪巢之后，就一面对本人进行拷问家中之有无，一面派人探询被捆者家中情况，据此好进行逼索。如认为被捆之人未说实话，就施以各种毒刑，最残忍的，是用细棕绳箍在人头上，另用小木棒一根插入绳中渐渐扭紧，使人忍受不住，疼

痛昏去，这就是所谓的“临安套头”。有的家庭一时筹措不起赎金，土匪就将被捆者关在土穴之中，每天只给稀饭一碗，进行折磨。有的土匪还相聚赌博，将被捆者打成赌本，赌而负者，即将自己捆来之人交给胜家。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旧社会里，官匪一家，人民遭受匪患，有冤无处伸。解放后，土匪被肃清，人民始重见天日。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镇远的兵匪之乱

梁　鼎　黄永锡

镇远人民所遭受的兵匪之祸，莫过于军阀割据时期的民国12—15年(1923—1926年)。

事情得从滇军二次入黔说起。

护法战役之后的民国11年(1922年)4月9日，袁祖铭入黔当政，他既不理睬老上司原贵州省长刘显世回黔主政，也不再受一向把贵州当做自己"势力范围"的唐继尧指挥，从而大大触犯了唐继尧向外扩张的野心。民国12年(1923年)，唐以滇军胡若愚旅假道贵州被王天培缴械为借口，自行恢复滇川黔联军总司令名义，派其弟唐继虞率张汝骥、吴学显部进入贵州，讨伐袁祖铭。袁祖铭力不能支，率部退出贵阳，辗转至鄂西投靠吴佩孚。

贵阳被滇军占领，刘显世重任省长，唐继虞任贵州军务督办。

滇军张汝骥、王沽修、吴学显号称三路总指挥，率队来镇远驻扎，吴学显部乃云南收编之土匪，平浪荡于大街小巷，强买强卖，敲诈勒索，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县太爷因应付不了这帮"匪军"的军差只好弃官潜逃。

后张汝骥和警备旅长王沽修率队返省，黔东各县只有吴部驻防。当时在镇远驻防的有彭管带、皮司令等部约几千人。他们逼粮要款，无休无止，有的拿假银元当真银元用，谁也不敢说个假字。更令人切齿的是，这些匪军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抢姑娘，大商号刘聚金家的一姑娘被逼得跳了河。当时躲在董九如先生家

避难的姑娘就有二三十人之多。

吴学显部撤走后，是年冬，又有一个自称支队长的梁惠卿来镇收编匪众，其肆行无忌不亚于吴学显。东门口的一条街被其放火烧毁；文明书院被毁得只剩断壁残垣，所存书籍损失惨重，因此激起涌溪人民无比愤恨，他们意图攻城，以武力驱逐之。当时有杨茂森、王平甫等头面人物怕将事闹大，出面制止。然而这两个人反而险被梁枪杀，幸经杨玉和出面说情，始免于难。

袁祖铭退到鄂西，受吴佩孚指使入川以协助川二军与唐继尧协助的川一军作战，屡挫唐继尧支持的川一军，名声大震。唐继尧深怕袁自四川挥师南下，便主动与袁和好，表示自愿交还贵州。

民国14年(1925年)1月23日，袁祖铭派彭汉章为贵州省清乡总司令，回黔接收政权。2月17日北洋政府任命彭为贵州省长，彭派他招安的土匪部队驻扎镇远。先是十九团洪范率队来驻扎。十八团王奠宁见洪范先来驻扎，便率部攻城，两军相持不下，最后洪部溃败，王部攻入镇远，大肆掠夺。当时地方土匪亦多，什么大老撞(钟姓)、小老撞、费占标、谭国安、向镇清、彭松廷、刘正清、张海清、大老闯等，大帮小帮不下几十股。兵去匪来，匪去兵来，轮番掠夺，城内百姓无一家幸免，绑架的事司空见惯。有个叫陈志刚的，被绑架后久久音信杳无，他的妻、儿都认为他已经不在人世，没想到在次年农历七月半，他家正在哭哭啼啼给他烧包时，他竟然回来了。

这些匪徒不但抢掠、绑架，而且也如滇军吴学显的匪军一样，连大姑娘、小媳妇也是他们抢动的对象(称姑娘为花叶子，称媳妇为包箩)。姑娘、媳妇们只好白天藏在阴沟里，到了晚上才能偷偷出来就食。只在梁家巷的大阴沟里就藏十几个。如躲藏不及，就有被拉去做"压寨夫人"的危险。有一家的姑娘就被抢去做了两年"压寨夫人"才放回来。

十八团、十九团走后，又"杀"出一个自称司令官的姜文华来镇远驻防，并网罗收编土匪以扩充势力，因人多势众，竟把镇远常平、

府义两仓积谷吃空。他们为维持军食就颁布一些苛捐杂税，老百姓的血汗几乎被榨干了，仍难填满他们的欲壑。最后他们就来个大搜，先搜大户，后搜小户，然后又挨户搜查，如发现哪家还有点米下锅，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进行严迫威逼，非挤干不可。

民国15年(1926年)6月，袁祖铭通过吴佩孚改委周西成为贵州省长，彭汉章任军事会办。不久，罗觐光率队从四川来此，驻扎镇远。此时城中已无油水可捞，罗觐光便派兵下乡搜刮。有些乡下人把粮食藏在坟里；城里梁家巷的梁老太太到乡间找到一点麦面，要装在长口袋里，戴上童帽，装成象抱孩子一样，才能弄回家。

在无法生活下去的情况下，镇远商户纷纷外逃，外商也返回原籍，以避灾祸；无处可躲的，只有呆在家里，听天由命。

当时的县长郑伯鸿，为官清正，体恤民情，在社会动荡不安之时，常与区长戴仁斋，团防局的林开荣，带壮丁查街。一天夜晚，当他们巡查到六牌北极宫城外时，突遭匪徒袭击，林开荣被击毙，县长郑伯鸿、区长戴仁斋均被俘获而去，壮丁们逃之夭夭。县长太太闻讯，忙这帮匪徒闯进县衙门，从县衙门后面跑到仁寿巷王审判官家，又觉得躲在他家不保险，就又跑到王家隔壁的梁家躲了起来。

县长、区长被绑走后，一直渺无音讯。据说这个绑架县长、区长的匪首，就是小田溪的刘正清。

不久，周西成派旅长侯小白来镇剿匪，以巩固其在贵州的统治地位，附近大小匪帮始稍收敛。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道真匪患辑要

柯昌佑整理

道真于民国30年(1941年)设置建县，此前隶属正安。从清咸丰至民国近百年间，境内匪患频仍，地无宁日。兹据有关史料辑要如下。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土茭子涂子香、肖国堂、盛光辉等在南川交界一带聚众寻仇，焚杀抢掠，抗拒差捕。正安州牧李上珍与南川县令张涛会于边界解决，涂子香等据寨顽抗。张涛檄韦材椿带练往剿，涂、肖夜遁。次年，李州牧诱肖杀于州城，事平。

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南川滩匪杨炳元潜伏大碛坝，不时入州抢劫。其党羽杨世玉、杨兴发、江鹏飞、古定邦等七八十人，由桐梓窜入庙塘(今正安县境)，为团总戴昌伦击溃，乃由水车至安场与杨炳元合，出新州，假道四川南川元村坝入川。该地团首韦心培率团御之，大败。匪等饱掠而复据大碛坝、土城坝、土溪场。旋走韩家沟，团首袁伯隆诱其匪徒诛杨世玉、杨兴发。袁一面密报州城，一面设伏。正安驻军蔺管带往剿，匪等退至王家湾，伏兵齐起，阵斩江鹏飞等7人，古定邦、杨绍武、严少臣等逃至四川继续抢劫。二十八年，正安州牧郎承谟派周吉至重庆，侦获古等5人，解州城处斩。

宣统元年(1909年)，复兴场何海廷纠纷胁数十人，于文庙、羊赶溪、丁氏坝各场抢劫。州牧龚玉铨率团练迭剿，何遁四川彭水乾溪、后山一带。官军还，何复骚扰如故。三年，何率众抢劫广东烟(鸦片)商烟土数十担，经广东巡抚咨贵州巡抚缉捕。北路巡防统领

徐安邦奉令来州，令管带刘元堂围攻数日，匪弹尽粮绝，以白刃相拒。官军焚其穴，擒何及其管事黄金亭解州城杀戮，乱平。

民国元年(1912年)，安场盐务军正目刘占彪叛变后，盐军裁撤。刘拐枪2枝，纠集黔军败类李云波、骆焕章、杜瞎子等百余人，常在十二茅坡、马家山等处抢劫行旅。民国2年初，李云波与骆焕章分股入川，均为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改编。旋即叛逃，李、骆仍分驻川黔毗连处抢劫。驻正安防军周连彪招安李云波，县知事张沛泽招安骆焕章。时李、骆不睦，互欲相害。周欲讨骆，张欲讨李。张至梅江，欲击李于土溪，侦知李匪有备，未遂。周以李匪为向导，在桥塘高寺一战，击走骆焕章。次年骆匪为四川巴县所获，正法。

民国3年(1914年)秋，以防滇军中队长高云中部下赵健友、汤子漠叛逃，至土溪与李云波合，四处劫掠。清乡督办刘显潜诱李杀于正安县城。汤乃出川。

民国6年(1917年)，川匪刘湘臣率五六百人盘踞丁氏坝、三岔水、文庙、新场一带大肆掳掠，新任团防局总理吴九成带练20余人赴县报告，县知事陈某率保安营一哨一与吴至丁氏坝，协驻防军排长王家烈追剿至四川涪陵，并得龙洞区长高素之协助夹击该匪于广坪中嘴，毙匪营长谢某及匪众数十，缴械数十枝。

民国11年(1922年)2月，川匪赵海州盘踞土溪场。巨匪骆健廷(绰号骆塌鼻子)派李惠风率众继至，破土溪韩兴顺寨及马禁台冉云山寨，掳掠数日，拉去富绅10余人。5月，骆健廷又裹胁甄少云、甄少清、刘少云等分踞土溪一带，与务川濯水彭耀武、熊少清合，约3000人。旋彭熊出涪陵。骆留丁氏坝，破洞劫村，耆民关树堂被杀，并派遣杨成忠掠周盖垭、水石脚、石缸内等处，毁民房数十间。骆闻正安城为戴和清、张占云所陷，乃率千余人进踞安场。守城保安营长陈应奎败溃花池。

民国12年(1923年)5月5日，骆健廷陷正安城，设城防司令，派陶春和(绰号陶瘟牛)等占踞安场、新州以为久计。19日，北区团

劳分道进取，以王怀珍部为主力，取道老鹰关直攻县城；张谷成、张兆魁取偏岩、石梁河攻城之东；韩应文、陈占春取道蒲算台，以断援安场之匪；陈维祯取下寺攻安场；张辅之、韩继儒、牟仲辉等率众分道策应，初颇得利。后韩应文、陈占春部为匪纵队长刘少云所败，兼军粮不齐，俱各撤退。

是年8月，王歧山声言奉旅长张汝冀令入踞正安县城。次年2月4日，经绅耆会议决定，以王歧山部住城中，王怀珍守安场。21日，骆健廷、刘健清等围攻县城。王歧山力不能敌，退格林窝，复遭骆匪夜袭，而退。王怀珍部退回北区。4月4日，北区团练陈维祯、韩继儒、王怀珍、李在华、牟仲辉与南川团练队长张茂春等克复正安。骆匪逃占安场。7日，骆反攻，城复陷。时骆匪众患瘟疫，闻王歧山、毛秉权、尹鸿猷、吴燕清等至，于5月12日狼狈逃遁。吴燕清见正安凋敝，率众他往。王、毛同驻城中，互相猜忌，各伏杀机。6月15日，毛秉权谋杀王歧山。7月，毛部兵士数千，日食困济，乃由土溪经大路槽东向他去。

民国17年(1928年)9月，川匪徐文光、段少清(人称徐段)裹胁千余人入境。先后在大磏坝烟熏大关洞，死居民百余人；烧蒿芝窝洞，死男女80余人；焚三会场民房10余间；破左家寨时，绅士熊鹏飞遇害，并挖掘绅士左鸿章遗骸，戮其尸体，继烧毁民房百余间；拉富拉夫200余人，六畜抢尽。次年正月，三进三出丁氏坝一带，轮番抢劫大烟、财物、粮食。并焚烧苏窝柁谢、冯两姓民房20余间，毒杀谢祥，割耳烧尸，惨不忍睹。二月初一日，派200余人攻打大路槽山头洞、黑磏岩，因洞险未逞，便烧沟子湾、桃子坪民房数间，复踞土溪场一带。3月，驻正安黔军团长谢治安率部进剿，徐、段败走，待谢部返正安时，徐、段盘踞如故。次年4月，四十三军师长朱沛然来正安招安徐、段，编为十三、十四两团，兵匪一家，仍大肆焚掠，遍及全境，致使农辍于耕，商罢于市，灾民达10万余。8月，团长谢治安令营长何青云及本县清乡大队长黄守瑛夹击朱沛然于天河寺，

擒朱以归。

民国 18 年(1929 年)2 月 12 日,戚福星率众数百由务川入境,经大路泥池垭、平水缺、偏岩子等处,遭地方团防击其后部。戚怒,烧毁大石磴、槐子坪、偏岩子民房数十间,并杀死无辜农民韩忠现、韩继州 2 人。

民国 19 年(1930 年),樊村人樊光斗,先提获赵海州枪 60 枝,藉以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官军捕,漏网。樊野心极大,勾结李昌荣、刘国辉等欲取遵义而进窥省城。21 年,驻军指挥官林丽山诱樊诛之。

民国 21 年(1932 年)5 月,李昌荣先以川匪就编成军,旋被裁。闻正安境匪盗四起,有机可乘,便纠合刘国辉窜入土溪场、大路槽、土城河一带,遭团队韩贞伦、韩勤宣、余伯伦率队拒之。匪等恼羞成怒,焚毁土城场、马蹄溪、三君坝、台上、打铁湾、大光坪、平老官一带民房百余间及大祠堂两级学堂。同时杀害无辜农民韩福应、韩牛、韩碧珍、韩李氏 4 人。李、刘股匪后为四十三军教导师长杨其昌所改编。

是年 10 月,邓权英、黄永叔(人称邓黄)纠集数十人,在川黔交界地方辗转抢劫,后入踞土溪场,烧杀掳掠,蹂躏 40 余日,乡团张辅之、杨育之等督团进剿,于柳马沟一战,乡团失利,队长韩作宾及乡兵 20 余人阵亡。匪等焚柳马沟民房 10 余间。后邓、黄为杨其昌改编。

民国 26 年(1937 年)8 月,悍匪杨金廷,系黔军第三师逃弁,纠合詹季高、唐克明余匪劫夺桐松路汽车、商旅,甚嚣尘上。中央军九九师自桐梓追剿,杨窜入庙塘、水车、新州、(均属今正安县境)、大磡坝一带,后盘踞土溪场。正安县长令科长梅友松率队长李玉柱协同第五、六、七区团队进剿,皆败北而返。次年 5 月,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刘千俊派保安副司令石勋率队进剿。杨窜入大磡坝与吴建翘合,吴自称司令,杨自称团长,人枪愈众。县长周凤文令军官陈惠民

率保安队及北区各团练协助官军围剿。陈至土溪场以四面受敌，移营河南韩家坡。翌日晨，与匪战于茅香坡、牛心山，各区团不能制胜，杨再踞土溪场。是日午，中央军九九师苏营、保安副司令石勋各率队复至，杨匪遁走丁氏坝、羊赶溪、三会场一带，苏营、石勋追击，屡胜。杨率残余出四川彭水浩口，折回铁窑而入务川。石勋等跟踪穷追，大败匪于大、小二坪，杨只身逃入绥阳彭家湾，为官军樊其书所杀。

是年，第六区铁窑土豪李永熙，自恃地邻正安、务川、彭水交界，政府控制难周，私自派款造枪，自称营长，仇杀李义方、李元章，虽襁褓亦难获免，称霸一方。驻正安防军曾两次往剿，未克。李永照复杀死该区区长韩代辉。其弟韩代蕃置枪办团，相互械斗，地无宁日，百姓受害。县长李培根至东塘口召集双方合解，人民稍安。27年(1938年)3月，县长周凤文奉省令驰剿，围其寨，李永照夜遁。4月，中央军九九师团副杜根福率队由务川往击匪寨，毙李代英等10余人。李永熙逃匿务川青岩乡内，官军追至，受害百姓争为向导，擒李而戮。并没收其部分财产，以作当地办学基金。

民国34年(1945年)5月1日，湖南省出席中国国民党六大代表毛秉文、张炯、张中宁，湖北省履新财政厅长吴嵩庆专车各一辆，分别由涪陵、重庆方向对开，在四川省武隆县白果树(即车盘洞)先后被劫。4日，四川卫戍第一分区司令部参谋长朱育万查办，并致函道真县长赵季恒派队协缉。14日，赵将与此案有关的大碛乡乡长王怀瑾诱至县城扣押，10天格毙。15日，又将同案之永锡乡乡队副胡汉廷格毙于永锡乡公所。16日，道真县保警大队、民联防总队及预十师杨营全部向大碛、永锡两乡分别清剿。击毙13名，俘8名，解第一分区司令部。追回失物141件。

(贵州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思县民初十年匪乱史略

姚绍坤

思县(今岑巩县)地处黔东,地方偏隅,山大林密,河溪深涧,纵横交错,地理复杂。置县前为思州府故地。自民国2年(1913年)废府置县后,思县即处在猖獗的匪乱和兵争中,长达10余年。

清末民初,思州府治地的大有一带匪聚山里,占据府地通往玉屏、青溪等地的主要通道。初时对地主官府没有形成威胁,对民众尚无更多危害,土匪活动只限于在较小的范围内。民国开始后,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匪势开始蔓延并日趋猖獗。

民国8年农历十二月初六,时逢罗家山(今注溪)赶场,匪首张大汉、龙老五纠集匪众在楠木坳设关卡羊,抢劫赶场人钱物,重点对象是城内商民。较为富有的商民涂保廷、颜茂恒、张朝相等前往赶场经商被匪拦劫,不但把所有物资抢光,而且将3人绑架至镇远属地的铧口山勒索赎金(俗称捉肥羊),钱物收刮殆尽才放归。这是民国初期在思县境内为匪关羊劫商之首次。众匪因之肥水频增,发了横财,一些游手好闲者、见利思迁者亦效尤干起了土匪营生。不久,在思、龙颈坳(今龙田)、马鞍山(今天马)、钟灵(今羊桥)等地相继出现聚众为匪的情况。民国9年六月初七拂晓,匪首冉崇英(四川秀山人)带领匪伙抢劫罗家山,直逼区公所。区长吴镇南、田秀平立即组织区属人员和警兵抢占要塞,布置关卡,严堵抢劫,开展了枪战,匪群大溃,投降的有3人,负伤逃窜的多人,并生擒匪头目渠魁,送县府于次日砍头示众。两月后,匪首张大汉与另一股匪首领

李德卿等合伙50余人，身带大刀、梭标、长茅、火药枪、步枪，抢劫并攻陷了罗家山，县官潘富文飞报镇远游击司令请求派兵清剿，援兵与县府警兵两面出击，击溃匪众，匪首张大汉等逃离县境。然而，当得知潘富文离任，新任知县抵县即将接印视事时，即又起祸心，企窥县城，以图大财。十一月十一日夜，几股土匪突袭都哨街，意在进入高等小学（今岑巩县中学）捉人勒赎。匪众突袭都哨街时，该校师生多半住宿于校内，闻听枪响，住校学生越墙隐伏于龙洞河（今龙江河）岸的荆棘中，一些值钱物件被抢。匪情出现后，卸任知县潘富文和新任知县夏茂德立即登碑城楼指挥，率众击匪，一面指派县警备队长何乾九带领精选的10名警兵由北街岳王庙滩口涉水过河，抵下瓦窑后山侧射，封锁堵住匪众退路；一面派另一警官带兵由沙溪塘上滩淌水过河，形成夹攻之状。一时之间，城内枪声大作。土匪支持不住放弃都哨街向桑坪方向溃走。

民国12年农历三月，数股土匪纠集在一起再次抢掠攻陷了罗家山，县团防局头目吴治邦接到情报后，派人夜奔湖南新晃县团练指挥部，请求兵警援剿。经过数时激烈战斗，打垮了土匪，收复了罗家山，毙匪多名。新晃县警兵战死11人。这次官匪交战以官府损失惨重告终，也是历次匪陷罗家山形成军事对抗最为严重的一次，震动了邻县及镇远行署。但是，引战也打掉了匪伙嚣张气焰，致使此后不敢轻易抢占罗家山。

同年仲秋八月，被某军抚委授团长职的杨松青率队进驻县城，团部设考棚内。县长肖乃昌畏惧军势，让权于杨松青。杨先后委任一批县、区、乡（镇）文职人员及军事长官，承揽政府公务。他对思县机关学校进行裁减，只留经费局，过去余数经费"全数移用"，并预集学校谷，使当年财政负担支大于收，出现空缺。民国13年三月，卸任县长肖乃昌奉调镇远，但辞不赴任，意留思县与杨松青理政。省会任命的新任县长董时熙虽到县履职，但无能为力，处处遇到刁难，尤其是对杨松青等裁减机关学校和预集学校谷而不满。夏五月

滇军司令景世奎护商到铜仁，董时熙闻讯密函景，归时到思县围剿杨松青，搞掉肖乃昌。六月初六，景世奎率部队由青溪县出发攻打思县县城。此时正值杨松青率队外出，城内留守只10余人。守城士兵不敢交战由后山逃逸。肖乃昌隐匿城内一民户家。滇军入城搜查，捉住肖乃昌，以通敌为由把他枪毙于考棚（杨松青团部）前。八日由代理县长杨建藩将肖乃昌尸体埋葬于望城山（坡）阳。枪杀肖后，县长董时熙跟随滇军晋省述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怕杨松青返回报复。十一日杨松青率队归县，果然寻求报复，惧祸者纷纷逃遁。秋七月，杨松青带领保商团赴铜仁，接受川军贺龙安抚就编。贺龙将杨松青的保商团编为川黔边防军第九混成旅第一梯团，即先锋团，杨松青任团长，罗统一任副团长。收编不久即转战湖南。但杨松青匪性不改，继续干着抢钱、抢物、抢（女）人的勾当。部队由湖南澧县撤出时，杨松青带了名妓“盖五省”随身玩乐，终日花天酒地。其部下亦皆效尤。杨松青到大庸县城时被贺龙扣留，部队被缴械解散。罗统一被贺龙留下改任某团营长。杨松青回到老家（湖南）便水县后不久病亡。

董时熙随军赴省，由本县人杨建藩代理县长。杨建藩代理县长后，于八九两月整饬县政务，清查溃散的杨松青兵士，格毙了一批返县者。十月后，思县稍安。

民国14年3月，清乡军某部营长鲁国滨率领部队打进县城，据城一月余。新任县长陈汝鸿为了拉拢鲁国滨，进言省清乡司令张庭光招安抚慰。后来鲁国滨因与陈汝鸿不和发生磨擦而率队离走。四月，鲁国滨再次攻陷县城并赶跑了陈汝鸿，由某军委任胡炯章代理思县县长。不久黔军向盘踞思县军队开战攻入县城，旋即县长再次易人。由于兵匪频繁，战事不断，更兼乙丑大旱，全县城乡已成十室九空，人民纷纷外逃。直到第二十五军清乡第一纵队第七支队长刘树清入思清匪和安顿地方，黎庶才稍安生。由于军队派系倾轧，互相争斗，刘树清也坐地不稳，受到另一派系部队的攻击，遂反叛

为匪，进入思县名匪杨松柏部，干起了土匪勾当。

清朝末年就占山为王、盘踞于大有石家洞近20年之久的大匪首杨松柏，趁官方无力治政之时，大肆抢劫掳掠，匪焰猖狂至极。民国15年冬，匪徒分据茂隆、马鞍山、；罗家山一带设卡关羊，抢劫市场，使各地场镇不敢交流物资，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羊桥(钟灵)、凯朋(凯本)、龙颈坳、黄平庄(平庄)等地也相继闹匪关羊，人民谈匪色变，终日处在惊恐之下。冬十月，新任县长徐大泽接印视事，出榜安民，决心清除匪患，稳定人心，制止住户外迁。徐采取3条措施：一是召集各区区长到县府商定剿匪计划，确定攻击目标；二是抚民安定人心，不行各公职人员以权盘剥人民，违者追究严惩；三是函约二十五军清乡部队某部营长游春山来县支援剿匪。民国16年三月初一，石家洞匪首杨松柏再次派匪到楠木坳拦劫行商，大掠小堡街，正逢南二区区长罗嘉宾奉令兵壮入城集结，打了一场遭遇战，匪溃走老巢。次日，游春山率部队进入县城，各区区长带领的警兵、壮丁也先后赶到待命。县长徐大泽与营长游春山紧急会商，制定剿匪方案，决定由各区分别先攻象形屯、香炉屯、铁壁洞、哈蟆洞，以扫清石家洞外围据点。这样漏网之匪之必归老巢，然后集中全部兵力围攻石家洞。为歼灭石家洞之匪，一些群众踊跃参加了剿匪行列。阳春三月三，天气晴朗，县长徐大泽遣各区壮丁2000余名为先锋，营长游春山率兵分途驰援，一举攻克了上述外围据点，而后立即转围石家洞。该洞地处巍峨大山之中，周围悬壁陡峭，丛林莽莽，洞内宽敞，底层有暗流，地势力极为险要。杨匪及一些头目的妻室也都住在洞内，多年抢劫的钱、粮、物贮存甚多。徐大泽、游春山的兵壮抵洞后实行了层层包围，抢占了有利地形，控制了主要通道。经察看地形认为采取硬攻很难取胜，遂决定火攻。壮丁将柴薪自洞顶坠入洞口之下的洼地。匪众使用惯技自行引火燃烧企图从中断掉火路，可是火起燃烧旺盛，兵壮极力大加燃料，火焰更大，火乘风势贯入洞口，如同烧窑一般。初时洞内匪众乱枪

射击，谩骂不停，继而寂而无闻。大火整整烧了两天两夜。剿匪士兵乘火快火时进洞搜索。残存于洞底阴河中隐匿的10多名土匪，用棉絮浸水裹身，趁黄昏时的余光飞快奔出，外围兵警见之立即开枪射击，但未中逃之夭夭。经过检查匪首杨松柏夫妇双毙，烧死烟死者计200余人。检查清点财产，计大洋（包括折价）2000余元。徐大泽攻破石家洞，剿灭了全县匪势最大，祸殃最深、最久的杨松柏股匪，震慑了土匪，安定了地方，稳定了民心，受到官方地方称赞。

县长徐大泽攻破石家洞，人不休息，马不停蹄，立即转入清剿乡下之匪。沿路设卡坐坳之匪闻风丧胆，清乡队乘机追击，毙匪数十名，到黄平庄时，由于正值瘟疫流行，加之昼夜用兵，染病死亡兵警达二三十人。徐县长亦病势垂危，遂停止剿匪。同年农历四月，省府下令徐大泽晋省述职。徐大泽一走，思县的兵争匪乱重新抬头。原在思县任过局长、区长的周境廷和杨炳章倒戈为匪，驻军龙玉成另立山头，分别率领党羽割据各区；匪首吴和清等攻入县城，盘踞和占领各主要市场。一时间全县城乡被蹂躏不堪，民生凋敝。民国17年至18年，受委的县长、局长不敢前来供职，有的装病推诿，有的干脆卸官回乡。整个思县成了“一盘散沙”。从民国17年到19年，据史料载，是思县最为奇重的“匪灾”之年。被抢劫灾民计1700余户8000余人，经济损失（含物资折价）达11万元，死亡逾百人，惧匪搬迁外流的达500余户近2000人。匪股3次直接抢劫县政府、财政局等机关。最大的一次，是震惊湘黔边区的戕杀县长陈梓材事件。

民国18年10月，陈梓材任思县县长，12月4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贵州省主席毛光翔发出饬令：在全省厉行清乡，剿除匪患。进驻思县的某团团长毛××与陈梓材联合张贴布告，实行剿抚兼施的策略平息匪势，但由于反叛的部队为匪以及本地土匪各霸一方，匪众逾千，县政府的政令无法执行。民国19年5月底，匪首吴海清（又名吴宽）、杨炳章、周境廷、叛军龙玉成等密谋攻

打县城，6月1日拂晓，各路土匪计600余人，包围了县城，县长陈梓材势单力薄，束手无策。各路土匪向城内发起攻击，城内一片混乱。匪首吴海清由后山攻入县府捉住了陈梓材；城内不论官府和居民的值钱物件被掠一空。中午，土匪将陈示众游街，然后将陈抵在肉案上砍成数截(块)丢在地上，暴尸太阳。手段极为残忍，观者不寒而栗，毛骨耸然。县城被匪践踏一月余，人民被驱逐散亡于外，城内住户只剩200余户。6月底，省主席毛光翔派部队击溃土匪，进驻县城，委任周光焕为思县县长。7月16日，周光焕到县接印视事，重点恢复和组织机构，新委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和公安局长，县府各科长，各区区长、乡(镇)长，开展地方自治，特别是加强公安局和保警队的力量。不久。周光焕离任由徐又新接替，贯彻执行前任工作宗旨和计划，使全县社会面貌有所改观。解放前思县虽出现过十分复杂的斗争，但不再是民国8年至19年期间的那种兵争、匪乱的严重状况了。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回忆我家乡的匪患

周道祥

贵州省织金县化起镇，是我的故乡，1954 年我就离开那里了，但每每忆起解放前那儿的匪患，就毛骨悚然。

现就我的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回忆如下。

独　匪

织金县在解放前就有 40 多万人口，各区、乡、镇所在地都辟为乡场，乡场之间的距离一般都在 20 里左右。那时赶乡场是赶的转转场，每天都可以赶一个乡场，即牛、猫(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场。四川、湖南等地的小商贩们，经常三五成群，挑着包箩，奔走于山间小路上，今天赶牛场，明天赶猫场，经营日杂百货。

我们那里把土匪叫做“老二”，拦路抢劫叫“宰线子”。我们相邻的一个寨子里有个姓李的老二，二十七八岁，绰号叫老乱，经常扛着一把马刀，一个人拦路“宰线子”。1947 年冬天，老乱得知有 8 个湖南的小商贩，将要由小鼠场来化起镇，就在其必经之路文家丫口埋伏。山丫口两边山上都长满了树，他用茅藤把一些小树串联起来，把一个藤头拴在路边的一棵小树上，他就蹲在小树旁。早上约七八点钟的时候，山丫口被大雾笼罩着，那伙小商贩挑着包箩，喘着粗气，正走到山丫口中间，离他还有丈把远，他就猛的一下跳将

起来，把大马刀一晃，大声喊："不许动！"然后用一只手拉住拴在小树上的绳头，狠扯几下，把那些串在一起的小树扯得哗哗响，又大声喊叫："弟兄们快下来！"这伙湖南人不知山上有多少土匪，顿时被吓得心惊胆颤。老乱手脚很麻利，把马刀藏好，一把小尖刀含在嘴里，用预先准备好的茅藤，顺着把商贩们一个个都很快捆起来。随后把尖刀往腰间一插，就进行搜身，嘴里还不断喊弟兄们快下来呀。搜完钱、银之后，拣一小捆白布挟着，拾起马刀来就跑了。等他跑远之后，这些湖南商贩们才发觉，原来土匪才一个人，互相解开后，想追也来不及了。

第二年，老乱抢来一个姓张的姑娘，藏在一个岩洞里，不准出洞，白天睡大觉，等天快擦黑，他才出洞去抢钱或抢东西回来吃。起初老乱怕她跑了，出洞时就把她捆起来。时间久了，渐渐放松了警惕，不再捆了。有一天晚上，她趁老乱出去的时候，跑出洞来，到区里报了案。政府马上派4个人跟着她来捉老乱，刚跑到半路，正遇着老乱跑去追她，当下被区里来的人捉住，立即把脑壳砍下来，拎起回区里去了。

股　匪

有一股土匪，十五六个人，头目姓崔，有3条枪，离我们寨子10多里路，经常来洗劫这里的几个寨子。他们怕被人认出来，即使是在晚上去抢人，一个个都用锅烟灰把脸抹黑，手里打着电筒。1948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我家邻居李南清的儿子李金贵结婚刚3天，我和张明善、李隆凤等几个在李南清家"掷色子"玩耍。我们看天上下着毛毛雨，都以为今夜可能太平无事，大家就多玩了一会。到了深夜1点钟左右，突然听到寨子外"叭叭"两声枪响，接着又听到有人大声叫喊："老二来了！老二来了！"一时整个寨子20多户人家便慌乱起来。人乱跑，狗乱叫，都不敢点火把或打电筒，各人摸黑

跑到寨子外找躲藏处。张明善那时腿上正生着疮，又红又肿跑不动，我背他跑了几步，不行，只好一同躲在李南清家牛圈楼上的一堆乱稻草里。不一会就听得有几个土匪冲进屋来，喊叫着："不许动！不许动！"并乱翻乱砸东西。不知怎么搞的，竟把李金贵捉住了，土匪们知道他刚结婚，就把他的衣服、裤子全脱光，把他抬到煤火上去烧，他杀猪似的惨叫。土匪逼他交出大烟（土烟）和银钱。我和张明善听到李金贵的惨叫声，吓得全身发抖。一个土匪站在楼梯上，用电筒朝我们的草堆扫几下，吼了几声就走了，没有搜着我们两个。土匪直把李金贵烧昏死过去才松手，最后把他结婚的衣物全抢走了。李金贵的屁股烧烂了，医了几个月才好，但右脚终归跛了。后来听他说，他睡得太死，他媳妇跑的时候拉他起来，他又倒转去睡，这样就被捉住了。

这一次，我们寨子里被抢的有4家，我家被抢去的东西最少，记得只有磁碗3副，腊肉2块，鸡4只，大米一小袋。

躲　匪

一吃完晚饭，天刚擦黑一家人老老少少都得赶紧收拾好，把要穿的衣服、裤子穿好，要带的东西捆扎好，就分几起走出家门，到早先准备好的地点躲匪。夏天，就在自己家地边搭个窝棚，一面躲匪，一面看守庄稼，一家人都住在窝棚里。冬天，都躲在地里的草堆里。人多一个草堆住不下，就分躲在几个草堆里。有时天气太冷，不愿意跑到野外去躲，象我们男孩子，就在自家的牛圈楼上搞一堆乱草，躲进乱草堆里，但必须把房顶掏一个洞，用草堵好，万一土匪来了，好从洞里跑出去。

1948年，我家就被抢了4次，但是每一次都没有抓到人，只被抢去一些衣物之类。那时，我的父亲还高兴地说，你看，我们躲得多好。可是最后一次，土匪却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子，等土匪走后，全靠

邻居们来救火，才没有被烧光。

我们寨子里的人家，怕匪，躲匪，好象成了家常便饭，而且躲的地方还要经常交换，不变换，万一被土匪知道，就完了。由于在野外躲藏，晚上不注意时，小孩子被狼叼走的也有发生。

官　匪

贵州的官匪（实际上是土匪）来抢劫时，叫你躲都躲不脱。临解放时，大部分土匪都是以国民党特务为骨干，以反动地主、封建势力为后台，并欺骗裹胁部分群众，啸聚起来的。其主要匪首绝大多数是地主、恶霸、军阀、政客、特务、惯匪。贵州匪乱猖獗，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国民党特务长期豢养、精心策划和一手炮制的结果。在1949年元月，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曾任南京宪兵司令）和贵州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就应召飞往南京领受使命，蒋介石妄图把贵州经营成为他最后抗拒解放的根据地。土匪凭借贵州各地高山、密林、沟壑、岩洞等自然条件，一面抗拒解放，一面对老百姓进行抢劫、奸淫、烧杀。

织金县的李名山是个恶霸兼匪首，他为找靠山，认谷正伦的父亲谷芸高为干爹。他是"西南区情报总站"的副站长，织金等8县的游击总指挥，他的儿子李成举是"中国反共救国军第八兵团"六十四师师长。

1949年2月，李成举部就洗劫了我们相邻的七八个寨子。那一天上午，太阳刚冒出山顶，我吃了早饭，就把一头母牛牵到离我家不远的杉林坡去放。不一会，就听到李家寨那边又打枪、又打锣鼓、又放鞭炮，闹得很。我跑到一个高坡处去看，原来是一大群土匪排成排，有的把枪端着朝天放，有的打锣打鼓，有的放炮竹，排着走。有些走大路上，有些走地里，有些走田埂上，后面的土匪押着抓来的挑夫，挑着抢来的衣物、大米、食盐、鸡鸭、猪等，牵着抢来的

牛、马、羊。他们这样排着走，又是在大白天，即使你躲在寨子附近或田地里，也是躲不脱跑不掉的，呆在家里那更不消说了。匪群离我们寨子只有1里多路了。我赶紧把牛牵到一条深沟里拴好，藏着，然后跑到一个岩洞里躲起来。匪群走后，我才把那条母水牛牵回家去。

我们寨子里，没有哪一家不遭抢，只是被抢的东西多少而已。别家的记不得了，我家被抢去一头猪，几只鸡。有好几家女人哭，小孩哭，男人骂，老年人拄着棍来回走，泣不成声。有些被拉夫去的，家里更着急。后来听说，在那次群匪的抢劫中，有几个女人被强奸了，有3个寨子，不但女人被强奸，还被土匪杀死了4个人。

以上这些事，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一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贵州省安顺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恶匪张结巴

马　锦

民国初期，滇境以唐继尧为首的各派地方军阀，为了争当云南王，连年用兵，相互厮杀，至使民生凋敝，财源枯竭，民不聊生。一些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以及破产农民、城市贫民为求生存，纷纷结伙为匪，四处流窜，打家劫舍，并参与军阀混战，祸乱民间，社会秩序混乱黑暗到极点。在众多匪股中，滇西北洱源一带匪首张结巴，纠集了千余人占山为王，肆行烧杀抢掠，涂炭百姓，手段残忍，凶恶之极，至今人们提到张结巴，仍谈虎变色，可见其对社会之危害。

一、出身贫寒　聚众为匪

张结巴原名不详，后顶替别人之名叫张占彪，因其口吃，故有“张结巴”之绰号。他是兰坪县人，生于1899年，从小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后来由于天灾，家乡无法生活，祖母带着他和他的大姐到剑川羊岑、鹤庆牛街打短工，有时也沿门乞讨。他9岁时，其大姐嫁到牛街乡下，他就在牛街给人放羊。一日，羊群被豹子咬死10来只，主人硬逼着要他赔，他没有办法，逃到灵应山罗刹洞躲藏。他的祖母一气身亡。被抛在仙人掌丛中。为了埋葬祖母偿还羊价，他从山上回来，自愿卖身。恰有一邓川焦石洞商人路过牛街，见此情景，遂生怜悯之心，出资给他办了事，并将

其带往焦石洞。

到了焦石洞不久，他被瓦窑头村无儿无女的汉炳林夫妇以1500文铜钱赎出做抚子，并改其名为汉结苏。他在汉家的头几年很勤快，放羊砍柴种地样样都干，汉家夫妇也还喜欢他。不料后来汉炳林夫妇一连生了三男二女，对他就冷淡起来，而张结巴也自觉在汉家无指望，便整日赶着羊群在山上生活，直至把羊杀光吃光也不回汉家。这时，他与永北人长毛老二、尖嘴老三相识，三人便在鹤庆北衙山上“爬龙背”（匪语，即当土匪）。汉炳林为甩掉张结巴，便以此为由报知县署。这时县上正在募兵，县署里有一姓卫哨长亲戚张占彪也在应募之中，卫哨长遂以张结巴顶替自己的亲戚，张结巴便当了兵，并在其后沿用了张占彪之名字。

此时张结巴20岁左右，在邓川常备队服役。他不愿受军纪约束，常外出游荡，惹事生非。有一次他约了几个人到酒馆喝酒，调戏酒馆姑娘，并借酒撒疯，高叫：“梅花镇上耍风流，终日酒醉桃花宫。”吓得酒家老小躲闪不迭。一些人与他评理，他却大打出手，将酒馆砸得稀烂。回队后，他受到严厉的训斥，挨了40军棍，并被关了禁闭。一天夜里，他将卫兵打死，拐带枪支，越墙逃回焦石洞。

然后，张结巴又找到了长毛老二、尖嘴老三，并约了喻东狗、罗全友等60多人，打制了一批长矛，大刀、匕首，正式上山“爬龙背”去了。众人推他为匪首，干起了拦路抢劫杀人的勾当。他们头一次抢劫，便显出了张结巴极残忍的性格。一日，他带着众人到鹤庆西园，路上遇着40多人的娶亲队伍，他一声令下，众匪将人全部杀死，财物一掠而光，就连死人身上的衣服、新娘的绣花鞋、新郎的红袖布、鼓手的唢呐、轿夫的红轿也全数掳尽。张结巴与众匪回山后，即用这些杀人越货得来的“财喜”尽情享乐挥霍了一番。尔后，为扩充力量，他又令喻东狗带200元到大理买枪支弹药招收人马。

岂知喻东狗到了大理，吃喝嫖赌，将200元钱花得一光二净，不敢回山交差。张结巴等不来喻东狗，恼怒之极，遂带领几人到喻家，将其妻子及2个儿子杀死。半年之后，喻东狗才回到家中。张结巴得知后，即给他写信道："东狗兄：别来无恙？思念非浅，事未办妥，无关紧要。君子不念旧恶，弟以友谊为重，决不计较，现有大事待兄来共图之。望接信后速回山寨，弟迎候之。弟占彪。"喻东狗见此满心欢喜，连杀妻灭子之事也扔在脑后，请了两个保人赶往山中。

喻东狗到达匪巢时，张结巴与众匪正围坐在篝火旁。他见喻东狗等人来了，便说："你你们一路辛辛苦了。坐坐下，东狗兄，你你来得真好！"话音刚落，一匪即举枪冲喻东狗头上放了一枪，喻应声倒地身绝。张结巴假意一惊，故意申斥道："哪哪个打枪？了得！"那个匪徒说是枪走了火。两个保人见此阵仗吓瘫倒在地，亦被张匪杀害。随后，张结巴叫人将喻东狗的心挑出炒熟，边吃边说："今天我吃了这条狗的心，方解心头之恨！"张结巴如此残忍狡诈，真是是世间少有。在他一生土匪生涯中，一直如此行事，成为滇西一带为害极烈的恶魔。

不久，官兵剿匪，将张结巴的股匪打散，张只身一人来到兰坪城，拜了清帮大爷杨文龙的码头，并得到杨之青睐。由于他了解行帮规矩，又胆大妄为，不久就当上了"管三"。杨文龙是县团保局团首，负有地方绥靖之责任，虽觉张结巴能为己用，但终究是地方一害，便有害张之心，只是念在帮会情分上没有下手。张结巴狡诈过人，觉察到此点，便先下手为强，设计将杨文龙杀死，然后带领10几人投奔了漾濞山匪首朱石宝（绰号朱队长）。1921年6月，他与罗高才、赵石掌结拜为异姓兄弟，以罗为长，张第二，赵第三，并决定自立山寨，招纳土匪。罗高才是洱源县大松甸彝族人，曾当过兵，回家后受人诬陷无法存身，逃亡中恰遇张、赵2人，一拍即合当了土匪。赵石掌是兰坪人，清末文生，受张

结巴网罗为匪。

二、重立山头　接受招安

张、罗、赵等3人决定自立山寨后，在永平城里纠集了一些喽罗，并探查清了县城团防队的情况，欲设法抢劫该队的枪支。

一天夜里，他们带领一群凶徒，摸进了团防队。罗高才只身挨拢卫兵，用力一掌，将卫兵打倒在地，又在脖胫上使动一踩，卫兵登时气绝。他提着卫兵的枪守住大门，张结巴、赵石掌带人冲进寝室，各用菜刀砍死了正在睡梦中的勤杂人员10多名。这时团防队的官兵都外出逍遥未在，其全部枪械即为他们所得。接着他们分头行事，张结巴火烧团防队营房；罗高才带人杀进县衙门，县官和他的老婆惊惶之中抱着烟枪，赤身露体逃出后门；赵石掌砸开监狱，放出囚犯。罗高才大叫："愿跟我们爬龙背的领抢上山！"一些囚犯一涌上前，扛起了枪枝。罗整顿人马，计有百十之众，即领人上山，罗成为该匪股的匪魁。以后这股土匪势力越来越大，在洱源附近各县抢劫近两年。

罗高才与张结巴、赵石掌结伙为匪并当了匪首后，并不甘居于这种生活。他觉得自爬龙背以来不仅没有发大财，反而受追剿几次险些丧命，而张、赵等也无大作为，只一味杀戮，特别是张结巴不讲义气，奸诈难防，时有反目之举，蓄谋另立山头，他惟恐自己终不免被其所害，死无葬身之地，因此生出招安之心。而张结巴为了扩充声势，则极力劝其投靠朱石宝匪股。罗不同意，并问计于赵石掌，赵说："朱石宝忌才妒能，不能容人。我等有枪有人，不能寄人篱下。"二人还合谋诱杀朱石宝，后因不慎泄密于张结巴，张大怒："朱朱队长是好好样的，裁裁（杀）他我我不同意！"罗、赵只得作罢，并设法稳住张结巴，暗中另作打算，张结巴自此，便提出分股流窜抢劫，由他自己带一股土匪进驻荒甸坝，含

有另立山头之意。罗高才未同意，并在暗中加以防范和监视。不久，罗高才即背着张、赵二人，给在大理镇守使李选廷手下任参谋兼警卫连长的马镇写了一封信，请他代为斡旋招安之事。

1924年元月初，朱石宝派头目“草上飞”来找罗、张匪股，约他们共同抢劫漾濞城，以抑制省军对土匪剿办。罗大喜，认为这是杀朱石宝受招安的大好机会，遂欣然同意，并决定朱石宝攻打城北门，他攻打南门，两股会合于县衙门，时间定在初六夜间。

“草上飞”走后，罗即招集亲信，暗中授计。尔后他又与张结巴、赵石掌商议，伪称：“从前朱队长要我们跟他归标（合股之意），兄弟以为是屈居其下，故不同意。当前共约抢漾濞城，并订先占领县衙者为尊，不知二位意见如何？”张、赵二人皆表示必须捷足先登，以便左右朱匪。随后三人互相吹捧，罗有意推张结巴为尊，以便稳住他，以利于招安的进行。张结巴喜之不尽，以为罗高才真要让位。其实他们在这里算计朱石宝，而朱石宝却也在打他们的主意，想借攻打漾濞城之机，吃掉罗、张、赵的匪股，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占领漾濞城。这些匪魁各怀鬼胎，单等初六夜晚一见分晓。

初六晚上，大约亥末子初，漾濞城南门外火光一闪，张结巴、赵石掌即猛攻南门。朱石宝到北门附近听到南门枪声甚急，便不顾一切向北门攻来，冲到距门不远的一片松林里，即为罗高才所率亲信匪众包围，罗高才手举枪响，“叭”的一声，朱石宝仰面朝天，脑浆涂地。朱手下众匪见“龙头”已死，一阵慌乱，以为是省军来剿，纷纷逃窜，罗高才趁势冒充省军，将朱匪众打得溃不成股。接着，罗高才告诉张结巴，说朱石宝被省军伏击，已被打死，让张马上停止攻击，立即回山。次日晨，罗高才宣布招安，众匪慑服，不敢异议，只有张结巴愤愤不满，但一时无计可施，无可奈何强忍下这口气。罗高才砍下了朱石宝的头，写了文书，派亲信送至大理。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得报大喜，赐给罗一枝五眼三

响的左轮枪，随弹百发，令他开赴大松甸，听候正式招安。

清明节这天，马瑛代表李选廷抵达洱源，办理招安罗高才事宜。在大松甸举行的招安仪式上，众匪集合在空地上，周围布满了马镇带来的一排省军，彩台之上则是官绅代表。在训话之后，即是马镇点名封官加委。众匪只听得大队长、中队长、排长、班长尽是姓罗的人充任，不禁横眉瞪眼，鸣哩哇啦，吵成一团。原来罗高才早在此这前，已暗中造了花名册，开列了加委官佐的名单，尽是自己的乡党亲信，马镇即按此名单宣布的。这时，张结巴更是怒气难忍，大声喊道："他妈的！老老子反了！反反了！"一时间会场更是大乱起来。省军见此，急忙向空中鸣枪弹压，才稍稍安静下来，马镇见势不妙，急忙高声封官："委张占彪，赵石掌为洱源县保卫大队副大队长，其他人将逐步升用。"之后，这场招安闹剧就草草收场了。

此后，这股降匪名曰"洱源保卫大队"，以罗高才为大队长，驻在洱源城内财神殿里。

三、反出保卫队　洗劫洱源城

张结巴自招安后当了保卫大队副大队长，心里一直不痛快，一是他从未有招安之心，二是他只是徒有虚名。罗高才大权独揽，为升官发财吃空额，扣克薪饷，与昔日匪友口是心非，同床异梦。保卫队中不少人不满他的作为，不是拐枪逃跑重新为匪，就是偷偷溜走回家务农去了。剩下的人也是不着军装，不训练，到处东游西逛，不成体统。张结巴表面上不象过去那般放荡不羁，为所欲为，实际上常到城内外观看虚实，勘查路径，结帮纳伙，图谋不轨。

火把节快到之时，罗高才要张结巴同回罗的家乡大松甸设宴招待乡亲和众弟兄们，仅留少数人留驻城里。张结巴觉得这是一

个好机会，心中定下暗计。火把节这天他欣然同罗至大松甸，竭力为罗捧场，指挥布置一切，俨然是罗的得力副手，是夜，火把高烧，灯烛齐明，宴席大开，张结巴里外周旋，殷勤敬酒，把一干人灌得东倒西歪。至半夜，张结巴提枪在外放了一枪，并大声喊道："逃逃兵，抓抓逃兵！"旋即返回席前，报告罗高才，要求带上一班团兵去抓逃兵。罗高才不知是计，且已醉意三分，便由张结巴去了。就这样张结巴带着10多个心腹，重新反水为匪。

张结巴带人在罗坪山遇到了原朱石宝的部下陈克武和李翊伯等小股土匪，遂结成一股，张结巴被他们拥为匪首。其后，他们洱源、邓川、鹤庆等地，大肆收罗溃散匪徒，纠集流氓赌棍，并指名道姓逼勒青壮年当匪，还强派各村送粮送枪，违者就遭打挨杀。为了拢络人心，欺骗百姓，他还散布什么"上等之人该我钱，中等之人莫肇闲，下等之人跟我来，每月十五元"。当时，有不少穷苦百姓上当受骗。张结巴就这样以种种手段，聚集了数百土匪，重操抢劫杀人的勾当。

是年秋，张结巴率匪部窜到洱源东山南大坪一带意欲攻打县城。他听说县城开来省军一个连，即设计将其调开，随后将匪部分为三股：他亲率一股悍匪攻打罗高才的老家大松甸（罗一直未回县城）；陈克武带领一股准备在打下大松甸后进攻洱源城；李翊伯、杨老幺率一股在清水河策应。

罗高才已知张结巴要攻打县城、大松甸，除报大理镇守使要求省军增援外，还在大松甸周围布置好了埋伏，准备迎战。张结巴带着土匪连夜窜到大松甸附近，于拂晓派出3个匪徒下山侦察。突然间，埋伏的保卫队哨兵从树丛中窜出，举起缅刀将他们杀死，然后又人不知鬼不觉潜回原地。张结巴等众匪不知前面发生变故，继续向前赶来，走入了保卫队的伏击圈。保卫队官兵举枪齐射，土匪伤亡大半，余众抱头鼠窜。张结巴见状大怒，暴跳如雷，亲自驱赶着剩下的顽匪进攻，占领了几个据点，将保卫队逼进村中。双

方一直激战到中午，不分胜负，各有伤亡，张结巴的左肩也中了一弹。他捂着伤口，圆睁红眼，狂呼乱喊指挥着土匪进攻，正当他带人由村东冲进村时，西北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原来是省军派出一个排来大松甸支援，张结巴即下令撤退到村西树丛中。

这时在山坳里正有3个老人放羊，张结巴看见，即令手下捉来，以泄未攻进大松甸之恨。他们把老人绑在树上，张结巴疯狂地叫喊："剜心！我我我要吃！"他将匕首拔出，活活将老人的心挑了出来，点着火烧熟了，和几个土匪分吃了之后，又令人从老人尸体上剥下3块皮，贴在自己的左肩的伤口上。这时，省军逼进大松甸，将张结巴击溃，另两路土匪亦不敢露面，窜回山中。

几天后，他们派出匪探到洱源城内侦察，得知省军已回大理，城内兵力空虚，县长王用中到大理去开剿匪会议，保卫队主力随罗高才在大松甸，只有保卫队、政警队等50来个官兵守卫，便决定乘机洗劫洱源。

农历九月十一日，张结巴匪部由清水河倾巢出动向洱源城扑来，到达时已是半夜。洱源居民正在酣睡中，守兵亦在抽鸦片赌博之后松懈警惕睡大觉，无人站岗放哨。土匪摸进北门城堡，连砍10多名团兵，余下的团兵不能抵抗，蜂涌逃出东门外，只有保卫队曹教练带着3个伙夫与匪徒死战，守住保卫队队部。此时城中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匪徒肆意抢劫，民财被掠抢一空，还掳走了近百人，连县长王用中的小儿子也被抓走。随后张结巴下令：①清点所抓之人，勒索赎命费，限期交清；②清点被抓女子，任匪徒奸污。于是城中群魔肆虐，弱女子受尽凌辱。

匪情传到大理，官员们惊慌失措，镇守使李选廷急派人送县长王用中星夜返回洱源县署，另写公扎派邓川补充大队助剿。该补充陈大队长马上检点兵马，向洱源出发。

张结巴听说官兵开来，即派陈克武带20个顽匪堵击，李翊伯带着抢来的财产回山，他自己和其余土匪将被掳的70余勒赎之人

全部就地杀戮，无一幸存。王用中的小儿子也被将睾丸割平，身子被剁成两节，摆在“神灵寺”的供堂之上。

张结巴退走之后，陈大队长才赶到，只见城中尸体遍地，血流成河，残垣断壁，满城百姓怨声载道，哭泣悲愤，其状惨不忍睹。两天后，王用中才回到县署。他见到自己儿子被害，丢官又在即，别无他计，遂决定杀几个通匪的人来泄恨，将土匪杨老幺的父亲和哥哥以及哥老会大爷王春荣抓走，于是年年底斩首。以后县长由一年轻文人严宝成继任。

四、作恶多端　涂炭生灵

张结巴率众匪退出洱源城后，又紧接着到鹤庆松桂街、鹤庆城内烧杀抢掠，然后才带着从鹤庆抢来的“压寨夫人”大乔及众匪窜入永北山中，吃喝作乐。就在1925年的春节时，张结巴遭到了永北山中另一股蛮匪的袭击。张匪部当时正在吹赌玩乐，毫无防备，结果被这股蛮匪抢走银元6驮，长短枪15枝，烧毁粮食无数。遭此一劫，张匪元气大伤。1925年四月初八时，他们在烧抢象眠山一带村庄时，被鹤庆团防队赶入黑泥哨山中，后来又被省军围剿，溃散成两股：张结巴带着一股，杨老幺、李翊伯带着一股，经过一段时间流窜，他们才会合于洱源罗坪山北段的清水河，并在这里建立匪巢，裹胁了一批百姓强逼为匪。张结巴这时匪焰更为嚣张，分封手下的杨老幺、陈克武、李翊伯、草上飞为“四大金刚”，杨言要抢洱源、攻大理、占昆明、独霸云南。他把匪部分为两股：一股在清水河，由陈克武、草上飞为首；另一股驻马鹿塘，以杨老幺、李翊伯为首；他自己则带着“特务队”（以金牙齿为头）不时来往于两大股匪之间。为了恢复元气，扩大匪势，他在周围村庄强派丁壮、枪支弹药、各种物资，闹得罗坪山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不久，他们风闻省里要派一旅之军到滇西剿匪，便

决计在省军未来之前大肆烧杀抢掠，把洱源搜刮干净，使省军来后“焦土自毙”。

自此洱源百姓遭了殃，张结巴匪部杀人如麻，抢劫无数，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

从农历五月初一开始，张匪大肆行动。杨老幺率一股土匪来到宁北区，乘五充街赶晚街之际突然出现，掳去百姓300余人，抢走物资无算。李翊伯率另一股土匪在几日之内先抢劫了蕨菜、横水、哨平等一带山村，然后扑下茈碧湖西岸，先后抢劫24个村庄，所到之处先抢后烧，一片片火海吞没村寨，不知多少财产化为乌有，多少百姓死于非命。张结巴为抢到更多的财物，不断变换残暴手法。起初几天，他每到一处烧杀抢掠一阵就走，后来他发现抢来的财物由土匪自己背着影响转移和作战，就逼着老百姓将财物背到山上匪巢中，以后，他嫌这样做也累赘，干脆改为抢人，把大批老百姓赶上山去，逼着其亲友以钱物去赎人。

五月二十四日未时，张结巴和陈克武带着土匪掳掠了宁南区。在他们的烧抢后退到赵天子庙东边沙坝上休息时，有一叫赵锡保的小头目要求到炼城村去“扛红旗”（即抢劫），以报当年受该村欺负他父子之仇，张结巴即应允说：“快快去！狠狠地整！”赵遂带人冲进村中，放起大火，刹时火苗乱窜，蔓延全村，有24户人家40多间房屋尽成灰烬。土匪走时还掳裹百姓20多人，其中有杨全美母女3人，因不愿受奸而被杀死。六月五日，张结巴与杨老幺又带人抢劫了凤羽街，掳走了50多人，录天正是赶街的日子，在慌乱之中被杀死、踩死、打死、吓死的百姓有10多人。还有8座民院、3座古庙被焚毁。沿途各村亦均遭抢烧，在黑潕江两岸的村村寨寨，张结巴手下的草上飞、段丙功、罗秉义等从北向南，从南向北来回烧杀，将乔石井一带17个村子、潭溪村一带的房子财产全部烧光抢尽。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张结巴匪股连续作恶，洱源大部分地区均遭匪乱，百姓苦不堪言。

经过一段烧抢后，张结巴匪股分别扎在深山老林中的清水河、马鹿塘、荒甸坝、篁竹山四处，称为“四大华堂”，把各地掳去的几百人捆绑在其中。在他们被绑上山的途中，土匪为怕他们逃跑，就用绳子藤条把他们捆成一串驱赶，强壮的人被逼背着土匪抢来的东西。一些老人和孩子，则被用细麻绳穿着耳朵，10人一串地牵着。走不动跌倒的被踩死，逃跑的当场被杀死。

在山上，张结巴拟了几条命令，由陈克武代为对大小土匪宣布：“众弟兄辛辛苦苦地跟占彪干了这些年，现在让大家痛痛快快玩半个月。从明天起，第一，点毛子送方（毛子指被抢的人，送方指用钱物赎人）；二、自己取财妈灯火（指妇人女子）；三、自由裁毛子。各华堂要搞出新花样。我们不留给广乌龟（指省军）一个人、一斤粮、一文钱，叫他们进得来，回不去。”说完，众匪大吼：“听大爷的。”张结巴大叫道：“我我今天先裁裁几个给弟兄们看看！来，把把他们三个拉拉出来！”小匪绑出一个老人、一个团兵、一个姑娘，将他们捆在树上。张结巴问老人：“你你为何挡住我的去路？”那老人反问：“我打中了一只豹子，你为何抢走？”张说老人反抗，用老人的7枝猎箭，直戳入老人心窝，顿时鲜血如注，老人惨死。他又对那个团兵吼道：“土土乌龟（指地方团保队）你你裁了我多少弟兄？”团兵哀求道：“没有杀过，大王饶命。”他上前就是一刀砍下人头。他又走近姑娘问：“牛街姑娘，你你为什么不不愿做我我的压寨夫人？”那姑娘大骂“土匪”，还吐了他一脸唾沫。张结巴恼羞成怒，一刀削去姑娘的鼻子，再想砍一刀，杨老幺拦住他说：“不让她死，再来个两刀四眼，留个纪念，放回示众。”张结巴“嘿嘿”两声，在姑娘左右肱上连戳两刀，姑娘疼痛难忍，昏了过去。自此以后，四大华堂的土匪开始折磨人质，勒索钱财，其残酷手法花样百出，前所未有，惨不睹闻。四华堂成了人间地狱。

被掳去人饿了冷了，被迫向土匪要求吃饭烤火。张结巴下令

烧起 3 堆大火，把人们栓在四边的木桩上，抬来大桶大盆滚烫的肉、油，在人们俯身舔吃之时，土匪趁势将人头按入桶中，将人活活烫死；张结巴还令土匪用细木棍将大块肥肉捣入人们的喉咙，活活憋死；还令匪徒将猪油涂在人们衣服、脸上，手脚上，用火活活烤死；又将 50 多人栓成一串，围成一圈，在四面点起大火，活活烧成黑炭。而土匪则以此为乐，在一旁哈哈大笑。之后，又将已死及半死之人投入火堆，烧成灰烬。在树林里，张结巴命令匪徒用尖刀将 20 多人的肠子从肛门中挑出，栓在搬弯的树梢上，然后一放手，人肠随着树枝的弹力被拉出，一串串挂在树梢上，人们惨痛而死。更有甚者，他们活活剥掉 200 余人的人皮，做成枪皮带和人皮鼓，还将活人的心肝眼睛挑出吃掉。

一个甲长李某，接到张结巴的通知，让他前去赎命送方。他好不容易凑了钱粮肉菜油等物，用 5 匹马驮着到匪巢，土匪仍说不够，将其吊打一夜。次日回村时，押解他们的土匪问："你们昨晚吃的炒肝好吃吗？"甲长说："好吃。"土匪告诉他说："那是你们要赎的那些人中 3 个人的心肝。"甲长听后如五雷轰顶，呕胆吐血，竟气绝而亡。一个老人前去送方赎子，因晚了半天，他的儿子就被杀掉。老人在一堆死尸中扒出儿子的尸体，亦悲愤地死去。有一个穷村子，因无钱无粮送方赎命，推选一个老人去清水河请求放人。张结巴说他们村里的人爱用匕首，就令匪徒用尖刀戳死 26 人，个个都是从耳根后戳进去。这个老人也一去未还。

被掳到四华堂的妇女姑娘，更是受到惨绝人寰的凌辱与催残。在清水河畔，匪徒把拼死不从的 20 多个妇女拉出来，当着他们亲人的面轮奸，然后又将她们按坐在尖桩和竹子上，阴道被戳穿而死。在马鹿塘，几十个姑娘衣服被剥光，手脚和头被捆在木桩上，被匪徒轮奸，割奶头，匪徒还用细铁丝将外阴皮穿起，用大木瓜锁锁上。在篁竹山，有 30 多个妇女被奸后处死……

张结巴的残暴行为罄竹难书，传出之后，城里乡下无人不怕，

谁家的孩子哭闹，只要听大人说："不要哭，张结巴来了。"孩子立即不敢哭闹，躲进大人的怀中。滇西的一些达官贵人士绅更是害怕，纷纷上书云南督军唐继尧，要求派兵来剿。

五、参加军阀混战　两度受到招安

滇西北不断传来告急匪警，正在与顾品珍争权夺利的唐继尧不得不引起重视，于1925年年底电大理剿匪司令部，派出独立营史华部赴源专剿张结巴。张结巴闻知，即施展狡猾伎俩，分一股土匪至沙溪，扬言要困毁沙溪，吞吃鹤庆，企图把史营调开，他自己则率主力躲进西山伺机而动。但是张结巴诡计失算，正当他带着匪众南窜时，撞到了史营枪口上。双方展开激战，史营兵精将悍，张匪乃系乌合之众，经过半天恶战，将张匪击溃。这一仗张结巴的土匪被打死145人，史营缴获了160枝枪，200驮银元、烟土等。张结巴手下恶名昭彰的头目杨老幺也被击毙，其首级被挂于凤翔镇上。老百姓听说后，无不拍手称快，盼望张结巴也落此下场，千刀万剐方解心头之恨。

张结巴吃了败仗，没命逃窜，几天之后，他又纠集残匪，并在兰坪收罗了一些土匪，又去抢拉鸡井。拉鸡井是个盐场，在附近一带算是较富裕的地区，井区有一保井中队，训练有素，武器精良。他们侦察到张结巴来到附近，便做好迎击准备，并设计引诱张结巴前来攻击。张结巴中计，又一次打了败仗，溃逃回山中，一面继续抢劫，一面整顿匪部。

1926年5月，前大理镇守署副使罗树昌，打出反对唐继尧的旗号，大肆招兵买马，收编地霸土匪武装，扩充实力，并从永北挥戈南下，进攻大理。其所部陈大光先进鹤庆，又直捣邓川。罗树昌此前曾招安张结巴，但张一直未加理睬，待陈大光攻下邓川后，罗又来招安张结巴，并许其攻占大理后委以旅长要职，张结巴这才点头

同意，但却不下山，准备见风使舵。这其间，罗树昌挥兵猛攻上关，而守兵仅史华一营，兵力分散，渐不能支。张结巴这才出击，将史华布置在苍山脚下防堵他的一个连打散。罗树昌遂夺取上关。然后张结巴又马不停蹄直捣喜洲，攻进乱抢一阵，退到南中休整。这时陈大光的先遣中队也来到南中，在张结巴的驻地附近待命。

先遣中队队长邱回才，是张结巴的死对头，其父曾被张结巴勒赎杀害，抛尸旷野，此时与张结巴近在咫尺，不由勾起他报杀父之仇的念头。正巧陈大光来令，让他与张结巴会谈。他考虑再三，决定与之会谈，到时相机行事。张结巴也接到了陈大光会谈的命令，他根本未把小小先遣中队长放在眼中，也不知对方是自己的仇人，遂同意会谈，但提出只谈一个时辰，来者只身一人与张结巴会面，余者要在场外。

邱回才强压心头之火，来到会谈地点，见到张结巴只随便说了几句，就猛地拔出手枪一梭子打过去。只见张结巴已应声倒地，其余的土匪吓得呆若木鸡，会谈地点周围的土匪及与邱随来的官兵也不知所措。邱回才以为张结巴已死，大仇已报，遂大喊："不要怕，是枪走火，弟兄们安静。"然后带人回到自己的防地。邱回才刚走，张结巴就一骨碌爬了起来，原来张结巴是诈死。他狡诈过人，邱回才一拔枪即被其发觉，他立即弯腰随枪声倒地装死，再加上邱的手枪是河西土造拉七，枪管大，火力散，只将张结巴的左臂擦破了几块皮。张结巴爬起来后，即指挥众匪向荒甸坝方向逃去。这次挨黑枪，他还以为是陈大光借邱回才之手杀他，做梦也没想到是自己种下的祸根。

是年9月，罗树昌反唐失败，唐继尧派陈维庚（被任命滇西剿匪司令）、唐继麟（唐继尧的堂弟、省军第三团团长）等进驻滇西。唐胜罗败，张结巴不但没有丝毫受损，反而在这一场混战中极度扩充了匪势，不但收编了罗部大批残兵败将，抢劫枪械、粮饷、被服，匪巢中堆满了这些物品。此时唐继麟的步三团辖区是大理以北各县，

其任务主要是剿灭张结巴。但是张结巴盘踞在深山老林里，行踪飘忽不定，牵得唐团乱转，也未能收到成效。张结巴得意狂妄之余，忽发奇想，企图进占大理，独霸迤西，为此他决定招安，还掳来了宁山应山铺一清末遗老吕咸熙、号吕进士的老先生，为他向陈维庚招安疏通牵线。

这时云南各派军阀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实力，均在收罗土匪武装，张结巴的招安要求一说即成。唐继尧还委任给他一个既大且长的官衔：大理、邓川、洱源、剑川、鹤庆、丽江、兰坪、云龙、漾濞、永平10县游击统管带兼"北伐后援军"独立第二混成旅旅长。他将自己匪部千余人编成3个团，制作了绣有"福国大昌"的大旗，到处得意洋洋耀武扬威地炫耀，并吹嘘说："我我有这么多雄兵猛将，滇滇西谁是对手！"并还自封为"军长"、"省长"等，其野心愈发不能抑制。他虽已招安，但其残暴本性并未改变，经常反复无常地寻找借口杀人。

1927年上半年，云南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加剧，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被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推翻，尔后，胡、张、龙三派又发生火并，战祸殃及全省，最后结果以龙云胜利告终。就在军阀们兵戈相见的时候，张结巴虽为唐继尧的"北伐后援军"的旅长，但并不卖力作战，只要见势不好，他即拉走队伍避战。唐军失败后，龙云势力尚未到达滇西，大理暂时成为一座空城，张结巴乘隙进驻大理。

六、盘踞大理　二张斗智

称霸滇西是张结巴久已蓄谋的，乱世之中他忽而匪，忽而兵，保存扩充了力量，并进驻了他久已向往的大理城。大理原为唐军所据，官吏亦为唐继尧所派。唐继尧一派失败后，城内军队官吏均作鸟兽散，给了张结巴一个极好的机会，他打着招安军的旗号，名正

言顺地开进大理。

为了盘踞此城，他进城后不烧不抢，反而一反常态，下令不扰民，实行公平买卖，使提心吊胆的大理人民暂时安定下来。随后他召集了大理所属的10县洪帮头目开会，说："我张占彪招安进城，是要要10县人民清清靖，请众众辈弟兄来捧捧场，日后决不不亏待你们！如如若有我们洪门子弟不守纪律，破坏坏我名誉的，你们就来抓旅部，我我给他下油锅。"他这一串不伦不类的行帮话，听得这些洪帮头目不由暗笑，但表面也不敢出丝毫，依然唯唯诺诺，点头称是。事后，他招待这些人大吃大喝，同他们弟四哥三、大爷长老幺短的，借此笼络这些地头蛇，以巩固自己在大理的地位。此外，他又将大理饷械局库房里的旧枪破管，悉数搬出，偷运至他在鹤庆牛街的旅部中去。

不久，在诸军阀角逐获胜的龙云，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肃清地方匪患，派出一〇一师张冲部来到滇西，剿抚土匪。张冲字云鹏，绿林出身，自归附龙云以后为其立下汗马功劳，不仅在军阀混战中出了大力，还收编了三迤众多土匪，对付土匪很有一套办法。他到滇西楚雄后收编了前唐继绕的近卫二十团，并委该部军官史华为一〇一师副师长。史华即是前面所提到的追剿张结巴的史营长。接着他在滇西剿灭了李济川、铁卤、独角牛、张良等数千土匪，一时颇得人心。然后，他率师西进大理。

就在张冲快要抵达下关之时，张结巴慌了，不知张冲此来是凶是吉，他急忙召集手下干将李翊伯、陈克武、杨光培、段炳功、罗炳义等开会计议，在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后，张结巴说："现现在不忙打，也不要守，而要退退，让他张冲进城，我抖抖点威风给他瞧瞧，给他碗辣子汤叫他尝尝。才晓得我张张占彪的厉厉害！"随后他们定下计策，决定先节节退让，直到鹅卵哨为止，并设一"鸿门宴"请张冲。若张冲不敢来，就师出有名，杀他人仰马翻；若张冲来了，就提些条件进行要挟，逼他就范；如若不从，则掷杯为号，大杀一

场，重新上山。计议已定，众匪分头布置。

张冲来到下关后，获知张结巴从大理撤往喜洲，并掳走了城内几名外国传教士。他正在揣摸张结巴此举时，又收到了张结巴的一封信，邀他去喜洲，张结巴要为他"洗尘"。当晚张冲召集团以上军官作了安排，于次日偕与张结巴有交情的洪帮大爷、大理盐税局局长郭邵宗，仅带5名卫士前往喜洲。岂知到了喜洲，不见张结巴人影，只见其留下纸条要张冲于第二日到鹅卵哨会谈。原来狡猾的张结巴又将队伍拉到了鹅卵哨。

第二日，张冲7人前往鹅卵哨，几里地外便是张结巴已布置的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个个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张冲久走江湖，并不在意，从容前行。到距会谈地点本主庙不远时，张结巴手下几十名卫士分用长矛、缅刀、刺刀交叉搭起，阻住去路，意在给张冲一个下马威。张冲举起指挥刀一路将其拨去，毫无惧色，走进本主庙大门。一进去张冲就发现院中、墙角、门背后已布满了埋伏，有意无意地露出枪管刀尖。张结巴坐在大殿中虎皮椅子上，叼着牙骨烟嘴，做未见张冲状。张冲见此，先声夺人，怒斥道："哈哈，我听说你张结巴是条好汉，才来会你，我单枪匹马，你却摆出这个大架势，想吓唬我。告诉你，怕死的不来！来的不怕死！"接着拍拍胸脯又说："听说你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杀吧！要是在你面前皱一下眉头，就算不得好汉！"边说边逼进张结巴。

张冲的举动震住了张结巴，感到此人不同一般的"广乌龟"。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翘起大姆指说："有胆量，有见识，好！好好汉！"还装模作样地斥骂左右："哪哪个叫你们这样干？还还不快给老子滚滚开！"说着请张冲就座。张冲趁势劝张结巴说："占彪！你我都爬过龙背。我以前在迤南爬龙背时，老百姓送德政碑，你在滇西北爬龙背，老百姓恨入骨髓。这是你要深省的。现在招安了，以后好好干，走正道，不要贻人口实，给绿林豪杰蒙羞。"张结巴听了，虚情假意地迎合："张师长，兄弟我我服你。"张冲恩威并施，说服张结巴

招安，郭邵宗在其间周旋，张结巴原来计划的一套全失去了作用。他的手下几次欲掷杯，都被他用眼色制止。最后他终于慑服于张冲，答应服从调遣，放回外国传教士，并提出与张冲结拜。张冲婉拒，送其两枝枪，张结巴亦回赠两枝。这时郭邵宗又以洪帮规矩规劝张结巴一番，张结巴均点头称是。

临别之时，郭邵宗使了眼色，张冲站起，上前一把抓住张结巴的右手腕，拉着就走，口中说道："我们一起去看看弟兄们。"郭邵宗及张冲的几个卫士也凑上前，拥着张结巴向外走。张结巴猝不及防，多年江湖生涯从未被人挟持过，一时害怕起来，只好乖乖地向外走。张结巴的手下及埋伏的人马都被吓住，呆若木鸡，看着这几人往外走去。出了大门不远，张冲对张结巴说："占彪大哥，好好待弟兄，好好干！后会有期！"旋即放开手扬长而去。张结巴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气急败坏地大吼道："威风扫地！快，回回旅部！"

自鹅卵哨会谈后，张结巴被省军委任为鹤（庆）丽（江）游击司令，并命令他克日赴防。张结巴得令后退出大理，但却盘踞在邓川焦石洞和鹤庆牛街一带，拒不北上，并派人分赴大理、邓川、洱源等10县，请来洪帮头目和士绅，威逼他们呈文挽留他。这些人慑于他的淫威，遂马马虎虎写了呈文一报了事。张结巴遂按兵不动，等待下文，但却如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张冲得知后，即改调张结巴去楚雄，并再三勒令他速往。张结巴无奈，只好打点人马上路。为防止张结巴反叛，张冲亲率精锐轻骑在前，另派两团劲旅在左右监视。

几日之后，张结巴行至宾川牛井处，其先头部队两个团已达姚安，他手下团长陈克武、李翊伯、杨光培突然跑来向他报告，说弟兄们不愿去楚雄，已跑了⅓，并煽动说，张冲诱骗他们至楚雄是为了解决他们，去楚雄是死路一条，叫嚷赶快反了。正在张结巴拿不定主意之时，手下抓住一个"奸细"，并搜出一封密信，大意是等张结巴所部到达姚安某山谷时，前后夹击，全部剿灭之。张结巴怒火万丈，一枪毙了奸细，大吼道："反！反！反！"立即命所部退回。

实际上此奸细此信究竟是何人所为，是个疑问。有的说是前洱源县王用中为报杀子之仇，收买人写假信，以借张冲之手杀张结巴；亦有一说是陈克武，李翊伯等为激反张结巴，设计如此。但不管如何，张结巴本性就决定了他早晚也要反，此信不过是一根导火索而已。

七、众匪逃窜瓦解　结巴中计被诛

张结巴在宾川牛井反叛后，向着邓川方向窜去。这时监视张部的一〇一师两个团早有防备，分从东西两面包抄过来，张结巴慌忙逃窜，又被另一伏兵打了伏击，结果众匪被打死打散过半。张结巴狼狈万状，带着残匪窜入深山。时值阴雨季节，张结巴等蜷缩在石洞中，以为安全了，可以高枕无忧了，又做起了东山再起的美梦。其余众匪亦各自寻欢作乐，赌钱喝酒。他们没有想到张冲所部龙霖团赵源清营的"蓑衣队"已逼近了他们的匪巢。

张结巴率匪逃窜到深山后，赵清源营尾随其后。当地百姓听说追剿张结巴，无不鼎力支援，送来了干粮、草鞋、长矛棍棒等，还自报奋勇带路直捣匪巢。当时下着倾盆大雨，老百姓送来了蓑衣簸帽，有50名官兵穿戴上，组成了蓑衣队，连夜冒雨向张结巴躲藏之处摸去。到了洞外，他们伪称是从焦石洞来送吃的，把匪哨干掉，接着和土匪激战起来。张结巴等匪魁见势不对，急忙从另一洞口爬出去逃跑了。天明了，土匪被击溃，蓑衣队也返回营地。

张结巴如惊弓之鸟带人窜进另一深谷，清点人数，所剩不多，决计分头活动，分三股流窜，然后至老君山会合。张结巴带着这股，直窜老君山；杨光培带20多人化装成军队模样，潜回洱源应家铺，拼凑人马，筹集资金；段秉功、罗炳义等去邓川西山腊坪哨，收罗散匪，以备后会。但是他们的如意打算又落了空，杨光培、段炳功等没窜出多远，即分别受到地方联防队的阻击，将他们再次打散，段炳

功等逃至腊坪哨，杨光堉等下落不明，只有张结巴顺利逃出。这时，张结巴原来东下楚雄时的先头两个团，也在省军的围攻之下溃散。张结巴的整个匪队伍已经瓦解。

张结巴此时身边只有50多人，匪目有陈克武、李伯翊、草上飞等，每人各有长短枪一枝，子弹所剩也不多。他们先潜到牛街、三营一带活动，后又到兰坪坝抢劫；被龙霖团赶入老君山以后，又窜至鹤庆坝子抢劫。张结巴在省军及地方联防队的追剿之下日暮途穷，难以生存，遂派其手下吴老三到牛街联系当地哥老会和士绅杨葆元，以做他图。但吴老三一到牛街即被人认出逮捕。龙霖根据他的口供，派赵源清等10人化装成土匪，打入张结巴的匪巢；另派一排官兵化装成商人、农民模样前往右所、焦石洞一带策应赵；另与洱源张笏县长商议，以张去杨葆元处，定计诱杀张结巴。杨葆元曾任丽江、永北县长，后来告老回家，在地方上颇负声望。

这时已是1928年的腊月。杨葆元为协助省军、地方百姓除掉张结巴这一魔头，几度前往张的匪巢与之会谈，以招安之事诱其下山。但是张结巴诡计多端，反复无常，后来才对杨慢慢有所信任，带10多随从下山，与杨住在双龙寺。一日，杨借给张结巴一岁半的儿子理发之机，将其认为"义子"，张结巴高兴异常，遂以"亲家"称杨，对杨更进一步信任。杨葆元借机将张结巴请到自己家中，将张的随从人员愿意回家给资遣散，张及其妻小、贴身警卫等7人均住杨家院里，杨葆元继续安抚张结巴，每天陪他吹烟喝酒，商谈"招安"。

腊月二十日，杨葆元与张结巴吃完早饭，又在烟床上吹烟。这时张妻正与杨夫人在外院天井逗张子玩乐，张的贴身警卫除头目草上飞值勤外，其他3人到村外闲逛。团防中队长杨子昭于此时带着几人手提火腿、鸡鸭、小菜、糕点等东西来了，说是来送年货，请杨葆元到厨房过目。杨葆元不耐烦地"哼"了一声，便下床到厨房去了，只有张结巴仍躺在床上吸烟。

这时，杨子昭手持名片走到床前说："大爷，彭团首上剑川，要

我们代他向大爷辞行。”张结巴起身用右手接名片，说时迟，那时快，杨子昭一步上前，用双手猛然卡住张结巴的脖子，用劲往床上按。张结巴拼死挣扎，反手去抓枕头下的手枪。随杨子昭来的李品芳、柯副官见状猛冲上去，对准张结巴的心窝连放两枪，其余人也拿刀在张的身上连戳几刀，混世魔头张结巴立时毙命身亡。值勤的草上飞听到枪声急忙奔进来，正碰上故作惊慌的杨葆元，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好了，快……”草上飞问：“那里打枪？”杨葆元说：“那里，那里！”推着草上飞说：“快跑，张大爷在门外，我们快去跟他！”草上飞跑出去后，杨葆元在他身后将大门关死，回屋等待消息。

草上飞被哄出大门后，即遭伏兵追击，但他逃出追捕，窜向东山。其他3名土匪有一人被击毙，另外两人也逃向东山。张的妻子大乔及儿子也被打死，其尸首解往大理。张结巴的首级先解往洱源，悬挂示众，随后又与尸身解往大理，验明正身，后头身被缝后，绑在木桩上示众。

在张结巴的土匪老巢焦石洞，龙霖团长与赵源清营长里应外合，全歼残匪，匪目陈克武、李翊伯、罗秉义3人首级被割下来，悬挂洱源城中示众。

至此，横行肆虐多年的张结巴的股匪彻底冰消瓦解。

李佩久、苏仕代、杨学胜、王靖宇、杨位儒整理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迤南悍匪赵小安始末

李表东

1947年4月，个旧和邻乡发生了赵小安（又名赵裔昌）为首的谋杀案，初而演成民族械斗，继而变为土匪流窜。地区蔓延好几县，时间持续到3年左右，各地丧失的生命和财产，到了无法估计的程度，成了迤南边区近代罕见的一场惨祸。在整个过程中，有些是我在个旧县县任内延续发生的，现特将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这篇资料，以备参考。其中最后两节，由普国梁、罗有发、曹万金诸同志供给了不少材料。

赵小安的父亲名赵太平，四川人，清朝末年到“猛丁”（临安府辖15猛之一）营盘街经商。猛丁地处边远，交通梗阻，文化落后。赵太平由于粗识文字，在猛丁行政委员衙门当了一个职员，人称赵师爷。后来赵太平有了钱，不愿落籍猛丁，迁到和邻乡蕨蕨地，买田制屋，定居于和邻乡。

1940年前后，赵小安给和邻乡长钱玉湘背枪使唤，因其为人机警，得钱信任。1942年赵小安经钱的介绍，到滇军二十一师陇耀团，为其贩运大米、大烟及各种货物。1945年滇军入越受日寇投降，赵小安脱离陇团，谋得金平县新安乡乡长位置。

猛丁是迤南边区盛产鸦片的地方，计有新安、铜厂、营盘三乡。其中营盘乡产烟最多，烟课最富，历系苗族“黄大”霸收。迄黄大被人杀死，他的全部武力由“二水老板”宣威人贺光荣继承，继续把持该乡的烟课。1946年钟光汉任金平县长，赵小安垂涎营

盘乡的烟课，行贿于钟光汉，希图买得这个乡长职务。事为贺光荣所闻，连忙把一大驮烟送给钟光汉，钟光汉就把乡长卖给贺光荣。赵小安断送了一笔财礼，大失所望，心中不服，悍然采取报复手段，将新安乡公所的枪支拖回蕨蕨地。钟光汉据以上报，说赵小安拐逃公枪，给了他一个通缉处分。赵小安在家里得知，考虑自己枪少势弱，不能在和邻乡久蹲下去，碰巧越南国民党武宏卿在国内搞反革命活动，派人到滇、越边区招纳失业军人及地方亡命。赵小安即趁机蛊惑副乡长李永祥，说他准备向外发展，请李永祥给予支持。李永祥误信赵小安的甜言蜜语，借了他两枝大枪，派10多人跟他投奔越南，领获1挺轻机枪和10多枝大枪。为时不久，赵小安便起歹意，包围武宏卿的参谋部，将一个参谋杀死，拖着领得的武器转回和邻乡。他有20多个喽罗，除少数人是和邻乡土著，其余都是国民党军队的兵痞或流氓，及过去曾经当过排连长的人。

李永祥是哈尼族人，为和邻乡地方恶霸，长期把持和邻乡政权，横行乡里，对汉族人很是歧视；上半山年中收得的烟课，概由他经手，伙同地方官及钱玉湘等少数人瓜分，县城绅士和当地汉族人民大部分对他不满。1947年春间，个旧县长高云裳办理乡镇民代表及乡镇长改选事宜。高本人亲赴和邻乡主持，受部分汉族包围，按预定计划由每保先选代表2人，7个保选出汉族12人，少数民族仅得2人；又选出汉族张家义为乡民代表会主席，汉族蒋廷俊为乡长，李永祥连选连任。这时赵小安正从金平新安乡拖枪回来，与张家义、蒋廷俊等气味相投，认为汉族受李永祥多年压制，抬不起头来，张家义及蒋廷俊两人的父亲，早年又皆死于李永祥和他的爪牙之手，复仇心理甚为浓厚。此次汉族在改选中已获得胜利，必须扩充武力，始能巩固汉族的统治地位，达到复仇的目的。

是年春末，戛嬷赶街的当天，赵小安带着几个兄弟来到李永祥

家，派人守住大门，他一个人进入李永祥抽大烟的房间。李永祥招呼他坐在烟榻上，正取烟灯蹲下倒油，赵小安即拔出手枪将李永祥当场打死。外边守门的人闻听枪响，迈步进去，正碰上李永祥的一个10多岁的侄子往外逃跑，又被击毙。李永祥的枪支子弹及值钱的东西，概被赵小安一掳而光。

白马寨系民族杂居的村子，离戛嬢六七里，与大伍寨同为一保。保长是哈尼族的高武，任事年久，李永祥恃为心腹。赵小安既将李永祥杀死，大伍寨的保长陈其昌（随赵到越南）即带人到白马寨杀高武。但因高武在赵小安回来后，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已经先有戒备，猛然听得戛嬢方面传来枪声，心知有异，马上聚集家属及身边的人，带着武器避往小伍寨。陈基昌来到白马寨，扑了一个空，于是把高武谷仓里的粮食如数搬走。

李永祥被杀，高武逃去，凡与李永祥接近和在左右的人都奔到小伍寨依附高武。高武一面把赵小安谋杀李永祥的情形报请个旧县长高云裳作主，一面以保护身家性命替李永祥报仇为理由，团结一些哈尼族有枪的人与赵小安互相对峙。赵小安则倚仗张家义、蒋廷俊诬指高武聚众劫掠，报请参议会及县政府派兵剿办。在高云裳尚未派人到和邻乡以前，赵小安企图消灭高武，几次进攻小伍寨，未能得手。在双方冲突中，一般居民的牛马牲口和粮食、房屋，每每被抢、被烧。即使是赵小安派人出动抢劫，乡民代表会和乡公所也是有意识地把这笔帐算在高武名下，用公文上报，加重高武的罪名。参议会接到这类文件，不惟书面上主张口头上也怂恿高云裳剿办高武。有时高武写一个报告给县政府，完全得不到高云裳的重视。

县长高云裳在事情发生后好几天，派秘书刘松樵赴和邻乡进行调解。起初他想召集赵小安、高武到戛嬢见面，当面调解。但高武不敢来，写信请刘松樵到小伍寨相会。小伍寨距戛嬢10多里，隔着一条大伍寨河。赵小安探知刘松樵将赴小伍寨。预先派人到河

边埋伏。刘松樵乘马将到河边，听得树林里面有人打枪，吓得滚跌下马。护送他的乡丁和常备队兵都说是高武派人邀击，劝他转回戛嬢。刘松樵回戛嬢后，召开了一次会议，到场的都是倾向赵小安、张家义一边的人。议定调解办法：

一、李永祥的丧事，由地方公送黄牛1条、猪1口、食米若干，归李家自行料理。

二、由乡公所派收现金1000元，补助赵小安消耗的子弹费。赵小安尽一个月内离开和邻乡。

三、划分江边到戛嬢的大路为两段，归赵小安的“二把手”负责保护，准其收保路费。

四、高武限驻小伍寨一个保，不得越界。

刘松樵根据上面几点，写成和约形式，赵小安欣然盖章承认。刘松樵派人送给高武，高武不愿盖章。刘松樵将和约交给蒋廷俊，叫他劝导高武承认。

刘松樵回城后，高云裳又邀请士绅座谈。其时，我已从昆明回来，也被邀在内。刘松樵把调解经过向大家报告。多数人窃窃私议，以为李永祥是通过选举经县政府认可的在职人员，被赵小安谋杀，不惟不追究责任，反由地方公送子弹费，还准赵小安的人保路，并且赵小安能不能按一个月期离开和邻乡，也成疑问。万一赵小安赖着不走，有6个保可以活动，高武只有一个保，能不能心服呢？但是大家都抱着事不干己的态度，这些问题没有人肯提出来研究。

刘松樵离开和邻乡后几天，高武由于困在小伍寨，急需解决粮、弹问题，派人到别保强借，又同赵小安连续发生冲突。蒋廷俊与张家义以高武破坏和约、越界烧抢为词，报请派兵剿办。高云裳又邀集士绅讨论，主张再由地方机关及士绅中推人前往调解。当即推出参议会副议长彭佐臣、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李应崐及士绅代表许家骐3人前往。他们尚未启行之时，云南省政府委我接

任个旧县县长。

6月下旬，我从昆明去个旧任职，知道彭佐臣等3人已赴和邻乡住了几天，想召集赵小安同高武在蚌夏见面，完成上次刘松樵所写和约和盖章手续。但结果只来了赵小安，高武始终不来。

当时，各县新旧任县长办理接交，照例要由上级派人监盘。高云裳交卸之前，建水行政督察专员朱仲翔派科长彭树甲来个，除监盘交代，并负代表朱仲翔调处这件案子的的任务。因此，我就职后，彭树甲即赴和邻乡进行调处。我托他们顺便捎去两封信，劝导赵小安和高武以地方为重，接受彭树甲调解，停止冲突。彭树甲去了10多天，转回县城，据说他已亲到小伍寨会见高武，劝令高武在和约上签字盖章，并带回一份交县政府备案。他的意见是万一双方再有冲突，希望我亲去处理。

彭树甲在和邻乡尽管完成了和约签字盖章手续，但赵小安并没有遵守规定离开和邻乡，而且串同蒋廷俊、张家义利用乡公所及乡民代表会的权力，向各保追清补助他的子弹费，派令各保无偿送米，勒令人民送验枪支，将好枪留用，又按各保贫富逼缴子弹。高武一方则以乡公所及代表会偏袒赵小安，心中不服，也经常越出小伍寨，向别保索粮、索款。因而双方的武装冲突仍然不断发生。不少的人由于地方秩序混乱，纷纷逃到建水、蒙自地界或木花果、水塘（均在江内属个旧）避难，弄到田地抛荒，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

我感到这场争端经过几次调解，都没有平息下去。我既接任县务，有责任亲往出事地点同双方当事人见面，谋求解除嫌隙的有效办法。8月下旬，我偕同秘书叶尚文带领常备自卫队12人启程。

我们从蛮铁过渡的时候，了解红河两岸及管理渡船的一些情况，我感觉和邻乡上半山距县城过远，通信不便，所以到了蚌戛，就住在关帝庙（小学校）。蒋廷俊同张家义第二天来见，我把蒋廷

俊留下。张家义是代表赵小安来的，我再三要他约赵小安来蚌戛面谈。另外，找人送信给高武，也叫他来蚌戛见面。在那几天当中，有些老年人来关帝庙找我，有时我到附近村寨找人闲谈，大家在谈话中对赵小安都有不满的情绪。特别是一个赶街天，我向几个汉族老年妇女问起赵小安，她们都不答复，只是频频摇头。我认为赵小安造成的恐怖气氛，已经笼罩着整个和邻乡，人民是敢怒而不敢言了。经屡次捎信催促，赵小安在一天夜晚9点多钟，来关帝庙见面。当时，我们寝室里陈设着大烟用具，招待他抽了几口大烟。

赵身材矮小，满脸烟容，问他年龄，只是26岁。经过半个多钟头的谈话，他对我提出与高武蚌戛相见"言归于好"的劝告，表示完全同意。他还说，可以随时离开和邻乡到别处谋生。最后，我要他在蚌戛多住几天，等把高武叫来，彼此当面解释，他也欣然接受。谁知他口是心非，当晚出了关帝庙，便一溜烟回戛嬷去了。

高武方面，由于小伍寨距蚌戛有40多里，他怕中途被赵小安截击，派人到蚌戛说明理由。我同叶尚文的主观想法是：高武与赵小安两人争斗，同和邻乡改选乡镇民代表及乡长有联带关系。因为代表人数分配得极不合理，少数民族得不到讲话的机会，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找出一个补救办法，可能在消极方面有点好处。再就是人民方面的损失应该调查，李永祥的丧事应该有着落。为此，我们准备组织一个临时"善后委员会"，目的是使少数民族在这个委员会里能占多数，一则补救乡民代表的偏单，再则对赵小安与高武双方起到一点监视作用，可以做县政府的耳目，获得一些比较可靠的材料。这一意见，在我回城以前，与各族老年人士提出研究，大家一致同意，我们拟好了一份组织大纲，准备召开一次大会，即行成立。

刚在这个时候，云南民政厅长杨文清为布置选举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出巡遮南。我留守县政府的秘书许颖贤两次来信，催我

回城，同时我也感到处理这件事情，颇为棘手，想同杨文清研究一个具体办法。这时下半山的谷子已在准备收割，蚌戛父老希望收好庄稼，要求将队兵留下，我让叶尚文带10名队兵留在蚌戛，并请他负责将善后委员会组织起来，与赵小安多加联系。可是我们的这些作法并不切合实际，而赵小安也越发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恶，使整个和邻乡变得更加黑暗。

我回城后，杨文清对我作了指示，他说："赵小安可以先招抚，如果缴清枪支，即可取消过去两次给他的通缉令。高武如何处置，叫我酌量情况办理。杨文清走后，我因回城途中疟疾复发，进行治疗，延至9月下旬身体好转，计划再赴和邻乡。在尚未启程以前，叶尚文迭次来信，说赵小安又继续制造了许多罪恶，比较严重的是：

一、善后委员会已经组成，刚刚开始调查工作，赵小安即派人在途中打死一个哈尼族姓罗的委员，以致其他委员害怕，不敢活动。

二、李永祥等人戛嬷田中的谷子已经成熟，高武几次带人收割、均被赵小安阻击，发生争斗；李永祥的房子被赵小安烧光；李永祥的棺材被赵小安当靶子射击。

三、李永祥的小女人带着两三岁的一个孩子，逃避在新戛嬷下面何家声的房子里，高武派了几个武装在那里保护。赵小安探悉，派人围攻，想把她母子斩尽杀绝。但因房屋坚固，一天两夜没有攻破。最后甩进手榴弹，爆炸起火，里面的人挖墙逃脱，何家的房子全被烧毁，双方各有死伤。

四、猛丁的贺光荣派人来和邻乡帮助高武，高武到别保强派粮食，经常与赵小安发生冲突。民间的牛马牲畜，双方都争相抢动，甚至估拉壮丁充当炮灰，房子也被乱烧。

除开上面一些，信中还提到赵小安带领家小来蚌戛，常到关帝庙找他，他身边的10个队兵已病倒大半，万一赵小安向他借用

枪弹，将无法应付，催我赶快动身。我这次去和邻乡，有中队长岳世藩率领的常备队一分队，加上六〇迫击炮1门和轻机枪2挺。另外同去的士绅彭商贤先生还由矿上调来的6个带枪的亲信，我也调来4个，并调教育局长张翼凤一同前往。

此次我们渡过蛮铁，刚登江岸，叶尚文又专人送来一封粘有鸡毛的信，信上说赵小安已将家小送回蕨蕨地，忽于昨晚又带领20多人来蚌戛，人民非常惊慌，催我迅速动身。信上的日期就是当天清早。我们到达蚌戛栅子外赶街的地方，瞥见赵小安派到中途持枪欢迎10多个人和村里年老的人排成横列，站立在大路右边，左边只有叶尚文、赵小安及站在赵小安身后一个手持大枪的总共3个人。我们走近他们身旁，叶尚文把赵小安介绍给大家。我告诉他稍缓一下来关帝庙和大家谈谈。我们进入关帝庙盥洗已毕，我意识到带来的武装，对赵小安来说是很大威胁，假如通知他来关帝庙，肯定使他发生误会。为了争取时间，解除他的一切顾虑，我同彭老及叶尚文等5人到他昨晚歇宿的地点找他。不料居停主人说："赵小安到寨子外参加欢迎的时候，已将骑马栓在门外，他转身回，便带人马走了。"

当天夜半时分，赵小安为了掩饰他的奸狡，从戛嬷专人送给叶尚文一信，说他误信谣言，未及报告，遽然离开蚌戛，深为后悔，请求替他解释，给以原恕。当由叶尚文写了回信，天还不亮，仍交来人带回戛嬷。信上说明我们对他非常谅解，希望他重来蚌戛。

大家住在蚌戛，一连几天，从口头书面对赵小安、高武两方面继续联系。赵小安仍以张家义为代表，往来于戛嬷及蚌戛之间。

我们对高武方面联系的结果，是他派人来蚌戛说，由于小伍寨与蚌戛相距40多里，怕在路上吃赵小安的亏，所以不敢到蚌戛见面。当时我叫人回去告诉高武，任随他选择一个适当的地点，约好日期，我可以去会他。后来高武选在新蚌戛。我按照约定的日子同叶尚文、张翼凤、岳世藩4人，带2个徒手佣人前往。那里

是哈尼族聚居的寨子，距小伍寨30多里，距蚌戛10多里，靠近大伍寨河。高武在谈话中说明他与赵小安的斗争，主要是赵小安杀了李永祥伯侄两人，还不够，又要杀他，他才团结有枪的哈尼族与赵小安反抗。刘松樵及彭佐臣、彭树甲等名为调解，实际上把他限制在小伍寨，让赵小安在6个保横行；他带着几十个人蹲在一个保，粮食缺乏，派人到别保借找，甚至收割自己田里的谷子，都同样挨打，心里很不服气。他表示：赵小安如肯缴枪，他也情愿交出来，他身边的弟兄都有田地，可以回家栽田种地；如果赵小安能离开和邻乡，他可以缴出枪支，带领家小到县城长住。

经过与高武会晤，我们把他的意见同杨文清的指示结合官绅同意的原则作了研究，认为问题关键要先看赵小安的态度，高武不会有多大困难。因此，拟就两条办法：一条缴枪，双方各准暂留自卫武装4人，照乡丁待遇，由乡公所发给伙饷，协助地方维持治安；一条出境，除双方私有武器，其余公枪及向民间提借的私枪一律归还，即日离开邻乡。以后任何一方非经乡公所会商及地方父老同意，不得入境。

在张家义来蚌戛时，我们把这两条办法告诉他，叫他征求赵小安的意见，并对他说明赵小安能做到第一条，政府可以取消过去给他的通缉令。后据答复，赵小安同意的是第二条，但要求给3天期限，让所带弟兄回家安排一下家务。这时，我们考虑赵小安多奸多诈，不能以诚相待。这两条办法要能够贯彻执行，不流于形式，不重蹈已往调解的复辙，非有压倒双方的武力，是绝对做不到的。因此，密令民新乡乡长钱玉湘在3天内调足壮丁100人，携带武器，赶到蚌戛。

民新乡的壮丁到了蚌戛，我们在关帝庙召开了一个大会，赵小安派陈树藩为代表，高武派两个哈尼族能讲普通话的人为代表。会议从下午1点钟开到6点钟，得出了如下结果：

补选副乡长问题，以得票最多的哈尼族罗正国当选；李永祥

的丧葬问题，由善后委员会协助乡长、副乡长主持办理，具体办法由蒋廷俊、罗正国订期召集善后委员另行商讨；赵小安与高武的去留问题，同意赵小安的要求，从下一天起，在3天内离开和邻乡，双方的家属及田产地业由乡公所负责保护，不得毁损或侵占。其余照我们预似的办法办理。

会议照议程进行完毕，我提出乡公所派收子弹事件，要求到会的人把知道的数字谈一谈。并说明这不是追究责任，而是了解一下情况，使县政府今后核发各乡子弹时多有一点把握。当即有纸厂的汉族郭思国（该保乡民代表）说，别人出过多少他不知道，他本人出过500颗，是乡民代表会开条子派的，每颗折缴现金2角。姓郭的话未讲完，张家义即起立声辩，不承认代表会有开条子派子弹的事情。我一面制止了张家义的发言，心里感到乡公所及代表会向人民派收子弹，是为赵小安效劳，假如继续追问下去，凡是出过子弹的人，难免以后不遭报复，于是宣告会议结束。

散后会，我们以县政府名义招待大家吃过晚饭，各自散去。黄昏以后，我派人找张家义，却已在饭后转回戛嬢了。当晚深夜，我们将应办文件赶忙就绪，想到赵小安诡计多端，过去乱拖枪、乱杀人、乱抢、乱烧纯是土匪行为。这次召开的大会虽然是迁就了他，但恐高武只注意开会，思想麻痹，又上赵小安的当。特乘夜深人静，把高武的代表找来，给他们一份文件，令其赶走夜路，尽天明以前到达小伍寨，并再三嘱咐告知高武小心戒备，防止赵小安袭击。

突然的事件果真在第二天清早发生了。当天我们尚未起床，罗正国即从新戛嬢派人来报，说拂晓时大伍寨河上游传来枪声，又发现小伍寨方面冒起浓烈的火烟，好像正在烧房子。我们意料，可能是赵小安与高武又在火并，马上派一个常备队的分队长带领一班队兵赶往弹压。我们也上老蚌戛坡头了望。据寨中父老手指方向说，正冒黑烟的地方是距小伍寨后面10多里的“宗哈”（哈尼

族人聚居的寨子），他们还说，听得高武手下有宗哈人在内，总是赵小安烧了小伍寨之后，又去烧抢宗哈了。中午时分，派去的那个分队长回来，说他们行至中途据小伍寨逃出的人说，赵小安黎明时围攻小伍寨，把高武的人打得五零四散，老百姓逃出的时候，高武的房子正在着火，赵小安已打过建水去了。我们回到蚌戛，那个代表赵小安的陈树潘也来报告，说他带着文件行至半路，知道赵小安已带领全部弟兄出境，不知去向，只得返回蚌夏，俟探有确实消息再将文件送去。

2点多钟，赵小安雇人挑着3个人头，连同草纸写的一份报告送来蚌戛。报告上说，他遵守会议决定办法，今早率领弟兄离开和邻乡，高武在半路上邀截，不许他通过，彼此发生接触，已将高武杀死，割下首级请查验。当下我们出关帝庙一看，3个人头当中的另外两个，就是昨天代表高武来开会的那两个哈尼族。过了一天，我在雀山，有两个10多岁的少年跑来哭诉，说他们的房子被烧，无家可归。据这两个孩子说：高武本人带领10多个人住在他们的家里，天还不亮，高武的代表由蚌戛回去，唤醒高武，叫高武多加警戒。不料天色刚刚发白，河边的一个步哨跑步回来，赵小安带着人紧跟在后面，一进寨子，就围起高武的房子，一面打枪，一面放火，这两个孩子躲到隔壁，才逃脱性命。

我们见了那3个人头，心里确有遏止不住的愤怒，精神上感到非常紧张和烦恼，认为赵小安这个凶狠残暴的刽子手，在过去几次调解时间，他都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离开和邻乡，原因是过多地对他妥协让步，才招来这样的结果。现在赵小安已经到建水地界肆行烧抢，建水团队不会不来清剿，他除了回窜和邻乡或通过老林窜往金平，别无出路。因此，计划在个旧地界截住他的归路，同时阻塞他逃回金平的去路，在和邻乡范围内把他彻底消灭。

第二天，我们按预定计划分头出发。我到雀山住在徐东贵兄弟的家里，派出该保壮丁星夜赶到老林边防守通往蒙自、金平的

重要路口，并用一切树木和石头将路口塞断。次日拂晓，蒋廷俊即来叩门说，赵小安夜半来戛嬢搜索粮食，慌慌张张吃了一顿饭，就向蒙自纳更逃走了。后来才得知，纳更土司是赵小安的干爹，彼此勾结。

赵小安既已逃窜出境，我们又处被动地位，只好做一通官样文章送给纳更土司龙健乾，要他派团队助缉拿，一面怀着沮丧失望的心情转回蚌戛。在回程途中顺往戛嬢查看一下：张家义的家里早已搬成一所空房子；李永祥的家确已烧成一片焦土；李永祥的尸棺被打上好几个枪眼。寨子外有几条战壕；赶街旷场挂着两个人头。据说前者是高武来割谷子时赵小安估派人民挖来阻击高武的，后者是3天前赵小安从小伍寨送来挂上的。

在我们回城的10多天当中，和邻乡是平静无事的。自民新乡丁撤退后，赵小安在他的干爹龙健乾支持下从纳更回窜，越更疯狂地施展他的强盗本领，荼毒人民。现仅择最为显著的3件事为例：

一、围攻常备队。岳世藩的临时队部设在蚌戛后山顶上一所庙里，居高临下，可以俯瞰蚌戛周围。民新乡壮丁撤走后，赵小安首先把蚌戛从老林引来的饮水沟挖断，接着就在第二天破晓时候，从蚌戛后山背面偷爬到山顶，袭击岳世藩的队部。相持了两个钟头，岳世藩顾虑距城过远，救兵难在短时间赶到，而且水源已断，更不能长久抵抗，遂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冒险突围，经过水塘撤退回城。所带队兵伤毙各1人，并损失大枪2枝，轻机枪也打坏。

二、诱杀罗副乡长。罗正国就副乡长职后，收容了高武的10多个弟兄，编归壮丁守备队，驻在蚌戛。自赵小安袭击常备队，所有调来的各保壮丁逃散一空；钱有铭带领几个人出去当土匪；龙健乾从纳更派来帮助赵小安的人在纳更蚌戛一带肆行抢掳，地方秩序，混乱达于极点。各村寨闻风逃散的人络驿于途。罗正国整

天躲在自己的田房里，不敢露面。赵小安派人向罗正国诱骗，叫他缴出“赎罪金”1000元（现金），就不再找他。罗正国满心欢喜，以为出钱买命，不致再有危险了，即设法四处搜罗，凑交了800元，尚欠200，无法缴出。结果被赵小安派人到田房里活活打死。

三、非法拷打郭代表家属。纸厂乡民代表郭思国在关帝庙大会上说出被派子弹的事情，为张家所仇恨。赵小安窜回来，派人到纸厂捉拿，幸亏他没有在家，将他的妻子捆去，用非刑拷问她丈夫埋藏金银的地方，赵小安派人挖得现金600元，才得释放。郭思国本人逃到县城，躲了两年多，直到江外解放才敢回家。

赵小安潜伏在纳更时间还捏造了许多人名向建水专员公署递过两次禀，一次告我威逼和邻乡青年出境；一次请朱仲翔命令我委赵小安当和邻乡乡长。年仲翔都照转给我，我当然不去理睬。但到了常备队被赵小安袭击，我鉴于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而且过去一切计划已经完全失败，实在没有再去过问这个问题的能力。因而抱定决心知难而退，电请省主席卢汉另派大员处理，又亲到建水请朱仲翔速往江外坐镇，以免乱源日益扩大。最后，卢汉命令驻蒙自的保安第二团团长张仲强负责办理，我便卸脱了这个千斤重担。

张仲强在抗日战争期间，随第六十军（滇军）赴华北抗日。卢汉任云南省主席，派充保安团第二团团长，驻扎蒙自。他奉命处理赵小安事件之后，是年12月底带领秘书和几个士兵乘吉普车来个，要我找几个较为重要的绅士到县政府座谈。在谈话中，张仲强发表处理赵小安的意见，大体同杨文清过去主张的一套相似，就是第一步招安，若赵小安不就范，第二步剿办。座中人当然不会提出不同的意见，随由他的秘书写一封信给赵小安，意思是叫他安分做人，不准再生事故。吃饭时候，张仲强还与黄元直约定日期，一同赴和邻乡。

1948年1月，张仲强由电话通知我，说他当天带一排人坐火

车来个，要我替他准备住宿的地方。他到后，住在云庙内原聚丰当。据他说，另有一个营，由营长赵健民率领，已从蛮板直赴逢春岭，他本人也要到逢春岭及新城与龙鹏程、龙健乾先行接头，再到和邻乡，并调个旧常备自卫队队长岳世藩带一个分队由蛮铁过渡，暂住蚌戛，以后再听命令。

张仲强此行在犒吾地界遇伏，丧师殒命，这是我事后听他的部下及岳世藩回城谈的。其经过是这样：

张仲强到了蓬春岭，与赵营长一同带领全部人马到达新城，与纳更土司龙健乾商量招抚赵小安。他将大部分队伍安排在雀山、戛嬢一带，自己驻在新城。通过龙健乾向赵小安传达，龙健乾又向双方作了担保，于是龙健乾陪同张仲强在新城后面山脚与赵小安会见。赵小安表示情愿接受招抚，约定日期缴枪50杆。张仲强志得意满认为赵小安已被他的强大威力所慑服，遂坦然不疑地移驻于戛嬢，等候接收枪械。谁料限期届满，所谓缴枪，全无动静，他才派人向龙健乾交涉，一面命令岳世藩将团队开到麻迷、五邦各处，严防赵小安从江边逃走。龙健乾在张仲强催促和责备之下，派人转催赵小安，赵小安才捡出几十支破枪送往戛嬢缴给张仲强，一面纠集喽罗向金平逃窜。

这时张仲强知道中了赵小安的圈套，非常恼火，马上集合全营兵马，亲自带领追赶，大有“灭此朝食”的气概。当天追到犒吾土所属“马店”（地名）略为休息，仍继续前进。出马店不到5里的“观音崖”，崖下是一条羊肠小道，长约七八里，路下边是马店河，路上边是绵亘不断、攀登不上的悬崖绝壁，地形十分险恶。前卫部队以单行队形走在前面，张仲强坐三丁拐凉轿在后。由于路径太窄，弯拐又多，轿夫请他下轿步行，赵营长在后面见他下轿，也跟着下马走路。才走出几十步远，埋伏在崖头上的赵小安从岩石上开枪迎击，同时河对岸的匪徒也朝着目标射击。霎时弹雨横飞，保安团的官兵进既不能，退又不可，连还击的目标也找

不着。有些人逼得跳下马店河，不是打死，就是淹死；不敢跳河的很多人都中弹伤亡。张仲强看到情势危迫，跳下河岸，拿着两支手枪左右乱射，沿着河岸向上游逃命，到了离射界稍远的地方，徒涉过河，找得一间田房，躲在里面。赵小安把保安团官兵打得落花流水之后，即派人在各处搜捡武器，又到处寻找张仲强的下落。终于在田房里找着，拖出外面，用枪打死。过了几天，尸首已经腐臭，才被逃散的士兵发现，通知龙鹏程派人抬到逢春岭，装入棺材。后来保安团副团长杨某带领队伍到达逢春岭，还嫌棺材不好，迫令龙鹏程用他父亲龙毓乾的杉木材子另外装殓。

卢汉对张仲强的丧师殒命，极为震怒。他在40县县长会议上大骂张仲强，说张仲强过了多少大江大海，这次在阴沟里翻船，真是丢尽军人的脸，损失政府的威信。由于卢汉十分重视自己掌握的保安团，要替自己争回面子，又派省保安司令部参谋处长尹继勋负剿办赵小安的责任。所用兵力除保安二团并调二十六军的一个团，归尹继勋指挥，于是年夏秋之间，在蒙自、个旧、金平各县地区进行兜剿。尹部消灭了赵小安的武装力量，逮捕了赵小安的父亲和妻子送蒙自管押，逮捕了蒋廷俊送个旧县管押（我时已交卸回省），并将张家义、陈树藩、陈世昌等击毙。赵小安本人依然漏网。

犒吾土司的地界是与金平猛丁相接的。土司龙鹏程由于欲望太奢，不满足于仅仅剥削自己界内的劳动人民，又垂涎猛丁的烟课，曾向金平县长钟光汉贿买猛丁营盘乡乡长位置，钟光汉收了龙鹏程的厚礼，将委令给了龙鹏程，但是贺光荣舍不得这块肥肉，一面也送钱给钟光汉，一面整顿武装，阻止龙鹏程到任。龙鹏程出了重价，才拿到钟光汉的委令，当然不甘示弱，下令所属“里长”强迫人民出枪出人，进攻营盘街，想把贺光荣赶走。不料双方接触之后，龙吃了贺光荣的败仗，打死了他的头目和士兵七八十人，才不得不忍气吞声地退回逢春岭。这时候，赵小安打垮了

张仲强，龙鹏程又想利用赵小安来替自己报仇，把赵小安约到逢春岭，结拜做干弟兄，希望互相合作，再去攻打贺光荣。但赵小安唯一的仇人是钟光汉，决心先打金平县城，再打营盘街，反而向龙鹏程骗得大批子弹，自去攻打金平。不料结果遭到失败，赵小安逃到犒吾所属大坪一带，依靠龙鹏程以为掩护，准备补充实力，再去攻打。钟光汉探闻赵小安潜伏在犒吾，严限龙鹏程负责缉拿，指定不能拿活的也要把人头解去。不然，以窝留土匪论罪，报请省政府革除他的土司职位。龙为了自身利益，又大调士兵，在大坪将赵小安击溃，除死、伤不计，还俘获30几人，因为赵小安逃脱，不好交帐，就把这批人处死，砍下人头，解送金平。赵小安被击溃后，带着一些残兵败将又窜回和邻乡，肆行抢劫。至保安团杨副团长进入江外，对赵小安恨之刺骨，才到蓬春岭，即令龙鹏程协同进剿，但龙鹏程不敢出马，派“门公”杨廷标为带路“先锋”，率领士兵同保安团开到雀山，把赵小安围住，经过半天接触，赵小安不支，烧去几所房子，突围逃走。跟着又被尹继勋带去队伍四处兜剿，才彻底消灭了他的武装力量。

在尹继勋剿办赵小安的过程中，由于军队及保安团遍及几个县的边区，对于无辜人民造下的罪恶擢发难数的。事后传闻，凡和邻乡及附近特别是纳更地区过去受赵小安裹胁，或被军队指为有嫌疑的人家——当然是稍有资财的人家，都被罚款赎罪。缴不起的，或拉牛马；或被捆打；竟直接枪杀；还有怀孕的妇女也惨遭杀害；一两岁的婴孩也被刺刀戳死，男妇老幼死了多少，无法统计。至于各族人民被迫供应的粮食，被抢走的猪、羊、鸡、鸭，那更不知有若干数字了。总而言之，反动军队足迹所到之处，一切不择手段，人民群众受到的痛苦是万分惨重的。古话说：“贼来如梳、兵来如篦”，正是尹继勋剿办赵小安的写照。

赵小安被击溃后，野心不死，逃到最边远的“猛喇”及“茨通坝”潜伏活动，凭着他那一套诱编的本领，勾结一小撮社会渣

滓，他的土匪武装又渐次复活。他于同年年底窜回犒吾、纳更地区，利用人民仇恨土司的心理，打着打倒土司的幌子，沿途暗诱各地青年入伙。1949年万保邦来遮南进行反蒋活动，组织“人民自卫军”，派赵汝懋为支队长，到江外联络民间武装和土匪武装，收编赵小安为独立团长。从此，赵小安假借这块招牌作护符，自封“红军”，到处招摇撞骗。由于人民迫望解放，受他蛊惑的人不在少数，其势力就日益膨胀起来。

遮南江外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土司，人们历来称他们为“土皇帝”。龙云和卢汉统治云南时期，尽管许多土司表面上已改为区长、乡长或保长，实际仍然保存着原有的土司制度。他们内部在权位及土地等个人利益方面的争夺极其剧烈。如纳更、犒吾两土司，纳更是龙济光的儿子龙健乾，犒吾是龙济光同胞兄弟龙裕光的儿子龙毓乾（当时是龙毓乾的儿子龙鹏程），所管地区，各有界限，各都统治着几千户人家。可是纳更的地区和户口，被龙毓乾久霸不还，龙健乾承袭纳更土职，想把这部分地方收回，终因力量不足，难以实现。这时候赵小安死灰复燃，冒充红军，声势日见增长，龙健乾以为赵小安是自己的干儿子，便想趁此时机借他的势力将那块地方争回，扩大自己的剥削范围。他特地邀约赵小安来新城土司衙门计划进行。龙毓乾闻得赵小安住在新城的消息，不明白龙健乾心中的鬼胎，却又怀着自己的幻想奔往新城，自恃与龙健乾谊属嫡堂弟兄，密谋活捉赵小安，解至金平县报功。不料龙氏弟兄利害不同，各有各的阴谋，以致事机不密，反被赵小安识破，先发制人，将龙氏弟兄同时捆绑，先在新城衙门前面将龙健乾枪毙，又把龙毓乾拖到逢春岭杀死。两个衙门的枪支财物尽为赵小安洗劫干净。此后赵小安的土匪武装竟发展到1000多人，上至建水，下至金平，到处杀人越货，捆人勒赎，受害者不计其数。所有各县边区的积谷概被糟踏干净，农民终年勤劳以血汗换来的粮食，概被抢光、搜光；又还窜到建水县六合乡大肆抢

掠，并将乡长普国梁的妻子打死，其武器、家财概被抄洗尽净，将普国梁捆到雀山软禁数月，妄图勒索更多的钱财。

1950年1月，我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解放了蒙自。蒋军残余部队二十六军由个旧逃回滇越边境，驮有几十驮从云南人民头上刮走的财物，被赵小安在中途全部截获。恰在这时，解放大军的追击部队已到江外，赵小安又梦想瞒过大军，赶紧派人向大军接头，佯示欢迎，一面赶将截获的驮子运往雀山，准备吞没。但是解放大军尚未到达江外即知赵小安长期冒充红军及其各种罪行，并且知道他将截获的这批财物私运雀山，立即分派队伍迅雷不及掩耳的把雀山重重包围，勒令缴出全部武器及所获驮子。赵小安自知末日已到，一切遵命照办。当时解放军根据上级“缴枪不杀”的规定，给予宽大，将所缴枪械的机柄取下，照旧发还原枪，连人带往盘溪，予以改编，想给他一条自新之路。但赵小安本性难移，死心踏地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到了盘溪又复逃跑。经拿获后，于1950年年底解到个旧，经过人民法院审判，这个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土匪头子，终于逃不出人民的法网，在个旧大坟坝被枪决。

（云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弥勒五匪首

杨　竖　陈荣华

匪首汤增藩

弥勒新哨区猴于乡小沙冲汤增藩，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民国初年，汤开始结伙抢劫，常召集匪众一二百人，在弥勒、泸西、邱北等县境内枪劫殷实富户和行商旅贾，仅民国8—11年(1919—1922年)，在泸西县境内就抢劫达11次之多。他为弥勒南乡著名匪首之一。

民国10年（1921年），省长唐继尧与驻川滇军军长顾品珍政见不协，顾于同年除日率部回滇，唐次日奔粤，是年春2月率部回滇。当时汤增藩之叔父汤守恒为唐继尧的第六梯队第十九支队支队长，与侄汤增藩互相勾结。民国12年（1922年）3月28日，汤打着拥护唐继尧旗号，率匪众200余人（每人腰系白布袋为记、并作为行劫后装钱物之用），闯进泸西城西门内驻扎。汤联合泸西城内士绅控告驻泸商团团首张勤，并派部下戴王谟、汤增谓二人到商栈与团首交涉谈判，要挟商团出银2000元，出枪20枝。汤一面扬言“要查封商团部，清算其历年账目”，同时以武力威胁，要商团保卫队长张炳华、队副冉玉清、耿实等到西门谈话。张等恐遭暗算，与团首张勤计议提出说：“以其死于匪首，不如决一死战！”但团首惧怕汤匪势力，不准轻举擅动。至正午12时，张炳

华私率团兵与城民集中于县署，向众讲明利害，兵民皆愤然，表示服从效命，一致对敌。张派团兵14人，先将汤匪的代表戴王谟、汤增谓二人杀死，将首级悬挂于街中灯杆之上，然后迅将四城门紧闭，率队飞驰至西门与汤接战。张部击毙汤匪旗手，然后猛攻，凡是腰系白布袋者，均用梭标戳死。匪徒76人丧生，遂不支，残部从西门城墙缺口处逃出。张率部追击数里，汤匪纷纷溃散。

汤自泸败窜回弥后，日思要报泸城之恨。有次泸西西门宪姓兄弟二人到竹元拉糖，路经猴于，汤侦知系泸西人，将二人杀死，把尸体放于屠案桌上示众，以泄前恨。随后，汤又到竹元、虹溪泣求匪霸高克谦、王兰阶，并勾结邱北巨匪，约期准备复攻泸西城。但路经竹元时，被竹元县佐马利桢侦知，出于桑梓义愤，马率法警将汤匪生擒，夺获枪支11枝。汤匪被押解至泸西城入狱监禁。

汤在狱中极力贿赂泸西县长何世熙，企图开脱罪责。但城中百姓纷纷愤诉，县长无奈，只好顺民意，于当年腊月三十下午5时，将汤匪处决于泸西西城外。

尔后，汤匪之叔汤守恒欲为其侄报仇，曾勾结高克谦和王兰阶匪霸，待机欲攻泸西。为此，泸城派人前去疏通高、王，并将汤匪叔侄情况飞报汤守恒上司龚得胜。经龚到泸查实后，革去汤守恒官职。汤为侄复仇之念从此破灭。

匪首乐树明

乐树明（名元辉，字树明），外号人称“小乐”。弥勒南乡坝下司宗渡人，生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间。自幼家境富裕，好逸恶劳，娇养成性，及长好玩刀枪，喜吹烟赌博。

辛亥革命后，云南政变频仍，军阀争权，招降纳叛，勾结地霸武装，各自扩充实力。地方治安混乱，官府无力维持，造成土

匪猖獗，村舍不安。乐树明为保其殷实家产，置枪备械，招收随从，有了一定实力。民国14年（1925年）2月，他伙同小路体扬瑞元，纠集300余人攻打县城，被东乡民团击败。9月，龙云初获云南统治权，派旅长杨济之来弥招抚地霸武装。乐率队进昆明接受招安，龙委乐为司令，嘱其回县招抚人马扩充实力。乐虽获此司令头衔，而回县所招集人数仅有数十人之众，且都未受过军事训练，龙云遂不重视。乐只得仍居地方，有事召集人，无事散伙。民国16年（1927年）正月初三日，有临安匪徒一起约200余人，由盘西窜至里方寨进行敲诈抢掠，并言要抢遍西南两乡。当时乐树明、张国亮、杨瑞元三匪联合出击临安匪徒，连续进攻3次方打退临安匪众。临匪败退时烧毁民房103户。乐树明有此一举，更加盛气凌人，而声势也大起来，同年正月二十日，乐伙同丁汉书，邱国宝、段发林、杨秉礼、付学义等地霸匪头千余人围攻县城，烧毁民房100余间，其城镇居民深受其害。县长李慎修调泸西联合团200余人方将乐匪击溃。

同年，小矣则惯匪李炳文、李炳坤被中矣则人杀死。李姓邀乐树明替其报仇。乐出动人马并伙同徐家寨刘顺清大烧中矣则，村民耕牛被劫走20多头，粮食财物任意抢去。继之伙同匪首袁老板借名攻打县城，进驻章保村。民团出击时匪徒竟放火烧房200余间。后袁老板被村民击毙，匪徒抢付家杉木寿板装殓运走，又抢村民耕牛40多头，被盖衣物均遭其洗动。

乐树明称霸为匪，鱼肉乡里，直至民国19年（1930年）9月26日，被县长肖跃棻利用常福仁诱杀。

匪首杨玉清

杨玉清（原名杨彦清），系弥勒新哨区羊街乡赤沙白村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自幼依仗族权欺压人民，20多岁时

即纠集匪徒数10人沿白沙坡至弥城一带拦路抢劫，弄得肩挑小贩、驮糖马帮不敢到竹元贩运红糖。杨匪趁机雇人组织马帮，专由竹元贩运红糖至弥勒出售，独揽市场牟取暴利。在这期间，他又暗地杀人抢劫，进行绑“空子”敲诈钱财。民国7年10月，绑架高宗堡徐汝志，勒交赎银200元方才放回。民国14年3月，杨匪率众百余攻打县城，县长李慎修紧闭四城门，召拖白民团猛攻。杨匪溃退时，火烧了新街3户客栈及扎腊栅子民房3间。

杨匪欺压乡里，任意派伕为其服劳役。他建盖私房耳房两所，茶房一所，碉楼一座，所用木料，分派大小矣盖、宗白、白度、补其、拖白、拖东比等农民砍运送村；所需四五万土基，分派赤沙白佃农托好晒干送至墙脚；石料数百车，分派附近村寨农民拉运至墙脚。但他却不付一分钱，不管一顿饭。赤沙白穷苦佃民，受尽其苦，无处申说。

杨后因霸占小羊街宋姓田产，被宋正祥弟兄约匪人朱学武、李春华杀于习岗哨南头。朱匪抄走杨匪全部家产，并赶走了全村耕牛50多头。

匪首杨瑞元

杨瑞元，弥勒小路体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1岁随父务农，性粗犷。20岁父母俱亡，从此，愈为横恶，常与近村游闲青年吃喝赌嫖，因戏侮族弟妇为族人讥责，遂外出避嫌。民国11年（1922年），云南军阀唐继尧与顾品珍混战，虹溪大姓王兰阶被唐委为支队长，王回弥扩充队伍，收容大批歹徒。杨趁机伙同数十无赖，到虹溪受委为营长，获一些枪弹。杨拥有人枪后，即盘据西乡一带，初时借口养兵，指派富户钱粮，敲诈勒索；既之设卡保路，暗中抢劫商旅；往后公开抢劫，成为弥勒实力较强的土匪。

民国14年(1925年)4月，杨纠合乐树明、张国亮等匪众200余人，敲锣镗、吹牛角，呐喊攻城，县长杨增藻闭城门，调东北乡联合团前来抗击。铺田村乡团沈文华11人自匪众西侧突袭，匪众始退。6月，杨率匪众抢劫猴于，烧毁民房5所，抢走不少财物。7月，杨匪进驻铺龙，挟段立业诡报要进攻县城，新任县长李慎修即派沈文华率团队出击。杨设伏杀死沈及团兵5人，伤11人。8月，杨率匪众约200余人来攻县城，时滇军退伍营长马永良任城防大队长，率队出击，又调联合团赶援击截，匪见势不敌退走。

民国15年(1926年)2月，杨纠合乐、张两股匪众300余人第三次攻县城，冲至东城外新街，烧毁民房百余间，抢掠居民财物无数运走。正当围城之际，泸西团首李岐山与东乡团首谷鑫等率团队驰援解围，打死打伤匪众30余人，团队亦伤亡10余人。杨、乐、张等匪众退回西南两乡后，游动骚扰，杀人越货，牵牛赶马，村民深受其害。民国16年(1927年)，除杨、乐、张等几股较大的土匪外，部份拥有少数人枪称霸一村的“二水老板”各据山头，明火执仗地杀人抢劫，致使很多小康之家逃进城里避居，城里殷实人家则到泸西或东乡一带避难。

民国17年(1928年)3月，杨、乐联合抢劫菜花庄，掠去财物牛马，纵火焚烧全村(只余4户)。4月，攻进古城村，据住数日，烧毁附近几村民房21户。时新任县长张联芳采用招抚之策，通过交涉委杨为财政员兼大队长，张国亮、王继尧为副大队长、中队长。匪众百余进住县城，名为“剿匪治安”，实际摆赌抽头，滥派捐税，杀人抢劫，强奸妇女。如此引狼入室，百姓不堪其苦。县府密令东乡团首谷鑫、罗靖邦、常福仁等率联合团围城，意图一举消灭。但杨匪奸诡，闭城严守，自带亲随巡视。联合团兵临城下，罗靖邦攻南城。杨知罗与城中马永和系甥舅，恐其内应，将马刺死于南城下。马姓族众与城内被胁守城壮丁恨杨入骨，四处呼喊响应，城外联合团攻打愈急。杨见势不敌，乘机离城逃回老

窠，其匪众30余人被击毙。

民国18年（1929年），杨复纠匪众200余人攻打虹溪。当时团总姜梦熊带团兵阻击，杨不支而退。继后，县府调联合团两次围剿，杨众叛亲离，其势渐孤。翌年，杨率亲信20多人避居小暮枝载荣家，县府重金收买杨的义子小贵生及赵云田，利用烘鸦片烟给杨抽吸的机会将其杀死。首级送入城中示众。

匪首赵光庭

赵光庭，又名赵光全。民国初年，随父由弥勒东乡赤甸村迁至南乡新哨区赤沙白村定居，租田耕种谋生，农闲上山砍扁担出售。因赤沙白田主杨福荣放猪吃赵所种庄稼，赵遂打死了杨家的母猪（尚余6个猪崽）。杨仗势欺人，将赵光庭老父捆绑吊打。更有恶者，逼着赵光庭18岁之胞妹用奶哺喂猪崽，并杨言："等赵光全回家，非要将他杀掉！"当时赵光庭不敢归家，但以杨家欺人太甚，尔后务要寻机报复。不久赵纠集了二三十人，回村杀死杨福荣，上山落草为寇，名曰"反政"。当时随赵为匪者众多，形成一支较大之股匪，有事出动，一声号令可以调集千余人众。赵匪主张"兔儿不吃窝边草"，在新哨地区概不抢劫，常远出东山区及泸西县一带进行抢劫。其所抢劫杀人作案统计如下：

民国7年（1918年）9月，抢劫习甲村民财价值300余银元。农民杨承忠被掳勒。同月，抢劫鸳楼村农民张学诗家，张被捆勒，付出赎金800余银元。同月26日，抢劫大鸳楼村农民财物价值300余银元，火烧谷子18石。同日抢劫泸西阿路瓦村，又抢茨西村村民，财物价值500余银元。10月23日，围攻新于村，烧毁房屋12间。同月，先后攻劫石岗冲村，杀死1人；抢劫路洒村30余户，财物价值千余元，杀死3人；抢劫由坝村，枪伤村民5人，抢劫财物价值6000余银元，烧毁民房40余间，谷米11石；抢劫上

马于吴家财物谷米10余石，300余银元，杀死1人；抢劫金马村村民财物价值500余银元。12月13日，抢动新坝村村民200余家，劫走财物价值5000余银元，掳走村民3人，后经村人段沧海奋勇夺回；抢劫小矣白村村民财物无数，火烧房屋20余间，杀死村人2人，伤1人；抢劫雨龙村村民财物价值500余银元，衣物等件无数，牛2头，马3匹；抢劫清水沟村民财物价值21500余银元，烧毁民房百余间，牛马48头，杀死村民2人，杀伤6人。25日，赵匪率众3000余人，围攻白勒坝村，经4昼夜战斗，被李春芳率村人击溃，毙匪60余人。赵匪火烧民房300余间，劫走耕牛40头、猪羊百余头。同月，又抢劫新寨；抢走财物价值4000余银元。同月劫旧城时，烧毁民房54间。民国9年（1920年）1月29日，抢劫小茨凹价值2000余银元，烧毁民房30余间。二月初四和初六日，又至上落鹤白村、下落鹤白村、间竹村、竹叶村、三塘村等地烧杀抢掠。

恶匪赵光庭先后抄抢劫过21个村寨，230余户人家，烧毁过民房395间，杀死10余人，绑架敲诈过5人，抢走稻谷20余石，牛马93头，猪着100余头，银元43600余元。此外，曾率匪众攻打过沙人寨、雨补、白落坝及泸西城。

赵匪极为残暴，杀死人后，常剖其腹，挖心煎炒下酒。绑获"空子"后，勒索时更为残忍，将人衣服扒光，掏出肚肠，吊在树上，使人痛极而死。

民国9年2月，匪首赵光庭才被弥勒县长胡道文设计诱捕送省处决。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滇西匪首王高脚与张梁

苏松林

20年代的云南，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兵祸连连，导致大批农民破产，为求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上山为匪。滇境各地匪乱四起，人民更加苦不堪言。当时在滇西凤仪、蒙化、漾濞之间的土匪王高脚、张梁，即是因生活所迫而当了土匪。王、张均为下关七五村人。七五村是白族人聚居地，由两个自然村组成，一叫福东，一叫福西。王高脚是福西人，张梁是福东人。

王高脚小名炳章，学名子锡，1898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王高脚的父母死得早，待姐姐出嫁后，他孤苦伶仃一人主要以砍柴卖钱渡日，有时去当挑夫和帮人家背驮子。王高脚个子高大，腿长步子大，走起路来别人跟不上，因此得了个"高脚"的绰号，其大名反到鲜为人知了。王高脚有一身的好力气，捆成把的柴一次能背四五十把，有一次把270斤洋纱从三台坡直背到下关的商号中。

他曾用卖柴所得的几文钱买了一匹羸弱的马，而他背的东西往往比马还多。一日，他到下关的酱油铺李高祥处卖柴，过秤时，马驮的只有85斤，他背的却有280斤。掌柜一看，不相信王高脚背得起那么多的柴，骂道："这个狗东西，咋个比牲口还驮得多？想是偷柴？"不给他柴钱。王高脚一怒之下扭头就走。第二天，他又去砍柴，马只随便驮了几根，他自己背了一大捆，到村口时，王高脚把马驮子上的柴加在自己背上，一直向李家走去。到了门口，王高脚大声

叫道："掌柜的，来秤柴。"小伙计一秤，有325斤。掌柜一见心里就明白了：昨天我说他偷柴，原来不是。这个人的力气确实大。

王高脚虽然力气大，但辛辛苦苦劳作还是吃不饱。他曾借高利贷，又到本村的油房里做帮工。借钱必须要还，利息又高。王高脚在债主天天逼债的窘境中实在无法生活，便一怒之下投到匪首何赖毛手下。何是四川汉人，流落在蒙化，后来成了土匪。他的人并不多，经常在一起的只有五六个人。他们在七五村后面的山上，天生桥至蒙化路口一带活动。

王高脚之所以投何赖毛，是因为他们原来就相熟。王高脚在油房做帮工时，有一天晚上，何赖毛吹大烟的灯油烧干了，就到七五村的段阿头家烟堂吹烟，正逢王高脚也到段家，何见生人进来，很不放心，不时地打量王高脚。段阿头见了就对何说："大哥，不怕得，他也是我相熟的人，你的香油（用以点灯）没有了，叫他去打给你就行了。他就在油房里帮人榨油。"王高脚马上就去油房提了一壶香油给了何赖毛。到了深夜，几个人又在一起吃宵夜。后来，王高脚又与何赖毛来往了几次，彼此就熟识了。

王高脚当土匪是在民国12年（1923年）前后，当时村里的人都不知道。他时常没了踪影，过几天又露面了，有时戴顶腾冲簸帽，有时又穿件麂皮褂子，有时又穿件白汗衫。到了第二年，人们才知道王高脚当了土匪。

王高脚入伙后，起初当伙伕，背柴米、锅碗家伙等。有一次，他们抢了几个挑担子的人，每人分了百十块花钱。当时，蒙化路口有保路队的六七个人守着。何赖毛对王高脚说："你要有本事把他们的枪拿来，就让你当头头。"王高脚披起一件蓑衣就去了。保路队的人都在窝棚里喝茶，枪架在门外。王高脚走过去，乘人不备抱起枪就跑。王高脚跑得快，保路队的人追不上，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枪扛跑了。就这样，王高脚当上了匪头。不久，何赖毛被打死了。

王高脚当匪头后，主要抢劫有钱人、商号的马帮等，从不乱杀

人。他的队伍很快就发展起来，最多时达500余人。后来成了著名匪首的福东人张梁也跟王高脚当了匪。张梁家也很穷，一家5口（父、母、哥、嫂）只有2亩多田、2间小房。张梁曾在下关读过高等小学。

王高脚越闹越大，与另一股匪张结巴分别在大理南北作乱，给地方当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不得不进行"清剿"。到民国14年（1925年）前，滇西镇守使李选廷率正规军一个团，在大理剿匪3年，毫无成效，最后，不得不使出"招安"的办法。

王高脚接受了招安，被编为"迤西剿匪侦缉大队"，王高脚任大队长，副大队长是同村人段某。段曾当过兵，辛亥革命后随滇军入川，参加过护国战争。大队下辖3个连，一连长是小关邑村的叶某，二连长就是张梁，三连长是天井村的赵某。上峰发下了大印和旗帜。王高脚每次出军，打着"云南迤西剿匪侦缉大队长"的三角形旗帜，很是威风。接受招安后，王高脚所部驻大理一塔寺。

1925年，李选廷被调回昆明，李秉阳为大理镇守使。1926年初，李秉阳随带驻腾永的第二十六团史华营到大理上任后，编练了一个补充大队，并将大理八属的团防抽调一部分集中使用，编成一个八属联合团，以闫殿馨为团长。李秉阳几乎把剿匪的事全部交史华负责，所以大理一带的人只知道有个史营长，而很少有人知道李秉阳。

王高脚的队伍虽然穿上了军装，但总不免受到歧视，他们的军饷常被拖欠。张梁本来就受不了约束，更受不得气，他约了几个人重新上山为匪。后王高脚、史华等人虽一再劝其回来，但张梁不听，依然聚众抢劫。尔后，王部手下"满天飞"等因不满王部军纪，亦加入张梁股匪。

王高脚当上了云南迤西剿匪侦缉大队长后，奉命去打张结巴。当时，张结巴主要在大理洱源一带活动。一天，张结巴的人正在花甸坝老巢煮饭吃，王高脚的人从三面围上去，一枪打在火塘上。张

结巴的人听到枪声，知道不好，很快冲出包围圈去。此役中副大队长段某因追赶张结马的座骑，被张的马弁打死。

1926年清明前，王高脚的大爹去世，王高脚回村行吊，帮助料理丧事。当时，张梁也回村上坟。在下关时，做茶叶生意的汪某曾对王高脚说过："王子锡，你阿大发送时，你不要跟着上山去，张梁这个人脾气要不得，反口多。"王高脚不以为然，说："怕什么？跨出去一步，捏也把他捏得死。"王高脚在吊丧期间见到张梁，责问他说："张梁，我当匪这几年，七五村的鸡都没有杀过一只，你为什么把段华杀了？你杀段华比杀我爹还辣。"原来，段华在村中开了个油房，王高脚曾在油房里做过工，与段华的关系很好。有一次王高脚回村与段华闲谈，王高脚说："张梁才几个人，明天去搜山，看他们走得到哪里去？"段华劝道："大队长，还是把他们招安算了。"但是，不知是谁对张梁说："王高脚他们要拔你的金牙齿。"张梁听了这话很不痛快，一天晚上，就带着人把段华杀了。张梁见王高脚动了肝火，不敢无礼，对王高脚说："大队长，我错了。现在人也死了，没有办法。"王高脚遂与张梁商议招安的事，劝他下山，张梁不好当面拒绝，回答说："再过几天。"

王高脚把丧事料理完后，又与张梁商议招安的事。一天，他们在王家商议完后出来，张梁让王高脚等人走在前面，他带人跟在后面，两人都带有护兵。走到距本主庙北10多丈的地方，张梁手下的一个护兵突然拔出枪来，朝王高脚脑后就是一枪，子弹从王高脚的耳边擦过。王高脚马上回过头来骂道："哼！你搞什么名堂？"张梁连忙一枪，把王击倒在地。王的3个护兵来不及还击，亦被击倒，两死一伤，王的另外一个护兵潘某（凤仪华营人）在王高脚死后，马上就投靠张梁，领着人抄了王高脚的家，并将王的坐骑也据为己有。

王高脚死后，张梁的势力很快就发展起来，人多时达千余人。张梁、满天飞等人心狠手辣，乱抢乱杀。他们经常抢蒙化人，蒙化人对他们又怕又恨。

王高脚活着的时候，七五村相对安宁些。王高脚一死，张梁越闹越凶，七五村人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难过了。一方面是“匪乱”，每当张梁带着人回村时，村里的人就要准备吃的；另一方面是“兵祸”，剿匪的队伍常到村子里来，甚至游兵散勇也敢到村中骚扰。一来就问：“张梁到哪里去了？快把张梁交出来！”大家既怕匪更怕兵，都说不知道。兵就骂道：“难道一个村子的人都不知道？”啪！啪！几个耳光打过去，最后是“搜！”其实，这些兵搜的不是土匪，他们真正要搜的是钱、米、猪、鸡，就连妇女戴在手上的玉镯也强行搜去。

有一次，张梁回村，正好碰上几个兵进村。张梁跑进一姓张的院子里，钻进茅草堆里躲起来。那家人都不晓得，兵一进院子就乱搜，大叫：“张梁在哪里？快把他交出来！”找不到张梁，抢了几件东西扬长而去。张家人等兵走了以后，望着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房子，叹了口气说：“张梁这个人要是被他们捉去就清静了。”想不到这话被躲在茅草堆里的张梁听到了。几天以后，张梁带人杀了张家3口人，仅侥幸逃脱一子。

1926年5月，原丽维镇守副使罗树昌独立于永北、华坪，张贴布告，发出通电，宣称声讨唐继尧。罗在滇西调集民团，招编土匪，组成“迤西保安军”，张梁即接受了罗树昌的指挥。

唐继尧见滇西大树反旗，于8月任命亲信陈维庚为迤西临时剿匪总司令官，加派步兵第二十团（俞沛英团）等归陈指挥。8月中旬，唐军第三团唐继麟部也开向永北。罗树昌的乌合之众在唐军面前不堪一击，未经大的战斗即溃散而败。张梁及宋金荣二部罗军，在唐军未到之时，先退于永平、漾濞一线，罗军另一部杨震寰据保山。陈维庚军经蒙化、顺宁取保山，至右甸（今昌宁），营长史华即奉令南行，分兵过施甸、趋蒲缥，截断杨、张、宋等的退路。10月15日，杨震寰闻陈维庚攻来，即退出保山，向西越怒江而去。17日。张梁、宋金荣二部即入空城据守。同日，陈维庚部亦开到保山。张、宋强迫保山城里的老百姓上城守护，让他们高喊：“活捉陈维庚！活捉

陈维庚!"的口号。双方经过激战，张、宋二部不支，退走老营、瓦房街等地，再西渡双虹桥转向腾冲。这时，腾冲之守军到刘正伦料不能支持，便弃腾走缅。腾冲即为张、宋等部所占。

面对这种形势，陈维庚改剿为抚，派人与张、宋、杨联系，封官许愿，准予自新。12月，陈维庚进驻腾冲。杨震寰亲赴陈军，被拘处死，上了陈的当。张梁未敢前去，派部下一排长先去商议招安事宜，结果人一到，亦被擒杀。张梁见招安无望，即退回老巢。过江桥时众匪被打死、淹死的不少，余众沿途溃散。到大合江时，张梁的副手满天飞被追兵击毙。到七五村后的山上时，张梁身边就只剩下二三十人了。张梁带着千余人自5月参加罗树昌讨唐到同年12月，仅8个月的时间，就被唐军陈部追击溃散。

张梁见大势已去，就投到张结巴那里，合伙干了几天。随后，拐了几枝好枪，跑到祥云的荞、禾、米甸一带，与当地的股匪沙蛮干合伙行动。沙蛮干是李济川的部下，也参加过倒唐的活动。

张梁与沙蛮干曾到过思茅、普洱一带抢劫。后来，二人在分赃上发生了矛盾，张梁提出按枪分，因为他的枪多；沙提出按人分，因为他的人多，双方争执不下。一天下午，沙蛮干借请客吃饭之机将张梁打死。

自七五村出了匪首王高脚、张梁后（王后来被招安，无甚大恶），尤其是张梁，为匪时间长，又参加了军阀混战，七五村便成了官军剿办对象，人民跟着遭了殃，不仅村民被视为匪，近200人被杀，而且村庄亦被官军焚毁，田地、山林被强当做"匪产"迫卖。匪乱与兵祸使七五村人无以为生，沦为下关有钱人家的佃户。当时流传"贼如梳，兵如篦，官如剃"，诚非虚言，而七五村的遭遇，则是兵与官的祸害要比匪还胜过百倍。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李继川在保里的罪行

杨家珠

李继川，苗族，祖籍今雷山县西江镇。其父李拉，是位银匠，青年时到保里打银首饰（项圈、手镯）为生。后定居保里，娶妻吴氏，生李继川。李幼时念过多年私塾，写得一笔好字，兼会武术，但心怀叵测，行为不善。

民国13年（1924年）11月上旬，杨相廷部8名士兵，身背步枪，来到保里机夏寨吴老满家求食。据说他们是黎平县顺寨人，吴曾迁居顺寨与他们相识。因吴不在家，使他们失望。斯时，有人把情况向保里所所长杨胜高报告。杨早想成立一支由本地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因无门路，迟迟不能实现。这时听人报告，正中心怀。遣派所自卫班长李继川到吴老满家对他们说："杨所长请你们到所里吃午饭。"他们信以为真，随李而来，刚跨进保里所大门就被自卫班缴了械。

杨获得了这批枪，又吸收各寨壮丁共30余人，成立了独立排。任命李继川（李与杨是拜把弟兄）为排长，训练壮丁，主持军务。独立排成立不久，几处来函向杨索还枪支，并对杨施加压力。杨最初犹豫不决，后决定不退。他暗中指使李继川将人枪拉走，暂避一时。杨为控制这批人枪，派其长子杨秀兰随同前往。此计果然有效。以后凡有来函索枪者，杨胜高都以李继川带枪"反水"拖往外地，推脱了事。

李继川带领独立排到榕江、剑河边境一带活动，自称团长，士

兵们呼他为“大哥”。不久，李继川带领这帮人干起了掳抢农民财物：“关羊”坐坳的勾当，成了名副其实的土匪。这时杨胜高获悉李在外为匪，派人将李召回。这些人已抢劫成性，虽回保里，难改恶习，不时到保里周围的村寨奸淫掳抢，无所不为，引起农民痛恨。

民国14年，平永匪首杨彦洲盘据在平永区北部，不断招兵，扩充势力，并扬言要进犯乐里。民国15年春，雷山县乌洛（永乐）李斗山自任剿匪游击队营长，在乐里举旗招兵，言称要为地方除掉杨彦洲。他这号召得到七十二寨拥护，杨胜高令其长子杨秀兰率独立排一班人参加。殊知李斗山部士兵未经训练，武器低劣，在雷山的桃由、平永的梁化两战俱败，李斗山解散其部众，自己回籍经商，杨秀兰也率队返回保里。

是年，七十二寨遭受虫灾，收成减半。翌年又逢大旱，数十寨酿成饥荒，帮匪四起，到处抢劫，弄得民不聊生。斯时，李继川手握枪柄，独揽大权，不听杨胜高节制，凡事自作主张，企图取代所长职权。

李继川干惯了打家劫舍的勾当，附近村寨屡遭抢劫，极为穷困，只有本里、乐里、往里、勒里、瑞里等寨稍为宽裕。李认为仅凭独立排不能济事，遂以防范土匪侵犯地方为由，于民国14年夏季，在保里大肆招兵买马，不管什么人，来者不拒。荒年招兵，一呼百应，至民国15年，兵员竟达1000余人。保里约有700户人家，虽然田土肥沃，但连续两年灾害，农民自身难保，如今每户要养2名士兵，没有几个月就把保里粮食吃空了。

为解决军需，李继川一方面派人外出打劫，一方面在保里巧立名目进行敲诈，对中产以上人家，竟以“借贷”为名，强征粮食，弄得保里一带，天怒人怨。

李继川虽身千人之首，他毕竟是异乡之人，一旦势孤，难免受他人暗算，必须收买一伙忠于自己的心腹，万一发生意外，才有救应。于是把剑河籍的人编成一个班，作为贴身警卫，保护自己，任命

杨世国(剑河人)为班长。该班武器不好,李想把独立排的武器转交杨掌握,而又没有理由。恰在这时,保里一吴姓孤儿到岑盘寨讨饭,偷了杨老和家一碗饭吃,被杨的祖母发觉,用棒锤在孤儿头部猛击数下,孤儿不幸死亡。独立排想趁机向杨家索取钱财,派一班人到岑盘寨将杨老和的祖母吊打。李继川借口独立排仗势欺人,将该排枪支收回,转交杨世国控制。因此,引起独立排和保里的人不满,开始产生矛盾。

李继川失去保里民众的信任之后,感到处境艰难,为了千余人的衣食,不得不向外寨发展。李和杨世国商议之后,兵分三路悍然向本里进攻。由于本里防卫严密,一时难以得手。李部杨老井(本里人)对李说:"大哥,请允许我去叫开寨门,进去说服他们。"李信以为真,让其进寨。殊知杨进寨后,叫人把寨门顶好,并将李部虚实告诉头人。李知上当,指挥队伍进攻,举起手中快枪高声叫喊:"若不开门,可别后悔!"本里农民不予理睬,李下令攻寨。本里寨向外发射土炮,李部有人负了重伤,才停止攻寨。

李继川看硬攻不行,遂向头人林老和提出要求:只要本里把300斤猪肉、300斤米酒、700斤糯米送到保里,两寨和好,不再来犯。本里头人认为只要今后李不带队来攻寨,答应按时把实物送到保里。殊知李继川不守信用,不久,李趁本里农民到白岩求山神之机,用计赚开寨门一涌而入,到处翻箱倒柜,杀猪宰羊,闹得鸡犬不宁。李部进入本里的第二天,派30人向乐里进犯,由于乐里防守森严,李部于下午4时许撤回本里。

李继川在夏季招兵时,早引起七十二寨的头人林昌运、林顺才、杨汉成等人的注意。在李部攻打本里寨时,林氏父子和杨汉成即商讨剿李之策。李部到乐里附近,头人们密切注意其行动。只要李部进驻乐里,随时予以消灭。

保里头人杨胜高知道李率部进攻乐里,一旦发生战斗,会引起保里和乐里互相残杀,给农民带来不幸。为了避免此祸。杨胜高率

30人到乐里交涉，表明心意。

杨胜高一行人刚到乐里下寨坡背盘括，被乐里自卫班发现，误认为是李继川带人进犯，立即开枪射击。通过说明，知道是杨胜高来会林昌运区长，自卫班才停止射击。杨胜高带去的30人全被缴械，将他们徒手遣回保里，只许杨一人到平阳寨会林氏父子和杨汉成等头人。会面时，杨胜高再三申明：李继川率部攻打乐里，是出于个人野心，与保里农民无关，请乐里头人不要误会，不要派兵攻打保里。并表示回去以后，设法解散李部作为和解条件。林氏父子认为杨虽诚心，但对于解散李部是无能为力，决定暂将杨胜高软禁在其女婿杨振国家，严密封锁消息。

当晚林顺才下达命令，限令各村寨壮丁务于明日到本里寨集中。这是，李继川独立排驻扎友寨。发现瑞里壮丁已经进寨，遂指挥一部分人占领友寨寨头，一部分人占领本里田坝中间有利地形，即向瑞里壮丁开火。殊知乐里队伍也是从两路进攻，一路由大寨、王寨直进；一路由银坳走田坝侧面进攻，使其腹背受敌。李带队仓皇逃窜。

李继川虽人多，但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当初投李，又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如今乐里村寨联合围攻，量李不是对手，都想即早脱离，另谋出路。因此，在两天之内逃跑殆尽，只剩下独立排跟在李继川身边。李看大势已去，遂带领独立排撤到机夏寨后坡，伺机报复。

乐里壮丁认为李已逃走，进寨寻食，放松警惕。殊知李部却在机夏寨坡背观察，趁壮丁放松警惕之机，李率部立即冲入寨内，将壮丁林老黑砍死。放哨的人发觉后，即鸣枪告警。林顺才听到枪声，急从井湾跑到大寨，指挥集中火力向独立排射击，大约10分钟才把独立排打退。

杨世国看李继川早已不得民心，独立排亦难成大事，杨遂于当晚带领剑河籍的10几位弟兄和枪支逃往他乡。独立排一散，李继川成了"光杆司令"，只好带着贴身卫士吴老三逃往朗洞避难去了。

战祸的魁首虽是李继川，杨胜高作为头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当初杨不重用李继川，保里便不会遭受这样严重的损失。埋怨之言渐渐传到杨胜高的耳里。为表白自己对地方不怀恶意，只有除掉李继川以谢桑梓，才能求得乡民的宽恕，于是他决计除掉李继川。一个周密计划在杨的胸中逐渐酝酿成熟。

李继川逃到朗洞躲避，四处打听杨世国的下落，却无讯息。朗洞一伙强人劝他入伙，遭他拒绝，他想，身为"大哥"，一心想回保里收拾残部，重整旗鼓，企图东山再起。

民国 16 年 12 月上旬，逃走半年多的李继川带着吴老三突然出现在机夏寨，恰巧吴老义家为调解婚姻，李被邀参加。席上大家殷勤向"大哥"敬酒，轮流把盏，酒量已过八成，遂由杨秀忠等 5 人送他到溪边吴老金家休息，与吴老金同榻而眠。

当晚 11 点钟左右，杨秀忠等 5 人摸到李继川的床前，用刺刀向李继川的腹部猛刺，谁知刺着右腿，李痛惊醒，顺手拍断刺刀，翻身爬起往内房跑。李身旁有吴老金和吴老三两人，杨秀忠不敢开枪。当李逃内房，腰部又挨了一刀，吴老三为救李继川，甩开包头帕将杨秀忠的刺刀绞住，随即准备扯刀，杨说："是我。"吴老三看见是杨秀忠，随即松手放开。杨冲到内房前，李将房门顶住，恳求在内房熟睡被惊醒的吴老三妻子救他。吴妻慌张异常，不知所措，血溅吴妻一身。杨秀忠冲到门前，两脚将门踢开，见李流血过多，已昏迷倒在地上，杨等 5 人将李拖下楼去。李慢慢睁开两眼，看见是平时弟兄，自知已到尽头，顺手从无名指上勒下一枚金戒指往口里吞，慢慢闭上眼睛，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李继川被杀的消息传出，七十二寨的农民无不拍手称快。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安龙壬戌事变纪实

郑伯衡

1922年3月值袁祖铭任贵州省长时，紧邻桂边的安龙县城，发生被广匪2000余人洗劫的巨祸，时人称为“安龙壬戌事变”。全城被掳去青年妇女900余人，青壮年男子七八百人，财物损失难以计数。我隶籍安龙，那时正在城里与退职军官王宜斋、郑子黎负责筹设保商营，当匪劫掠时，幸得逃出，对全城遭受蹂躏惨状，及引匪纵匪前后，皆所目睹，有责提供这一事实，谨按记忆事变实况，述之如次。

安龙壬戌事变，导因于军阀招安广匪刘显潜（号如渊）开其端，袁祖铭（号鼎卿）促成于其后。民国9年（1920年）贵州政变，刘显世（号如周）走昆明，刘氏兄弟骤失权势而不甘心失败。次年，刘显潜在兴义召集散亡，欲凭藉下五屯（刘氏老家所在）世传余威以复振，而苦实力单薄。适值广西频年内战之后，陈（炳琨）沈（鸿英）诸部溃散流窜，又复兼并裹胁据地互攻，全省糜烂不堪。原据百色的莫超凡，被广西自治军司令刘华堂（名日福，广西博白人）击溃，退滇边剥隘。原据罗里路城一带之匪，窜扰黔桂边境，其中瞿高明、陈豹两股合共2000余人，时出没于红水江流域。刘显潜思利其众以厚己力，乃派刘盛堂（安龙龙广人）给以名义，前往广西招纳。这时，祖铭挟王天培、彭汉章两部，所谓“定黔军”入贵阳已数月，王、彭恃拥戴功，骄恣不可御。祖铭谋建亲信部队以自固，而感资实缺之，祖铭父干臣虽居龙广而

常在安龙，日周旋于官绅间，且熟知桂边情况。刘盛堂至安龙就商于干臣，干臣为充实祖铭力量计，乘机说盛堂，谓："刘华堂扼守百色，莫超凡穷蹙无所归，其他各部又皆局促一隅，在这样情势下，陈豹、瞿高明自易就范，你此行必然成功。不过，如周、如渊也该休息了，不如让祖铭搞几年罢！"盛堂本知刘显潜势难抗祖铭，得干臣启示，决计舍刘而就袁，挟匪自重，谋取个人利禄。于是满怀希望地向坡脚走了。王宜斋、郑子黎筹组保商营，干臣专断用罗光德，杨维刚、杨维知、刘成钧4人充保商营连长。罗、郑与袁有密切关系，二杨（龙广人）是祖铭亲表弟，后升至旅长。干臣为祖铭厚植势力，即此可见一斑。保商营尚未成立，而盛堂结纳瞿陈已成的函报来了。干臣喜不待言，急函复盛堂，嘱将"广军"部队先带到安龙，再到贵阳编制。于是匪部分两路入黔，瞿高明率千余人由册亨经贞丰转安龙，陈豹率千人渡红水江，由坡脚直趋安龙。3月20日，干臣皆同何兴斋（何璧辉之父）米徽五及地方绅耆远至懒板凳（距城数里）郊迎，对陈豹视同上宾。

先是地方各界人士闻广军将到，惕然有疑虑，为防患未然计，曾建议指定城外猪儿庙、岔口庙、水桶山为其驻地，而不许入城。袁、何初以为然，殊匪部心存叵测而貌为纯善，预派代表数人见绅耆父老说："我们来，是来保护地方，对士兵管得严，决无扰害。你们看看我们的军风纪就知道了。"干臣、兴斋虽还半信半疑，但恐稍拂匪意，转滋纠纷，便一口允许匪部入城。不料，匪进城后，就不是那样说了，竟至挨家挨户驻扎。同日下午6点钟经贞丰来的瞿高明一股续到，原指定驻扎地点是玉皇阁及附近一带，匪部哪里肯听分配，把城外所有草纸街、鼠场坝、马场坝民房逐户住满，又窥视民家财物，尤注目青年妇女，城内外居民已惴惴危惧。

这时，温牛（距城30里）有一乡民来向县长胡尧年（名桐荪）报告说："广军沿途强拉人民的鸡牲鹅鸭来吃，又在温牛估买估卖，且见他们由贞丰来，每人都背有绳索一根。"同时安龙城中

有人听到贞丰传来消息说："贞丰得广军入境消息，士绅计议，不管来意善恶，防备总是要的，但既无驻军，保警队实力薄弱，请军防御又道远莫及，能救燃眉者只有急促保商队王海平来城保卫。"王得讯，率部及乡兵数百人星夜驰救，先匪到达，布置城防，并设疑兵，分部众为数队，或由东门进南门出，或由西门进北门出，交叉往复穿行。匪见此不知城中军队究竟有多少，知贞丰已有准备，只好退兵。于是决定舍贞丰而趋安龙。警报迭来，已证明匪来意不善。寇情虽明，但何以为抗呢？大家筹商，保警队寥寥数十人，王宜斋远在箐里，郑子黎又因洒雨一带有土匪，前往清缉去了。众人一筹莫展，米徽五说："还是洒雨近一点，不如专人叫郑子黎赶回来商量。"宋庞三、钟云楼说："也只有这样办了。"马上派人前去。哪知当天郑未在洒雨，到北乡追匪去了，又跟着赶到北乡，郑接信知城里危急，只身匆匆赶回安龙，已夜尽更深，顾不得休息，到万寿宫团防局与地方父老商议。郑说："匪人多械利不足畏，他们地形不熟，主客形势大异，只要我们布置得好，是可以抵御他们的。我建议一面赶调各乡乡兵分占城外山头，保警队一面扼守要隘，我带人策应，匪一动就四面合围。也许这样一来，匪见我有备就不敢动了。"多人认为郑说的倒是一个办法，匪徒欲动，也不能不有所顾虑。但干臣却不以为然地说："广军休息一两天就开拔去贵阳，祖铭是重用他们的。你们这样一来，岂不引起他们的疑虑吗？还敢开去贵阳吗？如果因此酿成事变，怎样对得起地方和祖铭呢？"悍然不纳郑议。大家听省长的老太爷这样说了，谁也不再说话。

次日清晨，安龙县的几个省议员启程赴省开会，县长胡尧年与地方绅耆均往城外寿佛寺送行，派尚在草创的保商营一个班，携带临时修理的旧枪护送。匪见有兵出城，颇有猜疑，但四郊不见警戒，终恐蹈贞丰覆辙，认为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伪绑兵一名送至县府，声言估买民间鸡鸭，请县长惩办。县府职员都去送参

议员去了，仅有经征员范希平在。范眼目近视，不知来者何人何事，说："县长不在。"正掉头回房，来匪就骂："丢那妈（广西骂人话）！你们县长走了？"立向范开一枪，范倒于县府堂侧毙命。县府枪声一响，城内外枪声连续不绝，匪徒行动开始了。一时人声鼎沸，势若天崩地塌。派送省参议员晋省之司务长韦登之到大街见男女老幼惊惶哭叫，沿街奔逃，韦说："你们不要跑。"追匪见韦身着武装，不问情由，就给韦腰上一刀，韦惨叫一声说："我是送省参议员进省的。"马上倒地，肠子掉出来死了。人们见状，有大胆的就喊："广军反水了！广军反水了！"大街小巷慌乱更甚，城门严闭，老百姓逃不出城，城中仅有的武力保警队和正在下操的保商营徒手兵一排，闻警皆四散逃逸。袁干臣老太爷这时着慌了，把郑子黎找去商量，还没有说几句话，匪已冲进团防局。郑子黎站起来说："我们正同老太爷为你们筹备粮秣和款项，请约束一下弟兄们罢！"匪不听郑分说，当时就要捆绑袁干臣、何兴斋二人。郑一面说一面用手阻挡，匪竟给郑一枪，右膀被打断，血流不止，抬到团防局楼上，呼号不绝。匪住入民房时，已先摸清各家情况，倾箱倒箧，挖墙掘地，财物无所隐，中年及10余龄少女不能逃出魔掌，备受蹂躏，全城哭声震地。入夜，匪烧仁寿宫房屋，延及民房，火光满天。

匪未入境之前，我与王、郑诸人筹组保商营未成立，先就旧镇台衙门设修械所，修理废旧枪支作装备营兵之用。当日，我们正在吃早饭，即闻枪声，知必有变。司务长邹乐天由大门跑出，见匪已占领张公祠，枪声颇密，我们不能出来。东门距所较近，镇台衙门被匪封锁，衙兵已跑，前门既不敢出，只有从后操场可以出去，我们便由此道经尚节堂出走。将到东门，远望城门已被匪下锁，又不能出去，退至考棚，侥幸那里种的火麻很高很密，我们就躲在麻林里，旁边又有坏墙一堵掩蔽，整整藏了一天一夜，匪来搜寻数次，没有发现人。我们整天听外面枪声疏密不绝，虽然

腹饥，谁也不敢出来。考棚与学校校园、天主堂都很接近，忽听天主堂方面有枪声，继又闻妇女惨叫声。傍晚，枪声始停，我们以为匪已出城，出来一看，见远处仍放有步哨警戒，急回原处。深夜，大家由水榨子出濠沟至南门，门已落锁，大家七手八脚将锁扭开逃出城外。我等几个人站在高处遥看土匪的行动。鸡鸣时，仁寿宫房屋被焚，匪正忙于抢掳民财，捆绑妇女，布置掩护退却，顾不上南门的警戒，向南门逃出的人络绎不绝。天明，城里有逃出者说："匪要出来搜山了。"大家又吓得向前跑，我逃到距箐里头王宜斋家只十数里的地方。王听说我逃到这里，亲来看我。这时城里来人报说："匪拉去妇女很多，现匪已走。郑子黎营长被匪打伤后在团防局楼上，匪未退时，无人敢救，喊了一天一夜，流血过多，怕有危险。"并报告劫后城中惨状。我对王说："请你赶快派人到城里把郑子黎接出来再说！"王说："子黎很高明，但愿无危险，他会回去调乡兵的。"正说话间，逃出的男女老幼得到匪走消息，纷纷返回城去。我又说："目前最紧的是援救妇女，你快点集合人，联合各乡乡兵去追匪吧，我先回城看看。"说后我便回城。郑子黎已抬回家中，尚能说话，还问大家情况，直到半夜才死。城中只听得一片哭声，哭儿哭女，哭夫哭妻，几乎家家在哭。仁寿宫被焚，幸有先回城居民抢救，附近民房延烧不多。满城彻夜红光，乃是广东街开纸火铺的王绍平家囤有油十数缸，匪把铺中所有纸张捆成一根一根的大蜡烛，放在油缸里搅拌，点在各街巷，天明不熄。下午，王宜斋带着乡兵到城，各处乡兵也来了，统计不下七八百人。广西新洲办团有声望的卢子善闻匪将回窜，调齐乡千余人，赶到坡脚河对面攀枝花防堵，派人与安龙乡兵联络，约期会剿。估计匪抢掠而归，又带着千余男女，是没有斗志的，如果两面夹击，纵不能全部消灭也可望击散，至少能救出受难妇女。约定卢渡河击其首，我们从梅子关压其尾。不料省长的老太爷袁干臣出头派人传达，不许双方开火，并说："如果开火，广军先屠

杀男女百姓，谁人负责？”于是乡兵就不敢动了。其实老太爷只是为保全自己的老命着想，何尝念及老百姓呢？匪挟有这样一个人质，可谓安如泰山。在坡脚休息3天，板坎休息3天，每天大酒大肉，逼青年妇女供淫乐。匪本想从坡脚过红水江，然船被卢子善部拉过对岸，江面太宽，只好顺着下流走到板坝，才渡江到板泵，又纵横烧村寨百余，抢到牛马数百匹。掠去的安龙妇女中，有自杀投河的百余人。拉去挑抬的青壮年男子，略有抗拒不服被惨杀者的约八九十人。匪到坡脚，就把何兴斋放回并带来信息，向袁省长索要老太爷袁干臣的肉票款20万元，限期10天，过期便撕票。

祖铭这时已得到安龙事变的消息，知自己的父亲被匪绑去，面子太难堪，急派何璧辉（厚光）率军会同当地乡兵相机办理。何到安龙，终以人质在匪手里，不敢冒昧进攻。匪得以从容过河，回到板泵，干臣也被架到那里。何军驻板坝，与匪隔河相望，只有派人往返议价，最后匪减到8万元，不允再减。还是由何兴斋带人挑了8万元去交纳，才把老太爷换回来。至于被抢男女，袁省长既不过问，一任流落异乡。安龙百姓在其淫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王宜斋见此种惨状，挺身向何说，愿赴百色与莫超凡接洽。王到百色，莫被刘华堂逐走，无从为力，王回安龙报何，何还是束手无策，只饬王再去设法。王感到自己未尽到责任，忧郁成疾，转侧床褥而死。王死讯传到安龙，大家一线希望落空，有人向何提议：“匪是广西来的，刘华堂既在清乡，不如派人赴百色与刘商办。”何允派人去了。刘知何军驻在板坝，恐匪窜扰后惹起黔桂两省兵端，又觉陈、瞿两部不能让其长此流窜，于是双方协议，决定3条：①刘负责将陈、瞿全部招安；②放回安龙被掳妇女；③黔桂恢复商运，驻板坝黔军，由何带回贵州。到此，何以为他的责任已完，至于妇女怎样接返故乡？安龙疮痍怎样平复？一概不管，率了部队径回贵阳而去。桂商苏发祥（名永业）居住安龙多

年，龙广置有房产，兴义设有永昌恒字号，百色也有字号。目睹这样情况，太觉不忍，独力成立慈善会，派人登记愿回家的妇女，慨捐私财生洋8000元，赎回妇女约800人。匪招安改编后，有隐瞒掳去妇女为妻妾的，有骗卖为妓女的，就难于究法了。赎回来的妇女，由于黔桂边境多是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家里又无钱资助，只有大家走路，其中仅少数富裕之家妻女能坐滑竿。到达家门那天，家人亲族都到郊外迎接。妇女受尽匪徒折磨，后经桂北蛮烟瘴疠，又历风尘跋涉之苦，无不蓬头垢面，形如枯槁，人人见之莫不掉泪，妇女见到亲人，痛哭失声，久不能止。

1923年，投击取巧、只图个人利禄的刘盛堂潜回龙广，被刘显潜之侄刘毅吾（时充旅长，驻防安龙）逮捕。毅吾把他解送安龙，全城男女老幼无不愤恨填膺，真是动了万人之愤。刘盛堂解到之日，大家涌至马场坝，空巷前往，大家把他绑在木柱上，不容分说，个个操刀争先就割。有一个老妈妈，她的女儿也是受难者之一，握了一把菜刀，含着眼泪，由人群中挤上前，割了刘大腿上几刀，手颤不止，还是咬牙狠割。不到一个小时，刘盛堂只剩了一个头和两只脚，地下一滩血，真有人把他的肉和脏腑拿回家煮来吃了。

罪大恶极的刘盛堂，被脔割死了，而引匪纵匪的罪魁祸首究竟谁属呢？多年来识者早有定论，也是安龙百姓藏之于衷而永远不忘的。我在这里只把时人对袁祖铭祸黔一年多所作的打油诗抄出来作为本篇的结束。那首诗是这样写的："无乱偏戡乱，祸黔说定黔。人材龟兔鳖，政策印烟盐。三千散议会，八万赎家严。闻香日继夜，遗臭不知年。"

（贵州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股匪三劫谷陇街

刘祚成

谷陇街位于黄平县城东南32公里处，居汉、苗二族，是谷陇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每逢赶场人数达3万人左右，为黄平五大集市之一。

解放前谷陇街也是土匪抢劫的主要目标，仅自1921年至1942年的21年中，就遭土匪3次全街洗劫，酿成悲剧，其实际情况如下。

第一次（1921年）：湖南土匪头子海蹓子（真名不详），窜入黔东各地，到处抢动，将赃物暗暗运回老家。海蹓子一帮武器装备大部分是五子枪，仅有少数毛瑟枪，武器较好，到处横行，各地民团都奈何不得。同年四月下旬（农历），海蹓子带领匪徒百余人窜至施秉乡间，抢劫一些村寨。五月初五，海匪聚集于三湾河山沟里，潜伏过节。是时，谷陇有一姓杨的割猪匠，由东坡归来，路经三湾河，发现有许多持枪的湖南人。杨回到谷陇后，即向团防局长王道昌反映情况。王某却毫不介意，认为自己局里有10多枝好枪，一点不作防御准备，反叫局丁们恣情欢度端午节。当晚局丁们得意忘形，纵情饮酒，觥筹交错，一直喝到半夜，人人醺醺大醉，有如死人一般。初六黎明进分，海蹓子率众匪徒，将谷陇全街围住，并占踞各险要地势，鸣枪数百响，同时呼喊："围倒！围倒！捉倒！捉倒！捉倒牛崽！"这时，全街70余户居民，都惊骇万分，各寻隐蔽处躲藏起来，家中财物，任凭土匪抢掠。

土匪打入团防局时，局丁们有的惊醒，就开后门钻入民房或逃跑；有的还酒醉如泥，不省人事，无一人还手抗敌，所有武器都被土匪夺去。在局室外，班长吴老七和局丁三黑脖等7人被打死。局长王道昌在家（谷陇街上）住宿，听到枪声及呼噪声后，才知大事不好，慌忙由街后想跑到团防局来指挥局丁反击，当他跑到一秧田坎上时，被土匪用枪打死。全街各户财物，被洗劫一空。直到天大亮时，土匪才收队向三湾河匆匆而去。

第二次（1925年农历五月十二日）：恶棍沈大川率领歹徒100余人，于拂晓时围抢谷陇全街，同月18日复来洗劫一次。居民的财物全被搜掠干净，弄得街民无法为生，有的搬往别处，另谋生路。沈大川系山凯乡王坳人，是沈奎章的族侄。因沈奎章办理地方治安工作有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奖励和一些人的赞誉，炫赫一时。由于有此威望和人缘关系，沈大川遂于1926年到谷陇团防局任大队副。他在职期间，跋扈凶横，与局长王国臣（谷陇街上人）互相猜嫉，矛盾重重。他离开团防局后，因生性好勇，想对王国臣施加报复，就各地串联，啸聚一帮歹徒。聚众后，为给养到处进行敲诈和抢劫。他对谷陇街的两次抢劫，风声太大，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后经沈奎章疏通，晓以大义，沈大川才勉强投案。因沈大川罪恶严重，民愤极大，政府对他处以极刑。

第三次（1942年农历二月初八日）：台江县大塘匪首张学诚，率众匪徒抢谷陇全街。当年农历正月初，台江县的边远地区三秉、大塘一带，聚集大股土匪，有向各处骚扰的迹象。谷陇闻讯后，也曾作防卫准备，在街两头修好栅子门，黄昏后紧紧关闭；并成立守护队（只10余人）。每夜巡逻、放哨，以防不测。但守护队员们，多数是青年，既无战斗技能，又兼武器笨劣，因而畏首畏尾，只合住于中街一木房内。上半夜在门口放哨、站岗，下半夜就上床安睡。当土匪来势汹汹、鸣枪呼吼时，他们蜜梦惊醒，不知所措，慌作一团，躲藏于阴暗处避灾，未敢还击。匪首张学诚，原

任过台江县革夷乡警卫干事，多少有些军事知识。他了解谷陇街较富裕，武装力量薄弱，因此选中此地抢劫。农历二月初七夜晚，张领匪徒100余人，向台江县大塘（距谷陇街40多里）直奔谷陇而来。初八黎明时将谷陇全街围住，一边大声呼喊，一边放枪，街民都各自隐藏起来。匪徒用斧子劈开栅子门，涌进街中，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楼上楼下，尽力搜搂，弄得全街杂物狼藉不堪。天大亮时，匪徒方呼啸而去。去时绑架街民向德全、王守祥、刘家有、张其谷、王光华等10余人与之背负赃物和在沿途“点水”（即为匪提示抢劫对象之暗语）。匪遁时，路经脚板坳、鸡叫坡、山凹坝、镰刀湾等地，途中各乡壮丁由两侧高山上，鸣枪截击。这时被抓去点水的街民，迫于唬吓，一路叫喊，要求两侧壮丁停止射击，否则他们将被土匪杀害。匪首张学诚沿途巡回指挥还击，其他匪徒尚寻险要及隐蔽处匍匐着放枪，而张学诚却站着还击，壮丁们见状，都畏缩不前。就这样土匪头张学诚拿街民们作人质，边还击边逃。最后张匪安然渡过清水江，返回老巢大塘。被抓去点水的人，除王光华外，当天下午全部释放回来。

（贵州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滇南剿匪之战

陈文祺

滇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约占70%，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封建势力也比较强大，又与越南、老挝接壤，国境线长。解放前，滇南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剥削，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住的茅草棚，吃的野菜饭，穿的破蓑衣，睡在火塘边。国民党李弥残部趁我解放滇南不久，县、区、乡人民政权尚示建立起来，并利用某些群众对我征粮政策不了解，凭着滇南山大、林密、菁深，交通不便，人口稀少，民族杂居，出入国境方便等条件，与当地地方恶霸反动势力相勾结，以抗粮抗税为名，组织了几百股、1万余人的土匪武装暴动，在滇南各地烧、杀、抢掠，破坏交通，围攻县城，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土匪特务，保卫国防，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1950年5月5日，滇南卫戍区召开了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对匪特实行“军事围剿，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拟定了三个阶段的剿匪方案：第一阶段剿灭最反动最猖狂的股匪，第二阶段打击小股和分散之匪，第三阶段结合反霸清查暗藏之匪。同时要求匪变我变，灵活机动，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并针对匪情，明确了任务，划分了区域，组织了北、西、东南三个机动进剿集团。我一一四团（缺三

营）与三九师一一五团为西集团，负责剿灭建水、石屏、龙武、曲溪、个旧之匪特，一一二团（缺二营）、一一三团及文山分区独立一团一营为东南集团，负责剿灭马关、河口、屏边、金平间之匪特，北集团由玉溪分区、军直、三九师部队组成，负责剿灭玉溪地区之匪。会后，部队立即进行紧张的战斗准备和战斗动员，部队战斗士气很高，个个磨拳擦掌，及时地投入了艰苦的剿匪斗争。决心消灭匪特，保卫边疆。

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首先对大股土匪采取了以“集中对集中”，充分运用多路合围，远途奔袭和穷追猛打的战术。4月初，我一一四团、一、二营进入龙武剿匪，在县委统一领导下，经过发动群众，宣传我党政策，团结了各族人民，争取了受骗之匪回家生产，然后对大黑山土匪采取分进合击，袭击，包围清剿等战术，狠狠地打击了顽匪。同时，注意了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农会，组训民兵。进入金平、元阳、河口等县的剿匪部队，积极发动群众，组建联防，参加联防者近2万余人，配合部队站岗、放哨，搜捕隐藏的散匪，维持社会治安，成为部队剿匪的有力助手。对要组织暴动，妄图袭击我俘虏团的通海县城匪特，我一一四团及时赶到后，与当地驻军密切配合，将全城包围，实行清查户口，收交武器，捕捉坏人，保证了我俘虏团的安全。5月15日，我一一四团在华宁以北的灯龙山，包围了飞自平、林同其、张成堂等股匪，经半小时战斗，全歼该匪，毙敌24人，俘敌73人，缴获各种枪58支。我无一伤亡。5月下旬，特务李康和恶霸金绍云、金绍禹在江川浪广镇一带组织土匪暴动，我一一四团即对该敌进行围歼。28日，在沈家桥、白龙潭及大小龙潭进行合围，经过一场激战，歼敌200余人。29日，四连勇猛追击歼匪，在小松山附近战斗6小时，后在三连一、二排，团警卫排，炮兵排和机炮排增援下，经过顽强战斗，将匪全歼，生俘自称“滇中剿总”匪代总指挥金绍禹，毙伤匪总副指挥金绍宽以下416人。5月28日，国

民党起义部队暂编三四团，在反动团长王耀云的操纵、欺骗下，于江川县浪广镇以北地区叛变，杀害我军代表20余人，然后向西逃窜，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大批区、乡干部和群众被其杀害。我一一四团奉命追歼该敌。为了追上和歼灭叛逃之敌，全团轻装前进，取捷径，经峨山、新平，由戈沙渡江，直插冬瓜岭，截住逃敌。经过一天激战，除毙伤外，俘匪150余人，缴获八二炮、六〇炮各3门，轻重机枪6挺，长短枪700余支、骡马60匹。余匪逃进山林，后被友邻部队全歼。

其次，对分散在金平、元阳、红河、建水、屏边、河口、马关、麻栗坡之匪，由一一二团、一一四团实行进剿。在军事进剿的同时，各部队抓紧时间，大力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积极宣传我党各项政策，开展了为群众做好事的活动，如看病、理发、砍柴、挑水、喂猪等。解除了群众思想顾虑，建立了军民鱼水情。广大群众主动积极的向我报告匪情，并给我们带路消灭匪特。如一贯拦路抢劫、危害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的惯匪马有兴，一天天黑时，到他姐姐家搞饭吃，他姐姐立即向我报告，并带领我军立即赶去，将村子包围，马有兴被我击毙，为民除了一害。建水县民兵主动为我带路，打击土匪普万有，由于路熟，行动隐蔽，迅速将普匪包围，击毙普匪，全歼该敌。在我党的政策感召下，土匪大队长肖文英、朱家富率领190余人，轻机枪1挺、步枪180余枝，子弹2000余发，向我缴械投诚。11月，一一四团一营进入建水县岔科剿匪，股匪以险洞藏身，洞前有堵石墙，枪击不着，弹投不进，不易接近。股匪凭此顽抗，我接近沿口的2名战士牺牲。战斗英雄、模范共青团员雷长富同志，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主动请战，迅速抱起炸药包，装上雷管，机智勇敢地通过20米开阔地，接近洞口，首先向洞内投了两个手榴弹，立即点燃炸药包的导火线，投入洞内。这时一声巨响，石墙倒塌了，雷长富同志亦被震昏倒了。当他醒来时，听到部队的冲杀声，高兴地说："敌人快完蛋了。"当

他发现两位同志抬着他时，他说："不要管我，消灭土匪要紧。"于是他咬坚牙关，用尽全身力气，甩开担架，继续投入战斗。在雷长富同志的英雄气概鼓舞下，全营奋勇杀敌，终于将该匪全部歼灭。岔科地区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第三，结合反霸清查暗藏之匪。经过一、二阶段的剿匪作战后，土匪残部及漏网匪徒，妄图化整为零，垂死挣扎。我除对腹心地区的散匪继续清剿外，对边沿一带的土匪，采取了"以分散对分散"的方法，进行围剿。在政治上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在军事上以班、排为单位，组织小型捕捉队，结合反霸、减租退押等任务，充分发动群众，组织联防自卫，建立群众性的情报网，检举和搜捕隐藏之匪特，以求净化内地，巩固边疆。1951 年 3 月下旬，我一一四团三营围剿红河县瓦渣、甲寅地区钱振祥、刘智敏等顽匪时，先后激战 39 次，歼匪 250 余人，争取自新土匪 607 人。经过工作，红河的各族人民政权逐步恢复建立，生产逐步发展，群众生活、生命财产得到了保障。4 月中旬，一一四团一、二营及一一三团二营配合友邻部队，发起了对盘踞在西萨西村的余启佑、刘范吾匪部进行会剿。一一四团一、二营为北路，一一三团二营与文山分区若干团为南路，一一六团为中路。该匪位于滇、桂、黔三省交界处，交通不便，山大林密，是匪特余、刘盘据的老巢。余启佑逃往该区后，与吴中坚、刘范吾、陈尔福等匪会合，达 3000 余人，自称"滇、桂、黔边军政长官公署"，又称"十四兵团"。他们同封建势力相勾结，威胁群众，征粮派款，训练匪干，建立反动政权，妄作反革命基地，幻想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13 日，我各路进剿部队，分别由黄泥岗、兔街、那林出发，16 日，一一三团二营协同文山基干团，在合围中歼灭敌滇、桂、黔副司令谭莫宁以下 60 余人。这时，余启佑匪部 1800 余人，窜至广南境内，妄图经董干逃向越南，一一三团二营与文山基干团直插田蓬、董干地区进行堵截，一一四团一、二营会同中路一一六团，对该敌

进行尾击。25日，在薹布歼匪余人。后来一一三团二营及一一四团一、二营与文山基干团迅速追到麻栗坡，在民兵及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在铁厂村附近将余匪紧紧包围，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歼敌指挥官蒋中固以下800余人。余匪600余人逃到西畴普弄，又遭我尾歼200余人。余匪继续逃窜，一一三团二营两个排跟踪追击，最后，除余匪只身漏网外，其余全部被我歼灭。至此，滇、桂、黔边会剿胜利结束。

在两年多的剿匪战斗中，全体指战员发扬了我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顾山高路远，林密箐深，大家忍饥耐寒，昼夜不停地疾进追击，所到之处多系少数民族，语言不通，对我党我军不了解，加之匪特造谣威胁，破坏我军声誉，给我造成很多困难。部队有时几天吃不上饭，用仙人掌、竹笋充饥，不少同志的鞋烂了，脚上起了大血泡，仍光着脚坚持追击。在困难面前，干部、党员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战胜困难。"钢铁营"在滇东南老荆山剿匪中，连长王洪胜率领8名战士，不顾滂沱大雨，树藤莽草堵路，绕过老荆山，直插敌后，连除匪徒13名哨兵，直捣匪巢，全歼杨国华股匪。1952年，除一一四团两个排和师直侦察连在屏边继续进行剿匪外，其余部队转回原防，滇南剿匪斗争已告胜利结束。这场剿匪斗争对开辟滇南工作，保卫群众生命财产，巩固国防都有重大意义。

（云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元阳土匪暴乱被歼记

张　纲

1950年7月，金平、元阳、红河等县的土匪头子贺光荣、白永清、朱应光、董家国等及龙鹏程、黄金祥等少数反动的土司头人，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结成了反革命联盟，蒙蔽和裹胁一部分不懂政策的土司头人及其随从人员，打着“反共救国军”、“人民自救游击队”、“江外联防救国军”等反革命旗号，胁迫一部分匪众，啸聚2000余人，疯狂地围攻元阳县城新街，妄图扼杀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江外反共基地”，实现其反革命的美梦。元阳县（当时叫新民县）工委、县人民政府和当地驻军及各族基干队和民兵共约1000多人，在新街附近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击退了土匪的多次进攻，终于取得了新街保卫战的胜利。新街保卫战不是突然发生的，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新安所、小新街、尼枯普等10多次战斗，在新街保卫战之后，也还有小水井、多衣树等10多次战斗。

早在1950年2月，元阳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全县社会秩序比较安定，顺利地建立了7个区人民政府，有8万多人口。当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尚未站稳脚跟，还没有来得及做巩固政权的工作，就投入了紧张的征粮工作，并陷入“左”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之中。3月，元阳县工委在新街召开征粮工作会议，县工委书记普照主持会议，他传达了地委粮食工作会议精神，分析了当时粮食紧张的形势，指出粮食工作是当务之急，必须全力以赴，迅速完

成全县450万斤的征粮任务。由于当时的政策是内地和边疆“一刀切”，脱离了当时边疆的实际，如在县政府的柱子上，贴着一副大对联，上联是“消灭土司制度”，下联是“根除封建剥削”。又如在会上布置征粮工作中要站稳阶级立场，划清阶级界线，不许同地富来往，不准到地富家吃饭，公粮任务主要是分给地富负担。这些口号和政策在边疆提得过早了，结果使民族上层对我怀疑顾虑，土匪特务乘机煽动暴乱。

当时，为了加强征粮工作，县工委委员作了分工，分头带工作队下去落实征粮任务，动员群众交粮。当时我在纳更区任区长，负责纳更上半山一片。我们下去以后，逐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全国解放的胜利形势，宣传国民党的数不清的苛捐杂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负但不合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只征收一项公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多有多出，少有少出，合理负担。各村的村长和寨老认为我们讲的有道理，很快将任务分到户，动员各户交粮。一个多月的时间，纳更区政府的中楼上，已堆满了大米，约有20多万斤，占全区任务的一半左右。

这时。各地传来了一些不利的消息。在纳更区政府所在地新城对面的小新街，工作组长倪学亮来报告说：土匪赵小安的连长陈保生，从盘溪逃跑回来，在小新街上拖起武装，其弟已扛着枪，在街上横行霸道。在小新街附近的村子和路上，发生了多起抢劫案件。为了稳定形势，县城驻军三营营长乔敬安同志率领百名解放军来纳更新城驻扎。几天以后，倪学亮从小新街来报告说：陈保生听到大军来新城，已跑到纳更冲多衣树的土司团长黄金祥躲藏起来了。乔敬安同志决定派一个班兵力去纳更冲多衣树捉拿陈保生。当天晚上，由区政府的2名基干队员带路前往。但是，当他们走到纳更多衣树时，却遭到土匪武装抵抗，4名解放军同志不幸中弹牺牲，陈保生、黄金祥逃走。接着，又听到筱石区土匪暴乱，区长田启铨同志在新安所不幸中弹牺牲。过了几天，又听到

犒吾区龙壮图、孙和等同志到尼桔普村征粮，遇到土匪袭击，孙和同志被匪杀害。5月间的一天拂晓，新城对面的小新街枪声乱响，到中午时候，见倪学亮同志扶着一位手臂受伤的助征员来新城，才知土匪攻占了小新街，征粮队的同志牺牲了2人。又过了几天，有人来报信，吉如区政府所在地戛嫘已被土匪攻占，吉如区政府的人已退到蚌戛去了。这样一来，纳更区政府所在地新城，东面受小新街土匪的威胁，西面受戛嫘土匪的威胁，夹在中间，两面受敌，情况比较紧张。为了加强区政府的防卫，我们把全区的工作队，基干队和持枪民兵步集中起来，共有100多人，有2挺捷克式轻机枪、50多枝步枪，50多枝火药枪。一时人多胆壮，我们认为实力比较强，土匪来了也不怕他。

6月19日（农历五月初五日），我们宰了一头猪，准备过端阳节。正吃早饭的时候，土匪来打新城了。由于我们早有准备，不等土匪靠近，战斗就打响了。我们的基干队和民兵分别驻守新衙门、老衙门和小学校。土匪从新城后面的山坡上居高临下向我们射击。我们坚守阵地，进行还击。解放军的班长、战斗英雄王来虎（征粮工作队成员）主动扛着一挺轻机枪，到老衙门后面最前沿的一个碉堡上去阻击敌人，基干队和民兵们也都按事先布置好的岗位阻击土匪。新城上空一片枪声和手榴弹爆炸的声音，一直响到晚上。大约晚上9点钟左右，我在老衙门前沿阵地一个没有顶棚的碉堡里，被土匪扔进来的手榴弹炸伤了。我忍着痛，摸黑路回到区政府。到半夜时候，由于子弹缺乏，于是，我们有计划地趁着黑夜撤到小寨。到小寨后，王平同志（县工委委员兼组织部长）看看我的伤势，认为打起仗来，行动不便，就叫我到个旧去医伤。

我到个旧以后，遇到龙壮图（副县长）、王玉臣同志，才知土匪围攻新城的那天，同时围攻逢春岭，龙壮图、王玉臣、黄学勤带领基干队向蛮板方向撤退，被土匪打散，区长黄学勤同志不幸

牺牲了。后来又碰到龙壮图的父亲龙志伊，才知我们走后，土匪又来围攻小寨，王平、黄青、朱国福等同志带领基干队和民兵阻击了一阵，就朝县城方向撤走了。一部分民兵留在当地，有的被土匪杀害，有的投降土匪了。龙志伊家的房屋，都被土匪烧了。后来我回到新街，听说就在端阳节那一两天当中，土匪同时攻打我各地工作队和区政府，在犒吾区大坪的16名解放军，全部被土匪杀害；在永乐区瑶人寨的8名解放军工作队，全部被土匪活埋；在猛弄区哈播村工作的区长郭营魁被土匪打死，副区长温保祥被土匪活剐；工作队干部孔繁华在楮皮寨被土匪打死；芭蕉岭、仓寨农民的房屋，被土匪烧了20多间，耕牛被土匪抢走30多头。

我在个旧医好伤，同杨汉光、王玉臣等同志回到县上，已是8月中旬，新街保卫战已结束。新街战斗极为激烈，当地驻军1个营及民兵与土匪激战，颇有牺牲。后来解放军第三十八师徐副师长率大部队抵达，才解了新街之围。新街下边的东瓜林里，新建起了一座烈士陵园，有100多位新街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忠骨埋在里边。这时全县大部分地区仍被土匪控制着，我们进不去。因此，我留在县上工作。县委组织工作队到各村寨去宣传剿匪的胜利形势和方针、政策，大讲“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发动各族群众组织“防匪自卫，保家护产”的联防武装。联防成立以后，各村各寨组织群众站岗放哨、查路条，联防队员们配合解放军剿匪、搜山，起到鼓舞士气、巩固阵地、搜捕残匪的作用。

但是，土匪仍不甘心失败，还想进行反扑。9月中旬，土匪头子白永清认为县城空虚，又率领匪众数百人从南面的山头向元阳县城扑来。来到新街南边的小水井村，就被当地联防民兵发觉，迅速报告驻水普龙的解放军。解放军一一二团三营的同志立即奋起阻击，很快打退了土匪的进攻，毙、伤、俘土匪20多人，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其余土匪溃散，朝猛弄方向逃去了。这一仗，驻

元阳的解放军打出了军威，从此，土匪不敢再向解放军进犯了。但是，土匪仍不断向没有驻扎解放军的地方进犯。10月上旬，土匪又从猛弄来了200多人，攻打我团结乡的多衣树村。多衣树土司普国梁、联防干部龙文焕、联防民兵普国寿等30多人坚守村子，与匪决战，打死土匪16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10多枝，余匪逃回猛弄去了。这一仗，多衣树的联防民兵也打出了威风，此后，土匪再也不敢向多衣树进犯。

为了进一步剿灭土匪，在全县开展工作，解放军一一二团的罗团长带领大批部队来到元阳，从10月到12月，先后西进太和，南进猛弄，东进和邻、纳更、犏吾等地区，在牛角寨、多沙、攀枝花、雀山、新城、小新街、逢春岭等地进行了10多次战斗，每次都打胜仗。解放军每打到一个地方，就留下一批工作队开展群众工作，我们就扩大一块地盘。1950年底，我们的工作范围已扩大到太和乡（原箐石区）、猛弄乡（原猛弄区）、和邻乡（原吉如区）、纳更镇（原纳更区）、犏吾镇（原犏吾区）等全县的大部分地方。这时，县工委派我随军东征回纳更任镇长，一路上看到在剿匪中，解放军模范地执行政策，热爱群众，令人感动。每次战斗，由民兵带路，只要战斗一打响，解放军就冲锋在前，掩护好带路人。在战斗中，解放军不肯轻易打死匪众，认为其中有受骗或被迫的群众。正因为这样，连长张桐在多沙村冲进土匪窝里，高喊："缴枪不杀！"却不肯开枪，不幸被土匪的子弹打中，英勇牺牲。解放军抓到土匪，一般都教育释放，还发给路费和通行证。当时，许多地方干部对此想不通，部队的领导同志就给地方干部讲政策的威力：释放一个土匪，可以争取回来好多个。解放军每到一地，就帮助各族人民做好事：如扫地、挑水、背柴、运谷子、治病等等，群众很感动，都说，解放大军爱护人民，不象国民党兵坑害人民。

这时，被打散的土匪分散成许多小股在各地骚扰，解放军一

到，他们就逃走，解放军走了又回来抢劫、杀人。他们还造谣说："解放军不长了，蒋介石还要回来。"群众顾虑很大。1951年4月初，犒吾小新街和猛弄攀枝花的解放军撤走以后，土匪又来围攻这两个地方，我的眼睛就在这次小新街剿匪战斗中被炸伤致残。但这次战斗我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粉碎了土匪妄图趁机打开缺口的阴谋。

是月，中央访问团访问元阳，从根本上扭转了元阳的局势。中央访问团协助省、地、县委正确认识边疆的实际，提高了边疆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当时，分析了边疆地区三大矛盾交织在一起，因此，必须克服"左"的指导思想，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尽量扩大敌我矛盾，缩小民族矛盾，对阶级矛盾则不扩大也不缩小，争取团结一切爱国民族上层，最大限度地孤立土匪、特务。对土司头人要实行"三要"、"五给"的政策（"三要"是：①拥护共同纲领，拥护人民政府；②反帝、反蒋、反匪特；③为人民服务。"五给"是：①保护生命财产；②承认土司制度；③不收缴其武器；④经济上给一定供给；⑤既往不咎）。按照这些方针、政策，先后建立了元阳县和蒙自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从此，元阳县各项工作都比较顺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县争取团结了90%以上的土司头人，争取了匪众1000多人回家自新，很快孤立了土匪特务，只剩下少数匪骨干。他们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处处围歼。于是，元阳活捉了匪首朱应光，金平打死了匪首贺光荣。1954年元阳新街成立了红河哈尼族自治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民族团结，加之，越南解放了莱州和奠边府，使残余土匪已无路可逃，终于全部歼灭了境内残匪。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回忆贵州剿匪斗争

潘　焱

一

1949年8月6日，新华社社论指出：凡是新解放区，起初必须有一个相当长时期，集中进行剿匪反霸斗争，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势力，才能打开局面，站稳脚跟，这几乎已经成为斗争发展必经的过程。

1950年，我军在胜利解放大西南之后，也立即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肃清残匪、打击封建势力、建立革命秩序的伟大剿匪斗争。这场斗争十分艰苦复杂，而贵州匪患的猖獗和持续时间之长，在西南云贵川三省中，尤为突出。贵州从1950年春季开始全面展开剿匪，到1951年夏秋之间，大股土匪陆续被歼灭，重要匪魁相继授首，攻占土匪最后盘踞的罗甸、望谟、册亨3个县城，使全省地区全部获得解放止，计约一年半的时间。

贵州的土匪所以如此猖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我军进展迅速，解放较快，封建势力、封建秩序和国民党的反动保甲制度还未来得及触动，广大的乡村仍被其所统治，大量的封建迷信组织（如哥老会和其他会道门等）和民间枪支仍为其所掌握。二是在西南作战中，一些封建势力代表人物，乘混乱之机，继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妄图继续保持其反动统治。三是由于贵州

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当时交通不便、文化落后、贫富悬殊等因素，也给土匪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四是贵州土匪是以国民党特务为骨干，以反动地主封建势力作后台，依靠封建关系，拉拢号召，出人出枪，以叛军惯匪为打手，并欺骗裹胁部分群众、啸聚附合而成的。其主要匪首的成份，地主、恶霸、军阀、政客、特务、惯匪几乎占90%。如黔南大匪首、自称“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总司令”的曹绍华，盘踞黔东南雷山地区直接与台湾匪特保持电台联络的大特务柏家华，匪“黔东南绥靖区总司令”谢世钦，匪“黔东北总指挥”史肇周，匪“第十四兵团司令官”蔡世康，匪“反共救国军第八兵团司令”罗湘培，匪“国民党革命整理委员会主任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彭景仁，匪“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副司令”牟开荣和石阡县的两大封建势力代表并称“西吴”、“东吴”的吴登仁、吴河清等，无一不是身兼多种反动身份，集国民党之军事、政治、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反动本质之大成。

贵州匪乱猖狂，除这一总的阶级根源外，更直接的还是国民党匪特长期豢养、精心策划和一手炮制的结果。早在1949年1月，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曾任宪兵司令）和贵州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原首都警察厅厅长），就应召飞往南京领受反共使命，妄图把蒋介石从1935年即伸入魔掌的贵州，经营成为最后抗拒解放的根据地。在蒋介石这一反动战略意图的指导下，谷、韩等匪帮和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勾结一起，共同制定了一套“应变计划”。先是从上而下加强政治方面的“反共”宣传教育，灌输所谓“反共救国实施纲领”，传授“反共游击经验”等，从思想舆论上做准备，以坚定其“反共意识”；随即扩充部队，把原来的5个地方保安团，扩编为8个保安团，继又扩充为6个师的番号，同时正规部队亦迅速招兵买马，成立第十九兵团，下辖第四十九军和第八十九军2个军，从人力上直接为开展所谓“游击战争”创造条件。

谷、韩等匪帮为更好利用吴河清之流的封建势力，还开办训练班，把贵州地主恶霸、军阀政客、土匪特务、帮会组织中的那些所谓“社会贤达”、“自然领袖”和“党团有力分子”都大量收罗组织起来，把他们培养训练为“反共中坚”，作为其发展匪特武装，破坏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骨干。这个极端反动的“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从1949年8月15日在贵阳雪涯洞开办，3期共轮训了1600多人。这帮匪徒遍布全省，成了后来土匪暴乱的元凶祸首。

谷、韩等匪为进一步利用封建地主阶级多年来对农民群众的直接统治关系，又提出所谓“政务下乡、党务下乡”，直接派遣特务下乡加紧同封建势力的勾结，以便控制农村，组织叛乱。为麻痹欺骗农民群众，他们还大开烟禁，公然号召各地广种鸦片烟，妄图给我埋下定时炸弹，挑起群众对我禁烟不满，以便乘机裹胁欺骗群众为匪。

临近解放，谷、韩等匪帮在仓皇逃跑之前，除慌忙进行破坏黔东及贵阳附近公路桥梁、焚烧隐藏大量档案、资财和屠杀大批革命爱国人士等罪恶活动外，再次布置一批匪特骨干携带40余部电台秘密疏散、隐蔽潜伏，并从监狱中放出800余名惯匪小偷配合行动，指示他们一旦时机成熟，即按原定“应变计划”组织发动其蓄谋已久的所谓“策应反攻大陆”的游击战争——土匪大暴乱。

解放之初，潜伏的匪特慑于我军声威，未敢轻举妄动，农村的封建地主势力不了解我党具体政策，亦在窥测等待。当时社会治安从表面上看还是较好的，到处是一片欢庆解放的热烈景象。但为时不久，当我军主力继续进军，一部入川作战，一部进滇歼敌，只少数部队留黔参加城市接管和维护治安，广大乡村尚未占领，群众尚未发动，匪特以为有机可乘，便纷纷蠢动起来。他们四处奔走串联，造谣欺骗，煽动蛊惑，封官许愿，不久土匪便陆续开始

叛乱。先由零星小股作试探性的骚扰破坏，渐渐活动到乡场附近，公路两侧，进而公开扯起“反共”旗号，专门反对共产党，反抗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由袭击我单独行动的地方工作人员，伏击我班排部队，发展为攻城掠镇，占领地盘，进而疯狂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匪“游击战争”，妄图与西南几省土匪相呼应，实现其建立西南大陆游击根据地的罪恶计划。

二

1950 年 3、4 月份，全省性的匪乱达到高潮。除各地反动封建势力纷纷自树旗帜，占山为王外，原起义的一部分蒋军（约 15 个团）和各地的乡保武装亦相继叛变为匪。当时，全省较大的股匪计约 460 余股，武装土匪达十二三万人，机枪在千挺以上。他们到处抢劫、破坏、杀人、暴动，劫行商、打军车、围攻我区乡人民政府和县城，残害我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及进步群众。元月 14 日，我随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同志，率兵团指挥机关参加成都战役后返贵阳，途经遵义、乌江之间的刀靶水，亦遭土匪伏击。杨司令员亲自指挥，经激战始将土匪击溃，安抵贵阳。3 月 5 日，我十六军四十七师供给处长张维友同志和四十六师供给处副处长李俊峰同志，专车来军区领取经费回去，至离贵阳仅 10 来里三桥以北之李家坟即遭土匪伏击而牺牲。4 月 6 日，我一四一团团直及一营，被叛匪保安一、五、十二等 3 个团包围在水城、纳雍之间，激战 3 昼夜始突围，牺牲干部战士 200 余人。4 月下旬，省委和兵团领导到重庆西南局开会，在川黔边界处再次被 800 余名土匪伏击。据不完全统计，在那土匪四起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我军、政工作人员牺牲即达 2000 余人。当时全省被土匪控制了 31 个县，我们占领的 48 个县，也多是县城和少数乡镇。翻开当时全省的剿匪形势图，整个贵州就象一张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桑叶，我们控制的几条主

要公路沿线好比几根残存的叶茎。在那一两个月中，全省大部地区，交通被阻，城乡隔绝，生产停滞，商业萧条，一时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形势相当严重。

党中央曾指出“大西南解放后，各部队要用相当时间，集中主要精力，进行一段剿匪反霸斗争。”但由于当时对土匪的力量和破坏性估计不足，部队从大兵团作战转为分散剿匪，对战士思想教育还不很深入细致，因而在一部分干战中存在着麻痹松懈思想，不少人反映：“大江大海都过了，还在乎这几个毛毛匪？”经过一系列血的教训，使大家的头脑才清醒一些。此时，党中央针对全国类似贵州的一些新解放区陆续发生的匪情，于1950年3月18日发出了关于剿匪与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号召新解放区的军民立刻转入剿匪斗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邓小平政委，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和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等首长具体指示我们：西南封建势力原封未动，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也是各阶层人士所热烈拥护的，要求西南全党全军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剿匪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要把剿匪斗争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要求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重新调整兵力部署，迅速学会新的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首长的一系列指示，贵州省委和军区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认真分析了我省匪乱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育，研究制定了剿灭对策。首先加强了领导，以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苏振华、省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杨勇为首，成立了25人的剿匪委员会。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动员全省党政军民，积极参加和支援剿匪斗争。二是在军事上重新调整部署，暂时主动收缩一部分不易控制的县城和边沿地区（23个县），加强交通沿线的守备力量。此时，我军区部队，除留少数警备城市和参加接管

工作外，均就地分散剿匪。此外，还专门集中一部分机动部队，组成东西2个集团，东集团由一三八团、一四〇团组成，西集团由一四一团和一三九团、一四〇团及四十五师一三五团各一个营组成。军区决定，东集团由我指挥，西集团由四十七师师长兼毕节军分区司令员郑统一同志指挥，均在军区直接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实行重点的重兵清剿。

在我军事进剿全面展开以前，我已综合各方面情报，查明土匪叛乱是国民党特务一手策划和指挥的。为斩断魔爪，3月23日，我公安部门组织对贵阳市的大搜捕，查获美蒋特务钱济渊以下249人，摧毁了匪特的指挥机关，切断了特务、土匪之间的联系，粉碎了匪特妄图里应外合，首先攻陷贵阳省城的罪恶阴谋。

为迅速扭转被动局面，6月21日至7月10日，我东集团首先组织了瓮（安）、余（庆）、湄（潭）铁壁合围战役。战役开始前，对于选取哪股土匪作为首战打击对象，我们是作过充分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的。当时，叛乱最早、对省城贵阳威胁最大的，是曾经攻到花溪的曹绍华匪部；但危害最烈、政治影响最大的却是叛变的起义部队。他们原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兵力装备远超过一般土匪，不给他们以严重打击，剩下的起义部队亦将不稳。为此，我们决定以盘踞在瓮安、余庆、湄潭地区的叛变的王福堂部作为首战对象。我把这一意图和实施方案向省委、军区作了报告，都表示同意。为保证首战必胜，我们集中了一三六团、一三八团、一四〇团和十六军一部兵力，在3个县的范围内拉开大网进行合围。主力突破股匪盘踞的中心据点后，迅速兵分320路，到处搜山设卡，追捕逃逸散匪。整个战役历时20天，一举活捉叛匪“三九二部队野战副司令”王福堂，歼匪主力3172名。7月5日，西集团组织金沙战役，再传捷报，25天时间，歼匪“中国国民党反共自救军西南联军川黔边总指挥部”、“息（烽）、开（阳）、修（文）总指挥部”、“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第八兵团川黔边游击总指挥部”、

“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金（沙）、仁（怀）边区总指挥部”和“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西南军区总指挥部”等5个匪指挥部，活捉匪首罗维舟等以下5000余人。这两次战役的胜利，给土匪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民心士气。6月以后，匪焰日趋下降，我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但此时著名的匪首，如石阡的吴登仁、吴河清，雷山的谢世钦，黔南的曹绍华，黔西北的罗湘培、廖兴序等，虽受到震动，但尚未直接受到打击，气焰仍很嚣张，他们针对我军的战略战术，重新制定对策，以分散对我之集中，继续负隅顽抗。于是我军在认真总结上两个合围战役经验，提高剿匪作战能力的基础上，东集团从7月中旬开始，又持续80天发起了对石阡两大封建堡垒所谓“东吴”和“西吴”的合围清剿。在我强大兵力分进合击下，号称“西吴”的“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副总指挥”吴登仁匪部首先被我击破，一举歼匪4241名。吴匪和少数亲信骨干化装逃脱，我一三八团以全团兵力沿着吴匪逃逸路线，圈圈相套，层层包围，山山设卡，村村搜索，该团保卫股长张作仁、政治指导员赵彬带侦察排24人，全部化装成便衣，跟踪追捕，穷追紧逼连续7昼夜，终将这一罪魁元凶拿获归案。紧接着在消灭“东吴”之后，为追捕匪首吴河清，也专门动员了一四〇团全团的兵力，实行三线封锁。该团团长曾长柏亲率一支精悍部队，在吴匪老巢——石阡、岑巩、江口3县交界的大顶山一带方圆五六十里的高山密林中，兜捕搜剿16天，行程1100多里，终于将吴匪俘获。

三

东集团对石阡80天合围结束后，军区叫我回去作了一次全面的汇报。省委和军区的领导同志对连续几个战役的胜利表示满意，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广大干战创造的一些成功经验很好的总结出

来。东集团剿匪的机动部队随即集中到黄平旧州搞了20多天的休整和总结。这中间，兵团政治部王辉球主任代表省委和军区领导专程来看望了剿匪前线的部队，当时，正在贵州的中央民族访问团也特意来进行了慰问。

在20多天的总结中，围绕如何贯彻执行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和宽严相结合的政策这一总的议题，在军事上着重总结了集中优势兵力，长途奔袭，分进合击，分片包干，梳篦清剿，小分队捉匪首等战术和方法上的经验；在开展政治攻势上着重总结了如何正确执行宽严政策的问题。实践证明，凡是我们及时对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坚决进行镇压，对胁从匪众大胆释放的地区，那里就会很快出现匪属妻子叫丈夫，父母叫儿子，促其迅速改恶从善，踊跃向解放缴枪投诚的热烈场面。在发动群众方面，我们着重总结了如何把捉尽匪首和发动群众联系起来的问题。“擒贼先擒王，刨树先刨根”，一个地区匪首没捉尽，等于没有掀掉压在群众头上石头，群众有顾虑就很难发动起来。但是要捉尽匪首净化一个地区，不发动那里的群众，完全靠部队的力量是不行的。因此，捉匪首和发动群众，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广大干部战士有很生动的创造和发明。如每到一个地区先提出“三不走”，即匪首不捉尽不走，地区不净化不走，群众不发动不走。使群众放心，大胆靠近我们，帮助我们。广大干战总结出必须“一身兼四员”（战斗员、侦察员、指挥员、宣传员）和“三勤三起”（口勤、手勤、腿勤和与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只有真心实意地关心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群众才会真正相信我们是他们的亲人，才能主动靠近我们，向我们反映情况。在发动群众中，广大干战还普遍学会了访苦、引苦、领导诉苦、培养积极分子、组织农协等工作方法。通过以乡村为单位，召开农代会，成立人民武装自卫队等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使他们直接参加剿匪斗争并亲自捕捉匪首，这样一个地区就更容易

净化了。这些经验，省委和军区的领导都给予了肯定，并让军区的《连队生活》报宣传推广，还给刚到贵州帮助剿匪的一八六师部队作了介绍。

9月以后，全省剿匪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时，从整个西南地区看，川滇两省著名股匪多数被歼，匪风已开始平息，而贵州形势仍比其他两省严重。大股土匪不仅仍控制着我21座县城及广大地区，且均与台湾特务机关保持着密切的电台联络，企图长期挣扎，负隅顽抗。

为彻底剿灭上述匪特，争取年底肃清贵州全省股匪，除四十五师早已于4月份来黔助剿外，西南军区又从川西军区调一八六师，川东军区调三十一师入黔会剿。9月16日到10月10日，兄弟部队一八六师在我镇远（后改称凯里军分区）、独山（后改称都匀军分区）两分区部队的协助配合下，在黔东南雷山地区展开合围，一举歼匪5590人。围剿中，师、团干部亲率30多个排约千人的兵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辗转清剿，追捕匪首，终将我省重要特务头子柏家华和匪“黔东南绥靖司令”谢世钦两匪首活捉。与此同时，兄弟部队四十五师对黔西北封建反动堡垒——威宁赫章地区之罗湘培、廖兴序、田战云、安纯三、李成举、潘厚昆等股匪展开围剿，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该役共歼匪8000余人（师以上匪首61名），并收复了股匪盘踞的广大地区。在此期间，兄弟部队三十一师在川黔也展开合围战斗，均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在兄弟部队的积极协助和配合下，我区部队更是全力以赴，各分区机动部队除自己分别组织一些小型的合围会剿外，入冬以后，又配合军区直接指挥的东、西两集团和友邻部队，进行了9个较大的合围战役。经过这样反复会剿，到1950年底，中心区内的股匪基本消灭，重要匪首多数落网，全省除册亨、望谟、罗甸、荔波4县城和一些边沿地区尚为股匪盘踞外，广大地区已为我控制，城乡治安逐渐稳定，人民生产生活日趋正常。

四

1951年元月28日，在我们为争取新的一年获得更大胜利而战斗的时候，省委、军区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对西南军区剿匪工作的嘉奖电，全省军民更加斗志昂扬，信心倍增，坚决表示一定按照党和毛主席的要求，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匪而战斗到底。贵州省委适时提出了完成“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以实际行动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全省从地区、县到区、乡、村各级都先后建立了清匪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参加清匪，到处实行重点戒严，山山搜捕，路路设岗，使残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仅遵义地区从元月2日开始，半个月时间，即歼匪3148名，俘匪“川黔边反共自救军总司令”卢杰等中队长以上匪首126名。

广大人民群众由积极支援剿匪，发展为勇敢拿起刀矛火枪直接参加剿匪。全省除土匪盘踞的少数地区外，人民武装自卫队普遍建立起来，1950年9月仅6万人，此时已发展到35万余人。这些武装自卫队员不仅勇敢地为我军传送情报，侦察匪情，探路带路，协助捕捉漏网匪首（重要匪首如屠占廷、罗湘培、廖兴序、彭景仁等的落网，都是由群众参加捕捉的），而且直接参加和股匪作战。水（城）南地区的碗场，人民自卫队与股匪张少恒部数百人血战一昼夜，队员伤亡70余人，仍毫不动摇，终于打退土匪的进攻，并配合我军将该匪歼灭。安顺分区人民自卫队，随我军到百里外去参战。大定（大方）县人民自卫队单独组成几个连去边沿区清剿散匪。兴仁分区人民自卫队千余人配合部队进入广西参加剿匪。

在全省群众性清匪运动展开的同时，我军主力部队的矛头，由中心地区指向边沿地区。在川、湘、桂、滇友邻地区兄弟部队的

协同下，先后对省与省边界结合部地区大股土匪，多次进行大规模的边地会剿和围剿。元月13日至2月3日，独山分区部队发起荔波合围战，历20天时间，歼匪“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总司令”陈与参等以下8200余名。接着，我一三八团和一五一团，又于2月24日，发起对长期盘踞黔桂边境平塘和广西天峨、南丹3县交界处的最大股匪莫树风、莫景芬、莫廷义等匪部的合围进剿，7天时间全歼该匪部1000余名，广西军区为此专门给我们军区发来贺电。在中心地区发动群众清匪的部队，为除恶务尽，对个别漏网的大匪首，一经查到线索，不辞千难万险，都要追捕归案。我军区警卫二团副连长孙显君、副排长蔡增敏和正安县公安局刘佩山三同志组成飞行队，追捕60天，经贵州、四川、云南3省，行程4800余里，捉住“反共救国军第九路军副司令”冯铭钊、参谋长冯铭清和“黔北反共救国军游击司令”冯庆丰。我一四五团三营排长于清泉与侦察干事杨瑞华，带领武工队追捕逃匪至云南平彝（富源）柏衙村，在当地农协积极分子帮助下，捉到匪支队司令何仁明等几名匪首，进一步了解到另几名主要匪首已潜逃昆明，又立即带领武工队员10人和民兵5人，连夜赶赴昆明，昼夜查捕，终于捕获匪“七路司令”纪肃帮、“副司令”胡少云、“二七师师长”董玉衡、“二二八师参谋长”陈护松等15名重要匪首。

经过全省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大股土匪相继被歼，重要匪首陆续落网。在剿匪斗争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我贵阳分区部队配合一五一团、一五二团等部队于3月23日至4月20日对罗甸，我兴仁分区部队配合安顺分区部队于5月13、14两日至5月21日对册亨、望谟三地区发起了合围进剿。两次战役共歼匪2000余人，俘历次漏网投奔该地存身的大小匪首数百名。至此，被贵州土匪最后盘踞的3个县城重见天日，贵州全境宣告全部解放。截至7月，全省尚存残匪2000余人，但已是苟延残喘了。

经过一年多艰苦复杂的剿匪斗争，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从

1950 年元月到 1951 年 8 月，我区部队共与股匪进行大小战斗 4246 次，毙伤俘降中队长以上匪首 14397 名，匪众 263739 名，共歼匪 278136 名，缴获各种炮 298 门，轻重机枪 1247 挺，步短枪 116866 支。股匪悉数被歼，一些罪大恶极的匪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梁正贵整理

（贵州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贵州解放初期各地重大股匪的暴乱及被歼概况

刘铭简

1949年冬，贵州解放以后，由于国民党在败退之前，派遣大批匪特分赴各地潜伏，与各地封建势力勾结，制定应变计划，因而爆发了大规模的匪乱。这次匪患，波及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造成的危害之大，是我省历史上少有的。全省军民经过一年半的艰苦奋斗，始将匪患平息。

1950年初，贵州象全国所有新解放区一样，各地仅有少数零星散匪，社会秩序也较为安定，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敲锣打鼓，欢庆解放翻身。但到3、4月间，刚刚获得解放的贵州，天上又布满了乌云，土匪蜂起，人数猛增，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竟将全省大部分农村和2/5的县城占领，甚至不少县城是从我军手中夺过去的。我军只能在沿湘黔、川黔、滇黔、黔桂4条公路干线上，守护一些重要目标和保证交通运输的安全。全省城乡隔绝，生产停滞，交通被阻，市场萧条，政令不能出城，一时人心惶惶。土匪甚至多次攻打贵阳市郊各县、区人民政府，并两次预谋攻占贵阳。我军为预防土匪的进攻，不得不在通往贵阳市的主要街口修筑堡垒加以防御。这些土匪都明确地提出了“反共自救”的政治口号，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和编制系列。据全省统计，土匪共有460多股，持枪人数13万余，大批被威胁欺骗临时为匪的群众均不计算在

内。土匪山头林立，派系纷杂，各据一方，占山为王，“司令”、“军长”、“师长”比比皆是，数不甚数。其中千人以上，在省内影响较大存在时间又较长的有以下几股：

在贵阳地区，首推“中央新编第一集团军”潘方侠匪部。潘方侠原为蒋介石侍从室副官，军统特务，曾在中美合作所任职。贵州解放前夕，潘匪以做大烟生意为遮身符，潜伏花溪，拉拢社会关系，为发动匪乱作准备。贵州解放后，潘匪遵照蒋介石“拯救黔众，同艰共生，坚持发展壮大游击力量，配合国军反攻大陆”的电令，四出串联，来往于贵筑（今花溪）惠水之间，并两次潜入贵阳，将贵阳四周及黔南地区之各股土匪统编为“中央新编第一集团军”，由潘方侠任总司令，总部设于离贵阳仅30公里之青岩。该集团军下辖9个军，其活动范围包括东至雷山、黎平，西至紫云、罗甸之整个黔南地区。潘匪还与贵阳潜伏的特务共同组织了“贵阳市策动委员会”，潘任主任，两次预谋采取里应外合手段，配合贵阳各郊区股匪大暴动，妄图攻陷贵阳。但两次计划均为我侦知，将市内潜伏特务捕获，并缴获其策动计划及委任关防，潘匪攻陷贵阳之阴谋才未能得逞。1950年4月11日，潘匪又率土匪1000多名攻打贵筑县，打死打伤贵州大学学生及工友8人，绑走66名。为营救贵大学生，我贵州军区参谋长潘焱亲率部队奔袭青岩，将潘匪总部300余名匪徒捕获，歼其总部。潘匪本人外出，侥幸漏网。以后，潘匪召集各匪首会议，妄图重整旗鼓，但各匪首眼看潘匪心力日拙，屡遭失败，便各怀二心，另找靠山或自树旗帜。潘匪仅带70余人逃向望谟，“中央新编第一集团军”番号就此空留。

在贵阳地区继之而起的是“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曹绍华匪部。曹绍华系平坝县平凯乡千何村人，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中统特务，曾任国民党保三团中校副团长，贵筑、惠水、安顺、平坝、紫云、长顺、广顺、罗甸8县联防主任，是

国民党贵州保安副司令韩文焕的得力助手。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在逃离贵阳时，委任曹匪为清镇、平坝、织金、修文、黔西5县游击司令。贵阳解放后，曹匪将原平坝县保警队的300名武装拖到马场进行暴乱，为黔中一带暴乱的首起分子。到4月份，该股匪发展到2000余人，在贵阳西南部的几个县内猖狂进行破坏，炸毁公路桥梁，拦截车辆，攻打平坝县城，抢劫二铺粮仓，在穿洞一次杀害我区、乡干部28人。该股匪始称“西南游击反共自卫军”，与潘方侠“中央新编第一集团军”勾结合股，后窜至长顺、广顺一带，改番号为“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曹任总司令，韦毓英为副司令，下辖7个师，并委派了清镇、平坝、安顺、广顺、长顺等县县长。该匪部在其盘踞的区域内建立了完整的政权组织和军事体系，并在匪师团驻地竖有旗杆，每日清晨集合匪徒出早操，举行升旗仪式，公开进行割据，妄图长期与我对垒。由于该匪部势力较强，我军又一时抽不出更多部队进剿，致使该匪部在贵阳西南部得以长期盘踞，为黔中人民切齿痛恨。直至1950年11月，我军举行长顺、紫云、惠水合围，才将该股匪歼灭。

与曹绍华在长、紫、惠地区鼎足而立的是“黔桂边区人民反共挺进军”屠占廷及“八十九军游击指挥部”刘逸群两股。屠占廷匪部原是国民党广西保安第一团，广西解放时窜来贵州，与紫云县长姚聚五结合，收编当地各股土匪，先被潘方侠委为第七军军长，后改番号为“黔桂边区人民反共挺进军”，屠任军长，下辖2个纵队，活动于紫云、望谟之间。刘逸群原系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之弟，曾任八十九军师长及安顺地区专员等职，解放后南逃罗甸为匪，被潘方侠委任为第五军军长，后又与长顺大地主结合，组成“八十九军游击指挥部”，刘任总指挥长。除以上两股土匪外，还有许多小股匪，如由原贵阳市警察局长陈一鸣为首的“戡战建国军”等。由于股匪甚多，山头林立，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往往发生矛盾。陈一鸣与曹绍华为了争夺一个乡的统治权而动了

刺刀。陈一鸣匪部是抢劫贵阳武器仓库而发展起来的，装备精良，为人垂涎。当他率部路过紫云时，“挺进军”屠占廷对其伏击，发生火拼。我军在进行长紫惠合围时，正是利用股匪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将此一地区之各股土匪全部消灭。

在水城、安顺地区，最大的股匪为“反共自卫救国军第八兵团”罗湘培部。罗湘培原为贵州保安第四旅旅长，解放前夕升任独二师师长。后在水城起义，旋于1950年3月叛变，逃窜郎岱，结合地方封建势力，成立“反共自卫救国军第八兵团”，罗任司令，杨如森任副司令兼参谋长，辖1个师及3个纵队，活动于郎岱、普定、织金地区。7月，我军围剿匪巢郎岱岩脚，罗匪率部逃往水城、赫章，重整队伍，仍以“八兵团”为番号，成立二十一军、二十二军、二十三军、九十四军。又将所盘踞之地域划分为4个游击区，建立匪政权，委任了纳雍、水城、大定（今大方）、毕节、赫章、威宁等县县长，妄图长期盘踞整个黔西地区。9月3日，川南叛军田动云率部3000人窜来赫章，罗匪带500百人亲到赫章欢迎，并在城内召开欢迎大会。罗、田二匪合股后，匪焰大炽。9月中旬，西南军区统一组织云、贵、川、康4省边界会剿，我省重点合围威宁、赫章罗湘培匪部，罗匪亲率其警卫团600余人拼死抵抗，我军几经战斗，将其全歼。

在黔西南地区为害最劣的是“滇桂黔边区反共抗俄同盟军”余启佑部。余启佑原为国民党二七二师师长，在兴仁起义后，又于1950年3月叛变，窜至盘县杨松，将我军一四五团筹粮队43人包围杀害，占领盘县、普安、水城交界的八纳山区为其大本营，纠合黔西向各股封建游杂武装，编为12个纵队，打出“滇桂黔边区反共抗俄同盟军”旗号，余启佑任总司令，并成立了普安、兴仁、盘县、晴隆、水城各县自治委员会，行使政权职能。该股匪为作好长期游击准备，还在其总部所在地水城顺场乡开办了“反共抗俄军官学校”，将各地恶霸地主、惯匪流氓集中施以游击战争训练。

为了和盘踞黔西北之匪第八兵团互相配合，余启佑和罗湘培相邀，在水城杨梅树区举行会谈，划分势力范围，以盘江为界，南部归余启佑，北部归罗湘培。余匪行事狡猾，我军多次进剿漏网逃脱。后又窜至兴义、安龙、册亨一带，建立“滇桂黔边区军政长官公署”，余任军政长官。1951年我军组织滇桂黔3省边界会剿，才将该匪部歼灭。

在黔东南一带的土匪主要有两大股：一为盘踞雷公山的“黔东南绥靖区”谢世钦部。谢世钦为雷山人，毕业于贵州军官团高教班，曾任国民党贵阳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保十团团长等职。黔东南解放后，谢匪率部窜到雷公山区，被潘方侠委为“中央新编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军长。潘匪失势后，谢匪纠合剑河、台江、丹寨、黎平、三都等县股匪，建立“黔东南绥靖区”，谢世钦任司令，下辖17个纵队及1个独立师，盘踞雷山、剑河、黎平、榕江，其活动范围可达从江、台江、炉山、麻江、丹寨、三都等县。该匪部有较严密的组织，官兵皆佩带标明“绥×”字样的胸章，“绥”为该部总称，第二字为各部主官姓名的最末一字，作为部队代号，胸章后面皆有佩带者的职务，姓名。谢匪还办了两期干部学校，分军士、军官、政工3个大队。第一期毕业300人分到各部充当骨干爪牙。谢匪为加强其统治，在其师、团机构及所控制的区域内均设有政工组织，广泛印刷标语传单，宣传反共纲领，妄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忍受暂时艰苦迎接反攻”，以拢络匪众。凡被我军俘虏释放的人，须进“青年服务营”学习交待。由于谢匪统治较严，又有一套游击战术，我军小部队几次进击皆未奏效。直至1950年9月，西南军区调一八六师入黔助剿，大军压境，合击雷山，才将匪巢捣毁。

在黔东南之另一大股土匪为“湘桂黔边区民众自卫救国军”杨锦标部。杨锦标系惯匪出身，多年来带200余名土匪在湘、桂、黔边界打家劫舍，抢夺行商。广西国民党军多次进剿也未使杨就范，

后在白崇禧“化阻力为动力”的手段下，收买加委杨锦标为“湘黔边界剿匪司令官”。解放前夕，又给他装备了一部分武器，命其开展游击活动，与我军进行周旋。贵州解放时，杨匪伪装进步，与路过黎平县境的我四野部队取得联系，组织黎平支前治安委员会，趁机收缴黎平、从江保警队及保安营的武器，查抄国民党县长的家产及枪支，使该匪部武装发展到1500人，机枪20余挺。我军接管黎平县城时，邀杨开会，被其拒绝，并图谋攻打县城。我军被迫撤出，行至茅贡山，被杨匪伏击，我军伤亡30余人，黎平遂被杨匪占领。杨设番号为“湘桂黔边区反共救国军”，自任司令，辖4个纵队，以黎平、榕江为中心根据地，其势力可达湖南靖县和广西三江县。杨匪在盘踞的地区建立了匪政权，委派了4县县长，还在农村各乡中建立匪基层组织，各配备一名指导员，以加强其统治。杨匪还和雷山的谢世钦、荔波的陈与参、三都的都堪、广西的伍英等匪首广泛联系，并于5月中旬召开会议，商讨游击应变方针，划分活动范围。该股匪存在时间较长，直到1950年底我军进剿黎平、从江、榕江，才将该股匪歼灭。

与黔东南的谢世钦、杨锦标这两大股匪遥相呼应的，是长期盘踞荔波县城的“黔桂边区反共救国军”陈与参部。陈与参原为国民党少将师长、广西第十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广西解放时，陈匪带其武装潜回荔波老家，拉拢地方封建势力，收编游杂武装，编为3个支队，陈任边区军政长官。陈匪与广西匪首莫树凤勾结，以荔波为根据地，在铁路沿线大肆进行骚扰破坏，抓丁派粮，稍有不从，即被杀害。陈匪曾袭入麻尾车站，杀死2名工人，抢走一批妇女。陈匪还制造了杀害民主人士英凤楼家40余人的大惨案。1951年元月中旬，我军围攻荔波，始将该匪歼灭。

黔北地区的土匪派系甚多，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又不断变化，不断组合。先是国民党八十九军起义后在余庆、瓮安叛变的4个团被我追歼，流窜于德江、思南、印江、石阡、余庆、瓮安、凤岗

等县，与当地封建势力结合，组成了各股土匪。其中九八二团残部逃往石阡本庄，结合被称为“西吴封建王朝”的吴登仁组成“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九八三团团长蔡世康带残部北窜德江，收编当地股匪，活动于德江、思南、印江一带。一〇二七团团长吴牧周带残部逃往石阡西南。7月我军进剿石阡，该匪又逃往松桃，与惯匪高竹梅结合，盘踞梵净山区。一〇二八团团长闻羽军带残部逃窜凤岗，结合史肇周匪部攻打凤岗县城，后又窜至乌江沿岸，活动于川黔边界的沿河地区。以上各股叛军经我迭次打击后，大都麇集于黔东北一带，由叛军头目彭景仁、杨通贤收编，成立匪十四兵团。彭景仁原为国民党四十九军三二七师师长，起义后在调往重庆学习途中潜逃为匪。杨通贤为国民党八十二师副师长，在湘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释放。杨回沿河后，贼心不死，拉拢沿河封建势力与我对抗。彭、杨二匪将各地逃到黔东北来的叛军，加上松桃、沿河一带原有的惯匪、保警队、治安大队组织起来，统一编组为“十四兵团”，彭景仁为司令，杨通贤为副司令，下辖一个军4个师。该匪部以梵净山为依托，勾结四川土匪，窜扰川黔边界及黔东北各县。1950年11月，我军会同川东军区部队进行黔东北会剿，歼灭了该股土匪。

在黔北地区的土匪还有“人民自卫军”史肇周部和“川湘黔鄂边区民众救国军”黄守英部。史肇周原为国民党凤岗县参议长，土匪起家发迹，为凤岗头号恶霸地主。凤岗解放后，史匪一面伪装进步，一面暗中策划，于1950年3月发动凤岗7个乡武装暴乱，与八十九军叛军攻打凤岗县城，经我打击后，又北窜德江、务川，与黄守英合股。黄守英原为国民党道真县参议长。道真解放后，黄匪看见我在道真的兵力不强，便于1950年3月，组织全县乡保武装，发动大规模暴乱，打进道真县城，恢复了旧政权。并在全县采取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强制手段，征集壮丁，威逼群众为匪，成立“川湘黔鄂边区民众救国军”，黄任司令，下辖12个纵队及

4个支队，武装人数发展至2000余人。后又与凤岗匪首史肇周结合，将川黔公路以东、乌江以西的黔北数县全部控制。1950年10月，川东军区用两师兵力与遵义分区部队共同进行黔北大合围，才将史、黄二匪部歼灭。

在川黔公路以西的黔西北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是由遵义地区的各股封建武装与叛军合股组成的“十九兵团剿共游击军”赵龙翔部。赵龙翔原为国民党十九兵团军官大队长。贵州解放后，赵匪带300余人潜伏金沙县境，勾结遵义、黔西等县封建武装，发展至1000余人，于1950年2月10日攻打金沙县城。我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在两座碉堡内坚守3天，待援军赶到，才将赵匪击退。4月我军被迫撤离，金沙为赵匪占据。赵匪将各股土匪、乡保武装统一编组，建番号为“十九兵团剿共游击军，赵任总司令，周天乙为总指挥，下辖8个纵队，约计3500人，活动于金沙、遵义、仁怀边境。7月，我军合围金沙，歼其大部。赵、周二匪率千余人窜仁怀川黔边界，直至1951年上半年才陆续被歼。

对于上述各股重大土匪的清剿，我军经历了被动应付，重点合围，全面清剿，边沿会剿等几个阶段。1950年上半年，由于匪风上涨，起义部队大规模叛变，我军仅能守卫重点目标的安全，保护交通运输，防止土匪的袭扰，机动作战部队则集中追歼叛匪。八十九军4个团叛变后，贵州军区从遵义、毕节、镇远3个分区抽调了3个团赴余庆、瓮安追剿。在普安叛变的二七二师由兴仁分区调主力追剿。在普定叛变的独二师由安顺分区部队追剿。在水城叛变的二七一师由路过毕节的兄弟部队追剿。对这些叛变部队的追剿击溃较多，很少全歼，以致这些叛匪流窜各地，与当地封建势力结合，猬集为一股股匪帮。这些匪帮在1950年6月以前，除“新编第一集团军”潘方侠部因直接威胁贵阳市的安全，我军集中力量在贵筑县将其总部摧毁，从此再无完整的组织系统，其余的均未受到沉重打击，而盘踞在某一地区，建立“封建王国”，

造成了贵州的割据状态。6月以后，贵州军区为了改变剿匪的被动局面，集中5个团的兵力，组成两个剿匪集团，分别进剿土匪比较集中，危害又较大的瓮安、余庆、湄潭三角地带和金沙两个地区。进剿采取合围战术，先撒开大网，大面积将匪包围，然后深入纵深清剿，使匪无隙可乘，无路可逃，力求剿平一地，净化一地。瓮、余、湄合围一举歼敌3000多人，重要匪首、“三九二野战部队”副司令王福堂化妆藏在一家老乡牛圈里，被我军战士揪了出来。此次合围，使贵阳东北部的腹心地区实现了净化，取得了首次合围成功。金沙合围，歼敌5000多名，将从贵阳、遵义、毕节3个地区逃来之匪一网打尽，消除了贵阳西北部地区的一大隐患。这两次合围大大震动了各地土匪，也有力地鼓舞了全省军民的斗志；我军由被动转向了主动。接着，我军又进行了石阡、江口、岑巩、施秉中间地区的两次合围，将被称为石阡“西吴”和、东吴”的两个封建王国彻底捣毁。“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副总指挥吴登仁和一一三军军长吴河清在合中，带着少数亲随，到处躲藏，均被我从大山中擒获。9月以后，为我军在全省广泛开展合围进剿时期。为了在1950年底完成腹心地区净化任务，西南军区又从川西和川东两军区抽调一八六师和三十一师入黔助剿，大大增加了贵州剿匪力量。任务分配如下：四十五师负责黔西地区，三十一师负责黔北和黔东北地区，一八六师负责黔东南地区。贵州军区的机动部队则负责整个黔南地区。这些部队到达各地后，各军分区部队皆共同参加清剿，实行统一指挥。全省共进行了8次大的合围战斗，即：威宁、赫章合围，歼“反共自卫救国军第八兵团”罗湘培部，罗湘培在合围中被打伤，只身潜逃，后被追捕，走头无路，自毙身亡，嚣张一时的“第八兵团”就此覆灭。雷山、台江合围，歼“黔东南绥靖区”谢世钦部，谢世钦逃进雷公山，被我军在一堆烂草中搜出，“黔东南绥清区”就此被消灭。黔东南另一大股匪杨锦标部是在黎平合围时被歼灭的，杨锦标漏网逃入广

西三江县，化妆成乞丐在小镇上行乞，被民兵认出，捕回贵州。务川、道真、正安合围，歼“川湘黔鄂民众自救军”黄守英和“人民自卫军”史肇周部。在合围时，黔北大匪首史肇周和叛军头目蔡世康被击毙，黄守英其大部残余逃窜川黔边界，川黔公路以东地区实现净化。都匀、贵定、麻江地区合围是我军向黔南进剿的开始，歼罗钧、潘治平、莫如兰等几股土匪。扫清外围后，即在长顺、紫云、惠水对“反共自卫救国军”曹绍华部、“反共挺进军”屠占廷部、“八十九军游击指挥部”刘逸群部、“戡乱建国军”陈一鸣等股匪进行合围。此次合围，是全省剿匪斗争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也较为成功的一次，主要匪首除陈一鸣当场击毙外，其余匪首曹绍华、屠占廷、刘逸群皆被生擒。匪魁曹绍华被押解贵阳示众3天后，公审枪决。长、紫、惠合围以后，我军又进行惠水、平塘合围，将“国民党讨共委员会”副主席兼一军军长王志诚俘获。从此，黔南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1950年12月进行的梵净山合围，歼灭最后盘踞在黔东北的“十四兵团”兵团司令彭景仁、四十九军军长吴汝周被生擒，黔东北地区此后再无较大股匪。经过以上八大合围，全省中心地区重大股匪皆已被歼。1951年元月，剿匪斗争进入会剿边沿地区的最后阶段。首先合围长期被“黔桂边区反共救国军”军政长官陈与参和纵队司令都堪盘踞的荔波，将陈与参和都堪活捉，消灭了黔南的这一大股土匪，荔波重获解放。我军乘胜进入广西，将危害黔桂边沿地区安全的广西大匪首“黔桂边区国民反共救国委员会”主席莫树凤歼灭。其次是解放罗甸以后，我军即开展对贵州土匪最后的一个巢穴——册亨、望谟合围。此一地区聚集了从各地漏网逃来的若干土匪，头绪纷杂，无统一组织。其中最大的是从盘县、兴义窜来的“反共抗俄同盟军”总司令余启佑，盘踞于兴义、安龙、册亨南部，建立“滇桂黔边区军政长官公署”，匪徒达4000余人，长短枪2400多支，为贵州最后一支重大股匪。经过合围，歼匪近6000名，中

队长以上匪首就有1340名，余启佑的“滇桂黔边区军政长官公署”被摧毁。册、望合围以后，贵州全境解放，结束了持续一年半的剿匪斗争。

（贵州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三穗土匪暴乱始末

王国华

一、土匪暴乱的主要原因

1949年11月7日，三穗县解放。12月，国民党在三穗的反动残余势力暗地组织土匪暴动。从1950年元月起，土匪先后拉上了山。2月，围攻三穗县城。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活动是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前夕一手策划的。

1、国民党三穗县政府溃退前夕的“应变计划”

1949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旋即解放南京，占领了国民党经营了20余年的老巢，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指挥其残余继续顽抗，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5月，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宣布全省实施“应变”政策。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亲自到镇远召开黔东应变会议，国民党三穗县长李熙昌和县民卫副队长杨再华到会参加。6月，李熙昌召开三穗县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国民党军驻三穗的三二七师正、副师长及地方绅士会议，制订“三穗县剿匪应变方案”，成立“三穗县应变委员会”，决定全体动员，以“拼命保命”、“破产保产之精神”与共产党周旋到底。在各地组织肃奸队、宣传队、传令队、运输队、妇女队、儿童队、突击队，执行调查、审查、运输等备战任务。组建两个防剿大队，负责全县“剿匪”。实行“三光”政策，把公路沿线房屋、仓库烧光，物资藏光。将

公路桥梁及电话通讯全部破坏。确定在三穗解放后，组织"三穗反共救国游击司令部"。并选择巴冶、良上等地为游击根据地，与人民政府顽抗到底。8月又成立"三穗县自卫经费捐献委员会"，负责筹粮筹款，购买武器，充实反动武装。经过多方筹集，李熙昌搞到步枪子弹10多箱，手榴弹100箱。这些弹药除一部分补充县"民众自卫总队"外，其余全分下乡，全县武备起"民众自卫队"240余人，壮丁队350多人。以这些地方武装配合国民党驻军二四九师，欲在三穗境内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

11月2日，三穗解放。同日下午，国民党三穗县长李熙昌搜集溃散人员，在德明宣布成立"三穗县反共救国游击司令部"，将民卫大队改编成警卫营，防剿大队改编为支队。各乡成立大队，李熙昌写信通知各乡乡长不要灰心，坚持游击，等待时局好转。

2、国民党在三穗的反动势力未受到大的打击。

人民解放军解放三穗，除在等溪、新场和瓦寨与国民党军二四九师有小的接触外，都是一路顺风，大踏步前进，三穗基本上是和平解放的。国民党正规军虽然逃跑了，但留在地方上的反动势力却很雄厚，其县、乡、保、甲全套组织都原封不动地存在着。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三青团组织、特务组织都未受到打击。当我大军过境时，这些人员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威，暂时龟缩起来，不敢轻举妄动，当我大军入川参加成都战役后，他们就一哄而起，组织土匪暴乱，向我人民政权发动疯狂的进攻。

3、少数反动分子混入革命队伍，窃情取报，助长了土匪气焰。

三穗解放以后，暂时龟缩待变的一部分国民党政警特人员，乘我用人之机，摇身一变，混入革命队伍。这些人员，一部分人在我政府的耐心教育下，转变了立场，为人民做了些事，而一部分死硬分子，却利用工作之便刺探我军政情报，与土匪通风报信。地方权绅王槐熙在窃取我"三穗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职务后，利用职权，刺探我军政情报，暗里组织和操纵土匪，两次攻打我三穗县

城。他们在我县大队3个排中策动2个副排长叛变，事情败露后，一个被我镇压，一个拖枪上山为匪。还有公安局、税务局等单位也潜藏着反动军警特人员，这些人员利用工作之便，坐收我政府情报，随时通报土匪，更助长了各地土匪的嚣张气焰，对我人民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来势汹汹的土匪暴乱

11月下旬，三穗解放才10多天，黔东土匪"东南绥靖区反共游击总司令部"派镇远特务左德权到三穗找王槐熙、杨声扬等地方头面反动人物联系，叫他们迅速在三穗全县组织土匪暴乱。11月29日，前三穗中学校长、地方权绅王槐熙，前国民党三穗县党部书记长、三穗县参议会参议长杨声扬等20余人集中七姓馆开会，决定成立"镇穗玉岑边区反共游击司令部"。布置到会人员分头活动，迅速把土匪队伍拉起来。1950年元月22日，王槐熙、王彦征、何祝三等20人在王彦征家再次开会，成立筹备委员会，筹款5000大洋，购制土匪服装。元月26日，王槐熙等20余人又在杨剑锋家开会，决定2月4日攻打三穗县城。会后，经王槐熙等人分头派人到各区乡串联，各地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惯匪、特务、地主、恶霸纷纷上山为匪。1950年2月6日，各路匪首麇集岑松，成立"黔东第一战区游击指挥部"(3月12日后，改称"贵州东南绥靖区镇远第一行政区游击总指挥部")，万超为总指挥兼匪三穗县长，下辖8个支队，并决定再次攻打三穗县城。1949年12月，等溪、款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与王槐熙取得联系后，惯匪王步洲到处串联，拉拢反动势力，成立土匪大队，后改称"反共游击团"，不久又称"穗柱边区联防游击指挥部"，天柱匪首姜弼为总指挥。

1950年4月，我县大队副排长粟满庭在反动势力策动下拖枪叛变，在坦洞、绞强一带组织土匪暴动，成立土匪支队，归附湖南凉

伞的"湘黔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统一指挥。

各地土匪暴乱后，先后占领我坪茶、泥山、响水、德明、绞颇、寨头、巴冶、良上、稿桥、顺洞、坦洞、等溪、款场、雪洞、海山、果界、贵秧等17个乡镇，占现行区域60%以上。匪乱达到高峰时，人民政府的有效控制区域只占全县1/3。各地土匪暴乱后，即进行设卡关洋、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攻打我区、乡、县人民政府，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刚刚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三、全县主要的几大股匪

1950年夏天，匪乱达到高峰。各地土匪达30多股，人数达3000多人，综合起来，这些股匪凑集成如下几个体系。

1、"镇穗玉岑边区反共游击司令部"。该匪部成立于1949年12月下旬。镇远县人左德权任中将司令、三穗县王槐熙任中将高参、杨亚新、杨声扬为少将副司令，李名亚为参谋长。下编两个团，李功韬为十六团团长、潘德超为十七团团长。同时成立了匪三穗县政府，王槐熙任匪县长。但时隔不久，就因互相矛盾，各争其地，各行其事，未成气候就分裂了。左德权、李功韬、潘德超另立门户，成立"中国人民反共救国自卫军第六梯队"，活动于坪茶、泥山、竹坪等镇穗边区。不久，内部又闹分裂，有的投靠长吉甘芹香匪部，有的投奔雪洞匪区，有的投到台烈、岑松的万超匪部，余下的分成小股各自活动。

2、"贵州东南绥靖区镇远第一行政区游击队总指挥部"。该匪部成立于1950年初，开始叫"黔东第一战区游击指挥部"。3月改名为"贵州东南绥靖区镇远第一行政区游击总指挥部"。该匪部亦建三穗县政府，剑河县岑松人万超任匪总指挥兼三穗县长，德明人杨修竹为副县长，杨量为参谋长。1950年10月，万超被我军生擒

后，杨量为总指挥，杨修竹为县长。该匪部下编9个支队，活动于三穗县、剑河县及镇远县交界山区。该匪部名义上属谢世钦、陈开明土匪体系，实际是各自为政，其下辖支队也是各占地盘、各自活动。

3、"湘黔边区反共游击司令部"。该匪部成立于1950年3月，是湖南新晃县凉伞乡最大的土匪集团。后各地土匪在我军打击下，纷纷逃窜，麇集于该地区，土匪人数大增，最多时达5000余人。7月以后，凉伞匪区染濡到湘黔边界的三穗县、天柱县交界地区。这年6月，该匪部与黎平匪首杨锦标勾结，改名为"湘黔桂边区游击联合总指挥部"。由于距离甚远，实际是各占其地，各自为政。不久，该匪部恢复了前名。该匪部包括湖南省的新晃县、芷江县、会同县和贵州省的三穗县、镇远县、岑巩县、玉屏县、天柱等县土匪。派系十分复杂，头目几易其人。它的最后一任司令是芷江大匪首杨永清，副司令是新晃县老惯匪姚大榜。该匪部除了直属匪部，下设"第二前进指挥所"，"指挥所"正副司令均为凉伞人。"指挥所"下设纵队，其中第十二纵队驻三穗县的雪洞乡，纵队司令邹志权、副司令唐不违、杨汉章均为镇远县流窜来的匪首，三穗县的甘芹香支队，舒策支队都归属十二纵队。第十二纵队活动于雪洞乡、海山乡一带。"指挥所"下面还有个第八纵队，驻湖南凉伞，司令汪昌仁亦为凉伞人。三穗县桐林区的粟满庭匪部，张仁沛匪部都属第八纵队。该部匪活动于湖南的凉伞、橙寨、黄雷和三穗县的桐林、坦洞、绞强一带。7月，桐林区匪首杨家谟，串联等溪、款场土匪成立"湘黔边区反共游击司令部第一纵队"司令杨家谟，副司令陆志泮、王步洲。该股匪活动于三穗县的等溪、款场及湖南、天柱交界的边沿地区。

这些土匪自称"九路军"（当时他们称人民解放军为"八路军"）意思是比我军还多一路，力量比我军还强大。他们盘踞在交通闭塞的边沿地区，各占山头，各自为政。在攻打我人民政府时，就采取暂时的联合行动。一旦被我军打击，又各自逃窜，回到各自盘踞的地区危害人民群众。

四、土匪暴乱

1、造谣惑众，制造反革命舆论。在土匪暴乱前夕和暴乱以后，一些反动分子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专门制造谣言，迷惑群众，为土匪的暴乱及其罪恶行径制造反革命舆论和借口。他们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母子不能团圆，丈夫妻子离散，年轻人要抓去当兵，老年人要拿出滚坎死"，"共产党不讲五伦八德，谬天行事"，"现在是大难临头了"了，把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描绘成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恶魔。怎样摆脱这场"劫难"呢？他们说"只有险中险，险中才有救"、"解放军在贵州的兵力薄弱，蒋介石准备反攻，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我们应该组织起来"。

2、逼人为匪，强征捐税，对群众大肆敲诈勒索。土匪为了维护和发展他们的势力，与人民政府作长期对抗，在他们占领区强迫群众为匪，规定凡是16岁以上、45岁以下者，必须上山为匪，谁不去杀他全家。此外，他们还进行强制摊派，规定每户人家出粮食多少，枪弹款多少，服装费多少，草鞋钱多少。限期交清，到期不交，轻者捆绑吊打，重者说你私通"八路"，加以杀害。

3、设卡关洋，拦路抢劫。土匪从老百姓身上敲诈不出多少东西。他们就派人到偏僻路上和人们必经的山头坳上设卡关洋，进行拦路抢劫。把过路行人，往来客商所带来的东抢劫一尽，有时拿了东西，还将人杀死。盘山、蜜蜂坡、台烈、白泥山、长吉、顺洞、分水岭、雪洞等经常发生抢劫杀人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元月至3月，全县就发生拦路抢劫事件124起。活动在泥山和盘山一带的土匪，还经常抢劫我过路的军车和商车，给我军、商交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威胁。

4、滥杀无辜群众，劫杀我农民积极分子。这些土匪，不仅是一伙梦想复辟的暴徒，还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对于不顺从他们

的无辜群众，对无力交纳捐税的老百姓，他们就以“抗捐”或“私通八路”为名加以杀害；对过往客商则以“八路军的探子”名义加以杀害；对于与我军、人民政府有接触的人或农村积极分子，更不放过，以“通匪”或“土八路”为借口加以杀害。土匪暴乱期间，在全县共杀害无辜百姓和与人民政府接近的积极分子50多人。

5、伏击我军小分队。对于我大部队的战斗力，一些匪首在解放战争中是早已领教过的，不敢有所图谋。对我执行任务的小分队，他们则集中人枪，选地设伏，进行突袭，手段非常残忍。3月20日，杨量股匪乘我县大队和政工人员到绞颇征粮之机，在稿雪、绞颇设伏袭击，使我县大队牺牲战士2人，工作人员重伤后牺牲2人。3月25日，驻三穗人民解放军一四九团团长率小分队由剑河返三穗，途经台烈、被万超、杨量等1000多名土匪伏击，我军牺牲4人，负伤5人。

6、攻打我区、乡、县人民政府。土匪从暴乱那一天起，就以推翻我人民政府为目的。2月4日，王槐熙调集八弓、德明、台烈、岑松、青溪等土匪1000余人围攻我三穗县城，被我过境部队一个排击溃，攻城未遂。2月10日，土匪再次围攻县城，人民解放军一四九团星夜驰援，土匪又未得逞。一四九团进驻三穗，土匪虽然再不敢围攻县城，但仍然不断围攻我德明、台烈、瓦寨、桐林、雪洞地区乡人民政府。从1950年初至9月，各地土匪先后向我县、区、乡、村政权发动攻击30多次，抢走公粮5万余斤，幸得各地干部战士英勇战斗，人民群众大力支持，才未造成更大损失。

五、开展剿匪斗争

1950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发出剿灭土匪指示。3月，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西南局指示，并制定了“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的剿匪方针，决定缩短战线，构筑碉堡，集中兵力，

据守公路沿线，先歼叛匪，扭转战局。同时派五十师进驻镇远专区，其中一四九团进驻三穗，负责镇远、三穗、岑巩、天柱、锦屏、剑河6县剿匪工作。

1950年3月，我一四九团到达三穗。4月初，一四九团与中共三穗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当前实际情况，制订扭转战局的具体措施。同时，成立三穗县剿匪指挥部，从党政军各方面挑出得力干部为指挥部成员。一四九团参谋长吕龙任剿匪指挥部指挥。

县剿匪指挥部经过认真调查分析，认为股匪中活动最频繁、最猖狂的是台烈地区的万超、杨堃匪部，长吉、瓦寨地区的陈光辉匪部、杨秀仁匪部及盘踞盘山一带的土匪。为了打击这些土匪的嚣张气焰，县人民政府一面调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巩固发展解放区；一面加强情报侦察工作，肃清内奸，了解土匪活动规律，选择重点，主动出击，再就是加强政治攻势，通过各种渠道，瓦解土匪组织，孤立顽固之敌。

4月24日，县公安局夜袭台烈，捕捉台烈匪大队长耿声明。5月3日，县公安局保卫大队夜袭苗乌，击毙土匪副支队长陈济洲。5月上旬，一四九团参谋长吕龙率警卫连到稿桥、良上，毙伤俘杨秀仁、万超等匪部70余名。5月24日，一四九团警卫连、卫生连、轮训队、炮兵连合击果介乡的土匪，毙伤匪数十名，俘匪10余名。5月26日，县公安局、县大队和一四九团一部突袭贵秧乡，在平河、王家寨、岑敦等地毙匪1名，生擒匪首4名，匪众25名，缴枪19枝、子弹300余发。

在对土匪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及时配合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剿匪斗争。5月中旬，县人民政府向全县发布《为彻底肃清特务土匪，告全县同胞书》，号召全县人民迅速行动起来，协助部队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清匪运动。同时号召为匪者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迅速到政府交枪登记。各级

政府还通过上层进步人士、匪属、土匪亲友，向土匪传信、传话，动员他们放下武器。这些措施很快收到了成效，一些土匪逐步下山，缴枪自新。据6月下旬到7月底一个月的统计，全县放下武器、离队回家生产的土匪就有425名，其中匪首4名，交枪37枝。

在加强政治攻势中，政府和部队对土匪严格执行宽严政策，对缴枪投降、悔过自新的土匪宽大处理，不追究刑事责任。对继续为匪而又罪大恶极者，则坚决镇压。6月19日，县人民政府召开公判大会，枪毙拖枪叛变的县大队副排长万祖荫、班长胡升。6月22日，公开处决了混入我政府机关为土匪窃取情报的奸细杨再朝及匪首周惠民、郑大元、龙炳熙、杨胜全。

8、9、10月，我人民政府、公安干警，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加速侦破工作，生擒了"反共救国军黔东第六梯队"司令杨亚新；破获了"李实才、粟安歧暴动案"；逮捕了混入我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上副主席的匪中将高参王槐熙。9月，我镇远军分区和一四九团进行"盘山合围"，歼灭了湘黔公路以北和德明一带土匪。10月"贵州东南绥靖区镇远第一行政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万超被我一八六师部队生擒。各地土匪感到末日开始到来，纷纷退踞边沿山区。杨堃匪部退守巴冶、良上一带；杨秀仁等股匪退缩到顺洞、稿桥的三穗与剑河两县交界地区；"湘黔边区反共游击司令部"第十二纵队、第八纵队一部和杨家谟第一纵队等匪部都麇集到雪洞、绞强、款场等湘黔交界边沿山区。

六、铁壁合围，全歼土匪

1950年9月以后，剿匪进入最后阶段。

8月，贵州军区东集团部队进行"余瓮湄"合围，接着开展"石岑合围"。

9月，我六十二军一八六师入黔助剿，"雷山合围"开始，10月

"雷山合围"结束，歼匪谢世钦以下7000余人。同月，镇远军分区开始"盘山合围"，11月结束，歼匪左德权以下800余人，肃清了三穗境内的德明、盘山及湘黔公路以北地区土匪。同月，一八六师进入剑河、榕江，进行"剑郎合围"，歼匪杨体仁以下6000余人。此时三穗境内土匪已处于孤立境地，绝大部分都麇集在湘黔边界的边沿山区。杨量、杨秀仁等匪部见势不好，早已逃窜天柱。11月底，镇远军分区的"新民乡合围"结束，立即转兵东进，准备歼灭湘黔边区的残匪。

盘踞湘黔边界雪洞、凉伞地区的残匪是杨永清、姚大榜的"湘黔边区反共游击司令部"。它包括从芷江、新晃、会同、玉屏、三穗、镇远、岑巩、天柱等地逃窜出来的残匪，共计5000余人。这5000多人占据湘黔公路和桂穗公路之间的雪洞乡、海山乡、橙寨乡、凉伞乡、黄雷乡、新寨乡、中寨乡、贡溪乡和天堂乡这一三角地带，面积达600多平方公里，人口5万余人。

12月7日，湘黔两省参战部队24个连和各县、区地方武装、民兵3000多人，分12路向"雪凉"地区疾进。18日，各路全面打响。其余地区，我军所向披靡，土匪望风逃窜。

经过短短几天战斗，"雪凉"地区残匪全部被我军围歼。接着各路部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农村人民政权，开展肃清残匪运动。经过20来天的战斗，共歼土匪5828名，缴枪1959枝，各种物品数千件。

1950年底，"雪凉合围"结束，全县土匪除了个别逃亡在外，其余全部被歼。计歼土匪2500多名，缴枪1424枝，子弹数万发，战马30匹，电话机6部，其他物资数千件。取得了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麻江土匪暴乱纪略

姜克俊　梁勤之

（一）

1949年11月14日，麻江解放。但是一批潜伏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勾结各地恶霸势力，组织武装土匪进行暴乱，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

据当时县公安局侦察，从1949年12月中旬就发现一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开始组织土匪，策划武装暴乱的阴谋活动。这些土匪暴乱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麻江县县长艾玉章，根据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的密令进行了一系列的应变部署。1949年7月，艾将全县划分为4个联防区，委派周志云、王星亮、张慕斌、罗伯雄、罗泽波、彭博渊等人任联防主任，各乡以自卫班为骨干组成防剿大队，并推定刘耀南为丹、麻边区联防主任，徐刚柔为炉、麻、丹、雷边区联防主任。并积极培训“反共”游击骨干。

同年8月至11月，先后分三批选送艾玉章（县长）、马绍光（副总队长）、周志云（联防主任）、周远扬（督练主任）、徐刚柔、罗毓先（防剿大队长）、张慕斌（联防主任）等9人参加贵州省“自卫干部训练团”受训。8月15日，组成县“反共救国动员委员会”，艾玉章任主任，甘瀑声、陈玉楼任副主任，委员118人，拟

定了该组织规程（13条），该会任务是：①加强反共宣传；②实施应变措施；③实现所谓“反共救国”之目的。

同年10月，艾召开应变会议，制定应变计划10条，准备以平山（县城东约两公里远处）作为所谓游击根据地，并命令各乡镇自卫队和联防组织进入待令状态，企图阻挠解放军胜利进军，为麻江土匪暴乱打下了组织基础。

二、这些反动势力及股匪寄希望于雷山匪首谢世钦，他们相互串连，拜把盟誓，结帮为匪，并胁迫群众为匪，扩大匪势。

三、部分叛军和少数留用乡长投靠土匪，成为土匪骨干。如叛军万世炯部团长苏戴平和营长曾德良从都镁叛变后，将叛军带到麻江毕架，加入白焕文匪部；又诗乡乡长刘仕炯（留用）叛变为匪后任戴树琪匪部副司令；下司区武装区队排长周培基绑架该队指导员，带兵8名，携枪8枝投靠匪首周志云，充当土匪八十一支队长。

全县较大的股匪计有：

白焕文匪部。白焕文又名白衍，麻江县毕架乡人，曾任国民党师长、军统特务、县反共救国委员会委员，乘解放初期人心未定之机，勾结军统特务欧德安（又名欧亚），网络叛军团长苏戴平等于1949年12月在笔架、琅琊山一带组织土匪，自称“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东南绥靖区游击总司令部”，白任总司令，欧任副总司令，有5个区司令部（其中有4个属都匀境辖），直辖第三区司令部，下设7个支队，49个大队，93个中队。中队副以上骨干400多人。活动于麻江的宣威、笔架、下司等地。

周志云匪部。周志云，麻江城关人，毕业于中央军校高教班，曾任远征军营长，麻江三青团干事兼股长，中学军训教官，县“反共救国委员会委员”，军统特务。1949年12月串连组织土匪，1950年元月投靠匪首谢世钦，号称“贵州省东南绥靖区第九纵队司令部”，周任司令，马定远任副司令，下设8个支队，29个大队，

65 个中队，有中队副以上骨干 520 余人，活动于我县下司、铜鼓、回龙、宣威等地，在下司盘踞时间最长，危害最严重。

尹涛匪部。尹涛，麻江谷硐人，曾当过国民党军队连长，谷硐乡乡长，县自卫总队常备队长，1949 年 12 月中旬召集张慕斌等 80 余人在景阳乡坳羊吃生鸡血酒，组织土匪，首先到福泉黄丝抢劫汽车，扩大匪势。1950 年元月，投靠匪首谢世钦，被委任为团长，下设 4 个营，6 个大队，有中队副以上骨干 90 多人，枪 300 余枝。活动于二区（今谷硐区）五乡，曾参与攻打县城。

陈国英匪部。陈国英，大乡人（大中乡今属凯里，当时属麻江辖），1950 年初投靠匪首谢世钦，先任三六三团一营营长，后提任副团长、代理团长。回大中、舟溪后，直接管辖原罗毓春匪辖的麻江、炉山、雷山、丹寨 4 县情报联络站，辖一个支队两个大队，有中队副以上骨干 250 多人，活动于大中、铜鼓、白午等地。

戴树琪匪部。戴树琪，福泉凤山人，1949 年 12 月在苗山组织土匪，后投靠匪首谢世钦，任第三纵队十一总队司令。设 4 个处，12 个支队，22 个大队，有中队副以上骨干 190 多人，活动于麻江新牌、碧波、又诗、良田、小堡等地。

罗飞雄匪部。罗飞雄，乐坪乡慈姑冲人，县“反共救国委员会”委员，1950 年元月在慈姑冲组织土匪，自称“曹总部第十一师”，罗任师长，下设 4 个团，13 个营，有中队副以上骨干 30 多人，活动于乐坪、坝芒等地。

据统计，全县共有大小股 15 起，被裹胁为匪的群众达数千人。

（二）

匪势猖獗时，匪首周志云、白焕文、尹涛等于 1950 年 2 月 16 日和 26 日，组织 3000 余人，围攻县城两次。全县 16 个乡镇，仅有县城和下司以及少数交通沿线村寨归人民政府掌握，其余 14 个

乡镇均先后被土匪攻占。土匪袭击我人民解放军数十次，大肆残杀我县党政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据统计，惨遭杀害的我县党政干部有马清本（区长）、贾俊卿（区长）、王成芳（乡长）等13名，在剿匪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有孙文山（连长）等29名；被土匪残杀的农会积极分子和群众81名。有一些过往客商被杀还未统计在内。其手段之残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有的被杀后挖去眼睛，有的被开肠破肚，有的被砍为几大块。土匪攻占区、乡政府后公开抢劫粮食，据统计约百余万斤；还抢劫我军运输车辆和商车数十次。周志云匪部抢劫铜鼓乡赵德敏家，得大洋12000多元。土匪为了强化反动统治，将党、政、军、特揉为一体。1950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在大中建立土匪“麻江县政府”，第九纵队司令周志云任县长，吴燕斌任副县长。将土匪武装统一编组，准备开展“秋征”。由于我驻军及时进剿，才使这个土匪县政府于同年七月初八宣告夭折。

（三）

土匪暴乱的种种罪行，激起全县干部、驻军和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麻江县委、县人民政府遵循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剿匪的指示，于1950年元月16日发布剿匪通令，指出：“人民政府为了保护全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愿与我县人民团结一致，完成以下工作：一、坚决消灭匪特。二、组织联防……我县人民积极武装起来，联防站岗、放哨、肃清土匪。三、以乡镇为单位组织人民剿匪指挥部，并组织十人或十五人之半脱产自卫队，由各乡镇长领导和指挥全乡镇剿匪工作。”从此，我县驻军依靠各级政府，发动群众，开始对土匪武装组织进行有力的围剿。1950年7月，贵州省军区东集团首先打响了都（匀）、麻（江）、贵（定）剿匪战役。此役尹涛、罗飞雄匪部大部分被击溃，尹涛只身逃回雷山谢

世钦老巢。同年9月2日，我一八六师4个团万余名干战奉命助剿，采取铁壁合围，重点突破，力争全歼的方针，集中主力沿下司向凯里、雷山挺进。周志云匪部撤至大中，妄图阻击。后来一触即溃，只剩少数匪首逃匿深山。同年10月，都匀地委再调五十一师一五二团和一五三团一部到麻江谷硐地区杀回马枪，历时10天，全部收复二区5个乡，捕获匪中队长以上骨干37名，缴获铁炮3门，步枪220枝。

在军事围剿取得节节胜利的鼓舞下，麻江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指示各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号召土匪、反革命分子自首登记。据下司、谷硐、宣威3个区1950年底统计，自首悔过的土匪近2000名，收缴各类枪支1088枝，子弹8300多发，轻重机枪2挺，土炮1门。

匪司令戴树琪和副司令刘仕炯在凯里被我俘获。匪团长陈国英在福泉被捕获归案。匪团长尹涛化名后潜逃回景阳被农会抓获。九纵队司令周志云躲在碧波朝阳山洞中被我围剿，开枪自杀未死，后被活捉。副司令马定远被公安机关捕获。匪八十一支队长周培基逃到湖南被民兵抓获。匪副县长吴燕斌，潜逃武汉、上海后被捕获。匪司令白焕文假自首落入法网。这些十恶不赦的匪首先后受到国家法律和人民的严正惩处。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回忆锦屏解放初期的土匪叛乱

张武云　刘月卿

锦屏是贵州省苗族侗族聚居县之一，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部，它东临湖南省的靖县，西靠剑河县，北接天柱县，南邻黎平县。

1949年11月初，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进入贵州，首先解放了黔东南地区的三穗、镇远等县。4日，解放了天柱县城，不久，又解放了靠近锦屏县的水陆交通要道远口。锦屏的地方反动势力和国民党残余惊恐万状。其代表人物王止善、龙俊生、龙运涛、王仁杰、王选才等深感大势所趋，暂时伪装起来，唱起了和平解放的高调。这个县的国民党县长吴昆是一位比较有远识的人，他召集锦屏的地方绅士开会，商量锦屏将要解放的形势。经过协商议定：第一，成立锦屏县治安维持会，推举龙运涛为治安维持会的主任委员；第二，吴昆先生把县印交给维持会，由维持会暂时行使临时地方权力；第三，选派代表准备与解放军谈判和平解放锦屏事宜。经过协商推举了王先平、文蔚锐为代表。

12月底，我镇远军分区司令员曾宪辉带领部队来到了天柱县的远口。1950年1月5日（或6日），王先平，文蔚锐到远口向曾宪辉表达了要求和平解放锦屏的所谓“诚意”。1月7日，曾宪辉司令员带领部队前往锦屏进行接管工作，于1月12日在锦屏召开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群众大会，曾宪辉在会上讲了话，郑重宣布锦屏从此解放。

正当我们的干部分配下去不久，接管和征收公粮的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出现了全县性的土匪大叛乱。3月12日深夜，驻县城的县基干大队（原锦屏保警队，400多人，10挺机枪）在国民党特务、匪首龙俊生等人的密谋策划下，由土匪头子胡朝明、杨治庭亲自指挥拉出县城，当夜占领了大同、卦治、平略等乡；与此同时，这个县多数乡的旧乡长也带领乡丁和地主武装叛乱。他们的统一反革命暴乱口号是："猪油涨价！"

锦屏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锦屏是有名的"模范县"。解放前夕，龙俊生（曾任国民党团长、锦屏民卫总队副总队长，叛乱后任土匪司令、匪锦屏县长）、王止善（曾任国民党团长、参谋长、匪锦屏县长）亲自到贵阳请示谷正伦，谷正伦向他们面授机宜："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上山打游击。"离开贵阳时，谷正伦还亲自赠送给龙俊生一枝手枪，以鼓励他们与人民为敌到底。在酝酿锦屏和平解放时，龙俊生、王止善、龙运涛、杨治鹏、王仁杰、王先平、龙文正、胡朝明等，对我制定了"小炮（鞭炮）迎进来，大炮轰出去"的反革命计划。文、王去远口后，龙俊生曾把县民卫总队拉出县城，驻扎在赤溪平，作了"万一谈不成，解放军来了就打"的准备。3月8日（即叛乱前4天），王止善、龙俊生、王选才、杨之鹏等看到机会已到，便在锦屏中学召开了有20多人参加的叛乱会，制定了"江西留（指江西来的干部），北方杀（指北方老干部）"的反革命策略。还确定马上把天柱匪首罗义忠、湖南匪首方世雄勾结来，集结匪众，攻打占领我锦屏县城，杀害我区乡干部。土匪暴乱后，我们在县机关的同志也面临着险恶的形势。我们共有51人，分到乡下去38人，县机关只留下13人，其中还有2个病号。土匪叛乱后，锦屏县城的空气异常紧张起来，老百姓看到我们不象过去那样亲热了，商号也无心思做生意了。一些经过我们工作发动起来的积极分子，则悄悄地劝说我们赶快离开锦屏。我们对此进行了认真讨论，最

后决定：第一，千方百计营救我们的同志。当时县通往各区乡的电话已被敌人切断，用电话营救同志们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以县长名义召集有上层人物和当时还没有参加叛乱的地方武装头目参加的会议。张武云同志在会上讲了全国的大好形势，介绍了锦屏土匪叛乱的情况。向大家指出国民党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搞反革命暴乱只能是自取灭亡。要求大家帮助我们营救在乡下的同志。经过大家讨论，商定以县长张武云的名义，给各点上的同志写信，由他们找可靠人送出。为了不被叛匪发现，采用竹筒子装信的办法，除了送往敦寨乡、新化乡和亮司乡的信被土匪搜去外，其他各乡都收到我们写去的信。乡下的同志收到信后，有的撤了出来，有的来不及撤则隐蔽了起来。二是为了保险起见，由在三江镇作工作的孙芳明找了一些积极分子，从另一个渠道送信。这些信多数同志也收到了。第二，将锦屏土匪叛乱的情况报告给上级的部队，我们给中共天柱县委写了信。请他们将锦屏土匪叛乱的情况向中共镇远地委汇报。我们还向驻远口的我五十师一四九团写了信，请派部队来营救我们的同志。他们接到信后，就立即派部队出发，到茅坪时得知我们已撤走就回去了。第三，将我们带去的银元和人民币隐藏起来。接管锦屏时，我们带有400元大洋和数十万人民币。除了随身带走少部分大洋外，将其余的大洋埋在了县府背后的猪圈里，请积极分子文宏祥用船将人民币运到卦治乡隐藏起来。第四，召开县政府所有的旧人员会（一些上层人物也参加了这个会），张武云同志向大家讲了话，宣传了党对旧职人员的政策，希望他们认清形势，不要上敌人的当。

我们把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在县机关的这10多个同志怎么办呢？锦屏县城特别是县府所处的位置，一半临水，一半靠山，我们除了13个人外，还有2个班的解放军。这2个班的指挥员（连指导员）正在发虐疾，坚守县府于我们不

利，遂决定撤到大凉亭山上去。这座山有一个破碉堡，山下就是通往天柱的交通要道。部队2个班，部署在旧警察所的碉堡里，这里隔路相望就是通往大凉亭的山路。3月13日晚7时以后，我们撤离县府。那天，牛毛细雨下个不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4米以外就辨别不清人的面目。我们到达山顶后马上作了布防，一半人休息，一半人警戒，随时准备战斗。零时以后，撤退出来的一区委书记朱学周带着通讯员曾光明也来到了大凉亭。那一夜除了周围有土匪放冷枪外，没有发生意外情况。

拂晓，雨停了下来。张武云同志提出他先下山回县府。为了以防万一，他和警卫员志景龙先下去，如情况没变化大家再下山。当他们快到山脚时，就被敌人发现了，这时我们山下边的2个班就与敌人接上了火。这时大家提出下山去接县长的要求。最后李之平，刘月卿跑步下山把张武云接了上来。就在这时，匪首龙俊生与其勾结的天柱县匪首罗义忠，湖南匪首方世雄，指挥着1300多名土匪向我们扑来。因为寡不敌众，我们朝天柱的高酿方向撤去，晚7时到达中共高酿区委所在地。

土匪占领了锦屏县城。16日“黔东南绥靖区司令”龙俊生在锦屏县城召开了“光复会”，“委任”特务王止善为锦屏“县长”。不久，龙俊生又把王止善赶跑，自任“县长”。龙俊生当了一个月的“县长”，怕他的“军权”丢掉，又叫王选才当“县长”。8月1日军统特务王仁杰勾结黔东大匪首杨金标把龙俊生赶出县城，先是自己当“县长”，后又把“县长”让给了龙运涛、龙天衢。在土匪占领锦屏7个多月的时间里，可以说“县长”成灾，“司令”成群，至于“支队长”、“中队长”则更是多如牛毛。

锦屏又陷入苦难的深渊。天不黑，老百姓早就关了门；天大亮还不敢开门。这些匪徒今天要“安家费”，明天要“服装费”，后天又要“兵源费”。他们在大街上到处设赌场，桌子摞桌子（有的摞3张八仙桌）坐在上面赌博。每到夜间，匪徒们以抓“共产嫌

疑”为名，到处抢劫老百姓的东西，强奸妇女。三江镇一青年妇女，被土匪抢到卫生院背后的碉堡里，轮奸了一个多星期才放回。有钱者得活命，无钱者被杀头。匪首龙俊生一次就下令枪杀了吴英、曾长发、谢中惠3个无辜百姓。农民刘树青曾当过农民代表，土匪“县长”王仁杰说他“赤化”了。为了保住性命，他不得不逃住在山洞里，最后将家中仅有的一条黄牛卖掉才买了一条命。青年杨世显曾宣传过“约法八章”，土匪以“共产探子”把他关进了牢房，整得死去活来，最后求亲借友搞了80元大洋才保住了性命。

在土匪叛乱中被杀害的我方人员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孙瑞民、民政科长康阜、区委副书记周金庆、区长刘书善、区委副组织委员李荣亭，区助理员王登岭、尚存养、刘云之，工作员孙景寅、倪光强，炊事员王月亮等。这些牺牲的同志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大义凛然，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3月13日早晨8点钟，驻亮司工作组的正在吃饭，旧敦寨乡长、土匪支队长龙景昌带着30多个土匪隐藏在亮司寨子里；由惯匪龙步高伪装成贫苦农民，一手拿着1米长的烟杆，一手拿着要求减少公粮任务的“呈子”，装成为民请愿的样子进屋就向康阜同志下跪，口称：“我们干人（穷人）没得饭吃，请科长减免征粮……。”康阜同志看穿了这个家伙不是好人，所以没有理他，就在另一个同志接他交的“呈子”时，这个坏蛋一步跨到墙边，将康阜同志挂在墙上的驳壳枪抢了过去，康阜同志一看情况不好，立即掏出了随身带的另一枝手枪，当他举枪射击时，6个土匪从门外一拥而上，把他的胳膊举了起来，致使所射击的子弹都打在房顶上，康阜同志壮烈牺牲。在亮司牺牲的还有孙瑞民、尚存养、王月亮同志，他们都是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下牺牲的。

3月12日，是敦寨赶场天，任敦寨区区长的刘书善同志尽管发着高烧，但仍然在场上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晚上，他和一名通讯员以及一名工作员住在敦寨乡蟑螂坡碉堡里。夜间，张老毛、

杨西保、陈福善、张老相等30多个土匪，在旧乡长龙景昌的指挥下，把碉堡包围了起来，并不断打枪，妄图把他引诱出来杀害，刘书善同志没有上当。第二天早晨，刘书善同志去接待室工作，在他洗脸时，土匪张老毛用匕首将他的右手刺伤，埋伏的匪众将他拦腰抱住。刘书善同志用患重病的身子，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与土匪进行了英勇的搏斗，最后落到土匪手中。旧乡长龙景昌有敦寨开了“庆祝会”，大肆喧嚷“捉住了共产党的大官”，报告给他们的主子、匪首龙俊生，并根据龙俊生的命令，把刘书善同志送到县城，关在县政府的监狱里。

和刘书善同志一起关在监狱的还有李荣亭同志。李荣亭同志在锦屏一区任区委副组织委员，分配在平略乡工作。3月13日，李荣亭同志去八洋征收公粮回平略乡公所时，被埋伏起来的土匪杨胜英、杨再辉袭击而被捕。匪徒们在平略乡公所对李荣亭同志折磨了三天后，也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大官”而押送到县监狱。

刘书善、李荣亭同志在狱中与匪徒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敌人施用的各种酷刑面前毫不畏惧。他们怒斥这些与人民为敌的匪徒。刘书善同志为了鼓励大家（在监狱里还关有一些所谓“同情共匪”的无辜群众和几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同志）的斗志，向大家宣传毛泽东同志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全国解放后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敌人用了硬的又来软的。在匪县长王止善、匪司令龙俊生的策划下，成立了一个“政工处”，由特务文启凤任“政工处长”。找了一些锦屏县城的女学生，组织成“政工宣传队”，要她们带着手风琴和“三民主义”书，每天到监狱给大家唱国民党的“党歌”，讲“三民主义救中国”。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敌人无计可施了，3月20日匪首龙俊生穷凶极恶地下令杀害刘书善、李荣亭同志。刘书善、李荣亭同志深知为革命献身的时刻到了，他们视死如归，不断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使匪徒们吓破了胆。他们慌忙用一

根30公分长、鸡蛋样粗的木棍横捆在刘书善同志的嘴上，又用一团烂布死死地塞进李荣亭同志嘴里，第二次将他们拉了出去。刘书善、李荣亭同志就这样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面。

周金庆同志是在新化乡牺牲的，当时在新化乡工作的还有王登岭、刘云之、孙景寅同志。3月13日，周金庆同志在新化乡公所搞征粮工作，其他三位同志都到保里工作去了。中午吃饭时，周金庆同志在孤立无援、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落入魔爪。敌人抓到周金庆同志以后，旧乡长张启堂以“周区长要开会”为名，设下圈套叫乡丁“通知”其他3位同志回乡公所。刘云之同志得到“通知”后，还没有走到乡公所就被埋伏的敌人抓到了。周金庆、刘云之同志在新化乡公所关了两天多，于3月15日拂晓被杀害在黄家山。周金庆同志牺牲时，大义凛然，义正词严，痛斥这些无耻的匪徒，他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死的，我可以先死，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些匪徒们，你们的末日很快就会到来！”他还高声朗诵夏明翰烈士“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的就义诗句，最后和刘云之同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就义。

和周金庆、刘云之同志在同一天牺牲的还有王登岭、孙景寅同志。3月13日，他们分别接到了所谓周区长要他们回新化乡公所开会的“通知”。王登岭同志接到的“通知”在先，他先到他睡觉的屋子里，发现屋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立刻预感到情况有了急剧的变化，马上抽出枪来打了两枪就冲了出去。当他到了离映寨4里的地方时，正看见孙景寅同志向新化方向走，于是他一面向孙景寅同志打手势，示意他赶快离开新化；一面还击身后追赶的敌人。他们二人汇合后，请了一个老乡带路，迅速朝着平察乡的方向走去。走了一天，终于到了平察乡。平察是锦屏最边远的一个乡，历来有土匪活动。这个乡有个号称“四大天王”之一的黄贵山，身边拥有一股土匪。他们发现王登岭、孙景寅同志

后，立即开枪射击，王登岭、孙景寅同志英勇地进行了战斗，最后，子弹打光，壮烈牺牲。

锦屏土匪叛乱期间，英勇牺牲的还有倪光强同志。3月12日晚，在小江负责征粮工作的郭云端同志接到了我们的信后，就找到倪光强同志，于13日回县。他们到达县城时，土匪已占了县城。在县府的背后遭到了土匪的伏击，郭云端、倪光强同志与匪首胡朝明指挥的土匪进行了英勇战斗，在战斗中倪光强同志不幸中弹牺牲，郭云端同志突围了出去。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土匪叛乱的日子里，锦屏各兄弟民族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们的同志。他们有的卖掉自己唯一的几亩田，把我们的同志从魔掌中救了出来；有的卖掉心爱的耕牛作为生活费把我们的同志养起来；有的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件破衣服脱下来给我们的同志穿。农妇陶玉兰和丈夫杨大掌把工作员田同志藏在自己家里，后来被土匪头子龙景昌发现了，陶玉兰就将田同志藏在牛圈里，先用稻草将他盖上，再用牛屎盖在稻草的上边，匪徒们要她把解放军交出来，她坚决不交，这群土匪就对她和她的丈夫施用了毒刑。土匪们先用绳子将陶玉兰的一只手和一只脚捆上吊起来，名曰吊“半边猪”，又把杨大掌的两个大姆指捆起中间加竹契子，名曰“破头箭”，但陶玉兰和杨大掌忍着极大的痛苦没有把我们的同志交给土匪，最后被勒索去40元大洋了事。陈孝迪被一个贫苦农民保护了起来，当被附近村里的一个人“告发”后，又把他藏在岩洞里，后来把仅有的3亩田卖掉，不够又求亲友借，凑了几十元大洋，交给旧乡长后，才把陈孝迪同志放了出来。

1950年12月18日，锦屏第二次解放。消灭土匪2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龙俊生、王止善、杨之鹏、王仁杰、龙运涛等一大批匪首纷纷落入人民的法网。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捣毁黔北大匪穴李家寨

黄永龙

李家寨是黔北地区最大的土匪老巢之一。该寨位于习水县南部的黄泥堂乡，与仁怀、赤水两县交界，座落于海拔1400多米的高地，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东、西、北3面是高200米左右的峭壁悬岩，南面是60度左右的陡坡，向下延伸1000多米，蜿蜒的小径从半坡横穿而过；南面两侧，沿山埂有两条2尺余宽的石梯路，直通大寨南门。

李家寨有三道防护墙，墙厚1.5米，高10米，寨门厚1尺许，门面钉有铁皮，寨外周围有阎王刺，倒挂刺等附墙而生，盘根错节，交织如网，人畜难近寨墙，墙上约3米之高处，射孔密布；在第三道防护墙上有一岗楼，可掩护三道寨门，确有一夫档关，万夫莫敌之险；西北角有一石砌碉堡，可容数十名士兵。

进第三道寨门，是一块长约120米、宽约10米的大草坪，草坪过后正面是大厅，左右两侧，是李正科的住房，后面是李正开的住房，寨内最高处是寨主李德三的斋堂，亦称紫云堂。紫云堂下面是掘土砌成的石拱道，暗通寨外秘密小路。李家寨内还专设有兵房、弹药房、粮仓、招待所、马棚、猪栏、蓄水池等。

1949年农历十月初，遵义解放，国民党遵义专员卢杰收集人马向黔北边区习、仁、赤3县边境溃退，企图以李家寨为据点，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此时李家寨群魔毕集，寨主李德三在上峰的授意下，建立了“兴隆反共委员会”，委李正开为主任委员，李正

科为副主任委员，宣传委员有黄绍良、张荣州，邓栋才等，他们在寨子附近的鞍龙山歃血盟誓，密谋反共到底。

1950年3月初，卢杰、蔡维新、戚文彬（川匪司令），先后溜到李家寨。他们称李家寨为“保险寨”、“安全寨”、“小台湾”。

卢杰把持李家寨后，暗中操纵各股土匪，坐地指挥，组织了川黔边区各县股匪“联合办事处”，自命为“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委任魏文青为第三纵队司令；张华清为第四纵队司令；李正开为第六纵队司令；韦映辉为第八纵队司令；冯友伦为第十纵队司令；何海荣为第十二纵队司令；杜伯符充任情报处长，袁明德充任人事处长；陈光正充任经济处长；李正科充任外交联络处长。卢杰亲笔从“司令”委任到连排长，委任状加盖“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印章。卢杰大肆散布谣言“柳州已经收复”，“美军登陆，上海已被占领，我们大有希望”。

3月底，李正开参加了官店沙溪的土匪会议，商议先攻打东皇、温水，因弹药不足，戚文彬怕得不偿失而不愿出兵，卢杰为此专程到川黔边界联络各股土匪，回来后即倾巢而出攻打仁怀县城。

李正开从李家寨出发，经二里、观摩，冯家嘴，三合到水圹，沿途扩充队伍。在观摩陈松柏处，搬了一门用10多人换抬的土炮，每炮装两升火药（重约16市斤），在观摩大河场放了一炮，以振军心。到冯家嘴扩充队伍后（一路集中了500余人），又放了一炮。

李正开匪部刚到水圹，即与从县城赶来剿匪的解放军部队遭遇，刚接上了火，匪众一听有嘎嘎嘎的机枪声和轰轰的迫击炮声，心惊胆颤，各奔逃生，土炮抬到簸箕坝时，为了轻装逃命，丢了土炮就跑。

卢杰、蔡维新、戚文彬、田华宾及桐梓、古蔺等地汇合的土匪2000余人，冲入了茅台镇，但心虚胆怯，不敢久留，即返回原地。

当天晚上，解放军渡河反攻，匪众见来势凶猛，不敢抵抗，连夜退回几十里，从沙坝过河，经二郎返回桑木和李家寨驻扎。

当群匪返至桑木垭集中时，卢杰主持召开大会，进行整编，增设了特务营，委任冷彬武为特务营长，罗跃艰、周树荣为连长，妄图凭借山寨之险与我军继续对峙。

1950年8月18日，李正开派人鸣锣通知，煽惑群众，说什么"共军要来打寨，杀进来鸡犬不留！""大家一定要沉住气凭险守御，不要乱跑，才能保住自己的妻室儿女。"又胡说什么"李家寨是天生险要，粮食械弹充足，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军是攻不进来的。"

8月21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和五排清扫了桑木的残匪后，到了李家寨，分别驻扎在靠近李家寨的兴隆场街上张少武家和锁口寺庙内。

22日早晨，解放军部队首长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后，托人到李家寨送劝降信。叫芦、李等人缴械投诚，悔过自新，谆谆告诫他们，不要执迷不悟，自贻伊戚。土匪叫来人捎了回书带回。这种文字上的谈判，曾来回三次。解放军首长信上指出："凡投诚者，保护全家安全，负隅顽抗者，一定予以歼灭！"

李正开召集寨内班排长会议，横下了心，准备孤注一掷。李正开还到营门楼上，给土匪们打气："你们要沉着气，不要怕，到了紧急关头，外面自然会有人来援助我们的。现在二里场的张银久，习水的任栋梁，火焰的邓清恒，他们都已整装待发，将来我们内外夹攻，还能稳操胜算……"

23日上午，李正开站在紫云堂左侧的岗楼上，用土望远镜观察解放军的动静，被我解放军"砰"的一枪，击中了他的右嘴角。

我军围攻李家寨数日，群匪拒不投降，遂请示团部派炮兵增援，协助攻击。

24日，团里派来了迫击炮排，协助步兵攻击。四班副班长宋常志登山侦察敌情，确定炮位，行至乡公所拐角处，被寨内岗楼

上发现目标，不幸中弹牺牲。

卢杰、李正开为了收买人心，每人发一块银元，并杀猪慰劳，李正开还狂妄地说："壬戌年（1922年）1000多狂徒来围攻李家寨40多天，都没有打进来，现在，共军不过一二百人，人少势单，我们怕什么！待他们人疲粮尽，自然不战自退。"

为了振作"军威"，李正开命部下抬出大炮，（亦称罐子炮、遍山炮、鬼炮），长七八尺，直口径4寸，每炮可装10斤火药，向街上放了一炮，轰的一声震得天摇地动，可是，炮口震裂，成了废铁。

25日10时许，解放军在离寨门右侧约500米的地方，架了一门平射炮对准寨门；在朱家坡山埂半腰距寨约400米处的黄瓜垭口，架的是八二迫击炮和六〇小炮，构成了一个锐角三角形的炮兵阵地。几挺重机枪架在郑家屋角一带，五连的一个主力排，隐蔽在石鹅洞的高石桩，居高临下，密切监视外围土匪的动向。八连尖刀班，抬着云梯，秘密运动到距第一道寨门约50米处的土坎下隐蔽，准备攻寨。

12时许，部队首长下达了总攻命令，三颗红、绿、黄的信号弹从兴隆场的新街升上天空。顿时，炮火齐发，震天动地炸得土匪鬼哭狼嚎，血肉横飞。重机枪吐着火舌，压得南门岗楼上的敌人抬不起头来。尖刀班在班长韩炳银的率领下，抬着着云梯，冒着弹雨，向寨门冲去。

云梯在南门右侧竖起，副班长罗义和急速爬将上去，但还未翻上寨墙，就被匪人用乱石，木桩打了下来，与此同时，寨门右侧那门平射炮的插销突然断了，停止了轰击，幸亏战士们急中生智，用"铁钉"代替，大炮很快又发挥了威力。战士们第二次竖起云梯，仍被匪人打倒下来。但在我军大炮轰击下，寨内水池被炸垮，房屋着火，顿时浓烟笼罩，烈焰腾空，群匪焦头烂额，东躲西窜，乱成一团，一部分匪徒用粪池里的清粪扑灭了南门岗楼

上的烈火，粪坑舀干后，匪徒又利用它来作掩体，用火力封锁第三道寨门。匪部主力逐渐转移到紫云堂高地，一挺轻机枪，不停地向下射击。李正科的加强班，固守着寨门左侧，群匪又稳住了阵脚。

我解放军战士夏海清、赵忠相再次把云梯竖起，他俩先后刚一露头，又被密集的弹雨连人带梯打倒下来。

第一道寨墙距第二道寨墙不过2米远近，寨墙之间是岗楼，这是解放军机枪、火箭筒主攻的目标。在强烈火力的掩护下，战士梁敬喜、张焕明、曾树清等再次竖起云梯，先向墙内投掷一排手榴弹，趁匪徒惊慌之际飞越寨墙，向内猛攻，岗楼上的土匪立不住脚，退到10米外的掩体内，用火力封锁寨墙。突击队员第一个翻上墙头，中弹跌了下来，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接连5个战士躺在血泊里。这时，韩炳银用木棍顶着军帽在墙头摇晃，把群匪的火力引向左侧，果然，群匪都向韩班长竖起的“假目标”疯狂扫射。战士张明喜趁机腾身跃起，翻越寨墙，不幸左腿中弹倒进墙内。张明喜侧身卧着，抱起冲锋枪向敌人火力点扫射，把土匪机枪射手周兴顺击毙。

此时，我军的冲锋号响彻云霄，五连、八连分别从南门的左右沿山埂冲上，到南门汇合后，于下午2时许攻破了李家寨。此时天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如注，匪徒们更加晕头转向，直往地道里钻。卢杰不知什么时候，丢下婆娘、儿女、溜之大吉。李正开心慌意乱，寻路逃走，当他转身窜到自己住房的走廊转角，见其弟李正科与张光栋、许洪华等还在负隅顽抗，忙靠进窗户急迫地叫道：“老弟！快，快逃走啊！”李正科哭丧着脸说：“我们走了，这一屋（指父母妻子）怎么办？”李正开焦急地说：“顾不得了！你不走我走了！”说完李正开转身从悬岩预开的一条秘密小路逃跑。受伤的李正科拉了一床棉絮裹在身上，卧在门口，端起枪顽固射击，被躺在寨墙下的战士张明喜发现，对准李正科一梭子弹，李

正科当即一命呜呼。挤在粪坑里的土匪，有的呆若木鸡，有的妄图逃窜，被我战士冲上，一个个束手受擒。

我军见有些土匪向后房奔跑，即跟踪追击，发现了一个地洞，洞内男女混杂，龟缩在一起。战士们端着冲锋枪高喊："举起手来！投降不杀！"卢杰的老婆却在洞内煽动说："投降就是自己送死！"战士们见洞内群匪蠢蠢欲动，即向洞口上空发射几枪，洞内的土匪哀声求饶，连喊："打不得，打不得啊！"匪部第十八纵队司令杜甘堂和参谋长李世朝从洞内走出，举手投降。

当我军攻上最高点"紫云堂"时，78岁的李德三还坐在菩萨面前敲着木鱼虔诚念经求菩萨保祐。我军战士将他与俘虏一道解回。

跳岩而逃的土匪，有的摔死，有的跌伤，有的被挟死在树枝上。

这次战斗结束，共击毙匪徒110余人，俘虏75人，缴获轻机枪1挺，各种枪支118支，子弹几千发，手榴弹10箱，电台1部。

（贵州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雪、凉合围”第一仗

袁宗武

1950年12月8日清晨，我分直侦察连向盘踞在雪洞地区的数百名土匪发起了猛烈进攻，打响了“雪凉合围”第一枪。接着各部队分成数路向湖南的凉伞发动了攻击，方圆300余里的“雪凉合围”全面展开了。

一、连夜奔袭

1950年11月底，我们侦察连结束了对镇远金堡地区的土匪合围以后，转移到三穗颇洞进行休整。大约休整了一个星期，就接到镇远军分区前线剿匪指挥部（以下简称“前指”）的命令，参加对雪洞、凉伞的合围战斗，具体任务是打雪洞。

雪洞，位于三穗东部，与湖南的凉伞三角地带连成一片。山高岭大，交通不便，自从五、六月份土匪在这里盘踞以后，烧杀抢劫，抓兵派款，挖战壕，筑碉堡，妄图把雪洞变成他们的反革命堡垒。这里的土匪约有五六百人，其中有的是几次逃出我合围圈的匪首，非常狡猾、顽固。他们除了步枪，还有5挺轻机枪，都掌握在匪司令周治权、杨汉章和匪支队长魏德茂（绰号“猫客”）几个头目手里。他们自吹雪洞为攻不破的“小台湾”。

12月7日下午大约4点钟，我们从颇洞出发，来到三穗时，赶场的人几乎散尽。天快黑下来了。我催促部队加速前进，争取在

半夜一点钟以前赶到桐林，接受任务。

我们离开县城，来到黄土坎时，巧遇一个赶场的人，他见了我，首先问道："同志，你们是去打雪洞吗？""不，我们是去桐林！"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我没有把真实意图告诉他。

"莫哄我，你们是去雪洞，我帮你们带路！我熟，那里有我的亲戚，经常来往，还带解放军去打过雪洞。"

我经回忆，隐约记得过去在工作中与他接触过。他叫宋启烈，烧巴人，是我们的民兵。于是我问："你去了，家里放心吗？"

"不要紧的。"他回答说。"好，那就同我们去吧！""我有一个要求，打完后要送我一枝好枪！"我便利落地点头说："打完了仗由你挑选。"他高兴地笑了。

我与宋启烈边走边谈，不觉来到烧巴。此时，天早已黑尽。战士们以每小时12里的速度前进，大约午夜1点钟到达桐林。

部队到达桐林，大家原地休息。连以上的干部到"前指"开会。"前指"临时设在桐林区政府（吴家祠堂里）。会议桌上摆着一盏小马灯，透过马灯的灯光，我看见曾司令员、段副政委等几个首长都在，还有七连、九连和区政府的负责人。会议上曾司令首先说："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合围雪洞、凉伞。这个地区集中了三省七县的土匪三四千人，他们自称为'小台湾'。雪洞有五六百土匪，匪首也比较多，除了步枪，还有5挺轻机枪。主攻雪洞的任务交给侦察连，七连担任界牌至坪桃一线的堵击，九连到款场龙脚一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连，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这个连从北到南，与敌人作战数十次，比较有经验，而且有贵州籍的战士，当地情况熟悉。装备也比较好，每人一枝卡宾枪、4个小手榴弹，每个班有6枝冲锋枪，每个排有3挺轻机枪和2门六〇炮。

散会后，我们回到连队，曲明耀指导员召开了党支委会，接着又向全连指战员作战前动员。战士们劲头很大，个个磨拳擦掌，

纷纷请战，表示一定打好这一仗！深夜两点钟左右，我们从桐林向雪洞出发了。

二、拂晓攻击

这天是农历十月二十九日，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气候寒冷，路滑难行。行军中有的战士摔了跤，没叫一声苦，又继续前进。我不小心，也掉进了水沟，摔伤了脚，手也擦破了皮，包扎了一下，又跟部队前进。

我们走出半溪沟，又爬了一座大山。我问宋启烈到了什么地方，他说到了撂鸡坡，下了山，就是雪洞。我催促部队加快步伐，飞快下坡，来到雪洞的老寨。

老寨，是在一个小山包上，位于雪洞街的南面，约10多户人家。宋启烈指着前方说："对面是猪场，土匪在上面修有碉堡，战壕直通银寨。"土匪盘踞的地方的确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地。按照在桐林的分工，三排担任尖兵排；我带一个排在右，下了田坎，越过小河，埋伏在碉堡东侧；副连长龚谦让带一个排居中，沿着大路直插雪洞街上；指导员带一个排走左边，越过雪洞下边小河，对土匪进行迂回包围。

东方发白，曙光来临。我尖兵排摸进雪洞街，见一伙土匪还在屋里赌钱。我们巧妙地抓来了2个土匪，摸清了街上和阵地上土匪的布置情况。部队随即向土匪阵地摸去，很快接近了敌人。土匪哨兵发现了我们，放了几枪，就缩进了碉堡。九班班长陈金明冲在最前面，不等后续部队跟上，就带着战士蓝宪坤首先向敌人冲去。当他冲到离敌堡70多米的地方，端着冲锋枪就向敌人的碉堡扫射。这时，敌人集中两挺机枪进行疯狂的还击，封锁我前进的道路，陈金明暴露在敌人阵地面前，不幸被土匪击中倒下。战士蓝宪坤见班长倒下了，端着冲锋枪又想冲上去。我看地形不利，

一面命令他就地隐蔽，一面叫机枪手对准碉堡猛烈射击，又命令炮班班长宋启斌架好六〇炮，对准敌堡揍它几炮。第一炮打在敌堡后面一点，敌人开始恐慌。九班战士急着要上，我示意暂不忙上。宋启斌接着又是两炮，打中敌人碉堡，把敌人的碉堡炸塌了。土匪有的被炸死，有的被炸伤，乱成一团。

土匪只集中火力对付我军的正面攻击，而没顾及其侧面。这时，我迂回部队在机枪掩护下，从侧面上来了。土匪慌忙扔手榴弹，有的抬腿就跑。九班战士端着刺刀，象离弦的箭冲了上去。兰宪坤捷足先登，第一个冲上敌阵，端着冲锋枪对准还来不及逃跑的敌人就是一梭子，一下打倒了10多个匪徒。土匪溃退了。

当我连在街上打响时，七连在十万、坪桃一带也打响了。他们很快歼灭了那里的敌人，迅速占领高地，堵击从街上溃逃的土匪。这时，从碉堡阵地上和从雪洞街上逃出的土匪，几乎汇合到了一处，蜂拥着向平关方向的山沟逃跑。在西面坡上，我一四九团二营三连二排的阻击部队及时对那些逃跑的匪徒射击，打得敌人喊爹叫娘。我们侦察连也居高临下，对着溃逃的土匪猛烈开火。顿时，在阵地上、半坡上及河沟里，打死打伤不少土匪。未被击中的土匪变成了惊弓之鸟，到处躲藏，接着战士们就抓俘虏，追击散匪。

我军一举攻下了敌人吹嘘的“小台湾”雪洞，虽然杨汉章、魏德茂等几个主要匪首漏网了，但击毙匪徒36名，活捉100多名，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数十枝。我叫向导宋启烈去枪堆里挑选了一枝最好的“中正式”步枪，满足了他的要求。

雪洞第二次解放了。

三、活捉杨汉章

我军攻下雪洞后群众主动给我们送信，报告几个匪首逃亡的

方向。特别提供了凉伞大土匪头子杨永清也窜到贵州边境的消息。“前指”对匪首窜逃方向作了分析后，命令我们侦察连在近几天之内，将杨永清、杨汉章等几个主要匪首捉拿归案。

接着，我们进行了分工，指导员带队留雪洞，我和副连长龚谦让挑选了两个精干的班，进行化装，穿上便衣，扛着夹板枪，外出侦察。吃过晚饭，龚谦让带一个班向晃县橙寨、凉伞一带侦察搜捕匪首，我带另一个便衣班向平关方向搜索。

我们班搜索了一夜一天，一无所获。第二天下午6点多钟，来到了镇远县境的一座大山沟边。我们进入村寨，敲了几家门，无人答应，就撤出村外休息，观察动静。

天色渐渐黑下来。隐蔽在树林里的哨兵跑来向我报告，说有个妇人从山沟里来了。我抬头一看，见一个老太婆慌慌张张地向寨子走来，便叫一个贵州籍的战士去问：“大妈，你们这里有九路军过路没有？”（土匪自称九路军）

老太婆反问到：“你问这个做哪样？”“我们被解放军打散了，准备从这里突围出去！”“你们是哪部分的人？”“我们是周司令的人！”那个老太婆见我们都是土匪模样，便信以为真，说：“在背后山上有一个杨大队长，他冷得很，又饿老火了，你们走就带他一起走！”

“这深山老林鬼都没有一个，为哪样不叫他来寨子里烤火，找东西吃？”贵州籍战士气汹汹地说。老太婆说：“他只一个人，怕下山来！”“怕什么，我们又不是外人！”“好，我领你们去找他！”老太婆说完转身就走，我叫两个战士跟上去，稍后我们也跟了上去。我们走了两里多路，来到一道瀑布坎下，沿着毛毛路，攀藤而上，便是一小块平地，平地的那头，用树枝临时搭了一个简单的窝棚。老太婆进去了，只听那个匪首说：“大嫂，你是怎么搞的，把人引到这里来，恐怕要送我的命了。”老太婆忙解释说：“不，他们是周司令的人，找你哩！”因为距离不远，他们讲话我们听得清

楚。贵州籍战士马上接口说："杨大队长，我们几个是周司令的人，准备突出去，特地来找你！"那匪首蹲在山沟里既冷又饿，听说是周司令派人找他，又是本地口音，就出来了，贵州籍战士迎了上去，说："杨大队长，事不宜迟，赶快走吧！"

那个匪首糊糊涂涂地同我们摸了一段黑路。我怕在半路出问题，便用手枪顶住他的背后，大声说："不准动！"两个战士立即上前，用一根结实的葛麻藤将他捆起来。那个"大队长"是个大个子，一副马脸。被捆后他说道："别误会，我是十二纵队副司令杨汉章！""什么司令不司令的，我们是解放军！正在找你呢。"我厉声地说。

杨汉章这条狡猾的狐狸，此时如巨雷轰顶，绝望地叫了声"我的天！"再也说不出话了。

四、智擒杨永清

我们活捉了匪首杨汉章后，从西折回向东，进入晃县境内搜捕大匪首杨永清。到了第三天下午，我们在蛤蟆塘外几里路的一个山沟里，捕捉了杨永清的警卫大队长以下20多人，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20多枝。我们押着匪徒向雪洞方向走了五六里路，凑巧在半路遇着副连长龚谦让也押着几个匪徒过来，其中还有一个女的。我忙问："副连长，他们是些什么人？"副连长笑了笑回答说："杨永清和他的老婆。"

匪首杨永清，芷江县黄土坡人，大地主出身，原任国民党湖南芷江警备司令，又是楚汉帮会寨主，是芷江、晃县一带的地头蛇，有"湘西王"之称。解放后，杨永清按照蒋介石的"应变计划"，组织土匪，当上了匪"湘黔桂边区反共游击联军总司令"，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1950年8月，我军对芷江土匪实行铁壁合围，杨匪率数百人突围至凉伞、橙寨一带，被这里的土匪推为首领，统

一指挥晃县、三穗、天柱、玉屏、镇远等几县的数千土匪，妄想作垂死挣扎。

12月8日上午，我军攻下敌人自称的“小台湾”雪洞、凉伞后，匪首杨永清、姚大榜、汪昌仁、杨德庄、周治权、杨汉章等各逃一方，谁也顾不了谁。8日下午天快黑时，我与龚谦让同志分手以后，各走一方。他带着小分队在崇山峻岭中搜捕了两天多，毫无匪踪。他们今天下午来到蛤蟆塘，各村寨都是空荡荡的，没有一户人家冒烟。当他们来到烂泥沟时，突然见寨子里有一家冒出微微的青烟。他们感到奇怪，就叫贵州籍战士戴胜福向冒烟的地方搜索。副连长和班长焦志林则埋伏在村寨附近，以观动静。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还不见戴胜福回来。是怎么回事？莫不是出了问题？但又没听到枪声。见炊烟越来越大，最后一下又消失了。龚谦让和焦志林同志分析，这里面一定有文章。果然不出所料，一会一个妇人在前引路，戴胜福端着一盆红苕出了村寨。戴胜福把手一挥，班长焦志林率两个便衣战士跟了上去。他们转过几个弯，翻几个山坳，向一个小山坡走去。

原来“雪凉合围”打响后，云集在这里的3000多名土匪迅速土崩瓦解。杨永清在我大军的沉重打击下，率领残匪向西潜逃。为了不暴露目标，他又甩开了不少警卫。当他逃到哈蟆塘时，只剩几个心腹了。昨晚，他绑在手指头上的香烧完，从梦中惊醒，又听到风吹草动，认为有人来捉他了，就连夜转移到烂泥沟深山老林里。他在这里躲藏了半天，见没有动静，饿得实在挨不下去了，才让他老婆化装成一个农村老太婆，下山去搞吃的。他老婆正在屋里煮苕，恰巧被我便衣战士戴胜福遇上。戴胜福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慢慢与这妇人缠。他十分殷勤地帮忙找柴火，煮红苕，还说自己是周司令派来约杨总司令准备突围的。那妇人半信半疑，最后终于将戴胜福带到杨永清的住处。

杨永清躲藏在两座大山中间的小山坡上，山上都是茂密的森

林。匪徒们用树枝给杨永清搭了一个临进窝棚。窝棚后面是悬崖，悬岩下面有条小溪，一条毛路可通上去，地方十分隐蔽。杨永清为了万无一失，又布置了三道暗哨。

焦志林等4人跟着那妇人，来到半山，放哨的匪徒立即跳出来盘问。那妇人摆手说："莫误会，这是周司令派来的人。"他们就这样顺利通过了三道岗哨，很快来到杨永清躲藏的那片林子。那妇人说："你等一下，我去找杨司令！"焦志林使了个眼色，4人一齐往前走。突然从窝棚侧面跳出4个黑脸大汉，拿着二十响手枪，命令他们把夹板枪放下。焦志林他们把夹板枪放下，来到窝棚门口，见里面有一个50多岁的老头，中等个子，眼睛深陷，脸色憔悴，腰插手枪，笔挺挺地站在那里。戴胜福为了不使杨永清生疑，把红苕端到他的面前。那略带热气的红苕，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使得这条两天没吃饭的饿狗直流口水。但杨永清仍然笔挺挺地站在那里，一双贼眼不停地转动，盯着每一个战士，右手紧握着一枝二十响加拿大手枪。戴胜福毕恭毕敬地说："请，杨司令！"杨永清不伸手。戴又说："请吃，杨司令！"杨还是不伸手。戴心想：你不吃，我吃给你看。说："总司令不吃，我们先吃啦！"他们几人吃了一个又一个，很快就吃了一大半，那妇人也着急，好容易才弄得这点红苕，生怕别人吃完，伸手去抢。4个卫士也饿得受不住，看着到口的东西被别人吃光，再也顾不得什么了，与杨永清的老婆一道抢红苕吃。他们几人只顾你争我夺，把红苕拼命往嘴里塞。焦志林见匪徒们抢得热闹，使了个眼色，4人一齐掏出手枪，大声喊："举起手来！"杨永清见势不妙，转身要往悬岩坎下跳。焦志林眼疾手快，左手揪住杨永清的衣领，右手把手枪顶住他的背心窝，厉声说道："谁敢动，先打死谁！"两个匪徒刚想蠢动，焦志林用手枪一点，"啪啪"两声，两个匪徒应声而倒。其余的匪徒和杨永清的老婆如梦初醒，站在那里高高举起了手。龚谦让闻枪声赶到，山上的土匪无一漏网，全部就擒。

在这次“雪凉合围”战斗中，我侦察连经过半个月的努力，歼匪374名，其中生俘杨永清、杨汉章等以下匪首（中队长以上）56名，缴获机枪3挺，长短枪122枝，各种弹药1700余发，以及其他若干军用物资。“雪凉合围”胜利结束后，我们侦察连又接到上级命令，投入了天柱、锦屏等地的剿匪战斗。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云雾山剿匪记

聂运民

1950年5月，中共贵州省委调集了省直属机关的大批干部，组织省委工作队，分赴瓮安、平越（福泉）、麻江、炉山（凯里）等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清匪斗争。

贵阳军大的五、六两班与邮电系统的部分同志近400人，组成中共贵州省委麻江工作队，在政委郭绍汤、大队长李珍轩、大队副王国祥等人的率领下抵达麻江。一到麻江，县委书记张英杰、县长左清溪分别向我们介绍了清匪和发动群众的情况，指出麻江县土匪司令周子云，在雷山匪首谢世钦的指挥下，于下司锅古寨上设立匪麻江县政府与人民政府对抗，曾数次攻打我麻江县城，打死我坚守下司区的马区长等人，烧杀掳抢，无恶不作。在我人民解放军和革命群众的反击下，现已基本打散，不少匪徒纷纷自首投诚，只有匪首周子云仍藏在云雾山中，经常出来扰乱。

之后分配剿匪任务，军大五班负责宣威区，六班负责杏山区，其他负责下司区。我被分配带领一个区队，负责杏山区碧波乡。到了碧波与驻军李排长、乡长凌养正联合组成乡工委会，推我任主任，李、凌任副主任，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经过两天的安排整顿，即分头下村工作。在短短的几天中，基本摸清了全乡情况，开始了清匪反霸与征粮工作。

碧波乡工作人员多一些，柿花村农会主席潘星斗希望工作同志以迁到他们村里居住，经工委会研究，电话请示县委批准，派

戴文谟分队迁居柿花村。他们一到村里，就批斗了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彭××的父亲、五寨恶霸地主彭寿堂。我们到碧波第七天的夜晚，匪首周子云为了给我们个“下马威”，与地主恶霸联系，派残匪40余人，围攻戴文谟分队，并冲进寨子抓住农会主席潘星斗的父亲，要他带领去找工作队和潘星斗。住柿花村的工作队员奋起反攻，听到枪声，我和李排长带领部分同志会同羊盖民兵赶来，始将土匪打散。但农会主席潘星斗的父亲，却被土匪枪杀在工作队住所门前。

县委闻讯，派杏山区委书记郑云亭和在县里汇报工作的凌养正乡长，星夜赶来慰问。我以工委主任身份，同意了群众的请求，将恶霸地主彭寿堂家的一口棺木，抬来装殓了潘公公，并召开了追悼大会，借此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我们清除了隐藏的土匪大队长范纯武和暗藏在我们内部的留用副乡长倪云臣（他与土匪在水碾中吃过生鸡血酒，土匪攻打麻江城，他准备作内应，给土匪打开城门），同时还争取了土匪李兴纯等。接着熊涤生分队也迁居村里，活捉了匪营长白云；黄运中分队清出了惯匪罗应龙。在乡里召开的诉苦大会上，张铸荣（女）同志启发童养媳文阿妹，揭发出窝藏在她家的匪特张银臣。张银臣欺骗乡长凌养正，说甘溪埋藏有轻机枪，张借挖枪机会，用锄头砸破凌乡长的头部逃走。我带领部分队员赶到甘溪，星夜追至平越（今福泉）黄丝，甘溪民兵队长周汉章将张银臣擒获。我们立即报请上级，召开宣判大会，公开枪决了这个匪特。接着我们先后争取了10余名土匪自首投诚，清出了卡宾枪、冲锋枪、左轮枪、驳壳枪以及步枪、马枪等40余枝，子弹数百发，手榴弹10余枚。

不久，都匀地委确定都匀高脚、麻江碧波两乡为土改试点乡。我们为了肃清全乡土匪，集中全力追歼全乡最后两个匪首卢维明、杨继兴。据群众来报：小冲发现卢维明流窜。我与凌乡长分头带领一部分同志，整天在小冲搜山。正在此时，土匪头子周子云窜

到碧波，妄图破坏土改试点。1950年12月底的一个中午，小冲中农××家来了个叫王凤池的土匪。他一进门就“要米”，××的母亲假意热情招待，一面做饭、一面叫孩子跑来报告。同志们闻讯，立刻跑步到小冲，活捉了这个匪徒。经过反复交代政策，他才说受匪首周子云的派遣，外出了解情况和找粮食的。

当晚，按照王凤池交代的路线，我们包围了朝阳村后山。山腰有个凹洞，我们悄悄地爬到洞边，用轻机枪对准洞口，命王凤池高喊：“周司令！周司令！我取米回来了。”狡猾的周子云好象闻到了一点风声，对王的喊话不张不睬，率领残匪向后天洞逃走。当他爬到只容一个人上的天洞口时，偷看到我们早已在洞口，又率残匪回头直冲前洞口，身影刚现，我轻机枪手一梭子子弹打在洞口壁上，周子云退回。我们停枪高喊：“缴枪不杀！”不到一分钟，洞内发出“叭”的一声枪响，顽固的周子云自杀了。我们立即命令洞内残匪出来，一个个地用绳捆上，串联起来。又把周子云拖出洞口，捆在一根2丈左右的木柱上，并命王凤池将洞内的枪弹取出。再派人入洞查看，无枪无人后，我们抬着周子云，押着其余土匪，连夜赶到麻江县城。到县城时，周子云已断气。我们用长长的白纸，写上“土匪司令周子云尸首”，斜靠在城门口的大石坎上示众。

消灭周子云股匪后，我们宣布麻江县清匪工作胜利结束，《新黔日报》还刊载了击毙土匪司令周子云的消息。碧波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宣布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贵州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台江剿匪斗争片断

张明达

1950年2月27日，台江县政委傅秀峰、县长王子奎，派我到远离台江县城80华里，靠近雷山、剑河匪巢的孝弟乡去担任副乡长，与留任乡长郜昌平一起工作。

我回家吃罢早饭，背上被条，赤手空拳，只身到了距县城一华里的台拱寨郜昌平家。我看见王昌荣、王文经、方照全等好几个旧乡长在与郜昌平吃饭。郜昌平招呼我在另外一个房间休息。他们鬼鬼祟祟地叽哩咕噜地边吃边谈。饭后，郜昌平背上一枝长枪，和我一同步行去孝弟乡公所。我们在途中边走边聊天，他问我："老弟，你看共产党怎样？"我说："共产党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几个县领导作风朴素，平易近人，很好！"他说："共产党人的心深得很，将来怎样，还等着瞧！"下午5点钟我们到达乡公所。闲坐了6天，郜昌平根本不开会传达和布置县里交代的支前工作。我心里着急，问他什么时候开会布置征粮任务。他说："忙什么！"这时我心里已有些怀疑了。

3月5日上午，乡公所里的乡干事、乡丁忙碌着收拾行装，神色紧张。我心中已猜到几分，留意观察其变。我见乡干事郜昌裕走进厕所后不久，郜昌平也跟着上厕所。郜昌平悄声向他的秘书郜昌裕说："从今天起，插上野鸡毛，各霸一方，时世造英雄，扩大地盘，称寡道孤，不必跟共产党走了，趁乱世发横财。""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抵挡不住，你我有多大本领，事关终身祸福，还得三思为好。"

"富贵共赏，祸由我一人承担，你怕什么？""有张明达在此，我们离开乡公所，他岂不知道？""强迫张明达和我们一起走。""我们的人不多，还要派人看守他，何必多此麻烦。""必要时送他一颗子弹就是了。"郤昌平阴险地回答。"一无冤，二无仇，人家年轻轻的……"郤昌裕表示异议。"那你看怎么办？""干脆我们自己走，不管他！""也好！"郤昌平作出了决定。

当时，我心情有些紧张，但仍强制自己，表情坦然，若无其事。郤昌平出来后告诉我："老弟！我今天走了，不跟共产党了，但我不去为匪，我去隐居。你好好工作吧！"他边说边拍佩戴在腰间的短枪"我这支短枪和乡公所的长枪，傅政委、王县长都不知道，你千万不能告诉他们。你我是本地方人，我们象石头一样，生在本地，死在本地，解放军象流水一样，迟早要离开台江的。如果你把我的情况告诉共产党，今后见面就不好说话了，知道吗？"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我只好虚与委蛇。郤昌平带着乡公所的全部人枪和他的爱人、小孩走了，临走时没有带走乡公所的大印。我也假意送他几步。他回转身冷冰冰地对我说："你回去吧！不用看我走哪个方向！"

我坐在乡公所的大门院坝里，思索着刚才出现的事件。突然，一个身穿便服、头戴斗笠，腰挂短枪的陌生人，跨进乡公所大门。他问我："郤县长在家吧？"听到"郤县长"三个字，我心里已明白了，原来郤昌平已当了匪县长。于是，我郑重其事地对来人说："郤县长下乡工作去了，我是他表弟，又是他的秘书，郤县长叫我留在乡公所处理要务，有何贵事找他，可由我转告他就是。""有封要紧信，谢司令（谢世钦）和余专员交代，要亲自交给郤县长，县长不在，秘书可以代收，但必须打盖有公章的收条。"来人讲明了来意。我立即走进办公室，取出笔墨纸张和公章，放在桌子上，写了收条，盖上公章。送信的土匪见我穿着便服，而且掌握公章，定是郤昌平的亲信无疑，遂解开了胸前的纽扣，从内衣里取出了一封信交给我。信封上用毛笔写着"郤昌平县长亲启"几个行书字，信封左下角写有"雷山

专署余辉庭缄”，信封的左上角粘着几片鸡毛。送信的土匪接了我的收条，放进他内衣的荷包后起身告辞，向雷山方向走去。我急忙回到办公室，拆开来信，内容主要是邀集土匪进攻台江县城。

我立即摇动电话机，向王子奎县长作了汇报。王县长指示说：“你要提高警惕，我马上派一个班的解放军来交密接你，解放军到后，你们连夜回城！”时间大约过去一个钟头，乡公所的大门又出现了第二个陌生人。此人身着破棉袄，腰挎柴刀，矮个子，一只眼。我用刚才应付雷山送信的土匪的办法对付他。这个从剑河送信来的土匪也把我当成了郜昌平的秘书，把剑河县匪县长、“湘黔桂边区剿共副司令”陈开明给郜昌平的一封亲启信交给了我。我把信拆开，内容都是密谋进攻解放军的事。我又打电话报告了王子奎县长。当天下午5点钟，一个班的解放军果然到达交密乡乡公所。我和解放军卸下了乡公所的电话机，连夜回城。

事后查知，郜昌平在离开乡公所后，先后在南牛、东扛、长耶3个村住了4天，受到匪保长和豪绅们杀猪杀鸭款待。第五天到达剑河县太拥乡公所，接受陈开明授其担任台江县长的委任状。郜昌平与陈开明的特使郑铸成密谈了一天之后，回到他任职多年，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孝弟乡招兵买马，进行叛乱活动。时间不长，就集聚了近百人枪。

3月28日晚，李子松、郜昌平股匪数百人，乘黑夜占领县城周围一带高地。29日拂晓从下水卡和县中学一段城墙偷袭县城。其中一部已从城墙爬进城内，在西街与县公安局的同志发生巷战；一部土匪从西街由背后攻击西门城楼。

天亮了，我英勇的解放军战士，从城中高地大炮台冲下来，把突入城中的土匪打得抱头鼠窜，逃出城外。大特务何建雄当场被我军击毙。然而土匪依仗人多，仍继续占领县城周围高地，企图围困我县城守军和机关干部。我们固守待援。为了防敌爬墙，我们把县城居民的灯笼都全部借来，用油点亮，并用竹竿把灯笼吊起，悬挂

在城墙上，把城外墙脚照得通亮，任何接近墙脚的行动都看得一清二楚。

在镇远军分区部队驰援解围，击退县城周围高地土匪之后，为更加有利地打击敌人，我守城部队和机关干部于4月3日主动撤离，转移到距镇远军分区较近的施洞驻防。

4月4日，邰昌平率匪众盘踞县城。

1950年农历六月，土匪团长石开、支队长李子松与匪台江县长邰昌平等股匪共3000余人，云集台江县城，阴谋进攻固守施洞的县人民政府机关干部和解放军九连，然后夺取镇远、盘踞黔东。为了先发制敌，我守军九连和县大队配合从镇远前来支援的军分区教导团，对盘踞台江县城之敌，进行奔袭。

6月25日，正逢施洞赶场天，为了避免走漏消息，对从台江方向来施洞赶场的群众，暂时采取准进不准出的措施，告诉群众等部队出发后再行回家。

下午5点钟，我军兵分三路按预定路线出发。左路从施秉乘木船沿清江河直下，经台江的宝贡、东南、番陇塘、李子寨、至台江县城东面山岭，占领县城东面一带高地；中路经猫坡、坝场、排略、水井寨直达县城北郊，占领城西北一带高地；右路经榕山、报效、板凳寨、南雄、番省牛打坪、猫猫坪，从南市沟出南市堂，沿方你河直下，占领县城南郊，切断雷山敌人退路，对盘踞县城之敌形成合围之势。出发前，我被指定为右路军向导，走在部队先头。

我们原计划在天亮前4点钟左右，三路部队分别占领城郊各个高地，拂晓进行突然袭击。谁知黑夜行军，路隘苔滑，影响行军速度，因此，当我们右路部队抵达南市塘时，天已大亮。这时从8里外的县城已经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和炮声。我们知道兄弟部队已与敌人交火。乌合之敌，已从城郊村寨夺路奔逃。我们且战且走，逐步缩小了对县城的包围圈，沿途俘敌数十，战马多匹。我们的连队，从洋汪寨起，分兵两路，沿方你河两岸、直扑城郊台拱和张家寨，截击

从县城外窜之敌，配合左、中两路兄弟部队作战。我与九连朱秉海指导员和一个班的战士，在张家寨边与从城中逃出之敌遭遇。我们凭据乘凉的石凳进行阻击。敌不支，折回寨中。张家寨是我生长的地方，路径熟悉，我带引战士从另路冲上山顶，先于敌人两分钟占领寨后高地。在我密集弹雨下，敌人弃尸3具，夺路逃窜。由马副连长带领的一部分战士，进抵台拱寨脚河岸，与从城中突围之敌展开激战。这时，左路部队也到达台拱寨背后高地，与从城中逃出的石开匪部短兵相接。县大队的黄玉河一人就戳倒了两个土匪。机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直打得敌人昏头转向。有的抱头鼠窜，有的俯首就擒，有的躲在茂密的稻田里，象落汤鸡一样，被我军一个个搜索出来。郎昌平因是台拱寨人，路径熟悉，从寨中小巷朝登交方向逃跑了。土匪团长石开在突围时被我军击伤，土匪用担架抬着他经展下、登交，红阳逃回雷山老巢。这时，县城周围高地，除西南面的南浓、朗等两寨高地外，均被我军占领，未能突围的大部分残敌，龟缩城中，依附丈多高的城墙，负隅顽抗，战斗呈胶着状态。

次日拂晓，我们站在县城南郊高地察看城中动静，城内静悄悄的，城墙上也不见敌人的踪影，部队向南门城楼打了几发炮弹也不见还击。原来敌人已于深夜从城西门和上下水卡溜出县城逃了。

1950年9月，西南军区从川西军区调一八六师入黔会剿。在我镇远、独山军分区的协助配合下，在雷山地区、剑郎地区进行合围。于9月19日，再次解放了台江县城。台江匪首郎昌平、雷山匪首石开和李子松等，先后被我捕获处决。他们的后台，雷山巨匪谢世钦和剑河匪首陈开明也得到应有的下场。从此，五星红旗永在台江县城上空飘扬。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供稿）

活捉大匪首吴河清

唐成海

“东吴”是黔东石阡、岑巩、江口一带的大匪首、大恶霸吴河清的代称，他与该地区另一大恶霸吴登仁(“西吴”)是这一地区的两霸。

吴河清家住石阡县青阳乡朝阳坡，历来靠打家劫舍为生。以后由匪而官，当了4年区长、团队大队长，继之被国民党收编，历任团长、旅长等职。30年代初，曾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加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1935年该匪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级班(二期)，后被编余返回贵州。从此即开始着力经营其封建王国。在这期间，该匪当过石阡县参议长、国大代表、国民政府戡乱建国委员会的宪政督导委员等职。

贵州解放前夕，谷正伦为实施其反革命“应变计划”，在贵阳开办所谓“反共自卫干部训练团”，吴河清前往受训，还当了“队长”。结业后，被谷正伦委任为江口县长。

吴河清通过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积聚了大量财富。据不完全统计，他家共有田3万余亩，石阡县的石固、青阳两乡大部分土地均为吴家所有。他还开办有铁矿、银耳厂各一个，修建了3座庄园。吴匪有一妻五妾，本人嗜吸鸦片烟，过着极端腐朽糜烂的生活。

“东吴”的势力范围共有8个乡，即石阡县的青阳、五德、枫香、石固和岑巩县的客楼、平庄以及江口县的官和，总面积约250多平方华里，人口4万余。在这8个乡中，属石阡县的4个乡是吴匪的

直接控制区，也是他的老巢所在地；其余 4 个乡均为其亲信所控制。长期以来，吴匪就利用这三县交界“三不管”的地区特点，称霸一方，为所欲为，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在这个“独立王国”中，政治、军事、经济以至于党务和教育，都自成体系。在政治上：上述 8 个乡，除乡、保之外，每乡都有国民党、三青团和扶风社（袍哥）的组织，从上到下，组织严密。在军事上：乡有所谓“防剿”大队，保有“防剿”中队，还有所谓“突击队”、“肃奸队”、“救护队”等。各乡约三五十人不等的所谓“突击队”，是吴匪的基本武装力量，其大小头目都是和吴匪关系很深的惯匪，具有枪法好、性格残忍等特点。“突击队”之外，尚有不脱离生产的“乡兵”，平时携枪在家为民，有事时集中起来参加作战。吴匪兵力的最高动员额达 3000 余人，有枪 1200 余枝（其中属于骨干的人枪约 400 余）。解放前夕，吴匪还购买了 7 挺轻机枪，是黔东一带战斗办较强的一股匪徒。在经济上：从征税收款到集市贸易，也全部为吴氏家族所操纵、把持。

在吴河清直接控制区内，从乡、保长到学校校长都由吴河清的子侄或亲戚担任。吴河清之子吴天锡担任五德乡乡长、“防剿”大队长、中心小学校长、扶风社社长等职；吴河清的侄孙吴定邦是枫香乡乡长，兼职与吴天锡不相上下；石固乡乡长是吴天锡的岳父；吴河清老巢所在地的青阳乡乡长，则由追随他 30 多年、死心踏地为之卖命的架廷献担任。属于“外围区”的 4 个乡的乡政权，也都为吴匪的亲信把持，如岑巩县的客楼乡乡长邓国安，是吴匪的“盟兄弟”。

吴河清除了自己培植一支武装力量外，还四处网罗了一批惯匪出身的国民党回乡军官，与之结成犄角之势，以便有事时相互策应。如石阡、岑巩一带的著名匪首邓陟、杨勋、杨凤池等都与他勾结甚紧，接受他的指挥。

与其他惯匪不同的是，吴河清自己还有一套情报组织，乡设

"情报总站"，保有固定的"谍报组"，情报传递十分迅速。整个情报网由其亲信梁显耀直接掌握，每日由梁汇集情报向吴报告。

我大军解放贵州后，吴河清慑于我军声威，虽未敢轻举妄动，但执行蒋、谷的"应变计划"却十分坚决。他与其心腹约定了3条对付人民政府的方针：①暂不公开组织武力对抗；②不缴械投降；③不解甲归田。我各级政权相继建立之后，吴匪为了摸清底细，曾几度派人与人民政府接洽，企图取得合法地位。

1950年初，全省匪焰日炽，吴匪决定：①抗粮不交。1949年秋征时，吴河清所控制的8个乡，粮食颗粒未交。②勾结股匪，组织叛乱。吴匪曾数度暗中指挥岑巩的匪首邓陟、杨凤池，玉屏匪首杨洪尧，攻打、袭击我区、乡政权和石阡、岑巩等县城。

1950年5、6月间原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一部分叛变以后，吴河清认为形势对他非常有利，很快同原国民党十九兵团参谋长、人特务熊起厚及其他叛军师、团长取得联系，以后又邀集这些匪首到他家里开会，筹组了一个名叫"川黔反共建国委员会"的反革命组织，将石、岑地区的土匪进行了编组，吴自任"一一三军军长"。

吴河清虽然自恃人多势众、巢穴稳固，但当贵州军区直接指挥的东集团剿匪指挥部所属部队，挥戈东指，向盘踞在石阡西部的吴登仁("西吴")匪部进剿时，吴河清自忖力不能支，随即将其匪部化整为零，分散到边远山区。

8月中旬，东集团剿匪指挥部所属部队开始了"石(阡)岑(巩)合围战"，指挥部命令一四〇团进驻吴匪老巢——青阳乡乡公所所在地的冷家榜，集中全力捕捉吴河清。

当时部队正在开展捉匪首立功运动，战士们都决心争取立功，不过也有人替我们担心，特别是一些曾经和吴匪打过交道的当地人士认为：吴河清虽然不过400人枪，但其老巢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加之吴匪诡计多端，解放前贵州军阀和国民党都对他无可奈何，捕捉他恐怕不容易。

8月16日晨，部队进入吴匪的老巢朝阳坡、大沟、金银坳地域。不但吴匪一家不见踪影，就连老百姓也见不到一个。后来审问俘虏，了解到吴匪连同其100多名亲信、打手，已逃往彭溪屯。担任追剿任务的一营营长崔敬坤、教导员李继田立刻把这一情况向团里作了报告。团里当即命令跟踪追击，进剿彭溪屯。但到了彭溪屯，也是一座空村。18日部队又合围乌木洞，在那里又扑了个空。

就在这时，我们从友邻部队处了解到吴匪准备向湖南方向逃窜，立刻电告一营，要他们向黄平庄、凯本方向截击。19日，一营赶到那里时，吴匪又回窜到大顶山、板溪一线。于是部队又向大顶山追击。

大顶山，位于石阡、岑巩、江口3县的交界处，海拔2100多米，山高林密，异常险峻；板溪一带，是吴匪多年盘踞之地。吴河清到这里不但易于取得粮食给养，而且还可以依靠这里的社会基础和险要地形，苟延残喘。

20日部队到达大顶山、板溪一线时，团里立即命令部队全面铺开，以班组为单位展开了多股多路的搜山活动。很快，这一带的每一座山岭上都布满了部队。白天，搜索的战士穿行在山间密林中；入夜，要道路口燃着篝火，往来游动着火把，把个大顶山封锁得严严实实。但是，从21日到23日，都没有发现吴匪的踪迹。

面对这种连续"扑空"的局面，我们非常着急，准备加派侦察人员外出了解情况。这时，三连送来了便衣侦察员的情报："吴河清已西窜，有返回老巢模样。"

这情报有点出人意外：难道吴匪真的不知道他的巢穴早已被我占领，竟敢回去送死吗？

正犹豫间，一营营长崔敬坤、教导员李继田和三营九连也都先后送来报告：

"吴匪确已西窜，惟具体位置不详……"

"据曾经为吴匪煮过饭的老乡胡起亮报告，吴河清已逃往观音

山。”

这两个报告，都是伪装成土匪的战士，从被打散的匪徒嘴里了解到的。有一个匪徒甚至还要我们的便衣战士和他一道向西去找“吴军长”。直到那个战士把他带到部队驻地，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枪，他才恍然大悟。

送来的大量情报证明，吴匪在逃离板溪时，已将100多名匪徒分成了三四十人的小股，准备分头从石固、花桥一线突围。

24日拂晓，部队进入欧家湾。一入村就捉住了一个给吴匪探路的匪徒。当晚，又在白阳坝将吴匪的儿子一家5人全部捕获；九连逮住了一个给吴匪送过饭、带过路的甲长。几方面的情况都表明：吴河清已逃往滥泥山。于是全团立即转向滥泥山。大家把这一带的每一个山头，每一道山沟都搜遍了，仍然不见吴匪踪影。

原来，24日当天，吴河清确实逃到了滥泥山附近，但在25日，他正准备经陈家湾逃向小鸡公一带，企图冲出封锁线时，不料我跟踪追击的部队行动神速，竟追到了他的前面，在茶园、地古一线展开了搜捕。这一下，把吴匪吓得魂飞魄散，一头钻进茅岩山上的刺巴笼里藏了起来，跟随他的几十个匪徒也躲在山上，足足憋了一天。由于我搜山部队多数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西边，而对已经走过的地方却忽略了，所以一直没有发现这群匪徒。

半夜，这些匪徒饿得实在支持不住了，正准备派人到茅寨村找饭吃，恰巧我三营的一个炊事班也赶到这里为部队煮饭，一个新战士不小心走火打了一枪。这下，使躲在山上的匪徒们乱作一团，跑了个净光。吴匪再次东逃的消息，立刻从各个分队报到团里。我们根据这些情况对吴匪可能逃跑的方向作了分析，判断吴匪很可能要逃回他的老巢——朝阳坡。因此，确定全团立刻经岩门、甘溪向东追击。

这时我们已经连续奔波了14个昼夜了。全团上下，从团长到每个战士，个个两眼熬得通红，两条腿沉重得几乎迈不开步。报话

机上的小鬼们嗓子嘶哑得几乎喊不出声音。有些战士端着饭碗，嘴里还含着一口饭就睡着了。看到这一切，我们多么想让战士们美美地睡上一觉呵。然而，想到吴河清还在逍遥法外，想到上级关于捕捉吴河清的命令，我们感到必须立即行动。

8月30日拂晓，一营三连到达王家沟附近，捉住了累得精疲力竭的土匪大队长吴定邦（吴河清之侄孙），但这家伙死也不肯交待吴河清的下落。三连领导认为吴定邦既然跑到这里，吴匪也远不了，立刻就将部队撒开，以班排为单位，一面搜索一面了解情况。当天下午，一排长高庆瑞带领的便衣班，在王家沟的一个老者嘴里了解到吴河清已逃到圈圈田大山的消息。他们立即派人回来报告，同时分路向圈圈田进发。待他们爬上陡峭的圈圈田大山时，已近黄昏时分。一登上山顶，就发现有几个人在山上吃东西，他们连忙从三面包围过去。这时山上那几个人发觉了他们，扭头就跑，高庆瑞连忙追了上去，抓住了一个匪徒，一问，才知道那个跑得最快的正是吴河清。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山岭依稀难辨，战士们只好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索追捕。这时三连的后续部队赶到了，战士们连夜进行搜索。拂晓时，这个罪大恶极的匪首，终于在一片草丛里被一营三连七班长杨咯咕捉住了。

吴河清身体肥胖，几天来他又累又饿又没有大烟抽，当他被杨咯咕揪住时，浑身都软瘫了。但他还想蒙混过关，诡称自己是给部队带路的老百姓。杨咯咕借着晨光朝他头上一看，大喝一声："住口！别装蒜了，你头上的那撮白毛告了你的状，吴河清你跑不了啦！"这时吴河清象打摆子一样，索索地抖了起来。

（贵州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匪首钟志达落网记

余庆县公安局史志办

余庆县人所共知的匪首钟志达，是个在解放前就烧、杀、掠、夺、无恶不作；解放后又继续为匪叛乱，当了土匪团长的老惯匪。这个恶贯不悛的土匪头子，于1950年6月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对瓮（安）、湄（潭）、余（庆）三县土匪的铁壁合围中，尽管其匪部被我歼灭，然而惯匪身世的钟志达，则在我军围剿中竟又漏网脱逃。直至1952年3月，经我余庆县公安局侦察发现他的行踪后，才在龙里县的“美真”照相馆将其捕捉归案。

1936年，二十一二岁的钟志达即随同其当土匪头子的哥哥钟志远一起，到处打家劫舍，横行乡里。后因匪伙分赃不均，钟志远被其同伙暗杀，钟志达从此继承了他哥哥为匪抢人的职业，当上了土匪“大哥”。到1945年，匪众已有40余人。钟志达为匪期间，起初几年仅限于余庆县的太平、洞水、葛旁，湄潭县的茅坪，瓮安县的珠藏等地。后来逐渐扩展到余庆、瓮安、湄潭、黄平、遵义等几个县的边沿结合地带。1938年9月13日夜间，钟志达在洞水乡打家劫舍时，一次就放火烧掉5户村民的房屋12间。在钟志达的亲属及其村邻群众中，谁要说他一个“不”字，必将招来横祸。他的大嫂钟杨氏、二嫂钟蒋氏、三嫂钟胡氏、以及洞水乡的黄寿松、阎文昌、谢兴顺等人，只因说了他“为匪抢人”一句话，均遭钟志达惨杀。对于钟志达一伙匪徒，国民党余庆县太平区、湄潭县茅坪区和黄平县的保警队，都曾对其进行过武装围剿，虽然

打死了钟匪一些人，但却付出了一个区长、一个区队长、一个区丁的代价。1945年某月，钟志达率其匪伙在遵义县团溪河上场抢劫时，遇遵义县保警队袭击，钟匪本人身负重伤，他的匪伙亦有5人被"招安"杀掉。余庆县政府为捕捉钟志达归案，曾发出"一两银子，换取钟匪一两骨头"的《通缉悬赏令》。钟志达此时更名易姓，逃到贵阳开设"永贞"照相馆，由一个土匪头子变成了"照相师傅"。

钟志达在贵阳隐匿4年后，于余庆县刚刚解放的1949年12月，回到老家洞水乡回龙场。正当他欲重操旧业、举棋未定之时，我洞水乡乡长罗润华及太平区支前委员会委员曾汉章（因勾结土匪被我镇压），来到钟志达家中，向其宣传党的政策，真心实意做其争取工作。经过多次接触，钟志达带着在解放前与其为匪的同伙20余人，来到龙溪区向我投诚。我太平区委经请示余庆县人民政府批准，委任钟志达为太平区剿匪大队副大队长，对其投诚人员只做登记，并未收缴其枪支。仅仅时过两个月，钟的土匪本性即暴露无遗，于1950年2月1日公然率其同伙为匪叛乱，投入"黔东反共游击司令部"陈英匪部，充任土匪团长，继而袭击我太平区支前委员会，杀害我支前委员冉锡光、郑雪峰等民主人士。尔后又攻打我瓮安县城和黄平县的平溪、浪洞等区乡人民政府，杀害我浪洞乡长王省三同志等。在我人民解放军东集团的大军于1950年6月，对瓮安、湄潭、余庆三县土匪展开铁壁合围时，盘踞在余庆太平一带以陈英（匪司令）、王福堂（匪副司令）、钟志达等为首的股匪被歼灭。钟志达化装成行商漏网潜逃。

钟志达潜逃后，余庆县公安机关当即将其列入专案进行追捕。1952年3月，县公安局在审查贩卖烟毒犯陈某一案中，发现该人曾为钟志达漏网潜逃办过去贵阳的通行证，遂给其立功赎罪机会，令其侦察钟匪行踪。了解到钟志达潜逃在贵阳的下落后，公安局长刘法文当即派出郑守芝带着陈某前往贵阳捕捉。3月4日，郑在

贵阳市公安局两位同志的协助下，在贵阳市河西路一个小巷一户人家查到了线索，女主人（钟志达的小老婆）毫无防备地说老家居住在余庆县的太平铺，男人姓钟名彪，现在龙里开设“美真”照相馆。郑与贵阳市公安局的同志研究分析，认为钟彪很可能就是钟志达，当即决定前往龙里侦察。3月5日早上，郑守芝带着陈某从贵阳包乘一辆有篷布包的马车出发，当天下午便抵达龙里县。他们在照相馆门口看到了一个男人，果然就是钟志达。郑守芝一面催促车夫加快车速，直奔龙里县公安局；一面叫陈某下车去照相馆稳住钟志达。当我4名公安人员出现在钟志达的面前时，郑守芝问：“钟老板，你认得我吗？”钟匪故作镇静地回答：“面熟。”郑接着告诉钟志达：“我是余庆县公安局的，你已被捕了。”话音刚落，一副亮铮铮的手铐铐住了钟志达的双手。经过审讯，在其老家洞水乡的一个姘妇处搜出了钟匪隐藏的部分枪支和子弹。

1952年9月7日，钟志达在余庆县城被公审枪决。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活捉匪首陈鹏

李绍武

陈鹏，是炉山县清平、五里桥、甘坝方园一带的大匪首，原籍四川人，当时家住炉山县城清平镇。解放前，曾任国民党营长，后弃军从政，在炉山组织红帮，纠集一伙拜把兄弟，组成所谓民卫队，成为炉山一霸。由于陈鹏在炉山有一定势力，又系国民党军统特务，被国民党县政府委任为清平镇镇长，兼民卫总队长，清平防剿大队长。1949年春，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在贵阳开办了所谓“反共自卫干部训练团”，陈鹏前往参加受训，接受反共教育。4月，冯绍棠在炉山开办“乡、镇干部训练班”，陈鹏在训练班里任大队长，培训反动骨干100多人。7月，冯绍棠在炉山组织“反共救国动员委员会”，陈鹏是该会重要成员之一。

1949年11月4日、7日、8日，我军解放了天柱、三穗和专署所在地镇远。陈鹏慑于我军声威，于我军解放炉山前夕，带领民卫队200余人，步枪百余枝、重机枪2挺，仓皇逃离炉山县城，潜伏于乡下。15日下午5时，我西进支队4大队2中队进驻炉山县，宣告成立炉山县人民政府，公安局也于当天正式成立。为了瓦解敌人，县委于16日在进步人士孙洪涛家开会，研究确定由地下党员李长春、李光庭，进步人士孙洪涛、陈松录分别做敌伪人员的争取工作。在我军事压力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陈鹏于11月18日率70余人，步枪60枝、左轮手枪1枝、重机枪2挺，向我人民政府投诚。根据我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宽大政策，人民政府

安排陈鹏任清平镇副镇长。

就在其假投诚几个月后，便迫不及待地组织土匪叛变。1950年农历三月十四日，陈鹏秘密到洛棉串联伪保长黄光普，三月十五日召集杨永龄等人在黄家开会，策划组织土匪武装，搜罗匪众19人，枪40余枝。三月二十日，将人枪带到凯里投奔匪纵队司令毛秉权。毛匪任命陈鹏为独立十一支队队长（后改为一一五支队长），陈鹏当上土匪支队长以后，反共更为积极，组织了4个土匪大队，聚匪众150余人，枪130余枝，在炉山附近的洛棉、五里桥一带，经常出袭骚扰，派粮、派款、敲诈勒索群众，强迫当地群众为匪。并与白腊王继伦匪支队相勾结，妄图两面夹击，夺取我炉山县城。由于陈鹏反共积极，曾被土匪司令部标榜为“反共最坚决的一个支队”，陈鹏因对其主子的赞赏更是利令智昏。七月四日，陈鹏匪部到洛棉一带活动，准备攻打我炉山县城。我公安机关得到情报，先发制敌，派出保卫队30余人，由队长陈光月带领，到洛棉月亮坡与陈鹏匪部交战，俘匪10余人。经此一击，陈鹏已成为惊弓之鸟。

1950年9月下旬，炉山境内的武装股匪大部被我全歼，残存的股匪不得不分散逃遁，追捕散匪已成为当务之急。10月5日晚，一名治安积极分子突然发现一个黑影翻墙进入李大成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了这一情况。李大成系匪首陈鹏的警卫员，原来曾为我所用，向我多次提供过土匪活动的情报，土匪猖獗时，思想发生变化，追随匪首陈鹏，其深夜跑回家来，定有缘故。公安局长谢吉魁当即派侦察股长姚希仁，干部李培柱、李大德、孟宪柱和通讯员等5人将李大成家包围起来。李大德推门进去，见李大成蹲在火炉边，其母正给他做饭。李大德问：“李大成你回来了！”李大成恐慌不安地回答：“李干事，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李大德严厉命令道：“不讲了，到公安局去！”李大成被带到公安局后，由局长谢吉魁亲自审讯，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李终于

交待："陈鹏现在棋盘山的陈德富家。陈叫我回来告诉他家属，他要回四川老家去，要他的家属不要去望他。另外，要我到周绍德家要钱作路费。天未亮前上山，第二天去四川。陈鹏身上带有一支美国大拉八手枪，30发子弹，2颗金戒子，1只金手镯。"李少成还供出了与他一道回来的陈鹏的另一警卫员胡刚。公安局又派人到胡家将胡刚抓来，胡态度极不老实，抗拒交待，被我关押。

10月6日清晨，由县公安局干部和保卫队干战20余人组成的追捕小分队，在保卫队长王朝君，治安干事李大德，班长朱云，姜水发5人带领下从炉山出发直奔棋盘山。小分队由李大成引路，沿着崎岖的小道摸索前进。陈德富家位于小屯寨的东北角，为了不惊动寨上的人，由寨边绕道而过。当小分队快要接近陈德富家时，为了不使陈鹏发现，王朝君先头一人前去侦察，其余的人埋伏在离陈家200米以外的地方监视控制。经过侦察，陈德富家就象山林中的孤庙一样寂静，其房子壁头是用篾条夹的，外面糊着牛粪，大门锁着，里面毫无动静。王朝君侦察好陈家房子的地形方位后，小分队将陈家包围起来。王朝君悄悄摸进屋去，屋里一片漆黑，王一手提枪，一手摸索，摸遍了屋里的每个角落，没有摸到什么。就在这时，从楼上传来了"卡察"响动的声音，王朝君迅速跃上楼去，正睡在楼板上的陈鹏一惊，正欲从枕头底下掏枪拒捕，王朝君猛扑过去，把陈鹏拿枪的右手捏住，双腿骑在陈鹏的身上，使陈鹏难以挣扎。陈鹏诱惑说："你放我，我这里有金子，有大洋，够你吃一辈子。"王朝君说："我要你的命。"一面与陈鹏搏斗，一面向外大喊："捉生了！捉住了！"其他同志闻声赶来，七手八脚地将陈鹏绑捆起来。

10月12日，炉山县人民法庭在清平镇召开公审大会，将陈鹏依法处决。

以假投诚骗取信任，打入我内部，又叛变为匪，继续作恶，在大势所趋之后，持械潜伏，负隅顽抗的匪首，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然而，曾经为人民做过有益的事情，而又不识时务，步入歧途，做了坏事，经过教育争取，能够幡然悔悟，戴罪立功的李大成，党和人民政府宽大为怀，得以新生，1951年经公安机关推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还成为解放军的一名干部。党和人民政府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大得人心，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猫客”就擒记

葛仁敬

“猫客”，原名魏德茂，是镇远、三穗一带的著名惯匪。贵州解放初期，魏匪慑于我军声威，伪装投降，混入我镇远县蕉溪区人民政府。1950年3、4月间，贵州匪风日炽，魏匪认为时机已到，立即公开与盘踞在镇远东部的匪“反共救国军黔东南绥靖区游击纵队”副司令左得权合流，当上了左匪的“支队长”。魏匪先后多次带领匪徒围攻我青溪、蕉溪、羊坪等区、乡政府，袭击我地方工作人员，残杀无辜群众，气焰十分嚣张。

由于魏匪残忍成性，杀人不眨眼，连他手下的匪徒都对之既怕又恨，不敢直呼其名，而称之为“茂客”。当地群众利用这两个字的谐音，称为“猫客”，暗喻此人馋若贼猫，贪婪成性。当年6月，魏匪伙同其他股匪，围攻我青溪区政府，我所在的镇远分区警三连奉令前往增援。归来时，三班副班长张庆明、战士赵光俭等3人与大队失去联系，被魏匪袭击，不幸牺牲，武器也被魏匪掠去。因此，魏德茂更加得意忘形，一面大摆宴席，庆祝他的所谓“胜利”，一面扬言“三个月把共产党赶出镇远”，猖狂已极。

早就对魏匪恨之入骨的我三连干部、战士，纷纷向上级写申请、递保证，要求进击魏匪，为烈士报仇，为民除害。但是分区“前指”出于对整个战局的考虑，一直没有对魏匪采取行动。待到同年11月初，分区主力对镇（远）、穗（三穗）边的盘山地域进击合围时，狡猾的魏匪又闻风远循，逃脱了被歼命运。

1950 年 12 月 8 日，镇远分区所属的 16 个连队，在分区“前指”首长曾宪辉领导下，对湘黔边界的凉伞、雪洞地区实施合围清剿，主要的打击对象是盘踞在那里的匪“湘黔挂游击总司令”杨云清。出乎意料的是，在这次战斗中，却意外地擒获了魏德茂。

事情是这样的：12 月 7 日夜，我们连从三穗县的平树地区出发，经 6 个小时急行军，于 8 月拂晓击溃聚集在雪洞街上的匪徒。“前指”当即命令我们连以一个排的兵力，由连长李梦笔同志带领，会合参战的机动部队，以多路出击的形式，对溃散的匪徒实行穷追猛打；另外两个排则由我带领插至雪洞东北，沿起伏的山脊，构筑一条长约 30 的里的封锁线，与担任堵击任务的友邻部队一起，把凉山、雪洞的广大地域包围起来，以利我机动部队分头追歼。

9 日，我带领二排前进到雪洞东北平茶溪附近的一个山村。各班战士迅速按“前指”规定的封锁位置进入了阵地，仅用了半天的时间，一条每隔 50 米就有一个哨兵的封锁线就组成了。哨位上构筑了工事、掩体、哨棚，准备了供夜间点火联络用的柴堆。各哨位之间白天用笛声、号声和梆子声进行联络；夜里，就点燃火堆，把封锁线变成了一条蜿蜒的火龙。

为了使封锁线更巩固、更坚强，使之真正成为匪徒插翅都难飞越的铜墙铁壁。第二天，各班又抽人组成了“群众工作组”，分赴封锁线两侧的村寨，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建立由民兵积极分子组成的群众性的“剿匪小组”。很快封锁线就从单纯由部队防守变成了有广大群众参战的活防线。节省出的兵力则组成了“突击组”，哪里发现匪徒，突击组就赶到哪里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就这样，我们围了 10 天，没有一起匪徒敢从封锁线上越过。

第十一天，平茶西南一个偏僻山村里突然来了一个头裹黑帕子、穿一身黑衣服的汉子。他先东张西望，见村里没动静，然后鬼鬼祟祟地钻进村头一户农民家里。恰巧这户农民家当时只有一位妇女，这家伙更为高兴，连忙从身上掏出一块大洋，对那位妇

女说："大嫂，几天没得饭吃了，帮帮忙搞点饭吃。"这人就是杀人如麻的恶魔"猫客"。这家伙见我大军向凉伞、雪洞集结，就换了便衣，隐藏在平茶附近，准备乘隙溜出封锁线。这位妇女虽不认识他，但从他的言行举止上断定他是土匪，便不动声色地对魏德茂说："要得，给你搞饭吃。"边说边起身洗锅、淘米。待稳住了魏之后，就以上坡弄柴为名，飞快地向村里的剿匪小组报告了。这个村的剿匪小组长潘老述接到报告后，一面派人给驻在附近的二排六班送信，一面带着两个民兵前去捕捉。

然而，当潘老述赶到那位妇女家时，魏德茂却不见了。原来魏匪见那位妇女很久没回来，起了疑心，也不顾肚子饿，慌忙向山上跑去。潘老述见匪徒逃跑了，立刻跟踪向山上追击。追到半山，就见魏匪歪歪倒倒地往一片密林中窜去。潘老述一个箭步扑上去，飞起一脚将魏匪踢翻在地，双手一按，卡住了魏匪的咽喉，趁势把他捆起来。

潘老述和另外两个民兵押着他向部队送时，走到一座悬崖边上，魏匪趁两人不能同时并行的机会，猛一窜，挣脱了民兵的手，翻身滚下了山。潘老述不顾个人安危，纵身跳了下去，两人就在悬崖下的草丛里展开了搏斗。就在两人打得难解难分时，我们六班的战士在排长郑祥的带领下赶到了，魏德茂这才老实下来。

"猫客"被活捉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山村里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部队驻地，要求亲眼看看这杀人的恶魔。很多受过魏匪残害的"苦主"，当面一字一泪地控诉了魏匪的罪行。魏德茂在证据确凿的事实面前，自然哑口无言，但是当他得知现在审讯他的部队就是他上半年曾袭击过的三连时，知道死在旦夕，便长叹一声："我魏德茂是命中注定啊！"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

石金生　整理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匪首刘启荣盗尸假死案

丁德元　谢文武

匪首刘启荣，男，53岁，黄平县化稿乡（今红梅乡）小溪沟人。解放前，刘匪当过保长、保队副。解放后，1950年在匪司令李庚全部下任中队长，曾与匪首袁祥太、丁明高、李家其、谭树荣、郭兴、代仁义等（均被我人民政府镇压）率领土匪攻打旧州城。土匪被我歼灭后，刘匪隐瞒罪恶，假装自新。但他始终“作贼心虚”，害怕受到人民的惩罚。因此，总想设法逃脱。1950年12月10日，刘匪到乡人民政府参加自新土匪会后，回到家就使了一诡计，叫其妻刘张氏及儿子、媳妇等哭叫说，刘回家突然得急症死了。为迷惑群众，当晚搬了一具棺材放在堂屋中间。刘匪装死躲在棺材内，用白纸盖着脸，手里拿着钱纸。棺木盖盖得不严，以便出气。当晚请了一些群众来到其家，帮办丧事。由于当时天气较冷，深夜群众都到他家灶房内烤火去了，刘匪家属趁无人之机，将棺材掀开，刘匪从棺材内出来，又将棺材盖好。第二天早上便抬了一口空棺材上山埋了。从此，刘启荣就隐藏起来。

刘启荣死后，村干及群众纷纷传说，怀疑他是假死，因刘匪死的情况不符合事实，疑点是：①刘匪死得太突然，按当地风俗习惯，死人埋葬前要请师（道士）开路，而刘家是先把人埋后3天才开路。②刘匪之妻刘氏每逢赶旧州场天都背10多双草鞋到市场卖，他家人多、地多、活路多，哪有人打草鞋卖呢？③该村居住分散，他家是独户一家，位于全村的中心点，一天晚上，全村村

干在他家楼下开会，突然听到楼上有响动声，刘匪老婆即说："今晚我家猫三在楼上翻倒什么东西搞响那？"（后查实是刘匪在楼上打草鞋把草绳勒断跌倒在楼板上的响声）。④他儿媳妇回娘家与人摆谈中，有人问她："你家老爹死好久了？"她说："没死，还在家躲着。"这个风声传到化稿乡的一些群众中。驻村干部根据群众提出的怀疑，决定要开刘匪之坟查看究竟，并问刘匪家属能否保证棺材内有人。刘匪得知干部要开坟查验的消息后，即施出"盗尸移埋"计。凑巧12月12日化稿乡梨子村军属樊和清病故，埋在大坡烂石窟山上。刘匪当夜与其妻商量，偷用樊家新埋的尸体，当晚有刘匪妻子刘张氏、儿子、女婿等人，趁夜深人静，挖开樊家坟，将樊和清尸体拖出来，转移埋进刘匪假坟的空棺材内。第二天村干和群众挖开刘匪的坟，揭开棺材查验，看尸体的一双脚，看到尸体的一双脚，就认为棺材内有死人，便信以为真，挖坟验尸的事就这样暂停了。

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后，黄平县公安局的干部，在学习追捕外逃犯的文件时，联系当时外逃匪首的实际，将本县外逃反革命分子逐个进行分类排队。有的群众提出，刘启荣之死是不是盗尸诈骗。因为在开棺验尸时见到尸体一双脚裤上有泥巴，穿的又不整齐的。根据调查当时恰有一军属老头病死埋有新坟，坟地偏僻，刘家有劳力，盗尸移埋是有条件的。为了揭开这个谜。县局领导决定组织人员对刘启荣的死进行重点侦察。县公安局派干部顾大成等3人组成工作组，前往该乡清查此案。工作组到了化稿乡了解情况，动员樊家开坟，看是否尸体被偷。但樊家按当地风俗有"开坟不利子孙"的顾虑，不愿开坟。经过耐心说服，樊家同意打开坟看，开坟一看，坟里的棺材确是空的。由此证明刘匪确实未死。

1954年农历正月初九，化稿乡召开全乡村干部和民兵治安积极分子会，会上大家议论说："今天是初九，按当地风俗，刘启荣

是真死，他家就要到坟边来烧香纸，如果是假死就不会这样做。”他家知道开了樊家的坟，刘匪必然有动静。根据村干部提供的情况，工作组决定派副乡长高永珍、转业军人吴占清2人，前往刘匪坟地附近暗地观察。大约中午1点左右，仍没发现什么动静，随后两人又转移到刘匪家的房后竹子林进行观察。半个小时后，被刘匪的大儿子刘昌华、女婿杨昌华砍柴回来发现。刘、杨进家不到10分钟，刘启荣就慌慌张张从屋里出来，他身穿兰色长衣服，脚穿布鞋，头上包着青布帕子，腰上拴根布腰带，背上背个一尺多长的竹酒筒，腰杆上别一把较长的柴刀。刘匪一出门就往河沟下走，仓皇地逃进深山密林中了。高、吴二同志发现刘匪走进大山后，速返乡政府向正在开会的工作组作了报告，会上立即研究布署了追捕刘匪的方案。

侦察组确定每个村立即回去两个村干，通知全村民兵和治安积极分子，在天黑之前赶到乡政府，执行紧急任务。由乡长杨通书、副乡长高永珍带领村干和民兵设卡、搜山。副乡长解德轩和工作组顾大成到刘匪家观察动态。到下午6点来钟，全乡民兵已集中160多人，工作组对前来参战的民兵进行了编组、交代任务，要求大家下决心，把隐藏5年的匪首刘启荣捉住。

正月十一日下午，民兵们在搜捕到大山的一个偏岩洞内，发现了刘匪的住地，洞内有顶罐、小锅、蓑衣、烂棉絮、竹酒筒、火柴、鞋子以及吃饭的碗筷等，但洞内没有人。根据这一情况判断，肯定是刘匪隐藏之处，很可能躲藏在不远的地方。

追捕工作组的同志和乡里的干部，带领民兵围山搜捕了三天三夜。刘匪在广大民兵的围捕下，再也无处藏身，于正月十二日上午，在山上上吊自杀。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　供稿）

后　记

自 1959 年周恩来总理倡导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以来，30 多年间，全国各地政协以亲历、亲见、亲闻为特色的文史资料出版物已不可胜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近现代史料宝库，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与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此基础上，将大量的、珍贵的然而又是散见的各类史料进行专题化、系统化的编辑出版工作，以满足专业研究、历史教学、图书资料，文艺创作等方面的需要，对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近现代史教育、国情教育，当是十分必要的，势在必行的。为此，我们编辑了《近代中国土匪实录》、《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两部书，以期达到存史、借览、教化之目的。

为真实而全面地反映自晚清戊戌变法前后至本世纪 50 年代全国解放前后各地的土匪、帮会的情况，使这两类史料真正达到专题化、系统化，我们于 1991 年夏，向全国各地政协发函征稿，得到省、市、县各级政协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帮助，数月内即寄送来数百万字的稿件，其工作之认真，时间之捷速、供稿质量之高，充分体现了全国政协系统文史资料工作者的大协作精神。囿于篇幅所限，我们只得对一些稿件予以割爱；同时为使两书内容更丰富，质量更好一些，又少量地选载了一些书刊的文章。在此，我们向对这项工作予以支持与指导的全国政协文史办，向提供稿件和各政协文史委、办并选文书刊的所属单位，向出版此书的群众出版社，表示衷心地感谢！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由李秉新负责编审，石玉新主编，编辑工作由徐俊元、杨小波、武永召、杜丽英完成；《近代中国帮会内幕》由曾昭余负责编审，徐俊元主编，编辑工作由石玉新、杨小

波完成。征编这样全国范围题材的洋洋250万言的专著，在我们尚属首次，由于水平所限，缺乏经验，错谬之外在所难免，诚望各地政协同仁、专家、阅历丰富人士并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

1992年7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下卷
作者=
页数=638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